

帝国的荣耀与衰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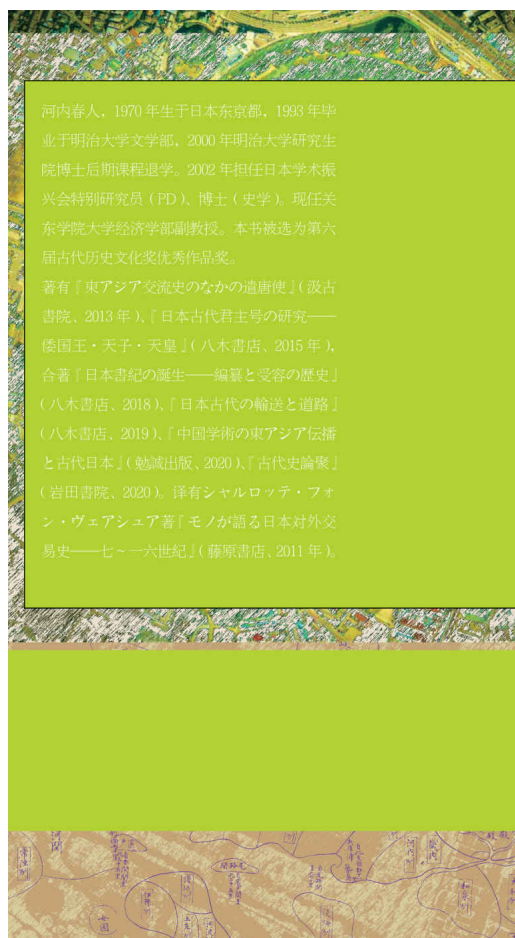
探索中外帝国的
统治者与帝国兴衰命运
(全7册)



总目录

- [倭五王：日本的王位继承与五世纪的东亚](#)
- [美第奇家族的兴衰](#)
- [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
- [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
- [伊莎贝拉：武士女王](#)
- [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
- [伊丽莎白女王](#)





河内春人，1970 年生于日本东京都，1993 年毕业于明治大学文学部，2000 年明治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后期课程退学。2002 年担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PD）、博士（史学）。现任关东学院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本书被选为第六届古代历史文化奖优秀作品奖。

著有『東アジア交流史のなかの遣唐使』（汲古書院、2013 年）、『日本古代君主号の研究——倭国王・天子・天皇』（八木書店、2015 年）、合著『日本書紀の誕生——編纂と受容の歴史』（八木書店、2018 年）、『日本古代の輸送と道路』（八木書店、2019 年）、『中国学術の東アジア伝播と古代日本』（勉誠出版、2020 年）、『古代史論聚』（岩田書院、2020 年）。译有シャルロット・フォン・ヴェアシュア著『モノが語る日本対外交易史——七～一六世紀』（藤原書店、2011 年）。

WA NO GOOU-OUI KEISHO TO GOSEIKI NO HIGASHI ASIA

By Haruhito KOUCHI

Copyright © 2018 Haruhito KOUCHI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OKORON-
SHINSH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OKORON-SHINSHA, INC. ,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 [前言](#)
- [序章 4世纪后期的东亚](#)
 - [1. 与百济的军事同盟——七支刀告诉我们什么](#)
 - [2. 高句丽的飞跃，倭国渡海——广开土王碑的真相](#)
- [第1章 赞派遣使节](#)
 - [1. 高句丽派遣的倭国伪使——东晋灭亡，刘宋建立](#)
 - [2. 421年，赞开启与刘宋的外交](#)
 - [3. 册封倭国王的意义——将军府的开设与府官制的引入](#)
- [第2章 从珍到济，再到兴](#)
 - [1. 赞之弟珍的遣使及其对官爵的要求——与同盟国百济的竞争意识](#)
 - [2. 443年，济的登场——王统移动了吗](#)
 - [3. 济的第二次遣使与兴的登场——不明确的王位继承](#)
- [第3章 倭王武的目标](#)
 - [1. 武在478年的遣使——刘宋的低谷，与高句丽的对抗](#)
 - [2. 武向刘宋皇帝上呈的上表文](#)
 - [3. 倭国的实情——上表文显示的权力结构](#)
- [第4章 倭五王到底是谁](#)
 - [1. 五王与天皇——始于室町时代的比对经过](#)
 - [2. 比对的可能性与限制——音韵、字形、谱系的相同性](#)
 - [3. 始祖王与5世纪的王权](#)
- [终章 “倭五王”时代的终结](#)
 - [1. 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断绝——为什么停止遣使](#)
 - [2. 倭王权的转变——继体大王的即位](#)
- [后记](#)
- [原文史料](#)
- [参考文献](#)
- [主要图片出处](#)
- [倭五王相关年表](#)

前言

研究日本古代的历史，与研究其他时代相比，有哪些困难之处？

首先就是史料的稀少，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日本存留的6世纪以前的文献资料少之又少。因此，我们不得不依赖8世纪初编撰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然而，《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有关5世纪以前的记述也充满了传说故事性的内容，并不能简单地把这些记载看成真实的历史事件。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们不得不借助中国的史料。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记载历史的习惯，而且其史书也包含了有关中国周边区域的内容，日本列岛亦非例外。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7世纪以前的日本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作“倭”或“倭国”。

当然，并不是中国每一个时代的历史书都记载了倭国的情况。只有在倭国向中国派遣了外交使节，或者中国王朝由于各种政治因素意识到其存在时，倭国才会成为历史记录的对象。即便如此，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些记录也是珍贵的史料。在这当中尤为重要的是在倭国本身尚未有文字记录流传于世的时代收集了关于倭国信息的两则史料，其中之一是3世纪的《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魏志·倭人传》，另一则史料是5世纪的《宋书·夷蛮传》倭国条（下文称之为《宋书·倭国传》）。

《宋书·倭国传》关于5世纪日本列岛的历史提到了五位向中国派出外交使节的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倭五王——赞、珍、济、兴、武。

至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赞是第16代仁德天皇，珍是第18代反正天皇，济是第19代允恭天皇，兴是第20代安康天皇，武是第21代雄略天皇（这里列出的代数参照现行皇统谱）。赞和珍的身份仍有争议，而济、兴、武的身份基本上没有疑问。但由于史料稀少，很难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深入的。

在现行的日本高中教科书中，有关倭五王的段落描述了他们在5世纪初以后的一个世纪间派遣了外交使节。然而，赞最早一次遣使是在421年，武最后一次遣使是在478年，两者之间仅仅相差57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多一点。由此可见，即便对于如此基础的事实，教科书里都存在着误导性的信息。

关于倭五王，一直以来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他们分别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里记载的历代天皇中的哪几位（需要注意的是，天皇这一称号直到7世纪下半叶才产生）。过去的研究也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与中国的《宋书·倭国传》里记载的倭五王进行了比较。

最近的研究显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并不完全是后世编造出来的故事，其背后具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研究工作也以此为前提展开。因此，有关倭五王的研究也是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中心，《宋书·倭国传》只不过在史料价值上加以补充而已。然而，这两者的可信度，也就是史料的价值，到底孰优孰劣呢？

《宋书》的作者沈约曾出仕于南朝宋（刘宋）、齐、梁三个朝代。该书最终写成于6世纪早期，也就是梁朝的时候。但沈约在487

年，也就是刘宋灭亡的479年的八年后得到了编撰史书的敕令，在次年，也就是488年就完成了本纪（记录每个皇帝的事迹）和列传（记录人臣的传记）。本纪和列传共70卷，沈约仅用一年时间就写完了。

然而，沈约在《宋书》的自序中提到，他写作《宋书》的时候参考了刘宋留下来的史书。由此看来，《宋书·倭国传》的内容，尤其是前半部分，很可能是在刘宋时就已经写好了。

另一方面，《古事记》成书于712年。太安万侶在序文里提到了该书编撰的经过，他说自己在天武天皇在位的时期，由于担心当时的帝纪、本辞等各氏族收藏的记录存在诸多错误，因此着手编撰此书，后来天武天皇去世，工作一度中断，之后他在元明天皇的时代继续并完成了编撰。《日本书纪》则没有序文残留，因此该书的编撰过程存在许多我们不清楚的地方，不过大体上可以认为681年颁布编撰史书的诏书就标志着《日本书纪》编撰工作的开始。该书的编撰经过了将近40年，到720年才终于完成。

在研究5世纪的倭国历史时到底应该以《宋书·倭国传》还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重点，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占据中心位置的应该是《宋书·倭国传》，而《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则应该被看作辅助性材料。当然，此前的研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现代日本人的潜意识里到底还是倾向于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作为理解历史的主轴。

本书正是希望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以外的史料着手，理解倭五王乃至5世纪倭国历史的真相。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王权、国家的组织方式、文化等层面上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编造的印象相差甚远的东亚历史的真实面

貌。我还希望，本书能够让大家注意到只用日本的立场看待日本历史的弊端。

*

以下将介绍本书的组成部分。

序章将探讨倭五王登场前夕的事情。4世纪下半叶，中国正处于分裂的状态。这些割据政权与倭国、百济等组成了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国家。我们将会探讨这些国家的概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第1章将从5世纪初的东亚局势说起，继而描述倭五王的第一位——赞。421年，赞发起了与中国的外交活动，结束了此前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断绝状态。我们将探讨他如此做的原因以及他的做法给日本列岛的统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在第2章，我们将关注从珍到兴之间的时代倭国的动向以及东亚的局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东亚政治的动向与中国的各割据政权间的斗争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另外，我们还会探讨五王的继承在倭国内部的真实情形。

第3章将关注五王中最后的一位——武。我们将以武呈上的上表文为线索，讨论与之相关的权力和文化问题，这可能会成为颠覆现代人对5世纪的固有观念的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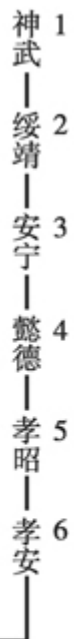
第4章将会把倭五王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的天皇进行对比，研究其一致之处。过去的研究已经多次探讨这一问题，然而本书希望能对这些论点所包含的问题进行批判，从而整理出五王真实的形象。

在终章里，我们将把目光放在倭五王以外，转而关注大和政权在倭五王之后翻开的新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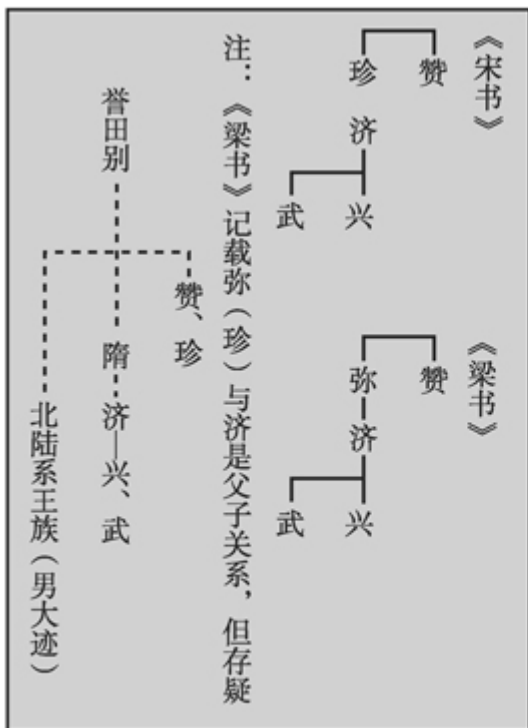
本书正文里提到学者名字时将省略其尊称。为方便读者，书中提及天皇的时候将附上其代数，需要注意的是，天皇代数以现在通行的皇统谱为准，并不代表历史事实。

希望读者能耐心读完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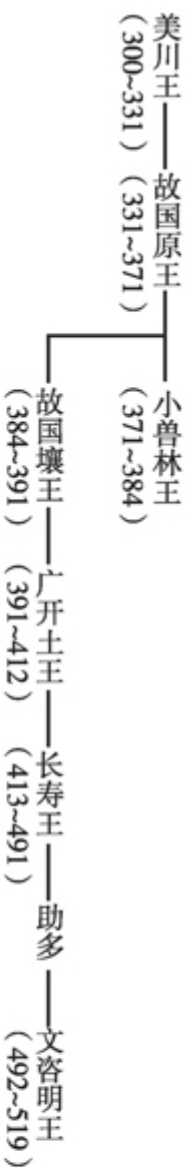
天皇家谱系图（出自《日本书纪》）



倭五王关系图



高句丽王



百济王



新罗王



注.. 数字指在位时间

序章 4世纪后期的东亚

——倭国的“空白”时代

我们从东亚的角度考察倭五王的时候，不得不关注两个问题：他们的行为背后依据的是怎样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为此，我们必须回溯倭五王登上东亚历史舞台之前的历史。

在日本古代史界，倭五王登场前的公元4世纪往往被称为“空白的4世纪”，这是因为同时代的文献史料里几乎完全没有记载倭国的事情。因此，我想要通过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史料来描述倭五王登场前的东亚总体局势，从而了解当时倭国的动向。

1. 与百济的军事同盟——七支刀告诉我们什么

刻在七支刀上的“倭王”

倭五王指的是东亚国际关系史上五位以倭王（或倭国王）的头衔出现的倭国国王。然而，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位被称作倭王的人，关于他的记载出现在一把刀上的铭文里，这把刀名为七支刀（图0-1）。



图0-1 七支刀

七支刀是石上神宫（今奈良县天理市）传世至今的神宝，以形状奇异著称。刀身两边都刻有文字，铭文里镶嵌黄金。铭文有数处由于黄金脱落而难以辨认，学者对此也有争议，但主流的解读是这样的：

正面铭文：

泰□四年□月十六日丙午正阳，造百炼铁七支刀。□辟百兵，宜供侯王。□□□□作。

解读：

泰□四年□月十六日丙午，在正午时刻，用精制铁材打造七支刀。（如佩带此刀则）能避免刀兵之灾，适合礼仪端正之侯王佩带。□□□□制作。

背面铭文：

先世以来，未有此刀。百济王世□奇生圣音，故为倭王旨，造传示后世。

解读：

这种刀前所未有，百济王世子奇受保佑降生，故为倭王旨制作（这把刀），希望（将百济与倭国的关系）展示于后世。

正面的铭文主要是与七支刀的效力相关的祝福语，背面则记载了七支刀制作的经过。从背面铭文的内容可以看出，七支刀是百济送给倭国的礼物，百济方面希望用流传后世的七支刀来祝愿两国关系能够延续。

再来考察铭文中的关键字眼。首先是开头的“泰□四年”，指的是东晋太和四年（369）。“太和”与“泰和”虽然用了不同的字，但在《隋书·经籍志》中，东晋太和年间的记录被记作“晋泰和起居注”，由此可见“泰”“太”二字是相通的。

其后提到了百济王的世子（世继），这位名字叫作奇的王子为倭王制作了七支刀，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倭王的字眼。针对“倭王旨”的“旨”字有几种解释：有人认为“旨”是“旨意”，意为倭王的意愿（山尾幸久）；有人认为是“尝”（嘗）字的省略写法（宫崎市定）；有人认为是“高超”之义（吉田晶）；还有人认为是人名（川口胜康、铃木靖民等），至今未有定说。

学者还通过赠予七支刀一事对百济与倭国的关系进行推断，形成了四种主要的说法。第一种说法为七支刀是东晋授予倭国的物品，百济只不过是中间人（栗原朋信）。第二种说法为七支刀是百济进贡给倭国之物（福山敏男、榎本杜人）。第三种说法为七支刀是百济赏赐给倭国之物（金锡亨）。第四种说法为，七支刀是对等关系的两个国家间的礼物（吉田晶、铃木靖民）。

虽然围绕七支刀的铭文尚有诸多疑问，但可以确定的是，七支刀是百济在369年打造的，目的是祈愿与倭国的关系能永远延续下去。

为何七支刀会来到倭国？而铭文中出现的倭王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还得追溯一下之前的历史。

高句丽出兵百济及其背景

首先让我们关注东晋太和四年（369）这个年份。这年九月，高句丽的故国原王发兵两万南下百济，百济的近肖古王在雉壤迎战并将其

击退。高句丽在两年后的371年又发动了一次攻击，同样被百济击退了。

高句丽之所以频繁试图南下，其实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局势有关。中原自公元4世纪初以来陷入分裂，辽东地区被鲜卑族建立的前燕王朝割据，而高句丽则长期以来受到前燕的侵扰。

333年，奠定了前燕立国基础的慕容廆去世，其子慕容皝与慕容仁争位，最终慕容皝胜出，在336年杀害慕容仁，并于次年即位，前燕正式建国。在这一过程中，慕容仁的家臣逃亡到了高句丽，其中就有一个名叫冬寿的人。

冬寿逃亡到高句丽，后死于357年。发掘于1949年的安岳三号墓就是冬寿的坟墓，墓壁上的墓志记载了当时事情的经过（冈崎敬）。

永和十三年十月戊子朔廿六日癸丑，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浪相、昌黎、玄菟、带方太守、都乡侯、幽州辽东平郭都乡敬上里，冬寿，字□安，年六十九，薨官。

由此可见，冬寿在逃亡高句丽之后还保留了前燕官职，并且拥有很大的势力。对于前燕来说，高句丽收留了前燕的敌对势力，可能对其构成威胁，因此前燕对高句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事实上，公元4~5世纪，出于政治原因逃亡到高句丽的人不在少数。

感受到威胁的前燕采取了军事行动。342年，前燕进攻高句丽，占领了王都丸都城，故国原王被迫单人匹马逃走。丸都沦陷后，前燕军队挖开了前代的美川王的坟墓并夺走了遗骨，又抓走了故国原王的母亲和妃子，在抢掠了一番财宝和人口之后便撤退了。

这一事件对高句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次年，故国原王向前燕称臣，以此换回了美川王的遗骨。然而他的母亲作为人质继续留在前燕，她三番五次提出回高句丽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最终在355年才得以返回。

由此可见，前燕给高句丽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而对前燕而言，高句丽也是一个相当麻烦的邻居。

局势在东晋太和四年（369）发生了改变。当年四月，东晋桓温决心出兵攻打前燕，辽东一带顿时变得不安起来。正是在前燕动弹不得的情况下，高句丽发动了对百济的战争。

东晋在369年进攻前燕的军队被击退，而在这场战争中立下战功的慕容垂与当权的慕容评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慕容垂逃亡到前秦。370年，前秦入侵前燕，失去了名将的前燕不堪一击，最终皇帝慕容暉被擒，前燕灭亡。

高句丽正是在前燕灭亡、西边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于371年再度攻打百济的。由此可见，东晋、前燕等各政权间的争斗与百济等国的局势有着直接的联动关系。

百济的外交政策——派遣到东晋与倭国的使节

面对高句丽的南下，百济近肖古王在371年的冬天发起反击，出兵围攻高句丽的平壤城。故国原王在防守战中中流矢而死，战争以百济的胜利告终。战后，百济将都城迁往汉城，其国势到达了第一次高峰。由此，百济实施了两项外交政策，其一是开始向东晋朝贡，其二是建立与倭国的外交关系。

先看看向东晋的朝贡。向东晋遣使跟百济迁都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城位于朝鲜半岛西岸的中部，在今天的首尔附近。如果要前往中国的话，从汉城只需要稍向北走，之后渡过黄海，就能到达山东半岛。由于前燕灭亡，当时山东半岛正处于东晋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百济能够安全地向东晋朝贡。自此以后，东晋与百济建立了友好关系，这种外交关系将在以后发挥能够决定东亚局势的重要作用。

东晋咸安二年（372）正月，百济向东晋朝贡。东晋方面立即做出了反应：同年六月，东晋向百济派遣册封使，任命近肖古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百济在次年（373）再次派遣使节，此举明显是要迅速强化与东晋的关系。

另外一项外交政策则是建立与倭国的外交关系。倭国与百济外交关系的建立在《日本书纪》中也有记载。在《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摄政前纪》仲哀天皇九年十月辛丑条中，百济第一次登场。书中记载，神功皇后降服了新罗，得知此消息的百济与高句丽则向她提出了投降的请求。这就是所谓的神功皇后“征讨新罗”与降服三韩的故事，我们当然不能将其看作真实的历史事件。说到底，这一记载反映了《日本书纪》成书的年代，也就是8世纪的时候，律令国家为了使自身的统治合理化而构筑的历史观。

日本律令国家单方面认为朝鲜半岛的诸国都是应该向日本朝贡的臣下之国（蕃国），其中包括当时已经灭亡的百济。为此，他们有必要解释这种朝贡关系的由来。因此，在编撰《日本书纪》的时候在神功皇后功绩（这段记载本身也是编造的）里又强行加入了百济臣服的虚构内容。

赠送于372年的七支刀

然而，我们不能一概认为《日本书纪》里所载的内容都是8世纪的人捏造的。比如说《神功皇后纪》中有一条关于倭国与百济间外交关系的记录：

（百济）久氐等从千熊长彦诣之，则献七枝刀一口、七子镜一面，及种种重宝，仍启曰：“臣国以西有水，源出自谷那铁山，其邈七日行之不及，当饮是水，便取是山铁，以永奉圣朝。”（摄政五十二年九月丙子条）

在这里出现了“七枝刀”。神功皇后摄政五十二年简单换算为公元纪年的话是252年，但是《日本书纪》明显把原本的记录往前调了120年，这件事实际上发生在372年。这么说，七支刀应该是制作于369年，并于372年送到了倭国。

那么，在倭国与百济之间七支刀的授受背后有着怎样的外交实情？

我们应该注意到，高句丽在369年南下但暂时被击退，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百济正是为了解决与高句丽的问题而展开了和倭国的外交活动，这就是倭国与百济结成的反高句丽同盟。

百济虽然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还杀死了故国原王，但他们可能并不认为高句丽以后不会再次来袭。为此，百济着手强化对外关系，在372年建立了与东晋以及倭国的外交关系。七支刀正是其象征。

倭国与百济的对等同盟

从这种对外关系的角度观察，七支刀授受背后的意图就变得很明显了。

我们先看中间人说。百济于372年与东晋建立外交关系，而制作七支刀则是在369年。从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来看，认为百济扮演了东晋授予倭国七支刀的中间人的说法明显是矛盾的，因此不能成立。也就是说，七支刀与东晋并无关系，必须将其放在倭国与百济间关系的脉络下加以解读。

东晋说的论据之一是七支刀上出现了东晋的年号。这一点我将在第1章讨论。

倭国与百济的关系是应对高句丽南下的军事同盟。那么两国分别要对高句丽采取怎样的行动呢？简单而言就是百济与高句丽直接对决，倭国则向百济派出援军。这么说来，百济是请求援助的一方，倭国在同盟中应该处于有利位置。然而，在371年，百济以一己之力击退了高句丽的入侵，倭国并没有在军事行动上发挥作用。这么说来，百济就完全没有向倭国臣服的必要。也就是说百济进贡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反过来说，百济赏赐给倭国的说法又如何呢？实际上，当时朝鲜半岛生产一种倭国依赖的重要资源，那就是铁。日本列岛当时并不产铁，因此保证铁的供应就是倭国的重要课题。上文引用的《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摄政五十二年条中也提到了铁的赠送。然而，倭国的铁主要来自朝鲜半岛南部的加耶区域（铃木靖民），很难想象倭国会仅仅因为失去了百济的供应就陷入困境。因此倭国并没有从属于百济的必要，赏赐说也是不成立的。

这么一来，我们就应该把两国看成对等的关系。当时确实出现了高句丽南下这么一个问题，但两国的同盟关系是出于一致的共同利益才建立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倭国与百济间深厚的关系开始建立。

倭王的真正面貌

那么，在当时与百济订立军事同盟的“倭王”是谁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弄清楚当时日本列岛的社会状况。

4世纪后期是日本的古坟时代。关于如何解释古坟时代，考古学家们尚有许多细节上的争议，但大体而言，古坟在当时的社会里起到了宣示政治统一的作用。

一般认为，古坟时代始于3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6世纪末。过去学者们把古坟时代分为前后两期，而现在则更倾向于划分成三期。另外，学界普遍认为7世纪是古坟时代的终结。

在各种古坟之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前方后圆坟。这种坟只有各地的首领才能建造，是权力的象征。而在后来被称作畿内的地方又集中出现了200米以上的巨型前方后圆坟。这些古坟中有不少是需要拥有极大权力才能建造出来的，很有可能是当时倭国王权持有者的坟墓。

畿内的巨大前方后圆坟集中出现在五个区域，而且可以看出，每个区域里分别有一个势力相继建造了该区域的古坟群。这五个古坟群是奈良盆地东南部的大和-柳本古坟群、北部的佐纪古坟群、西部的马见古坟群、大阪河内地区的古市古坟群以及和泉地区的百舌鸟古坟群。

这些古坟群被认为是当时当地大王辈出的标志，它们的消长顺序是这样的：最初出现的是大和-柳本古坟群，之后佐纪古坟群在4世纪崛起，古市古坟群在4世纪末取而代之，马见古坟群在5世纪初达到顶峰，但它的势力比不上古市古坟群，而在5世纪中叶，百舌鸟古坟群似乎取代了古市古坟群。另外，随着时代的推移，前方后圆坟发展得越来越大，百舌鸟古坟群之中的大山古坟是最大的一个，这点也是广为人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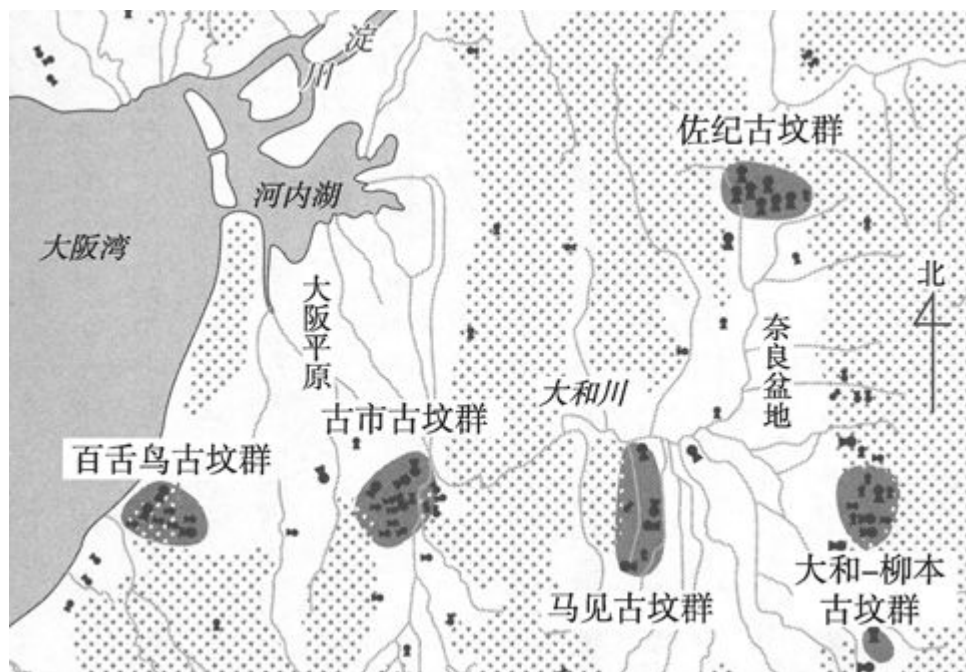


图0-2 古坟群图（3世纪中叶～6世纪）

不难看到，从巨大前方后圆坟变迁的意义上说，倭国与百济建立军事同盟并正式参与朝鲜半岛事务的4世纪后期，正是权力从佐纪古坟群向古市古坟群转移的时期。

佐纪古坟群位于奈良盆地，而古市古坟群与之不同，坐落于大阪。如果要通往朝鲜半岛的话，濑户内海是必经之路。七支刀上提及的“倭王”既然采取了强化与百济关系的政策，那么保持联系通道自然是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如此看来，可以认为他为了这一目的而建造古坟，从而使该区域成为据点。

然而，我们并不能草率地认为大阪地区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佐纪古坟群与古市古坟群都处于大和川及其支流的流域范围内，从交通层面看两者位于同一通道上，我们不应该武断地认为两者间是断绝的关系。尤其是当时的大阪平原上存在一个巨大的湖泊，名叫河内湖（『新修 大阪市史』）。撇除交通便利的因素，它作为国内政治中心的地理条件其实并不好。古市更可能是作为交通要冲而发展起来的第

二据点。话虽如此，我们依然不应该小看“倭王”离开佐纪而在古市建造古坟的意义。

“倭王”一改前王的做法，重视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以河内地区为据点建立了与百济的外交关系。可以说他是一位使当时的外交政策为之一新的领袖人物。这正好为即将到来的倭五王时代的国际竞争拉开了帷幕。

高句丽与新罗

另一方面，后来与高句丽、百济形成鼎立之势的新罗在当时采取了何种立场呢？

新罗原本是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所建立的斯卢国。跟百济一样，新罗在4世纪中叶崛起。在这一时期可以确认的是新罗于366年和368年与百济进行了外交活动。然而在373年，两国围绕如何处理从百济往新罗逃散之人的问题产生对立，可见双方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新罗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从地理位置看，它与前秦等政权之间的交通并不方便，必须经过百济等国的势力范围。在这种状况下，新罗于377年第一次向前秦派遣了使者。当时，新罗的使者伴随高句丽使者向前秦朝贡，高句丽的遣使起到了媒介的作用。由此我们也能看到，当时高句丽应该介入了新罗的外交事务。

这种对他国外交的介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高句丽而言，充当新罗向前秦朝贡的媒介在政治上有两层意义。其一，通过把以前从未朝贡的新罗使者带到前秦，以此赞颂前秦皇帝（苻坚）的仁德，高句丽给前秦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印象，以便以后顺利地发展双边关系。前秦在370年攻灭前燕，从而扩大了势力范围。这时候高句丽成了前秦的警惕对象，而高句丽在是否应该与前秦为敌的问题上相当谨慎。

其二，高句丽通过这种方法向前秦展示新罗从属于高句丽，从而凸显自身的实力。这一点与高句丽主张的对外立场也有联系。新罗在4世纪后期登上国际舞台的时候，曾受到高句丽对外活动的强烈限制。

距离中原王朝较远的国家通过交通通道上的某一媒介进行朝贡，这种做法叫作重译。这是因为从中华思想来看，与中原不接壤的外族通过邻近中原的地区来朝，在过程中需要“多次翻译”。在古代，中原附近的很多国家利用这种思想带着其周边国家一起向中原王朝朝贡，我们可以把这种外交方式称为“重译外交”。

新罗于383年再次向前秦遣使，但这次却没有记载说他们跟随高句丽的使者而来。然而，从交通道路与高句丽和前秦关系等因素来看，这次遣使很有可能是在高句丽的监督下进行的。

新罗虽然在4世纪60年代与百济通使，但到了70年代后却加入了高句丽的阵营。这一外交政策的转变的背后有高句丽的影响。高句丽面对371年故国原王战死带来的冲击，暂时停止南下进攻百济所在的半岛西岸，为了恢复失地，转而加强了在半岛东岸的力量。373年新罗与百济的外交对立可能也是受到了高句丽的影响。

2. 高句丽的飞跃，倭国渡海——广开土王碑的真相

淝水之战——前秦与东晋的决战

随着371年百济对高句丽取得大胜，以百济为中心的新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前秦也逐渐在中国北方获得了压倒性的力量。

前秦在370年灭了前燕，376年灭了汉族政权前凉，又迫使鲜卑族的代国从属于自己，至此统一了华北地区。现在离统一天下就只剩下南边的东晋了。为此，苻坚于383年率领号称总数一百万的军队南下，意图灭亡东晋。东晋派遣军队迎击前秦军，双方在建康西北方向、淮河的支流淝水对峙，这是一场决定天下大势的大战。

双方兵力存在压倒性的差距。然而，在交战刚开始的时候，东晋军成功挫败了具有人数优势的前秦先锋部队。苻坚对此采取了过分谨慎的态度。他命令军队向后退，打算等东晋军渡过淝水的时候发动攻击，然而这却是致命的错误。前秦的大军一开始后退就难以停止，这时又有汉人将领倒戈，东晋军趁势追击，前秦军瞬间大败。据说在这一场战役里前秦损失了七八成将士。

东晋军队获胜的消息很快传回了建康。宰相谢安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跟客人下棋，客人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若无其事地回答了一句“小儿辈大破贼”。然而等客人辞别之后，他高兴得在房间里手舞足蹈起来，连折断了屐齿都不知道（《世说新语》）。此次战役的胜利使东晋的统治得以延长了半个世纪。

战败后的苻坚很快失去了斗志，而那些在前秦统一华北期间归降的五胡势力，如鲜卑族的后燕、西燕，羌族的后秦，氐族的后凉等相

继反叛。最终苻坚在失意中被杀，强盛一时的前秦也迅速衰落，在394年就灭亡了。

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淝水之战的影响同样波及东亚其他地区。在战役发生的次年，即384年，百济向东晋遣使。在这一年，百济近仇首王去世，枕流王即位，这次遣使的目的应该是报告王位的更迭，但很可能还包括祝贺东晋的胜利。枕流王仅仅在位两年，在385年去世，继位的辰斯王则于386年获得东晋的册封。史书上并没有记录外交活动，但王位更替之际百济应该是有派遣使者向东晋报告的。百济每次王位更替时都获得了东晋的册封，双方的关系不断获得强化。

另一方面，随着前秦政权的瓦解，辽东地区的局势趋于混乱。东晋太元十年（385）六月，高句丽出兵攻陷辽东郡和玄菟郡。后燕对此做出反击，并在十一月夺回两郡。因为双方的交战，辽东出现大量流民，其中不少经由幽州、冀州进入了高句丽。

这一时期在位的高句丽王是小兽林王（371～384年在位）和故国壤王（384～391年在位）。据说小兽林王在373年颁布了“律令”。这里的“律令”不一定是中原式的成文法典，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对统治制度的进一步整理。故国原王在371年战死后，高句丽接收了许多从辽东地区迁出或逃离辽东地区的人。这些人进入高句丽或许会引起一些摩擦，成为社会不安的因素，但同时，流入人口的增加也可以成为任用人才的好机会，从而让高句丽迅速恢复实力。

377年，高句丽带着新罗使者一同出使前秦，这是它当时已经恢复到能在朝鲜半岛东南部施加影响力的证明。东晋太元十七年（392）正月，新罗又向高句丽派遣了质子。

高句丽力量的恢复同样意味着对百济战争的重新开启。早在淝水之战前后的376~377年以及386年，高句丽便多次南下攻击百济。百济也做出了围攻平壤城等反击。双方的角力陷入了胶着，朝鲜半岛西南部也因此延续着紧张的态势。

广开土王的登场与飞跃

在这种局势下，391年高句丽出现了一位新的王，这就是广开土王。广开土王名叫谈德，在史书中则记作“安”。他的谥号是“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谥号是他死后获得的称号，意义是开疆拓土、让社会得以安宁的伟大的王。所谓“广开土王”和“好太王”都是这个谥号的略称。他生前则被称作永乐太王。他统治高句丽22年，其间高句丽的实力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广开土王在位期间连年征战，广开土王碑记载了他的军事活动。广开土王碑位于中国吉林省集安市，由414年广开土王之子长寿王所立，上面记载着广开土王生前的事迹以及管理他陵墓的守墓人的信息。碑文内容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记载了从神话时代直至广开土王去世期间高句丽的历史；第二部分记载广开土王的功绩，按照年代顺序记录了他开拓的土地；第三部分则是管理、守卫广开土王陵墓的守墓人的列表。

对广开土王功绩的记述以395年亲征稗丽（契丹）为序幕，依次记载了396年亲征百济，398年讨伐肃慎，399年击退倭人，400年进攻倭、安罗，404年与倭进行海战，407年与百济交战（但没有记录国名），以及410年亲征东扶余。终其一生，广开土王马不停蹄地扩张了高句丽的范围。在所有交战对象之中，倭国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国家，由此可见广开土王应该是以倭国作为他最大的敌人的。



图0-3 广开土王碑拓本（正面）

在广开土王碑中出现的民族或国家除了上述的几个以外还有韩和秽（濊），广开土王攻击并掠夺了它们。韩是朝鲜半岛南部诸小国的总称，高句丽把韩和濊纳入势力范围，并在碑文中高调宣告了这些事情。从这些国家与民族的名称也可以看出《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载的众多民族在当时依然存在。广开土王对周边采取的

长期军事行动破坏了原有的民族势力平衡，一些国家或民族在此以后消失了。

编撰于11世纪的《三国史记》也记载了高句丽连年出兵百济和后燕。然而《三国史记》中关于广开土王的记载存在年代错误，为此有必要借助碑文的内容加以修正（武田幸男）。

虽然在碑文上没有记载，但当时高句丽同样加强了对新罗的压迫。392年，高句丽接收了新罗的质子。401年，质子实圣回国并于次年即位，但新罗在412年再次向高句丽派遣了质子。

当时的地缘政治对新罗并不有利：北方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高句丽，西方则是与高句丽对立的百济。如果想要与东晋等王朝交往，新罗就必须通过高句丽或百济，但国内的制度整合也一直没有进展。此外，新罗的南方还有倭国的势力。倭国一直通过与加耶的巩固关系对这一地区进行干涉。

关于新罗与倭国关系的记载，有364年的倭兵入侵并被击退，以及393年，倭人围攻金城但没有攻陷而退兵，途中遭到新罗的奈勿尼师今追击。看来4世纪后期倭国与新罗之间主要处于敌对和冲突的状态。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新罗受到高句丽的掣肘，被要求与百济的同盟国倭国进行代理战争。

倭国渡海——辛卯年条的真相

广开土王碑中关于高句丽与倭国关系有怎样的记载呢？

碑文中有一句最为有名又最具争议的话：

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
每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

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百残（百济）和新罗本来从属于高句丽，但在辛卯年（391）遭到倭国袭击，两国成了倭国的臣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段碑文被看作日本统治朝鲜半岛南部的证据，从而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提供了支持。战后有学者认为，广开土王碑遭到日本军参谋本部用石灰涂改，碑文被篡改成有利于日本的内容（李进熙），碑文的可信性从而受到了质疑。但现在已经明确，石碑上的石灰是制作拓本的时候匠人为了使字迹清晰而涂上去的，而且围绕更早制作的拓本所进行的研究也陆续展开了。

近代以来围绕碑文的内容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一种观点批判了二战前的倭国统治论，认为“渡海”的主语并非倭国而是高句丽，说的是高句丽迫使百济与新罗臣服的事情。

然而正如武田幸男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句话的作用是为后文高句丽击败倭国一事提供背景，因此改变主语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倭国确实于391年在朝鲜半岛展开了军事活动。

那么我们要解答的问题就是，百济与新罗真的在391年以前是高句丽的附属国，在那以后又成了倭国的附属国吗？

我们首先再次确认一下新罗与高句丽和日本的关系。按照碑文的内容，高句丽在391年应对倭国的侵略，在396年攻击了百济。碑文没有提到新罗，应该是默认新罗此时是倭国的臣属。

然而，高句丽却在392年接收了新罗的质子。正如上文所说，高句丽在391年以前已经可以对新罗施加强大的影响力，而广开土王即位后，又以质子的方式加强了对新罗的制约。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所谓新罗臣服于倭国的说法并非事实。

百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根据碑文记载，在上述391年的事件之后，广开土王在396年攻打百济并迫使其臣服。这时候高句丽并不是跟百济的宗主国倭国交战，而是与百济交战，理应是宗主国的倭国则完全没有出现。说到底，391年以前百济曾经在与高句丽的战争中降服的说法也是不可信的。两国之间更像是势均力敌的对立关系，故国原王的战死就是其证据。

再者，碑文中公然把百济称作“百残”。“残”是个贬义的字，这强烈地表现出高句丽对杀害了故国原王的百济的憎恶。由此可见百济向来是高句丽的敌人，而且并不从属于倭国。

简而言之，百济和新罗在391年成为倭国附属国的说法并不成立，百济在此以前也不从属于高句丽。那么碑上的这句话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考虑414年高句丽立碑时的处境。

从高句丽的立场出发，广开土王在位年间正是他们加强对半岛南部施压的时代。具体而言，高句丽的目的是迫使新罗、百济等国臣服。为了正当化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是主张两国本来就从属于高句丽。描述倭国迫使两国臣服，而广开土王夺回了两国的故事正是要为高句丽统治南部提供正当的理由（武田幸男、李成市）。

在广开土王向南扩张势力的同时，倭国不得不登上半岛的政治舞台。倭国建立了与百济的外交关系，加强了与加耶地区的联系，还对新罗施加压力。然而对大海对面的人来说，倭国是一个实体不明且不友好的存在。

广开土王碑中对倭国的记载反映了高句丽的动向。高句丽对半岛南部的军事攻势越是强劲，倭国在当地反而越有存在感。

来自骑兵的冲击——与高句丽的战争

倭国与高句丽的战争有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是陆战。据记载，倭国军队在400年入侵新罗的时候，高句丽派遣步骑兵五万迎击。倭军一开始试图退却，但遭到高句丽军追击而溃散。倭军从来没有与具备冲击力和破坏力的骑兵战斗过，在可怕的骑兵面前束手无策。

与高句丽发生的军事冲突让倭国发现了一种新的事物，那就是马。马原本并不存在于日本列岛。《魏志·倭人传》记载倭国“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鹄”。马起源于欧亚大草原，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驯养成功，之后逐渐向各地推广。

碑文高调记录了广开土王的胜利。倭军惨败这件事当然存在赞扬广开土王的意图，但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件事是可信的。毕竟倭军面对的是马这种当时的高级武器，惨败也是必然的结果。

战斗的另一种模式是海战。按照碑文的描述，倭军在404年入侵了带方郡附近海域。他们的行军路线应该是沿着百济的海岸北上，双方之间的战斗则在船上进行。倭军可能是因为害怕高句丽的骑兵而选择了乘船进攻。

与骑兵的遭遇战也促使倭国引入马匹。现在可以确认，日本东部在5世纪已经有养殖马匹的迹象。长野县饭田的宫垣外遗迹发现了马的全身骨骼，群马县甘乐郡的西大山遗迹一号坟则出土了马具。甘乐郡这一地名起源于加罗，是渡来人聚居的地方。此外，6世纪的群马县涩川市白井遗迹群也发现了马蹄的遗迹，当地应该有在养马。另外还发现了用马殉葬的情况，这种做法在日本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大概是渡来人带来的习俗。

马并不只是作为一种动物传入了日本。野马的性格非常刚烈，驯养马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伴随马一起传入的还有把马培育成家畜这种重要的技术。另外骑马需要各种马具，包括马鞍、马镫、笼头、辔头、蹄铁、马衔等。

在倭五王的时代，马的确已经传入了倭国。倭国也具备了与马配套的养殖技术与马具，形成了稳固的先进技术。把这些东西带到倭国的是渡来人，而此事发生的契机则是倭国与高句丽的战争。无论在哪个年代，战争都是促进技术革新的催化剂。



图0-4 攻城图（三室塚）

之后在东晋义熙八年（412）十月，广开土王去世，享年三十九。这在当时的标准看来都算英年早逝了。这位高句丽王的影响波及东亚，极大地改变了这个原本存在诸多民族的地区。在他死后，高句丽、百济、倭国三足鼎立的政治局势形成了。这正是倭五王登场前发生的事情。

第1章 倭派遣使节

——重启中断150年与中国的外交

在倭五王的时代，倭国通过与中原王朝的外交活动积极地参与东亚的国际关系。在那之前，倭国最后一次向中原王朝派遣使节是在266年，当时还是西晋时期，遣使的是邪马台国，之后双方的关系就断绝了。倭国的身影在整个4世纪都没有在中原王朝出现。

而到了5世纪，倭五王再次向刘宋遣使。这种外交活动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呢？本章将探寻遣使的经过，由此刻画出当时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

1. 高句丽派遣的倭国伪使——东晋灭亡，刘宋建立

高句丽、倭国的使节派遣

413年，继广开土王之后巨连成为新的高句丽王。他去世于491年，在位达79年之久，死后被称作长寿王。长寿王继位的那一年，东亚局势出现了一次剧变。

高句丽在那一年向东晋派遣了使节。高句丽上一次向东晋遣使是在343年，中间隔了70年。既然这件事情如此不寻常，我们就有必要探讨事件背后的含义了。在那以后，东亚其他国家的局势还将进一步把中国卷入其中。

还有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在同一年，倭国也向东晋派遣了外交使节。倭国上一次向中国遣使已经是将近150年前了。倭国在4世纪一直没有与中国进行外交活动，这次的遣使却打破了之前长久的沉默。

如果这两个事件都是真实的话，在那一年前后，东亚的局势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尤其需要考虑的是，高句丽与倭国在同一年都向东晋遣使，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围绕这个问题，不同的理解方式会影响整个事件的性质。

两国的朝贡在《晋书·安帝本纪》义熙九年条是这样记述的：

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

单从这句话来看，我们可以获得的信息只有高句丽、倭国等在东晋义熙九年（413）带着贡品来朝。不过，我们还有另一则史料《义熙

起居注》作为补充。

起居注专门记录皇帝的日常生活，里面也包含了政务相关的内容。这些记录是编撰史书时使用的原始材料，到皇帝去世的时候要编撰记录他在位时事迹的实录。王朝灭亡之后，史家利用实录和其他资料编成完整的史书，这是史书编撰的主要程序。史书的主要构成部分是本纪和列传，本纪是以在位皇帝划分的编年史，列传则记载人物、外国等的事迹。因此，外国使者朝贡的记录有时候记录在本纪，有时候记录在列传，也可能两边都有记录。

《义熙起居注》中的“义熙”是晋安帝（397～419年在位）的年号（405～419）。这本书是义熙年间的起居注，应该是编撰《晋书》时使用的史料。

《义熙起居注》中有这样一条记录：

倭国献貂皮人参等，诏赐细箜篌香。

《义熙起居注》本身已经散佚，成书于10世纪的《太平御览》引用了书中的一些逸文。上述的句子就是逸文的一部分。

按照这一描述，倭国向东晋进贡了貂皮和人参。貂的栖息地遍布北海道、朝鲜半岛北部、西伯利亚和今俄罗斯其他地方。在貂之中黑貂的皮毛价值最高，是十分珍贵的物品。这里的人参指的是药用价值很高的高丽参，其出产地包括朝鲜半岛和现俄罗斯的沿海各州。这两种产品都不太可能产自日本列岛，而更像是高句丽的产物。

与倭国进贡相关的三种说法

过去学界普遍认为倭五王的登场是从《宋书·倭国传》记载的421年赞^[1]的遣使开始的。然而随着倭五王研究的推进，最近越来越多的

学者认同《梁书》所说的赞在413年遣使。倭五王在5世纪积极地向中国派遣外交使节，他们最初在东亚外交舞台中登场是在什么时候呢？这虽然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但当代史学界依然有较大分歧。

《义熙起居注》中记载的倭国朝贡看起来与高句丽有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事件呢？

至今为止的研究主要分成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高句丽的使节带着倭国使节一同朝贡，我们可以称之为共同入贡说。《义熙起居注》中提到东晋把细箜（一种管乐器）赐给了倭国。细箜的别名是“和”，“和”与“倭”是谐音，东晋可能因此选择把它下赐给倭国（池田温）。

另外《日本书纪》中也能找到支持共同入贡说的内容。应神天皇时期有这么一个故事，说阿知使主和都加使主前往“吴”的时候在高句丽问路，在高句丽人的指引下抵达了“吴”。“吴”指的是江南地区，这个故事说的是倭国与江南的交通往来以高句丽作为中介，倭国使节跟高句丽使节一同前往当地。这一则记录很可能反映了413年倭国与高句丽共同遣使。

第二种说法是，所谓的倭国遣使是高句丽人安排的，倭国并没有真的派遣使者。这个倭国使者是高句丽在战争中捕获的战俘，高句丽把他假扮成使者的样子，让他带着高句丽的物产朝贡。这种说法可以叫作倭人俘虏说。这一说法是对上文讨论过的倭国使者献上貂皮和人参这两种物品的解释（坂元义种）。

第三种说法为东晋赏赐的细箜和麝香是佛教仪式中使用的物品。当时佛教已经传入了高句丽，但尚未传入倭国。这一派认为东晋赏赐的这些物品是给高句丽的，所谓赐给倭国是记录错误。我们把这一观

点叫作史料误引说（石井正敏）。这一派还认为，倭国使者根本没有在413年来到东晋，当时朝贡的只有高句丽的使者。

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呢？

共同入贡说认为倭国与中国的外交活动始于413年，而倭人俘虏说与史料误引说都认为413年的派遣是高句丽所为，当时倭国并未与东晋建立关系。倭国是在怎样的国际局势之中参与东亚的对外交往的呢？上述两种结果的差异将导致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

《梁书·倭传》中的“赞”

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先关注另一则跟413年倭国遣使相关的史料，那就是《梁书·倭传》。该书记载了邪马台国的台与派遣使节以后的经过：

其后复立男王，并受中国爵命。晋安帝时，有倭王赞。

《梁书》中“赞”登场于晋安帝的时代。晋安帝时倭国使节来朝只有413年的这一次，也就是说《梁书》把413年的遣使看成倭五王外交活动之始。《梁书》的这段记载直接影响到倭五王的问题。

那么《梁书》的记载到底是否可信呢？

明确表明413年倭国朝贡是赞派遣使者的史料有《梁书·倭传》和综合记述南朝历史的《南史·倭国传》。然而《南史》的记录基本上就是《梁书》的复制，因此认为是赞遣使的实际上就只有《梁书》而已。这里我们就要考虑《梁书》的可信度问题。

《梁书》成书于629年，作者姚思廉是唐代官员，他继承父亲遗志完成了这部史书。该书的特征是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美文（一种注重

形式的文体），而是用古文写成。也就是说，姚思廉在编撰《梁书》的时候并不是直接引用原始史料，而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很多记述乍看起来是独立的记事，但实际上可能是姚思廉综合了好几处原始史料改写而成。

简单而言，我认为《梁书》中晋安帝时赞派遣使者的记述源于《宋书》中421年赞遣使的记录。413年遣使的主体并不明确，姚思廉便把两次遣使的王当作同一个人，因此才出现了这种记录。

因此，我们不可以按照《梁书》的说法，断定413年派遣使者的就是倭五王的第一位——赞。

413年派遣伪使的目的与影响

言归正传。高句丽与东晋交往的目的是，在广开土王这位一代英主死后、长寿王刚刚即位的情况下，建立一种一改从前风格的对外关系，对内显示自身的权威。不过，当时高句丽对外政策的背景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辽西的割据政权北燕的动向。

北燕本来是高句丽人的后代高云在407年建立的政权，但高云在409年因臣下叛乱而被杀，之后汉人冯跋镇压叛乱后掌权。北燕本来是高句丽人的政权，理应是一个比较容易拉拢的对象，但现在政权更迭，这有可能会让高句丽变得紧张起来。长寿王跟东晋建立关系或许就是面临与北燕陷入对立的一种对策。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413年的倭国使者呢？

倭国既然跟长寿王之父广开土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那它应该没有动机派使者与高句丽一同到东晋朝贡。因此共同入贡说很难让人信

服。也就是说，关于413年倭国使者的身份，应该是认为他并非真正使者的倭人俘虏说或史料误引说更加合理。

这里我想再提一下序章中提到的高句丽进行的“重译外交”。高句丽与前秦交往的时候带上了新罗使者，通过这种做法，一方面构筑起巧妙的对外关系，另一方面也树立了高句丽的威信。

高句丽在时隔七十年后于413年再次向东晋遣使，这应该是包含向东晋示好，以及通过带着过去与高句丽敌对的倭国使者一同进贡来展示它在东亚强大地位的意图。因此，高句丽准备了专门的贡品，伪造了倭国使者，并且获得了细箜和麝香这两种赏赐物。这么看来，赏赐的物品也有可能是高句丽向东晋要求的。

高句丽也确实达到了它的目的。这次朝贡的成果之一是，长寿王获得了东晋的官爵，被任命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对于东晋来说，华北的诸王朝或许在将来与自己敌对，而与高句丽建立关系将有利于东晋应对这种局面。长寿王正是预测到了这一意图而遣使的，这也反映出高句丽王手腕之高超，这正是在复杂的形势中练就的。

但是，413年派遣伪使还有更深层次的影响，那就是让东晋通过高句丽再次认识到倭国的存在。早在倭国自身还没有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它就已经通过高句丽出现在东亚国际社会之中。这一点在史料上也有所反映。

中国历代王朝都认为倭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后汉书·倭传》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魏志·倭人传》和《晋书·倭人传》都说“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而《宋书·倭国传》关于倭国位置的记载是“在高骊东南大海中”，这表明刘宋对倭国位置的认识是以高句

丽为基础的，这种地理观正是受到了413年高句丽为重译外交而设计的伪使的影响。

百济向东晋进贡

高句丽在东亚采取了新的行动，与此同时高句丽的敌国百济处于怎样的境况中？下文将关注百济的动态。

自372年近肖古王建立百济与东晋的外交关系后，又有好几次可以确认的百济遣使。379年，近肖古王之子近仇首王派遣的使节因为狂风没能够抵达，之后百济在384年（枕流王元年）、386年（辰斯王二年）、406年（腆支王二年）都派遣了使者。这些遣使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百济每一代新王即位之际，都会迅速向东晋派遣使者。这是为了向东晋汇报本国的王位更替，并希望获得对方的承认和册封。东晋既然是百济的外交对象，告知对方本国君主的身分自然是很基本的事情。另外，双方既然存在册封关系，那作为获得册封一方的百济向东晋报告王位的继承也是一种义务。

同时，百济与倭国的关系也相当亲密。按照广开土王碑的记载，广开土王在396年入侵百济，百济大败。百济国王阿莘王的弟弟和大臣共十人被掳至高句丽。这对百济而言自然是极大的屈辱。

在这种情况下，阿莘王采取的策略是强化与倭国的同盟。他把王子腆支送到倭国当质子。对此，倭国也表现出愿意积极提供军事援助的姿态。对广开土王而言，百济与倭国的关系阻碍了他的南下。



图1-1 《梁职贡图》中的百济国使者

质子——在古代东亚的价值

根据记载，在高句丽南下期间，不仅百济，连新罗也向倭国派遣了质子。说起质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强国为了避免小国背叛而强迫小国交出的。上文提到的新罗向高句丽派遣的质子就很符合这一印象。然而，古代东亚的质子并不是只有这一种性质。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异人，他是中国战国时代秦国的一名王族。他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却被派往赵国当质子。当时秦国不仅是战国七雄之一，而且已经经历了成功的政治改革，其国力正开始超越其他六国。异人被派往赵国的理由之一是其母身份低贱，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秦比赵弱。质子的派遣确实与国力强弱有关，但说到底其实是一种外交礼仪。异人在其父安国君即位后改名为子楚，之后在公元前250年继承王位，史称庄襄王，他就是秦始皇的父亲。

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稍晚一点，发生在7世纪。647年，新罗向倭国派遣了一名王族成员，名叫金春秋。《日本书纪》中把他称作“质”，但是他的活动却并不符合我们所说的质子。

金春秋在前往倭国之前，首先在642年去了高句丽，提议与对方夹击百济，高句丽的权臣泉盖苏文拒绝了他的提议。他的下一步就是作为“质”前往倭国进行外交活动。然而到了第二年，即648年，他却出现在唐，从唐太宗那里得到了攻打百济的许可。从他的活动来看，金春秋更像是一名外交官，而不是小国为了表示臣属于大国而派出的那种行动遭到约束的质子。

从这些例子来看，古代东亚的质子并不一定是在有强弱之分的两国之间，小国向大国交出的那种质子。反之，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派遣质子往往是为了使之成为两国间沟通的通道。反过来说，担当质子的人处在一个重视两国关系的立场上。腆支正符合这种情况。

腆支王与倭国、高句丽的外交

405年，百济阿莘王去世。他在位的时期基本上与广开土王重合，他几乎一辈子都在苦于应对广开土王的入侵。远在倭国的长子腆支也得知了阿莘王去世的消息，在腆支回到国内前，其二弟训解代为理政。然而他们最小的弟弟碟礼却发动了政变，杀害了训解并自立为

王。倭国派遣了一支一千人的部队，护卫腆支回到百济。腆支故意在回国前在海岛上停留，最终反对磔礼的人果然把磔礼杀死，腆支得以回到国内。

从腆支的角度来看，继承王位时倭国帮助过自己，而他长期在倭国活动，也建立起了深厚的人脉关系。实际上，广开土王碑文剥落的部分虽然难以断定，但应该记录了高句丽在407年与某个国家交战，而不少学者认为这个国家应该是百济。腆支王即位以后，与高句丽的对决必然是他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为了与让先王痛苦不已的广开土王对决，与倭国的合作将是不可缺少的。

百济与倭国的关系应该相当良好，409年倭国把夜明珠赠予百济，418年百济把白锦赠予倭国，这些记录就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夜明珠是一种可以储存光亮、在黑暗中发光的稀有石头，现代称之为萤石。萤石在中国的云南有少量出产，在日本则从未被发现。倭国自邪马台国时代就以出产珍珠而出名，卑弥呼死后，台与就向魏朝赠予白珠（即珍珠）5000颗。倭国送给百济的夜明珠大概是珍珠的误写。

百济送给倭国的白锦是把蚕茧煮熟后抽丝而得，这与养蚕技术有关。养蚕是古坟时代的技术革新之一，而绢的制作方法在弥生时代就已经传到了日本，因此绝不是腆支把该技术传入了日本。但无论如何，百济把这种高级制品送给倭国，大概也能说明当时倭国对养蚕、织绢这些技术的重视。

其实腆支王的外交活动并不仅限于与倭国建立友好关系。416年，他从东晋获得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的官爵。值得注意的是，他获得的官爵与372年以来百济外交的风格有所不同，尤其特殊的是官爵的除授并不是发生在新王刚刚即位的时候。百济王向来都是在继承王位之后很快获得册封，而腆支王在即位后不久的406年也有派遣使者，但那时候却没有获得册封，其原因不明。

东晋在416年终于派来了册封腆支王的使者。当时腆支王并没有向东晋派使者，这是东晋一方的主动行为。《梁书》记载余映（腆支王）在义熙年间上贡了生口（奴隶），但那应该指的是刚即位的406年。413年，高句丽向东晋朝贡，东晋应该由此确认了包含朝鲜半岛在内的对华北包围圈的有效性。5世纪初的东亚眼看就要进入由东晋主导的国际秩序了。

东晋的灭亡与刘宋的建立

然而，这时候的东晋王朝早已是风烛残年。403年，东晋曾因权臣桓玄的逼宫而一度亡国，但将军刘裕发动政变杀死桓玄，东晋得以复国。刘裕是个很有军事才能的将领，他在410年攻灭了山东半岛的南燕政权。从外人看来这好像是东晋疆域的扩张，高句丽之所以与东晋交好也与这种形势有关。然而事实却是刘裕掌握了东晋的实权。

417年，刘裕灭后秦并夺回了长安。这时候，东晋贵族心中最为向往的还都洛阳的愿望变得可能，他们对刘裕抱有很高的期望，而刘裕也明确表明了自己对帝位的觊觎。他杀害了晋安帝，扶立东晋最后的皇帝恭帝，并在420年接受了恭帝的禅让。这就是东晋的灭亡和刘宋的建立。

刘裕在历史上被称为宋武帝，他在即位的第二个月进行了人事调度，这与百济等国也有关系。征东将军高句丽王高琨（即长寿王）升任征东大将军，镇东将军百济王余映（即腆支王）升任镇东大将军。

跟这些将军升迁一起进行的还有徐州（山东半岛）和雍州（长安一带）等刺史任命，事实上反映了刘宋的势力范围。这个范围同样包含了高句丽与百济。

此前的研究几乎都采用了坂元义种的说法，即认为高句丽王与百济王的升迁主要是为了庆贺新王朝的建立以及催促他们前来朝贡。这种说法当然有其道理，但从整体人事部署来看，刘宋将其看成刘宋将军的同列。这意味着刘宋其实希望高句丽和百济可以在军事上发挥作用。

在东晋灭亡的420年，百济腆支王也去世了。他的去世仿佛有一种与东晋共存亡的感觉。

2. 421年，赞开启与刘宋的外交

倭国的到来——刘宋的欢迎及其背景

倭国采取行动的时机似乎就是为了配合刘宋建国这件事一般。在这种背景之下，倭王赞总算登上了东亚国际关系的舞台。421年，宋武帝对倭国发布了诏书，诏书中写道：

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宋书·倭国传》）

从诏书的内容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倭国的使者确实抵达了刘宋，他们的王名叫赞，使者带来了贡品，刘宋皇帝因此把官爵赠予倭王。按照中华思想，外国使者远道而来，那是皇帝的德泽远布国外的明证。从刘宋的角度出发，新王朝刚刚成立，以前一直没有遣使朝贡的国家就来朝了，这正好证明了武帝取代东晋建立刘宋的正当性。

实际上，刘宋皇帝刘氏一族也有其弱点。武帝刘裕虽然从将军当上了皇帝，但他的父亲只是一名低级官吏，因此他并非出身于贵族阶层。西晋王朝灭亡于316年，当时很多西晋贵族逃亡到东晋，他们在东晋依然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说东晋是一个门阀社会。刘裕虽然凭借优秀的军事才能当上了皇帝，但门阀士族们非常看不上他出身于寒门和行伍。双方间存在不少芥蒂。

《宋书·蔡廓传》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宋文帝对他的宠臣说：“如果你想要当士人（贵族），你就要到名门贵族家里，说是皇帝的命令，要你坐下。”（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这位宠臣到了贵族家里，贵族举起扇子，说这不是你该坐的地方，拒绝让他坐下。

（球举扇曰：“若不得尔。”）他把此事报告给皇帝，皇帝说：“那我也没办法了。”（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这件事就此作罢。

武帝称帝之初也是不得不向贵族的特权意识妥协。他提升了高句丽王和百济王的官爵，一方面是希望两国在军事上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应该也希望他们快点遣使朝贡，借此稳固他的皇帝之位。就在这个关头，倭国的使者来到了刘宋。不难想象，宋武帝应该很能感受到此事对于他巩固帝位的重要性。

赞为何要在421年遣使

那么，赞向刘宋遣使的目的是什么呢？

倭国派遣使者的421年是宋武帝接受禅让既而立国的第二年，可以说倭五王的登场跟刘宋的建立是同时发生的。赞为何突然就参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之中了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当时东亚的局势。421年，高句丽王是长寿王。在百济，坚持亲倭国政策的腆支王在前一年亡故，其子久尔辛王（420～427年在位）刚刚即位。久尔辛王在位八年，其间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新罗在广开土王在位的时候从属于高句丽，417年，訥祗麻立干杀死了实圣尼师今后即位，但他依然难以摆脱高句丽强大的影响力，他的外交政策也十分重视高句丽。

赞遣使的时候倭国与朝鲜半岛各国的关系并没有太大改变。既然如此，赞参与东亚局势的主要原因就应该是刘宋的动向了。刘宋强化了与高句丽和百济的关系，这种对外政策刺激了倭国采取新的策略，这种假说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

朝鲜半岛的铁是倭国不可或缺的资源，因此倭国长期关注朝鲜半岛，尤其是高句丽和百济的动态。高句丽和百济从东晋获得官爵，并在刘宋建国之际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对此倭国难以袖手旁观。随着高句丽、百济与刘宋的关系越发加深，赞对于倭国没有趁刘宋建立这一国际局势变动的机会采取行动而感到焦急。

百济王与高句丽王的名字

赞与刘宋进行外交活动时有考虑到百济等国，这从他所用的名字中也可可见一斑。倭国和百济与中国王朝的外交是通过文书进行的，而文书中就写着当时各国王的名字。我们可以从他们取名的方式解读当时的外交关系。

421年刘宋发给赞的诏敕中把他称作“倭赞”。过去的研究已经表明，这里的“倭”并不是国名而是姓氏，“赞”则是名字。赞为什么要以“倭”为姓，并为自己取“赞”这个一字名呢？

取一字名是因为受到了百济的影响。中国一方记录的百济王的名字，最初是册封近肖古王时用的“余句”。表1-1列举了其后的历代百济王的册封名，不难看出，他们在中国都是以一字名被称呼的。从他们的名字来看，自372年百济建立与东晋的外交关系以来，他们一直都在使用一字名。

表1-1 百济王的名字

王	中国名	朝贡年	备注
近肖古王	余句	372	没有抵达东晋
近仇首王	须	379	
枕流王	不明	384	
辰斯王	余晖	386	
阿莘王	—	—	
腆支王	余映	406	

那么实际上百济王的真名是怎样的呢？《日本书纪》中把即位前的阿莘王记作“王子阿花”，即位后记作“阿花王”。腆支王也是类似，即位前记作“王子直支”，即位后记作“直支王”。从这两个例子来看，百济王似乎是即位后直接在本名之后加上“王”字，叫作“某某王”。

近肖古王的本名其实是肖古，之所以加上“近”字是因为在他七代以前就有过另一位肖古王，因此在他名字上加上“近”字以便区分。《古事记》中把他记作“照古王”，《日本书纪》中记作“肖古王”，由此可见在他的名字前加上“近”字应该是后人的做法。中国史料中所用的“句”这个名字大概是来自肖古的“古”。

近仇首王的“近”和近肖古王一样是后世添加的称呼。仇首又记作贵须，他的名字就是贵须。中国把他称作“须”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辰斯王的“晖”这个名字的来源。

这种一字名并不是中国方面对百济王的称呼，而是百济向中国自称的。最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是近仇首王。《三国史记》中记录了“须”这个一字名，我们可以猜测这应该是打算在向东晋遣使的时候使用“余须”作为王名。然而这次向东晋遣使却以失败告终，东晋一方没有得知他的名字，中国史料中也没有关于“须”的记载。另外，腆支王在中国史料中叫作“映”，但这很有可能是“腆”的误写。本

来腆支王应该是把名字中的“腆”字作为一字名，向东晋进行朝贡。由此看来，百济的传统是取名字中的一个字作为向中国朝贡时使用的名字，其中又以使用第二个字居多。

高句丽又是怎样的呢？表1-2整理了4世纪中叶到5世纪高句丽王的名字。高句丽在314年攻占了带方郡，当地是自后汉（东汉）末期以来，魏晋等历代王朝掌控朝鲜半岛的据点。因此历代王朝一直关注高句丽的动向，也留下了高句丽王名字的记录。

表1-2 高句丽王的名字

王	讳	别名	史料中的名字	朝贡年
故国原王	斯由	国罡上王	钊	343
小兽林王	丘夫	小解朱留王		
故国壤王	伊连	于只支		
广开土王	谈德		安	397 前后
长寿王	巨连		高璊	413

攻占带方郡的美川王名叫乙弗利，这并不是一字名。然而他下一代的故国原王除了斯由这个本名以外还有钊这个一字名。故国原王败给了前燕，343年高句丽臣服于前燕并得到册封，故国原王应该就是在那时取了一字名。小兽林王和故国壤王的一字名都很不幸地没有留下记录。可以确认的是广开土王的一字名是安（本名是谈德），长寿王的一字名是璊（本名是巨连）。

对“中华”的憧憬

我们来看看姓氏有什么讲究。百济国王姓“余”，这是因为他们标榜自己出身于扶余族。扶余是曾经居住在高句丽北方的民族，高句

丽本身也是来自扶余。广开土王碑中关于高句丽王族的出身有明确记载：“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

百济国起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一个马韩国家，原本叫伯济国，跟高句丽相比，百济是否出身扶余族是有疑问的。但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放在与高句丽对抗的立场上看。高句丽早在公元前就已经建立，而百济则建立于4世纪中叶，是个后发国家。4世纪中叶正是高句丽南下的时代，百济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建立的，对于百济而言，高句丽是一道必须跨越的阻碍。因此百济人有一种与高句丽对立的意识，继而把自己的出身说成跟高句丽是一样的。百济把扶余的一个字当作自己进行外交活动的姓氏，也体现了这种与高句丽对立的意识。

高句丽王的“高”姓直接取自国名。高句丽王在4世纪中叶开始在对外交往中使用一字名，这与加入中华册封体系有很大关系。为了与高句丽对抗，百济同样使用了姓氏与名字各一个字的做法。一字名是中华当时的通常用法，百济等国的做法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这种想法在中原王朝有其先例。王莽灭亡前汉（西汉）建立新朝的时候就以二字名不符合中华特色为理由将其禁绝。他的复古政策一直影响到后世，到了4~5世纪的时候才逐渐消退，二字名的中原人又多了起来。虽说如此，二字名并非中华特色这一观念依然存在，对中华文明怀有憧憬的高句丽、百济、倭国都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它们的王在对外活动中使用一字名，以此标榜自己接受了中华文化，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也容易接受这些名字，在册封的时候直接使用这些一字名。

“倭赞”之名的意义

赞使用的一字名仿效了高句丽与百济的取名方法。

高句丽用国名的一字，而百济使用了先祖扶余族的一字作为姓氏。赞参考了他们的做法，使用“倭”作为自己的姓氏。王的名字也是参考了与中国交往时使用一字名的做法，把自己的本名变化为一个字的汉字，取了“赞”这个名字。

从汉字的挑选也能看出，“倭赞”这个名字是倭国一方取的。“赞”这个字有“褒奖”“赞美”的意思，显然是个好字。古代中国把周边国家称作夷狄，有蔑视对方的传统，翻译对方的国名、人名的时候往往不使用好字。“邪马台国”的“邪”和“卑弥呼”的“卑”都是我们熟知的例子。反过来说，如果使用了“赞”这种好字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应该是倭国方面取的名字。

既然百济、倭国等国的王都使用了一字名，这或许会让人认为，中原王朝周边的其他国家也会采取类似的行动。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看5世纪上半叶中原王朝的其他周边国家是使用怎样的名字与中原王朝进行外交的。比如说在435年，阇婆婆达国的国王向刘宋朝贡，在相关的记录中他的名字是“师黎婆达阇阿罗跋摩”。阇婆是一个位于马六角海峡东方的港口城市，阇婆婆达国是一个东南亚小国。他们把国王名字的发音直接翻译成汉字，因此他的名字非常长。

东亚也有类似的例子。479年，朝鲜半岛加耶地区的加罗国向刘宋之后的南齐遣使，当时的王名被记作“荷知”。成书于13世纪后期的朝鲜史书《三国遗事》中记载大伽耶有过一个“嘉悉王”，我们现在认为他就是荷知。“荷知”就是“嘉悉”，可见王的名字并不是一个字。

通过比较这些例子，我们发现在4世纪下半叶到5世纪期间，故意把王的名字改成一字名的只有百济和倭国等，这是它们特殊的取名方

法。它们对中华有更强烈的意识，在同一套规则下相互竞争，这就是5世纪发生的事情。倭国是最晚加入这种国际竞争的，因此尤其重视这件事。

赞得到了什么

通过421年的遣使，赞作为倭国王的地位获得了刘宋的认可，并且得到了册封与官爵。然而，史料没有记载他具体得到的官爵。《宋书·倭国传》只记载了“可赐除授”，不过我们可以推测一下他获得的官爵。首先刘宋肯定认可他为正统的倭国的王，也就是说赞获得了“倭国王”的爵位。

另外，高句丽王和百济王在420年获得晋升的是将军号。赞既然是因为他们的晋升才派遣了使者，那他应该也强烈要求获得将军号。我们从他425年第二次遣使时的使者司马曹达这个人身上也能看出这一点。

本书后文还将详细讨论司马曹达这个人，简单而言他名叫曹达，司马是他的官职。司马这个职位是将军幕僚的一员，既然存在司马这种官，那么赞就必然获得了将军号。从赞以后的倭国王获得的将军号来看，赞获得的应当是安东将军。安东将军是守护中国东方的将军之一。

参考百济和高句丽的例子，赞应该还获得了使持节、都督某诸军事的头衔。这是跟将军号匹配的、表示权限的头衔，并不是独立的官职（山口正晃）。

上文提到，百济腆支王从东晋得到的官爵是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字面意思是作为镇东将军保管节杖，监督百济地区的军队。赞应该知道高句丽和百济是从东晋获得官职的，他

有与这两个国家竞争的意识，不难推测，他应该也要求获得同样的官爵。

不过，我们找不到赞本人要求的证据。赞的继承者珍等人要求获得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头衔。关于这个官职，我们将在第2章详细叙述。

倭王与倭国王——与卑弥呼的区别

刘宋把赞册封为倭国王，这距离卑弥呼在239年获得的“亲魏倭王”已经过去182年。卑弥呼的时候是“倭王”，而到了赞的时候则变成了“倭国王”。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两者之间其实存在巨大的差异。

现在我们已经辨明，“王”的封号一般赐予地理上离中国比较近、关系比较密切的周边国家，在5世纪南北朝对立的时候往往赐予中国希望其发挥军事支援作用的那些国家（荆木美行、金子修一）。与此相对，“国王”则往往授予那些位置较远、交通受阻隔的国家。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卑弥呼和赞的区别。

卑弥呼跟曹魏进行外交的时候，双方接洽的窗口是带方郡。那是位于朝鲜半岛中西部、靠近今天首尔近郊的地方，是魏实施东亚政策的对外接洽地。《魏志·倭人传》记载倭国“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由此可以推测邪马台国与魏进行外交的窗口就是带方郡。

《宋书·倭国传》则说倭国“在高骊东南大海中”。高句丽于314年前后攻占带方郡，占据了其土地。自此以后中原王朝在朝鲜半岛失去了立足点，倭国也从中原王朝的视野中消失了。

魏能够通过带方郡跟整个朝鲜半岛进行持续的来往，就算要去倭国，交通也是比较方便的。与此相比，刘宋已经失去了在半岛的官署，高句丽、百济等国尚且能够跟刘宋进行一定频率的交往，但新罗、加耶这些稍远一点的国家就已经不在其交涉范围之内了。因此《宋书》中并没有新罗和加耶的列传。倭国更是在大海的对面，虽然地理位置没有变，但曹魏与刘宋对日本列岛的认知可谓云泥之别。

从军事支援的角度上看也是一样的。曹魏把倭国看成位于南方的国家。《魏志·倭人传》说“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又说“所有无与儋耳、朱崖同”。会稽在今天绍兴一带，儋耳、朱崖则在海南岛。当时正是魏、吴、蜀三国鼎立的时候，三国在彼此的对抗中往往会利用周边诸民族。对魏国而言，倭正好处于牵制吴国的有利位置。

众所周知，如果按照《魏志·倭人传》的记载把邪马台国放在正确的地图上，那它就会位于现在的东海上。与其说是《魏志·倭人传》的记录有误，不如说这反映了曹魏对倭国的地理认知。

另外，卑弥呼的爵位上带有“亲魏”这一特殊称号，享受这种待遇的除了倭国以外就只有西方的大月氏民族。曹魏把“亲魏倭王”这一待遇赐予倭国，证明其认可倭国的军事利用价值。

与此相比，南朝刘宋自从建国以来就将华北诸王朝视为对抗的对象，他们认为倭国在地理上是比朝鲜半岛还要远的偏僻地方，再加上中国与倭国已经有150年没有来往，他们必然认为倭国在刘宋与华北诸王朝的对决中没有多少可利用的军事价值。正因如此，刘宋给赞册封的不是“倭王”，而是希望对方能进行实质上的朝贡的“倭国王”。

3. 册封倭国王的意义——将军府的开设与府官制的引入

拥有将军号的意义

刘宋册封赞为倭国王，意味着承认倭国作为外藩之国的地位。藩本身的意思是区分内外的墙壁，外藩则是在中国周边负责保护中国的国家。

历代倭五王都有自己是刘宋外藩的意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五王的最后一位——武的上表文中看到，他在文中提到“作藩于外”，意思就是认同刘宋是国际秩序的中心，倭国则在其外围。虽说是客套话，但倭五王既然受到刘宋的册封，他们就通过朝贡与刘宋皇帝建立了君臣关系，在倭五王看来，倭国是刘宋的外臣。

从赞到武，倭五王一直保持着作为刘宋外臣的意识，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缺乏独立意识。倭五王到底是如何利用刘宋的外臣这一身份，在东亚局势中制造有利于自身的局面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课题。

刘宋册封给倭五王的称号并不只有倭国王，另一个能够确认的称号是先前提到的安东将军号。将军号自然是指拥有统率军队的权限，是一个军事性的官职。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将军号并不仅仅是一种军事官职。

表1-3 刘宋将军号的排序（五品及以上）

一品	大将军
二品	骠骑、车骑、卫、诸大将军
三品	征东、征南、征西、征北 镇东、镇南、镇西、镇北 中军、镇军、抚军 安东、安南、安西、安北 平东、平南、平西、平北 左、右、前、后 征虏、冠军、辅国、龙骧
四品	左卫、右卫、骁骑、游击 左军、右军、前军、后军 宁朔 建威、振威、奋威、扬威、广部 建武、振武、奋武、扬武、广武
五品	积射、强弩 鹰扬、折冲、轻车、扬烈、宁远、材官、伏波、凌江

3世纪西晋动乱以后，地方官也兼任将军，这在当时处于军事高度紧张状态的中国是必须采取的做法。在西晋以后这种倾向也一直持续，到了东晋和刘宋，将军的职权进一步扩大。刘宋的将军已不仅仅是一种军事官职，还起着标示身份的作用。

这种标示身份的作用并不仅仅适用于刘宋内部，还能应用于东亚其他各国。各国的王得到的将军号有所不同，高句丽是征东，百济是镇东，倭国是安东。这三者在官职级别上比较接近，但征东略高于镇东，镇东又略高于安东。另外，高句丽和百济还获得了大将军号这一优待。这表明在刘宋的国际秩序中，高句丽的地位最高，百济次之，

倭国则更低一点。这是三国对刘宋的政治利用价值的真实反映。石井正敏认为，将军号的高低是以来朝的顺序决定的，但反过来说，越是重视与刘宋关系的国家也会越早遣使朝贡，因此与上述观点并无太大出入。

倭国开府——将军府的设置与府官制

赞担任安东将军意味着一种重要的权限得到了刘宋的承认，那就是可以在刘宋的朝廷以外设立为刘宋服务的官署。

这种官署一般被称为将军府或者军府。还有一个广为日本读者熟知的名字，那就是幕府。总而言之，赞现在可以用安东将军这一身份开设幕府了。我们一般认为镰仓幕府是日本最早的幕府，那是天皇任命的征夷大将军的幕府，而刘宋皇帝任命的安东将军所建立的幕府，在构造上是相似的。

顺便一说，正如《吾妻镜》中说“将军家御居所者，称幕府”，幕府一词在日本是将军住所的意思，也可以指整个武家政权。为了避免混淆，本书将使用将军府这个说法。

将军是管理将军府一切事务的长官，同时还需要辅助他的人。因此赞在开设将军府的同时也获得了任命幕僚的权限。当时朝廷对将军府官员的设置详细规定，具体而言就是司马、从事中郎、参军等职位。这些从属于将军府的官员叫作府官。

赞在425年再次向刘宋派遣使节，当时担任使者的人就是上文提到的司马曹达。这是一个担任司马这一官职的人，名叫曹达，可以确认他是在倭国将军府就职的府官。

像赞这样担任刘宋的将军（大将军）并开设将军府，能够把幕僚任命为府官的制度就是府官制。在当时并不是只有倭国开设将军府和任命府官，高句丽和百济也这么做。跟倭国的司马曹达的情况一样，我们从两国的对外活动中能够确认其府官制的存在。表1-4整理了具体的细节。

表1-4 各国设置的府官

朝代	时间	公元纪年	高句丽	百济	倭
晋	义熙九年	413	长史高翼		
刘宋	景平二年	424	长史马娄	长史张威	
	元嘉二年	425			司马曹达
	孝建二年	455	长史董腾		
北魏	延兴二年	472		长史余礼、司马张茂	
南齐	永明八年	490		长史高达、司马杨茂、参军会迈	
	建武二年	495		长史慕遗、司马王茂、参军张塞	

高句丽在413年向东晋遣使时派遣了长史高翼这一人物，到了刘宋时期则出现了424年的长史马娄、455年的长史董腾这两个名字。百济在424年向刘宋遣使时有长史张威，472年向北魏遣使时有长史余礼，两次向南齐遣使都有派遣长史，长史也是府官中的一种官职。倭国、高句丽、百济三国在进行外交活动时都派遣了府官。将军府是在刘宋皇帝的权威下设置的，三国向刘宋的朝贡也有汇报将军府工作的一面。

然而，倭国与高句丽、百济这两国之间也存在不同。倭国派遣到刘宋的府官是司马，而高句丽和百济两国派遣的则是长史。坂元义种认为，长史是文官之首，而司马则是武官之首，倭国派遣司马是为了强调自身的军事性质。然而要是说高句丽、百济与倭国有这种性质上的差别的话，似乎是不太合理的。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这种区别体现了各国王地位上的差别。

在将军府的府官之中地位最高的就是司马，而在比将军府地位更高的大将军府中，最高地位的府官是长史，其下有司马、从事中郎这些职位。将军与大将军之间存在明显的地位差别。可见倭国、高句丽、百济之间地位有别，而各国都派遣了其将军府中最重要的幕僚。

从高句丽到百济、倭国——东亚府官制的推广

与此相关的一种观点是，东亚地区的府官制是为了向南北朝等政权派遣使节而建立的体制。如果府官制有国内政治任务的话，那么将军府长官被派遣进行外交活动的这一段时间国内政治就会陷入停滞，因此府官应该是专门负责对外活动的职务。确实，我们在史料中看到的府官基本上都是外交使者，然而这很可能是南北朝等政权把各国府官当作外交使者而造成的结果，并不能由此断定各国的府官仅执行外交任务。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我们需要回顾东亚府官制的成立。

东亚最早引入府官制的是高句丽的广开土王。广开土王本人并没有与南朝，而是与北方五胡诸王朝进行交往。在此期间，后燕慕容宝任命广开土王为平州牧（即平州的行政长官），承认后者是辽东、带方地区的国王。慕容宝自即位以来跟北魏多次交战却连遭败绩，他大概也希望能通过认可高句丽的地位来缓解自身的困境。

广开土王通过慕容宝任命的平州牧这个职位，设置了长史、司马、参军这些官职。通过慕容宝在位的年代，我们可以推测广开土王接受任命的时间是在396年到398年。广开土王设置了府官，却没有留下派遣府官出使东晋或其他政权的记录。我们看到的关于高句丽府官进行对外活动的最初记录是在413年，也就是广开土王之子长寿王即位时向东晋派遣的使者。

高句丽的府官制始于广开土王，他以州官的身份设置州府，并任命州府的府官。在那以后，长寿王于413年任命州府的府官为使节，派其前往东晋。他这么做或许有着向东晋展示自身拥有完善的东晋官职系统的意图。

东晋皇帝任命长寿王为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之后高句丽设立了征东将军府，重新确立了府官制。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来看，高句丽当初设置的府官并不以外交为目的。应该说府官并非只有外交这一职能。

在与高句丽引入府官制相近的时候，百济也采用了府官制。百济与东晋进行外交活动，从东晋获得了镇东将军、百济王的任命，因而开设镇东将军府，推进了以王为顶点的统治机构的整備。

赞也是在得知百济的动向后以获得官爵为目的采取了行动。他于421年派遣使者，从东晋获得了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册封，算是达成了目的。之后他开设了安东将军府，任命曹达为司马，并委任后者作为府官执行外交任务。

从事情的发展情况来看，倭国、高句丽、百济的竞争以高句丽为起点，百济由于对高句丽的敌对意识而加入，倭国则是模仿百济的做法。就这样，这三个国家在竞争之中开启了政治机构的整備。

司马曹达是什么人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被任命为府官的是哪些阶层的人？

如果是在后世的幕府的话，在幕府中担任要职的人通常是实力仅次于将军的厉害人物。安东将军府的情况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手上的线索只有一条，那就是担任倭国府官的唯一的例子——曹达。他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呢？

我们除了曹达的名字以外并不知道他的其他信息，然而名字也是相当重要的线索。姓曹名达，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姓名。当时日本列岛的人名，如稻荷山铁剑上的“乎获居”和江田船山大刀上的“无利弓”等，都是没有姓氏只有名字的，而且用两到三个汉字表达。曹达的姓名明显不符合这种形式，他有可能是从外国来到日本的渡来人。

那么，我们能不能认为曹达来自朝鲜半岛呢？倭国与中国直接进行外交活动始于421年，而曹达作为使者出使刘宋则发生在425年。由此看来，他可能不是从朝鲜半岛前往倭国的。

4~5世纪来到日本列岛的渡来人，即使是从朝鲜半岛来的，也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背景。像曹达这样当上了府官的人，从名字来看应该是中国人。当时百济等国的人名有牟头娄、赞首流等，也没有姓氏，跟中国人的人名是不一样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

当时的朝鲜半岛存在大量西晋人（西本昌弘）。这是因为高句丽在314年前后攻占了西汉设置的乐浪郡和带方郡，当时跟这两郡相关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不可能全部平安回到晋。其中的大部分人很可能被高

句丽吸收，高句丽利用他们来整備自己的统治机构。高句丽之所以能够最早引入府官制，部分是出于这一原因。

另外，逃离高句丽统治的人如果从带方郡直接向南避难就会进入百济的国境。百济当时正处于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也会利用这些中国人。这从百济的府官制也能看出端倪。

我们可以再一次查看表1-4中府官的名字。百济的余礼跟百济王一样是余姓，应该是百济的王族，但除此以外的大多数都是中国式的人名。尤其是百济在424年派遣的长史张威、472年的司马张茂、495年的参军张塞，这三个人都姓张，有可能是同一族人。495年的司马王茂则有可能是3世纪在乐浪郡一带拥有相当势力的王氏的子孙。

在那之后的就是倭国。4世纪至5世纪初，陶器须惠器的生产技术传入日本，由此我们认为这是大量渡来人来到日本列岛的时代。既然如此，中国人跟随传入技术的朝鲜渡来人进入倭国也是相当合理的。他们被朝鲜半岛各政权吸纳，世世代代生活在此。对百济等国的统治者而言，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极大的魅力。对这些中国人而言，知识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因此知识在他们之间世代相传。曹达正是一个拥有这些知识的人，他在5世纪初来到了倭国。

倭国同样重视中国的知识。百济等国任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而倭国本来对自身落后于东亚其他国家就应该有着危机意识，因此在曹达以前可能已经有类似的人物受到倭国的任用。跟那种持有技术的朝鲜渡来人集团形成的聚落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的规模相对较小，他们很可能未能在日本列岛建立据点。

他们担任倭国王直属的近臣，获得了与统治者的政治联结，从而确保了自身的地位。对倭国王而言，跟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建立直接关系能让他在与列岛其他豪族的对抗中更有优势，因此他很欢迎这些

人。倭国王与这些中国人在列岛上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关系。赞和曹达就是在这种关系下在5世纪引入了府官制度。

安东将军府的意义

倭国通过与百济建立军事同盟而加入了东亚局势。刘宋王朝建立后，倭国看到刘宋与高句丽、百济的交往活动，由此展开了中断150年的外交。

赞开启了与刘宋的外交活动，由此加入东亚国际关系之中，并获得了倭国王、安东将军的中国官爵。与此同时，倭国接触到中国官僚制度的冰山一角，体验到这种中国统治技术的精粹，以后引入这种先进的统治制度由此变得可能。

当然，倭国得到的不过是一些零碎的制度，与中国的制度完全无法相比。即便如此，将军府这一统治机构的建立也是倭国权力机构整備的第一步，在日本史上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1] 倭王赞在《宋书》中写作“讚”，在《梁书》中写作“贊”，本书一概作“赞”。——译者注

第2章 从珍到济，再到兴

——遣使的意图与王的权力

赞从刘宋获得了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册封，这意味着倭国在东亚国际舞台之中上升到与高句丽、百济同等的地位。同时，这也增加了相互之间的竞争，使得东亚的国际关系变得越发紧张起来。

1. 赞之弟珍的遣使及其对官爵的要求——与同盟国百济的竞争意识

438年，珍登场——请求得到安东大将军

438年四月，赞之弟珍遣使访问刘宋，报告了赞死去的消息。

珍希望刘宋能降旨任命自己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下文简称为“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从刘宋获得册封意味着刘宋成为珍的靠山。珍刚刚即位，权力尚未稳固，他希望通过让刘宋认可自己是赞下一任的王来巩固自身的地位。

在所有倭五王相关的史料之中，珍在438年提出的要求中第一次出现了“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这一头衔。不过，史料中初见跟历史上第一次要求或受封是两回事。有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有过任命，只不过没有记录下来而已。那么，珍之前的赞有没有获得“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的官职呢？如果有的话，那珍只不过是按照赞的标准提出要求而已；如果没有的话，珍为何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珍在438年的遣使中用到了“自称”这个词。“自称”说明刘宋方面没有任命，但倭王宣称自己拥有某些官爵。如果赞本来已经有这些官爵的话，那这里就不应该出现“自称”一词。最终珍的请求被拒绝了。

我们可以把珍要求的官爵与赞的官爵进行对比。赞拥有的官爵是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则希望得到比这个更高的职位。倭国王还是一样的，但他还希望得到“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

军等赞没有获得过的头衔。既然珍要求获得比赞更高的官爵，那这背后就应该有相应的背景。

首先来看看安东大将军。珍应该对先王赞只获得安东将军感到相当不满。高句丽王是征东大将军，百济王是镇东大将军，与此相比倭国王获得的仅仅是安东将军，比大将军低了一级。倭国向刘宋朝贡的时间比两国晚，珍对此必定感到相当焦急，因此才把尽早获得能与两国匹敌的官爵当作自己的政治任务。对安东“大”将军的要求正是这一想法的具体表现。

为何想要得到“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

关于“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从倭国与高句丽、百济的竞争关系这一视角加以理解。首先我们再次梳理高句丽和百济从刘宋那里得到的官爵。

438年珍首次在史料中出现，当时高句丽与百济的官爵如表2-1所示。这两国都有“使持节、都督……诸军事”这一头衔，而赞（请求前）则没有获得相对应的官爵。4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争夺东亚外交的主导权，对倭国来说，获得跟两国相同的地位是重要的外交任务。倭国与刘宋进行外交比两国要晚，因此希望通过获得新的官爵来挽回这一方面的劣势。

表2-1 438年前后各国的带官情况

高句丽		使持节	散骑常侍	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	征东大将军	高句丽王	乐浪公
百济		使持节		都督百济诸军事	镇东大将军	百济王	
倭国	请求前				安东将军	倭国王	
	请求	使持节		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	安东大将军	倭国王	
	任命				安东将军	倭国王	

当时倭国与百济成立了以阻止高句丽南下为目的的军事同盟。这一同盟并不仅限于倭国与百济两国，还包含了周边的其他小国。百济当时对慕韩（马韩）拥有很大影响力，而倭国则与以金官加耶（任那）为首的加耶诸国有着很深的联系。这些小国也被视作同盟的成员。倭国希望能成为这一军事同盟的盟主。

再者，倭国还觊觎新罗及其周边的秦韩（辰韩）。新罗和秦韩都是高句丽的附庸国，但刘宋并没有把这两国的军事指挥权交给高句丽。这与其说是刘宋不承认高句丽的地位，不如说是高句丽自身觉得有必要请求相关的官职，因此刘宋也就没有授予。

珍便决定利用这一破绽。他希望刘宋能够认可倭国对事实上从属于高句丽的新罗与秦韩的军事指挥权，从而在名义上营造倭国对这些国家有影响力的形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倭国向刘宋提出了对“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这一官职的请求。这六国就是“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

与百济的对抗意识，珍的请求“落空”

珍时刻注视着高句丽与百济的动态，他向刘宋请求官爵的时候心中想的也是两国国王获得的官爵，在这其中他尤其关注的是百济。

当时，高句丽长寿王的官爵是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之所以有乐浪公是因为高句丽统治着乐浪郡，刘宋对此表示认可。刘宋认为在名义上乐浪依然是自己的领土，而给事实上统治当地的高句丽王授予乐浪公的爵位，以此来调整名义与事实间的矛盾。

百济王并没有获得公爵的册封，珍也没有请求得到类似的爵位。他执着于获得安东“大”将军号以及“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而对乐浪公一类的公爵位并不感兴趣。这表明他真正关注的是百济王，自己必须获得与百济王同一级别的官爵。

珍按照百济王获得官爵的标准，“推算”出自己应该得到的官爵。反过来说，既然倭国与百济是同盟国，那倭国的官爵就不应该低于百济。解决这一问题成了倭国的一大外交任务。

珍带着与百济的强烈的竞争意识向刘宋提出了请求。问题是他所提出的请求不可能被全盘接受。

刘宋按照之前给赞授官的先例，把珍册封为与赞一样的安东将军、倭国王。珍提出的要求里得到认可的只有倭国王而已。珍对刘宋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但其结果却是请求完全落空了。

然而，他为自己请求官爵册封并不是外交活动的全部。如果只是为自身考虑的话，那是无法获得周围其他人的支持的。当时日本列岛的政治局势仅仅是倭王权处于权力的顶端，各地的豪族则与其存在松散的政治联系。对倭王而言，让各豪族认可自己王位的正当性很有必要。从这点来看，5世纪上半叶的倭王权可谓基础相当脆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珍效仿了百济使用过的另一种中国官爵的用法。

中国官爵的“用处”——对百济而言

说到底，中国的官爵对东亚其他诸国而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百济通过向国内的王族、贵族授予中国官爵，强化了自身的立场。我们可以从458年的事例得知其任命的细节。

百济王余庆（盖鹵王）向余纪等十一名王族、贵族授予了将军号。然而任命官员的权力本应在刘宋皇帝手中，百济王并没有这种权限，因此这时候的将军号是非正式的任命。这种做法被称为“假授”，为了与正式的将军加以区别而在将军号之前加上“行”字。百济向刘宋汇报了这些任命，并得到了追认。比如说余纪，他从百济王那里获得了“行冠军将军”的假授，之后刘宋皇帝加以确认，他才正式成了冠军将军。

表2-2 假授与除正（458年，百济）

名	假授官职			除正官职
余纪	行冠军将军	右贤王	→	冠军将军
余昆	行征虏将军	左贤王		征虏将军
余暉	行征虏将军			征虏将军
余都	行辅国将军			辅国将军
余乂	行辅国将军			辅国将军
沐衿	行龙骧将军			龙骧将军
余爵	行龙骧将军			龙骧将军
余流	行宁朔将军			宁朔将军
糜贵	行宁朔将军			宁朔将军
于西	行建武将军			建武将军
余娄	行建武将军			建武将军

百济的王族、贵族可以通过百济王获得中国的官爵。当他们认可中国官爵的价值，并且想要获得这些官爵的时候，就不得不先获得百济王的假授，然后向刘宋申请并得到认可。通过这种方法，百济王强化了王族、贵族对自身的从属。对百济王而言，假授权很可能是提高王权权威所必要的权力。

另外，百济东城王在495年向南齐遣使，并请求南齐认可他对八个人假授的将军号，这八个人是沙法名、赞首流、解礼昆、木干那、慕遗、王茂、张塞、陈明。这八个人可以分成两个阶层。

从沙法名到木干那的四个人都是三字名，不是中国式的名字。

《隋书》是7世纪上半叶按照唐太宗的敕命编撰的史书，《隋书·百济传》记载“国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笏氏、解氏、贞氏、国氏、木氏、苜氏”。这四个三字名的人物中三个属于八族之中。与此相对的是慕遗等四人，他们都使用中国式的名字，而且都作为府官

（将军府的幕僚）出使南齐。也就是说，将军号是被授予贵族和府官的。

值得注意的是，贵族阶层之中也有人获得了迈罗王、辟中王、弗中侯、面中侯等王侯爵位的假授。王、侯等级的爵位与百济王本身相去不远，这表明贵族并不完全从属于百济王权。与此相对，百济对府官的假授则是乐浪太守、城阳太守、朝鲜太守这些地方官。地方官是服务于百济王的官僚，两者的君臣关系是相当明确的。

如上所述，百济王把王、侯的爵位授予贵族，把地方官的职位授予府官。与无差别授予众人的将军号不同，王侯与地方官的区别成了划分身份的标志。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从那以后的百济政权主要由获得王侯爵位的贵族层与担任府官的流亡汉人层组成。由于身份的不同，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有所区别，百济王则通过将军号在他们之中建立了一种统一的身份等级。

这件事情的结局却是南齐没有承认百济王的假授，不对这些王侯的爵位以及太守的官职予以除正。即便如此，从百济王假授的情况我们也能知道，在百济的统治集团中，存在以百济王为核心但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王侯，以及臣僚性质更强一点的府官这两个阶层。

珍与平西将军倭隋

与百济一样，珍也提出了把将军号授予麾下豪族的申请。

刘宋在任命珍为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同时，也认可了珍任命倭国王族、豪族为将军的请求。当时获得认可的人员有倭隋等十三人，他们获得了平西、征虏、冠军、辅国等将军号。

在这其中，由于倭隋使用了倭这个姓氏，他应该是倭国的王族。另外，这些获得认可的将军号都是三品，在品级上跟安东将军相同。然而平西与征虏、冠军、辅国之间还是存在高低之分。武田幸男指出，在十三人之中只有倭隋被任命为平西将军，其地位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珍的安东将军也是三品将军，倭隋的平西将军与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这两人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古坟群正是解开这一谜题的关键。

我们在序章提到，在畿内地区存在五个拥有大王墓级别的巨大前方后圆坟的古坟群，而建造于5世纪的古坟群则有古市古坟群和百舌鸟古坟群两个。这说明当时同时存在两股有能力建造大王墓的势力。

也就是说，当时有两个能够产生大王的王族集团。在当时的倭国，能够产生大王的家族以倭为姓，其内部则可能存在数个具备实力的集团。在5世纪上半叶，以赞和珍为领导者组成了赞系王族集团，同时还有与之匹敌的王族集团存在，其领袖就是倭隋。

对珍而言，他假授给其他人的将军号与自己的安东将军差距越大越好，因为这样才能强化倭国王的权威。因此，他并不真的希望把高级的将军号假授给其他王族与豪族。然而他无法用这种方法对待倭隋。倭隋在日本列岛的势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珍不得不对倭隋有所顾虑。

进一步说，珍获得的安东将军的“东”指的是刘宋王朝眼中的东夷。高句丽的征“东”与百济的镇“东”也是同一个道理。然而，珍对倭隋的假授却是平“西”。这意味着在日本列岛内的两大王族集团里，珍作为安东将军是“东”集团的首领，而他认可倭隋为“西”集团的首领。

换言之，我们可以认为倭珍与倭隋分别统率着构成倭王权的两个倭姓集团，他们之前存在东、西的位置关系，通过互补的方式实行对日本列岛的统治。

当然，这是一种偷换概念的做法。本来“东”指代东夷的一部分，现在则变成了把日本列岛分成两半后的“东”边。当时的政治局势是，以安东将军珍和平西将军隋为两大巨头，另外还有一些有能力建造前方后圆坟的强大豪族，这些豪族可能是地方的势力，他们获得了征虏、冠军、辅国等将军号。他们与倭王权建立起松散的政治联系，以此构成了日本列岛的统治网络。

最终，珍通过假授权与拥有势力的王族和豪族建立了联系，实现了对倭国全境的统治。反过来说，这种做法也反映了倭国王无法以一己之力把权力延伸到日本列岛的每个角落。

2. 443年，济的登场——王统移动了吗

北魏统一北方与刘宋的元嘉之治

珍即位并出现在国际外交舞台的时候，一件大事极大地影响了东亚的局势。中国北方长期以来存在着众多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这些少数民族被统称为“五胡”。439年，五胡诸政权的争霸终于尘埃落定，北魏统一了北方。

北魏的正式国号是魏，是鲜卑族建立的王朝。鲜卑族之中有一支名叫拓跋部的强大部族，他们在3世纪末崭露头角，族长拓跋猗卢于310年被西晋封为代公，315年封为代王，由此建立了代国。然而到了376年，当时由拓跋什翼犍统治的代国遭到前秦苻坚的入侵，最终灭亡。前秦政权在383年淝水之战后瓦解，流亡的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于386年重建代国，并在当年改国号为魏。之后拓跋珪征服后燕，扩大了势力范围。398年北魏迁都到平城（今大同），拓跋珪自称皇帝。自此，北魏王朝正式建立。

然而当时的北方还存在其他政权，在此之中夏是能够与北魏匹敌的强国，其建立者赫连勃勃是南匈奴人。北魏并没有进攻赫连勃勃，但赫连勃勃在425年死去，形势随即大变。北魏趁机攻打夏，赫连勃勃的继承者赫连昌被俘虏，其弟赫连定向西逃跑，在途中被杀，夏于431年灭亡。

北魏的东方还有北燕（参考第1章）。夏还存在的时候，北魏为了避免两面作战而没有攻打北燕，而在夏灭亡后，北魏再也没有后顾之忧，随即展开对北燕的战争。当时统治北燕的是冯跋之弟冯弘，他抵挡不住北魏的进攻，只能逃亡高句丽。北燕于436年灭亡。

北魏的西面还有北凉。北凉并不是强国，但它依靠与夏、刘宋等国进行巧妙外交而生存下来。当北魏的势力向周边扩张时，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已经臣服于北魏。之后沮渠蒙逊死去，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北凉在439年灭亡了。沮渠蒙逊同族的沮渠无讳等人逃到敦煌，他们在当地建立的政权一直存续到460年。

随着北凉灭亡，北方总算在前秦崩溃以后再一次统一了。当时在北魏的边境、今天甘肃南部一带还有一个名叫后仇池的政权，但它并没有能力对抗北魏，在442年也被北魏平定了。

我们再来看看江南一带的形势。东晋于410年攻灭南燕，成功占领了山东半岛，然后又灭了后秦。之后，刘裕于420年建立了刘宋。

北魏统一北方的时候，交通要冲山东半岛正处于刘宋的统治之下。且不论与北魏接壤的高句丽，百济与倭国都是因为交通要道的统治权改变而与南朝展开了外交活动。

当时的刘宋同样处于政治转型期。建立刘宋的是武帝刘裕，但他在422年死去，那正是赞朝贡的第二年。继承皇位的是其长子少帝，但是他品行不佳，最终在424年被废位，其弟刘义隆继位，是为文帝。

宋文帝在位长达30年，当时政权稳定，由于他的年号是元嘉，因此人们把这个时期称作“元嘉之治”。

438年珍的遣使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当时刘宋也发生了政治变动。436年，刘宋重臣檀道济由于与文帝不和而被杀。檀道济是刘宋的建国功臣，是个优秀的将领，因此他被杀时有人说宋文帝是在自毁长城。事实上，刘宋在450年遭到统一华北后的北魏进攻，一度被逼得相当狼狈。

高句丽与百济的对立

当时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的局势也出现了变化。

高句丽时刻关注着北魏势力的扩张。435年，也就是北魏统一华北四年前，长寿王首次向北魏派遣使节。北魏授予他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的官爵。

虽说如此，高句丽却似乎完全没有要臣服于北魏的意思。北魏要求高句丽交出北燕的逃亡者冯弘，但遭到高句丽拒绝。冯弘跟刘宋也颇有关系，大概高句丽正是看中了他这方面的价值。然而冯弘并不打算在高句丽终老，他于438年逃亡刘宋，打算东山再起，结果却被杀了。

冯弘事件导致北魏与高句丽的关系恶化。北魏太武帝打算征讨高句丽，但由于大臣的反对而没有成行。不过，北魏讨伐高句丽这件事绝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高句丽一方也很清楚北魏对自己的威胁。高句丽本来就与刘宋有联系，而在北魏强盛的时候又与北魏建立关系。高句丽在南朝与北朝之间来回周旋，以此寻找机会来扩大自身势力。

北魏于439年统一华北，同年高句丽给刘宋送了800匹马，这是一份大礼。马匹拥有很强的军事色彩，由此可以推测，长寿王由于害怕强大的北魏，希望刘宋能对北魏采取军事行动。只要能够稍微削弱过分强大的北魏的势力，对高句丽来说就是好事。

另一方面，高句丽也加强了对新罗的压迫。1979年，韩国忠清北道出土了一块中原高句丽碑。据考证，这块碑的建造时间是5世纪上半叶。在碑文里，高句丽把新罗王称作“东夷寐锦”。当时的新罗君主

尚未自称为“王”，寐锦是5世纪新罗最高领袖的称号之一。新罗第一个自称“王”的君主是6世纪上半叶的法兴王。高句丽把新罗称为东夷，也就是东方的野蛮人，这表明高句丽建立了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中华思想”，把新罗视为夷狄。这是高句丽试图建立一种有别于中华的国际秩序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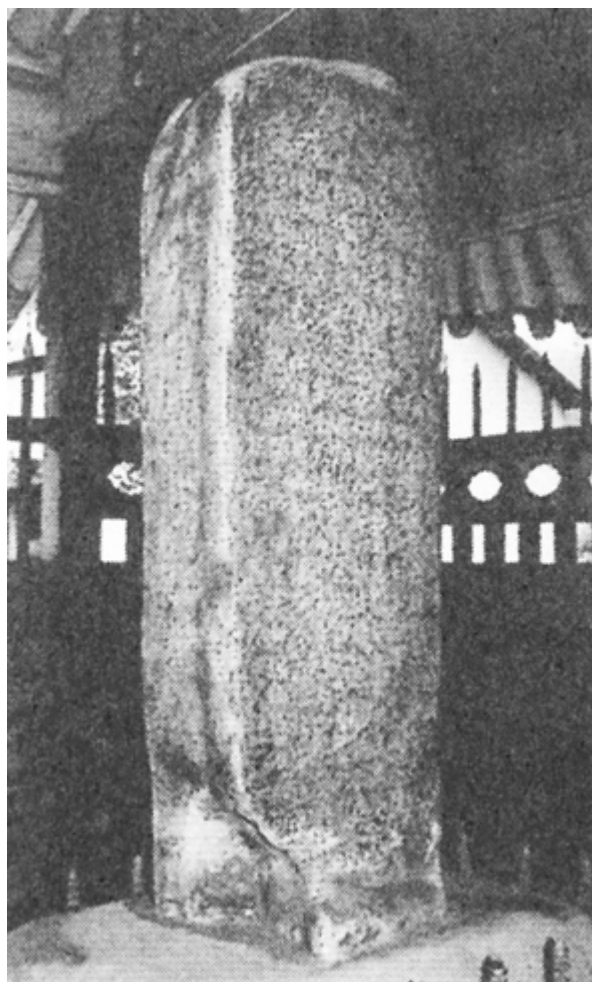


图2-1 中原高句丽碑

百济当时的君主是毗有王。在他即位后不久的428年，百济曾接待过倭国的外交使节，但在那以后就没有了关于百济与倭国外交的记载。熊谷公男由此推测，在那个时期百济与倭国的关系变得疏远了。

确实，下一次百济与倭国间进行外交活动已经是461年，其间有30年以上没有来往。在毗有王的祖父腆支王的时代，百济与倭国是军事同盟，彼此间有着积极友好的关系。与之相比，这种关系在毗有王时期变得相当消极。

毗有王的在位时期是427～455年，这与倭国和百济间外交断绝的时期几乎重合。由此看来，似乎是毗有王改变了对倭国友好的外交方针，而在他死后两国的外交才得以恢复。

另一方面，百济在433年向新罗派遣了和亲使节。自两国在373年决裂以来，已经经过了整整60年。次年，百济向新罗赠送了马匹和白鹰，新罗则回赠了黄金与宝石。在这个时期，百济试图与臣服于高句丽的新罗接触，而新罗也给予了正面的回应。一方面高句丽加强了对新罗的压迫，另一方面新罗开始尝试寻找脱离高句丽而自立的方法。

百济与倭国的关系走上绝路了吗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认为，毗有王否定了此前与倭国的友好关系，转而致力于构筑与新罗的关系呢？

确实，两国之间没有进行正式的外交活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交流就此断绝。证明这一点的正是倭国与刘宋的外交活动。

在毗有王在位年间，倭国分别于430年、438年、443年、451年四次向刘宋派遣外交使节。从倭国前往刘宋，需要先到达朝鲜半岛西岸，然后北上横跨黄海，到达山东半岛后再南下。百济位于朝鲜半岛西部，如果没有百济的帮助，倭国的使者就无法到达刘宋。

在毗有王的统治时期，百济虽然没有与倭国进行外交活动，但肯定为倭国与刘宋的外交活动提供了帮助。虽说百济没有采取积极的外

交行动以强化与倭国的关系，但双方的友好关系并没有断绝。百济当时的做法更有可能是以与倭国的关系为基础，进而构筑与新罗的关系，从而达到对抗高句丽的目的。

此外，百济在440年时隔十年再次向刘宋派遣了使节。这大概是因为前一年高句丽向刘宋赠送马匹的事件引起了百济的警惕。自4世纪以来，百济一直在密切留意高句丽的军事动向。

由于北魏的存在，高句丽应该无法通过陆路抵达刘宋，因此只能从辽东半岛出发，渡过黄海到达山东半岛。高句丽把800匹马送给刘宋，应该动用了一支颇为庞大的船队，百济的警戒系统很可能察觉到船队的移动，但他们并不知道船队的目的。百济很可能是为了确认高句丽与刘宋进行外交的目的而紧急向刘宋派遣了使节。

高句丽和百济相继遣使，而刘宋此时正致力于强化对北魏的包围网，这正好是刘宋确认两国能成为包围网一员的机会。北魏的动向对东亚局势产生了确切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并不那么直接。

济的到来——他与赞、珍不明确的血缘关系

在百济实施与新罗协同的外交政策的同时，倭国在朝鲜半岛采取了一种很不一样的做法。

《三国史记》记载倭国在440年、444年两次入侵新罗。《日本书纪》也出现了讨伐新罗的记录，而当我们修正《日本书纪》的纪年后，这件事应该发生在442年。《日本书纪》记载倭国军队在新罗的计谋之下把攻击的对象指向了大加耶。倭国到底是不是单纯地改变了攻击对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尚存疑问，但是这一则记录确实说明了当时倭国军队的一些情况。

我们认为当时倭国军队的结构是由豪族担任将军，他们分别指挥各自的部队参加战争。同时这些豪族也分别构建他们与高句丽、新罗等国的关系。面对高句丽的时候，整个倭国保持一致的立场，但面对新罗、加罗等国时，每个豪族都有各自的立场，因此他们可能不容易产生全军统一的意见。如果确实如此，那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新罗是利用了倭国军队里跟本国关系密切的豪族，让他们阻止倭国军队入侵新罗。

《三国史记》和《日本书纪》记录的年份存在差异，但毕竟是不同的史料，这种差异是可以容忍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倭国在5世纪40年代初发动了对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之所以要这么做，很可能是因为不久前（438年）即位的珍看到百济与新罗建立了友好关系，担心这一发展会影响到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希望能通过军事行动来强化自身的权力。

在这种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倭国于443年向刘宋遣使。然而，这时候派遣使者的倭国王并不是珍，而是济。这么说在这个时候珍应该已经死去，济已经接替他当上了王。

济大概也是在即位以后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力基础而马上向刘宋派遣了使节。我们可以认为他遣使的目的是获得刘宋的官爵，并通过这种方法得到与先王同等的地位。结果，珍的遣使只有438年这一次，他在位的时间也应该只有五年而已。

《宋书》并没有记载济当时请求获得的官爵，这说明他的请求应该并不过分。珍得到的官爵是安东将军、倭国王，那么济要求的大概也是安东将军、倭国王而已。

然而，珍与济之间的王位继承却存在极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珍和济两个人之间似乎并不存在近亲关系。

《宋书·倭国传》中明确记载赞与珍是兄弟，却没有记载珍与济的关系。济依然使用了倭作为姓氏，无疑他跟此前的倭国王属于同一家族。但是既然他没有对刘宋说明自己与珍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推测，他与珍并没有相当亲近的血缘关系。由此可见，倭国的王位在赞传给其弟珍之后，似乎并没有继续在他们的近亲中继承下去。

针对这一问题，最合乎常理的解释就是珍没有儿子，因此远亲的济一族继承了王位。然而当时的倭国王权并未发展成熟，很难保证这样的王位继承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

《日本书纪》描述的惨烈战争

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第16代仁德天皇死后，围绕王位的继承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斗争。这场斗争始于第17代履中天皇，结束于即位于480年的第22代清宁天皇，持续了六代天皇。履中天皇正是此前一直被认为与倭五王存在深刻关系的人物。对于这场斗争，《日本书纪》的记载是这样的。

履中天皇即位的时候，他同父同母的弟弟住吉仲皇子反叛，另一个同父同母弟弟多迟比瑞齿别（即后来的第18代反正天皇）派隼人杀害了住吉仲皇子。履中天皇在位六年后死去，继位的反正天皇在位期间没有发生过王族争位的事情，他的统治一直处于和平状态。然而到反正天皇继位五年后去世的时候，却出现了两位王位继承人，那就是后来的第19代允恭天皇和大草香皇子。

豪族们一致支持允恭天皇，他因此得以顺利继位，然而这一则记载也暗示了当时存在允恭天皇和大草香皇子双方竞争的事实。允恭天皇统治了足足42年。

允恭天皇死后，其太子木梨轻皇子由于与亲妹妹轻大娘皇女乱伦等备受争议的行为而倒台。第20代安康天皇逼死了木梨轻皇子，他即位后又诛杀了当年与父亲允恭天皇争夺王位的大草香皇子。大草香皇子之子眉轮王为报杀父之仇杀害了安康天皇。安康天皇的弟弟大泊濑皇子怀疑自己的两个哥哥白彦、黑彦皇子与此事有关，于是杀害了眉轮王与两位皇子。

大泊濑皇子还借口邀请履中天皇之子市边押磐皇子打猎，在途中将其射杀，又对其弟弟御马皇子问罪并处刑。之后他继承了王位，即第21代雄略天皇。雄略天皇死后，星川皇子专权用事，惧怕其权力的大伴室屋等人放火烧死了星川皇子。在此之后清宁天皇继承了王位。

我们必须慎重地考量《日本书纪》记载的这一系列事件到底具有多少真实性。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记录透露出5世纪的王族围绕王位继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王统的移动——倭隋与倭济

我们现在继续说济向刘宋的遣使。在珍之后继承王位的济应该原本就拥有颇大势力，起码他的力量足以与珍匹敌。然而当我们考虑珍去世的情况时，就会发现如果济要成为新的王，首先必须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倭国王一族之中能与珍匹敌的人物并不是只有济一人而已。满足这一条件的除了济以外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倭隋。

珍一方面希望能与高句丽王、百济王并肩，让倭国成为东亚的大国；另一方面，他自然不希望国内出现能与他平起平坐的强权人物。然而现实却是他无法忽视以倭隋为首的强大王族集团，不得不向刘宋皇帝推荐倭隋，授予倭隋平西将军的官职。平西将军是足以与安东将

军匹敌的职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倭国王倭珍与平西将军倭隋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关系。

我们并不知道倭珍是如何死去的。不少学者结合《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进行了种种猜测，但这些说法都缺少证据。然而，珍的近亲确实没能继承他的王位，成为下一任倭国王。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种：珍没有适合继承王位的近亲，或者他的近亲跟他一起死去了。无论出于哪种原因，最终是济继承了王位。

倭济在血缘上与倭珍并不是近亲，他想要成为下一任倭国王就必须得到臣属于倭王权的王族与豪族的认同。具体而言，这些人就是得到珍的推荐、从刘宋获得将军号的人。在珍的朝廷里，尤其能够左右大局的就是地位仅次于珍的倭隋。换言之，在珍去世后，为什么能与他匹敌的倭隋没能继位呢？

济在443年向刘宋遣使，倭隋在这时候的动向有几个可能性。

其一，济可能在即位的时候已经拥有了足以凌驾倭隋的力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济一定经历了急速的权力扩张，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探讨倭隋与倭济的关系。其二，倭隋或许在倭珍死前就去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倭隋与倭济的即位就没有关系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思考倭隋一派的继承者的动向。其三，我们还不能排除倭济就是倭隋继承者的可能性。

总结起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倭隋与倭济究竟属于不同的势力还是同一势力。也就是说，到底当时存在第一大势力倭珍、第二大势力倭隋、第三大势力倭济，还是只有倭珍、倭隋两大势力，倭济继承并保存了倭隋的势力。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这一时期畿内古坟群的推移。5世纪时存在古市、百舌鸟两个能够产生大王的王族集团。结合考古学证据来看，倭隋与倭济属于同一集团的可能性似乎更加合理。由此看来，我推测济是与珍分庭抗礼的平西将军倭隋的近亲，大概倭隋先于珍去世，在他死后济继承了他的势力，并接替珍成为新的倭国王。

珍在位仅仅五年便死去，此后王统向倭隋、济一脉转移，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

倭国王的地方统治

与难以辨明的倭国中央政治动向相比，关于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我们能够找到可以提供线索的资料。

千叶县市原市的稻荷台一号坟是一座建于5世纪中期的圆坟。该古坟出土了一把刻有文字的剑。剑的正面刻着“王赐□□敬□”，背面刻着“此廷□□□□”。学界将之称作“王赐”铭铁剑。

由于铁剑身上的铭文残损甚多，我们在理解其内容时必须相当慎重。最值得注意的是表面开头的“王赐”二字。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大和的王授予地方豪族，可见铁剑是下赐之物。

关于铭文中的“王”字可以有两种解读。

第一种是平川南提出的，他认为只出现“王”字说明当时的人对“王”的身份没有争议。也就是说在5世纪能够使用“王”这一头衔的只有大和政权的盟主倭国王一人而已。其他人即便身为王族，也不能自称“王”，而王族的身份则通过倭这个姓氏加以区分。我们不妨在这一点上把倭国与百济加以对比。在百济，拥有权力的王族都得到了王、侯这些爵位的假授。与此相比，倭隋虽然似乎拥有能与珍匹敌的

权势，但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获得了王侯爵位的假授。当时的日本列岛上能够叫作王的人只有一人而已。

第二种是，铭文上面写的“王”并不是“大王”。铸造于5世纪下半叶的稻荷山铁剑和江田船山大刀上的铭文都有“大王”二字，而“王赐”铭铁剑则与它们不同。“王”这个称号与刘宋册封的“倭国王”更加接近，由此看来，通过册封获得的头衔似乎具有统治国内的功能。



图2-2 “王赐”铭铁剑

但是我们要注意，铭文上写的并不是“国王”。对刘宋而言，“国王”与“王”存在明确的区别，但倭五王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们对册封制度的理解尚且存在不足。虽说如此，他们确实把从中国获得的称号用在了构筑与国内豪族的关系之中。这一点意义重大。我们难以断定铭铁剑上的“王”到底是五王中的哪一个，但既然铭铁剑铸造于5世纪中期，那很有可能是珍或者济。

反高句丽浪潮

通过443年的遣使，济获得了刘宋的册封，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倭国王。济虽然来自与珍不同的王统，但刘宋还是认可了他对前任国王权力的顺利继承，授予了他和珍一样的官爵。

虽然王统出现了变化，但倭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立即发生转变。或许反而正是因为王统的更迭才更加需要顾及日本列岛上众王族、豪族的利益而延续原有的外交政策。上文提到，倭国对新罗的军事行动一直延续到444年，这么看来倭国很可能从珍的时代开始就持续对朝鲜半岛发动积极的攻势。不过，到了444年以后，倭国对新罗的攻势暂时停止了。

450年，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刘宋本来在文帝的统治下经历了被称作元嘉之治的太平日子，但在450年遭到北魏南下入侵，刘宋军大败于北魏军。北魏军在战胜后撤退了，因此刘宋暂时还继续统治着山东半岛。然而经此一役，刘宋的国势转为衰落。

与此同时，新罗开始明确表现出反叛高句丽的信号。

高句丽在迫使新罗臣服以后，向新罗派遣了将领对其加以监视。450年，这名将领在野外打猎时，被新罗城主三直杀害。高句丽长寿王对此极为愤怒，立即向新罗派遣了军队。最终新罗国王訥祗麻立干向

高句丽道歉，从而避免了冲突。然而这件事的背后明显存在上文提到的新罗与百济交好的因素。

新罗的这一行为向朝鲜半岛内外宣示，5世纪上半叶之前的新罗与高句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

同年，百济向刘宋遣使，要求获得《易林》、《式占》和腰弩。《易林》和《式占》都是占卜书，腰弩则是靠脚和腰部力量把弦拉开的弩。百济之所以要获得弩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很可能是要用来在战场上与高句丽对决。由此可见，百济与新罗交好以后，已经做好了在不久以后与高句丽对决的准备。

3. 济的第二次遣使与兴的登场——不明确的王位继承

451年，济第二次遣使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济于451年再次向刘宋遣使。

这是济时隔八年再次向刘宋遣使，然而当时的刘宋在经历过北魏入侵后尚未完全恢复。刘宋遭受强烈打击后重整国家制度，以强化对北魏的包围网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倭国使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刘宋。对刘宋而言，这正好是宣传皇帝权威恢复的好机会。

倭国为何要在此时派出使者呢？其实这个时候倭国有两件需要与刘宋交涉的事情。其一，济的属下有多达23人想要获得官职。其二，济想要成为第一个当上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倭国王。这两点是探明倭国目的的重要线索。

我们首先分析第一点。济在此前对23人假授了官职，为此需要刘宋方面的正式任命。《宋书·倭国传》并没有记载具体的官职名称，只记录了“军郡”二字。这里的“军”指将军，“郡”指郡太守。正如上文所说，百济对贵族阶层授予王侯的爵位，对府官则授予太守的官职。由此类推，济推荐的23人中应该也有日本列岛中拥有权力的豪族和担任府官的渡来人两种。这次遣使的主要目的应该就是请求给予他们正式的任命。

王在位期间为多名部下请求任命的例子有495年百济的遣使。当时百济请求刘宋授予一些在与高句丽战争中立下功劳的贵族和府官将军号、王侯爵位以及太守官职。当时是东城王在位的第17年，因此并不是新王即位后为了显示王的权威而进行的假授。也就是说，当时的东

城王是为了奖励有战功的贵族与府官，才向刘宋遣使要求官爵的任命。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济统治下的倭国也存在论功行赏的必要。那么，这是针对什么事件的行赏呢？可以想到的是444年济刚刚即位后对新罗的进攻。也就是说他请求对在这次战争中立下战功的王族、豪族、府官进行任命。

此外，我们还可以推测此次遣使与443年遣使时没有提出承认豪族们的假授有关。有可能济在443年遣使时出于某种原因暂时把对豪族的假授延后，最终在451年才得以实施。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济应该是在451年才总算巩固了自己作为倭国国主的地位。

济“升格”了吗

接下来我们分析济本人获得新官爵的问题。

不过，首先要解决一个与史料相关的问题。史料中对济在451年官爵的描述出现了矛盾。

济在443年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倭国王，然而《宋书》的本纪部分却记载他从安东将军、倭王升格为安东大将军。《宋书·倭国传》则说刘宋认可济担任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但将军号仍然是安东将军。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宋书》本纪部分记载济是倭王，这比倭国王高了一级，而从《宋书·倭国传》的内容来看，他此时应该仍然是倭国王，不知哪一种说法才是事实。其二则是济到底有没有成为安东大将军。在王的称号与将军号两点上，《宋书》的本纪与《倭国传》出现了矛盾。

关于这两个问题，学界主要有四种看法：认为《宋书》本纪正确（高宽敏），认为《宋书·倭国传》正确（宫崎市定、西嶋定生），认为存在先后两次任命（坂元义种、荆木美行），认为史料存在讹误（石井正敏）。这四种说法中最值得介绍的是两次任命说。这种看法即，刘宋首先任命济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倭王，之后又在同一年将其从安东将军升为安东大将军。这种说法整合了两处史料的矛盾之处。

如上文所述，济提出了任命23人为军郡的请求。在为部下请求任命的同时，他必然也为身为统帅的自己请求了任命。济当时已经是安东将军、倭国王，那么他要求的应该就是珍当年没有获得准许的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了。然而当时他应该没有获得安东大将军的任命。在济之后担任倭国王的兴受册封的时候也是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倭国王，由此可以推测此时济的将军号应该也只是安东将军而已。

东亚诸国的新王即位的时候，都会继承前任王的官爵。百济毗有王（余毗）即位的时候，刘宋的做法是“以映爵号授之”。腆支王（余映）的官爵是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毗有王正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这些头衔。毗有王之后的盖鹵王（余庆）即位时获得了镇东大将军的任命。由此看来，起码就将军号而言，把先王的将军号赐予新王是通例。

济之后的兴获得的官爵是安东将军、倭国王，关于这点我们在下文将会详细叙述。如果济获得了安东大将军的任命的話，那兴应该也会对此提出要求。由此可见，济最终拥有的将军号与王号应该还是安东将军、倭国王。《宋书》本纪出现的“倭王”处应该是漏写了“国”字，至于安东大将军的任命，应该是济对此提出了请求，而编撰《宋书》时史官将其误记为任命。

六国诸军事的要求与除正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济这一次外交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获得了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官职。这是珍当初没能够完成的外交任务。

然而，刘宋方面却对授予济的六国诸军事官职所指的范围做出了调整。珍在438年向刘宋要求的六国是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济在451年要求的也是一样。

倭国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六国之中的任那其实就是过去的弁韩，秦韩就是辰韩，慕韩就是马韩，这是3世纪以来存在的三韩。百济和新罗本来是马韩与辰韩之中的小国，后来发展成了强国，但在当时尚未能够统一马韩和辰韩。由此看来，倭国提出的六国其实就是朝鲜半岛上没有向高句丽屈服的全部地域。济和珍的目标都是要成为反高句丽联盟的盟主。

刘宋认可的六国则与倭国的请求有着微妙的差异。刘宋授予官职的六国是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在这里百济的名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加罗。

刘宋之所以不把百济包括在内，石井正敏认为是因为刘宋此前一直授予百济王都督百济诸军事的头衔，而且百济王的将军号是镇东大将军，比倭国王的安东将军高，因此刘宋方面很难认可倭国王在百济王所统治的百济拥有军事权力。虽然坂元义种认为这种做法是可行的，然而我认为石井正敏的说法更加妥当。

另一个问题在于为何用加罗取代了百济。此前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刘宋在去除百济之后为了凑数才加上了加罗。然而，倭国并没有对加

罗提出要求，刘宋反而把加罗加入头衔之中，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任那”——不同的认识

说起来，任那到底是什么呢？古时候人们认为任那就是加耶地区整体的一个称呼，加耶也叫加罗。这种理解其实会造成一个矛盾。那就是倭国请求得到名为任那的加耶全部区域的军事权，刘宋则对倭国授予了任那和加罗的军事权，这两个名字指的又是同一个地方。虽说加耶并不是刘宋能直接控制的区域，但刘宋办事总不至于马虎到这种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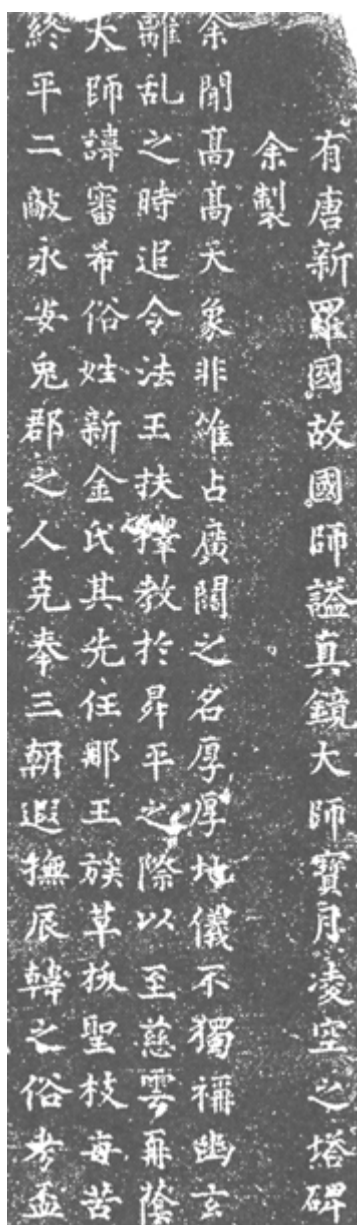


图2-3 真镜大师碑

因此，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任那这一名字所指代的地理区域。最近学界有一种说法为，任那是对处于加耶地区的强国金官国的称呼（田中俊明）。这种说法引用的一处证据是凤林寺真镜大师宝月凌空塔碑的碑文，里面有“大师諱審希，俗姓新金氏，其先任那王族”这句话。新金这个姓氏是532年金官国向新罗投降之后，新罗赐给金官国王族的姓。新罗王族本身姓金，因此取了新金这个姓氏来加以区分。

碑文说真镜大师的出身是“任那王族”，这里指的就是金官国的王族。

然而，任那一词却并不一定指金官国。《日本书纪》钦明天皇二十三年正月条中就说“总言任那，别言加罗国、安罗国、斯二岐国、多罗国、卒麻国、古嗟国、子他国、散半下国、乞飡国、稔礼国，合十国”。这一条记事发生在金官国灭亡之后，因此金官国的名字没有出现，但很明显这里的“任那”指的是加耶地区全部区域。

所以说任那有金官国和加耶全部区域两种意义，我们应该如何整合这两种词义呢？首先要注意的是，朝鲜史料中任那指的是金官国，日本史料中任那指的则是加耶全部区域。

如果我们重视朝鲜史料的话，那么任那一词本来指的就是金官国，而倭国最早其实也是把金官国看作任那的。我们其实也可以认为，由于倭国一直通过金官国，也就是任那，与加耶地区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因此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用任那指代加耶诸国的用法。这种把小地名的含义扩大的做法在日语中有一个很常用的例子，即本来指代加耶地区的kara（加罗）一词在后来扩展到指代整个朝鲜半岛的kara（韩），到最后连中国也叫作kara（唐）了。

由此看来，珍与济提出军事权的时候说的任那一词应该不是指金官国，而是包括多个国家的整个加耶地区。如果这里的任那是金官国的话，那给人的印象就是倭国只在意金官国的军权，而对安罗国等加耶地区的其他国家毫无兴趣。广开土王碑里记载了倭国与安罗国的协同行动，可见两国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很难想象倭国向刘宋请求都督六国诸军事官职的时候会漏掉安罗。

刘宋眼中的任那与加罗

另一方面，刘宋理解的任那则是金官国的别名。

同时，刘宋还知道加耶地区除了任那（金官国）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势力日益增长的国家，即加罗国（大加耶）。我们可以推测出刘宋知道加罗国存在的理由。上文提到，倭国在5世纪40年代初计划进攻新罗，但受到新罗计谋的影响，转而把进攻目标变更为大加耶。之后百济介入其中，倭国停止了进攻。如果这一系列的事件都真实存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倭国曾经尝试在加耶内部展开军事活动。

百济有可能把这次事件的过程告知了刘宋，又或者是倭国为了强调自身获得加耶地区的军事权力的正当性而汇报了事件。如果我们认为此事与倭国23人获得官爵的事情有关的话，那么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应该更大。

无论出于哪一种原因，刘宋得知了5世纪40年代初发生在倭国与大加耶之间的军事接触，对大加耶（加罗）的存在也有了明确的认知。因此在451年倭国朝贡时刘宋不但认可了倭国在加耶地区任那（金官国）的军事权，还将加罗国（大加耶）也包括在内。倭国与百济在大加耶问题上立场不同，这一次可以说是倭国占了上风。

刘宋承认了倭国在加耶地区的两大势力金官国与大加耶的军事权，而倭国对其他加耶诸国也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其实就等于承认了倭国在加耶地区的地位。刘宋其实是把倭国请求中的百济剔除在外，同时又做出了一些调整，以在名义上满足了倭国对六国的要求。这么做大概也有一部分是为了强调刘宋的恩德，希望倭国能在军事层面上有所贡献。然而，对于实际上的军事权而言，倭国所要求的任那（加耶地区）与刘宋授予的任那、加罗（加耶的强国金官国与大加耶）实际上几乎没有区别。

同时，倭国还获得了正尝试摆脱高句丽影响的新罗及其周边的秦韩的军事权。新罗在5世纪40年代初与倭国产生了冲突，我们很难认为在那以后两国的关系走向了友好。然而，这并不是刘宋关心的问题。

《宋书》全文里出现“新罗”二字的只有授予倭国的这个“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头衔。刘宋最关心的外交问题是对北魏的包围网，新罗并没有进入这一包围网。

倭国对新罗的攻击

对于济而言，刘宋承认倭国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军事权应该是一大外交成果。然而，现实的东亚局势却是在混乱之上又变得更加紧张了。

北魏在450年南征以后基本上确立了在中国的优势地位。然而，北魏也无力在短时间内攻灭刘宋。

北魏太武帝想要对刘宋乘胜追击，但他被宦官杀害了。宦官们拥戴太武帝的幼子继位，然而没过多久也将其杀害。北魏官员对专横的宦官进行反扑，拥立了太武帝之孙文成帝。这些都是发生在452年的事情。北魏虽然在短时间内统一了华北，建立了强大的政权，但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对北魏而言最大的障碍是皇帝与鲜卑族的矛盾，皇帝希望在北魏推行汉化政策，将其转变为中华王朝，而鲜卑族则反对这种做法。另外一个大问题则是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因此，北魏并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针对外部的军事行动。

局势不稳的并不只是北魏而已，刘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453年，开创了元嘉之治、把刘宋国势推向高峰的文帝被皇太子杀害。皇太子即位仅仅三个月就因为杀害文帝而遭到讨伐，不久后被处刑。之后即位的孝武帝已经难以恢复过往皇帝的威势了。

由此可见，当时南朝和北朝都处于政变与混乱之中，双方都暂时无力推动国际局势。与此同时，百济等国的局势也陷入动荡，好像是看准了这一时机一样。首先是高句丽长寿王，他感到新罗的独立对自身不利而在454年攻击了新罗。次年三月，百济毗有王外出打猎，到了九月却突然离奇死去。到了十月，高句丽可能是由于得知百济王死去而入侵了百济，但新罗向百济派遣了援军。百济与新罗自433年以来就有联动的趋势，此时两国的同盟关系正式确立。高句丽对百济、新罗这一局面确立起来。

那么，倭国在这一局势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刘宋在名义上承认了倭国在新罗、加耶等地的军事权，此时倭国正将对新罗的军事行动变为现实。459年，倭国再次攻击新罗，派出了100多艘兵船围攻月城，但被新罗击退。之后倭国在462年、463年两次入侵，对此新罗在沿岸地区修建了两座城堡。新罗虽然力图摆脱北方高句丽的影响，南方的倭国却以从刘宋获得的名义军事权为理由入侵，这依然是个相当令人头痛的问题。

那么，百济与新罗的同盟在倭国问题上是否仍然有效呢？或者换个角度看，百济是否基于这一原因而放弃了自4世纪末以来与倭国的同盟关系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认为百济因此疏远了倭国。

460年，倭国向刘宋遣使。这次遣使并没有留下王的名字，但很有可能是济。我们也不知道这次遣使的目的是什么。然而，单单是派遣了使者这一事实就能说明，百济像过往那样对倭国渡海给予了帮助。

另外，百济在461年向倭国派遣了王弟昆支（《日本书纪》作军君）。这是自428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在文献里的倭国与百济间的外交，中间相隔了32年。更重要的是这次派遣的并不是普通使者，而是王族成员。中国史料在458年出现了余昆的名字。有学者认为昆支出使的真

相是他在百济内部的王族斗争中失败并被放逐。但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倭国收留百济王族的背后应该有倭国与百济之间的外交共识。

455年毗有王去世后，继位的就是那位拥有传奇命运的盖鹵王。在盖鹵王即位后，百济对倭国的外交政策再度转变。毗有王统治时也与倭国保持了友好关系，但他的外交政策毕竟比较被动。与此相比，盖鹵王则是积极地与倭国建立友好关系。作为这种新外交政策的一环，向倭国派遣王族也是相当有可能的。盖鹵王一边保持着与新罗的同盟，另一边再次强化与倭国的关系，以此作为与高句丽对决的资本。

对百济而言，与新罗结盟是为了对抗高句丽，而不是要对抗倭国。毗有王虽然给倭国提供了不少便利，但不可否认的是两国的外交确实处于停滞状态。在盖鹵王即位后两国的友好关系得以复苏。然而，为了对抗高句丽而联合起来的两个盟友——倭国和新罗之间却产生了对立，这使百济陷入了尴尬的局面。

462年，兴的登场

宋文帝遭到暗杀后，刘宋陷入了混乱的局面，孝武帝即位后局面暂时得到稳定，但皇族的叛乱还是相继发生，刘宋的国力不断衰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倭国使者于462年来到刘宋。然而，这次遣使与之前的外交活动并不一样，这一次是自称济的“世子”的兴汇报了济去世的消息。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济统治倭国将近20年。

我们可以认为，兴遣使的目的是报告倭国王济去世的消息，同时要求刘宋方面册封自己为新王。仅从这两点看的话，这次遣使与珍、济的第一次遣使并无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兴遣使时的立场。他作为遣使的主体，身份是倭国王的世子，这与珍、济的情况有所不同。描述珍遣使的史料是“赞

死，弟珍立，遣使贡献”，即珍在国内即位以后派遣使者。济的情况是“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在遣使的时候济已经自称倭国王了。也就是说，珍与济在第一次遣使的时候已经在倭国即位为王，向刘宋朝贡只是为了获得正式的册封。兴并不自称为王，而是以世子的名义遣使。

世子这一词语原本是诸侯继承者的意思，在古代则是天子的继承者。后来天子的继承者称太子，诸侯的继承者则称世子，以作区别。在宋武帝接受东晋恭帝禅让前不久，他被允许使用与皇帝同等的待遇，他的王妃改称王后，世子改称太子。由这一事例可知，东晋末期时太子与世子在制度上存在明确区别。

世子制度在刘宋的周边国家同样适用，如刘宋在430年任命北凉沮渠蒙逊之子为河西王世子，439年把吐谷浑（活跃于今西藏、青海一带的游牧民族）的族长封为河南王，其庶长子封为抚军将军，嫡子封为河南王世子。由此可见，刘宋把周边诸国的君主封为王的同时也会将其继承人封为世子。

然而，这些世子的性质并不都一样。以北凉为例，在刘宋册封世子以前，沮渠蒙逊已经在423年任命其子为世子。这与刘宋的任命无关，是沮渠蒙逊自己立的世子。简而言之，世子有两种，一是周边国家自己决定的继承人，二是刘宋正式承认周边国家选定的继承人，任命其为某王世子。

那么，东亚其他国家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能找到的一处事例是略早之前，在东晋时百济的例子。《晋书》本纪太元十一年（386）四月，余晖以百济王世子的名义遣使，东晋将其任命为使持节、都督、镇东将军、百济王。

余晖就是辰斯王，他即位的过程并不顺利。384年，近仇首王去世，长子枕流王继位。然而枕流王在次年，即东晋太元十年（385）十一月也去世了。《三国史记》记载，当时枕流王长子阿莘年幼，因此其叔父，也就是近仇首王的第二子继位，是为辰斯王。不过，《日本书纪》中却说年幼的阿花（阿莘）是被辰斯夺去了王位。如果辰斯王确实是通过夺位继承的话，那他的即位自然是不符合常规的。事实上，《三国史记》里也记载了阿莘是枕流王的太子，这与《晋书》中辰斯是百济王世子的说法存在矛盾。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辰斯的百济王世子的身份是有疑问的。

关于辰斯王的世子身份，我的解释是这样的。近仇首王死去后，枕流王继承了王位，并把儿子阿莘立为世子（《三国史记》作“太子”）。然而枕流王在不久后死去，年幼的阿莘没能继位，其叔父辰斯则当上了新王。我们不知道辰斯王是否篡夺了阿莘的王位，但他的即位肯定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他作为新王的立场并不稳固。

因此，辰斯声称自己是枕流王的继承者，以百济王世子的名义于386年向东晋遣使。东晋将他册封为王，他就能利用东晋的权威作为后盾，从而强化了自身的权力基础，进而即位为王。

从济到兴的王位继承发生了什么

回到正题。兴在和刘宋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与珍、济不同，并没有说自己已经即位，而是以世子的名义遣使。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针对兴的世子身份，我们可以做出三种解释。其一，刘宋可能在之前已经认可了他作为倭国王世子的地位。其二，济把兴任命为继承者，但没有获得刘宋的承认。其三，兴并不是济的继承者，但他在向刘宋遣使的时候自称为世子。

孝武帝向兴颁布了诏书，这是我们解答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

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藩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

值得注意的是，诏书的开头就出现了“倭王世子”四个字。

这四个字表明刘宋可能认可了兴作为世子的地位，这么看来，第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应该更大。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刘宋授予的王号是倭国王而非倭王。如果这是刘宋承认的世子身份，那应该称作倭国王世子才对。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兴自称“倭王世子”，孝武帝直接使用了这个称号并记在了诏书里。

兴以世子名义遣使这件事本身也很值得关注。正如上文所说，辰斯王作为百济王世子遣使的时候，他尚未即位为王。如果我们认为这一例子普遍适用的话，那么以世子名义遣使就意味着自称世子的人出于某种原因而难以顺利即位，要在获得中国的册封以后，利用中国的权威在国内即位。如果没有任何继承问题的话，那应该是先在国内即位，然后向刘宋遣使，获得刘宋的册封。也就是说，兴自称为世子这件事，本身就可能意味着出于某种政治因素，他的即位难以获得认可，他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才向刘宋派遣了使者。

从济到兴的王位继承或许出现了某种问题。兴可能与辰斯王一样，并不是意料之中的继承者。为此，我们要继续考察济与“世子”兴之间的关系。

在兴之后向刘宋遣使的是武，《宋书·倭国传》记载武是兴之弟。武的上表文也称济为“亡考”（亡父），由此看来，兴应该确实是济的儿子。然而即使血缘上是亲父子，两人在政治上的关系却并不一定和谐。自古以来也有骨肉相残的说法。重点在于，兴为何在对刘

宋展示世子这一政治地位时没有强调济与自己的父子关系。这一点似乎是解开世子兴身份问题的关键，但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让人信服的史料。

珍、济、兴的王权

济继承了珍的王位，兴又继承了济的王位，五王的地位由此传承下去。

刘宋授予赞的头衔安东将军、倭国王代代相承。在这个过程中，济对“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的索求获得了认可，这可以说是倭国国际地位的一次跃升。与高句丽、百济相比，倭国是较晚介入东亚国际关系的。我们可以认为此时的倭国总算在官爵上达到了不次于两国的水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倭国的权力扩张一帆风顺。

很早以前就有学者指出，济对珍王位的继承实际上是王统的转移。此外，理应是父子关系的济与兴之间的继承似乎也不稳定。

虽然这几位王都获得了刘宋的倭国王册封，但他们在国内的王位继承并非没有问题。当时的王位继承并不单纯是王在近亲中选定一个继承者，由该继承者顺利继承。实际上继承者与先王血缘关系的远近并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能否为周边的人实现倭国的利益。因此，当时的王位继承往往并不安定，即便近亲之间也不得不展开激烈的斗争。

第3章 倭王武的目标

——在激荡的东亚中

5世纪初不安定的国际局势在进入下半叶以后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巨大的旋涡，其影响波及整个东亚。这对倭国而言也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课题。

倭五王的最后一位——武是如何面对这种国际局势的呢？倭国从赞以来在东亚国际舞台积累的外交财富终于通过武的上表文结出果实。他的上表文是五王构筑的权力的总结，在研究5世纪倭王权时也不得不认真分析这篇上表文。我将在下文进行这一方面的分析，并探讨武的动向。

1. 武在478年的遣使——刘宋的低谷，与高句丽的对抗

高句丽再度南下

在兴向刘宋遣使的462年，东亚诸国的关系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之上，但这个局面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

刘宋相对于北魏的劣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刘宋为了挽回这一局面，让高句丽更紧密地站在自己的阵营里，于463年提升了长寿王的官爵，任命他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谓开府仪同三司，顾名思义就是拥有开府的权力，其仪（待遇）与三司（指司徒、太尉、司空，是宰相一级的官职）相同。由此，高句丽获得了名义上最高级的待遇。从刘宋获得这一级别待遇的只有仇池（420年确认）、北凉（421年）、吐谷浑（454年）、高句丽。刘宋正是由于穷途末路才将如此高的地位授予了高句丽。

然而，长寿王对刘宋的态度相当冷淡。如表3-1所示，高句丽在5世纪60年代多次向北魏遣使，其频率比向刘宋的遣使高得多。尤其是到了60年代后半，每年遣使已经成为常态。这自然是出于对北魏势力增强的戒备。

高句丽的目的是要与西边的北魏保持稳定的关系，并推进南下政策。对高句丽而言，当时最需要解决的外交难题是新罗。新罗对高句丽显示出越来越强硬的敌对姿态，为此高句丽于468年袭击了位于两国边境地区的悉直。对新罗而言，高句丽全力南下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为了抵御高句丽的势力，新罗在国境上的何瑟罗筑城，之后又于470年在朝鲜半岛中部修筑了三年山城，以此强化了防御体系。

表3-1 460~475年各国遣使的状况

	高句丽		百济		倭国
	北魏	刘宋	北魏	刘宋	刘宋
460					○
461	○	○			
462					○
463		△			
464					
465	○				
466					
467	②	○		○	
468	○				
469	○				
470	○	○			
471				○	
472	②	○	○		
473	②				
474	②				
475	百济王都陷落				

注：②表示一年内两次遣使，△表示获得了头衔，但无法确认是否遣使

对新罗的盟友百济而言，高句丽针对新罗的攻击也是一件大事。百济于469年攻击了其与高句丽的国境一带。这次军事行动可以被看作为牵制高句丽对新罗的入侵，是百济与新罗针对高句丽的协同行动。在这段时间，百济与高句丽的对立趋于尖锐，或许还发生了其他军事冲突。之所以说或许，是因为从盖鹵王即位的455年到467年这13年间的记录已经散佚了。

中原的局势也出现了变化。北魏于5世纪60年代中期重新开启了对刘宋的入侵，并于469年占领了山东半岛（川本芳昭）。对高句丽等国而言，山东半岛这一进出大陆的门户终于落入了北魏手中，大陆的局势明显向有利于北魏的一方倾斜。这一事件迅速地影响了国际局势，高句丽进一步倾向北魏。在472年以后，高句丽几乎每年都向北魏派遣两次使者。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防止北魏在高句丽南下攻击百济、新罗的时候干预三国间的事务。

百济接近北魏

对于一向重视与刘宋外交的百济而言，北魏的扩张与山东半岛统治权的转移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同时高句丽加强了对百济的攻势，这时候把希望寄托在刘宋身上已经变得不可取了。于是，盖鹵王在472年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断，那就是向北魏朝贡。

对百济而言，北魏与高句丽接壤，因此是能够帮助其逆转劣势的唯一一个国家。面对高句丽的南下，盖鹵王已经难以挽回局面，因此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北魏能出兵干预。他任命私署冠军将军、驸马都尉、弗斯侯、长史余礼和龙骧将军、带方太守、司马张茂为使者出使北魏，在上表文中诉说了本国狼狈的境况。由于当时百济没有获得北魏的册封，为了表示官职是盖鹵王私自授予的，因此在头衔里加上了“私署”二字。

我们应该关注使者的人选。从余礼的姓氏看，他应该是百济王族的一员，而且他拥有弗斯侯这一侯爵头衔，这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猜测的正确性。此外，张茂的官职是太守，他应该是百济收留的汉人遗民，负责实际的外交事务。由王族担任府官的做法与第1章的说明有所出入，但鉴于交涉内容的重要性，可能百济当时故意任命王族为府官，以此强调自身对北魏的重视。

百济向北魏呈上的上表文描述了本国与高句丽对抗的历史。为了能让北魏出兵，文章里有不少夸张之处，但只要有助于认识当时百济的形势的话，也不失为宝贵的史料。以下我将列举上表文的几个要点。

- 百济曾经击败高句丽的故国原王，还将其处刑，在最近的30年间却陷入了劣势。
- 高句丽与刘宋和北方的柔然保持良好关系，意欲对北魏不利。
- 高句丽在440年阻止北魏向百济遣使，还杀害了使者。百济方面有证据证明此事，在此一并提交。

百济方面在上表文中主要提出了两项主张。其一是自毗有王在位的5世纪40年代起，百济与高句丽的对抗变得更加激烈。其二，高句丽是个反复无常的国家，为此北魏有必要出兵讨伐。

百济败北，盖鹵王被处刑

然而北魏没有行动。百济方面把一具马鞍作为证据呈上，但北魏方面认为马鞍并不来自北魏，因此不予认可。高句丽虽然做出了一些对北魏不利的举动，但并不至于要为此讨伐高句丽，因此向高句丽出兵一事就此作罢。由此可见，高句丽积极与北魏进行外交颇有成效。此后，对北魏的反应感到绝望的盖鹵王再也没有向北魏朝贡。

当然，百济并不是只在北魏进行游说活动。百济使者在467年、471年访问刘宋，然而史料并没有记载这两次遣使的细节。

我们也不知道倭国在这段时间的动向。当时盖鹵王的弟弟昆支留在倭国，他理应起到维系两国关系的作用。然而，没有迹象表明百济向倭国要求过援兵，倭国也没有做出任何要支援百济的举动。

刘宋元徽三年（475）九月，高句丽长寿王任命逃亡至高句丽的百济人再曾桀娄、古尔万年为将军，二人率领三万人的军队攻击百济王都汉城。百济在当时已经和高句丽交战30年，国力大损。还有一种说法是高句丽用计谋使百济修建了许多土木工程，由此使百济人民变得穷困。盖鹵王派王族文周为使者，要求同盟国新罗派遣援军。然而，这时候的盖鹵王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派文周出使的另一个考虑是让他逃出百济，希望有朝一日文周能带领百济复国。

汉城在围攻之下抵抗了七天。这一点在《日本书纪》与《三国史记》中的记载是一致的，应该是事实。新罗答应了文周的请求并派遣了援军，却为时已晚。七天后，汉城陷落。

盖鹵王本来打算逃跑，却在路上被逮捕并遭到处刑。他的王后与留在城中的王子一并被杀。通过这次战役，长寿王成功为故国原王报仇雪恨，这是高句丽誓愿得以实现的一天。

武的登场——新的官爵要求

在劫难之后，百济人不得不拥立在外逃亡的王族文周为新王，试图重建国家。在盖鹵王被杀后的一段时间里，倭国并没有做出支援百济的大动作。当时倭国的外交活动表现为向刘宋的遣使。

《宋书》本纪中记载，刘宋昇明元年（477）“冬十一月己酉，倭国遣使献方物”。（己酉是误记，应为乙酉，详见下文。

《宋书》本纪又记载，在第二年（478）“五月戊午，倭国王武遣使献方物，以武为安东大将军”。《宋书·倭国传》则记载：“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综合两处记载，我们可知在兴死后武即位，武在478年遣使要求册封。

实际上这几则记载带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武到底是在哪一年登场的。但在这里我们先要讨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武在这次遣使中得到了什么。

478年的使者的确是武派遣的。武私自拟定了一些官职，并希望得到正式的册封。在武以前的王都是在第一次遣使时获得了官爵，而刘宋对武的应对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然而，他获得的官爵却有所不同。

只要关注武在此时要求的官爵，就不难看出他的目的相当明确。我们不妨将其与济和兴的头衔相比。济最初是安东将军、倭国王，后来升格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兴则是安东将军、倭国王。

在武要求获得的官爵中，首先倭国王并无改变。而在将军号上，武自称为安东大将军。在此以前倭王即位时获得的都是安东将军，武则要求获得品级更高的安东大将军，可见他对将军号的升格有着明确的要求。

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这一头衔是在刘宋授予济的六国之上又加上了百济。百济在475年以后陷入了明显的劣势，因此倭国希望趁此机会获得百济的军事权。此外，武还要求刘宋承认之前一直没有正式认可的开府仪同三司。如上文所述，刘宋在463年把开府仪同三司的头衔授予了高句丽，武之所以提出这项要求也是为了对此事做出应对。

从对百济的排序意识到对高句丽的对抗意识

上文提到，珍请求获得官爵时有意识地参考了百济王的官爵，而武遣使时则更多关注高句丽。可以说官爵对倭国王的意义从与同盟的排序意识转移到了与敌对国家的对抗意识。

面对武的请求，刘宋承认的官爵是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刘宋并没有认可倭在百济的军事权。

百济虽然都城陷落、盖鹵王被杀，但即位的文周王正意欲重振国家。我们不能确定刘宋掌握了多少有关盖鹵王被杀后百济情形的信息，但刘宋不会轻易把军事权授予倭国。此外，刘宋也没有认可开府仪同三司。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开府仪同三司是刘宋朝廷里级别最高的头衔，不能轻易授予；二是刘宋将开府仪同三司授予高句丽，目的是要利用对方，如果又授予武的话或许会激怒高句丽。

然而，刘宋在另一个方面认可了倭国的请求，那就是安东大将军。另外，刘宋任命武为倭王而非倭国王，即便武并没有对此提出要求。第1章已经提到，这两者都是升格的体现。刘宋一方面允许武升格为大将军，另一方面通过倭王这一头衔认同了倭国作为外臣对刘宋的利用价值。

刘宋授予武的官爵可以说是执行了胡萝卜与大棒的政策。一方面武获得的官爵与前任相比有了明显的提升，另一方面这大概无法让武完全满意。这是因为武的官爵与高句丽相比明显落了下风。

谁派遣了477年的使者

与此前一样，武在478年遣使是为了接受官爵的册封。可以说这次遣使达成了该目的的最低要求。然而问题在于前一年的遣使。

史料只记载了477年“倭国”朝贡，而没有记载王的名字。478年遣使的王毫无疑问是武，但我们无法明确判断在477年遣使的是不是他。

遣使的频率也与过往不一样。距离477年最近的一次遣使是在462年，也就是兴请求册封的时候。在这两次之间的15年中倭国都没有向刘宋派遣使者。如表3-2所示，这是倭五王遣使的历史里间隔最长的一个空白期。与之相对的是477年、478年连续两年遣使。在倭国与中国进行外交的历史里，间隔15年与连续两年朝贡都是特例。倭国内部可能出现了某种问题。

表3-2 倭五王的外交频率

公元纪年	刘宋年号	派遣者	出处
421	永初二年	赞	《倭国传》
425	元嘉二年	赞	《倭国传》
430	元嘉七年		《文帝纪》
438	元嘉十五年	珍	《文帝纪》
443	元嘉二十年	济	《倭国传》
451	元嘉二十八年	济	《文帝纪》
460	大明四年		《孝武帝纪》
462	大明六年	兴	《孝武帝纪》《倭国传》
477	昇明元年		《顺帝纪》
478	昇明二年	武	《顺帝纪》

注：派遣者留空处表示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派遣者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477年的遣使？学界围绕这一问题存在多种见解。

第一种观点为477年的遣使是史料的误记，实际上并未发生（铃木英夫）。第二种观点为477年与478年两次朝贡的使者是同一个人，派遣他出使的是武（广濑宪雄）。第三种观点是武分别在477年、478年派遣了不同的使者（横山贞裕、前之园亮一）。第四种观点则为477年

遣使的是兴，478年遣使的是武（坂元义种）。这些观点基本上涵盖了全部的可能性。那么到底哪一种看法是正确的呢？

先直接说结论。我认为，第四种观点，即兴在477年遣使、武在478年遣使是正确的。以下将论证各种观点的正误。

首先看第一种说法，即477年遣使是史料误记，实际上并未发生。477年遣使记载中有“（昇明元年）十一月己酉”。这是一个明确的日期，也就是说条文的背后存在具体的记录。如果只是因为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存在难以解释的事情就否定史料本身的价值，那么基于史料研究历史的史学就无法作为一种学问立足了。当然并不是所有史料都反映了历史事实，但如果要说某一则史料并非事实，最起码要能够说明清楚为何产生了这样的错误。

第二种说法，即477年与478年的使者是同一个人的说法能否成立呢？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倭国使者就在刘宋停留了七个多月的时间，他首先到达刘宋，之后谒见皇帝，《宋书》的本纪与《倭国传》都把这个过程记录成了两次朝贡。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存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略显琐碎，但对解答该问题相当重要，因此下文将详细探讨。

首先，477年与478年的两次朝贡都有“献方物”的明确记载。朝贡的日期应该就是刘宋接收贡品时记录的日期。

我们可以关注这些日期。477年遣使的日期是“十一月己酉”，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九日，但这个日期应该存在误记。《宋书》本纪中在己酉（二十九日）之后又出现了丙午（二十六日），这是很不自然的。唐代整理的南朝地方志《建康实录》则把此事记载为“乙酉”（五日），这应该才是正确的，己酉是乙酉的误写。无论如何，可以确认的是倭国朝贡一事有着精确到日期的详细记载。

与之相对，478年遣使的日期是“五月戊午”，戊午是十二日。在这个日期发生的事情应该就是“倭国王武遣使献方物，以武为安东大将军”。虽说我们可以认为收到贡品与授予官爵是两则记录，但按照外交礼仪，外交使节谒见皇帝，向皇帝献上贡品，之后皇帝应该授予赏赐。从礼节的流程来看，把献方物与册封看成同一天的事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总而言之，如果认为477年与478年是同一次遣使的话，那么就无法解释使者为何在两个时间里献上了贡品。献方物这件事既然有明确的日期记载，那么就是有根据的记录。另外，把一次朝贡误记为两次的说法也难以成立，因为昇明元年（477）十一月并没有戊午日，而昇明二年（478）五月也没有乙酉日。就算认为使者曾经打算回国，但在路上出了问题因此又折返，也无法解答两次献方物的问题。因此，昇明元年十一月的使者与昇明二年五月的使者明显不是同一人。

为什么间隔只有半年

我们来探讨一下第三种说法，即477年、478年的两次遣使都是武发起的。回顾武获得册封的过程，首先是武自称“倭国王”并向刘宋遣使，之后刘宋册封武为“倭王”。《宋书》本纪部分提到478年遣使时明确记载了“倭国王武”。武应该是在昇明二年五月献上方物的时候同时获得了安东大将军和倭王两个头衔。也就是说，477年遣使时武并没有得到册封，因此那一次遣使并非由武发起。

另外，武在478年获得的安东大将军是他得到的第一个将军号，这一点也能成为佐证。《宋书》在记录第一次任命官职的时候使用“为”字，而如果是官职的晋升则使用“进”字。478年授予武官职的时候用了“为”字，证明这是第一次授予。假如武在477年已经遣使过一次，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何他在那个时候没有获得官爵？

有没有可能武在第一次遣使的时候没有获得刘宋的官爵呢？我们不妨看看此前四王的例子。

赞、珍、济、兴都是在第一次遣使的时候就获得了官爵。没有理由认为只有武在第一次遣使时不被礼遇。反过来，正如前文所述，刘宋对武其实是相当礼遇的。

由此看来，477年遣使应该并非由武发起，也就是说第三种说法不能成立。武应该是在478年首次向刘宋派遣使者，并获得了官爵。《宋书·倭国传》提到兴死后武自称了几种官爵并遣使朝贡，刘宋向他授予了正式的头衔，这两处记录正好可以综合起来理解此事。

那么，为何两次遣使的间隔只有半年之短呢？从倭国的状况我们能看出一些端倪。倭国之所以在间隔15年后遣使，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应该是与百济灭亡有关，很有可能是要向刘宋报告与高句丽对决的事情。然而当时倭国王突然去世，因此新即位的武又一次向刘宋派遣了使者。

2. 武向刘宋皇帝上呈的上表文

上表文描述的5世纪下半叶的世界

武派出的使者向刘宋皇帝呈上了一篇很长的上表文，《宋书·倭国传》记载了这篇文章。这是一则重要的史料，如果要理解5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局势，就一定不能忽视这则史料。下文将引用武的上表文并译为现代汉语。

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径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篲。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

【一】倭国受刘宋册封，处于偏远的地方，以藩国的身份，处于刘宋的海外。过去我的祖先就亲自披上铠甲，翻过大山，渡过大河。向东征讨毛人的五十五国，向西让夷狄的六十六国臣服，又渡过大海，安定了半岛上的九十五国。刘宋皇帝的王道安定，土地也扩张到远离都城的地方。自祖先以来世代朝贡，从来没有错过日期的。臣

（武）虽然愚钝，在惶恐之中继承王位，但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还是一心向着刘宋。倭国朝贡的路线要经过百济，在国内也准备好了船舶。

【二】然而高句丽却违背道理，企图吞并周围的国家，派兵侵略了边境地区，不断杀害人民。因此经常导致倭国向刘宋朝贡的使者无法顺利到达，失去了朝贡的机会。使者就算想要前往刘宋，道路也是时而通畅时而堵塞。亡父济看到高句丽阻挡了前往刘宋的道路，感到非常愤怒，百万弓兵被他感奋激发，正准备大举进攻高句丽。然而这时候我的父兄都去世了，以致本来马上要成功的事业没能达成。之后由于我要为父兄守丧，没能发动军队。

【三】因此我暂时让军队停了下来，未能击破高句丽。至今为止我一直在训练军队，希望能达成父兄的愿望。正义之师为了达成文武之功，即便白刃在眼前相交也面不改色。我希望能在皇帝的恩德之下击败强敌高句丽，让危险得以平息，让此前的事业不至于白费。

【四】我私自自称开府仪同三司，另外还给属下的其他人假授了官职，希望以此鼓励他们的忠诚。

这篇上表文是记录了倭国周边情况的宝贵史料。其内容包含了多方面的信息，因此也存在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学界对上表文做出了各种解释。现在我们先关注上表文的结构与目的。

上文现代汉语部分将文章按照内容的结构分成了四部分。第一部分强调倭国长期以来受刘宋册封，也一直尽忠职守，两国关系一直到武为止都相当良好。

第二部分控诉高句丽为了侵略周边国家而阻碍了倭国外交使节的派遣，以致倭国向刘宋的朝贡出现了问题。之后叙述了倭国曾计划出兵攻打高句丽，结果由于济、兴的死亡而没能实现。

第三部分说明了现在的状况，再次向刘宋提出必须讨伐高句丽。

最后，武在第四部分阐述自己在倭国内部假授了官职，希望能达成目的。《宋书·倭国传》里没有记录具体假授的情况，大概是在收录的时候省略了，上表文原本应该在这一段之后附有请求承认假授官爵的内容。

从上表文看兴的死及针对高句丽的意图

如上所述，478年的遣使无疑是在兴死后由武主导的，而477年的遣使应该不是武的所为。在武的上表文中也有体现这种王位继承的语句，即“居在谅暗”这句，这是思考兴之死以及武的即位时不能忽略的重要史料。

谅暗就是服丧的意思。儒家思想的行为规范被称作礼，礼重视家族伦理，在家族年长者去世的时候需要服丧。根据后汉经典《白虎通》的记载，父亲去世时应该服丧三年，兄长去世时应该服丧一年。

兴曾于462年遣使，也就是说济在那以前已经去世了，因此武不可能为济服丧，所以上表文中提到的谅暗应该是为兄长兴服丧。

然而，上表文中还出现了“奄丧父兄”这句话。一般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济与兴相继去世，兴在位不过数年，在此之后武就即位了。不过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就与谅暗的记录出现了矛盾。这种解释还会引申出一个外交上的问题，那就是武为什么没有在即位后马上向刘宋派遣使者。

这里我们不妨回顾倭五王向刘宋派遣使者的目的：王自身得到册封，获得刘宋的官爵，以及推荐王族、豪族获取官爵，从而加强王的

权威，再就是通过获得将军号得到任命府官的权力，从而对统治机构加以整备。

针对这一点，有一种说法为倭国在武的时代开始摆脱中国的权威。然而这种说法忽视了倭国与百济等国的关系。倭五王获得的官爵并不仅仅在倭国内部发挥作用，还有与高句丽、百济在东亚竞争中提高本国地位的目的。倭五王一直留意着百济与高句丽的官爵，并请求获得能与之匹敌的头衔。只要武没有放弃与百济、高句丽的竞争，那就不会仅仅因为不再需要利用官爵进行国内统治而停止遣使。武既然有要与高句丽对抗的意识，那他在即位之后就必然要马上向刘宋遣使，以要求得到册封。

也就是说，“奄丧父兄”这句话应该理解为兴在不久前去世的意思。如果477年的使者是兴派遣的，那么在使者出发后不久兴就死去了。

正因如此，倭国才会做出连续两年遣使（更准确地说是时隔半年遣使）这种与过往很不一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兴在派出使者之后就出于某种原因死去，武作为新王即位后，为了得到刘宋的册封就必须马上遣使，因此没等上一次的使者回国就派出了新的使者。

我们不知道兴为何在受到册封后整整十五年间没有遣使，这大概与兴即位的经历有关。另外，百济经历了短暂的亡国，这一国际形势的剧变也扰乱了倭国国内的形势，与477年遣使可能也有关系。然而，在那个时候兴却突然死去了。

虽然只是暂时的，但百济毕竟灭亡了，在这种局势之下，新即位的武不得不马上派出使者。在战胜百济之后，高句丽可能会大举南下。倭国依赖朝鲜半岛南部出产的铁，对倭国而言，高句丽南下难免让人联想起4世纪末的惨痛记忆，因此很有必要阻止高句丽南下，确保

能从百济、加耶获得稳定的铁的供给。然而百济实在无力，为了让局势向有利于倭国的一方发展，武必须让刘宋承认自己在朝鲜半岛南部七国的军事权，进而做好与高句丽对决的准备。换言之，478年的遣使既是为了获得册封，也是为了让刘宋认可倭国与高句丽开战。

高句丽征讨计划的真伪

与高句丽的对决是上表文的一大主题。文章中还强调这并不只是武面临的问题，而且是贯穿五王时代的外交任务。

上表文中提到了从济的时代开始的高句丽征讨计划，然而，这一计划到底是否存在呢？在上表文以前的时代，倭国并没有进行过针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武最终也没有执行这一计划。在倭五王时代里，倭国与高句丽之间并没有发生过战争。针对这一问题，学界分成了认同计划（铃木英夫）与怀疑计划（熊谷公男）两派意见。然而，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倭国有没有要执行计划的意愿。

我们还是要关注上表文的内容。上表文提到征讨高句丽的计划是在济的时代开始的，那么我们不妨回顾济在位的时候倭国与高句丽的动向。

长寿王即位以后的时代里，高句丽与百济发生直接冲突的记录并不多。可以确认的军事冲突是454年、468年高句丽攻打新罗与469年百济攻打高句丽。前者的起因是高句丽针对新罗独立动向的反制，后者则是百济作为同盟国向新罗发出的救援。

上文提到，百济向北魏呈上的文书中陈述了高句丽南下攻打百济一事，然而史料中却找不到能确认此事的记录。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没有留下记录就断言高句丽与百济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然而这是百

济给北魏的上表文，其目的是指出高句丽的暴虐行为，希望北魏能出兵援助，因此百济一方很有可能夸大了事实。

武在上表文中提到，由于高句丽的行为，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对高句丽堵塞通往刘宋的道路感到愤怒），因而制订了攻打高句丽的计划。然而，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我们推定为济在位的443～462年，高句丽发动过阻止倭国遣使的军事行动。反而在475年，也就是百济的汉城沦陷后不久，能与这句话对应的事件发生了：

三月，遣使朝宋，高句丽塞路，不达而还。（《三国史记》文周王二年）

这是《三国史记》的记录，说的是百济文周王在476年向刘宋遣使陈述本国形势之险恶，但由于高句丽的阻碍而不得不放弃。这次遣使或许与倭国也有关系。

次年（477），百济王族昆支被任命为内臣佐平这一重要职位，他此前一直滞留在倭国。昆支能够回到百济自然与倭国有关。我们不知道他回国的确切时间，但无疑是在475年以后，因为在那一年汉城陷落，重要的百济王族都遭到了处决。

倭国使者在477年能够抵达刘宋，这说明他们得到了百济的帮助并摆脱了高句丽的阻挠。476年百济遣使失败，而在第二年倭国遣使却获得了成功，这说明倭国在此期间又在帮助百济复兴。

由此我们可以确认高句丽在476年阻碍了他国的外交事务。反之，倭国在济的时代于443年、451年、460年三次朝贡，其间并没有遭到阻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武为了让刘宋承认他对高句丽实施的军事行动，把高句丽在476年的行为投射到过去，因此才有了上表文中关于济的记载。

篡改过去与自我立场正当化

通过歪曲过去发生的事件来将现在的做法正当化，这么做的并非只有倭国。

本书的序章中提到，高句丽曾在广开土王碑中叙述百济、新罗本来是高句丽的属国，这件事就是虚构的。本章的开头部分还提到了另一个例子，即百济在呈给北魏的国书中说高句丽杀害了北魏派往百济的外交使节，并借此声讨高句丽。然而，这件事情真实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

看来，为了让自己的做法看起来是不得已而为之，各国都曾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过去。

由此看来，我们不得不怀疑讨伐高句丽是否真的是济的政策。然而要说倭国从来没考虑过对高句丽采取军事行动的话，那似乎并非事实。

高句丽自468年以来与新罗、百济对抗，百济的盟友倭国也感到了强烈的危机感。可以想象，高句丽的南下将会侵犯倭国关于铁的权益。高句丽的南下在济的时代应该也是迫在眉睫的政治难题。

然而，兴却没有获得“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的头衔。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拥有反高句丽联盟的主导权。我们不知道兴为何没有对诸军事号提出要求，可能是因为兴通过政变即位，他的权力基础较为脆弱。另外，倭国时隔15年后在477年遣使，无疑与百济的衰落有关。反过来看，武在第一次遣使时要求获得的官爵正好反映了讨伐高句丽成了倭国当前的现实政治任务。

上表文的文化水平

武的上表文反映的并不只是当时东亚各国的外交关系，还有其文化水平。

4世纪到6世纪是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中南朝的文学尤为发达，被称作六朝文学。当时的文学并不只是一种独立的文艺，而且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由于按照当时的惯例，负责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能够担任官僚，步入仕途。反之，文章写得是否出彩也是评判官僚的一大标准。

当时的文章被称作骈俪文，是一种以四字句或六字句两两相对，使用对偶的手法以追求美感的文体，这种文体又被称作美文（福井佳夫）。能否写出优美的文章是当时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准。

外交文书也是一样的。把外交文书尽可能写成优美的文章是周边国家向中国宣传本国文明优于其他国家的重要机会。各国在书写呈给中国的外交文书时，为了能胜过其他国家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表文也是各国竞争的一个“战场”。

武的上表文的主体是四字的对仗句，文章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甚至被认为与中国人写的文章相比也毫不逊色。

而且上表文不只是形式工整，其内容也多有出典。优秀的文化人一眼就能看出文章中引经据典的部分。文章的作者必然对古典作品相当熟悉，其文字功力也能够驾驭这些内容。

当然，文章中并不会指出具体的典故，文章创作的原则是作者与读者都能理解典故在古典作品中的出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国家会被认可为“文明国家”。

出色的文书

上表文是以丰富的中国古典知识为基础写就的。下面我将列举至今为止已被发现的用典及化用的例子。

“躬擐甲胄，跋涉山川”这一句出自儒家经典五经之一的《春秋左传》，原句是成公十三年条的“躬擐甲胄，跋履山川”，两句的文字几乎一致。《春秋左传》中襄公二十八年条还有“跋涉山川”这句话，可见上表文的句子是两者融合而成。

之后的一句“不遑宁处”则出自五经之一的《诗经·国风》。“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来源于《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条，原文是“虔刘我边陲”，上表文中为了保持句子的工整而有所调整，但其用字基本相似。除此以外，上表文中还出现了众多来源于古典文学的词语（志水正司、田中史生）。

上表文的作者参考的并不仅仅是古典文学，还包括许多时代相近的文人的作品。比如东晋桓冲所写的上表文中就有“臣虽凡庸……请率所统”，与武的上表文中“臣虽下愚……驱率所统”的格式基本一样。

武的上表文中还出现了诸如“偏远”“寇仇”等桓冲上表文中用过的词语。另外《后汉书·朱浮传》中有“六国之时，其执各盛，廓土数千里，胜兵将百万”，其中出现了“廓土”和“百万”两个词。上表文中“廓土遐畿”“控弦百万”两句或许正是受其影响。

上表文中出现古典作品的句子可能并不都是直接从古典引用的。有一部分可能参考了时代相近的文章，这些文章之中引用了古典中的词句，武的上表文在引用这些句子时间接引用了古典，于是看起来就像是直接引用一样。无论如何，上表文的写作无疑体现了对古典词句的驾驭。

执笔者与制度维持

既然上表文体现了高级的作文技术，那么5世纪的倭国就必然存在能够写出优秀文章的人物，这在古坟时代的倭国有可能吗？实际上，由于文章写得实在太好，从古代以来就有人质疑它是否真的出自倭国。

甚至有人猜测，上表文可能是《宋书》的编者沈约在编写《倭国传》的时候自己写上去的（久米邦武）。然而又有人反驳说，倭国在当时被蔑称为东夷，是外族，沈约没有理由专门修改倭国的外交文书并记载在史书上。

其实，倭国里确实存在能够写出此种上表文的人物，那就是被任命为府官的渡来人。当时倭五王的麾下担任府官的中国移民，他们并不会因为住在倭国就忘记了中国的学问与知识。正是府官们动用了他们所有的知识，为倭国撰写了外交文书。对他们而言，中国的学问正是能帮助他们维持地位的武器。那么，他们的知识是如何维持的呢？

首先是代代相传的古典相关的知识，其主要的传承方法应该就是学习书籍了。然而，他们自4世纪以来就流亡到了朝鲜半岛，在此期间是如何带着书籍迁徙的呢？可以推测，他们学习的方法不只是书籍，还要依靠口头背诵来记忆知识，以此进行学问的传承。

其次，府官多次作为外交使节前往刘宋，在此期间他们能够接触到中原王朝的古典作品，停留期间也能对学术知识进行重新确认。另外，他们可能获得经典书籍并带回了倭国。并非只有遣唐使把文物带回了日本。

再者，他们获得知识的机会也并不限于阅读古典作品。从中原王朝获得的同时代的文章，还有刘宋授予倭国的国书本身，对府官们而言都是宝贵的文章范例。

比如说，兴获得的国书的开头就有“奕世载忠，作藩外海”，而武的上表文中则有“封国偏远，作藩于外”。“作藩外海”与“作藩于外”两句相当相似，我们不应该认为两者只是偶然一致而已。应该说，刘宋国书本身就是上表文的参考，上表文的语句是从国书调整而成的。

这么看来，府官们有可能利用手中的资料撰写了上表文。遗憾的是，我们并不知道5世纪的倭国到底拥有多少五经等中国古典书籍。

《宋书·倭国传》只引用了武的上表文，这篇上表文文章出色，虽然篇幅较长，但仍然被全篇引用。这是府官们努力工作的结晶，并非后世修改的结果。

此外，从上表文中也能看出武的时代的政治体制。

当时的外交惯例是各国通过外交文书表达本国的主张，在赞的时代里，曹达等人的做法也是如此。后来的府官们把倭王权的意图写在外交文书里，前往中原王朝进行相应的交涉。武的上表文的文化水平之高，说明府官这一团体在外交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说明府官制度要么从赞的时代以来就一直在外交层面上持续运作，要么受到了进一步调整，发挥了制度性的作用。换句话说，上表文说明了与刘宋的外交在武的时代的倭国制度中也是必要的。

东亚的文化同质性

武的上表文体现了高度的文化水平。当时拥有这种文化水平的其实并非只有倭国，高句丽与百济也是一样。

具体的例子能在《南齐书·百济传》找到，即百济在495年向南齐呈上的外交文书。下文将引用该文章并加以分析。

【一】臣自昔受封，世被朝荣，忝荷节钺，克攘列辟。
往姐瑾等并蒙光除，臣庶咸泰。

【二】去庚午年，獫狁弗悛，举兵深逼。

【三】臣遣沙法名等领军逆讨，宵袭霆击，匈梨张惶，
崩若海荡。乘奔追斩，僵尸丹野。

【四】今假沙法名行征虏将军、迈罗王（中略）伏愿天
恩特愍听除。

“列辟”出自《逸周书》（西周天子的言行录，一般认为创作于春秋战国时代）。“獫狁”是犬戎的别名，是西周时期的少数民族，也是致使西周衰落的原因之一，百济的上表文用古代的少数民族指代北魏。“匈梨”是汉代的少数民族匈奴，与獫狁一样，都是用来指代北魏的蔑称。“丹野”一词在《后汉书》及《魏略》（成书早于《魏志》的曹魏历史书）都有出现，意思是鲜血染红大地。这些都是百济外交文书中使用中国书籍里的典故的例子。

武的上表文中较多使用五经中的语句，而这篇495年的百济外交文书则更多参考了史书。两者在使用中国典籍中的语句来写作这一点上是共通的。两国都希望以此来证明本国对中华文明的尊崇。

两篇文章里都出现了“自昔”这一词语，这说明了中国的学术是东亚知识的标准。这一点作为政治上的价值观受到了各国的一致认可，因此，两国的外交文书里才出现了同样的用法。

外交文书相似性的意义

倭国与百济两国外交文书的相似性并不仅仅体现在语句上。我们在上文中把武的上表文分成了四个段落，其中第一段强调倭国与南朝在历史上的关系，第二段说明了外交事件发生的经过，第三段叙述解决事件的方法，第四段请求获得官爵的册封。

百济的外交文书也表现出同样的结构。上文引用的文章中也标记了数字，其构成与倭国的上表文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倭国与百济在外交文书的文章脉络上也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显示出，倭国与百济以同样的程度享受着中华文明，而且创作文章的人出自同一阶层。在倭国，写作外交文书的是由中国渡来人组成的府官阶层，而府官在百济也无疑参与了外交文书的创作之中。两者都是中国人或其后裔，而且由于出身相同，两者之间或许还存在某种联系。我猜测，倭国与百济的府官阶层通过外交活动建立了联系，彼此之间定期交流文化知识，由此达到文化的同频。

高句丽与倭国和百济处于敌对关系，因此无法认为彼此之间存在外交知识的交流。然而高句丽攻占了乐浪、带方两郡，而且自古以来收留了不少流亡至此的知识分子，因此高句丽对中华文明的吸收应该领先于倭国、百济。

成书于7世纪的史书《周书》记载高句丽“书籍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晋阳秋》。这是一本记载晋朝（265～420）历史的书，作者是东晋的孙盛。孙盛在写作这部史书时受到了不少政治压力，因此把书籍送给了前燕的皇帝。至于高句丽如何获得该书，应该要么是通过外交活动从前燕获得，要么是在前燕亡国时其高层逃亡高句丽，从而流入。由此可见，高句丽拥有独自接触中华文明，从而获得书籍的能力。

由此看来，倭王武的上表文绝非超越当时文化水平的作品。当时中华文明在整个东亚广泛传播，各国在政治上协调、竞争的过程中都要使用中华的文化知识，武的上表文正是由此产生的文化结晶。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各国说到底也不过是在外交场合中使用中华文化，在国内政治中并不会用到。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文化知识的应用其实仅限于对外活动中。

3. 倭国的实情——上表文显示的权力结构

爆发战争了吗——考古学上的疑问

武的上表文并非如实记载事实，而是根据政治目的进行了修改。另外，文章的行文使用了古典文言文。在文章之中，有一段相当有趣的文字，体现了当时倭国的历史认知：

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

这句话说的是武的祖先东征西讨，征服了本来不从属倭王权的夷狄。这可以说是提到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列岛过程的最早的史料。

说起大和政权的扩张，就不得不提《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的第1代神武天皇开启的东征，以及第10代崇神天皇为了征服四方而派遣了四道将军的传说，此外还有日本武尊平定了不服从天皇的东国的虾夷和九州的熊袭的故事。日本武尊的传说与上表文所说之事非常相似，这应该是大多数学者认可的。

然而，这句话却包含了一个大问题。近年来，学界围绕以大和政权为中心的日本诸势力统合的过程产生了争论。那是因为从考古学分析来看，并没有证据表明日本列岛在古坟时代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争（下垣仁志）。

从考古学上判断是否发生战争的依据是考察是否出现了防御性聚落、武器、受伤致死的人骨、武器陪葬品、武器形状的祭品、战士或战争场面造型的物品等。我们发现了弥生时代的高地聚落与有箭头刺伤的人骨等大量战争痕迹，却找不到属于古坟时代的这类遗迹与遗

物。这一事实让我们对上表文中的这句话产生了极大的疑问：到底真的是武和他的祖先东征西讨并统一了日本列岛吗？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尊重考古学的事实，也就是说有必要重新审视上表文的内容。上文已经用了许多篇幅说明上表文采用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典故，既然如此，那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一角度解释这句话呢？

“东征”和“西服”所表达的意义

从这一角度浏览中国的古籍，就能找到一些有趣的文章。《晋书·乞伏乾归传》就是其中之一。

翟琨奋剑谏曰：“吾王以神武之姿，开基陇右，东征西讨，靡不席卷，威震秦梁，声光巴汉。”

这句话说的是西秦王乞伏乾归为了建立国家而东奔西走、在各处征战的事情。西秦是鲜卑人建立的国家。

另外一则值得关注的文献是《晋书·阳骛传》：

（慕容）皝即王位，（阳骛）迁左长史。东西征伐，参谋帷幄。

这句话说的是前燕慕容皝即位为王以后，他的手下阳骛作为左长史为他征伐东西两方的敌人。

由此可见，当时的文章在表现与周围的敌人交战的时候，往往会使用向东西两个方向奔走的表现手法。向东如何向西如何，这种说法在当时的文章中处处可见。

既然如此，我们也可以把武的上表文中的“东征”“西服”理解为按照文章规范而采用的表现手法。武在这里强调的是倭王权为了刘宋皇帝攻打东西两方面的敌人，让边境的人也认识到刘宋的国威。上表文的后半部分提到要讨伐高句丽，而且为此需要获得开府仪同三司的任命，而“东征”“西服”这两句话正是为了正当化这两件事情。

习惯用语产生的“记忆篡改”

简而言之，“东征”“西服”是当时文章的习惯用语。既然考古研究并未发现古坟时代爆发战争的痕迹，那我们就应该将其理解为历史事实。上表文只是把一件可能在过去发生的事情写成了外交辞令，却在后来被当成了倭国历史的一部分。

再之后，这段话又进一步演变为倭王权为了统一日本列岛而进行的武力征服的历史。在上表文中，倭王权为了刘宋皇帝而东征西讨，但在武以后倭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断绝，刘宋皇帝在倭国政治中不复存在，因此在倭国的意识中这段历史就变成倭王权为了自己而东征西讨。为了把这件事变得合理，人们又添枝加叶，传说由此形成。日本武尊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

过去的学界认为，在日本列岛上首先发生了武力征服的事实，之后才分别转化为上表文以及《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记载。然而真实的情况可能与此相反，是上表文中的中国式表现手法经过加工变成传说，进而成为历史记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日本的历史里出现了记忆的篡改。

武的上表文无疑是了解当时形势的不可多得的史料。然而，上表文的写作目的本来就不是要记载正确的历史事实。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武的权力的实情

武的上表文的目的应该是文章末尾提到的“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然而这句话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其余咸各假授”中的“其余”两个字。“其余”可以指武请求获得的其他官爵（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也可以指他为倭国的王族、豪族请求的将军号。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

上表文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希望刘宋承认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头衔，而把其他的官爵省略为“其余”。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咸各”二字，这两个字是否能理解为只针对武一个人呢？如果我们认为，武给自己假授了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些官爵，并把它们省略为“咸”，那么“各”这个字就显得多余了。

如果我们认为“其余咸各假授”这句话把王族、豪族也包括在内的话，那“各”这个字就容易解释了。即“咸各”就是指开府仪同三司以外的其他官爵以及给王族、豪族的假授。

那么，为什么文章中单独强调对武的假授呢？这就涉及对武的权力的评价。上文提到，有一种说法为，在武的时候，倭国王已经拥有巨大的权力，以至于开始在外交上与刘宋保持距离。然而按照我们的分析，武在对王族、豪族进行统治的时候依然需要经过假授中国官爵与请求正式承认这一过程，也就是说武的权力依然要依托于刘宋，尚未达到至高无上的程度。因此，两种解释存在矛盾之处。到底478年遣使是否有通过刘宋的权威让王获得统治日本列岛正当性这一作用呢？这是一个有关权力来源的问题。

然而，从当时倭国的权力结构来看，我们很难认为武仅仅为自己请求了官爵。例如6世纪初就爆发了筑紫君磐井对抗大和政权的事件，类似的例子说明，当时的豪族绝非完全臣服于大和政权，武的权力也远达不到专制的水平。武在向刘宋请求官爵的时候，如果不同时为王族、豪族请求的话，大概是无法获得他们的支持的。

上表文的意图

上表文的主要目的是向刘宋报告武的即位并请求获得册封，此外还希望刘宋承认武对麾下实力人物的假授，借此巩固武自身的权力。在这一点上，武的遣使与此前的倭国王并无区别。比起之前的倭国王，武请求获得更高的官爵，并以百济的困境作为提出请求的理由。

当然，阻止高句丽南下是倭国为了维护自身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而不得不进行的外交任务。与高句丽正面对抗的百济在当时已经衰落，无法像过去一样承担重任。在这种形势之下，要与高句丽对决，就不得不让倭国担任反高句丽联盟盟主的地位。

武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在478年做出了请求官爵的举动，因此他需要获得能够匹敌甚至凌驾高句丽的官爵。此外，他还需要把将军号授予麾下的王族与豪族，以此来巩固王的地位，并在讨伐高句丽时获得他们的支持。

上表文的内容透露出倭国当时的外交课题与权力结构，这两者其实从赞以来一直没有明显的改变。由此看来，武并没有超越倭国王这一地位。他的权力依然构筑在中国册封这一框架之中，这也是他权力的界限所在。

第4章 倭五王到底是谁

——比对的历史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束缚

我在前面的三章以倭五王为主轴叙述了5世纪的东亚历史发展。在本章，我将讨论前文一直没有提到的最大的论题：中国史料《宋书》的本纪与《倭国传》中出现的五位倭国王，到底是日本史料（尤其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哪几位天皇？

这一问题如此之重要，说它是倭五王研究的起点也并不为过。在本章，我将重新审视以下两个问题：过去的学者是如何认为倭五王的人物形象的？今天的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他们？

五王应该对应《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哪些天皇？下文简单列举过去的各种说法。

赞是第15代应神天皇、第16代仁德天皇或第17代履中天皇，珍是第18代反正天皇，济是第19代允恭天皇，兴是第20代安康天皇，武是第21代雄略天皇。由此可见，除了赞以外，其他几位倭国王的身份都相当确定。然而，这里却存在一个巨大的陷阱。

表4-1对比了《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倭五王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的天皇在位时间。

表4-1 《宋书》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对比

公元纪年	《宋书》	《日本书纪》	《古事记》
412		允恭	仁德去世 履中去世 反正去世
421	赞		
425			
427			
432			
437			
438	珍		
443	济		
451			
453			
454		安康	允恭去世
456		雄略	
457			
462	兴		

表4-1 《宋书》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对比-续表

公元纪年	《宋书》	《日本书纪》	《古事记》
478	武	雄略	雄略去世
479			
480		清宁	
484			
485		显宗	
487			
488		仁贤	
489			
498			
499		武烈	
502			

《宋书·倭国传》记载的是倭国向刘宋遣使的时间，《日本书纪》记载的是在位时间，《古事记》没有记载在位时间，只记载了去世的时间（即崩年干支），表中把时间换算成了公元纪年。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天皇的去世时间并没有留下记录。不难看出，不仅《宋书》与日本史料记载的时间有出入，连《日本书纪》与《古事记》之间都有年代不符的地方。

在不同史料间年代出现差异的情况下，前人是如何论证他们对倭五王的比对的呢？下文将首先梳理他们的理论。

1. 五王与天皇——始于室町时代的比对经过

最初的比对——室町时代瑞溪周凤的尝试

日本人自古就知道中国的历史书中有关于日本的记载。

比如说《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摄政六十六年的条目中就有“是年，晋武帝泰初二年。晋《起居注》云：‘武帝泰初二年十月，倭女王遣重译贡献’”的记载。泰初二年即西晋泰始二年（266），一般认为倭女王指的是台与。《日本书纪》这里的内容有意把神功皇后的传说与中国史料中的台与加以对比、结合。我们先不考虑这一则内容是否可信，但它的确是最早提到中国史书的日本史料。

针对中国史料中记载的日本，首次进行认真研究则是在室町时代。禅僧瑞溪周凤（1391～1473）的著作《善邻国宝记》中引用了中国正史中提及倭王向南朝派遣外交使节的内容。该书认为向东晋遣使发生于履中天皇与反正天皇在位期间，而赞则对应允恭天皇。这是最早讨论倭五王应该对应哪些天皇的著作。

瑞溪周凤比对的方法是简单地将《日本书纪》中的纪年与中国年号加以对应。具体的方法如下。

《日本书纪》在每代天皇元年记事的末尾都记载着“太岁”。太岁是一颗假想中的星球，其运行方向与木星相反，人们以太岁所在的位置确定当年的干支。干支每60年循环一次，也就是相隔60年的两个年份干支是一样的。比如允恭天皇元年的太岁是壬子年，以此换算为中国的年号就是义熙八年。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把《日本书纪》的纪年与中国的年代进行对照。另外，允恭天皇元年的壬子年换算为公元纪年则是412年。

瑞溪周凤直接把中国史书记载的年代与《日本书纪》的年代加以对比，以五王遣使的年代来将他们与天皇进行对应。如果中国史书与《日本书纪》的年代都是正确的话，这么做自然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事实上在编撰《日本书纪》的时候年代上被做了手脚，因此两则史料的年代之间存在偏差。瑞溪周凤的比对方法并不准确。

由此可见，瑞溪周凤的比较方法过于简单，只能说是一次不成熟的早期尝试。然而，这也是第一次将不同的史料进行对比，我们不应忽略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善邻国宝记》中有关倭五王事迹的部分并非来自《宋书》，而是来自《南史》。为什么他要引用《南史》呢？

《南史》是唐朝史家李延寿在659年前后完成的史书。之所以要创作这部史书，是因为南北朝的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每一个王朝的寿命都相对较短。比如说在刘宋以后登场的南齐建国于479年，之后在502年灭亡，仅仅延续了24年。

因此，李延寿就将南北朝时期的南朝，也就是在江南建国的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的历史写成一部史书，将《宋书》一类的断代史重新加以编辑，写成了跨越四朝的《南史》。唐朝统治者在659年认可《南史》为正史。李延寿还编撰了北朝的史书《北史》。

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南史》与《北史》是两本相当方便的史书，因此在研究南北朝时期的时候学者们都喜欢读这两本书。这一倾向同样蔓延到日本，所以瑞溪周凤参考的不是《宋书》而是《南史》。在不同的年代，人们对史料的看法也有所不同，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不过，《南史·倭国传》只是把《宋书·倭国传》等史料进行了二次编辑，里面并没有新的内容，因此现代研究只重视《宋书》，基本上不会提及《南史》。

比对研究的深入——松下见林

到了江户时代，针对倭五王的研究有了更大的进展。江户时代是一个各种学问都快速发展的时代，而历史学的研究则明确了广泛收集历史材料，并对之进行合理解释的研究方法。也有一些学者选择对具体史料的性质进行评价，并以此刻画历史的面貌。江户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有松下见林、新井白石、本居宣长。

松下见林（1637～1703）是一位身兼医生与国学者的知识分子。现代人可能对他比较陌生，他的著作中有一部《异称日本传》，是一本网罗了中国、朝鲜史料中有关日本的记载的历史著作。松下见林在讨论倭五王的时候，与瑞溪周凤一样首先以年代将倭五王与天皇进行了对比，但是在此之后他更进一步，用人物的名字进行了比对。

松下见林认为，赞这个名字出自履中天皇的本名去来穗别（罗马音为Izahowake），是其读音的省略；珍则来自反正天皇的本名瑞齿别中的“瑞”字，“珍”是“瑞”的讹误；济来自允恭天皇的本名雄朝津间稚子，“济”是“津”的讹误；兴是安康天皇本名穴穗的讹误；武是雄略天皇本名大泊濑幼武的省略。松下见林的解释影响深远，是现代定论的原型。

然而，松下见林的解释存在一个大问题。他比对的方法是将五王的一字名解释为汉字的讹误或名字的省略，也就是说混杂了两种方法。这种方法未免有点牵强附会。

其次，松下见林指出的几个汉字讹误的例子如果成立的话，那就意味着5世纪时使用的汉字与《日本书纪》标记的名字相同。然而且不说5世纪时采用的是哪些字，单说成书时间相近的《日本书纪》与《古事记》，里面天皇的名字就采用了不同的汉字。

比如说，松下见林认为珍来自反正天皇名字的讹误。《日本书纪》中反正天皇的名字确实是瑞齿别，松下见林认为“瑞”“珍”字形接近，因此将二人加以比对。然而《古事记》中反正天皇的名字却是“水齿别”，里面并没有使用“瑞”这个字，这就不能说“珍”是其名字的讹误。

近年的研究显示，在对比《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时，不能认为《古事记》的全部内容都比《日本书纪》更加古老。然而单论用字的话，《古事记》无疑残留了更多7世纪以前的古老用法。

比如说九州北部的地名Tsukushi，《日本书纪》将其一律记为“筑紫”，而《古事记》中却出现了“竺紫”这种写法。“竺紫”就是一种比“筑紫”更古老的写法，但这其实也是7世纪的写法，我们不能认为5世纪时也是用了“竺紫”这两个字。如果我们要用汉字字形来推论倭五王的身份，当然就必须使用当时的用字进行比较。

如果要用反正天皇名字的汉字写法来与倭五王进行比对，那我们既不能用《日本书纪》的“瑞齿别”，也不能用《古事记》的“水齿别”，而必须知道5世纪的人用了哪些汉字来表示Mizuhawake这一名字。然而想要知道这一点，在找到更多5世纪的史料之前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以汉字字形为基础进行人名比对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新井白石与本居宣长的成就与局限

与松下见林相比，新井白石（1657～1725）采用了更合理的解释，从而进一步改进了比对方法。他排除了汉字讹误的判断方法，用五王名字的读音统一解释他们的一字名。

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在当时尚未确立，历史学家往往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解释史料，而新井白石排除了这一做法，因此我们应该对他进行高度评价。这种理性的研究方法同样存在于新井白石的其他著作，可以说他在日本史学界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然而，即便新井白石对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依然不能认为他对倭五王的解释就一定是正确的。

新井白石重新解释了松下见林归纳为字形讹误的珍、济、兴。他认为“珍”就是“瑞”；“济”的读音为“Tsuu”，与“津”一致；“兴”的读音为“Hon”，与“穗”一致。他的解释依然显得牵强。

新井白石的说法都以汉字读音为标准，这确实是一个进步，然而他却回避了音读与训读混用的问题。如果说赞是来自“Za”这个发音的话，那这里采用的是音读，但武的日语发音“Takeru”使用的是训读，可见他的解释混用了音读与训读，依然没有做到前后连贯。在赞身上使用音读，在武身上使用训读的这种人名比对的方式自然免不了受到随意解释的批评。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井白石的解读也是有局限的。

本居宣长（1730～1801）则使用了批判史料的方法，为倭五王研究做出了贡献。

本居宣长的研究着重于追溯日本古代的思想，他认为《古事记》才是最值得研究的史料。他以《古事记》为参照，对其他史料进行了

严格的评价。在他看来，中国的史料混杂了中国人的中华思想，含有过多的主观性。

尤其是针对倭五王的记载，本居宣长认为，当时的天皇不可能对中国皇帝行人臣之礼，倭五王朝贡的记录其实是吉备等地的地方豪族与中国进行外交活动时留下的记载。

本居宣长过分重视《古事记》，认为其他史料统统不足为信，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具有双重标准的日本学者。然而，他在否定史料价值的时候往往会谈及史料的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这是他的研究里有意义的地方。他并不是囫圇吞枣地全盘接受史料的内容，而是先思考史书作者的立场。这种方法论直到现在还是史学的通用做法。

近代研究的成果与停滞——西方人的观点

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延续了江户时代的研究成果，同时还有人从新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但这么做的人并不是日本人。

明治时代，英国外交官威廉·乔治·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 1841~1911）围绕倭五王问题提出了两点见解。

其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的天皇的名字其实是他们的谥号，即天皇死后人们对他们的评价，而赞、珍、济、兴、武则是他们在世时的本名，两者不一致是理所当然的。

其二，他关注《宋书·倭国传》记载的倭五王的继承关系，提出应该通过对比天皇与倭五王的谱系来推论两者的对应关系。其中，《宋书·倭国传》记载珍是赞的弟弟，兴与武是兄弟且都是济的儿

子，与之对应的则是《日本书纪》中，履中天皇、反正天皇、允恭天皇是三兄弟，安康天皇、雄略天皇则都是允恭天皇的儿子。

阿斯顿的比对方法是当时的日本人从未想过的。日本人习惯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中心思考历史，比如说《日本书纪》中雄略天皇的名字里有“幼武”两个字，于是就认为他与《宋书·倭国传》中的“武”是同一个人。把中国史料与日本史料放在同等地位并进行研究是当时的日本人所不能想象的。反过来说，正因为阿斯顿是英国人，他的思想没有被限制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之中，才能从这种角度思考问题。

虽然阿斯顿提出了思考问题的新角度与分析方法，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倭五王研究基本上比较低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明治时代以来日本人认为天皇是神圣的存在，对天皇的研究被学界视为禁忌，因此研究也就难以进行。

1892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久米邦武发表了题为《神道是古代的祭天风俗》的论文，之后遭到国学者的批评，最终不得不辞去职位，是为“久米邦武笔祸事件”。1940年，早稻田大学教授津田左右吉的著作《〈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研究》《神代史研究》也被批评为不敬，不仅被列为禁书，他本人也被迫辞职，是为“津田左右吉事件”。

由此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历史研究者经常遭受政治压力。在这种氛围下，倭五王这一涉及“天皇向中国朝贡”的历史主题自然不会是学者热衷研究的对象。针对倭五王的研究还要等到日本战败以后。

得到解放的古代史研究——“两个王家”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古代史研究从天皇制度的压力下得到解放。“天孙降临”与“万世一系”这些说法不再是不可挑战的真理，对天皇的各种研究也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

针对古代天皇的研究中，比较广为人知的有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征服说”，即认为有一个善于骑马的民族从朝鲜半岛来到了日本列岛，并征服了大和盆地一带，成了后来的天皇家；还有水野祐的“王朝交替说”，即认为3世纪至5世纪之间的日本实际上经历了三个王朝的兴衰。这些说法并没有成为今天的通说，但在发表的当时确实起到了打破战前既有观念的重大作用，也为后来新观点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在这个新观点爆发的时代，关于倭五王的研究出现了一部划时代的作品，那就是藤间生大的《倭五王》（1968年出版）。藤间生大尝试用严密且合理的方式解释《宋书·倭国传》中的谱系。他关注《宋书》没有记载珍与济的关系这一点，认为两者之间可能不存在血缘关系，或者本来有血缘关系，却被济隐瞒了事实。不难看出，他的这一想法受到了王朝更替说的影响。按照藤间生大的学说，赞与珍属于一系，济、兴、武属于另一系，也就是说当时存在“两个王家”，这种说法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学界。

然而，学界里也有反驳这种说法的声音。从倭五王与刘宋进行外交活动时使用的名字就能看出他们的同族关系。第1章提到，赞的正式名称是“倭赞”，这里的“倭”与高句丽王的“高”、百济王的“余”同样，都是姓氏。珍在朝贡时也使用了“倭珍”这一名字。济与武在《宋书》的本纪中分别以“倭济”“倭武”的名字出现，也就是说他们都自称倭姓。兴是济与武的近亲，他大概也自称倭兴。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倭五王全部以倭为姓，而姓氏一样即意味着他们来自同一个父系家族，这是批判“两个王家”说的论点（吉村武彦）。

根据“两个王家”论，5世纪的倭国王彼此之间并不一定存在血缘关系。现代人很容易认为5世纪的王位继承与后世一样以血统为基础，这一学说提出了一种不一样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反之，倭国王确实都向中国的南朝自称倭姓，藤间生大也把这一点考虑在内，因此并不排除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可能。简而言之，“两个王家”论根据赞、珍系统与济、兴、武系统间没有清晰的关系记载，强调两者存在断绝性，但两者之间或许也有血缘关系；反之，相反的论点根据他们都自称倭姓，强调两者的连续性。

倭王权与姓

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强调两者的断绝性。

在济刚即位，与刘宋进行外交活动时，他可以通过主张自己平稳继承了前任倭国王的王位来确保刘宋承认他的地位。为了让外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他声称自己与先王一样都是倭姓。因此，济完全有可能并非先王珍的同族，而是倭国的新盟主，只是自称倭姓而已。

我们能在后世的琉球王国找到类似的例子。1406年，佐敷的按司（首长）思绍灭掉中山王国的国王武宁，并在同年向明遣使朝贡。思绍在朝贡的时候就自称武宁的世子。思绍主张自己与武宁有血缘关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明能承认自己的地位。

即便赞、珍系统与济、兴、武系统确实存在血缘关系，我们也没有证据表明珍与济之间的王位继承是平稳过渡的。至少我们难以仅从倭姓这一点判断两个系统在政治上是否属于同一集团。

再者，就算权力转移发生在同姓之间，其政治关系也可能是断绝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中国南朝的齐与梁。南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与下一个王朝梁的开国皇帝萧衍是同族，两人的高祖父同为萧整。南齐宗族在内部斗争中瓦解，萧衍拥立了皇族萧宝融为帝（和帝），之后接受和帝的禅让成了梁朝皇帝。他们两家人虽然都姓萧，但萧衍一族在南齐建国以前就与萧道成一族分离，南齐皇族自然不会认为萧衍一族也享有南齐的天命。

我们很难认为5世纪的倭国能够正确理解中国的天命思想。然而从齐与梁的例子可以看出，即便在中国，是否同族与权力是否平稳继承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倭国就更是如此了。

以倭为姓

我们不妨从另外一种角度看问题：古代中国在周边国家出现了政变等权力变动的情况时，倾向于采取相对严厉的态度。这是由于中国奉行儒家思想推崇的身份秩序，难以容忍破坏这种秩序的行为。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7世纪的例子。642年，高句丽贵族泉盖苏文掌握实权并杀害了高句丽的荣留王。当时唐朝朝廷就认为杀害国王是扰乱秩序的行为。唐太宗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并询问大臣是否应该征讨高句丽。唐太宗皇后的兄长长孙无忌认为泉盖苏文会自取灭亡，因此当时没有出兵。然而在两年后的644年，唐与高句丽就陷入了激烈的战争。

东亚各国的权力变动并不只是国内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演变为国际事件。对于济而言，如果能让刘宋承认自己是合法的倭国王，他就能借助刘宋的权威来巩固自身对日本列岛诸豪族的统治。

那么，如果刘宋认为济与先王关系疏远，通过推翻前朝而建立了新的王权的话，会出现怎样的情况？

当时的中国处于南北朝分裂的状态，很难想象刘宋会对倭国进行军事干预，然而刘宋方面完全有可能驳回济的要求，拒绝授予倭国王等官爵。济刚刚当上倭国的新王，权力尚未稳固，很有必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之所以以倭为姓，也是要强调自己是正统国王，而且顺利继承了先王的王位。

话虽如此，济大概并不是为了政治利益而伪称倭姓，他与赞、珍应该确实是同族。其中一个佐证是两者都使用了前方后圆坟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标志性建筑。这样看来，赞、珍系统与济系统应该是在数代以前拥有同一祖先的两个王族集团。

在5世纪，人们到底有没有必须是倭姓一族才能担任倭国王这一观念呢？我们很难认为5世纪在日本列岛上居住的人们有姓氏这个概念。比如说稻荷山铁剑上的“乎获居”与江田船山大刀上的“无利弓”都只有名字而无姓氏。当时的日本列岛应该是一个没有姓氏制度的社会。

可以推测，在这么一个社会里之所以出现了倭国王一族的倭姓，主要是受到了与朝鲜半岛各国进行外交的影响。百济等国的王在向中国朝贡的时候受到后者人名的影响，于是为自己取了姓氏。倭国也是模仿了这种做法，于是产生了倭这个姓氏。

当时的日本列岛上还有渡来人这一拥有姓氏的阶层，除此以外最初出现的姓氏就是倭国王一族。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是倭姓一族当上了倭国王，不如说是当上了倭国王的家族给自己取了倭这一姓氏。

2. 比对的可能性与限制——音韵、字形、谱系的相同性

赞、珍、济、兴、武，比对的现状

上文讨论了倭姓的问题，下面我们回到比对的问题上。

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倭五王到底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出现的哪几位天皇？如果分析这一问题，最基本的是前面提到的三种方法。

第一是名字发音、音韵的一致性，第二是汉字字形的一致性，第三是《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继承顺序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谱系的相似性。学者们通过这三种方法的结合，不断提出新的人物比对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比对分析的工作也变得更加细致，但随之产生的问题也不少。以下我将整理至今为止学界提出的各种说法。

首先是赞，本章开头部分已经提到，现在学界对于赞的身份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从音韵学看就有音读的大鷦鷯（Sazaki，仁德天皇）和训读的誉田（Homuta，应神天皇）两种说法。从谱系上说，赞与下一任倭国王珍是兄弟关系，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能够对应的是履中天皇。可见在不同的比对方法之下，赞可以对应完全不同的人物。

关于珍的比对，首先是古代就有人提出的字形比对法，即通过“珍”与“瑞”的相似性比对为瑞齿别（反正天皇）。《梁书》把珍的名字写作“弥”，前田直典认为弥读作“Mi”，也是来自瑞齿别（Mizuhawake）。从谱系上看，珍与赞是兄弟关系，《古事记》和

《日本书纪》中能够对应的也是反正天皇。然而，如果珍确实是反正天皇的话，那么赞就只能履中天皇，而这一点是难以断言的。

关于济，几种方法都指向允恭天皇，然而其论证并不轻松。音韵学上“济”的读音是“Tsuu”，与“雄朝津间”的“津”（Tsu）一致，然而这种说法略显牵强。而认为“济”是“津”之讹误的说法也无法让人信服。从谱系分析来看，《宋书·倭国传》中济是兴、武两个倭国王之父，而《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允恭天皇则是安康天皇与雄略天皇的父亲，这么看济与允恭天皇能够对应。这种说法虽然看起来有道理，但这种谱系关系并不罕见，只是一种很常见的关系。而且这一谱系比对能够成立的前提是武确实就是幼武

（Wakatakeru），也就是雄略天皇。然而，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济是允恭天皇，谱系比对法只能提供情境证据而已。

关于兴，音韵学上穴穗（Anaho，安康天皇）与“兴”相似的说法缺少说服力，谱系上则是通过安康天皇与雄略天皇的兄弟关系比对为安康天皇。同样，这些方法并不能直接证明兴是安康天皇。

关于武，音韵学上的“Wakatakeru”中的“takeru”和《日本书纪》里使用的汉字“幼武”都与“武”能够对应，这是学界认为比较能够确认的比对关系。谱系上，雄略天皇是允恭天皇之子、安康天皇的弟弟，这也能够与武对应。这么看来，从音韵、谱系两种方法来看武都是雄略天皇（Wakatakeru），学界对此没有争议。实际上，学者往往是以武为起点，推断出济与兴分别是允恭天皇和安康天皇。

如上所述，倭五王与古代天皇的比对主要以名字的音韵与谱系关系是否一致作为判断标准。如果两种方法能够得出同一结论，那么我们就从史料中看出真实的历史，这是最理想的状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倭五王比对的局限并不止于此。

首先认为武就是雄略天皇这一点没有疑问，然后以武为出发点进一步推断他的父亲济、兄长兴分别是雄略天皇的父兄允恭天皇、安康天皇，这种假设看起来似乎没有问题。然而人物名字的音韵却并非一致。学界现在的做法为假设武是雄略天皇这一比对关系可以成立，而假装音韵学的问题并不存在。

围绕赞与珍的研究就更加混乱了。如果从谱系学的角度认为珍是反正天皇的话，那赞就必须是履中天皇，然而人物名字的音韵并不一致。反之，如果追求音韵一致的话，那么又找不到谱系上一致的天皇。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自古以来学者都是在音韵与谱系两种方法中按照自己的喜好挑选一种，从而将倭五王与天皇进行比对。这么一来历史研究就显得不够严谨。近年有学者提出，我们对两种方法并用的做法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

以音韵进行比对的局限

虽然倭五王的比对研究在论证中存在诸多矛盾，但除去本居宣长这一派完全否定比对的说法以外，学界对赞之外的四位倭国王的身份其实基本上没有争议。因此，他们的比对关系应该基本上没有问题。然而，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尤其是使用人物名字进行的类推存在极多疑问。下文将对此逐一解释。

上文已经提到，以字形类似的方法比对珍的身份难以成立。另外，用《梁书》中记载的“弥”字来进行比对也是不对的。《梁书》编撰于629年，其中《倭传》的内容基本上是对成书更早的《宋书·倭国传》加以修改写成。“弥”这一名字其实是“珍”的异体字“玕”的讹误，在《梁书》中又写作“弥”的正体“彌”。因此，“弥”并不表示“Mi”这一发音。因此，从字形、音韵上都没有证据表明珍与反正天皇（Mizuhawake）有关联。

再说济，如果说济与允恭天皇的名字音韵一致的话，那就相当于否认了字形讹误的说法，反之亦然。也就是说音韵说与字形相似说并不互补，反而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还有一种说法为津与济字义相近，但这也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因此，对济进行人名比对是不可行的。

兴的情况也是，单用人名来推断他是安康天皇并不可行。从根本上说，穴穗（Anaho）可能本身就不是人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提到安康天皇的住所是穴穗宫，由此可见，穴穗更可能是一个地名。

我们还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如《日本书纪》安康元年的记录中出现了一位名叫“大泊濑皇子”的王族（《古事记》记作“大长谷王子”），也就是即位以前的雄略天皇。雄略天皇正式的谥号是大泊濑幼武，其中泊濑（Hatsuse）一词来自他居住的泊濑宫，他的本名则是幼武（Wakatakeru）。我们也可以解读为幼武居住在泊濑宫，而人们按照宫殿的名字把他称为大泊濑王。同样，将穴穗皇子的名字解释为居住在穴穗宫的皇子比较合理。简而言之，我们此前认为穴穗是名字，但其实这更可能是居住地的通称，因此就难以与“兴”这一人名关联。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兴不是安康天皇。

因此，《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记载的天皇的名字并不能与珍、济、兴这三个名字形成对应关系。

武的人名比对的问题

此前一直没有触及武的比对问题，而学界一直认为武的比对是比较可信的。“武”的日语训读就是“Takeru”，因此与雄略天皇的名字“Wakatakeru”一致，这是一目了然的。然而，这里其实存在一个重大的误区。

“Takeru”或“Take”是“武”的训读读法。如果我们认为“武”就是“Takeru”的话，那我们就默认5世纪晚期汉字的训读已经在日本列岛社会上确定下来。进一步说，我们必须假设这时候训读的用字已经脱离了语言本身的字义，而使用在人名之中，也就是说训假名的用法已经成立。

那么，日本对汉字的训读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呢？至今我们发现的最早使用训读的案例是出土于冈田山一号坟的铁剑的铭文，其铸造年代是6世纪下半叶（冲森卓也）。通过红外线照射，我们发现了“各田𠂔”三个字。

在金属与石头上雕刻文字时，人们往往把笔画多的字省略为笔画少的字。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委”字就是“倭”字的简略用字。“各田𠂔”的“各”本字是“额”，“𠂔”本字是“部”。“部”字只写偏旁是古代常见的写法。因此“各田𠂔”其实就是“额田部”的意思，在日语中读作“Nukatabe”，这是训读最早的例子。



图4-1 冈田山一号坟铁剑

如果我们认为“武”读作“Takeru”的话，那就等于把已知的训读成立年份往前推了100年。就算那时候已经有训读，我们也不能确定5世纪的人将“武”用作“Takeru”对应的汉字。相反，在古代“Takeru”所对应的更常见的汉字是“建”。古代氏族中有一支叫建部氏，他们一直到奈良时代依然用“建”字代表“Takeru”。“Wakatakeru”在《古事记》中记作“若建”，而由于《古事记》的

成书时间更早，因此可以认为“武”是“Takeru”一词在后世才出现的训读用字。也就是说，就算把“Wakatakeru”记为训假名，也不一定要使用“武”这个汉字。

从更根本的角度看，5世纪倭国的人名到底是如何书写的呢？

我们可以从两把有名的刀剑上的铭文找到答案，那就是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和江田船山古坟出土大刀。在这两把刀剑的铭文上记载了人物的名字。前者有“获加多支卤”（Wakatakeru）、“乎获居”（Owake）、“意富比埤”（Ohohiko）等，后者则有“无利弓”（Murite）、“伊太加”（Itaka）等。

在这些例子中，每个汉字都代表了一个音节，我们把这种标记方法称为假借。在5世纪，把固有的名词分解为音节并写成汉字是常见的做法，身为大王的Wakatakeru也不例外。因此，我们难以认为在那个使用汉字表达音节的时代已经使用“武”作为“Takeru”的训读用字。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训读方式，因此理所当然地认为“武”就是“Wakatakeru”。然而5世纪时训读尚未成立，因此我们不得不针对这一历史状况来重新思考武的比对问题。

如上所述，我们其实并不能通过《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一字名推断出倭五王所对应的天皇。

谱系论的死角——谱系是真实历史吗

那么使用谱系进行比对的方法又是否可行呢？看起来谱系似乎比名字比对更加可靠，然而其实这种方法也存在陷阱。

《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五王的继承关系，除了表达地位的“世子”以外，应该都是刘宋从使者口中得知的。刘宋没有必要在记

录里更改五王的继承关系，《宋书》中五王的谱系，包括没有明确记载关系的在内，都直接使用了倭国使节的说法。真正值得比较的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谱系。

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从第1代神武天皇一直到第41代持统天皇，皇位都是在同一个家族中连续继承的。然而现在的研究认为这不是事实。首先，早期天皇是否真实存在就有很大的疑问，另外我们还必须慎重看待5世纪及以前天皇的王统。

比如说第1代神武天皇到第9代开化天皇之间，许多天皇的名字里都有“Yamatoneko”一词。这个词语同样出现在第42代文武天皇的谥号“倭根子丰祖父天皇”（Yamatoneko Toyoojino Sumeramikoto）与第43代元明天皇的谥号“日本根子天津御代丰国成姬天皇”

（Yamatoneko Amatsumiyo Toyokuninarihimeno Sumeramikoto）等处。可见“Yamatoneko”是律令国家初期天皇称号中常用的词语。神武天皇至开化天皇之间的天皇使用了同样的称呼，很可能是因为在编撰《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7世纪末、8世纪初的时候把当时常用的词语加进了天皇名字之中。

再者，第10代崇神天皇与第1代神武天皇都拥有“Hatsukuni Shirasu Sumeramikoto”这一称号，其中“Hatsukuni Shirasu”的意思是“最早治理国家”。这个称号同时被神武天皇与崇神天皇拥有，这可能暗示了崇神天皇才是真正的最早的天皇，后人又在他之前添加了从神武天皇到开化天皇的谱系。

那么，崇神天皇之后的谱系又是否反映了真正的历史呢？这其实也是值得质疑的。本书开头部分列出了天皇的谱系，其中从崇神天皇到仁德天皇基本上都是父死子继，唯一的例外是日本武尊。实际上，父死子继要到律令国家成立的时候才成为皇位继承的原则。6、7世纪

更普遍的皇位继承方式是同辈间继承，我们很难认为在那以前可以实现连续的直系继承。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仁德天皇以前的直系继承？对《日本书纪》的批判性研究认为，直系继承是基于《日本书纪》编撰当时的政治观念进行的创作。天皇的谱系确实具有这一特点，然而这一观点并不能够说明所有问题。只强调《日本书纪》编撰者的作伪并不恰当。

在后面的段落里，我希望用一个新的角度分析天皇谱系成立的问题。那就是，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人们是如何记忆王位的传承并将其转化为谱系？

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记忆的继承是什么

川田顺造是研究非洲无文字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家。他指出非洲部落首领的继承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那些事迹与谱系位置广为人知的首领往往是旁系继承，而那些人们只记得名字和继承顺序的首领则多数是直系继承。

他还指出，那些在谱系上与前任首领属于不同系统的首领在继承地位的时候，也会把他那些没有当过首领的祖先整合进首领的谱系之中。

他的这两个观点对谱系形成过程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我并非想要把非洲的事例生搬硬套在倭国的王位继承上。重要的问题是，有关王位继承的记忆到底有多准确呢？

在没有文字以及文字尚未普及的社会，王的谱系传承到底有多“正确”呢？当然，在缺少文字的情况下，口头传承应该特别发达，

传承的错误也应该相对较少才对。因此，重要的信息应该比较容易继承下来。然而，那些人们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则会被忘却，又或者会在人们不经意间遭到篡改，王位的传承也不例外。非洲的例子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再回到倭五王的例子。学者比对履中天皇到雄略天皇之间的王位继承并非直系继承，而是兄终弟及。乍看之下，这种继承方式应该比较接近历史真相才对，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帝纪》的诞生与“旁系”的处理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谱系的原型来自6世纪中期，钦明大王（本书用大王表示真实存在的大王，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谱系中的“天皇”加以区别）统治时创作的《帝纪》。

《帝纪》现已失传，但武田祐吉等学者认为，该书罗列了各天皇的名字、父母、子女、后妃、在位年数、宫殿和山陵的所在地。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都是《帝纪》成书以前残存在人们记忆中的信息。

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帝纪》成书的年代。钦明大王是继体大王的儿子，而继体大王出生于越前（一说为近江），是从外地来到大和继承王位的大王。对于钦明大王而言，最重要的谱系应该是继体大王及其祖先。按照《日本书纪》的记载，第25代武烈天皇没有子孙，王统由此断绝，继体天皇作为外来者，在507年继承了王位。

那么继体大王又有着怎样的出身呢？能够为此问题提供线索的史料是《上宫记》，学界认为它成书于7世纪。按照该书的说法，继体天皇是Homutsuwake王的五世孙。对钦明大王而言，出身关乎自身的正统性，因此必须加以重视。

然而根照谱系，继体大王的祖父，也就是钦明大王的曾祖父是一个名叫“大郎子”的人，大郎子其实就是“少爷”的意思，由此可见他们连自己直系祖先的名字都已经忘记了。有的学者认为这反映了继体大王的谱系是伪造的（川口胜康）。除却这点不谈，最起码对于钦明大王而言，5世纪的大王其实都是旁系，他们在谱系上并不处于值得重视的位置，反而是容易被忘却的存在。

这还关乎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里应神天皇以后、继体天皇以前的天皇到底是否真实存在。这些天皇中不乏真实性存疑的人物，比如说第23代显宗天皇和第25代武烈天皇。不少学者认为，由于6世纪初仁德天皇一系王统断绝，继体一系为了把王统的转移正当化，从而创造了武烈天皇的暴虐形象。这一例子清楚地反映出大王的谱系其实极有可能遭到过篡改，其篡改的程度甚至到了创造架空天皇的地步。

对《日本书纪》的怀疑

所以说，对6世纪以后的倭王权而言，5世纪的大王其实只留下了相当模糊的记忆，因此为了历史叙述的方便，连创造架空天皇这种事情也可以发生。

《日本书纪》的编撰者又在《帝纪》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的天命思想，把真相与虚构结合起来，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皇位继承谱系。《古事记》中记载的从神武天皇到第33代推古天皇的谱系与《日本书纪》是一样的。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录相同就认为这一谱系自古已经存在。

7世纪下半叶的天武天皇统治时期，日本开启了正式的史书编撰工作，当时的编撰成果经过后来的整理形成了确立的天皇继承顺序，之后呈现在712年成书的《古事记》与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中。

上文描述了成书于6世纪的《帝纪》收录了5世纪存在的大王的谱系，之后又转移到《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过程。我并不认为当时的人已经把5世纪发生的历史全部忘却，在《帝纪》中重新创作了历史，但我们确实有必要对此前一直被认为是历史事实的亲子、兄弟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最起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就赞、珍之间的兄弟关系而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谱系中并没有恰当的比对对象。这么一来，济、兴、武的比对是否正确也就值得怀疑了。由此可见，使用谱系来对倭五王进行比对的方法也有很大问题。

3. 始祖王与5世纪的王权

三大王族集团

前文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从名字、谱系弄清倭五王的身份是极其困难的。说到底，我认为把《宋书·倭国传》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进行对照研究的做法难以得出重大的成果。要想知道5世纪倭王权的真实情况，我们就必须从别的方法着手。

我在序章中提到过，考古学研究指出5世纪曾存在多个势力强大的王族集团。通过比较百舌鸟古坟群与古市古坟群，我们发现大王墓与其他王族集团的古坟之间并不存在能将两者区分开来的差距。也就是说，当时的倭王权其实由多个王族集团构成。在两个集团并存的同时又存在大王，这说明产生大王的集团并不对另一集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倭五王中，赞、珍系统与济、兴、武系统可能就属于谱系上不同的集团。从珍与倭隋的关系中我们也能看出倭国王与其他强大的王族并存这一事实，而且当时并非只有两个王族集团。6世纪初，继体大王从近江、越前一带进入河内、大和并继承了王位，我们可以推测，他的集团应该在5世纪拥有一定的势力。

也就是说，构成5世纪倭王权的强大的王族集团最起码有赞集团、济集团，还有北陆集团这三个。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王族自相残杀的记载来看，当时可能还存在其他具有势力的集团。但是考虑到大和、河内两地拥有巨大前方后圆坟的古坟群这一事实，当时的权力应该不是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

从古坟群的此消彼长来看，5世纪上半叶应该存在三个王族集团，到了5世纪下半叶则收拢为两个。按照我们现有的信息，赞系统与济系统应该能够分别与古市古坟群与百舌鸟古坟群相对应。另外，百舌鸟与古市两个古坟群都存续到5世纪下半叶，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王位从珍转移到济并不一定意味着由珍领导的赞集团就此灭亡。

王位的转移发生在济即位的443年，在这个时期并没有看到古坟群出现明显衰退的迹象。虽然我们可以认为王位转移的原因是珍的死亡，但赞集团在那以后可能还维持着某种程度的力量。在大和、河内两集团相互竞争的同时还有隔岸观火的北陆集团。

这些强大的王族集团与各地豪族建立了政治联系，这种政治上的结合需要双方的共同意愿，其结果就是建筑在各地的具有政治标志性的前方后圆坟。

我们可以推论，随着日本列岛上政治统合的推进，前方后圆坟的数量也应该不断增加。然而土生田纯之指出，4世纪到5世纪间相模、甲斐一带的豪族停止了前方后圆坟的建造。这似乎意味着地方豪族中断了与王族集团的关系，由此看来，王族与地方豪族的关系并非必然由王族主导，有时候地方豪族可能才是判断政治关系走向的一方。

始祖王誉田别

王族集团共同使用倭姓，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有着同一个始祖，那么这位始祖是谁呢？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北陆集团继体大王的谱系。

对大和、河内而言，继体大王的势力处于北陆，是外部的力量。他之所以能够继承王位，是因为他与之前的倭五王拥有同一始祖，这应该是当时人们的共识。按照上文提到的《上宫记》的记载，这一共

同祖先名叫Homutsuwake。这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谱系中记载的Homutawake（誉田别）有所区别，但考虑到各王族集团分别记录自己与始祖间关系的谱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许会产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只要我们假设两者有共同的始祖，那么赞系统与济系统应该以Homutawake为共同的始祖。

那么，为何Homutawake会被各集团认为是共同的始祖呢？《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Homutawake就是第15代应神天皇。按照书中的记载，应神天皇在与朝鲜半岛各国的外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与百济的关系。

《古事记》记载，在应神天皇的时代，百济肖古王（近肖古王）“以牡马一匹、牝马一匹，付阿知吉师以贡上。亦贡上横刀及大镜”。《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五年八月的记事中也有提及阿知吉师来朝与赠送马匹的事情，但是没有提到刀和镜。《日本书纪》中另一处提到从百济获得刀和镜这一组合，那是在神功皇后的时代，获得的是七支刀与七子镜。

如果《古事记》中提到的横刀与大镜就是指七支刀与七子镜的话，那么我们在序章中提到的，以七支刀为媒介展开的与百济的外交就有了一种不同的说法，即这一事件并非发生在神功皇后的时代，而是在应神天皇的时代。

也就是说，七支刀铭文上明确提及的赠予对象“倭王”有可能就是Homutawake。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倭国王族集团可能正是因为Homutawake开启了与百济的外交活动，才把他奉为共同的始祖。

被奉为始祖王的Homutawake在王权谱系中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后世的人对此也有强烈的意识，这种对历史的感观最终残留在《古事记》之中。

神野志隆光认为，《古事记》虽然分成了上中下三卷，但其实每一卷的内容都自成一体，有其独特的系统。上卷讲述的是神话的世界，人类并没有登场；中卷描述天皇统治的天下世界的形成过程，重点是从神话到历史的转移；下卷则是讲述已经形成的天下世界一直到推古天皇的天皇谱系。应神天皇的位置是中卷的末尾，也就是说，《古事记》的作者认为天皇统治的历史世界正是在应神天皇的时代最终形成的。

然而应神天皇，也就是Homutawake，在《古事记》中并非始祖。其原因之一大概是6~7世纪编撰各种历史书的时候，天皇的谱系不断往上追溯，在原本的谱系之前又添加了新的谱系。然而，从神武天皇一直到应神天皇的继承都是父死子继的直系继承，而从应神天皇之子仁德天皇开始则出现了旁系继承，可见即便史书的编撰者对5世纪的记忆已经模糊，但还是清楚应神天皇前后的历史应该有明确的区别。

地位继承顺序的逻辑

虽然各王族集团都有自己的谱系，但围绕这一话题我还要附加一点说明。

谱系是当时日本列岛的社会，尤其是统治阶层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这把铁剑上刻有铭文，里面记载了一段广为人知的谱系：

上祖名意富比埤（Ohohiko），其儿多加利（Takari）足尼，其儿名弓己加利获居（Teyokariwake），其儿名多加披次获居（Takahishiwake），其儿名多沙鬼获居（Tasakiwake），其儿名半弓比（Hatehi），其儿名加差披余（Kasahiyo），其儿名乎获居臣（Owake no Omi）……

这里记载了上祖Ohohiko之后八代的名字，最后一个就是制作铁剑的Owake no Omi，这是现存最古老的谱系史料。

铭文中虽然在上祖之后的每一代首领的名字前写着“其儿”，但彼此之前其实并不一定存在亲子关系。一直到乎获居为止，每一代都是选择家族里最合适的人物为新领袖。新领袖与前任族长虽然都是同族，但未必是父子关系。学界认为，新族长是通过担任前族长的“儿”来建立起模拟的父子关系，由此顺利继承族长之位。由此可见，豪族把每一代族长的名字记录下来，以此构成从先祖到现任族长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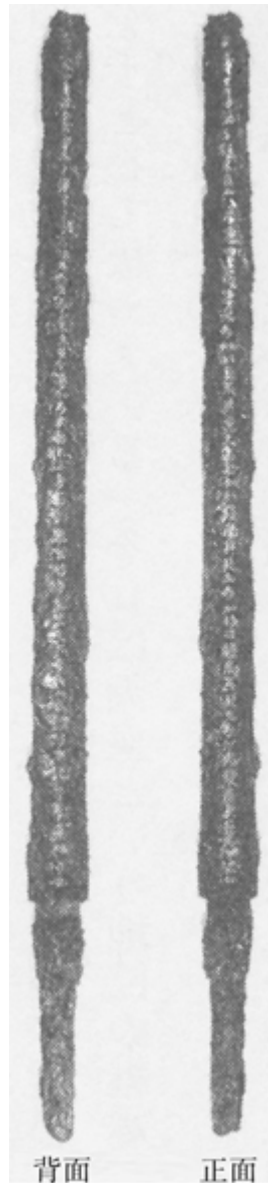


图4-2 稻荷山铁剑

像稻荷山铁剑铭文显示的，这种豪族集团首领不以血缘关系继承，而是同族内非连贯地继承，然后把各个领袖用模拟的父子关系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到9世纪仍然存在。

位于京都府宫津市的笼神社是丹后国的一宫^[1]，社内藏有《海部氏系图》这一古代谱系图。《海部氏系图》采用了一种名叫纵系图的古老记录形式，也就是把卷轴纵向展开，用一根竖线记载每一代海部

氏族长的名字。我们今天看到的谱系一般是横向记载的，与纵系图的形式很不一样。这种谱系并不记录祖、父、子、孙这样的直系血统，而是不论血缘的远近，把始祖相同、拥有实力的家族成员当成不同世代的族长，这是一种有异于现代人想法的逻辑。

天皇家也要贯彻的逻辑

稻荷山铁剑铭文与笼神社谱系图都是豪族的谱系，并不能代表天皇家的情况。不过其实也有史料显示当时的天皇家同样在有意识地遵守这一逻辑。《续日本纪》中记载了一篇8世纪天皇继承的即位宣命，其中有如下文字：

灵龟元年尔，此乃天日嗣高御座之业食国天下之政乎，朕尔授赐让赐而，教赐诏赐都良久：“挂畏淡海大津宫御宇倭根子天皇乃，万世尔不改常典止，立赐敷赐閑留随法，后遂者我子尔，佐太加尔牟俱佐加尔，无过事授赐。”止，负赐诏赐比志尔……改养老八年为神龟元年而，天日嗣高御座食国天下之业乎，吾子美麻斯王尔，授赐让赐。^[2]

翻译为现代汉语则是：元明天皇在灵龟元年（715）把皇位让给我（元正天皇），她对我说“你要按照天智天皇定下来的万世不改之法治理国家，之后确保把皇位传给我的儿子首皇子”……因此现在改养老八年（724）为神龟元年，把天皇之位让给我的儿子首皇子。

在文章中，元明天皇和元正天皇都把皇太子首皇子（即圣武天皇）称为“我的儿子”。首皇子的父亲是文武天皇，元明天皇则是文武天皇的母亲，元正天皇是文武天皇的姐姐。也就是说，对首皇子而言，元明天皇其实是祖母，元正天皇则是姑妈。然而她们都没有严格按照血缘关系，而是直接把首皇子当作自己的儿子。这正好表明了在

继承天皇的地位时，前天皇与新天皇之间存在一种概念上的亲子关系。

另外，文武天皇的即位宣命也反映了天皇家有趣的谱系意识：

高天原尔事始而，远天皇祖御世，中、今至麻弓尔，天皇御子之阿礼坐牟弥继继尔，大八岛国将知次止，天都神乃御子随母，天坐神之依之奉之随，此天津日嗣高御座之业止，现御神止大八岛国所知倭根子天皇命，授赐比负赐布贵支高支广支厚支大命乎受赐利恐坐弓……

翻译为现代汉语为：自高天原的时代开始，从远古的初代天皇，一直到中世、现在，天皇的皇子相继出生，世代统治大八岛（日本），正如高天原的皇祖神把他的皇子任命为天上的神，我（文武天皇）也接受了统治日本的持统天皇的命令。

文章中把天皇的谱系进行了时代的区分，在神话、初代天皇与现在（“今”）的文武天皇之间设置了“中”这么一个时期。这表明了当时的人认为天皇的谱系不是从神话、初代直接延续到现在，而是存在一个中间的时期。“中”可以包含很多内容，但其中必然包含了应神天皇。上文说过，Homutawake本来处于始祖王的位置，但在后来则被重新设定为中间时期的天皇。

不过，5世纪的大王虽然把Homutawake看作始祖王，但并不是说他就是最初的大王，在他之前没有更早的大王。对于5世纪的大王而言，Homutawake是创造了他们统治的世界的伟大的王，是有必要与更早的古代的王加以区分且具有重要意义的王。

与豪族一样，王族集团也遵守地位继承优先的逻辑。与豪族不一样的是，在王族集团里，家族的地位继承与倭国王的地位继承是重合

的。

也就是说，当赞集团拥有王位时，赞与珍作为集团的首领也拥有从始祖王Homutawake（可能还包括以前的王）到赞、珍的王位继承顺序。然而在济继承王位以后，王位继承的顺序就转移到济的系统，这时候继承始祖王谱系的就变成了济集团的历代领袖，他们的名字会被编入王位继承的顺序之中。也有可能济集团在获得王位以后赞集团就成了旁系，赞与珍可能会被排除在王位继承顺序以外，反过来济集团的领袖就进入新的继承顺序。可能这才是赞与珍的比对工作完全不清晰的真正原因。

获加多支卤真的是武吗

在对王位继承的研究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那就是真实的大王，即稻荷山铁剑铭文中提到的获加多支卤：

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

学者认为铁剑铭文中提到的“辛亥年”指的是471年。稻荷山古坟的修建时间应该是5世纪末，这与铁剑铭文的年代推定是吻合的。

过去的研究认为武与获加多支卤（Wakatakeru）是同一人物，从铭文中的纪年推断，武应该在471年以前即位。铁剑铭文中出现的“治天下”这一概念也很值得注意，我们可以认为，这一词语说明，当时的倭王权已经拥有了相当大的权力，不再需要依赖中国的册封。这也能解释武为何在即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向刘宋遣使。

然而，这一理解也有问题。按照这种说法，武在471年以前即位，他的权力已经达到了不需要受册封的程度，然而他在478年却向刘宋遣

使并要求官爵。如果他只是为自己请求官爵的话，那还可以理解成他是为了与高句丽对抗。然而武在上表文中还为属下的王族、豪族请求官爵，很明显这与国内统治有关，这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矛盾。

武在上表文中明确请求刘宋授予官爵，其中包含了武与势力强大的王族和豪族的官爵，这说明日本列岛上的统治者依然需要依赖中国的权威。就算请求获得官爵的只有武一人，那也说明武通过中国的册封提高了自身的权威，进而巩固在国内的统治。不然的话就难以解释他向刘宋遣使的意义。

我们可以认为，倭五王正是通过册封建立了以“天下”为统治范围的权力。与第2章提到的“王赐”铁剑铭文中描述的5世纪中期的“王”相比，此时王的权力已经增长了许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时候的王不再需要向中国派遣外交使节，只是结合两者思考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而已。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疑问，说到底是因为我们认为向刘宋遣使的武与铁剑铭文上的获加多支卤是同一人物。然而正如第3章所述，武应该是在478年前后即位并在当年向刘宋遣使的，再结合本章中讨论的用字问题，可见我们还是要慎重思考武与获加多支卤是否同一人物的问题。

必须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解放的比对论

至今为止，通过对照《宋书·倭国传》与稻荷山铁剑铭文，有关当时的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可能。

其一，武与获加多支卤是同一人物，这是最主流的看法，然而这种说法存在诸多问题，这在上文已经论述了。

其二，武在478年前后即位，在此之前的倭国王是兴，因此471年的王应该是兴。那么，获加多支鹵就应该是兴才对。然而，Wakatakeru这个本名与兴这个一字名却很难联系在一起。

其三，兴在462年即位，武在478年即位，在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位没有向刘宋派遣过使者的王，也就是Wakatakeru。如果是这样的话，兴应该是在即位后不久就去世了。另外，武在上表文中并未提到这位Wakatakeru，因此后者很可能来自济集团以外的王族集团。然而，这与上表文中谅暗的说法又有矛盾。

其四，铁剑铭文中的“辛亥年”可能指的不是471年，而是下一个辛亥年——531年。稻荷山古坟已经挖掘的部分存在两个埋葬地点（主体部分），分别是黏土埴与砾埴，至少有两人埋葬于此。铁剑出土于砾埴，然而黏土埴与砾埴都并非位于后方圆形部分的中心，因此很可能还存在一个尚未发现的墓穴（高桥一夫）。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葬于砾埴的乎获居臣就是后来追葬的，古坟的修造年代就没有必要与铁剑铭文中提到的年代一致。然而，这么一来埋葬的年代就要在531年以后了，把年代往后推这么多可能也并不合适。

我对此也暂时不能断定。武与获加多支鹵到底是否同一人物，471年前后的王到底是谁，这是我们今后需要解答的课题。

倭五王到底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天皇谱系中的哪些人物，一直以来这都是倭五王研究的中心问题。

然而，自5世纪以来，随着政治上的变动与历史书的编撰，天皇的谱系多次遭到添加与删减。如果忽略这些因素的话，讨论倭五王的比对是难以得出结论的。对倭五王的研究不应该拘泥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而是以倭五王为基础重构5世纪的历史。这正是我写作本书的目的。

[1]. 一个地区中规格最高的神社。——译者注

[2]. 这段及下段引文使用上代日本语而非汉文写成，其中小字部分是万叶假名，代表一个日语音节，而非字面意义。——译者注

终章 “倭五王”时代的终结

——世袭王权的确立

武是倭五王的最后一位，在他之后倭国王再也没有进入中国的视野之中。倭国在5世纪频繁地向中国派遣使者，为何在武以后却突然停止遣使？本章将探讨这一现象的原因与背景，从而对5世纪倭五王在东亚历史舞台上登场的意义进行最终的思考。

1. 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断绝——为什么停止遣使

475年以后的东亚势力结构

在高句丽军队南下、百济都城汉城沦陷的这段时间里，东亚的局势也产生了变化。

475年，百济的文周王在逃离兵灾后于熊津建都，由此重建了百济。476年，耽罗（即济州岛）的政治集团与百济缔结关系，百济开始向南方发展，从而开启了国势的复兴。

此外，百济与倭国也取得了联系。《日本书纪》说是雄略天皇帮助百济复国，但这只是《日本书纪》的笔法而已。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应该是百济把复国的消息告知倭国，倭国再加以确认而已。《日本书纪》把百济灭亡记在了雄略天皇二十年（476），这明显是编撰时杜撰的结果。

在得知百济复国的消息后，停留在倭国的昆支返回了百济。文周王于476年把强大的贵族解仇任命为兵官佐平，477年又把昆支任命为内臣佐平，以此重新建立国内政治。这一人事任命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希望通过昆支来强化与倭国的关系。

然而，百济的政治状况并不稳定。昆支在担任内臣佐平的同年去世，解仇借此机会谋杀了文周王并拥立了三斤王，以此控制了百济的大权。然而解仇没能控制住局势，他在478年与三斤王对立并被诛杀。

倭国正是在解仇杀害文周王、拥立三斤王这一混乱的时期通过百济向刘宋派遣了使者。由于百济经历了亡国与复国，这一时期的史料记录错综复杂，不同的史料中事件的发生时间多有出入，这使得许多

事情都变得难以解释。三斤王在诛杀解仇的次年（479）死去。在复国期间，王权与贵族之间产生了分歧，局势相当动荡。

《三国史记》记载，百济在475年短暂灭亡的同时，倭国就对新罗展开了军事行动，之后又在476年、477年连续对新罗发动进攻。如果这一记载是真实的话，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百济与新罗结盟，倭国在没有百济牵制的情况下对新罗发动了进攻。此外，当时高句丽南下，倭国此举或许也是为了牵制新罗与高句丽的结盟。

477年之后，倭国暂时停止了对新罗的强硬政策，倭国军队下一次攻击新罗是在482年，中间有五年没有动静。这一中断的原因可能是兴的死亡。

在兴死亡、武即位的时候，武有必要向刘宋要求爵位以确保其地位，他很可能因此暂停了对外的军事活动。另外，当时倭国把昆支送回刚刚复国的百济，可见此时的倭国又要重视与百济的关系了。

高句丽在475年攻打汉城以后停止了领土的扩张，对外行动也仅限于向北魏、刘宋遣使而已。当时北魏的政局也不稳定，北魏献文帝在先帝的皇后文明太后的逼迫下，于471年让位于五岁的孝文帝。之后双方依然处于对立状态，献文帝最终在476年遭到毒杀。

我们并不知道高句丽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北魏的政治形势，但是献文帝与文明太后激烈对立的消息应该在475年传到了高句丽。无论如何，当时的北魏由文明太后通过垂帘听政进行统治，她的对外政策并不积极。这也是百济在472年请求援助时遭到拒绝的原因之一。

刘宋则是已经走到了命运的尽头。将军萧道成掌握大权，通过镇压反对派扩张势力，并在477年杀害皇帝，拥立了新的皇帝，是为顺帝。477年与478年的倭国使者正是在这种局势下来到刘宋，他们应该

不难感觉到刘宋快要亡国了。479年，萧道成接受了顺帝的禅让，建立了南齐。据说顺帝知道自己在劫难逃，说出了“愿后世世勿复生天王家”这句话。他在一个月后被杀。

萧道成是南齐的高帝，他的王朝与刘宋有着同样的问题。齐高帝是军人出身，他与贵族之间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

最后一次遣使是在什么时候

在这种形势之下，武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持续到了什么时候？武在478年呈上表文，在次年的479年，刘宋就灭亡了。倭国与南齐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南齐书·倭国传》中记载了南齐与倭国的关系：

建元元年，进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号为镇东大将军。

南齐于502年亡国，梁建立。《梁书》中也提到了倭国：

车骑将军高句骊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大进号征东大将军。安西将军宕昌王梁弥~~頌~~进号镇西将军。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镇西将军河南王吐谷浑休留代进号征西将军。

按照这些史料的记载，武在479年从安东大将军升格为镇东大将军，在502年又升为征东大将军。

然而，我们不能凭这些记载就判断两国的外交活动还在进行。倭五王研究的泰斗坂元义种就认为这些记载之所以会出现，并不是因为武向中国遣使，而只是为了庆祝新王朝的建立而进行的升格。确实，史料只记载了将军号的升格，并没有提到使节来朝。尤其是《梁书》

记载各国的统治者一起升格，更加佐证了这个说法。因此坂元义种的说法一直以来被学界认为是合理的史料解释。

新史料告诉我们什么

2011年，新的史料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那就是清代人张庚的《诸番职贡图卷》。这是临摹梁元帝（552～554年在位）时的画作《梁职贡图》的一部分。

所谓职贡图是一种画像，里面描绘与中国有来往的各国使者的样貌，并在图画的旁边书写题记以对图画上的国家进行说明（榎一雄、深津行德）。《梁职贡图》的临摹本有三个版本传世，其中两个版本只有图画，既有图画也有题记的只有北宋1077年临摹的版本，一般被称作北宋摹本。

北宋摹本的倭国使图相当有名，大概许多读者已经看过了。里面描绘的倭人穿着一件前方敞开的外袍，脚上没有穿鞋，这看起来更像是南方民族的衣着，与出土陶器的倭人形象相当不一样。题记部分有损坏，已经看不到后半部分。

《诸番职贡图卷》原本有图画与题记，但现在也散佚了。不过《爱日吟庐书画续录》中整理并收录了《诸番职贡图卷》的题记，这是最近才发现的。其中倭国使的题记如下：

倭国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地。气温暖，出珍珠青玉，无牛马虎豹羊鵞。男子皆黥面文身，以木绵帖头，衣横幅无缝，但结束相连。好沉水捕鱼蛤。妇人只被发衣如单被，穿其中贯头衣之。男女徒跣。好以丹涂身。种稻禾麻苧蚕桑，出袖布缣锦。兵用矛、盾、木弓，箭用骨为簇。其食以手，器用笱豆。死有棺无槨。齐建元中，奉表贡献。



图5-1 《梁职贡图》中的倭国使者

其中衣服与赤足的记载与北宋摹本的图画相符，可见图画是基于题记而画。文章的内容与《魏志·倭人传》的内容基本一致，应该是由《倭人传》修改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末尾的一句话：“齐建元中，奉表贡献。”建元是南齐建国初的年号，也就是479～482年。上文提到《南齐书》中记载武官爵的晋升，此前学界一直认为当时并没有遣使，只是形式上的升格，然而《诸番职贡图卷》却显示倭国使节确实访问了南齐。



图5-2 《爱日吟庐书画续录》

有学者认为，《诸番职贡图卷》是相对晚近的史料，而关键的信息点只有在这里出现了，因此需要慎重考虑其真伪。不过，比《诸番职贡图卷》更古老的北宋摹本的倭国使题记虽然后半部分缺失，但我们不妨将前半部分与《诸番职贡图卷》比较。两者虽然有文字的出

入，但并没有新增的句子，可见《诸番职贡图卷》的内容应该不是伪造，那么我们就不能忽视倭国朝贡的句子了。《梁职贡图》题记应该是把《魏志·倭人传》与其他史料结合而成的。

结合《南齐书》的记载，真实的情况应该有两种可能。其一，武在479年向南齐遣使，南齐方面册封了他的官爵；其二，南齐为了庆祝建国，统一升格了各朝贡国统治者的官爵，武的使者是在之后才到达南齐的。两种情况都显示，武曾经向南齐派遣过一次使者，这就是倭五王的最后一次遣使。

武为何停止遣使

武不再向中国派遣外交使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至今为止，学者们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5世纪倭国与东亚他国关系的变化。对此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下文首先考察它们各自的论点与问题。

第一种说法围绕交通线路展开（川本芳昭）。

我们在第3章提到，山东半岛的所有权在469年从刘宋转移到北魏。因此学者认为，随着山东半岛易主，倭国向南朝遣使变得困难，因此就停止了遣使。从具体的交通线路来把握外交关系是理解历史细节时必须使用的方法。因此交通道路说是一种值得关注的说法。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469年以后百济与倭国向中国遣使的次数发生了锐减。交通道路说应该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山东半岛易主并没有使外交活动变得不可能。百济在471年就向刘宋遣使，倭国也在477年、478年遣使。这显示了北魏占领山东半岛并没有导致百济和倭国与南朝断绝关系。换言之，交通道路说对武停止遣使的解释是薄弱的。

第二种说法为外交关系断绝与中国的鼎革思想有关（前之园亮一）。

479年刘宋灭亡后，南朝经历了齐、梁、陈三个短命的王朝。学者认为这些王朝的皇帝的出身都不高，因此倭国并不认可遣使的价值。这种说法的根本论点是东亚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中国王朝的更替。

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鼎革思想与皇帝出身的关系。我们在第1章也提到过，刘宋的皇帝其实出身也不高，如果说皇帝的出身会导致外交活动停止的话，那么当初倭国与刘宋的外交就无法得以维持。

第三种说法为，当时的倭国把自身视作“天下”，因此想要从中国的影响中脱离出去（西嶋定生）。

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稻荷山铁剑与江田船山大刀的铭文中出现了“天下”这一概念。这能够说明当时倭国的统治制度已经成熟，倭王不再需要获得中国的册封。至今为止，这是最多学者认同的观点，看起来也是最有道理的。

然而，我们要慎重思考权力的成熟是否必然导致册封关系的中断。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中国周边的国家成长到一定地步时应该会断绝册封关系。然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周边国家都拒绝了册封关系，比如说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就一直保持着册封关系。就算是日本，在特殊的情况下也会接受册封，足利义满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这三种观点都分别涵盖了重要的观察角度，都是在对当时倭王权的性质进行了深入思考后提出的。然而它们又分别存在如上所述的各种问题。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外交关系的断绝呢？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考虑5世纪倭国与南朝进行外交的目的。

上文已经论述过，与刘宋进行外交的目的在于获得官爵。从刘宋获得的官爵可以在国内给王族与豪族分配将军号，也能用府官制的方式达到强化倭王权的目的；在国外则是为了在与百济等国竞争时拥有相应的地位。反过来说，停止与中国的外交也就意味着不再获得中国的官爵，这也就放弃了作为倭国王统治日本列岛，以及出现在东亚外交舞台上的手段。这可以说是强制改变了倭五王共同构筑的权力结构。

2. 倭王权的转变——继体大王的即位

加耶的自立与解体

以下先概括一下武从东亚外交舞台上消失之后的国际状况。

百济三斤王于479年去世。《日本书纪》记载当时昆支的第二个儿子末多在倭国，在倭国500人的护送下回国并继承了王位，是为东城王。按照这种说法，末多应该在昆支归国以后继续留在倭国，作为两国沟通的桥梁。倭国之所以护送他回国也是因为希望扶植一位对倭国友好的百济王。

同样在479年，南齐建国。南齐不仅提升了武的爵位，还让高句丽王从车骑大将军升格为骠骑大将军。百济则在第二年，即480年向南齐遣使，获得了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的爵位。与倭国、高句丽相比，百济获得官爵的时间更晚，将军号也没有升格。这时候倭国与百济的将军号是同级的，不过从武不再向南朝遣使的事实也能看出，此时的倭国已经不重视与南齐的关系了。从此以后，以将军号为标准的地位意识在东亚地区失去了意义。

加耶的动向也值得注意。479年，加罗国王荷知向南齐遣使，这个加罗国就是第2章提及的大加耶。学者把荷知比对为《三国遗事》中的嘉悉王。与百济、新罗相比，加耶是各小国的集合体，在较晚的时候才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而这时候的加耶正作为联盟开始了整合，其盟主正是大加耶。

475年，百济暂时陷入了亡国的状态，大加耶因此得以向南齐遣使。479年的遣使宣示了加耶诸国成为朝鲜半岛上第四大国的可能性。然而百济很快在文周王与三斤王的努力下复国了。虽说大加耶并不是

没有能力单独通过朝鲜半岛西岸向中国遣使，但从它看准了南齐建国这一时机遣使的事实来看，当时可能存在把情报告知加耶，并帮助其遣使的力量。百济向南齐遣使是在480年，故可以排除百济的可能性。由此看来，倭国就有可能参与其中了。再加上倭国很有可能向南齐派遣了使者，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倭国与加耶可能是同时遣使的。

然而，加耶最终只向中国派遣了一次使者，之后再也没有遣使了。后来百济为了恢复国力而向朝鲜半岛西南部的马韩扩张势力，于5世纪末到6世纪上半叶发展至荣山江流域一带。同时新罗也开始了对加耶的入侵。加耶在百济与新罗的蚕食下最终解体，失去了成为独立国家的可能性。

高句丽对百济、新罗

高句丽在攻打百济并对其造成严重破坏以后，似乎又把目标转移到新罗身上。进入5世纪80年代，高句丽发动了对新罗的攻势，这些攻击断断续续地发生在481年、484年、489年、494年。

百济在484年向新罗派出援军，并在次年恢复了短暂亡国以前的关系。这意味着东城王采取了重视与新罗关系的外交政策。495年，百济更是向新罗提出了联姻的邀请，百济王最终迎娶了新罗重臣的女儿。百济与新罗的同盟关系通过联姻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我们不清楚当时倭国的外交政策，但倭国在482年、486年重启了对新罗的袭击。对此，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观点为，百济与新罗的同盟关系对倭国不利，因此倭国对此进行了干扰。对倭国而言，百济、新罗、加耶诸国最好分别有求于自己，百济与新罗的联盟则破坏了这种关系。倭国之所以重启中断了

五年的对新罗的攻击，可能是因为倭国认为东城王是亲倭国的百济王，他能够堵住百济内部的反对声音。

第二种观点为，袭击新罗并不是倭王权主导的。

我们在第2章提到，当时的军事组织方式是豪族们各自率领自己的军队。下文还会论述，当时的倭王权与倭五王时代相比，势力其实是衰落了。倭王权可能失去了对豪族活动的控制。

《日本书纪·显宗天皇纪》中记载了一个名叫纪生磐的人，他自称三韩王，在加耶自立并与高句丽勾结。6世纪上半叶还有一个名叫筑紫君磐井的人，他私自与朝鲜半岛的诸国交往。这些记载的真伪难以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倭国并非铁板一块。

在这种情形下，北魏于490年对百济发动进攻。由于需要渡海，中国其实极少对百济发动直接进攻。除了这一次北魏的进攻以外只有660年唐攻打百济并导致百济最终灭亡的一例而已。490年，北魏文明太后亡故，孝文帝亲政，然而他并没有对外交政策做出明显调整。攻打百济大概是为了在北魏国内宣示皇帝的权力。百济击退了北魏的攻击，并在495年给南齐的上表文中汇报了这件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统治高句丽长达78年的长寿王在491年去世。长寿王无疑与倭五王一样都是5世纪东亚政坛的核心人物。由于他在位时间实在太长，他的继承人助多王子先他而死，继承王位的是助多之子、长寿王之孙罗云，是为文咨明王。文咨明王延续了长寿王的外交政策，对新罗与百济发动了多次进攻。

在5世纪90年代，倭国只是偶尔出现在东亚的政治舞台上。从5世纪末到6世纪上半叶，高句丽、百济、倭国三足鼎立的局势转化为高句丽与百济、新罗的对立。

继体大王的登场

文献上并没有记载这一时期倭王权的状况。我们可以看看《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说法作为参考。《古事记》中记载雄略天皇的去世是在“己巳年八月九日”，也就是489年，而《日本书纪》记载的则是雄略天皇二十三年（479），两者相差足足十年。

对雄略天皇的前代安康天皇以及之后的清宁、显宗、仁贤、武烈几代天皇，《古事记》连死亡时间都没有记载。另外显宗天皇与武烈天皇都没有皇子。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天皇中有一些是架空的人物，这在第4章已经提到。

能够确认的是，在这一时期，倭国停止了倭五王时代那种向南朝的遣使，而且不仅是与中原王朝，与百济等国的外交活动也大幅减少了。考虑到与中原王朝的外交是由倭王权主导的，这一趋势可能显示了当时的倭国处于国内政治混乱的状态。

能够证明此点的是继体大王在6世纪初的登场。继体大王即位前的名字叫男大迹（Ohodo）王，在越前、近江一带拥有势力。他自称是誉田别（Homutsuwake）的五世孙，于507年在河内樟叶宫即位。《日本书纪》记载，武烈天皇死后，大伴金村打算迎立仲哀天皇的五世孙倭彦王，但没有成功，于是与物部麁鹿火、许势男人商议，最终迎立了继体大王。

如果男大迹王是誉田别的五世孙的话，那么他在谱系上就应该属于倭五王以外的系统。不过在5世纪的时候，他应该也是使用倭姓、王族集团出身得到承认的人物。继体大王即位的时候受到了大伴、物部、许势这些大豪族的支持，即位后也马上承认了他们的地位。这意味着男大迹在即位以前已经拥有一定的势力，大和地区的豪族也认可他的地位。

话虽如此，继体大王也不是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没有在大和而是在河内即位，这本身就说明当时可能存在一定规模的拒绝接受继体大王的势力。后来继体大王经过山背的弟国（即今京都府乙训郡）并建筑了磐余玉穗宫，最终才进入了大和国。而此时已经是 he 即位的第20年了。

王位世袭化与王统的确立

继体大王的王位并不稳固，这意味着他之后的王位继承也存在不稳定的因素。继体大王自己恐怕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有意做出改善之举。他创立了一种挑选继承候选人的制度，即大兄制度。同一个母亲生下的王子组成了各自的小集团，其代表称作大兄，同时是王位继承的候选人。这种制度一直到7世纪下半叶仍然发挥着作用。

后来，虽然几经曲折，但大王的王统最终还是在继体大王的子孙之间继承下来。从这种角度出发，可以说继体大王的计划获得了成功。王位继承由原来的多个系统中拥有最强力量的人继承逐渐转移到近亲继承，王位的世袭性得到增强。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产生了倭五王的两个王族集团都衰落了。在武最后一次遣使的20年后，这两个集团中没能产生适合担任王的人选。

《日本书纪》把衰落说成暴虐的武烈天皇的责任。有关武烈天皇的记载充满了与君主身份不符的行为，比如说割开孕妇的肚子、让人爬树之后把树砍断等。《日本书纪》这么写的目的在于说明武烈天皇的行为导致他的王统失去了天命，并致使继体天皇即位。编撰《日本书纪》的人生活在8世纪，这时候的人已经学习了天命思想，因此才写下了这样的故事，但这并不是当时的真实情形。

那么，这两个王族集团真的在5世纪末走向绝路了吗？百舌鸟古坟群与古市古坟群都没有建造新的巨大前方后圆坟，但两者都延续到了6世纪上半叶。由此看来，在继体大王的时代，产生倭五王的两个王族集团依然存在。

《日本书纪》记载，继体天皇迎娶了武烈天皇的姐姐手百香皇女。由此看来，5世纪并立的两个王族集团可能并非衰落，而是通过婚姻与新王朝实现了统合。

刘宋的崩溃与新秩序

倭国的王在5世纪初向中国的南朝派遣使节，到了5世纪末则逐渐停止了遣使。有关停止遣使的原因，至今为止学界一般认为是倭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统治制度，不再需要依赖中国的册封。

不过，在武停止遣使、继体大王登场的这大约20年间，倭国的国内政治很可能是比较混乱的。这与武建立了强大的权力基础这一说法并不一致。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遣使停止呢？如果把停止遣使的时间与国际形势进行比较，那么刘宋的灭亡应该还是主要的原因。上文我介绍了与中国鼎革思想相关的学说，这是一派相当重要的说法。上文虽然已经指出了这种看法的问题，但其实在国际关系之中，名分是相当重要的，而且这点不仅仅适用于古代。

倭五王被刘宋皇帝册封为倭国王，也就是说，刘宋皇帝与倭五王结成了君臣关系，五王获得了倭国王、安东（大）将军、“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这些官爵，并利用这些头衔建立其与国内的王族、豪族以及朝鲜诸国的关系，从而构筑其权力结构。倭五王认识到能够确保自己权力的来源是刘宋的皇帝，这是其权力正当性的根源。

这种观念并不限于倭五王，对百济王而言也是一样的。因此，倭国王与百济王之间既有互助，也有竞争的关系。换言之，他们是在刘宋的册封体系这一规则之下共同处理国际政治的问题。

然而，百济在475年短暂灭亡，之后在479年刘宋也灭亡了，这对倭五王而言意味着国际政治的规则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剧变。倭国可能是为了试探新王朝打算如何介入东亚国际政治，才在南齐建国时派遣了一次使者。然而，倭国并不认为南齐能够继续保证其权力的正当性，因此才停止了遣使。

类似的情况在之前也发生过。卑弥呼曾经被曹魏封为亲魏倭王，她与她的继承人台与都与魏进行外交活动。《魏志·倭人传》记载台与曾经在卑弥呼死后派遣过一次使者，而《晋书·倭人传》则记录了此后的外交关系。按照《晋书》的说法，曹魏于265年灭亡，西晋建立，倭国在266年向西晋派遣了一次使者，但此后就再也没有遣使了。

当然，卑弥呼、台与的时代与倭五王的时代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共同点，那就是在王朝（曹魏、刘宋）灭亡的同时，此前与该王朝建立的册封关系也终止了。

由于国内权力的成熟而终止册封关系的说法听起来比较合理，但这其实是受限于从一国的历史看问题的结果。当时的倭王权只是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还不能从东亚的国际关系中脱离出去。具体而言，加耶的铁、百济与新罗的文物以及来自高句丽的外交压力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倭五王最希望从刘宋获得的是约束东亚各国的国际秩序，官爵则是这种秩序的具体表现。建立南齐的萧道成在478年武遣使的时候官居骠骑大将军。如果对武而言，中国是高于倭国的上国的话，那么萧道成则在过去与自己同样都是刘宋皇帝的臣下，他可能因此不愿意承认

萧道成的帝位。正是因为他们依附的皇帝失去了权威，武才终止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同一时期，倭国国内陷入了混乱。在平息混乱的过程中，统治制度也发生了变革。倭五王在5世纪建立了倭姓的王权，由此统治无姓的民众。而6世纪的王权则与之不同，大王没有姓氏，反而把姓氏赐予豪族乃至民众，自己君临臣下，这可谓一次重大的体制改革。至于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那已经是超越了本书涵盖范围的问题，因此此处就不具体叙述了。

导致这一转变发生的契机正是继体大王的即位与世袭王权的建立，与此同时，倭五王的真实形象则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人们再一次记起他们的时候，已经是1000年后，瑞溪周凤所在的室町时代了。

后记

对我而言，初中、高中的记忆已经相当模糊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当时在日本史课上产生的那种奇怪的感觉。当时我的日本史老师是这么说的：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上铭刻着“获加多支卤”这个名字，这就是《日本书纪》中的“幼武”（Wakatakeru），也就是雄略天皇；另外《宋书·倭国传》中出现的倭国的王“武”也是“幼武”的省略；这三处不同的史料中都出现了同一个名字……

我刚听完这段话的时候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然而同时又有一丝难以除却的奇怪感觉。

稻荷山铁剑上的“获加多支卤”确实能与《日本书纪》的“幼武”联系到一起（虽然现在看来这一点也是有问题的）。可是中国史料《宋书》中的“武”在宋人看来难道不应该读作“mu”吗？这怎么就与获加多支卤是同一人物呢？

之所以会感到奇怪，正是因为人们把稻荷山铁剑上的获加多支卤与《日本书纪》的幼武以及中国史料《宋书》的“武”画上了等号。不过内向的我当时并没有提出质疑，这一疑问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我在研究生阶段进行了正规的日本古代史学习，也读了有关倭五王的论文。由此我知道了倭五王的一字名赞、珍、济、兴、武是倭国方面对外使用的名字。然而，一个新的疑问又出现了。

如果获加多支鹵就是武的话，那么他为何不在与刘宋进行外交中使用“获加多支鹵”这一名字呢？如果每一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的话，那么宋人就可以更正确地称呼他了。为何他不使用这种方法呢？

我从论文中又读到，之所以使用一字名是因为受到了高句丽与百济的影响。这种国际性视角给予了我极大的启发。然而，疑问还是没有解决。

如果要使用一字名的话，那么直接在“获加多支鹵”中选一个字来用就行了，为何要用宋人读不出来的“武”（Takeru）这一训假名呢？说到底，把“武”这个字训读为Takeru的做法在5世纪就已经存在吗？

正当我这么思考的时候，我的朋友江草宣友问我要不要在国学院大学的国史学会发表报告，于是我就以《倭王武的上表文与文字表记》为题做了报告。这是2001年的事情了。

这就是本书的出发点。在此后的十几年间，我断断续续地思考着倭五王的问题。其间已故的石井正敏先生希望我为《日本的对外关系》撰写有关倭五王的论文，这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回忆。当时的论文也成了本书的基础。也不知道我是否达到了石井正敏先生的期待。他最终没能读到这本书，这实在是极大的遗憾。

这时候，中公新书编辑部的白户直人先生问我要不要写点东西，说是远藤庆太与河上麻由子两位新进学者推荐了我。他问我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写的题目，我就回答说想写倭五王相关的书，他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当时我刚刚写完一本关于遣唐使的书，他可能以为我会继续写关于遣隋使的内容。然而倭五王是我研究了十几年的课题，因此我就乘机机会，对他提出了这样“无理”的提议。

我真正着手写作时却发现这本书并不那么好写。这是因为已经有不少人写过关于倭五王的书，比如倭五王研究领域的泰斗坂元义种、之后的藤间生大，以及最近的森公章等。他们的书都相当精彩，如果我写的内容与他们一样的话，那就没有出版的价值了。

记载5世纪倭国历史的史料中，最重要的确实是《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然而这两本书的成书过程相当复杂，这在有关继体天皇以前的记载中尤为明显。如果不对书中的内容加以研究，不辨其真伪，那么自然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如果说本书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本书虽然也提到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内容，但并不以此为根据，而是按照中国、朝鲜的史料以及考古学的成果描绘出历史的真相。日本的考古学界往往难以把中国、朝鲜的史料包含进研究的范围中，反之亦然。以日本古代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则能够把两者都加以考虑，这是它的优势所在。

当然，对于中国史、朝鲜史、考古学的专家而言，本书对这些领域的理解可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我衷心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指正。

本书并不是把内容写完就结束了。白户直人先生总是既耐心又严厉地对我说，这一处的语言节奏把握得不好，这一处的内容与读者想看的不一致，这一处要写得更平白易懂一点，等等。通过与他的合作，我学会了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进行写作。由此本书呈献的内容比当初的构想更加完善，在这一点上，我还是颇有自信的。

本书中含有与一般说法不一样的内容。不过我认为，学问的本质就是对既有的观念提出疑问并加以修正。至于本书在这一点上做得好不好，还有待读者的判断。

河内春人

2017年10月

原文史料

《晋书·安帝本纪》：

- （义熙九年）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

《义熙起居注》（引自《太平御览》）：

- 倭国献貂皮人参等，诏赐细箜篌香。

《宋书·文帝本纪》：

- （元嘉七年春正月）是月，倭国王遣使献方物。

- （元嘉十五年四月）己巳，以倭国王珍为安东将军。……是岁，武都王、河南国、高丽国、倭国、扶南国、林邑国并遣使献方物。

- （元嘉二十年）是岁，河西国、高丽国、百济国、倭国并遣使献方物。

- （元嘉二十八年）秋七月甲辰，安东将军倭王倭济进号安东大将军。

《宋书·孝武帝本纪》：

- （大明四年十二月丁未）倭国遣使献方物。
- （大明六年三月）壬寅，以倭国王世子兴为安东将军。

《宋书·顺帝本纪》：

- （昇明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倭国遣使献方物。
- （昇明二年）五月戊午，倭国王武遣使献方物，以武为安东大将军。

《宋书·夷蛮传》倭国条（《倭国传》）：

•倭国在高骊东南大海中，世修贡职。高祖永初二年，诏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太祖元嘉二年，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世祖大明六年，诏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藩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顺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

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径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簣。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南齐书·东南夷传》倭国：

• 倭国，在带方东南大海岛中，汉末以来，立女王。土俗已见前史。建元元年，进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号为镇东大将军。

《梁书·武帝本纪》：

• 戊辰，车骑将军高句骊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大进号征东大将军。安西将军宕昌王梁弥_頔进号镇西将军。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镇西将军河南王吐谷浑休留代进号征西将军。

《梁书·诸夷传》倭条：

- 晋安帝时，有倭王赞。赞死，立弟弥。弥死，立子济。济死，立子兴。兴死，立弟武。齐建元中，除武持节、督倭新罗任那伽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镇东大将军。高祖即位，进武号征东将军。

《梁职贡图》：

- 倭国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地。气温暖，出珍珠青玉，无牛马虎豹羊鹄。男子皆黥面文身，以木绵帖头，衣横幅无缝，但结束相连。好沉水捕鱼蛤。妇人只被发衣如单被，穿其中贯头衣之。男女徒跣。好以丹涂身。种稻禾麻苧蚕桑，出袖布缣锦。兵用矛、盾、木弓，箭用骨为簇。其食以手，器用笏豆。死有棺无槨。齐建元中，奉表贡献。

七支刀：

- （正面）泰□四年□月十六日丙午正阳，造百炼铁七支刀。□辟百兵，宜供侯王。□□□□作。

- （背面）先世以来，未有此刀。百济王世□奇生圣音，故为倭王旨，造传示后世。

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文：

- 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埵，其儿多加利足尼，其儿名弓己加利获居，其儿名多加披次获居，其儿名多沙鬼获居，其儿名半弓比，其儿名加差披余，其儿名乎获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练利刀，记吾奉事根原也。

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银象嵌铭文：

治天下获□□□卤大王世，奉事典曹人，名无
□（利？）弓，八月中，用大铁釜，并四尺廷刀，八十练□
十振。三寸上好刊刀。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洋洋，得□恩
也。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书者张安也。

参考文献

倭五王综合论述

藤間生大『倭の五王』岩波新書、1968年

坂元義種『古代東アジアの日本と朝鮮』吉川弘文館、1978年

坂元義種『倭の五王』教育社、1981年

山尾幸久『古代の日朝関係』塙書房、1989年

森公章『倭の五王』山川出版社、2010年

田中史生『倭の五王と列島支配』『岩波講座日本歴史 1』岩波書店、2013年

东亚动向

坂元義種『百済史の研究』塙書房、1978年

西嶋定生『日本歴史の国際環境』東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

武田幸男『高句麗史と東アジア』岩波書店、1989年

礪波護・武田幸男『世界の歴史6 隋唐帝国と古代朝鮮』中央公論社、1997年

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東方書店、2002年

川本芳昭『中国の歴史05 中華の崩壊と 拡大』講談社、2005年

序章

村山正雄編著『石上神宮七支刀銘文図録』吉川弘文館、1996年

山尾幸久『日本古代王権形成史論』岩波書店、1983年

宮崎市定『謎の七支刀』中央公論社、1983年

吉田晶『七支刀の謎を 解く 』新日本出版社、2001年

川口勝康『四世紀史と 王統譜』『人文学報』154、1982年

鈴木靖民『石上神宮七支刀銘と 倭国をめぐる 国際関係』『倭国史の展開と 東アジア』岩波書店、2012年

栗原朋信『「七支刀」銘文からみた日本と 百済・東晋の関係』『上代日本対外関係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78年

福山敏男『石上神宮の七支刀』『美術研究』158、1951年

榎本社人『石上神宮の七支刀とその銘文』『朝鮮学報』3、1952年

金錫亨『古代朝日関係史』勁草書房、1969年

岡崎敬『安岳三号墳（冬寿墓）の研究』『史淵』93、1964年

鈴木靖民『加耶の鉄と 倭王権についての歴史的パースペクティヴ』『日本古代国家の展開』上、思文閣出版、1995年

都出比呂 志『 古代国家はいつ 成立し たか』 岩波新書、2011年

広瀬和雄『 前方後円墳国家』 角川書店、2003年

森公章「 東アジア 史の中の 古墳時代」『 古墳時代の 考古学1』 同成社、2011年

新修大阪市史編纂委員会『 新修 大阪市史』 1、大阪市、1988年

河内春人「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 文書外交の 成立」『 歴史評論』 680、2006年

武田幸男『 高句麗と 東アジア』 岩波書店、1989年

李進熙『 広開土王陵碑の研究増訂版』 吉川弘文館、1972年

武田幸男『 広開土王碑と の対話』 白帝社、2007年

李成市「 表像としての 広開土王碑文」『 思想』 842、1994年

林俊雄『 興亡の世界史02 スキタイと 匈奴 遊牧の 文明』 講談社、2007年

川本芳昭『 魏晋南北朝時代の 民族問題』 汲古書院、1998年

第1章

池田温「 義熙九年倭国献方物をめぐって」『 東アジアの文化交
流史』 吉川弘文館、2002年

石井正敏「 五世紀の 日韓関係」『 日韓歴史共同研究報告書 第一
分科篇』 日韓歴史共同研究委員会、2005年

川本芳昭「倭国の四一三年東晋遣使」『新版古代の日本2』角川書店、1992年

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岩波書店、1982年

山口正晃「將軍から都督へ」『東洋史研究』76-1、2017年

小尾孟夫『六朝都督制研究』溪水社、2001年

荊木美行『記紀と古代史料の研究』国書刊行会、2008年

金子修一『隋唐の国際秩序と東アジア』名著刊行会、2001年

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中公文庫、1997年

河内春人「倭国における南朝官爵の史的意義」『日本古代君主号の研究』八木書店、2015年

前之園亮一「倭の五王・司馬曹達・百濟府官の単名について」『共立女子短期大学文科紀要』45、2002年

田中史生「倭の五王の対外関係と支配体制」『島根県古代文化センター研究論集』14、2015年

西本昌弘「楽浪・帯方二郡の興亡と漢人遺民の行方」『古代文化』41-10、1989年

鈴木靖民『倭国史の展開と東アジア』岩波書店、2012年

第2章

村山正雄「百濟の大姓八族について」『東洋史論叢』山川出版社、1972年

武田幸男「平西將軍・倭隋の解釈」『朝鮮學報』77、1975年

塩沢裕仁「宋書にみる倭隋の將軍号」『法政大學大学院紀要』
31、1993年

市原市教育委員會・財団法人市原市文化財センター編「王
賜」銘鉄劍概報 千葉県市原市稻荷台一号墳出土』吉川弘文館、1988
年

熊谷公男「五世紀の倭・百濟關係と羅濟同盟」『アジア文化史
研究』7、2007年

木村誠『古代朝鮮の國家と社會』吉川弘文館、2004年

李成市『古代東アジアの民族と國家』岩波書店、1998年

糸永佳正「新羅の高句麗からの自立時期について」『大阪教育
大學 歴史研究』36、1999年

井上直樹「高句麗の対北魏外交と朝鮮半島情勢」『朝鮮史研究
會論文集』38、2000年

高寛敏「倭の五王と朝鮮」『東アジア研究』8、1995年

荊木美行「元嘉七年遣使の「倭國王」をめぐって」『史料』144、
1996年

石井正敏「五世紀の日韓關係」『日韓歴史共同研究報告書 第一
分科篇』日韓歴史共同研究委員會、2005年

田中俊明「大加耶連盟の興亡と「仁那」」吉川弘文館、1992年

田中俊明「古代の日本と加耶」山川出版社、2009年

湊哲夫「倭王世子興没年代考」『日本史論叢』2、1973年

第3章

鈴木靖民「武（雄略）の王権と東アジア」佐伯有清編『古代を考える 雄略天皇とその時代』吉川弘文館、1988年

川本芳昭「倭の五王による劉宋遣使の開始とその終焉」『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汲古書院、1998年

井上直樹「高句麗の対北魏外交と朝鮮半島情勢」『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38、2000年

田中俊明「百濟文周王系の登場と武寧王」『高麗美術館研究紀要』5、2006年

鈴木英夫「古代の倭国と朝鮮諸国」青木書店、1996年

廣瀬憲雄「倭の五王の冊封と劉宋遣使」『梁職貢図と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勉誠出版、2014年

荊木美行「風土記と古代史料の研究」国書刊行会、2012年

横山貞裕「倭王武の上表文について」『日本歴史』389、1980年

前之園亮一「倭の五王の通宋の開始と終焉について」『古代国家の政治と外交』吉川弘文館、2001年

笠井倭人「倭王武の上表文」『古代の日朝関係と日本書紀』吉川弘文館、2000年

川崎晃「倭王武・百済王餘慶の上表文と金石文」『古代学論究』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2年

湯浅幸孫「倭国王武の上表文について」『史林』64-1、1981年

福井佳夫「倭国王武『遣使上表』について」上下『中京国文学』14・15、1995、1996年

河内春人「倭王武の上表文と文字表記」『日本古代君主号の研究』八木書店、2015年

鈴木英夫「倭の五王と高句麗」『高句麗研究』14、2002年

熊谷公男「倭王武の上表文と五世紀の東アジア情勢」『東北学院大学論集 歴史と文化』53、2015年

福井佳夫『六朝美文学研究』汲古書院、1998年

内田清「百済・倭の上表文の原典について」『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86・88、1996年

志水正司「倭の五王に関する基礎的考察」『日本古代史の検証』東京堂出版、1994年

田中史生「武の上表文」『文学と古代日本2』吉川弘文館、2005年

久米邦武「聖徳太子実録」『久米邦武歴史著作集』1、吉川弘文館、1988年

田中史生「倭の五王の対外関係と支配体制」『島根県古代文化センター研究論集』14、2015年

下垣仁志「古代国家論と戦争論」『日本史研究』654、2017年

第4章

笠井倭人『研究史 倭の五王』吉川弘文館、1973年

河内春人「『読まれる』史料と『読めない』史料」『中央史学』39、2016年

ウィリアム・ジョージ・アストン「日本上古史の大意」『文』1-14・15、1888年

吉村武彦「倭の五王とは誰か」白石太一郎、吉村武彦編『争点 日本の歴史 2』新人物往来社、1990年

前田直典「応神天皇朝といふ時代」『元朝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

原島礼二・石部正志・今井堯・川口勝康『巨大古墳と倭の五王』青木書店、1981年

沖森卓也『日本古代の表記と文体』吉川弘文館、2000年

西條勉「倭の五王と古代王権の系譜学」『国士館大学文学部人文学会紀要』28、1995年

川田順造『無文字社会の歴史』岩波書店、1976年

武田祐吉『古事記研究1 帝紀攷』青磁社、1944年

土生田純之『古墳』吉川弘文館、2011年

神野志隆光『古事記の世界観』吉川弘文館、1986年

義江明子『日本古代系譜様式論』吉川弘文館、2000年

義江明子『古代王権論 神話・歴史感覚・ジェンダー』岩波書店、2011年

河内春人『倭王武の上表文と文字表記』『日本古代君主号の研究』八木書店、2015年

高橋一夫『鉄剣銘一一五文字の謎に迫る 埼玉古墳群』新泉社、2005年

大平聡『ワカタケル』鎌田元一編『古代の人物1 日出づる国の誕生』清文堂出版、2009年

終章

田中俊明『大加耶連盟の興亡と「任那」』吉川弘文館、1992年

田中俊明『百済文周王系の登場と武寧王』『高麗美術館研究紀要』5、2006年

榎一雄『梁職貢図について』『榎一雄著作集』7、汲古書院、1994年

深津行徳『台湾故宮博物館蔵「梁職貢図」模本について』『学習院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調査研究報告』44、1999年

尹九龍『清張庚諸番職貢図巻 解題・翻刻』鈴木靖民・金子修一他編『梁職貢図と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勉誠出版、2014年

川本芳昭『倭の五王による劉宋遣使の開始とその終焉』『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汲古書院、1998年

前之園 亮一「倭の五王の通宋の開始と終焉について」『古代国家の政治と外交』吉川弘文館、2001年

吉村武彦編『古代を考える 継体・欽明朝と仏教伝来』吉川弘文館、1999年

主要图片出处

0-1 『大古事記展』（奈良県、2014年）

0-2 若狭徹『古墳時代ガイドブック』（新泉社、2013年）

0-3 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編『古代日本 文字のある風景』（朝日新聞社、2002年）

0-4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文化保存指導局写真帳編集室編『高句麗壁画』（朝鮮中央歴史博物館、1979年）

1-1 鈴木靖民、金子修一他編『梁職貢図と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勉誠出版、2014年）

2-1 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編『古代日本 文字のある風景』（朝日新聞社、2002年）

2-2 市原市教育委員会・財団法人市原市文化財センター編『「王賜」銘鉄剣概報』（吉川弘文館、1988年）

2-3 『文字、それ以後——韓国古代文字展』（国立中央博物館、2011年）

4-1 『出雲岡田山古墳』（島根県教育委員会、1987年）

4-2 高橋一夫『鉄剣銘一一五文字の謎に迫る 埼玉古墳群』（新泉社、2005年）

5-1 鈴木靖民、金子修一他編『梁職貢図と 東部ユーラシア 世界』（勉誠出版、2014年）

5-2 鈴木靖民、金子修一他編『梁職貢図と 東部ユーラシア 世界』（勉誠出版、2014年）

倭五王相关年表

公元纪年	事件	倭五王	百济王	高句丽王	朝代
369	高句丽南下,百济将其击退	誉田别	近肖古王	故国原王	东晋
371	高句丽南下,百济将其击退并反击,故国原王战死				
372	百济首次向东晋遣使,倭国与百济结盟(七支刀)				
377	新罗向前秦遣使(首次向中国遣使)		近仇首王	小兽林王	
383	淝水之战,前秦大败				
385	百济发生政变(存疑)		枕流王	故国壤王	

倭五王相关年表-续表1

公元 纪年	事件	倭五王	百济王	高句丽王	朝代
391	倭国进入朝鲜半岛南部。广开土王即位	誉田别	辰斯王	故国壤王	东晋
396	广开土王亲征百济		阿莘王	广开土王	
396 ~ 398	高句丽设立府官（东亚最初的府官制）				
400	高句丽与倭国、安罗交战				
404	高句丽与倭国在带方郡海岸交战				
405	百济阿莘王去世，腆支王即位		腆支王		
412	广开土王去世				
413	长寿王即位。倭国、高句丽向东晋遣使	赞	久尔辛王	长寿王	刘宋
420	刘宋建立，高句丽、百济升格				
421	赞首次向刘宋遣使				
425	赞派司马曹达出使刘宋				

倭五王相关年表-续表2

公元纪年	事件	倭五王	百济王	高句丽王	朝代
430	倭国向刘宋遣使	赞	毗有王	长寿王	刘宋
435	高句丽首次向北魏遣使				
438	珍向刘宋遣使,请求六国诸军事	珍			
439	北魏统一北方。高句丽向刘宋献上800匹马				
440	倭国军事介入新罗	济			
443	济向刘宋遣使				
444	倭国军事介入新罗				
450	新罗杀害高句丽将领,反叛高句丽				
451	济向刘宋遣使				
452	北魏太武帝被杀				
453	宋文帝被杀				
454	高句丽攻打新罗				
460	倭国向刘宋遣使		盖鹵王		
461	百济盖鹵王将昆支派往倭国				

倭五王相关年表-续表3

公元 纪年	事件	倭五王	百济王	高句丽王	朝代
462	兴作为世子向刘宋遣使(倭国可能发生了政变)	兴	盖鹵王	长寿王	刘宋
468	高句丽攻打新罗				
469	北魏从刘宋手中夺取山东半岛				
471	北魏献文帝让位(476年遭毒杀)				
472	百济向北魏朝贡,请求出兵高句丽				
475	高句丽攻陷百济汉城,盖鹵王被杀				
477	倭国向刘宋遣使(倭国王不明),昆支回到百济		文周王		
478	倭国(武)遣使,呈上表文	武	三斤王	文咨明王	南齐
479	刘宋灭亡,南齐建立。加罗国(嘉悉王)向南齐遣使				
479 ~ 482	倭国向南齐遣使(倭国王不明)				
490	北魏袭击百济,百济将其击退				
491	长寿王去世				
495	百济向南齐遣使,上表				
502	梁建国		武宁王		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倭五王：日本的王位继承与五世纪的东亚|（日）河内春人著；梁适雨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12

ISBN 978-7-5201-8431-1

I . ①倭… II . ①河…②梁… III. ①日本-古代史-研究②国际关系史-研究-东亚-中世纪③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南朝时代
IV . ①K313.2②D829.313③D83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30284号

倭五王：日本的王位继承与五世纪的东亚

著者|（日）河内春人

译者| 梁适雨

出版人| 王利民

组稿编辑| 董风云

责任编辑| 沈艺 成琳

责任印制| 王京美

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
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行|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装|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开本: 889mm×1194mm 1| 32

印张: 8.375 字数: 155千字

版次| 2021年12月第1版 202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201-8431-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21-3498号

定价 5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倭五王指《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赞、珍、济、兴、武五位倭国王。在邪马台国与中国断交150年后，五王在五世纪初重新向中国派遣了使者。当时东亚各国之间纷争不断，倭国也卷入其中。河内春人从中国史料出发，解读了倭国向中国遣使朝贡的意图和时代背景，展现了当时倭国国内不稳定的王权与文化氛围，分析了倭五王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日本天皇的对应关系，描绘了五世纪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

王位継承と五世紀
の東アジア

聚焦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的东亚国际关系
以中国史书重绘倭五王的真实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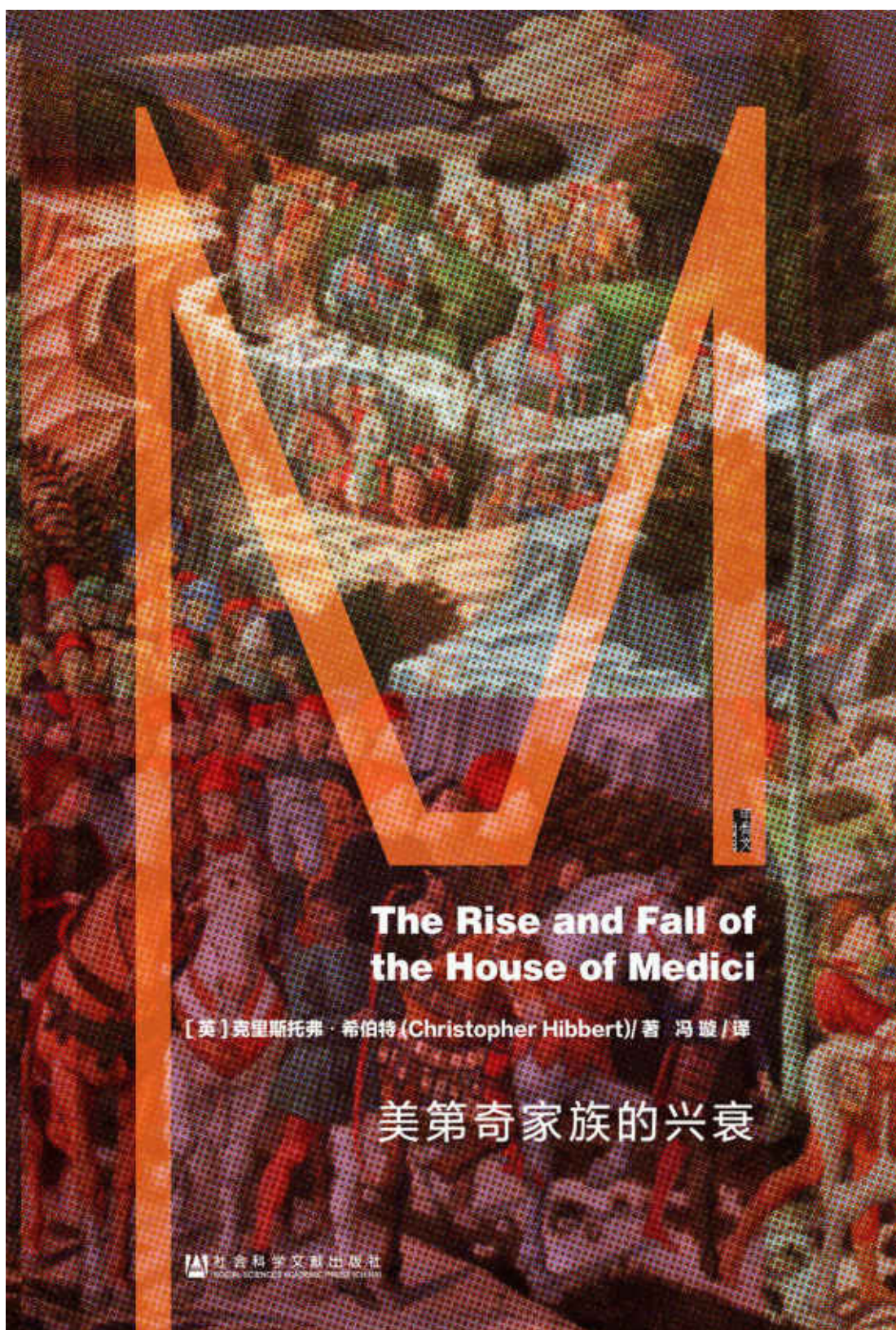


9 787520 184311



定价：58.00 元

甲骨文官方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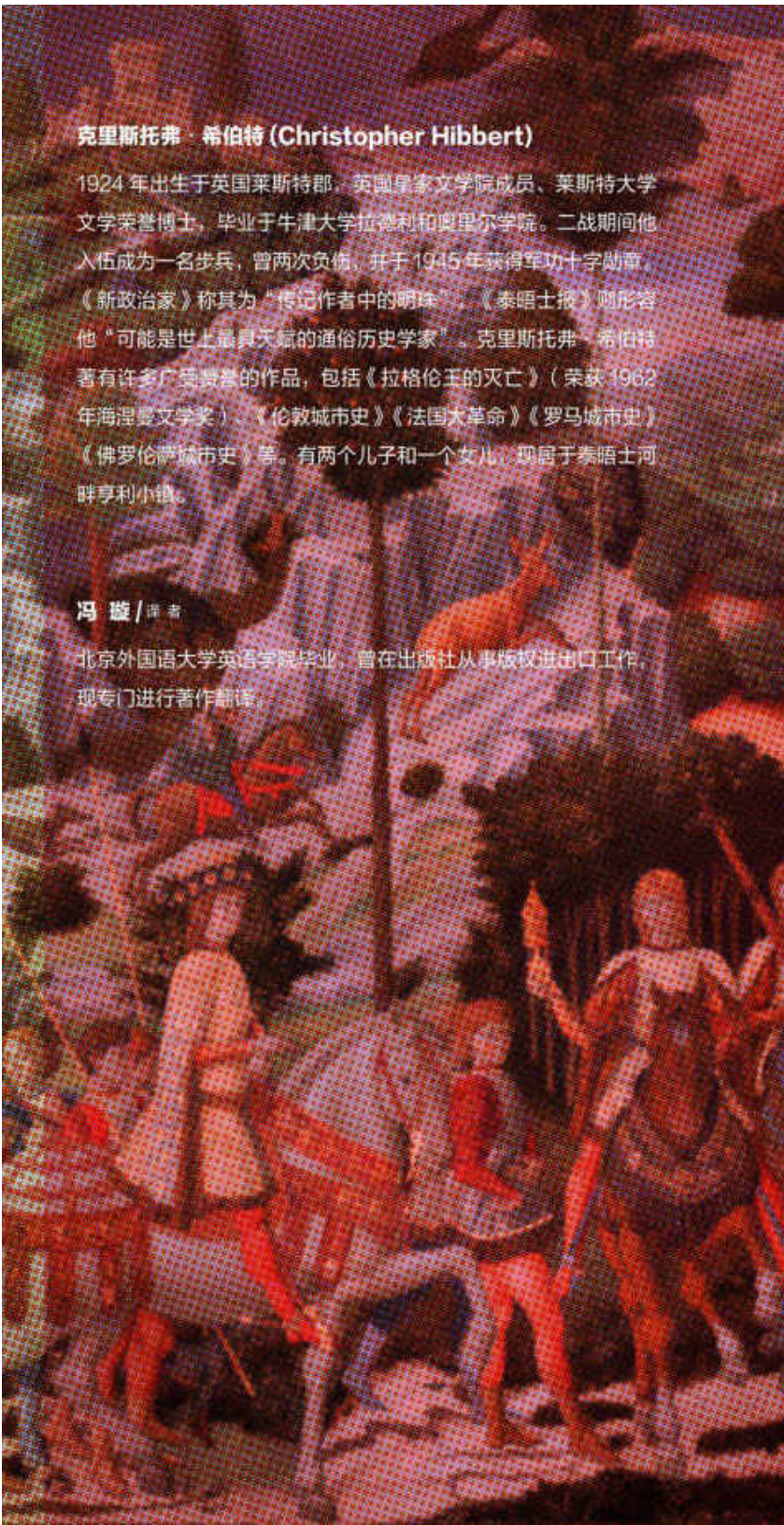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f Medici

[英] 克里斯托弗·希伯特 (Christopher Hibbert) / 著 冯 璇 / 译

美第奇家族的兴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克里斯托弗·希伯特 (Christopher Hibbert)

1924 年出生于英国莱斯特郡，英国皇家文学学院成员、莱斯特大学文学荣誉博士，毕业于牛津大学拉德克利夫和奥里尔学院。二战期间他入伍成为一名步兵，曾两次负伤，并于 1945 年获得军功十字勋章。《新政治家》称其为“传记作者中的明珠”，《泰晤士报》则形容他“可能是世上最具天赋的通俗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伯特著有许多广受赞誉的作品，包括《拉格伦王的灭亡》（荣获 1962 年海涅曼文学奖）、《伦敦城市史》《法国大革命》《罗马城市史》《佛罗伦萨城市史》等。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现居于泰晤士河畔亨利小镇。

冯 璇 / 译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毕业，曾在出版社从事版权进出口工作，现专门进行著作翻译。

美第奇家族的兴衰

〔英〕克里斯托弗·希伯特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作者自序](#)
- [地图](#)
- [第一部分 1400](#)
 - [第一章 佛罗伦萨和佛罗伦萨人](#)
 - [第二章 美第奇家族的兴起](#)
 - [第三章 阿尔比奇家族的敌人](#)
 - [第四章 被流放者与国家的主人](#)
 - [第五章 大主教们与建筑师们](#)
 - [第六章 战争与和平](#)
 - [第七章 艺术家与哀悼者](#)
- [第二部分 1464~1492](#)
 - [第八章 痛风病人皮耶罗](#)
 - [第九章 年轻的洛伦佐](#)
 - [第十章 教皇与帕奇家族](#)
 - [第十一章 佛罗伦萨的救世主](#)
 - [第十二章 意大利指南针上的指针](#)
 - [第十三章 洛伦佐：资助者、收藏家和诗人](#)
- [第三部分 1492~1537](#)
 - [第十四章 皮耶罗·迪·洛伦佐·德·美第奇和费拉拉的修士](#)
 - [第十五章 驱逐令](#)
 - [第十六章 美第奇的回归](#)
 - [第十七章 教皇莱昂内！](#)
 - [第十八章 向罗马进军](#)
 - [第十九章 围困与谋杀](#)
- [第四部分 1537~1743](#)
 - [第二十章 公爵科西莫一世](#)
 - [第二十一章 科西莫的继承人](#)
 - [第二十二章 费尔迪南多二世和法国公主](#)
 - [第二十三章 科西莫三世和王子费尔迪南多](#)
 - [第二十四章 最后一个美第奇](#)
- [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主要画像、半身像和雕塑](#)
- [参考文献](#)
- [美第奇家族成员图谱](#)
- [索引](#)

作者自序

尽管描写美第奇家族及其所处时代的作品很多，但直到1909年G. F. 杨上校的两卷本著作出版，我们才有了第一部全面描写整个美第奇家族的英文著作。该书从十四世纪美第奇银行在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的领导下崛起写起，直到1737年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位托斯卡纳大公吉安·加斯托内去世为止。基于当代研究的成果，本书意在对该课题做出进一步研究并为杨上校的著作——被费迪南德·谢维尔评价为“一个多愁善感的作者凌驾于历史上的主观离题”——提供一个可靠的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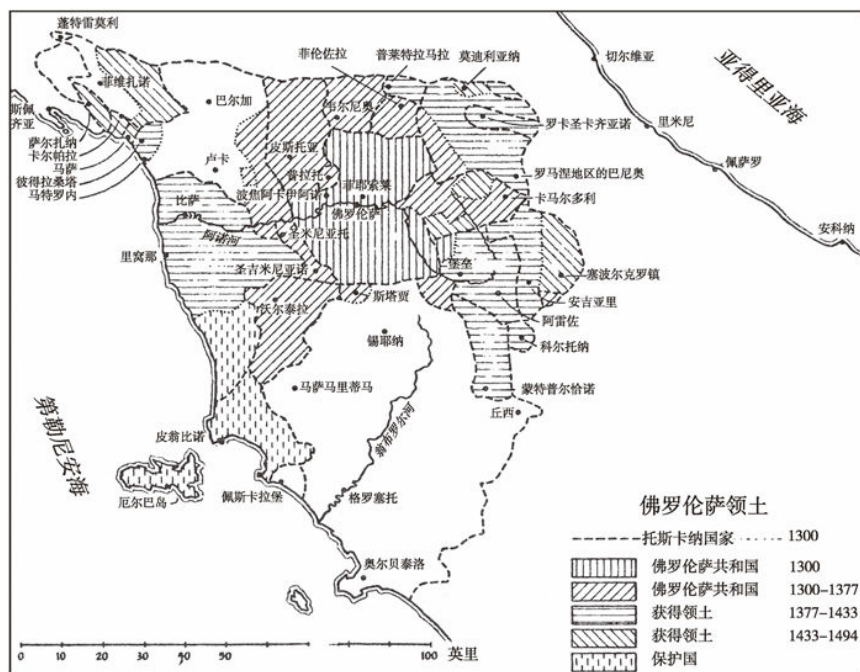
本书涉及的范围极广，我不敢在这些领域中妄称专家，但是我参考了许多作家和学者的著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的写作帮助极大。在此我想特别感谢哈罗德·阿克顿爵士、伊夫·博苏克女士、埃里克·科克伦教授、文森特·克罗宁先生、J. R. 黑尔教授、乔治·霍姆斯博士、劳罗·马丁内斯教授、艾里斯·奥里戈侯爵夫人、里多尔菲侯爵、雷蒙德·德鲁弗教授、尼古拉·鲁宾斯坦教授和费迪南德·谢维尔先生。我尤其感激利兹大学意大利语系的布赖恩·莫洛尼博士和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的乔治·霍姆斯博士为本书进行审校并提出不少宝贵的改进意见。法比奥·纳尔迪先生就本书中关于托斯卡纳地区地形及建筑方面内容提供的参考也给我带来了很大帮助。我在佛罗伦萨工作期间，法比奥·纳尔迪先生和帕特里齐娅·纳尔迪夫人以及国立中央图书馆和佛罗伦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为我提供了很多便利。

在此我还要感谢罗伯托·布鲁尼博士、毛瑞斯·希尔夫人、杰拉尔丁·诺曼夫人、弗朗切斯科·帕帕法瓦伯爵、约翰雷夫人、琼·圣乔治·桑德斯夫人、米博·斯塔尼兰先生，以及不列颠博物馆、伦敦图书馆和牛津博德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最后我想要再一次感谢我的朋友哈密什·弗朗西斯和乔治·沃克审校此书。感谢我的妻子编制本书索引。

地图





第一部分 1400

第一章 佛罗伦萨和佛罗伦萨人

“不经商的佛罗伦萨人……无论如何也抬不起头”

1433年9月的一个清晨，一个长着鹰钩鼻、面色灰白的清瘦男人走上了通往佛罗伦萨市政厅（Palazzo della Signoria）的台阶。^[1]这个人就是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据说是世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科西莫走进大门，一个官员让他在院子里等候，说会议室里的会议一结束就带他进去。几分钟后，侍卫队长让科西莫跟随自己上楼，但他们走的楼梯并不通向会议室，而是通向钟楼上一间狭小的牢房。科西莫就这样被关进了这间被戏称为“小旅馆”

（Alberghettino）的牢房里。据科西莫后来回忆，他就是透过牢房里仅有的一个窄小的窗户缝隙俯瞰整个城市的。

当时的佛罗伦萨城里有广场和高塔；有曲折、狭窄的繁忙街道；有用巨石垒墙、阳台突出的碉堡模样的宫殿；有古旧的教堂，外墙上画着黑色、白色、绿色和粉色的几何图形；还有修道院、女修道院、医院和拥挤的住宅区。城市的四周有用砖块和石头建造的带雉堞的高耸城墙，城墙之外围绕着村庄，村庄之外则是有绿树覆盖的山峦。佛罗伦萨城墙之内的人口超过5万，虽不及巴黎、那不勒斯、威尼斯和米兰，但是足以超越包括伦敦在内的其他欧洲城市。况且这里的人口统计也没那么精确，甚至是非常随意的，记录新生儿数量的方法是往罐

子里放豆子，一个男孩儿出生就放一粒黑豆，一个女孩儿出生就放一粒白豆。

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整个城市被分为4个大区（quartieri），每个大区又被分为4个小区，每个小区依其纹饰徽章命名。4个大区各具特色，取决于该区主要进行的商业活动和居住在该区的富人家的宫殿。富人家的孩子，还有他们的仆人、家臣和侍卫经常在这些有柱廊的室外敞廊（loggie）中说笑嬉闹，甚至谈论生意。

城里最繁忙的区域包括维奇奥桥（Ponte Vecchio，又译作旧桥）及其周边地区，这是一座横跨阿诺河（Arno）最窄一段的石桥，两岸有许多屠夫的肉店；^[2]奥尔圣米凯莱教堂（Orsanmichele）附近和公共粮仓一带也很热闹，到了夏天，银行家们会在这里支起铺着绿色桌布的桌子，丝绸商人则在这里搭建帐房；^[3]还有就是老市场

（Mercato Vecchio）所在的大广场，那里曾经是古罗马广场。^[4]此时的老市场上有服装商人和倒卖二手衣服的店铺，有鱼贩的货摊，有面包师傅和果蔬商贩，有卖皮革制品和文具的商店，还有制作蜡烛的作坊，里面因为点着遮盖蜡味的熏香而总是雾气缭绕，妓女们就在这里为客人提供服务。市场里开放的摊位都加了顶棚来遮蔽烈日的炙烤，成捆的丝绸、整桶的谷子和玉米，还有各种皮革制品就摆在这里供买主挑选。空地上还有理发师给顾客剃须剪发；裁缝在门廊的阴凉里给客人缝制衣物；仆人和家庭主妇们则聚在卖熟食的货摊前采购；面包师傅把一盘盘的面团推进公共烤箱；做家具的木匠和做首饰的金匠也都把自己的商品展示出来；街头公告员来往于广场之上，一边发布当天的新闻，一边替人做做广告；衣衫褴褛的乞丐举着木碗乞讨。夏天，孩子们在石板上掷骰子玩；到了冬天，他们则会用雪堆出狮子的形状，因为狮子就是佛罗伦萨的纹饰象征。城市里还有各种动物随意穿行：戴着银项圈的狗，在门廊和过道上吃食的猪和鹅，甚至连山上的野鹿或羚羊也会跑进城市，带着清脆的蹄声一路穿过广场。

在前几年，虽然但丁谴责了佛罗伦萨人奢侈浪费的作风，但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会对各种炫富行为嗤之以鼻。佛罗伦萨人的衣着都很简朴，除工匠阶层以外的男性都穿着长及脚踝的长袍，正面一排扣子从上到下，有点儿像教士穿的教士袍（cassock）。佛罗伦萨人的房子也装饰得很低调。哪怕是那些富有的家族，用的也是最简单的木桌子和一点儿都不舒服的床。家里的墙壁也是一白到底，挂毯都被收进柜子，只在特殊的日子才展示出来；地板就是光秃秃的石面，除了芦苇编成的草垫子外什么也不铺；窗户也大多是用油纸糊的。玻璃和陶制装饰品很是少见，就算有也要被小心翼翼地保管起来；银器要么放在餐具柜里，要么锁在主人房间的橱柜里，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有资格使用；而且那时也没几个家庭买得起叉子。可是近些年来，虽然佛罗伦萨人还会被称赞简朴，但是他们已经明显不再那么节省和克制了。富裕人家的石头房屋，从街面上看还是一副严苛冷峻的样子，可是楼上房间的窗户都镶了玻璃或挂着帘子，房间内部更是另一番风景。大多数房间里铺满了地毯，墙上装饰着壁画、挂毯和宗教图片，偶尔也挂凹面镜，用来把光线反射到桌子和写字台上。壁炉就更是常见了，在寒冷的冬夜里，人们不再像从前一样需要靠平底暖床炭锅和装着热炭的陶土手炉（scaldini）来取暖了。大部分家具表面都以镶嵌工艺装饰。床也被摆放在架高的平台上，还加了顶棚，四周有踏足板。这些床都相当大，通常能达到12英尺宽，至少可以容纳4个或者更多人并排睡在上面。人们睡觉时不穿衣服，喜欢让皮肤直接接触亚麻质地的床单和被套。他们还喜欢在床顶上吊挂一些放有熏香或草药的镂空香炉，呼吸着从中缓慢释出的甜香空气入睡。

在宽松马裤和夹克上衣之外，男人们还要套上一种长及脚踝的猩红色长袍（lucco），这种长袍袖子宽大，领子上连有兜帽；年轻一些的男士们会偏爱活泼的颜色，比如绸缎上衣外面配一件粉色斗篷，穿一双有银色蕾丝花边的白色短袜，戴边沿上插一根羽毛的天鹅绒帽子或有香味的手套，还可以佩戴金戒指、金项链和镶着珠宝的匕首和长

剑。尽管佛罗伦萨和当时欧洲其他城市一样有禁奢法令，但是没有人真正遵守，女人们更是对此不屑一顾。下面是一个负责监督女人们遵守禁奢法令的官员提交的报告，里面提到的他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就很典型：

依据您的指令，我到街上巡视了妇女佩戴违禁饰物的情况，但总会遭到抗议，因为每种情况都确实无章可循，难判对错。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女人在头巾边缘镶了一圈蕾丝花边，于是我的助手问她：“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头巾上有花边。”结果这个女人立马摘下头巾，拆掉了用别针固定在上方的花边，还说那只是个花环。再往前走，我又碰到了一个女人，她穿的裙子前面缝了好多纽扣。我的助手对她说：“女人的衣服上禁止有纽扣。”她却辩称：“这些不是纽扣，是装饰扣，你看，我衣服上既没有扣环也没有扣眼。”最后，我的助手终于遇到了一个他认为确凿无疑的违禁者，于是掏出记录簿准备写下她的名字，他对这个女人说：“你穿的是貂皮。”结果这个女人却抗议道：“你不能记我的名字，这不是貂皮，是幼兽的皮毛。”“那你说的幼兽指什么？”“就是一种动物。”

让很多简朴的教士感到郁闷的是，佛罗伦萨商人妻子们的奢侈是出了名的，同样出名的还有她们的典雅高贵和白肤金发。深色头发的女人会给头发染色，或者戴白色、黄色丝绸做的假发；肤色红润的女人则会抹粉让自己变白。她们走在街上风情万种，服饰艳丽，还要佩戴珠宝首饰和银质纽扣。春夏的裙子都是丝质或者天鹅绒做成的，冬天的衣物则换成织锦或皮草。女人们骄傲地炫耀自己的衣物首饰，因为她们衣橱里的家当往往比丈夫的房产还值钱得多。当然，未婚的年轻姑娘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她们平时闭门不出，只有在去做弥撒的时候才可以戴着厚厚的面纱出门。更有些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则是完全不曾出过家门，她们只能在自己的卧室里做弥撒，在父亲的花园或是院内的敞廊里活动活动腿脚。到了适婚年龄，她们的父母或监护人会全权替她们安排，当然她们的嫁妆也是极其丰厚的。

很多新娘的嫁妆里都要包括几个外国奴隶。奴隶进口是在1336年正式被合法化的，原因是瘟疫暴发导致本地仆人数量锐减。这些外国

奴隶大多是希腊人、土耳其人或俄国人、切尔克斯人或鞑靼人。一些家庭偏爱鞑靼人，因为干活最卖力；而另一些家庭则更喜欢切尔克斯人，因为样貌俊秀、脾气温和。所有奴隶都必须起早贪黑地工作，锡耶纳的云游传教士贝尔纳迪诺（Fra Bernardino）叮嘱家庭主妇，为她们自己好就一定要做到：

有房间要打扫？让你的奴隶去扫。有瓶瓶罐罐要刷？让你的奴隶去刷。有蔬菜水果要削皮？让你的奴隶去削。有衣服要洗？让奴隶去洗。让她帮你照看孩子，帮你打理一切。要让她们习惯不停地工作，否则她们会变得又懒又笨。不要给她们一点儿闲暇时间，只要你不不停地指使她干活，她就没空靠着窗子看热闹打发时间。

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市场上买个奴隶很便宜。这些奴隶通常都是年轻的女孩儿，被买去做奴隶就意味着一辈子都要受主人的束缚。主人对奴隶享有绝对的权力，可以“拥有、保留、出卖、冷落、交换、玩弄、租借或退租、随意处置、判定过错及实施自己或自己的继承人想要采取的任何举措，直至永远，其他人无权干涉”。事实上，奴隶被归入主人的动产，在财产清单中和家禽家畜列为一类。很多女奴会怀上主人的孩子：不仅在当时人们的往来书信中经常见到此类麻烦引发的争执，连接收弃婴的医院也是人满为患，肤色黝黑或斯拉夫人样貌的弃婴源源不断地被送到这里。

奴隶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但她们的伙食还算不错。尽管从法律意义上讲奴隶没有任何地位，也几乎不享有任何权利，但她们会被当作家人一样对待。赶上艰苦的年景，她们的生活反而比最贫穷的佛罗伦萨市民要好过一些。有时候，穷人一天的食物就只有一点儿无花果和栎树皮做的干面包。而一个小康之家的女奴却可以分享主人家的晚餐：蒜香意面、意式肉汤饺子、肝泥香肠或血肠、羊奶酪、水果和葡萄酒，到了周日还可能有鸽子肉或是羊羔肉。富商家里的餐食自然更有异国风情。虽然法令禁止过度奢侈，但是人们就如同在服饰上一

样，在饮食上也公然抛弃了法律的约束，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可能的漏洞。比如法令规定主食不能有烤肉和馅饼之外的东西，那么人们就把能想到的所有美食全填进馅饼里，包括猪肉、火腿、鸡蛋，还有大枣和杏仁等。一个富有人家在款待尊贵的客人时，可能会先奉上一个甜瓜；接着是意式饺子（ravioloi）、意式馄饨（tortellini）或意式千层面（lasagne）；然后是一种用面粉、鸡蛋和糖做成的蛋糕

（berlingozzo）；还要再来几片煮阉鸡、烤鸡或珍珠鸡肉；还有辣牛肉或猪肉冻、画眉肉、丁鲷、梭子鱼、鳗鱼、鳟鱼、鸽子、鹧鸪、斑鸠、孔雀和煮小山羊肉。至于蔬菜，常见的选择有蚕豆、洋葱、菠菜、胡萝卜、韭葱、豌豆和甜菜根。最后还有配着糖或蜂蜜吃的杏仁奶蒸的米饭，或者是用藏红花色素调过色，被做成了动物或人形的松子布丁和松仁蛋糕（pinocchiato）。所有的食物都用料十足、味道浓郁。一碗鸡肉蔬菜浓汤（minestra）里要加姜汁、杏仁碎、肉桂、丁香，还要撒上奶酪或糖。鱼肉馅饼里则要加橄榄油、橙汁和柠檬汁、辣椒、盐、丁香、欧芹、肉豆蔻、藏红花、大枣、葡萄干、月桂叶粉末和马郁兰。有一种特别的红酱（sapore sanguino），里面不仅有肉、葡萄酒、葡萄干、肉桂、檀香，甚至还有漆树这种现在只被用来制革的染料。夏天的时候，大多数富户一天最主要的正餐是在傍晚之前吃的。桌子和凳子都被摆在敞开的花园门口附近，只有客人能坐在直背椅子上，更多时候则是坐在板凳上或箱子盖上，房间远处的角落里还有乐手在吹奏舒缓的音乐。

那些统治整个佛罗伦萨的人就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理论上说，城里几个行业协会的所有会员在政府中都有发言权，但实践中却并非如此。行业协会的总数是21个，包括7个大行会和14个小行会。7个大行会中，又以律师业行会（*Arte dei Giudici e Notai*）地位为最高。位居其次的是羊毛业行会（*Arte della Lana*）、丝织业行会（*Arte di Por Santa Maria*）和毛织业行会（*Arte di Calimala*），这些行会的名字来源于他们存放货物的仓库所在大街的街名。^[5]尽管银行家

依然被教堂斥责为放高利贷的，以至于他们不得已用俗语或委婉语来掩饰自己真正的生意，但是崛起的银行业行会（*Arte del Cambio*）已经成了在财力和重要性上都能够与前述大行会相匹敌的力量。医药香料业行会（*Arte dei Medici, Speziali e Merciai*）的会员包括医生、药剂师，以及香料、染料和药品等货物的经销商，同时也包括一些艺术家和手工艺者。举例来说，画家既是向经销商买染料的客人，也是隶属于这个行会的会员。最后一个大行会是皮革皮草业行会（*Arte dei Vaccai e Pellicciai*），它代表的是皮革、皮草商人和皮革手工匠的利益。

剩下那些小行业协会里的会员则是一些普通的生意人，包括屠夫、制革工人、皮匠、铁匠、厨师、石匠、木工、酒商、旅店老板、裁缝、甲冑师及面包师傅等。一个羊毛业行会的会员可以看不起铁匠行会（*Arte dei Fabbri*）里的铁匠们；但是铁匠也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时候，就是相比于成千上万的羊毛工人、布料工人、织工、纺纱工、染工、梳刷工和打浆工，以及车夫、船夫、苦力和小商贩这类没有固定营业场所的普通劳动者。尽管这些劳动者的数量占到了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他们却无权组建自己的行业协会。这样的不公在过去多次引发不满，有时候甚至会发生暴动。1378年夏天，梳毛工们就发动了一次起义。这些工人被称作“琼皮”（*ciompi*这一名称来源于他们在洗毛车间工作时所穿的木底鞋的名称），是羊毛工人群体中最卑贱的一类，他们的工资还不够让家人吃饱饭。于是梳毛工们大喊着“和让我们挨饿的叛徒同归于尽”的口号，把那些被他们视为压迫者的商人的店铺洗劫一空。商人和他们选举出的头目吓得不得不逃跑保命。梳毛工们还提出要成立三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行会。迫于这样的形势，所有要求都被满足了。只可惜好景不长，其他行业的工人们出于嫉妒，依靠他们雇主私下里的权钱支持，很快就联手摧毁了梳毛工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行会。到1382年，原有的21个行会重新掌握了对城市

无可争议的控制权。根据《1293年正义法令》的规定，佛罗伦萨为独立的共和国，行会通过重新修订这一法令，实现了对政府的操纵。

当时政府官员的组成方式是这样的：21个行业协会中年满35岁的会员都有资格参选政府官员，他们的名字会被写下来并分别放进8个皮质的袋子（*borse*）中。袋子被放置在圣十字教堂（Church of Santa Croce）的圣器收藏室里，^[6]每两个月拿出来一次，在简短的仪式后，从中随机抽取当选者。任何想要观看选举仪式的市民都会获得许可。有负债或已就任上一届政府官员的人，以及与已当选人有亲属关系的人不能够作为候选人。当选官员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将担任执政官（*Priori*），由这些执政官组成的政府被称为执政团（*Signoria*）^[7]。执政团成员最多不超过9个人，其中6个人代表大行会、2个人代表小行会，最后一人则作为首席执政官（*Gonfaloniere*），^[8]负责持有和保管城市的旗帜——白色底面上有一朵红色百合图案的佛罗伦萨旗。执政官一旦当选，就必须马上离开自己的家，统一住进市政厅，直到两月任期届满。执政官们的工资不高，但是可以享受的待遇不低。市政厅里面不但有大批身着绿色制服的仆人为他们服务，在他们享用丰盛晚餐的时候，还有小丑（*Buffone*）在旁给他们讲笑话、唱歌助兴。所有执政官都穿着深红色的长袍，领口和袖口镶着貂皮边。为了显示区别，只有首席执政官的长袍上绣着金星。

如果执政团想要颁行法律或制定外交政策，他们必须征求另外两个也是经选举建立的委员会（*Collegi*）的意见，分别是十二贤人团（*Dodici Buonomini*）和十六旗手团（*Sedici Gonfalonieri*）。除此之外，还有十人战争委员会、八人安全委员会和六人商贸委员会，不过这些委员会都是依共和国形势需要临时通过选举组建的。也有一些职务是永久性的，比如总理大臣通常是由优秀的学者来担任；^[9]执政团公证员（*Notaio delle Riformagioni*）主要负责宣布执政团的法案；最高行政长官（*Podesta*）是个类似于首席大法官的职务，往往由

出身高贵的外国人担任，他居住的宫殿既是法院又是监狱，后来被更名为巴杰罗宫。^[10]

一旦危难来临，执政官们会敲响市政厅钟楼里的大钟。因为钟声低沉，像牛叫的哞哞声，大钟因此得名牛钟（*Vacca*）。当钟声响彻整个佛罗伦萨的时候，所有年满14岁的男性市民都要集中到自己所属的小区，然后跟随在代表小区的旗帜后面统一行进到市政厅前，组成市民议会（*Parlamento*）。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团要先确认到场人数已超过市民总数的三分之二，然后才能请求他们批准组建最高司法委员会（*Balia*）的提议，最高司法委员会成立后将代表人民全权处理城市面临的危机。

佛罗伦萨人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感到无比骄傲，并标榜它为实现他们所吹嘘的自由的保障。佛罗伦萨人坚信其他意大利邦国的政府都比不上他们的。威尼斯虽然也是公认的共和国，但是正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威尼斯所谓的共和是由各个贵族家族在政府中就职；而按照佛罗伦萨的法律，这样的特权是不被许可的。佛罗伦萨的另一个主要竞争对手——米兰——还处于专制公爵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的完全掌控之下。至于从罗马到亚得里亚海沿途分布的各个独裁者统治的小教皇国，都还是近乎无政府的状态。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则因安茹（Anjou）和阿拉贡（Aragon）两大家族的争斗而长期分崩离析。

与这些国家相比，佛罗伦萨能有如此稳定、民主、受拥护的政府确实是一大幸事。不过事实上，政府的实际运作也难称民主。在组建政府的过程中，社会下层民众（*Minuto Popolo*）被成功拒于门外，贵族（*Grandi*）也很难进入各种共和国委员会。整个选举过程实际上被少数几个最富有的商人家族控制着，他们的目的是确保只有可信的家族支持者的名字被放入存放候选人名条的皮袋里。如果这其中出现任

何差池，他们就可以召集市民议会，通过组建最高司法委员会来“变更”皮袋里的候选人，这样就可以防止不受自己信赖的执政官被选入执政团。所以实际上，政府几乎就是富人完全依据自己的利益而组建的。

对于佛罗伦萨的商人们来说，钱的意义非同一般。有钱就是有地位，没钱就是没尊严。作为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诗人、运动健将、画家、音乐家和建筑家，出身佛罗伦萨历史最悠久的古老商人家族之一的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1]就曾说过：穷人很难“靠美德获得尊重和名誉”，贫穷“会让美德蒙上阴影”，并“让美德沦为隐蔽而晦涩的哀愁”。另一位同样出身商人世家的佛罗伦萨哲学家马泰奥·帕尔米耶里（Matteo Palmieri）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只有做大买卖的商人才值得受人瞩目和尊重，社会下层民众只要吃饱饭就不应该再奢望什么。还有一位名叫格雷戈里奥·达蒂（Gregorio Dati）的佛罗伦萨丝绸商人的观点更绝对，他说：“不经商的佛罗伦萨人，没有周游过世界、见识过他国风土人情，然后衣锦还乡的佛罗伦萨人，无论如何也抬不起头。”

人们普遍认定，商人的财富应当是通过“体面而重要的”交易获得的。一夜暴富会受到严重质疑，而通过“丑恶的交易”、“下流的手艺”或“挣薪水的下等职业”赚钱也同样不被看好。规模庞大、货物高档的交易不但能让经营它们的商人受人信赖，也会使从中受益的共和国信誉提升。

挣了大钱的商人自然也不能吝啬小气，他们必须拥有气派的宫殿和宽阔的家庭敞廊，还要有美丽的乡村别墅和私人小教堂。他们还必须给自己的家人购置得体的衣物，就算不雍容华贵，也起码要价格不菲。商人们还得给女儿准备好丰厚的嫁妆。为建造教堂和修道院捐款

时必须慷慨大方，这不仅仅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更是给自己的后代和佛罗伦萨增光。如果某个商人足够富有，他还可以借钱给共和国政府，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威望。乔瓦尼·鲁切拉伊（Giovanni Rucellai）靠经营一种著名的佛罗伦萨红色染料——苔红素（*orice*）——而积累了巨额财富，甚至连他的家族姓氏都是从这个染料的名字衍生而来的。他曾宣称“把钱花好比挣到大钱本身带来的荣耀还要多”；花钱还能让他得到更多的满足感，他斥巨资建造的宏伟的鲁切拉伊宫就是由阿尔贝蒂设计的。^[12]

不过，对于一个富有而慷慨的商人来说，想要在佛罗伦萨的社会上获得名望，光靠经营体面的生意是不够的。缔结好的姻亲关系是非常理想的方式；而在共和国政府就职、服务大众的家族传统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方式。事实上，没有哪个不曾在政府就职的商人可以自称拥有多高的社会地位。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富商们的下一代。他们年纪尚轻就已经懂得：如果自1282年起的执政官名录上没有自己家族的姓氏，那么就根本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尼科洛·达·乌扎诺（Niccolo da Uzzano）是一位德高望重、富可敌国的显贵。他家墙上就挂了这样一份执政官名录，一旦出现了某个他闻所未闻的候选人，他就可以立刻查出此人是出身于古老家族，还是新近的暴发户。^[13]

美第奇家族自然不算暴发户，不过和它的竞争者相比，他们也称不上历史悠久。在随后的许多年中，所有形式的传奇都成了赚取钱财的资本。

^[1] 佛罗伦萨市政厅，亦译为领主宫、旧宫、维奇奥宫，是佛罗伦萨政府所在地。该建筑始建于1299年，后经多次扩建与改造，直至十六世纪末。米开朗基罗·米凯洛齐于十五世纪四十年代对其庭院进行了重建。萨沃纳罗拉时期为容纳大议会而修建了大会议厅（Sala del Maggior Consiglio）。科西莫一世公爵于1540年从美第奇宫搬来了这里，并由乔焦·瓦萨里对此处重新进行修缮和装饰。

后来科西莫公爵入住皮蒂宫，并将市政厅赐给了自己的儿子弗朗切斯科。为了致敬弗朗切斯科的妻子——奥地利女大公约安娜，整个庭院又被修饰一新。

[2] 维奇奥桥所在的位置从罗马时代起就建造过桥梁。现存的维奇奥桥修建于1345年，取代的是于十二世纪建造，但是在1333年被洪水冲毁的那座桥梁。当时维奇奥桥两侧的店铺以皮革店和皮包店为多，后来变成了屠夫的肉店。到十六世纪末，依照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的指令，又换成了金店和珠宝店。

[3] 奥尔圣米凯莱教堂的名字是从古老的圣米凯莱教堂衍生而来的。圣米凯莱教堂建在奥托（Orto），它的位置被奥尔圣米凯莱教堂取代。现存的教堂是1336年修建的，本来是打算作为公共粮仓和小教堂。建筑外墙壁龕里的雕塑是由城市中的行业协会订制的。多纳泰罗创作的圣乔治大理石雕是由甲冑师行会订制的，被放置在教堂北墙最西侧的壁龕里的是一个仿品，真品被移到了巴杰罗国家博物馆。

[4] 老市场在十九世纪末被拆毁了，是为了给当时要建造的共和国广场（Piazza della Repubblica）腾出地方。

[5] 卡利马拉街（Calimala）字面上的意思是恶名之街，但其实可能是罗马将军卡利斯（Roman Callis Major）名字的讹用。

[6] 圣十字广场上的圣十字教堂和圣十字修道院修建于1228~1385年。到1863年，又修建了独具特色的十七世纪风格的大理石教堂正面。米开朗琪罗以及科西莫·德·美第奇的好朋友莱昂纳多·布鲁尼、卡洛·马尔苏皮尼和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的墓都设在这里。当时佛罗伦萨几个重要家族的家族教堂也都建在这里，其中就包括与科西莫联姻的巴尔迪家族的家族教堂。由米开罗佐为科西莫建造的见习教士堂建于1445年左右。

[7] 又译为长老会议，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最高行政机构。——编者注

[8] 又译为正义旗手。——编者注

[9] 总理大臣（Chancellor of Florence）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最重要的官僚政府职位。虽然总理大臣既不是经正式选举产生，如九人执政团成员或首席执政官，也不等同于现今一些国家政府首脑，但他可以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担任这一职位的人大多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些著名的学者、政治思想家和人文主义者。——编者注

[10] 巴杰罗宫在十五世纪被称为波德斯塔宫（Palazzo del Podesta），始建于1254年至1255年，最初是作为市政大厅。庭院中的楼梯是在十四世纪中期重建时增加的。到1574年这里成为警察总长的官邸。现在这里成了国家博物馆（Museo Nazionale），收藏了众多美第奇家族人员的雕像和半身像以及他们订制的其他艺术作品。

[11] 阿尔贝蒂宫位于本奇街6号，这里现在变成了霍恩博物馆（Museo Horne）。阿尔贝蒂家族曾经负责打理圣十字教堂的高坛。

[12] 鲁切拉伊宫于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建造完成，现在的地址是德拉维尼亚诺瓦街18号。它由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设计，由贝尔纳多·罗塞利诺（Bernardo Rossellino）主持建造。阿尔贝蒂还为乔瓦尼·鲁切拉伊设计了多明我会的圣玛丽亚诺韦拉教堂的正面，该教堂里有鲁切拉伊家族的家族教堂。从火车站和普拉托门之间可以看到一部分修复后的鲁切拉伊宫的花园，即奥里切拉里园（Ortioricellari）。

[13] 尼科洛·达·乌扎诺在巴尔迪街上的宫殿现在改名为卡波尼宫（36号）。

第二章 美第奇家族的兴起

“时刻远离公众的视线”

据说美第奇家族的祖先叫阿韦拉多（Averardo），是一名英勇的骑士，曾效忠于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有一次，阿韦拉多在去罗马的途中经过托斯卡纳地区，在佛罗伦萨以北的一个叫穆杰洛（Mugello）的地方遇到了一个野蛮的巨人，当地的贫苦农民深受其害。阿韦拉多与巨人交战并最终将其杀死，但是他的盾牌上留下了多处巨人挥舞狼牙棒猛击的凹痕。查理曼大帝为了奖励阿韦拉多的英勇行为，许可他将盾徽制成金底饰以红色小球的样式，象征着盾牌上的凹痕，以此纪念他伟大的胜利。从那以后，这也成了美第奇家族的标志。^[1]另外一种不那么戏剧化、可信度更高的说法则是红色小球象征着药丸或拔火罐。正如他们的名字所示，美第奇家族很可能是医生或药剂师，祖上则有可能是从穆杰洛迁到佛罗伦萨来的烧炭人。不过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红色小球代表钱币，是当铺的传统标志。

起码可以确定的是，在后来这些年里，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一直是受人敬仰的家族。他们随着这个城市的繁荣而发展壮大，而且偶有家族成员在政府里担任官职。第一个成为首席执政官的美第奇家族成员是阿尔迪戈·德·美第奇（Ardingo de' Medici），他在1296年当选这一要职。而他的兄弟古乔（Guccio）不但在三年后也当选为首席执政官，还获得了死后入殓四世纪石棺并被安葬在圣乔瓦尼巴蒂斯塔黑白八角教堂（San Giovanni Battista）外的殊荣，这个教堂也被称作洗礼堂（Baptistery）。另一位美第奇家族成员阿韦拉多，也就是科西莫的曾曾祖父于1314年当选首席执政官。然而自那以后，美第奇家族似乎经历了一段衰落期。阿韦拉多的一个孙子菲利诺·迪·孔特·德·美第奇（Filigno di Conte de' Medici）在一本写给子孙的

短小回忆录中就哀伤地提到了这段时期。他庆幸他的家族在佛罗伦萨还有几处不大的房产及两座宫殿、一个旅馆，以及在穆杰洛的卡法焦洛（Cafaggiolo）地区有“周围围绕着房屋的半个宫殿”。他们依然生活富足，但是和以前相比就相差甚远了；至于社会地位，则是“依然重要，但本可以更高”。曾经，人们会说“你看起来像个美第奇”，并且人人敬畏他们，然而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Salvestro de' Medici）是菲利诺的一个堂兄弟，他在1370年和1378年先后两次当选首席执政官，重新恢复了家族的荣耀。梳毛工起义那一年，萨尔韦斯特罗对起义团体的同情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在起义成功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声誉也获得了大幅提升。不过最终起义失败，萨尔韦斯特罗和美第奇家族也受到重创。从那时起，美第奇的名字就和遭主宰这座城市的领袖家族忌讳的起义分子们联系在一起了。

科西莫的父亲，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 Medici）一直想要打消对他家族的质疑。他可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阔少爷：他父亲留下的那点可怜的遗产要分给一个遗孀和五个儿子。所以，乔瓦尼自己挣到钱之后就发誓绝不让这份财富再受到任何威胁。乔瓦尼像他的父亲一样对社会下层民众充满同情，所以也受到下层民众的爱戴。但乔瓦尼本身是个极其谨慎的人，他十分清楚佛罗伦萨人对野心过度的市民是出了名的不信任。所以，他一直尽可能地远离公众视线的焦点，靠自己迅速发展起来的银行生意积累财富。

乔瓦尼被视为一个善良、诚信、通情达理且有人情味的人，他本人也乐于接受这种名声。不过，人们也不会忽视他那总是微眯着的双眼中透出的精明世故，以及那宽阔的下巴显示出的坚毅决绝。乔瓦尼从来不会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言语中偶尔闪烁的智慧火花也往往

被其苍白脸上天生的哀怨表情所掩盖，从而让人对他放松警惕。乔瓦尼本就富有，他的妻子皮卡尔达·布埃利（Piccarda Bueri）更是带来了丰厚的嫁妆，但是起初乔瓦尼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科西莫和洛伦佐（Lorenzo）——一直住在拉尔加街（Via Larga）上一栋不大起眼的房子里，后来才搬到了主教堂广场（Piazza del Duomo）一所略大一些但依然简朴的房子，这里靠近当时尚未完工的圣母百花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e）。^[2]不少低级别的商人会故作姿态地远离公共生活，如果可以的话乔瓦尼倒真愿意完全避开公众的视线，待在佛罗伦萨的房子和他的乡村别墅中，待在主教堂广场的办公室和红门街（Via Porta Rossa）^[3]上离现在的诺沃市场（Mercato Nuovo）^[4]不远的银行里。但是在佛罗伦萨，如他的孙子日后所说的那样：不在政府里就职的富商是不能获得成功的。

尽管不情愿，乔瓦尼还是在1402年接受了执政官一职，并在任职的两个月中被选为首席执政官。后来他又两次当选，分别是在1411年和1421年。除了这几次经历之外，乔瓦尼很乐意躲在账房里，为公共基金和私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或者投资附近乡村的土地。他乐意给不再享有政治权利的失势贵族们代理财产业务，却委婉地反对他们要求重获公民权利的政治诉求，而这也是他唯一明确持有的政治立场，除此之外就任由富有的阿尔比奇（Albizzi）家族通过他们的朋友和执政官候选人来掌控政府。

不得不说，即便是阿尔比奇家族的敌人们也没有在这一家族的统治时期有什么不满，这段时期恰好也是佛罗伦萨相对繁荣发展的好时期。阿尔比奇家族的统治非常严苛：反对者一律要被逮捕、流放、没收财产，甚至处决。佛罗伦萨的边界不间断地向外扩张。到阿尔比奇家族当政时，他们掌管的地域早就超越了城墙围起的这个城市。此时的佛罗伦萨包含了皮斯托亚（Pistoia）和沃尔泰拉（Volterra），以及1351年从那不勒斯女王手里购得的普拉托（Prato）等乡镇。鉴于阿

尔比奇家族成功地控制了政府，他们不仅占据了阿雷佐（Arezzo），还在1406年通过占领比萨（Pisa）及比萨港（Porto Pisano），开通了一条能让佛罗伦萨直接通向大海的通道。后来，阿尔比奇又于1421年从热那亚人手中买来了里窝那（Leghorn）。

佛罗伦萨的第一艘武装战船就是在比萨港举行的下水仪式。购买港口这一做法大大增加了共和国的财富，也给长期以来作为支柱产业的羊毛和布料交易增添了助力。世代以来，大批的羊毛都是从英格兰、低地国家及托斯卡纳的山丘和山谷地区运到佛罗伦萨进行加工和染色，然后再出口。在黑死病降临之前，这一行业养活了近三万人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羊毛和布料商人的行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长久以来都在佛罗伦萨的政府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城市里一些最豪华的建筑也是在他们的授意之下建造起来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就是委托羊毛业行会的官员管理的，该协会的象征——羔羊图案——也醒目地出现在了教堂的墙上。

乔瓦尼拥有两家羊毛工厂，所以他是羊毛业行会的会员。但是，由于他最主要的生意是银行，所以他也是银行业行会的会员。银行业行会的声誉从1252年开始有所提高。当时城市里的银行家们发行了一种美丽的小金币。金币背面是佛罗伦萨的拉丁文名称（Florentia），正面则选用了百合花的图案，百合正是这座城市的象征。^[5]这种货币就是著名的佛罗林金币（*fiorino d'oro*），它在世界上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花朵币（the flower），也叫佛罗伦萨币（florence）或佛罗林币（florin）。一枚佛罗林币里含有54格令^[6]的纯金，在十五世纪三十年代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英镑。一个年收入150佛罗林币的人可以生活得很宽裕。当时城里一栋带花园的小房子一年的租金大概是35佛罗林币；一栋豪华宫殿大概能卖到1000佛罗林币；一个女仆一年的薪水超不过10佛罗林币，购买一个奴隶也不过50佛罗林币。很快，佛罗林币就受到了广泛认可并在全欧洲流通起来，这完全是出

于对发行它的城市和在那里营业的银行的信任。到1422年，流通中的佛罗林金币的数量达到了两百万枚；仅在老市场广场周围，就有72家银行和证券交易行，其中最兴旺、发展最迅速的，无疑就是美第奇的银行。

乔瓦尼的一个远房堂兄，维耶里·迪·坎比奥·德·美第奇（Vieri di Cambio de' Medici）于14世纪就在罗马开设了分行。威尼斯和热那亚、那不勒斯和加埃塔（Gaeta）也都有美第奇的分行。乔瓦尼·德·美第奇起初就是在他堂兄维耶里的分行里做学徒，后来在日内瓦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分行，接着又在罗马开了第二家。后来随着比萨港口的业务激增，他又在布吕赫（Bruges）和伦敦分别设立了代理行。不过与其把乔瓦尼业务的蒸蒸日上归因于佛罗伦萨羊毛交易的繁荣，倒不如说是他与教皇的密切关系。

对于乔瓦尼这样一个保守、谨慎的银行家来说，1410年当选教皇的巴尔达萨雷·科萨（Baldassare Cossa）绝对不是一个典型的可结交之人，他们之间建立友谊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科萨是一个感观至上、热爱冒险、无所顾忌而且极度迷信的人。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那不勒斯家族，曾经当过海盗。当他决定投身圣职的时候，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都坚信，他这么做绝不是为了服侍上帝，而是为了寻找新的冒险，而他的人生也的确称得上一次大冒险了。

当时，教会正因为阿维尼翁（Avignon）的教皇与罗马的教皇分庭抗礼而陷于困境。为了终结这场将整个欧洲分化为几个阵营的“教会大分裂”，各方于1409年在比萨召开会议，会议达成的决议是罢黜阿维尼翁教皇本尼狄克十三世（Benedict X III）和意大利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Gregory XII），同时选举了新的教皇亚历山大五世

（Alexander V）。结果亚历山大五世刚刚当选就宣布会议终止，而被罢黜的两个教皇也都拒不承认会议的决定。这样一来，不但情况没

有好转，竞争的教皇反而从两个变成了三个。亚历山大五世去世后由科萨继位，他选择的称号是约翰二十三世（John XXIII）。为了化解这一僵局，德国君主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尝试在康斯坦茨（Constance）召开新会议。到1414年年底教皇约翰前往康斯坦茨时，就有美第奇银行的代表随行，他们俨然已经成了教皇的金融顾问。

至此为止，美第奇家族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教皇御用银行家的地位。以阿尔比奇、里齐（Ricci）和斯皮尼（Spini）家族为主的其他佛罗伦萨银行在过去也曾作为教廷的财务代理机构；相对于他们来说，即便是乔瓦尼在1386~1397年大幅提高了银行业务量之后，美第奇家族在罗马的业务依然算少的。然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位期间，美第奇家族却成了最主要的教廷业务代理者。据说美第奇银行是为教皇筹集了一万达科特金币（ducats）的买官钱才获得了教廷代理的美差。不过，1403~1410年间，科萨还在博洛尼亚（Bologna）任教皇使节一职时，他就已经与乔瓦尼保持通信并有大量业务往来，他还称乔瓦尼为“非常亲近的朋友”。

科萨当选教皇后，美第奇家族就开始利用与教皇办公室之间有利可图的关系，因为教廷的收入和开支都是由这个办公室负责的。同时美第奇银行还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与那不勒斯国王拉迪斯劳斯（Ladislaus）交战时最主要的支持者。那不勒斯国王支持的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也就是教皇约翰的两个竞争者之一。最终教皇约翰与那不勒斯国王于1413年握手言和，依照停战条约的规定，教皇须向那不勒斯国王支付95000弗罗林币，这笔款项自然也是由美第奇家族主要负责筹集的。作为抵押，教皇向美第奇银行旗下的一家罗马分行交付了两顶宝贵的主教法冠和大量的主教板。这样的交易其实并不符合乔瓦尼的品位，但是成为教廷财务代理便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这一点小小的代价总是要付的。至于与教廷财务相关的业务到底有多大的利

润，从一点就足以见得，那就是当时美第奇银行全部利润的一半都是由罗马的两家分行贡献的。

不过在召开康斯坦茨会议时，美第奇家族的地位有所动摇。教皇约翰于1414年10月底抵达康斯坦茨，迎接他的是一连串指控，包括传播异端邪说、买卖圣职、专制暴政、毒杀前教皇亚历山大五世，以及引诱至少两百名博洛尼亚女子。教皇约翰不得不装扮成一个背着弓箭的平民才得以逃出康斯坦茨，可是他很快就被出卖并带回康斯坦茨听候处置。最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本尼狄克十三世都被罢黜。会议还接受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的辞职，并选举了新的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V）。

此时的教皇约翰已是贫病交加，他在海德堡城堡里被关押了三年，直到美第奇家族再次对他伸出援手。通过他们在威尼斯的分行，美第奇家族筹集了38500莱茵盾的赎金来换取约翰的自由。被罢黜的教皇在获得释放之后，由巴尔托洛梅奥·德·巴尔迪（Bartolomeo de' Bardi）（很快他就将成为美第奇罗马分行的经理）陪同来到佛罗伦萨，并受到了乔瓦尼·德·美第奇的欢迎。在他仅剩的几个月的生命里，美第奇不但为他提供了住所，还出面向马丁五世求情，最终为他谋得了图斯库鲁姆（Tusculum）枢机主教的职位。

当时马丁五世也住在佛罗伦萨，他在圣玛利亚诺韦拉修道院（Santa Maria Novella）住了两年。^[7]马丁五世是一个温柔单纯的人，但是他与美第奇家族的关系并没有乔瓦尼所盼望的那么亲近和友好。他们曾经因为一个珍珠镶嵌的主教法冠而发生过矛盾。这个法冠是教皇约翰逃出康斯坦茨时抵押给美第奇的，后来马丁五世威胁将美第奇家族逐出教会，才最终迫使他们将法冠交还给教堂总管。在执行教皇约翰的遗嘱时，双方又出现了分歧，因为约翰在遗嘱中规定要将自己保有的施洗者圣约翰的一根手指留给美第奇家族。教皇约翰对圣

物的信仰是无限的，所以一直把它带在身上。随后，他们还为洗礼堂外教皇约翰坟墓上的刻字而争执不下，因为墓碑基座上刻着“教皇约翰二十三世”（Ioannes Quondam Papa X X III），而这样的碑文让现任教皇马丁五世认为受到了冒犯。

1420年9月9日，教皇马丁离开佛罗伦萨，启程前往罗马，随行的还有12名枢机主教。佛罗伦萨的官员、各个行会和院校的代表，还有统一着装的旗手组成的长龙，护送教皇到达圣皮耶尔·加托里尼门（Porta di San Pier Gattolini），在那里教皇向众人赐予祝福。此后教皇途经圣加焦（San Gaggio）的女修道院——依据当时一位编年史记录者的记录——“他下了马，要求女修道院里所有的修女都到他面前来，他逐个祝福她们，并隔着面纱亲吻了她们的额头”。

乔瓦尼·德·美第奇也在送行的队伍之中，他被选为有权使用金色马刺的四骑士（*Cavalieri*）之一。看着教皇离去，乔瓦尼心中只有担忧，因为他的家族银行与教会的关系已经如履薄冰。虽然美第奇家族没有被完全排除在教廷业务之外，但是他们已经不再享受任何在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时期曾拥有的特权。此时最受教廷偏爱的变成了美第奇家族的老对手——斯皮尼家族。^[8]然而到了1420年年底，斯皮尼公司突然宣告破产。在此之后不久，美第奇在罗马的经理就接手了斯皮尼的生意，他的分行也很快恢复了曾经的显赫地位。没过几年，美第奇家族的银行不仅成了意大利最成功的商业公司，更是一举成为全欧洲最能赚钱的家族事业。对于这样的成果，乔瓦尼作为父亲当然功不可没，而他的长子也同样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科西莫出生于1389年9月27日，他的生日正好也是基督教殉道者科斯马斯（Cosmas）和达米安（Damian）的纪念日。这两个人被认为是医师的守护神，在科西莫订制或是为向他致敬而创作的油画作品中就经常出现这两个人的身影。科西莫年幼时在卡马尔多利会

(Camaldolese) 的安杰利圣母修道院 (Santa Maria degli Angeli) [9] 接受教育，在那里他学会了德语、法语、拉丁语，同时对希伯来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也有涉猎。后来，和佛罗伦萨其他富商家的少爷们一样，他也开始聆听罗伯托·德·罗西 (Roberto de' Rossi) 的讲座或课程。罗西本人也出身于一个古老富有的佛罗伦萨家族，他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在罗伯托·德·罗西极具启发性的教导下，以及和安杰利圣母修道院同学们的交谈中，科西莫获得并发展出了一份对古典知识和古典理念的尊敬和对人们现世生活的兴趣。他参与讨论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中年，而对人类的兴趣则一生未变。科西莫绝对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

和这个圈子里其他人文主义者相比，科西莫算不上最博学的，但是就连教皇庇护二世 (Pius II) 都对他称赞有加。佛罗伦萨人在这位教皇眼里都是“利欲熏心的奸商，听不进一点儿高尚的东西”，只有科西莫是个有文化、有智慧、有见识的人，“比一般商人更有修养”。确实没有几个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手稿的了解能超过科西莫，因为他年纪尚轻时就已经开始收藏了；更没有什么人像他一样在公共生活中坚持人文主义理想的重要性。虽然他一直没有学会演讲和雄辩等人文主义者们必备的技能，但他从不质疑那些靠这些技能在佛罗伦萨社会担当重任的人文主义者。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其实都有着和科西莫类似的家庭背景，但科西莫和他们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如他的父亲一直教导的那样，科西莫迫切地想要远离公众视线。

科西莫很少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就算有必要，他也从不会带一名以上的随从。他的穿着总是很低调，小心地把靠墙的路让给老年人走，并“最大限度地遵守治安法官的要求”。科西莫还总是把扮演英雄、出风头的机会留给其他大家族的后裔们，比如1428年在圣十字广场上举办的大型比赛中，[10] 伟大的帕拉·斯特罗齐 (Palla Strozzi) [11] 的儿子洛伦佐赢得了胜者的桂冠，而科西莫以及美第奇

家族其他成员的出席都未被提及。若是有人就生意上的问题向科西莫寻求帮助或征求他的建议，科西莫会认真聆听来访者的问题，然后简短直率地给出见解，让人觉得他好像吝于结交朋友似的。不过，老百姓们依然爱戴他、信任他。在他年老之后，本就灰黄的脸色加上岁月的痕迹，让他看起来总是带着一副讽刺的神情，他那总是简短模糊的评论又加重了话语中嘲笑的意味。但即便如此，他的言行举止依然让人觉得可亲而非可惧。

科西莫与乔瓦尼·德·巴尔迪（Giovanni de' Bardi）的长女孔泰西纳·德·巴尔迪（Contessina de' Bardi）结婚时只有二十几岁。巴尔迪是他父亲在罗马分行的合伙人之一。巴尔迪家族曾经也是佛罗伦萨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但是和佩鲁齐（Peruzzi）、阿恰尤奥利（Acciaiuoli）家族一样，他们借给包括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和那不勒斯的安茹国王罗伯特（Robert, the Angevin King）在内的各个君主的贷款比收回的还款多太多，以至于他们的生意经常难以为继。孔泰西纳结婚时给丈夫带来的嫁妆算不上多，尽管其中包括坐落在巴尔迪街（Via de' Bardi）上的巴尔迪宫（Palazzo Bardi），这条街上所有的房产原本都是属于巴尔迪家族的。^[12]科西莫夫妇随后搬进了巴尔迪宫，所有房间也随之低调地换上了美第奇家族的纹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皮耶罗（Piero）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正如给科西莫的祝福中所写的那样：“上帝保佑你，让你与高贵、杰出的新婚妻子在新婚之夜就能孕育出一个男孩儿。”

孔泰西纳是一个缺乏想象力、挑剔且爱管闲事的女人，热爱美食，身材肥胖，但是也很能干，天性乐观、一心顾家、不善交际。她的受教育程度远不及其孙女们将来所能接受的那样，所以和其他佛罗伦萨人的妻子们一样，她是不被许可进入丈夫的书房的。科西莫很喜欢妻子，但也谈不上如胶似漆，那些因公事与妻子分开的日子并不难熬，他也极少写信给她。

他们第一次分开是在1414年。据他的朋友——书商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说，时年25岁的科西莫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一起去参加康斯坦茨会议，一走就是两年。教皇被废黜之后，科西莫从阿尔卑斯山脉向北游历了很多城市，也访问了美第奇家族在德国、法国和佛兰德斯地区的分行。教皇约翰去世后，科西莫回到了佛罗伦萨，但是没过多久他又作为罗马分行的经理动身前往罗马了，而他的妻子则留在巴尔迪宫照顾大儿子皮耶罗和小儿子乔瓦尼。

科西莫在担任罗马分行经理的三年多时间里，只偶尔回佛罗伦萨探望家人，其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位于蒂沃利（Tivoli）的房子中，由一名叫马达莱娜（Maddalena）的女奴照看。这名女奴是科西莫的一个代理从威尼斯替他买来的，并且确认她是“一个健康的处女，大约21岁，没有任何疾病”。科西莫很迷恋她，与她同床共枕。马达莱娜为科西莫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卡洛（Carlo）。这种事在当时也是司空见惯，卡洛和孔泰西纳生的儿子们一起生活，同样接受正规、全面的古典教育。卡洛的外貌有明显的切尔克斯人特征，他长大后进入了教会，并且借助他父亲的影响当上了普拉托教区牧师（Rector of Prato）和教廷最高书记（Protonotary Apostolic）。[13]

科西莫在罗马成功避免了引起佛罗伦萨敌人的嫉妒，可是回到佛罗伦萨没多久，他出众的才能及所谓支持社会下层民众（*Popolo Minuto*）、反对大领主（*Magnati*）的观点就重新引起了阿尔比奇家族的怀疑。

科西莫的父亲一生谨慎小心，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谦逊温和的印象。当阿尔比奇家族试图拉拢他参与加紧对共和国政府的控制、稳固寡头政治的计划时，他拒绝了；阿尔比奇家族的对头们听闻此事，立刻跑来拉拢乔瓦尼加入更激进的抵制寡头政治的活动，乔瓦尼给出的

答复是他没有任何想要改变政府现状的意愿，不论发生什么，他都只想专注于自己的生意，对政治活动分身乏术。与之类似，当阿尔比奇家族提议通过设立一种新的收入和财产税（*catasto*）来改革佛罗伦萨不公平的税制时，乔瓦尼也是在极其慎重地考虑了整个提议之后才表示支持，但是仍附加了各种各样的保留条件，以至于谁也琢磨不透他的真实态度。

乔瓦尼一生克己，从不给人嫉妒的理由，总是避免做出承诺，临死前还在病榻上叮嘱两个儿子要效仿他的做法：对富人和权贵不冒犯，对穷人和弱者要永远慷慨。

不要表现得像是在给出建议，而是要在对话中谨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除非是受到召唤，否则不要前往市政厅；即使被召唤前往，也只要完成被安排的任务就好；得到了认可也不要表现出骄傲……避免法律诉讼和政治争议，时刻避免进入公众的视线……

后来科西莫也给自己的儿子们留下了类似的忠告，但是抛开谦逊的外表和沉默寡言的举止不谈，科西莫其实远比他父亲更有野心，他立志要让自己的财富发挥不同的作用，而阿尔比奇家族也对科西莫的每一步举动都充满疑虑和关切。

[1] 美第奇家族标志上的小球从来没有确定的数量。最初是12个；到科西莫·德·美第奇时代则以7个为常见，比如美第奇宫东南角的盾牌上就是7个，可是在圣洛伦佐教堂高坛一角的韦罗基奥制作的圆盘上却是6个。圣洛伦佐教堂老圣器收藏室的天花板上是8个，公爵科西莫在王室祭堂（*Capella dei Principi*）的坟墓上是5个，大公费尔迪南德的观景城堡入口的盾徽上是6个。

[2] 圣母百花大教堂，也被称为杜奥莫教堂，其修建工程始于十三世纪末，由阿诺尔福·迪·坎比奥（*Arnolfo di Cambio*）设计。布鲁内莱斯基的圆顶直到1436年才完工，而外部的装饰在十年之后他去世时都没有完成。新哥特式正面是十九世纪末建造的。

[3]. 红门街当时属于达万扎蒂宫（Palazzo Davanzati）（9号），属于达维奇家族，是他们在1330年前后建造的，现在这里变成了博物馆。

[4]. 诺沃市场现在被称为稻草市场，是乔瓦尼·巴蒂斯塔·德尔·塔索（Giovanni Battista del Tasso）在1547年至1559年间建造的。

[5]. 佛罗伦萨建筑物上的佛罗伦萨百合标志没有美第奇的小球多，在佣兵敞廊（Loggia dei Lanzi）后面老造币厂（old Mint）的十五世纪门廊上可以看到佛罗伦萨百合标志。

[6]. 英美最小的重量单位，1 格令约等于0.0648克。——译者注

[7]. 圣玛利亚诺韦拉的多明我会教堂和修道院是从十三世纪中期开始修建的，到十六世纪完工。从为教皇马丁五世修建的房间可以俯瞰整个大庭院。十六世纪六十年代瓦萨里对教堂内部进行了重新装修。鲁切拉伊、巴尔迪和斯特罗齐家族都在这里修建了家族教堂。大庭院里的小教堂于1515年由雅各布·卡鲁齐·蓬托尔莫（Jacopo Carrucci Pontormo）和里多尔福·吉兰达约（Ridolfo Ghirlandaio）进行重新装修，为的是迎接教皇莱奥十世乔瓦尼·迪·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来访。

[8]. 斯皮尼家族十三世纪晚期冷峻风格的宫殿，现在被称作斯皮尼费罗尼宫，位于托尔纳博尼街和天主圣三桥边的阿恰尤奥利河滨大道的交会处。向下游方向的下一个宫殿就是十四世纪的吉安菲廖齐宫。再向下游走隔几个门是十七世纪的科尔西尼宫（科尔西尼河滨大道，10号），这里的画廊偶尔会向公众开放。

[9]. 安杰利圣母修道院现在成了圣玛利亚诺瓦医院的一部分。其中人们所知的阿尔法尼街（Via degli Alfani）上的安杰利圣母八角形小教堂（Rotonda di Santa Maria Angeli）是1434年起按照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建造的。

[10]. 圣十字广场会举行传统的锦标赛，包括战车赛和足球比赛。一块写着1565年2月10日字样的牌匾标记了足球场地的中心。

[11]. 帕拉·斯特罗齐雇佣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来创作自己父亲的家族教堂的祭坛装饰品《贤士来朝》。这个奥诺弗里奥·斯特罗齐的家族教堂就在圣三一教堂里。这幅祭坛装饰画里描画了多位斯特罗齐家族成员，现在收藏于乌菲齐美术馆。多明我会的圣玛利亚诺韦拉教堂中的斯特罗齐堂里有一幅安德烈亚·奥尔卡尼亚（Andrea Orcagna）创作的祭坛装饰画以及纳尔多·迪·乔内（Nardo

di Cione)创作的壁画。斯特罗齐家族的波焦阿卡伊阿诺别墅后来归属了伟大的洛伦佐。

[12] 巴尔迪街几乎全是由巴尔迪家族重建起来的。在他们修建巴尔迪宫(现已不存在)之前,这里就是一片叫作蚤窝(Borgo Pigiglioso)的贫民窟。圣十字教堂里的十四世纪巴尔迪家族教堂里有乔托及其助手创作的壁画。

[13] 卡洛·迪·科西莫·德·美第奇也是一位谨慎的收藏家。罗杰·范·德·韦登(Roger van der Weyden)的《埋葬》(*Entombment*)就是他的收藏品之一,现在收藏于乌菲齐美术馆。

第三章 阿尔比奇家族的敌人

“连修道士的厕所里都装饰着他的纹饰”

阿尔比奇家族的领头人里纳尔多·迪·梅塞尔·马索（Rinaldo di Messer Maso）曾经是一名军人，也做过外交官。他是一个自大、骄傲、容易冲动的人，而且故步自封、反对改革。^[1]他对内坚定地维护寡头政治，如果有必要，甚至不惜将次要行会的数量减半；对外则主张通过武力在战场上打败佛罗伦萨的敌人们。那时他已经迫使执政团陷入了与米兰毫无结果的征战；在1429年他又极力鼓动向与米兰联手的卢卡（Lucca）宣战。佛罗伦萨和卢卡的恩怨由来已久，他们是彼此在丝绸贸易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击败卢卡的想法在佛罗伦萨城内受到欢迎，连科西莫本人后来也哀叹卢卡凭其从山脉地区延伸至海边的广阔疆域，战胜了各种征服它的尝试，屹立不倒。不过科西莫并不认为此时是加入战争的好时机，而且尽管他同意在紧急成立的十人战争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却仍带有明显的不情愿，并且暗示在阿尔比奇家族的领导之下佛罗伦萨军队不可能取胜。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卢卡人向米兰寻求援助，应他们的要求，公爵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向卢卡派出了伟大的雇佣军（*condottiere*）指挥官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佛罗伦萨的雇佣军根本无法和斯福尔扎的队伍抗衡，于是佛罗伦萨的执政团花了五万弗罗林币将其收买；然而米兰公爵又为卢卡找到了一个有才能的将领尼科洛·皮奇尼诺（Niccolo Piccinino）。十人战争委员会随即又想出了更复杂的退敌之计，他们想引塞尔基奥河（Serchio）的河水冲垮卢卡搭建的防御壁垒。不过，这个计策也如反对者们所预计的那样失败了：卢卡驻军趁夜色冲出卢卡，推倒了佛罗伦萨人的水坝，河水倾泻而下，反而灌入了佛罗伦萨人的营地。到1430年秋天，科西莫认定再与这个损失惨重、耗资巨大的战争有任何瓜葛都是不明智的，于是就以希望别人也

有机会为战争委员会出谋划策为由，退出了委员会，离开佛罗伦萨前往维罗纳（Verona）。

在科西莫缺席的情况下，他的敌人开始散布谣言，称科西莫妄图利用自己的巨额财富收买雇佣军首领入侵佛罗伦萨共和国并推翻政府。有些人相信了这样的谣言；有些人虽然不信，却也乐于利用这样的谣言来解决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伙儿心存不满的贵族和大领主们一起去拜访了长者尼科洛·达·乌扎诺（Niccolò da Uzzano），他是佛罗伦萨最受敬重的政治家。这伙人的目的不仅是探询尼科洛如何看待他们攻击科西莫的提议，更是想获得他的支持。尼科洛在自己位于巴尔迪街的家中接待了这些人，虽然礼貌地倾听了他们的提议，但态度却是谨慎且不支持的：就算真的有可能除掉美第奇家族，让阿尔比奇家族势力更加壮大也未必就是好事，他们很可能会变成像米兰的维斯孔蒂一样的专制暴君。再说，最后的结果更有可能是，谁也无法彻底除掉美第奇家族。如果对两大家族的支持者做一番比较的话，阿尔比奇一方不见得能占到多少优势。而且念及以往美第奇家族的恩惠，社会下层民众肯定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此外，美第奇的支持者还包括城中几个最显赫的家族，如托尔纳博尼家族（Tornabuoni）和波尔蒂纳里家族（Portinari）都与美第奇家族有各种密切的生意往来；其他家族也从美第奇那里贷了款或收了礼物；还有一些则是通过联姻与美第奇家族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科西莫的妻子孔泰西纳所属巴尔迪家族，以及科西莫的弟弟洛伦佐的妻子吉内夫拉·卡瓦尔坎蒂（Genevra Cavalcanti）背后的卡瓦尔坎蒂家族^[2]和马莱斯皮尼家族（Malespini）。除此之外，在关系密切的人文主义者圈子内部，科西莫也有数不清的好朋友；相反，公然指责新古典知识与基督教信仰相对立的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则在这个圈子中树敌无数。

尼科洛·尼科利（Niccolo Niccoli）、卡洛·马尔苏皮尼（Carlo Marsuppini）、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和安布罗焦·特拉韦尔萨里（Ambrogio Traversari）都是科西莫的密友，而这几位杰出的人物在佛罗伦萨的社会里都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风流倜傥的尼科洛·尼科利是一个富有的佛罗伦萨羊毛商人的儿子，此时他已经六十六岁了，是这几个人中年纪最长的。他总是衣冠楚楚，是一个相当挑剔、吹毛求疵的业余艺术家。他从不关心家族生意，而是把继承来的财富都用在了他美丽的豪宅和了不起的收藏上。他的收藏品包括图书、手稿、勋章、钱币、凹雕玉石、浮雕和花瓶，“没有哪个到佛罗伦萨来的尊贵客人会错过参观他的藏品的机会”。科西莫比尼科洛小二十五岁，尼科洛开始收藏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科西莫深受尼科洛的影响，也开始进行类似的收藏。两人曾经计划一起去圣地（Holy Land）寻找古希腊手稿，但是这一行动并没有得到科西莫的父亲乔瓦尼·德·美第奇的支持。他可不想让儿子跟尼科洛一样“不务正业”，在科西莫被尼科洛其他奇思妙想引诱之前，乔瓦尼就把他安排到家族银行里工作了。尼科洛收藏的书籍超过八百本，这一数字直到他去世时还在不断增加，算得上当时最大的藏书规模了。他对收藏古董的痴迷程度至死不减，为此不惜卖房卖地，甚至向科西莫借钱。他本人从未创作过一本著作，因为他写的每段话都不能满足自己严苛的要求；不过他倒是创造了一种手写体，能够让抄写员更快、更整齐、更美观地抄写手稿，这种字体后来成了早期意大利印刷界使用的斜体字的基础。尼科洛甚至成为来佛罗伦萨的游客们好奇的对象，他们在街上追寻他经过时优雅高贵的身影，但是又被提醒他其实脾气不好，有时甚至会唐突无礼。唯一能让尼科洛感到惧怕的人是他那泼辣的情妇，这个女人曾经还是他另外五个兄弟之一的旧情人。这件事让他的家人都很反感，直到有一天他的两个兄弟实在忍受不了她的傲慢无礼，直接把她捆起来鞭打了一顿。对噪音敏感到连“被困住的老鼠发出的吱吱声”都听不得的尼科洛在听到情妇的尖叫时，竟然被吓哭了。

尼科洛的大部分手稿都是由他的朋友波焦·布拉乔利尼搜集来的。波焦·布拉乔利尼被认为是一位学者、演说家、散文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他还写过一个名为《波焦·布拉乔利尼笑话集》的系列作品，内容都是些诙谐低俗的小故事。波焦1380年出生在佛罗伦萨附近一个小乡村里，父亲是个贫穷的药剂师。波焦年纪轻轻就赤手空拳地来到佛罗伦萨闯荡，他想尽办法获得了一个进入菲奥伦蒂诺学院（Studio Fiorentino）^[3]学习的机会。这所大学是1321年教皇被逐出博洛尼亚后创办的。作为该校的董事之一，科西莫极力推动这里的学科扩建，除了已有的语法、法学、逻辑学、占星学、外科学和医学等学科外，又聘请了伦理学、修辞学和诗歌学方面的教授。波焦学习的是法学，后来加入了律师业行会，并进入教廷负责撰写宗座牧函。波焦也陪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参加了康斯坦茨会议，几年之后他又和科西莫一起前往奥斯蒂亚（Ostia）度假，并在那一地区进行了一些考古研究。波焦足智多谋、有魅力、乐观、好享乐、幽默、智商极高，而且为达目的不惜使用贿赂修道士之类的手段。他作为尼科洛·尼科利的代理到德国、法国和瑞士寻找失传的手稿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但找到了各式各样隐藏的珍宝，更发现了一些失传已久、据说只有部分残存于世的手稿的完整版本。有一次，他到瑞士的一个修道院，那里的藏书室就设在塔楼底部昏暗、肮脏的地牢里。波焦在那里发现了卢克莱修（Lucretius）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和阿比修斯（Apicius）的烹饪书，以及昆体良（Quintilian）的一本罗马教育方面的重要书籍。

至于那些不能够用钱买下的文本，波焦就亲自用一种优美、易识、间隔适度的手写体抄写下来。他参考的样式是十一世纪的卡洛林手写体，而非后来取代它的令人疲倦又粗笨的哥特式。科西莫看过波焦的抄本后，决定把自己所有的藏书都按类似的字体重新抄写。这种字体也同样受到早期意大利印刷界的青睐，并将其作为罗马字体的基

础，就如他们将尼科洛·尼科利的手写体作为斜体字的基础一样。波焦的手抄本实际上成了现代手写体和印刷体的起源。

然而，波焦并不像有些人文主义者那样因醉心于学术而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他纵情于声色犬马，连工作的时候也喜欢有漂亮的姑娘陪伴左右。他给尼科洛·尼科利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他正在拓写碑文，却被两个观看他工作的姑娘吸引住了，结果把正事抛到了一边。尼科洛听了感到非常惊讶，可是波焦却回答说：工作的时候，他更愿意有窈窕可人的姑娘，而不是“长着长角的水牛”陪伴左右。波焦有好几个情妇，仅他承认的私生子就有十四个之多，但是他完全有能力供养他们。凭借他的经济头脑和在教廷里的人脉，波焦挣了很多钱。他直到五十五岁才决定结婚，对方毫不意外又是个只有十八岁的美人，还带着丰厚的嫁妆。波焦用这笔钱买了一栋大宅，和妻子又生了六个孩子。

和波焦一样，科西莫的另一个人文主义者朋友——莱昂纳多·布鲁尼——刚到佛罗伦萨时也是个穷小子。他也在菲奥伦蒂诺学习法律，在教廷任职并且积累了不少的财富；但是比起波焦，莱昂纳多绝对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他长着一个尖鼻子，给人感觉很机警，有些傲慢，其他人文主义者认为他有“绝顶的口才”。莱昂纳多强烈反对尼科洛·尼科利包养情妇的事，而波焦在他看来根本就是堕落腐化的典型。莱昂纳多为了和一位受人尊敬、极度富有的年轻姑娘结婚而放弃了在教会里继续发展的念头。婚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与翻译中，并且在政府里为佛罗伦萨的公共事业鞠躬尽瘁。他极力宣扬佛罗伦萨是古代共和国体制的继承者，并最终成为佛罗伦萨的总理大臣并长期任职。他的美名传扬甚广，甚至连西班牙国王的使节都曾拜倒在他高贵的红袍之下。

科西莫的另一位挚友，安布罗焦·特拉韦尔萨里同布鲁尼一样受人尊敬，但是他比后者更加谦虚圣洁，是个连肉都没吃过的苦行僧。特拉韦尔萨里从罗马涅地区（Romagna）来到佛罗伦萨。他的家族在罗马涅地区拥有大片的地产，他也刚刚当上苦行的卡马尔多利会（Camaldolite Order）的代理主教（Vicar-General）。特拉韦尔萨里还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学者，他自学了希伯来语，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事实上，他可以随口把希腊语翻译成通畅、优美的拉丁语，其速度之快，连尼科洛·尼科利这位佛罗伦萨城里写字最快的人都跟不上他口述的速度。特拉韦尔萨里比科西莫小三岁，他为科西莫翻译了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所有著作，包括那些他诚实的精神所无法苟同的不洁段落。科西莫经常出入特拉韦尔萨里在安杰利圣母修道院的房间，而面对即将发生的美第奇家族与阿尔比奇家族的冲突，他更是对特拉韦尔萨里感激不尽。

另一个经常出入修道院的是卡洛·马尔苏皮尼。他来自阿雷佐的一个贵族家庭，也是一名学者，并被任命为大学的修辞学和诗歌学讲师。他当时只有三十二岁，是科西莫的人文主义者圈子里最年轻的朋友，但是他的学识已经名声在外。在其最著名的一堂课上，他引用了所有已知的希腊和拉丁学者的论述。马尔苏皮尼在著书立说方面不如布鲁尼多产，但也不像尼科洛·尼科利那么苛刻挑剔。他把一两本希腊著作翻译成了拉丁文，还写了一些诗歌警句，并为科西莫母亲的葬礼创作了一篇演讲词。

马尔苏皮尼在大学中的死对头是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名叫弗朗切斯科·费勒夫（Francesco Filelfo）。费勒夫的父母都是佛罗伦萨人，但他却是在安科纳（Ancona）附近的托伦蒂诺（Tolentino）出生的，当时他的父母就居住在那里。费勒夫不到二十岁就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古典主义学者了，并且被威尼斯委以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重任。在那里，他娶了自己希腊语老师约翰·克里索卢拉

斯（John Chrysoloras）漂亮的女儿。而克里索卢拉斯的兄弟伊曼纽尔·克里索卢拉斯（Emmanuel Chrysoloras）之前是佛罗伦萨大学的希腊语教授。后来费勒夫受尼科洛·尼科利的邀请来大学授课。起初，尼科洛很满意费勒夫的才华和活力。费勒夫的课一堂接一堂，从早讲到晚，对什么内容他都能侃侃而谈，他讲西塞罗（Cicero）和泰伦斯（Terence），荷马（Homer）和李维（Livy），修昔底德

（Thucydides）和色诺芬（Xenophon）；此外，他还教授伦理学课程，每周要到教堂做一次关于但丁的公开讲座；所有这些活动之外，他还能挤出时间创作无数的警句、颂歌、演说词和历史故事，甚至还会翻译，只要有钱可赚。过了一段时间，尼科洛·尼科利就后悔邀请这个留着拜占庭式络腮胡的浮躁年轻人来佛罗伦萨了。事实证明，费勒夫是一个虚荣、粗暴、无礼、贪财、挥霍无度且爱记仇的人。科西莫的朋友们都避免与他接触，当他与马尔苏皮尼争论时，他们都选择支持后者。于是费勒夫转而投靠了阿尔比奇家族，替他们做舆论攻击的差事。费勒夫刚来佛罗伦萨时，科西莫不但热情款待了他，还替他付了房租；而现在，费勒夫反过头来对科西莫加以最无情的攻击。

只要佛罗伦萨的这些人文主义者还是科西莫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只要尼科洛·达·乌扎诺还活着，科西莫就不用担心阿尔比奇家族有足够的力量来毁灭美第奇家族。尽管尼科洛·达·乌扎诺总体上认同阿尔比奇家族的政治观点，但是他也一直很尊重美第奇家族，甚至在科西莫父亲的葬礼上还伤心落泪。可是到1432年，尼科洛·达·乌扎诺也去世了，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反对美第奇家族的阴谋迅速成熟起来。城里到处流传着关于美第奇家族的恶毒谣言，毋庸置疑大部分是由费勒夫传播的。这些谣言说道：科西莫穿着简朴是为了避免引起民众对他通过不法途径聚敛的财富的注意；他所谓的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心不过是追求私利者挂在口头的掩饰之词；不是有人听到他亲口说“除非是有利可图或是出于恐惧之心，否则没有人会做诚信之事”？他向慈善事业和建筑项目的捐款更是伪善，不过是一个放高

利贷的人花钱买良心上的安慰而已，更何况哪一笔善款不是大肆宣传，哪一座由他出资的建筑上没有把美第奇的纹饰放在醒目的位置？“连修道士的厕所里都装饰着他的纹饰！”就是在这种舆论的作用下，1433年年初的一个夜晚，有人往科西莫家的大门上泼洒了鲜血。

像1430年退出战争委员会前往维罗纳一样，此时的科西莫选择再次离开佛罗伦萨，这次他到自己在穆杰洛的特雷比奥（il Trebbio）的房产里待了几个月。^[4]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在佛罗伦萨银行里的巨额财产悄悄转移到了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分行里，还将成袋的钱币寄存在圣米尼亚托主教堂（San Miniato al Monte）的本笃会隐士和圣马可（San Marco）的多明我会修士那里，这样如果阿尔比奇家族开始行动，这些财产就可以免于被没收。

科西莫不在城里的这段时间，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控制了执政团在九月的选举。他的操控非常隐蔽，结果九名当选的执政官中，七名都是明确支持他的。另外两名据称有可能是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他们分别是巴尔托洛梅奥·斯皮尼（Bartolommeo Spini）和雅各布·贝林吉耶里（Jacopo Berlinghieri）。当选首席执政官的是贝尔纳多·瓜达尼（Bernardo Guadagni），为了确保他的参选资格，阿尔比奇家族不得不先免去了他所有的债务。^[5]

九月的第一周，科西莫还在穆杰洛。在这里他收到瓜达尼的紧急召唤，要求他马上回到佛罗伦萨，并被告知“有重大事项需要做出决定”。科西莫决定直面自己的命运。

1433年9月4日，科西莫回到了佛罗伦萨。当天下午他就到市政厅拜见了首席执政官贝尔纳多·瓜达尼。但是贝尔纳多·瓜达尼言辞闪烁，不谈正题，只是说这个需要科西莫从穆杰洛回到佛罗伦萨的“重大决定”，要到三天后执政团正式召开会议时才能被正式讨论，同时对于城中过去几天要出大事的传言他也无可奉告。

离开市政厅后，科西莫去拜访了他认为还是朋友的在任执政官之一，但是得到的回答同样是一些模棱两可的安慰之词。随后他又去了自家的银行，毫无疑问是去转移更多的财产。在此之后，他再无他法可想，只能坐等即将召开的执政团会议。

7日上午，科西莫到达市政厅的时候，执政团会议已经开始了。在侍卫队长的押送下，科西莫登上楼梯，经过紧闭的会议室大门，被关进了牢房。很快便有人通知他说“有充分的理由对其进行关押，会尽快向其说明”。

两天后，也就是9月9日，科西莫所在牢房顶上的钟楼里，巨大的牛钟发出隆隆的响声，召唤所有佛罗伦萨人到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参加市民议会。低沉的牛叫一般的钟声响彻整个城市，市民们纷纷响应前往。但是广场入口有武装的阿尔比奇家族支持者把守，所有明确或有可能支持美第奇家族的市民都被拦在了广场之外。科西莫后来回忆说，他当时从牢房的窗口向下望，广场上被允许进入的市民最多不超过23人，他们就站在执政官们所在的位于宫殿一层的围栏

（*ringhiera*）前。执政团秘书代表执政团询问到场的公民是否同意设立一个由200人组成的最高司法委员会来“代表人民的利益进行改革”。在场公民们恭顺地给出了许可，于是这个最高司法委员会得以顺利组建。

尽管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看似掌控了政府并强烈建议判处科西莫死刑，但是最高司法委员会的成员们却没有痛快地接受他的提议。委员会里的讨论十分激烈，迟迟无法达成共识。一些成员同意判处科西莫死刑，另一些则坚持流放就足够了，甚至有一两个委员提议应当将科西莫无罪释放。很多委员不愿意顺从阿尔比奇对科西莫处以极刑的原因显而易见：对成千上万支持他的市民来说，科西莫依然是他们心中的英雄，虽然这些人暂时被威慑和压制，但是委员们害怕死

刑判决会引发强烈的反对；除此之外更令他们担忧的是，科西莫的被捕已经引发了外国势力的激烈抗议。费拉拉（Ferrara）侯爵是美第奇银行的客户，他已经代表科西莫的利益提出干涉。威尼斯共和国在财政方面也受科西莫关照颇多，此时派出了三位大使前往佛罗伦萨全力确保科西莫被释放；如科西莫本人所说，就算大使们与里纳尔多谈不拢，他们的到来也足以“给那些本来支持判处死刑的人施加巨大的影响”。科西莫的老朋友，同时也是卡马尔多利会代理主教的安布罗焦·特拉韦尔萨里此时也拜访了里纳尔多；甚至据说还有一位更有影响力的美第奇银行客户——欧金尼乌斯四世（Eugenius IV）——也向他打了招呼。欧金尼乌斯四世是一个威尼斯商人的儿子，他于两年前继任马丁五世成为教皇。此时里纳尔多已经严刑拷打了科西莫的两名支持者，成功给科西莫扣上了叛国的罪名。其中一个支持者尼科洛·蒂努奇（Niccolo Tinucci）是一位有名的公证人，也是一位业余诗人。他被刑讯官严刑逼供，最终屈打成招，指认科西莫有意召集外国势力在佛罗伦萨进行革命。无论是特拉韦尔萨里还是威尼斯大使都不相信这份供述，佛罗伦萨的大多数市民也不相信。渐渐地，里纳尔多也被迫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判处流放要比他的亲信弗朗切斯科·费勒夫坚持要求的死刑更明智。

科西莫在关押他的市政厅钟楼牢房里获许会见了特拉韦尔萨里及少数几个经过挑选的访客。因为怕被下毒，科西莫还被批准食用巴尔迪宫送来的饭菜。但是看守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避免科西莫与外界交换任何消息，更不允许他和银行之间有任何通信。给科西莫的食物从制作到送达全程都有官员监督，他与访客谈话时也必须要有守卫在场监听。不过，这个叫费代里戈·马拉沃尔蒂（Federigo Malavolti）的守卫对科西莫怀有同情之心，再加上一点贿赂，科西莫的信息还是被顺利传出了牢房。连穷困的首席执政官贝尔纳多·瓜达尼本人都欣然接受了1000弗罗林币的贿赂，如果他狮子大张口，美第奇家族无疑会全力满足，科西莫事后嘲讽地评价他是个软弱无能的

人。不过，贝尔纳多·瓜达尼在收受“价格合理”的贿赂之后，就宣布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再参与委员会的审议工作，并将自己的投票权委托给另一位执政官马里奥托·巴尔多维内蒂（Mariotto Baldovinetti）。而这位与贝尔纳多·瓜达尼一样穷困的执政官自然也是美第奇金库早就打点好的。

原本的支持者都被对方收买并倒戈，美第奇银行强大的外国客户团也不断地施加压力；再加上美第奇家族忠诚的朋友们日益直白的表态，就连帕拉·斯特罗齐这样有影响力的温和派也逐渐脱离自己的阵营；除此之外，阿尔比奇家族甚至还面临着出现武装起义的危险。科西莫的弟弟洛伦佐一听到哥哥被捕，就马上和美第奇家族的其他一些成员赶往穆杰洛集结军队准备救人；与此同时，卡法焦洛的小部分美第奇家族支持者也集结了队伍；据说连雇佣军指挥官尼科洛·达托伦蒂诺（Niccolo da Tolentino）也被科西莫的朋友内里·卡波尼（Neri Capponi）收买，已经带着一队雇佣兵从比萨前往拉斯特拉（Lastra）准备参战。尼科洛·达托伦蒂诺的队伍在拉斯特拉按兵不动，因为他们担心进一步逼近会引发佛罗伦萨城内的骚乱，难保科西莫不会在混乱中被暗杀。即便没有交战，还是不得不承认，尼科洛·达托伦蒂诺的存在是促使阿尔比奇最终放弃将这个令他头疼的囚犯处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9月28日，科西莫被判流放帕多瓦（Padua）10年，而他诡计多端的堂兄弟阿韦拉多（Averardo）也被判流放那不勒斯10年。至于他那不怎么抛头露面、也不那么有威胁的弟弟洛伦佐则被判流放威尼斯5年。整个美第奇家族，除了维耶里一支外，全被划定为贵族阶级，永远不得在政府中就职。他们在佛罗伦萨的组织领导者普乔·普奇（Puccio Pucci）和乔瓦尼·普奇（Giovanni Pucci）也被判流放到阿奎拉（Aquila）10年。^[6]执政团里两名没有追随阿尔比奇家族的执政官没有受到其他执政官所得的利益和嘉奖。

科西莫拥有诸多美德，但刚勇血性似乎是他一直缺少的。所以当被召唤到市政厅面前听取审判结果时，他表现得有些可怜巴巴。他辩解说除非受到召唤，他本人从来没有主动和执政团接触过，也“一直不愿担任官员职务”，而且不但没有煽动托斯卡纳地区的任何城市反抗政府，还曾经帮助政府筹集资金组建军队打击地方势力。尽管如此，科西莫还是在执政官面前郑重声明：

既然判决我流放帕多瓦，我在此声明我会遵从判决前往，并且按照你们的命令待在那里。别说是到特雷维佐地区（trevisian state），就是判我流放到阿拉伯或者其他任何完全陌生的国度，我也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你们的命令对我而言是灾难，但我依然心存感激，宁愿把这看作恩赐而非祸患……只要知道我的敌人能为这座城市带来和平与幸福，我受什么苦难都是值得的……我只恳求你们一件事，长官大人们，既然你们免我不死，就请你们保障我的性命不会丧于邪恶的市民之手，否则那将是你们的耻辱……请确保那些手握尖刀、等在广场之外迫切想伤我性命的人不会得逞。我死事小，只怕你们会背上永久的恶名。

其实执政团像科西莫担忧自己的性命一样惧怕无法控制的暴乱，因此他们下令犯人应当乔装打扮，连夜穿过圣迦尔门（Porta San Gallo）离开佛罗伦萨。全副武装的侍卫一直护送他至边境，然后才由科西莫自行取道费拉拉，最终到达帕多瓦。

[1]. 阿尔比奇家族的中世纪塔楼位于阿尔比奇镇。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建造的宫殿已经不复存在。现在这个位置是88号阿尔托维蒂宫（Plazzo Altoviti）。

[2]. 卡瓦尔坎蒂家族小教堂里由多梅尼科·韦内齐亚诺（Domenico Veneziano）创作的《圣人弗朗西斯和施洗者圣约翰》（*Saints Francis and John the Baptist*）现在收藏于圣克罗切歌剧博物馆（Museo dell' Opera di Santa Croce）。卡瓦尔坎蒂家族的由多纳泰罗创作的《圣母领报》（*Annunciation*）则被收藏在圣十字教堂。

[3]. 菲奥伦蒂诺学院后来升级为大学。现在位于圣马可广场附近的建筑是由托斯卡纳大公的马厩改造而来。北侧的植物园名叫草药园（Giardino dei Semplici），面向拉马尔莫拉街（Via Lamarmora），是在十六世纪中期根据科西莫一世的指示建造的。

[4]. 美第奇家族世代拥有卡法焦洛这片土地，特雷比奥就在离卡法焦洛大约一英里外的一座山顶上。据瓦萨里称，原本的中世纪堡垒经米开朗基罗为科西莫进行了改造，重修了庭院，加入了敞廊，还把堡垒和塔楼四周的防御壁垒改建成了带顶棚的通道，整座建筑不再那么荒凉冷峻。1644年这里被出售给朱利亚诺·塞拉利（Giuliano Serragli）。1864年又被卖给王子马尔坎托尼奥·博尔盖塞（Prince Marcantonio Borghese）。后来又被恩里科·斯卡雷蒂（Dott. Enrico Scaretti）买走并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重新修复。他的遗孀，也是格拉德温勋爵（Lord Gladwyn）的妹妹一直居住在这里，至此书创作之时依然如此。

[5]. 瓜达尼宫位于圣神教堂广场（7~9号），是在十六世纪初期为代家族（Dei）建造的。1684年被多纳托·瓜达尼（Donato Guadagni）买下。

[6]. 十六世纪的普奇宫位于普齐街（2~4号）。赛尔维街拐角处的盾徽是乔瓦尼·迪·洛伦佐·德·美第奇，即教皇莱奥十世的。普奇家族支付了圣母领报大殿敞廊的修建费用，该敞廊是由卡奇尼设计并于1601年修建完工的。普奇家族的家族教堂在圣母领报大殿内的许愿小院（Chiostrino dei Voti）东墙侧面。韦罗基奥创作的伟大的洛伦佐的雕像在洛伦佐逃脱帕奇家族的暗杀后就在这里展示，但现已丢失。据瓦萨里称，波提切利的圆形浮雕《贤士来朝》就是由普奇家族订制的，现在陈列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

第四章 被流放者与国家的主人

“他就是无冕之王”

在去流放地的路上，科西莫受到的多是赞誉而非斥责。费拉拉侯爵热烈欢迎并盛情款待了他；到了帕多瓦，科西莫也被当成尊贵的客人，受到当地官方的接待，一位身份如此显赫又腰缠万贯的人物被流放到本地显然使他们感到无比喜悦。可以确定的是，科西莫依然富有，在他被关押期间，阿尔比奇一切想要让他破产的尝试都失败了。里纳尔多沮丧地告诉自己的朋友：“如果没有万无一失的把握，就不要挑战强大的敌人。”他现在才被迫认清了这一点，虽然暂时把美第奇家族赶出了佛罗伦萨，但是他自己在城里的位子并没有坐稳。

在帕多瓦待了两个月之后，科西莫获许离开这里到威尼斯和弟弟团聚。威尼斯的圣乔治马焦雷修道院（San Giorgio Maggiore）给他提供了住处。他在这里把一切安排妥当，并且宣布出资为修道院修建一所急需的藏书室。^[1]当然这主要是因为他得知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曾在这里做过修道士，对这座修道院颇有感情。他委托了年轻的佛罗伦萨建筑师米开罗佐·米凯洛奇（Michelozzo Michelozzi）来设计藏书室。米开罗佐是陪同科西莫一起来威尼斯的，因为他在佛罗伦萨为科西莫设计建造的房子现在暂时停工了。

虽然身在威尼斯，科西莫对佛罗伦萨的时局变迁依然了如指掌，因为他的支持者们无时无刻不在策划推翻阿尔比奇家族的大业。1434年2月初，口才出众、学识过人的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Agnolo Acciaiuoli）^[2]因为指责阿尔比奇家族的独裁统治而遭逮捕，并被判处流放科森扎（Cosenza）10年。短短几周之后，科西莫的一个远房亲戚马里奥·巴尔托罗梅奥·德·美第奇（Mario Bartolommeo

de' Medici) 也因涉嫌破坏阿尔比奇家族的外交政策而被逮捕并判处流放10年。

科西莫小心避免了被扣上与他们同谋的罪名。他知道阿尔比奇在佛罗伦萨的地位每况愈下，而威尼斯和罗马都支持美第奇家族的回归。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自从美第奇家族离开以后，其他银行“连一个开心果”都不能提供给政府。1434年夏天在伊莫拉（Imola），佛罗伦萨军队在一场决定性战斗中输给了米兰雇佣兵，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随之达到了高潮。重新选举的结果是一批众所周知的美第奇家族支持者当选执政官，他们中的尼科洛·迪·科科（Niccolo di Cocco）还被选为首席执政官。

如果不是因为帕拉·斯特罗齐的反对，里纳尔多可能会直接用暴力来阻挠这次选举。自从尼科洛·达·乌扎诺去世后，富可敌国的帕拉·斯特罗齐就成了佛罗伦萨寡头政治体系中最受尊敬也最有影响力的温和派。在他的劝说下，里纳尔多同意当选的执政官们就职，但前提是谁要提议把美第奇家族请回佛罗伦萨，谁就会被强行驱逐出市政厅。可惜，执政团已经决心不再受他的恐吓，他们抓住九月里纳尔多暂时不在佛罗伦萨的机会，发出了这份令他恐惧的邀请。里纳尔多一回到佛罗伦萨就被执政团召唤前往市政厅，但是因为担心自己会像科西莫一样被逮捕并关进“小旅馆”，并以为拥有帕拉·斯特罗齐、乔瓦尼·圭恰迪尼（Givoanni Guicciardini）^[3]、里多尔福·佩鲁齐（Ridolfo Peruzzi）^[4]和尼科洛·巴尔巴多里（Niccolo Barbadori）^[5]的支持，里纳尔多决定无视执政团的召唤，而是直奔宫室，召集自己的支持者武装起来，下令让五百人组成的侍卫队去占领市政厅对面的圣彼尔谢拉吉奥教堂（San Pier Scheraggio）^[6]，并时刻准备攻占市政厅。宫殿门口的守卫已经被重金收买，就算执政团下令锁紧大门，他也会让里纳尔多的军队自由进入。

9月25日早上，里纳尔多的军队开始部署位置，但是执政团对此并非毫无准备。他们也把自己的军队部署到了广场之上，还安排士兵在街上来回巡视。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围困，他们已经向宫殿里运送了必需品。然后他们就关闭了宫殿的大门并设置了壁垒，同时继续从周边区域调集力量作为支援。为了给集结增援力量争取时间，执政团派出两名执政官前去与阿尔比奇谈判，而他们请来的另一位更有影响力的中间人——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此时也已经到达了佛罗伦萨。

欧金尼乌斯四世的前任马丁五世来自极有权势的科隆纳（Colonna）家族。但是欧金尼乌斯四世刚刚和这个家族发生了争执，并被一群张狂的暴徒赶出了罗马逃往佛罗伦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为他提供了庇护之所。这里的人都知道欧金尼乌斯四世曾经表达过他对美第奇家族的同情，并且希望在美第奇家庭财力的支持下，一个强大的佛罗伦萨政府能够和威尼斯联手，帮助他重回罗马。9月26日下午，教皇的代表——枢机主教维泰斯基（Vitelleschi）——离开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去找里纳尔多，为的是说服他到修道院与教皇面谈。

至此，里纳尔多正变得孤注一掷。他成功占领了圣阿波利纳雷广场（Piazza Sant' Apollinare）并且关闭了所有出口，下一步就要围困巴杰罗宫，攻打市政厅，烧毁所有美第奇家族和他们主要支持者的房屋。不过，虽然他从佛罗伦萨以外召集了无数的雇佣兵，但都只是承诺他们可以掠夺战利品而非向他们支付确定的报酬，更何况这些军队至今迟迟无法赶到佛罗伦萨；而城内的军队渐渐开始背弃他。最糟糕的是，里纳尔多要想取胜，几大家族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但此时的情况是：乔瓦尼·圭恰迪尼宣称他能做的只有保证不让自己支持美第奇家族的兄弟皮耶罗（Piero）向执政团提供支援；之前暗示可以提供500人武装队伍供里纳尔多差遣的帕拉·斯特罗齐现在也改变了注意，只带了两个随从来到圣阿波利纳雷广场，和里纳尔多简单交谈了

两句就匆匆离开了；里纳尔多最主要的支持者里多尔福·佩鲁齐也开始动摇，并且接受了执政团的召唤，但是这次会面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于是里多尔福·佩鲁齐转而敦促里纳尔多接受枢机主教维泰斯基的邀请去圣玛利亚诺韦拉修道院和教皇面谈。

在佩鲁齐和巴尔巴多里的陪同和一个临时组建的支持者武装队伍的护送下，里纳尔多在当晚六点多出发前往修道院。途中他们经过马特利（Martelli）家族的住处，而这一家族中的长者一直都是美第奇的好朋友，有时还会有生意上的合作，所以他们试图阻拦里纳尔多前进。双方爆发了打斗，好几个人受了重伤。马特利家族的侍卫终于被逼回房子里后，里纳尔多又费了好大劲才阻止了护卫们冲进马特利宫洗劫财物并说服他们继续跟随他向圣玛利亚诺韦拉修道院前进。^[7]一行人马怨声载道地抵达了修道院，并在前面的广场上休息，不过显然已经没有人愿意长时间留在外面等待。

里纳尔多从修道院出来的时候，夜已经深了，确实没有多少护卫留下等他。他只找到一小拨儿还坐在广场上的人。他的精神显然已经崩溃了。在刚刚的谈话中，教皇的神情举止是那么高高在上，说话又那么富有技巧。里纳尔多被告知教廷的意愿与执政团的意愿是一致的，继续抵抗也只是徒劳。虽然教皇表示会尽己所能保护阿尔比奇家族不受敌人的报复，但是这并没有给里纳尔多带来多少安慰，他只能就这么回去了。

两天之后，钟楼上的牛钟被敲了整整一个小时来召唤市民参加议会。市民们集中到广场上之后，军队从外面将他们围了起来。枢机主教维泰斯基及教皇的另外两位代表最先出现在围栏之内，伴随着响亮的号角声，全体执政官和共和国的官员们很快也都到齐了。执政团秘书依照传统向市民们大声提问：“佛罗伦萨的市民们，你们是否许可成立最高司法委员会来代表人民的利益进行改革？”人群顺从地表示

同意，一个由350名市民组成的最高司法委员会随即被选举出来。对于美第奇家族的流放判决立刻被撤销了，他们还因为流放期间的良好表现而受到了赞扬，并被正式邀请回到佛罗伦萨。

1434年9月28日，也是科西莫被流放整整一年之际，他在300名威尼斯士兵的护送下离开威尼斯返回佛罗伦萨。几天后，他在晚餐时间到达了位于卡雷吉（Careggi）的乡村别墅。^[8]一路上经过的村庄，到处都是向他欢呼致敬的农民。通往佛罗伦萨的道路上也满是欢迎的民众，连佛罗伦萨城内的街道上聚满了翘首以盼的市民，等着目睹美第奇家族荣耀的回归。为了避免发生骚乱，执政团紧急通知科西莫等天黑再进城。日落之后，科西莫在弟弟洛伦佐的陪同下，带着一个仆人，跟随一个城里派来的执仗官，从巴杰罗宫附近的一个小通道重新进入了佛罗伦萨。他在市政厅一个特意为他准备的房间里过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先去拜见了教皇并感谢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然后才回到巴尔迪宫。迎接他的群众聚集在街上喧闹地欢呼，仿佛他是“取得大胜凯旋”的英雄。

此时对他敌人的判决已经被公布出来。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和他的儿子，甚至后代都不得进入佛罗伦萨，其他几个家族也受到了同样的判决，有的甚至是整个家族都被流放，因为依照佛罗伦萨的习惯，有时犯罪被认定为既是个人罪行也是集体同谋。在被流放人员名单中还包括佩鲁齐、瓜斯科尼（Guasconi）、瓜达尼和圭恰迪尼家族的成员，以及尼科洛·巴尔巴多里和马泰奥·斯特罗齐（Matteo Strozzi）。事实上，被流放的总人数超过了70人，其中很多是众所周知的大家族。所以，也有人抱怨科西莫把佛罗伦萨的大家族都赶走了，而科西莫则以他一贯的嘲讽口吻反击道：“在佛罗伦萨，扯七八码红布就可以造就一个新市民。”

科西莫回归之后，弗朗切斯科·费勒夫并没有留在这里接受和阿尔比奇一样的判决，而是早早逃到了锡耶纳（Siena）去效忠维斯孔蒂家族。费勒夫写了一系列诽谤美第奇的文章来煽动佛罗伦萨人起义，甚至可能还协助雇用了一个希腊杀手刺杀科西莫。没什么人为这个令人厌烦、脾气乖戾又爱慕虚荣的学者离开佛罗伦萨感到可惜，倒是有很多人为了值得尊敬、诚实守信的帕拉·斯特罗齐被流放帕多瓦而难过。然而科西莫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富可敌国又容易受人影响的帕拉·斯特罗齐必须离开佛罗伦萨，这样才能保证他自己在佛罗伦萨的位置更稳固。当被请求看在旧时情分上帮助美言几句的时候，科西莫还是摆出了他标志性的模糊态度，对最终判定的流放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他显然有理由安慰自己说，政治从来不是帕拉·斯特罗齐的强项，在帕多瓦那个没有政坛纷争侵扰的地方，他的生活反而会更幸福。事实也证明，帕拉·斯特罗齐在帕多瓦安顿下来，过上了平静祥和的日子，终日忙于研究、讨论和收集藏书。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科西莫不止一次希望自己能过上那种简单的生活。在其他一些意大利邦国里，死刑是比流放更常用的刑罚，统治者背后也都有强大的军队在支持和保护。但死刑和军事独裁都不是佛罗伦萨的传统，而佛罗伦萨的传统是不容被质疑的。科西莫想成功地统治佛罗伦萨，就必须做得像他根本没有在统治佛罗伦萨一样；如果想要改变现有的政治结构，就必须精心计算，把可能产生的对传统的冒犯降低到最小。如果不依靠政治影响力就能控制并扩大自己的银行事业，那么科西莫一定愿意隐于幕后，远离这些纷争。银行事业才是他最大的成就感来源，就算有一根点石成金的魔杖在手，科西莫也会选择继续做一个银行家。然而，像他父亲被迫认清的现实一样，佛罗伦萨的富商想避免参与政治，绝对是不明智的。即便如此，科西莫还是成功扮演了一个单纯的、成功的银行家角色。表面上他乐善好施、平易近人，时刻准备好接受共和国委派给他的任何政治或外交任务，并且协助制定财政政策，而实际上他才是佛罗伦萨最有权势的人。他

以极其精妙的技巧维持着自己的权势地位，他的朋友书商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写道：“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嫉妒，科西莫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时，会想方设法让这个提议看起来是由别人而非他提出的。”至于多得无法掩饰的巨额财富，科西莫会按照比别人高很多的标准缴税。不过同任何精明算计的富人一样，科西莫也会做假账，通过夸大坏账的数额来降低需纳税部分的数额，使实际缴纳的税款远低于其真正收入应缴纳的数额。没有人真正清楚科西莫到底有多富有。他一生中被选举为首席执政官的次数不超过三次，也从不考虑担任什么永久性的政府职务，更不会冒佛罗伦萨人之大不韪去建议从本质上改动现行的并不完善的宪法。他唯一的提议是建立一个“大委员会”

（*Consiglio Maggiore*），全权负责国家安全和税务，这个机构是后来的“百人团”（*Cento*）的前身。科西莫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形式的炫富，他选择骑骡子而不是高头大马。待时机成熟后，他甚至故意让众人以为那个虚荣、健谈、奢侈且充满野心的卢卡·皮蒂（Luca Pitti）才是佛罗伦萨最有权势的人。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它表面呈现出来的样子。尽管宪政机构和部门都像原来一样存在，但是在遇到政治压力或军事威胁的时候，美第奇家族总可以委托精心挑选的选举官（*Accoppiatori*）来操控候选人名单，防止美第奇家族的敌人当选执政官。大部分选举官都与美第奇一派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比如同样是从被流放地召唤回来的显赫市民阿尼奥洛·阿恰沃利就支持美第奇一派；精明、能言善辩的组织家普乔·普奇，不仅是科西莫从工匠阶层中提拔起来的人才，也是公认的美第奇一派的经理人。美第奇一派的根基无时无刻不在扩大。在普奇的建议下，贵族被重新定性为平民（*Popolani*），这样他们理论上就拥有了竞选政府职务的资格。这一举措也赢得了下层民众的欢迎，他们选择将其理解为一个值得赞扬的民主决定。那些出身卑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在佛罗伦萨历史上第一次被视为有能力担任政府职务的人，这更让民众感到无比满足和自豪。然而事实上，当权者早就想好

了措施以避免这一政策偏离他们的意愿。古老的贵族家庭依然是被排除在实权之外的，而超过四分之三人口的劳动者依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以圣玛利亚诺韦拉区域为例，该区新获批准的159个有资格作为候选人的市民中，超过145人是依据1449年规定本来就有竞选资格的人的儿子、孙子或兄弟。

短短几年间，表面上松散的美第奇一派，其势力根基已经相当稳固，而且他们被坚定地视为代表佛罗伦萨整体的利益，所以科西莫不再需要费心去压制什么反对声音。他的老朋友内里·卡波尼（Neri Capponi）是个传统的共和派，他偶尔会表达一些对科西莫暗中发展势力的担忧；另一位有同样担忧的是詹诺佐·马内蒂（Giannozzo Manetti），他是一位富有而博学的商人，时常会被委以外交任务。不过这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强大的背景，而且很快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卡波尼在1455年就去世了，而马内蒂则抗议说佛罗伦萨野蛮的重税几乎让他破产，最终选择离开这里去了那不勒斯。

尽管实际情况可能不如科西莫的批评者们后来所说的那么严重，但是科西莫一派以操控佛罗伦萨的税收体系为手段来打压敌人是绝对存在的。以普乔·普奇为代表的税务官员们在计算批评者的应缴税款时可没什么公平公正的念头。普乔·普奇作为美第奇一派的经理人，免不了要替科西莫干一些不怎么光彩的勾当。这其中就包括低价购买被流放人员的地产或通过买卖政府债券来聚敛个人财富等。

就是因为这些，尽管少有公开的指责，但美第奇一派绝不是广受爱戴的，甚至有些时候，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事实上，在1458年，美第奇一派几乎濒临瓦解的边缘。当年1月，在经历经济长期停滞之后，佛罗伦萨的商人和地产拥有者们惊闻又要加征新税。到初夏的时候，就出现了要修改宪法的声音，随后又有传言说反对修宪的人已经被逮捕，严刑拷问之后交代了同谋。佛罗伦萨城里的不满情绪此刻已

经十分高涨，科西莫不得不通过他在米兰的银行租下帕维亚（Pavia）的一套房子，一旦佛罗伦萨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他就打算和妻子一起搬到那里去。他的儿媳已经带着孙子们躲到了卡法焦洛的别墅里，科西莫已在别墅四周修建了围墙和高塔，为的就是应对危急情况。

到8月10日这一天，首席执政官卢卡·皮蒂认为有必要召开一个平和的市民议会。开会时，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已经谨慎地部署好雇佣兵军队和武装支持者。执政官们身着深红色长袍和镶皮边的斗篷出现在围栏之内。执政团秘书大声宣读了决定建立新的最高司法委员会的法律条文，之后又按照传统询问广场上的市民们是否认可这一提议。他“反复问了三遍，但是由于声音太小，只有几个人听懂了他的话，而且也没有什么人回答同意”。尽管如此，仅有的几个同意声就足够走完形式，最高司法委员会被批准建立，然后“执政官们回到了宫殿，市民回到作坊，雇佣兵则回到兵营”。

新建立的最高司法委员会马上通过了美第奇一派提议的各种措施。选举官的权力也被确认延长十年，所以抽签选举依然只是形式而已。首席执政官的权力也大大增加了。卢卡·皮蒂的任期即将结束，于是他和科西莫的大儿子皮耶罗·德·美第奇（Piero de' Medici）以及另外八人一起被选为选举官。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又一次在街上摇旗呐喊，科西莫的家人也全都回到了佛罗伦萨。美第奇一派至高无上的地位被重新树立起来，而科西莫本人也成了无可争议的佛罗伦萨元老，他就是“国家的主人”，1458年当选教皇庇护二世的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德·比科罗米尼（Aeneas Silvius de' Piccolomini）说：“政治问题在他的家中解决，他选定的人在政府任职……他决定战争还是和平，连法律也在他的控制之中……除了缺一个名号，他就是真正的帝王。”如果外国使臣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会被建议直接找科西莫本人面谈，因为找其他任何人都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佛罗伦萨史学者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 对此评论说：“从罗马灭亡至今时今日，再没有普通市民能拥有科西莫所享有的声望了。”

[1]. 威尼斯的圣乔治马焦雷修道院的藏书室已经被毁了，但是修道院的宿舍也能体现出米开罗佐的设计风格，很可能也是由他最初设计修建的。

[2]. 阿恰尤奥利在圣使徒镇 (Borgo Santi Apostoli) 有多处房产，包括阿恰尤奥利宫 (3~10号)。他们在阿诺河畔的宫殿毁于1944年，当时撤退的德国人为阻止追兵炸毁了附近的桥梁，同时也毁坏了这栋建筑。

[3]. 圭恰迪尼宫就在圭恰迪尼街上。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就是在蒙蒂奇的圣玛格丽塔街 (Via di Santa Margherita a Montici) (75号) 的拉维亚别墅中写出了《意大利史》 (*History of Italy*) 。

[4]. 佩鲁齐家族的房屋和宫殿都建在佩鲁齐广场上，有几处建筑上有他们家族的标志——梨。他们在圣十字教堂里的家族教堂里有乔托及其助手创作的壁画。

[5]. 在圣费利奇塔教堂 (Santa Felicita) 里的卡波尼堂是为巴尔巴多里家族修建的，他们在1525年把对该小教堂的权利移交给了卡波尼家族。

[6]. 为了建造乌菲齐，圣彼尔谢拉吉奥教堂被拆掉了。

[7]. 马特利家族教堂在圣洛伦佐教堂大殿，其中有一件祭坛装饰品出自菲利波·利比之手。

[8]. 卡雷吉的乡村别墅是科西莫·德·美第奇的弟弟洛伦佐在1417年购买的，并由米开罗佐为科西莫进行扩建。后来朱利亚诺·达·圣加洛又为伟大的洛伦佐修建了南边的敞廊。洛伦佐的儿子皮耶罗从佛罗伦萨逃走后，这里遭到了洗劫，还被大火烧毁了。韦罗基奥的《大卫》和陶土作品《复活》

(*Resurrection*) (现在均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还有小男孩手捧喷水的鱼的喷泉作品 (现在陈列于市政厅) 都是为美第奇的这座别墅而制作的。大公科西莫一世修复了这些作品，但是随后又失修破损并被美第奇家族的后人卖给了伯爵温琴佐·奥尔西 (Vincenzo Orsi)。现在这里是卡雷吉医院 (Ospedale di Careggi) 的员工招待所。

第五章 大主教们与建筑师们

“为上帝奉献多少都不能让我变成他的债主”

科西莫掌权的最初几年，让他赚足美名的事莫过于说服他的朋友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于1439年将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大会（General Concil）改在佛罗伦萨召开。

由于教义上的明显分歧，基督教两大派别已经对立了六个世纪，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特别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士兵在他们威尼斯雇主的煽动下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自此两大教派之间的争论日益激烈，不过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连续几代都在蚕食东罗马帝国的领土，此刻几乎已经逼近君士坦丁堡城门之外。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认为这是与东正教和解的最佳时机。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约翰·帕莱奥洛古斯（John Paleologus）已经以基督的名义向他请求帮助，甚至做好了只要西方基督教世界愿意派士兵和水手拯救东罗马帝国免于即将来临的灾难，他们就愿意从此服从罗马天主教领导的准备。于是教皇决定立即在意大利召开大会商讨此事，不能再有半分耽搁。

然而，教皇心中想的可不只是教派统一这一件事。当时在巴塞尔（Bâle）还有另一个会议正在进行。这一会议是由德国君主召集的，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教皇尚不能接受的教会改革措施和教义学说。教皇想要解散这个会议，可是那些固执的参会团体并不愿意就此作罢，反而宣称他们不但会对教廷财务进行激进改革，还打算与东罗马帝国教会达成协议。教皇根本没有耐心听取那些致力于减少他收入的改革计划，至于与东罗马帝国的和解，他更不允许任何其他人插手。于是，

为了防止东罗马帝国与巴塞尔会议之间再有什么来往，教皇直接向东罗马帝国皇帝发出邀请，让他到费拉拉来与自己会面。

1437年底，约翰·帕莱奥洛古斯乘船来到威尼斯，随行的是一个7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包括君士坦丁堡牧首和他的随从主教们，还有神学家、学者、译员和官员等。1438年1月8日，大会在费拉拉召开。当时天寒地冻，城里人满为患，双方在争取优先地位和举行宗教仪式的问题上又存在诸多争议。天主教的主教们还禁止东正教人员在天主教教堂里按照东正教的方式做弥撒；东正教牧首则对这一禁令表达了强烈不满。教皇此时也焦躁不安，有消息说他的敌人正在邻近的博洛尼亚谋划推翻他。博洛尼亚本来是教廷国，后来宣告独立，现在处于本蒂沃利奥（Bentivoglio）家族的统治之下。更令教皇担心的是他此时囊中羞涩，不得不把自己在阿西西（Assisi）的中世纪高塔古堡抵押出去以借到巨额款项。即便如此，他还是被迫停止继续为他的大批希腊客人承担开销。

科西莫幸灾乐祸地观望着在费拉拉发生的这些麻烦事。本来他就因为教皇选择费拉拉而不是佛罗伦萨作为会议举办地而感到不快。如果一个城市能被选为这么重要的会议的举办地，那么它无论在财政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必将受益匪浅。如果两大教派真能达成共识，那么作为基督教重新统一见证地的城市也必将获得无上的荣耀。更何况，能与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加强联系，也会给佛罗伦萨的银行家、贸易者和商人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而与君主周围的希腊学者交流探讨也一定是一段轻松愉悦的经历。当年年底，费拉拉又暴发了疫情，科西莫的愿望终于有机会实现了。他派弟弟洛伦佐到费拉拉向教皇保证佛罗伦萨绝对是个健康的城市，而且愿意免费提供食宿，同时还许诺在会议期间每月提供1500弗罗林币的贷款供会议代表使用。教皇立刻接受了洛伦佐的提议并着手安排离开费拉拉。

遗憾的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和他庞大的代表团进入佛罗伦萨城的仪式并不如佛罗伦萨官员们期望的那样令人印象深刻。冬日的一场狂风暴雨把成千上万翘首以盼的市民逼回了家中，他们本应该聚集到大街上、房顶上观看壮观的行进队伍。窗台下悬挂的各种旗帜标语都被雨水打湿了；庆祝的喇叭声也被狂风淹没了。为了主持这次盛事而特意让自己当选为首席执政官的科西莫也承认，直到客人们全都安全到达住处之后，他才算松了一口气。

教皇和他的随从们被安排到圣玛利亚诺韦拉修道院；牧首被安排到博尔戈·平蒂（Borgo Pinti）的费兰蒂宫（Palazzo Ferranti）；东罗马帝国皇帝和随从则被安排住到已被流放的佩鲁齐家族的宫殿和房屋中。这些住所还向客人提供葡萄酒、蜡烛、蜜饯、杏仁软糖和其他糖果。小型委员会议就在圣玛利亚诺韦拉修道院里进行，而全体人员出席的大会则在圣十字教堂举行。

作为观察员旁听了这些会议的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对译员进行希腊语和拉丁语互译时博学的论述和娴熟的技巧印象深刻。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讨论没有带来任何成果，而且与会双方的耐心也都要被磨尽了。争论焦点是三位一体中第三位格的根源和性质。希腊方面的观点遭到了教皇发言人兼首席顾问安布罗焦·特拉韦尔萨里的强烈质疑。古典经文被搬出来考证，希腊方面的辩词混乱不清，其中一个代表团成员突然发现经文中有一段对本方观点不利的论述，就决定把那段文字划掉，可是情急之下紧张过度反而划掉了另外一段。东罗马皇帝为了缓和因己方的欺诈行为而引发的骚乱，提议派人去君士坦丁堡取来更多其他的权威经文。不过他的提议遭到了罗马枢机主教盛气凌人地反驳：“陛下，一个人去打仗的时候应当带好武器，而不是到了战场上再派人回去取。”

对于佛罗伦萨的市民来说，这场会议无疑是一次盛事。留着胡子的君士坦丁堡男人们衣着艳丽、头饰奇特，再加上跟随着他们的摩尔或蒙古仆人，更别说那些一同到来的奇怪动物，无不让佛罗伦萨人感到新奇有趣。这些场景更为佛罗伦萨的画家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作素材，从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Gentile da Fabriano）到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许多人都受到了影响。

最终，在特拉韦尔萨里和耐心、智慧的尼西亚（Nicaea）大主教约翰内斯·贝萨里翁（Johannes Bessarion）单独商议之后，双方终于在圣灵这一敏感问题上妥协，也打开了解决其他问题的通路，诸如教皇对东罗马帝国教会的一部分权威。涉及全基督教和解条款的关键文件最终于1439年7月5日庄严签署；次日在教堂举行的庆祝活动上，这个戏剧性的声明被正式公布：“愿上天喜乐、众生欢欣，为这阻隔东西方教会的高墙已经倒塌，平静与和谐重降人间。”

枢机主教切萨里尼（Cesarini）先用拉丁文宣读了声明，接着大主教贝萨里翁又用希腊文宣读，之后意大利枢机主教与希腊大主教拥抱庆贺，其余高阶神职人员及东罗马帝国皇帝也同他们二人一起在教皇面前下跪致敬。后来为庆祝理智的胜利，他们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传达的信息还被刻在了支撑教堂穹顶的石柱上。

然而，人们庆贺的和谐统一并没能维持多久。代表团一回到君士坦丁堡，佛罗伦萨就收到了协议因强烈抗议而不得被废止的消息。东罗马帝国皇帝还发现，他在意大利获得的声援和协助抵抗土耳其人的承诺都不过是一纸空文。14年之后，苏丹的禁卫军就翻过了君士坦丁堡硝烟弥漫的城墙，而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人头则被征服者嘲讽地悬挂在斑岩石柱的顶端。

对佛罗伦萨而言，正如科西莫预见的那样，会议带来了更乐观的结果。它不但让城市贸易因此获利，更给此时人们已经开始谈论的文

文艺复兴（*Rinascimento*）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如此之多的希腊学者出现在佛罗伦萨，迅速激发了人们对古典文本、古典历史、古典艺术和哲学的兴趣，尤其促进了对柏拉图的研究。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英雄，长期以来一直被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光辉掩盖。贝萨里翁的住处每天晚上都聚集着许多希腊和意大利学者，他本人也被说服留在意大利，并被封为枢机主教和西旁托（Siponto）的大主教。陪同贝萨里翁一起从君士坦丁堡来到意大利的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mistos Plethon）是研究柏拉图的权威，他也同意留在佛罗伦萨，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落叶归根回到祖国。

科西莫也对卜列东关于柏拉图的演讲十分感兴趣，从中受益匪浅，他甚至决定要在佛罗伦萨建立柏拉图研究院，并且把自己有限的私人时间都用来研究柏拉图。卜列东的回国和科西莫的事务缠身一度使这一计划被迫推迟，直到几年之后，科西莫领养了他的一个私人医生的儿子——名叫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的年轻医学院学生，这些计划才重被提起。菲奇诺对柏拉图的强烈兴趣不但促使科西莫资助他继续深造，后来还安排他在位于宁静乡村的蒙特维奇欧（Montevecchio）别墅里学习希腊语，并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翻译成拉丁文。^[1]菲奇诺热切地接受了这个工作，随着其年龄和学识的增长，科西莫还会邀请他到邻近的卡雷吉别墅里，要么两人，要么与其他朋友——包括听从科西莫的劝说，于1456年来到佛罗伦萨的希腊学者约翰·阿基罗保罗斯（John Argyropoulos）——畅谈哲学问题直至深夜。柏拉图研究院就在这些积淀上慢慢成长起来，并对以后欧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次会议不仅点燃了科西莫心中建立柏拉图研究院的希望之火，还使得他有机会为自己的藏书室增添不少珍贵的作品。他的藏书室已经被视为当时世界上最宝贵的藏书室之一。在过去多年中，科西莫的代理人一直按照他的指示在欧洲各地乃至近东地区搜集一切能找到的

珍稀手稿，特别是在德国的修道院——因为那儿的修道士们似乎对这些作品的价值一无所知。1437年尼科洛·尼科利去世时，把自己的800多册藏书都送给了科西莫，作为对他长久情谊的回报。科西莫把宗教方面的书籍都送给了圣马可修道院，其余的自己留下。科西莫的藏书室对于所有想要阅读的朋友都是开放的，这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开放性藏书室，后来在罗马的梵蒂冈藏书室也承袭了这样的模式。在科西莫及其继承人的不断扩充下，藏书室最终收藏了超过一万册

（*codices*）拉丁及希腊作者创作的书籍，还有数以千计的但丁和彼特拉克（Petrarch）时期的珍贵手稿及佛罗伦萨更早时期的作品。^[2]

除了为藏书一掷千金外，科西莫和他的父亲一样，在装饰佛罗伦萨的建筑上也慷慨大方得很。乔瓦尼·迪·比奇从来不是什么爱书之人，事实上，从1418年的一次财产盘点来看，他总共只有三本书：一本拉丁语的《圣玛格丽特的一生》，一本教士乔瓦尼的拉丁语布道词和一本意大利语《福音书》。但是乔瓦尼·迪·比奇一直认定，一座城市的荣耀，以及城市中在乎荣耀的富有市民的个人声誉，都需要通过对公共建筑的资助和修缮来实现。

乔瓦尼参与的第一个重要项目是为圣乔瓦尼巴蒂斯塔洗礼堂建造新大门。这个洗礼堂被但丁称为“我尊敬的乔瓦尼堂”（il mio bel Giovanni），在当时已有250多年的历史了。^[3]洗礼堂的南门装饰是1330年由安德烈亚·皮萨诺（Andrea Pisano）设计的，描绘该教堂所致敬的圣人乔瓦尼的生活景象。1402年瘟疫暴发，人们决定重修教堂北门作为对上帝的献祭，以祈求1348年那场从那不勒斯向北席卷整个欧洲、千万人丧生的可怕灾难不要重降人间。新大门由青铜制成，并请技艺最精湛的工匠操刀，共有七名当时顶尖的艺术家被邀请提交设计方案参加竞选，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可能也是评委之一。

青铜板的设计主题是以撒的献祭。所有作品提交后，三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获得了评委们的青睐。这三个人当时都只有二十多岁，雅各布·德拉·奎尔查（Jacopo della Quercia）来自锡耶纳，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和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都来自佛罗伦萨。经过漫长的讨论后，吉贝尔蒂和布鲁内莱斯基最终胜出。但是当评委告诉两人希望他们合作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脾气火爆的布鲁内莱斯基无法接受，一气之下离开佛罗伦萨去罗马学习建筑了。临走之前他把自己的青铜板留给了科西莫，后来科西莫把它摆到了圣洛伦佐教堂的圣器收藏室中，展示在圣坛之后。

最终建造大门的任务落在了吉贝尔蒂一个人身上。他多才多艺，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具备的素质之一。他本来是学习做金匠的，但同时也是一名画家、建筑家和雕塑家。他设计过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窗户以及马丁五世和欧金尼乌斯四世的三重冕。他为乔瓦尼·德·美第奇设计了一个红玛瑙镶金浮雕，描绘的是阿波罗

（Apollo）和玛尔叙阿斯（Marsyas）；还为科西莫设计了一个圣物箱，用来存放三位已不为人知的殉道者的遗骨。接受建造洗礼堂大门的工作时，吉贝尔蒂只有23岁，待他完成所有工作时，已经快73岁了。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总是不断地修改重做，直到浮雕的成品达到他能实现的最完美程度为止。他对“最大限度地还原自然本来样貌”的极致追求让助手感到疲惫不堪。大门经过了22年的打磨才终于完工。为了庆祝此等大事，执政官们列队从市政厅前往教堂，向艺术家和伟大的作品致敬。^[4]要知道，只有为了最庄严神圣的事件，执政团官员才会被允许集体离开市政厅。然而，庆祝仪式刚结束，吉贝尔蒂就马上回到布法利尼街（Via Bufalini）上与圣玛丽亚诺瓦医院（Santa Maria Nuova）^[5]相对的铸造厂，着手设计洗礼堂的东门了。抱着建造出无法超越的杰作的决心，又经过了28年的精心雕琢，已经垂垂老矣的吉贝尔蒂才不得不承认他不可能再对作品做出什么改

进了。于是描述《旧约》中故事情节的镀金铜板最终于1456年被安装到了洗礼堂的东门上。后来，米开朗琪罗就是被这扇门上的雕刻深深打动，并惊叹它们“配得上作天堂之门”。^[6]

乔瓦尼·德·美第奇在吉贝尔蒂的第一扇门完工之前就已经是一位老人了，那时他还和科西莫一同安排了洗礼堂中另一件建筑杰作的建造，也就是为他的朋友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修建纪念碑。^[7]乔瓦尼还非常关心育婴堂（Ospedale degli Innocenti）的筹款和修建。育婴堂是丝绸业行会为佛罗伦萨的弃婴们修建的医院。^[8]除此之外还有圣洛伦佐教堂的扩建，这个教堂是公元393年由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为神建造的，如今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圣洛伦佐教区的8位代表人物都同意出资在此建造家族小教堂；乔瓦尼更是承诺不但要建造家族教堂，还会承担圣器收藏室的建造费用。圣洛伦佐教堂和育婴堂的工程都被委派给了从罗马学成归来的布鲁内莱斯基。他迫切地想要展示学到的新技法，以此向吉贝尔蒂证明艺术可不只是铸造铜雕版而已。布鲁内莱斯基建造的圣洛伦佐教堂也不愧为文艺复兴早期的杰出建筑作品之一，它后来成了美第奇家族的家族教堂，美第奇家族成员的墓也大都设在这里。^[9]

然而，布鲁内莱斯基最杰出的作品还要数大教堂的巨型穹顶。当时人们几乎认定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穹顶跨域的直径达到了138英尺。布鲁内莱斯基通过对万神殿和罗马其他一些建筑的仔细研究，坚称自己可以建造出不需要任何支架支撑的完美结构。泥瓦匠行会指定的委员会认为他的说法不可信，而布鲁内莱斯基则还和以前一样暴躁易怒，不愿向委员会就他的建造计划做出任何说明。他强调整个项目必须由他全权决定，不允许任何没受过专业培训的官老爷干涉他的设计。甚至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布鲁内莱斯基带着一个鸡蛋去参加了委员们毫无建设意义的讨论会，他声称只有自己知道如何让鸡蛋立住。当所有委员都承认他们做不到之后，布鲁内莱斯基把鸡蛋

的一头在桌上磕破，于是鸡蛋就立在了桌子上。委员们抗议说：“早知道这样，我们也能让鸡蛋立住。”而布鲁内莱斯基则回答道：“是的，就好比如果我告诉你们我将怎样建造教堂的穹顶，你们也会说出同样的话。”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中，布鲁内莱斯基表现得更加嚣张狂傲，以至于委员们下令把他赶出会议现场。侍卫们把布鲁内莱斯基带出宫殿，直接扔到广场之上。布鲁内莱斯基仰面倒地。从那以后人们在街上看到他都会指指点点地大喊：“疯子来了。”

后来，无数建筑家为穹顶的建造献计献策，比如用浮岩建造穹顶之类，但是都被否决了。直到1420年，委员会最终做出了让步，这项艰巨的任务还是落到了布鲁内莱斯基肩上。但让他非常恼怒的是，他还是被要求与吉贝尔蒂合作。事实上，吉贝尔蒂在穹顶建设初期给布鲁内莱斯基提供的帮助有多重要，可能是布鲁内莱斯基永远不愿承认，后世也永远无法估量的。

16年后，穹顶建成了。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杰作，也是工程学上的壮举。1436年3月25日，在圣母领报日庆典当天——依据古怪的佛罗伦萨历法，这天也是新年的第一天——穹顶正式建成，盛大的敬神仪式持续了五个小时之久。^[10]人们特别修建了一条架高的木质通道，将教皇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的房间和大教堂门口连接起来，通道上面不但挂满了旗帜和花环，还装上了深红色的顶棚。到了指定的时间，身着白衣的教皇戴着嵌有珠宝的三重冕走出住处，缓慢地走过铺着地毯的木质通道。他的后面跟着7位枢机主教、37位主教和大主教，以及由首席执政官和执政官们带领的城市主要官员们。伴随着唱诗班吟唱的赞美诗，不少围观者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父亲去世以后，科西莫继续为修建、改造和装饰佛罗伦萨及其周边乡村里的教堂、修道院和慈善机构而慷慨解囊，仿佛是要在整个托斯卡纳地区都留下自己的标记。“我知道这座城市可以有多讽

刺”，他有一次对朋友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说，“也许过不了五十年，我的家族就会被驱逐，但是我修建的建筑却能屹立不倒。”作为银行业行会指定的四人委员会成员之一，科西莫也为雇佣吉贝尔蒂制作圣马太雕像出了资。圣马太被视为银行家的保护神，他的雕像要被供奉在奥尔圣米凯莱教堂墙外侧的壁龛里，这里全部14个壁龛已分别被各个行会认领。^[11]在出资比例上，科西莫比别人出得都多，以与自己的财富相称；但是只比别人略多一点，这是他惯有的谨慎态度，以免引起他人的不满。除了奥尔圣米凯莱教堂，还有圣十字教堂的见习教士宿舍和小教堂^[12]，圣母领报大殿（Santissima Annunziata）的唱诗班席位^[13]，现已被毁的圣巴尔托罗梅奥（San Bartolommeo）教堂的藏书室，位于菲耶索莱的被称作拉巴迪亚（La Badia）的圣多明我会修道院（科西莫在此还有一个专属房间）^[14]，以及菲耶索莱的圣吉罗拉莫内蒙蒂教堂（San Girolamo nei Monti）都得到了科西莫的慷慨捐助。而且他丰富的建筑知识甚至让领头的工匠和设计者们都心服口服。此外，为在巴黎的佛罗伦萨学子重建学院、翻新耶路撒冷的圣神教堂（Santo Spirito）及扩建阿西西的方济会修道院，科西莫也都重任在肩。在大教堂穹顶建成一年之后，科西莫无疑又为米开朗基罗重建圣马可修道院提供了资金。据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的说法，这项慈善事业是科西莫受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劝诱而接手的。有一次在科西莫良心受到困扰的时候，他向教皇征求意见，最终决定花费四万达克特的巨资重建这座多明我会修道院。这座修道院的院长名叫安东尼奥·皮耶罗齐（Antonio Pierozzi），因为他实在太瘦小而被戏称为安东尼诺（Antonino）。此人严苛、禁欲且令人生畏，后来在1445年成为佛罗伦萨的大主教，到1523年被追封为圣徒。安东尼诺是科西莫的密友，经常有人看到他俩单独或与别人一起在科西莫宽敞的专属房间内畅谈。每当科西莫感觉需要安静地反思时，他都会一个人来到这里寻找平静。据说他们总是在一起谈论高利贷以及时刻困扰着银行家的如何赎罪的问题。教会的说法是放高利

贷者要想获得宽恕，必须在有生之年或去世之时偿还所有经非正当渠道赚取的不义之财。忏悔的银行家去世时在遗嘱中做出让继承者惊恐不已的规定，即对他们资产收取的第一笔费用就是悉数归还全部财产，这种案例广为人知。按理说，仅为慈善事业捐款是不够的；但是现实的教会人士很快改口称，这也是非常有效的办法，科西莫无疑也更愿意相信这样的说法。他为慈善一掷千金，他的孙子后来发现科西莫在1434~1471年这三十八年间，“仅建筑、慈善和税款上的开销就达到了惊人的663755弗罗林币”。事实上，科西莫在修建圣马可修道院的时候太过慷慨，以至于修道士们“本着谦虚的心”不得不提出反对。但是科西莫完全没把他们的抱怨当回事，他曾说过：“为上帝奉献多少都不能让我变成他的债主。”重建工程完工之后，科西莫又给修道院捐献了善款，给修道士们购买了法衣、圣杯和配有插图的弥撒书，还把尼科洛·尼科利的大部分藏书赠送给修道院，又雇用了无数的抄写员抄写更多副本以丰富修道院的藏书。^[15]

待圣马可修道院完工之后，科西莫决定要为自己修建一座新宫殿。几年前他就已经从巴尔迪宫搬出，住进了他父亲在主教堂广场的房子。尽管他已经对这处家族老宅做了一些改进和扩建，能够满足一家人的生活需要，但是对于他的生意来说，这里显然已经太小了，他急需更多的储藏室和账房。于是，他选定在城里最宽阔的拉尔加街（Via Larga）和圣乔瓦尼诺德利斯科洛皮教堂（San Giovannino degli Scolopi）北墙外的戈里街（Via de Gori）交叉口，修建新房子。^[16]他选中的建筑师是才华横溢但脾气暴躁的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此时他为附近的圣洛伦佐教堂修建中殿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可是当看到布鲁内莱斯基的修建计划和木质模型时，科西莫觉得他的设计太过奢华绚丽，于是委婉地否决了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方案。科西莫会像建筑师一样把订制的建筑视为自己的作品，而他订制的所有建筑一直以来都保持着低调、内敛、沉静而不刻意的风格，他当然希望自己的住处也能如此。将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搁置一旁，科西莫转

而选中了年轻的建筑师米开罗佐·米凯洛齐。这个决定让布鲁内莱斯基怒不可遏，甚至将自己的模型“打了个粉碎”。

米开罗佐生于佛罗伦萨。他的父亲是个裁缝，老家在勃艮第（Burgundy）。米开罗佐在还是多纳泰洛（Donatello）的学生的时候，就因为优秀的雕塑天赋而小有名气，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洗礼堂中建造的墓碑。米开罗佐的设计没有布鲁内莱斯基那样富丽堂皇，但他简约大方和用色内敛的风格更符合科西莫的品位。科西莫常说嫉妒就像野草，千万不能提供水分和养料供其生长，所以科西莫一直谨慎避免让修建美第奇宫这件事冒犯到批评者们。然而，这座宫殿既要给美第奇家族事业提供办公室和账房，又要满足私人生活之用，所以必定面积可观，科西莫的敌人自然要抓住机会大肆渲染科西莫修建豪宅的用意，谴责这座宫殿就是其贪欲的象征。“他要建造的这座宫殿要宏伟到让罗马圆形竞技场都黯然失色，”有人写道，“用别人的钱盖房，谁都会想盖多豪华就盖多豪华。”事实上，和之后二十年间建造的其他宫殿——比如鲁切拉伊宫和令人敬畏的皮蒂宫（Palazzo Pitti）——相比，美第奇宫绝对称不上富丽堂皇。这座宫殿在十五世纪中期的估价是五千弗罗林币。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科西莫的后代还是最终购得这座宫殿的里卡尔迪家族（Riccardi）都对这里进行了改造和扩建，让它变得更加宏伟壮观；但是在它建成之初，这座宫殿最显著的特点是新颖独特，而绝非富丽堂皇。虽说把房子修建成碉堡一样四角带高塔、墙上开堞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直到米开罗佐开始修建美第奇宫殿为止，佛罗伦萨才算有了第一座融合了意大利早期哥特风格的精妙和古典品位的沉稳的精美建筑。^[17]

宫殿一层外墙使用的是巨大的粗凿石料，为了获得一种粗放、简约（*rustica*）的效果。米开罗佐认为这种设计能“在意大利艳阳的照耀下获得光和影所带来的美感，表现出坚固和强悍”。起初，宫殿一

层面向拉尔加街的一面是类似碉堡的完整墙体，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巨大的拱形通道。但是在用于居住、位于通道之上的楼层，这种严肃的气氛因为加装了成排的拱窗而变得柔和不少，二层两侧还有多利克式圆柱（Doric），三层两侧则是科林斯式圆柱（Corinthian）。整座宫殿之上延伸出一圈常见于古典罗马建筑的飞檐，飞檐的高度达到了8英尺，线条简洁有力、高耸威严。而面向戈里街的一侧则是一条开放式的敞廊。敞廊的拱门上后来又加装了弯曲的有铁栅栏的窗子，这种窗子也是米开罗佐设计的，被称为“跪窗”（Kneeling Windows）。在敞廊的一角还有一盏美丽的铁质壁灯，是由尼科洛·格罗索（Niccolo Grosso）制作的，这位制作者有个外号叫“收押金的人”（*il Caparra*）。^[18]在壁灯之上，有石刻的美第奇家族盾徽，同时还有科西莫的私人纹饰——盾牌上伸出三根孔雀羽毛，分别代表着节制、审慎和坚韧这三种科西莫最看重的美德。

在美第奇宫完全建成之前，米开罗佐就着手设计科西莫在穆杰洛的乡村别墅了。科西莫从来不会对田园生活感到厌倦。只要有机会，他就会离开佛罗伦萨到特雷比奥或他钟爱的卡雷吉别墅里，住上尽可能长的时间。在这里他可以安静地读书，甚至到花园里修剪一下葡萄藤，打理打理橄榄树，或是栽种桑树、杏树。哪怕只是和在田间劳作的村民闲聊几句，也能给他带来莫大的安慰。有时他还会从和村民的聊天中学到一些谚语和寓言，回到城里之后再将它们用到自己跟别人的谈话中，给语言增加不少趣味。在卡雷吉，他可以尽情地和朋友畅谈而不必担心被打断；还可以召唤门徒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来做伴。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是个矮小、丑陋，但聪明绝顶的年轻人，就住在蒙特维奇欧的乡村别墅里。两人会一起吃饭、下棋。下棋也是科西莫唯一会参与的游戏。他在一封于1462年写给菲奇诺的书信中说：

我昨天来到了卡雷吉，主要是为了让自己放松一下。我想尽快见到你，马尔西利奥。来的时候带上我们最喜欢的柏拉图的作品，我相信你已经如你承诺的那样，将它翻译为拉丁文了。没有什么是比发现通往幸福的

道路更让我投入的事业了。所以快点来吧，别忘了带着你的俄耳甫斯七弦琴。

科西莫当然没有废弃卡雷吉的意思，不过他还想再要一个位置更加偏远的乡村别墅。在遇到变故或瘟疫之类的情况时，那里就可以充当避难所，还可以拉近美第奇家庭与穆杰洛地区村民的关系，可谓一举多得。他最终选定了卡法焦洛的一片土地，这里世代都是他家族的财产。经米开罗佐设计，一栋新的乡村别墅在1451年就初具雏形了。[\[19\]](#)

几年之后，米开罗佐又开始为美第奇建造另一座别墅。这次是在菲耶索莱，科西莫的儿子乔瓦尼想要重建一座像城堡一样的别墅，并称之为贝尔坎托（Belcanto）。[\[20\]](#)别墅四周陡峭而多岩石，根本不可能进行耕种。尽管科西莫不赞成儿子的选择，批评他花费巨资只为欣赏窗外的风景，但是乔瓦尼辩称这独特的景色就是菲耶索莱的精髓所在：在夏日的傍晚，可以与家人及朋友们坐在阴凉的阳台上俯瞰整个佛罗伦萨。

不过儿子描述的美景并不合科西莫的口味。如他告诉乔瓦尼的那样，他更偏爱从卡法焦洛的窗口向外望，满眼都是属于他的土地。再说，此时的科西莫年事已高，对新房子已经提不起兴趣。当1463年菲耶索莱的美第奇别墅建成时，科西莫已经74岁了。三十年来掌控整个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压力已经令他身心俱疲。

[\[1\]](#) 菲奇诺所在的别墅就是现在人们所知的勒方坦那酒店（Le Fontanelle）。

[\[2\]](#) 科西莫的藏书室一开始设在卡雷吉，后来移到了美第奇宫。1494年藏书室被执政团没收的时候，不立即归还所借图书的人会被处以50弗罗林币的罚金。在萨沃纳罗拉的建议下，藏书都被转移到了圣马可修道院。到1508年，藏书室被

教皇莱奥十世重新买回并带到了罗马。后来又由克莱门特七世带回佛罗伦萨，并于1532年安置在圣洛伦佐教堂修道院里的一栋建筑中，直至今日。

[3]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怀疑圣约翰洗礼堂曾经是一座罗马神殿，大概建于十二世纪。装有皮萨诺设计的南侧青铜大门是由洛伦佐·吉贝尔蒂的儿子维托里奥（Vittorio Ghiberti）建造的。

[4] 洛伦佐·吉贝尔蒂设计的北侧青铜大门上刻画的是基督和四个福音传道者以及四个教堂神父在一起。

[5] 圣玛利亚诺瓦医院是1286年由福尔科·波尔蒂纳里（Folco Portinari）建造的，他就是但丁笔下的贝亚特丽切（Beatrice）的父亲。

[6] 洛伦佐·吉贝尔蒂的东侧镀金铜门上有艺术家自己的肖像。人们可以看到他光秃秃的脑袋从一个圆孔中探出。

[7] 洗礼堂中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之墓是由多纳泰罗设计的，但铜制雕像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

[8] 育婴堂正对着圣母领报大殿广场。布鲁内莱斯基在助手弗朗切斯科·德拉·卢纳（Francesco della Luna）的帮助下建造了中间的九个拱门，其他的是在十六、十七世纪修建的。襁褓中的婴儿的圆形浮雕是安德里亚·德拉·博比亚（Andrea della Bobbia）的作品。

[9] 圣洛伦佐的四世纪大殿在十一世纪重建。布鲁内莱斯基的文艺复兴早期代表作——圣洛伦佐教堂——1421年开始动工。其中安葬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的老圣器收藏室是在1429年建成的。布鲁内莱斯基于1446年去世时工程还没有彻底完成。他的死引发了佛罗洛萨多个工匠之间的激烈纷争，谁都想接手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思路。他们到科西莫面前表达各种冲突的诉求。依照科西莫的思路，最后由乔瓦尼·迪·多梅尼科（Giovanni di Domenico）和安东尼奥·马内蒂（Antonio Manetti）负责完成了这一工程。

[10] 布鲁内莱斯基一直严密保守的秘密就是为圣母百花大教堂建造两个穹顶，也是全欧洲最大的穹顶，一个穹顶里面再建一个穹顶。每个穹顶都由一个鼓座支撑，同时又捆绑在一起。每块石头都以燕尾榫的方式小心地串联起来，所以整个屋顶几乎是自己支撑起来的。

[11] 吉贝尔蒂在奥尔圣米凯莱教堂的圣马太雕像是1419~1422年完成的，占据了西墙最北边的一个壁龛。铜制的施洗者圣约翰和圣史蒂芬也都是吉贝尔蒂的作品。

[12] 见习教士堂由米开罗佐于1445年左右建造。光滑的陶制祭坛装饰品出自安德烈亚·德拉博比亚的工作室。在大公费尔迪南多二世的安排下，1642年伽利略被安葬于此。

[13] 圣母领报大殿的唱诗班席位，也被称为圆形大厅（Rotonda），是由米开罗佐在1445年开始修建的，直到十五世纪七十年代才由阿尔贝蒂建造完成。

[14] 直到1618年，菲耶索莱的巴迪亚修道院就是菲耶索莱的大教堂。1456~1469年一直由美第奇家族出资重建。

[15] 米开罗佐于1437~1444年一直在圣马可为科西莫工作直到他的藏书室修建完成。藏书室走廊尽头的两个房间由科西莫使用，萨沃纳罗拉的房间在西边走廊尽头。

[16] 拉尔加街现在被称为卡武尔街（Via Cavour）。圣乔瓦尼诺德利斯科洛皮教堂在十六、十七世纪分别由巴尔托洛梅奥·阿曼纳蒂及朱利奥·帕里吉、阿方索·帕里吉兄弟重建。

[17] 美第奇宫是在1444~1460年建造的。德戈里街一面的跪窗后来被单调的方形栏杆取代，这是一种毫无装饰性的设计。窗子两边都可见的铁质横档是用来支撑旗杆、烛台或者拴马用的。窗户下面的石凳不仅供仆人和访客使用，任何路过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小坐休息，算是美第奇家族的一份微薄的好客之礼。根据乔瓦尼·阿弗拉多（Giovanni Avogrado）不太可靠的证据，宫殿本来有一个艳丽的正面，包含红色、白色和绿色。1527年罗马陷落，美第奇家族被迫逃出佛罗伦萨的时候，这座宫殿也差点被毁掉。狂热的共和主义者米开朗琪罗提议将宫殿夷为平地，在这里建一个广场并取名为骡子广场，竖立克莱门特七世的肖像，以此暗示教皇作为美第奇家族私生子的身份。宫殿最终得以保留下来，但是由政府托管，直到1550年美第奇家族重返佛罗伦萨时，这座宫殿才又回到美第奇的名下并一直传到大公费尔迪南多二世，他把宫殿出售给了马尔凯塞·加布里埃莱·里卡尔迪（Marchese Gabrielle Riccardi）。（里卡尔迪扩建了这个宫殿，上层在本来10个窗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7个。）1814年宫殿由大公国政府买下，现在被称为美第奇-里卡尔迪宫，并成为一个辖区。

[18] 如果想在宫殿的墙壁上加装这些巨大的带尖的灯，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尼科洛·格罗索的外号“收押金的人”得自他总是坚持要收预付款。

[19] 卡法焦洛更像个堡垒而非别墅。瓦萨里称其“拥有成为一座出众的乡村豪宅的全部必要条件”。这里有漂亮的花园、果林和喷泉，也有高塔和城垛拱，四周还围绕着壕沟和吊桥。后来这里和特雷比奥一起被博尔盖塞王子买下。他推倒了中心的高塔，填平了四周的壕沟。现在这里呈现一幅萧条景象，连花园里也只剩下蒲公英和野鸡。

[20] 美第奇别墅，之前叫贝尔坎托，本来是属于巴尔迪家族的。为乔瓦尼·德·美第奇进行的重建是在1461年完工的。1671年大公科西莫三世将其出售。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嫂子奥福德伯爵夫人（Countess of Orford）进行了翻新。到十九世纪又被英国画家和收藏家威廉·布伦德尔·斯彭斯（William Blundell Spence）买走，并改名为斯彭斯别墅。现在它属于西比尔·卡廷夫人（Lady Sybil Cutting），她的女儿马尔凯萨·艾丽斯·奥里戈（Marchesa Iris Origo）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第六章 战争与和平

“伦琴？伦琴？伦琴是什么地方？”

科西莫作为佛罗伦萨外交政策决策者的至高地位从未被质疑过。尽管官方通信都是由执政团完成，但是没有哪个重要决定是未经美第奇首肯而做出的。人们时常可以见到各国大使穿过美第奇宫的拱门；而佛罗伦萨的大使们赴任前也必然要先去拜会科西莫。

多年来，米兰一直是科西莫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他耐心而坚定，尽其所能地说服佛罗伦萨人相信，他们对于米兰公国一贯的敌对态度是错误的，如果佛罗伦萨能够与米兰结盟，对这个城市来讲绝对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哪怕为此得罪传统盟友威尼斯也是值得的。15世纪初期，威尼斯打败了维罗纳、维琴察（Vicenza）、帕多瓦、贝卢诺（Belluno）和费尔特雷（Feltre），后来又击败了土耳其舰队，并把共和国的疆域扩大到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而米兰的公爵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在阿尔比奇家族的怂恿下，与佛罗伦萨的关系不断恶化，那时的佛罗伦萨最该感谢的就是威尼斯这个强大而富有的同盟者。

很多人都相信维斯孔蒂是个精神错乱的疯子，他们听说他会在夏天脱光衣服，赤裸着肥硕肮脏的身体在花园里打滚。因为样貌太丑陋，所以他从不允许别人为他制作肖像；他的腿因为畸形而瘫软无力，以至于没有侍者的搀扶就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总是神经兮兮的，连看到出鞘的宝剑都会发出惊叫；他非常惧怕雷声，为此在自己的宫殿里设置了一间完全隔音的房间；他热衷于恶作剧，和毫无防备的臣子说话时会突然从袖子里拿出一条蛇。除此之外，他还是个狡猾、神秘、极端多疑的人。尽管如此，不可否认，他也是个足智多谋

的政治家。在长达35年之久的统治中，他成功收复了伦巴第

（Lombardy）地区——本来是他父亲征服的领地，但在维斯孔蒂年幼时失守。他还一心想要把公国疆域向南扩展到托斯卡纳地区，尽管阿尔比奇家族和其他被流放的佛罗伦萨人保证，他只需要派军队到那里摆摆样子，人民就会拿起武器反抗美第奇这个压迫者，但事实上维斯孔蒂的愿望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1437年他的侵略军在巴尔加

（Barga）战役中被击败，1438年又再一次被挫败，直到1440年，在阿诺河上的安吉亚里（Anghiari）附近一场残酷的战斗中，连维斯孔蒂手下最善战的雇佣军指挥官尼科洛·皮奇尼诺都被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击溃。战败的皮奇尼诺带着残兵败将迅速撤出了托斯卡纳地区，跟在他们后面的阿尔比其家族也彻底打消了重归佛罗伦萨的美梦。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心灰意冷地骑马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开始了他的朝圣之旅，而佛罗伦萨人则趁机占领了切塞纳蒂诺山区

（Cesentino）的大片领土，这里本来是一位落后的封建君主的领地，无奈他错误地选择了与米兰人结盟。

安吉亚里之战发生时，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已经48岁。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娶了他父亲的雇佣军指挥官的富有遗孀，这个指挥官因为犯通奸罪被处决了；第二次他娶了一位年轻的女士，但是因为有只狗在新婚之夜狂吠不止，维斯孔蒂就把新婚妻子关进了牢笼。这两任妻子都没有生下孩子，只有他的一个情妇生了个女儿，取名比安卡（Bianca）。比安卡有无数追求者，其中最执着的莫过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

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本人也是私生子，他的父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来自罗马涅地区，名叫贾科莫·阿腾多洛（Giacomo Attendolo）。阿腾多洛被迫加入一群冒险者，原来的首领去世以后，他却成了这伙人的新头目，并把姓氏改为斯福尔扎。他领导自己的队伍为那不勒斯和教皇打过仗，后来因为救助一个落水的年轻侍者而不

幸淹死在佩斯卡拉河（Pescara）。1424年，年仅22岁的弗朗切斯科继承了父亲的位置，开始领导这支当时意大利最训练有素的雇佣军队伍之一。他很快就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替维斯孔蒂、威尼斯和教皇打过仗，任何愿意满足他开出的高价的人都可以获得他的服务。弗朗切斯科身强体壮、和蔼可亲、脚踏实地、心直口快、待人真诚，习惯了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教皇庇护二世后来这样描述他：

他很高大，而且极具威严。他的表情总是很严肃，说话的声音也不大，谈吐和蔼可亲，总体来说他就像个王子一样，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受命运眷顾的人。他天资聪慧，健壮威武。他的妻子不仅容貌美丽、身份高贵、品行优良，还给他生了8个优秀的孩子（他还有11个私生子）。他甚至都不怎么生病，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他想要而得不到的。

时常令斯福尔扎的雇主——米兰公爵——感到担忧的是，斯福尔扎在边界的马尔凯地区（Marches）已经建立了一个小王国，而且他的野心还远不止于此。如果能够娶到比安卡，那么一旦她的父亲去世，斯福尔扎就将继承米兰公国。

维斯孔蒂不怎么想让一个农民的私生子来当女婿，但此时的斯福尔扎不仅仅是意大利最好的军人，更代表了一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于是，1441年维斯孔蒂许可了女儿的婚事，并把蓬特雷莫利（Pontremoli）和克雷莫纳（Cremona）作为嫁妆献给新郎，至于米兰爵位的继承问题，则只是做了一些模糊的许诺。

维斯孔蒂言而无信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六年后他去世时又指定那不勒斯的阿拉贡国王阿方索（Alfonso）为其继承人也并没让人感到震惊。此时整个意大利都卷入了这场喧嚣，奥尔良（Orleans）公爵宣称自己作为瓦伦蒂娜·维斯孔蒂（Valentina Visconti）的儿子对米兰公国可以提出利益诉求，德国皇帝也宣称自己对米兰自古就享有权利，连威尼斯也不容忍任何干涉其对伦巴第行使权利的行为。就在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准备带兵进入米兰夺回他认为本就属于他的合法

继承权时，米兰人则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他们最满意的决定——重建米兰共和国，让人民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在佛罗伦萨，科西莫机警而焦虑地关注着危机的发展。他几年前见过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一面，对他的谈吐举止和人格魅力印象深刻。自那以后他们之间的友谊日益深厚，尤其是财力不济的斯福尔扎总是能在捉襟见肘之时接到美第奇银行慷慨的贷款，这更巩固了他们的关系。除了为斯福尔扎提供贷款并保证他可以收到佛罗伦萨纳税人的额外补贴之外，科西莫还用上了自己所有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来帮助斯福尔扎。事实上，正是依靠科西莫的全力以赴，斯福尔扎才能在三年的战争和外交谈判之后，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入主米兰，并于1450年成为米兰公爵。

科西莫对斯福尔扎不懈的支持为他在佛罗伦萨城内招来了不少指责，有两位地位显赫的市民——内里·卡波尼和詹诺佐·马内蒂——尤其不满。前者曾经在安吉亚里大败皮奇尼诺一战中做出过重要贡献，后者则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令那不勒斯和威尼斯极为不满的是，科西莫在其他国家都没有表态之时，率先承认斯福尔扎为米兰的合法领主，这让当时科西莫面对的反对之声更加响亮。反对美第奇统治的人说：科西莫的所作所为令人震惊。为了支持一个以前的雇佣兵头子、一个自封的公爵，不仅佛罗伦萨的市民要被征税，连传统的盟友都变成了敌人。而科西莫之所以支持斯福尔扎，难道不是因为害怕已经借给他的巨额贷款打了水漂？而且与一个专制统治下的米兰打交道不是显然比与一个共和国打交道更有利可图吗？

科西莫一直认定威尼斯已经不能再被视为一个可靠的盟友。一方面，在黎凡特（Levant），威尼斯的利益与佛罗伦萨的利益存在冲突；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地区的领土扩张使它成了土耳其的敌人，但是佛罗伦萨与土耳其却有着互利的贸易关系；此外，威尼斯的商船队对

于佛罗伦萨正在发展的舰队来说，也是个难缠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让对佛罗伦萨感激涕零的斯福尔扎入主米兰，不仅有利于对抗不断入侵的威尼斯，也可以帮助佛罗伦萨实现图谋已久的占领卢卡的野心。最重要的是，只有佛罗伦萨与斯福尔扎结盟才能真正给意大利带来和平；没有和平，经贸就不可能繁荣发展。科西莫的理论得到了米兰驻佛罗伦萨大使尼科代莫·特兰凯迪尼·达·蓬特雷莫利

（Nicodemo Tranchedini da Pontremoli）强有力的支持；他受斯福尔扎派遣而来，非常聪明、善于说服别人，在佛罗伦萨一直待了17年。

然而，科西莫的争辩在很长时间里依然没有得到支持，直到威尼斯人为了反对科西莫的政策决定与那不勒斯国王结盟并威胁入侵托斯卡纳地区时，科西莫才看到了彻底打破佛罗伦萨人偏见的机会。科西莫极其少见地亲自来到市政厅，威尼斯的大使正在那里抗议与米兰结盟的提议并发出威胁，科西莫直接打断了威尼斯大使的发言并指责威尼斯政府才是侵略者。虽然科西莫不是天生的演说家，但是他的发言吐字清晰、掷地有声。到了八月，佛罗伦萨和米兰就正式签署了盟约。

盟约签署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迅速的。威尼斯敦促德国皇帝来破坏这对新的盟友，东罗马帝国皇帝被说服取消了佛罗伦萨商人的一切特权，他们随即被驱逐出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威尼斯人甚至花钱雇人在佛罗伦萨城内煽动反对美第奇家族的情绪。作为回应，科西莫关闭了他在威尼斯的分行，转而在米兰开了一家新分行。同时，他还通过那些负责东方贸易的经理人争取到了与土耳其的贸易特权，以弥补希腊人废除佛罗伦萨商人特权而带来的损失。科西莫还不忘主动拜访佛罗伦萨的老朋友法国，希望借此来抵消威尼斯和那不勒斯通过拉拢德国皇帝而获得的优势。

在法国宫廷谈判非常需要技巧，因为无论是科西莫还是斯福尔扎都不希望挑起法国干涉意大利事务的心思，他们认为一旦法国和英国的争端平息，法国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要转向意大利，所以他们宁愿到巴黎去迎合法国国王查理七世（Charles VII），模棱两可地承诺：一旦法国决定捍卫安茹家族对那不勒斯的权利主张，佛罗伦萨和米兰都会提供帮助。这次重要的微妙交涉最终是由科西莫的朋友——迷人又有才华的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完成的。凭借满口的甜言蜜语、阿谀奉承，以及夸大修辞却没有任何实质性承诺这一文艺复兴时期最为内行推崇的外交手腕，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把这个自视甚高、野心勃勃、有点古怪的法国国王哄得喜笑颜开。1452年4月，各方签订了条约，内容包括：法国保证在佛罗伦萨和米兰受到攻击时出兵相助；法国承认斯福尔扎为米兰公爵；作为回报，佛罗伦萨和米兰向查理七世承诺，如果法国向那不勒斯宣战，佛罗伦萨和米兰均不会做出干涉。

这一条约的签署引发了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担忧，为了破坏这个新联盟，趁法国忙于和英格兰的战争，威尼斯和那不勒斯双双向佛罗伦萨与米兰宣战，并由阿方索国王的私生子堂·费兰特（Don Ferrant）带兵向托斯卡纳地区进军。佛罗伦萨市民听到军队逼近的消息，惊恐万分；大批市民冲到科西莫的宫殿要求他说明如何防止佛罗伦萨城遭受攻击；甚至有一个疯狂的商人冲进科西莫的房间大喊：

“伦琴陷落了！伦琴陷落了！”科西莫装作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位于托斯卡纳地区边界小镇的样子，冷淡地回答说：“伦琴？伦琴？伦琴是什么地方？”

科西莫尽力表现得冷静自信，但他心中难免充满担忧。城市中反对他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事实证明与米兰结盟是一个充满危险且代价高昂的实验。佛罗伦萨不但要为斯福尔扎提供资助，更要为自己本身的防御做准备，所以正如斯福尔扎驻佛罗伦萨的代表汇报的那样，沉

重的赋税使得科西莫的敌人每天都在增加。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被十万火急地派往法国向查理七世寻求帮助，但是因为忙于应付英国人在波尔多（Bordeaux）的暴乱，法国此刻根本无暇分神开辟另一个战场。

科西莫最终也病倒了，只能卧床休息。和平的呼声持续不断，连他的一些主要支持者也不得不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避免出入他的宫殿了。就在此时，从法国传来了让美第奇一派如释重负的好消息，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成功说服了安茹家族的勒内（Rene of Anjou）派兵来解救盟友，以换取盟友支持他将阿方索的阿拉贡家族赶出那不勒斯。法国军队粗暴、劫掠式的干涉让他的盟友比敌人还心惊胆战。随后在1453年5月，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为意大利最终实现和平带来了希望。1454年4月在洛迪（Lodi），和平终于变成了现实。四个月后，鉴于土耳其的威胁愈发严重，佛罗伦萨、米兰、教皇和威尼斯联合在一起组成了“最神圣联盟”（a Most Holy League）：对内保证意大利维持现状，对外共同抵御侵略者。

和平对科西莫而言来得有点晚。“市民对新税收意见非常大，”威尼斯大使汇报道：

而且现在还可以听到以前从没出现过的辱骂科西莫的各种言辞……两百来个受尊敬的大家族本来可以靠他们拥有的财产所带来的收入生活，现在却因为难以承担财产税而不得不将其变卖。征收这项新财产税时，科西莫不得不宣布将由他先垫付这笔税款，在所有相关的人找到解决之道以前，也不会再要求任何人补缴。为了重获民心，他不得不每天分发很多蒲式耳^[1]的谷物给穷人，因为他们都在抱怨粮食涨价买不起。

然而，科西莫这一沉着、有远见的政策最终获得了成功。威尼斯因为受困于土耳其而忧心忡忡，根本无暇再对托斯卡纳地区施加任何威胁；斯福尔扎这个佛罗伦萨坚定的盟友已经被各国承认为米兰公

爵。包括签约国那不勒斯在内的这份合约为意大利在此后五十年里实现大体上的和平，第一次真正带来了希望。

科西莫这样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当然不会天真地相信，依靠这样一个松散的合约，意大利邦国联盟就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但是至少对佛罗伦萨来说，在科西莫的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发生任何损失惨重、无利可图的战争。

君士坦丁堡被攻占以后，佛罗伦萨人当然也听到了教皇狂热的鼓吹，要求他们参与讨伐土耳其的圣战。既是广受认可的意大利外交事务决策者，又是教廷银行家的科西莫自然是最先收到教皇呼吁的人之一。教皇要求佛罗伦萨为他提供两艘配有装备和人员的大船，用来向土耳其发起攻击。作为回报，佛罗伦萨人会拥有永恒的灵魂。科西莫巧妙而谨慎地回复了教皇的要求，他找的借口对他自己及其后代都极为有用：

当您庄严地谈及我们即将来临的永生之时，哪个人能不因为您的话语而获得提升？哪个人不是仿佛瞥见了自已获得永生时的光辉荣耀？……至于您提出的要求，我最可称颂的神父啊，……您给我写信的时候并没有把我看作一个满足于普通市民身份的普通人，而是把我看成统治佛罗伦萨的王子……您明明知道在一个政府广受拥护的共和国里，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的权力是多么有限。

其他意大利邦国给教皇的回复也同样含糊其词。只有威尼斯人挺身而出，相信圣战的胜利会给他们此生甚至死后带来福音。没有被困难阻挠的教皇毅然决然地扛起十字军的大旗出发了，可是战船还没下海，教皇自己就染上疟疾去世了。美第奇银行正式表达了哀悼，然后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下一位继任者。

作为一个银行家，科西莫和他的父亲一样足智多谋。在他的领导之下，家族生意不断壮大。他以过人的组织才能和惊人的记忆力而闻

名，为了这个让人费神的行业，他有时甚至工作到深夜。科西莫更为人所知的一个特质是他与分行经理们之间相互的绝对忠诚。每个分行经理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工作都受到严格的监督，必须定期向佛罗伦萨提交长篇报告说明做了什么工作、见了什么人；而他们的报酬自然也是极为丰厚的。在发现父亲的助理巴尔迪工作方法古板、跟不上新变化之后，科西莫提拔了两名年轻的合伙人，分别是罗马分行的经理安东尼奥·迪·梅塞尔·弗朗切斯科（Antonio di Messer Francesco）和日内瓦分行的经理乔瓦尼·德·阿梅里戈·本奇

（Giovanni d' Amerigo Benci）。在他们的帮助下，银行业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长，美第奇银行的标志“”、美第奇银行的座右铭“以上帝和好运的名义”（*Col Nome di Dio e di Bona Ventura*）以及美第奇银行的代表，遍布欧洲所有重要的首都和商业中心，包括伦敦、那不勒斯、科隆（Cologne）、日内瓦、里昂、巴塞尔、阿维尼翁、布吕赫、安特卫普、卢贝克（Lubeck）、安科纳、博洛尼亚、罗马、比萨和威尼斯。这些分行规模都很小，其他一些则更是临时性的机构，专为短时间的集市或会议上的交易提供服务。分行也都不会雇用很多人手。在1470年，平均一个分行的雇员人数也就是九名到十名。出纳员一年的工资大概是40弗罗林币，学徒则只有20弗罗林币。即便如此，很多分行在其所在的城市里也算得上最大的企业之一了。而这些分行的经理不仅是精明的生意人，更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代理人。比如说，美第奇米兰分行就类似于一个金融管理部门，他们的办公地点在一座由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提供的宫殿里。后来这里由米开罗佐设计、科西莫出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再比如罗马分行，因为要经常跟随教廷一起出行，所以他们不但能享受相当的特权，而且获得的盈利也更多。就像他的父亲扶植巴尔达萨雷·科萨，也就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一样，科西莫选择扶植托马索·巴伦图切利（Tommaso Parentucelli）。巴伦图切利是一个托斯卡纳医生的儿子，后来当上了博洛尼亚的主教，最终成了教皇尼古拉五世

(Nicholas V)。巴伦图切利年轻时因为贫穷被迫辍学，他离开大学后在佛罗伦萨给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和帕拉·斯特罗齐的孩子做家庭教师。他在佛罗伦萨委员会中表现突出，后来又在扩充美第奇藏书室上给科西莫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他是一个友善、风趣、学识渊博的人。他的朋友，同样是人文主义者的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德·皮科洛米尼曾经说：“连巴伦图切利都不知道的事情一定是人力可知范围之外的事情。”科西莫看出巴伦图切利是一个值得支持之人，看重他条理清晰的头脑，谨慎而有目的性的处事方式；每次巴伦图切利找科西莫贷款，科西莫都会毫不犹豫地满足主教的一切要求。主教继任教皇之后，他与美第奇银行的紧密联系便成为对双方都更加有利的互惠关系。尼古拉五世的朋友比科洛米尼在1458年当选教皇并选择了庇护二世的称号，他也延续了教廷与美第奇家族的传统友谊，继续将教廷的财务事宜委托给美第奇银行。1469年庇护二世来到佛罗伦萨的时候，甚至理所当然地住进了美第奇宫，在这里他和科西莫变得非常亲近。当教皇离开时，科西莫

想要亲吻教皇的脚，但是由于痛风，他已经无法弯腰。于是他大笑起来并讲了个笑话：“两个从乡下返城的佛罗伦萨人，一个叫帕帕，一个叫卢波，在广场上相遇，他们伸出手臂想跟对方握手，但是因为两个人都胖得出奇，以至于太多的肉体（恕我使用这个词）阻隔在二人中间，只能用自己的肚子碰到对方的肚子。肥胖让他们失去了握手的能力，就像我的痛风剥夺了我致敬的能力一样。”

除了各种传统的银行业务之外，美第奇银行还接受客户的各种代购委托，无论是织锦挂毯，还是神圣遗骸；无论是马匹和奴隶，还是安特卫普修道士画的版画；甚至帮助拉特兰的圣约翰教堂寻找来自杜埃（Douai）和康布雷（Cambrai）的唱诗班男孩儿；还有一次竟然是一只长颈鹿。美第奇银行还是各种香料、丝绸、羊毛和布料的进出口商。他们买卖辣椒和糖、橄榄油、柑橘类水果、杏仁、皮草、刺绣、染料、珠宝，然而最重要的商品其实是一种透明的矿物盐——矾。它

是生产上色快、颜色艳丽的染料必不可少的原料，在玻璃和皮革的制造过程中也十分常见。到1460年，几乎整个欧洲使用的矾都是从小亚细亚（Asia Minor）进口的，士麦那（Smyrna）附近产量丰富的矿藏一直被热那亚人控制，1455年以后又被土耳其人接管。但是到了1460年，在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附近的托尔法（Tolfa）的教廷国境内发现了新的储量丰富的矿藏，成千上万吨的矾随着死火山中的蒸汽喷了出来。美第奇抓住了这个价值连城的发现，这是一个再正确不过的商业决策。到了1466年，银行与教皇签订了合约，许可美第奇和铝业协会的合作伙伴们一起开采这个利益丰厚的矿藏并把产品销往海外。

几年后，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德·康米尼（Philippe de Commines）称，美第奇银行不但是欧洲最能赚钱的组织，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伟大的商号。“光是美第奇的名字就可以让他们的仆人和代理人们享受无尽的优厚待遇，”康米尼如是写道，“我在佛兰德斯和英格兰见到的景象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1]. 在英国1蒲式耳约等于8加仑，约36升。——译者注

第七章 艺术家与哀悼者

“房子这么大，家人却一个个离我而去了”

美第奇宫的访客们只要穿过拉尔加街上的敞廊，就可以进入一个优雅别致的内院，院子（*cotile*）呈方形，四周是由柱子支撑的一圈拱廊，圆拱上方还有八个圆形大理石浮雕，其中几个是依照美第奇收藏的浮雕作品雕刻的，也有美第奇收集的勋章背面的图像。拱顶之下有古典的半身像、石像、圆柱、铭文和罗马石棺，其中就包括科西莫的曾曾曾曾祖父的堂兄弟、1299年任首席执政官的古乔·德·美第奇使用的公元四世纪石棺。当时院子里已经有或者后来增添的雕像还包括多纳泰罗的《大卫》（*David*）^[1]和《朱蒂斯斩贺芬尼》（*Judith Slaying Holfernes*）^[2]。

多纳泰罗1386年出生于意大利，他的父亲是尼科洛·迪·贝托·巴尔迪（Niccolo di Betto Bardi），一个因为支持阿尔比其家族而最终身败名裂的商人。像吉贝尔蒂一样，多纳泰罗原本是金匠学徒，而且还在吉贝尔蒂的工作室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不过他并没有留下来一起制作洗礼堂的大门，而是追随布鲁内莱斯基去了罗马。在那里，他一边在金店里打工，一边学习古典艺术。他回到佛罗伦萨之后，乐于尝试任何形式的作品：不论是制作壁炉架上的盾徽装饰，还是在铜版上雕刻浅浮雕，他都一样满怀热情。他还受雇为大教堂、乔托

（Giotto）钟楼、奥尔圣米凯莱教堂和圣洛伦佐教堂制作艺术品，后来他还为圣洛伦佐教堂修建了铜质讲坛。尽管他的作品广受赞美——他为奥尔圣米凯莱教堂创作的大理石雕像《圣乔治》（*St George*）尤其被认为是一项杰作——但直到完成铜像《大卫》之后，人们才开始真正理解他的绝世才华和独特创意。他的其他雕塑作品，如同他所处时代里的其他雕塑一样，往往被放在建筑物里的指定位置来表现建筑

主题或起装饰作用。但《大卫》不仅是精美至极、充满感情的艺术作品，更是令人震惊的创新设计，它是自古典时期以来，第一个无支撑物站立的人物铜像。

多纳泰罗同时期的一些人认为他惊世骇俗。多纳泰罗本人作为同性恋者就已经不被认可了，更让这些人气愤的是他喜欢把年轻男性的雕塑制作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且充满肉欲。对科西莫来说，这样的反对意见完全没有道理，只能说是对激发了多纳泰罗创作灵感的古希腊理念的愚钝不解。出于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钟爱，科西莫接受了安东尼奥·贝卡德里（Antonio Beccadelli）以《赫马佛洛狄忒斯》

（*Hermaphroditus*）向其致敬。这一作品以卡图卢斯（Catullus）的方式赞颂了同性之爱的愉悦。也正是出于这样的人文主义精神，科西莫尊重多纳泰罗的才华，也尊重激发了这样才华的古典艺术。

科西莫对多纳泰罗的感情日益加深，甚至形成了一种慈父般的责任心。他会确保多纳泰罗从不缺少订单，要么是他直接向多纳泰罗订制，要么是把多纳泰罗推荐给自己的朋友。作为美第奇家族的收藏品，多纳泰罗制作的各种铜像从来没让科西莫失望过，其中就包括孔泰西纳·德·美第奇的铜质头像。正如乔焦·瓦萨里（Giorgio Vasari）说的那样：“多纳泰罗真心喜爱科西莫，对于他的喜好再了解不过，所以从来不会让他失望。”不过对于别的出资人来说，多纳泰罗就算不上幸运的选择了。曾经有一位热那亚商人在科西莫的推荐下，向多纳泰罗订制了一个铜制头像。但是作品完成之后，商人抱怨多纳泰罗要价太贵。于是，两人到科西莫面前让他评理。科西莫命仆人把铜像抬到美第奇宫的房顶上，放在碧蓝天空和充足阳光之下，然后他评定商人出的价钱低了。热那亚商人反驳说自己的出价已经相当慷慨了，鉴于多纳泰罗仅用一个月就完成了这个作品，他支付的工钱计算下来已达到一天半个多佛罗林币。这样的说法让多纳泰罗怒不可遏，他指责商人只会像买豆子一样讨价还价，根本不懂艺术。多纳泰

罗甚至将铜像推出围栏，掉到街上“摔了个粉碎”。窘迫的商人提出支付双倍价钱请他重新制作一个铜像，可惜无论是商人的重金还是科西莫的恳求，都没能说服多纳泰罗答应这件事。

多纳泰罗其实是一个完全不看重金钱的人。他把挣来的钱都放在一个柳条篮子中，篮子就用一根绳子吊在他工作室的天花板上。无论是他的工匠、学徒还是朋友都可以随意取用而无须征求他的许可。多纳泰罗对穿着也不讲究。科西莫不忍看他穿着简朴甚至破旧的衣服走在街上，就在一次过节的时候送给他一身精神的套装、一件红斗篷和一顶帽子。不过多纳泰罗没穿两天就又换回了旧衣服。待他年事渐高无法继续工作之后，科西莫就把卡法焦洛附近、属于美第奇产业的一个小农场赠送给他。但是，多纳泰罗一点儿也不喜欢那里的生活。农场的账目让他头昏脑涨；佃农们的抱怨更是让他心烦意乱：今天这个说大风掀翻了他们家鸽舍的顶棚；明天那个说因为没有交税，所以政府没收了自己的黄牛；后天又有一个说大雨毁了自己的果园和葡萄树。多纳泰罗恳求美第奇家族收回农场的所有权，科西莫不但照做了，而且依然把农场的收入记在多纳泰罗名下。“多纳泰罗对这样的安排再满意不过了，”瓦萨里说，“作为美第奇家族的家臣和朋友，多纳泰罗余生都过得衣食无忧、舒心惬意。”

在多纳泰罗为美第奇宫制作铜像和圆形浮雕的同时，菲利波·利比（Fra Filippo Lippi）也受雇为美第奇宫创作图画。菲利波比多纳泰罗小二十岁，就出生在佛罗伦萨。他的父亲是个屠夫，在菲利波还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他的妈妈也死了，所以年仅十六岁的菲利波被安置在了卡尔米内圣母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Carmine）^[3]的加尔默罗修会做一名修道士。可是菲利波对于修道院的生活完全不感兴趣，他在加尔默罗修会期间唯一的收获就是有幸看到了伟大的马萨乔（Masaccio）在布兰卡契堂（Brancacci）创作壁画，并立志成为像他一样的艺术家。事实上，在其他修士眼中，菲利波对艺术的热衷恐

怕是他拥有的唯一美德了。他撒谎成性、嗜酒好色，根本不配做一名修道士，所以当他抛弃了入会誓言，决心离开修道院的时候，他的上级们都感觉如释重负。离开修道院的菲利波不幸在安科纳海岸附近被巴巴里海盗（Barbary）劫持，当时他正和几个朋友一起乘船出海。成功逃脱的菲利波辗转来到了那不勒斯，又从这里回到了佛罗伦萨。他为圣安布罗焦修道院（Sant' Ambrogio）修女们创作的精致的祭坛装饰画让科西莫·德·美第奇注意到了他杰出的才华。尽管菲利波在别人眼中是个嫖客和扒手，但科西莫还是请他来为自己工作。菲利波的一些早期杰作都是在美第奇宫创作的，包括《圣母加冕》

（*Coronation of the Virgin*）^[4]。后来科西莫又帮助菲利波获得了在普拉托工作的机会。在创作圣史蒂芬教堂（St Stephen）主祭坛壁画的过程中，菲利波还把教堂院长，也就是科西莫儿子卡洛的肖像画了进去。

就是在为普拉托的圣玛格丽塔修道院（Santa Margherita）的修女们创作祭坛装饰画的过程中，好色的菲利波盯上了一个新入会的年轻修女——佛罗伦萨人弗朗切斯科·布蒂（Francesco Buti）的女儿卢克雷齐娅（Lucrezia）。菲利波巧言引诱，说服小修女做他壁画中女神的模特。修女受到引诱并跟他私奔，还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菲利皮诺（Filippino）。科西莫觉得已经成为父亲的菲利波应该安定下来，于是通过巧妙地向教皇展示了几件菲利波的小作品，就成功帮他获得了教皇特许他结婚的恩赐。

菲利波的好色已经在佛罗伦萨给科西莫招来了好多麻烦。每当有不可抑制的欲念袭来时，菲利波就无法专心创作。他曾经无数次溜出在美第奇宫的工作室，急匆匆地穿过花园，消失在拉尔加街上，天知道去什么地方找女人了。最终，习惯于要求艺术家在规定时间内以商定的价格完成作品的科西莫忍不住把菲利波锁在屋子里，并告诉他未完成画作就不许出来。菲利波于是找了把剪刀，把床单全剪成布条系成

绳子，顺着它爬下楼逃走了。菲利波被找到后在科西莫的劝说下同意回来工作，这令科西莫感到十分欣慰，并“下定决心今后只靠感情和善意留住菲利波，许可他自由出入”。在那之后人们经常会听到科西莫说，对待艺术家应当充满尊重，而不应如那时期很多出资人一样视他们为雇佣工。

有一位艺术家是让人无法不敬重的，他就是被常称为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的乔瓦尼·达·菲耶索莱（Giovanni da Fiesole）。这个矮小的修道士受雇于科西莫创作了圣马可教堂会规室、回廊和走廊墙壁上的壁画。安杰利科1387年出生在穆杰洛的维基奥（Vicchio），被取名为圭多（Guido）。后来他成为菲耶索莱的圣多梅尼科修道院（San Domenico）的教士时，改名为乔瓦尼。他在科尔托纳（Cortona）待过一段时间，并为那里的多明我会修道院创作了壁画。1418年他回到菲耶索莱，但直到1436年年近五十岁的时候，他才回到佛罗伦萨并接受科西莫的邀请重拾画笔。从此以后，科西莫对他的作品大为关注，给了他“许多关于《耶稣受难像》（*The Crucifixion*）^[5]这幅画细节方面的帮助和建议”。这幅画是为会规室创作的，美第奇专属房间的壁画主题则是《贤士来朝》（*Adoration of the Magi*），描绘的是贤士将王冠置于伯利恒马槽的事迹，科西莫喜欢“时刻看着这幅壁画，以贤士为榜样指导身为统治者的自己”。^[6]

每天清晨，在开始创作《耶稣受难像》以及后来其他宗教主题的作品之前，安杰利科都会跪地祈祷。每当描绘耶稣基督受难于十字架上的画面时，他都会特别激动，以至于泪水夺眶而出，沿着面颊不断淌下。他是最淳朴、最诚实、最神圣的人。其他修道士从未见过他发怒。科西莫曾经说：“每个画家都是在画自己。”看看安杰利科作品中那些人物的脸庞和神情，你无法质疑这个说法的正确性。

安杰利科在1455年去世。他死后，科西莫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严重的关节炎和痛风让他几乎丧失了行动能力，哪怕是在家里转转也要靠仆人抬着才行。有时走到接近门廊的地方他还会大声叫喊，好像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似的。一次，妻子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叫喊？”科西莫竟然答道：“什么也不为。要是真有事情发生了，叫也没有用。”

随着年龄增长，科西莫变得越来越喜欢讽刺，越来越惜字如金，也越来越刻薄。据说有一次他的老朋友大主教向他请教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把修道士赌博定为违法行为，科西莫不无讽刺地回答说：“最好先禁止他们玩灌铅的骰子。”来佛罗伦萨的访客都会发现他形容枯槁、疾病缠身并闷闷不乐，因为在他身体状况衰退的晚年里，科西莫确实遇到了不少伤心事。他的大儿子皮耶罗此时已经四十岁了，一直体弱多病，人们甚至怀疑他活不过自己的父亲。正因如此，科西莫一直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偏爱的二儿子乔瓦尼身上，也就是那个让米开罗佐在菲耶索莱的峭壁上修建美第奇别墅的人。

1458年别墅开工时，乔瓦尼只有37岁，是个精明能干、开朗愉悦的人。他的样貌称得上丑陋，有一个美第奇家族典型的大鼻子，眉毛之间还有一个大肿块，皮肤上布满了湿疹。乔瓦尼沉迷于女色和美食，身材肥胖。他很懂绘画，也热爱音乐，尤其喜欢听一个叫布尔基耶洛（Burchiello）的佛罗伦萨理发师讲的下流笑话，哪怕是在布尔基耶洛将其讽刺矛头转向了美第奇家族之后，乔瓦尼还不忘在去彼得罗洛（Pietrolo）接受硫黄浴治疗时邀请他来为自己讲笑话。乔瓦尼心宽体胖、无忧无虑，但他一直都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公民和精明能干的生意人。乔瓦尼是他父亲一手培养出来的，在银行总经理乔瓦尼·达·梅里戈·本奇去世之后，在银行生意问题上，他更是越来越受父亲的倚重。

乔瓦尼在费拉拉分行工作过一段时间，在1454年当选过执政官，后来又多年作为佛罗伦萨在教廷的大使，不过任大使时他似乎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和更世俗化的主教们一起吃吃喝喝上了。乔瓦尼也和他父亲一样从威尼斯买了一个切尔克斯女奴，她“容貌姣好，十七八岁……有一头乌黑的秀发和精致的五官，还聪明伶俐”。不过，乔瓦尼显然也很迷恋自己的妻子吉内夫拉·德利·阿尔比奇（Ginevra degli Albizzi），并且十分喜爱他们唯一的儿子科西米诺

（Cosimino）。科西莫也非常疼爱这个小男孩。同一时期生活在费拉拉的洛多维科·卡博内（Lodovico Carbone）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科西莫正在与卢卡大使代表团探讨国家大事，科西米诺拿着一把树枝走进来，打断了大人的谈话，让祖父给他做一个哨子。让代表团烦恼的是，科西莫真的马上中止了会议去帮小男孩儿做哨子，而且是直到把哨子做得完全符合他的心意才回来。代表团主席在被通知继续开会时认为有必要对科西莫提出抗议：“先生，我不得不说，对于您的行为我们感到无比震惊，我们代表我们的民众来和您商讨国家大事，而您竟然抛下正事去陪一个孩子。”

“哦，大使阁下，”科西莫伸手搂住大使的肩膀，不带一丝窘意地回答道，“难道您本人不是一位父亲和祖父吗？我去做哨子您完全不应惊讶。幸好我孙子没让我给他吹上一段呢，因为如果他要求，我肯定也会照办的。”

但是，让这位祖父陷入无尽悲伤的是，他疼爱的小孙子在1461年过六岁生日之前不幸夭折了。仅仅两年之后，一直拒绝节食减肥的乔瓦尼也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科西莫再也没能从这些打击中恢复过来。每当仆人抬着他经过美第奇宫宽敞的房间时——在他事业的顶峰时期，这里曾经住着五十多人——他们都会听到科西莫低声哀叹：“房子这么大，家人却一个个离我而去了。”在卡雷吉的别墅里，科西莫会独自静坐数小时。妻子问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待着，跟谁都不说话。

“我们以前要出远门的时候，你总会提前两个星期就开始做准备，”科西莫回答道，“所以，现在我就要去另一个世界了，你难道不明白我有多少事情需要考虑吗？”还有一次，妻子问他为什么静坐的时候一直闭着眼睛，科西莫回答得更加简短和消极，他说：“是为了适应永远地闭上。”

1464年初夏，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在佛罗伦萨的使者尼科代莫·特兰凯迪尼前去拜访科西莫。尼科代莫·特兰凯迪尼过去常常来美第奇宫，有一次刚巧遇到科西莫和他的两个儿子同时卧病在床，都因痛风的困扰而变得脾气暴躁。而如今再看到科西莫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易怒，而是身心俱疲，甚至是彻底绝望了。除了痛风和关节炎之外，他还要忍受“因小便不畅而引起的持续发热”。科西莫对访客说：“我的尼科代莫啊，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能感觉到生命正在消逝，我已经准备好离开人世了。”两个月后的8月1日，科西莫去世了，享年76岁。在去世的前几天，他坚持要离开病床，穿上最正式的衣服，到圣洛伦佐教堂向院长忏悔。科西莫“还请院长做了弥撒”，儿子皮耶罗告诉他的两个孙子说：

他表现得好像完全健康似的。让他阐明信仰时，他逐字逐句地念诵了教义并重复了自己的忏悔，最后接受了圣餐。在整个过程中他都全神贯注，最先祈求的就是所有他错待过的人的原谅。

科西莫知道，对待有些人他太过严苛了。但是他如果仁慈一些，宽容一些，就永远不会获得他所拥有的这些权力和财富。他从来不认为允许那些在1434年被执政团驱逐出境的对手们回到佛罗伦萨是什么明智之举；他在面对威胁自己家族的敌人时也从来不会手软；他还一直小心确保家族成员和朋友都被安排到报酬丰厚又风光荣耀的位置上，而敌人则不能有半点机会。但是，对于佛罗伦萨人来说，对于那些深受他的恩惠、感激他为这个城市所做的贡献的人来说，他是值得尊敬的，他的去世是沉痛的，他的慷慨、政治敏感和繁多而广泛的成

就都是被人们称颂的。作为他的朋友，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这样描写科西莫：他的渊博知识、良好品位和多才多艺绝对是卓越非凡的。

当旁听了某个学者的讲座后，他会给他们写信探讨相关的问题；在和神学家相处时，他也能对神学问题品评一番；他在研究任何一个学科时都充满兴趣，对哲学也是如此。占星家发现他对占星学颇为了解，因为他对此坚信不疑，并运用占星学指导个人生活。音乐家同样能够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精通，音乐也总能给他带来巨大的乐趣。雕塑和绘画更是他最了解的两种艺术，他向来偏爱有才华的工匠。在建筑方面，他算得上一位完美的评判家，没有哪一处重要的公共建筑是不考虑他的意见和建议就开工或完成的。

几年前，还不是执政团成员的科西莫被执政团描述为“共和国领袖”（*Capo della Repubblica*）；此时执政团正式通过了授予他“国父”（*Pater Patriae*）称号的法令，并下令将这一称号刻在他的墓碑之上。另一个曾经获得这一称号的人是西塞罗。

人们本想为科西莫建造宏伟的墓葬，至少要像他的家族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洗礼堂中建造的那样。但是，科西莫在临终之时要求他的葬礼不需要任何“浮华的仪式”。

科西莫的父亲临终时也做了类似要求，不过它们被忽略了。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的遗体被放在敞开的棺材里抬到圣洛伦佐大教堂，一路上他的儿子们和28名美第奇家族成员跟随着，还有大批的外国使臣和佛罗伦萨官员。遗体最终被葬在老圣器收藏室中心的墓室中，其豪华程度绝对超过了乔瓦尼本人的期望。^[7]科西莫的葬礼相对低调，但足够壮观。圣洛伦佐教堂的大殿里点燃了繁星般的蜡烛，烦琐而庄严的仪式之后，科西莫的遗体被埋在了圣坛尽头的大理石纪念碑下，纪念碑顶上有蛇纹石和斑岩装饰，还刻有美第奇家族的盾徽。由于圣洛伦佐教堂是圣安布罗斯的教堂，而且圣坛下供奉着很多

殉道者的遗骨，所以教堂规定不得有遗体葬在纪念碑下方的中殿里。于是遗体被安葬在地下墓穴中，但是为了将墓穴和蛇纹石、斑岩纪念碑连接起来，二者中间又修建了一个8英尺见方的巨型石柱。柱子上刻着“皮耶罗谨以此柱纪念他的父亲”。^[8]

^[1] 多纳泰罗的《大卫》（约1430年）现在陈列在巴杰罗国家博物馆。大议会于1494年将皮耶罗·德·美第奇驱逐出佛罗伦萨后没收了这座雕塑，并下令将其摆在市厅花园的一根柱子上。

^[2] 美第奇家族1494年逃出佛罗伦萨后，执政团下令将多纳泰罗的《朱蒂斯斩贺芬尼》（约1460年）从美第奇宫移至市厅的栏杆前。它现在仍然矗立在宫殿之前，雕塑底座上的铭文是对所有暴君的警示：“给出了一个社会安全很好的例证。1495年。”（Exemplum. Sal[utis] Pub[licae]. Cives. Pos[uere]. MCCCCXCV）。原本的铭文大意是：“王国毁于骄奢，城市兴于美德。那些骄傲的人看吧，你们的头颅将被谦逊之人砍下。皮耶罗·迪·科西莫·德·美第奇谨以此女子雕塑致敬赐给这座城市自由和坚韧的市民们无敌永恒的精神。”

^[3] 卡尔米内圣母教堂大部分已经毁于十八世纪朱塞佩·鲁杰里（Giuseppe Ruggieri）和朱利奥·曼纳约尼（Giulio Mannaioni）重建时发生的大火。但是布兰卡齐堂幸免于火灾。马萨乔和马索利诺（Masolino）创作的环形壁画由菲利波·利比之子菲利皮诺·利比完成。

^[4] 菲利波·利比的《圣母加冕》现在收藏于里卡索利街（Via Ricasoli）52号的学院美术馆（Museo dell'Accademia）。

^[5] 安杰利科的《耶稣受难像》收藏在圣马可教堂的会规室里。回廊另一面的圣马可博物馆里面有圣马可的主祭坛，还有科西莫的守护神科斯马斯和达米安跪在地毯上。

^[6] 圣马可所有的房间都是由安杰利科及其助手负责装饰的。安杰利科的《圣母领报》被放置在通向宿舍走廊的楼梯顶端。

^[7] 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在圣洛伦佐教堂老圣器收藏室中的石棺是由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布贾诺（Andrea Cavalcanti Buggiano）制作的。石棺上面的大理石上有代表美第奇家族的七颗红球。

[8] 在圣洛伦佐教堂的高坛上有科西莫的大理石纪念碑，也是那里唯一竖立的纪念碑。由韦罗基奥设计，上面的碑文如下：

这里安葬的是

科西莫·美第奇

依公共法令

尊称其为国父

享年

75岁3个月零20天

第二部分 1464~1492

第八章 痛风病人皮耶罗

“只要是为了购买珍贵或稀有的物件，他从来不在乎价钱”

皮耶罗成为美第奇一家之长时已经48岁。成年初期就伴随他的不健康状态让他有了“痛风病人”（*il Gottoso*）这个绰号。这也是为什么他不能像一个美第奇财富继承人被期望的那样活跃于家族生意或佛罗伦萨国事中。不过，皮耶罗在1448年当选过执政官，也做过佛罗伦萨驻米兰、威尼斯和巴黎的大使。到1461年，他还当选首席执政官，也是美第奇家族中最后一个担任这一职位的成员。

皮耶罗的眼皮下垂，总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脖子上还有腺体肿块。尽管如此，他还是比弟弟乔瓦尼好看一些。他有一个坚毅的下巴和薄而紧绷的嘴唇，这显示出他长期忍受痛风和关节痛折磨以及湿疹侵扰的坚毅性格。事实上，皮耶罗的本性并不是他受慢性病折磨时所表现出来的暴躁易怒。他是个体贴、有耐心、有礼貌的人。有的人认为他的举止过于冷淡，质疑他拥有像他父亲一样统治佛罗伦萨的权威，但真正了解他的人都觉得他是可敬可爱的。

在银行业务方面，他虽然没有父亲那样的天分，但是非常严谨并讲究方法和系统。对于父亲葬礼的花销，皮耶罗秉承了一贯的细致入微，比如选择哪一种弥撒，给家族里的女眷们多少黑色布料做面纱和

手帕，花多少钱给仆人和奴隶们做服丧衣物以及买多少蜡烛等。这种对细节和质量的关注使他具备了成为一个优秀外交家的素质。事实上，他在法国的时候，法国国王路易十一（Louis XI）和他交情极深，以至于皮耶罗刚成为美第奇一家之长，路易十一就许可他用瓦卢瓦王朝（House of Valois）的三支百合标志装饰美第奇盾徽上的一个小球。

大部分佛罗伦萨人都已准备好给予皮耶罗像给予他父亲一样的权力和尊重，其中部分是缘于他的妻子及他们5个健康美丽的孩子。卢克雷齐娅·托尔纳博尼（Lucrezia Tornabuoni）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充满魅力、生气勃勃，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并且多才多艺。她原本的家族姓氏是托尔纳昆齐（Tornaquinci），是个贵族，但为了规避贵族出身所带来的限制，他们不仅把姓氏改了，把家族纹饰换了，连贵族的自负也抛弃了。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依然富有。这个家族的宫殿气势恢宏，位于当时佛罗伦萨最主要的大街上。在圣玛利亚诺韦拉修道院唱诗班席位上，由多梅尼科·比戈尔迪·基兰达约（Domenico Bigordi Ghirlandaio）创作的描绘施洗者圣约翰和圣母生活场景的美丽壁画就是由托尔纳博尼家资助的。^[1]

卢克雷齐娅不仅是艺术的资助者，也是一位能力出众的诗人。她最大的兴趣是神学，所以其大多数诗文也都是赞美诗或是改编自圣经的韵文。她的作品表现出这类创作中少见的深沉情感和极高的文学性。不过，无论是经文改编还是文学兴趣都没有妨碍她成为一名广受爱戴的妻子和母亲。她的丈夫、孩子们以及公公都非常爱她。

卢克雷齐娅有三个女儿，她们是玛丽亚、比安卡和通常被唤作南妮娜（Nannina）的卢克雷齐娅。她们后来都嫁入了门当户对的大家族。玛丽亚嫁给了莱奥佩托·罗西（Leopetto Rossi），比安卡嫁给了古列尔莫·德·帕奇（Guglielmo de' Pazzi），卢克雷齐娅嫁给了

有学问的贝尔纳多·鲁切拉伊（Bernardo Rucellai）。卢克雷齐娅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哥哥洛伦佐和弟弟朱利亚诺（Giuliano）。在祖父去世时，他们分别是15岁和11岁，但是已经可以预见将来都会成为优秀杰出的男人。

洛伦佐很早就显示出了过人的天赋。虽然他没有父亲和弟弟那样在美第奇家族中少见的俊朗外表，但是他枯黄的脸色和不规则的五官充满力量、引人注目。虽然动作总是有些突兀和不雅，但是他高大强壮、身形矫健。洛伦佐从小接受了全面深入的教育。他的启蒙老师是拉丁语学者和外交家真蒂利·贝奇（Gentile Becchi），后来换成了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者和但丁作品评论家克里斯托弗罗·兰迪诺

（Cristoforo Landino），还有祖父科西莫的追随者和朋友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洛伦佐的父亲皮耶罗在科西莫去世后也一直向他支付津贴。洛伦佐15岁时已经被委任了各种会令其他同龄孩子感到恐惧的重任。他曾带着外交任务被派往比萨会见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

（Ferrante）的二儿子费代里戈（Federigo）；代表父亲前往米兰出席国王费兰特长子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女儿伊波利塔

（Ippolita Sforza）的婚礼；到博洛尼亚与市民领袖乔瓦尼·本蒂沃利奥（Giovanni Bentivoglio）会谈；到威尼斯接受总督的召见；到费拉拉与埃斯特（Este）家族相处；到那不勒斯拜见国王费兰特。

1466年，洛伦佐去罗马参加新教皇保罗二世（Paul II）的就职典礼，并和他商讨了托尔法的矾矿合同问题；同时为了弥补他所接受的人文主义教育在商业研究上的欠缺，他还趁此机会同罗马分行经理乔瓦尼·托尔纳博尼（Giovanni Tornabuoni），也就是他的舅舅，讨论了银行业务。他在罗马期间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而信件内容完全像是写给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的。

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支持者看来，皮耶罗本人其实和洛伦佐一样需要别人的帮助和建议。自科西莫去世后，野心勃勃、善于逢迎、花

言巧语的卢卡·皮蒂就一心想要在佛罗伦萨获得与他的才华相称的权力和影响力。他认为皮耶罗完全不配成为伟大的科西莫的接班人。持同样看法的还有杰出的外交家、科西莫以前的朋友，驻法国大使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在科西莫生命的最后几年中，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不断批评美第奇家族，认为高龄折损了科西莫的能力，就如疾病影响了他儿子的能力一样，他们“胆小懦弱，哪怕能招来一丁点儿麻烦或担忧的事也要尽力避免”。这两个人对美第奇家族的攻击越来越公开化之后，佛罗伦萨大主教的兄弟迪奥蒂萨尔维·内罗尼

（Diotisalvi Neroni）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迪奥蒂萨尔维·内罗尼曾经是佛罗伦萨第一个常驻威尼斯的大使，后来还做过驻米兰大使。这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美第奇家族阵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佛罗伦萨渐渐被分化成两大阵营：高山派和平原派。高山派是卢卡·皮蒂的支持者，因为他在维奇奥桥另一侧的奥尔特拉诺

（Oltrarno）高地上建造的宏伟宫殿此时已经接近完工；平原派则是仍然忠诚于美第奇家族的一派，因为美第奇家族是位于低地拉尔加街上美第奇宫的主人。高山派后来又获得了商人阶层的大力支持，起因是皮耶罗为了了解“自己站在多深的水里”，下令彻查自己的银行业务，之后的报告让他十分担心，以至于错误地追缴了一些他父亲科西莫授意忽略的欠款，虽然他已经尽其所能地帮助了几个受冲击最大的人，但由此而来的一连串破产自然都被归罪到了皮耶罗头上。尽管如此，高山派此时还没有强大到把皮耶罗赶走，就像四十几年前把科西莫驱逐出佛罗伦萨一样。直到一个更有活力、更有决心的美第奇反对者加入之后，局势才发生了变化。

这个高山派最强有力的加盟者就是尼科洛·索代里尼（Niccolo Soderini），他是个演说家，出身于佛罗伦萨最古老、最荣耀的家族之一。索代里尼激烈地抨击选举官制度，因为美第奇家族就是通过这种办法让自己的朋友和支持者都成为执政官的。索代里尼积极鼓吹恢复共和国早期采用的抽签办法，他的理想主义和雄辩最终获得了胜

利。选举官制度被废止了，紧接着在1465年11月的选举中，尼科洛·索代里尼被选为首席执政官。他在成群支持者的簇拥下入主市政厅，还有人将一个橄榄叶做成的花环戴在他的头上。

不过除了这次得意洋洋的入职典礼，索代里尼的首席执政官任期称得上虎头蛇尾，令他颜面扫地。他承诺并积极推动的改革引发了委员会的反感，他们对此全无兴趣并将其搁置一旁。到了1466年1月，这批执政官短暂的任期结束，沮丧地离开了市政厅，还有人嘲讽地在那里贴了张标语，上面写着“九个傻子滚出去”。索代里尼回到自己的住处，此时的他已经如皮蒂、阿恰尤奥利和内罗尼一样深刻地意识到，想要战胜美第奇家族，唯有武装起义这一条道路了。

几周过去了，美第奇的敌人们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然而在3月8日这一天，美第奇伟大的盟友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在米兰去世了。斯福尔扎有好几个儿子，其中年纪最大的加莱亚佐·玛丽亚（Galeazzo Maria）是一个喜怒无常、品位怪异并且举止反常的年轻人。不过皮耶罗仍然坚称，与米兰的盟友关系对佛罗伦萨未来的繁荣至关重要。相反，高山派则坚持认为佛罗伦萨应当重新与老朋友威尼斯结盟。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中，一场政变悄然酝酿起来。

皮蒂、索代里尼和他们的朋友们暗中与威尼斯人接洽，请求他们协助将美第奇赶出佛罗伦萨。他们还向费拉拉的大公、友善但好卖弄的博尔索·德·埃斯特（Borso d'Este）发出邀请，后者最近刚刚在费拉拉最主要的广场上竖立了一尊自己的雕像。博尔索·德·埃斯特同意提供帮助，他让自己的兄弟埃尔克莱（Ercole）带领军队穿过边界向佛罗伦萨进发。这支军队主要负责攻打佛罗伦萨，而其他力量则负责抓捕皮耶罗和他的两个儿子，然后随便给他们安个方便的罪名就马上处决。到了8月，实施这一计划的机会终于来了：皮耶罗因为生病，坐着轿子离开佛罗伦萨去卡雷吉的别墅休养了。

皮耶罗刚到卡雷吉，就有信使送信，说他的朋友、博洛尼亚的乔瓦尼·本蒂沃利奥警告他有危险迫近。皮耶罗马上命令仆人扶他下床并抬着他赶回佛罗伦萨，同时他还让洛伦佐先行一步为回归佛罗伦萨做好准备。洛伦佐一路策马飞奔，在回城的路上，发现有一些全副武装的叛乱者游荡在大主教的别墅附近。幸好没有被叛乱者认出，洛伦佐才得以通过。刚走出那些人的视线范围，洛伦佐就立刻派人掉头回去给父亲送信，让他选择另一条鲜有人经过的小路回佛罗伦萨。

8月27日下午在佛罗伦萨，美第奇一家的突然出现让叛乱的领导者惊慌失措，立刻就丧失了胆量。卢卡·皮蒂马上来到美第奇宫乞求皮耶罗的原谅，并发誓以后要与美第奇家族“同生共死”；另外几个集结了武装支持者的人，却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皮耶罗看起来胸有成竹，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他先是召集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然后向米兰派出信使请求帮助，同时着手准备即将在9月2日举行的新一届由美第奇家族坚定的支持者组成的执政团的就职典礼。

这次的执政团是遵照美第奇的倡议，召集市民议会后选举出来的。几百名对美第奇怀有好感的市民进入由三千名士兵列队守卫的广场上，洛伦佐骑着马在中间往来巡视。议会同意组建最高司法委员会，这场风波就这么结束了。共和行动失败了，美第奇家族的权力却得到了巩固。

索代里尼、内罗尼和阿恰尤奥利都被驱逐出了佛罗伦萨。年事已高、颜面扫地的卢卡·皮蒂因为投降而被免于处罚。考虑到他曾是科西莫的朋友，美第奇希望他能够重新与自己结盟，这一期望后来也的确实现了。卢卡·皮蒂的女儿嫁给了乔瓦尼·托尔纳博尼，也就是皮耶罗的妻子卢克雷齐娅的一个近亲。然而，即便是被流放到了威尼斯，卢卡·皮蒂的两个同谋内罗尼和索代里尼仍然在策划着反对美第

奇的阴谋。他们成功说服了那里的总督和议会，让他们相信在佛罗伦萨城内，反对美第奇家族的呼声高涨，只要威尼斯派军队攻打佛罗伦萨，城里的反美第奇阵营就会揭竿而起、配合威尼斯军队。带着这样的认识，1467年5月，著名的雇佣军指挥官巴尔托罗梅奥·科莱奥尼（Bartolommeo Colleoni）被任命为威尼斯共和国终身大将军，受雇带兵向托斯卡纳地区进发；然而这个巴尔托罗梅奥·科莱奥尼曾两次弃威尼斯于不顾，选择为米兰而战。皮耶罗这一次的反应依然很快，他召集了米兰和那不勒斯的援军，同时集结了佛罗伦萨的军队来阻截科莱奥尼的进发。佛罗伦萨的雇佣兵在伊莫拉这个小邦国的地域内与威尼斯军队相遇，果断地将他们打败了。皮耶罗对佛罗伦萨政府的控制自此彻底稳固了。

皮耶罗在保护自己家族不受佛罗伦萨城内敌人的危害和保护自己的城市不受外来入侵的同时，还延续了美第奇家族慷慨大方的传统。他出资打造了圣米尼亚托教堂里为摆放十字架受难像的精致神龛。^[2]他为圣母领报大教堂制作的神龛更加华丽，底座上甚至刻有虚荣的铭文：“光这块大理石就花了四千弗罗林币。”^[3]与此同时，他还为父亲的古币收藏增添了无数的新藏品，为美第奇藏书室购买了大量稀有手稿，并且将许多手稿重新抄写并配上精美的插图。有人对安东尼奥·阿韦利诺·菲拉雷特（Antonio Averlino Filarete）说，皮耶罗会花几个小时来看这些书，翻书页时都十分小心，“好像那是一摞黄金”：

第一天，皮耶罗觉得看看这些书就会让他愉悦，目光扫过一个个书卷，任时间流逝，对眼睛而言都是一种享受。第二天，他想看看自己收藏的那些古代君王和杰出人物的雕像，有的雕像是用金子制成的，有的是用银子，有的是用铜，还有的是用宝石、大理石或者其他任何值得赏玩的珍贵材质……第三天，他又会想要看看数量巨大、价值连城的珠宝和宝石，有些刻了图案，有些没有。他特别喜欢一边赏玩宝贝，一边谈论它们各自的精彩之处。再过一天，他可能又会去欣赏金质、银质或其他什么宝贵材

料制成的花瓶，并且赞赏它们极高的价值和制作者精良的工艺。总而言之，只要是购买珍贵或稀有的物件，他从来不在乎价钱。

和他的父亲一样，皮耶罗希望艺术家们把他看作出资人和朋友。安东尼奥·阿韦利诺·菲拉雷特还写道：科西莫在多纳泰罗的创作活跃期“授予了他许多荣耀和无穷的酬劳”，皮耶罗在这位雕塑家年老之后以及去世之时，依然供养他的生活并尊重他的遗愿。多纳泰罗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被安葬在圣洛伦佐教堂里靠近科西莫的地方。皮耶罗答应会完成他的心愿，并且承担了葬礼及将他葬在科西莫旁边墓穴的全部费用。多纳泰罗的棺材被抬到教堂下葬时，美第奇家族和成千上万悲恸的佛罗伦萨市民都来送他最后一程。

在长长的送葬队伍里，还包括很多为皮耶罗工作的或即将为他工作的艺术家。其中卢卡·德拉·罗比亚（Luca della Robbia）很快将被选为雕塑家行会的主席。卢卡出生于1400年，1428年为大教堂完成的优美的唱诗班唱台（singing-gallery）已经为他赢得了持久的赞誉。^[4]随后他又受执政团的雇佣来完成由乔托和安德烈亚·皮萨诺开启的钟楼北面的浮雕系列。^[5]皮耶罗还让他为自己制作了一些椭圆形的陶土浮雕，悬挂在美第奇宫书房的墙面上，此外还有一些铺地的地砖。这些物件都“新颖独特并且很适合夏天”。^[6]

去圣洛伦佐教堂的送葬队伍中还有一位老艺术家，他就是当时已经69岁的保罗·迪·多尼（Paolo di Doni）。他也是佛罗伦萨人，害羞内向、沉默寡言，但是一位对动物，特别是鸟类，充满热情的艺术家。他房间里到处都是鸟类的图画，所以他也得了个绰号“乌切洛”（Uccello，在意大利语中是“鸟”的意思）。他有几幅用蛋彩画颜料创作的鸟类和其他动物的图画就被美第奇买走，挂在了美第奇宫的墙上。在多纳泰罗去世前几年，皮耶罗还曾邀请乌切洛创作以圣罗马诺（San Romano）溃败为主题的三版画，来纪念1432年阿尔比奇家族统治时期佛罗伦萨打败锡耶纳的历史。在这幅画中，马似乎主导了作战

行动。后来这幅画被挂在了洛伦佐的卧室中。紧挨着它的是乌切洛的另外两幅作品，一幅描绘了巴黎传奇中的场景，另一幅画的是狮子与龙在争斗。^[7]

《罗马诺之战》完成后不久，皮耶罗就又为美第奇宫向另一位佛罗伦萨艺术家订制了三幅大型画作。这位艺术家就是安东尼奥·迪·雅各博·本奇（Antonio di Jacobo Benci），因为他的父亲是个鸟贩子，所以他也被称为波拉尤奥洛（Pollaiuolo，在意大利语中有“鸡舍”的意思）。波拉尤奥洛既是雕塑家，雕刻家、珠宝和珐琅商人，也是一位画家。他向皮耶罗毛遂自荐，展示了自己精湛的人体画技艺。这种技艺是他长时间解剖观察尸体获得的。皮耶罗向他订购了《赫拉克勒斯的苦差》（*Labours of Hercules*）中的两幅，分别是斩杀尼密阿巨狮和摧毁勒拿九头蛇，此外还有一幅描写后来赫拉克勒斯击败利比亚巨人安泰俄斯的作品。^[8]赫拉克勒斯正是执政团印章上的图案，他象征着勇气。这些图画中的赫拉克勒斯被描绘得“英勇无畏”，与其说是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倒不如说是一名穿着闪光铠甲的古代战士。

如何用古典神话故事来赞颂佛罗伦萨及其统治者的美德与成就？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哪个艺术家比亚历山德罗·迪·马利亚诺·菲利佩皮（Alessandro di Mariano Filipepi），也被称为波提切利（Botticelli），更契合皮耶罗的想法了。多纳泰罗去世时，波提切利只有22岁。他父亲是佛罗伦萨的一位皮革商人，在新镇的圣人街上（Via Nuova Borg' Ognissanti）经营着一家生意清淡的小店。他的哥哥以加工画框上的金箔（*batiloro*）为生，并且替代父亲承担了抚养波提切利的责任。波提切利从小体弱多病，波提切利这一昵称（意思是小木桶）可能来源于他的哥哥。波提切利离开学校后，做过菲利波·利比的学徒，但是没多久他就应邀住进美第奇宫了。在那里，皮耶罗和卢克雷齐娅像家人一样对待他。多纳泰罗去世后不久，波提切

利完成了《圣母颂》（*Madonna of the Magnificat*）这幅画。画中他把美第奇家的两个儿子都描画成了跪在圣母面前的天使。朱利亚诺有天使一般的面容和浓密卷曲的迷人秀发，还有一缕正好垂下来挡住了他的眉毛；洛伦佐则略显黝黑，他只比画家小5岁，侧面、阴影的描绘手法让他的形象更加理想化。^[9]

《三贤士朝圣》（*Adoration of the Magi*）是波提切利为美第奇家创作的另一幅家庭群像，同样采取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所推崇的以宗教主题表现世俗人物的方法。这幅画中的洛伦佐——如果我们接受传统鉴定的话——被安排在明亮的光线下，而不再遮遮掩掩。这幅画是皮耶罗的朋友瓜斯帕尔·迪·扎诺比·德尔·拉马（Guaspare di Zanobi del Lama）为圣玛丽亚诺韦拉教堂绘制的，可能也是为感恩美第奇家族躲过1466年阴谋、避免暗杀或流放之灾。^[10]虽然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似乎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但是这幅画看起来显然是在向洛伦佐致敬。就如波提切利后来为商业行会委员会（*Arte della Mercanzia*）创作的《坚韧》（*Fortitude*）一样，那幅画其实也更像是致敬皮耶罗的。

《坚韧》是商业行会为他们的大厅订制的六幅版画之一，代表慈善、公正、信仰、节制和坚韧的美德。起初打算请安东尼奥·波拉尤奥洛的弟弟皮耶罗来画，但是皮耶罗·德·美第奇怂恿托马索·索代里尼（Tommaso Soderini）说服了委员会里的同事们至少让波提切利完成其中一幅。波提切利于是创作了这幅被认为暗喻了他的朋友和资助者坚毅的性格的画作。^[11]

波提切利完成作品后不久，另一位艺术家又开始在美第奇宫一层的小教堂设计壁画。这位艺术家名叫贝诺佐·戈佐利，也是佛罗伦萨人，曾经在吉贝尔蒂的领导下协助建造洗礼堂的铜制大门，后来又做了安杰利科的助手。贝诺佐·戈佐利在美第奇教堂里没日没夜地工作

了数月，渐渐完成了高坛周围墙壁上的壁画。在美第奇的标志图案钻戒和“永恒”（semper）箴言之上有装饰的花边，再上面是两幅巨大的描绘天使庆贺基督诞生的图画，天使们正好可以俯视下方摆在圣坛之上的菲利波·利比创作的《圣母与圣子》（*The Virgin Adoring the Child*）。[12].

教堂主体的墙壁上，戈佐利画了纪念美第奇家族历史的内容，不过是用传说的三贤士去伯利恒的故事表现的，其中一些人物以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为圣三一教堂（Santa Trinita）的奥诺弗里奥·斯特罗齐（Onofrio Strozzi）家族小教堂创作的圣坛装饰物《贤士来朝》（*Adoration of the Magi*）为原型。[13].

人们曾经坚定地认为艺术家是为了纪念1439年那次让佛罗伦萨成为欧洲文化中心的天主教大会而创作此画，所以将画中三位贤士的原型分别定为：东罗马帝国皇帝约翰·帕莱奥洛古斯——从他特别的长袍、长满络腮胡子的忧郁面容和独一无二的头巾式王冠可以辨别；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神态庄严的白胡子老人，也戴着与众不同的头饰，骑在一匹骡子上；年仅10岁的美第奇家族继承人洛伦佐·德·美第奇。他穿着盛装，骑在装饰华丽的马背上，马饰上也装点着美第奇家族七个红色小球的纹饰。正是他的祖父让这些伟大的人物从东方来到了佛罗伦萨。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对皮耶罗而言，这幅画描绘的其实是每年主显节当天在佛罗伦萨的三国王大游行。美第奇家族一直会参加这一活动，1446年科西莫本人就现身由米开朗基罗帮助设计的贤士游行纪念活动。显然很多参加这次盛大游行的人都被戈佐利画到了作品中，他们大多数人戴着当时学者喜欢的平顶圆帽；在国父科西莫的肖像里，他也戴着这样的帽子。还有一些留着胡须的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学者，比如阿尔吉罗波洛斯特和查尔康迪拉斯（Chalcondylas），则都受到了美第奇家族的游说并接受了他们的资助而留在佛罗伦萨。在这两人中间，戈佐利画了他自己，这一点

毋庸置疑，因为他在画中人物的帽子上大胆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他前面是美第奇家族的其他成员：皮耶罗的小儿子朱利亚诺，有一个黑人举着弓箭走在他前面；国父科西莫，他骑的马上装饰着美第奇家族的纹饰以及他本人三根孔雀羽毛的徽标；科西莫的弟弟洛伦佐，戴着一顶锥形的帽子骑在骡子上；当然还有画家的资助者皮耶罗，就像他在其他画像中表现的那样，依然没有戴帽子。除此之外，画中还有三个漂亮的姑娘坐在马背上，穿着类似的衣服，帽子上插着羽毛，这显然代表着皮耶罗的三个女儿。^[14]

同他预订的其他画作一样，皮耶罗对这幅图画的创作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指示戈佐利把服装画得越艳丽越好。戈佐利同意了他的提议，并提出因需要大量的金色和天青色染料，皮耶罗能否预支工钱。当图画快要完成时，皮耶罗说画中的天使似乎过于突出，但是戈佐利并不认同他的说法：

我总共画了两个六翼天使，其中一个遮掩在角落的云彩中，只能看到他的翅膀尖端，一点儿也不会喧宾夺主，只会增强图片的美感；而另一个天使则是在圣坛的远端，以同样的方式被云彩遮挡着。鲁贝托·马泰利（Ruberto Martegli）看到这个布局的时候也说完全不会觉得突出。不过，如果您要求修改，我还是会遵照您的意愿，再多画两朵云彩。

皮耶罗可能没有活到壁画完成的那一天。他从1469年年初就一直疾病缠身，而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也麻烦不断。一些市民冒充他的名义在街上日夜抢掠作恶，并对被他们认定为美第奇反对者的路人施暴并勒索金钱。有人自以为是地认为皮耶罗的病体摧毁了他的意志，也有人将皮耶罗对共和国宪法的尊重误解为软弱可欺。但是皮耶罗又一次展现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强大决心，他下令把罪魁祸首带到他的房间，在病榻上斥责了他们的恶行；他还警告他们，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他会把已逐出佛罗伦萨的家族成员都召回来整治他们。这之后，城市里的暴行和掠夺马上就停止了，但是没到这一年年底，皮耶罗就

去世了。圣洛伦佐教堂老圣器收藏室中，他被置于他弟弟乔瓦尼的旁边。在他及叔叔的遗体之上，皮耶罗的儿子们放置了斑岩石棺，还装饰了叶形图案，这些都是由多纳泰罗最杰出的学生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为美第奇家族设计的。^[15]

[1]. 在圣玛丽亚诺韦拉的马焦雷礼拜堂有基兰达约的壁画，资助者托尔纳博尼家族的女儿卢克雷齐娅·托尔纳博尼也被画进了《施洗者的诞生》（*Birth of the Baptist*）这幅画中，就是右数第三位女性人物。

[2]. 圣米尼亚托主教堂的十字架神龛是为圣乔瓦尼·瓜尔贝托（San Giovanni Gualberto）的十字架制作的。他在圣三一教堂的小教堂是由卡奇尼设计的。毛织业行会负责圣米尼亚托主教堂的维护和装饰，并同意在这里修建神龛，前提是只有毛织业行会的标识可以被刻在上面。但是皮耶罗·德·美第奇坚持要把他的盾徽——一只鹰隼抓着刻有美第奇座右铭“永恒”的钻戒及三支羽毛——也刻在上面，最终两个盾徽都刻在了上面。

[3]. 圣母领报大教堂的十字架神龛大约在1450年制作。就像圣米尼亚托主教堂的神龛一样，也是为皮耶罗设计的，设计者很可能是米开罗佐。

[4]. 卢卡·德拉·罗比亚的《唱诗班唱台》现在被陈列在大教堂歌剧博物馆（Museo dell' Opera del Duomo）（主教堂广场9号）。多纳泰罗的作品也在这里展出。它们都是在1688年被从大教堂里移出来的，目的是大公王子费尔迪南多和公主维奥兰特·贝亚特丽切在此举行婚礼时能有空间容纳下更多的歌手。

[5]. 钟楼是从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修建，当时乔托是大教堂建造工程的总指挥（*Capomaestro*）。卢卡·德拉·罗比亚的浅浮雕是在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完成的。

[6]. 卢卡·德拉·罗比亚的釉面陶砖是为装饰皮耶罗·德·美第奇的书房而设计的，其中一部分现在陈列于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7]. 乌切洛的三幅铜版画《圣罗马诺的溃败》散落到了各处。一幅在乌菲齐美术馆，一幅在罗浮宫，第三幅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伦敦的这幅画描绘的佛罗伦萨指挥官就是尼科洛·达·托伦蒂诺。他在主教堂广场的衣冠冢由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Andrea del Castagno）设计建造。在它旁边的另一个衣冠

冢是纪念英国雇佣军首领约翰·霍克伍德（John Hawkwood）的，由乌切洛设计建造。

[8] 波拉尤奥洛的《赫拉克勒斯的苦差》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他的《赫拉克勒斯和安泰俄斯》（*Hercules and Antaeus*）展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

[9] 波提切利的《圣母颂》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

[10] 波提切利的《三贤士朝圣》是为圣玛利亚诺韦拉创作的圣坛装饰物，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根据乔焦·瓦萨里的观点，画中将手伸向圣子的脚的国王就是科西莫；穿着白袍跪在旁的是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在他后面，对“圣子表现出无限喜爱之情”的是科西莫的二儿子乔瓦尼。在画正中前景最显著位置跪着的就是皮耶罗·德·美第奇。而在画面最右侧、穿着橘色袍子的人则是波提切利本人。穿着黑色长袍、肩部有一条红色带子的人物可能是一个理想化的伟大的洛伦佐的画像。

[11] 波提切利的《坚韧》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

[12] 菲利波·利比的《圣母与圣子》于1814年被移出美第奇家族教堂，现在这幅画在柏林。现在美第奇堂里展示的是内里·迪比奇（Neri di Bicci）临摹的仿品。

[13] 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的《贤士来朝》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

[14] 在队列前方穿着蓝色衣服的年轻男子骑着神气的高头大马，马上还有一只豹子，这个人物通常被认为是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尽管有人说戈佐利可能是想以取笑的方式展现令人畏惧的、冷酷的卢卡领主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德利·安泰尔米内利（Castruccio Castracani degli Antelminelli），也是佛罗伦萨在十四世纪最强大的敌人。豹子就是卡斯特拉卡尼的象征。按照那一时代的习惯，戈佐利应描画人们一眼就能想到的象征，而不是直接刻画与真实人物相似的形象。

[15] 韦罗基奥设计的圣洛伦佐教堂老圣器收藏室中的皮耶罗和乔瓦尼之墓是一座由蛇纹石、铜、斑岩和大理石建造的宏伟建筑，于1473年完工。

第九章 年轻的洛伦佐

“天生愉悦的性格”

洛伦佐此时年方二十，身强体壮、英气勃发、天资聪颖，好像有着永远使不完的精力，是美第奇家族杰出的领导者。这个家族从未有过一个像他这样的继承人。洛伦佐有一头顺直、浓密的中分黑发，长及肩膀；他的鼻子扁平，完全没有嗅觉，看起来像被打坏以后没有修复好一样；他宽大的下巴向前突出，使得下嘴唇几乎包住了上嘴唇；他的眉毛又粗又黑，眼球凸出，目光极具洞察力。洛伦佐实在是丑得吓人，连声音也是嘶哑的，带着鼻音，音调很高。不过一旦他开口说话，他的整个表情都鲜活了起来，举止让人着迷，细长的手指有丰富的表达动作，以至于让人忽略了他的缺陷。

他做每一件事都带着一种极具感染性的热情。如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所言：“他有一种天生愉悦的性格。”洛伦佐还对足球

（*calcio*）和手球（*palloni*）充满兴趣。当时的足球与现在的足球运动类似，但是一方可以有27名队员；当时的手球则是一种在场地内戴着手套玩的球类游戏。洛伦佐还会出去打猎或带鹰行猎。虽然有些五音不全，他却很喜欢唱歌，无论是在饭桌边还是马鞍上都会高歌一曲；他的一个朋友说，有一次洛伦佐又说又唱地走了30英里，让所有随行的人都和他一样兴致高昂。洛伦佐唱的大部分歌曲都是他自己创作的，其中不乏一些不堪入耳的淫词浪调。他尤其喜欢听下流、低俗、有性暗示的笑话。他还和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喜欢恶作剧，有些玩笑在后人看来可以说是无情甚至冷酷的。据说有一次，一个无趣又嗜酒的医生喝得烂醉如泥，于是洛伦佐让两个朋友把医生绑了并偷偷送到乡下，关在一个偏远的农舍里，然后散布谣言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人们很快便相信了谣言，所以当医生逃脱拘禁跑回家时，他的妻

子还以为面前这个面色苍白、衣衫褴褛的人是鬼魂，说什么也不肯让他进门。

然而，洛伦佐的善良和体贴在他的朋友中也是出了名的。他是一个有求必应、重情重义、和蔼可亲（*simpatico*）的人，善于结交朋友。洛伦佐特别喜欢动物，尤其是马。他的马名叫莫雷洛

（Morello），一般由他亲自喂养。每次看到他，莫雷洛都会高兴地嘶叫、跺脚，欢迎主人；要是洛伦佐不能来，莫雷洛会焦躁、忧郁，甚至生病。洛伦佐乐于在乡下骑马打猎，在卡雷吉料理花园，在穆杰洛打理农场；或是养牛放牛，培育参加赛马节（*palio*）的赛马；抑或在卡雷吉养卡拉布里亚（Calabrian）猪，在波焦阿卡伊阿诺（Poggio a Caiano）养西西里雉鸡、兔子，甚至尝试自制奶酪。但是，洛伦佐同样喜爱他在佛罗伦萨的生活，读书、写作、讨论、研究柏拉图、弹奏七弦竖琴、设计建筑图纸，还会纵情于声色。他是个令人惊讶的全才，而且希望让别人都认识到这一点。不得不承认的是，洛伦佐非常虚荣，争强好胜，要是在竞技或智力项目里输给别人，他会特别生气。

洛伦佐19岁的时候，家里人决定给他选定一门亲事。新娘是蒙特罗顿多（Monterotondo）的雅各布·奥尔西尼（Jacopo Orsini）16岁的女儿，罗马女继承人克拉丽切·奥尔西尼（Clarice Orsini）。洛伦佐的母亲以探望她的两位负责管理美第奇罗马分行的兄弟——乔瓦尼·托尔纳博尼和弗朗切斯科·托尔纳博尼为由，前往罗马了解女方的情况。卢克雷齐娅第一次看到克拉丽切时，她和母亲正走在去圣彼得大教堂的路上。当时克拉丽切披着罗马风格的罩衣（*lenzuolo*），所以卢克雷齐娅没有看清她的情况，不过觉得“她好像很漂亮、白皙，而且个子很高”。卢克雷齐娅第二次见到克拉丽切时，依然没能如愿看清楚她的身材，“因为罗马女人总是把自己遮掩得很严实”；但是通过对方穿的紧身上衣，她判断她的胸部发育良好，而且有一双

“修长而精致”的手。她的脸庞“有点圆，但也不乏吸引力，她的脖颈非常优雅，但是有点太细了”。她的“皮肤很好”。卢克雷齐娅这一次还注意到，她的头发不是金色，而是红色的，毕竟罗马女人很少能够有幸天生金发。

“她不像我们佛罗伦萨的姑娘一样昂着头，而是略微向前伸，”卢克雷齐娅观察后得出了结论，“我想她应该有点害羞……不过总体上我觉得她是大大胜过普通人的。”当然，她还不忘强调说克拉丽切比不上她自己的三个女儿，因为她们不仅比她漂亮，还接受过任何罗马女孩儿不敢想的良好教育。不过卢克雷齐娅认为克拉丽切生性质朴、举止得当，希望她很快就可以适应佛罗伦萨的习俗。

佛罗伦萨人并不都认可这门亲事。一直以来，哪怕是城市里最有钱的商人家族也不会与托斯卡纳地区以外的家族联姻；而美第奇家族此前也一直选择与自己类似的家族结盟。洛伦佐就是这种安排的受益者。他的姐妹们全都嫁给了有钱有势的佛罗伦萨人；后来他自己的女儿们也效仿此道，一个嫁入了里多尔菲家族（Ridolfi）^[1]，另一个嫁入了萨尔维亚蒂家族（Salviati）^[2]。洛伦佐的第三个女儿路易贾（Luigia）从小就被许配给了她叔父皮耶尔弗兰切斯科（Pierfrancesco）的小儿子乔瓦尼。本来洛伦佐和父亲还曾因为分配科西莫的遗产而与皮耶尔弗兰切斯科一系产生过分歧，虽然所有的争议在定下这门亲事时已经解决了，但洛伦佐还是决心通过联姻的方式加强家族内部的联系。尽管这门亲事并没能结成，因为路易贾不到12岁就去世了，但是家族两大分支间的稳固关系在洛伦佐有生之年再未被破坏过。

尽管洛伦佐明白与佛罗伦萨家族联姻结盟的重要性，他也同样意识到突破常规与奥尔西尼家族联姻的好处。这不仅可以避免引起佛罗伦萨城内被他拒绝的各个有适婚女儿家族的嫉妒，还可以让他与一个

拥有更大影响力的家族结盟。奥尔西尼家族世代都是军人或神职人员，在那不勒斯王国和罗马北部有大片的地产；他们不但能筹钱，还能征兵。此外，通过克拉丽切的舅舅——枢机主教拉蒂诺

（Latino），奥尔西尼家族在教廷也可以发挥稳固的影响力。洛伦佐本来想娶个更漂亮、更有文化、不是出身于这种封建封闭家庭的新娘，但是在一次弥撒上看到克拉丽切之后，他认为这门亲事是可以接受的；谈妥六千弗罗林币的嫁妆之后，洛伦佐就由他的远房堂兄比萨大主教菲利波·德·美第奇（Filippo de' Medici）代理在罗马与克拉丽切结婚了。

为了让佛罗伦萨人更好地接受这门不受欢迎的亲事，美第奇家族在1469年2月7日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锦标赛。这场锦标赛预计耗资一万达科特，并且将会成为佛罗伦萨人见过的最壮观的盛景之一。十五世纪诗人路易吉·浦尔契（Luigi Pulci）还为此写下了《洛伦佐·德·美第奇赛马节》（*La Giostra di Lorenzo de' Medici*）这一迷人的意大利语诗篇。

比赛场地设在圣十字广场，在二月暖阳的照耀下，观众纷纷聚集到屋顶和阳台上，从窗户和栏杆的缝隙向下张望。他们可以看到美丽的卢克雷齐娅·多纳蒂（Lucrezia Donati）被护送到专为“锦标赛女王”准备的华丽宝座上；还能看到18名来自佛罗伦萨上流社会的金甲青年（*jeunesse doree*），他们将作为骑士参赛。在传令官、旗手、吹笛人、鼓手依次进场之后，骑士们在男仆和重骑兵的陪同下游行穿过广场，接受成千上万名支持者热情的欢呼。每个骑士都穿着华丽的服饰，连铠甲和头盔也是为了比赛精心制作的。对于意大利人来说，虽然曾发生过费代里戈·达·蒙泰费尔特罗（Federigo da Montefeltro）在比赛中弄瞎一只眼的意外，但是他们的锦标赛可没有德国人所喜欢的那种野蛮血腥的场面；在佛罗伦萨，展现美好比炫耀鲁莽的勇气和力量更受推崇。

没有哪个骑士能比洛伦佐更加光彩照人。他披着一件镶着红边的白色丝绸斗篷，斗篷下面是一件天鹅绒外衣，还戴着一条绣着玫瑰图案的丝巾，玫瑰栩栩如生，有的凋谢了，有的正盛开着，旁边还用珍珠绣上了励志箴言：LE TEMPS REVIENT（时光倒转）。他的黑色天鹅绒帽子上也装饰着珍珠和红宝石，还有一颗用金线缠绕的大钻石。他骑的白色战马是那不勒斯国王送的礼物，马身上也披着镶满珍珠的红白相间天鹅绒；另一匹他准备在长枪对决时骑的战马是费拉拉的博尔索·德·埃斯特赠送给他的；而他穿的铠甲则是米兰公爵的贺礼。他的盾牌正中也镶着一颗巨大的钻石；头盔顶上插着三根长长的蓝色羽毛；旗帜上画着一棵月桂树，树的一侧已经枯萎，另一侧则绿意盎然，旁边也用珍珠绣着和丝巾上一样的箴言。最后，包括著名的雇佣军首领罗伯托·达·圣塞韦里诺（Roberto da Sanseverino）在内的评委们将第一名授予了洛伦佐，颁给他一个镶银、头顶上有战神造型装饰的头盔。当然这多少是出于对赛事组织者继承人的褒奖，而非真心承认他无人可及的英勇善战。

4个月后，也就是1469年6月，这场精彩的锦标赛所致敬的克拉丽切·奥尔西尼来到了佛罗伦萨准备举行结婚庆典。美第奇宫至少要办5场盛大的宴席。过去几周中，鸡鸭鱼肉、葡萄酒和蜡、蛋糕和果冻、蜜饯、杏仁甜面包、糖衣杏仁就源源不断地从托斯卡纳的各个地方送往美第奇宫。宫外的敞廊和宫内的院子及花园里也摆上了一排排的桌子。庆典于周日早上开始。新娘由朱利亚诺从罗马护送来到佛罗伦萨，她要骑着那不勒斯国王赠送给新郎的白马从圣皮耶罗镇（Borgo San Piero）的亚历山德里宫（Palazzo Alessandri）出发前往美第奇宫。^[3]新娘穿着白色和金色相间的刺绣礼服骑在马上，后面跟随着长长的伴娘和仆人队伍。在佛罗伦萨，有喜事的家庭都要在门口挂上橄榄枝，新娘伴着院子里乐队吹奏的喜庆音乐通过拱道时，橄榄枝会被降至她头顶的高度。依照佛罗伦萨的传统，参加婚礼的宾客要按照年龄和性别分配座位。从敞廊上可以看到花园的是克拉丽切所在的桌

子，这里坐的都是年轻的已婚女士；洛伦佐的桌子在大厅里，同桌的都是年轻的男士；敞廊上方的阳台上则是由卢克雷齐娅主持的、为年长女士们准备的宴席；而皮耶罗的同辈和长辈则在院子里另坐一桌。院子里还有一些巨大的铜质冷柜，里面装满了托斯卡纳葡萄酒。每上一道菜之前，都要先吹号示意，尽管“饭菜和酒水都是简单朴素的适合婚礼的种类”，但是宴席过后有统计称，到宴席结束，宾客们总共吃掉了5000多磅蜜饯，喝掉了超过300桶葡萄酒——主要是棠比内洛（*trebbiano*）和维奈西卡（*vernaccia*）。宴席结束后，宾客们还可以欣赏音乐和舞蹈，整个舞台都装饰着挂毯，四周还围着绣了美第奇家族和奥尔西尼家族纹饰的帘子。

宴会、歌舞、展览和戏剧表演整整持续了三天。到星期二早上，新娘前往圣洛伦佐的大殿听弥撒，手里还拿着“一本《圣母书》，这本书精美无比，每个字都是用金子在深蓝色纸张上写成，封面则用水晶和烫银装饰”。

洛伦佐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年轻多么美好；

可惜她短暂易逝；

让我们抓住这大好时光，及时行乐；

因为明天充满了未知。

洛伦佐的同龄人们都迫不及待地采纳了他的建议。他们白天参加舞会，晚上去焰火派对。洛伦佐有时在拂晓时分就起床，骑着马，挎上弓，到森林里去打猎；天黑之后，他又会和朋友们一起伴着月光在街上漫步，对着宫殿窗口的姑娘吟唱诗歌和小夜曲。还有一次，在一个寒冷冬夜[洛伦佐这次并没有在场，他当时去比萨访问了，是他的朋友菲利波·科尔西尼（Filippo Corsini）后来给他讲述的]，洛伦

佐的一大堆朋友们冒着雪聚到了玛丽埃塔（Marietta）的宫殿外面，她是洛伦佐·迪·帕拉·斯特罗齐（Lorenzo di Palla Strozzi）的女儿，也是一个可爱、任性、父母双亡的姑娘。这一伙儿人在窗下举着明亮的火炬，吹着喇叭和笛子，又唱又叫，甚至还往她的窗户上扔雪球。玛丽埃塔打开窗子看；

结果一个小伙子的雪球砸到了玛丽埃塔雪一样白皙的脸上，围观者乐不可支……不过人们眼中的大美女玛丽埃塔对这样的情景已经见怪不怪，她优雅而巧妙地给自己解了围，不失一点颜面。

洛伦佐继承家族之初就成就显赫，那时佛罗伦萨举办了一系列娱乐活动：露天表演、锦标赛、化装舞会、展览和游行、音乐节、狂欢节，以及各种舞会和娱乐游戏。事实上，佛罗伦萨世代都因丰富的节庆活动而闻名欧洲，再没有哪个城市能拥有比这里更多更精彩的公众娱乐活动了。受惠于行会规章，这里的人每年的工作日不多于275天，所以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享受生活。在老市场举办嘉年华会、赛马节、足球赛和舞会；在圣十字广场模拟战斗；在阿诺河的各个桥下进行水上表演。有时候市政厅广场也会作为马戏团的表演场，甚至变成狩猎场。人们用长矛激怒到处乱跑的野猪；还把狮子从广场后面的笼子里放出来，想尽办法激起狮子的野性，尽管总是不太成功，但足以刺激它们去攻击猎狗。这种不顾后果的冒失行为不止一次地带来失控的局面，曾经一头狂暴的水牛夺去了三个人的性命。那之后，人们又把一匹母马和一群公马放到一起，有市民认为这个场景“是适合姑娘们的精彩娱乐”，然而另一位更受人尊重的日志作者则认为这个场景“令思想正派、行为得体的人感到不快”。

每年5月1日的五朔节（Calendimaggio）是最受欢迎的佛罗伦萨节日之一。每逢这一天，佛罗伦萨的年轻男子们都要起个大早，把由缎带和糖衣果仁装饰的开花灌木摆到他们心仪的姑娘家门口；而姑娘们则会穿上漂亮的长裙在圣三一教堂广场伴着鲁特琴的音乐翩翩起舞。

除此之外，还有施洗者圣约翰日，纪念这座城市的守护神。每到这一天，所有商铺都会挂起彩带和横幅，还会举行无骑手的赛马比赛：参赛马匹在身体两侧驮着带穗子装饰的铁球，沿葡萄园街（Via della Vigna）的普拉托门（Porta al Prato），经老市场和科尔索街（the Corso），一路跑到克罗切门（Porta alla Croce）。大规模的游行队伍中有教士和唱诗班歌手，有装扮成天使和圣人的市民，还有装饰华丽的巨大战车穿行于街道，车上载着大教堂的圣物，包括神圣王冠上的一根荆棘、圣十字架上的一个钉子以及圣约翰的一根手指。主教堂广场上会支起巨大的有银色星星图案的蓝色顶棚，顶棚下面摆满了虔诚信徒们送来的彩绘蜡制供奉品，这些都要被送到洗礼堂去。在市政厅广场上，载有镀金城堡模型的马车要依次通过彩旗飘舞的市政厅阳台，每个精致的镀金城堡代表一个隶属于佛罗伦萨的市镇。

四旬斋节（Lenten festivals）的庆祝仪式自然要严肃得多。在受难周的星期三，大教堂会举行黑暗晨祷。整个教堂不亮一盏灯，只在圣坛上点着一根蜡烛；黑暗之中，神职人员和集会教众仪式性地用柳树杖敲击地面。到了星期四，也就是濯足节，大主教会为穷人施洗足礼。星期五是耶稣受难日，在下午三点整，所有教堂和修道院的执事都要到街上去，用木质的响板召唤人们，无论身处何地，此刻都要停下手中事，跪下来虔心祈祷。随后还会重演基督的葬礼，整条街上都要挂起黑布以示哀悼。修道士组成的长队沿街行进，他们拿着谴责的标语、荆棘编成的王冠、长矛和海绵，以及《耶稣受难记》中提到的所有物品，从锤子、钉子到紫色长袍和骰子，应有尽有。他们后面是象征死去的基督的形象，还要为他支起黑色和金色相间的顶棚；再后面是一身黑衣的圣母玛丽亚，手里拿着一条白色的手帕。星期六是复活节前夕，所有的灯都会被重新点亮。大教堂里圣坛上的黑布也都换成了金色。大主教要唱起《荣归主颂》（*Gloria in Excelsis*）；大教堂放飞的鸽子会一直飞过主教堂广场的屋顶，钟楼里的钟也会敲响令人振奋的钟声，响彻整个佛罗伦萨。

洛伦佐和朱利亚诺很享受这些节日，他们帮助设计舞台、布景和猎捕陷阱，还有雕塑和铠甲、表演者的戏服，以及精美的马具和用来掩盖动物气味的香薰。他们还乐于创作戏剧和露天表演，剧情里充满了当时人们最热衷的典故；他们也喜欢和学者、诗人一起讨论演讲、歌曲以及带着隐喻的假面剧本中夸张的台词。

任何来佛罗伦萨的尊贵客人都会受到盛情款待。因此，1473年6月22日，一支护送那不勒斯国王的女儿埃莱奥诺拉（Eleonora）去与费拉拉的公爵埃尔克莱（Duke Ercole）完婚的庞大贵族队伍向北行至佛罗伦萨时，佛罗伦萨人就不失时机地按照风俗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公主穿着黑色和金色相间、“镶着数不清的珍珠和宝石”的礼服，骑马经罗马娜门（Porta Romana），穿过维奇奥桥到市政厅，沿途都有市民向她欢呼鼓掌。她在市政厅接受了执政官们的致敬之后，继续前往美第奇宫同洛伦佐、朱利亚诺和其他无数客人共进晚餐。第二天还举办了假面舞会及焰火表演。6月24日，在普拉托延伸到阿诺河河岸的草地上还举行了一个花园派对（*fête champêtre*），客人们可以吃着草莓，沿着河岸在绿草地上散步，也可以像充满活力的佛罗伦萨人一样在阳光下尽情舞蹈，随意跳跃嬉戏。

这些节日盛大而激动人心，但也算不上多与众不同。不过所有人都承认，1475年佛罗伦萨举办的锦标赛堪称绝无仅有的一次盛事，其规模甚至超过了1469年的赛马节（*giostra*）。这次锦标赛是以朱利亚诺的名义举办的，他当时22岁，一头乌发，高大健壮，广受爱慕。朱利亚诺的赛马节也在圣十字广场举办，美丽的卢克雷齐娅·多纳蒂也如1469年一样又一次被奉为“锦标赛女王”，而另一位更加美丽的西莫内塔·卡塔内奥（Simonetta Cattaneo）则坐在了“美貌女王”的宝座上，她是马尔科·韦斯普奇（Marco Vespucci）的妻子，据说朱利亚诺深深地爱着这位因肺病而不久于人世的年轻女士。朱利亚诺来到她的面前，身上戴着她的信物。他穿着一套量身订制的礼服，据说

这套衣服花费了至少八千弗罗林币。朱利亚诺的旗帜是由波提切利设计的，描绘的是智慧和战争女神帕拉斯（Pallas）穿着金色的长袍，手持长矛和盾牌，低头俯视着站在橄榄树旁边的丘比特，后者脚下还有弓和折断的箭。如他的兄长一样，朱利亚诺也获得了第一名，他戴着头盔接受了颁奖，这个头盔是韦罗基奥为预料之中的胜利而特意设计的。

这次著名的锦标赛还是安杰洛·安布罗吉尼（Angelo Ambrogini）早期文学作品的灵感来源。安杰洛·安布罗吉尼也被人们称作波利齐亚诺（Poliziano），这是他的出生地的名字。他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托斯卡纳律师，也是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后来被设计暗杀皮耶罗的阴谋者们杀害。父亲去世后不久，波利齐亚诺就被带到了佛罗伦萨，由美第奇家族承担他的教育费用：他曾先后跟随克里斯托法罗·兰迪诺学习拉丁文，跟随阿尔吉罗波洛斯和安德尼可士·卡里斯托斯（Andronicos Kallistos）学习希腊语，跟随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学习哲学。美第奇家族让他想在这里住多久就住多久，后来还赠送了一套乡村别墅给他。他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令人震惊的学识和与他年龄不符的文学素养。他创作的《朱利亚诺·美第奇赛马房的房间》（*Stanze della Giostra di Giuliano de' Medici*）树立了他继薄伽丘之后最杰出的意大利诗人的地位。

波利齐亚诺对朱利亚诺和洛伦佐的致敬可不是任何一个慷慨的资助者都理应享有的隐喻奉承而已，因为洛伦佐的确是“为托斯卡纳春天欢畅的鸟儿们提供栖息之地的月桂树枝”。洛伦佐经常邀请艺术家、作家和学者到他在菲耶索莱、卡法焦洛和卡雷吉的乡村别墅中一起畅谈、朗读、欣赏音乐或探讨古典文本与哲学谜题。有时他们也会在卡马尔多利修道院（Abbey of Camaldoli）^[4]见面，1468年时，洛伦佐和朱利亚诺曾经连续四天和柏拉图研究院的多位成员讨论人类最高的使命、至善（*summum bonum*）的本质，以及《埃涅阿斯纪》

(*Aeneid*) 中的哲学理念等，这些人包括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克里斯托法罗·兰迪诺、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以及三位学术修养颇高的商人：阿拉曼诺·里努奇尼（Alamanno Rinuccini）、多纳托·阿恰尤奥利（Donato Acciaiuoli）和皮耶罗·阿恰尤奥利（Piero Acciaiuoli）。

洛伦佐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城市里一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都来到我家悼念他，并且鼓励我像父亲和祖父一样挑起治理国家的重担。”来访人员中领头的托马索·索代里尼和阴谋策划推翻皮耶罗的尼科洛·索代里尼是亲兄弟，但他一直都反对家人的阴谋。此外，因为他娶了托尔纳博尼家的女儿，所以洛伦佐也算是他的外甥。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几名皮蒂家族的成员。他们在吊唁的前一天参加了一个在圣安东尼奥修道院（Sant’ Antonio）举行的有七百多名现任政府支持者出席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皮蒂家族成员为卢卡·皮蒂在那次阴谋中的行为做出了补偿，他们坚定地支持索代里尼请求洛伦佐继任的提议。洛伦佐谦逊地听取了来访人员的陈述，但是“他们的提议有违我年轻人的天性，”他反驳说，

尤其是考虑到即将面临的巨大的重担和危险，我十分不情愿地同意了。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朋友和财产；因为在佛罗伦萨，不在政府任职的富人往往会遇到磨难。

洛伦佐的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此时他还不满21岁，刚结婚不到6个月，当然想将更多的时间用在那些他投入极大热情的享乐上，可是新责任却不允许他这样做。洛伦佐是一个谨慎而有野心的年轻人，他深知拒绝公共职责不仅是自私的而且是不明智的。即使没有母亲的建议，他也不会置家族的责任于不顾，更何况他那有责任心、理智且有才华的母亲深刻地影响着他。虽然谦称自己还没有父亲那样的权威，但是他已经写信给米兰公爵要求斯福尔扎家族将从祖父科西莫时期开始的对美第奇家族的支持延续下去。

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继承者加莱亚佐·玛丽亚·斯福尔扎（Galeazzo Maria Sforza）此时在米兰已经地位稳固。他是一位有才能的统治者，但是他令人发指的邪恶和残忍行径也招来了越来越多的恶名。他的敌人声称他强奸过无数米兰贵族的妻子和女儿；他发明酷刑来惩罚冒犯了他的人并借此满足自己的虐待欲；他亲自监督犯人受刑，甚至亲手砍断他们的四肢；将死之人痛苦的呻吟和残破的尸体都能让他感到愉悦。支持与米兰结盟的一方驳斥说这些故事都是子虚乌有的恶意中伤，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位公爵是个极度奢侈与虚荣的人。1471年他访问佛罗伦萨时，带来了数量惊人的顾问、随从、仆人和士兵，其中包括500名步兵、100名骑士和50名穿着银色制服的马夫，每个马夫牵着一匹配了金色锦缎马鞍、金质马镫和丝绣缰绳的战马。公爵还带了他的号手和鼓手，以及猎人、养鹰人和猎犬。他的妻子、女儿及侍女进城时足足坐满了12顶用金色锦缎覆盖的轿子。

佛罗伦萨人承认排场盛大，但是没有过分地崇拜。只要愿意，他们完全能创造出比这更壮观的场面。连米兰公爵也不得不承认，尽管美第奇家族的生活方式简朴得多，尽管洛伦佐穿的都是低调、深颜色的衣服，但是米兰的财富和美第奇宫四墙之内聚集的财富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虽然自以为是、残暴成性，加莱亚佐·玛丽亚·斯福尔扎却是一个有学问、有品位的鉴赏家，他认为洛伦佐的艺术和学术声望名副其实，而且这位年轻的主人为资助艺术和文化所做的贡献也令他肃然起敬。

然而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他们想要的则是分享属于美第奇家族的尊重和权势。皮耶罗刚去世，一个摧毁美第奇家族影响力的新阴谋就开始筹划了。1466年因推翻皮耶罗的阴谋失败而被流放的那批人，想要利用美第奇家族新领袖的年轻和缺乏经验卷土重来。他们在迪奥蒂萨尔维·内罗尼的领导下集结军队，占领了普拉托。不过这是他们能取得的最大战果了。洛伦佐和坚定支持他的执政团像当年皮耶罗面

对威胁时一样果断出击，立即派出一支雇佣兵队伍夺回了普拉托，密谋者们本来指望的来自佛罗伦萨内部同谋者和费拉拉的增援也随之失去了。阴谋最终未能得逞，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再一次获得巩固。

此时，洛伦佐的个人地位其实还没有获得公开的认可。举个例子来说，第二年教皇保罗二世（Paul II）去世时，执政团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到罗马向继任者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表示祝贺，洛伦佐也是这个代表团中的一员，但是他并没有享受到任何优待或比其他使节更高的地位：毕竟，佛罗伦萨在名义上依然是共和国；而佛罗伦萨的市民们也更希望维持现状。尽管如此，洛伦佐还是凭借出身而受到了一定的特殊对待。年轻的他本不能进入百人团，不过百人团的成员们通过了一项特殊法案许可他加入。他同时也被许可加入最高司法委员会，并且像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一样处理关乎国家的重要事务，他给各国使节和王储们写了不计其数的信函，还在各种委员会的议事进程中充当领导角色。

1472年，沃尔泰拉地区出现了动乱，在应对动乱过程中，洛伦佐的个人影响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沃尔泰拉一直是托斯卡纳地区最不稳定的市县之一，因为尽管有自治政府，每年却还要向佛罗伦萨缴纳贡金。这次动乱的起因是沃尔泰拉附近一处矾矿的开采合同问题。依据合同，开采权由一个财团获得，这个财团包括三个佛罗伦萨人、三个锡耶纳人和两个沃尔泰拉人。但是沃尔泰拉地区的居民普遍认为这个财团是通过欺诈的手段获得了利益丰厚的合同，所以他们选举出地方法官来控制矾矿并且赶走了正在作业的工人。洛伦佐本来不是这个财团的成员，也不负责财团的事务，但是沃尔泰拉的工会要求他对争议进行仲裁。洛伦佐支持财团的意见并判定应当马上将矾矿的控制权交还给财团。受到这一判定的鼓励，财团中的两个沃尔泰拉人因吉拉米（Inghirami）和里科巴尔迪（Riccobaldi）立即带领一支武装护送队伍回到矾矿，以合法拥有者代表的地位自居并宣示所有权。

这样的行为招致了武力冲突，场面十分血腥，多人丧生，因吉拉米的尸体被从窗口扔到了下面的广场上，佛罗伦萨派驻沃尔泰拉的地方长官（*Capitano*）庆幸自己没有和他一起被扔出去。

此时的洛伦佐认定必须武力镇压暴动。不过他的命令没有立即得到遵从。虽然他宣称支持者被无情杀害，而且沃尔泰拉暴乱者们与被驱逐出佛罗伦萨的流亡者们相互勾结准备攻击美第奇家族，但是大部分执政官认为以武力解决冲突反而会激化矛盾，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沃尔泰拉的主教也持相同观点。不过，洛伦佐此时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沃尔泰拉人向来爱闹事，这次必须让他们受点教训；如果他们没受到惩罚，其他托斯卡纳市县也许就会效仿他们的做法。最终，洛伦佐的意见还是被采纳了。一支由乌尔比诺伯爵（Count of Urbino）费代里戈·达·蒙泰费尔特罗领导、由佛罗伦萨出钱的雇佣军队被派往沃尔泰拉。沃尔泰拉的市民疯狂地想要寻找同盟，他们甚至向那不勒斯国王提出，如果他派兵协助抵御佛罗伦萨的攻击，沃尔泰拉就将归顺于他。可是除了锡耶纳和皮翁比诺（Piombino）提供了一点点帮助之外，没有什么人愿意来拯救沃尔泰拉。经过了一个月的围城战，沃尔泰拉最终还是投降了。洛伦佐写信说这一事件的顺利解决令他感到欣慰，可惜这封信写得太早了。

这封信抵达沃尔泰拉时，整座城市已经被抢掠一空。谁也不知道投降条约为何会被公然践踏。有人说实际上沃尔泰拉人自己雇用的雇佣兵为乌尔比诺伯爵的军队打开了城门，为的是一起洗劫沃尔泰拉。不管伯爵的队伍怎样进城，反正他们很快便展开了掠夺，这些人闯进民宅和店铺，杀人强奸，无恶不作。有人甚至说伯爵本人不但没有阻止这些行为，还偷走了一本稀有的多语种《圣经》；也有人说伯爵虽然处罚并吊死了几名作恶的士兵，但完全没有起到警示作用。总之，暴乱持续了数小时，成百上千人或死或伤，每条街道上都是抢掠和破

坏的痕迹。现场的惨状又因为随后大雨引发的塌方而更加令人心惊胆战。

得知这一切后，洛伦佐马上赶到了沃尔泰拉。他尽己所能地向沃尔泰拉人民表达了佛罗伦萨市民对暴行的无比遗憾。他显然是真诚的；但是人们无法忽视正是他鼓吹暴力镇压，正是他雇用了乌尔比诺伯爵，正是他把矾矿的所有权判给了最初的特许经营者（*concessionarires*），正是他强行收回了沃尔泰拉人的自治权。在沃尔泰拉，这些事情至今依然被人们铭记在心。

[1]. 里多尔菲家族不久之后在马焦街（现在的马焦雷街）和马泽塔街（Via Mazzetta）的交叉路口修建了宫殿。现在宫殿被称为圭迪故居（Casa Guidi）。1861年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就是在这里去世的。

[2]. 十四世纪的萨尔维亚蒂宫建在德拉维尼亚韦基亚街（Via della Vigna Vecchia）和帕尔米耶雷街（Via Palmiere）的交叉口。

[3]. 圣皮耶罗镇就是现在的阿尔比奇镇。

[4]. 卡马尔多利修道院，即卡马尔多利的仁爱修会是在十一世纪初由圣罗穆阿尔多（St Romualdo）创建的。它的名字来源于马尔多利园（Campus Maldoli），是一片面积达3000英亩的森林。一个叫马尔多卢斯（Maldolus）的阿雷佐富商向修会提供了这片地产。药房是十六世纪建造的，其他房屋大多是十七、十八世纪建造的。

第十章 教皇与帕奇家族

“除了杀人，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Francesco Della Rovere）1471年当选教皇，称西克斯图斯四世，当时洛伦佐代表佛罗伦萨向他致以祝贺。西克斯图斯四世身材魁梧、性格粗暴。他的脑袋特别大，还有一个塌鼻子，牙齿也都掉光了，所以总是显得很吓人。他出生于萨沃纳（Savona）附近一个贫穷的渔民社区，很小就加入了方济会。凭借着卓越的讲道才能、好学、虔诚，还有一点个人魅力和野心，他在不到50岁时就成为方济会的会长，三年之后又当上了枢机主教。自那以后，他就不停地为自己众多的亲戚谋求各种福利，包括恩惠、职位、金钱、土地和权力，其中尤以教皇的姐姐一家受惠最多。至于这些亲戚是否具备相匹配的才能则十分值得怀疑。教皇的外甥中有六个被封为枢机主教，至于那些没有投身教会的亲属，教皇也是想尽办法为他们在各个教廷国中谋求有利可图的官职和爵位。

皮耶罗·里亚里奥（Piero Riario）是教皇的外甥之一，他机智幽默、和蔼可亲，但喜欢浮夸炫耀。在教皇的帮助下，他当上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圣安布罗斯修道院院长，特雷维索（Treviso）、芒德（Mende）、斯帕拉托（Spalato）和塞尼加利亚（Senigallia）的主教以及佛罗伦萨的大主教。另外一个叫吉罗拉莫·里亚里奥

（Girolamo Riario）的外甥更是贪得无厌，很多人相信他其实是教皇的私生子。这个肥胖、粗野、聒噪的年轻人看上了伊莫拉这片地区，认为以此为基础可以在罗马涅地区逐步获取更多的地产。伊莫拉这个位于博洛尼亚和弗利（Forlì）之间的小镇最近被塔代奥·曼弗雷迪（Taddeo Manfredi）卖给了米兰公爵，而教皇恰好认为后者的亲生女儿卡泰丽娜·斯福尔扎（Caterina Sforza）是吉罗拉莫新娘的不二人

选。于是双方随即展开了协商，而美第奇银行在罗马的分行也被下令负责筹集四万达科特的资金用来购买伊莫拉。

对于这个要求，洛伦佐感到非常不安。到目前为止，他和教皇的关系依然非常亲密，罗马对他的态度还是“十分尊敬”的，而且教皇也向他保证美第奇银行仍然是教廷的御用银行和托尔法矾矿的代理人。教皇还赠送给洛伦佐两个大理石头像雕塑，一个是奥古斯都（Augustus），另一个是阿格里帕（Agrippa）。除此之外，洛伦佐还获得了以最优惠的价格购买教皇保罗二世收藏品的机会，其中的珍宝种类繁多，包括凹雕、浮雕、花瓶和半宝石级的酒杯，等等。洛伦佐当然迫切地希望自己与新任教皇的友好关系不受破坏；另外，他也明白伊莫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小镇是从里米尼（Rimini）到博洛尼亚最主要的通道，洛伦佐一直希望将其买下归佛罗伦萨所有，所以无论如何不能让它落到教皇手里。当贷款申请被交到自己面前时，洛伦佐找各种借口不批准这笔贷款。但是教皇仍不死心，又去找了美第奇银行在罗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帕奇家族。后者欣然接受了这个为教皇服务的机会，并希望借此夺走垂涎已久的作为教廷银行的美差。

在帮助吉罗拉莫如愿购得伊莫拉之后，教皇又把注意力转向了侄子乔瓦尼·德拉·罗韦雷（Giovanni Della Rovere）。虽然他已经当上了罗马的地方行政长官，还是皮德蒙特（Piedmont）的蒙多维（Mondovi）的领主，但是他依然想像表亲一样在罗马涅地区立足获益。西克斯图斯于是热心地为乔瓦尼安排了与乌尔比诺公爵费代里戈（Duke Federigo of Urbino）长女的婚事。这样一来，不仅教皇的势力范围空前地向佛罗伦萨逼近，而且佛罗伦萨失去了一个原本听命于它的成功的雇佣军首领。

至此，洛伦佐与教廷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当教皇竭力要将尼科洛·维泰利（Niccolò Vitelli）赶出卡斯泰洛城（Città di

Castello) 时，佛罗伦萨和教会开战已经迫在眉睫。卡斯泰洛城是佛罗伦萨的前哨圣塞波尔克罗镇 (Borgo San Sepolcro) 附近的一个小镇，科西莫在世时，用从一个犹太当铺老板那里没收来的资金购买了这里的所有权。现在为了保卫教皇眼中最厚颜无耻的维泰利，洛伦佐集结了6000人的兵力。即便如此，维泰利也没能躲过投降的结果，但是他逃亡到佛罗伦萨后受到了体面的接待，这不禁让西克斯图斯怒火中烧。

麻烦到此远未结束。1474年皮耶罗·里亚里奥因为长期沉迷于他舅舅赐予的奢侈生活而耗尽了生命；于是佛罗伦萨大主教的职位空缺出来。洛伦佐成功帮助自己的姐夫里纳尔多·奥尔西尼 (Rinaldo Orsini) 成为里亚里奥的继任者；不过他也没能阻止教皇提名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 (Francesco Salviati) 成为比萨的大主教。教皇曾保证任命共和国内神职职位之前必须征得执政团的认可，现在教皇出尔反尔，洛伦佐自然也不会承认萨尔维亚蒂在托斯卡纳的地位。所以萨尔维亚蒂不得不在罗马苦等三年而无法上任，失意、苦闷的他愿意为一切旨在推翻美第奇统治的阴谋提供全力支持。

洛伦佐在罗马还有更加危险的敌人。为了确保意大利北部岌岌可危的和平，他曾提议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三方建立同盟关系。但是，这一提议不但没有带来和平，还几乎挑起了另一场战争，因为教皇怒不可遏地谴责这一联盟是针对他的。而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也因为没有被征求意见而对结盟产生了怀疑，并且担心自己在亚得里亚海 (Adriatic) 的利益会受到影响。那不勒斯国王对教会长久以来的敌对情绪本因他的一个私生女嫁给了莱昂纳多·德拉·罗韦雷

(Leonardo della Rovere) ——教皇数不胜数的侄子之一——而有所缓和，现在他们的关系因为对佛罗伦萨年轻领袖的不信任而变得更加紧密。

到了1476年，洛伦佐面临的困境又进一步恶化。他最坚定的盟友加莱亚佐·玛丽亚·斯福尔扎在圣史蒂芬日（St Stephen's Day）去做弥撒的路上被三个年轻的刺客暗杀了。加莱亚佐·玛丽亚的儿子此时只有7岁，所以孩子的母亲宣布自己为摄政王；但是一群叔叔们却不认可这个决定，为王位继承权争吵不休。王位之争一日不了结，洛伦佐就一日不能指望米兰来与他共同抵御正在聚集的谋求推翻他的叛乱者们。

1477年年初的几周内，三个主要谋划者聚集到了罗马：第一个是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他的野心可不是成为一个伊莫拉领主就能满足的；第二个是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郁郁不得志的比萨准大主教盼着借此机会更上一层楼，拿下佛罗伦萨大主教一职；第三个则是弗朗切斯科·德·帕奇（Francesco de' Pazzi），是帕奇家族在罗马的银行经理，一个矮小、阴郁、“极端自负和高傲”的年轻人，他认为帕奇家族替代美第奇家族成为佛罗伦萨统治者的机会已经到来了。

帕奇家族是一个比美第奇家族历史更加久远的家族。^[1]他们的一位祖先曾经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并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Holy Sepulchre）带了一些燧石回到佛罗伦萨。这些燧石后来被存放在圣使徒教堂（Sant' Apostoli）^[2]。直到十三世纪初，这个家族还对商业贸易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是到了1342年，他们却宣布与历史悠久的家族血统决裂，以获取平民身份来参选政府官员。后来，他们在银行业赚了大钱。到了十五世纪早期，当时的家族领袖安德烈亚·德·帕奇（Andrea de' Pazzi）斥巨资雇用布鲁内莱斯基在圣十字教堂旁边建造了帕奇堂。^[3]安德烈亚的儿子皮耶罗用在建精美藏书室上的钱远多于他父亲建帕奇堂的开销。后来接替他成为家族主人的弟弟雅各布（Jacopo）却更喜欢攒钱而不是花钱。

雅各布绝对是一位非常吝啬的老人，但是好赌成性。全佛罗伦萨的人都知道他一输钱就发脾气。他认为政变成功的概率极其渺茫，所以当年轻的亲戚弗朗切斯科来向他通报正在罗马筹划的阴谋之时，他的态度“比冰还冷”。另外，他十个侄子之一的古列尔莫是洛伦佐的姐夫，他本人和洛伦佐的关系一直不错，尽管洛伦佐的统治意味着帕奇家族永远不可能在佛罗伦萨拥有任何实权，但是他倒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和其他家庭成员一样，他当然也为洛伦佐干涉乔瓦尼·博罗梅奥（Giovanni Borromeo）的财产一事感到不悦：帕奇家族的一员娶了乔瓦尼·博罗梅奥的女儿，并希望将来能够继承妻子家族的财产；但是当老博罗梅奥去世后，一项据称是美第奇家族推行的新法律刚好获得通过，于是本来应由帕奇夫妇继承的财产转而被乔瓦尼·博罗梅奥的侄子继承。众所周知，这个侄子是美第奇支持者，而帕奇夫妇则不是。尽管如此，雅各布·德·帕奇并不认为博罗梅奥事件足以严重到要策划一次政变。

弗朗切斯科以为如果能证明自己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也许老帕奇就会被说服。于是他又找上了吉安·巴蒂斯塔·达·蒙泰赛科（Gian Battista da Montesecco），后者是一个多次为教廷提供优良军事服务的雇佣军指挥官，也是一个不熟悉阴谋诡计的粗勇武夫。起初他并没有明确表态，只解释说自己是受雇于教皇和他的外甥伊莫拉领主吉罗拉莫·里亚里奥的，非经他们许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弗朗切斯科向他保证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教皇的利益；至于吉罗拉莫·里亚里奥本人，更是此次行动的策划者之一，参与其中的还有比萨大主教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此时的蒙泰赛科还是没有被说服，后来弗朗切斯科和萨尔维亚蒂一道再次向他施压时也依然不起作用。第二次两人来访时对蒙泰赛科说：洛伦佐对教皇大不敬；只要洛伦佐活着，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对伊莫拉的统治就“连个豆子都不值”；佛罗伦萨人都憎恨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只要给一点儿鼓励，他们就会奋起反抗现在的统治者。

然而，蒙泰赛科充满疑虑地说：“大人们，做事前请三思，佛罗伦萨可不是什么小事呀。”

“对佛罗伦萨的情况我们比你了解的多得多，”大主教显然已经对这个顽固的军人失去了耐心，他反驳道，“我们的计划必将成功，就像我们三个人坐在这里一样真切。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争取雅各布·德·帕奇先生的支持……只要获得他的支持，事情就十拿九稳了。”

渐渐地，蒙泰赛科开始动摇，最终提出只要得到教皇的许可，他就加入叛乱者的阵营。因此，弗朗切斯科和萨尔维亚蒂答应带他去见教皇西克斯图斯。

在随后的接见中，教皇告知蒙泰赛科，立即解决“佛罗伦萨的问题”确实是他的意愿。

“但是，圣父啊，如果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不死，这个问题恐怕没法解决。”

“杀人与教会的宗旨不符，我不希望也不同意任何人在这件事中丧命。尽管洛伦佐是个恶棍，并且对我不敬，但是我并不是要他死，而是希望更换政府中的执政者。”

“我们会尽一切可能保他不死，”吉罗拉莫说，“但是如果他必须死，教皇陛下能否赦免杀他之人的罪过？”

“你真是个傻子。我告诉你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伤及他的性命，只要实现政府更迭就好。而且我再对你说一遍，吉安·巴蒂斯塔，我非常希望更替政府，洛伦佐这个恶棍、这个卑鄙的无赖（*furfante*）从来不尊重我，只要把他赶出佛罗伦萨，我在共和国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我会非常满意。”

“教皇陛下说得极是。请放心，我们会尽一切可能实现您的愿望。”

“去吧，除了杀人，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圣父，您是否满意由我们来负责执行此次计划？您是否相信我们会取得成功？”萨尔维亚蒂问教皇。

“我很满意。”

教皇于是起身，再一次向他们保证会提供“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的任何可能需要的协助”，然后就让他们退下了。

三个人离开时仍然和来时一样确信：若要计划成功，就必须杀了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不论教皇怎么明令禁止，到非走这一步不可的时候，教皇也一定会赦免杀人者。

受到这次接见的鼓舞，蒙泰赛科开始招募所需的士兵并亲自前往罗马涅，与托伦蒂诺、伊莫拉和卡斯泰洛城的雇佣军首领们一起商讨战术。之后又骑马翻过亚平宁山脉直奔佛罗伦萨，向洛伦佐转达吉罗拉莫·里亚里奥的友好和善意。

当蒙泰赛科到达卡法焦洛时，洛伦佐正在为克拉丽切的一位亲属服丧；但他还是如以往一样亲切、健谈并且充满魅力。他提起里亚里奥时就像提到好朋友一样友善；蒙泰赛科完全为他的个人魅力所折服，开始后悔自己暗中执行的任务。在洛伦佐的陪同下，蒙泰赛科回到了佛罗伦萨，来到了他在坎帕尼亚（Campagna）的住处，雅各布·德·帕奇也如约前来，因为蒙泰赛科就是来给他递送里亚里奥和大主教的信件的。

雅各布像往常一样阴郁、易怒而且消极。“他们会为此折断脖子的，”他对蒙泰赛科说道，“我比他们更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不想听你说什么，我不想听任何关于你们阴谋的事。”

然而当雅各布听蒙泰赛科复述了被教皇接见的过程之后，他的态度便完全转变了，很快他就成了一位虽谈不上狂热坚定，但也是全心全意的阴谋支持者，甚至准备随着事态发展而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他建议说，执行暗杀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些理由让美第奇家的两兄弟分开，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同时杀掉两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邀请洛伦佐去罗马并在那里将其暗杀，朱利亚诺则在佛罗伦萨找机会解决掉。不过洛伦佐拒绝了前往罗马的邀请，所以阴谋计划者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在两兄弟的地盘上杀掉他们，最稳妥的办法自然是在他们参加娱乐活动、身边没有护卫的时候下手。

在娱乐活动中执行暗杀的机会果然出现了。教皇十七岁的甥孙拉法埃拉·里亚里奥（Raffaele Riario）原本就读于比萨大学，如今刚刚被封为枢机主教。他应邀来佛罗伦萨并暂住在位于蒙图盖

（Montughi）的雅各布的乡村别墅里。拉法埃拉写信告知洛伦佐自己的到来。此时的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一起住在菲耶索莱的美第奇别墅里。阴谋计划者们相信一定能找到用匕首或毒药暗杀两人的机会，不是在蒙图盖，就是在菲耶索莱。

洛伦佐收到年轻的枢机主教的信件之后，立刻邀请他来菲耶索莱。到了约定好的那天，洛伦佐带着儿子皮耶罗，与波利齐亚诺一起骑马到蒙图盖，准备亲自陪同枢机主教及其随从返回菲耶索莱参加宴会。洛伦佐先为自己的弟弟没能前来迎接枢机主教而致歉，因为他在一次意外中摔断了腿，现在只能卧床休养，很遗憾不能参加宴会。鉴于此，阴谋者们决定改变计划，等朱利亚诺伤好以后再想办法。

此时阴谋者们已经决定到佛罗伦萨去执行暗杀。因为枢机主教拉法埃拉·里亚里奥询问洛伦佐是否可以去看慕名已久的美第奇宫的珍宝，并且提议下周日是个合适的日子，这样他就可以参加大教堂的大弥撒时顺路去参观美第奇宫。洛伦佐立刻表示同意并且开始为尊贵的客人安排宴席，还向佛罗伦萨的各界名流，以及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和费拉拉的大使们发出了请帖。与此同时，他的敌人们也在为席间暗杀美第奇两兄弟做着准备。可是到了最后一刻，阴谋者们的计划似乎又要被迫改变，因为朱利亚诺的健康状况仍不允许他出席这次宴会，除了伤腿之外，“他的眼睛也发炎了”。

获悉暗杀计划的人太多了，帕奇家族觉得如果再一次推迟，难保消息不被泄露。更重要的是，蒙泰赛科的军队集结在各个战略要塞，黄昏时分就能抵达城墙下了。如果不能在宴会上同时杀了美第奇兄弟，他们就必须在大教堂弥撒期间除掉二人。暗杀者觉得这个计划也很理想。弗朗切斯科·德·帕奇可以在贝尔纳多·班尼迪·巴龙切利（Bernardo Bandini Baroncelli）的帮助下用刀刺杀朱利亚诺。巴龙切利是一个投机商人，他不但把家产挥霍一空，还欠了重要的生意伙伴帕奇家族一大笔钱，所以急于借此机会大赚一笔。在他们刺杀朱利亚诺的同时，蒙泰赛科可以去刺杀洛伦佐，但是后者非常反对这个安排。在见到洛伦佐之前，蒙泰赛科对自己说杀死他是在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但是自从和洛伦佐交谈过，他就越来越厌恶自己接受的这个任务。此时他看到了逃避任务的机会，他的良心不允许自己“犯下谋杀这样亵渎神明的罪行”；他不能在“上帝可以看到自己的地方”冷血地夺取一个人的生命。让阴谋者们庆幸的是，有两个不怎么小心谨慎的教士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暗杀任务。这两个身材瘦削、怒火中烧的教士分别叫安东尼奥·马费伊（Antonio Maffei）和斯特凡诺·达·巴尼奥内（Stefano da Bagnone）。安东尼奥是沃尔泰拉人，因为不久前在家乡发生的起义被洛伦佐镇压而一直怀恨在心；斯特凡诺则是雅各布·德·帕奇一个私生女的家庭教师。作为教士，他们用刀的技

术肯定不如蒙泰赛科那样让人放心，但毕竟是以二敌一，如果攻其不备，趁洛伦佐反抗之前给出致命一击，应该也不是完全没有胜算。

暗杀者们预计大钟会在弥撒主持者起立之时敲响，而教堂钟声响起之时就是同时袭击两兄弟的最好时机。这个时间点非常理想，因为暗杀者们既可以看到弥撒主持者的动作，也可以听到钟声，这些都能成为不会被错过的行动信号。此外，在那一刻，无论是暗杀目标还是其他会众都会垂下目光以示敬意，而暗杀者正好可以借此出击。一旦暗杀成功，大主教萨尔维亚蒂会和雅各布·迪·波焦·布拉乔利尼（Jacopo di Poggio Bracciolini）——一个充满野心、奢侈无度以至于穷困潦倒的男子，他的父亲还是科西莫的一个人文主义学者朋友——以及大批武装支持者一起冲进市政厅，杀死任何胆敢反抗他们的执政官。

1478年4月26日星期日上午接近11点的时候，年轻的拉法埃拉·里亚里奥骑马从蒙图盖来到佛罗伦萨，他在美第奇宫的院子里（*cortile*）下马，然后被领到了二层一间专门为他准备的房间里，他在这里换上了枢机主教的法衣。准备妥当之后他走下楼去，在楼梯底端见到了洛伦佐，后者陪同他一起前往大教堂。路上他们还遇到了大主教萨尔维亚蒂，然而萨尔维亚蒂并没有和他们一起进入大教堂，理由是要去探望自己病重的母亲。洛伦佐带着枢机主教走到主祭坛之后就自行走到了站在回廊上的一群朋友中间。因为中殿里没有椅子，大批的会众可以随意走动。

朱利亚诺此时还没有出现，所以弗朗切斯科·德·帕奇和巴龙切利赶回美第奇宫接他，却发现他因为腿伤的困扰最终决定不去参加弥撒了；不过最后他们还是说服他改变了主意。朱利亚诺一瘸一拐地沿拉尔加街向大教堂走去，弗朗切斯科·德·帕奇亲热地用胳膊揽着他，说他自受伤以来好像胖了不少，边说边假意在朱利亚诺身上摸

索，其实是为了察看他衬衣下面有没有穿铠甲。除了证实朱利亚诺没有穿铠甲之外，帕奇还高兴地发现他也没有带佩剑。

进入大教堂之后，弗朗切斯科·德·帕奇和巴龙切利径直走向了唱诗班的北侧。朱利亚诺礼貌地跟随在他们身后。一直走到朝向赛尔维街（Via de' Servi）的大门前二人才停下。而此时洛伦佐依然站在主祭坛一边的回廊上，在吉贝尔蒂用来分隔唱诗班与人群的木制屏风的另一侧。洛伦佐身边最近的是他的朋友波利齐亚诺，此外还有其他四个朋友，分别是菲利波·斯特罗齐（Filippo Strozzi）、安东尼奥·里多尔菲（Antonio Ridolfi）、洛伦佐·卡瓦尔坎蒂（Lorenzo Cavalcanti）以及美第奇银行里昂分行的前任经理弗朗切斯科·诺里（Francesco Nori）。而那两个准备暗杀他的教士安东尼奥·马费伊和斯特凡诺·达·巴尼奥内则紧挨着站到了他的身后。

钟声一响起，两名教士就拔出了藏在袍子下面的匕首。马费伊非常不专业地先用手扶住洛伦佐的肩膀，似乎是为了让自己稳住或是为了稳住目标。洛伦佐回头时已经感觉到匕首的尖端贴近了自己的脖子。马费伊用力刺出匕首，但只划破了绷紧的肌肉。洛伦佐一边跳开躲避，一边扯下斗篷迅速缠绕在手臂上作为简易的盾牌。另一只手则拔出佩剑，朝两个教士砍去。那两个教士见他反应如此迅速已经吓破了胆，洛伦佐毫不费力地就将他们击退了。随后他奋力一跃翻过圣坛围栏，埋头冲向新圣器收藏室。

在圣坛另一侧，朱利亚诺残破的尸体已经倒在了地上。钟声敲响时他顺从地低下了头，巴龙切利一边大喊着“叛徒，受死吧！”一边用力将匕首垂直地插进了朱利亚诺的头顶，他用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乎将朱利亚诺的头劈成了两半。弗朗切斯科·德·帕奇随后还疯狂地将匕首反复刺入已经毫无反应的尸体，甚至连匕首尖端误扎进自己的

大腿都没有知觉。朱利亚诺倒地之后，两个暗杀者竟然还对尸体施以暴行，最终在他身上留下了多达19处刀伤。

朱利亚诺倒在血泊中后，巴龙切利跨过他的尸体向新圣器收藏室冲去，途中不仅一刀要了弗朗切斯科·诺里的性命，还划伤了洛伦佐·卡瓦尔坎蒂的手臂。不过等他赶到收藏室厚重的铜质大门时，洛伦佐已经冲了进去，波利齐亚诺在其他几个朋友的帮助下将大门紧闭。洛伦佐不断地询问：“朱利亚诺呢？他安全了吗？”但是没有人能回答他。安东尼奥·里多尔菲帮洛伦佐吸出了他脖子伤口处的血，以防刀上有毒；与此同时，另一个和他们一起躲进收藏室的朋友西吉斯蒙多·德拉·斯图法（Sigismondo della Stufa）则爬上了通往德拉·罗比亚（della Robbia）唱诗班阁楼的梯子，从那里俯瞰大教堂中的情景。

此时教堂中的会众已经乱作一团，有人大喊穹顶要塌了。洛伦佐的姐夫古列尔莫·德·帕奇大声呼喊着自己是无辜的。朱利亚诺的尸体还躺在原地。拉法埃拉·里亚里奥呆若木鸡地站在主祭坛旁边，已经完全吓傻了。那两个袭击洛伦佐的教士和朱利亚诺的暗杀者们显然都已经逃跑了。洛伦佐在朋友们的护送下急匆匆地回到了美第奇宫。

此时，大主教萨尔维亚蒂和其他密谋者已经按照计划带着武装支持者来到了市政厅，其中大部分是假扮主教随从但依然面露凶相的佩鲁贾雇佣兵。萨尔维亚蒂通知首席执政官切萨雷·彼得鲁齐（Cesare Petrucci）说，教皇有紧急谕令要传达给他，当时正在吃饭的彼得鲁齐因而下令允许萨尔维亚蒂及其随从进入宫殿。萨尔维亚蒂本人被领到了一间接待访客的房间里，那些佩鲁贾人被安排在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并关上了门，而包括雅各布·迪·波焦·布拉乔利尼在内的其他随从则被拦在了走廊外。

彼得鲁齐吃完饭后来会见萨尔维亚蒂，后者此时已经紧张得全身发抖。他向彼得鲁齐传达所谓的教皇口信，不但声音含混不清、断断续续，脸色也变来变去，还不时地瞥向门口的位置。彼得鲁齐只听了几句，就扬声召唤侍卫，萨尔维亚蒂见此立刻冲出房间，向自己的人大喊行动的时机到了。然而，回应他的只是一些听不清的叫嚷声和砸门声。原来彼得鲁齐当选首席执政官之后，马上对市政厅里的各个房间进行了改装，房间内的人无法从里面打开房门，所以那些佩鲁贾人实际上已经被有效地控制住了。

当里面的人开始砸门的时候，雅各布·迪·波焦·布拉乔利尼就冲向了首席执政官，不过后者却抓着他的头发把他掀翻在地。然后身强力壮的首席执政官随手抄起一个烤肉叉作为武器，一边大声召唤执政官跟随他去敲响牛钟，一边追上大主教及其同伙，毫不费力地把他们全打倒在地。此时钟声已经响彻整个城市，所有人都涌向广场。帕奇家族的成员和一小撮支持他们的人骑着马沿街大喊：“自由！自由！人民的自由！打倒美第奇！打倒小红球！自由！自由！”尽管也有少数人应和他们的叫喊，但是大部分人还是用坚定的声音回应他们：“小红球万岁！小红球万岁！小红球！小红球！小红球！”

此时，一支由50名全副武装的美第奇支持者组成的队伍已经冲进市政厅，在宫殿守卫的配合下向佩鲁贾人发动了进攻，并将其全部剿灭，然后还把他们滴着血的头颅挂在长矛和宝剑顶端带回到广场。朱利亚诺遇害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市政厅。雅各布·迪·波焦的脖子上拴着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绑在一条横木上，被直接抛出了市政厅的窗口。大主教萨尔维亚蒂也是这个下场。剩下的弗朗切斯科·德·帕奇被发现躲藏在帕奇宫里，大腿的伤口还在不停流血。人们扒光了他的衣服，把他拽到广场，按照和雅各布·迪·波焦一样的方式处置。大主教的另两个同谋被勒死后，尸体也被这样拴着抛出了窗外。五个人就这么被吊在半空，下面就是骚动的群众。宫殿北侧雉堞墙投下的阴

影中，奄奄一息的身体还在挣扎扭动。此时已经来到广场上的波利齐亚诺记录下了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在绳子末端不断挣扎的大主教，眼睛已经突出眼眶，狠狠地咬住了他旁边弗朗切斯科·德·帕奇赤裸的身体。

受市政厅处决的强力刺激下，成百上千的人们走上大街小巷，寻找其他同谋者或是任何可以借机扣上共犯罪名的不受欢迎的市民。这些人聚到美第奇宫的窗口下要求面见洛伦佐。洛伦佐于是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的脖子上缠着绷带，锦缎马甲上满是血污。他向大家说明自己只是受了一点轻伤，并且请求大家不要仅仅因为怀疑谁参与了谋杀就肆意报复。他还敦促人们暂时养精蓄锐，准备好应对策划了这起阴谋的共和国的敌人们，因为他们在阴谋被挫败之后必然还要向这座城市发动新的进攻。

人民也许为洛伦佐的话而欢呼，却完全没有按他说的去做。他们不但袭击阴谋策划者，也袭击那些他们想要扣上同谋者帽子的人。这些受害者中有些直接被杀死了，有些则受了重伤，人们甚至拖着他们的尸首沿街示众。这样的暴乱持续了好几天，连附近农村的人都蜂拥进城，期待着有什么热闹可看，或是有什么好处可捞。最终大约共有80人被无情地杀害了。

参加这次政变的人几乎都没能逃脱惩罚。年轻的枢机主教拉法埃拉·里亚里奥在暗杀发生时完全被吓傻了，站在大教堂的主祭坛上不知所措，直到有人把他带到了安全一些的老圣器收藏室里。后来还是洛伦佐派仆人护送他回到了美第奇宫。暴乱结束后，也是洛伦佐派人护送乔装打扮的枢机主教回到了罗马。据说，终其一生，枢机主教因为目睹这个可怕的事件而留下的惨白面色从未褪去。那个想要谋杀洛伦佐的教士的兄弟拉法埃拉·马费伊（Raffaele Maffei）以及大主教的亲戚阿韦拉尔多·萨尔维亚蒂（Averardo Salviati）也都是在洛伦

佐的干涉下才没有受到暴民的伤害。除了无法证实一个叫纳波莱奥内·弗兰切西（Napoleone Francesi）的人是否参与了阴谋之外，所有已知的阴谋者中没有一个能逃脱公开的或是暗中的复仇。雅各布·德·帕奇因为阴谋失败而深受打击，愤怒绝望地满地打滚，甚至疯狂到割下了自己的耳朵装进盒子。他后来设法逃到了卡斯塔尼奥

（Castagno）的村子里，但是村民认出了他并把他带回佛罗伦萨。在城里他不仅受到严刑拷打，后来还被扒光衣服，从窗口抛出去并吊在了大主教的尸体旁边。雅各布的尸体起初被埋在了圣十字教堂。但是不久后恰逢连日暴雨，人们认为这是他邪恶的灵魂招来的祸患，于是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扔到了一个苹果园的水沟里。不过这还不是他的归宿，后来又有一个暴民拖着他的尸体沿街示众，还大喊着：“快为伟大的骑士让路！”这个低俗到令人发指的恶作剧后来发展到更加不堪的地步：人们把他的遗骸支在帕奇宫门口，用已经腐烂的头颅拍着门喊道：“开门来，你的主人要进去！”之后，已经腐烂的尸体被扔进了阿诺河，可是又被一群孩子捞了上来，挂在一棵柳树上鞭打，最后又重新扔回了河里。

至于那两个教士，安东尼奥·马费伊和斯特凡诺·达巴尼奥内都在躲藏的过程中被抓住了。他们先是受了阉割，然后被送上了绞刑架。雅各布的弟弟雷纳托·德·帕奇（Renato de' Pazzi）被发现躲在穆杰洛的一栋房子里，人们并没有证据证明他参加了密谋，却还是无情地把他吊死了。他死的时候穿着一身农民才穿的破烂工作服，“好像是去参加化装舞会一样”。他的家人虽然逃过了死刑，但被判处了监禁，被关押在沃尔泰拉的地牢里。洛伦佐的姐夫古列尔莫·德·帕奇似乎是无辜的，所以只被幽禁在他自己的乡村别墅里。

最后几个被抓到的主要密谋者中就有蒙泰赛科，他直到5月1日才被捉拿归案。在严刑拷打和秘密审判之下，他详细供述了整个阴谋的经过以及教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审判官问出了所有有用的信息之

后，作为军人的蒙泰赛科被判处了砍头的刑罚，并于5月4日在巴杰罗宫的院子里被处决了。

协助杀害朱利亚诺的巴龙切利起初成功逃出了佛罗伦萨的领地并一直跑到了君士坦丁堡；不过在那里他还是被认了出来，洛伦佐向苏丹王提出了正式的请求，于是逃犯被一路押解回到了佛罗伦萨，最后也是在巴杰罗宫的院子里被处决了。

帕奇家族的耻辱并没有随着家族成员的处决而终结。执政官们颁布了一个法令，永远禁止任何人使用这个家族的姓氏及纹饰图案。他们的财产都要被没收，他们的家族宫殿也更换了新的名字，整个城市里任何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地方也都要改名。象征他们家族的海豚图案不论出现在哪里，都要被剔除或磨平。娶了帕奇家族女儿的男人永远不能担任共和国政府官员，所有与这个古老家族相关的仪式都要被废除，其中就包括在复活节前夜将神圣的燧石抬到帕奇宫的仪式。^[4]按照佛罗伦萨的传统，帕奇家族叛徒及其同谋者的画像还要被画到巴杰罗宫的墙上。这些画像是由波提切利创作的，酬劳是一个人像40弗罗林币。每个人像的脖子上都缠着绳子，代表着他们被处决的方式，只有纳波莱奥内·弗兰切西是被绳子拴住脚踝吊起来的，暗示他还在逃。每个图像下面还刻有洛伦佐写的恰当评论。

乔焦·瓦萨里记录说，与这些侮辱性图案相对的是：

洛伦佐的朋友和亲属们为感谢上帝保他度过劫难，下令在城市各处竖立起他的雕塑。于是在韦罗基奥的帮助和建议下，（一个技艺高超的蜡像艺人）制作了三尊真人大小的蜡像。蜡像内部有木制框架作支撑，外面是腊制的服装，连衣服上的褶皱都描绘得真实鲜活。然后他又用更厚的蜡层，依照洛伦佐本人的样貌特征制作头和四肢，最后用油彩画上头发和饰物。完成后的蜡像是如此精致自然、栩栩如生，到今天看来也还是如此。三尊蜡像之一陈列在圣加洛街上的基亚里托修女堂（Chiarito），就摆在十字架受难像之前，这尊蜡像身上的衣服是完全按照洛伦佐脖子上扎着

绷带、站在美第奇宫窗口向人民讲话时的穿着来制作的……第二尊蜡像穿着普通佛罗伦萨市民穿的长袍，被陈列在圣母领报教堂里，摆在卖蜡烛的桌子旁矮门的上方。第三尊蜡像被送到阿西西的圣母安杰利教堂，摆在了圣母像之前。

[1]. 帕奇家族宫殿现在称为帕奇夸拉泰西宫（Palazzo Pazzi-Quaratesi），始建于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可能是由朱利亚诺·达·圣加洛设计的，现在位于普罗孔索卢街（Via Proconsolo）10号。在帕奇谋划叛乱后，该宫殿被美第奇接管，后来又转给了奇博和斯特罗齐家族。

[2]. 圣使徒教堂和洗礼堂是同一个时代修建的。十六世纪的大门由贝尔代托·达·罗韦扎诺（Benedetto da Rovezzano）设计建造。木质彩绘房顶建于十四世纪早期。

[3]. 布鲁内莱斯基去世后，帕奇堂由朱利亚诺·达·马亚诺负责完成，教堂的木门也是他制作的。陶瓷装饰是卢卡·德拉·罗比亚设计的。圣安德鲁的彩绘玻璃是真品的仿制品，真品及其他许多珍宝现在被收藏在圣克罗切歌剧博物馆，本来都是属于修道院的。

[4]. 焰火节已经被复兴。以前是在复活节周日午夜弥撒时举行，现在改为在复活节当天中午举行。燧石都是从圣使徒教堂取来的，人们会在指定的时间，在大教堂的圣坛前用燧石打出的火花点燃鸽子型的火箭，诚挚地希望鸽子型火箭能沿着拴好的线射向外面广场上堆满烟花爆竹的货车，将其引燃之后再沿着线落回到大教堂。如果仪式顺利成功，就预示着这一年会有好收成。

第十一章 佛罗伦萨的救世主

“那个邪恶之人的儿子和毁灭之人的养子”

1478年的耶稣升天节（Ascension Day）这一天，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被安葬在圣洛伦佐教堂老圣器收藏室的斑岩石棺中。这个石棺也是他和他的兄弟为纪念父亲和叔叔而建造的。朱利亚诺遇害时年仅25岁，还没有结婚，不过在这一年年初，他的一个情妇菲奥雷塔·戈里尼（Fioretta Gorini）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朱利奥

（Giulio）。^[1]没过多久，孩子的母亲也去世了，洛伦佐于是收养了他，并把他当作亲生骨肉一样看待。

至于他自己的三个儿子，洛伦佐是这样评论的：大儿子呆，二儿子灵，小儿子善。不过洛伦佐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对女儿们也一样疼爱有加。他喜欢和她们一起做游戏，马基雅维利后来评论他的这一习惯时隐约带有一丝惊讶和不满。洛伦佐曾经为孩子们写了一个剧本，名字叫作《圣乔瓦尼和圣保罗》（*San Giovanni e San Paolo*）。剧本不仅给每个孩子都安排了一个角色，连他自己也有一个。洛伦佐让孩子们记住，无论他有多少国家大事要去处理，也无论他们有多少课程要去学习——孩子们的教育一直是他非常重视的一件事——他都会挤出时间和他们谈心。“如果连凶猛的野兽都关爱自己的幼仔，”洛伦佐写道，“那我们对孩子的宠爱岂不是应该得多。”

洛伦佐与孩子们分离的时候总是会想念他们，而孩子们也会像他想念他们一样想念自己的父亲。“洛伦佐什么时候来？”孩子们总是这样问自己的老师或母亲。在帕奇家族阴谋之后那段不稳定的时期内，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一起被送到了皮斯托亚，暂住在他们的朋友

潘恰蒂基（Panciaticchi）家中。同行的还有波利齐亚诺，他是年长的几个男孩儿的家庭教师。波利齐亚诺当然不愿意离开佛罗伦萨，不过他并没有在写给洛伦佐的信中抱怨什么。波利齐亚诺会向洛伦佐讲述孩子们的情况，说潘恰蒂基一家以“极大的善意”接待了他们，请他放心；还说克拉丽切一切安好只是心情不畅，除了从佛罗伦萨来的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好消息外，什么也不能让她高兴起来。“她几乎连门都不出。我们什么也不缺，很多人送来礼物都被我们拒绝了，只留下了沙拉、无花果、几小瓶葡萄酒和一些烤鱼卷（*beccafichi*）。这里的人不会拒绝我们的任何要求……我们一直很警惕，还安排了侍卫把守大门。等你有时间了一定要来看看家人，他们一心盼着你来。”

1478年的整个夏天，洛伦佐的家人都住在皮斯托亚。冬天临近的时候，他们搬到了卡法焦洛的更加安全的别墅里。寒冷的冬天让这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单调，波利齐亚诺越来越难以忍受这样无聊的日子，但是他在写给洛伦佐的信中还是没有过多抱怨；不过在面对洛伦佐的母亲卢克雷齐娅的时候，波利齐亚诺可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快。这里的天气冷得吓人，所以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只能穿着拖鞋和大衣坐在火炉前；这里还总是下雨，孩子们根本没法到户外去，波利齐亚诺只好为他们设计一些可以在房间里玩的游戏。为了让游戏更有意思，输了的孩子会被罚吃饭时少吃一道菜，不过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自从有了这项措施之后，输了的孩子们往往会哭闹起来。更糟糕的是，波利齐亚诺和克拉丽切相处得并不愉快，这让本就艰苦的日子变得更加难熬。

依照克拉丽切缺乏想象力又古板的罗马思维，年幼的乔瓦尼学习拉丁文时诵读的竟然是古典文本而非祷告诗令她惊骇不已。而波利齐亚诺知道洛伦佐会认可他的教育方法，所以也不愿做出改变。由此引发的争吵被不断扩大，最后克拉丽切把波利齐亚诺赶出了别墅。虽然洛伦佐觉得可以原谅妻子解雇了他的朋友，并且重新指定了温和一些

的马蒂诺·达·科梅迪亚（Martino da Comedia）作为孩子们的教师，但他还是要让妻子明白自己并不认可她的行为。克拉丽切反过来责备他不该许可令人讨厌的波利齐亚诺使用菲耶索莱别墅里的私人房间，说他这样宽恕一个被自己扫地出门的人让她成了所有人的笑柄。洛伦佐忍无可忍地给克拉丽切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来训斥她的行为。他还提醒说，她没有按照自己的要求把波利齐亚诺的书籍送还给他，并且要求她当天就把书送出。

尽管这次争吵很激烈，但这是洛伦佐和克拉丽切仅有的一次严重争吵。克拉丽切自然是远远配不上洛伦佐的。洛伦佐的母亲当年在这个年轻的罗马姑娘身上发现的害羞、诚实和讨人喜欢虽然还在，但克拉丽切实际上一直没能融入佛罗伦萨的生活。在内心深处，她还是个罗马人，过于自负和任性，为自己古老的血统而骄傲，为她丈夫和教皇之间的纠纷而担忧，丈夫和机智、诙谐、玩世不恭的朋友们之间她根本听不懂的谈话更是让她如坐针毡。

洛伦佐对自己的妻子肯定是不忠的，不过她对此似乎并不怎么介意，毕竟在那个时代没有几个丈夫会对妻子忠诚。而且洛伦佐在这个问题上也很谨慎。他对卢克雷齐娅·多纳蒂的迷恋仅仅停留在罗曼蒂克的层面，他们在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认识了，虽然他在锦标赛上佩戴了她的信物，还写诗赞美她美丽的眼睛和双手，以及她精致脸庞上不断变化的表情，但是克拉丽切了解佛罗伦萨的风俗，也知道洛伦佐绝不会让卢克雷齐娅这样富有的多纳蒂家族的女儿做自己的情妇。况且，克拉丽切也很喜欢卢克雷齐娅，她们相识的时候，卢克雷齐娅已经结婚了。克拉丽切还非常高兴卢克雷齐娅能成为自己长子的教母。洛伦佐和其他女人的风流韵事也没有引起克拉丽切多少关注。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说，“风流多情”的洛伦佐在40岁的时候疯狂爱上了多纳托·本奇（Donato Benci）的妻子巴尔托洛梅亚·代·纳西（Bartolommea dei Nasi），并经常在她的别墅过夜，直到破晓前才

回到佛罗伦萨。如果确有此事，那要么是他对克拉丽切隐瞒了实情，反正克拉丽切并不在乎这种事；要么是这件事发生在克拉丽切去世之后。洛伦佐与其他女人的关系从来没有影响过他与妻子之间的感情。虽然克拉丽切和洛伦佐没有什么共同的喜好，她既不懂艺术，也不懂文学，更不用说政治或哲学了，但毫无疑问他们是深爱着彼此的。每次给丈夫写信的时候，除了引用一两句布道时牧师讲到的劝诫或说说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之外，克拉丽切就写不出别的了。不过她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丈夫的关爱，她的丈夫也同样如此。在他们之间的一封书信中，洛伦佐写道：

我已经平安到达了目的地，我想这是除了我的平安返回之外最能让你高兴的消息了。我也是这样思念着你和家。你要好好陪着皮耶罗，祖母孔泰西纳（洛伦佐年事已高的祖母，按照当时的习俗在1473年去世之前他们一直住在一起）和母亲卢克雷齐娅（也和洛伦佐一家住在一起直到1482年去世）。为我向上帝祈祷。如果有什么需要在我离开（米兰）之前带回去的就跟我说。你的洛伦佐。

克拉丽切全心全意地关爱着孩子们，尤其是女儿马达莱娜（Maddalena）。她总共生了10个孩子，其中3个没有活过婴儿期；而11岁路易贾的去世，更是加速了她生命的终结。当时克拉丽切已经患上肺结核有一段时间了，当病情有所好转之后，同样也生着病的洛伦佐决定去菲莱塔（Filetta）接受药浴治疗。然而他刚走9天，克拉丽切就离开了人世。这个消息让洛伦佐痛不欲生，他写道：“没有任何事能让我从这沉重的苦痛中解脱，这已经超过了我能承受的范围。祈祷上帝赐予我平静，并祈求我主让我在有生之年内免于承受最近接连发生的考验。”

费拉拉驻佛罗伦萨大使三天后才写信向公爵通报克拉丽切·德·美第奇的死讯。他说之所以没有及时通报，是因为他觉得这事不怎么重要。

正如洛伦佐担心的那样，帕奇家族阴谋的失败，再加上佛罗伦萨人对参与阴谋之人严厉的报复行为引发了罗马的狂怒。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带着300名长戟兵冲进了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多纳托·阿恰尤奥利的家并逮捕了他。要不是威尼斯和米兰大使强烈反对这种严重违反外交豁免权的行为，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就要将多纳托·阿恰尤奥利直接关进圣安杰洛城堡（Sant' Angelo）的地牢了。没能成功处置自己选定的替罪羊之后，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只得竭力鼓动舅舅用尽职权内的一切办法报复佛罗伦萨人，尤其是美第奇家族。教皇本人和外甥一样怒不可遏，根本不需要旁人煽风点火。他先是下令逮捕罗马境内所有主要的佛罗伦萨银行家和商人，不过想到枢机主教拉法埃拉·里亚里奥还被扣押在佛罗伦萨，又只好把这些人都放了。然后他又没收了所有他能掌握的美第奇银行的资产和美第奇家族的财物。他还免除了教廷金库对银行欠下的所有债务，并派一名罗马教廷大使去佛罗伦萨要求将洛伦佐交给教廷审判，并下达了一份冗长的针对“洛伦佐·德·美第奇——那个邪恶之人的儿子和毁灭者的养子——及其所有共犯和教唆犯”的驱逐令。所谓共犯包括了首席执政官和整个执政团，所有成员都被“认定为有罪、亵渎神明、受到诅咒、声名狼藉、不被信任、应被逐出教会并且无权立下遗嘱的人”。文件里还写道：“他们所有的财产都应由教会没收；他们的房子应当被夷为平地；他们的住所应当被废弃，成为无法入住的荒地。让永恒的废墟来见证他们永恒的耻辱。”教皇威胁说如果这些判决没有在两个月内执行，就要切断佛罗伦萨和外界的全部联系。然而光凭这些还是不能让教皇解气，他又正式向佛罗伦萨宣战，并且毫不费力地说服那不勒斯的国王费兰特也向佛罗伦萨宣战。

那不勒斯本来就巴不得将阿拉贡家族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托斯卡纳地区，国王费兰特的儿子卡拉布里亚公爵（Duke of Calabria）阿方索立即带着军队穿过了边境，占领了蒙特普尔恰诺（Montepulciano）

周边的地区。然后他派信使到佛罗伦萨冷酷地宣告了这座城市即将迎来的毁灭，同时还转达了教皇比之前驱逐令措辞更恶毒的口信。

对于这些以及后续的所有威胁恐吓，执政团给出了一份充满挑战的回复：

您说洛伦佐是暴君并要求我们将他驱逐，但是大多数佛罗伦萨人称他为人民的守护者……请记住您尊贵的职位是基督的代表，请记住交到您手中的圣彼得的钥匙不是为了让您能够如此滥用职权……佛罗伦萨会坚决地捍卫它的自由，我们相信基督知晓我们这一事业的正义，因此也必不会抛弃我们这些信主之人；我们还相信我们坚定的盟友会将我们的事业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我们尤其相信最坚定的基督徒法国国王路易，他一直是佛罗伦萨的庇护者和保护人。

虽然佛罗伦萨人大谈对盟友的信任，不过他们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去期待盟友的帮助。法国国王确实给洛伦佐写了一封充满友谊和同情的信，就教皇对洛伦佐的处理提出了抗议；除此之外还模糊地威胁要组建新的大议会，并重申安茹家族对那不勒斯的所有权。法国国王派遣菲利普·德·科米纳作为特使前往直意大利，不过就如科米纳自己所言，他们能给佛罗伦萨人的只有同情而已：“路易对佛罗伦萨人的偏爱也许在某些层面上是有影响力的，但实际上并不如我希望的那么多，除了随从，我没有军队可为佛罗伦萨人提供支持。”

要是早几年，佛罗伦萨人也许还可以期盼米兰提供军事协助，但是自从加莱亚佐·玛丽亚·斯福尔扎被谋杀之后，他的遗孀——也是他们年幼的儿子吉安·加莱亚佐（Gian Galeazzo）的监护人——与去世丈夫的弟弟们之间的王位之争一直没有停止，这使得米兰无法再成为意大利政治中一支有效的力量。最后由吉安·贾科莫·特里武尔奇奥（Gian Giacomo Trivulzio）领导的一支军队被派到了佛罗伦萨，可惜军队的人数太少，起不了什么作用。美第奇在罗马的亲戚奥尔西尼家族派来的雇佣军队伍人数也十分有限；同样人数有限的还有博洛

尼亚的军队，是由乔瓦尼·本蒂沃利奥提供的。多年前洛伦佐曾经代表父亲拜访过乔瓦尼·本蒂沃利奥，并且从那以后双方一直维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事实上，当所有东拼西凑的兵力集结到长官埃尔克莱·德·埃斯特（Ercole d' Este）手中时，包括这位高大英俊、精明谨慎的费拉拉公爵在内的大多数人都确信，佛罗伦萨这一次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已经抵达基亚纳河谷（Chiana valley）的那不勒斯军队即将要发起的猛攻了。

然而，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军队还不是佛罗伦萨所面临的唯一威胁。此时，教皇又鼓动锡耶纳和卢卡加入了他的阵线，并把自己军队的控制权委托给了令人敬畏的军人——乌尔比诺公爵费代里戈·达·蒙泰费尔特罗。看看教皇阵营的军队实力，再对比一下佛罗伦萨的杂牌军，菲利普·德·科米纳不得不相信，佛罗伦萨的独立即将终结。

佛罗伦萨人比科米纳乐观得多，他们仍然拒绝遵从教皇提出的任何要求。托斯卡纳地区的主教们对教皇驱逐令的回应尤其大胆，他们在佛罗伦萨的大教堂里举行会议，并全体一致认定执政团截至目前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完全正当。依据这一决定，他们还颁布了对教皇的驱逐令。前一年由贝尔纳多·琴尼尼（Bernardo Cennini）在佛罗伦萨建立起来的印刷厂印制了很多对教皇的驱逐令，并把它们散发到整个欧洲，每个标题都足够吸引眼球，比如《佛罗伦萨教士怒斥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檄文》（*Contrascommunica del clero Fiorentino fulminate contro il summon Pontifice Sisto IV*）。而这种态度也获得了其他神职人员、会众以及洛伦佐本人的完全支持。

至此，洛伦佐已经毫无争议地树立了他作为佛罗伦萨大业领导者的地位。他召集佛罗伦萨的重要人物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洛伦佐用带着鼻音的尖细声音向大家保证，如果他一个人，甚至是他一家人的流放或死亡能够换来佛罗伦萨的救赎，那么他甘愿牺牲。而雅各布

• 代 • 亚历山德里（Jacopo dei Alessandri）则代表大家向洛伦佐表示，他们一致决定坚决支持洛伦佐直到最后一刻。同时他们还指定了一个12人的侍卫队来保障洛伦佐的安全，并选举他加入紧急成立的十人战争委员会，专门处理佛罗伦萨的防务事宜。

这次战事之所以没有像科米纳预料的那样以佛罗伦萨的惨败终结，主要归功于运气和十五世纪意大利独特的战争传统，而非佛罗伦萨军队的战斗力或他们指挥官的卓越能力。费拉拉公爵似乎不愿意挑战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军队实力，后者不但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人，还碰巧是他妻子的哥哥。费拉拉公爵的军队一直与敌军保持着两日行军距离，所以他的队伍用了三周才走完从比萨到萨尔扎纳（Sarzana）短短50英里的路程。佛罗伦萨人催促他快些行进时，他嘲笑说这些建议都是“完全不懂战争的学究们”提出来的。佛罗伦萨的一位药材商卢卡·兰杜奇（Luca Landucci）评论说：“意大利军人的体系是这样的，只要你方把注意力转向掠夺那里的财物，我方就去掠夺这里的财物。短兵相接才不是我们真正想做的。”所以直至1478年11月，双方还没有打过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就各自退回驻扎地过冬去了。

转到来年，形势对佛罗伦萨更加不利了。首先，年幼的公爵吉安·加莱亚佐·斯福尔扎在争夺王位的斗争中取胜，不甘失败的叔叔们逃到了那不勒斯，在国王费兰特的怂恿下，又带着军队回到米兰打算以武力夺取政权。敌人卷土重来逼近伦巴让公爵夫人极为不安，所以她调回了支援佛罗伦萨的队伍去保卫她在米兰的政府。

公爵夫人尤其忌惮洛多维科·斯福尔扎（Lodovico Sforza）的回归。后者有个外号叫“摩尔人”。（il Moro），一方面是因为他受洗时取的名字是毛罗（Mauro），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肤色像摩尔人一样黝黑。其实洛多维科的样貌看上去有些脂粉气，嘴巴尤其小，头发也带着精致的卷曲。他是个虚荣自大、胆小懦弱，但也聪明绝顶的

人。他在艺术和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但识人用人却很糟糕。他玩世不恭，没有是非观，但是彬彬有礼、体贴入微。他不仅有行政和外交的天赋，还有着非凡的记忆力。总之是一个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敌手。

到了9月，洛多维科与公爵夫人达成协议，成了米兰的统治者。他认定米兰公国不宜再把处于覆灭边缘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当作盟友。与此同时，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军队一路冲杀，已经抵达埃尔萨谷地（Val d’ Elsa），并攻下了波焦因佩里亚莱（Poggio Imperiale）的堡垒。要不是在佛罗伦萨以南30英里的小镇科莱（Colle）受到了持续两个月的殊死抵抗，公爵早就兵临佛罗伦萨城下了。11月4日，科莱最终还是失守了。卢卡·兰杜奇在日记中写道：公爵的大炮共朝科莱“发射了1024枚炮弹”。此时已经入冬，那不勒斯的军队无法在埃尔萨谷地继续前行，于是卡拉布里亚公爵只得再一次撤回锡耶纳过冬。尽管又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此时佛罗伦萨已然处在了前所未有的危急时刻。七拼八凑的雇佣军首领之间争吵不断；费拉拉公爵因为斯福尔扎的撤离而乱了阵脚；一群乌合之众组成所谓的突击队，实际上是去托斯卡纳地区的乡村里为非作歹；佛罗伦萨城里还暴发了瘟疫；战时委员会为了保证军需而加征各种重税，人民也开始怨声载道。除此之外，佛罗伦萨的经济开始衰退，部分是因为英国人开始自己制造布料，所以几乎停止了对意大利的羊毛出口。成百上千的工人被工厂拒之门外，因为商人已经没有订单可供他们生产。洛伦佐清楚地意识到佛罗伦萨不可能再撑过新一轮的进攻，也知道他的盟友们都支持总体的和平，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让佛罗伦萨人认为意义非凡、勇气可嘉的决定：他要亲自前往那不勒斯，把自己送到敌人的宫廷之上。洛伦佐把管理城市的重任交给了刚当选的首席执政官托马索·索代里尼，然后就骑马向海岸进发。在去比萨的路上，他在圣米尼亚托泰代斯科镇（San Miniato Tedesco）给执政团写了一封信：

当我们的城市面临这样的危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深思熟虑了，必须马上行动……我已经决定，在诸位的许可之下，马上起航前往那不勒斯。我知道敌人的行动主要针对我一人，希望我此去将自己交由他们处置，就能让我的市民们重获安宁……既然我享有比任何一个市民都多的荣誉和责任，我也理应为我们的国家做出最多的贡献，哪怕是为此献出生命。我将抱着这样的决心前行。也许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愿，这场由我弟弟和我的鲜血引发的战争，也必须由我来终结。我的心愿是，无论代价是我的生存或死亡、灾难或兴旺，我都能为这座城市带来福祉……我的心中满怀希望，我祈祷上帝的恩赐助我履行任何一个市民都应时刻准备好为他的国家而履行的义务。我任凭执政团阁下的差遣。劳伦蒂乌斯·德·美第奇
(Laurentius de Medici)

根据菲利波·瓦洛里 (Filippo Valori) 的记录，当这封满怀感情的信在执政团里被当众宣读的时候，没有一个执政官不感动地潸然泪下。没有人相信国王费兰特的为人，据说他会把敌人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后展示在私人博物馆里，所以大家此时都以为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洛伦佐了。然而所有人也明白，除了他的牺牲，恐怕没有第二个办法能够挽救共和国了。因此执政团也只能任命他为驻那不勒斯大使，并祝福洛伦佐一切顺利。接到执政团回信的第二天，洛伦佐从瓦达 (Vada) 起航，并在1479年圣诞节前夕抵达了那不勒斯，当时他29岁。

站在码头上迎接他的是国王费兰特的二儿子费代里戈，洛伦佐还是个小男孩儿时就见过他，也很喜欢他。他们热情地相互问好。洛伦佐也受到了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妻子、天资聪颖的伊波利塔·斯福尔扎的热情接待，他们也是多年的朋友了。同样欢迎他的还有国王费兰特的主要顾问之一迪奥梅德·卡拉法 (Diomedes Carafa)，他是一位年事已高的作家、鉴赏家和收藏家。过去洛伦佐帮过他很多忙，每次他有朋友前往佛罗伦萨都会受到洛伦佐的接待和照顾，洛伦佐还送给他一个精致的铜马头雕塑，那也是卡拉法收藏的最好的罗马古董之一。事实上，洛伦佐的随从们很快就发现，此行远没有他们以为的那么有

勇无谋，更没有洛伦佐在给执政团的那封信中所描述的那么命悬一线。

写那封信之前，洛伦佐就开始秘密与那不勒斯宫廷通信，并确保他的前往不会受到冷遇。他搭乘的这艘船实际上也是那不勒斯人派来接他的。他知道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军队已经控制了托斯卡纳南部大片的土地，并且反对任何不以承认他的胜利为前提的和解方案；但是洛伦佐也知道国王费兰特对于法国国王不断重申安茹家族对那不勒斯统治权的威胁非常担忧，更不用说在南亚得里亚海沿着意大利海岸来来回回的土耳其舰队又抱着多少危险的企图。

不过，国王费兰特也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达成协议的人。他不但机敏狡猾、精于政治，更是个冷酷无情、报复心强、善于掩饰真实想法的人。要想猜出这样一个面色阴沉、臃肿肥胖、时不时就闹脾气一言不发的人到底喜欢什么，或者到底在想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科米纳就评论说：“没有人能知道他到底是生气还是高兴。”不过他和洛伦佐一样的是，他们都喜欢乡村生活、驯鹰术以及打猎。他们对诗歌的品位很相近，对新知识和古典时期的看法也很相似。在他们漫长的对话中，洛伦佐不是只谈眼下的战争和统一意大利的理想，而是多次转弯抹角地提到古典时期那些通过实现和平而创立伟业的伟大统治者。关于实际的协议，他强调尽管教皇近来扶植那不勒斯，尽管教皇封费兰特的儿子乔瓦尼为枢机主教，尽管教皇的侄子为费兰特的女儿办了一次举世无双的奢华婚宴，尽管教皇免除了那不勒斯对教皇例行的年贡，但是教皇永远不可能像佛罗伦萨一样成为真正对那不勒斯有利的朋友。西克斯图斯只是在利用那不勒斯来实现个人目的。

费兰特显然没有被说服，于是谈话不断延长，洛伦佐越来越灰心，他在卡拉布里亚公爵夫人的海边别墅花园中忧心忡忡地散着步，一名随行人员描述说“他仿佛是一个人在扮演两个角色，”

白天他表现得非常轻松、优雅、乐观和自信，但是到了晚上就会为自己和佛罗伦萨的悲惨处境而愁眉不展，反复强调他根本不在乎生死，但是无法挽救自己的国家于危难之中让他痛苦不堪。

在努力说服费兰特的同时，洛伦佐成功地用自己的慷慨给那不勒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这次行程，他通过抵押卡法焦洛和穆杰洛的土地筹来了六万弗罗林币。一到那不勒斯他就赎买了100名船上奴隶的自由，还给他们每人10弗罗林币和一套体面的衣服。然后他又为一些穷苦人家的女儿提供了丰厚的嫁妆，又向多个慈善事业捐赠了大笔善款。瓦洛里说他从保罗·安东尼奥·索代里尼（Paolo Antonio Soderini）那里听到洛伦佐出访那不勒斯总共的开销之后，吓得不敢把这个数字写下来。

即便如此，费兰特还是不愿谈协议。最终，洛伦佐在那不勒斯待了将近十周之后，不得不把问题摆上桌面，声称自己不能再继续等下去了，佛罗伦萨有紧急的事务待他回去处理。在匆匆告别之后，洛伦佐就骑马离开那不勒斯向北启程了。而国王费兰特只好急忙起草和平协议，派人追着给洛伦佐送去。

战争终于结束了。和平协议的条款对佛罗伦萨来说不算很有利。佛罗伦萨不但要向卡拉布里亚公爵支付赔偿款，还不得不在教皇的坚持下释放在押的帕奇家族人员；此外佛罗伦萨还必须同意托斯卡纳南部一些地区继续由外来势力控制；不过至少战争结束了，和平得到了保障，教皇的野心没能得逞，而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重新成了朋友和盟友。

[1] 波提切利创作的这幅古板又没有什么魅力的《年轻女子肖像》（*Portrait of a Young Woman*）是挂在皮蒂宫里的。画中人物一度被认为是克拉丽切·奥尔西尼，被认为是西莫内塔·韦斯普奇的可能性更小。最有可能的身份应该就是菲奥雷塔·戈里尼。

第十二章 意大利指南针上的指针

“如果佛罗伦萨注定要被暴君统治，那绝对找不到比他更优秀、更令人愉快的人选了”

1480年3月洛伦佐回到佛罗伦萨时，受到了比他祖父1434年从流放地返回时更热烈的欢迎。战争期间，推翻他的努力反复上演。里亚里奥家族不断筹划他的毁灭，吉罗拉莫·里亚里奥更是两次试图找人暗杀洛伦佐。现在，尽管支付给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巨额赔偿款引发了一些抱怨，但洛伦佐在佛罗伦萨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了，而且他还会抓住一切机会让自己的位置更加稳固。

直到此时为止，如米兰大使所说，洛伦佐已经“下定决心以祖父为榜样，用尽一切宪法允许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事实上，他还决心不做任何会刺激佛罗伦萨人敏感神经的事。不过他在那不勒斯逗留了这么长的时间，已经让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面临危机，这让洛伦佐意识到只有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更稳固的基础，才能让它提升至新的层次。洛伦佐从那不勒斯回来后不到一个月，应对战争带来的经济困局便成了组建一个新的最高司法委员会的绝好理由。最高司法委员会立即批准成立一个七十人委员会，当选委员任期5年。新委员会接管了选举官选举执政团官员的权利，执政团将来则不再享有提起重要法案的权利。委员会还可以从内部成员中选举成立两个政府机构，一个是负责外交政策的八人外交军事事务团（*Otto di Pratica*），另一个是负责内政和金融的十二行政长官团（*Dodici Procuratori*）。执政团和百人团的权力都被极大限制了，七十人委员会成为实质上的佛罗伦萨政府。

此时的洛伦佐并不能完全控制这个政府。波利齐亚诺称他是佛罗伦萨的领袖（*caput*）；其他人则用曾经授予其祖父的“国父”称号来敬称他。不过七十人委员会出于嫉妒往往会死守自己的政治独立，并不总是愿意顺着洛伦佐的心意。他不得不向那些搞不清楚状况的外国使节解释为什么他不能决定国家的某项政策，因为他“只是一个市民，而不是佛罗伦萨的执政团官员”。他承认自己享有比自己身份多得多的权力，但即使是他“也不得不耐心地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让别人以为他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是对他有好处的，这样既可以避免向朋友兑现昂贵的人情——就像他的祖父被教皇加里斯都三世

（Calixtus III）要求资助十字军东征一样，又可以反驳反对者阿拉曼诺·迪·菲利波·里努奇尼（Alamanno di Filippo Rinuccini）称他为独裁者的指责。事实上，洛伦佐的影响力是广泛、有说服力的，且通常是决定性的。当洛伦佐告诉某个委员或官员他想要如何处理某件事的时候，他的意见都会被遵照执行；当他提议某人应当被选入某个部门的时候，这个人通常也会按他的意思当选。他可能永远不会接受“共和国领袖”之类的正式头衔，但是在他去世后，一份官方文件中称他为“第一市民”（*vir primarius nostrae civitatis*），这一点是无人能否认的。他的敌人当然会毫不犹豫地给他贴上暴君的标签，但是如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承认的那样，“如果佛罗伦萨注定要被暴君统治，那绝对找不到比洛伦佐更优秀、更令人愉快的人选了”。这个观点在佛罗伦萨城里绝对不乏支持者，特别是那些相对贫困的人们。对他们而言，洛伦佐是不是专制者并不重要。在他的统治下，他们能吃饱饭，能有激动人心的公共节日，而且能享受到——或者说大部分人能享受到——公平正义。兰杜奇就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个可怜人受到的不公待遇：

在1480年10月15日这一天，一名隐士（被指控曾试图刺杀洛伦佐）死在了圣玛丽亚诺瓦医院里，他已经被各种酷刑折磨得不成人形。他们说行刑者削掉他的脚底后将他的脚拿到火上烤，直到上面的脂肪都化去了，

然后又让他站起来到结晶的粗盐上走，他就是这样被折磨致死的。然而，最终也没有关于他是否有罪的定论，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

虽然洛伦佐在佛罗伦萨的地位稳固了，但美第奇银行的财富却迅速缩水。洛伦佐并不像祖父那样善于经营；他给了分行经理们太多的权限，而且过分依赖于那位趋炎附势、阿谀逢迎的总经理弗朗切斯科·萨塞蒂（Francesco Sassetti）的不明智建议。当被人提醒要提防萨塞蒂的许多政策时，洛伦佐往往会承认自己“并不是很明白这些事情”，然后就把别人的建议抛到脑后了。因为管理失误和在玫瑰战争期间过度贷款给爱德华四世（King Edward IV），美第奇伦敦分行被迫关门，布吕赫分行随后也崩溃了；然后是米兰分行，当年由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赠送给科西莫的营业场所也被卖给了“摩尔人”洛多维科。里昂、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分行在经营上也都遇到了困难，一方面是因为管理失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整个佛罗伦萨银行业的崩坏，在随后的12年中，它将彻底走向没落。

帕奇家族阴谋不仅想要推翻美第奇家族的统治，还要摧毁美第奇银行。而整个美第奇银行体系在这次阴谋发生之前其实就已经濒临破产了。正是因为预料到美第奇银行很快会破产，而洛伦佐也会随之身败名裂，雷纳托·德·帕奇才不愿意参与那次阴谋。阴谋虽以失败告终，但是洛伦佐依然面临财务上的窘境。不过，洛伦佐从来不允许道德上的顾虑阻碍他的政治前途和个人野心，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打起了那些不属于他的基金的主意。他先是挪用了指定他为监护人并委托他代管的两个堂弟的基金，总数超过五万五千弗罗林币。到1485年这两个男孩儿成年向他索要欠款时，洛伦佐却无力偿还，只好把自己在卡法焦洛的别墅和穆杰洛的一些地产过户给他们作为补偿，但是堂弟们仍声称这并不足以完全弥补他们的损失。除此之外，洛伦佐还私自动用国库的钱财。在他去世后，他的继承人被判定要归还超过七万五千

佛罗林币的债务，都是洛伦佐“未经任何法律和官方许可就私自支取而给公众造成的损失”。

除了财务上的困扰，洛伦佐回到佛罗伦萨后还要为共和国前线持续的不稳定而费神。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热那亚人夺下了萨尔扎纳的堡垒。此后，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也把自己在罗马涅的势力范围扩张至托斯卡纳地区边境；而卡拉布里亚公爵则利用锡耶纳发生暴乱之机建立了对该地区的统治权。最糟糕的是，因为洛伦佐和那不勒斯达成了和平条约，教皇的其他同盟者也就放弃了对教皇的继续支持，这又大大加深了教皇对他的厌恶感。教皇虽然无力自行组织对洛伦佐的宣战，但是他仍然拒绝撤销之前的禁令和驱逐令。

不过随后的局势又朝着对洛伦佐有利的方向发展了，时机之巧使得人们甚至怀疑是不是他本人安排了土耳其人发起攻击的时间：1480年8月，7000人的土耳其军队在奥特朗托海峡（Otranto）登陆，在意大利的靴子形版图的“鞋跟”处建立起了稳固的桥头堡，并威胁要穿过那不勒斯，直逼罗马。长久以来的担心变成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卡拉布里亚公爵不得不从锡耶纳火速赶回南方，国王费兰特也被迫将那不勒斯军队占领下的一些托斯卡纳地区市镇还给了佛罗伦萨。他们还说服教皇，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都面临危机的时刻，意大利内部各国更不应该发生内讧。各方最终商定，佛罗伦萨派遣一个由佛罗伦萨主要家族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到罗马，为自己城市的错误行为做出模糊的道歉，而教皇方面也答应赐予原谅和宽恕。于是代表团在12月3日这一天来到圣彼得大教堂。为了接见他们，中殿里特意摆放了带华盖的御座。教皇坐在御座上，代表团跪在教皇面前。路易吉·圭恰迪尼

（Luigi Guicciardini）作为代表团团长，含含糊糊地说了一段道歉之词，声音甚至盖不过旁观者的议论。同样，教皇也嘟囔了几句听不清楚的斥责之词，并用忏悔杖轻敲了他们的肩膀，表示禁令被正式解除，随后教皇还给他们赐了福。代表团使节们也向教皇承诺提供15艘

配有装备的舰船来协助抵抗土耳其军队，然后就回到了佛罗伦萨，并向洛伦佐汇报一切都顺利完成了。几个月后，土耳其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Mahomet the Conqueror）在盖布泽（Gebze）突然去世。他在奥特朗托海峡的军队也被召回土耳其，意大利的和平似乎重新得到了保证。

在洛伦佐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尽一切可能维护着意大利的和平，不仅要全力防止教皇为贪婪的家人谋利而使意大利陷入小规模冲突，还要打造一个统一、强大的意大利，既能抵挡土耳其人的进攻，又能挫败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对它的各种图谋。这样的政策本来就需要巨大的耐心和最老到的外交手腕，而吉罗拉莫·里亚里奥把他在罗马涅的领地范围扩大到托斯卡纳地区的野心更是让洛伦佐的工作难上加难。这一地区曾两次爆发战争，都是依靠洛伦佐的亲自调停才重归和平。在第二次战争之后，也就是1484年8月，教皇的使节回到罗马向他汇报，说和平条约拒绝了他的外甥对切尔维亚（Cervia）和拉韦纳（Ravenna）各镇的领地要求。这次战争本就因为争夺对这些地方的权力而起，结果竟一无所获。因痛风的折磨而异常暴躁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在听到这一消息时，先是气得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又狂怒地大叫自己永远不会承认这种耻辱的条约。然而在第二天，教皇就一病不起，几个小时之内就断气了。

西克斯图斯的继任者英诺森八世（Innocent VIII）是一个随和亲切的人。他骄傲地承认自己有孩子，会为他们谋利，却不像西克斯图斯四世那样把这作为自己政策的核心。洛伦佐的一个代理用“兔子”这个词来指代教皇。不可否认，他那略微斜视的忧郁眼神和谦逊的举止确实有几分像兔子。洛伦佐对他的选举过程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并且有理由相信自己在适当的时候一定可以对新教皇施加一些有利的影响。此时，英诺森的首席顾问还是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粗野、好战的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

他在罗马教廷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皇英诺森的当选。不过因为大力怂恿教皇国加入与那不勒斯的昂贵却徒劳的战争，枢机主教渐渐失宠了。后来一个叫博科利诺·古佐尼（Boccolino Guzzoni）的海盗自封为奥西莫（Osimo）——安科纳南部教廷国里的一个小镇——的领主。枢机主教作为罗马教皇的使节前往那里，意欲将古佐尼驱逐出去，可是他没能完成任务。洛伦佐不失时机地利用了枢机主教的失败，只花了相当于这次失败征讨费用一小部分的钱就收买了古佐尼。

洛伦佐抓住一切机会让教皇对他日益敬重，并获得了教皇的友情，甚至是钟爱。洛伦佐还费尽心思地打探教皇的品位并投其所好。他会定期向教皇赠送蒿雀，还有一桶桶教皇最喜欢的葡萄酒和上好的佛罗伦萨布料。洛伦佐还会给教皇写一些礼貌又讨喜的书信，有的信上说如果教皇身体抱恙，他也会担心忧虑；还有的信上，他会鼓励说“教皇就应当是敢作敢为”，然后看似无意地加入自己对于恰当的教廷政策的看法。洛伦佐的关心让英诺森非常高兴，对于他的观点教皇也深信不疑，并且觉得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英诺森受洛伦佐的影响之深，用最为不满的费拉拉大使的话形容就是“教皇连睡觉都逃不过伟大的洛伦佐的眼睛”。而在那那不勒斯的佛罗伦萨大使也确信如此，并向洛伦佐保证“整个意大利都知道，你对教皇的影响力之大，实际上是佛罗伦萨大使在‘以某种方式’（*quodammodo*）掌控罗马的政策”。

到了1488年，这种影响力又进一步扩大了。洛伦佐的女儿马达莱娜嫁给了弗兰切斯科·奇博（Franceschetto Cibo），他是教皇加入教会之前生的儿子之一。新郎当时已经年近四十，身材魁梧、了无情趣、嗜酒如命，据说一辈子没表达过一个有意义的观点；马达莱娜当时是个天资平平、五官鲜明、肩膀圆润的16岁少女，她对这门亲事自然没多少期待，更不用说视女儿为掌上明珠的母亲了。洛伦佐曾形容马达莱娜是他母亲“头上的眼睛”（*occhio del capo*）。不过，马

达莱娜是个顺从的孩子，她的母亲也是个顺从的妻子，于是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再说，除了无趣、酗酒和好赌成性外，弗兰切斯凯托据说是个非常善良的人。而洛伦佐更是慷慨大方。虽然他当时正处于又一次财务危机中，不得不向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承认一时很难凑够四千达科特的嫁妆，因为还有很多其他“亏空要补”。不过最终他还是想办法凑够了这笔钱，并且将佛罗伦萨的帕奇宫和蒙图盖的帕奇别墅，还有阿雷佐附近斯帕达勒托（Spedaletto）的一片不错的地产都送给了弗兰切斯凯托。

教皇对此非常满意。洛伦佐对他的控制也更加稳固和严密了。整个欧洲都接受了未来教廷的政策将由佛罗伦萨直接决定这个事实。如科西莫时代一样，美第奇又一次成为意大利实质上的决策人。欧洲的统治者向他寻求建议；穆斯林君主们给他送来厚礼。洛伦佐一次又一次地调停斡旋，阻止教皇出于自己顽固的反阿拉贡家族的偏见而发动对那不勒斯的攻击，通过保证中小国家的独立来维持亚平宁半岛上微妙的均势，保住了意大利的和平。现在看来，洛伦佐的伟大的外交家的名声绝对是言过其实的，因为他是个轻率鲁莽、目光短浅的人，会为了眼前利益而冒无谓的风险；意大利之所以没有陷入内战，更多是源于运气而非他的英明治理；而外来势力没有在这一时期入侵也完全是因为这样更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不管怎样，洛伦佐在他有生之年作为国务政治家的至高地位鲜有质疑：他就是“意大利指南针上的指针”。他为从热那亚人手中接手彼得拉桑塔城（Pietrasanta）找到了合理的理由；还夺回了萨尔扎纳的堡垒，彻底弥补了他在帕奇叛乱中受到的耻辱，这些都极大提升了他在佛罗伦萨的声誉。虽然不情愿，但他还是出现在了彼得拉桑塔和萨尔扎纳的战场上，鼓励士兵们英勇奋战，并指引他们通过被攻破城墙的缺口。

根据希皮奥·阿米拉托（Scipio Ammirato）的描述，在他从萨尔扎纳凯旋之后：

佛罗伦萨共和国凭借洛伦佐的威名，摆脱了一切困扰，意大利的邦国间也鲜有冲突。在外无战事、内无忧乱的环境下，佛罗伦萨可以尽情地享受艺术与和平的美好，吸引更多的文人墨客来这里著书立说，人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繁荣城市、发展农业上。简而言之，佛罗伦萨全心投入对艺术和其他所有美好事物的追求，让人们把这个时代视作幸福的代名词。

第十三章 洛伦佐：资助者、收藏家和诗人

“他通晓一切事情”

在他不断地被请去调停意大利邦国之间令人厌倦的冲突的那些年里，洛伦佐说过他渴望能有机会回到托斯卡纳地区，躲进某个听不到一句国家大事的与世隔绝的地方。他还渴望有更多时间在乡村别墅里和那些杰出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朋友们相聚。他们可以去菲耶索莱；或是卡雷吉，每年的11月7日，这里都会举办纪念柏拉图诞辰的宴会；还可以去佛罗伦萨西北12英里之外的波焦阿卡伊阿诺，这里的旧别墅是由朱利亚诺·达·圣加洛（Giuliano da Sangallo）重建的；[\[1\]](#)他还可以去位于穆杰洛峡谷通往皮斯托亚途中的卡法焦洛别墅，那里离城市更远，也更像一座森严的堡垒。尽管偶尔也会有随行人员因为小事争吵的烦扰，但是在这些乡村别墅里度过的时光通常是轻松惬意、令人愉悦的。用餐时，客人可以随便选择自己喜欢的座位，而洛伦佐和那些亲密的朋友们也是这样随性地加入宾客之中，比如安杰洛·波利齐亚诺；或是另一个风趣、爱嘲讽的诗人路易吉·浦尔契，通常被洛伦佐唤作“吉吉”（Gigi）；还有乔瓦尼·皮科（Giovanni Pico）及米兰多拉和孔科尔迪亚伯爵（Count of Mirandola and Concordia），后者是一位聪明、诚实的贵族，他的作品非常有影响力——其中一部深受洛伦佐的喜爱——但是一直受到教会的严厉抨击。来这里的宾客可能还会遇到风趣的书商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马尔西利奥·菲奇诺，他的作品《柏拉图神学》（*Theologica platonica*）就是献给洛伦佐的；真蒂莱·贝基，洛伦佐曾经的家庭教师，现在是阿雷佐的主教；伟大的音乐家安东尼奥·斯夸尔恰卢皮（Antonio Squarcialupi），他是大教堂的管风琴演奏家，洛伦佐曾帮助他的唱诗班招募演唱者；还有艺术家菲利波·利比、多梅尼科·基兰达约和波提切利，他们都曾受雇于洛伦佐，为他装修斯帕达勒托

的乡村别墅；以及安东尼奥·波拉尤奥洛，洛伦佐评价他是“佛罗伦萨城里最伟大的大师”；此外，在洛伦佐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年轻的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也是这里的座上客。

米开朗琪罗的父亲虽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只是个清贫的托斯卡纳地方法官。米开朗琪罗七八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佛罗伦萨的弗朗切斯科·乌尔比诺（Francesco Urbino）学校，随后又到多梅尼科·基兰达约在佛罗伦萨经营的大画室里当学徒。米开朗琪罗的这个选择让父亲非常失望，因为后者认为这是一个低下的行当。但是米开朗琪罗少年老成的天赋从一开始就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当他看到米开朗琪罗十三岁时创作同伴们在圣玛丽亚诺韦拉的托尔纳博尼家族教堂里工作的情景时的画作忍不住惊呼：“天啊，这个男孩儿懂的比我还多！”后来洛伦佐让基兰达约推荐一些有前途的学生到他新创办的学校学习，基兰达约毫不犹豫地把米开朗琪罗的名字写进了推荐名单中。

根据乔焦·瓦萨里的说法，洛伦佐创办这座学校的目的，不仅仅是训练男孩子们掌握一门具体的手艺，更是为了让他们有机会接受比在其他地方能接受到的更广泛的教育。洛伦佐把美第奇宫和圣马可之间的一个花园布置了一下，并且雇用老朋友——师从多纳泰罗的贝托尔多·迪·乔瓦尼（Bertoldo di Giovanni）——担任学校的校长。洛伦佐还把自己收藏的无数油画作品和半身古董塑像借给学校，摆在画室和花园周围。^[2]据说米开朗琪罗就是在仿制畜牧之神法翁的半身像时第一次被洛伦佐注意到。瓦萨里是这样记录的：

尽管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大理石雕刻，米开朗琪罗仿造的法翁像却是那么传神，连洛伦佐都惊呆了。后来当他看到米开朗琪罗脱离了样本，发挥想象力给法翁雕刻了嘴巴、舌头和满口牙齿的时候，洛伦佐忍不住大笑起

来，并以他一贯的迷人风度对米开朗琪罗说：“难道你不知道老人是不可能满口牙齿的吗？总会掉几颗的。”

洛伦佐一离开，米开朗琪罗就凿掉了法翁的一颗牙，

他还特意在牙床上凿了个坑，让那里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掉了一颗牙一样；然后他就一直盼望着洛伦佐再来。后来洛伦佐看到了米开朗琪罗对雕塑做出的修改，他精湛的技艺和单纯朴实的性格令洛伦佐每每想起都忍俊不禁，洛伦佐还给自己的朋友们讲过这件趣事，他们也无不感到惊讶。洛伦佐于是决定帮助和培养年轻的米开朗琪罗。他先是派人把他的父亲洛多维科请来，询问他是否同意让米开朗琪罗留下来，并且补充说会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他。洛多维科当然欣然许可。然后洛伦佐就在美第奇宫为米开朗琪罗安排了房间，像照顾自己的家人一样关照他。米开朗琪罗可以和洛伦佐的孩子或是其他任何尊贵的客人同桌吃饭，洛伦佐对待他也总是十分尊敬……为了让米开朗琪罗可以帮父亲贴补家用，他每个月的薪水高达5个达科特；洛伦佐还送了米开朗琪罗一件紫罗兰色的斗篷，连他的父亲也被安排到海关工作。事实上，所有在圣马可花园学习的男孩子们都有数目不等的薪水可领，尊贵而伟大的洛伦佐在他的有生之年一直没有停止资助这些学生。

米开朗琪罗在美第奇宫住了四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每天都会向洛伦佐展示自己的创作成果”。^[3]

洛伦佐的财富远远不及自己的父亲或祖父，所以他没有订制那么多的雕塑和绘画作品，而那些跟他有关系的作品，也大多已经损毁或丢失了，比如斯帕达勒托的壁画就已遭破坏。还有一些不久前还被认为

是洛伦佐订制的艺术品——比如波提切利最著名的作品《春》（*Primavera*）^[4]和《维纳斯的诞生》（*Birth of Venus*）^[5]——现在则被确认是洛伦佐那个与他同名且年轻富有的堂弟洛伦佐·迪·皮耶尔弗兰切斯科·德·美第奇（Lorenzo di Pierfrancesco de' Medici）订制的。画作被挂在了卡斯泰洛别墅的墙上，这座别墅也是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分支在1477年买下来的。^[6]波提切利的《帕拉斯和肯陶洛斯》（*Pallas and the Centaur*）也挂在这里。虽然这幅

画的内容是庆祝洛伦佐挫败了帕奇家族的阴谋，终结了佛罗伦萨的战争，但是它很可能是由洛伦佐·迪·皮耶尔弗兰切斯科订制的。^[7]

不过，就算洛伦佐本人没有向波提切利订制很多作品，他也帮助他获得了很多其他佛罗伦萨出资人的订单，而且似乎也帮助他得到了在罗马西斯廷小教堂（Sistine Chapel）工作的机会。洛伦佐也为菲利波·利比、安东尼奥·波拉尤奥洛和朱利亚诺·达·马亚诺

（Giuliano da Maiano）争取过许多工作机会：利比被他送到了罗马，波拉尤奥洛去了米兰，而马亚诺则被推荐给了卡拉布里亚公爵。他还帮助基兰达约获得了在圣玛丽亚诺韦拉和圣三一教堂工作的机会，^[8]后来又推荐他到西斯廷小教堂工作。至于被瓦萨里描述为“一刻不停地专注于绘画和雕刻”的韦罗基奥，洛伦佐也让这位艺术家获得了在托斯卡纳各个地方工作的机会。洛伦佐向他订制了《大卫》^[9]的铜像和陶质的《复活》（*Resurrection*）^[10]，摆放在卡雷吉乡村别墅里，不过雕塑家的兄弟声称洛伦佐没有付工钱。在洛伦佐的学校花园里有一尊被严重毁坏的红色石像，雕刻的是被剥皮之后的玛尔叙阿斯的身体。洛伦佐让韦罗基奥修复并完成这座石像，以便与科西莫在罗马购买的玛尔叙阿斯白色大理石雕像配成一对。瓦萨里记录说：

韦罗基奥用红色大理石重新雕刻出了腿和胳膊，其技艺之精湛让洛伦佐大喜过望，并且把修复后的红色雕塑和白色雕塑分别摆放在了大门两边。这尊古老的石雕展现的是玛尔叙阿斯被剥皮后的身体，从中可以看出创作者的细致入微和精准的判断力。他还巧妙利用了红色大理石上的白色纹理，让它们看起来像是人类身体被剥皮后显示出来的细小筋脉。

当韦罗基奥离开佛罗伦萨的时候——他将前往威尼斯去创作最后一幅传世之作，矗立于圣乔瓦尼和圣保罗广场（Piazza di Santi Giovanni e Paolo）的雇佣军首领巴尔托罗梅奥·科莱奥尼纪念碑，洛伦佐祝他一路顺风。与米开朗琪罗一样，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也在洛伦佐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当达·芬奇决

定前往米兰时，洛伦佐同样亲切地祝他好运。达·芬奇是个私生子，来自一个名叫芬奇（Vinci）的托斯卡纳村庄。可以确定的是，从他12岁来到韦罗基奥在佛罗伦萨的工作室工作时起，洛伦佐就十分关注这个已经展现出过人天赋的少年；后来达·芬奇决定前往米兰谋求发展，以展现他那令人震惊的多才多艺，正好公爵洛多维科·斯福尔扎在寻找一位艺术家来雕刻他父亲骑马的塑像。一向善于利用这种政治交情的洛伦佐就给公爵送去了一把达·芬奇制作的马头形状的银质竖琴，并以此向他推荐了达·芬奇。

洛伦佐肯定希望别人知道他是个艺术鉴赏家，就像他逐渐积累起作为建筑评论家的显赫名声一样。事实上，在修建重要的建筑物之前先来征求他的意见已经成了一种惯例。比如圣神教堂正面的设计方案之争就被提交到他的面前；^[11]菲利波·斯特罗齐也曾就斯特罗齐宫的比例问题向他咨询。^[12]洛伦佐还被邀请为皮斯托亚的圣雅各布教堂在建的福尔太圭里墓（Forteguerra tomb）挑选最终的模型，而两个备选方案分别是由韦罗基奥和皮耶罗·德尔·波拉尤奥洛（Piero del Pollaiuolo）提交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人们觉得“他通晓一切事情”。后来圣神教堂要画一幅新的圣坛版画，接手这一任务的基兰达约被告知作品的“风格、标准和形式都要”让洛伦佐满意。

到1491年，大教堂的正面仍然没有建成。洛伦佐本人也提交了一份设计方案。鉴于韦罗基奥、波提切利、基兰达约和菲利波·利比以及其他一些大师都加入了竞争，评委们觉得有些难以抉择。为了逃避这个难题，评委们请洛伦佐来决定使用哪个设计。但是，洛伦佐在盛赞了所有方案之后，说自己没法做出决定，这个问题还是延后再议吧。^[13]

虽然洛伦佐在画作和雕塑上花的钱比他的祖父少得多，而且也没有坚持完成一些由他祖父发起修建的工程——比如菲耶索莱的巴迪亚

教堂，但是洛伦佐终其一生都未曾停止扩充他在其他方面的惊人收藏，包括铜像、勋章、钱币、古陶器、古董珠宝，还有罗马、拜占庭、波斯和威尼斯的花瓶。很多花瓶是用亚宝石雕刻制作的，而且大多数花瓶上都加刻了他名字的缩写“LAUR. MED”作为标记。事实上，他宁愿花费比买一幅巨幅油画多得多的钱来购买一块精雕细琢的珠宝，因为在他看来这才是更合理的投资。他收藏的很多珠宝价值高达几千弗罗林币，而一件波提切利或波拉尤奥洛的画作最多也就值几百弗罗林币。

洛伦佐在资助作家和学者上也一直是毫不吝啬的，更不用说购买书籍和手稿来扩充美第奇的藏书室了。他要求代理们永不停歇地为他寻找珍贵的书源。在他的资助下，乔瓦尼·拉斯卡里斯（Giovanni Lascaris）两度前往东方寻找遗失的手稿，终于在第二次探寻之旅后带回了超过两百册的希腊书籍，其中近一半作品都是此前无人知晓的。

尽管活字印刷术在十五世纪中期的德国美因茨（Mainz）已经出现，但是这一技术起初在意大利并未得到迅速发展，很多学者认为它是“一些德国城市中的野蛮之人”采用的粗俗工艺，很多收藏家甚至拒绝收藏印刷出来的书籍。那不勒斯于1465年才建立了第一家印刷厂，罗马是1467年，威尼斯和米兰是1469年，维罗纳、巴黎和纽伦堡则是1470年。到了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紧挨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西门的地方建起了英国第一家印刷厂，并以中间一条红色垂直纹线的盾形徽作为标志。至于佛罗伦萨的第一家印刷厂则到1477年才由贝尔纳多·琴尼尼建立起来。在这之前，甚至是在有了印刷厂之后的很多年里，洛伦佐还是遵循这座城市根深蒂固的传统，雇用大批抄写员、插画家和代笔人来抄写他收藏的手稿，好让这些作品能够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并且为托斯卡纳地区内外，尤其是比萨的图书馆提供更多的副本。

洛伦佐清楚比萨和沃尔泰拉一样抵触归属于佛罗伦萨这件事，所以他一直花大力气改善佛罗伦萨与这两座城市的关系，并且树立了美第奇家族作为这些城市庇护者的形象。他开发了比萨的港口，在比萨城外买地，在城里的河边买房，还常带家人来此暂住。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树林茂密的亚平宁山脉阻挡了从罗马涅一路刮来的凛冽东风，所以这里的气候相对温和。最重要的是，洛伦佐为了缓和比萨人、佛罗伦萨人以及美第奇家族的关系，设法复兴了名噪一时但如今已经败落的比萨大学。1472年，洛伦佐把这座大学打造成了托斯卡纳地区最重要的大学，并提供了两倍于政府每年资助的六千弗罗林币的捐款。

洛伦佐给佛罗伦萨大学基金会的捐款同样慷慨。佛罗伦萨大学是欧洲唯一一所能力开设正规的希腊语课程的大学。这里的教师和讲师包括约翰内斯·阿尔吉罗波洛斯（Johannes Argyropoulos）、泰奥多鲁斯·加扎（Theodorus Gaza）和迪米特里厄斯·查尔康迪拉斯（Demetrius Chalcondylas），其中迪米特里厄斯·查尔康迪拉斯还和迪米特里厄斯·克雷泰恩西斯（Demetrius Cretensis）一同于1488年在佛罗伦萨发行了最早的印刷版荷马作品集。全欧洲的学生都来到这里学习希腊语。后来成为英国国王亨利八世（King Henry VIII）的专属医生以及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创立者之一的托马斯·利纳克尔（Thomas Linacre）于1487年来到佛罗伦萨并在这里待了3年，他还有幸和洛伦佐的儿子们一起上了查尔康迪拉斯的课程。利纳克尔的朋友、后来成为最早在牛津大学教授希腊语的教师之一的威廉·格罗辛（William Grocyn）是1488年来到佛罗伦萨的。到1489年，他们的另一个朋友威廉·拉蒂默（William Latimer）也来到了佛罗伦萨，正是他帮助格罗辛和利纳克尔将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翻译为拉丁文。

洛伦佐和这些学者一样对古希腊哲学家和拉丁文诗歌充满热情，但是他无法容忍那些轻视意大利语或者贬低托斯卡纳诗人的艺术成就的人文主义者。每当洛伦佐想通过创作诗歌来摆脱生意上和生活中的烦扰时，他效仿的不是那些拉丁语诗人，而是但丁和薄伽丘。他不想用拉丁语，而是更愿意用孩提时就学会的简单又美丽的托斯卡纳方言（Tuscan）。洛伦佐对这种语言充满忠诚和热情，他和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一样坚信，只要诗人潜心钻研语言的用法，只要人们摒弃尼科洛·尼科利的无稽之谈——但丁的诗歌只适合没有文化的羊毛工人和面包师傅阅读，托斯卡纳方言就一定可以变得更加含蓄和圆润。如果洛伦佐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来发展语言天赋，再加上对托斯卡纳方言的深沉感情，那么他用托斯卡纳方言创作矫揉造作的诗文就一定能有质的提高。尽管如此，他仍然称得上十三世纪晚期诗人的合格继承者，也是彼特拉克的先驱。

洛伦佐的诗歌称得上丰神俊逸、多姿多彩：有的忧伤、有的振奋、有的充满希望，但更多是发人深省的，既包含了宗教情绪，也包含了凡人的情感欲望。他能写出其母亲曾经创作的那些虔诚的赞美词句，也能写出让母亲担忧的亵渎神灵的改编诗文；他还会写打猎歌、情歌、欢快的舞曲（*canzoni a ballo*），以及天马行空的滑稽戏和情色的狂欢节歌曲（*canti carnascialeschi*），比如《卖冷杉松果的人》（*Song of the Fir Cone Sellers*）就是一首关于肉欲激情和物欲之爱的赞歌。不过，洛伦佐在作品中表达最多的还是他对托斯卡纳的美丽风景以及农民生活中的幸福与艰辛的深刻感情，这些作品中往往充满了非凡而生动的细致描绘。羊群咩咩叫着穿过高地上的草场，刚学会走路的小羊蹒跚地追随着妈妈的脚步，而牧羊人则把刚出生的羊羔和跛足的绵羊扛在肩上；到了夜里，羊群会被圈在用杆子和网子围起来的羊圈里，牧羊人吃过面包和羊奶做的晚饭，此时已经在黑夜中呼呼大睡；苍鹭向着落日的方向飞去，猎鹰向地面的猎物俯冲；海边有橄榄树林，树叶在吹过海岸的清风中拂动；燧石的火星落在秋日

的枯叶上，点燃了草丛，火势向森林蔓延开去，火苗烧过草丛和洞穴，受惊的鸟儿和动物四散奔逃，到处是扇动翅膀和蹄子蹬地的声音；到了冬天，高大的杉树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黝黑，冰冻的树叶被脚步踩碎；躲避猎捕的野鹿绝望地逃命；任劳任怨的公牛奋力拖动沉重的石料；筋疲力尽的飞鸟宁可坠入海洋，也不敢在船只的桅杆上停留歇脚；翁布罗尔河（Ombrone）发了洪水，浑浊的河水沿着山坡奔涌而下，连粗壮的冬青树干和农民搭建木屋的厚木板都被卷走，冲到了开阔的平原之上；还有农民的妻子背着号啕大哭的婴孩儿，赶着他们的牲畜躲避这可怕的洪水。

到1492年年初，仅43岁的洛伦佐显然已经时日无多。多年来他一直受到痛风的困扰，疼痛日益加重，已经渐渐失去了行动能力；此外他的总体健康状况也在迅速恶化。每年去泡温泉成了他的习惯。他可以去斯帕达勒托或波雷塔（Porretta），或是维戈内（Vigone）——圣凯瑟琳（St Catherine）就是在此处温泉里忍受灼人的温度，以此来为坠入炼狱做好准备；他还可能去沃尔泰拉南部的莫尔巴温泉

（Bagno a Morba），他的母亲在那里修建了一处迷人的温泉疗养地。每次泡温泉回来，洛伦佐都断言说自己已经恢复健康了，可是过不了几个月他就又会操劳过度、疲惫不堪。他要被人抬着才能前往自己最喜欢的波焦阿卡伊阿诺的乡村别墅。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进行什么活动，只能在这里读读书，欣赏一下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

（Andrea del Sarto）创作的壁画，监督一下领地周边农民的耕作，或是去有各种外国动物的动物园里看看动物，这里还养着一只巴比伦苏丹送给他的美丽的长颈鹿，它的性情极其温顺，还会“吃孩子用手递给它的苹果”。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里，不时暴发的烦躁和怒气掩盖了他曾经的风度翩翩。痛风引发的越来越严重的疼痛让他变得唐突无礼甚至出言不逊。对一个无情地批评音乐家斯夸尔恰卢皮品格的人，洛伦佐尖

锐地说：“要是你知道达到艺术上的完美有多艰难，你就不会抓住这点儿短处不放了。”对另一个同情他视力下降并评论说佛罗伦萨的空气对眼睛不好的锡耶纳人，他则反驳说：“看来锡耶纳的空气对脑子不好。”当他的一个懒散邈远的堂兄弟得意扬扬地夸耀自己乡村别墅丰沛的水源时，他答道：“那你就可以多洗洗手了。”

到1492年2月，洛伦佐无法继续管理生意和事务；他已经不能走路，甚至拿不住一支笔。波利齐亚诺写道：持续不断的发烧折磨着他“整个人，不仅伤害了他的动脉和血管，也侵蚀着他的四肢、内脏、神经、骨头和骨髓”。3月初，他的小儿子乔瓦尼向他告别，离开佛罗伦萨到罗马去了。洛伦佐不得不站在卧室的窗口来回应外界说他已经去世的谣言。两周之后，他被抬着送到了卡雷吉的乡村别墅，然后就再也没能回到佛罗伦萨。

波利齐亚诺和其他一些朋友陪他一起去了卡雷吉，他们会坐在床边陪他说话；如果他太累了，他们就轮流大声朗读他最喜欢的托斯卡纳诗人的作品精选。他对波利齐亚诺说，要把余生都用来创作诗歌和研究学问，佛罗伦萨的政务则交给儿子皮耶罗处理。但是波利齐亚诺回答说：“人民不会同意你离开的。”

没过几天，两只佛罗伦萨的狮子在它们位于狮子街（Via di Leone）的笼子里打架，最后双双丧生。紧接着第二天，也就是4月5日夜里，闪电击中了大教堂的灯笼，教堂顶部一个大理石球掉下来砸到了广场上。洛伦佐问是教堂哪一侧的石球，听到别人的回答后，他说：“是临近我家的一侧，看来我要死了。”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不祥之兆出现：母狼在夜里嚎叫；天上出现了奇怪的光亮；一个女人在圣玛丽亚诺韦拉做弥撒时突然发起疯来，边跑边大喊有一头愤怒的公牛，牛角上还冒着火，就要把教堂顶翻了；连马尔西利奥·菲奇诺都说他看到鬼一样的巨人们在他的花园里打斗并发出吓人的哀号。

洛伦佐的私人医生皮耶罗·莱奥尼（Piero Leoni）与洛多维科·斯福尔扎派来的一位来自伦巴第的医生拉扎罗·迪帕维亚（Lazaro di Pavia）一起来到卡雷吉。这个伦巴医生给洛伦佐开了一副把珍珠和珍贵宝石研磨后混合的药方。他在洛伦佐卧室旁边的房间里制作这种药时，发出了巨大的噪音。洛伦佐呼喊道：“安杰洛，你在哪儿？”波利齐亚诺很快来到他的身边。洛伦佐问他那个医生到底在干什么。听到波利齐亚诺的回答之后，洛伦佐有那么一刻似乎相信这副怪异的药剂也许真能治好他的病，他紧紧握住波利齐亚诺的双手，充满期待地望着他的脸，而波利齐亚诺只能侧过脸避开他的注视，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忍不住痛哭失声。

当天晚些时候，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来探望洛伦佐。洛伦佐又说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虽然声音越来越微弱，但是米兰多拉还是听到洛伦佐所说的：“我只希望能多活几天，那样就能帮你的藏书室多挑选一些好书。”

医生的怪药让洛伦佐愈加虚弱，他让人去请神父来听他最后的忏悔并赐予圣餐。他坚持要从床上起身，穿戴整齐。可是这对他而言还是太难了，很快他就被抬回床上并倒在了枕头上。

皮耶罗经常来探望父亲，波利齐亚诺记录说，每当此时，洛伦佐都会“强撑出一副坚强的样子，为了不加重儿子的哀伤，忍住眼泪不让儿子看到”。

4月8日，洛伦佐陷入了类似昏迷的状态，一个卡马尔多利教士把眼镜的镜片举到洛伦佐嘴边察看他是否还有呼吸并判定他的大限已经来临，于是开始宣读耶稣受难的故事。此时洛伦佐已经说不出话，只能动动嘴唇表示他听懂了，他的眼睛盯着举在他面前的银质十字架，并偶尔亲吻一下十字架，直到彻底停止了呼吸。

皮耶罗·莱奥尼一直认为洛伦佐的疾病不会致命。他不赞成同行们那些近似妖术的药剂，而是坚称只要保证病人时刻处于温暖、干爽的环境，夜里不要受凉，不要吃梨和葡萄籽就不会有事。洛伦佐的离世以及外界指责他使用巫术和下毒，都让莱奥尼心灰意冷。他离开卡雷吉后，就跳进圣杰尔瓦西奥（San Gervasio）别墅的井里自杀了。

洛伦佐的遗体被送到圣马可修道院，后来被带回圣洛伦佐教堂，和弟弟朱利亚诺一起葬在了老圣器收藏室里。

[1] 洛伦佐在1479年买下了波焦阿卡伊阿诺别墅。朱利亚诺·达·圣加洛在次年将其改造成了一座纯文艺复兴式建筑，但是直到十六世纪才又加入了三角楣饰和有人字屋顶的敞廊。外部的楼梯是十七世纪才修建的。敞廊内部的壁画是菲利波·利比创作的。原本的庭院修建为一间豪华会客厅（*Salone*），墙上装饰的都是弗朗切斯科·克里斯法诺·弗兰恰比焦（Francesco di Cristofano Franciabigio）、亚历山德罗·阿洛里（Alessandro Allori）、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和雅各布·卡鲁齐·蓬托尔莫的画作。除了这个房间外，这栋建筑的内部装潢都有了很大的变动。现在这栋建筑属于国家，并被改建成为博物馆。

[2] 根据瓦萨里的说法，洛伦佐的学校位于圣马可广场附近的一个花园，曾经属于菲耶索莱的巴迪亚教堂，后来成了克拉丽切·奥尔西尼嫁妆的一部分。当时的文献中对此没有记录，它的具体位置也不为人所知。

[3] 在吉贝利纳街（Via Ghibellina）70号的博纳罗蒂故居（Casabuonarroti）能看到许多米开朗琪罗早期的作品，故居是由博纳罗蒂的侄子在这块一直属于他家的地产上建造的。《楼梯上的圣母》（*Madonna of the Stairs*）大约是1490年完成的。《半人马之战》（*Battle of the Centaurs*）大约是1492年完成的。

[4] 波提切利的《春》（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中充满了古典及文学的暗示，也一直存在着最复杂的解释。有的作家认为维纳斯和佛罗拉的原型都是莫内塔·韦斯普奇，她的亲戚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是个航海家，后来以自己的名字为美洲命名。而画作左面的墨丘利的形象则与波提切利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肖像》（*Portrait of Giuliano de' Medici*）（现存于

米兰的克雷斯基收藏馆）有相似之处，后者创作于二三年以前，也就是大约1475年。

[5] 也有人说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中维纳斯的原型是西莫内塔·韦斯普奇。这幅画（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创作于约1485年。

[6] 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春》和《帕拉斯和肯陶洛斯》都曾经悬挂在美第奇的卡斯泰洛别墅。这个别墅是1477年由洛伦佐·迪·皮耶尔弗兰切斯科·德·美第奇购置的。那里的花园是由尼科洛·佩里科利·特里博洛（Niccolo Pericoli Tribolo）和他的继任者贝尔纳多·布翁塔伦蒂在公爵科西莫一世时期建造的。池塘和洞穴里的各种石像和铜制雕像是由特里博洛、阿曼纳蒂、詹波隆那和佩利诺·达·芬奇（Pierino da Vinci）创作的。其他一些由詹波隆那创作的动物铜像被移到了巴杰罗宫。这座别墅后来经过萨瓦家族的改造和重新装修，现在被修复并作为克鲁斯卡学会的总部。

[7] 据称波提切利的《帕拉斯和肯陶洛斯》（陈列于乌菲齐美术馆）大约创作于1482年，是为了庆祝洛伦佐与国王费兰特的谈判成功。画面背景的月桂树被认定为那不勒斯的月桂树；毫无疑问帕拉斯的裙子上绣着的是美第奇家族的标志——连环相扣的钻戒。

[8] 在洛伦佐的推荐下，基兰达约于1485年开始受雇装修圣玛丽亚诺韦拉的马焦雷礼拜堂。他创作的壁画最后是由其助手们完成的，彩绘玻璃窗也同样如此。他的圣坛装饰画在十九世纪初受到损毁，并且被运到了德国。洛伦佐还帮助基兰达约获得了创作圣三一教堂里萨塞蒂堂的壁画和圣坛装饰画的工作机会。弗朗切斯科·萨塞蒂是美第奇银行的总经理。他和他的四个儿子都被画进了圣坛后面的壁画中。站在菲利波旁边的是洛伦佐本人。还可以看到洛伦佐的儿子们和他们的家庭教师路易吉·浦尔契、阿尼奥洛·波利齐亚诺（Agnolo Poliziano）一起走在台阶上。

[9] 韦罗基奥的《大卫》制作于约1474年，现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

[10] 韦罗基奥的《复活》制作于约1479年，现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

[11] 中世纪的圣神教堂除了食堂之外，都在1471年的大火中被毁，从1434年到1487年，一直在根据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重建。这里的教士们在半个世纪里不得不靠每天少吃一顿饭来省钱支付工程费用。布鲁内莱斯基去世后，人们对是否继续执行他关于教堂正面的设计存在分歧，朱利亚诺·达·圣加洛主张坚持，其他工匠则希望修改。后来他们还去寻求了洛伦佐的意见，但是这个教堂正面最终

也没能建起来。在洛伦佐的鼓励下，朱利亚诺·达·圣加洛制作了一个圣器收藏室的模型。

[12] 位于托尔纳博尼街和斯特罗齐街交会处的宏伟的斯特罗齐宫是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为菲利波·斯特罗齐建造的。原本的设计可能由朱利亚诺·达·圣加洛完成，但是大部分建造工作是由贝尔代托·达·马亚诺（Benedetto da Maiano）、西蒙内·德尔·波拉尤奥洛（Simone del Pollaiuolo）和朱利亚诺的兄弟监督完成的。

菲利波·斯特罗齐的儿子讲述了他父亲如何避免可能出现反对建造如此宏伟的宫殿的故事，那就是让大家觉得这是洛伦佐建议的结果。一开始他先是拒绝了他雇用的各个建筑师和工匠的方案，理由就是他们的设计都太富丽堂皇，而他想要简朴一些的宫殿。但得知洛伦佐希望这座城市能够在各个方面都被装点得卓越非凡后，他同意去征求一下洛伦佐的意见。于是洛伦佐被请来评议各个设计方案，最后他选中了最雄伟壮观的一个。然而斯特罗齐一边惺惺作态地称自己想要简朴的风格，一边又奉承洛伦佐的高雅品位。他说不知道自己这样的地位建造这么宏伟的宫殿合不合适，又说不得不承认洛伦佐对空间和风格的理解远胜于他。最后斯特罗齐如愿地建成了自己真正想要的宫殿。按当时的风俗，他还找占星师选了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作为奠基日，也就是1489年8月6日。

[13] 据说大教堂的正面一直没有完工。1515年为了迎接教皇莱奥十世的到来，修建起了一个临时的正面（详见本书第十七章）。到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时期，人们想要重新设计一个合适的正面。于是布翁塔伦蒂、詹波隆那和洛多维科·卡尔迪（Lodovico Cardi）提交了模型。科西莫一世的私生子、极有天赋的堂·乔瓦尼·德·美第奇（Don Giovanni de' Medici）也提交了设计模型，他还参与过设计圣加埃塔诺教堂（San Gaetano）、圣洛伦佐教堂中的王室祭堂，以及观景城堡。然而，最终教堂正面的提议没有实质性进展，只是用一个帆布帘遮挡了起来。当帆布帘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被吹坏之后，公爵科西莫三世到博洛尼亚找来了工匠，在棕色石头上画上了壁画。后来壁画也渐渐被磨损侵蚀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才被换成了大理石和马赛克图案，并一直保留至今。

第三部分 1492～1537

第十四章 皮耶罗·迪·洛伦佐·德·美第奇和费拉拉的修道士

“看吧！是上帝在领导这支军队”

22岁的皮耶罗完全没有他父亲那样的人格魅力。他身强体壮、行动敏捷，有一头浓密的淡棕色头发，长及肩膀，额前还垂着一缕刘海。皮耶罗的外貌并非毫无吸引力，但是他的性格和举止绝算不上讨人喜欢。他和洛伦佐一样冷酷无情，却没有洛伦佐的机智老练；他和洛伦佐一样对敌人睚眦必报，却不像洛伦佐一样对朋友永远忠诚。从他小时候写的书信中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任性骄躁的孩子。5岁时在给祖母的信中这样写道：“给我送点无花果来，因为我喜欢吃，而且我只要红色的那种；再给我送点带核的桃子和其他我喜欢的东西，你知道的，比如糖果和蛋糕之类的。”皮耶罗还让父亲给他买一只“世上最好的猎犬”；可是当猎犬送到他手上之后，他又迫不及待地想要一匹矮种马，还抱怨说：“你答应给我的矮种马我还没有收到，别人都笑话我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耶罗的脾气越来越火爆，举止也越来越狂妄自大。也许是为了避免被拿来与常被嫉妒但广受爱戴的父亲相比较；也许是因为他认为美第奇家族的地位已经稳固到可以完全不顾及支持者的意见，任其为所欲为。总之，皮耶罗对生意和公共事务不闻不

问，把时间都花在户外游玩和诗歌创作上，就连他写的诗也不过是对洛伦佐生动风格的拙劣模仿而已。国家大事被交给他的秘书皮耶罗·多维齐·达·比别纳（Piero Dovizi da Bibbiena）处理，已经濒临瓦解的银行生意则全交给了那位其实不能胜任的叔祖父乔瓦尼·托尔纳博尼。皮耶罗在佛罗伦萨不得民心的窘境因妻子阿方西娜

（Alfonsina）而更加恶化。这个奥尔西尼家族的女儿傲慢无礼、心胸狭窄，她将宁愿留在罗马与真正的贵族（*nobilita*）为伴的想法表露得十分明显，这让大多出身为乡野村夫的佛罗伦萨人尤其感到厌烦。

皮耶罗和两个堂兄之间的摩擦也是他在佛罗伦萨名声受损的原因之一。洛伦佐和乔瓦尼都是皮耶尔弗兰切斯科·迪·美第奇的儿子，都比皮耶罗年长，也更富有。洛伦佐在作为他们的监护人期间侵吞了部分本属于他们的遗产，所以他们并不掩饰对家族主要一支的怨恨，甚至不掩饰在下次权力争斗时抛弃皮耶罗的打算。事实上，这样的争斗即将重现。早在几年前，一位来自费拉拉的口才出众、充满激情的多明我会苦行僧就已经用警示性的布道让聚集在大教堂里的会众们心中充满了羞愧、悔恨和恐惧。

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年出生于费拉拉，从小在祖父的教育下长大。他的祖父是一位医生，来自帕多瓦，在温泉治病的疗效功用方面是公认的专家，也是长期大量饮酒有助于长寿这一理论的支持者。祖父依靠理论和名望赢得了在费拉拉宫廷里担任公爵御用医师的肥差，他的儿子在他去世后继任了这一职位。不过，他的孙子对宫廷生活就不那么憧憬了，只去了一次公爵的城堡之后就发誓再也不要回到那个地方了。吉罗拉莫是一个内向的男孩儿，阴郁、苍白、沉默寡言，热衷于创作忧郁的诗歌，用鲁特琴弹奏忧伤的、近似挽歌的乐曲以及研究圣经经文。据说在他爱上拉奥达米娅·斯特罗齐（Laodamia Strozzi）之后，行为举止变得更加消沉沮丧，因为这位佛罗伦萨流放者的女儿傲慢地拒绝了他的求爱；不过

吉罗拉莫一直坚称自己从来没想要娶她。他后来的生活则遵行了最严格的禁欲主义。除了布道的时候，他几乎从不和任何女性说话；他吃得很少，更是坚决不会品尝祖父收藏的大量烈酒；他穿的衣服都很破旧且打着补丁；他睡觉的床也不过是一块铺了一层稻草的木板。

1475年的某个宗教节日当天，吉罗拉莫一声不响地离开了父亲的家，到博洛尼亚的圣多梅尼科修道院做了一名见习教士，在那里一待就是七年。他给父亲写信解释自己的突然出走：

你需要感谢上帝的比你向上帝抱怨的多。因为上帝赐给你一个儿子，并且选定他成为自己的战士。能有一个作为耶稣基督的骑士的儿子难道不是莫大的恩典吗？……我再也不能忍受漫不经心的意大利人的所有恶行了……我也是血肉之躯，所以我要用全部的力量来抵制与理智相违背的身体本能，这样才能避免被恶魔附身。

为了帮助别人战胜恶魔，萨沃纳罗拉被博洛尼亚的多明我会派往意大利各地传教，包括费拉拉、布雷西亚（Brescia）、热那亚以及托斯卡纳和伦巴第的各个城镇。1481年，他被任命为圣马可修道院的诵经员来到佛罗伦萨，并受邀到圣洛伦佐教堂做四旬斋节布道。1489年，他在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安定了下来。

一开始，他根本算不上一个称职的布道者。在后来号称能用布道感动“整个意大利”的日子里，他承认了在最初的几年里，他连“一只母鸡都感动不了”。根据吉诺齐（Ginozzi）的记述：“他的动作和发音都让人不舒服，留下来听他布道的人都是妇女和孩子，而且不超过25人。他非常沮丧，甚至想过要彻底放弃布道的工作。”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讲道时语调僵硬、动作笨拙，更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给人留下好感的人。吉罗拉莫身材瘦小，样貌丑陋，有一个巨大的鹰钩鼻和肥厚的嘴唇，唯一能体现出他非凡性格的就是浓眉下的一双绿眸，目光炯炯有神，甚至“有时会放出红光”。

当时大多数佛罗伦萨人更倾向去听奥古斯丁修会的教士马利亚诺（Fra Mariano）所做的更优雅、更有文化、更精炼的布道，连洛伦佐都依他的要求在圣加洛门外修建了一座修道院。然而萨沃纳罗拉这个笨拙的多明我会教士渐渐也赢得了一批坚定的支持者，因为略过所有的缺点，人们开始感受到他布道中精彩的内容、满满的激情和迫切的真诚。到1491年，来听他布道的会众人数大幅增长，以至于圣马可教堂都容纳不下了，所以当年的四旬斋节布道是在大教堂里进行的。

这些布道在佛罗伦萨引起了轰动。萨沃纳罗拉甚至开始认为自己是上帝选定的先知，他的话都是受神灵启示的，质疑他就是质疑上帝的智慧。按照他的说法：“不是我本人在传教，而是上帝通过我在布道。”在长时间的斋戒和冥想之后，他还会被赐予关于未来的景象。他知道教会将受到斥责与摒弃，但是能够浴火重生，而且这一切很快就会成为现实。他还知道如果意大利人——尤其是佛罗伦萨人——不改进他们的处事方式，将会受到极其可怕的惩罚。只有回归基督教会最初的简朴才能拯救他们。人们必须抛弃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这两个人肯定已经坠入地狱永劫不复；人们还必须抛弃腐蚀他们灵魂的奢华和物欲；禁止赌博、纸牌游戏以及荒淫放荡的狂欢节和赛马节，更不用说华服、熏香和粉黛；人们还要把囤积的钱财捐赠给穷人；把那些邪恶的油画全都涂抹遮盖，因为画家甚至“把圣母玛丽亚也描画得如娼妓一般”；人们还要严惩卖淫之人，她们只是长着眼睛的行尸走肉，至于鸡奸者则应该被活活烧死；对于政治机构也要进行改革，科西莫宣称国家不应受制于祈祷和经文是大错特错的，因为除此之外，根本没有治理好国家的其他方法。萨沃纳罗拉在大教堂的神坛上向众人宣告：“首先你要顺从上帝之法，因为没有哪部好的法律不是遵循这永恒之法的。”佛罗伦萨人为了一个暴君描画给他们的景象而放弃了自己古老的自由。他们必须重新构建一部宪法。“我认为威尼斯人的宪法是最好的宪法，你们可以效仿他们的宪法，但是要抛弃其中不好的部分，比如总督统治。”

对这种指责美第奇统治的言论，洛伦佐一直给予了耐心和宽容。他的朋友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向他保证萨沃纳罗拉是一位虔诚的伟人；其他一些朋友，比如波利齐亚诺和波提切利也对萨沃纳罗拉有类似的评价，言语中不乏尊重和敬畏之意；米开朗琪罗年老之时还说，自己仍能感觉到神父的话语萦绕耳际；当萨沃纳罗拉被提名为圣马可修道院的院长时，洛伦佐没有提出任何反对；甚至是在萨沃纳罗拉拒不承认美第奇家族与圣马可修道院之间的渊源以及他们捐献的巨额资助时，洛伦佐也没有表示出一点儿不快。有一次，一些资深的美第奇家族支持者在拜访萨沃纳罗拉时建议他“不应这样布道”，他却回答说：“回去告诉洛伦佐，他应当好好忏悔自己的罪责，否则上帝定会让他受到惩罚。”然而洛伦佐临死之前，还派人请来了萨沃纳罗拉和马里亚诺。根据波利齐亚诺的说法，当时两位教士都祝福了洛伦佐。

洛伦佐去世后，萨沃纳罗拉对灾难将至的可怕警告及对美第奇统治的批判都更加强烈而明确了。到了1492年，他在布道中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景象，比如：“上帝的宝剑”悬于佛罗伦萨黯淡的天空之上；可怕的大风暴、瘟疫、战乱、洪水和饥荒；一个黑色的十字架在罗马徐徐升起，上面刻着“上帝之怒”几个大字，十字架的横梁不断延伸，穿过整片大地，带来狂风骤雨；在耶路撒冷则立着另一个金色的十字架，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高耸入云。

来听布道的会众们仿佛被他描述的逼真景象吓呆了，萨沃纳罗拉向他们大声召唤道：“噢！忏悔吧，佛罗伦萨！趁现在还有时间，穿上纯洁的白色衣服。不要再等了，否则连忏悔都来不及了。”萨沃纳罗拉向众人说明了这景象预示着什么：除非他们追随金色的十字架，否则灾祸将至。到时会有瘟疫和战乱；还会有外来敌人跨过阿尔卑斯山，像“拿着巨大剃刀、全副武装的理发师”，不但带来像琉璃苣菜肴一般苦涩的不幸，还要强行实施冷酷无情的改革，“仿佛要把智慧也研磨成面粉一般”。

“我是上帝派来这里的，”萨沃纳罗拉宣称，“主对我说我把你安排在意大利的中心，你要像个看守一样为我巡视，你会听到我的话，然后把我的话传达给所有人。”人们听着他的话，心里满怀恐惧。圣马可修道院的院长预言了洛伦佐的死，然后洛伦佐就去世了；他又预言了教皇英诺森八世和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的死讯，他们不久也都去世了；他还预言，在很多会众的有生之年内，土耳其人会改信基督教，尽管他们现在还是伊斯兰教徒，但萨沃纳罗拉这么说了，他们的改宗就算生效了。所以，上帝之剑指向佛罗伦萨和外国君主的军队打过阿尔卑斯山也一样会变为现实。

据说教皇英诺森在听到洛伦佐的死讯时大呼：“意大利的和平时代要终结了！”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也已经去世，他的死让人联想到可能爆发的战争。他的继承人查理八世是个充满活力和野心的年轻人，梦想着完成可与罗兰（Roland）相媲美的丰功伟绩，通过出神入化的用兵，统领他父亲建立的曾经击溃法国国内一切敌人的常备军队，为自己赢得荣耀。不过查理绝对不是什么将才或英雄。佛罗伦萨人第一次听到“上帝之剑”预言的那一年，查理年方二十。他是个身材瘦小、目光短浅的人，而且丑得出奇，不但有一个比萨沃纳罗拉的鹰钩鼻更大更尖的鼻子，还有一副永远闭不严的肥厚嘴唇，部分被一小撮散乱的红色胡须挡住了。他的头和手时常会痉挛；偶尔他嘴里嘟囔的几个词也总是让人听不清；他走路时总是曲着膝，一瘸一拐的；他的脚特别大，以至于有传言说他脚上有六个脚趾；他的暴饮暴食和荒淫无度也是出了名的，其无知更是达到了让人震惊的程度。也许是出于天真或天生的坏脾气，他的焦躁、任性和不知天高地厚让他身边的人不得不时刻提防着。他父亲在位期间已经极大地扩张了法国的领土范围，但是始终没有作为安茹王朝继承人宣称对那不勒斯王国享有权利。不过现在看来，只要时机允许，查理很有可能会起兵跨过阿尔卑斯山。这个年轻人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想当初年轻美貌的布列塔

尼女公爵安妮（Duchess of Brittany Anne）已经和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订婚，而查理却横刀夺爱，娶了人家作王后。

查理等待的开战机会终于来临了，而提供这个机会的人正是人称“摩尔人”的米兰公爵的叔叔洛多维科·斯福尔扎。公爵吉安·加莱亚佐在1490年就已经到了正式继位的年龄，但是他的叔叔却不愿交出摄政王的权力。其实吉安·加莱亚佐本人对此倒毫不介意，因为他是个懒散的年轻人，未必有胆量跟自己的叔叔争权，而且比起政治，他更喜欢去养狗、骑马和享受美食。不过，他的妻子伊莎贝拉

（Isabella）却是一个比他积极得多的人。她反复向自己的祖父、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抱怨，要求他帮忙让丈夫的叔叔及其傲慢专横的妻子弄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起初国王费兰特不愿意插手，不过最终还是决定尽己所能帮助孙女。

为了防止那不勒斯或意大利其他任何地方对自己采取行动或挑战，洛多维科决定先发制人。他建议查理八世重申安茹家族对那不勒斯的所有权，如果那不勒斯胆敢拒绝，他就有理由出兵进军意大利，届时米兰公国将助他一臂之力，而且会在意大利为他筹集战争所需要的任何款项。事实上，洛多维科也确实成功地从一家热那亚的银行里以14%的利息借到了十万法郎的贷款。

查理对此求之不得，尤其是在1494年国王费兰特去世后，他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不但宣称对那不勒斯和耶路撒冷享有主权，还准备出兵入侵意大利，要将国王费兰特的继承人阿方索二世（Alfonso II）赶下王位。当年9月，法国入侵意大利，超过三万人的大军在绣着法国纹饰和“*Voluntas Dei*”（神的旨意）字样的白色丝绸大旗的引领下，跨过阿尔卑斯山，缓慢地进入了伦巴第。先遣部队在这里受到洛多维科的热烈欢迎。查理国王随后到帕维亚向自己的表亲、无实权的公爵吉安·加莱亚佐表示敬意。此时吉安·加莱亚佐已经因病卧床

不起，可是他的医生却说查不出病因。公爵夫人跪在法国国王脚边泣不成声地请求他不要带兵攻占那不勒斯，但是查理此时根本不打算回头，洛多维科就更不用说了。查理刚刚离开帕维亚向南朝皮亚琴察（Piacenza）行进，米兰公爵的病情就急转直下，显然是毒药导致的病情恶化。没过几天，他就去世了，他的遗孀和四个孩子都被逮捕并囚禁，而洛多维科则宣布自己成为米兰公爵。

庞大的法国军队及后面由随军平民、厨师、马夫、赶骡人、教士、乐师、小贩、营妓和侍臣组成的零散队伍拖拖拉拉地继续前行，一路畅通无阻。所有教廷国都没有进行任何阻拦，威尼斯则宣布中立。查理离托斯卡纳边界越来越近。他派信使去要求皮耶罗·德·美第奇承认安茹家族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并许可法国军队通过托斯卡纳地区。皮耶罗让法国信使等了五天才宣布佛罗伦萨中立，而其间他还越权向那不勒斯国王承诺将支持其统治。然而法国根本不允许佛罗伦萨保持中立，他们需要托斯卡纳地区的堡垒作为后方的安全保障，这样才能安心地继续向南前进。于是，查理借口不满佛罗伦萨给信使的无礼待遇，进攻了菲维扎诺（Fivizzano）的托斯卡纳堡垒，不但将堡垒洗劫一空，还惨无人道地屠杀了全部守军。

这件事让皮耶罗展现出了令其他市民惊讶的能量，他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来阻止法国军队深入托斯卡纳地区。皮耶罗召集了所有雇佣军首领，把雇佣军派遣到托斯卡纳边境的堡垒，连皮耶罗的妹夫保罗·奥尔西尼（Paolo Orsini）也被派到了萨尔扎纳。皮耶罗本人准备动身去彼得拉桑塔，但是他的积极应对并没有得到佛罗伦萨其他主要市民相称的回应。萨沃纳罗拉似乎从预言成真中获得了一种沮丧的满足，又继续做出更多的预言，整个城市都笼罩在国之将亡的氛围中。曼图亚的信使在写给自己主人的信中说：“一个多明我会教士就让整个佛罗伦萨陷入了恐慌，所有人都放弃了希望，渴望通过虔诚获得救赎。一周里面有五天都在斋戒，人们前三天只吃面包、喝白水；

后两天吃面包、喝葡萄酒。所有的女孩和大多数少妇都躲进了修道院避难，所以街上只能看到男人、少年和年长的妇女。”

“看吧！”萨沃纳罗拉大喊道，

上帝的宝剑已经降下，灾难已经来临，预言已经实现。看吧，是上帝在领导这支军队……看吧，我将要放水淹没大地……这不是我而是上帝的预言。它就要成真。它已经成真了！

他的声音响彻整个大教堂，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全身打起了冷战，连头发根都竖了起来。洛伦佐·伦齐（Lorenzo Lenzi），这位即将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的富有的外交家也感到了同样的惶恐。当皮耶罗·德·美第奇向他索要更多的资助来保卫佛罗伦萨时，伦齐辩驳说这个城市就要毁了，抵抗是没有意义的。皮耶罗的堂兄弟们也是这样认为的。洛伦佐和乔瓦尼·迪·皮耶尔弗兰切斯科·德·美第奇为了不受牵连，已经派信使到查理国王的大营中送信，表示不支持皮耶罗的行动。他们不但完全理解法国的入侵行为，而且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提高佛罗伦萨人的认同感，若有必要，还会出资支持。他们的信在途中就被拦截了，然后两兄弟都被软禁在了美第奇家族的别墅中。洛伦佐被关在卡法焦洛，乔瓦尼被关在卡斯泰洛，但是两人很快就逃了出来，并立刻加入了查理在维杰塔诺（Vigevano）的指挥部。他们向查理保证，只要处理掉皮耶罗，佛罗伦萨就会立即加入法国攻打那不勒斯的阵营。

到了10月底，美第奇一派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弃皮耶罗而去。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处于绝望的境地。无论是教皇、威尼斯还是那不勒斯，都不可能给他提供任何帮助，迪克·德·蒙庞西耶（Duc de Montpensier）带领的左翼侵略军在罗马涅地区已经瓦解了那不勒斯的部分军队；而法军右翼则绕过萨尔扎纳，距离比萨不过几英里之远。在这样的情况下，皮耶罗未与执政团商议就自行来到查理国王在圣斯

特凡诺（San Stefano）的大营。他认为此时唯一能拯救佛罗伦萨的办法就是向法王卑微地投降，并努力赢得他的友谊，那样佛罗伦萨也许还有一线生机。显然，皮耶罗希望此行能够像父亲当年前往那不勒斯一般，取得巨大的外交成就。他还仿照父亲当年在前往比萨途中写的信，写了一封类似的送回了佛罗伦萨。

查理轻蔑地接见了皮耶罗，不但索要了一笔巨额贷款，还提出要继续占领萨尔扎纳、彼得拉桑塔、萨尔扎纳罗（Sarzanella）和利布拉弗拉塔（Librafratta）的堡垒以及比萨和里窝那两座城市，直到他所谓的“事业”成功为止。皮耶罗的反应让法国人感到难以置信。他们事后向菲利普·德·科米纳描述这一场景时都“忍不住大笑”：皮耶罗简直荒唐地在所有问题上让步，迫切地同意了法王的所有要求，然后在11月8日返回佛罗伦萨向执政团汇报他的所作所为。

第二天一早，皮耶罗带着佩剑，在一群全副武装的保镖的陪同下来到市政厅进行汇报。已经得知投降协定内容的执政官们在皮耶罗面前关闭了宫殿正门，公开声明他们对这种卑怯行径感到愤怒，其实私下里他们都在欢喜终于为自己的绝望处境找到了一个替罪羊。执政团给皮耶罗传信，说他可以从宫殿旁门进入，但是所有侍卫必须留在宫殿之外。皮耶罗拒绝进入，于是几位执政官走出宫殿对他进行规劝，然而皮耶罗依然不肯遣散侍卫，于是执政官们回到宫殿之内，再一次将皮耶罗拒之门外。没过多久，执政团敲响了牛钟，大批民众迅速集结到广场之上，他们对着皮耶罗叫骂和发出嘘声，甚至向他扔石头。皮耶罗依然站在那里，不过已经把剑握在了手中。他没有表现出惧怕，但是显然开始担忧要如何收场，直到随从说服他先回到美第奇宫再做打算。他的弟弟乔瓦尼本来一直来回骑着马大喊“小球！小球！小球！”来鼓动民众对其家族的支持，却没有什么效果。他在拉尔加街上遇到了从市政厅回来的皮耶罗，两人一起回到了美第奇宫。后来卢卡·兰杜奇还看到乔瓦尼跪在窗前祈祷。

夜幕降临以后，皮耶罗和妻子、两个年幼的孩子及堂兄弟朱利奥经圣加洛门逃出了佛罗伦萨，取道博洛尼亚前往威尼斯。他们把家族收藏中拿得动的值钱的小件宝贝都带走了。乔瓦尼乔装成多明我会教士的模样，偷偷地把美第奇藏书室中的不少财物转移到了圣马可修道院，然后也逃出了佛罗伦萨。他们逃走后，执政团立即颁布法令宣布美第奇家族被永远逐出佛罗伦萨，并且悬赏4000弗罗林币捉拿皮耶罗，2000弗罗林币捉拿乔瓦尼。他们的堂兄弟皮耶尔弗兰切斯科家的儿子们也匆忙把姓氏改为波波拉诺（Popolano），并把美第奇家族的纹饰从自家宫殿墙上撤了下来。

皮耶罗本打算用美第奇宫中的一些房间来接待法国国王；美第奇家族逃出佛罗伦萨的消息一传出，法国国王就以“美第奇银行里昂分行拖欠巨款为由，宣告了对这些房间的所有权并掠夺了许多财物”。按照菲利普·德·科米纳的汇报，“在被掠夺的财产之中，法国国王从几件精美的宝物中抓起了一只完整的独角兽的角（其验毒和催情的功效卓著），尽管旁边还有两只更大的角；其他人也都效仿他。美第奇家族最精美的家具已经被转移到城中的另一座房子里，但是依然被暴徒们抢夺一空。执政团也抢到了皮耶罗的一些贵重珠宝、在佛罗伦萨分行的两万达科特现金、一些珍贵的玛瑙花瓶、数不清的雕刻精美的浮雕、总重约40磅的3000枚金银勋章”以及大量画作和雕像。^[1]

这边掠夺者们在大肆抢掠，那边法国军队已经直逼比萨，查理八世立刻宣称比萨已经脱离共和国暴君的统治。为了抗议法王的这一举动，也为了尽可能地更改皮耶罗·德·美第奇同意的条约，佛罗伦萨派出了一个由4名外交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比萨，等待查理国王的接见。这四人之中就包括萨沃纳罗拉，与其说他是来抗议的，不如说他是来传达上帝神圣的意志的。据记录，他对法国国王说：

国王陛下，你终于来了。你作为上帝的执行者、公正的执行者来到这里。我们为你的到来而欢欣鼓舞……我们希望耶和华会借着你让骄傲的人

变谦卑，让谦卑的人受赞扬，除恶扬善，矫曲为直，去旧换新，拨乱反正。

萨沃纳罗拉还为佛罗伦萨被上帝选为惩罚对象而祈求上帝的仁慈，他请求国王宽恕那些反抗他的到来的人们；因为他们本无意冒犯，只是还不知道查理是“上帝派来的”。查理被这些话打动了，同意宽容地对待佛罗伦萨，不过他依然决心要带领一支人数众多、有足够威慑力的军队浩浩荡荡地进城。

[1] 美第奇家族的收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丰富的收藏，尽管一度被散到各处，但是其中一些真品后来都被寻回了。比如，有四个精美的花瓶，其中两个是碧玉做成的，一个是玛瑙做成的，一个是水晶做成的，并且都配有金制或银制的底座，上面还镶有珍贵的宝石并在瓶底刻了洛伦佐的名字。1502年，伊莎贝拉·德·埃斯特（Isabella d' Este）听说有人出售这四个花瓶，就派莱昂纳多·达·芬奇代表她去验货。最后由于某些原因，可能是价格太高，她并没有买下这四个花瓶。而是由公爵科西莫一世买了回来。很多雕塑最终也回到了奥里切拉里园。

第十五章 驱逐令

“有人已经在地狱为自己准备了位置”

国王查理八世在1494年11月17日这一天经圣弗雷利阿诺门（Porta San Freliano）进入佛罗伦萨。他穿着镀金的铠甲和金线缝制的斗篷，头戴王冠，像个得胜的英雄一样。按照当时军队统领进入被攻占城市的方式，他手中还握着长矛，横在身侧。4名骑士为他举着豪华的顶棚，他的左右各有一位将军，身后则跟随着100多名衣着华丽的皇家保镖；再后面是200多名步行的骑士；骑士后面则是拿着钢戟的瑞士护卫和穿着用繁复羽毛装饰的铠甲的官员们。另有5000名加斯科涅步兵和5000名瑞士步兵步行前进，他们后面是3000名穿着刻花铠甲和刺绣斗篷，举着用金线刺绣的天鹅绒旗帜的骑兵。骑兵后面还有4000名布列塔尼弓箭手和2000名石弩手。最后是各种武器和大炮，由骏马而不是牛或骡子拉着前进，这可是佛罗伦萨人从来没见过的景象。

胸甲骑兵的形象有些凶恶吓人，他们胯下战马的耳朵和尾巴都被剪得很短，看着像怪物一样。后面的弓箭手都来自苏格兰或其他北欧国家，个子高得出奇，与其说是人，不如说他们更像未开化的野兽。

太阳下山时查理国王抵达了主教堂广场，从他巨大的黑色战马上跳了下来。夹道欢迎的人一直在欢呼致敬，因为他们被萨沃纳罗拉说服了，认为法国国王是来解放他们的；然而当人们惊讶地注意到他矮小的身材和笨拙的动作时，欢呼声渐渐小了。不过据观察者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很快就恢复了先前的欢呼声势。之前一些佛罗伦萨市民的房子被用粉笔做了标记，作为法国军需官们指定的接待士兵的住处。当国王的士兵们忙着在这些焦虑的市民家中安顿下来的时候，查理则去做了弥撒，然后骑马直奔美第奇宫，沿途“法国万岁”（*Viva Francia*）的喊声不绝于耳。

事实证明，不情愿的接待者们对这些北方士兵的疑虑是没有必要的。在一万二千名法国士兵驻扎佛罗伦萨的11天里，只发生过几次骚乱，不超过10个人丧生。总体来说，这段时间平静得出奇；直到法国军队准备离开但不肯承担这段时间的吃住开销时，才引发了广泛的不满情绪。

同样也是因为钱的问题，查理国王和执政团之间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本来查理要求执政团许可他继续使用其军队已占领的堡垒，同意他暂时占领比萨直到“事业”获得成功，同意向他支付十五万达科特的赔款以补偿这次远征的开销。但是查理在11月25日与佛罗伦萨的代表会面时，宣令官当场宣读的合约条款中赔款数额变为十二万达科特。查理愤怒起身打断了宣令官，并威胁说赔款必须维持原定的十五万达科特，否则他就要让军号手吹号集结军队，把整个城市洗劫一空。查理的叫嚣让皮耶罗·迪·吉诺·卡波尼（Piero di Gino Capponi）怒不可遏。曾经作为佛罗伦萨驻法国大使的皮耶罗在查理幼儿时就认识他了，如今却被这个不招人喜欢的年轻人如此威胁。皮耶罗一怒之下抢过宣令官手里的条约，撕了个粉碎。按照圭恰迪尼的形容，皮耶罗用“因愤怒而颤抖的声音”毫不畏惧地朝着查理大喊：“如果你吹号，我们就敲钟！”这句话后来成为佛罗伦萨的一句谚语。

考虑到为了这点儿钱财而冒险攻城不太值得，查理国王决定让步，于是不疼不痒地开个玩笑说：“卡波尼呀卡波尼，你可真是个铁公鸡。”说完就签了条约，离开佛罗伦萨前往罗马去了。

查理离开两天后，市政厅广场上召开了一次市民议会，多数票通过建立一个最高司法委员会。之后人们又任命了20名选举官取代各个美第奇委员会，并负责选举今后的执政团成员。不论宪法上有什么变动，萨沃纳罗拉的支持者们迫切想让大众知晓，佛罗伦萨的统治权现

在属于圣马可修道院的院长，一个教会控制的神权政府即将建立，这个国家实质上将要依照经文来管理。

萨沃纳罗拉本人对此直言不讳，在12月21日的布道中他宣称：

上帝已经把我的船推进了大海，海风吹着我向前。上帝不允许我退缩。昨天晚上我与上帝交谈时说：“主啊，请您怜悯我吧，让我回到我的避风港去。”但是主回答说：“这不可能。你难道看不出风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吹吗？”“我可以布道，但是为什么让我参与佛罗伦萨的政务呢？”“如果你要让佛罗伦萨成为一座圣城，你就必须把她建立在坚实的基石之上，并且为她组建一个看重美德的政府。”

萨沃纳罗拉为遵循主的意愿而义无反顾。在布道中，他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指出了前路的方向，而信众们也坚定地追随着他。萨沃纳罗拉手中握着十字架，敦促人们将所有鼓吹美第奇家族复兴的人赶尽杀绝。上帝命他改革这个城市和教会，上帝的意愿一定会实现。斋戒必须延续下去；无论是金质的装饰物和闪闪发亮的手抄本，还是银制的圣杯和烛台，还有珠宝装饰的十字架都必须从修道院中搬走。“受神佑护”的孩子们必须剪短头发，在街上唱着圣歌游行，为穷人收集救济品，并且搜查违禁的胭脂盒和镜子，还有淫秽的画作和邪恶的图书；因为此类“虚荣之心”就是魔鬼诱人向善的请帖。这些孩子一定要让成人体会到耻辱，这样他们才能抛弃赌桌，走进忏悔室；孩子们还要向当局报告所有违法行为、所有不适当或招摇卖弄的穿着以及那些扔石头的坏孩子。

将来的节庆必须是赞颂上帝荣耀的宗教盛典，所有“虚荣”都要以上帝的名义投入献祭的篝火。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一次被人们深深铭记的庆典中，穿着白袍的孩子们在街上游行，手里举着橄榄树枝和红色的十字架，唱着圣歌翩翩起舞，在奇诺齐（Cinozzi）看来“仿佛是天使降临人间与人类的孩子一起庆祝”。多纳泰罗制作的一座少年耶稣手举荆棘王冠的雕塑被从一座教堂抬到另一座教堂。后来在市政

厅对面还搭起了巨大的金字塔形脚手架，底部堆着各种过分华丽的服装、镜子、天鹅绒软帽、假发、面具、扇子、项链、手镯和各种小饰品。在这些东西上面是一摞摞可能诱发淫秽思想的亵渎神灵的图书和画作；还有棋盘和骰子盒，一副副的纸牌和魔术指南；名媛的半身像和画像；连洛伦佐·迪·克雷迪（Lorenzo di Credi）、波提切利和教士巴尔托罗梅奥（Fra Bartolommeo）这些被改造了的艺术家也把自己以前创作的充满肉欲的画作送来销毁。而在这堆东西的最顶端，是一个威尼斯商人花20000斯库多银币（*scudi*）订制的雕塑作品，现在它们全都要被扔进火中。堆积如山的物品周围有侍卫把守，执政团从他们宫殿的阳台上看着这些东西被点燃，在合唱团的诵经声、小号声和铃声中熊熊燃烧。

当然也有人反对这种表示虔诚的方式，他们谴责萨沃纳罗拉忠诚的支持者是“跟屁虫”（*masticapaternostri*）或“伪君子”

（*piagnoni*）。每当萨沃纳罗拉布道时，反对者们会用敲鼓等方式制造“各种噪音”来压过萨沃纳罗拉说话的声音，他们还怂恿淘气的小孩子们向萨沃纳罗拉的追随者扔石头。不过，更多的人还是把萨沃纳罗拉视为伟大的改革家；他们认同他关于重建一个质朴纯洁的世界的梦想，相信人们都会信仰基督，他们也认可奇诺齐关于那时的佛罗伦萨将是个“荣耀之地”的说法；他们像卢卡·兰杜奇一样为自己的孩子能加入那些“受神佑护的孩子的队伍并受到所有改邪归正之人的尊敬”而无比骄傲；他们也像航海家的叔叔乔焦·韦斯普奇（Giorgio Vespucci）和斯特罗齐兄弟一样渴望有一天佛罗伦萨将成为“新的耶路撒冷”。

查理八世一路向南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阻挠。罗马未做抵抗就沦陷了；而费兰特的儿子，国王阿方索二世，受到各种噩梦和预言的惊吓，被因自己的无情和残暴而受到残害的鬼魂追索，甚至听到脚下的石头都在呼喊：“法国！法国！”他于是选择退位并逃进了西西

里岛上的一家修道院。法国军队跨过了那不勒斯的边境，屠杀了圣乔瓦尼山（Monte di San Giovanni）的居民并且放火烧了整个镇子，以此警告反对者。整个王国都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中，如圭恰迪尼所说，法国人作战的方式是“意大利人几个世纪来都不曾见识过的”。那不勒斯人也选择将查理视为帮助他们脱离阿拉贡家族统治的救星，于是向佛罗伦萨人一样热烈欢迎他的到来。事实上，那不勒斯人的盛情款待和这座城市的美好令查理如此陶醉，以至于将继续进军耶路撒冷的打算完全抛到了脑后。法国国王在自己的新领地乐不思蜀，终日玩乐享受，和无数佳人厮混，甚至还把她们的画像收集起来装订成册。不过当法国国王在那不勒斯的艳阳下玩物丧志时，北方的敌人们则忙着筹划推翻他的大计。

查理的所有敌人中，最积极的莫过于新教皇罗德里戈·博尔贾（Roderigo Borgia），即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他是个秃顶的大胖子，其貌不扬，喜欢奢华炫耀，对女人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富有和权势，更因为他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和充沛的精力，甚至在他的放荡和挥霍中都带着一种孩子气的热切，这为他赢得了无数情妇的钟爱。和众多前任一样，博尔贾也决心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的六个儿子谋取福利。在所有儿子当中，邪恶而迷人的切萨雷·博尔贾（Cesare Borgia）最具才干和野心。教皇意识到要想实现这些野心，就必须先让整个意大利团结起来抵抗外国侵略者。于是他打算建立一个致力于将法国人赶出意大利的联盟，并且自作主张地称其为神圣联盟。

洛多维科·斯福尔扎迫切地想要加入这个联盟。现在他已经为自己唆使法国入侵意大利而产生不良后果感到悔恨，因为奥尔良公爵嫉妒查理八世占领那不勒斯，进而也主张自己对米兰公国的权力。和米兰一样，威尼斯也加入了教皇的神圣联盟，此外还有君主马克西米利安及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国王费迪南德（King of Aragon and

Castile, Ferdinand)。尽管法国军队在那不勒斯的驻扎已经受到了威胁，他们却没有立即撤出这座城市。事实上，直到神圣联盟成立7周之后，查理才在留下一支庞大的驻军镇守那不勒斯的前提下，带领军队重新向北行进。

这真是一段漫长的行军过程。5月过去了，6月也过去了，直到进入1495年7月，法国军队竟然还没有翻过亚平宁山脉。因为满载着各种财物，每两个人就需要一头骡子拉的货车。与此同时，神圣联盟已经组建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由面相凶猛、双眼突出的曼图亚侯爵

（Marquis of Mantua）弗朗切斯科·贡扎加（Francesco Gonzaga）带领。两支军队越来越靠近，战事一触即发。这次他们可不会像以前文艺复兴风格的战争一样，有什么灵巧地避免对抗一说了。按照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观察，法国人的入侵彻底终结了以前的雇佣军首领所钟爱的那种拖延、迂回的作战方式。雇佣军首领雅各布·皮奇尼诺（Jacopo Piccinino）就曾经承认，这样拖延作战时间的策略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报酬；为了保护自己人马的安全，他们作战时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退回河边或壕沟的安全地带”；即便是不得不交战之时，他们也是以俘获而不是杀死敌人为目标。当然，把法国入侵以前的意大利战争描绘成一滴血都不流的大行军也未免夸张了些。比如1440年的安吉亚里战役中就有大约900人被杀，而不是如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只有一人丧命”。不过，几千人交火的大战斗中，无一人战死沙场，靠两军将领握手言和就结束战争的情况倒也并不稀奇。意大利军人在需要的时候自会英勇迎战；但是在更多情况下，将领会让他们忙于掠夺财物而不是短兵相接，让他们用长矛赶牛放羊而不是用石弩射击敌人。那一时期的编年史中偶有提及穿着无袖上衣和颜色艳丽的紧身裤，随着鼓乐声行军的步兵，偶尔喊喊支付他们酬劳的王公贵族的名号，与其说是去打仗，不如说是巡游演出。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查理八世的军队。他的士兵训练有素、身经百战，上阵就是为了

杀敌。“他们面对敌人时像一堵无法攻破的墙。”最重要的是，如圭恰迪尼所说，

他们配备了意大利人见都没见过的先进武器，能让之前所有用于攻击的武器都相形见绌……这种武器就是火炮，它用炮弹而不是石头为弹药，而且口径和威力都是以往的武器不可比拟的。除此之外，这些大炮还都是放在马车上而不是像意大利的传统那样用牛车来拉……它可以以惊人的速度被安置在城墙下并做好开火准备。而且，这种可怕的武器不仅可以用来攻城，还可以用于战场之上。

1495年7月，法意两军终于在塔罗河（Taro）河岸上正面交锋了。神圣联盟的雇佣兵根本不是查理国王的炮手和骑兵的对手。交战时间短暂，场面残酷，比意大利十三世纪末以来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更野蛮和血腥。意大利一方的伤亡非常惨重。当人数明显占优的法国军队继续向北前进时，落在后面的数以百计的法国随军人员竟然还拿着尖刀和斧头跑到战场上砍杀已经受伤、痛苦尖叫的意大利士兵。不过后来意大利人还是收复了战场，并且拦截了法国人的行李车，收缴了据说是属于查理曼大帝的宝剑和铠甲，还有珠宝、银盘、皇室印玺、一个神圣的十字架、一根神圣的荆棘、一件圣母的背心、一段圣丹尼斯（St Denis）的肢体和一本女子裸体画册——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描绘的……各个城市里面淫乱交媾的素描”。曼图亚侯爵就此宣布战争获胜。到了8月底，查理和他那支虽然疲惫但仍不乏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已经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安全地回到了法国。意大利人才震惊地发现，凭着他们的美德、才干、财富、曾经的辉煌和经验以及所有的军事技能，竟然完全阻挡不了北方军人的无情践踏。

佛罗伦萨人并没有加入这场惨痛的战役。萨沃纳罗拉对自己作为“上帝旨意执行者”的身份坚信不疑，不愿与神圣联盟有半点儿瓜葛。一个多明我会的无名小卒竟然能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这令教皇感到惊讶；而他在布道中支持入侵者以及自称是上帝选定的代言人的说法更让教皇愤怒。于是教皇要求萨沃纳罗拉到罗马来向他做出解

释，而萨沃纳罗拉却回复说佛罗伦萨离不开他，他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远行，最重要的是前往罗马是违背上帝意愿的。自此双方之间通信的言辞越来越激烈，最后教皇直接禁止萨沃纳罗拉继续布道。起初萨沃纳罗拉遵守了教皇的命令，改由他虔诚的门徒，多梅尼科·达·帕夏（Fra Domenico da Pescia）代他登上神坛传教。但是到了1496年2月，萨沃纳罗拉认为教皇的禁令已经失去效力，于是又开始每天在大教堂布道直到4月3日。

教皇用尽所有办法强迫萨沃纳罗拉服从他的命令。他先是下令将本来获许可独立的托斯卡纳地区的多明我会重新收归罗马教廷统治，这样他就有权将萨沃纳罗拉派遣到一个远离佛罗伦萨的修道院去，但是萨沃纳罗拉拒绝承认教皇在这一问题上的管辖权。亚历山大甚至承诺只要他肯放弃布道，就封萨沃纳罗拉为枢机主教，但是萨沃纳罗拉回复说，另一种红帽子才更适合我，即“用鲜血染成的”。

最终，在1497年6月，教皇采取了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将萨沃纳罗拉逐出教会。萨沃纳罗拉花了6个月的时间思考自己的处境，每天斋戒祈祷，直到上帝指引他做出最终的决定——他要违背教皇的命令。在圣诞节这一天，萨沃纳罗拉公开在大教堂主持大弥撒。亚历山大要求执政团要么把“萨沃纳罗拉这个邪恶之子”遣送到罗马，要么将他关押在佛罗伦萨。如果执政团不照办，教皇将下令封锁整个城市。

对此萨沃纳罗拉回复教皇：

你根本没有听取我的陈述，我已经不能再把我的信仰寄托于教皇您，而是要把我自己完全地交付给我主，是他决定了弱小也可以挫败强大。我建议教皇您也快为自己的救赎做准备吧。

至于执政团，萨沃纳罗拉认为他们对教皇威胁的反应太温和，给他们的警告也更加严厉。“告诉那些追求伟大和赞颂的人，他们的座

位已经准备好了，不过是在地狱里……告诉他们惩罚已经降临，有人已经在地狱为自己准备了位置。”

不过，这次教皇算好了发出威胁的时机。萨沃纳罗拉的支持者们在佛罗伦萨越来越失去根基，而最主要的原因甚至不是政府内部的人员变动。当年托斯卡纳地区的收成很差；到处都是饥民，甚至有人饿死街头，还暴发了瘟疫。萨沃纳罗拉口中的英雄查理国王也没有按他承诺的那样把比萨还给佛罗伦萨，而是将控制权交给了当地的居民，比萨人借机拿起了武器守护自己的独立。随后发生的战争也都是由报酬不高的雇佣兵打的，自然又是无限期地拖延了下去。因为这些灾难的发生，反对萨沃纳罗拉的声浪越来越高，对他统治的批评也越来越直白。一群斗志昂扬的年轻人还组建了一个被称作“一百五十人政团”（*Compagnacci*）的组织，成员大多是富人家的孩子。为了示威，他们往大教堂的神坛上抹油，在神坛四周悬挂腐坏的驴皮，还在萨沃纳罗拉布道时把一个笨重的柜子砸到大教堂中殿的石头地板上，把正在听布道的会众吓得四散奔逃。

那也是萨沃纳罗拉最后几次布道之一了。佛罗伦萨考虑到教皇的警告，决定禁止萨沃纳罗拉继续传教。萨沃纳罗拉同意先停止传教，条件是给他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打算把3月18日这一天的布道用来为自己正名，在布道中他坚持说自己有权反抗不合法的当权者，还提及自己的预言都已经实现，并谴责教会是一个邪恶的机构，因为他们助长了通奸和恶习。他还说自己不是因为想要传教而传教，而是因为受到了深入骨髓的熊熊火焰的驱使：“我感到整个人都燃烧了起来，而上帝的精神就是这火焰。哦，心中的精神啊！你像风掀起海面的波涛一样，你的经过也会带来风暴。除了服从我别无他法。”

在这最后一次布道之后，方济会教士们——一直挑战声称与上帝存在特殊关系的多明我会——又一次提出让萨沃纳罗拉提供证据证明

他受到了上帝的特殊偏爱。方济会教士弗朗切斯科·达·普利亚（Fra Francesco da Puglia）坚称萨沃纳罗拉收到神圣的启示是假的，因为他没有任何证据。为了揭穿萨沃纳罗拉的谎言，他愿意与萨沃纳罗拉一起从火焰中穿行，以证明这个多明我会教士根本没有受到上帝的保护。萨沃纳罗拉拒绝参加这种严酷的考验，辩驳说自己的存在是为了更高贵的工作。不过他同意让自己坚定的支持者多梅尼科·达·帕夏代替自己参加考验。多梅尼科热切地接受了挑战，然而弗朗切斯科则拒绝与萨沃纳罗拉之外的任何人一起挑战，于是他也安排了另一个方济会教士朱利亚诺·隆迪内利（Fra Giuliano Rondinelli）代为参加。

执政团的大多数成员为采用这种过时的野蛮方式而感到惊骇，甚至说祖先要是听到他们竟然还在讨论这种严酷考验的可行性，也会感到羞耻；还有成员提出，看谁能从阿诺河河面走过而不沾湿衣角也是一个“同样能证明真伪的奇迹”。然而，人们此时已经被烈火考验的计划挑起了兴趣，如果取消很可能让民众失望。最终的决定是，如果多明我会教士多梅尼科死了，那么萨沃纳罗拉要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如果方济会教士隆迪内利丧身火海而多梅尼科没有死，则弗朗切斯科·达普利亚要被逐出佛罗伦萨。考验将于1498年4月7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在市政厅广场上进行。届时所有外乡人必须离开佛罗伦萨，街上要设置路障，通往广场的道路也要由带武器的侍卫把守。

佣兵敞廊前面一条30码长、10码宽的走道被布置出来。走道两边堆积着大量浸了油的木柴，中间留下大约3英尺宽的空间让两个教士通过。整个佣兵敞廊被划分成两个区域，供双方的支持者预订位置。

方济会教士们率先进入了场地，并在那里等待多明我会教士们的到来。领头的多明我会教士举了一个十字架，其他人排成两队跟随在十字架后面，一路颂唱着应景的圣歌来到场地。队伍最后面是多梅尼

科，他旁边是萨沃纳罗拉。让方济会教士们愤怒的是，这个“被驱逐出教会之人的手中”还拿着圣饼。而当多梅尼科要举着十字架走进火场时，众人更是难掩惊愕之情。最终他被说服不举十字架，但坚持不放下神圣的圣饼。众人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直到一场暴雨倾盆而下，只好宣布当天的考验取消。

人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第二天正好是棕枝主日（Palm Sunday），一伙愤怒的暴徒们攻击了聚集在大教堂准备听萨沃纳罗拉的门徒之一布道的会众。一百五十人政团的成员们手持木棒追打会众，还向他们扔石头，口中还念着各种诅咒。会众们从大教堂里仓皇逃散，纷纷躲进圣马可修道院寻求庇护。虽然萨沃纳罗拉宣扬应当靠祈祷来寻求主的保护，可是这里的教士们却背着他储备了一些武器以防遭到围攻。一些教士把修道院教堂的塔尖拆下，扔向下面广场上的暴徒；另一些教士则把长矛掷向那些企图点燃修道院外墙的人。在攻击者们翻过修道院的围墙进入唱诗班席位之前，就已经有一些暴徒和修士丧生了。萨沃纳罗拉躲在藏书室中，但是很快就被执政团派来的侍卫们逮捕了。他被押着穿过大街，一路上都有民众对他嘲笑讥讽。最后他被关进了市政厅钟楼上的“小旅馆”里，也就是65年前科西莫·德·美第奇被关押的地方。

萨沃纳罗拉受到了严刑拷打，在吊刑刑具（*strappado*）的可怕折磨下，承认了所有安在他头上的罪名，可是一旦把他从刑具上放下来，他又会立即改口否认，然后拷问就会从头再来。最后，萨沃纳罗拉、多梅尼科以及另一个他最坚定的门徒西尔韦斯特罗（Fra Silvestro）一起被判定犯下了邪教异端和分裂教会罪并被处以死刑。市政厅广场上搭起了一个脚手架，上面还缠着各种易燃物。萨沃纳罗拉和两个同伴被链子吊在上面烧死了。初夏的天空下，火焰熊熊燃烧，有人大声喊道：“哦，先知啊，现在正是需要奇迹的时候！先知啊，救救你自己吧！”

“几个小时之内，几个受刑之人就被燃烧殆尽了，他们的胳膊和腿渐渐开始掉落到地上。”兰杜奇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受刑者身体的一部分还被链子吊着，于是人们不断朝尸体扔石头，想让尸体掉进火里，因为他们担心会有人想要保存他们的遗骸。最后行刑人不得不砍断吊杆才让尸体都掉到地上，人们又往火堆里加了很多柴草并不停搅动，直到尸体彻底化为灰烬。然后有人在执权杖者的陪同下用马车把最后剩下的骨灰全部拉走并投进维奇奥桥附近的阿诺河中，这样就没有人能找到他们的遗骸了。

第十六章 美第奇的回归

“已经拿下普拉托，虽然难免出现一些伤亡”

万贯家财已经散尽，宫殿和别墅也都被没收，现在的美第奇家族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部落一样在欧洲四处游荡。皮耶罗还留在意大利，靠偶尔当掉一块宝石或浮雕度日。他为共和国的敌人效力，还加入了切萨雷·博尔贾的阵营，不断尝试通过武力重返佛罗伦萨执政。切萨雷·博尔贾在罗马涅建立了一个王国，他认为帮助美第奇重返佛罗伦萨能为自己创造一个有价值的盟友。皮耶罗真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人马抵达了罗马娜门，却发现佛罗伦萨人完全不支持他的回归和重新当政，于是只好带着队伍奔向锡耶纳。最后他决定为法国国王效力，以换取一些含糊的关于支持他重返佛罗伦萨的承诺。

此时查理八世已经去世，死因是他的头重重地撞到了昂布瓦斯（Amboise）城堡中的房梁；不过继任者路易十二（Louis XII）重申了他的家族对那不勒斯王位的权力，并且以他的祖父娶了瓦伦蒂娜·维斯孔蒂为理由，宣称对米兰公国也享有权利。不过这两项主张都受到了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的强烈质疑。虽然在1500年的时候，费迪南德和路易达成了共享那不勒斯的协议，但是双方在利益分割上总是争吵不休，很快就重新开战了。

1503年12月，英勇善战的西班牙将领贡萨尔沃·德·科尔多瓦（Gonsalvo de Cordoba）率军大败法军。当时皮耶罗·德·美第奇也在法国军队中，在试图穿过加里利亚诺河（Garigliano）逃往加埃塔的时候，船不幸倾覆，他本人淹死在了河水中。后来他的尸体后被寻回，埋葬在了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上的修道院里。^[1]皮耶罗有两个孩子，女儿叫克拉丽切，儿子叫洛伦佐，当时11岁。他们的叔

叔乔瓦尼，一位公认的杰出人物，则在皮耶罗死后成了这个家族的领袖。

乔瓦尼于1475年12月11日出生在美第奇宫，此时是28岁。他年幼时，父母就对他寄予厚望。在他出生前一晚，母亲做了一个十分奇怪且异常生动的梦。她看见自己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在大教堂里分娩，可是生出来的却不是一个人类婴儿，而是一头巨大的狮子。

洛伦佐受到这个梦境的鼓舞，认为让儿子成为教会的王子会让美第奇家族受益匪浅，于是决心为儿子铺设一条神职之路。在这个孩子刚刚显示出足以在教会立足的才能时，里昂分行就接到了密切关注神职空缺的命令，因为在法国获得神职要比在意大利容易一些。乔瓦尼很早就接受了神职。他8岁的时候就受了削发礼，在法国国王的引荐下加入了丰杜斯修道院（abbey of Fontdouce），后来法国国王还想任命他为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Aix）大主教，却发现那里的大主教仍然在世。为了补偿乔瓦尼的失望，法国国王又任命他为沙特尔

（Chartres）附近的圣热梅修道院（Saint-Gemme）院长及托斯卡纳地区所有大教堂的教士会成员，此外还有包括帕西尼亚诺修道院

（Passignano）院长和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在内的二十多个受人尊敬且报酬不菲的职务。在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去世后，乔瓦尼·巴蒂斯塔·奇博（Giovanni Battista Cibo）被选举为英诺森八世，于是又有更高的职位出现了空缺。为了避免教皇在满足自己的愿望之前就去世，洛伦佐尽其所能地说服他尽早封乔瓦尼为枢机主教。在教皇的儿子弗兰切斯凯托·奇博娶了自己的女儿马达莱娜之后，洛伦佐更是指示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要不失一切时机地敦促教皇满足乔瓦尼的要求。洛伦佐还受到另外两位枢机主教切萨雷·博尔贾和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Ascanio Sforza）的帮助，他们两人在教廷里都有巨大的影响力；除此之外，他不断地给教皇写私人信件，提醒他那是“自己最大的愿望”。到1489年3月，英诺森终于让步了，但是附加了两个条

件：升职之后乔瓦尼必须离开佛罗伦萨去比萨学习教会法，以及他升职之事要先保密，3年之后才可以公布。洛伦佐对第一项要求没有任何意见，但是对于第二项却一直非常担心，他怕一旦英诺森在3年保密期满之前去世，继任的教皇有可能会宣布这个不合常规的任命无效，所以他试图将儿子升职立即公布于众，但是一直没能成功。虽然老教皇的健康状况一月不如一月，但就是不肯撒手而去。洛伦佐后来也承认自己没有一天不担心会收到教皇离世的可怕消息。英诺森是在1492年7月25日去世的，不过在他去世之前洛伦佐的野心就已经得到了满足。1492年3月，也就是教皇去世前3个月和洛伦佐去世前3个星期的时候，乔瓦尼在菲耶索莱古老的巴迪亚教堂接受了正式的任命，教廷的简短公告也被正式宣读。

乔瓦尼穿着斗篷，戴着红色帽子和蓝宝石戒指走进教堂。这个16岁少年的外表其实并不讨人喜欢。虽然他个子不矮，看起来和蔼聪慧，但是脸色灰白、皮肤松弛、极度肥胖，而且视力也明显衰退了。他的鼻子短而上翘，嘴也总是半张着。不过外貌并不代表本质，乔瓦尼所有的老师都认可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性情也称得上乐观慷慨。不过他们也都发现他非常懒散，好吃嗜酒，贪图享乐。他在罗马时放任自己沉迷于这些嗜好，毫无节制。他的一个教师说：“他早上不肯起床，晚上又不肯按时就寝，我对此非常担忧，这样不规律的生活习惯恐怕会影响他的健康。”

父亲非常清楚儿子的这些缺点，于是决定给儿子写一封长信，试图说服他选择一种更符合其高贵地位的生活方式：

我想提醒你的第一件事是，你要对上帝心怀感激，永远记住今日的荣耀不是缘于你自己的美德或才干，而是靠着上帝的恩惠。你应当通过选择神圣、模范、洁净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你的感激……让我欣慰的是，在过去几年中，虽然没有人要求你，你也能经常自觉自愿地去忏悔和参加圣餐礼。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坚持这样做更能让你继续保有上帝的恩赐了。我也十分清楚，在罗马那样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里生活，会让你觉得遵循我的

建议很难，因为那里会有很多人想要让你堕落或怂恿你沾染恶习，你年纪轻轻就被提升为枢机主教这件事更是会激起别人的嫉妒……因此，你必须更加坚定地抵制这些诱惑……同时，你还一定要避免被冠以虚伪的名声，对话中既不要假装节俭朴素也不要过分严厉。等你年长一些的时候就会更明白这些道理了……你很清楚用你的表现为别人树立一个枢机主教中的榜样有多么重要。如果所有枢机主教都能尽忠职守，这个世界肯定会比现在美好得多，因为如果枢机主教都变好了，就能选出一个好的教皇，那么世界也会宁静得多……

你不仅是如今罗马教廷中最年轻的枢机主教，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枢机主教。因此，当你与其他枢机主教集聚一堂时，你一定要表现得最恭顺、最谦逊……生活要尽量有规律……丝绸和珠宝并不适合你这种地位的人，收藏古董和精美的书籍是更好的选择。你住的地方也没必要太豪华，但是要井井有条、满室书香。邀请别人来你家的次数要比你接受别人邀请的次数多，但是也不要太过频繁。三餐应当简朴，还要勤于锻炼身体……对别人不要毫无保留地倾诉过多。最重要的一条，也是我要求你一定遵守的一条：早晨要早起！这不仅是为了身体健康，也是为了让你有时间安排和推进一天的工作……

关于你在枢机主教会议上的发言，我觉得毕竟你还年轻，现在对你有利的方法就是把提交给你的任何东西都先送给教皇过目，因为你还没有经验。你会发现有人为各种小事请你到教皇面前说情，起初要尽量避免这种事情，不要为了不值当的事情让教皇费心。因为越是不去打扰他，反而越会受到他的关注，这是教皇的本性……别了！

洛伦佐称罗马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并不过分。据估计，在这个人口不足50000的城市里，妓女的人数竟接近7000。她们大部分是在教廷机构许可经营的妓院里接客。本韦努托·杰利尼（Benvenuto Cellini）称妓女们多数染有梅毒这种“在教士之中极为常见的疾病”，他本人也不例外。在罗马，罪犯的人数差不多和妓女一样多。他们大多靠贿赂来避免刑罚。据称当时平均每天发生14起谋杀；被绞死的犯人的尸体要吊在圣安杰洛城堡的护城墙外，散发出腐败的恶臭，从城墙下面的桥上走过都变成了一件可怕的事。即便如此，很多杀人犯就算被抓住了也会很快放出来。枢机主教中最富有的罗代里戈

• 博尔贾在被问到为什么这么多作恶之人都逃脱了绞刑时回答说：“上帝并不想要罪人的性命，而是希望他们付出代价后继续活着。”在英诺森八世去世后，这位罗代里戈·博尔贾正是通过向自己的竞争者和潜在支持者大方地赠送各种礼物来确保自己成为亚历山大六世的。人们确信有5头驴拉着载满黄金的货车进入了另一位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的后院——不论是从富有程度还是影响力上，他都是最有可能击败罗代里戈·博尔贾的人。

年轻的枢机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早年在罗马生活得春风得意；但是当佛罗伦萨政府为他的人头定了价钱之后，他意识到暂时离开意大利才是明智的。于是，在获得许可他到阿尔卑斯山外游历之后，乔瓦尼就启程经威尼斯前往巴伐利亚了，陪同他的还有堂弟朱利奥，朱利奥当时在比萨大学读书。他们又从巴伐利亚去了布鲁塞尔，然后前往佛兰德斯海岸并打算乘船去英格兰。不过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骑马向南去了鲁昂（Rouen），然后又到了马赛并由此乘船前往热那亚，住在了乔瓦尼的姐姐马达莱娜家中。最后他们从热那亚回到罗马，此时亚历山大六世本人与佛罗伦萨的关系已经恶化了，所以依然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乔瓦尼等人在城中的一座宫殿里安顿了下来，虽然他的财富已经大不如前，但乔瓦尼还是决心享受生活。他的身边终日围绕着慷慨的朋友和络绎不绝的宾客。除了堂弟朱利奥，跟他们一起住在宫殿里的还有一位贝纳尔多·多维齐·达·比别纳（Bernardo Dovizi da Bibbiena）。他是皮耶罗·多维齐的哥哥，一个精明、幽默且诡计多端的人。贝纳尔多·多维齐·达·比别纳比乔瓦尼大五岁，曾经是他的家庭教师，很快又成了他的秘书。经常出现在这里的还有乔瓦尼的弟弟朱利亚诺，一个友善有礼的年轻人，表面上有些软弱无能，但未必没有丝毫野心。他的乐观性格使他深得乌尔比诺公爵和曼图亚侯爵家族的喜爱，他们也是朱利亚诺被流放期间的收留者。另一个常客是

教皇最宠爱的外甥枢机主教加莱奥托·弗兰乔托（Galeotto Franciotto）。起初乔瓦尼出于自私的考虑才去培养与加莱奥托的友谊，但是后来他越来越喜欢这位朋友，在加莱奥托不幸早逝之后，乔瓦尼几乎一提起他就忍不住热泪盈眶。

有了弗兰乔托和多维齐做他的左膀右臂，还有朱利亚诺和朱利奥，以及他一直努力讨好的众多枢机主教和无数来自佛罗伦萨的访客，再加上仍然对美第奇这个名字崇拜不已的无数艺术家们，乔瓦尼慷慨奢华地款待他们，所以他总是欠着一屁股债。客人们都习惯了他那些珍贵银器的反复消失和重现，它们如果不是在乔瓦尼的餐厅里，就肯定是在哪家罗马当铺里。

乔瓦尼会与宾客把酒言欢直至深夜；也会在上午与艺术家谈论他感兴趣的艺术作品；还会把整个下午都用于在坎帕尼亚平原上放鹰打猎——这项活动并不符合枢机主教的身份，乔瓦尼于是找借口说对于身材肥胖的人而言，打猎是必不可少的锻炼。这样的生活虽然享受，但是乔瓦尼显然还不满足。他那双目光黯淡、视力微弱的眼睛似乎在时刻瞟向刚刚当选的新教皇，关注着他那清瘦、留着胡子、烦躁不安的身影。

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在1503年11月当选教皇。此前，年迈的庇护三世（Pius III）在接替亚历山大六世之后，只当了26天教皇就去世了。尤利乌斯是一个渔民的孙子。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粗犷健谈，但是脾气暴躁，还染上了梅毒。他总喜欢提及自己贫困的童年时期跟着船在利古里亚海（Ligurian）沿岸运送洋葱的经历；他还喜欢谈论自己在学问上的无知以及对军旅生活的向往。当被问及该为米开朗琪罗给他创作的雕像选取什么象征物时，他回答说“我不是学究，我可不要举着一本书，我手里要有一把宝剑。”

尤利乌斯非常喜欢剑。当选教皇不久，他就强令24名极不情愿的枢机主教随他一起前往佩鲁贾和博洛尼亚镇压叛乱，发誓要让它们重归教会的领导。佩鲁贾的统治者吉安-保罗·巴廖尼（Gian-Paolo Baglioni）听到教皇亲临的消息时就已经吓得浑身发抖，不但直接投降交出了整座城，还跪在教皇面前请求宽恕。教皇原谅了他，但是还不忘补充一句：“再敢造反我就吊死你。”随后，没给枢机主教们一点儿休息时间，教皇又率队穿过罗马涅的沼泽地向博洛尼亚前进。乔瓦尼·本蒂沃利奥已经弃城而逃了。教皇的队伍于1506年11月11日抵达，所有人都因为精疲力竭而格外暴躁，手上和脸上也满是被蚊子叮咬的大包。

在为教会成功收复了佩鲁贾和博洛尼亚之后，尤利乌斯又下定决心要收复被威尼斯夺走的里米尼、法恩扎（Faenza）和拉韦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皇成立了康布雷联盟（League of Cambrai），不仅将法国国王路易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拉拢进来，连打算分享部分威尼斯控制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也成了盟友。对于威尼斯的军队而言，这样的联盟太过强大，1509年5月14日，他们在克里莫纳附近的阿尼亚德洛（Agnadello）被彻底击败。教皇虽然成功地扩大了教会的控制区域，但是也给外国势力在伦巴第扎下根基创造了机会。他决心要把它们赶走，反复宣称“我绝不允许这些野蛮人控制意大利”。他号召整个意大利团结起来把外国势力赶出阿尔卑斯山，第一个目标就是法国人。他骑着马把法国驻军赶出米兰多拉时说：“让我们看看到底谁更有胆识，是法国国王还是我。”在他坚定自信的感召下，他的军队占领了米兰多拉，他顺着木梯爬上了已经破败的城墙。不过这之后的几个月里，他的军队再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大胜，因为包括佛罗伦萨在内的大多数意大利邦国都不太愿意响应他的号召。

法国一直是佛罗伦萨的传统盟友。虽然查理八世在位时两国的友谊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法国人挑拨的佛罗伦萨与比萨之间的战争此时已经结束。当靠山威尼斯在阿尼亚德洛战败之后，比萨人就不得不向佛罗伦萨求和了。所以此时，佛罗伦萨人宣布中立。虽然教皇生气地称其为“一个不好的榜样”，但是其他意大利邦国却认为效仿佛罗伦萨的选择是明智的。尤利乌斯号召意大利人加入抗击法国的行动不成，只好转而联合已经牢牢掌控了那不勒斯的西班牙。这次教皇和西班牙人建立了一个新的神圣联盟，并率领军队一路向北到博洛尼亚，这里曾在法国的帮助下被费拉拉的阿方索·德·埃斯特（Alfonso d'Este）公爵占领，现在又被本蒂沃利奥家族夺了回去。尤利乌斯宣布一旦教会重新夺回博洛尼亚，将任命枢机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为该地区的教皇使节。乔瓦尼对艰苦的行军毫无怨言让尤利乌斯印象深刻，后者不但将阿马尔菲的教会统治区封赏给他，还许诺了今后的晋升。在佛罗伦萨，执政团听到乔瓦尼的节节高升时感到非常担忧。

然而，神圣联盟的军事行动并不怎么成功。他们不但没有拿下博洛尼亚，还在1512年的复活节这一天，在去夺取拉韦纳的路上被阻拦在了龙科（Ronco）河岸。两军随即展开了残酷的战斗。法国和西班牙的火炮一刻不停地向对方保持着阵形的重骑兵们投掷炮弹。双方的伤亡都非常惨重，在此前的欧洲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次战争像这次一样，在战场上留下如此多的尸体。据说神圣联盟有一万名士兵丧生，而法国军队的死亡人数也与此相近。

枢机主教乔瓦尼在战斗开始前骑着白色驯马随着西班牙军队一路行进，勉励他们奋勇杀敌，并向上帝祈祷胜利。他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为将死的士兵提供最后的安慰，却不幸被俘。他被押送到了博洛尼亚，平民们看到他穿着红袍子的肥硕身体和流苏宽边帽下布满汗水的脸时都嘲笑他，但是本蒂沃利奥却对他非常友善。他被送到摩德纳（Modena）时也受到了善待，比安卡·兰戈内（Bianca Rangone）还

卖掉了自己的珠宝来为他换取食物和衣服。最终他被送到了米兰，枢机主教费代里戈·圣塞韦里诺（Federigo Sanseverino）为他提供了舒适的住宿。

乔瓦尼当时确信法国人在拉韦纳之外获得了不可否认的胜利，并迫使受到重创的神圣联盟军队撤退。佛罗伦萨人也是这么以为的，他们还点燃了巨大的篝火庆祝教皇战败，就如他们曾经庆祝威尼斯人在阿尼亚德洛的溃败一样。不过事实证明，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斗，所谓的胜者也没有占到丝毫的便宜。在战斗进入尾声时，法国军队年轻有为的将领加斯东·德·富瓦（Gaston de Foix）被一颗流弹击中摔下马来，满身鲜血，脑浆迸裂，还被西班牙步兵补了几刀。不仅如此，此时法国本身也面临着英国和西班牙入侵的双重威胁，一支人数众多的瑞士军队抓住时机，趁乱夺去了本由法国人占领的一些地区。法军补给不足，只好从拉韦纳和博洛尼亚撤出，后来连米兰也放弃了，最终完全撤出了伦巴第。

枢机主教乔瓦尼这个重要的人质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走的，所以法国人强迫他随他们一起离开。不过他在到达阿尔卑斯山之前就已经决心逃跑了。撤退到波河（Po）岸边的一个小村庄时，乔瓦尼用装病的办法让一个陪同他的教士躲过法国侍卫的看守，拉拢了两个当地地主帮助他逃脱。第二天早上当枢机主教正要踏上法军停在河边的驳船时，一支由这两个地主田里的农民组成的武装小队突然从芦苇丛中蹿了出来，一番混乱之后，他们成功地将枢机主教掳走了。以乔瓦尼的身材，他显然无法扮成士兵，只好藏在地主亲戚的城堡后院的鸽房里，后来转移到戈迪亚斯科（Godiasco），再后来又到了曼图亚。此时他意识到，没有了法国人，依靠神圣联盟的军队强行改造佛罗伦萨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来曼图亚，为的就是确保改革后的政府形式能如他所愿。

自从萨沃纳罗拉被行刑之后，佛罗伦萨已经不再被视为一个重要的邦国，也一直没能恢复伟大的洛伦佐当政的黄金时期所拥有的活力和愉悦。一连串的金融危机使得多个行业协会接近崩溃。因为狡诈的雇佣军首领们出工不出力，和比萨耗时耗力的狼狈之战更是榨干了执政团的所有资源。法国国王在托斯卡纳地区的代表罗贝尔·德·巴尔扎克·昂特赖格（Robert de Balzac Entragues）已经把萨尔扎纳卖给了热那亚，把彼得拉桑塔卖给了卢卡。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这种惨淡的气氛也体现在波提切利晚期的绘画作品中。他此时已经过早得衰老了，腿脚也不好，“没有拐杖就无法站直或走动”。^[2]

萨沃纳罗拉去世4年之后，人们试图通过任命一位终身首席执政官来强化城市政府的统治力。当选者是皮耶罗·索代里尼（Piero Soderini），诚信、勤劳但没有什么行政才干，但凡重大事件他都要咨询另一位小官员的意见，这个人就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他的名气已经完全盖过了索代里尼。

马基雅维利身材瘦削、举止优雅、面色苍白，稀疏的黑发梳向脑后，露出骨骼凸出的高耸额头。在他仅有的一幅留存下来的画像中，他用一种含着愉悦、质疑和嘲讽的眼神回应着观者的注视。马基雅维利出身于托斯卡纳地区一个古老的家族，他的父亲是个律师。萨沃纳罗拉被处决后，30岁的马基雅维利就担任了他此时担任的政府职务。他一直鄙视萨沃纳罗拉的理念和管理方式，他最主要的关切之一就是战争，马基雅维利如他之前的莱昂纳多·布鲁尼一样，坚决主张抛弃雇佣军队为共和国打仗的传统，认为共和国必须组建自己的民兵。在过去的经历中，雇佣军首领经常被发现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时他们不肯与其他受雇的军队合作；有时他们不肯与和自己有友好条约的雇佣军开战；有时他们同时接受交战双方的雇佣；最主要的是，他们永远不会拿自己和手下的生命冒险，因此总是贻误战机、浪费雇主的钱

财。索代里尼同意将组建民兵的计划提交给执政团审议并委任马基雅维利负责组织。马基雅维利对这一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情，到1506年2月，他第一批招募的士兵在市政厅广场上举行了一次阅兵仪式。兰杜奇对这一情景的记录如下：

大部分应征的士兵都是来自偏远乡村的农民。每个人都穿戴着白色的背心、红白相间的长袜、白色的帽子和鞋，还穿着铁质的胸甲。大部分人手里拿着长矛，有一些举着火绳钩枪。他们虽然是士兵，但可以住在自己家里，只在需要的时候才会集结起来。以后城外乡村里的人都应当如此装备，这样我们就不需要雇用外国人来为我们打仗了。这也被视为为佛罗伦萨做出的最好安排。

兰杜奇对民兵的信心并未因为神圣联盟中西班牙军队的逼近而动摇。在雷蒙德·德·卡多纳（Raymond de Cardona）的率领下，西班牙军队已经从博洛尼亚出发向佛罗伦萨边境进发。西班牙人反复要求佛罗伦萨改组政府，他们的队伍已经抵达巴贝里诺（Barberino）并向坎比（Campi）发起了进攻，把当地的农民吓得纷纷从山上逃进城里避难。即便如此，在兰杜奇看来，也是在其他所有“有智慧的人”看来，佛罗伦萨“没什么可担忧的，相反倒是我们的敌人应该感到恐惧，因为一旦进入平原地区，他们的气数就要尽了。大批的民兵部队已经动员起来，我们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迎接敌人的准备”。

马基雅维利一直忙着组织穆杰洛的防御，他对当前形势有一个更客观的判断，然而佛罗伦萨城中的索代里尼则和兰杜奇一样自信满满。他已经拥有九千人的民兵武装，他知道西班牙军队的人数远不及这个数目。尽管佛罗伦萨城内的美第奇一派趁着西班牙军队的逼近又有复苏壮大之势，但是索代里尼相信他们想要在佛罗伦萨搞革命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

卡多纳本人并不确定，如果神圣联盟不提供协助的话，他的军队是否足够强大到可以攻陷佛罗伦萨。他本来就不愿意进军托斯卡纳。

教皇的侄子，脾气火爆的乌尔比诺公爵也不认同这次远征。但是枢机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非常坚持。当乌尔比诺公爵拒绝为卡多纳提供军火时，乔瓦尼自掏腰包购置了两门火炮。当卡多纳抱怨补给不足时，也是乔瓦尼出钱为他补足。当佛罗伦萨的代表团带着合理的停战条约来与卡多纳谈判时，也是乔瓦尼坚持拒绝了一切不以恢复美第奇家族地位为前提的和谈。枢机主教让一个农民把秘密的信函藏在圣玛利亚诺韦拉墓地的围墙里，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与佛罗伦萨城中美第奇的同情者们取得了联系。枢机主教的堂弟朱利奥还在一座乡村别墅里秘密安排了与安东弗朗切斯科·德利·阿尔比奇（Antonfrancesco degli Albizzi）的会面，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美第奇支持者之一。他向朱利奥保证，虽然索代里尼摆出了一副抗争到底的面孔，但是他的支持者们一听到西班牙火炮的轰鸣就会崩溃。

面临着枢机主教让他交出佛罗伦萨的要求，索代里尼下令逮捕城中所有已知的美第奇支持者；然后又在市政厅广场上向所有集会的市民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在他的讲话中，索代里尼严正地警告市民，提醒他们允许美第奇家族重回佛罗伦萨的危险。还说虽然美第奇家族自称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回归，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根本不可能只满足于普通市民，他们一定会重新恢复独裁者的地位。索代里尼还说，伟大的洛伦佐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的权势，而是以个体平等的名义掩饰其本质，而他的儿子却不再掩饰；现在由枢机主教代表的年幼的洛伦佐，也就是伟大的洛伦佐的孙子，更是不会记得任何家族的优良传统。“因此，你们才有权决定我是应当辞去公职（你们要求的话，我会高兴地照办），还是继续执政带领你们顽强地保卫国家。”民众大声地表达了对索代里尼的支持，重整旗鼓又投入到保卫佛罗伦萨的战斗中。

马基雅维利的民兵镇守在城市各个据点，而西班牙的士兵则逼近了佛罗伦萨西北仅12英里外的普拉托的大门，饥饿的士兵们还被告

知城里有充足的食物。20年前乔瓦尼来普拉托的时候，人们为了欢迎他修建了一个凯旋门，但是那个拱门坍塌了，还砸死了两个为了向他致敬而打扮成天使的小孩儿。人们至今没有忘却这一悲剧，此时枢机主教再次到来，难怪站在土褐色破损城墙下的老者预言有更多可怕的事将要发生。

很快，城墙就被卡多纳的火炮炸出了一个洞。据雅各布·纳尔迪（Jacopo Nardi）的记录，其实那个洞口还没有一扇窗户大。城墙后面还有修道院的高墙，高墙后面还站着长枪兵和弓箭手，他们完全可以把洞口堵严实。但实际上看到西班牙步兵接近，这些人“全都四散奔逃，甚至连武器都丢在地上，好像敌人已经跳到了他们的背上”。圭恰迪尼的记录里也提到：

西班牙人看到当地的民兵和毫无经验的市民竟然如此胆怯懦弱，缺乏作战技巧，都感到无比惊讶。他们几乎没受到任何阻挡就轻易攻破了城墙，然后迅速穿过了城镇，所有人都放弃了抵抗，只知道哀号和逃窜，而他们的敌人则尽情地施暴、抢掠和杀戮。吓破胆的佛罗伦萨士兵都扔掉了武器向胜利者投降。

整整两天的时间里，西班牙人在城中无恶不作，强暴妇女，在圣坛上杀死教士，洗劫教堂，焚烧或强行闯入修道院，对里面的人施加酷刑来逼迫他们说出装有宝物的箱子藏在何处。即使这些人说了实话，他们依然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他们的尸体还会被扒光衣服扔进已经填满了被砍下的四肢的臭水沟或水井。“没有什么能躲过入侵者的贪婪、淫欲和冷酷无情。要不是枢机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派人把守着主教堂，躲在里面的女人也难逃被玷污的命运。超过两千名男性丧生，而且都不是在战斗中牺牲（因为根本没有人奋起反抗），而是在哭喊逃命时被杀死的。”

然而，枢机主教对后来被马基雅维利形容为“惨绝人寰、令人震惊”的景象并不知情，也没能阻止其发生。1512年8月29日，他在给教

皇写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

今日下午4点我军已经拿下普拉托，虽然难免出现一些伤亡……如此迅速决绝地占领普拉托虽然让我心痛，但至少可以给其他人一个警示和震慑。

这个警示和震慑显然非常有效。普拉托沦陷的消息还没有传到佛罗伦萨，就已经有一群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来到市政厅要求索代里尼辞职，索代里尼也已经做好了辞职准备，而且觉得在还能脱身的时候离开也不错。于是在派遣马基雅维利去为自己谈妥一条安全通路之后，他就在护送之下离开了佛罗伦萨并前往被流放之地达尔马提亚海岸。

后来佛罗伦萨人被迫同意了美第奇家族的回归，还要加入神圣联盟并选举一名新的首席执政官。民兵制度也被废止了。在清洗索代里尼旧部的过程中，马基雅维利的职位被一个美第奇取代了，其实他本来是欢迎美第奇回归的。他想继续为美第奇家族工作的机会很快被拒绝了。最后马基雅维利离开了佛罗伦萨回到位于佩库西纳

（Percussina）的圣安德烈亚（Sant' Andrea）的乡村宅邸，并在第二年写出了《君主论》（*The Prince*）。

[1] 卡西诺山大教堂里的皮耶罗·迪·洛伦佐·德·美第奇之墓是由安东尼奥·达·圣加洛和弗朗切斯科·达·圣加洛（Antonio and Francesco da Sangallo）兄弟共同设计的。位置是在老教堂的唱诗班席位。

[2] 波提切利特别提到过《流浪的女人》（*Derelitta*，现存于罗马的帕拉维奇尼收藏）、《弗吉尼亚的故事》（*Story of Virginia*，现存于贝尔加莫的卡拉拉学院画廊）和《卢克雷齐娅的悲剧》（*The Tragedy of Lucrezia*，现存于波士顿的伊莎贝拉嘉纳艺术博物馆）中的佛罗伦萨悲剧。后两幅可能是为韦斯普奇家族创作的，他们当时住在赛尔维街。

第十七章 教皇莱昂内！

“既然上帝让我成为教皇，那我们就好好享受吧！”

1512年9月1日，也就是索代里尼离开佛罗伦萨的这一天，枢机主教乔瓦尼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进入了佛罗伦萨。他剃掉了流放期间蓄起的络腮胡，穿了一件不太起眼的长袍，也没有带任何侍从，一个人走在佛罗伦萨的街道上。工人们已经开始忙着撤下城市建筑上替代美第奇纹饰的深红色十字架，在拉尔加街围观者的欢呼声中，泥瓦匠们正忙着修复美第奇家族宫殿上的家族纹饰。不过朱利亚诺并没有回美第奇宫，而是去拜访了安东弗朗切斯科·德利·阿尔比奇。他似乎非常想通过自己简朴低调的行为举止向别人证明他只想做一名佛罗伦萨的普通市民，对管理政府毫无兴趣。

不过，这样的态度和他哥哥的计划恰恰相反。枢机主教历尽艰辛、费尽周章，可不只是为了给美第奇找个家。他本人进入佛罗伦萨的时候，有1500名士兵随行，而且摆足了与他职务相称的排场，大张旗鼓地回到了原本的家族宫殿，他表现出来的气势足以说明他是以统治这座城市为目的而回到这里的。

起初，他似乎满足于让共和国的政府机构在表面上维持原貌。不过盛大的入城仪式结束两天后，有人在市政厅广场上组织了一场示威，参与者们大喊着“小球！小球！小球！”，并要求召开市民议会。示威者的要求被采纳，执政团召集了市民议会，所有权力被移交给由40人组成的最高司法委员会，而且几乎所有当选的都是美第奇一派的成员。

毫无疑问，佛罗伦萨人现在有了一位新主人，但是枢机主教乔瓦尼似乎已经准备好向大家保证他不会严苛地统治，也不会征收沉重的

苛捐杂税。他的个人标识——一个牛轭——的意思显而易见，但标识下面却刻着：“因为我的轭很松”（*Jugum enim meum suave est*）。事实上，从一开始，枢机主教就在小心地说服佛罗伦萨人，美第奇家族的回归是要带领他们重新过上洛伦佐统治时期的美好生活，而不是萨沃纳罗拉执政时那种苦闷的日子。现在，娱乐活动和宗教节日都受到鼓励；那些洛伦佐喜爱却被萨沃纳罗拉禁止的节日颂歌又重新响彻街头巷尾。而留在城里的枢机主教的弟弟、和蔼可亲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则似乎是一种保证，证明这个政府是善解民意、仁慈高尚的。

在美第奇家族重掌佛罗伦萨大权不足六个月后，枢机主教得到通知说他的恩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病危了。此时年仅37岁的乔瓦尼自己也在病中，但是为了出席教皇选举大会，他让仆人用轿子抬着他去罗马。

旅途让乔瓦尼精疲力竭，更不用提胃溃疡的剧痛和肛痿带来的麻烦了。1513年6月，他终于到达了罗马。哭泣的妇女们亲吻教皇从太平间的格子窗露出的脚。枢机主教乔瓦尼已经错过了教皇选举大会的开幕仪式和圣灵弥撒。由于圣彼得大教堂正在改建中，所以弥撒是在圣安德鲁小教堂（St Andrew）里举行的，从墙壁裂缝里进来的风总是把圣坛上的蜡烛吹灭。起初几天，乔瓦尼病得太重根本无法起床，闷闷不乐地接受痛苦的治疗。而此时，其他的枢机主教们已经开始分化成各个小团体，不断地争论和密谋。争论持续了一周还没有结果，为了迫使他们尽快做出决定，会议改为每天只给枢机主教们提供一顿引不起食欲的饭食，再加上依照惯例门窗封闭的房间里挥散不去的骚臭气味，新教皇的人选果然马上就出炉了。

在讨论初期，并没什么人提起枢机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的名字。不过随着讨论深入，所有人都承认他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教皇人选（*papabile*）。乔瓦尼和善可亲、广受爱戴、圆滑机智、善于交际又

平易近人。他虽然相对年轻，但已经做了20多年的枢机主教，所以绝不缺乏经验。他也很恪守宗教职责，每周还会斋戒两次。显然在家族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会毫不留情地反击，不过哪个教皇不是这样呢？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好，就算事实证明选举他为教皇是个错误，他在位的时间恐怕也不会很长。来自主要统治者家族的年轻一些的枢机主教们，比如费拉拉的伊波利托·德·埃斯特（Ippolito d'Este）、曼图亚的吉西蒙多·贡扎加（Ghismondo Gonzaga）和锡耶纳的阿方索·彼得鲁齐（Alfonso Petrucci）都迫切想要选举一位和他们一样出身的教皇，他们可不希望再有一位像尤利乌斯二世那样的乡野村夫带着他们来一趟疲惫不堪的行军。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代里尼（Francesco Soderini），也就是皮耶罗·索代里尼的弟弟当然反对乔瓦尼当选。不过乔瓦尼的秘书贝纳尔多·多维齐向枢机主教索代里尼提起，枢机主教美第奇的侄子洛伦佐或许可以迎娶索代里尼家的某位小姐，由此渐渐说服他支持乔瓦尼。于是在3月11日这一天，枢机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作为高级执事亲自负责计算投在骨灰瓮里的选票，这也让他有机会亲自宣布自己的当选。然后，他谦逊地宣布如果教会同意他的选择，他希望称自己为莱奥十世（Leo X）。

美第奇当选教皇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萨，让所有被称为“帕莱斯奇”（*Palleschi*）的美第奇支持者都欣喜若狂。狂欢持续了整整四天。到处都是铃铛声、烟花爆竹的爆炸声、城市外围远山上传来的隆隆炮声，熊熊燃烧的篝火里添加的柴火都是之前萨沃纳罗拉的支持者们的家具，不时还会有喝醉的人们大喊：“小球！小球！教皇莱昂内（Leone）！小球！小球！”“诺沃市场的年轻人把丝绸商人和银行家店里的房顶和门板都拆下来扔进了火里，所以到第二天早上，这些人的房顶都被烧光了。如果不是当局介入，恐怕这一整片地区的所有人家都没有门和屋顶了。”在市政厅的围栏内，市民们可以喝到免费的甜葡萄酒，都装在一排排的镀金木桶里。美第奇宫门外自然也支起了

桌子，上面堆满了各种食物来款待举着神奇的圣母雕像的游行队伍，他们都穿着金色的衣服，从因普鲁内塔（Impruneta）来到这里。^[1]

罗马的庆祝活动则有节制得多，但正式入主梵蒂冈的仪式（*Sacro Possesso*）仍然堪称华丽壮观，绝对能够满足一贯喜爱盛典的教皇本人的所有愿望。不过不得不承认，教皇本人的形象实在不怎么威风。他侧骑在阿拉伯白马上，头顶上是由八个出身高贵的罗马人为他举起的顶棚，即便如此，谁都能看出来教皇的脸因为炎热几乎变成了紫色。人们不会看不到他的身材多么肥胖，肚子多么凸出，短短的脖子上有多少肥肉，下巴堆积多少层，视力微弱的双眼有多么外凸。而那些负责近身侍奉他的人更是无法忽略马鞍上那肥硕屁股下面不时散发出的难闻气味。不过，教皇显然非常享受这场盛典：因为视力不好，他看不清凯旋柱上的刻字，当侍从念给他听时教皇一直满意地点头；对沿路欢呼致敬的群众，他也一直保持着和善可亲的表情，还让侍从把钱袋里的钱币抛撒给围观者；他向众人赐予教皇的祝福时，脸上也挂着友好的微笑；教皇还不忘向人们挥手致意，他最骄傲的就是这双肉乎乎但形状美观、皮肤白皙的手，尽管此时这双手上戴着洒了香水、缝了珍珠的手套。教皇的欣喜溢于言表，无人能不受其感染。被流放的贫苦日子已经结束了，现在他要享受权势和财富带来的好处。据称他对弟弟朱利亚诺说：“既然上帝让我成为教皇，那我们就好好享受吧！”

当然，教皇莱奥享受生活的决心并不影响他同样坚定的目标——让美第奇家族重新成为意大利政治中的决定性力量并将外国势力赶出意大利领土。为了达到第一个目标，教皇打算把意大利中部的费拉拉和乌尔比诺两个公国，以及包括帕尔马（Parma）、摩德纳和皮亚琴察在内的几个城市合并到一起，组建一个强大的邦国。这个新邦国最终将由一个美第奇来统治，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教皇的侄子，也就是皮耶罗的儿子洛伦佐，一个相貌英俊、充满活力和野心的年仅20岁的青

年。此时的洛伦佐已经作为莱奥的代表，在秘书的陪同下被派往了佛罗伦萨。秘书的职责是每天向罗马汇报年轻主人的情况。与此同时，教皇打算通过外交手段而非战争把曾经帮助其家族夺回佛罗伦萨的西班牙人赶出米兰和那不勒斯王国。而那不勒斯王国则有可能最终被交给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统治，在哥哥当选教皇之后，朱利亚诺已经被召回罗马并受封为教会的首席执政官，显然已经准备好在新的伟业上施展身手。

1515年的头一天，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去世，可能是被他那年轻而有活力的英国新娘，亨利七世（Henry VII）的女儿玛丽公主（Princess Mary）花样繁多的要求折腾死了。即位的新王是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教皇莱奥有信心控制住这个年轻人，尤其是当他的姨妈萨瓦的菲利贝尔特公主（Princess Philiberte of Savoy），也就是已经丧夫的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妹妹，与教皇迷人的弟弟朱利亚诺结为夫妻之后。这也似乎成了教皇所提倡的政策要获得成功的预兆。

然而，事实证明法国新王并不像教皇希望的那样易受控制。高大英俊、永不满足的弗朗索瓦一世兼具智慧与魅力，立志要重新掌握查理八世在位期间曾经对意大利短暂拥有的权力。对弗朗西斯的一意孤行及对意大利的野心，教皇深感不安，他向自己的顾问们寻求建议，他的顾问们也向更多的人寻求建议，被咨询的人中就包括马基雅维利。依照他合理的论断，意大利应当与法国结成同盟，但是教皇不愿采纳，并最终决定和西班牙的费迪南德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瑞士结盟。

这样的联盟完全没有让法国国王有所退缩，反而让他鄙视。弗朗西斯率领着近十万人的大军翻过阿尔卑斯山南下至皮德蒙特。教皇的联盟匆匆集结了一支人员混杂的队伍，既有卡多纳带领的西班牙军队，也有凶恶暴躁的锡永（Sion）枢机主教马修·斯金纳（Mathew

Schinner)带领的瑞士雇佣军,还有洛伦佐·德·美第奇亲自挂帅、枢机主教朱利奥为教廷代表的佛罗伦萨军队。意大利人其实根本不想打仗,尤其是在看到洛伦佐与朱利奥已经开始和弗朗西斯谈判之后,可是法国军队随后横扫了佛罗伦萨军队,又在马里尼亚诺

(Marignano)重创了瑞士军队,给他们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处理掉这些根本不是对手的敌人之后,弗朗西斯留下一支队伍驻守米兰,其余人马则继续向博洛尼亚进军。教皇将在那里与他举行和谈。

教皇前往博洛尼亚途中要先经过佛罗伦萨。他的侄子洛伦佐现在已经巩固了美第奇家族在那里的统治。几个月之前,洛伦佐去了一次罗马,把佛罗伦萨留给自己的两个舅舅雅各布·萨尔维亚蒂(Jacopo Salviati)和皮耶罗·里多尔菲(Piero Ridolfi)管理。他在罗马获得了使用佛罗伦萨统帅这一称号的许可。回到佛罗伦萨之后,执政团也顺从地授予他这一称号。自那以后,洛伦佐就越来越独裁,要求在美第奇宫而不是政府的办公地点召开会议,拒绝那些稳健温和、更有经验的市民的建议,身边围绕的尽是一些弄臣一般的年轻花花公子。

为了迎接教皇的到来,洛伦佐和皮耶罗·里多尔菲下令举办盛大的接待仪式,皮耶罗还被指定为仪式的首席执政官。两千名工人加入了准备工作,负责制作装饰物、方尖碑、奖杯、徽章、古典神明的雕像以及刻满了经文引言的凯旋门。据称总花费超过了七万弗罗林币。雅各布·圣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巴乔·班迪内利(Baccio Bandinelli)和安德烈亚·德尔萨托负责监督所有的工作,连教堂都被改作工匠们的临时工作场地。为了创造出开阔的远景,还拆除了几栋房子。圣三一教堂广场上建造了一座由22根柱子支撑的城堡,诺沃市场则竖起了一座50英尺高的彩绘方尖碑。大教堂也临时修建了一个正面:

(这个教堂正面让)所有人都赞叹。上面有那么多图画和装饰;所有人都对它很满意,实际效果也令人赞叹和喜爱,所以永久的教堂正面也将

以此为模型。

事实上，佛罗伦萨的改造工程如此浩大，以至于当教皇早于预计时间达到时，人们不得不请求他不要直接进城，而是到马里尼奥（Marignolle）的吉安菲廖齐（Gianfigliuzzi）别墅暂住几天，等待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2]教皇从来不会让自己的仰慕者失望，也从来不会婉拒参加盛典的邀请，所以他欣然接受了这样的安排，转道前往马里尼奥，直到最后一个凯旋门建好，最后一道屏风做好了装饰，并画好了充满寓意的人物，还有雅各布·圣索维诺用木头和石膏做成、由安德烈亚·德尔萨托绘制的教堂正面也被立在了教堂朝西的一面。

一切准备就绪后，教皇在1515年11月30日圣安德鲁日这一天，头戴镶有珠宝的三重冕，身穿耀眼夺目的长袍从罗马娜门进入佛罗伦萨，后面还跟着一大长队的侍从、护卫和枢机主教们。当看到圣费利切教堂（San Felice）外的屏风前立着自己父亲的半身像，并通过望远镜看清雕像下面写着“这是我挚爱的儿子”时，教皇忍不住热泪盈眶。教皇肯定还想到了他刚刚去世的妹妹孔泰西娜，所以她的丈夫，也就是负责这次接待的首席执政官才被许可“穿着镶有黑貂皮的黑色绸子斗篷”站在一片穿着红色袍子的人中间，“尽管他这样的身份在这样的日子里是禁止哀悼服丧的”。当教皇通过马焦街（Via Maggio），穿过天主圣三桥进入市政厅广场时，他的脸上再一次扬起了笑容，并且抬手向欢呼的群众点头赐福，还让侍从向围观人群抛撒钱币。教皇会不时停下欣赏路边的装饰。在大教堂里，为了让会众们更清楚地看到教皇，中庭里还建起了一个巨大的讲坛。教皇穿着白色织锦法衣，披着深红色的披肩，戴着无边帽站在讲坛上，左右看了看之后才开始祈祷。

相较于在佛罗伦萨度过的如此荣耀的一天，教皇在博洛尼亚受到的接待就悲惨寒酸多了。他的队伍通过时，街道上全无欢呼喜悦之声，倒是偶尔有人喊出支持最近被流放的本蒂沃利奥的口号。教皇到

市政厅（Palazzo Pubblico）等候法国国王，很久之后对方才姗姗来迟，还对被派往城门迎接他的朱利奥·德·美第奇简略地说自己“根本不在乎什么排场”并且希望谈判马上开始不要延误。法国国王与教皇见面问候时还算得上亲切有礼，但之后很快就露出了不退让的本色。他坚持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两个城市必须投降法国，因为他作为米兰的征服者有权这样要求。他还坚持让教皇把最近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手中得来的雷焦（Reggio）和摩德纳还给法国的盟友费拉拉公爵阿方索。面对国王不肯退让的态度，教皇仍不愿放弃将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德拉·罗韦雷（Francesco Maria della Rovere）赶出乌尔比诺的打算，他还拒绝支持弗兰西斯宣称对那不勒斯拥有权力的说法，至少目前是这样的，理由是在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还活着的时候根本没必要谈论这个问题。

不过，教皇的本性还是喜不喜争吵的。最终他同意将雷焦和摩德纳还给费拉拉公爵，不过他其实完全没有要遵守这个协议的打算。教皇还暗示他很可能会改变帮助弗朗西斯对那不勒斯宣称主权的主意，而且后来他也确实改变了主意。教皇还大方地册封法国国王的私人教师为枢机主教；作为回报，弗朗西斯也加封朱利亚诺·德·美第奇为内穆尔公爵（Duke of Nemours），这令教皇非常满意。甚至当弗朗西斯蛮不讲理地要求教皇把最近在罗马发现的拉奥孔（Laocoon）大理石群像送给他时，教皇依然对他摆出笑脸，要知道这可是教廷收藏中最有价值的宝物之一。^[3]

根据教皇的一个陪同人员的说法，教皇虽然表面上和颜悦色，其实心里对于这次与法国国王的谈判非常不满意。回到佛罗伦萨后，教皇发现阿诺河发洪水，佛罗伦萨的市民们正遭受着严重的食物短缺；而且他的弟弟朱利亚诺也因为肺病在美第奇宫卧床不起。尽管他的病已经到了药石罔效的地步，教皇还是派人把朱利亚诺送到菲耶索莱休养。他看起来“整个人都枯萎耗尽了，仿佛马上就要燃尽的蜡烛”。

教皇时常去探望自己的弟弟，这总能给朱利亚诺带来短暂的安慰。知道教皇仍有将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德拉·罗韦雷驱逐出乌尔比诺的打算，朱利亚诺乞求教皇不要这么做，因为朱利亚诺很喜欢德拉·罗韦雷，而且他的妻子在美第奇流放时期也善待过他。但是教皇总是对弟弟的请求避而不谈，只是说：“亲爱的朱利亚诺，不要为政治费心了，你现在需要的是专心把病养好。”

然而朱利亚诺的病情急转直下，最终在3月17日这天不幸去世了。他的妻子萨瓦的菲利贝尔特并没有为他生过孩子，不过与同名的叔叔一样，朱利亚诺也有一个私生子，名叫伊波利托（Ippolito）。

朱利亚诺去世前一个月，教皇离开了佛罗伦萨，并且从此再没有回去过。他是被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的死讯以及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大公查理（Archduke Charles）继位的消息召回罗马的。这是件极端重要的大事，不但终结了一系列原本由康布雷联盟发起的战争，也让洛伦佐和教皇有了对付乌尔比诺公爵的机会，他们本来就是因为费迪南德和朱利亚诺在世，才迟迟没有动手的。

第一步，他们翻出了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可怕丑闻：5年前，脾气暴躁的公爵曾在拉韦纳的大街上袭击并杀死了死敌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阿利多西（Francesco Alidosi）。教皇为此案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团，他本人也是成员之一。虽然最终的结论认为惹人讨厌的阿利多西——据推测可能是尤利乌斯二世的变童——挑衅公爵而丧命是自作自受，但调查团还是通知公爵无论他的杀人行为是否情有可原，他都不适宜再以教会的名义统治乌尔比诺了。同时调查团还重提了当初他拒绝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协助恢复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地位的要求，以及后来拒绝帮助保卫意大利抵抗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侵略军的事。为此公爵被召唤到罗马就自己不光彩的行为做出解释。

公爵并没有应召前往罗马，于是教皇将他驱逐出了教会，并让洛伦佐从佛罗伦萨带兵直接从他手中夺走乌尔比诺。洛伦佐的行动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公爵被迫从曼图亚逃走。5月时洛伦佐进驻了乌尔比诺，但是不到一年之后，被剥夺了爵位的公爵就带着西班牙的军队卷土重来，要夺回自己的公国。在乌尔比诺的多山地区艰苦战斗的时间虽短，却耗费了佛罗伦萨和教皇巨额的军费。这场战争不但激发了持久的反对声浪，还使洛伦佐受了严重的枪伤，他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意志都因此渐渐磨灭了。不过，在那段时间里，教皇曾一度感到非常满足。洛伦佐被宣告为乌尔比诺公爵和佩萨罗领主（Lord of Pesaro），莱奥梦想的由美第奇主宰的、团结强大的意大利中部邦国似乎已经成型，而洛伦佐正向着成为一国之主的方向前进。

在意大利还没有陷入战乱、美第奇家族在乌尔比诺扎根发芽的那段时间里，莱奥欣慰地在梵蒂冈安定下来，开始享受生活。他的花销相当惊人。据说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他不但花光了节俭吝啬的前任留下的所有积蓄，还用光了自己及继任者的所有收入。“让教皇积攒1000达科特，简直比让石头飞起来都难。”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Francesco Vettori）如此评价道。很快教皇就欠下了罗马几乎所有银行的债，有的银行甚至要收他40%的利息。可是教皇却完全没有考虑过削减自己庞大的仆人数量或是取消那些几乎从不停歇的奢侈娱乐和宴会。

枢机主教们也都效仿了教皇。曼图亚侯爵的妻子派秘书通知丈夫说：

枢机主教里亚里奥昨天款待我们的宴席太丰盛了，恐怕用来款待全世界的王后都富有余。我们在餐桌前坐了整整4个小时，和最可敬的枢机主教们一起有说有笑。

威尼斯大使形容在另一个枢机主教科尔纳罗（Cornaro）家里举办的宴会时则写道：

食物都太精致了。菜品源源不断地被送上来，我们总共吃了65道菜，每道菜里至少包括三盘食物。而且上菜的速度快得惊人，我们往往一道佳肴还没吃完，就又有新盘子摆在面前了。所有的食物都是用最精致的银器盛放的，主教大人有足够的餐具供所有人使用。这一餐结束时，我们都要被丰富的食物撑爆了。我们的耳朵也快被持续不断的音乐演奏震聋了，大厅内外都有人奏乐，似乎所有罗马能见到的乐器这里都有，横笛、拨弦钢琴、四弦琴，除此之外还有唱诗班的歌声。

枢机主教和罗马贵族之类的人物争相举办无可比拟的盛大娱乐活动。富可敌国的锡耶纳银行家阿戈斯蒂诺·基吉（Agostino Chigi）连浴室用具都是纯银的。一次他邀请教皇来吃饭，豪华的餐厅里挂着各种精致的挂毯。客人用的餐具都是专门订制的，上面还有每位客人的家族饰章。撤下最后一道菜之后，教皇赞扬了基吉丰盛的晚餐和精致的新餐厅。然而基吉却回答说：“教皇陛下，这并不是我的餐厅。”他示意仆人们扯下那些精致的挂毯，露出了后面的一排排马槽，然后说：“这不过是我的马厩而已。”另一次，基吉宴请整个罗马教廷。然后为每位枢机主教呈上了他们家乡的特色菜。人们还听说，基吉下令让仆人在每道菜之后把用过的银质餐具扔进台伯河，以此显示他的银器多到同一件不使用第二次。不过后来有人看到他的仆人在河上拉了个大网，把被丢弃的银器都又捡了回去。

教皇本人的宴会以珍稀的食材而闻名，比如孔雀舌之类他自己都舍不得吃的菜肴。教皇的宴会还因滑稽幽默而闻名，比如从糕点里飞出一只夜莺，或者从布丁里钻出一个赤裸的婴儿之类的。矮人、小丑和弄臣更是他餐桌旁必不可少的内容。宾客们被他们滑稽的动作和残酷的恶作剧逗得哈哈大笑——比如，有一次，他们在已经腐坏的肉上撒满味道极重的酱汁掩盖臭味，然后欺骗几个智商有欠缺的矮人说这是专为他们准备的佳肴，饥饿的矮人们真的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教

皇本人尤其偏爱弄臣马里亚诺·费蒂（Fra Mariano Fetti）。这个多明我会的教士曾经是个理发师，后来竟然被封为教廷印玺保管者。这位机智、狡猾、无比低俗的教士最能博得教皇的开怀大笑，所靠的不仅是他粗俗的幽默，还有他出了名的能一次吃下40个鸡蛋或20只鸡的本事，以及他对特殊小菜和糕点的喜爱——有时主人会出主意在派里面放一整只带着喙和羽毛一起下锅的乌鸦。

在莱奥担任教皇期间，似乎没有比戏耍可怜的巴拉巴洛（Baraballo）更让他开心的恶作剧了。这个来自加埃塔的老教士好像认定了自己那点滑稽蹩脚的诗歌创作是什么天赋奇才。有人建议他应该要求在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上（Capitol）公开受赏，彼特拉克也受到过这样的礼遇。教皇热情地认可了这个要求，向巴拉巴洛保证说他的诗歌完全配得上这样的特别嘉奖，并且提出让他骑着自己非常喜爱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赠送的大象汉诺（Hanno）去参加典礼。大象不久前才刚刚运来，现在被养在美景宫（Belvedere）里。典礼当天，巴拉巴洛身穿大红色带金流苏的宽外袍，骑着同样盛装打扮过的大象，神态庄严地从梵蒂冈前往卡比托利欧山。教皇的首席传记作家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描述此情此景时写道：“若不是亲眼看见，我永远不会相信竟有这样可笑的事情。一个年过花甲、受人尊敬的老者，头发花白、仪态庄严，却是骑在大象上，周围还吹着喇叭。”

不过响亮的吹奏声和围观人群的欢呼叫嚷让大象受了惊吓，它站在圣安杰洛城堡的吊桥前嘶叫，不肯过河。巴拉巴洛不得不从装饰豪华的鞍具上爬下来，这场闹剧也就草草结束了，至少对于坐在不远处阳台上愉快地通过望远镜看热闹的莱奥来说是结束了。

虽说这样大型的活动不可能经常举办，但是教皇在自己宫殿里举办的戏剧表演、假面舞会、芭蕾舞、哑剧和摩尔人的舞蹈表演

(*moresche*)等则是尽如他意地从来不曾停息过，为他提供了无尽的乐趣。最早的两部无韵诗历史悲剧——乔万尼·鲁切拉伊(Giovanni Rucellai)的《鲁斯蒙达》(*Rosmunda*)和吉安-乔焦·特里亚诺(Gian-Giorgio Trissino)的《索福尼斯巴》(*Sophonisba*)——都在教皇面前上演过。不过教皇显然更偏爱通俗喜剧以及阿里奥斯托(Ariosto)、马基雅维利和枢机主教贝纳尔多·多维齐·达比别纳创作的或多或少有些下流的滑稽剧。阿里奥斯托的《卡萨利亚》(*Cassaria*)和《交换者》(*Suppositi*)，还有马基雅维利的《曼陀罗花》(*Mandragola*)都是1519年为教皇上演的，都令他非常满意，而所有作品中教皇最钟爱的莫过于多维齐的《百灵鸟》(*Calandria*)。这部剧是关于一个愚蠢的年轻人爱上了一个姑娘，而这个姑娘却喜欢和自己的双胞胎哥哥假扮对方来戏耍自己的情人，由此上演了各种甚合教皇口味的桥段。

教皇有时会花好几个小时观看这些表演，或者坐在赌桌上玩没什么难度的纸牌游戏(*primiero*)，输了钱也不生气，赢了钱还会赏给大家。到了节庆之日，教皇更是会整天外出观赏斗牛，参加宴席舞会，看他的枢机主教在化装舞会上和女士们跳舞，或去观看罗马人热衷的各种运动，还有他们的赛舟会、游行、扔橘子大赛及充满暴力和危险的滚酒桶比赛——巨大的木桶从泰斯塔乔山(Monte Testaccio)的陡坡上极速滚落，山脚下聚集的农民们则冒着断手断腿的危险抢夺装在桶里面的猪。

当然莱奥的生活中也不是只有浮华。如果说他在举行娱乐活动、购买法国猎犬和克里特猎鹰，添置皮草和金饰，以及供养不断壮大的家族人员上花费了巨资的话，那么他在对罗马的改造和修缮上也同样毫不吝惜。他修建的里佩塔街(Via Ripetta)为拥堵的旧城提供了一条通向人民广场(Piazza del Popolo)的新路；他修缮了多尼卡(Domnica)的圣玛丽亚教堂，还为它加装了一个带门廊的宏伟正面；

除了以上这些，他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梵蒂冈宫（Vatican Palace）和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中。他留用了尤利乌斯二世的建筑师——被称为布拉曼特（Bramante）的多纳托·德·安杰洛·拉扎里（Donato d' Angelo Lazzari），并由其从1505年起主持修建新教堂。教皇莱奥还有一个更具野心的设想，就是抽干蓬蒂内沼泽（Pontine Marshes），并且要求莱昂纳多·达·芬奇设计一个可行的方案。

为了将罗马打造成全欧洲最具文化气息的城市，教皇采用了各种措施来吸引有才华的艺术家、作家和学者来罗马生活，还将自己的藏书室免费向他们开放，并不断收集珍贵的手稿来扩充本就十分丰富的藏品。教皇自己是爱书之人，爱读书也爱藏书，对于喜爱的作者的作品，他甚至能够大段背诵和引用。即便是在财力不济之时，他也会想尽办法——通常是出售有俸圣职和枢机主教之职——来资助那些求助他的作家、学者、诗人和剧作家们。教皇大力资助了罗马学院；协助重组大学，增加了教学设施和教授数量；教皇鼓励学习和使用拉丁文，并且设法资助拉丁文作家和诗人；把拉斯卡里斯带回罗马并建议由其编辑和印制自己收藏的希腊手稿。

但不得不承认，教皇本人的品位还称不上完美。他少有的一些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完全比不上其父亲的文学造诣。他尝试谱写的音乐作品更不成功。尽管他为西斯廷小教堂招揽了欧洲最好的唱诗班，但是他自己最喜欢听的，也会挥着丰满白皙的手哼唱的那些音乐都被认为是平凡陈旧的。同样，他对于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没什么鉴赏力。除了会观看他们创作的喜剧之外，教皇并不看重马基雅维利或阿里奥斯托；他也不崇尚圭恰迪尼。事实上，那些从他的慷慨资助中受益最多的反而是一些低等得多的作家，比如贝尔纳多·阿科尔蒂（Bernardo Accolti），莱奥对其作品的认可程度几乎跟阿科尔蒂本人对自己的认可程度一样高了。

至于教皇对米开朗琪罗的忽视，与其说是他没有能力欣赏伟大的才华，倒不如说是他没有耐心容忍艺术家暴躁的脾气。米开朗琪罗是受尤利乌斯二世的鼓励来到罗马的，他是个阴郁、易怒、独立且固执己见的人，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进行创作，尤其不愿无条件遵从资助者的要求或是给创作设定时间表。教皇虽然公开表示对米开朗琪罗有很深厚的感情，而且每每想到两人年少时一起生活的经历就“几乎感动地落泪”，但实际上他们相处得一直不好。教皇鼓励米开朗琪罗做一名建筑师，并督促他回到佛罗伦萨为布鲁内莱斯基的圣洛伦佐教堂修建新的正面。^[4]相比之下，教皇更喜欢和年轻顺从、谦虚有礼的拉斐尔·圣齐奥（Raffaello Sanzio）打交道。

拉斐尔是乌尔比诺人，布拉曼特把他推荐给尤利乌斯二世，后者于是指定拉斐尔装饰自己在使徒宫（Apostolic palace）的办公室。后来教皇莱奥要求拉斐尔留下来继续工作，在他们的共同指导下，完成了拉斐尔敞廊（Loggia di Raffaello）和拉斐尔厅（Stanze di Raffaello）的建造。^[5]

^[1] 神奇的圣母雕像（miraculous statue of the Virgin）在圣玛利亚德尔因普鲁内塔教堂。这座教堂始建于十三世纪，十五世纪重建，战争中损毁严重，现已被复原。圣母的大理石祭坛由多纳泰罗的一名追随者制作。

^[2] 菲利波·斯特罗齐的第二任妻子是塞尔瓦吉娅·德·吉安菲廖齐（Selvaggia de' Gianfigliuzzi）。吉安菲廖齐家族的家族教堂在圣三一教堂里。吉安菲廖齐宫位于科尔西尼河滨大道（2号）。“小王位凯觐者”（the Young Pretender）的妻子奥尔巴尼（Albany）伯爵夫人就居住在这里，拜伦（Byron）和司汤达（Stendhal）也曾在这里居住过。霍勒斯·曼爵士（Sir Horace Mann）的房子也在附近。查尔斯·哈德菲尔德（Charles Hadfield）的著名旅馆就在阿诺河对岸的圭恰迪尼河滨大道，十八世纪成百上千名热衷于留学欧洲（Grand Tour）的英国人来佛罗伦萨时都住在这里。他们之中很多人在这里的时候都让托马斯·帕奇（Thomas Patch）画过像，这位画家从1755年到1782年去世为止都住在佛罗伦萨。

[3]. 佛罗伦萨雕塑家巴乔·班迪内利被要求以最快的速度雕刻出一套可以乱真的拉奥孔大理石群像。真正的拉奥孔群像是1506年1月，由特拉亚浴场

（Trajan）附近的一个农民在自家葡萄园挖地时发现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花了4140达科特买下了这套雕塑作品，并把它们运到了梵蒂冈。运送过程中，沿途都要撒上鲜花。

[4]. 米开朗琪罗在和朱利亚诺·达圣加洛、雅各布·圣索维诺及巴乔·德·阿尼奥洛（Baccio d' Agnolo）的竞争中获胜，但是他的获胜方案最终并没有被付诸实践。他在卡拉拉的采石场里花了两年时间试图解决各种技术难题，结果圣洛伦佐教堂的新正面建造计划却被搁置了。

[5]. 拉菲尔厅中有很多歌颂教皇莱奥十世与美第奇家族的暗示。比如在赫利奥多罗斯厅（Stanza of Heliodorus）中，拉菲尔被授意用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和圣莱奥（St Leo）的会面来隐喻拉韦纳战役。画中的圣莱奥骑着一匹白马，其实他代表的就是教皇莱奥十世，因为教皇在很多场合的坐骑都是一匹白马。教皇莱奥十世的形象还出现在了火灾厅（Stanza dell' Incendio）中，这幅画是由拉菲尔的助手于1514~1517年为教皇的餐厅创作的。这里的画作展现了八、九世纪两任教皇莱奥三世和莱奥四世的生活情景。窗户对面墙上的壁画展示的是公元847年的那场大火，据说火势已经猛烈到要烧毁圣彼得大教堂了，但是教皇莱奥四世对着火焰画了个十字手势，大火就熄灭了。如同在赫利奥多罗斯厅的壁画中一样，莱奥四世也象征着莱奥十世。

第十八章 向罗马进军

“给教皇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教皇莱奥一有机会就会骑马离开罗马，前往坐落于通往波尔图（Porto）道路上的玛利亚纳（Magliana）别墅。在这里他仍然以遵从医嘱为借口公然违反教廷法令，尽情地沉醉于带猎犬、猎鹰甚至雪雕打猎。别墅周围的广阔区域都被圈定为教皇的专有猎场。场地里还有一个巨大的用网围起来的罩子，里面都是鸽子、松鸡和苍鹭，是专为猎鹰捕猎用的；同样还有一个兔笼（*conigliare*），里面养的兔子是专为雪貂准备的。

有时教皇在玛利亚纳别墅会暂住六周之久，在这里他不穿圣衣和白色法衣，更让教宗礼典长惊愕的是，教皇甚至“穿着长筒马靴，这是非常不合礼法的，因为人们无法亲吻教皇的脚了”。因为视力不济，教皇并不能参加最初阶段的打猎活动，他只是骑着最喜欢的白马到高坡或特别建造的平台上，用望远镜观看最后的猎杀环节。

猎场四周用绑着帆布的杆子围得严严实实。为了防止围栏中的猎物跑到临近的灌木丛或沼泽里，还安排了瑞士卫兵和骑着马的猎场看守在农民的帮助下列队将围栏围起来。当猎场内牵着猎犬和獒的马夫们做好准备，教廷的枢机主教、绅士和他们的朋友们也都就位之后，教皇会举起白手绢作为吹响号角的信号。然后猎场管理员就会进入围栏，大声喊叫着，吹着喇叭，甚至通过放枪来把猎物们驱赶到帆布围栏前的缺口处。很快狂奔的动物们就会冲进开阔的猎场里，有牡鹿、野猪、野兔、家兔、狼、山羊和豪猪。等待已久的猎手们此时会迫不及待地开始猎杀他们选定的猎物，有的人用长矛或剑，有的人用斧子或戟，还有的会带着猎狗在那些侥幸逃脱的猎物后面紧追不舍。

通过望远镜观看这些杀戮场面时，教皇常常会被马里亚诺的滑稽动作惹得捧腹大笑，尽管他其实是故意让自己陷入各种无厘头的麻烦来取悦教皇的；教皇还不免会羡慕身材魁梧的枢机主教圣塞韦里诺，后者在这种场合里总是会在肩上披一张狮子皮，甚是威风。如果有猎物已经被网或绳子困住，教皇就会走近它，将眼镜举到左眼上，手持长矛，亲自杀死挣扎不休的动物，然后还要高高兴兴地接受随从的祝贺。

据诗人圭多·西尔维斯特（Guido Sylvester）的记录，有一次打猎经历让教皇尤其欢畅。当天发生了各种意外。先是一个教廷成员把猎犬当成狼猎杀了，展示成果时他的愚蠢似乎让教皇觉得很有趣。接着又有两个人为了争夺一只被猎杀的野猪而打了起来，涉事一方还在争斗中伤了一只眼睛。再后来，枢机主教科尔纳罗的一名养狗场管理员，也是一个出了名的酒鬼，举着长矛刺杀一只已经受伤、正向森林逃跑的野猪，结果却失手刺死了自己最喜欢的猎犬。一怒之下养狗人扑向野猪想要扭住它的脖子将其扼死，结果却被野猪从背上甩下并用獠牙刺死了。同行的人员把养狗人的尸体抬到了枢机主教面前，枢机主教命人用最好的葡萄酒洗掉尸体上的血污，还即兴创作了一段诗文祭奠他的悲惨命运。最后教皇骑着马返回别墅，仆人们抬着各种被猎杀的动物尸体跟随其后，有人听到教皇评价这一天时赞道：“这真是极好的一天。”

除了对这些血腥场面的描述之外，圭多·西尔维斯特还评论说，在一天成功的狩猎之后，教皇一定会心情大好，和颜悦色，以至于此时提交到他面前的任何提议都能轻松通过，任何文件都会被顺利签署，任何要求都会获得满足；相反，要是这一天的狩猎不成功，教皇则会咆哮和抱怨。所以那些想要向教皇讨些优待的朝臣或教士都会识趣地等待时机，比如在坎帕尼亚的狩猎成功之后，或是从奥斯蒂亚的人工咸水湖垂钓归来之时，又或者是等他去枢机主教法尔内塞

（Farnese）在维泰博（Viterbo）的领地里游玩尽兴，在那里他可以用袋子抓捕雉鸡、鹧鸪和鹌鹑，以及在鸟棚（*uccellari*）里设机关诱捕蒿雀、画眉、百灵鸟和金翅雀。

教皇当然受到了很多人的爱戴，比如那些在他外出狩猎、钓鱼的途中得到慷慨赏赐的农民，或者是那些在宫廷中野心得到了满足的教士和宠臣们；但是在罗马，还是有一些枢机主教对教皇的种种行为颇有微词。与乌尔比诺耗资巨大的战争并不是唯一将教会财力消耗殆尽的美第奇事业；当教皇想让侄子洛伦佐迎娶法国公主的计划不再是秘密时，弗朗切斯科·索代里尼也不是唯一因为教皇的失信而怒火中烧的枢机主教。

枢机主教拉法埃拉·里亚里奥永远不会原谅教皇为了给卑鄙的洛伦佐谋得封地而把自己的亲戚赶出乌尔比诺的行径；枢机主教阿方索·彼得鲁齐也无法把自己心中的愤怒搁置一旁，因为正是在莱奥的帮助下，他的兄弟博尔盖塞·彼得鲁齐（Borghese Petrucci）才被夺去了锡耶纳的总督一职。当莱奥把自己亲密的朋友都封为枢机主教，却拒绝其他枢机主教家庭中更符合条件的人选时，更是大大地冒犯了这些枢机主教。莱奥在当选教皇后短短几个月里，就加封了贝纳尔多·多维齐和另一个托斯卡纳老乡洛伦佐·普奇（Lorenzo Pucci）为枢机主教，第三个受加封的则是他的外甥洛伦佐·奇博（Lorenzo Cibo）。虽然他已经任命朱利奥·德·美第奇为佛罗伦萨的大主教，但是为了让朱利奥也能升格为枢机主教，教皇授意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他堂弟的出身，并且明示希望调查结果是自己的叔叔朱利亚诺曾经与西莫内塔·戈里尼（Simonetta Gorini）^[1]秘密结婚，因此朱利奥是他们的合法婚生子。而委员会不负教皇的托付，“查出了”这样的结果。如果朱利奥本就受人爱戴，也许还没什么人对此提出异议，不过根据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观察：

他是个阴郁、孤僻的人，不乐于助人，被普遍认为是个贪婪、行事极其谨慎小心的人。非常有自制力，如果不是因为胆小怕事，也许本能成就一番事业。

在罗马教廷之中，最憎恨朱利奥的人非阿方索·彼得鲁齐莫属。他是个英俊、高傲、风流成性的枢机主教，此时只有22岁。因为教皇干涉了其家族在锡耶纳的事务而一直心存不满。他在选举教皇时曾投票给莱奥，但现在他开始公开指责莱奥，其言论在罗马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包括枢机主教里亚里奥和索代里尼，还有富有的朋友、年轻的枢机主教绍利（Sauli），以及以前做过英格兰枢机主教保护者的阿德里亚诺·卡斯塔莱斯（Adriano Castellesi）。虽然卡斯塔莱斯与教皇之间并无家族恩怨，但据说他非常迷信一个算命先生的预言，那个算命先生曾对他说下一任教皇叫“阿德里安（Adrian），是一个有着卑微出身的清瘦男子”。所以卡斯塔莱斯一直将尽快实现这个预言视为自己最神圣的使命。

起初大家商定解决现任教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趁他出去打猎时雇人将其暗杀。不过，大家很快又设计出了一个更隐蔽的方案：找一个从韦尔切利（Vercelli）来的江湖郎中，在彼得鲁齐的秘书和一个锡耶纳朋友的帮助下，以治疗肛瘘为借口把有毒的绷带绑在教皇身上。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彼得鲁齐于是前去与被驱逐的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德拉·罗韦雷讨论后续行动了，却没想到在自己离开的时候，一个男侍从的不谨慎行为导致阴谋败露，江湖郎中、彼得鲁齐的秘书和那个锡耶纳朋友都被移交给教廷的刑讯师一并处置。

很快，彼得鲁齐也被勒令即刻返回罗马与教皇商谈一些事情。教皇向他承诺会保证他的安全。也许是相信了教皇的承诺，抑或是以为教皇已经为以前对待自己家族的做法感到后悔，天真的彼得鲁齐马上回到了罗马，并且与枢机主教绍利一起到梵蒂冈认罪。两个人立刻遭到逮捕，并被关进了圣安杰洛城堡中“最可怕的地牢”。彼得鲁齐声

嘶力竭地痛斥出尔反尔的教皇莱奥，绍利也在狂怒之下把自己的白色法衣撕成了碎布。和他们的手下一样，这两个人也受到了酷刑的折磨，最后不但招了供，还交代了同党。枢机主教里亚里奥被逮捕时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不得被抬着送到了关押的地点。

在抓捕彼得鲁齐阴谋的其他支持者之前，教皇召集了一次枢机主教会议。在所有枢机主教面前，教皇展现了从未有过的震怒，以至于在场的人都怀疑教皇是不是在演戏吓唬他们。教皇肥硕的身体不断颤抖，声音大到连临近的走廊上都可以听到。他要求其他参与阴谋的罪人马上坦白。于是枢机主教索代里尼和卡斯塔莱斯都承认了自己知晓这一阴谋并跪在教皇脚下卑微地忏悔。

卡斯塔莱斯最终设法逃出了罗马并从此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而索代里尼则缴纳了巨额的罚款，帮助教皇解决了一些不还行的债务，之后他觉得还是效仿卡斯塔莱斯销声匿迹为好。里亚里奥被释放后去了那不勒斯，他交的罚款数额甚至比索代里尼的还要高。绍利凭借自己在法国和意大利一些有权势的朋友而得以离开地牢，却被下令软禁于罗通多山（Monte Rotondo）的房子里，第二年就神秘地去世了。彼得鲁齐在地牢里被教皇的穆斯林刽子手执行了死刑，有可能是被吊死的，也有可能是直接砍了头。至于那位韦尔切利的江湖郎中以及彼得鲁齐的秘书和朋友则被拖在马后在罗马游街，他们身上的肉还要被用钳子一块块撕下来，最后才吊死在圣安杰洛城堡前的桥栏杆上。

尽管从里亚里奥和索代里尼那里收来的巨额罚款暂时缓解了教皇的囊中羞涩，他还是觉得有必要通过加封更多的枢机主教来为金库带来更多收入，也正好填补罗马教廷中的空缺。与此同时，教皇还要求比较富有的已当选的人为他提供更多的捐赠。其实钱并不是莱奥加封31个枢机主教的唯一原因。他希望自己能够创造一个比前任留下的更

加稳固可靠的罗马教廷，一个不会对任何符合美第奇家族利益的行动有异议的教廷。因此，在教皇的名单中尽管确有一些人是配得上这个职位的，但更多的人是因为教皇的私心才当选的。在这些人当中，既有法国和葡萄牙皇室的王子；又有摩德纳的比安卡·兰戈内的儿子埃尔克莱·兰戈内（Ercole Rangone），她也是莱奥以前重要的女恩人；还有一向无法无天的蓬佩奥·科隆纳，也许一顶枢机主教的帽子能让他有所收敛；此外还有他的两个佛罗伦萨外甥尼科洛·里多尔菲（Niccolo Ridolfi）和乔瓦尼·萨尔维亚蒂；而第三个佛罗伦萨亲戚则是路易吉·罗西（Luigi Rossi）。

现在罗马教廷中尽是一些美第奇家族的朋友和亲戚，以及那些受过美第奇恩惠的人，教皇觉得让侄子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堂妹马德莱娜·德拉图尔·奥维涅（Madeleine de la Tour Auvergne）结婚的时机也成熟了。于是在1518年3月，洛伦佐带着一支人数众多的红衣侍从队伍北上翻越阿尔卑斯山去迎娶新娘，当然还少不了带着他叔叔慷慨准备的聘礼，包括36匹宝马以及用龟壳制作并镶嵌着珠母和宝石的婚床之类的珍品。

尽管被美第奇家族的富有所震惊，但是法国宫廷上下对于乌尔比诺公爵本人可称不上有多满意，他傲慢的性格以及对于一个25岁青年来说有些可怜的身材和外形让人难生好感。事实上，婚后不过几个月人们就看出公爵必将不久于人世，而他的妻子竟比他还要短命。1519年4月底，她生下女儿后没多久就去世了，而这个被取名为凯瑟琳

（Caterina）^[2]的女婴将来则会成为法国王后。又过了几天，洛伦佐因为梅毒导致的肺结核加重而去世。洛伦佐人生中的最后几个月都是在卡雷吉和波焦阿卡伊阿诺的乡村别墅里度过的，陪在他左右的是一位皮斯托亚人秘书及另一个名声不太好的男性朋友，似乎没有人为他的离世感到哀伤。

洛伦佐从法国回来后，佛罗伦萨人已经对他满怀怨言了，他的贵族做派日益明显，衰弱的健康没能使他的政治野心有一丝减退，而且他对城市财政的处理不当，再加上那个傲慢、贪婪又专横，心里只有儿子的阿方西娜的影响。洛伦佐去世后8个月，他的母亲也在罗马去世了，不过她的死讯同样没有引起任何伤感的情绪。

枢机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非常清楚佛罗伦萨人的不满，于是匆匆从罗马赶回来稳固美第奇家族对城市的控制，同时小心翼翼地不冒犯任何人。他赶在洛伦佐的死讯还没有彻底传开之前到达佛罗伦萨，确保了没有发生任何动荡，同时也将整个共和国的管理大权转到自己和一些重要家族手中，他巧妙地向这些家族征求意见，直到教皇为佛罗伦萨设定好新的计划为止。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一派是幸运的，朱利奥处理事务的方式婉转而机智，在他谨慎认真的财政管理之下，佛罗伦萨经历了一段繁荣时期。教皇一直无法决定如何处理佛罗伦萨或乌尔比诺的问题，因为此时美第奇家族的正统继承人只剩下一个有一半法国血统的女婴，男孩子们则都是私生子：伊波利托是内穆尔公爵朱利亚诺与一个佩萨罗的性感女郎生下的，而亚历山德罗（Alessandro）虽然名义上是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的儿子，但是有传言说他实际上是枢机主教朱利奥和一个那不勒斯的摩尔人女奴或一个罗马坎帕尼亚的农家女的儿子。

最终，教皇决定封凯瑟琳·德·美第奇为乌尔比诺女公爵（Duchess of Urbino）并将其公国附属为教廷国，还要求佛罗伦萨贡献了一大笔赞助以支付将德拉·罗韦雷赶出去的花销。作为补偿，教皇把圣莱奥（San Leo）堡垒和占领下来的蒙泰费尔特罗地区（Montefeltro）划给了佛罗伦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佛罗伦萨的共和国政府。而这一问题在1519年之后变得更加复

杂，因为当年年初，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去世，随后查理五世（Charles V）经选举继位。

无论是法国国王还是教皇都曾极力阻挠这位充满野心的年轻人当选，因为他不仅是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国王，还是荷兰君主和奥地利大公。既然没能阻止其当选，莱奥在百般踌躇、万般推脱之后，决定抛弃与法国的联盟，转而与查理五世私下达成秘密协议。因为此时此刻，教皇不得不依靠查理五世来解决一个已经无法忽视的麻烦——令他苦恼的奥古斯丁修会教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多年来教皇一直竭力对路德思想和德国人改革教会的要求置之不理，希望这个问题可以依靠德国教士们的诡辩解决，最终能够不了了之。然而路德却始终没有退缩，以至于教皇不得不将他驱逐出教会。而现在教皇希望查理五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能够处决马丁·路德这个异教徒，从而帮他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皇帝本人倒是不反对处死路德，但是那些带着同情听了路德的激情宣言的德国王子们则不赞成这种做法。查理当然可以否决他们的意见，而且他也是这么跟教皇承诺的，但是作为交换条件，教皇必须支持他夺取包括米兰在内法国占领的意大利地区的打算。教皇同意了这个条件，前提是将法国从这些被占领地区赶走之后，教廷有权拿回弗朗索瓦一世在1515年博洛尼亚会议上拒绝归还的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两个城镇，而且查理要协助他们夺取费拉拉。最终双方达成了协议，皇帝的军队也整装待发。

枢机主教朱利奥的加急信件传来了皇帝打败弗朗索瓦一世的捷报，还有米兰被攻破、法国军队朝那不勒斯逃窜的消息也都传到了正在玛丽亚纳别墅的教皇耳中。尽管刚刚接受了治疗肛瘘的手术，教皇还是出去打了一天的猎。这个时节白天潮湿闷热，晚上却寒冷多风。莱奥坐在卧室里的壁炉前，背后的窗子却没关，他时不时会走过去观看下面院子里点起来的庆祝篝火，结果染上了重感冒，还发起了高

烧。两天后他被人抬着回到了罗马，并被告知他们已经夺回了皮亚琴察和帕尔马。

（1521年）12月1日大约早上7点的时候，教皇因重感冒去世了，之前没有任何人警告他这次感冒会有生命危险，所有的医生都说这只是在玛利亚纳着凉造成的轻微不适而已。

枢机主教朱利奥一接到教皇突然离世的信息，就马上奔赴罗马去参加当月28日的教皇选举大会，显然是抱着要成为堂兄继任者的打算。不过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代里尼赶在朱利奥之前回到了罗马，并且在枢机主教蓬佩奥·科隆纳（Pompeo Colonna）的帮助下，结成了强大的反朱利奥联盟。于是朱利奥退而选择支持阿德里安·德代尔（Adrian Dedel）参选，他是查理五世曾经的老师，一位籍籍无名、道德高尚、节俭朴素的佛兰德斯枢机主教。很多罗马教廷中的大人物甚至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为了挫败像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和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这样有权势的枢机主教的当选野心，朱利奥一手导演的谦虚学者当选教皇的结果也在众人的意料之中；感到意外和愕然的恐怕只有新教皇本人，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几乎是惊慌失措的。新教皇选择了阿德里安四世（Adrian VI）的称号，极不情愿地前往罗马就职。他的当选也算是应了那个让枢机主教阿德里亚诺·卡斯塔莱斯激动无比的算命先生的预言。新教皇很不习惯在罗马的新生活，他每天只花1达科特，三餐都是由一个佛兰德斯老妇人负责准备的，教皇对这个脾气暴躁的仆人似乎格外宠爱。教皇对教会做出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此外，他为限制教会奢侈之风而做出的努力，以及那些因他的节俭而失去了往日奢华生活的人的憎恨和敌意，最终都超过了教皇的承受能力。他染上了一种肾病，再加上人们难免猜测可能被下了毒，没过一年时间，教皇就去世了。罗马人终于不用再忍受一位非意大利籍的教皇了。他们甚至在教皇医生家门口摆放了节日花环，并称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美第奇家族的两个私生子伊波利托和亚历山德罗，以及凯瑟琳·德·美第奇现在都居住在佛罗伦萨。在确认这里完全处于美第奇一派的控制下之后，枢机主教朱利奥在罗马安顿了下来。他居住的豪华宫殿是从枢机主教里亚里奥手里没收而来的，作为其参与谋害教皇莱奥十世的代价。朱利奥在这里的生活不算过分奢侈，但是也少不了美第奇家族一贯阔绰的样子。他是艺术家和音乐家的资助者，是穷人的守护神，也是慷慨大方的主人。按说以他冰冷的态度和阴郁的外貌，还真不适合这样一个角色，不过朱利奥却做到了，因为在阿德里安四世死后冗长沉闷的教皇选举大会上，他需要发动所有可以召集的朋友。起初他看起来毫无希望当选。法国表示强烈反对，此外许多其他的反对者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其中最想要阻挠朱利奥当选的莫过于有权有势的枢机主教蓬佩奥·科隆纳，因为他本人也同样对教皇的位置虎视眈眈。几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选举仍然没有结果。罗马甚至发生了示威行动和暴乱。在人们的记忆中，历史上从没有过持续这么长时间的选举大会。最终，依靠各种贿赂和收买换来的承诺，再加上为了避免僵局使宿敌枢机主教奥尔西尼渔翁得利，枢机主教科隆纳放弃了对朱利奥的反对。查理五世和亨利八世也赞同让一个美第奇当选，而弗朗索瓦一世之所以没有反对，是因为相信美第奇家族肯定不会永远效忠德国皇帝。最终，枢机主教在持续了60天的选举大会中脱颖而出，成为教皇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VII）。这一年他25岁^[3]。选举大会上曾经与他为敌的人没有几个转投他的阵营，但是在罗马，还是有很多人看好他，并且“相信接下来会看到一个繁荣昌盛的教廷，一个开明的教皇；在前任教皇阿德里安野蛮统治下被废弃的文学和艺术也会得到复兴”。

教皇克莱门特绝对是一个慷慨且有眼光的资助者。虽然他本不是慷慨之人，更绝对不是爱热闹、善交际之人：他更喜欢在闲暇时间里听听音乐，而且他比莱奥十世更热衷于讨论神学和哲学问题。不过他也明白慷慨的重要性以及可能带来的回报。克莱门特在救济和施舍上

像莱奥一样大方，作为资助人也毫不吝惜。他延续了美第奇家族对拉斐尔的资助，并邀请他设计准备在马里奥山（Monte Mario）松柏覆盖的峭壁上修建的别墅。^[4]教皇还向最具才艺也最爱争论和吹嘘的佛罗伦萨艺术家本韦努托·杰利尼订制了作品。教皇还鼓励了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的研究，他还让朱利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和吉安·弗朗切斯科·彭尼（Gian Francesco Penni）到梵蒂冈工作，并在那里为莱昂纳多·达·芬奇提供了私人住处。莱奥十世打算在佛罗伦萨的圣洛伦佐教堂中建造一个礼拜堂作为父辈朱利亚诺和洛伦佐及他们的两个堂兄弟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和内穆尔公爵朱利亚诺的安葬之地，^[5]并已经把这项工作指定给了米开朗琪罗。克莱门特不仅对此工作进行了确认，还让米开朗琪罗在圣洛伦佐另外设计一个藏书室，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将美第奇家族的藏书重新送回佛罗伦萨。^[6]

正如弗朗索瓦一世收回对教皇克莱门特的反对时所预见的那样，教皇很快就表现出了不再忠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迹象。到1524年年底，在几经辗转变化之后，教廷重新与法国结盟，法国军队也重新出动。然而克莱门特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却一天比一天犹豫不定，并且后悔做出了这个决定。他的这种烦恼是有理由的，1525年2月，消息就传到了罗马，说皇帝和米兰公爵结成联盟，在帕维亚打败了法国军队，还俘虏了弗朗索瓦一世。教皇此时的处境与查理的囚徒无异。为了摆脱这样不利的困境，教皇像任何理智尚存的人都会选择的一样，与皇帝达成了协议，可是背地里，他又与已经被释放的弗朗西斯同样达成协议，支持他卷土重来再次越过阿尔卑斯山。

虽然教廷的特使们尽全力不让秘密协议泄露，但最终还是没能瞒住皇帝。查理五世非常清楚教皇的目的，于是决定先发制人，以防止他们建立起一个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联盟。1526年9月，在唐·乌戈·迪·蒙卡达（Don Ugo di Moncada）的唆使下，皇帝的特使枢机主教蓬佩奥·科隆纳带领着一支家臣和雇佣武装护卫组成的强大队伍来到

罗马，占领了圣彼得大教堂附近的郊区，并洗劫了教皇宫殿，此前教皇已被迫逃往更安全的圣安杰洛城堡。最后，教皇被迫在圣安杰洛城堡签订了条约，条约规定他必须放弃针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结盟，还要赦免科隆纳的无理攻击。

克莱门特当然根本不打算遵守这个条约。签字之后没过几周，他便派遣教廷的军队开赴科隆纳的领地，下令要攻破要塞和城堡，威吓科隆纳的佃农并通告科隆纳家族他们已经被认定为不法之徒，所有的封号和职务都将被免除。盛怒之下的枢机主教科隆纳此时提到教皇克莱门特的名字都会气得浑身颤抖，于是他带着能召集的所有人力投靠了查理·德·拉努瓦（Charles de Lannoy），也就是查理五世在那不勒斯的总督，后者已经在加埃塔驻扎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准备“给教皇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此时，一个更加严峻的威胁来自德国。老当益壮的勇士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Georg von Frundsberg）已经集结了一支大军，主要是由巴伐利亚（Bavaria）和法兰克尼亚（Franconia）的路德教派教士（*Landsknechte*）组成，他们心中满怀着宣教的热忱，发誓要向罗马的反基督教会复仇，而他们另一个更实际且同样强烈的要求则是剥夺教皇的巨额财产。这支令人惧怕的队伍完全没有被阿尔卑斯山区的风雨和暴雪阻挡，一路南下来到伦巴第。即便是当教皇的其他敌人，比如科隆纳和拉努瓦的人马在弗罗西诺内（Frosinone）受阻时，冯·弗伦茨贝格带领的强悍德国人依然能勇往直前。

英勇的战士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Giovanni delle Bande Nere），也是伟大的洛伦佐的孙女婿，曾经尝试阻挡德国人毫不留情的进击，但是他不但没能阻止他们穿过波河，还在战斗中被隼炮的炮弹击中了右腿。在医生为他截去已经被压碎的腿时，乔瓦尼还要忍痛帮医生举着火炬照明，然而这个医生使用锯子的技术实在不济，乔瓦

尼·德拉·班代·内雷终因伤势过重于11月30日去世。被任命为教皇军队将领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曾多次警告乔瓦尼不要冒险激进，并且也在给克莱门特的信中督促他给乔瓦尼同样的建议：“他太重要了，显然敌人就是决心要夺他性命的。如果失去他，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现在圭恰迪尼为这些警告终究没有起作用而悔恨不已。他哀悼乔瓦尼时说：“在我们最需要勇气的时候，上帝却将最英勇的战士召去了。”

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死后不久，冯·弗伦茨贝格又接受了奥朗日王子菲利贝尔特（Philibert, Prince of Orange）的帮助，后者也是效力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于是德国人的队伍中又增加了一大批来自米兰的西班牙士兵。合并后的军队人数超过三万，继续往南向博洛尼亚行进。

现在教皇终于认清脱离可怕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尽力达成停战条约，而且敌军领袖似乎也正有此意，只是路德教派教士可不是长途跋涉来换一个空手而归的。他们叫嚣要将罗马掠夺一空，除非得到一笔让他们满意的补偿。此时体形肥胖又已经上了年纪的冯·弗伦茨贝格熬不住艰苦的军旅生活突发中风，虽然主将被抬回了费拉拉，军队向罗马逼迫的脚步并没有停。在波旁公爵夏尔（Charles, Duke of Bourbon）迟疑不决的领导下，德国人已经表明了如果满足不了他们的目的，他们是不会遵从这个新长官的命令的。

如果换一个比波旁公爵坦率得多的将领，肯定会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很难掌控这支加速向罗马逼近的军队了。军队里的士兵们忍饥挨饿、衣衫褴褛，脏污的身体接受倾盆大雨的冲洗，在山间奔流的溪涧中步履蹒跚，需要手拉手才能勉力维持平衡。到5月4日，他们终于到达了伊索拉法内塞（Isola Farnese），仅距罗马7英里之遥。波旁公

爵从这里派人传信到罗马，通知他们只有支付一笔让手下士兵满意的补偿才能免于劫难。

教皇并不想和敌人达成协议。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停滞已久的城市防卫措施。许多高阶神职人员和贵族们都清楚意识到了他们所面临的危险，早就逃走避难去了。其余的则忙着把自家财物隐藏好，或者是加强宫殿的防御，抑或是雇用更多的守卫来保护安全。然而教皇本人仿佛“陷入麻痹状态”一样，直到4月26日才开始向公众募集款项以支持罗马的防御；直到5月3日，在反复督促无效之后，他才以同意加封六名富人为枢机主教的方式筹集了二十万达科特。如圭恰迪尼说的那样：“教皇在痛苦中煎熬，筹钱这件事比毁掉教会和整个世界”更令他良心不安。5月4日，教皇最终召集了罗马大议会，并敦促人民在伦佐·达·切里（Renzo da Ceri）的带领下保卫城市。

然而，罗马人其实并不打算这样做。他们宁愿相信，逼近的敌人如果占领罗马，自己“也许能够和在教士统治之下享有一样的好处，甚至可能会过得更兴旺”。所以人们不但阻止了伦佐·达·切里炸断台伯河上的大桥的想法，更有甚者，要不是被伦佐阻拦下来，市民们就要派遣信使去和波旁公爵达成单独的协议了。当卡比托利欧山上的大钟被敲响时，几乎没什么人响应钟声走出家门。最终伦佐集结了不足八千名士兵，其中还包括两千名瑞士卫兵和两千名乔瓦尼·德·美第奇黑衣军团（Black Bands）的成员。广阔的罗马城墙就要靠他们来守卫了。

[1]. 此处与前文不符，应为菲奥雷塔·戈里尼。——译者注

[2]. 又译作卡泰丽娜。——编者注

[3]. 原文似有误，朱利奥1478年出生，应为45岁。——译者注

[4]. 拉菲尔为克莱门特七世设计的别墅位于马里奥山上台伯河转弯处的莫雷桥边（Ponte Molle）。但是别墅在建成之前就被教皇的敌人枢机主教科隆纳在1527年罗马陷落时炸毁了。后来奥地利的玛格丽特重建了这座别墅并将其命名为马达马别墅（Villa Madama）。

[5]. 圣洛伦佐教堂的新圣器收藏室，也就是人们所知的美第奇堂，是1534年由米开朗琪罗完成建造的。洛伦佐和朱利亚诺都被安葬在靠近入口处的《圣母和圣婴》（*Madonna and Child*）旁边。内穆尔公爵朱利亚诺的石棺在右，公爵被塑造为教堂的神职人员，倚在他脚下的是被称为《昼》的男性雕像和被称为《夜》的熟睡的女性形象。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的墓葬在左，这位被马基雅维利以《君主论》致敬的公爵被描绘为一位军人，目光低垂，若有所思。他的脚下是名为《晨》与《昏》的雕塑。米开朗琪罗1534年离开佛罗伦萨时，美第奇堂的装饰还没有完成。为伟大的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以及教皇莱奥十世建墓的计划后来也一直未能实现。十七世纪时，丹麦王子来到佛罗伦萨并参观了这座教堂，称其为“世界上最华丽壮观的艺术品之一”。

[6]. 米开朗琪罗为劳伦齐安图书馆（Biblioteca Laurenzian）设计的华丽入口和楼梯在他离开佛罗伦萨时已经大体完工，未完成的部分由巴尔托洛梅奥·阿曼纳蒂和乔焦·瓦萨里依据米开朗琪罗留下的指示收尾。图书馆于1571年向公众开放。

第十九章 围困与谋杀

“温和的手段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1527年5月6日黎明时分发起的第一波进攻被教皇的枪手们击退了，不过没过多久，台伯河上升起了浓雾，在雾气的笼罩下，波旁公爵的士兵们沿着葡萄藤做的梯子爬上了城墙。波旁公爵本人被火绳枪的流弹击中，奥朗日王子把他抬到了附近的小教堂里。公爵最终不治身亡，此时进攻的军队已经跟着科隆纳领地一心要报仇的那批人以及其他一些劫掠者攻破了城池的守卫，并且扬言要攻入城市中心区。尽管守卫者们拼尽全力、英勇反击，但终究敌不过帝国军队巨大的人数优势。很快就有大批守军开始向圣安杰洛城堡的吊桥慌忙撤退，护城河吊桥上挤满了要抢着躲进城堡里的人，以至于很多人摔倒甚至被踩踏。

教皇此时也在逃向城堡。诺切拉（Nocera）主教发现教皇的时候，他还犹豫不决。于是他巧言说服教皇从连接教皇宫殿和圣安杰洛城堡的石头走廊逃走。路上大主教帮教皇提着圣袍的下摆以便让他能跑快点，同时还不忘用紫色的斗篷把教皇的头和肩部严实遮住，“以免下面的人群中有什么野蛮歹徒认出教皇的白色法衣，在他经过窗口时妄图行凶”。

确实有一些西班牙士兵向教皇开火了，不过教皇最后还是平安躲进了城堡。这里总共有三千多名难民，包括13名枢机主教，其中一个还是躲在篮子里被从高处拉进城堡的。从吊桥拉起的那一刻起，除了那些躲进防卫坚固的宫殿中的大家族，其余留在罗马城中的民众若还想有一丝生机，恐怕就只能寄希望于入侵者的仁慈了。结果证明，没有任何人受到了仁慈的对待。在当天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入侵者都

在忙着抢占食物储备和寻找过夜之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5月7日这一天，入侵者血洗了整个城镇，杀害甚至肢解了所有的居民，其残忍程度令人震惊。暴徒们还砸坏了教堂和修道院的大门，把避难的人赶到街上，把里面的铃铛和钟表、圣杯和烛台摔个粉碎，珍贵的宝藏被毁坏殆尽，连神圣的遗物都被用来做火绳枪射击的靶子，古代的手稿甚至被用来铺马圈。无价的祭祀礼服被随意地披在烂醉的妓女肩上；纯洁的修女被当作赌博的筹码几经倒手。马丁·路德的名字被用长矛刻在拉斐尔厅的壁画上。商店和房屋被抢劫得最为彻底，甚至连百叶窗上的合页以及门上的把手都被拆下来拿走了。有钱人被抓来做人质换取赎金，而穷人一旦被抓，就只能遭受折磨和屠杀。教士们被扒光衣服参与恶意歪曲的弥撒，还要被迫念诵亵渎神明之词，若不遵从就只有死路一条。圣坛之上溅满了血迹和酒渍，更有暴徒在此行淫秽或赌博之事，连十字架都被扔到了街上。为了戒指切掉一根手指，为了手镯砍断一条胳膊，为了耳坠割下一对耳朵之类的事不止一两件。一个商人因为付不起赎金被绑在一棵树上，每天被拔掉一个指甲，直到最终丧命。据统计，仅仅这第一天，就有超过八千人被残忍杀害。

在圣安杰洛城堡之内，有一位名叫本韦努托·杰利尼的不知疲倦、英勇无畏、积极振奋的神枪手，从他言过其实、自吹自擂的记述中看，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我当时就在城堡里，正要去找一个负责管理枪械的炮兵领取武器，却发现他在凝望城墙之外他本来居住的地方，那里有他的房子以及还留在里面遭受欺凌的妻小。因为担心殃及家人，他不敢贸然向那里开炮，所以只能踩灭了导火线悲痛地哽咽出声。其他炮兵也都处于类似的两难境地。看到此情此景，我只好抓起一个导火线，在另几个不那么沉浸于悲痛之中的士兵的帮助下，摆好一些重型火炮和隼炮，向我认为有必要的地方开火。借此我打死了不少敌人……我不断地向敌人开火，一些枢机主教和贵族都在旁边给我祝福和叫好。在他们的激励下，我迫使自己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总之，我想说是因为有我的壮举才保住了城堡的安全……我就这么一直坚守着直到夜晚降临。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杰利尼“以无法想象的能量和热情”协助了“被教皇指定来管理炮兵的罗马贵族安东尼奥·圣克罗切（Antonio Santa Croce）”。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杰利尼的行为。他先是和两个枢机主教“结下了深仇”，他命令这两个人从布置了火枪的高台上下来，因为他们“丑陋的红色四角帽从远处就能被发现”；接着他又因为用大炮投掷石头时打中了城堡的阳台，差点儿误杀了正好站在那里的另外两名枢机主教。不过据杰利尼自己说，教皇对他只有百般赞誉。他“没有一天不立下赫赫战功，在教皇心中的分量也与日俱增”。因此当他要求教皇赦免他所有的杀戮之罪时，

教皇在城堡中的教堂里举行了仪式，他举起自己的右手，小心地在杰利尼头上比画了一个大十字，然后祝福他，并原谅他已经犯下的和今后为教廷效力时可能会犯下的所有杀人罪行。

杰利尼还继续写道：

离开教皇后，我又爬上塔楼继续向敌人开火，几乎弹无虚发……如果我把在如地狱般的残酷战场上的所有壮举一一列举出来，恐怕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惊……所以我就略去大部分细节不谈，直接说教皇克莱门特因为担心属于教会金库的三重冕和大量珍贵的珠宝落入贼手……下令让我去把这些珍贵的宝石从镶嵌着它们的金质底座上取下，然后用纸包好，一起缝进教皇及其信任的仆人卡瓦列里诺（Cavalierino）的衣服内衬里。完成之后，教皇又把剩下重约200磅的金子交给我，让我偷偷地将它们熔掉。

每天天亮之后，教皇都会向北眺望，期盼着能有援兵来解救罗马于危难之中，然而这样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到了6月初，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围困之后，教皇不得不向皇帝的特使投降。与他一起避难于城堡中的难民们因为饥饿和疾病已经逼近死亡的边缘，而他期盼的援军也已经被逼退回维泰博了。教皇不得不将奇维塔韦基亚、奥斯蒂亚和摩德纳以及帕尔马和皮亚琴察的统治权移交给帝国军队，同时他还被要求交纳一笔巨额赔偿金，用于补偿科隆纳家族的损失，最后还要释

放7名重要的人质，其中就包括雅各布·萨尔维亚蒂和洛伦佐·里多尔菲（Lorenzo Ridolfi）。

虽然教皇已经投降，但是在交纳全额赎金之前，他仍不被允许离开圣安杰洛城堡，现在这里成了囚禁他的监狱。转眼春夏已过，而教皇依然被扣留此地。帝国军队因为瘟疫和饥荒不得不撤出罗马，但留下了一支两千人的队伍镇守城池，以防被囚禁者伺机逃脱。到了12月初，德国和西班牙军队把城市附近的乡镇劫掠殆尽之后又回到罗马，扬言如果得不到拖欠的赔偿款，他们就要吊死守军长官，将教皇大卸八块。不过教皇得到消息说，看守愿意放他一条生路，所以在12月7日早上，教皇穿着他男管家的衣服，在少数几个人的陪同下逃出了城堡，朝奥尔维耶托（Orvieto）去了。那里有一座防卫坚固的主教宫殿，位置极其偏僻，只有帕利亚（Paglia）峡谷中的一条骡马道可走。教皇决定就在这里开始他复兴权势和名誉的大业。

这座位于奥尔维耶托的老城堡“已经破旧不堪，连房顶都坍塌了，只有30来个乌合之众听其差遣”。亨利八世的特使就是在这里向教皇寻求与阿拉贡家族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的许可的。克莱门特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可以获得亨利友谊的机会，但凯瑟琳又是查理五世的姑姑，所以现在身无分文的教皇能做的无非就是给英国国王一些模糊的承诺，说只要自己能回到罗马就一定会批准他的请求。事实上，教皇此时所想的是一些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没有什么比佛罗伦萨问题更令他担忧，因为罗马被屠城和他自己被囚禁已经在佛罗伦萨引起了极为不利的反应。

佛罗伦萨人非常厌恶居住在美第奇宫的教皇代表——那个无礼又贪婪的外国枢机主教西尔维奥·帕塞里尼（Silvio Passerini），陪同他的还有另外两名教廷代表，分别是枢机主教因诺琴佐·奇博（Innocenzo Cibo）和尼科洛·里多尔菲。佛罗伦萨人对于帕塞里尼

的被监护人——两名年纪尚轻的美第奇私生子——也没有什么好感，不讨人喜欢的亚历山德罗更是不受爱戴。这两个男孩都在公共场合受过洛伦佐的孙女克拉丽切·斯特罗齐（Clarice Strozzi）的斥责，她曾经愤怒地指责他们根本配不上美第奇这个伟大的姓氏，还说克莱门特本人也不配做教皇，就像帕塞里尼不配做教皇代表一样。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曾写信给教皇汇报市政厅附近的一起暴乱，在书信中他写道：

这样的事在我来这里不长的时间内就看到一千次了，这都是因为（帕塞里尼）这个阉人整日无所事事，忽略了重要的事情……他尽其所能地让自己和所有人看起来更值得怀疑，让所有人都感到绝望，而且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无能。

圭恰迪尼还认为，帕塞里尼的两个被监护人和他一样应当受到斥责。

毫无疑问，佛罗伦萨人都同意圭恰迪尼的观点。当罗马陷落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萨之后，人们纷纷涌上街头，高喊着口号、唱着感恩歌曲以示庆祝。帕塞里尼和两个被监护人刚一逃走，人们就把圣母领报教堂里的教皇雕像扔到广场上砸了个粉碎，并且大声宣布要订立新宪法，重建大议会和民兵组织，选举反美第奇的尼科洛·卡波尼

（Niccolo Capponi）为首席执政官，组建政府并任职一年。美第奇宫虽然有重兵把守以防止暴徒们冲进去抢劫，但是他们还是没能阻止吉贝尔蒂的一个后人在宫殿正面墙壁上画了一幅教皇沿着梯子爬上绞刑架的壁画。

教皇尽管目前势力衰微且财力不济，但还是决定不再放任局势恶化下去。法国军队的帮助是指望不上了，虽然他们又一次出兵意大利，并且一度前进到那不勒斯，但是瘟疫摧毁了他们的战斗力，法国人不得不又一次向西班牙人投降。鉴于此，教皇最终决定与神圣罗马

帝国皇帝达成协议，并于1529年6月29日在巴塞罗那正式签署。该协议规定，教皇将承认皇帝在意大利的地位，并在皇帝到达之后为他举行加冕仪式，而查理则保证让美第奇家族重掌佛罗伦萨，如有必要不惜提供武力协助。

一些年长的也更谨慎的佛罗伦萨市民觉得，鉴于教皇以前对佛罗伦萨政府的安排也不是太过分，所以接下来应当考虑如何与教皇达成协议，他们还提出了一些互相妥协的条款。然而年轻一些的市民则拒绝接受这种懦弱的建议，他们的爱国热情也代表和鼓动了更大部分的佛罗伦萨人。这些人组建了民兵队伍，筹资雇用更多兵士，又把郊外一些可能为帝国军队提供庇护的乡村别墅拆除了，另外还加固了自己城市的防御设施。这些武装力量的指挥权最后被交给了佩鲁贾的雇佣军首领马拉特斯塔·巴廖尼（Malatesta Baglioni），他的父亲就曾经参与过针对美第奇的战斗，这次他为佛罗伦萨效力就是要顺势回到自己的城市重掌大权。与此同时，最具独创性的米开朗琪罗被指定监督防御工程，他那充满启发性的雕塑《大卫》此时就竖立在市政厅。

[1].

根据米开朗琪罗的建议，城市的防卫城墙应当延伸至将圣米尼亚托山也包括进来，而教堂的钟楼应当加装混凝土垫层以抵挡炮火的攻击。在这些工程将近完工之前，米开朗琪罗突然失去了勇气，逃出了佛罗伦萨。虽然没过几天他又回来了，但是并没有重新承担起丢下的责任。他的这种表现后来被归因为艺术家的古怪脾气而非临阵脱逃，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原谅。

到此时为止，教皇已经获得了奥朗日王子的协助。当初这个冒险家带领帝国军队攻陷了罗马，现在又是他，带领着一支同样目无法纪、主要由西班牙人组成的队伍来攻打佛罗伦萨了。这支队伍于1529年初秋时节抵达了佛罗伦萨外围的山坡。据说当时他们对城内大喊：

“佛罗伦萨，把你们精美的锦缎都搬出来吧，我们要用长矛丈量你们

的布料。” 尽管这支军队有四万人之众，王子仍然不认为他的手下强大到能够听从命令打赢一场攻坚战，所以最后还是决定采取围城的策略，把佛罗伦萨耗到弹尽粮绝、主动投降。

多亏了有军事才能且英勇无畏的佛罗伦萨将领弗朗切斯科·费鲁齐（Francesco Ferrucci）^[2]组织突击队保证了城内供给线路的畅通，佛罗伦萨才能在围困之下坚持十个月之久。不过到了1530年8月3日，费鲁齐在皮斯托亚附近山区里一个叫加维纳纳（Gavinana）的村子中陷入一队西班牙士兵的包围，最终被乱刀砍杀了。他的牺牲也导致佛罗伦萨的彻底崩溃。没过几个星期，投降似乎成了必然的选择。虽然马拉特斯塔·巴廖尼走在街上时还戴着写有“自由”

（*Libertas*）字样的帽子，但是背地里他已经和敌人达成了秘密协定。市民们都在遭受着瘟疫和饥饿的折磨；有些沿街乞讨的可怜人甚至叫喊着只有美第奇回归才能不再挨饿。贝尔代托·瓦尔基（Benedetto Varchi）记录说：

所有人都会被恐惧和困惑逼疯了。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或是去哪里。有些人想要逃跑，有些人开始躲藏，还有些人则到市政厅或教堂里寻求庇护。大多数人选择听天由命，过一个小时算一个小时，等待他们的可能只有死亡，而且是最可怕、最残酷的死法。

弗朗切斯科·费鲁齐牺牲几周后，一个由佛罗伦萨市民组成的代表团同意接受皇帝和教皇代表提出的投降协议。他们被迫交出50名人质作为如约支付巨额赔偿款的保证；把仍由佛罗伦萨占领的堡垒都移交给帝国军队；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美第奇支持者；只有满足这些条件，城市的自由解放才会获得保障。同时教皇还承诺宽恕所有“市民带来的伤害”，教皇会以“他一贯的关爱和仁慈之心”来对待他们。虽然没有哪一方会指望教皇遵守这一承诺，后来事实也证明，教皇的确再一次食言了。

查理五世的代表进入佛罗伦萨一个星期之后，市民们被召唤到市政厅广场上举行市民议会，内容是投票决定建立最高司法委员会。随后一个由美第奇控制的最高司法委员会组建了起来，教皇的一名坚定支持者被任命为首席执政官。而在帝国军队逼近佛罗伦萨之前就逃离这里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也被请回来负责监督“改革”和报复措施的执行。

圭恰迪尼在9月24日到达时就发现：

这里的人民已经疲惫不堪，资源也已经消耗殆尽，佛罗伦萨城外几英里之内的乡镇都被摧毁了，很多佛罗伦萨辖属的乡村里，农民数量锐减，几乎没有多少老百姓能幸存下来。

连圭恰迪尼自己的乡村别墅也被毁了。他很快就下定决心，如果这个国家还想重新“振兴起来，温和的手段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所以，他后来也不再采取什么温和的手段了。一个被称作“愤怒者”

(*Arrabbiati*) 的极端反教会团体的首领弗朗切斯科·卡波尼

(Francesco Capponi) 受到了酷刑的折磨，并最终被处决。他的一些支持者也落得相同的下场。新当选的首席执政官拉法埃拉·吉罗拉米 (Raffaele Girolami) 也被判处了死刑，不过最终减轻为终身监禁。还有大批市民领袖被判处了永久流放。

为了取代这些人在城市政府中的位置，教皇让此时已经19岁的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 (Alessandro de' Medici) 回到佛罗伦萨。教皇不但从查理五世手中为这个有着浓黑卷曲头发的年轻人买下了彭内公国 (Dukedom of Penne)，还希望他将来可以迎娶皇帝的亲生女儿玛格丽特 (Margaret)。

教皇余生再也没有回过佛罗伦萨，然而这个城市的未来就这样被他果断粗略地确定了下来。教皇又把另一个美第奇家族的私生子伊波利托封为枢机主教——虽然这个乐观、爱交际、奢侈纵欲的年轻人并

不喜欢这样的安排——然后就开始把全部的精力投到了这个家族最后的资源上——年仅12岁的凯瑟琳·德·美第奇——一个苍白、瘦弱，长相平平但意志坚定的小女孩儿。教皇对她寄予厚望。有传闻说，教皇之所以封伊波利托为枢机主教，就是为了让无法成为凯瑟琳缔结婚约的对象，因为凯瑟琳似乎对这个男孩儿表现出了过分的喜爱，而克莱门特绝对不会允许这个女孩儿选择一门无论是对美第奇家族还是对教皇本人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的婚事。实际上，他已经打算让她嫁给法国国王的儿子了。

如此有野心的计划当然需要极为精巧的策划。教皇既不能表现得太热切，又不能不征求帝国皇帝的许可。他把这样一个角色扮演得出神入化。威尼斯的大使就完全被教皇骗到了，根本没想过教皇其实早已暗中认定这门亲事；而皇帝则以为法国宫廷一定不会同意这样的安排，所以当教皇到博洛尼亚寻求他的许可时，他完全没有把这当成什么大事就随口同意了。然而，令皇帝非常意外的是，法国人丝毫没有反对这门亲事。于是在1533年10月28日这一天，教皇在马赛亲自主持了14岁的乌尔比诺女公爵凯瑟琳·德·美第奇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二儿子——奥尔良公爵亨利·德·瓦卢瓦（Duke of Orleans Henri de Valois）的婚礼。

这次婚礼也是克莱门特的最后一次成功了。他在前往马赛主持典礼之时就已经病了；而婚礼之后，满载着最终由罗马和佛罗伦萨的纳税人埋单的昂贵礼物回到梵蒂冈时，教皇已经是个将死之人。此时的他骨瘦如柴、形容枯槁，本来就有一点斜视的右眼几乎完全失去了视力，肝病又使他的皮肤总是苍白中透着蜡黄。让他烦忧的还有来自各方的麻烦事：英国在与他争论罗马教廷至高无上（the Holy See）的地位问题；皇帝因为对美第奇家族与法国结亲不满而对教皇敌意日盛，重新提出组建教会大议会（General Council of the Church）的

要求；而最令教皇发愁的，莫过于伊波利托和亚历山德罗之间持续的不和，以及由此可能招致美第奇家族再一次失去佛罗伦萨的危险。

1534年9月22日这天，当本韦努托·杰利尼去向教皇展示自己为他设计的模型时，发现教皇躺在床上，病情急剧恶化：

教皇命人取来眼镜和蜡烛，即便如此他依然无法看清楚我的作品。于是他改为用手指触摸模型的方式来鉴别。抚摸了半天之后，教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对自己的一个朝臣说觉得对不起我，如果上帝能恢复他的健康，他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报酬。又过了三天，教皇就去世了。

杰利尼承认当他亲吻去世教皇的双脚时，眼中不禁充满了泪水，可是除他之外没有人为教皇哀悼。相反，罗马为此而欢庆。像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形容的那样，教皇是“费了很大力气才从一个伟大且受尊敬的枢机主教变为一个渺小而不被尊敬的教皇”。每天夜里都有人闯进圣彼得大教堂，教皇的尸体被用剑钉在棺材板上；暂时的墓碑上被涂抹了污物，连下面篆刻的碑文“至尊克莱门特教皇”（*Clemens Pontifex Maximus*）也被恶意涂改为“至恶的教皇”（*Inclimens Pontifex Minimus*）。[3]

教皇的死讯让佛罗伦萨有一种更加不祥的预感。人们认为教皇死后，这个被很多人怀疑是教皇私生子的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会迫不及待地抛开所有约束，组建一个更符合他心意的专制政府，尽管到目前为止他一直表现得小心翼翼。进入佛罗伦萨9个月以来，他公开承袭了公爵的头衔，但是为了安抚由此引发的共和派的愤怒和质疑，他一直被要求征询和考虑佛罗伦萨市民会议的意见和建议，而他也确实照做了一段时间。所以人们渐渐感到安心了，甚至愿意勉强地认可，这个脾气暴躁、举止粗鲁的年轻人等成熟一些之后，身上没准也是有一些优点的。

此时教皇的死讯传来，人们又重新开始担心起来，而冬季结束之前，人们的担心似乎就要变为现实了。亚历山德罗连假装征求市民议会建议的样子都不再做了，不但变本加厉地实行独裁统治，在私生活上也越来越放纵淫乱。而他让佛罗伦萨人出离愤怒的行径绝不止这一桩：市政厅钟楼上的大钟依他的命令在市政厅广场上当众砸毁，以此象征共和制度的终结；然后他又让人把大钟的金属熔掉重铸成象征他家族荣耀的奖章；刚刚扩建的位于阿拉朱斯蒂齐亚门（Porta alla Giustizia）的堡垒大门上也被刻上了美第奇家族的纹饰；^[4]任何武器都要被收缴扣押，即便悬挂在教堂里的作为敬献的武器也不例外；他还修建了一座巴索堡垒（Fortezza da Basso）^[5]——“威尼斯、锡耶纳、卢卡和热那亚已经证明，它对于一个自由城市而言完全没有必要”。有人偷偷谈论着暗杀暴君的计划，但是反对用暴力脱离目前困境的人则主要担心招致帝国军队的武力干涉，毕竟不久前的围城惨状还历历在目。有一段时间人民寄希望于嫉妒心强的伊波利托能够出面解决佛罗伦萨人的麻烦；而且伊波利托也确实同意要将亚历山德罗的行径报告至查理五世的宫廷之上；不过伊波利托还没有采取行动，就于1535年8月10日在伊特里（Itri）去世了，死因有可能是疟疾，但也有可能是被毒害死的。他的尸体被一些强壮健美的运动健将抬回了罗马——其中有摩尔人、鞑靼人、土耳其人、黑人摔跤手和印度潜水员，因为他曾经幻想着和这些人一起远游。

被佛罗伦萨驱逐的流亡者领头人们在查理五世面前列举了亚历山德罗的种种劣迹。他们的代表，历史学者雅各布·纳尔迪，讲述了公爵种种令人惊骇的恶行，还说佛罗伦萨此时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中，震慑住她的是“一座阴森的堡垒，一座用她悲苦人民的血汗为其不幸市民建造的囚笼和刑场”。不过，皇帝虽然承诺“要伸张正义”，但是比起纳尔迪的指控，他更愿意相信亚历山德罗的首席幕僚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强词夺理、混淆视听的辩驳。圭恰迪尼甚至这样恬不知耻地总结自己的陈述：“对方那些关于女性、强奸及类似行为的污蔑我

们无意一一驳斥；但是公爵大人的美德、名望，城市中人们对他的看法，以及其审慎和良好的品行就是对此最好的回击。”

确认了自己未来女婿的优良品德，皇帝自然不愿意承认那些对他的控诉。亚历山德罗与14岁的玛格丽特的婚礼也如期举行了，回到佛罗伦萨之后，他对城市的控制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他也志得意满地准备利用好运大展宏图。不过短短几个月之后，他就一命呜呼了。

洛伦扎乔·德·美第奇（Lorenzaccio de' Medici）是皮耶尔弗兰切斯科的儿子，也是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的远房亲戚。这个清瘦、平凡、愁容满面的年轻人因为有一些怪癖而一直名声不佳。在过去几年中，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罗马，但是因为他一喝醉酒就喜欢乱砍古董雕塑的脑袋，所以被人赶了出来。于是他来到佛罗伦萨投靠亲戚，年长三岁的亚历山德罗，并成了后者的一名陪同。他们两人花天酒地，纵容自己男扮女装的嗜好；有时两人同骑一匹马在街上狂奔，对过往行人大喊大骂；有时他们还会同床共寝。亚历山德罗也不知道该拿洛伦扎乔怎么办，但是他显然非常喜爱这个亲戚。后者神秘的微笑和精妙模糊的言辞总会勾起亚历山德罗的兴趣，他甚至还给洛伦扎乔取了个昵称叫“哲学家”。不过，洛伦扎乔显然不是真心喜欢亚历山德罗的，他嫉恨他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总幻想着自己能成为一个英雄，甚至是枭雄也好，只要有名，美名或恶名都没关系。最终，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诛戮暴君的角色。

为此洛伦扎乔设计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计划。他有一个貌美的亲戚卡泰丽娜·索代里尼·吉诺里（Caterina Soderini Ginori）。她是一位目空一切的傲慢女士，因优雅的举止和对年老无趣的丈夫忠贞不渝而备受赞赏。洛伦扎乔对亚历山德罗说：只有能把卡泰丽娜勾引上床，才能算得上真正的风流人物。如果亚历山德罗愿意试试自己的运

气，他可以找个借口安排两人独处。时间就定在了星期六晚上，正好是主显节之夜，这样的公共节日里，没人会注意卡泰丽娜或亚历山德罗去了洛伦扎乔的房子里。亚历山德罗高兴地同意了，并在指定的时间如约前往洛伦扎乔的房子。他把侍卫都留在了室外，解下了佩剑，脱光了衣服躺在床上等待卡泰丽娜的到来。当房门发出轻响时，亚历山德罗已经快睡着了。然而进来的人并不是卡泰丽娜，而是洛伦扎乔和他雇佣的杀手斯科龙科洛（Scoroncolo）。洛伦扎乔接近床边，一边低声问“你睡着了吗”，一边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刺亚历山德罗的腹部。当他伸手捂住亚历山德罗的嘴以免他叫喊的时候，亚历山德罗狠狠地咬住了他的手指，伤口深得露出了骨头，另一边的斯科龙科洛则直接把刀捅进了亚历山德罗的喉咙。带着满身的血迹，把被严重咬伤的手用手套包起来之后，洛伦扎乔跑了出去，一路狂奔经斯卡尔佩里亚（Scarperia）逃向了博洛尼亚。至于佛罗伦萨人在发现亚历山德罗被刺杀之后会做何反应，就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

洛伦扎乔逃跑时还拿走了自己房间的钥匙，为的就是保证在他逃出佛罗伦萨边境之前，没人会发现他家中的尸体。他也没有让政府中的敌对势力知道自己的计划，防止他们第一时间利用这一事件。因为依照贝尔代托·瓦尔基的观点，当时如果有一个人立即站出来领导一场革命的话，美第奇一派可能就会被彻底推翻。意识到这了一点，

“圭恰迪尼，也是毫无争议的帕莱斯奇领袖，以及枢机主教奇博和亚历山德罗之前的朝臣们无不感到惊恐万分……市民们大多是对他们怀有敌意的，而他们现在手里又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因为此时公爵的侍卫亚历山德罗·维泰利（Alessandro Vitelli）带领着几名手下都到卡斯泰洛城去了。

枢机主教奇博是第一个意识到亚历山德罗可能有危险的人。星期天早上，亚历山德罗的侍卫去向他询问还要在洛伦扎乔的房子外面站岗多长时间。奇博一边命令他们继续站岗，原地待命，一边警告他们

不许对任何人提及在这里站岗的原因。奇博随即确认了亚历山德罗确实没有偷偷回到自己的住处，然后就对外宣布公爵昨晚操劳过度仍在卧床休息。直到当天晚上，洛伦扎乔的卧室房门才终于被砸开，而亚历山德罗遇害的消息则是第二天才传到反对者们的耳朵里。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错过了，维泰利已经回到了佛罗伦萨，帕莱斯奇们也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一群有意进行革命的人士向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寻求建议，因为他被认为是反对美第奇统治的市民中最德高望重的代表。尽管韦托里给出了一些愿意支持革命的模糊承诺，但是他心中清楚起义的时机已过。这边众人刚走，他就匆匆赶去拜访了圭恰迪尼，打算把自己的运气赌在帕莱斯奇上。

星期一早上，帕莱斯奇们都聚集到了市政厅，这里现在已经被更名为旧宫（Palazzo Vecchio）。他们是来讨论继承者的人选的。枢机主教建议由亚历山德罗4岁的私生子朱利奥（Giulio）继承公爵的头衔，并由他本人担任摄政王。不过这个建议被其他人否决了。他们建议把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请回来。科西莫是伟大的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和玛丽亚·萨尔维亚蒂（Maria Salviati）的儿子，而玛丽亚又是伟大的洛伦佐的外孙女。这个年轻人品德优良，没有什么执政经验，绝对不会成为像亚历山德罗那样邪恶的统治者。事实上，圭恰迪尼不仅想通过控制科西莫来实现自己控制政府的愿望，更是打着把女儿嫁给科西莫的如意算盘。所以圭恰迪尼早已派人去穆杰洛的特雷比奥别墅，马不停蹄地将这位17岁的少年请回佛罗伦萨。

第二天，这一提议被提交到委员会以求通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一做法。反对者之一的帕拉·鲁切拉伊（Palla Rucellai）就勇敢地宣称“共和国不需要公爵，不需要领主，也不需要王子”。他还把一颗白豆子扔进了桌上的骨灰瓮中，同时补充道：“这就是我的投票，同意不可能，要命有一条！”

圭恰迪尼机敏地还击道：“没有人能够容忍再让一群暴徒来管理佛罗伦萨的政务。”他并不是提议让科西莫世袭公爵，而只是选举他为共和国领袖，并且遵从宪法的规定和约束，同时也接受“顾问团”（magnificent Counsellors）的建议。争论持续了数个小时，要不是护卫队长维泰利果断干涉，可能还会持续更久。为了收买他对科西莫的支持，圭恰迪尼已经承诺日后封他为圣塞波尔克罗镇的领主。于是在讨论陷入僵局之时，维泰利故意安排手下去会议室窗口下面扭打吵闹，还有人大喊：“科西莫，伟大的乔瓦尼之子，他就是佛罗伦萨的公爵！科西莫！科西莫！科西莫！”然后另一个充满权威的声音传来：“快点决定吧，我们快要抵挡不住要冲进来的士兵了！”

事情最终有了结果。科西莫的当选得到了通过，圭恰迪尼期待借着他的名义行使权力。而那些了解科西莫的人则难免怀疑圭恰迪尼是否真的能把科西莫控制在自己手中。就像本韦努托·杰利尼评论的那样：

他们给一个年轻人一匹好马，然后告诉他只能在划定的圈子里面走走。那么谁能告诉我，当这个年轻人想要到圈子外面策马狂奔的时候，谁又能拉得住他呢？你怎么可能给你的主子立规矩呢？

[1] 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是1501年皮耶罗·索代里尼当选首席执政官后向他订制的，米开朗琪罗于1504年完成了雕像的创作。波提切利想将雕塑摆在佣兵敞廊，也有人认为放在大教堂的台阶上更合适，最终它被摆在了市政厅前方。1527年的暴乱中，雕塑的一条胳膊被损坏了，但是它仍然立在这里直到1873年才被替换为仿品。在风吹日晒雨淋的侵蚀下，雕塑头发和胸前衣带上的镀金都已经磨损了，真品现在陈列在学院美术馆。

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复制品左侧（挨着多纳泰罗的《朱蒂斯和贺芬尼》）是象征着佛罗伦萨的《狮子像》（*Marzocco*）。这里摆的也是复制品，真品是多纳泰罗在1418~1420年创作的，现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十四世纪时，城市里养的狮子从圣乔瓦尼广场迁走后被安排在了市政厅广场；到了十六世纪，公爵科西莫一世占据了市政厅，因为嫌弃狮子的气味，把它们都迁走了。现在的莱奥尼街（Via Dei Leoni）就是当初养狮子的地方。《大卫》右边的《赫拉克勒斯和卡库

斯》（*Hercules and Cacus*）由巴乔·班迪内利在1534年完成。本来赫拉克勒斯的雕塑也是计划由米开朗琪罗创作的，但是教皇莱奥十世显然担心米开朗琪罗会借此机会用雕塑来赞美已覆灭的共和国的美德，所以下令把大理石料交给巴乔·班迪内利进行创作。克莱门特七世也认可这一决定，不过他的目的是让米开朗琪罗全心全意为美第奇家族工作。

[2] 弗朗切斯科·费鲁齐的出生地是圣神教堂街32号。如同其他许多佛罗伦萨英雄一样，每年都会有人在这里摆放花环以示怀念。

[3] 克莱门特七世最终被放在了一个出自罗马万神殿的精致的斑岩骨灰瓮里，埋葬在拉特兰的圣约翰教堂大殿的科尔西尼堂。

[4] 阿拉朱斯蒂齐亚门是现在的皮亚韦广场（Piazza Piave）。

[5] 令人敬畏的专制象征巴索堡垒，面积达到了12万平方米，是佛罗伦萨最大的历史遗迹。这一工程的奠基日是1534年7月15日，这是由当时高明的博洛尼亚占星师挑选的吉日。为了清除障碍，连本来位于这里的圣乔瓦尼埃万杰利斯塔修道院都被拆毁了。

第四部分 1537～1743

第二十章 公爵科西莫一世

“从人们的脸上看不出有一丝喜悦”

科西莫出生在佛罗伦萨的萨尔维亚蒂宫（Palazzo Salviati）。这座巨大而阴郁的宫殿是他母亲玛丽亚的家族宫殿。玛丽亚的父亲是贾科莫·萨尔维亚蒂（Giacomo Salviati）^[1]，他娶了教皇莱奥十世的姐姐卢克雷齐娅。玛丽亚的儿子出生时，教皇莱奥十世作为教父给孩子取名为科西莫，说是为了“重新唤起对美第奇家族有史以来最智慧、最勇敢、最审慎的祖先的怀念”。

玛丽亚非常喜欢自己的教皇舅舅，而且连长相上都遗传了舅舅的一些特点。她的眼睛又大又黑，脸圆乎乎的，因为使用了过多的化妆品，所以肤色白得有些不自然。她这么做无非是为了能对丈夫多一分吸引力，可事实上，她丈夫更喜欢外面的女人，这件事对她而言根本不是秘密了。起初她还黯然神伤，后来就只剩下愤怒和怨恨。玛丽亚几乎见不到自己的丈夫，因为他总是出去打仗，偶尔回到佛罗伦萨也不会在家多做停留。有一个关于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回家探望的故事是这么讲的：一次，他骑着战马从科尔索（Corso）回到佛罗伦萨，经过自己宫殿时，乔瓦尼看到保姆抱着儿子站在楼上的窗口边，于是就对保姆喊道：“把他扔下来！”保姆自然不敢遵从这样冒险的指令，于是乔瓦尼又喊道：“把他扔下来！我命令你扔。”保姆只好

伸着胳膊把孩子送出窗口，闭着眼睛狠下心松开手。乔瓦尼接住孩子亲了亲。孩子没有因为被从高处扔下或被久违的父亲亲近而哭闹，这样平静的表现让乔瓦尼很是满意，他甚至大声宣布道：“好！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王子！这是你的命运。”

科西莫见到父亲的机会不多，所以对他也没有很深的感情。科西莫的家庭教师描述说，当听到乔瓦尼在为了阻止德国人跨过曼图亚附近河流的战役中受了致命伤的消息时，科西莫“并没怎么哭泣，而只是说了句‘其实我已经猜到了’”。当时科西莫年仅7岁，身体健康、样貌英俊，在同龄孩子里面算高个子，总是喜欢把栗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由于亚历山德罗和伊波利托以克莱门特七世门徒的身份来到佛罗伦萨后时局并不稳定，所以科西莫一家迁到了威尼斯生活。后来他们来到了博洛尼亚，从博洛尼亚又到了乔瓦尼在特雷比奥的别墅，然后离开这个别墅回到了博洛尼亚。在那里，他的祖父雅各布·萨尔维亚蒂（Jacopo Salviati）监督他断断续续受到影响的学业。过了一段时间，科西莫又从博洛尼亚去了热那亚，之后他回过一次佛罗伦萨，然后就离开去了那不勒斯。

科西莫的一位家庭教师就曾暗示，这样漂泊不定的生活对科西莫没有什么益处，反而让他变得心绪不稳，无法把精力集中到学业上，他总是想扔下书本跑到乡间玩乐或是去士兵的营帐中寻求刺激。事实上，科西莫一心想要成为一名军人。教皇克莱门特接到的汇报中说，科西莫14岁时就已经“在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上都像一名骑士一样”。汇报中还说科西莫身边总是围绕着一批曾经在他父亲麾下效力的军官。这些信息令教皇极为忧心，于是他派人传话给科西莫，要求他换掉“奇装异服”改穿普通的佛罗伦萨长袍。科西莫虽然生气，但也只能不情愿地服从教皇的命令。

不过，科西莫并不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愚笨青年。他举止优雅、态度冷淡，精明而不多言。虽然学问上难免有薄弱缺漏之处，但他乐于弥补改进，而且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那些知识一旦补上了就不会忘掉。有些人已经发现了他性格中的一个隐秘特点，而这个特点后来给他带来了恶名；也有些人憎恶他的冷酷无情，这种本性使他对残忍和暴行无动于衷；还有些人则有理由坚信科西莫会成为是一个严厉独裁的暴君。然而，按照贝尔代托·瓦尔基的说法，人们对科西莫的普遍看法是这样的：

科西莫享有一万二千达科特的私人收入，他本可以把时间都消磨在打猎、捕鸟、钓鱼这些他最热衷的玩乐上，让圭恰迪尼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掌控佛罗伦萨政府，直到把这个国家的资源用光耗尽为止。然而背着主人算计他的利益可不是什么好事，一直被认为不乏常识但反应迟钝的科西莫此时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理解力。整个佛罗伦萨的人民奔走相告，原来科西莫不仅仅是获得了一个国家，他还拥有上帝赐予的智慧。

科西莫不相信任何人。他不相信枢机主教奇博，也不相信亚历山德罗·维泰利，更不相信圭恰迪尼。他觉得这些人都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而他已经决定不受任何人摆布。科西莫愿意听取才华横溢的秘书弗朗切斯科·坎帕纳（Francesco Campana）的建议，还可以从母亲那里获得一切关于佛罗伦萨主要家族的信息；然而即便是对这两个人，他也不会表露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所有的决定都最终由他一人做出。

他的反对者们就远没有他这么果敢坚决了。社会底层民众之所以选择支持科西莫，是因为之前的共和国并没有给这一群体带来什么好处；还有一批人是因为愿意支持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的后人而团结在一起的；除此之外重新组建起来的民兵组织和佛罗伦萨几个最重要的贵族家庭也都是支持科西莫的，这样科西莫的势力就渐渐压制住了他的敌人们。科西莫在西班牙军队的帮助下，化解了被流放者团体（*Fuorusciti*）的威胁。那些被从佛罗伦萨驱逐出去的人团结在一

起，打算策划推翻科西莫的统治。1537年7月，被流放者军队在普拉托附近的蒙泰穆尔洛（Montemurlo）被彻底击溃。据当时一个锡耶纳人的观察记述，这场战役胜利之后，“小球！小球！胜利！胜利！”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佛罗伦萨。“欢乐的气氛充满大街小巷。科西莫宫殿一层的窗口处不断有人向外抛掷面包。还有两根木质的管子伸出窗外，里面不停地流出葡萄酒。”

这样的免费娱乐其实是精心策划的结果，所谓的欢庆并非真的如那个锡耶纳人看到的那样源自全体群众自发一致的感受。被流放者军队中有许多年轻人都是佛罗伦萨最卓越家族的后人，而带领他们的则是皮耶罗·斯特罗齐，也就是伟大的菲利波（the great Filippo）的儿子。皮耶罗虽然得以逃脱，但是他的一大批同伴都被俘虏，在经历了耻辱的全城游街示众之后，又被判处了严酷的刑罚。16人被判处死刑，还有很多人死在了牢狱中；侥幸逃亡他国避难的，也都被追查出来暗杀了。

流放者叛乱中被俘虏的四个领导者被处以砍头的极刑，连续四天，每天在市政厅广场上当众斩首一人。处理完了流放者，科西莫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如何将仍占据着托斯卡纳地区堡垒的西班牙驻军赶走的问题。起初帝国皇帝不肯批准科西莫的要求。他打算承认科西莫的佛罗伦萨公爵身份，但前提是佛罗伦萨公国必须成为帝国的封地。皇帝既不同意将西班牙军队撤出意大利，也不同意科西莫与亚历山德罗年轻的遗孀玛格丽特的婚事，而是把女儿改嫁给了奥塔维奥·法尔内塞（Ottavio Farnese），也就是克莱门特七世的继任者新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的孙子，因为皇帝觉得此时拉拢教廷比联姻佛罗伦萨更重要。不过科西莫还是设法为自己敲定了一门在政治上有利可图的婚事。他娶了堂·佩德拉·德·托莱多（Don Pedro de Toledo）的女儿埃莱奥诺拉。托莱多不但富可敌国，而且是那不勒斯的西班牙总督。

[2]科西莫结婚后没过多久，皇帝与教皇的关系就出现了紧张。皇帝开

始意识到获得佛罗伦萨公爵的支持对自己来说十分重要，于是同意了将西班牙军队撤出托斯卡纳地区。

摆脱了外国势力之后，科西莫也差不多排除了政府中各个大臣对他的干涉。虽然执政团和首席执政官办公室已经依法裁撤了，但还是有各种委员会和顾问团存在。不过公爵作为所有组织的主席，可以很轻易地确保他们不会做出任何他不认可的决定。久而久之，科西莫甚至都不再费事与他们协商。圭恰迪尼和韦托里被“晾在一边”；而根据路易吉·阿尔贝托·费拉伊（Luigi Alberto Ferrai）的说法，枢机主教奇博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并且“是以一种极其高明的手段，既孤立了他，又不刺激到他”。

然而，科西莫本质上毕竟不是一个圆滑机智的人。恰恰相反，有时他唐突直率的程度甚至到了粗暴苛责的地步，而且常常没有礼貌，无故出言不逊。至于他处置反对者时表现出来的严厉无情更是不会因为反对者的歉疚和悔恨而有丝毫动摇。无论是把真正的或假想的敌人投入最可怕的沃尔泰拉地牢，还是雇佣杀手暗杀难缠的持异议者或危险的敌对者，都不会让他有丝毫良心上的不安。科西莫曾像被放逐者一样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十年，其间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辩护书》

（*Apologia*）的作品来庆祝暴君被诛，以显示自己的无私和美德。然而刺杀亚历山德罗的洛伦扎乔最终在威尼斯的圣托马桥（Ponte San Toma）附近被人找到，并且被用抹了毒药的匕首刺死了。同样，为了摆脱圣马可的多明我会教士，科西莫指责他们“公开反对国教”，然后毫不犹豫地将他们驱逐出了修道院。对于教士们的强烈抗议，科西莫冷酷地回答道：“我的神父们，请问是谁修建了这座修道院？是你们自己吗？”

“不是。”

“那是谁允许你们居住在这里的？”

“是过去的佛罗伦萨人民和我们永远怀念的长老科西莫。”

“那就对了。如今是现在的佛罗伦萨人民和科西莫公爵要把你们赶出去。”

佛罗伦萨的主人科西莫在经历了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战争之后，又成了锡耶纳的主人。这场战争从1554年开始，但是直到1557年，将这里作为西班牙封地由科西莫及其后人占有的权力要求才被批准。此时，锡耶纳已经受到了战争的重创，人口从一万四千锐减到六千，连附近的区域也遭受了毫不留情的掠夺和破坏。他们对佛罗伦萨人的仇恨自此深植于心中，历经几代都未曾消退。科西莫在佛罗伦萨的敌人则用嘲笑和鄙视的口吻指责他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只为了在一个千疮百孔、年收入不超过五万达科特的锡耶纳封侯。

科西莫本人当然不满足于只得到一个锡耶纳。他想要的是大公的头衔，而这是只有教廷才有权力加封的爵位。事实上，科西莫实现这一野心的欲望已经强烈到近乎疯狂，他不间断地向有权加封他的机构提出要求，直到最终实现愿望。教皇庇护五世（Pius V）在1569年赐予了科西莫大公的头衔。

这一年的12月，当佛罗伦萨敲响钟声、点燃篝火、鸣响礼炮庆祝科西莫的新头衔时，有人却注意到“人们的脸上看不出多少真心的喜悦”。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佛罗伦萨又一次敲响钟声，点燃庆祝篝火，教堂里的人们发自内心地唱起了赞美诗（Te Deums）。这种喜悦才是自发的、真挚的；所有人都认可他们尊贵的大公——现在已经被敬称为“殿下”（*Altezza*）和“阁下”（*Serenissimo*）——这一次理应受到赞美。在勒班陀之战（Lepanto）中，佛罗伦萨的船队为把土耳其舰队彻底赶出东地中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西莫正是由于坚持保卫自己的海岸线不受土耳其强盗和野蛮海盗的劫掠，同时也为了让

自己和托斯卡纳地区在西班牙眼中更加坚不可摧，才一手打造出了这样一支胜利之师。

很多年前，科西莫就对威尼斯大使说过：“只有当一个人在海上和在陆地上一样强大的时候，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强大。”为了实现这种强大，科西莫下令大力建造船只。他和造船师一起商讨设计图，监督招募水手和购买外国奴隶的事宜，亲自下达航行指示，并给船只配备必要的武器装备。科西莫还创立了一个新的作战骑士组织——“圣斯特凡诺骑士团”（Knights of Santo Stefano）——后来被公认为与其说是一个圣战军团，倒不如说是一群涣散的海盗。他的两个私生子科西莫和洛伦佐都被封为骑士，同时还有亚历山德罗的私生子朱利奥。科西莫还在厄尔巴（Elba）岛上新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这个岛屿是皮翁比诺公爵（Duke of Piombino）割让给他的，此外还加固了岛上的首府并命名为大都会（Cosmopolis）。[3] “我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投入到海军事务，我已经造好了一些船，还有一些正在建造之中。我还会为所有的船配备必要的设备。”科西莫毫不夸张地向威尼斯大使保证道。

科西莫说话算话。最先造好的两艘船“萨埃塔”号（La Saetta）和“皮萨纳”号（La Pisana）在1550年下水开始了处女航；随后是“圣乔瓦尼”号（San Giovanni）。到1565年，又有更多的船投入到营救被困在马尔塔（Malta）的圣约翰骑士团的远征中；到1571年，也就是勒班陀之战中，教皇庇护五世真该好好感谢科西莫此时规模已经相当可观的强大舰队，以及他为支持伟大的基督教事业而捐赠的六万斯库多银币。[4]

科西莫虽然容易晕船，但还是非常喜欢亲身登上战船航行。他会伴着“号角声、鸣枪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从莱里奇（Lerici）起航，

要么向上游航行至塞斯特里（Sestri），要么沿着海岸线航行到里窝那，然后登陆去钓鱼、捕鸟或是打一天猎。

科西莫从来没有对这些运动失去兴趣。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离开佛罗伦萨到特雷比奥的别墅，或是波焦阿卡伊阿诺、卡斯泰洛或卡法焦洛，抑或是其他小一点的乡村别墅，比如切雷托（Cerreto）、莱切托（Lecceto）或蒙泰卢波（Montelupo）。每当此时，科西莫就会穿上红色马裤、西班牙高筒皮靴和鹿皮短上衣，戴着镶有宝石的黑天鹅绒帽子，与猎手、养鹰人、男仆和侍臣们一起骑马进入附近的森林和山谷。他们追捕野猪和雄獐，或跟在追兔子的猎犬后面策马狂奔，或放鹰和塞特犬去捕猎，还会用袋子抓野雉和鹧鸪。卡布里亚纳（Cabriana）记录说：

公爵能在最终汇入穆杰洛山谷的锡耶韦河（Sieve）里抓到鳟鱼之类各种各样的鱼。然后他还会把自己的成果分给侍臣们，而他自己则躺在草地上高兴地看他们在附近烤鱼、吃鱼。

对于侍臣们来说，在公爵身边的日子可不是每天都这么轻松愉快的。公爵是个非常严厉的主人，哪怕是最微小的错误也要加以指责，任何时候都要求流程和服饰上的统一，比如所有的男仆必须在冬天戴红帽子，夏天戴紫帽子。而且公爵对于私人生活就像与大臣们打交道时一样过分地神秘兮兮。他的仆人从来都不知晓一次出行会持续多少时间，甚至连去哪儿都不知道。他们中有人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大公阁下对于他要去哪儿这样的事越来越保密。”另一个侍臣则觉得公爵对恶作剧的热衷和他的神秘兮兮一样让人难以忍受，他抱怨说：“今天早上，公爵去看为捕鸟而布置的网子，然后从里面抓了几只鸟，还让其中一只来啄我，而且是我的右手，当时真的很疼。别人说这是公爵的恩宠，不过对我而言是严重的疼痛。”

如果公爵不是这么任性妄为、无法预料的话，也许人们还能忍耐一下，可是他的喜怒无常是出了名的。有些场合，他似乎愿意与人亲近，甚至可以允许别人无拘无束；另一些时候，则连哪怕最细微的不敬都不能容忍。一个威尼斯使节记录说：

有时他会抛开所有的威严和尊贵同每一个人开非常亲密的玩笑，并且似乎也鼓励别人同样随意地对待他；但是一旦玩闹的兴致过了，他会翻脸不认人，好像根本不认识你一样。如果还有人胆大到做出哪怕一丁点儿随意的行为，公爵会马上摆出平时惯有的严厉模样。所以在佛罗伦萨，人们都说公爵就像有一套戏服，他高兴穿就穿，高兴脱就脱。

对于他的妻子，人们也有类似的抱怨。

公爵夫人埃莱奥诺拉·达·托莱多（Eleonora da Toledo）和她丈夫一样严厉。侍从每天在信件中写满了公爵夫人的各种要求——将未能按时到达的商品立刻送来或替换某些她不满意的货物，比如“立刻把公爵夫人喜欢的西班牙咸鱼送来，现在收到的这批不新鲜，而且已经损坏了”，或者“马上把大公阁下的斗篷和紧身上衣送来，不得有误”，又或者是“给大公阁下做两双长袜，但是不能像别的那样又短又紧”。

然而，尽管埃莱奥诺拉严厉苛责、喜怒无常、傲慢自大，但侍从们还是很爱戴她的。对科西莫而言，她是个好妻子，如果说科西莫还会爱什么人的话，那么他最爱他的妻子。婚后不久，科西莫就举家搬出美第奇宫，住进了改造为公爵官邸的旧宫。公爵夫人的房间在楼上，公爵的房间在楼下，而公爵母亲则住在中间一层。无论是公爵还是公爵夫人，与她的关系都不怎么好，一是因为她本来就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二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公爵母亲越来越懒散邈遑。至少有一次，她把自己的儿子气得暴跳如雷。当时公爵卧病在床，母亲小题大做地管这管那，这比医生的无能更让公爵火冒三丈。最终公爵对她大发脾气，她抹着眼泪离开了公爵的房间；第二天两人都不愿和

对方说话。科西莫和妻子之间倒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不但没抱怨过妻子的赌博嗜好，对她还很纵容，对于妻子过分的善变也从没表现出一丝厌烦。作为他的妻子，公爵夫人则容忍了公爵的神秘兮兮和坏脾气，当然还有长时间的面色阴沉和沉默不语。他们似乎只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才出现过不同意见。

他们共有5个儿子——弗朗切斯科是指定的继承人；乔瓦尼在17岁时就被封为枢机主教，两年后死于“恶性热病”；费尔迪南多

（Ferdinando）也被封为枢机主教，后来成了托斯卡纳大公（Grand Duke of Tuscany）；加尔恰（Garzia）17岁时去世，与他哥哥乔瓦尼的离世仅相差两周；最小的是彼得罗（Pietro），出生于1554年。此外，他们还有3个女儿，分别是玛丽亚、伊莎贝拉和卢克雷齐娅。所有的女儿都是严格按照西班牙人的方式养育的，除了去做弥撒，她们几乎从不被许可迈出家门一步，除了神父、医生和家庭教师外几乎没见过别的男性。玛丽亚和卢克雷齐娅很早便夭亡了。玛丽亚只活到17岁；卢克雷齐娅则是16岁，去世时与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结婚还不到一年。伊莎贝拉则嫁给了保罗·焦尔达诺·奥尔西尼

（Paolo Giordano Orsini），婚后他们住在美第奇宫，她虽然没有因病早逝，却最终死于丈夫的谋杀。科西莫没有活到悲剧发生的这一天。当他听到玛丽亚死于疟疾的时候，他们正在里窝那的城堡里。科西莫独自一人走上堡垒，这样就没人看到他放任自己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样子了。科西莫哀怜地说着：“她的体质和我一样，要是让她多呼吸点新鲜空气就好了。”回到佛罗伦萨之后，科西莫还在哀悼女儿，他会对着挂在墙上的女儿的肖像，在房间里独坐几个小时。

科西莫似乎从来不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即便在不那么悲哀的情境下，他似乎也没怎么享受过生活的乐趣，只有打猎除外。科西莫很少笑，他吃得也很少，对食物没什么要求，到晚年更是每天只吃一顿简单的饭菜。他也不爱喝葡萄酒，在室内常常穿一件黑天鹅绒长袍，

而且还说更愿意穿一件简单的佛罗伦萨长袍。他在旧宫的房间虽然装饰豪华，他却选择睡在一间墙上挂着深绿和深蓝烫金压花皮子的昏暗房间里。感觉上，就算睡在像修道院房间那样简朴的地方——比如秘书那只有“三张桌子、两盏黄铜灯、两个板凳和四个墨水台”的房间——他也觉得很满足似的。

这些秘书的工作时间非常长，而科西莫自己也和他们一样，有时到黎明都还没有更衣休息，他要亲自审阅和回复那些他不许可别人知晓的信件，标注文件，编辑报告，撰写指示让秘书誊抄。他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出门，遇到雨天无法出门就会抱怨：“我坐在这里就像猎鹰站在栖木上一样。”做完了书面工作，他会去做弥撒，通常是在大教堂，有时也去圣母领报教堂；之后他会打一会儿网球、散散步或骑骑马，不是因为喜欢，而是为了锻炼身体。如果步行，他总是走得很快，在短上衣里面穿一套软甲，腰带上挂着一把宝剑和一把匕首，还在剑鞘里插了“许多像针一样尖利的短剑（stileti），就像把针插在针盒里一样”。当然他的身边还要有瑞士保镖时刻陪伴。

科西莫绝对有必要考虑被暗杀的风险。已经不止一次有人企图要他的命而没有成功。虽然对这些暗杀者的惩罚极其严厉，却依然没能让其他想要暗杀他的人望而却步。计划从窗户里射杀科西莫的朱利亚诺·博纳科尔希（Giuliano Buonaccorsi），不但被烧红的钳子折磨，还被拖着脚踝游街，最后被开膛破肚扔进了阿诺河。即便如此，科西莫的手下很快就又发现了一个暗杀计划，有人企图把宝剑和铁蒺藜插在阿诺河河底，因为科西莫夏天会在那个地方游泳。

早在1546年的时候，科西莫就开始计划在旧宫附近找一栋建筑，将散落在佛罗伦萨各处的司法和行政机构，以及几个主要的行业协会都集中到一起，以便他更近距离、更亲力亲为、更有效地控制一切。于是他任命乔焦·瓦萨里为设计师，着手建造这栋巨大的新建筑，即

1559年动工的乌菲齐宫（Uffizi）。[5]一年之后，公爵及其家人从旧宫搬到了阿诺河对面的皮蒂宫，也就是卢卡·皮蒂在100年前建造的那座巨大的宫殿。1549年公爵夫人用九万弗罗林币从皮蒂家族手中买下了这座宫殿，并指示巴尔托洛梅奥·阿曼纳蒂（Bartolommeo Ammanati）负责扩建和修缮工作。[6]到公爵一家入住之时，无论是巨大的庭院，还是一层正面新建的“跪窗”都没有彻底完工。但是公爵夫人拒绝推迟搬离旧宫的时间。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来享受皮蒂宫的宽敞和宏伟，在景色宜人、视野开阔的花园中散步。在旧宫的时候，她只能把自己的奇花异草都种在一个封闭的小阳台上，从那里看到的风景也极其有限。

皮蒂宫——此时它应被叫作大公爵宫——的后面是一大片向南延伸至圣乔焦（San Giorgio）高地，向西到达罗马娜门的开阔土地。这些土地是从不同的家族手中买来的，其中就包括波戈利家族

（Bogoli）。他家的花园被称作波波利花园（Boboli），其实就是波戈利的误读。在1550年尼科洛·佩里科利·特里博洛（Niccolo Pericoli Tribolo）去世前的十年里，这座花园一直属于他，他还在这里设计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圆形阶梯剧场和一个被称作内普丘恩

（Neptune Pond）的池塘。当时这项工程是由布翁塔伦蒂（Buontalenti）、朱利奥·帕里吉和阿方索·帕里吉（Giulio and Alfonso Parigi）主持的。巴乔·班迪内利则在公爵夫人的建议下建造了一个精巧且有乡土气息的人工洞穴。[7]

公爵夫人入住新宫殿的愿望因为她日益衰弱的身体状况而更加迫切。按照威尼斯大使的汇报，此时的公爵夫人“总是感到身体不适”，因为患有慢性咳喘，她“每天早上都会呕吐”。公爵夫人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种担心确实不无道理。搬出旧宫两年后，她最疼爱的儿子加尔恰去世了，她当时“悲痛而绝望，不再像从前一样遵从医生的建议”，仅两周后，公爵夫人就去世了。在她生命最后的时

刻，科西莫一直陪着她，把她抱在怀中。就如玛丽亚去世时公爵拒绝别人的安慰一样，妻子死后他也把自己与所有人隔离开来，独自哀伤。他命令长子弗朗切斯科不要试图来安慰他，那样只会让痛苦变得更加无法承受。科西莫再也没能从这次打击中彻底恢复过来，到1564年，他已经把大部分的公务都转交给继承人处理。

有传闻说，每当科西莫陷入无法自拔的伤痛中，为了分散注意力，他“观看了上千部时事讽刺剧，这既不符合他的身份，也不符合他的年纪（43岁）……他还和很多女人发生了关系，尤其是那些在佛罗伦萨地位显赫的夫人们”。科西莫还把年轻貌美的埃莱奥诺拉·德利·阿尔比奇（Eleonora degli Albizzi）收为情妇，还跟她生了一个儿子。人们都猜想科西莫也许会娶她为妻。公爵有一个最喜欢的仆人叫斯福尔扎·阿尔门尼（Sforza Almeni），这个仆人警告弗朗切斯科他的父亲可能会考虑再婚，这使得父子二人大吵了一通。最后科西莫把自己的仆人痛斥了一顿，他说：“滚出我的眼前。现在就滚。永远别再指望我会给你一点儿好处。”

阿尔门尼想着公爵的怒火很快就会过去，自己会获得原谅，所以根本没有离开佛罗伦萨，甚至还斗胆回到了皮蒂宫。科西莫一看见他就控制不住脾气，他一面大喊着“叛徒！叛徒！”（*Traditore*），一面把一支打猎用的长矛狠狠刺向阿尔门尼，矛尖甚至穿透了他的身体。而事后，让公爵感到遗憾的竟是杀死这么一个“卑劣的小人”弄脏了自己的手。

阿尔门尼说的没错，公爵确实是打算再婚的，只不过他要娶的并不是埃莱奥诺拉·德利·阿尔比奇，而是另外一名年轻的情妇卡米拉·马尔泰利（Camilla Martelli）。卡米拉也为科西莫生了一个孩子。她是一个高挑、贪婪、自私、脾气暴躁的女人，而且对丈夫索求无度。为了躲避她，科西莫要么把自己和学者们关在一起，听他们给

他念书；要么就到美第奇宫去和女儿伊莎贝拉·奥尔西尼一起消磨晚间时光。有一晚他在美第奇宫时突发中风；第二次发作之后他的胳膊和腿就都不听使唤了，最后连说话的能力也失去了。从那以后，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一天晚饭后，他决定要坐着马车去看一场足球比赛。那天很冷，还下着雨，在两个小时的观赛过程中，科西莫坐在场边，只是偶尔看一眼场上的选手们，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近乎昏迷的状态。之后他又拖了两个多月，经常连续几天都处于意识不清的状态，直到1574年4月21日，科西莫去世，享年55岁。遗体穿着全套大公服饰，被安放在皮蒂宫大厅里。教堂敲响了悼念的钟声。第二天，“所有商店都没有营业……不管走到哪里，都会看到黑色的悬挂物，直到皮蒂宫广场”。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为科西莫的去世而感到惋惜。近些年来他反而比年轻时更受拥戴一些，据威尼斯大使的观察，科西莫已经可以“独自坐着马车，只带一个仆人在街上走过”。人们知道他是圣马蒂诺兄弟会（San Martino）的活跃成员，这个兄弟会是一个致力于匿名救助穷人的组织；人们也感谢他鼓励并资助佛罗伦萨传统的流行娱乐活动，比如露天表演、赛马和足球。他还创立了圣玛丽亚诺韦拉广场的战车赛，那里至今还有标记赛道的标杆。他最受赞颂的功绩是让佛罗伦萨摆脱了对西班牙的依附，以及组建了一支小而善战的船队并拓展了佛罗伦萨的领土范围。不过，尽管此时政府稳定，司法严苛却不失公正，财政状况也较为良好，科西莫受到的赞颂却并不比指责多。人们只看见他剥夺了佛罗伦萨曾有的自由，却看不到他带来的稳定。人们更愿意控诉他的间谍和监狱、他的重税和对私人贸易的肆意垄断，却不愿提及在他的倡导下托斯卡纳地区农业、排水和灌溉方面的进步，更不用说他为促进橄榄种植和银矿开采而开凿的运河，还有对比萨和里窝那的开发，以及实现托斯卡纳地区城市之间的政治团结。也许有人会提起：1557年那场毁灭性的洪水之后，是科西莫鼓励巴尔托洛梅奥·阿曼纳蒂建造了美丽的天主圣三桥^[8]，并且重建了阿拉卡

拉亚桥（Ponte alla Carraia）^[9]；也是在科西莫的资助下，乔焦·瓦萨里彻底修缮了旧宫；还有佛兰芒人乔瓦尼·罗索（Giovanni Rosso）和尼科洛·菲亚明戈（Niccolo Fiamingo）也是在科西莫的资助下，在佛罗伦萨城里建起了挂毯工厂；还有科西莫出钱向阿尼奥洛·布龙齐诺（Agnolo Bronzino）订制的那些肖像、壁画和寓意油画；或是他向本韦努托·杰利尼订制的《珀尔修斯》（*Perseus*），多亏了他的耐心等待，才能最终在1554年完工并竖立于佣兵敞廊。^[10]肯定也有人会抱怨他重修皮蒂宫耗费了大量钱财；或是在皮蒂宫和旧宫之间修建私人走廊时因为赶工而使五名工人丧生；为装点波波利花园而花费的巨资；圣洛伦佐教堂里巴洛克式陵墓的宏大设计，为的只是把美第奇家族成员埋葬于这个阴森的豪华地府；^[11]还有彭托尔莫（Pontormo）装饰的卡斯泰洛别墅和蒂雷博洛（Tirbolo）的华丽花园喷泉；^[12]以及修建在波焦阿卡伊阿诺的花园和修建围绕被称作皮内塔（Pineta）的巨大林地的围墙所花费的巨资。如果一个仰慕者要赞扬科西莫对比萨大学和菲奥伦蒂诺学院的提升，还有他邀请贝尔代托·瓦尔基这样有天赋的人回到佛罗伦萨生活；鼓励意大利的音乐家、科学家和植物学家，以及支持伊特鲁里亚（Etruscan）的考古研究；改进佛罗伦萨草药园及他建立的比萨植物学院；将美洲地区的药草和东藩的作物引入托斯卡纳；对古董、奖牌及伊特鲁里亚手工艺品的鉴赏力，那么一个诋毁者则无疑会拿伟大的洛伦佐治下的共和国黄金时代，与接下来必然来临的弗朗切斯科大公治下的黑暗时代相对比。

^[1] 家族成员表上及后文中为雅各布·萨尔维亚蒂。——译者注

^[2] 那不勒斯的总督护送女儿去佛罗伦萨，到达后他和他的随从被安排住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里。从那以后，格林回廊（Green Cloister）上建于十四世纪的会规室就改称为西班牙堂，也成为佛罗伦萨的西班牙侨民教堂。

^[3] 大都会在一个多世纪以后变成了费拉约港（Portoferraio）。据说科西莫和他的建筑师就是在雷奇佐山丘（Colle Reciso）脚下的公爵府（Casa del

Duca) 监督工程进展的。杰利尼创作的科西莫半身像曾经被摆在斯泰拉堡垒 (Forte Stella) 的入口, 现在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

[4] 市政厅的大型内普丘恩喷泉 (Neptune Fountain) 就象征着公爵科西莫在海军上的成就。喷泉的设计工作本来是委托给了班迪内利, 但是还没有开工他就去世了。经过一轮新的竞争, 最终这个工程被交给了阿曼纳蒂。1575年喷泉建设完成, 广场现在已更名为德尔格兰杜卡广场 (Piazza del Granduca), 并在1543年重新铺筑。

[5] 乌菲齐宫是由多个曾经在这里办公的政府机关出资建造的。它们的名字或座右铭也都被刻在了大门的柱廊上。1574年瓦萨里去世之后, 建造乌菲齐宫的工作由贝尔纳多·布翁塔伦蒂和阿方索·帕里吉继续进行。这里曾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中作为欧洲最伟大的艺术品展览馆之一。美第奇收藏中的很多精品都曾被收藏在乌菲齐宫的一间八角展室里。佐法尼 (Zoffany) 在1772~1778年在夏洛特女王 (Queen Charlotte) 的资助下曾经在这里创作了大批画作, 其中包括大批知名的英国鉴赏家、外交家和收藏家们的肖像。有一幅画中就画了霍勒斯·曼爵士站在美第奇的维纳斯雕像下面, 这个雕塑是仿制希腊原作的罗马时期复制品, 它是在蒂沃利的哈德里安 (Hadrian) 的别墅中发现的, 大概是大公科西莫三世时期被带回佛罗伦萨, 如今还陈列在这个展室中。佐法尼的其他画作中出现的画中画, 比如提香 (Titian) 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 (*Venus of Urbino*), 是依照他的意愿从乌菲齐的其他房间或是从皮蒂宫搬来供他作画之用的。

[6] 皮蒂宫始建于十五世纪五六十年代。卢卡·皮蒂建造这座宫殿时收到了科西莫两万弗罗林币的资助, 作为他对美第奇一派进行政治服务的回报。这座宫殿可能是卢卡·凡切利 (Luca Fancelli) 设计的。阿曼纳蒂在1562年为公爵科西莫一世和托莱多的埃莱奥诺拉完成了花园改建。后来十七世纪时又由朱利奥·帕里吉和阿方索·帕里吉进行了正面的加宽改建。再后来十八世纪时又由朱塞佩·鲁杰里修建了两个新的侧翼。那时这里被称为大公爵宫 (Grand Ducal Palace)。复兴运动 (Risorgimento) 之后, 皮蒂宫归属于萨瓦家族, 又由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三世 (King Victor Emmanuel III) 捐献给了国家。现在这里共有五个博物馆。一层的阿尔真蒂博物馆 (Museo degli Argenti) 中有许多美第奇家族收藏的珍宝。

[7] 波波利花园里面仍然保存有多位艺术家的作品, 包括詹波隆那、凡切利、乔利 (Cioli)、彼得罗·塔卡 (Pietro Tacca)、卡奇尼和罗莫洛·德尔·塔达 (Romolo del Tadda)。圆形阶梯剧场是依罗马模型建造的。为庆祝大公科西莫三世的婚礼, 这里上演了《欢乐的世界马术芭蕾》 (*Il Mondo*

Festeggiant)。骑士花园 (Giardino del Cavaliere) 的位置就是1529年围城期间米开朗琪罗建造堡垒的地方。下面的阳台则是为枢机主教莱奥波尔多·德·美第奇 (Leopoldo de' Medici) 建造的。

[8] 最初的天主圣三桥建于十三世纪。阿曼纳蒂建造的桥上有诸多雕像是为了庆祝大公科西莫三世的婚礼于1608年制作的, 包括乔瓦尼·卡奇尼的《春》和《秋》、彼得罗·弗兰克维拉 (Pietro Francavilla) 的《夏》和塔代奥·兰迪尼 (Taddeo Landini) 的《冬》。1944年这座桥被炸毁了, 但是战后人们按照原型将其复原, 为保证原汁原味, 石匠们都是使用与十六世纪时一样的工具进行作业。圣三一教堂的正面是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雇佣布翁塔伦蒂修建的, 于1594年完工。

[9] 阿拉卡拉亚桥始建于十三世纪初, 后三次被洪水冲毁。1304年, 因为来这里庆祝河神节的人数过多, 桥身又被压垮。1559年, 阿曼纳蒂对这座桥进行了第五次重建。1944年该桥又毁于战火, 所以今天人们看到的桥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建造的。

[10] 佣兵敞廊原本被称为执政官长廊 (Loggia dei Signori), 是十四世纪末由西蒙内·塔伦蒂 (Simone Talenti) 设计作为有顶棚的公共庆典场地而建造的。它现在的名字来源于公爵科西莫一世的瑞士雇佣兵 (Landsknechte), 他们的营房就在这附近。公爵科西莫时期, 这里变成了开放的雕塑展览场地并一直延续至今。杰利尼的《珀尔修斯》是1554年被摆在这里的。詹波隆那的《强掳萨宾妇女》 (*Rape of the Sabines*) 是1583年被摆在这里的, 当时本来摆在市政厅前面栏杆内的多纳泰罗的《朱蒂斯和贺芬尼》被摆回了广场。在这两座雕塑的后面是詹波隆那的另一件作品——希腊雕塑《墨涅拉俄斯扶着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 (*Menelaus Supporting the Body of Patroclus*) 的罗马仿品以及皮奥·费迪 (Pio Fedì) 的《强夺波吕克塞娜》 (*Rape of Polixena*)。最后一排还有六个罗马雕塑, 都是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从罗马的美第奇别墅带回来的。

[11] 王室祭堂的建造工作从1605年就开始了, 最初是由费尔迪南多一世授意的, 他希望能够实现科西莫一世建造巨大的王室祭堂的计划。祭堂的主体结构直到1737年才建成, 而圆形屋顶的装饰更是直到1836年才完工。鉴于祭堂直到科西莫三世统治时期才建成, 所以大公及其妻子和儿子们的遗体只能暂时安葬在新老圣器收藏室中。彼得拉·杜拉的几代工匠们断断续续地为三位科西莫、两位费尔迪南多和大公弗朗切斯科修缮围绕在四周墙壁上的精致墓碑。

祭堂地面上嵌入了16个用大理石、珊瑚、碧玉、玛瑙、珠母贝和青金石雕刻的盾徽, 都是大公国属地城市的标志。所有的大公死后都被埋葬在陵墓下面的地下室

中。公爵们都是戴着皇冠、握着权杖下葬的。公爵夫人们也都埋葬于此，唯独弗朗切斯科一世的遗孀比安卡·卡佩洛除外。当布翁塔伦蒂询问费尔迪南多一世应当将他的嫂子藏于何处时，一向厌恶她的大公回答说：“随便任何地方，总之她不能和我们葬在一起。”比安卡·卡佩洛的埋葬地点至今无人知晓。

[12] 卡斯泰洛别墅花园的复杂而有创意的建造计划是由贝尔代托·瓦尔基为公爵科西莫一世设计的，并由特里博洛、阿曼纳蒂和布翁塔伦蒂实施。但是最终这一计划并未完全实现。特里博洛、阿曼纳蒂和布翁塔伦蒂的作品至今还在园中，但是詹波隆那的《拧头发的维纳斯》（*Fountain of Venus Wringing out her Hair*）被移到了彼得拉亚，他制作的岩洞中的动物铜像现在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

第二十一章 科西莫的继承人

“这样的娱乐前所未见”

弗朗切斯科既没有父亲的生意头脑，也没有父亲的勤勉精神。他不负责任、任性妄为、沉默孤僻。威尼斯大使在汇报中不满地评价他是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有一头黑发，肤色偏深，性情忧郁”。另一位大使则写道：“他的着装没有一丝品味，举止也毫不优雅。”他还是个“喜欢沉默思考的人”，说话“非常谨慎”。“过分沉迷于女色”，“没有什么美德可被称赞”。

弗朗切斯科的妻子是奥地利女大公约安娜（Joanna of Austria）。她和丈夫一样苍白、瘦削、缺乏魅力。她嫁到托斯卡纳之后极度思乡。约安娜从未把佛罗伦萨当成自己的家，她在这里水土不服，心情沮丧，丈夫对她不闻不问，连佛罗伦萨的人民也讨厌她的奥地利式傲慢，只有公公尽己所能地关照着。科西莫为了欢迎约安娜的到来把旧宫的花园特别修缮了一番：弧形壁画上画着奥地利乡村和城镇，这些壁画都是由瓦萨里的学生创作的。伟大的洛伦佐放置在卡雷吉别墅花园里、有小童和喷水的鱼装饰的华丽喷泉也被搬到旧宫来。^[1]即便如此，约安娜依然没能得到多少安慰。她在1578年就去世了，年仅30岁，她在去世前一年生下的同样病恹恹的儿子菲利波在她死后没多久也死了。弗朗切斯科显然对妻子的死无动于衷，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迎娶情妇比安卡·卡佩洛（Bianca Capello）了。

比安卡是一位充满魅力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威尼斯贵族，然而令她的家族失望的是，她秘密嫁给了一个佛罗伦萨公司的职员。被迫离开威尼斯后，比安卡随丈夫来到佛罗伦萨。一日弗朗切斯科骑马经过比安卡的窗下，对美人一见钟情，秘密安排了一次私会之后，比安卡便

成了弗朗切斯科的情妇。弗朗切斯科还在家中给比安卡的丈夫安排了一个收入丰厚的肥差，并且在皮蒂宫附近给他提供了豪华的住处，这样自己就可以方便地去与情妇见面了。^[2]弗朗切斯科还为比安卡修建了一座乡村别墅，这座普拉托利诺（Pratolino）别墅有一个景色极美的花园，1581年蒙塔伊涅（Montaigne）到此做客时对这个花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这里不但有詹波隆那（Giambologna）制作的铜像和阿曼纳蒂设计的喷泉，还有贝尔纳多·布翁塔伦蒂（Bernardo Buontalenti）的带有可移动景致的人造洞穴。除此之外，这里还有风琴、音乐瀑布和各种机械形象，有种满柏树和冬青的散步场所，有修剪成各种奇妙造型的黄杨树篱构成的迷宫和喷水形成的拱形游廊，水流会越过行人的头顶，分别落在道路两边的小溪中。转过一个拐角，穿过巨大的鸟舍和迷宫，游览者就会看到一个人造洞穴，里面站着火神伏尔甘（Vulcan）及其家人，石壁上覆满了珊瑚和贝壳，还有“铜质和大理石的野兽雕塑在水力的作用下不断移动变换，展现出狩猎的场景”。在花园另一角的草坪上，虽然看不到水源，却有水柱喷出，一个牡羊女从墙上的壁龛走出来，到水井前用篮子打水，同时还有森林之神萨梯（satyr）在旁吹着风笛。

佛罗伦萨人对弗朗切斯科的情妇比安卡·卡佩洛充满憎恨，人们说她其实是个女巫，长着一双邪恶的眼睛，就是她毒死了可怜的约安娜。待解决掉她的丈夫之后，弗朗切斯科就娶了比安卡为妻，据说他们的婚礼耗资三万多弗罗林币，这让人民的愤怒之情更加难以抑制。

弗朗切斯科的行为已经让佛罗伦萨人义愤填膺，这个家族里其他成员的无耻行径更让他们厌恶。其中最过分的就是弗朗切斯科的弟弟彼得罗。弗朗切斯科继承爵位之时彼得罗20岁，不但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是一个游手好闲、放荡不羁的寄生虫。他不仅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妻子埃莱奥诺拉，甚至在公共场合对她出言不逊。而埃莱奥诺拉则从众多的情人那里寻求安慰，贝尔纳迪诺·安蒂诺里（Bernardino

Antinori)就是其中之一。贝尔纳迪诺·安蒂诺里因为在一场决斗中杀死了对手而被软禁在自己的宫殿中，但是埃莱奥诺拉为了看他一眼而在他窗前的大街上来回踱步，导致他直接被发配到了厄尔巴岛。^[4]后来他被带回佛罗伦萨受审，结果被判死刑，并被绞死在巴杰罗宫的囚室中。埃莱奥诺拉听到情人的悲惨结局后显露出的烦闷和哀伤让彼得罗火冒三丈，他命令埃莱奥诺拉前往卡法焦洛，并在那里把她也勒死了，而他的行为显然是得到了大公的默许。

这并不是弗朗切斯科家里发生的唯一一次谋杀。妹妹伊莎贝拉婚姻和兄弟们的一样不幸福，而且她还和自己丈夫的堂兄弟特洛伊洛·奥尔西尼(Troilo Orsini)成了情人。她的丈夫保罗·焦尔达诺·奥尔西尼是个非常暴力且有仇必报的人。他疯狂地爱上了弗朗切斯科·阿科兰博尼(Francesco Accoramboni)年轻热情的妻子维多利亚，于是这两个人决定要解决掉各自的配偶好双宿双飞。于是，维多利亚雇用了一个职业杀手在内格罗尼(Negroni)别墅杀死了丈夫。奥尔西尼先是雇用杀手杀死了自己的堂兄弟特洛伊洛，然后又在恩波利

(Empoli)附近的切雷托圭迪别墅(Ceretto Guidi)谋杀了妻子。^[5]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的手段极其狠辣：奥尔西尼先是与妻子共进晚餐，饭后他示意四名帮凶到他们头顶上的房间去，从天花板上一个窟窿里顺下一根绳子。奥尔西尼装作要亲吻妻子的样子，实际上是抓住绳子勒住她的脖子，再由帮凶向上收回绳子，直至把她勒死为止。事后，奥尔西尼宣布妻子是死于突发中风引起的癫痫。尽管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y X III)以教廷名义下令禁止奥尔西尼的这门婚事，他还是没过多久就迎娶了维多利亚，然后带着她去了布拉恰诺(Bracciano)的城堡。如果不是因为格列高利十三世去世，这桩耸人听闻的事件也许会就此被人遗忘，但是教皇的继任者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不会轻易罢休，因为他不仅是一位严厉无情的教皇，下定决心要整顿他前任在位时出现的众多无法无天的丑闻，更是被谋杀的弗朗切斯科·阿科兰博尼的叔叔。所以奥尔西尼逃到威尼

斯，最后死在了那里。他在遗嘱中把巨额财富都留给了维多利亚，不过后者随后也在帕多瓦被人用尖刀刺死了，杀她的正是她丈夫愤愤不平的兄弟，他本来希望自己会成为巨额遗产的继承人。

源源不断的丑闻让弗朗切斯科的名誉一落千丈。于是大公选择在普拉托利诺隐居，他在这里喂金鱼，养驯鹿，种植专为他从印度送来的稀有灌木，还和人谈论宇宙构造、化学和自然的秘密。他的余生不是在普拉托利诺别墅里，就是在瓦萨里在旧宫为他修建的实验室中，连和行政长官们开会的地点也被安排在那里，就因为不愿意离开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化学和科学实验。弗朗切斯科也有一些别的爱好，能够让他偶尔转移一下注意力：在乌菲齐宫的第四层，他开办了一个画廊，还为年轻的艺术家用创办了工作室，这些本来是由瓦萨里设计改建的，瓦萨里去世后，又由贝尔纳多·布翁塔伦蒂和阿方索·帕里吉负责，直到1574年才改建完成。1583年，弗朗切斯科又建立了克鲁斯卡学会（Accademia della Crusca）^[6]，即秕糠学会（the Chaff），这个学院旨在去除托斯卡纳地区方言中不纯净的地方，事实上就是想要宣扬佛罗伦萨的至高地位——只有她才能作为意大利文学的最终评判者。这个学院在这方面尤为活跃，比如剧作家吉罗拉莫·吉利（Girolamo Gigli）就因为其关于“锡耶纳的圣凯瑟琳（Saint Catherine）是比佛罗伦萨人最敬爱的乔瓦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更杰出的作家”这种不可原谅的冒犯言论而被驱逐出了佛罗伦萨。不过，弗朗切斯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花在了研究化学、炼金术、熔炼、吹制玻璃、宝石镶嵌和钻石切割上了，而且他还真成了一位专家。他最擅长熔炼水晶和用贵金属制作花瓶；还发明了一种切割水晶的新方法，以及一种革命性的瓷器制作方法，使得当时托斯卡纳地区的陶艺匠人们能够制造出与中国瓷器一样精致的陶瓷制品。^[7]除此之外，他还发明了焰火和仿真珠宝的制作方法。然而，这些科学实验给他带来的却不是赞誉而是诽谤：人们说他整天把自己锁在嘈杂的实验室里研制毒药，供女巫比安卡使用。而这样的说法因他们两人在

1587年10月突然同时死亡而更加令人深信不疑，事实上，他们都是死于疟疾。

弗朗切斯科死后，他久居罗马的弟弟费尔迪南多一世（Ferdinando I）继承了爵位，并向人民保证他哥哥的死完全是由于自然原因。费尔迪南多在1563年作为一名年仅15岁的枢机主教去了罗马，在后来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俨然已经成了教廷中极有影响力的一员。虽然他并不真心热爱宗教事业，但还是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并且创建了信义宣传传道团（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Propaganda Fide）。费尔迪南多还特别钟爱古典雕塑，并且有很多收藏，其中大多数是古希腊雕塑的罗马仿品，包括美第奇的维纳斯雕塑。他在平钦（Pincio）买下了一处别墅专门用于展示这些雕塑。^[8]在哥哥去世之后，费尔迪南多把很多雕塑都带回了佛罗伦萨。由卡拉多里（Carradori）负责修复的六尊罗马女子雕像就被摆放在了佣兵敞廊里。

费尔迪南多继承爵位时38岁，他从来都不怎么喜欢自己的哥哥，而且他是一个比弗朗切斯科亲切友好得多的人。虽然费尔迪南多也喜欢铺张浪费、招摇卖弄，但是他很快就展示出了对佛罗伦萨人民福祉的真切关注，并且决心保持佛罗伦萨的独立地位，哪怕要付诸武力也在所不惜。这一点与弗朗切斯科无限度妥协以避免争议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在费尔迪南多相对温和但更有效率的统治之下，佛罗伦萨政府的腐败问题有了好转，财政也更加稳定，贸易和农业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佛罗伦萨开设了更多的医院，比萨也建立了一座专门面向学者们的大学。他父亲创立的船队此时也壮大了起来。还有被孟德斯鸠称为“美第奇王朝代表作”的里窝那此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人口有了大幅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大公的宗教宽容政策吸引了欧洲各国的人们来此生活，其中不仅有遭受迫害的新教徒，还有很多犹太人，这也是今天里窝那人口中犹太人比例仍高于其他意大利城市的

原因。费尔迪南多大公的诸多善举和慷慨宽容赢得了人们的爱戴。他设立的在圣洛伦佐教堂为贫苦人家的女儿提供嫁妆的活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人们都乐意参加这个庆典，届时费尔迪南多会为穷人们分发财物，这样他们的女儿就可以找到更好的亲事了。除此之外，1589年阿诺河水位暴涨，佛罗伦萨及周边的乡村都受灾严重，费尔迪南多亲自将装有食物的篮子分发给受灾者，并且冒险乘坐小船去视察灾情，抚慰受灾的群众并承诺一定会为他们提供帮助。

费尔迪南多更喜欢囤积财富而不是把钱拿去投资。他还下令让贝尔纳多·布翁塔伦蒂为他打造一个牢不可破的保险箱，而这个保险箱就被放置在气势威严的观景堡垒（Forte di Belvedere）中，这个堡垒也是由布翁塔伦蒂设计建造的，位于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圣乔焦高地，于1590年开工，到1595年建成。^[9]不过，费尔迪南多在需要炫耀铺张的场合，也绝对是毫不吝惜钱财的。他从萨鲁塔特家族

（Salutat）手中买下了一座中世纪城堡彼得拉亚（Petraia），并且指示布翁塔伦蒂将其改造为一座宏伟的乡村别墅，还要配套建造同样豪华壮观的花园。^[10]费尔迪南多还在阿蒂米诺（Artimino）修建了一个豪华的狩猎小屋，并称之为费尔迪南达别墅（Villa Ferdinanda），这里同样也是由布翁塔伦蒂设计的。^[11]他还不断出钱改建皮蒂宫和波波利花园，扩建了乌菲齐宫的画廊并修建了一间八角形展室（Tribuna）。他从波斯和埃及购买了无数稀有的手稿来扩充美第奇藏书室。他还花了一千达科特购买了一个巨大的镀金地球仪，其构造之复杂前所未见，就是用来证明托勒密（Ptolemy）关于太阳、月亮和星星围绕地球旋转的理论，并否认哥白尼的说法。^[12]他还把贝利尼宫（Bellini）^[13]的装饰工作指定给詹波隆那，并让他在锻造厂里打造了科西莫大公的巨型骑马雕塑，用来摆在市政厅广场上。

^[14]费尔迪南多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孙女——洛林家族的克里斯廷（Christine of Lorraine）结婚时，开销之巨仿佛是要显示美第奇

家族还没有失去往日的荣光，以及放弃兄长支持西班牙的政策也是一件值得以壮观场面来庆祝的盛事。^[15]

克里斯廷进入佛罗伦萨时，沿路穿过了一系列为致敬佛罗伦萨、致敬美第奇家族和洛林家族的光辉历史而修建的凯旋门。在婚礼之前的几个星期里，众多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就开始忙于修建这些拱门，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艺术家、手工艺者、厨师、木匠、机械师和缆索工，音乐家、歌手、士兵、演员、园丁和焰火制作者也投入到繁忙的准备工作中，不但要设计新颖而精致的游行队列，还要安排招待会、宴会、露天庆典、音乐演奏和幕间表演（*intermezzi*）。不但要佛罗伦萨人前所未见，还要整个欧洲的人也都前所未见。这场盛大的婚礼成为舞台艺术、芭蕾和新兴的音乐剧（*drama per musica*）发展的新里程碑。最精彩的部分要数在皮蒂宫上演的音乐表演了，舞台上出现了各种新奇的布景设备，会喷发的火山和能吐火焰的恶龙足以让观众惊艳，而真正的高潮则出现在舰队登场时，整个院子里被注入了五英尺深的水，逼真地再现了18艘由英勇的基督教士兵操控的舰船向土耳其堡垒发起猛攻的场景。

这样的娱乐表演给后来在凡尔赛宫为路易十四（Louis XIV）举办的诸多庆祝活动带来了启发。费尔迪南多非常善于安排这样的活动，他也从不错过任何利用这些活动来提升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及整个世界的威望并顺势宣传自己政策的机会。在他举办的诸多宫廷盛典中，最成功的莫过于为侄女玛丽亚与纳瓦尔家族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举办的婚礼。后者能够成功击败天主教联盟并继位为法国国王多半是靠着美第奇家族的雄厚财力支持。除了常见的赛马会和锦标赛、游行和露天表演，以及烟花秀和水滨派对（*water fêtes*）等，在乌菲齐还上演了朱利奥·卡奇尼（Giulio Caccini）的《切法罗的劫难》（*Il Rapimento di Cefalo*），该剧的布景也是由布翁塔伦蒂亲自设计；这里还上演了雅各布·佩里（Jacopo Peri）的《尤丽迪茜》

(*L' Euridice*) 和《达芙妮》(*Daphne*)，后者被称为历史上第一部歌剧，虽然现已遗失，但当时也都是由费尔迪南多资助创作的。1600年10月5日这一天，玛丽亚·德·美第奇(Maria de' Medici)和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大教堂由代理人履行了婚礼程序。旧宫里举办了盛大的宴会，每一道菜都精心制作和装饰成带有寓意的样式，以此来象征法国国王与美第奇家族联姻是多么明智的选择以及这个家族有着多么出众的美德。

1609年费尔迪南多去世了，他19岁的儿子科西莫二世继承了爵位，也继承了这个家族奢华挥霍的风格。在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尔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 II)的妹妹女大公玛丽亚·马达莱娜

(Maria Maddalena)结婚时，阿诺河上举行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观者无不声称这样的表演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从阿拉卡拉亚桥到天主圣三桥的整段河流都是演出的舞台，为了这一时刻，两岸都装饰着各种雕像。观众们坐在阿诺河河滨大道(Lungarni)的巨大看台上观看了《阿尔戈英雄纪》(*Argonautica*)，讲述了伊阿宋

(Jason)如何在围绕人造海岛舞台航行的过程中，击败巨大的海豚、龙虾和会喷火的九头蛇，最终找到了金羊毛(golden fleece)并将它献给了女大公玛丽亚·马达莱娜，同金羊毛一起献上的6个红苹果则是美第奇家族标志红球的象征。

科西莫二世对于建筑的品位也和父亲相似。他扩建了皮蒂宫，重建了阿尔切特里(Arcetri)附近的波焦因佩里亚莱别墅。^[16]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随身带到佛罗伦萨的望远镜就架设在别墅里，后来伽利略本人也住在这里并得到了庇护。

伽利略1564年出生在比萨，他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佛罗伦萨贵族后裔。伽利略本来想成为一名画家，但是父亲却不支持他，于是伽利略改为学医，后来又改学数学和物理，因为总是质疑既有的理论，再

加上他的疯狂理论和急躁脾气，伽利略在比萨大学里的老师们总是被他气得火冒三丈。虽然后来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教师的职位，但是其他教师却巴不得他快点递交辞呈，因为受不了他的冷嘲热讽和孤僻性格。于是伽利略又去了帕多瓦大学并在那里工作了18年，直到曾经的学生科西莫二世邀请他到佛罗伦萨，这样他就可以远离诽谤者的干扰和教会的指控，安心进行研究和实验了。伽利略接受了这个邀请，在美第奇家族的保护下度过了余生。他在1610年出版的作品中提及了他新发现的木星旁边的卫星，当时他将其命名为“美第奇之星”

(*Medicea Sidera*)。[17]伽利略的保护者科西莫二世刚刚过三十岁就去世了，也没有做出什么值得赞颂的功绩，而伽利略则是在1642年去世的。他去世时，教会严禁为他立任何纪念碑，于是科西莫的儿子费尔迪南多二世 (Ferdinando II) 将他埋在了圣十字教堂的见习教士堂。[18]

[1] 旧宫花园中的喷泉上站立的小天使雕塑是韦罗基奥原作的仿品，原作收藏在百合花厅 (Sala dei Gigli) 的一个房间中。壁画由马尔科·达·费恩扎 (Marco da Fienza)、乔瓦尼·隆巴尔迪 (Giovanni Lombardi) 和切萨雷·巴廖尼 (Cesare Baglioni) 创作。

[2] 比安卡·卡佩洛的房子位于马焦街 (24~26号)。

[3] 普拉托利诺由布翁塔伦蒂设计并建造了15年之久，1822年被拆毁，理由是维护费用太高无力支付。50年后这片地产被王子保罗·德米多弗 (Prince Paul Demidoff) 买下，并改名德米多弗别墅，属于南斯拉夫王子保罗名下。他将别墅重建后卖出。詹波隆那的巨型雕塑《亚平宁》仍然立在这里。其他雕像则被移到了波波利花园，包括象征大公科西莫一世的雕像《珀尔修斯和龙》 (*Perseus and the Dragon*)。

[4] 在托尔纳博尼街和龙迪内利街连接处的安蒂诺里宫是为博尼 (Boni) 家族建造的。

[5] 切雷托圭迪别墅本来是属于圭迪家族的。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布翁塔伦蒂为大公科西莫一世将其翻新并在别墅前面加盖了巨大的双斜坡。

[6] 克鲁斯卡学会总部现在位于法官宫（Palazzo dei Giudici），但是很快就会迁到卡斯泰洛城别墅。

[7] 大公弗朗切斯科时期佛罗伦萨人制作的瓷器是当时欧洲最早出现的瓷器，也是现在存世量最稀少的，只有大约70件。其中一件体积娇小、形状不佳的瓷碗于1973年在纽约卖出了180000英镑的高价，创下了欧洲瓷器拍卖的最高成交价。其他的瓷器都陈列在卢浮宫、法国塞弗尔国家陶瓷博物馆（Musée de Sevres）、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及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8] 罗马的美第奇别墅是由安尼巴莱·利比（Annibale Lippi）在1544年为枢机主教里奇设计的。后来在1577年被枢机主教费尔迪南多·德·美第奇买下。他是美第奇家族的枢机主教之中第一位在这里居住的。别墅正面和花园的布局没有被改动过。现在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的《墨丘利》（约1565年）曾经是这座别墅花园中喷泉的一部分。别墅前的喷泉正中原本是一座佛罗伦萨百合的雕塑，而后换成了现在的加农炮弹石雕。这是因为当初克里斯蒂娜女王（Queen Christina）被许可试验安杰洛城堡的加农炮，然而炮弹没有如预期那样射向空中，而是无意击中了美第奇别墅。这座别墅在1803年被拿破仑买下，现在这里是法兰西学院的所在地。

[9] 观景堡垒，也称作圣乔焦堡垒，现在存放了大量从佛罗伦萨其他建筑中移来的壁画，包括菲耶索莱的巴迪亚教堂阿兰奇修道院（Chiostro degli Aranci）壁画，圣玛丽亚诺韦拉教堂韦尔德修道院（Chiostro Verde）壁画，圣乔瓦尼广场比加洛敞廊（Loggia of the Bigallo）上的[由安布罗焦·迪·巴尔代斯（Ambrogio di Baldese）和罗塞洛·迪·雅各布·弗兰基（Rosello di Jacopo Franchi）创作的]壁画以及彼德拉皮亚纳街（Via Pietrapiana）7号米诺·达·菲耶索莱（Mino da Fiesole）故居中的壁画。这里还陈列着波提切利创作的原属于斯卡拉街上圣马蒂诺教堂的《圣母领报》。

[10] 彼得拉亚别墅是1595年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从菲利波·萨卢塔蒂（Filippo Salutati）的遗孀手上买来的。院子里装饰的壁画是由被称作“沃尔泰拉人”（il Volterrano）的巴尔达萨雷·弗兰切斯基尼（Baldassare Franceschini）创作的，内容是赞颂美第奇家族的历史。壁画是为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的儿子唐·洛伦佐·德·美第奇（Don Lorenzo de' Medici）画的。复兴运动之后，这座别墅归属了萨瓦家族，后来又由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King Victor Emmanuel II）进行了改建和装修。

[11] 阿蒂米诺的费尔迪南达别墅位于波焦阿卡伊阿诺西南大约四英里外，修建于1594~1595年。1781年被卖给了侯爵马尔凯塞·洛伦佐·巴尔托洛梅伊（Marchese Lorenzo Bartolommei）。二十世纪初进行了重建，但现在仍然闲置着。

[12] 法官宫临近乌菲齐，可以俯瞰阿诺河的半边现在成了科学史博物馆。此前这座宫殿属于卡斯泰拉尼家族，他们的家族教堂在圣十字教堂里。法官宫的名字来源于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时期在这里建立的司法委员会（Consiglio di Giustizia）。博物馆中收藏了大量地球仪、星盘、钟表和地图，还有米开朗琪罗的指南针和伽利略的望远镜。

[13] 贝利尼宫位于平蒂镇（Borgo Pinti）26号。大门上方有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的半身像。

[14] 市政厅里的公爵科西莫一世雕像是由詹波隆那于1587~1599年在贝利尼宫创作的。圣母领报大殿广场上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骑在马上雕像是长寿的詹波隆那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开始创作，并由彼得罗·塔卡于1608年最终完成的。费尔迪南多一世去世后，雕像被移至贝利尼宫。

[15] 费尔迪南多一世认为作为美第奇象征的红色小球容易让人感觉商业气息太重，于是决定将家族标志换成了蜜蜂（古时的蜜蜂象征着为人民的福祉鞠躬尽瘁、贡献一切的统治者），但是他仍不忘想尽办法向美第奇家族财富的奠基者们致敬。1565年，为了纪念送信者给科西莫一世送来蒙特穆洛（Montemurlo）大捷的喜讯，人们在圣三一教堂广场上信使报信的地方立起了一根巨大的正义之柱。就在柱子底部，费尔迪南多一世建造了四座灰泥雕像，分别代表着奥古斯都、查理曼大帝、科西莫一世及国父科西莫。石柱来自卡拉卡拉浴场（Baths of Caracalla），是教皇庇护四世（Pius IV）赠送给公爵科西莫一世的。巨石被放置在滚轴上，从罗马一直运到奇维塔韦基亚，再从比萨用船运到佛罗伦萨。1581年建造的石像被认为是罗莫洛·德尔塔达的作品。

[16] 波焦因佩里亚莱别墅曾经属于巴龙切利家族，后来属于萨尔维亚蒂家族。它现在的名字来源于奥地利的大公夫人玛丽亚·马达莱娜，后者在1619年买下这座别墅。后来这里又成为拿破仑的妹妹埃莉莎·巴乔基（Elisa Baciocchi）的家。现在这里是一座女子学校。

[17] 位于染匠大街（Corso dei Tintori）的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里现在存放了三百多卷伽利略的论文，这里同时还保存着波利齐亚

诺、米开朗琪罗和马基雅维利的论文。很多手稿和书籍都来自大公的帕拉蒂纳藏书室（The Palatina）。这个藏书室是由费尔迪南多二世和他的弟弟吉安·卡洛、莱奥波尔多共同建立的。

[\[18\]](#) 伽利略的遗体在1737年被移出了圣十字教堂的见习教士堂，并被重新埋葬在了西门的北侧。

第二十二章 费尔迪南多二世和法国公主

“她最惯常的幻想就是说自己屈尊下嫁了”

父亲去世时，费尔迪南多二世只有10岁。他是个随和亲切的男孩儿，从来不给家庭老师们找麻烦，也不给他们任何可以居功的理由。17岁时他周游了欧洲大陆，将佛罗伦萨留给母亲和祖母管理。然而这两个女人之间以及她们和各个委员会之间终日争吵不断，而且她们两个显然既不遗憾费尔迪南多二世的离开，也不期盼他的回归。不过，佛罗伦萨人民对他的了解越深，反而越来越偏爱费尔迪南多了。1630年，费尔迪南多20岁的时候，佛罗伦萨暴发瘟疫，但凡有钱人家全都躲到城外去了，只有他和弟弟坚持留在佛罗伦萨尽全力帮助受难的平民。他的外表看起来可不像个大英雄，从宫廷画师尤斯图斯·苏斯泰尔曼斯（Justus Sustermans）为他画的肖像来看，他有一个圆鼻头，还有哈布斯堡式（Habsburg）肥厚突出的嘴唇，上面蓄着尾部像箭头一样上翘的八字胡，再加上松弛下垂的眼睑，与画像上摆出的贵族统帅姿势形成了滑稽的对比。费尔迪南多体形肥胖，性情尤为温和，比起貌美姑娘，他反而更喜欢年轻俊俏的男子。他还喜欢钓鱼、打猎、玩保龄球，不过前提是别人会让他赢，因为他一输就会发脾气，对比他平日里温和有礼的样子，显得格外吓人。费尔迪南多的生活不算铺张，皮蒂宫门口挂着有柳条包装的瓶子，意思是这里也像其他小一些的宫殿一样对外出售葡萄酒。不过费尔迪南多也绝不是个小气的人，他和前辈一样会花很多钱举办露天表演、化装舞会和奇幻秀；在弟弟莱奥波尔多（Leopoldo）的鼓励下，他还慷慨资助了一些科学家和文人雅士。自1657年起，久负盛名的试验科学院（Del Cimento）的学者们开始在皮蒂宫举办会议。学院秉承“实验再实验”（*Provando e Riprovando*）的箴言，以一个熔炉和三个坩埚为徽标，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十年就因为学者之间的争吵、嫉妒和不和而解散，但是它存续期

间发表的出版物却做出了巨大的科学贡献。费尔迪南多和莱奥波尔多都是伽利略的学生，他们对伽利略的研究都很感兴趣，还会为他平息外界的争议，签署他的往来信函；他们也密切关注气压计的发明者埃万杰利斯塔·托里切利·达·莫迪利亚纳（Evangelista Torricelli da Modigliana）的著作，还会亲身体验双眼望远镜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并订制温度计、星盘、象限仪、湿度计等，到皮蒂宫的人都会看见大量新奇的机械装置。

虽然兄弟俩痴迷于这些仪器，但是他们的兴趣爱好并不局限于此。尤其是莱奥波尔多，绝对称得上一个博学之人。他每天会花四个小时“埋首于书海之中”。能找到的书他都会读，无论是“评论的、英雄的、讽刺的还是猎奇的作品……或是描述其他国家地理风俗和居民生活的手稿……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试验科学院的秘书在给莱奥波尔多订购书目的代理的信中写道：

你可以给我送来关于我送给你那种鱼的自然历史的内容，或是解释某种奇特受孕的原因……或是关于在甘多尔福（Gandolfo）城堡发现的与人类骨骼相似的骷髅骨的内容；还有关于奖牌、新近发现的雕塑、浮雕和其他古董或者建筑设计的，或是有意思的故事之类的——总之什么书都可以。

莱奥波尔多“就像一个带着一块面包的小男孩儿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口袋里装一本书，一有时间就要读上几页”。

费尔迪南多对于兴趣爱好则更有选择性，也更务实，除了在试验科学院进行一些实验之外，他最感兴趣的是佛罗伦萨用宝石（*pietra dura*）制作马赛克的工艺的发展。宝石工厂里雇用了大量的工匠，每日忙碌于制作装饰物和浅浮雕，或是用大理石、象牙、水晶、金子、彩色矿石和半宝石来装饰家具。^[1]为了能有地方容纳这些作品和不断增添的画作和雕塑藏品，费尔迪南多不得不对皮蒂宫进行了大范围的改建，以便展示自己向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艺术家们订制的壁画作品，

包括奇罗·费里（Cirro Ferri）、弗朗切斯科·富里尼（Francesco Furini）、创作了壁炉厅（Sala della Stufa）中巴洛克式精美壁画的彼得罗·达·科尔托纳（Pietro da Cortona）和在银器博物馆（Museo degli Argenti）工作过的乔瓦尼·达·圣乔瓦尼（Giovanni da San Giovanni），他工作的时候是坐在一个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浴盆里，悬在半空中，因为患有痛风，腿上还缠着绷带。^[2]在如此精心装饰过的画廊里，参观者可以看到大公最新购置的收藏品。^[3]

作为一个统治者，费尔迪南多的政策就是尽可能避免一切麻烦和冲突。他曾经被迫卷入和教皇那令人厌烦的巴尔贝里尼（Barberini）亲戚的一次短暂战争，除此之外，所有对佛罗伦萨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都通过缓和与抚慰的方式获得了解决。为了不冒犯教皇，在公爵弗朗切斯科·玛丽亚二世（Francesco Maria II）去世后，他甚至不愿意主张自己对乌尔比诺的权利，而是任由公国变成了教廷国。与此类似，他还同意卫生部的官员在教皇面前下跪认错，并为在瘟疫暴发时依法隔离教士和牧师而道歉。对于难以驾驭的众多家庭成员的一些本应严厉谴责的行为，费尔迪南多也同样采取了宽大的态度。他和好脾气的莱奥波尔多向从来没有矛盾，在试验科学院解散后，莱奥波尔多就去罗马成了一名枢机主教。费尔迪南多与另一个弟弟马蒂亚斯

（Mattias）也相处和睦，马蒂亚斯曾经作为一名将军参加了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并且立有战功。他在战争时期收集的象牙装饰品极其可观，也算得上皮蒂宫展品中的一个小奇观了。^[4]之后，马蒂亚斯又创造了另一种形式的惊人收藏，他集合了一批畸形人，其中包括一个丑陋的侏儒，不但“长着稀疏的尖牙”，还有着惊人的饭量，可以在丰盛的正餐之前吃下40根小黄瓜、30个无花果和1个大西瓜当作开胃菜（*hors d'oeuvres*）。不过费尔迪南多倒确实与另一个弟弟吉安·卡洛（Gian Carlo）关系不睦，后者和莱奥波尔多一样是名枢机主教，却是一个远不如他自律的人。

吉安·卡洛不是一个毫无品位的人，他在罗马认识了萨尔瓦托·罗萨（Salvator Rosa），于是邀请他来佛罗伦萨，不但向他支付了一笔固定的年金为宫廷作画，还许可他同时接受其他资助者的订制。吉安·卡洛出资为一群演员在佩哥拉街上（Via della Pergola）建造了一座剧院；^[5]他还为另一群演员租用了科科梅罗街（Via del Cocomero）上的一座宫殿，并邀请费尔迪南多·塔卡（Ferdinando Tacca）设计舞台布景。^[6]不过，真正最让吉安·卡洛感兴趣的并不是油画和戏剧，而是美食和女色。他的这两种欲望似乎永远不会满足。他被逐出罗马的原因就是他在探访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的时候，拒绝由年长且不那么好色的枢机主教陪同。吉安·卡洛回到佛罗伦萨的时候还很年轻，英俊而富有，穿戴讲究，留着卷曲的长发，一心沉迷于享乐。他搬进了一座美丽的乡间别墅，这座别墅就建在斯卡拉街（Via della Scala）尽头一个景色迷人且充满异域风情的花园中。^[7]他在这里整日与情妇厮混，据说经常与多个情妇同时做爱。他还将不止一个令他厌烦的对手溺死在了鲤鱼塘里。有一次，一个女人找吉安·卡洛为自己的丈夫求情，他立刻把这个妇人带上了床，然后下令释放她那臭名昭著的杀人犯丈夫，还威胁治安官说如果不遵照指令放人，他就要砍掉治安官的脑袋。于是治安官请求大公裁定，费尔迪南多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无奈地宣布：“遵照枢机主教的命令吧，谁让他是我弟弟呢。”所有人都知道费尔迪南多心中惧怕吉安·卡洛，所以后来当他听到这个弟弟死于中风的消息时，表现出来的显然是宽慰而非哀痛。

大公还发现自己的妻子维多利亚·德拉·罗韦雷（Vittoria della Rovere）几乎和吉安·卡洛一样令人厌烦。她是一个一本正经还爱管闲事的女人。长相平平、身材肥胖，结婚后更是越来越胖，双下巴比自己丈夫的还厚，而且一直无法生下一名继承人：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儿，不过出生后不到一天就死了；第二个孩子只活了几分钟；1642年8月14日，她终于生下了一个能够活下来的孩子，这个孩子

就是后来的科西莫三世（Cosimo III）。不过小科西莫的出生没能改善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没过多久，维多利亚就撞见丈夫正在爱抚一名男侍从。之后几个星期她都不愿与丈夫说话。当她终于决定讲和之后，他却不愿与她重归于好，过了差不多二十年他们的关系才终于缓和，1660年他们迎来了第二个儿子弗朗切斯科·玛丽亚（Francesco Maria），不过这段婚姻仍然算不上幸福。

这对夫妇的一个主要分歧就是儿子科西莫的教育方式。大公希望他能接受现代教育，希望孩子对于他自己非常感兴趣的那些科学发现也能有一些认知。相反，大公夫人则坚决反对。她坚持要以传统方式由教士来教育儿子。科西莫最终还是接受了传统的教育。他被灌输的思想是科学实验不但是不信神的邪恶行径，更是不符合王子身份的事情。很快他就形成了一种古板的缺乏宽容精神的人生观，这也成了左右他一生的性格缺陷。到16岁的时候，他已经显示出了一种“极度的虔诚”，如卢卡大使汇报的那样：

与他的父亲不同，科西莫的忧郁情绪已经达到了极深的程度。大公费尔迪南多对所有人都很亲切，似乎随时会和你开个玩笑，而王子却几乎从来没笑过。人们将此归因于他傲慢冷漠的性情。

除了教堂圣歌，科西莫不喜欢任何音乐，也不喜欢跳舞；他宁愿去做弥撒，也不愿去剧院看戏。他更愿意和教士们而不是女孩儿或侍臣们谈话。他也会出去打猎，但当猎物从头顶飞过时他却不开枪，口中还喃喃念着“可怜的小东西”（*Poverino*），不过事后他还是会津津有味地吃别人杀死的猎物。他的父亲认为早点结婚也许会对儿子有好处，而他理想的新娘就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叔叔加斯东·德·奥尔良（Gaston d'Orleans）的女儿玛格丽特-路易丝（Marguerite-Louise）。这样的安排也令巴黎满意，那里的枢机主教马扎林

（Mazarin）心中成为教皇的梦想正需要美第奇家族的支持。不过，嫁给这样一个阴沉、肥胖，长着肥厚嘴唇和下垂眼角的意大利人对于玛

格丽特-路易丝本人来说可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她是个活泼、敏锐、充满活力、爱玩闹且任性妄为的姑娘。除此之外，她还爱恋着堂兄洛林家族的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 of Lorraine）。她恳求堂兄国王路易十四不要把她送到佛罗伦萨去。她到卢浮宫跪在国王面前，求他把自己从这可怕的命运中解救出来；然而国王只是扶她起身，告诉她此时反悔已经太晚了。所以在1661年4月17日，玛格丽特-路易丝和科西莫在巴黎由代表举行了结婚仪式，当时她年仅15岁，而因为患了麻疹而留在皮蒂宫养病的科西莫则是18岁。

新娘启程前往佛罗伦萨时，“哭声大得所有人都能听到”。途中每经过一个城镇过夜后的第二天，她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拖延出发时间。最后她终于到达了马赛，当时下着瓢泼大雨，玛格丽特装病不肯离开用鲜花装饰的大船上的舱房，于是她就乘船一直航行到了里窝那。新郎在恩波利附近的安布罗贾纳（Ambrogiana）别墅等着迎接她。^[8]不过在第一次见到新娘之后，科西莫并没有表现出一点欣喜之情，更不愿意亲吻她；而新娘在听到医生宣布虽然她已经得过麻疹且王子的病已不再具有传染性，但他们还不宜共处一室的时候，也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欣慰。

在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庆典之后，新娘新郎终于圆房，只不过王子一点也不热情，而且很快就睡着了。人们安慰新娘说等他彻底康复之后就会强壮起来，不过玛格丽特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康复与否。汉诺威（Hanover）公主索菲娅（Sophia）很多年后回忆说其实王子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他一周最多与妻子同床一次，然后就会在医生的监督下离开，以防留在那里时间过长会对他的健康有害”。玛格丽特非常讨厌丈夫，他的彬彬有礼在她看来也是种侮辱。

婚后第二个晚上，玛格丽特就向丈夫索要皇冠珠宝。而他则回答说自己没有权力做这样的决定，于是玛格丽特大发脾气，说自己宁愿

住在法国最肮脏的窝棚里也不愿住在托斯卡纳的宫殿里。第二天，她又自作主张地拿走了一些珠宝赏赐给了法国随从们，然后又不得不费了很大的劲要回来。在这之后，她几乎不怎么和丈夫说话，到他们结婚将近一个月的时候，贝齐耶主教（Beziers）汇报说：“王子只与新娘同房过3次。”主教还说：“每次他不来过夜，就会派自己的贴身男仆去告诉她不用等了。而陪同的法国女士们……都觉得很尴尬，因为她们的女主人每天都很哀伤……她觉得这里的生活令她感到陌生。”

人们希望到了夏天，佛罗伦萨各种精彩纷呈的娱乐活动会让玛格丽特重新高兴起来。旧宫的盛宴、皮蒂宫的舞会、圣三一教堂桥上的烟花秀、马焦街上的赛马、圣玛利亚诺韦拉广场上的战车赛，还有从铺着地毯的街道穿过的盛装游行等接连不断。在施洗者圣约翰节这一天，市政厅广场上照例举办了献礼节（*Festa degli Omaggi*）庆祝活动。仅过了一周，将近两万名观众聚集在波波利花园的圆形剧场上观看了《欢乐的世界马术芭蕾》（*Il Mondo Festeggiante*），这是一个融合了假面剧、活人静态画面、盛装游行、马术芭蕾、音乐剧和魔术效应的综合表演。科西莫本人也参与其中，穿着镶有珠宝的铠甲饰演赫拉克勒斯。又过了短短10天，雅各布·梅拉尼（Jacopo Melani）创作的《赫拉克勒斯在底比斯》（*Hercules in Thebes*）也在佩哥拉街的剧院里上演了。这些之后，玛格丽特-路易丝又开始了到美第奇家族各个别墅的游玩之旅，从波焦因佩里亚莱到波焦阿卡伊阿诺，从阿蒂米诺到卡斯泰洛和普拉托利诺。尽管如此，公主依然很少再表现出她曾经的开朗活泼。多数时候她都在想家，闷闷不乐、百无聊赖，或是沉浸在幻想中；托斯卡纳的一切她都看不顺眼，因为托斯卡纳不是巴黎；她几乎从不出现在公共场合，即使不得已必须出席也要戴着面具。当有人问她喜不喜欢佛罗伦萨时，她会不高兴地回答要是这儿离巴黎近点儿，也许她还能更喜欢一些。玛格丽特是个奢侈铺张的人，吃穿用度各项费用让一贯节俭的大公咋舌。更糟糕的是，她为人轻率鲁莽。当洛林家族的查尔斯王子访问佛罗伦萨的时候，玛格丽特毫不

掩饰自己对堂兄的爱意，还在他离去之后给他写了很多充满感情的书信，即便他的回信都被中途拦截了，她也还会继续写。1663年8月，玛格丽特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取名费尔迪南多，之后她就因为乳房肿块而一直抱病在身，整个养病期间她除了自己的法国侍从们谁都不见。科西莫把她的任性妄为都归咎于这些侍从，于是一口气把其中28人替换成了意大利人，结果只是让玛格丽特-路易丝闹得更凶了。

威尼斯大使这样写道：“她从不听取任何反对意见，也不尊重任何人。她最惯常的幻想就是说自己下嫁了一个远远配不上她的家族；而这恰恰刺痛了美第奇家族最敏感的神经。”为了躲避丈夫，玛格丽特无所不用其极。她在宫中的卧室换了一个又一个，离丈夫的房间越远越好；她还向公公请求准许她独自去乡村别墅里生活。大公费尔迪南多本来对她充满耐心、体谅和宽容，可是最后连他也忍无可忍地冷硬起来，对玛格丽特说如果她继续这么无法无天，就把她送进修道院去。而玛格丽特对此的回应更加傲慢失礼，她说她的公公一定会后悔把自己送到修道院去，因为她会把整个修道院的修女们都教唆得像猴子一样吵闹聒噪。玛格丽特总是能从恶意中伤科西莫中找到快感。她到处散播他无能的故事，还说他连做个马夫都不配，更别说是做丈夫了。大公对此的报复措施就是所有人去阿蒂米诺打猎的时候，玛格丽特被单独送到了马蒂亚斯的拉佩吉别墅（Lappeggi），并且命人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她去哪儿都要有人跟着，并且绝不允许她收阅任何未经他们许可的信件。她对此的报复则是假装美第奇家族要毒害她，所以每一样食物都只能由法国厨师准备，她吃之前还必须让一个管家先吃一口。她还对外宣称这门婚事是强加给她的，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她的地位就像个小妾，丈夫与别人通奸；她现在不得不进入修道院——当然必须是法国修道院。当她的这些提议被呈递到法王路易十四面前时，他的回答是：如果玛格丽特要回法国，也绝对不是进入法国修道院，而是直接投入巴士底狱。除了这样的威胁之外，路易十四

还派一个特使带着他的书信去托斯卡纳，信中他斥责了玛格丽特的“任性妄为”和“固执己见”。

玛格丽特依然拒绝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离开拉佩吉别墅之后，她又被送到了波焦阿卡伊阿诺。科西莫听说她病了之后前去探望，可是她却抓起床头小桌上的瓶子，威胁说他胆敢靠近就要敲碎他的头。病好之后，玛格丽特恢复了在别墅后面的小山上快速攀爬的运动方式，她在前面走得飞快，不时还会丢石头乱打路边的小鸟，侍从们则辛苦地远远跟在后面，累得气喘吁吁也追不上她。

到了1665年10月，玛格丽特突然厌倦了单调乏味、与世隔绝的乡村生活，于是前往皮蒂宫请求大公准许她回归宫廷生活。费尔迪南多马上向她保证自己对此再满意不过了。科西莫也亲吻了妻子，看到她显然已经准备好做出符合她身份的样子，所有人都很欣慰地欢迎她回来。有一段时间，一切都好了起来：她变得和蔼可亲，打扮得美艳动人，开始跳舞、欢笑，履行妻子的职责与科西莫做爱并且再一次怀孕。可是麻烦又开始出现，怀孕之后她依然坚持骑马狂奔，走路飞快；被劝说后她又开始指责美第奇家族剥夺她的人身自由，把她像个犯人一样囚禁着。怀孕期间她不但坚持剧烈运动，还得了一次重感冒，医生只好给她大量放血，尽管如此，她还是在1667年8月11日生下了一名健康的女婴，取名安娜·玛丽亚·路易莎（Anna Maria Luisa）。孩子出生后，她的乳房脓肿复发了，而且还感染了天花。医生又开始给她大量放血，还剪掉了她的头发。在疾病和苦闷的双重打击下，她对科西莫的抱怨比以往更加恶毒。大公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让科西莫出国也许有好处，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德国和荷兰，结果发现他回来时玛格丽特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就又把送到了西班牙，然后又去了英格兰。

[1]. 宝石加工场 (Orificio Delle Pietre Dure) 于1796年从乌菲齐内迁出并搬到了阿尔法尼街 (78号), 至今还有工匠在这里工作或接受培训。

[2]. 在皮蒂宫第四号展室的东墙上可以看到乔瓦尼·达·圣乔瓦尼的作品。在“沃尔泰拉人”巴尔达萨雷·弗兰切斯基尼的帮助下, 他还在拱顶上创作出了《美第奇和德拉罗韦雷家族的联合的寓言》 (*Allegory of the Union of the House of Medici and Della Rovere*)。北墙上的《洛伦佐在卡雷吉的柏拉图学院》 (*Lorenzo and the Platonic Academy at Careggi*) 和《洛伦佐之死的寓言》 (*Allegory of Lorenzo's death*) 是弗朗切斯科·富里尼的作品。南墙上的《伟大的洛伦佐迎接阿波罗》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Receives Apollo*) 是切科·布拉沃 (Cecco Bravo) 的作品。窗户之间的《洛伦佐被围绕在艺术家中间》 (*Lorenzo surrounded by Artists*) 是奥塔维奥·万尼尼 (Ottavio Vannini) 的作品。

[3]. 最后一次购入的艺术品中不乏一些精美的雕塑, 包括《赫马佛洛狄忒斯》、西塞罗的头像及《伊多利诺》 (*Idolino*)。鲁本斯的《战争的后果》 (*Consequences of War*) 是费尔迪南多二世买来的。委罗内塞 (Veronese) 的《达尼埃莱·巴尔巴罗》 (*Daniele Barbaro*)、《一个男人和与圣巴巴拉一起的神圣家庭的肖像》 (*Portrait of a Man and Holy Family with Santa Barbara*) 都是枢机主教莱奥波尔多的藏品。拉斐尔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画像, 提香的《斜倚的维纳斯》 (*Recumbent Venus*)、《马格达莱纳》 (*Magdalena*)、《贝拉》 (*La Bella*) 和《灰眸贵族男子肖像》 (*Portrait of a Grey-eyed Nobleman*) 以及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 (Piero della Francesca) 著名的乌尔比诺公爵费代里戈·达·蒙泰费尔特罗和他妻子巴蒂斯塔·斯福尔扎 (Battista Sforza) 的肖像都是1634年费尔迪南多与维多利亚·德拉·罗韦雷结婚时购入的。

[4]. 大部分象牙装饰品是由马蒂亚斯·德·美第奇从科堡城堡 (Castle of Coburg) 带回佛罗伦萨的。它们都陈列在第十展室。

[5]. 佩哥拉剧院 (Teatro Della Pergola, 位于佩哥拉街12号) 是费尔迪南多·塔卡在1656年建造的。现存的建筑是巴尔托洛梅奥·西尔维斯特里 (Bartolommeo Silvestri) 设计的, 建于十九世纪早期。

[6]. 科科梅罗街是现在的里卡索利街。

[7]. 吉安·卡洛的花园在斯卡拉街。柏拉图学院的成员们曾经在这里举行辩论会，现在花园的位置已经被建筑物覆盖。

[8]. 巨大而威严的安布罗贾纳别墅起初是作为打猎时的临时住所而建造的。大公科西莫三世在这里的墙上挂满了稀有动物和花卉的画作。现在这里是精神病院。

第二十三章 科西莫三世和王子费尔迪南多

“十八年就够了。我活不了那么长”

26岁的科西莫和以前一样阴郁，却比结婚时自信多了。因为暴饮暴食，他现在已经极度肥胖；不过举止也不无魅力，尽管他的言谈间总是过多地使用宗教敬语，但谈论的内容却是广泛而有趣的。科西莫在英国受到了学术圈人士的殷勤款待，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家族曾经庇护过伽利略。佩皮斯（Pepys）还见到他经常出入女王的小教堂，并且形容他是一个“举止得体、肤色黝黑、身型肥胖的人，穿着晨礼服……一个令人愉悦的美男子”。在法国宫廷上，科西莫也给人留下了类似的好印象。国王给玛格丽特-路易丝写信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自然应当好好关照我的堂妹夫。不过和他接触后我发现，仅凭他个人的魅力和美德我就应当对他以礼相待。”根据不太可靠的记述，“科西莫谈论任何话题都令人敬佩。他的身材就年纪来说确实胖了些。但是他的头型很好，留着卷曲的黑发，嘴巴很大，唇红齿白，面色健康红润，才思敏捷，待人接物和蔼可亲”。

科西莫回到佛罗伦萨时，心里还念念不忘这些北方的国家。他回来没多久就感慨地说：“我殷切地盼望有朝一日能再见如天堂般的英格兰，我希望再一次拥抱我所有的老朋友们。”他对法国也抱有同样的热情，而且回国之后他高兴地发现任性的法国妻子已经和自己的公公婆婆相处得融洽多了，所以甚至愿意多给她一些津贴来作为奖励。然而，此时他父亲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医生对水肿和中风的医治给他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安慰；到最后，医生们认为放血已经没有任何效果，于是把烧热的铁块放到他头上，还强行把药粉（*polvere capitale*）从鼻子里灌进去；另外还尝试了把四只鸽子活生生地开膛破肚后放在他的额头上之类的怪异方法。最终大公费尔迪南多二世于

1670年5月27日去世，他和自己的父亲、祖父一样被埋葬在圣洛伦佐教堂中巨大的巴洛克式陵墓中。

科西莫三世在无尽的惶恐中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尽管他父亲为人节俭，还采用了严苛庞大的税收体系，但是托斯卡纳的财政形势仍然没有任何起色。这里的贸易迅速衰败，人口也因为疟疾、瘟疫和农业落后导致的食物短缺而锐减。起初，科西莫还努力地想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远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于是他把政务抛给了母亲及其朋友们；他甚至指派自己不满12岁的弟弟替他接待外国大使。科西莫专横的母亲对这样的安排倒是很满意，不过他的妻子就另当别论了，她义愤填膺地抱怨说一个法国王室的女儿竟然要屈尊受一个姓德拉·罗韦雷的人压制。

1671年夏天，玛格丽特-路易丝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吉安·加斯托内（Gian Gastone），这个名字来自他的外祖父加斯东·德·奥尔良。之后，科西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又迅速恶化了。玛格丽特-路易丝认定自己患了乳腺癌，于是请求路易十四给她派来一位法国医生。路易同意了她的请求，但是医生检查过后发现她胸部的肿块“绝对不是恶性的”。尽管如此，医生可怜她迫切想要回到法国的愿望，还是建议大公让玛格丽特-路易丝去勃艮第的圣雷内（Sainte-Reine）药泉疗养，有助于改善她整体的健康状况。科西莫自然不会同意，而他的拒绝也必然引发妻子的激烈抗议。此外，他们还会为他送给她的各种珠宝的成色而争吵，为她的铺张浪费而争吵，为她的仆人们争吵，其中为一位法国男厨师而引起的争吵尤为严重。玛格丽特-路易丝与这位厨师的行为极不检点，她这么做也是为了报复科西莫解雇了她的两个德国马夫和一个法国舞蹈家。有人记录说：

这个厨子特别害怕，或者是装作特别害怕被人挠痒。公爵夫人发现了他的这个弱点之后，就特别喜欢挠他的痒……他为了躲避，会又叫又闹地满屋子跑，然后公爵夫人就会笑得难以自抑。

挠痒玩腻了之后，公爵夫人还会用枕头拍打厨师的头，厨师就会躲到她的床下，不过公爵夫人还是会继续打他直到精疲力竭地坐到椅子上为止。这时她旁边的乐师们就会继续演奏之前被他们的玩闹打断的音乐。有一天晚上，厨子喝醉了，所以当公爵夫人用枕头打他的时候，他叫嚷得格外大声，连大公都被惊动了。他下楼看到发生了什么之后，“立即把厨师赶到了走廊里”——不过后来对他的处罚还是被暂缓了。最终公爵夫人决定彻底解决自己与大公之间的问题。她给科西莫写信说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了：

我最终的决定应该不会令你感到意外，你好好想想这12年来是怎么对待我的就明白了……我是你不幸福生活的源泉，正如你是我不幸福生活的源泉一样。我请求你同意我离开，这样我才能获得内心的平和。我会派我的忏悔牧师去与你讨论具体事宜。

大公回信如下：

我不知道你的不幸福能否和我的相提并论。谁都能看到这12年来我从未停止给予你尊敬、体贴和关爱，唯独你对此视而不见……我等着听忏悔牧师还有什么可为你辩解的……与此同时，我会下令除了必要的侍从和待遇之外，你（在波焦阿卡伊阿诺）仍然会享有公爵夫人应有的尊重。

听到这段婚姻已经无可挽回之后，路易十四又派马赛主教作为特使到托斯卡纳去。主教发现大公夫人在波焦阿卡伊阿诺别墅里的仆从人数竟多达150名。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到哪儿都必须有人跟随，没有大公的许可也不得接受任何来访。尽管对丈夫抱怨连天，公爵夫人却没有意志消沉。事实上，她又变得“活泼明快，勇敢无畏……风趣开朗了”。主教也觉得像大公这样一个“忧郁阴沉”的人难免会感到和公爵夫人无法相处。不过他还是希望尽可能地调和二人的关系。精力过剩的公爵夫人为款待主教准备了舞会、盛宴、音乐和戏剧等，但是在这歌舞升平的表象背后，主教还是发现了公爵夫人不幸福的真正原因，哪怕是大公承诺愿意解决问题后，公爵夫人也依

然不能满足。“12年来她尝试着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是到现在也没能成功。”除此之外，她再也不能在“不冒犯上帝”的前提下跟他生活在一起了，因为她的婚姻是被强迫的，所以她并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妻子。最后连主教也不得不承认，他此行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了。

1673年5月他回国向法王复命了。

路易十四及科西莫都认为，即便他们同意正式分居，为了面子上好看，玛格丽特-路易丝也应当继续留在托斯卡纳，但是公爵夫人坚决要回到法国。1674年12月26日她的请求最终获得了许可。她获准进入蒙马特尔（Montmartre）修道院隐居。玛格丽特确保了自己离开时不会两手空空。她不但会有一份慷慨的年金收入，还有一大笔补贴用来支付这趟旅程的花销，她还被许可带走床和挂毯，以及价值约一万克朗币（crown）的银子。事实上，她真正带走的比这个数量还要多得多。玛格丽特-路易丝还搬走了波焦阿卡伊阿诺别墅里面的一些贵重物品，她还没出发就已经赠送出大笔的赏金，以至于不得不向科西莫索要更多现金，以免自己“身无分文地被晾在半路”。

正如人们预想的那样，公爵夫人在蒙马特尔并不会真正地隐居。起初她表现得还算虔诚顺从，不过没多久她就在路易十四的许可下跑到凡尔赛去了。她还会定期写信到佛罗伦萨索要钱财，要来钱就拿去赌博或者花在购买衣服、买胭脂和假发上。她仍和过去一样浮躁多话。有传言说她和许多人发生了婚外情，包括卢维尼伯爵（Comte de Louvigny），卢森堡元帅护卫队中的一个副官，甚至还有他同队的卫兵。后来她又喜欢上了自己的马夫，他会用牙齿帮她咬开坚果，还被许可在玩牌的时候赢她的钱，甚至还服侍她沐浴。玛格丽特欠的债越来越多，于是又向科西莫索要两万克朗币，而科西莫过了好长时间才回复她这封十万火急的信，这让她十分恼怒。此外，她还在蒙马特尔引发过骚乱，当时刚上任的修道院长大胆指责了她的不良行径，她竟然一手挥舞着短柄斧头，一手拿着手枪，怒不可遏地追打年轻的院

长。事情发生后，她被批准离开蒙马特尔到小一点的圣芒代教区（Saint-Mande）去了，在那里她很快又找到了新恋人，这次是一个不守教规的教士。

不过，此时玛格丽特-路易丝已经47岁了，不再那么无法无天。她声称自己对于圣芒代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这里的修女们会在夜间爬墙跑出修道院，女院长会穿着男人的衣服，一连几个月不见人影。大主教为她的改革热忱所打动，任命玛格丽特-路易丝取代潜逃的异装癖院长，成了圣芒代的新院长。4年之后，她又从自己的妹妹那里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终于不需要再向科西莫伸手要钱了。玛格丽特-路易丝活到76岁才去世，她总是没完没了地谈论自己的过去，还说从来没有后悔离开托斯卡纳：“啊！只要我再也看不见大公的脸就行了。”

大公这一方则选择用炫富的方式来庆祝摆脱了这个惹人烦的妻子。公爵的宴会上摆满了异国的新鲜食物；他送给客人们最精美的礼物，似乎是想显示自己并不是像公爵夫人的支持者污蔑的那般小气，而且美第奇家族还是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富有——尽管这并不是事实。公爵宴会上的侍者都是穿着他们本国民族服装的外国仆人；他吃的阉鸡要先拿到他面前称重，不够20磅重的都要退回厨房；他吃的点心和果冻都要做成城堡和纹饰动物的样子；他喝的葡萄酒也要先放到雪里冰镇。大公的饭量越来越大，身材也越来越胖。他现在的脸色与其说是红润，不如说是红肿了。

在其他方面，大公倒是没有这么毫无节制。他对教义的理解越来越狭隘。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性行为是被严令禁止的。基督教妓女如果向犹太人卖淫的话，会受到鞭刑然后关进监狱，而嫖娼的犹太人则会被处以高额的罚款。基督教徒如果在犹太家庭或店铺做仆人，也会被处以重罚，交不起罚金的就要遭受酷刑或囚禁。科西莫为了遵从宗教法庭的意愿，也不再像美第奇家族之前那样向科学家和哲学家们

提供庇护。比萨大学的教师们都接到了大公本人的命令，要求他们不得“在公开或私人场合，以撰写文章或讲座的方式，让学生阅读或向他们教授任何宇宙原子学说创始人德谟克里特斯（Democritus）的哲学思想”。而且，为了防止学生们从其他大学接触到这样污染思维的学说，大公又下令禁止托斯卡纳学生到公国边境以外的大学学习。

下决心扫除一切道德败坏与异端邪说的科西莫还禁止了五朔节，因为这个节日起源于异教徒。坚持在街上吟唱五朔节歌曲的姑娘们要被处以鞭刑。科西莫还发公告禁止年轻男女晚间在门口或窗前嬉戏调笑，这样的行为被指责为“强奸、堕胎和杀婴行为的主要诱因”。与被正式规定自己不得婚娶的女子发生关系的男子要受到酷刑的惩罚；鸡奸者则要被砍头；还有一些针对财产实施的罪行也可能被处以砍头的刑罚。于是，行刑的场面变得越来越常见。事实上，短短一年时间里，佛罗伦萨就执行了超过两千次的公开处决。杀人者不但会被处以死刑，还要被分尸。有一次科西莫想用烧红的铁钳对一个杀人犯上刑，但是最终被治安官劝阻了，为的是“不要让这座城市感到厌恶”。

而让这座城市时刻厌恶的是科西莫的重税和其他财政勒索。几乎每个月都在加征新税，而旧税的税率也在不断升高。神职人员大都是免于交税的，正如他们如果犯法也经常能免于刑罚一样，除非是个别极端恶劣的罪行——比如有一个牧师欺骗会众中的年轻姑娘说，在他的帮助下，她们可以生下即将以人形降临人世的圣灵。虽然从神职人员这里收不上来多少钱，但是妓女们却是最有效的税收来源。妓女们必须花钱购买执照，否则就不能在晚间上街拉客，而且她们拉客时还必须举着点燃的火把，否则也要被罚款。妓女每年要缴纳6个克朗币的豁免费，否则就随时可能被社会风化办公室的官员随便找个借口逮捕，他们会以各种微小的违规行为为借口，比如没有按规定在头发或

帽子上佩戴黄色丝带之类。被逮捕的妓女要在胸前挂一块写着“卖淫”二字的牌子，由行刑官手持鞭子一路抽打着走到老市场。

科西莫还通过向商人出售食盐和面粉这类基本物资的专营权来敛财。卖出了专营权之后，他又会反过头来向小贩们出售特殊许可，让他们可以不受商人垄断的限制。对于那些想要钻规定空子的人，惩罚是极为严厉的：试图突破面粉垄断的面包师傅可能会被发配到船队上服役；从腌鱼的卤水中提取盐分的行为则可以被判死罪。税收和专营许可费偶尔会被用在一些有意义的地方，比如为大公的藏书室买书，或是为枢机主教莱奥波尔多的收藏购买微缩模型。但更多时候，这些钱被用来购买手套和香薰这类昂贵的礼物，或者向科西莫某位英国朋友赠送成箱的基安蒂酒（Chianti），或购买一些来源不明的所谓圣物，或者被宫廷里其他什么新的奢侈行为挥霍掉了。

这个宫廷中最奢侈的人，莫过于大公的弟弟弗朗切斯科·玛丽亚。他也是这个家族最近受封的枢机主教，一个开朗乐观、无忧无虑的大胖子。他的叔叔马蒂亚斯去世后，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就搬进了拉佩吉别墅，不过以他的品位而言，这座别墅还不够宏伟。他要建筑师安东尼奥·费里（Antonio Ferri）为他设计各种装修方案。方案提交后，他毫不意外地选中了最奢华昂贵的一个并且询问这个方案的造价。费里说的钱数远远超出了枢机主教可支配的金额。“如果我只给你三万克朗币，你仍然按照这个设计方案装修，建成的别墅能住多久呢？”费里估计了一下说可以保证在18年以上。枢机主教于是指示他说：“这样的话你就开工吧。18年就够了。我活不了那么长。”^[1]

装修工作很快就完成了。花园的布局足以与普拉托利诺的那些花园媲美。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在此定居，尽情地享受自己估算的余生。他纵容自己的程度简直是没有底线。他喜欢熏香，所以拉佩吉别墅的一个房间就被改造成了香料房。他喜欢年轻男子的陪伴，于是别

墅里总是住满了年轻男子，他让他们用他的钱赌博，还让他们穿着女人的衣服在餐桌边服侍。弗朗切斯科·玛丽亚还特别喜欢吃，他吃完一顿饭之后会喝催吐剂把食物吐出来，这样胃里就有地方再吃第二顿了。他还喜欢恶作剧，会不惜重金找人给他策划有意思的恶作剧并帮助他付诸实践。他还会在仆人身上花很多钱，比如把一包包的钱币从窗口扔到外面的草坪上，然后看仆人和附近的农民为了争抢钱币而打作一团。仆人会抓住各种机会揩他的油，不过他并不在乎，甚至还鼓励他们顺手牵羊的行为。每到复活节的时候，他就会把所有仆人叫到面前让他们忏悔，然后再赐予宽恕，宣布他们拿走的都是他自愿赠送给他们的礼物。正因如此，他总是钱不够用，于是就持续不断地寻求更多有圣俸和津贴的职位，争取到了就把要做的工作丢给秘书。

有这样一个懒散、奢侈的弟弟，科西莫自然担心他会给自己的继承人费尔迪南多王子带来不好的影响。王子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活泼有趣，聪明智慧，有艺术天分，而且独立自主，与他的法国母亲而不是忧郁的父亲有更多相似之处。费尔迪南多15岁就已经掌握了复杂的象牙雕刻技艺并创作出了不少任何收藏家都会趋之若鹜的作品。除此之外，他还是个有天赋的音乐家，大键琴弹得极好，唱歌的技巧和魅力也出类拔萃。后来他在普拉托利诺别墅的四层专门修建了一个剧场——和叔叔弗朗切斯科·玛丽亚不同，后者会让演员们在拉佩吉别墅的舞台上喋喋不休地吵闹，以防止自己在中途睡着——这里上演的几部精彩作品都有他的参与，其中就包括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Alessandro Scarlatti）的五部歌剧，费尔南迪多和他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费尔南迪多还和雅各布·佩里、贝尔纳多·帕斯奎尼（Bernardo Pasquini）以及亨德尔（Handel）有联系，这些人都被邀请到佛罗伦萨与费尔迪南多及其设计者们一起创作，这些作品在全欧洲的音乐圈都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费尔迪南多还是一位露天表演的策划大师。1689年忏悔节（Shrove Tuesday）当天在圣十字广场举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比武表演就是由他组织策划的。大批观众站在

广场四周的木质看台上，欣赏了欧洲和亚洲两支水平相当的骑士队伍之间精彩纷呈的比武表演。除了这些之外，费尔迪南多也是一位艺术品的资助者和收藏家。他对画作极有鉴赏力又不拘于一格，对瓷器的鉴赏力和对画作的一样好。他购买了拉斐尔和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的画作，还买下了帕尔米贾尼诺（Parmigianino）没有完成的《长颈圣母》（*Madonna dal Collo Lungo*）。当塞巴斯蒂亚诺·里奇（Sebastiano Ricci）和朱塞佩·玛丽亚·克雷斯皮（Giuseppe Maria Crespi）籍籍无名时，费尔迪南多就已经雇佣他们在皮蒂宫进行创作了。费尔迪南多还收集了一些佛罗伦萨教堂里本来不被看中的圣坛装饰画，然后花钱再为教堂画新的。这些被他收购的作品就包括拉斐尔的《巴达齐诺的圣母》（*Madonna del Baldacchino*）和巴尔托罗梅奥的《圣马可》（*San Marco*）。在1701年的圣路加日（St Luke's Day）上，费尔迪南多在圣母领报教堂的回廊上举办了佛罗伦萨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油画展，他不但为画展提供了几幅自己的藏品，还制作了展品目录。

然而，即便有这样的才华和成就，对于父亲来说，费尔迪南多还是让他感到失望。别的都不说，光是他对貌美男歌手的迷恋就让父亲无法容忍。先是他的家庭教师有一天撞见他与一个名叫彼得里洛（Petrillo）的男歌手拥抱接吻；后来又有一个自负的威尼斯阉人歌手（*castrato*）切基诺（Cecchino）设法成了费尔迪南多的家臣并且对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大公于是决定费尔迪南多必须尽早结婚才行。他需要一个妻子来消除切基诺和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玛丽亚的不良影响，而且美第奇家族也必须有继承人。更重要的是，大公希望婚姻责任能够唤醒费尔迪南多对政府事务的责任心，反正到目前为止他还没展露出任何这方面的才能。只可惜，大公为费尔迪南多选定的妻子并没能引起他的半点儿兴趣。

巴伐利亚公主维奥兰特·贝亚特丽切（Violante Beatrice）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年轻姑娘，胆小羞怯、没有主见。她第一眼看到丈夫就爱上他了，但是她的丈夫却丝毫不掩饰自己与她结婚只是因为父命难违。婚礼当天奇冷无比，两个在圣加洛港口站岗的士兵甚至被冻死了。16岁的新娘在从大教堂前往皮蒂宫的路上忍不住将脸埋在暖手笼里，可怜兮兮地说自己一辈子都没有觉得这么冷过。不过她不是一个会不停抱怨的人，因为她知道丈夫本来就对自己没有兴趣，而抱怨只会将没兴趣转化为厌恶。费尔迪南多基本上无视妻子，而且事后证明她没有生育能力。突然有一天他离开佛罗伦萨去了威尼斯，并且从一位贵族夫人那里染上了梅毒。之后，令专横的切基诺惊恐，更让隐忍的妻子伤心的是，费尔迪南多带回了一个年轻的情妇，这无异于在他们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1] 拉佩吉别墅只维持了18年，枢机主教去世后，别墅的第二层就因为承重墙不稳固，有倒塌砸进花园的危险而被拆除了。本来就不稳固的结构又在1895年的地震中受到严重破坏，剩下的部分估计也随时可能倒塌。

第二十四章 最后一个美第奇

“佛罗伦萨已经不是当初的佛罗伦萨了”

既然费尔迪南多不可能有继承人，大公科西莫只好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二儿子吉安·加斯托内的身上。之前他没怎么在意过这个次子，而吉安·加斯托内也不是一个渴望被关注的年轻人。他内向、孤僻、闷闷不乐，大多时间都是一个人独处，把令他哥哥和叔叔们沉迷的嘈杂、奢侈的圈子隔绝在自己门外。他更喜欢研究植物学和古文物，或者是学习包括英语在内的外语。他样貌端正、温柔体贴，不过没有什么朋友，同性或异性都没有。当然他也没有任何野心，甚至没有成为谁的丈夫的野心，他常常带着深深的恐惧思考将来家族会为他选择一位怎样的新娘。而当他看到新娘的那一刻，恐惧变成了惊骇，因为安娜·玛丽亚·弗兰切斯卡（Anna Maria Francesca）真算得上是一位奇丑无比的女人了。她是萨克斯-劳恩堡公爵（Duke of Saxe-Lauenberg）的女儿，也是帕兰帝内伯爵（Count Palantine）纽伯格的菲利普（Philip of Neuberg）的遗孀。她除了样貌丑陋，还很愚蠢，很爱吵架，“身材肥胖，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一丁点儿吸引力可言”。她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也不喜欢耗费体力的室外活动，而且似乎对在那个潮湿、丑陋的城堡里了却余生感到心满意足。1697年他们在选帝侯城堡的教堂里举行婚礼之后，吉安·加斯托内和妻子一起回到了位于布拉格附近赖希施泰特村（village of Reichstadt）那令人沮丧的城堡。无论是妻子还是城堡都让吉安·加斯托内感到恶心。他的同性恋倾向比其兄长的还要强烈，所以他在这里就靠和一个狡猾、俊俏的马夫朱利亚诺·达米（Giuliano Dami）偷情来寻求安慰，虽然没太大作用，但至少能让他暂时逃出只有茅舍和莎草床的绝境，这里就像囚禁他的监狱一样。

第二年春天，吉安·加斯托内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微服化名地去了趟巴黎，这让他的父亲大为震怒，斥责说这样的出行有失美第奇家族的身份。从巴黎回来后不久，他又去了布拉格，并且只带了他的马夫情人。为了忘掉在赖希施泰特村的生活给他带来的苦闷，吉安·加斯托内沉迷于赌博、性爱和酒精，穷困的学生和站街的男妓都是他做爱的对象，他还经常在简陋的小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在这里“他自甘堕落，开始抽烟，就着面包嚼莼拨和小茴香籽，这样就能有德国人一样的酒量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重新回到赖希施泰特村的妻子身边，可是这里的生活让他更加绝望。他会一连几个小时独自在房间里，凝望窗外衰败阴沉的景象，忍不住泪流满面。他甚至不愿意去回复信函或签署秘书为他起草好的文件。偶尔，当他不是这样了无生趣的时候，他要么去喝酒，要么和自己的意大利仆从赌钱——他输给别人好多钱，以至于不得不把妻子的珠宝拿去当掉，而当铺给他的价格往往都不及珠宝价值的一半。吉安·加斯托内恳求妻子和他一起去佛罗伦萨，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一个不这么压抑的环境中继续痛苦地生活。可是妻子每天把时间花在“在马厩中与人聊天”上，坚决不肯离开这个不知道她为什么如此留恋的赖希施泰特村。她的忏悔师警告她，如果去了佛罗伦萨，她一定很快就会被谋杀，这是所有美第奇家族的妻子或早或晚都难以逃避的命运。

在佛罗伦萨，科西莫在担忧和失望中一天天衰老。常年以来的暴饮暴食和缺乏运动已经彻底损害了他的健康，医生建议他采取“严格的毕达哥拉斯养生法”（Pythagorean regimen）来应对“胆汁过多”的病症，也就是只吃水果、蔬菜并且参与骑马和打猎等强度大的运动。他遵循了这些建议，不过身体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提升他的精神。他因为始终无法给自己宠爱的女儿安娜·玛丽亚（Anna Maria）寻找到一个满意的丈夫而格外沮丧。安娜·玛丽亚身材高挑，一头黑发，说话声音很粗，笑起来很大声，甚至有些粗鲁笨拙。西班牙、葡萄牙，还有萨瓦公爵和法国王太子（the Dauphin）已经先后拒绝了他的

提亲。最后帕兰帝内选帝侯威廉（Elector Palatine Willian）同意娶她为妻。他们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举行了婚礼，之后不久选帝侯就把性病传染给了自己的妻子，这也成了她后来流产的主要原因，她早年的生活也因此变得不幸。

科西莫知道孩子们已经不可能为美第奇家族带来继承人了，绝望之下他只好将目标转向自己的弟弟弗朗切斯科·玛丽亚。枢机主教被这个请求吓得不轻。他压根儿不想娶妻生子，现在这个想法没有任何改变。更何况结婚意味着要和他在拉佩吉别墅享受的那种放浪生活告别，还意味着放弃枢机主教的职位。他现在已经48岁了，不想再有什么改变，而且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如从前。不过最终他还是拗不过哥哥。为他安排的妻子是瓜斯塔拉和萨比奥内塔公爵（Duke of Guastalla and Sabbioneta）的女儿埃莱奥诺拉公主（Princess Eleonora）。她和自己未来的丈夫一样抗拒这门亲事。人们提醒她这门婚事对她的家族而言是莫大的荣耀，但是比起家族荣耀，她更在意自己要和一个脸上有疤、又丑又胖、患有痛风的老男人同床共枕，更何况谁都知道他其实更喜欢漂亮的男孩儿。事实上，婚后的几周，埃莱奥诺拉怎么也不肯和丈夫圆房；不过最终还是在丈夫的温和与耐心下妥协了。行房的经历让埃莱奥诺拉感到厌恶，也让弗朗切斯科·玛丽亚觉得痛苦而精疲力竭。事实上，这一切对他而言确实已经无法承受了，婚后不到两年，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就去世了。

他的侄子费尔迪南多与维奥兰特·贝亚特丽切公主的婚姻也是同样的不幸，而且他余下的时间也不比自己的叔叔长多少。费尔迪南多在威尼斯感染的性病一直没有彻底康复。在弗朗切斯科·玛丽亚结婚时，费尔迪南多就已经失去了记忆，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一种恍惚麻木的状态，时不时还会突发癫痫。他最终在1713年10月底去世。之后不到三年，他的妹夫帕兰帝内选帝侯也去世了，而他的遗孀安娜·玛丽亚则打算搬回佛罗伦萨。

此时，她的哥哥吉安·加斯托内已经回到了佛罗伦萨。他在1708年的时候丢下妻子独自回到了佛罗伦萨，当时他37岁。从那以后他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除了朱利亚诺·达米之外几乎不和任何人来往。他经常醉得连马都骑不稳，差不多每个晚上都是在酒精带来的晕眩中度过。吉安·加斯托内还患有哮喘，他甚至不愿拆开寄来的信件，这样也就不需要回信了。一个到佛罗伦萨访问的法国人记录道：

“有人担心吉安·加斯托内会比自己的父亲先去世，这种担心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大公体质强健而且非常在意健康，相反他的次子却似乎一心想要加速生命的终结。”

科西莫早就不再关心吉安·加斯托内这个儿子了，他一心只想在托斯卡纳继承权的规定下如何保护女儿安娜·玛丽亚的利益。起初委员会劝他颁布法令让佛罗伦萨的主权像共和国时期一样回归到人民手中，他不愿意接受。不过后来他决定，如果安娜·玛丽亚能够比哥哥长寿，她应当继承爵位成为女大公，之后才可以恢复共和国体制。这样的决定引发了后来持续多年的外交争执：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Charles VI）、埃斯特家族（House of Este），还有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Philip V）和伊丽莎白·法尔内塞（Elizabeth Farnese）全都提出有权继承公国。这个棘手的问题令科西莫忧心忡忡，于是他只好一心埋首于宗教信仰之中来寻求解脱。

几年前他曾经进行了一次罗马朝圣之旅，当时他实现了一个毕生的心愿，就是被任命为拉特兰（Lateran）的圣约翰教士，这样他就有权亲手摸一摸圣荣（*Volto Santo*），也就是基督在前往加略山

（Calvary）的路上曾经用过的手帕。据说自从亲手捧起了这块神圣的布料之后，科西莫就变得比以往更加虔诚了。他还把价值二十万克朗币的油画《圣母领报》送给了教皇。作为回礼，他将一盒子神圣遗骸带回了佛罗伦萨，没过多久他又给这份收藏增添了一段圣弗朗西斯·哈维尔（St Francis Xavier）的小肠。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来访时，科

西莫才会带着至高的崇敬向他们展示这些圣物，还会谦逊地向圣物跪拜。一个英国游客确信：

科西莫在自己的房间里安装了一个机器，上面装了日历中圣人们的银质肖像。这个机器会在每个圣人的纪念日展示出这个圣人的肖像，科西莫则会在圣人肖像之前行祷告仪式……他每天至少要去五六个教堂。

科西莫用无限的热忱来规劝别人改信天主教。克拉科夫（Cracow）的主教把三个顽皮捣蛋的哥萨克（Cossack）男孩儿领到他的面前，科西莫会连续几个小时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基督教教义。科西莫还会为改信天主教的外国新教徒提供丰厚的年金。另外，科西莫把同样的执着投入到处理佛罗伦萨现存的他认为会引发人们淫秽想法的艺术作品上。本来展示于大教堂内的巴乔·班迪内利的亚当与夏娃大理石雕塑就被科西莫搬走了；又因为有教士对他说乌菲齐里展示的裸体雕塑都太淫秽，科西莫就打算把它们全都藏到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去。科西莫自己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日子，他每天吃的都是最简单的饭菜，而且几乎都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进餐。他除了白水什么都不喝，每天早睡早起，甚至不点火炉。他曾经的缺点大部分都随着年岁的增长改掉了，只是固执和偏见还和以前一模一样。尽管如此，他仍然得不到人们的爱戴。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人们对他的态度更多是谨慎和尊重，再没有暴徒集结在他的窗口下嚷嚷着乞求食物或是用石灰在宫墙上涂写侮辱性的标语。可是当科西莫偶尔乘坐两匹马拉的马车离开宫殿，在举着长戟的瑞士保镖的护卫和仆从的前呼后拥下缓缓走在街上时，人们虽会行礼，但绝不会欢呼。直到1723年10月31日他去世，也没有什么人为此感到悲伤。

佛罗伦萨有其他更值得悲伤的理由。这个城市此时已经变得愁云遍布、贫穷破败。游客们反映说城里见到最多的是乞丐、流浪汉和修道士。他们成群结队、垂头丧气地在街上游走，两边的建筑也陈旧晦暗，窗户上糊的油纸也都是撕坏的。上一代人哀叹这个城市竟沦落到

如此的境地，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主教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就写道：“佛罗伦萨已经不是当初的佛罗伦萨了，这里的人口还不足五万……一个人要是在托斯卡纳转转就会发现人口下降得多么严重，这片曾经充满生机的土地已经变得一贫如洗。”之后的游客也都是类似的失望感受，他们中有人这么说：

这个国家的衰败是显而易见的，城里大片的空地无人利用，已有的房子也都破败失修、不适宜居住，所以人口并不多；而现有人口也并没有什么用，因为其中大部分都是神职人员……我曾经在一次游行队伍中看到了超过四千名修士和教士。

科西莫向佛罗伦萨人征的税已经够重了，甚至他在将死之时还批准再加征一项新的个人所得税。即便如此，佛罗伦萨的财政也到了破产的边缘。同样捉襟见肘的还有城市中的贵族们，回想他们前辈的富足和好客，而现在被邀请去打打牌或者开个茶话会（*conversazione*）就算最令人兴奋的活动了，主人能拿来待客的无非就是柠檬水、咖啡和茶，偶尔能有点冰淇淋。贵族们现在吃的也是从附近小饭馆里买来的普通饭菜，而且他们连饭钱都快凑不出来了，更别说供养那些怀揣着对美好年景的遐想而在门口游荡的仆人们了。

52岁的吉安·加斯托内接替了他父亲的位置之后，人们就更不指望能有什么起色了，根本没人相信他能克服自己的懒散、酗酒和放荡淫乱。一开始他还挺像回事，展现出了对人民福利的真诚关切，并且鄙视大多数亲戚奢侈炫耀的行为。他把税赋降到了人们可以忍受的程度，并且降低了谷物的价格；他终止了公开处决犯人的习俗，并且给城市里的乞丐们设立了像样的济贫院；他把政府从科西莫三世时期被教会严格控制的状态下解放了出来；他还恢复了科学家和学者们近年来被剥夺的自由；他也取消了针对犹太人的法令。可是，不久之后，他懒散的本质重新占据了上风，大部分时间里，他甚至都不肯离开自己的床，任由圆滑狡诈的朱利亚诺·达米替他将不想见的客人拦在门

外，其实就是打发那些工匠和古董商们，他们指望着把其他有鉴赏力的收藏家根本不会要的作品推销给懒散随意的大公。

朱利亚诺·达米还会为吉安·加斯托内招募一批乱七八糟的年轻男女来供他消遣，其中还是以粗鲁吵闹的年轻男孩儿居多，这些人被统称为“鲁斯潘蒂”（*Ruspanti*），因为他们都是以领取鲁斯皮币（*ruspi*）为酬劳的。这些鲁斯潘蒂多是来自佛罗伦萨贫穷人家的漂亮年轻人，他们娱乐大公的方式就是在他的房间里玩耍吵闹，甚至对骂一些污言秽语，大公心血来潮时，也许还会加入他们的恶作剧中。有些时候，大公会摆上一桌丰盛的晚宴，让鲁斯潘蒂们假装成他的大臣或是其他一些佛罗伦萨最重要的领袖市民们，然后大公会为这些假扮的名流们致祝酒词。宴会结束后，他则劝说这些年轻人互相做爱供他观赏。鲁斯潘蒂的数量每个月都在增长，到1731年年底，已经达到了近四百人之多。随着人数的增长，鲁斯潘蒂变得越来越暴力和难以管控，他们不但在波波利花园中发动暴乱，被拖欠薪酬时还会去抢劫附近的饭馆和市场里的货摊。

吉安·加斯托内的嫂子维奥兰特在她的丈夫费尔迪南多去世后选择继续留在佛罗伦萨生活。她试图为吉安·加斯托内寻找一些不那么堕落的娱乐来取代鲁斯潘蒂，于是她经常安排一些宴会并邀请了最有意思、最有学问的人来为大公助兴。然而吉安·加斯托内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吃饭的时候不是咒骂就是打嗝，有时还会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粗俗评论。最让人难堪的一次，他不但在饭桌上呕吐，还拽下了自己的假发擦嘴。

其实，很多时候大公都是在床上用餐的。午餐是在下午5点，晚餐是在凌晨2点。午餐之前，他会同意接待几个重要的访问者，但是依然不会离开他的床，只是靠着枕头坐起来，四周还要摆满新摘的玫瑰，主要是为了掩盖房间里霉臭的气味。在这些时候，大公只是穿着沾满

鼻烟的衬衫，戴着长领带和睡帽。他几乎不怎么离开房间，偶尔出现在众人眼前也只是为了打破他已经去世的传言。他倒是出席了1729年的施洗者圣约翰日庆祝活动，不过在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醉了，这样他就不会觉得冗长的仪式那么难熬了。他懒洋洋地坐在马车上，时不时从车窗探头出去呕吐。到了普拉托门，他摇摇晃晃地去看赛马，整个过程中还不停地辱骂自己的男仆和身边的女士们；最后他干脆睡着了，被用轿子抬回了皮蒂宫。从那之后他几乎再没有离开过皮蒂宫，除了一次坐着轿子去声名狼藉的圣斯佩兰迪诺（San Sperandino）公共浴室，以及另外一次戴着草帽、穿着睡衣坐在轿子里前往波焦因佩里亚莱别墅。1737年6月，克拉翁王子（Prince de Craon）代表洛林公爵弗朗西斯（Duke of Lorraine Francis）——也是玛丽亚·特雷莎（Maria Theresa）的丈夫——拜访吉安·加斯托内，发现他已经是个将死之人了。欧洲的其他大国自行选定洛林公爵作为大公的继承人，甚至都没费心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王子向洛林公爵汇报说：“大公的情况很可怜，他下不了床，胡子已经长了好长；床单很脏，他的视力非常微弱，他说话的声音很低而且模糊不清。总体来说，他剩下的时间超不过一个月。”王子说的一点儿也没错。吉安·加斯托内在1737年7月9日去世了，享年65岁。

新政权控制的六千人大军此时已经进入了佛罗伦萨的边境；政府中所有重要的位置也都被指派给了外国人。托斯卡纳成了奥地利帝国的一个属国，而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个代表，帕兰帝内选帝侯夫人安娜·玛丽亚则被许可一直生活在皮蒂宫中她的房间里。

这位高挑、尊贵，甚至有些粗鲁、高傲的老妇人一直强烈反对自己弟弟的行为，虽然她费尽心机的劝阻总是以被辱骂驱逐结束，但她最终还是在弟弟临死前说服他接受教会的仪式。安娜·玛丽亚本人也是极为虔诚的，她很少离开宫殿，偶尔坐着“有侍卫随行的八匹马拉着的”马车驶出宫殿的庭院，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确认她要么是去做

弥撒，要么是去向她最爱的慈善事业捐款，要么是去视察圣洛伦佐教堂里家族陵墓工程的进展。之前这项工程一度停摆，现在也是由她本人承担费用才得以继续。她偶尔有几个访客，据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观察，她房间里的家具都是银质的，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温馨舒适，她在这里接待客人时会不苟言笑地站在一个黑色华盖下面。安娜·玛丽亚一直很清楚自己是这世上最后一个美第奇的事实。

佛罗伦萨人也知道这个事实。人们为自己的国家再一次被外国势力占领而感到愤恨与羞愧，占领者的大炮被放置在这个城市的堡垒中，炮口却对准了人民。此时回想美第奇曾经的荣耀让他们感觉既骄傲又感伤。当公共建筑上象征美第奇家族的红球被取下，由装饰着鸢尾花（fleurs-de-lis）、雄鹰和十字架的洛林家族盾徽取代时，佛罗伦萨人感到深深的遗憾。当他们听说国父科西莫的生日、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当选纪念日、科西莫一世受封公爵纪念日等所有与美第奇家族有关的公共庆祝节日都要被废止时，人们更是义愤填膺。法国学者查理·德·布罗斯（Charles de Brosses）在这一时期探访了托斯卡纳地区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佛罗伦萨人愿意付出自己全部家当的三分之二来换取美第奇家族的回归；然后付出剩下的三分之一赶走洛林家族……他们憎恨洛林家族。”1743年2月，75岁的安娜·玛丽亚去世了，整个佛罗伦萨都沉浸在失去她的悲伤中。英国特使的助手汇报说：

普通人都认定她是被飓风带走了；今天早上刮起了一场极为强烈的飓风，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而现在却又晴空万里了——这就是证明。除此之外，约翰·加斯东（John Gaston）去世时也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人们坚信自己就是目击者，没有人能打破这种信念……周一早上，人们找了个借口请来了她的忏悔师，因为安娜·玛丽亚坚持不同意叫他来……忏悔师被要求告诉安娜·玛丽亚她很快就要死了，但是她还不太高兴地反问：“谁告诉你的？”忏悔师则说：“是你的医生。”

“好吧，那我们就把该做的都做了吧，要抓紧。”就这样他们给她吃了圣餐……她的意识到最后都是清醒的，但是去世前最后大约一个半小时里，她一句话也没说过……从周四起她的遗体就被停放在宫殿的大厅里供人们瞻仰，今天晚上将被正式下葬……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也要去和她的祖先们团聚了。

然而，圣洛伦佐教堂的陵墓并不是人们真正记住她的原因。在她的遗嘱中，安娜·玛丽亚把美第奇家族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新任大公和他的继承人，包括所有的宫殿和别墅，所有的画作和雕塑，所有的珠宝和家具，还有书籍和手稿——美第奇家族世代收藏的所有艺术品。她做出如此决定只有一个条件：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能离开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全部财富要永远留在这里供全世界人民欣赏。^[1]

^[1] 最后是由一直不受爱戴的洛林家族和大公弗朗切斯科精力充沛的儿子彼得罗·莱奥波尔多（Pietro Leopoldo）的部长们来重振这个资源枯竭、饱受压迫的国家的。混乱的立法和过度开发的乡村是晚期的美第奇家族统治留下的社会和经济困难。但是他们留下的光辉灿烂的艺术和文化遗产——佛罗伦萨巴洛克艺术繁荣而精妙的工艺在科西莫三世的雕塑家乔瓦尼·巴蒂斯塔·福吉尼（Giovanni Battista Foggini）的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却是近年来才逐渐获得承认。1974年在底特律和皮蒂宫举办的名为“美第奇家族的暮光”的展览——当然贝尔纳多·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对此是毫不感兴趣的——是第一次举办此类型的展览。

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主要画像、半身像和雕塑

主题	类型	艺术家	现存地点
乔瓦尼·迪·比奇	去世后创作的画像	布龙齐诺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乔瓦尼·迪·比奇	画像	扎诺比·斯特罗齐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国父”科西莫	去世后创作的画像	彭托尔莫	乌菲齐宫
“国父”科西莫	画像(布鲁内莱斯基向其展示圣洛伦佐教堂模型)	瓦萨里	佛罗伦萨旧宫
洛伦佐·迪·乔瓦尼	去世后创作的画像	布龙齐诺	乌菲齐宫
皮耶罗·迪·科西莫	半身像	米诺·达菲耶索莱	巴杰罗宫
乔瓦尼·迪·科西莫	半身像	米诺·达菲耶索莱	巴杰罗宫
伟大的洛伦佐	去世后创作的画像	瓦萨里	乌菲齐宫
伟大的洛伦佐	壁画(与萨塞蒂家族成员一起)	基兰达约	圣三一教堂的萨塞蒂家族堂
伟大的洛伦佐	壁画(坐在枢机主教乔瓦尼前面)	瓦萨里	佛罗伦萨旧宫
伟大的洛伦佐	画像	佛罗伦萨画派, 15世纪初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伟大的洛伦佐	死者面部模型	/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皮耶罗·弗朗切斯科·迪·洛伦佐	画像	瓦萨里	佛罗伦萨旧宫

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主要画像、半身像和雕塑-续表1

主题	类型	艺术家	现存地点
皮耶罗·迪·洛伦佐	画像	布龙齐诺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皮耶罗·迪·洛伦佐	半身像	韦罗基奥	巴杰罗宫
朱利亚诺·迪·洛伦佐	壁画(儿时与家庭教师波利齐亚诺在一起)	基兰达约	圣三一教堂的萨塞蒂家族堂
(?)孔泰西纳	半身像	多纳泰洛	巴杰罗宫
(?)菲奥雷塔·戈里尼	画像	波提切利	皮蒂宫
教皇莱奥十世	画像(与枢机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和路易吉·德罗西在一起)	拉斐尔	乌菲齐宫
教皇莱奥十世	壁画(途经佛罗伦萨)	瓦萨里	佛罗伦萨旧宫
教皇莱奥十世	壁画(任命30个枢机主教)	瓦萨里	佛罗伦萨旧宫
教皇克莱门特七世	画像	布龙齐诺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公爵亚历山德罗	画像	瓦萨里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伊波利托	画像	提香	皮蒂宫
凯瑟琳	画像(21岁时)	/	波焦阿卡伊阿诺
凯瑟琳	画像(40岁时)	波布斯	乌菲齐宫
乔瓦尼·迪皮耶尔弗兰切斯科	画像	瓦萨里	佛罗伦萨旧宫
卡泰丽娜·斯福尔扎	画像	瓦萨里	佛罗伦萨旧宫
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	雕像	班迪内利	圣洛伦佐教堂广场

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主要画像、半身像和雕塑-续表2

主题	类型	艺术家	现存地点
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	画像	提香	乌菲齐宫
玛丽亚·萨尔维亚蒂	画像	瓦萨里	佛罗伦萨旧宫
科西莫一世	画像(12岁时)	通常被认为由里多尔福创作 基兰达约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科西莫一世	画像(青年时期)	彭托尔莫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科西莫一世	画像(当选)	弗兰切斯科和雅各布·利戈齐兄弟	佛罗伦萨旧宫
科西莫一世	画像	瓦萨里	乌菲齐宫
科西莫一世	画像(穿着铠甲)	布龙齐诺	乌菲齐宫
科西莫一世	骑马雕像	詹波隆那	佛罗伦萨旧宫
科西莫	半身像	切利尼	巴杰罗宫
科西莫一世	画像(戴着公国的王冠,穿着公国的王袍)	布龙齐诺	乌菲齐宫
埃莱奥诺拉·德·托莱多	画像	布龙齐诺	佛罗伦萨旧宫,弗朗切斯科一世的实验室中
埃莱奥诺拉·德·托莱多	画像(与乔瓦尼在一起)	布龙齐诺	乌菲齐宫
伊莎贝拉	画像	布龙齐诺	乌菲齐宫
加尔恰	画像	布龙齐诺	乌菲齐宫
枢机主教乔瓦尼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波焦阿卡伊阿诺
彼得罗	画像	布龙齐诺	乌菲齐宫
弗朗切斯科一世	画像	委罗内塞	皮蒂宫
奥地利的约安娜	画像(与菲利波在一起)	/	乌菲齐宫

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主要画像、半身像和雕塑-续表3

主题	类型	艺术家	现存地点
比安卡·卡佩洛	画像	布龙齐诺	皮蒂宫
埃莱奥诺拉(弗朗切斯科一世之女)	画像	普尔佐尼	皮蒂宫
费尔迪南多一世	画像	亚历山德罗·阿洛里	皮蒂宫
洛林家族的克里斯廷	画像	希皮奥内·普尔索内·迪加埃塔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洛林家族的克里斯廷	画像(55岁时)	苏斯泰尔曼斯	科尔西尼宫画廊
克劳迪娅(费尔迪南多一世之女)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乌菲齐宫
科西莫二世	画像(12岁时)	苏斯泰尔曼斯	波焦阿卡伊阿诺
科西莫二世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科尔西尼宫画廊
科西莫二世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乌菲齐宫
玛丽亚·马达莱娜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科尔西尼宫画廊
玛格丽塔(科西莫二世之女)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波焦阿卡伊阿诺
弗朗切斯科(科西莫二世之子)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波焦阿卡伊阿诺
安娜(科西莫二世之女)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皮蒂宫
费尔迪南多二世	画像(14岁时)	苏斯泰尔曼斯	皮蒂宫
费尔迪南多二世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波焦阿卡伊阿诺
马蒂亚斯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皮蒂宫
枢机主教莱奥波尔多	画像	/	乌菲齐宫
枢机主教莱奥波尔多	半身像	/	乌菲齐宫

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主要画像、半身像和雕塑-续表4

主题	类型	艺术家	现存地点
维多利亚·德拉罗韦雷	画像(青年时期)	卡洛·多尔齐	皮蒂宫
维多利亚·德拉罗韦雷	画像(中年时期)	卡洛·多尔齐	皮蒂宫
科西莫三世	画像(作为拉特兰的教规)	/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玛格丽特-路易丝	画像	/	乌菲齐宫
安娜·玛丽亚·路易莎	画像(与帕兰帝内选帝侯在一起)	G. F. 杜文	皮蒂宫
安娜·玛丽亚·路易莎	画像(与枪支和狗)	G. F. 杜文	皮蒂宫
维奥兰特·贝亚特丽切	画像	/	乌菲齐宫
吉安·加斯托内	画像	/	乌菲齐宫
吉安·加斯托内	半身像	/	乌菲齐宫

参考文献

The Last Medici, Methuen, 1932; rev. edn, 1958;
reprinted, 1973.

Tuscan Villas, Thames & Hudson, 1973.

Ady, Cecilia M., *Lorenzo dei Medici and Renaissance Italy*,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1955.

Allodoli, Ettore, *I Medici*, Florence, 1928.

Andriani, Giovanbattista, *Istoria de' suoi tempi*, 1583.

Antal, Friedrich *Florentine Painting and its Social Background*,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8.

Anzilotti, *La costituzione interna dello Stato Fiorentino sotto il Duca Cosimo I de' Medici*, 1910.

Armstrong, Antonio Edward *Lorenzo de' Medici and Florenc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1911.

Baccini, Giuseppe, *see* Orlando

Barfucci, Enrico *Lorenzo de' Medici e la società artistica del suo tempo*, Florence, 1945.

Baron, Hans *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 rev. ed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Baroni, Costantino *Bramante*, Bergamo, 1944.

Bayley, C.C., *Wa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Toronto, 1961.

Becker, Marvin B., 'The Republican City State in Florence' in *Speculum* XXXV, January 1960, pp. 39-50.

Biagi, Guido, *The Private Life of the Renaissance Florentines*, Florence, 1896.

Booth, Cecily, *Cosimo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1.

Borsook, Eve, *The Companion Guide to Florence*, Collins, 1966.

The Mural Painters of Tuscany, 1960.

Bossi *see* Roscoe

Bow■ Maurice. 'Songs of Dance and Carnival' in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 ed. Jacob.

Bracciolini, Poggio, *Istoria dall' origine di Firenze al 1454*, Florence, 1598.

Brandi, Karl, *The Emperor Charles V*, trans. C. V. Wedgwood, Jonathan Cape, 1965.

Brion, Marcel, *The Medici: A Great Florentine Family*, trans. Gilles and Heather Cremonesi, Elek, 1969.

Brown, Alison M., 'The Humanist Portrait of Cosimo de' Medici Pater Patriae' i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XIV, 1961.

Brucker, Gene A., 'The Ciompi Revolution' in *Florentine Studies*, ed. N. Rubinstein.

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 1343-1378, Princeton, 1962.

'The Medici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n *Speculum*, XXXII, January 1957, pp. 1-26.

Renaissance Florence, Wiley, 1969.

Burckhardt, Jacob,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trans. S.G.C. Middlemore, 1890, new edn, 2 vols., introduction by Benjamin Nelson and Charles Trinkaus, Harper Torchbooks, 1958.

Burke, Peter, *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 Batsford, 1972.

Burnet, Gilbert, *Some letters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what seemed most remarkable in travelling through*

Switzerland, Italy, etc., 1689.

Caggese, Romolo, *Firenze dall decadenza di Roma al Risorgimento d' Italia*, Florence, 1912-13.

Camugliano, G. Niccolini di, *The Chronicles of a Florentine Family 1200-1400*, 1933.

Cantagalli, Roberto, *La Guerra di Siena*, Siena, 1962.

Capponi, G.A. ,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Firenze*, 2 vols. , Florence, 1875.

Carden, R.W. , *The Life of Giorgio Vasari*, 1910.

Catalogue of the Medici Archives, Christie, Manson & Woods, 1919.

Cavalcanti, Giovanni, *Istorie Fiorentine*, 2 vols. , Florence, 1838-9.

Cecchi, Emilio, *Lorenzo il Magnifico*, Rome, 1949.

Cellini, Benvenuto, *Autobiography*, trans. George Bull, Penguin Books, 1956.

Chabod, Federico, *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 trans. David Moore, Bowes & Bowes, 1958.

Chamberlin, E.R. , *Everyday Life in Renaissance Times*, Batsford, 1965.

Chastel, André, *Art et Humanisme à Florence au temps de Laurent le Magnifique*, Paris, 1961.

‘Vasari et la légende Médicéene: L’ école du jardin de Saint Marc’ in *Studi Vasariani*, Florence, 1952.

Cochrane, Eric, *Florence in the Forgotten Centuries 1527-1800*,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3.

The Late Italian Renaissance, Harper & Row, 1970.

‘The Florentine Background of Galileo’ s Work’ in *Galileo: Man of Science*, ed. Ernan McMullin, Basic Books, 1967.

Communes, Philip de, *The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munes, Lord of Argenton*, ed. Andrew R. Scobie, 2 vols., 1906.

Conte, Giuseppe, *Firenze dai Medici ai Lorena*, Florence, 1907.

Cronin, Vincent, *The Florentine Renaissance*, Collins, 1967.

The Flowering of the Renaissance, Collins, 1969.

Cruttwell, M. , *Verrocchio*, 1904.

Dami, Brunetto, *Giovanni Bicci dei Medici*, Florence, 1899.

Dati, Gregorio, *Istoria di Firenze dal 1380 al 1450*, Florence, 1735.

Deiss, Joseph Jay, *Captains of Fortune: Profiles of Six Italian Condottieri*, Gollancz, 1966.

Delaborde, H.F., *L'Expédition de Charles VIII en Italie*, Paris, 1888.

Dini-Traversari, A., *Ambrogio Traversari e i suoi tempi*, Florence, 1912.

Doren, Alfred, *Le arti florentine*, trans. Klein, 2 vols., Florence, 1940.

Dorini, Umberto, *I Medici e i loro tempi*, Florence, 1947.

Ehrenberg, Richard, *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trans. H.M. Lucas, 1928.

Einem, Herbert von, *Michelangelo*, trans. Ronald Taylor, Methuen, 1973.

Ewart, K.D., *Cosimo de' Medici*, 1889.

Ferrara, Mario, (ed.), *Savonarola: Prediche e scritti*, Florence, 1952.

Ferrai, Luigi Alberto, *Cosimo I de' Medici, Duca di Firenze*, 1882.

Fischel, Oscar, *Raphael*, trans. Bernard Rackham, 2 vols., Kegan Paul, 1948.

Gadol, Joan, *Leon Batista Alberti: Universal Man of the Early Renaiss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Gage, John, *Life in Italy at the time of the Medici*, Batsford, 1968.

Galluzzi, Riguccio, *Istoria del Granducato di Toscana sotto il governo della Casa Medici*, 7 vols., Florence, 1820–1.

Gaye, G., *Carteggio inedito d' artisti dei secoli XIV, XV, XVI*, Florence, 1839–40.

Gilbert, Felix, 'Florentine political assumptions in the period of Savonarola and Soderini' i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X, 1957, pp. 187ff.

'Guicciardini, Machiavelli and Valori on Lorenzo Magnifico' in *Renaissance News*, IX, 1958, pp. 107–14.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Gill, Joseph,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Goldthwaite, Richard A., *Private Wealth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Gombrich, E.H., 'The Early Medici as Patrons of Art' in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 ed. Jacob.

Grayson, Cecil, 'Lorenzo, Machiavelli and the Italian Language' in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 ed. Jacob.

Guarini, Elina Fasano, *Lo stato mediceo di Cosimo I*, 1973.

Guicciardini, Francesco, *Carteggi*, ed. P.G. Ricci, Rome, 1954-62.

Storia d' Italia, ed. Costantino Panigada, 5 vols., Bari, 1929; English edition, ed. Sidney Alexander, Collier-Macmillan, 1969.

Gutkind, Curt S., *Cosimo de' Medici: Pater Patriae, 1389-1464*,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38.

Hale, J.R., 'The End of Florentine Liberty: The Fortezza da Basso' in *Florentine Studies*, ed. Rubinstein.

Florence and the Medici, Thames and Hudson, 1977.

Machiavelli and Renaissance Italy,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1961.

Renaissance Europe 1480-1520, Fontana, 1971.

'War and Public Opinion in Renaissance Italy' in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 ed. Jacob,

Hay, Denys, (ed.) ,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its Historical Set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The Renaissance Debate,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5.

Higgins, John R. , *A Historical Guide to Florence*, Robert Hale, 1973.

Holmes, George, *The Florentine Enlightenment, 1400-50*,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9.

‘How the Medici became the Pope’ s Bankers’ in *Florentine Studies*, ed. Rubinstein,

Hook, Judith, *The Sack of Rome, 1527*, Macmillan, 1973.

Horne, Herbert, *Alessandro Filipepi Commonly Called Sandro Botticelli, Painter of Florence*, 1908.

Horsburgh, E.L.S. , Girolamo Savonarola, 1901.

Hyett, Francis A. , *Florence: Her History and Art to the Fall of the Republic*, 1903.

Imbert, G. , *La vita Fiorentina nel Seicento*, Florence, 1906.

Jacob, E.F. , (ed.) ,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 Faber, 1960.

Janson, H.W. , *The Sculpture of Donatello*, 2 vols.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Joannides, P., 'Michelangelo' s Medici Chapel: Some new Suggestions' , *Burlington Magazine*, CXIV, pp. 542-6.

Krautheimer, Richard, *Lorenzo Ghiberti*, Princcton University Press, 2 vols., 1970.

Landucci, Luca, *A Florentine Diary from 1450-1516*, trans. Alice de Rosen Jervis, 1927.

Laven, Peter, *Renaissance Italy, 1464-1534*, Batsford, 1966.

Lettere di Lorenzo il Magnifico al Sommo Pontefice Innocenzo VIII, Florence, 1830.

Lorenzino de' Medici, *Opere*, ed. Simioni, 2 vols, Bari, 1913.

Scritti e documenti, Milan, 1862.

Lucas-Dubreton, J., *Daily Life in Florence in the Time of the Medici*, trans. A. Lytton Sells, Allen & Unwin, 1960.

Lungo, Isodoro del, *I Medici Granduchi*, 1896.

Lyall, Archibald, *Companion Guide to Tuscany*, Collins, 1973.

McCarthy, Mary, *The Stones of Florence*, Heinemann, 1959.

Machiavelli, Niccolò, *Istorie Fiorentine, Opere*, ed. Antonio Panella, vol. 1, Milan, 1938.

Macinghi negli Strozzi, Alessandra, *Lettere di una gentildonna fiorentina del secolo XV ai figliuoli esuli*, ed. Cesare Guasti, Florence, 1877.

Maguire, Yvonne, *The Private Life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936.

The Women of the Medici, 1927.

Mallett, Michael,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Bodley Head, 1974.

‘Pisa and Florenc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Florentine Studies*, ed. Rubinstein.

Marks, L.F., ‘The Financial Oligarchy in Florence under Lorenzo’ in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 ed. Jacob.

Martines, Lauro, *Lawyers and Statecraft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Florentine Humanists 1390–146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Masson, Georgina, *Companion Guide to Rome*, Collins, 1965.

Italian Villas and Palaces, Thames & Hudson, 1959.

Mattingly, Garrett, *Renaissance Diplomacy*, Jonathan Cape, 1955.

Minor, Andrew C., and Mitchell, Bonner, *A Renaissance Entertainment: Festivities for the Marriage of Cosimo 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68.

Morassi, Antonio, *Il Tesoro dei Medici*, Milan, 1963.

Morisani, Ottavio, *Michelozzo architetto*, Einaudi, 1951.

Müntz, E., *Les Collections des Médicis au XVe Siècle*, Paris, 1888.

Murray, Peter,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Thames & Hudson, 1969.

Murray, Peter, with Linda Murray,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Thames & Hudson, 1969.

Nagler, Alois Maria, *Theatre Festivals and the Medici, 1539–1637*, trans. G. Hickenhoyer, Yale, 1964.

Nardi, Jacopo, *Istoria della città di Firenze*, 1888.

Nitti, Francesco, *Leone X e la sua politica*, 1892.

Noble, Mark, *Memoirs of the Illustrious House of Medici*, 1797.

Origo, Iris, 'The Domestic Enemy: The Eastern Slaves in Tuscany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Speculum*, 1955, pp. 21–66.

The Merchant of Prato, Jonathan Cape, 1957.

Orlando, Filippo, and Baccini, Giuseppi (eds.) ,
Bibliotechina Grassoccia, Florence, 1886-98.

Palmarocchi, Roberto, *Lorenzo de' Medici*, Turin, 1941.

La politica italiana di Lorenzo de' Medici, Florence,
1973.

Pampaloni, Guido, *Palazzo Strozzi*, Rome, 1963.

Panella, Antonio, *Storia di Firenze*, Florence, 1949.

Partner, Peter, 'Florence and the Papacy in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in *Florentine Studies*, ed. Rubinstein.

Pastor, Ludwig von, *History of the Popes from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ed. R.F. Keir, 1899-1910.

Pellegrini, F.C., *Sulla repubblica fiorentina al tempo di
Cosimo il Vecchio* Pisa, 1880.

Perrens, F.-T., *Histoire de Florence depuis la domination
des Médicis jusqu' à la chute de la république*, 9 vols.,
Paris, 1877-88.

Piccolomini, Aeneas Silvius, *Memoirs of a Renaissance
Pope: The Commentaries of Pius II*, trans. Florence A. Gragg,
ed. Leonora C. Gabel, 1959.

Picotti, Giovanni Battista, *La giovinezza di Leone X*,
Milan, 1927.

Pieraccini, Gaetano, *La Stirpe de' Medici di Cafaggiolo*, 3 vols., Florence, 2924; 2nd edn, 1947.

Plumb, J.H., *The Horizon Book of the Renaissance*,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Co., 1961.

Pope-Hennessy, John, *Italian High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Sculpture*, Phaidon, 1963.

Paolo Uccello, Phaidon, 1950.

Prescott, Orville, *Princes of the Renaissance*, Allen & Unwin, 1970.

Randolph, G., *Florentine Merchants in the Age of the Medici*, 1932.

Reumont, Alfred von, *Lorenzo de' Medici*, Leipzig, 1874; London, 1876

Ricchioni, Vincenzo, *La costituzione politica di Firenze ai tempi di Lorenzo il Magnifico*, Siena, 1913.

Richards, Gertrude R.B., *Florentine Merchants in the Age of the Medic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Ridolfi, Roberto, *The Life of Francesco Guicciardini*, trans. Cecil Grays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

The Life of Girolamo Savonarola, trans. Cecil Grayson, 1959.

The Life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trans. Cecil Grayson, 1963.

Robiony, Emilio, *Gli ultimi dei Medici*, Florence, 1905.

Rochon, André, *La Jeunesse de Laurent de Médicis*, Paris, 1963.

Rodocanachi, E., *Le Pontificat de Léon X*, Paris, 1931.

Roeder, Ralph, 'Lorenzo de' Medici' in Plumb, *The Horizon Book*.

Roover, Raymond de, 'Labour Conditions in Florence around 1400: Theory, Policy and Reality' in *Florentine Studies*, ed. Rubinste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 1397-149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Roscoe G., and Bossi, L., *Vita e Pontificato di Leone X*, Milan, 1816-17.

Roscoe, W., *Life of Leo X*, 1846.

Life of Lorenzo de' Medici, new edn, 1872.

Ross, Janet, *Florentine Villas*, 1901.

Florentine Palaces and Their Stories, 1905.

Lives of the Early Medici as told in their correspondence, 1910.

Roth, Cecil, *The Last Florentine Republic*, 1925.

Rubinstein, Nicolai, 'Florentine Constitutionalism and Medici Ascendanc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Florentine Studies*, ed. Rubinstein.

(ed.) *Florentine Studies: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Faber, 1968.

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1494, Clarendon Press, new edn, 1968.

'Politics and Constitution in Florence at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 ed. Jacob.

Rud, E., *Vasari's Life and Lives*, London, 1964.

Salvini, R., *Botticelli*, Milan, 1958.

Scaife, Walter, *Florentine Life During the Renaissance*, 1893.

Schevill, Ferdinand, *History of Florence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City through the Renaissance*, Harcourt Brace, 1936.

The Medici, Harcourt Brace, 1949.

Segni, Bernardo, *Storie Fiorentine*, 1728.

Shepherd, William, *The Life of Poggio Bracciolini*, 1837.

Sinibaldi, Giulia, *Il Palazzo Vecchio di Firenze*, Rome, 1950.

Sismondi, J.C.L., *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publics during the Middle Ages*, ed. William Boulting, n.d.

Solerti, Angelo, *Musica, Ballo e Drammatica alla corte Medicea dal 1600 al 1637*, Florence, 1905.

Spini, Giorgio, *Cosimo I de' Medici e la indipendenza del Principato Mediceo*, Florence, 1945.

Strong, Roy, *Splendour at Court: Renaissance Spectacle and Illusi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3.

Symonds, John Addington,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1875–86.

Tenenti, Alberto, *Firenze dal Comune a Lorenzo il Magnifico*, Milan, 1970.

Tolnay, Charles de, *Michelangel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60.

Ullman, B. L., and Stacker, P. A., *The Public Library of Renaissance Florence*, 1972.

Valori, Niccolò, *Laurentii Medicei vita*, Florence, 1756.

Varchi, Benedetto, *Storia fiorentina*, 3 vols., 1838-41; new edn, Florence, 1963.

Vasari, Giorgio, *Le vite dei più eccellenti pittori, scultori ed architetti*, 9 vols., Florence, 1906.

The Lives of the Artists, trans. George Bull, Penguin Books, 1965.

Vaughan, Herbert M., *The Medici Popes*, 1908.

Vaussard, Mauric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talie au XVIII^e Siècle*, Hachette, 1959; trans. Michael Heron, Allen & Unwin, 1962.

Vespasiano da Bisticci, *Vite di Uomini Illustri*, ed. D' Ancona and Aeschlimann, Milan, 1951.

The Vespasiano Memoirs, trans. George & Waters, 1926.

Villani, Giovanni, *Chronica di Giovanni Villani*, ed. Dragomanni, 4 vols., Florence, 1844-5.

Villani, Matteo, *Chronica di Matteo Villani*, ed. Dragomanni, 2 vols., Florence, 1846.

Villari, P., *La storia di Girolamo Savonarola*, Florence, 1877.

Wadia, Bettina, *Botticelli*, Hamlyn, 1968.

Weil-Garris Posner, Kathleen, 'Comments on the Medici Chapel and Pontormo' s Lunette at Poggio a Caiano' in *Burlington Magazine*, CXV, pp. 641-9.

Weinstein, Donald, 'The Myth of Florence' in *Florentine Studies*, ed. Rubinstein.

Savonarola and Flo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Savonarola, Florence and the millenarian tradition' in *Church History*, 1958, pp. 291-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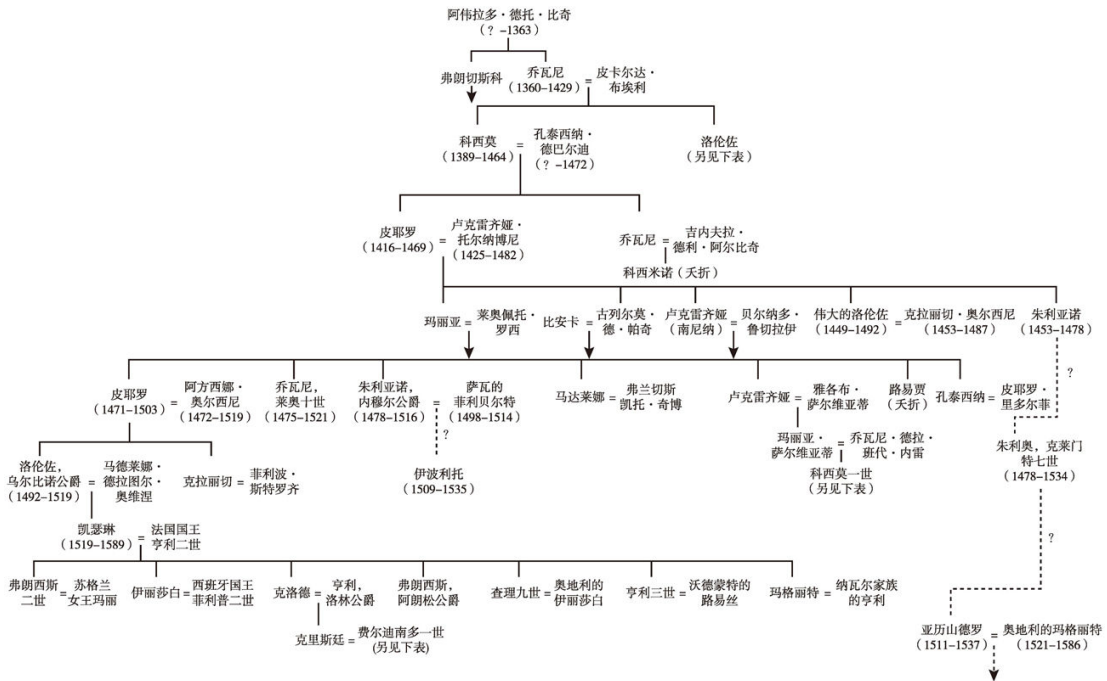
Weiss, Roberto, *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 Blackwell, 1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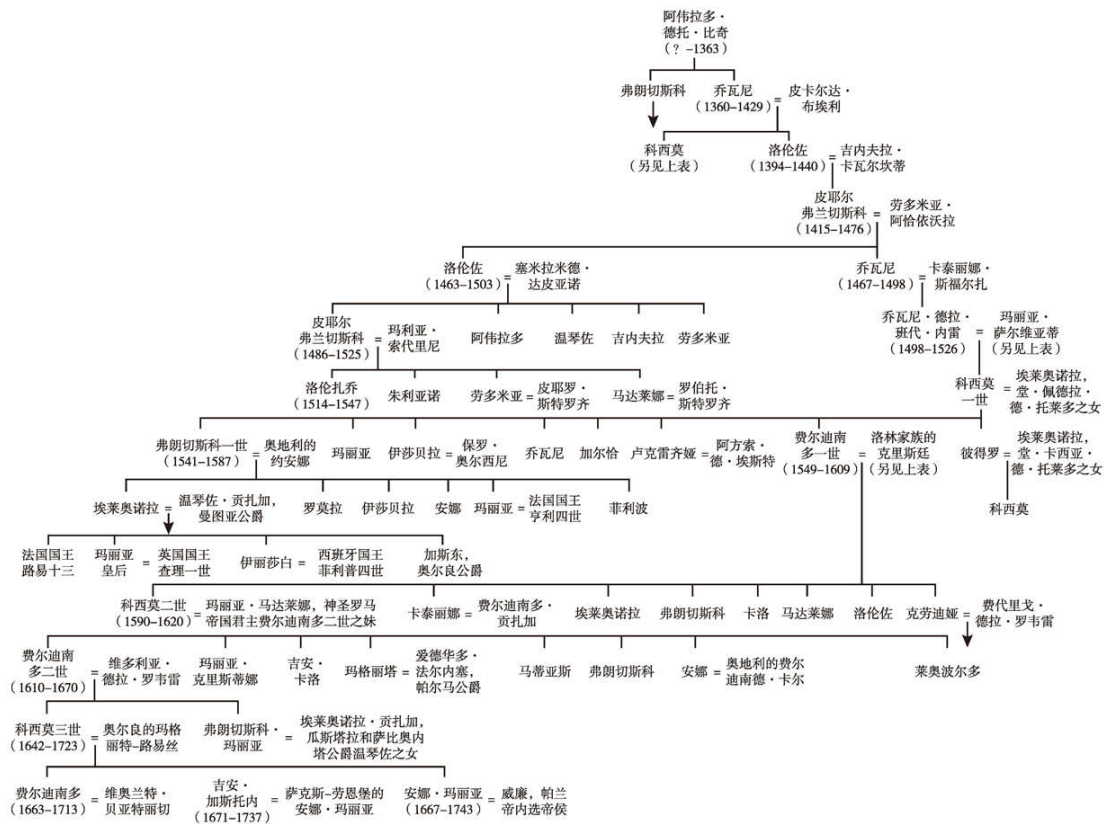
Winspeare, F., *La congiura dei cardinali contro Leone X*, 1957.

Young, G.F., *The Medici*, 2 vols., 1909.

美第奇家族成员图谱

科西莫·迪·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的后代





索引

（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cciaiuoli, Agnolo, banished, 55, 106; and the Medici, 61, 103-4, 105; diplomacy with France, 84, 85

Acciaiuoli, Donato, 122, 148

Acciaiuoli, Piero, 122

Accoramboni, Francesco, 277

Accoramboni, Vittoria, 277-8

Agnolo, Baccio d' , 325

Albany, Louisa, Countess of, 325

Albert II, German Emperor (d. 1439) , 64

Alberti, House of, 35

Alberti, Leon Battista (1404-72) , on poverty, 28; and Palazzo Rucellai, 29, 313; at Camaldoli Abbey, 122; and Tuscan poetry, 171; and Santa Maria Novella, 313

Albizzi family, power and achievements of, 32-3; and the Medici, 40, 41, 43, 47; Uzzano and, 48; and the anti-Medicean plot, 50, 52; growing unpopularity of, 54-5; and the Duke of Milan, 79, 80; lose hope of returning to power, 80

Albizzi, Antonfrancesco degli, 212, 215

Albizzi, Ginevra degli, *see* Medici, Ginevra de'

Albizzi, Eleonora degli, 272

Albizzi, Rinaldo di' Messer Maso degli, 32; personality, 42; and humanism, 43-4; and the anti-Medicean plot, 48, 49, 50, 52; on conflict with the mighty, 54; takes up arms, 55-6; loses support, 56-7; and Eugenius IV, 57; banished, 58; goes on pilgrimage, 80; Parentucelli and, 87

Alfonso I, King of Naples, 81, 84, 85

Alfonso II, King of Naples, 183, 184, 193

Alidosi, Francesco, Cardinal, 223

Allori, Alessandro (1535-1607) , 322

Almeni, Sforza, 272

Ambrose, St, 71, 98

Ammanati, Bartolomeo (1511-92) and the Pitti Palace, 271, 328; Cosimo I and, 274; and the Villa Pratolino, 276; and San Giovannino degli Scolopi, 317; and the Villa of

Castello, 323, 329; and the Neptune Fountain, 327; and the Ponte alla Carraia, 329

Ammianus Marcellinus, 45

Ammirato, Scipio, 163

Angelico, Fra, *real name* Guido di Pietri, *monastic name* Giovanni da Fiesole (1387–1455) , his history, 94; his nature, 94; Gozzoli and, 110; his *Crucifixion*, 319; his *Annunciation*, 319

Anna Maria, Electress Palatine, *née* Anna Maria Luisa di Cosimo de' Medici, (1667–1743) , 291; her marriage, 304; widowed, 304; and the Tuscan succession, 305; the last of the Medici, 309; death of, 310; her bequest, 310–11

Anna Maria Francesca of Saxe-Lauenberg, *see* Medici, Anna Maria Francesca, de'

Anne, Duchess of Brittany, *and later* Queen of France, 183

Antelminelli, Castruccio Castracani degli, 320

Antinori, Bernardino, 277

Antonio da Sangallo, 325

Apicius, Marcus Gabius, 45

Argyropoulos, John (1416–*c.* 1486) , 69, 111, 122, 170

Ariosto, Ludovico (1474-1533) , 227

Aristotle, 68

Arno, river, water displays on, 119, 282; Pazzi' s corpse in, 141; Savonarola' s remains thrown into, 200; in flood, 223, 279-80; Buonnacorsi' s corpse in, 270-1; Acciaiuoli palace on, 315

Assisi, 65, 74, 143

Astrology, 97-8, 324, 327

Avogadro, Giovanni, 317

Baglioni, Cesare, 330

Baglioni, Gian-Paolo, 207

Baldese, Ambrogio di, 331

Baldovinetti, Mariotto, 52

Bande Nere, Giovanni delle, *see* Medici, Giovanni di Giovanni de'

Bank, Medici, branches of, 34; and the Papacy, 35, 36, 37, 88, 89, 129; Cosimo *Pater Patriae* and, 49, 59-60; and the Florentine government, 55; Sforza. and, 82; and alliance with Milan, 83; under Cosimo *Pater Patriae*, 86-8; and Sixtus IV, 128-9, 148; and Città di Castello, 129; declining fortunes of, 158

Banquets, at the wedding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17-18; given by Giovanni di Lorenzo as cardinal and Pope, 206, 225-6; given by the cardinals under Leo X and by Agostino Chigi, 224-5; Leo X' s, 225; for wedding of Maria de' Medici, 281; in the Palazzo Vecchio, 289; of Cosimo III, 297

Baraballo, Fra, 226-7

Barbadori family, 316

Barbadori, Niccolò, 55, 57, 58

Bardi family, bankers, 39; and the Medici, 43, 87; their chapel in Santa Croce, 313; and the Via de' Bardi, 314; and the Villa Medici, 318

Bardi, Bartolomeo de' , 36

Bardi, Contessina de' , *see* Medici, Contessina de'

Bardi, Giovanni de' , 38

Bardi, Niccolò di Betto, 90

Baroncelli, Bernardo Bandini, 135-6, 137, 138, 142

Bartolommeo, Fra, *prop.* Baccio della Porta (1475-1517) , 192, 301

Battles,

Agnadello (1509) , 207, 208, 209

Anghiari, (1440) , 80, 194

Barga (1437) , 80

Fornovo (1495) , 195

Imola (1434) , 55

Imola (1467) , 107

Lepanto (1570) , 266, 267

Marignano (1515) , 220

Montemurlo (1537) , 263

Pavia (1525) , 240

Ravenna (1512) , 208, 209

Beccadelli, Antonio, *Hermaphroditus*, 91

Becchi, Gentile, Bishop of Arezzo, 103, 165

Benavieni, Antonio, 107

Benci, Giovanni d' Amerigo, 87, 95

Benedetto da Rovezzano, 321, 323

Bentivoglio family, 65, 209, 222

Bentivoglio, Giovanni, 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03,
149–50; warns Piero di Cosimo, 105; and capture and recapture

of Bologna, 207, 208

Berlinghieri, Jacopo, 49

Bernardino of Siena, St (1380–1444) , 23

Bessarion, Johannes, Archbishop of Nicaea (c. 1395–1472) , 67, 68

Bicci, Neri di, 320

Bisticci, Vespasiano da, 165; and Cosimo *Pater Patriae*, 39, 73, 74; on Cosimo *Pater Patriae*, 60, 97–8; and Council of Florence, 66; his tomb, 313

Boboli Gardens, origin of the name, 271; Cosimo I and, 274; Ferdinand. I and, 280; *Il Mondo Festeggiante* in, 289, 328; *Ruspanti* in, 308; historical note on, 328; *Perseus and the Dragon*, 330

Boccaccio, Giovanni (1313–75) , 278

Bogoli family, 271

Bologna, excommunication of, 45; rumours of plots in, 65; Medici office in, 87; Bishop of, 87; Savonarola a novice in, 179; taken and retaken, 207, 208; Cardinal Giovanni di Lorenzo in, 209; French forces withdraw from, 209; Leo X and Francis I in, 222

Borgia, Cesare (1476–1507) , 193, 201

Borgia, Roderigo, Cardinal, *later* Alexander VI, Pope,
q. v. 203, 205

Borromeo, Giovanni, 132

Botticelli, Sandro, *prop.* Alessandro Filipepi (1444–1510) , 165, 168; his works, 109–10, 166, 167, 315, 320, 322, 323, 331; designs Giuliano di Piero' s standard, 122; and the Pazzi conspirators, 142; 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67; cost of his work, 169; and Savonarola, 181; his pictures burned, 192; and the tragedy of Florence, 325; and Michelangelo' s *David*, 326

Bourbon, Charles, Duke of (1490–1527) , 242–3, 244

Bracciolini, Jacopo di Poggio, 136, 139–40

Bracciolini, Poggio, 44, 45–6, 136

Bramante, *prop.* Donato d' Angelo Lazzari (1444–1514) ,
228, 229

Bravo, Cecco, 332

Bronzino, Agnolo (1502–72) , 274

Brosses, Charles de, 310

Browning, Elizabeth Barrett, 321

Brunelleschi, Filippo (1377–1446) , and bronze doors for the Baptistery, 70; Giovanni di Bicci commissions, 71; and

basilica of San Lorenzo, 71-2, 317; and the Cathedral dome, 72, 313; Cosimo *Pater Patriae* and, 75; Donatello and, 90; and the Pazzi chapel, 131; and the Rotonda di Santa Maria Angeli, 314; and the Ospedale degli Innocenti, 316; and Santo Spirito, 323

Bruni, Leonardo (1369-1444) , 44, 46, 47, 211, 313

Bueri, Piccarda, *see* Medici, Piccarda de'

Buggiano, (Andrea Cavalcanti) , 319

Buonnaccorsi, Giuliano, 270-1

Buontalenti, Bernardo, and the Boboli Gardens, 271; and the Villa Pratolino, 276, 330; and the Uffizi palace, 278, 328; and Forte di Belvedere, 280; and *Il Rapimento di Cefalo*, 281; and the Cathedral façade, 324; and Santa Trinità, 328; garden of the Villa of Castello, 323, 329; and Cereto Guidi, 330

Burchiello, *the barber*, 95

Burnet, Gilbert, Bishop of Salisbury, 306

Buti, Lucrezia, 93

Byron, George Gordon, Baron Byron, 325

Caccini, Giulio (1550-1618) , 281, 328

Caccini, Giovanni, 315, 319

Calabria, Alfonso, Duke of, *later* Alfonso II, King of Naples, *q. v.*, and Florence, 148–9, 150, 155; and Duke of Ferrara, 151; progress of his forces, 152; in Siena, 159; and the Turkish invasion, 159; Maiano and, 167

Calabria, Duchess of, *née* Ippolita Sforza, 103, 153

Camaldoli, Abbey of, 122, 321

Cambio, Arnolfo di (1232–1301) , 313

Cambrai, League of, 207, 223

Campana, Francesco, 263

Capello, Bianca, *see* Medici, Bianca de’

Capponi family, 316

Capponi, Francesco, 251

Capponi, Neri, 52, 61, 82

Capponi, Piero de Gino, 190–1

Carafa, Diomedes, 153–4

Carbone, Lodovico, 96

Cardi, Lodovico, *called* Cigoli (1559–1613) , 324

Cardona, Raymond de, 211, 212, 213, 220

Carnivals, *see* Festivals

Castagno, Andrea del, 320

Castellesi, Adriano, Cardinal, 233, 234, 238

Catherine de' Medici, Queen of France, *see* Medici
Caterina di Lorenzo de' (1519-89)

Catherine of Aragon, Queen of England (1485-1536) ,
247, 248

Catherine of Siena, St (1347-80) , 172, 278

Cattaneo, Simonetta, *see* Vespucci, Simonetta

Catullus, Valerius, 91

Cavalcanti family, 43

Cavalcanti, Ginevra, *see* Medici, Ginevra de'

Cavalcanti, Lorenzo, 137, 138

Caxton, William (*c.* 1422-*c.* 1491) , 169

Cellini, Benvenuto (1500-71) , on syphilis, 205; Clement
VII and, 240, 246-7, 253; on his prowess as a gunner, 245-6;
on Cosimo I, 258; his *Perseus*, 274, 329; his bust of Cosimo
I, 327

Cennini, Bernardo, 150, 169

Cesarini, Cardinal Julian (1398-1444) , 67

Chalcondylas, Demetrius (1434-1511) , 111, 170

Charlemagne, King of the Franks, *and* Roman Emperor, 30

Charles V, Holy Roman Emperor (Charles I, King of Spain; 1500-58) , succeeds Ferdinand the Catholic, 223; succeeds Emperor Maximilian, 237; Leo X and, 237; takes Milan, 238; and Clement VII, 239, 240-1, 249, 251, 252; Imperial army marches on Rome, 241, 242-3; and Catherine of Aragon, 248; Imperial forces besiege Florence, 250; and Cosimo I, 264

Charles VI, Holy Roman Emperor (1685-1740) , 305

Charles VII, King of France (1403-61) , 84

Charles VIII, King of France, *called* the Affable (1470-98) , his ambitions, 182; his appearance, 182, 190; his personality, 183; and the invasion of Italy, 183-4, 185; Piero di Lorenzo and, 186; Savonarola greets, 188; enters Florence, 189-90; and Capponi, 190-1; in Naples, 193; and his army, 194, 195, 196; and Pisa, 197; death of, 201; and Franco-Florentine friendship, 208

Charlotte of Mecklenburg-Strelitz, Queen of England, 328

Chigi, Agostino, 225

Christina, Queen of Sweden (1626-89) , 286, 330

Christine of Lorraine, *see* Medici, Christine de'

Chrysoloras, Emmanuel (c. 1355–1415) , 47

Chrysoloras, John, 47

Cibò, Franceschetto, 162, 203

Cibò, Giovanni Battista, *see* Pope Innocent VIII

Cibò, Innocenzo, Cardinal, 248, 256, 257, 263, 264

Cibò, Lorenzo, 232

Cibò, Maddalena, *née* Maddalena di Lorenzo de' Medici,
162, 203, 205

Cicero, Marcus Tullius, 98

Cimento, Del, 284, 285, 287

Ciampi, 25–6, 31, 257

Cione, Nardo di, 314

Clothes, the *Iucco*, 21, 215, 262, 270; of 14th century Florentines, 21; of 15th century Florentines, 21–3; of *Priori* and *Gonfaloniere*, 26–7; of Bruni, 46; of *Signoria*, 62; of the Constantinopolitans, 67; ceremonial attire of Eugenius IV, 73; of Donatello, 92; scholars' caps, 111; of Roman women, 114;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16–17, 124; of Clarice Orsini, 117; of Princess Eleonora of Naples, 121; of Charles

VIII, 189; of Italian soldiers, 195; of national militia, 211; of Leo X, 221, 222; of *Gonfaloniere* Ridolfi, 221; of Fra Baraballo, 226; of Cosimo I, 267, 270; uniform of pages of Cosimo I, 268–9; of Grand Duke Gian Gastone, 308, 309

Cocco, Niccolò di, 55

Colonna family, 56, 241, 247

Colonna, Cardinal Pompeo, 235, 238, 239, 241, 326

Commines, Philippe de (1445–1509) , 89, 149, 150, 151, 186

Compagnacci, 197, 199

Condottieri, and early Renaissance warfare, 194; and Pisan-Florentine war, 210; untrustworthiness of, 211

Baglioni, Malatesta, 249, 250

Colleoni, Bartolommeo (1400–75) , 106, 167

Hawkwood, Sir John, 320

Montesecco, Gian Battista, 132–4, 135, 136, 141–2

Niccolò da Tolentino, 52, 320

Piccinino, Jacopo, 194

Piccinino, Niccolò, 42, 80, 82

Sanseverino, Roberto da, 117

Sforza, Francesco, *see separate entry*

Trivulzio, Gian Giacomo, 149

Urbino, Federigo da Montefeltro, Duke of, *see separate entry*

Constantinople, 64, 85

Copernicus, *prop.* Nicolaus Koppernigk (1473–1543) ,
240, 280

Cornaro, Cardinal, 225, 231

Corsini, Filippo, 118

Cosmas, St, 37

Cossa, Baldassare, Cardinal, *later* Pope John XXIII, *q. v.*
(*c.* 1370–1419) , 35, 87

Council of Bâle (1431–49) , 64–5

Council of Constance (1414–18) , 34, 35–6

Council of Florence (1438–45) , 64, 66–8, 69, 87, 110

Council of Pisa (1409) , 34

Craon, Prince Marc de, 309

Credi, Lorenzo di (1459-1537) , 192

Crespi, Giuseppe Maria (1665-1747) , 300

Cretensis, Demetrius, 170

Crusades, preached by Calixtus III, 86; Pazzo de' Pazzi and, 131

Curia, the, 95, 129

Dami, Giuliano, 303, 305, 307

Damian, St, 37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 70, 171

Dati, Gregorio, 28

Del Cimento, 284, 285, 287

Democritus, 297

Diogenes Laertius, 47

Domenico da Pescia, Fra, 196, 198, 199, 200

Domenico, Giovanni di, 317

Donatello, *prop.* Donato di Betto Bardi (1386-1466) , Michelozzo and, 75; his history, 90; his works, 90-1, 192, 312, 315, 318, 329; Cosimo di Giovanni and, 91, 92, 108; and the Genoese merchant, 91-2; attitude to money, 92; in old

age, 92; Piero di Cosimo and, 107–8; and the tomb of John XXIII, 316; his gallery, 320

Donati, Lucrezia, 116, 121, 146

Doni, Paolo di, 108

Dovizi da Bibbiena, Bernardo, 206, 217, 227, 232

Dovizi da Bibbiena, Piero, 178, 206

Duomo, the, *see* Florence, Santa Maria del Fiore, Cathedral of

Edward III, King of England (1312–77) , 39

Edward IV, King of England (1442–83) , 158

Eleonora, Princess of Naples, 121

Eleonora of Toledo, *see* Medici, Eleonora de'

Elizabeth, Queen of Spain (1692–1766) , 305

Entragues, Robert de Balzac, 210

Este, Alfonso d' , *see* Ferrara, Duke of

Este, Borso d' , *see* Ferrara, Duke of

Este, Ercole d' , *see* Ferrara, Duke of

Este, Ippolito d' , Cardinal, 217

Este, Isabella d' , 324

Fancelli, Luca, 328

Farnese, Alessandro, Cardinal, *later* Pope Paul III, *q. v.*
(1468-1549) , 238

Farnese, Elizabeth, *see* Elizabeth, Queen of Spain

Farnese, Ottavio, Duke of Parma and Piacenza, 264

Federigo, Prince of Naples, 103, 153

Fedi, Pio, 329

Ferdinand the Catholic, King, V of Castile, II of Aragon
and Sicily, *and* III of Naples (1452-1516) , joins the Holy
League, 194; and Louis XII, 201; and Leo X, 220, 222; death
of, 223

Ferrai, Luigi Alberto, 264

Ferrante, Don, 84

Ferrante, King of Naples (1423-94) , 103; 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17, 154; and Sixtus IV, 130, 154; and
Florence, 148, 159; and the Sforzas, 151, 183; the *Signoria*
distrusts, 153; and the Turkish invasion, 159; Savonarola
and, 182; death of, 183

Ferrara, Cosimo di Giovanni at, 54; disastrous Council
of, 65-6; Savonarola' s forebears at court of, 178; Leo X

and, 237

Ferrara, Alfonso d' Este (I) , Duke of (1476-1534) ,
208, 222

Ferrara, Alfonso d' Este (II) , Duke of (1533-97) , 269

Ferrara, Borso d' Este, Duke of, 105, 117

Ferrara, Duchy of, 219

Ferrara, Ercole d' Este, Duke of, 150, 151, 152

Ferrara, Lucrezia d' Este, Duchess of, *née* Medici,
Lucrezia di Cosimo de' (1544-61) , 269

Ferrara, Marquis of, 50, 54

Ferri, Antonio, 299

Ferri, Cirro, 285

Ferrucci, Francesco, 250, 327

Festivals, pageants of the Magi, 111; tournament to
celebrate wedding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16; Florence
famous for festivities, 119; *Calendimaggio*, 119, 297;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19-20, 289; Lenten and Easter, 120; for
Princess Eleonora of Naples, 121; Savonarola' s orders on
carnivals, 192; encouraged under Cardinal Giovanni, 216; for
the election of Leo X, 217-18; reception of Leo X in
Florence, 220-2; celebrations for title of Grand Duke, 266;

Cosimo I encourages, 273; for the wedding of Ferdinand I, 280-1; for the wedding of Maria de' Medici and Henry IV, 281; for the wedding of Cosimo II, 282; for the wedding of Cosimo III, 289; Grand Prince Ferdinand arranges a joust, 308; abolition of Medici public holidays, 310; *Scoppio del Carro*, 321-2

Fetti, Fra Mariano, 226, 231

Fiamingo, Niccolò, 274

Ficino, Marsilio (1433-99), Cosimo *Pater Patriae* and, 68-9, 77; 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03, 113, 122, 165; Poliziano and, 122; his villa, 316

Filarete, Antonio Averlino, 107

Filelfo, Francesco (1398-1481), 47-8, 51, 59

Florence, in 15th century, 19-21; government of, 25, 26-7, 28, 32; banner of, 26; territorial expansion, 32; trade, 33; the florin, 33; Martin V in, 36; Cosimo *Pater Patriae* returns to, 58; taxation in, 61-2; and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65-6, 68; entry of Eastern Emperor into, 66; Medici generosity for adornment of, 69; Cosimo *Pater Patriae* on, 73; Cosimo *Pater Patriae* and foreign policy of, 79, 82-4; and Milan, 79-80, 83, 84, 105, 130; war declared on, 84, 148; Party of the Hill and Party of the Plain, 104, 105; return of the Medici, 105-6, 212, 214, 249, 251; and Venice, 106, 130; pageants and festivities in, 111, 118-19, 217-18; Florentine

wedding customs, 117-18; lions of, 119, 173, 327; Milanese state visit to, 124; and the Papacy, 129, 130, 159-60; rioting in, 140; War of the Pazzi Conspiracy, 149-50, 151, 152, 155; and Naples, 155; Cennini's printing press in, 169; Savonarola and, 179, 180, 181, 182, 191, 193, 197; attitude to French invasion of Italy, 184; Charles VIII enters, 189-90; Cinozzi on, 193; and France, 208; in decline, 210, 306-7; national militia of, 211, 213, 214; reception for Leo X, 220-2; flood and famine in, 223; Cardinal Giulio's administration, 236; problem of government of, 237; resentment against Passerini and Clement VII in, 248-9; organization of defence of, 249; siege of, 250; surrenders to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250-1; resentment against Alessandro de' Medici, 254; Florentine navy, 266-7; under Ferdinand I, 279

Accademia della Crusca, 323, 330

Baptistery, the, *see* San Giovanni Battista, church of

Bargello, the, *Podestà* at, 27; Albizzi intends to seize, 56; executions in, 142, 277; Botticelli's paintings of the Pazzi conspirators in, 142; Donatello's works in, 312, 318, 327; historical note on, 313; Verrocchio's works in, 316, 323; Pollaiuolo's work in, 320; Giambologna's bronzes in, 323, 329; bust of Cosimo I in, 327

Borgo degli Albizzi, 321

Borgo Pinti, 66, 331

Borgo San Piero, 117, 321

Borgo Sant' Apostoli, 315

Campanile, the, 90, 320

Casa Buonarroti, 322

Casa Guidi, 321

Corso, the, 120

Corso dei Tintori, 332

Duomo, the, *see* Santa Maria del Fiore, Cathedral of

Forte di Belvedere, 280, 313, 324, 330

Fortezza da Basso, 254, 327

Fortezza di San Giorgio, 330

Giardino dei Semplici, 315

Loggia dei Lanzi, 199, 314, 329

Lungarni, 282

Lungarno Acciaiuoli, 314

Lungarno Corsini, 314, 325

Lungarno Guicciardini, 325

Mercato Nuovo, 32, 217–18, 221, 313

Mercato Vecchio, 20, 34, 119, 120, 312

Ospedale degli Innocenti, 71, 316

Orti Oricellari, 313

Palazzi, *see separate entries*

Piazza dei Pitti, 273

Piazza del Duomo, 32, 75, 120, 189

Piazza della Repubblica, 312

Piazza della Signoria, *Parlamento* and, 27, 50, 57, 62, 191, 251; *Signoria* troops in, 56; circuses in, 119; and festival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20; fighting in, 139; conspirators' corpses hang in, 140; ordeal by fire in, 199; Savonarola burned in, 200; national militia parade in, 211; Soderini speaks in, 212–13; Medici supporters in, 214, 215–16; Leo X in, 221; rioting in, 248; Michelangelo's *David* in, 249; executions in, 264; statues in the Loggia dei Lanzi, 274, 279, 280; *Festa degli Omaggi*, 289; the city's lions in, 327; Ammanati's Neptune Fountain in, 327; statue of Cosimo I in, 331

Piazza Piave, 327

Piazza Peruzzi, 315

Piazza San Marco, 322

Piazza Sant' Apollinare, 56

Piazza Santa Croce, 312; tournaments in, 38, 116, 121, 314; mock battles in, 119; joust in, 300

Piazza Santa Maria Novella, 57, 273

Piazza Santo Spirito, 315

Piazza Santa Trinità, 119, 221, 331

Piazza Santissima Annunziata, 316, 331

Ponte alla Carraia, 274, 282, 328–9

Ponte Santa Trinità, 221, 274, 282, 289, 314, 328

Ponte Vecchio, 20, 121, 200, 312

Porta al Prato, 120, 308, 313

Porta alla Croce, 120

Porta alla Giustizia, 254, 327

Porta di San Pier Gattolini, 36

Porta Romana, 121, 221

Porta San Gallo, 53, 187

Porta San Freliano, 189

Prato, the, 121

Rotonda di Santa Maria Angeli, 314

San Bartolommeo, church of, 73

San Gaetano, church of, 324

San Gaggio, convent of, 36-7

San Giovanni Battista, church of (the Baptistry) , 31, 321; tomb and monument of John XXIII in, 36, 75; bronze doors of, 70-1, 110, 316; Dante on, 70; votive offering taken to, 120; historical note on, 316

San Giovannino degli Scolopi, 75, 317

San Lorenzo, Brunelleschi' s works in, 70, 75, 326; Giovanni di Bicci and, 71, 98, 319; Medici chapel, 71, 326; Donatello' s work for, 90; Cosimo *Pater Patriae*' s monument in, 98, 319; Donatello buried in, 108; the Medici tombs in, 112, 144, 174, 274, 293, 309, 321, 329; Savonarola preaches at, 179; Michelangelo and, 229, 240, 325; Capella dei Principi, 274, 293, 309, 313, 324, 329; Duke Ferdinand I inaugurates a ceremony at, 279; Medici emblems in, 313; Martelli chapel, 316; the Medici Library in, 316; historical note on, 317

San Marco, convent of, Cosimo *Pater Patriae* and, 69, 74;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s body at, 174; Savonarola at, 179, 180, 181; treasures from Medici Library lodged at, 187, 316;

refuge sought in, 199; Cosimo I and the Dominicans of, 265; historical note on, 317; Fra Angelico' s *Crucifixion* and *Annunciation* in, 319

San Martino, church of, 331

San Miniato al Monte, church of, 107, 319

San Pier Schieraggio, church of, 55, 316

Sant' Ambrogio, church of, 93

Sant' Antonio, convent of, 123

Sant' Apostoli, church of, 131, 321

Santa Croce, church and convent of, 131; *borse* kept at, 26; meetings of Council of Florence in, 66; Cosimo *Pater Patriae* and, 73; Jacopo de' Pazzi buried in, 141; Galileo buried in, 282, 317, 332; historical note on, 312-13; Bardi chapel, 314; Donatello' s *Annunciation* in, 315; Peruzzi chapel, 315; novices' chapel, 317

Santa Felicità, church of, 316

Santa Maria degli Angeli, monastery of, 37, 47, 314

Santa Maria del Carmine, convent of, 92-3, 319

Santa Maria del Fiore, Cathedral of (the Duomo) , 32; *Arte della Lana* and, 33; and Council of Florence, 67; Ghiberti' s windows for, 70; Brunelleschi' s dome, 72, 317;

Donatello and, 90, 320; Della Robbia' s singing gallery, 108, 320; Matins of Darkness, 120; Holy Saturday in, 120; and the Pazzi conspiracy, 135-6, 137-8; façade of, 168, 221, 324; lightning strikes, 173; Savonarola preaches in, 178, 180, 185, 196, 197; *Compagnacci* in, 197; congregation attacked in, 199; Leo X in, 222; Cosimo I in, 270; proxy marriage of Maria de' Medici in, 281; ceremony for Ferdinand III and Marguerite Louise in, 288; historical note on, 313; cenotaphs in, 320; *Scoppio del Carro*, 321-2

Santa Maria Novella, church and convent of, Eugenius V in, 56, 57, 66, 73; meetings of Council of Florence in, 66; Ghirlandaio murals in, 102, 167, 319, 323; Botticelli' s *Adoration of the Magi* in, 109; Tornabuoni chapel, 165; mad woman in, 173; secret messages left in, 212; Alberti designs façade of, 313; historical note on, 314; Strozzi chapel, 314; Capella Maggiore, 319, 323; Botticelli' s work for, 320; Viceroy of Naples lodged at, 327; Spanish chapel, 327

Santa Maria del Impruneta, 325

Santa Maria Nuova, hospital of, 71, 314, 316

Santa Trinità, church of, 167, 319, 328; Onofrio Strozzi chapel, 110, 314; Sassetti chapel, 323; Gianfigliuzzi chapel, 325

Santissima Annunziata, church of, Cosimo *Pater Patriae* and, 73; Piero di Cosimo' s gift to, 107; wax effigy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in, 143; Clement VII' s effigy thrown

out of, 248; Cosimo I in, 270;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in, 301; Caccini' s loggia in, 315; Pucci chapel, 315; the choir of, 317; the tabernacle, 320

Santo Spirito, church of, 168, 323

Straw Market, 313

Teatro della Pergola, 332

Uffizi, the, 316; function of, 271; art gallery in, 278, 327-8; Ferdinando I enlarges, 280; the Tribuna, 281; opera at, 281; nude statues in, 306; pictures in, 314; Uccello' s work in, 320; Pollaiuolo' s work in, 320; Botticelli' s works in, 320, 322; Gentile da Fabriano' s work in, 320

Via Bufalini, 71

Via Calimala, 312

Via Cavour, 317

Via de' Bardi, 39, 43, 313, 314

Via de' Benci, 313

Via de' Gori, 75, 76, 317

Via de' Pucci, 315

Via de' Servi, 137, 315, 325

Via degli Alfani, 314, 332

Via dei Leoni, 173, 327

Via del Cocomero, 286, 332

Via della Pergola, 286, 289, 332

Via della Scala, 286, 331, 332

Via della Vigna, 120

Via della Vigna Nuova, 313

Via della Vigna Vecchia, 321

Via di San Gallo, 143

Via di Santa Margherita a Montici, 315

Via Ghibellina, 322

Via Guicciardini, 315

Via Lamarmora, 315

Via Larga, Medici home in, 32; Palazzo Medici in, 75, 76, 90, 215; Filippo Lippi in, 93; Pazzi and Giuliano di Piero in, 137; renamed, 317

Via Maggio, 221, 289, 321, 330

Via Maggiore, 321

Via Mazzetta, 321

Via Nuova Borg' Ognissanti, 109

Via Palmieri, 321

Via Pietrapiana, 331

Via Porta Rossa, 32, 313

Via Proconsolo, 321

Via Ricasoli, 319, 326, 332

Via Rondinelli, 330

Via Santo Spirito, 327

Via Strozzi, 323

Via Tornabuoni, 314, 323, 330

Florence, Archbishops of, Antonio Pierozzi, 74, 95; Piero Riario, 128; Rinaldo Orsini, 130; Giulio de' Medici, 232

Florentines, clothing of, 21-3; women, 22-3; Dation, 28; Pius II on, 38; and the Medici, 50, 82; in fear of Don Ferrante, 84; Medici marriages with, 115; Mantuan envoy on Savonarola and, 185; celebrate defeats of Venice and the Pope, 209

Foggini, Giovanni Battista, 333

Foix, Gaston de (1489-1512) , 209

France, and Florence and Milan, 84, 85; Piero di Cosimo ambassador to, 102; and battle of Ravenna, 208, 209; and Florence, 209

Franceschini, Baldassare, ‘il Volterrano’ , 331, 332

Francesco da Puglia, Fra, 198, 199

Francesco da Sangallo, 325

Francesco II, Duke of Lorraine, *later* Francis I, Holy Roman Emperor (1708–65) , 309

Francesi, Napoleone, 141, 142

Franchi, Rosello di Jacopo, 331

Franciabigio, *prop.* Francesco di Cristofano Bigi (1482–1525) , 322

Franciotto, Galeotto, Cardinal, 206

Francis I, King of France (1494–1547) , 252; Leo X and, 219, 222; his appearance and ambition, 219; invades Italy, 220; and Parma and Piacenza, 237; Charles V defeats, 238, 240; and Clement VII, 239, 241

Frundsberg, Georg von (1473–1528) , 241–2

Fuorusciti, 263–4

Furini, Francesco, 285, 332

Galilei, Galileo (1564-1642) , 292; his history, 282; burial of, 282, 317, 332; Ferdinando II and, 282, 284, 317; his telescope, 331; his papers in Biblioteca Nazionale, 332

Gaza, Theodorus (1398-1478) , 170

Genoa, Medici office in, 34; and Smyrna alum mines, 88; and Florence, 159, 163; buys Sarzana, 210

Gentile da Fabriano (1370? -1427?) , and the Constantinopolitans, 67; *Adoration of the Magi*, 110, 314, 320

Ghiberti, Lorenzo (1378-1455) , and bronze doors for the Baptistry, 70-1, 316; and the Cathedral dome, 72; his statue of St Matthew, 73; Donatello and, 90; Gozzoli and, 110; his wooden screen in the Cathedral, 137; his bronzes in Orsanmichele, 317

Ghiberti, Vittorio, 316

Ghirlandaio, Domenico Curradi (1444-94) , 168; his murals in Santa Maria Novella, 102, 167, 319, 323; Michelangelo and, 165

Ghirlandaio, Ridolfo (1483-1561) , 314

Giambologna, *prop.* Jehan de Boulogne (1529-1608) , 328; bronzes by, 276, 323; equestrian statue of Cosimo I, 280, 331; and the Cathedral façade, 324; his *Rape of the Sabines*, 329; *I' Appenino*, 330; equestrian statue of Ferdinando I, 331

Gianfigliuzzi, Selvaggia de' , 325

Gigli, Girolamo, 278

Ginori, Caterina Soderini, 255, 256

Giotto di Bondone (1267–1337) , 108, 314, 315, 320

Giovanni, Bertoldo di, 165

Giovanni da San Giovanni, 285, 332

Giovio, Paolo, 226

Girolami, Raffaello, 251

Giuliano da Maiano, 167, 321

Giuliano da Sangallo, 164, 316, 322, 323, 325

Giulio Romano, *prop.* Giulio Pippi de' Giannuzzi (c. 1492–1546) , 240

Gonsalvo de Cordoba (1453–1515) , 202

Gonzaga, Eleonora, *see* Medici, Eleonora de'

Gonzaga, Francesco, Marquis of Mantua, 194, 195–6, 206

Gonzaga, Ghismondo, Cardinal, 217

Gorini, Fioretta, 144, 322

Government, trade guilds and, 25, 26; organization of, 26, 27; Albizzi family control, 32; Ten of War, 42-3, 151; and the Albizzi plot, 49, 50

Accoppiatori, 60-1, 62-3, 104, 191

Balia, 106, 191; and the anti-Medici plot, 50; and the Medici, 58, 216; confirm powers of *Accoppiatori*, 62-3;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dmitted to, 125; creates Council of Seventy, 156; after the siege of Florence, 251

Cento, 125

Collegi, 27, 105

Council of Seventy, 156-7

Dodici Procuratori, 157

Gonfalonieri, office of, 26; dress of, 27; holders of the office of, 30-1, 32, 55, 60; 62, 90, 104, 152, 220, 251; increase in power of, 63; Cosimo *Pater Patriae*, 66; in procession, 73; Piero di Cosimo, 101; Cesare Petrucci, 138-9; excommunicated, 148; Soderini appointed for life, 210; Capponi appointed for a year, 248-9; a pro-Medicean, 251; abolition of the office, 264

Parlamento, 27, 106, 191, 216

Priori, selection of, 26; dress of, 26-7; prestige, 29; holders of the office, 32, 95, 101, 104; and the anti-Medici

plot, 49, 52, 56; in procession, 71, 73; and the Pazzi Conspiracy, 139; and Piero di Lorenzo, 186

Signoria, method of forming, 26; organization, 27; and the 15th century Albizzi-Medici conflict, 32, 42, 49, 52-3, 55-8; manipulation of elections, 60; and foreign affairs, 79; honour Cosimo *Pater Patriae*, 98; and the Medici, 106, 187; seal of, 109; and the Volterranean riots, 126; and ecclesiastical appointments, 130; and the Pope, 148, 149;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 153; its authority limited, 157; Piero di Lorenzo and, 186; get Medici jewels, 187; Charles VIII and, 190; *Accoppiatori* and, 191; watch the bonfire of vanities, 192; Alexander VI and, 197; and Savonarola, 198, 200; and Cardinal Giovanni, 208; war drains the resources of, 210; and a national militia, 211; and Lorenzo di Piero's title, 220; abolition of, 264; and the Medici library, 316

Gorini, Simonetta, 233

Gozzoli, Benozzo (c. 1420-97), 67, 110-12, 320-1

Grandi, and government of Florence, 28; and Cosimo di Giovanni, 43; Medici declared to be, 52; become eligible for election to office, 61

'Great Schism', the (1378-1417), 34

Greek Orthodox Church, 64, 65, 67

Grocyn, William (c. 1446-1519), 170

Grosso, Niccolò, 76, 318

Guadagni family, 58

Guadagni, Bernardo, 49, 51-2

Guasconi family, 58

Guicciardini family, 58

Guicciardini, Francesco (1483-1540) , 315; on Cosimo *Pater Patriae*, 63; on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46, 157; on Capponi and Charles VIII, 190; on the French in Naples, 193; on French artillery, 195; on the sack of Prato, 213-14; on Giulio de' Medici, 233; on Giovanni delle Bande Nere, 242; on Clement VII, 243; on Cardinal Passerini, 248; on the aftermath of the siege of Florence, 251; eulogizes Alessandro de' Medici, 254; leader of the *Palleschi*, 256, 257; and Cosimo I, 257, 258, 264; Varchi on, 263

Guicciardini, Giovanni, 55, 56

Guicciardini, Luigi, 160

Guicciardini, Piero, 56

Guilds, trade, Florentine, 25-6; and *Signoria*, 26; doth and wool, 33; *Arte del Cambio*, 33, 73; *Arte di Por Santa Maria*, 71; and the Cathedral dome, 72; commission statues for Orsanmichele, 73; and number of working-days per year, 119; on verge of ruin, 210; of the Calimala, 319-20

Hadfield, Charles, 325

Handel, George Frederick (1685–1759) , 300

Hanno, *elephant belonging to* Pope Leo X, 226

Henry VIII, King of England (1491–1547) , 239, 247–8

Henry II, King of France, *see* Orléans, Henri de Valois,
Duke of

Henry IV, King of France (1553–1610) , 281

Holy Leagues, Florence, Milan, the Pope and Venice, 85;
Alexander VI' s, 194; mercenaries in battle, 195; Savonarola
and, 196; League of Cambrai, 207, 223; Julius II' s, 208,
209, 211–12, 214

Humanists, Cosimo *Pater Patriae*, 37–8; Albizzi and, 43–
4; friends of Cosimo *Pater Patriae*, 43, 46, 47; Piccolimini
and Parentucelli, 88; and vernacular poetry, 170

Imola, 107, 128, 129, 131, 132

Insignia, of Florence, 26, 33, 313; of the Medici, 30,
48, 102, 111, 313, 319, 323; of *Arte della Lana*, 33; of
Cosimo *Pater Patriae*, 76, 111; of the Medici bank, 87; Valois
lilies, 102; seal of the *Signoria*, 109; standard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17; of citizens of Florence, 215; Cardinal
Giovanni' s personal device, 216; of *Del Cimento*, 284;
Peruzzi family emblem, 315; arms of Piero di Cosimo, 320; the

Castracani leopard, 321; Francesco I and the Medici emblem, 331

Jews, 129, 279, 297, 307

Joanna, Archduchess of Austria, *see* Medici, Joanna de' , Grand Duchess

John VII Paleologus, Emperor of the East (*c.* 1425-48) , 83; and the Pope, 64; enters Florence, 66; and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67, 68; and the Florentine-Milanese alliance, 83; Gozzoli and, 110

Kallistos, Andronicus, 122

Knight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267

Knights of Santo Stefano, 266

La Badia, monastery of, 73

Ladislaus, King of Naples, 35

Lama, Guaspare di Zanobi del, 109

Landini, Taddeo, 328

Landino, Cristoforo, 103, 122

Landucci, Luca, on Italian warfare, 151; on the attack on Colle, 152; on an alleged assassin, 158; and the influence of

Savonarola, 193; on the burning of Savonarola, 200; on the national militia, 211; his confidence, 211-12

Lannoy, Charles de, 241

Lascaris, Giovanni, *called* Rhyndacenus (c. 1445-1535) , 169, 228

Latimer, William, 170

Latino, Cardinal, 116

Lenzi, Lorenzo, 185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 168, 228, 240, 324

Leoni, Piero, 173, 174

Libraries, of San Giorgio Maggiore, Venice, 54, 315; the Medici, 69, 88, 107, 169, 187, 240, 299; Vatican, 69; of San Bartolommeo, 73; *Biblioteca Laurenziana*, 240, 326; Biblioteca Nazionale, 332; the Palatina, 332

Linacre, Thomas (c. 1460-1524) , 170

Lions of Florence, 119, 173, 327

Lippi, Anniballe. 330

Lippi, Filippino (c. 1458-1504) , 165, 168, 319; his birth, 93;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 167; his mural at Poggio a Caiano, 322

Lippi, Fra Filippo, *called* Lippo Lippi (c. 1406–69) ; his history, 92–3; his behaviour, 93; Cosimo *Pater Patriae* and, 93–4; Botticelli and, 109; *The Virgin Adoring the Child*, 110, 320; his altarpiece in San Lorenzo, 316; *Coronation of the Virgin*, 319

Lombardi, Giovanni, 330

Lorraine, Charles, Prince of, 288, 290

Lorraine, Francesco II, Duke of, *later* Francis I, Holy Roman Emperor (1708–65) , 309

Louis XI, King of France (1423–83) , 102, 149, 182

Louis XII, King of France (1462–1515) , 201, 207, 208, 219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 (1638–1715) , 281; Marguerite-Louise and, 288, 291, 293–4, 295, 296; and Cosimo III, 292

Lucca, 42, 83, 150, 210

Lucretius, *prop.* Titus Lucretius Carus, 45

Luther, Martin (1483–1546) , 237, 245

Machiavelli, Niccolò di Bernardo (1469–1527) , and the battle of Anghiari, 194; appearance, 210; organizes national militia, 211; on the sack of Prato, 214; *The Prince*, 214, 326; his advice sought, 219; *Mandragola*, 227; his papers, 332

Maddalena, Cosimo' s *slave-girl*, 39-40

Madeleine de la Tour d' Auvergne, *see* Urbino, Duchess of

Maffei, Fra Antonio, 136, 137-8, 141

Maffei, Raffaele, 141

Mahomet II, 'the Conqueror' , Sultan of Turkey (1430-81) , 160

Malavolti, Federigo, 51

Malespini family, 43

Manetti, Antonio, 317

Manetti, Giannozzo, 61, 82

Manfredi, Taddeo, 128

Mann, Sir Horace, 325, 328

Mannaioni, Giulio, 319

Mantua, Francesco Gonzaga, Marquis of, 194, 195-6, 206

Manuel I, King of Portugal (1469-1521) , 226

Marco da Fienza, 330

Margaret of Parma, *see* Medici, Margaret de'

Marguerite Louise of Orléans, *see* Medici, Margaret Louise de'

Maria Maddalena, Archduchess of Austria, *see* Medici, Maria Maddalena de' , Grand Duchess

Maria Theresa, Empress of Austria (1717-80) , 309

Mariano, Fra, 180, 181

Marie de' Medici, Queen of France (1573-1642) , 281

Marsuppini, Carlo, 44, 47, 48, 313

Martelli family, 57

Martelli, Camilla, *see* Medici, Camilla de'

Mary, Queen of France, 219

Masaccio, *prop.* Tomasso Guidi (1401-28?) , 92, 319

Masolino da Panicale (1383-1447) , 319

Maximilian I, Holy Roman Emperor (1459-1519) , and Anne of Brittany, 183; joins the Holy League, 194; and Julius II, 207; Leo X and, 220; death of, 237

Mazarin, Jules, Cardinal, *orig.* Giulio Mazarini (1602-61) , 288

Medici, the, origins of, 30; insignia of, 30; public service, 30-1; the Albizzi and, 43, 55, 212; the Martelli

and, 57; sentence of banishment revoked, 58; opposition to, 104; Gozzoli and, 110; and Poliziano, 122; and the Pazzi, 131, 132; *Signoria* declares them banished, 187; Savonarola and, 191; restoration of, 212, 214, 216; election of a Medici Pope, 217; the Sacred College and, 235; and Henry of Navarre, 281; and the Inquisition, 297; the Medici holidays abolished, 310; bequest of the Medici treasures, 310-11; and the Palazzo Medici, 317-18; the Medici collections, 324, 332

Medici, Alessandro de' , *illegitimate son of* Lorenzo, Duke of Urbino *or of* Cardinal Giulio, 239, 257, 262; his parentage, 236; his unpopularity, 248; Clement VII' s plans for, 251; and Ippolito, 252-3; Florentine resentment against, 253-4; his marriage and death, 254-5; and Lorenzaccio di Pierfrancesco, 255; assassination of, 256

Medici, Alfonsina de' , *née* Orsini, 178, 187, 236

Medici, Anna Maria Francesca de' , *née* Anna Maria Francesca of Saxe-Lauenberg, 302-3

Medici, Anna Maria Luisa di Cosimo de' , *see* Anna Maria, Electress Palatine

Medici, Ardingo de' , 30

Medici, Averardo de' , 31

Medici Bank, *see* Bank, Medici

Medici, Bianca de' , *née* Capello, 275-6, 278, 329, 330

Medici, Bianca di Piero de' , *see* Pazzi, Bianca

Medici, Camilla de' , *née* Martelli, 272-3

Medici, Carlo de' , *illegitimate son of* Cosimo *Pater Patriar*, 40, 93, 314

Medici, Caterina di Lorenzo de' , Duchess of Urbino *and later* Queen of France (1519-89) , 239, 280; birth of, 235; created Duchess of Urbino, 236; her marriage, 252

Medici, Christine de' , *née* Christine of Lorraine (1565-1636) , 280, 283

Medici, Clarice de' , *née* Orsini, Lucrezia de' Medici on, 114-15;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 116, 145-7; her wedding celebrations, 117-18; at Pistoia, 145; and Poliziano, 145; her temperament, 146; and her children, 147, 162; her death, 147; and Giovanni' s birth, 202; and Botticelli' s *Portrait of a Young Woman*, 322

Medici, Clarice di Piero de' , *see* Strozzi, Clarice

Medici, Contessina de' , *née* de' Bardi, 43, 47; marriage, 38; personality, 39; Donatello' s bronze head of, 91

Medici, Contessina di Lorenzo de' , *see* Ridolfi, Contessina

Medici, Cosimino di Giovanni de' , 96

Medici, Cosimo de' , *illegitimate son of* Cosimo I, 266

Medici, Cosimo di Ferdinando de' , *later* Cosimo II, Grand Duke of Tuscany (1590-1620) , 281-2

Medici, Cosimo di Giovanni de' , *Pater Patriae* (1389-1464) , 32; imprisoned, 19, 50, 51, 200; education, 37; and humanism, 37-8; his personality, 38, 41; his marriage, 38, 39; and his slave-girl, 39-40; and war with Lucca, 42-3; his friends, 44, 45-7; and Filelfo, 48; and the Albizzi plot, 48, 49-52; commissions a library for San Giorgio Maggiore, 54; in exile, 54-5; returns to Florence, 58; banishes his enemies, 58-9; in politics, 59-60, 61-3; his unostentatious behaviour, 60, 73; Vespasiano da Bisticci on, 60, 97-8; Pius II on, 63; Guicciardini on, 63; and Council of Florence, 64, 65-6; his interest in philosophy, 68-9; and Ficino, 68-9, 77; his library, 69, 88; a generous patron, 69, 71, 73; and Brunelleschi, 70; and Ghiberti' s reliquary, 70; his munificence, 73-4; his new palazzo, 75-6; his love of country life, 77; and his villas, 77, 78, 316; and Florence' s foreign policy, 79, 82-6; and Francesco Sforza, 82; the Venetian ambassador on, 85; and Calixtus III, 86, 157; the banker, 86-8, 104, 129; and Pius II, 88; and Donatello, 91, 92; and Filippo Lippi, 93-4; his respect for artists, 94; and Fra Angelico, 94; on painters, 94; in old age, 94-5, 96; and his grandson, 96; death of, 97; his funeral, 98, 101-2; memorial to, 98, 319; in the Magi pageant, 111; Gozzoli and, 111; Savonarola and, 180; Leo X on, 261; Novices' Chapel, Santa Croce, 313; and Botticelli' s *Adoration of the Magi*,

320; and Luca Pitti, 328; statue to, 331; and the old sacristy of San Lorenzo, 317

Medici, Cosimo di Ferdinando de' , *later* Cosimo III, Grand Duke of Tuscany (1642–1723) , his temperament, 287; his appearance, 288, 292, 297; his marriage, 288–9, 290, 291, 294–5, 328; in *Il Mondo Festeggiante*, 289; travels abroad, 292; economic problems, 293, 296; a bigot, 297–8, 306; punishment under, 298; levies taxes, 298–9, 307; and Grand Prince Ferdinand, 301; worried and ill, 303–4; and the Tuscan succession, 305; his religious zeal, 305–6; death of, 306; and the Villa Medici, 318; and the Cathedral façade, 324; and the Villa Ambrogiana, 333

Medici, Cosimo di Giovanni de' , *later* Cosimo I, Grand Duke of Tuscany (1519–74) , 312; elected to power in Florence, 257–8; Cellini on, 258; and his father, 261–2; his appearance, 262; his childhood, 262; his nature, 262–3, 267–8, 270; Varchi on, 263; and the *Fuorosciti*, 263–4; and Charles V, 264; his marriages, 264, 273; his ruthlessness, 264–5; his ambition, 265–6; Grand Duke, 266; creates the Florentine navy, 266–7; his pleasures, 267; and his wife, 269, 272; the children of, 269; and the death of his daughter, 269–70; his austerity, 270; attempted assassinations of, 270–1; and his son Francesco, 272; his mistresses, 272–3; death of, 273; his achievements, 273–4; and his daughter-in-law, 275; Giambologna's equestrian statue of, 280, 331; and the Giardino dei Semplici, 315; and

his villas, 316, 330; and the lions of Florence, 327, Pitti Palace altered for, 328; his *Landsknechte*, 329

Medici, Don Giovanni de' , *illegitimate son of* Cosimo I, 324

Medici, Eleonora de' , *daughter of* Don Garzia of Toledo (1556–76) , 277

Medici, Eleonora de' , *née* Eleonora Toledo (1522–62) , 264, 268–9, 271, 272, 328

Medici, Eleonora de' , *née* Gonzaga, 304

Medici, Ferdinando di Cosimo de' , Cardinal, *later* Ferdinando I, Grand Duke of Tuscany (1549–1609) , Grand Duke, 279–80; his lavish expenditure, 280; wedding celebrations for, 280–1; and Ponte Vecchio, 312; his arms, 313; and Santa Trinità, 328; and Bianca Capello, 329; and Villa Medici, Rome, 330; erects monuments in Piazza Santa Trinità, 331

Medici, Ferdinando di Cosimo de, *later* Ferdinando II, Grand Duke of Tuscany (1610–70) , and Galileo, 282, 317; his appearance, 283; his temperament, 283, 285; and *Del Cimento*, 284; his interest in mosaic, 285; and his brother Gian Carlo, 286; and his son Cosimo, 287, 288; and Marguerite-Louise, 290, 291; death of, 293; and the Grand Ducal Library, 332

Medici, Ferdinando di Cosimo de' , Grand Prince (1663–1713) , 290, 300–1, 304, 320

Medici, Filigno di Conte de' , 31

Medici, Filippo di Francesco de' , 275

Medici, Francesco di Cosimo de' , Grand Duke of Tuscany (1541–87) , 269; his nature and appearance, 275; and his mistress, 275, 276; his second marriage, 276; and his brother Pietro, 277; his interests, 278; and Palazzo della Signoria, 312

Medici, Francesco Maria di Ferdinando de' Cardinal (1660–1710) , 299–300, 304

Medici, Garzia di Cosimo de' (1547–62) , 269, 272

Medici, Gian Carlo di Cosimo de' , Cardinal (1611–63) , 286, 332

Medici, Gian Gastone di Cosimo de' , Grand Duke of Tuscany (1671–1737) , birth of, 293; his marriage, 302–3; his unhappiness, 303; returns to Florence, 304–5; Grand Duke, 307; his disreputable behaviour, 308–9; death of, 309, 310

Medici, Ginevra de' , *née* degli Albizzi, 96

Medici, Ginevra de' , *née* Cavalcanti, 43

Medici, Giovanni di Bicci de' (1360-1429) , his personality, 31-2, 40; his appearance, 31; in public life, 32; his business, 33, 34, 35; and John XXIII, 34, 36; and Martin V, 36; and his son Cosimo, 38, 44; advice to his sons, 40-1; a generous patron, 69, 71; and the Baptistery bronze doors, 70; his cornelian cameo, 70; his funeral, 98; his tomb, 317; his sarcophagus, 319

Medici, Giovanni di Cosimo de' (1421-63) , 39, 101; and Villa Belcanto, 77-8; and his father, 95; character and appearance, 95; public servant, 95; his slave-girl, 95-6; death of, 96; his tomb, 112, 321; and Botticelli's *Adoration of the Magi*, 320

Medici, Giovanni di Cosimo de' (1543-62) , 269

Medici, Giovanni di Giovanni de' , *called* Giovanni delle Bande Nere (1498-1526) , 242, 257, 261-2, 263

Medici, Giovanni di Lorenzo de' , *later* Pope Leo X, *q. v.* (1475-1521) , his education, 145; and his father, 147; and his brother, 187; flees from Florence, 187; his early preferment, 202-3; his appearance, 203; his nature, 203, 217; advice from his father, 204-5; travels abroad, 205; his pleasures, 206; Julius II impressed by, 208; military matters, 209-10, 212, 214; returns to Florence, 215-16; ill, 216; Pope, 217

Medici, Giovanni di Pierfrancesco de' , 115, 178, 185,
187

Medici, Giuliano di Lorenzo de' , Duke of Nemours (1478–1516) , his personality, 206, 216, 219; enters Florence, 215; *Gonfaloniere* of the Church, 219; his marriage, 219; created Duke, 222; his death, 223; his bastard, 236; his tomb, 240, 326

Medici, Giuliano di Piero de' (1453—78) , 102; Botticelli and, 109, 320, 322; Gozzoli and, 111; and Clarice Orsini, 117; delights in festivities, 120–1; his *giostra*, 121–2; and the Pazzi Conspiracy, 133–7; assassinated, 138; his illegitimate son, 144; his tomb, 240, 326; and Gozzoli's fresco, 321

Medici, Giulio de' , *illegitimate son of* Alessandro de' Medici, 257, 266

Medici, Giulio de' , *illegitimate son of* Giuliano di Piero; *later* Pope Clement VII, *q. v.* (1478–1534) , 237; his birth, 144; flees to Venice, 187; and his cousin Giovanni di Lorenzo, 205, 206; and Albizzi, 212; and Francis I, 220, 222; Leo X and, 232–3; Guicciardini on, 233; and election of Adrian VI, 238; his mode of living, 239; Pope, 239

Medici, Guccio de' , 30, 90

Medici, Ippolito de' , *illegitimate son of* Giuliano di Lorenzo, 239, 262; his birth, 223, 236; his unpopularity, 248; created cardinal, 252; and Alessandro, 252–3, 254; death of, 254

Medici, Isabella di Cosimo de' , *see* Orsini, Isabella

Medici, Joanna de' , Grand Duchess of Tuscany, *formerly* Archduchess of Austria, 275, 276, 312

Medici, Leopoldo di Cosimo de' , Cardinal (1617-75) , 284-5, 328, 332

Medici, Lorenzaccio di Pierfrancesco de' , *also called* Lorenzino (1514-47) , 255-6, 265

Medici, Lorenzo de' , *illegitimate son of* Cosimo I, 266

Medici, Lorenzo di Giovanni de' (1395-1440) , 32, 43; and the Albizzi anti-Medicean plot, 52; returns to Florence, 58; and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66; Gozzoli and, 111; and Villa of Careggi, 316

Medici, Lorenzo di Pierfrancesco de' , 178, 185, 187, 323

Medici, Lorenzo di Piero de' , *calle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449-92) , 102, 212, 257, 274; his appearance, 103, 113; his education, 103; on diplomatic missions, 103; and the anti-Medici plot, 105-6; Botticelli and, 109; Gozzoli and, 111; his happy temperament, 113; his enjoyment of life, 114, 118; his versatility, 114; his marriage, 114, 115; his wedding celebrations, 116-18; his delight in festivities, 120-1, 216; patron of artists, writers and scholars, 122, 164-8, 170, 322, 323; Poliziano on, 122, 174; and public office, 123, 125; respect for, 124; and Volterra, 125-7; the banker, 129, 158-9; and Sixtus IV, 129-30, 148, 150, 159; and

the Pazzi Conspiracy, 131-8, 140; wax effigies of, 142-3, 315; and his children, 144, 162; and his wife, 145-7; relationships with women, 146-7; the *Signoria* on, 149; and the defence of Florence, 150-1; his mission to Naples, 152-5; his generosity, 155; his authority and influence, 156-7, 160, 162; and Innocent VIII, 161-2, 202-3; his prestige, 162-3; connoisseur of architecture, 168; collector, 169; poet, 170-2; dying, 172-4; death of, 174; and Savonarola, 181, 182; and his son Giovanni, 202-5; his tomb, 240, 326; Verrocchio's fountain, 275; and Poggio a Caiano, 314; and Botticelli's *Adoration of the Magi*, 320; Filippo Strozzi and, 323-4

Medici, Lorenzo di Piero de' , Duke of Urbino (1492-1519) , 202, 212; and the election of Leo X, 217; the Pope's representative in Florence, 219; and Francis I, 220; his new title, 220; takes Urbino and assumes title, 224; Leo X and, 232; marriage and death of, 235; his unpopularity, 236; his bastard, 236; his tomb, 240, 326

Medici, Lucrezia de' , *née* Tornabuoni, 123; poet, 102, 170; wife and mother, 102; and Botticelli, 109; on Clarice Orsini, 114-15; at Lorenzo's wedding banquet, 117; and Lorenzo, 123; Poliziano confides in, 145; and Bagno a Morba, 172; portrayed by Ghirlandaio, 319

Medici, Lucrezia di Cosimo de, *see* Ferrara, Lucrezia d' Este, Duchess of

Medici, Lucrezia di Lorenzo de' , *see* Salviati, Lucrezia

Medici, Lucrezia di Piero de' , *see* Rucellai, Lucrezia

Medici, Luigia di Lorenzo de' , 115

Medici, Maddalena di Lorenzo de' , *see* Cibò, Maddalena

Medici, Margaret de' , later Margaret of Parma, 251,
255, 264

Medici, Marguerite-Louise de' , Grand Duchess of
Tuscany, *née* Marguerite-Louise of Orléans (1645–1721) , her
reluctance to marry, 288; and Ferdinand III, 288–9; and the
crown jewels, 289; bored and unhappy, 289–91; pregnancy and
illness, 290, 291, 293; her indiscreet behaviour, 290, 294,
296; and her mother-in-law, 293; asks for a separation, 294;
retires to a French convent, 295–6

Medici, Maria de' , *née* Salviati, 257, 261, 263, 269

Medici, Maria di Cosimo de' , 269

Medici, Maria di Francesco de' , *see* Marie de Medici,
Queen of France

Medici, Maria di Piero de' , *see* Rossi, Maria

Medici, Maria Maddalena de' , Grand Duchess of Tuscany,
formerly Archduchess of Austria, 282, 283, 332

Medici, Mario Bartolommeo de' , 55

Medici, Mattias di Cosimo de' , Prince (1613-67) , 285-6, 290, 332

Medici, Piccarda de, *née* Bueri, 32

Medici, Pierfrancesco di Giovanni de' , 115, 159, 255

Medici, Piero di Cosimo de' (1414-69) , birth, 39; *Accoppiatori*, 63; his poor health, 95, 101; on his father, 97; and his father' s monument, 98; his appearance and character, 101; the banker, 101-2, 104; and Ficino, 103; and the plot against the Medici, 105-6; and government of Florence, 107; his munificence, 107; Filarete on, 107; friend and patron of artists, 107-12; Botticelli' s *Fortitude*, 109-10; his tomb, 112, 321; and Donatello' s *Judith Slaying Holofernes*, 319; and San Miniato al Monte, 320; and Botticelli' s *Adoration of the Magi*, 320

Medici, Piero di Lorenzo de' (1471-1503) , 135, 173, 212; and his father, 174; his appearance, 177; his temperament, 177-8; and his cousins, 178; and the French invasion, 184, 185; and Charles VIII, 186; flees to Venice, 187; hopes to reinstate himself, 201; death of, 202; his tomb, 324-5

Medici, Pietro di Cosimo de' , 269, 277

Medici, Salvestro de' , 31

Medici, Vieri di Cambio de' , 34

Medici, Violante Beatrice de' , *née* Princess Violante Beatrice of Bavaria, 301, 304, 308, 320

Medici, Vittoria de' , Grand Duchess of Tuscany, *née* Della Rovere, 287, 293

Melani, Jacopo, 289

Mercenaries (*see also Condottieri*) , 42, 56, 125, 126, 139

Michelangelo, *prop.* Michelangiolo Buonarroti (1475–1564) , 168; on Ghiberti' s bronze doors, 71; 'kneeling windows' , 76; his history, 165; 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66; and Savonarola, 181; and Julius II, 207, 229; Leo X and, 229, 240; Clement VII commissions, 240; *Biblioteca Laurenziana*, 240, 326; and the defences of Florence, 249–50; his tomb, 312; and the Palazzo Medici, 318; his early work, 322; and the new sacristy at San Lorenzo, 326; his *David*, 326; and the commission for a *Hercules*, 327; and the Boboli Gardens, 328; his compasses, 331; his papers, 332

Michelozzi, Michelozzo di Bartolommeo (1396–1472) , and San Giorgio Maggiore, Venice, 54, 315; monastery of San Marco, 74; Cosimo *Pater Patriae* commissions, 75; and Palazzo Medici, 75, 76; and the Medici villas, 77, 95, 315, 316; and Medici bank in Milan, 87; and the pageant of the Magi, 111; and Palazzo della Signoria, 312; and the Novices' Chapel,

Santa Croce, 313, 317; and the tomb of John XXIII, 316; and the tabernacle of Santissima Annunziata, 320

Milan, Medici bank in, 87, 158; artists in, 167, 168; printing presses in, 169; Cardinal Giovanni in, 209; French troops occupy, 220; fall of, 238

Milan, Duchy of, government of, 27; Florence and, 42, 79–80, 83, 84, 106, 130, 149, 151; battle of Imola, 55; Venice and Naples declare war on, 84; Duke of Orléans and, 194; Spaniards and, 219; Francis I and, 222; Charles V and, 237

Milan, Dukes of, *see the Sforzas and Visconti*, Filippo Maria

Mino da Fiesole, 331

Mirandola, Pico della, *see* Pico della Mirandola, Count Giovanni Moncada, Don Ugo di, 241

Montaigne, Michel Eyquem de (1533–92) , 276

Monte Cassino Abbey, 202, 324–5

Montefeltro, Federigo da, *see* Urbino, Federigo
Montefeltro, Duke of

Montesquieu, Charles,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279

Montpensier, Anne-Marie-Louise d' Orléans, Duchesse de, *called* Mademoiselle, 292

Morello, *the horse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14

Museums and galleries,

Galleria dell' Accademia Carrara, Bergamo, 325

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 Boston, 325

Metropolitan Museum, New York, 330

Musée de Sèvres, 330

Musée du Louvre, Paris, 320, 330

Museo degli Argenti, 328

Museo dell' Accademia, 319, 326

Museo dell' Opera del Duomo, 320

Museo dell' Opera di Santa Croce, 315, 321

Museo Horne, 313

Museo Nazionale, 313

Museo Nazionale di Storia della Scienza, 331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315, 320

Pallavicini collection, Rome, 325

Uffizi, *look under* Florenc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320, 330

Naples, 34, 87, 158, 169

Naples and Sicily, Kingdom of, strife in, 27-8; Sforza a *condottiere* for, 81; Florentines expelled from, 83; France and, 84, 183, 186; declares war on Florence and Milan, 84; and Florence, 106, 150, 152, 155; Orsini estates in, 116;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s mission to, 152-5; Sixtus IV and, 159; Charles VIII in, 193; Spain and, 208; Leo X' s plans for, 219; Francis I and, 222

Napoleon I, Emperor of France, 330

Nardi, Jacopo, 213, 254

Nasi, Bartolommea dei, 146

Nemours, Duchess of, *see* Philiberte of Savoy, Princess

Nemours, Duke of, *see* Medici, Giuliano di Lorenzo de'

Neroni, Diotisalvi, 104, 105, 106, 124

Niccoli, Niccolò, his personality and interests, 44-5; and Bracciolini, 45, 46; Bruni disapproves of, 46; and Traversari, 47; and Filelfo, 47, 48; his books, 69; and Dante' s poetry, 171

Nocera, Bishop of, 244

Nori, Francesco, 137, 138

Orange, Philibert, Prince of (*r.* 1502–30) , 242, 244,
250

Orcagna, Andrea, *prop.* Andrea di Cione (*c.* 1308–68) ,
314

Orléans, Henri de Valois, Duke of, *later* Henry II, King
of France (1519–59) , his marriage, 252

Orsanmichele, church of, commerce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20; Ghiberti' s *St Matthew* for, 73, 317; Donatello' s
work commissioned for, 90; historical note on, 312;
Ghiberti' s bronzes in, 317

Orsini family, 116–17, 149

Orsini, Alfonsina, *see* Medici, Alfonsina de'

Orsini, Clarice, *see* Medici, Clarice de'

Orsini, Isabella, *née* Medici, Isabella di Cosimo de' ,
269, 273, 277

Orsini, Jacopo, 114

Orsini, Paolo, 184

Orsini, Paolo Giordano, 269, 277–8

Orsini, Rinaldo, Archbishop of Florence, 130

Orsini, Troilo, 277

Orvieto, episcopal palace of, 247

Pageants, *see* Festivals

Palazzi,

Alessandri, 117

Altoviti, 314

Antinori, 330

Bardi, 39, 58, 75

Bellini, 280, 331

Capponi, 313

Corsini, 314

Davanzati, 313

degli Acciaiuoli, 315

dei Giudici, 330, 331

della Signoria (*later renamed* Palazzo Vecchio, *q. v.*) ,
Cosimo *Pater Patriae* in, 19, 49, 51, 58, 83; *Alberghettino*,
15, 19, 200; *Priori* live in, 26; the *Vacca*, 27, 50, 57, 139,
186, 254; Albizzi plans to attack, 55–6; Soderini at, 104;
and festival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20; Princess Eleonora
of Naples at, 121; and the Pazzi conspiracy, 138–40, 141;
Piero di Lorenzo at, 186; the bonfire of vanities opposite,

192; celebrations for the election of Leo X, 218; re-named, 257; historical note on, 312; Donatello' s works in, 318; Michelangelo' s *David* in front of, 326

Ferranti, 66

Gianfigliuzzi, 314, 325

Guadagni, 315

Guicciardini, 315

Martelli, 57

Medici, building of, 75-6; courtyard of, 90; Donatello, 91-2; Filippo Lippi, 93; Della Robbia, 108; Uccello, 108; Pollaiuolo, 108; Botticelli, 109; Gozzoli, 110;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s wedding celebrations, 117-18; Princess Eleonora of Naples entertained at, 121; and the Pazzi Conspiracy, 135, 136; Michelangelo at, 166; plundered, 187; Charles VIII at, 190; Giovanni di Lorenzo born in, 202; celebrations for the election of Leo X, 218; council meetings in, 220; Duke of Nemours dying in, 223; picture of Clement VII on façade of, 249; murder in, 269; Cosimo I taken ill at, 273; Medici shield on, 313; Medici Library kept at, 316; historical note on, 317-18

Medici-Riccardi, 318

Pazzi, 141, 162

Pazzi-Quaratesi, 321

Pitti, 104, 274; grandiose, 76; the Ducal Palace, 271; Cosimo I dies in, 273; Ferdinando I and, 280; Cosimo II extends, 282; wine sold at, 284; *Del Cimento* meets at, 284; Ferdinando II extends, 285; Sala della Stufa, 285; the collection of ivories, 286; Marguerite-Louise at, 291; Grand Duke Gian Gastone dies at, 309; Electress Palatine at, 309; historical note on, 328; murals in, 332

Pucci, 315

Rucellai, 29, 76, 313

Salviati, 261, 321

Spini-Ferroni, 314

Strozzi, 168, 323

Tornabuoni, 102

Vecchio (*formerly* Palazzo della Signoria, *q. v.*) , 274; the *Palleschi* at, 257; the Ducal Palace, 269; decoration of the courtyard, 275; laboratory of Duke Francesco in, 278; Ferdinand I' s banquet in, 281; historical note on, 312; the fountain and murals at, 330

Palleschi, 217, 256, 257

Palmieri, Matteo, 28

Panciaticchi, Andrea, 145

Papacy, the, the ‘great schism’ , 34; and the Medici bank, 35, 36, 37, 88, 89; and the Eastern Church, 67; Sforza a *condottiere* for, 81; and the French invasion of Italy, 186; Leo X enjoys, 218; a pro-Medici Sacred College, 235

Papal States, near-anarchy in, 27; Bologna and, 65; alum deposits in, 89; and the French army, 184; Urbino becomes part of, 285

Parentucelli, Tommaso, Bishop of Bologna, *later* Pope Nicholas V., *q. v.* , 87, 88

Parigi, Alfonso, 271, 278, 317, 328

Parigi, Giulio, 271, 317, 328

Parma, 219, 222, 237, 238, 247

Parma, Duke of, *see* Farnese, Ottavio

Parmigianino, *prop.* Girolamo Francesco Maria Mazzola (1503-40) , 300

Pasquini, Bernardo (1637-1710) , 300

Passerini, Cardinal Silvio, 248

Patch, Thomas, 325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65, 66, 110

Pavia, Lazaro di, 173

Pazzi bank, 129, 131

Pazzi Conspiracy, the, 131–42, 158

Pazzi family, their history, 131; after the Conspiracy, 141, 155; publicly disgraced, 142

Pazzi, Andrea de' , 131

Pazzi, Bianca, *née* Medici, Bianca di Piero de' , 102

Pazzi, Francesco de' , and Pazzi Conspiracy, 131, 132, 135, 137; executed, 140

Pazzi, Guglielmo, 102, 131, 138, 141

Pazzi, Jacopo di Messer Andrea de' , 131–2, 134, 141

Pazzi, Pazzo de' , 131

Pazzi, Piero di Messer Andrea de' , 131

Pazzi, Renato di Messer Andrea de' , 141, 158

Penni, Gian-Francesco, 240

Pepys, Samuel (1633–1703) , on Cosimo III, 292

Peri, Jacopo (1561–1633) , 281, 300

Peruzzi family, 58, 66, 315

Peruzzi, Ridolfo, 55, 57

Petraia, castle of, 280

Petrarch, Francesco Petrarca (1304–74) , 227

Petrucchi, Alfonso, Cardinal, 217, 232, 233, 234

Petrucchi, Borghese, 232

Petrucchi, Cesare, 138–9

Philibert, Prince of Orange, *see* Orange, Prince of

Philiberte of Savoy, Princess, Duchess of Nemours, 219,
223

Philip V, King of Spain (1683–1746) , 305

Piacenza, 219, 222, 237, 238, 247

Piccolomini, Aeneas Silvius, *later* Pope Pius II, *q. v.*, on
Cosimo di Giovanni, 63; on Parentucelli, *later* Nicholas V, 88

Pico della Mirandola, Count Giovanni (1463–94) , 164–5,
174, 181, 185

Pierino da Vinci, 323

Piero della Francesca (*c.* 1420–92) , 332

Pierozzi, Antonio, Archbishop of Florence, 74, 95

Pietro da Cortona, 285

Pietro Leopoldo, Grand Duke of Tuscany, 333

Pisa, conquest of, 33, 34; Archbishop of, 130; Lorenzo di Piero and, 169–70; and France, 186, 187; Savonarola greets Charles VIII in, 188; Florence and, 197, 208; School of Botany at, 274; college for scholars at, 279

Pisano, Andrea (*c.* 1270–1349) , 70, 180, 316

Pitti family, 123

Pitti, Luca, his personality, 60; *Gonfaloniere*, 62; *Accoppiatore*, 63; and the Medici, 103–4, 105, 106, 123, 328; pardoned, 106; his palace, 271, 328

Plague, in Ferrara, 66; and new doors for the Baptistery, 70; in the Imperial army, 247; in the French forces, 249; in Florence, 250, 283; in Tuscany, 293

Plato, 68, 164

Platonic Academy, 69, 332

Plethon, Giorgios Gemistos (*c.* 1355–1450) , 68

Poliziano, Angelo, *prop.* Angelo Ambrogini, (1454–94) , his history, 122; on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22; 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35, 137, 157, 164, 173–4; and the Pazzi Conspiracy, 137, 138; and the execution of Salviati, 140; tutor to children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45, 323;

Clarice de' Medici and, 145, 146; and Savonarola, 181; his papers, 332

Pollaiuolo, Antonio, *prop.* Antonio di Jacobo Benci, (1429-98) , 110, 165, 167, 320

Pollaiuolo, Piero, *prop.* Piero di Jacobo Benci, (1443-96) , 108-9, 168

Pollaiuolo, Simone del, *called* il Cronaca (1457-1508) , 323

Pontormo, Jacopo Carrucci da (1494-1557) , 274, 314, 322

Popes,

Adrian VI (*r.* 1522-3) , 238-9, 240

Alexander V (*r.* 1409-10) , 34, 35

Alexander VI (*r.* 1492-1503) , 193, 194, 196-7, 205

Benedict XIII, *Antipope at Avignon*, 1394-1417, 34

Calixtus III (*r.* 1455-8) , 86

Clement VII, *né* Giulio di Giuliano de' Medici, *q. v.* (*r.* 1523-34) , election of, 239; a generous and discriminating patron, 240; his indecision, 240, 244; his foreign policy, 240-1, 242; urges defence of Rome, 243; and Cellini, 246-7; surrenders, 247; escapes, 247; and Henry VIII' s divorce, 247-8; his effigy torn to pieces, 248; and the surrender of

Florence, 251; and Alessandro de' Medici, 251, 254; and Caterina de' Medici, 252; illness and death of, 252-3; the marriage of his daughter, 255; and the boy Cosimo I, 262; and the Medici Library, 316; Michelangelo and, 318, 327; Raphael and, 326; his tomb, 327

Eugenius IV (*r.* 1431-47) , succeeds Martin V, 51; and San Giorgio Maggiore, 54; and the Medici, 56; Rinaldo degli Albizzi and, 57; Cosimo *Pater Patriae* and, 58, 74; and Council of Florence, 64, 66, 67; and Council of Bâle, 64-5; his golden tiara, 70; and completion of the Cathedral dome, 73

Gregory XII (*r.* 1406-15) , 34, 35, 36

Gregory XIII (*r.* 1572-85) , 277

Innocent VIII (*r.* 1484-92) , succeeds Sixtus IV, 160; 'a rabbit' , 161; 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61, 182, 202-3; Savonarola and, 182; and Giovanni di Lorenzo, 203

John XXIII *né* Baldassare Cossa, *q. v.* *Antipope* to Popes Benedict XIII *and* Gregory XII, (1410-15) , background and personality, 34; and King of Naples, 35; accusations against, 35-6; last years, 36; his will, 36; Cosimo *Pater Patriae* and, 39; and Bracciolini, 45; his monument, 71, 75, 98, 316; Giovanni di Bicci and, 87

Julius II (*r.* 1503-13) , 217, 228; appearance and temperament, 207; his military exploits, 207-8; and Giovanni

di Lorenzo, 208; dying, 216; and the Duke of Urbino, 223; and Michelangelo, 229; and Raphael, 229, 332; and the Laocoön, 325

Leo III, 326

Leo IV, 326

Leo X, *né* Giovanni di Lorenzo de' Medici, *q. v.* (*r.* 1513-21), election of, 217; his appearance, 216; his enjoyment of the papacy, 218, 224; and the House of Medici, 219; his reception in Florence, 220-2, 314, 324; and the Duke of Urbino, 222, 223-4; and Francis I, 222-3; and his brother Giuliano, 223; his extravagance, 224, 227; Vettori on, 224; his dinners, 225-6; his amusements, 226-7, 230-2; his expenditure on Rome, 227-8; a generous patron of writers and scholars, 228; and Michelangelo, 229, 240, 327; makes enemies, 232-3;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of, 233-4; creates a pro-Medici Sacred College, 235; and Charles V, 237; and Luther, 237; godfather to Cosimo I, 261; his coat of arms, 315; and the Medici Library, 316; Raphael and, 325, 326

Martin V (*r.* 1417-31), 36, 37, 56, 70, 314

Nicholas V, *né* Tommaso Parentucelli, *q. v.* (*r.* 1447-55), 87

Paul II (*r.* 1464-71), 103, 125, 129

Paul III (*r.* 1534-49), 264

Pius II, *né* Enea Silvio Piccolomini, *q. v.* (*r.* 1458–64) , on Florentines, 38; on Cosimo *Pater Patriae*, 38, 63; on Francesco Sforza, 81; and the Medici bank, 88; and Cosimo *Pater Patriae*, 88

Pius III (*r.* and *d.* 1503) , 207

Pius IV (*r.* 1559–65) , 331

Pius V (*r.* 1566–72) , 266, 267

Sixtus IV, *né* Francesco della Rovere (*r.* 1471–84) , 125; his appearance, 128; nepotism, 128–9; 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29, 130, 159; and the Pazzi Conspiracy, 132, 133, 155; and Florence, 148, 159; Tuscan bishops excommunicated, 150; and Naples, 154, 159; and the Florentine deputation, 160; death of, 160

Sixtus V (*r.* 1585–90) , 277

Portinari family, 43

Portinari, Folco, 316

Prato, 32, 124, 125, 213–14

Printing, 44, 46, 169

Processions, Martin V leaves Florence, 36; to celebrate completion of the Baptistery bronze doors, 71; to celebrate completion of the Cathedral dome, 73; escort of Princess Eleonora of Naples, 121; Charles VIII enters Florence, 189–

90; Leo X enters Florence, 221; Francis I and, 222; Christine of Lorraine enters Florence, 280

Pro paganda Fide, 279

Ptolemy, *prop.* Claudius Ptolemaeus, 280

Pucci, Giovanni, 52

Pucci, Lorenzo, 232

Pucci, Puccio, 52, 61, 62

Pulci, Luigi (1432-84) , 116, 164, 323

Quercia, Jacopo della (c. 1367-1438) , 70

Quintilian, *prop.* 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45

Rangone, Bianca, 209, 235

Rangone, Ercole, Cardinal, 235

Raphael, *prop.* 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 , Leo X and, 229, 325; Clement VII and, 240, 326; *Madonna del Baldacchino*, 300-1; his portrait of Julius II, 332

Relics, holy, finger of St John the Baptist, 36; belonging to the Cathedral, 120; *Volto Santo*, 305; Cosimo III' s sacred collection, 305

Renaissance, Council of Florence and, 68; versatility of artists of, 70; Brunelleschi' s church of San Lorenzo, 72

René I, Duke of Anjou (1409–80) , 85

Renzo da Ceri, 243

Riario, Girolamo, and Sixtus IV, 128; at Imola, 129; and the Pazzi Conspiracy, 131, 132, 133;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 134, 156; seeks vengeance on Florence, 148, 159; his ambitions, 160

Riario, Piero, Archbishop of Florence, 128, 130

Riario, Raffaele, Cardinal, and the Pazzi Conspiracy, 134–5, 148;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 135, 140–1; at Palazzo Medici, 136–7; and assassination of Giuliano di Piero, 138; his pallor, 141; his dinner party, 224; and Leo X, 232, 233, 234; his palace confiscated, 239

Riccardi family, 76, 318

Ricci, House of, 35

Ricci, Sebastiano, 300

Ridolfi family, 321

Ridolfi, Antonio, 137, 138

Ridolfi, Contessina, *née* Medici, Contessina di Lorenzo de' , 115, 221

Ridolfi, Lorenzo, 247

Ridolfi, Niccolò, Cardinal, 235, 248

Ridolfi, Piero, 220, 221

Rinuccini, Alamanno, 122, 157

Riots, *Ciampi*, 25–6, 31; in Volterra, 125–7; after the Pazzi Conspiracy, 140; after cancellation of ordeal by fire, 199

Robbia, Andrea della (1435–1525) , 317

Robbia, Luca della (c. 1400–82) , 108, 138, 320, 321

Robert, King of Naples, 39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Council of Florence, 64; and Greek Orthodox Church, 65, 67

Rome, Medici offices in, 34, 35, 36, 87, 114, 158; Cosimo *Pater Patriae* in, 39–40; Eugenius IV driven from, 56; artists in, 70, 72, 90, 167;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in, 103, 125; Lorenzo the Magnificent's proxy wedding in, 116; anti-Medici conspirators in, 131; and the Pazzi Conspiracy failure, 148; printing presses in, 169; falls to Charles VIII, 193;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on, 204; crime and corruption in, 205; Giovanni di Lorenzo in, 205, 206; conclave in, 216–17; celebrations for the election of Leo X, 218; under Leo X, 228; Charles V's forces advance on, 241–3; sack of, 244–5

Belvedere, 226

Castel Sant' Angelo, 241; executions at, 205, 234;
Clement VII takes refuge in, 241, 244; fugitives in, 244-5;
the attack on, 246-7; Queen Christina at, 330

Monte Testaccio, 227

Piazza del Popolo, 228

Santa Maria in Dominica, church of, 228

St Peter' s Basilica, Florentine deputation in, 160;
under reconstruction, 216, 228; corpse of Clement VII
desecrated in, 253; threatened destruction by fire, 326

St John in Lateran, church of, 88, 305, 327

Via Ripetta, 228

Romualdo, St, 321

Rondinelli, Fra Giuliano, 198

Rosa, Salvator (1615-73) , 286

Rossellino, Bernardo, 313

Rossi, Leopetto, 102

Rossi, Luigi, 235

Rossi, Maria, *née* Medici, Maria di Piero de' , 102

Rossi, Roberto de' , 37

Rosso, Giovanni, 274

Rovere, Francesco della, *see* Pope Sixtus IV

Rovere, Francesco Maria della, *see* Urbino, Francesco
Maria I and II, Dukes of

Rovere, Giovanni della, 129

Rovere, Giuliano della, Cardinal, *later* Pope Julius II,
q. v., 161

Rovere, Leonardo della, 130

Rovere, Vittoria della, *see* Medici, Vittoria de'

Rubens, Peter Paul (1577-1640), 332

Rucellai family, 314

Rucellai, Bernardo (1449-1514), 102

Rucellai, Giovanni, 29, 227, 313

Rucellai, Lucrezia, *née* Lucrezia di Piero de' Medici,
102

Rucellai, Palla, 257

Ruggieri, Giuseppe, 319, 328

Ruspanti, 308

St Stephen, Prato, church of, 93

Salutati, Antonio di Messer Francesco, 87

Salviati, Averardo, 141

Salviati, Francesco, Archbishop of Pisa, waits in Rome, 130; and the Pazzi Conspiracy, 131, 132, 133, 136, 137, 138–9; executed, 140

Salviati, Giacomo, 261

Salviati, Giovanni, Cardinal, 235

Salviati, Jacopo, 220, 247, 262

Salviati, Lucrezia, *née* Medici, Lucrezia di Lorenzo de' , 115

Salviati, Maria, *see* Medici, Maria de'

San Domenico Fiesole, convent of, 73, 94, 317

San Leo, fortess of, 236

Sanseverino, Federigo, Cardinal, 209, 231

Sansovino, Jacopo, *prop.* Jacopo Tatti (1486–1570) , 220, 221, 325

Santa Croce, Antonio, 246

Santo Spirito, Jerusalem, church of, 74

Sarto, Andrea del, *prop.* Andrea Vannucchi (1486-1531) ,
172, 220, 221, 300, 322

Sassetti, Francesco, 158, 323

Sauli, Cardinal, 233, 234

Savonarola, Girolamo (1452-98) , 178-82, 216; his effect
on Florentine morale, 185; and Charles VIII, 188; his power
in Florence, 191; differing attitudes to, 192-3; and the Holy
League, 196; and Alexander VI, 196-7; and the proposed ordeal
by fire, 198, 199; tortured, hanged and burned, 200;
Machiavelli' s contempt for, 210; his cell at San Marco, 317

Scarlatti, Alessandro (1659-1725) , 300

Schinner, Matthew, Cardinal, 220

Scoroncolo, *assassin of* Alessandro de' Medici, 256

Sforza, Ascanio, Cardinal, 203, 205

Sforza, Bianca, *née* Visconti, 80, 81

Sforza, Caterina, 128

Sforza, Francesco, Duke of Milan (1401-66) , and war
between Florence and Lucca, 42; his birth, 80; personality
and appearance, 81; Pius II on, 81; marriage, 81; and Cosimo
Pater Patriae, 82; Duke of Milan, 82, 85; and Florence' s
foreign policy, 83; and France, 84; and the Medici bank in
Milan, 87, 158; death of, 105

Sforza, Francesco Maria, Duke of Milan (*d.* 1535) , 240

Sforza, Galeazzo Maria, Duke of Milan (1444-76) , his instability, 105; his cruelty and extravagance, 123-4; 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24; his daughter' s marriage, 128; assassinated, 130

Sforza, Giacomo Attendolo (1369-1424) , 80-1

Sforza, Gian Galeazzo, Duke of Milan (1469-94) , 130, 151, 181, 183, 184

Sforza, Ippolita, *see* Calabria, Duchess of

Sforza, Isabella, Duchess of Milan, 183, 184

Sforza, Lodovico, Duke of Milan, *called* il Moro (1451-1508) , appearance, 151; character, 151-2; in power, 152;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 168, 173; and Charles VIII, 183, 184; proclaims himself Duke, 184; joins the Holy League, 194

Sieges, Lucca (1429-30) , 42-3; Rome (1527) , 244-6; Florence (1529-30) , 249-51; Volterra (1472) , 126

Sigismund, Holy Roman Emperor (1368-1437) , 34

Silvester, Guido, 231

Silvestri, Bartolommeo, 332

Silvestro, Fra, 200

Slaves, 23-4, 33, 39-40, 95, 266

Soderini, Francesco, Cardinal, 217, 232, 233, 234, 238

Soderini, Niccolò, 104-5, 106, 123

Soderini, Paolo Antonio, 155

Soderini, Piero, 210-11, 212-13, 214, 215

Soderini, Tommaso, 110, 123, 152

Spain, and Julius II' s Holy League, 208; and battle of
Ravenna, 208; Spanish forces advance on Florence, 211-12; and
sack Prato, 213; Leo X and, 219

Spini, Bartolommeo, 49

Spini, House of, 35, 37

Squarcialupi, Antonio, 165, 172

Stefano da Bagnone, Fra, 136, 137-8, 141

Stendhal, *pseud. of* Marie Henri Beyle, 325

Strozzi family, 314

Strozzi, Clarice, *née* Medici, Clarice di Piero de' ,
202, 248

Strozzi, Filippo the Elder (1428-91) , 137, 168, 323-4

Strozzi, Filippo the Younger (1489–1538) , 262, 323

Strozzi, Laodamia, 179

Strozzi, Lorenzo di Palla, 38

Strozzi, Marietta di Lorenzo, 118–19

Strozzi, Matteo, 58

Strozzi, Palla (1372–1462) , 38, and the Albizzi, 52;
and Rinaldo degli Albizzi, 55, 56–7; banished, 59;
Parentucelli and, 87; commissions Gentile da Fabriano, 314

Strozzi, Piero, 263–4

Stufa, Sigismondo della, 138

Sumptuary laws, 22, 24

Sustermans, Justus, 283

Switzerland, Swiss army in Lombardy, 209; Leo X and, 220

Tacca, Ferdinando, 286, 332

Tacca, Pietro, 328, 331

Tadda, Romolo del, 328, 332

Talenti, Simone, 329

Tasso, Giovanni Battista, 313

Tinucci, Niccolò, 51

Titian, *prop.* Tiziano Vercelli (*d.* 1576) , 328, 332

Tornabuoni family, 43, 102

Tornabuoni, Francesco, 114

Tornabuoni, Giovanni, 103, 106, 114, 178, 319

Tornabuoni, Lucrezia, *see* Medici, Lucrezia de'

Trade, in 15th century Florence, 20; guilds, 25-6;
merchants and, 28-9; wool, 33, 34, 152; silk, 42; in
decline, 293

Tranchedini da Pontremoli, Nicodemo, 83, 97

Traversari, Ambrogio, 44, 47, 51, 66, 67

Treaties,

Barcelona (1529) , 249

Lodi (1454) , 85

Montil-les-Tours (1452) , 84

Tribolo, Niccolò Pericoli, 271, 274, 323, 329

Trissino, Gian-Giorgio, 227

Turkey, and Constantinople, 64, 68, 85; Venice and, 79, 83; Florence and, 83; and Italy, 84, 159, 160; and Smyrna alum mines, 88; Savonarola' s prediction about, 182; battle of Lepanto, 266

Uccello, Paolo, *prop.* Paolo di Dono, 108, 320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315

University of Florence, 45, 46, 47–8, 170, 274

University of Padua, 282

University of Pisa, 274, 282, 297

University of Rome, 228

Urbino, Battista da Montefeltro, Duchess of, *née* Sforza, 332

Urbino, Caterina, Duchess of, *see* Medici, Caterina di Lorenzo de'

Urbino, Duchess of, *née* Madeleine de la Tour d' Auvergne, 235

Urbino, Duchy of, 219, 222, 224, 285

Urbino, Duke of, *see* Medici, Lorenzo di Piero de'

Urbino, Federigo da Montefeltro, Count of, later Duke of, loses an eye, 116; attacks Volterra, 126–7; and Eugenius

IV, 129; papal troops under, 150

Urbino, Francesco, 165

Urbino, Francesco Maria (I) della Rovere, Duke of, 212, 222, 223-4, 233

Urbino, Francesco Maria (II) della Rovere, Duke of, 285

Uzzano, Niccolò da, 29, 43, 48, 313

Valori, Filippo, 153, 155

Vannino, Ottavio, 332

Varchi, Benedetto, 250, 256, 263, 274, 329

Vasari, Giorgio (1511-74) , 328; on Donatello and Cosimo *Pater Patriae*, 91; on Donatello in old age, 92; on the wax effigies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142-3; 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s school, 165, 322; on Michelangelo, 165-6; on Verrocchio, 167; architect of the Uffizi, 271; and the Palazzo Vecchio, 274, 275, 278, 312; death of, 278; and Santa Maria Novella, 314; and Il Trebbio, 315; and the Pucci, 315; on Cafaggiolo, 318; and Botticelli's *Adoration of the Magi*, 320

Vatican, Library, 69; Sistine Chapel, 167; entry of Leo X into, 218; Palace, 228; Loggie di Raffaello, 229; Stanze di Raffaello, 229, 245, 325-6; Clement VII commissions artists for, 240

Veneziano, Domenico, 315

Venice, Medici office in, 34, 87; slave-market in, 39, 95; Medicean exiles in, 52, 54; San Giorgio Maggiore, 54, 315; Cosimo *Pater Patriae* leaves, 58; Neroni and Soderini in, 106; Verrocchio' s bronze of Colleoni in, 167; printing presses in, 169; Lorenzaccio stabbed in, 265

Venice, Republic of, government of, 27; and Cosimo *Pater Patriae*, 50-1, 82-3; and Fourth Crusade, 64; and Florence, 79, 82-3, 105, 106, 130, 186; conquests by, 79; Sforza a *condottiere* for, 81; and Lombardy, 82; declares war on Florence and Milan, 84; and France, 184; joins the Holy League, 194; League of Cambrai designed against, 207; and battle of Agnadello, 207, 208, 209

Veronese, Paolo, *prop.* Paolo Cagliari (1525-88) , 322

Verrocchio, Andrea del (1435-88) , 168; and the Medici tomb, 112, 321; and Giovanni di Piero' s helmet, 122;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 167, 315; Vasari on, 167; his bronze of Colleoni, 167; Leonardo da Vinci and, 168; his fountain, 275, 316; and the Medici emblem, 313; *David* and *Resurrection*, 316, 323; memorial to Cosimo *Pater Patriae*, 319; his *Putto* in Palazzo Vecchio, 330

Vespucci family, 325

Vespucci, Amerigo (1451-1512) , 193, 322

Vespucci, Giorgio, 193

Vespucci, Marco, 121

Vespucci, Simonetta, *née* Cattaneo, 121, 322

Vettori, Francesco, 224, 257, 264

Victor Emmanuel II, King of Italy, 331

Victor Emmanuel III, King of Italy, 328

Villas,

Ambrogiana, 288, 333

Belcanto, 318

Cafaggiolo, 164, 267; a place of refuge, 62, 145;
Michelozzo designs, 77; Cosimo *Pater Patriae* and, 78;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t, 122, 134, 145; Montesecco at, 134;
mortgaged, 155; and the sons of Pierfrancesco, 159, 185;
fortress, 318

Careggi, Cosimo *Pater Patriae* at, 58, 69, 77; Piero di
Cosimo at, 105;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t, 114, 122, 173;
annual banquet at, 164; Verrocchio' s works for, 167, 275,
316; Duke of Urbino at, 235; historical note on, 316

Castello, 267, 274; Giovanni di Pierfrancesco at, 185;
historical note on, 323; garden of, 329; Accademia della
Crusca and, 330

Cereto Guidi, 277, 330

Demidoff, 330

Ferdinanda, 280, 331

Gianfigliuzzi, Marignolle, 221

Il Trebbio, 77, 257, 267, 315, 318

Lappeggi, 290, 299, 300, 304, 333

Lecceto, 267

Le Fontanelle, 316

Madama, 326

Magliana, 230, 238

Medici (Fiesole) , completed, 78; Michelozzo and, 95;
Poliziano at, 122, 146; and the Pazzi plot, 134-5;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 164; historical note on, 318

Medici (Rome) , 330

Montelupo, 267

Montevecchio, 68, 77

Negroni, 277

Petraia, 280, 331

Poggio a Caiano, 322;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 114, 164, 172, 314; Duke of Urbino and, 235; Cosimo I and, 267; the park at, 274; Marguerite-Louise at, 291, 295; Strozzi family and, 314; architecture and artists of, 322

Poggio Imperiale, 282, 309, 332

Pratolino, 276, 278, 300, 330

Ravia, 315

Spedaletto, 165, 166

Violante Beatrice, Princess of Bavaria, *see* Medici,
Violante Beatrice de'

Visconti family, 59, 81

Visconti, Bianca, *see* Sforza, Bianca

Visconti, Filippo Maria, Duke of Milan (1392-1447) ,
27; and war between Florence and Lucca, 42-3; and war with
Florence, 79; personality and appearance, 79-80; his
marriages, 80; and Francesco Sforza, 81

Visconti, Valentina, 201

Vitelleschi, Cardinal, 56, 57

Vitelli, Alessandro, 256, 257, 263

Vitelli, Niccolò, 129-30

Volterra, sack of, 126

War of the Pazzi Conspiracy, 149–50, 151, 152, 155

Weyden, Roger van der (1400–64) , 314

Wolsey, Cardinal Thomas (*c.* 1475–1530) , 239

Zoffany, John, 32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第奇家族的兴衰|（英）克里斯托弗·希伯特（Christopher Hibbert）著；冯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

书名原文：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F MEDICI

ISBN 978-7-5097-9718-1

I . ①美… II . ①克…②冯… III. ①美第奇（Medici, Lorenzo de 1449-1492）-家族-史料 IV. ①K835.4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3089号

美第奇家族的兴衰

著者|（英）克里斯托弗·希伯特

译者|冯璇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周方茹 刘杰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开本：889mm×1194mm 1| 32

印张：14.125 插页：1 字数：310千字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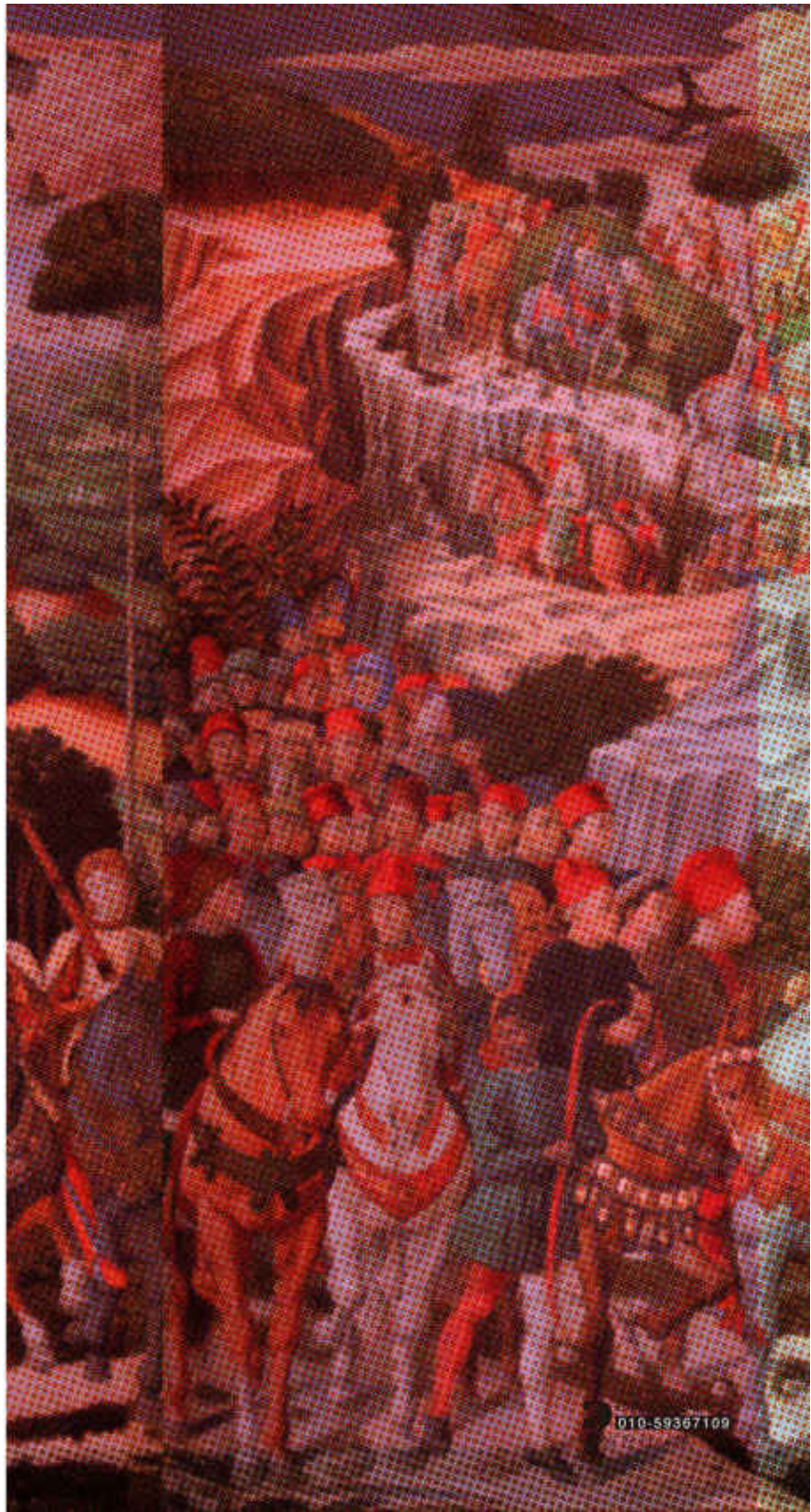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7-5097-9718-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6681号

定价| 6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精彩至极、可读性强……浪漫唯美又不乏戏剧性和血腥杀戮。

——萨谢弗雷尔·斯特维尔爵士 (Sir Sacheverell Sitwell)

(克里斯托弗·希伯特) 不愧为大师，他的这部作品研究深入，可读性强。

——《每日电讯报》

克里斯托弗·希伯特先生是一位相当多才多艺的作家。

——雷蒙德·莫蒂默 (Raymond Mortim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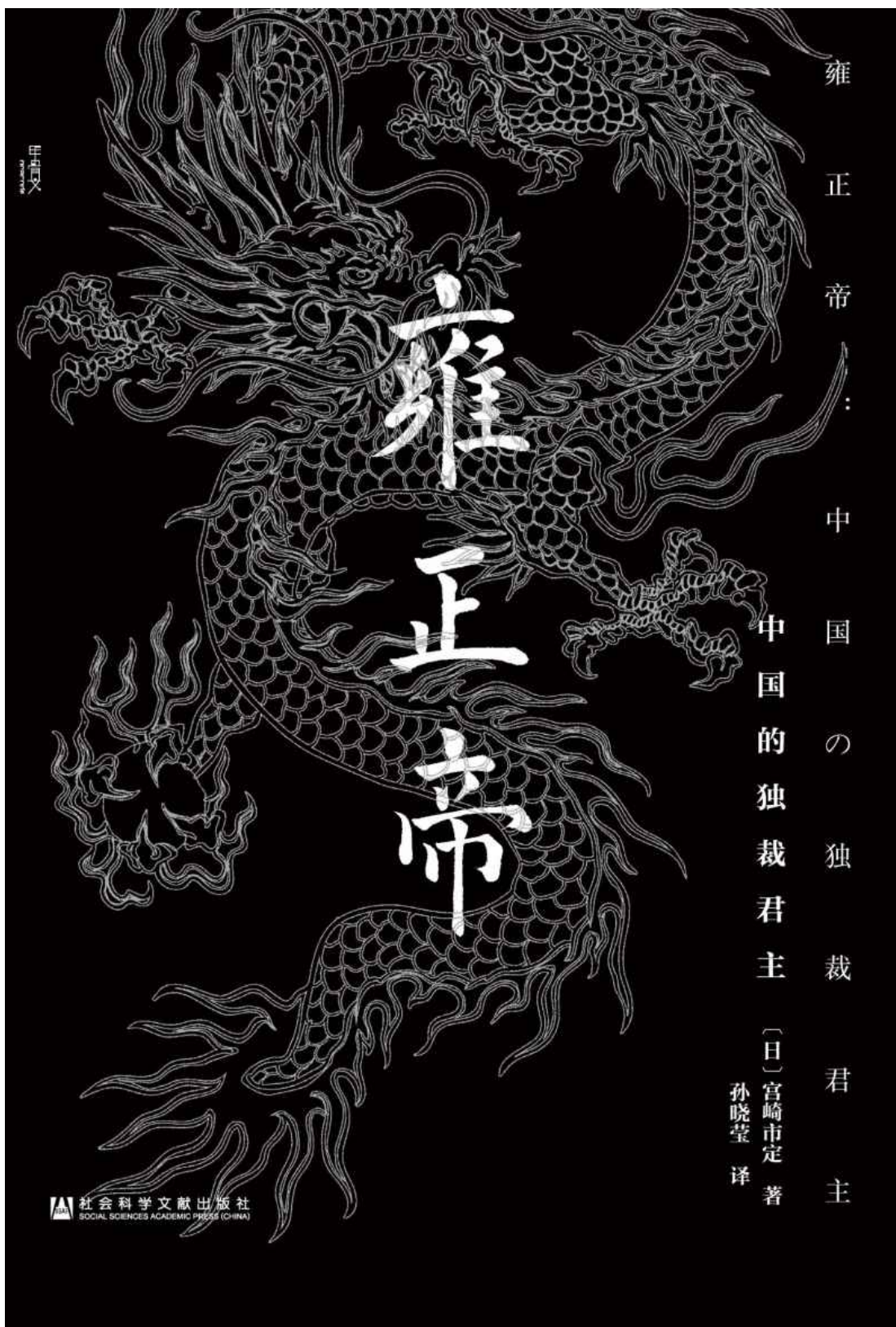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097-9715-1



9 787509 797181 >

定价：69.00元



雍正帝：
中国的独裁君主

中国的独裁君主

〔日〕宫崎市定 著

孙晓莹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东洋史学者，原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京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曾被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波鸿大学等聘为客座教授。1978年获法兰西学士院颁发的「朱利安奖」，198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功劳者」奖章。出版了《九品官人法之研究》《亚洲史研究》（全五卷）、《亚洲史论考》（全三卷）、《论语之新研究》《水浒传》《古代大和朝廷》《中国政治论集》《游心谱》等众多著作，另有《宫崎市定全集》（全二十四卷、别卷一）。

YOSEITEI-CHUGOKU NO DOKUSAI KUNSHU

By Ichisada MIYAZAKI

Copyright©1996 Matsue MIYAZAKI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XX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OKORON-SHINSHA,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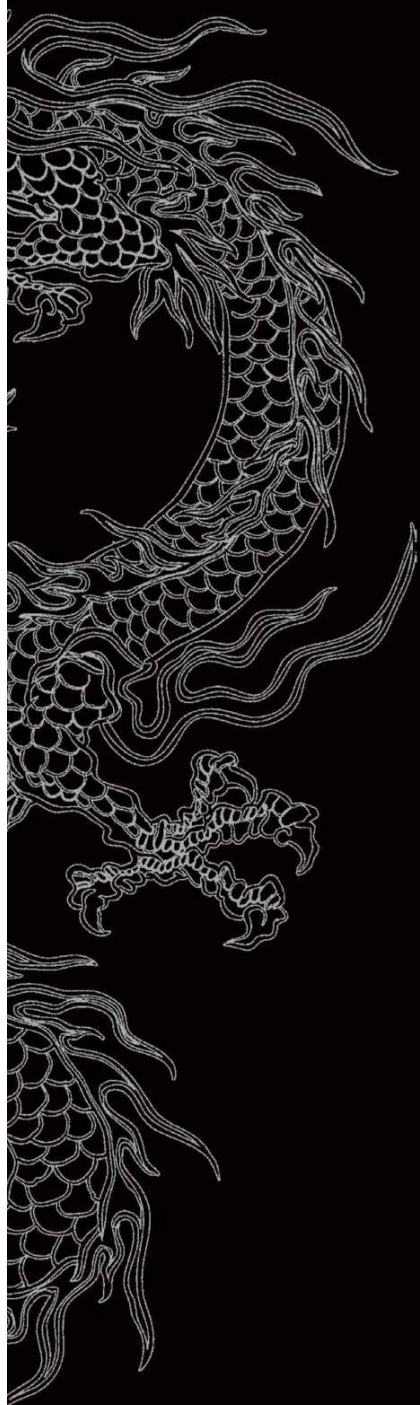
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

雍正帝

中国的独裁君主

〔日〕宫崎市定 著

孙晓莹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作者介绍



宫崎市定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东洋史学者，原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京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曾被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波鸿大学等聘为客座教授。1978年获法兰西学院颁发的“儒莲奖”，198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功劳者”奖章。出版了《九品官人法之研究》、《亚洲史研究》（全五卷）、《亚洲史论考》（全三卷）、《论语之新研究》、《水浒传》、《古代大和朝廷》、《中国政治论集》、《游心谱》等众多著作，另有《宫崎市定全集》（全二十四卷、别卷一）。

序言

试着打开案头的地图册，找一找欧洲大都市中的王宫。若是在比例尺为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它们最多只能用一个点来表示。接着在北京地图中找一找，在同样的比例尺下，可以清楚地看到1厘米左右的四四方方的皇城以及在其内部略小一圈的紫禁城占据着城市的中央，雄伟而庄严。紫禁城是明清两代天子的私人住宅，皇城的大部分是其外苑。今日探访北京城之人首先就会被它的宏大所震撼，更不用说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明代规模的、庄严的清代故宫宫殿建筑。长3公里、宽2.5公里的皇城作为天子一个人的生活场所实在是太大了。然而对皇宫面积的特别要求确实有恰当的理由：天子的宫殿是数千年来中国式的独裁皇帝的权力的象征。

独裁君主必须尽量拉开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即使是大臣，为了谒见天子，也必须在通过皇城的第一道门“大清门”后，步行约2公里的路程，其间共计穿过七道门，更何况是普通的人民。在他们看来，天子似乎住在另一个世界上。他们甚至对直接管理他们的知县都甚为忌惮，敬而远之。知县之上是知府，知府之上是道台，道台之上是省级的被称为布政使的财务官，再上是总督。在中央，有相当于日本各省大臣的各部尚书，其上是类似宰相的内阁大学士和相当于在军事大本营工作的军机处大臣，再上面才是居于深幽之处的天子。无论是从垂直高度计算还是从平面距离计算，人民与天子之间都横亘着广阔的空间。

虽说是独裁政治，但其实体无法轻易被掌握。这既是制度的问题，也是君主能力的问题，而且理念和现实之间有相当大的鸿沟。即使同在中国，独裁政治因时代不同也有变化和发展。最近关于独裁政治的理论似乎非常流行，这种风气发展过快的话，似有脱离实际而空发议论的危险。我们应当在看清实体的基础上再进行议论，切忌以概念规定实体。这样做虽然烦琐，但为了论述独裁制，还是需要举出一个个有代表性的实例，去探明真相。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若问谁是近世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独裁君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清朝的雍正帝。很多人虽然对其父康熙帝、其子乾隆帝之名耳熟能详，但对雍正帝之名也许会毫无印象。正因如此，我愈发感到介绍这位帝王的独裁政治的状况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清朝统治者是兴起于东北的异民族而非汉人。太祖、太宗两代生活于东北，第三代皇帝顺治帝继明朝灭亡之后于1644年进入北京统治全中国。其子是第四代康熙帝，康熙帝之子是雍正帝。因此雍正帝从太祖算起是第五代，从清朝进入北京后算起是第三代。一个王朝的兴衰大致在第三代的时候确定，因此雍正帝正处于清朝最为关键的转折时期。

雍正帝即位于1722年，略迟于俄国的彼得大帝，稍早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相当于日本的德川八代将军吉宗的中期。他取得了可与这些明君相提并论的政绩，甚至被誉为有着数千年传统的中国独裁政治的最后完成者和实践者也绝不过分。在讲述他的政治之前，我们必须从他所处的特殊的个人环境，特别是直至他即位为止的宫中内乱写起。因为这是理解雍正帝自身以及中国古代的独裁政治的必要前提。

如果读者读完此书后仅感到书中所写的确实是在中国发生过的事情，那么可以说我的意图就完全以失败告终了。因为比起从过去的世

界里不断地找出意想不到的事实介绍给大家，修正至今为止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历史图景才是历史学的任务。

- [1 懊恼的老皇帝](#)
- [2 变成猪，变成狗！](#)
- [3 对基督教的誓言](#)
- [4 天命的自觉](#)
- [5 总督“三只鸟”](#)
- [6 忠义超越民族](#)
- [7 独裁政治的界限](#)
- [参考年表](#)
- [《雍正朱批御旨》解题：其史料价值](#)
- [解说](#)



图1 雍正年间的中国

1 懊恼的老皇帝

年届五旬之时，一向对自己强壮体格引以为豪的康熙皇帝终于显现出衰老之兆。

当时，清朝正如旭日东升一般国运兴隆。康熙帝在其执政初期，不仅平定了国内的大叛乱，巩固了清朝的基础，而且把台湾纳入了版图，蒙古的游牧民族和部落也举部请求投降归附。康熙帝为了保卫蒙古，亲自率兵穿越戈壁沙漠，与阿尔泰山麓剽悍的骑马民族梟雄噶尔丹在昭莫多决战并大败之。那年他四十三岁，正年富力强。然而，与壮年时代光辉的文治武功相反，康熙帝在晚年的十几年里因家庭内讧而精神烦闷，这使他的个人生活愁云密布，自然也对他的健康产生了不良影响。

即使在儿女满堂之人被称为最幸运的人的那个时代，康熙帝的孩子数量还是太多了。八岁登基的早熟天子，在十四岁便早早有了第一个儿子。从此之后，每年或是每两年就有一个孩子出生，登记在玉牒之上的皇子达三十五人，女儿因为不被当回事所以其人数不清。在中国，自古以来因为女儿没有继承权而不将其算入孩子的数量，即便有好几个女儿，如果没有儿子，习惯上也被称为“无子”。至于康熙帝，假设女儿和儿子的数量相同的话，他就是七十个子女的父亲。但他为儿女满堂而烦恼。当然，他不是因为生活困苦而烦恼。作为帝王，康熙帝有别人体会不到的烦恼，那就是继承人的问题。

在君主制下，皇子之中继承父位成为皇帝的人与没能继承皇位的人之间，虽为兄弟却有不啻天地的悬殊。继承人大体上是嫡长子，虽然有这样的惯例，但也可以按照君主的意愿任意变更。因此，皇子之间容易出现围绕皇位继承的暗斗。为了防止这一问题，中国才设立了预先选定继承人的皇太子制度。虽然这一制度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完善，但兴起于东北的清朝的情况略有不同。大体而言，北方游牧民族之中有根深蒂固的“共和”^[1]的习惯。他们的首领由实力强大的族长等人从武力最强的人或是血统最尊贵的人中选举产生，而由选举产生的首领不能擅自指定他的继承人。清朝第一代皇帝太祖和第二代皇帝太宗都最终未确定继承人就离世，到太宗之子顺治帝时，终于在临死前成功地行使了对继承人的指定权，这显示了中国传统的君主制观念终于渗透到满族人之中。到了康熙帝时期，他则完全效仿中国传统模式，希望在天子在世时事先安稳地将皇太子指定下来。

当然，康熙帝的数十个子女中大部分是庶子。占据皇城中心约1平方公里的空空荡荡的紫禁城中，生活着数百名后妃宫女和数百名太监，但男人只有皇帝一人而已。皇子在成年后便会分府搬出紫禁城。后妃宫女和太监只不过是侍奉皇帝一人的男女奴隶而已。皇后之外的嫔妃宫女被挑选出来且幸运地生育了皇子的话，会被授予贵妃、皇贵妃等称号和位分。康熙帝十分年轻的时候所生的孩子们大多夭折了，直到第五个出生的孩子才顺利长大成人，被称为大阿哥，然而他只是庶出。“阿哥”在满语中是贵公子的意思，从大阿哥往下，皇子们会依次被称呼为二阿哥、三阿哥等，但在正式场合，会被称为皇二子、皇三子等。

二阿哥是唯一一位皇后所生的嫡子。皇后因为产后恢复不好，生下二阿哥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因此，康熙帝为了寄托哀思，不但对这个遗孤宠爱有加，而且在他两岁的时候就早早立他为皇太子。康熙帝那时只有二十二岁，完全没有如此急迫地指定继承人的必要。而联系

此后的情形来看，也确实是有些太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位二阿哥正是清朝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皇太子，有两度被立又两度被废的不幸命运。以此为戒，以后清朝的天子再也没有立过皇太子。

康熙帝做梦都没有想到后来会出现那么悲惨的结局。即使打破清朝以往的习惯，生前就指定继承人、立皇太子，皇室宗亲和大臣们也没有丝毫意见，这意味着清朝已经完全汉化，确立了独裁君主制。完全变成独裁君主的康熙帝感觉安心而满足，非常得意，此后，就只剩下教育皇太子、将其培养成杰出的皇帝这一项工作了。从皇太子刚刚懂事开始，康熙帝便手把手地教他读书；从其六岁开始让他跟从大臣张英、李光地学习，还命熊赐履给他讲中国哲学；到他再年长些，又选拔汤斌等名士承担辅导之责。因此，皇太子成长为既通满文、汉文，又擅长弓马骑射之术的优秀青年，被寄予厚望。如果就这样下去什么都没有发生的话，康熙帝也可以作为慈父享受圆满的家庭生活吧，但虽然皇宫之中衣食无忧，皇太子还是禁不起外界的巨大诱惑。皇太子品行不端的传闻开始在宫中流传，渐渐地也传到了康熙帝的耳朵里。

康熙帝对皇太子用心良苦，将辅导他的重任交给世上第一流的君子们，然而仅仅只将这些顽固僵化的道学家老臣放在皇太子身边，是失败的第一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康熙帝以为把皇太子置于圣人君子围绕的环境中，就无须担心他走上邪道，可以完全放心。这一点老皇帝可是失算了。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皇太子无论走到哪里，身边都是干巴巴的老头子，一点意思都没有。他逐渐对父皇选出负责辅导他的老人家们敬而远之，自己任性地结交了一些玩伴。但是，交友玩乐是需要经费的。皇太子受野心家之托将政治上的事情私下通报给父皇，每次事成之后就能收到大笔酬金。康熙帝盲目溺爱儿子，允许皇太子在政治上进行暗箱操作——这是他第二大失策。皇太子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成长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寡头。

在此简单讲讲中国过去的寡头政治。在中国，官僚的地位本身历来就是一种资本，只要当了官，钱就会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但为了维持官职，官员们必须预先花费相当多的金钱和各方搭上关系。就这样，以面对面、钱对钱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政党般的组织就产生了，这被称为朋党。朋党以朝廷重臣为首领，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中又有各级头目，他们各自身居要职，此外，还有无数党羽依附他们。官职的晋升首先需要头目之间进行暗中交易，然后才在形式上作为政府的决定进行公布。

康熙帝时期也不能例外，朋党之风大为盛行。最初，出身于满洲贵族的大臣明珠作为首领纠集朋党，大量收受贿赂，恣意决定官员的去留，终于在康熙二十七年，被作为检察官的御史郭琇揭发而倒台。

郭琇这个人喜欢装腔作势，这一点却在当时社会中颇受欢迎。他最初任吴江知县，因为金钱问题丑闻传遍四方。作为上级官员去那里赴任的是相当于民政长官的巡抚汤斌，这个人因清廉扬名天下，干劲十足地扑过来准备对手下的贪官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郭琇早早到汤斌跟前问安，在离开之前，说：

迄今为止我贪污受贿之事确实无疑，但究其原因乃上官索贿，所以我也无可奈何，只得从下层官民中收取罢了。大人为人清正廉洁，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若上官分文贿赂不取，我自此便也不再收受一文贿赂。请大人赐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其间我会将县里的政治彻底整顿给您看。^[2]

汤斌笑而应允。郭琇回到县中，将县衙的柱子、地板彻底擦洗一新，接着对僚属宣布：

昨日之知县已死。今日来者是转世重生之郭琇。你们也一齐给我转世重生！

该县的政治从那日起焕然一新。汤斌将郭琇作为政绩最优秀者上报朝廷，他的才干逐渐得到认可，当上了相当于检察官的御史。郭琇眼见明珠蛮横的样子，出于御史的职责，不能放任不管。但对权势极盛的明珠下手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情。思考再三，他终于下定决心一赌输赢。

二月六日正值明珠生日，明珠党羽齐集于他家举行庆祝宴会。就在这一天，郭琇清早就去了朝廷，提交了列举明珠八大罪状的弹劾本章，在归途中顺道拜访了明珠家。因为名士郭琇是稀客，明珠兴高采烈地出迎，招呼他在大官们列坐的上座就座。郭琇悠然地径直走向里面，仅稍稍点头而没有正式见礼。看着他扭扭捏捏的样子，明珠误解了：

若有为鄙人祝贺的诗文见赐，愿拜读大作。

郭琇忽然做出严肃的表情：

想请您过目的是对您的弹劾文。

然后就把弹劾文的抄本摆到了明珠眼前。明珠接过展开，却手抖不止以至不能阅读。郭琇愈发从容：

下官在各位大人面前失礼至极，这样无礼该当处罚，我自罚一杯。

他一边说一边将放在旁边的大杯拉到手边，斟满后一口喝光，然后轻蔑地瞥了一眼目瞪口呆的满座大官又悠然而去，真是好胆量！

这样痛快的趣闻的宣传效果必然是百分之百的，一日之内便传遍北京，成了街头巷尾人人谈论的话题。而且，那些在明珠家被郭琇看到的人，谁都无法为明珠辩护。于是，名震一时的明珠也就轰然倒台了。

下一个登场的朋党首领是索额图。索额图是满洲贵胄，而且还是皇太子的母亲即死去的皇后的叔父。这可是成为政治首领再合适不过的身份了。索额图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紧紧握住皇太子，将他当作自己的后盾，这使得情况变得颇为棘手起来。尽人皆知越早接近将来注定继承大统的皇太子越有利，但想要接近皇太子首先必须通过索额图之手。于是索额图的威势日益膨胀起来。比起向已在风烛残年的康熙帝表达忠心，奉承有远大前程的皇太子以及他的大管家索额图更为合算。但这是独裁制下天子所不能容忍的僭越行为。天子无论如何都必须是政治的中心。一日当空，又生一日，只会令政治陷入无尽的混乱。

在君主独裁制下，皇太子只不过是一介臣子，只是皇帝的候补。换言之，他的身份与过去普通家庭已经成年但尚未继承家业的嫡长子相似，不能干预政治。这位皇太子忘却本分，一跃成为政治寡头，这一点让康熙帝深感烦恼。虽说是皇太子，但他实际上已经三十岁了，而在家长眼中，他依旧只是一个孩子。皇帝认为这全是索额图的错，若没有索额图，事态绝不至于发展到如此境地。康熙帝痛下决心，命令将索额图免职、幽禁，后因他毫无悔过之意而最终赐其自尽，时值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帝五十岁。

康熙帝本以为只要没有索额图就万事大吉了，但他的预想完全落空了。已经形成的以皇太子为中心的党派不但没有因此解散，反而变本加厉，性质愈发恶劣起来。康熙帝垂垂老矣，一旦驾崩，天下就是皇太子的了。不少人考虑到未来而倾心于皇太子，皇太子自己也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康熙帝是自己的父亲，同时也是自己的外叔祖索额图的仇人。虽然不知皇太子是否真的想到那一步，但最终康熙帝已经收到了皇太子心怀怨恨、不得不防的报告，接着这个消息也传到了皇太子一方。独裁制度下皇太子的地位极不安稳，天子一声令下，不会起任何政治波澜，臣子们也不会有一声反对，皇太子的位置就可以轻

而易举地被他人取代。因此，皇太子一日未登基成为天子便一日惴惴不安。然而，即使再想尽早成为天子，现在稳稳地坐在天子位置上的不还是自己的父亲吗？

听到皇太子意图发动政变的传闻，康熙帝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他最终下定决心废黜太子。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帝在内蒙古的布爾哈蘇台的旅途中，紧急召集王公大臣等文武百官至行宮前，喚出皇太子，命其跪下，宣布了废黜太子的诏书：

朕对尔之恶行视而不见置之不理，隐忍优容至今二十五年矣。惟冀尔一日悔过自新，不意尔为索额图所蒙蔽，视父为仇讎。此时尔之行动有如恶魔附体。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万一朕身遭不幸，即便不虑及自身，岂能容尔玷污祖宗弘业。尔等不幸之人不可立为太子。

宣诏终了，康熙帝悲不自胜，泣不成声，以至背气昏厥。父子之爱业已断绝，帝王的荣耀又遭到无情践踏，康熙帝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他亲笔写下不得不废黜太子之情由，告于天地神明，将废太子拘禁于宫中。

但是，康熙帝并没有放弃最后一丝希望，若是太子能够改过自新，还可让太子复位，自己也可以恢复失去的名誉。太子并不愚笨，想必能够借此时机幡然悔悟。只要他有懊悔之意，父子之间以后也不会有任何芥蒂，到时候一家子又可以重新变得和睦起来。康熙帝如此期待着。

可是康熙帝的估计过于乐观，事态进一步恶化了。比废太子年长两岁的大阿哥趁机秘密地在父皇耳边嘀咕。

“父皇，二阿哥（废太子）活着终究不成器。请您痛下决心……”

“此后当如何？”

“八阿哥还算是可靠之人。”

康熙帝听到此话不由一惊，仿佛天地翻覆一般。他认为皇太子之事是自己与皇太子之间的問題，与其他皇子并无半点瓜葛。皇子们应当对此事不闻不问，完全相信父皇，一心一意学习经典才对。但从大阿哥的语气来看，皇子们现在当真欲取皇太子而代之，开始大肆图谋，甚至要杀掉碍事的废太子！不甚聪颖的大阿哥受到品行不端的八阿哥的煽动，竟然来说这样的话。从大阿哥充满自信的表情就看得出来，在他心中能做皇太子的除自己之外别无他人。

康熙帝意识到事态严重：

召诸阿哥。

皇子们齐聚一堂。为首的大阿哥三十七岁，除去废太子二阿哥，三阿哥三十三岁，四阿哥三十二岁，五阿哥三十一岁，七阿哥三十岁，八阿哥二十九岁，兄弟们一直排下去，十四阿哥二十二岁，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有十多位，十分壮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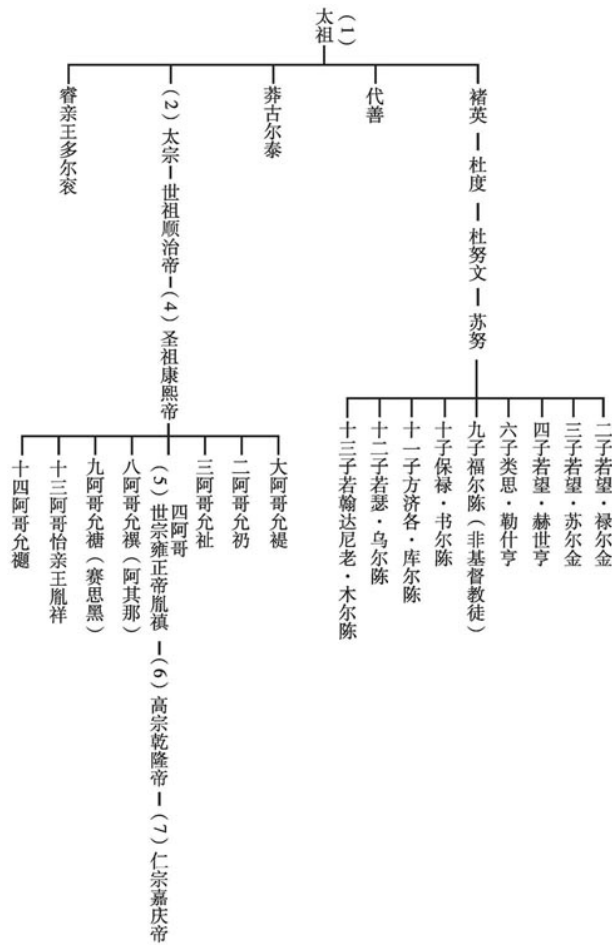


图2 清朝宗谱略览

朕问八阿哥，你想当皇太子吗？

八阿哥听了父皇的话，立即跪倒在地，一时语塞，不知如何是好，其神情分明浮现出了否定的意思。此时，九阿哥和十四阿哥走上前去，替八阿哥回答道：

八阿哥绝无此心，想必有什么误会。此事我等皆可作保。

啊哈，看来有什么勾结啊。康熙帝心中暗想。他们能说为八阿哥作保这样的话，却为什么不为废太子说情呢？康熙帝想到这里更觉得可悲可叹。皇太子无论立与不立都是父亲的权力，本非皇子们可干预之事，站在这里的皇子们却对废太子之事幸灾乐祸，相互勾结，磨砺

爪牙，以待时机。向父亲推荐兄弟，为兄弟作保，他们只是想要通过这样的做法使自己得到认可罢了。康熙帝愈发龙颜不悦。

行了。都回去吧。八阿哥留下。

皇帝认定八阿哥是意图谋取皇太子地位的首谋，将其拘禁。其后不久，又发生了第二件怪事。大阿哥为诅咒废太子，请蒙古喇嘛将魔魅之物埋于地下十余处。魔魅是中国自古以来盛行的迷信，满洲、蒙古等民族特别相信这种神秘的力量。揭发这一阴谋的是三阿哥。掘地检视，果不其然，布偶以及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接连不断地被挖掘出来，证据确凿。康熙帝着实吃了一惊，却又因此事感到心情舒畅不少。康熙帝聪颖过人，却在废太子身上失去了判断力。废太子迄今为止的行为怎么想都非精神正常之人所为，仿佛鬼魅附身一般，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所操纵。康熙帝今天终于理解了：他是大阿哥施魔魅之术的受害者。康熙帝这样想着，突然对废太子心生怜悯。他立即将大阿哥拘禁，同时下定决心要让废太子复位。

某日，康熙帝突然召集百官入宫。

众卿以为朕诸阿哥之中谁最适宜为皇太子？尔等宜各抒己见。

大臣们突然间无法揣测皇帝的意思，非常困惑。正在面面相觑、苦思冥想之时，不知从何处传来了信号：“八”。因此，大臣们一同在纸上写下八阿哥的名字，呈递到皇帝面前。大臣的表现与康熙帝的期待恰恰相反，使得康熙帝愈发感到忧虑不安：这件事决不能放任不管，若不尽早让废太子复位，事态将更为严重。于是，康熙帝再次召集百官，让废太子宣誓定会改过自新，解除了对他的拘禁。

尔等在前日太子精神失常、行为狂暴之时无人劝谏，时至今日举荐八阿哥意欲何为！

大臣们在接受皇帝严厉的训斥后退下了。大臣马齐被视为发出“八”字信号的主谋，他虽然免于一死，但受命闭门思过。大臣之中唯有李光地一人没有与众大臣同流写下八阿哥的名字。他请求道：

太子所为无疑是疾病所致，应待其好生休养、疾病痊愈后再行定夺。

只有这个答案正合皇帝心意，他因此受到嘉奖。

翌年，即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康熙帝再次立二阿哥为皇太子，祭告天地神明以及祖宗之庙，诏告万民，大赦天下。

康熙帝本以为这样姑且可以放宽心、松一口气了，不料皇太子转瞬之间故态复萌。得知皇太子东山再起的野心家们见太子时来运转，便竭力争取恢复业已断绝的关系，争相在太子面前献殷勤。太子禁不住身边的人一再恳求，再次在政治上动手动脚、暗中活动。无论事情怎样不合情理，作为未来皇帝的皇太子也大致都能办到。二日同辉的景象再次出现。

因此，皇太子的反对者们大放非难中伤之词。虽然这些非难来源不明，但一定是来自作为太子亲兄弟的皇子之中。一石激起千层浪，皇太子企图再次发动政变等话，最初是无凭无据的流言，没过多久竟出现了将要弄假成真的态势。

这是第二次了。康熙帝想着，如果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隐忍不发就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话，他愿意以忍耐来换取一个圆满的结局。他甚至想着，只要皇太子高兴，无论付出多大牺牲也在所不惜。自己离世之后，无论是地位、财产还是权力，不都会完完全全地传给皇太子吗？如果他在自己在世期间——从近期的健康状况来看也不会太久了——稍微节制一些，能让老父安度晚年的话，自己也就别无他求了。他认为父子之间不可能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是，这再微小不过的愿

望似乎也难以实现。先发制人！在天子还在犹豫不决之时，皇太子的阴谋已经按部就班地展开了。

康熙五十一年，皇帝再次废黜皇太子，并将其幽禁于宫中。

数年之间，隐忍实难，惟朕乃能之。并非从今往后不可再忍，倘若朕躬有不测之事，如何向祖宗交代。若因爱子心切而毁坏累代声誉见责，朕亦无言以对。

帝王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再次被伤害的康熙帝心中的愤懑之情不可言状，他郁郁不乐——他是战无不胜的帝王，但在家庭生活中一败涂地。不止皇太子一人不守道义，所有皇子都是疏远父亲、违背父命的不孝子。

先前被皇帝训斥为何不规劝皇太子的朝臣们这次争先恐后地进言，希望天子慎重考虑和反思，并提出为废太子承担全责，为其将来作保。皇帝愈发激动了：

朕最初废太子之时，心中懊恼难忍，因朕深信皇太子本身并无罪愆，是献媚者之过。但正是此番，朕明白皇太子罪不可赦。惩处不孝之人理所当然，朕心中释然。今后勿再提一切关于皇太子之事。

康熙帝嘴上说得极好，却无法遮蔽心中的苦闷。因再次受到精神上的打击，皇帝的身体日渐衰弱下去。六十岁以后的康熙帝不知为何总是病怏怏的，大部分日子都闷在房间里。那个壮年之时可以独自拉开需要五人合力才能拉开的大弓，射出的箭是普通箭的两倍之长且能百发百中、威风凛凛、英勇善战的天子，晚年竟如此衰弱不堪。

康熙帝虽然对皇子和大臣们严肃地宣布不许再提有关皇太子的一个字，但实际上其心中一日也不曾忘记皇太子。康熙五十七年，皇帝无缘无故召入礼部官员，命令其查阅有关皇太子的仪式。为此朝廷上下立即紧张活跃起来。有些人自以为是，认定天子有再次立太子的打

算。翰林院检讨朱天保，生怕别人赶在自己前面，紧急奏请求再次将废太子册立为皇太子。

康熙帝勃然大怒，传来朱天保：

尔言近期废太子慎之又慎，再启天性之美德，尔何从而知？

朱天保遭到尖锐的质问，一时语塞。因为谁都不允许接近被圈禁的废太子。

此皆臣父朱都纳同婿戴保商议缮本，令臣来奏。

朱天保在被追问之下，竟然出乎意料地全盘招供。康熙帝愈发生气了。

此人不惟不忠，还是不可饶恕的不孝子！

康熙帝立即将其父朱都纳召入宫中。朱都纳一再请罪：

非在臣一身。应将臣凌迟处死。求将臣独子朱天保宽免。

康熙帝冷冷地嘲笑他：

在紧要关头供出父亲之罪，让如此不孝子活着干什么！想受凌迟之刑的话，朕准了，令尔看杀尔子之后，始将尔凌迟。

康熙帝被触及旧伤，突然变得残酷、宛如他人。朱天保和他的姐夫戴保被拖到刑场斩首。年迈的朱都纳被强制命令到刑场去观刑，但由于年老而免于死刑。

此时，国境附近战云密布。占据蒙古西北部的准噶尔部的猛将敦多布翻越山岭，穿越沙漠，驰骋于无垠旷野，长驱直入西藏。中国西部国境一带一时受到威胁。于是，康熙帝命十四阿哥为大将军，率大军前往征讨。十四阿哥正当三十一岁，血气方刚。康熙帝认为十四阿

哥的相貌风度最像自己，因而对其钟爱尤甚，人们纷纷传言任命十四阿哥为大将军可能是立他为皇太子的前奏。如果大将军取得煌煌战功而归的话，作为奖赏，将其擢拔为皇太子的概率极高。更何况当时后宫无主，嫔妃们和皇子们一样处于势力对抗、群雄割据的状态，其中十四阿哥的母亲是个不容小觑、手腕出众的角色，为众人所惧怕。

出征的翌年，十四阿哥在青海地区大破敌军将领敦多布，进而进军平定西藏一带。他虽没有亲自上前线杀敌，但作为总指挥官坐镇军中，承担责任的同时也享有获得一大半功勋的权利。可惜，康熙帝未能等到十四阿哥凯旋的那一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平时已经不甚康健的他身体状况突然恶化，在北京的皇子们被召集到了临终的父皇的枕边。十四阿哥的同母兄长四阿哥那时恰好代父举行祭天大典，在南郊进行斋戒，他收到紧急报告后疾驰奔归。集结到皇帝身边的有三阿哥、四阿哥、七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十三阿哥兄弟八人，此外，还有大臣隆科多。

皇子们各怀心思，紧张地守在临终的父亲的床边。这时，大臣隆科多被召到康熙帝身边，康熙帝让他传达了指定继承人的旨意。结果出人意料，是四阿哥。

继承康熙帝之位的四阿哥就是雍正帝。

[1]. 这里指原始民主。——译者注

[2]. 关于本书中的引文，能够找到对应的中文原文时尽量回译为中文原文，如大量出自《雍正朱批谕旨》的引文；但由于原书并非严格的研究著作，宫崎市定在引用时并不拘泥于原文，甚至有自己发挥的地方，故而在翻译时参照中文材料、根据日文进行了调整和拼接。为了保留日文原书的特色，本书所有引文以直接引文形式出现，特此说明。——译者注

2 变成猪，变成狗！

围绕着立太子一事，皇子们上演的兄弟阋墙终于画上了休止符。四阿哥雍正帝如今与其说是其他阿哥的兄弟，不如说是他们的君主。雍正帝名胤禛，兄弟们的名字中的第一个字是共通的。在中国固有的传统习惯中，天子之名需要避讳，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文字上都禁止出现。因此天子的名讳，不允许出现在过去是兄弟、如今已是臣子的名字中。于是，一条特别的敕令被颁布，阿哥们名字的第一个字全部被改为“允”字。中国式的独裁皇帝没有兄弟。在观念上可能有兄弟，但现实中并不存在。因为一旦出现在皇帝面前，即使是兄弟也全部转变为臣子。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可能有臣子以外的人。能否成为天子，让原本站在同一起跑线的兄弟之间产生了天壤之别。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康熙帝的皇子们为何要拼命争夺皇太子之位了。

雍正帝刚一继位，似乎世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康熙帝统治长达六十一年，的确过长了一些。独裁君主一人持续统治国家六十余年，自然难免在政治上逐渐走向因循姑息。无论是官吏还是人民，一直被一个皇帝统治也难免会感到厌倦。万民注视着新皇帝的一举一动，期待着万象更新。

翌年正月元日，大清改元雍正，是为雍正元年（1723）。新皇帝年四十六岁，他在壮年时期蛰伏于藩邸，拜此所赐，世间传说他是尝尽了酸甜苦辣、富有深切同情心的君主。他精通学问和文学艺术，尤其对禅学造诣颇深，深知禅学之奥义。在宫中，迫于皇帝的生母皇太

后的威压，嫔妃和宦官整日低声下气、诚惶诚恐。其同母弟十四阿哥手握大军于西部边陲，而且在十四阿哥手下实际负责全部军务的总督年羹尧之妹是在雍正帝后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备受宠爱的年贵妃。从这一点来看，雍正帝完全不用担心新帝即位初期常见的军队叛乱、民间不稳等问题。即使换了天子，社会也注定会太平无事。那么，在这个太平无事的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中央政府方面，新皇帝即位之时设立了最高政治会议，任命了四位最高委员（总理事务王大臣）：八阿哥、十三阿哥、大臣马齐和大臣隆科多。全国上下齐心一致，雍正帝的位置可以说稳如泰山，看起来似乎没有给企图从外部趁隙作乱的人留下哪怕一丝头发的空隙。

尽管如此，不知从何传出的奇怪谣言如风一般在世上传播开来：雍正帝的即位不是先帝的意思，是通过阴谋实现的。康熙帝在临终之际，把大臣隆科多召到身边，拿笔在他的手上写下“十四”，让他展示给皇子们，即让十四阿哥继位之意。但是被雍正帝收买的隆科多将“十”字用手指盖住，只将“四”字展示给众阿哥看，因此四阿哥即了位。另一种说法是隆科多用舌头舔掉了“十”字。还有传言称康熙帝在纸上写下“传位土四阿哥”，雍正帝将其盗出，将“土”字改写成表示对象的介词“于”，于是就被读作“传位‘于’四阿哥”了。

当然，也有与这样的谣言针锋相对，站在雍正帝的立场上为其辩护的言论。

不，不，雍正帝的继位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在康熙帝的皇子之中，大阿哥因为诅咒皇太子之事被拘禁；二阿哥即废太子；三阿哥因为头脑驽钝，对谁都不构成威胁。接下来不就轮到四阿哥了吗？另外，新皇帝和先帝有特别深厚的缘分。除太子以外，皇子们幼年时期都被养育在大臣等的家庭中，唯独四阿哥被留在宫中，在康熙帝第二位皇后（孝懿仁皇后）身边长大成人，先帝最清楚他的人品，对他寄

予厚望。如果原本准备传位给十四阿哥的话，必定不会将最重要的皇子送到千里之外。先帝驾崩之前不久，屡次派遣四阿哥代替先帝巡查仓库、代行祭天大典等，也正是因为有意传位于四阿哥。

在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中，在感情上最能激起人们的兴趣的当然是对雍正帝不利的传言。对成功者的嫉妒、对权力者的反感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但这些谣言无休无止必定有什么原因。雍正帝毫无疑问把传播谣言的罪魁祸首锁定为八阿哥。

被任命为朝廷的四位最高委员之一的八阿哥绝对谈不上春风得意。雍正帝对待八阿哥表面上看起来极其慎重有礼。但对八阿哥而言，越是受到礼遇越是心情不快。无论是出席朝廷会议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还是在家休息的时候，他无时无刻不感到雍正帝的密探就在身边盯着自己。不，所有人在不经意间都叛变到了行情大好的雍正帝一方，变成了监视自己行动的走狗。最高委员中的另一个人，兄弟十三阿哥正是如此。

八阿哥和十三阿哥同时被授予亲王爵位，分别为廉亲王和怡亲王。在清代，皇子不一定都会成为亲王。他们的爵位逐渐上升，最高爵位即是亲王。在八阿哥的亲朋们前往祝贺这位新亲王的时候，八阿哥却满面愁容地说道：

何喜之有？我头不知落于何日。

八阿哥不经意间说漏嘴的话意味深长，被密探一字不漏地传到了雍正帝的耳朵里。

这个无礼的家伙！不可饶恕！

雍正帝暗下决心。虽说是兄弟，但现在自己已经践天子之大位，比起兄弟之情，君臣之义更为贴切。身为臣子，对君主表示不满和反

感的就是乱臣贼子。如果因为是兄弟就饶恕他的话，如何能够要求万民效忠于朕呢！

虽说如此，再等等，再等等。现在还不是反目的好时候。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牢牢抓住他的尾巴的时候再下手。在点燃炸弹之前，将它一直紧紧搂在怀中才是最安全的。

雍正帝若无其事，寻常一般地对待八阿哥，命令他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自不必说，无论何时密探们都在从各个角度暗中窥视着这些行动。八阿哥接到的首项任务是营造先帝山陵的工程监督。八阿哥深知雍正帝勤俭节约，因此尽可能压缩了工程的预算。建造山陵需要红土，按照先例应当从北京运来，但由于脚价太高，权且代以当地的红土。

怠慢先帝的山陵工程，偷工减料，想要让朕蒙受不孝的恶名吗？！

与八阿哥的预期相反，他竟然受到了雍正帝的斥责。接下来的工作是管理上驷院。因为牧场有太多毫无用处的马匹，他计划缩减马匹的数量。

是说先帝的做法太过奢侈了吗？若有大事，有多少马匹也不算多！

再次被训斥的八阿哥愈发灰心丧气了。接下来他又被命令去整饬内务府的人事。这个工作若是处理不好，很是遭人怨恨。最初的整顿计划被斥责为太宽松。管他呢，破罐子破摔吧。果不其然，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内务府的人员高举反旗蜂拥而来。虽然骚乱在发展成为暴动之前被镇压了下去，但得知这件事的雍正帝无法保持平静，认为这次骚动想必是八阿哥为了让天子怨恨而故意导演的一出闹剧，说不定骚乱本身就是八阿哥暗中煽动起来的。

八阿哥想着，无论如何都会遭到憎恨，于是在被问到是不是煽动者的时候，不管什么都“是，是”地点头承认。他的承认却令雍正帝

更不满意。八阿哥才不是因为不是对手就沉默不语、低头认输的那种人呢。一步一步调查下来，雍正帝终于明白，对八阿哥煽动这次骚动的猜测确实无根无凭。那么这是他想要通过替人顶罪博得人气、赢得世间同情的策略吧？雍正帝如此胡乱地猜测。他让八阿哥明确指认骚乱中最先涌入八阿哥家的人，八阿哥根据目击的厨师的证词指出了五个人。接下来讯问那五个人，他们竟然都与骚动事件无关，甚至还有人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若是稀里糊涂地把这些人抓起来判了刑，舆论不会责备八阿哥，一定会谴责是天子的失误。雍正帝愈发觉得八阿哥面目可憎。八阿哥因为这次事件被剥夺了亲王的爵位，成为无爵位的皇族。

因为需要考察先帝的事迹，八阿哥被要求上交康熙年间赐给他的诏书和宸翰等，但他无论如何都不听命。他声称他的家人误将先帝宸翰与其他一些文件一同焚毁了。这些宸翰之中，有与皇太子问题相关的、康熙帝以严厉语气训诫八阿哥的语句。雍正帝无论如何都想要看到。八阿哥认为若以此为材料，被不怀好意地写入朝廷编纂的历史则会遗臭万年，因此，无论怎样都不肯上交。不管催促多少遍，八阿哥除以同样的话拒绝外别无他言：

天地明察，我绝无虚言。我若虚言，一家俱死。

雍正帝大发雷霆。

一家啊，说得好。清朝从天子到皇族不是一家吗？可见你是向天祈祷灭亡我清朝！宗姓之内岂容得此人！

八阿哥因为此事被削去宗籍、贬为一介平民。仅仅被降格为平民还不够，他被单独圈禁在宗人府中专设的单间里。从此，八阿哥便自暴自弃了。

自己本来一直食欲不振，也好，从现在开始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吧。日日保重身体，能活着的时候便好好活着。只要不杀我，无论多么艰难，我也要咬牙活下去给你们看。

听到这话，雍正帝怒不可遏。

这家伙已非皇族，乃一介平民。他那容易被误认为皇族的名字会给其他兄弟们添麻烦。给他起一个什么名字好呢？去问问他自己吧。

使者将旨意传达给八阿哥，他满不在意，只回答了一个字——“狗”。

好，让他变成狗！

雍正帝当即把八阿哥的名字改成了狗。满语中狗读作“阿其那”，从此在朝廷上人们不可再称八阿哥的真名，取而代之的则是“阿其那”。

若从雍正帝的角度来讲，他也有充足的理由。在独裁君主制之下，所有的人际关系必须建立在稳固确立的君臣关系的基础之上。无论是父子、兄弟还是朋友，一旦被置于君臣关系之前，必然失去它的全部价值。诚然，雍正帝和八阿哥过去是兄弟，但在雍正帝即位之后，两人之间首先必须是君臣关系，其次才是兄弟关系。若先顾及兄弟情谊，君臣关系就无法确立。在独裁君主制下，君主也被赋予了独裁的义务，即使是兄弟，对将君臣关系视为儿戏的人，必须教育他不管怎样都必须将君臣关系视为重中之重。中国的古语有“教不严，师之惰”的说法，即教师若对学生不进行彻底而严厉的教育，应当问其怠慢之罪。同样，处于独裁君主的位置如果树立不好独裁君主的威严，那就是君主的疏忽。并且，君主若对兄弟尚且不能彻行独裁，如何对万民进行独裁！

尽管如此，雍正帝对八阿哥的迫害也着实过甚。八阿哥与雍正帝的严苛恰好相反，很早就博得了宽仁长者的名声，世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同情八阿哥也不无道理。

于是，各种各样的谣言风一样地在世间流传，其中有这样一个：

十月作乱，八佛被囚……雍正帝是加害者，八阿哥是被害者。军民怨新主。……军民齐崛起！

十月是雍正帝诞生的月份。“八佛”不消说是指八阿哥，因为他的温厚，经常被赋予“佛”的绰号。雍正帝听闻此事甚感不安，但表面上对此显得很冷淡，他说：

似此凶张、恶诈、奸险之佛诚自古所未闻。果真是佛与否听之于舆论。

所谓舆论，不外乎文武大臣等百官集议于朝廷罢了。大臣们按照雍正帝的指示，组织了特别审判会议，对阿其那的行为进行审议，最终列出阿其那四十条罪状，对他进行参劾。雍正帝下达最终判决：

阿其那犯下的所有恶行皆为激怒朕。朕若加刑于他，天下之愚者必定以此将恶名加诸朕，如此则正中阿其那下怀。朕才不会上这个当。

因此，雍正帝命令八阿哥如从前一样过着单独圈禁的生活。

同样的迫害无疑也会被施加在和八阿哥最亲密并因八阿哥之事和雍正帝交恶的九阿哥身上。康熙帝临终之际，九阿哥的生母宜妃想要冲到先帝枕边，因此与雍正帝的生母德妃发生过激烈冲突。雍正帝即位之后，在召回同母弟十四阿哥的同时，派遣九阿哥取而代之奔赴西宁。他当然没有赋予九阿哥大将军这样光耀的称号，此举只是为了将他放在与自己关系紧密的总督年羹尧身边受其监视。最为要紧的是，以此切断他与八阿哥的联糸。

九阿哥在年羹尧的监视之下，受到的待遇几乎与阶下囚一样。密探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了雍正帝。雍正帝的钦差宗楚来视察的时候，九阿哥说：

我如今于世间毫无希望和野心，正欲抛却凡世出家修行。不知可否给我多些自由？

雍正帝接到使者的奏报，抓住九阿哥的话柄不断诘问：

若是出家则不成兄弟，舍弃世事则不成君臣。是想成为既不是兄弟又不是君臣身份吧？

九阿哥偷偷给在北京的十阿哥送信，但信在途中被截获。信中写道：

事机已失，追悔无及。

这句话意味深长，可以任意解读。雍正帝自然将其解读为某种阴谋。这封信暴露之后，九阿哥开始用暗号与在北京的家人互通书信。九阿哥对基督教抱有兴趣，和西洋传教士颇有往来。甚至在九阿哥被派往西宁的时候，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João Mourão）也追随他一同前往。但是他白天需避人耳目，只有晚上才从窗户出入。九阿哥可能已经偷偷地接受了由穆敬远主持的洗礼。因此，九阿哥与其子懂得罗马字母并非不可思议之事。其后，他们用罗马字母写信，在北京与西宁之间鸿雁往来。

九阿哥之子所写的从北京送到西宁的密信虽然被慎之又慎地缝在夹衣之中，但还是被城门官发现了。这封信被拿给西洋传教士看，但传教士回答看不懂这些文字。

朕未曾禁止九阿哥与家人书信往来。至于别造字样，巧编格式，缝于（骡夫）衣袜之内传递往来，阴谋诡计甚于敌国奸细。定是有何企图。速速严查。听闻九阿哥身边的太监聚敛了大量钱财，一并严查钱财的来源。

按照雍正帝的命令，宗人府决定剥夺九阿哥的皇族身份。既然不再是宗室就必须改名。至于改什么名字，雍正帝又派人去问了九阿哥，九阿哥的提议让雍正帝不太满意——“改成猪”。

于是，九阿哥的名字被改成了猪，因为九阿哥身体肥胖滚圆。在满语中猪被读作“塞思黑”。此后“塞思黑”就变成九阿哥户籍上的名字了。其兄阿其那在特别最高审判会议上受审之时，塞思黑也一并受到审判。与阿其那的四十条罪状一样，塞思黑被列举罪状二十八条，也受到参劾。塞思黑最初被发配到西宁边疆，临行之时脱口而出：

越远越好。

这无心之言传到了雍正帝耳朵里，雍正帝反而把他召回，安置在了离首都很近的保定府，单独圈禁起来。雍正四年八月末秋风起时，塞思黑因患痢疾而病亡。即便得到塞思黑病笃的报告，雍正帝也只是不紧不慢地下令派遣医生为其诊治，但塞思黑没能等到医生到来。

伊恶贯满盈，获罪天祖，已伏冥诛。

雍正帝如此自言自语。阿其那也在九月初病死了。九阿哥和八阿哥相继死于圈禁之事不得不令人生疑。社会上风传，恐怕是相关官吏对两位施加了适当的“处置”吧。

雍正帝的同母弟十四阿哥最终也未能逃脱雍正帝的迫害。虽说是同母所生，但年龄相差十岁的兄弟俩自幼就关系紧张。雍正帝即位后立即将十四阿哥召回京城。

大将军十四阿哥因为有平定青海之赫赫武功，本打算在还都之时举行隆重的凯旋仪式。到达北京附近的时候，他派出使者向朝廷询问凯旋仪式的手续。雍正帝极其愤慨。

对天子无一句问候，肆无忌惮地询问凯旋仪式算怎么回事？！忘记了还在大丧之中吗？

对独裁君主而言，他没有同母兄弟。在宫中初次谒见时，十四阿哥打算以家礼相见，出乎其意料的是，雍正帝正等待着他施臣子之礼。看到十四阿哥并未打算行跪拜之礼，皇帝的侍从跑过去把他的头按到了地上。

这是迎接凯旋将军之礼吗？

十四阿哥激动异常。

这是谒见天子之礼吗？

雍正帝如此反问。

雍正帝觉得这样的弟弟绝不能留在京城，于是命令他去守护康熙帝的山陵，远离北京。后来又出现了妄图起兵谋反、企图拥立十四阿哥为皇帝的野心家，十四阿哥因此被原地圈禁。他十分长寿，一直活到乾隆时代，直到那时才最终被释放。

雍正帝对他的兄弟们的迫害并不是凭其喜好任意为之的。有时我们看到的雍正帝如施虐狂般的执拗是在独裁君主制下作为君主不得不履行的义务而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惊叹于雍正帝强韧的精神。在和注定不会对自己心服口服的兄弟们进行的心理战中，八阿哥、九阿哥到底不是雍正帝的敌手。他们或者失去分寸，或者情绪激动，在自己的内心感情上产生破绽，最终被始终冷静如一的雍正帝一步步逼向死地。作为成长于深宫的皇族，不得不说他的性格极其怪异。也许是四五十年空居藩邸的生活，以及其间被卷入兄弟数十人围绕着皇位继承进行残酷斗争的经历，锻炼出他如此特殊的性格吧。

虽说幸而获胜甚好，但其中的辛苦真是难以忍受。雍正帝一定是这样想的吧。他不想让这样的悲剧在自己的孩子们身上再次上演，其解决方法就是被称为“秘密建储”的制度。

雍正元年八月，皇帝召来诸皇子以及众大臣，宣布：

自古皇太子多不孝。盖因被立为皇太子者由此安心，再无学习之心、修炼之意志。再者，那些有野心的官僚们亦念此乃将来之天子，出于投机取巧之心，争相追随。故皇太子心生怠惰，流于奢侈，陷于邪道。历代圣明天子烦恼于皇太子之放纵者不在少数。即使大行皇帝亦对废太子束手无策。皇太子制度确实不佳。然而天子固有一死，不得不预为之计。朕有一良策。朕已于心中定下后继之人，但不会将其告与他人。仅将名字书于纸上，藏于小匣之内。将此匣置于高悬于乾清宫宝座之上的“正大光明”匾之后。视朕心中之继嗣者其后之言行，若其不致力于学、走上邪路，朕即重写名字，即时更换。朕若有事，无暇亲口指定继承人而驾崩之时，诸皇子、大臣共同开启小匣视之，其中所书名字即为皇位继承者。

雍正帝设计的新方法确实十分巧妙。此方法实施之后，有清一代一直遵行不改，也因此清代没有出过愚蠢的天子。皇子们想要成为天子，必须不断地提高自身修养，让父皇满意。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意味着独裁政治的形式也被带入家庭内部。皇子们即使在家庭中、在父皇面前也只能是臣子。作为一介臣子，为了成为继承人必须不断地接受试炼。因此，真正的独裁君主无法拥有真正的家庭生活，无论何处都只剩下君臣关系，甚至不能拥有普通家庭一样的亲子生活。从此之后，清朝再没有立过皇太子，唯一的特例是雍正帝之子乾隆帝。他过度模仿汉族君主的做法，在其即位六十年时立其子，即后来的嘉庆帝为皇太子并随即让位，自己隐退成为太上皇。

至此，如果我们仅仅对雍正帝对其兄弟的迫害感兴趣，而忘记书写他对兄弟的友爱之情的话，就不能说是公正的。不得不说，八阿哥和九阿哥对于他们自己的悲剧，应当负有与雍正帝同样的甚至大于他的责任。他们执着于满洲时代的朴素的家族制度，认为父子兄弟应当

团结一致、忧乐同享，像君臣这样的做派和形式主义背离了满洲的国粹。当然，这种思想与雍正帝的信念水火不容，他已经完全变成中国式的独裁君主，并以汉族的统治技巧使满族人得到安泰。但是，如果说兄弟之中有与皇帝的思想产生共鸣并以身示范，为使雍正帝成为独裁君主而尽力示好之人的话，雍正帝也必然会心存感谢。十三阿哥怡亲王正是如此。

十三阿哥怡亲王小雍正帝八岁。雍正帝与同母弟十四阿哥水火不容，却将十三阿哥视为心腹知己。从众多兄弟中脱颖而出的怡亲王行事谨慎正直，忠诚地侍奉着雍正帝。他身兼九职，勤勤恳恳地工作，尤其对肃清相当于财政部的户部纲纪用力最深。某次，雍正帝对大臣十分骄傲地说：

自怡亲王总理户部以来，一直被称为“伏魔殿”的户部面貌焕然一新，再无被贿赂诱惑之官员。若不信服，且试之。

朕虽信用尔等大臣而任用之，但若与怡亲王相比，似鸿毛与泰山。即使[将尔等百千聚集一处，朕倚赖未必如王一人也。] [\[1\]](#)。

怡亲王于雍正八年去世。雍正帝失望过度，饮食不进，寝不聊寐。

怡亲王事朕诚敬忠爱之心八年有如一，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前怡亲王避朕名讳将上一字改为“允”，今着改回原“胤”字。

雍正帝命令礼部在祭文中写作“胤祥”。这包含着从臣子升格再次回到兄弟关系的意思。即使是独裁君主，还是希望有兄弟亲情的。但有权利再次成为君主兄弟的只能是如怡亲王一般八年如一日，任劳任怨，比臣子更加尽心竭力的兄弟。只有完全成为臣子的兄弟，独裁君主才会将其视为兄弟。兄弟不是天生的，是天子赋予的地位。这正是独裁政治之下的君主家庭生活的特色。

[1]. 当宫崎市定引用的内容与中文史料的原文有所出入时，引文中的中括号标记完全符合中文史料的内容，后文不再特别说明。——译者注

3 对基督教的誓言

若彻底实施独裁制，君主不但不能拥有家庭生活，同样也无法拥有亲戚关系。清朝兴于东北，进入中原后，政治形态逐渐汉化，但其社会还保持着浓厚的满洲色彩。尊崇家庭门第的风气也是其表现之一。在满洲贵族之中，有一个比现在的皇室更为嫡系并以此为傲的家族，那便是苏努一族。

苏努的血统来自清朝的始祖——太祖皇帝的长子褚英。褚英是英勇善战的将军，帮助父亲屡立战功，自然也应当拥有继承父位的权利。可是，年纪相差不多的父子二人中途突然反目成仇。究其原因，大概是太祖的后妻的问题。随着太祖逐步扩张势力，整个东北都纳入其掌握之中，太祖从原本是敌国的叶赫部迎娶了他的妻子，立其为皇后。叶赫部不是纯粹的满洲血统，他们的血统中混杂着相当浓厚的蒙古人的血统。但是在满族人中，叶赫部是第一流的名门望族，连飞黄腾达的太祖的血统也望尘莫及。太祖把出身于叶赫部的后妻立为皇后，并宠爱她所生的第八皇子，这不单单是被年轻妻子的美色所迷惑这么简单。太祖在褚英出生之时还只不过是满洲一部之长，但现在其权威远及整个东北，视野广阔必须号令各个种族，这导致太祖前后的立场完全不同。从政策角度来说，他需要利用叶赫部的名声。但褚英并不明白这一点，认为太祖只不过是拥有纯粹满洲血统的旧亲戚等闲视之，而一味追捧、奉承新亲戚罢了。

褚英的旧满洲主义与其父的大满洲主义最终发生了正面冲突。太祖逮捕并圈禁了褚英。褚英在圈禁中与世长辞。褚英之后的子孙为：杜度—杜努文—苏努。

大满洲主义因褚英的死而凯歌高奏。太祖死后，叶赫部出身的皇后所生的第八皇子因其母方的高贵血统，被众人推举即位，即为第二代的太宗。其后顺治帝、康熙帝至雍正帝的历代皇后中出身于叶赫部的占多数。太祖以来代代相传的家臣却被当作乡下人，反而不为世人所重视。

越是不被世人所重视，越是自命不凡，以其血统为傲。苏努一家自认为是清朝的嫡系，瞧不起当今的皇室。虽说如此，他们也不能超然世外，与政治权力完全无关。若是远离政权，自然难逃被社会埋没的命运。苏努利用所有机会以求接触政权。在康熙时代诸阿哥暗斗之际，他为八阿哥出谋划策。雍正帝即天子位后，他受八阿哥牵连受到处罚也是自作自受。但苏努一族时至今日依旧以他们的嫡系血统为傲，不肯舍弃自尊，加之苏努的孩子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使得雍正帝对他们一家的迫害变本加厉。

苏努在雍正元年已是七十六岁的老人，是清朝皇族之中最年长的人。他有十三个儿子，除其中两个早年夭折外，其余全部长大成人，当时都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他还有十六个女儿，大多数已经结婚生子。这一家开始信仰基督教是从十多年前第三子苏尔金的精神烦闷开始的。

苏尔金在对人生问题抱有深深的疑惑之时，偶然听到关于基督教的传闻便产生了兴趣，派遣下人到街市上寻找关于基督教的书籍，寻遍街市却没有找到。他在别人的指点下来到了西街的天主堂，那里的传教士送给他一本用汉文写的入门书。苏尔金阅读之后为之动心，尝试着和兄弟、亲戚们讨论，但仍有不解之处，便亲自赴天主堂拜会神

父，消除疑惑。兄弟们不顾父亲苏努的禁止，虽然没有接受洗礼，但已经成为虔诚的信徒。第十子书尔陈在即将作为一支部队的统领随十四阿哥出征准噶尔之时，接受洗礼并被赐予教名保禄。他的妻子也同时信教，教名为玛丽亚。第三子苏尔金在两年之后受洗，教名为若望。

此时恰逢康熙帝驾崩，雍正帝即位。九阿哥被派遣到西宁时，苏努的第六子勒什亨、第十二子乌尔陈受命随行，他们以此为契机接受洗礼，分别被授予教名类思和若瑟。伴随着雍正帝对八阿哥、九阿哥的迫害的表面化，苏努一家自然会受到牵连。雍正二年，苏努举家被流放至万里长城的内长城以外的右卫。

年迈的苏努每日俟候在宫门，请求天子的宽恕，但无人理睬。终于，规定的日子到了，就算再不情愿也不得不出发。虽说只是一家搬迁，但其家庭成员共有六十余人，再加上奴婢三百人，形成了一个大队。苏努一家扶老携幼在荒野之中前进。

右卫与外长城相接，是与张家口相距不远的一座拥有五万人口的城市，其中四万人是驻扎于此地的驻屯兵，可谓地处前线。在这里寻找可以容纳这一家人的房屋并非易事。苏努等男人们不得不作为兵卒在这支军队中当差。尽管落魄如此，但因为原本是皇族，作为军队长官的将军意外地向他们示好并给予其优待。但是，将军某次前往北京谒见雍正帝，与其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回来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苏努一家又被命令迁徙到离右卫两英里的、处于沙漠之中更加乡下的新堡子。而这个时候，他们刚刚在右卫找到房子，并从仅有的存款中预先支付了一年的房租，修葺了破烂的屋顶。

他们在新堡子的生活比在右卫时更加凄惨。雨雪交加，生活设施不足，薪炭也无从入手，年迈的苏努在进入十一月之后不堪寒冻最终病死。苏努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以纯粹的满洲血统为傲的、拥有古代

武士般气质的老人，因此，他并不喜欢他的孩子们信奉外来宗教——基督教。有时他会干涉他们的信仰，至少要求他们低调行事。即使他对孩子们的真挚情感表示同情理解，但作为对外承担全部责任的家长，苏努也许不得不如此处理。

在苏努离世后，孩子们终于可以一起肆无忌惮地谈论信仰。家庭中的女性和大多数奴婢在离京之前就已经信奉基督教了。现在他们在新堡子的屋内设置了礼拜堂。每逢基督教节日，全家人都会齐聚于此，虔诚地祈祷。

除苏努一家之外，在右卫的军人中还有几个家庭信奉基督教。一个教名马可的退役军人来往于右卫与新堡子之间，联系苏努一家，并且往来于北京，向西洋传教士传递音信。在得知苏努一家在流放地的消息后，北京的信徒们为了慰问他们并鼓励他们坚持信仰，筹划去拜访他们。但是他们是以政治犯的罪名被流放的，信徒们害怕慰问之事若被天子的密探得知，会使得事态更加不利，因此慰问之事必须秘密进行。

苏努旧宅附近住着一位教名为托马斯的中国医生，他与苏努的各位公子虽然在身份地位上有天壤之别，却是平等亲密的教友。他从苏努旧宅的管家那里拿到了五百两现银和一骡驮的慰问品，踏上了充满艰难的冒险旅途。他顺利地通过长城关口的检查，到达右卫附近，但害怕碰到熟人，故意没有从这里经过，而是绕道前往新堡子。途中，他忽然失去了方向。农历三月的天气依旧寒冷，不凑巧天气骤变，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北风如刀割一般冷冷地吹到他身上。暴风雪大到连马头都看不到了，他握着缰绳的手也要冻僵了。

托马斯冒着暴风雪在茫茫沙漠中毫无目的地骑马前行，天完全黑了下来。托马斯想，今夜如果不能到达目的地，一定会被冻死，但想要原路返回，也不知道方向，除了凭借马的感觉向前走外别无他途。

就在这时，马猛然停了下来一动不动，托马斯差一点从马上跌落下来。原来，马撞上了类似黑色墙壁一样的东西。接着，旁边的门开了，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

谁啊？

他似乎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声音：

我。

不能稀里糊涂地说出自己的名字，于是他故意放低声音回答。

“到底是谁啊？”

“是我。让我进家。”

黑影默不作声地把马牵进门内。得救的托马斯下马，腰以下已经毫无知觉。这家的男人借着门缝漏出的灯火看清了托马斯，欢喜雀跃地一把抱住他。

哦，托马斯，从哪里来的？

说话的正是苏努的第二子若望·禄尔金。听到声音的兄弟们立刻围过来。这真是从天而降的天使的慰问啊。大家高兴得欢蹦乱跳。多亏了这场暴风雪，托马斯没有受到任何人的盘问而平安到达，真是格外幸运。他们十分感谢神的指引。经过两天两夜的促膝交谈，托马斯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他们的父亲苏努临终时候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母亲随后在孩子们的热心鼓动下也接受了洗礼，在神的恩宠下不久就追随她的丈夫而去等事情。考虑到在这里久留可能会使事情败露，托马斯在两天后踏上归途。尽管家徒四壁，他们还是包了些银子给托马斯饯行，托马斯却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用力地握了握手，就此分别。

苏努的第六子类思·勒什亨和第十二子若瑟·乌尔陈之前随同皇帝的弟弟九阿哥前往西宁，此时因为要为父服丧被送到了新堡子。服丧期满时，朝廷对九阿哥进行了审判。因与九阿哥有共谋的嫌疑，二人也被传唤至北京接受审判。

二人被带上九条锁链，装进摇摇晃晃的囚车运往北京。审判超乎寻常地严格。结果，他们被判处终身监禁。监牢被高墙包围，与外界隔绝，在五尺左右的地面设有单人牢房的入口。牢房横宽六尺，进深十尺，囚徒脖子与手腕上拴着沉重的铁链，只被允许在其中来回走动。高墙之上设有一个洞口，从这里递送食物。

除类思与若瑟外，苏努的男性子孙们无一例外同时受到审判。他们被铁链拴着带到右卫城中，由将军做出判决，等待天子裁决后执行。苏努的第二子若望·禄尔金以及以下的第四子、第九子、第十子、第十三子，以及长子的一个孙子，总共六个人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监禁起来。其他人则被赦免，再度回到新堡子。

从这个时期开始，朝廷对基督教的取缔日趋严格。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明代，西洋耶稣会的传教士就来到中国，慢慢发展了教徒。但直到康熙三十一年，传教自由和信仰自由才真正被官方许可。其后因为罗马教廷表示中国的传统习俗不可理喻，清朝方面也采取报复性措施，对来华传教士加以限制，要求他们必须取得政府的许可证书。康熙帝晚年进一步加强限制，明令禁止西洋传教士到各省传教。但这一禁令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各地的天主堂基本如从前一般被保留，传教士的行动自由也没有受到影响。

雍正帝登基之后形势大变。像其他方面一样，宗教政策也从放任转向干涉。于是，一切外来宗教不得不一时隐藏起来，因为压迫和迫害的时代到来了。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无论在教义方面，还是在实际方面，自然有与本土的中国思想和习惯差异显著、性质迥

异的内容。君主想要在中国式的理念之上建立并施行中国式的独裁政治，基督教就无论如何都难逃被视为障碍物的命运。特别是基督教承认女性的人格，将她们当作完完全全的信徒对待，让她们自由出入教堂，这与中国的旧思想相冲突。这个问题不仅发生在基督教上，佛教也蒙受了同样的责难，以至于妇女参拜佛寺的行为屡屡在法律上被禁止。男女混杂进行祈祷、聆听布道，无疑动摇了中国圣人所教诲的

“男女有别”。教徒互相帮助，意味着组织结社，若是任其发展，就可能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古来便有的、经常成为叛乱中坚力量的邪教性质的秘密结社组织。人民任意结社，比起国家法律更看重宗派教义，比起尊重天子更尊重教主，为了宗教舍弃性命在所不惜。若是这样的话，便侵犯了君主的大权，与独裁制水火不容。

早在雍正元年，以福建发生的官员迫害基督教徒事件为开端，雍正帝发出一道敕令，命令全国的西洋传教士集中于北京侍奉朝廷，否则就经由葡萄牙管治的澳门离开中国。西洋传教士的传教事业因此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另外，这一敕令还命令从前误入基督教的教徒改过自新，尤其是作为知识阶层的读书人应当率先响应号召。翌年，即雍正二年，雍正帝颁布了可以被称为清朝教育敕语的《圣谕广训》——这是对其父康熙帝颁布的关于人民须知的圣谕十六条的详细讲解，其中将基督教列为异端，并训诫被基督教诱惑的人绝不能忘记作为人民的本分。但是雍正帝并没有将基督教视为那么危险的邪教，如果教徒表面上表示放弃信仰，他便不打算深究。但棘手的是基督教徒们恪守不可说谎的信条，特别是他们笃信在受到压迫和迫害之时，言不由衷地表示放弃信仰的怯懦行为最为可耻。因此，各地出现了凄惨的殉教事件，苏努一家也是如此。

康熙帝既然曾经一度敕准信仰自由，朝廷有时便对一般民众信教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但对于作为清朝的心腹大臣的满洲军人，以及士大夫、读书人等不能听之任之。苏努一家是基督教徒一事在之前审判的时候已经明了，现在雍正帝发布的放弃信仰的敕令正逐渐在地方推行，苏努一家不得不再一次接受朝廷的审判。

苏努一家十四岁以上的男子被传唤到右卫城里，被命令宣布放弃信仰，但是无人回应。右卫将军惊讶之余只得将作为一家之主的苏努的第三子若望·苏尔金拘留，暂且让其他人返回新堡子。第十一子方济各·库尔陈自己要求与其兄一同被拘禁。

听到这一消息，他们的家眷们共同商议，决定制作家族内的基督教徒的名单呈给将军。这里面甚至包括了几乎所有女婢。六位妇女作为代表到将军衙署自首，让官员们不知所措：

妇道人家，不晓道理，惟愿各自听随夫君命运。

她们毫无推诿逃脱之意。苏努的孙辈中又有五个八岁以上的男孩到官署自首，呈报自己是基督教徒：

没有规定说必须到十四岁才能兑现对基督的誓言。

右卫将军等对如何处置他们感到为难，一边将此事上奏朝廷，一边将年长的若望和方济各送往北京，交由最高审判会议裁夺。

其间被监禁于北京的类思·勒什亨与若瑟·乌尔陈兄弟也同样被逼迫放弃信仰。但二人固不从命，若瑟尤其坚强不屈。最初受雍正帝的密旨，三阿哥以及其他大臣将若瑟拖出监牢，威逼利诱其放弃信仰，但若瑟丝毫不为所动：

我曾发誓如侍奉天子一般信奉神，成为基督教徒，若如此行为激怒天子，我万死不辞，但绝不可能改变我的誓言。

大臣们无计可施，将若瑟的话原封不动地上奏雍正帝，并奏请对他处以重刑。但雍正帝命令他们再次与若瑟见面，让他改过自新。这次列席官员人数众多，于是将附近的佛寺充当了临时法庭。若瑟的仆人听说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认为最终到了不得不为主人收尸的时候了，带着席子冲到了佛寺门前。万幸的是到了傍晚，若瑟再次平安无事地被送回了监狱。这一日他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信仰，并继续顽强地拒绝了大臣们的劝告。雍正帝听闻此事，召来总理事务王大臣马齐，说：

命令将伊即刻处死虽然容易，但不能说是至善之政。须让有罪之人意识到自己的过失。由于尔等审讯拙劣，最终被伊等愚弄。你再去一次，这次这样说：无论是满族人、汉人、蒙古人还是西洋人，当作神明加以崇拜的对象都是同样的天，只是不同的国民崇拜仪式各不相同罢了。朕并非意欲禁止伊崇拜天帝，惟因伊乃满族人，欲令其依照满洲仪式崇拜而已。惟念伊抛却祖宗传统而依西洋人之仪式，此乃大谬，并无他意。以错误的仪式崇拜天，反而是对天的侮辱。朕因此命伊改过。

大臣等带着皇帝口谕的记录，第三次去审问若瑟。但是若瑟毅然决然地重复了前两次的回答：

真正的信仰是唯一的。我的信仰绝不与侍奉天子相矛盾。因为神教导我始终忠诚于我侍奉的君主。若我放弃信仰，反而陷入欺君的境地。我只想反问您，若如您所说，服从西洋人的信仰之人是西洋人的孩子的话，那么学习孔子之道之人就是孔子的子孙吗？

这让大臣们感到十分棘手。无论是谩骂、诅咒、嘲笑还是威吓，他们用尽侮辱性的语言，却最终无功而返。雍正帝得到报告后却没有丝毫怒色：

必须将信仰与政治分开处理。若只因信仰问题就治其死罪，那在处治忤上叛逆之徒时，还有什么比死罪更严重的刑罚可判呢？还是耐心地要求他反省吧。

于是，若瑟等人被继续监禁，刚从新堡子被押解而来的若望和方济各兄弟二人同样被处以监禁。他们一家的财产被全部没收，以往从北京送来的微薄的生活费就此断绝，只剩下妇孺的苏努一家在新堡子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北京的西洋传教士听说他们家穷困的情况，本打算尽可能收集金钱和物品秘密送往新堡子，但最终未能实现，只能写信给自己的国家，请求为其募金。

至此为止与若瑟关押在一起、照顾若瑟饮食起居的男仆叫马小儿。马小儿最初得到承诺，短期就会有人来替换他，因而答应随若瑟一同关入单身牢房。但因一直无人来替换，不管其情愿与否，他与若瑟实际上已经共同生活了两年有余。当意识到这个没有自由的工作似乎变成半永久性的时候，他失望得几乎癫狂。主人若瑟时常安慰他：

不信神则心中烦闷。

若瑟指导马小儿进行祷告。若瑟每日早晨起来，反复背诵已经熟烂于心的《圣经》语句。马小儿听到后便觉得心情逐渐恢复平静。若瑟在举止上没有丝毫慌乱，精神愉悦，对待下人也彬彬有礼。他的颈部和手上都系着沉重的铁链，虽然旁人想要帮忙支撑一下，但除了更换衣服和活动身体以外，他都拒绝他人帮助：

我乃罪恶深重之人，必于此世赎罪。

若瑟如是说。他严守天主教戒律，对肉类不动一箸，原封不动地拿给马小儿吃，只因为狱中没有日历，害怕因算错日子而打破斋戒。这单人牢房看起来不像牢房，而像是神圣的宗教场所。

苏努一家的家产被没收，作为仆人的马小儿自然也被从若瑟身边带走，赐给了新的主人。他终于摆脱了在单人牢房中的工作，结束了两年多的监禁生活，重新回归自由的社会。但他丝毫没有感觉到幸福，反而为离开他那富有同情心的主人而感到痛苦。他即刻飞奔至天

主堂接受洗礼，被赐予教名保禄。此后每天一旦有空闲，他便到监狱守候，拜托看守的士兵让他从高墙上的洞口看主人一眼，这成为他唯一的慰藉。

雍正五年，圣母升天节（8月15日）的早上，马小儿流着泪连滚带爬地来到天主堂，带来了主人若瑟的死讯。14日早上，看守正纳闷若瑟最近三日都没有来拿从洞口送来的食物，于是去牢房查看情况，只见若瑟半裸着爬到门口，最终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了。守卫赶紧向上级报告，他们对若瑟进行了尸检：他大概是喝了某种毒药，大量吐血而死。马小儿15日一早得知了这一消息。若瑟的遗骸在数日之后被送到公共墓地火葬，骨灰被撒到土里。

中国传教士罗萨里奥给新堡子带去了噩耗。苏努一家被幽禁在家中，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因此罗萨里奥只得到和与看守他们的卫兵关系亲近的苏努家仆人秘密会面的机会。但苏努家的女人们没有表现出一丝心慌意乱，她们为他终于等到进入天堂的时刻而欢欣鼓舞。这在过去的中国可是难得一见的稀有现象，罗萨里奥也为之一惊。

此时仍留在新堡子的苏努一家的奴婢共一百九十四人，他们全部被带回北京、分配到别的王公家。苏努一家的经济状况愈发窘迫。虽然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恰巧收到了从法国送来的为他们筹集的救济金，拜托中国的信徒送到了他们手上，但是他们在新堡子的情况依旧不断恶化。苏努一家被剥夺了奴婢，仅仅剩下六十二位家庭成员。他们被迫搬到十八间^[1]大的小屋居住。他们向官员要求，至少要给他们和在监狱关押的囚徒一样多的粮食，但这样的要求还是被拒绝了。一家人饥寒交迫，相继倒下。他们甚至没有一个人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不得不躺在泥土地面上喝粥苟活。

炼狱般悲惨的生活持续了多年后，苏努一家终于否极泰来。雍正十一年春，有一位带着军事使命被派往蒙古的将军途经新堡子，偶然

遇到苏努家的妇女正在亲自从水井里打水。这位将军甚是同情他们的穷苦状况，回到朝廷后便上奏请求雍正帝赦免苏努一家。不知当时雍正帝是怎样的心情，当即同意了他的请求。流放到各地的苏努一家的男人们除了已逝的两三人外，全部被赦免，回到了新堡子。此时距离这悲惨的一家流离各地已经八个年头了。从那以后，他们再次作为满洲出身的军人，也就是以八旗兵的身份，到各地的军队去赴任了。

雍正帝释放甚至不惜违背天子之命也不肯放弃信仰的苏努一家的理由现在已无从知晓。或许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导师若瑟，接着又失去了若望，因此对信仰有所动摇，或者在表面上表示放弃信仰了吧。但是我认为事实也许并非如此。实际上，对清朝而言，满族人是国家之宝。万一有大事发生之时，不管怎样，清朝能够依靠的始终是满洲军人。此外，无论是多么彻底的独裁君主，君主的威力总有其界限。雍正帝自己对这一点有清楚的认识。让过度残酷的迫害无限继续下去会影响到后世对天子的评价。超越理性范围的强压反而会使独裁权力本身产生裂缝。总之，就连如此顽固的雍正帝，在面对顽固的基督教徒时，也最终没有耐心与之较量了。

雍正帝原本认为宗教与政治可以截然二分。某个臣子曾经上奏称伊斯兰教是外来宗教，有害国体，请求禁止。此时，雍正帝责备他说：

〔奏中之论皆太过矣。回回、喇嘛等教〕确属外来之物。或许习惯各不相同，若是苦恼于此〔徒滋纷扰，有是治理乎？〕

那时候，雍正帝并没有将基督教视为多大的危险。但是日本岛原之乱的消息传来后，他发现若是听之任之大概会出现妨碍政治的苗头，最终发出了禁令。

关于基督教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中国基督教徒作为医生从军，立下大功，回来之后被推荐以要职，但同时有资格的还有另外三人。因此，他们被引见给天子，请天子任命其中一人。终于到了引见之日，这位基督教徒的应答很受雍正帝喜欢，但最后皇帝突然口气一转，问道：

“朕听说，你是基督教徒，确否？”

“诚如是。”

这个男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天子都为之一惊。

“你头脑不太清楚吧，想想再重新回答。”

“基督教拥有神圣的教义，是教会我们忠诚与顺从以及一切美德之教。”

雍正帝死死盯着这个信徒的脸，什么都没说就让他们四人一起退下了。那人自己显得很淡定，但旁观的人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一个宦官在这个男子回去的路上拍拍他的肩膀，小声说道：

“您真是惹大麻烦了。好不容易到手的好机会也将化为泡影。”

“即便如此，若是平日对他人说尽大话，而遇到紧急状况却欺君罔上，就太说不过去了。”

他那淡定十足的态度令人钦佩。翌日，这个基督教徒被召到官署，竟得到了本以为毫无希望的任命书。

正如前面所言，雍正帝对禁止基督教一事不包含任何政治意味。若是一个诚实的基督教徒，仅是不可说谎这一点，也是作为臣子的长处。人才与宗教孰轻孰重？如果对宗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利于选用人才的话，雍正帝还是会以人才为重。因此，可用之人若是在信仰问题上彻底坚持，原本不把信仰当作问题的雍正帝便不得不让步。

即便如此，一直坚持到底、不肯言弃的苏努一家的信仰之坚定、忍耐力之强确实令人惊叹。说到底，当时的满族人尚且具有如此气质。此外，他们还拥有作为清朝嫡系的自尊心。他们自信满满甚至有些固执，拥有对于正确的事情无论何时都要坚持到底的信念。正是因为当时的满族人有这样的精神，才成就了清朝的霸业。但问题只有这些吗？而且只是这样简单吗？

根据苏努的第三子若望的供认，从他们最初听到基督教的教义起到完全皈依，实际上经历了十多年，这十多年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充满烦闷的岁月。烦闷的根源不消说是基督教与满洲固有的民族信仰的交锋。原本不满百万的满族人，统治着人口百倍以上的人并成功建立清朝，若没有满洲神“天帝”（abkai han）^[2]的护佑，注定是无法实现的。对他们而言，这位神明是无比珍贵的充满善意之神，有求必应。他们尽管不忍心背叛、抛弃这位传统的神，却又不可能继续这样信奉下去。若望等人之所以持有这样的疑问，实际上不外乎是对于祖先的功业有所疑惑。他们以武力征服了汉地，但这终究是不是正义的行为呢？汉人的人口是满族人的百倍，在智慧和技术方面也远远凌驾于满族人之上。满族人高高在上、瞧不起为数众多的汉人的情况可以持续到哪年哪月，满族人的特权又能否长久地得到维系呢？若是遵循传统习惯，毫不懈怠地将牺牲奉献给满洲之神，那么他一定会爽快地答应将恩泽延续到子孙万代。然而越是如此容易地得到肯定答复，他们越感到不安。

恰好，别的神出现了。他不仅是满族人的神，还是所有人类的神。他自称是在混沌中创造宇宙，在宇宙中创造人类的神。神绝不以一个民族或一个人作为对象，因为他是面向全人类施行正义的神。神绝不牺牲或幕后活动所动，因为人们除以正确行为来奉仕他以外别无他途。无论是满族人、汉人还是西洋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毫无差别的人类罢了。作为整个中国的征服者，满洲的贵族应当彻底坚守世俗的

荣誉，保持满洲传统的神灵信仰，还是应当舍弃所有的荣耀，拜服在全人类之神的面前，接受平等的对待，这才是他们烦恼的焦点。

最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以满族人的身份，而是以人的身份生活。他们放弃了满族的民族神而皈依了基督。但他们把作为满洲民族的骄傲和历史全部丢弃了吗？不，不，他们无论何时都是满族人，因此无比热爱满洲民族。但是他们认识到若是不能一时脱离满族人，满族人就不可救药了。作为傲慢的征服者形成特权阶级，只知道骄奢淫逸的贵公子会被诅咒。不远离傲慢之人就会灭亡。如果不能发现满族人正确的生活方式，他们就可能像以色列十族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在命运面前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将来。他们因作为满族人的荣耀与作为人类的正义感的对立而烦恼，最终通过信教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于是，来自外部的迫害越强，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磨难越能得到神的恩宠，信仰便愈发坚定。最终，就连雍正帝也败下阵来，只好放手不管。

然而，他们在迫害面前所展现出的不屈不挠的信念确实值得赞赏。而且这样的精神体现了当时满族人品质中所具有的真正价值。在以兴盛期的清朝为中心的满族人的风气中，虽然具有起步较晚却一步登天的民族所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但也具有在前代称霸一时的辽、金以及元等王朝所看不到的优点。他们即便在武力上较蒙古族的成吉思汗略显逊色，遵守秩序、团结一致、为集体献身的牺牲精神却远胜蒙古族。清朝初期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屡次出现内斗，但每次的结局都是失败者向占有优势之人妥协，从而使清朝避免了分裂，克服了危机。康熙末年发生的皇子之间的内讧以及雍正帝对苏努一家的镇压等事，如若发生在元朝，有可能直接发展为内乱谋反。因此元朝自掌控中国全境起，仅仅九十余年便亡国了。而在清朝统治之下，一旦天子即位，君臣之分已定，就没有硬要以武力满足自己欲望的皇族。如年迈的苏努一般，不但不听从儿子们的劝说，没有信奉基督教，而且对

雍正帝称他不忠这点直到最后都不服。直到临终之时他都对雍正帝所加罪状抗议不已：

天子认为我等因祖先褚英被幽禁至死而怀恨在心，言诅咒清朝等语。绝无此事。我祖杜度十七岁初战，二十三岁战死沙场。我父杜努文一生戎马，皆在军中度过。我七十余岁至今忠诚为臣。天子非难我家实属不当，唯此事无法信服。

在处于荒野的新堡子中断气时，年迈的苏努不断重复着这样的话。当被雍正帝当作猪的九阿哥的部下劝说他谋反的时候，苏努立即一口回绝：

从未想过兄弟之间竟要以武力争天下。

当然，谋反一事在事实上的确不可能实现，但苏努也完全没有这样想过。他们明白，若是满族人分为敌我内部相争的话，满洲族群会立刻自我灭亡。在满族人全体的利益面前，个人的问题只是不足挂齿的细枝末节。作为个人无论面对怎样的命运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就是他们值得钦佩的人生观。

武力征服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只要是有良知的满族人，恐怕最终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数占绝对多数、勤奋而聪慧的汉人，最终必定起来反抗。对于这一点的忧虑和不安，恐怕是苏努一家皈依基督教的外部动机。他们通过信仰，想要在神的面前作为纯粹的人，希望神解决他们的烦恼。雍正帝也不是没有同样的烦恼。然而雍正帝希图用完全不同的方法，那就是站在帝王的立场上用更现实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施行历代中国帝王没有几人能够做到的完美政治，建设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公正社会，令万民安堵，这正是上天赋予清朝皇帝的任务。通过完成这个任务，清朝和满族人将一同享有上天对中国人的最高嘉奖——家业传于万代。雍正帝对此深信不疑，几乎可以称得上是

宗教般的信仰。于是，皇帝凭借着当时满族人的诚实和坚韧，一步步地将这一信念付诸实践。

[1]. 间是面积单位。——译者注

[2]. 原文使用的アブカイ・ハン一词，是满语abkai han的音译。abka意为天，han意为汗、君主，abkai han即“天帝”、“上帝”。——译者注

4 天命的自觉

明万历年间（1616）崛起于东北一隅的清朝在太祖一代平定整个东北地区，与人口不啻百倍的明朝相抗衡，战事一直延续到其后的太宗时代，到第三代皇帝顺治帝时，清朝便挺进北京，平定全中国，这的确确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满族人自己也一定为这意想不到的成功吃了一惊。在传统的满族思想中，这是在满族的守护神“天帝”的护佑下实现的。清朝进入北京后便将业已焚毁的明朝宫殿基本依照原样重建，唯一的区别是在位于内廷的坤宁宫深处的院子前，设有祭天的竿子，这被称作“神杆”。另外，在皇城的东南角建有称为“堂子”的建筑物，这是满洲式祭天最神圣的灵地，在此行祭礼是清朝天子的特权。

在中国人民看来，明清易代是天命所归。到那时为止，承受上天之命统治中国的明王朝已堕落不堪，天命抛弃明朝转而让清朝统治中国人民。满族人进入关内，随着汉化程度不断加深，普遍接受了天命思想。毋庸多言，雍正帝也是其中之一，他对天命深信不疑。满洲的“天帝”和汉人的“天”毕竟是同一个“天”，在恩惠满族人的同时也必须惠泽汉人。

康熙帝从三十五位皇子之中唯独选出雍正帝继承大统，这自然也只能被解释为天命使然。在众皇子围绕储君之位进行的激烈争斗中，大概谁都没有预想到最后的胜利者会是雍正帝吧！是降于清朝的天命在众皇子中选择了雍正帝。

天命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保证天下万民的生活，使其各安其分是天子被赋予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天命也许会再次离开，转向他处。“天道无常”，天命早晚会从不配承受它的人身边溜走。这就意味着革故鼎新。实现天命既是对天的义务，同时也是对祖先的义务，也是对全体满族人的责任。

雍正帝担此大任而践天子之位是在其四十五岁之时。若是可以相信雍正帝所说的话，那么他此前曾极力避免接触现实政治。这也是避免深陷于兄弟互相争斗的漩涡而必要的自保之术。他自己说：

〔朕向在藩邸，谨守节度，实未留心吏治，亦并未交接一人。是以践阼之后，〕〔臣工皆所未识，政务皆所未经。〕完全不知所措。

但此言必须打个折扣再听。雍正帝表面上没有参与兄弟间的内讧，但并不是完全对此采取超然世外的态度，只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从容不迫地冷眼旁观事态变化罢了。与此同时，他并不怠于深入观察人情世故。不受拘束地生活于藩邸的非嫡长子身份，让他也有闲心对父亲康熙帝的施政方针进行冷静的评判。后来皇帝在给大臣的一封信的一节中，有一句抱怨颇值得玩味：

朕是在藩邸阅历世情四十五年，备尝世间辛苦才成为天子的四阿哥。朕非生长深宫之主，若怀轻朕之心，恐将来噬脐莫及。

这恐怕是雍正帝的肺腑之言吧！

那么，在雍正帝眼中，康熙时代的政治究竟如何呢？康熙帝作为宽仁大度的君主享有极高的评价，若将此称为“民间的评价”却名不副实。舆论归根结底不过是有权有势者的舆论，在民间，处于最底层的苟延残喘的贫民们多数被排除在舆论范围之外。若一日不从早到晚片刻不得休息地劳作就无法维持生计的农民们根本没有精力制造舆

论。舆论不过是来自知识阶层的政治家在政治之余饮酒作诗之时散发出来的贵族的香气罢了。

康熙帝的时代，一言以蔽之，是寡头政治的时期。寡头政治并非发轫于康熙帝时期，也非开始于清朝。有史以来，历朝历代无不实行寡头政治。在中国，时代愈靠后，寡头政治发展愈快。明朝狼狽不堪的亡国也是寡头政治招致的败局。

兴起于唐宋时代的高级文官考试，即科举制度成为制造政治寡头的温床。听起来，公平地选用人才是好事情，但为了参加检验在经典古籍方面的教养的科举考试，人们至少要进行十年以上的学习。若不是在经济上和时间上都有充分保证的上流阶层，就会因为实际问题而无法参加科举考试。不参加科举考试就无法成为官吏，即使成为官吏也无法指望能出人头地。考中科举考试、成为官吏的人，凭借一己之力便可以敛聚钱财；与此相反，若是没有一官半职，仅仅想要维持手中的财产也困难重重。因此，财产、官位、教育和文化都向特殊阶级集中起来。政治为这个特殊阶级服务，舆论也拥护这个特殊阶级。

官吏们先是因为拥有万贯家财才做了官，接着又因为做了官而敛聚起万贯家财。究其原因，若不与官吏勾结，就无法建立任何企业。无论是商业、工业还是矿业，为了和官吏疏通关系，都要耗费巨额资金。于是，与政府权力紧密联结而成立的企业，例如，像盐业一样的垄断企业，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这些利润当然不是为了兴办正规企业而积蓄的资本。其中大部分被政治寡头揽入怀中，只能促进毫无意义的消费罢了。因此，企业家为了弥补向政治寡头上供所造成的损失，或怠慢国家税收，或向下榨取劳动成果，不得不从这两种方法中选取一种。若是允许资本家偷税漏税，则国家财政必定会破产；若是榨取劳动走向极端，再生产便无以为继。在大多数王朝的末期，这两种现象并存。

在清朝的历史上，从内部观察处于兴盛阶段的康熙帝时期可以发现，政治寡头的暗中活动十分活跃。前文业已提及的皇太子的悲剧也只是与之相关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也是在朝廷上掌握实权的大部分满族人还没有充分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被汉人的政治寡头所操纵的结果。将明珠和索额图等满族人出身的寡头大党魁推举上台的，说到底还是汉人的寡头们。

汉人政治寡头中最显赫的是徐乾学，王鸿绪和高士奇紧随其后。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文人，他们通过前文所述的科举考试而结党。在中国，随着科举考试的兴起，师生关系发生了特殊的变化。从前，实际上教授学问之人为师，受教之人为弟子。而在科举盛行之时，考官被视为师，考生中的及第者被视为弟子。因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私学，对于教授读书作文的教师而言，教授学生是他们的职业，弟子向他们支付了相应的谢礼。换言之，由于这是一种类似商品交易的行为，经常付钱结算，因此这种买卖两清之后再没有留下丝毫恩情和人情。但在科举考试中，朝廷大官因公务而来，让什么风格的答案通过考试全凭考官个人裁夺，能在众多的考生之中对自己的文章另眼相看、产生共鸣并将自己选拔出来的人才是知己，必须一生对其感恩戴德，因此考官才是自己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恩师，也是带领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首领。如此，在一次次科举考试中，考官与考生间结成了师生关系，同时也结成了首领与部下的因缘。原本历代帝王对这种倾向都非常戒备，在科举最后一次考试即殿试中，天子亲自担任考官，进士及第之人便成为天子门生，以此极力防范他们与天子之外的考官建立师生关系。但清朝初期的天子汉学素养尚浅，将考试全权交于大臣之手，因此以徐乾学为首的学者大臣们有机可乘，形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等级森严的庞大组织。

且不论康熙帝对汉文化的理解究竟有多深，他屡次大兴文化事业，编纂卷帙浩繁的书籍。其中十之八九以徐乾学为编纂的总裁官，

于是他每每任用弟子为编纂官，编撰事业完成后，部下接受恩赏，被拔擢为高官，或者被任命为考官而奔赴地方。于是，一个无形但如藤蔓一般蔓延开来的广泛的关系网就这样形成了。

天子独裁权的发达与官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天子正是通过官僚机构，才得以成为独裁君主。但是一旦官僚机构形成，君主独裁权就会因官僚机构受到制约。理论上，独裁制下的官僚人人都是天子的奴仆，官吏与官吏之间不应当有私人联系。天子如同扇轴一般，必须将所有人集中于一点，不允许有其他轴心存在。但实际上，以科举为契机，官僚机构形成了几个节点，天子之意尚未传达到民众之前，便在途中遭到种种歪曲，人民的下情在上达过程中也被结节所阻断。天下的政治表面上是以君主之名义运行的，实际上却被官僚组织中盘踞的大小结节即政治寡头玩弄于股掌之间。

从位于官僚群体金字塔顶点的天子宝座的视角，无法轻易发现政治寡头的存在。但从横向的第三者视角观察，这些都清清楚楚。雍正帝到四十五岁为止的藩邸生活，让他仔细看清了政界的恶习：

试思当今皇帝即昔日饱尝人世间酸甜苦辣之四阿哥也。

这句话一方面让人觉得雍正帝自信满满，另一方面又让人体会到其心情之沉重。

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雍正元年的一月一日，皇帝发上谕，训诫上自一品的总督下至正七品的知县等地方官，告知他们各自的为官要务。这道上谕可以被视为雍正帝发布的论述自己执政方针的宣言书，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希望地方官戮力同心、一心治国的渴求。作为上谕中共通的内容，雍正帝提出当时地方官面对的最大诱惑是兼取名声与实际利益——“名实兼收”，指出必须根绝这种败坏的风气。“名”是指官吏之间的相互评价，可以通过交际而获得。在官场上，名声是

一种资本。天下闻名的官吏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优待，因为交际面广泛的人利用价值很高，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拜托其在背后运作转圜。在奢侈浮华的官场上，交际应酬必定需要高额费用。费用如何获得？或者私吞租税，或者勾结政商，或者收取贿赂，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最终无非加重了人民大众的负担。挥霍不义之财进行奢靡的交际，利用交际攫取名声，名声远播则有更多机会做上高官，在幕后运动中也更能呼风唤雨，于是收入便源源不断滚滚而来，也就是所谓的名实兼收。但长此以往，官吏日益肥硕，底层人民大众日渐瘦弱。政治决不可如此。政治并非为了官吏，而是为了人民。官吏若想要认真施行政治，就不应当将时间和金钱浪费在互相交际上。但最让雍正帝为难的是，通过科举及第而身居要职的高官们，不但善于交际，更乐于交际。

继对地方官的训诫之后，雍正二年七月，皇帝又颁布《御制朋党论》的敕文，文锋直指这一点。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作《朋党论》，在文中大致有如下论述：

不应责备官吏之为朋党者，因为正人君子方能始终如一地团结一致，奸邪小人因利害而动，故其朋党易破。

雍正帝对其大加贬斥，称它为欧阳修的邪说，因而自己另制《朋党论》一篇。雍正帝认为：

君子之必无朋党。奸邪小人掩己之非，欲以大力树朋党，歪曲天下之公判，此乃干犯君主大权。

两年后，雍正帝再次颁下敕谕，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昔者天下治道无二。唯命下之时，熟虑是否[秉公持正，适中合理，至于旁意忌嫌亦奚暇瞻顾计虑耶。] 天下人无数，所思皆异，岂能缄其口焉。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雍正帝似乎非常蔑视舆论，但在雍正帝看来，当时所谓的舆论未必是公正的万民的舆论，而是被严重歪曲的舆论，因此不可取信。最终，他的态度可以归结为著名的《论语》中的语句：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万事皆在君主心中。“别废话，把一切都交托给朕！”这便是独裁君主最贴切的心声。

但是，君主以一己之力背负天下的全部责任，凭良心说，真是太辛苦了。不过话说回来，在四十五岁这样年富力强的年龄继承大统的雍正帝对此甚为自信，加之他还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在。他自始至终都十分积极进取：

[士俗官常自宋元以来其流弊不可问矣。朕欲竭力挽此千百年之颓风。]

雍正帝充满自信地谈着他的抱负。

但这项工作确实相当困难。因为这意味着改革当前的官僚组织，树立全新的官僚体系。而且，与在别处新建房屋再毁坏旧屋不同，他的工作更像是将旧房子中被虫蛀的柱子一根根取下来更换为新的，将其改造成全新的建筑一般。革命容易而改革实难正在于此。

为了达到目的，首先必须辨别官员的人品。到底是不是能够凭良心为官施政的人呢？到底是不是有能力按照自己所说的去施行的人呢？虽然麻烦，也必须一个人一个人地去检验。独裁政治的好坏由君主手中所握棋子的优劣来决定。尤其是在舆论已经不可信的时候，必须借助特殊的办法。这个时候皇帝最终还是使出了自古以来独裁君主常用的手段——密探政治。

兴起于东北的清朝具备实施密探政治的良好条件。清朝用从东北带来的直属势力组成八旗组织，围绕在天子左右。旗是军队编制的单位，其中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以及从满洲时代便降服于清的汉人所组成的汉军八旗，正好二十四旗，他们区别于一般的中国人民，被赋予诸多特权。这时候也正值日本德川幕府利用谱代的旗本御家人到外样大名的领地去做间谍的时期。同样，雍正帝也派出八旗子弟让他们去当密探。八旗子弟中的心思细密者被挑选出来担任侍卫，他们在天子身边听候差遣，有时候也奉命办理机密任务，甚至被派到非常偏远的地方。当时的满族人已经可以与汉人毫无差别地讲汉语了。

关于密探政治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个地方官到地方赴任之时，从北京雇用了一个仆人随行。这个仆人忠诚地侍奉主人，令主人十分满意。三年任期结束，作为地方官的主人收拾行李准备回京，这个仆人却突然提出要请假。分别之时，他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后便走了：

老爷您真是诚心竭力、尽忠职守啊，回京之后天子定会奖赏您。

地方官回京拜谒天子，雍正帝果真特意对他说了嘉奖的话。退出宫门的时候，他不经意看到，在那里待命的侍卫长竟然就是之前还在自己身边当仆人的那个人！

独裁统治下，密探政治的失败就在于君主反过来会被密探所误。密探如同烈性药物，副作用极大，另外，若是用错分量就会招致不可想象的后果。明代的天子利用宦官强制实施密探政治而最终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为了不被密探所误，不能仅抓住一条线不放，必须让密探形成纵横交错的系统。可能的话，比起专门设置密探类似性质的专门机构，让官僚之间互为间谍是最上策。若不是思维相当缜密的睿智君主，则无法将密探政治运用得如此自如。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故事。五六个朝廷大臣聚在一起熬夜打麻将赌钱，最后在收拾麻将牌的时候，发现一张牌不知去向，无论怎样找都找不到，只好就这样散场。第二天其中一个人觐见的时候，雍正帝问道：

夜间何以为欢？

这位大臣感到相当为难。赌博本被法律明文禁止，更何况雍正帝特别厌烦此事。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臣实在无颜见陛下，在打麻将。”

“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吗？”

“丢失了一张麻将牌，无论怎样找也没有找到。”

于是，雍正帝显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从袖中拿出一张牌扔了下去：

丢的就是这张吧？

因为一五一十地招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位大臣最终免于处罚，但他引以为戒，从那之后再也没有碰过麻将。

传说还有这样一个故事。雍正帝的密探深夜在政府机关巡视，检查守夜人是否确实去上夜班了。某天早上，相当于日本司法省的刑部的大臣进宫谒见，皇帝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刑部的匾额在何处？”

“悬挂于衙门之上。”

“胡说！”

雍正帝大喝道。大臣顺着皇帝所指的方向一看，刑部的匾额正躺在宫殿的角落。因为在两三天之前的半夜，刑部衙门的守夜人沉沉睡去，皇帝的密探把刑部的匾额摘下拿进宫来，而这位大臣直到前一刻还没有发现。被皇帝收缴上来的匾额没那么轻易还给刑部，刑部从那以后一直都没有挂匾额了。

这些故事被当作逸闻趣事流传下来，但是雍正帝的本领并不用在这些无聊的地方。皇帝最想知道的是人民的生活状况、治安状况、经济状况等。为了解这些状况，皇帝命令地方官每年时时向他报告各种情况。冬天则报告积雪量；春、夏则报告降雨量、麦和蚕的收成状况，以及有无干旱洪水；秋天则报告米谷的产量、米价的高低等。报告制度在康熙帝晚年已经开始施行，而雍正帝命令大小官吏分别报告，互相对照，确认其中确无虚报才放心。

然而，在中央政府的机关中并没有专门负责处理这些报告的机构。这些奏报以奏折的形式直接交到天子手上。原来中央政府与地方行省的联络是通过各省总督，以及作为总督的助手、负责民政事务的长官——巡抚之手进行的。总督与巡抚向中央政府提出报告或要求，这种公文称作“题本”。题本最终也会被交到天子手上，但会经过六部和内阁等政府机构处理之后，再呈给天子裁夺，天子掌握最终决定权。大多数君主认为只需做出最终决定便完成了独裁君主的任务，可以安然享乐了。但雍正帝是不满足于吃现成饭的独裁君主，他另辟蹊径，想出了新方法。当时中央政府的官吏、地方大员、总督、巡抚能够不向内阁递送文书而直接向天子递交报告，呈报意见。这样的文书被称为“奏折”。奏折即是总督、巡抚个人以非公开的方式向天子个人发送的亲启信件。奏折的内容千差万别，有的时候是贺年卡，有的时候是天气、米价的报告，有的时候是军事上的机密。雍正帝扩充了前代创制的奏折制度，允许更广范围的官吏呈递奏折，以此获取地方

情报，除此之外，也顺便通过报告的方式方法观察上奏官吏的人才人品。

文官中的知府和武官中相当于师团长一级的总兵，在赴任之前必会被召到宫中谒见皇帝。那时雍正帝会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训诫。他们到任之后应当立即向皇帝呈递作为亲启信件的奏折，重复一遍谒见之际训谕的内容。若是所书内容有误，雍正帝会用朱笔一一订正，提醒他真正的敕谕是如此这般。若有特别的命令，则在信札的余白处用朱笔书写，之后将信函再返还给寄信人。这是最初的考试。收到这样的朱笔宸翰即“朱批谕旨”的当事人，既不能将其留在自己的身边，也不能将之示于他人，必须即刻送还到天子身边，同时，从这次开始必须提出政见或是施政情况的报告。除此之外，雍正帝还在批注中写道，无论有何等见闻，都需原原本本、毫无隐瞒地报告。

[若闻见不广，必至是非颠倒混淆，贻误匪浅。] 故许汝等奏折以广耳目。

[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武是否整饬？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风闻入告也。只需于奏中将有无确据抑或偶尔风闻之处分析陈明，以便朕更加采访得其实情。]

[苏州地当孔道，为四方辐辏之所，其来往官员暨经过商贾，或遇有关系之事，亦应留心体访明白密奏以闻。]

忙时若非秘事，[令人代书可也。] 因与正式文书不同，[即略带行草亦属无妨。辞达而已，敬不在此。]

从地方汇集于此的报告，只有雍正帝一人开封阅读，即使对朝廷大臣也绝对保密。若有需要公开处理的重大问题，雍正帝也是将寄信人的姓名部分裁剪掉后再让大臣们看，并听取其意见。同样，收到皇帝回信的人也绝不能将内容泄露给他人。因为若是不能保守秘密，地方官惧怕遭到报复，肯定谁也不敢说上级官员或大臣的坏话，天子

肯定也不能再将秘密的事情托付于臣子。提供情报是地方官在本职工作之外的重要任务，若是怠惰也会被催促。当然若是将应当报告之事隐瞒不报，必定会被狠狠地教训一顿。

（此事）〔朕悉于他处闻之。汝今何颜对朕？若云不闻不见，是乃无耳无目木偶人也。〕

〔似此琐屑不应奏之事渎奏，必有应奏之事隐匿而不奏闻者。〕

尔等都如何行政的？不被朕知道就了事了吗？了解尔等勾当是朕政务中头等大事。

这项不是工作的任务，话说回来只不过是雍正帝与地方官个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而已，因此，地方官在亲启信中无论写了如何糟糕的事情都不会受到处罚。

（此奏甚为荒唐。）〔此事尔幸以折密奏，因随笔批谕，以示朕意。若系具疏题达，则妄言之罪，不为尔宽矣。〕

即使不会受到处罚，也会被雍正帝当成笨蛋，或者免不了被他痛骂一顿。皇帝骂人的话极其辛辣狠毒，很多直刺人心。

〔下愚不移，无可救药，尔之谓也。〕

〔即禽兽不如之谓也！〕

〔可谓良心丧尽，无耻之小人也！〕

〔则为木石之无知，洵非人类矣。〕

〔大欺大伪，大巧大诈！〕

〔如此负恩悖理，老奸巨猾，败坏国家法纪之人！〕

皇帝的恶骂滚滚而来，无穷无尽。天子居然知道如此花样繁多的骂人话，语汇丰富到令人瞠目结舌。从天子的责任而言，雍正帝在说

这些话之前，必须把握确凿无疑的证据。我们不得不为古时候获得情报的迅捷而惊叹不已。责骂虽然如此严厉，但归根到底也是私人层面的。雍正帝以此来要求地方官反省。官员若是迅速洗心革面或建功立勋的话，他便立刻转怒为喜。遭受责骂则还有一线希望，但若最终被认为不可救药，官员就会通过正式的命令被免职。

雍正帝的居室中堆满了上文所说的地方官上奏的、在得到皇帝朱批的回信后再次交还的文书，即“朱批谕旨”。后来皇帝选出可以作为政治参考的部分将其出版，以红、黑二色印刷，黑字是臣子奏折的原文，红字是皇帝用朱笔改动的或是批注的部分。《雍正朱批谕旨》这部书共有厚厚的一百二十册，是雍正帝倾注心血、勤勤恳恳专注于政事的结晶，是展示雍正帝如何励精图治的纪念碑。而且出版的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听说数倍于此的一捆捆信札直到清朝末年依旧在宫中堆积如山。

从前称天子日理万机，即每天有一万件事情要处理。其实，若是想要认真处理每一件政事，天子无疑会忙得不可开交。雍正帝丝毫不敷衍了事，每件事都不马虎草率，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政事之中，这种专注认真着实令我们敬服。像他这样有良知的帝王，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大概也无与伦比吧！

早上四点以前起床，这不限于雍正帝，大体中国人都习惯于早起。雍正帝每天早晨一定会读记录先帝历史的实录以及作为诏敕集的宝训各一卷。宫门四点开启，六点是一般官吏上班的时间，大臣则必须进宫参见。于是天子在用过早膳后，于七点会见这些大臣，与之共同商议政事。若有特别请求谒见的人，天子则继续接见，接见经常会延至午后。若是时间宽裕，雍正帝便召入学者，让他们讲解经书或历史。一般人早上起得早，晚上也习惯于早早休息，晚上七八点就是就寝的时间了。但是勤勉的雍正帝大多数时候利用晚上的时间，批阅地

方官吏派人送来的作为亲启信函的奏折，书写回复的谕旨，忙得不可开交。他每日至少批阅二三十份，多的话则需要看五六十份。

[朕立志以勤先天下。天下凡大小臣工奏折悉皆手批，外人亦不信，至于日间廷臣之面奏折奏者甚繁，心绪亦不静，不如灯下可得如意。大概外来奏折晚批者十居八九，此折亦系灯下所批。朕从幼夜间精神更好，非出勉强也。]

卿之报告颇为冗长，但无需致歉。虽甚繁冗，朕欣阅览之，乐而忘疲。即为数千字之长文，朕亦无一次不从头至尾览阅完毕。君臣之间不必如此客气。

朕不认为自己是万世明君，但也绝非庸主。[灯下随笔所书，莫晒字画之丑率也。]

[因卿奏内有恐惧彷徨之语，援笔书此以谕。时夜已过半矣。]

[朕初御极时，诸臣俱未认识，朕费无限苦心鉴别人才，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惟以天下大计为重，此身亦不爱惜。]朕于西暖阁匾额取“为君难”（做君主真难啊——作者注，余同）三字，两侧柱子上对联云“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天下大治或大乱都是我一人的责任，不愿为了我一个人而让全天下人辛劳）。

[奏内静养一语，固出爱君之诚然。朕谓养身之道不关动静，能养则动未有害，不能养则静亦无益。故曰养身莫如养心，而养心之要惟贵适理。但勉邀上天许一是字则无往而非养也。若内怀惜己之心，外假他人之力以求事合乎理，理恐未当，以求理慊于心，心更难安，如是则反不得其养矣。诸凡审己，量力而自强不息，朕亦未尝不养也，卿其勿庸过虑。]

以上是从雍正帝写给地方官的回信中挑选出来的语句，从中可以窥见他是如何孜孜不倦地勤勉于政事的。如果奏折中对地方政事有关键性的意见，即使是几千字长的奏折，雍正帝也不辞劳苦地阅读；若有官吏提出不疼不痒、纸上谈兵的空论来敷衍塞责，雍正帝的暴脾气会立即发作：

[朕一日之所披阅及一切训谕甚属殷繁，举凡尔等奏章，朕皆自首至尾详视不遗。如或览或不览何必谆谆命尔等具折耶。当谅朕心力所能，择紧要处简明陈叙以闻方是。若动以幕宾门客缀辑闲文混行冒渎，甚至以数两几分花帐连篇累牍任情开列以相烦琐，于心忍乎！思之！]

[颂圣谕词朕尤厌观。类斯等奏章嗣后竟可不必，朕实无暇批阅也。]

实际上，雍正帝丝毫没有空闲。康熙帝厌倦政事时，便去欣赏江南的风景，几次顺着运河巡幸苏州、杭州。乾隆帝也效仿其祖。但是雍正帝只是偶尔去位于北京近郊西山的别墅，一步都没有踏出过北京。因公务缠身，若是一日怠惰，一日的工作就积攒下来，日后必更加劳苦。天子自己如此，因此也不让地方官做无益的旅行。无论何时，想要到北京谒见天子的请求肯定会被一口回绝。调任的官吏同样也会接到不必绕道来京，赶紧直接到新的任职地赴任的命令：

即来京陛见，朕亦无可教导，至于地方事宜奏折可以训谕，[何必仆仆道路，不特无益，兼恐贻误职分中事。]

雍正帝统治的十三年中，在励精恪勤的皇帝的示范倡导下，各方面政务都稳步取得进展，政绩斐然。虽然有的官吏感到被如此天子驱使，不堪重负；但与此同时，也有官吏认为正是被如此进取的天子所用，才找到了工作的价值。

天下之财为万民之物。为天子一人之奢侈而花费实属浪费。

雍正帝没有为自己增建一座宫殿。地方官奉上贺表时若用绫绢，他也会说为何如此不知节约，让其以后不再使用绫绢而改用纸张。为了天下政事，他十三年如一日鞠躬尽瘁，这绝非易事，正是由于他对天命的自觉，也正是因为相信这是令全部满族人以及列祖列宗奠定的清朝基业日益稳固的唯一方法。当他听到地方大获丰收的消息时，说：

天恩浩荡，朕不胜庆幸之至。

这是将天下事视为自己之事，双掌合十叩苍穹以示感谢的他。

接到一百六十八人被洪水冲走的报告后，他说：

〔被淹如许名口，深堪恻恻，嗟此灾黎横遭无辜，实属可怜至极。皆缘朕与〕卿等地方大员之责任，〔不能绸缪于早之所致。〕

这是因自己未能未雨绸缪而深深自责的他。

5 总督“三只鸟” [\[1\]](#)

独裁政治之下的理想是不允许有特权阶级存在。在君主面前，无论是大臣、地方官、商人还是农民，都必须是普通的臣民。但是君主不可能一个人承担全部的政务，无论如何都需要庞大的官僚组织，然而官僚只是协助天子，代行天子保证人民生活的任务而已。正如君主需要对耗费民财来满足自己愿望之事持谨慎态度一般，官僚也不能为了一己私欲而任意处理政事。官僚应当为了天子与万民而存在，而不是为官僚自身而存在。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是非常困难的。由于被天子委以大权，官吏往往会以权谋私，不但完全不为人民着想，反而榨取人民以自肥，这样的状况很常见。官僚之间联系紧密，互相帮助遮掩所做的恶事，在互相的包庇之下，收取贿赂，侵吞公款。官僚给彼此面子、互相庇护缺点的行为甚至被视为美德，于是就出现了让人无从下手整顿的官场习气。其中最糟糕的是科举出身的人。考官与考生中的及第者成为老师与弟子，同一期考试及第者们成为同年级同学，即“同年”，以此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以图相互方便。触怒君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若是被同僚厌恶则永无出头之日了。他们如此团结，结成十分牢固的“朋党”。

雍正帝认为要想让他们按照官僚本来的使命施政为民，放弃施政为官，无论如何必须破坏这些科举出身之人的团结，但是又不能贸然放弃拥有上千年漫长历史的科举制度，而且最重要的是除此之外没有

更适当的方法。总之，如何运作制度要比制度本身更重要。自古就有以下说法：

有治人，无治法（进行治理的是人，并不是法律条文）。

人才的问题也一样。科举出身的人自然都不是平庸之辈，重要的是如何运用人才。建立选拔人才的公正标准，对成绩斐然者尽数录用，对无能乖张者毫不留情地免职，如此下去，官场的风气也会焕然一新吧。

〔朕待天下臣工总惟大公无我一语耳。〕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信者乃伊自取信，可疑者乃自取疑。赏罚亦然，总与朕无涉。朕不横意见于中，以为此人必信此人必疑也。

如此强调是非分明的雍正帝拼命地寻找人才，求贤若渴。

人才难得为帝王第一苦衷。

他曾如此深深感叹。即使是睿智非凡、见识广博的雍正帝，也有数次被欺骗而失败的经历。最终得到皇帝完全信任、恩宠不衰的是地方官田文镜、李卫和鄂尔泰三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人都不是科举出身。

田文镜是汉军出身。所谓汉军，虽然也是汉人，但在清朝还在东北之时便已经归顺，代代为臣。因此，汉军即使不参加科举也有特别的出仕途径。在雍正初年，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担任相当于日本总理厅秘书的内阁侍读一职。他被命令前往陕西省祭祀华山之神，途经山西省，见到人民苦于饥馑。这是关系到地方官政绩的大事，因此被地方官员隐瞒下来，并未向朝廷报告。田文镜看不下去，上奏天子，天子也为之一惊，立即任命田文镜为特使，派遣他前往山西救灾，挽救了七八十万灾民的性命。

如此能干之人，为何至今未闻一人赞许？

雍正帝终于注意到他了。工作结束后，他被任命为相当于河南省财政官的布政使，很快被提拔为相当于民政长官的巡抚之上的总督。他治理河南省约十年，被称颂为政绩天下第一。

田文镜在承担赈济山西省饥民工作的同时，劝说地方官员向天子提出整理地方财政的策略。调往河南省之后，他被赋予了自由发挥其才能的权利，便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践，以为天下模范。

当时官吏的俸禄少得可怜，低到甚至无力维持家庭生活。作为民政长官的巡抚的俸禄一年仅白银一百五十五两，在一两白银相当于六斗米的时代，在生活水准高、交际讲究排场的官场，无论如何都难以为继。原因何在？在估算财政收入和支出时，尽量把基础值降到最低，这在中国自古以来被视为善政。租税从人民那里以谷物和现银的形式征收上来，几乎全部被收入中央国库，完全没有惠及地方。只有高级官吏和军队的俸禄从中央国家经费之中支取，而原则上国库不允许支給地方费用。至于地方官衙的维持费、书记^[2]的劳务费、办公费等，中央没有什么特别规定，各地方视情况而自由处置。于是，地方政府除去收取法律规定的国税外，还收取占国税若干成的附加税（耗羨）。虽然这种行为不被中央政府认可，但由于地方不得不征收附加税来维持运作，故而被默许。因此若是尽量将租税的额度定得小一些，就算地方官再增加几成的税收，也没什么大不了。若是将必要的部分悉数算入租税，地方官在此基础上增收几成税额的话，反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然而，由于中央政府不承认附加税，便完全无法将其置于监督之下，只得放任地方官自由处理。一方面，地方官在当地拥有极大的权限，这笔附加税比起用作地方政府的开支，自然绝大部分被官吏个人贪污消费了。政府应当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因此为了补充不足的

地方经费而再次向人民征收附加税。就这样，附加税逐步增加，永无尽头。

如果只是这样，还算可以接受，但由于征收附加税并没有可以依据的法规，各人所承担的赋税最终变得不公平。有权有势的人，尤其是官吏以及在官府任职的书记等小吏找些理由便可以免交附加税，他们应缴的部分反而被转嫁到贫困的农民身上。这就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导致富者强者愈富，贫者弱者愈贫。

另一方面，地方官绝不会满足于他们的俸禄。他们侵吞的附加税多达俸禄的千倍！当时的河南巡抚一年的俸禄是一百五十五两白银，但实际上他每年有二十万两白银的收入。其他人的情况可以推知。河南巡抚是管理约五百万人口的大官，比起日本德川时代的大名中最大的加贺侯地位更高，收入却不能与之比肩，问题就出在这里。租税的增加额度在法律上没有规定，单凭各地的习惯制定，这种习惯也因地方官的想法而变动。上层官吏既然已经在正规的俸禄外获得了千倍以上的收入，就必然不会取缔处于底端的地方官聚敛钱财的行为。

弊害随时代发展而越来越明显，通过之前的方法，尽量将租税的基准降到最低，以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如果采用增税的方式，在制度上进行一次彻底的税制调整，承认地方费用，也支给地方官生活费，最终能为人民谋利。田文镜当机立断，首倡新政策，并在河南省付诸实践。

然而，雍正帝并不希望在自己这一代留下公然增加租税的记载，因为这将会打破祖宗成法。何况雍正帝曾因自己为租税过重的苏州地区减去租税四十五万两白银之事而感到满足，认为自己施予苏州莫大的恩典，而一味增加税额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是，雍正帝让地方官自行整顿财政。但这既不是天子的命令，也不是中央政府的指令，只是采用了地方官希望自己的构想得以施行而天子以个人身份默许的一种

形式。整顿财政的提案是以奏折的形式被送到天子手上的。天子虽然在回信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但不置可否。全部责任必须由地方官个人来承担。中国国土广大，不同的地方情况各异，无法统一。最了解地方实际情况的是地方官本人，因此，雍正帝命令他在充分调查的前提下承担全责实施。

田文镜沿袭前任巡抚的做法，继续实施进行到一半的财政整理政策，河南省的租税定额为三百万两白银，其中，附加税为一成三分约为四十万两，这不但包括地方开支，也包括支給官吏在任职地的补助。巡抚的补助为每年三万两，这相当于俸禄的两百倍，但巡抚级别的大官，家中也有数量众多的男仆、女仆，这些钱绝对不算多。当时大官的家庭包括佣人在内少则四五十人，多则四五百人。这笔任职地补助被称为“养廉银”，是为了保持官吏廉洁奉公的补助金。地方各省中最早完善这一制度的就是田文镜管理的河南省。逐渐地，其他省份也仿照实施。养廉银制度自此开始，到清朝末年为止一直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成为清朝俸禄制度的特色。雍正帝在某封信中说：

〔钱粮之加耗羨原非应有之项。凡为地方州县实有万不得已公私两项之用度。全革耗羨势必不可行。〕即使再增加一成变为两成，养廉银成为几万两，若是官吏不再从人民身上取一文，养廉银以外也分文不取，这便可以说是善政了。

除此之外，田文镜所施行的政策，如告发隐匿开垦地、填补前任倒卖所保管物资的亏空、催收滞纳的租税等，都大合雍正帝的心意。原本开垦田地应当向政府申报，缴纳相应的租税，但有权势之人从前收买官吏，逃避登记，没有缴纳赋税，田文镜将这些土地全部登记造册。租税的一部分由地方仓库保管，但是官吏侵吞这些物资或蒙混账目的情况很常见，田文镜逐件核查账目，揭发负责人，令其赔偿。滞纳租税的人中也有不少是贫民，但有权势的人与官吏勾结，缓交多年

的租税却并未被没收财产。田文镜对这样有权有势的阶层毫不手软，强制催缴。

同雍正帝求贤若渴一样，田文镜也在探求人才。原本地方官的人事全部由中央政府决定，相当于民政长官的巡抚无从置喙，只能在其赴任之后根据该官吏的品行和才能，在成绩表上打分。他一个接一个向朝廷参劾在养廉银以外另行谋取钱财的，以及在规定的附加税以外再行榨取的部下。这也是由于巡抚自身没有直接罢免部下的权力。数年之间，田文镜推荐的成绩优异的部下有十九名，参劾并致使其被免职的官吏有二十二名。

他无视地方上的权势者一直以来享有的特权，对下级官吏采取毫不包庇的态度，这样的行为自然招致了激烈的舆论抗议。然而，雍正帝丝毫不为这些舆论所动，责难的声音愈高，雍正帝对田文镜便愈加信任。于是，制造舆论的一方最终放弃，几乎不再有什么责难的声音了。确实，河南省没有不廉洁的官吏。权势者虽有不满，但下层人民得了救。虽然征收一成三分的附加税，但与过去不知因何被征收的平均七八成的增额相比，人民的负担着实轻减太多了。

以前河南省没有设置总督，最高负责人就是巡抚。雍正帝为田文镜专门设置河南总督一职并让他担任。雍正六年，为了让其管理山东省，雍正帝又任命田文镜为河南、山东两省的总督。听说田文镜要管理山东省，山东的官吏们都惊恐万分，他们一个个心怀鬼胎，怕是没有一人能逃过田文镜的参劾。即使雍正帝夙兴夜寐、勤以为政，但因为一直没有适当的人选，直到其即位满六年，像山东这样的大省的财政整顿依旧是一纸空文、毫无进展。雍正帝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改革是不现实的，于是他盘算着，首先将田文镜派往河南，静静观察他的政绩，塑造一个模范省，以此为典型推广至全国。雍正帝特意提拔在河南省经过训练的田文镜的下属官吏，将他

们配置到各省的要地。河南省宛如全国官吏再教育的学校一般。这点虽然好，可是过多优秀的官吏被雍正帝从河南省调出，让田文镜叫苦不迭。

田文镜兼任山东总督后，立即奏请天子务必施行德政，宣布对过去的不良行为既往不咎，要求认为自己有罪的人自首。随后，他逐一调查官吏的实际情况，进行替换，山东省的政治面貌由此焕然一新。

雍正六年四月，河南省孟津县一个平民的妻子徐氏捡到了远道而来的棉商在途中丢失的一百七十两白银。正直的徐氏和她的丈夫找到失主后便将白银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失主拿出六十两白银作为谢礼，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商人也是重情重义之人，便将此事呈报知县，恳请知县一定要让他们将礼钱收下。田文镜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感动，自己又拿出五十两表彰徐氏，并把这件事写到了给雍正帝的奏折中——这个故事是距今两百年前的事情，当时的欧洲尚处于大白天还会发生拦路抢劫的时代，希望读者们考虑到这一点——雍正帝认为这件奇特的事情若是只止于君臣内部实在可惜，特意通过政府公开颁布敕语传布天下：

古来以路不拾遗作为天下治平之证，现今河南省小民将拾获白银，
[寻找给还原主，] [丝毫不取，] [固辞不受酬谢。] [实为古今罕觐之事。] 天子再为褒奖。

雍正帝对徐氏夫妇大加赞赏，并给予他们白银百两，特别授予他的丈夫七品顶戴。接着河南省商丘县的卖面贫民捡到白银二十四两并还给失主，雍正帝再次下敕给予卖面条的人白银五十两并授予其九品顶戴。后又有大将军傅尔丹麾下的士兵拾金不昧，也受到雍正帝奖赏。

也许有人会认为雍正帝这样以奖赏为诱饵，想让天下人民悉数成为正直之人的做法太过理想，简直如同儿戏，不禁令人冷笑。但雍正

帝别有目的：真正奖赏的既不是小民之妻徐氏，也不是卖面之人，而是田文镜。

怎么样？这就是田文镜治下的河南省。其教育遍及胸无点墨的贫民。天下总督们，学学田文镜吧。

虽然没有明着赞赏田文镜，但雍正帝的真正意图就在于此。赏赐贫民的妻子、布告天下，实际上是给予田文镜最高的荣誉。

还有一件事不容忽视，田文镜赢得雍正帝如此信任有一个偶然的原因。原本雍正帝就对天命深信不疑，他认为励精图治则上天必定会降下福祉，而这种福祉体现为风调雨顺。因气候不正常而发生的饥馑、暴发的洪水是由于政治上有失误，责任应当由天子和当地的地方官承担。上天为了催促政治家们进行深刻的反省，时不时地降下灾厄。这对雍正帝而言是接近于信仰的信念。

在田文镜赴任之前，河南省连年饥馑，人民流离失所。然而田文镜一到任，气候突然就恢复正常，接连丰收。

看看吧。田文镜的政治不管受到政治寡头怎样的非难和攻击都如此顺利，难道不是天意所在吗？

雍正帝露出会心的笑容。这样的思考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得通。因为华北地区大体上降水稀少，甚至可以说，在别的地方会引发洪水的降雨量在这里刚好能带来丰收。但是如果施政不力导致人民穷困的话，就没有足够的治水条件，在气候上应当可以丰收的时候会因为洪水而颗粒无收，而雨量没有到发生洪水的程度时又会发生旱灾，这样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人民摆脱苦难。若是进行了良好的治理，也做好堤防工程的话，即使发生洪水也会被遏制，可以尽情享受丰收的利益；即使出现歉收的气候，依靠人民的生产意愿也会获得一定程度的收

成。田文镜赴任之初，黄河时不时发生洪水，但幸而避免了溃堤，气候在此之后逐渐好转，便接连出现了少见的丰年。

但是气候似乎按照某种周期循环往复，雍正八年河南和山东部分地区歉收，人民流亡进入湖北省，当地总督的报告被送到了天子手上。于是，天子对田文镜产生了稍许怀疑，认为他已经是年近七旬的古稀老人，精疲力竭，是不是已经不能同以前一样活跃地行政了。确实从那个时候开始，田文镜的身体每况愈下，他自己也自觉地上书请求致仕回乡，但是天子慰留他。雍正十年河南和山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借此时机，天子批准了田文镜的辞呈，使他得以善始善终，不久之后他便病歿了。天子特意下令河南省立祠祭祀田文镜，但在雍正帝死后，乾隆初年发生了地方官参劾已逝的田文镜的事件。

其次，深受雍正帝信任的是李卫。他出生在江苏省徐州的豪门之家，捐纳出身。所谓捐纳是指出钱买官。有这样经历的人通常被考中科举、对自己的典籍修养沾沾自得的士大夫群体瞧不起，被视为旁门左道之中最为低贱的一种。但坦白而言，由于科举考试竞争激烈，若不是一等一的才子，恐怕为了考中科举，已经将一生的精力消耗殆尽，因此秀才出身的大政治家很少。与此相反，在买官制度下，很多官吏在当官之后想要赚回因买官而投入的资本，因此成为贪官。虽然这种情况很普遍，但也有特别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他们家里的钱财取之不尽，对官吏的俸禄和外快这些微不足道的小钱不屑一顾，总想要尝试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业，以实现生为男子汉的夙愿，但又不想做像参加科举考试这样麻烦的事情。若是钱能够解决的话，就出钱做官试试看。李卫恰恰是这种人。

李卫受到雍正帝信任是从雍正元年被任命为云南省掌管驿站和食盐专卖的盐驿道开始的。他一到任，马上揭发了属下十多名官吏和数

名武官的不轨行为。翌年他便升任相当于财务官的布政使，虽然来自官僚的责难甚嚣尘上，但雍正帝对李卫的信任反而与日俱增。

闻卿议论殊觉痛快。

雍正帝如此赞赏他。有段时间浙江省比年不登，人民面有菜色，皇帝在雍正三年十月拔擢李卫为浙江巡抚，企图让他突破难关。李卫赴任后立即让商人在长江上游地区收购大量的稻米运到浙江，漂亮地解除了这次危机。而且在李卫赴任之后，浙江省连年丰收，这愈发增加了雍正帝对他的信任。

与此同时，毗邻的福建省也遭受饥馑，暴动四起，然而巡抚毛文铨仓皇狼狈、不知所措，使人心愈发动摇。雍正帝大惊，任命被评价为精明能干的高其倬为闽浙总督，让他前往福建。闽浙总督管辖福建和浙江二省，作为浙江巡抚的李卫自然在其手下。高其倬在赴任途中会见了李卫，听取了关于福建省的报告，从浙江省借用了数万石稻米送往福建，但是到达福建之后才发现福建的粮食状况并没有那么糟糕。由于巡抚毛文铨过度惊慌，有权势的人趁机囤积居奇，米便从市面上消失了。而毛文铨惊慌失措的原因是理应妥善保存的官米不知何时被官吏们暗中倒卖，仓库中只留下名义上的款目，无法在必要的时候卖出官米，调节米价。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仅仅是高其倬从浙江借米的消息被传播开来，暴动便平息了。但是此后就出问题了。科举出身的高其倬最终迫于情面，打算庇护福建省倒卖官米的官吏。以救济饥荒的名义从各地运来的米被直接存放到政府的仓库中而没有在市场上流通，因此米价一如既往地居高不下，人民没有得到丝毫恩惠。听说这件事情的雍正帝另外派遣监察官对福建省上下进行了财政检查，结果查知在应当保存的八十八万石米中有五十三万石被倒卖，五十余名官吏作为负责人遭到弹劾。当然本应由高其倬办的事情却被别的监察官揭发出来，着实让高其倬面子扫地。雍正帝改命高其倬为福建总

督，只管辖福建一省，将李卫晋升为浙江总督，让他能够在浙江一省自由施展才干。

李卫曾在云南的食盐专卖上取得过极好的成绩。因此，雍正帝任命其为浙江巡抚以后，还特意让他兼管食盐专卖的工作，而巡抚与食盐专卖原本没有直接关系。浙江省的沿海地区出产食盐，这些盐不仅供应浙江本省，原则上也供应江苏省南部、苏州平原一带。政府的食盐专卖原本以扩大国库收入作为首要目的，因此贩卖价格相当高，至少是原价的三十倍，人民消费食盐如同缴纳赋税一般。这个领域必然走私贸易风行。若是廉价的私盐泛滥，昂贵的官盐定会受到排挤、毫无销路，那么国库收入也会因此蒙受巨大损失，因此政府甚至不惜动用军队取缔私盐，对买卖私盐行为的处罚也日渐加重。

浙江省的情况尤其特殊。因为所产食盐也会在不属于浙江省管辖的江苏省内销售，所以私盐取缔甚难。在江苏省卖出多少官盐丝毫不影响江苏省官僚的政绩，完全是浙江省官吏的政绩。因此走私半公开化，甚至在上海等新兴都市的繁华之地，一斤官盐都卖不出去。

虽说同是走私商人，也分三六九等，古时如此，今亦如此。被官府抓到的有贩卖一升、两升的行商，也有拥有牢固的组织、大摇大摆、横行霸道的大人物，在这一点上也是古今同理。李卫为了确立专卖法，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与这种大人物作战到底。

李卫为了取缔黑市，组织了特别警察队。被提拔为队长的是一个叫韩景琦的人，这个人原本是镖局的头领。所谓镖局，是指过去在运输金银和贵重物品时，负责中途保险、携带武器进行护卫的组织，因此镖局里都是孔武有力的武艺高强之人。以韩景琦为队长的特别警察队在各个要地拉网取缔，引起走私商人的大恐慌。这支警察队将查获私盐卖出的金钱充作维持费，但是走私很难完全根除，这支队伍也不至于无以为继。

走私商中最大的一个头目竟然是一位“女中豪杰”——沈氏。沈氏是个胆量过人、武艺高强的人。她拥有部下数百人，数只大船满载私盐横行在苏州平原的河流地带，而她自己则负责最后押运。地方的警察队几次三番与沈氏交手，但总是狼狈而归，可见她是个颇为厉害的角色。李卫无论如何也想抓到这个女贼，但是贼巢不属于他管辖范围的江苏省，不能派遣自己的警察队直接冲过去。于是他与江苏省的一个名叫金文宗的官吏秘密取得联络，趁着沈氏解散了部下自己躲在藏身处之时，成功地将其逮捕。

听她一件件招供，李卫才知道她在“英勇善战”的一生中，多次与政府军作战，让对手蒙羞的事迹不可胜数。如果如实报告的话，官吏之中颜面扫地的人可不是少数。因为本不是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情，为了给其他人留足颜面，李卫必须在正式报告有所保留。于是，他仅仅在亲启信函中将事情的实际情况报告给了天子。但若不将事实公布，就无法宣判这个女贼死刑，因此他便使用了杖毙这种灵活的处理方式。判处杖刑在地方官的权限范围内，因此地方官可以加以利用。在施加杖刑时击打犯人要害部位令其死亡，就是杖毙。这种处理方式若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犯人确有应死之理），是被半公开许可的。

雍正帝似乎对擒捕盗贼一事特别感兴趣。他的意见是：

〔去莠方可以茂谷，惩恶正所以安良。〕〔庸鄙无识之流感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谚语，以为曲全一人可得美名而获厚福，殊不知其人无罪而蹈颠危果能救之则为阴隲，倘系犯罪应死之人而故意宽纵是为枉法殃民，岂不干天地之和而造子孙之孽乎？〕

然而，雍正帝对剿灭强盗的兴趣似乎超出了上述理由。若是破坏了雍正帝的好心情，挽回的办法或者是揭发、参劾不肖官吏，或者是

捕获厉害的盗贼，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李卫一开始便兼具这两个条件。这一次雍正帝干脆地赞成对沈氏处以杖毙：

法律惟有运用巧妙才有效。严格依法行事也会有不公平之时，而有时越法而行亦是公平所在。

这不得不说是独裁这种政治形态下的必然结论。

被李卫的手段深深吸引的雍正帝接下来将江苏省的警察权委托于李卫，让他在担任浙江总督的同时，兼管邻省的治安维持。李卫虽然力辞但未获准。与田文镜的河南省等不同，江苏、浙江原本是文化最为先进的地方，人口稠密，却也是臭名昭著的最难治理的地方。李卫特别擅长捕盗，他取缔流浪者，剿灭盗贼的大头目，浙江地区的声誉与从前相比大有提升。

像雍正帝一样，李卫也利用密探揭发盗贼并取得巨大成功。他采取以恶制恶的做法，让过去是盗贼大头目而如今已金盆洗手的海大如成为他的手下。发誓洗心革面的海大如对盗贼的内外消息都了如指掌，带来了许多穷凶极恶的罪犯的线索。从李卫那里得知此事的雍正帝拍着膝盖开心地说：

[若见不及斯，即不命以督捕之任矣。]

李卫当然不会单单靠着消灭盗贼度日，作为广大中国经济产业中心的江苏、浙江的政务分外繁忙，他即使由于过度劳碌而吐血，也不停止工作，精勤如此。

雍正十年，李卫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移往与北京相当近的保定。在李卫即将离开浙江之时，沿海发生了大海啸。大概是因为此前有优秀的地方官坐镇，曾经狂暴的海神也不得不忍耐至此吧！雍正帝之后

在训诫留在浙江省的官吏时如是说。李卫所赴任的直隶省在那之后连年丰收，尤其是在皇帝驾崩的雍正十三年获得了大丰收。

雍正年间，在这三位有名的总督中，因为鄂尔泰是满洲出身，皇帝对他格外信任。不论什么事情，雍正帝都可以放心地毫不隐瞒地对鄂尔泰说出。雍正帝在尚居藩邸之时就已得知鄂尔泰的为人，那是因为他派人到担任内务府官的鄂尔泰那里去拜托某事，却被鄂尔泰断然拒绝：

[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宜交结外臣。]

被如此回复的雍正帝反而觉得这个人值得欣赏，因而在即位之后，提拔他担任云南、贵州二省的总督。当时，因为在这个地方的山里发生了苗族的叛乱，雍正帝为了处理这次叛乱，特意派遣鄂尔泰前往，但因位于两省之南的广西省也有苗族，而且也没有被妥善治理，于是后来又加入广西省，任命他为三省总督。

在最遥远、最偏僻的地方，鄂尔泰勤勤恳恳地工作。特别是因为他是满洲出身，雍正帝带着牵制汉人政治家的意思，动辄把“学学鄂尔泰”挂在嘴上。在政治策略上，满族人之间确实可以无需理由地互相理解。在给鄂尔泰的回信中，可以看到皇帝有如此语言：

朕实落泪览之。卿真良臣也。[孰能居此心，孰肯言此语，即此一语，卿九祖逍遥极乐矣。]

[朕实含泪观之。卿实可谓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

卿之信[字字出于至诚，句句朕皆动容览阅。]

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耳。

雍正帝写给鄂尔泰的回信与其他完全不同。雍正帝很少对其他臣子使用像“落泪”等显示出他柔软一面的文字，但是在给鄂尔泰的回信中再三提及。

鄂尔泰作为地方官的功绩是前述的平定苗疆。长江以南的山间自古以来居住着苗族，他们是与暹罗人和缅甸人相近的民族，随着汉人开发平原的进程，他们逐渐被驱逐到大山深处，清代初期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省境内的山间居住。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氏族性的团结，在族长的统帅下形成大小部落。这些族长被清朝赋予与地方官相同的待遇，被授予官位，但采用世袭制，不由清朝政府选任，被称为土司。随着中国国内的人口增加，汉人闯入土司所辖土地后，两者之间便经常发生种种摩擦。汉人进入土司管辖的地区耕作，苗族人本以为只是出现了抢夺他们土地的人，但其实还有罪犯逃窜进入他们的部落以逃避官府之眼，有时也有汉人的人贩子借宿在苗族部落，带走买到的子女，转卖到陌生的地方，苗族中也有人协助汉人做这样的恶事。苗族有毒箭，也使用买来的枪械，大部落的酋长甚至拥有大炮，因此犯人若是逃入这个部落便很难被追缉。从苗族这方来讲，每当土司继承官位之时，转呈申请的汉族官吏往往借机索取贿赂，土司不花费大笔金钱就得不到许可。为了泄愤，他们或者接纳汉人的亡命之徒，或者被亡命之徒教唆做出抢掠汉人地界或拐骗人口的事情。这一问题总有一日必须得到彻底解决，这将意味着苗族的土地最终汉化。

苗族的土地即“苗疆”的汉化在前代已经开始进行，被称为“改土归流”，是改土司归由中央政府选任的官吏即流官管辖的意思。改土归流既有由苗族方面主动提出请愿的情况，也有中央政府进行武力讨伐最终实现的情况。鄂尔泰对三省的苗族进行武力讨伐，施行改土归流。由此，大致相当于贵州省的面积、到那时为止半独立的土地完全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鄂尔泰调离之后，苗族蜂拥而起反抗

官吏统治，动乱一直持续到乾隆初年。由于鄂尔泰的努力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叛乱很快就被镇压，苗族也逐渐汉化了。直到现在在华南地区，拥有苗族姓氏的人仍很多，如岑、龙等，其中出了许多名士。

雍正帝即位第八年，如左右手般受到信赖的怡亲王薨逝后，为了填补空缺，雍正帝在两年之后召鄂尔泰回朝，任命他为相当于日本总理大臣的内阁大学士。雍正帝驾崩之后，辅佐乾隆帝、执掌乾隆朝初期朝政的正是鄂尔泰。

除上述三人外，还有山西省的诺岷、四川省的岳钟琪、广东省的杨文乾等名臣，他们都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但是还有其他一些省份，雍正帝在有生之年也没有找到合他心意的总督或巡抚。

至此还有一个问题，雍正帝通过与地方长官之间的亲启信函（奏折）的往来商议地方政事，但终究能否通过这样的手段掌握地方的实际情况？信札写作技巧的高低是否会令雍正帝头晕眼花而无法做出正确判断？的确不能排除有这样的倾向。河南省的田文镜被雍正帝看中是因为他有一位作为私人秘书的幕友邬先生，众人对他的最主要评价是十分了解雍正帝喜好的奏折的写作要领。有人说，雍正帝有必须对地方官呈递的奏折挑点儿毛病的性格。因此，田文镜在给天子上奏之时，总会预先留一处漏洞。结果雍正帝发现这个漏洞后对这一点一个劲儿地批评，反而快速跳过了要紧的地方，一字不改。然而，其他地方官不知道这个技巧，一心想要写成完美无缺的奏折，因此有时候最为重要的部分被雍正帝挑出毛病来，这点成为地方政治实际运作上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

然而，这是过分轻视雍正帝的观点。在书面文章上蒙混过关，只能一时取得成功，不是长久之计。雍正帝曾如此感慨万千地追忆：

满保、黄国材之奏折完美无缺。朕亦不小心被其引诱，[批谕甚多，朱笔所书不下数万言。阅其所奏天花乱坠，朕亦无数嘉奖，格外优恤。及至于今考其作为，何尝实力奉行一事。言念及此，殊无意味，每不禁为之面赤也。]

塞楞额对实际政事十分马虎，一天到晚只钻研寄奏折之遣词造句。纸面文章起不了什么作用。实行要紧。

无论何处都一味讲求实用主义，打心眼里极度厌恶奉承的文辞和不实在的语言的雍正帝并不是会被表面文章蒙骗的天子。另外，他不单纯依靠地方官的上奏，还使用他擅长的密探的方式来刺探地方的实际情况，想要完全欺骗皇帝并非易事。

[不可通同欺蔽，即使尔阖省一气共相隐瞒，朕亦另有访闻之道凡百处。]

若是有人胆敢轻视毫无忌惮地公开说出这样的话的雍正帝，那他肯定要遭殃了。

上文已提及，雍正十年，天子想要整理居室里堆积如山的地方官的上奏以及自己批注的回复文章，将其命名为“朱批谕旨”出版，作为后世地方官行政为官的参考，或许其中也包含想要将自己辛苦的证据传于后世的愿望吧。除此之外，雍正帝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动机。

那就是想要痛斥科举出身者的陋习。中国原本是文字之国，文人同时也是政治家，政治家同时也是文人。正因如此，熟读经典，学写文章，在科举中取得优异的成绩而及第的人，走上仕途后一般都会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他们一生的愿望就是在作为政治家步步高升的同时，作为文人万古流芳，因此成名之人大多筹备出版自己的文集。文集除诗和辞藻华丽的文章外，也包含“奏议”一项。奏议是呈于天子的上奏文。有时候奏议中也包含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辩护而让君主不省心的内容。更有甚者，仅仅为了装饰自己的文集，特意用激昂的语气

滔滔不绝地记述对别人或对天子不利的事情，以此显示自己的刚直。雍正帝对这样的文人习气深恶痛绝。正是因为雍正帝还在位，他们才有所收敛，但没准在雍正帝驾崩后他们会出版文集，洋洋得意地痛诉天子之非，为自己辩护，为此雍正帝需要先发制人，将皇帝与众臣之间往来的文书清清楚楚地公布天下，将他们无论被皇帝如何痛斥却也无可辩驳的事实预先公之于众。在雍正帝给当时有名的文人陈世倌的回信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语句：

〔 承办之事不能尽心竭力告竣，而妄生越俎之思，莫非又为文集起见耶？凡此密奏之事件，若少存邀名之念于中，恐贻害身家不浅。〕

〔 尔意不过欲奏折后列之文集中以便沽名耳。若果欲纪载，将朕朱批谕旨一并录入方可。〕

雍正帝的朱批谕旨 的出版，正如他给陈世倌的回信一般，均为皇帝亲自批示的切行事务。

《雍正朱批谕旨》一百二十册是雍正帝在地方政治问题上呕心沥血的结晶，借此我们可以窥见雍正帝的个人思想和政治方针，同时它也是关于当时社会状况的最值得信赖的珍贵史料。另外，其中的遣词造句也非常有趣，令人百读不厌。雍正帝一个接一个地读这些奏折，读后一一认真地订正文字，书写回复，仅仅是他的努力就令人惊叹，但出版的内容仅仅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这令人更加惊讶于雍正帝绝伦的精力。另外，既不是虚荣，也不是野心，不得不说，若不是有真正的坚定的信仰，若不是天命所归，这是不管精力多么旺盛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的事情。

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经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之手，事无巨细地传到了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恰好处于与中国相似的绝对专制君主控制之下。国王作为基督教的拥护者，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最终觉醒的国民大众开始对国王的控制和教会的权威投以批判的目光。

中国当时的情况被介绍到那里，欧洲的知识分子知道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不受宗教约束的文明国家，既感到惊讶，又感到难以置信。其中甚至有人极力推崇，认为像中国一样的君主政体才是理想政治应有的形态。

雍正帝的施政方式当然也传到欧洲人的耳中。他对基督教的镇压及其为了民生安定而奋不顾身、不懈努力的姿态，成为当时欧洲人的话题。与法国的伏尔泰齐名的西班牙思想家戈埃斯（ゴージェス）^[3]针对世人对雍正帝的非难，为其做了如下辩解：

根据传教士的传言，这个中国皇帝非常节俭。除了救济洪水等天灾的灾民外绝不耗费钱财；他拒绝为表达祝贺之意而为自己策划的宴会；他不允许别人制作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纪念碑；他比任何人都率先履行自己的义务。他所希望的是，所有的人可以效仿他对自己的义务尽职尽责。确实，这个皇帝禁止基督教传教。这无疑是遗憾的事情。但是，他对宗教的盲目并不能妨碍我们赞赏他的仁慈和节俭。

尽管对基督教进行迫害，但雍正帝在政治上展现出的仁德可以说完美无缺。我们并不吝啬于将对基督教施加迫害的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ianus）视为伟大的罗马皇帝，但为何单单在将这个罗马皇帝所展现的正义给予中国皇帝时如此犹豫呢？

当时的中国甚至被欧洲人视为一种乌托邦。中国儒教的政治哲学被介绍到欧洲，被称颂为贤人政治的模范。但不正是因为有像雍正帝这般与当时世界水平相比出类拔萃的真实案例，欧洲的思想界才得以进步的么？

^[1] 在日语中，三只鸟指在某一领域最优秀的三个人。——译者注

^[2] 旧时负责文书工作的人员。——译者注

^[3] 由于日文原书中仅有片假名，无法确定此人具体指谁，此处采用音译，特此说明。——译者注

6 忠义超越民族

从东北兴起而入主中原的清朝必然会激起汉人攘除夷狄、同仇敌忾之心。这对清朝而言是大问题，让统治者们绷紧了神经，因此难免屡次发生悲惨的文字狱。

当清朝采取了汉人的独裁政治体制后，从东北入关的满洲民族成为特权阶级，清朝成为满族人的共有物，满洲人整体来说并不喜欢采用凌驾于汉人之上的政治体制。清朝的皇帝对于满族人是独裁君主，对汉人也必须是独裁君主。甚至可以说，只有建立在满族人和汉人两大支柱的实力均衡之上，清朝才能实现安定。虽说如此，但满族人口稀少、文化落后，单凭武力强大一点，即使在铁炮等先进武器普及之后，总体而言满洲的实力也甚不可靠。然而清朝因本身是满族人所建立，在危急时刻能够依靠的无外乎满族人。如果汉人污蔑满族人，将满族人当作夷狄对待的话，无论是清朝还是满族人都无法保住其在中国的地位。因此其不得不用尽一切手段来根绝众多汉人的攘夷思想。若是在汉人的王朝，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清朝统治之下就需要被当作重大事件来处理，这正是文字狱发生的原因。雍正年间的文字狱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纯因为诽谤朝政，另一种明显是因为攘夷的言论，而且我们必须看到两者中都潜藏着民族问题的暗流。最初的文字狱是与年羹尧垮台密切相关的汪景祺事件。

清朝初年以来，占据蒙古西北、阿尔泰山麓、天山山脉以北的游牧民族准噶尔部强盛起来。康熙帝之时因准噶尔部侵入外蒙古，外蒙

古喀尔喀部投降清朝，请求保护，康熙帝亲征外蒙古，打败了准噶尔部的英雄噶尔丹。正是从此时开始，外蒙古心悦诚服地归附中国。

在外蒙古被大挫锐气的准噶尔部势力向南延伸，天山南路的清朝军队迅速投降，接着准噶尔越过昆仑山脉，征服西藏。正如前述，康熙帝末年，清朝以十四阿哥为大将军，在青海击破了准噶尔部之兵。助十四阿哥一臂之力、实际指挥军事的是川陕总督年羹尧。年羹尧虽然是汉人，但他是出身于在入关之前就历代侍奉清朝的汉军，而且文笔很好。年羹尧率兵追击准噶尔部败退之兵，进入西藏，开始着手平定西藏。

雍正帝即位后，立即将十四阿哥召回北京，命年羹尧取而代之成为大将军。年羹尧的妹妹在雍正帝的后宫深受宠爱，被授予贵妃称号，拥有仅次于皇后的尊贵地位。因为这层关系，在雍正帝完全掌握权力之前，年羹尧手握重兵、遥为后援，无疑对雍正帝巩固帝位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然而，雍正帝在北京作为主权者的地位逐步稳固下来后，便苦于年羹尧权力过大。特别是在雍正元年年末，青海叛乱，年羹尧令部下岳钟琪镇压了这次暴动，这让年羹尧的威权大增。为了猎取官位而进行活动的人都奔到年羹尧身边，通过他的推举获得官位。另外，朝廷中还有大臣隆科多，与年羹尧相互勾结，左右人事。这是独裁君主无法容忍的事情。

年羹尧从陕西呈递的奏折中，对雍正帝用了“夕阻朝乾”这个词语。他本来是想写出自《易经》的语句“朝乾夕惕”，即朝亦勤勉、夕亦勤勉之意，却把字写错了。雍正帝看过后大发雷霆：

若是《易经》中之语句“朝乾夕惕”尚还意思明了，年羹尧不仅故意书为“夕阳朝乾”，还将文字错书。年羹尧乃读书之人，自然不可能出于

疏漏而误写。想必是说朕的行为称不上“朝乾夕惕”，甚至正与之相反。若是如此，不妨明说！

这看起来完全是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但实际上对于年羹尧目前为止的种种不端行为，特别是干犯天子大权的事实，雍正帝证据确凿，只是还没到揭发他的时机。

〔年羹尧荐胡期恒为甘肃巡抚，来京所奏之言皆属荒唐悖谬，朕观其人甚属卑鄙下贱。〕后揭参金南瑛，为怡亲王曾奏荐，〔并非无才之人。〕〔荐举胡期恒之类以肆其蒙蔽也。〕

年羹尧部下命西藏的番人服苦役，导致其离叛，朕诘问其经过，竟称此前业已奏报完毕，但实际上一次都未曾报告过。为何如此说谎？必须给朕回奏。

实际上，回信后不久，年羹尧便被免职了。接着在其左迁为杭州将军的赴任途中，雍正帝的诘问一条接一条如下雨一般：曰盐专卖权丑闻；曰官吏侮辱事件；曰贪污军费；曰乱杀无辜事件；曰人事变动不公……总数多达十多条。

从另一方面说，年羹尧对雍正帝是什么样的天子缺乏清晰的认识。他习惯了康熙时期宽大的政治，哪怕稍被谴责，仗着自己军功卓著，同时妹妹又是雍正帝宠爱的贵妃，处罚也会不了了之，因此他从不将其放在眼里。他将在任职期间囤积的如山般的财产分别用二十辆车、七八十艘船运往杭州，寄顿于途中各处的熟人处，即使万一有失，凭借这些财产也可安度一生。到达杭州时，陪同的人包括家庭成员共千余人，仆人之下还跟随着伺候仆人的仆人。其豪奢之甚宛如日本的大名出行的仪仗一般。雍正帝命令地方官调查年羹尧的财产，单不动产就有土地二百九十七顷，房屋一千二百间。雍正帝听闻此事后更加怒不可遏。

当雍正帝表明了要坚决彻底地追究年羹尧之罪的意思后，内外官吏争先恐后地揭发年羹尧的罪状。每一条罪状都令年羹尧的爵位和官位降低，转瞬间他被剥夺杭州将军的职位，成为一介平民。而且在此之后罪状依旧接连不断地增加，政府汇总这些罪状参劾年羹尧，竟列出大逆之罪五条、欺罔罪九条、僭越罪十六条、狂悖罪十三条、专擅罪六条、贪婪罪十八条、侵蚀罪十五条、忌刻罪六条、残忍罪四条，总共九十二条罪状。最终，年羹尧免于斩首，被令自裁，长子年富被判死刑，十五岁以上之子被判流刑，全部家产被抄，时值雍正三年十二月。

最令人感叹怜惜的是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在针对她哥哥的判决下达之前，雍正帝被告知年贵妃病重，他下令若其病故则以高一级的皇贵妃之礼入葬。被明确给予期限的病逝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这不仅对年贵妃而言是悲剧，对雍正帝而言也绝对是沉重的悲剧。独裁君主不得不牺牲他的家庭生活。

有一事值得注意，即年羹尧被参劾的罪状之中最为严重的大逆之罪导致汪景祺连坐之事。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私人秘书，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将在受年羹尧延请后奔赴西部的途中见闻写成《西征随笔》，其中包含甚为僭越的内容。年羹尧读过此书，知道这些内容，但并没有参奏揭发他。这本书自然立即被清朝禁止出版发行，因此写了什么内容在当时是没人知道的，然而近年这本书在北京故宫被发现了。

现在我们看过便知，果然到处都是让雍正帝读后会生气的地方。他写到满族人去做地方官，因为不懂汉文，不能在所到之处顺利施行政治，即使如此也没有多少地方发生叛乱，这完全是侥幸；还称自雍正帝视为眼中钉的年羹尧任陕西总督后，施政周全，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最令雍正帝愤怒的是书中如下一个小故事：

先帝南巡杭州，杜诏方为诸生，于道左献诗，先帝颇许可之，赐御书绫字。杜捧归启视，则“云淡风轻近午天”四句也。某作七言绝句云：

皇帝挥毫不值钱，

献诗杜诏赐绫笺，

千家诗句从头写，

云淡风轻近午天。^[1]

这么说多少有些苛刻，就算不是雍正帝也会生气的，而且仅仅是讽刺的对象是天子这一点就比较麻烦了。何况这个故事揭露康熙帝学问方面的幼稚，那么自己会不会也因为是异民族而动辄被中国的文化人蔑视呢？过虑的清朝天子一下子怒火中烧。汪景祺被处斩，其妻被发遣到东北北部边疆为奴。汪景祺自己在书的序文中写道：

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义论悖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

如此说来，汪景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吧。雍正帝在翻阅首页时题字：

惜见此之晚。

这句话现在依然留在书上，墨色分明。

因年羹尧事件连坐的还有一个文人——钱名世。他是当时有名的作家，但因赠年羹尧诗赞美其平定西藏之功而触了雍正帝的逆鳞。对他的处罚与众不同，雍正帝亲自为他挥毫写下“名教罪人”（道德上的罪人），制成匾额，命他挂于家门之上；并且不厌其烦地下令让朝廷官吏中善于写文章的人各自作诗一首，谴责他离经背道的行径，并汇成一册赠予钱名世，让其自费出版，并颁发给天下的学校各一册。该书的序文为雍正帝亲自所作。

接下来发生的文字狱是查嗣庭案。查嗣庭作为朝廷官吏被任命为江西省乡试（科举的最初级考试）的正考官，考试题目出的是“维民所止”一句。这是《诗经》中的句子，意为“这是人民所居住的地方”，但有人揭发“维止”二字是“雍正”二字的去头。雍正帝单凭此事不能将其治罪，因而搜查其家，发现两本日记，其中有诽谤康熙帝的政治的语句。然而无论如何，这个事件作为大逆罪处理似乎证据不够充分。在监狱被拘禁期间，查嗣庭病逝。后来雍正帝下达判决，查嗣庭被戮尸梟示，他的子孙被处以流刑，财产被抄没。原来查嗣庭被雍正帝盯上，是因为他被认为是朝中大臣隆科多的党羽。当时，隆科多与年羹尧内外勾结，多有专权的举动，因此受审，不久被参劾，共有四十一条罪状，但他毕竟是拥护雍正帝登基的功臣，因而没有被处死，仅被处以监禁之刑。

这些文字狱的登场人物以浙江人居多。汪景祺和查嗣庭是浙江人，接下来将要登场的吕留良也是浙江人。雍正帝大概是憎恨浙江人的。为了警戒众人，雍正帝命令取消浙江省的乡试。被取消乡试意味着该地区的人无法成为官吏的候补者，这对当地人民来说真是沉重打击。即使对清朝抱有反感，他们也依旧渴望得到官吏的地位。幸而浙江总督李卫受到雍正帝喜爱，在他的劝解下，禁令不久便解除了。

在年羹尧悲惨地结束了一生后，取而代之成为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总督，负责西部边疆军事的是岳钟琪。此人姓岳，传说是南宋忠臣岳飞之后。若是岳飞的子孙，就应当如同岳飞一般，为了汉人将异民族建立的清朝视为仇敌并与之斗争到底。因此，有个叫张熙的人特意前去劝他谋反。岳钟琪大惊，赶紧将张熙绑缚送至朝廷。张熙是被他的老师曾静教唆的，因此朝廷将罪魁祸首曾静逮捕归案。审讯曾静后，雍正帝才意识到一部分中国人的反清思想根深蒂固、挥之不去，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他的自信。

在此之前，从顺治朝到康熙朝初期，浙江省有一位名叫吕留良的文人，他是遵奉朱子学的学者，抱有强烈的反清思想，终生不仕，隐居而终。他留下了文集、日记等著述，其中不仅包含反满思想，某些还被印刷出版，广为世人所知，他死后被尊如圣人，甚至历任地方官都会前往其祠堂致敬。曾静的民族革命思想不外乎是与吕留良的著作产生共鸣的结果。通过讯问曾静，雍正帝得知吕留良的思想在汉人之间广为流行，他密书浙江总督李卫，命令押收吕留良家的一切文书。

李卫其实也曾受吕留良的名声所惑，为他的祠堂赠过匾额。接到命令后，李卫大惊失色，逮捕吕留良的三子，将其他家人监禁在家中，因书籍甚多，一时难以搬运，在书架上悉数贴上封条，制作目录，仅将必需的书籍送至北京。雍正帝对李卫说：

〔斯事朕谈笑而处之。无故加之不怒一语，朕生平所长。若谓此等遂致淆乱胸怀，则汝为不知汝君之臣矣。〕

这一番话还是无法掩饰雍正帝心中的动摇。对于这起事件，从东北出身的总督鄂尔泰和雍正帝之间的往来文书中可以看到如下语句：

〔鄂尔泰：国家一统垂八十余年，圣圣相承，教养备至，而汉人之心思终不能一视，满洲之人物犹未能争光。每一念及，臣窃有余恨。〕

雍正帝：叹息流涕耳。

鄂尔泰：逆贼曾静者实甚于禽兽之人。禽兽中之恶禽兽。

雍正帝：为朕放心，丝毫不必愤闷。遇此怪物自有一番奇料理，卿可听之。〕

雍正在对曾静进行审讯的过程中，看出他是个愚蠢正直的农民，却意料之外地容易相处。针对曾静直率地列举出责难雍正帝的二十七条，雍正帝逐条解释清楚，证明其都是凭空捏造的，接着再询问曾静对他的解释的意见，曾静最终俯首认罪。雍正帝集中精力反驳的是曾

静提出的“清朝因为是异族统治，所以不是正统的君主，汉人没有对其尽忠的义务”这一观点。

自古无无君之民。有君则必须尽忠，此乃自然之理。中国之圣人亦如此教诲。忠义乃为人最基本之道，反之则不为人。如此若论谁是真正的君主，君主乃天命所归。此亦正如中国圣人所教导。是天命所归之君不分汉人还是异民族。不，我朝虽为异民族，却无有如我朝仰承天命得国之正者。试想，中国乃革命之国，王朝屡经更迭，开国皇帝于前王朝而言则为谋反之人。明太祖自元朝看来无非是光棍。我清朝与之不同。兴于满洲，[我朝之于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 天命传于我朝。非我亡明，明自取灭亡。明使生灵涂炭，我朝为拯救生民而治中国。纵观历史，得天下之正者无过于此。若因是异民族则不可，经书之中不亦记载舜为东夷之人。汉人因蒙古人是异民族而鄙视之，蒙古人亦蔑称汉人为蛮子，如此相称乃后世至卑至陋之见。忠义乃中国圣人所教万世不变之教训，为超越民族的、有价值之道。^[2]

雍正帝以与曾静的问答为核心编纂了一本书，以《大义觉迷录》为名出版。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曾静招架不住雍正帝尖锐的反问，称自己是“弥天重犯”，即犯下弥天大罪的罪人，一味地忏悔。但这不能仅仅理解为他只是被帝王的权力压制，或者是雍正帝对其施加精神上的拷问，强迫他招认。曾静是山野农夫，仅仅以传闻为话柄，对雍正帝进行人身攻击，若是在今天的法庭上接受审判，也会因没有证据而处于明显不利的局面。曾静最终示弱，无条件投降，也只是因此而已。

雍正帝从曾静派弟子劝说谋反的目标——岳钟琪以前所奉上的奏折以及皇帝回复的朱批谕旨中选出数十封，让曾静阅读。这些书信展示皇帝对岳钟琪的信任多么深厚，岳钟琪对皇帝如何忠诚，目的是让曾静领悟到他的劝诱完全是痴心妄想。除此之外，雍正帝还让他读了数百封自己与各省总督等之间的往来文书，目的是让他知道皇帝是何等关心天下政事，何等勤勉。曾静最终完全被感化了：

弥天重犯昔虽冥顽，同于禽兽，今得被化，幸转人胎。天子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念。若闻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不惟减膳，甚或饮膳不御，殫竭精诚，为民祈祷。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一应上任官员无论大小，每日必逐一引见，各省督抚奏折件件御览，毫不迟延，直至二三更。因不知晓，身犯寸磔之典，死有余辜。岂料既超禁处厦，还给食赐衣。重义透髓，一字一泣。谨供。[\[3\]](#)

不可思议的是，引发这么大事件的曾静和张熙却免于死刑，得以活命。雍正帝认为：

汪景祺因对圣祖仁皇帝肆行谤议，不能倖逃国法。然曾静之讪谤之语乃谤及朕躬。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不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鸱鸣而已。伊已悔过感恩，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

朝廷大臣认为此不足以警戒后世而再次上奏请求将其治以重罪，但雍正帝不予理睬，说：

天下后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皆朕身任之，于臣工无与也。诸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奏。

然而，雍正帝对吕留良一家的处罚很重。因为这是发生在康熙时期的事情，康熙帝最终对此一无所悉便与世长辞了。目标虽然是先皇，但所犯的罪亦不可饶恕。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梟首示众，其子吕毅中被问斩，一家被流放至东北为奴。判决书之后附有但书，特别强调并不禁止出版吕留良的著作，以显示皇帝的胸怀。

该事件自雍正六年开始，至雍正十年年末最终结束，是个历时五年的大疑案。正巧在这期间，蒙古西北部的准噶尔部再次蠢蠢欲动，清朝面临必须再次出兵与其交战的情势。即使岳钟琪在曾静之事中始终表示出谨慎的态度，雍正帝也认为不能仅仅依靠汉人武将，产生了要任用满族人的大将，让他们立下赫赫武功的愿望，定要让汉人们刮

目相看。于是，谁是满族人中最合适的将军人选呢？他在寻觅之时将目光停留在了傅尔丹身上。

傅尔丹出身于满洲名门，作为内大臣长期侍奉康熙帝，并且也在沙场历练过。雍正初年他再次担任内大臣，随后又担任相当于日本内务大臣的吏部尚书。传说他赭面美髯、威风凛凛、武艺高强，因此受到雍正帝信任。当然，能被雍正帝选中的，一定是格外严谨、正直的人。雍正七年三月，傅尔丹被任命为大将军，挑选国内精锐两万四千人出征。准噶尔部得到消息，由于尚未做好防御准备而提出议和，因此决战的时间被拖延了一年左右。但是雍正帝从最初就明白准噶尔部并无丝毫讲和之心，雍正九年伊始，傅尔丹出兵蒙古西北，进驻科布多城，等待进入准噶尔部领地的机会。准噶尔部首领策零认为既然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与清朝军队一战，希望挑选一个对于自己最为有利的地点作为战场。于是他故意派出间谍，让其假扮投降之人来到傅尔丹身边，假称准噶尔部现在正麻痹大意，机不可失，若是发动突袭，必能将其全歼。傅尔丹一听，不顾参谋等人的谏言，急忙命令全军出动。

清军从科布多城向西进发百余公里，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附近遭遇占据要地、严阵以待的准噶尔部大军。既然已经无路可退，清朝军队也下定决心准备开战。然而这正中对手下怀，战况从一开始便对清军不利。前来援助的蒙古兵首先临阵脱逃，清军陷入敌军的四面包围。有名的将军相继倒下，战死沙场。傅尔丹乔装突围，好不容易逃回科布多城，但四散奔逃、最终回来的人总数不到两千。

在出兵之前就有一些人预言傅尔丹将会败北。岳钟琪访问傅尔丹阵营之时，看到墙壁上挂着许多刀枪，感到十分不解，便询问他。

此皆吾所素习者，悬以励众。

这就是答案。

为大将军者不恃谋而恃勇，亡无日矣。

岳钟琪如此自言自语地退下了。大概是岳钟琪与傅尔丹讨论了战术策略但意见不合，看到整排武器后留下如此言论吧，但是预言不幸言中。雍正帝后悔自己看走了眼，虽然傅尔丹在败北的报告中恳请处以重罪，但雍正帝并没有特别责备他。

自古以来，提拔政治家容易，选任大将困难。政治家更换多少次都不甚紧要，而大将一旦任命便不能频繁变动。而且，战争是一战定胜负，失败了便无法挽回。诸葛孔明虽然是优秀的政治家，但是在战争上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不甚擅长。雍正帝任用年羹尧和岳钟琪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但他为了凸显傅尔丹，遗憾地断送了这次战争。值得一提的是，出于民族成见，想要让满洲出身的大将建立战功，这是雍正帝的国粹主义导致的失败。

这次战败很快因蒙古部长英杰策凌亲王的力战而得到补救。策凌据称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他娶了康熙帝之女为妻，是雍正帝的妹夫。他是蒙古西部的一部之长，原本与准噶尔部便是势不两立的仇敌关系。傅尔丹刚刚败北之时，准噶尔部乘胜侵入策凌亲王的游牧地，策凌亲王出兵迎击，大败准噶尔部，这是他初次扬名。

紧接着在雍正十年，准噶尔部趁策凌亲王不在时进行偷袭。听说家人将要被当作俘虏带走，策凌急忙发兵追击，在喇嘛庙光显寺与准噶尔部进行决战，大破敌军，寺庙一侧的河水被血染红。策凌因这次战功被赐予超勇亲王称号。

准噶尔部再三被打败，其国力终究也不能与拥有整个中国的丰富资源的清朝相匹敌，于是再次提倡议和，雍正帝也考虑到财政的疲敝而同意议和，但双方在国境问题上相持不下。该问题到下一代乾隆帝

的时候才得到解决，乾隆帝在中年时出动大军平定准噶尔，收回的土地就是现在的新疆。

在与准噶尔部的战争期间，雍正帝在作为中央政府的内阁之外创设了相当于军事大本营的军机处，这最初被称为“军机房”。军务相关的事务全部由军机处处理，军机处大臣是其负责人。即使军机处决定的是像军需品的征发等与国内财政相关的事项，内阁也必须按照军机处的决定实施，因此内阁逐渐处于军机处的下风，最后不仅是军事，连国内政治的最高决定权也被军机处把持。内阁变成按照军机处的决定去命令相当于日本各省的六部实施的中间机构。军机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成为清朝政治机构的一大特色。

若问为何需要设立军机处这样的机关，这是由于自明代开始施行的内阁制度到清代变得不够便捷。清朝成立之初，天子也罢，政府的干部也罢，都是满族人，在朝中使用满语交流，因此来自中国各省的汉文报告和意见书都在内阁被翻译成满文后才被呈到天子面前。到康熙末年，满洲出身的官吏也大体通晓汉文，不再需要专门翻译，但身为满人，不能放弃满文只用汉文。然而，翻译耗费时间，导致公务停滞不前，不但令朝廷无法敏捷地处理政事，还有在公务停滞期间外泄机密的危险。

雍正帝创设的军机处，在大臣之下设有满族人和汉人的书记官，他们被称为章京。满文的文书由满族人章京处理，汉文的文书由汉人章京处理。因不需要翻译，事务得以快速处理。由于有这样的优势，最初仅作为处理军务的大本营而设的军机处最终成为处理国内政治的中枢机关。不过大臣一贯以文臣充任，绝不意味着军人政治。另外，即使军机处处理的文书，最后的决定权也在君主手中，情形与内阁一致。

军机处大臣之下作为书记官的章京都是精明能干的年轻政治家，即使不是文采飞扬的人，也必须是能够快速写作的人。章京之下没有设置书记。从前中国式的官厅的下级组织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像代书人一样的人，他们被称为胥吏，由于处理公务的方式恰似民间的承包商一般，随之产生了非常大的弊害，而军机处绝对不使用胥吏，纯粹作为天子的智库而侍奉天子。因此，有人认为在避免清朝的政治出现重大弊害方面，军机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军机处虽很难说是满洲式的机关，但从不用胥吏这一点而言，可以说至少不是汉人式的机关。创建这样的新式机关，的确是雍正帝智慧的结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满族人的独特创意。

[1]. 参见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诙谐之语》，上海书店，1984，第49页。此处根据日文对原文略做删改。——译者注

[2]. 此段为《大义觉迷录》第一卷第一篇上谕的内容概括，日文与原文差距较大，本段内容根据日文翻译。参见《大义觉迷录》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2册，第260～266页。——译者注

[3]. 参见《大义觉迷录》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2册，第340～344页。日文与原文有出入，此处根据日文进行了删改。——译者注

7 独裁政治的界限

夜里十点、十二点才入睡，早上四点以前起床，清醒的时候完全投入到政事之中没有片刻闲暇，完全献身于政治的雍正帝的励精图治值得后世高度评价。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采取独裁政治的形式，雍正帝无论如何苦心孤诣都无法得到同等的回报；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很难采取君主政体以外的政体，若是采用君主政体，唯有进一步推动从宋、明以来在中国逐渐发展成熟的独裁制。

清朝自东北勃兴、与明朝正面对峙前后，正值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改革运动告一段落之时，旧教中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为了传播福音，络绎不绝地跨越波涛、千里迢迢地来到中国。清朝入主北京、成为四百余州之主的时候，发现那里有两种相异的新文化，即汉人的汉文化和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西洋文化。公平而视，西洋文化要优秀得多。康熙帝是西洋文化的爱好者。他经常将传教士召入宫中，让其侍讲数学和物理学等，有时甚至想要学习拉丁语。他在朝廷上召集大臣，向汉族大臣夸耀自己所学的新知识，如“在中国的数学中，自古以来以直径的三倍计算圆周，但实际上是三点一四一五九倍”等。无论是汉文化还是西洋文化，在满族人来看同样是异文化，康熙帝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都更被西洋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康熙帝令人编纂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一万卷的最后插入了机械的图画，虽然使用机械的人物的衣服被改成了中国样式，但力点符号则仍用字母表示。因此康熙帝批准传教士的请求，允许他们在中国传播基督教。

雍正帝正与之相反，他是汉文化的爱好者。对于雍正帝而言，完美无缺地统治中国是至高无上的使命，无论行动还是信念都以此为出发点。统治中国则必须成为中国式的独裁君主。而且，独裁君主制的理论依据只有在汉文化中才能找到。于是雍正帝自身在四十五年的藩邸生活期间，积淀了深厚的汉文化底蕴。他把禅学等也当作汉文化的一种纳入了学习范围。作为汉人国家的独裁君主，为了君临天下，自己也必须是不落人后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人。与之相反，西洋文化一向对政治没有什么补益。如基督教，他一方面承认基督教与所谓的邪教性质不同，另一方面又因为预料到将来的纷扰而将之禁止。如果说文化是一种力量，远离祖国的西洋文化，在当时终究无法与汉文化相匹敌。如大炮、火枪，在中国一经仿制，立刻转化为中国用于对抗西方的力量。西洋文化在向中国渗透后又经过百年时间，经历了产业革命的洗礼，成为在其他世界无法立即模仿的新锐文化后，再次逼近中国之时，才成为毫无悬念的胜利者。

雍正帝的独裁政治虽然形成于异民族的帝王之手，但达到了过去的汉人帝王也无法企及的高度。恐怕在独裁政治的范围内，能够达到如此发达的形式的确旷古烁今，更何况中国幅员如此辽阔。让独裁制产生、发达的正是中国的广阔，而同时嘲笑独裁政治无力的也是中国的广阔。甚至在雍正帝的独裁政治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政治力在广阔的领域面前显得很彻底。

雍正七年秋，皇帝下达严令，让江南、江西二省总督范时绎缉捕大盗赵七。范时绎立即通报安徽巡抚魏廷珍、江西巡抚谢明，巡抚们继而写文书命令下级文武官吏四处奔走、寻找赵七，但最终甚至连赵七身在何处都无法得知。像这样的大盗联络广泛，收买官府的吏员，即使政府布下天罗地网，赵七照样可以远走高飞。雍正帝捶胸顿足，感到万分遗憾：

听闻[汝等地方上纵令此等大盗公行无忌]，长江之上不能安行，朕据所获情报，[书赵七名姓交发汝等]，又致令远颺，成何体统。缉捕盗贼理应秘密探知其行踪袭击住所，若是[遍行文书、传播风声，] 只会令盗贼闻风逃遁。[将此相机密为之事委交汝等庸愚督抚即朕之误。] 若李卫、田文镜不至如此糊涂。

赵七终究还是没有被捕获。即使拥有如此强大威力的独裁君主，无论如何也有无法触及社会各个角落的时候。

然而对雍正帝的独裁政治而言，其最强大的敌人不得不说是被要求去追捕大盗赵七而最终让他逃脱了的官僚机构。不管雍正帝多么激动和焦躁，许多官僚对此也只是冷眼旁观，甚至妄图加以批评，毕竟李卫和田文镜等人只是凤毛麟角。

归根结底，在雍正帝的理想中，官僚只不过是工作而被驱使的道具罢了。他们不能有文化生活，不能沉浸于文人的趣味中，最重要的是不能为了子孙后代积蓄财产。如此一来，特权阶级就不存在了。对雍正帝而言，特权阶级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所谓特权仅指天子一人所拥有的独裁权，天子以外的万民只有完全平等的价值。因此他解放了地方上的贱民。山西省的乐户，浙江省的惰民、九姓渔户，安徽省的世仆等贱民阶级从此以后得到与良民毫无差别的待遇。下层人民的生活得到保证、治安得以维持的话，则清朝可以延续到子孙万代，相反则难保不久之后人民会爆发革命、颠覆清朝。

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存在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地方的农民和城市的劳动者穷困潦倒，无法独立生存。极端地说，他们处于只有将劳动力完全卖给资本家才能勉强苟活的状态。换言之，生产所需要的资本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从资本家之中选拔出来，做学问、中科举、走上仕途之人便是官僚。官僚是资本家利益的代表。因此官僚与资本家的结合甚为密切，官僚掌握政权以拥护资本家，资本家分出一部分

利益为官僚做后盾。这种结合从实际的运作方法来看绝不公正，多数情况下采取特权与贿赂交换的形式。

雍正帝企图切断这种结合。支給官僚养廉银，即令其至少可以维持生活的任职地补贴。因为官僚应当是天子的公仆，而不能是资本家的私仆。这样的“新生活运动”在理论上正确无疑、无可置喙，但给过去一直串通一气的官僚和资本家带上了约束的脚镣，双方明显痛感不便。不仅限于这个问题，在清朝，对任何社会问题不满的声音立即会驱使人心转向民族革命和攘夷思想。

曾静事件中就曾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他站在社会改革论的立场上，憎恶世上盛行的不正义行为，指出所有社会的不合理不仅是宋、明以来的积弊，更是清朝施政不周的结果，其锋芒直指雍正帝。然而曾静所指摘的社会的不公、贫富悬殊、官僚与资本家勾结等陋习也正是雍正帝想要竭力摒除的。这也许是曾静在雍正帝面前最终屈服、雍正帝也赦免了曾静的理由之一。驯服像曾静一般的空想家易如反掌，困难的是驯服社会上拥有实力的人——官僚和资本家。

雍正帝的统治时间仅有十三年，他的王朝按常理说并不是那么短暂的，但与总体而言统治时间较长的清朝其他诸位皇帝相比甚为短暂。但是雍正帝式的施政方式最多只能维持十三年左右可能就达到极限了。我这么说有两层意思。第一，雍正帝这样的天子独断万机，个人能力和健康终究不能持久。雍正帝非常中意的李卫某次叙述下属官吏的无能：

我的布政使彭维新[非懒惰偷安有心迟延之人，] 缘此人过于小心。文书收发[柴米琐屑必亲自经手，是以每日办事必至四更仍然诸务丛集。臣见其为案牍所困深加怜惜，] 不得不代为办理，而臣有总督之事，[岂能事事周到而保无贻误也。]

对于李卫的抱怨，雍正帝安慰道：

〔大笑览之。卿与之同处一城，日逐代一藩司办理事件即云难胜，恐致贻误，朕代各省督抚办理者十居六七，恐致贻误之念更当何如耶？〕

其实，连地方官的工作也不得不分担的施政方式只有雍正帝才能够做到，但即使是雍正帝，最终能否坚持几十年也值得怀疑。纵观历史上的帝王事迹，梁武帝、唐玄宗、万历帝在即位之初都是励精图治之君，但中途厌倦，将政事委于臣子，因而适得其反，政治出现日益混乱的倾向。若是雍正帝更为长寿，糟糕的话可能心气一变，对政事草率了事，若不然，则可能因身体有恙，或者老耄昏庸，总而言之，难以维持像从前一样紧张有序的政治光景了。

第二，前文已提及，官僚和资本家阶级的不满已经积攒了十三年，因为还处于适当的程度故而隐忍未发，若是超过这个限度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就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前文提到曾静的自白书，其中列举了数条对雍正帝的个人攻击，可知地方读书人无论何时都对他有着根深蒂固的反感。雍正帝驾崩时，一般官员是不是都会产生“哎呀呀，总算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呢？世间流传着雍正帝是被女剑客所暗杀的传言，也可以被视为知识阶层的希望所映射的影像。因为雍正帝确实是在某些方面被诅咒“早点死才好”的天子。

雍正十三年八月，这个历史上无人能与之比肩的独裁君主因病逝世。他的嫡子宝亲王即位，是为乾隆帝。乾隆帝即位后，清朝的政策立刻发生巨大转变，回归到康熙时代的宽大政治。出人意料的是，这次政策转换的中心人物正是备受雍正帝信任的满族人鄂尔泰和汉人文人政治家张廷玉。张廷玉是安徽省桐城人，生于宦宦之家，进士出身，是典型的官僚，雍正三年以后连续担任内阁首班、大学士之职，设立军机处后，兼军机大臣，被雍正帝称为股肱之臣。

进入乾隆时代，鄂尔泰与张廷玉并列占据朝廷官僚的首班，代表满族人与汉人两大势力，但是二人对于改变原来的施政方针并无异

议，大概因为他们二人一致认同若不是雍正帝就无法施行雍正帝式的政治这一观点。但也许二人最终在目的上多少有些不同。鄂尔泰因为是满族人，总是站在满族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若像雍正帝一般无视社会上有权势者的意向，则满洲民族的前途、与之唇齿相依的清朝的前途令人担忧。君主掌握着政治上最终的决定权，因此无论多么有权势的官僚，上面的一句话就可以让他沉默，甚至能够将他消灭。但是，这是一个个单独的官僚，而不是官僚阶级。雍正帝的努力终于改变了官僚组织中极小的一部分，但官僚制度依旧存在。不受拥有这种不死之术的官僚阶级的欢迎，就不是为清朝着想。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官僚的私欲，允许他们与资本家勾结，让清朝与他们利益相关、休戚与共，这才是让清朝永存、保持满族人的既得利益的最为安全的方式。

与之相对，汉人张廷玉的想法又有些许不同。汉人的文化是不灭的，无论在政治上被何等异民族王朝控制都毫不动摇，这一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被证明。异民族王朝的汉化是历史的必然，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无论是什么样的王朝，只要是汉文化的保护者，汉人的上策是支持这个政权。汉人希望清政府不要多管闲事，让汉人自治，只在武力上提供保护，使之不受外敌侵害便好。但是，汉文化换句话说就是儒家文化，而雍正帝的做法怎么看都倾向于法家。委任大臣做大臣的工作，委任地方官做地方官的工作，既然委任便不再横加干涉是儒家的政治。这也是最为自然且永久的方法。像雍正帝一般法家化的、连地方官的工作都想带到宫中亲力亲为的做法让人不敢恭维。清朝适当地尊重汉文化，作为汉文化的保护者就可以了。换言之，优遇学者，让官僚生活富足。因为他最终也是为了清朝，所以如此引导清朝也成为他作为臣子尽忠的理由。

无论如何，在乾隆以后，清朝与知识阶级、官僚阶级最终融为一体。从一方面而言，这意味着清朝的存在依存于官僚阶级。可以说清

朝选择了一条最为容易的路，但也可以说是命运使然，清朝终有一天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

清朝定下迎合官僚阶级、与之融为一体的方针，在做出如此让步的同时，也要求得到相应的回报，那就是让汉人忘记清朝是异民族建立的，甚至想要他们忘记夷狄曾经存在于中国边境的事实。“夷”等文字被大量从古书中抹去，有可能显露清朝前身的明代记录全部作为禁书被焚毁。不仅如此，连雍正帝敕制的《大义觉迷录》在乾隆时代也被列入禁书。活到那时的曾静也被拉出来砍了头。有幸的是，清朝统治时间很长，因此这个政策显示出了效果。到了清末，汉人忘记了清朝的建立者是异民族，不，甚至连满族人都忘记了自己与汉人不同，是满族人的子孙。满族人，这个历史上的伟大民族被吸收到汉民族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开始再次出现雍正帝所担心的不健康的现象并且日益严重。由于官僚和资本家的结合，纲纪紊乱、官场腐败的事态从乾隆中叶开始已经越来越严重，清朝到末年最终陷入令人目不忍睹的无政府混乱状态。

既然一进入乾隆时代就恢复了康熙时代所谓的宽大政治，那么中间雍正帝苦心孤诣十三年的政治完全没有意义吗？不。在清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中，雍正帝存在的意义极为重大。若是康熙帝的宽大政治直接延续到乾隆时代的宽大政治，那么官场腐败无疑会毫无节制地加速发展。清朝末期的官场腐败也许会提前百余年出现，清朝或许等不到西洋文化的进攻便早已从内部分崩离析了。

清朝的领土范围在乾隆时代到达顶点，但无论是乾隆帝的武功还是其留传于后世的文化事业，都是因为有了雍正时代的民力涵养和丰富的物资积蓄才得以实现的。历史总是轻率地忽视幕后的力量，甚至异口同声地对其进行口诛笔伐。不管雍正帝在中国文化人之中如何恶

名昭著，在清朝学者之中独放异彩的、性情乖戾的讽刺家章学诚对他的赞赏依旧值得我们倾听：

今观雍正年传志碑状之文，盛称杜绝馈遗，清苦自守，不知彼时逼于功令，不得不然。[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 [\[1\]](#).

不得不说这恐怕是超过朝廷御用学者纯粹的阿谀奉承百倍的，对雍正帝的最高赞美之辞。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完成了一次对历史记载中的雍正帝的事迹及其时代背景的全方位观察。但还有一个问题：作为个人的雍正帝的性格又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我是小说家，一定会首先抓住他的性格，再以此为中心展开叙事。然而，作为一个笨拙的历史学家，我无法使用如此巧妙的技巧，不得不另寻他途，最终只能在文献学的规范内，试着归纳和想象他的性格，以此来作为本书的结尾。

雍正帝的血管中还奔流着朴素纯真、坚韧不拔、不服输的满洲民族的血液。但是勇武的满洲民族在入主中原、与汉族混居后逐渐被同化，失去了过去的蛮勇。雍正帝之父康熙帝还保持着大部分狩猎民族的勇敢，康熙帝年长的皇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的气质，但雍正帝多少有些不同。雍正帝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都无疑是一个小心谨慎、性格内向的人。他的兄弟们都随心所欲、胆大妄为，又是打架又是喝酒，也为争做皇太子进行政治运动。然而畏畏缩缩的雍正帝并没有参与其间。这也有他的生母身份低微令他感到自卑的原因吧。他总是独自蜷缩在角落里，自然也被从兄弟之间的交往中孤立开来。但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性格，他不是不想参与到兄弟们吵吵嚷嚷的政治运动中，但天性使他难以深入其中。

雍正帝对性格内向的自己一定也十分焦虑。他认为这是自己性格的弱点，在内心呼喊着想变得强大起来，想要像兄弟们一样随心所欲的他不知对自己感到多么失望。他学禅的动机大概也出于此。因为若生来便是豪杰的人，一定对禅的修行不以为然。雍正帝的禅学是满洲民族终于进入反省期的征兆之一。

我们经常将内向的性格和软弱的性格相混淆。其实越是内向谨慎的人越是坚强，过于争强好胜的人很少能笑视成败。雍正帝正是这种内向之人。在与兄弟们的公开竞争中，他表现得很坚强。他希望成为更加强大的人，并不断地提高自身修养，不要被欺骗，不要被蒙蔽，小心再小心，最终形成了无比坚固的像混凝土堡垒一般的性格。

当即位成为同时肩负大清王朝和满洲民族命运的雍正帝后，他下决心必须让自己更加强大。他下决心必须对他人强硬，同时对自己更加强硬。但是误认为自己性格软弱的他在下定决心之前徘徊踌躇，终于在天命上发现了安身立命之地。与其说他信仰天，不如说他仰赖于天。天命令他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独裁君主，他必须彻底地履行这个义务，若有阻挡独裁君主光辉的人则绝不轻饶。于是他开始对过去瞧不起自己的兄弟们进行迫害，不断加压，直到兄弟们从心底完全屈服为止。迫害之手同样伸向了过去自己的心腹之臣隆科多和年羹尧。对手越强，雍正帝越拼尽全力镇压到底，决不允许他人违背崇高的天命。

对于曾静等人的谋反，雍正帝付出了惊人的努力。对于曾静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乡下书生，若是一般的独裁君主便可能将这可恶的家伙砍头了事，但他鼓起浑身勇气，全力处理这个问题。他从各个方面分析解剖曾静的思想，加以反击，不说到对方心悦诚服绝不罢休。

从即位以来，他日理万机，毫无空闲。与此同时，自幼习字作文的他，在著作方面著有《世宗皇帝御制文集》，但我尚没有机会过

目。在书法方面，他造诣颇深，笔锋强劲，正如其人。在印章方面，多用包在椭圆之中的“为君难”三字的印章。另外，雍正帝的品质甚至影响到当时官窑烧造的瓷器。雍正年制的宫中使用的陶瓷，多为质地之上挂白衣，形成光滑洁白的表面，再描绘五彩的花鸟或纹样。描线每一点每一画都一丝不苟，其端正严谨的感觉宛如雍正帝就在面前。官窑的监督官经常听取雍正帝的批评意见，努力令皇帝满意，因此皇帝的意向甚至皇帝本人的性格都在陶瓷器上得以反映。

最近^[2]在故宫发现了数种雍正帝的肖像画，其中有一幅稀有的肖像，它大概出自宫中的西洋传教士之手。繁忙的雍正帝有时也有头戴欧式假发接见传教士的空闲时间，真是令人感到欣慰。

总之，雍正帝本性朴素善良，是代表了当时满族人性格特点的人物。因此，他希望成为中国式的独裁君主，并在向这个目标一味努力前进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创造了一种中国前所未有的独特的独裁体制。对强者虽然过于严苛，但无上爱护毫无抵抗、毫无防备能力的普通人民，哪怕粉身碎骨也要保证他们的生活。他不喜好战争，这一方面源于他过于好胜、不能放手一赌输赢的天性，另一方面源于他深切的同情心，他认为战争是最不合算的，不知会给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苦难。因此，他这一代没有赫赫武功。他也没有御驾亲征，恐怕即使亲自指挥军队也不甚高明。我们提到独裁君主立即会联想到战争，但雍正帝则不同，他是厌恶战争、喜好和平的独裁君主。但是，没有建立武功的皇帝会立即被历史遗忘，真是可悲可叹！

更为可悲的是他感人至深、充满善意的政治也因为采取独裁君主制的形式，不但出人意料地得到极少回报，而且还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专制君主制能够在中国存续数千年，是因为它具有某种程度的灵活性，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若是君主制没有任何理想，完全恣意妄为，或者如硬壳一般顽固不化地镇压人民，中国人民无论如何

逆来顺受都必定会将其打破，创造出新的政治形式。幸或不幸，历代明君圣主不断改良君主制的理想和实施，维系着沉默大众的信赖。雍正帝的独裁政治正处于其顶峰。于是，信赖独裁制的民众被引上了若不是独裁制国家便无法得到治理的方向。这对中国人民来说的确是可悲的结果。从这一点而言，不得不说雍正帝的政治实在是充满善意的恶意政治。

[1].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古文十弊》，《章氏遗书》卷五。——译者注

[2]. 指本书撰写时的20世纪50年代。——译者注

参考年表

公历年份	清朝纪年	备注	时事
1615		明万历四十三年	清太祖长子褚英死
1616	天命元年	明万历四十四年	清太祖建国
1644	顺治元年	明崇祯十七年	明朝灭亡,清朝进入北京
1662	康熙元年		康熙帝九岁
1667	康熙六年		康熙帝亲政,第一个皇子出生不久死去
1672	康熙十一年		大阿哥允禔生
1674	康熙十三年		二阿哥生,皇后死
1675	康熙十四年	(以下为雍正帝的年龄)	二阿哥被立为皇太子
1678	康熙十七年	一岁	四阿哥(雍正帝)生
1681	康熙二十年	四岁	平定吴三桂的三藩之乱
1682	康熙二十一年	五岁	俄国彼得大帝即位
1683	康熙二十二年	六岁	收复台湾
1688	康熙二十七年	十一岁	明珠倒台
1696	康熙三十五年	十九岁	康熙帝亲征,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击破外蒙古
1703	康熙四十二年	二十六岁	索额图被赐死
1708	康熙四十七年	三十一岁	皇太子被废
1709	康熙四十八年	三十二岁	二阿哥再次被立为皇太子

参考年表-续表1

公历年份	清朝纪年	备注	时事
1712	康熙五十一年	三十五岁	皇太子再次被废
1715	康熙五十四年	三十八岁	法国路易十四死
1716	康熙五十五年	三十九岁	日本德川吉宗成为八代将军
1717	康熙五十六年	四十岁	准噶尔的大将敦多布进入西藏
1718	康熙五十七年	四十一岁	十四阿哥被任命为大将军,进行西征
1720	康熙五十九年	四十三岁	清军于青海击破敦多布,进入西藏
1722	康熙六十一年	四十五岁	十一月康熙帝死,雍正帝即位
1723	雍正元年	四十六岁	正月雍正帝训谕地方官 四月十四阿哥被召回为康熙帝守陵 十二月西洋传教士除在朝廷效力者外,均被逐放至澳门
1724	雍正二年	四十七岁	二月雍正帝颁布相当于日本教育诏书的《圣谕广训》,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 五月苏努一家被流放右卫 七月雍正帝作《朋党论》 八月田文镜成为河南巡抚 十一月苏努死 十二月废太子死
1725	雍正三年	四十八岁	四月年羹尧左迁杭州将军 五月苏努之子类思以及若瑟被押送至京 十月鄂尔泰任云贵总督,李卫任浙江巡抚,高其倬任闽浙总督 十一月年贵妃死 十二月雍正帝赐死年羹尧,杀汪景祺

参考年表-续表2

公历年份	清朝纪年	备注	时事
1726	雍正四年	四十九岁	三月八阿哥改名阿其那 五月九阿哥改名赛思黑, 苏努的子孙分别被拘禁于各地 六月朝廷弹劾阿其那罪状四十条, 赛思黑二十八条, 十四阿哥十四条 八月赛思黑死 九月阿其那死 十二月苗疆开始改土归流
1727	雍正五年	五十岁	五月查嗣庭死, 这段时间类思和若瑟接受讯问, 苏努的其他儿子若望和方济各被押送至京 六月若瑟· 乌尔陈死 十月, 朝廷列举罪状四十一条 弹劾隆科多, 对其处以监禁 十一月李卫升浙江总督, 高其倬改任福建总督
1728	雍正六年	五十一岁	五月雍正帝任命田文镜为河南、山东二省总督, 平定西藏内乱 七月雍正帝旌赏河南民妇徐氏 十月雍正帝任命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
1729	雍正七年	五十二岁	三月雍正帝任命傅尔丹为大将军征讨准噶尔 九月雍正帝颁布《大义觉迷录》
1730	雍正八年	五十三岁	四月怡亲王死
1731	雍正九年	五十四岁	六月傅尔丹与准噶尔交战大败 九月策凌亲王击败准噶尔部

参考年表-续表3

公历年份	清朝纪年	备注	时事
1732	雍正十年	五十五岁	正月雍正帝召鄂尔泰任内阁大学士 七月李卫移任直隶总督, 策凌亲王于光显寺再破准噶尔 十一月田文镜致仕
1733	雍正十一年	五十六岁	六月雍正帝解除对苏努一家的监禁
1735	雍正十三年	五十八岁	八月雍正帝死, 子乾隆帝即位
1740	乾隆五年		田文镜死后遭弹劾, 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即位

《雍正朱批御旨》解题：其史料价值

一 序言

《雍正朱批御旨》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书籍之一，我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我试着为这本书解题之际，请读者原谅，我将从这本书与我个人的关系讲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我决心通读《十一朝东华录》，从天命朝开始读，经过顺治朝、康熙朝，在读到雍正朝的时候，感觉到清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对此详加考察，追其根本，发现雍正帝这位天子所具有的个性对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我很想了解雍正帝其人其事，于是找到了《雍正朱批御旨》这部书。昭和二十二年的暑假，我抛开读到一半的《十一朝东华录》，转而埋头阅读《雍正朱批御旨》。此后两年我在京都大学以“雍正帝及其时代”为题开设特别课程，接着下一年（昭和二十五年）我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作为岩波新书之一问世。我之所以挑选这样一位看起来没有销路的天子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实在忍不住想要试着将其人其事写出来的冲动。

《雍正朱批御旨》是历来被清史研究者一再使用的书，但大家对它的使用方法似乎流于零碎而随意。而且雍正这个时代、雍正帝这个人似乎也不应当仅仅被简单评价为夹在康熙与乾隆之间的过渡性的时代和过渡性的天子。关于此事，甚至有以下奇谈。

在日本帝国主义兴盛之时，有数名以“中国通”自诩的人曾在北京的日本使馆里聚会，山南海北地闲聊之时，谈话偶然涉及雍正年间的事情。当其中一个人提出雍正这个年号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时，一个自称是中国历史学家的人解释道：“这是清朝初期，康熙之后、乾隆之前的年号。”然而同席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中国通”打断了他：

“没有的事。众所周知，清朝初期的年号中，康熙、乾隆这两个年号是连续的，中间定然没有插入雍正的余地。恐怕雍正是明朝的年号吧。”在历史学家目瞪口呆的时候，在座的其他人一齐附和那位似是而非的“中国通”：“的确如此。康熙、乾隆是人人皆知的连续的年号，‘历史学家先生’哪里记错了吧。”最终，雍正被认定为明朝的年号，“历史学家先生”的说法被当作错误的答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被否决（《漫笔：多数决》，载《伊东忠太郎建筑文献》第六卷）。

我认为这个小插曲非常有趣，曾经一度将其写入拙著《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的序言之中，但在向同僚们征求意见的时候被泼了冷水。他们认为一般群众不会觉得这件事那么有意思，因而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最后只能从序言中将这一插曲删除了。

在我们看来，雍正帝的统治时间不过十三年，但正是这十三年奠定了清朝国内的基础。雍正帝的才品在清朝首屈一指，其父康熙帝和其子乾隆帝亦难以望其项背。我在这里将“我”改成“我们”这一复数形是因为我试着询问了一下，同事安部健夫教授完全赞同我的意见。其实，安部教授早在我之前已经通读了《雍正朱批谕旨》。于是，我和安部教授商量，决定募集志同道合的朋友，彻底重读《雍正朱批谕旨》，将其中的史料分门别类做成卡片，为雍正时代绘制详细的剖面图，以此为理解清朝史乃至中国史助一臂之力。我们将每周五下午定为讲读原文的时间，从昭和二十四年（1950）开始，至昭和三十二年（1958）一直坚持了八年，在我们同事所举办的讲读中没有哪

个持续过如此之久。有些年份，我们甚至不分寒假、暑假持续不断地进行，甚至有时到了年末除夕时仍旧使用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会议室，连办公室都提出抗议，称我们有碍用火安全，给他们造成了困扰。这也证明了《雍正朱批谕旨》本身是本相当有趣的书籍。若不是如此，它也不至于让人如此痴迷。在慢慢积累中，我们到了脱离文献研究并开始试着对历史进行总结的阶段了。昭和三十一年，我们获得文部省的科学研究费的补助，开始着手进行“雍正时代史的综合研究”。

我们最初使用的原文底本是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木刻雕版印刷本，这个版本与京都大学文学部藏本相比，形式上多少有些差异。此外还有一个石印本，因为石印本的原文正确无误，可知前两种木刻雕版印刷本都不是原版。原版无疑是殿本，因此无论如何都希望能够得到一部殿本的《雍正朱批谕旨》。

巧合的是，昭和二十九年夏，我因为其他事情去东京，在从东京大学正门向学士会馆走的途中，顺便走进森川町的旧书店看看，映入眼帘的是堆积如山的、破旧不堪的书帙。是什么书呢？我打开书帙一看，正是殿本的《雍正朱批谕旨》，而且十八函一百二十册完整无缺。听书店的人说，这套书是数日前从广岛方面进的货，昨天刚刚陈列到店里。我赶紧飞奔回京都，奔走筹集书费八万日元，多亏同事们的热情相助，最终将它买回了文学部。我不得不认为这完全是雍正帝的英灵指引我与这部书发生了邂逅。但是查阅殿本后发现，有些在其他版本中文字有疑问的地方，利用这个版本也无法得到解决。虽说是殿本，也不是绝对没有文字错误，如“冰蘖”被误写为“冰蘖”（第二册，齐苏勒，雍正三年九月初十日条目）。可以利用以殿本为主的数种《雍正朱批谕旨》，是我们莫大的幸福。

《雍正朱批谕旨》是以朱、墨二色套版印刷而成的精美书籍。墨字部分是众臣的奏折内容，上奏人包括地方的文官和武官，文官包括

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和道员，武官包括提督、总兵等，共二百二十三名。在墨字的行间或是奏折末尾有雍正帝用朱笔书写的批示，即朱批。因此这部书虽以朱批谕旨为名，却并没有体现出这部书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它是集雍正时期地方大员的奏折以及雍正帝的朱批谕旨为一体的。这部书作为史料的价值不必多说，各种史实在墨字部分的奏折中随处可见，再附加上天子的朱批谕旨，其史料价值就更高一层了。另外，朱批谕旨本身的史料价值也很高。

这里必须预先说明的是，墨字的上奏文并非普通的上奏文，而是采用“奏折”这一形式的文书。普通的上奏文以题本的形式通过通政司达于天子，由中央政府即六部及内阁公开处理。奏折与之不同，可以说是写给天子个人的亲启信件，由内部渠道直接送到天子手中，并由天子亲自处理。该制度如何形成，又是如何被有效利用的，这些问题是阅读《雍正朱批谕旨》的必备知识，同时这些知识又只有在阅读《雍正朱批谕旨》后才能真正掌握。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概括性地说明一下雍正帝及其时代。

二 雍正的时代

雍正帝自清太祖开国算起是第五代，自平定中原、君临天下的顺治帝算起是第三代。常言道，在君主政体之下，第三代处于决定整个王朝盛衰的重要转折点。雍正帝正是第三代，他是出色地完成了第三代君主之任务的英主。可以说清朝的政治方针大体在这个时代得以确立。具有清朝特色的制度，如秘密建储之法、军机处的创立、支給养廉银的原则等都是由雍正帝制定的。

然而雍正帝所面临的第三代君主的任务具体指什么呢？我认为，即使同样是第三代，对于兴起于异民族而君临全中国的第三代具有非同一般的任务，那就是从异民族式的原始体制向中国式的独裁君主制的转换。

满洲时代的女真人无疑还保持着氏族制度。但在他们侵入进步的中国近世社会后，就必然采用更加进步的独裁君主制度。但他们不可能从氏族制一跃进入独裁制，恰如动物学中所说的，个体发生是以重复系统发生的形式实现的，即满洲民族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内重复中国三千年的历史。更具体而言，如果用氏族制代表古代的话，接下来必须经过中世的封建制后，才能够进入近世的独裁制。当然这个“发生过程”因为不是从内部萌生的，而是受到外部刺激的产物，所以实际上经过了非常混乱的发展过程，有过前后矛盾、碰撞，最终才得以到达目的地。

从满洲时代的太宗，经过入关后的顺治帝直到康熙帝初年，清朝政权中出现了浓厚的封建色彩。从当时的满洲民族最自然的思考方式看来，清朝政权当然必须像下文所述一般。

首先，以天子为中心，皇族作为宗室划一个小圈，占有最中央的席位。宗室虽然低天子一等，但其地位并非当时的天子所赐。这与天子是历史的产物同样，他们的地位也是历史的产物。天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天子，是由于宗室承认了天子的地位。因此天子应当尊重宗室特权，同时肩负着保护宗室的责任。换言之，天子是宗室的象征，也必须是宗室的共有物。因此宗室对清朝的政治拥有极大的发言权，承担巨大的责任，同时享有他们应分得的那份收益。

其次，在宗室划的小圈之外，满族人划了一个中圈。宗室与一般满族人之间在权利和义务上有一个等级的差别，这个差别与前述天子和宗室之间的差别性质相同。

最后，在满族人的中圈外，汉民族形成一个大圈。汉民族在权利上又比满族人低一等，要尽的义务也比满族人更加沉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汉人是满族人实施统治的基础，只是因为满族人由于历史原因而有权凌驾于汉人之上。

若从侧面来观察这三个圆圈，则是以天子为顶点的金字塔形，上层是宗室，中层是满族人，最下层是汉人，各阶层有为各自的上层效力的义务。这就是当时的满族人心中描绘的清朝政权的理想状态。



图3 封建制

如此阶级性、封建性的体系在中国社会已是遥远的过往。中国近世的独裁君主制的理念不允许在君主与人民之间插入特权阶级。从

独裁君主的立场来看，统治人民的必须是君主一人。但人民人数众多而君主只有一人，所以为了治理人民，君主不得不借官僚之手。但与此同时，在君主看来，官僚只应是帮忙的小工，不能形成集团，成为介于君主与人民之间的特权阶级。天子与人民之间被隔开很远的距离，这仅仅意味着天子的尊严，但两者之间必须没有丝毫阻碍地、顺畅地进行沟通交流。因此官僚应当是最富有传导力的电线，不能自己发电或耗费电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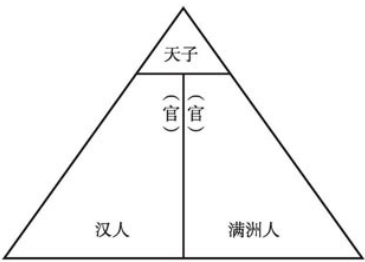


图4 独裁制

但是由于清朝是由兴起于东北的异民族所建立的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独裁化的清朝天子的地位必然带有双重性质：他既是满洲民族的天子，也是汉民族的天子。原本民族不同的满洲民族与汉民族拥戴共同的天子，可以说两民族之间建立了兄弟关系。清朝的天子常常将“满汉一家”挂在嘴边，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满汉之间变得完全没有区别，只不过原本不同民族的人现在不再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罢了。

清朝的天子是立于满洲民族和汉民族两根支柱之上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统治两个民族的人民，天子需要官僚，但官僚不能形成特权阶级，必须像线一样细，像管一样空心。

清朝初期的历史是君主权力的扩张的历史，但君主权力的扩张具体而言不外乎是从上述第一形态的封建制转到第二形态的独裁制。太宗迫害兄弟、顺治帝剥夺睿亲王家的特权、康熙帝诛杀权臣鳌拜等事件都是在这条道路上无法避免的悲剧。再加上同一个天子（康熙帝）连

续统治数十年这一个人因素，其结果是，至康熙帝末年，清朝的体制已经大体上接近中国式的独裁君主制。

雍正帝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即位的。“个体发生重复系统发生”的原理也必定适用于雍正帝个人，如清朝在其初期不得不在短时期内快速经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一般，雍正帝在他即位初期的数年中必须快速经历数十年的清朝历史。于是这条道路上的悲剧不断上演。雍正帝迫害兄弟阿哥们、迫害宗室苏努一家，以及镇压大臣隆科多等事件正是因此发生的。

既然在清朝之前的历史中已经形成了独裁制的轮廓，雍正帝个人的努力在确立独裁制方面应当很容易取得成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宋朝以后的中国，近世的独裁制虽然在理论上已经完成，但是在现实中并没有完全实施。阻碍君主独裁制实施的是官僚的特权阶级化，官僚的特权阶级化只有在他们之间产生私下团结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当私下的团结逐渐发展，无非就形成了所谓的“朋党”。

说起中国独裁制的理论，官僚的地位是因天子的恩惠而临时被授予的，因此他们只是辅助天子的机关，只能作为充当联络天子与人民之间的电线或通气管。因此官僚应当单独直属于天子，官僚之间不允许横向联结。若是他们建立起横向的联结，官僚就结成了一个团体，会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自主地行动。在人民之上拥有特权的人只有天子，所有人在天子面前都应褪去光辉成为平等的人，这是独裁制的终极理念。然而实际上，应当作为独裁君主的天子与他的人民之间出现了官僚这个特权阶级，形成了半封建化的阶级社会，企图侵害天子独裁权的危险无时不在。独裁君主必须与妨害他的独裁权之人持续斗争。因此中国近世的历史可以被视为独裁君主与官僚之间不断暗斗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从清朝初期到康熙帝为止的历代天子，以及现在作为研究对象的雍正帝都不能例外。

康熙帝自即位之初到晚年，一直不间断地为官僚间的朋党而烦恼。特别是由于围绕着皇太子问题而发生的事情，令皇帝的烦恼更甚。即使雍正帝即位之后，这个形势依旧没有迅速改变。雍正帝制服他的兄弟阿哥们，诛杀官场上的大人物、政界的大党首、汉军出身的年羹尧，无非是对朋党比周这一风气的镇压。

雍正帝实现了中国近世独裁君主制的理想，在世界历史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优秀的独裁天子。这意味着他在某种程度上解散了官僚私下的团结，令每个人直属于自己，对他们随心所欲、颐指气使，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如此困难的任务不可能仅凭天子的权力震慑住官僚就能够实现。不容忽视的是，这不仅需要策略，需要准备，同时也需要耐心和诚意。

三 奏折政治的出现

雍正元年春正月朔，雍正帝向天下官僚颁布谕旨十一道，分别训谕总督、巡抚、督学、提督、总兵、布政司、按察司、道员，以及副将、参将、游击等官，知府、知州、知县各官，晓谕他们各自的为官要务，因此这十一道谕旨应当被看作阐明雍正帝执政方针的文件。其共同点是，他批评了所谓的“名实兼收”这一陋习。雍正帝说：

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世宗实录》、《雍正朝东华录》，雍正元年春正月朔日条目）

这里虽然将“名”与“实”对立，其实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因为“名”是在官僚社会中的颜面，有颜面就能获得好地位，有好地位就能得到财富以实家，拥有财富则可以再以此为资本更有颜面。在官僚生活中，颜面即名誉，是宝贵的资本，财富与之表里相依。但名誉主要通过交际获得，学问只有在作为交际的手段时才有意义，政治也成为交际的牺牲品。为这样的官僚提供交际费用的最终都是人民，因为在苛政下不得不承受最大痛苦的牺牲者就是人民。而对人民的怨恨最后负责的只有天子一个人，官僚在形势最终恶化的时候可以投降以苟活，甚至还有倒戈这条退路，唯有天子一旦失去实权就不得不与王朝同归于尽。因此天子绝不能允许牺牲天子与人民而让官僚名实兼收。雍正帝为了表示他的决心，在改元之初颁布了那十一道谕旨。

雍正帝最憎恨官僚的横向团结。官僚一旦横向团结起来，天子自然会脱离人民，天子的独裁权就会落入官僚手中而最终被破坏。这就是“朋党”必将招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朋党之弊在中国自古有之。自宋代以来，独裁君主几乎神经质一般地警戒和镇压官僚的朋党。然而宋代名臣欧阳修所著的《朋党论》认为，社会上所谓“君子周而不比”有误，小人因利禄而结为朋党，因此不能长存，而君子集同道之人为朋党，故团结一致。

对此，雍正帝在雍正二年七月作《御制朋党论》，颁布给诸王大臣，反驳欧阳修，贬斥欧阳修的看法为歪理邪说。皇帝认为，欧阳修所谓的“道”归根结底是小人之道，欧阳修之论一出，小人愈发肆无忌惮，借同道之名结为朋党。君子无朋，唯小人则有之。“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这就是“新朋党论”的大致内容。

的确应当避免朋党。按照官僚制度组织庞大的官僚群体，依据上下统属关系维持一丝不乱的体系是绝对必要的。就地方制度而言，首先有总督、巡抚，其次有布政司、按察司两司，再次有道员、知府，最后有知州、知县。中央的命令按照这样的顺序向下传达，地方末端的事务逆向上传，最后经总督、巡抚之手，转达至中央。因此总督、巡抚的权限极大，以他们为首的地方官僚体系被固定下来，变成封建性的上下关系，独裁君主则不得不防范地方分离的倾向。

总督和巡抚被天子派遣到地方，是其所管辖省份的最高政治责任者，天子许可他们向天子报告地方事务或请求指令，这通过两种形式实现：其一称为题本（又称本章），可以说是公开的文书；其二称为奏折，是一种私人的文书。

题本是总督、巡抚作为一省的长官因公务向天子呈递的文书。呈递人需在题本之上钤盖官印，表明其作为公务人员的资格。文书通过驿传送往北京，之后经过被称为通政司的衙门送到内阁。内阁留下文书的副本，将正本送到天子手上。天子召内阁大学士入宫，一边听取他们的意见，一边决定文书的处理，裁决各种各样的事务。天子在做

决定时，按照事务各自不同的性质征求六部以及相关部门的意见，决定被做出后由负责的各部通知地方的总督、巡抚，由总督、巡抚转达最基层的政府机关，事务往来完全通过公文进行。总督、巡抚以题本的形式通过内阁向天子报告的事件专门有一名称，为“题达事件”。关于财政、司法、行政等可以依据相关法律和先例处理的事件，大体上属于题达事件。

然而除此之外，总督、巡抚也可以个人名义向天子呈递私人性的文书，这被称为奏折。有的时候是到达任职地点的报告，有的时候是贺年或者是时令问候，这些被称为“请安折”。机密事件的秘密报告称为“奏事折”，是没有必要让中央政府任何官员知晓，也不能让他们知晓，只需天子本人阅览的文书。因此奏折也可以说是总督、巡抚写给天子的亲启信件，没有必要加盖官印。

上述制度自清朝建国之初已经存在，近年来在北京故宫发现的康熙时代的奏折中有各种有趣的史料，这些史料以《文献汇编》、《明清史料》、《史料旬刊》为名已经逐渐公布。

雍正帝确立独裁制，禁止地方官僚的朋党之风，让每一个官僚直属于天子，利用的正是奏折制度。从前，地方官僚中拥有给天子呈递奏折权利的是总督和巡抚，在非常特别的情况下，其他的臣子也能够秘密上奏，但仅限于极其特殊的情况。雍正帝则要求不仅是总督、巡抚，也包括布政司、按察司、提督、总兵，甚至连道员、知府也必须向天子上奏。

作为地方官赴任的知府以上的官吏首先被召入宫中谒见天子。引见时天子会就地方政治的施政方法等对其进行恳切训谕，特许其以后可以向天子呈递私人性的奏折，并为此赐予他称为“折匣”的四个信箱。这种箱子长八寸八分，宽四寸四分，高一寸五分，外涂黄漆，内

裱黄绫，可以上锁。造有同样的钥匙两把，一把天子保存，另一把被交给官吏本人。

赴任后，该官吏必须尽快以奏折的形式向天子呈递到任报告，这时他必须一字不差地重复一遍谒见天子时得到的训谕，并发誓无论何时都会遵循训谕行事。奏折被放入折匣中，上锁，并在外面严密地包裹好送往北京。此时总督、巡抚等可以利用驿传，或者可以派遣武官上京，威风凛凛地将奏折送到乾清门门口的奏事处。然而从前没有上奏折权利的布政司、按察司及其以下的官员则需专程派遣家仆，尽量悄无声息地上京，到达天子指定的大臣家中提交折匣，由大臣转呈天子。布政司以下的官吏可以说是总督、巡抚的属官，属官若是被授予直接与天子通信的权利，或许会让作为上官的总督、巡抚对此有所顾虑，雍正帝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如此安排的。

折匣被送到天子手中，天子用自己的钥匙打开锁，取出奏折阅读。如复述引见时所下达的训谕有误，皇帝会用朱笔一一订正，晓谕他牢记天子的训示。如果有其他事情则依旧用朱笔书写在信札的余白处，将奏折再次放入折匣中锁好，按照相反的顺序返还给寄信人。这种天子在臣子呈递的奏折上用朱笔书写的部分即朱批谕旨，可以说是天子对奏折的回信。

当事人收到返还的带有朱批的奏折并恭敬拜读后，必须再将奏折放入折匣送还天子。天子与官僚个人的通信必须绝对秘密地进行，官僚绝对不能向他人泄露自己所上奏折的内容以及天子对此所赐朱批谕旨的内容，也不能记录所写内容。不仅如此，总督、巡抚以外的官吏甚至不能公开自己被允许给天子上奏折这一事实。

发给四个折匣的原因是，预计这个数量可以满足任职地与北京之间的不断往来。

从此之后，该官吏在任职地必须毫无遗漏、事无巨细地向天子报告所管辖的民政或者军事等的实际情况。

雍正帝新构想的、可以称为奏折政治的方法，与其说是儒家化的，不如说是法家化的。因为儒家化的政治提倡在选用官吏或者委任官吏之前费尽苦心寻觅，一旦选用或委任之后，便听之任之，不加干涉；若是不能完全信任、委以全责的人，不如从一开始就不选用。

但是雍正帝的做法是，不把地方一省的政治完全托付给作为负责人的总督、巡抚，也从他们的布政司以下的属官中收集报告。曾经马尔齐哈因引用《论语》“箴豆之事，则有司存”之句受到雍正帝的严厉训斥。雍正帝说：

其心欲朕不加详察，则伊等邀结党与，任意擅行。（《世宗实录》、《雍正朝东华录》，雍正二年五月甲寅条目）

可见无条件地将大权委任给少数官僚，立刻就有变成朋党据点之虞。

四 奏折与朱批

雍正帝之所以要求地方官呈递奏折，也是因为想要准确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他在给陕西宁夏道鄂昌的朱批谕旨中写道：

汝等下僚亦得奏折者，不过欲广耳目之意，于汝责任外一切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武是否整饬，[雨旸果否若百姓之生计若何，风俗之淳浇奚似，即临境远省以及都门内外，]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以风闻入告也。只须于奏中将有无确据抑或偶尔风闻之处分析陈明，以便朕更加采访[得其实情。等既非本所管辖，欲求真知灼见尔不可得，所奏纵至谬谈失实断不加责。]但密之一字，最为紧要，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鄂尔泰亦不必令知。（《雍正朱批谕旨》第九十二册，鄂昌，以下省略书名，仅从出自何册开始记载）

引文中所提及的鄂昌的叔父鄂尔泰是雍正帝最为信赖的满洲出身的宠臣，但甚至在叔侄二人之间互相告知奏折的内容也不被允许。被派遣到江南第一都市苏州的织造官由内务府任命，委派他们进行隐秘的任务特别方便。雍正帝在给苏州织造李秉忠中的朱批中写道：

苏州地当孔道，为四方辐辏之所，其来往官员暨经过商贾，或遇有关系之事，亦应留心体访，明白密奏以闻。（第八十九册，李秉忠）

因此，地方官获许向天子上奏，既被授予了极大的特权，也被强加了沉重的义务。若是忽视了这个义务，就会被雍正帝督促，甚至遭受斥责：

地方事宜如民情吏治、年岁丰歉何故未见陈奏一字。（第七十五册，柏之蕃）尔兄（董象纬）居官惟务巧饰，自到广以来，未具一切实之奏，通省岂无一件可闻于朕之事。（第四十三册，董象纬）

针对奏报雨泽情形：“奏报如此怠缓甚属不合。”（第七十六册，杨鲲）

虽然如此，但地方官若是絮絮叨叨地奏报琐碎的事情，又会被训斥为何上奏如此无聊之事：

朕无暇细览此等琐屑计簿也。（第十三册，费金吾）

尔身任封疆，当知大体。似此琐屑不应奏之事渎奏，必有应奏之事隐匿而不奏闻者。（第十九册，塞楞额）

因此奏折的内容必须是具有独创性和价值的。若是在奏折中书写了已经以题本上奏过的事情，或者应当以题本上奏的事情，雍正帝会气愤地质问为何要让他费双重工夫：

似此已题案件何必又多一番烦渎，此皆居心不实。（第二十六册，常赉）

此应具题之事，何得折奏。（第九十一册，巩建丰）

虽然如此，但地方官也不可到任后匆匆忙忙地过早提出自己的政见。

尔甫经到任，尚未周知地方事宜，遂为此未见颜色之瞽论耶。不过据一二属员之书生管见，即率尔道听途说公然具折上奏。殊属孟浪妄谬之至。（第三十一册，法敏）

雍正帝向地方官僚广泛地索取奏折，但不仅仅是拿来而已，他将奏折一封接一封地读完，在读后随手用朱笔批示训谕。《世宗圣训》卷七，圣治，雍正八年七月甲戌上谕中云：

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不但宫中无档案可查，亦并无专司其事之人，如部中之有司员、笔帖式、书吏多人掌管册籍、翻阅条规、稽查原委也。朕不过据一时之见，随到随批，大抵其中教诲之旨居多。

《雍正朱批谕旨》中也有：

朕立志以勤先天下，凡大小臣工奏折悉皆手批。外人亦不信。（第五十册，鄂尔泰一）

正因为自己有勤勉以为天下表率的气，雍正帝无法忍耐臣子的怠慢。特别是臣子完全忽视他辛辛苦苦写下的朱批，连一点儿反应都没有的时候，他会大发雷霆：

黄叔琳自任浙抚以来，大负朕恩，种种不可枚举。朕经严谕数次，竟无一字奏覆，封还朕谕，可恶至极！（第十八册，陈世倌）

观汝景况，朕所颁赐朱批谕旨总未过目也。昏愎错谬，何至于此！（第九十九册，程元章）

朕诲汝许多格言，何啻珍宝。况悉系亲笔所书，未见汝感激奏谢一字。似此随众赏赐些微物件，乃长篇大论以相烦渎，殊属不知轻重、不识大体之至！可惜朕一片苦心训诲汝如此顽蠢之人。自此亦不再训亦不赏赐矣。（第三十九册，石云倬）

作为雍正帝手下的官僚，最大的罪恶除了上述怠慢以外，还有隐匿和不实。这不仅有害于政治，更是对想要知道真相的雍正帝的纯粹感情的背叛。雍正帝追求真实的精神与当时考证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是相通的。

凡事如此，据实不隐方是。（第十二册，杨琳）

汝对丁士杰果有此言乎？丁士杰之被参或有冤抑乎？其据实奏闻。……朕但欲得事之真情而已，非为丁士杰起见。（第三十九册，石云倬）

地方官若有隐瞒会被严厉地斥责，但如果能够直率地坦白自己的过失，乞求原谅，则会令雍正帝立即转怒为喜。

此所奏分数（二麦的收成）皆属太过。似此虚捏，何益之有？（第二十五册，何世璠）

江宁城内正月以来连次被盗，兼有旗兵种种不法举动，朕悉于他处闻之。汝今何颜对朕？若云不闻不见，是乃无耳无目木偶人也。如知之而隐匿不奏，辜负朕恩，有过汝者乎？（第七十六册，噶尔泰）

不可通同欺蔽，即使尔阖省一气共相隐瞒，朕亦另有访闻之道凡百处。（第四十五册，尚灏）

汝于广东任内有数事欺隐，朕深为寒心。（第九十二册，阿克敦）

分派营伍一事，如何情由，其据实陈奏。如知悔过，朕犹宽恕。若仍欺隐，恐未必妥也。（第四十五册，佟世麟）

似此认咎直陈，不事文饰，情尚可恕。但当奋兴砥励，以期无忝此任。（第九十八册，杨嗣）

此数起盗贼情形（衙门被窃事件），朕早闻之，汝幸实陈。倘匿不奏闻，其祸莫测。（第七十五册，陈王章）

对于如此贯彻实事求是精神的雍正帝而言，他非常厌恶臣子阿谀奉承之言，同时，若官僚过分卑躬屈膝、自轻自贱，也会让他的情绪变得焦躁不安。针对江西布政使李兰所写的“皇上洪福”，雍正帝的朱批是：

朕深厌此种虚文。（第三十五册，李兰）

在福建布政使赵国麟写自己是“一得之愚”的旁边，雍正帝训诫他，写下朱批：

用愚字处过多矣。朕岂有肯畀愚人以藩司之职。（第九十六册，赵国麟）

就连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中国式的无意义的套话，他也非要用朱笔订正这些言过其实的词句：

（墨字）臣虽粉身碎骨，（朱批）不必至此。（墨字）至死以报，（朱批）何用如是。（第二十八册，宜兆熊）

（墨字）臣每当官兵聚集之公所，必大声疾呼，委曲开导。（朱批）因欲众人听闻，大声是矣，疾呼似可不必。（第四十六册，蔡良）

（墨字）赏臣花屯绢两匹，蜜荔枝一瓶。……缝衣有耀，顶踵皆被龙光，怀核亲尝，肺腑长含玉液。（朱批）衣只被身，何及顶踵？核岂足尝，难入肺腑。概属套语，浮泛不切。（第三十八册，王士俊下）

但有时候他会认可臣僚的谦卑之辞，或者将其替换为程度更甚的词语：

（墨字）臣自知器小才庸；（朱批）将己之态度一语写出如画。（第二十九册，沈廷正）

（墨字）战栗惶悚；（朱批）改为“羞愧汗赧”。（第六十六册，宪德）

雍正帝的朱批有时辛辣，有时讽刺，但若是发现自己有错，他也不惮于坦率地承认：

朕前谕误矣。（第二十八册，宜兆熊）

朕严行批谕系出于一时之见，随于各处访询，知尔所奏颇属有理，前谕错责汝矣。候另有旨。（第四十五册，杨鹏）

雍正帝的奏折政治也是对官僚的政治教育，对接受教育的官僚而言是一大考验。经得起这个严格的考验，始终得到雍正帝恩宠的仅有以满族人鄂尔泰为首，汉军田文镜、捐纳出身的李卫以及其他寥寥可数的几人而已。科甲出身的政治家并不在此列。因为科举容易成为朋党的温床，科甲出身之人被认为拘于情面，无法保持公正无私的态度。

阅读《雍正朱批谕旨》，在官僚的奏折与天子的朱批谕旨的来往中可以发现，最初大体上感觉一切顺利，途中逐渐变得阴云密布，最终遭受雍正帝独特的恶骂以至销声匿迹的官僚为数众多。

殊属迂阔不通之至！（第三十六册，楼俨）满口支吾，一派谎词！（第四十五册，马觐伯）

庸愚之极。……欺诳瞻徇，昏庸无识之督抚！（第二十八册，宣兆熊）

（天地神明未肯被）汝辈不忠不诚，凡夫俗子之所欺诳也！（第四十一册，岳超龙）

不学无术，躁妄舛谬。（第六册，石礼哈）

可谓良心丧尽，无耻之小人也！（第四十二册，管承泽）

可谓无知蠢钝之极！（第三十二册，武格）

如此负恩悖理，老奸巨猾，败坏国家法纪之人！（第四十六册，魏经国）

似汝忘本负恩，刚愎自用之辈。（第三十三册，伊拉齐）

大欺大伪，大巧大诈！（第二册，杨名时）则为木石之无知，洵非人类矣。（第二十九册，沈廷正）

即禽兽不如之谓也！（第十四册，黄国材）

洵为大笑谈！果系年老昏愆乎？汝其据实奏朕知之。（第四十五册，杨鹏）

即使这是亲笔信中的文辞，如此对臣子破口谩骂的天子在中国历代君主中大概也绝无仅有了，恐怕在西洋近世的独裁君主中也没有。

至雍正十年，天子决心将这段时间堆积如山的，附有朱批的奏折原封不动地付梓出版。究其目的可能有多种。雍正帝大概也意识到自己严厉的政治不一定会受到世间好评，这种倾向尤其在科甲出身、向来占据官场主流的官僚中间体现得非常强烈。雍正帝预想到在他死后，也许这些科甲出身的派系会再次在官场上抬头，非议雍正时代的

政治，甚至可能颠倒黑白。因此他认为有必要事先将秘密文书悉数披露，昭示世人事实如此，千真万确，不容置喙。

出版工作似乎进行得很顺利，但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在雍正年间究竟进展到什么程度。从书中包含雍正帝病逝前不久的雍正十三年八月的奏折可以推测，全书大概是进入乾隆年间才最终完成的。而且据《啸亭杂录》所言，出版的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在宫中保和殿的东西两庑中，带有朱批的奏折数倍于此，积如山岳。

如此问世的《雍正朱批谕旨》，正如我们上文已经简单介绍过的，是与世间的史料集迥异的书籍。特别是雍正帝的朱批无比明晰，能使人读后颇有酣畅淋漓之感，恐怕称其为“天下第一痛快之书”也无妨。

五 题本与奏折

官僚有官僚的体制，必须保持上下系统一丝不乱的秩序。但是雍正帝令作为地方的总督、巡抚属员的布按二司、道员、知府直属于自己，令他们呈递奏折，这就难免会导致官僚组织体系的紊乱。雍正帝并未忘记这一点，对此多有留意。于是，他令总督、巡抚派使者到北京，至乾清门将奏折提交到奏事处，再送到天子身边；而二司道府派遣私人至京，拜托怡亲王，或是内阁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等秘密将奏折转呈天子。湖南辰沅靖道王柔曾经以赍折使者途中遭遇盗窃为由，上奏请求允许派遣的使者利用驿站并沿途为其提供保护，又有布政使佟吉图的家人至宫门呈递奏折之事，对此雍正帝朱批：

汝此奏不通之极。道府等员乃系小臣，品级卑微，无奏对之分。朕因欲广闻见，许令具折密奏。虽许密奏，不时诫谕汝等，毋得张扬泄露，作福作威，以挟制上司，凌驾同僚。今若特降明旨，将微员下吏之家丁差役，概令驿官查验，拨兵防护，殊觉封章络绎，道路纷纭，观瞻之下，成何礼体。即督抚赍进奏折，亦未曾如是行事。两司奏折至京，皆命廷臣代转，不许径至宫门，况汝等末职耶。（第七十册，王柔）

朕意尔等藩司，若明上奏折，未免物议一省事权不专，有两三巡抚之嫌，所以前谕尔将奏折交怡亲王代为转奏。今尔家人为何竟直诣宫门进折耶？（第十五册，佟吉图）

因为两司以下的官员是被特许秘密地向天子上奏折的，所以正式的文书必须呈报总督、巡抚，以总督、巡抚之名通过中央政府“题达”于天子。然而总督和巡抚拥有以题本和奏折这两种形式上奏的权利，因此必须根据案件的性质分别使用这两种形式。如前述，“奏折”是作为官僚个人的行动，而“题本”是总督、巡抚作为公务人员的行为。因此，军事、中央财政、礼制、重大司法案件、制度的改废，以及其他有例可循的行政事务全部应当采用题本的形式。总督、

巡抚必须对这个区别有充分理解、毫不混淆地分别使用。但是在细微之处，区分二者就甚为困难了。

直隶总督李卫是最被雍正帝信任的封疆大吏，曾经受辖区内的魏象枢、魏裔介的子孙之托，对赐予其祖先的荣典代为谢恩，他使用题本奏谢，却因这种情况应当使用奏折而他错用题本的疏忽而被通政司弹劾。因此，下一次李卫自己被雍正帝恩赐圣祖文集时，他不用题本而用奏折谢恩，这次又被通政司以因不用题本奏谢而指摘参劾。李卫感到万分困惑，在其他奏折中向雍正帝陈述此事并表示歉意，天子为此朱批：

奏本题本条款虽分为二，原非大相悬殊，不过俾汝等封疆诸臣慎重检点之深。以汝资历之深，尚不能谙悉程式，其他服官未久，宜乎不免错误者多矣。然朕因此亦每不令依例处分也。（第八十二册，李卫六）

地方督抚中资历最老的李卫尚且在题本与奏折的使用方法上犯错误，可想而知区别两者有多困难。李卫还在奏折上闹过一个笑话。奏折本是私人书信，没有固定的体裁，他却把题本的格式原封不动地当成了奏折的格式，曾经上奏称“此折系遵奉部颁定式”，雍正帝训谕：

部颁式样限定字数，系专为本章而言，与密折无关。（第七十七册，李卫一）

如此烦琐的典章制度，也是独裁君主驾驭臣子的武器之一。虽然雍正帝自己说奏折没有程式，但臣子还是必须谨慎对待，小心处理。如前所述，奏折有奏事折和请安折的区别，这种区别可不能等闲视之。

将此折（奏事折）附于请安函内，而函面标题奏折二件，亦可谓不达礼体，不敬之至矣。（第九十六册，赵国麟）

请安折因用于祝贺或时节问候的礼节，地方官僚有时为了表示郑重，使用黄绫，但雍正帝反倒认为这是浪费，令与奏事折同样使用白纸。

请安折用绫绢为面表，汝等郑重之意犹可，至奏事折面概用绫绢，物力艰难，殊为可惜。以后改用素纸可也。（第十三册，黄国材）

嗣后奏折不必每一折一封套，两三折并封可也。请安折应如旧，奏事折面宜用素纸，绫绢殊为可惜。（第十二册，裴^韫度）

概言之，题本的内容是被公之于众的表面政治，奏折的内容是秘不示人的幕后政治。因此即使地方官在奏折中上奏了愚拙之事，天子也可以置之不理。

此事尔幸以折密奏，因随笔批谕，以示朕意。若系具疏题达，则妄言之罪，不为尔宽矣。（第十六册，李绂）

设或具疏题奏，则天下人传为话柄矣。……览奏不禁发笑，实属可怜之封疆大吏也。（第二十册，傅^{_泰}）

若是天子赞成地方官在奏折中申述的意见，想要将其公表天下、付诸施行的时候，会命上奏者将同样内容以题本的形式再次具奏。或者为了省事，天子甚至有时直接将奏折转送内阁将其作为题本处理。

照依此折具本题奏。将不合例缘由本内声明可也。（第六十五册，高其位）

所奏甚属可嘉。毋须另疏具题。即将此折交部改本，颁发谕旨矣。（第六十三册，田文镜^七）

同样的事情，在《世宗圣训》卷七，圣治，雍正八年七月甲戌的上谕中有记载：

各省督抚大臣于本章（题本）之外，有具折之例。又以督抚一人之耳目有限，各省之事岂无督抚所不及知，或督抚所不肯言者，于是又有准提

镇藩臬具折奏事之旨。即道员武弁等亦间有之。此无非公听并观，欲周知外间之情形耳。并非以奏折代本章。凡折中所奏之事，即属可行之事也，是以奏折进呈时，朕见其确然可行者，即批发该部施行，若介在疑似之间，则交与廷臣查议。亦有督抚所奏而批令具本（题奏）者，亦有藩臬等所奏而批令转详督抚者。……凡为督抚者，奉到朱批之后，若欲见诸施行，自应另行具本，或咨部定夺。为藩臬者，则应详明督抚，俟督抚具题或咨部之后，而后见诸施行。……凡折中批谕之处，不准引入本章（题本），以开挟制部臣之渐，则奏折之不可据为定案，又何待言乎。

由此，奏折与题本的区别终于逐渐明晰起来。

雍正帝一方面尊重总督和巡抚的官方地位，在题本与奏折的区别上恪守从前的习惯，另一方面与作为他们属员的布按两司以下的官员直接通信。这种奏折政治，乍一看似乎自相矛盾，然而雍正帝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奏折，一方面甄别人才、淘汰庸愚，另一方面防止臣子朋党化、封建化，应当将其视为使题本政治回归本来应有形态的一次尝试来理解。对雍正帝而言，奏折政治说到底只是权宜之计，从祖宗传下来的题本政治才是他的终极理想。

六 《雍正朱批谕旨》的价值

雍正时代的政治是公开的题本政治与隐秘的奏折政治并行的，我们自然可知《雍正朱批谕旨》作为史料的价值极高。雍正时代的史料除此之外还有《世宗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以及以《实录》为基础的《雍正朝东华录》、《世宗圣训》、《雍正上谕》和《雍正八旗上谕》等，但是这些史料可以说全部是题本范围内的记录。唯独《雍正朱批谕旨》是奏折政治的记录被公开的部分。那么，这两种记录具体有什么不同之处？尤其是作为奏折政治的记录的《雍正朱批谕旨》又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一，如前所述，《雍正朱批谕旨》是雍正帝与地方官僚个人之间的私人性质的往来文书，因此体现了每个人鲜明的个性。首先，雍正帝作为个人的个性近乎赤裸裸地展现出来。他好胜而自信，好强而勤勉，却又感情丰富、容易动容，是典型的满族人。出现在《实录》和《世宗圣训》中的雍正帝，作为身着帝王衣冠的皇帝令人难以接近，但出现在《雍正朱批谕旨》中的雍正帝是一个以心换心、有教养的读书人。而上奏折的官僚在某种程度上也放下了戒备心，对待作为个人的雍正帝。他们的处世之道以及行为有巧有拙，虽然说贤愚有别，但其间表现出来的各不相同的态度甚为有趣，特别是很多对当时官场生活的描写十分逼真。我们一边阅读一边摘录的以“官场”为标题的卡片为数众多也是必然的。

第二，《雍正朱批谕旨》的内容中，虽然比起天子的文章，臣子的奏折所占的分量较重，但臣子的奏议因有了天子的朱批而价值大幅提高，这一点必须加以注意。我们在处理其他时代的史料的时候形成了只要看到奏议类的文章立刻盲目地将其尊为第一等史料的习惯。但是一读《雍正朱批谕旨》，就会意识到这样的态度颇为危险。为什么

呢？针对臣子奏折的内容，雍正帝指责其为隐匿不实或不切实际的空论的不在少数。由此可知，历代奏议之中偏离实际政治、远离真相的应当有很多，不能像过去一样只要见到奏议的文章便如获至宝，利用只言片语来为自己的研究行方便。同时，像雍正帝这般明察秋毫的天子所赞成的奏折的内容，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引用了。

第三，《雍正朱批谕旨》因为是地方官所上的奏折，所以提供了关于地方政治实际情况的颇有价值的史料。《实录》等原本是中央政府的记录，因此关于地方的情况，若不是相当重要的事件便不进行记载。然而地方官的奏折几乎所有都是关于地方政治的，特别是关于各地的气候、米麦的收成、粮价等连详细的数字都被记载下来。据说这类报告被要求以奏折的形式由督抚负责奏报，大概始于康熙帝的时候（第七十二册，魏廷珍）。

在地方政治之中应当特别重视关于地方财政的史料。在中国说到财政就是指中央财政，因其从未建立起地方财政。这虽然是独裁君主制的必然结果，但实际上任何时代都存在地方财政。在清朝，地方财政采取“公项”（公费）的形式，财源为赋税的若干成耗羨，以及盐商等捐出的规礼银等。支出为地方衙门的运营费，其中包含官僚的生活费。官僚在任职地的津贴在雍正时期得到整顿，建立了养廉银制度，但是养廉银被完全当作临时的惯例进行处理，因此基本没有出现在题本政治的领域内，都在奏折的范围内被处理。因此雍正时代建立养廉银的情况，不参照《雍正朱批谕旨》便几乎无从下手研究。

雍正帝最初本希望在朝廷上建立养廉银制度的基本原则，因此令九卿公开会议此事，但会议中发现如果公开承认养廉银，也必须承认耗羨，而耗羨是正规赋税外的未经公认的附加税，因此又将此事从题本的范围转到奏折的范围，完全委托各省总督、巡抚处理，天子仅仅参加商讨，后来甚至连商讨也拒绝参加了。

养廉一项，究非俸薪之比，毋得叙入本内。（第五十九册，田文镜三）

养廉之议准照所奏支給，疏内无庸叙入。（第六十六册，宪德）

在尔等酌量（耗羨）为之，朕不便代为画定准绳。（第二十八册，宜兆熊）

耗羨二字非朕之可谕之事。（第六十二册，田文镜六）

历来天下督抚之羨余、养廉一事朕从未批谕一字。（第十一册，毛文铨）

第四，《雍正朱批谕旨》中包含一些在公开的文书中看不到的秘密事项，或者不合朝廷体统的琐碎事项等。军事、外交等机密事项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被当时官僚视为琐碎的杂事对于我们而言，其中也有一些是重要的史料，如作为地方衙门的下级吏员的胥吏的制度、关税、公行的状态、民间秘密结社等，不可胜数。在过去对广东贸易以及洋行的研究中，《雍正朱批谕旨》的奏折差不多是必须引用的文献。我曾在《东方学》杂志第二辑中刊登过题为《明清时代的苏州与轻工业的发达》的小文章，其中引用的该书中关于苏州踹坊的记载，之后曾被各方的论文所引用或借鉴，可见关注之人还是很多的。

七 奏折政治与军机处

雍正帝的奏折政治使近世性的独裁制变得更加完善。独裁制之下的官僚绝不是服务于人民的，但也不允许他们成为将人民据为己有的特权阶级。在这一点上，绝不能将其与封建君主或封建贵族等同视之。其中，后者无视人民的权利，仅要求获得自己的存在价值和存在权利。独裁制是以人民的利益与君主的利益完全一致为前提的。官僚凭借君主的恩惠被临时授予地位，因此不能侵害君主的利益，也不能侵害人民的利益，侵害人民的利益就等同于侵害君主的利益，背叛君主的恩典。若官僚各自为政，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出背叛君主的恩典这样无法无天的行为，只有结党谋划才有可能做到。雍正帝的理想是解散官僚的私人党派，让他们一个个都直属于天子。于是，前所未闻的奏折政治应运而生。

但是这样的政治，唯有像雍正帝这样精力绝伦的英主，而且是在四十五岁这样年富力强的岁数即位的天子才能够做到。若是换一个时代，别的天子即位的话，从一开始就可以预见这样的政治必然难以为继吧。

那么会不会雍正帝一死，奏折政治就随之消亡，政治的中心退回内阁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旦开始了新的政治方向，就无法无条件的逆转。然而雍正帝之后即位的乾隆帝虽说英明，终究是个只有二十五岁的青年天子，还不具备如雍正帝一般对全国官僚每一个人都颐指气使的力量，于是必然产生了军机处政治。

军机处的起源，在此之前并不十分清楚。我曾经在《东方史论丛第一》中发表了一篇小文——《清朝国语问题的一面》，主要论述了为了省去文书翻译的繁杂，内阁政治不得不转移到军机处政治的经

过。现在，我必须再讨论一下在雍正帝的奏折制度下军机处是如何产生的。

雍正帝与清朝的宿敌西北准噶尔部之间爆发了新的冲突，在宫中临时设立军机房作为总参谋部。依据《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这是雍正七年六月癸未的事情，怡亲王及内阁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三人被命令密办军需事宜。雍正十年，军机房改名为办理军机处，其大臣称为办理军机事务。军机处的任务是处理西北军务，但处理方法间于雍正帝的奏折政治与题本政治之间。即前线的将军发来的报告以奏折的形式由乾清门的奏事处送到天子手中，既不通过通政司，也不通过内阁。若只是普通的奏折，天子一人批阅，一人处理即可；若是关于西北军务的奏折，则天子与军机大臣一同商议。恐怕从雍正帝的时候开始即由军机处大臣拟旨。所谓拟旨是指大臣替天子拟好答复臣子奏请的言辞，等待天子批准后即成为天子的命令。拟旨是内阁大学士的职责，因此军机处可以说是内阁的分局。实际上，初期的军机大臣大体上是从内阁大学士中选拔出来的。

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帝殁，乾隆帝即位后，便在办理军机处外又设立总理事务处。十月，办理军机处被总理事务处合并，这表明总理事务处不仅处理军机，还成为处理天下奏折的正式机关。不久之后，它的名称再次改回办理军机处，但实质上依旧兼办一般事务。至此，过去位于幕后的奏折政治直接登上前台。既然由隐秘变为公开，奏折政治也不得不发生质的变化。这就是奏折政治的法制化。

雍正帝的奏折政治是他的独创，以他的个性为中心进行运作。奏折政治没有固定的规则。雍正帝在《雍正朱批谕旨》卷首的自序中写道：

至其中有两入奏事而朕之批示迥乎不同者，此则因人而施，量材而教。严急者导之以宽和，优柔者济之以刚毅，过者裁之，不及者引之……

读者当体朕之苦心也。

他不拘泥于先例常法，也不让它成为先例常法，所有一切都统一于雍正帝的人格。他的朱批，因人施教，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训诫。因此他所创造的奏折政治在他亲自运用期间成效显著。

然而这样的形式被子孙继承，并成为半公开的、大臣也可以参加的状态，就需要稍微有一些基准，至少需要从积累的先例中逐渐总结出一些习惯法。致力于将军机处的奏折政治法制化并总结出一种制度的是代表满人官僚的鄂尔泰和汉人官僚领袖张廷玉两位军机大臣。于是，奏折政治逐渐侵蚀题本政治的范围，天下的政治逐渐脱离内阁，转而以军机处为中心运行开来。又因奏折已经取得官方的地位，经过军机处拟旨、得到天子批准就可以直接生效，这被称为“奏准”，被认为与经过内阁的“题准”具有同等效力。因为两者都是由天子批准的，所以都可以作为约束后世的先例。

奏折政治范围的扩大同时导致题本政治的衰落，只有最无关紧要的报告事项才以题本的形式经过内阁。到了光绪二十八年，一切题本被改为奏折，自明代开始的通过内阁的题本政治最终消失了。这被称为“改题为奏”。

这里有一本同治六年的带有饶旬宣自序的名为《奏折谱》的书，我收藏的是光绪庚寅年（1890）题有“京都二酉斋藏板”的版本，书中叙述了在奏折政治极度发达之时奏折的实际运用方法，这一点非常有趣。根据此书，我们可以感觉到同治时代的奏折与早在一百四十年以前的雍正时代的奏折在各方面的差异颇大：雍正帝曾说过奏折没有固定的书写格式，而《奏折谱》将书写格式作为主要论述内容，不厌其烦地把奏折形式化了；雍正帝曾训诫请安折不要用绫绢，而《奏折谱》却写着需使用黄绫；参劾官吏照例应当使用题本，同治年间却全部使用奏折。《奏折谱》中记载的这些制度的建立似乎是习惯逐渐积

累的结果，作为书中的先例，书中引用了如乾隆时期的上谕、嘉庆十七年刑部议定应奏条贯等，但似乎没有关于奏折的系统的法典。应当注意的是，在这些习惯法的累积中，还保存下来了一则雍正时期偶然发生的故事。

《奏折谱》的“禁令”条目下记载着忌讳用“朝乾夕惕”四字，这是雍正时期有名的年羹尧案件的余波。简而言之，由于年羹尧在奏折之中不但变换了这四个字的顺序，还写了错字，引起了像日本的“国家安康”一般的笔祸^[1]，最终倒台，还招致杀身之祸。此外，该书还提醒不要使用“洪福齐天”或者“来岁必获丰年”等词句，这些都是在《雍正朱批谕旨》中屡次遭到雍正帝指责的语句。

除此之外，雍正帝的奏折政治给后世带来的巨大影响还有幕友的流行。奏折原本是秘密文书，但雍正帝自己也曾吩咐过，若不是特别秘密的奏折，让他人代笔也无妨，这就开启了非胥吏的胥吏，可称为士大夫性质的胥吏——幕友的活跃领域。幕友政治开始于雍正年间，至乾隆年间达到顶峰，随后逐渐衰落，一直存续到清朝末年。在这个过程中，除可以称为胥吏的学问的“吏学”之外，还产生了作为幕友的学问的“幕学”。这也是奏折政治所带来的影响之一。

另外，其他关于雍正帝的奏折政治值得一讲的内容还非常多，因受篇幅所限，等有机会再做补充。

[1] 日本庆长十九年（1614），京都方广寺重建之时所新铸的大钟上的铭文为“国家安康”，被认为将德川家康的名字“家”和“康”分开，是在诅咒德川家康身败名裂。此事成为大坂冬之战的导火索。——译者注

解说

砺波护^[1].

本书以1995年5月24日去世、享年九十五岁的宫崎市定在五十岁时作为岩波新书之一问世的评传《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岩波书店，1950年3月）为主体，其后附载了他在七年后所写的论文《〈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史料价值》（《东洋史研究》第15卷第4号的特辑《雍正时代史研究》，1957年3月）。本书同时收录于《宫崎市定全集》全二十四卷本、别卷一（岩波书店）的第一版中的第14卷《雍正帝》。本次，选入中公文库的是以全集本作为底本的。

关于雍正帝与《雍正朱批谕旨》，在之前已经选入中公文库的宫崎的《中国政治论集》中（第299～361页），对雍正帝《御制朋党论》与李卫《探听日本动静折》已经有过解说。现将由宫崎执笔但未署名的，作为了解本书主人公雍正帝的大概轮廓最合适的文章——《东洋史辞典》（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编，东京创元社，1961年3月）中“雍正帝”之条目摘录于此：

雍正帝，1678（康熙十七年）～1735（雍正十三年），从清太祖算起的第五代天子，雍正是其年号，庙号世宗，讳胤禛，康熙帝的第四子。继康熙帝六十一年（1722年）的统治期后，在与众兄弟的竞争中即位，改变康熙时代的宽大政治，希图肃清纲纪。除去年羹尧、隆科多等旧臣，施行独裁政治，在地方官中，拔擢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为总督，在中央，任用其弟怡亲王胤祥、张廷玉等，尤其是设立军机处以求敏捷应对政务，使内阁制度成为空壳。关心地方民生，令督、抚、布、按、提督、总兵等以个人

名义任意呈递作为亲启信的奏折，他通读奏折写下朱批并发还，在训诫臣子的同时也识别、选拔人才。《雍正朱批谕旨》由相关的往来文书编纂而成，因此是详细地展现了清代社会一个缩影的史料。平定青海、西藏叛乱，但经略新疆不得不等待下一代的乾隆帝来实现。该皇帝的统治时间比较短暂，但可以说正是这个时期奠定了清朝的基础。

若问作为满洲民族王朝的清朝皇帝中哪一位会被选为评传的对象的话，应当是在位六十年以上、被誉为盛世的第四代皇帝康熙帝（1661～1722年在位）或第六代皇帝乾隆帝（1735～1795年在位）中的一位。但是，宫崎为何关注一般而言几乎没有任何名气的第五代皇帝雍正帝（1722～1735年在位）并为其作传，我们可以从全集第14卷《雍正帝》卷末的自跋中找寻答案。

宫崎对清朝史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他自1922年（大正十一年）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入学以后参加矢野仁一教授的课程的时间。在矢野以清朝史、清朝与西欧诸国的国际关系史为主题的课程和研讨组中，宫崎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宫崎曾反复在《向中国学习》所收的《矢野博士的追忆》、《矢野博士的东洋史学》，以及矢野的《鸦片战争与香港》、《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圆明园》（均为中公文库）两本著作中宫崎所作的解说等文中提及。但是，在毕业论文题目选择《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之后，宫崎首先专注于宋代史研究，最终写出了一篇篇在古代史方面功力深厚的论文，却没有精力精读与清朝相关的史料。

在成为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副教授后，将近四十岁的宫崎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被允许去法国考察学习两年。1936年（昭和十一年）2月20日他从神户港坐船前往法国，就在快要到达香港之时，传来了“二·二六事件”的消息。到达巴黎后，宫崎进入亚洲语言学校，作为旁听生学习阿拉伯语。1937年9月，他开始了在西亚各地两个半月的游

历。其间的经历在出色的旅行记《西亚游记》（中公文库）中记载得十分详尽。

到达巴黎后不久，宫崎的愿望实现了，美国和中国被文部省追加为允许暂住的国家。但是由于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中日战争爆发，宫崎不得不放弃到中国进行考察研究的计划。在法国的生活平静安稳，1938年，他延长了在当地的居留时间，横穿大西洋经由美国，于1938年（昭和十三年）8月19日，时隔两年半后回到祖国。仅仅两周后的9月1日，以内阁直属的国策机关的近卫文磨首相为总负责人的东亚研究所成立，京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室也被委托进行研究工作，这最终将宫崎引上清朝史研究之路。

1939年正月，宫崎接受东亚研究所为期两年的委托，以为“清朝官制与官吏选拔制度”为题进行研究，下一个委托研究是作为“异民族的中国统治策略”的一环的“清朝的中国统治策略”。作为成果，其著作《科举》以及论文《清朝国语问题的一方面》是他在战争末期等待出征、可能成为遗作的精神准备下完成的，两者都在战败后才公开发表。《科举》现在改题目为《科举史》，被收入平凡社的东洋文库。1936年写成的《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公新书，即后来的中公文库）是另一本书。

满洲民族建立的王朝——清朝将占压倒性多数的汉民族置于统治下，其中央政府采取一种双重体制，即主要官员中的满人与汉人人数相同。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但是，至于两者之间如何沟通、用何种语言，几乎没有被提及。宫崎的《清朝的国语问题的一方面》（全集第14卷）率先阐明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清初内阁同时作为翻译机关，将满文翻译成汉文，汉文翻译成满文，制成满汉合璧的文书。而到雍正帝之时，特别是在成立军机处后，内阁的权限移往此处，在此

满文的文书用满文处理，汉文的文书用汉文处理，不再需要翻译。宫崎阐明了这个变化过程。

东亚研究所委托的下一个题目是“中国的边境统治策略”，这里所指的边境是在边境居住的异民族。宫崎负责其他人都不承担的清朝的西藏统治政策。清朝将西藏纳入管辖范围是在雍正帝统治时期，雍正帝即位之后，他一直居住的藩邸被改建为喇嘛寺、赐予西藏等事情，留在了宫崎的记忆中。东亚研究所委托的下一个题目是“英法联军的北京占领事件”，1943年（昭和十八年）他发表了《从中国方面的史料看英法联军的北京侵入事件——特别是主战论与和平论》（全集第16卷）。

如此长期致力于清朝史研究的宫崎深感熟读清朝基本史料的必要，忆起先师桑原鹭藏的教导，他开始通读可以被视为《资治通鉴》续编的《十一朝东华录》。从最初开始阅读，经过康熙朝读到雍正朝的时候，他发现所写的内容和事件非常有趣。创立了军机处的雍正帝、派远征军到西藏将其纳入保护的雍正帝，他们看起来是分别不同的人物，但在逐渐对准焦点后，雍正帝的人物形象便浮现出来。读完《十一朝东华录》中雍正朝部分的宫崎就此中断阅读，开始搜集关于雍正帝的资料，在文学部陈列馆的书库的一隅邂逅了卷帙浩繁的《雍正朱批谕旨》。

发现由十八函一百二十册构成、朱墨二色套版印刷的《雍正朱批谕旨》后，他像着了魔一般地埋头阅读，在协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安部健夫推动共同研究班的同时，他一气呵成写出了作为岩波新书之一出版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这些情况在《〈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中料价值》的“序言”中被生动地描写出来，这里不再赘述。

以流畅易懂的文字写成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后的1950年春出版了。虽然不是最畅销的书，但深远地影响了关心中国的广泛人群。今日试着重读此书，“对基督教的誓言”之中雍正帝对苏努一家坚决的宗教镇压以及“忠义超越民族”中在满洲民族王朝统治下的年羹尧与曾静的笔祸案件给人留下了特别新鲜的印象。宗教、政治与民族问题也正是在现代世界史中最为重要的题目。另外，“独裁政治的界限”的末尾，雍正帝那令人落泪、充满善意的政治由于采用独裁君主制的形式，不但得到的回报出乎意料地少，还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等带有总结的地方，即使在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今天还是被视为警世之文。

正篇《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中，宫崎没有解说作为依据所使用的史料，但根据附载的《〈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史料价值》可知，这是一部“纵横无尽”地运用《雍正朱批谕旨》的作品。

但是，“对基督教的誓言”这一章，不仅使用了汉文资料，也灵活运用基督教耶稣会的法国传教士——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写给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的书信等。宫崎自己对此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整整二十年后，矢泽利彦编译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平凡社，东洋文库）出版。其中“2雍正编，1971年刊”所收录的第二篇书简到“3乾隆编，1972年刊”的第一篇书简为止，每一篇都是关于苏努一家的信仰以及遭受迫害的极其详尽的记录，但原书极其稀有、难得一见，连京都大学图书馆等都没有收藏。

但是今年，我有幸参观了宫崎家玄关旁双层书架上的藏书，夫人松枝女士注意到在里面的一个角落有十四册书脊文字无法确定的、以熟皮装订的厚厚的西洋书籍。这正是1891年刊行于里昂的《耶稣会士书简集》的全本。与杜赫德的大著《中华帝国全志》全四册同样，是

宫崎1936年以后在法国暂住期间购入带回的。该书网罗了来自雍正帝统治之下的中国的书简，在第11卷随处可见用红色铅笔划的线，写着“苏努”、“年羹尧”等汉字，而且代替书签夹在书中的是邮局的收据，上面盖着“京都净土寺24・3・2”的邮戳，不禁让人联想到昭和二十四年（1949）宫崎在准备写作本书时精读这卷书的情景。

附载的《〈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史料价值》是宫崎任会长的东洋史研究会的机关杂志《东洋史研究》第15卷第4号的《雍正时代史研究》特辑中登载的五篇论文中位于卷首的绪论。该杂志在其后还有三期，组成《雍正时代史研究》的特辑，每一次宫崎都投了稿。由于学界对研究雍正帝及其时代的兴趣逐渐高涨，为了满足复制这些已经成为过时刊的特集号的需求，东洋史研究会1986年影印了四册二十四篇论文并附上索引，出版了《雍正时代的研究》（同朋社）一书。该书付梓之际，承担解说文章写作的也是宫崎。

这部《雍正时代的研究》的出版计划还在进行的时候，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紧密联系史料的踏实的清史研究成果也逐渐为世人所知，出现了以雍正帝为题材的论考。例如，冯尔康受到重视雍正帝与雍正时期的郑天挺的影响，写成了六百余页的《雍正传》

（人民出版社，1985）；左步青选编的《康雍乾三帝评议》（紫禁城出版社，1986）中，集录了当时学术杂志刊登的以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为对象的论文二十一篇。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由计红绪、王云高合著的二十五回的章回体小说《雍正皇帝》（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不但初版印刷四万部，听说两人还写了与这部长篇小说同名的三十一回的电视剧脚本。更令人惊异的是，在两年后的1990年，长春市的时代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增补了四分之一内容的该书的新版。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雍正热，宫崎的《雍正帝》的的确确起到了先驱者、带头人的作用。顺便说一下，宫崎没有来得及仔细查阅作为

雍正朝的根本史料之一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的《雍正朝起居注册》全五册（中华书局，1993）。

最后稍微讲一下本书选入中公文库的经过。《游心谱》出版后，担任编辑的小林久子正式提出了出版文库本的建议，宫崎欣然允诺。因为机会难得，仿照曾经《隋的炀帝》选入中公文库之际附载论文《隋代史杂考》的体裁，我斟酌决定将《〈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史料价值》一并载入。

1996年4月

[1] 砺波护，1937年出生，日本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师从宫崎市定。——译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日）宫崎市定著；孙晓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097-9463-0

I . ①雍… II . ①宫…②孙… III. ①雍正帝（1723-1735）—人物研究 IV. ①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3167号

雍正帝

——中国的独裁君主

著者|（日）宫崎市定

译者|孙晓莹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冯立君 董风云

责任编辑|沈艺 冯立君 占禄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开本：889mm×1194mm 1| 32

印张：6.875 字数：125千字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97-9463-0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1165号

定价| 4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简介

孙晓莹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学专业，文学博士。现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

《雍正帝》是宫崎市定精研《雍正朱批谕旨》的重要成果。

本书分七章论述了雍正时期的若干关键问题，

涉及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及雍正帝即位后翦除异己问题、

苏努教案与政教关系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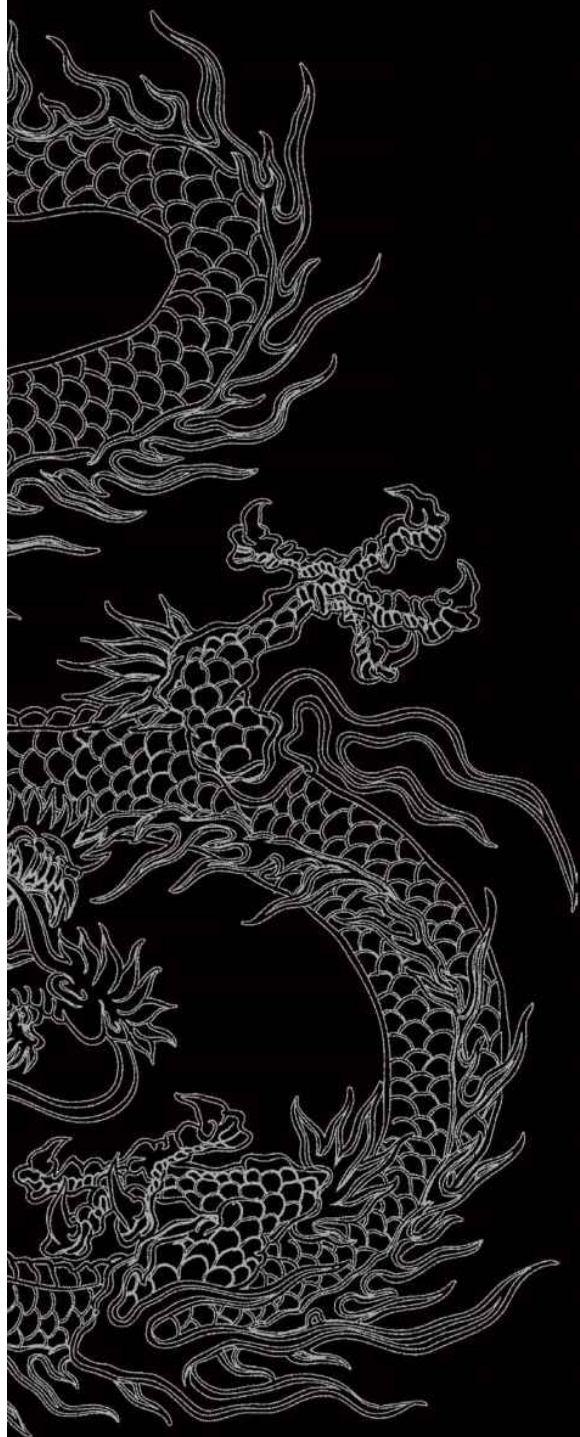
文字狱与华夷观念问题、

以奏折制度为核心的密探政治与君臣关系问题等，

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这位「近世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独裁君主」的统治状况，

同时生动立体地勾画出雍正帝勤勉与好胜、

辛辣暴躁却又充满人情味的人物形象。



甲骨文官方微信



定价：48.00 元

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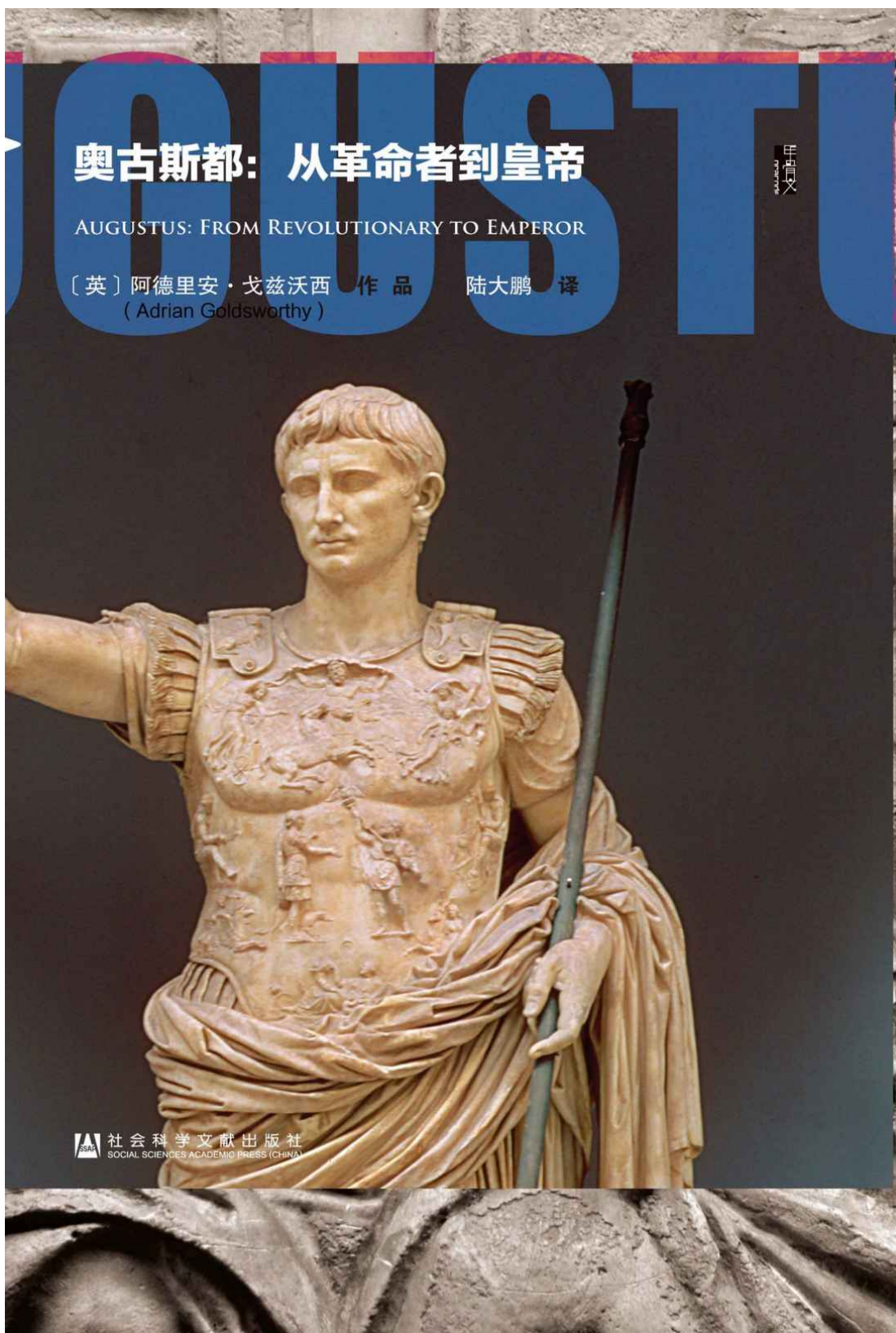
AUGUSTUS: FROM REVOLUTIONARY TO EMPEROR

〔英〕阿德里安·戈兹沃西 作品
(Adrian Goldsworthy)

陆大鹏 译

甲骨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S

【英】阿德里安·戈兹沃西

(Adrian Goldsworthy)

阿德里安·戈兹沃西在牛津大学获得古代史博士学位，曾在多所大学任教。他著作颇丰，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包括《恺撒：巨人的一生》《西方的没落：超级大国罗马的灭亡》和《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他创作了五部小说，讲述拿破仑战争时期一群英国士兵的命运沉浮，其中最新一部是《驱敌靠岸》(*Run Them Ashore*)。 he 目前是纽卡斯尔大学的访问学者。

陆大鹏

英德译者，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热爱一切 long ago 和 far away 的东西。代表译作“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伯罗奔尼撒战争》《伊莎贝拉：武士女王》等。

豆瓣、新浪微博：陆大鹏 Hans

微信公号：ldphans

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

阿德里安·戈兹沃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书获誉

本书获得2014年美国出版商专业与学术卓越奖（PROSE）的传记与自传类荣誉奖。

令人肃然起敬……戈兹沃西先生……巧妙地运用关于奥古斯都生平的证据……这部传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非常圆满的。对某些传统的说法做了有益的纠正。

——布兰登·博伊尔，《华尔街日报》

戈兹沃西真正的专业是军事历史学，这赋予他的传记以力度和精彩：他对奥古斯都与军队关系的描述是大师级的。

——罗伯特·哈里斯，《伦敦周日时报》

戈兹沃西为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罗马皇帝写的这本精彩超群的传记非常细致，有很深厚的研究功底……戈兹沃西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和才华横溢的作家……《奥古斯都》很可能成为这位真正伟大的罗马领袖的优秀传记之一……戈兹沃西提醒读者……人性是亘古不变的。奥古斯都拉拢罗马的“媒体”，就像今天美国的任何一位政治家取悦福克斯新闻或CNN一样。我们的感觉是，奥古斯都能够很好地适应21世纪的政治，同时还能睿智地统治国家。

——盖里·安德森，《华盛顿时报》

恺撒·奥古斯都戏剧性的崛起和长期统治，是阿德里安·戈兹沃西的重磅级传记《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的主题。本书扣人心弦地研究了古罗马的政治生活，它与我们的政治体制十分相似，非常有趣。但美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不同之处同样能说明问题。

——尼克·罗密欧，《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戈兹沃西就像一位珠宝大师观察一块奇异冰冷的钻石一样，观察着罗马历史的核心——奥古斯都皇帝，并揭示了整个罗马世界的方方面面。但本书充满了人性的温暖，文笔优雅，激发起读者对历史的热爱。

——J. E. 兰顿，著有《军人与鬼魂：古典时代战役的历史》和《怒歌：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就像戈兹沃西给尤利乌斯·恺撒写的传记一样，本书也是任何对古罗马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

——娜塔莉·海恩斯，《独立报》

对罗马最稳重也最神秘的皇帝之一所做的探索，令人着迷……这部精彩绝伦的书……令人手不释卷，可以轻松浏览，去感受众多的人物与事件。

——詹妮弗·赛尔威，《每日邮报》

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众多著作中，奥古斯都这一人物形象有些模糊，虽然没有被忽视，但仍然很陌生。戈兹沃西的目标是把奥古斯都的生平从史海中挽救出来，刻画他的激情、残忍和意志力，正是这些东西塑造了他那常常令人忽视的个性……阿德里安·戈兹沃西这部优异的新传记把奥古斯都这位帝国建立者的故事讲得令人拍案叫绝。

——迈克尔·奥斯林，《国家评论》

戈兹沃西创作了一部文字优雅、论据充分的奥古斯都传记，坦率而毫无粉饰或隐瞒。他筛选了奥古斯都时代的文献，将古代的证据与最顶尖的现代学术研究融合起来，创作出一部研究极其精细但可读性极强的罗马第一位皇帝的传记。本书探讨了领袖的本质、权力的运用和这两方面需要付出的代价。

——罗斯·玛丽·谢尔顿上校，弗吉尼亚军事学院

戈兹沃西娴熟地引导我们通过“现代学术”的湍流。他挑战了一些常被重复却从未得到质疑的说法……并且特别专业地介绍了罗马元老权力

斗争以及利用婚姻来巩固或破坏政治联盟的手段……《奥古斯都》是我们有可能读到的最值得信赖的奥古斯都传记。

——尼古拉斯·莎士比亚，《每日电讯报》

戈兹沃西（著有《恺撒：巨人的一生》等）对古罗马的理解显然已经深入骨髓，他的奥古斯都传记也是一部关于罗马及其发展的内容丰富的编年史……戈兹沃西质疑了为什么奥古斯都被许多历史学家遗忘，而没有被列入伟大领袖的名单（这个名单包括尤利乌斯·恺撒、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哈德良）。他提供了许多理由，证明奥古斯都应当位于这个名单的最前列。

——《科克斯书评》

奥古斯都是古罗马最伟大的领袖……但有时也是个神秘的人。阿德里安·戈兹沃西的绝妙传记会改变这一切。《奥古斯都》揭示了主题人物的个性及其所处的时代，对他的缺点做了公正评判，对许多配角的描摹也非常精彩。传记就应当是这个样子……《奥古斯都》是最优秀的传记，因为它激发读者在古代与现代之间做比较，而没有把这些比较直接表现出来。本书值得被广泛阅读，并且以最好的方式彰显了普鲁塔克那句名言的真实性：“除了歌颂罗马之外，历史还有什么？”

——泰德·劳伦斯，“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

历史学家和传记家戈兹沃西（著有《恺撒：巨人的一生》）在这部精彩的传记（它的许多主题在现代仍然引人深思）中展现了他对古罗马的丰富知识……强有力的叙述，关于罗马生活的许多趣味盎然的细节使本书更为丰富……戈兹沃西制造的整体效果是，读者见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的整个生活距离我们现代人的体验并不远。古代的文化习俗常常让我们觉得陌生，但那些政治动机、阴谋、家庭关系和情感，在今天就像在公元纪年之初一样真实。

——《出版人周刊》，星级评论

阿德里安·戈兹沃西又写了一部大作。他的奥古斯都传记是关于奥古斯都如何取得成功的最中肯也最精妙的一本书……本书的有些部分读起来就像小说。或许，戈兹沃西在写了几本小说之后，已经懂得如何调动读者的注意力。他显然是今天最优秀的罗马历史学家。

——马丁·罗贝尔，PhDiva.com

奥古斯都去世2000周年的纪念日让我们对罗马帝国的建立者和第一位皇帝重新产生了兴趣。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阿德里安·戈兹沃西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时间点，出版了一部新传记来讲述这个重要但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戈兹沃西客观给出了神秘而复杂的奥古斯都生平的已知事实。他娴熟地记述了奥古斯都崛起的事件，揭示了他是一位二流的军事指挥家、聪明的操纵者、自信的表演艺术家和圆熟的政治家。

——林赛·鲍威尔，UNRV网站

一部“权威性强，始终饶有趣味的新传记”。

——约翰·格雷，《新政治家》

戈兹沃西，畅销书《恺撒：巨人的一生》的作者……以动人心扉的活力，讲述了奥古斯都的军事胜利、惊心动魄的逃亡、外交成功和黑暗的家庭纠纷，把罗马帝国与东方各王国（如帕提亚）的紧张对峙描摹得活灵活现，同时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诗人，如维吉尔与贺拉斯的精彩介绍……戈兹沃西的洞见和引经据典始终非常精彩……《奥古斯都》是一部一流的通俗传记，由一位技艺娴熟的专家写成，可以与《恺撒：巨人的一生》媲美。

——史蒂夫·多纳休，《华盛顿邮报》

奥古斯都固然重要，但常常是躲在古典世界表面之后的谜。戈兹沃西的《奥古斯都》揭示了围绕在罗马第一位皇帝身边的所有戏剧与细节。本书洋溢着一种能量、学术和智慧，是一部值得细心品味的历史书。

——巴利·施特劳斯，著有《指挥大师：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和领导的天才》

这是一部能让学者感兴趣的传记，但也可以让任何对古代世界感兴趣的人轻松阅读。戈兹沃西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能够让他的非常细致的历史著作吸引大众读者，这是罕见的才华。我推荐本书。

——理查德·魏格尔，《博林格林（肯塔基）每日新闻》

《奥古斯都》精彩地完结了以恺撒开始，以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结束的三部曲。这是用英语中讲述奥古斯都生涯与其诸多自相矛盾之处的最佳长篇作品。

——卡尔·格林斯基，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

戈兹沃西的目标读者应当感激，他们拥有这样一位优秀的导游，为他们提供了高水平的地图、术语表和人物表，以及罗马元老在政坛攀升过程的概括……本书价值极高，可读性极强。

——S. J. V. 迈洛克，诺丁汉大学

- [致谢](#)
- [序章](#)
- [第一部 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前63～前44年](#)
 - [一 “祖国之父”](#)
 - [二 “富裕且名誉良好的人”](#)
 - [三 尤利乌斯和恺撒担任执政官](#)
 - [四 出路](#)
- [第二部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阿努斯），前44～前38年](#)
 - [五 继承人](#)
 - [六 赞颂](#)
 - [七 奖赏和抛弃](#)
 - [八 复仇和纷争](#)
- [第三部 凯旋将军恺撒，神之子，前38～前27年](#)
 - [九 神子们](#)
 - [十 竞争对手](#)
 - [十一 凯旋](#)
- [第四部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之子，前27～前2年](#)
 - [十二 恢复传统，继往开来](#)
 - [十三 在战争中击败骄傲者](#)
 - [十四 “最强大权力的头衔”](#)
 - [十五 鹰旗](#)
 - [十六 结尾和开端](#)
 - [十七 家庭和同僚](#)
 - [十八 奥古斯都的和平](#)
- [第五部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之子，祖国之父，前2～公元14年](#)
 - [十九 父亲](#)
 - [二十 “哨兵岗位”](#)
 - [二十一 为了共和国](#)
 - [二十二 奥古斯都盛世](#)
- [终章 “着急也要从容！”](#)
- [附录一 元老晋升体系（荣耀之路）](#)
- [附录二 耶稣的出生年代](#)
- [术语解释](#)
- [主要人物](#)

- [谱系图](#)
- [参考文献](#)
- [缩写词](#)
- [译名对照表](#)

致谢

本书的许多想法是在漫长岁月里逐渐形成的。1988年，在牛津大学的第一年，我听了一门关于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的课程，非常精彩。授课的是我的导师Nicholas Purcell，是他最早向我介绍了Platner和Ashby的鸿篇巨制《古罗马地形学辞典》（*A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1929）。在随后的年月里，Alan Bowman、Miriam Griffin、Fergus Millar、Barbara Levick、Andrew Lintott 和David Stockton等人的讲座、研讨课和课程帮助我熟悉了古典世界，尤其是奥古斯都及其所处的时代。这些学者的著作都列在本书末尾的“参考文献”部分。我还想向其他一些学者表示感谢，因为我参考了他们的著作和文章。

更具体地说，我要感谢那些帮助我写作这部传记的人们。Philip Matyszak是我在牛津大学期间结交的朋友，他关于罗马元老院内部运作的思想一直对我很有启发。他又一次从自己的写作中抽出时间，阅读了本书手稿，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评论。同样，Ian Hughes也阅读了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把对历史的理解与编辑的敏锐眼光结合在一起，提出了意见。Kevin Powell阅读了全书，像往常一样注重细节，同时还能保持对宏观场景的把握。我的另外一位好友Dorothy King聆听了我的很多想法，总是带着极大的洞察力和机智做出评论，并为我提供了一些图片。我还要感谢母亲的校对技能，以及我的妻子，她阅读了一些章节。他们和我的其他亲友，在过去几年中不得不和奥古斯都一起生活，我非常感激他们的支持。

像往常一样，我必须感谢经纪人Georgina Capel，是她创造了机会，让我有时间好好地写这本书，并且很感激她对本书一贯的热情。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们，英国的Alan Samson和美国的Christopher Rogers，以及他们的团队，是他们做出了这样漂亮的书。最后，由衷感谢David Breeze，是他绘制了本书中的谱系图。在M. Cooley主编的*The Age of Augustus. Lactor 17*（2003）一书图表的启发下，他不仅提出了制作不同时期多个版本家谱图表的建议，还花了很大力气帮我制作这些图表。这些图表有助于读者理解奥古斯都的亲戚和他们同时代人之间极其复杂的家庭关系。

序章

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督^[1]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2]

——《路加福音》，1 世纪末

尽管幼年记忆已经模糊，但我一定是从这个圣诞节故事的简略段落中第一次听到奥古斯都的名字。和大多数听到或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一样，我当时应当没有多想，直到后来我越来越热爱历史，才对关于古罗马的一切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要研究罗马史，就绕不开奥古斯都及其遗产。他是罗马的第一位皇帝，他最终用蒙着面纱的君主制取代了延续近五百年的共和国，他创立的体制使得罗马帝国稳定发展了约两百五十年。在这期间，帝国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为幅员辽阔、繁荣昌盛。3 世纪，罗马帝国面临着数十年的危机，在经历了宏大深刻的改革之后才生存下来。即便如此，一直到 15 世纪，在君士坦丁堡执政的罗马皇帝都自命为奥古斯都的权力与威望的合法继承者。

毋庸置疑，奥古斯都非常重要，同时，他的故事也具有强烈的戏剧性。我在向学生传授关于奥古斯都的课程时，总是会停下来提醒他们，奥古斯都投身于极其凶残的罗马政治时，还不到十九岁，差不多比我的所有学生都年轻。在描述他的所作所为，他如何驾轻就熟又冷酷无情、毫无忌惮地周旋于内战（在这期间，人们的效忠关系错综复杂又瞬息万变）时，我们常常忘记，他当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他是

遇刺身亡的尤利乌斯·恺撒的甥孙，被后者立为主要继承人，并获得了“恺撒”的名字。这意味着，恺撒将他收为养子。在罗马，权力不是世袭的，但在“恺撒”这个名字的支持下，他将死去的独裁官的亲信召集到自己麾下，宣布了自己的意图，即继承养父的所有官职和地位。随后，尽管困难重重而且遭到经验远比他丰富的竞争对手的阻挠，他还是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马克·安东尼是他的最后一位竞争对手，于前30年被击败并殒命。经历数次内战的年轻而嗜血成性的军阀随后成功地将自己转型为受人爱戴的国家守护者，采用了“奥古斯都”这个带有宗教意味的名号，并最终被歌颂为“祖国之父”。他是一位海纳百川的人物，而不是制造纷争的恶徒；他执掌最高权力达四十四年之久，这对任何一位君主来说都是很长的时间；他寿终正寝的时候，他指定的继承人可以毋庸置疑地顺利继承皇位。

然而，尽管他的故事非常了不起，他对罗马帝国历史的影响也极其深远（这个帝国的历史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恺撒·奥古斯都却从大众的视野中渐渐远去。对大多数人来说，他只不过是圣诞节宗教仪式中或者学校上演的耶稣降生题材话剧中的一个名字，仅此而已。很少有人会想到，7月（July）是以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名字命名的；但我怀疑更少有人会意识到，8月（August）是以奥古斯都（Augustus）命名的。尤利乌斯·恺撒闻名遐迩，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尼禄、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或许还有哈德良，以及一些哲学家也很有名，但奥古斯都不是那么广为人知。原因之一是，莎士比亚从来没有以他为题材写过一部剧。或许因为奥古斯都活到了高龄，最后寿终正寝，他身上没有多少天然的悲剧性。在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中，奥古斯都以屋大维的名字出现；在《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中则被称为恺撒。但这两部剧中，他的角色都不是特别鲜明有趣，不如布鲁图斯和安东尼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甚至也比不上埃诺巴尔布斯^[3]那样的小角色。在剧中，他主要是作为安东尼的陪衬，显得软弱，甚至怯懦，却能冷酷而娴熟地玩弄权

术。与他相比，安东尼被塑造得有血有肉，英勇无畏，激情澎湃。古代史料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两人的差异，其根源在于当时的宣传战。在现代人对这个故事的讲述中，奥古斯都与安东尼的差别显得更加突出，例如1963年的著名史诗巨片《埃及艳后》中，罗迪·麦克道尔扮演的奥古斯都如冰山一般冷酷，并且带有一丝虐待狂的意味。^[4]

电影中的奥古斯都精于算计、奸诈阴险、冷酷无情，所以观众倾向于同情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他们的死显得特别悲惨，因为这些故事说到底是以这一对鸳鸯为主角的。没有一部以奥古斯都为核心人物的戏剧、电影或小说能激发大众的想象力。在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小说《我，克劳狄》以及根据它改编的精彩的BBC版电视剧中（如今这部电视剧至少与小说一样有名），奥古斯都仅仅是一位比较重要的配角。格雷夫斯对奥古斯都的描写非常正面，他是一位淳朴、情绪化、偶尔露出凶相的老人，但被他那精于权谋而且残忍暴虐的妻子李维娅耍得团团转。这些故事扣人心弦、趣味横生，但总的来讲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奥古斯都何以如此重要，让我们很难把那个玩弄阴谋诡计的青年与常常被欺骗和愚弄的皇帝联系起来。

奥古斯都的生平远不止这些，而且更多的故事绝不是沉闷无聊的。有人认定他的成功是必然发生、不可避免的，要么是因为他的政治天才（这是比较老派的观点），要么是因为时势使得罗马必然出现君主制，或早或晚。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奥古斯都的长寿让所有人吃惊，他的成功，尤其是早年的成功，也令人意外。在很多时候，他更像是一个赌徒，而不是小心算计的运筹帷幄者。奥古斯都冒了很多险，尤其是在内战期间，而这些风险并非都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有时人们没有认识到，其实奥古斯都非常像尤利乌斯·恺撒，比如他摆脱自己造成的困境的本领。我们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能够表明，他建立新政权的计划是在长时间内逐渐成熟的。事实上，这个过程包括了很多随机应变和试验，通过不断摸索尝试、吸取教训来建立新体制，偶

然性起到的作用差不多和设计安排一样大。我们看到，他非常努力地去抑制自己的激情和火暴脾气，常常失败，所以他绝不是那种冷冰冰的权术家。真实的奥古斯都和身怀六甲的有夫之妇李维娅有了私情。奥古斯都迫使她的丈夫与她离婚，然后在她分娩仅仅几天之后就与她结婚，并且还让她的前夫主持婚礼。我们或许觉得这更像安东尼做的事情，甚至更像尼禄（马克·安东尼与奥古斯都姐姐的外孙的外孙）[\[5\]](#)的所作所为。

除了激情洋溢之外，他还颇有些残暴。奥古斯都、安东尼和他们的后三头同盟李必达都犯过大屠杀的罪行，比如在有名的“公敌宣告”期间（莎士比亚剧中的台词是“那么这些人都是应该死的；他们的名字上都做了记号了”），其他很多时候也犯过这样的罪行。这个时期的其他军阀并不比他们心慈手软，不过这也不能洗脱他们的残酷暴行。尽管后来的奥古斯都温和克制，但我们实在很难喜欢年轻的奥古斯都。现代大多数为他立传的传记家也颇感棘手，不知道如何将这个人迥然不同的两面联系起来。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将他的故事分为两段。从他最初的崛起一直到亚克兴角大捷，很显然自成一体，充满了南征北战和阴谋诡计，涉及许多著名人物，如西塞罗、布鲁图斯、塞克斯图斯·庞培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然后，很多传记家会直接跳到他的晚年，讲述他选择继承人时遭遇所谓的阴谋。这两段截然不同的故事相当于莎士比亚和格雷夫斯挑选的主题。这绝非偶然。其他作家，尤其是学者，通常也将其叙述定格于前30年。对于奥古斯都的余生，则主要讨论更广泛的主题，例如“奥古斯都和元老院”“奥古斯都和各行省”，以及“奥古斯都与宗教”。[\[6\]](#)

尽管传记对广大读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或许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学术界对传记感兴趣的人并不多。我写了一部尤利乌斯·恺撒的传记，因为比较近期的关于他的书都不能令人完全满意，要么缺乏细节，要么只讲了他生平的一部分。作家们要么关注他的政治生涯，要

么描写他的戎马一生，但从来没有人两方面都写，这样的区别对待会让罗马人感到困惑。在写作恺撒传记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有朝一日我要写一部同样规模的奥古斯都传记，因为还没有一部他理应享有的完整传记。关于他生平的某些方面，已经有了一些不错的著作，一些非常优秀的简略概述，但没有一部非常详细地描写他整个生涯的书。从不同主题入手的策略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关于政府采用的政策、思想或图景的讨论会让读者眼花缭乱，看不到奥古斯都这个人。从年轻的奥古斯都一下子跳到晚年奥古斯都，很容易显得过于跳跃和缺乏连贯性，让读者无法真切地感受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和《恺撒：巨人的一生》一样，本书的目标是，将奥古斯都当作一位现代政治家来为他立传，提出我们会对现代政治家提出的相同问题（尽管史料不足，让我们很难得到圆满的答案），并努力理解真实的奥古斯都。[\[7\]](#)

皇帝变幻莫测的面目

但真实的奥古斯都极难准确描摹，不仅仅是因为他一生中非常仔细地重塑自己的形象。4世纪中叶，尤利安皇帝在当时的帝国体制中当了几年恺撒（副皇帝）之后，通过武力夺得了最高的奥古斯都头衔。他写了一部讽刺作品，幻想在一场宴会上，诸神欢迎已经被神化的皇帝们。奥古斯都也在那里，不过被描绘为一个奇怪的、不自然的形象，就像变色龙一样，不断变换颜色，以适应周边环境。只有在得到哲学的教诲之后，他才变成了一位优秀而睿智的统治者。[\[8\]](#)

奥古斯都很了解自己的公众形象，不过所有的罗马政治家都会大肆宣扬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功绩与成就，并抓住一切机会鼓吹。马克·安东尼至今仍然享有经验丰富且精明强干的军事家的美誉，这主要是由于他的宣传得力，而不是他实际的军事经验与才干。与奥古斯都不同的是，安东尼拥有更多的时间来塑造和宣扬自己，也拥有比其他人

多得多的资源。在古典世界的历史人物中，奥古斯都留存至今的肖像最多。尤其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后，人们甚至很难看透表象，去了解真实的奥古斯都。即便如此，我们也知道许多关于他家庭生活与习惯的故事，关于日常偶发事件的诸多轶事趣闻，甚至他讲过的笑话或者攻击他的笑话。在这些方面，我们掌握的关于奥古斯都的材料比关于尤利乌斯·恺撒的材料多得多，也超过几乎任何一位罗马历史的主要人物。但我们需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些貌似“真情流露”的时刻其实也是表演作秀的好机会，而且罗马的公共生活总是非常戏剧化的。罗马政治家是在公众视野内生活的，而奥古斯都特别希望别人觉得，他无论在私生活还是公事中都是楷模。关于他的信息很少有完全清楚明晰的。

或许我们应当从一个基本问题开始，即如何称呼他，就连莎士比亚在不同剧作中都用不同的名字称呼他。他最初的名字为盖乌斯·屋大维。成为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之后，他用了恺撒的名字，改称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他可以将“屋大维阿努斯”加在名字后面，以纪念他真实的、相当默默无闻的家庭背景，但他显然没有这么做。只有他的敌人才叫他屋大维阿努斯。随着时间流逝，他修改了自己的名字，取掉了“盖乌斯”，换成了非常偏离常规的“凯旋将军”（Imperator）。尤利乌斯·恺撒被神化之后，他又变成了“神圣尤利乌斯之子”。最后在前27年，罗马元老院和人民投票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他们肯定是精心准备了这个称号，知道这一定会让他龙颜大悦。

于是，他在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分别有着迥然不同的名字，而且这些名字还有不少形式和细节上的变化。现代学界的常规是，将前27年之前的他称为屋大维，此后称他为奥古斯都，而完全避免使用“恺撒”这一名字，以免和尤利乌斯·恺撒混淆。这种办法虽然清楚了，却非常有误导性，会让人觉得在双手沾满污血的后三头同盟者

和卓越的政治家与统治者之间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在罗马世界，名字是非常重要的。在较晚近的时期也是这样，比如“恺撒”作为统治者头衔一直延续到现代，如“kaiser”（德国皇帝）和“tsar”（俄国沙皇）都是“恺撒”这个名字的变体。马克·安东尼将年轻的奥古斯都称为“一切都要感谢他的名字的兔崽子”，正是因为这个少年被称为恺撒之后，才获得了一种重要性，而他以其他方式是不可能变得如此显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奥古斯都从来没有自称为屋大维。如果我们这么称呼他，而不是用“恺撒”，那么就较难理解那些年的事件。我们需要知道他在每个阶段如何自称，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会尽量用这种方法，并据此将本书分为若干部分。那位著名的独裁官将始终被称为“尤利乌斯·恺撒”，如果单独提到“恺撒”，那么指的就是奥古斯都。

棘手的不仅仅是他的名字。Imperator是个拉丁词，英语里的emperor（皇帝）就是从它演变来的，但在奥古斯都时期，Imperator并没有“皇帝”的意思。他自称为“元首”（princeps），意思是第一公民，其他罗马人也是这么称呼他的。如果我们称他为皇帝，那么就等于给他的政权强加了一个不同的概念，这个概念出自我们的后见之明，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将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因此，在“序章”和“终章”之外，我不会称他为皇帝，尽管我有时会把他的后继者称为皇帝。类似地，我不会将他建立的政权称为“帝国”，因为罗马共和国也拥有海外的帝国基业，而将其称为“元首国”（principate），学者们熟悉这个术语，不过它在学术圈之外很少见。

另一个与拉丁语词源有关联的困难就是Republic（共和国），它源于拉丁文res publica，字面意思是“公共之物”或“国家”；罗马人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国家的，但它并没有今天的“共和国”的特殊体制含义。“共和国”这个词非常有用，不可能完全绕开，否则我们

怎么称呼那个延续了很长时间、最终在前1世纪灭亡的政治体制呢？但我努力避免现代人的一种倾向，即将尤利乌斯·恺撒和三头同盟的对手称为“共和派”，因为这会让我们误以为这些人是一个团结一致的集体，而事实上，他们是许多立场和目标差别很大的不同群体。“共和派”这个词也会让很多群体显得具有合法性，而事实上他们没有，就像假如我们使用“屋大维”这个名字，就让马克·安东尼在死后赢得了一场胜利一样。不过追求准确性也是有限度的，比如我将July（7月）和August（8月）这些词用于它们被发明出来之前的时期，因为很少有读者会熟悉罗马历的Quinctilis（第五月）和Sextilis（第六月）。

在本书中，我会努力做到独立和客观。这么说好像有点奇怪，毕竟我们探讨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冲突和争端，但历史会让人们感情用事，即便最冷静和最严肃的学者也不能免俗。尤利乌斯·恺撒常常引起阿谀奉承的赞颂和愤恨的憎恶，奥古斯都差不多也是这样。在整个19世纪及以后，他受到广泛赞颂，因为他治愈了一个破碎共和国的疾病，给了罗马人和平、稳定和繁荣，因此被认为是一位贤君。在帝王和帝国仍然主宰着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时候，这样的理解是很容易产生的。到了20世纪，世界风云变幻，旧制度消失殆尽，世人对奥古斯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罗纳尔德·赛姆爵士的《罗马革命》是这一时期关于奥古斯都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出版。这部作品的挑衅性很强，拒绝将奥古斯都的崛起视为一件好事，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正处于发展中的“族谱学”（研究贵族家族和关系的学问），将那个时代描绘为一位领袖的崛起，他的派系取代了旧的精英阶层。这一切的背后是赛姆所处时代的那些独裁者，尤其是墨索里尼，他自称“领袖”（这是刻意模仿奥古斯都的称号），并将他的支持者称为“法西斯党”。法西斯是一把斧头，被多根绑在一起的木棍围绕着，象征一位罗马行政长官^[9]的权力。今天，

《罗马革命》的读者更容易联想到比之更恐怖的德国纳粹主义的崛起，或者斯大林的专制统治。^[10]

现代世界对任何政治派别的独裁者都持怀疑的态度，也不是很愿意原谅奥古斯都杀人如麻式的崛起，尽管他最终实现了和平。但我们需要小心，不能对过去做简单化的描绘，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独裁者、所有的帝国或者所有的国家，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奥古斯都杀了很多，但他从来没有给世界带来希特勒或斯大林式的灾祸。我们应当始终根据时代背景来审视他的行为。他对自己的敌人毫不手软、大肆杀戮，但这样的他并不比当时的其他军阀更好或更坏。尤利乌斯·恺撒不像他那样冷酷，曾经宽恕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和其他一些人，但这些人后来却将他刺死。奥古斯都、安东尼和李必达在公布他们要处死的敌人的名单时，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不像希特勒那样坏”肯定不算赞许，而说某人并不比他的竞争对手差，也好不了多少。但是，我们知晓一位成功领袖的缺陷，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他的对手的缺陷视而不见。赛姆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不会犯这个错误，尽管他对安东尼的评价特别慷慨大方，而在评论奥古斯都的支持者（尤其是来自门阀贵族圈子之外的大多数人）时特别严厉。他也知道，罗马精英阶层的家族关系特别复杂，亲戚关系并不一定与政治上的效忠关系相吻合，罗马人会为了很多其他方面的考虑迅速改换阵营。虽然《罗马革命》是75年前问世的，但它是一部杰作，再加上赛姆的许多其他著作以及对其他人的影响，这部书仍然决定着对奥古斯都及其时代的讨论基调，尤其在英语世界的学术界。对奥古斯都的研究有过很多新思路，研究重点也有变化，但总的来讲，这些研究都是着眼于特定的主题或细节。然而，始终没有一部研究该时期的、拥有类似影响力的全面著作，所以我们对奥古斯都的时代（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研究它，后来又教这方面的课程）的理解，仍然受到20世纪中期这部皇皇巨著的影响。

在正式的教学不可避免地要做一些架构上的安排，而这种安排往往会扭曲过去。关于共和国晚期的课程一般以尤利乌斯·恺撒结尾。通常认为，奥古斯都时代从亚克兴角战役开始。亚克兴角战役要么被单独处理，要么被混入对元首国的研究中，而前44～前31年的后三头同盟执政时期很少受到人们关注，这加剧了屋大维与奥古斯都之间的割裂。一种比较少见的思路是，将奥古斯都及其生涯视为共和国的延续。人们的注意力一般集中在这二者（共和国与奥古斯都体制）的明显差别。奥古斯都并不知道他正在创建的新体制会延续许多个世纪。因此这种研究思路会夸大从共和国到元首国的变化，毕竟在当时这种变化肯定没有那么显而易见。这也会鼓励现代人使用“共和国”和“共和主义”等术语，并描绘出这样的图景：元老院的反对迫使奥古斯都将自己独裁的事实隐藏在共和国的表象之后。

对尤利乌斯·恺撒的态度也会影响我们对他的继承人的理解。独裁官恺撒因为掌握了永久性的绝对权力而被谋杀。奥古斯都也获得了这样的权力，却能寿终正寝。因此大多数现代学者认为，很显然，奥古斯都的行为方式一定与他的养父有着根本不同之处，尤利乌斯·恺撒赤裸裸地运用自己的权力，而奥古斯都则软化和隐藏自己的权力。这种推断使得现代学者不愿意称奥古斯都为恺撒。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很多学者追随赛姆进一步推断出，奥古斯都打败安东尼并成为国家主宰之后，就非常刻意地与尤利乌斯·恺撒拉开距离，尽管仍然与“神圣尤利乌斯”有着联系。

这种想法很方便趁手，似乎能够解释为什么奥古斯都和尤利乌斯·恺撒的命运如此不同。人们不断重复这种想法，但不幸的是，没有证据能够支撑它。首先，奥古斯都和恺撒的对比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尤利乌斯·恺撒在前45年和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后所处的不同局势。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尤利乌斯·恺撒刚刚打赢了一场艰苦的内战，而他在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在罗马停留的

时间很少。不管尤利乌斯·恺撒多么精力充沛，他主宰国家的时期很短而且常常被打断，所以他能取得的成绩是有限的。而奥古斯都在打败安东尼的时候，已经作为后三头同盟者之一掌握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超过十年时间，并且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罗马和意大利，而他的两位同僚都不在罗马和意大利。从亚克兴角战役之后开始讲述奥古斯都的故事，就忽略了这些漫长的岁月，在这期间，他通过武力和提拔亲信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古老的贵族世家逐渐凋零，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失败之后几乎无人敢步其后尘。有人认为，尤利乌斯·恺撒面对着一群死硬的元老院传统派的反对，未能安抚他们，所以奥古斯都一定也面对并且战胜了类似的反对派。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奥古斯都和尤利乌斯·恺撒所处的局势实在是千差万别。很多现代学者钟爱的观点——奥古斯都受到元老院反对——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事实上，罗马贵族表现出的对共和国体制的忠诚还不如今天的学者。若是仔细观察一番，我们会发现，尤利乌斯·恺撒和恺撒·奥古斯都之间的差别其实没那么大。

为了讲述一个全新的关于奥古斯都的故事，我们有必要避开许多代人积累下来的学术辩论。本书不是关于那个时代的史册，而是一部传记。所以，尽管我们需要考虑更广泛的事件，但必须将注意力聚焦于奥古斯都本人。我们有必要知道，在他人生的每一个节点，他身处何方，如果有可能还要知道他在做什么。这样的研究告诉我们，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意大利或各行省旅行。除了2世纪的哈德良，他的后继者当中很少有人这么做。我们还清楚地知道，他即便年迈之时也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他政治生涯的基础不仅仅是简单的改革和立法，还要关注细节和日常维护。而在对他的作为和成就的概览中，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些方面。当时发生了很多变化，有体制、社会、经济、罗马本身和更广阔的帝国的变化。如果我们能把握这些变化产生的节奏，就能真正理解它们的重要性。

这是一部篇幅很长的书，我原本也可以轻松地把篇幅翻一倍或两倍。我努力帮助读者一瞥奥古斯都对意大利和整个帝国的影响，以避免局限于观察罗马一些贵族世家的命运，但篇幅的限制使得我无法添加更多细节。本书一笔带过的许多主题，都可以写出长篇著作来。用几页纸来概括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是一件让人非常受挫的事情，没有机会探讨奥维德和其他一些诗人也令我遗憾。本书写作过程中让我最感愉快的事情之一，是有机会重读该时期的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其中很多作品是我结束学生时代以来第一次阅读。我尽了最大努力去帮助读者领略这些作品，同时保证不偏离奥古斯都这个中心人物，毕竟这是一部关于他的书。对奥古斯都及其时代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本书注释部分和长长的参考文献清单，它们有助于了解关于这些主题的论述。

讲故事：奥古斯都生平的史料来源

罗马世界的大量文学作品、公文和私人信函当中，只有极少一部分留存至今。在印刷机发明之前，所有文字都需要手抄，因此除了耗费人力、价格昂贵之外，也带有只增不减的讹误。很多书籍失传，就是因为没有人制作足够多的抄本。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新的世界里有能力读书写字的人变得更少，也没有充裕的财富来支持书籍抄写工作，于是更多的书籍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中世纪，教会保存了一些古代文献，但很有选择性，而且教会选择保存的文献也由于火灾、事故或疏忽而损失了很大一部分。这意味着，古典世界的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在每一个阶段，我们必须考虑文献资料的不完整性，以及时常出现的互相矛盾。

关于这些岁月的最完整叙述是在事件发生很久之后写出来的。阿庇安在2世纪初写作，他的《内战史》一直写到塞克斯图斯·庞培于前36年战败。狄奥在3世纪初写作，他的史书涵盖了整个时期，非常详

细，关于奥古斯都生平的部分只遗失了一点点。阿庇安和狄奥都是希腊人（不过狄奥也是一位罗马元老和高级行政长官），用希腊语写作，所以有时较难确定他们翻译成希腊语的拉丁文术语。两人写作的时候，元首国都已经稳固确立，皇帝的统治牢不可破，因此他们都倾向于将他们所处时代的立场投射到更早期的时代。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开始从政的时候，正是奥古斯都在位期间。他的简短叙述的优势在于，写作时间更接近事件本身，但他高唱提比略皇帝的赞歌，进而削弱了其叙述的可靠性。以上是我们今天掌握的最完整的史料，但并不涵盖所有方面，因此我们有时需要参考较晚近的作品，如弗罗鲁斯和奥罗修斯的作品，尤其是关于各行省和边疆的情况。有这些史料总比没有好，但使用时必须非常谨慎。历史学家李维是奥古斯都的同时代人，他的相关著作一直写到前9年，可惜这些书卷都遗失了，只有晚近得多的一份非常简略的概述留存至今。

在前43年西塞罗被奥古斯都、安东尼和李必达下令处决之前，他的书信和演讲稿非常直接和详尽（尽管有非常明显的倾向性）地描述了时事。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书信集里还包括其他人写给他的信，以及这些绝望的时期里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这些流言蜚语对人们行动的影响有时不亚于真相。遗憾的是，西塞罗的作品只有一部分保存至今，其他一些作品，包括这位演说家与奥古斯都的更多通信，虽然古代作家可以读到，可惜都没有保存到我们的时代。

奥古斯都的自传涵盖了一直到前25年的事件，但没有留存至今，尽管其中的一些信息被保存在他的同时代人“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撰写的简短传记中。不过我们今天能读到的《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是在奥古斯都晚年编纂的一部作品，在他死后被置于其陵墓之外，并在其他地方保存了抄本。这部作品主要列举了他的成就和荣誉，所以是一部得到他认可的关于他一生的官方记载。苏埃托尼乌斯在1世纪末和2世纪初撰写的传记更完整，也更有人情味。它显然采用了许多不同

来源的史料，其中包括非常敌视奥古斯都的史料（很可能产生于前44～前30年的宣传战）。这部书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特别有意思的是奥古斯都给家人（其中一些人出现在苏埃托尼乌斯为提比略和克劳狄写的传记中）的私人信件的摘选。但令人沮丧的是，苏埃托尼乌斯没有提供任何确定的日期或其他能够帮助我们确定事件时间顺序的提示。

其他一些史料提供了少量相关资料。例如普鲁塔克为布鲁图斯、西塞罗和马克·安东尼写的传记，以及他的其他作品，其创作时间与苏埃托尼乌斯和阿庇安差不多。塔西佗是普鲁塔克的同时代人，还是一位资深的罗马元老，但他的史书里没有讲到奥古斯都，只是间接传达了一些关于他的信息。老塞内卡和小塞内卡活跃于1世纪早些时候，也提供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很久之后，5世纪初的作家马克罗比乌斯显然采纳了更早期的史料，编纂了上文提到的涉及奥古斯都的笑话集。对于所有这些作品，我们通常没有办法知道，作者是从何处得到资料的，所以无法证实其可靠性。但最重要的地方或许是，关于奥古斯都本人的趣闻轶事如此之多，这让我们能了解到人们是如何看待他的，以及他希望大家如何看待自己。^[11]

铭文，无论是刻在石碑上的还是钱币上的，也能提供一些关于奥古斯都时代的明确信息，正如图像和雕塑能够有意识地传达信息。很多铭文的优势在于直截了当，尤其是其年代非常明确的时候，不仅能够反映当时短时间内的重大事件，也能够传达更宽泛的信息。对建筑物和其他遗址的发掘也能揭示时代风尚的变化，但由于阐释发掘出来的遗迹需要特别谨慎，因为我们很少能彻底地、完全地理解它们，阐释也绝少能够做到完全肯定。对于所有这些物质证据，背景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但背景环境从来不会清楚明确到我们满意的程度。而且较早期的发掘工作往往不如晚近的发掘那样谨慎和精细。尤其是对于艺术品和建筑，我们很难做到客观，也难以做到不忽视也不过度解读微小的细节。罗马人究竟花了多少时间来考量图画和钱币上的铭文？

但与文献资料不同的是，当下仍在开展的考古工作不断获得关于奥古斯都时代的新的物质证据，非常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他的世界的理解。

理解奥古斯都并不容易，对于任何类型的证据我们都要小心谨慎。我们也应当对史料的局限性保持坦诚开放的态度。有些东西，我们是根本不知道的，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更多的东西，我们只能猜测，但对于这些猜测的基础也必须坦率诚实。在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的地方，我们绝不能假装确定。绝对真相是很难捕捉到的，或许根本不可能捕捉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当尽最大努力去接近真相。关于奥古斯都，我们可以说很多东西，在我们努力理解他和他的世界时，可以运用不同类型的证据。

[1]. 这是中国大陆通用和合本圣经对恺撒·奥古斯都的译法（除特别标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 Luke 2: 1-3.

[3]. 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中埃诺巴尔布斯的原型是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前32年执政官），他曾和父亲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前54年执政官）一起在庞培的领导下反对尤利乌斯·恺撒，后得到恺撒赦免。在恺撒死后的内战中，格奈乌斯先是反对后三头同盟，然后投靠安东尼。在奥古斯都与安东尼决战前夜，他又叛逃到奥古斯都那边，据说因羞耻而死。

[4]. 近期的HBO迷你电视剧《罗马》（2006～2007年）把少年屋大维描绘得比较有同情心，但另一个演员接过这个角色，扮演成年屋大维之后，就显得精于算计。剧中还指出屋大维有虐待狂倾向。他与李维娅结婚时告诉她，他们做爱的时候，他会喜欢打她。

[5]. 奥古斯都的姐姐是屋大维娅，她的女儿安东尼娅生了日尔曼尼库斯，日尔曼尼库斯的女儿是小阿格里皮娜，小阿格里皮娜的儿子就是尼禄皇帝。

[6]. Shakespeare, Julius Caesar, 4.1.1.

[7]. 近期研究奥古斯都及其时代的篇幅较短的著作为：D. Shotter, *Augustus Caesar* (2nd edn, 1991), W. Eck, *The Age of Augustus* (2003), K. Galinsky, *Augustus.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of an Emperor* (2012), J. Richardson, *Augustan Rome 44 BC to AD 14. The Restoration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mpire* (2012); 通俗作品当中, R. Holland, *Augustus. Godfather of Europe* (2004) 主要讲亚克兴角战役之前的故事, 而A. Everitt, *Augustus: The Life of Rome's First Emperor* (2006) 则讲述这个时期和后来的权力斗争。

[8]. Julian, *Caesars 309 B-C*; 简略讨论见K. 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1996), p. 373。

[9]. 罗马共和国的行政长官 (magistrates) 经选举选出, 可分成正规长官 (Magistratus ordinarii) 与特殊长官 (Magistratus extraordinarii) 两类, 执掌政治、军事以及在某种情况下的宗教权力。

正规长官按照级别从低到高包括: 财务官 (Quaestor)、市政官 (Aedile)、裁判官 (Praetor)、执政官 (Consul)、监察官 (Censor) 等。正规长官每年由选举产生 (监察官除外), 任期一年。每个级别通常选出至少两位正规长官, 以防一人权力过大。

特殊长官包括独裁官 (Dictator)、骑兵统帅 (Magister Equitum) 等。

有元老身份的人可以通过所谓晋升体系 (Cursus honorum, 字面意思为“荣耀之路”), 在服完兵役后, 依次参选和担任官职。不同的职位对候选人均有最低年龄的限制。官员在各职位间晋升需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法律禁止连续担任同一职位。当然, 这些规定并不总是得到遵守。

平民保民官 (Tribune of the Plebs) 在技术上严格地讲, 不属于行政长官。

[10]. 历史学家们对奥古斯都的态度, 见Z. Yavetz, 'The *Res Gestae* and Augustus' public image', in F. Millar & E. Segal (eds), *Caesar Augustus. Seven Aspects* (1990), pp. 1-36, 尤见pp. 22-6, 也见J. Edmondson (ed.) *Augustus* (2009), pp. 14-26。

[11]. 对一些主要史料的讨论, 见F. Millar, *A Study of Cassius Dio* (1964), A. Wallace-Hadrill, *Suetonius* (2nd edn, 1995), C. Pelling, *Plutarch and History* (2002), C. Smith & A. Powell (eds), *The Lost Memoirs of August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Autobiography* (2009), R. Syme, *Tacitus* (2 Vols, 1958), 及R. Mellor, *Tacitus* (1993)。

第一部 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 前63～前44年

他年幼的时候，得到了一个绰号“图里努斯”，要么是为了纪念他的祖先的来源地，要么是因为在他出生不久之后，他的父亲屋大维在图里镇压逃亡奴隶，赢得了一场胜利……马克·安东尼在信中常称他为图里努斯，以此辱骂他。他的回答仅仅是，这不过是他的旧名而已；他很吃惊，安东尼居然以为这样就能让他生气。

——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7.1

一 “祖国之父”

他出生的那一天，元老院正在商讨喀提林阴谋的问题。屋大维迟到了，因为他的妻子在分娩。正如后来人们常说的，普布利乌斯·德基迪乌斯^[1]得知屋大维迟到的原因和孩子出生的时间后，宣称世界的主宰降生了。^[2]

——苏埃托尼乌斯，2世纪初

前63年，罗马是已知世界的最大城市。它的人口至少有75万，到前1世纪末便会增加到100万。大多数人生活在肮脏、拥挤的街区或公寓楼（*insulae*，字面意思是“岛屿”）内，这些房屋很容易发生火灾，疾病在这里肆虐。这么多人聚居在一个地方，每天必然有许多婴儿出生，也有很多人死亡。因此，一名叫作阿提娅的妇女于9月23日黎明前分娩并不算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她为丈夫生下了一个儿子。

阿提娅比大多数母亲都幸运，因为她是贵族，她的丈夫盖乌斯·屋大维是一位元老，有足够的财富为她提供最优质的护理，并且在帕拉丁山东侧山麓拥有一座舒适的宅邸。她快临盆的时候，得到了女性亲属、家中女奴和女释奴^[3]，以及一位有经验的产婆的照料。根据风俗习惯，男性不可以进入被选作产房的房间，只有在发生难产的时候才会传唤一位男性医生，不过如果真的发生难产，医生其实也做不了多少。阿提娅是有经验的母亲，她在几年前给丈夫生了一个女儿。

但丰富的经验、舒适的条件和优质的护理都不能保证阿提娅的生命安全。分娩对母子都很危险，在这一天出生的孩子当中有一些是死胎，还有一些将来会夭折。有不少母亲也会丧命。九年后，阿提娅的表妹尤利娅^[4]因难产而死，她的孩子几天后也死去了，尽管她的丈夫^[5]是当时罗马最富财力和权势的大人物。生儿育女的岁月或许是女人一生中最危险的时期。

阿提娅的分娩很顺利，母子平安。产婆将男婴放在地上检查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畸形的迹象或其他问题。随后孩子被送到父亲面前。根据罗马的传统，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对全家人拥有生杀大权，尽管到这个时期已经很少有人如此严格地行使这样的权威。即便如此，也应当由盖乌斯·屋大维决定是否接纳新生儿进入自己的家庭。他很快接纳了男婴，将他展示给聚集起来和他一起等待的亲友，以及那些得知孩子降生之后立刻登门道喜的亲友。盖乌斯·屋大维已经有两个女儿了，长女是他在前一段婚姻中生的。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说，女儿也很有价值，因为联姻能够帮助他赢得和维持政治盟友。但只有儿子能够从政，获得与父亲相提并论的地位，甚至超过父亲的成就，从而给家族增添荣耀。

家中祭坛点起了火，人们向家庭保护神拉瑞斯和灶神皮纳特斯，以及其他受到特别尊崇的神祇献祭。客人离去之后，会执行相同的仪式。访客中肯定有阿提娅的三十七岁舅舅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元老，已经享有一定的声誉。前不久，他赢得了一场竞争特别激烈的选举，当选为罗马最高级和最有威望的神职人员——祭司长^[6]。这个职位主要是政治上的，而且尤利乌斯·恺撒似乎并不特别虔诚信教。即便如此，和其他罗马人一样，他还是高度重视传统的宗教仪式。罗马贵族终其一生都被宗教仪式所环绕，孩子的平安降生对一个元老阶层的家庭及其亲属来说，总是一件喜事。^[7]

除此之外，外界没有理由对此非常关注，因为盖乌斯·屋大维作为元老的地位很低。许多年后，在这个孩子长大成人、成为奥古斯都之后，才开始流传一些关于他出生时的征兆，甚至公开预测他未来的丰功伟绩。苏埃托尼乌斯讲了一长串这方面的故事，其中很多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些根本就是荒诞无稽的。其中一个荒唐故事说，有人预言罗马的国王将要诞生，于是元老院颁布法令，将在指定时段出生的男孩全部处死。但有一些元老的女子正在怀孕，于是他们以程序的

技术角度阻止了法令通过。共和国的立法工作根本就不是这样运作的，而且如果真的有如此严酷和有争议的措施，西塞罗只字未提就很奇怪了。这根本就是一个捏造的传奇。还有的荒唐故事肯定是从亚历山大大帝和其他英雄的神话中汲取了灵感。伟人的父亲不可能是凡人，于是有人传说阿提娅在阿波罗神庙参加一次夜间仪式时在轿子上睡着了。一条蛇出现，从她身上游过，在她大腿上留下了一条蛇皮一样的印迹。她醒了，感到自己需要按照仪式要求清洁自己，就像她刚刚做过爱一样，因为只有身体洁净的人才可以进入神祇的圣所。她没有办法洗去皮肤上的印迹，于是不再去公共浴室洗澡。九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儿子。^[8]

盖乌斯·屋大维不需要这种神秘体验也会感到开心。在罗马文化里，生日是很重要的，人的一生中都会庆祝生日。根据罗马的阴历，一年有十个月，9月（September）是其中第七个，因为在古时一年是从3月（战神玛尔斯的月份）开始的，罗马军队一般从这个月开始出征作战。对罗马人来说，9月23日是10月“月首日”的九天前。罗马人的历法规则是，一个月有三个节日，分别是第一天（月首日）、第七天和第十三或第十五天（月中日）。月首日本身算一天，9月23日也算一天，所以它是10月“月首日”的九天前。

根据罗马人的计算，这一年是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之后的第690年。更贴近生活的算法是，这一年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和盖乌斯·安东尼^[9]担任执政官的年度。两位执政官是罗马最高级的行政长官，平起平坐，任期一年。共和国体制刻意阻止任何一个人获得最高权力或永久性权力，所以任何人在执政官任期结束之后都必须等待十年才能再次参选。每一年以当年掌权的两名执政官的名字命名，选举时票数第一的执政官的名字排在前面。执政官大多来自一小群豪门望族，如安东尼家族。西塞罗很不寻常，因为他是他们家族历史上第一个在罗马从政的人，而且几十年来不曾有一位“新人”^[10]攀升

到执政官的高度。盖乌斯·屋大维也是一位新人，他肯定希望能够复制西塞罗的成功。^[11]

两名执政官的权力平等，但每个月里其中一人享有优先权力，两人轮流。因此9月23日这一天，在元老院主持会议的是西塞罗。据苏埃托尼乌斯所说，盖乌斯·屋大维因为儿子出世而迟到了，这为另一个关于“世界主宰”诞生的传说提供了背景，但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谨慎。这个故事可能根本就是捏造的，尽管盖乌斯·屋大维参加元老院会议迟到并非不可能。当天会议上元老们讨论了关于他们的一员卢基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阴谋起事的传言，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关于革命的流言口口相传，其中很多认为喀提林为幕后指使，因为他在这年夏季的选举中未能当选为下一年的执政官。如果元老院真的讨论了这些事务，而目前又未采取任何行动，说明要过一段时间，此事才会发展到一个重大关头。^[12]

与此同时，生活照常继续。9月30日夜间，盖乌斯·屋大维和阿提娅在家中整晚守夜。他们举行了仪式，高潮是献祭和次日（10月的月首日，即他们儿子出生后的第九天）举行的净化仪式。净化的目的是保护婴儿免受出生时可能进入其身躯的恶灵或其他超自然影响的侵害。婴儿会得到一个特别的护身符，它通常是黄金制成的。护身符被系在脖子上，直到他正式成年。随后，由一名观鸟占卜师^[13]观察飞鸟行迹，以预测孩子的未来。盖乌斯·屋大维和阿提娅可能被告知，征兆很吉利。^[14]

直到这时，男婴才被正式命名，并根据程序注册到公民名单中。他与父亲同名，因此被称为盖乌斯之子盖乌斯·屋大维。许多家族的一代代男性成员往往使用同一个名字，不过在这些年里一些最有权势的贵族世家开始打破这种传统，使得他们与元老阶层的其他人拉开了更大的距离。氏族^[15]名（第二个名字），此处是屋大维，当然是自

动延续的，只有第一个名字（个人名）才可以选择。大多数显要的男子拥有完整的三个名字，所以阿提娅的舅舅叫作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尤利乌斯氏族枝繁叶茂，第三个名字（家族名）说明他属于这个氏族的恺撒分支。三名制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即便是许多贵族家庭也没有第三个名字，有的是因为他们人丁不是很兴旺，有的则是因为他们自信名满天下，能被大家轻易识别。屋大维氏族目前还没有必要区分自己的若干支系。

罗马人不认为有必要准确地识别女性，因为她们不能投票，也不能参加竞选。阿提娅只有一个名字，即她父亲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的氏族名“阿提乌斯”的阴性形式。最重要的是她父亲的身份，以及与他家族的关系。罗马女性一生都只有这个名字，结婚之后也不会改名。阿提娅的女儿叫屋大维娅，她的继女（即其丈夫在前一段婚姻中生的女儿）也叫屋大维娅。如果他们又生了其他女儿，一定还叫屋大维娅。有时候罗马家庭会给女儿们的名字加上序号，以便用于正式场合。^[16]

婴儿需要大量的照顾料理，但阿提娅在这方面主要发挥了较远距离的监督作用。她忙于管理整个家庭，并扶持丈夫的政治生涯。有人主张母亲应当用母乳喂养孩子，但实际上这是很少见的，一般是让一名奴隶乳母来喂养孩子。这名乳母或另外一名奴隶将担任孩子的保姆。（有些哲学家主张母亲应当亲自哺乳的原因是，他们担心如果让奴隶来哺乳，孩子会从奶水中吸取到一些奴隶的品质。）父母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无疑由父母个人决定。有的父母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不过也有例外。我们知道，在前2世纪，老加图（他以拥有严峻、老派的美德并对其大肆宣扬而闻名）在自己的男婴洗澡时总会亲临现场，除非有特别重要的公务。老加图的妻子是坚持母乳喂养孩子的妇女之一，有时甚至给家中奴隶的孩子喂奶。^[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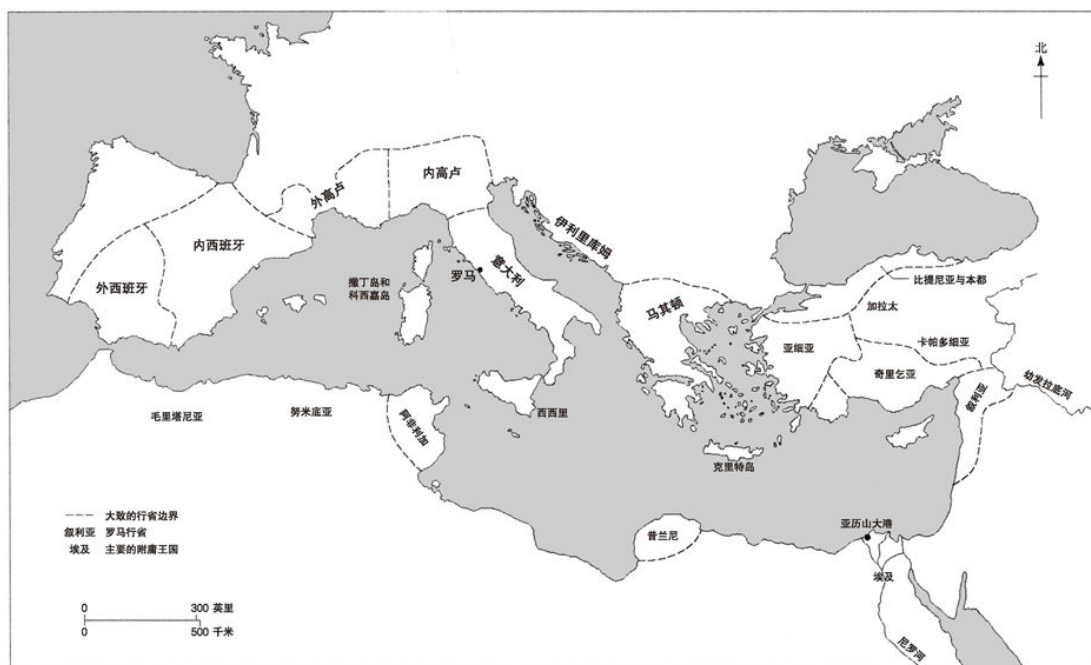
我们掌握的史料几乎完全没有提及屋大维的幼年时代，不过苏埃托尼乌斯的一个预示他将成为伟人的故事的戏剧性并不是很强，或许还具备一定的真实性。在这个故事里，屋大维已经能爬了。他被保姆放在最底层的一个房间睡觉，却在当晚失踪了，于是家人匆匆四处搜寻他。次日早上，人们发现他在最顶层的房间观察升起的太阳。[\[18\]](#)

饱受困扰的世界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也是后来发生的。在前63年最后几个月，罗马的气氛非常紧张，孩子的父母遭遇了很多令人担忧的事情。罗马共和国自前2世纪中叶以来就主宰着地中海世界。迦太基已经灭亡，东方诸王国要么被罗马征服，要么羸弱不堪而依赖罗马的善意，因此不构成任何威胁。小亚细亚的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与罗马对抗数十年之久，此刻已经被罗马最成功和最受民众爱戴的将领“伟大的庞培”彻底击败了。米特里达梯六世一生中长期服用解毒药，对毒药形成了免疫。这一年，他企图服毒自杀，但就是死不了，于是让一名卫兵将他杀死。庞培的军队支持犹太王族内战中的一派，围困耶路撒冷三个月，于10月将其攻克。似乎无人能抵挡罗马共和国的军事威力。[\[19\]](#)

罗马的实力远远超过所有邻国和潜在敌人，但征服和海外帝国带来的巨大收益动摇了罗马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微妙平衡。贵族之间争夺崇高官职和地位的竞争历来非常激烈，但在过去受制于严格的传统和法律。如今，这个体制的很多支柱受到了威胁，因为元老们为了笼络人心不惜一掷千金；社会中也涌现了很多群体，他们对自己的困境感到绝望，因此不管是谁，只要能捍卫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拥护他。现在有些人得到了机会，攀升到过去无法想象的高峰，却引起了其他人的怨恨和抵制。

前133年，一位叫作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的贵族当选为十位平民保民官之一。他提出了一项旨在扶助农村贫民的立法。他赢得了相当多的赞许，但被指控企图自立为王，于是被一群元老（领头的就是他的表兄）活活打死。前122年，提比略的弟弟盖乌斯企图发动一场甚至更为激进的改革，最终连同他的数百名支持者一起被杀害。这一次的厮杀显然是早有预谋的，双方都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政治竞争变得凶残起来，这样的景象在前100年又重演了。十年后，提议为所有与罗马结盟的意大利人授予公民权的保民官^[20]被谋杀，意大利各民族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起兵反抗罗马。在激烈斗争之后，罗马人打赢了这场战争^[21]。他们之所以能够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终于勉强同意赋予意大利各社区想要的东西。于是，罗马公民的数量大大增加，政客们可以去培植更多的选民，这又一次改变了政治平衡。



前1世纪的罗马帝国

没过多久，一位平民保民官引发的争端^[22]愈演愈烈，导致前88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事件：一位罗马将军率领军队攻打罗马城。他的名字是苏拉，他与一位上了年纪、广受人民爱戴的英雄马略之间的竞争是此次冲突的根源。随后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屠杀，暴行肆虐，并越来越猖獗和残酷，直到苏拉打赢了内战，自立为独裁官。独裁官原本是很少见的临时性紧急措施，他却将它变成了独占永久性权力的地位。几年后他辞官退隐，几个月后寿终正寝。共和国面临新的内战威胁，前78年的执政官之一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23]招兵买马，企图攫取政权。李必达被击败，他本人及其党羽都被处死，但苏拉的很多对手在西班牙坚持作战，继续打了很多年。

前63年，内战的阴云仍然笼罩着共和国。每一位元老都曾经历苏拉和马略两派间的血腥厮杀，大多数元老在这期间都失去过近亲或朋友。尤利乌斯·恺撒的姑姑嫁给了马略，而尤利乌斯·恺撒的第一任妻子是马略最亲密盟友之一^[24]的女儿，或许仅仅是由于恺撒年轻，才躲过了得胜的苏拉党人的屠刀。即便如此，有一段时间，他也被迫逃亡，遭到追捕，直到他母亲在苏拉派那边的关系救了他的命。被苏拉处死的人的后裔被禁止从政，他们努力四处游说，希望恢复自己的权利。苏拉已经去世了，但所有的资深元老都是由他挑选，或者至少是经他默许的人选。新的内战似乎随时可能爆发，给罗马人带来混乱、危险和机遇。苏拉的许多支持者通过掠夺死去的敌人发了大财。而在当前体制下受挫的人则希望在一场新的革命中得到晋身的机会。

喀提林是苏拉党人之一，但他新近获得的财富还不足以维持其浮华奢侈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野心，正是由于这种野心，他在向潜在支持者馈赠礼物时非常慷慨大方。苏拉将元老数量翻了一倍，并将裁判官（仅次于执政官的高级行政长官）增加到八人，但每年仍然只有两名执政官，所以对最高荣誉的争夺变得愈发激烈了。前70年，数十名元老因为严重腐败和昏庸无能被剥夺元老资格。这次清洗发生得十分突

然，在历史上也算相当罕见。这些人再次加入谋求官职的竞争中，其中有几个人拥有足够的金钱和野心，希望能够再次当选、恢复政治地位。

在政坛阶梯上攀登，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要想成为一名元老，首先要满足资格要求，即拥有足够数量的地产。为了在竞选中占据优势，政客们大肆举债，贷款金额越来越高。喀提林因此债台高筑，尤利乌斯·恺撒也是如此。竞选祭司长的职位时，尤利乌斯·恺撒的主要对手是一个年纪较长、威望较高的政治家，双方都向参选的部落送去了大量贿金。尤利乌斯·恺撒知道，如果自己失败，就没有希望清偿债务。但他狂赌了一把，寄希望于这次选举胜利能让债主相信，他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象，将来会继续攀升并成为一個有价值的盟友，最终还清债款。选举这一天早上，尤利乌斯·恺撒在离家之前告诉他的母亲，他要么以胜利者的身份回来，要么就永远不会回来了。最后他当选了，他的债主目前还愿意继续支持他。^[25]

喀提林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和尤利乌斯·恺撒一样，他也是贵族，他的家族属于罗马最古老的贵族世家。在罗马，平民（如盖乌斯·屋大维和他的儿子）的数量远远多于贵族，几百年来很多平民跻身于精英阶层。好几个贵族家族的光辉已经黯淡，逐渐衰败，变得默默无闻。近几个世纪以来，喀提林和尤利乌斯·恺撒的祖先在选举中都没有取得多少成功。他们都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而且这两人都极富魅力和才华，并都拥有风流浪子的名声，这至少能让公众记得他们，哪怕仅仅是作为流言蜚语的主题。尤利乌斯·恺撒节节胜利，喀提林的政治前途却开始受阻。^[26]

喀提林由于在担任阿非利加行省^[27]总督期间的不端行为遭到了起诉，未能参加前65年和前64年的执政官选举。在下次竞选中，他越来越狂野不羁的言论疏远了太多有影响力的人，于是他被西塞罗组

织的精彩攻势击败了。对血统古老的贵族来说，被一个“新人”打败是特别耻辱的事情。喀提林将西塞罗称为罗马的“常住外国人”。另外一位胜利者是盖乌斯·安东尼，他在前70年被逐出元老院，现在卷土重来，杀回政坛。尽管他在选举中曾与喀提林互相支持，但西塞罗承诺在安东尼的执政官任期结束之后给他马其顿行省总督的职位，于是将安东尼争取到中立的战线上。其实根据抽签，马其顿行省总督的职位原本属于西塞罗，他主动把它让给了安东尼。马其顿是个富庶的地区，一位无所顾忌的总督可以轻松地搜刮到巨额金钱，恢复自己的财富。[\[28\]](#)。

但喀提林又参加了前63年7月的选举（由执政官西塞罗主持）。这一次参选各方都有严重的贿选行为，而且得到一大群打手的支持，所以西塞罗带着自己的追随者到达会场，并在托加袍下穿着胸甲，他“偶然”露出了胸甲，以显示自己的决心。这一次选举虽然有威吓，但没有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喀提林第二次被击败。[\[29\]](#)。

喀提林以及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人陷入了绝望。如果一位元老为了还债卖掉自己的土地，那么很可能会赔一笔钱，因为市场很萧条；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卖了土地，就失去了获得元老身份的资格，再也没有政治前途。对某些人来说，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在政治上破产，要么掀起一场革命。在伊特鲁里亚[\[30\]](#)乡村，喀提林的追随者曼利乌斯（曾是苏拉军中的一名百夫长）从穷困和绝望的人中召集一支成分复杂的军队。苏拉的一些老兵在退伍时得到了土地，但由于土地贫瘠、经济萧条或者他们自己的错误，不能维持生活，于是和曾经的马略党人，以及其他一些觉得只有革命才能挽救自己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将会高举马略的某个军团曾经使用（不是在内战中，而是马略在潮水般蛮族的攻击下挽救了意大利的伟大战争中使用）的一尊鹰旗，成群结队地开进。但形势还不明朗，人们不知道喀提林是否会发动公开叛乱，或者在何时发动。[\[31\]](#)。

10月21日，元老院发布了终极议决，要求两位执政官采纳一切必需的措施保卫共和国。事实上这等于宣布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但人们对这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可以中止法律效力产生了分歧。前122年，元老院曾用终极议决来镇压盖乌斯·格拉古，后来在前100年、前88年和前78年也用过这种手段。从很多方面来看，这其实是承认在遇到严重的内部动乱时，共和国的传统机制不足以解决问题。

喀提林还待在罗马，并继续参加元老院会议，即便在曼利乌斯于10月底公开叛乱之后也是如此。西塞罗对喀提林的公开谴责越来越凶猛，但密谋者暗杀西塞罗的企图失败了。最后，11月8日夜间，喀提林逃走，与曼利乌斯会合。他留在罗马城的盟友非常无能，他们笨拙地去接触阿洛布罗基人（高卢的一个部落）的使者，希望能为叛军获得一支骑兵部队。这些高卢人却报告了罗马当局，密谋者被当场擒获。

四名参与密谋的元老被逮捕，其中最资深的是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现任裁判官，也是前70年被剥夺元老资格的人之一。他的妻子叫尤利娅，是尤利乌斯·恺撒的远房亲戚，她在此之前已经当过一次寡妇^[32]。兰图鲁斯和另外三人被带到元老院受审，自称清白无辜，但能够证明他们有罪的证据越来越多，于是他们的决心瓦解，各自认罪。现在的问题是，应当如何处置他们。12月5日，在和谐女神庙举行的一次会议决定了他们的命运。选择和谐女神庙为开会地点无疑是为了呼吁大家团结，但或许也是为了提醒人们政府在过去曾采取过的强硬措施，因为建造和谐女神庙的人就是镇压盖乌斯·格拉古的领导人^[33]。

在随后的辩论中，许多发言者主张处决犯人。盖乌斯·屋大维作为元老的资历非常浅，大家不会征询他的意见，但尤利乌斯·恺撒已经当选下一年的裁判官，而且还是祭司长，所以西塞罗很快询问他的意见。有人说阿提娅的这位高调浮夸的舅舅参与了喀提林阴谋，但尤

利乌斯·恺撒没有附和其他人的意见以证明自己对共和国的忠诚，而是大胆地反对处死犯人。他正确地指出，不经审判就处决犯人是违反宪法的，不过他自己的建议——将每一名犯人送往意大利的不同城镇羁押——也完全缺乏先例。罗马人没有那种长期羁押犯人的监狱，更不要说终身监禁了。

大家的共识开始动摇，一时间，似乎雄心勃勃的尤利乌斯·恺撒将要单枪匹马地改变元老院的意见，从而威名远播了。但这时，另一个前程远大的人——下届保民官小加图^[34]——发表了气势汹汹的演说，敦促立刻处死犯人。其他人附和了这一信念，严肃质疑了监禁犯人的做法是否务实可行。投票表决的结果是，多数人赞同处决犯人。我们不知道盖乌斯·屋大维投了什么票，但他很可能随波逐流，而不是站在尤利乌斯·恺撒那边。元老院中最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之一赞扬西塞罗为“祖国之父”。^[35]

兰图鲁斯的裁判官职位已被褫夺，但享受了特殊待遇：由执政官西塞罗亲自押他上刑场。四名犯人被处决。随后，西塞罗简洁地宣布：“他们已经死了。”这句话在拉丁语里只有一个词，vixerunt。有传闻说，密谋者企图在罗马搞大屠杀和纵火以便制造混乱，现在公众看到危险解除，都松了一口气。共和国逃脱了最直接的威胁，尽管喀提林及其军队仍然逍遥法外。人们很难预测，他们为了保卫共和国而愿意暂时中止法律，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罗马仍然主宰着世界，但它的政治仍然竞争激烈、险象环生，暴力冲突和政局动荡的威胁始终没有远去。不过，虽然风险很大，但成功的奖赏也很大。这一年结束的时候，盖乌斯·屋大维决心在政坛努力奋斗。^[36]

^[1] 普布利乌斯·尼基迪乌斯·菲古鲁斯（约前98～前45年），罗马共和国晚期大学者，前58年裁判官。在尤利乌斯·恺撒与庞培的内战中，他支持后者。

尤利乌斯·恺撒胜利后，尼基迪乌斯的好友西塞罗帮助他向恺撒说情，但尼基迪乌斯没有来得及获得赦免，便在流亡中死去了。

[2]. Suetonius, *Augustus* 94.5.

[3]. 在古罗马，被主人授予自由的奴隶可以成为公民，享有全部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选举权，原主人则成为他的恩主和保护者。释奴受到一些限制，比如不能担任公职，不能担任国家祭司，不能成为元老。但后来释奴也能成为高官。释奴在获得自由后生的孩子生来自由，享有全部公民权。一些释奴获得了很高的地位，甚至成为巨富。

[4]. 尤利乌斯·恺撒的女儿。

[5]. 庞培。

[6]. 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古罗马的神职人员。古罗马没有专门的教会阶层和团体，普通公民可以扮演神职人员的角色，比如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可以在家中作为祭司主持宗教仪式。神职人员的身份往往被授予贵族和豪门世家成员，是一项很大的荣誉，但也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因为神职人员往往要自掏腰包来主持祭祀等宗教活动。

最重要的神职人员团体有四个：1. 大祭司团（College of Pontiffs），包括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其他大祭司（Pontiff）、15名祭司（Flamen，分别侍奉一位神）、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s）、祭典之王（Rex Sacrorum）；2. 观鸟占卜师（augur）；3. 十五人团（Quindecimviri sacris faciundis），主要负责保管《西卜林书》；4. 司膳（Epulones），负责安排节庆活动和公共宴席等。

[7]. 关于时间，见Suetonius, *Augustus* 5.1；关于局势的概述和生育的概况，见B. Rawson,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Roman Italy* (2003)，passim，尤见pp.99-113，S. Dixon, *The Roman Mother* (1988)，pp.106-8，237-40。另见论文集B. Rawson (ed.)，*Marriage, Divorce and Children in Ancient Rome* (1991)；关于尤利乌斯·恺撒和他当选祭司长，见A. Goldsworthy, *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pp.124-6，关于他没有宗教上的顾虑，见Suetonius, *Caesar* 59；关于奥古斯都出生时间的星相学问题和他后来采纳摩羯为自己的符号，见T. Barton, ‘Augustus and Capricorn: Astrological polyvalency and imperial rhetoric’，*JRS* 85 (1995)，pp.33-51。

[8] 关于一系列征兆，见Suetonius, *Augustus* 94.1-12，尤见94.3-4；Dio 45.1.2-3重述了关于蛇的故事，可能是直接以苏埃托尼乌斯为资料来源，或一种常见资料。

[9] 后来尤利乌斯·恺撒麾下大将和后三头同盟者之一马克·安东尼的叔叔。

[10] 成为自己家族史上首位元老或执政官的人被称为“新人”（novus homo）。

[11] 对执政官和其他高级行政长官的详细讨论，见A.Lintot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99)，pp.94-120，尤见104-9。

[12] Suetonius, *Augustus* 94.5说著名的宗教专家和神秘学家普布利乌斯·尼基迪乌斯·菲古鲁斯做了这个预测。其他故事说是西塞罗和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可能同样是为了让自己的说法更可信。关于喀提林辩论的时间顺序，见D.Stockton, *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pp.336-9，尤见337。

[13] 古罗马人的一个习俗是通过观察鸟类的飞行（是单飞还是成群、飞行方向、发出何种声音、何种鸟类等）来预言占卜。

[14] 见B.Rawson,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Roman Italy* (2003)，pp.105-12。

[15] 氏族是许多血缘相近的家族组成的集团。

[16] 关于罗马人姓名，见B.Salway, ‘What’s in a name? A survey of Roman onomastic practice from 700 BC-AD 700’，*JRS* 84 (1994)，pp.124-45，尤见124-31。关于奥古斯都的名字和在这个时期的活动，详见R.Syme, ‘Imperator Caesar: A study in imperial nomenclature’，*Historia* 7 (1958)，pp.172-88 = *Roman Papers* Vol.1 (1979)，pp.181-96。

[17] Plutarch, *Cato the Elder* 20.3.对本话题的详细讨论，见K.Bradley, ‘Wet-nursing at Rome. A Study in Social Relations’，in Rawson (1986)，pp.201-29。

[18] Suetonius, *Augustus* 94.6.

[19] 关于米特里达梯六世，见P.Matyszak, *Mithridates the Great. Rome's Indomitable Enemy* (2004)，及A.Mayor, *The Poison King* (2010)。

[20] 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他的改革令人回想起格拉古兄弟当年的改革，这很有讽刺意味，因为德鲁苏斯的父亲曾是盖乌斯·格拉古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德鲁苏斯和格拉古兄弟一样，也来自影响力极大的名门望族，所以他在立法时胆子比较大，但也使人们害怕他会过于野心勃勃。德鲁苏斯的改革，尤其是扩大公民群体的计划，遭到了强烈反对。但就在公民大会就扩大公民群体的立法投票之前，德鲁苏斯在自己家的门廊上向访客问候时，被人用皮匠的刀子刺死。凶手的身份始终没有查清楚。

[21] 所谓“同盟者战争”（前91～前88年）。

[22] 一位叫作苏尔皮基乌斯的保民官在公民大会上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讨伐米特里达梯六世的指挥权从苏拉手中夺走，交给了马略。

[23] 是后三头同盟者之一李必达的父亲，父子同名。

[24] 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秦纳，他的女儿科尔内利娅是恺撒的第一任妻子。

[25] 对他母亲的话，见Suetonius, *Caesar* 13，也见Plutarch, *Caesar* 7, Dio 37.1-3, Velleius Paterculus 2.43.3；概况见A.Goldsworthy, *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pp.124-7 = (2007)，pp.150-4。

[26] 恺撒的祖先，见A.Goldsworthy, *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pp.31-4 = (2007)，pp.37-41；喀提林，见D.Stockton, *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pp.73-8, 96-8, 100-07。

[27] 第三次布匿战争（前149～前146年）中，罗马彻底消灭了迦太基，在其领土上建立阿非利加行省，范围约在今日的突尼斯北部、阿尔及利亚东北部和利比亚西部地中海沿岸地区。这是罗马帝国西部最富庶的一个行省。今日非洲大陆的名称即是从该省的名称而来。

[28] T.Mitchell, *Cicero: The Ascending Years* (1979)，pp.149-76, 222-5, D.Stockton, *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pp.79-

[29] 可参见Sallust, *Bell. Cat.* 26-7, D. Stockton, *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 pp. 105-6, T. Mitchell, *Cicero: The Ascending Years* (1979), pp. 226-32, T. Rice Holmes, *The Roman Republic* Vol. 1 (1928), pp. 259-72; ‘residentialien’ (*inquilinus civis urbis Romanam*) 见Sallust, *Bell. Cat.* 31.9; 相关也可见Cicero’s *Pro Murena*, 这是西塞罗为其中一位成功候选人辩护的演讲稿, 此人被指控行贿。

[30] 伊特鲁里亚地区大致相当于现今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拉齐奥和翁布里亚。前9世纪, 伊特鲁里亚文明在这一地区兴起, 出现许多城邦。前650年前后达到极盛, 影响力超过意大利半岛上的各民族。罗马早期受到伊特鲁里亚文明的极大影响, 前509年之前有多位伊特鲁里亚国王统治罗马。但伊特鲁里亚最终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完全被罗马同化。

[31] 关于鹰, 见Sallust, *Bell. Cat.* 59.3。

[32] 这个尤利娅在之前的一段婚姻中生的儿子就是马克·安东尼, 当时只有十岁左右。

[33] 前121年执政官卢基乌斯·欧皮米乌斯, 他镇压了企图发动改革的盖乌斯·格拉古, 以“元老院终极决议”为借口, 处死了格拉古的三千名支持者。从一开始, 盖乌斯及其反对派就比十年前的提比略·格拉古更胆大妄为, 肆无忌惮地使用恐吓与威胁的手段。一次斗殴导致执政官欧皮米乌斯的一名仆役丧生, 于是局势到了一个紧急关头。元老院通过了一道法令——学者们称其为“元老院终极决议”, 即最后通牒法令, 这个术语源自恺撒曾使用的说法, 但在当时并没有这个名字——呼吁执政官以任何必需的手段保卫共和国。正常的法律被暂时搁置, 斗争双方的党徒都拿起了武器。欧皮米乌斯在自己的武装力量之外, 还调来了一群克里特雇佣兵弓箭手, 这些雇佣兵之前在罗马城外等候, 说明欧皮米乌斯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预谋的。盖乌斯及其支持者的人数不敌对方, 他们占据了阿文廷山上的狄安娜神庙。但执政官拒绝与其谈判, 率军杀入了神庙。格拉古在厮杀中丧生。欧皮米乌斯之前许诺, 谁将格拉古的首级送来, 就赏赐与首级同等重量的黄金。果然, 格拉古的首级被送到了他面前。欧皮米乌斯后来因此受到起诉, 但被无罪开释。最终他因受贿而被流放, 死在国外。

[34] 老加图的曾孙, 全名为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

[35]. Cicero, *In Pisonem* 6.

[36]. 喀提林阴谋，见D. Stockton, *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pp.110-42，T. Mitchell, *Cicero: The Ascending Years* (1979)，pp.219-40；恺撒在此案中起到的作用，见M. Gelzer, *Caesar Politician and Statesman* (1968)，pp.50-52，C. Meier, *Caesar* (1996)，pp.170-72及A. Goldsworthy, *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pp.115-42 = (2007)，pp.144-72。

二 “富裕且名誉良好的人”

他的父亲盖乌斯·屋大维虽然不是贵族出身，却来自一个非常显赫的骑士家族，是个尊贵、正直、清白和非常富裕的人。^[1]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约公元30年

我们对阿提娅的丈夫盖乌斯·屋大维了解不多。据史料记载，他相当富裕，不过史料并没有具体谈及与其他元老相比，他究竟有多么富裕。他在帕拉丁山被称为“牛头”的地区拥有一座宅邸，在诺拉（那不勒斯以东约20英里的一座城镇，苏拉将其转变为殖民地^[2]，以安置他的老兵）还有另外一座宅子。他们家在伏尔西城镇韦莱特里及其周边地区（在罗马城外的阿尔班山以南）还拥有面积相当大的地产。伏尔西人曾经是罗马人的顽敌，在前4世纪被罗马征服和同化。^[3]

盖乌斯·屋大维的财富是继承来的，对罗马人来说，这是最好的财富来源。屋大维氏族是韦莱特里当地的士绅，城镇里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就是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据说，历史上曾经有一位屋大维匆匆结束了向战神玛尔斯的献祭，以便率领城镇的武士打退邻近一个社区的攻击。那肯定发生在韦莱特里被罗马征服以前，人们用这个故事来解释当地向玛尔斯献祭风俗的特点。在较晚近的前205年（对这个时期已经有了较好的史料记载），盖乌斯·屋大维的祖父在对抗汉尼拔的战争中担任罗马军队的军事保民官。战争结束后，他没有寻求政治前途，说明他和很多人一样，在共和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时毅然参军，保家卫国。^[4]

他的儿子，也就是盖乌斯·屋大维的父亲，在其漫长一生中满足于地区性政治，只在韦莱特里担任过官职。他们家原本就很富有，他通过精明的投资和银行业（放债收息，这种挣钱方式远远没有经营土

地那么体面）积攒了更多财富。多年后，马克·安东尼嘲讽他是一个肮脏的兑换钱币者，其他人则声称盖乌斯·屋大维追随了父亲的行当，以便在罗马选举时向各部落发放礼物和赤裸裸地行贿。在罗马政坛，人身攻击是家常便饭，所以对上述说法，我们不能盲目相信。就连讲了很多关于奥古斯都的污秽故事的苏埃托尼乌斯，对这个说法也表示怀疑。^[5]

盖乌斯·屋大维是一位地区性贵族和成功商人的儿子，不仅是罗马公民，还是骑士阶层的成员。骑士是罗马人口普查中地位最高的阶层。骑士身份的资格要求是，拥有价值超过4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6]的财产。不过到前1世纪，这个数字也不算特别高了，骑士的财产往往超过这个标准。在早先的世纪里，罗马军队的成员是那些足够富裕、能自备武器甲冑的人。最富有的人买得起马匹，因此能够在骑兵部队中服役。虽然骑士的军事职能已经消失（罗马军团的士兵已经改为从最贫穷的公民中招募，由国家为其提供装备），但骑士的名头保存了下来。元老身份的取得不是根据财产多寡，而是在一个人当选为行政长官或被选拔到元老院之后获得。所有的元老都必须属于骑士阶层。一共有大约600名元老，骑士有数千人，而根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罗马公民的数量约为90万。^[7]

这些年里最富有的元老可能是伟大的庞培，他在东方的军事胜利中赢得的财富使他更加富裕。他在元老院的强有力竞争对手是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庞培曾在前70年与他一同担任执政官。克拉苏有时被称为“富人”。庞培和克拉苏都曾在苏拉麾下效力。苏拉的政敌被处决后，其财产被没收，庞培和克拉苏从中捞了不少油水。克拉苏也是一位精明而活跃的生意人。他拥有一大批奴隶工匠和建筑工，以及一些受过训练的消防员。罗马经常发生火灾，克拉苏的把戏之一就是以低廉价格收购即将受到大火威胁的房屋，然后派他的奴隶去拆除房屋以制造隔离带，从而灭火。过一段时间之后，克拉苏会在买下

的地皮上重新建房然后出租。最终，罗马城的相当大一部分地产都到了他的名下。他的财产总值一度高达2亿塞斯特尔提乌斯，这足以让500人获得骑士身份。他曾说，如果一个人不能自费组建军队，就算不上富人。庞培在之前的内战中就自掏腰包组建过3个军团，并为其提供军费。[\[8\]](#).

盖乌斯·屋大维不大可能和克拉苏或庞培属于一个层次，但他应当知道克拉苏是如何运用自己的金钱的。克拉苏敛财不是为了金钱本身，而是利用他的财富达到政治目的，向很多元老提供无息贷款（或利息非常低）。据传言，元老院中的大部分人都欠克拉苏的钱。克拉苏被指控参与喀提林阴谋，但欠他钱的元老们害怕他突然要求还债，于是这事很快不了了之。他对五花八门的生意都感兴趣，与外省的包税人集团联系密切。包税人就是詹姆斯一世钦定本圣经中所谓的“税吏”，他们执行共和国所需的任务，如在各行省征税。这样的生意大多是在幕后操纵的，因为法律禁止元老参与这种生意，不过很多元老还是参与其中。克拉苏或许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位。除了金钱之外，他还拿人情做买卖。他是一位精明强干和成功的辩护律师，非常勤奋地代理其他人打官司，以便卖人情给他们。[\[9\]](#).

盖乌斯·屋大维有一个当银行家的父亲，肯定有一些显贵人士欠他的钱，或者因为之前的贷款而对他感恩戴德。所以，他很有可能继续做家族生意，因为这对他的仕途很有帮助。与很多元老不同的是，他的绝大部分财富没有被套牢在地产上，所以能随时拿出现金为自己赢得政治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就是因为他的财富，他才娶到了阿提娅作为第二任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叫安卡里娅，我们不知道这段婚姻是如何结束的，是因为她去世了，还是因为他看到有机会获得更有利的姻亲而和她离婚。对罗马精英阶层来说，婚姻是重要的政治工具。[\[10\]](#).

尤利乌斯·恺撒自己也曾与一个富裕骑士的女儿订婚。^[11]后来他让自己的一个姐姐嫁给了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此人也是一名地区性贵族，其家庭背景与屋大维氏族很类似。阿提乌斯来自阿里奇亚（在阿尔班山，距罗马城较近），相当富有，他母亲那边与庞培有亲戚关系。他的父亲显然与元老世家的千金结了婚，这有助于阿提乌斯在罗马的仕途。尤利乌斯·恺撒的另一个姐姐先后嫁给了两名这样的小士绅，他们都有着政治上的雄心，希望到罗马城从政。借助于这些联姻网络，尤利乌斯·恺撒得到了一些忠诚的盟友，他们非常乐意与这样一位血统古老的豪门贵族拉上关系，这很可能也为尤利乌斯·恺撒提供了金钱上的帮助，促进他的事业。^[12]

前62年，盖乌斯·屋大维可能四十岁出头，感到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参加下一年八名裁判官的竞选了。在罗马，从政与年龄是紧密联系的，苏拉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一点，曾以法律条文正式规定每一个官职的最低年龄要求。（关于从政或晋升体系，见附录一。）参选裁判官的人必须至少三十九岁。对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说，在规定下的最低年龄当选某职位（尤其是当上执政官）会被视为政治上很大的成就，非常值得骄傲。西塞罗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他的运气特别好，而且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也非常突出。我们没听说过盖乌斯·屋大维当过辩护律师，他的才华可能不在这个方面。^[13]

他曾两次担任军事保民官，大约在前70年代的某个时间，所以至少在政治生涯开始的时候，他曾努力去赢得军事声誉，这一般能够吸引选民的支持。每年有24名军事保民官当选，这是旧时制度的遗存，因为在过去罗马军队只有4个军团，每个军团由6名军事保民官指挥。到前1世纪的时候，通常同时存在几十个军团，所以大多数军事保民官是由行省总督挑选和任命的。我们不知道盖乌斯·屋大维曾在何地服兵役，但他既然当过两次军事保民官，每次都要至少服役一年，说明他对这个岗位还是很有热情的。在共和国更早期的历史上，任何寻求

从政的人都必须服至少十年兵役。到前1世纪，这个规矩已经松懈了很多，不过即便是毫无军人气概的西塞罗也在军中待过一段时间。为行省总督担任“帐篷伙伴”的年轻人其实就是下级参谋军官，跟随总督以积累经验。[\[14\]](#)

随后，盖乌斯·屋大维当选为罗马最低级的行政长官，即财务官，这是从政的第一个正式步骤。自苏拉改革以来，当选为财务官的人自动获得元老身份。每年有20名财务官，前73年的财务官之一是盖乌斯·托拉尼乌斯，后来盖乌斯·屋大维与他交好，所以盖乌斯·屋大维很可能也是在前73年担任财务官的。财务官的主要职责在财务方面。有的在罗马工作，有的被派去辅佐行省总督，监管行省的财务。我们不知道盖乌斯·屋大维被分配到了什么样的任务。托拉尼乌斯则率军镇压斯巴达克斯的奴隶起义，遭到惨败。[\[15\]](#)

前64年（不过这个时间也部分是猜测，虽然可能性比较大），盖乌斯·屋大维和托拉尼乌斯都担任平民市政官。每年有四名市政官，其中两人是平民市政官，两人是席位市政官。只有平民可以担任平民市政官，而平民和贵族均可担任席位市政官。市政官的职责范围很广，从组织公共节日（尤其是纪念丰收女神的刻瑞斯节和平民节庆活动），到管理罗马城内的交通和公共工程，不一而足。当市政官是吸引选民注意力的极好机会，尤其是在市政官自掏腰包来补充国家拨付的资金的情况下。节庆活动包括游行、宴饮和公共娱乐活动，如斗兽。在罗马历史的这个阶段，只有在葬礼时才能举办角斗士竞技。每年的市政官职位很少，所以它不是晋升体系中的必经级别。对托拉尼乌斯来说，当市政官有利于恢复他被奴隶起义军打败之后受损的地位。对盖乌斯·屋大维来说，这是赢得更多政治盟友并在选民面前露脸的机会。[\[16\]](#)

他的仕途没有阿提娅的舅舅那么顺利。自共和国早期以来，尤利乌斯·恺撒的家族已经远远偏离政治核心，但在他幼年时，家族的运气开始好转。家族的另外一支开始重新崛起，至少让人们再一次熟悉了恺撒这个姓氏。尤利乌斯·恺撒父亲的姐姐嫁给了深得民心的英雄马略。在如此显赫的姻亲的帮助下，尤利乌斯·恺撒的父亲轻松获得了裁判官职位，可惜后来猝死（一天早上，他在穿鞋时骤然倒下去世了），否则还能攀升更高。

尤利乌斯·恺撒本人在不到二十岁时就凭借英勇壮举获得了罗马最高荣誉——橡叶冠^[17]。根据传统，这项荣誉只授予在战斗中冒着生命危险挽救另一位公民的勇士。或许就是由于这项功绩，或许还有一些贵族的支持，他得到了特别的许可，得以比正常的最低年龄早两年担任行政长官。尤利乌斯·恺撒在法庭上非常活跃，穿着打扮和生活方式高调浮夸，执行公务时恪尽职守，自己借钱来弥补国家资金的不足。他也是一位经历丰富多彩的英雄，曾与海盗和入侵的敌军交手，并且因为与许多有夫之妇私通而成为流言蜚语的主角。当时和其他很多时代一样，对政治家来说，臭名也比默默无闻要好得多。即便如此，尤利乌斯·恺撒的政治生涯总的来讲还是很传统的。^[18]

盖乌斯·屋大维的仕途晋升比较慢，也没有恺撒那么精彩，但也算是稳步提升。竞选官职的人会正式穿上一种特别的白色托加袍（*toga candida*，意思是“纯白的托加袍”，英语中“候选人”*candidate*一词就是这么来的）。在竞选拉票时吸引大家的眼球是非常重要的。罗马没有我们今天理解的那种政党，竞选也并非是不同的政策的竞争。选民非常坦然直率地根据候选人的品格和过去的行为来选择，而不是看重候选人表达的观点。如果候选人的品行不是很显眼，罗马人民就倾向于选择名门世家的成员，因为罗马人相信，美德和才干是可以遗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因此，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和祖父曾经建功立业（或至少没有丢人现眼），那么他也一定有类似的才

华。家族先辈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网和人情恩泽对他也会有很大帮助。显贵家族紧抓一切机会去宣扬家族成员的功业。宅邸门廊会陈列象征家族往昔成就的纪念物。走进大门的人第一眼就会看到这家人祖先的半身雕像，它们展示着先辈曾经担任的官职的象征物。^[19]

屋大维氏族不是很知名。即便如此，盖乌斯·屋大维的朋友、对他抱有良好祝愿的人和求他办事的人也得每天早上来向他请安。所有元老的日常生活动都是这样，每天的开端是那些欠他们钱或者人情的人、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好处的人，以及与他们有联系或者希望与他们拉上关系的人，都会来向他们正式请安。黎明之前的几个小时里，也就是一天工作开始之时，竞选官职的候选人家里理应如此繁忙，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前64年，昆图斯·西塞罗写了一本关于竞选拉票的小册子，送给他哥哥，作为竞选执政官的建议。马尔库斯·西塞罗其实基本不需要这些建议，但这样的小册子也是一种很好的文学形式。小册子里写道，不少选民会拜访多位候选人，多处押注。昆图斯建议，候选人在有客登门时要表现出喜出望外的样子，以恭维对方，使其成为自己的真诚支持者。^[20]

对候选人来说，政治盟友自然是多多益善，拉票就是结交新朋友的机会。如昆图斯·西塞罗所说：“……在竞选期间，你能与任何人结交而不失体面。在人生的其他阶段，交朋友就没有这么轻松了。在其他时间，你若是努力与人们缔结友谊，会被人觉得是刻意逢迎谄媚。但在拉票的时候，如果你不竭尽全力去结交很多这样的人，人们就会觉得你是个糟糕的候选人。”^[21]

竞选对选民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卖个人情给候选人，支持他，让他对自己感恩戴德。表达自己对某位候选人的支持有非常显而易见的办法，其中最主要的是伴随他在广场^[22]行走。对候选人来说，在公共场合陪伴自己的人越多越好，越显赫越好，以便让世人都

知道他们之间的友谊。罗马选民倾向于支持一个看上去就非常成功的人，所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有希望获胜的一方，候选人的“粉丝团”会越来越壮大。

一位候选人在前呼后拥之下穿过城市中心时，他会遇到一些行人，所以会希望别人看到他和尽可能多的显赫人物为伍。候选人身旁会有一名受过特殊训练的奴隶，称为“指名者”。当有人走近时，指名者会向候选人小声提示来人的姓名，好让候选人以恰当的方式问候他们。若是过于明显地依赖这种辅助手段，会显得很粗俗，但小加图特立独行地公开表示自己不需要指名者的帮助，还企图禁止其他候选人使用指名者。在外界压力之下，他放弃了这种企图，指名者仍然是一位政客的核心幕僚人员。^[23]

有些重大事业，候选人若是支持它们，就能得到社会某些群体的好感。尤利乌斯·恺撒追随格拉古兄弟和其他改革家的脚步，始终赞同将国有土地分配给城市贫民和退伍军人的法案。他还在法庭和元老院积极捍卫行省居民的权益。罗马城的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元老院颁布终极议决之后，行政长官的行动是否仍然受到约束。前63年，尤利乌斯·恺撒参与了一场作秀审判，有人被指控在前100年（也就是三十七年前）的动乱期间处死犯人。这整个审判是为了表达政治立场，遵循的是非常古旧的程序，最后没有做出任何裁决就结束了。恺撒在此案中的目的不是为了否认杀死反叛共和国的公民的必要性，而是提出了质疑：这样的人在投降之后已经不再对国家构成威胁，那么是否仍然可以剥夺其接受正式审判的权利。在关于喀提林党徒的辩论中，大家争执的是同样的问题。这一年还没结束，西塞罗就因为处决喀提林党徒而遭到了攻击。^[24]

盖乌斯·屋大维不大可能深入介入这些非常有争议的事情。前62年初的几个里，喀提林的军队仍然逍遥法外，共和国受到一场长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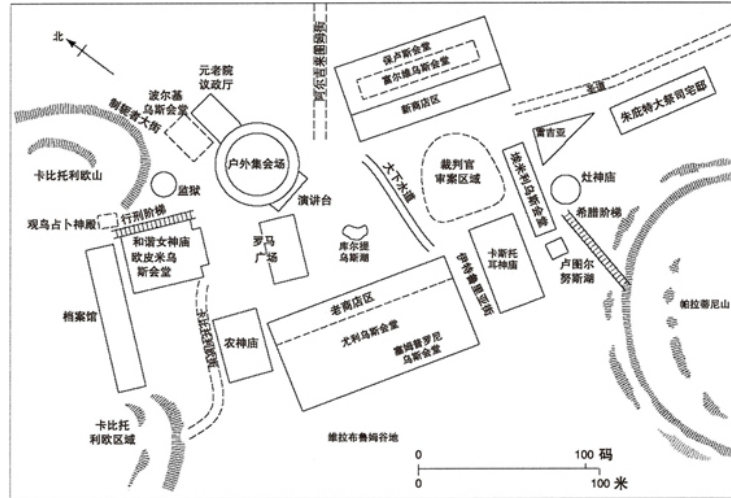
内战的威胁。后来，喀提林的支持者逐渐作鸟兽散，这场叛乱没有成气候。没过多久，喀提林叛军被一支名义上由盖乌斯·安东尼统领、实际上由他一名经验更丰富的部下指挥的政府军包围了。叛军寡不敌众，注定要灭亡。即便如此，喀提林和数千名死硬分子仍然顽抗到底，宁愿战死也不愿意投降之后被处决。[\[25\]](#)

在前62年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公众最关注的事情可能是，伟大的庞培即将结束他在东方的军事行动，返回罗马。米特里达梯六世已经死亡，战争结束了，庞培忙了几个月以重组各行省和该地区的诸盟邦，随后率领他的军队踏上了归途。没有人说得准，他们回国之后会干什么。有人担心，庞培会变成第二个苏拉。更多人不愿意看到一个拥有极大财富和威望的人继续主宰国家。庞培已经打破了罗马政界几乎所有的规则，他在内战期间征集了一支私人军队，后来又拒绝将其解散，于是元老们决定授予他合法权力，让他去镇压叛军，以防止他自己反叛共和国。前70年1月1日，他就任执政官并同时成为元老，此时仅三十六岁。在此之前，他不曾担任过任何选举产生的官职。内战期间，他热衷处死显赫的贵族，因而获得了“年轻的屠夫”的绰号。在更近期，有人控诉他偷走了其他人的荣耀，在别人指挥的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时去摘桃子。[\[26\]](#)

像克拉苏和加图这样迥然不同的元老都对庞培的成功感到怨恨。但在绝大多数人眼里，庞培是罗马最伟大的英雄。尤利乌斯·恺撒非常积极地支持有利于庞培的提案，同时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前62年初，他与一位平民保民官结交，此人建议将庞培召回，以镇压喀提林叛军。此项提议受到了强烈反对，于是这名保民官逃走了，尤利乌斯·恺撒在一个短时期内被免去了裁判官职务，直到他公开承认错误。盖乌斯·屋大维极有可能远远避开了这些波折，同时确保自己发表合适的意见，以便和他的听众保持一致。[\[27\]](#)

聪明的候选人会竭尽全力去讨好尽可能多的人。他和他的朋友需要招待和歌颂许多个人与群体，如骑士阶层、包税人、较贫困的阶层、城内各种行会社团的成员，以及各种公民大会中的投票团体。最重要的是，候选人应当表现得慷慨大方和乐于助人，尤其是要帮助自己的支持者。如昆图斯·西塞罗所说：“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诺言……而是慷慨和讨喜的好处。他们也一定会求候选人帮忙。对于你做不到的事情，就优雅地婉拒，或者更好的办法是不要拒绝。前者是好人的选择，而优秀的候选人要选择后者。只要是办得到的事情，最好尽可能多地做出承诺。因为如果你拒绝帮助别人，一定会当场激起敌意，并且让更多人敌视你……如果你直截了当地拒绝，别人会很生气。而如果你许下诺言，即便后来没有办法兑现，只要有合理的理由，别人反倒不会那么恼火。当然，你应当尽可能兑现诺言。”^[28]前1世纪和今天一样，竞选时的发誓许愿往往转瞬即逝，很难真正落实。古今的选民也一样倾向于乐观地相信政客的诺言，而忘记过去的教训。

盖乌斯·屋大维有很多钱可以款待选民，或者用礼物和放贷来维持现有的友谊，以及结交新朋友。他的家族之前的商业活动无疑也能给他拉来一些人脉，再加上尤利乌斯·恺撒这样的亲戚非常公开地支持他。人心是可以收买的，而大多数礼物或人情交易都不会违反旨在打击腐败的法律。贿选与赠礼的界限很模糊，值得注意的是，尤利乌斯·恺撒虽然一掷千金地拉拢选民，却从来没有被指控过行贿。这些事情可以用非常精细微妙的手段来处理，只有最明目张胆的行贿者才会被送上法庭。^[29]



罗马城的中心，约前63年

每年有八个裁判官职位，所以每年的二十名财务官注定有十几个人无法晋升到更高一级。不过这样的胜率还是比竞选执政官要好得多。裁判官的选举时间在执政官选举之后，由同一种公民大会，即百人会议来选出。在百人会议中，罗马公民的三十五个部落^[30]根据财产情况和古时罗马军队的结构分为若干个“百人团”。因为武装的公民群体被禁止进入罗马城的神圣边界，他们就在边界之外的战神广场聚集，在所谓的“羊圈”内投票。“羊圈”是一种围场，每个“羊圈”供一个选举单位使用。

富人的百人团总人数较少，有权先投票。选民依次走过木制过道（或称“桥梁”），将写着他们选择的候选人姓名首字母的木板放入一个篮子。每个百人团的多数意见即代表整个百人团的意见。候选人可能有机会在百人会议正式开始之前的非正式集会上向在场选民发表演讲，然后在场外的一个平台上等候和观察。每个候选人都穿着光鲜的白色托加袍。第一个获得多数百人团支持（共193个百人团，若赢得97个百人团的支持即可算作多数）的候选人就算当选了，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候选人等。选举过程很繁琐，耗时很久，有时天黑了还没

有选出八名裁判官，于是公民大会就要解散，在下一个可以执行公务的日子继续选举。^[31]

在此次选举中，盖乌斯·屋大维是第一个获得多数票的。他的岳父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很快（可能是在下一年）也将获得裁判官职位，这或许能够说明，尤利乌斯·恺撒的影响力和名望对他亲戚的仕途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裁判官在一年任期内的主要职责是审理案件。七名裁判官负责主持苏拉建立的七个法庭，而另一名裁判官则享有威望很高、职权范围广泛的“城市裁判官”^[32]称号，其权威仅次于两名执政官。盖乌斯·屋大维得到的任务是监管一个法庭。^[33]

案件审理一般在广场的高台上举行，如果案件很重要，或者很有意思，或者涉及丑闻，就会有很多群众来围观。主持法庭的裁判官端坐在他的席位上，周围有六名手执法西斯束棒的执法吏侍奉。执法吏这样的幕僚人员是职业吏员，不像裁判官是每年更换的。执法吏因为经验丰富，有时候能够对审判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主持法庭也是让群众熟悉自己的好机会，也可以借此获得更多的政治人脉。如果原告、被告、辩护律师和陪审员是元老、骑士或其他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就可以对他们以礼相待、表示同情。罗马法律体制中没有国家对某人提起公诉的概念，指控总是由普通公民提出。起诉人通常是雄心勃勃、希望扬名立威的年轻人，而辩护律师一般是更为显赫的名人。罗马元老们认为，更体面的做法是支持一位受到指控的元老（即便他的罪行铁证如山），而不是寻求结束他的政治生命。因此，司法体系也是有利于精英阶层的。很多审判都带有政治意义。对参与审判的人来说，所有审判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人情交易的途径。

前60年末，西塞罗高度赞扬了盖乌斯·屋大维作为裁判官的行为，建议弟弟昆图斯在担任亚细亚^[34]总督时效仿盖乌斯·屋大维，

因为：

……聆听时必须要有礼貌，裁决案件时必须宽大为怀。为了圆满解决争端，必须仔细辨明真相。盖乌斯·屋大维近期就是凭借这样的举动，赢得了群众的爱戴；在他的法庭上，执法吏第一次规规矩矩，没有胡乱生事，而参加庭审的另一名行政长官闭上了嘴巴，所有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发言，想讲多久都可以。或许他这么做会让人觉得太温和，但事实上他的这种温和是为了平衡这样严酷的事件：某些“苏拉党人”被强迫归还他们用暴力和恫吓手段夺走的财物；那些当官时发布不公正法令的人在辞官并成为普通公民后也不得不承受在任官员的不公。他的这种严酷若不是包裹在许多温和善意的糖衣之下，或许就让人难以接受了。[\[35\]](#)

打击那些非常贪婪或凶残的前苏拉党人的做法特别受群众欢迎，尤利乌斯·恺撒和加图在不同时期都曾支持这种做法。盖乌斯·屋大维似乎是理想化的罗马法官，对少数人严苛，而对那些有资格得到善待和理解的人，尤其是那些出身高贵、人脉很广的人，一般会宽大为怀。当一位元老无法逃避有罪的判决时，他会被允许放弃自我辩护和公民权，带着自己的大部分财富逃离罗马城，在流亡中也能过得舒舒服服。这就是为什么西塞罗不愿意对喀提林阴谋分子进行正式审判，因为他们肯定会选择流亡，而不是被处决。[\[36\]](#)

按照元老阶层的标准，盖乌斯·屋大维在裁判官任上干得不错。随着行省数量的增加，大多数裁判官在卸任后都会担任一段时间的行省总督。具体的职位由元老院挑选，然后用抽签方式分配到个人。盖乌斯·屋大维获得了富饶且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马其顿行省，以及资深执政官的衔级。资深执政官和资深裁判官不是直接由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元老院赋予军权[\[37\]](#)。在前往马其顿途中，盖乌斯·屋大维奉命去镇压图里地区（意大利南部的塔兰托附近）一群为非作歹的匪徒。苏埃托尼乌斯说，这些匪徒部分是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的幸存者，部分是喀提林叛军的掉队士兵。盖乌斯·屋大维很快就驱散了这群匪徒。[\[38\]](#)

行省总督有很多捞油水的机会，大多数罗马人都把在海外服务和中饱私囊联系在一起。大约在这个时期，诗人卡图卢斯声称，他从比提尼亚^[39]总督幕僚的官职卸任回国后，一位朋友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捞了多少？”一位臭名昭著的西西里岛总督曾发表如下妙论：当官要当三年才行，第一年捞到足够的钱偿还债务，第二年发大财，第三年攒够足够的钱去贿赂法官和陪审团，以保证自己返回罗马后若被以贪赃枉法罪名起诉（这样的起诉是避免不了的），能逃脱法律制裁。大多数行省总督不会这么明目张胆，但资深执政官在其行省内拥有最高军权和司法权，总会有很多人希望得到他的善意。行省总督只有维持自己开销的津贴和人数不多的幕僚，而没有薪金。^[40]

盖乌斯·屋大维在行省总督任上的品行又一次赢得了其他元老的赞许。在他治下，马其顿行省内部安定，而边境上与培西人和其他色雷斯民族的冲突给了他获得军事荣誉的机会。他打赢了一场战役后，热情洋溢的士兵们赞誉他为凯旋将军。若希望从元老院那里获得凯旋式的荣耀，得到士兵们的如此赞誉是必需的步骤。法律规定，若要获得凯旋式资格，胜利的规模必须非常宏大，至少杀敌5000人，但实际上很少有人会真的去准确计算这个数字。一个人能否获得凯旋式的荣誉，往往取决于他在元老院的朋友的影响力。^[41]

盖乌斯·屋大维的仕途一帆风顺，若能获得凯旋式的荣誉，必然有助于竞选执政官。尤利乌斯·恺撒在政坛的进展也很顺风顺水，担任了前59年执政官。他外甥女的丈夫也大有希望很快步其后尘，登上最高行政长官的位子。然而，在从马其顿返回罗马的途中，盖乌斯·屋大维病倒了，后来在位于诺拉的自家宅邸去世。^[42]

^[1] Velleius Paterculus 2.59.1-2 (Loeb translation).

^[2] 古典时代的殖民地大多是与母邦（metropolis，英语中“大都市”一词即来源于此）领土不接壤的海外殖民城邦的形式。殖民城市与母邦之间的联系十

分紧密，但与近代的殖民主义不同的是，这种联系并不以母邦直接控制殖民城市的形式存在。母邦与殖民地也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罗马的殖民地起初是在征服的外国领土上建立的居民点，或安置退伍军人的定居点，后来有的发展为地位很高的城市。

[3] Suetonius, *Augustus* 3, 5, Velleius Paterculus 2.59.1-2, Dio 45.1.1, Tacitus, *Ann.* 1.9; 关于他的财富，见I. Shatzman, *Senatorial Wealth and Roman Politics. Collection Latomus Vol.142* (1975), p.387, 包括692 and 693, 概况见E. Rawson, 'The Ciceronian Aristocracy and its Properties', in M. I. Finley (ed.), *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 (1976), pp.85-102; 帕拉丁山东北侧的考古发掘显示，这里有一座贵族宅邸，前2世纪和前1世纪有人居住，并曾翻新过，后来在尼禄的大火中被毁，可能就是屋大维曾拥有的房子，见J. Patterson, 'The City of Rome Revisited: From Mid-Republic to Mid-Empire', *JRS* 100 (2010), pp.210-32, 尤见. p.223fn.112, 还提及了意大利在该地区的近期考古发掘。

[4] Suetonius, *Augustus* 1.2.2.

[5] Suetonius, *Augustus* 2.3-3.1, Appian, *BC* 3.23; 一位银行家的记账单上出现了C. Octavius的名字，这可能就是盖乌斯·屋大维的父亲。关于元老参与借贷，见I. Shatzman, *Senatorial Wealth and Roman Politics. Collection Latomus Vol.142* (1975), pp.75-9。

[6] 塞斯特尔提乌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是一种小银币，在帝国时期是一种较大的铜币。

[7] Livy, *Pers.* 98说前70~前69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是90万人，但其他史料的数字比这多1万人，见E. Lo Cascio, 'The Size of the Roman Population: Beloch and the Meaning of the Augustan Census Figures', *JRS* 84 (1994), pp.23-40。古代人口的总数仍然是非常有争议的。

[8] Plutarch, *Crassus* 2讲到，克拉苏说只有有能力组建一支军队的人才算富人；他的产业，见Pliny, *NH* 33.134, 不过Plutarch, *Crassus* 2 的估计数字要略微低一些，见I. Shatzman, *Senatorial Wealth and Roman Politics. Collection Latomus Vol.142* (1975), pp.375-8, 庞培见pp.389-93。关于他们的职业生涯，见A. Ward, *Marcus Crassus and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1977) , P.Greenhalgh, *Pompey: The Roman Alexander* (1980) 以及R.Seager, *Pompey the Great.A Political Biography* (2nd edn, 2002) 。

[9]. 关于克拉苏如何花钱, 见Plutarch, *Crassus* 2-3; 关于欠他债的元老, 见Sallust, *Bell. Cat.* 48.5-6; 关于包税人, 见E.Badian, *Publicans and Sinners* (1972) 。

[10]. Suetonius, *Augustus* 4.1.

[11]. 尤利乌斯·恺撒的这门婚姻是父母包办的, 未婚妻是一个叫科苏提娅的女子, 她的父亲属于骑士阶层, 而非元老。她的家庭非常富裕, 无疑会给恺撒带来一大笔嫁妆, 这些钱肯定能帮助他踏上从政之路, 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好处了。恺撒和科苏提娅可能已经结婚了, 而不是仅仅处于订婚状态, 因为苏埃托尼乌斯的措辞的意思是, 两人离了婚, 而普鲁塔克显然将科苏提娅算作恺撒的妻子之一。两人年纪尚小, 因此不大可能已经正式结婚。不管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都算是一刀两断了。

[12].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112; 与庞培的关系, 见Suetonius, *Augustus* 4.1。

[13]. 他的年龄是猜测的, 但有一定根据: 他于前73年和盖乌斯·托拉尼乌斯一同担任裁判官, 他们也曾同年担任平民市政官, 见*ILS* 47。但托拉尼乌斯曾被斯巴达克斯打败过 (Sallust, *Hist.* 3.46M, Florus 2.8.5) , 所以他的政治前程可能进展得比较慢, 他和屋大维是在较晚阶段成为同僚的。证据见Broughton, *MRR* 2, p.110。

[14]. 盖乌斯·屋大维的政治生涯, 见*ILS* 47; 该时期的军团数量, 见P.Brunet,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1971) , pp.446-72, 估计前80年的军团总数最低, 为13个; 前71~前70年最高, 为39个。

[15]. 关于裁判官, 见A.Lintot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99) , pp.133-7; 关于时间, 见注释9; 关于托拉尼乌斯和斯巴达克斯, 见Sallust, *Hist.* 3.46M, Florus 2.8.5。

[16]. A.Lintot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99) , pp.129-33.

[17] 严格地讲，橡叶冠并非表彰军人英勇壮举的最高荣誉，比它更高的是禾草冠（corona graminea）。禾草冠只会颁授给直接挽救整个军团或全军的将军、指挥官或其他军官。禾草冠是以在战场上采集的禾草、花卉、野草和各种谷物等植物编织而成的。不过，普通士兵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确实是橡叶冠。

[18] 近期出版的对恺撒早期生涯的精彩介绍，见E.Gruen，‘Caesar as a politician’，in M.Griffin (ed.)，*A Companion to Julius Caesar* (2009)，pp.23-36，也见L.Taylor，‘The Rise of Julius Caesar’，*Greece and Rome* 4 (1957)，pp.10-18，及M.Gelzer，*Caesar Politician and Statesman* (1968)，p.22，概况见A.Goldsworthy，*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pp.82-151 = (2007)，pp.61-183，和R.Billows，*Julius Caesar: The Colossus of Rome* (2009)，pp.56-110，他强调恺撒始终站在民众事业一边。关于橡叶冠，见Gellius，*NA* 5.6.13-14，Pliny *NH* 16.12-13，讨论见V.Maxfield，*The Military Decorations of the Roman Army* (1981)，pp.70-74，119-20。

[19] 关于候选人和一般的选举过程，见L.Taylor，*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 (1949)，尤见pp.50-75，和*Roman Voting Assemblies: 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 (1966)，尤见pp.78-106，A.Lintott，‘Electoral Bribery in the Roman Republic’，*JRS* 80 (1990)，pp.1-16，F.Millar，*The Crowd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1998)，H.Mouritsen，*Plebs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2001)，尤见pp.63-89，A.Yakobson，‘*Petitio et Largitio*: 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the centuriate assembly of the Late Republic’，*JRS* 8 (1992)，pp.32-52。

[20] Q.Cicero，*Handbook on Electioneering* 35。学界的共识是，昆图斯·西塞罗就是本书的作者。他的文学创作很多，虽然很少保存到今天。在高卢与尤利乌斯·恺撒一同征战时，他告诉兄长，他仅仅十六天内就写了四部悲剧。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3.5| 6.8。

[21] Q.Cicero，*Handbook on Electioneering* 25-6 (Loeb translation)。

[22] 广场（Forum）是古罗马的城市中心，呈长方形，周围是罗马一些最古老与最重要的建筑。它是罗马公共生活的中心：不仅是凯旋式游行、选举、公共

演讲、罪案审判、角斗士竞技的场所，也是商业中心。广场及周边有纪念伟人的雕像和纪念碑。

[23] 见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8.2; 见Q.Cicero, *Handbook on Electioneering* 41-2讲到候选人记住别人名字的重要性，即便需要提醒，也要表现得自然。

[24] 关于恺撒的立场，见A.Goldsworthy, *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 pp.119-45，尤见pp.121-4讲到拉比里乌斯·波斯图穆斯的审判。R.Billows, *Julius Caesar: The Colossus of Rome* (2009), pp.56-110强调恺撒始终支持民众事业是他成功的部分原因。

[25] Sallust, *Bell. Cat.* 60.7-61.4.

[26] 庞培政治生涯的概述，见A.Goldsworthy, *In the Name of Rome* (2004), pp.152-80，具体内容见R.Seager, *Pompey the Great. A Political Biography* (2nd edn, 2002), pp.20-38; 他的绰号，见Valerius Maximus 6.2.8。

[27] Suetonius, *Caesar* 15, Dio 37.43.1-4, 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26.1-29.2.

[28] Q.Cicero, *Handbook on Electioneering* 45, 47-8 (Loeb translation) .

[29] R.Billows, *Julius Caesar: The Colossus of Rome* (2009), pp.104-5非常精彩地论证了这一点。

[30] 分为四个城市部落和三十一乡村部落。

[31] 讨论见L.Ross Taylor, *Roman Voting Assemblies* (1966), pp.84-106。

[32] 城市裁判官与其他裁判官的区别是，一般裁判官往往被外派，而城市裁判官则留在罗马城，负责处理司法工作。

[33] Velleius Paterculus 2.59.2讲到在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with E.Gruen, *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74), pp.118-19。

[34] 亚细亚行省在今天土耳其的西部沿海地区。今日“亚洲”的名称即从该省的名称而来。

[35] Cicero, *ad Quintum Fratrem* 1.21 (Loeb translation) .

[36] Suetonius, *Caesar* 11, Dio 37.10.1-3, 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17.4-5.

[37] 大多数资深的行政长官在任职一年后会被派遣出去，治理一个行省。执政官或裁判官掌握军政大权的时间可以延长，每次可以延长一年，那时他们就被称为资深执政官（proconsul）或资深裁判官（propraetor）。

[38] Suetonius, *Augustus* 3.1.

[39] 位于现代土耳其的北部海岸。

[40] Catullus 10; Cicero, *Verrines* 1.40.

[41] Suetonius, *Augustus* 3.2, 94.5, Velleius Paterculus 2.59.2, *ILS* 47; 关于杀敌5000的要求，见Valerius Maximus 2.8.1，讨论见 J. Richardson, ‘The triumph, the praetors and the Senate in the early second century BC’ , *JRS* 65 (1976) , pp.50-63, 尤见61-2。

[42] Tacitus *Ann*, 1.9, Cicero, *Philippics* 3.15与E. Gruen, *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74) , p.143, fn.96。

三 尤利乌斯和恺撒担任执政官

“如果他（恺撒）想当执政官，但还保留自己的军队，怎么办？”另外一人问道。庞培温和地答道：“如果我的儿子想用棍棒打我，怎么办？”这些话让大家怀疑，庞培正在和恺撒争吵。

——凯利乌斯·鲁弗斯给西塞罗的信，前51年10月^[1]。

父亲去世时，小屋大维年仅四岁。盖乌斯·屋大维的绝大部分家产都传给了他的独生子。家族财产的用途是支持子孙的政治事业。贵族的婚姻通常是为了获得政治上或财政上的好处，离婚和再婚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尤利乌斯·恺撒很年轻时就订过婚，后来结过三次婚。庞培结过四次婚。阿提娅嫁给盖乌斯·屋大维时没有改用丈夫的姓氏，她自己的财产与丈夫的家产也是分开的。除了嫁妆之外，她名下的财产都由她父亲掌管。妻子是很少继承丈夫的财产的，一般来讲是孩子，尤其是儿子，成为父亲财产的主要继承人。

遗嘱会指定监护人来监管男孩的财产，直到他成年。监护人之一是盖乌斯·托拉尼乌斯，他曾与小屋大维的父亲一同担任市政官，或许也曾一起担任过财务官。为了保护遗产（理想情况当然是以财生财），需要对财产进行管理和投资。托拉尼乌斯后来被指控侵吞了盖乌斯·屋大维的很大一部分财产。当然这可能是管理或投资不善导致的，而不是刻意侵吞，不过屋大维长大成人之后可不会这么想，他会^[2]对托拉尼乌斯加以残酷的报复。

阿提娅对她父亲来说是很重要的资产。她还很年轻，可能只有二十多岁，还能生养更多儿女，如果她不再嫁，就显得不正常了。罗马法律规定寡妇或离异女性必须等待十个月才能再嫁，这是为了明确她在后一段婚姻中所生孩子的血统。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与

尤利乌斯·恺撒的姐姐结婚，以及和盖乌斯·屋大维结亲，得到了不少好处。但这并不是说他不可以与其他贵族家系攀亲，以获得新的人脉。阿提娅再嫁了，她的新丈夫是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普斯，他后来当上了前56年执政官。菲利普斯不是尤利乌斯·恺撒的朋友，但他的家族是豪门世家，在政治上很成功，并且与阿提娅结婚能够带来一大笔金钱，这对双方都算是很好的亲事。菲利普斯已经有了一个开始仕途的成年儿子，还有一个女儿，但如果他希望从新的婚姻中得到更多孩子，就要失望了。^[3]

屋大维没有和母亲一起去她的新家，他（或许还有他的姐姐）搬去和阿提娅的父母一起生活。外祖父母承担了监督这对姐弟成长与早期教育的责任。过了一段时间，除了照料他们的保姆之外，外祖父母还雇用了一名教师。屋大维的主要仆人名叫斯法埃鲁斯。教师一般是一名希腊奴隶，他的部分任务就是向孩子传授希腊语和拉丁语。前1世纪的罗马贵族能够熟练掌握这两种语言。除了读书写字和基本算术之外，孩子们还要学习罗马共和国的风俗与历史。正如西塞罗所说：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不是通过一种历史的观念与先人联系在一起，那还算是什么生命？”对于更宽泛的国家历史，人们往往主要宣扬自己家族祖先的事迹。阿提娅会确保屋大维继承尤利乌斯氏族，尤其是恺撒家族的伟大功业和古老血脉，无疑也会向孩子灌输盖乌斯·屋大维家族的历史，尽管它没有恺撒家族那样光辉灿烂，但也值得骄傲。多年后，屋大维仅简单地说屋大维家族是“一个古老而富裕的骑士家族”，并没有详细叙述。^[4]

“三个头的怪兽”

前62年底，伟大的庞培率军返回了罗马。此前，他从公民大会那里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极大权力和丰富资源，他取得的胜利令先前罗马将军们的成就黯然失色。庞培为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凭借经验

和组织规划天才，先是扫荡了地中海的海盗，最后彻底击败了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并全面重组了近东格局。很多元老怀疑，这样一个惯于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人，现在能否满足于仅当一个普通元老。很多人担心他会利用手中的军队主宰共和国，就像当年的苏拉一样。^[5]

庞培不是苏拉，何况此时的局势与当年截然不同。苏拉结束与米特里达梯六世的战争回国后，发现他的罗马政敌已经举兵反对他，因此，他还要继续进行未结束的内战。前62年，庞培做了一个大气的姿态以安抚人们的恐惧。他刚刚抵达意大利就解散了军队。罗马的政治气氛发生了变化，人们松了一口气，后来又感到伟大的征服者现在处于脆弱的状态。庞培不再拥有官方权力，也不掌握军队，尽管他还在城市的正式边界之外保留着自己的军权，以等待庆祝他的凯旋式。他现在能够依赖的只有财富、本领和罗马人称为“威望”

（*auctoritas*）的那种无形之物。英语里的*authority*（权威）一词不能准确地表达*auctoritas*的含义。“威望”既包含了地位，也包含一个人及其家族凭借其成就与人脉而理所应当享有的尊重。说得简单些，“威望”其实就是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6]

没有人会怀疑庞培的重要性，也没有人在财富或政治人脉上能够超过他，但他并不能独占这些东西，还有很多人也拥有突出的财富和人脉，虽然没有他那么强。庞培在整个青年时代和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南征北战。他对政界的日常运转、政治上的人情交易和运用，几乎没有任何经验。除此之外，他渴望得到群众的颂扬和其他元老发自内心的认可。在这些心愿得不到满足时，他很难摆正自己的心态。在实践层面上，庞培有三个目标：第一个也是最简单的目标是，获得庆祝凯旋式并在城市中心宣扬自己成就的权利；第二个目标是让他对东方各行省和王国的重组获得批准，让他的所有决策得到元老院

的确认；最后的目标是通过一项法案，为他的退伍老兵分配土地，让他们在农场上安顿下来，以便将来供养自己和家人。

这对国家都是好事。庞培在东方所做的安排是很理智的，得到批准之后，其中很多条款的效力维持了几个世纪。军团士兵们英勇作战，取得了胜利，但共和国给他们的军饷少得可怜。现在军队不再需要他们，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活都难以为继。的确，庞培这么做会得到退伍军人的感激，以及他们未来的投票支持，让原本就有义务支持他的门客数量大大增加。这一代的罗马贵族认为，若是其他人获得了极大威望，就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还有很多人对庞培心怀不满，因为他们记得自己的亲戚就是被这位年轻的屠夫处死的。^[7]

庞培奋斗一番之后才得到了自己的凯旋式。这是他的第三次凯旋式，场面极其宏伟壮丽，强调了他史无前例、规模庞大的功业。士兵们列队行进，队伍中有成群的俘虏和大量的花车。花车上载着战利品、记录历次征服的清单和展示作战场景的图画。庞培本人则乘坐一辆战车，身穿凯旋将军的紫袍，戴着月桂花环，脸涂成红色，模仿“至善至伟朱庇特”（罗马的主神）的古老赤陶塑像的颜色。这一天，凯旋将军扮演着神的角色。随后的岁月会非常清楚地表明，面对群起而攻之的政敌，影响力和财富都不是万能的，都是有局限的。作为普通公民，庞培没有政治权力，也不能传唤元老院开会或者向公民大会提交法案。在前61年和前60年，他支持自己的两名老部下当上了执政官。但这两人的政治才干非常有限，很快就被各自的同僚阻挠或边缘化了。

加图在挫败庞培的行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还有其他很多门阀世家子弟暂时停止了他们之间惯常的争斗，希望联手推翻伟大的英雄庞培。这些人喜欢自称为“好人”或“贵人”，他们口中标榜的自由和共和国仅仅代表着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他们宁愿让问题得不到解

决，也不愿看到自己的竞争对手凭借解决这些问题而获得莫大声望。这必然导致政界核心具有极大惰性。没有一项旨在向退伍军人（或其他贫困公民）授予土地的法案通过并成为法律，而庞培对东方的安排仍然留待元老院批准。各行省和同盟王国的统治者与各社区进退两难，不知道庞培给他们的权力能否维持下去。

克拉苏也参加了许多针对庞培的攻击，但很快就和庞培一样受到了挫折。好几个重要的包税人公司为了获得在亚细亚和东方其他行省征税的权限，向元老院做了过高的承诺，导致现在无法承担自己的开支。他们希望减少上缴国库的金额。克拉苏或许在这桩生意中也有投资，而且肯定与主要的包税人联系紧密。尽管他有很多欠他人情的政治盟友，但此事在元老院提出之后，还是遭到了阻挠。^[8]

若是仅仅从庞培、克拉苏及其对手的角度来解读这一时期，就大错特错了。每年的各项选举仍然非常火热，常出现贿选和恫吓的情况，而法庭上也继续开展着受政治驱动的斗争。前61～前60年，尤利乌斯·恺撒担任外西班牙行省总督。在上任之前，一些债主要求他立刻偿清巨额债务，他险些未能启程。克拉苏干预了此事，帮他还了一些债务，并为剩余债务担保。外西班牙的一场叛乱给了这位新总督发动一场战争、获得荣誉与大批战利品的机会。尤利乌斯·恺撒返回罗马时，已经改善了他的财务状况，并获得了庆祝凯旋式的机会。

他决心乘胜追击，赢得前59年的执政官席位，也就是以法律许可的最低年龄当上执政官。为了参加选举，他必须亲自到罗马城内宣布自己要参选。他请求破例允许他不亲自到场也可获得参选资格。元老院开会讨论了此事，主持人征求加图的意见时，他絮絮叨叨地讲个不停，直到辩论时间耗尽，会议不得不在未投票的情况下结束。元老院不可在天黑之后继续辩论，所以任何在白天不能决定的事情都必须放弃。这是加图惯用的伎俩，也是他较年轻时就成为元老院重要人物

的原因之一。但这一次他的成功转瞬即逝。尤利乌斯·恺撒进了城，宣布了自己的候选人身份，尽管这意味着他必须解散军队、放弃凯旋式。[\[9\]](#)

加图对尤利乌斯·恺撒之所以咬牙切齿，部分原因是个人憎恶。另外，加图的同母异父姐姐塞维利娅与尤利乌斯·恺撒有着长期私情关系；加图自己的女婿马尔库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毕布路斯（年龄比岳父大）也在竞选执政官。加图或许希望确保毕布路斯当选，并且让一个不像恺撒那样高调浮夸的人成为毕布路斯的同僚。加图或许还希望尤利乌斯·恺撒此次竞选失败并彻底垮台，就像喀提林那样。如果他这么想，就严重误判了形势，所有候选人都一掷千金地拉拢人心。最后尤利乌斯·恺撒轻松以第一名当选，毕布路斯勉强当选，成为恺撒的同僚。[\[10\]](#)

这都是公开的局面。在幕后，尤利乌斯·恺撒与克拉苏和庞培缔结了盟约，说服他们相信，只有搁置敌意，一起合作，并借助恺撒的力量，他们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恺撒还想将西塞罗拉拢为类似的亲密盟友，但没能说服他。现代学者将罗马最富有的两个人和最雄心勃勃的新来者组成的联盟称为“前三头同盟”。当时这还只是秘密协定，前59年才渐渐为公众所知。[\[11\]](#)

1月，尤利乌斯·恺撒上任之后，便向元老院提交了一份土地法案。法案的措辞很温和，他的态度也是欢迎和解的。他宣布，只要是合理的批评，都可以接受，愿意修改任何条款。他已经颁布法令，要求将元老院辩论的内容公开发表，让公众了解元老们的立场。只有加图愿意让自己的顽固反对意见被记录在案。他很快开始故伎重施，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尤利乌斯·恺撒大发雷霆，命令执法吏带走加图。但加图很擅长将自己打扮为被暴君侵害的受害者。至少有一名元老和

他一起离去，宣布自己宁愿和加图一起坐牢，也不愿意和恺撒待在一起。会议没有投票表决就结束了。[\[12\]](#)

加图、毕布路斯和他们的支持者抓住一切机会阻挠尤利乌斯·恺撒，不断滋生事端。他们的主要目标倒不是阻止他，而是迫使他采取越来越激进的手段，以便让人们对他行为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公民大会通过了尤利乌斯·恺撒的土地法案，于是庞培的老兵得到了农场。几个月后，又通过了第二项土地法案，对前一项加以补充，将更多公有土地分配给退伍军人和两万名至少有三个孩子的男性城市贫民。政府指派了二十名专员来监督土地分配工作，其中之一是阿提娅的父亲。庞培在东方所做的安排也终于全部得到了批准。大约在同一时期，包税人如愿以偿，得到了退税，不过当局在这么帮助他们的同时也警告他们将来要好自为之。[\[13\]](#)

尤利乌斯·恺撒越来越依赖公共集会和公民大会来通过立法，于是庞培和克拉苏对他的支持渐渐公开化了。斗争双方都使用了众多打手和恫吓手段，但前三头同盟的支持者更多，组织得也更好。在一次关于土地法案的公共集会上，毕布路斯的执法吏携带的法西斯束棒被打得粉碎，他自己被泼了一篮粪便。此后，毕布路斯退隐回家，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出现在公共场合。他宣称自己在观测天象，寻找征兆，并且经常看到空中有闪电。如果一位主持公务的行政长官看到闪电（朱庇特发出的征兆），公务就要中止。但观测者必须亲自到集会或公民大会宣布凶兆，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待在家里。然而，他的这些做法足以让人们对这一年的立法产生不确定性。[\[14\]](#)

庞培从东方返回后，曾与加图接触，希望与他的一个外甥女结婚，但遭到了傲慢的拒绝。庞培随后娶了尤利乌斯·恺撒的女儿尤利娅，这就公开证实了他与恺撒的盟友关系。尤利娅的父亲比庞培小六岁，虽然老夫少妻年龄差距很大，但这是一门成功的婚姻，年纪较大

的庞培享受着年轻貌美的新娘的赞美与崇拜。世人皆知，克拉苏和庞培都是雄心勃勃的执政官的盟友，人们开始谈及所谓“三个头的怪兽”主宰了国家。也有人开玩笑说，这一年的执政官是“尤利乌斯和恺撒”，因为毕布路斯不肯抛头露面，也没有尝试颁布任何法律或者开展自己的工作。除了观测天象之外，他还忙于撰写恶言诽谤的小册子攻击同僚，并将这些文件张挂在广场，供大家阅读。其他人也对尤利乌斯·恺撒恶言攻击，称他为“所有女人的丈夫，所有男人的妻子”，因为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说他曾被年迈的比提尼亚国王引诱，充当他的男宠。^[15]

这个旧闻又被重新提起。庞培、克拉苏和尤利乌斯·恺撒联合起来足以让任何法案得以通过，尽管有时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不管批评他们的人如何渲染，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控制公共事务的所有方面。他们确保前58年的两名执政官成为他们的朋友，其中之一是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即尤利乌斯·恺撒的新岳父。但前三头同盟无法阻止更多的政敌占据其他行政长官职位，也没有办法长期控制选举。这一年年底，尤利乌斯·恺撒离开罗马城，去担任行省总督，任期五年，这给了他一个机会去赢得荣誉和足够的金钱来还债和发大财。一位平民保民官在公民大会提出法案，将内高卢^[16]和伊利里亚^[17]行省交给了他。外高卢总督去世后，庞培建议元老院将这个行省也交给尤利乌斯·恺撒，于是后者通过元老院的法令获得了第三个行省。^[18]

“是他们想要这样的”

除了正式的书本教育之外，元老子弟还要通过观察长辈来学习。从七岁开始，男孩便要在父亲（或另一名男性亲属）处理事务时跟随左右，观察长辈如何接见每天登门拜访的门客并与其打招呼，跟着长辈走过广场，参加元老院会议。男孩不能进入元老院议政厅，但

议政厅大门敞开，他们可以在室外旁听。他们还要在战神广场上、在众目睽睽之下锻炼身体，渐渐学会骑马、投掷标枪和用盾牌与剑格斗。因此，从很小的时候，年龄相仿的男孩们就待在一起，他们将来会成为争夺官职的对手，或者同僚。

我们不知道阿提娅的父亲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是在何时去世的。据我们所知，他担任过的最后一个职位是前59年的土地分配专员。或许小屋大维就在外祖父阿提乌斯·巴尔布斯的最后几年中伴随在他身旁，学习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我们对此没有直接的证据。屋大维的舅公尤利乌斯·恺撒只是个遥远的存在，因为他在随后十年中将远离罗马城。在开始观察政治生活的大约同一时期，男孩们还开始接受一名语法教师（传授文学和语言）的教育。当时罗马大约有二十家学校，经济条件足够好的家长可以把孩子送去上学。非常富裕的家庭一般雇用一位家庭教师，不过通常会允许亲友或门客的子女与自己的孩子一起上课。在受教育的某个阶段，屋大维开始缔结一些将会延续终生的友谊。^[19]

罗马的青少年要学习阅读和背诵拉丁文与希腊文古典著作，以便对其加以评论和引用。孩子们还要死记硬背地学习一些东西，比如十二铜表法^[20]，即罗马法律的古老根基。但最有助于男孩成长的，是对共和国运作与元老私人事务的观察学习。对女孩来说，则是观察母亲如何执掌家务。在前50年代，观察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对人很少有什么教诲作用。尤利乌斯·恺撒不再在罗马担任执政官，庞培和克拉苏又重新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但与尤利乌斯·恺撒担任高级行政长官时相比，他们对日常事务的控制力下降了许多。大多数其他元老的影响力比不上这两位伟人，但有些元老拥有足够的力量办成一些事情。与庞培、克拉苏或尤利乌斯·恺撒没有任何关系的政治竞争仍然在激烈地开展着。

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喀是一位富有领袖魅力、活跃好动且意志坚定的政治家，他成了这十年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姓氏原本是克劳狄·普尔喀，然而他很早就改用了较为平民化的拼法——克洛狄乌斯。但是他骨子里始终是个贵族，带着延续数百年的古老门阀贵族的那种高度自信。“普尔喀”这个家族名的意思是“美丽”，很能体现他们眼中的自己。克劳狄氏族以绝对自信和盛气凌人而闻名。在反对迦太基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有一位克劳狄·普尔喀率领了一支罗马舰队。在战前举行的占卜仪式上，如果圣鸡吃掉食料，就说明诸神支持罗马人，对迦太基舰队的进攻就会得胜。但圣鸡不配合，让他非常不耐烦。最后他抓起圣鸡的笼子，将它们从自己的旗舰上抛入大海，并喊道：“如果圣鸡不肯吃，那就喝吧！”罗马人随后发动了进攻，遭受了与迦太基的漫长战争史上最惨重的一次海战失败。几年后，克劳狄·普尔喀的妹妹坐轿子穿过拥挤的罗马街巷时，受到来往人群的阻碍，于是她大声说，希望“她哥哥能把这些穷鬼多淹死一些”，别挡着她的路。她因此遭到了起诉。^[21]

克洛狄乌斯比他的祖先更懂得民意，但在说话做事时同样肆无忌惮、毫无克制。作为贵族，他不能担任保民官，于是努力了好几次，想把自己的身份变为平民。克洛狄乌斯对西塞罗的极度憎恨是世人皆知的。前59年，当演说家公开批评前三头同盟时，克洛狄乌斯几乎马上就做出回应。几个小时后，执政官尤利乌斯·恺撒和观鸟占卜师庞培就主持了一场仪式，安排一位年纪比克洛狄乌斯还小的平民“收养”他为义子，于是将他的身份从贵族改为平民。整个仪式完全是象征意义的，颇有滑稽闹剧的意味，但在技术上是合法的。克洛狄乌斯在其他方面仍然是个彻头彻尾的贵族，拥有一大群门客和支持自己的政治盟友，于是轻松当选保民官。很多政治家都曾利用成群的打手来威吓，甚至攻击自己的竞争对手。克洛狄乌斯将这种活动提升到了一个新层次，将传统的行会社团作为有组织帮会的基础。他的对手将他

的支持者斥责为乌合之众，不过他的很多打手是商店业主和手工艺人，有不少是释奴（毕竟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释奴）。[22].

西塞罗很快遭到克洛狄乌斯的攻击，主要涉及他处死喀提林党人的事情。几个月后，西塞罗众叛亲离，不得不开始流亡。克洛狄乌斯不是尤利乌斯·恺撒、克拉苏或任何人的工具，他和这些人合作仅仅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很快，他就威胁要质疑前59年各项法案的合法性，他的打手还开始攻击庞培，于是共和国的这位大英雄在一段时间内都不敢走出家门。后来，一位叫作米罗的元老招募了支持者，其中很多是角斗士，与克洛狄乌斯的党徒争夺街道和公共场所。政治暴力愈演愈烈，贿选上升到更严重的层次。[23].

克拉苏与庞培的旧日嫌隙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在一段时间内前三头同盟似乎要瓦解了。前三头匆匆进行了一系列谈判，最后在内高卢的卢卡（因为尤利乌斯·恺撒不能离开他的行省）商谈，终于消除了矛盾。庞培和克拉苏一同参加竞选，当选为前55年执政官，这是他们第二次成为同僚。两人都为自己一年任期结束之后的去向做好了安排，各自以资深执政官身份担任特别行省总督。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尤利乌斯·恺撒在高卢和伊利里亚行省的任期延长了五年。克拉苏卸去执政官职务后当上了叙利亚总督，从一开始就打算进攻帕提亚[24]，这是东方最后一个还没有被罗马控制的大国。庞培则得到了西班牙的两个行省和驻扎在那里的军队，但始终没有去那里上任。他待在位于阿尔班山的自家别墅，也就是在罗马城的正式边界之外，所以他保留着军权。他派遣军团长（罗马总督的下属，凭借总督委派的军权，可以独立指挥）管理两个行省，若有需要，他随时都有军队可以动用。[25].

达成这一切的过程中，始终伴有暴力冲突，选举时的暴乱几乎司空见惯，有人为此丧命的情况越来越多。有一次，庞培回家时浑身溅

上了别人的血，令他的妻子尤利娅受到惊吓，导致流产。前三头同盟仍然无法阻止常常敌视他们、思想独立的元老在将来获得高级官职。克拉苏离开罗马城去行省上任时，一名保民官不断骚扰他，严正呼吁神祇诅咒这位资深执政官以及他筹划的非正义战争。在大多数元老的脑子里，私人仇隙远比共和国福祉重要。^[26]

这诅咒果然发生了效力，或者是克拉苏太粗心让他的远征酿成了灾难。前53年，他的军队被阻挡于卡莱^[27]，在企图逃跑时被迅捷的帕提亚骑兵击溃，只有少量残兵败将逃出，大部分人阵亡或被俘。克拉苏与敌人谈判时被斩首。他的死亡严重削弱了庞培与尤利乌斯·恺撒之间的联盟。大约同一时间他们还遭遇了更大的打击，尤利娅因难产而死。她的父亲匆匆提议让庞培娶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庞培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很快，屋大维娅嫁给了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他是威望最高的平民豪门之一的成员，他不是尤利乌斯·恺撒的朋友，尤利乌斯·恺撒应当没有参与安排这门婚事。不过从政治角度来看，这门婚事对女孩的近亲非常有利。阿提娅的丈夫菲利普斯是前56年的执政官，马凯鲁斯则将在前50年赢得这个官职。^[28]

克洛狄乌斯和米罗继续争斗，其他领导人也在互相竞争，虽然斗得没有那么凶。政坛非常动荡，以至于前53年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位执政官当选，直到夏季才完成了选举，有两个人当选。这年秋季的暴力冲突比以往更严重了，因为这一次米罗也是候选人，而他的不共戴天之敌克洛狄乌斯也在竞选裁判官。这一次又发生了暴乱，导致百人会议未能完成任务，新的一年又在没有执政官的情况下开始了。前52年1月，克洛狄乌斯和米罗凑巧在城外相遇。克洛狄乌斯在最初的打斗中负伤，被抬进一家酒馆。米罗派人闯入酒馆，把他的老对手杀掉了。克洛狄乌斯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随后的葬礼上愤怒不已，掀起了一场戏剧性的抗议，克洛狄乌斯的在天之灵一定会表示赞赏。支持者将他的尸体抬进元老院厅堂，在那里将他火葬，结果把房子也烧掉

了。罗马似乎正陷入无政府状态。罗马城没有足够的警察来控制暴民，只有军队才能做到。问题是，谁拥有军权和威望来掌控局面？

[29].

加图和贵人派成功阻止庞培被任命为独裁官。庞培被任命为唯一执政官，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这年晚些时候，他有了一位同僚，即昆图斯·科尔内利乌斯·梅特卢斯·皮乌斯·西庇阿·纳西卡，他的名字很长，说明他出身罗马最鼎盛的门阀贵族家庭，不过他本人没有多少才干。庞培还娶了这个西庇阿的女儿科尔内利娅，借此与贵族精英阶层缔结了新联盟。他通过武力恢复了秩序。米罗遭到审判，法庭被士兵和敌视他的人群团团围住。在不可避免的有罪裁决下来之前，米罗选择了流亡。他毫无疑问是有罪的，但这次审判很不公正，也无视正当程序。在类似的审判中，倒是有不少克洛狄乌斯党徒被定罪，他们逃往北方，投奔尤利乌斯·恺撒阵营，受到了欢迎。庞培的行省总督任期得到延长，这一年年底时，他恢复了原先不寻常的姿态，即待在罗马城近郊。有时元老院选择在城市边界之外的神庙开会，以便让庞培也能参加，而无须放弃他的军权和军队。[30].

到前51年，尤利乌斯·恺撒已经在高卢做最后的扫荡。或许除了他自己之外，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他竟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军事家。他利用一个高卢部落的迁徙对外高卢和罗马盟邦构成的威胁，对高卢施加干预，并且逐步扩大活动范围，征服（罗马人的委婉用语是“平定”）了西至大西洋、东至莱茵河的所有土地。他的胜利非常辉煌宏伟，他每年发表一些作品（即著名的《高卢战记》）宣扬自己的成功。就连西塞罗也赞扬《高卢战记》是拉丁语言最崇高的表达之一。庞培在东方赢得胜利后得到了十天的公共感恩，以颂扬他的业绩，这是之前任何一位罗马将军得到天数的两倍。尤利乌斯·恺撒最初的成功则得到了十五天的公共感恩；后来他袭掠神秘岛屿不列颠之

后，得到了二十天感恩；他镇压了高卢诸多部落大联盟的叛乱之后，又得到了二十天感恩。罗马人民有了一位新的军事英雄。^[31]

尤利乌斯·恺撒希望从高卢返回罗马庆祝自己的凯旋式，然后立即当选前48年执政官，因为法律规定，任何人的两次执政官任期之间必须间隔十年，他已经符合这个条件。他不打算退隐成为普通公民，因为那样会很容易遭到起诉。他的好几个政敌已经公开表示要对他加以审判，就像审判米罗那样，让士兵包围法庭。为了达到目的，他需要获准在本人不到场的情况下宣布自己将参加竞选。与庞培前不久无视规则的行为相比，尤利乌斯·恺撒的要求只是个小小的让步。尤利乌斯·恺撒还希望在前49年年底之前仍然保留资深执政官的身份和军权。他提出，他有权这么做，因为公民大会授予他这样的指挥权。尽管尤利乌斯·恺撒的第一次执政官任期之后罗马政坛发生了许多动荡，批评者们却大谈特谈他当执政官时的恫吓手段与暴力冲突，并预测他第二次担任执政官时将更加凶险。更重要的是，他们感到尤利乌斯·恺撒现在的地位很脆弱，于是蜂拥而上，利用他的弱势，就像他们在前60年代末攻击庞培一样。

庞培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猜不透他究竟是怎样想的。西塞罗早已断定，“罗马的亚历山大”是个极难揣测的人。一些迹象渐渐出现了，他正在转而反对自己的前岳父。他对尤利乌斯·恺撒的支持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在后世的人们看来，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就像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的诗人卢坎^[32]概括的那样：“恺撒不能接受别人的地位优于自己，庞培不能接受别人与自己平起平坐。”尤利乌斯·恺撒要想称心遂愿地返回罗马，就必须承认，自己需要庞培的帮助与支持。有人问庞培，如果尤利乌斯·恺撒拒绝服从元老院，他会怎么做。庞培自满地答道：“如果我的儿子想用棍棒打我，怎么办？”这样的话鼓励了尤利乌斯·恺撒的政敌。^[33]

连续多位执政官加入了对尤利乌斯·恺撒的攻击，要求立刻将他召回。首先发难的是屋大维娅丈夫的堂兄弟，也叫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34]。小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于前50年担任执政官期间也非常敌视妻子的舅公。为了抵挡政敌的攻击，尤利乌斯·恺撒将他从高卢掠夺到的财富大量投入罗马城，以笼络支持者，尤其是拉拢保民官。前50年12月1日，一位保民官迫使元老院进行投票表决，要求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同时辞职。370名元老支持这一动议，只有22人反对。绝大多数元老不愿意看到一场新的内战，尽管很多人不喜欢尤利乌斯·恺撒和他的显赫地位。^[35]

有传闻说，尤利乌斯·恺撒已经入侵了意大利。马凯鲁斯^[36]努力劝说元老院采取行动，但元老们不愿意，并且保民官们否决了他的动议。他对这结果置之不理，和同僚一起，在朋友们的陪伴下，匆匆去阿尔班山的别墅找庞培，向这位资深执政官呈上一把剑，呼吁他用军队保卫共和国。庞培毫无顾虑地称愿意用武力反对自己的前岳父和朋友。后来发现尤利乌斯·恺撒入侵意大利的消息是假的，于是不了了之。前49年1月1日，又一位马凯鲁斯^[37]当上了执政官，即前51年执政官^[38]的弟弟。各方都提出了一些建议，但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信任，而且都把别人愿意谈判视为软弱的表现。1月7日，元老院通过了终极议决，呼吁各位行政长官以及在城市周边的资深执政官（显然指的是庞培）尽一切努力确保共和国的安全。马克·安东尼和另一名保民官一直在为尤利乌斯·恺撒摇旗呐喊，却被警告他们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于是他们逃离了罗马城，去往北方。^[39]

几天后，可能是1月10日，尤利乌斯·恺撒率领仅仅1个军团渡过了卢比孔河，越过了他的行省（他在那里仍然拥有合法的军权）与意大利的边界（他在意大利没有合法军权）。多次得到公共感恩的人现在成了叛国者，他必须胜利，否则就要步喀提林的后尘。他在开启内战的时候，究竟有没有说出老赌徒的口头禅“骰子已掷出”，我们并

不清楚，但他冒的风险无疑是非常大的，他也很确信自己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尤利乌斯·恺撒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尊严，愿意让共和国陷入内战。庞培、加图和尤利乌斯·恺撒的其他对手也同样愿意发动一场战争，剥夺他的地位和尊严。^[40]

[1]. Caelius' quote from Cicero, *ad Fam.* 8.8.9.

[2]. Suetonius, *Augustus* 8.1, 27.1, Nicolaus of Damascus 2, Appian, *BC* 4.12.

[3]. Nicolaus of Damascus 3, 和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127-8, 及 'Neglected children on the *Ara Paci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88 (1984), pp.583-9, 586 fn.17.

[4]. 屋大维的教师，见Dio 58.33.1，讲到斯法埃鲁斯前40年去世后，奥古斯都为表达对他的感激，为他举行了公开葬礼；Cicero, *Orator* 120；关于童年生活，见B.Rawson (ed.),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Roman Italy* (2003)，尤见pp.99-113；关于教育，见H.Marrou,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1956)，pp.229-91, A.Gwynn, *Roman Education* (1926)，尤见1-32；Cicero, *de re publica* 4.3；'an old and wealthy equestrian family'，见Suetonius, *Augustus* 2.3。

[5]. 讨论见R.Seager, *Pompey the Great. A Political Biography* (2002)，pp.72-9, 及T.Wiseman in *CAH2* IX, pp.358-67。

[6]. 权威力量的一个特别突出的例证，见Valerius Maximus 3.7.8。

[7]. R.Seager, *Pompey the Great. A Political Biography* (2002)，pp.79-82, M.Gelzer (trans. P. Needham), *Caesar* (1968)，pp.65-8；关于军饷，值得一提的是，尤利乌斯·恺撒把军饷翻了一倍，士兵们还不能算是富有。Suetonius, *Julius Caesar* 26，关于此时期的军队，见R.Smith, *Service in the Post-Marian Roman Army* (1958)。

[8]. 见Cicero, *ad Att.* 1.17.9, 18.3, 18.7, 2.1.8, with E.Badian, *Publicans and Sinners* (1972)，pp.101-4.

[9] 关于他担任西班牙总督和此后的归来，见M.Gelzer (trans. P. Needham), *Caesar* (1968), pp.61-70, A.Goldsworthy, *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 pp.148-59 = (2007), pp.179-95, Gruen, 'Caesar as a politician', in M.Griffin (ed.), *A Companion to Julius Caesar* (2009), pp.23-36, 尤见29-31; 古代史料中讲到加图阻挠会议议程，见Appian, *BC* 2.8, Dio 37.54.1-2, Suetonius, *Julius Caesar* 18.2 和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31.2-3, *Caesar* 13.1。

[10]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34-5.

[11] Cicero, *ad Att.* 2.3, 3-4.

[12] 尤利乌斯·恺撒的执政官任期，见L.Ross Taylor, 'The dating of major legislation and elections in Caesar's first consulship', *Historia* 17 (1968), pp.173-93. Gruen, 'Caesar as a politician', in M.Griffin (ed.), *A Companion to Julius Caesar* (2009), pp.31-5, M.Gelzer (trans. P. Needham), *Caesar* (1968), pp.71-101, C.Meier (trans. D. McLintock), *Caesar* (1996), pp.204-23, A.Goldsworthy, *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 pp.161-81 = (2007), pp.196-220, R.Billows, *Julius Caesar. The Colossus of Rome* (2009), pp.111-29, R.Seager, *Pompey the Great. A Political Biography* (2002), pp.86-100; 加图被捕，见Dio 38.2.1-3.3. Suetonius, *Julius Caesar* 20.4和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33.1-2 的版本略微不同，说加图是另一次被捕的，不是在辩论土地法的时候。

[13] Suetonius, *Augustus* 4.1讲到阿提乌斯·巴尔布斯是二十名土地委员会成员之一。

[14] 广场上的骚乱，见Dio 38.6.4-7.2, Appian, *BC* 2.11, 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32.2-6, Suetonius, *Julius Caesar* 20.1; 关于毕布路斯企图阻止立法，见Suetonius, *Julius Caesar* 20.2, Dio 38.8.2, 相关评论见L.Ross Taylor, 'The dating of major legislation and elections in Caesar's first consulship', *Historia* 17 (1968), pp.177-9.

[15] Suetonius, *Julius Caesar* 21, 50.1-2, Plutarch, *Pompey* 47-48, *Caesar* 14及Dio 38.9.1; “所有女人的丈夫，所有男人的妻子”，见Suetonius, *Julius Caesar* 52.3。

[16] 内高卢也叫山南高卢，“山”指的是阿尔卑斯山。内高卢是意大利北部凯尔特人居住的地区，前220年代被罗马征服，约前81～前42年间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后来被并入意大利。内高卢以波河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前49年，内高卢全体居民获得了罗马公民权。

[17] 伊利里亚，或称伊利里库姆，是前167～公元10年罗马的一个行省，位于今巴尔干半岛西部、亚得里亚海东岸。大约包括今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黑山和阿尔巴尼亚等地区。公元10年，伊利里亚行省被分割为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行省，但伊利里库姆 伊利里亚作为地区名仍然被广泛使用着。该地区的人民以孔武有力著称，是罗马帝国军队的主要兵源地之一。多位皇帝，包括君士坦丁大帝，出生于伊利里库姆。

[18] L. Ross Taylor, ‘The dating of major legislation and elections in Caesar’s first consulship’, *Historia* 17 (1968), pp.182-8讨论了授予尤利乌斯·恺撒指挥权的《瓦提尼乌斯法》。

[19] Nicolaus of Damascus 3; 关于罗马教育的概况，见n.4。

[20] 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在约前450年制定的法律，据说刻在12块铜牌（也有说是着色的木牌）上而得名。这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的内容分别为：传唤、审判、求偿、家父权、继承及监护、所有权及占有、房屋及土地、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之补充、后五表之补充等十二篇。十二铜表法颁布之后，就成为共和时期罗马法律的主要渊源。该法典对贵族的权力做了一些限制。

[21] Suetonius, *Tiberius* 2-3, Cicero, *de natura deorum* 2.7 讨论了克劳狄·普尔喀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角色。关于克洛狄乌斯，见W. Tatum, *The Patrician Tribune Publius Clodius Pulcher* (1999) *passim*, 关于“良善女神”节丑闻和他对西塞罗的敌意，见J. Balsdon, ‘Fabula Clodiana’, *Historia* 15 (1966), pp. 65-73; 关于他们家族在前1世纪的地位，见E. Gruen, *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74), pp. 97-100。

[22] Dio 38.12.1-3, Cicero, *de domo* 41, *ad Att.* 8.3, Suetonius, *Julius Caesar* 20.4, Plutarch, *Caesar* 14; 也见M. Gelzer (trans. P. Needham), *Caesar* (1968), pp. 76-8, R. Seager, *Pompey the Great. A Political Biography* (2002), pp. 91-9。

[23] 对这些年政治的精彩介绍，见J.Ramsay, ‘The Proconsular Years: Politics at a Distance’, in Griffin (2009), pp.37-56, 及 Wiseman in *CAH2IX*, pp.366-81, 385-408。

[24] 帕提亚帝国，中国古书称之为安息，是公元前247～公元224年统治波斯的王朝，与罗马长期对抗，后在内乱中被萨珊王朝取代。

[25] 关于卢卡“会议”及庞培、克拉苏与尤利乌斯·恺撒之间联盟的巩固，见Suetonius, *Caesar* 24.1, Appian, *BC* 2.17, Plutarch, *Pompey* 50, *Caesar* 21, *Crassus* 14; 也见M.Gelzer (trans. P. Needham), *Caesar* (1968), pp.120-24, R.Seager, *Pompey the Great. A Political Biography* (2002), pp.110-19, Meier (1996), pp.270-73及A.Ward, *Marcus Crassus and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1977), pp.262-88。

[26] 尤利娅流产，见Plutarch, *Pompey* 53; 克拉苏离开罗马城，见 Cicero, *ad Att.* 4.13, Plutarch, *Crassus* 16。

[27] 在今天土耳其东南部，今称哈兰。

[28] Suetonius, *Julius Caesar* 27.1; 关于卡莱战役和克拉苏之死，主要资料是Plutarch, *Crassus* 17-33, 及Dio 40.12-30。

[29] 克洛狄乌斯和米罗，见M.Gelzer (trans. P. Needham), *Caesar* (1968), pp.145-52, Meier (1996), pp.297-301及R.Seager, *Pompey the Great. A Political Biography* (2002), pp.126-35。

[30] 庞培作为唯一执政官，见Plutarch, *Pompey* 54, *Cato* 47, Dio 40.50.4, Appian, *BC* 2.23; 关于庞培的地位和新婚姻，见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36-40, 关于科尔内利娅，见Plutarch, *Pompey* 55。

[31] 对这些战役的更详细记述，见A.Goldsworthy, *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 pp.184-356 = (2007), pp.222-431; 关于恺撒《战记》，见论文集K.Welch & A.Powell (eds), *Julius Caesar as Artful Reporter: The War 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Instruments* (1998)。

[32] 即马尔库斯·安奈乌斯·卢坎努斯(39～65年)，他未完成的史诗《法萨利亚》描述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被誉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之后最伟大的拉丁文史诗。

[33] Quotations from Lucan, *Pharsalia* 1.125-6 (Oxford translation by S.Braund), 及Cicero, *ad Fam.* 8.8.9; 内战前夕局势, 见 M.Gelzer (trans. P. Needham), *Caesar* (1968), pp.169-94, R.Seager, *Pompey the Great. A Political Biography* (2002), pp.138-51, Wiseman in *CAH2* IX, pp.414-23, A.Goldsworthy, *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 pp.358-79 = (2007), pp.434-60。

[34] 史学界称他为大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 以区别屋大维娅的丈夫小盖乌斯(前50年执政官)。

[35] Appian, *BC* 2.28, 另一个略微不同的版本是Plutarch, *Pompey* 58, 参见Dio 60.64.1-4.

[36] 前50年执政官小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

[37] 大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

[38] 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

[39] Plutarch, *Pompey* 59, Caesar, *BG* 8.52.3, Dio 40.64.3-4, Appian, *BC* 2.31-2, Caesar, *BC* 1.1-5, Suetonius, *Julius Caesar* 29.2, Dio 41.1.1-3.4.

[40] Suetonius, *Caesar* 31-2, Plutarch, *Caesar* 32, Appian, *BC* 2.35.

四 出路

是他们想要这样的，即便在我的所有伟大功业之后，我，盖乌斯·恺撒，如果不是得到了我的军队的支持，也会灭亡。

——尤利乌斯·恺撒在法萨卢斯看到敌军死尸时说的话。当时在场的阿西尼乌斯·波利奥记载，前1世纪末^[1]。

内战的细节无须赘述，因为当时屋大维只有十三岁，没有参与内战。尤利乌斯·恺撒迅速占领了意大利。庞培或许仍然希望他的旧盟友做出让步，或许对自己的实力非常满意。几个月前，他自吹自擂道，他只消“跺跺脚，意大利的泥土中就能崛起一支支军团和骑兵”。然而，令他的盟友垂头丧气的是，他未经一战便放弃了罗马，撤退到布隆迪西乌姆^[2]。一位元老玩世不恭地问他，现在是不是应当开始跺脚了。他率军渡过亚得里亚海，撤到希腊北部，动用了他在东方各行省和盟邦的所有人脉，组建了一支大军和舰队。庞培已经接近六十岁，但仍然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艺和组织天分。庞培常说：“苏拉这么干过，我为什么不行？”他指的是，苏拉曾经从希腊杀回意大利，打赢了一场内战。但拿苏拉做榜样实在不好。庞培的一些盟友开始窃窃私语，说他们打仗仅仅是为了选择哪一位独裁者统治他们而已。其他人则公开批评庞培的每一个决定。庞培自己的政治生涯打破了宪法每一条规则，如今他却成了自由共和国的捍卫者，指挥着多年来作为他死敌的贵人派。这很有讽刺意味，由此产生的联盟也是不稳定的。^[3]

尤利乌斯·恺撒的政敌和希望保持中立的大多数人都害怕他会是一个真正残暴野蛮的主子，像马略和苏拉一样屠杀反对派。但他表现得非常宽大为怀，只攻击那些抵抗他的人，并饶恕所有投降的人。前49年3月，他宣布：“让我们看看，用这种方法，我们能否赢得所有人

的支持，获得永久性的胜利。其他人由于残暴，未能逃脱世人的仇恨，也未能让他们的胜利延续千秋万代。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卢基乌斯·苏拉，但我不打算效仿他。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征服，我们通过怜悯和慷慨，逐渐壮大自己。”^[4]

平定意大利之后，他又挥师西班牙，迅速战胜了庞培留在那里的军队，迫使他们投降。尤利乌斯·恺撒亲自到场指挥的时候都能取胜，但他的下属没有他那样的才干，其中好几个人吃了败仗。到前48年初，他集结了足够多的船只，将部分军队运往马其顿。庞培拥有数量和资源上的优势，仍然打算效仿苏拉。尤利乌斯·恺撒的兵力较少，却已身经百战，战斗力超强，而且对统帅赤胆忠心。他发动了进攻，差一点就将兵力超过他的敌军封锁在狄拉奇乌姆^[5]并迫使其屈服，但庞培突破了他的包围圈。恺撒军队撤退了，庞培军队紧随其后，显赫的元老们不断催促庞培迅速打赢战争，并且已经在为预期获得的战利品而争吵。前48年8月9日，在法萨卢斯，庞培发起挑战，尤利乌斯·恺撒非常高兴地应战了。庞培的作战计划很稳健，但不是很高明。他将全部赌注押在骑兵身上，因为他的骑兵兵力是恺撒的七倍。尤利乌斯·恺撒猜到了对方的意图，采取反制措施，随后他的老兵们将缺乏经验的庞培军队及其外国辅助部队杀得血流成河。^[6]

罗马贵族只要保持勇气、拒绝承认永久性失败并重整旗鼓赢得下一次战役，那么就算吃了败仗也会得到原谅。庞培却彻底丧了胆，在战役结束前就逃走了，最后逃到了埃及。埃及的孩童国王托勒密十三世的谋臣下令杀死了庞培，希望借此讨得胜利者的欢心。庞培的死对尤利乌斯·恺撒来说本应是极大的便利，但当他追击赶到并看到自己前女婿的首级时，却表现出了对谋杀犯的厌恶和愤怒。恺撒的军队因为吸收了数万名庞培军队的俘虏而力量大增，他急需现金来发军饷，于是干预了埃及事务，很快卷入了埃及内战。年轻的国王与他的姐姐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争夺王位。规模不大的罗马军队很快遭到围攻，在

一番苦战之后，援军才抵达，最终击败了敌人。尤利乌斯·恺撒在埃及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觉得他在那里待得太久了），和情人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一起在尼罗河上观光。与此同时，庞培军队重整旗鼓，加图的钢铁意志帮助他们在阿非利加集结了一支新的军队。尤利乌斯·恺撒终于离开埃及，在亚细亚击溃了米特里达梯六世的儿子指挥的一支军队，于秋季短暂地返回意大利，然后渡海来到阿非利加。前46年4月6日，他在塔普苏斯打败了庞培军队。加图宁愿自杀也不投降接受敌人的怜悯。内战还没有结束。庞培的长子格奈乌斯在西班牙征募了一支军队，于是尤利乌斯·恺撒很快离开罗马，再次征战。前45年3月17日的蒙达战役是最后的决战，非常凶残和激烈，但最后高卢战争的老兵们赢得了胜利。^[7]

混战中的世界

到内战时期，屋大维待在母亲身边，在继父菲利普斯家中生活。他的外祖母尤利娅于前51年去世，外祖父可能在之前的几年里辞世。在恺撒的女儿尤利娅的葬礼上，年仅十二岁的屋大维发表了悼念演说，并得到了赞扬。贵族的葬礼是非常公开化的事件，首先在广场举行一场仪式，然后在城外游行、火葬。葬礼上不仅可以颂扬死者，还可以展示所有先辈的功业。在最宏大的葬礼上，死者家族要雇用演员，让演员穿戴家族历史上曾经担任高位的所有先辈的官服，佩戴他们的葬礼面具，这是一种纪念往昔荣耀的可视化方式。一般会让年轻一代发表悼词，将他与曾经的伟大事业联系起来，暗示着他在将来也会取得类似的成就。^[8]

这是小屋大维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他与著名的（目前也是非常有争议的）舅公产生了更紧密的联系。从其他方面看，他不过是诸多骑马出行、在公共场所锻炼、与同龄人会面和竞争的贵族少年之一。据说菲利普斯非常热心地监督继子的成长，屋大维

很有可能在菲利普斯外出办事和参加公共集会与元老院会议时跟随他。菲利普斯和阿提娅每天询问屋大维的教师与辅导老师们，他做了什么，取得了怎样的进步。多年后，阿提娅被奉为罗马母亲的理想化典型：

在美好的往昔，所有人的儿子，只要是合法婚生的，都不是在雇佣乳娘的房间里长大，而是在母亲怀中和膝下成长。而母亲能够得到的最高颂扬就是，她持家有方，全身心奉献给孩子……在这样一位母亲面前，任何人胆敢口出恶言，或者胡作非为，都是极大的冒犯。她不仅要严格遵守宗教的要求、勤勤恳恳地照料年幼的儿女，还要管理他们的娱乐和游戏。我们得知，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尔内利娅、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和奥古斯都的母亲阿提娅就是以这种精神培养自己的儿子的，这几位母亲就是这样养育了她们君王一般尊贵的孩子。^[9]

母亲应当是权威人物，可能会与孩子十分疏离，孩子们需要顺从家庭与国家的要求，赢得母亲的赞许。^[10]内战开始的时候，阿提娅和菲利普斯觉得罗马可能会很危险，于是将少年屋大维送到他继父的别墅之一。我们知道菲利普斯拥有至少两栋别墅，一座在普泰奥利^[11]，一座在阿斯图拉附近（在海边，离罗马更近），但可能还有其他别墅。菲利普斯不肯明确地支持内战的任何一方。屋大维娅的丈夫马凯鲁斯也是这样，尽管他在几周前还向庞培送上宝剑。尤利乌斯·恺撒宣布，他将尊重这样的中立人士，只会攻击那些与他为敌的人。而自命为法律与共和国捍卫者的庞培派，却威胁要将任何不支持他们的人视为敌人。^[12]

我们不知道长辈们在何时觉得屋大维可以安全返回罗马了。前47年底时他肯定在罗马。10月18日，他正式接受了成年礼。孩子在什么年龄接受成年礼，并无定规，一般是14~16岁。此时屋大维的16岁生日已经过去了几周。婴儿时戴在脖子上的护身符终于被取下，他第一次接受剃须修面，并将头发剪短。男孩可以留长长的、蓬乱的头发，但成年公民应当留较短的、整洁的发型。男孩穿的是镶紫边的托加长

袍，只有男孩和行政长官可以穿这种长袍。屋大维现在换上了成年人穿的朴素托加，以显示自己的新地位。苏埃托尼乌斯讲了一个预示屋大维前程的故事，声称在脱下孩童托加袍的时候，他的上衣撕裂了，掉落到脚踝处。这象征着行政长官和元老院终有一日将屈服于他。和其他情况一样，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是不是后人捏造的。家中仪式结束之后，新的成年人还要在男性亲属及家族朋友的陪伴下，走过城市中心，通过广场，登上卡比托利欧山^[13]，在朱庇特神庙中献祭，为青春女神尤文塔斯^[14]献上祭品。^[15]

尤利乌斯·恺撒很可能亲自到场，见证甥孙生命中这个重要的时刻。他于9月底从东方回到意大利，但随后要组织去往阿非利加的远征，还要平定军团士兵的一场哗变（在他长期远离意大利期间，这些士兵开始焦躁不安）、举行选举，然后于10月中旬去往西西里岛。或许他太忙碌，没有参加屋大维的成年礼，但他对这个十六岁少年已经表现出了兴趣。法萨卢斯战役中，一位庞培派领导人死亡，于是大祭司团出现了一个空缺。尤利乌斯·恺撒正式推荐他的甥孙为候选人，选民果然按照他的意思，选举屋大维为大祭司。^[16]

屋大维虽然已经正式成年，并且成为罗马的高级神职人员之一，但仍然在菲利普斯家中生活，阿提娅依旧管制着儿子的生活和教育。大家觉得他是个少见的帅小伙。他的头发有一点卷曲，带有淡淡的金色，不过对头发颜色的类似描述很难评判，或许仅仅表示他的头发不是黑色，而是有一些褐色。他的牙齿小，牙缝比一般情况要大；他晚年时蛀牙很严重，但年轻时的牙齿肯定要好一些。他的面色不是非常明显的黧黑，也不是特别白皙。他的动作优雅，躯干和四肢比例恰到好处，所以看上去比实际情况要高。他的一名释奴后来声称，屋大维成年后的身高超过5英尺6英寸（按照较小的罗马计算方法，是5尺9寸），不过这个数字可能高估了。屋大维显然自认为矮小，所以他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穿着厚底鞋，以便显得高大一些。^[17]

尤利乌斯·恺撒非常魁梧，目光炯炯有神。屋大维在身高方面比不上舅公，但觉得自己的目光和他一样犀利。罗马贵族子弟在成长过程中，就养成了对自己家族重要性的极高观感。屋大维特别自信，据说很小的时候就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了一群朋友。为他立传的“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后来声称，屋大维还引起了一些欲望旺盛的成熟妇人的注意。为了隐藏自己的魅力，他在可能被外人看到的繁忙时间较少抛头露面，甚至仅在夜间去神庙。罗马贵族女性和她们的兄弟一样受过良好教育，但不能从政，被作为巩固或打破政治联盟的工具，被安排嫁人或离婚。因此，有许多百无聊赖的元老夫人，她们的丈夫要么不在罗马，要么虽然在罗马但对她们兴趣不大。克洛狄乌斯的几个姐姐因为不守妇道和生活放荡，常常成为流言蜚语的主角。其中之一就是诗人卡图卢斯笔下的“莱斯比娅”。卡图卢斯曾爱过她，被她离弃后就由爱生恨。尤利乌斯·恺撒的下属之一迪基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的母亲就是一位风流成性的妇人，一位元老用这样多彩的语言描绘她：

其中有塞姆普罗尼娅……出身高贵，非常美丽，就像她的丈夫和孩子们一样得到命运恩宠；她饱读希腊和拉丁文学，擅长演奏里拉琴，舞姿优美（体面的妇女不应有这样高超的舞艺），还拥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天赋，注定会生活得多姿多彩。但她却视自己的荣誉和贞洁如粪土。很难说她在金钱和贞操中更看轻哪一个。她性欲旺盛，经常追逐男人，而不是被男人追逐……她常常背弃诺言、拖欠债款和参与谋杀。她囊中羞涩，却沉溺于奢侈的生活，因此走上了一条疯狂的道路。即便如此，她仍然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会写诗、打趣，能够端庄地、温柔地或者放荡地与人交谈；总的来讲，她有许多突出的天赋和魅力。^[18]

据说年轻的屋大维抵御住了这些高贵的狐狸精的诱惑。但贵族少年与他们的姐妹不同，在性方面享有相当大的自由。罗马有很多妓院，也有众多高档次的交际花，男人们要绞尽脑汁、一掷千金地追求和包养她们。当时，马克·安东尼与一个叫作西塞莉丝的哑剧演员有私情。尤利乌斯·恺撒不在罗马期间，安东尼担任他在意大利的代

表，带着西塞莉丝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罗马是个奴隶制社会，人当成财产。如果一名奴隶被主人看中，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权利去抵抗主人的肉欲。^[19]

屋大维去西班牙参加了讨伐格奈乌斯·庞培的战役，但因为患病，到西班牙时战斗已经结束了。即便如此，尤利乌斯·恺撒仍然欢迎他的到来，对他特别热情。返回罗马后，屋大维离开了菲利普斯家，在附近的一套公寓住下。许多富人区拥有大型公寓楼，富家子弟在结婚和获得自己的宅邸之前常常租住这种公寓楼。十七岁的屋大维仍然将大量时间用于与母亲和继父相处，不过有时也设宴招待朋友。有些朋友后来声称，屋大维在一整年的时间里完全禁欲，因为他觉得这对他的健康，尤其是嗓子，有好处。希望从政的人至少应当拥有说得过去的演讲本领。不管屋大维禁欲的理由是什么，有意思的是，大家觉得禁欲整整一年是不同寻常的事情，不仅对年轻的罗马贵族来说不寻常，对屋大维来说算是一桩了不得的成就。^[20]

独裁官

尤利乌斯·恺撒在前49年只当了几天空裁官，以便主持执政官选举。他担任了前48年、前46年、前45年（这一年年初时他是唯一执政官，就像庞培在前52年那样）和前44年执政官。法萨卢斯大捷的消息传到罗马后，元老院又一次任命他为独裁官，并将他的任期增加到十二个月，这是正常时期独裁官任期的两倍（苏拉是个例外）。前46年，他被任命为任期十年的独裁官，不过每年要正式地延长任期。前44年年初的几周里，他被任命为终身独裁官，还获得了其他一些权力。他被任命为道德风纪长官，接管了传统上由监察官负责的工作（在最近几十年里，监察官很难发挥效力）。前45年，独裁官获得了提名随后三年的执政官和一半其他行政长官的权力，因为他计划向帕提亚人发动一次大规模远征，预计自己要离开罗马城三年时间。^[21]

然而，尽管尤利乌斯·恺撒拥有极大权力，但他在罗马城待的时间非常短：除了前44年之外，他每一年都在南征北战，遇刺身亡之前还在打算出征作战。而在随后的岁月里，大量传闻和宣传也让我们很难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即便如此，独裁官仍然保持了他一贯的充沛精力，在罗马城的短时间内匆匆做了很多事情，开展了许多立法和改革工作。但我们常常很难判断，有哪些工作落实了，又有哪些仅仅是宣布了或处在计划阶段。他肯定发动了一个向退伍军人和城市贫民分配土地的大规模项目，这是他在前59年担任执政官时的项目的延续。很多人被安置在意大利的农场上，这些土地往往是死去的庞培党羽被没收充公的产业，有的土地则是用战利品购买的。外省也建立了一些由公民组成的殖民地，其中最重要的殖民地位于迦太基和科林斯。

除执政官之外的行政长官的数量也增加了，所以现在每年有四十名财务官和二十名裁判官。他这么做部分是为了奖赏忠诚的追随者和近期才投奔他的前庞培派，但也有务实的理由。罗马的疆域不断扩张，需要更多行政长官来管理。尤利乌斯·恺撒还提名了更多元老，其中很多是来自意大利各城镇的地区性贵族，但也有一些人是来自西班牙和高卢各行省的公民。元老院成员人数超过了九百人，每年有新当选财务官的人进行补充，因为当选这个职位的人自动获得元老身份。[\[22\]](#)

庞培为罗马建造了第一座石制剧场，这是他用战利品建造的宏伟建筑群的一部分。尤利乌斯·恺撒运用从高卢获取的金钱，开始翻新战神广场上的投票场地。旧的投票围场将改用大理石铺地和筑墙，并搭建凉棚，为等待投票的公民提供荫凉。当上独裁官后，他继续这项工程，重建了元老院议政厅，并开始建造一座新广场，即尤利乌斯广场，其位置与主广场呈一定角度，其中包括一座献给他的神圣祖先维纳斯的神庙，以及更多用于公共事务和商贸活动的空间。建筑工程既为失业者提供了薪水不错的工作岗位，也能颂扬工程背后的人。罗马

贵族很早就着手建造这样的纪念性工程，以宣扬自己的功业。尤利乌斯·恺撒仅仅是极大地扩大了工程的规模。^[23]

新的法律管理着罗马城、意大利和各行省的生活与商贸，并对一些债台高筑的人提供援助。罗马的历法是根据月相周期计算的，一年有355天。大祭司团需要对某些年份增添闰月，才能让历法与自然季节挂钩。这种历法容易受到政治操纵，到前1世纪中叶已经严重脱离实际。尤利乌斯·恺撒主持编纂的儒略历^[24]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历法已经很接近，在16世纪得到了细微修改。它根据364天的太阳周期计算，每四年添加一个闰日。大祭司（包括年轻的屋大维）为前46年增添了3个闰月，于是这一年一共有446天。这样做是为了让新一年（前45年）的1月1日从太阳周期的恰当时间开始。为了歌颂尤利乌斯·恺撒，他出生的月份被更名为尤利乌斯月，即我们今天的7月（July）。^[25]

这只是独裁官得到的大量荣誉和特权之一。结束阿非利加的战事回国后，尤利乌斯·恺撒举行了四次凯旋式，比庞培多一次，超过了共和国的所有其他英雄。四次凯旋式分别纪念在高卢、埃及、亚细亚和阿非利加的胜利，表面上都是战胜了外国敌人。即便如此，纪念阿非利加胜利的凯旋式上仍然有描绘庞培派领导人死亡的图画。前45年底，尤利乌斯·恺撒从西班牙返回后，公开举行了第五次凯旋式，这一次是明目张胆地庆祝在内战中战胜了罗马同胞。^[26]

不过他宽大为怀的政策仍然维持了下来。虽然有些人很担心，但胜利之后的尤利乌斯·恺撒并没有露出凶残的一面，变成新的苏拉。他不准自己的支持者随意掳掠财物和杀人。他的忠诚亲信肯定得到了许多好处。尤利乌斯·恺撒曾说，哪怕是一个土匪，只要忠诚地为他效力，也会得到奖赏。他的亲信得到了元老地位、高官厚禄和行省总督职位。已死敌人的房地产被没收，但他并没有将其简单地发放给亲信。尤利乌斯·恺撒将这些房地产公开拍卖，并且坚持要求大家按照

房地产在战前的市场价来全额购买，这让马克·安东尼等人大吃一惊。同样，那些希望废除现有债务的人（罗马政治中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呼声就是要求“新账本”，意思是销毁所有现存的账本，从头开始）也失望了，尤利乌斯·恺撒仅仅给了他们一定程度的援助。^[27]

屋大维也得到了一些奖赏。虽然阿非利加战役期间他实际上待在意大利，但仍然在纪念此次战役的凯旋式上得到了名义上的军事荣誉。古老的罗马贵族在历史上已经渐渐凋零衰败，在近期的内战中更是损失惨重，于是尤利乌斯·恺撒扩大了贵族阶层。屋大维也因此获得了贵族身份。屋大维的一些亲戚朋友在内战中曾为庞培派效劳，他恳求舅公赦免这些人，独裁官同意了。屋大维得到了好几个荣誉职位，并且在公共场合得到了尤利乌斯·恺撒一定程度的关爱。除了屋大维这个甥孙之外，独裁官还有两个外甥，是他另外一个姐姐尤利娅（不是阿提娅的母亲）的儿子们。这个尤利娅在第一段婚姻中生的儿子昆图斯·佩蒂乌斯在高卢战争和内战期间为尤利乌斯·恺撒效力。至于尤利娅在第二段婚姻中生的儿子卢基乌斯·皮纳里乌斯，我们对不太了解，他可能才刚刚开始从政。后来有人说尤利乌斯·恺撒特别疼爱屋大维，我们很难判断这种说法是不是后人附会。前45年年底时屋大维才十八岁，太年轻，所以在政治生活中并不引人注目。^[28]

在这些年里春风得意的不仅仅是恺撒的忠实亲信。前44年1月1日就任裁判官的新人当中有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和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他们都曾为庞培效力，在法萨卢斯战役之后才向恺撒投降。布鲁图斯是塞维利娅的儿子，塞维利娅是加图的同母异父姐姐，也是尤利乌斯·恺撒的长期情人。布鲁图斯如今得到了威望极高的城市裁判官职位。尤利乌斯·恺撒可能已经内定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为未来执政官的人选，只不过目前他们年龄还不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原先的庞培派都得到赦免，被允许结束流亡回国。前46年，尤利乌斯·恺撒允许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屋大维娅丈

夫的堂兄弟，前51年担任执政官时对尤利乌斯·恺撒的攻击特别凶狠）回国，得到了西塞罗热情洋溢的赞扬。

3月15日

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的统治远远谈不上严酷，他的改革很务实，一般来讲也符合国家更广泛的利益。但任何人都不应当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更不要说是永久性拥有了。苏拉比尤利乌斯·恺撒残暴得多，但苏拉掌权几年后就辞去独裁官职务，退隐回家了。因此，尤利乌斯·恺撒说苏拉“在政治上是个文盲”，并且不打算放弃对国家的主宰权。他已经五十六岁，虽然受到癫痫病的困扰，但完全可以再活上几十年。他正在筹划的帕提亚战争将给他带来体面的荣耀，因为他的敌人是外国人，他在大概三年之后回国时会获得更高的威望。

[29].

尤利乌斯·恺撒实际上享有君主的权力。他获得的荣誉是曾经的伟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庞培）所得荣誉的延伸，但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历史上的先例。在所有公开场合，他坐在黄金的官方席位上，穿戴凯旋将军的托加袍和月桂花环，并被允许穿长靴和长袖上衣，据他说，这是他的上古祖先阿尔巴朗格（邻近罗马的一座城市，在罗马早期历史中是它的竞争对手）国王的装束。他的宅邸增加了三角楣饰，就像神庙那样。其他荣誉将尤利乌斯·恺撒的地位提升到与神祇非常接近的程度，不过很难确定他在世时是否已经被神化。我们可能对将活人奉为神明的做法感到震惊，但拥有多神教传统的罗马人不会很吃惊。传说中就有英雄通过功业被升格为神的故事，赞颂伟大成就为“如神一般”也是司空见惯的。[30].

有非常荒诞不经的故事在流传，称尤利乌斯·恺撒打算迁都到伊利昂，即特洛伊的地点。据传说，罗马人的祖先就是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摧毁后逃亡的特洛伊人。也有人说尤利乌斯·恺撒希望迁都到亚历

山大港，或许打算与他的另一位情人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一同统治和生活。前46～前44年，她两次访问了罗马，并且和她的随行人员一起居住在城市正式边界之外一座属于尤利乌斯·恺撒的别墅内。她生了一个男孩，可能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孩子。后来亚历山大港人给这个孩子取了个绰号，叫作恺撒里昂^[31]。他是私生子，不是罗马公民，根据罗马法律不享有任何地位。何况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独裁官本人对这个孩子表现出了特别的关心，所以现代人的观念，即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对她的罗马情人有着极大影响力，完全是想象。但这无法阻止更多的流言蜚语，据说有一位元老打算提一个议案，允许尤利乌斯·恺撒想娶多少妻子就娶多少，以便生孩子作为继承人。西塞罗不是独裁官的朋友，但即便他也不相信这个传闻。对于大多数传言，理智的观察者肯定都持怀疑态度，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这些故事能够流传，就印证了当时人们的恐惧和担忧。这些流言蜚语带有足够的可信成分，能被不断重复，反映了罗马精英阶层抑郁的情绪。^[32]

很多传言都讲到，尤利乌斯·恺撒企图自立为王。一些群众欢呼他为国王（Rex）。Rex（雷克斯）也是一个贵族家系的姓氏。恺撒答道：“我不是雷克斯，而是恺撒。”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话题。有保民官将一座恺撒雕像头上的冠冕除去，他大发雷霆，声称他们剥夺了他拒绝这项荣誉的机会，是刻意让大家想起君主制，以诋毁他的名誉。最有名的一个事件发生在前44年2月15日的牧神节^[33]，成群的祭司除了腰间围着山羊皮缠腰布之外全身赤裸，跑过大街小巷，用鞭子轻轻抽打路过的人。^[34]独裁官在高台上主持节庆活动，祭司的领头人马克·安东尼在游行结束时跑到他面前，献上一顶王冠。尤利乌斯·恺撒拒绝了，群众欢呼起来。安东尼再次请求，独裁官再次拒绝。对此事最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哑剧，意在一劳永逸地向群众表明，他并不想要国王的头衔。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很快人们就说，这是一场测试，尤利乌斯·恺撒是想接受王冠的，如果围观群众表现得热情一些，他肯定就接受了。流传的

另一个说法是，元老院将进行辩论，是否让恺撒成为除罗马城之外所有地区的国王。[\[35\]](#)

真相究竟如何，并不重要。元老们内心里知道，政局不应当是这个样子的。不管尤利乌斯·恺撒是不是国王，不管他多么仁慈和高效，不管他如何看待自己手中的权力，他都掌握着最高权力，实际上相当于王权。这意味着，共和国无法存在了。对罗马贵族来说，真正的共和国理应是这样的：元老阶层分享权力，指导着通过公开竞争选出的行政长官，并且行政长官的人选定期更换，便于更多的人有机会当上高官、获得利益。这才是自由。就连一贯支持恺撒的人士也觉得，如今自由已经不复存在。

独裁官本人的态度也无助于缓和紧张的气氛。尤利乌斯·恺撒在罗马待的时间很短，要做的事情又太多，多年南征北战让他十分疲惫，而且惯于发号施令，对那些不如他精力充沛的人常常表现出不耐烦，所以他经常显得不够审慎。他辞去了前45年的执政官职位，让两个人接替他。12月31日这天，其中一名执政官突然去世，于是尤利乌斯·恺撒匆匆将原本正在进行立法工作的会议改为选举执政官的投票表决会议，将他的另一名亲信选为执政官，此人的任期只有当天余下的几个小时。西塞罗开玩笑说：“卡尼尼乌斯担任执政官期间，没有人吃午饭。但在他任上没有发生任何坏事，因为他的尽忠职守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在他整个执政官任期上，他从来没有睡过觉。”但私下里，西塞罗觉得此事是莫大的悲剧，足以让任何人流泪。在尤利乌斯·恺撒的恩泽佑护下当上裁判官和财务官的人们对他很感激，但同时也哀叹，他大大增加了这些职位的数量，它们贬值了。[\[36\]](#)

“共和国不过是个虚名，没有实质，没有形态。”据说独裁官曾有过这样的言论。如今，国家大事的决策都是由尤利乌斯·恺撒及其谋士闭门做出的，处理了内战的纷扰和之前多年行政混乱积压的大量

事务和问题。尤利乌斯·恺撒的决定通常是很合理的，但问题不在这里。通常他假装自己的命令是元老院发布的，将其伪装成正当程序。西塞罗惊讶地发现，外省的一些社区写信给他，感谢他在元老院会议（其实根本没有这些会议，尤利乌斯·恺撒甚至编造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上投票支持他们的请愿，授予他们某些特权。马克·安东尼（与尤利乌斯·恺撒一同担任前44年执政官）带领一群元老向他奉上新的荣誉时，独裁官仍然继续处理公务，没有起身问候他们。从技术上讲，他作为独裁官，比执政官的地位更高，所以完全可以坐着不动，但很多元老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尤利乌斯·恺撒在观看公共比赛时还按照自己的一贯做法，同时向多名书记员口述信件，始终忙于政务。这让群众不高兴，因为群众希望他和大家一起欣赏他所提供的奢华盛景。尤利乌斯·恺撒似乎始终行色匆匆，没有时间去讨好元老和群众。^[37]

群众的不满很快就消退了，但许多贵族的怨恨还在。独裁官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据西塞罗后来回忆，尤利乌斯·恺撒哀伤地说：“连马尔库斯·西塞罗都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随时来见我，而是需要坐下来等待。我难道还要去怀疑世人多么憎恶我吗？西塞罗是那样性情随和的人，但我毫不怀疑，他一定恨我。”他的另外一句话“我活得已经足够久了，也得到了足够多的荣耀”则表达出听天由命、身心俱疲的意味。他决心让罗马及其帝国基业高效运转，这决心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弱，他似乎期望别人能够认识到，他必须这么做。独裁官估计，如果他突然死亡或被杀，就会爆发新的内战，并且认为其他人也应当有足够的理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让他活下去才是有利于大局的做法。他决心表现出自信，或者是由于非常自满，于是解散了由西班牙武士组成的卫队。元老院投票决定为他组建一支由元老和骑士组成的新卫队，但始终没有落实。尤利乌斯·恺撒徒步或者乘轿穿过大街小巷，在公共场所处理政务，并参加元老院会议。他在罗马的时候，

人们是很容易接近他的，但一旦他离开罗马远征帕提亚，就很难再接近他了。[\[38\]](#)

就是这个原因促使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领导的一群元老采取行动。我们无须明确介绍尤利乌斯·恺撒在这几个月里的具体权力，更不用询问他对未来的计划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他的权力地位与共和国是无法共存的，要想恢复共和国，就必须除掉他。密谋者包括好几个恺撒派的主要人物，以及一些先前的庞培派。盖乌斯·特雷博尼乌斯曾担任前45年执政官，而迪基姆斯·布鲁图斯（马尔库斯·布鲁图斯的堂兄弟）曾在高卢为尤利乌斯·恺撒效力，担任前45年裁判官，并被独裁官内定为他远征帕提亚期间的执政官之一（他的母亲就是上文提到的、被撒路斯特乌斯[\[39\]](#)冷嘲热讽的塞姆普罗尼亚）。这些主谋分子在当前政权下其实混得不错，但仍然怨恨一个人独揽大权，不管他是谁。

这种政治上的动机是最重要的。公平地说，独裁官死了之后，这些密谋者会成为共和国的领导人，仕途发展至少会和以往一样顺利，或者好得多。这些人是罗马贵族，从小就被教育得雄心勃勃，至少有一些人受到了著名的希腊义士刺杀暴君故事的激励。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还是加图的外甥，却向尤利乌斯·恺撒投降，并在他手下飞黄腾达。他的舅舅宁愿用剑自杀，也不愿意接受胜利者的垂怜。这种自杀手段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加图用剑刺伤自己之后并没有死，他的儿子传来了医生，包扎了伤口。其他人离开后，加图便撕开缝好的伤口，掏出内脏，以这种非常痛苦和恐怖的方式死去了。他素来擅长将自己的对手描绘为残暴的压迫者，这种死法也是对敌人的控诉。内疚让布鲁图斯愈发崇拜自己死去的舅舅，不仅撰写了一部歌颂他的传记，还休了自己的妻子，以便与加图的女儿、毕布路斯的遗孀结婚。[\[40\]](#)

西塞罗也写了一部《加图传》，赞扬加图，但语调比较温和。尤利乌斯·恺撒写了一部言辞激烈的《反加图传》，作为对布鲁图斯和西塞罗著作的回应，这符合罗马的传统，用骇人听闻的恶言攻击加图，但仅此而已，没有采取任何其他措施。前45年初，卡西乌斯称尤利乌斯·恺撒为“仁慈的旧主人”，更愿意支持他，而不是凶神恶煞的格奈乌斯·庞培。不管尤利乌斯·恺撒多么“仁慈”，毕竟是他们的“主人”，这在原则上就是错误的。密谋者没有用誓言来互相约束。秘密起誓被认为是非常阴险的事情，喀提林党人就曾经这么做过。在公开场合，所有元老都曾宣誓要保卫尤利乌斯·恺撒。^[41]

3月15日，尤利乌斯·恺撒去参加一次元老院会议，地点是庞培剧场建筑群中的一座神庙。一队属于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角斗士待在附近，他们即将参加近期在那里举行的一些竞技比赛。独裁官身边没有保镖。特雷博尼乌斯将马克·安东尼拉到一边，在室外一直和他说话。安东尼是恺撒的同僚执政官，会坐在他旁边。安东尼非常健壮和勇敢，很可能会拼命抵抗。在马尔库斯·布鲁图斯的敦促下，密谋者决定只杀独裁官一人。

密谋者以有事相求为借口，将尤利乌斯·恺撒团团围住，其中一人突然从背后刺他。独裁官大吃一惊，然后愤怒起来，拔出自己长长的笔^[42]作为武器，将笔尖刺向对方。密谋者围着他，用刀子疯狂刺他。在混乱中，布鲁图斯大腿受伤，另外一人被同伙的刀子刺伤。尤利乌斯·恺撒倒了下去，倒在庞培雕像的底座旁。他身上有二十多处伤，不过后来据说只有其中一处是致命伤。他只剩下一点点力气，拉起自己的托加袍遮住面部，这是维护自己仪容的最后努力。^[43]

独裁官已经死了，共和国得到自由了。布鲁图斯呼喊西塞罗的名字，其他密谋者高呼自由已经恢复。在一旁观看的元老，包括西塞罗，全都惊慌失措，拔腿就跑。他们害怕发生更普遍的暴力冲突。在

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角斗士护卫下，密谋者来到卡比托利欧山。罗马城的民众被他们的举动惊得呆若木鸡，但他们或许已经意识到，群众的情绪表明他们并没有得到支持。大多数群众仍然对尤利乌斯·恺撒很忠诚，毕竟他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这是历代元老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的。密谋者幻想中的、万分渴望的那个共和国早就不能正常运作了。

几周后，一位叫作马提乌斯的元老（他是坚定的恺撒派，尽管他也不喜欢恺撒的独裁）在给西塞罗的信中忧郁地写道，假如尤利乌斯·恺撒“那样的天才都找不到出路，那么谁能做到”？^[44]

^[1] Quoted in Suetonius, *Caesar* 30.4.

^[2] 今天的布林迪西，在意大利南部。

^[3] 庞培关于跺脚的吹嘘，见Plutarch, *Pompey* 57, 60；“苏拉这么干过”，见Cicero, *ad Att.* 9.10.3；对这些战役的叙述，见A. Goldsworthy, *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 pp. 380–471 (2007), pp. 461–574。

^[4] Cicero, *ad Att.* 9.7C.

^[5] 今天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

^[6] 关于这些战役，见A. Goldsworthy, *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 pp. 380–431 = (2007), pp. 461–524。

^[7] 关于罗马指挥官的行为，见N. Rosenstein, *Imperatores Victi* (1993), pp. 114–51；对庞培之死和尤利乌斯·恺撒在埃及的详细叙述，见A. 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p. 167–81。

^[8] Suetonius, *Augustus* 8.1, Nicolaus of Damascus 3；关于葬礼，见Polybius 6.53.1–54.6的著名叙述。

^[9] Tacitus, *Dialogues* 28.6 (Loeb translation), p. 307.

[10] Nicolaus of Damascus 3, Velleius Paterculus 2.59.3; 对母亲和母亲角色的更广泛讨论, 见S.Dixon, *The Roman Mother* (1988), pp.104-40, esp.129-35。

[11] 今天的波佐利, 意大利南部城市。

[12] Nicolaus of Damascus 4; Cicero, *ad Att.*12.16, 12.18, 14.11 提及菲利普斯的别墅; 马凯鲁斯的中立, 见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62。

[13] 卡比托利欧山 (Capitoline Hill) 是罗马城七座山丘中最高的一座, 在广场附近, 是重要的宗教与政治中心。美国国会大厦所在的“国会山” (Capitol Hill) 就得名自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

[14] 尤文塔斯是罗马神话中的青春女神, 是大神朱庇特和天后朱诺所生的女儿, 对应希腊神话中宙斯和赫拉的女儿赫柏。尤文塔斯拥有少女般的青春和活力, 在奥林匹斯圣山的神宴上侍候诸神, 专门给他们斟酒。她的双耳壶中盛有的长生不老酒拥有恢复青春美貌的神力。同时尤文塔斯还是青少年的守护神, 所有罗马少年在即将成年之时都要前往神庙, 祈求尤文塔斯的庇佑。

[15] Suetonius, *Augustus* 8.1, 94.10, Dio 45.1.5-6, Nicolaus of Damascus 4; 关于穿上成年托加袍的仪式, 见B.Rawson,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Roman Italy* (2003), pp.142-4, 关于向青春女神尤文塔斯献祭, 见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4.15.5。

[16] 当选祭司, 见Nicolaus of Damascus 4, Cicero, *Philippics* 5.17.46, Velleius Paterculus 2.59.3。

[17] Suetonius, *Augustus* 79.1-2.

[18] Sallust, *Bell. Cat.*25.

[19] 尤利乌斯·恺撒的相貌, 见Suetonius, *Julius Caesar* 45.1, 屋大维的眼睛, 见Suetonius, *Augustus* 79.2。性道德与屋大维, 见Nicolaus of Damascus 5, 15; 古罗马有大量关于性的文学作品, 而且往往很有现代色彩, 见P.Grimal (trans.A.Train), *Love in Ancient Rome* (1986); 安东尼与西塞莉丝, 见Cicero, *ad Att.*10.10, *Philippics* 2.58, *ad Fam.*9.26. Serv. On E10; *de vir. Ill.*82.2, Plutarch, *Antony* 6, 9。西塞罗在*Philippics*

2.58, 69, 77中表达了对她的憎恶；见P.Grimal (trans.A.Train), *Love in Ancient Rome* (1986), pp.222-37；关于莱斯比娅其实是克洛狄乌斯的姐妹之一，见Apuleius, *Apologia*.10。

[20] Suetonius, *Augustus* 8.1, Velleius Paterculus 2.59.3, Nicolaus of Damascus 10-13, 15.

[21] 对尤利乌斯·恺撒担任独裁官时期的介绍，见J.Gardner, ‘The Dictator’, in M.Griffin (ed.), *A Companion to Julius Caesar* (2009), pp.57-71, 细节详见M.Gelzer (trans.P.Needham), *Caesar* (1968), pp.272-333, C.Meier (trans.D.McLintock), *Caesar* (1996), pp.430-96。

[22] 见E.Rawson, ‘Civil War and dictatorship’ in *CAH2* IX, pp.438-67, 及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61-96讲到了恺撒党人和他的新元老们。

[23] Cicero, *ad Att.*4.16.3, 8, 17.7, Suetonius, *Caesar* 26.2, Pliny, *NH* 36.103, with Rawson in *CAH2* IX, pp.453-4.

[24] “儒略”是恺撒的名字尤利乌斯的旧译。

[25] Suetonius, *Caesar* 44.2, Pliny, *NH* 18.211, Plutarch, *Caesar* 59, Macrobius, *Saturnalia*.14.2-3, T.Rice Holmes, *The Roman Republic* Vol.III (1923), pp.285-7, M.Gelzer (trans.P.Needham), *Caesar* (1968), p.289, 及Z.Yavetz, *Julius Caesar and his Public Image* (1983), pp.111-14.

[26] 关于凯旋式，见Dio 43.19.1-21.4, 42.3, 44.1-3, Appian, *BC* 2.101-2, Plutarch, *Caesar* 55, Suetonius, *Caesar* 37, Pliny, *NH* 7.92, Cicero, *Philippics* 14.23；相关评论也见M.Gelzer, *Caesar* (1968), pp.284-6, T.Rice Holmes, *The Roman Republic* Vol.III (1923), pp.279-81, 概况见S.Weinstock, *Divus Julius* (1971), 尤见pp.76-7。

[27] 尤利乌斯·恺撒说，哪怕是一个土匪，只要忠诚地为他效力，他也会奖赏他，见Suetonius, *Augustus* 72；关于他的负债和奖赏追随者，见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p.183-90。

[28] Suetonius, *Augustus* 8.1, 41.1, Nicolaus of Damascus 6-15, Dio 43.47.3, Tacitus, *Ann.* 11.25.2, 注意R. Billows, *Julius Caesar: The Colossus of Rome* (2009), pp. 256-8 的评论, 以及他对屋大维和外甥们的态度。

[29] Suetonius, *Julius Caesar* 77.

[30] 关于尤利乌斯·恺撒的计划, 对比E. Rawson, 'Caesar's Heritage: Hellenistic Kings and their Roman Equals', *JRS* 65 (1975), pp. 148-59, R. Carson, 'Caesar and the monarchy', *Greece & Rome* 4 (1957), pp. 46-53, 和J. Collins, 'Caesar and the corruption of power', *Historia* 4 (1957), pp. 445-65。

[31] 意思是“小恺撒”。

[32] 关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真正重要性, 见E. Gruen, 'Cleopatra in Rome. Fact and Fantasies', in D. Braund & C. Gill (eds), *Myths, History and Culture in Republican Rome: Studies in honour of T. P. Wiseman* (2003), pp. 257-74, 更多概况见A. 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p. 192-203; 允许尤利乌斯·恺撒多娶妻的故事, 见Suetonius, *Julius Caesar* 52.3。

[33] 牧神节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节日, 起源可能在罗马建城之前, 时间是每年2月13日至15日, 是春季驱逐恶灵、净化城市的节庆, 纪念牧神和抚育罗马创始人罗慕路斯与雷穆斯的母狼。

[34] 如果被鞭子打到, 是非常幸运的, 尤其对那些求子心切的妇女或希望顺利生产的孕妇来说。

[35] “不是雷克斯, 而是恺撒”, 见Suetonius, *Julius Caesar* 79.2; 牧神节, 见Dio 44.11.1-3, Appian, *BC* 2.109, Plutarch, *Caesar* 61, Antony 12, Cicero, *Philippics* 2.84-7, *de divinatione* 1.52, 119, Suetonius, *Caesar* 79.2-3。J. North, 'Caesar at the Lupercalia,' *JRS* 98 (2008), pp. 144-60有力地论证了, 此事不是尤利乌斯·恺撒为了当国王而安排的; 即便是他安排的, 也是为了非常公开地拒绝; 另见Weinstock (1971), pp. 318-41。

[36] Suetonius, *Caesar* 41.2, 76.2, 80.3, Dio 43.46.2-4, Plutarch, *Caesar* 58, Pliny *NH* 7.181, Cicero, *ad Fam.* 7.30.1-2, M. Gelzer, *Caesar* (1968), p. 309, 310-11, 和 T. Rice Holmes, *The Roman Republic* Vol. III (1923), pp. 328-30。

[37] Suetonius, *Caesar* 77; 西塞罗莫名得到外省居民的感谢, 见 Cicero, *ad Fam.* 9.15.4; 竞技会上的表现, 见 Suetonius, *Augustus* 45.1。

[38] “我活得已经足够久” 见 Cicero, *pro Marcello* 8, 25; ‘he hates me’, Cicero, *ad Att.* 14.1。

[39] 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前86~约前35年), 古罗马史学家、政治家和来自外省平民家庭的“新人”。他终生反对门阀贵族势力, 为尤利乌斯·恺撒效力。主要作品有《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他在担任阿非利加总督期间强取豪夺, 大发横财。

[40] 关于密谋者, 见 M. Gelzer, *Caesar* (1968), pp. 323-9,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 44-5, 56-60, 64, 95, A. Lintott, ‘The assassination’, in M. Griffin (ed.), *A Companion to Julius Caesar* (2009), pp. 72-82, 也见 Suetonius, *Caesar* 83.2, Dio 43.47.3, 44.11.4-14.4, Appian, *BC* 2.111-14, 3.98, Plutarch, *Antony* 13, *Brutus* 6-13, *Caesar* 62, Suetonius, *Caesar* 80.1, 3-4, Velleius Paterculus 2.58.1-4; 关于 Cato 自杀见 Dio 43.10.1-13.4, Appian, *BC* 2.98-9, 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56.4, 59.1-73.1。

[41] 引自西塞罗的话, 见 *ad Fam.* 15.19.4; 赞美加图的著作和尤利乌斯·恺撒的《反加图传》, 见 Cicero, *ad Att.* 12.21.1, 13.40.1, 46, 51.1, *Orator* 10, 35, 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11.1-4, 25.1-5, 73.4, *Cicero* 39.2, *Caesar* 3.2, Suetonius, *Caesar* 56.5, with M. Gelzer, *Caesar* (1968), pp. 301-4, T. Rice Holmes, *The Roman Republic* Vol. III (1923), p. 311 和 D. Stockton, *Cicero* (1971), p. 138; 元老们宣誓保卫尤利乌斯·恺撒, 见 Suetonius, *Julius Caesar* 84.2; 密谋者不受誓言约束, 见 Plutarch, *Brutus* 12, 与喀提林党人不同, 见 Sallust, *Bell. Cat.* 22.1-2。

[42] 这个时期罗马的笔一般是金属制的, 在蜡板上写字。

[43] 刺杀, 见Plutarch, *Caesar* 66, *Brutus* 17, *Antony* 13, Dio 44.19.1-5, Appian, *BC* 2.117, Suetonius, *Caesar* 82.1-3。

[44] 盖乌斯·马提乌斯的话, 见Cicero, *ad Att.*14.1。

第二部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阿努斯），前44～前38年

后来，根据他舅公的遗嘱……他开始自称为盖乌斯·恺撒。

——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7.2

五 继承人

屋大维阿努斯……很有头脑，很有活力，他很可能对我们的英雄们（刺杀恺撒的密谋者）示好。但我们对他能够信任到什么程度呢，毕竟他是这个年纪，有这样的姓名，继承了这样的遗产，经历过这样的教育。我在阿斯图拉遇见了他的继父，他觉得绝对不能信任屋大维阿努斯。即便如此，我们必须注意他，至少要让他远离安东尼。

——西塞罗，前44年6月^[1]。

3月15日这天，尤利乌斯·恺撒的甥孙离罗马很远，因为前45年年底时独裁官送他去国外深造。贵族子弟常常为担任行省总督的亲戚或家族友人效力，作为他们的“帐篷伙伴”。他们与总督及其幕僚一起生活，观察总督的一举一动，就像他们在家时观察亲戚在广场的活动一样。尤利乌斯·恺撒打算带屋大维一起远征帕提亚，希望让他历练一番，积攒经验。于是这个年轻人被派往马其顿，那里有6个军团和相当规模的辅助部队^[2]在为东方的战争做准备。尤利乌斯·恺撒为了给克拉苏报仇雪恨，正在集结大军，马其顿的部队只是其中一部分，但马其顿离意大利较近，很方便，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在希腊。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同时，屋大维也不能忽略政治技能，因为军事和政治是公共生活的两大支柱。希腊的修辞学教师享有盛誉，年轻的罗马贵族常去希腊学习。^[3]

四个月里，屋大维和一群朋友与侍从居住在马其顿西海岸的阿波罗尼亚^[4]。这座城市的位置具有战略意义，在艾格纳提乌斯大道^[5]沿线，这条宏伟的罗马大道是在前2世纪建造的，横亘希腊半岛，一直通到爱琴海畔。阿波罗尼亚曾经受到尤利乌斯·恺撒的慷慨善待，因此很欢迎他的甥孙。冬季，屋大维接受了嗓音训练，练习演讲，观察军队的操练与锻炼，并参与其中。除了和罗马军团一起训练之外，他还与由非公民组成的骑兵团一起训练，因为年轻贵族常担任这种单位的

指挥官。在针对帕提亚国王骑兵部队的战斗中，罗马的骑兵有可能起到关键作用。^[6]

消息穿过亚得里亚海需要时间，所以直到3月底，屋大维母亲的一封信才送到他手中。这封信很可能是由家中的一名仆人或与他们家有某种联系的人送来的。阿提娅很可能是在3月15日当天写信的，因为她在信中只讲到了恺撒遇刺的基本事实。书信始终只是信息的一部分，信使常常要补充细节和解释，但这名信使并不知道更多情况。他在拿到信后立刻离开了罗马，并且十万火急地赶来，所以并不知道3月15日之后发生的事情。和阿提娅一样，他只能描述人们的震惊和惶恐，以及害怕发生更多暴力冲突，因为死去的独裁官的亲戚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屋大维的母亲敦促他立刻返回意大利，并尽量保持低调。

这个年轻人以罗马人的恰当方式接受了这个噩耗，在一次临时举行的会议（就是为行政长官和行省总督出谋划策的会议）上征求伙伴的建议。在场的人中我们知道名字的有昆图斯·萨尔维迪努斯·鲁弗斯和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他们都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与屋大维维持着关系。这两人的背景与屋大维的父亲相仿，属于意大利城镇的当地士绅。萨尔维迪努斯的年纪可能大一些，阿格里帕和屋大维差不多同龄，可能从小时候就与屋大维一起接受教育。^[7]

独裁官的死讯传开之后，驻扎在附近的各军团的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前来拜访屋大维，表达自己的同情和对刺客的愤怒，并表示支持他。有人说，这些军人表示愿意接受他的指挥、进军罗马，这可能是后来的夸张说法。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善意。驻扎在马其顿的全部6个军团都是尤利乌斯·恺撒在前48年的法萨卢斯战役之后组建的，每一名军官的最初任命和后来的晋升都要感谢独裁官的批准。有些军官可能在此之前就在不同的军团为他效力。尤利乌斯·恺撒过去

给他们的好处让他们感恩戴德，同时他们也热切期望在将来得到丰厚的赏赐。在东方的战争以利润丰厚而闻名，该地区的富庶国家里有大量战利品。世人皆知尤利乌斯·恺撒是个幸运的将军，从来没有输掉一场战争，并且在分享战利品时特别慷慨大方。除了军人之外，阿波罗尼亚城的代表也前来吊唁，并保障屋大维的安全。^[8]

罗马贵族理应征询他人的建议，但随后就要自行斟酌并做出决定。屋大维决定不再等待传来更多消息，而是立刻渡海前往意大利，安排了运载他一行人及其侍从的船只。他可能先在卡拉布里亚沿海的一个偏僻地点停靠，然后在大港口布隆迪西乌姆（今天的布林迪西）正式登陆。很快，他就了解到罗马当前的局势。^[9]

在刺杀最初造成的震惊情绪消退之后，一些元老赞扬了密谋者，但广大群众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布鲁图斯等人的演讲无人响应，分配金钱也拉拢不到人。后来的历史学家阿庇安辛辣地讽刺道，密谋者竟然希望一群可以被金钱收买的选民响应他们捍卫自由的口号。密谋者没有采取行动，于是失去了主动权。3月17日，安东尼以执政官的身份召集元老院开会。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和其他人一些人感到不安全，不敢参加，留在卡比托利欧山上。在漫长的辩论之后，西塞罗提出的一项动议被绝大多数人通过，赦免了密谋者，但认可尤利乌斯·恺撒的所有决定与举措。这个妥协虽然不符逻辑，却是必需的。大多数行政长官都是独裁官任命的，如果他的决定无效，那么这些人（包括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和安东尼）就不能合法地占据官职。同样，如果他的举措是不合法的，那么就没有一个行省总督是合法的，近期的全部法律也没有效力，分配给退伍军人和其他定居者的土地就不再是他们的财产。复苏的共和国极有可能立刻陷入混乱，因此只能等待新的选举，对每一项命令和法律进行重新裁决。

尤利乌斯·恺撒的岳父提出动议，为他举办了公开葬礼。葬礼地点在广场的中心位置，时间最可能是在3月20日，由安东尼主持并致悼词。他究竟说了多久，具体说了些什么，各方面史料众说纷纭，但对演讲结果的记述是一致的。安东尼向群众展示了独裁官死前穿的袍子，它被刀子割裂了，还沾着血迹。人们用蜡做了一尊恺撒像，展示他的二十三处伤口。人们用剧场使用的那种吊车将蜡像吊起来，旋转着向群众展示。安东尼宣读了独裁官的遗嘱，包括将他在台伯河附近的广阔花园改为公园，以及给每一位公民300塞斯特尔提乌斯（即75迪纳厄斯^[10]）的赠礼，他过去也曾这样馈赠公民。遗嘱还将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立为第二继承人，群众听到这里，表达了对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憎恶。愤怒的群众很快沸腾，开始攻击密谋者及其同情者的房屋。一位叫作秦纳的保民官（他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密友）被暴民杀害，他们误以为他是那个也叫秦纳的密谋者。就像群众喜爱的另一位英雄克洛狄乌斯一样，尤利乌斯·恺撒的遗体也在广场上被火化。长凳和其他可燃物被堆起来形成火葬堆。对密谋者来说，罗马城已经不再安全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全都离开了罗马。^[11]

尤利乌斯·恺撒的遗嘱还将盖乌斯·屋大维立为继承人，将独裁官庞大家产的四分之三都传给了他，不过有一个算是相当常见的条件，即要求遗产受赠人改用尤利乌斯·恺撒的姓氏。遗嘱是前45年9月15日独裁官从西班牙战役返回后拟定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屋大维或他的任何直系亲属知道遗嘱的内容。尤利乌斯·恺撒显然非常看好这个年轻人，觉得他比自己的两个外甥都更有才干。但我们必须记住，尤利乌斯·恺撒在立遗嘱时并不认为自己很快就会死去。西塞罗后来宣称，独裁官在东方战争中将一去不复返，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看法很普遍，或者很可能成为现实。而且也完全不能确定，屋大维一定比他的舅公活得更久，因为这个年轻人在前45年就患过重病，所以才没有及时赶到西班牙，何况他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健壮。如果这个年轻人经受住了鞍马劳顿，躲过了帕提亚人的箭矢，并且持续表现出才

华，那么尤利乌斯·恺撒也许会给他更多的公开认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不可能知道独裁官的长期计划是什么。^[12]

罗马人非常重视收养关系，养子在各方面都与亲生儿子享有完全相同的权益，此外还拥有自己血亲家族的宝贵人脉。这种完全的收养必须在养父在世时进行，他死后就不能进行收养。正因如此，学术界出现了漫长而非常复杂的辩论，关于尤利乌斯·恺撒的遗嘱究竟给了屋大维何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争论没有抓住重点。屋大维是他舅公财产的主要继承人，还将改用他的姓氏。尤利乌斯·恺撒的权力、官职和荣誉都是授予他本人的，不是可以世袭的财产。但他是一位元老，恢复了自己家族的威望，并将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接受了尤利乌斯·恺撒家产与姓氏的年轻人必然也会前程远大，有希望将家族的政治成就延续下去。他当然不一定很快就取得成功，但过一段时间到了合适的年龄之后，他就理应进入政界，为恺撒之名获得新的荣耀。

如果屋大维接受了遗产（因为继承财产不是强制性的，受赠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接受，我们知道有些人曾拒绝接受遗产），那么他不仅继承了舅公的姓氏，还继承了他的政治前途。虽然尤利乌斯·恺撒与屋大维之间并不是完全合法的收养关系，但主要继承人与儿子之间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了。有些技术上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亲生儿子或养子会继承父亲或养父对其释奴享有的权利；尤利乌斯·恺撒的释奴不仅数量极多，而且其中很多人非常富裕，这些释奴有义务支持他，奉他为新的恩主，为他投票，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资源供他使用。屋大维并没有被正式收养，所以可能觉得要主张自己享有这种权利会比较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独裁官的全体或部分释奴不会选择他作为自己的恩主。^[13]

在布隆迪西乌姆，屋大维收到了菲利普斯的一封信，以及阿提娅的第二封信，这两人此时已经知道尤利乌斯·恺撒遗嘱的条件。他们也看到，虽然密谋者得到了赦免，并且仍然有很多元老支持他们，但群众非常憎恨密谋者。目前尤利乌斯·恺撒的亲属还没有遭到血洗或报复性攻击。但这不能说明，屋大维能够安全地以独裁官继承人的身份进入政界。十八岁的少年太年轻，要等十几年才能参选官职、进入元老院，但恺撒的名字会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或许还会招来敌意，他可能很难应付这种敌意，甚至很难生存下来。他的继父已经在考虑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参加前41年的执政官竞选（竞争对手将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因此不愿意让屋大维过早从政。菲利普斯建议屋大维拒绝接受遗产，保留自己的姓氏。他的母亲有些犹豫，但同样谨慎。我们掌握的史料可能有些夸张，因为它们都是后世撰写的，而且大多以奥古斯都自己的回忆录为基础。年轻的英雄拒绝被经验丰富的长辈的建议所羁绊，这样的形象在文学上早已形成传统，从阿喀琉斯到亚历山大大帝，皆是如此。根据阿庇安的说法，年轻的屋大维甚至向阿提娅引用了《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对母亲忒提斯说的话。^[14]

这并不是说谨慎是不对的，至少这两封信都敦促屋大维不要鲁莽行事。不管他们的建议究竟是怎么样的，决定只能由他一人做出。他自己的雄心、自信和自尊一定是主要动机，否则此后发生的一切就让人无法理解了。或许从一开始，他就坚信自己一定能战胜所有竞争对手，不管他们的年纪比他大多少，经验又比他丰富多少。不过，在当时没有一位理智的观察者能够预测随后几年的局势走向，也无法预测他能够扮演的角色。^[15]

如果说屋大维曾经犹豫要不要接受尤利乌斯·恺撒的遗产和姓氏，那么他的犹豫是很短暂的。十八岁时，他不再是盖乌斯·屋大维，而变成了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根据传统，他应当在这个新名字后面加上“屋大维阿努斯”，以保留一点自己本名的痕迹。但他

始终没有这么做，尽管他的敌人有时会称他为屋大维阿努斯，以强调他的真实家族背景是比较默默无闻的。“序章”已经讲到，本书不会遵照现代人的习惯称他为屋大维，而是称他为恺撒，因为这才是他自己使用的名字，我们掌握的史料也是这么称呼他的。这个名字的威力与随后发生的事件有着很大关系。[\[16\]](#).

罗马

年轻的恺撒及其随行人员从布隆迪西乌姆出发，前往罗马，在正常情况下这段路程需要走九天或更久。他的朋友们已经开始称他为恺撒。可能早在这个阶段，他就派遣一名信使去亚细亚行省，控制尤利乌斯·恺撒为帕提亚远征准备的一些作战资金。一行人肯定一路快马加鞭，于4月初抵达罗马。西塞罗当时不在罗马城，他于4月10日写信询问屋大维抵达罗马的情况，是否有人争先恐后地迎接他，或者是否有爆发革命的迹象，但西塞罗显然不认为会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果然，恺撒此次到访罗马的时间很短，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安东尼让年轻的恺撒等了一段时间，才在帕拉丁山上的宅邸（原先是庞培的府邸）花园内接见他，场面非常冷淡。执政官安东尼的确非常忙碌，正在应付潮水般的请愿者，而且他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少年在政治上有什么价值，或者有什么重要意义。少年希望接管尤利乌斯·恺撒的全部家产，这对安东尼来说不是好消息，因为他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尽可能多的资金来巩固自己的地位。4月12日，西塞罗漫不经心地表示，他之前询问的关于恺撒的情况并不重要。[\[17\]](#).

离开罗马后，十八岁的少年恺撒穿过坎帕尼亚[\[18\]](#)，前往那不勒斯。途中，他花了一些时间与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的一些定居于此的军团老兵交谈。4月18日，他与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见了面。巴尔布斯是西班牙人，来自加的斯[\[19\]](#)，凭借为庞培效劳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后来加入尤利乌斯·恺撒的幕僚。他曾在西班牙和

高卢为尤利乌斯·恺撒效力，但后来更多地担任他的政治代理人，在罗马城为他服务，推动了很多幕后交易，并为他出谋划策。对少年恺撒来说，巴尔布斯是一个重要的人脉，应当与他结交，而且这样一个有影响且富裕的政客对他来讲也是很有价值的。当天晚些时候，巴尔布斯告诉西塞罗，少年恺撒决定接受遗产。[\[20\]](#)

几天后，西塞罗见到了年轻的恺撒，后者正待在他继父的别墅（位于那不勒斯湾沿岸的普泰奥利），西塞罗的乡间别墅就在附近。西塞罗写信给朋友阿提库斯称：“屋大维和我们在一起，对我很尊敬，也很热情和友好。他的伙伴们称他为恺撒，但菲利普斯不这么叫他，我也不。”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密谋者受到的威胁，以及对执政官安东尼决策的轻蔑，关于恺撒的内容很少。目前，西塞罗并不觉得这个十八岁少年很重要。阿提娅与丈夫不同，已经将儿子称为恺撒。菲利普斯从来不会公开站队，但肯定不会积极反对继子的雄心壮志，或许在悄悄地帮助他。屋大维娅的丈夫马凯鲁斯可能也是这样，不过他目前与密谋者还保持着良好关系。除了自然的损耗之外，多年内战加上庞培与尤利乌斯·恺撒多次担任执政官时的动荡也使得高级元老损失惨重，所以此时只有十七名前任执政官在世，其中好几人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或者意愿去参与政治。能够指导共和国并控制门客-恩主关系网（就是这种网络维系着共和国）的资深政治家已经为数不多。尤利乌斯·恺撒的死更是雪上加霜，因为他曾史无前例地处于庞大的门客-恩主关系网的中心，没有人能够轻松填补他留下的空缺。他的支持者都是单方与他维持着关系，绝不是一个团结一致集体。[\[21\]](#)

此时马克·安东尼是执政官，尽管他只有四十岁，因此严格来讲并不符合任职资格。尤利乌斯·恺撒在即将离开罗马远征帕提亚的时候，曾任命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为补任执政官

[22]，以接替自己的岗位。多拉贝拉只有三十多岁，这更是独裁官明目张胆地违反传统的例子。即便如此，在尤利乌斯·恺撒遇刺之后，多拉贝拉身穿官服、在执法吏陪同下出现时，没有人敢出声反对。安东尼和多拉贝拉都曾支持尤利乌斯·恺撒，但好几个密谋者也曾是他的亲信。安东尼和多拉贝拉都以鲁莽和高调浮夸的行为而闻名。更重要的是，世人皆知他们互相看不顺眼。尽管尤利乌斯·恺撒早已内定了多拉贝拉，安东尼还是企图阻止他当选，为此甚至操纵国家宗教，声称自己在选举时观察到了雷电，所以投票无效。在过去，行政长官之间的竞争和公开敌对阻止了任何一个人在共和国获得太多权力。

[23].

马克·安东尼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形象是一个虚张声势的狂徒、头脑简单的军人和尤利乌斯·恺撒的忠实副手。我们很难看透这幅讽刺画像，去理解真实的安东尼。他肯定将自己展示为非常尚武骁勇的形象，自称是威风凛凛、趾高气扬的半神赫拉克勒斯的后裔，就像尤利乌斯·恺撒自称是女神维纳斯的后代一样。安东尼常常蓄着英雄式的浓密大胡子，而“非传统”的年轻贵族（其中很多人曾支持喀提林）的胡须通常是胡乱蔓生的。安东尼把上衣束得很高，以炫耀自己肌肉发达的大腿，并且即便在城内也佩带利剑，尽管这种做法被认为是不妥当的。铭刻在钱币上的安东尼肖像显示，他的脖子粗壮，面部线条粗重，证实了人们对他的描绘，即一个孔武有力的壮汉，竭尽全力地展现自己咄咄逼人的男性气概。他的演讲风格强悍有力，属于富丽浮夸的亚洲风格，就是西塞罗讨厌的那种。[24].

安东尼家族是根基牢固的平民望族。安东尼的祖父是当时最著名的演说家之一，仕途辉煌，当过执政官和监察官。但在那个凶暴的年代，辉煌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在内战期间被马略下令处死。他儿子的名望没有那么高，说得好听些是个善良的傻瓜，说得难听些就是恶习难改的浪荡子。安东尼家族的名望很高，再加上或许大家觉得他是个

无害的人，于是元老院在前73年指派安东尼的父亲去清剿海盗，不过没有给他六年后庞培得到的那样强大的资源。结果是不难预测的，安东尼的父亲一败涂地，没能回家就死去了。他的遗孀很快嫁给了兰图鲁斯（前63年被处决的喀提林党人之一），所以安东尼在二十出头时就已经失去了父亲和继父。因此他对共和国没有什么好感。^[25]

安东尼是个地地道道的纨绔子弟，内心里认为自己理应得到荣誉与光辉，因此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去尊重常规的行为准则。他的父亲留下了累累债务，家族的一些产业已经被抵押出去，所以安东尼拒绝继承这部分产业。他在青年时代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丝毫不知节制，终日酗酒作乐，追逐美女。虽然囊中羞涩，他仍然不愿意抑制自己浮夸奢侈的本性。安东尼很快也债台高筑，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当时不罕见。他开始从政的时间比一般情况晚得多，曾在叙利亚、犹太和埃及服役，后来到高卢投奔尤利乌斯·恺撒。他没有赶上参加高卢的大部分主要战役，但在高卢大叛乱（其高潮便是前52年夏季残酷的阿莱西亚攻防战）后期参加了作战。在内战中，安东尼追随尤利乌斯·恺撒，参加了意大利战役、马其顿战役的第二阶段，在马其顿战役中指挥恺撒军队的左翼。内战的其他战役，他就没有参加了。^[26]

安东尼在军旅生涯中的表现其实并不算特别突出。他本人非常勇敢，但缺乏独立指挥的经验（不管指挥的部队规模有多大）。总的来讲，他比贵族通常待在军中的时间要少。但他将自己宣传为一位伟大的军人和统帅（赫拉克勒斯不仅凭借自己的无穷力量建功立业，也曾指挥军队），他的这种形象一直延续到今日。尤利乌斯·恺撒一般更愿意让安东尼扮演政治角色，前49年和法萨卢斯战役之后他都让安东尼管理意大利。但结果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安东尼人脉很广，而且他的家庭背景比尤利乌斯·恺撒的其他支持者要好得多，但他不是个非常精明世故的人。他带领盛大的车队巡游意大利各地，带着他的母亲

和哑剧演员情妇，以及形形色色不适合出现在一位罗马行政长官随行队伍中的人。安东尼喜欢与戏子伶人打交道，这些人肯定和现代演员一样激情四射、热情奔放，但社会地位显然低于安东尼，不管他想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子。元老是不应当和这些人待在一起的，其中很多人，包括他的情妇，都曾经是奴隶。但安东尼对这种规矩置之不理。有一次，他在广场上摆开席位，接受人们的请愿，但他显然还在遭受宿醉的折磨。政事处理到一半的时候，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呕吐起来。有人说他吐到了自己怀里，还有人说一位朋友掀起了自己的斗篷帮助他。有传闻说，他甚至试验用狮子，而不是马，给他拉车。^[27]

他就是这样愚蠢地炫耀通过内战获得的权力，但更糟糕的是，骚乱导致罗马城和乡间发生了暴力冲突，因为一些野心勃勃的人（包括多拉贝拉）在怂恿和四处活动，支持负债人的事业。尤利乌斯·恺撒最终回到罗马后，在一段时间内不再公开任用安东尼，并对多拉贝拉加以严密监视，在作战时也带着他。在蒙达战役后期，独裁官传唤马克·安东尼到西班牙，有迹象表明他又开始宠信安东尼。安东尼和他一起乘坐马车，而年轻的屋大维和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则乘坐第二辆马车跟在后面。到前44年，尤利乌斯·恺撒选择安东尼为同僚执政官，多拉贝拉为接替自己的续任执政官，说明他已经恢复了对这两人的恩宠和信任。^[28]

作为执政官，安东尼和多拉贝拉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大权在握。他们曾支持尤利乌斯·恺撒，并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但他们两人都是豪门世家子弟，有着自己的野心。要说他们只是尤利乌斯·恺撒的爪牙，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实际上是在追寻自己的利益，而支持尤利乌斯·恺撒对他们有利。据说特雷博尼乌斯曾在密谋早期试探安东尼。“解放者”^[29]们杀死了独裁官，以便恢复旧日的共和国，让贵族可以像过去那样竞争官职和发挥影响力。执政官肯定是这种新

秩序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则表明，这种竞争进行的方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30\]](#)

安东尼等人与密谋者的停战始终是令人高度紧张的。安东尼和多拉贝拉都不愿意强有力地支持密谋者，或者提高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人的地位，这对安东尼和多拉贝拉肯定没有好处。不管安东尼和多拉贝拉对独裁官和刺杀案是怎么想的，如今密谋集团的领导人都是与他们争夺官职与威望的对手了。各方都着眼未来，因为在目前来讲，大赦和认可尤利乌斯·恺撒的举措是必要的，但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时间维持。假以时日，密谋者和独裁官的举措都可能在元老院、公民大会或法庭遭到攻击。前49年的内战之所以爆发，就是因为庞培派威胁要为了尤利乌斯·恺撒十年前做的事情而起诉他。在罗马的体制下，任何事情都不是板上钉钉的，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可能被定性为非法，所以永久性安全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律上的攻击可以很容易结束一个人的仕途，但暴力却是非常真切的威胁。

混乱和即刻陷入冲突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两名执政官和密谋者都没有自己可以直接调遣的军队。独裁官的副手、骑兵统帅李必达在城郊有1个军团，并在尤利乌斯·恺撒遇刺之后的日子里将一些士兵调至广场，但他没有力量也没有意志，去用武力为自己争得更长期的主宰地位，尤其是独裁官死去之后，从技术上讲他已经丧失军权了。安东尼安排李必达接替尤利乌斯·恺撒当上祭司长，随后这位前任骑兵统帅去了外高卢，接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使得他暂时不必害怕任何敌人。[\[31\]](#)

尤利乌斯·恺撒的葬礼刚刚结束，一群热情的支持者就在他的火葬堆处建了一座祭坛。这群人的领导人叫阿玛提乌斯，他自称是马略的孙子，所以也就是独裁官的血亲。尤利乌斯·恺撒在世时并没有认这个亲戚，阿玛提乌斯寻求其他亲戚（包括年轻的屋大维）的支持，

也没有成功。安东尼和多拉贝拉对他没有好感，命令将阿玛提乌斯的追随者驱散，并拆除祭坛。4月底，安东尼离开了罗马，去寻求尤利乌斯·恺撒老兵的支持。在这期间，发生了更直接的对抗。多拉贝拉将阿玛提乌斯和他的许多支持者处死了，赢得了西塞罗的热情赞颂。但这表明，很多群众仍然在哀悼独裁者，并且对当局没有采取措施镇压凶手而感到怨恨。安东尼愿意利用群众的情绪，让密谋者惴惴不安，同时自己招募老兵，尤其是先前的百夫长。但他不希望群众的愤怒爆发，从而无法控制局面。目前他的地位很强大，而且他的两个兄弟分别是前44年的裁判官和保民官，但这种地位是不能长期维持的。安东尼和其他人一样，也在为未来做准备，需要保护自己，并且维持长期的实力。^[32]

3月17日，元老院认可了尤利乌斯·恺撒生前做出的决定。其中有些决定还没有正式宣布，但已经被很多人知晓，因此也得到了认可。执政官安东尼应当在确认尤利乌斯·恺撒的每一项决定之前，与一群资深元老组成会议商讨。这种做法是不实际的，他可能也不喜欢这么做。因为有太多决定等待确认，太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请愿者排着队等待当局的处理。元老院怠惰多年，而且近期的内战又造成许多动荡，因此积压了太多政务，尤利乌斯·恺撒还没来得及将它们全部处理完就死了。在务实的层面上，安东尼无疑感到有很多紧迫的事情需要做。这对他来讲也是天赐良机，可以向许多人施加恩惠，收买人心，有希望拉拢到更多的支持者。尤利乌斯·恺撒遇刺后，安东尼控制了他的文件。现在他宣布了一些所谓的尤利乌斯·恺撒生前的决定（尽管人们对这些决定一无所知），并坚持要求元老院批准它们。其中有些似乎与独裁官生前实际做过的事情相矛盾。据西塞罗说，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克洛狄乌斯的遗孀）受到加拉太^[33]国王狄奥塔鲁斯的贿赂，让安东尼确认狄奥塔鲁斯的统治权。后来演说家强烈谴责安东尼在这几个月里捏造的所谓尤利乌斯·恺撒的决定，所以我们很难

准确知晓安东尼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不过就算西塞罗夸大其词，也不可能完全是空穴来风。[\[34\]](#)

安东尼正在为将来的成功聚集资金和人脉，也为了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长远来看，他最需要的是一支强大而忠诚的军队。特雷博尼乌斯和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分别得到了叙利亚和内高卢行省。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最终得到了西西里岛和亚细亚的粮食供应管理权，这对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让他们这样级别的人去管理粮食，有些贬抑的意思，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兵权。安东尼和多拉贝拉合作，把叙利亚给了多拉贝拉，在这一年年末撤掉了特雷博尼乌斯，接管了计划中的帕提亚远征的权责。安东尼接管了马其顿和驻扎在那里的6个军团，不过他同意将其中1个交给同僚执政官。然后他决定让弟弟盖乌斯代替自己治理马其顿，他本人则取代迪基姆斯·布鲁图斯，控制内高卢，这样就既可以方便地监视意大利，也可以得到“长发高卢”，即前不久被尤利乌斯·恺撒征服的地区。在马其顿的5个军团和辅助部队将被调到他的麾下，他的弟弟则在马其顿征募新军队。尽管尤利乌斯·恺撒将行省总督任期限定为两年，安东尼还是让公民大会投票，把他在这个扩大后的行省的任期定为五年，就像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得到的特别指挥权一样。[\[35\]](#)

从很多方面来看，此时的局势很像前49年内战爆发前，各方互不信任，主要领导人都在准备自己的武装力量，以应付可能爆发的战争。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遥远的距离之外观察，没有办法夺回主动权。布鲁图斯是城市裁判官，所以负责主持阿波罗节，即一年一度纪念太阳神阿波罗的节庆和竞技活动。布鲁图斯为这些活动出资，并敲定了活动流程和一些具体的演员，但觉得此时返回罗马太危险，所以没有亲自到场。马克·安东尼的弟弟盖乌斯代替布鲁图斯主持了竞技，所以群众应当感谢谁，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清了。竞技活动很顺利，有些人愿意欢呼布鲁图斯的名字，但也可能有人举行了反对密谋

者的游行。不久之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离开了意大利，去往地中海东部，后来也集结起了自己的军队。布鲁图斯可能并不很情愿这么做，但还是鼓励罗马人民的军团反抗安东尼，并非法夺取了军队的指挥权。西塞罗开始觉得，安东尼是对他们本身和对恢复真正共和国的最大威胁。西塞罗不断哀叹，密谋者原本应当把安东尼和独裁官一起杀掉。他以后见之明评论道：“密谋者拥有男子汉的勇气，却只有婴儿的头脑。” [36].

西塞罗还没有用新名字称呼年轻的恺撒，而这个十八岁少年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和发表的言论让西塞罗担心，但他主要烦恼的还是安东尼。他知道多拉贝拉是个流氓，因为此人曾短暂地与自己非常疼爱的女儿图利娅结婚，后来离了婚却拒绝归还她的嫁妆。但多拉贝拉出发赴行省上任之后，就不再是主要问题了。安东尼是最大的威胁，因为他是共和国复兴的头号敌人。西塞罗渴望有办法削弱安东尼的权力，让密谋者返回罗马并发展壮大。 [37].

[1]. Cicero, *ad Att.* 15.12.2.

[2]. 罗马军队的辅助单位主要依赖外国士兵，他们被称为辅助部队。

[3]. Suetonius, *Augustus* 9.2, Appian, *BC* 3.9, Velleius Paterculus 2.59.4, Dio 45.3.1, Nicolaus of Damascus 16讲到屋大维在阿波罗尼亚的时期；西塞罗和尤利乌斯·恺撒等许多罗马人曾去希腊化世界学习演讲术，见 Cicero, *Brutus* 316, 及 Suetonius, *Caesar* 4.2, Plutarch, *Caesar* 2.

[4]. 今天阿尔巴尼亚西部的费里附近。

[5]. 古罗马人于前2世纪建造的大道，经过今天的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共和国、希腊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全长约1120公里，得名自主持工程的马其顿总督格奈乌斯·艾格纳提乌斯。

[6]. Appian, *BC* 3.9强调他在骑兵中的训练。

[7]. 关于萨尔维迪努斯和阿格里帕，见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129, fn.2-3。

[8]. 关于尤利乌斯·恺撒遇刺的消息和人们的反应，见Nicolaus of Damascus 16, 讨论见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31, 关于军团士兵对战利品的期待，见p.47。

[9]. Nicolaus of Damascus 17-18, Appian, *BC* 3.10-11.

[10]. 迪纳厄斯是古罗马从公元前211年，也就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开始铸造的小银币，起初币重4.5克，后来不断贬值，3世纪中期废止。

[11]. 关于尤利乌斯·恺撒遇刺的后果和他的葬礼，见Rawson *CAH2* IX, pp.468-70,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97-105,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12-14, A. 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p.204-14, T. Mitchell, *Cicero the Senior Statesman* (1991), pp.289-91; Appian, *BC* 2.120-23, 120谈及了贿赂群众同时却宣扬自由的讽刺意味。

[12]. 关于遗嘱，见Suetonius, *Julius Caesar* 83.2, 有价值的讨论，见R. Billows, *Julius Caesar: The Colossus of Rome* (2009), pp.256-8.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31 fn.71 提及了关于此话题的辩论；西塞罗后来说尤利乌斯·恺撒不会从东方归来，见Cicero, *ad Att.*15.2.3。

[13]. 安东尼拒绝将尤利乌斯·恺撒的部分遗产给屋大维，见Cicero, *Philippics* 2.44; 对释奴的权力，见Appian, *BC* 3.94。

[14]. Nicolaus of Damascus 18, Appian, *BC* 3.11-13, Suetonius, *Augustus* 9.2; 西塞罗谈菲利普斯的战役，见Cicero, *ad Fam.*12.2.2; 阿庇安著作中说屋大维引用阿喀琉斯的话，见*BC* 3.13, citing *Iliad* 18.98: “那么我很快要死了；因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伙伴死去。”

[15]. 强调屋大维从一开始就雄心勃勃，见B. Levick, *Augustus. Image and Substance* (2010), pp.23-4。

[16] 关于名字，见重要文章R.Syme, ‘Imperator Caesar: A study in imperial nomenclature’ , pp.172-88。

[17] Nicolaus of Damascus 18, Appian, *BC* 3.13-21, Cicero, *ad Att.*14.6.1和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 p.31, fn.73; Cicero, *ad Att.*14.5.3 询问阿提库斯关于抵达罗马的事情。

[18] 在今天意大利的西南部。

[19] 加的斯是今天西班牙西南部的滨海城市，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是著名的贸易海港和海军基地。

[20] Cicero, *ad Att.*14.10.3; 巴尔布斯的背景和他为尤利乌斯·恺撒效力，见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p.71-3。西塞罗曾在法庭为他辩护，辩护词见*pro Balbo*; 西塞罗的证词，见A.Lintott, *Cicero as Evidence* (2008) , 尤见pp.339-73。

[21] 引文见Cicero, *ad Att.*14.11.2; 马凯鲁斯与密谋者关系友好，见*ad Att.*15.12.2; 关于两位前任执政官的态度，见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p.114, 128。Syme倾向于使用“恺撒派”和“庞培派”的说法，但并没有将它们描绘成泾渭分明或永久性的群体。

[22] 如果一位执政官在任期内死亡（此情况并非罕见，因为执政官常常处在战斗的前线）或被免职，就会选出另外一位，在前任任期余下的时间里执政，被称为“补任执政官”（*consul suffectus*）。

[23] 关于多拉贝拉，见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p.69, fn.2, 97, 150-51; 过去与安东尼的矛盾，见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 pp.186-91。

[24] Plutarch, *Antony* 4讲到他模仿赫拉克勒斯，和张牙舞爪的浮夸军人形象；安东尼的概况，见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 *passim*。

[25] 关于家族，见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 pp.52-65。

[26] Cicero, *Philippics* 2.44讲到拒绝接受父亲的部分遗产；44-6 提及他的少年时代；见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p.81-104。

[27] Cicero, *Philippics* 2.58, *ad Att.*10.10, 13, *ad Fam.*9.26, *Serv.*On El0; *de vir. Ill.*82.2. 西塞罗对安东尼的憎恶直到*Philippics* 2.58, 69, 7才公开表达出来；另见Plutarch, *Antony* 6, 9, Pliny, *NH* 8.55。

[28] Cicero, *Philippics* 2.64-9, 72-4, 78, Plutarch, *Antony* 10, Dio 45.28.1-4; Plutarch, *Antony* 10 说安东尼和恺撒之间发生决裂。M.Gelzer (trans. P.Needham), *Caesar* (1968), pp.261-2倾向于认为这次决裂很严重，而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104表示怀疑；和尤利乌斯·恺撒乘坐同一辆车，见Plutarch, *Antony* 11。

[29] 这是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密谋集团（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人）的自称。

[30] Plutarch, *Antony* 13.

[31] 见R.Weigel, *Lepidus. The Tarnished Triumvir* (1992), pp.44-51, 及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97-111；关于安东尼的态度，见深刻的讨论J.Ramsay, ‘Did Mark Antony contemplate an alliance with his political enemies in July 44B.C.E.?’, *Classical Philology* 96.3 (2001), pp.253-68, 这篇文章虽然主要讲夏季的几个月，但很好地分析了他的态度。

[32] 阿玛提乌斯和献给尤利乌斯·恺撒的祭坛，见Appian, *BC* 3.2-3, 36, Cicero, *ad Att.*14.15,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99；他企图得到年轻的屋大维的接受，见Nicolaus of Damascus 14。

[33] 加拉太是古代安纳托利亚（现在的土耳其）中部高地的一个地区。加拉太北面是比提尼亚和帕弗拉哥尼亚，东面是本都，南面是吕高尼和卡帕多细亚，西面是弗里吉亚。此时加拉太是罗马的一个附庸国。

[34] J.Ramsay, ‘The Senate, Mark Antony, and Caesar’s Legislative Legacy’, *Classical Quarterly* 44 (1994), pp.130-45 正确地没有全盘接受西塞罗的说法，而是精彩分析了好几种最有争议的措施及其背

景。细节并不能改变核心的一点，即颁布这些法律和授权对安东尼特别有利，不管它们是否真的是独裁官的决策。

[35] Appian, *BC* 3.27, 30, with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115-16, 及P. Brunt,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1971), pp.477-83,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33-4.

[36] Cicero, *ad Att.*16.1, 2.3, 4.1, 5.1, Appian, *BC* 3.24, Plutarch, *Brutus* 21.2-3; 引文来自Cicero, *ad Att.*15.4。

[37] Cicero, *ad Att.*16.15.1写到他决定将多拉贝拉没有偿还嫁妆的事情公开。

六 赞颂

我十九岁的时候自行决定并自筹经费，组建了一支军队。共和国的自由受到某个派系的暴政压迫时，我借助这支军队，成功捍卫了共和国。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公元14年，于奥古斯都去世不久后发表
[\[1\]](#).

5月，年轻的恺撒回到了罗马。多年后有一个传说，他抵达罗马城的那天，光晕环绕着太阳，这又是一个预示他未来辉煌成就的征兆。安东尼的弟弟卢基乌斯此时是保民官，他允许这个少年在一次公共集会上讲话。西塞罗得知恺撒演讲的内容后不以为然，仍然认为他并不重要。这个十八岁少年希望自己作为尤利乌斯·恺撒养子的地位得到正式承认，并获得其全部遗产。或许他还没有开始公开攻击密谋者，而是主要强调他“父亲”的声望和荣誉。至少有一次，可能是在纪念丰收女神刻瑞斯的竞技活动中，他企图根据尤利乌斯·恺撒在世时的一道元老院法令，将独裁官的座椅和月桂花冠公开展示。这个花冠就是牧神节时元老们向尤利乌斯·恺撒献上但被拒绝的那一个，不过安东尼不允许进行这种展示。

恺撒提出其他要求，尤其是关于独裁官的家产时，安东尼也同样不肯帮忙，最后独裁官留下的现金很少或几乎完全没有传到恺撒手中。安东尼在方方面面都表现出他觉得新的恺撒是个麻烦。其他人也觉得新恺撒很脆弱。不过也有可能确实很难分清哪些东西是尤利乌斯·恺撒的私人财产，哪些是被他控制的国家财产。有人在法庭上提起了一些诉讼，要求获得尤利乌斯·恺撒的一些财产，理由之一便是这些财产是他在内战期间非法攫取的。总的来讲，这些案件都对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不利。[\[2\]](#).

少年开始借贷。马提乌斯和另一个叫作拉比里乌斯·波斯图穆斯的银行家（过去常与尤利乌斯·恺撒有联系）借钱给他。奥庇乌斯^[3]和巴尔布斯可能也出资帮助他。为了积累现金，恺撒还变卖或抵押了属于自己和独裁官的一些财产。菲利普斯和阿提娅也伸出援手，而独裁官的外甥们（他们得到了独裁官遗产的剩余部分）也多多少少愿意地将这些遗产转交给主要继承人。我们不知道，尤利乌斯·恺撒为帕提亚远征准备的资金是何时抵达的。随这笔资金一同送抵罗马的，还有亚细亚行省一年的税收，但年轻的恺撒自称将这些钱和其他公款交给了国库，只保留了独裁官的私产。^[4]

随后几个月内，少年恺撒将大部分时间用在准备纪念尤利乌斯·恺撒在内战中的法萨卢斯大捷，以及他的神圣祖先“母亲维纳斯”的竞技活动。这也是元老院在独裁官在世时投票决定授予他的荣誉。这一次，没有人企图妨碍或阻拦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举行这些活动。恺撒决定在举行这些活动的同时举办葬礼竞技，以及角斗士竞技和斗兽表演、大型宴会与戏剧表演。这些活动大多会在广场上举行，一些主要公共建筑也会搭建临时场地。这些庆祝活动于7月20日至28日举行，盛大而奢华。为了达成独裁官在遗嘱中的心愿，即向每一位罗马公民赠送金钱，恺撒不得不借了更多钱。^[5]

在竞技活动期间，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彗星。这种“长发”星被认为是可怕的凶兆，预示着迫在眉睫的灾难。恺撒或他的一位支持者给出了更好的阐释，声称这亮光是尤利乌斯·恺撒在升往苍穹、加入诸神的班列。于是，在维纳斯神庙（位于尤利乌斯·恺撒广场建筑群的中心）的独裁官雕像头顶上添加了一颗星。这个故事流传开了，尤其是那些仍然爱戴尤利乌斯·恺撒的人热衷传播这个故事。从很多方面看，这个故事源于元老院在尤利乌斯·恺撒生前授予他的半神荣誉，以及为他建立的后来又被两名执政官下令拆毁的祭坛。这一次，当局没有企图阻止给予尤利乌斯·恺撒这样的荣誉。^[6]

举行公共娱乐活动和纪念祖先都是屡试不爽和非常高效的笼络人心的手段，不过这一次活动的规模和尤利乌斯·恺撒成为神祇的说法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人所获得的荣誉。担任平民保民官是另一种屡试不爽的得到群众爱戴的办法，这一年7月举行选举以填补被杀害的秦纳留下的空缺时，有人说年轻的恺撒即将竞选这个职位。由于尤利乌斯·恺撒在指定他为继承人之前已经将他的身份改为贵族，所以他是不能竞选平民保民官的。这个事件的准确细节今天已经没有办法还原了，有的历史学家说年轻的恺撒企图让一位朋友得到这个职位而不是自己去竞选，但是失败了。这场风波表明，与应对彗星凶兆时的高超手腕相比，恺撒这一次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不断说他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年，这可能太重复了，但我们必须牢记，恺撒毕竟还很年轻，缺乏经验。他之所以从政，就是因为极度自信，而这种自信很容易发展成自负和鲁莽。私下里，他坚信彗星预示着自己即将平步青云。年轻的恺撒非常公开地变卖家产和贷款，这有助于他举办竞技活动，并给死去的独裁官带来荣誉，同时也为自己赢得尽可能多的支持者。[\[7\]](#)

恺撒和安东尼的关系仍然很糟糕。安东尼的势力越来越强，到夏末，他从定居的老兵当中招募了一队强悍的保镖。其中很多人是先前的百夫长，因为百夫长在作战时要身先士卒、带头拼杀，所以往往是非常厉害的战士。如果安东尼打算建立新的军团，有经验的领导者也会特别有价值，因为他们有能力组织、训练和指挥新兵。更重要的是这些老兵的政治意义。有些百夫长属于骑士阶层，但绝大多数百夫长属于百人会议中的最高阶级，所以他们不仅武力强大，他们的投票也很重要。或许是为了赢得这个群体的支持并能操纵法庭，安东尼引入了一项新法律，让这个阶层中的部分人或全体成员有资格担任陪审员，于是在元老和骑士这两个群体之外，又出现了第三个不容小觑的陪审员团体。[\[8\]](#)

与执政官安东尼不同，恺撒没有官职，没有权力，虽然他的公开支持者目前能够为他提供资金，但没有直接的政治权力。马提乌斯告诉西塞罗，他帮助这个孩子，仅仅是因为他与尤利乌斯·恺撒的友谊。恺撒仅有的实实在在的资本就是金钱和他的姓氏。从很早期开始，他就运用这两项资本，去拉拢独裁官之前的军官和士兵。很快，他开始向愿意为他效力的人提供500迪纳厄斯的赏金（超过普通士兵两年的军饷），并承诺将来会给更多赏赐。他给百夫长或军事保民官的奖赏肯定更高。他可能还谈到要向密谋者复仇，尽管此时还没有在公开场合讲到这些。人们开始接受他的金钱，并宣誓支持他，但目前他的支持者数量依然远远少于安东尼的人。所有这些老兵仍然对尤利乌斯·恺撒赤胆忠心，毕竟他们曾追随他南征北战。在一段时间内，一些前任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说服了安东尼，让他对独裁官的继承人友好一些。年轻的恺撒站在投票围场的隔间外，鼓励人们投票批准将内高卢交给安东尼而非迪基姆斯·布鲁图斯。但后来恺撒和安东尼的关系又变糟糕了，安东尼声称他的保镖队伍中的一名老兵收了恺撒的贿赂，要谋杀他。有不少罗马政治家，其中最突出的是庞培，害怕刺杀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安东尼的这个指控背后很可能没有真凭实据。从务实角度看，干掉执政官对年轻的恺撒而言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他真的企图暗杀安东尼，就又一次说明他在这个阶段的思维还是比较幼稚的。^[9]

8月1日，尤利乌斯·恺撒的岳父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大胆地在元老院批评安东尼。他的口吻是告诫性的，而不是尖刻的攻击。更重要的是，之前已经有消息传出来，很多人早就知道他要讲什么了。西塞罗正在去希腊的路上，公开理由是帮助他儿子的学业，但实际上是罗马渐渐走向暴力冲突的政治局势令他感到恐惧、绝望。所有密谋者和其他一些关键大人物，如李必达，都离开了意大利。多拉贝拉很快也将动身。没有一个拥有军权的人留在意大利，与安东尼争夺意大利本土的主宰权。很多人感到局势正在往内战的方向扭转，就像前49年

之前的几年一样，而且人们对内战没有多大热情。皮索要求确认对密谋者的大赦，以便让密谋者回国，密谋者和安东尼这样的恺撒派都不会因此损失威望。执政官没有对此做出凶暴的回应。西塞罗感到有希望出现新的妥协，于是返回了罗马。一个月后的9月2日，他发表了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反腓利比克之辩”的演说，其效仿的蓝本是前4世纪著名演说家德摩斯梯尼警示雅典人提防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威胁的演说。此次演说虽然批评了安东尼近期的一些行为，但敦促他恢复在3月15日之后的日子里曾表现出的和解精神。[\[10\]](#)

作为执政官，安东尼有采取行动的权力，而其他人士，哪怕是最资深的元老，也只能告诫和建议。他也有能耐将退伍老兵召回来支持他，这些老兵的数量此时可能多达6000人。驻扎马其顿的军队中已经有1个军团在布隆迪西乌姆港登陆，其他军团紧随其后，所以他很快将拥有一支像模像样的军队，供他调遣。他听到别人的批评，暴跳如雷，但没有动用手头现有的军队，尽管西塞罗私下里写道，他确信安东尼一定在计划搞一场大屠杀。演说家又一次暂时避开罗马城和公共集会，开始撰写他的《第二次反腓利比克之辩》，这是一本言辞激烈凶狠的小册子，将安东尼的品性痛斥得体无完肤，并谴责了他近期的举动，但始终没有以演讲的形式发表。在一段时间内，局势有些沉寂，但各方都在备战。10月初，安东尼南下去往布隆迪西乌姆，接收新近抵达的部队。[\[11\]](#)

9月，恺撒庆祝了自己的十九岁生日，此时他在坎帕尼亚招募定居于此的独裁官的老兵。随后几周内，他的追随者增加到3000人，但非常缺乏武器装备。老兵对他们的老部队仍然抱有相当程度的忠诚。到年底，这些人被分配到尤利乌斯·恺撒的第七、第八军团（当然是新建的）。和喀提林的军团很类似，这些单位的结构可能在很早的阶段就已经确定了，等待更多新兵来填补空缺。恺撒还借此机会任命了多达120名百夫长和十几名军事保民官，确认了一些军官先前的衔级，并

提拔了一批人，给予他们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薪水。在这个阶段，老兵云集到恺撒麾下，既是为了得到赏金，也是被恺撒这个名字所吸引，而这个少年的品质如何，大家还不清楚。尤利乌斯·恺撒曾引领这些官兵走向胜利，并慷慨大方地奖赏他们，使他们渐渐地效忠于他。他的继承人无法立刻或在短时期内恢复这种纽带的全部吸引力，但老兵们愿意给这个少年和他的金钱一次机会。年轻的恺撒知道金钱和承诺未来赏赐的重要性，于是派人到布隆迪西乌姆收买安东尼的部队。^[12]

与此同时，这个十九岁的少年率领他的老兵（这样一支军队的存在肯定是非法的），于11月初返回罗马。他将自己的武装支持者带进了城，这同样是违法的。他为此已经筹划了好几个星期，不断请求西塞罗（肯定还有其他显赫的元老）批准他这么做，理想情况是他抵达城市时，他们公开对他表示支持。恺撒奉承这位老政治家，敦促他“第二次拯救共和国”（第一次是在前63年镇压了喀提林）。西塞罗“不好意思拒绝，但又不敢同意。但他（恺撒）一直在积极活动，还会继续下去。他会带领一支强大的支持者队伍到罗马，但他还只是个孩子。他觉得他可以立刻召开元老院会议。谁会来？就算有人来，在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谁敢惹安东尼？”但西塞罗承认，“各城镇热情地支持他（恺撒）”。^[13]

恺撒向西塞罗保证，他会在合法的框架内通过元老院来行事，暂时不提自己未经元老院授权而非法组建的军队。但西塞罗一直对这个少年的新姓氏和他要求获得显要地位的做法感到不安，也开始担心年轻恺撒的意图，尤其是恺撒坚持要求确认独裁官的所有立法和荣誉。即便如此，西塞罗还是觉得这个少年“高度自信，但没有什么威望”，因此不足为虑。西塞罗的通信伙伴、狡猾的骑士阿提库斯没有从政，但和罗马的几乎每一位显贵都保持着非常友善的关系。他比西塞罗更审慎一些，写道：“虽然目前那孩子（恺撒）势力很强，遏制

住了安东尼，但我们暂时还不能对他做出长远的评判。” 恺撒的姓氏和金钱把很多潜在支持者，尤其是老兵，从安东尼那边吸引到了他那边。^[14]

年轻的恺撒抵达罗马时，安东尼还在远方。一位非常积极活跃、已经开始公开攻击安东尼的保民官将年轻的恺撒带到广场，召开了一次公共集会。他和恺撒站在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神庙的台阶上，俯视着一块常被当作集会与立法会议场所的开阔地。公开佩剑的老兵们围绕着自己的领袖，明目张胆地展示他们的非法武力。保民官先发言，又一次猛烈抨击安东尼，呼吁人民团结到尤利乌斯·恺撒继承人的麾下，反对执政官。年轻的恺撒随后发表了演讲，其文稿很快就流传开来。西塞罗很快也得到了一份抄本，对其内容肃然起敬。年轻的恺撒颂扬了尤利乌斯·恺撒及其功业，然后转身，指了指独裁官的一座雕像，表示自己希望“赢得父亲的荣光”。年轻的恺撒斥责安东尼阻挠他获得遗产以及在元老院的作威作福，这可能更合西塞罗的口味，但让很多老兵不满。他们忠于尤利乌斯·恺撒，看到杀害他的凶手仍然没有受到惩罚，非常愤怒。在老兵们看来，那些凶手才是恶徒，马克·安东尼不是。^[15]

安东尼正在返回罗马的途中，身边有他自己的老兵护卫着。最初从马其顿调来的2个军团正从布隆迪西乌姆北上，若有需要可以很容易调遣。对恺撒的老兵来说，安东尼不是主要敌人，而且他的军队比恺撒的一小群武器装备不足的人马强得多。如果与安东尼发生武装冲突，恺撒必败无疑。一些老兵开始暂时抛弃他们的年轻领袖，溜回家中。广大群众并没有蜂拥前来支持恺撒，最重要的是，显赫的元老们也没有表现出热情。除了召开会议的保民官之外，没有一个元老参加会议。西塞罗根本不在罗马城，其他很多人也躲在自己的乡间别墅，暂避风头。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大失所望，于是也溜走了，带着自己剩余的支持者去伊特鲁里亚（那里有大量独裁官的老兵定居），

进行新一轮的招兵买马。在那个地区也有其他人在招兵，独裁官生前的一些军官在为安东尼招募人马。

在这个阶段，年轻的恺撒在政坛斗争中仍然只是个小角色。在意大利除了安东尼之外，只有他拥有武装支持者，但人数太少，所以算不上一支真正的力量。他这么小的年纪就能受到公众的关注已经很了不起了。他在政治上走错了好几步，这不足为奇，毕竟奥古斯都的政治才能并不是天生的，当时也并不存在一个团结一致的恺撒派，即便存在，力量也不强。到目前为止，他仅仅比几年前被处决的假马略重要一点点，与这个假马略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拥有财富，而且与独裁官有着确凿无疑的联系。不过，他仍然可能会像假马略一样被轻松消灭。安东尼打算召集元老院开会，将这个孩子宣布为国民公敌。^[16]

但随后发生了一些事情，彻底改变了局势，使得年轻的恺撒的重要性瞬间大大提升了。

军阀

第一个抵达布隆迪西乌姆的军团是玛尔斯军团（以战神玛尔斯的名字命名），随后是第四军团。他们在布隆迪西乌姆这座港口城市郊外扎营的时候，年轻恺撒的亲信来了，与很多随军人员（妓女等）和商贩（任何一支罗马军队都有这样一群人跟随着，等着挣大兵们的钱）交谈。他们在营地散发宣传册，窃窃地承诺给每一位士兵500迪纳厄斯的赏金（这个赏格如今已是世人皆知了）并在退伍时给每人5000迪纳厄斯（几乎相当于二十年的军饷）。给百夫长和军事保民官的赏金肯定比这多得多。^[17]

这两个军团以及第二军团和第三十五军团（其中一个已经在布隆迪西乌姆登陆，另一个很快也将从马其顿渡海赶来），全都是尤利乌斯·恺撒在前48年胜利之后组建的。至少有一些普通士兵可能曾在庞

培麾下反对尤利乌斯·恺撒，这些士兵对尤利乌斯·恺撒有多少感情，是很难说的。但军官就不同了。尤利乌斯·恺撒在征战过程中一直将有作战经验的军团中的初级百夫长调到新建部队，并提拔他们。这几个军团的全部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都是尤利乌斯·恺撒任命和提拔起来的，对他忠心不二。其中一些人可能拥有非常丰富的作战经验。这几个军团作为整体还没有打过仗，但兵力都接近满员，而且已经经历了多年的训练，准备很充分。[\[18\]](#)

马克·安东尼在前来接管这几个军团的指挥权之前，与它们素无联系。对官兵来说，他是个陌生人。而且，与流传甚广的传说相反，他事实上并没有伟大的军事功业和胜利可以吹嘘，也没有许多在困难情况下控制军队的经验。这几个军团几个月前还在急切地盼望在帕提亚获得大量战利品，如今却发现要接受一个陌生人的指挥，而且处在内战边缘。与此同时，年轻恺撒的名字四处传扬，他还做出很慷慨的承诺。有些军官可能在他待在阿波罗尼亚时就认识他，或许这促使他们开始认真考虑他的提议。

执政官是带着夫人富尔维娅一起来的。从一开始，安东尼对局势的处理就很糟糕，他显然以为士兵们会无条件服从他。军团士兵们桀骜不驯，难以控制。他提议给每人100迪纳厄斯（也就是他那竞争对手恺撒的报价的五分之一，仅相当于半年的军饷），遭到了士兵们的耻笑。执政官怒火中烧，企图用威吓的手段迫使士兵们听话，于是怒气冲冲地咆哮道：“你们会学会服从命令的！”他要求军官们交出惹是生非的士兵的名单。一些士兵被逮捕并被处决了。有些百夫长也成了牺牲品。据西塞罗说，一些官兵被押到安东尼住的房子，在那里惨遭屠杀，鲜血溅到了富尔维娅身上。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非常可疑，而且也不重要。总之，玛尔斯军团和第四军团的官员离开布隆迪西乌姆，开始沿着海岸线北上前往内高卢时，是闷闷不乐的。[\[19\]](#)

玛尔斯军团打头阵，第一个公开宣布支持恺撒。第四军团（由安东尼的财务官亲自指挥）步其后尘，很快也倒向恺撒阵营。这两个军团都拒绝向安东尼妥协，不过安东尼迅速向第二军团和第三十五军团每人发放500迪纳厄斯，控制住了这两个军团，只有少数人当了逃兵，投奔了恺撒。安东尼终于意识到，他不能简单地用恐吓来迫使军团士兵们顺从，也不能指望陌生人会忠于自己。但他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军队。[\[20\]](#).

11月28日夜间，他召集元老院开会（在夜间开会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元老院不能在天黑之后辩论），怒斥年轻的恺撒。次日，他在城外举行阅兵，要求元老们都来观看。所有到场的元老都被哄骗去和士兵们一起宣誓效忠安东尼。随后安东尼便离开了罗马，去往内高卢，在途中与他的两个军团以及第五“云雀”军团（由尤利乌斯·恺撒的老兵组成，最初是在外高卢组建的，后来其成员获得了公民身份）会合。第五“云雀”军团可能是由安东尼在这一年早些时候招募到的6000名老兵组建的。西塞罗早在这年11月就将安东尼的保镖称为“云雀”。此外，安东尼还有相当多的辅助部队，包括摩尔人骑兵。罗马军队和任何时期的任何军队一样，很少能够长时间地维持完整的理论兵力，所以安东尼的军队加起来大约有1.5万人，全都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这是一支规模不大但战斗力很强的军队。[\[21\]](#).

恺撒还是个普通公民，虽然太年轻，既没有从政的资格，也不是元老院成员，但也正式组建了一支军队。玛尔斯军团和第四军团停留在阿尔巴福肯斯[\[22\]](#)，恺撒匆匆赶去与他们会合，并立刻兑现诺言，每人发放500迪纳厄斯的赏金。玛尔斯军团和第四军团举行了阅兵和操练，并开展了一次实战演习。这样的操练是罗马军事训练的标准内容，这两个军团最近几年都在为远征帕提亚做准备，所以无疑表现得特别优秀。一个世纪之后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有些夸张地说，罗马军队的“训练是不流血的战斗，战斗则是流血的训练”。一个军团

的满员兵力包括10个大队，每个大队480人。罗马军团士兵全部是重步兵，以一排排的密集队形作战，防具包括头盔（一般是青铜的）、链甲和半圆柱形的长盾。在过去，盾牌通常是椭圆形的，不过我们更熟悉的矩形瓦状盾牌可能正在变得流行。士兵携带一种重型标枪，有效射程为10~15码，在与敌人交锋前投掷。士兵的主要武器是剑。在奥古斯都生活的时期，士兵普遍使用长度不到2英尺，既可以劈砍也可以刺杀的短剑，但剑刃长度达到3英尺的剑也很常见。剑刃较重，制作工艺水平很高，适合劈砍，刺杀时的杀伤力特别强，三角形的剑尖很适合穿刺敌人的护胸链甲。[\[23\]](#)

来自马其顿的各军团兵力可能非常接近理论兵力。他们拥有全套装备，携带着行军作战所需的帐篷、奴隶、役畜、驮马所用的鞍具和运载物资的大车等。负责指挥的是经验丰富的军官，官兵都接受过长期训练，已经惯于密切协作，也拥有强烈的集体意识与认同感。玛尔斯军团可能也有数字番号，但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这也表明士兵们对自己军团名号的自豪感。为了支援这些部队，恺撒还拥有重建的第七军团和第八军团。这两个军团的成员是从退伍军人定居的主要地区招募来的，大多是老兵，也可能包含一些年轻人。曾在尤利乌斯·恺撒麾下服役的士兵比来自马其顿的军团拥有更多的作战经验和胜利纪录。但目前他们缺乏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而重建的两个军团还在转型过程中。要让这些部队能够协同或单独作战，还需要一点时间。来自马其顿的军团已经准备就绪，就是他们让年轻恺撒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他们接受他的指挥，尽管他根本没有合法权力向他们发号施令或者发放军饷。

恺撒的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与马克·安东尼的军队旗鼓相当。前43年的两位执政官，奥卢斯·希尔提乌斯和盖乌斯·威比乌斯·潘萨，正在组建一支由4个新军团组成的部队。新兵很多（我们很难判断，这些新兵是志愿兵还是被强征入伍），但其中很少人（或者根本

没有人)有军事经验。尤利乌斯·恺撒的许多老兵已经被年轻恺撒吸引走了,因此两位执政官任命的监督新军团组建和训练的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不大可能是最有经验或最能干的。重新入伍的老兵可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就能组成新的拥有战斗力的军团。但要让白手起家的新部队与他们匹敌,还需要很长时间。在训练和经验方面,来自马其顿的军团比新军团领先了大约四年。执政官的4个新军团若是与安东尼的人马相遇,肯定会一败涂地。若要在战场上打败安东尼的老兵,元老院就需要其他部队。而在意大利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已经宣誓效忠恺撒。

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和潘萨都是独裁官在生前挑选的,曾长期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劳。这两人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可能都比担任执政官的正常年龄要大。西塞罗在公开场合热情洋溢地赞扬他们。私下里,他觉得这两位执政官精力欠缺、意志不坚定。而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曾与两名执政官一同在高卢战争期间为尤利乌斯·恺撒效力)则说这两人是腐败的无用之徒。安东尼离开罗马之后,演说家又一次出现在罗马,敦促元老院采取措施,镇压安东尼。12月20日,他在由保民官召集的元老院会议上发表了“第三次反腓利比克之辩”。此时,两名执政官和其他多名行政长官都已经去往各自的行省。这年11月,年轻恺撒(西塞罗坚持称他为屋大维)的演讲曾让西塞罗惊恐失望。西塞罗在书信中常引用一句希腊格言:“要让这样一个人救我,还不如没有人救我!”现在,西塞罗却觉得,安东尼不是两害之中更严重的那个,而是唯一的恶徒。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已经写信表示拒绝让安东尼接管他的内高卢行省。在这种情况下,两害相权取其轻,西塞罗终于开始称呼年轻恺撒为恺撒,而不是屋大维或屋大维阿努斯。他主张,共和国应当接受这个拥有非法武装部队的十九岁少年的帮助。[\[24\]](#)

西塞罗的演讲和往常一样,精彩绝伦:

盖乌斯·恺撒是个年轻人，或者说简直是个孩子，但他拥有神圣的智慧和勇气。就在此刻，安东尼的疯狂到了最顶峰的时候，人们害怕他从布隆迪西乌姆返回后要大开杀戒。我们没有寻求援助，也没有想到寻求援助，甚至根本没有得到援救的希望，因为似乎已经没有人来帮助我们。就在此刻，盖乌斯·恺撒集结了一支由不可战胜的老兵组成的强大军队，并慷慨地挥霍了他继承的财产……以便拯救共和国……若他不曾出生于共和国，那么，如今由于安东尼的罪行，共和国将不复存在……[25].

年轻恺撒的士兵们也受到了赞扬：

对于玛尔斯军团，我们也不能吝啬赞美之词。还有谁比玛尔斯军团的将士更勇敢，更忠于共和国？他们认清了马克·安东尼是罗马人民的敌人，于是拒绝再和这个狂人结盟。他们看到，安东尼的目标是屠戮共和国的公民、将共和国彻底消灭，于是抛弃了他……[26].

安东尼是罗马的执政官，两个军团却拒绝服从他的命令，这肯定是哗变。他们投奔了一个没有任何合法军权的人的非法私人武装。这些行为都得到了元老院的原谅。安东尼不再是执政官，而被宣布为国民公敌，是新的喀提林，或者更糟糕，是新的斯巴达克斯，因此只要反对他，一切都可以被合理化。这就是西塞罗的立场，不过到目前为止，安东尼其实并没有做出什么伤天害理、应当受到如此谴责的事情来。其实，恺撒比安东尼违反了更多法律。[27].

元老院的意见开始转为支持西塞罗，但转向的速度远远没有他所希望的那样快。恺撒和他的军队都是无法抵御的现实。两名执政官组建的4个新军团没有能力抵抗安东尼的部队，也没有办法抵挡恺撒的人马。元老院没有办法镇压恺撒，于是只能暂时接受他，甚至原谅他。苏拉当年运用二十三岁的庞培的私人军队就是一个先例。

安东尼则是另外一回事。他曾是执政官，他的官职与权力至少与希尔提乌斯和潘萨，甚至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权力一样正当合法，而且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内高卢交给他管辖，恺撒还曾到场

鼓励公民支持这项法律。不过，这次投票表决的合法性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有人说安东尼运用了恫吓手段，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开会的时候当真下起了雷暴雨，而不仅仅是想象出来的凶兆。不管元老们是否喜欢或认可安东尼，他们目前还没有为此打一场内战的想法。安东尼在元老院也有盟友，而且他的母亲和妻子也竭尽全力地帮助他笼络人心。密谋者全都在国外，只留下一些同情他们的人，而且很少有人愿意全力帮助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元老院暂时还不肯宣布安东尼为国民公敌，而是派遣了三名资深元老作为代表，去与他商谈。其中一人就是菲利普斯，没有证据表明他不是真诚地希望达成妥协。[\[28\]](#)。

即便如此，这次商谈还是徒劳无功。安东尼继续攻击恺撒，羞辱他真实的家庭，提醒大家，他并非真的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儿子。

“所谓的”恺撒只不过是个外省的小鱼小虾，是外国奴隶的后代，不过是个娃娃，用自己的肉体换得年老的独裁官的宠幸。安东尼的这些话充满了贵族的傲慢，但在其他方面全是罗马政坛攻击詈骂的常见说辞，即便在当时也没有人完全当真。[\[29\]](#)。

尽管安东尼发表某些言辞的背景已经被遗忘，但他的有些话被人们牢记下来。安东尼说，这个年轻的暴发户不过是个“一切都要感谢他的名字的兔崽子”。当然，恺撒除了名字之外，还要感谢自己“拥有一支军队”。西塞罗会强调这两方面（名字与军队），在他心里，安东尼是令人厌恶的，是不值得尊重的，因此是比尤利乌斯·恺撒坏得多的头号敌人。暴君（尤利乌斯·恺撒）死了之后，暴政却在继续，而且新的暴君（安东尼）并没有像尤利乌斯·恺撒那样历经百般辛劳，而是轻松获得了崇高地位。更重要的是，西塞罗自己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有过太多挫折和失意，而且他感到终于能够最后一次为罗马和他挚爱的共和国效劳，甚至挽救罗马和共和国了。从一开始，年轻的恺撒就对西塞罗表现出了极大尊重。这种尊重不需要是真诚的。西

塞罗是一位显赫的资深政治家，雄心勃勃的新来者完全有理由去奉承他。他对年轻恺撒的好感也不一定完全是伪装的。政治友谊就像用来巩固政治联盟的婚姻一样，都是为了眼前利益，大家都知道这种友谊可能是短暂的。目前，恺撒和西塞罗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双方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西塞罗愿意利用这个孩子和他的军队，就像前49年加图及其盟友愿意利用庞培来反对尤利乌斯·恺撒一样。互惠互利并不需要互相之间的绝对信任，而且说到底恺撒毕竟只有十九岁，还缺乏政治经验。西塞罗认为，长远来看，恺撒肯定不会构成什么威胁。^[30]



意大利

1月1日，希尔提乌斯与潘萨就任执政官，西塞罗再次展开对安东尼的猛烈抨击。元老院通过了终极议决，但没有具体提到安东尼。安

东尼的舅舅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成功阻止了宣判安东尼为国民公敌的投票表决，终极议决的其他措辞也被淡化了。元老院宣布了紧急状态，但这还不是正式开战。当然，这也不会妨碍备战工作。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内高卢总督职位得到确认。更具戏剧性的是，恺撒被授予资深裁判官级别的军权，好让他合法地指挥自己已经拥有了一段时间的军队。他还被纳入元老院，获得财务官的衔级，这使他可以比正常的从政年龄资格早十年。要再等十年，他才有资格参选执政官。和他们的领袖一样，恺撒的士兵也得到了褒奖，国家同意向他们支付年轻恺撒拉拢他们时所承诺的退伍奖金。^[31]

在仅仅几个月内，年轻恺撒组建了一支军队，短暂地占领了广场，未能赢得足够的支持，被迫撤退，随后又收买了两个军团的忠心，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迫使元老院要么与他武力对抗，要么认可他的地位。元老院选择接受他。没过多久，他就开始与安东尼作战，在此过程中竟然帮助了杀害他养父的凶手之一迪基姆斯·布鲁图斯，他还曾于前45年与后者在西班牙同乘一辆马车。

[1]. *Res Gestae* 1 (Brunt & Moore's translation).

[2]. Appian, *BC* 3.21-2, Suetonius, *Augustus* 10.1-2, 95, Dio 45.3.4-7.2, Nicolaus of Damascus 28, 另见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114-17, 116, fn.3 引用 T. Rice Holmes, *The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 Vol.1 (1928), p.191 认为此次刻瑞斯节的时间是5月底，而非通常的4月。

[3]. 盖乌斯·奥庇乌斯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密友和亲信。尤利乌斯·恺撒不在罗马期间，奥庇乌斯为他打理私人事务。奥庇乌斯和尤利乌斯·恺撒的另一名亲信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一起对罗马施加了很大影响。奥庇乌斯撰写了关于尤利乌斯·恺撒征战阿非利加等地的史书，还写过一部尤利乌斯·恺撒传记。

[4] Nicolaus of Damascus 18谈及尤利乌斯·恺撒的战争储备金。关于他的财政支持者，见注释4。

[5] Appian, *BC* 3.23-4, 28, Suetonius, *Augustus* 10.1, Dio 45.6.4, Cicero, *ad Att.* 15.2.3, with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131及J. Ramsay, ‘Did Mark Antony contemplate an alliance with his political enemies in July 44 B.C.E.?’, *Classical Philology* 96.3 (2001), pp.253-68, 尤见253, fn.3谈及节庆的时长和它在此阶段的日期。这篇文章分析了前44年夏季事件的时间顺序，很有价值。

[6] Suetonius, *Julius Caesar* 88, Pliny, *NH* 2.93-4, with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40-41, 详细分析见J. Ramsay & A. Licht, *The Comet of 44 BC and Caesar’s Funeral Games* (1997), pp.135-53。

[7] 当选保民官，详见Appian, *BC* 3.31, 称他支持了一位候选人，但群众“要求”他参选，被安东尼阻止，另见Plutarch, *Antony* 16, Dio 45.6.2, Suetonius 10.2, with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120及Z. Yavetz, *Plebs and Princeps* (1969), pp.73-5; 彗星预示他未来的伟大，见Pliny, *NH* 2.93。

[8] 陪审团制度的改革，见J. Ramsay, ‘Mark Antony’s Judiciary Reform and its revival under the Triumvirs’, *JRS* 95 (2005), pp.20-37, 不过请注意，p.31讲4万或5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作为部落会议“第一等级”的资格，被认为与骑士资格（八倍于这个数字）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不过4万或5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与恺撒不久之后向士兵承诺的退伍奖金数字相比，仍然多出了差不多一倍。

[9] Cicero, *ad Fam.* 11.28.6-7记载了马提乌斯给西塞罗的信。马提乌斯说自己资助年轻的恺撒，是因为他与尤利乌斯·恺撒的友谊；Appian, *BC* 3.28-30讲到和解与投票，32-42讲到他们的关系和后来所谓的阴谋，另见Cicero, *ad Att.* 16.8.1-2, *ad Fam.* 12.3, Dio 45.7-3-9.5, 12.1-6, Plutarch, *Antony* 16。后来加入恺撒队伍的志愿者与士兵的身份，见J. Linderski, ‘Aphrodisias and the *Res Gestae*: The *Genera Militiae* and the Status of Octavian,’ *JRS* 74 (1984), pp.74-80提出，恺撒士兵发出的誓言都是紧急

征兵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常规的军人誓言（sacramentum），而是coniuratio，并讨论了此种誓言对其身份的影响。

[10] 西塞罗在此时期的思考和行动，见D.Stockton, *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 pp.292-7, 及J.Ramsay, ‘Did Mark Antony contemplate an alliance with his political enemies in July 44 B.C.E.?’ , *Classical Philology* 96.3 (2001), 尤见pp.265-7。

[11] 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41-2, D.Stockton, *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 pp.292-3, 297-9, A.Lintott, *Cicero as Evidence* (2008), pp.375-82; Appian, *BC* 3.5讲到安东尼的6000名老兵; Cicero, *ad Fam.*12.2.1, 3.1, Plutarch, *Cicero* 43讲到他的恐惧。

[12] Appian, *BC* 3.40; Cicero, *ad Att.*16.8, 写于前44年11月4日，报告称恺撒拥有3000名老兵，并提到恺撒希望赢得马其顿各军团的支持。

[13] Cicero, *ad Att.*16.11.6.

[14] 对恺撒的担忧，Cicero, *ad Att.*16.14.1, 阿提库斯的引文见16.15.3, 参见Plutarch, *Cicero* 44-6, 及D.Stockton, *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 pp.295-6。

[15] 引文见Cicero, *ad Att.*16.15.3, 另见Appian, *BC* 3.41-2, Dio 45.12.3-6。

[16] Cicero, *Philippics* 3.20讲到，安东尼企图宣布恺撒为公敌。

[17] 不可避免的随军商贩队伍不是在前53年昆图斯·西塞罗的冬季营地外，见Caesar, *BG* 6.37。

[18] 尤利乌斯·恺撒将老部队的百夫长提拔到新军团的更高职位，见e.g. Caesar, *BG* 6.40。

[19] Appian, *BC* 3.31, 40-44, Dio 45.12.1-13.5, Cicero, *Philippics* 3.4, 6, 38-9, 4.5-6, with 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47-50; 对玛尔斯军团及该军团一名百夫长墓碑的讨论，见L.Keppie, ‘A centurion of *legio Martia* at Padova?’ , *Journal of Roman Military*

Equipment Studies 2 (1991) , pp.115-21 = L.Keppie, *Legions and Veterans: Roman Army Papers 1971-2000* (2000) , pp.68-74, 及 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 pp.219-21。

[20] Appian, *BC* 3.46, Dio 45.13.5, with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p.126-7。

[21] 对恺撒的攻击, 见Cicero, *Philippics* 3.20, Appian, *BC* 3.44-6, Dio 45.13.5; 西塞罗早在这年11月就将安东尼的保镖称为“云雀”, 见 Cicero, *ad Att.*16.8, 不过他可能仅仅是想把安东尼的追随者描绘为野蛮人, 于是选择了这个名号。

[22] 意大利中部城镇。

[23] 约瑟夫斯的引文, 见*BJ* 3.75; 该时期军队概况, 见H.Parker, *The Roman Legions* (1957) , pp.47-71, 尤见55-6, F.Adcock, *The Roman Art of War under the Republic* (1940) , P.Brunet,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1971) , P.Connolly, *Greece and Rome at War* (1981) , M.Feugère (ed.) , *L'Équipement Militaire et l'Armement de la République*, *JRMES* 8 (1997) , E.Gabba (trans.P.J.Cuff) , *The Roman Republic, the Army and the Allies* (1976) , L.Keppie, *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 , Y.Le Bohec, *The Imperial Roman Army* (1994) , J.Harmand, *L'armée et le soldat à Rome de 107 à 50 avant notre ère* (Paris, 1967) ; 更宽泛的研究包括A.Goldsworthy, *The Complete Roman Army* (2004) 和近期非常精彩的S.James, *Rome and the Sword. How Warriors and Weapons Shaped Roman History* (2011) 。

[24] 西塞罗的引文见*ad Att.*16.5.3, with 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 p.49, 及D.Stockton, *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 , pp.299-306; 昆图斯对执政官的看法, 见*ad Att.*16.27.2; 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在内高卢, 见Cicero, *ad Fam.*11.6, 6a.2。

[25] Cicero, *Philippics* 3.2 (3, 5) (Loeb translation, slightly altered) 。

[26] Cicero, *Philippics* 3.3 (6) (Loeb translation, slightly altered) 。

[27]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 pp.49-51, A. Lintott, *Cicero as Evidence* (2008) , pp.385-8.

[28]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p.162-70; the vote Appian *BC* 3.30.

[29] Suetonius, *Augustus* 2.3-3.1, 4.2记载了其中一些辱骂, 概况见 K. Scott,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44-30 BC' ,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1 (1933) , pp.7-49。

[30] “一切都要感谢他的名字的兔崽子” 见 Cicero, *Philippics* 13.24; 恺撒吹捧和讨好西塞罗, 见 Plutarch, *Cicero* 45-6; 西塞罗的策略, 见 D. Stockton, *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 , pp.300-02, 326-8。

[31] Appian, *BC* 3.48, 50-51, Dio 46.29.2-6, Cicero, *ad Brutum* 1.12, *Philippics* 5.3-4, 25, 31, with Rawson in *CAH2* IX, pp.479-81。

七 奖赏和抛弃

恺撒说，他当然对你没有怨言，除了这一件事情：他认为你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赞扬这个年轻人，奖赏他，然后抛弃他。”他还说，他绝不会允许自己被抛弃。

——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给西塞罗的信，前43年5月24日^[1]。

冬季的几个月中，各方进行谈判，但毫无建树。在冬季很难为军队提供给养，而两位执政官还忙着训练新兵和征集物资。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在穆蒂纳^[2]城驻扎，他的军团士兵靠屠宰役畜、制咸肉来度日。安东尼将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军队团团围住，但没有逼得太紧，也没有尝试进攻。等待对安东尼有利，因为只要他等得足够久，守军就要忍耐饥饿，不得不投降。让对方在更激烈的战争中走出第一步，对安东尼也没有害处。各个阵营还不是很明朗，大家还不知道，那些坐拥重兵的总督们会如何反应。西塞罗敦促在西班牙的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以及在高卢各行省的李必达和卢基乌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派出各自的军队去支援迪基姆斯·布鲁图斯。这三人都向西塞罗保证自己的友好和对共和国的忠心，却都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3]

在远方，另外一位布鲁图斯如今掌控着马其顿行省及其驻军。盖乌斯·安东尼奉兄长之命去控制马其顿，但未能赢得当地驻军的支持，他自己的部队反而投奔了布鲁图斯，他本人也成了俘虏。特雷博尼乌斯被多拉贝拉逮捕和处决，有人说多拉贝拉对其进行了毒刑拷打。特雷博尼乌斯是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凶手中第一个丢掉性命的。没过多久，军队又转而反对多拉贝拉。在随后几个月内，他很快被彻底打垮，最终自杀。卡西乌斯接过了叙利亚境内各军团的指挥权。密谋者获得了自己的军队，开始从各行省榨取钱财和其他资源。

西塞罗开始努力劝说元老院将密谋者已经做的事情合法化，但密谋者的这些军队都没有办法去援救迪基姆斯·布鲁图斯。恺撒及其士兵仍然是决定意大利命运的关键力量。^[4]

新官上任的资深裁判官恺撒非常情愿地接受两位执政官的指挥，与他们保持着亲密关系。两位执政官都曾是铁杆的恺撒派。可能是在前44年年底，希尔提乌斯为尤利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补充了第八卷。他也可能是《亚历山大港战争史》和《阿非利加战争史》的作者，这两部书续写了尤利乌斯·恺撒的《内战记》。对尤利乌斯·恺撒往昔胜利的赞颂无疑会赢得他的旧部的好感。^[5]

3月，元老院控制下的军队开始调动。恺撒的几个军团是仅有的真正做好了战斗准备的部队。恺撒将第四军团和玛尔斯军团交给希尔提乌斯指挥，于是这位执政官动身前往内高卢。年轻的恺撒则率领第七军团随后跟进，他的第八军团此时可能还没到他身边。这些部队得到了一些骑兵和轻步兵的支持，可能还有一队战象，是叛逃安东尼的军团带来的。希尔提乌斯和恺撒各自还组建了一个大队的禁卫军，都是精心挑选的精锐老兵，用作司令部的卫队在战斗中也是令人生畏的力量。潘萨目前还留在罗马，匆忙地训练和准备4个新军团，并主持元老院会议。他参加了3月19日的一次会议，但次日便离开了罗马城，带领4个军团的新兵北上。^[6]

希尔提乌斯和恺撒在安东尼战线附近建造了两座设防营地，但觉得自己力量还不足，必须等待其余部队抵达，才敢向穆蒂纳发起突破作战。他们点燃了烽火，向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发信号，但没有办法知道，后者是否知道他们已经在那里了。后来一名信使溜过了敌人前哨，游过一条河，潜入穆蒂纳城。被包围的穆蒂纳驻军和负责营救他们的解围部队之间的通信就只能依靠这些勇士和信鸽，所以通信很不稳定。一连几周，两军发生了一些小规模交锋。马其顿的几个军团投

奔恺撒时带过来的一些辅助骑兵现在决定重新回到安东尼的怀抱。安东尼可能还得到了其他一些增援部队，因为他的兵力似乎增加到超过3个军团。在穆蒂纳城内，迪基姆斯·布鲁图斯部队的存粮濒临告罄，但希尔提乌斯和恺撒在得到增援之前，还没有办法救援迪基姆斯·布鲁图斯。^[7]

到4月的第二周，潘萨及其部队快要抵达。他们是沿着埃米利乌斯大道^[8]开赴穆蒂纳的。安东尼不能让几支敌军会师，于是决定趁着敌人还分成几股、比较脆弱的时候快速攻击。他派遣了一些小部队到希尔提乌斯和恺撒营地前，希望能够缠住他们。安东尼亲自率领2个来自马其顿的军团，即第二军团和第三十五军团，以及很大一部分骑兵和轻步兵，匆匆南下，去伏击潘萨的新兵。希尔提乌斯察觉了安东尼的这一动向，或者是得到了情报，于是在4月13日至14日夜间，派遣玛尔斯军团以及他和恺撒的禁卫军大队与潘萨会合，并护送他的部队。希尔提乌斯的这个决定是一场赌博，因为如果这些部队走错了路，迎头撞上兵力更强的安东尼部队，就可能被全歼。不过他的这次冒险收到了成效，这些部队顺利与潘萨会合了。

4月14日晨，潘萨得到加强后的部队接近了小镇“高卢广场”（距穆蒂纳约7里^[9]）。安东尼军队的大部分都隐藏在房舍内，或者道路两侧的沼泽与灌木林地，但有一些前哨被潘萨部队发现。玛尔斯军团的将士记起了自己的战友在布隆迪西乌姆被安东尼处决的事情，怒火中烧，突然发动了进攻。随后爆发了一场凶残的混战，由于地形复杂，可以分解为好几场小规模战斗。恺撒的禁卫军大队在大道上与安东尼的卫队交手，伤亡惊人地惨重。在后方，潘萨的新兵军团开始撤往他们连夜修建的行军营地，并竭尽全力地加固防御工事。

在一段时间内，玛尔斯军团坚守阵地，甚至将第三十五军团逐退了半里路，但安东尼的骑兵优势渐渐发挥出来，迫使玛尔斯军团后

撤。这些训练有素的士兵的顽强战斗，以及潘萨及其军官的指挥，使战线被勉强稳住，撤退没有变成溃散。尽管潘萨本人头部被投射武器击中，负了重伤，但其部队的大部分士兵撤到了营地的防御工事处。安东尼军队攻打潘萨营地的低矮土墙，但未能突破。此时已是下午，安东尼认识到自己的士兵疲劳且饥饿。如果是尤利乌斯·恺撒处于安东尼的位置上，一定会在现场建造自己的设防营地，并将食物送过来，对敌人施加持续不断的压力。但安东尼率军撤回了自己的原营地。

此时，希尔提乌斯和恺撒已经认识到，他们遭到的试探性攻击只是幌子。希尔提乌斯率领第四军团和第七军团的大部分士兵出动，让他的年轻同僚守卫营地。不知是因为运气好，还是希尔提乌斯的谋略高明，他成功攻击了正在撤退的安东尼军队。在月光下，安东尼军队仓促组成了战线，但他们胜利的喜悦渐渐变成了疲惫不堪，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没有办法应付第二场战斗。第二军团和第三十五军团被突破，伤亡惨重，各自都丢失了珍贵的鹰旗和其他一半军旗。大多数士兵都被打散了，有的退到了“高卢广场”，还有一些人躲藏在沼泽地内。安东尼的骑兵伤亡很少，成功逃脱，他在夜间派出巡逻队去搜寻和召回尽可能多的掉队士兵。[\[10\]](#)

除了这些残部之外，安东尼手中还有状态良好的第五“云雀”军团和其他部队，足以继续封锁穆蒂纳。而且他仍然拥有兵力和骑兵质量上的优势，所以在随后几天的小规模交锋中打得很不错。但他转入了守势，而希尔提乌斯和恺撒对他加强了压力，逼近了安东尼战线，向其发起挑战。安东尼拒绝出战。希尔提乌斯和恺撒的这种做法有助于提升己方官兵的自信。这一周结束的时候，安东尼终于按捺不住，排兵布阵，出来应战。他吃了败仗。希尔提乌斯和恺撒乘胜追击，向安东尼的战线发动了全面进攻。在之前的战斗中，十九岁的恺撒起到的作用很小，安东尼后来声称恺撒逃离了战场，抛弃了作为将军身份

标识的红斗篷。于是在这第二次交战中，恺撒刻意表现了自己的英雄气概。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有一次，在旗手负伤后，恺撒亲自举起军团的鹰旗。这是个很有名的姿态，意在激励将士奋力进攻，或者鼓舞正在动摇的士兵。攻打设防阵地总是非常困难的，但兵力和自信能够发挥作用。希尔提乌斯冲进了安东尼的主营地，但在帐篷之间的混战中阵亡。到这一天结束时，安东尼军队丢失了好几个关键地点。安东尼放弃了对穆蒂纳的封锁，撤退了，寄希望于与为他带来生力部队的下属会合。[\[11\]](#)

对安东尼的追击战打得有气无力。希尔提乌斯死了，身负重伤的潘萨只能躺在营帐内，没等这个月过去就不治身亡。迪基姆斯·布鲁图斯是下一年的执政官（这也是尤利乌斯·恺撒生前的任命），所以地位比恺撒高；他自己的部队在忍饥挨饿地死守穆蒂纳几个月之后，状态非常糟糕。而且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囊中羞涩，很难为部队支付军饷和提供给养。在穆蒂纳围城战之前，守军屠宰了所有役畜，现在很难找到替代的牲口。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缺少有战斗力的骑兵，也没有辎重，所以无法作战。解围部队中最强的部分仍然忠于年轻的恺撒，何况老兵不会喜欢一个杀害尤利乌斯·恺撒的凶手。[\[12\]](#)

恺撒现在实际上掌握着他自己的和两位执政官的军队。后来有人指控恺撒下令杀害希尔提乌斯，甚至亲自动手杀了他，并且安排潘萨去送死，以便抢夺军队指挥权。据说潘萨的私人医生遭到逮捕和拷问，因为潘萨的伤情突然恶化了。这些故事的背后肯定有后见之明和仍然持续的内战宣传需求，这些说法不大可能是真的。罗马的军事指挥官要身先士卒，身处距离战斗最前沿不远处，而且要穿着鲜红色斗篷和精美甲冑，因此是非常显眼的目标，很容易遭到投射武器或者想要扬名的敌军勇士的攻击。在内战中，双方的服饰相似，难免造成混乱，指挥官遇到的威胁肯定更大。在第一次“高卢广场”战役中，玛

尔斯军团的一名指挥官险些被潘萨的一些新兵杀死，这些新兵到最后一刻才认清对方是友军。[\[13\]](#).

两名执政官的死亡肯定是机缘巧合，而不是恺撒的阴谋使然，但这改变不了根本的事实：如今恺撒拥有七八个军团。

重返罗马

元老院先得知安东尼军队获胜（这或许指的是潘萨部队的战败）的传闻，随后才听到“高卢广场”的完整故事。两名执政官和恺撒都因此次胜利而受到褒奖，尽管恺撒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穆蒂纳解围的消息令西塞罗和其他一些害怕安东尼的人欢欣鼓舞。元老院宣布举行五十天的公共感恩活动，这远远超过了尤利乌斯·恺撒得到的荣誉。安东尼终于被宣判为国民公敌，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对各自军队和行省的指挥被合法化。并非所有人都欢呼雀跃。阿西尼乌斯·波利奥是西班牙一个行省的总督，也是老的恺撒派。他写信给西塞罗，哀叹如此多的意大利优秀子弟白白丧命。[\[14\]](#).

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尽了全力，但无法阻止安东尼逃跑。5月初，迪基姆斯·布鲁图斯抱怨道，他“没有办法向恺撒发号施令，也没有办法调遣恺撒的军队。这两件事情都很糟糕”。元老院下令将第四军团和玛尔斯军团交给迪基姆斯·布鲁图斯，但士兵们拒绝接受他。几周后，西塞罗不得不向布鲁图斯承认，没有办法强迫士兵们接受他。布鲁图斯可能得到了对一些新兵军团的勉强算是长期性的指挥权，于是他带着这些新兵和原先的残兵，出发追击安东尼。安东尼很快与普布利乌斯·温提迪乌斯·巴苏斯（尤利乌斯·恺撒旧时的参谋军官之一）新征募的3个军团生力部队会合了。随后，安东尼全军进入了外高卢。元老院敦促李必达和普兰库斯去攻击安东尼，但这两人麾下最优秀的军官和部队都是尤利乌斯·恺撒的旧部。5月，安东尼的军队在李

必达的主力部队附近扎营。两军的老战友互相亲热起来，大家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两军不愿意彼此厮杀。李必达的部队宣布支持安东尼，李必达很快也倒戈过去。他的一名有元老身份的下属自杀了，但只有这一例死亡。李必达和安东尼成了盟友，很快普兰库斯和阿西尼乌斯·波利奥也加入进来。国民公敌的势力日益增长，远远超过以往。^[15]

元老院投票决定授予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凯旋式的荣誉。恺撒得到了级别较低的小凯旋式。小凯旋式的将军骑在马背上，而不是乘战车，而且得到的威望也比凯旋式将军要低。元老院还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将各军团解散，并向退伍军人分配土地。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和恺撒都被排除在这个委员会之外。这意味着恺撒不仅要被夺走军队，而且没有机会通过赏赐将士来赢得支持。许多元老感到危机已经度过了，希望放松下来，也迟迟不能清楚认识安东尼元气恢复的程度。元老院的一次会议不明智地决定，将曾经承诺赏赐给投诚军团的赏金减少一半。^[16]

5月24日，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写信给西塞罗，报告称十九岁的恺撒重复了一句话：“我们必须赞扬这个年轻人，奖赏他，然后抛弃他。”布鲁图斯的一名幕僚成员确信这句话最初是西塞罗说的。演说家没有否认自己说过这话，而这句话（*laudanum aduluscentum, ornandum, tollendum*，最后一个词既有“升高”，也有“抛弃”的意思）的节律也的确符合西塞罗的风格，所以应当确实是他说的。^[17]

从一开始，元老院就把恺撒当作镇压安东尼的便利工具。对年轻的恺撒来说，接受元老院的命令就将他征募军队的行为合法化，并帮助他成为随后斗争中的一位重要参与者。现在，元老院正式批准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正在增强的军事力量，甚至认可了塞克斯图斯·庞培（伟大的庞培的幼子，此前在西班牙和地中海岛屿掀起了叛乱）的

地位。这些人都不大可能对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友好。这些年早些时候，安东尼曾写信给希尔提乌斯和恺撒，警告他们，唯一能够从他们双方的冲突中渔利的，就是过去的庞培派。^[18]

恺撒可不打算被抛弃，他在公开场合也这么说过。和大家一样，他希望长久地保全自己的地位。这个月初，迪基姆斯·布鲁图斯暗示，年轻的恺撒在觊觎希尔提乌斯和潘萨留下的空缺的执政官职位。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可能去找了西塞罗，暗示他俩可以联合起来。有传闻称，老演说家已经得到了空缺的执政官职位之一。在马其顿的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听到了这种说法，他从一开始就不主张元老院任用恺撒。6月，西塞罗写信给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向他保证，自己已经在元老院讲话，反对恺撒的亲戚们，那些人努力将恺撒推到最高职位。西塞罗指的应当是菲利普斯和马凯鲁斯。不过，尽管西塞罗劝说恺撒放弃如此疯狂的野心，但仍然继续高度赞扬这个年轻人。尤利乌斯·恺撒曾说马尔库斯·布鲁图斯的信念常常会到偏执狂的地步。布鲁图斯没有被西塞罗说服，担心西塞罗太容易被吓倒，又太容易被年轻的恺撒奉承得飘飘然。在布鲁图斯眼里，恺撒只是一个未经合法选举的军阀，他的地位、名字和财富都是从尤利乌斯·恺撒那里继承来的，而布鲁图斯及其同志杀死了这位暴君。西塞罗则不断敦促“解放者”的领导人马尔库斯·布鲁图斯率领军队返回意大利。说到底，军力胜过理性。^[19]

7月，恺撒的军队派来了一个代表团。代表团有四百人，大约是一个大队的规模，算不上一支军队，但包括许多百夫长和各级官兵代表。他们要求元老院给他们的统帅以执政官的职位，并要求发放承诺过的全额赏金。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代表团的发言人是一名叫作科尔内利乌斯的百夫长。他援引了主要来自遥远过去的前例，说明在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可以将低于法定年龄的人任命为执政官。百夫长们是比较富裕的人，常常是来自意大利外省城镇的贵族。旧的观念

——百夫长是从普通士兵提拔起来的军士长——是一个神话，但很遗憾的是，这种错误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即便如此，在元老们看来，百夫长的社会地位仍然远远低于他们自己，而且元老们很怨恨百夫长们陈词时的强硬语调。百夫长们的要求被愤怒地拒绝了。据说科尔内利乌斯掀开了自己的军服斗篷，露出了剑柄和剑鞘（普通士兵的剑佩带在身体右侧，而百夫长的剑在左侧）。他说：“如果你们做不到，它能做得到。”^[20]

这样赤裸裸的威胁可能只是个传说，但很快变成了现实。代表团返回内高卢，回到恺撒身边后，“要求”他率领军队进军罗马。他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情愿，立刻率军南下。又有一位恺撒率军跨过了卢比孔河，不过这一次这条小河对他的军权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的军权是个特例，并不与任何具体地区挂钩。他手中大约有8个军团。元老院只有1个军团，是潘萨组建的，而且潘萨觉得这个军团还不能胜任作战任务。一名信使被派往北非行省，召唤那里的3个军团回国保卫罗马城。

元老院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投票决定授予恺撒缺席参加竞选的权利（尤利乌斯·恺撒在前49年要的就是这个），但恺撒已经不再愿意信任他们，于是继续进军。在他抵达罗马城之前，来自阿非利加的2个军团先到了。这些士兵的训练水平高于潘萨留下的新兵，但他们没有动力去对抗优势敌人，毕竟元老院只有3个军团，而恺撒有8个。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在一名或多名裁判官的指挥下，开始准备防御。元老院还做了一件更阴险的事情，派人去将阿提娅和屋大维娅作为人质，但没找到她们。她们很可能已经得到了警示，或者自己足够精明，认识到形势对她们很危险。

恺撒兵临城下，元老院的军队非常明智地倒戈到他那边。一名裁判官因羞耻或愤怒而自杀，但年轻的恺撒和他的卫队进城时，并没有

发生武装冲突。群众以及许多元老，都出来迎接他。西塞罗是最后一个来的，年轻的恺撒冷冰冰地提及了这一点。夜间传出了谣言，说玛尔斯军团和第四军团发生了哗变，反对恺撒。元老院在黎明前开了会（这又违反了传统），短暂地为此欢欣鼓舞，后来发现这是假的。

前43年8月19日，恺撒当选为执政官，此时他的年龄仅有19岁10个月26天。这么年轻的人担任公职，此前还没有先例。这个年轻人对自己在这方面的独一无二感到非常自豪。他的同僚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外甥昆图斯·佩蒂乌斯。我们估计可能除了他俩之外没有别的候选人，但选举的所有正当程序都得到了遵守，罗马人民依法走过“羊圈”投票。他的当选很可能确是由于得到群众的支持，不过他的军队就驻扎在战神广场上，这肯定能帮助选民们想清楚应当选择谁。当选之后，恺撒履行了传统的献祭，据说有十二只秃鹫从他头顶上飞过。根据神话，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的时候，也出现了同样的吉兆。

不久之后，罗马人民再一次聚集起来开会，这一次是为了投票确认尤利乌斯·恺撒收养行为在法律上的合法性。随后恺撒颁布了其他一些法律，其中一项推翻了前44年3月17日的大赦，宣布刺杀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是一桩罪行。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夺取各自行省行为的合法性被剥夺，他们和其他密谋者都被一个特别组成的正式法庭缺席判处有罪，庭审在一天内完成。陪审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并且受到严密监视，只有一名陪审员敢于投票主张密谋者无罪。因为密谋者肯定是杀死了独裁官，并且曾对此自我吹嘘过，所以只要尤利乌斯·恺撒被杀一事被认为是犯罪，那么他们肯定是有罪的。让人们感到不安的是此次庭审的时间过短，以及缺席审判这种显然不符合常规的做法。不过，这次审判比西塞罗前63年审判喀提林党人时更符合法律程序。另一项法律撤销了将安东尼和李必达宣布为国民公敌的法律。多拉贝拉的国民公敌身份也被撤销，恢复为合法的前任行政长官，不过他可能在得知消息前就死了。塞克斯图斯·庞培短暂享有的法律地位

被剥夺，又一次被宣布为叛贼。一位裁判官被指控阴谋杀害年轻的恺撒，并被草草地罢免和判处死刑。判决可能是迅速而残酷的，但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孤例。

独裁官遗嘱里承诺给罗马人民的馈赠的剩余部分，终于由正式成为他养子和继承人的年轻恺撒支付了。恺撒从几乎已经空荡荡的国库拿钱，给了他的军团士兵每人2500迪纳厄斯，并承诺会支付剩余一半赏金。他新近得到的几个军团可能也获得了慷慨赏赐，因为说到底他的力量还是有赖于军队。他现在有11个军团，但安东尼和李必达有22个之多。不过安东尼和李必达的这些部队可能只是空架子，实际兵力是理论兵力的一半，甚至更少。一位军事统帅的威望更多取决于他所拥有军团的数量，而不是他实际指挥的士兵的确切总数，所以统帅们倾向于组建很多军团，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有机会将忠诚的追随者提拔到高级衔级。^[21]

恺撒及其军队很快重新北上，返回内高卢。安东尼和李必达在那里等待他。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外追踪安东尼和李必达，但没有办法与兵力远超自己的敌人交战。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及其军队在迪基姆斯·布鲁图斯麾下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投奔了安东尼。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部队成群结队地叛变，他带了一小群骑兵作为护卫，躲到了一位高卢酋长那里。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在尤利乌斯·恺撒帐下效力的时候认识了这位酋长，但在新形势下，旧的友谊也土崩瓦解了。或许是在安东尼的命令下，这位酋长杀死了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将其首级送给安东尼，得到了安东尼的认可。

敌对双方的最优秀官兵都是曾为尤利乌斯·恺撒战斗的旧部，都热爱和缅怀他，也都仇恨杀害他的凶手。他们不愿意互相残杀，所以尽管恺撒的军队规模比李必达和安东尼的军队小得多（可能是后者的一半），但他仍然能够自信地接近对方。三位领袖都认识到，互相攻

击会非常困难。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争斗对各方都没有什么好处。尽管安东尼在前一年愿意与所谓的“解放者”和平共处，但这纯粹是出于双方的务实需求。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东方各行省军力的支持下，不大可能愿意妥协，也不可能对安东尼或李必达友好，更不会对年轻的恺撒友好。要相信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风险实在太大了。当然，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及其盟友对安东尼等人也抱有同样程度的怀疑。[\[22\]](#)。

安东尼、李必达和恺撒互相通信，也有使者通风报信，所以知道对方愿意妥协。10月底，他们在波诺尼亚（穆蒂纳以北不远处）附近会晤。两天时间里，三位主要领袖及其幕僚人员商谈了结盟的细节。每位领袖都带来了5个军团，三人在一个小岛上商谈的时候，负责警戒的士兵在一条河两岸互相监视着。随后达成的协议在罗马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也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庞培、克拉苏和尤利乌斯·恺撒之间达成的是非正式合作协议，而新的联盟却在他们抵达罗马后很快得到法律认可。三人同意分享只有尤利乌斯·恺撒曾经享有的最高权力。他们将成为有权恢复国家秩序的三头同盟（字面意思是三个人组成的理事会）。得到如此强大的权力之后，恺撒同意放弃自己短暂担任的执政官，将这个职位让给温提迪乌斯。温提迪乌斯目前担任裁判官，正是他的增援使得安东尼战败之后得救。温提迪乌斯将在本年度余下的几周内担任执政官，虽然任期很短，却让他终身享有前任执政官的地位。

三位领袖合军一处，共同率领联军的很大一部分开赴罗马。意大利根本没有任何军队能够抵抗他们，他们进入罗马城时就像恺撒几个月前进城那样平安无事。11月27日，一位名叫提提乌斯的保民官召集了公民大会，大会批准了三头同盟的建立，并授予了他们五年的权力。大会可能还正式将他们已经占有的行省授予他们。李必达得到了外高卢和西班牙各行省，安东尼得到高卢的其余部分。恺撒得到了西

西里岛、撒丁岛和其他一些较小的岛屿，以及北非。恺撒的地盘可能是最弱小的，因为其领地的很大一部分很快将被塞克斯图斯·庞培占领。就像这个年轻人的父亲（伟大的庞培）所做的一样，三头同盟将通过军团长来控制各行省，他们没有义务亲自到行省去。其中的关键在于控制驻扎在各省的军队，而二十岁的恺撒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从长远看来，控制军队远远比控制广袤的各行省重要。^[23]

三头同盟是明目张胆的军阀，各自拥有忠于他们本人而不忠于国家的私人军队。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以及塞克斯图斯·庞培也都是这样，他们全都一掷千金地赏赐麾下士兵，以巩固他们的忠诚。恺撒与其他军阀没什么不同，但他的崛起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军阀，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他这个年龄，在正常情况下，应当在军中担任下级军官或开始在法庭担任辩护律师，但他成了拥有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权势的人之一。

^[1] Cicero, *ad Fam.* 11.20 (SB 401) (Loeb translation, modified).

^[2] 今称摩德纳，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波河南岸。现在以“引擎之都”著称，因为有许多意大利著名的跑车制造商，如法拉利、兰博基尼、帕加尼及玛莎拉蒂将工厂设立于此，而且除兰博基尼之外，它们的总部也都设在摩德纳市内或附近。

^[3] Appian, *BC* 3.27, 49. 及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 50.

^[4] Appian, *BC* 3.63, 79, 及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 171–2, 183.

^[5] Caesar, *BG* 8. *praef.* 声称巴尔布斯敦促他写作，另见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 51, fn. 133 讲到第七和第八军团得到优待。

[6] Cicero, *ad Fam.*10.6.3, 参见*Philippics* 13.7-9, 见A.Lintott, *Cicero as Evidence* (2008), p.399。

[7] Appian, *BC* 3.50, 65, Dio 46.35.1-37.3, 包括恺撒骑兵部队的逃兵, Pliny *NH* 10.110讲到使用信鸽。

[8] 古罗马的一条大道, 在意大利北部, 从今天的里米尼通往皮亚琴察, 前187年竣工, 得名自主持工程并完成的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前187年执政官)。

[9] 1罗马里=1618.5码或1.48公里, 比现代的英里小一点。

[10] “高卢广场”的两次战斗, 见Cicero, *ad Fam.*10.30包括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生动的目击记述, Appian, *BC* 66-70, Dio 46.37.1-7, 及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51-5, 及L.Keppie, *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 pp.115-18, 及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p.225-7。阿庇安在戏剧性的描写中强调老兵军团静默的、机器一般的杀戮, 但这可能只是文学夸张。我们应当记住, 在场真正的老兵只有禁卫军。马其顿各军团普通士兵的作战经验很少。

[11] Appian, *BC* 3.71-2, Dio 46.38.1-7, Cicero, *ad Fam.*11.13.2, Suetonius, *Augustus* 10.4讲到恺撒的行为, 如Velleius Paterculus 2.61.4强调他的勇敢和年轻; 挑战, 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1996), pp.143-5。

[12] Appian, *BC* 3.73-5, Plutarch, *Antony* 17-18; 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缺少牲口, 见Cicero, *ad Fam.*11.13.2。

[13] Cicero, *ad Brutum* 1.6.2 记述了当时的一个传闻称布鲁图斯表示怀疑, 因为他认识潘萨的医生, Suetonius, *Augustus* 11记述了后世的故事, 讲到恺撒害死了希尔提乌斯和潘萨。参见Tacitus, *Ann.*1.10, 此处暗示潘萨是被毒死的, 希尔提乌斯则被自己的部下在恺撒的劝诱下杀害; 在高卢广场险些被安东尼军队抓住随后又差点被己方杀死的军官, 见Cicero, *ad Fam.*10.30.3。

[14] Cicero, *ad Brutum* 1.3.4, *ad Fam.*10.21.4, 11.19.1, 11.21.2, Appian, *BC* 3.74, Dio 46.40.1及Rawson in *CAH2* IX, pp.483-5,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176-8及D.Stockton, *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 , pp.318-23 概括了元老院的反应和穆蒂纳胜利之后的情况;波利奥的书信,见Cicero, *ad Fam.*10.33.1。

[15] Cicero, *ad Fam.*11.11.4 for quote, *ad Fam.*11.19.1讲到迪基姆斯没有得到第四军团和玛尔斯军团而感到失望;李必达军队的变节,见Plutarch, *Antony* 18, Appian, *BC* 3.80-84, Dio 46.38.6-7, with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p.178-9, 及P.Brunt,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1971) , pp.481-4。

[16] D.Stockton, *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 , pp.319-30.

[17] Cicero, *ad Fam.*11.20.

[18] Cicero, *Philippics* 13.22-5.

[19] Appian, *BC* 3.82, Cicero, *ad Brutum* 1.3.2, 4.3-6, *Philippics* 14.15, Plutarch, *Cicero* 45, with D.Stockton, *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 , pp.325-8, A.Lintott, *Cicero as Evidence* (2008) , pp.416-21; Cicero, *ad Brutum* 1.10.3 (Loeb translation 18.3) 讲到恺撒的亲戚们鼓励他竞选执政官。

[20] Appian, *BC* 3.88, Suetonius, *Augustus* 26.1, Dio 46.42.3-43.6;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185, fn.7, 对这个故事的细节表示怀疑。

[21] Appian, *BC* 3.88-95, Dio 46.44.1-49.5, Velleius Paterculus 2.65.2, *Res Gestae* 1, with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p.185-8; 该时期的罗马军团, 见P.Brunt,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1971) , pp.481-4。

[22] J.Ramsay, ‘Did Mark Antony contemplate an alliance with his political enemies in July 44 B.C.E.? ’ , *Classical Philology* 96.3 (2001) , pp.253-68提出, 安东尼只关心增强自己的地位, 从来没有真正致力于和密谋者永久性结盟。

[23] 三头同盟的建立, 见Plutarch, *Antony* 19-21, Appian, *BC* 3.96-4.46.50.1-56.4, with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p.188-

91,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 57–61, 及 Rawson in *CAH2* IX, pp. 485–6, 及 A. 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p. 228–31。

八 复仇和纷争

马尔库斯·李必达、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恺撒，奉人民之命，管理和治理共和国。他们宣称，背信弃义的叛贼哀求饶命，而在得到宽恕后却成为恩主的敌人，密谋反对恩主，盖乌斯·恺撒因此被那些得到仁慈宽恕的人杀害……；我们也因此遭到侮辱，被宣布为国民公敌；现在……我们要先发制人，而不是被他们伤害……

——阿庇安记载的三头同盟镇压政敌的宣告，2世纪初^[1]。

但有一件事情需要评论一下。对于那些被镇压的人，他们的妻子表现出了极大的忠诚，他们的释奴也是如此，他们的奴隶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忠诚，而他们的儿子们则忘恩负义。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1世纪初^[2]。

三头同盟的统治是从大屠杀开始的。恺撒、安东尼和李必达从波诺尼亚南下的过程中，派遣士兵先行出动，消灭了十几位显赫人物。他们没有给出任何事先警告，不过西塞罗和其他一些受害者猜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逃离了罗马城。在有四人被杀后，士兵们开始搜索其余人，一夜之间在罗马精英阶层中引发了极大恐慌，他们担心自己也处于危险中。执政官佩蒂乌斯（恺撒的同僚和表舅）派遣传令官到各地，要求大家保持冷静，等待天亮，那时就会公布通缉名单。佩蒂乌斯已经上了年纪，而且身体不好。人们相信，此事的巨大压力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几天后就去世了。三头同盟把他留下的执政官职位赏给了另外一名追随者，尽管任期只有本年度余下的几周时间。^[3]

三头同盟抵达罗马后，恢复了苏拉曾经用过的公敌宣告手段，于是谋杀变得更公开和正式。广场上张贴了两张名单，据说其中一张名单专门用来通缉元老。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失去了法律保护，三头同盟的下属或者任何渴望领赏（赏格就是死者财产的一部分）的人都可以

合法地杀死他们。杀人者可以呈上死者首级，以此为据领赏。首级随后被固定在演讲台^[4]上。死尸的其余部分则被丢弃在死亡现场，或者和城市的垃圾一起被投入台伯河。任何人，包括被镇压者的直系亲属，若胆敢帮助名单上的人，就可能遭到镇压。最初的名单上有数百人，在随后几个月内增加到超过两千人。镇压的程序非常正式，但掩盖不了事实：这是非法杀戮，规模远远超过了西塞罗不经审判处死喀提林党人的行为。这一次，没有一位保民官，事实上是没有任何人敢于发出抗议。安东尼属下的一名指挥官后来冷冷地评论道：“要批评那些有能力镇压你的人，实在太难。”三头同盟指挥着意大利的全部军队，即便他们每人只带了1个军团和1个禁卫军大队到罗马城，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违抗他们的意志。^[5]

新政权的合法性只是一层薄薄的虚饰。建立三头同盟的《提提乌斯法》在提交的当天就被草草通过，完全无视法律要求，即任何提案要等待至少三天才能成为法律。三头同盟声称，镇压行动是消灭国家与国家领袖之敌的必要手段。他们宣称，尤利乌斯·恺撒对人宽大仁慈，却被自己宽恕的人杀害了。他们可不打算重蹈覆辙，所以会毫无怜悯之心地杀死任何敌人，对敌人的亲戚和家人也一视同仁。恺撒、安东尼和李必达在制定死亡名单时，做了一些交易。这个场景后来被莎士比亚记录下来，令人毛骨悚然：“那么这些人都是应该死的；他们的名字上都做了记号。”^[6]安东尼允许两位同僚把他的舅舅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7]列在名单上，李必达也则放弃了自己的亲兄弟埃米利乌斯·保卢斯，这两位受害者都是前任执政官。年轻的恺撒没有多少显赫的亲戚可以牺牲，于是拿托拉尼乌斯来凑数，也就是曾经监护他但被指控侵吞他父亲遗产的人。^[8]

埃米利乌斯·保卢斯逃到了米利都^[9]，在那里流亡，他很可能得到了李必达本人的预先警示。李必达也并没有认真去追捕自己的兄弟。安东尼的母亲尤利娅将自己的兄弟藏在家中。刽子手闯到门前

时，她堵住了门。据普鲁塔克记载，尤利娅告诉刽子手们：“你们想杀卢基乌斯·恺撒，就先杀我吧，我是你们统帅的母亲！”后来她在广场上公开与自己的儿子攀谈，后者“不情愿”地赦免了自己的舅舅。没有人保护托拉尼乌斯，于是他死了。在随后大约一年时间里，有数百人丧生。[\[10\]](#).

西塞罗原本可以逃走。他登上了一艘开往东方的船，但由于天气恶劣，船被狂风吹回岸边，他似乎也没有精气神去逃亡了。在这期间，他的弟弟昆图斯和侄儿都被抓住并被杀死了。西塞罗的儿子正在雅典学习，很安全，很快就将作为布鲁图斯的军官参加反对三头同盟的战争。前43年12月7日，演说家听天由命，带着尊严迎接死亡。他是目前为止地位最显赫的受害者，也是唯一一位遇害的前任执政官。他的死亡向人们发出警示：即便是最显赫的人，若是得罪了三头同盟，也是死路一条。西塞罗虽然很成功，但仍然是个“新人”，他不像门阀贵族那样拥有许多代人传承下来的人脉关系，他无法保护自己，因此成了一个显而易见、非常脆弱的目标。在他卸去执政官职务之后，面对克洛狄乌斯和其他野心勃勃的政客攻击时，他显得势单力薄。[\[11\]](#).

后来有人说，年轻的恺撒记起了老政治家曾经对自己的提携，于是主张放他一马。恺撒或许真的替西塞罗求了情，甚至可能是真诚的，而不是在讨价还价。但不管真相是什么，他都没有坚持到底。安东尼命令将西塞罗的右手和首级一起送到罗马，后来将它们都钉在演讲台上，以便报复那只写下了《反腓利比克之辩》的手，以及那张曾经宣读这份演讲稿的嘴。在此之前，他和妻子富尔维娅用餐时，这些恐怖的战利品被送到他面前。据说安东尼抓住了西塞罗的首级，带着野蛮的喜悦放声大笑。随后，富尔维娅拿走了战利品，痛斥死者，甚至从自己头发上拔出发簪，去刺死者的舌头。两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去恨西塞罗，或许富尔维娅更恨他，因为她的第一任丈夫克洛狄乌斯曾

是西塞罗的死敌，而西塞罗甚至在法庭上为杀害克洛狄乌斯的凶手米罗辩护，尽管没有成功。在更近的时期，富尔维娅眼睁睁看着西塞罗说服元老院去反对身为合法执政官的安东尼，并将他宣布为国民公敌。当时富尔维娅居住在罗马，感到自己的财产和人身都遭到了威胁，因为一些野心勃勃的人觉得他们这样一个富户处于脆弱状态。[\[12\]](#).

史料中讲到，三头同盟全都为了这场大屠杀而欢呼雀跃。我们很难辨清事实真相，很难把真相与后来的宣传分离开，因为罗马的政治宣传中素来充满凶残而想象力丰富的攻击。在年轻的恺撒及其继承人统治的时代写下来的大多数故事都将他描绘为温和而不情愿的合作者，而将他的两位同僚描绘为野兽。但这不是留存至今的唯一版本。苏埃托尼乌斯声称，恺撒起初不情愿，但很快就热情而积极地追杀受害者。李必达和安东尼都是成熟的人，处于能够在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年龄，即便那些嫉妒和痛恨他们统治的元老，也更加怨恨一个黄口小儿杀人越货的权力。大多数罗马人觉得，还只有二十岁的恺撒实在不应当树立这么多敌人。[\[13\]](#).

事实上，被镇压的不仅仅是三头同盟的敌人。安东尼、李必达和恺撒拥有大约40个军团的大军，而且士兵们惯于接受慷慨的赏赐，因此他们急需大笔现金，此外治理国家也需要开支。被镇压的很多人之所以出现在名单上，仅仅因为他们很有钱，而三头同盟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让他们活下去。受害者的家产被没收，宅邸和乡间庄园被拍卖，以便为新政权筹集资金。在这些情况下，受害者是被杀了还是逃往国外，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的财产总会被充公。恺撒和安东尼都被指控，仅仅为了夺得一些精美的科林斯青铜花瓶，就肆无忌惮地杀人。被安东尼下令处死的维雷斯是一位前行省总督，即便按照罗马的标准也算是特别地贪婪，他于前70年被西塞罗成功地控诉，此后流亡海外。他还有很多财产，其中的艺术收藏品特别珍贵，于是这位年老的

罪犯因此丧命。三头同盟无论是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群体，都急需金钱。传说在镇压政敌期间，富尔维娅和安东尼曾接受贿赂，然后杀死或者赦免某些人。富尔维娅还曾往名单上增加人名，仅仅因为她觊觎那些人的财产。据说安东尼还曾赦免一个人，因为此人的妻子答应和安东尼上床。[\[14\]](#)

在镇压行动中有很多人丧生，不过大多数受害者还是逃走并生存下来，最终返回了意大利和罗马城。这些大清洗引发了许多精彩的故事，如戏剧性地逃出、英雄保护受害者、亲友互相出卖、奴隶告发主人等。后来出现了汗牛充栋的书籍，讲述这些故事。据说有一个男孩在上学路上被杀害；还有一个男孩正在举行成人仪式，此时凶手匆匆将他的名字加在镇压名单上。不过总的来讲，儿童都是安全的，不会受到伤害，除非他们自己名下拥有巨额财产。虽然三头同盟威胁要处死那些庇护和窝藏被镇压者的人，但并没有认真执行。一名受害者的藏身之处被发现后，他的妻子哀求与丈夫一同赴死。士兵们拒绝了，行政长官（可能是三头同盟之一或他们的一名高级下属）也拒绝了，这时这名女子宣称自己犯有包庇窝藏丈夫的罪行。据说最后这名寡妇把自己活活饿死了。[\[15\]](#)

没有故事专门讲述妻子因为窝藏丈夫而被杀死，但有很多故事讲到父亲保护儿子，或儿子庇护父亲。有一个邪恶的故事写道，一名女子安排自己的丈夫遭到镇压，将他锁在家中，等待士兵赶来，然后在丈夫被处决仅仅几个小时后便与情夫结婚了。还有一名被镇压的男子立起石碑，镌刻了铭文来纪念爱妻。他提到，妻子帮助他藏身和逃跑，最后说服恺撒赦免了他。但赦免令很难执行，女子在努力劝说李必达执行赦免令、召回她的丈夫时，李必达却命令仆人殴打这名女子。[\[16\]](#)

还有一个故事说，恺撒对某个案子下令暂缓执行判决。在此案中，一名女子将丈夫藏在一个大箱子内，把箱子搬运到正在主持公共竞技的恺撒面前。她随后揭示了自己的计谋，群众被她的勇敢和忠贞感动。恺撒察觉到群众的情绪，于是赦免了他。即便是军阀，也不能完全无视民意。根据镇压法令，奴隶若告发自己的主人，便可获得自由。但在几个得到宣传的案例中，如果奴隶告发主人后过于嚣张，或继续攻击前主人的家庭，三头同盟便会将这些奴隶处死，或重新卖为奴隶，以便向人民保证，社会秩序并没有受到严重威胁。^[17]

恺撒、安东尼或李必达在下令镇压政敌时都表现出了冷酷无情，他们难逃罪责。从纯粹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这些谋杀非常成功地制造了恐怖气氛，但经济收益却令人失望，因为很少有人竞买被没收充公的财产。太多的潜在买家不敢出手，以免显露出自己很有钱，能够买得起新地产。还有人记起了那些曾经从苏拉镇压政敌活动中受益的人后来遭到的频繁攻击。急需更多金钱的三头同盟开始征收一批新税，根据富人的财产对其征税，这是非常不符合罗马传统的措施。他们宣布，将对1400名最富裕的女性公民的地产进行评估，以便征税。这是史无前例的做法。在前3世纪抵抗汉尼拔的绝望战争中，贵族女性曾自愿捐献珠宝和其他财物给共和国，但国家从来没有对她们征过税。在霍尔腾西娅（她的父亲^[18]曾经是罗马第一演说家，不过这个地位后来被西塞罗夺走了）领导下，一大群妇女先去找了三头同盟的女性亲属，然后冲进广场，去找恺撒、安东尼和李必达当面对质。这一次，广大群众仍然赞赏这些女性所表现出的勇气，于是三头同盟觉得还是让步比较稳妥。只有400名女性被征税，而男性的纳税负担则被加重。各农场的一半出产将被征收，而意大利各社区不得不在冬季为士兵提供免费住宿地，这种服务原本是被强加给外省的。^[19]

腓立比战役

前42年1月1日，李必达第二次就任执政官，这离他上一次担任执政官（同僚是尤利乌斯·恺撒）仅仅过去了四年。这一次他的同僚是卢基乌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此人是穆蒂纳战役后加入安东尼军队的指挥官之一。两位执政官的第一个举措是宣誓已不在人世的尤利乌斯·恺撒的全部决定永久有效。安东尼和恺撒非常愿意参与这次宣誓，元老院的其他人不是那么情愿，但也不得不加入其中。尤利乌斯·恺撒被正式封为神，人们在广场上他被火葬的地点附近建造了一座供奉他的神庙。这座神庙的遗迹存留至今。他的继承人如今不仅仅是拥有恺撒之名，还是神的儿子，尽管年轻的恺撒没有立刻采用这个头衔。^[20]

罗马贵族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家族关系。前43年年末，阿提娅去世了，她活得足够久，看到了儿子当上执政官。她得到了一场公开葬礼。此时她的儿子已经与一位年老贵族的女儿订婚，但三头同盟建立后，这段婚约便被解除了。安东尼和李必达都没有年龄合适的女儿，但军队明确表示渴望采取一些措施来巩固三头同盟，于是年轻的恺撒娶了富尔维娅在第一段婚姻中生的女儿。这个姑娘叫克劳狄娅，在她父亲^[21]将身份从贵族改为平民时，改了自己的姓氏，但克劳狄娅的名字没有被改为较为低俗的克洛狄娅。克劳狄娅的父母都来自重要的贵族世家，所以对恺撒来说也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但她年纪还小，还要几年才到正常的结婚年龄。尽管他们结了婚，但没有过夫妻生活。两年后，他们离婚时，恺撒发誓她还是处子之身。^[22]

目前，这段婚姻为安东尼和恺撒建立了非常传统的联系。就在几个月前，这两人还互相攻击辱骂，兵戎相见。现在，他们要一同率军东进，去对付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集结起来的强大军队。李必达留在意大利，只有几个军团。虽然恺撒年轻而缺乏经验，但他显然必须随军去惩罚那些谋害他养父的人。这比在三头同盟之间瓜分各行省重要得多。安东尼和恺撒将会赢得荣耀，或者殒命沙场。如果他们赢了，

李必达就只能间接地分享一点点威望和权力。如果他们输了，未能回国，那么曾参与清洗政敌的李必达可能会发现自己有很多敌人。[\[23\]](#)

要想胜利，并不轻松。“解放者”已经获得和招募了超过20个军团。其中有些军团最初是尤利乌斯·恺撒组建的，但都不曾在他的指挥下打过很多仗，因此没有理由对他、他的继承人或马克·安东尼表现出善意。这些军队也不会特别忠心耿耿地捍卫元老精英阶层的利益。和三头同盟一样，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非常仔细和慷慨地为士兵提供经济上的刺激。地中海东部各行省别无选择，只能为此埋单，因而遭到苛捐杂税的压榨，除此之外，还必须提供粮草、物资和盟军士兵。有些人是自愿支持的，但没有人能够抵挡“解放者”大军的强大力量。罗德岛不愿意满足卡西乌斯的要求，于是卡西乌斯率军入侵该岛。犹太地区的一些社区顽固地拒绝合作，于是卡西乌斯将那里的居民全部卖为奴隶。大约在同一时间，布鲁图斯攻打并洗劫了吕基亚[\[24\]](#)的桑瑟斯，导致当地居民大批自杀。这些恐怖手段让大多数社区都积极地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布鲁图斯用他获得的部分白银铸造了一批带有他头像的银币，银币另一面是更妥当的共和国自由之帽[\[25\]](#)。铸造带有自己头像的钱币的做法是尤利乌斯·恺撒开创的，现在三头同盟也效仿他。[\[26\]](#)

前42年夏末，“解放者”觉得自己足够强大，便开始集结兵力，然后从小亚细亚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入马其顿。安东尼和恺撒派遣了8个军团渡过亚得里亚海，同时准备自己的主力部队，并集结运送如此多士兵所需的船只。8个军团的先遣部队兵力少于对方，谋略也占下风，沿着艾格纳提乌斯大道向西撤到安菲波利斯。“解放者”没有穷追不舍，但在腓立比城下占据了一个易守难攻的位置。这座城市由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于前4世纪建立，并以他的名字命名。

安东尼和恺撒的主力部队直到9月才起航，在这个时间开始作战算是非常晚了，但行动之坚决果断可与尤利乌斯·恺撒在内战中的表现媲美。和尤利乌斯·恺撒一样，安东尼和恺撒也缺少运输船，并且面对着强大的、决心阻止他们渡海的敌军舰队。安东尼在布隆迪西乌姆港准备远征的时候，袭击港口的敌军被他打退。在抵达亚得里亚海之前，恺撒与力量不断增强的塞克斯图斯·庞培打了几场无关大局的小规模海战。在最终起航的时候，他们只带去了部分军队，而且他们的运输船必须返回来运载增援部队。第二批部队渡海之后，“解放者”的战船就封锁了海路，并且封锁维持了一段时间。^[27]

安东尼和恺撒的军队在阿波罗尼亚登陆。两年多前，恺撒（当时还叫盖乌斯·屋大维）就是从这里出发，去面对风云变幻的罗马政治。但熟悉的环境并没有什么用，因为他在航行途中患了重病。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病，但他此时没有办法继续前进。安东尼率领他的军队继续开进，去援救在安菲波利斯的先遣部队。然后他继续推进，勇敢地在腓立比附近扎营，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对峙。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因为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兵力至少比他多三分之一，但“解放者”过于谨慎，未能利用这个优势。在随后十天内，两军的前哨之间发生了一些小规模交锋，直到恺撒及其军队抵达与安东尼会师。年轻的恺撒快到二十一岁了，因为体弱不能骑马，所以不得不乘轿。^[28]

安东尼和恺撒手中有19个军团，这相当于前48年决定性的法萨卢斯战役时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兵力之和。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有17个军团。“解放者”在骑兵方面有优势，据说出动了2万名骑兵，而安东尼和恺撒只有1.3万名骑兵。如果各军团的兵力接近理论数字，那么就有超过20万人参加了随后的战役，不过我们必须谨慎。很可能所有军团的兵力都远远少于理论数字，上述的骑兵兵力也是夸大的。用船运输马匹很困难，为这么多战马提供饲料也非常困难，何况还有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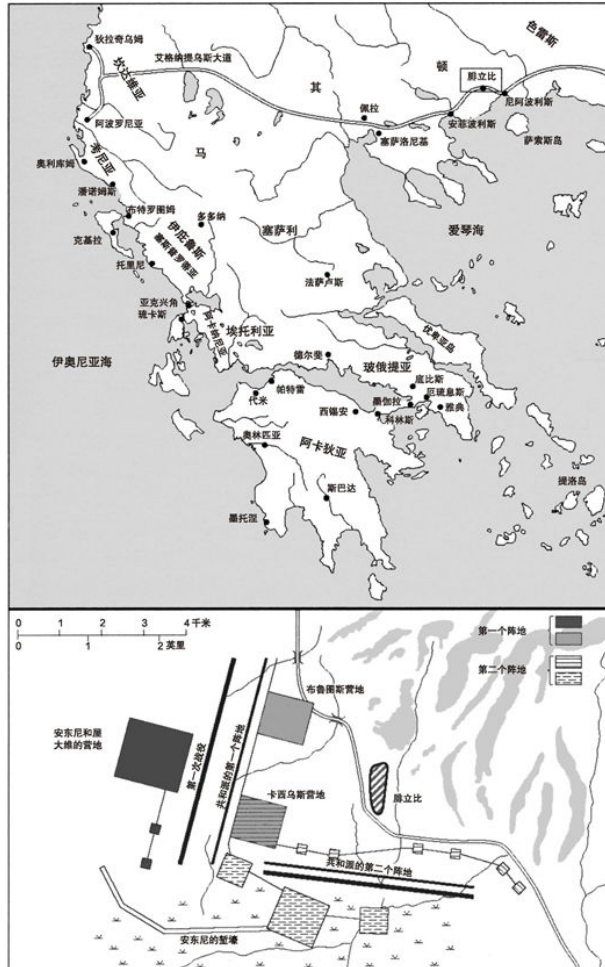
相当的役畜以及这么多士兵，要在相当长的时间维持这么多人员和牲口的生存，难上加难。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已经聚集了大量粮草，并且可以从海路获取补给，他们的对手没有这些优势。但要说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能够在整个战役期间维持如此庞大军队的给养，仍然是非常值得怀疑的。[\[29\]](#)。

即便各部队的兵力是其理论数字的三分之二或一半，仍然是非常庞大的。两军都有一些老兵，但绝大多数士兵和军官的作战经验都很少。统帅们也是如此。卡西乌斯于前53年在克拉苏麾下担任财务官，并率领一队残兵败将撤退到安全地带，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和布鲁图斯都曾在前48年的马其顿战役[\[30\]](#)中作战，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军事经验，直到他们为了筹集军费而开展了一些小规模惩罚性行动。这远远不足以让他们做好充分准备，去调遣史上投入战场的规模最大的罗马军队。安东尼的指挥经验比较丰富，不过正如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并没有大家一般认为的那么丰富。他的指挥水平远远比不上尤利乌斯·恺撒或庞培，尽管后两位从来不曾指挥过这么多军团。在这场新内战中，双方的军队都庞大而笨拙，而且高级军官们都没有指挥如此宏大规模战争的经验。在两边，各支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是单独行动的，仅仅对给他们发饷的领袖忠诚。他们互相挨着，排兵布阵，但并没有整合起来接受统一指挥。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腓立比城外的高地上各有一座营地。布鲁图斯在右翼，他的侧翼在一线山峦上。卡西乌斯在左翼，在一大块沼泽地旁边。防御工事的战线将两座营地连接起来。他们有充足的水源，与海岸之间有着稳妥的补给线。他们的计划是等待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或者等待敌人的粮草耗尽。这种战略或许能成功，但把主动权拱手让给敌人很不符合罗马的传统。恺撒的军队驻扎在布鲁图斯对面，安东尼的军队在卡西乌斯对面。在一段时间内，双方满足于小规模交锋。大多数日子里，两军都出营，摆开阵势，但双方都

没有向前推进、迫使对方交战。这种形式的挑战在当时的战争中是很常见的。[\[31\]](#).

为了打破僵局，安东尼判断敌军阵地左侧的沼泽地是一个薄弱点，于是派遣士兵建造一条贯穿沼泽地的战线。他的士兵从己方营地出发，向外延伸战线。他的目标是建造一块从卡西乌斯身旁经过的阵地，最终威胁敌人的补给线。起初，高高的芦苇可以掩蔽施工，并且安东尼小心地每天在营地外排兵布阵、发出威胁，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最终卡西乌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派遣士兵修建自己的壕沟和壁垒，与安东尼的战线构成直角。他打算截断安东尼的战线，消灭施工人员，并切断所有前进得过远的敌人，以便慢慢将其吃掉。10月3日，安东尼的侦察兵发现了敌人的动向。像往常一样，两军都摆好作战阵形。这一次，“解放者”可能决定向前逼近一点点，甚至打算发动进攻，以便将敌人的注意力从修建工事上转移走。



希腊和马其顿，两次腓立比战役

安东尼正在自己战线的最右翼，他立刻带领手边的部队冲进沼泽地，去攻击卡西乌斯的新战线。在其他地方，两军混战起来。不管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这次进攻是不是事先筹划的，他们的幕僚很难协调这么多缺乏经验的军团。前进的命令没有同时抵达各单位，所以指挥官们自行决定，有的等待，有的则在没有得到指示的情况下前进。于是，他们热情洋溢却缺乏秩序地前进。在另外一边，情况甚至更加混乱。在一连许多天摆开阵势、面对敌人却没有作战之后，安东尼和恺撒的军队没有预料到敌人这次会真的发动全面进攻。布鲁图斯的右翼战线比恺撒的部队延伸得要长，这可能是偶然，而不是布鲁图斯有意为之。第四军团占据着最左端的荣誉位置，这个有经验的恺撒军团

发现自己的正面和侧翼都遭到冲击，很快就败退了。恐慌情绪迅速蔓延，恺撒的整个左翼崩溃了。布鲁图斯的部队兴高采烈，潮涌般猛冲追击敌人，突入敌营，随后很快分散开去掳掠敌营的财物，完全忘记要一鼓作气取得彻底胜利。

与此同时，安东尼的士兵借助梯子，爬上卡西乌斯的新壁垒，将其占领，然后在将军的敦促下继续前进。安东尼是第一批杀进卡西乌斯主营地的人之一。卡西乌斯的大多数军团都在前方作战，没有参与沼泽地里的战斗。但随着新壁垒失守的消息传开，卡西乌斯的各大队开始动摇和撤退。卡西乌斯自己陷入了绝望，军队在他周围土崩瓦解。他的眼睛近视，误以为布鲁图斯的一些骑兵是敌人，于是命令自己的贴身仆人帮助他自杀，他不愿被俘。（这个仆人之后就消失了，有些人怀疑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命令就杀死了主人。）布鲁图斯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士兵，以让他们去抵抗安东尼。这些士兵开始满载着战利品，返回营地。安东尼也卷入了冲击卡西乌斯营地的战斗，没有办法掌控全局，也未能利用布鲁图斯部队的混乱。恺撒则干脆不知所踪。[\[32\]](#)

这位年轻的将军在10月3日这一天的行为，导致他的余生始终笼罩在争议之中。毫无疑问，他没有像一位罗马贵族理应做的那样，身先士卒。这时他的病还很严重，没有办法积极地指挥，但他也没有任命一位下属来代替自己，这无疑是因为一位军阀必须亲自为亡父报仇，而不能借助他人之手。这种指挥真空，就是他的军队遭到布鲁图斯攻击后迅速陷入混乱和溃败的最重要原因。恺撒可能就在军中，坐着轿子待在战线后方。“解放者”的人马冲进他的主营地时，他肯定不在那里，尽管好几个人跑到布鲁图斯那里，吹嘘自己杀死了年轻的恺撒。恺撒自己的说法是，他的私人医生认为继续留在营帐中很危险，于是他的伙伴们听取了医生的警示，让仆人把他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被抬走的时间是在战斗打响之前还是战斗期间。他们把他抬离战

场，躲在后方远处的沼泽地内。也许他们或他本人对战役已经绝望，抑或他仅仅是精疲力竭，无法行动，总之他在那里待了三天才返回营地。[\[33\]](#)

在第一次腓立比战役中，双方军队都很笨拙而且也不专业，再加上糟糕的指挥，最终打成了平手。恺撒的各军团伤亡最重，还丢失了一些军旗。更糟糕的是，一名信使送来了噩耗：最近一批从意大利输送援兵的船只在海上被敌军战船拦截并摧毁了。运输船被敌人烧毁，玛尔斯军团的很大一部分，以及另外一个军团的官兵，被烧死或溺死。布鲁图斯得知这消息时并不相信，但在确认自己的盟友和妹夫[\[34\]](#)死后，陷入了绝望。卡西乌斯死了，但他的军队和布鲁图斯的军队仍然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布鲁图斯立刻给了卡西乌斯的士兵一笔丰厚的赏赐，拉拢他们继续为共和国和自由而战。安东尼则继续打造绕过敌军左翼的战线。卡西乌斯之前在一座视野开阔的山上派驻了部队，但不知是因为错误，还是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布鲁图斯将这支部队撤走了。安东尼和恺撒发现了敌人的这个错误，立刻派兵到那个地点，并迅速建造了一座强大的要塞。布鲁图斯的补给线现在受到了威胁。时间一天天、一周周地流逝，他的军队开始倍感挫折，急于与敌军对抗，做个了结。

10月23日，布鲁图斯不情愿地出战了。这一次两军的位置与之前的战场呈直角，这意味着布鲁图斯的部队不再拥有缓坡的地理优势。即便如此，战斗还是漫长而残酷的，不过安东尼和恺撒的军队稳步将对方打退，“就像工人推着一台沉重的机械”，敌军最终瓦解溃散。布鲁图斯聚拢了几个军团，有秩序地撤退了。然后，像他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在加图等人榜样的感召下，他自杀了。[\[35\]](#)

恺撒的病情已经大有好转，所以在第二次战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胜利的主要功劳还是安东尼的。据说，俘虏中的一些贵族嘲

讽年轻的恺撒，而欢呼安东尼为凯旋将军。那些得到宽恕的俘虏肯定倾向于加入安东尼那边，这又一次体现了人们更青睐一个年纪较长、地位更巩固并且拥有无可争议的贵族血统的人。安东尼对布鲁图斯的遗体以礼相待，因此得到了赞誉。不过据普鲁塔克说，恺撒对布鲁图斯的遗体给予同样的尊重。布鲁图斯的首级准备被送往罗马（我们不知道这是谁下的命令），摆放到尤利乌斯·恺撒雕像的脚下，但运送首级的船只在海上倾覆，首级也失踪了。有人指控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残酷地对待战俘，据说有一次他让一对父子赌博决定谁先被斩首。^[36]

安东尼获得了打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大部分荣耀，不过恺撒后来简单地宣称：“我把那些杀害我父亲的人驱赶到流亡队伍中，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惩罚他们的罪行，后来他们对共和国开战，我两次在战场上击败他们。”^[37]

主要的密谋者都战败和死亡了，恺撒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目前这对他而言已经足够了。军阀需要成功，战争已经打赢了。他和安东尼必须兑现给士兵的承诺，其中很多人服役期已满，有的是因为服役年限到了，有的是因为参军时订立了契约，规定战争结束后便退役。退伍军人得到的承诺是在意大利得到土地。三头同盟决定让恺撒回国监督这项工作。安东尼将留在地中海东部，确保各行省保持忠顺，并压榨它们的钱财，以便筹集三头同盟支付军饷和分配土地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主要的附庸王国和城市别无选择，只能满足他的要求，就像它们前不久被迫满足“解放者”的需求，以及几年前满足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的要求那样。国王和其他领袖知道，如果他们拒绝服从，罗马人能轻而易举地找到野心勃勃的竞争对手来取代他们。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仅仅是急于讨得安东尼欢心的一大批东方显贵之一。^[38]

但恺撒在起航返回意大利之前，又病倒了。和上一次患病的情形一样，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病，也不知道这次是新的疾病，还是旧病复发。有一段时间，人们担心他会死掉，还有谣言说他已经死了。几个月过去了，他迟迟未能返回，罗马城变得越来越紧张。传闻称他在筹划一件比之前的大清洗更为凶残的事情。恺撒和安东尼在国外期间开始怀疑李必达，疑心他已经开始私下里与塞克斯图斯·庞培单独谈判。于是，恺撒和安东尼暂时瓜分了李必达的几个行省，不过他们似乎打算在将来的某个时间把北非的两个行省交还给他。李必达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三头同盟的一员，但他的地位显然已经低于另外两人了。^[39]

前41年，恺撒终于返回罗马，开始急迫而坚决地搜罗土地。在他们动身去马其顿作战之前，三头同盟就已经指定了意大利的十八座城市，计划没收其土地，分配给退伍军人。富人和有背景的人，尤其是元老和最富裕的骑士，若是发现涉及自己的地产，便发出抗议。疏远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总是很危险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的地产都得到了豁免。这意味着遭到打击最大的是中等阶层，他们没有什么办法抗议，尽管其中很多人还是决定来罗马城尝试一番。在好几个案例中，被指定城市周围的土地还不够，于是附近社区的土地也被没收，尽管这些社区并没有被三头同盟指定。

士兵得到的承诺是，他们退役之后将得到农场。他们拿自己的生命和肢体冒险，去帮助统帅打仗，他们也知道，三头同盟之所以能够统治，就是依赖他们的力量。于是，士兵们傲慢而粗暴地坚持要求得到更好的待遇。尤其是，他们希望他们的亲戚，以及阵亡战友的父亲和儿子也得到保护，不至于被没收土地。与此同时，一些耕种自家土地已经几代的家庭丧失了土地，但他们并没有犯过罪，也不曾反对三头同盟。土地被没收时，原先的牲畜、工具、建筑和房屋，以及作为劳动力的奴隶，会被一并没有没收。人们畏惧但并不爱戴三头同盟，所以

三头同盟如履薄冰，一方面要满足退伍军人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不能疏远太多其他人。同时，塞克斯图斯·庞培在骚扰通往意大利的海路，所以运到意大利的粮食比正常情况少了许多。于是粮食开始短缺。和通常情况一样，最容易受到饥谨威胁的是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已经开始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可能更糟糕了，因此倾向于支持任何变革。[\[40\]](#)

恺撒在意大利本土，所以很多群体都将他当作怨恨的焦点。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敌人出现了。为了给迪基姆斯·布鲁图斯报仇，马尔库斯·布鲁图斯杀死了安东尼的弟弟盖乌斯，但到前41年，安东尼仅剩的弟弟卢基乌斯·安东尼当上了执政官。卢基乌斯拥有罗马贵族趾高气扬的自信，我们不应当将他仅仅视为其兄长的爪牙，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作为执政官，他开始支持那些被没收了土地的农民和意大利心怀不满的社区。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和恺撒的关系恶化了。随后发生的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即便在当时也很难查清，况且很快就陷入了宣传的泥沼。富尔维娅加入了卢基乌斯，竭尽所能地从安东尼的老兵当中帮他召集人马。但很少有老兵表现出热情，因为尽管他们喜爱自己的老长官，但不愿意站到被剥夺土地的农民一边去反对政府，毕竟政府正在非常努力地把那些没收来的土地分配给安东尼的老兵，以及恺撒的老兵。站到卢基乌斯旗下的大多数士兵都是来自意大利北部和坎帕尼亚肥沃地区的新兵，这些地区受土地分配政策的打击最大。

前41年年末，卢基乌斯率领他的新军队向罗马城进发。李必达在城内，但他的兵力远远不敌卢基乌斯·安东尼，而且广大群众对三头同盟没有多少支持。罗马迅速陷落，李必达逃去投奔恺撒。但在恺撒率领一支庞大而纪律严明的军队赶来时，卢基乌斯·安东尼已经撤退了，而且跑得比他之前来时更快。他向北进发，希望与意大利境内马克·安东尼属下的几名将军会合，他们有大约13个有作战经验的军

团。恺撒的下属指挥官堵住了他的去路，将他封堵在佩鲁西亚（今天的佩鲁贾）。恺撒的军队在佩鲁西亚城周围挖掘了一道壕沟，建造了壁垒，并每隔一小段距离就建造一座塔楼，等待敌人因为饥饿而屈服。在冬季的几个月，卢基乌斯·安东尼坚守下来，等待安东尼的将军们带兵救援。援军到了很近的地方，有一次在离佩鲁西亚仅20里的地方扎营，但由于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得到马克·安东尼本人的指示，所以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或许也认识到，己方的士兵也不同情卢基乌斯叛党。没有一位将军选择与恺撒手下驻扎在那里观察他们的指挥官发生对抗，而恺撒的指挥官也小心地避免严重的冲突。^[41]

考古学家在佩鲁西亚发现了一些铅制的弹丸，上面铸有文字，揭示了当时两军之间的宣传和粗俗辱骂。恺撒的部下嘲讽卢基乌斯·安东尼的秃头，或者表示希望他们的投射武器击中富尔维娅的 *landica*（这是一个特别粗俗的俚语词，指的是阴蒂）。尽管安东尼的妻子并不在佩鲁西亚，但她显然受到特别的憎恨和讥讽。守军弹丸上的文字则自称瞄准恺撒的屁股，把他描述为堕落下流的同性恋者，供别人鸡奸。除了这些污言秽语攻击之外，守军还常袭击围城者的战线。有一次，恺撒在以军队统帅的身份举行献祭时，遭到突然袭击，险些丧命。不过守军袭击的结果一般没有如此惊险，有时一些守军能够突围逃走。^[42]

卢基乌斯·安东尼的兄长属下的指挥官不能够或不愿意帮助卢基乌斯。他的粮草最终消耗殆尽，于前40年2月投降。佩鲁西亚遭到洗劫，被付之一炬，不过我们不确定火是胜利者还是当地居民放的。一些领头放火的平民可能被处决了，卢基乌斯·安东尼的一些元老级支持者可能也被处死。谣言和敌视恺撒的宣传很快将此事夸大为又一场恐怖大屠杀，说三百名显赫平民被献祭给尤利乌斯·恺撒的灵魂。这种捏造的故事肯定受到了《伊利亚特》的启发，阿喀琉斯在其战友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上杀死了特洛伊战俘。据苏埃托尼乌斯说，有人哀

求饶命或者替人求情时，年轻的恺撒简练地回答“你必须死”或者“他必须死”。不过总的来讲，恺撒的报复还是有限的。叛军士兵得到了宽恕，其中很多人无疑被招募到恺撒军中。卢基乌斯·安东尼不仅没有受到伤害，还被派去治理西班牙的一个行省。^[43]富尔维娅已经逃到她丈夫身边了，安东尼的母亲也逃到了国外，先是跑到塞克斯图斯·庞培那边，后来他派人将她送到安东尼那里。^[44]

安东尼没有干预这场所谓的“佩鲁西亚战争”，没有支持自己的弟弟和妻子，也没有约束他们。前40年春，他在返回意大利的途中，带来了实力非常雄厚的舰队。没有人知道，新的内战是已经真正结束了，还是刚刚开始。

^[1] Appian, *BC* 4.8 (Loeb translation) .

^[2] Velleius Paterculus 2.67.2 (Loeb translation) .

^[3] Appian, *BC* 4.6提到，有些史料说，三头同盟当即下令处死了十二人，也有史料说是十七人。

^[4] 演讲台 (Rostra) 在罗马广场 (Forum) 上、元老院议政厅之外。Rostra的字面意思是战船船首的冲角，它装饰着迦太基战争期间俘虏的敌船的船首，由此得名。行政长官和其他大人物常常在演讲台向罗马人民的非正式集会发表演讲。

^[5] 镇压政敌，概况见Appian, *BC* 4.6-31, Dio 47.1.1-15.4, Plutarch, *Cicero* 46, *Antony* 19, 精彩的介绍见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 pp.62-82, 及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p.190-94; 对镇压政敌的影响、其表现形式和年轻恺撒角色的精彩介绍，见A.Powell, *Virgil the Partisan: A Study in the Re-integration of Classics* (2008) , pp.55-62, 68-9, 他指出，人们容易忘记这些谋杀是多么残暴，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镇压政敌”这样的词；三头同盟中每一方带到罗马城的兵力，见Appian, *BC* 4.7; 上文关于不要用文字反对三头同盟的引文，被认为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说的话，见Macrobius, *Satires* 2.11.1。

[6]. 典出莎士比亚《尤利乌斯·恺撒》第四幕第一场，是安东尼说的话。

[7]. 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是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的远方堂兄，曾担任前64年执政官。他的父亲也叫卢基乌斯，是前90年执政官。他的儿子也叫卢基乌斯，内战中站在庞培一边，反对自己的父亲和堂叔。

[8]. Appian, *BC* 4.8-11 记载了镇压政敌公告的一个版本，可能是真实的。名单包含盖乌斯·托拉尼乌斯，见Suetonius, *Augustus* 27.1。

[9]. 米利都为古希腊名城，位于今天土耳其西南部，前6世纪为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发源地，即所谓“米利都学派”的家园。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统治下，米利都相当繁荣。

[10]. Plutarch, *Antony* 19-20, Appian, *BC* 4.5-30, 37, Dio 57.1.1-14.5, with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190-96, 及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62-82; Plutarch, *Antony* 20 (Oxford translation, modified) for quote.

[11]. 见Plutarch, *Cicero* 47-8, Appian, *BC* 4.19-20, 及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78其他讨论和资料见D.Stockton, *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 pp.331-2, T.Mitchell, *Cicero. The Senior Statesman* (1991), pp.322-4, A.Everitt, *Cicero. A Turbulent Life* (2001), pp.304-10。

[12]. Dio 47.8.3-4, Plutarch, *Cicero* 48-9, *Antony* 20, Appian, *BC* 4.19, 也见Cornelius Nepos, *Atticus* 9.3-7, with 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p.245-6。

[13]. Suetonius, *Augustus* 27.1-2强调他追逐受害者，对比Velleius Paterculus 2.66-7, 认为安东尼和李必达才是罪魁, K.Scott,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44-30 BC',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1 (1933), pp.7-49, 尤见19-21, A.Powell, *Virgil the Partisan: A Study in the Re-integration of Classics* (2008), pp.63-8 讲到史料对恺撒的态度以及对他的描述, 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p.246-7。

[14] 科林斯花瓶，见Suetonius, *Augustus* 70.2，安东尼为抢夺维雷斯的艺术品而镇压他，见Pliny, *NH* 34.2.6, with K.Scott,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44-30 BC’,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1 (1933), pp.20-21；安东尼和富尔维娅，见Appian, *BC* 4.40, Dio 47.7.4-5, 8.5。

[15] Appian, *BC* 4.30讲到年轻的受害者，及4.23-4关于妻子的故事；女性的角色，见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74-82。

[16] Appian, *BC* 4.23, with 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64-5, 79；女子被李必达的侍从殴打的故事出自她丈夫为纪念她而竖立的纪念碑，今天通常称为Laudatio Turiae（不过这个名字可能不太准确），见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67-74的讨论和资料。

[17] Dio 47.7.4-5.

[18] 昆图斯·霍尔腾西乌斯·霍尔塔鲁斯（前114～前50年），前69年执政官，著名演说家。

[19] Appian, *BC* 4.31-4, Dio 47.14.2-3, with 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84-8.

[20] Dio 47.18.3-19, with S.Weinstock, *Divus Julius* (1971), pp.386-98.

[21] 即前文讲到的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喀，西塞罗的死敌，被米罗杀害。

[22] 阿提娅之死，见Suetonius, *Augustus* 61.2, Dio 47.17.6；与克劳狄娅的订婚和结婚，见Suetonius, *Augustus* 62.1, Velleius Paterculus 2.65.2, Plutarch, *Antony* 20；克劳狄娅离婚时还是处女，见Dio 48.5.3。

[23] 讨论见R.Weigel, *Lepidus. The Tarnished Triumvir* (1992), pp.69-70, 77-9。

[24] 今天土耳其西南部的一个地区。

[25] 自由之帽 (Pileus) 是古希腊和罗马时期自由人戴的一种尖顶帽，奴隶在获得自由时往往得到这样一顶帽子，以象征他们的自由人身份。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人误将自由之帽与来源于古代弗里吉亚（今土耳其中西部一地区）的一种帽子混淆，用弗里吉亚帽象征自由，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26] Dio 47.25.3，与Appian, *BC* 4.100-01；Appian, *BC* 5.17 详细讨论了士兵的态度，Cornelius Nepos, *Eumenes* 8.2将马其顿老兵与当时的罗马士兵相比，因为二者都贪婪且热衷于内战；布鲁图斯的钱币，见M.Crawford, *Roman Republican Coinage* (1974)，pp.498-508。

[27] Appian, *BC* 4.101-8, Plutarch, *Brutus* 37-40。

[28] Appian, *BC* 4.106, 108, Dio 47.37.2-3, Suetonius, *Augustus* 13.1.

[29] 数字见Appian, *BC* 4.88, 108；讨论见P.Brunet,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1971)，pp.485-8，基本上接受较高的估计，怀疑的立场见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pp.251-3；对比Appian, *BC* 4.137，他强调战役的规模，Dio 47.39.1 声称这些战役不是内战中规模最大的；另见Velleius Paterculus 2.113，未来的皇帝提比略觉得控制聚集在一个地方的10个军团太困难。

[30] 即尤利乌斯·恺撒与庞培在马其顿的决战，后者大败。

[31] 挑战，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1996)，pp.141-5。

[32] 关于第一次腓立比战役，见Appian, *BC* 4.109-14, Plutarch, *Brutus* 40-45, Dio 47.42.1-47.1，配有精美插图的叙述见S. Sheppard, *Philippi 42 BC. The Death of the Roman Republic* (2008)；损失惨重导致士气瓦解，见Caesar, *BG* 5.33，与*BG* 5.43记述的另一个军团的较好纪律对比。

[33] 屋大维行为的不同说法，见Plutarch, *Brutus* 41, *Antony* 22, Dio 47.41.3-4, 46.2, Velleius Paterculus 2.70.1, Suetonius, *Augustus* 13.1, Pliny, *NH* 7.147，简要讨论见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204-5,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 pp.95-6,
Stark (1933) , pp.21-2, 和A.Powell, *Virgil the Partisan: A Study in
the Re-integration of Classics* (2008) , p.106。

[34]. 卡西乌斯娶了布鲁图斯的三个妹妹之一——尤尼娅·特尔提娅。

[35]. Appian, *BC* 4.125-31, Plutarch, *Brutus* 49-52, *Antony* 22 (这是暗示恺撒在第二次战役时仍然患病的唯一史料) , Dio 47.48.1-49.4。

[36]. Appian, *BC* 4.129-31, 135, Suetonius, *Augustus* 13.1-2, Dio 47.49.2, Plutarch, *Brutus* 53.3, *Antony* 22, *Comparison of lives of
Dion and Brutus* 5.1, with Stark (1933) , pp.22-3.

[37]. *Res Gestae* 2 (Loeb translation) .

[38]. 安东尼在随后一年半行动的更多细节, 见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 pp.261-71, 尤其强调他面对附庸国统治者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所做的选择。

[39]. Appian, *BC* 5.3, 12, Dio 48.1.2-3.6, with R.Weigel,
Lepidus. The Tarnished Triumvir (1992) , pp.79-80.

[40]. 对没收土地的详细讨论, 见L.Keppie, *Colonisation and Veteran
Settlement in Italy: 47-14 BC* (1983) , *passim* and 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 pp.108-51。

[41]. 佩鲁西亚战争, 见Appian, *BC* 5.12-51, Dio 48.5.1-14.6,
Plutarch, *Antony* 30, Velleius Paterculus 2.74-6, 讨论见
E.Gabba, 'The Perusine War and Triumviral Italy' ,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75 (1971) , pp.139-60,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p.207-12, 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 pp.152-72, 及
C.Pelling in *CAH2* X, pp.14-17。

[42]. 见J.Hallett, 'Perusinae Glandes and the Changing Image of
Augustus' , *AJAH* 2 (1977) , pp.151-71, 另见T.Rihl, 'Lead
Slingshot (glandes)' , *JRA* 22 (2009) , pp.149-69有力地指出, 这些铅制

弹丸可能是用非常轻型的手持武器发射的，而不是用投石器。这不会改变这些信息的重要性；恺撒险些丧命，见Suetonius, *Augustus* 14，声称这些袭击者是获释的角斗士，参见Appian, *BC* 5.33；逃离围城，后来导致悲剧，见Propertius, *Elegies* 1.21。

[43] 此后卢基乌斯·安东尼就从史册中销声匿迹了，我们不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

[44] 围城战结束，对战俘的处置见Appian, *BC* 5.46-9, Dio 48.14.3-6, Suetonius, *Augustus* 15, 及Velleius Paterculus 2.74.4讲到，大火是一名居民点起来的，Stark (1933), pp.27-8；阿喀琉斯的献祭，见*Iliad* 23.21-2。

第三部 凯旋将军恺撒，神之子，前38～ 前27年

凯旋将军是赋予一名赢得胜利的将军的头衔，但在此之前从未被用作永久性的名字。在前42年尤利乌斯·恺撒被正式封神之后，他（恺撒）正式获得了“神之子”的称号，但后来才开始一直使用这个头衔。

九 神子们

啊，在怎样遥远的将来才能回到故乡，再看见茅草堆在我村舍的屋顶上，再来欣赏我的小小收成，自己的王国？种好了的土地将被粗鲁的士兵掳掠，异族人将占有我们的果实，这都是战争给我们的灾难，把自己的土地让给这些人！

——维吉尔，前1世纪30年代^[1]。

伟大世纪的运行又要重新开始，处女星已经回来，又回到萨图恩^[2]的统治，从高高的天上新的一代已经降临，在他生时，黑铁时代就已经终止，整个世界又出现了黄金的新人。圣洁的露吉娜^[3]……正当你为执政官，波利奥啊，伟大的岁月正在运行初度。

——维吉尔预言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开始，前40年^[4]。

前41年的某个时候，随着富尔维娅与卢基乌斯·安东尼的关系恶化，恺撒得到启发，写了一首关于他的岳母（马克·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的短诗：“安东尼操了格拉菲拉，富尔维娅为了报复，想搞我！怎么办？我要操富尔维娅吗？如果马尼乌斯求我操他屁股，我应当这样做吗？我觉得不行，如果我还有一丁点儿理智的话。她说，要么操，要么打仗。呃，对我来说，我的鸡巴比我的生命更珍贵。让战斗开始吧！”^[5]

一个多世纪之后，诗人马提亚尔引用了这些诗句，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知晓它们的存在。他还厚脸皮地说，既然罗马的第一位皇帝能写淫秽诗歌，那他也可以。恺撒这些诗句的拉丁文特别粗俗，与他的士兵在佩鲁西亚往铅制弹丸上刻的污言秽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格拉菲拉是罗马的附庸国卡帕多细亚统治者的出身高贵的情妇，三头同盟重组东方各行省时，格拉菲拉委身于安东尼，希望说服他，让她的儿子继承卡帕多细亚的王位。（当时安东尼把卡帕多细亚的权力给了

其他人，但几年后又安排格拉菲拉的儿子成为国王，所以她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安东尼遇见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之前几个月，他和格拉菲拉的风流韵事已经传到了罗马，成了新的流言主题。马尼乌斯是安东尼在意大利的一位重要代理人，后来被指责激化了政局，被认为是促发佩鲁西亚战争的主要责任人之一。^[6]

即便按照罗马政客凶残地互相攻击的标准，这几句诗也是非常低俗的，作者是一个纵情于污言秽语的毛头小子，充满了任性顽固的自信。仅仅几年之间，恺撒便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人之一，如同他养父般的作为国家最高领袖的荣誉和地位似乎指日可待。平步青云说明他有着极大的、极其强烈的野心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但也说明他的运气非常好。和几乎所有成功的政治家一样，恺撒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若不是尤利乌斯·恺撒被谋杀，年轻恺撒的政治生涯将会截然不同，晋升肯定要慢得多，不过说不定到最后会取得同样崇高的地位。借助西塞罗领导下的元老院的帮助，他得以攫取权力，并获得合法性。后来元老院领导人要“抛弃”他时，他又变成了安东尼和李必达的有价值盟友。他也曾失败过，比如第一次进入罗马，以及在第一次腓立比战役中的可耻表现。他也冒了很多风险。他完全有可能输掉战役，或者殒命沙场。他克服了两次非常严重的疾病，并直面愤怒的公民和由哗变老兵组成的暴民团体。有一次，他派遣一名百夫长去安抚哗变士兵，士兵们却将此人杀死，将尸体丢在恺撒一行人的必经之路上，以确保他看得见死尸。年轻恺撒在每一次危机中生存下来，最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古代史料中记载的预兆往往是后人的捏造，但恺撒一定坚信自己的好运气，以及必将赢得天下的命运。^[7]

在佩鲁西亚战争打响之前，他与克劳狄娅离婚了。有人说恺撒故意没有与妻子圆房，因为他知道这段婚姻以及它所代表的政治联盟不会维持多久。不过，没有圆房的原因可能仅仅是这个姑娘年纪太小，就算有了孩子，在政治上不利的婚姻也会终结。恺撒及其指挥官击败

了卢基乌斯·安东尼，安东尼的将军们未能有效地支持卢基乌斯·安东尼，也是恺撒胜利的原因之一。但恺撒终归是赢了，并且在这次挫折之后变得更强。随后，好运气又一次站到他这边。在腓立比战役之后重新分配各行省时，内高卢变成了意大利的一部分，高卢各行省的其余部分被分给了安东尼，安东尼通过自己的下属昆图斯·弗费乌斯·卡雷努斯来控制这些地区。前40年夏季，卡雷努斯病逝，留下一个年轻的儿子来掌管局面。恺撒的年纪可能只比小卡雷努斯大一点点。他匆匆赶到高卢，威逼小卡雷努斯将军队指挥权交给他。就在一夜之间，11个军团转了手。^[8]

恺撒外出期间，安东尼返回了意大利。他现在拥有一大批战船，因为一度为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效力的海军将领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加入了他们。就在前不久，阿赫诺巴尔布斯还在袭掠意大利沿海地区。他与安东尼的联合舰队抵达布隆迪西乌姆时，当地驻军认出了阿赫诺巴尔布斯的战船，于是封闭了港口。安东尼认为这是恺撒在刻意开战，于是攻打这座城市。驻军可能犯了个错误，不过在佩鲁西亚战争造成的激烈气氛中，双方无疑都高度紧张。恺撒从高卢返回，开始准备作战。他集结了军队，并又一次努力招募刚刚定居下来的退伍军人。退伍军人因为得到了土地而对恺撒感恩戴德，做出了良好的回应。直到消息传来，这一次他们的敌人是安东尼和他们的许多老战友，有些人转身回家了，而留下的人也是不情愿地跟随恺撒。^[9]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此时安东尼处于强势地位。塞克斯图斯·庞培已经找到他，提议与他结盟，共同反对恺撒。在佩鲁西亚战争之后，安东尼的母亲逃到了西西里岛，得到了塞克斯图斯的照顾。或许她真的是因为害怕才逃跑，但实际上她基本不会有任何危险，所以她的逃跑更有可能是为了公开表示对恺撒的敌意。恺撒肯定是这么想的。塞克斯图斯欢迎了这位逃亡的老妇人，派人送她去东方，去见她

的儿子。安东尼对塞克斯图斯很感激，但目前还不是全心全意地打算与年轻的同僚开战。他这么谨慎，有着很好的理由。前41～前40年冬季，他在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都城亚历山大港沉溺享乐。他离开时，克利奥帕特拉已经怀孕了，后来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在这几个月里，帕提亚人入侵了叙利亚，以此支持提图斯·拉比埃努斯领导的罗马军队。拉比埃努斯是一名顽固的共和派分子，错过了腓立比战役。他的父亲是尤利乌斯·恺撒在高卢时最优秀的军团长，但在内战中选择为庞培效力，前45年在蒙达战败后自杀。东方各行省多年来不得不为罗马内战的双方提供资源，如今国弊民穷，驻军很少，没有力量抵抗帕提亚人的进攻。帕提亚人只遇到了微弱抵抗，便轻松占领了叙利亚，然后派遣规模较小的部队去占领犹太和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10]

安东尼抵达布隆迪西乌姆时，拥有一支舰队，但陆军兵力不多。他的一些下属在意大利和西方还有一些军团，但失去了卡雷努斯的军队之后，安东尼的军力远远小于恺撒。考虑到东方各行省的状况，再从那里征兵困难重重，在政治上也很不利，而且最快也要几个月。若与塞克斯图斯·庞培结盟，便能获得更多齐装满员的战船，但陆军士兵却很少。目前来看，不管长期力量平衡如何，军事优势肯定在恺撒那边。但这并不意味着恺撒必胜无疑，或者互相厮杀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真正有益。

最后，安东尼和恺撒没有得到选择的机会。双方在布隆迪西乌姆周边集结的时候，尤利乌斯·恺撒的老兵认出了自己的老战友，开始亲密交往。他们起初是开玩笑，后来变得严肃起来。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不愿意与先前的同袍作战。士兵们努力避免新的战争，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佩鲁西亚战争之前的紧张时期，士兵们迫使恺撒和卢基乌斯·安东尼在最后关头进行了谈判。不过那一次，在谈判开始之前，互相的猜疑和误会激起了一场武装冲突，结果没有

谈成。这一次，士兵们更坚决，双方的领导人也真诚地希望达成妥协。^[11]

他们没有亲自去谈判。阿西尼乌斯·波利奥代表安东尼去谈判，而恺撒的代表是一名叫作盖乌斯·梅塞纳斯的年轻骑士，此人是恺撒的主要密友之一，可能与他年龄相仿，说不定就是某个与恺撒一同受教育的青年。参加谈判的还有卢基乌斯·考基乌斯·涅尔瓦，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官，深受将士们信任，似乎被认为是个中立分子。没有人替李必达说话，不过他被任命为北非总督，拥有一支按照那些年的标准来说不算强大的军队。恺撒仍然控制着高卢，并得到了其他所有西方行省，往东一直到伊利里亚的斯科多拉^[12]。安东尼则得到了恺撒领地以东的所有地区。阿赫诺巴尔布斯和其他一些人得到了赦免。安东尼告诉恺撒，萨尔维迪努斯·鲁弗斯（恺撒最信任的指挥官之一）已经开始秘密地与自己谈判。鲁弗斯被逮捕并处决了。恺撒让元老院颁布了终极议决，以便给予处决鲁弗斯的行动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安东尼则处死了自己的代理人马尼乌斯，据说马尼乌斯曾伪造文书，煽动卢基乌斯和富尔维娅打着安东尼的旗号造反。^[13]

偶然的机缘也帮了他们的忙。富尔维娅逃到希腊后，受到了丈夫冷冰冰的“欢迎”。她心力交瘁，再加上非常抑郁，很快患病死去了。这意味着，近期佩鲁西亚战争的主要罪责可以方便地推到她身上。由于富尔维娅受到了很多恶毒宣传的攻击，我们已经很难公正地判断她的真实品格和扮演的角色，但她肯定是那一代女性中在政治上最为活跃的分子之一。她死后，安东尼又一次成了单身汉。巧合的是，屋大维娅的丈夫马凯鲁斯也在这一年死去了，于是恺撒的姐姐和他新近巩固了关系的盟友之间很快缔结了婚姻。由于罗马法律规定寡妇再嫁之前必须等待十个月，恺撒和安东尼装模作样地请求祭司允许安东尼与屋大维娅在这个期限之前结婚。祭司当然做出了令他们满意的决定。^[14]

屋大维娅此时大约三十岁，已经和马凯鲁斯生了一个儿子。贵族女性在自己的婚姻上很少有自主权，但在随后的岁月里，她尽其所能地做一个忠诚的贤妻，而她和安东尼在一开始似乎的确很幸福。安东尼与恺撒重归于好的消息在意大利全境和罗马城受到了普遍欢迎，主要是因为这意味着不会再发生新的内战。三头同盟很愿意强化这种信息。屋大维娅的肖像和丈夫一起出现在钱币上。她是第一位出现在罗马货币上的女性。阿西尼乌斯·波利奥是这一年的执政官之一，诗人维吉尔在诗中预言，他当执政官的年份将标志着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开端，第一个吉兆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男童的诞生。虽然维吉尔没有说这个男孩是谁，但他指的显然是安东尼和屋大维娅即将诞生的孩子。屋大维娅确实很快怀孕了，不过生的是个女孩，所以关于和平与普遍繁荣的预言显得有些为时过早了。[\[15\]](#)。

在与安东尼和解之前，恺撒也再婚了。他的新娘是斯科利博尼亚，比他年长约十岁，已经结过不止一次婚，是塞克斯图斯·庞培的岳父卢基乌斯·斯科利博尼乌斯·利博的妹妹。恺撒可能是希望增加与塞克斯图斯打交道的机会，不过斯科利博尼乌斯·利博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塞克斯图斯的主要盟友之一。这段新婚姻至少会让利博和塞克斯图斯这对翁婿之间的忠诚关系变得不是那么铁板一块。[\[16\]](#)。

尼普顿之子

塞克斯图斯·庞培的势力太强，恺撒没有办法忽视他。到前42年时，塞克斯图斯已控制了西西里岛，后来又占领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他的齐装满员的强大舰队以这些岛屿为基地，恣意袭掠意大利沿海地区，扰乱贸易航线，造成了极大损害，以至于运往意大利，尤其是对罗马这座大都市来说非常重要的粮食供给都严重减少了。安东尼与恺撒在布隆迪西乌姆的和谈将塞克斯图斯排除在外，仅仅含糊地说

将来再谈，所以塞克斯图斯在随后几个月内加强了袭扰行动。在正常时期，首都所需的很大一部分粮食是从西西里岛运来的。没了西西里岛的粮食，再加上从更远地方运送粮食的路线被截断，罗马城的粮价迅速飙升，政府不得不想尽办法去寻找足够数量的粮食，以便执行尤利乌斯·恺撒向公民免费发放粮食的政策。一年多以来，罗马一直是愤愤不平的退伍军人、被剥夺了土地的意大利农民以及城市贫民（他们代表着前两个群体的存在和要求）时断时续的暴乱场所，如今变得更加动荡不安。^[17]

塞克斯图斯·庞培不断施加压力。即便在年轻军阀横行的年代，他也算得上很年轻的一位了，可能只比恺撒年长三四岁。法萨卢斯战役时，他被认为太年轻，没有参战。他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在埃及被杀，然后看着自己的兄长征集了一支军队去对抗尤利乌斯·恺撒，最后却被打败和处死。塞克斯图斯留着一条性命，在西班牙发动了一场新的叛乱。家族的人脉和他自己的领袖魅力很快为他赢得了成功。他的部下掳掠或建造船只，在地中海西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发动袭击。前43年春季，西塞罗说服元老院，将塞克斯图斯夺得的权力合法化。仅仅因为他是伟大的庞培的儿子，塞克斯图斯便被正式任命为“舰队及沿海地区长官”。同年年底的权力转移将他从一名合法任命的行政长官变成了不法之徒，因为《佩蒂乌斯法》^[18]将他和密谋者一同定罪，尽管他并没有参与谋杀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的阴谋。塞克斯图斯和“解放者”虽然都敌视三头同盟（卡西乌斯曾表示对格奈乌斯·庞培^[19]非常不屑，因此对他的弟弟可能也有类似的想法），但互相之间并没有积极的合作。此外，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可能都不会喜欢一个自称继承其父亲权力的人。^[20]

和恺撒一样，塞克斯图斯大肆宣扬对自己父亲的尊重，以此为由控制指挥权。虔敬是一种非常深刻的、非常符合罗马人风尚的义务，它指的是对诸神、祖国，尤其是对父母的尊崇。恺撒为被谋杀的养父

复仇，以此宣扬虔敬。卢基乌斯·安东尼以兄长的名义举兵反叛时，将虔敬这个词加在自己的名字和执政官头衔之后。塞克斯图斯·庞培自称皮乌斯（意思是“虔敬的”），还采用了父亲的绰号“伟大的”，于是他的名字在钱币上就是“伟大的皮乌斯”，这是非常不合常规的名号。^[21]

恺撒和塞克斯图斯·庞培有很多相似之处。钱币上描绘的塞克斯图斯·庞培蓄着胡须，这是哀悼亡父和亡兄的象征。钱币上的恺撒肖像也是这样。“解放者”死后，恺撒公开地剃去胡须，表示大仇已报。但在此之后的几年里，钱币上仍然刻有他蓄须的形象。不过，塞克斯图斯的父亲是在战争中失败，作为流亡者被杀死，不像恺撒的养父那样，是在成功的巅峰被谋杀的。所以，塞克斯图斯的权力基础不可避免地远离意大利，主要来自他自己和家族的威望，而不是传统的国家机构。恺撒则成功地进入国家的核心，来到共和国政治生活的中心。两人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差别，其一定会让塞克斯图斯永远显得更高一筹。三头同盟开始镇压政敌的时候，塞克斯图斯庇护了所有受害者和逃离三头同盟统治的人。他的战船在意大利海岸线巡游，随时准备营救逃亡者，而对于那些被三头同盟悬赏缉拿的人，塞克斯图斯给出双倍的价钱，鼓励人们将这些受害者救到安全地带。由于他的努力，数百人的生命得以挽救。他这么做有政治上的加分，但即便如此，这种义举也与那些凶残年代的残酷暴行形成了鲜明对比。^[22]

但塞克斯图斯也切断了意大利和罗马的粮食供应。他的这项战略是针对三头同盟的，但不可避免地给广大民众，尤其是最贫穷的人群带来了苦难。到前40年年底，安东尼和恺撒都在罗马，为了庆祝在马其顿的胜利而举行了小凯旋式。他们都不得人心，所以群众把粮食短缺怪罪到他们头上，因为大家觉得他们应当和塞克斯图斯谈判。和退伍军人一样，绝大多数民众希望和平；他们也效仿退伍军人，举行了越来越凶暴的抗议活动，迫使领导人缔造和平。前39年年初，恺撒在

广场处理政务时，一群愤怒的暴民围了上来。有人动用了投射武器，他身边的一小群侍卫花了很大力气才保护住自己的领袖。

安东尼前来营救他。他带来了一群队形齐整的士兵，沿着圣道[23]赶来。起初一群人堵住了他的路，但没有做出任何敌对的举动，因为大家觉得安东尼对塞克斯图斯较为友好。但安东尼命令士兵强行开道，群众做出了愤怒的回应，用石头攻击士兵，将他们逐退。士兵们重新集结，并得到增援。然后他们从两个方向冲进广场，砍倒那些挡路的人。安东尼的部下杀出一条路来营救恺撒，将他带了出来。但一连几个钟头，群众控制着城市中心，后来才慢慢散去。[24]

安东尼和恺撒去找塞克斯图斯的母亲和其他人，并通过这些关系，在春季开始谈判。双方互不信任，所以第一次谈判是在那不勒斯湾海岸附近的巴亚举行的。在海上搭建了两个木制平台，双方领导人及其幕僚分别站在两个平台上。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当年夏季又在附近的米西努姆角继续商谈，这一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塞克斯图斯将获得指挥军队的合法权力。他被元老院接纳为成员，并获得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他已经实际控制了这些地区）以及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作为他的行省。安东尼已经拥有观鸟占卜师的身份，于是亲自监督了塞克斯图斯被这个祭司团接纳的仪式。伟大的庞培的儿子将在前33年的选举（由三头同盟控制）中当选为执政官。

《米西努姆条约》结束了意大利被封锁的局面，但塞克斯图斯得到的利益有限，因为实际上条约仅仅是认可了现状。他坚持要求三头同盟赦免所有被镇压的人和其他被迫流亡的人，并允许这些人返回意大利并收回他们被没收的财产的四分之一。只有谋杀尤利乌斯·恺撒的仍然在世的凶手和其他一小群人被排除在此次大赦之外。很可能是逃到西西里岛的许多贵族向塞克斯图斯施压，敦促他与三头同盟议

和，以便让他们回家。有意思的是，恺撒的内兄斯科利博尼乌斯被内定为前34年的执政官。

塞克斯图斯要想返回罗马，就必须放弃自己对海军及其基地的指挥权，他当然不愿意这么做，就像恺撒和安东尼不会愿意解散自己的军队一样。只有通过武力，这些军阀才能维持自己的重要地位和长期的安全。安东尼在一次拍卖会上买下了伟大的庞培的宅邸和地产，其中最重要的是帕拉丁山坡上时髦的卡里奈区^[25]的豪宅。“卡里奈”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船的龙骨，塞克斯图斯在自己的旗舰上宴请恺撒和安东尼时开玩笑说，如今他唯一的家就是他的舰队的龙骨。在这次宴会上（之前，安东尼和恺撒在岸上款待了塞克斯图斯），据说塞克斯图斯麾下的一名海军将领声称，他只要切断缆绳，把客人干掉，就能让他的统帅成为世界的主宰。塞克斯图斯不愿意干这样背信弃义的事情。他后来懊恼地说，如果这名将领没有征询他的意见，而是自作主张地行动就好了。^[26]

情人们

在被镇压的人得以回国之后，塞克斯图斯留在了西西里岛，我们不能确定他有没有正式控制伯罗奔尼撒半岛。安东尼和屋大维娅去了东方，在雅典度过了前39～前38年的冬天。安东尼热情洋溢地融入了希腊城市的生活。雅典人将这对夫妻称为“乐善好施的神祇”，将安东尼称为“新的狄俄倪索斯神”，并举办了一场仪式性的婚礼，让他与雅典城的保护女神雅典娜“结婚”。虽然得到了这样的荣耀，他还是向雅典人征收了一笔新税，作为“嫁妆”。不过，若不是雅典人民如此热情地欢迎安东尼夫妇，他向他们索要的税额还会更多。春天到来之后，安东尼正式脱去了希腊风格的便服，又一次换上了罗马统帅的服饰。他麾下的将领温提迪乌斯已经将帕提亚入侵者从罗马各行省

逐出。在随后的几年里，安东尼的宏大使命将是狠狠惩罚帕提亚人，并最终为克拉苏报仇雪恨。^[27]

恺撒留在意大利，开始建造船只的工程，以便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他建立海军的唯一目的是镇压塞克斯图斯，但目前脆弱的和平还在维持。粮食供应又一次充足如前，流亡者也得以回国，因此罗马城的民众普遍来讲还是很高兴的。提比略·克劳狄·尼禄就是这样一位流亡者，他曾担任前42年的裁判官，但在那一年结束时非常任性地拒绝离职。他是个朝三暮四的人，在内战中曾支持尤利乌斯·恺撒，前44年3月15日^[28]后又积极地歌颂谋杀他的凶手。佩鲁西亚战争期间，他和卢基乌斯·安东尼为伍，并开始招募那些因为当局安置退伍军人而被剥夺土地的人。此次叛乱失败后，他遭到镇压，和其他很多人一样逃往西西里岛，但似乎觉得塞克斯图斯·庞培对他的接待不是很慷慨，于是又逃往希腊。他似乎麻烦不断，有一次不得不逃离斯巴达，但一行人被困在一场森林火灾中，后来好不容易才逃出来。^[29]

克劳狄·尼禄的妻子在方方面面都比她丈夫更值得注意。她的名字是李维娅，不过人们更熟悉她的绰号德鲁茜拉。她也有克劳狄氏族的血脉，来自这个贵族氏族的另一个显赫得多的支系。她的父亲被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最古老、最富贵的平民豪门之一的后代）收养，于是身世愈发显贵。李维乌斯·德鲁苏斯于前91年担任平民保民官，捍卫罗马的意大利盟邦的权利。后来他被谋杀，不久之后意大利盟邦就发动了叛乱，即“同盟者战争”。为了控制危机，共和国不得不向这些同盟者授予罗马公民权。很多人回想起李维乌斯·德鲁苏斯，对他还很爱戴。李维娅的父亲被后三头同盟宣告为公敌，于是与“解放者”并肩作战，在腓立比战役之后自杀。此时他的女儿已经结婚了，并在前42年11月为丈夫生了个儿子，给孩子取名为提比略·克劳狄·尼禄^[30]。^[31]

李维娅的丈夫起兵造反，她（此时大约十七岁）便来到他身边。她伴随丈夫经历了佩鲁西亚战争和流亡，躲过了追兵，风餐露宿。据说有两次，婴儿提比略的哭声险些让他们暴露。逃离斯巴达的时候，李维娅的头发和衣裙被烧着了。他们回到罗马之后，经济拮据。虽然《米西努姆条约》承诺允许他们收回被没收财产的四分之一，但和很多流亡者一样，他们实际上很难真正收回这么多。他们设法将提比略过继给一位热切希望与一个古老的贵族氏族拉上关系的富裕元老。在政治上，这个决定可能不是非常明智。没过多久，这位元老的兄弟就被怀疑阴谋反对恺撒。此人随即被逮捕，后来莫名其妙地死掉了。[\[32\]](#)。

李维娅的身份非常高贵，无论是从血缘还是收养的关系来看，都是豪门贵族。而且她正值青春年少，非常美丽。她的头脑特别机敏（许多年后，她的曾孙卡利古拉称她为“穿裙子的尤利西斯”），这种聪明和机智无疑增强了她天生美貌的吸引力。前38年1月，她为丈夫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所以她在返回罗马时一定已经怀孕几个月了。即便如此，她还是吸引了恺撒的目光，这甚至可能发生在他的二十四岁生日宴会上（可能在生日当天举行，也可能在生日前几天，以庆祝他大仇得报、剃掉胡须）。[\[33\]](#)。

恺撒自愿禁欲的年代早已经过去了。斯克利博尼娅怀孕了，在前39年年末生下了一个女儿（当然叫作尤利娅），但恺撒与她的婚姻在政治上已经不再非常有利，夫妻间似乎根本就不亲密。恺撒积极地追逐着其他女人。安东尼目前对恺撒的这些风流事还是很宽容的。后来恺撒的朋友们为他的风流辩解道，他之所以引诱元老们的妻子，是为了搞清楚她们的丈夫在想什么、做什么。安东尼后来散播了一个故事：在宴会上，恺撒将一位前任执政官的妻子当着她丈夫的面拖进卧室，她回到宴会厅时头发乱蓬蓬，脸红到耳朵根。李维娅·德鲁茜拉

尽管大着肚子，还是很快成为恺撒最新的一位情人，但这不仅仅是逢场作戏或为了刺探政治情报。[\[34\]](#)

恺撒爱上了她的美貌和聪明，而李维娅可能也热情地投桃报李。她不大可能对自己丈夫到目前为止的政治生涯或前景感到满意。世人皆知，权力就是一种春药，年轻的恺撒令人瞠目结舌的晋升之路给了他极大的权力，让他踌躇满志、高度自信。她的贵族背景和人脉在政治上很有价值，但这都是长期的优势，在短期内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所以很难从这个角度来解释随后发生的怪诞丑闻。只有从以下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恺撒惯于称心遂愿，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这对情人铁了心要立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恺撒还只有二十四岁，而李维娅还不到二十岁。或许她害怕夜长梦多，情夫会朝三暮四。[\[35\]](#)

斯克利博尼娅刚生下女儿尤利娅，恺撒就把她休了。基本上，一位罗马丈夫只需要对妻子说“你的财产还归你！”，就算离婚了。恺撒的离婚理由包括一条，他“再也不能忍受她的怨妇性格”。我们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恺撒在无端侮辱她。克劳狄·尼禄非常给恺撒面子，乖乖地与李维娅离了婚。前39年10月初，恺撒和李维娅订婚了。此事还需要向恺撒所在的大祭司团申请裁决。官方正式确认，李维娅身怀六甲，孩子的父亲是克劳狄·尼禄，这就明确了孩子的血缘关系。但这也不能阻止流言蜚语，有人说孩子是恺撒的，于是开玩笑道，一对夫妇仅仅三个月就生下了孩子，是多么幸运；但这个孩子肯定是克劳狄·尼禄和李维娅在希腊时怀上的，所以孩子不可能是恺撒的。目前李维娅以未婚妻的身份搬到了恺撒家。前38年1月14日，她在恺撒家中生下了一个男婴，取名为德鲁苏斯·克劳狄·尼禄。男婴被送到生身父亲身边，由父亲抚养长大。[\[36\]](#)

1月17日，也就是李维娅分娩仅仅三天之后，恺撒便和她结婚了。新娘的父亲已经去世，而她似乎没有多少亲近的男性亲属，只好让她的前夫在婚礼上陪伴她。婚礼仪式非常盛大，随后的宴会主题是奥林匹斯诸神，有六名男子和六名女子打扮成希腊诸神的模样，参加宴会。恺撒打扮成阿波罗。饮食极尽奢靡，这对年轻夫妇纵情享受自己的财富与权力。根据当时的风尚，贵族女性身边要有衣着非常“清凉”的奴隶男孩（这一次可能打扮成丘比特的样子）侍奉，小声地向她们发表尖刻的评论，对她们周围的人评头论足。这些幽默评论非常尖酸、做作，往往十分粗俗，老于世故的人会喜欢这种笑话。在宴会上，据说有个男孩指着斜躺在餐桌另一端的克劳狄·尼禄，对李维娅说：“夫人，您的丈夫在那边，您为什么在这边？”

多年后，有人批评恺撒抢走了另一个男人的妻子，这种事情只有暴君才做得出来。这些批评家为了在政治上攻击恺撒而夸大其词，因为克劳狄·尼禄其实是顺从恺撒意志的，不过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李维娅极有可能是个热情积极的参与者，她同意，甚至主动提出要与恺撒迅速结婚。当时罗马又开始缺少粮食，所以这次被称为

“十二神祇盛宴”的奢华婚宴遭到了群众的普遍怨恨。人们说恺撒的确是阿波罗，不过是折磨人类的阿波罗，这是阿波罗比较令人讨厌的一个身份。当时有一句流传很广的顺口溜：“恺撒假扮阿波罗，在诸神新颖的骄奢淫逸之间狂妄；所有神祇都把脸扭开，不去看人间；连朱庇特都逃离自己的黄金宝座。”^[37]

凯旋将军

罗马又一次出现粮食匮乏，原因是三头同盟与塞克斯图斯·庞培之间发生了新的摩擦。意大利遭到了一些海盗的袭击，恺撒声称，被俘的海盗在刑讯之下供认他们是塞克斯图斯派来的。不管这是不是真的（庞培可能确实没有办法控制他麾下所有人），恺撒都相信自己已

经准备就绪，可以打赢一场海战。庞培信赖的海军将领之一，一个叫作梅纳斯的释奴，倒戈到恺撒这边，带来了一些船只，这使得恺撒得以控制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在这些年的内战里，各方都非常重视数量，或者投入比对方更多的军团。罗马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去解决某个问题，就必然会取得成功。罗马的绝大多数军事统帅，包括尤利乌斯·恺撒，都还没有完全转变自己的思维，都还认为海战与陆战在根本上是差不多的。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也是如此。恺撒于前38年入侵西西里岛的计划从方方面面表明，他非常志得意满，完全没有尊重大海的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力量。[\[38\]](#).

在意大利西海岸，从墨西拿海峡一直到那不勒斯湾，都没有天然良港。再加上塞克斯图斯的部下能够从其基地（在各个岛屿上）出发，随意打击航程之内的任何港口，所以恺撒的准备工作必须在距离目标相当远的地方进行。根据计划，恺撒的两支舰队将在海上会合，然后互相协同，攻击西西里岛，但后来没有按照这个计划行事，两支舰队各自为战。这些船只都是新建的，水手缺乏经验，指挥官同样是生手，只有梅纳斯一个人比较有经验。塞克斯图斯的舰队经验丰富，在与恺撒的一支舰队的交锋中占了上风，并将另一支恺撒舰队击溃。恶劣天气把残余的恺撒舰队也收拾掉了。此时刮起了特别凶悍的暴风，这对意大利西海岸原本就不可捉摸的大海而言也算是非常严重的了。梅纳斯的船员知道如何应付，但其他大多数船长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的船只被风浪吹到岸边，撞得粉碎。次日，恺撒的船只剩下一小半，此次战役以惨败告终。罗马发生了暴乱，恺撒派梅塞纳斯去稳定那里的形势，但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39\]](#).

塞克斯图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因为恶劣天气来得正是时候。后来他穿上一件海蓝色的斗篷，自称尼普顿[\[40\]](#)之子。据说恺撒在战前曾吹嘘自己即便没有尼普顿佑助也能打赢，并命令在罗马下

一次的竞技会游行中不要展示海神的塑像。大多数罗马人认为，缺少粮食，以及这样一场没有必要、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战争都是三头同盟的错，不应该责怪海神。人们知道恺撒痴迷于掷骰子和赌博游戏，有些诙谐滑稽的人便编出了这样的顺口溜来描述当时的情况：“他在海战中两次失败，丢掉了自己的舰队，于是开始玩骰子，希望能赢一回！”^[41]

恺撒曾请求安东尼在这一年初夏时到布隆迪西乌姆会谈，但恺撒自己却没有如约出现。安东尼等得不耐烦，便乘船返回了东方。在夏季的惨败之后，恺撒派梅塞纳斯去见安东尼，最终安排了一场新的会议。会议于前37年在塔兰托如期举行。安东尼带来了300艘战船，将其中120艘借给了自己的小舅子，这是新交易的一部分。恺撒则承诺借兵给安东尼，让他去远征帕提亚。据信，屋大维娅帮助促成了此次协议，说服自己的丈夫多给了10艘小船，而她的弟弟则为安东尼提供了1000名精锐的禁卫军士兵。三头同盟以更正式的方式再续盟约，因为前43年的法律赋予他们的五年任期已经结束了。这种政体上的虚幌子的细节究竟是什么，现代学者对其知之甚少，在当时可能也比较含糊，因为罗马史上不曾有过如此广泛权力的先例。安东尼与富尔维娅的儿子安提勒斯（此时十岁）同恺撒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尤利娅订了婚，以便敲定协议。这种婚约现在几乎已经是例行公事了。^[42]

三头同盟计划对塞克斯图斯开展一场新的战争，整个前37年和前36年的上半年全部用来准备打仗。负责指挥的是阿格里帕，恺撒的老友和同龄人，前44年时曾与恺撒一同待在阿波罗尼亚，后来似乎一直为恺撒效力，并不断得到升迁。他没有参加讨伐塞克斯图斯的第一次战争，因为当时他在高卢，镇压了阿基坦尼亚的一次叛乱，并效仿尤利乌斯·恺撒在莱茵河上架桥，率军征讨日耳曼部落。终其一生，无论是作为将军、工程师还是行政官员，阿格里帕都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艺和精明强干。他对恺撒忠心耿耿，并且非常小心谨慎地保持谦逊。

他凭借上述军事胜利，得到了一次凯旋式的荣誉，但他为了避免突出自己上级的失败，决定不举行凯旋式，而是集中精力去打造一支新的、更强大的舰队。在那不勒斯湾沿海的库迈背后，他挖掘了一条运河，通过一个较小的湖泊将阿维尔努斯湖与大海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港口和安全的基地，用来训练水手。

成群的桨手开始在岸上练习，坐在一层一层特制的长凳上，以模拟船舱内的场景。其中很多桨手都是曾经的奴隶，用参军换取自由。奴隶是很少被军队征募的，这是其中一个罕见的例子。好莱坞电影里，桨帆船的桨手都是奴隶，被铁链锁在船上。这是虚构的神话，因为罗马战船的船员都是自由人，是领军饷的水手和桨手。战船的船体尺寸很大，非常坚固，甲板被遮蔽起来，以保护桨手，很多战船配有一种新型的可折叠的塔楼，可以从塔楼上向敌船射箭或使用投射武器。还有一种秘密武器叫作“哈尔帕克斯”，这是一个尾端系着绳子的钩子，用弩炮射出去，深深嵌入敌船，将其咬死，然后将敌船控制住，以便己方士兵登上敌船。^[43]

塞克斯图斯也没有闲着。双方各自集结了300多艘战船，每一位军阀都希望压倒对手。他们遇到的有些问题和前38年是一样的，因为恺撒的舰队分散在多个地点，不得不各自准备。7月初战役开始时，恺撒的三支舰队向西西里岛发动进攻，但很难协调配合。这一次尼普顿似乎仍然对恺撒不爽。由于天气恶劣，阿格里帕损失了一些船只。在第一次尝试时，只有从北非出发的李必达在西西里岛成功登陆，但此后一些增援部队乘坐的船只都被敌军拦截和消灭了。

阿格里帕在米莱角外海打赢了一场战役。他的战船尺寸很大，防护很强，而敌军的战船虽然机动性强但比较小，很难击伤他的战船。不久之后，恺撒在陶罗梅尼乌姆（今天的陶尔米纳^[44]）被塞克斯图斯击败，损失了大部分船只，不得不逃到岸上。有一段时间，他身边

只有一名卫兵。在遇到友军时，他已经精疲力竭。但在随后的日子里，越来越多的士兵在西西里岛登陆，最后兵力达到约21个军团，此外还有一些辅助部队。庞培军队对其中一些部队进行了严重侵扰，但缺乏兵力和决心去歼灭其中任何一支。战局对庞培越来越不利，他的基地遭到攻打，被逐个占领。他别无选择，只能打一场大海战。

9月3日，在瑙洛库斯^[45]外海，决战开始了。交战的时间和地点甚至有可能是双方事先约定的。阿格里帕在自己的旗舰上指挥，而恺撒在岸上观战。据说恺撒因为疲劳而睡着了，他的部下不得不将他唤醒，好让他发布进攻的命令。后来安东尼讥讽恺撒胆战心惊、呆若木鸡，甚至不敢看敌人，更不要说与其交战了。事实证明，恺撒不在现场也没什么要紧。阿格里帕的海战指挥技能在不断提高，他的战船尺寸比敌船大，船员也在近期获得了自信和经验，所以他的舰队击溃了敌军，将大部分逃窜的庞培派战船都摧毁了。恺撒向阿格里帕授予了一面特别的蓝色方旗，以及一项新设立的荣誉：海战金冠。它是一顶形状像战船船首的金冠。^[46]

恺撒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但与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战争是他一生中最严酷的考验之一。对恺撒来说幸运的是，庞培始终缺少陆军部队以致不能将战火燃烧到意大利，因为他一直未能占领人口稠密的地区，以便组建更多军团。恺撒在这场冲突中冒了很大风险，在战局不利的时候损失惨重。有意思的是，有好几个故事留存至今，讲到他本人逃脱险境，以及在千钧一发之际逃得性命。这些故事的风格与那些讲述“公敌宣告”受害者逃亡的故事很相似，它们显然激发了罗马人的想象力。恺撒的这些故事可能都源于他自己的回忆录，风格和尤利乌斯·恺撒平心静气的《战记》很不一样，后者很少讲到自己的事迹。二者文体不同，但更重要的是，尤利乌斯·恺撒是在非常谦逊地讲述自己的胜利。他的继承人自己蒙受了失败，胜利是由其下属赢得的，所以不得不描绘自己个人的英勇行为，来给自己贴金。到前36

年，恺撒已经非常精明地承认，他需要依赖阿格里帕这样的人才去真正作战，但他很擅长将主要的功劳包揽到自己身上，并用尽可能激动人心的笔触来描写自己在战斗中发挥的作用。

[1]. Virgil, *Eclogues* 1.67-72 (Loeb translation, slightly modified).

[2]. 萨图恩 (Saturn) 是古罗马的重要神祇，历史悠久，极其复杂。他是卡比托利欧山的第一位神，是主持万物生长和死亡、丰饶、财富、农业、周期性复苏、解放和时间的神。他的统治被认为是和平繁荣的黄金时代。罗马广场上的农神庙就是供奉他的。罗马最重要的节日农神节 (Saturnalia) 也是纪念他的。土星 (Saturn) 和星期六 (Saturday) 得名自他。罗马人认为他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克洛诺斯 (宙斯的父亲)。

[3]. 露吉娜是古罗马主持生育和分娩的女神。

[4]. Virgil, *Eclogues* 4.4-12 (Loeb translation, slightly modified).

[5]. Martial, *Epigrams* 11.20.3-8, 评论见K.Scott,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44-30 BC',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1 (1933), pp.7-49, 尤见24-6。

[6]. Appian, *BC* 5.7, Dio 49.32.3讲到格拉菲拉，马尼乌斯见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208-9, and Appian, *BC* 5.19。

[7]. Appian, *BC* 5.13, 5.15-17讲到士兵两次反对恺撒的哗变，第二次是由于百夫长Nonius被谋杀，见Dio 48.8.1-10.1; Suetonius, *Augustus* 104.12-106.2讲到他对自己的命运极度自信。

[8]. Suetonius, *Augustus* 62.1, Dio 48.5.3讲到克劳狄娅。卡雷努斯见Dio 48.20.3, Appian, *BC* 5.51, 54, 59-61。

[9]. Appian, *BC* 5.55, Velleius Paterculus 2.76.

[10]. 安东尼的母亲尤利娅，见Appian, *BC* 5.52; 拉比埃努斯的父亲，见R.Syme, 'The Allegiance of Labienus,' *JRS* 28 (1938), pp.113-25,

及W.Tyrell, ‘Labienus’ departure from Caesar in January 49 BC’, *Historia* 21 (1972), pp.424-40; 关于小拉比埃努斯, 见Dio 48.24.4-25.1; 关于帕提亚人的入侵, 见Dio 48.26.5, with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p.223, 对战役及其背景的讨论, 见D.Kennedy, ‘Parthia and Rome: eastern perspectives’, in D.Kennedy (ed.), *The Roman Army in the East.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ements* 18 (1996), pp.67-90, 尤见77-81, 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185, 225-8。

[11] Dio 48.12.1-5, Appian, *BC* 5.20-24.

[12] 今天阿尔巴尼亚西北部的斯库台。

[13] Appian, *BC* 5.56-66, Dio 48.28.1-30.2, with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129, 216-17, 242, 253-5, 及Pelling in *CAH2* X, pp.17-20; 梅塞纳斯, 见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129, 341-2, 359。

[14] 关于富尔维娅, 我们的史料中有些疑问, 见D.Delia, ‘Fulvia Reconsidered’, in S.Pomperoy (ed.), *Women’s History and Ancient History* (1991), pp.197-217, 她的死亡, 见Plutarch, *Antony* 30, Appian, *BC* 5.59, Dio 48.28.3-4; 安东尼与屋大维娅的婚姻, 见Plutarch, *Antony* 31, Appian, *BC* 5.64, Dio 48.28.3-31.3, Velleius Paterculus 2.78.1, with 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188-201,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217-20, E.Huzar, ‘Mark Antony: Marriages vs. careers’, *The Classical Journal* 81 (1985| 6), pp.97-111, 尤见103-11。

[15] Plutarch, *Antony* 57, 概况见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193-200 在这些年的背景下精彩地讨论了维吉尔的《第四牧歌》。关于这孩子的身份还有别的意见, 有人说他是波利奥的儿子。在基督教时代, 这种弥赛亚般的语调和前1世纪的成文年代有时被阐释为指的是耶稣。

[16] Appian, *BC* 5.53, Suetonius, *Augustus* 52.2, Dio 48.16.3,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213.

[17] 见G.Rickman, *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 (1980), pp.60-61, P.Garnsey,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Responses to Risk and Crisis* (1988), pp.202, 206-8。

[18] 得名自颁布此法律的昆图斯·佩蒂乌斯，他是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的外甥。

[19] 格奈乌斯·庞培（约前75～前45年），伟大的庞培的儿子，塞克斯图斯·庞培的哥哥。父亲死后，他坚持抵抗尤利乌斯·恺撒，在蒙达战役中战败被杀。卡西乌斯曾说，格奈乌斯·庞培是“一个残忍的新主人。你知道格奈乌斯多么蠢；你知道，他误以为残忍就是勇气，他还以为我们老是嘲讽他。我担心他会像个农夫一样，用剑来报偿我们说的笑话”。

[20] 见K.Welch, ‘Sextus Pompeius and the *Res Publica* in 42-39 BC’, in A.Powell& K.Welch (eds), *Sextus Pompeius* (2002), pp.31-63; 卡西乌斯对格奈乌斯·庞培的评价，见Cicero, *ad Fam.*15.19.4。

[21] A.Powell, ‘An island amid the flame’: The Strategy and Imagery of Sextus Pompeius, 43-36 BC’, in A.Powell& K.Welch (eds), *Sextus Pompeius* (2002), pp.103-33. esp.105-9, 118-29, and A.Powell, *Virgil the Partisan: A Study in the Re-integration of Classics* (2008), pp.31-83; 关于卢基乌斯·安东尼，见Dio 48.5.4。

[22] Appian, *BC* 4.25, 36, 85, 5.143, Dio 47.12.1-13.1, Velleius Paterculus 2.72.5, 77.2, with K.Welch, ‘Sextus Pompeius and the *Res Publica* in 42-39 BC’, in A.Powell& K.Welch (eds), *Sextus Pompeius* (2002), pp.45-6; 恺撒正式理发剃须，见Dio 48.34.3, 评论见M.Flory, ‘*Abducta Neroni Uxor*: The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on the marriage of Octavian and Liv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8 (1988), pp.343-59, 尤见344。

[23] 圣道 (Via Sacra) 是古罗马的主街道，从卡比托利欧山山顶，经过罗马广场的一些最重要的宗教遗迹（这里是最宽的一段），到达斗兽场。这条路是传统的凯旋式路线，开始于罗马郊区，经过罗马广场。

[24] Appian, *BC* 5.67-8, Dio 48.31.1-6.

[25] 卡里奈区应当在埃斯奎里努斯山上，不是在帕拉丁山。

[26] Appian, *BC* 5.69-74, Dio 48.36.1-38.3, Velleius Paterculus 2.77, Plutarch, *Antony* 32, with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221-2,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205-7, 与 A. Powell, *Virgil the Partisan: A Study in the Re-integration of Classics* (2008), pp.190-91; 尤其 K. Welch, 'Sextus Pompeius and the *Res Publica* in 42-39 BC', in A. Powell & K. Welch (eds), *Sextus Pompeius* (2002), pp.51-4 暗示, 这些流亡者可能迫使塞克斯图斯接受了条约。

[27] Plutarch, *Antony* 33, Appian, *BC* 5.76, Dio 48.39.2, Seneca, *Suasoriae* 1.6, with M. Grant, *Cleopatra* (1972), pp.129-30; 温提迪乌斯的军事行动, 概况见 A. 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p.286-8, 援引了古代史料。

[28] 尤利乌斯·恺撒在这一天遇刺身亡。

[29] 见 Dio 54.7.2, Suetonius, *Tiberius* 6.2-3, with A. 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10-11, 16-18.

[30] 后来的提比略皇帝。

[31] A. 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3-10, 15-16; 她父亲的死, 见 Dio 48.44.1, Velleius Paterculus 2.71.2。

[32] Suetonius, *Tiberius* 6.1-3, *Augustus* 27.4.

[33] *Ulixes stolatus*, Suetonius *Caius* 23; 概况见 M. Flory, 'Abducta Neroni Uxor: The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on the marriage of Octavian and Liv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8 (1988), 和 A. 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11-14.

[34] Suetonius, *Augustus* 53.1, 69.1-2, 后一种指控可能源自安东尼在罗马看到的事情; 另见 M. Flory, 'Abducta Neroni Uxor: The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on the marriage of Octavian and Liv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8 (1988), pp.352-3 和 A. 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24-5 讨论了从宴会桌上抢走有夫之妇的故事可能指的是李维娅，不过克劳狄·尼禄只是前任裁判官，不是前任执政官。

[35] M.Flory, 'Abducta Neroni Uxor: The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on the marriage of Octavian and Liv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8 (1988), pp.345-6称：“他希望在李维娅的儿子出生之前与她结婚，说明他在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之前，能够从这门婚姻中得利。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他为什么明知自己匆匆与孕妇结婚会造成丑闻，还是这么做了。”但没有人能说明，他匆匆结婚究竟能得到什么政治利益。这种理论可能是由于Flory将恺撒视为精明算计、冷静沉着的政治阴谋家。如果把他匆匆结婚的行为视为早熟青年的轻率，倒是更有说服力。

[36] A.Barrett, *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11-26, M.Flory, 'Abducta Neroni Uxor: The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on the marriage of Octavian and Liv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8 (1988), p.348; 关于离婚，概况见S.Treggiari, *Roman Marriage* (1991), pp.435-82及'Divorce Roman Style: How easy and frequent was it?' in B.Rawson (ed.), *Marriage, Divorce and Children in Ancient Rome* (1991), pp.131-46; 恺撒对克利博尼娅的评价，见Suetonius, *Augustus* 62.2; Suetonius, *Claudius* 1讲到，德鲁苏斯出生于恺撒和李维娅结婚三个月后，但这指的肯定是订婚，而不是实际的婚礼。

[37] Suetonius, *Augustus* 70.1-2 (Loeb translation); 婚宴，概况见Suetonius, *Augustus* 70.1, Dio 48.43.4-44.5, with A.Barrett, *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24-7, 他认为十二主神的宴会与订婚，而不是婚礼有关联; M.Flory, 'Abducta Neroni Uxor: The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on the marriage of Octavian and Liv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8 (1988) 更有说服力地论断这是婚礼宴会; 奴隶男孩，见Dio 48.44.3, 概况见W.Slater, 'Pueri, Turba Minuta', in *BICS* 21 (1974), pp.133-40。

[38] Dio 48.45.5-46.1, 及Appian, *BC* 5.78-80, 他将梅纳斯称为Menodorus。

[39] 此次战役，见Appian, *BC* 5.81-92, Dio 48.46.1-48.4, with J.Morrison& J.Coates, *Greek and Roman Oared Warships* (1996),

pp.149-52, M.Pitassi, *The Navies of Rome* (2009), pp.186-91, W.Rogers, *Greek and Roman Naval Warfare* (1937), pp.496-516, 及 R.Paget, 'The Naval Battle of Cumae in 38 BC', *Latomus* 29 (1970), pp.363-9。

[40] 尼普顿是罗马神话中的海神，大致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

[41] Suetonius, *Augustus* 16.2讲到尼普顿，70.2包含这诗句，另见 Appian, *BC* 5.100, Dio 48.48.6-49.1, with A.Powell, "An island amid the flame": The Strategy and Imagery of Sextus Pompeius, 43-36 BC', in A.Powell& K.Welch (eds), *Sextus Pompeius* (2002), pp.120-26, 及 (2008), pp.97-8。

[42] 屋大维在前38年未能与安东尼相见，见Appian, *BC* 4.78-80, 前37年的会议，见Appian, *BC* 5.93-5, Plutarch, *Antony* 35, with Pelling in *CAH2* X, pp.24-7, 及P.Brunt,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1971), p.502讲到屋大维承诺给安东尼的士兵数量；关于三头同盟第一个五年任期的结束，见F.Millar, 'Triumvirate and Principate', *JRS* 63 (1973), pp.50-67, 尤见.51, 53, 及Pelling in *CAH2* X, pp.67-8。

[43] 阿格里帕在高卢，见Dio 48.49.2-3, Appian, *BC* 5.92 讨论见 J.M.Roddaz, *Marcus Agrippa* (1984), pp.70-72, 及Pelling in *CAH2* X, p.25,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231。

[44] 西西里岛东部城镇。

[45] 西西里岛北部城镇。

[46] Appian, *BC* 5.96-122, Dio 49.1.1-16.2, Suetonius, *Augustus* 16.1-3, Velleius Paterculus 2.79.1-6, Livy, *Pers.*128-9; 也见 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298-303, J.Morrison& J.Coates, *Greek and Roman Oared Warships* (1996), pp.154-7, M.Pitassi, *The Navies of Rome* (2009), pp.187-91, J.M.Roddaz, *Marcus Agrippa* (1984), pp.87-138, M.Reinhold, *Marcus Agrippa: A Biography* (1933), p.29讲到阿格里帕前37年被授予指挥权时还缺乏海战经验；阿格里帕的港口，见R.Paget, 'The ancient ports of Cumae,' *JRS* 58 (1968), pp.152-69, 尤见161-9；关于

海战金冠，见V.Maxfield, *The Military Decorations of the Roman Army* (1981) , pp.74-6。

十 竞争对手

无论是在海洋还是在陆地，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我都在全世界南征北战。胜利的时候，我总是饶恕那些恳求宽恕的人。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1\]](#).

最后，他打破了与马克·安东尼的联盟，这联盟历来是可疑和不确定的，并且通过许多和解来艰难地维持。为了更好地揭露自己的竞争对手已经堕落，已经丧失了一位罗马公民的体面，他下令打开并公布安东尼留在罗马的遗嘱。这份遗嘱指定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孩子为安东尼的继承人。

——苏埃托尼乌斯，2世纪初[\[2\]](#).

恺撒很快得到了一个新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个人勇气，不过这一次让一位盟友吃了亏。占领西西里岛之后，李必达多年以来第一次获取了一个重要地位。在腓立比战役之后，三头同盟中最年长的那一位遭到排挤，当然心有怨言，他现在期望恢复一些曾经的权力。李必达绕过了恺撒在岛上的将领，安排让一支最强大的庞培派军队向他投降并接受他指挥，此举将自己的军队扩充到超过20个军团。尽管其中很多军团的兵力远远少于理论数字，但这个总数也算非常惊人了。为了赢得这些新投诚的前庞培派士兵的支持，他允许他们与自己的士兵一起洗劫墨西拿。他自己的士兵可能不是很愿意和不久前还是敌人的士兵一起分享战利品，但还是服从了命令。现在李必达感到自己很强大，决心将西西里岛纳入自己的阿非利加行省，并继续控制得到扩充后的军队。他在努力夺取西西里岛控制权的时候，与恺撒及其在当地的指挥官发生了一些愤怒的争吵。他将自己的军队调离恺撒的军队，单独扎营。在这些年里，军队是终极的权力基础，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一个拥有强大而忠诚军队的人。但忠诚往往是可以商谈、可以交易

的。恺撒的部下很快开始在李必达的士兵当中活动，就像前43年在布隆迪西乌姆拉拢第四军团和玛尔斯军团那样。

凯旋将军恺撒率领一支骑兵赶到了。他将这些骑兵留在李必达营地外，只带几名军官和卫兵，勇敢地进入营地。他这个举动有点像当年尤利乌斯·恺撒冷冰冰地直面哗变的第十军团，称呼他们为“公民们”，而不是通常的“兄弟们”，用这种手段击垮了他们的意志。但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缺乏前者的魅力，而且与他正在面对的士兵也没有旧交情。大部分士兵对他来讲都是陌生人，其中一些是前不久投诚的敌兵，不过肯定有一些军官是尤利乌斯·恺撒的旧部，这也许会有帮助。李必达及其亲信企图阻挡年轻的统帅。恺撒被推推搡搡，险些被一名士兵投掷的标枪击中，但没有受到伤害。如果李必达的军队下定决心的话，恺撒一行人肯定会遭到屠戮。

恺撒向士兵们讲话，敦促他们加入他这边。他亲自举起一尊军团鹰旗（就像他在穆蒂纳做的那样），开始走出营地，相信属于这个单位的士兵会跟随他。有些人跟了上去，其中一些是旗手，于是更多的人跟着他们走了。并不是所有士兵都瞬间投奔到恺撒那边。目前，大多数士兵还在犹豫不决。恺撒的更多士兵抵达营地外面，这可能促使营地内的很多士兵拿定了主意。更重要的是，李必达未能成功煽动士兵们的激情，让他们支持他。于是士兵们抛弃了他，起初是三三两两，最终全体都投奔了恺撒。被抛弃的指挥官卸去了自己的甲冑和军服斗篷，换上平民的托加袍，去向恺撒投降。

当年尤利乌斯·恺撒展现了宽大的胸怀，但后三头同盟公开选择了不同的路线。现在，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决定效仿自己“父亲”的仁慈，这既是务实的做法，也是值得的。李必达被剥夺了三头同盟成员的地位，失去了所有的权力。恺撒饶了他一条性命，他被送回意大利软禁起来，过上舒适的囚徒生活。恺撒究竟有没有权力这么

做，在法律上是说不清的，不过在这些年里，这并不重要。李必达很多年后才去世，一直保留着祭司长的身份。他得到了宽恕，因为他对恺撒不构成威胁。这种裁决本身就带着一些残酷，更糟糕的是，对罗马贵族来讲，承认其他人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就是莫大的耻辱。后来，恺撒有时会把李必达带到罗马，让他参加一些仪式或元老院会议。不过，恺撒对李必达的处置，与很多被镇压的政敌受到的待遇相比，还是非常仁慈的。李必达活了很久，寿终正寝。^[3]

塞克斯图斯·庞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带着残余的几艘船和一些人马，驶向东方，选择与安东尼而不是恺撒打交道。这种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他起初也受到了安东尼的欢迎，颇受鼓舞。他感到有机会逆转自己的命运，可以以更强势的地位与敌人谈判，于是开始组建一支新的军队。安东尼下属的一名将领迅速将塞克斯图斯击败，不久之后将他处决了。即便在当时，人们也不确定究竟是不是安东尼下令处死了塞克斯图斯。^[4]

安东尼仍然自称三头同盟之一，尽管此时已经只剩下两个同盟者了。他有更大的难题需要烦恼，所以伟大的庞培的儿子的命运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前36年夏季，马克·安东尼终于发动了对帕提亚的大规模进攻，旨在恢复罗马的荣耀。由于克拉苏的战败和近期东部各行省遭到帕提亚入侵，罗马损失了不少颜面，急需弥补。恺撒没有兑现一年前向同僚做出的承诺，即借兵给他。即便如此，安东尼的军队也是极其雄壮的，拥有15到18个军团，并得到了辅助部队以及附庸国统治者提供的强大盟军的支持。后来，普鲁塔克兴高采烈地声称，远至印度的统治者听闻安东尼大军出征的消息，都为之战栗。^[5]

但安东尼不是亚历山大大帝，帕提亚人也不像前4世纪的波斯人那样一触即溃。安东尼欺骗敌人的计划没有取得多少成效，却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他不耐烦地将行动迟缓的攻城器械和辎重留下，只给

它们留了少量卫兵。机动性极强的帕提亚人猛扑过来，消灭了安东尼的攻城器械和辎重部队，于是安东尼的主力部队被困在敌境深处，没有装备，粮草不足，而且冬天快到了。他的亚美尼亚盟军背信弃义，让局势更加恶化，但全部责任都在安东尼一个人身上。罗马人别无选择，只能撤退，在漫长的四个星期里持续遭到帕提亚人的无情追击和袭扰。安东尼表现出了极大的个人勇气，他的士兵也非常英勇，但在一个夜晚，罗马士兵们突然陷入恐慌。安东尼绝望了，想到了自杀。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他才没有自杀。事实上，敌军不久之后就放弃了追击，罗马军队最终撤到了安全地带。此次远征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军团士兵未能回国，随军人员和盟军的损失更重，骑兵战马和役畜的损失比率难免是最高的。幸存者在经历这番折磨之后，身体状况肯定不佳，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对安东尼来说幸运的是，帕提亚人并不打算发动一场反攻。他自己在很多年里都不会再有足够的力量发动新的远征，说不定永远也不会有这个能力了。

若能在帕提亚取得一场辉煌胜利，安东尼将赢得超过在世或史上任何罗马领导人的军事荣耀，并获得大量战利品，使得他的财富超过恺撒或其他任何竞争对手。然而他一败涂地。很多现代学者低估了此次惨败的重要意义，反而觉得安东尼没有全军覆灭、丢掉性命，已经很了不起了。今天的我们当然知道，罗马人始终未能征服帕提亚人，也没有征服他们的波斯继承者，但当时的罗马人自己不知道这一点，也不会怀疑自己的最终胜利。对共和国最大的贡献就是击败外国敌人。安东尼将自己打扮为一位伟大的军人、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有时将自己描绘为狄俄倪索斯（他在东方既是酒神，也是胜利之神）。他很可能对自己的宣传信以为真了。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他的军事经验是有限的，高级指挥的经验更少，而他经历过的大多数战役都是内战。我们不应当对安东尼远征帕提亚的失败感到非常惊讶。对他自己而言，这次失败出乎意料，对他个人和他的政治前途更是一次毁灭性打击。^[6]

光荣与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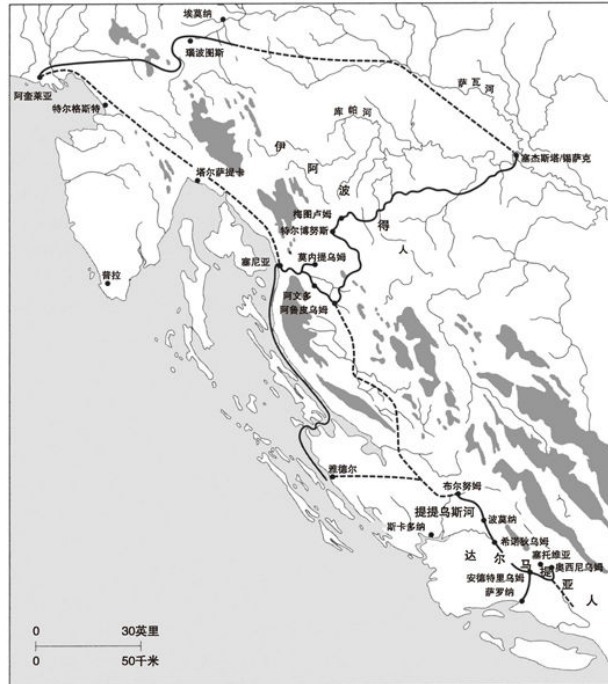
“凯旋将军恺撒”这种非常规的名号宣扬了他是一位成功的军事统帅，他还用宣传来不断强化这种形象。到此时，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军事才干有限，并愿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阿格里帕这样有才华的下属。前36年年末，击败塞克斯图斯的胜利是毫不含糊的，与东方传来的稀里糊涂的报告形成了对比。安东尼非常努力地将自己的失败粉饰为成功，但一切都是徒劳。恺撒返回罗马，举行了一次小凯旋式以纪念在西西里岛的胜利。在过去，庆祝内战胜利是一种禁忌，不被允许，如今却成了家常便饭。不过，恺撒还是将塞克斯图斯描绘为海盗和逃亡奴隶的领导人，以便让民众觉得塞克斯图斯是活该吃败仗，这对国家是好事。恺撒曾将数千名奴隶解放，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在自己的舰队中服役。这个事实被忽略了。而战俘中的所有前奴隶都被返还给旧主人。战俘中有大约6000名前奴隶，因为短期内找不到主人，恺撒下令将他们处决，这可能是刻意地效仿前71年克拉苏将同样数量的斯巴达克斯奴隶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元老院授予恺撒一项荣誉，允许他在广场竖立一座他本人的英雄式裸体雕像，雕像被置于石柱顶端，石柱上装饰着战船的船首。这座雕像的旁边是一座类似的纪念碑，它是为了颂扬罗马第一次伟大的海战胜利，地点也是米莱，不过时间是前260年，敌人是令人生畏的迦太基海军。^[7]

将自己的胜利与历史上战胜危险的外国敌人的胜利相提并论，肯定是有好处的。更好的办法是亲自赢得新的胜利，于是在随后三年内，恺撒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讨伐伊利里库姆行省内外的各部族。尤利乌斯·恺撒生前曾计划在远征帕提亚之前在巴尔干打一场战役。在前40年代，尤利乌斯·恺撒的两位下属指挥官在该地区遭受了一些失败，损失了一些珍贵的军旗。罗马人在这些战事中的损失与在帕提亚人手下遭到的损失（帕提亚人先是从克拉苏，然后从安东尼那里夺得

了一大批战利品）相比，是很少的，但伊利里亚能够给恺撒一个机会去为之前的失败复仇，并收复象征罗马荣誉的军旗。

前35年，恺撒在巴尔干北部作战，一直打到萨瓦河畔的塞杰斯塔（今天克罗地亚境内的锡萨克），然后在那里派驻了两个半军团过冬。他可能在考虑向多瑙河和达契亚^[8]发动一次大规模远征。达契亚国王在近些年里被视为对罗马的真切威胁，而且很可能就是尤利乌斯·恺撒筹划的攻势的最终目标。即使恺撒现在开始考虑这个想法，也很快就放弃了，至少是暂时放弃了。前34年，他的军队在更南方的达尔马提亚，攻击了许多很小的部落和氏族。在这些战役结束时，恺撒在给元老院的报告中列举了不少于30个不同民族。该地区的地形非常复杂，在过去曾有不只一支罗马军队被敌人包围在高耸群山环绕的山谷中，进出山谷的通道全被敌人控制。恺撒的行动非常谨慎，在山谷两侧的山顶上都安排了侧翼掩护部队。在19世纪印度西北边境省，这种策略被称为“给高地加冕”。前1世纪罗马人这么做的目的与19世纪的英军是相同的。任何敌人若企图攻击山谷内的罗马主力部队，就会遭到两侧高处的罗马侧翼掩护部队的冲击。在该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两军对垒，但有很多突袭和伏击作战，以及攻打土著部落山顶要塞的围攻战。^[9]

记述这些战役的史料中又有很多突出表现凯旋将军恺撒个人功绩的段落，这些史料肯定都是来源于他自己的回忆录。在梅图鲁斯（这是一个小地方，即便在罗马时代也不为人熟知，现在已经无法确定具体地点）围攻战中，他起初在一座高塔上居高临下地观察主攻势。他的士兵建造了一座面向敌人城墙的坡道，但还没有到城墙那么高。坡道上有四座吊桥，可以伸到敌人城墙上，以便罗马人登上城墙。守军打得非常凶猛，先是第一座，然后是第二座，最后是第三座吊桥被推翻或者被攻击者的重量压垮，所以罗马军团士兵显然不太愿意登上最后一座吊桥。



前35～前33年，奥古斯都在伊利里库姆的军事行动

恺撒匆匆离开自己的观察塔，向士兵们呼喊，鼓舞他们前进。但没有效果，于是他决定身先士卒，从一名士兵手中夺走盾牌（尤利乌斯·恺撒在另一个危机时刻也曾这么做，这已经是一段佳话），冲上最后一座吊桥，身边只有阿格里帕和其他一些幕僚人员。军团士兵受到鼓舞，或是感到羞愧，于是潮水般跟了上去。人太多了，吊桥被压垮，落入坡道与城墙之间的深深凹陷处。有些士兵因为这次坠落而丧命，恺撒很幸运，仅仅右腿和双臂负伤。他很快回到观察塔顶端（可能得到了不少帮助），让全军都看到他还活着，还能继续指挥，将来还能继续奖赏士兵们。军团士兵们奉命建造新的吊桥，以便发动新的进攻。这种非常罗马式的执拗令敌人丧胆，于是梅图鲁斯很快投降了。^[10]

一年后，在另一座默默无闻的要塞之外的战斗中，恺撒的膝盖因被石块击中而负伤（我们不知道这石块是敌人投掷的，还是用投石器射出来的），一连几天不能行走。这些作战的规模都相对较小，但战

斗本身可能很激烈和困难。在另一次围攻战中，敌人在夜间发动突袭，罗马人的一个大队陷入恐慌，抱头鼠窜。恺撒下令对这个大队实施十一抽杀，即每十名士兵中抽签选出一人，将其活活打死，然后另外九人要接受象征性的羞辱：在战役的余下时间里，他们只能吃大麦（一般是牲畜的饲料和给奴隶吃的食物）而不是小麦。比较不寻常的是，我们还得知，此次有两名百夫长被处决。因为一个大队里顶多有六名百夫长，所以此举意味着恺撒认为这两名百夫长应当负主要责任。前36年，在亚美尼亚，安东尼麾下的一个大队因为类似的恐慌逃窜而遭到十一抽杀。我们还知道，在这些年里，在西班牙作战的一位将军也对部队实施这样的惩罚。这是一种传统的惩罚，但它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已经很少见，被认为是一种几近过时的严酷行为。^[11]

恺撒显然非常希望在世人眼中成为一位传统风格的伟大的罗马将军，就像他那被谋杀的养父一样。最重要的是，这样的领袖应当取得成功。尽管他的伊利里亚战役不如安东尼与帕提亚人的斗争那样重要，但他胜利了，而安东尼失败了。恺撒于前33年夏季返回罗马，带回了从落败和求饶的敌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以及之前战败时丢失的罗马军旗。这些战利品和军旗被存放在新建的屋大维娅门廊^[12]。元老院很快授予他凯旋式的荣誉（他已经获得了两次小凯旋式），不过他决定等一段时间再举行凯旋式。当年尤利乌斯·恺撒面对两个选择，要么留在罗马城外等到自己的凯旋式结束，要么放弃这项荣誉而立刻进入城市参选执政官。从那个时候到如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完全来去自由，他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13]

在伊利里亚战役期间，他曾多次返回罗马城，并于前33年1月1日第二次就任执政官。这距离他上一次担任执政官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十年，但恺撒此时仍然只有二十九岁，所以这样的传统限制早就没有意义了。然而这一天还没结束，他就辞去了执政官职位，以便指定一位

继任者。安东尼在前一年也是这样做的，并且根本没有离开自己的行省到罗马就任执政官。尤利乌斯·恺撒对罗马的高级行政长官职位漫不经心，后三头同盟更是远远超过了他，视这些职位如儿戏。现在每年的两位执政官都不会在任整整一年，而是很快辞职，指定补任执政官来接替自己。补任执政官也可能辞职，给其他人一个机会，所以前33年居然有多达六位补任执政官，不过这与前38年多达六十七位裁判官同时任职的事情相比，也不算什么了。每一位官员都因为曾经担任这些官职而获得永久性的显赫地位，在元老院会议中获得相应的优先权利。^[14]

凯旋式的含金量也比以前下降了很多，元老院授予此项荣誉时越来越慷慨大方。在前30年代，有好几位高级将领（有的是恺撒的人，有的是安东尼的部下）获得凯旋式荣誉，仅仅在前34～前33年就有六人。很多获得此项荣誉的人建造或修缮了城内的大型纪念建筑，以永久性纪念自己的胜利。阿西尼乌斯·波利奥在前39年举行了凯旋式，后来修复了监察官使用的自由大厅，为其增添了一座公共图书馆，图书馆的一翼存放希腊文书籍，另一翼存放拉丁文书籍。这是罗马的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因为尤利乌斯·恺撒筹划的图书馆项目在他死后就被放弃了。提图斯·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于前34年举行凯旋式，并开始建造罗马的第一座石制圆形剧场。在过去，剧场的座席都是临时性的，通常是倚靠着大型公共建筑搭建起来。同年，盖乌斯·索希乌斯庆祝了自己的凯旋式，他收复了耶路撒冷，帮助大希律王^[15]在犹太复辟。他建造了一座阿波罗神庙，后来称为阿波罗·索希阿努斯神庙，今天在马凯鲁斯剧场旁还能看得到。^[16]

对罗马人来说，战胜外国敌人的胜利是非常值得庆祝的。如果说这些凯旋式以及相应的建筑工程是安东尼与恺撒两派支持者之间的竞争，那就错了。这些凯旋的将领个个都是骄傲的罗马人，而且即便在两位巨头瓜分了共和国及其各行省统治权的年代，他们也并不拥有自

己固定的党派。事实上，安东尼的部下的成功就像恺撒亲信的凯旋一样，反衬了安东尼的失败。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觉得，如今的战争是针对真正的敌人，而不是罗马同胞。在罗马城中心的建造工程增加了城市的忙碌气氛，甚至在这些生活福利设施竣工之前，就能让人们变得更乐观。这些工程也给很多人，不管是工匠还是普通劳工，带来了领薪水的工作机会，并给建材供应商带来了很好的生意。

恺撒把尤利乌斯·恺撒的很多恢宏的建筑工程继续开展下去，尤其是在广场重建元老院议政厅和新建维纳斯神庙，这两项是工程的核心项目。不管其他人主持的纪念建筑是多么壮观，在整体的雄伟和规模上都没有办法与他的工程媲美。前33年，阿格里帕担任市政官（这个职位常常被人忽视，因为三头同盟的支持者们得到了很多更高级的职位）。他曾在前37年担任执政官，因此让他这样一位前任执政官来当级别较低的市政官，是非同寻常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过去，仅仅三十岁出头的前任执政官更是无法想象。这个年轻人曾在高卢征战，将塞克斯图斯·庞培逐出大海，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和恺撒一起，在梅图鲁斯身先士卒地冲过危险的吊桥。现在，他开始监督罗马城的公共生活福利设施，像往常一样，以充沛的精力和精明强干的本领投入工作。[\[17\]](#)

他主持建造了一座新的高架渠，即尤利乌斯高架渠（和往常一样，苦劳是阿格里帕的，但功劳都被机敏地归于他的上司），并大规模翻新或维修了其他高架渠。这不仅仅是为了建造宏伟建筑：借助于700座新的蓄水池、500处泉眼和130座水塔，整个罗马都有流动水的良好供应。下水道得到检查、维修和改良。做一些虽然凡俗但必需的工作，也是能够吸引群众眼球的。多年以后，人们还记得这位了不起的市政官乘坐小舟，巡视大下水道（罗马城的主要下水道）的情景。除了这些务实的公共设施之外，阿格里帕还主持了罗马城每年59天的竞技娱乐活动，向群众分发奖品，并安排了170次免费开放公共浴室，以

及组织理发师免费为公民服务。审美方面也没有被忽视。他建造的很多水泉都饰有雕像或石柱，公园里有非常宏大的艺术品展示。

对罗马城的所有人（不仅仅是富人）来说，生活都变得更舒适了。在内战、公敌宣告、没收土地和殖民的许多混乱岁月之后，意大利的生活开始变得稳定一些。恺撒对上述的这些坏事负有责任，很多人因此痛恨他。但现在人们似乎不再恨他了，没有人愿意回到之前的动荡日子。很少有人爱戴他，但国内和平重新降临，人们为此感激他，并且越来越相信安宁的日子会继续下去。有些人或许感到，还有一件事情没有了结，因为没有人知道安东尼会何时返回罗马，以及以何种方式返回。

亚克兴角的阿波罗

现在该说说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了。到目前为止她基本上没有露面，读者或许会觉得奇怪。尽管她名扬四海，作为一位浪漫人物具有极大魅力，是东方的象征，或者是一位在被男性主宰的世界里的独立女性，但实际上，地中海世界已经几乎被罗马主宰，所以她的权力很小，重要性很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罗马的许多附庸统治者之一，她之所以能够维持政权、对抗竞争者，完全依赖罗马的撑腰。尤利乌斯·恺撒恢复了她的王位，推翻了她的弟弟和共治者托勒密十三世。尤利乌斯·恺撒在世时，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曾两次访问罗马，无疑是担心情人的朝三暮四会削弱对她的支持。有人认为，尤利乌斯·恺撒将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培植为自己的长期情妇，并且在政治上受到她的引导。这完全是现代人捏造的神话。他们的孩子托勒密·恺撒里昂和母亲一起来到罗马，但他不是罗马公民，也不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合法儿子，所以在罗马政治中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尤利乌斯·恺撒遇刺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罗马逗留了差不多一个月，尽其所能地获得独裁官死后出现的新政权的认可。其他的附庸统治者或附庸国也在做

同样的事情，有的亲自到罗马，有的是通过代理人，其中有一个派系在寻求劝说罗马将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全部或部分领土交给她的妹妹阿尔西诺伊。西塞罗在一封信中提到过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这个段落经常被引用。但西塞罗的通信极多，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其中仅仅短暂露面，显然说明她根本就是个不重要的角色。女王返回自己的国家之后，立刻谋杀了自己的第二个弟弟托勒密十四世（尤利乌斯·恺撒立他为她的共治君主），以恺撒里昂取而代之。一个男婴肯定比十几岁的弟弟更容易控制。^[18]

前41～前40年秋冬，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安东尼成了情人。他离开时，她已经怀了孕，王位也得到巩固。他还非常善解人意地下令杀死了阿尔西诺伊，除掉了她最后一个（至少在她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有可能成为威胁之前）真正的成年竞争对手。三年半之后，这对情人才再次相见。安东尼娶了屋大维娅，和她生了两个女儿。前37～前36年冬季，安东尼把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带到了安条克，见到了他们的两个孩子，男孩亚历山大·赫利俄斯和女孩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分别是太阳神和月神的名字。安东尼在安排将埃及粮食和白银输给自己军队作为给养和军饷时，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旧情复燃。他出发远征帕提亚时，女王又一次怀孕。在安东尼兵败返回之前，女王生了个男孩，取名托勒密·费拉德尔甫斯。安东尼将自己的情人召唤到身边（在今天黎巴嫩沿海的一座小城市）安慰自己，此后就与她如胶似漆，很少长时间分离了。^[19]

前35年，屋大维娅带着一队精锐禁卫军、一些骑兵和虽然凡俗但至关重要的役畜，来到雅典，以补充丈夫在战争中损失的资源。安东尼接收了这些部队和牲口，却没有去见她，而是写信让她返回罗马。在之前的岁月里，屋大维娅陪伴丈夫旅行时，从来没有去过比希腊更远的地方。罗马的行政长官去自己的行省赴任时一般不带妻子，更不要说战时了。但公开展示自己的王家情妇，也是很不正常的事情。恺

撒很快将安东尼简单粗暴地打发一位体面尊贵的罗马妻子，与他可耻地公开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出双入对的行为对立起来。有些人怀疑，整个事情是恺撒一手炮制的，他故意鼓励姐姐去雅典，以损害安东尼的形象。两位巨头之间的关系肯定已经冷淡了下来，而且双方对此都不加掩饰。^[20]

在这些年里，恺撒能够随时去罗马，而安东尼不能。屋大维娅继续扮演一位尽职尽责的贤妻角色，欢迎丈夫派来的人，尽力帮他们获得官职和荣耀。但她要得到这些，就必须去找自己的弟弟。据说恺撒建议她与丈夫分手，但她拒绝了，而是继续替丈夫说话。恺撒出手帮助提携安东尼的人，至少能够获得这些人的部分感激，而且恺撒比安东尼处在更有利的位置（很简单，因为恺撒在意大利或附近），能够用慷慨大方来拉拢新的支持者。如今，对没收土地政策的受害者做出让步显得像是大慈大悲，其实仅仅是对之前的残酷恶行的稍许缓和。恺撒在伊利里亚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永久性打破了塞克斯图斯·庞培对意大利的封锁，解除了面临的威胁，促使罗马和意大利向正常的、稳定的方向发展。恺撒就在意大利本土，所以他获得的荣誉比身处远方的同僚多得多。前36年年底，恺撒的人身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就像他是一位平民保民官一样，不过他的此项特权是永久性的，而不仅仅是在任职的一年内有效。一年后，同样的荣誉被授予屋大维娅和李维娅，国家立起她们的雕像来歌颂她们，并且赋予她们无须监护人即可自行处置自己财政的合法权利^[21]。恺撒的人身将享有特殊地位，他的直系亲属也是这样。^[22]

前34年，安东尼又一次出征。他通过狡猾的手段俘虏了之前的盟友——亚美尼亚国王。这也算是胜利，但还远远不能弥补他进攻帕提亚的惨败。他返回亚历山大港，举行了盛大的胜利游行。亚美尼亚国王身披黄金（据另一份史料，是白银）枷锁，和其他的王室俘虏一起行进，后面跟着一辆战车。安东尼坐在战车上，打扮成狄俄倪索斯。

游行的最高潮是，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端坐在宝座上（宝座在一个装饰精美的平台的顶端）接见他。整个仪式很像罗马的凯旋式，不过是在一座外国城市上演的，不是在罗马，而且是给一位外国女王观赏，而不是给罗马公民。不管真相如何，恺撒及其盟友很高兴将此事描绘成这种样子，来破坏安东尼的形象。^[23]

这一年早些时候，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主持了另一场仪式，用托勒密王朝最喜爱的极其壮观奢华的方式来进行。所谓“亚历山大港的献土”确认了女王及其共治君主恺撒里昂的权力，并将东方各行省的大片土地赏赐给安东尼与女王的三个孩子。亚历山大·赫利俄斯得到了帕提亚和米底^[24]，这两个地区其实都不在安东尼或罗马的控制范围之内。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被赞颂为“众君主的女王，她的儿子们亦是君主”，这无疑是为了确认她的统治权，以及她对自己儿女的主宰权。孩子们中最大的已经是个少年了，很快就将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东方的行政管理实际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也很难知道安东尼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因为真相很快就被一大堆充满敌意的宣传掩盖了。安东尼的最亲密盟友们扣押了安东尼自己对此事的报告，因为这非常有损他的形象。^[25]

对安东尼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如果恺撒本人没有批评他，那么就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对安东尼大肆口诛笔伐。他们说，安东尼是一位阴险的东方女王及其腐朽廷臣的奴隶。贺拉斯在若干年后的一首诗里捕捉到了这种批评情绪：

多么可耻！一个罗马人拜倒在一个女人裙下（你们这些后辈一定不肯相信），手里拿着木桩和兵器。尽管他是军人，却低三下四地伺候一大群干瘪的宦官，而阳光照射在军旗丛中腐化的蚊帐上！^[26]

安东尼被描绘为酒鬼，或者甚至被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灌下魔药，被她拖来拖去，牢牢控制。他的行为举止已经不再像罗马人，他已经

忘了自己是共和国的公仆。人们不断强调安东尼与恺撒的对比。恺撒取得了胜利，为国家福祉而劳作，受到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赞颂，并且和自己的罗马妻子一起生活。安东尼自称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代，所以文学和艺术中再次开始炒作赫拉克勒斯的那段故事：这位半神被翁法勒^[27]诱骗，穿上女人的裙子，坐下来纺线，而她拿起他的大棒，披上他的狮皮。^[28]

攻击是双向的。安东尼写了一封公开信，攻击恺撒批评他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关系时采用的双重标准：“你为什么变了？是因为我在操女王吗？她是我的妻子吗？（当然不是！）我是刚刚开始和她上床吗？难道不是已经持续了九年吗？你呢？你只上德鲁茜拉（李维娅）一个人吗？如果你在读这封信时没有在于特尔图拉、特连提拉、卢菲拉或萨尔维娅·提提西尼阿姆，或者她们所有人一起，我就祝贺你！干什么人，真的重要吗？”^[29]

恺撒的风流是世人皆知的，但与很多罗马女人有露水情缘是一回事，被一个外国情妇套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希腊人，罗马人对希腊人的态度非常复杂，既有仰慕（因为罗马人感到自己的文化没有希腊那么高级），也有对被征服民族的鄙夷。更糟糕的是，她是埃及的统治者，罗马人对埃及蛮族（他们有很多带着动物脑袋的神祇）有着很多历史悠久的刻板印象。恺撒及其盟友拥有许多材料可以利用。安东尼自己的行为举止也无助于维护他的形象。他发表的唯一著作为论他的酗酒，为自己的酗酒辩护，或许还暗示，他从来不会因为饮酒而丧失行动能力，并且在执行公务时从来不会酗酒。我们不知道这部书的细节，因为它已经遗失。他需要写一本书来自我辩护，足以说明他的酗酒是多么严重，公众形象是多么糟糕。^[30]

安东尼的攻击比自我辩护更多。双方的辱骂都非常符合罗马政客互相攻击的传统，很少会考虑真相是什么。安东尼又开始炒作恺撒在

腓立比战役中的糟糕表现，并大肆宣扬恺撒被塞克斯图斯·庞培击败以及怯懦惧敌的故事。安东尼绘声绘色地描述恺撒是一个恶毒的腐化堕落之徒，将自己的身体出卖给尤利乌斯·恺撒，以获得独裁官的恩宠；后来，恺撒打算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尤利娅嫁给某个伊利里亚小部落的国王，甚至考虑自己娶这位国王的女儿。这个指控肯定比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私情更严重，至于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身为贵族的安东尼自然要表示对竞争对手真实（而非收养他的）家族背景的鄙视。到了这个比较晚的时期，恺撒里昂才开始起到一些重要作用。倒不是恺撒里昂自己有什么重要，而是因为他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儿子。这表明自封的凯旋将军恺撒、神之子，根本就不是尤利乌斯·恺撒的血亲。恺撒让奥庇乌斯（独裁官的旧部之一）写了一份小册子，“证明恺撒里昂根本不是独裁官的儿子”。安东尼回答说，他曾亲耳听到尤利乌斯·恺撒承认这个男孩是他的儿子。[\[31\]](#)。

双方的唇枪舌剑演化为武装冲突，我们很容易觉得这完全是恺撒的错。他最终取得了胜利，所以很容易被看成事件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但事实上两位巨头都对权力非常贪婪，也都对最终的武力对抗没有什么顾虑。前33年夏季，安东尼的军队开始在幼发拉底河集结。他这么做也许是想再次进攻帕提亚，但即使他有过这种想法，也很快放弃了。他命令军队开始了超过1000英里的长征，开赴小亚细亚沿海。西方唯一的潜在敌人就是恺撒。[\[32\]](#)。

前32年1月1日，安东尼的两位高级下属，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曾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海军将领）和盖乌斯·索希乌斯成为执政官。三头同盟的第二个五年期限可能在前一年年底到期，恺撒和安东尼失去了正式的权力，不过他们仍然掌控着军队和许多行省。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赞扬安东尼，间接地批评恺撒。索希乌斯随后发动了针对恺撒的人身攻击，并向元老院提交一项动议，谴责恺撒。在投票表决开始之前，一名保民官否决了此项动

议。恺撒到目前为止都非常有策略地避免参加这些会议，但在下一次会议召开时在军队的护送下到达会场，他的朋友们也陪伴在他身边，并且小心地显露出他们“隐藏”的匕首。不管他有没有合法的军权，他都冷静地坐在两名执政官之间的座椅上，以显示他才是实际上的主宰。阿赫诺巴尔布斯和索希乌斯明白这种暗示，于是离开罗马，去希腊与安东尼会和，沿途没有遭到骚扰。其他一些人也开始跟随他们离开了意大利。^[33]

安东尼麾下也有人逃到恺撒那边。不久之后，前任执政官卢基乌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抵达罗马，还带来了他的外甥马尔库斯·提提乌斯（原定的下一年执政官，就是他下令处死塞克斯图斯·庞培）。普兰库斯曾多次变节，朝三暮四，名声很臭，但他的决定被认为是一个风向标。直到前不久，他还积极地参与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狂欢。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曾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赌局，由普兰库斯主持，看谁能拿出最昂贵的菜肴。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将价值连城的珍珠耳环丢在酒里，然后一口吞了下去。普兰库斯宣布她是获胜者。还有一个故事说，普兰库斯曾参加一场奥林匹斯诸神主题的宴会，他扮演海神格劳科斯的角色。这位前任执政官穿上了假的鱼尾，涂抹自己的皮肤，然后裸体跳舞。现在他背叛了安东尼。一位玩世不恭的元老说：“安东尼一定做了很多事情，你才离开了他！”^[34]

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知道安东尼的很多秘密，可以卖给恺撒，而且他这个人的存在也有价值。普兰库斯是安东尼遗嘱的见证人，所以知道其中一些条款对安东尼的形象很不利。这份遗嘱存放在罗马的灶神庙，尽管为首的维斯塔贞女^[35]拒绝交出遗嘱，但恺撒还是把它强行拿走，并在广场的一次公共集会上当众宣读了遗嘱的摘要。遗嘱的内容，或者至少恺撒选择公布的那部分，令人激愤不已。安东尼在遗嘱中正式承认恺撒里昂为尤利乌斯·恺撒的儿子（他在自己的遗嘱

里提到这个，有些奇怪），并将自己的财产传给他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生的孩子。遗嘱里肯定有将自己部分财产传给他的合法的罗马儿女的条款，但被忽略了。更糟糕的是，他希望自己的遗体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一起葬在亚历山大港，即便他是在意大利去世的。^[36]

我们掌握的古代史料都没有说这份遗嘱是伪造的，这肯定是正确的。这份遗嘱本来就令人尴尬，绝不能公之于众。恺撒固然没有伪造遗嘱，却非常仔细地扭曲和加深了它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恺撒自己的行为是刻意与安东尼形成鲜明对照的。他还只有三十岁，却已经开始为自己和家人建造一座宏伟的陵寝。在过去，贵族建造纪念建筑是为了传扬自己家族的荣光，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恺撒的陵寝工程让过去的任何建筑都黯然失色。它很快就被称为Mausoleum，得名自卡里亚^[37]国王摩索拉斯（Mausolus）的著名陵墓，后者是古典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

恺撒陵寝的直径为300罗马尺^[38]，墙高40尺，顶部有穹顶，穹顶的顶端有一座巨大的恺撒雕像，其尺寸显然是帝王风格的，又一次强调恺撒与其他人不同。更重要的是，陵寝在罗马，在城市正式边界之外的战神广场，这个地点很适合建陵寝。恺撒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罗马人，与安东尼不同，绝不会想要被葬在罗马之外的任何地方。有传闻称，安东尼打算将首都搬迁到亚历山大港（之前有传闻，说尤利乌斯·恺撒也曾有这个计划）。还有一个故事说，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最喜欢的誓言是：“就像我会在卡比托利欧山上主持公义一样。”这些故事互相矛盾，但这不重要，因为它们传达的信息是：安东尼服从她的命令，心里早已不顾及罗马的利益。^[39]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罗马的敌人。这是恺撒宣传攻势的长期主题，因为人们更愿意假装自己在抵抗一个威胁罗马的外国敌人，而不是互相竞争的两位罗马军阀之间即将爆发新的内战。表面上，内战的

爆发不是恺撒和安东尼的选择，而是保卫罗马的集结号。整个意大利宣誓在这场战争中服从恺撒的领导，这是一个精心导演出来的团结姿态。恺撒允许安东尼的退伍老兵拒绝宣誓效忠恺撒，但很少有人拒绝，根本没有人表现出愿意集合起来为安东尼作战的态度。一些元老，可能有数百人，逃去加入安东尼阵营，现代历史学家觉得能有数百人已经很了不起了。有些元老是对安东尼负有义务，或许也有人只是觉得他更可能获胜，或者这些元老处于绝望的处境，希望发生新的革命。当年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密谋者中所剩无几的幸存者投奔了安东尼，因为他们不可能得到尤利乌斯·恺撒继承人的欢迎。恺撒吹嘘说，有七百多名元老宣誓接受他的指挥。即便这个数字被夸大了，也仍然是元老阶层的大多数。一些人公开保持中立，其中最著名的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他说自己“会远离你们之间的争吵，并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40]。^[41]

前32年夏季，恺撒领导着罗马共和国正式向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宣战。在遥远的过去，被称为“国务祭司”的团体负责宣布战争与和平。古老的仪式被恢复，或者可能是发明出来的，但伪装成一种传统。恺撒作为一名国务祭司，在战神庙主持了祭祀。一支长矛被染上牺牲品的血。祭司念诵了敌人的恶行，然后将长矛投掷出去，插入一片象征着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埃及王国的土地。^[42]

安东尼的陆海军已经在希腊西海岸集结了。此时的时节已经太晚，双方都不能发动进攻，但安东尼的计划似乎是按兵不动，在希腊迎击敌人。庞培在前48年，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前42年，都运用过这样的计划，但都失败了。苏拉是唯一一个以希腊为基地打赢内战的罗马统帅，但他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渡海去了意大利作战。安东尼依赖自己陆军与舰队的庞大兵力，相信敌人会犯错误并被击垮。和近期的其他战争一样，这场新的战争的规模也是极其宏大的。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安东尼那边，她的存在导致他的一些高级下属发生了摩

擦。如果他渡海进攻意大利，一定非常不利于他的公众形象，这或许就是他不愿意渡海的另一个原因。但他按兵不动的结果就是，将主动权拱手交给了敌人。[\[43\]](#)

阿格里帕发动了进攻。他极可能是整个战役的规划者，而且在关键时刻指挥大军有条不紊地击败安东尼的肯定是他。他凭借一连串闪电般的攻击，袭掠和摧毁了安东尼的多个基地，威胁了他的补给线。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时，恺撒（这一年，他第三次担任执政官）亲自率领主力部队渡海，在伊庇鲁斯登陆，占领了一座称为托伦涅（意思是“长柄勺”）的城镇。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开玩笑说，如果恺撒“坐在长柄勺上”（在俚语中，“长柄勺”指的是阳具），他们不必担心。但事实是，敌人已经渡过了亚得里亚海，而安东尼还没有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对抗敌人。恺撒逼近了安布拉基亚湾沿岸的亚克兴角，安东尼的主基地就在那里。很快，恺撒从海陆两面封锁了亚克兴角。从春末到整个夏季，安东尼的部下未能突破敌军的封锁，也未能引诱敌军在对安东尼有利的环境下交战。在此期间，安东尼的营地环境卫生状况极差，疟疾和痢疾传播得很厉害，导致军队不断减员。恺撒的部队等待着，观察着敌人越来越羸弱。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恺撒军队赢得了许多小规模胜利，有一次差点俘虏了安东尼本人。逃兵（包括普通士兵和辅助士兵，也有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这样的元老）偷偷从安东尼营地溜走，受到恺撒的欢迎。但恺撒这边没有人逃往安东尼营地。[\[44\]](#)



阿克兴角战役

前31年9月2日，安东尼的舰队出航，向敌人发起挑战。至少有部分船只配有桅杆和帆，其实在战斗中应当抛弃这些笨重的物件。战船在战斗中完全依靠划桨来机动，所以船上配有桅杆和帆说明安东尼显然在考虑带领部分或全部船只突围。或许他还希望打赢一场海战来扭转战局，但也为失败做好了准备。这对一位统帅来说，不是乐观的心态。两军舰队摆好阵形需要好几个钟头。随后，两军对峙了很长时间，双方都不愿意在太靠近岸边的地方作战。终于在安东尼的战船开始继续推进的时候，阿格里帕命令他的战船往外海退一点距离，以便腾出更大空间。然后，他们尝试从侧翼包抄敌人。恺撒舰队的兵力可能更强一些，船长和水手的技能在针对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残酷战争之后肯定也有很大提高。两支舰队都拥有很多大型战船，战斗打响之后，大家发现很难用撞击战术来击沉或击伤这些大船。大部分战斗是用投射武器或用抓钩登船，然后近战。随着各艘战船运动起来捕捉优势地位，整齐的战线被打破，出现了一些缺口。

该地区的某个固定时间通常会刮起西北偏北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她指挥的一队船只利用这个风向变化，突然升起船帆，从舰队主力背后驶出，径直奔向战线中央的一个大缺口。他们对正在交锋的战船置之不理，继续前进，而安东尼离开自己的旗舰，登上一艘轻型船只，追了上去。大约70到80艘船逃走了，载着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很大一部分财物，但这顶多相当于整个舰队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其他船只被留下来作战，其中一些继续非常顽强地拼杀。最终，幸存者闷闷不乐地撤回到港口。安东尼舰队损失了约5000人和一些船只。安东尼输掉了这场战争，尽管他和情妇带着很大一部分金钱逃走了。他的陆军指挥官普布利乌斯·卡尼迪乌斯企图率军离开，但官兵拒绝服从，而是与恺撒做了一笔很好的交易，向他投诚。舰队残部则与陆军一同投降。[\[45 \]](#).

安东尼保住了性命，但不管有多少钱，都没有办法买新的陆海军来替代他受损的军队，也没有办法修补他受损的声誉。一位罗马贵族绝不能承认失败，也绝不能抛弃部下，自己和情妇一起逃命。恺撒手头有更紧迫的问题，所以不能直接去追击竞争对手。之前他让梅塞纳斯留下掌管意大利和罗马城。梅塞纳斯虽然只是个骑士，没有官职，也没有成为元老，但以精明的手段把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现在有些服役期满的军团士兵向恺撒施加压力，要求立刻退役并得到恺撒曾向他们承诺的赏金与农场。曾为安东尼效力的士兵和恺撒自己的士兵一起，鼓噪着要求赏赐。监管大约40个军团的运动和部分士兵的退役，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阿格里帕被派去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恺撒本人在这一年年底前去跟进。一方面，面对哗变或叛乱的威胁，他给出了慷慨的承诺。另一方面，他希望避免回到佩鲁西亚战争时期那种常常引发叛乱的动荡状态。在意大利不能通过没收来获取土地，这意味着他必须找到资金去收购土地。恺撒又一次去了东方，寻找充足的现金。[\[46 \]](#).

现在很多曾支持安东尼的附庸统治者和社区都急于向恺撒表示忠心，他们热情地帮助他得到了资金。所有人都愿意用金钱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带着同样的想法与恺撒接触。虽然恺撒的宣传把她描绘为敌人，但她其实始终是罗马的忠实盟友，肯定会愿意为了他的利益而积极压榨自己的臣民，就像她曾为了尤利乌斯·恺撒和安东尼的利益而剥削民众那样。安东尼已经无药可救，不管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对他有怎样的感情。她是个生存能力极强的人，尽管她的家族和宫廷内斗不休、血雨腥风，并卷入了罗马持续发生的权力斗争中，但她还是安然无恙地活到了三十九岁。恺撒玩世不恭地鼓励她，而当他的军队开进埃及时，她可能还鼓动自己的部队向恺撒投诚。

[47].

安东尼决定效仿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以及他那个年代的许多贵族，自行了断。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可能促成了他的死亡，但她的情夫自杀得很不利索，用太长的时间与她做最后一次精神上的团圆。女王还活了一个多星期，希望能够与恺撒达成协议。她躲在墓穴内，里面堆满了可以移动的财宝和易燃物，她可以威胁随时将其摧毁。恺撒的使者把她诱骗出来。我们不知道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当年访问罗马的时候，有没有和年轻的恺撒见过面。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他们唯一一次相遇就是这个时候。她向胜利者苦苦哀求。不同史料对这次谈话细节的记载是不同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竭尽全力去赢得他的怜悯和同情，穿得可怜兮兮但没有隐藏自己的美艳，并讲到她对尤利乌斯·恺撒的热爱，以及独裁官对她的挚爱。

但这都无济于事。在战前，恺撒的动员口号就是反对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所以现在不能留她了，也不能留她的孩子。恺撒需要她的财富来资助新的退伍军人安置计划。他也希望把她当成一件装饰性的战利品，在自己的凯旋式上展示。但很难说罗马平民看到一个女人在俘虏队伍中会做出什么反应。当初尤利乌斯·恺撒把十几岁的阿尔西诺

伊放在自己埃及战役凯旋式的游行队伍里，群众对她表示同情。不过这都不重要了。或许他的确下令让她活下去，并且在发现她自杀后还唤来了医生和蛇毒专家。但死了的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几乎和活着时一样有价值，他可以在凯旋式游行里展示她的肖像，而不用担心群众会同情她。恺撒得到了她的财富，并将她的王国当作自己的私人产业，得到的收入也成为他个人的财产。^[48]

恺撒里昂被他的教师出卖了。他的存在对恺撒来说很尴尬，于是恺撒里昂被处死了。安东尼的长子安提勒斯也被抓获并处死。恺撒里昂和安提勒斯都在仅仅几个月前经历了成人礼，所以算是成年人，这足以让他们必死无疑。安东尼的一些核心的罗马支持者自杀或被处死，但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政权更迭。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臣民将不得不缴纳沉重的赋税，但他们在她及其家族的统治下就一直是这样的苦命。祭司们赶来，表示如果罗马人允许他们在神庙上保留女王的肖像，就愿意给罗马人缴纳一笔钱。这不是因为他们热爱女王，而是不愿意因为拆除肖像而损坏神庙，他们也想积极地向新主人表示忠心。恺撒知道自己的希腊语水平不够，于是借助一名译员，向亚历山大港群众讲话。他的一生到目前为止都是不循常规的，也没有时间像西塞罗、尤利乌斯·恺撒、安东尼和大多数贵族子弟那样练习演讲。^[49]

前30年年末，恺撒三十三岁，已经成为罗马和整个地中海世界无可争议的主人。

^[1] *Res Gestae* 3 (Loeb translation).

^[2] Suetonius, *Augustus* 17.1 (Loeb translation).

^[3] 关于这个情节，见Velleius Paterculus 2.28.3-4, Appian, *BC* 5.123-6, Dio 49.11.1-12.4, 讨论见R.Weigel, *Lepidus. The Tarnished Triumvir* (1992), pp.88-92。

[4] Dio 49.17.1-18.7, 50.1.4, Appian *BC* 5.127, 133-44, Velleius Paterculus 2.79.5.

[5] Plutarch, *Antony* 37.

[6] 对此次战役的详细记述, 见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p.304-20; 安东尼的损失, 见Plutarch, *Antony* 49-51, Velleius Paterculus 2.82.3.Dio 49.31.1-3, with A.Sherwin-White, *Rom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st, 168 BC-AD 1* (1984), pp.320-21.Livy, *Pers.*130声称8000人行军穿过亚美尼亚时死于“风暴”, 但没有给出伤亡总数字; 安东尼险些自杀, 见Plutarch, *Antony* 48; 现代评论者倾向于对安东尼评价过高, 例如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264, ‘it was a defeat, but not a rout or a disaster’. C.Pelling,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1988), pp.220-43更现实, 并提到普鲁塔克认为此次远征的失败是安东尼一生的转折点。

[7] Appian, *BC* 5.130-31, *Res Gestae* 4 and 25声称3万名奴隶被归还给主人; 屋大维舰队使用奴隶, 见Suetonius, *Augustus* 16.1, Dio 47.17.4, 48.49.1, 49.1.5, 最后一段暗示他们退役后得到了自由; 恺撒得到的荣誉, 见P.Zanker (trans.A.Shapiro),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 pp.40-42, 及B.Levick, *Augustus. Image and Substance* (2010), p.40。

[8] 达契亚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 以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匈牙利和乌克兰的一小部分。达契亚人是色雷斯人的一支。前82~公元106年, 此地存在一个一度非常强盛的达契亚王国, 后被罗马征服。

[9] 这些战役的概况, 见Appian, *Illyrian Wars* 16-29, Dio 49.34.2-38.1, 43.8, with E.Gruen in *CAH2* X, pp.172-4, 尤见M.Kos, *Appian and Illyricum* (2005), pp.393-471。

[10] Appian, *Illyrian Wars* 19-21, Suetonius, *Augustus* 20.

[11] Appian, *Illyrian Wars* 26, 27, Suetonius, *Augustus* 20, 24; 安东尼对一个大队的十一抽杀, 见Plutarch, *Antony* 39, Dio 49.26.1-27.1, with A.Sherwin-White, *Rom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st, 168 BC-AD 1* (1984), p.318。

[12] 以奥古斯都的姐姐小屋大维娅（安东尼的妻子）命名。

[13] 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325-6.

[14] Dio 47.15.2-3, 48.43.2, 49.43.6-7, 49.39.1, with 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257-67.

[15] 大希律王（约前74~前4年）是犹太国王，罗马的附庸。他以残暴著称，为了权位，曾下令杀害自己的家人与多位拉比。但他也是犹太历史上最著名的建设者，扩建了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又称希律圣殿），修建了恺撒利亚的港口，建造了马萨达与希律宫的城墙。在《圣经·新约》中，他知道伯利恒有个君王诞生了，就派三智者先行，假意跟随朝拜。当三智者从另一方向离开后，他下令将伯利恒及其周围境内两岁及以下的所有婴儿杀死，而耶稣一家在其死后才回到拿撒勒。

[16] 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252-3, 326-31.

[17] Suetonius, *Augustus* 28.3, Pliny *NH* 36.121, 讨论见N.Purcell in *CAH2* X, pp.782-9。

[18]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生涯，概况见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M.Grant, *Cleopatra* (1972), J.Tyldesley, *Cleopatra. Last Queen of Egypt* (2009)；非常有洞察力的对她与尤利乌斯·恺撒关系的重新审视，见E.Gruen, 'Cleopatra in Rome. Fact and Fantasies', in D.Braund & C.Gill (eds), *Myths, History and Culture in Republican Rome: Studies in honour of T.P. Wiseman* (2003), pp.257-74, 她父亲与罗马的关系史，见M.Siani-Davies, 'Ptolemy XII Auletes and the Romans', *Historia* 46 (1997), pp.306-40；西塞罗提及她，见Cicero, *ad Att.*14.8, 15.15, 评论见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234, 可对照M.Grant, *Cleopatra* (1972), pp.95-7；阿尔西诺伊四世，见Strabo, *Geog.*14.6.6, with P.Green, *Alexander to Actium: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 (1990), p.669, 及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p.235-6；

Ptolemy XIV 之死，见Josephus, *AJ* 15.39, *Against Apion* 2.58, Porphyry, *Fragments of Greek Historians* 260。

[19] 阿尔西诺伊四世和另外一个潜在竞争者的死亡，见Josephus, *AJ* 15.89, Appian, *BC* 5.9, Dio 48.24.2; 被 Lebanon 传唤，见Plutarch, *Antony* 51, Dio 49.31.4。

[20] Plutarch, *Antony* 53-4, Appian, *BC* 5.95, 138, Dio 49.33.3-4, with M. Grant, *Cleopatra* (1972), pp.150-53,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336,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265.

[21] 罗马女性一般需接受监护人（父亲、兄长、儿子或其他男性亲属等）的监督，财政由监护人控制。

[22] 屋大维继续在罗马代表安东尼处理事务，见Plutarch, *Antony* 54; 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民官身份，见Dio 49.15.5-6, 38.1, 讨论见Pelling in *CAH2* X, pp.68-9, 与A. 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31-2; 缓解没收土地造成的冲击，从而得到爱戴，见e.g. Virgil, *Eclogues* 1.40-47, with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121-2。

[23] Plutarch, *Antony* 54, Dio 49.40.3-4, Velleius Paterculus 2.82.3-4, 评论见M. Grant, *Cleopatra* (1972), pp.161-2, 及Pelling in *CAH2* X, p.40。

[24] 米底是一个古国，在今天的伊朗西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一带，前7世纪到前6世纪一度很强盛。其居民为古伊朗民族。

[25] Plutarch, *Antony* 54, Dio 49.41.1-6, with Pelling in *CAH2* X, pp.40-41,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338-9, M. Grant, *Cleopatra* (1972), pp.162-75, J. Bingen, *Hellenistic Egypt: Monarchy, Society, Economy, Culture* (2007), pp.78-9, G. Hölbl, *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 (2001), pp.244-5; 查禁安东尼自己的版本，见Dio 49.41.4。

[26] Horace, *Epodes* 9.11-16 (Loeb translation)。

[27] 根据希腊神话，翁法勒是吕底亚（小亚细亚西部一地区）女王。赫拉克勒斯因误伤人命，被迫作为奴隶侍奉翁法勒一年。翁法勒强迫赫拉克勒斯穿女人的衣服、做女人的活计。一年期满后，翁法勒与赫拉克勒斯结婚。

[28] Plutarch, *Comparison between Antony and Demetrius* 4, with M. Grant, *Cleopatra* (1972), p.188, 及Pelling in *CAH2* X, p.43. 关于 Hercules and Omphale 见 P. Zanker (trans. A. Shapiro),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 pp.57-65, esp.58-60; 魔药见 Dio 49.34.1, Josephus, *AJ* 15.93。

[29] Suetonius, *Augustus* 69.2.

[30] 对宣传战的讨论，见 K. Scott,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44-30 BC’,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1 (1933), pp.7-49, esp.33-49,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335-49, Pelling in *CAH2* X, pp.40-48, 及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276-8。

[31] Suetonius, *Caesar* 52.2 讲到盖乌斯·奥庇乌斯写了小册子，否认恺撒里昂是恺撒的儿子；安东尼指控恺撒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伊利里亚国王 Cotiso，见 Suetonius, *Augustus* 63.2。

[32] Plutarch, *Antony* 55-6, Dio 49.44.3, 50.1.1-2.2.

[33] Dio 49.41.4, 50.2.2-7, with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252-3; 三头同盟的结束见精彩的概括，Pelling in *CAH2* X, pp.67-8。

[34] Velleius Paterculus 2.83.1-2, Pliny, *NH* 9.119-21, 参见 Horace, *Satires* 2.3.239-42, Valerius Maximus 9.1.2, Pliny, *NH* 9.122; Suetonius, *Caligula* 37.1, with B. Ullman, ‘Cleopatra’s pearls’, *The Classical Journal* 52.5 (Feb.1957), pp.193-201,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276-80, 及 A. 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p.337-9; 引文见 Velleius Paterculus 2.83.3。

[35] 维斯塔贞女，或称护火贞女 (Vestal Virgin)，是古罗马炉灶和家庭女神维斯塔的女祭司。维斯塔贞女共六位，六岁至十岁开始侍奉，必须守贞、侍

奉神祇至少三十年。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守护维斯塔神庙的炉灶，不让圣火浇熄。三十年期满退休后，她们会得到丰厚的退休金，可以结婚。与前维斯塔贞女结婚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而且能获得不菲的嫁妆。

[36] Plutarch, *Antony* 58, Suetonius, *Augustus* 17.1, Dio 50.3.1-4.1, with J. Johnson, 'The authenticity and validity of Antony's will', *L'Antiquité Classique* 47 (1978), pp. 494-503.

[37] 今天土耳其西南部一地区。

[38] 1罗马尺合295.7毫米。

[39] P. Zanker (trans. A. Shapiro),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 pp. 72-7.

[40] 阿西尼乌斯·波利奥后来退出政坛，著书立说，组织文学活动，扶助文学新人，安度晚年。

[41] Velleius Paterculus 2.86.3讲到阿西尼乌斯·波利奥。誓言，见 *The Res Gestae of the Divine Augustus* 25.2-3, Suetonius, *Augustus* 17.2, 讨论见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 357-68;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 278, fn. 3 声称300多名元老投奔了安东尼，Syme很有权威，所以很多人认为这种说法是事实，而非推测。

[42] Dio 50.4.1-6.1, Livy 1.32详细描述了屋大维恢复此种仪式之后的具体情况，另见 J. Rich, *Declaring War in the Roman Republic in the Period of Transmarine Expansion* (1976), pp. 56-8, 104-7.

[43] Dio 50.9.3, Plutarch, *Antony* 56, with C. Pelling,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1988), pp. 259-60, 及 *CAH2* X, pp. 52, 55, M. Grant, *Cleopatra* (1972), pp. 197-8, 及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 294-5.

[44] 作战的概况见 A. 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p. 360-64; 'sit on aladle', 见 Plutarch, *Antony* 62, with C. Pelling,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1988), pp. 271-2; 逃兵见 Plutarch, *Antony* 59, 63, Velleius Paterculus 2.84.2, Dio 50.13.6,

14.3, with 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372-3及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296。

[45] 此次战役见Plutarch, *Antony* 64-6, 68, Dio 50.14.4-35.6, with J.Carter, *The Battle of Actium: The Rise and Triumph of Augustus Caesar* (1970), pp.203-13, S.Sheppard, *Actium: Downfall of Antony and Cleopatra*. Osprey Campaign Series 211 (2009), 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374-5, 380-82, M.Grant, *Cleopatra* (1972), pp.206-15, 及C.Pelling,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1988), pp.278-89, 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p.364-9, D.Harrington, 'The Battle of Actium-a study in historiography', *Ancient World* 9.1-2 (1984), pp.59-64, 及C.Lange, 'The Battle of Actium: A reconsideration', *Classical Quarterly* 61.2 (2011), pp.608-23, 后者认为有些学者说此次战役不激烈, 是错误的; 安东尼军队的投降, 见Plutarch, *Antony* 68, Dio 51.1.4-3.1, Velleius Paterculus 2.85.5-6, with L.Keppie, *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 pp.134-6。

[46] Dio 51.3.1-4.8, Pelling in *CAH2* X, pp.61-2.

[47] Dio 51.6.4-8.7, Plutarch, *Antony* 72-3, with C.Pelling,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1988), pp.297-300;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协助恺撒入侵, 见Dio 51.10.4-5, Plutarch, *Antony* 76; 见M.Grant, *Cleopatra* (1972), pp.222-3怀疑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背叛安东尼, 而认为她的投降是形势所迫。

[48] 概况见A.Goldsworthy,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pp.376-87,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与恺撒的会面, 见Dio 51.11.3, 5-13, Plutarch, *Antony* 82-3, with C.Pelling,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1988), pp.313-16, Florus 2.21.9-10; 她的死亡, 见Strabo, *Geog.*17.1.10, Dio 51.13.4-14.6, Plutarch, *Antony* 84-6, with C.Pelling,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1988), pp.316-22, Velleius Paterculus 2.87.1; 另见M.Grant, *Cleopatra* (1972), pp.224-8, J.Tyldesley, *Cleopatra. Last Queen of Egypt* (2009), pp.189-95, E.Rice, *Cleopatra* (1999), pp.86-91, P.Green, *Alexander to Actium* (1990), pp.679-82, 及

G. Hölbl (trans. T. Saavedra), *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 (2001), pp. 248–9; 阿尔西诺伊在尤利乌斯·恺撒的凯旋式, Dio 53.19.1–20.4, Appian, *BC* 2.101。

[49] Dio 51.15.5–6, Plutarch, *Antony* 81.狄奥说恺撒是用希腊语演讲的,但他可能忽视了恺撒借用一名本土演说家的可能性。

十一 凯旋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死让国家没了防备；塞克斯图斯·庞培在西西里岛被打垮；李必达被抛到一边；安东尼丢了性命。就连尤利乌斯一党也只剩下恺撒这么一个领袖。

——塔西佗，2世纪初^[1]。

无论在海洋还是陆地，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我都在全世界南征北战。胜利的时候，我总是饶恕那些恳求宽恕的人……我两次庆祝小凯旋式，三次庆祝凯旋式，二十一次被称颂为凯旋将军。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2]。

听到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死讯之后，诗人贺拉斯歌唱道：“现在，开始饮酒吧！现在，让我们用脱去了镣铐的脚，跺一跺大地！我的朋友们，是时候了，让我们为诸神摆开战神祭司也会满意的盛宴！”就在不久前，女王曾威胁意大利：“完全失控的女人，胜利的甜酒让她酩酊大醉，她什么都想要。”好在她的胜利很短暂，她从亚克兴角熊熊燃烧的舰队逃走，“逃离意大利，而恺撒追击她……就像鹰追击一只温顺的鸽子，或一位敏捷的猎手追击一只兔子……”但女王“在刀剑面前没有表现出女性的畏惧……她意志坚韧，以冷静的面容凝视自己毁坏的宫殿，还有勇气拿起牙齿锋利的毒蛇，让自己的身体饮下它们的黑色毒液……她绝不愿意被夺走王权，被押走，去面对凯旋式上讥笑的人群：她可不是卑贱的女人”。^[3]

曾经令人畏惧的敌人在失败和死亡之后，也比较容易得到仰慕了，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面对死亡时的勇气和尊严为恺撒的胜利增添了光辉。但真正重要的、给诗人带来如此喜悦的，不是她的自杀，而是战争的胜利结束。在其他诗篇中，贺拉斯曾写到安东尼成为埃及女王的“奴婢”，贺拉斯和其他人也都知道这是一场新的内战。在亚

克兴角，被抛弃在燃烧战船上死去的大多数人都是罗马人。战争的公开敌人是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诗人们和其他人一样，都一次又一次说到安东尼的“东方盟友”，但他们没有隐藏事实，即真正领导敌人的是安东尼。这是又一场内战，尽管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正如维吉尔在几年后清楚地写道：

在一边，奥古斯都·恺撒屹立在高耸的船首，领导意大利人去战斗，和元老院与人民、家庭与国家的神祇在一起……他父亲的星辰在他头顶上熠熠生光……在另一边，安东尼带着野蛮的强力……统领着埃及和东方的力量……跟着他的，是——哦，多么可耻！——他的埃及妻子……在当中，女王用他们本族的叉铃（埃及伊西斯^[4]女神的崇拜仪式上使用的一种嘎嘎作响的神圣乐器）呼唤她的大军……形态各异的恐怖神祇和吠叫的阿努比斯挥动兵器，与尼普顿、维纳斯和密涅瓦厮杀。^[5]

亚克兴角的胜利是意大利团结一心的美德与传统的胜利，得到了正义神祇的佑助，领导者则是神圣尤利乌斯的儿子。敌人是牛鬼蛇神的东方力量，以及他们奇形怪状的神祇。其中特别讲到豺首的阿努比斯（冥界之神），尽管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她的希腊祖先对这些古老的崇拜仪式并不感兴趣。正义的一方赢得了一场压倒性的、必需的胜利，非常光荣，因为它带来了和平的希望。^[6]

维吉尔、贺拉斯和其他诗人看够了只能导致人民被屠杀、土地与财产被偷窃的内战。在前29年发表的诗集《歌集》（不过写作时间是之前恺撒和安东尼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期）中，贺拉斯表达了对一场罗马人之间兄弟相残的新斗争的恐惧：“何方，在这邪恶的疯狂中，你要奔向何方？你为何拔出刚刚入鞘的剑？在陆地和海洋流的拉丁人的鲜血，难道还少吗？不是为了让罗马人烧毁充满嫉妒的迦太基的傲慢要塞，也不是为了让长久以来我们触手可及的布立吞人^[7]身披枷锁地走下圣道，而是让帕提亚人的祈祷成真：这座城市将自己毁掉自己？”^[8]

大约在同一时间，贺拉斯哀叹道：“又一代人被内战击垮，这座城市被自己的力量压垮！”无论是意大利敌人、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军还是汉尼拔的迦太基军队，都不曾战胜罗马，但它“如今将被我们自己摧毁，我们这渎神的一代，血统被诅咒的一代”。虽然发出了这样严正的警告，诗人在结尾时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并呼唤所有意大利人加入这场战争。[\[9\]](#).

贺拉斯这样的人渴望和平，但并非为了和平愿意承受任何代价。对罗马人来说，真正的和平只能从胜利中来，最理想的状况是彻底的胜利，将来不必再与同一个敌人交战。尤利乌斯·恺撒喜悦地写道，他“平定”了他在高卢征服的各部落。战争应当以绝对胜利结束，由罗马人来决定和平条件，而不是用妥协和让步换取和平。同样的态度在罗马人的内战中也起到了作用，所以内战几乎没有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尤其是无法长期解决。贺拉斯曾参加腓立比战役并逃跑，因此比较了解真实的战争。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服从自己发出的呼唤，参加亚克兴角战役。他说自己和恩主梅塞纳斯一起待在一艘战船上，但我们不确定梅塞纳斯有没有离开意大利海岸，所以我们很难知道贺拉斯是否真正加入了舰队，去满足他的愿望——用一场胜利来终结内战。[\[10\]](#).

诗人们反映了几乎是普天之下所有人的愿望，即在漫长岁月的动荡与暴力之后，重返和平与稳定的状态。在这些冲突中，意识形态的作用甚微。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自称为自由而战，但他们的行为举止与同时代的其他军阀没什么区别。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失败了，丢了性命。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最后一批密谋者作为安东尼的党羽死去，为一位巨头效力，去反对另一位。如此戏剧性的阵营转换在从上到下的所有阶层中都是司空见惯的。现在绝大多数人只希望能够活下去，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财产。人们记得，年轻的恺撒在腓立比战役或佩鲁西亚战争之后，是多么冷酷无情地处死战俘。但真相是，得

到宽恕的人比被处死的人多得多。后来有人说，他的很多最亲密朋友和盟友都曾追随安东尼而反对他，但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前或之后倒戈。[\[11\]](#)

密谋者所谓的“自由”，即便对那些希望享有它的贵族们，也不再有什么吸引力了。帝国时期的元老，如历史学家塔西佗，将会复苏这种“自由”的观念，视其为一个浪漫的幻梦。但这些人对前几个世纪“自由”政治的怀旧也没有妨碍他们接受现实。至少塔西佗对“自由”共和国最后几十年的凶残暴力没有多少幻想。在前30年，没有什么人会对共和国抱有任何幻想，因为太多人由于选择了错误阵营，或者因为没有选择任何阵营，而丢掉性命。[\[12\]](#)

自同盟者战争和随后苏拉进军罗马以来，共和国深陷暴力与混乱之中。在世的人们对这些事件还记忆犹新，而在恺撒自己的一生中，暴力冲突变得愈发残忍和漫长。没有人记得政治不受暴力威胁或实际暴力影响的时期。我们很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豪门贵族，他们的损失之大，令人震惊，但长期充实元老院的那些地位较低的家族同样损失惨重。如此之多的冲突和死亡摧毁了他们的政治理想，打乱了旧的友谊和联盟关系，甚至遏制了贵族本能的野心。元老和其他人一样，最渴望的是和平。

元老院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安东尼的死讯。主持此次会议的是补任执政官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他是那位著名演说家的儿子，与父亲同名，曾在法萨卢斯的庞培军中反对尤利乌斯·恺撒；在腓立比战役中支持布鲁图斯，反对三头同盟；后来又加入了塞克斯图斯·庞培阵营。前39年，被镇压的人获得大赦，他才返回罗马，后来得到了恺撒的恩宠。前30年的两名执政官辞职时，他被任命为补任执政官。他只有三十五岁，但在这些年里，年龄资格已经不算什么了。这一年的另外一位执政官是同样年轻的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

也就是尤利乌斯·恺撒的盟友克拉苏（他于前53年在卡莱惨败）的孙子。就在前不久，这位小克拉苏还是安东尼的支持者，但后来成功地改投恺撒门下。他和小西塞罗后来都当上了行省总督，小克拉苏在马其顿总督任上打了一场非常成功的战役。旧日豪门的名字又开始浮现，但要说一切恢复原样，还为时尚早。恺撒在前30年第四次担任执政官，前29年第五次担任执政官。

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小西塞罗恰恰在这次会议上，听到了那个曾下令处死他父亲的人自杀的消息。当初，恺撒同意安东尼处死演说家西塞罗的决定，但大家一般认为安东尼是杀害西塞罗的幕后指使，而且肯定是他命令将演说家的首级和手割下来公开展示。亚克兴角大捷的喜讯促使元老院授予恺撒一次凯旋式，现在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死讯以及占领埃及的捷报推动他们授予恺撒又一次凯旋式。胜利者本人此时不在罗马，凯旋式只是他获得的大量荣誉中的一部分。安东尼战船的冲角被树立在广场的几个关键地点，作为战利品；还将建造一座拱顶，以纪念恺撒的胜利；此外还设立了几个新的节日。罗马的所有神职人员和维斯塔贞女的祈祷中都必须为恺撒祈福，即便是私人用餐时也要以他的名义奠酒。奠酒的命令肯定是不可能强制执行的，但仍然很快成为根深蒂固的习俗，这又一次说明人们是多么望眼欲穿地渴望和平，并希望恺撒能给人们带来和平。^[13]

元老院还投票表决，授予胜利者新的权力，包括某些形式的司法权责。恺撒谢绝了授予他的一些荣誉。据说他最喜爱前29年1月11日举行的一次仪式。这次仪式与广场上的雅努斯·格米努斯神庙有关，这座神庙很小，形似拱顶。古老的门神雅努斯·格米努斯有两张脸，一张往前看，另一张向后看，被认为与事情的开端有关联，所以在每年的1月，人们常向他祷告。神庙的狭窄两端有青铜门，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就打开门。因为罗马人几乎总是在某地与某人交战，所以神庙的门已经多年没有关过了。

现在，元老院命令举行一场仪式，正式将神庙的青铜门关闭，以象征恺撒的胜利终于恢复了和平。元老们宣布，将举行一种叫作平安占卜的仪式，不过仪式的时间可能是前28年。此种仪式仅在和平时间举行，旨在从诸神那里寻求吉兆，表明此时适合为罗马人民的安全祈福。关门仪式和平安占卜仪式，和向埃及宣战时的仪式一样，都很古老，或许根本就是当时的人捏造的，至少仪式的细节是当时发明出来的。但它们让大家觉得自己与遥远的过去，与罗马繁荣昌盛、胜利不曾被内战玷污的时代，有着关联。^[14]

元老们和绝大多数人民一样，渴望和平，所以他们在命令举行上述仪式时，刻意忽略了高卢和西班牙尚未熄灭的战火。虽然元老院向恺撒授予的大量荣誉有很大的阿谀奉承成分，就像元老院当年向尤利乌斯·恺撒泼洒荣誉一样，但人们真诚地渴望稳定的生活。在前29年，一个人拥有绝对权力的概念已经不像差不多二十年前尤利乌斯·恺撒击败庞培时那样让人震惊了。二十年前，许多贵族觉得尤利乌斯·恺撒的独裁是不堪忍受的。尤利乌斯·恺撒于前45年在西班牙取得最终胜利之后建立的和平很短命。前40年和前36年的充满和平期望的时期也转瞬即逝。如果对稳定的渴望比过去要强烈，那么人们也更清楚地知道，稳定仍然可能是短暂的。一切都取决于年轻的恺撒，取决于他打算做什么。目前他还留在东方，直到前29年夏末才返回意大利。元老们和其他人能够做的只有等待，并心怀希望。

胜利者

现在，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思考一下，年轻的恺撒如今是怎么样一个人。到目前为止，我们追踪了他的政治生涯，目睹了他的崛起。从一开始，他的雄心壮志就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政治才干以及相当程度的好运气（罗马人认为好运气对任何成功者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夸张地认为他具有完美的政治实用主义精神，

或者假定他始终是他后来成为的那位伟大的、成功的政治家，他的思想很早就被确定下来，就大错特错了。恺撒犯过错误，但也表现出愿意吸取教训的精神。在研究古典世界时，我们总是更容易看到人物做了什么，而较难理解他的内心思考和性格。

我们可以瞥见在政治家外表之后隐藏的那个真实的人，最有意思的肯定是他与李维娅非常不体面的仓促结婚。这显露出了一个迅速崛起至高位置、手握极大权力的年轻人的急躁。但这段婚姻维持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他的漫长生命落幕。在某个时间，最可能是前30年代，李维娅怀孕了。孩子胎死腹中，可能分娩也特别困难或有着不同寻常的危险。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这对夫妇没有再生孩子。她很可能再也没有怀孕过。有传闻称，恺撒与其他女人有过很多婚外情，其中一些女人据说还是他的妻子选来送给他的，这也许说明他的全部或大部分肉体愉悦都是从其他女人那里寻得的。罗马元老往往会结好几次婚，如果妻子对他们不再有价值，就可能与其离婚。恺撒没有与李维娅离婚，但并没有政治上的因素迫使他与她保持夫妻关系。她的家庭背景很好，却没有强大到如果离婚就会对他不利的程度，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女人拥有很好的家庭背景。他们的婚姻生活维持了这么多年，说明他们之间持续着深深的爱意，以及互相尊重和依赖。恺撒并非仅仅看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我们在探究他的其他家庭成员时必须牢记这一点。^[15]

他表现出了另一种类型的激情。在镇压政敌、腓立比战役与佩鲁西亚战争胜利的时期，他显然非常热衷于发布死刑命令。恺撒知道自己常常大发雷霆、做出严酷的裁决。他的教师之一——来自希腊的修辞学教师阿提诺多罗斯——给了他这样的建议：“发怒的时候，在说话之前，先背诵一遍字母表。”据说在恺撒大发脾气的时候，差不多只有梅塞纳斯一个人能够安抚他的情绪。狄奥讲了一个故事来证明这一点：有一次梅塞纳斯来见他时，他正在主持朝政；梅塞纳斯看

到恺撒正打算把一大批人判处死刑，于是努力在围观者中挤出一条路，走到恺撒身边。但梅塞纳斯挤不过去，于是在一块木板上写道：“刽子手，请站起来！”

他将木板扔到恺撒怀里，促使他立刻结束了工作，没有做出任何判决。狄奥告诉我们，恺撒对梅塞纳斯非常感激，因为梅塞纳斯坦率地指出，怒气会让他犯错误。这个故事发生在恺撒政治生涯的早期。在打败了塞克斯图斯·庞培和安东尼之后，恺撒就更愿意效仿尤利乌斯·恺撒的仁慈，去宽恕敌人。这或许说明他在慢慢成熟，不过目前还没有人知道这种变化是不是永久性的。^[16]

年轻的恺撒虽然迅速地在血雨腥风中崛起为最高统治者，但在很多方面，他还是他那个阶层的典型分子。有些学者喜欢把他视为外省士绅的情感与元老精英集团品位的混合体，但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猜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往往很难了解到元老院之外任何人的道德、精神和政治立场。很显然，恺撒有着罗马精英集团大部分人的那种文学兴趣，他自己也写诗（有时是非常淫荡的诗），并广泛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著作。^[17]

在前30年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恺撒定期与阿提库斯（西塞罗的同学和终生好友）通信。阿提库斯去世不久之后发表的一部传记声称，即便恺撒与阿提库斯两人都在罗马，如果恺撒不能亲自拜访阿提库斯，也几乎天天给他写信，“有时询问古代史的问题，有时向他请教诗歌中比较难懂的段落，有时开玩笑地尝试诱导他写更长的信”。这些话题在贵族的交流中都是常见的。阿提库斯没有从政，而且始终是个骑士，没有获得元老身份，但他非常富有，而且人脉比很多元老都更强大，他与当时政坛的几乎所有关键人物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就是由于逃避政治，他才在几十年的动荡中幸存下来。在前2世纪和前1世纪之交出生的那一代人中，像他这样明哲保身、躲过血雨腥风

的人并不多见。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曾定期给阿提库斯写信，布鲁图斯也是。他与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密谋者很亲近，在前44～前43年安东尼被谴责时，他还保护了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后来，三头同盟镇压政敌期间，心存感激的安东尼庇护了阿提库斯，也与他通信。阿提库斯地位巩固，受到广泛仰慕，与他结交无疑是一种微妙的地位象征，但这并不是说恺撒与他的友谊不真诚。阿格里帕娶了阿提库斯的女儿，这肯定是门当户对的婚姻，也表明了阿提库斯与恺撒的亲密关系。阿格里帕夫妇生了一个女儿维普撒尼娅，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许配给了李维娅的长子提比略。[\[18\]](#)

阿提库斯写了好几部书，其中有一部赞颂了西塞罗前63年当执政官的事迹，但最有名的是他的《编年志》，这是一部编年史，主要是讲罗马历史。他对遥远的过去，体制、仪式与风俗的起源，以及古人的成就，都兴趣盎然。他和西塞罗常对自己同时代人的无知感到震惊，这些人甚至连自己祖先的政治生涯和官职都一头雾水。这个时期，爱好历史是很常见的，既是为了历史本身，也是为了逃避前1世纪的风云动荡。这些年里研究历史最勤奋的学者是博学之士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不过和阿提库斯的作品一样，瓦罗的大部分著作都没有保存到今天。直到前3世纪和前2世纪之交，罗马人才开始编纂史书，虽然对更早的时期也有一些文献记载，但这些资料往往非常混乱和残缺不全。所以，尤利乌斯·恺撒穿上阿尔巴朗格古代国王的长袖上衣和靴子时，没有人知道这种风格究竟有没有真实的历史依据。[\[19\]](#)

他的继承人似乎从幼年便对罗马的传统有着浓厚兴趣。对历史的兴趣能够帮助他赢得阿提库斯的友谊，以及其他很多志同道合的贵族的好感，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恺撒对历史的兴趣是不真诚的。在政治上，这非常有利，不过我们很难说得清，诸如复兴国务祭司长矛仪式这样的事情，是出于他的历史兴趣和真诚的热情，还是因为这些事情

是很有价值的象征，他对这方面的兴趣使其更容易利用这些象征。阿提库斯建议了另外一种表现自己尊重传统的方式：修缮“誓言守护者朱庇特”的神庙。年轻的军阀亲自去了这座倾颓半壁的建筑，视察了存放在那里的遗迹，其中有些据说有数百年历史。^[20]

阿提库斯于前32年在罗马去世，没有活着看到内战的结束。他病得很重，决定绝食自杀，享年七十七岁。这意味着他不需要在恺撒和安东尼之间做出选择，不过凭借他的年高德劭，以及处理类似事情的惯常本领，他一定能在内战中生存下来，并且仍然保留胜利者的好感，而不至于失去幸存的失败者的友谊。阿格里帕在他临终前拜访了他，尽管他的葬礼很简朴，但所有的贵人都到场了。我们不知道恺撒有没有参加葬礼，这个时期他完全可能在罗马。^[21]

对历史和传统的尊重代表着恺撒性格中比较柔和的一面，不过这一面也可以转化为政治优势。但从这方面，我们无法推测他最终返回罗马后可能做些什么。目前，他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到前30年，恺撒指挥着大约60个军团，比尤利乌斯·恺撒在其权力巅峰时还要多。在近期，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为所欲为，所以元老院和所有人都赞颂他，并希冀和平。人们为他做的祈福和献祭很可能是真心实意的。他原本就体弱多病，假如他被疾病夺去生命，那么就有新的领袖登场并互相争斗以填补权力真空，结果必然是出现更多混乱。不管大家是否喜欢恺撒，所有人都知道未来取决于他，于是他们等待他回来揭示他的大政方针。

归来

人们等了很久。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自杀的整整一年之后，恺撒才返回意大利。之前他在埃及逗留了几个月，因为那里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他急需资金，亚克兴角战役之后的几个月里驻扎在

意大利的一些军团的骚动更突出了金钱的重要性。恺撒打算向他自己的士兵，以及向他投诚的安东尼士兵分配之前承诺的农场，而不至于给意大利各社区带来很大困难。他尽可能地收购土地，即便是没收土地，也会给前主人一些补偿金或新的土地（通常在外省）。完成这些工作需要大量金钱。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希望逃脱或者与恺撒达成交易的时候，疯狂聚集了埃及王国的财富。现在这些财富都落入恺撒手中，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他还需要从各社区压榨更多金钱。

埃及土地特别肥沃，农业产出丰盛，而且位于好几条贸易路线上，因此非常富庶。这一切早就令罗马人垂涎三尺，仅仅由于政客们彼此嫉妒，不愿意让任何一个竞争对手从中获利，埃及才没有被吞并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恺撒至高无上的地位除去了这个障碍，于是埃及正式成为罗马海外帝国的一部分。3个军团和一些辅助部队将驻扎在埃及，不过自前58年以来几乎一直有罗马军队在埃及，所以这不算什么大变化。不过，设立一位罗马总督是新鲜事，恺撒离开之后，总督将代替他行使全部军政大权，接管托勒密王朝的行政体系。

首任总督是盖乌斯·科尔内利乌斯·伽卢斯，他在攻击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行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伽卢斯颇有文墨，享有诗人的美名，并且与西塞罗和阿提库斯都很友好。他可能只有三十出头，不过在那个雄心青年叱咤风云的时代，这也不算稀罕。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是一名骑士，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没有被吸纳进元老院（此时元老院已经大大扩充）以奖励他的忠诚。后来接替他的所有埃及总督都是骑士，恺撒还正式禁止任何元老涉足埃及。我们很难说，是因为恺撒从一开始就打算只派骑士当埃及总督，还是因为伽卢斯的忠诚和才干比他的地位更重要。恺撒在埃及拥有相当多的私人地产，但要说埃及是唯一一个成为他私产的行省，就有些夸大其词了。在其他行省也有属于他的地产。[\[22\]](#)

后来，伽卢斯的部下被派去镇压底比斯（古老的上埃及王国[23]）的叛乱。叛乱的原因可能是埃及人对托勒密王朝还有一些残存的忠诚，或者怨恨新来的征服者，或者不满罗马人强征的赋税徭役，或者所有这些原因混合起来。叛乱很快被平定下去。但在开始这些军事行动之前，恺撒还派遣他的士兵去维修和改良灌溉系统，这些设施帮助人们控制一年一度的河水泛滥，以便尽可能地利用尼罗河的馈赠。托勒密王朝在其鼎盛时期曾花费很大力气去管理这些运河和排水沟，但后来王族因为争夺王位的内乱而耗尽了力量，于是灌溉系统被遗忘了。有现代学者说，在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统治下，埃及繁荣昌盛。这忽视了她统治期内漫长的混乱和动荡。显然很多水利工程要由恺撒的士兵来承担。他这么做的目的不是无私的。恺撒希望新行省提供稳定的粮食和其他财富，成为罗马的永久性财产。[24]

恺撒在埃及的时光并非纯粹用于工作。他参观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陵寝，并对此事大肆宣传。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体 and 送葬队伍在前往家园马其顿的途中被托勒密一世拦截，并带到了埃及。遗体最终被停放在亚历山大港的一座宏伟陵墓内。棺材原先是黄金的，后来托勒密王朝的一位囊中羞涩的国王将黄金棺材熔化，换成了水晶。[25]

到目前为止，亚历山大是历史记载比较详尽的年代里最伟大的英雄。庞培努力把自己打造成罗马的亚历山大，而据说青年时代的尤利乌斯·恺撒在看到这位伟大征服者的半身像时不禁潸然泪下，因为马其顿国王在同样的年龄已经征服了半个世界，而他却还没有什么成就。亚历山大与恺撒的共同点——青春年少、难以抑制的充沛精力和奇迹般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时期很多恺撒雕像的头发也被做成马其顿国王那种风格，绝非巧合。他打算瞻仰伟大征服者的遗骸，将其带出陵墓，用鲜花装饰遗体，并为其戴上一顶金冠。他可能太激动了，以至于伸手触摸亚历山大遗体的面部时，不小心把鼻子的一部分撕了下来。[26]

恺撒触摸到了过去，虽然用力过猛，却让人联想起亚历山大的精神。亚历山大曾在急躁之下挥剑砍断戈耳狄俄斯之结^[27]。恺撒自己的豪华陵墓正在罗马城正式边界之外的战神广场施工。规模宏伟的陵墓，以及他有意识地将自己与亚历山大联系起来，说明他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还不打算掩饰自己的权力。恺撒在亚历山大港的时候还命令将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安葬在她已经准备好的墓穴内。他的这个姿态很慷慨，但同时也是在提醒大家，安东尼是个忘记了爱国的罗马人，竟然想要和自己的外国情妇一起葬在国外。罗马元老院在向恺撒授予大量荣誉的同时，也拆毁了安东尼的雕像和纪念碑，甚至命令他们家族的人不准再用马克·安东尼这个名字。这倒不是为了将安东尼从历史中铲除，而是为了确保他的可耻被永久地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28]

恺撒离开埃及之后，去了叙利亚。就像上一次短暂到访叙利亚一样，他发现自己必须确认地中海东部行政管理的安排。在那里和在罗马与意大利一样，当地统治者和社区都希望得到稳定安宁，毕竟他们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帕提亚入侵，还被迫为罗马的内战出钱出力。一些附庸统治者被替换，一些社区获得了一部分特权，一些社区失去了一部分特权。这句简单的概括掩盖了漫长而艰难的一轮又一轮请愿、代表团拜访和会议，以及恺撒拿定主意后宣布自己决定的过程。他的慷慨大方鼓励人们向他效忠。在过去，该地区的人都没有任何选择，不得不支持安东尼，还有他之前的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和其他人。^[29]

腓立比战役之后，安东尼写信给犹太祭司长和国王赫卡努斯二世，告诉他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没有合法权力，他们的残暴冒犯了诸神，而他们的失败给了他（安东尼）机会，“让我们的盟友也享有神赋予我们的和平；由于我们的胜利，亚细亚的身躯从一次重病中逐渐恢复了”。恺撒此时也在贯彻同样的安定精神。战争已经结束，正义

的一方获胜了，那些曾为恺撒作战的社区将得到特别的奖赏。就像对历史上曾经的征服者一样，各社区也热忱地膜拜罗马领袖本人，以表达自己的忠诚。以弗所^[30]和尼西亚^[31]被允许建造供奉神圣尤利乌斯和罗马女神的神庙。罗马公民被命令只能崇拜这些神祇，但外省居民被允许将恺撒本人奉若神明。亚细亚行省的帕加马和比提尼亚行省的尼科米底亚建造了大型神龛。罗马公民和外省居民在是否奉皇帝为神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将会持续几个世纪。^[32]

总的来讲，保持原样、尽可能少地改变现状、确认大多数附庸统治者的权力，是更简单也更务实的做法。这种做法很可能赢得急于被新政权接受的人的感激。长远来看，这些地区需要稳定，这样才能恢复元气，再一次为罗马人带来利益。在短期内，和在埃及一样，叙利亚的统治者和各城市也都急于讨得恺撒的欢心，于是热情洋溢地向他奉上礼物，所以他原本就非常强势的财政地位变得更加稳固了。一年前恺撒还囊中羞涩、急缺资金，现在却享有数额巨大的盈余。他返回罗马之后，罗马的利率猛跌，据狄奥说从12%下降到了4%，因为他给罗马经济注入了大量现金。^[33]

犹太的大希律王为赢得恺撒的永久支持做了很大努力，我们对此比较了解。他向恺撒求救，在恺撒入侵埃及之前被确认为犹太国王。在入侵埃及期间，大希律王又一次来到恺撒身边，为他带来军队需要的给养和资金。恺撒离开埃及前，大希律王又一次拜访恺撒，并奉上更多的礼物。之前安东尼把大希律王的一些土地夺走，送给了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恺撒如今将这些土地物归原主。女王的卫队（数百名高卢人）也是安东尼的礼物，如今也被恺撒赠给犹太国王。但大希律王仍然非常紧张，并且越来越偏执。他在第一次心惊胆战地拜见恺撒之前，将自己的妻子米利暗（赫卡努斯二世的外孙女，所以是真正的犹太王族血脉^[34]，而大希律王是以东^[35]人，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及其母亲送到一座要塞，让她们在那里等他回来。这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她

们，但他留了命令，如果他未能赢得恺撒的欢心、未能返回，就将他的妻子杀死。他自己的母亲和妹妹非常憎恨他的妻子和岳母，这两派女人互相之间的恨意显而易见，不共戴天。他把母亲和妹妹送到了马萨达^[36]的一座要塞。

大希律王成功返回了，但他的妻子得知他曾秘密命令处死自己的事情之后，非常恼怒。大希律王希望妻子这样思考：他对她无比挚爱，不能容忍其他男人占有他，所以在自己保不住性命的情况下要把她杀死。但她可不会这么想。几年前，她的兄弟“意外”溺死，大希律王被怀疑是凶手，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早就高度紧张了，很快就恶化。他指控某些人要毒死他，最终他的岳母也加入反对女婿的阴谋中，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女儿注定要被他害死。米利暗于前29年被处决。大约在前30年，大希律王还处死了她的祖父，即年迈的赫卡努斯二世。尽管赫卡努斯二世早就被残害得肢体残缺，不能担任祭司或国王，大希律王还是觉得他对自己是个威胁。这位老人曾经作为俘虏被帕提亚人关押了一些年。大希律王指控他与帕提亚帝国私通，将他判处死刑。^[37]

让恺撒长舒一口气的是，帕提亚人目前忙于内战，王室成员在争夺权力，因此，罗马的东方各行省没有被入侵的危险。贺拉斯等诗人鼓吹为在卡莱和安东尼的惨败中丧生的罗马人和珍贵的军旗复仇，但恺撒还不打算满足这样的要求。入侵帕提亚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大业。即使一切顺利，也要很多年才能胜利，而一旦遇到挫折，他的声誉就会就像安东尼那样受损。更重要的是，东方各行省有没有充分地恢复元气，能不能为这样一场大规模战争提供资金、给养和支持，都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恺撒不急于长时间远离罗马，去进行如此艰难的冒险。他允许帕提亚国王的一位被打败的兄弟居住在叙利亚。与此同时，他正式向帕提亚内战的胜利者——国王弗拉特斯四世——保证罗

马的和平意图。弗拉特斯四世将自己众多儿子中的一个送到罗马当人质。恺撒这次外交上的成功被赞颂为伟大的胜利。[\[38\]](#)

东方各行省暂时得到了平定和安宁，恺撒也收到了埃及和其他行省与王国的大宗赋税，因此富得流油，于是在前29年夏季开始返回意大利，途中游览了希腊。在意大利，他受到了群众欣喜若狂的欢迎，他的慷慨大方也有助于赢得人们的好感。意大利各社区为他送上赠予胜利者的传统金冠，不过这种赠礼只是名义上的，惯常的做法是赠送价值相当的黄金。他原先的巨额债务早已偿清，开销也得到支付，还剩下一大笔盈余。于是恺撒宣布他不会接受金冠。元老院命令所有阶层的人和所有祭司，包括维斯塔贞女，都出城迎接他。他也拒绝了这种礼遇。他说，灶神庙的圣火不应当无人照管，于是维斯塔贞女留在城内。虽然政府并没有正式下令，但所有的主要宗教崇拜团体和许多个人都举行了公共献祭，感谢诸神保佑他安全归来。一大群人自发地等待着，为他欢呼。[\[39\]](#)

欢迎的人群并没有被挡在远处，也并非只有达官贵人才能接近恺撒。接近得胜军阀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的胳膊上站着一只渡鸦，他训练这只渡鸦喊道：“恺撒万岁，胜利的统帅！”恺撒大为赞许，心花怒放，于是花5000迪纳厄斯买了这只鸟。不久之后又有一个人走上前来。原来他是刚才那个驯鸟师的生意伙伴，他自己没有得到赏金，非常不满。他说还有第二只会说话的鸟，于是很快带着另一只渡鸦来了。这只渡鸦非常不知趣地喊道：“安东尼万岁，胜利的统帅！”恺撒感觉很好玩，并没有生气，命令第一个人与他的伙伴分享5000迪纳厄斯。毫无疑问，假如是安东尼凯旋，也一定会有欢呼雀跃的人群迎接他。最让人高兴的是，内战终于结束了，人们有希望过上长久的和平生活。胜利者如此慷慨大方的消息促使一些人送来了一只受过训练、会说同样的话的喜鹊，恺撒也把它买下了。一个贫穷的鞋匠得到灵感，又弄来一只渡鸦，尝试训练它。他的努力失败了，不过这只鸟

后来学会了他气急败坏的呼喊：“我的所有辛苦，所有钱，都白费了！”据说，从一大群急于吸引他注意力的群众当中，恺撒听到了这只鸟的嘶哑声音。他被逗乐了，于是用高于5000迪纳厄斯的价格买下了它。[\[40\]](#)

前29年8月13日，年轻的恺撒终于庆祝了他早在前34年凭借征讨伊利里亚人的战功而获得的凯旋式。次日他举行了第二次凯旋式，这一次是纪念亚克兴角大捷，展示了从敌船船首取下的冲角，以及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不寻常的武器、俘虏，还有载着描绘战争场景图画的花车。游行非常恢宏壮观，接连两天慷慨地展示了来自埃及的战利品。8月15日，举行了第三次凯旋式，这一次是为了庆祝征服埃及，无疑是最壮美的一次。托勒密王朝以奢靡著称，他们的典礼和游行非常复杂，神话般奢华，所有的东西都是黄金或其他贵金属制成，镶嵌宝石，悬挂着来自远东的丝绸。现在，所有这些华美的物件全都被展示在罗马街头。最后一天凯旋式的战利品包括双胞胎亚历山大·赫利俄斯和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他们只有十多岁。他们母亲的肖像被做成假人展示，还出现在至少一幅图画中，描绘了她手里拿着毒蛇准备自尽的场景。三天里，有另外七位国王或王子被押过市中心，包括加拉太统治者和安东尼的其他盟友。其中有些人被处决，但大多数都被饶恕了。[\[41\]](#)

恺撒本人似乎只参加了第三场凯旋式，而且直到那时才进城。他乘坐一辆战车走过圣道，身穿凯旋将军的紫红袍服，面孔被涂成红色。按照常规，拉车的是四匹骏马。最左侧的马上坐着李维娅的儿子提比略·克劳狄·尼禄，而右侧的马（根据罗马风俗，右侧比左侧的位置更尊贵）上坐着屋大维娅的儿子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两个男孩都大约十一岁。凯旋将军的儿子和亲属参加游行是很常见的，所以这个姿态并没有皇朝主宰天下的意思。跟随战车的不仅有参加了这些战役的元老（这是惯例），还包括恺撒的同僚执政官和当年

的许多其他行政长官。更常见的做法是让这些入引领游行队伍，这或许是为了强调，胜利属于整个国家。^[42]

恺撒返回罗马的时候，离他的三十四岁生日还有一个多月。这一年，他第五次担任执政官，并将于前28年1月1日第六次担任执政官，这一次的同僚是阿格里帕。元老院授予他们监察官的权力（不过没有给他们监察官的职位）。他们宣布，将执行自前70年以来第一次正规的人口普查。他们更全面的计划是什么，还很难判断。目前，恺撒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这最近一场内战的胜利究竟能不能带来持久和平，大家拭目以待。^[43]

[1]. Tacitus, *Ann.* 1.2 (Loeb translation, slightly modified).

[2]. *Res Gestae* 3, 4 (Loeb translation).

[3]. Horace, *Odes* 1.37 (Loeb translation).

[4]. 伊西斯起初是埃及的女神，后来在整个希腊-罗马世界受到广泛崇拜。她是理想的母亲和妻子，是自然与魔法之神，保护奴隶、罪人、手工艺人和被压迫者，也倾听富人、统治者、贵族和少女的祈祷。她常被认为是荷鲁斯（隼头人身，法老的守护神）的母亲。伊西斯的意思是“王座”，她的头饰就是王座。埃及法老被认为是她的孩子。在埃及神话中，她的丈夫和兄弟奥西里斯被塞特杀害并肢解后，她收集散落在大地上的尸块，用魔法让奥西里斯复活。

[5]. Virgil, *Aeneid* 8.678-99 (Loeb translation, slightly modified).

[6]. 对此次战役描述的讨论，以及此主题的大量文献，见C. Lange, *Res Publica Constituta. Actium, 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 (2009), pp.75-90, with J. 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370-72, 375-83。

[7]. 布立吞人是在铁器时代、罗马时代和之后一段时期生活在今天不列颠的一些凯尔特族群。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始定居不列颠后，布立吞人要么被

同化吸收，成为后来的“英格兰人”的一部分，要么退居到威尔士、康沃尔、苏格兰等地，也有的迁徙到今天的法国布列塔尼。

[8] Horace, *Epodes* 7.1-10 (Loeb translation)；民众希望战胜帕提亚人和在不列颠的征服，见J.Rich, ‘Augustus, War and Peace’, in J.Edmondson (ed.), *Augustus* (2009), pp.137-64, esp.143-6 = L.de Blois, P.Erdkamp, G.de Kleijn and S.Mols (eds), *The Representation and Perception of Roman Imperial Power: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Workshop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Impact of Empire (Roman Empire c.200 BC-AD 476)* (2003), pp.329-57。

[9] Horace, *Epodes* 16, quotes taken from lines 1-9 (Loeb translation)。

[10] Horace, *Epodes* 1讲到梅塞纳斯随恺撒舰队出航，诗人虽然身体虚弱，但也觉得自己必须一同前往，见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362-3；贺拉斯在腓立比战役，见*Odes* 2.7，其中讲到他逃离战场，参见*Epistulae* 2.2.46-51。

[11] Suetonius, *Augustus* 51.1.另见Velleius Paterculus 2.86.1-3；对奥古斯都宽待旧敌的详尽讨论，见M.Dowling, *Clemency and Cruelty in the Roman World* (2006), pp.29-75。

[12] 例如Tacitus, *Ann.*1.1-2, 4, with W.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pp.1-16。

[13] Dio 51.19.1-7, with C.Lange, *Res Publica Constituta. Actium, 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 (2009), pp.125-48 包括详细讨论，W.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pp.182-3；渴望和平，见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389-98。

[14] Dio 51.20.4-5, Suetonius, *Augustus* 22, *Res Gestae* 13, with C.Lange, *Res Publica Constituta. Actium, 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 (2009), pp.140-48及J.Crook in *CAH2* X, pp.74-5；Dio 51.19.7讲到司法权，他将其与雅典的雅典娜投票相比，他有权在任何法庭投票。或许他被允许担任最高上诉法官，但细节

不明确；关于平安占卜 仪式，见W.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 p.41, fn.92。

[15] Suetonius, *Augustus* 63.1讲到流产的孩子，概况见A.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 pp.28-34, 118-22, 及M.Dennison, *Empress of Rome. The Life of Livia* (2010) , pp.89-96。

[16] Dio 55.7.2-3, with quote from Loeb translation; 阿提诺多罗斯的故事，见Plutarch, *Moralia* 207C.7。

[17] Suetonius, *Augustus* 85.1-2.

[18] 引文见Nepos, *Atticus* 20 (Loeb translation) 。

[19] 关于阿尔巴朗格国王的服饰，见Dio 43.43.2, 及S.Weinstock, *Divus Julius* (1971) , p.324; 关于此时期贵族对历史的兴趣，见E.Rawson,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Roman Republic* (1985) , pp.102-3, 233-49。

[20] 见Nepos, *Atticus* 20, 讨论见J.Rich, ‘Augustus and the spolia opima, ’ *Chiron* 26 (1996) , pp.85-127, 尤见113-16。

[21] Nepos, *Atticus* 22.3-4.

[22] Dio 51.16.3-17.8, with A.Bowman in *CAH2* X, pp.676-89, P.Brunet, ‘The administrators of Roman Egypt’ , *JRS* 65 (1975) , pp.124-47及 ‘Princeps and equites’ , *JRS* 73 (1983) , pp.42-75, 尤见62-3; 关于Gallus见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p.252-3, 300。

[23] 在埃及南部。

[24] Dio 51.18.1, Suetonius, *Augustus* 18.2.

[25] G.Hölbl (trans.T.Saavedra) , *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 (2001) , pp.14-15.

[26] Suetonius, *Augustus* 18.1, Dio 51.16.5; 关于肖像，包括他的肖像被做成类似亚历山大形象的时期，见K.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1996) , pp.164-79, 尤见167-8。

[27] 根据神话，弗里吉亚（小亚细亚一地区）没有国王，神谕说第一个赶着牛车进城的人将成为国王。农民戈耳狄俄斯赶着牛车进城，被推举为国王。为了感谢神祇，他将牛车献给神。他的儿子米达斯用一个非常复杂的结将牛车拴在神庙柱子上。传说能够解开这个结的人将会征服世界。亚历山大大帝到访时，尝试解开这个结，但失败了。他挥剑将其砍断，用这种办法把它“解开”了。

[28] Suetonius, *Augustus* 17.4, Plutarch, *Antony* 86, Dio 51.15.1 讲到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下葬，Dio 51.19.3-5 讲到安东尼及其形象公开受辱，C.Lange, *Res Publica Constituta. Actium, 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 (2009), pp.136-40; 亚历山大与戈耳狄俄斯之结的故事，见Plutarch, *Alexander the Great* 18。

[29] Dio 51.18.1-3, with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300-02, 及F.Millar, *The Roman Near East 31 BC-AD 337* (1993), pp.27-34。

[30] 以弗所是一座古希腊城市，位于今天土耳其西部，前10世纪由希腊殖民者建立。前129年被罗马共和国控制。该城的阿尔忒弥斯神庙是古典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公元268年被哥特人摧毁。《约翰福音》可能在此写下。5世纪基督教会的多次会议在以弗所召开。后来港口因泥沙淤塞而废弃，以弗所逐渐衰败。

[31] 尼西亚古城，今称伊兹尼克，位于今天土耳其西北部，因基督教的两次会议（公元325年和787年）和“尼西亚信经”（基督宗教信仰的一项基本决议）而闻名。1204年拜占庭帝国被西方十字军消灭后，拜占庭贵族以尼西亚为都城，建立尼西亚帝国，最后于1261年恢复为拜占庭帝国。

[32] Josephus, *AJ* 14.314-16, 及14.301-12 (quotes from Loeb translation); 亦见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105-6; 神庙与崇拜仪式，见Dio 51.20.6-8; 皇帝崇拜，概况见S.Price, *Rituals and Power. The Roman Imperial Cult in Asia Minor* (1985), 及J.Scheid, 'To honour the Princeps and venerate the gods. Public cult, neighbourhood cults, and imperial cult in Augustan Rome', in J.Edmondson (ed.), *Augustus* (2009), pp.275-99, 尤见288-99。

[33] Suetonius, *Augustus* 41.1, Dio 51.21.5.

[34] 此处简要介绍一下犹太王国哈斯蒙王朝末期的历史。赫卡努斯二世与其弟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争权，后者得胜。赫卡努斯二世不甘心，在重臣安提帕特帮助下反抗。伟大的庞培率领罗马军队来到犹太，攻占耶路撒冷，废黜了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立赫卡努斯二世为傀儡（庞培恢复了他的大祭司位置，但没有恢复其王位），由安提帕特辅佐。

前47年，尤利乌斯·恺撒在亚历山大港作战期间，安提帕特率军支援他，因此得到恺撒的好感，在恺撒支持下成为犹太的实际统治者。安提帕特被谋杀后，他的儿子大希律王赢得罗马内战的胜利者奥古斯都的支持。

[35] 以东是一个古代地区，大致在今天以色列南部、死海以南。其居民为闪米特人，与犹太人血缘相近。

[36] 位于今天以色列的东部，死海之滨。

[37] Josephus, *AJ* 15.161-78, 183-236, *BJ* 1.386-97, 431-44, with E. Schürer, G. Vermes & F. Millar,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1 (1973), pp.301-3; Josephus, *BJ* 1.397 讲到卫队。

[38] Dio 51.18.2-3, with A. Sherwin-White, *Rom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st, 168 BC-AD1* (1984), pp.324-41, 及J. Rich, 'Augustus, War and Peace', in J. Edmondson (ed.), *Augustus* (2009), pp.143-8。

[39] Dio 51.19.2-3, 20.4 with W. 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pp.39-41, 拒绝桂冠, Dio 51.21.4。

[40] 渡鸦的故事，见Macrobius 2.4.29。

[41] Strabo, *Geog.* 12.35讲到一名领袖及其儿子被处死。

[42] 凯旋式见Dio 51.21.4-9, Plutarch, *Antony* 86, *Res Gestae* 4讲到被俘的王族成员, with C. Lange, *Res Publica Constituta. Actium, 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 (2009), pp.148-57, W. 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p. 41; 马凯鲁斯和提比略坐在拉战车的马背上，见 Suetonius, *Tiberius* 6.4。

[[43](#)]. *Res Gestae* 8.

第四部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之子，前27～前2年

凭借这项功业，元老院授予我“奥古斯都”的称号。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第34节^[1]。

^[1] 名字的具体措辞有所变化，他可能仍然被称为恺撒或奥古斯都。有时是奥古斯都·恺撒，有时是恺撒·奥古斯都。——作者注

十二 恢复传统，继往开来

我扑灭内战的烈火之后，在我第六次和第七次担任执政官期间，全体人民同意将全部政权交给我。后来我将共和国交还给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由他们的意志来主宰共和国。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1].

共和国古老而传统的形式得到了恢复。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2世纪初^[2].

前29年8月是普天同庆和一掷千金的时候。恺撒向每一位成年男性公民赠送了100迪纳厄斯（相当于400塞斯特尔提乌斯），后来还以他的外甥马凯鲁斯的名义，向男孩们馈赠了金钱。这些赠礼被宣布为公民得以分享的“战利品”。同时，被安置在意大利和海外各殖民地的约12万退伍军人也每人得到了1000塞斯特尔提乌斯奖金。当年苏拉的老兵在得到农场之后就被遗忘了，后来很多人变卖了自己的农场，或者债台高筑，成为军事力量的来源，很容易被喀提林那样的人利用。恺撒安置的退伍军人更多，他决心不让这些人将来成为不安定因素。现役军人应当也得到了赏金，不过史料中没有提到这方面。阿格里帕等将领则凭借战功得到了奖赏。^[3]

在纪念征服埃及的凯旋式不久之后，罗马城举行了典礼，为两座新纪念碑揭幕，分别纪念取得的胜利和恺撒家族的荣耀。前42年，三头同盟宣布在广场南端独裁官被火葬的地点附近建造一座供奉神圣尤利乌斯的神庙。这座神庙终于竣工，并于前29年8月18日正式开放。在文艺复兴时期这座神庙被拆除了，其建材也被挪为它用，因此，我们今天只能看到神庙的一点点残迹，完全无法想象它原初的壮美。神庙旁有一座新的演讲台，即尤利乌斯演讲台，从那里可以越过广场眺望

主演讲台。前29年，这两座演讲台都装饰着从安东尼战船取下的冲角。三次凯旋式展示的许多战利品都被存放在神庙内。

主演讲台附近屹立着新的元老院议政厅，即尤利乌斯议政厅。尤利乌斯·恺撒启动了这项工程，将元老院议政厅迁到这个新地点，以便让议政厅将罗马广场与他自己筹建的尤利乌斯广场连接起来。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议政厅是3世纪末建造的，但利用了原先尤利乌斯议政厅的地基，规模和形状可能也与原先大体相似。尤利乌斯议政厅的前方原先有一座柱廊，高耸的屋顶（今天的议政厅高度为104英尺，尤利乌斯议政厅可能差不多高）上有一座带翼的胜利女神像，神像踩着一个球体。尤利乌斯议政厅内还有一座胜利女神像，是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城市塔兰托掳来的。罗马人于前3世纪初占领了塔兰托。这座胜利女神像周围环绕着一些来自埃及的精美战利品。有一座维纳斯（尤利乌斯家族的女祖先）雕像，由著名雕塑家阿佩莱斯^[4]创作，被尤利乌斯·恺撒买下。^[5]

除了正式的庆典和凯旋式之外，还举办了一些盛大的公共娱乐活动，以吸引城市居民。在一系列斗兽表演中，专业的猎人杀死了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凶猛野兽。罗马群众第一次见到犀牛和河马。为了愉悦群众，这些野兽被杀死了。为了纪念神圣尤利乌斯神庙的落成，举行了体育和其他竞赛。贵族男孩们骑马参加竞争激烈而往往很危险的“特洛伊”竞技，这种竞技的名字和所谓的起源让人们想起遥远的过去，以及尤利乌斯家族的起源。这些竞技包括赛马（有时一名骑手要同时驾驭两匹马）和赛车。还有好几场角斗士竞技，这种表演原先一般在葬礼上举行，但现在大家已经忘记了这种关系。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开放了他新近建成的石制圆形剧场（这是罗马城第一座此类剧场），并举行了一系列斗兽和角斗士表演。他是恺撒最信赖的下属之一，用在前34年阿非利加战役胜利的收益建造了这座剧场。这些表演很成功，以至于群众投票决定授予他每年提名一名裁判官的权利。

大约在同一时期，恺撒也举办了一些角斗士比赛，包括一场大规模战斗，双方都是战俘，据说一边是日耳曼的苏维汇人，一边是巴尔干的达契亚人。还有一些战斗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其中一名参赛者是元老昆图斯·维特里乌斯，他为了出风头，自愿参加角斗士比赛。并不是每一场角斗士比赛都要打到出人命为止。有些比赛用的是钝兵器，有些比赛是根据点数来评判输赢，就像现代的击剑比赛。虽然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危险性，但大多数贵族都热衷于兵器和武艺，有时非常喜欢竞争。角斗士比赛持续很多天，即便恺撒生病了没法到场观看，比赛也继续进行。^[6]

新的开始

前28年1月1日，恺撒开始了他的第六次执政官任期。他前两次担任执政官时，新年的第一天他都不在罗马城，不过这一次他在城里，因此能够执行传统的仪式。这预示着，这将是不同以往的一年。在三头同盟统治下，执政官得到任命，每年都会任上辞职，由补任执政官接任。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恺撒和安东尼曾各自担任执政官仅一天。这种做法是为了给更多的人当执政官的机会，以便奖赏他们的追随者。但这就让执政官的含金量下降了。不过时代不同了。这一年，恺撒及其同僚阿格里帕将会一直担任执政官到12月31日，那时才正式离职，并发出古老的誓言，保证自己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尽其所能地为国家效力。

根据传统，一年有两名执政官，每个月里其中一人的权力优先，两人轮流。在三头同盟统治下，这种规矩被忽略了，至少在三头同盟之一担任执政官的年份里是这样。前28年，恺撒恢复了传统的做法，1月由他占据优先位置，2月则轮到阿格里帕。恺撒的侍从的变化就象征了优先权的轮换。1月，十二名执法吏走在恺撒前面，为他开道。每一名执法吏都携带完整的法西斯束棒。作为三头同盟之一，恺撒和他的

两位同僚一直都有执法吏陪伴在身边。不过我们不确定，他们是像独裁官那样拥有二十四名执法吏，还是像执政官那样拥有十二名。到2月，以及阿格里帕优先的每个月份，恺撒的执法吏就改为跟在他身后，并且携带的法西斯束棒也与完整的版本明显不同，不过具体细节我们就知道了。这种变化不仅表达了对同僚的尊重，也是对执政官职位的尊重。类似地，此前十年中大量分配裁判官职位的做法也被叫停了，这一年和随后的年份里只有八名或十名裁判官。^[7]

元老院也得到了改革，变得更体面庄重。尤利乌斯·恺撒曾接纳了许多新元老，著名的例子是接受了来自高卢的罗马公民，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这些人脱掉了自己的高卢式裤子，换上了罗马的托加袍，并且找不到去元老院议政厅的路。他还吸纳了更多来自意大利各城镇的贵族人士，所以尽管前49～前45年内战造成了很大损失，但元老院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在独裁官遇刺造成的混乱以及三头同盟统治下，元老院迅速扩大，挤满了三头同盟的党羽，最后人数超过1000人。在这个时代，逃亡奴隶也能当上裁判官；贿赂能使人平步青云，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的。^[8]

恺撒和阿格里帕还拥有监察官的权力，于是开始了四十多年来第一次正规的人口普查。自前71年以来，每五年选举一次的监察官未能执行其职责的核心部分——人口普查。恺撒和阿格里帕的人口普查结束后，一共登记了406.3万名公民及其财产和地位。这个数字是上一次人口普查结果的五倍。在普查过程中，两位执政官还削减了元老院人数。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除掉顽固的安东尼分子或其他异己。他们宣布，这样做的目的是恢复元老院曾经的威望。恺撒发表了一次演讲，请每一位元老来反省自己的名望、财产和祖先血统，判断自己是否真的适合成为罗马威望最高的群体的一分子。随后几天内，大约50人主动退出了元老院，两位执政官还将另外140人除名。这些被开除出元老院的人都重返普通公民的生活，但被允许继续享有穿戴元

老服饰的特权，以及可以在公共竞技和娱乐活动中坐在仅供元老使用的座椅上。被剥夺元老身份的人当中有一个平民保民官，他同时还丧失了官职。

只有那些被正式逐出元老院的人的名字才被公布，这是对他们没有主动离开的一种轻微斥责。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在驱逐这些人的会议上，恺撒在托加袍下穿着胸甲，佩带利剑，就像西塞罗在前63年做的那样，并且身边围绕着十名身强力壮的朋友（都是元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当时没有发生麻烦，后来也没有。苏埃托尼乌斯的这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不过我们必须谨慎，因为之前几十年的高度紧张情绪到这时未必已经完全消散。这可能是因为恺撒对尤利乌斯·恺撒的命运记忆犹新，所以明确表示，虽然他慷慨大方，但绝不打算重蹈养父的覆辙。不过在其他方面，作为一个团体的元老院和各位元老都得到了非常小心的尊重。前29年，恺撒利用自己的权力，向一些人授予了贵族身份。他希望，人数减少后的崭新的元老院（不过人数还是远远多于苏拉时期的600人，更多于苏拉独裁之前正常的300人）能恢复之前的大部分尊严，让显赫大族成员的美名能够在元老院出现。元老名册上的第一人，即首席元老^[9]，是恺撒自己。首席元老的身份虽然不能带来正式权力，但拥有很大威望。^[10]

前28年有三位元老庆祝了凯旋式，5月有一人庆祝了在西班牙的胜利，另一人于6月庆祝在高卢的胜利，还有一人于10月庆祝在阿非利加的胜利。三头同盟都非常慷慨大方地授予其支持者凯旋式的荣誉，哪怕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相比之下，阿格里帕赢得了真正的辉煌胜利却谢绝凯旋式，就更惊人了。不过，庆祝战胜外国敌人的胜利总归是好事，而且这些人的凯旋式不可能与恺撒自己的庆祝胜利仪式相提并论。没有人能够获得可与他媲美的威望，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得到埃及的黄金，更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连续三天举行三场凯旋式。在整个罗马历史上，除了恺撒，只有罗慕路斯和庞培曾赢得三次凯旋式。

尤利乌斯·恺撒一共得到过四次凯旋式，但他的继承人还拥有两次小凯旋式，所以能够和养父平起平坐，甚至超过他。估计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些事情，因为恺撒显然已经获得了与其祖先，包括神圣尤利乌斯比肩的威望。那个“一切都要感谢他的名字的兔崽子”如今已经赢得了最宏伟的胜利。至少在目前，恺撒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其他元老。

[11].

在这些年里，他拥有执政官的衔级和威望。三头同盟已经正式解散，他已经多年没有使用“三头同盟之一”的头衔。不过，他在前43年获得的权力仍然继续有效（直到被正式解除），所以给他的地位增添了额外的法律依据。三头同盟的完整头衔是“恢复国家秩序”的三人理事会。在内战前，安东尼曾说自己要正式辞去这个职务，并要求恺撒也辞职，然后又说等他赢了之后会放弃自己的权力。若要让国家恢复稳定，就必须承诺永久和平。一个世纪之后的塔西佗说，在内战和三头同盟的年代，“没有法律，没有惯例”。换言之，基本的体制崩坍了，被专断的权力取代。[12].

前28年，恺撒将一名裁判官任命为城市裁判官，此人负责罗马城本身的一些具体事务，包括监督主要的法庭。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担任城市裁判官这个威望很高的职位了，也没有证据表明在三头同盟统治下传统的法庭能够正常运作。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密谋者和三头同盟的其他敌人都是在特别设立的法庭上受审的，这些特别法庭运作非常迅速，并且一定会给出令三头同盟满意的结果。根据传统，城市裁判官是抽签产生的，不过尤利乌斯·恺撒曾经自己选择和指定人选，比如他指定布鲁图斯（而不是卡西乌斯）为前44年的城市裁判官。恺撒任命城市裁判官的时候，可能这种指定合适人选的做法已经不再显得专横跋扈。前28年发行的一枚金币上铭刻着这样的口号：“他将罗马人民的法律和权益归还给他们。”这枚钱币的正面是恺撒的头像，戴着胜利者的花冠。在钱币背面，他坐在行政长官的座

椅上，即执政官的象牙座椅。铭文上的“他”指的是谁，是显而易见的。[\[13\]](#)。

除了重新设立法庭之外，恺撒还宣布恢复正常的选举。选举场地是装潢华丽的新围场，由尤利乌斯·恺撒开始建造，由阿格里帕完成。罗马人民现在可以在装饰着大理石与艺术品的“羊圈”集合，他们等待的时候，有遮阳棚提供荫凉。由统治者直接任命行政长官的做法被终结了，不过可能直到前27年秋季才被叫停，但也可能是在前一年。狄奥告诉我们，在前28年，恺撒将国库的控制权交还给从前任裁判官当中挑选的两名官员。很多个人欠国家的债务被一笔勾销，但国库状态良好，因为亚克兴角大捷之后恺撒从埃及和东方各行省获得的大量财富被送入国库。各行省和盟邦王国的稳定意味着将来会有稳定的收入输送到罗马。[\[14\]](#)。

在传统机构被恢复（虽然有时候形式被改变了）的同时，罗马城本身也得到了翻新美化。前30年代末集中的建筑活动持续下来，并得到大力推进。前28年，恺撒回应了元老院的一个请求，命令修复罗马城内的八十二座神庙。其中很多神庙都很小，而且绝大多数都符合简单的传统设计，而不是更宏伟的现代风格。在修复神庙的同时，恺撒还复兴了在每座神庙内举行的古老仪式。虔敬是罗马的一种传统美德，是罗马人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罗马人民缺乏对古老神祇的恰当尊重，体现在最近几代人的道德堕落。在混乱和暴力的几十年里，这种堕落是世人皆知的。罗马人很容易想到，时局动荡是因为人心不古，所以要复兴社会就必须改善人们的行为举止、重新确立与诸神的良好关系，正是这些神祇引领罗马走向辉煌。与此同时，埃及的伊西斯崇拜被驱逐出罗马城。宗教复兴的精神非常严格地遵守传统，由恺撒亲自领导。

在修缮神庙的同时，恺撒当局还在市中心与城外的战神广场继续开展宏伟的建筑工程。阿格里帕仍然非常忙碌。曾举行过凯旋式的元老们继续将他们的一些战利品用于纪念性建筑的建设工程。所有这些工程都为居住在罗马的数千人，甚至是数万人，提供了薪水不错的工作。前28年，恺撒还向有资格领取免费粮食的公民发放了四倍于常规数量的粮食。他尝试对粮食分配工作做一些安排，以避免与建筑工程冲突，但没有成功。这表明在那些年里，大型建筑工程提供就业机会是多么重要。良好的就业机会和国家提供的一些支持让民众相信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和家人，所以很少有人寻衅滋事。^[15]

9月，史上第一届亚克兴竞技会召开了，持续了好几天，又一次让人们想起恺撒的胜利及其带来的和平。战神广场上搭建的临时木制平台上举行了体操表演。很多参赛者来自豪门世家，在形形色色的项目中角逐，以纪念恺撒的伟大胜利。至少有一天全部用于举行角斗士比赛，角斗士都是外国战俘。在此次节庆期间，恺撒又一次病倒了，没有观看剩余几天的比赛。阿格里帕代表他到场，并且像以往一样，让大家都明确知道，节庆活动的功绩属于他的主子，节庆的所有开销也是由恺撒承担的。^[16]

一个月后的10月9日，帕拉丁山上的阿波罗神庙落成并向公众开放。早在前36年，恺撒新近购得的一座豪宅的一部分被闪电击中，于是他发誓要建造一座新的阿波罗神庙。与他主持修复的许多建筑不同，这座新神庙非常奢华，用熠熠生辉的白色大理石建成，饰有黄金，明显受到希腊风格的强力影响，但同时仍然很符合罗马传统。这座神庙是一个更大建筑群的一部分，建筑群还包括一座圣林和一座图书馆。人们认为，亚克兴角的胜利最应当感谢的神就是阿波罗。这座雄踞于帕拉丁山的阿波罗神庙在很远之外就能看见，从广场上也看得见。恺撒的府邸就在神庙旁边，他的府邸似乎已经将现有的多座贵族住宅连接起来。大约在这个时期，恺撒开始主持修建一条路，它从帕

拉丁山的较远一侧连接其宅邸的主门，从屠牛广场^[17]延伸过来，而不是从主广场，这意味着它要在沿途经过其他贵族的宅子。恺撒享有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得到诸神恩宠，其他元老不能和他竞争。他命令将自己的所有黄金塑像和其他纪念塑像全都熔化，铸造成宗教仪式用的三足鼎，献给阿波罗神庙。这种谦虚的姿态就是为了获得大家的赞赏，而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姿态，就和他当初欣然接受这些东西一样，表明了自己的无比强大。^[18]

这些年里还建成了另一座恢宏的阿波罗神庙，不过是对旧神庙的改建。此项工程由盖乌斯·索希乌斯出资和监督，他于前34年占领了耶路撒冷，于前32年在安东尼的庇护下成为执政官，并领导了对恺撒的攻击。但他主持建造的这座神庙还是被冠以他的名字，后来被称为阿波罗·索希阿努斯神庙，这是很不寻常的。这座神庙的檐壁融合了古典希腊雕塑的风格，但新的雕塑描绘了被击败的敌人的形象。这些敌人穿着长裤，更像西方人，而不像犹太人，可能是代表恺撒在巴尔干征服的一些伊利里亚蛮族。索希乌斯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后得到了恺撒的宽恕，被允许完成这项建筑工程，并得到功劳。修复一座旧神庙和纪念罗马军队的胜利，都是很好的事情。索希乌斯费了很大力气才得到赦免，他的这项代价高昂的工程可能是在向新政权表忠心，不是在和恺撒竞争。安东尼和内战的其他所有军阀都出局之后，没有人能和恺撒竞争。^[19]

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20]的故事。他在卸去执政官职务后去了马其顿当总督。前29年，与罗马敌对的部族向马其顿发动袭掠，他做出了积极回应，发动强有力的反攻，打得相当精彩。在第一场大规模战役中，他不仅击溃了巴斯塔奈部落的军队，还亲自在肉搏战中斩杀了他们的领袖——戴尔多国王。此次胜利之后，他扩大了行动规模，在这一年和随后一年里赢得了许多胜利。这些行动有点像尤利乌斯·恺撒在高卢的最初干预，大胆甚至残酷无

情地利用一切机会将战事升级，并迅速歼灭每一个新敌人。狄奥对这些军事行动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李维可能也留下了相关记述。但这些行动持续不超过两年，而且就像尤利乌斯·恺撒一样，克拉苏的一切作为都可以被描述为符合罗马人民的更广泛利益。[\[21\]](#)。

克拉苏可能在前28年年末或前27年年初返回罗马，并得到了凯旋式的荣誉。他肯定比在三头同盟统治下庆祝凯旋式的很多人都更配得上这项荣誉。据狄奥说，人们以克拉苏和恺撒的名义献祭，纪念他的成功，而恺撒凭借这些军事胜利获得了凯旋将军的头衔，克拉苏却没有。狄奥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希腊出土的两座碑铭上记载了克拉苏的凯旋将军头衔，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些碑铭完工之后传来消息，克拉苏的凯旋将军头衔被取消了。我们也可以确定，恺撒并没有因为克拉苏的军事胜利而得到凯旋将军头衔。[\[22\]](#)。

狄奥还告诉我们，假如克拉苏是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动的（但事实上，他是资深执政官，而非当年在任的执政官），就能凭借亲自斩杀戴尔多的功绩在凯旋式之外赢得至高无上的荣誉：举行奉献“最高战利品”的仪式，把即将死去的敌人的盔甲兵器奉献给誓言守护者朱庇特神庙。历史上只有三位罗马统帅曾获得此项荣誉。第一位是前8世纪的罗慕路斯，第二位是前5世纪的科尔内利乌斯·考苏斯，最后一位是前222年的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23\]](#)。罗慕路斯赢得此项荣誉时是国王，马凯鲁斯则是执政官。考苏斯的地位不太清楚，根据李维的记载，考苏斯当时应当不是最高统帅，而是一位下属。但根据后人附会的版本，李维又说：“与我的前辈和我本人曾经说的相反，考苏斯杀死维爱王国国王的时候，是执政官。”李维这番话的资料来源是恺撒本人，后者“修复了年久失修的誓言守护者朱庇特神庙之后走进神庙，命人将据说是考苏斯奉献的敌人亚麻布胸甲上的文字读给他听”。李维“觉得，是恺撒修复了这座神庙，若不相信他的证词，简直是亵渎神明”。虽然有这段文字，李维还是没有更改自己史书的措

辞，在书里仍然说考苏斯是一位军事保民官，为一位独裁官效力。

[24].

有些现代学者认为，恺撒这番证词的背后有不可告人的隐秘动机，因此这不仅仅是关于历史趣闻的证据，更表明了恺撒紧张兮兮地害怕与人竞争的心态。按照这种理解，克拉苏继承了他祖父的财富并拥有古老贵族世家的遗产与威望，像一位真正的罗马贵族那样行事，决心赢得威名，与所有同时代人（包括恺撒）一决高低。克拉苏是将近两个世纪里第一位亲手斩杀敌军统帅的罗马将军，他很自然地会要求获得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荣誉，以增加其家族和本人的荣耀。恺撒害怕竞争者，嫉妒其他人的光辉，尤其是事关奉献“最高战利品”或关闭雅努斯神庙大门这样的古老仪式。于是，恺撒授意元老院拒绝授予克拉苏这项额外的荣誉。拒绝的理由是他在一座坍塌神庙的古代胸甲上看到的文字，这个理由很可能是捏造的。恺撒简直不顾一切了，他非常害怕更多元老会集结到这样一位豪门子弟旗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复苏如此古老的荣誉，防止竞争对手因此崛起。克拉苏被允许举行凯旋式，但仅此而已，后来就在史书里沉默了，尽管他的血脉延续了下去。[25].

阴谋论总是很吸引人，而这个故事塑造了非常有意思的形象：恺撒在反对派元老的强大压力下，高度紧张地努力巩固和保护自己的地位。这种说法非常流行，已经被当作是真的，我在其他地方也曾信以为真。但只要仔细研究一番，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狄奥没有说克拉苏要求获得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荣誉而遭到拒绝。其他史料也根本没有讲到这一点。克拉苏确实庆祝了凯旋式，这绝不是不起眼的荣誉。其他很多元老在结束官职任期、治理过行省和打赢一场战争之后，就在史册中无声无息了，所以克拉苏在之后的史料中失去踪迹也就不奇怪了。恺撒修复朱庇特神庙的决定源自阿提库斯的启发，而且是好几年之后的事情。我们没法判断他是何时公布自己查看

胸甲的结果，但由于他一直对古罗马仪式兴趣浓厚，所以这可能与克拉苏完全无关。李维提及恺撒查看胸甲的事情，是为了尊崇恺撒。李维在史书中说考苏斯不是执政官，这并不能说明他对恺撒及其政权持批评态度。

克拉苏返回罗马的时候，基本上不可能出现任何公开的争议。如果他真的要求获得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荣誉（也就是说，如果几个世纪之后的狄奥的话是真的），那么狄奥著作和其他史料中一定会有克拉苏正式提出要求、元老院对此进行讨论和拒绝的相关记载。克拉苏曾为塞克斯图斯·庞培和安东尼效力，后来才投奔恺撒，这表明克拉苏在政治上还是很有本事的。就算他真的想索取“最高战利品”的荣誉，他也会自己放弃，或者被人（或许是恺撒的亲信）私下里劝服而放弃。从另一个角度看，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表明克拉苏在元老院有大群支持者。他或许受到自己军队的爱戴（他率领他们赢得了胜利），但这些官兵与其他对恺撒忠心不二的军队相比，数量是很少的，何况恺撒近几年一直在忙着赏赐士兵和退伍老兵。克拉苏即便有上位的野心，也没有希望和恺撒竞争，而且他目前已经赢得足够多的官职和荣耀，这些东西足以满足绝大多数贵族的期望。^[26]

目前，恺撒的军事力量无比强大，大多数阶层的民众对他还比较满意。终于和平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意大利不再到处挤满了被剥夺土地的农民、难以驾驭的退伍军人或债台高筑的公民，这些人曾经陷入绝望，会跟随任何承诺给他们更好未来的领袖。铁杆的安东尼或庞培分子基本上已经被消灭殆尽，几十年内战中的口号和忠诚已经被渐渐淡忘。恺撒的地位至高无上，短期内不会受到任何威胁。至于未来会怎样，还很难预测，如何建立一个能够保障稳定和他本人安全的新政权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

狄奥著作的第五十二卷全部用来记载据说来自阿格里帕和梅塞纳斯的演讲。他们两人针锋相对，据说阿格里帕主张恢复接近原先共和国的体制，而梅塞纳斯则建议建立一种隐蔽的君主制。具体的措辞都是狄奥的，反映了他所知晓的3世纪初的帝国，他的很多想法可能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更有关联。但他说恺撒认真考虑了这些问题，而苏埃托尼乌斯也说恺撒在这些年里曾考虑恢复共和国体制。恺撒会不会退出政坛，就像苏拉当年辞职退隐那样，就很难说了。就算他真的曾经这么斟酌，后来也肯定是放弃了。[\[27\]](#)。

现代历史学家很容易想到尤利乌斯·恺撒的独裁，并认为他的继承人想到要避免这种独裁体制。古代史料没有这种说法。尤利乌斯·恺撒在蒙达战役结束、返回罗马不到一年后就死了，没有时间真正做些什么，所以应当不能为他的继承人提供什么可以吸取的教训。或许他的遇刺身亡教会了恺撒要尊重元老院和其他机构，但恺撒在前28年的绝对权力和独裁官当年的权力都是毫不掩饰的，尽管他没有自立为独裁官。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元老院及其立场与前44年有很大不同。[\[28\]](#)。

前28年，恺撒忙于将罗马社会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行政长官和各种机构的尊重并没有减少恺撒本人的权力。他可能在8月正式宣布内战结束。他还宣布，其三头同盟的两位同僚的所有非法举动，以及他本人作为三头同盟之一而得到的一些权力和额外的荣誉，将从这年年底开始失去效力。这表明“恢复共和国”的工作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进展，危机大体上已经结束，所以不再需要三头同盟这样特殊的行政长官职位。这一切都是一个井井有条、积极主动的进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恺撒是被迫做出这些妥协的。这年年底，恺撒和阿格里帕卸去执政官职位并按照规定宣誓，但恺撒的权力并没有因此而减弱。[\[29\]](#)。

奥古斯都

前27年1月1日，恺撒开始了他的第七次执政官任期，阿格里帕则是第三次担任执政官。我们不知道此前有没有举行正式选举。如果举行了选举，不管有没有其他候选人与他竞争，广受爱戴的恺撒都必胜无疑。1月13日，元老院召开会议，恺撒以执政官身份主持。聚集在此的元老当中只有少数人事先得到消息：此次会议不是普通的辩论，而是要公布一个重大的宣言。恺撒精心准备了演讲。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恺撒总是会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相当不重要的）宣言事先完整地写好，然后照本宣科，以确保自己的表达明确清晰，避免说不应当说的话，或者错误地遗漏一些东西。^[30]

狄奥记载了这次演讲的内容，但除了其中心主题之外，没有办法确定狄奥的版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恺撒实际上说的话。恺撒宣布自己要辞职，并将各行省、军队和法律的控制权归还元老院。在狄奥的版本里，恺撒先宣布他即将要说的话会让大家震惊，因为他已经处于成功的巅峰（这成功也是他努力得来的），没有人能够强迫他放弃权力。大家只有考量他的高尚一生，理解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给“父亲”复仇并保卫国家，才会觉得他即将做出的举动并不意外，反而更加光荣。

除了我已经辞世的父亲，谁比我更宽宏大度？谁比我更接近神祇？诸神临鉴，我拥有这么多勇敢的士兵，既有罗马人也有盟军，他们对我绝对忠诚。我主宰着赫拉克勒斯双柱^[31]之内的整片海洋，只有几个部落除外。我在每一块大陆都拥有城市和行省……你们全都安宁和平……最重要的是，都乐于服从我。虽然如此，我却自愿自觉地放弃如此伟大的统治权，放弃如此庞大的领地。^[32]

他经常提到尤利乌斯·恺撒的成就，以及他拒绝接受王冠、国王头衔，最后不幸遇害的往事。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如今追随他的脚步，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力，或许能够赢得更大的光荣。恺撒已经

做了需要做的事情，让共和国强大而稳定，所以现在可以把统治共和国的任务交给其他人，而不必担忧它的安全。

不管狄奥记载的恺撒演讲内容是否真实，他描写的元老们的反应是非常可信的。恺撒的亲信知道他要说什么，于是在恰当的时刻高声鼓掌。有些人怀疑这位三十六岁的执政官只是在演戏，并不打算放弃统治权。但他们不敢表露自己的怀疑，去指责年轻的军阀在撒谎。那些相信他真诚的人当中，有的欢迎他辞职的前景，但其他人或许是大多数人，害怕他辞职之后会引发新一轮内战，新的领导人会崛起并争夺主宰权。怀疑他和相信他的人都没有欢呼，前者是因为恐惧，后者是因为沮丧。很多人高呼着，哀求他改变主意、继续统治国家。恺撒主持着会议，因此由他决定谁发言。在一段时间内，他坚持要求大家允许他辞职并安宁地生活，这安宁是他奋斗得来的。但共和国最高级的议事会作为一个集体，以及元老们作为个人，都央求执政官继续担任国家元首。[\[33\]](#)

恺撒表现出极大的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同意了。狄奥认为这是一场作秀，恺撒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主宰地位，而仅仅希望大家公开表达对他的支持，表明自己是由于责任感和全民公决（几天后，公民大会确认了元老院的决定）而被迫担任国家公仆。这是一场精彩的表演，元老院和人民热情洋溢地赞同恺撒继续担任国家元首，尽管大家事实上没有其他选择。[\[34\]](#)

我们不确定，恺撒未来角色的细节是在1月13日的会议上，还是在后来的日子里确定的。1月13日肯定向他授予了一项荣誉，即在他府邸门廊的大门上方展示橡叶环。橡叶冠——罗马奖励英勇行为的最高荣誉——被授予冒着生命危险挽救另一位公民的勇士。根据传统，得救的人会用橡树叶编织一顶冠冕，亲自送给他的救命恩人，以公开认可恩情，并象征自己对恩人的永久性义务。尤利乌斯·恺撒在青年时代

服兵役早期曾获得此项荣誉。前27年，他的继承人获得的这项荣誉表明他拯救了全体公民，并再一次强调他的胜利利于全体公民的福祉。大约在这一时期，罗马城还铸造了一些钱币，上面有橡叶环图案，还有“拯救公民”的铭文。可以说，他有恩于所有公民。他府邸门廊上还加挂了胜利桂冠，作为永久性的装饰。[\[35\]](#)

1月14日，元老院没有开会，因为这一天是不吉利的日子，不可以执行公务。在日历中，不吉利的日子一般是军事失利或可怕事件之后的日期。将1月14日定为不吉利日子是比较近期的事情，是元老院在前30年确定的，因为这一天是马克·安东尼的生日。1月15日，元老院开了一次会，但很短暂，因为要庆祝一个宗教节日。1月16日，元老院才举行了一次完整的会议。我们无法确定元老院许多具体决策的确切时间，但其结果是确定无疑的。

在元老集体的“压力”下，恺撒同意接受某些行省的统辖权，理由是这些行省最需要抵御外敌或平定内乱。于是，他掌管了整个西班牙半岛（罗马在那里的征服尚未完成）、整个高卢（罗马对那里的占领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部落威胁着高卢的稳定）和叙利亚（那里在历次内战中饱受骚扰，并且受到邻国帕提亚的威胁）。他还保留了对埃及的控制权，理由或许是它前不久才刚刚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元老院投票决定将上述各地区交给他管理，为期十年。不过他强调说，如果他能更早地将这些地区彻底平定下来，就会早一些把部分地区归还元老院。其余行省则由元老院监管。

恺撒控制的各行省包括罗马军队的大部分。马其顿驻扎着一些军团，克拉苏近期在那里的成功意味着它不属于脆弱的行省之一，因此不需要恺撒的直接监管。阿非利加也有几个军团。除此之外，元老院控制的行省没有多少军事力量。驻扎马其顿和阿非利加的士兵可能继续向恺撒宣誓效忠，几年后肯定还是这样。

新体制的一些细节是在这些日子里定下来的，也有一些细节是后来确定的。恺撒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所以他挑选部分军团长去掌管其庞大辖区的部分地区。这些军团长控制的地区范围，以及他们的决策权，都与过去的行省总督完全相同，但是只拥有上级委派的军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元老院行省的总督是资深执政官，从前任行政长官中选拔，拥有独立的军权。元老院行省的总督的服饰和标志都是平民化的（在这些早期岁月，马其顿和阿非利加的总督可能除外），而元首委派的军团长则佩带利剑，身披军服斗篷。元老院行省和帝国行省的总督并非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人们可以在这两个类型的职位之间转换。在埃及以外，恺撒选拔一些元老来担任他的军团长，为他统治各行省。这能保证元老院阶层的人有更多机遇。在自己家族的声望之外，人们还可以赢得新的荣誉，虽然军团长们得到的荣誉和头衔与资深执政官（他们拥有独立军权）略有不同，但毕竟也算荣誉。在新体制下，贵族互相竞争，超越他人以赢得名望的冲动仍然起着作用。^[36]

恺撒超脱于竞争之外，因为他的地位至高无上，没有人与他平起平坐。军团长由他挑选，所以他控制着所有那些得到主要军事指挥岗位的人。马其顿和阿非利加的资深执政官级别的总督只具备有限的独立性。这两位总督很可能不被允许征募新兵，而且就算他们能够得到自己指挥的军队的忠诚，也没有能力去抵抗控制其他所有军队的人（恺撒）。每一位元老的政治生涯的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能否讨得恺撒的欢心。

没有人会怀疑，恺撒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为期十年的特别指挥权很像之前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曾享有的指挥权。这有助于建立这样一种公众形象：一位人民公仆为了广大群众的福祉承担着重任。人民不大可能对此有任何顾虑。历史证明，特别指挥权能够更高效地处理问题，比将一位野心勃勃的行政长官换为下一位的传统模式更高

效。一些元老可能也是这么想的，甚至那些没有机会参与体制的人也是这个看法。只要恺撒还控制着绝大部分军队，国家就无别路可走。狄奥玩世不恭地写道，恺撒“被说服”担任国家要职之后首先做的事情就包括让元老院发布一条法令，为他的禁卫军大队提高军饷。这种说法没有足够的证据，但禁卫军士兵的年薪可能是375迪纳厄斯，而普通军团士兵只有225迪纳厄斯。一共有9个禁卫军大队，所以总兵力比一个军团（10个大队）的名义兵力要弱一点，其中几个禁卫军大队定期驻扎在罗马城或城郊。这种做法与尤利乌斯·恺撒不同，后者于前44年初解散了自己的卫队。恺撒的最高统治地位的终极保障仍然是武装力量。^[37]

1月13日，尤其是15日和16日元老院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对恺撒歌功颂德，以及授予他新的个人荣誉。在这方面，大家能够真正独立地去决定歌颂礼赞的细节，不过整个辩论无疑仍然是恺撒主导的，因为他决定元老们发言的顺序，事先还给一些元老提过醒。很快大家就决定授予恺撒一个额外的名字，以象征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往昔，以及未来对国家的贡献。有人建议称他为“罗慕路斯”，永久性地将他与罗马的创立者联系起来，因为他复兴了罗马，相当于重建了罗马城。

罗慕路斯不仅是罗马城的创立者，还是罗马的第一位国王。根据一个传说，他最后没有死亡，而是升天成神。但罗慕路斯有些地方就不是那么值得歌颂了。罗马城的建立是从兄弟相残开始的，罗慕路斯用铁锹杀死了自己的孪生兄弟。对于经历了这么多内战的一代人来说，罗慕路斯的这些举动令人不安。根据另一个传说，罗马第一位国王的消失不是那么光彩，他是被一群元老活活撕成碎片的。过了一段时间，元老院不再打算将恺撒命名为罗慕路斯。据苏埃托尼乌斯说，恺撒本人及其亲密谋士很喜欢罗慕路斯的名字，如果这是真的，他们一定在某个时候改变了主意。大家非常公开和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这能够让我们了解当时的气氛。元老们热切希望向如此强大的人授予

荣誉。不管大家是否喜欢他和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人怀疑他的至高无上性。[\[38\]](#)

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提出了一个建议。此人曾把自己的皮肤涂成蓝色并穿上鱼尾，为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跳舞，后来投奔恺撒，带来了关于安东尼遗嘱的消息。最终元老院对他的提议进行了投票表决。普兰库斯建议了“奥古斯都”这个名字。元老们纷纷站到他身旁表示同意，这个提议以绝大多数票（或许是全票）通过。主持会议的执政官现在正式成为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之子。此前没有一个罗马人有过这样的名字。我们今天已经熟悉了这个名字，所以容易忘记它在当时是非常新颖奇特的。“奥古斯都”这个名字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与一种非常罗马式的传统——通过观鸟占卜寻求神的指导和认可——有着紧密联系。罗马最早也最受尊重的诗人恩纽斯[\[39\]](#)曾写道，罗马城是通过“威严的观鸟占卜”建立的。罗马人对他的这段诗句耳熟能详，就像今天我们对最有名的莎士比亚诗句如数家珍一样。

恺撒·奥古斯都（有时为了着重强调，也可称为奥古斯都·恺撒）独一无二。与他的十年指挥权不同，新名字是一项终身荣誉。人民很难想象，或许根本无法想象，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之子，有一天会退隐，或者其他人的荣耀、威望和地位能够接近他。历史上的先例，如庞培的特别指挥权和他从前54年起遥控指挥西班牙各行省的做法，都与恺撒·奥古斯都的地位相去甚远。过去曾有人赢得了辉煌的名字，如苏拉被称为“菲利克斯”（幸运的、有福的），庞培被称为“伟大的”，但从来没有人拥有“奥古斯都”这样光辉和神圣的名字。只有尤利乌斯·恺撒曾拥有可与他媲美的权力和地位。后世一般习惯将他的继承人称为奥古斯都，而非恺撒·奥古斯都，这就掩盖了两人相似的政治地位。

后来罗马人民又投票决定授予他一项新的荣誉，即在尤利乌斯议政厅陈设由黄金制成的“美德之盾”，以赞颂他的美德、公正、宽宏、敬神和爱国。《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将此荣誉与授予“奥古斯都”名号的决定相联系，但“美德之盾”的荣誉可能来得较晚，或许是在授予“奥古斯都”名号一周年时。法国南部的阿尔勒保存着“美德之盾”的一个复制品，带有明确的年份，即前26年，他第八次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这个复制品最初是各行省的陈设品之一，当时还有很多带有CLV（culpeus virtutis，美德之盾）字样的钱币。这让人回想起尤利乌斯·恺撒得到的类似赞扬，所以应当是有意为之。^[40]

恺撒·奥古斯都在国内拥有个人化的、永久性的崇高地位，在过去只有他的养父能够与他相提并论。和尤利乌斯·恺撒一样，他继续每年都担任执政官。恺撒将权力移交给元老院，然后元老院立即将权力交还给恺撒的作秀是非常重要的，比前44年牧神节传达的稀里糊涂的信息^[41]更成功。我们不应聚焦于恺撒·奥古斯都在自我形象展示和行为上与其养父的少许差别，而忽视了二者之间极大的、非常公开化的相似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兑现了自己少年时的承诺，即赢得养父的荣誉和官职。尤利乌斯·恺撒曾不屑地说共和国“不过是个虚名，没有实质，没有形态”，不过我们不知道他在何时发表了这样的言论，又是在何种语境下发表的。他的继承人更有策略，避开了已经被废止的独裁官头衔，但他与尤利乌斯·恺撒的区别仅仅是表面上的。恺撒是“神之子”，这个名号以及“恺撒”的名字始终在展示他与被害的尤利乌斯·恺撒之间的关系。装饰罗马城的与他有关系的纪念性建筑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尤利乌斯·恺撒在世时歌颂他的建筑。^[42]

两人的行为还有另一个相似之处。尤利乌斯·恺撒在前44年曾计划离开罗马、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而恺撒·奥古斯都在获得前文所述的荣誉之后也打算离开罗马，到他在西方的行省待上几年。这年末

尾，他到了高卢，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在何时离开罗马的。有人说他是刻意在克拉苏于7月举行凯旋式时回避，这种说法没有很充分的根据。克拉苏的凯旋式并非本年度的唯一一次，因为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梅萨拉·考尔维努斯在9月也庆祝了凯旋式。前28年的几次凯旋式举行时，恺撒都在罗马城。如果在克拉苏沿着圣道游行之前恺撒便离开了罗马，那是因为他想在本年度结束之前启动在各行省的工作。少年马凯鲁斯与提比略陪伴在他身边，担任军事保民官，第一次去汲取从军经验。青少年跟随亲属去外省，以这种方式学习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比较不寻常的是，李维娅可能陪伴丈夫一同前往。在他们婚姻生活的余下时间里，他经常外出，她也习惯于陪伴在他左右。过去，总督夫人一般会留在家中，所以屋大维娅陪同安东尼去雅典时，大家会感到惊讶。奥古斯都·恺撒也会无视这种旧传统。^[43]

[1]. *Res Gestae* 34 (Loeb translation, slightly modified).

[2]. Velleius Paterculus 2.89.3.

[3]. Dio 51.21.3-4, *Res Gestae* 15. 狄奥说阿格里帕得到了一面深蓝色旗帜的赏赐。我们不确定这是否就是击败塞克斯图斯·庞培之后他得到的那面旗帜，还是新的荣誉，见Suetonius, *Augustus* 25.3；关于殖民，见P. Brunt,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1971), pp. 332-44, 及L. Keppie, *Colonisation and Veteran Settlement in Italy 47-14 BC* (1983), 尤见 pp. 58-86。

[4]. 希腊艺术家，可能活跃于前330年代。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伊苏斯的肖像就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5]. Dio 51.22.1-4, Crook in *CAH2* X, pp. 75-6, 及 P. Zanker (trans. A. Shapiro),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 pp. 79-82。

[6]. Dio 51.22.4-9, *Res Gestae* 22讲到恺撒的竞技会；Dio 51.23.1讲到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和挑选裁判官的特别荣誉。

[7] Dio 53.1.1-2, with E.Stavely, ‘The “Fasces” and “Imperium Maius” ’, *Historia* 12 (1963), pp.458-84, 尤见466-8, F.Millar, ‘Triumvirate and Principate’, *JRS* 63 (1973), pp.50-67, esp.62。

[8] Cicero, *ad Fam.* 6.18.1, *Philippics* 11.5.12, 13.13.27, Dio 43.47.3, Suetonius, *Caesar* 76.2-3, 80.2; 尤利乌斯·恺撒的新元老来源, 详尽讨论见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78-96; 尤利乌斯·恺撒死后的时期, 见J.Osgood, *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p.257-60, 283-8; 逃奴当上官, 见Dio 48.34.5。

[9] 首席元老原本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元老院的荣誉职衔, 后来在屋大维所创建的元首制度中, 该职衔即是罗马皇帝的正式称呼。

[10] Dio 52.42.1-5, Suetonius, *Augustus* 35.1-2, *Res Gestae* 8.

[11] Caius Calvisius Sabinus战胜西班牙人的凯旋式在5月26日, Caius Carrinas战胜高卢人的凯旋式在7月6日, Lucius Autronius Paetus在阿非利加取得的胜利凯旋式在8月16日。

[12] Tacitus, *Ann.* 3.28 ‘*non mos, non ius*’; 三头同盟恢复国家秩序的作用, 概况见C.Lange, *Res Publica Constituta. Actium, 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 (2009), *passim*.

[13] Dio 53.2.3, with W.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pp.83-6, Crook in *CAH2* X, pp.76-7. J.Liebeschuetz, ‘The settlement of 27BC’, in C.Deroux, *Studies in Latin Literature and Roman History* (2008), pp.345-65.

[14] 选举见A.Jones, ‘The elections under Augustus,’ *JRS* 45 (1955), pp.9-21, esp.11; 国库, 见Dio 53.2.1, 3。

[15] 建筑工程, 见*Res Gestae* 20, Dio 53.2.4-6, with W.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pp.83-4, 概况见P.Zanker (trans.A.Shapiro),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 pp.101-36.

[16] Dio 53.1.4-6.

[17] 屠牛广场在卡比托利欧山、帕拉丁山和阿文廷山之间靠近台伯河的地方，是罗马城的主要码头，也是贩卖牛肉的集市。

[18] Dio 53.1.3, with P.Zanker (trans.A.Shapiro),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 pp.65-71, 240-54, 及 T.Wiseman, 'Conspicui Postes Tectaque Digna Deo: the public image of aristocratic and imperial houses in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Empire', in *L' Urbs.Espace urbain et histoire* (1987), pp.393-413, 尤见399-407; 对阿波罗神庙的近期研究, 见S.Zink, 'Reconstructing the Palatine temple of Apollo: a case study in early Augustan temple design', *JRA* 21 (2008), pp.47-63。

[19] Purcell in *CAH2* X, pp.787-8, P.Zanker (trans.A.Shapiro),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 pp.66-71; Velleius Paterculus 2.86.2.

[20] 那个最有名的克拉苏(前三头同盟成员, 巨富, 曾镇压斯巴达克斯, 死于远征帕提亚时)的孙子。

[21] Dio 51.23.2-27.3, Livy, *Per.*134.

[22] Dio 51.25.2, with J.Rich, 'Augustus and the spolia opima', *Chiron* 26 (1996), pp.85-127, 尤见95-7, 概况见 T.Barnes, 'The victories of Augustus', *JRS* 64 (1974), pp.21-6。

[23] 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前268~前208年), 五次当选执政官, 是高卢战争(前225年)和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前201年, 对手是汉尼拔)的名将和英雄, 曾与敌军领袖单挑并将其杀死, 获得了罗马军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他还征服了叙拉古城, 发明家阿基米德就死于那场战役中。

[24] Livy 4.20.5-7 (Loeb translation); 对“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详尽讨论, 见H.Flower, 'The tradition of the spolia opima: M.Claudius Marcellus and Augustus', *Classical Antiquity* 19 (2000), pp.34-64。

[25] 关于家庭, 见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424, 496-7。

[26] 克拉苏要求“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荣誉但被拒绝的理论，见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308-9及‘Livy and Augustus’,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64 (1959), pp.27-87, 尤见43-7, Crook in *CAH2* X, p.80, W.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pp.87-8, Millar (1973), p.62, J.Richardson, ‘*Imperium Romanum: Empire and the Language of Power*’, *JRS* 81 (1991), pp.1-9, 尤见8; 笔者在此问题上遵照了非常有说服力的E.Badian, ‘“Crisis Theor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Principate’, in W.Wirth, *Romanitas and Christianitas* (1982), pp.18-41, 尤见24-7, 及J.Rich, ‘Augustus and the spolia opima’, *Chiron* 26 (1996)。

[27] Suetonius, *Augustus* 28.1; 阿格里帕与梅塞纳斯的辩论，见Dio 52.1.2-41.2, with F.Millar, *A Study of Cassius Dio* (1964), pp.102-18。

[28] 一般人眼中他与尤利乌斯·恺撒的对比，如P.Cartledge, ‘The second thoughts of Augustus on the res publica in 28|7 BC’, *Greece and Rome* 31 (1984), pp.30-40, 尤见34-5,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317-18, E. Salmon, ‘The Evolution of Augustus’ Principate’, *Historia* 5 (1956), pp.456-78, 尤见459-62, K.Galinsky, *Augustus.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of an Emperor* (2012), pp.63, 152-3. 此种理论包含了审视独裁官最后岁月和密谋者动机的许多文献。

[29] 内战的结束，见Macrobius, *Saturnalia* 1.12.35, 概况见W.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pp.81-2。

[30] Suetonius, *Augustus* 84, Dio 53.2.7与11.1讲到朗读演讲稿，53.3.1-10.8是狄奥的版本。

[31] “赫拉克勒斯双柱”是直布罗陀海峡南北两岸的巨岩，北面一柱是位于英属直布罗陀境内的直布罗陀巨岩，南面一柱则在北非，但确切是哪座山峰没有定论。根据希腊神话，这两大巨岩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所立，为他捕捉巨人革律翁之行留下纪念。赫拉克勒斯双柱之内的海洋即地中海。

[32] Dio 53.8.1-2 (Loeb translation) .

[33] Dio 53.11.1-4.

[34] Dio 53.11.5-12.1.

[35] *Res Gestae* 34, with W.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 pp.86-8及 P.Zanker (trans.A.Shapiro) ,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 , pp.91-4.

[36] Dio 53.12.2-16.3, with W.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 pp.89-95, J.Liebeschuetz, ‘The settlement of 27BC’ , in C.Deroux, *Studies in Latin Literature and Roman History* (2008) , pp.346-53, E.Salmon, ‘The Evolution of Augustus’ Principate’ , *Historia* 5 (1956) , pp.459-67, Cartledge, P., ‘The second thoughts of Augustus on the res publica in 28| 7 BC’ , *Greece and Rome* 31 (1984) , pp.31-8, J.Ferrary, ‘The powers of Augustus’ , in J.Edmondson (ed.) , *Augustus* (2009) , pp.90-136, 尤见90-99, A.Jones, ‘The imperium of Augustus’ , *JRS* 41 (1951) , pp.112-19, 尤见112-14, 及G.Chilver, ‘Augustus and the Roman constitution 1939-1950’ , *Historia* 1 (1950) , pp.408-35是很有价值的文献, 介绍了到当时学术界的争论, 涉及恺撒为自己地位的辩护。行省和战争的一般作用见 J.Rich, ‘Augustus, War and Peace’ , in J.Edmondson (ed.) , *Augustus* (2009) , pp.137-64, esp.153-7; 贵族竞争的继续, 见 W.Eck, ‘Senatorial Self-Representation: Developments in the Augustan Period’ , in F.Millar & E.Segal (eds) , *Caesar Augustus. Seven Aspects* (1990) , pp.129-67。

[37] Dio 53.11.5, with G.Watson, *The Roman Soldier* (1985) , pp.97-8讲到禁卫军的军衔, 指出狄奥说的“双倍军饷”一定是粗略数字; 对军队的控制, 概况见J.Campbell, *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 31 BC-AD 235* (1984) , *passim*。

[38] 注意Horace, *Epodes* 7.17-20包含当时人的看法, 即罗马被罗慕路斯杀害兄弟雷穆斯的罪行诅咒了; 罗慕路斯和他的死亡, 见Livy 1.16.1-4。

[39] 昆图斯·恩纽斯（约前239～前169年），常被认为是罗马的第一位诗人。他的作品大多已经失传，但对拉丁文学影响极大。

[40] *Res Gestae* 34, Suetonius, *Augustus* 7, Dio 53.16.7, Velleius Paterculus 2.91, W.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pp.92-5, P.Zanker (trans.A.Shapiro),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 pp.95-100, R.Syme, 'Livy and Augustus', *Harvard Studies of Classical Philology* 64 (1959), p.59, 及 'Imperator Caesar, a study in nomenclature', *Historia* 7 (1958), pp.172-88; 对盾牌上美德的含义, 以及这些荣誉全部曾被授予尤利乌斯·恺撒的详尽讨论, 见S.Weinstock, *Divus Julius* (1971), pp.228-59。

[41] 前44年2月15日, 罗马人庆祝牧神节。

[42] Suetonius, *Julius Caesar* 77.

[43] Suetonius, *Augustus* 24.1讲到他不允许行省总督的妻子陪伴他们去行省; 李维娅, 见A.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34-7。

十三 在战争中击败骄傲者

记住，罗马人，因为这些便是你的技艺，你必须用力量统治各民族，
维护和平繁荣，饶恕被征服者，在战争中击败骄傲者。

——维吉尔，前20年代^[1]。

恺撒·奥古斯都离开罗马之前，雅努斯神庙的大门被再次开启，这意味着官方正式宣布的和平结束了。接受西班牙、高卢、叙利亚和埃及为自己行省的那个人要出征了，他开始了在这些地区恢复（罗马统治下的）秩序和稳定的工作。这将在在遥远国度开展的针对外国敌人的战争，所以不会威胁罗马本土的安定，不会让罗马回到近些年的动荡和混乱状态。这是为恢复共和国健康所做的努力，群众情绪高涨，大家兴奋地谈及要征服不列颠。

尤利乌斯·恺撒曾两次在不列颠岛登陆，理由是保障高卢的安全，因为布立吞人曾向欧洲大陆派遣武士，支援那里的酋长。前54年，不列颠东南的主要部落向尤利乌斯·恺撒投降，并同意向罗马纳贡。但在随后的岁月里，先是高卢爆发大规模叛乱，然后又是漫长的多次内战，所以我们不知道不列颠部落是否每年都按时纳贡。由于尤利乌斯·恺撒的活动，过去被高卢中间商控制的市场向罗马商人开放了，到前1世纪末，这些商人将在泰晤士河畔的伦蒂尼乌姆^[2]建立永久定居点。很多罗马人显然想要得到更多，他们热切希望正式将这个仍然充满异国情调的岛屿变成一个永久性的行省。诗人们将布立吞人描绘为与帕提亚人类似的敌人，罗马将其彻底征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理有据的。几年后，贺拉斯宣称：

布立吞人和可怕的帕提亚人

被纳入帝国之后，

奥古斯都将被视为人间的神明。

有时罗马人还说，印度人也必将臣服于罗马的伟大领袖，正如他们曾屈服于亚历山大大帝。战胜危险而稀罕的外族，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是最伟大的国家公仆为祖国做出的极佳贡献。^[3]

大约在这一时期，不列颠东南部诸部落间的权力斗争似乎为罗马人提供了干预的良机。后来，泰晤士河以北的两个部落，卡图维劳尼人和特里诺文特人，主宰了不列颠东南部的广大地区，这两个部落的国王垄断了罗马商人带来的奢侈品贸易。奥古斯都在位期间，被打败的不列颠统治者逃往罗马帝国，请求奥古斯都运用他的影响力和军队，帮助他们实现复辟，这种情形至少有两次。在整个罗马史上，外国人向元老院或皇帝求援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一般只有在对罗马领导人有利的时候，求救者才会得到援助。

恺撒·奥古斯都可能考虑了向不列颠发动远征。他在高卢的阿基坦尼亚沿海地区集结了一批运输船，说明他做了一定程度的准备。或许这只是紧急预案，或者是为了配合外交手段。最后事情的解决令奥古斯都满意。我们对具体细节不清楚，既不知道问题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是如何解决的。总的来说，奥古斯都应当不大可能热切希望进攻不列颠。尤利乌斯·恺撒的先例表明，远征不列颠至少需要几年时间，收益有限，风险却很大。在前55年和前54年，他都因为风暴而损失了很多船只，几乎被困在岛上，被迫在敌对部落的包围之下，在没有补给物资和支援的情况下过冬。也很难摸清，远征不列颠究竟是多么大的挑战。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有一队罗马战船绕过不列颠北端，确认它是一个岛屿，并对它的真正范围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在没有受到更严重挑衅的情况下，奥古斯都放弃了远征不列颠，表现出了他避免与帕提亚交战（除非不可避免）时的谨慎。诗人们会继续鼓吹征服不列颠和帕提亚，但目前恺撒·奥古斯都考虑的是其他事情。^[4]

他从罗马去了高卢，花了几个月时间主持巡回法庭，接受请愿，并开始人口普查。尤利乌斯·恺撒征服莱茵河以西、远至英吉利海峡与大西洋海岸的所有领土，仅仅是一代人以前的事情，这些行省的最终形态还没有明确。即便如此，奥古斯都在高卢停留的时间也很短，该年年末到了塔拉科（今天的塔拉戈纳），即内西班牙行省的首府，不久之后被更名为塔拉科嫩西斯。在那里，前26年1月1日，他开始了自己的第八次执政官任期，这次的同僚是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后者此时在罗马。奥古斯都去西班牙的借口是，西班牙西北部少数仍然保持独立的社区发生了骚乱。但他很可能早就打算去西班牙，在那里开启他的战争。^[5]

在前3世纪末罗马与汉尼拔和迦太基的漫长斗争中，罗马军队第一次涉足西班牙半岛。罗马共和国在意大利之外的第一个永久驻军地就是西班牙，那里也是罗马人边疆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地区。这是一个棘手的地区，虽然有不少总督赢得了凯旋式，但也有一些总督的征战得到的只有耻辱。在各个战例中，罗马人运用的手段很少是光明正大的。缺乏正当理由的侵略、背信弃义和血腥屠杀是边疆作战的家常便饭。伊比利亚半岛的很多居民都是意志坚定且本领高强的战士。罗马人积极将他们招募为盟军，很早就将著名的西班牙短剑定为自己的武器。但罗马人很团结，而当地的各民族一盘散沙，于是罗马的内西班牙和外西班牙行省逐渐扩张，直到囊括了几乎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被坎塔布里亚山脉保护的地区除外）。前1世纪的西班牙也不安宁。罗马人和土著居民之间仍然有一些战争，但更糟糕的是前70年代和前40年代的罗马内战，西班牙的土著也被卷入了共和国的兄弟相残。有时内战非常野蛮。考古学家在巴伦西亚发掘出了庞培与塞多留^[6]战争期间被毒刑拷打和处决的人的骨骸，而尤利乌斯·恺撒的一名军官写道，他的部下在一堵胸墙上挂满了敌人的首级。^[7]

虽然发生了这样恐怖的事件，塔拉戈纳等城市还是欣欣向荣。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有着城市定居的悠久传统，希腊和迦太基的殖民地与商埠和土著社区混杂。伊比利亚人的定居点发展起来，由长官和议事会领导着行政机构，至少已经有文字使用情况，不过用的是迦太基或拉丁字母。第二次布匿战争末期，一些罗马军人在西班牙定居，后来有更多人前来，特别是在前1世纪。其他意大利人和罗马人来到西班牙寻找商机，尤其是开发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金银矿。大量西班牙人作为盟军为罗马军队效力，其中一些人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前89年的一份铭文记载道，一群为伟大的庞培的父亲作战的西班牙骑兵（约三十人）获得了公民权。庞培本人则更加慷慨地帮助曾经支持他讨伐塞多留的西班牙社区领导人获取公民权。其中一位受益者是来自加的斯的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他后来成为尤利乌斯·恺撒最信赖的亲信之一，并在尤利乌斯·恺撒遇刺之后为他的继承人提供金钱、人脉和辅佐。巴尔布斯于前40年获得补任执政官职位，他是罗马第一位出身外国的执政官。

加的斯是一个特别繁荣的贸易中心，当地有能力航海的地主已经在为意大利和其他地区的市场生产商品。橄榄油成为此地的主要出口商品，发酵鱼露也是如此，比如著名的“加鲁姆鱼露”。几十年后，地理学家斯特拉波^[8]记载道，仅仅在加的斯就有多达五百人不仅是罗马公民，而且成为骑士。在意大利，除了罗马城之外，很少有一座城市拥有这么多骑士。其中一些骑士，比如巴尔布斯和他的同名侄子（后获得执政官地位，被任命为阿非利加总督）去了罗马从政。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家乡切断了联系。尤其是小巴尔布斯花了很多钱在加的斯举办娱乐活动和建造纪念性建筑。由于当地贵族、行省总督或恺撒·奥古斯都的慷慨捐资，其他城市也拥有了剧场和竞技场，得以分享共和国的音乐戏剧文化，以及角斗士表演的血腥品位。这些活动非常受欢迎，显然表明西班牙当地人普遍希望成为罗马人，

或至少体验一下帝国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在获得公民权之前便改用罗马式的名字，尤其在南方，穿托加袍已经蔚然成风。在这些年里，当地铸造的铜币上不再使用伊比利亚语言的铭文，而是只用拉丁文。[\[9\]](#)

在远离地中海海岸的地区，很多社区抵抗罗马的时间要长得多，再加上它们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们（或至少是当地贵族）接受罗马帝国统治的速度要慢一些。西班牙中部被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主宰，这是个有着鲜明特色的多民族集团，说一种与高卢人和布立吞人的语言类似的凯尔特语。古人认为凯尔特伊比利亚人是伊比利亚人与高卢入侵者的混血后裔，今天的学者认为这不大可能是真的。除了语言之外，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风俗和工艺品似乎与同时代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凯尔特”社会没有什么共同点。在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居住地以北分布着阿斯图里亚斯人和坎塔布里亚人，他们分成许多单独的群体，往往居住在特定的设防山顶居民点。很少有罗马军队能够深入这些土地，也不曾有任何罗马人能够长期停留。三头同盟统治下举行的多次西班牙战役凯旋式，就是为了庆祝在这一地区赢得的胜利。[\[10\]](#)

我们没有很好的理由去怀疑，一些仍然独立的民族在袭击邻近的、罗马行省内的、更为定居化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在古典世界的很多时期，袭击掳掠都是常见的事情。在迦太基人或罗马人抵达很久之前，西班牙半岛就有了大量武器，说明在这两个入侵民族到达之前，西班牙土著民族之间就战火连绵。不过，迦太基人和罗马人通过直接冲突或贪得无厌地索取雇佣兵与盟军，深刻地改变了土著战争的形态和激烈程度。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征服和更近期的历次罗马内战，则不可避免地扰乱了广大地区内的所有社会，让崎岖不平的坎塔布里亚山区原本就非常艰难的生存斗争更加难以为继。这一切肯定让掳掠貌似脆弱的邻居显得更有吸引力。[\[11\]](#)



西部各行省，包括西班牙和高卢

奥古斯都可能从一开始就打算攻打西班牙西北部，以完成对西班牙的征服。这项任务有着清晰的界限，似乎在仅仅几年内便可完成；虽然地形崎岖，不大可能很轻松，但风险不像进攻布立吞人或帕提亚人那样大，不可能造成大灾难。这并非一场针对充满异国情调或著名敌人的战争，但这一点或许恰恰是额外的吸引力，因为它能向人民展示，恺撒·奥古斯都为了国家利益，愿意去承担不是那么光鲜的使命，并兑现他的诺言，即恢复他指挥下的各行省的秩序与安全。春季，他离开塔拉戈纳，北上与正在集结的军队会合。这支军队的目标是发动进攻，“平定”坎塔布里亚人。

“指挥官宁要稳妥，不要勇敢”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仍然是一位军阀，他对国家的主宰，说到底还是取决于他掌握的军事力量比其他任何人都强大。按照现代的

标准，他始终是一位军事独裁者，尽管他一直避免使用罗马意义上的“独裁官”头衔。虽然在前27年年初他做了一番表演，主动交出权力，然后不情愿地接受元老院“强加”给他的权责，但只要他仍然垄断着军队，就没有人能够强迫他做任何事情。军队都是他自己的，元老院没有掌管这些军队的实权，也没有权力征召和解散这些部队或其他部队。虽然奥古斯都会就士兵服役的具体条件向元老院“申请”，但元老不可能有权做真正的辩论，也不可能拒绝他的申请。在过去，军队的很多管理工作，包括大多数军事保民官的晋升、所有百夫长的任命和晋升，都被委派给具体的总督。现在仍然是这样，但对军队的绝大部分来说，这位总督就是奥古斯都本人。雄心勃勃的军官若想要一个锦绣前程，就必须赢得他的好感。^[12]

军队把奥古斯都推到了主宰地位，最终也只有军队有希望遏制他的权力，所以对他来说，军队既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潜在的威胁。他必须防止任何人效仿自己，或者马略、苏拉、庞培及其儿子们、尤利乌斯·恺撒、马克·安东尼和其他大小军阀（正是这些军阀使得前1世纪动荡不安）。对于士兵的忠诚，不能想当然。恺撒·奥古斯都经历过一些哗变，对此有很深的理解。他不仅仅需要限制授予元老们的军权（每位统帅的任期只有几年，控制的兵力很少），还需要让军团及其军官们保持心满意足和忠心耿耿。

在亚克兴角大捷和彻底击败安东尼之后，当时存在的大约60个军团全都处于奥古斯都的控制下。很大一部分官兵曾为多位统帅效力。大多数年纪足够大的人曾向尤利乌斯·恺撒宣誓效忠，这在他们和他的继承人之间构建了一种强有力的情感纽带。但这还不够，急于退役的士兵的哗变就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军团肯定只有个骨架，大多数军团的兵力都远远少于理论数字。即便如此，军队的总兵力仍然超过罗马历史上任何时期，包括与迦太基殊死搏斗的时期。长时期维持这样

庞大的军队是不可能办到的，而且非常危险，因为要让这么多人保持心满意足，是非常困难的。[\[13\]](#)

因此，奥古斯都及其谋臣必须决定他们想要维持的军队的规模和形态。他们需要判断，要维护他的地位、抵抗任何潜在的罗马竞争者，需要多少兵力；以及要维持帝国、保卫和扩张各行省，还需要多少兵力。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如果帝国在邻国眼中显得软弱，在边疆和各行省内遭到挫折，那么凯旋将军奥古斯都的声望和权威就会遭到严重损害。这样的损害还不足以打破他的权力，但可能引发人们的反对之声，于是竞争对手就有机会崭露头角。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奥古斯都决定维持一支由26或27个军团组成的军队。具体数字无法确定，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中两个拥有较多兵力的单位是在何时组建的。有一个时期总数还达到了28个军团。军团数量被砍掉了一半以上，亚克兴角大捷之后恢复退伍军人殖民地的举措缓解了裁军的困难。到前29年，有12万退伍军人被安置到各殖民地，这相当于24个齐装满员的军团。到了退役时间、不愿意继续服役的人离去之后，剩余的士兵足以构成26或27个差不多满员的军团。

[\[14\]](#)

我们对共和国最后几十年中兵役的细节不是很了解，但至少部分士兵只服六年兵役，或者到战争结束时便退伍，所以那些有资格退伍的人不一定是年纪很大的人。有些人把从军视为职业，会延长服役期，这在军官当中是很常见的。在前1世纪的动荡岁月里，原本很小的陆军职业军官团体迅速扩大。这些人主要担任军事保民官、各级长官和百夫长，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和专业技能。其中部分是骑士，或者通过获取战利品而成为骑士。对这部分人来说，军队是晋升的垫脚石；对其他人来说，从军是获得良好生活条件与体面职业的手段。

要忽略这些人是不明智的，而且我们不应当仅仅考虑元老们的需求（即获得军事声誉），因为社会的其他阶层同样热衷于从军。很多军官是出身于意大利各城镇的乡绅。还有一些人因为退伍军人的安置，获得了与其军衔相匹配的相当多的土地，因此成为乡绅，有资格进入当地的行政机构和城镇议事会。不管这样的人是否愿意继续从军，他们和与他们类似的人都热切希望，自己或者儿子仍然有机会从军。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征兵出现困难，这或许并非偶然。

26个军团不仅意味着约13万士兵有了生计，还表明提供了156个军事保民官和1560个百夫长岗位。差不多1个军团的禁卫军（禁卫军每一级别的军饷都比同级别的普通军官要高）也增加了岗位数量，越来越正式的辅助单位也为非公民士兵提供了更多晋升机会。辅助单位一般分为步兵大队或兵力相当的骑兵团，通常由罗马公民指挥，不过有时由组成该单位的民族中的贵族指挥。起初的常见做法是将这样一个辅助单位交给一名前任资深百夫长指挥。有一段时间，奥古斯都做了试验，让两名元老阶层的青年联合指挥一个辅助骑兵团，希望借此让青年元老们积累一些指挥和管理骑兵的经验，为将来在军团中担任更高级职位打好基础。不过后来他越来越多地选择一位骑兵长官或军事保民官来指挥辅助单位。这意味着，骑士阶层成员能够担任的公职数量有了极大增加。骑士们担任这些公职时需要向元首宣誓效忠，从他那里接受衔级、薪金，以及未来晋升的机会和利益。^[15]

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常备军是一种重要手段，可以满足骑士这个重要群体晋升的愿望，以及让这些人和其他想要从军的人为此忙碌。前63年，曾在苏拉麾下担任百夫长的一个人为喀提林集结了一支军队。而在内战中，这样的人为各支军队贡献良多，使之成为高效的武装力量。3世纪初的狄奥从一位元老的刻薄视角写道，梅塞纳斯建议奥古斯都大规模招兵，是为了防止无业青年盲流化。更大的危险是，这些青年可能加入竞争对手组建的军队。^[16]

在构建新军队的过程中，集体自豪感和当前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共和国早期，通常的做法是每年为各军团重新编号，以便让执政官总是指挥第一至第四军团。这种制度在前1世纪瓦解了，尤利乌斯·恺撒的各军团对自己的身份抱有特别的自豪感，不管他们后来是为李必达、安东尼还是为年轻的恺撒效力。安东尼的军团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后迅速投奔恺撒，但不肯放弃原先的番号、名称和传统。这意味着，从一开始，新组建军队的番号就没有遵循逻辑。番号为第四、第五、第六和第十军团的单位各有两个，番号为第三军团的单位多达三个。有好几个军团，比如第五“云雀”军团，仍然保留自己的旧名称（尽管他们与安东尼联系紧密），或许是因为他们曾忠诚地为尤利乌斯·恺撒作战。该军团继续将大象作为自己的标志，纪念自己于前46年在塔普苏斯击败庞培军队战象的功绩。[\[17\]](#)

第五“云雀”军团是在为西班牙西北部的战役做准备的6个军团之一。其他单位分别是第一军团、第二军团、第六“胜利”军团，或许还有第九军团（在这些年里赢得了“西班牙”的称号），肯定还有第十“孪生子”军团。我们知道还有第八“孪生子”军团和第十四“孪生子”军团，不过这两个军团没有参加西班牙作战。这三个“孪生子”军团都是由之前的两个军团结合而成的。组成第十“孪生子”军团的旧军团之一曾为安东尼效力，自称起源于尤利乌斯·恺撒的第十军团；在一段时间内，该军团保留了“骑士”的称号，这个称号源于前58年，当时士兵们短暂地骑马作战，并开玩笑说，长官打算把他们全部升为骑士。将两个单位融合为一个新单位，可以维持两个单位的自豪感，肯定比解散现有军团要强。[\[18\]](#)

官兵都被允许保留自己的传统，但这支新组建的军队不会像内战时期的军队那样，受到统帅慷慨的娇纵。士兵的服役期被延长了，不久之后士兵们将必须服满传统的十六年，才有资格在退伍时得到土地。有的时候，士兵们要再多服四年兵役，在这期间被称为老兵，可

以不必承担某些工作，但必须留在军中，受到军纪约束。在过去，常常为了巩固士兵的忠诚而定期赏赐战利品和奖金，今后不再定期发放，而只是偶尔为之，并且只有奥古斯都本人或其亲属可以这么做。这种态度的变化反映在称呼的变化上。内战期间，年轻的恺撒常效仿他的养父，将官兵称为“弟兄们”。前30年之后，这种亲热的称呼消失了，他只是简单地称呼他们“士兵们”。他坚持要求所有总督和指挥官（包括他的亲属）都这样称呼士兵。在西班牙，他像在伊利里亚一样，对部队严加管束。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有的百夫长遭到象征性的羞辱，被命令站在他的营帐外，有时手里拿着一块用来修建壁垒的泥炭，或者没有系腰带，于是他们长长的军服上衣一直垂到脚踝，就像女人的裙子一样。[\[19\]](#)

最高级军官也受到严密的控制。恺撒年轻时常常冒极大的风险，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他有时受到生命危险，最突出的就是在对抗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战争中。如今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已经成熟了。坎塔布里亚战役时他已经三十八岁，所以他更倾向于谨小慎微。苏埃托尼乌斯写道：

他认为，对一位精明强干的领袖来说，最不得体的就是草率和鲁莽。所以他最喜欢的一些口号包括：“着急也要从容！”“指挥官宁要稳妥，不要勇敢！”以及“只要做得好，慢一点也无妨！”

他曾说，无论是一场战役，还是整个战争，都不应当草率地开始，只有在成功的希望明显大于失败的代价时才能开启。他说，那些为了少许利益而冒巨大风险的人，就像用金钩钓鱼，如果钩子丢了，无论捕到多少鱼都不足以弥补。[\[20\]](#)

指挥军队的罗马贵族知道自己的军事指挥岗位是短期的，急于为自己和家族增添声望，并且在罗马几个世纪屡战屡胜的经验之后志得意满，认为自己必然胜利。所以本能促使他们做出勇敢的，甚至是鲁莽的行动。奥古斯都不希望他的军团长以及少数有权指挥军队的元老

资深执政官，仅仅为了获得荣耀和战利品（就像庞培或尤利乌斯·恺撒以及更早的许多其他统帅那样），就寻求毫无必要的战争，或者去冒惨败的风险。尽管奥古斯都远离战场，但军事失利总会损害他的形象。他在行省的权责极大，再加上享有结束内战、为国家带来和平的威望，所以他更是不能接受失败。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不能承受太多的挫折，不管是他本人遭受的挫折，还是部下的失败。^[21]

而且，如果是他本人或者阿格里帕和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这样的亲信（这些亲信与他联系紧密，他可以分享他们的光荣）之外的其他人赢得了太多光辉胜利，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危险。上文已经讲到，我们不太相信，奥古斯都曾公开阻止克拉苏获得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荣誉；而且克拉苏和其他很多贵族一样被允许举行凯旋式。今后很少有人会得到机会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除非他们是恺撒·奥古斯都的亲信。即便如此，风险还是有的。大约在前26年，奥古斯都留在埃及掌权的那个人失宠了。骑士科尔内利乌斯·伽卢斯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很大成功，镇压了上埃及的叛乱，然后多次击败了袭掠罗马埃及行省的南方王国^[22]，并掳掠其土地。但他庆祝自己的胜利时过于高调。有一份宣扬他胜利的铭文保存至今。据狄奥记载，伽卢斯还让人在金字塔上铭刻他的丰功伟绩。狄奥还说，伽卢斯放纵地侃侃而谈，说奥古斯都的坏话。这更增添了危险，因为狄奥很了解伽卢斯。伽卢斯曾有过判断失误的时候，比如将一名修辞学教师吸纳为自己的亲信，而此人在当阿提库斯的女儿的家庭教师时勾引过这个女孩。这名教师是个释奴，做出这种事情是非常不端的行为，而且这个女孩后来嫁给了阿格里帕，所以奥古斯都看到此人受到伽卢斯的欢迎，尤为恼火。^[23]

和许多故事一样，伽卢斯倒台的细节很难说清楚了。指控他的是一个叫作瓦列里乌斯·拉尔古斯的人，他此前是伽卢斯的同僚，所以很可能享有元首一定程度的宠信。但具体情况不太明朗，而且大家都

知道拉尔古斯常常发起凶残而没有根据的控诉。狄奥告诉我们，有个人第一次见到拉尔古斯，问拉尔古斯认不认得他。拉尔古斯说不认识，于是这人刻意将此事记录在案，免得拉尔古斯将来对他发出莫须有的指控。狄奥还告诉我们，奥古斯都内层圈子的另一名亲信（和伽卢斯一样也是骑士）有一次遇到拉尔古斯时立刻用手捂住自己的口鼻，这说明在拉尔古斯面前呼吸也不安全。^[24]

恺撒·奥古斯都不再宠信伽卢斯，免去了他的官职。我们不知道具体罪名，但可能是根据处置行省总督腐败罪行的法律来罢免伽卢斯的，在此之前骑士不会受到这种法律的制裁。但无论是职责还是权力，伽卢斯都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总督。现在元老院看到他受到用以制裁担任行省总督的元老的法律的惩罚，或许感到一丝安慰。埃及是重要的财源和谷仓，受到奥古斯都本人的严密监督。奥古斯都不会放过伽卢斯及其属下在埃及贪赃枉法的行为。或许这位骑士就像过去许多元老阶层的总督一样太肆无忌惮了，不过这只是猜测。

伽卢斯失去了奥古斯都的友谊，元老院将此视为恺撒对伽卢斯直截了当的敌视，于是积极地将他定罪并流放。伽卢斯陷入绝望，于是自尽。据苏埃托尼乌斯说，奥古斯都为此流下了眼泪，抱怨道，“只有他（奥古斯都）不能克制自己对朋友的怒气”。有人认为元老院的行动是联合起来和奥古斯都作对，但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或许这件事情表明了某些元老拼命讨元首的欢心，于是去做他们认为元首想要做的事情。或者，元老院对伽卢斯的攻击是为了表明，即便是奥古斯都任命的骑士总督也不是法外之身。如果是这样，那么元老院的做法应当得到了元首的批准，或者至少得到了他在罗马的代表（如阿格里帕、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和梅塞纳斯）的认可。^[25]

自传的最后一卷

奥古斯都全军兵分三路，各自沿不同路线进入坎塔布里亚山区。他的目标似乎是占领主要隘口、征服土著居民的主要设防定居点。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其中一些地点发生了激烈战斗和严重破坏，还发现了罗马人在这些战役中建造的一些临时营地。遗憾的是，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将任何考古发现的地点与古代文献中相关短暂记录（几乎是非常混乱的）中提到的地名对应起来。奥古斯都的自传以这些战争的胜利结尾，但在现存文献中几乎找不到这部自传的蛛丝马迹。这次军事行动也没有关于个人功业和遇险的故事流传下来，但他遇到的最大危险应当不是敌人造成的。这一年年底之前，他又患了重病，返回塔拉戈纳，在那里监督军事行动，直到行动于前25年结束。[\[26\]](#)。

坎塔布里亚人和阿斯图里亚斯人打得相当坚决，有故事说被包围的武士宁愿自杀也不投降。现代人有一种强烈的、容易让人进入误区的本能，觉得任何时期西班牙发生的战争都是游击战。在这样崎岖多山的地区，伏击战肯定能发挥作用。根据史料记载，敌人曾企图伏击罗马军队，但一个盟友社区的人向罗马人告密，于是罗马人迅速支援了受到威胁的部队，击败了敌人。但有一些战斗的规模肯定很大，也有为数众多的攻城战。罗马军队损失相当大，因为并非每一次交战都是罗马人取胜，而且即便是攻打一座有围墙的小村庄，对攻击者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在某个时间，一支载着大量士兵的舰队从高卢的阿基坦尼亚起航，在西班牙北部海岸进行了一次或多次登陆，在敌人被主力部队缠住的时候发动了进攻。[\[27\]](#)。

西班牙的作战与在伊利里亚山区的行动有相似之处，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两次战争分别有多少人参加。我们也不清楚，罗马人在一个战区吸取的经验教训有多少能被传达给其他部队。这些战役中建造的临时营地符合共和国时期军队的传统，善于利用地形地貌。虽然营地的内部结构肯定是井然有序的（早在前3世纪，希腊人就很仰慕罗马军营的组织有序），但还没有发展到几十年后那种标准的纸牌形状布局

和相当标准化的内部结构。和服役条件一样，罗马军队的日常规程和操练模式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被设计引入的，而是奥古斯都在世时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不断增添新的规则。[\[28\]](#)

与之前的军事行动一样，罗马军队在穿过谷地和隘道时总会尝试控制高地。他们建造了15英里长的围墙，将敌人的一座要塞团团围住，令守军插翅难逃。这场战争严酷、有条不紊，不是很辉煌壮丽，但它给了官兵们赢得荣耀、获得晋升或得到其他奖赏的机会。第一和第二军团都获得了“奥古斯塔”的荣誉称号，至少第二军团还将奥古斯都的星座摩羯座定为自己的符号之一。[\[29\]](#)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之后，罗马军队终于获得战争胜利。捷报传到罗马，要再一次关闭雅努斯神庙的大门。奥古斯都被赞颂为凯旋将军，元老院投票授予他一次凯旋式。他接受了荣誉称号，但谢绝举行凯旋式，并且后来再也没有庆祝过凯旋式。他这个姿态实际上是宣布他已经赢得了太多荣誉，不需要更多的个人荣耀，也不需要再一次在罗马市中心游行。像阿格里帕一样，他将继续为了国家福祉而不计酬劳地辛勤工作。至少奥古斯都没有得到传统荣誉的报酬。实际上宣布最终胜利的消息有些过早了，奥古斯都刚刚离开西班牙，坎塔布里亚人和阿斯图里亚斯人就又一次开始作战。随后是更多的战役，最终的高潮是前19年阿格里帕非常高效地（尽管残酷无情）打垮了敌人。即便如此，战事在起初也没有完全向有利于罗马人的方向发展。第一“奥古斯塔”军团由于某些失败而被剥夺了荣誉称号。它后来在日耳曼边境长期作战，赢得了“日耳曼”的称号。[\[30\]](#)

前25年1月1日，奥古斯都在塔拉戈纳第九次就任执政官。他可能一度离开塔拉戈纳，去亲自接受一些坎塔布里亚领袖的投降，但他的病情仍然严重，所以不大可能奔波劳顿。但这也不意味着他闲坐无事。我们知道外省有好几个使团去了罗马城，拜见元老院之后前往塔

拉戈纳觐见奥古斯都。使团肯定不止几个。请愿者来自帝国各个角落，希望奥古斯都答应他们的请求。^[31]

外省居民中只有一小部分有机会见到奥古斯都本人。他的肖像则是另一回事，后来比任何其他神祇或凡人的肖像都更常见。罗马人铸造了一些纯金或纯银钱币，上面有他的头像或与他有紧密联系的符号。他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碑上，雕像被竖立在意大利和外省各地。这些雕像是理想化的奥古斯都，英俊、威严而魁梧。雕像表现的奥古斯都永远青春英武，或者更妙的是，永远是他年富力强的状态。没有一幅中年或老年奥古斯都的肖像。

这并不是说，他忘记了自己是个终有一死的凡人（何况他还经常抱病），对自己家族的未来漠不关心。马凯鲁斯和提比略在陪伴他去西班牙之前都已经穿上了成年人的托加袍，正式成为男子汉。西班牙战役让他们尝到了军事生涯的滋味，李维娅的儿子后来非常喜爱军旅生活。对年轻贵族来说，联姻是他们雄心壮志的一个重要部分。奥古斯都自己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尤利乌斯·恺撒对他的收养，所以他知道，与他的大家族建立任何联系都是大事。如果李维娅在他身边，那么夫妻俩一定详细讨论了这些事情。对于绝大多数家事，他们一定进行了讨论。提比略被安排与阿格里帕的女儿维普撒尼娅订了婚，而马凯鲁斯得到更大的优待，与奥古斯都的独生女尤利娅订了婚。马凯鲁斯和尤利娅是表兄妹。虽然罗马贵族互相通婚、关系紧密，但表兄妹结婚也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这又一次证明，尽管恺撒·奥古斯都大肆宣扬传统，但他不会让自己受到旧规矩的约束。^[32]

[1]. Virgil, *Aeneid* 6.851-3: *tu regere imperio populos, Romane, memento (Hae tibi erunt artes) pacisque imponere morem, parcere subiectis et debellare superbos.*

[2]. 就是今天的伦敦。

[3]. Horace, *Odes* 3.5.2-4 (Loeb translation, slightly modified); 战争在奥古斯都公众形象中的作用和攻击帕提亚人、布立吞人和印度人受到民众支持, 见J.Rich, 'Augustus, War, and Peace', in L.de Blois, P.Erdkamp, O.Hekster, G.de Kleijn & S.Mols (eds), *The Representation and Perception of Roman Imperial Power: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Workshop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Impact of Empire (Roman Empire, c.200 BC-AD 476)* (2003), pp.329-57 = J.Edmondson (ed.), *Augustus* (2009), pp.137-64, 尤见143-8; 关于不列颠, 见Caesar, *BG.* 4.20, 讲到了不列颠人对高卢人所谓的援助, 关于这些行动的概况, 见A.Goldsworthy, *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 pp.278-92。

[4]. 概况见M.Todd, *Roman Britain* (3rd edn, 1999), pp.15-22, G.Webster, *The Roman Invasion of Britain* (rev.edn, 1993), pp.41-74, 及J.Manley, *AD 43 The Roman Invasion of Britain-A Reassessment* (2002), pp.37-50; 关于环绕不列颠的航行, 见*Agricola* 38。

[5]. Dio 53.22.5, Orosius 6.21.1-11, Florus 2.33.46-59.

[6]. 昆图斯·塞多留(约前123~前72年), 罗马政治家和整个罗马史上最优秀的军事家之一。他青年时代在马略麾下屡建奇功, 在马略、秦纳和苏拉的内战中支持马略和秦纳。苏拉得势之后, 塞多留率军在西班牙坚持抵抗, 后被庞培打败, 最后被自己的部下杀害。

[7]. 巴伦西亚的恐怖遗迹, 见A.Ribera i Lacomba & M.Calvo Galvez, 'La primera evidencia arqueológica de la destrucción de Valentia por Pompeyo',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8 (1995), pp.19-40, 及Caesar, *Spanish War* 32; 对罗马边疆和西班牙各行省的研究, 见S.Dyson, *The Creation of the Roman Frontier* (1985), 尤见pp.199-236, 及J.Richardson, *The Romans in Spain* (1996), pp.41-126; 西班牙短剑的起源, 见F.Quesada Sanz, 'Gladius hispaniensis: an archaeological view from Iberia', *Journal of Roman Military Equipment Studies* 8 (1997), pp.251-70及*Armas de la Antigua Iberia de Tartessos a Numancia* (2010) 详细研究了西班牙的装备与作战。

[8]. 斯特拉波(前64或前63~公元23年), 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 生于现在土耳其的阿马西亚(当时属于罗马帝国), 著有《地理学》十七卷。

[9] 巴尔布斯，见Cicero, *pro Balbo*, J.Richardson, *The Romans in Spain* (1996), pp.103, 106, 117, 119, 126, 引用Cicero, *ad Fam.*10.32.3, 阿西尼乌斯·波利奥尖刻批评了年轻的巴尔布斯在加的斯的行为；关于出生在西班牙的公民从政，见M.Griffin, ‘The Elder Seneca and Spain’, *JRS* 62 (1972), pp.1-19；关于在加的斯的骑士的人数，见Strabo, *Geog.*3.5.3；关于行省的经济与人口，见J.Richardson, *The Romans in Spain* (1996), pp.149-78。

[10] 关于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以及关于“罗马化”和“文化适应”正在进行的考古学辩论，见L.Curchin, *The Romanization of Central Spain. Complexity, Diversity and Change in a Provincial Hinterland* (2004)，尤见pp.69-143。

[11] 罗马人对西班牙的看法往往是非常简单的，至少那些没去过西班牙的罗马人是这样，关于这个问题，见Strabo in J.Richardson, *The Romans in Spain* (1996)，对过时和怪异的描述的讨论以及更新的信息见pp.150-68；另请注意，狄奥写道一名土匪投降，最终得到奥古斯都的赦免和奖赏。Dio 56.43.3。

[12] 关于皇帝和将军的概况，见J.Campbell, *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 31 BC-AD 235* (1984)。

[13] 奥古斯都的新军队，概况见L.Keppie, *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pp.132-54, H.Parker, *The Roman Legions* (1957)，pp.72-92, 及R.Syme, ‘Notes on the legions under Augustus’, *JRS* 23 (1933)，pp.14-33。关于第二十一军团和第二十二军团的创建时间，有些疑问。第二十二军团是由加拉太国王的以罗马方式训练的士兵组建，这些士兵被罗马军队接纳后都得到了公民权。这可能发生在前25年加拉太国王驾崩后。

[14] 前29年共安置了12万退伍军人，见*Res Gestae* 15。

[15] Suetonius, *Augustus* 38.2.

[16] Sallust, *Bell. Cat.*24.2, 28.4, 30.1, 56.1-2, 59.3讲到前百夫长曼利乌斯为喀提林组建了一支军队，参见59.6敌对一方的指挥官佩特列乌斯则曾服役三十年，先后担任军事保民官、长官、军团长或裁判官；Dio 52.27.4-5；前44年安东尼招募前任百夫长，见第六章；J.Campbell, *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 31 BC-AD 235* (1984)，pp.101-9讲到百夫长的作用，及R.Smith, *Service in the Post-Marian Roman Army* (1958)，pp.59-69。

[17] 见L.Keppie, *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 pp.134-40, 尤见142-3。

[18] 关于在西班牙的罗马军队, 最新的著作见A.Morillo Cerdán, ‘The Augustean Spanish Experience: The origin of the *limes* system?’, in A.Morillo, N.Hanel & E.Martín, *Limes XX: 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 Roman Frontier Studies. Anejos de Gladius* 13 Vol.1 (2009), pp.239-51, 240, R.Syme, ‘The Spanish War of Augustus’,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55 (1934), pp.293-317, 298-301, 及 R.Jones, ‘The Roman Military Occupation of North-West Spain’, *JRS* 66 (1976), pp.45-66, 48-52; 关于*Caesar’s Legio X Equestris*, 见*BG* 1.42及L.Keppie, *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 p.137。

[19] Suetonius, *Augustus* 24.2-25.1; 关于“弟兄们”和对军人的待遇, 见J.Campbell, *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 31 BC-AD 235* (1984), pp.32-93。

[20] Suetonius, *Augustus* 25.4.

[21] 对罗马将领的讨论, 见A.Goldsworthy, ‘“Instinctive genius”: the depiction of Caesar the general’, in K.Welch & A.Powell (eds), *Julius Caesar as Artful Reporter: The War 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Instruments* (1998), pp.193-219; 对失败的责任, 见Suetonius, *Augustus* 23, 高卢和日耳曼的军事失败被认为是他的责任, 尽管他并没有直接指挥。

[22] 指的是努比亚王国。

[23] Dio 53.23.5-7, *ILS* 8995, 11.4 ff, 及Crook in *CAH2* X, pp.80-81; 勾引阿提库斯的女儿庞贝尼娅, 见Suetonius, *Gram.*16。

[24] Dio 53.23.6, 24.1-2, 讨论见B.Levick, *Augustus. Image and Substance* (2010), pp.174-5。

[25] Suetonius, *Augustus* 66.2, 及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309-10, 他将此事与之前克拉苏的事情联系起来, 理由是伽卢斯“可能”早在前28年就被从埃及召回了。但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狄奥给出的较晚的年代。

[26] 关于前26～前25年的军事行动，见近期的讨论，A.Morillo Cerdán, ‘The Augustean Spanish Experience: The origin of the *limes* system?’ , in A.Morillo, N.Hanel & E.Martín, *Limes XX: 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Roman Frontier Studies.Anejos de Gladius* 13 Vol.1 (2009) 提到考古证据。更大范围的背景，见Gruen in *CAH2* X, pp.163–6.R.Syme, ‘The Spanish War of Augustus’ ,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55 (1934) 及 ‘The conquest of North-West Spain’ , *Roman Papers*.vol.2 (1979) , pp.825–54, 及D.Magie, ‘Augustus’ War in Spain (26–25 BC) , *Classical Philology* 15 (1920) , pp.323–39 仍然是对文字史料的有价值讨论；Suetonius, *Augustus* 85.1讲到自传，with J.Rich, ‘Cantabrian closure: Augustus’ Spanish War and the ending of his memoirs’ , in C.Smith & A.Powell (eds) , *The Lost Memoirs of August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Autobiography* (2009) , pp.145–72; Dio 53.25.6–7讨论了奥古斯都的疾患。

[27] Orosius 6.21.1–11, Florus 2.33.46–59.

[28] A.Morillo Cerdán, ‘The Augustean Spanish Experience: The origin of the *limes* system?’ , in A.Morillo, N.Hanel & E.Martín, *Limes XX: 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Roman Frontier Studies.Anejos de Gladius* 13 Vol.1 (2009) , p.243.

[29] Florus 2.33.50.

[30] A.Morillo Cerdán, ‘The Augustean Spanish Experience: The origin of the *limes* system?’ , in A.Morillo, N.Hanel & E.Martín, *Limes XX: 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Roman Frontier Studies.Anejos de Gladius* 13 Vol.1 (2009) , pp.243–4; 关于军团，见 Dio 54.11.5 with L.Keppie, *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 , pp.138, 157。

[31] 例如Orosius 6.21.19–20, Strabo, *Geog.*12.8.18, with Crook in *CAH2* X, p.82及J.Richardson, *Augustan Rome 44 BC to AD 14. The Restoration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mpire* (2012) , pp.93–4强调了在奥古斯都在西班牙期间，塔拉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罗马世界的中心。

[32] 对李维娅作用的讨论，见A.Barrett, *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127-9。

十四 “最强大权力的头衔”

罗马人民！不久前还冒着生命危险去追寻胜利桂冠的恺撒，如今像赫拉克勒斯一样，从西班牙海岸凯旋归国。让他的夫人，那位为了自己无可比拟的卓越夫君而欣喜的女士，以及我们敬爱领袖的姐姐，向正义的神祇做恰当的献祭……

——贺拉斯，前24年，描述恺撒·奥古斯都从西班牙归来^[1]。

从西班牙回国的旅程耗时甚多。奥古斯都又一次病倒，可能是近些年来多次困扰他的那种疾病复发了。人满为患的罗马大都市被认为是一个不卫生的地方，所以他遵循贵族的习惯，在康复时远离罗马城。到前24年1月1日，他可能已经在意大利，但没有赶到罗马亲自开始自己的第十次执政官任期。但元老院仍然宣誓要服从他所有的正式举措，并批准了他的“请求”，即向每一位罗马公民发放400塞斯特尔提乌斯的礼金，他的每次凯旋式都会如此慷慨地赏赐公民。元老们投票授予元首更多荣誉，其中一些被他谢绝。^[2]

这一次奥古斯都的同僚执政官是盖乌斯·诺巴努斯·弗拉库斯，此人是腓立比战役中一位高级将领的儿子，还娶了小巴尔布斯的女儿。阿格里帕和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仍然在罗马，梅塞纳斯也在，所以罗马城有好几位对奥古斯都忠心耿耿、富得流油且有权有势的下属，足以保证一切令奥古斯都满意，尽管这几个人并没有正式官职。陶鲁斯家中豢养着一大群身强体健的日耳曼奴隶，不过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用这些力量去强迫他人的意志。尽管至少有几个大队的禁卫军之前陪同元首去了西班牙，城内肯定还留有一些禁卫军。所以，恺撒的支持者在罗马城有一些随时可以动用的武装力量。^[3]

更重要的是，阿格里帕正忙于一系列宏伟的建筑工程，为人民提供了许多待遇不错的工作岗位，并持续地宣扬奥古斯都的光荣以及他

的胜利为人民带来的和平。前26年，战神广场上新的投票围场（更名为尤利乌斯围场，这是为了纪念尤利乌斯·恺撒，但更是为了纪念他的养子）竣工并正式开放，地面铺着大理石，装饰着许多精美的雕像和图画，围场的很大一部分都设有天蓬，投票者可以享受荫凉并欣赏艺术品。围场附近是公共浴场和一个操练场、一座奉献给尼普顿的会堂^[4]（这是为了纪念在瑙洛库斯和亚克兴角取得的胜利），还有一座华丽的神庙，后来被称为万神殿，因为它里面供奉着所有主要神祇的雕像。阿格里帕起初打算在万神殿内陈设一座奥古斯都雕像，并将建筑命名为“奥古斯都神庙”，但元首认为这太容易让人觉得自己被神化，于是谢绝了。这个故事当然完全可能是奥古斯都刻意设计出来宣扬自己多么谦逊的。神圣尤利乌斯·恺撒的一座雕像被摆放在万神殿内，而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的肖像装饰着入口门廊，与诸神雕像保持一个安全的、充满敬意的距离。入口上方的三角楣饰很可能饰有橡叶冠雕塑，这又一次提醒大家，奥古斯都对公民同胞们做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

一个半世纪之后，哈德良皇帝在原址重建了万神殿，但改变了它的朝向，今天游客能看到的就是这座带有令人肃然起敬的穹顶的宏伟建筑。阿格里帕的万神殿设计得更传统，不过规模仍然非常宏大。哈德良保留或翻新了原先的铭文，所以阿格里帕的名字被雕刻在建筑正面，这生动展示了罗马人翻新一座建筑，既增添原先建造者的光荣，也提高翻新者的荣耀。当然翻新工程对翻新者的益处更大，因为竣工时他仍然在世。阿格里帕在战神广场的工程为罗马人民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同时为他们提供了实用而豪华的生活便利设施，这延续了十年前他担任特别市政官时开创的事业。后来，浴场得到扩建。前19年建造的新高架渠——维尔戈水道——改善了浴场的供水。会堂为举行公共事务提供了更多空间，但和其他工程一样，建筑的功能与审美融为一体。会堂的装饰很多，其中有一幅描绘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阿尔戈英雄的著名图画。公开陈设著名的艺术品是非常鲜明的平民派作

风，帕拉丁阿波罗神庙的公共图书馆也是这样，因为它们让广大群众能够享受到原本只有富人才能享有的东西。但与之前的政治家不同的是，阿格里帕从来不会仅仅宣扬自己的成就，而总是尽可能增添奥古斯都的荣耀。他的建筑工程总是颂扬奥古斯都的胜利所带来的和平。[\[5\]](#)

奥古斯都持续获得新的胜利。雅努斯神庙大门在仅仅几年后又又一次关闭，公开宣布元首带来了新的成功。在共和国多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关闭雅努斯神庙大门的仪式仅仅执行过两次，但我们很难确定当时有多少人知晓这个事实，而且他们还不知道，宣布西班牙和平有些为时过早。其他行省传来的消息都很好，奥古斯都的将军们在南征北战。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都传来了捷报。科尔内利乌斯·伽卢斯的生涯虽然以耻辱告终，但他的胜利无疑是货真价实的。接任他的艾利乌斯·伽卢斯也是一名骑士。到目前（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奥古斯都似乎已经决定对埃及施加特殊待遇，让一名骑士阶层的长官，而不是元老阶层的军团长，来统治埃及。[\[6\]](#)

奥古斯都向艾利乌斯·伽卢斯下达的指示是直白坦率且咄咄逼人的。艾利乌斯·伽卢斯向阿拉伯福地（阿拉伯半岛的西北角，那里的居民凭借香料、宝石和丝绸等奢侈品的中转贸易发了大财）[\[7\]](#)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伊始，他的许多船只因在红海遭遇风暴而损毁，此后的进展也很不顺利。罗马军队很难适应沙漠条件，步履艰难，因为交战而损失的人很少，因为干渴、中暑和疾病而死亡的人却很多。艾利乌斯·伽卢斯选择了错误的路线，他后来责怪并处决了提出此建议的盟友。但我们很难说这位盟友是故意坑害罗马人，还是仅仅庸碌无能。罗马人占领了好几座要塞，但饮水耗尽，不得不放弃对最后一座要塞的围攻。艾利乌斯·伽卢斯及其将士虽然缺乏技巧，但表现出了顽强的意志，撤退时比进攻时更顺利。

此次入侵无疑是个失败，而且代价高昂，但战场离罗马非常遥远，而且规模不大，顶多只有两个军团的部分兵力以及一些辅助部队和盟军参加。与尤利乌斯·恺撒的不列颠远征（建树甚微，但得到了罗马群众的疯狂赞颂）一样，阿拉伯半岛充满了异国情调，神秘莫测，是罗马军队不曾涉足的国度。奥古斯都宣布此次入侵取得了胜利，没有人过分关注真相。没有一位元老参加此次远征，艾利乌斯·伽卢斯的继任者普布利乌斯·佩特罗尼乌斯发动远征时，也没有元老随军行动。佩特罗尼乌斯率领埃及行省驻军的很大一部分兵力，沿着尼罗河南下，在第一和第二瀑布之间赢得了一些胜利。埃塞俄比亚人的一座主要城市被攻破，于是罗马人宣布对遥远的异邦民族取得了又一次胜利，这一次是真实的胜利。[\[8\]](#)

在海外的成功（尽管其中有些是想象的，而非真实的成功）加强了国内的稳定。元首似乎在兑现他的诺言，即为他管辖的各行省带来秩序，不管他是亲自出马还是派遣部下行动。如果执政官之一长期不在罗马，对罗马的日常管理造成了困难，那么就要想办法来应对。事情并非始终顺利。前26年，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梅萨拉·考尔维努斯（他的父亲是执政官，他本人则是前32年的补任执政官），以及一个曾支持“解放者，后来又支持安东尼的人”被任命为罗马城长官。尤利乌斯·恺撒恢复了這個古老的职位，选择几个人在他远离罗马期间负责罗马的行政管理。除此之外，这个职位只出现在共和国早期遥远而迷雾笼罩的年代。梅萨拉上任几天之后就辞职了，“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职权”。有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解释是，他认识到自己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被幕后的奥古斯都亲信弄得像一场骗局，于是辞职了。现代人还有一种解释是，他受到了其他不认可奥古斯都政权的贵族的压力，被迫辞职。但这两种解释完全是猜测。后来这个职位被再次启用，并交给了值得信赖的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9\]](#)

衰老、疾病和死亡

奥古斯都最终返回罗马的时候，已经快到年底了，他得以在新近修缮完毕的道路上旅行。他本人曾为弗拉米乌斯大道^[10]的修复工程出资，并鼓励其他元老，尤其是曾庆祝凯旋式的元老，去承担其他主要道路的工程。有一些元老效仿他的做法，但最后大部分工程还是恺撒·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承担的。这些工程将实用功能与强有力的视觉信息结合起来。路上的里程碑记载着修复道路的功臣的名字，而显眼的地点，如主要桥梁，则竖立着元首雕像。^[11]

这些雕像非常优雅，表现的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他的面庞没有任何衰老或压力的迹象，与近几十年来罗马十分常见的那种布满皱纹、下颌多肉的肖像形成了对比。但事实上恺撒·奥古斯都已经三十九岁了，受到重病困扰，以至于无法参加马凯鲁斯和尤利娅的婚礼。阿格里帕代表奥古斯都参加了这次婚礼。在很多场合都是阿格里帕代表奥古斯都出席的。没有人说得准，奥古斯都还能活多久，他本人也说不准。我们不知道他长期疾病缠身的原因，不过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他患有肝病，所以我们可以大致推测至少他的肝有一些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奥古斯都的疾病是假装的，为了吓唬广大群众，让他们觉得假如元首死了，内战就会再次爆发，于是大家会感激他的继续存在，并接受他的主宰。也有人说奥古斯都的疾病是心理或情绪上的侵扰导致的身体病痛，不过正如一位著名学者说的，“医生遇到自己无法诊断的疾病时，总喜欢说它是心理原因造成的”。^[12]

对罗马贵族来说，培养下一代从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马凯鲁斯和提比略都在离开罗马城、陪同奥古斯都去西班牙之前接受了成人礼。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在亲属的幕僚中获取最初的军事和外省生活经验也是司空见惯的，只是他们获得军事保民官职衔时太年轻。不过，他们后来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一般情况。这两位青年在恺撒之前

返回了罗马，在西班牙的最后几周里，他们为军团士兵主持了一系列竞技和娱乐活动，以庆祝战役的结束。后来，在前24年，元老院在奥古斯都的鼓励下，加快了晋升他们的速度。他们获得了元老身份，马凯鲁斯获得了前任裁判官的衔级，并被允许在正常年龄的十年以前担任各级官职，包括执政官。提比略被允许比法律规定的年龄早五年担任官职。

秋季，两位十八岁少年第一次竞选官职。他们肯定得到了奥古斯都的公开支持，并且在拉票与投票的环节，奥古斯都很可能还亲自到场。和奥古斯都推荐的其他人选一样，此次竞选的结果没有任何疑问，马凯鲁斯当选为市政官，提比略成为财务官。虽然他们非常年轻，但我们不应当忘记，他们都来自非常古老和威望极高的贵族豪门。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比阿格里帕那样的人更容易被其他元老接受。

马凯鲁斯尤其得宠，得到了比提比略更高的官职，并且享有最大的荣誉：与元首的独生女结婚。但提比略得到的荣誉也是非常慷慨和不同寻常的，他的未婚妻维普撒尼娅是三次担任执政官的人的女儿，还是阿提库斯的外孙女。前23年，奥古斯都挑选李维娅的儿子为自己的财务官，并给了他一项特别的职责，即在他们前往罗马旅途的最后阶段组织粮食运输工作。提比略还奉命去调查很多乡村大庄园的奴隶营地，其中一些被怀疑非法囚禁无辜的旅行者，强迫其为庄园劳动。后来发现果然如此。这两项工作都很有意义，而且同样重要的是，给了提比略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做一些重要而得民心的公共事业。马凯鲁斯的情况就更是这样了。他作为市政官，负责主持竞技活动，在自己的舅舅和岳父，即元首本人的帮助下搞得有声有色、令人难忘。广场临时看台的上方搭起了凉棚，为观众遮阳，表演者中有一位拥有骑士身份的舞者和一位来自贵族世家的年轻女子。^[13]

前23年，马凯鲁斯和提比略都是十九岁。恺撒·奥古斯都四十岁，第十一次担任执政官。与他一同当选的同僚原本应当是一个叫瓦罗·穆里纳的人，但后者于前24年年底或次年年初去世了。接替穆里纳的是格奈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此人曾在腓立比与奥古斯都敌对。皮索的家世很显赫，但自内战以来很少参与政事，据说曾拒绝别人鼓励他从政。这一次他被说服了，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改变主意，但这打破了近些年来的常规，即奥古斯都的同僚执政官全都是他的亲信。这或许是奥古斯都与皮索和解的姿态，或许是向大家保证，贵族世家的成员能够享有他们理应享有的崇高荣誉。[\[14\]](#)。

这一年很不顺利，不过不是两位执政官的缘故，也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很好地合作，而是因为天灾。一场严重的疫病暴发，在意大利各地导致大量人口死亡，而且它在本年度和下一年度多次在罗马暴发。台伯河洪水泛滥，影响了罗马城地势较低的区域，引发了更多疫病。庄稼收成很糟糕，导致粮食匮乏。虽然提比略的努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市场被严重扰乱，粮价飙升。为了赈济穷人，奥古斯都使用自己的资金，向在罗马城的25万公民发放了12份粮食或面粉（可能是一个月一份）。[\[15\]](#)。

大家都觉得恺撒·奥古斯都已经时日无多。上半年某个时候，困扰他很久的肝病又发作了，病情非常严重。通常的治疗手段包括热敷，但这一次没能缓解他的痛苦。奥古斯都将高级行政长官、显赫元老和骑士阶层的代表召唤到自己病榻前，共商国是。谈话结束时，他将自己的图章戒指交给阿格里帕，但向自己的同僚执政官皮索汇报了当前军队和公共账目的状况。没有人提及马凯鲁斯。恺撒·奥古斯都非常刻意地没有指定继承人。要指定继承人是很困难的，因为他的权力和威望都属于他本人，而且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元首地位可以传给其他人。除此之外，马凯鲁斯年仅十九岁，正处于自己政治生涯的开端，即便奥古斯都本人也是在多年里逐渐获得其养父的地位的。如果

恺撒·奥古斯都去世，那么阿格里帕是接管大部分军队的最佳人选，但他缺乏政治人脉，而且在过去愿意将大部分功劳都让给朋友，这些都是弱点。他不是恺撒家族的成员，根本就不是贵族，即便他控制了政权，也很可能需要用武力保住权力。

恺撒·奥古斯都顽强地生存着，不过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继续开会，甚至不能做出重要决策。一位新医生被唤来照顾他，即释奴安东尼·穆萨，他和其他很多医生一样，可能来自希腊化世界。他摒弃了通常的疗法（热敷），改用冷敷和冷水浴。元首的身体逐渐好转，恢复了元气。不管是穆萨的疗法真正有效，还是奥古斯都自愈，他后来再也没有患过重病，也不再受到肝病的困扰。其他疾病，比如感冒，以及初春和9月（他生日前后）容易生病的情况，在大多数年份里都会发生，但看上去羸弱的奥古斯都还有三十五年的寿命。

穆萨凭借自己奇迹般的疗法，得到了痊愈的元首的丰厚赏赐。元老院举行了公共感恩活动，很快赐给这位医生额外的慷慨赏金，以及佩戴一枚金戒指的权利。元老院还让人制作了穆萨的雕像，将其摆放在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雕像旁。穆萨和其他医生都被赋予永久免税的权利。消息传开之后，许多个人和社区举行了公共感恩活动，庆祝恺撒·奥古斯都恢复健康。^[16]

至少在目前，国家安定得到了保障，即便那些不是非常喜欢元首的人也感到高兴。但人们对未来还是抱有担忧，有流言谈到马凯鲁斯为什么被忽略，这表明至少有一部分人认为，奥古斯都如此厚待马凯鲁斯是准备让他接班。奥古斯都听到这些流言，很不高兴，因为这些说法对他原本非常正当、非常公开地交权给同僚执政官和老友的做法产生了消极影响。他身体恢复到足以参加元老院会议的程度后，便公开否认他在培养马凯鲁斯接班。作为证据，恺撒·奥古斯都带来了他所谓的遗嘱，并主动表示愿意宣读给元老们听，表明他的外甥除了正常

的遗产之外什么都得不到。这个举动很有意思，让人联想到差不多十年前他公开安东尼遗嘱的事情。如果接受他的主动建议（即当众宣读遗嘱）就意味着大家不相信元首的话，需要看到证据，所以元老们迅速高呼，不肯让他宣读遗嘱。^[17]

7月1日，奥古斯都离开罗马城，去往附近的阿尔班山，在那里辞去了执政官职务。他处于罗马城的正式边界之外，可能事先没有走漏自己即将辞职的风声，避免了元老们“表忠心”或者广大群众迫使他收回成命的情况。他可能还宣布自己在近期内将不再担任执政官。执政官皮索迅速主持选举了一名补任执政官来接替奥古斯都。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候选人在这么短时间内出现，而且奥古斯都可能已经鼓励卢基乌斯·塞思提乌斯参选。塞思提乌斯曾是布鲁图斯的财务官，为他效力，反对年轻的恺撒。尽管塞思提乌斯在腓立比战役之后投降并且得到赦免，但还是公开而热情地赞颂死去的“解放者”，家中存放着布鲁图斯的肖像，并定期哀悼他。奥古斯都选择这样一个肯定不是他亲信的人当执政官，得到了广泛的敬佩，尤其是贵族们的仰慕。和皮索一样，塞思提乌斯也被门阀贵族认为是担任最高行政长官的合适人选。事实上，在随后十年中很多执政官都是贵族。这是奥古斯都恢复表面看起来正常的体制的又一个姿态。^[18]

虽然奥古斯都不再担任执政官，但他掌管帝国所有关键军事行省的十年任期还没有过一半。他仍然享有极大的威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几乎垄断了武装力量，所以辞去执政官职务并没有削弱他的最高地位。但这种主宰地位如何以合法的方式表达出来，需要注意。他如今不再拥有执政官的军权，于是元老院迅速投票授予他永久性的资深执政官级别军权，授权他合法控制他的各行省以及各省驻军。一般来讲，当一位资深执政官离开自己的行省、跨越罗马的神圣边界进入罗马城之后，他的军事指挥权和司法权就正式失效了（除了他在凯旋式那天获得的特别授权之外）。而奥古斯都打算频繁地进出罗马城。

为了避免每一次都要给他特别授权的麻烦，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宣布对他施加相应的豁免。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即便在罗马时也拥有永久性的资深执政官军权。而且他的军权被明确规定为优于任何其他资深执政官的军权。如果奥古斯都来到一个元老院行省，那么该省总督无权阻碍或推翻他的行动和决定。这种授权并没有将这些元老院行省交给他掌管，也不需要他向总督们定期发出指示。和以往一样，他继续接收和答复这些地区的社区发出的请愿，他的决定也得到尊重。这既是因为他的威望极高，也是由于他拥有正式权力。

在过去，恺撒曾多次被授予平民保民官的部分权益和权力。前23年，这些权益和权力被恢复，或者范围得到扩大。他是贵族，根据法律是不能担任平民保民官的，尽管他在前44年的混乱中曾尝试竞选这个职位。自前36年起，他，以及屋大维娅和李维娅，都陆续获得了平民保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任何人胆敢以任何形式伤害他，都将被视为亵渎神明。现在他不再担任执政官，因此没有在城内处理政事的正式权力，于是他被授予保民官的权力，以便让他有权在城内处理政事。作为一名行政长官，保民官有权召集元老院或平民大会。奥古斯都还得到了以往任何保民官都不曾享有的一项权利，即在每一次元老院会议上提出一项动议。^[19]

这些新权力的具体细节，以及为什么要授予他这些权力，目前仍然是非常有争议的学术讨论话题。对于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回答，而且和几乎所有情况一样，我们对奥古斯都及其谋士的动机一无所知。这个计划肯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过很难明确这些考虑是在他上一次患病之前还是之后进行的。执政官的职位很方便，也是传统的、显赫的权力的一种明显的表达方式。但在前23年，奥古斯都已经连续九年担任执政官，而且除了最初两年之外，他都任满一年任期。

在前23年之前，他的同僚执政官主要是他的亲信。虽然这是一种合法公开地掌权与行事的有效方式，但意味着在这十年里，除了元首的亲信之外，任何人都不能攀登到元老政治生涯的巅峰。习惯性的辞职和任命补任执政官的做法令这个官职的尊严受损，表现了奥古斯都赤裸裸的主宰地位（因为他控制着这个体制），同时还要进行频繁的选举活动。[\[20\]](#).

狄奥说恺撒·奥古斯都希望给更多元老赢得最高行政长官职位的机会，这可能是正确的。前23年之后，一连十年不再有补任执政官，而且后来即使出现了补任执政官，也是孤例。大多数担任执政官的人都出身贵族世家，但都很年轻，所以在内战（尤其是越来越遥远的腓立比战役）中都只是小角色。皮索和塞思提乌斯那样的人代表着旧的元老精英阶层，可能会公开支持“解放者”的事业，并希望恢复理想化的共和国（即由元老院指导，不受任何个人或派系的支配）。[\[21\]](#).

但他们也是二十多年来在三头同盟或恺撒·奥古斯都统治下生活过的人。不管他们愿不愿意，都必须接受新政权，至少目前必须接受。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执政官的官方名录中，而且他们公开履行官职职责，这些都装饰了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恢复每年两名执政官的做法不仅是传统的，而且阻止了任何个人获得太多或永久性的影响力和权力，而这恰恰是执政官制度的初衷。不管执政官的威名多么显赫，他们都无法与恺撒·奥古斯都相提并论，后者十一次担任执政官，三次庆祝凯旋式，更多胜利的功劳也被正式归于他，而且他仍然掌控着所有重要的行省，并在罗马政治生活中继续起到积极作用。

尽管有人努力将这些年的事情解释为元老们联合起来与奥古斯都作对，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奥古斯都改变自己的正式地位是被人强迫的。很多元老肯定很高兴看到执政官职位的竞选可以在广泛的、恰当

的候选人之中进行。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在随后几年里，百人会议的大多数选民持续在选票上写下恺撒·奥古斯都的名字，尽管他根本没有参选。这些选举实际上由当年的两名贵族执政官之一主持，并且竞争很激烈，据说存在普遍的贿选和一些暴力骚乱，就像之前几十年一样。奥古斯都总是谢绝再次当选，但很显然，许多人只在奥古斯都拥有公开权力以维持稳定、避免内战的时候，才感到放心。百人会议的投票由富人组成的百人团开始，往往也由他们决定结果，所以这并非一群粗鲁不羁的文盲贫民希望那个给他们娱乐活动和免费粮食的人继续掌权。[\[22\]](#)

对奥古斯都来说，让元老们相对满意是非常理智的做法，因为他需要借助这些人在意大利和各行省工作。除了埃及之外，他的所有行省总督和指挥军队的下级军团长都是元老。这种体制需要不断有新的元老自愿为他效力，然后接受奖赏——荣耀、头衔和为自己与家族赢得声望的机会。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前23年，奥古斯都将裁判官的数量从传统的八人增加到十人，利用增加的两名裁判官来帮助管理国家财政。每年有两名新的执政官，再加上他自己的新权力，于是有了更多的高级行政官员，使他能够办成更多的事情。连续担任执政官对奥古斯都来说可能也很不方便，而且在他远离罗马时，给他的同僚带来了沉重负担。因此他做的这些改变是有充分理由的。[\[23\]](#)

更重要的问题是，恺撒·奥古斯都的权力在将来应当如何公开行使。他大病痊愈，说明他的未来还将延续一段时间。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他非常强调保民官权力，并在统治期间用他担任保民官的年数来确定年份。他的继承者延续了这种做法。塔西佗在2世纪初将保民官描述为“最强大权力的头衔”。但奥古斯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强调保民官权力的，而且用他担任保民官的年数来纪年的做法起初也只是图方便，因为再也不能用他担任执政官的次数来纪年了（自前30年起的很多年都是这么做的）。很多罗马人对平民保民官有着很深的感

情，认为平民保民官是公民权益的捍卫者，所以这种联系对奥古斯都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但罗马人不断尝试迫使元首当执政官，后来有一次甚至企图让他当独裁官，说明人们对奥古斯都当保民官这件事本身并不满足。^[24]

这些年里，有迹象表明奥古斯都在努力掩饰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他放弃了之前的一项计划，即为他在帕拉丁山的宅邸建造宏伟的道路。通往他宅邸的道路将会从广场出发，从许多最豪华的贵族府邸门前经过，这些府邸的门廊上装饰着其主人或主人先祖的战利品和丰功伟绩的标志物。这样，元首就不是茕茕孑立，而是处于罗马城所有伟人的巅峰。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努力去掩饰自己远远超过其他人的荣耀和地位。他的豪华宅邸胜过其他任何人的住宅，甚至胜过恢宏的阿波罗神庙；其他任何人都不像他那样居住在罗马如此多的古老而神圣的场所附近，比如罗慕路斯的小屋和牧神圣所（罗慕路斯和兄弟吮吸母狼乳汁之后被发现的地点）。这绝不是一位普通元老的住所，甚至不是一位元首（这个词原意是许多人的首领）的家宅。通往奥古斯都宅邸之路开始的地方——广场——立起了越来越多的纪念碑，以颂扬神之子、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25]

作为执政官，以及作为三头同盟成员，奥古斯都拥有正式的行政长官职位，以及相应的权力，唯一的约束就是紧急法律规定的他的两位同僚的权力，正是这项法律创建了三头同盟。前23年他辞去执政官职位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从那以后，他只是偶尔担任正式的行政长官。除此之外，他的权力属于他个人，与任何官职都没有联系。而且这些权力是终身制的。奥古斯都拥有保民官权力和资深执政官级别的军权，以及其他一些权力，这些都是元老院和人民授予的。他的权力没有任期限制，也没有任何官职可以让他辞去。他的行省指挥岗位是有任期的，但在期满之前就被迅速延长五年或十年。恺撒·奥古斯都是共和国最伟大的公仆，因为他是恺撒·奥古斯都，并将始

终如此。从很多方面来看，前23年之后，他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先前更加明显，而不是更加隐晦。这一般被称为“奥古斯都的第二次解决方案”。尽管他小心避免国王或独裁官这样的头衔，但他的主宰地位是一目了然的，并且所有迹象都表明他的权力将是终身制的，就像尤利乌斯·恺撒在前44年所享有的地位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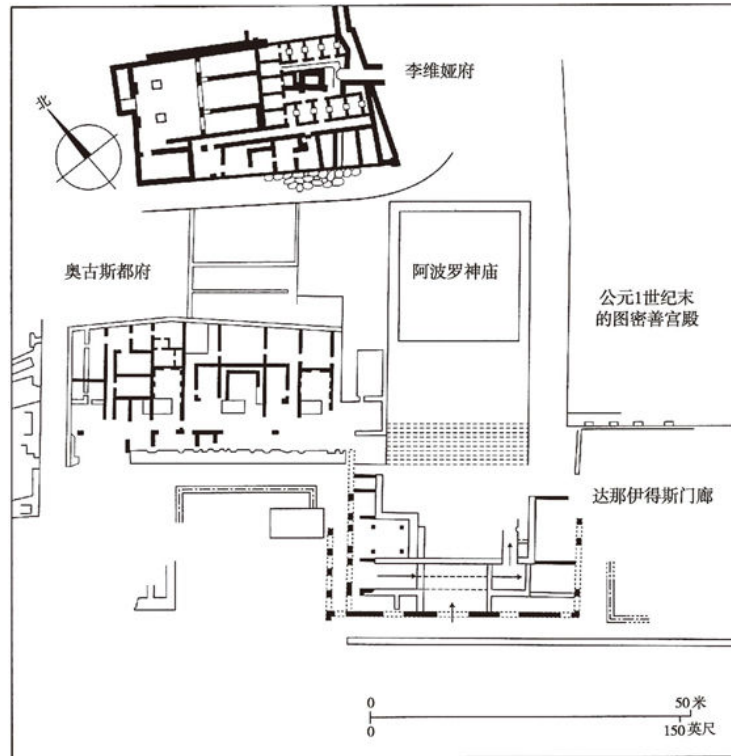
竞争与阴谋

前23年下半年某个时间，阿格里帕离开了罗马，前往地中海东部。他获得了资深执政官级别军权的特别授予，可能为期五年。我们不太清楚他为什么被授予这个特殊指挥岗位，但他的职权范围显然包括叙利亚这个帝国行省。但阿格里帕没有去叙利亚，而是在莱斯波斯岛（其名义上的长官是亚细亚总督）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从那里监管更广泛的地区。他可能作为奥古斯都的代表，接见了一些来自元老院行省和帝国行省的代表团，为元首分担了一些工作。帕提亚国王目前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他的竞争对手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内，这可能加剧了两国边境的紧张气氛。帕提亚人可能会发动一场入侵，就像前41～前40年做的那样。因此，让一位有能力协调对策的人掌管地中海东部的大局，会很有帮助。派遣阿格里帕去东方的做法本身就表明罗马人不是毫无戒备的，或许已经足以震慑帕提亚国王，令其不敢公开与罗马作对。^[26]

当时流言四起，说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人们说，十九岁的马凯鲁斯和四十岁的阿格里帕之间存在竞争。据说阿格里帕非常嫉妒奥古斯都那年轻而未受考验的外甥所受到的特别恩宠；也有人说阿格里帕宽宏大量，刻意避开马凯鲁斯，以免妨碍后者。两人的关系很可能有些紧张。众所周知，阿格里帕脾气比较火爆，有时很难相处。他已经拥有一系列胜利和公共建筑工程，现在处于罗马传统中政治生涯的巅峰期。马凯鲁斯很年轻，可能已经被自己新近获得的崇高地位弄得心醉

神迷。有迹象表明，他的判断和言论在有的时候很值得商榷。有权有势的人身边总会聚集一些门客和比较非正式的追随者，这些人希望与大人物结交，从而得利。马凯鲁斯的一些追随者可能觉得，打击任何有可能与自己的恩主平起平坐或甚至超过他的人的威望，是很好的主意。[\[27\]](#)

事情应当就是这样了，阿格里帕和马凯鲁斯之间斗得你死我活的故事都是夸大其词，或者完全是捏造的。奥古斯都的本意很可能就是，在自己返回罗马之后，派遣阿格里帕到外省，确保他们两人当中随时都有一人在努力维护帝国的稳定，保障和收缴稳定的财政收入。十年前，地中海东部还遭到压榨，先是支持安东尼的战争努力，后来又为恺撒的得胜军队出资。即便帕提亚的威胁并不真实存在，也有许多工作要做，以确保该地区复苏并处于罗马的有效控制之下。恺撒的疾病可能使他未能早些返回罗马，直到他痊愈之后，才将自己最精明强干的下属派往东方，执行新一轮凡俗而缺少光辉的劳作。流言蜚语在继续传播，但极不可能影响任何重要决策。



奥古斯都在帕拉丁山上的府邸平面图

恺撒·奥古斯都的状态不错，虽然意大利和罗马出现了粮食匮乏、瘟疫和自然灾害，但他一直很健康。这年年底时，马凯鲁斯病倒了。有史料称，他的症状与奥古斯都前不久患病的情况相似，但当时瘟疫还在传播，所以他也完全可能是染上了瘟疫，不管这瘟疫究竟是什么。安东尼·穆萨被唤来医治马凯鲁斯，大家希望他能在马凯鲁斯身上创造奇迹，就像他当初在马凯鲁斯的舅舅身上创造奇迹一样。这一次穆萨失败了。马凯鲁斯死了，十六岁的尤利娅成了寡妇。这对少年表兄妹的婚姻很短暂，没有生下一男半女。[\[28\]](#)

后来有传闻称，马凯鲁斯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毒死的，凶手或幕后元凶是李维娅。我们无法证明马凯鲁斯不是被谋杀的，这种可能性太小了。在瘟疫肆虐的时期，青少年早夭的现象屡见不鲜，名人也不可能免于瘟疫，而即便在安宁的年份，罗马年轻人也有可能病死。在挤着近100万人并且不断从世界各地吸收商品与人员的大城市，病菌

有很多机会传播开来并导致人们死亡。马凯鲁斯应当是自然死亡的。当时他的死亡并不对任何潜在竞争者特别有利。元首的健康状况仍然非常好，他在这一年年初拒绝指定马凯鲁斯为继承人，而在外甥去世之后，他也不大可能公开地恩宠提比略或其他人。^[29]

在公众层面上，马凯鲁斯受到了极其深切的哀悼。葬礼之后，马凯鲁斯的骨灰被存放在战神广场上的奥古斯都陵墓。这座陵墓还没有完工，马凯鲁斯是第一个在此安息的人。屋大维娅建造了一座公共图书馆，以纪念她的儿子。奥古斯都也表达了哀思，将尤利乌斯·恺撒开始建造（或至少是筹划）的石制剧场（现已接近竣工）命名为“马凯鲁斯剧场”。普罗佩提乌斯^[30]写了一首诗纪念马凯鲁斯，追溯了马凯鲁斯曾主持的节庆活动以及为群众提供荫凉的凉棚。几年后，维吉尔描写他的史诗主人公埃涅阿斯拜访阴间，看到了未来伟大罗马人的影像，他们还没有得到肉身，还没有降生到凡间。其中他看到了一个“英俊超俗”的青年，但面带忧伤，因为“死亡的黑影”笼罩着他。埃涅阿斯的向导解释说，这就是马凯鲁斯，并且：

……命运只允许人世短暂地一瞥他的身形，不允许他在凡间停留太久。哦，天上的诸神啊，若你们的这些馈赠延续很久，你们就会觉得罗马人过于强大！著名的战场上，怎样的抽泣声会飘向玛尔斯的伟大城市！父亲台伯河啊，你从新建的坟墓旁流过时，会目睹怎样的送葬队伍！再也没有一位特洛伊血统的青年，会让他的拉丁先祖如此充满期望。罗慕路斯的土地再也不会拥有这样优秀的男儿。呜呼哀哉，他的善良，他的骑士荣誉，他不可战胜的持剑的臂膊！在战斗中，无人能够面对他而毫发无损。他徒步冲向敌人，或者纵马奔驰，用马刺催动口泛白沫的骏马。^[31]

自然灾害一直持续到前22年，但奥古斯都的身体一直很健康。两位新的执政官拥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不过没有特别突出的个人才干。持续的粮食短缺促使人们呼吁元首直接掌管政权，就像伟大的庞培于前56年在类似危机中做的那样。恺撒·奥古斯都谢绝了任何额外的权力或头衔，但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粮食问题。有些人在故意囤积粮

食，等待粮价升到最高点，于是他向这些囤积者施加了非正式的压力，将存粮投入市场，实现了短期的救济。在长远方面，他安排每年指定两名前任裁判官来监管向罗马城输送粮食的工作。^[32]

奥古斯都办成了一些事情。如果他不施加干预的话，那么许多年来元老政府典型的惰性似乎要卷土重来了。很多人对奥古斯都辞去执政官职务和拒绝接受其他行政长官职务仍然有顾虑。有人要求他就任监察官，或永久性接受监察官的权力。还有一次，一群意志坚定的群众包围了正在开会的元老院，堵住了议政厅大门，要求元老们立刻选举奥古斯都为独裁官，否则就把房子连同里面的人一起烧掉。或许就是在这一次，一大群人要么是夺得了真正的法西斯束棒，要么是制作了类似的束棒，带着二十四支束棒（象征独裁官）去找恺撒。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圣尤利乌斯之子发表了演讲，谢绝了这项荣誉，并以同样的方式应对他们持续的哀求。但群众非常坚决，促使他非常戏剧性地撕破了自己的衣服，以示无奈。多年后，他吹嘘自己曾两次谢绝独裁官职务。这个场景让人联想起尤利乌斯·恺撒在牧神节的表现。但奇怪的是，有些学者倾向于相信尤利乌斯·恺撒是在作秀，却相信奥古斯都是真诚的。类似地，关于要求奥古斯都接受官职的群众运动是不是奥古斯都安排的，历史学界很少有争论，大家一般都认为这些运动多多少少是群众自发的。这些事情进一步表明，恺撒·奥古斯都必须关注元老和骑士阶层之外的人群的意见。起到重要作用的不仅仅是精英阶层，还要让其他群体也心满意足，才能维持长期稳定。这个事件表明他仍然在为国效力并处置遇到的各种危机。他向群众保证，辞去执政官职位并不意味着他已经退隐，也不说明他今后只关注外省。他将运用自己现有的权力，尽其所能。^[33]

另外，选举产生了两名监察官，这也是佯装恢复传统的做法。其中之一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让他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监管道

德风化，未免有些讽刺。另外一个人曾在前43年遭到政治清洗，但生存了下来。两名监察官的任职并不顺利。有一次两人在主持一场仪式时，所站的平台坍塌了。狄奥记载道，一般由监察官监管的大多数工作，其实都是由奥古斯都亲自安排的。在粮食匮乏的时期，一些公共节日被取消了，其他节日的规模也缩减了不少。节日活动的开销受到限制，负责主持节日的行政长官被禁止花费比其同僚更多的金钱。只有得到元老院的正式批准，才可以举办角斗士竞技，并且一年顶多举办两次，每一次竞技不能超过120名角斗士。遵照监察官的传统，还采纳了其他一些措施，以遏制不端行为和奢靡之风。元老的儿孙（只要他们足够富裕，算得上骑士阶层）被禁止登台演戏，恺撒·奥古斯都在马凯鲁斯的娱乐活动期间曾允许这种现象发生。在其他人的提议下，一些措施可能被采纳为法律，但奥古斯都肯定是幕后的推动者。[\[34\]](#)。

奥古斯都这样的绝对主宰地位肯定让很多人感到宽慰，但在前22年年初，在一些令人不快的事件中，他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了质疑。首先是马尔库斯·普里穆斯受审，此人之前是元老院行省马其顿的总督，现在任期结束，返回了罗马。马其顿是少数仍然拥有驻军的元老院行省之一，普里穆斯利用这些军队开展战争，赢得荣耀和战利品，大发横财。现在他被起诉，罪名是损害了罗马人民的威严或声誉。苏拉和尤利乌斯·恺撒都曾确认已有的立法，禁止行省总督在没有元老院明确许可的情况下率军离开自己的行省。普里穆斯攻击的民族之一是欧德律赛人，这个部族在几年前刚被克拉苏打败过，后来向克拉苏投降，被授予盟友地位。如果克拉苏还在世，很有可能帮助欧德律赛人申冤，因为征服者往往会成为落败敌人的保护者。其他人可能也对此案感兴趣，推动了起诉进程。非公民的个人或社区不能在罗马法庭上提起诉讼，因此需要罗马公民来代理他们。

为普里穆斯辩护的律师是一位被普遍认为是善人的元老，而且得到奥古斯都的宠信。他的名字是穆里纳，有的史料说他叫李锡尼·穆里纳，也有的说是瓦罗·穆里纳。他可能与被选举为前23年执政官，但在就职前不久或之后死亡的那个穆里纳有亲戚关系，然而我们不知道是多么亲近的关系。他的妹妹或同父异母妹妹是特伦提娅，即梅塞纳斯的妻子；他还有一个兄弟是盖乌斯·普罗库雷乌斯，是元首的亲信。没有证据表明穆里纳敌对奥古斯都，而作为主要的辩护律师（为被告辩护的人可能有很多），他关注的应当是让自己的客户无罪开释。读一读西塞罗的演讲稿，我们就会发现，罗马的辩护律师随时可以歪曲事实，眼睛都不眨一下。

普里穆斯毫无疑问攻击了欧德律赛人，而欧德律赛人是罗马人民的正式盟友。辩方的论点可能是，欧德律赛人背信弃义，图谋反对罗马，或者已经做出了敌对行为，因此理应受到惩罚。尤利乌斯·恺撒曾在一次停战期间攻击一些日耳曼部落，后来就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但这一次普里穆斯更过分，声称自己得到了发动进攻的许可，甚至是直接指示。据狄奥记载，普里穆斯的证词前后不一致。普里穆斯有一次声称指示他进攻欧德律赛部落的人是奥古斯都，后来又说是马凯鲁斯。他可能是说，马凯鲁斯向他传达了奥古斯都的暗示或直接命令。[\[35\]](#)

在很多层面，这都令人震惊：一位近期才进入元老院的少年，竟然能够命令或者鼓励一位资深执政官去做某件事情。这让人想起三头同盟或君主制的旧日子，那时行政长官和总督都没有真正的独立性，统治者或其亲信可以强迫他们做事。这可不是恺撒·奥古斯都在前27年精心设计的形象，他在近期辞去执政官职位并谢绝独裁官职位，也不是为了让大家这么想。

马凯鲁斯已经死了，不能出庭作证。法庭没有传唤恺撒·奥古斯都，因为没有人愿意用这种方式挑战他的权威。穆里纳和普里穆斯可能是希望借用元首的名字把这一潭水搅浑，帮助普里穆斯无罪开释。在过去，罗马法庭常常无法将铁证如山的罪人定罪，而这一次可能有一些陪审员对普里穆斯友好，或者愿意对他网开一面，以便换取他的友谊或好处。

虽然没人敢也没人想要奥古斯都出庭，但他还是来了。他明确表示自己愿意出庭作证。一位主持法庭的裁判官问他，是否曾像普里穆斯说的那样指示普里穆斯进攻欧德律赛部落，元首否认了这种说法。被告的辩护律师穆里纳还没有质询他，而穆里纳此时越来越绝望，因为恺撒·奥古斯都的到场和无法撼动的声望对他的客户施加了极大压力。他们肯定希望避免这种情况。恼怒与恐惧的混合很快让辩方律师采用了罗马庭审中常见的咄咄逼人、尖刻凶悍的语调。奥古斯都仍然不动声色，这令人恼火。穆里纳问他为什么到庭，是谁传唤他来的。元首精练地回答：“公共利益。”

虽然一些陪审员投票主张将普里穆斯无罪释放，但他还是被判有罪。这些陪审员可能是和被告有着种种联系，但也有人可能是因为奥古斯都干涉庭审而非常恼火，于是和他对着干。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元首说的是不是真相，究竟是完整的真相，还是很多现代政治家常用的那种避免直接撒谎而刻意设计出的误导众人的所谓真相。奥古斯都应当不大可能希望进攻欧德律赛人，更不会用如此拙劣的方式部署安排。但有传闻称，奥古斯都有时对马凯鲁斯的判断和举止不满，所以存在这样颇有吸引力的可能性：他的外甥可能不明智地对普里穆斯说了些什么。^[36]

虽然很多人仰慕奥古斯都镇静自若而充满尊严的干预，但至少有一部分人怀疑他欺骗了大家。普里穆斯声称自己得到了命令，并且认

为大家会相信他，这突出了元首主宰政局的事实，而不是元首精心维持的假象。不管案情究竟如何，这都损害了奥古斯都的形象。穆里纳肯定怒火中烧，几个月后他被指认为企图刺杀奥古斯都的阴谋集团的成员之一。这是亚克兴角战役之后小李必达^[37]企图政变以来第一次出现关于阴谋的传闻。这个集团的领导人是范尼乌斯·凯皮欧，据说是个声名狼藉的人，不过很难说他是否抱有“共和派”情感，他可能是另一个布鲁图斯，也完全可能是另一个喀提林。

我们不知道这些密谋者的目的，也不清楚其中绝大多数人的身份，不过大部分显然是元老或来自元老家族。他们或许希望杀死恺撒·奥古斯都，恢复传统的政府体制，就像“解放者”在前44年希望的那样。即便的确如此，他们也和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人一样，渴望刺杀暴君的光荣和未来的政治利益。另外，密谋者也可能是希望除掉“暴君”，然后以己方一员取而代之。密谋没有发展起来。尤利乌斯·恺撒当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自己。恺撒·奥古斯都则维持着禁卫军和其他卫队，以及一个虽不引人注目但十分高效的间谍和告密者网络。他绝不打算重蹈自己舅公的覆辙。

密谋者们受到控诉，在审判开始之前或不久之后逃之夭夭。虽然他们缺席，但审判照常进行，提比略是控方的律师之一。控方一般是年轻人，这为贵族青年提供了在其政治生涯早期抛头露面的机会。被告一旦逃亡，就被认为是承认自己有罪。贵族享有一项特权，就是在被定罪不久前或不久后逃跑。过去很多罪人带着自己可以携带的财产逃亡，在一座盟邦城市过上舒适的退隐生活。这意味着他们丧失了公民权，政治生命也结束了，但能够逃脱死刑。

凯皮欧、穆里纳等人没有得到这种传统的宽大优待。政府派遣士兵（可能是禁卫军）将其绳之以法并处决。死者之一的父亲后来赞扬了一名努力保护他儿子的奴隶侍从，但公开处死了另一名出卖他儿子

的奴隶。据说，穆里纳从梅塞纳斯的妻子那里提前得到了警告。因为有传闻称这个女人和奥古斯都有长期私情，所以我们不确定她是从丈夫还是从元首那里得到了消息。有流言称，在一段时间内，奥古斯都和他的老友梅塞纳斯疏远了，但梅塞纳斯的影响力主要在幕后，所以很难判断这种说法是真是假。总的来讲，这应当只是个谣言，梅塞纳斯和奥古斯都仍然很亲密。

历史学家狄奥哀叹道，记述奥古斯都取得内战胜利之后的事情比记载之前的事情困难，因为太多的关键决定是私下里做出的，并没有史料记载，而公开的事情仅仅是空虚的仪式。一个世纪之后的图密善皇帝抱怨道，证明某项行刺阴谋真实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被杀掉。不管具体细节如何，前22年的阴谋应当不是凭空捏造的。有的学者认为这起阴谋和普里穆斯审判发生在前一年，是有人企图强迫奥古斯都辞去每年的执政官职务。这种理论没有说服力。凯皮欧和穆里纳的阴谋应当发生在奥古斯都辞去执政官职务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元首的权力在很多方面愈发肆无忌惮，肯定也带有终身制的意味。权力属于他个人，而不再与任何任期固定的行政长官职位有联系。[\[38\]](#)。

前44年，“解放者”惊讶地发现，公众对他们的行动毫无热情。前22年，更是找不到人民普遍敌视奥古斯都的迹象，不过敦促他当独裁官的压力可能让他的敌人害怕他很快会实施永久性统治。凯皮欧阴谋没有给人计划完备的感觉，或许本来就没戏。前63年，西塞罗不愿意允许喀提林密谋者活下去过流亡生活。奥古斯都的选择和西塞罗一样。各行省正处于安定下来的过程中，与之前几代人的印象相比，外省距离罗马已经不是那么遥远。历次内战中也出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在罗马被定罪因而逃亡的人后来作为其他领导人的党羽重返罗马。奥古斯都不愿冒这个险，或许也希望向其他所有企图攻击他的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他想提醒大家，他依旧是过去多次血腥镇压政敌、大批处决敌人的那个军阀，现在之所以不那么做了，完全是因为

他自己的选择。恺撒·奥古斯都拥有远远超过国内其他任何人的强大权力，也不打算放弃自己的权力。他公开强调合法性和传统的做法让其立场有所温和，但他没有尝试去掩饰自己对权力的态度。

他继续为罗马人和外省居民提供和平稳定。有些贵族私下里讨厌这样的事实（即只有他才能维持和平），但仍然接受这样的现实。虽然一些贵族怨恨奥古斯都公开宣扬自己的胜利，随后又庆祝击败和处决密谋者的行为，但绝大多数民众并不怨恨他。恺撒·奥古斯都仍然深得民心，人们害怕他因为疾病或被刺杀死亡后，会天下大乱。目前政权稳固，尽管马凯鲁斯死了之后，奥古斯都需要在别处寻找长远的未来。

[1]. Horace, *Odes* 3.14.1-8 (Loeb translation) .

[2]. Dio 53.28.1-3, *Res Gestae* 15.1, with Crook in *CAH2* X, pp.83-4.

[3].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372, 引用 *ILS* 7448-9讲到他的保镖。

[4]. 会堂 (Basilica) 是古罗马的一种公共建筑形式，呈长方形，外侧有一圈柱廊，主入口在长边，短边有耳室。Basilica这个词源于希腊语，原意是“王者之厅”。在古罗马的城市，会堂一般是作为法庭或大商场的豪华建筑。基督教沿用了罗马会堂的建筑布局来建造教堂。随着历史的变迁，会堂这个词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今天在天主教中，有特殊地位的教堂被赋予Basilica的称号，中文的说法是“宗座圣殿”。

[5]. Dio 53.23.1-4, with P. Zanker (trans. A. Shapiro) ,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 , pp.139-43.

[6]. Dio 53.26.1-5, 27.1-2, 评论见 T. Barnes, ‘The Victories of Augustus’ , *JRS* 64 (1974) , pp.21-6.

[7]. 原文有误，阿拉伯福地（Arabia Felix）指的是阿拉伯半岛南部，今天的也门一带。

[8]. 艾利乌斯·伽卢斯的阿拉伯远征，见Dio 53.29.3-8，Strabo, *Geog.*16.4.23-4, 17.1.53-4, *Res Gestae* 26.5, with S.Sidebotham, ‘Aelius Gallus and Arabia’, *Latomus* 45 (1986), pp.590-602, 及Gruen in *CAH2* X, pp.148-51。

[9]. Tacitus, *Ann.*6.11 on Messalla Corvinus, with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403及Crook in *CAH2* X, pp.81-2。

[10]. 弗拉米乌斯大道是古罗马的一条大道，从罗马越过亚平宁山脉，通往里米尼，由盖乌斯·弗拉米乌斯（前187年执政官）主持建造。

[11]. Dio 53.22.1-2.

[12]. Dio 53.27.5-6, 30.1, Suetonius, *Augustus* 81.1, with E.Badian, ‘“Crisis Theor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Principate’, in W.Wirth, *Romanitas and Christianitas* (1982), pp.18-41, 31包含这句引文。

[13]. Dio 53.26.1-2, 28.3-4, 31.2-3, Suetonius, *Tiberius* 8-9.3, with B.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19-24, R.Seager, *Tiberius* (2005), pp.12-13.

[14]. *Res Gestae* 15.1；皮索不愿意从政，见Tacitus, *Ann.*2.43。

[15]. 粮食，见*Res Gestae* 15.1。

[16]. Suetonius, *Augustus* 59及81.1-2, Dio 53.30.1-3.

[17]. Dio 53.31.1。

[18]. 辞职与塞思提乌斯，见Dio 53.32.3-4, with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335。

[19]. Dio 53.32.5-6.

[20] 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辩论，见W.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 pp.100-16, A.Jones, ‘The imperium of Augustus’ , *JRS* 41 (1951) , pp.112-19, E.Stavely, ‘The “Fasces” and “Imperium Maius” ’ , *Historia* 12 (1963) , pp.458-84, E.Salmon, ‘The Evolution of Augustus’ Principate’ , *Historia* 5 (1956) , pp.456-78, 尤见464-73, J.Crook, ‘Some remarks on the Augustan Constitution’ , *Classical Review* 3 (1953) , pp.10-12, W.Lacey, ‘Summi Fastigii Vocabulum: The story of a title’ , *JRS* 69 (1979) , pp.28-34, H.Last, ‘Imperium Maius: A note’ , *JRS* 37 (1947) , pp.157-64, J.Ferrary, ‘The powers of Augustus’ , in J.Edmondson (ed.) , *Augustus* (2009) , pp.90-136, 尤见99-103,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p.335-8, 及 B.Levick, *Augustus. Image and Substance* (2010) , pp.84-7。

[21] Dio 53.32.3.

[22] 将前23年事件视为对集中有力的反对派的反应，见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p.335-6, 也认为是奥古斯都的盟友推动的, B.Levick, *Augustus. Image and Substance* (2010) , pp.80-86的分析更为平衡, 但 E.Badian, ‘“Crisis Theor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Principate’ , in W.Wirth, *Romanitas and Christianitas* (1982) , pp.28-38 有力驳斥了上述论点, 并提出主要原因其实是奥古斯都患病, 从而精心安排; 人民多次尝试选举奥古斯都为执政官, 见Dio 54.6.1-2, 10.1, 及 A.Jones, ‘The elections under Augustus,’ *JRS* 45 (1955) , pp.9-21, 尤见13。

[23] Dio 53.32.2.

[24] Tacitus, *Ann.* 3.56, with W.Lacey, ‘Summi Fastigii Vocabulum: The story of a title’ , *JRS* 69 (1979) .

[25] T.Wiseman, ‘*Conspicui Postes Tectaque Digna Deo*: the public image of aristocratic and imperial houses in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Empire’ , in *L’Urbs. Espace urbain et histoire* (1987) , pp.393-413, 尤见401-12。

[26] Dio 53.32.1, 对阿格里帕在这些年里的权力的讨论, 见W.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pp.117-31, 尤见127-31。

[27] Dio 53.31.4-32.1, Velleius Paterculus 2.93.1-2, Josephus, *AJ* 15.350, Suetonius, *Augustus* 66.3.

[28] Dio 53.30.4, 33.4, Velleius Paterculus 2.93.1.

[29] 狄奥提到, 有人指控李维娅谋杀了马凯鲁斯, 见53.33.4-5, 及 Tacitus, *Ann.*1.3讲到李维娅杀害了皇族的其他一些成员; 贵族的死亡情况, 详见W.Scheidel, 'Emperors, Aristocrats, and the Grim Reaper: Towards a 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Roman Elite', *Classical Quarterly* 49 (1999), pp.254-81。

[30] 塞克斯图斯·普罗佩提乌斯(约前50至前45~约前15年), 奥古斯都时代的著名诗人, 以《哀歌集》闻名于世。他是科尔内利乌斯·伽卢斯(前文讲到的埃及总督)和维吉尔的好友, 并通过他的恩主梅塞纳斯, 与奥古斯都也有交情。

[31] Virgil, *Aeneid* 6.860-65, 870-81 (Loeb translation), Propertius 3.18.

[32] Dio 54.1.1-3; 见G.Rickman, *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 (1980), pp.60-66, 179-86。

[33] Dio 54.1.4-2.1, *Res Gestae* 5.

[34] Dio 54.2.1-3.1.

[35] 尤利乌斯·恺撒, 见BG 4.11-16及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51.1-2讲到元老院对他的攻击。

[36] 对普里穆斯的审判, 见Dio 54.3.2-4; 对马凯鲁斯的低评价, 见Dio 53.31.4。

[37] 小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前30年)是后三头同盟者之一李必达的独生子。他曾与安东尼的长女订婚, 但不知为何取消了婚约。他因阴谋反对奥古斯都而被处死。

[38] 此次密谋，见Dio 54.3.4-8，及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333-4，B.Levick, *Augustus. Image and Substance* (2010)，pp.80-83，及D.Stockton, ‘Primus and Murena’，*Historia* 14 (1965)，pp.18-40强调此次审判和密谋是影响奥古斯都重组自己权力的主要因素，通常将这些事件的年代定为前24或前23年，而M.Swan, ‘The consular fasti of 23 BC and the conspiracy of Varro Murena’，*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71 (1967)，pp.235-47及E.Badian, ‘“Crisis Theor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Principate’，in W.Wirth, *Romanitas and Christianitas* (1982)明确说密谋者不是前23年的执政官，审判和密谋都发生在奥古斯都辞去执政官之后；Dio 53.19讲到此时期的所有决定都是秘密做出的，所以很难理解；Suetonius, *Domitian* 21评论了这些密谋；对皇帝们的反对，以及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联系，见R.MacMullen, *Enemies of the Roman Order. Treason, Unrest and Alienation in the Empire* (1967)，pp.1-45。

十五 鹰旗

我迫使帕提亚人归还三支罗马军队的战利品和军旗，并让他们恳求罗马人民的友谊。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1].

弗拉特斯四世卑躬屈膝，接受了恺撒的帝国统治。

——贺拉斯，约前19年^[2].

恺撒·奥古斯都在罗马城或其附近待了不到两年时间，随后又一次巡视各行省。在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将成为他的习惯，即访问罗马和较长时间地巡视各行省交替进行。相比之下，他不在罗马的时间更长，所以他创建的政权主要是在其远离首都期间发展的。很久之后，他的继承者才像他那样大范围旅行。哈德良是第一位在旅行历程上与他平分秋色的皇帝。奥古斯都一生访问了帝国几乎每一个行省。前22年，他先去了西西里岛，这是罗马最古老的海外行省，不是直属元首的帝国行省。西西里岛的元老总督应当没有多少机会或根本没有机会和他对抗，因为他的军权级别更高，足以确保总督不会尝试以任何方式妨碍他。

西西里岛是罗马重要的粮食供给地，奥古斯都新近承担的赈济罗马饥荒的使命无疑是他访问该省的一个直接理由，不过他其实不需要任何理由。后来，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会向到元老院行省上任的总督发放书面指示，就像他们向到帝国行省上任的军团长发出命令一样。他这时可能已经这么做了。穆里纳为普里穆斯辩护的一个焦点似乎是，普里穆斯收到了额外的非正式命令，并非没有收到任何指示。没有人质疑元老院行省的社区有无权利向奥古斯都申诉，或奥古斯都有无权力对此种请愿做出裁决，因为这些都已经司空见惯。行省总督的

任期很快被标准化为一年，所以元首能够更轻松地、更前后一致地设立重要的先例，并处理重大事务或对其他行省有影响的事情。恺撒·奥古斯都管去往何处，都拥有军权和权威，处理当地行省总督无权处理的事情。行省总督则忙于在更地方性的层面上主持司法和决策。[\[3\]](#)

但这一次，奥古斯都还没有机会开始工作，就有人呼吁他返回罗马。在他远离罗马期间，百人会议选举他为下一年执政官的同僚（尽管他并没有参选），然后拒绝选举其他人。元首不肯动摇，也不肯回去恢复秩序。在《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中他自称曾两次拒绝担任独裁官，第二次拒绝可能就发生在此时。前21年1月1日，只有一位执政官就职，他召开公民大会选举一位同僚执政官时，争夺剩余岗位的两名竞争者炮制的混乱迫使会议中断。恺撒·奥古斯都仍然拒绝返回，而是将争吵不休的两名候选人传唤到西西里岛。两人被训诫一番，并被禁止参加下一轮选举。但后来选举时还是发生骚乱，直到最终有人当选，事情才算了结。[\[4\]](#)

前22～前21年冬季，奥古斯都留在西西里岛。这是自讨伐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战争以来，他第一次访问该岛。尤利乌斯·恺撒曾向西西里人授予拉丁公民权，但西西里人近期因为支持失败的一方而付出了惨重代价。前36年，年轻的恺撒入侵西西里岛时洗劫了城市，没收了当地人的土地，处决了许多显赫公民，或许还取消了当地人的拉丁公民权。奥古斯都的好几位主要支持者，包括阿格里帕，获赠西西里岛上的大片庄园作为战利品。但从长远来看，惩罚旧敌人没有恢复西西里岛各社区的稳定与繁荣那么重要。尽管如今供养意大利和罗马的大部分粮食和其他作物来自埃及和北非，西西里岛的贡献还是很大的。奥古斯都在岛上建立了六个新殖民地，包括叙拉古、卡提纳（今卡塔尼亚）和潘诺姆斯（今巴勒莫）。这六个殖民地都是原本就有的城市，融合了土著居民、退伍军人，或许还有一些平民定居者。其他

几个社区获得了拉丁公民权，但并不是全岛都得到了此种待遇。元首下令在叙拉古和卡提纳展开大规模建筑工程，在其他城市可能也有，以便让这些城市看起来既宏伟又具有罗马风格。当地的精英集团无疑也在效仿他，于是各城市建起了圆形剧场、拱门、会堂和神庙。^[5]

沿海社区，尤其是北岸和东岸（与意大利的交通最便利）的社区，从迅速繁荣起来的贸易中获益最大。这些社区最初大多是希腊殖民地——叙拉古是希腊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一，曾击败雅典人的入侵并和迦太基打成平手，先后成为罗马共和国的盟友、敌人和被打败的臣民。后来西西里岛几乎被视为意大利的一部分，一度成为仅有的两个元老无须皇帝批准便可访问的行省之一。变得更罗马化或意大利化，并不意味着西西里岛抛弃了希腊语言或文化。尽管一些较古老的建筑被取代，但现有的宗教崇拜和风俗习惯延续了下来。其他建筑则得到修缮和复原，和较新风格的建筑一同屹立。西西里岛仍然是大希腊^[6]的一部分，所以奥古斯都在前21年选择从西西里岛出发，视察其他说希腊语的行省对他本人和其他人来说，都是非常自然的事。^[7]

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

在尤利乌斯·恺撒遇刺前的几个月，奥古斯都曾访问希腊，后来腓立比战役时又去了希腊，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前和之后也去过。那个时期他还去过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希腊地区对罗马始终很忠诚，因此三次卷入罗马内战，而且都是站在失败的一方^[8]。亚克兴角战役十年之后，无人怀疑恺撒·奥古斯都至高无上的地位，对罗马精英阶层来说非常重要的、堂皇伪装的宪政，对外省居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从一开始就把他视为君主。“恺撒”的名字在帝国各地已经家喻户晓。“奥古斯都”在希腊语中被译为“赛巴斯托斯”，意思是“可敬的人”或“尊贵的人”，他的形象很快变得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常见。当地的铸币厂发行了印有他头像或象征他统治的符号的钱币，

一般还有他的名字和头衔。很快，几乎所有新的金银币都由罗马控制的铸币厂来生产，但各地的铜币仍然很流行。罗马并没有强制推行自己的度量衡，而是希腊各地主动采用，因为这很方便，比如在交税和从事贸易时。在东方，迪纳厄斯银币被称为一个德拉克马，但其实这种银币和迪纳厄斯是同一种钱币，币值也相同。唯一的例外是埃及，那里沿用了与罗马略微不同的币制。^[9]

几十年后，有人问耶稣，犹太人是否应当向罗马交税，耶稣让提问的人拿一个用于交税的银币过来，然后问道：“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恺撒的。”耶稣说：“这样，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由于奥古斯都在其漫长一生中发行了大量钱币，所以耶稣手里的这个钱币上的肖像极可能是奥古斯都，而不是当时在位的提比略皇帝。更重要的是，福音书的作者讲了这个有名的故事，知道任何读者都会很熟悉这样一枚钱币，会知道钱币上应当有皇帝头像，会自动认可它是皇帝权力和至高无上地位的象征。^[10]

虽然很多外省居民永远不会亲眼见到恺撒·奥古斯都，但通过他的名字或肖像，很多人对他非常熟悉。前26年年底在埃及的摩里斯湖附近写下的一份纸莎草纸的文书记载道，租借“一头红色母牛，名叫赛伊莉丝”，租期十个月。文书上的年份是“神之子恺撒统治的第五年”。埃及的传统是根据统治者在位的时间（或者有的时候是根据君主及其配偶的在位时间）来纪年，所以奥古斯都的统治时期是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统治结束开始计算。为了行政上的便利，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统治时间被多算了几天。于是，前30年，负责在俄克喜林库斯^[11]的街道点燃油灯的人宣誓就职时，将这一年称为恺撒统治的第一年。前一年是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统治的第二十二年，也是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她的儿子恺撒里昂共同统治的第七年。

上述安排租借母牛的文书是用希腊文写的，不过母牛的主人是一个叫庞培的人，他很可能是罗马公民。他的一名奴隶代他处理这笔交易。租借母牛的人叫帕普斯，他拼写某些希腊词语的方法充分表明他是个埃及本土人。一个罗马人（可能是一个大地主或中等地主）及其奴隶和一个埃及本土人做了这笔交易，说明埃及行省的人口是非常混杂的。在埃及，罗马人不过是取代了希腊人和曾经统治这个国家的其他外族的一支新的占领力量而已。在这个真正古老的国度，点油灯、畜牧业和生活都像之前一个又一个世纪那样照常进行。整个交易只涉及一头母牛，不过租期很长，所以帕普斯可能打算给母牛配种，然后自己留下牛犊。他的租金是用粮食付的，并宣称，“我会将母牛以健康良好的状态返还，如果我不能返还，就赔偿187德拉克马银币”，并用他的财产作为抵押。[\[12\]](#)

过了一段时间，用恺撒的名字纪年、他的肖像出现在公共纪念碑与钱币上，一定变得司空见惯，不再引起人的注意，就像今天大多数人不会花时间去注意货币上的符号与文字一样。让人们如此熟悉自己，算是成功的标志，但这种变化发生的速度之快，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东方各行省，绝大多数民众早就认识到，罗马的统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与持续更换行政长官相比，单独一位领袖成为罗马统治的代表，让东方人民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罗马的统治，或许对个人和当地社区更有益。在《马太福音》中，质问耶稣的人很轻易地接受了货币、税赋与皇帝之间的联系。从技术上讲，其实并非如此。税金是付给罗马国家及其国库的，不是直接付给奥古斯都或其继承者的。但对外省居民来说，钱币上的那个人显然就是国家元首，这种联系是自然而然的。由于元首直接或间接地支配国家税收，所以从根本上讲，也可以说税金是付给元首的，尽管有专门的法律机制掩盖了这种隐蔽的真相。帝国的臣民很自然地将奥古斯都视为君主，根本没有注意到，或者根本不关心他在罗马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国王或独裁官等头衔的做法。

因为主宰他们的世界的力量是由一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领导的，所以当地居民很自然地希望这位统治者会善待他们。一种常用的办法是在自己的社区公开尊崇奥古斯都。前27年之后不久，雅典的一位行政长官将卫城^[13]上的一座新建筑奉献给奥古斯都。这似乎是一个石柱群，一共九根石柱，环绕着一座“由人民建造的”祭坛，献给罗马女神和恺撒·奥古斯都。这种模式是奥古斯都于前29年批准的，允许外省居民向他做宗教崇拜的献祭，但必须同时向罗马的神祇献祭。大约在同一时期，米利都城的议事会在其议政厅庭院内建造了一座奉献给罗马和奥古斯都的祭坛。在以弗所，一份涉及一些相当常规的公民活动的铭文提到，一名公民竖立了“赛巴斯托斯”雕像，并奉献了一座神龛，其结构应当与上述的类似。建造这种东西是对元首的尊崇。这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写信给奥古斯都，或者派人去觐见他，把自己做的事情汇报给他，同时借机提出一些要求。^[14]

觐见元首是吸引他注意的最有效办法，如果运气好，还能得到积极的回应。前29年，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搭乘一艘商船旅行，船停在了渔村伊亚罗斯附近。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位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希腊小岛上。一个渔民上了船，说自己是整个村庄的使者，希望见到恺撒，请求他减少村子要交给罗马的税金，因为“他们吃尽苦头才凑齐100德拉克马，而政府要求他们缴纳150德拉克马”。这艘船把这名使者送到了科林斯，奥古斯都正在那里逗留，打算返回意大利庆祝他的三次凯旋式，但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成功见到奥古斯都并减少他们的税务负担。斯特拉波提及这个故事，仅仅是为了印证这个岛屿和周边其他岛屿的贫困，否则我们根本不会知道此事。尽管埃及的德拉克马币值比希腊的低一些，但这个村的全体村民缴纳的全部税金还不及“一头红色母牛，名叫赛伊莉丝”的价值。对在一个贫困地区挣扎谋生的村民来说，这笔税金一定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显然觉得，将此事汇报给奥古斯都本人是办得到的，也是值得一试的。这让我们可以猜想，

每年一定有数百名，甚至数千名请愿者求见元首或者像阿格里帕那样代表元首行事的大人物。[\[15\]](#)

毫无疑问，较大的、较重要的社区和较富裕的个人，比渔村的穷人更容易见到元首并得到良好待遇。但这并没有吓倒村民们，他们还是去求见元首了。有时，比较重要的社区会不太受欢迎。雅典曾热情支持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并在前32～前31年欢迎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所以必须特别努力地去讨好得胜的恺撒。和其他很多社区一样，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后，雅典也被要求为恺撒的战争努力提供金钱和资源。为了向奥古斯都表忠心，雅典人肯定迅速建造了歌颂他的纪念碑。

希腊名城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所有的罗马贵族都特别尊重它们的历史和文化成就。在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对抗罗马的战争中，雅典曾支持他。后来苏拉的军队攻占了雅典城，对其进行了恐怖洗劫。但由于雅典的历史，洗劫的结果并不算很糟糕，苏拉说，他“因为死人的缘故，可以饶恕活人”，这里“死人”指的是雅典人的著名祖先们。雅典继续繁荣发展，不过如今的雅典几乎只是一座历史博物馆，供到访的罗马贵族参观雕塑或纪念碑。和以往一样，奥古斯都及其亲信遵从传统，但气度更恢宏。阿格里帕很快开始在雅典城的老阿哥拉（市场）中央建造一座有屋顶的大剧场。它的装饰非常奢华，规模也恢宏得惊人。只有运用罗马技术以及罗马人研制的混凝土，才有可能建造如此之大却没有柱子支撑的屋顶。于是，在一座标志着罗马技术成就的伟大建筑里，人们可以上演传统的希腊音乐和戏剧。这座剧场还颂扬了元首及其亲信的光荣，他们的名字被镌刻在建筑上，他们的肖像在那里展出。后来雅典城还建造了一座新市场，这意味着普通的商业活动也会被恺撒的符号所环绕。[\[16\]](#)

除了仰慕希腊的过去（或至少是符合罗马人需求的版本的过去，能够让罗马人自称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者）之外，罗马人也理解和信任雅典城的机构，所以允许绝大多数日常事务和行政工作由本地人执行，这很自然也很方便。此种现象在奥古斯都时代比在共和国时期更为突出。很快，包税人失去了在从各行省收税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收税的职责被交给各城市和各地的其他社区，不再被罗马包税人把持。受益最大的是当地贵族，他们有足够的影响力和财富去赢得自己社区内的官职，然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地行使职权。和在西西里岛一样，其他各行省也都出现了由当地人、奥古斯都及其亲信共同出资的建筑工程。

富人和贵族希望得到尊重，并在自己的社区内掌权。但也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即他们应当运用自己的财富为社区造福，为节庆活动出资，或者建造永久性纪念建筑。在较小的层面上，就是这种思想构成了罗马政治竞争的一部分。在罗马，这种现象越来越受到元首压倒一切的慷慨和威望的约束。在外省，富人花费巨款为民造福的行为对他不构成威胁，而是受到鼓励。在恺撒·奥古斯都治下，整个希腊世界的地区性精英热情洋溢地启动建筑工程，挥金如土。节庆和体育竞技得到复苏、扩展或引入，往往还会修复或建造剧场和其他供这些活动使用的场所。随着这些本质上属于希腊文化的传统活动再次蓬勃发展起来，演员、音乐家和运动员都得到了新的表演和获奖机会。

与这些活动一同涌现的还有外国元素，在风格和方法上与角斗士竞技的野蛮景观迥然不同。前2世纪，塞琉古王朝的一位国王在罗马当了一年人质之后回国，尝试将角斗士竞技之类的血腥运动引进自己的祖国。他的臣民对此感到憎恶。但一个半世纪之后，对角斗士的热情在整个希腊世界迅速蔓延。有人建造了圆形剧场，更多人则简单地利用自己的剧场和某些临时性竞技场举办这些恐怖的比赛。在所有形式的公共服务中，总会有争夺声望的竞争，有的是同一社区的个人之间

的竞争，有的是相邻社区之间的竞争。在一座城市担任行政长官是一项荣誉，但代价高昂，有时是个沉重负担。奥古斯都鼓励大家在这些事情上花钱，并用这样的前景激励他们：不仅可以在当地获得威望，还能有更好的机会得到奥古斯都的宠信、获得罗马公民权，以及为帝国效力的政治前程。^[17]

地区性精英阶层中最顶尖的是附庸国统治者，这些人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控制的土地要比罗马总督们多。这些人（有时会有女性）的权力取决于罗马的好感，但在自己国内享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负责地区性行政管理。他们之间有时甚至会发生小规模战争，这是非常有风险的，尤其是如果开战之前没有得到帝国的许可的话。他们必须将自己的野心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并且不能做任何有可能冒犯奥古斯都的事情。这些国家不算真正的独立王国，而被认为处于罗马人民的统治之下。罗马人（其实也就是奥古斯都）随时可以剥夺他们的地位。这些统治者大多拥有自己的小型军队，但没有一个人幻想可以对抗强大的罗马军队。

我们不确定这些附庸国统治者是否会定期向罗马纳贡。史料中常写到他们为罗马献上礼物，而且往往是非常奢华的礼物，比如用来纪念帝国胜利的金冠；他们也经常给罗马送来粮食、资源和士兵，以支援罗马的军事行动。大希律王派了500人参加艾利乌斯·伽卢斯在阿拉伯半岛的远征。有些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些附庸国负有响应罗马号召、满足其要求的义务，但不会定期纳贡。但附庸国也完全可能每年向罗马提供金钱、服务或某种物资，尽管他们很有策略地将其称为礼物。非常粗略地讲，这些附庸国统治者相当于行省总督，区别在于前者的权力是终身制的（不过奥古斯都可以随时罢免他们），而且不会自动传给继承人。例如，大希律王被授予一项特权，可以自行挑选继任者，但我们不知道其他附庸统治者是否也能这么做。^[18]

在这些年里的附庸统治者当中，史料对大希律王的生平记载最详细，揭示了他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和对罗马人的彻底依赖。他在世时多次访问罗马。当奥古斯都、阿格里帕、皇族的其他高级成员或代表访问东方时，大希律王总会寻求拜见他们并向他们表达尊崇的机会。前20年，他觐见了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向这位犹太国王授予了新的领土，而大希律王大约在这一时间将自己的几个儿子送到罗马接受教育。附庸统治者经常这么做。他们的孩子可以说是人质，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接受罗马式教育。这些王室子弟大部分时间都和奥古斯都的亲属一起度过，奥古斯都还有机会判断这些附庸统治者的性格和可靠程度。大希律王受到信任，被认为很可靠，但其他统治者不是这样。这一次他得到的大部分土地都是从另一位附庸统治者那里夺来的。[\[19\]](#)

大希律王的王国腹地仍然是犹太、撒马利亚、加利利和他的家乡以东地区。在这些地区有撒马利亚人和很多非犹太人社区，奥古斯都新赐给他的领土也是混杂居住的。在他的犹太臣民面前，尤其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国王总是小心地把自己的形象塑造为虔诚的犹太人。他很快就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宏大工程，并且很认真地把工程做好，使用上乘材料，在所有的圣洁之地都让祭司主持工作。除了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之外，大希律王可能是这个时代主持建筑工程最多的人了，他还出资修建了自己领土上和邻近各行省的纪念性建筑。有的工程是实用性质的，比如他建造了一座人工港（沿海没有天然港口），称为恺撒利亚港。此项工程需要大量罗马制造的防水混凝土。这种混凝土是用火山砂（维苏威火山周边地区的白榴火山灰）制成约45英尺×25英尺×13英尺的块状，然后沉入海底，形成防波堤。新的港口拥有规模很大的码头和仓储设施，很快吸引了大量贸易活动，帮助大希律王更轻松地获得奢侈品，并通过向商品和商贸活动征收赋税，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财政收入。[\[20\]](#)

“恺撒利亚”这个名字是奉承恺撒·奥古斯都比较露骨的手段之一。大希律王建造了不止一座被命名为“恺撒利亚”的城市，而他重建的撒马利亚都城被更名为赛巴斯托斯，并安置了大量非犹太人，其中很多殖民者是大希律王军队的退伍军人。赛巴斯托斯城是一个招募士兵的好地点，在犹太王国最终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之后，赛巴斯托斯的军人被纳入罗马军队，成为正规部队，由罗马总督指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处决耶稣的士兵就是赛巴斯托斯人。[\[21\]](#)

所有用恺撒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似乎都建有奉献给罗马和奥古斯都的神龛。这些城市的大部分人口是非犹太人，虽然也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这些城市还建有其他的异教神庙，并陈列着男女神祇的雕像，以及元首——往往还有他的家人和盟友（如阿格里帕）——的雕像。但是没有大希律王的肖像。在犹太人的城市，尤其是耶路撒冷，除了罗马钱币上的肖像之外，没有任何人的肖像。圣殿铸造自己的货币供献祭用，因此圣殿庭院内才有兑换钱币的人[\[22\]](#)。圣殿的货币上没有任何侵犯宗教情感的符号。和大部分精英人士一样，大希律王说希腊语，对希腊文学和哲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仰慕希腊文化的很多方面，例如，他慷慨地为奥林匹克运动会捐资。他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座剧场及一座供赛马和赛车竞技的赛马场，可能还建了一座圆形剧场，不过有的历史学家相信这座圆形剧场其实就是赛马场，他的角斗士竞技就在那里举行。国内的许多非犹太人城市都举办竞技活动，而在耶路撒冷每隔四年举办一次大型的体育和戏剧节。他不强迫自己的犹太臣民参加这些竞技活动，而只给他们一点点压力，让他们观看。[\[23\]](#)

大希律王渴望不仅在自己的王国，而且在更广大的希腊和罗马世界都被视为一位重要人物。他的绝大多数高级谋臣和官员都是希腊人，他的军队也主要由非犹太人组成。奥古斯都把安东尼赠给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高卢卫队送给了大希律王，我们听说他的军中还有日耳

曼人和色雷斯人。他的少数犹太人士兵要么是和他一样的以东人（不被犹太人认同为真正的犹太人），要么是逃离帕提亚的巴比伦犹太人，其土地和生计都依赖他的恩典。国王高度依赖这些外国人的帮助，并且绝对依附于罗马，这让他的犹太臣民非常憎恶。他的高级总督和将领一般是犹太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他的亲戚。不过，即便是他的亲戚，若是对他不忠，或者被怀疑对他不忠，也难逃一死。哈斯蒙王族的男性成员都已经死了，许多女性也已经不在人世。

只要大希律王拥有罗马的支持，就足够强大，没有人能够用武力推翻他。这些年里，一群年轻的犹太贵族尝试刺杀他，但这些密谋者虽然勇敢且信仰坚定，却没有什么真本事。大希律王的间谍揭露了这一阴谋，所有密谋者被传唤到国王面前，供认不讳。他们遭到毒刑拷打后被处死，他们的很多亲戚也被处死。大希律王在他的犹太臣民当中非常不得人心。非犹太人的态度比较难以判断，他们和撒马利亚人也无法联合起来反对他的统治。再加上他冷酷无情地用武力对付任何反抗，所以他能够维持自己的地位。从罗马人的角度看，大希律王是否得民心，根本不重要，只要他忠于罗马、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臣民就可以了。[\[24\]](#)

大希律王用奥古斯都的名字来命名一些城市，并在一些新建筑的装饰中歌颂他。赛马场（我们假设它就是圆形剧场，而不是单独的另一座建筑）上竖立了纪念奥古斯都历次胜利的纪念柱，并依次给出每次胜利的名称。这些纪念柱是按照传统的罗马风格设计的，由一根立柱和若干横梁构成，上面挂着盾牌，顶端是一顶头盔，这些装备被认为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一群耶路撒冷人误以为纪念柱代表了人的粗糙图形，立刻骚乱起来。他们与领导人会见，通知大希律王，他们不喜欢看到角斗士与野兽或其他人搏斗到死的血腥景象，但最不能接受的是人像[\[25\]](#)。大希律王多次否认这是人像，但群众就是不信，最后大希律王不得不命人取下立柱上的战利品，以证明它们仅仅是木柱。

此事以哄堂大笑结尾，而且犹太群众的愤怒始终不是针对为奥古斯都歌功颂德的行为，甚至也不是反对罗马文化，而仅仅因为它可能违背犹太律法。[\[26\]](#)

在后来的岁月里，犹太人对罗马统治的怨恨越来越强，在尼禄、图拉真和哈德良在位时掀起了大规模反叛。但目前犹太人怨恨的目标主要是大希律王。国王若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可能会施加非常野蛮的惩罚。他身边的亲信知道，他喜怒无常、难以揣摩，而且常常视人命为草芥。但在他的统治下，王国欣欣向荣，活跃的贸易和宏大建筑工程提供的实际好处与就业机会给国家带来了不少益处。有好几次，他减轻了臣民的纳税负担，当然我们不知道减税之后负担是不是仍然很沉重，也不知道社会各阶层是否都从新的繁荣中获得实利。农村贫民的生活可能是非常艰苦的。

即便如此，在前20年代末农业歉收、粮食短缺的年份，大希律王向接替艾利乌斯·伽卢斯的新任埃及总督（也是骑士身份）求援，并主动提出要把自己的金银饰品熔化铸成钱币，以此付账。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写道，埃及总督佩特罗尼乌斯是国王的朋友，于是允许大希律王购买大量埃及粮食，并帮助他安排船只运粮到犹太。奥古斯都肯定知道佩特罗尼乌斯的行动，或至少在事后对其予以认可。此事也能说明各附庸王国与正式的行省融合成一个帝国的程度。粮食被运到犹太之后，大希律王认真地将面粉和面包发放给最需要救济的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大希律王的慷慨举动（符合传统的犹太精神，即关爱穷人）赢得了臣民的一些好感。[\[27\]](#)

各行省、附庸国的城市和其他社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自治的。在它们之上，罗马和奥古斯都具有更高的权威，能够解决困难、授予好处或者赈济灾民。当然，罗马和奥古斯都也掌握着无比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镇压任何臣属社区。在过去，罗马统帅曾向忠诚的外省居

民授予罗马公民权，随着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那样的军阀崛起，这种事情越来越常见。奥古斯都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不过由于所有被他或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授予公民权的人都会改用尤利乌斯的姓氏，我们很难准确判断一个人是在何时获得公民权的。越来越多的辅助士兵在退伍时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在他的继承者统治下，辅助士兵退役时会自动成为罗马公民。而授予公民权也是对外省权贵予以奖赏的一种常见手段。再加上殖民计划，本土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涌入外省，于是外省有了更多常住公民。在东方各行省，只有少数殖民地，如贝里图斯（今天的贝鲁特）长期保持了罗马特色，或长期使用拉丁语处理绝大多数公务。在其他地方，希腊语的地位根深蒂固，或者受到广泛仰慕。罗马人并没有施加压力去改变这种局面，不过地中海东部很多雄心勃勃的人会去学拉丁文。^[28]

当外省社区的很多居民成为罗马公民时，奥古斯都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决定这些人是否仍然有义务在其家乡担任官职。他的决定是，这些人仍然有这样的义务，除非他对某些个人予以豁免。因此，一名外省居民可以成为罗马公民，如果足够富裕的话，或许还能担任军官或者帝国官员，但返回自己家乡之后，仍然要积极参与当地社区的政治生活。罗马人始终努力栽培被征服地区的贵族，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更是大力推行此种措施。对所有外省居民来说，奥古斯都就是罗马权力的象征，他对外省居民请愿的答复带有非常个人化的语调，这些答复常常被做成碑铭，竖立在公共场所。他写信给以弗所，谈到以弗所派到他那里的使者，并说：“接见他们之后，我发现他们都是善良的爱国志士。”后来他还承诺道：“我会尽我所能，为你们效劳，并保留你们城市的特权。”负面回复很少被记载下来，除非是被另一个运气更好的社区记载下来。例如，阿佛洛狄西阿斯^[29]人民得意扬扬地竖立了一块碑铭，记录奥古斯都拒绝免除萨摩斯岛的税赋，而免去了阿佛洛狄西阿斯的税赋。但奥古斯都拒绝萨摩斯人的措辞还是非常亲切的：“我对你们颇有好感，而且我的妻子在为你们说

话，我很想让她高兴一下，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惯例。我对你们缴纳的贡金其实并不关心，但不愿意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随便授予免税的高级特权。”^[30]

有些文件记录了元老院的正式法令，批准元首授予外省社区某些特权和好处，我们可以推断元首授予的所有主要特权和好处都得到了元老院的认可，所以拥有至少表面上的宪政的合法性。但人们的印象是，总的来讲奥古斯都施行的仍然是高度独裁的统治，尽管至少在公开层面上，他的统治是在为臣民造福。使者觐见元首，是奥古斯都发表演讲和馈赠礼物的机会。他的很多演讲是用希腊语完成的，这增强了这种感觉：他是一位仁慈贤君，对外省文化非常同情。他毫不羞耻地提及李维娅替萨摩斯人说情这件事，这与共和国时期的风气相比是很大的变化，也等于公开承认，任何有能力影响奥古斯都的人都是值得结交攀附的。这种做法并不罕见。有些社区曾经欢迎李维娅，她与当时的丈夫逃离意大利之后得到了一些社区的帮助。这些社区都得到了慷慨的优待。^[31]

奥古斯都做某些巡视的时候，他的妻子很可能陪伴在他身边，或者始终陪同他巡视各地。前21年，他从西西里岛去了希腊，在萨摩斯岛过冬，然后于前20年渡海前往亚细亚，巡视了这个行省和比提尼亚，随后去往叙利亚。在他巡视的各个地方当中，叙利亚其实是第一个分配给他、由他通过军团长统治的帝国行省。他在元老院行省的时候，当地的总督照常办公，主持司法并接受请愿。元首处理一些更重大、更敏感的问题，有很多使团和请愿的情况被记载下来并保存至今，让我们能够瞥见当时等待他斟酌和答复的潮水般的问题。有些使者真正见到奥古斯都时可能吃了一惊，他们看到的不是雕像上的完美青年，而是一个开始步入中年的人，而且他的皮肤非常敏感，常戴一顶宽檐软帽以遮挡阳光。^[32]

现实的不完美从来都不会妨碍外交活动。一天又一天，一座又一座城市，公务在不断进行。使者们等待觐见的机会，然后发表自己的演讲（有的演讲很长），随后等待奥古斯都的回复，要么喜悦要么失望。有些社区遭到了打击。雅典丧失了一些土地，而斯巴达获得了更多土地的管辖权。亚细亚的库济库斯^[33]爆发了一起严重骚乱，一些罗马人被鞭笞和处死。库济库斯因此遭到了严厉惩罚，失去了城市的地位，一些公民被卖为奴隶。这是非常极端的惩罚，遭受类似处罚的城市不多。^[34]

旅行的时候，奥古斯都必须时刻跟踪罗马局势。前21年，罗马发生了更多骚乱。不管他身在何处，都有其他行省的人前来觐见和请愿，就像他住在塔拉戈纳期间有人到那里拜见他一样。在埃及，总督佩特罗尼乌斯面临着埃塞俄比亚人对埃及行省南部的袭掠，局势很严重。他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但在沙漠里很难维持军队的正常运作，不得不将大部分部队撤回。埃塞俄比亚女王康达吉^[35]又一次派遣她的武士去袭击罗马人，发动了第二次战役，迫使罗马人反击。这一次，佩特罗尼乌斯的准备比较充分，向南打得更远。大英博物馆存放着一尊奥古斯都雕像的头部，是埃塞俄比亚人切割下来当作战利品运回家的。雕像的头部后来被埋在他们一座神庙的入口处，佩特罗尼乌斯的士兵前来复仇时摧毁了神庙建筑，但雕像头部一直埋在那里，直到被发掘出来。最后康达吉寻求妥协，佩特罗尼乌斯让他们的使者去见奥古斯都。有意思的是，斯特拉波告诉我们，埃塞俄比亚人抱怨道，他们“不知道恺撒是谁，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于是佩特罗尼乌斯“派人护送他们；他们去了萨摩斯岛，因为恺撒在那里……”^[36]

前20年，阿格里帕被派回罗马，去处理那里持续的骚乱，但他很快就不得不动身去西班牙，镇压那里再次爆发的叛乱。次年，他打了一场艰苦的战役，终于粉碎了坎塔布里亚人和阿斯图里亚斯人的大规

模抵抗。与此同时，百人会议的选民又一次将奥古斯都的名字写在选票上，拒绝选举超过一名执政官。前19年年初，新当选的执政官盖乌斯·桑提乌斯·萨图尔尼努斯还没有同僚。又举行了一次选举，但其中一名候选人马尔库斯·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掀起暴力活动，严重扰乱了选举。鲁弗斯几年前曾担任市政官，颇得民心。在发生洪灾和火灾的时期，鲁弗斯不仅出钱款待民众，还将自己的奴隶组成一个消防队，帮助民众保护房屋。虽然他还不到参选执政官的合法年龄，但自荐为候选人，并将自己的家奴和支持者组织起来，以武力威胁他人，就像过去克洛狄乌斯和米罗做的那样。他可能承诺自己当选后要开展激进的改革，或者他被认为威胁了国家安定，因为后来的史料说他阴谋反对奥古斯都本人。持有同样态度的人还将一些军事失败说成元首的过错，尽管他并不在战区。萨图尔尼努斯让元老院通过了终极议决（这是历史上最后一次终极议决），鲁弗斯及其部分支持者被逮捕并处决。留在罗马城或其附近的禁卫军，以及梅塞纳斯和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等人的积极支持或许对萨图尔尼努斯帮助很大。此事令人回想起凶残动荡的过去，并警示人们，这样的动乱仍然可能发生，尤其是在元首远离罗马的时候。但在很多方面，此事更证明了奥古斯都政权的稳定性越来越强。传统机制处理了这个问题，而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是罗马史上众多野心勃勃、为达到目标不惜动用武力的最后一位元老（往往是保民官）。[37]

军旗的回归

由于奥古斯都身在远方，可能直到这些风波结束之后才得知情况。在他离开罗马之前，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四世派来了使者，要求将他的竞争对手梯里达底返还。梯里达底之前逃到奥古斯都那里寻求保护和支持，并且带来了弗拉特斯四世的儿子作为俘虏。梯里达底和弗拉特斯四世的儿子都得到了礼遇，因为罗马人觉得他们在未来可能会有用。但在前23年，弗拉特斯四世派来的代表团要求将这两人返

还。帕提亚大使先去找了奥古斯都，而奥古斯都将大使和梯里达底带到元老院的一次会议上。元老们没有对此事做出决定，而是立刻投票决定将此事交给元首裁断。最靠近帕提亚的叙利亚地区是奥古斯都辖区的一部分，所以元老们的决定有一定道理，但更重要的是，这揭示了罗马真正的主人是谁。[\[38\]](#).

奥古斯都将弗拉特斯四世的儿子送回了，但拒绝交出梯里达底，而且要求帕提亚国王返还他控制的罗马军旗和战俘。前20年，元首抵达叙利亚，近距离与帕提亚人继续谈判。奥古斯都还用展示武力的方式，支持自己的谈判。亚美尼亚爆发了一场叛乱，推翻并杀死了国王阿尔塔夏二世。亚美尼亚王国夹在帕提亚和罗马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文化上与帕提亚更亲近，不过总的来讲在军事上受到罗马的威胁更大。阿尔塔夏二世之前得到帕提亚人的支持，但现在亚美尼亚的大贵族提议将王位交给他的兄弟提格兰。提格兰也是一位在罗马避难的外国流亡王子。

奥古斯都同意了亚美尼亚大贵族的提议，并派遣二十一岁的提比略率领一支军队，护送提格兰回他的王国。对如此年轻的提比略来说，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指挥使命，近期的类似例子只有庞培和内战中的年轻恺撒。这次护送就像是一次游行，途中没有发生武装冲突，最后提格兰被立为新国王。和平地展示罗马力量的做法有着悠久传统，广受仰慕。提比略身边肯定有年纪较大、经验丰富的军官辅佐。不过即便如此，这个年轻人也有了一次发号施令、统领大军的机会。[\[39\]](#).

此次亚美尼亚远征为罗马和帕提亚正在进行的谈判提供了一个背景。奥古斯都此时并不比前29年更希望与帕提亚交战。战争的风险太大，而行动规模也令人生畏。一旦开战，他至少要离开罗马两三年，在那期间将难以继续处理所有的请愿和其他问题。弗拉特斯四世也不希望发生武装对抗。除了与罗马相邻的边境之外，他还有其他的边境

要保护，并且还要面对更直接的威胁：王族内部的竞争对手和难以驾驭的贵族。近些年里，奥古斯都确保了叙利亚及其周边城市以及附庸国君主都对罗马保持忠诚，所以若是帕提亚人发动入侵，也很难在那里得到任何支持。

两国都不希望发生战争，所以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和平手段，让双方下得了台，都能自称取得了胜利。罗马人可能承诺不支持梯里达底，不过他很可能被允许过着舒适的流亡生活。作为回报，弗拉特斯四世发誓维持和平，并返还了从克拉苏和安东尼那里，以及在前41～前40年从罗马行省缴获的罗马军旗。罗马战俘也得以回国，其中有些人是在卡莱战役被俘的，在帕提亚已经生活了三十年。

丧失的鹰旗和其他军旗的成功回归，是奥古斯都所有成就中被宣扬得最热烈的一次。例如，著名的“第一大门”^[40]奥古斯都雕像的胸甲上就有庆祝此次胜利的图像。此次胜利是通过外交而不是成功的战争赢得的，不过这并不重要。对罗马人而言，他们的优越性得到了认可，因为帕提亚国王承认了他们的力量，并满足了奥古斯都的要求。军旗被收回了，虽然相对于罗马人来说这些象征物的意义对帕提亚人小得多，但帕提亚人此刻也一定认识到了它们的象征性价值。就我们所知的情况而言，在这次协定中，弗拉特斯四世付出的比得到的要多。对自己国内的人，他无疑会说这是两位平等君主之间的协定。罗马人不是这么看的，他们觉得，一个骄傲而危险的敌人由于畏惧罗马的力量而臣服了，并且没有损失任何罗马人的生命。

虽然贺拉斯宣称“为了祖国牺牲，是一件甜蜜而适宜的事情”（*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如今我们熟悉这句话，可能是由于威尔弗雷德·欧文所说的“古老的谎言”^[41]），但罗马人从来不会为了光荣而希冀一场己方损失惨重的胜利，他们的胜利纪念碑上也从来不会刻画己方的死者。^[42]

当局很快就铸造了一批钱币，描绘军旗的回归，并刻有宣扬此事的铭文。元老院向奥古斯都授予了如潮水般的新荣誉，其中很多被奥古斯都谢绝。但在他谢绝这些荣誉的消息传来之前，西班牙和其他一些行省已经铸造了一些刻有这些新荣誉字样的钱币。有些钱币上描绘卡比托利欧山耸立着一座新神庙，用来存放这些军旗。不过据我们所知，并没有新建这样一座神庙。虽然奥古斯都接受了对他此次胜利的正式感恩，但谢绝了返回罗马后举行小凯旋式（甚至是完整的凯旋式）的荣誉。不过还是出现了一些描绘凯旋式的钱币。其中一批钱币描绘元首乘着一辆由一对大象拉的战车，所以我们推测他也被授予了这种怪诞的荣誉。庞培曾企图在凯旋式时用大象给自己拉车，但没有成功，因为他发现游行路线上的一座拱门太窄，如此笨重的战车和大象过不去，于是不得不换成传统的马拉战车。尤利乌斯·恺撒在庆祝高卢战争胜利的凯旋式之后，在夜间攀登卡比托利欧山时用四十头大象载着火炬。很显然，如此浮夸高调的姿态，使用如此巨大和充满异国情调的动物，仍然能够激发一些贵族的想象力。^[43]

奥古斯都谢绝了几乎所有的新荣誉。但他对元老院向他授予这些荣誉的决定还是感到很高兴，并且谢绝之后，大家又会赞扬他的谦逊。同时，他也足够自信，相信自己的声望和威名已经足够大，不需要更多荣誉了。后来，回归的军旗被陈列在复仇者玛尔斯神庙中，这座神庙是他的新建筑群“奥古斯都广场”的一部分。他在腓立比战役之后就发誓要建造这座神庙，因为他成功向杀害养父的凶手复仇了。不过后来神庙很晚才动工，现在正好也可以纪念向帕提亚人的复仇。

元老院还投票决定授权他建造一座凯旋门。这是他第三次得到这样的荣誉，前两次分别是瑙洛库斯战役和亚克兴角战役之后。据我们所知，他只建造了一座凯旋门，坐落在罗马广场边缘神圣尤利乌斯神庙的旁边，是为了纪念亚克兴角战役。奥古斯都没有建造新的凯旋门，而是决定对亚克兴角凯旋门进行改造，在其顶端竖立了一座大于

真人尺寸的元首雕像，乘着战车，胜利女神在他身后，而卑躬屈膝的帕提亚人向他交还罗马军旗。这样的图像告诉我们，虽然奥古斯都拒绝了很多荣誉，但他仍然是罗马史上最伟大的国家公仆。他的形象随处可见，他的名字、形象或符号出现在罗马市中心、意大利各城镇和外省各地的纪念碑上。^[44]

前19年3月27日，小巴尔布斯庆祝了凯旋式，以纪念他在担任阿非利加总督期间取得的一次胜利，他后来将很多战利品投资于建造一座新的石制剧场。奥古斯都的军团长不会得到凯旋式的荣誉，因为他们的胜利都属于他。但军团长会得到凯旋式的象征符号。大多数有元老身份的总督都没有机会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使仍然有权指挥军队的阿非利加总督和马其顿总督也没有多少机会。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人们有没有意识到，巴尔布斯的凯旋式是最后一次旧式风格的凯旋式。奥古斯都本人此后再也没有庆祝过凯旋式，而在将来只有他的亲属才被允许得到这种荣誉。但即便对他们而言，凯旋式的机会也非常稀罕。战争将继续，罗马人不断取得胜利，但所有的胜利都主要归功于元首，而他对用传统方式纪念胜利根本不在乎。亚克兴角凯旋门上增添了过去所有凯旋式的清单，这或许能说明奥古斯都对凯旋式的态度。^[45]

前20～前19年冬季，奥古斯都返回了萨摩斯岛。在这几个月里，不断有使团和请愿者来求见。其中有一个代表团是某位印度统治者派来的，送来了一些老虎作为礼物，还有一个不幸的男孩，他天生没有胳膊，但可以用脚抓住东西。两个多世纪之后的狄奥觉得这些礼物仍然值得一提。老虎可能被送到了罗马，展示给群众，可能为了给群众提供娱乐活动而被宰杀了。罗马人的娱乐方式就是这么残酷。残疾男孩引起了大家的好奇，而不是同情。印度使者在奥古斯都的宫廷待了一段时间，跟着他去了雅典。狄奥还说，在雅典，一名印度使者跳进

一个特别准备的火葬堆，自杀了。狄奥不知道这人自杀是因为年事已高，还是“为了给奥古斯都和雅典人上演一场好戏”。

对罗马人来说，印度仍然无比遥远和神秘。亚历山大大帝到过印度，但不曾有罗马军队抵达那里。即便如此，前来拜见奥古斯都的印度使团并不止一个，这说明一些印度领导人很认可罗马的财富、权力和威望。罗马人和外省居民对丝绸、香料和其他远东奢侈品的胃口非常大，而且需求不断增长，所以印度使者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与罗马这个市场建立联系。同时，这样的交流也让奥古斯都有机会吹嘘，罗马统治着差不多整个世界。这种想法让罗马人和希腊人都激动不已，并且随着新的胜利不断来临，似乎越来越真实。罗马无须动武就收回了自己的军旗，恢复了自己的荣誉，但这不是扩张放缓的迹象。^[46]

[1]. *Res Gestae* 29.2 (Loeb translation).

[2]. Horace, *Epodes* 1.12.27-8 (Loeb translation).

[3]. 奥古斯都与书面指示，见F.Millar, ‘State and Subject: the impact of monarchy’, in F.Millar & E.Segal (eds), *Caesar Augustus. Seven Aspects* (1990), pp.37-60, 尤见46-8, 书面指示的性质见D.Potter, ‘Emperors, their borders and their neighbours: the scope of imperial *mandata*’, in D.Kennedy (ed.), *The Roman Army in the East. JRA Supplementary Series 18* (1996), pp.49-66.

[4]. Dio 54.6.1-4, *Res Gestae* 5.

[5]. Dio 54.7.1, Strabo, *Geog.* 6.2.4-5, Pliny, *NH* 3.90, with R.Wilson in *CAH2* X, pp.437-9.

[6]. 大希腊 (Magna Graecia) 是古时意大利南部沿海由希腊人殖民定居的地区。前8世纪，希腊人开始向意大利南部殖民，建立了许多繁荣的城邦，罗马人称之为大希腊。建立在意大利的著名希腊城邦有那不勒斯、叙拉古等。大希腊对意大利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影响，希腊字母经由大希腊的传播和演化，最终形成拉丁字母。前3世纪的皮洛士战争之后，大希腊被罗马共和国吞并。

[7]. 关于元老无需正式批准便可去往西西里岛，见Tacitus, *Ann.*12.23.1及Dio 52.42.6。狄奥认为这是奥古斯都的决定，塔西佗和狄奥都声称，唯一类似的授权是关于元老去往纳博讷高卢的产业。

[8]. 三次内战指的是尤利乌斯·恺撒与庞培的内战（前49～前45年）、后三头同盟与“解放者”（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内战（前44～前42年）、奥古斯都与安东尼的内战（前32～前30年）。在这三场内战中，希腊地区先后支持庞培、“解放者”和安东尼，三次都站在失败的一方。

[9]. 见A.Wallace-Hadrill, ‘Image and authority in the coinage of Augustus’, *JRS* 76 (1986), pp.66-87。

[10]. Matthew 22: 20-21, 评论见F.Millar & E.Segal (eds), *Caesar Augustus. Seven Aspects* (1990), pp.44-5。

[11]. 埃及城市，在今天的开罗西南偏南约160公里处，其周边地区是重要的考古发掘地，出土了大量托勒密王朝和罗马时期的纸莎草纸，包括米南德的戏剧、《多马福音》残篇和欧几里得著作的残篇等。

[12]. J.Rea, ‘Lease of a Red Cow called Thayris’,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68 (1982), pp.277-82.

[13]. 在雅典、底比斯、科林斯等古希腊城邦，卫城是城市中地势较高、易守难攻的部分，可能筑有军事要塞，做防御之用。

[14]. *Inscriptiones Graecae* (1893-) II 2.3173, 评论见J.Camp, *The Archaeology of Athens* (2001), pp.187-8。

[15]. Strabo, *Geog.*10.5.3.

[16]. J.Camp, *The Archaeology of Athens* (2001), pp.188-93, 奥古斯都时代背景下，罗马人对希腊的态度，以及希腊人对罗马的态度，详见G.Bowersock, *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 (1965), pp.42-61, 尤见85-100, 及A.Spawforth, *Greece and the Augustan Cultural Revolution. Greek Culture in the Roman World* (2012), pp.59-86, 尤见106-17关于雅典人的讨论。

[17]. 概况见F.Millar, ‘Empire and City, Augustus to Julian: Obligations, excuses and status’, *JRS* 73 (1983), pp.76-96及

P.Veyne, *Bread and Circuses* (1992), 尤见A.Spawforth, *Greece and the Augustan Cultural Revolution. Greek Culture in the Roman World* (2012)。

[18] 概况见B.Levick in *CAH2* X, pp.649-50; 艾利乌斯·伽卢斯的部队, 见Josephus, *AJ* 15.317; 大希律王和他自行选择继承人的权利, 见Josephus, *AJ* 15.343, 16.129及Gruen in *CAH2* X, pp.155-7的评论。

[19] Dio 54.9.3, Josephus, *AJ* 15.343-8, 360, *BJ* 1.398-400.

[20] 概况见D.Roller, *The Building Programme of Herod the Great* (1998), 港口见C.Brandon, ‘Cement, concrete and settling barges at Sebastos: comparisons with other Roman harbour examples and the descriptions of Vitruvius’, in A.Raban & K.Houm (eds), *Caesarea Maritima. A Retrospective after Two Millennia* (1996), pp.25-40。

[21] 罗马军队里的赛巴斯托斯人, 见M.Speidel, ‘The Roman army in Judaea under the Procurators’, in M.Speidel, *Roman Army Studies* Vol.2, Mavors (1992), pp.224-32。

[22] 《圣经·新约》中耶稣洁净圣殿的典故, 见《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节, “耶稣进了神的殿, 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当时圣殿的祭司允许商人在圣殿的外邦人院子进行买卖; 又因圣殿不收希腊和罗马的钱币, 犹太人缴纳殿税或奉献须用指定的希伯来钱币, 故有兑换银钱的人, 为那些外来朝圣者提供方便。因买卖是在圣殿的范围内进行, 神圣之地因而被玷污; 占用外邦人的院子, 剥夺了外邦人敬拜神的权利; 祭司和商人勾结串通, 祭司给予商人各种方便, 而商人高价剥削, 然后平分暴利。耶稣大力谴责这些利欲熏心的商业行为。

[23] 大希律王的统治, 见E.Schürer, G.Vermes & F.Millar,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1 (1973), pp.287-329, 尤见309-15, 是绝妙的介绍; 奥林匹克运动会见Josephus, *AJ* 16.149, *BJ* 1.427, 他自己的节庆活动见15.268-71; 刺杀见15.280-91; 大希律王给希腊社区的馈赠, 见G.Bowersock, *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 (1965), pp.54-6, 及A.Spawforth, *Greece and the Augustan*

Cultural Revolution. Greek Culture in the Roman World (2012) , pp.84-6。

[24] Josephus, *AJ* 15.217, 17.198, *BJ* 1.672, 及E. Schürer, G. Vermes & F. Millar,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1 (1973) , p.315。

[25] 犹太教“摩西十诫”的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仿佛上天下地的形象，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26] Josephus, *AJ* 15.272-9.

[27] Josephus, *AJ* 15.305-16.

[28] R. MacMullen, *Romanization in the Time of Augustus* (2000) , pp.1-29.

[29] 在今天土耳其西南部，得名自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

[30] L. Jalabert, R. Mouterde et al., *Inscriptiones grecques et latines de la Syrie* (1929-) 3.718 = R. Sherk, *Roman Documents from the Greek East* (1969) , no.58, doc.iii; J. Reynolds, *Aphrodisias and Rome* (1982) , No.13.

[31] Dio 54.7.2.

[32] Dio 54.7.1-6; Suetonius, *Augustus* 82.1 讲到他戴帽子，保护自己的皮肤。

[33] 库济库斯为古希腊名城，位于今天土耳其西北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前410年，在库济库斯，雅典军队在亚西比德的指挥下大败斯巴达舰队。

[34] Dio 54.7.2, 6.

[35] 康达吉（Kandake或Candace）是古代尼罗河流域库施王国（在埃及以南）女王的头衔，普林尼和《新约》里讲到埃塞俄比亚的女王被称为康达吉。前21年时的康达吉是阿玛尼利纳斯（Amanirenas）。

[36] Dio 54.5.4-6, Strabo, *Geog.*17.1.54 (Loeb translation); Dio 54.6.1讲到罗马的骚动。

[37] 见Velleius Paterculus 2.91.3-4, Suetonius, *Augustus* 19.1, 及Dio 53.24.4-6, 他错误地将此事件的年代定为前26年, with Crook in *CAH2* X, p.89及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371-2, W.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pp.148-9。

[38] Dio 53.33.1-2.

[39] Dio 54.9.4-6, Velleius Paterculus 2.94.4, with B.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25-7, R.Seager, *Tiberius* (2005), pp.13-14.

[40] 第一大门 (prima porta) 是罗马郊区的一个地点, 距市中心12公里, 在台伯河右岸, 是几条重要道路的交会点, 也是从北面进入罗马城的入口, 因此具有重要意义。1863年在此发掘出了奥古斯都最著名的一尊雕像。

[41] 威尔弗雷德·欧文 (1893~1918年), 英国军人与诗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在他之前, 战争诗歌常鼓吹爱国主义或所谓的战争荣耀, 而他用令人震惊的现实主义笔法描绘堑壕战、毒气战的凶残恐怖。他于1918年11月4日在法国阵亡, 恰好一周之后, 停战协定签署了。他的名诗Dulce et decorum est (……是一件甜蜜而适宜的事情) 描写一战期间英军士兵遭到毒气攻击的惨状, 谴责战争和鼓吹“为国捐躯”的“古老的谎言”。

[42] Dio 54.8.1-2, *Res Gestae* 29.2, Velleius Paterculus 2.91.1, Suetonius, *Augustus* 21.3, *Tiberius* 9.1, Ovid, *Fasti* 5.579-84, with D.Kennedy, 'Parthia and Rome: eastern perspectives', in Kennedy (1996), pp.67-90, 尤见82-3, 及B.Campbell, 'War and diplomacy: Rome and Parthia, 31 BC-AD 235', in J.Rich & G.Shipley (eds), *War and Society in the Roman World* (1993), pp.213-40, esp.220-28; *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 Horace, *Odes* 3.2.13。

[43] 对这些荣誉及其背景的详尽讨论, 见J.Rich, 'The Parthian honours',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66 (1998), pp.71-

128；大象和凯旋式，见Plutarch, *Pompey* 14.4, Pliny *NH* 8.4讲到庞培的凯旋式，Suetonius, *Julius Caesar* 37讲到用大象承载火炬。

[44] 凯旋门，见J.Rich, ‘The Parthian honours’ ,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66 (1998) , pp.97-115, 各项荣誉的概况，见 Gruenin *CAH2* X, pp.159-60, Levick (1996) , pp.236-7。

[45] 见W.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 pp.138-40,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367及Crook in *CAH2* X, p.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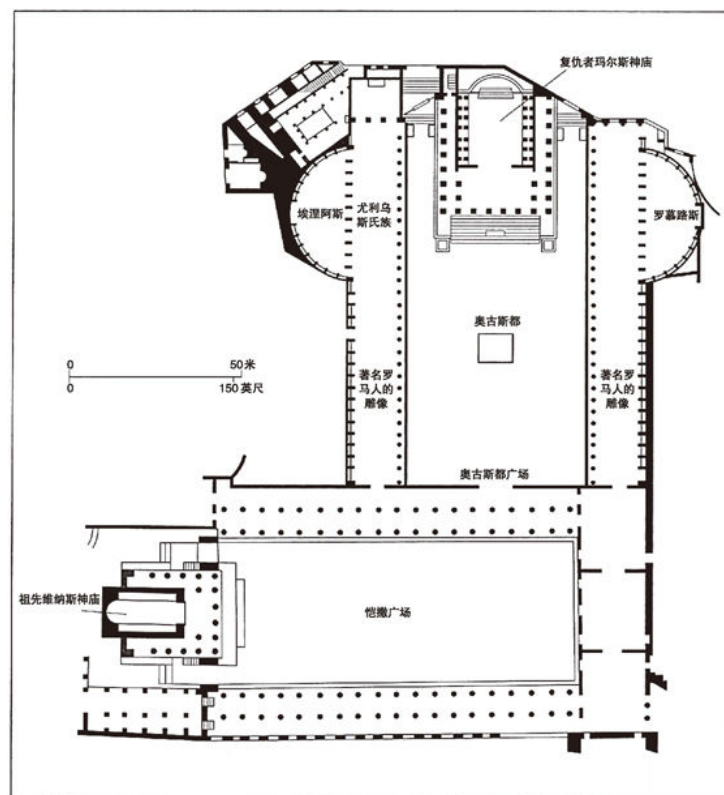
[46] Dio 54.9.8-10, *Res Gestae* 31-2, with Rich, ‘Augustus, War, and Peace’ , in L.deBlois, P.Erdkamp, O.Hekster, G.de Kleijn & S.Mols (eds) , *The Representation and Perception of Roman Imperial Power: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Workshop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Impact of Empire (Roman Empire, c.200 BC-AD 476)* , (2003) , pp.329-57 = J.Edmondson (ed.) , *Augustus* (2009) , pp.137-64, 尤见145-6。

十六 结尾和开端

从这高贵的血脉，特洛伊的恺撒将会出世，他会把他的帝国扩张到大洋边，他的荣耀将升至星辰……假以时日，不再焦虑的你们，将会欢迎满载东方战利品的他，去往天堂；人们在发誓时也会呼唤他的名字。然后，战争会停息，野蛮的年代变得温和……

——维吉尔，前20年代末^[1].

恺撒·奥古斯都可能在雅典逗留了几周，然后徐徐地返回意大利，在沿途所有重要社区停留，接见臣民。他继续工作，即便印度大使自杀这样恐怖的事情也只是个小插曲。他持续不断地接见请愿者和书写信件。诗人维吉尔来到雅典，他比请愿者更受到奥古斯都的欢迎。维吉尔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创作十二卷史诗《埃涅阿斯纪》，现在去希腊旅行，休息一番。他是梅塞纳斯的长期密友，通过梅塞纳斯认识了奥古斯都。人们普遍相信，是元首敦促维吉尔开始了创作史诗的伟大工程。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奥古斯都肯定对史诗的进展很感兴趣，有一次在西班牙写信询问写作情况。在离开罗马、前往东方之前，奥古斯都和一些家人参加了维吉尔亲自公开朗诵《埃涅阿斯纪》部分章节的聚会。哀悼前不久去世的马凯鲁斯的段落让他们非常感动，屋大维娅甚至因此晕倒。^[2]



奥古斯都广场

维吉尔是个完美主义者，遣词造句呕心沥血，在创作《埃涅阿斯纪》时一天只能写出几行。他的朋友贺拉斯也是梅塞纳斯圈子的成员，创作时有时更慢。这样缓慢的苦吟不是装腔作势，也不是外行的表现，因为他们都是非常严肃的艺术家，才华横溢。贺拉斯被大家仰慕，而维吉尔的诗歌已经被誉为可能是拉丁语言最美丽的表达。梅塞纳斯在选择诗人加入自己的朋友圈子时颇具慧眼。他的文艺伙伴可能都是骑士（贺拉斯就是骑士，他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释奴），非常富裕，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非常清闲，能够专心于诗歌。虽然其中有些人在内战中丧失了一些土地，但他们不需要仰人鼻息，不需要依赖梅塞纳斯和奥古斯都的恩宠，这两位馈赠仅仅让这些文人生活得更舒适一些而已。奥古斯都可能是在患病之后希望雇用贺拉斯，于是写信给梅塞纳斯：“在此之前，我能用自己的手写信给朋友们；如今，肩负着工作的重担，并且身体欠佳，我希望从你身边把我们的朋

友贺拉斯请来。我要请他离开你那寄生虫的餐桌，来到我这帝王的桌前，帮助我写信。”^[3]

最后贺拉斯谢绝了这个提议，但他和奥古斯都仍然维持着友好关系。元首给老友梅塞纳斯写的这封信具有非正式而取笑逗乐的风格，他和诗人们的通信用的也是这种风格。对罗马精英阶层来说，文学是一种非常受尊重、非常时髦的闲暇活动，也是真正的文明人的标志。尤利乌斯·恺撒在高卢时的幕僚是一群才华横溢的文人，而奥古斯都和梅塞纳斯一样，非常尊重诗人和作家。在社交场合与其他元老或重要人物交流时，文学是非常有用且比较中立、不带政治性的话题。在奥古斯都与阿提库斯的交往中，除了热爱传统之外，文学也是一个主要话题。奥古斯都和梅塞纳斯也都写作，奥古斯都还和贺拉斯等人一起嘲笑梅塞纳斯写诗的努力。奥古斯都常常自嘲，有一次放弃写作一部悲剧时开玩笑地说，他的主人公“摔倒在自己的海绵上”。^[4]

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梅塞纳斯文学圈子里的诗人们也都清楚奥古斯都主宰国家的现实，并且他的统治说到底还是建立在强大军事力量之上。但奥古斯都并没有强迫诗人们去写作，正如他没有强迫元老们去从政一样。有人认为这些诗人的作品仅仅是政治宣传，甚至提出他们作品的内容受到梅塞纳斯（以及奥古斯都）的严密监控。这些观点都大错特错。也有人努力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挖掘隐含的颠覆言论或对元首及其政权的批评。这样做是徒劳无功的。奥古斯都非常骄傲地只与最优秀的作家结交。这是自尊问题，但也是很好的政治手腕。亚历山大大帝受到了太多平庸诗人的夸张歌颂，因此声誉有些受损。

奥古斯都可以鼓励和诱导维吉尔、贺拉斯和普罗佩提乌斯这样的人去写某些主题的作品，他们自己也知道哪些主题会让元首开心。他们有时开玩笑说自己是被“强迫”写作的，但这种说法是常见的文学手段，代表着虚假的谦虚。西塞罗、阿提库斯及其同时代人常常玩同

样的游戏，互相敦促去写某些特定主题的作品。奥古斯都曾写信给贺拉斯，温和地批评他没有在他的作品中讲到自己。奥古斯都用惯常的打趣口吻写道：“你是担心如果大家知道你是我的朋友，你的身后名会受损吗？”这些话的背后很难说存在什么真正的威胁。奥古斯都谈的是友谊（因为贺拉斯是皇室的亲信），而不是政治。尽管在罗马，友谊和政治往往被混为一谈，但奥古斯都暗示的意思是，贺拉斯若是写一部以奥古斯都为主题的作品，将会给他们两人都带来荣誉。贺拉斯的回应是他的《书信集》第二卷的第一首诗，谈到了他这样的诗人主动为国效力，并包括那句著名的诗：“被俘虏的希腊征服了凶悍的胜利者，将艺术带到了粗野的拉丁姆^[5]。”^[6]

诗人们受到的压力是很小的，而且他们的绝大多数主题都是自己喜欢的。差不多所有亲身经历过内战的人都会愿意歌颂恺撒的胜利以及它给人们带来的和平。复苏宗教仪式、恢复稳定和击败危险的外国敌人，这些无疑都是有利于全体罗马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好事，诗人们如果不这么想，就非常奇怪了。他们作品的措辞并没有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更没有直接审查。若要创作出佳作，维吉尔和贺拉斯等人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风格来写作。

结果是，一大批文学水平极高的不朽名著诞生了，随后许多世纪里一直为人们所称颂。其中很多作品符合新政权的口味，但也有很多作品讲的是更普遍的人生经历。这样的作品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任何被严密控制的宣传，并且有利于促进恢复传统和安宁的气氛。奥古斯都与诗人们的交情为他的统治增添了不少光辉，因为文学是任何一位元老都可以拥有的非常正当的兴趣，而且这些诗歌显然非常优秀，所以，他不会被认为是暴君，诗人们也不会被认为是阿谀奉承之辈。普罗佩提乌斯拒绝接受“对抗帕提亚人和其他敌人的战争”这样的主题，而是去写爱情。他不是在攻击国家政策，而是在诗歌中运用机智和富有魅力的手法去愉悦读者，而不是劝读者放弃政治生活。奥古斯

都的统治创造了一个鼓励文学和艺术繁荣发展的环境。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们努力扬名立万，往往会彻底改变现有的风格。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维吉尔和其他人表达的观点不是真诚的，尽管现代人有一种偏见，认为所有的伟大艺术家都必须是异见分子，这是他们的天性使然，尤其是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位用武力夺取权力的领导人的统治之下。作为对比，我们可以考虑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很多伟大的音乐和艺术作品就是在专制君主统治时期，甚至在专制君主的直接赞助之下问世的。[\[7\]](#)

有一次，维吉尔谈到要写一部以奥古斯都为主人公的史诗，后来放弃了这个创意。《埃涅阿斯纪》的背景是遥远的过去，讲述的是埃涅阿斯的故事，他是特洛伊的英雄，在这座城市陷落之后逃走，带领一群流亡者来到了意大利。几个世纪之后，他的后代罗慕路斯建立了罗马。埃涅阿斯的世界就是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是最古老和最伟大的希腊史诗）的世界，维吉尔刻意要尝试在拉丁语中与荷马史诗的辉煌比肩。埃涅阿斯也被认为是尤利乌斯氏族的祖先，他们的姓氏尤利乌斯来自埃涅阿斯之子尤卢斯的名字。因为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是维纳斯的儿子，所以显贵的尤利乌斯氏族拥有神的血统。维吉尔为这部史诗投入了全部精力，就连他去希腊的旅行也只是暂时休息一下，然后继续修改史诗，提高创作水平。虽然维吉尔呕心沥血地苦吟，而且《埃涅阿斯纪》部分章节在公开朗诵之后受到了欢迎，但他还是对自己不满意。据说他曾在一次公开朗诵的过程中修改诗句。他不像喜爱锦衣玉食的贺拉斯那样热衷社交，而是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自己的一个乡间庄园里，苦思冥想地修改诗作，一行一行地改善或摒弃。[\[8\]](#)

《埃涅阿斯纪》还没有完成，但不知是由于希腊没有如预期的那样激发他的灵感，还是他觉得自己有义务陪伴奥古斯都，他和元首及其随行人员一同返回了意大利。在旅途中，他病倒了，起初是中暑，

后来发高烧。维吉尔抵达了意大利，但于前19年9月21日在布隆迪西乌姆病逝，享年五十二岁，他去世的日子离恺撒·奥古斯都的四十四岁生日只有两天。他在遗嘱中立元首和梅塞纳斯以及卢基乌斯·瓦里乌斯（也是梅塞纳斯文人圈子的一员）为继承人。维吉尔生前对《埃涅阿斯纪》不满意，曾请求瓦里乌斯，假如他去世了，就烧掉手稿。瓦里乌斯拒绝了这个请求。维吉尔在临终的日子里恳求仆人将手稿拿到他身边，以便亲自把它们烧掉。奥古斯都确保无人服从这个命令。元首敦促瓦里乌斯和一位同僚整理了这部史诗，很快将其发表。^[9]

维吉尔的意愿遭到了违背，但这为人类做出了极大贡献，挽救了罗马文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埃涅阿斯纪》对奥古斯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吸引力，因为这是一部恢宏优美的史诗，由一位著名诗人创作，讲述的是他的尤利乌斯祖先之一以及罗马人起源的激动人心的故事，赞颂了罗马人的过去与未来。因此奥古斯都的行动并非完全无私，不过如果史诗没有大体完成并且水平不高的话，他应当也不会希望将它公之于世。人们很快开始猜测，维吉尔生前打算做怎样的修改，今天的学者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埃涅阿斯纪》被世人普遍赞美为足以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的杰作。它很快成为罗马教育的标准教材。

（一个世纪之后，在帝国的两端，分别在不列颠北部和犹太的两位百无聊赖的军队书记员在日常文书的背面胡乱写了这部史诗的一句，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些文书。）《埃涅阿斯纪》是拉丁文学中经常被引用的作品，但我们应当注意，历史上的引用大多引自《埃涅阿斯纪》前几卷。就像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埃涅阿斯纪》的很大一部分也被忽视，因为教师们往往集中注意力于为人熟知的少数选段。

^[10]

《埃涅阿斯纪》第一卷第一行是“我歌唱的是战争和一个人的故事”，诗人用第一人称，这就与荷马的传统分道扬镳了。《埃涅阿斯纪》的世界与荷马的世界交织起来，其中很多人物，最重要的是埃涅

阿斯，都直接来自荷马史诗。《埃涅阿斯纪》的上半部分很像《奥德赛》，描写特洛伊流亡者在地中海漫游，有时会涉足奥德修斯曾经到过的地方。比如，他们遇到了当初奥德修斯及其伙伴逃离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11]时被留下的一个人，后来又看到被戳瞎的怪物怒气冲冲地跌跌撞撞。在整个故事中，神祇会不断干预人的命运，朱诺复仇心切地追踪特洛伊人，而维纳斯则保护她的儿子。

虽然《埃涅阿斯纪》中有很多荷马的影子，也有很多指涉其他文学作品的典故，但在神话之外还是能看出一个更现代和更复杂的世界。埃涅阿斯有时会害怕、生气或一时糊涂，有时为了鼓舞部下会故作自信和热情，自己内心里其实是绝望的。荷马的英雄则完全是无比自信、极度自我为中心的，比如《伊利亚特》讲的是阿喀琉斯因为自己受到不公而大发雷霆，于是躲在营帐内生闷气，直到帕特罗克洛斯的死亡促使他重返战场，大肆杀戮。与他个人的动机（他选择了短暂但光荣的生命，而不是默默无闻地活到高龄）相比，整个希腊军队的命运似乎无足轻重。在《奥德赛》里，英雄奥德修斯在旅途中失去了所有伙伴，却并不感到懊悔。他和仙女与女神缠绵嬉戏之后，回到家里屠杀了向他妻子求婚的人和所有曾经接纳求婚者的家仆。对这些英雄来说，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荣誉和成功，所以许多世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尤其是贵族，都将这两部史诗当作个人行为的指南。

埃涅阿斯则不同，他始终清楚自己更重要的使命。他是虔诚的埃涅阿斯，尊重神祇和家人，尤其是他从特洛伊废墟里救出来的父亲。他知道自己肩负着特洛伊种族的命运，他需要带领他们去意大利，后来的罗马就是由他们建立的，而罗马人将崛起到维吉尔时代的那种崇高地位，甚至还将取得更辉煌的成就。他多次瞥见这样的未来，从中受到激励。除了公开的敌人之外，他还面临着诱惑，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他和他的追随者受到了迦太基女王狄多的欢迎。朱诺和维纳斯联手让狄多爱上了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和狄多在一起狩猎时遭遇风

暴，躲在一个洞穴内，发生了肌肤之亲。但特洛伊人前途受到的威胁很短暂，因为埃涅阿斯很快就带领他的全体族人离开了，而不是在迦太基人当中定居。如果他们留下，迦太基就将成为地中海最强大的国家，而不是罗马。伤心欲绝的狄多自杀殉情，导致她的民族对埃涅阿斯的后代抱有刻骨铭心的仇恨，这为前3世纪和前2世纪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真实冲突提供了一个古老的缘由。^[12]

维吉尔的史诗融合了现有的传说（有时他从多个版本中挑选了一个）、荷马史诗和其他史诗，他自己也做了很多虚构。书中暗指他自己所处时代之处不胜枚举，但不会显得笨拙。诗中经常出现西西里岛，埃涅阿斯曾两次到访那里，这肯定反映了西西里岛在奥古斯都崛起过程中起到的核心作用。绝望的狄多哀叹她的情人没有给她留下一个“小埃涅阿斯”以宽慰被抛弃的她，这肯定让维吉尔的同时代人联想到尤利乌斯·恺撒、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恺撒里昂。史诗中的迦太基女王很容易与近期历史上的埃及女王联系起来，但这个联系不会显得太刻意。维吉尔非常同情狄多，她被诸神操纵，爱上埃涅阿斯，后来又被抛弃。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本人在故事快结束的时候也露过面，被写得很负面，但狄多更像是一位受害者而非恶人。只有诗人描写她的恐怖自杀时，她才被写得精神不稳定和危险，或许现代人会觉得狄多的性情变化得太突然，但维吉尔时代的人可能不会这么觉得。^[13]

虔敬的埃涅阿斯先公后私，将民族的命运置于比个人情感更高的地位，因此抛弃了狄多。后来，他拜访冥界时遇到了她的鬼魂。这个场景主要刻画他的哀愁和愧疚，而不是她的情感。女王拒绝与他相认。埃涅阿斯每一次都做出了有利于未来的正确选择，但对他自己和身边的人造成了很大伤害。他们最终抵达意大利，受到当地一些国王的欢迎，却使得他们与邻国发生了战争，这在很多方面影射了维吉尔时代的历次内战。荷马史诗中详细描写了战争中的伤痛和死亡，战斗场面残酷而野蛮。维吉尔也遵循了这种传统。《埃涅阿斯纪》展现的

很可能是一个比荷马史诗更冷酷的世界。一位盟邦国王被绊倒在地，跌落到祭坛上并被杀死，他的对手嘲讽地喊道：“他完蛋啦！（这是角斗士竞技场上观众常用的呼喊。）这是给大神的更好的祭品！”就在附近，另外一个人的胡须被点着，然后被打倒在地，惨遭屠杀。

《埃涅阿斯纪》相比荷马史诗，更多地描写了战争的惨重代价，以及死者亲人的痛苦感受。^[14]

尽管维吉尔把战斗描写得非常恐怖、令人哀伤，但他并没有谴责战争本身，更没有说战争是无谓的。埃涅阿斯在战斗中也是非常残酷无情的，他杀死了包括一个佩戴祭司符号的人在内的众多敌军，拼出了一条血路。在故事末尾，他遇见了鲁图利亚国王图尔努斯，后者已经杀死了许多特洛伊人及其盟友，其中最重要的是伊万德国王的儿子帕拉斯。图尔努斯被埃涅阿斯击伤，请求埃涅阿斯看在他可怜父亲的份上饶他一命，这让埃涅阿斯想起了自己挚爱的、现已去世的父亲安喀塞斯。胜利者一瞬间被感动了，有些犹豫。然后他注意到，图尔努斯系着一根从帕拉斯尸首上剥下的腰带，于是他的怜悯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狂怒”。埃涅阿斯高呼这是正义的惩罚，是为帕拉斯报仇雪恨，于是将剑深深刺入图尔努斯的胸膛，他的“肢体松懈下来，变冷了，随着一声叹息，他的灵魂愤怒地飞向阴间的黑影”。^[15]

全诗就这样结束了。虽然维吉尔并没有完成对这部巨著的修改，但他未必打算以怜悯而非复仇结束故事的最后一幕。图尔努斯以武力反对埃涅阿斯，为给敌人造成的破坏而欢呼雀跃，对敌人没有一丝怜悯，在最后的决战中还破坏了停战协定。图尔努斯并没有被描写成一个一无是处的恶魔，维吉尔也很同情他，就像对狄多和其他角色一样。这样对人性的同情与理解，是伟大艺术家的标志，但维吉尔绝没有鼓励读者（尤其是前1世纪的罗马读者）将这些人物与埃涅阿斯相提并论，更没有暗示他们可能才是正义的一方。许多罗马人能够做到敬佩自己的敌人，并承认他们的征服战争常常给被征服人民带来极大苦

难。但这些认识从来不会真正挑战罗马人内心根深蒂固的信念，即罗马的扩张是正义的。敌人就是敌人，必须打败他们后才能善待他们。诗歌和现实生活一样，只有罗马的胜利才能带来和平的喜悦。[\[16\]](#)

埃涅阿斯在很多方面都反映了奥古斯都本人的特点，例如，显而易见的英雄主义，英明神武的武士形象。有人说维吉尔没有刻意颂扬元首，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埃涅阿斯和奥古斯都把责任和虔敬看得比自己的享乐和利益更重要，忍受了极大的艰难困苦，奋斗了多年才赢得最终胜利，让广大群众享受到和平与繁荣。有的时候，为了更重要的福祉和罗马人的命运（当然对埃涅阿斯来说是罗马人祖先的命运），他们不得不做一些可怕的事情。目标如此高远，他们必须消灭所有阻碍他们的人，符合道义、激昂浓烈的狂怒替代了从容虔敬的态度。埃涅阿斯有时甚至会嘲讽即将被杀死的敌人，据说年轻的恺撒在腓立比战役之后和佩鲁西亚战争时期也曾这么做。[\[17\]](#)

史诗赞颂了恺撒·奥古斯都。工匠之神武尔坎为埃涅阿斯锻造的华丽盾牌的中心图案就是亚克兴角大捷时期的恺撒·奥古斯都。有时维吉尔会更模糊地说到一位恺撒。有一次，他讲到“特洛伊的恺撒……满载东方战利品”，我们很难判断他指的是奥古斯都还是尤利乌斯·恺撒。或许他是故意含糊其辞，对两位恺撒都有指涉，养父的丰功伟绩增强了养子的成绩和美德。类似地，当维吉尔写到加图在阴间裁判死人时，他指的既是著名的老加图，也指涉曾坚决反对尤利乌斯·恺撒的小加图。维吉尔热衷赞颂历史上伟大的罗马人。在史诗里，喀提林死后遭到可怕的惩罚，除此之外史诗很少提及政治分野。在等待出世的罗马的未来英雄当中有两位“以同样雄武的阵势熠熠生辉”的豪杰，显然是指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他们“呜呼哀哉……将会造成战争与流血”，“新娘的父亲”会反对“她的丈夫”。诗中敦促他们保持克制，避免内战。这肯定是维吉尔对他们的批评，但这批评很温和，既是针对伟大的庞培，也是针对独裁官尤利乌斯·恺

撒，并且敦促后者首先“饶恕敌人”，这显然是在认可和称赞他那著名的宽宏仁慈。^[18]

《埃涅阿斯纪》洋溢着爱国主义，充满了歌颂往昔荣光的激动人心的段落，并预言在神圣尤利乌斯·恺撒的儿子的统治下必将取得更伟大的成就。虽然诗中鲜血淋漓地刻画了战争和传统（维吉尔那一代人对这些已耳熟能详），但对未来非常乐观，因为罗马的前途不可限量。和所有伟大的作品一样，《埃涅阿斯纪》也有很多层面，不同时代的人对其有丰富的阐释，这些阐释往往会让作者本人感到惊讶或沮丧。奥古斯都应当不会想到那些复杂的解读，他只是被优美的诗句所感动，并且因为自己出现在这样一部广受赞颂的史诗中，与它有着紧密关系而备感愉悦。

家族与权力

元首及其随行人员抵达罗马时，已是年末。在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掀起的骚乱之后，这一年仍然只有一位在职的执政官。直到这时，元老院才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见奥古斯都，他选择了一名元老作为另一位执政官。这样做的具体程序不太清楚。狄奥暗示说，奥古斯都凭借自己的权威指定了一个人，没有举行正式选举。不过狄奥可能是在描述事情的本质，而不是实际的技术细节。被选定的那个人在内战期间曾忠心耿耿地为奥古斯都效力。做了这个安排之后，奥古斯都又一次谢绝了元老院全体集合并与群众一同正式欢迎他入城的荣誉。他发现一大群元老仍然打算去迎接他，于是借着夜色，悄悄溜进了城。不过他接受了元老院的另一项投票决定，即在卡佩纳门（他在沿着阿庇乌斯大道^[19]靠近罗马后，从这座城门进入罗马城）建造一座幸运返乡女神庙。每年的献祭于10月12日（新设立的奥古斯都节）在这座神庙举行。^[20]

恺撒·奥古斯都外出期间，罗马城有些不安稳。只有在阿格里帕的直接监督下，才能暂时阻止百人会议每年选举奥古斯都为执政官的行为。可能就是在返回罗马之后，开始考虑每年设立三个执政官职位，以便他自己能够担任这个职务，同时还能让另外两人有机会。这种想法太不符合常规，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超过两名执政官同时存在。据狄奥记载，奥古斯都被授予了永久性的执政官权力。但这是否符合史实，以及如果属实，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直是学者争论的话题。学者的共识是，奥古斯都被授予了执政官职务的符号，所以从现在开始，他在城内行动时，有十二名执法吏护卫。在元老院会议上，他的行政长官席位在两位执政官之间。不管这些权力的细节如何，它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就像前23年他得到的那些权力一样，与任何官职都没有关系。在罗马，符号，尤其是官职的符号，有着重要意义，它加强了奥古斯都对国家的控制。^[21]

狄奥所记载的奥古斯都在这个时期接受的其他一些新权力，可能实际上被他拒绝了，或者根本就是讹传。奥古斯都被任命为终身制“公共道德监管者”，这可能是他被临时授予监察官的权力，因为在下一年元首又开始清洗元老院，希望能减少元老人数，恢复元老院的尊严（近期选举时的一些骚乱有损元老院的体面）。没有人自愿退出元老院，于是奥古斯都选择了三十名元老，公开宣誓自己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人。这三十名元老随后做了同样的宣誓，每个人写下另外五名元老的名字，但不可以写自己或亲属的名字。每个五人小组中的一人被抽签决定为新元老名单上的一员。然后最初的三十名元老重复这个过程，每人再写五个名字。这种程序非常麻烦，而且容易受到幕后交易的操纵。安梯斯提乌斯·拉比奥举荐了李必达，这让奥古斯都很恼火，努力让拉比奥改变主意。拉比奥拒绝了，说他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既然元首允许李必达继续担任祭司长，那么拉比奥希望李必达成为元老就没有什么不对。奥古斯都只得作罢。他在三头同盟的老同僚一定是被抽中了，因为李必达成了元老院的一员。^[22]

奥古斯都十分气恼，于是放弃了这种选举程序，改为由他自己挑选剩余的元老。有人发出了抗议，比如有个人被排除在元老院之外，而他的儿子却被选中，于是他用非常罗马化的方式抗议。他撕开自己的托加袍，脱掉上衣，露出了身上的伤疤，那是他为国负伤的光荣印迹。另一位元老请求辞去元老资格，让位于他的失去元老身份的父亲。和上一次清洗元老院一样，被开除的人被允许保留元老身份的衔级和威望，后来，有些人通过当选行政长官而重新获得了元老身份。据说奥古斯都的目标仍然是将元老数量减到三百人，但最后被迫放弃，满足于六百人的规模。如果总人数再少一点，就很难填充所有必需的职位，在投票时也很难达到四百人的法定在场人数。

大约在这个时期，元首组建了一个更小和更便捷的议事会，后来被称为元首御前会议，其成员包括各个级别的行政长官的代表和十五名抽签选出的元老，任期六个月。这个议事会是一个很有用的试探更多元老意见的机构，也有助于在一项提议被呈送元老院讨论之前对其加以提炼。奥古斯都仍然非常尊重元老院，只要他在罗马，就会参加元老院的每一次会议，并鼓励元老们各抒己见。他虽然对拉比奥很生气，但没有采取措施惩罚他。元老院后来提议，让所有元老轮流睡在元首卧室外，拉比奥说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打呼噜太响。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奥古斯都在元老院的演讲会被“我不明白！”或“如果给我机会，一定发言反对你！”这样的呼喊声打断。后面这句话一定是那些没有被邀请参与讨论的人说的。有时怒气冲冲的元老之间的唇枪舌剑让奥古斯都非常烦恼和愤怒，会议尚未结束就拂袖而去，这让元老们高声疾呼，他们应有权对重大的公共事务表达自己的意见。^[23]

在过去，元老也属于骑士阶层，必须满足拥有至少40万塞斯特尔特提乌斯财产的资格。如今，为了增加元老的尊严，奥古斯都正式将元老划分为单独一个阶层，并要求其成员拥有至少100万塞斯特尔特提乌

斯。一些无法满足这个条件的人就失去了在元老院的席位。有一些人虽然财产不够，但元首认为他们有足够的德行，于是赠送足够的金钱，以便让他们保留元老身份。同时，他颁布了一部新法律，处置选举中的贿赂和恐吓行为。

这样的立法在历史上很少奏效，但奥古斯都拥有足够的权力和威望，能够更严格地执行这项法律。这些罪行虽然没有完全根除，但肯定是大大减少了。随后十年中，很多名门望族的成员当上了执政官。这些大家族在历次内战中损失惨重，后继的年轻人没有亲身参加内战，如今愿意在被奥古斯都主宰的国家里从政。执政官的荣誉仍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比元老院的其他成员对奥古斯都更友好，也不能证明他们对他更敌视。狄奥说，大约在这个时期，有几个人因为图谋反对元首而被处死。但狄奥没有给出这些人的名字。[\[24\]](#)

前18年，李维娅的次子德鲁苏斯担任财务官。他只有十九岁，和兄长提比略一样被授予比正常年龄早五年担任裁判官和执政官的权利。阿格里帕的女儿维普撒尼娅尚在襁褓中时就被许配给了提比略。提比略远征东方返回后，维普撒尼娅已经到了嫁人的年龄，于是他们终于结婚了。几年后，他的弟弟德鲁苏斯娶了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娅的女儿小安东尼娅。奥古斯都在东方期间，罗马还缔结了一门甚至更重要的婚事。前21年，阿格里帕被派回罗马，处置那里的骚乱，同时他还有更私人的事情要办理。他休掉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屋大维娅和马凯鲁斯的女儿，所以是奥古斯都的外甥女），然后娶了奥古斯都的女儿，寡居的尤利娅。新娘只有十八岁，新郎与她父亲（四十二岁）的年纪差不多，但老夫少妻在贵族婚姻中是很常见的。这门婚事说明阿格里帕深得奥古斯都的宠信。就这样，奥古斯都与他最信赖也最可靠的副手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有流言说，这门婚事是不得已而为之。据说梅塞纳斯告诉恺撒·奥古斯都，他把阿格里帕培植得太

强大，现在必须把阿格里帕杀掉，或者让他成为自己的女婿。现实中，其实没有多少其他选择。奥古斯都对提比略的态度还不明确，但如果取消提比略和维普撒尼娅的婚约，一定会被认为是对她父亲的冷落。[\[25\]](#)

阿格里帕出身于内层元老圈子之外，凭借与恺撒·奥古斯都的关系得以平步青云，这让很多贵族非常嫉恨他。和其他新人一样，阿格里帕似乎格外宣扬自己的平凡出身，有意识地与广大群众交好，为他们修建福利设施，同时轻蔑地谢绝其他元老非常渴望的个人荣誉，比如凯旋式。他非常热衷收藏艺术品，总是公开展出，而不是私藏。但与奥古斯都圈子的其他人和一般贵族不同的是，他对文学没有什么兴趣，也不结交诗人和作家。阿格里帕精力充沛而高效，是一位成功的将军、行政管理者和建筑巨头，也是一位成功的丈夫，至少按照罗马的标准是这样的。前20年，他离开罗马前，尤利娅已经有孕在身，这一年晚些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盖乌斯。前19年，阿格里帕彻底粉碎了西班牙最后一次大规模叛乱，在返回罗马后又一次谢绝了凯旋式的奖励。尤利娅很快又怀孕了，在前17年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卢基乌斯。[\[26\]](#)

作为元首的女婿，并且拥有如此多的伟大成就，阿格里帕的威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位元老。很快，他又得到了正式的权力。前18年，恺撒·奥古斯都还有一年就要到期的五年行省指挥权又被延长了五年。同时，阿格里帕也被授予一个为期五年的总督职位，不过可能不是与具体的某些行省有关联，并且后来才被确定为级别高于普通总督。他过去也一定拥有过类似的职权，不过在前20年代其地位的细节很难搞清楚。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于前18年被授予了为期五年的保民官权力。除了恺撒·奥古斯都之外，还不曾有人拥有过这样的权力。阿格里帕的保民官权力有时间限制，不像元首那样是终身制的，但仍然是一种个人化权利，这让阿格里帕在其他行政长官和显赫元老当中

显得与众不同。总的来讲，他的新地位使他享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如果奥古斯都在随后几年内去世，那么阿格里帕一定有机会继承他的地位。[\[27\]](#)

一个皇朝正在形成。卢基乌斯出生后，奥古斯都收养了尤利娅和阿格里帕的两个儿子，于是人们更加觉得阿格里帕家族正在被培养为帝国的接班人。这种收养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购买，奥古斯都在一位裁判官面前，用一枚低价值的铜币（称为“阿斯”）在一台秤上敲了三下。于是，两个婴儿，元首的外孙也是元首最亲密盟友的儿子，就变成了盖乌斯·恺撒和卢基乌斯·恺撒。到这个阶段，应当不会有人觉得恺撒·奥古斯都会退隐，而且很多权力都属于他个人，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具体的官职可以辞掉。但在其行省指挥任期被延长五年时，他声称这足够平定这些地区了。也许有些人相信他。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任期被延长为十年，并没有因此发生骚动。一些罗马人可能仍然在怨恨一个人掌握如此大的永久性权力的事实，但即便是心怀不满的人也很少愿意冒重燃内战的风险，至少短期内不愿冒这个险。随着时间流逝，新的现实——奥古斯都除了没有君主的名号之外，其实已经是一位君主——变得越来越不引人注目。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一位新的军阀与奥古斯都分庭抗礼，异见分子不会拥有这样一位领袖，所以除了暗杀之外，没有任何除掉元首的办法。奥古斯都比尤利乌斯·恺撒更小心地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所以任何行刺他的企图都是非常危险的，而前44年的事件向所有人证明，即便有可能刺杀独裁者，结果也很可能只是回到混乱和内战的状态。[\[28\]](#)

要谋杀恺撒·奥古斯都并非绝对不可能，而且我们也不能高估他采取的防备措施。他常参加元老院会议，出于这个原因或其他一些原因，他常常在罗马街头步行或者乘轿。在元老院会议上，他遇到每一位元老都会向其问候，常常还用亲热的方式与其道别。主持会议的时候，他会预先搞清楚每一位与会者的名字，以便直呼其名，请他们发

表高见。他依赖于自己极佳的记忆力，而不用指名者。元首在罗马和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会接见请愿者，并且非常努力地表现出自己愿意倾听。有个人接近他时非常紧张，他责备这个人看上去仿佛“向大象奉上一枚钱币”。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希腊诗人常在帕拉丁山上奥古斯都宅邸的门廊外等候，可能是和其他一大群希望吸引奥古斯都注意的人在一起。这位诗人拿着一首他写的赞颂皇帝的诗，希望得到赏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奥古斯都对他置之不理。他喜欢和维吉尔与贺拉斯那样的才子交往，但不打算接受一位不成功作家的平庸颂歌，因此从来没有允许这位诗人接近自己。[\[29\]](#)

这个希腊人坚持不懈，最后奥古斯都决定耍弄他一下。这一天，诗人和往常一样在门外等候。这一次，元首走到他面前，给了他一张纸莎草纸，上面写着奥古斯都自己的几行诗。希腊人安之若素，大声朗诵了这首小诗，赞扬了它的文采，然后给了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几枚钱币作为赏金，道歉说钱不多，还用希腊语说：“我以奥古斯都的好运气起誓，如果我有更多钱，一定会给你更多。”元首被逗乐了，命令一名侍从给了这人1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30\]](#)

这个故事以及其他很多轶闻清楚地表明，恺撒·奥古斯都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大家是可以接近他的，不仅富人和显贵可以，差不多所有人都可以。这也证明绝大多数罗马人满足于接受他的主宰地位，而不愿意接受其他选择。在这种环境下，奥古斯都更加公开地认可阿格里帕的地位，并收养他的两个儿子。这是稳定民心的举措，承诺了未来的稳定和安全。显然这对奥古斯都本人很重要，所以他才收养了那两个男婴。在这个时期，罗马民族的未来，尤其是精英阶层的未来，也成了他认真思考的问题。内战和政治迫害对元老阶层和很多骑士家族造成了巨大破坏。有些家族干脆已经灭亡，其他家族则有一代人或者几代人在从政的最合适年龄之前或期间死亡。抚养孩子是很

昂贵的事情，尤其是如果这些孩子想要从政的话。人们普遍相信，越来越多的男子要么选择单身，要么结婚却不生孩子。

奥古斯都决定采取行动。无疑地，他先和御前会议（即小议事会）探讨了此事，然后将其提交元老院。他的担忧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可以说是关系到道德的：他希望罗马的精英阶层尽自己的义务，不断提供年轻男子来从政。管一管此事对奥古斯都来说也是非常正当的，因为在过去监察官的部分职责就是监督公众的道德风化。他从东方返回后，元老院投票授权他通过一项《奥古斯都法》，但这个决定没有经过正常的元老院讨论、公民大会投票的程序。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接受这项权力，即使接受了，他也没有运用。他遵从正当程序，将自己的提案呈送元老院，请求批准，然后接受投票表决，使其成为《尤利乌斯婚姻法》。生三个或更多孩子的父亲将得到一些福利，而适龄却不结婚或不生子的男子将受到处罚。他像往常一样非常关注元老阶层的尊严，因此禁止元老与女释奴结婚，但其他公民，包括骑士，则被允许与女释奴结婚，因为很多人相信公民当中男多女少。

[\[31\]](#).

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引入了《尤利乌斯处置通奸法》，处罚通奸以及与自由女性的任何非婚性行为。据说是元老院最先感到急需处理这个问题的，元老们认为年轻一代过于放荡，导致很多人没有结婚生子。这项法律通过了，但据狄奥记载，有些人希望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奥古斯都却不愿意继续干预，因为他觉得新法律已经足够了。这种事情肯定是很难管的，参与通奸的人很可能仅仅显得可笑而已。而且奥古斯都自己也曾是个风流浪子，与很多有夫之妇发生过奸情，这肯定不利于法律的执行。在辩论中，有人讥讽说，奥古斯都非常有资格讨论这个话题。他遭到嘲讽，而且有人对他施加压力，要他加大干预力度，于是他建议他们都管好自己的老婆：“你们应当按照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训斥和教导你们的妻子。我就是这样的。”元

老的总人数虽然多达六百，但仍然只是小小的贵族群体（也包括元首及其家人）的一部分。很多元老认识李维娅，所有元老都知道她以贞洁闻名，所以奥古斯都的这种说法让大家很惊讶。好几个发言者敦促奥古斯都介绍一下他教导自己妻子的细节，他却只说得出自己与李维娅和尤利娅的仪态、服饰和礼节提过一些建议。^[32]

元老们可以自由地取笑元首，让他窘迫，而不必害怕遭到报复。元首的不悦或许会影响某些人的升迁，但很多元老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官职、荣誉、行省指挥权，所以不会害怕。他们对元首的嘲讽是温和的，尤其与罗马政坛传统的极其污秽粗俗的语言相比，而且并没有直接批评奥古斯都本人。在很多方面，这样的对话有利于维护奥古斯都所希望的那种表象：他只不过是元老院中最显赫的一位成员而已。他提议的法律得以轻松通过，但执行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对新法律的抵制并不是由于反对他本人。为了应付新法律，有些男子安排自己与婴儿订婚，于是就享有婚姻带来的福利，而在好些年内都不必真的结婚。奥古斯都的回应是对法律做了修改，规定订婚之后必须在两年内结婚，否则婚约无效。^[33]

制定这些法律的努力造成了更多不方便的窘境，他负责监管公众道德风化的临时职责意味着他需要审理具体的案件。一名男子被指控娶了一个之前与他有过通奸行为的女子，这事情与奥古斯都不循常规地追求李维娅的故事十分相似。在这个案子里，控方对被告的品行还做了其他许多指控，显然非常仇恨被告。奥古斯都最后驳回了起诉，含糊地宣布，原告和被告双方应当捐弃前嫌。前17年年初，元首四十五岁，已经是个成熟男子，不会像青春年少时那样动辄暴跳如雷、时常说出蠢话来。他很好应对了元老们讥讽地询问或者打断他演讲的行为，即便陷入窘境时也以很好的风度脱身，不会有失体面。^[34]

他的温和可亲软化了其独裁的冷酷现实，曾经的三头同盟之一的强硬面孔只是偶尔显露出来。有一次，奥古斯都与一名叫作维迪乌斯·波利奥的骑士一同用膳，此人以富裕、奢侈和残酷而闻名。波利奥也是奥古斯都的老友，可能是年轻的恺撒于前44年投身政治时支持他的富豪之一。和西塞罗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波利奥也拥有面积很大的装饰性鱼池，其中之一养着食肉的七鳃鳗，如果有奴隶惹恼了他，他就把奴隶丢进去喂鱼。席间，一名奴隶偶然打碎了一套昂贵的酒杯中的一只，主人立刻命令将此人扔进鱼池。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命他的侍从把这套酒杯的剩余几只拿过来，当着主人的面一只一只砸碎，直到波利奥释放那个奴隶。这个故事表明他并不赞成这位骑士的残酷行为。他这么做的动机肯定也在于此。他那绝对的自信令人不寒而栗，他知道自己可以这么做，而主人没有任何办法。后来波利奥去世了，将他的奢华别墅之一遗赠给元首。奥古斯都将这座别墅拆毁，以消灭这恶人留下的痕迹，让维迪乌斯的名字陨灭。别墅已经是他的财产了，他可以随意处置，但他鄙夷地消灭维迪乌斯遗迹的做法，不管是多么合情合理，也体现出了恺撒·奥古斯都绝对的主宰地位。

[35].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反抗他。不管人们如何假装不是这个样子，大家其实都很清楚实际情况。人们可以批评他，但这些批评非常有限，这也证明了他受到的敬畏。在过去，罗马人对哪怕是国内最伟大的人，也会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人们还会在公共场所，包括元老院议政厅，留下匿名小册子，以抒发更为强烈的情感。恺撒·奥古斯都在元老院发表演讲，为自己辩护，驳斥这些匿名攻击，并宣布将来要对这些小册子的匿名作者追查到底，予以严惩。有时最凶残的攻击是针对其他元老，与他或他的政权无关，反映了历史更悠久的仇隙。和其他任何时代一样，大多数人的时间、精力和利益只有一小部分被用于高端政治。这些年里，奥古斯都将演员皮拉得斯从流亡中召回。皮拉得斯和另外一位叫作巴绪卢的演员的追捧者之间激烈争斗，

皮拉得斯羞辱了一名捣乱分子，诱导群众去辱骂这个人，后来导致皮拉得斯获罪而被放逐。巴绪卢是梅塞纳斯的宠儿，还曾是他的情人，得到这位大人物的保护。如今，皮拉得斯重返罗马，和巴绪卢都继续受到观众的欢迎。奥古斯都为了过去的骚乱而责备皮拉得斯，他则向恺撒保证，最符合恺撒利益的事情就是，让群众把闲暇时间和热情全部用于剧场和追星（有些明星臭名昭著）。[36].

年份的周期

前17年，新生儿卢基乌斯及其兄长盖乌斯被恺撒·奥古斯都收养。他开始筹划长远的未来。虽然在几十年的纷争之后获得了和平，虽然他常鼓吹精神和肉体的复兴，虽然他对传统和往昔的光荣兴致勃勃，但他的政权始终着眼于未来，而非过去。恺撒·奥古斯都领导下的罗马人取得的成就将会延续下去，他率领他们走向未来，将会有更了不起的成绩。复兴传统是为了让罗马人准备好迎接这样的未来：让罗马人与数个世纪以来引导他们城市进步的神祇融洽相处，让公民们像罗马人理应的那样行动和作为，但说到底并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在正确的路径上继续前进。

罗马人有好几种计时法。年是根据四季的自然变化计算的，并且与政坛有紧密联系。每一年执政官的名字被用来为这一年命名。每隔五年，监察官应当重新检视全体公民的人口、财政状况和衔级。此外还有一个更长的周期，称为世纪（saeculum），它比人的最长寿命还要长。庆祝世纪的例子在过去只发生过几次，对于它的长度大家也很惘然，不过大多数人觉得一个世纪应当是一百年。上一次庆祝世纪是在前146年，但一百年后的内战动乱使得无人关注，无人纪念新的周期。奥古斯都说，有人报告称，预示着尤利乌斯·恺撒升天成神的彗星也标志着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但这种时间算法不是很方便，后来他的一位支持者，著名的法学家盖乌斯·阿泰乌斯·卡皮托经过一番

努力，“发现”世纪周期其实是110年。如果从罗马建城开始计算，那么下一个世纪之交就是前17年。并非所有人都信服这种说法，比如后来的克劳狄皇帝就恢复了传统纪年法，以便在自己统治时期庆祝世纪之交，但对急于举行一场宏伟和适宜的活动的奥古斯都来说，大家不相信并不很重要。^[37]

奥古斯都花费了很大精力去筹备世纪节（*ludi saeculares*），现代英语将其译为*Secular Games*（字面意思为“世俗节庆”），这很有误导性，因为世纪节在方方面面都是宗教仪式。奥古斯都深度参与了节庆的每个阶段，阿格里帕也是如此。阿格里帕自获得保民官权力以来，发挥的作用更大。两人都是重要的古老祭司团——十五人团^[38]——的成员，祭司团奉命监管这些仪式。十五人团的成员如今已经不止十五人，因为奥古斯都扩大了所有祭司团，并且他是所有祭司团的成员。十五人团的其他成员都是元老，节庆的筹备计划由他们审阅和批准。元老院规定具体细节应当被记载在大理石和青铜碑铭（由国库出资）上，竖立在现场。所有工作都是以传统和适宜的方式进行的，但在整个过程中，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远远超过祭司团的同僚和其他元老：“执政官盖乌斯·西拉努斯报告称，在荒废多年之后，世纪节庆祝活动将在本年度举行，由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和马尔库斯·阿格里帕领导，他们均享有保民官权力……”

新近发布的关于婚姻的法律禁止未婚青年男女观看公开节庆活动，但这一次的节庆太重要（因为它的一个周期比人的寿命还长，所以这是他们见证此种节庆的唯一一次机会），于是姑且允许他们观看。

前17年5月31日，奥古斯都在台伯河畔的战神广场举行夜间献祭，世纪节就这样拉开帷幕。根据《西卜林书》规定的仪式，他向命运三女神（这一次用她们的希腊语名字摩伊赖称呼她们）献祭了九只母绵

羊和九只母山羊。他为了罗马人民向命运三女神祈祷，将罗马人称为“奎里努斯^[39]的子孙”，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他们的身份，请求女神继续保佑他们在战争中旗开得胜，并保佑国家和军团士兵。祈祷文中还有比较古老的元素，即请求女神让“拉丁人驯顺”。罗马说拉丁语言的邻居自前4世纪起就已经被罗马牢牢控制，但罗马的仪式极度保守，所以常常见到上古留下的遗迹，甚至其中有些不断重复的语句如今已经无人理解。这一次的仪式应当不是沿袭古例，而是刻意模仿古风，炮制古色古香的气氛。这传统的表象之中还编织了当代的元素：在祷告中，奥古斯都两次请求女神降福给“罗马人民、奎里努斯的子孙、十五人团、我、我的家族和我的亲属”。

当夜还有一场仪式飨宴，参与者是精心挑选出来的110名已婚妇女，都已经当了母亲。宴会桌前还摆放着女神朱诺和狄安娜的神像。还有一场戏剧表演，观众按照传统的罗马方式站着观看，而不是按照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方式坐着观看。次日，即6月1日，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各自去了卡比托利欧山，杀死一头完美无瑕的献祭公牛，将其奉献给“至善至伟朱庇特”。6月2日，两人各自向朱诺献祭了一头母牛，也是在卡比托利欧山举行。祭司团的其他成员在一旁侍奉，但只有他们两人执行献祭。除了向特定的神或女神祈祷之外，他们还重复了第一次祈祷，请求神祇压制拉丁人，并请求神祇保佑罗马人民、奎里努斯子孙的安宁和成功，以及保佑元首及其家族和亲属。6月1日夜间，他们向希腊的助产女神厄勒梯亚献了祭饼。6月2日夜间，奥古斯都在台伯河畔屠宰了一头怀孕的母猪，以纪念大地母亲。次日，他和阿格里帕在帕拉丁山向阿波罗和狄安娜奉献祭饼。

我们现代人对动物献祭非常陌生，所以研究古罗马的学者常常觉得这是想当然的事情，而忘记了动物献祭需要多么精心的准备。必须找到合适的动物，保持其健康，然后沉稳地牵到祭坛前，避免让它们惊慌失措。屠宰动物的工作一般由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完成，因为必

须做得干脆利落。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站在一旁背诵祷文，托加袍的一部分遮盖他们的头顶。有很多奥古斯都的画像，还有不少阿格里帕的画像，表现他们是这样遮盖头部的。元首显然希望展示自己的虔诚和祭司身份。如果献祭仪式出了差错，不管是准备工作、屠宰牺牲品还是祷文中哪怕极其细微的错误，都会让整个仪式失效，必须从头再来。

在献祭的同时，110名已婚妇女举行了神圣宴会，她们有时也参加公共祷告。仪式之后，还有为期七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戏剧表演，其中一些表演在临时的木制剧场举行，有的则在庞培剧场或尚未竣工的马凯鲁斯剧场举行。还有几天举行斗兽和赛车表演，以此结束差不多两周的华丽盛景。通过这些节庆活动，罗马过去和未来的伟大光辉与恺撒·奥古斯都及其盟友阿格里帕的领导，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6月3日，先是在帕拉丁山，后来在卡比托利欧山，由二十七名（三九二十七是神圣的数字组合）男童和二十七名女童组成的合唱队演唱了一首特别制作的诗歌。诗作者是贺拉斯，不过假如维吉尔还在世，也许也会被选中。这首《世纪之歌》保存至今。它呼吁得到献祭抚慰的诸神以及其他神祇，保佑和保护罗马人，并提到了《埃涅阿斯纪》歌颂的特洛伊的历史。奥古斯都关心的很多东西都在诗中有所体现，比如“父老”（这是对元老的另一称呼，根据传统，元老都是一家之主）关于男女永世同心的敕令和关于养育新一代孩子的法律。元首本人在诗中被赞颂为“安喀塞斯和维纳斯的光荣后嗣……愿他在战斗中旗开得胜，但击败敌人之后以怜悯待之”。这一年发行的一系列钱币上刻画了尤利乌斯·恺撒的形象，再一次突显了尤利乌斯家族的重要性。^[40]

节庆活动的宗旨是表现正在进行的和已经稳固确立的复兴，以及更光辉未来的美好前景。罗马人将会繁衍生息，在下一个历史周期里

新的一代代人将会更加强大，而恺撒·奥古斯都处于这一切的中心。他现在可以说自己有了儿子，因为正如他自己的政治生涯所表明的那样，养子和亲生儿子一样享有父亲遗留的地位和影响力，而且养子和亲生儿子一样，抚养起来要付出很大代价。通过这种方式，奥古斯都努力做一个表率，去养育新一代罗马人，就像鼓励和强迫精英阶层的其他成员去做的那样。他的继子和其他亲属的早婚，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元首圈子的其他人没有做出表率。梅塞纳斯已经结婚，但没有孩子，而且似乎对男性情人更感兴趣。维吉尔似乎没有结过婚，而且有传闻说他只对小男孩有欲望。贺拉斯热衷追逐女性，但只和职业交际花及其他娼妓交往。据说他的卧室墙壁和天花板上挂满镜子，和这些女人做爱时，他就可以自我观赏。如果这是真的，它一定是一桩非常奢侈的爱好，因为镜子非常昂贵。奥古斯都对此似乎并不介意，在给贺拉斯的书信中开玩笑地为他取了绰号“极其淫荡的小男人”和“完美的阴茎”。这几个人都没有认真从政，梅塞纳斯在幕后有影响力和权力，但没有担任过官职。^[41]

恺撒·奥古斯都遵照非常典型的罗马习惯，更关心公众形象和实用价值，而不是仅仅为了改变行为习惯而改变。他需要贵族繁衍生息，这样才能有新的一代；他需要贵族在公共场所表现出尊严并尊重神祇和一般传统。他关于婚姻的法律受到很多人的怨恨和无视，但总的来讲大多数人应当或多或少自愿地服从了。只要他们服从法律，并且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举止符合规矩，那么奥古斯都和其他人就不会很关心这些贵族的私生活。

^[1] Virgil, *Aeneid* 1.286-94 (Loeb translation).

^[2] Donatus, *Life of Virgil* 31-2, 35.

[3]. Suetonius, *Horace* (Loeb translation) .

[4]. “摔倒在自己的海绵上”，见Suetonius, *Augustus* 85.2, *Horace passim*; 讨论见P.White, *Promised Verse.Poets in the Society of Augustan Rome* (1993) , 尤见pp.3-34, 112-55, J.Griffin, ‘Augustus and the poets: “Caesar qui cogereposset” , ’ in F.Millar & E.Segal (eds) , *Caesar Augustus. Seven Aspects* (1990) , pp.189-218, and K.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1996) , pp.225-79, 上述著作介绍了以奥古斯都时代诗人为主题的大量文学。

[5]. 拉丁姆是以罗马为中心的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拉齐奥大区。

[6]. Suetonius, *Horace*; Horace, *Epistulae* 2.1.156-7; 被强迫写作，如希尔提乌斯，见the preface to *BG* 8; 讨论见P.White, *Promised Verse.Poets in the Society of Augustan Rome* (1993) , pp 112-42, 及 A.Powell, *Virgil the Partisan* (2008) , 尤见pp.3-30。

[7]. Propertius 3.5, 9, 12.

[8]. Donatus, *Life of Virgil* 20-24, 34, with K.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1996) , pp.246-53.

[9]. Donatus, *Life of Virgil* 35-41.

[10]. J.Ziolkowski & J.Putnam, *The Virgilian Tradition. The First Fifteen Hundred Years* (2008) , pp.44-5.

[11]. 波吕 斐摩斯是希腊神话中独眼巨人之一，是波塞冬的儿子。根据荷马史诗《奥德赛》，特洛伊十年鏖战之后，英雄奥德修斯在回家途中登陆独眼巨人聚居的西西里岛。他和十二名同伴被困在波吕 斐摩斯的巢穴。波吕 斐摩斯回洞后发现了奥德修斯等人，立刻用巨石封堵了洞口，并随后残暴地摔死和吞食了其中几人。奥德修斯悲痛万分之下想到了一个逃走计划，他把没有勾兑的烈性葡萄酒给波吕 斐摩斯喝，并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叫“没有人”。趁着巨人醉酒熟睡，奥德修斯带着剩下的人把巨人用作武器的橄榄树桩削尖磨锐，然后几人一起举着，插入了巨人的独眼。巨人大声痛呼，希望岛上其他的巨人来帮忙，但他呼喊的“没有人攻击我”只被当成了玩笑，因而没人前来。第二天，巨人和往常一样把他洞里圈养的巨羊放出洞外吃草，在洞口他一一摸索羊的脊背，防止奥德修斯等人骑羊逃走，但奥德修斯和他的手下还是藏在羊的肚子下面安全逃出。回到船上的奥

德修斯大声嘲笑波吕斐摩斯“没有人没有伤害你，伤你的是奥德修斯”，这一傲慢举动为他招来后来的不幸。波吕斐摩斯向他的父亲波塞冬祈祷，要求报复奥德修斯。波塞冬唤起巨浪和大风，将奥德修斯的船吹离了回家的航线，后来遭遇了更多艰险。

[12] K. 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1996), pp.229-31, A. Powell, *Virgil the Partisan* (2008), pp.11-12, 151, 153-5, 159-61.

[13] Dido and a ‘little Aeneas’, Virgil, *Aeneid* 4.328-9, Cleopatra 8.685-714.

[14] Virgil, *Aeneid* 10.510-605, 12.291-305介绍了战斗场景，引文见 12.295, Dido’s spirit 6.450-76。

[15] Virgil, *Aeneid* 12.945-52.

[16] 关于罗马人对敌人态度的讨论，见G. Woolf, ‘Roman Peace’, in J. Rich & G. Shipley (eds), *War and Society in the Roman World* (1993), pp.171-94, 尤见178-85。

[17] 埃涅阿斯杀死敌人时嘲笑他们，见Virgil *Aeneid* 10.510-605。

[18] Virgil, *Aeneid* 1.286-94如果指的是奥古斯都，暗示他被神化了；6.666-70，及A. Powell, *Virgil the Partisan* (2008), pp.42-3, 133；尤利乌斯·恺撒和庞培，见6.828-35。

[19] 阿庇乌斯大道是古罗马时期一条把罗马及意大利东南部阿普利亚的港口布林迪西连接起来的古道，得名自兴建此工程的罗马监察官和演说家“盲人”阿庇乌斯·克劳狄·凯库斯（前340～前273年）。

[20] Dio 54.10.1-7；任命为执政官，见P. Brunt, ‘The role of the Senate in the Augustan regime’, *Classical Quarterly* 34.2 (1984), pp.423-44, 尤见429-30。

[21] Suetonius, *Augustus* 37；B. Levick, *Augustus. Image and Substance* (2010), pp.89-90, E. Salmon, ‘The Evolution of Augustus’ Principate’, *Historia* 5 (1956), pp.456-78, 尤见471-3, A. Jones, ‘The Imperium of Augustus’, *JRS* 41 (1951), pp.112-19, 尤

见117，关于象征的力量见E.Stavely，‘The “Fasces” and “Imperium Maius” ’，*Historia* 12（1963），pp.458-84。

[22] Dio 54.13.1-14.5, Suetonius, *Augustus* 54, with Crook in *CAH2* X, pp.91-3.

[23] Dio 54.15.1-8, Suetonius, *Augustus* 35, 54, with R.Talbert, ‘Augustus and the Senate’，*Greece and Rome* 31（1984），pp.55-63，尤见61。

[24] Dio 54.15.1-4, 16.1, 17.3, Suetonius, *Augustus* 35, with A.Jones, ‘The elections under Augustus,’ *JRS* 45（1955）。

[25] Dio 54.6.4-6, 8.5, 10.4, 12.4-5.

[26] Dio 54.11.1-6涉及坎塔布里亚战役。

[27] Dio 54.12.4-5, with W.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1996），pp.117-31涉及阿格里帕的行省。

[28] Suetonius, *Augustus* 55.1涉及领养。

[29] Suetonius, *Augustus* 53.2-3讲到他的平易近人。

[30] Macrobius, *Saturnalia* 2.4.31.

[31] Dio 54.10.5-7, 16.1-2, *Res Gestae* 6.2, with Crook in *CAH2* X, pp.92-3.

[32] Dio 54.16.3-5.

[33] Dio 54.16.7.

[34] Dio 54.16.6, 概况见A.Wallace-Hadrill, ‘Civilis Principis: between citizen and king’，*JRS* 72（1982），pp.32-48。

[35] Dio 54.23, Pliny, *NH* 9.77, Seneca, *de ira* 3.40.2, *de clementia* 1.18.2, with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410;

关于Vedius见R.Syme, ‘Who was Vedius Pollio?’ , *Roman Papers* Vol.2 (1979) , pp.518-29。

[36] Suetonius, *Augustus* 45.4, 55, Dio 54.17.4-5.

[37] 世纪节, 概况见K.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1996) , pp.100-06, B.Levick, *Augustus. Image and Substance* (2010) , p.152和Price in *CAH2* X, pp.834-7。

[38] 十五人团 (Quindecimviri sacris faciundis) 是古罗马主要负责保管《西卜林书》的祭司团。《西卜林书》是一部神谕集, 用希腊文写成, 据说是罗马末代国王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从一名西比尔女预言家手中购得。在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重大危机时期, 人们都会寻求这部神谕集的指导。

[39] 奎里努斯 (Quirinus) 是古罗马神话中的神祇之一, 在罗马城建立之时、古罗马早期曾具有重要意义。后地位衰微, 仅为祭祀之用。后来被认为与罗马的建城者罗慕路斯的地位等同。

[40] Horace, *Carmen Saeculare* 17-20, 50-52 (Loeb translation) ; 记载世纪节的铭文的译文, 见N.Lewis & M.Reinhold (eds) , *Roman Civilization. Selected Readings* Vol.1: *The Republic and the Augustan Age* (3rd edn, 1990) , pp.612-16. 引文来自上述译本, 略有改动。

[41] Suetonius, *Horace, Augustus* 86.2, Donatus, *Life of Virgil* 9, Dio 55.7.1-6, C.Williams, *Roman Homosexuality. Ideologies of Masculinit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1999) , pp.157-9.

十七 家庭和同僚

奥古斯都·恺撒……因为长期待在首都，受到很多人的憎恶。

——狄奥，3世纪初^[1]。

我没有向任何部落发动非正义战争，平定了阿尔卑斯山，从最接近亚得里亚海的地区，一直到托斯卡纳海。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2]。

前17年年末或前16年年初，三个日耳曼部落，乌西皮特人、滕科特利人和苏刚布里人，突然围捕了他们领地内的一些罗马人（可能是商人），并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突然对罗马人表现出敌意，但随后一大群武士集结起来，渡过莱茵河，向罗马的高卢行省发动了一次袭掠。军团长马尔库斯·劳里乌斯集结了一支军队来对付他们，就像尤利乌斯·恺撒、阿格里帕和其他罗马统帅过去差不多在同一地区做过的那样。但劳里乌斯没有他们那样的军事才干，这一次进展不顺利。在主力部队前方侦察的辅助骑兵遭到伏击，被打得落花流水。兴高采烈的日耳曼武士追逐这些逃窜的骑兵，把他们一直追赶到罗马主力部队那里。主力部队吃了一惊，陷入混乱。第五“云雀”军团乱了阵脚，丢失了宝贵的鹰旗。一段时间内，大部分罗马军队都在败退，后来才恢复了秩序，击退了敌人。

劳里乌斯及其军队虽然战败，但生存了下来，而且损失应当不是很大。苏埃托尼乌斯说此次挫败“并不严重，但影响很坏”，仍然将它列为奥古斯都军队在内战之后仅遭受的两次大败之一。劳里乌斯是奥古斯都的军团长，士兵也是奥古斯都的士兵，所以他们的失败完全可以说是他本人的失败，就像他们过去的胜利也属于他一样。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之所以能够领导国家，是因为他的胜利带来了和平

与繁荣。任何挫折都会损害他的地位，而在大肆宣传从帕提亚和伊利亚收回军旗的光荣之后，如今又损失了一面鹰旗，这实在令人尴尬。奥古斯都宣布他将御驾亲征高卢，并于春末离开了罗马。但他还没有抵达高卢，那里的战事就结束了。劳里乌斯集结了一支比先前更强大且准备更充分的军队，入侵了日耳曼部落的腹地，以报复他们之前的袭击。这消息促使日耳曼人派使者来求和，于是罗马人给了他们和平，但必须遵照罗马的条件。我们不知道那面鹰旗后来怎么样了，但没有大规模宣传它的回归，所以它的丢失可能是很短暂的，在第一次冲突中就被收回了。^[3]

奥古斯都继续前往高卢，可能已经打算巡视西方各行省，这时传来了劳里乌斯失利的消息。阿格里帕也离开罗马，去往东方，他和岳父在随后三年多时间里都不会返回意大利。他们继续按照业已确定的惯例，在罗马待一段时间后就要花较长时间巡视各行省。据狄奥说，奥古斯都很高兴离开罗马城，用高卢传来的消息作为匆匆上路的借口。他前不久颁布的婚姻法仍然让一些元老和骑士恼火。元首愿意对违反该法的朋友和支持者网开一面或宽大处理。这能让人理解，也符合罗马人的习惯，却让那些受到更严厉处理的人更加怨恨。没有迹象表明存在联合一致反对奥古斯都的集团，但奥古斯都的平易近人和希望元老院进行自由公开辩论的主张却让他常常陷入尴尬境地。他在罗马待得越久，那些对他抱有敌意的人就越容易试探他宽容的底线，而只要他希望维持其政权传统和符合法律的表象，他能做的就很少。^[4]

李维娅可能陪奥古斯都去了高卢，不过狄奥记载了一段荒诞的传言，说奥古斯都之所以离开意大利，是为了避开公众耳目，继续与梅塞纳斯的妻子特伦提娅通奸。李维娅的儿子提比略很快与他们会合，奥古斯都的两个继子在随后几年里都将在公共事务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提比略在罗马逗留的原因之一是与德鲁苏斯一同主持纪念奎里努斯（对奎里努斯的崇拜历史悠久，如今奎里努斯被视为神化了的罗慕

路斯) 神庙落成的角斗士竞技。这兄弟俩奉命主持这些竞技可能不是偶然，因为新神庙的檐壁上描绘罗慕路斯与雷穆斯兄弟的图像，不是描绘他们之间的争斗，而是描绘在罗马城建立之前，兄弟俩作为观鸟占卜师，坐着寻求诸神的指导。这种兄弟和睦的景象，不管是亲兄弟之间还是全体罗马人之间的和睦，就是奥古斯都政权在当今和未来所主张的状态。^[5]

提比略当选前16年的裁判官。近些年来，元老院名单上一直把他列为前任裁判官，如今他终于真正担任了这个职务。他时年二十五岁，被元老院的法令允许比正常年龄早五年竞选每一级别的行政长官。后来奥古斯都降低了所有重要职位的最低年龄要求，但我们不清楚这是何时发生的，也不知道这是一次性的大规模改革，还是一系列较小的变化。这个过程似乎在前20年代末之前完成，所以如今的人可以比过去更早地担任官职。年满三十岁即可担任裁判官，满三十三岁即可担任执政官。这项变革有助于豪门世家子弟担任执政官和其他行政长官，因为那些被内战和政治迫害摧残得枝叶飘零的家族的新一代成员已经成年了。^[6]

前16年1月1日，两位新任执政官分别是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和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这两人都有着无可挑剔的贵族家世，提比略和德鲁苏斯也是这样。阿赫诺巴尔布斯也是奥古斯都的甥孙，因为他母亲是大安东尼娅^[7]，即屋大维娅和马克·安东尼的女儿。西庇阿和奥古斯都的关系比较远，不过他是尤利娅的同母异父哥哥，因为他的母亲是斯克利博尼娅，即奥古斯都休掉的前妻。如此亲近的关系在罗马政坛司空见惯，未必能保证政治上一定是伙伴。后来西庇阿没有干满一年任期就被奥古斯都的一名老部下取代（补任执政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过史料中没有相关记载，这说明应当不是由于什么坏的原因。^[8]

在离开罗马之前，奥古斯都又一次恢复了城市长官的官职，这一次他将这个职位给了经验丰富的下属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前26年，奥古斯都曾尝试恢复这个古老的职位，但梅萨拉上任几天后就辞职了，于是奥古斯都的尝试失败。但在十年后，城市长官的权力和职能应当已经被清楚界定了。罗马城组建了三个城市大队当作警察，交给城市长官指挥。提比略可能获得了威望很高的城市裁判官职位，如果是这样，他应当上任几个月后就陪同奥古斯都去了高卢。提比略不在期间，德鲁苏斯代理他的职务，尽管他还没有正式担任任何职务。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这样的人是奥古斯都的老战友，但权力越来越多地被交给元首的亲属。奥古斯都的女婿和同样拥有保民官权力的阿格里帕正身处东方。提比略和奥古斯都一同在高卢，很快将取代劳里乌斯成为那里的军团长，而德鲁苏斯被从罗马唤来，于前15年开始在外省承担更重要的工作。这兄弟俩，以及阿格里帕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奥古斯都的养子）就是未来稳定的保障。即便元首去世，他的政权也不会立刻垮台，内战也不会爆发。^[9]

殖民地、社区和道路

这是奥古斯都第四次到访高卢，这足以印证高卢的重要性。通过征服“长发高卢”，尤利乌斯·恺撒获得了足以与庞培匹敌的财富、威望和忠诚的军队。在随后的岁月里，高卢在历次内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战略作用，尽管战火很少燃烧到该地区。新的高卢各行省在近期才被征服，而且容易遭到莱茵河东岸蛮族的袭击，所以通常需要相当多的驻军，而这些军队比其他任何罗马军队都更接近意大利。此外，高卢也是招募辅助士兵的重要地区，高卢骑兵特别有名。前43年，李必达控制着驻扎高卢的军队，所以他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而奥古斯都在前40年控制了那里的军队，从根本上破坏了安东尼的根基。

内高卢如今已经是意大利的一部分，不再有驻军。尤利乌斯·恺撒的主要基地是外高卢（今天的普罗旺斯）。前29年，外高卢被纳入奥古斯都庞大的外省辖区。这一年，他承诺将把平定下来、不再受外敌威胁的行省交还元老院，外高卢就是第一个被用来证明其诚意的行省。可能在前22年（不过我们无法确定），外高卢被交给元老院管辖，从此由一名总督治理。它被更名为纳博讷高卢（得名自其首府纳博讷），不再有驻军，不过有很多退伍军人定居在该省近几十年来建立的众多殖民地。这些人非常感激奥古斯都，所以他们不大可能支持他的竞争对手兴兵作乱。长远来看，纳博讷高卢是一个兵力资源丰富的地方，因为这些殖民者的后代会遵照家族传统，从军效力。^[10]

纳博讷高卢已经非常罗马化了，几十年前尤利乌斯·恺撒就发现当地的贵族是有价值的盟友。这些人会说流利的拉丁语，熟悉罗马文化，有时还懂希腊文化，并且很容易与他的罗马军官和幕僚打成一片。有些当地人已经享有罗马公民权，更多人将会在后来的岁月里获得公民权的奖赏。目前高卢全境公民最常见的名字是尤利乌斯，尤其在纳博讷。这证明了尤利乌斯·恺撒和后来的奥古斯都对当地的慷慨优待。最受宠的当地贵族会成为骑士甚至元老。很多社区已经变为非常接近罗马风格的城市，建立退伍军人殖民地的工作更是加快了这种同化进程。许多城市的规划是围绕着秩序井然的街道，以广场为中心，广场上有处理公共事务的会堂，有足够的空间供商业活动之用，通常还有一座供奉罗马神祇的神庙。许多城市很快有了剧场和竞技场，有的是元首出资建造的，有的是当地富豪建造的。不到一个世纪之后的老普林尼说，纳博讷高卢差不多可以算作意大利的一部分。^[11]

高卢的其余部分则不同，罗马的影响没有那么深。长发高卢发展为三个行省：西南部的阿基坦尼亚、北部和中部的卢格敦高卢和东北部的比利时。这大致相当于尤利乌斯·恺撒在《高卢战记》里所说的

高卢分成的三部分，虽然不是完全对等。奥古斯都时代已经有“三个高卢”的说法，后来的高卢各行省可能已经被划定，不过似乎此时是一名军团长治理整个长发高卢。这肯定是个军事辖区，劳里乌斯前不久与日耳曼袭击者的不幸遭遇就证明了这一点。靠近阿尔卑斯山的地方也偶尔会出麻烦，那里的居民仍然不在罗马控制之下。阿基坦尼亚也会有问题。总的来讲，奥古斯都说三个高卢是比较棘手的地区，需要他亲自处理，是有道理的。[\[12\]](#)

虽然高卢各部落在几十年之后才被罗马征服，但这些部落并没有大规模抵抗的迹象。阿基坦尼亚是唯一的例外，不过如今罗马已经彻底征服了西班牙北部，所以比利牛斯山脉以南不再有独立的人群去袭击或者援助阿基坦尼亚的高卢部落。在随后的年份里，阿基坦尼亚不会有大规模战事。但目前，最靠近阿尔卑斯山的地区和与日耳曼部落的漫长边界常遭到罗马帝国之外的敌人攻击。如果罗马人不能处理这些问题并保护自己的臣民，那么有些高卢贵族或许会觉得，与罗马结盟不划算，他们或者他们的竞争对手就可能寻求日耳曼军事领袖的支持。尤利乌斯·恺撒时代的局势就是这个样子，他不觉得这是难题，而将其视为武装干预的良机。[\[13\]](#)

奥古斯都需要寻找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在很多方面，阿尔卑斯山的问题比较容易处置，因为它差不多已经被罗马的行省包围了，不过这仍然不是轻松的任务。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山谷中的部族有比较松散的组织，包括很多互有区分的社区，其领袖只在很小的地区享有权威。艰苦的生活条件培养了坚忍不拔、凶悍勇猛的武士，他们擅长袭击定居谷地，从希望不受骚扰地安全通过山道的商人（有时甚至还有罗马军队）那里敲诈买路钱。近期有一些关于恐怖的野蛮暴行的报告，说明至少部分社区开始憎恨罗马人。袭击突然增多，据说他们会杀死所有落入他们手中的罗马男人，并杀害所有被他们的占卜师认为怀着男孩的孕妇。[\[14\]](#)

近些年来，奥古斯都多次下令在阿尔卑斯山区开展军事行动，如今他决心完成对该地区的征服，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他的两个继子。德鲁苏斯于前15年春开始行动，从意大利率领几支部队进入因河流域。随后提比略从高卢的基地进军。这场战争的特色就是残酷的小规模冲突和攻打设防村庄。巧合的是，两兄弟于8月1日（奥古斯都在埃及取胜十五周年）会师，联手取得了一场大规模胜利。到这一年年底，几乎整个阿尔卑斯山区都已经被罗马牢牢控制，少数顽抗的地区也很快被荡平。罗马对这些山区及其隘道的控制再也不会受到挑战。为了纪念此次胜利，并与庞培在比利牛斯山脉竖立的类似纪念碑相媲美，奥古斯都在滨海阿尔卑斯山脉^[15]的拉蒂尔比耶建立了一座宏伟的胜利纪念碑，并列举了罗马人在这些战役中打败的四十五个部族。其中不少部族的名字在其他史料中不曾出现过，反映了该地区社会的松散状况；也有一些部族没有反抗罗马，而是选择接受其统治。在诺里库姆^[16]可能没有发生多少战斗，但至少有部分赖提亚人^[17]和温德利希人^[18]顽强抵抗，尽管他们并没有希望战胜占有更多资源的罗马军队。贺拉斯写了两首诗，分别赞颂提比略和德鲁苏斯的胜利。奥古斯都宣称自己对这些部族的战争是师出有名，罗马人总是喜欢这么想。^[19]

罗马控制了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道路，这极大地改善了意大利与南面的伊利里库姆和北面的高卢之间的交通，使得罗马帝国成为一个更连贯的整体。从很多方面看，罗马人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控制阿尔卑斯山，似乎令人惊讶，但的确需要奥古斯都的自信和控制力，才能投入大量资源，开展一系列艰苦的战役。这些战斗往往非常残酷而枯燥，得到的战利品或奴隶却非常少。在过去，向阿尔卑斯山部族缴纳买路钱，才是更简单和更实惠的办法。就像征服西班牙北部山区的战事一样，恺撒·奥古斯都愿意从事艰难但有价值的工作，同样也热衷宣扬自己的成就。^[20]

十多年前，阿格里帕开始在高卢建造一个庞大的道路系统，以保障高卢全境的交通便利，尤其是改善通往北面和东面的莱茵河，以及西面的阿基坦尼亚和西班牙的道路。两条主路在卢格敦（今天的里昂）交会，所以这座城市的街道网络是根据两条主路的走向来布局的。和所有罗马大道一样，这两条主路最初用于军事方面，为军队尤其是军队的补给队伍提供高质量、排水优良、一年四季均可用的道路。军队需要的粮食、肉类和其他物资的数量十分庞大，就连接按时向士兵发放的钱币（作为军饷）也是笨重且很占空间的货物。只要条件许可，这些物资会尽量走水路，因为那样更方便也更经济，所以新的道路系统是对交通繁忙的水道（如罗讷河与加龙河）的补充。供给军队的粮食和牲畜都是在行省内部征集的，但将这些物资运到需要的地方，还得细心准备并完成相当多的工作。在随后几年里，越来越多的军团被调到莱茵河前线，因此后勤需求大大增加了。除了运送必需品之外，随着平民和士兵对葡萄酒和精美餐具的要求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档次不一的奢侈品流动起来，被提供给沿途的市场，或者创建新市场。[\[21\]](#)

这都不是新鲜事。尤利乌斯·恺撒当年就发现，高卢全境的土著城镇里都有罗马商人居住或经商。考古发掘也证明了高卢人对来自地中海的商品的热情。前1世纪输入高卢的意大利葡萄酒的数量令人震惊：一位学者估计约4000万瓶葡萄酒取道罗讷河被送往高卢。道路也不完全是新开辟的，因为高卢人在一些路线上建有主要道路，在河上架桥，在沼泽地建造堤道。高卢的很多城镇都有工匠，有时数量还很多，并且工艺门类也很完备，能够生产各种产品，销往广大地区。很多部落，尤其是高卢中部的部落，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发展到相当发达的程度。[\[22\]](#)

尽管如此，罗马人作为占领军的到来，除了给当地居民带来征服的伤痛（往往还是非常恐怖的伤痛）外，也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原

有道路虽然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够用，但在设计上远远不如罗马的适用于各种天气条件的由碎石铺设的大道，在规模上更是无法与罗马的道路网相提并论。在尤利乌斯·恺撒抵达高卢之前，贸易和商品流通的规模虽然很大，但主要是服务于精英阶层的奢侈品。受益者几乎全是贵族，对贸易的控制巩固了他们的权力。埃杜依部落的领地在罗讷河沿岸，他们的一些酋长通过控制葡萄酒贸易的税收，在部落内部获得了极大财富与主宰地位。在罗马人统治下，这种垄断被打破了，当地贵族只有通过成为罗马政府体制的一部分，才能获得区域性权力。种类繁多的商品从意大利（后来还从其他行省送来）北上，被运往高卢，以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为客户。当地人还适应了新形成的品味。在奥古斯都治下，高卢开始大规模种植葡萄树和酿制葡萄酒。而随着对陶器的需求越来越大，高卢本地也开始建立陶器工坊。高卢南方早就普遍使用遵照罗马标准的钱币，如今这种风俗传播到了更广泛的地区，尤其是在有驻军、军团士兵会消费的地方。卢格敦建起了一座官方的罗马铸币厂，生产金银币，为士兵提供军饷，为官方工程提供资金。这些金银币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了，也促使经济很快变得更加货币化，同时也传播了恺撒·奥古斯都的形象和符号。

罗马的影响传播得很广，也很快，但这个进程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非常彻底，所以高卢仍然保留着一种独特个性，不同区域也有差别。三个高卢的罗马化程度远远低于纳博讷高卢。在大规模殖民的阶段，在纳博讷高卢之外，只建立了三个退伍军人殖民地，分别是卢格敦、新堡（今天的尼永）和劳里卡（今天瑞士境内的奥格斯特）。虽然城镇在很多地区的高卢社会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功能和罗马人所期望的不一样。对罗马人来说，一座城市是一个政治实体，管辖它周边的土地，但每一座城市在本质上都独立于其邻居。在高卢，“部落”^[23]更重要，大多数部落包括几个城镇，它们都认为自己是更广泛实体的组成部分，而很多贵族可能居住在自己的农庄，而不是城镇内。^[24]

奥古斯都可能遵循了现有的罗马惯例，无视高卢的这种结构，而是将每一个部落视为独立的城邦，将其中一个城镇指定为首府，即真正的部落中心，尽管它和别的社区和首府的规模差不多。有些中心的发展得到国家的扶持，但具体模式是多种风格的混合。许多城镇没有罗马城市那种整齐划一的网格状布局，不过差不多所有城市很快拥有了自己的广场。渐渐地，大多数中心城镇离开了前罗马时代常见的山顶，搬迁到地势较低的地方，理想情况下还要能够轻松地与道路网相通。地区政府逐渐采纳了罗马制度，尽管罗马制度其实和当地传统融合了起来。古老的高卢名字，比如大酋长（一个部落的最高行政长官的头衔）仍然使用。虽然也用罗马的头衔，比如裁判官，但一般一个头衔只有一个人（这是高卢的传统），不像罗马那样，一个级别的行政长官可能有两人或更多。[\[25\]](#)

在三个高卢，罗马公民比在纳博讷高卢要少见。不过公民的数量在稳步增加。当地贵族受到鼓励，将自己的儿子送去接受罗马式教育，后来演讲术在高卢流行起来。同时，当地贵族有机会协助罗马人的行政管理，代表罗马人担任当地行政长官，并且最重要的是，可以在罗马军队中担任军官。奥古斯都时期辅助部队三分之一的兵员来自高卢。贵族的实力不再取决于他豢养了多少武士（就像尤利乌斯·恺撒时代那样），但这些领导人的后代有机会为罗马作战从而获得荣誉。前1世纪末期，不少死者下葬时还遵循旧传统，即在死者身边放置一把剑或其他兵器，一起入土。有些事情的变化必然是非常缓慢的。我们掌握的史料中零星提及德鲁伊，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仍然很少。在前罗马时代的高卢，德鲁伊提供了一些跨民族的架构和仲裁力量。罗马征服高卢后，德鲁伊并没有当即消失。人祭之类的习俗被罗马当局禁止，泛滥成灾的猎头和部落混战（正是这些活动为人祭提供牺牲品）也被禁止。奥古斯都禁止罗马公民参与德鲁伊仪式，但没有禁止德鲁伊宗教本身。其他的高卢宗教崇拜换上了罗马式的名字和元素，

越来越多地在石制神庙中进行，尽管这些神庙往往建在城镇之外原有的圣地之上。^[26]

坚持传统并不意味着积极而刻意地排斥罗马风俗。高卢人的普遍倾向是渴望变成罗马人，至少富人是这么想的。事实上罗马人并没有努力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高卢，除非是在对行政管理有帮助的时候。比如，罗马人引入了罗马历法，将一年分成若干月份和日期，表明节日和交税的日期，取代了传统的德鲁伊监管的阴历。和所有的新制度一样，高卢人起初对罗马历法不是很理解，奥古斯都的一名财政官员就利用高卢人对新制度的不熟悉发了横财。此人名叫尤利乌斯·李基努斯，自己也是高卢人，但曾被罗马人俘虏和奴役，可能是在尤利乌斯·恺撒的高卢战争期间。后来他成为尤利乌斯·恺撒的家奴，侍奉得非常勤勉，最终获得了自由。他对奥古斯都也很忠诚，被任命为行省财务长官，这种衔级的情况不太明晰，不过越来越多地与骑士地位有联系，并且是奉命辅佐帝国行省的总督，就像财务官辅佐过去的行省总督一样，任务是收税。

李基努斯对他的高卢同胞没有什么同情心。他到行省上任的时候可能已经很富裕，但在动身之前决心要抓住一切机会盘剥行省居民，大捞油水。在罗马的旧历法中一年只有十个月，December（12月）是最后一个月。尤利乌斯·恺撒改革历法的时候，将January（1月）定为第一个月，December仍然是最后一个月，因为这两个月包含在政治和宗教上非常重要的日期。李基努斯告诉行省居民，December这个词在拉丁语里很显然是“第十”的意思，所以December之后肯定还有第十一和第十二月。以此为据，他多收了两个月的税。

不管高卢人有没有听信他的解释，都别无选择，只能交钱，否则他们将面对帝国的怒火，最终肯定会被迫交钱。但很多人都非常怀疑李基努斯。前16年奥古斯都来到行省的时候，人们向他投诉李基努

斯。起初，元首驳回了一些投诉，因为他不想承认是自己任命了这样一个贪赃枉法的狗官，所以仅仅温和地批评了他的行省财务长官。但铁证如山，而且当地很多重要的贵族明确地敌视李基努斯，于是奥古斯都受到了很大压力，不得不去处置李基努斯。不料李基努斯想出了一个更有想象力的办法来逃避惩罚。他邀请奥古斯都去他府上，将自己搜刮到的所有钱财交给元首，宣称自己这么做是为了防止高卢太富裕以致反叛罗马。这是非常罕见的关于罗马人担心高卢发生叛乱的暗示，我们不能太当真。不过李基努斯似乎全身而退了，因为奥古斯都相信了他的借口。

除非奥古斯都亲自到外省，否则很难知道他的代表在那里做了些什么。这也是他大范围旅行的原因之一。官员一定程度的中饱私囊在他的预料之中，他也能接受。他的目标是约束各行省政府的过分行爲，因为它们的暴政往往促使行省居民掀起反叛（李基努斯说他阻止了这种反叛）。长途跋涉去觐见元首是耗时费力且代价高昂的事情，因为请愿者必须去罗马或者元首当时在的其他地方。元首亲自巡视各行省，让更多个人和社区有机会与他交谈。奥古斯都在高卢的时候，阿格里帕在叙利亚和东方的其他行省，同样是巡视各地、主持司法。巡视外省不仅是一个解决具体问题的机会，还能更明确地表达罗马政府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同时也让总督们（不管是元老院行省还是帝国行省的总督）在处理外省社区的问题时更难采取与元首截然不同的办法。

奥古斯都离开高卢，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去往西班牙。自前19年阿格里帕成功镇压最后一次大规模叛乱以来，伊比利亚半岛就很安定，只是偶尔发生零星的骚乱。伊比利亚半岛如今被划分为三个新行省，贝提卡在南部，占据了绝大部分繁荣的定居地区，罗马文化在那里与历史悠久的城市生活传统水乳交融。这个行省被交给元老院管辖时，大约与纳博讷高卢被交给元老院时在同一时间，这再一次证明奥

古斯都在完成了平定某地区的使命之后愿意交出该地区的管辖权。另外两个行省仍然在他的控制下，由他的军团长治理。西部的卢西塔尼亚（比今天的葡萄牙大一点）已经基本上有人定居，不再有大规模驻军。内西班牙行省驻扎着3个军团。这个行省从今天的加利西亚延伸至西班牙中部，一直到地中海沿岸，近些年被征服的人群就居住在这个行省。曾经在该地区作战的其他军团已经离开西班牙，被调往其他地方，大多数是调往高卢或伊利里库姆。[\[27\]](#)

一些军团士兵留了下来。奥古斯都在坎塔布里亚战争期间或之后在这里建立了两个大型的退伍军人殖民地，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恺撒奥古斯塔（今天的萨拉戈萨），在内西班牙的埃布罗河畔；奥古斯塔埃梅里塔（今天的梅里达），在卢西塔尼亚的瓜地亚纳河畔。就像在高卢一样，逐渐扩展的新道路网与河流结合起来，为这些殖民地和其他主要城市提供了良好便捷的交通。殖民地是对忠诚老兵的奖赏，同时也是罗马统治的堡垒，假如发生严重动乱（这种可能性不大），这些殖民地有潜在的军事价值。奥古斯塔埃梅里塔显然建造得非常宏伟，但它的城墙主要是为了耀武扬威，而不是为了防御。从瓜地亚纳河上长长的多拱桥可以进入奥古斯塔埃梅里塔。

殖民地也是罗马生活的样板，被规划和组织得非常有序，市中心有一个恢宏的广场，奥古斯塔埃梅里塔可能有两个广场。阿格里帕为这座城市建造了一座壮观的石制剧场，用他自己和奥古斯都的雕像以及记载他们两人享有保民官权力的年份的碑铭来装饰剧场。元首为殖民者建造了一座同样宏伟的竞技场，好让他们享受那些最符合罗马传统的娱乐。后来一代代人不断为城市增光添彩，美化环境，新建纪念碑，其中很多模仿了奥古斯都在罗马城的宏伟工程。西班牙和高卢还建立了其他一些殖民地，或者得到了新一批人口输入（退伍军人）。在西班牙各行省，城市生活大多欣欣向荣，主要是通过本地人的努力。大多数主要社区建起了一个罗马式广场，虽然设计风格与罗马城

的广场并不完全相同，但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广场的规模不一，但无一例外都遵循了罗马建筑的最佳原则，运用一种基本的长度单位来确定所有数据，从柱子的直径和间隔距离到建筑和庭院的大小都是如此。长度单位本身五花八门，但背后的原理是一样的，能够赋予建筑一种几何上的整齐划一，这就是罗马设计的理想。和高卢一样，西班牙也出现了新的市场，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变革，当地或罗马地主开始为其他行省和意大利本土的消费者生产橄榄油、鱼露和葡萄酒。[\[28\]](#)

老战友和老对手

对奥古斯都政权来说，军人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记住，虽然此时仅仅是亚克兴角战役之后的第二个十年，但这已经是前88年以来最长的没有内战的时段了。如果不算同盟者战争，那就是自前91年以来最长的没有内战的时段。军团士兵服役期间，要对其加以约束并保持其忠诚；退役之后，要给他们分配土地，让他们满意，但又不能对生活在退伍军人定居地的原居民造成损害。大约在这个时期（狄奥说是前13年），奥古斯都为军队制定了新规矩，将军团士兵的服役期确定为十六年，而九个大队的禁卫军受到优待，只需服役十二年。军团的数量比较稳定，不会像内战期间突然猛增，所以比较容易预测每年退役的老兵的数量。[\[29\]](#)

与此同时，辅助部队变得更为固定化和永久化。有些部队仍然用其指挥官的名字来命名，如斯凯瓦部队，这是一个骑兵团，可能得名自尤利乌斯·恺撒麾下的一位著名百夫长。但辅助部队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番号，并用兵员的招募地点来命名。高卢、色雷斯和西班牙部队都很常见。指挥这些辅助部队的是职业军官（通常是骑士，或者来自出了最多百夫长的阶层），他们由此获得了体面和有利可图的职业。外省贵族也可以担任军官，对他们来说，担任军官是获得公民权

和成为帝国统治集团一分子的机会。元首会亲自授予这样的外省贵族公民权，让他们对元首感恩戴德。在军中待了一段时间（或长或短）之后，军官退役之后便可在自己家乡的社区担任要职，不管他们的家乡是殖民地还是意大利或外省的城镇。理想情况下，他们将仍然对奥古斯都忠心耿耿，满足于自己的命运，不大可能加入任何企图组建一支军队的竞争对手。恺撒的名字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家族将忠于尤利乌斯·恺撒及其继承人视为根深蒂固的传统。

这是一种很私人化的关系。有一次，一名退伍军人（可能是前任军官或禁卫军士兵，因为这个故事显然发生在罗马）卷入了诉讼，于是去找奥古斯都，求他支持自己。元首向他表达了最好的祝愿，并为这名退伍军人找了一位辩护律师。但这还不够，于是此人掀起自己的上衣，向群众展示伤疤。“但是，恺撒，”退伍军人宣称，“你在亚克兴角遇险的时候，我可没有派人代替自己去打仗。我是为你作战的。”奥古斯都听到这话，脸红了，于是亲自担任此人的辩护律师，“因为他害怕大家觉得他不仅傲慢，而且忘恩负义”。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虽然早已不将士兵称为“弟兄们”，但他还是希望士兵相信，他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曾在他的领导下出生入死。[\[30\]](#)

他对另一位老战友就不是那么关心了。李必达仍然是一位元老，尽管他只有在元首的命令下才会被带来开会。在这些会议上，奥古斯都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位前盟友的鄙夷。但李必达在前13年去世之前一直是祭司长。所以，罗马最高级的祭司已经沉寂了二十多年，虽然这让奥古斯都得以静悄悄地指导罗马的国家仪式，但依然有些事情是他不能做的。奥古斯都没有剥夺李必达的祭司长身份，让自己担任这个职务，这让很多人感到吃惊。不过后来奥古斯都曾吹嘘自己拒绝这么做的义举，“仅仅在李必达终于死了之后，他才接受这个职位。李必达当年是利用内乱夺取这个职位的”。[\[31\]](#)

前12年3月6日，奥古斯都正式就任祭司长。他说，“我的父亲”尤利乌斯·恺撒也曾担任祭司长。此后，只有皇帝才能担任这个职务，直到罗马帝国灭亡教皇采纳了这个头衔。这次就职典礼规模宏伟、威风凛凛、庄严肃穆，奥古斯都自己的描述明确表示，他认为祭司长头衔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获得的遗产。根据传统，这位最高祭司应当居住在罗马广场边缘、灶神庙旁的正式府邸中，而这座府邸前不久遭火灾受损。奥古斯都将这座府邸赠给维斯塔贞女，自己仍然住在帕拉丁山上的府中，并将其宅邸的一部分作为神庙奉献出来，让它名义上成为公共财产，以便他能恰当地履行祭司职责。奥古斯都的府邸原本就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因为它毗邻帕拉丁阿波罗神庙和其他一些略微逊色的圣所。^[32]

前13年夏季，奥古斯都返回了罗马。提比略早于他到达罗马并在这一年年初就任执政官，他的同僚是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此人是阿格里帕的女婿。罗马又一次发生洪灾，台伯河水位上涨，淹没了两岸，灾情严重，以至于巴尔布斯只能乘船去他新竣工的剧场，不过他还是热烈庆祝了剧场的正式落成。为了庆祝此事，提比略询问这位西班牙裔前任执政官应当如何欢迎元首的归来。巴尔布斯提议向奥古斯都授予新的荣誉，后来奥古斯都礼貌地谢绝了。这种模式如今已经成为常规。有人尝试正式欢迎他，但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又一次趁着夜色悄悄溜进了罗马城。次日早上，他接见了聚集在其宅邸外的群众，然后登上卡比托利欧山，从侍从的法西斯束棒上取下胜利者的桂冠，将其悬挂在至善至伟朱庇特的雕像上。这些胜利的象征物是提比略和德鲁苏斯赢得的，归功于奥古斯都，如今被奉献给佑护罗马的大神。

这一天，恺撒·奥古斯都宣布，浴池（主要是阿格里帕建造的那一座）将免费开放，在浴池等待顾客的理发师也将免费为到场的公民同胞理发。早些时候的元老院会议上，奥古斯都的嗓子哑了，无法演

讲，于是一名财务官代他宣读。这是值得庆祝的节日，因为马凯鲁斯剧场也竣工了，并在盛大的典礼中向公众开放。奥古斯都七岁的外孙盖乌斯·恺撒参加了所谓“特洛伊竞技”——这是一种颇具戏剧性但有时会很危险的骑马训练和搏斗演习——让这孩子至少在名义上领导了一组贵族男孩。斗兽表演也是盛景的一部分，六百头野兽遭到屠戮。9月，举行了更多竞技和斗兽表演，以庆祝元首诞辰。非常讽刺的是，这些庆祝活动的安排和主持者是马克·安东尼和富尔维娅的儿子尤卢斯。[\[33\]](#)

出现了一些尴尬的时刻。在另一场竞技会（组织者是执政官提比略，目的是庆祝奥古斯都返回罗马城）上，提比略允许盖乌斯坐在元首身旁的贵宾席上。可能就是在这一次，群众集体起身，向这男孩欢呼和问候。奥古斯都不高兴，训斥了他的继子和群众。虽然他在这些场合会接受人们对其成就的赞颂，但他觉得向一个没有任何成就、没有正式成年的小孩发出这样的赞颂，是非常不合适的。另外，他不允许任何人——不管是亲人、元老，还是群众——称他为“主人”。[\[34\]](#)

群众的反应表明很多人愿意赞颂所有和奥古斯都有关联的人，并且暗示着他们认为这个男孩有资格获得权力，因为他出身高贵，并且是奥古斯都的养子。但元首非常努力地否认“家天下”的存在，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君主制。他这么做部分是为了做给贵族看，并继续维持这样的幻象：他们生活在一个共和国里，不是由单独一个人统治的，尽管共和国的第一公民治国有方，而且有资格掌握政权。元老们不断授予他更广泛和前所未有的荣誉，这对奥古斯都显然很重要，说明很多元老现在已经不关心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那么珍视的自由了。总的来讲，他这么做的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的自我认识。奥古斯都坚持不懈地追求最高统治权，这是贯穿他一生的主线。这并不是说他运用权力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因为他非常努力地把权力用好。我

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元首认为自己理应赢得内战、获得统治地位并牢牢掌握统治地位，因为这对广大人民的福祉有利。他显然是这么看的。因此，他可能真的觉得自己仅仅是国家的第一行政长官，是公仆而非统治者。自我约束和实现理想的愿望比元老精英阶层的意见更能有效地节制他的行为。

现在他回到了罗马，就有可能受到不讨喜、不适宜的阿谀奉承，在公共辩论中也可能遭遇窘迫。在元老院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名叫科尔内利乌斯·希森纳的贵族因为妻子的行为而遭到批评（她可能是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的女儿，但因为这些年里有好几个叫科尔内利乌斯·希森纳的人，所以我们无法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希森纳否认自己应当为妻子的行为负责，因为他是遵照奥古斯都的建议和支持才娶了她。元首看到自己卷入如此不体面的争吵，而且感到自己有可能说出将来会后悔的话，或者做出不妥的事情，于是站起身来，匆匆离开了议政厅。他等到自己冷静下来，才返回议政厅。[\[35\]](#)

虽然奥古斯都公开鼓励自由辩论，但他并不总是关心辩论的内容和基调。而且，不管他如何伪装，大家都不会忘记现实：他的威望压倒其他所有人，并且其他人要想得势，必须得到他的提携。前13年，奥古斯都再一次努力去获得符合他心目中理想标准的新元老，但遇到了一个问题，即豪门元老家族的一些后代不愿意从政，而满足于骑士身份。尤其是，想当保民官的人非常少。虽然保民官的主要权力被奥古斯都接管了，但保民官仍然有很多职责，与全体公民相关的一些小事，都可以向保民官上诉。为了填补保民官的岗位空缺，不得不从一些年纪不到四十岁的前任财务官当中抽签。年纪在三十五岁以下、拥有足够多的财富、足够好的符合元老资格的骑士，都被强制性地纳入元老院，除非他们亲自向元首证明自己的身体有问题，无法履行元老院的职责。奥古斯都的面具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卓越公仆，但他不得不

强迫其他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即便是奥古斯都，也没有办法把世界完全改造成他想要的那个样子。[\[36\]](#).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虽然没有君主的名分，但其实是无冕之王。他想要的权力，元老院和人民都不会拒绝，即便他们不愿意给（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前13年，他的行省指挥任期被再次延长五年，而阿格里帕的保民官权力也被延长了五年，并第一次获得了高于其他所有人（奥古斯都本人可能除外）的资深执政官军权。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此时都是五十岁上下，阿格里帕的地位非常高，是自三头同盟以来地位最接近奥古斯都同僚的人。不管两人的军权的准确定义是什么，他们都不是平起平坐的。阿格里帕是他的女婿，这意味着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但尤利娅父亲的地位毕竟比阿格里帕高一些。更重要的是，阿格里帕不是恺撒家族成员，也缺少这个姓氏带来的威望，更不用说庞大的人脉关系网络了。阿格里帕的地位仅次于奥古斯都，但始终只能是二把手，奥古斯都也没有努力让阿格里帕与自己平起平坐。[\[37\]](#).

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虽然人到中年，但仍然聪明强干、精力充沛，并对自己的老友忠心耿耿。他最喜欢的谚语是“和平让渺小的东西生长，纠纷让伟大的东西垮台”。前13年，他返回罗马，待了几个月之后又去处理巴尔干的军事问题。他离开罗马时，尤利娅第五次怀孕了。夫妇俩除了盖乌斯和卢基乌斯之外，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在巴尔干，展示一下武力就足以平息当地的骚乱，于是阿格里帕在前12年返回意大利，在抵达罗马前就病逝了。他的疾病不明，但这一年非同寻常地任命了三名补任执政官，说明这一年可能暴发了某种流行病。不久之后，尤利娅生了第三个男孩，被命名为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38\]](#)。[\[39\]](#).

阿格里帕去世的时候，奥古斯都并不在老友的身边。狄奥说奥古斯都当时在雅典主持泛雅典运动会^[40]，但听说阿格里帕患病后立刻返回。阿格里帕的遗体被庄严肃穆地运回罗马，随后举行了公开葬礼，元首亲自致悼词。接着，这位亲人的骨灰被安放到奥古斯都为自己准备的宏伟陵寝中。^[41]

[1]. Dio 54.19.2 (Loeb translation) .

[2]. *Res Gestae* 26.

[3]. Dio 54.20.4-6, Suetonius, *Augustus* 23.1; Strabo, *Geog.* 7.1.4 提到，苏刚布里人在其国王梅洛领导下的行动，是奥古斯都与日耳曼人战争的开端，但他指的可能是后来的一个事件。

[4]. Dio 54.19.1-2.

[5]. Dio 54.19.3; 奎里努斯神庙，见Price in *CAH2* X, p.822。

[6].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369.

[7]. 原文有误。前16年执政官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是大安东尼娅的丈夫，而不是儿子，所以他是奥古斯都的外甥女婿。卢基乌斯是尼禄皇帝的祖父。

[8]. Crook in *CAH2* X, pp.94-5.

[9]. Dio 54.19.6, Suetonius, *Tiberius* 12.2, B. 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 p.27,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p.403-4.

[10]. Dio 53.12.7, 54.4.1; 纳博讷高卢的发展概况，见C. Goudineau in *CAH2* X, pp.471-87, M. Christol, *Une Histoire Provinciale. La Gaule narbonnaise av. J. -C. au IIIe siècle ap. J. -C.* (2010) , 尤见 ‘La municipalisation de la Gaule narbonnaise’ , pp.105-28, 及 J. Drinkwater, *Roman Gaul. The Three Provinces, 58 BC-AD 260* (1983) , pp.20-21。

[11] 关于共和国最后几十年里的外高卢，见S.Dyson, *The Creation of the Roman Frontier* (1985)，pp.165-73; Pliny, *NH*.3.31。

[12] 讨论见J.Drinkwater, *Roman Gaul. The Three Provinces, 58 BC-AD 260* (1983)，pp.17-25，及Goudineau in *CAH2* X, pp.487-502。

[13] 尤利乌斯·恺撒的作战，见A.Goldsworthy, *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pp.205-92 = (2007)，pp.248-353。

[14] Dio 54.20.1-2, 22.1-2, Florus 2.22, Strabo, *Geog.*4.6.7-8.

[15] 滨海阿尔卑斯山脉指阿尔卑斯山的西南部，是法国与意大利边界上的一段。

[16] 诺里库姆相当于今天奥地利大部分和斯洛文尼亚一小部分地区。

[17] 赖提亚人是古罗马人对当时阿尔卑斯山一带若干部族的称呼。他们居住在今天的瑞士中部、奥地利蒂罗尔地区和意大利东北部阿尔卑斯山地区。他们的语言可能与伊特鲁里亚语言有关联，也可能属于凯尔特语。

[18] 温德利希人是古罗马时期居住在今天瑞士东北部和德国南部一些地区的部族，可能是凯尔特人，前15年与其邻居赖提亚人一起被提比略领导的罗马军队征服。

[19] Dio 54.22.2-5, Velleius Paterculus 2.95.1-2, Strabo, *Geog.*4.6.9, *Res Gestae* 26, Horace, *Odes* 4.4和14, with Gruen in *CAH2* X, pp.169-71, C.Wells, *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An Examin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1972)，pp.59-89，及G.Alföldy, *Noricum* (1974)，pp.52-61。

[20] 见Wolff in *CAH2* X, pp.535-41。

[21] J.Drinkwater, *Roman Gaul. The Three Provinces, 58 BC-AD 260* (1983)，pp.12, 21, 119-40, C.Wells, *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An Examin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1972)，pp.93-148。

[22] 葡萄酒贸易，见A.Tchernia, ‘Italian wine in Gaul at the end of the Republic’，in P.Garnsey, K.Hopkins & C.Whittaker (eds)，

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1983), pp.87-104; 对高卢社会的精彩介绍, 见N.Roymans, *Tribal Societies in Northern Gaul: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Cingula* 12 (1990), 尤见pp.17-47, 及B.Cunliffe, *Greeks, Romans and Barbarians: Spheres of Interaction* (1988), 尤见pp.38-58和80-105。

[23] 部落 (civitas) 这个词不是非常准确, 有些学者会用“国家”来取代“部落”, 但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说法。

[24] R.MacMullen, *Romanization in the Time of Augustus* (2000), pp.85-120, P.Wells, *The Barbarians Speak. How the Conquered Peoples Shaped the Roman Empire* (1999), pp.49-78, B.Cunliffe, *Greeks, Romans and Barbarians: Spheres of Interaction* (1988), pp.48-9, 86-7, 96-7, 132-4, S.Dyson, *The Creation of the Roman Frontier* (1985), pp.137-9, 154, 及C.Goudineau, *César et la Gaule* (1995), pp.141-3。

[25] J.Drinkwater, *Roman Gaul. The Three Provinces, 58 BC-AD 260* (1983), pp.18-27, 93-118, 141-59。

[26] Caesar, *BG* 6.15讲到, 贵族的地位取决于他们供养了多少武士; Pliny, *NH* 30.4.13讲到禁止公民参加德鲁伊崇拜仪式, 概况见J.Drinkwater, *Roman Gaul. The Three Provinces, 58 BC-AD 260* (1983), pp.38-9, 44, 179-81, 206-7, 及T.Derks, *Gods, Temples and Ritual Practi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igious Ideas and Values in Roman Gaul* (1998), *passim*。

[27] 概况见Alföldy in *CAH2* X, pp.449-63, J.Richardson, *The Romans in Spain* (1996), pp.41-126, 及B.Lowe, *Roman Iberia.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2009), esp. pp.87-115; 军队, 见A.Morillo Cerdán, ‘The Augustean Spanish Experience: The origin of the *limes* system?’, in A.Morillo, N.Hanel & E.NOTES 575 Martín, *Limes XX: 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 Roman Frontier Studies. Anejos de Gladius* 13 Vol.1 (2009), pp.239-51, 尤见244-7。

[28] 见W.Mierse, *Temples and Towns in Roman Iberia. The Social Dynamics of Sanctuary Designs from the Third Century BC to the*

Third Century AD (1999) , pp.54-127, B.Lowe, *Roman Iberia.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2009) , pp.87-115, 及R.MacMullen, *Romanization in the Time of Augustus* (2000) , pp.50-84;

W.Trillmich (trans.C.Nader) , *Colonia Augusta Emerita, Capital of Lusitania* in J.Edmondson (ed.) , *Augustus* (2009) , pp.427-67, 及 R.M.Durán Cabello, ‘Edificios de espectáculo’ , in X.Raventós (ed.) , *Les capitales provinciales de Hispania 2.Merida: Colonia Augusta Emerita* (2004) , pp.55-61。

[29] Dio 54.25.5-6, with K.Raaflaub,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Augustus’ military reforms’ , in J.Edmondson (ed.) , *Augustus* (2009) , pp.203-28.

[30] 关于斯凯瓦部队, 见CIL 10.6011, 评论见J.Spaul, *ALA2* (1994) , pp.20-21, 辅助部队的概况, 见D.Saddingt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Auxiliary Forces from Caesar to Vespasian (49 BC-AD 79)* (1982) , pp.15-26, 77-82, 及P.Holder, *The Auxilia from Augustus to Trajan* (1980) , pp.5-13; Macrobius, *Saturnalia* 2.4.25及(较简略) Dio 55.4.2讲到此次审判; 与士兵和退伍军人的关系, 见J.Campbell, *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 31 BC-AD 235* (1984) , pp.32-59, 243-81。

[31] Dio 54.15.4-7, 27.2-3, *Res Gestae* 10 (Loeb translation for quote) , Suetonius, *Augustus* 16.4, 31.1, Ovid, *Fasti* 3.415-28.

[32] *Res Gestae* 10, with Price in *CAH2* X, pp.825-7, 及 S.Weinstock, *Divus Iulius* (1971) , pp.276-81。

[33] Dio 54.25.1-4, 26.1-2.

[34] Dio 54.27.1, 及Suetonius, *Augustus* 56。

[35] Dio 54.27.4, with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p.377, 379.

[36] Dio 54.26.3-9, 概况见R.Talbert, ‘Augustus and the Senate’ , *Greece and Rome* 31 (1984) , pp.55-63讲到创造真正自由的辩论的难处。

[37] Dio 54.28.1.

[38] 波斯图穆斯是“遗腹子”的意思。

[39] 谚语“和平让渺小的东西生长，纠纷让伟大的东西垮台”（*nam concordia parvae res crescunt, discordia maximae dilabuntur*）见 Seneca, *Epistulae* 94.46（参见 Sallust, *Bell. Jug.* 10.6 with Syme, p. 343, n.1）。

[40] 泛雅典运动会是前566年至前3世纪在雅典举行的盛会，包括宗教节日、体育竞技和文化活动等。

[41] Dio 54.28.2-29.8, Suetonius, *Augustus* 64.1, Velleius Paterculus 2.96, Tacitus, *Ann.* 1.3.

十八 奥古斯都的和平

为了纪念我的归来，元老院投票决定奉献一座“奥古斯都和平”祭坛。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1\]](#).

我的歌将我引领到和平祭坛前……来啊，和平女神，你精致的秀发戴着阿提卡的花冠，让你温柔地停驻在整个世界。再也没有敌人，也没有凯旋式的机会。对我们的领袖，你将是比战争更伟大的荣耀。愿士兵仅仅为了遏制侵略者而战……！愿远近的世界都畏惧埃涅阿斯的子孙，如果有不畏惧罗马的国度，愿它热爱罗马！

——奥维德，1世纪最初十年[\[2\]](#).

阿格里帕将面积广大的花园和战神广场上的浴池建筑群赠给了罗马人民，还捐出了自己的一些庄园，以便为维护这些花园和建筑群提供资金。奥古斯都亲自宣布了他的遗愿，以确保这些遗愿会得到执行，并向所有男性公民（或至少是在罗马城的男性公民）赠送400塞斯特尔提乌斯，并说这是他的朋友的另一项遗愿。这种慷慨赠礼很符合阿格里帕近二十年来的一贯作风，他将自己新近获得的大部分财富用于为人民建造生活福利设施，并在帝国全境的许多城市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尤其是在罗马城。他的建筑活动的规模远远超过恺撒·奥古斯都之外所有的罗马贵族，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仍然在世的，并且既注重实用，也注重美观。当群众向元首抱怨葡萄酒太贵时，他答道，他的女婿已经为他们建造了一座高架渠，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饮用水。[\[3\]](#).

阿格里帕的勤奋和才干的最大受益者始终是奥古斯都。阿格里帕的遗嘱也是这样，将他最大一部分财产赠给了老友和岳父，包括意大利和各行省的大量田产。狄奥写道，其中一座庄园囊括了几乎整个克

森尼索^[4]。（在希腊）。于是，阿格里帕凭借内战期间和之后忠心耿耿的效力而赢得的巨大财富，如今回到了领袖的手中（阿格里帕曾追随这位领袖，并与他一同崛起），最终可能落入盖乌斯和卢基乌斯手中。政治和家庭的忠诚是很难分开的，这在罗马不算罕见。人们平步青云，靠的是新老朋友的支持、恩主提携和联姻。阿格里帕通过联姻收益良多，先是娶了庞贝尼娅（富甲天下且人脉极广的阿提库斯的女儿），然后娶了恺撒的外甥女马凯拉，最后娶了恺撒的女儿尤利娅。后来奥古斯都收养了阿格里帕与尤利娅的两个儿子，于是阿格里帕与奥古斯都的关系更加亲近了。^[5]

奥古斯都非常看重亲情。从很多角度看，这并不稀罕，因为罗马人的血亲、收养或姻亲关系往往会帮助他们晋升，但神圣尤利乌斯的儿子将他家庭的重要性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过去，权力和官职是不能分享的，因为二者都是有期限的，也需要竞争得来，并且受到选民影响。这些限制对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没有用，他可以将实际上是终身制的官职授予阿格里帕，最终给了他保民官权力和高级资深执政官军权。早在前36年，奥古斯都的妻子和姐姐就获得了保民官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并因此成为公众人物。而马凯鲁斯、提比略、德鲁苏斯和后来的盖乌斯与卢基乌斯都得到了特别优待，成年之后就迅速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官职。虽然奥古斯都不赞成群众对幼年盖乌斯的歌颂，但他有意识地让大家感到，他的家族理应比罗马的其他任何人得到更多尊重和更重要的公众角色。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奥古斯都和平祭坛。前13年7月4日，元老院下令建造这座祭坛，以纪念他满载成功地从外省返回。原先元老院打算在尤利乌斯议政厅内建造一座献给奥古斯都本人的祭坛，被他谢绝，于是改为奉献给和平的祭坛。祭坛的位置也改为战神广场，延续了他和阿格里帕将这个地区变为纪念他荣耀的巨大建筑群的做法。祭坛被安置在神圣土地之上，其设计参考了雅努斯神庙，两端各有一

个入口，其内部的大理石被精心雕琢，做成传统神龛的木板的模样。外墙上也有工艺同样精湛的装饰，尤其是南北两面有表现宗教游行的檐壁。祭坛的具体性质，或者说它代表的是一个具体事件还是融合了真实和虚构元素的某种想象的仪式，至今仍然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主题。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之一是，祭坛表现的是纪念奥古斯都前13年胜利的正式感恩活动（这是他荣获的五十五次公共感恩之一，五十五次感恩活动一共890天，让尤利乌斯·恺撒也黯然失色）。[6]

毋庸置疑的是，奥古斯都的家人在游行和檐壁的图案中都占据了核心位置。其他元老也有露面，比如戴着尖顶的独特帽子的祭司。祭司当中肯定有神圣尤利乌斯祭司，这个职位是前44年设立的，而其他祭司职位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远古。恺撒·奥古斯都走在祭司们的前面，他的前面是执法吏。元首的形象被刻画得比周围其他人高一点点。他本人其实不高，所以应当不会比周围的人都高，但他也没有被刻画得像波斯帝王或埃及法老那样耸立在人群之中。阿格里帕跟随着祭司们，也比其他人略微高一点，显得比较突出。他的托加袍一角遮盖着头部，可能表明他在祈祷或者在仪式中扮演某种角色，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说明他在雕塑竣工前就去世了。一个穿着短上衣的小男孩拉扯着他的托加袍，但转头仰望身后的李维娅。她轻轻拍着孩子的头，可能是为了抚慰他，让他安静下来。

这种非正式的姿态在雕塑场景的其他部分也很常见。提比略站在李维娅旁边，后面更远的地方是安东尼娅，她拉着一个孩子的手，并转头与她的丈夫德鲁苏斯说话。德鲁苏斯刚从高卢的军事指挥岗位回来，穿着鲜明的军装斗篷，另一个小男孩拉着他的斗篷，并抬起头看着一个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女孩。我们很难判断奥古斯都和平祭坛雕塑中的人的身份。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被刻画得很清晰，但其他人都是程式化风格，这有助于让两位领导人显得更突出。其他人物仪态庄严，除了少数几个人都很年轻，虽然人物外貌不同，但很相似，区别

只在细节。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肯定一下子就能辨认出这些人物，并了解这些相似面容的细微差别，但我们就很难分清了，尤其是那些名气较小的人物。雪上加霜的是，这些雕塑从古典时代晚期一直到20世纪的墨索里尼时代被连续翻新修缮，有时被修改很多。人物当中可能包括马克·安东尼的儿子尤卢斯·安东尼，还有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他们都娶了屋大维娅的女儿。群像中还有元首的其他亲属，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确定人物的身份。^[7]

小孩是最难辨认的，所有小孩都是胖乎乎的面容，这是为了强调他们的年幼，但这使得我们无法准确判断身份。大多数小孩都像他们周围的成年男女一样穿着托加袍或裙子。拉着阿格里帕斗篷的男孩不一样，他只穿着一件短上衣，脖子上还戴着项圈（这种项圈最初是高卢风俗，很重，由金银或青铜制成）。有人因此猜测这孩子是个蛮族王子。当时有很多蛮族王子被作为人质送到罗马，在奥古斯都家中长大，奥古斯都希望他们将来会成为罗马的盟友。但我们知道，参加特洛伊竞技骑马训练的男孩也戴着项圈，所以这个孩子更可能是盖乌斯·恺撒。一个打扮与他相似但年龄小一点的男孩出现在雕塑的其他部分，可能是他的弟弟卢基乌斯。^[8]

奥古斯都和平祭坛的用料考究，工艺水平极高。希腊艺术的影响清晰可辨，特别鲜明地（肯定是有意识地）模仿帕提农神庙的带状装饰。很多学者估计，高级雕刻师是希腊人，但这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有些概念的罗马风格很强，非常符合奥古斯都的理念，这远远不是简单的模仿。夫妻之间和成年人对小孩说话时轻松闲适的非正式仪态是前所未有的，游行队伍中有这么多女人和小孩也是史无前例的。在圣所的两翼——独立于游行队伍的雕塑——还有描绘罗马人的神圣佑护者罗马女神和大地母亲，以及罗马人在神话中的祖先埃涅阿斯、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图像。较小的细节图上还有准备献祭公牛的场景。以这种方式，罗马人的遥远过去，以及尤利乌斯氏族和元首的祖

先都得到了纪念，并与当今（被奥古斯都及其家人主宰）紧密联系起来。维吉尔史诗中也有这样的主题，当时的许多艺术和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和平得到了颂扬，但这是罗马人的胜利，是在军事胜利之后得来的，而且是奥古斯都的成功赢得的和平。几年后，诗人奥维德（他并非奥古斯都政权毫不含糊的宣传鼓动家）将会歌颂奥古斯都和平祭坛，并希冀和平，因为外族要么热爱罗马，要么畏惧它。这和平将是罗马雄霸天下、不受任何挑战的和平。^[9]

奥古斯都的领导将保障这样美好的未来，他的许多亲人（奥古斯都和平祭坛雕像上有三代人）将会支持他。年纪最大、地位最高的家庭成员是奥古斯都和李维娅，以及阿格里帕，尽管他没有活到前9年年初这座祭坛竣工和对外开放之时。和往常的奥古斯都雕像一样，此处的他没有任何衰老的痕迹，成熟而威风凛凛，绝不像是五十出头的人。第二代人由李维娅的两个儿子引领着，他们都还只有二十多岁。最后是年幼且前程远大的第三代人，盖乌斯、卢基乌斯和其他孩子。可以上溯到埃涅阿斯的家族血脉如今枝繁叶茂，未来有了保障。奥古斯都此时不像过去那样常受重病困扰，但已经不再年轻，终有一死。现代学者总是努力寻找元首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有没有确定继承人。罗马人先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凯鲁斯身上，然后是其他人，这明确地证明当时的人们大体上也是这么想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以及苏埃托尼乌斯、塔西佗和狄奥），奥古斯都死后，一连几百年，罗马将处于一位又一位皇帝的统治之下。

奥古斯都可能不是这么打算的，因为在马凯鲁斯死后，他总是寻找不止一位继承人，寻找多位支持者和未来的接班人。阿格里帕分享奥古斯都的权力，帮他承担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同龄人，但缺少威望，并且出身低微。提比略和德鲁苏斯是贵族子弟，受到优待，在官场平步青云，并且分别娶了阿格里帕的女儿和奥古斯都的外甥女，但没有被奥古斯都收养。盖乌斯和卢基乌斯则成为恺撒家族的成员，

后来也很快得到提携。这五个人（成年之后）都分担了外省的行政管理，领兵作战，并监督罗马发生的很多事情。他们是同僚，但地位都低于元首，只是程度不同。[\[10\]](#)

没有一丝迹象表明，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曾被奥古斯都定为唯一继承人，而其他三人则将站到一边，接受这个人的主宰。五个人并非平起平坐，但理论上应当团结一心，为天下人的福祉效劳。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奥古斯都最亲近的人的高死亡率是正常的事情，而不是超乎寻常（按照罗马世界的标准，人的死亡率本来就很高）。所以，他赋予这么多亲属（有的是收养的，有的是血亲或姻亲）崇高地位，可以理解为提前准备，以应对不可避免的损失。没有证据表明奥古斯都是这么想的。他在亲人的辅佐下领导国家，绝对信任这些人的忠诚。他似乎希望自己死后这种局面能够延续下去。虽然不会有单独一位元首，但会有多位领导人，他们共同承担艰苦的职责，级别最高的领导人死后也不会造成权力真空和内战。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非常罗马式的概念，不太像是君主制，而是一个非正式小圈子的统治，圈子成员拥有君主一般的权力。在奥古斯都治下，这种体制是有效的。后世恢复这种体制的努力都失败了，主要是因为再也没有一个人享有恺撒·奥古斯都那样极高的威望。他是神圣尤利乌斯的儿子，担任执政官，获得公共感恩和凯旋式的次数远远超过其他人。就连阿格里帕也无法赶上他的纪录，尽管大多数工作其实是阿格里帕做的，但功劳总算在奥古斯都头上，并进一步增加他的威望。其他任何一位皇帝的作为都比不上恺撒·奥古斯都（至少几个世纪之内是这样），甚至在位时间都没有他主宰罗马国家的时间那么长。身份和作为使得他有了这么多建树，统治了这么久，因为他家族内部的任何一人都不大可能挑战他，而这个圈子之外的人没有挑战他的能力。

阿格里帕的去世对奥古斯都是一个打击，因为他鞍前马后，跟随奥古斯都三十多年，圆满完成了奥古斯都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但奥古斯都体制的优点在于，现在其他人可以接替阿格里帕了。最沉重的负担不可避免地落在了提比略和德鲁苏斯肩上，他们在随后几年都将南征北战，几乎没有任何停歇。提比略还被要求与妻子维普撒尼娅离婚。维普撒尼娅已经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很快还将生下一个女儿。按照罗马贵族的标准，他们的婚姻很幸福，但罗马贵族常常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而离婚和再婚，所以他们的离婚并没有让人感到惊讶。奥古斯都的女儿虽然已经当了两次寡妇，而且生了五个孩子，但仍然只有二十七岁，如果不再嫁就非常奇怪了。一段时间里，奥古斯都考虑在骑士阶层为女儿找一个丈夫，要富裕而尊贵，但不像元老那样受到从政的诱惑。但这样的人当了元首的女婿之后一定会受到比以往多得多的注意，未必能与政治活动拉开距离。

尤利娅很希望嫁给提比略，从很多角度看，他也是显而易见的理想人选，因为如果奥古斯都从家族圈子之外选一个女婿，就会大幅提升女婿家的地位。奥古斯都已经不需要维持阿格里帕的忠诚，而德鲁苏斯娶了奥古斯都的外甥女，不能随便拆散，所以他命令提比略与维普撒尼娅离婚。后来维普撒尼娅再嫁了，寿命很长，为她的元老丈夫生了至少五个孩子，但她完全没有尤利乌斯家族的血统，所以这没关系。提比略和尤利娅订了婚，但遵照法律要求，十个多月后才结婚。这门婚事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提比略与奥古斯都及其养子的关系，后者将来会和提比略一起，辅佐元首治理帝国。^[11]

征服

在这期间，提比略被派往巴尔干，因为那里又一次出了麻烦。阿格里帕的死讯应当是诱使当地发生骚乱的因素之一。提比略的弟弟德鲁苏斯返回了高卢。在随后三年里，兄弟俩将在这些边疆地区积极作

战。这显然是同一计划的不同部分，但有些现代学者的说法——奥古斯都努力在多瑙河，最终在易北河沿线建立利于防守的边界——没有什么说服力。在花费多年时间平定现有的行省、完成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和近期占领阿尔卑斯山之后，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决心在欧洲发起大规模征战。这是非常干净体面的荣耀，赢得的胜利将会兑现奥古斯都和平祭坛赞颂的“通过力量获得和平”的誓言，并让他管辖出现军事问题的各行省的做法更加合理。这也是一个机会，让提比略和德鲁苏斯扬名立威，积累更多的高层指挥经验。[\[12\]](#)

这些积极进取的对外扩张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近几年来，部队和给养被集中到莱茵河一线和巴尔干。这并不是说这些战争是罗马人在没有受到挑衅、毫无缘由的情况下悍然发动的。有一种说法是，罗马的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是对之前所遭袭击的反应，现代人对这种说法的冷嘲热讽是大可不必的。外族袭击司空见惯，往往非常严重，但罗马人的反应比较难预测，有时是小规模报复，有时是大规模进攻，甚至是直接征服。现有资源的多寡、统帅行动的自由程度以及赢得荣耀的欲望，共同决定了罗马人反应的规模和类型。前58年，上述这些因素，再加上赫尔维蒂人迁徙带来的机遇，引发了尤利乌斯·恺撒征服高卢，而不是他之前觊觎的巴尔干。[\[13\]](#)

此时奥古斯都没有受到其他地区大规模战事的烦扰，而且享有史上任何一位罗马统帅都没有的行动自由，于是他决定在莱茵河和巴尔干为罗马开疆拓土。和其他罗马人一样，他并不是从政治地理的角度看世界，而是将世界看作许多民族和国家组成的网络。他将要攻击这些民族和国家，“饶恕被征服者，在战争中击败骄傲者”。一些蛮族将被纳入罗马的行省，其他的则将被迫认可罗马的权力。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远离地中海的土地只有非常模糊的把握，肯定没有考虑到中欧及远方辽阔的草原。奥古斯都很可能相信自己能够征服整个欧洲，一直打到罗马人理念中环绕全部三个已知大洲的大洋，但这样的可能性

要留待将来检验。目前他的愿景还是比较有限的。他要为罗马增添荣光，惩罚曾袭击各行省的蛮族，并阻止他们将来再侵犯罗马。

提比略和德鲁苏斯将亲自领兵作战，而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在远方监督。他改变了近期的习惯（长时间巡视各行省），在随后几年里只是短暂地视察接近战区的地方，将大本营设在意大利北部的阿奎莱亚（在意大利与伊利里库姆边界附近）或高卢的卢格敦。阿奎莱亚和卢格敦距离罗马都不算很远，他好几次返回罗马，通常是在作战季节结束之后。苏埃托尼乌斯抄录了奥古斯都亲笔写给继子提比略的一封信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是关于3月20日至25日纪念女神密涅瓦的节庆活动的。从中我们可以知晓奥古斯都的旅程：

亲爱的提比略，我们的密涅瓦节过得很快活，因为我们整天玩乐，常常流连于赌桌。你弟弟大呼自己运气太差，但最后看来，成绩其实还不错。他开始输得很惨，但后来出人意料地逐渐赢回了很多钱。我输了2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但这是因为我和往常一样，在游戏时特别慷慨大方。如果我不是这样故意放人一马、礼让别人，我应当赢了整整5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但我喜欢让着大家，因为慷慨会给我带来永恒的光荣。[\[14\]](#).

在保存至今的他给亲友的书信里，这种非正式的轻松笔调是很常见的，奥古斯都至少在表面上和两个继子相处融洽。德鲁苏斯的风度翩翩、和蔼可亲，很快就深得人心。提比略沉默寡言、性格复杂，人们更容易尊重他而不是喜爱他，但奥古斯都给他的信里常有亲热的表示，以及一种温和的、逗乐的口吻，并且经常出现讽刺性的语句，比如“永恒的光荣”。在另一封信里，奥古斯都描述了一次宴会，自嘲他和客人“像糟老头一样赌博”。奥古斯都的书信与西塞罗的书信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不断表示对收信人的亲昵，常常引用和开玩笑，或许还虚伪地表示对收信人的挚爱。即便如此，在这个阶段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元首和即将成为他女婿的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15\]](#).

前12年，德鲁苏斯在三个高卢行省完成了一次正式的人口普查，这无疑有助于对各行省进行组织安排，记录财产状况和应交给罗马的税额，并确保各省为他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提供足够的给养。人口普查可能在前一年奥古斯都离开高卢各行省之前便开始了，元首曾在前27年亲自监督了高卢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可能也是为了建立比现行税收制度（近期被李基努斯用来渔利）更公平的制度。除了《路加福音》，我们没有其他证据表明奥古斯都在某个时间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帝国全境开展一次人口普查并据此征税。这样一道命令是完全可能存在的，它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有效说明了已经开展的工作，并且就像其他很多细节一样，没有被我们掌握的史料记载下来。另外，福音书作者也可能仅仅反映了一个外省居民的视角，对他们来说，罗马行政当局定期实施人口普查和征税，看上去就像是中央政府的单一决策。[\[16\]](#)

有时，人口普查会激起怨恨，甚至反叛，尤其是在近期刚刚平定的行省。少交税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尤其是在征税者是占领军的情况下。据李维记载，此次人口普查在高卢引发了一些麻烦。狄奥也有这样的暗示，但没有具体讲。如果真的发生了骚乱，规模可能不大。对个人和社区来说，将财产和权益情况登记在册其实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些记录具有无可指摘的权威。大多数地区很快习惯了人口普查，而德鲁苏斯高效镇压了所有抵抗。[\[17\]](#)

除了组织高卢各行省的财政收入和维持秩序，还有大量工作是为即将开始的渡过莱茵河战争做准备。为了安置集结起来准备参战的部队，罗马人建立了一系列大型军事基地。兵力数字很难确定，但可能至少集结了8个军团，并得到大量辅助部队和一些海军（拥有小型作战桨帆船和运输船）的支持。基地之一位于今天瓦尔河畔的奈梅亨[\[18\]](#)，考古发掘表明它是在前19～前16年建造的。这座基地面积约42公顷，用泥土、草皮和木材建成，可能足以容纳2个完整的军团和一些

辅助单位。和这些年里军队建造的绝大多数要塞（不管在莱茵河畔或者河畔以东，还是在西班牙）一样，这座基地还不是公元1世纪和2世纪十分常见的罗马军事基地那种整齐划一的纸牌形布局。奥古斯都的军队利用良好的天然地理位置，常在地建造要塞，壁垒大致依地势修建，呈六边形、七边形或八边形。它们的内部布局各不相同，正如不同类型的建筑有不同设计一样，但总的来讲相似之处远远多于不同点。由此可见，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罗马军事基地的模式化布局是从奥古斯都时期军事基地的布局方式发展而来的。奥古斯都为军队制定了很多规章制度，这些制度在随后一百多年中持续有效，没有大的变化。[\[19\]](#)。

我们习惯了后来的大型石制要塞，可能不太会注意奥古斯都时期军事营地的规模和组织。奈梅亨的驻军维持了不到十年，但在这期间，士兵们居住在根据标准设计方案建造的高质量、整齐在营房内，每个帐篷小组（八人）拥有两个房间。考古发现的一些营房比较小，被判定是辅助部队而非正规军团的营房，但即便是这些营房，也能为居住者提供相当程度的舒适条件，帮助他们度过欧洲北部的严冬。指挥部建筑、为担任军团长（负责指挥1个军团，不过在这样的营地里也可能是一名军团长指挥2个军团）的元老准备的房舍，以及为骑士和有元老身份的军事保民官准备的房子，就舒服多了。在这些战役期间建造的其他要塞也有类似的建筑类别。这些军事基地在规模和组织上很像在帝国边缘兴起的组织良好的地中海风格城市。

前13～前12年冬季，日耳曼武士再一次袭掠罗马的高卢各行省，但被德鲁苏斯击退。来年春季，他发动了针对莱茵河以东部落的第一次攻势。一些部队沿着莱茵河的一些支流流域走陆路，其他部队则登上宽敞的船只，绕过北海，在海岸登陆。有一次他严重误判了当地条件，落潮之后水面高度比他预计的要低，导致很多船只搁浅。尤利乌斯·恺撒在远征不列颠期间也曾低估海潮的力量和潮差。好在当地的

新盟友弗里斯人前来保护，帮助了搁浅的罗马人。但总的来讲，德鲁苏斯的远征很成功。日耳曼部落的家园遭到攻击，村庄和农场被付之一炬，牲畜被驱赶、掳走，庄稼被毁坏，聚集起来抵抗的武士都被打败。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的塔西佗写道，一位蛮族领袖说了一个黑色笑话：罗马人“制造了一片废墟，然后说这就是和平”。看到抵抗罗马的代价如此惨重，好几个部落效仿弗里斯人，寻求与罗马结盟。提比略在潘诺尼亚^[20]运用了类似的手段，取得了相似的成功。^[21]

这一年年底，德鲁苏斯返回罗马，短暂停留。这证明，旧时对行省总督的种种限制，对元首的亲信完全无效。他当选裁判官，获得了威望很高的城市裁判官职位，但在罗马只待了很短时间就返回莱茵河前线，继续作战。前11年初春，二十七岁的德鲁苏斯又一次发动进攻，亲自率领一支部队从陆路推进。之前向罗马投降的一些部落如今可能打算再冒险抵抗。佛罗鲁斯讲的一个故事说，苏刚布里人、切鲁西人和苏维汇人抓住了二十名出现在他们领地的罗马百夫长，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件可能就发生在前11年。这些百夫长出现在日耳曼领地，可能是作为外交活动的代表，更可能是在招募辅助士兵，因为盟邦有义务为罗马军队提供兵员。但罗马人常常利用各部落间的竞争和纠纷，分而治之，从中渔利。苏刚布里人集结了一支军队，攻击了邻近的卡蒂人，因为卡蒂人拒绝与其结盟反对罗马。苏刚布里武士忙着这事的同时，德鲁苏斯进行快速打击，蹂躏了他们的家园。^[22]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莱茵河以东地区居住着很多各不相同、往往互相敌对的人群。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日耳曼人，但该地区的居民应当不大可能认为自己是日耳曼人。从尤利乌斯·恺撒的描述看，日耳曼人和高卢人两个泾渭分明的族群，尽管他也承认有些日耳曼人已经定居高卢，所以有些混淆。他做这样的区分是很有用的，这样他就能明确地说日耳曼人对高卢构成威胁，并在莱茵河一线停止征服战

争。他和其他古代作家把日耳曼及其各民族描绘得非常负面，说他们比高卢居民更原始，也更凶悍。在他们眼中，日耳曼是沼泽丛生、丛林密布之地，很少有明显的道路，没有较大的城镇，没有神庙；那里的人民是半游牧的，养牲畜，在森林里狩猎，但不从事农耕。很多对蛮族的刻板印象（可以上溯到荷马《奥德赛》中对恐怖的独眼巨人的描绘）让罗马人更加觉得，日耳曼人完全没有开化，所以难以揣测、非常危险。

考古证据对上述理念发出了质疑，但也制造了新的难题。在尤利乌斯·恺撒抵达高卢之前，日耳曼中部的广阔地区与莱茵河以西地区很像，都拥有大型山顶城镇；和高卢的城镇一样，也有手工业、贸易和社会组织的迹象。这些地区之间存在广泛联系，不管政治关系如何，文化上的相似是很突出的，都属于考古学家所说的拉登文化[23]。前1世纪上半叶，这些日耳曼中部的城镇全部被放弃，或者在规模和文明程度上急剧萎缩。有证据表明城镇遭到了凶残而血腥的摧毁，而考古证据中的武器也比以前更加常见。这些破坏不是罗马人造成的，因为他们还没有抵达这些地区，不过罗马帝国的影响像波浪一样扩散出去，可能是诱发这些破坏的因素之一，不管是贸易模式的变化，还是直接的军事行动。罗马人不大可能知道离他们帝国如此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他们在抵达这些地区看到荒凉破败的景象之后，便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当地的正常情况，当地人素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些日耳曼城镇及其周围的社会可能是在尤利乌斯·恺撒抵达高卢之前崩溃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无从探究。掌握的证据可以被理解为内部动乱造成了破坏性的权力斗争，也可以被解读为新的侵略性很强的民族抵达这里，狠狠打击了原住民。从考古学角度很难追踪民族的迁徙，但史料中不断提到庞大人群去寻找新土地的故事至少部分反映了现实。我们很难依据考古证据来判断族群，因为这些族群的构成可能非常复杂，可能有近期形成的、存在时间很短的群体与较

老的亲属群体混合在一起。基于晚期凯尔特和日耳曼语言，对保存至今的名字的语言学分析表明，当时的不同群体的确存在鲜明的差别，但我们还是不能准确判断具体人群的种族和文化身份。罗马人很可能没有完全理解那些有名字的族群之间的关系，如苏刚布里人、切鲁西人、卡蒂人、考契人或苏维汇人，这些族群很可能随着领导人的兴衰而快速变化。

在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肯定有很多不稳定性和快速变化，所以罗马人觉得日耳曼人在不断迁徙是有道理的。在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社会，这种看法就未必正确了。城镇消失了，但在莱茵河以东的大多数地区，农场和大小村庄在很长时间（好几代人）内仍然有人居住。虽然没有大的定居点，但总人口可能还是很多的。农业很普及，但主要是为了养活当地人口，剩余产品很少，只够支撑人们度过收成不好的年份。长远来看，这些部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处于瞬息万变的状态，很多人口定期迁徙。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部落群体定居在同一片土地上达数十年之久，而且有得到认可的领袖。罗马人可以努力去辨别这些部落，去了解他们目前的家园和酋长，至少在近期是可以做得到的。[\[24\]](#)

对日耳曼人，德鲁苏斯及其幕僚无疑有很多误解，也犯了很多错误，但他们对这些敌人的了解在不断加深。由于没有平坦的道路，罗马军队的人员和物资运输很困难。当地没有大型社区，这意味着很难找到大量囤积的粮食和草料。在高卢，尤利乌斯·恺撒常常率军前往一座城镇，要么要求当地人交出粮草，要么强行夺走。德鲁苏斯很难到数百个小型定居点搜索粮食，所以在日耳曼的罗马军队不得不自行携带几乎全部物资。若有需要，他们会在河上架桥，建造穿过沼泽地的堤道，这都需要时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德鲁苏斯及其部下沿着河流前进，因为这样比较容易用驳船运送给养。陆地行进的困难也能解释罗马人为什么依赖绕过北海沿岸的航行。[\[25\]](#)

虽然有这些困难，但第二个作战季节很成功。在给养耗尽之前，罗马军队深入日耳曼土地，打到了比以往更远的地方。夏季快结束了，德鲁苏斯率军返回莱茵河。在这个阶段，若将军队留在敌境过冬，就很难为他们提供粮草，更无法支持他们作战。日耳曼酋长们豢养着成群的武士，他们除了打仗之外没有任何工作，不过这样的职业武士很少。一整个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军队需要每一个有能力自备武器并愿意作战的自由民，所以这样一支军队要很长时间才能集结起来。这也意味着，一支罗马军队在撤退时比初期进攻时更有可能遇到顽强抵抗。这一次，之前袭击卡蒂人的武士也回来了，加入了其他队伍，去抵抗蹂躏他们土地的罗马人。罗马人的行军队伍很庞大，而且携带笨重的辎重，所以行军路线是可以预测的。武士们满腔怒火，也很自信，因为入侵者的撤退看上去像紧张的逃跑。

德鲁苏斯的行军队伍遭到一连串伏击。罗马人稳步推进，不过即便击退了进攻的敌人，他们也没有办法追击并杀伤大量敌人，而且没有时间停下来整顿队形、认真对付难以捕捉的敌人。每一次成功，不管规模大小，对日耳曼武士来说都是鼓舞，也激励更多人加入他们。最后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伏击，罗马的行军队伍被围堵在一条狭窄的隘道内。罗马人被困住了，面临被全歼的危险，但部落军队本质上的笨拙救了罗马人。日耳曼武士没有携带维持长时间作战的粮草，所以希望速战速决，赶紧回家。没有一个领袖能够掌控全军，很多酋长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力，而每一位武士都有权选择自己何时、如何作战。罗马人似乎已经是瓮中之鳖，于是日耳曼人没有静候罗马人饿死或被迫在不利条件下作战，而是成群结队地猛冲上去，希望歼灭罗马人，并掳掠其辎重。这种类型的近距离作战对罗马军团士兵有利，德鲁苏斯及其部下终于得到一个打击对手的机会。罗马人在困境中奋起反击，重创了得意洋洋的日耳曼武士，后者的自负很快变成了惊慌失措的逃跑。德鲁苏斯及其部下在余下的路途中没有受到任何阻挠，安然返回了莱茵河。[\[26\]](#)

此次战役，以及提比略在多瑙河附近的作战，都被宣布为胜利。奥古斯都被授予一次凯旋式，但他和往常一样谢绝了。他的两位继子被授予小凯旋式，但可以展示凯旋式的符号。秋季，兄弟俩返回了罗马，奥古斯都也回来了。为了纪念李维娅两个儿子的胜利，城内的每位男性公民都获赠400塞斯特尔提乌斯。奥古斯都的五十二岁生日期间举行了一系列斗兽表演。尤利娅和提比略也大约在这个时候结婚了。但并非全都是喜讯。屋大维娅突然去世了，于是又有一位亲人的骨灰被安放在奥古斯都陵寝。元首的姐姐得到了国葬的荣誉，由她的女婿德鲁苏斯致主悼词。[\[27\]](#).

虽然有亲人辞世，但奥古斯都是自信满怀的。元老院下令关闭雅努斯神庙的大门，以表示罗马世界已经确立了和平。但消息传来，达契亚人越过多瑙河发动了一次袭击，于是关闭雅努斯神庙大门的仪式没有举行。前10年，战争继续。奥古斯都和李维娅陪德鲁苏斯一家去了高卢的卢格敦。这一年晚些时候，安东尼娅生了她和德鲁苏斯的第二个儿子，即未来的克劳狄皇帝。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年，卢格敦建成了一座非常奢华的圣所，包括一座献给罗马女神和奥古斯都的祭坛。高卢全境的部落领袖被传来参加仪式，从此之后每年都举行这种仪式。尤利乌斯·恺撒曾说高卢全体部落的习惯是每年定期开会，奥古斯都禁止了这种具有潜在颠覆性的集会，所以这种新的崇拜仪式可能是为了填补取消这种会议之后的空白。[\[28\]](#).

提比略这一年在巴尔干作战，至少还有一支军队支持他的行动，后者的指挥官也得到了凯旋式符号。德鲁苏斯在日耳曼作战，兄弟俩定期通信，他们也分别和奥古斯都及母亲通信。有一次，提比略拿一封信给元首看，德鲁苏斯在信中说要联合他们兄弟的军队，迫使奥古斯都“恢复自由”。苏埃托尼乌斯说这个故事是提比略憎恨自己弟弟的第一个迹象，但没有其他证据能表明兄弟之间存在敌意，所有迹象都表明他们的关系很融洽。此事可能是偶然，或者是后人附会。现代

学者倾向于假设德鲁苏斯希望元首退位并恢复共和国体制，还喜欢将这兄弟俩都描绘为具有非常传统的政治观念的贵族。但德鲁苏斯的措辞很含糊，意思可能仅仅是，他不喜欢一些在奥古斯都羽翼下得到高官厚禄的人，并希望用更优秀的人（包括他们兄弟俩）取而代之。德鲁苏斯肯定是雄心勃勃的。在其他地方，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德鲁苏斯渴望赢得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荣誉，甚至在战场上拼命追逐日耳曼人的国王，希望将其堵住，然后独自将其杀死。如果将此事与前29年克拉苏的事情联系起来，未免想象力太丰富了。这其实就是一位年轻贵族希望赢得最罕见也最崇高的荣誉之一的急切心情。^[29]

前9年1月，德鲁苏斯成为执政官，此时他的二十九岁生日仅仅过去了一周多一点。他寻求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荣誉可能就是在这一年。他以执政官的身份，凭借自己的军权作战。也是在这一年，他率军进逼易北河。一个故事很快流传开来，说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个比真人更高大的女人的幽灵，她警告他不要再继续前进，并说他的生命已经时日无多。此时作战季节已经快结束了，德鲁苏斯返回了位于莱茵河的基地，但这一次他在日耳曼留了一些驻军。在四次战役中，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土地遭到罗马人蹂躏，那里的大多数部族都接受了罗马的统治。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还不清楚，但他的成就肯定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返回高卢过冬的途中，德鲁苏斯在骑马时出了事故，腿部受了重伤，未能治愈，结果这位年轻的将军于9月去世了。^[30]

提比略很快来到弟弟身边，他的这趟旅途因神速而闻名。在他的安排下，德鲁苏斯的遗体做了防腐处理，然后隆重地运回罗马。最早抬棺木的是德鲁苏斯麾下的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随后罗马殖民地和城镇的显赫公民接过了这个职责。在旅途的很多阶段，提比略亲自走在送葬队伍中。人们对德鲁苏斯的哀悼是真诚的，反映了他深受人民爱戴。塞内卡^[31]后来说，人们对这位闯劲十足的年轻英雄的纪念，仿佛是一场凯旋式。仪式的高潮是在罗马举行的公开葬礼。提比略在

广场上神圣尤利乌斯神庙外的演讲台致了悼词。奥古斯都在城市正式边界之外的弗拉米尼乌斯广场向更多的人（可能比广场上的人更多）致了悼词。（奥古斯都此时还在为姐姐服丧，所以不能进入罗马城执行纪念他最近一次胜利的仪式。）按照传统，演员们戴着德鲁苏斯祖先的葬礼面具和象征物，以及尤利乌斯氏族祖先的面具和象征物，尽管奥古斯都并没有收养德鲁苏斯。最后遗体被火化，安放在奥古斯都陵寝。他与元首的关系显然胜过他的真实家族背景。^[32]

奥古斯都陵寝附近就是奥古斯都和平祭坛，它于前9年1月30日正式落成。祭坛旁边有一座巨大的日晷，是一座从埃及运回的方尖碑，这是为了纪念奥古斯都战胜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日晷演示了尤利乌斯·恺撒历法的正常周期，每年有365.25天。方尖碑耸立在一座柱基之上，高度超过100英尺，每天正午会投下略微不同的影子，人们可以用碎石路面上的青铜线标出的网格来测量影子，用希腊字母来标注黄道十二宫图和阳历年。虽然日晷很宏伟，但可能是人们的计算错误，或者日晷的地基发生了移位，到1世纪中叶，普林尼发现日晷已经有三十年不能正确计算时间了。（方尖碑后来得到了大幅度翻修，如今矗立在另一个地点，即罗马的蒙特奇特利欧广场。）^[33]

就连奥古斯都也无法掌控自然。五年前，他拥有三位积极进取且精明强干的亲属的辅佐，盖乌斯和卢基乌斯成年后也能够帮助他。如今阿格里帕和德鲁苏斯都已不在人世，只剩下提比略。在随后几年里，提比略将肩负重担。

^[1] *Res Gestae* 12 (Loeb translation).

^[2] Ovid, *Fasti* 1.709-18 (Loeb translation).

^[3] Dio 54.29.4-5, Suetonius, *Augustus* 42.1.

[4] 克森尼索的字面意思是“半岛”，古代有多个地区被称为克森尼索。这里指的应当是色雷斯的克森尼索，即今天的加里波利半岛，属于土耳其，西面是爱琴海，东面是达达尼尔海峡。

[5] Dio 54.2.5.

[6] Dio 54.25.3, *Res Gestae* 4, 12; 和平祭坛，见D.Conlin, *The Artists of the Ara Paci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reece and Rome* (1997), M.Torelli, *Typology and Structure of Roman Historical Reliefs* (1982), pp.27-61, P.Zanker (trans.A.Shapiro),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 尤见pp.158-60, 179-83, 203-4, K.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1996), pp.141-55; 关于雕刻描绘的是前13年正式感恩活动的理论，见R.Billows, 'The religious procession of the Ara Pacis Augustae: Augustus' *supplicatio* in 13 BC', *JRA* 6 (1993), pp.80-92. M.Torelli, *Typology and Structure of Roman Historical Reliefs* (1982), p.54认为这画面是幻想的，是“应当发生的聚会”，并非实际发生的。

[7] 修复工程，见D.Conlin, *The Artists of the Ara Paci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reece and Rome* (1997), pp.47-56。

[8] 对部分儿童身份的不同观点，见R.Syme, 'Neglected children on the Ara Paci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88 (1984), pp.583-9, J.Pollini, 'Appuleii and Some Others on the Ara Paci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90 (1986), pp.453-60, C.Rose, 'Princes and barbarians on the Ara Paci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94 (1990), pp.453-67。

[9] 帕提农神庙的带状装饰，见D.King, *The Elgin Marbles* (2006)，尤见pp.137-8讲到它对和平祭坛的影响和奥古斯都对雅典的一般态度。

[10] B.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28-30.

[11] 提比略与维普撒尼娅离婚，娶尤利娅，见Dio 54.31.1-2, 35.4, Suetonius, *Augustus* 63.2, *Tiberius* 7.2, with B.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31, R.Seager, *Tiberius* (2005), pp.19-20。

[12] Dio 54.31.2-4.

[13] 讨论见 Gruen in *CAH2* X, pp.178-81, C.Wells, *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1972), pp.246-50, J.Rich, 'Augustus, War and Peace', in L.de Blois, P.Erdkamp, O.Hekster, G.de Kleijn & S.Mols (eds), *The Representation and Perception of Roman Imperial Power: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Workshop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Impact of Empire (Roman Empire, c.200 BC-AD 476)* (2003), pp.329-57 = J.Edmondson (ed.), *Augustus* (2009), pp.137-64, 尤见 149-62, A.Goldsworthy, *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 pp.205-14 = (2007), pp.248-57。

[14] Suetonius, *Augustus* 71.3 (Loeb translation); 德鲁苏斯颇得民心, 见 Tacitus, *Ann.* 2.41。

[15] Suetonius, *Augustus* 71.2 for the letter, 更多概况见 A.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38-44。

[16] Luke 2: 1, with F.Millar, 'State and subject: the impact of monarchy', in F.Millar & E.Segal (eds), *Caesar Augustus. Seven Aspects* (1990), pp.37-60, 尤见 41-2。

[17] Livy, *Pers.* 137-8, Dio 54.32.1.

[18] 奈梅亨在今天荷兰的东部。

[19] 关于奈梅亨, 见 P.Franzen, 'The Augustan legionary fortress at Nijmegen. Legionary and auxiliary soldiers', in A.Morillo, N.Hanel & E.Martín, *Limes XX: 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 Roman Frontier Studies. Anejos de Gladius* 13 Vol.1 (2009), pp.1257-69, 更多概况见 C.Wells, *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1972), pp.93-148, 及 C.Wells, 'What's new along the Lippe: Recent work in North Germany', *Britannia* 29 (1998), pp.457-64。

[20] 潘诺尼亚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北面和东面以多瑙河为界, 西面是诺里库姆和意大利北部, 南面是达尔马提亚和默西亚。地理位置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匈牙利西部、奥地利东部、克罗地亚北部、塞尔维亚西北部、斯洛文尼亚北部、斯洛文尼亚西部和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北部。

[21] Dio 54.32.1-3, Tacitus, *Agricola* 30.

[22] Dio 54.33.1-2, Florus 2.30.24; L.Powell, *Eager for Glory. The Untold Story of Drusus the Elder, Conqueror of Germany* (2011), 尝试详细重建德鲁苏斯的历次战役, 本年度事件见pp. 81-92。

[23] 拉登文化 (La Tène culture) 是欧洲铁器时代的一种文化, 得名自瑞士拉登的考古发掘地, 1857年在那里发掘出了大量手工制品。拉登文化于约前450年至前1世纪 (被罗马征服) 在今天的比利时、法国东部、瑞士、奥地利、德国南部、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地繁荣。

[24] 概况见M.Todd, *The Early Germans* (2004), pp.17-47, P.Wells, *The Barbarians Speak. How the Conquered Peoples Shaped Roman Europe* (1999), pp.3-93。

[25] 尤利乌斯·恺撒在高卢, 见Caesar, *BG* 1.23。概况见J.Roth, *The Logistics of the Roman Army at War (264 BC-AD 235)* (1999), pp.117-55。

[26] Dio 54.33.2-4; 对日耳曼军队及其局限的讨论, 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1996), pp.42-53。

[27] Dio 54.33.5-54.4, 35.4-5.

[28] Dio 54.32.1, 36.2, Suetonius, *Claudius* 2.1, Livy, *Pers.*139, Caesar, *BG* 6.13讲到德鲁伊一年一度的会议, with D.Fishwick, *The Imperial Cult in the Latin West: Studies in the Ruler Cult of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Vol.3* (2002), pp.9-20。

[29] Suetonius, *Tiberius* 50.1, *Claudius* 1.4, with B.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34, R.Seager, *Tiberius* (2005), pp.21-2。

[30] Dio 54.36.3-55.1.5, Suetonius, *Claudius* 1.2-3, Livy, *Pers.*142, with C.Wells, *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1972), pp.163-211涉及征服。

[31] 此处指小塞内卡（约前4～65年），罗马斯多噶派哲学家、政治家、戏剧家、幽默家。他是尼禄皇帝的教师和谋臣，后因被怀疑参与刺杀尼禄的阴谋而被迫自杀。他的父亲老塞内卡是著名修辞学家和作家。

[32] Dio 55.2.1-7, Valerius Maximus 5.5.3, Pliny, *NH* 7.84, Seneca, *ad Marciam* 3.2, with R. Seager, *Tiberius* (2005), p.22, and E. Champlin, 'Tiberius and the Heavenly Twins', *JRS* 101 (2011), pp.73-99, esp.76-81.

[33] Pliny, *NH* 36.72-73.

第五部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之子，祖国之父，前2～公元14年

我第十三次担任执政官期间，元老院、骑士阶层和全体罗马人民称呼我为祖国之父。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35

十九 父亲

奥古斯都对他的朋友们说，他有两个宠坏了的女儿，不得不忍受她们。一个是罗马共和国，一个是尤利娅。

——马克罗比乌斯，5世纪初^[1]。

命运将你提升到崇高的荣誉地位，李维娅，肩负这重担吧……如果你能做得到的话，请挺直脊梁，忘记你的忧伤，保持高昂斗志。当我们寻找美德的理想榜样时，最好你就是罗马人中的第一女性。

——佚名作者，可能写于1世纪初^[2]。

李维娅因幼子辞世而哀恸万分。更让她痛苦的是，有传言说，是奥古斯都害死了德鲁苏斯。苏埃托尼乌斯认为这种传言非常荒唐，他肯定是正确的，但这个传言已经散播出去了。恺撒的夫人私下里寻求亚历山大港哲学家阿莱乌斯的建议，此人得到她丈夫的尊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意思的是，他的建议非常“现代”：他鼓励悲痛的母亲抓住一切机会谈论她的儿子，并在家中到处展示他的肖像。德鲁苏斯的遗孀安东尼娅虽然只有二十多岁，却拒绝再嫁，带着孩子搬去和婆婆一起生活。德鲁苏斯与安东尼娅的两个儿子被授予“日耳曼尼库斯”的名字，以纪念他们父亲的胜利。元老院决定在城内为李维娅竖立一些雕像，并授予她“三子权”^[3]。她和奥古斯都的孩子流产了，不能算是一个孩子，所以她其实没有资格享有这个地位。^[4]

此项荣誉强化了李维娅作为理想的罗马妇人的公众形象。她的悲恸是真诚的，但被克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没有妨碍她继续履行公共和私人的职责。这与屋大维娅很不同，屋大维娅在儿子马凯鲁斯死后就不再抛头露面。后来，有人暗示或者直接指控李维娅玩弄阴谋诡计和谋杀，把李维娅的名声搞臭。所有的指控都涉及秘密的罪行，但就连最严厉的批评者也必须承认，她在公共场合的举止素来是完美无

瑕的。她的美丽受到赞扬，对奥古斯都的忠贞也从未受到质疑，所有人都说她非常贞洁（罗马人说的“贞洁”指的是，妻子只和自己丈夫睡觉）。有一个故事甚至暗示她有一种调皮的幽默感：有一次她坐轿子经过一些被剥光衣服、等待处决的死刑犯，她说看到这些裸男，就跟看到裸体雕像差不多。李维娅被视为一位忠贞贤淑而顺从的妻子，据说顺从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甚至亲自挑选美女供丈夫享用。^[5]

李维娅的肖像和奥古斯都类似，都表现得青春永驻、俊美秀逸，她的头发、服饰和仪态都洋溢着尊贵的优雅。她热爱时尚（很多人争相效仿她的穿着打扮），但着装始终在一位罗马贵妇的得体范围之内。她家中豢养着数量极多的奴隶、释奴和女仆，其中有很多化妆专家，无疑还有淘气的弄臣和侏儒，他们受过专门训练，专门娱乐主人，并常被赋予英雄的名字。李维娅很喜欢他们，罗马最矮的女侏儒就在她家中。李维娅朋友圈中的绝大多数贵妇应当都有这种爱好，但奥古斯都觉得侏儒和其他有严重畸形的人不吉利，所以不喜欢他们。前9年或前8年1月30日，李维娅庆祝了五十岁生日。她的身体似乎一直很健康，虽然痛失爱子，但她的自信和机智并没有减少一分一毫。^[6]

前9年，提比略庆祝他的小凯旋式，举办了一次宴会招待元老们。同时，李维娅和尤利娅举办并主持了一次宴会，招待贵妇们。这种做法也是奥古斯都发明的，让女性在其家族举办的胜利庆祝活动中拥有更重要的地位。李维娅并没有正式的权力，但她和皇族的其他女性往往扮演重要的公共角色，这与过去的行政长官夫人完全不同。有一份史料甚至说李维娅是罗马女性的元首，将“元首”这个非常男性化的概念拓展到李维娅身上，暗示了她对罗马人的妻子女儿享有类似的领导权。^[7]

奥古斯都的女儿和李维娅的儿子之间的婚姻起初很幸福。提比略离开罗马、奔赴巴尔干时，尤利娅陪他同去，并留在阿奎莱亚（位于

意大利北部和伊利里库姆的边界）支持他。尤利娅又一次怀孕了，但这一次不顺利，他们的儿子出生不久之后就夭折了。失望可能影响了夫妻关系，一年年过去，他们逐渐疏远。有传言说，尤利娅还是阿格里帕妻子的时候，就被提比略吸引。提比略相信了这话，对她产生了怨恨。他对维普撒尼娅还有一些爱；或者随着他和尤利娅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就越来越爱维普撒尼娅。提比略有一次在罗马偶然遇到自己的前妻，就跟着她。他双目含泪，脸上一副绝望的表情。亲戚们小心地安排，防止他们再次相遇。^[8]

尤利娅和提比略的性格迥异，没有互补，反而渐渐起了更多的冲突。提比略的个性非常复杂，无疑还记得自己幼年时遭遇的恐惧和逃亡生活。他关于人的行为举止的观念非常严厉和传统，而且不善于社交。提比略父亲的家系虽然古老，但地位不高，他如今的高位完全是由于母亲嫁给了奥古斯都。与他不同，尤利娅生在恺撒家族，是三巨头之一的女儿，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她父亲就成了罗马世界唯一的主人。随着夫妻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她开始公开表示对丈夫家世背景的鄙视。即便如此，提比略和梅塞纳斯与阿格里帕一样，深受元首的宠信，得到了极大权势。尤利娅的儿子们也是这样。^[9]

尤利娅顺从父亲的意志，在他的政治谋划中扮演指定的角色，帮助父亲先后巩固了马凯鲁斯、阿格里帕和提比略的忠诚，并为奥古斯都生了五个外孙和外孙女。如今，尤利娅觉得没有必要掩饰自己作为奥古斯都女儿的骄傲，也没有必要掩饰自己对奢侈享乐生活的酷爱。有人建议她效仿父亲朴素而节制的生活方式，她却答道：“他忘记了自己是恺撒，但我记得我是恺撒的女儿。”尤利娅和李维娅一样喜爱时髦，但比李维娅年轻约二十岁，更加高调奢华，也更风骚。有一次，她意识到父亲不欣赏她的仪表，尽管他什么也没说。次日，她穿了一套庄重得多的衣服，他显得很高兴。“这难道不是更合适奥古斯都女儿的风格？”他说。尤利娅回答：“今天我是为了父亲的眼睛打

扮的，昨天是为了丈夫的眼睛。”奥古斯都的女儿非常机智，在行为举止上有主见，不愿意听从其他人的指示。阿格里帕和提比略外出作战时，她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处。尤利娅虽然骄傲，但并没有令人讨厌的傲慢，所以她在罗马很受欢迎，既是因为大家喜欢她，也是因为喜爱她的父亲、前后三位丈夫和儿子们。[\[10\]](#)

离开的那个人

奥古斯都担心德鲁苏斯的死亡会导致日耳曼各部落再次侵犯罗马，于是在前8年派遣提比略接替他弟弟的岗位。元首在正式服丧期结束后进入罗马城，待了几个月，随后匆匆赶往高卢，督察军队在莱茵河以东的作战。虽然德鲁苏斯死了，但罗马军队还是展示出了强大力量和坚定决心，于是日耳曼各部落向罗马求和。全体日耳曼人的使者被传唤到卢格敦拜见奥古斯都，但苏刚布里人没有派使者来，于是他宣布不会和其他部落的使者打交道。最后，可能是在邻居们的压力之下，苏刚布里人派来了使者，但使者一到就被逮捕了。这违反了协议（不过罗马人违反外交协议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后来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俘虏被分开送往不同社区，作为人质扣押起来。但很快所有俘虏都自杀了。目前他们的部落同胞还没有开战，但罗马人这次背信弃义令日耳曼人在将来愈发仇恨和不信任罗马人。[\[11\]](#)

我们不太了解这一年作战行动的细节，但可能以展示武力为主，实际作战不多。盖乌斯·恺撒第一次品尝到军旅生活的滋味。他只有十二岁，还没有正式成年，但参加了一些操练。作为军饷发放的一些钱币上也有他的形象。可能是阿格里帕和德鲁苏斯的辞世促使奥古斯都决定，让较年长的养子比正常年龄早一些接触军事。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年的行动成果不多，提比略却被授予了一次完整的凯旋式，这是十多年来奥古斯都之外的其他人第一次获得此项荣誉。元首

则像往常一样，没有举行元老院授予他的凯旋式。秋季，提比略第二次当选执政官。[\[12\]](#)

虽然胜利的规模值得怀疑，但庆祝胜利的活动却非常宏大，在很多方面被视为近几年在日耳曼和巴尔干的艰苦战役的高潮。这些战役为罗马征服了许多土地，在多瑙河河畔的潘诺尼亚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设立了新行省。奥古斯都获得了征服者享有的另一项古老特权，正式扩大了罗马城的范围，不过很大一部分郊区仍然在罗马城范围之外，这种安排有时很有用。元首行使特别的执政官权力，命令执行一次人口普查，于前8年完成，登记了4233000名公民及其财产状况。奥古斯都的行省管辖任期已经有二十年了，如今再次被延长十年。尽管他已经将部分地区的管辖权交还给元老院，但在近些年里获得了伊利里库姆以及新征服土地的控制权。奥古斯都常常向元老们抱怨自己的负担太重，但他们和他本人依然毫不犹豫地扩大他的权限。和尤利乌斯·恺撒一样，元首也得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月份的殊荣。有些人希望把9月改成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生日在9月，但他选择了前面一个月，因为他在那个首次成为执政官，并赢得了许多胜利。于是，罗马旧历法的第六个月变成了奥古斯都月（August）。[\[13\]](#)

欢庆之外也有悲伤，因为梅塞纳斯在这一年去世了。奥古斯都的两位老友都辞世了，参加过内战的那一代人大部分都已不在人世，而亚克兴角战役时期的毛头小伙儿现在也至少四十多岁了。元首五十五岁，仍然给自己增加了很沉重的工作负担。梅塞纳斯的活动大体上一直在幕后，他没有正式衔级或官职。他的影响力在近些年可能下降了，但他能为元首提供建议和意见，所以仍然很重要。他在世时很低调，死时也没有引起什么轰动，但他把大部分财产留给了奥古斯都，包括罗马郊区一座规模相当大、非常奢华的别墅。不久之后，诗人贺拉斯也去世了，奥古斯都失去了“完美的阴茎”。贺拉斯既是奥古斯都快乐的通信伙伴，也愿意并能够用非常美丽的语言赞颂奥古斯都及

其政权。较年轻的诗人就像较年轻的政治家一样在接管大局，但奥古斯都都觉得这些年轻人有时不好驾驭，或者不符合他的世界观。[\[14\]](#).

最近几年里，他多次鼓励更多人从政，并提高元老院会议的出席率。根据罗马的传统，只要一位高级行政长官召集，元老院就要开会，所以会议可能很仓促。虽然仍需要一些紧急会议，但奥古斯都都在前9年规定元老院每个月必须开两次会，日期必须避开法庭审判日和其他需要元老出席的事情。无故缺席的罚款数额被提高了，但由于违反的人太多，只能抽签选出一小部分人来接受惩罚。奥古斯都为任何做出元老院官方决议的正式投票规定了法定人数。如果出席人数不到法定人数，决议仍然会被记录在案，但地位较低。每年会公布元老名册，参加每一次会议的人名和人数也被记录下来。

奥古斯都启动了这些改革，将所有提案公布在议政厅内，给元老们充足的机会去研读，然后再进行讨论。这些改革可能带来了一些变化，他表现出愿意接受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有时政坛太自由散漫，让他很不高兴。前8年执政官选举出现了严重的贿选现象，所有候选人，包括胜利者，都被判有罪。因为差不多所有人都参与其中，所以最后没有处罚任何人。但奥古斯都经常要求在将来的选举中，候选人要缴纳押金，如果发现他们有腐败行为，就会没收押金。[\[15\]](#).

前8年末，提比略返回意大利，先留在罗马城外，等待举行他的凯旋式。所以，前7年1月1日他就任执政官的时候，元老院在城市正式边界之外开会，具体地点是马凯鲁斯剧场旁的屋大维娅门廊。奥古斯都此时在外省，所以他的光辉没有遮蔽女婿的辉煌时刻。提比略在第一次演讲中宣布将以他和德鲁苏斯的名义修复广场上的和谐女神庙。这座神庙的第一位修建者曾在前121年带头私刑处罚激进的保民官盖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前63年西塞罗在这里召集元老院会议，

裁决喀提林党人的命运。在前7年或之前的某一年，提比略还承诺要修缮另一座神庙，即卡斯托耳与波鲁克斯神庙，也是以他和弟弟的名义。^[16]

卡斯托耳与波鲁克斯合称“狄俄斯库里”，或称“天神的孪生子”，是特洛伊的海伦的兄弟，以男子汉的美德和兄弟友爱著称。其中一人死后，另一人与其分享生命，于是兄弟俩轮流活着和死亡。狄俄斯库里在罗马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出现过，据说曾于前494年抵达罗马，宣布雷吉鲁斯战役^[17]的胜利。德鲁苏斯在世的时候，李维娅的两个儿子可能也曾以狄俄斯库里自命，后来提比略肯定宣传了这种观念。在过去，卡斯托耳与波鲁克斯神庙常被罗马人民用作非正式集会上即兴演讲的地点，在共和国的最后几十年里见证了许多动荡和有争议的集会。很难说提比略是否刻意对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神庙做出评论，如果的确如此，更难说他的态度究竟是什么。不管是不是这样，他肯定为罗马市中心的修缮做出了贡献，将其建设得更加宏伟，同时把所有建筑都与奥古斯都及其家人联系起来。^[18]

1月初，提比略庆祝了他的凯旋式，这是自前19年巴尔布斯的游行以来罗马城见证的第一次凯旋式。此后，他在卡比托利欧山上主持了一场宴会，招待元老们；而李维娅主持了另一场宴会，款待罗马的显赫贵妇。母子俩还主持了新建的李维娅门廊（在埃斯奎里努斯山上，奥古斯都主持建造，以妻子的名字命名）的落成仪式。李维娅门廊建在维迪乌斯·波利奥宅邸（后被拆毁）的原址，维迪乌斯就是那个用奴隶喂鱼的臭名昭著之人。拆掉这样一个不得民心之人的宅邸，并消除他的痕迹，无疑是受欢迎的举动。同样重要的是，李维娅门廊是一座宽敞的厅堂，为各种类型的公务活动（包括一些小型审判）提供了有屋顶遮盖的空间，是供广大群众使用的有价值的建筑，而不是过去那种炫耀私人财富的奢靡宅邸。李维娅门廊内设有一座献给和谐女神的祭坛或神龛，重申了国家与家庭和谐的主题。^[19]

上述的几次庆祝活动中都没有提到尤利娅，这很可能不是偶然。她没有特别的理由在庆祝李维娅门廊（以她婆婆的名字命名）的仪式中起到突出作用，但没有参加庆祝提比略凯旋式的宴会，就有些奇怪，与几年前他举行小凯旋式时的情况大相径庭。夫妻之间的私人隔阂已经影响了他们的公共角色。提比略离开罗马、返回日耳曼去指导前7年的作战时，他们两人应当都不会不高兴。奥古斯都返回罗马、盖乌斯·恺撒主持欢迎活动和选举计票大厅（这是阿格里帕重建的奢华的投票围场及其周边建筑群的一部分）落成仪式时，尤利娅无疑是愿意出席的。计票大厅是一个工程学上的巨大成就，带有罗马人建造的最大的无柱子支撑的屋顶。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它因火灾而坍塌，人们觉得太难重建屋顶，于是就让它保持露天状态。[\[20\]](#)。

前7年也发生了一些火灾，一场大火严重损毁了广场的部分区域和邻近地区。人们认为这是有人蓄意纵火，而非事故。一群债台高筑、希望自己房子被毁后得到赔偿的人成为怀疑对象。尽管市中心发生了这场骚乱，但还是举办了纪念阿格里帕的葬礼竞技，由盖乌斯·恺撒和卢基乌斯·恺撒同奥古斯都一起主持。角斗士比赛包括成对武士的对决和大规模混战，场地是投票围场（可能是搭建了临时看台），既是为了方便，也是为了让大家记得阿格里帕对公民同胞的贡献和慷慨。元首一行人中，除了奥古斯都之外，所有人都穿着黑色丧服。此事也是向公众进一步介绍他的两个养子的机会。[\[21\]](#)。

这一年，罗马城的行政经历了大规模重组，部分原因是上述的火灾。根据传统，罗马被划分为许多小区。奥古斯都如今重新划定了265个小区的边界，它们又被分为14个大区。在每个小区，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监督十字路口神龛（供奉该地区的保护神）的崇拜仪式，这些行政长官如今得到了更大的权限，威望也提高了。在特殊场合，这些行政长官有一对执法吏陪同，并可以在自己的小区内穿官袍。这些行政长官中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释奴，城市的大部分居民

也都是释奴。释奴阶层得到了担任正式官职、在本地享有权力和威望的机会。奥古斯都慷慨出资，将全市的十字路口神龛翻修得更精美，将自己的名字与保护各个社区的本土精灵和神祇联系起来。元首的形象不仅在城市的所有纪念性建筑中，还在迷宫般的小巷里，几乎无处不在。在将奥古斯都和神祇一同供奉的祭坛前，自由人和释奴都定期献祭，有的是以个人身份，有的是以社区的集体身份。公元1年建造的一座祭坛带有这样的铭文：“献给墨丘利^[22]、永恒之神朱庇特、天后朱诺、密涅瓦、太阳神阿波罗、月神狄安娜、粮食之神、伊西斯和虔敬之神、神圣的命运女神，愿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他的力量、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力量以及各民族，吉祥如意……卢基乌斯的释奴，卢基乌斯·卢克雷提乌斯·泽图斯，遵从朱庇特之命，献上此祭坛。胜利属于人民！播种顺利，健康永福！”

奥古斯都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崇拜，但那些参与“奥古斯都”祭坛仪式的人代表他做了礼拜。除了传统的罗马男神祇之外，还包括伊西斯，这表明罗马大多数居民的信仰，以及他们的种族身份发生了变化。国家不时企图镇压希腊化的埃及宗教崇拜，但未能阻止它的稳步传播，最后伊西斯终于被罗马当局接受，被纳入保护罗马城的传统的万神殿。^[23]

前6年，提比略返回罗马，于6月获得了新荣誉。奥古斯都在新的一年继续获得保民官权力，这也被授予他的女婿，为期五年。提比略还获得了高级资深执政官地位（至少在地中海东部有效）。只有阿格里帕曾以这种方式分享元首的崇高地位，如今奥古斯都显然在期望提比略履行与阿格里帕相同的职责，分担元首的大部分工作，并扮演帝国的救火队，东奔西跑地处理一个又一个危机和问题。这一次，帕提亚的宫廷政变威胁了亚美尼亚的稳定和罗马在东方的利益。提比略在这一年11月就三十六岁了，现在他已经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将领和行政管理者，他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外省。阿格里帕和德鲁苏斯

不在了，奥古斯都的养子还是小孩，所以一切迹象都表明，从今往后，提比略几乎马不停蹄地在帝国全境奔波。得到崇高地位是要付出代价的。[\[24\]](#)

这一年晚些时候，罗马人民聚集在阿格里帕扩建的奢华选举围场内，召开百人会议，选举盖乌斯·恺撒为下一年的执政官之一。盖乌斯不是候选人，而且还没有成年，因为他虽然已经年满十四岁，但还没有正式换上成年人的托加袍。选民将他的名字写在选票上，就像过去他们选择同样不是候选人的奥古斯都一样。元首的两个养子深得民心，十一岁的卢基乌斯前不久到剧院时受到了群众的热情欢呼，当时并没有显赫的大人物和他一起出现。但我们还是很难相信群众选举盖乌斯是完全自发的。更可能的情况是，尤利娅的朋友，或者至少是那些向她和她的儿子们邀宠的人，在试探群众对此事的反应。

奥古斯都大为不悦，迅速采取行动来遏制群众的热情。此事又一次表明，他比其他罗马人更注重传统。虽然他已经将高级行政长官的最低年龄资格降低了十岁，并允许自己的家人以更小的年龄参选，但将一个孩子选为执政官，仅仅因为他是奥古斯都的养子，肯定会让执政官的地位贬值。奥古斯都觉得必须对百人会议（被富裕公民把持）加以约束。后来在一次公共集会上，奥古斯都拒绝接受群众的投票。他公开祈祷，希望再也不会出现需要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担任执政官的国家危局，就像他在前43年那样。大约在这个时期，元首宣布，他本人而不是他的养子要参加竞选。他可能还承诺等盖乌斯成年后授予他一些荣誉。盖乌斯将成为一位大祭司，被允许参加元老院会议，并在公元1年他二十岁时担任执政官。奥古斯都可能希望盖乌斯到二十岁时给他一个公共角色，但群众推选盖乌斯为执政官的事情可能反映了他自己的亲人和一些群众要求提拔尤利娅的儿子们的压力。[\[25\]](#)

不久之后，提比略突然宣布要退出政坛，说他劳累多年，已经心力交瘁。他不愿意再监管东方各行省和边疆，希望过退隐生活，到罗德岛从事学术研究。起初大家并不以为他是认真的，奥古斯都不准他退隐，但他一直坚持。最后提比略以绝食抗议，一连四天滴水未进，直到元首妥协。奥古斯都公开谴责女婿逃避对国家的责任，最后很不情愿地批准了。提比略没有像一位罗马统帅那样威风凛凛地去外省，而是悄悄离开意大利，身边只有一些朋友。奥古斯都患病的消息让提比略犹豫了一段时间。元首可能是真的病了，也可能是假装生病，希望李维娅的儿子回心转意。但没有更坏的消息传来，而且提比略觉得自己这样逗留，会让大家觉得他在等待岳父死去，于是终于起航了。他在途中停留，强迫帕罗斯城把一座灶神像卖给他。他宣布要将此神像陈设在和谐女神庙。[\[26\]](#)



战神广场

奥古斯都毫不掩饰自己对提比略的愤怒，因为是他把提比略扶持成自己的女婿和国内仅次于他自己的第二号人物，提比略却背叛了他。阿格里帕从来没有这样抛弃过他（不过在阿格里帕晚年，由于他和马凯鲁斯的竞争，阿格里帕曾尝试中断自己在东方的任职），但阿格里帕已经死了，德鲁苏斯也死了，提比略离开了他，而盖乌斯和卢基乌斯还太年轻，不能辅佐他。五十七岁时，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暂时失去了他多年来精心栽培的所有助手。奥古斯都很恼怒，也很困惑，他和其他人都不明白提比略为什么突然要退隐。史料反映了人们的困惑，古往今来的学者对此众说纷纭：提比略嫉妒盖乌斯和卢基乌斯；或者提比略希望这两个孩子不会受到他的成功的威慑，能自己闯出一番事业。后来有人说，他逃离罗马，是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和尤利娅一起生活。[\[27\]](#)

这些解释都没有道理。提比略完全可以多年巡视外省，这样就可以避开妻子，而不需要采取退隐的极端措施。盖乌斯和卢基乌斯还太年轻，目前还不可能是他的竞争对手，而提比略在临走之前向奥古斯都和李维娅展示了自己的遗嘱，两个孩子是他的主要继承人。现代学者经常将提比略的地位解读为实际上的摄政王，他要帮助奥古斯都领导国家，直到两个孩子足够成熟、能够接管局面。奥古斯都显然不是这么想的，并且继续筹划多人联合辅佐他、在他死后合作领导国家的计划。即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他的这种想法。如果尤利娅及其亲信希望她的两个儿子尽快上位，那么提比略可能感到自己的长期地位已不稳固了。但提比略已经差不多拥有了一切权力，奥古斯都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了。如果提比略是把辞职当成讨价还价的手段，那么说得好听些也是大错特错，而且会适得其反，让提比略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失去所有权责，尽管直到公元前1年他所享有的保民官权力和军权才到期。

有时候，表面上的事情往往包含很多真相。提比略说自己太累了，他在过去十年中的确有八年在南征北战，而且未来也不会有机会闲下来。这与传统的政治生涯迥然不同，过去的行政长官和外省职务都不会延续这么久，会有机会在家休息。奥古斯都、阿格里帕和他们选来帮助自己的人必须持续不断地工作，没有较长的休息时间。这种前景是令人生畏的：持续辛劳的一生，阿格里帕就是因为劳累过度而早逝。提比略虽然具有贵族的责任感，但他当了元首之后，大部分时间都远离罗马，隐居起来。奥古斯都抱怨自己的负担太重，但似乎愈战愈勇，喜欢与个人和群众不断接触，而不感到特别劳累。提比略对工作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热情，而是带着一种严峻的责任感去劳作。弟弟的去世、不幸的婚姻、疲惫的身心，再加上辛劳不断的未来，以及最终要和他讨厌的妻子生的毛头小子分享权力，这些都让他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所以他的退隐可能和政治没有多大关系。提比略疲惫而腻烦，于是逃离了压力和责任，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再需要继续工作。[\[28\]](#)

父亲、孩子和信任

奥古斯都只得一个人统领帝国。前5年，他第十二次担任执政官，他上一次担任执政官还是十八年前。盖乌斯第一次披上成年托加袍的那天，奥古斯都引领他与公众见面。不久之后，盖乌斯被授予史无前例的“青年元首”头衔，并被指定为骑士阶层的名誉领袖，这个概念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两个头衔都没有实际的权力或真正的职责，但肯定让盖乌斯更加受到公众关注。在等待养子长大成人的时候，恺撒·奥古斯都不得不依赖其他人来领军作战。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是前16年执政官，而且是大安东尼娅的丈夫，所以算是元首的亲属，他奉命指挥日耳曼的作战，打了一场大战役。接替他的马尔库斯·维尼基乌斯也开展了大规模行动，他是一位新人，前19年担任执政官。并非所有被选拔为军队统帅的人都是奥古斯都的亲戚，

但都得到信赖，其中大多数人连续得到不同职务，有时还得到凯旋式荣誉的奖励。^[29]

关于提比略退隐的这些年，史料语焉不详，很难重建细节。狄奥的叙述高度概括，从前5年一下子跳到了前2年。其他边疆可能有更多的军事行动，《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列出的一些没有旁证的胜利可能就发生在这些年。据我们所知，奥古斯都在这些年里很少旅行，似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巡视外省。元首没有一位高级助手，所以最好留在罗马，让代表团来见他。仍然不断有人向他请愿，只有在这个时期他才能亲自处理其中大部分事务。有时请愿的事由非常重大。前12年，亚细亚社区遭遇一连串地震，地震又引发了火灾，灾情严重，于是当地人请求减免税赋。奥古斯都为亚细亚免税两年，然后自掏腰包，将相当于两年税收的金钱缴纳国库，以便让亚细亚有时间恢复元气。^[30]

有的事情涉及范围较小，也更私人化。前6年，希腊的克尼多斯岛派遣一个使团去拜见元首。有两位使者都叫狄俄倪索斯，其中一人的父亲也叫狄俄倪索斯，另一人的父亲和祖父都叫狄俄倪索斯。他们前来控告一个叫阿纳克桑德利达斯之子欧布罗斯的人和他的妻子蒂菲拉谋杀了克律西波斯之子欧布罗斯。克尼多斯人在取名的时候显然没有什么想象力，但这件罪案颇不寻常。受害者的兄弟及其追随者曾连续三夜攻击被告夫妻俩的家宅。奥古斯都在给克尼多斯社区的信中写道：“欧布罗斯和蒂菲拉夫妇，因为在自己家中无法得到安全，于是通过协商……或在家中设防抵抗攻击，命令他们的一名家奴，不是杀人（被这种事情激怒的人完全可能会杀人，他的愤怒也是正当的），而是向攻击者泼粪，迫使其后退。但家奴……将便壶和里面的东西一起抛了下去，把欧布罗斯砸死了……”

当地社区可能是在死者兄弟的影响下，认定欧布罗斯和蒂菲拉夫妇应当负责，而这对夫妇通过总督阿西尼乌斯·伽卢斯向奥古斯都上诉。伽卢斯命令按照罗马人的惯例，对夫妇俩的家奴进行审问，但那个抛下便壶的奴隶坚持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不过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奥古斯都继续写道：“我将审讯笔录也发给你们。你们对这些奴隶过于严酷，对犯罪行为的错误方面吹毛求疵、穷追不舍，对那些罪有应得的人（因为他们连续多次在夜间暴力攻击他人的家宅，三次强行攻入）却不生气……所以被告才这么害怕把奴隶交给你们审讯。”

在此案中，真正的受害者（即暴力攻击的受害者，也是当地审判不公的牺牲品）最终从元首那里得到了公正的裁决，但这可能花了很长时间，并且经历了相当多的困难，花了不少钱。奥古斯都发布裁决、指示克尼多斯“修改公共档案”以符合其意见的时候，被告欧布罗斯已经去世。[\[31\]](#)

个人、社区，甚至整个行省，都向恺撒·奥古斯都上诉，请求他的评判。君王亦是如此。大希律王有多达十位妻子和一大群儿女。其中两个最受宠的儿子被送往罗马抚养，在奥古斯都家中接受教育，但这两个儿子是被处决的米利暗生的，所以大希律王并不信任他们。多年后，大希律王将两个儿子召回身边。前13年，他把两个儿子带到意大利，来到元首面前，互相指控背信弃义。此事暂时得到了解决，但在前7年，国王又一次指控两个儿子阴谋反对他。这一次他没有亲自去罗马，而是派了使者。奥古斯都命令在贝里图斯举行一次特别庭审，他的叙利亚总督和其他一些罗马人奉命审理此案。两个儿子被判有罪，很快被处决，尽管罗马人的主张是监禁。[\[32\]](#)

大希律王年事已高，身体很差，觉得周围所有人都是他的威胁，都要背叛他，因此对自己的亲属进行了一连串屠杀。奥古斯都冷淡地评论道，他“宁愿当大希律王的猪，也不愿当他的儿子”[\[33\]](#)。但犹

太国王自始至终对罗马忠心耿耿。前4年，大希律王显然已经时日无多，一群人聚集起来，拆毁了他立在犹太教圣殿主门前的金鹰。犹太人仇恨这个金鹰，可能是由于它违反犹太教禁止偶像的律法，而不是因为它是罗马的象征。虽然群众行动得很迅速，但很快被逮捕并带到国王面前。他命令将拆毁金鹰的人活活烧死，那些鼓舞他们的人也被处决。大希律王虽然不得民心，但对王国的控制仍然是牢不可破的。不久之后他就死了。奥古斯都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包括盖乌斯·恺撒）来决定如何安排犹太国的未来，最后将王国分割为三块，分给大希律王仍然在世的三个儿子。大约是大希律王在位的最后一年，耶稣诞生了。这对此后的历史显然有着重大意义，但不是奥古斯都的故事的一部分。（对证据的讨论，见附录二。）大希律王死后不到一年内，叙利亚总督两次率军进入犹太国，平定针对大希律王继承者及其罗马后台的暴力骚乱。^[34]

亚克兴角战役已经过去很久了，自前30年以来，除了边陲的一些小规模战役之外，东方各行省几乎一直安享太平。人民接受了罗马的统治，罗马统治带来的和平与稳定也受到欢迎和珍视。早在前26～前25年，亚细亚一些社区组建的议事会（负责参加对罗马和奥古斯都的崇拜仪式）悬赏鼓励大家设计恰当的尊崇奥古斯都（就是他给人民带来了这个和平安定期）的方式。前9年，终于有人获奖。因为受奖者是一位罗马的资深执政官，所以他可能事先征求了元首的意见并得到了批准。从此，所有社区都改变了自己的历法，改为一年从9月23日（奥古斯都的生日）开始。这一天成了“恺撒月”的第一天。前4年，奥古斯都引入了一种新程序，能让外省社区更快捷地起诉贪赃枉法（非法杀人的罪行除外）的总督。奥古斯都的形象和名字在各行省无处不在，他做了很大的努力确保善政，不过新的体制可能对腐败的行政官员有利，因为审判他们的将是其他元老，而元老们的本能就是同情自己的同僚。^[35]

前2年，六十岁的恺撒·奥古斯都第十三次担任执政官，卢基乌斯·恺撒的成年典礼因此得到了更多荣誉。这个十五岁的少年被任命为观鸟占卜师，并和哥哥一起成为青年元首。他也被允许参加元老院会议，还被内定为公元4年的执政官。前2年2月5日，元老院和人民投票决定授予奥古斯都“祖国之父”的称号。历史上多次有人获得这个称号，但到奥古斯都之前已经变得罕见了。西塞罗于前63年，以及尤利乌斯·恺撒在做独裁官时均获得过“祖国的家长”称号，不过这个称号不是很确定，有人相信他们当中的一人或两人的称号是“祖国之父”而不是“祖国的家长”。西塞罗的这项荣誉是非正式的，而尤利乌斯·恺撒的称号是元老院正式投票授予的。在罗马文化中，父亲，尤其是一家之主，受到极大尊重，但奥古斯都的头衔和西塞罗与尤利乌斯·恺撒的未必有很大差别，只是措辞略有不同，让奥古斯都更突出，并强调他是万民之父。一个代表广大群众的团体向奥古斯都授予这个称号时，他起初拒绝了。后来在剧院的一次演出上，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瓦列里乌斯·梅萨拉代表其他元老，再一次走到奥古斯都面前，宣布：“所有的祝福和神的恩宠都属于你和你的家人，恺撒·奥古斯都！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请求诸神赐予共和国永久的好运，给我们的城市不朽的喜悦。元老院在全体罗马人民支持下，宣布你是祖国之父！”

奥古斯都感动得流下眼泪，答道：“我已经达成了自己最深切的心愿。诸位元老，我还能向不朽诸神祈祷什么呢？我只能接受你们所有人同意赋予的荣誉，直到我的生命结束。”^[36]

元首先是百般谦逊地推辞、最后迫于群众压力接受的惯例已经根深蒂固了，双方肯定都理解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但事实仍然是，奥古斯都直到这一阶段才接受这个头衔。如果他想要的话，肯定早就接受了。一方面推辞、另一方面施压的惯例让双方都很舒服，但真正对奥古斯都的荣誉加以限制的是奥古斯都自己，而不是所谓的元老们的

反抗。梅萨拉是前31年执政官，曾经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盟友，后来是安东尼的党徒，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前转换阵营，后来获得了一个行省总督职位和一次凯旋式。他属于曾亲眼看到恐怖内战的那一代人，如今这个群体在不断减小。不管奥古斯都做过什么不堪的事情，他已经给国家带来了差不多三十年的稳定和内部和平，仅凭这一点，群众对他的赞颂肯定是真诚的。他的骄傲也是货真价实的。《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的最后一段就是讲他获得“祖国之父”的荣誉：“我第十三次担任执政官期间……元老院、骑士阶层和全体罗马人民称呼我为祖国之父，并下令将此头衔铭刻在我的宅邸门廊和元老院议政厅。”^[37]

在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奥古斯都已经从满腔怒火、为父报仇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统一天下的年迈政治家和罗马世界的“父亲”。两个养子和他一样广受爱戴，正在接受教育和培养，准备身居高位。他的女儿（也是他唯一的孩子）却不是很愿意扮演父亲为她指定的角色。

提比略退隐罗得岛之后，尤利娅又茕茕孑立了。很可能在此之前夫妇已经分居多年，所以他的离去并不显得十分戏剧性。对尤利娅来说，孤单也不是稀罕的事情，因为她和阿格里帕还是夫妻的时候，阿格里帕大部分时间也在外省。但尤利娅不喜欢寂寞。她非常活泼，喜爱艺术，尤其是诗歌，喜欢和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美貌贵族青年待在一起。她深知自己地位显赫，所以她的圈子几乎全是出身豪门望族的青年贵族，他们的姓氏可以追溯到罗马的上古。他们都很年轻，没有参加过内战（对他们父母那一代人来说，内战肯定是改变他们生活的最重要体验），是在和平与繁荣的年代成长起来的。^[38]

诗人奥维德（普布利乌斯·奥维德乌斯·纳索）与尤利娅年龄和经历相仿，他的诗歌优美而充满激情，也有一种调皮捣蛋的意味，有

时甚至显得轻浮。他没有早先一代诗人（他们经历过政治清洗、土地被没收的年代）阴暗的潜意识和严肃性，而有着一种无法压抑的喜悦感。大约前2年，他在创作三卷本《爱的艺术》，这部诗歌表面上是技术手册，讲述如何寻觅和赢得爱人。这部书主要讲的不是性爱，而是引诱，而且描述了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一些纪念性建筑，并重述了一些著名的神话故事，如伊卡洛斯^[39]的故事，与此同时向男女读者提供建议。他多次向读者保证，自己并不是在颂扬通奸（他笔下的女性不是明媒正娶的妻子，而是情妇，其中很多是释奴），并没有威胁罗马正当的婚姻和繁衍后代（这些都是奥古斯都政权积极推动和鼓励的事情）。他的笔调从来不是刻板和说教式的，一直到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最后一行都是这样。在最后一行，他让听取其建议的人宣称：“纳索是我们的教师。”^[40]

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有时会抱怨罗马精英阶层年轻一代的放荡不羁和漫不经心的奸情。这两位作家将真相与狂野的夸张搅和在了一起。到前1世纪，很多出身高贵的富裕女性不再满足于枯坐家中，静静等待丈夫从帝国的某个角落返回。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都曾追逐有夫之妇，这样的风流浪子不止他们两人。和通常情况一样，谣言往往比真相夸张许多倍，但有些贵妇的确会养情夫，更多贵妇则享受着男性青年贵族的陪伴，并纵情享用美酒、盛宴、舞蹈和音乐。

尤利娅就是这样一个女子，显然非常喜爱奢靡的生活和男性的陪伴。在她与阿格里帕的婚姻中，据说奥古斯都曾怀疑她不贞，但后来看到她的所有孩子长得都很像阿格里帕，才放下心来。据说尤利娅曾逗趣地说，她“除非船上已经载满货物，否则不会允许乘客上船”。至少有一次，奥古斯都写信给一位元老，要求他不要去拜访他的女儿，但奥古斯都似乎让自己相信，尤利娅的行为举止虽然愚蠢，但并没有越轨。奥古斯都暗示尤利娅，她应当效仿她的继母（李维娅的朋友都是成熟稳重的女性，与尤利娅身边花天酒地的年轻人截然不

同)。毫无疑问，尤利娅对此的反应非常冷淡，毕竟李维娅比她大二十岁左右。尤利娅向元首保证，她的朋友也会“和她一起变老”。前2年，尤利娅三十七岁了，已经生了六个孩子。人们往往会努力与衰老对抗，尤其是那些为自己的美貌而骄傲的人。有一次，尤利娅的奴隶帮她拔掉白发时，奥古斯都突然来了，后来问她是不是“宁愿秃头，也不愿意有白头发”。^[41]

前2年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元首发现了确凿的证据，尤利娅有一桩或更多婚外情。我们不知道奥古斯都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也无法判明事情真相。所有史料都不怀疑她有情夫。有些情夫被指名道姓，如诗人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一个阿庇乌斯·克劳狄、一个西庇阿、提图斯·昆克提乌斯·克里斯皮努斯（前9年执政官），以及最有意思的是，尤卢斯·安东尼（马克·安东尼和富尔维娅的儿子）也名列其中。此外还有一些没有名气的情人，但史料没有给出具体的姓名。被指名的情夫毋庸置疑都是豪门贵族，所有人都可能和尤利娅年龄相仿。

除了通奸之外，尤利娅还被指控有一些肆无忌惮、令人发指的恶行。据说她公开举行酩酊大醉的聚会，甚至在演讲台上狂欢取乐；她还在夜间集会，给广场上的马西亚斯（一个以音乐才能闻名的萨提尔^[42]，与酒神巴克科斯有关联）雕像戴上花环。更疯狂的故事说，尤利娅渴望新的刺激，公开向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我们本能地将这些故事视为无聊的流言蜚语。我们这么做很可能是正确的，不过历史上的确有人做过一些相当愚蠢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不过这些指控可能说明，尤利娅和她的圈子越来越放荡不羁了，他们可能确实在公共场所聚会。如果真的是这样，就让人想起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亚历山大港的彻夜狂欢，这颇有讽刺意味。或许所有人都假定奥古斯都知道这些事情，并且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自己的女儿。^[43]

很多情夫出身名门望族，所以许多学者认为此事背后有政治因素在发挥作用，这些情夫其实是在阴谋夺权。普林尼声称当时有人企图刺杀奥古斯都。狄奥说尤卢斯是幕后黑手。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连暗示也没有，尤利娅也不大可能会图谋弑父。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她希望得到允许与提比略离婚，然后嫁给尤卢斯，让尤卢斯成为元首的新女婿之后有希望获得更多权力和职责，并与奥古斯都（将来还有年轻的盖乌斯和卢基乌斯）一起成为国家领导人。假如奥古斯都在接下来几年里去世，尤卢斯和尤利娅将能辅佐儿子们，与他们分享权力。前6年，盖乌斯被选举为执政官，这说明有人在推动尤利娅的两个儿子迅速攀升。她和其他人希望从中获利，是说得过去的。这或许就是她和情夫的计划，或许也有人在疯狂地大谈自由和企图恢复旧贵族世家的主宰地位（马西亚斯雕像和遮蔽它的无花果树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人民自由的象征）。[44]

可能确实存在这些绘声绘色的传言，尤利娅或许真的想和尤卢斯结婚。但是，尽管历史学家给出了很多聪明的理论，但不大可能存在有组织的阴谋。奥古斯都肯定没有把这事情当成政治阴谋来处理。奥古斯都对女儿连续多次通奸罪行的公开谴责也极不可能是掩盖失败政变的烟雾，尤其是因为他曾颁布非常严厉（而且受到广泛怨恨）的关于婚姻和通奸的法律。元首让他的家人扮演非常公开化的角色，把他们当作罗马人恰当行为的榜样。对奥古斯都来说，尤利娅的通奸是比提比略退隐更严重的背叛。奥古斯都肯定有很深切的感受。他原本无须公开处理此事，却坚持让元老院来处置，让一名财务官宣读他的书信，因为他无法亲自到场发表讲话。

尤卢斯·安东尼自杀了——可能因为他预见到自己会被判死刑，后世的史料含糊地说他是被杀的也为这一推测提供了佐证。其他所有情夫都被流放。其中一人是在任的保民官，被允许结束任期之后遣送出国。尤卢斯·安东尼的年幼儿子也被放逐，后来在马西利亚[45]生

活，死在那里。总的来讲，这些相对宽大的处理是驳斥政治阴谋论的最有利论据。在过去，奥古斯都处决阴谋反对他的人时很少会犹豫。大多数罗马人显然认为，对于通奸罪，这样的处罚过于严苛了。塔西佗后来说，元首仿佛在处置叛国罪。这种说法或许最接近真相。奥古斯都义愤填膺，觉得自己女儿的不端行为是极大的个人耻辱，她的情夫们是故意羞辱他和他的家庭。这是对其威望的打击；或者，从很多方面看，甚至更严重，因为人民对他的印象并没有变坏，受损害的主要是他的自尊。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感到羞耻和愤怒，而不是畏惧。^[46]

他不肯见尤利娅，将她放逐到小岛潘达特里亚^[47]。她在岛上没有酒喝，没有任何奢侈品，也几乎见不到任何男人。到岛上处理公务的男人，不管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只有在奥古斯都仔细检视其外貌和人品之后，才被允许登岛。尤利娅的女释奴福柏自杀了，可能是因为卷入丑闻而感到羞耻，或者是畏罪。奥古斯都说“宁愿自己是福柏的父亲”。但尤利娅的母亲斯科利博尼娅陪伴她一同流亡。有人认为这是斯科利博尼娅在公开驳斥尤利娅通奸的指控，但完全可能是母亲仍然爱着自己的女儿，并愿意原谅她。而奥古斯都却不愿意宽恕女儿。^[48]

整个事件让恺撒·奥古斯都十分震怒，他要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受到惩罚和公开羞辱。后来他的怒气平息了一点。尤利娅在岛上待了五年之后，被允许搬到大陆上瑞吉昂^[49]附近的一座更舒适的别墅，但仍然不能接触奢侈品和男性。虽然罗马群众多次组织大型游行要求奥古斯都释放尤利娅，但都被他坚决拒绝。后来他说自己后悔当初的做法，若是私下处理此事就好了。塞内卡说，奥古斯都抱怨道，假如阿格里帕和梅塞纳斯还活着，给他出主意，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至少他们会告诉他真相，阻止整个事件发生，或者至少阻止尤利娅的不端行为变得那么严重。但他的两位老友都已经不在了，较年

轻的朋友也不在了，只留下奥古斯都日渐衰老和孤立。他的希望越来越集中在盖乌斯和卢基乌斯身上。^[50]

^[1] Macrobius, *Saturnalia* 2.5.4.

^[2] Anonymous, *Consolation to Livia* 349–56. 这部著作据说是在德鲁苏斯死后有人写给李维娅的，但可能其实是几十年后克劳狄在位期间撰写的修辞学练习。对李维娅角色的讨论和关于此话题，见N.Purcell, ‘Livia and the Womanhood of Rome’,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86), pp.78–105. J.Edmondson (ed.), *Augustus* (2009), pp.165–94。

^[3] 三子权 (Jus trium liberorum) 是奥古斯都为鼓励上层阶级生育而引入的一种特权，授予生了至少三个孩子的公民或至少四个孩子的释奴。享有三子权的男子可免除为公众提供福利的义务；享有三子权的女子可不再处于男性亲属的监护下，可自行处置财产和继承遗产。然而罗马上层阶级不愿意生养很多孩子，所以想尽办法利用法律的漏洞。

^[4] Dio 55.2.3, 5–7, Suetonius, *Claudius* 1.4–5, Seneca, *de consolatione ad Marciam* 4.3, with A.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44–5, 108–9.

^[5] Dio 58.2.4, Suetonius, *Augustus* 71.1, 讨论见A.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122–6, Purcell (2009), pp.167–72。

^[6] Suetonius, *Augustus* 83, Pliny, *NH* 7.75; A.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103–6, 180–81, 364, n.7提及记载李维娅家中仆役的许多铭文，人人都有非常具体的职责，如管理服装的人，见CIL 6.3985, 4041, 4251，摆放珍珠的人，见CIL 6.3981。

^[7] Dio 55.2.4, with Purcell (2009), pp.165–8, 177–80.

^[8] Suetonius, *Tiberius* 7.2–3, with B.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31–2, R.Seager, *Tiberius* (2005), p.20, 及 E.Fantham, *Julia Augusti, the Emperor's Daughter* (2006), pp.79–82.

[9] Tacitus, *Ann.*1.14.3, 53.2, with B.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 p.37.

[10] Macrobius, *Saturnalia* 2.5.5, 7.

[11] Dio 55.6.2-3, 参见Caesar, *BG.* 4.7-9谈及尤利乌斯·恺撒逮捕日耳曼部落的使者, 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51.1-2讲到对恺撒此种背信弃义行为的批评。

[12] Dio 55.6.4-5, with E.Fantham, *Julia Augusti, the Emperor's Daughter* (2006) , pp.97-8.

[13] Dio 55.6.6-7, Suetonius, *Augustus* 31.2, Macrobius *Saturnalia* 1.12.35, *Res Gestae* 8, with M.Boatright, 'The Pomerian extension of Augustus' , *Historia* 35 (1986) , pp.13-27.

[14] Dio 55.7.16, Suetonius, *Horace*, 称诗人卒于前8年11月27日, 梅塞纳斯死后的第五十九天; 关于梅塞纳斯的影响力, 见G.Williams, 'Did Maecenas "Fall from favour" ? Augustan Literary Patronage' , in K.Raaflaub & M.Toher (eds) , *Between Republic and Empire. Interpretations of Augustus and his Principate* (1990) , pp.258-75.

[15] Dio 54.30.2, 55.3.1-4.2, 5.3.

[16] Dio 55.8.1-2.

[17] 大约前493或前489年(年份无法确定), 新生的罗马共和国击败了拉丁联盟(领导者为前不久被驱逐的罗马末代国王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此役是塔奎尼乌斯家族夺回罗马的最后一次尝试。

[18] 讨论见E.Champlin, 'Tiberius and the Heavenly Twins' , *JRS* 101 (2011) , pp.73-99。

[19] Dio 55.8.2, with A.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 pp.46-7, B.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 pp.36-7.

[20] Dio 55.8.3-4, Pliny, *NH.*16.20.

[21] Dio 55.8.5-6.

[22] 罗马神话中的墨丘利大致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是商业、雄辩（及诗歌）、信息（通信）、旅行、边界、运气、诡计和盗贼之神，也是引领死者灵魂去往冥界的使者。

[23] Dio 55.8.6-7，关于献词见 *CIL* 6.50705 = *ILS* 3090 with Purcell in *CAH2X*, pp.800-02。

[24] Suetonius, *Tiberius* 9.3, 11.3, Velleius Paterculus 2.99.1, Tacitus, *Ann.* 56.3, Dio 55.9.4, with B. 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35-6.

[25] Dio 55.9.1-5, with B. 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37-8, 概况见 ‘Julians and Claudians’, *Greece and Rome* 22 (1975), pp.29-38。

[26] Dio 55.9.5-8, Suetonius, *Tiberius* 10.1-2, Velleius Paterculus 2.99.1-4.

[27] 讨论见 Crook in *CAH2 X*, pp.100-01, B. 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37-40 及 *Augustus. Image and Substance* (2010), pp.182-3, R. Seager, *Tiberius* (2005), pp.23-7, E. Fantham, *Julia Augusti, the Emperor's Daughter* (2006), pp.83-4, A. 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48-9, J. Corbett, ‘The Succession policy of Augustus’, *Latomus* 33 (1974), pp.87-97, 尤见 87-91, 及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391-2, 413-14。

[28] Seneca the Younger, *On the shortness of Life* 4.2-5 谈及奥古斯都都抱怨自己政务的沉重负担。

[29] Dio 55.9.9, 10a.2-3, with Gruen in *CAH2 X*, pp.182-3, and E. Fantham, *Julia Augusti, the Emperor's Daughter* (2006), p.99.

[30] 亚洲的税务，见 Dio 54.30.3。

[31] *EJ* 312 = *SIG3* 780 (译有 M. Cooley [ed.], *The Age of Augustus. Lactor* 17 [2003], pp.197-8)。

[32] Josephus, *BJ* 1.538-51, 概况见E. Shürer, G. Vermes & F. Millar,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1 (1973), pp.320-29, Goodman in *CAH2* X, pp.741-2, 及 L. White, 'Herod and the Jewish experience of Augustan rule', in K. Galinsk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Augustus* (2005), pp.361-87, 尤见375-6见到大希律王的最后时光。

[33] 因为犹太人不能吃猪肉, 所以猪是安全的。

[34] 奥古斯都的笑话, 见Macrobius, *Saturnalia* 2.4.11; 处决, 见 Josephus, *BJ* 1.648-53; 对叙利亚驻军的干涉, 见*BJ* 2.45-79。

[35] 见R. Sherk, *Roman Documents from the Greek East* (1969), no.65讲到新历法, V. Ehrenberg & A. Jones,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Reigns of Augustus and Tiberius* (2nd edn, 1975), 311, v。

[36] Suetonius, *Augustus* 58.2, 他自称准确记录了梅萨拉和奥古斯都的话, Crook in *CAH2* X, pp.101-2, 及B. Levick, *Augustus. Image and Substance* (2010), pp.91-2, 204-5; 对各种颂扬和对此项荣誉的庆祝, 详见 W. 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pp.193-7, 详尽讨论这个术语及国父的概念, 见 T. Stevenson, 'The ideal benefactor and the father analogy in Greek and Roman thought', *CQ* 42 (1992), pp.421-36, 他认为西塞罗闾尤利乌斯·恺撒都被命名为祖国之父。M. Gelzer (trans. P. Needham), *Caesar, Politician and Statesman* (1968), p.315, fn.2讲到尤利乌斯·恺撒的情况。

[37] *Res Gestae* 35.

[38] Suetonius, *Tiberius* 7.3声称这对夫妻在失去孩子之后就不再同床共寝; 尤利娅的生活方式, 见E. Fantham, *Julia Augusti, the Emperor's Daughter* (2006), 尤见pp.81-4。

[39] 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中著名工匠代达罗斯的儿子。代达罗斯用羽毛和蜡制成翅膀, 和儿子一起飞行逃离克里特岛。伊卡洛斯不听父亲的劝告, 飞得太高, 蜡融化了, 翅膀解体, 导致他坠海而死。

[40]. “纳索是我们的教师。” (*Naso magister erat*) , Ovid, *Ars Amatoria* 2.744, 3.812, 概况见K.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1996) , pp.261-9主要讲《变形记》, 但将奥维德置于奥古斯都时代的大背景下。

[41]. Macrobius, *Saturnalia* 2.6-7, 9, Suetonius, *Augustus* 54.2.

[42]. 萨提尔是希腊神话里的一种生物, 一般被视为潘(牧神)与狄俄倪索斯(酒神)的复合体。萨提尔拥有人类的身体, 同时亦有部分山羊的特征, 例如山羊的尾巴、耳朵和阴茎。一般来说他们是酒神狄俄倪索斯的随从。有时, 萨提尔被视作最低级的树林之神, 跟随着潘或宁芙仙女在森林中游逛。萨提尔的形象往往是淫荡好色的。

[43]. Dio 55.9.11-16, Suetonius, *Augustus* 65.1, *Tiberius* 11.4, Velleius Paterculus 2.100.2-5, Seneca, *Brevitate Vitae* 4.6, *de Beneficiis* 6.32, Pliny, *NH* 21.8-9, Tacitus, *Ann.*1.53, 3.24.3, 4.44; 关于密谋者的身份及其关系, 见A.Ferrill, ‘Prosopography and the Last Years of Augustus’, *Historia* 20 (1971) , pp.718-31, 尤见729, 及‘Augustus and his daughter: a modern myth’, in C.Deroux (ed.) , *Studies in Latin Literature and Roman History* 2 (1980) , pp.332-46, 及A.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 pp.48-51。

[44]. Pliny, *NH* 7.149 声称尤利娅密谋刺杀夫妻, 及Dio 55.10.15 声称尤卢斯企图篡权; 其他未指名的人也被处死。

[45]. 现代的马赛。

[46]. Tacitus, *Ann.*3.24, 4.44, Dio 55.10.15.

[47]. 潘达特里亚岛今天的名字是文托泰内, 在意大利西海岸, 长3公里, 最大宽度约800米。此后罗马帝国皇室有多位成员被放逐到此地。

[48]. Suetonius, *Augustus* 65.2讲到福柏; 尤利娅的丑闻和被流放, 见E.Fantham, *Julia Augusti, the Emperor's Daughter* (2006) , pp.84-91, 及E.Leon, ‘Scribonia and her daughters’,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82 (1951) , pp.168-75, 尤见173-4; Ferrill, A., ‘Augustus and his daughter: a modern myth’, in C. Deroux (ed.) , *Studies in Latin Literature and Roman History* 2 (1980) 合情合理地质疑了现代学者关于政治阴谋的理论;

W.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pp.202-9提出, 奥古斯都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盖乌斯与卢基乌斯的合法性。

[49] 今天的雷焦卡拉布里亚, 与西西里岛的墨西拿隔海相望。

[50] Seneca, *de Beneficiis* 6.32.

二十 “哨兵岗位”

玛尔斯来了，他降临的时候给出了战争的预兆。复仇者从天而降，欣赏他自己的荣耀和奥古斯都广场上他自己的恢宏神庙。战神非常庞大，神庙也是如此。玛尔斯必须这样居住在他儿子的城市……他看着……神庙立面上的奥古斯都之名；他读到恺撒之名时，神庙似乎变得更宏伟了。

——奥维德，公元前到公元后的世纪之交^[1]。

尤利娅的丑闻并没有影响她的儿子盖乌斯和卢基乌斯，何况可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尤利娅都没有亲自抚养他们了。两个少年已经正式成年，开始承担越来越公开化的职责。尽管对奥古斯都来说前2年是以愤怒和遭受背叛结束的，但这一年除此之外还发生了许多踌躇满志的庆祝和节日活动，他的两个养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月12日，盖乌斯和卢基乌斯主持了复仇者玛尔斯神庙（奥古斯都的新广场的核心）落成仪式期间的庆祝活动。奥古斯都广场与尤利乌斯·恺撒广场（大体上也是奥古斯都主持建造的）呈直角，而后者与主要的罗马广场（奥古斯都对其加以改建）相连。于是，市中心公共空间的面积翻了一倍还多，提供了更多供行政管理、庭审、典礼和宗教仪式之用的可遮风挡雨的开阔空间。这些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奥古斯都广场的门廊在整个建筑群竣工之前很久就被开放使用了。奥古斯都的很多改革设立了新的官职和任务，或者恢复了长期被忽略的做法。在很多方面，对该地区的结构翻新都可以理解为让国家再一次正常运转起来的切实迹象。^[2]

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都自掏腰包购买了他们的广场工程所需的土地，因为这些土地几乎全都在私人手里。买下地皮之后，他们又拆除房屋、公寓、商店和仓库，以便清理出空间。并非所有的土地原主人都愿意出售，但没有人受到强迫，至少两位恺撒筹划的建筑群

边缘土地的主人没有受强迫。奥古斯都年轻时，在腓立比战役之前曾宣誓要为复仇的战神建一座神庙。这个誓言在四十年之后终于兑现了，耽搁这么久的部分原因无疑是等待所需的土地能够落实。但最后他没有买到自己想要的全部土地。由于一两位地主拒绝卖地，奥古斯都广场不是对称的，东北角的形状不规则。奥古斯都可能因此感到受挫，但他愿意接受现实，说明他尊重财产权，不愿意践踏别人的权利，哪怕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更不要说为了他的名望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广场的不完美恰恰比完美的对称图形更珍贵。^[3]

在其他方面，奥古斯都不惜一掷千金。他的所有建筑工程的设计及施工规模都非常宏伟，哪怕修缮古旧的神龛也是如此（这种修缮工作表面上简单，其实不然）。重建的罗马广场和规划得整齐划一的尤利乌斯广场都非常雄伟，用来彰显罗马权力的恢宏，并提醒大家牢记当前的伟大和复兴是在元首领导下得来的。奥古斯都广场胜过了这两座广场，而且只有两个入口，所以影响力更强。高墙挡住了广场外城市街道的全部景象，同时保护纪念碑免遭火灾。庭院地面用大理石铺就，做成五彩缤纷的图案。设计中糅合了现代理念和古典建筑风格，门廊上有女像柱，即被做成女性雕像的承重石柱，阿格里帕在万神殿也用了这种石柱。看到这些，受过教育的观察者会立刻想到厄瑞克忒翁神庙（前5世纪伯里克利在雅典卫城建造的神庙），追溯至处于文化和帝国霸业巅峰时期的雅典人。有的人也许想不到这个联系，但会看到成排的优雅而精美的雕像装饰着广场的周边。普林尼觉得奥古斯都广场是世界上最美的建筑之一。它没有照抄过去的模板。奥古斯都广场上的女像柱是高浮雕，背部平坦，与墙壁齐平紧贴，而雅典的女像柱是完全立体的独立雕像，可以承载屋顶的重量。^[4]

复仇者玛尔斯神庙的立面是白色的意大利大理石，入口处是宽阔的阶梯，主祭坛设在阶梯内。罗马的神庙是神祇拜访城市时的住所，而不是宗教崇拜的场所。几乎所有主要宗教崇拜的祭坛都在神庙之

外，所有的动物献祭肯定都是在露天进行的。神庙前方是一排八根非常高的科林斯风格石柱，神庙左侧和右侧也有相似的石柱，所有石柱都承载着高高的三角楣饰。这设计很像尤利乌斯·恺撒广场上的维纳斯神庙，但比它大一半。维纳斯和玛尔斯都是传统的罗马神祇，是共和国的强大支持者，而维纳斯被尤利乌斯氏族奉为祖先。这个氏族还自称是阿尔巴朗格国王的后代，雷娅·西尔维亚就来自这个王朝。她为战神玛尔斯生了双胞胎罗慕路斯和雷穆斯。尤利乌斯氏族没有说自己是这个家系的后嗣，但在近期，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曾宣称与罗马的建立者罗慕路斯有联系，而罗慕路斯是战神的儿子。

庭院两侧的门廊陈设着令人追溯往昔的雕像。左侧有埃涅阿斯的雕像，他周围是阿尔巴朗格历代君王，以及尤利乌斯氏族最突出的成员（人数肯定不多，而且其中很多人肯定没有特别显赫的事迹，因为这个氏族发达的时期不多）。对面是罗慕路斯，周围是罗马历史上“最杰出的人”，其中一些和对面的某些人一样，纯粹是为了充数。铭文记录了每个人的事迹，肯定得到了奥古斯都的批准，但可能不是他亲笔写的。除了罗马城建立之前的时代的人物之外，没有外国人，而且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其中有女性。尤利乌斯·恺撒不在其中，因为他已经是神，不能和这些凡人站在一起。他的雕像在神庙内，和其他神像在一起。^[5]

雕像中的埃涅阿斯背着父亲安喀塞斯逃离特洛伊的废墟，一手牵着儿子尤卢斯。这个形象在当时的私人艺术和官方图像中都很常见。学术界有争论，这个尤卢斯究竟是不是尤利乌斯氏族的祖先和罗马的终极缔造者。我们无法确定，但这种说法至少是值得相信的。罗慕路斯的雕像刻画了他奉献“最高战利品”的场景。不足为奇的是，雕像群主要宣扬武德和曾庆祝凯旋式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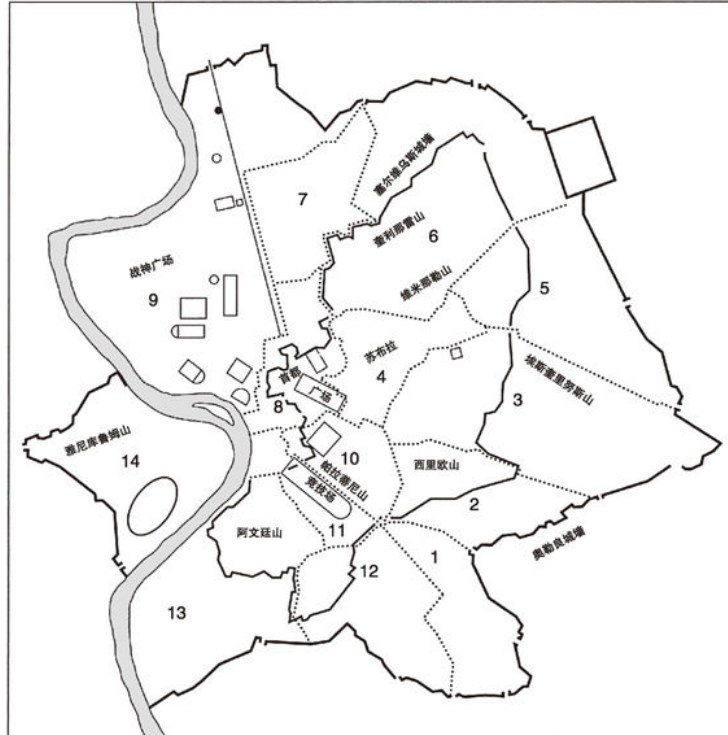
这是那些曾帮助罗马变得如此伟大的英雄豪杰的班列，并且政治倾向性不强，因为里面包括苏拉、马略和伟大的庞培。铭文强调的是战胜外国敌人的胜利，讲到内战时都很简略和中性。介绍马略的铭文写了他在努米底亚^[6]打败朱古达的武功、对抗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战争、连续多次担任执政官的业绩，并赞赏他在前100年镇压了保民官萨图尔尼努斯，最后才中性地写道：“七十岁时，由于内战，他被迫离开祖国，后来借助武力返回。他第七次担任了执政官。”^[7]

奥古斯都宣称，“最杰出的人”的雕像被摆放在那里，是让人们根据这些英雄的业绩来衡量他本人，以及未来的元首们的成就。从建筑群的设计来看，他希望大家如何批判他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在通往神庙的庭院正中央，耸立着孤零零的一座恺撒·奥古斯都青铜像，他像凯旋将军一样，乘着四匹马拉的战车。这是他的广场，他前不久获得的“祖国之父”头衔被刻在雕像的底座上。这是对罗马历史的纵览，将他置于中央位置，表明他与诸神和从建城开始一直到他自己时代的历代英雄好汉都有着紧密联系。奥古斯都认为自己与罗马的成功息息相关，他是这些伟人的优秀继承者，因为他领导国家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国强民富，河清海晏。他就是这些各不相同的人物（既有神也有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他是神之子，而其神祇父亲的雕像就在神庙内。^[8]

奥古斯都广场颂扬了他的成就和罗马的光荣。庭审在广场的门廊举行，复仇者玛尔斯神庙也将在国家生活中发挥中心作用。从帕提亚人手中收复的鹰旗终于有了永久性的存放场所，而将来丢失又收复的罗马军旗也将被存放于此。元老院需要讨论宣战或授予凯旋式时，就会在这里开会。从这里，军队统帅们动身前往外省，最后返回这里；赢得凯旋式的将领的雕像将被竖立在这座广场上。奥古斯都还颁布了一条法令，将来贵族男孩举行成人礼的地点必须是这座神庙，以便提

醒孩子们，成年意味着若情势需要，他们有义务参军打仗，为国效力。

盖乌斯和卢基乌斯被授予了某种形式的临时权力，以主持包括斗兽表演在内的庆祝活动。作为表演，在马克西穆斯广场杀死了260头狮子。过了一段时间，当局放水淹了弗拉米尼乌斯广场，也可能是将它的一小部分暂时改为小湖，职业猎人在这里为观众表演，杀死了36条鳄鱼。这可能是为了纪念在埃及的胜利，但杀死这种稀罕的动物是一种常见的表演，就像印度使者献给奥古斯都的老虎很可能最后被杀死在罗马的竞技场一样。为了给群众提供娱乐，有时还会杀人。宏大的角斗士比赛又一次在选举围场上演了。这种比赛并不总是要杀人见血。奥古斯都的外孙，十岁的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在特洛伊竞技中骑马。苏埃托尼乌斯说，奥古斯都认为这种仪式很适合用来将年轻贵族介绍给公众。特洛伊竞技不是真的打斗，但有时也会出危险，有一次一位元老的儿子在竞技期间从马背摔下，导致终身瘸腿。元首赠给他一只金饰圈。可能在前2年，阿西尼乌斯·波利奥的孙子也在这种比赛中断了一条腿。波利奥在元老院坚定地批评这种比赛，说得合情合理，于是奥古斯都很快不再举行特洛伊竞技。[\[9\]](#)



罗马的十四个行政区域

过去和未来

此次节庆最让人长久怀念的一项赛事就是奥古斯都海战，比罗马举办过的任何娱乐活动都更宏大、更费钱。当局在台伯河西岸挖掘了一个1800罗马尺×1200罗马尺的人工湖，用特别为此建造的高架渠阿尔希提纳水道（20多英里长）引水。主题是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希腊人在雅典人的领导下，击溃了入侵的波斯海军。虽然表演的规模没有真实战役那么大，但也非常可观了。奥古斯都后来吹嘘道，共有“30艘带冲角的战船，包括三列桨座战船^[10]或双排桨座战船，还有很多较小的船只参加了表演。参战人数约3000，还不包括桨手”。我们不确定这场海战表演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拟真的。考虑到罗马人的品位，这场表演应当不会是完全不流血的，但也应当有相当多的舞台操控。两个多世纪之后的狄奥说，这场表演留下的一

些架构仍然存在。而维莱伊乌斯说罗马群众的娱乐胃口被这些宏伟的比赛“满足到生厌”了。[\[11\]](#)

狄奥还告诉我们，希腊人赢得了此次战斗，这也许暗示其中有真枪实弹的厮杀。结果不是事先内定的，但希腊人获胜应当是大家都希望的结果。新广场的建筑效仿雅典卫城，并且重演了雅典最伟大的胜利，这说明奥古斯都显然非常希望与古典时期的光荣以及希腊文化的巅峰（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非常尊重希腊文化）扯上关系。在那个时期，雅典是民主制国家，领导人（如伯里克利）是选举产生的，而不是僭主或国王。奥古斯都或许刻意让大家想到这一点，表现他是这样一位民选领袖。不过我们不能在这个方向想得太远。有人说，奥古斯都早年的思维更像亚历山大大帝及其继业者时代的希腊化君主，所以才建造了华丽炫目的纪念性建筑，如阿波罗神庙；后来他更成熟了，便改为更节制的建筑风格，那样才符合自由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这种说法不能让人信服。[\[12\]](#)

古典希腊城邦与希腊化时代君主国之间泾渭分明的差别，其实大体上是现代学者发明的概念。喜爱希腊文化的罗马人并不觉得自己应当局限于前5世纪和前4世纪初“更优越的”风格和文学，而忽略后世的作品。而且我们应当记住，奥古斯都广场和他早年的建筑一样恢宏壮观，同样歌颂了元首本人。不仅如此，奥古斯都广场还展出了两幅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像，还有好几座雕像，所以广场的宗旨显然是纪念过去的伟大胜利和胜利者，而不是与他们的政治背景扯上联系。[\[13\]](#)

同样的建筑和同样的符号可以与不同主题联系起来，惊心动魄的海战景象让人想起萨拉米斯海战，但也完全可能让人追溯亚克兴角海战。这两场海战都可以被描绘为文明战胜了野蛮，西方战胜了东方。奥古斯都近期的胜利完全有资格与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相提并论，正如“最杰出的人”为他的广场增添了恢宏气势一般。恺撒·奥古斯都

吸纳了过去的荣光，接受了所有最好的东西。他利用马略、苏拉和庞培等人的形象，但剥去了他们与内战有关的负面元素，将他们视为先辈。他们增强了罗马的力量，把他的成就推向了巅峰。这就像维吉尔让理想化的加图担任冥界法官一样。奥古斯都公开表示仰慕小加图，赞扬任何愿意保全国家原状的人。死人没有办法决定新政权如何利用他们，而这样海纳百川的历史观强化了人们的印象，即朋党相争的内战已经过去了。即便是先前的敌人，以及其他一些不大可能赞成恺撒·奥古斯都及其终身制主宰地位的人，也被当作元首仰慕和宣传的榜样。^[14]

对尤利乌斯·恺撒死敌的利用，并不意味着完全恢复他们的名誉。奥古斯都利用的庞培和加图的形象，其实是“消毒过后”的版本。这些人的缺陷和糟糕决定被人们记住，这只会更加衬托出元首的英明。奥古斯都赞扬庞培和加图的事迹和人格，并不是在暗地里批评尤利乌斯·恺撒。很多学者坚信不疑，奥古斯都有意识地与尤利乌斯·恺撒拉开距离。这种理论被不断重复，从来没有受到质疑，尽管它明显与证据不吻合。先称他为屋大维、后称为奥古斯都的习惯也鼓励了这种理论，却让我们忘记虽然他在前44年之后多次改名，但他始终被称为恺撒。的确，他在早年崛起的岁月比后来当权时期更常援引养父的名字，但这其实并没有学者们说的那样明显。他仍然被称为恺撒·奥古斯都，完成了独裁官的很多建筑工程，并在新广场颂扬他的尤利乌斯祖先。更广泛的罗马历史及英雄，如埃涅阿斯和维纳斯、罗慕路斯和玛尔斯，被增添到这个家族当中，或与其拉上关系。私人史与国家历史融合起来，就像纪念建筑糅合了私人和公共的光荣一样。诗人奥维德强调说，复仇者玛尔斯神庙既表现了为尤利乌斯·恺撒复仇诺言的兑现，也表现了成功向帕提亚复仇、收回军旗。在此处，和其他地方一样，奥古斯都将自己和亲人抬高到公共生活的中心，他个人的成就与广大人民的福祉融为一体。^[15]

尤利乌斯·恺撒如今已经是神，不能简单地把他当作又一个罗马英雄，所以他的雕像在神庙内，而不是和尤利乌斯氏族其他成员在一起。没有迹象表明，罗马人会觉得这是有意识地把作为凡人的奥古斯都的一些比较值得商榷的行为与作为神的尤利乌斯·恺撒区分开来。从政初期的罗马贵族常大谈特谈自己的父亲和祖先，将他们的成就作为自身价值的证据。但地位巩固、获得高级行政长官职位之后，罗马贵族就很少谈及祖先了，因为到这个阶段，他自己的事迹变得更重要。一个人的祖先不是他的竞争对手，不过如果他的成就与祖先比肩或甚至超越他们，肯定是件好事。罗马贵族死后举行公开葬礼时，会再一次强调整个家系，一代代人的肖像被展示出来，以证明儿孙们的大好前景。

内战之后，奥古斯都较少谈及尤利乌斯·恺撒，仅仅因为这么做是很自然的。任何罗马贵族家庭都会这么做，尽管可能不会像他那样突出。此时他自己的行动和胜利比养父的重要得多，所以得到广泛宣传。尤利乌斯·恺撒没有被遗忘，更没有被刻意压制，他的声望和荣耀继续加强着养子的威望，但没有必要再大肆宣传。恺撒·奥古斯都已经接管大局，远远超越了养父的光荣，但后者的纪念建筑仍然屹立，他的雕像繁多而引人注目，他的形象有时对养子仍然有用。说到底，毕竟是尤利乌斯·恺撒将尤利乌斯氏族从默默无闻提升到威震天下的地位，并让恺撒之名崛起于所有罗马贵族姓氏之上。

一个世纪之后的塔西佗说，在奥古斯都治下，历史写作衰败了，不是因为遭到了镇压和审查，而是因为历史学家们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罗马的传统是，撰写史书的人只能是那些参与历史构建的人，即参加辩论、制定法律和领兵作战的元老。只有这些人才有能力理解伟大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但在奥古斯都在位时，这些人如果想要在政坛有一番作为，就要依赖元首的善意。渐渐地，元老们要么不再写近期历史，要么只写溜须拍马的作品。这不仅仅是取悦奥古斯都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很多人都愿意忘却自己在内战中的所作所为。德鲁苏斯的次子克劳狄^[16]宣布自己打算写一部内战史。李维娅和他的母亲安东尼娅悄悄地但坚决地劝他放弃这个念头。^[17]

奥古斯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历史著作是李维写下的，这绝非偶然。李维是一个来自意大利北部的贵族，毕生没有从政。他不必关心赢得官职，对政治和战争也没有直接的经验。阿西尼乌斯·波利奥认为李维的作品有着强烈的偏狭守旧意味，但没有人怀疑李维的勤奋。他最终撰写了一部从罗马建城到德鲁苏斯去世的罗马史，共计142卷。我们不确定这部书是何时发表的，其中有些书卷可能在奥古斯都去世后才发表。李维写引言的时候，内战正酣，所以引言的语调非常抑郁，但随着局势好转，他的语调也发生了变化。李维不属于梅塞纳斯的文人圈子。尽管他与奥古斯都关系不错，但绝不是官方的宣传机器。然而他作品的立场与元首的很多观点相符，肯定与元首政权推行的罗马身份与文化吻合。李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也倾向于道德评判。在他看来，当罗马人道德水准高、尊重传统和神祇并奉行美德的时候，罗马就繁荣昌盛；而各阶级，尤其是领导人民的元老们腐化堕落时，罗马就蒙受失败、秩序紊乱并发生内战。^[18]

李维《罗马史》的大部分，包括讲述最后一个半世纪的各卷，只有简略的概述流传下来，所以对于他如何描写具体个人，我们只能猜测。保存至今的几卷对某些事件的描写确实与奥古斯都广场上很多

“最杰出的人”的铭文有很大出入。有的是细节上的差别，如前168年埃米利乌斯·保卢斯^[19]打败珀尔修斯^[20]国王的战争的确切天数。有的差别则反映了截然不同的传说，对于某些个人，广场铭文的说法与其他史料有着显著差别。有一篇概述表明，李维严厉批评了马略的晚年和他前88年年末返回罗马大开杀戒的事情，而新广场的马略雕像铭文没有提及这些。^[21]

李维写到科尔内利乌斯·考苏斯赢得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荣誉时，记述了奥古斯都对此事的解读，但也写了与之矛盾的其他说法。李维还讨论了尤卢斯究竟是埃涅阿斯与其特洛伊妻子生的儿子，还是后来与意大利妻子生的。李维对伟大庞培的评价可能也比较正面，因为塔西佗说奥古斯都温和地批评李维是一个不知悔改的庞培派分子。庞培也被列入“最杰出的人”，所以李维积极评价庞培并非在颠覆奥古斯都政权。更令人震惊的是，据说李维考虑到尤利乌斯·恺撒后来的所作所为，还曾质疑他的出生是一件好事。这个段落已经遗失，所以我们很难判断其语调或结论，但保存至今的概述并不能说明李维非常敌视尤利乌斯·恺撒。[\[22\]](#).

相信恺撒·奥古斯都淡化其养父影响力的学者认为李维的这段话能够支撑他们的观点，理由是李维一定相信不会激怒元首，才敢这么写。但是，除了悄悄向年轻的克劳狄施加压力让他写别的主题，以及奥古斯都晚年的几个例子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元首曾压制文学创作。有一次他写信给提比略，要求他“听到别人说我的坏话，不要太往心里去；我们能够阻止别人对我们采取不利的行动，就应当满意了”。官方的立场不断得到宣传，在大量文学作品、奥古斯都及其亲人的演讲、法令、奥古斯都自传，以及罗马和外省各地的纪念建筑上，都有官方宣传。不断的重复强化了官方宣传，而持续的成功和繁荣更是提供了有力支持。李维的主题——遵守恰当的罗马式美德，才能获得成功——也是对元首的强有力支持。[\[23\]](#).

奥古斯都没有积极地镇压异见人士，也没有隐藏过去。表达异见的人很少，而这少量异见也被支持他的潮水般的赞扬淹没了。尤利乌斯·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开始了内战，奥古斯都在前44～前30年参加了对政敌的清洗迫害，并经常处决犯人和血腥镇压政敌，这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在世的人对此记忆犹新，而且即便这些记忆黯淡了，那些年的文献记载和宣传都还在。隐藏历史，更不要说重写历史，是不实

际的，奥古斯都可能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么做。他自己的版本很明确，将罪责扩展和转移到更多人身上。我们应当注意，李维愿意质疑尤利乌斯·恺撒做法的正确性，但并不意味着李维把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尤利乌斯·恺撒，而认为其他人都是清白无辜的。李维哀叹西塞罗的死，但同时也说西塞罗在尽最大的努力搞死三头同盟，只不过没有三头同盟那么成功而已，并没有说西塞罗和三头同盟有任何本质区别。[\[24\]](#).

文学作品的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很多时候适得其反。那些表面上开诚布公，偶尔赞扬元首曾经对手（而且一定是已经死了的对手），或者对元首及其亲信加以温和的批评，反而是更好的宣传手段，有助于赞颂罗马和奥古斯都。这样的作品可能质量会更好，就像那个年代的诗歌一样，也有利于制造一种情感，即如今又有了一个自由和成功的共和国。作品的尺度是由作者和奥古斯都共同决定的，或者作者的作用更大。李维可能确实真诚地赞同奥古斯都的很多观点，社会上的很大一部分人也是如此，尤其是意大利各地的有产者和比较富裕的阶层。李维热情洋溢地记述战胜外国敌人的胜利和罗马权势的扩张，从亚克兴角战役到前9年的二十年给他提供了很多值得描写和歌颂的素材。

奥古斯都家族

前1年，十九岁的盖乌斯·恺撒获得了第一个指挥岗位，离开罗马，奔赴多瑙河。抵达那里的驻军营地之后不久，他的任务发生了变化。他被授予东方各行省的军权，被派去应对罗马东部边境受到的威胁。亚美尼亚发生权力斗争，帕提亚人对其施加干预，并将其傀儡扶植到亚美尼亚王座上。和以往一样，战胜帕提亚人的期望令罗马公众为之心旌摇曳，给诗人们带来很多灵感。奥维德甚至将这种热情抒发到他的《爱的艺术》第一卷里：“看呐！恺撒在准备为已征服的世界

增添最后一块土地。”帕提亚人将要为前53年屠戮克拉苏军队而付出代价。虽然奉命出征的统帅盖乌斯·恺撒年轻而缺乏经验，但罗马人必胜无疑。“为你复仇的人要到了。他虽然年轻，却统领有方；他虽然还是个少年，却没有任何少年能像他一样运筹帷幄……恺撒家族的成员，皆是少年英雄……父亲玛尔斯和父亲恺撒，保佑他，因为你们中的一个已经是神，另外一个即将成神。”诗人随后回到主题，想象自己一边观看盖乌斯·恺撒凯旋，一边泡妞。奥维德为这位女子描绘盖乌斯·恺撒的凯游行，有的内容是真实的，有的则是想象的，不过都是高度自信的。^[25]

这个指挥岗位原本应当给提比略，但他还在罗得岛，而且已经过去了五年，他的保民官权力和军权都已经失效。尤利娅闹出丑闻之后，奥古斯都没有征询提比略的意见，而是直接代表他，给尤利娅发去了一封休书。随后他简单地通知提比略发生了什么事情。提比略写信请求对他的前妻宽大处理，但奥古斯都没有理睬他。提比略还不断请求允许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回国，也被拒绝了，于是他依然留在罗得岛听课和参加辩论。李维娅为他搞到了一个不明确的军团长身份，以便对其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总的来讲，大家很尊重提比略，不过有一次辩论结束后一位哲学家跟着他回家，不仅与他争辩，还凶狠地辱骂他，于是提比略命令将此人逮捕了。提比略终其一生都是个不善交际、笨嘴拙舌的人，在罗得岛也发生了一些尴尬的事情，产生了一些误会。有一次他希望探望病人，不料他的侍从让当地行政长官把能找到的所有病人全都拉来，按照病情严重程度一字排开给他看。提比略大感窘迫，向病人们道歉，然后派人把他们送回家。^[26]

因为他是元首的继子，而且直到不久前还是元首的女婿，所以大家不是很确定应当如何对待他。有迹象表明，很多权贵会来拜访他，大多数经过那里去自己行省的罗马官员也会来见他。盖乌斯·恺撒及其随行人员经过罗得岛附近时，提比略离开了罗得岛，去向恺撒的养

子和东方统帅请安。敌视提比略的史料说，他匍匐在这个少年面前，这可能太夸张了。不过提比略的地位的确摇摇欲坠。整个东方社区都必须决定如何对待他，以及如何对待那些凭借与他的关系在各地享有显赫地位的人。为了表明自己没有阴谋结党营私，或者准备等元首驾崩后夺权，提比略不再穿罗马将军的服饰，也不再练习骑马和武艺。据说他穿着希腊人的服饰，如果这是真的，就很像安东尼与屋大维娅新婚后在雅典过节那样。高卢的一座城市认为提比略已经失宠，于是摧毁了他的雕像。^[27]

盖乌斯没有在罗得岛停留，但在穿过东方各行省时肯定受到了欢迎。毕竟他是奥古斯都的养子，有权处理请愿。希腊诗人们也像奥维德那样歌颂盖乌斯：“宙斯之子，去幼发拉底河吧，东方的帕提亚人已经飞快地跑来向你投降。去吧，皇子。恺撒，你会看到他们因为恐惧而无力弯弓搭箭。按照你父亲的训令，统治吧。请你首先向升起的太阳证明，罗马以四周的海洋为边界。”^[28]

雅典只是众多争相迎接和款待年轻皇子的城市之一。这些年的某个时期，雅典人将一整座阿瑞斯（希腊的战神，相当于罗马的玛尔斯）神庙搬走，一丝不苟地重建雅典的阿哥拉（市场）。虽然盖乌斯·恺撒受到万众瞩目，但他的养父小心地派遣了年纪较长、经验丰富的人去辅佐他，或者去负责做出许多关键的决定。盖乌斯·恺撒的幕僚很多，包括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他前不久在日耳曼表现突出；还有马尔库斯·劳里乌斯，他的战绩不是很好，在前16年丢失了第五“云雀”军团的鹰旗；另一位前任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奎里尼乌斯，可能从一开始就陪伴着盖乌斯，随后多年里他一直在盖乌斯的幕僚中。^[29]

奥古斯都留在罗马。现在他已经不愿意长时间巡视外省。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能感到自己在衰老，尤其是因为他的同龄人在世的已

经不多了。公元2年生日这天，他给长子写了一封信：

9月23日

你好，我亲爱的盖乌斯，我最亲爱的小驴子。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总是想念你。尤其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特别思念我的盖乌斯。不管你今天身在何方，我希望你庆祝我的六十四岁生日，祝我健康和幸福……我向诸神祈祷，不管我还有多少时间，都要安全和健康地在你身边度过，看着我们的国家如此繁荣，而你们俩都成为男子汉，准备继承我的哨兵岗位。[\[30\]](#)

在星相学上，六十三岁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年纪，所以奥古斯都开玩笑地表示，过了这个年纪让他长舒一口气。他谈到自己的“哨兵岗位”，说明在他眼里，自己是一个守护国家的监护者，他也希望自己的养子将来能够接过这个职责。虽然年事已高，他的工作还是很繁重，尤其是因为盖乌斯和卢基乌斯年纪还小，刚刚开始分担他的重任。

元首和两个养子非常亲近。遗憾的是，他公开发表的给盖乌斯的书信集只有这一封信流传了下来。他很可能也给卢基乌斯写过信。这封信的风格与他给其他亲人的信类似，语调轻松，常用希腊语的表达方式。奥古斯都喜欢引用，与行省总督、部下和亲戚通信时常引经据典来描述良好行为的榜样。在两个养子的一生中，只要他们不在他身边，他总会写信给他们。他们在身边的时候，他们对他们的成长关怀备至，教他们游泳和骑马。大约前10年，他挑选了语法教师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教导两个男孩。弗拉库斯原本在罗马开办了一所学校，但奥古斯都给了他年薪1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于是他高兴地关闭了学校，来到帕拉丁山，被安顿在一座曾属于著名首席元老卡图卢斯并依然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宅邸内。[\[31\]](#)

奥古斯都买了帕拉丁山上的一些房屋，将其连接起来，作为自己的府邸。奥古斯都府肯定有一个主门，门廊上雕刻着橡叶冠，但各座房屋和圣所（最重要的是阿波罗神庙，附有图书馆和灶神龕，雅典娜神像就存放在那里，这神像据说是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带来的）之间可能由一些狭窄街道和小巷连接起来。对这个地点的考古发掘没有明确的结论，很难将遗址和文字记载一一对应起来。今天称为“李维娅府”的房子（在那里发现了一根铅制水管，上面刻着她的名字）是她在奥古斯都驾崩后的住处，但我们没有办法准确地知道在这之前他们住在哪里。今天所说的奥古斯都府其实只是为了方便才这么叫，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它在整个建筑群中的具体功能。奥古斯都对原有建筑进行了调整和改良，至少在私人生活区似乎没有大幅度改变原有的贵族宅邸。[\[32\]](#)

元首自称生活朴素。苏埃托尼乌斯说，在超过四十年的时间里，奥古斯都“无论冬夏，住在同一间卧室内”，意思是奥古斯都在这么久的时间里只用一间卧室，不会因为天气寒冷或炎热而换地方。奥古斯都不习惯早起，如果需要一大早就到城市的另一个区域，他就会在前一夜住到附近的朋友家。其他史料告诉我们，夏天酷热，他夜间睡觉时会把房门敞开，甚至把床榻搬到一个庭院内，睡在一座装饰性喷泉旁边。奥古斯都每晚睡觉不会超过七个小时，睡在一张“低矮而装饰简单的床上”，但如果他中途醒了，就不愿意一个人继续躺下去，而坚持让别人陪伴他。不过在午饭之后他经常打盹，有时坐轿子也会打瞌睡。他的生活需求很少（精力充沛的尤利乌斯·恺撒的睡眠时间更少），也很朴素，不像很多富裕元老和骑士那样骄奢淫逸，更不要说像马克·安东尼使用黄金尿壶那样穷奢极欲了。奥古斯都家中用的卧榻和桌子留存到一个世纪之后，苏埃托尼乌斯说这些家具整体上都很简朴。[\[33\]](#)

舒适而有节制，是奥古斯都生活作风的特点。不过我们不能从表面意思来理解，而要在前1世纪普遍奢靡（后来愈演愈烈，一直发展到卡利古拉和尼禄那样丧心病狂般的极度奢侈）的背景下来理解。奥古斯都的生活作风是他自己和很多元老都会感到恰当的。帕拉丁山上的奥古斯都府邸，以及其他可能与元首及其家人有关系的地方的墙上都有装饰性绘画，往往非常复杂，符合最时髦的品位。他的乡间别墅（他常住在别墅，以躲避罗马的喧嚣）按照当时贵族的标准也不算奢侈，而且他只有三座别墅，而连只算一般富裕的西塞罗也有九座。奥古斯都没有仅供私人欣赏的昂贵艺术品和雕刻收藏品，这与某些富裕元老不同。和阿格里帕一样，奥古斯都的艺术品是用来公开展示、供广大群众欣赏的。不过他喜欢装饰性花园，收藏了各色珍奇。他在卡普里岛的别墅展示了他的“巨型骨骸”，即巨大动物和鱼类的骨骸（可能是恐龙之类的化石），以及据说曾被著名英雄使用过的古代兵器。[\[34\]](#)

奥古斯都的生活作风很符合一位元老领袖的身份，显然也是作为榜样告诉元老们应当如何表现。他强调的简朴是相对而言的。在家的時候，以及不需要接待客人或出席公共场合的时候，他一般穿的是李维娅、屋大维娅或其他女眷给他做的衣服（家中大量奴隶和女释奴肯定也帮助贵妇们做衣服）。对罗马精英阶层的妻子和女儿来说，织布是一项传统活动，不过到这个时代虽然更受人仰慕，但很少有人实践。我们很难知道其他人在多大程度上效仿元首的女眷在这方面做出表率。冬天，他在马甲和毛衣之上穿多达四件上衣，大腿和腿肚子上裹着暖腿套。长裤是蛮族的风俗，差不多三百年后罗马皇帝才开始穿长裤。夏季他穿得比较轻便，总是戴着一顶遮阳的宽檐帽，即便在帕拉丁山上府邸建筑群内也是这样。不过这是非正式的服饰。如果要出席正式场合，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会打扮得符合自己的身份。他家中总是备好合适的官服，如果他突然需要处理公务，便可以立即换上。[\[35\]](#)

奥古斯都的饮食也很有节制。与穿衣打扮一样，一方面是由于他饮食有节的天性，另一方面是身为罗马元老领袖，他要做出榜样。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他喜欢普通面包而非精致的高级面包，常吃湿润的奶酪、无花果和一条小鱼。在大多数日子里，他常常不等正式的用餐时间，想吃就快活地吃起这些东西，并且坐轿子或乘马车时也会吃东西。他的书信中讲到他这样吃面包、枣子和葡萄。他还喜欢吃黄瓜、莴苣和苹果。他吃苹果一般是要蘸什么东西，或者苹果表面覆盖一层东西。他很少喝葡萄酒，一次不会超过一品脱^[36]，如果喝多了就会用催吐的手段把过量的酒吐出来。他举办的宴会很丰盛，也经常举行正式宴会，但有时他在宴会上吃得很少，因为在宴会之前他已经吃过东西，或者打算宴会结束后再吃。据我们所知，他更喜欢客人的陪伴和交谈，掷骰子或者玩其他游戏，比如让大家竞买不知道是什么的奖品，或者不知道奖品的真实价值，将真正贵重的东西和非常普通的东西混在一起。他的花招之一是只给别人看一套画作的背面。在重要的宴会上，他喜欢发秘密奖品，有时是贵重的东西，有时是珍奇，比如古代钱币，有时是开玩笑的东西，比如海绵或铁制拨火棒。他会给这些东西取一语双关的名字，把它们赠给大家。^[37]

奥古斯都常在家中招待客人，也经常接受邀请和其他人一起用餐，但和他一起吃饭的一定是贵族能够接受的有身份的人。他从来不会让释奴和自己同桌吃饭，但有时会邀请不是元老也不是骑士的自由人。苏埃托尼乌斯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个曾经的侦察者（这个词最初指军队的侦察兵，但后来意思变成了情报人员，可能在奥古斯都时代已经有了这一层意思）受奥古斯都邀请，到他家中吃饭。奥古斯都曾在此人的别墅住过，所以为了表示感激而请他吃饭是个可以接受的理由。这也说明此人至少有比较好的经济条件。元首非常仔细地按照每个人的身份和过去为他提供的服务来恰如其分地尊重他们，就像他非常耐心地接见请愿者一样。我们已经看到，他有很强的幽默感，非常活泼，而且特别喜欢双关语和讽刺语（这也是非常符合罗马

人性情的)。有一次，奥古斯都主持审案，一名辩护律师是一个驼背的元老，他不断请求元首：“如果您发现有错，就把我理直了。”奥古斯都最后开玩笑说：“我会纠正你，但我没有办法把你理直。”

[38]

开玩笑往往是摆脱窘境（比如要拒绝某人时）的温和之法。笑话也是很好的故事，能够迅速传播，让大家愈发觉得奥古斯都也是一个普通人，不是高高在上的暴君。一位商人给他送来一套用推罗^[39]紫色染料染成的衣服。但元首对颜色的深度不太满意。商人保证说，如果他衣服拿到光线下，就会好看一些。皇帝答道：“什么？你的意思是，我要在阳台上转来转去，罗马人民才能看出我穿的衣服很好？”有段时间他拥有一个指名者，但此人记忆人脸和及时认出别人的本领不够，没办法帮助主人。有一天，他们即将走到广场，奴隶问有没有忘记什么需要的东西。奥古斯都说：“你最好拿一些介绍信，因为你在那儿谁都不认识。”^[40]

奥古斯都的笑话有时很尖刻，但按照当时的标准（罗马人喜欢嘲讽别人的身体缺陷），从来都不会显得恶毒。更重要的是，他虽然会挖苦人，但从来不会同时做出残酷或专横的行为，这与他在三头同盟的时候迥然不同，那时的他会下令处死别人，还会开玩笑说，他们将成为“食腐鸟的饲料”。奥古斯都在幽默时从来不会故意展示或者滥用自己的权力，就像他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不会这么做一样。他也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些故事的靶子，受人嘲笑。据说有一次他遇见了一个长得非常像自己的人。于是元首问这人，他的母亲是不是在罗马待过。那人说没有，不过他父亲经常到罗马。奥古斯都和其他人打交道时的温和与礼貌或许反映了他的真实性格（至少是他在这个阶段的性格），以及明智的政策。他慷慨与友善的举动很容易被口口相传。有一次，他听说一位地位不高的元老眼瞎了，打算自杀。恺撒·奥古斯都几乎不认识这人，但还是去到他床前，长谈一番，劝他改变主意。

他的同情心和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人，都超越了正式职责，但非常有助于劝服人们接受（往往还是喜爱）他的统治。[\[41\]](#)

很多事情元首都是在公开场合完成的，所以有很多故事流传下来，讲述他的小缺点和怪癖。他一般遵循尤利乌斯·恺撒的建议，即正式演讲和声明应当简单明了，并嘲讽梅塞纳斯和提比略，因为他们喜欢晦涩和过于复杂的句子。奥古斯都自己会用一些粗俗的词，并且喜爱朴实无华的民间谚语，比如“就像烧芦笋一样快”或“他们会在希腊的月首日付钱”（因为希腊历法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日子，所以意思是他们不会付钱）。他尤其喜欢“着急也要从容！”这句口号，他在拉丁文和希腊文中都用过这句话。他的行为举动有一些独特之处，融合了一些很深的迷信思想。他害怕打雷和闪电，因为有一次在西班牙旅行途中，站在他身旁的一名举火炬的人被雷电击中身亡。所以他旅行时总是随身携带一块海豹皮作为吉祥物，保护自己。如果在家中遇到打雷，他会躲到地下室里。有的日期他不会出门，但如果开始旅行时下了小雨，他会很高兴，因为他相信这是一个吉兆。而如果奴隶把他的鞋摆错了方向，那就是凶兆。[\[42\]](#)

这都是小怪癖，不会惹人讨厌，处于能让人接受的贵族行为范围之内。类似地，他对健康的关注也不会显得过分，毕竟他的身体状况曾经很差。他研究出了自己的洗澡方式，没有像常规的罗马洗浴法（用特别热和特别冷的水）那么极端，但用金属工具刮掉涂在身上的油（当肥皂用）时太用力，在皮肤上留下了疤痕。他还是容易生重病，有时腿和手会患风湿病或软弱无力的毛病，尤其是右手，让他时常无法握笔。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前，他按照常规的贵族习俗，公开操练武艺，既徒步使用兵器，也骑马。从前29年开始，他改用投掷和接住一个球的锻炼方式，年岁大了之后就满足于骑马，然后是跑步，每次跑步结束时要跳一跳。这对上了年纪的元老来说，都是正常的运动。奥古斯都的生活方式和他的举止风度、果断行动一样，塑造了一

个正常的、受尊重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做得过分的罗马贵族形象。锻炼和元首生活的很大部分内容一样，是公开进行的，他的家庭生活作风也是为了证明他拥有领导国家所必需的性格。在帕拉丁山上的建筑群内，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给了自己一个私人房间，他给这个房间取名为“工坊”或者“叙拉古”（西西里岛的最大城市）。他时常来到这个房间，其他人都不可以打搅他，他会躲在那里享受片刻的安宁，或者详细筹划立法或其他项目。他的另外一个很方便的躲避处是一个释奴名下的一座别墅，就在城市正式边界之外。^[43]

公元1年1月1日，盖乌斯·恺撒就任执政官。此时他还在遥远的罗马-帕提亚边境，所以就职典礼的职责落在了他的同僚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身上。保卢斯是奥古斯都的外孙女尤利娅的丈夫。元首的习惯是在举荐自己的亲戚竞选官职时，向选民推荐他们，并说“如果他们有资格的话”。在顾问们的辅佐下，盖乌斯表现不错，而且帕提亚人也没有与罗马公开交战的胃口。奥古斯都的养子和帕提亚国王会面谈判，双方各自举行阅兵，请对方观看，然后在幼发拉底河两岸举办了奢华的宴会。和平得以确定，由罗马提名的人被安插到亚美尼亚王位上。^[44]

公元2年，十九岁的卢基乌斯·恺撒离开罗马，去往西班牙，这是他的第一个行省总督职位。西班牙已经没有战争威胁，所以他可以在安全环境内积累经验。途中，他经过纳博讷高卢，在马西利亚稍事停留。毫无疑问，在旅途的每一站，当地人都会热烈欢迎他，还有长长的请愿者队伍等待着他。这位年轻的皇子在为履行公共职责做准备。不料命运横插一手，这个少年在马西利亚病逝了。奥古斯都伤心欲绝，但暂时还能感到宽慰，因为他的另一个养子不断取得成功。但东方出了麻烦。盖乌斯的幕僚受到丑闻的冲击，劳里乌斯被指控接受外国君主的贿赂，自杀了。罗马人在亚美尼亚也好景不长，一大群民众

起兵反抗新国王，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是米底人而不是亚美尼亚人，受到当地贵族的怨恨。

公元3年，盖乌斯率军去镇压亚美尼亚的叛乱，但在攻打一座不知名的设防城镇时，他不明智地亲自去与敌军首领谈判，被奸诈地打伤。他的伤情很重，无法治愈。在秋季和冬季，他的伤势越来越重，行为也变得飘忽不定。有一次他写信给养父，请求允许他退隐，这和差不多十年前提比略做的事情一样有些奇怪，但对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而言更显得古怪。公元4年2月21日，盖乌斯·恺撒去世了。意大利和外省的许多社区和元首一起公开哀悼他。两个早逝的青年得到了极大的荣誉，甚至超过了德鲁苏斯。又有两个骨灰瓮被安放到奥古斯都陵寝。六十七岁那年，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孤零零地守着自己的哨兵岗位。^[45]

[1]. Ovid, *Fasti* 5.550-54, 567-8 (Loeb translation).

[2]. 概况见Dio 55.10.6, Velleius Paterculus 2.100.2, Suetonius, *Augustus* 31.5, 及Ovid, *Fasti* 5.545-98; 年代, 见C.Simpson, 'The date of the dedication of the Temple of Mars Ultor', *JRS* 67 (1977), pp. 91-4. 还有一种说法是8月1日, 也是有可能的, 但5月12日的理论更有说服力。

[3]. Suetonius, *Augustus* 56.2谈到, 他不肯强迫地产所有者将其广场需要的地产卖出。

[4]. Pliny, *NH* 36.11, 102; 关于厄瑞克忒翁神庙, 见J.Camp, *The Archaeology of Athens* (2001), pp. 93-100; 关于奥古斯都及其图像, 见P.Zanker (trans. A. Shapiro),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 pp. 81-2, 113-14, 193-215, S. Dyson, *Rome. A Living Portrait of an Ancient City* (2010), pp. 128-31, 及W. Lacey,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pp. 193, 197-202。

[5]. 参见Dio 56.34.2-3讲到奥古斯都葬礼上有类似的展示和颂扬历史伟人的游行；“最杰出的人”（*summi viri*）的说法出自后世的文献*Scriptores Historia Augusta, Alexander Severus* 28.6；讨论见T.Luce, ‘Livy, Augustus, and the Forum Augustum’, in J.Edmondson (ed.), *Augustus* (2009), pp.399-415, esp.403-6；铭文碎片，见CIL 1, pp.186-202 讨论了*elogia*，部分译文见M.Cooley (ed.), *The Age of Augustus. Lactor 17* (2003), pp.238-9；奥古斯都参与撰写*elogia*，见Pliny, *NH* 22.6.13；Cornelia见CIL 1.39。

[6]. 努米底亚（前202～前46年）是古罗马时期的一个柏柏尔人王国，如今已经消亡。其领土大约包括现今的阿尔及利亚东北以及突尼斯的一部分（皆位于北非）。当时以出产精锐骑兵闻名。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就是以努米底亚骑兵赢得早期多场战争的胜利，后来也因努米底亚骑兵投向罗马而战败。其后，努米底亚先后成为罗马的行省之一和附庸国。努米底亚领土西端与罗马帝国的另一行省毛里塔尼亚（即现今的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接壤，东端则与罗马帝国的阿非利加行省（迦太基故地，即现今的突尼斯）接壤，其领土北临地中海，南接撒哈拉沙漠。

[7]. 对尤卢斯身份的疑问，见Livy 1.3；马略见T.Luce, ‘Livy, Augustus, and the Forum Augustum’, in J.Edmondson (ed.), *Augustus* (2009), pp.406-7，英文译文见M.Cooley (ed.), *The Age of Augustus. Lactor 17* (2003), p.238, K25。

[8]. Suetonius, *Augustus* 31.5, *Res Gestae* 35.

[9]. Dio 55.10.6-8, Suetonius, *Augustus* 43.2.狄奥可能将纪念阿格里帕的基金会也算作节庆之一。

[10]. 三列桨座战船是古代地中海的航海文明（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等）使用的一种桨帆船。战船每边有三排桨，一个人控制一支桨。此种战船在希波战争、雅典帝国兴亡中起到重要作用。

[11]. *Res Gestae* 23, Velleius Paterculus 2.100.1, Dio 55.10.7.

[12]. 见P.Zanker (trans.A.Shapiro),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 pp.105-6，奥古斯都时代所有主要神庙的辉煌；关于其风格偏离希腊化时代帝王风格的说法，见Purcell in *CAH2* X, pp.788-90，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是K.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1996), pp.197-213。

[13] Pliny, *NH* 34.48, 35.93-4.

[14] Macrobius, *Saturnalia* 2.4.18.

[15] 奥古斯都与尤利乌斯·恺撒拉开距离的理论所用的例子之一，见 Z.Yavetz, ‘The personality of Augustus’ , in K.Raaflaub & M.Toher (eds) , *Between Republic and Empire. Interpretations of Augustus and his Principate* (1990) , pp.21-41, 32, ‘Gradually but consistently he distanced himself from the memory of Julius Caesar’ ; 复仇者玛尔斯神庙，见Ovid, *Fasti* 570-83, 及K.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1996) , p.208讲到奥古斯都广场的设计刻意让人想到尤利乌斯·恺撒。

[16] 后来的克劳狄皇帝。

[17] Tacitus, *Ann.*1.1, Suetonius, *Claudius* 41.2; 概括见 M.Toher, ‘Augustus and the Evolution of Roman Historiography’ , in Raaflaub & Toher (1990) , pp.139-54。

[18] 见R.Syme, ‘Livy and Augustus’ , *Harvard Studies of Classical Philology* 64 (1959) , pp.27-87, 及K.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1996) , pp.280-87。

[19] 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马其顿尼库斯（约前229～前160年），两次担任执政官，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征服了马其顿，消灭了安提柯王朝。他的父亲也叫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于前216年在坎尼战役（被汉尼拔打败）中阵亡。他的儿子就是小西庇阿，被过继给大西庇阿的儿子。

[20] 珀尔修斯（约前212～前166年）是马其顿王国安提柯王朝的末代君主。安提柯王朝是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由他的帝国分裂出的几个政权之一，统治马其顿本土。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前171～前168年）中，珀尔修斯被罗马击败并投降，安提柯王朝灭亡。到前146年，罗马彻底消灭了马其顿的本土势力，将马其顿变成一个罗马行省。珀尔修斯投降后学会了拉丁语，成了熟练的金属工匠和公证人。

[21] 见T.Luce, ‘Livy, Augustus, and the Forum Augustum’ , in J.Edmondson (ed.) , *Augustus* (2009) , pp.406-15。

[22] Tacitus, *Ann.* 4.34; Seneca, *Quaestiones Naturales* 5.18.4谈及李维质疑尤利乌斯·恺撒的降生是不是一件好事; R. Syme, ‘Livy and Augustus’, *Harvard Studies of Classical Philology* 64 (1959), p.58探讨和涉及了奥古斯都与尤利乌斯·恺撒拉开距离的理论。

[23] Suetonius, *Augustus* 51.3 (Loeb translation for quote).

[24] Seneca, *Suasoriae* 4.22.

[25] Dio 55.10.17-18, Ovid, *Ars Amatoria* 1.177-86, 203-4 for the quotes (Loeb translation), 更概括见177-229。

[26] 关于这些年里的提比略, 见B. 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39-42, 44-6, R. Seager, *Tiberius* (2005), pp.23-9; 奥古斯都代表提比略与尤利娅离婚, 见Suetonius, *Tiberius* 11.4-5; 拜访病人, 见Suetonius, *Tiberius* 11.2; 哲学家, 见Suetonius, *Tiberius* 11.3。

[27] Dio 55.10.19, Velleius Paterculus 2.101.1, Suetonius, *Tiberius* 11.1, 12.2, 13.对提比略行为和会见地址的说法有所不同; 对这些年的有趣讨论, 见G. Bowersock, ‘Augustus and the East: The problem of succession’, in F. Millar & E. Segal (eds), *Caesar Augustus. Seven Aspects* (1990), pp.169-88。

[28] G. Bowersock, ‘Augustus and the East: The problem of succession’, in F. Millar & E. Segal (eds), *Caesar Augustus. Seven Aspects* (1990), p.172.

[29] G. Bowersock, ‘Augustus and the East: The problem of succession’, in F. Millar & E. Segal (eds), *Caesar Augustus. Seven Aspects* (1990), pp.172-3, 讨论了军营内的辩论, (2001), pp.116-17;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425, 428-9涉及盖乌斯及其谋士。

[30] Gellius, *NA* 15.7.3 (Loeb translation, slightly emended).

[31] Suetonius, *Augustus* 64.3, 89.2, *de grammaticis et rhetoribus* 17.2.

[32] 关于奥古斯都在帕拉丁山上宅邸的非常有价值和有洞见的讨论，见 P. Wiseman, ‘The House of Augustus and the Lupercal’, *JRA* 22 (2009), pp. 527–45, 尤见 527–36。

[33] Suetonius, *Augustus* 72.1, 73, 78.1–2, Pliny, *NH* 33.49.

[34] Suetonius, *Augustus* 72.3 谈到骨头, 82.1 谈到他睡觉时敞着门或者在室外睡觉; 奥古斯都的生活概括, 见 Z. Yavetz, ‘The personality of Augustus’, in K. Raafaub & M. Toher (eds), *Between Republic and Empire. Interpretations of Augustus and his Principate* (1990), pp. 21–41, 提示读者谨慎的段落 R. Saller, ‘Anecdot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Greece and Rome* 27 (1980), pp. 69–83; 壁画, 见 J. Clarke, ‘Augustan domestic interiors: propaganda or fashion?’ in K. Galinsk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Augustus* (2005), pp. 264–78, 及 K. 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1996), pp. 179–97; 见 Vitruvius, *de architectura* 7.5.3–4 讲到一位建筑师批评了帕拉丁山上出现的非常时髦的建筑。

[35] Suetonius, *Augustus* 73, 82.1.

[36] 1 品脱约合 568 毫升。

[37] Suetonius, *Augustus* 75–77.

[38] Suetonius, *Augustus* 74 讲到, 唯一曾应邀与他一同用膳的释奴是与塞克斯图斯·庞培作战期间变节的海军将领梅纳斯; 笑话见 Macrobius, *Saturnalia* 2.4.8。

[39] 推罗是腓尼基人建造的古城, 在今天黎巴嫩南部, 称苏尔, 为海港城市。古时因产一种稀有而昂贵的紫色染料(用骨螺制成)而闻名。在古时很多文化中, 紫色是王室专有的颜色。

[40] Macrobius, *Saturnalia* 2.4.14–15.

[41] Macrobius, *Saturnalia* 2.4.20, Suetonius, *Augustus* 53.3; 关于幽默的有效性, 见 Z. Yavetz, ‘The personality of Augustus’, in K. Raafaub & M. Toher (eds), *Between Republic and*

Empire. Interpretations of Augustus and his Principate (1990) ,
pp.36-38。

[42] Suetonius, *Augustus* 29.3, 86.1-88, 95, 97.1-2, Gellius, *NA*
10 11.5, 24.2.

[43] Suetonius, *Augustus* 72.2, 80-83, with E.Gowers, ‘Augustus
and “Syracuse” ’ , *JRS* 100 (2010) , pp.69-87.

[44] Suetonius, *Augustus* 56.2讲到他向选民推荐自己的亲戚；盖乌斯在
东方，见Dio 55.10.20, 10a.4-5, Velleius Paterculus 2.101.1-3, with
A.Sherwin-White, *Rom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st, 168 BC to AD*
I (1984) , pp.325-41。

[45] Dio 55.10a.5-10, Velleius Paterculus 2.102.1-3, Suetonius,
Augustus 65.1-2, Tacitus, *Ann.*1.3.

二十一 为了共和国

命运夺走了（恺撒的）伟大名字的希望，但已经为国家恢复了最强大的壁垒……恺撒·奥古斯都没有再耽搁一分一秒；因为他不需要努力去寻找一个人，而只需要挑选一个声名显赫的人。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1世纪初^[1]。

奥古斯都比较能够听天由命地接受亲人的死亡，而不能接受他们的不端行为。

——苏埃托尼乌斯，1世纪末^[2]。

3月中下旬的某个时间，盖乌斯·恺撒的死讯传到了罗马。奥古斯都的悲恸是真诚的，但他在哀悼的时候已经开始谋划未来。三个月后，他的决定就被公布了。和以往一样，他求助于自己最亲密的家人，不过很多学者所持的观点——奥古斯都痴迷于自己血统的延续——并没有说服力。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将“恺撒”这个姓氏的威望提高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并借助所有媒介不断宣传它。恺撒·奥古斯都让大家相信他是独一无二、高于其他任何人的，这种神话很早就开始扩展到他的亲人身上。任何接替他两个死去的养子的人，都必须成为一位恺撒，但也必须配得上这样的荣誉。现实中可供选择的人很少。^[3]

其中之一是尤利娅的最后一个儿子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但他只有十五岁，还没有正式披上成年托加袍。更现实的选择是德鲁苏斯的长子日耳曼尼库斯，他十八岁，已经表现出他父亲的魅力和赢得群众支持的本领，不过他是元首的外甥孙，亲缘关系更远一些。苏埃托尼乌斯说，奥古斯都认真地考虑过选择日耳曼尼库斯为自己的主要继承人，但后来放弃了，可能是因为他不确定自己能活到这个少年可以证明自己的年月，所以放不下心来。和往常一样，他似乎没有考虑提

携外甥女和外甥孙女的丈夫们，也没有打算提拔外孙女婿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4]

此外还有四十五岁的提比略，他两次担任执政官，曾是奥古斯都的女婿，曾和他分享保民官权力，很可能是当时国内最优秀的将领。提比略多次写信请求回国，他在罗得岛待了八年之后，奥古斯都对前女婿的态度终于软化。他没有允许提比略回国，而是让盖乌斯·恺撒裁决此事。盖乌斯·恺撒起初拒绝，但最终同意了，这个变化据说是由于劳里乌斯的垮台。劳里乌斯长期憎恨提比略，提比略也恨他。这是公元2年的事情。卢基乌斯·恺撒的死讯传到罗马的时候，“流亡者”提比略回来了。他写了一封公开吊唁信给奥古斯都，信中充斥着悲恸和赞美之词。除了带自己的儿子德鲁苏斯去复仇者玛尔斯神庙举行成年礼之外，提比略非常小心地避免出席任何公开场合。他没有住在自己的豪宅（原属于庞培，后被安东尼占据），而是搬到了城市边缘的一座属于梅塞纳斯的别墅。^[5]

奥古斯都故伎重演，不是寻找一个继承人，而是好几个。现代学者认为他是在为自己心仪的真正继承人准备几个摄政者或监管者，这种理论也是误导人的。奥古斯都并不是这么想的，他显然希望亲密的家人能够以一个小组的形式合作并分享权力。这并不是说他的这个信念是现实的。他最后做出的决定是其几次皇朝安排中最复杂和最不符常规的一个。第一步，他要求提比略收养其侄子日耳曼尼库斯。然后，5月26日，奥古斯都收养了提比略和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收养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收养一个四十五岁的前任执政官，而且他自己已有两个成年的儿子（养子日耳曼尼库斯和亲生儿子德鲁苏斯），就绝对没有先例了。所以，奥古斯都不仅有了两个儿子，还有了两个孙子。很快他又安排了婚姻，来巩固第二代人的纽带。日耳曼尼库斯要娶阿格里皮娜（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女儿），而日耳曼尼库斯的妹妹李维拉（似乎之前被确定要嫁给盖乌斯·恺撒）

则嫁给了德鲁苏斯。提比略仍然单身，部分原因是他不愿再婚，很难为一个曾经与恺撒的独生女结婚的男人找到合适的对象也是原因之一。

波斯图穆斯有点与众不同，不仅仅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不是李维娅儿孙的人。他比提比略年轻三十岁，年龄更接近提比略的儿子们（虽然比他们还要小），肯定与他们而不是与他的新哥哥更有共同点。而且奥古斯都也没有努力去快速提升波斯图穆斯的公共形象。一年之后，波斯图穆斯才接受了成人礼。在过去，奥古斯都会就任执政官，在成人礼上向群众介绍他的养子盖乌斯和卢基乌斯。他没有为波斯图穆斯这么做，不过奥古斯都已经多年没有担任执政官，所以这可能是他如此决定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波斯图穆斯没有像他两个死去的哥哥那样得到青年元首的头衔。奥古斯都也没有宣布授权他参加元老院会议并提前参选行政长官；同样，也没有为他安排与奥古斯都家族的其他显赫成员结婚。目前，从元首的外孙变成养子，仅仅给了波斯图穆斯“恺撒”之名，而没有其他任何直接好处。^[6]

提比略如今的名字是提比略·尤利乌斯·恺撒。奥古斯都在元老院宣布收养提比略的决定时称：“我这么做，是为了共和国。”历史学家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认为，奥古斯都的这个宣言有损提比略的声望。很多人认为奥古斯都这话表明他听天由命的沮丧情绪或高度讥讽，但他不大可能公开表达这样的情感。前6年提比略退隐时，奥古斯都显然觉得自己遭到了女婿的背叛，这种愤怒可能始终没有完全消退。但提比略在罗得岛上的时候并没有惹是生非，而且自回国以来非常小心地避开政治，尽可能保持低调。随后几年里，奥古斯都给提比略的信和给其他亲人的信差不多，都是充满温情、建议、引用和逗乐的语调。不管奥古斯都私下里对提比略怎么看，至少在公开场合会对自己的新养子表示尊重、信任和喜爱。^[7]

提比略显然从这种新局面中获得了好处，而且借助后见之明，我们知道他将会继承元首之位，统治国家二十三年，寿命比日耳曼尼库斯和德鲁苏斯都长得多。即便我们不知道这些后话，他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个十年前就退出政坛而且没有希望恢复地位的人，变成了仅次于奥古斯都的国家领导人。李维娅的儿子是元首最高级的助手，无疑也是他的继承人当中最资深的一位，而这些继承人当中包括李维娅的两个孙子。很快有传闻散播开，说这一切都是她精心策划的，她甚至安排暗杀了盖乌斯和卢基乌斯，以便让提比略成为奥古斯都唯一的可行选择。这些传闻加上她下毒害人的旧闻，各种阴谋论愈演愈烈。这些都不大可能是真的，何况盖乌斯是在亚美尼亚与敌人谈判时负伤的，李维娅如何安排？所以阴谋论实在是异想天开。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地确定，但很少有学者对这些阴谋论有丝毫的相信。盖乌斯和卢基乌斯之死，以及之前其他人的死亡，更有可能是因为糟糕的运气。学者们更愿意说克劳狄家族和尤利乌斯家族（更具体地说是尤利娅的后代，甚至她母亲斯科利博尼娅的后代）之间存在权力斗争。这也不大可能是真的。^[8]

公元4年，奥古斯都授予提比略保民官权力，为期十年。这可能发生在他收养提比略之前。前一年，奥古斯都的行省指挥权和军权被延长了十年。提比略曾经的崇高地位得到了恢复，又一次攀升到之前仅阿格里帕享有的地位。但这一次元首的高级副手是他的养子，而不是女婿。这个差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提比略的新身份并非完全对他有利。公元4年，他从一个古老贵族世家的族长（而且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变成了另一个家族的初级成员，从养父手中接受最高权力。一瞬间，提比略的财产都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成为奥古斯都财产的一部分，听凭他处置。波斯图穆斯也是这样，所以阿格里帕庞大家产的剩余部分都转入了他的老友手中。根据罗马的法律和传统，父亲拥有很大权力。他可以断绝与养子的关系，但养子没有办法取消收养关系。

被收养之后，养子的政治和财政独立性就丧失了；儿子公开反对父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肯定也是非常丢人的。[\[9\]](#)

提比略小心翼翼地表现出自己非常重视这个新地位，在养父奥古斯都在世时始终对他毕恭毕敬。李维娅和她的儿子（当然如今也是她丈夫的儿子）显然对新局面非常满意，很可能是他们曾在幕后推动奥古斯都做出这样的决定。但获益最大的其实是奥古斯都，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是被操纵的。他如今有了一个中年儿子，一个少年儿子，还有两个孙子，在近期和远期都有了亲密助手，而且儿孙数量这么多，足以应付任何新的打击（如夺走了盖乌斯和卢基乌斯的噩运）。他又一次适应了新情况，从自己家族中选拔了一群亲密同僚。在前6年之前，提比略曾表示自己持续奔波劳顿，感到非常疲惫。但在公元4年年底之前，他出征日耳曼，随后十年一直在非常活跃地治国理政。他的长期退隐可能给了他新的工作激情，但奥古斯都可以对儿子发号施令，并自信一定会得到他的服从，就像当年驱使阿格里帕那样驱使提比略辛勤工作。[\[10\]](#)

新身份让提比略付出了艰辛努力，也剥夺了他的独立地位，但这样一位成熟而显赫的贵族心甘情愿地接受另外一人的收养（即便那是至高无上的元首），的确出人意料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这或许最能解释奥古斯都的话，即他“这么做，是为了共和国”。这样的事情，对于置身其中的双方的决定，都需要一番解释。虽然经验丰富的提比略对奥古斯都而言是最方便的选择，但他也完全可以继续将提比略排除在政坛之外，而且那样对国家安定也不会构成什么严重威胁。完全可能有人敦促奥古斯都选拔其他人。狄奥和塞内卡记述了格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秦纳领导的一次未遂的阴谋，不过讲得都很糊涂，令人难以置信。这起阴谋东窗事发，奥古斯都原打算处决秦纳，却被李维娅劝阻了。李维娅显然非常有说服力，奥古斯都居然打算支持秦纳竞选，并确保他成为下一年的执政官之一。[\[11\]](#)

狄奥还说罗马有人游行示威，要求释放尤利娅。这让我们怀疑这些示威是有人操纵的，至少是受到了那些希望从尤利娅重获自由一事当中获益的人的鼓励。狄奥说这些示威发生在公元3年，但也有人说是公元4年，还有人将这些示威看作更广泛的社会骚动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元首坚决拒绝释放尤利娅，宣布除非水火交融，否则他绝不原谅自己的女儿，于是群众将燃烧的火炬投入台伯河，说水火交融了。公元3年，尤利娅最终被允许返回意大利本土，在瑞吉昂附近度过余生，对她的监禁只是比以前放松了一点点。我们的史料不能说明她享有足够的自由，能够和那些要求释放她的人接触。同样，拒绝释放尤利娅并没有损害奥古斯都自己的声望。公元3年年初，他在帕拉丁山的府邸失火，损坏严重。许多社区和个人纷纷表示愿意出资帮他修缮府邸。奥古斯都从这些热心人那里只接受了象征性的一点钱，让他们参与重建工作，不过我们不知道其余的钱是被退回了，还是被用于公共工程。[\[12\]](#)

公元4年，奥古斯都被授予执政官权力，以便开展一次不完整的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没有包括贫困公民和居住在意大利之外的人，只是重新登记了那些自称拥有至少2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财产的人。与此同时，他重新审核了元老花名册，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去相信他这么做是为了除掉提比略或波斯图穆斯的潜在敌人。这很可能仅仅是之前努力的延续，目的是审查那些行为或身份可疑的人。有些人为了达到获得元老资格所要求的财产标准，可能要费一番力气。我们听说，十年后，演说家霍尔腾西乌斯的孙子养了四个儿子，但财产只有12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因此没有办法把财产分割以让四个儿子全部都成为元老。公元4年，元首向八十名元老赠送金钱，好让他们达到元老阶层的财产资格标准。有人说，从这时到奥古斯都去世，提比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执政官的人选。提比略很有可能在举荐人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奥古斯都也是如此，但他们推举的人选都不是令人特别意外，全都是那种即使不受他们推举也很可能当上执政官的人。[\[13\]](#)

这一年颁布了一项新法律，加强了近期其他一些立法，并详细规定了如何对待奴隶，尤其是如何授予其自由，最重要的是限制了遗嘱中能够解放的奴隶的数量，以及年轻的奴隶主能够解放的奴隶的数量，还具体规定了释奴对其原主人的义务。奥古斯都对太多释奴增加了罗马公民的数量感到担忧，害怕罗马有太多人获得免费领取粮食的资格。但其他措施继续保护释奴，赋予他们公民权（尽管有一些限制），并奖励那些生育很多儿女的释奴（其他生养多的公民也会得到奖励）。释奴当中包括许多勤奋而非常成功的人，在罗马城的各个小区发挥重要作用，有时在其他地方的城镇能够成为当地显贵。奥古斯都认真地扶持这些人，让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就像他对其他社会群体那样。从公元4年的立法和其他活动来看，这一年没有发生大幅度的权力转移或政府方向变换，而是“生意照常”。^[14]

自汉尼拔以来的最大危险

这一年结束前，提比略领兵在莱茵河以东作战。冬季，他短暂地回到罗马（每年他都会这么做），随后返回前线，在次年春季指挥了一场新的军事行动，至少前进到易北河。此次行动针对的是一些已经处于罗马影响之下地区的领袖和部落，这说明他们在抵抗罗马，或者对罗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该地区的其他社区似乎已经接受，甚至欢迎罗马人的统治。考古发掘证明，在1世纪初的瓦尔德吉尔姆斯^[15]至少有一座罗马风格的城镇被建立起来，距离征服日耳曼战争时期的罗马军事基地不远。有迹象表明，还存在与其类似的社区。对该地区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城市生活方式（它从根本上是属于罗马的）还没有什么吸引力，但这并不是说将来不会发生变化，毕竟其他行省被罗马征服之后就发生了变化。^[16]

罗马人计划在公元6年开展一场规模更大的行动，希望扩张新领土，而不是简单地巩固已有的征服。攻击目标是马科曼尼人的国王马

罗博杜斯。马科曼尼这个部族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支系——苏维汇人。苏维汇人的习俗是把头发在头顶或两侧绾成髻，这就是有名的苏维汇发髻。马罗博杜斯聪明、有领袖魅力，而且无疑也是一位本领高强的军事领袖，他为自己开辟出了一个帝国，囊括很多族群以及他自己的部族。他控制着现代波西米亚的大部分，即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地区。他至少在青年时代曾在罗马待过一段时间，可能是作为人质。他回到家乡的初期可能得到了罗马人的支持。维莱伊乌斯说马罗博杜斯“血统是蛮族，智力却不是”，并说他统领着一支特别强大的王家军队，拥有很多常备军。维莱伊乌斯说这些士兵的训练几乎达到了罗马标准。这肯定是夸大其词了，不过马罗博杜斯的确是日耳曼各部落好几代人中出现的最强大领袖。他的领地与日耳曼、诺里库姆和潘诺尼亚这三个罗马行省接壤。尽管他接纳了从这些地区逃亡的人，但即便维莱伊乌斯也明确表示马罗博杜斯并没有对罗马人采取敌对行动。维莱伊乌斯只是说，马罗博杜斯的使者有时对罗马非常恭顺，有时却敢于“大言不惭，仿佛他们和罗马是平等的”。^[17]

外国领导人的“傲慢”就足以让罗马人采取行动了，至少要展示一番罗马的力量。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互相畏惧和猜忌更使得局势恶化。马罗博杜斯加强自己的力量，以便自卫，被罗马人视为威胁。罗马人从驻扎在日耳曼的军队抽调部队，组成了一支强大力量，交给军团长盖乌斯·桑提乌斯·萨图尔尼努斯指挥，他是一位经验丰富而成熟稳重的前任执政官（前19年担任执政官），在前一年支持提比略的作战中凭战功荣获“凯旋式符号”的奖励。萨图尔尼努斯的部队将从北面攻击马罗博杜斯，而提比略会率领另一支大军（来自多瑙河沿线驻军）从南面进攻。公元6年秋季，攻势开始了。两支罗马军队穿越了居住在罗马各行省与马罗博杜斯王国之间的部落。没有发生交战，日耳曼国王没有积极的动作，而是退后，直到两支罗马军队几乎会师，距离日耳曼军队只有几天路程。就在马罗博杜斯将要被迫选择战斗或屈服的时候，消息传到罗马军中，罗马的巴尔干各行省爆发了严重的

叛乱，于是形势大变。提比略向马罗博杜斯提出了恢复和平的条件。国王不想冒险与罗马人交战（除非他别无选择），所以很高兴地接受了。于是罗马军队调头撤退，去处置更紧急的叛乱。^[18]

罗马人原先志得意满地以为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很平稳安定，但这两个行省的叛乱却迅速蔓延。就像很多叛乱一样，这里的新一代长大成人了，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被罗马人打败的滋味，于是自负地反叛罗马。据说当罗马人在伊利里库姆征召辅助部队以对付马罗博杜斯时，当地部族看到了自己的人数，开始意识到自己拥有很强的力量。罗马统治者对行省居民的征发（不管是征召人力、牲畜、庄稼支持罗马军队，还是直截了当地要钱）往往给人民造成沉重负担，尤其是如果负责征发的官员笨拙或腐败，或二者兼而有之的话。一位叛乱领袖后来宣称：“这事全怪你们罗马人，因为你们派来保护羊群的，不是牧羊犬或牧羊人，而是恶狼。”^[19]

外省居民心中酝酿着不满，又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强大，尤其是看到自己地区的罗马驻军的精锐部分被调去征服波西米亚，于是叛乱爆发了。各行省的罗马商人和其他平民最先遭到攻击。罗马的军事原则是尽可能快速地处理任何叛乱迹象，用能够快速集结的任何部队发起镇压。无动于衷会被视为软弱无能，会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叛乱。但这样快速反击的风险在于，部队往往力量很弱，无法对付任何顽强的抵抗。若是罗马军队战败，不管失败是多么微不足道，都会鼓舞叛军，壮大其力量。我们不清楚这场叛乱的细节，但罗马人可能没有迅速镇压叛乱，可能还遇到了一些小挫折。至少有一次失败比较严重，维莱伊乌斯记载道，一支罗马军队的老兵们遭到屠杀。^[20]

其他行省也出了麻烦。大约在这个时期，阿非利加（最后一个有驻军的元老院行省）边境发生了军事行动。亚细亚的伊苏利亚^[21]也出了问题。也是这一年，负责管辖叙利亚的帝国总督普布利乌斯·苏

尔皮基乌斯·奎里尼乌斯率领主力部队干涉了犹太地区。大希律王的儿子阿奇劳斯非常不得民心，被罗马人剥夺了王位，流放到高卢，舒适地安度余生。大希律王王国的很大一部分改由罗马人直接管辖，变成了一个罗马行省。不同寻常的是，这个行省的总督是一位骑士身份的长官，而非元老身份的总督，这是埃及之后第二个由骑士掌管的行省，不过后来会有更多这样的行省。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奎里尼乌斯开始主持一次人口普查。这是犹太人第一次接受人口普查，直接向罗马人交税，而不是交给当地国王。很快爆发了一连串的暴力活动。罗马人的反应是非常典型的以暴制暴，而且迅速取得成效，就像前4年大希律王死后情形一样。[\[22\]](#)

六十九岁那年，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同时在多条战线上遇到严重问题，在一个短时期内似乎丧失了斗志。普林尼说奥古斯都陷入了绝望，一连四天不肯吃饭，并宣布自己打算死去。叛乱的伊利里库姆是距意大利最近的行省之一，那里的叛乱从一开始就规模浩大。奥古斯都对该地区有亲身体验，所以知道那里的武士多么凶悍，地形多么不利于罗马军队。起初他没有办法知道波西米亚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马罗博杜斯选择战斗而不是接受和平，那么就很难从那个战区抽调大量部队去镇压伊利里库姆的叛乱。而帝国其他地区的军队要么太遥远，无法迅速赶到伊利里库姆，要么已经在处理其他问题。在意大利，他只有9个大队的禁卫军、少量日耳曼卫队、城市大队和帝国舰队，这些兵力加起来也不能算作可用的野战军。[\[23\]](#)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奥古斯都还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军费重组，目标是设立长期性的、可持续的军费。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奥古斯都建立了军事国库，自掏腰包为其提供了1.7亿塞斯特尔提乌斯，并指定三名前任裁判官担任军事国库的管理者，任期三年。军事国库的资金被用来支付士兵的军饷，以及士兵退伍时的奖金（现在士兵退伍后一般不会得到土地，而是发放一笔奖金）。此时共

有28个军团，为了延缓发放退役奖金从而削减开支，兵役期从十六年延长到了二十年，如果继续服五年兵役，则被称为老兵（伊利里库姆叛乱初期被屠杀的就是这种老兵）。即便如此，长远来看还是需要稳定的资金流。为了提供这笔资金，奥古斯都征收了5%的遗产税，任何非直系亲属的人若要继承财产，都需要交纳遗产税。这是超过一个半世纪以来第一次对居住在意大利的公民征收直接税，从一开始就受到群众的普遍怨恨。^[24]

面对迅速蔓延的叛乱，当务之急不再是谋求长期稳定性，而是迅速征召新的军队来镇压叛乱。奥古斯都在元老院宣布，除非迅速采取措施，否则叛军十天之内就能打到罗马。还有人将此次危机与罗马和迦太基的大战相提并论。数十年来当局第一次在罗马城征兵，但没有足够的志愿兵，于是实施了有限的强制征兵，并接受那些往常因为身体状况或职业而不被接受的人。当局组建了新的大队，不过我们不确定这些大队将来要被军团吸纳，还是仍然作为独立单位。与此同时，政府要求富人交出一些奴隶。这些奴隶被赋予自由和公民权，然后编入特别大队，称为“罗马公民志愿大队”。这个番号以不同的服装和装备，将他们与在军团服役的生来就是自由人的公民区分开。^[25]

富人被要求尽自己的义务，担任现有军队和新部队的指挥官。奥古斯都要求大家自愿报名，尤其是元老和骑士阶层的青年。多年来，他鼓励骑士阶层培养一种比以往更强的身份认同，任命盖乌斯·恺撒和卢基乌斯·恺撒为骑士阶层名义上的领袖，并恢复了一年一度的骑士（那些根据传统有资格作为骑兵服役的人）游行，并将骑士身份仅局限于那些年龄和身体状况适合服兵役的人。在这个危机时刻，骑士们不是作为骑兵服役，而是担任辅助单位的指挥官，并在军团中担任军事保民官。公元6年，一些骑士主动报名，其他人若是受到国家征召，也愿意参军。有少数人不愿意参军，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一位骑士父亲切掉了儿子们的大拇指，这样他们就不符合参军的身体资

格。奥古斯都下令对此人进行审判、定罪，最后的处罚是将他卖为奴隶，并将其财产拍卖。此人属于一个包税人公司（这种公司仍然从政府承揽合同，征收一些税赋），他的同事们开价要买他，于是元首以象征性价格将他卖给他先前的一名释奴。于是犯人被送到一座乡间别墅当奴隶，但没有受到虐待。^[26]

各阶层都有一些人不愿意为国效力，这只是更广泛问题的一部分。对罗马的所有居民来说，火灾仍然是严重的威胁，近期的几次火灾迫使奥古斯都组建了7个火警队，每个队负责城市的2个区域，作为消防队和夜间巡逻队。火警队的绝大多数人员都是释奴，因为罗马人口的很大组成部分是释奴，也说明当时各种人力都很缺乏。为了给火警队提供资金，政府以奴隶售价的2%^[27]，对奴隶贸易征税。此外还有粮食短缺的问题，原因可能是收成不好，或者将粮食运往罗马有困难。多余人口（包括角斗士和等待出售的奴隶）被禁止进入城市100英里范围之内。与此同时，一些公共事务被暂时停止，元老被允许待在乡间、不来参加元老院会议；另外实施了豁免，以便元老院不足法定人数时的投票也算有效。^[28]

不足为奇的是，在这些令人忧心忡忡的时期，有人暗暗表达着不满。一些匿名小册子在流传，或多或少公开地暗示要闹革命。很难说攻击的对象是元首还是他身边的人；也许是其他行政长官和元老被人民责怪，不得民心。狄奥说，人民将骚动的大部分罪责归于一个叫鲁弗斯的人，此人自称普布利乌斯，而苏埃托尼乌斯说他姓普劳提乌斯。但大多数人相信此人身份低微，也不够聪明，所以不是真正的策划者。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些骚动与那些相信应当让李维娅的子孙下台、让尤利娅及其亲人上台的人有关系。狄奥认为，遗产税是人民不满的原因之一。但遗产税只会影响到那些拥有相当多财产的人，所以历史学家们怀疑尤利娅亲人的支持者进行了政治操纵，希望放大人民的不满情绪。但这样的理论只是猜测而已。^[29]

粮食短缺的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促使奥古斯都拒绝在他的生日当天举办公共宴会。他派遣几位前任执政官去改善粮食供给制度，同时自掏腰包为罗马城有资格接受免费粮食的人提供额外食物。渐渐地，粮食供应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更适合庆祝的时候到了。为了纪念提比略的弟弟德鲁苏斯，角斗士比赛得以举办，由日耳曼尼库斯和克劳狄主持。克劳狄身体虚弱，常常抽搐和口吃，显然不适合从政，因为从政就有军事义务。克劳狄的母亲说他是“自然未完成的怪胎”，喜欢骂别人“和我儿子克劳狄一样笨”。但在这个阶段，他被认为可以出席公共场合，尽管在观看角斗士比赛时他穿一件厚斗篷而不是通常的托加袍，可能是为了掩盖外貌。提比略在广场重建的卡斯托耳与波鲁克斯神庙落成时，又纪念了德鲁苏斯。神庙中将提比略称为“提比略·尤利乌斯·恺撒·克劳狄阿努斯”，以赞颂他原先的家族背景和如今的恺撒之名。^[30]

尤利娅的孩子们

我们对波斯图穆斯被收养之后几年的情况了解不多。公元5年，他成年了，举行了公开成年礼，但没有大肆宣扬。不过这也比克劳狄的成年礼要强。借着夜色，克劳狄被匆匆带进复仇者玛尔斯神庙，而后又被偷偷带出来。亲人们还没有拿定主意，要在多大程度上将克劳狄展示给公众。波斯图穆斯还年轻，所以他还没有扮演公共角色，也不奇怪。与克劳狄不同，波斯图穆斯健壮而活跃，但我们的史料都说大家对他的性格和智力有怀疑，含糊地暗示他性格凶暴、行为不端，但没有具体说如何不端。值得记住的是，他母亲出丑闻的时候，他还不到十岁，并且亲眼看到她被流放，他的两个哥哥都得到迅速提升，享有广泛赞誉，他自己却没有。或许他开始努力迫使大家更好地认可他。^[31]

公元5年，奥古斯都改革了百人会议的投票制度，从最高阶层中组建了10个新百人团，并以盖乌斯和卢基乌斯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们。这10个百人团最先投票，其他百人团很可能会效仿他们，因为罗马选民喜爱站在胜利者一边。这次改革可能是偶然的，也是让国家机构更顺利运作的努力的一部分，但肯定有利于防止前6年的事件（选民们选盖乌斯·恺撒为执政官，尽管他根本不是候选人）重演。一些野心勃勃的人可能觉得，波斯图穆斯是他们飞黄腾达的良机。这个少年可能说了一些不明智的话，或者有不妥的举动，渐渐失去了奥古斯都的信任。公元7年，人们期待十七岁的波斯图穆斯会得到一个公共职位以及某些新建部队的指挥权，率军开赴潘诺尼亚作战。但这个职位被交给了日耳曼尼库斯。^[32]

波斯图穆斯似乎是逐步垮台的。起初，他遭到训斥，被送往那不勒斯湾的苏伦图姆（今天的索伦托），他在那里终日钓鱼。随后奥古斯都正式断绝了与他的父子关系，他不再是一位恺撒，而变回了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他的生父留下的财产没有归还给他，因为奥古斯都把这笔钱的大部分投入了军事国库。波斯图穆斯为此大声抱怨，尤其是攻击李维娅，于是最终他被流放到科西嘉岛附近的小岛普拉纳西亚^[33]，受到严密监视。古典世界已经散播着这种怀疑：提比略及其母亲急于除掉潜在的未来竞争对手。今天仍然有学者相信这种理论。这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更可能的是波斯图穆斯自掘坟墓。奥古斯都在此事当中，和在其他很多事情中一样，可能受到了妻子的引导，但他亲眼看着这孩子长大，应当对他的天性有很好的把握。有人说奥古斯都家族愿意容忍克劳狄所谓的迟钝和羸弱，所以应当也会容忍波斯图穆斯的愚蠢或更糟的情况。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克劳狄不是恺撒的养子，也不被认为是他的继承人之一。^[34]

波斯图穆斯是元首唯一的外孙，所以在公元4年没有办法轻易地忽略他，除非把他关在什么地方。奥古斯都可能已经怀疑这孩子品行有

问题，但希望他改过自新，长成一个沉稳能干的男子汉。波斯图穆斯在被收养之后也没有得到公共角色，这主要是因为奥古斯都的谨慎，而不是提比略或他母亲对波斯图穆斯的嫉妒和猜忌。波斯图穆斯没有进步，于是奥古斯都摒弃了他。塔西佗后来说，波斯图穆斯并没有真正犯罪，很难说是不是他的某个举动促使奥古斯都放弃了他。政治竞争肯定发挥了作用，但史料的判断——他被流放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性格和人品——很可能是正确的。[\[35\]](#)

公元7年，日耳曼尼库斯率军前往潘诺尼亚，开始证明自己是一位优秀将领。他的角色仍然是比较次要的，其他部队也有自己独立的指挥官。历史学家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自豪地告诉我们，他就是指挥官之一，没有履行当年财务官的职责，而是领兵作战。提比略是最高统帅，他在前一年匆匆赶到了平叛前线。这是一场艰难的战役，附近各行省遭到邻国部族的攻击，于是一些原本肩负平叛任务的罗马部队被调走。这又一次证明，罗马人非常幸运，因为马罗博杜斯愿意讲和而不是利用罗马暂时的弱势趁火打劫。从此之后，马罗博杜斯成为罗马的坚定盟友，并因此获得了更巩固的地位。[\[36\]](#)

战斗规模宏大，常常非常残酷，因为很多叛军曾在罗马军中作为辅助士兵服役。他们懂拉丁语，知道罗马军团如何运作，而且他们比大多数部落武装都更加遵守纪律。有好几次，罗马远征军被遏制住，不得不撤退，或者在蒙受严重损失之后才取胜，好几支被包围的驻军在千钧一发之际得到救援。有一段时间，提比略统领着自内战以来最强大的罗马军队，包括10个军团、70个辅助大队、14个辅助骑兵单位、1万名老兵（这里老兵指的应当是重新入伍的退伍军人，而不仅仅是处于兵役末期的资深士兵），以及色雷斯国王和其他友邦提供的盟军。提比略的这支大军相当于整个罗马军队的三分之一以上，比尤利乌斯·恺撒指挥过的任何军队都更庞大。提比略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军队太大，无法有效地保障后勤，也难以控制，于是不久之后就将其

分割成多支野战军。不过这还不包括所有被派去平叛的部队。讨伐潘诺尼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的罗马军队共计15个军团，还有数量差不多的辅助部队。因此，为了镇压一个行省的叛乱，相当于罗马全军一半以上的兵力参加了艰苦的作战。^[37]

这是自亚克兴角战役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也比之前更加艰难。关于叛军进逼罗马的说辞是耸人听闻的，但这场战争确实与前30年以来的历次规模较小的战争迥然不同，其规模大得多，取胜也更艰难。在一段时间内，或许只是非常短的时间，这场战争威胁到了奥古斯都的领导。奥古斯都政权素来宣称，罗马人民及其元首被诸神赋予持续的、不可阻挡的胜利，因为美德和虔诚使得他们有资格得到这种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宣传，不过重复了那么多遍的主题往往被宣传对象信以为真。罗马可能输掉一场战争、丢掉一个行省的前景令人震惊，意味着罗马人已经丧失了诸神的恩宠，不再有资格获得胜利。这足以解释为何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在战争开始时险些崩溃：“他创造的一切，似乎都受到了威胁。即便在他恢复勇气之后，也有迹象表明他心里还是害怕，一个表现就是，他后来不耐烦地说，提比略赢得不够快。”^[38]

公元7年，奥古斯都庆祝了七十岁生日。有很明显的迹象表明，他已经非常衰老了，健康在走下坡路。次年，他开始减少自己的工作量。三位前任执政官被派去接待盟邦领导人和外省社区的大部分使团。这些使团仍然不断来到罗马，向元首请愿，或者仅仅来赞颂他。他参加元老院会议的次数大大减少了。虽然他还继续主持司法听证会，但部分会议在帕拉丁山上的家中举行，而不是在公共场所。选举的时候，他不再亲自参加并表示自己对得宠候选人的支持，而是简单写下他推荐的人的名字，展示给选民。但我们不应当夸大他的虚弱，况且他旧日的坚定还会不时表露出来。公元8年，也可能是在其他年

份，他旅行到意大利-伊利里库姆边界上的阿里米努姆（今天的里米尼），以便接近战区。^[39]

公元7年又出现粮食匮乏的情况，导致更多骚乱。次年的选举被暴乱打断，以至于无法进行，于是奥古斯都任命了所有行政长官。据我们所知，这些暴乱是候选人之间的竞争造成的，他们都与支持提比略及其家人或被抛弃的波斯图穆斯的派系没有关联。但在公元8年，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女儿小尤利娅因通奸罪被公开谴责，和她母亲一样被流放到一个岛上。这一次只有一个情夫被指名道姓，就是迪基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他得到通知，他已经失去了恺撒的友谊，必须“自愿”流亡。我们不了解小尤利娅的丈夫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的命运，不过因为罪名是通奸，所以他应当还活着。保卢斯在公元1年担任执政官，但没有得到其他高级岗位，而且被苏埃托尼乌斯列入阴谋反对奥古斯都的密谋者之中。苏埃托尼乌斯没有指出保卢斯阴谋反对奥古斯都的时间，也没有记载他具体做了什么。因此如果小尤利娅出丑闻时他还没有被流放，那么他阴谋反对元首一定发生在她出事之后。小尤利娅在几个月后生了一个孩子，但奥古斯都不准抚养这孩子，而是把孩子弃于荒野。这显示了一家之主以及元首享有的生杀予夺大权。^[40]

诗人奥维德卷入了此事，他没有受到正式指控或审判，而是被命令自行前往黑海之滨的托米城^[41]，留在那里等候指示。托米位于帝国的边缘，也是希腊-罗马文化的边缘。他在那里写了许多诗，恳求宽恕回国。遗憾的是，它们不能帮助我们了解丑闻的更多细节。不过考虑到事件的敏感性质，这也不足为奇。奥维德被责怪做了某些不谨慎的事情，可能是看到了他不应当看到的事情，另外他的《爱的艺术》也被认为有伤风化（这部诗已经流传了至少十年，因此算不上新鲜事）。年迈的奥古斯都如今元气渐渐衰竭，更容易发怒，可能觉得这

部诗欢快地赞扬婚外情，对年轻人的影响十分恶劣。不过，奥维德的另外一桩罪行可能更严重。[\[42\]](#)

总的来讲，整个事件仍然迷雾重重。学者们肯定觉得性丑闻背后有政治阴谋，尤其是因为保卢斯被指认为密谋者之一。具体是什么阴谋，众说纷纭。根据他当时是否还在罗马，有不同解释。不过学者们总是认为，此事对提比略及其亲人作为帝国接班人的地位发起了挑战。有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理论是，小尤利娅和西拉努斯企图结婚，甚至举行了一个仪式（奥维德可能目睹了这个仪式），以某种方式迫使元首提携自己外孙女的新丈夫。但这只是猜测，而且不管多么有吸引力，其他的解释也能覆盖我们知道的少得可怜的事实。如果真有阴谋，肯定没有什么结果，很可能从一开始就筹划得很幼稚，执行得很差劲。小尤利娅可能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了，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让她开始搞婚外情或危险的政治阴谋（或二者兼有）。奥古斯都晚年说两个尤利娅和波斯图穆斯是他的“三个疖子”或“三处溃瘍”，所以他们的罪行可能是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违背他的意愿，而不是野心勃勃的夺权阴谋。[\[43\]](#)

不管怎么样，结果都是一样的。李维娅的家系将会主宰皇位继承，这可能是秘密权力斗争的胜利，也可能是偶然为之的结果。公元9年，提比略返回罗马，凭借成功镇压巴尔干叛乱的战功荣获凯旋式，这是他理所应得的。他的工作做得虽然慢，但很彻底，据说在战争晚期对叛军恩威并施，以武力配合和解。至少有一次，一名叛军高级将领被宽恕，这在任何战争中都是罕见的事情，更不用说在叛乱中了。更有力的证据是，这些地区再也没有发生过叛乱，在今后的几个世纪里将是罗马帝国一个稳定而欣欣向荣的部分。看样子危机结束了，胜利换来的和平可以继续统治天下了。就在这时，从日耳曼传来消息，那里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军事灾难。

[1]. Velleius Paterculus 2.103.1-2.

[2]. Suetonius, *Augustus* 65.2.

[3]. Pisa (*ILS* 140) 的一份铭文明确表示, 到4月2日, 那里的人已经得知盖乌斯的死讯, 消息一定在此之前就传到了罗马城; 对这一年的决策的讨论, 见 R.Birch, ‘The Settlement of 26 June AD 4 and its Aftermath’, *Classical Quarterly* 31 (1981), pp.443-56; 关于恺撒的名字, 以及恺撒家族与其住所的联系, 见D.Wardle, ‘Valerius Maximus on the Domus Augusta, Augustus, and Tiberius’, *Classical Quarterly* 50 (2000), pp.479-93。

[4]. Suetonius, *Caligula* 4.1; 关于概况, 见B.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47-52, R.Seager, *Tiberius* (2005), pp.29-32; 关于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及其家族, 见R.Syme, *The Augustan Aristocracy* (1986), pp.104-27。

[5]. Suetonius, *Tiberius* 12.2-3, 15.1, Velleius Paterculus 2.102, Tacitus, *Ann.* 3.48.

[6]. Dio 55.13.1a-2, Velleius Paterculus 2.103.1-104.1, Suetonius, *Tiberius* 15.2, 相关讨论见R.Birch, ‘The Settlement of 26 June AD 4 and its Aftermath’, *Classical Quarterly* 31 (1981), 尤见. pp.444-8。

[7]. 引文来自Velleius Paterculus 2.104.1; 讨论见Crook in *CAH2* X, p.105, B.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49-50, R.Seager, *Tiberius* (2005), pp.29-32; 奥古斯都给提比略的信, 见 Suetonius, *Tiberius* 21.2-6。

[8]. 李维娅的参与, 见Dio 55.10a.10, Pliny, *NH* 7.149, Tacitus, *Ann.* 1.3, Suetonius, *Augustus* 65.1, with A.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52-9, 241-2; 关于两个家族之间更广泛的竞争, 见B.Levick, ‘Julians and Claudians’, *Greece and Rome* 22 (1975), pp.29-38。

[9]. Dio 55.13.2. Suetonius, *Tiberius* 16.1 声称此次授权仅为三年, 但 *Res Gestae* 6 Augustus 表明授权更有可能是十年。

[10] Suetonius, *Tiberius* 15.2谈及提比略认真对待自己被收养。

[11] Dio 55.13.1, 14.1-22.2, Seneca, *de clementia* 1.9.1-10, with B.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54, R.Birch, 'The Settlement of 26 June AD 4 and its Aftermath', *Classical Quarterly* 31 (1981), p.447, A.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131-3, Syme, R., *The Augustan Aristocracy* (1986), p.266.

[12] Dio 55.12.4-5, Tacitus, *Ann.*1.53.

[13] Dio 55.13.4-7, 概况见C.Nicolet, 'Augustus, Government, and the Propertied Classes', in F.Millar & E.Segal (eds), *Caesar Augustus. Seven Aspects* (1990), pp.89-128; 霍尔腾西乌斯·霍尔塔鲁斯和他的四个儿子在公元16年, 见Tacitus, *Ann.*1.37-8, 及C.Nicolet, 'Augustus, Government, and the Propertied Classes', in F.Millar & E.Segal (eds), *Caesar Augustus. Seven Aspects* (1990), pp.95-6; 关于选举, 见B.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51-4。

[14] 有价值的介绍, 见Treggiari in *CAH2* X, pp.893-7。

[15] 在今天德国西部黑森州的拉瑙县。

[16] Dio 55.13.1a, 29.5-7, Velleius Paterculus 2.104.2-107.3; 对拉瑙-瓦尔德吉尔姆斯的考古发掘的概述, 见R.Wolters, *Die Schlacht im Teutoburger Wald* (2008), pp.65-9。

[17] Velleius Paterculus 2.108.1-109.4; 关于马科曼尼人和苏维汇人的概况, 见Tacitus, *Germania* 38-41, Strabo, *Geog.*7.1.3。

[18] Velleius Paterculus 2.109.4-110.2, Dio 55.28.6; 在据说由Maroboduus创作的辞藻华丽的演讲稿中, 罗马人调动了12个军团去对付他, Tacitus, *Ann.*2.46。

[19] Dio 56.16.3 (Loeb translation)。

[20] Dio 55.29.1-30.6, Velleius Paterculus 2.110.2-6; 罗马军队对叛乱的应对, 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1996) , pp.79-95。

[21]. 大约在今天土耳其西南部的安塔利亚省。

[22]. Dio 55.27.6-28.4, Josephus, *BJ* 2.111-118, *AJ* 17.314.

[23]. Pliny, *NH* 7.149谈及他企图自杀。

[24]. Dio 55.24.9-25.6, *Res Gestae* 17, with L.Keppie, *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 , pp.147-8.

[25]. 见Suetonius, *Augustus* 25.2, Velleius Paterculus 2.110.6-111.2, with L.Keppie, *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 , pp.168-9, 引用V.Ehrenberg & A.Jones,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Reigns of Augustus and Tiberius* (2nd edn, 1975) , p.368讲到征召公民。

[26]. Suetonius, *Augustus* 24.1, 概况见C.Nicolet, ‘Augustus, Government, and the Propertied Classes’ , in F.Millar & E.Segal (eds) , *Caesar Augustus. Seven Aspects* (1990) , pp.99-101。

[27]. 也有说法是4%。

[28]. 警备队, 见Dio 55.26.4-5, with G.Watson, *The Roman Soldier* (1985) , pp.19-20; 关于其他问题, 见Dio 55.26.1-27.3。

[29]. Suetonius, *Augustus* 19.1, Dio 55.27.1-2, with R.Birch, ‘The Settlement of 26 June AD 4 and its Aftermath’ , *Classical Quarterly* 31 (1981) , pp.450-52, B.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 pp.55-9, 及T.Wiedermann,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Ovid’ s *Tristia*2’ , *Classical Quarterly* 25 (1975) , pp.264-71, esp.265-8。

[30]. Dio 55.26.2-3, 27.3-5, Suetonius, *Claudius* 2.2.

[31]. Dio 55.32.1-2, Suetonius, *Augustus* 51.1, 65.1, *Claudius* 2.2, Velleius Paterculus 2.112.7, Tacitus, *Ann.*1.5-6, with R.Birch, ‘The Settlement of 26 June AD 4 and its Aftermath’ , *Classical Quarterly* 31 (1981) , pp.446-52, 及B.Levick, ‘Abdication and Agrippa Postumus’ , *Historia* 21 (1972) , pp.674-97, 尤见690-93。

[32] Dio 55.32.1, with B. 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 51–2, A. Jones, ‘The Elections under Augustus’, *JRS* 45 (1955), pp. 9–21, 尤见 13–17。

[33] 今称皮亚诺萨岛，在意大利本土与科西嘉岛之间。

[34] Dio 55.32.1, with B. Levick, ‘Abdication and Agrippa Postumus’, *Historia* 21 (1972), pp. 690–97, R. Birch, ‘The Settlement of 26 June AD 4 and its Aftermath’, *Classical Quarterly* 31 (1981), pp. 448–51, 455–6, 及 A. 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 57–65。

[35] Tacitus, *Ann.* 1.3.

[36] Velleius Paterculus 2.111.3–4; 关于此次战争的概况，见 Dio 55.29.1–32.4, 34.4–7, 56.11.1–17.1, Velleius Paterculus 2.110.1–116.5。

[37] Velleius 2.113.1–2, Suetonius, *Tiberius* 16.1, with A. 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1996), pp. 35–7, 116–25。

[38] Dio 55.31.1 讲到，奥古斯都相信提比略作战不力，进展不够快，这与他此前敦促将领小心谨慎形成了对比，Suetonius, *Augustus* 25.4。

[39] Dio 55.33.5–34.3。

[40] Suetonius, *Augustus* 65.1, 4, 72.3, 101.3, Tacitus, *Ann.* 3.24, 4.71, Pliny, *NH* 7.75, with R. Birch, ‘The Settlement of 26 June AD 4 and its Aftermath’, *Classical Quarterly* 31 (1981), pp. 452–4,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 432, 468, 与 (1986), pp. 115–27, 188–99。

[41] 今天罗马尼亚的港口城市康斯坦察。

[42] Ovid, *Tristiae* 2.207 讲到“两起罪行，一首歌谣和一个错误”；讨论见 R. Syme, *History in Ovid* (1978), pp. 206–29。

[43]. Suetonius, *Augustus* 65.4, with B. 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55–62, Crook in *CAH2* X, pp.108–9都对这个问题做了谨慎的讨论。

二十二 奥古斯都盛世

奥古斯都盛世笼罩着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的边境，保护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免遭土匪劫掠。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1世纪初^[1]。

罗马人非常善于吸纳被征服的族群，并劝说他们（或至少是他们的领袖），支持罗马的统治并加入征服者一方对他们更有利。阿米尼乌斯就是这样一个光辉例证。他生于约前18～前15年，属于切鲁西部族（日耳曼人的一支，领地在莱茵河以东，靠近威悉河）的王族。除了他之外，部族里还有几个贵族拥有王族血统，但在日耳曼部落松散的社会与政治架构中，王权的地位并不高，所以出身王族未必能够主宰部落。阿米尼乌斯的父亲西吉莫尔仅仅是争夺部族权力的几个权贵之一。西吉莫尔可能参加过前1世纪末反抗罗马人的战争。即使是这样，他也很快向入侵者投降了。西吉莫尔也完全可能从一开始就认为，与罗马结盟能够帮助他战胜当地的竞争对手。世界上很多地方的领袖都是这样，将罗马军队的强大力量视为可以帮助自己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一种威胁。

罗马人从切鲁西部族招募辅助士兵，年轻的阿米尼乌斯起初就是这样一个辅助单位的指挥官，与罗马人并肩作战。他的弟弟弗拉乌斯很快也追随他，加入罗马军队。兄弟俩可能都曾作为人质在罗马生活，居住在帕拉丁山上的奥古斯都府邸，和元首家族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不过对此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兄弟俩肯定都会说非常流利的拉丁语，这样比较容易获得罗马公民权，因为奥古斯都更愿意将公民仅限于那些他认为有资格成为罗马人的人。阿米尼乌斯在罗马军中参加了很多军事行动，可能在日耳曼作战，也可能在镇压伊利里库姆大叛乱的队伍中。他被授予骑士身份，后来在公元7年返回家乡，成为

切鲁西人的重要领袖之一。在新建的日耳曼行省，骑士身份所需的至少4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是一大笔钱。阿米尼乌斯很富有，而且是久经考验的罗马盟友，常常是日耳曼行省总督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的座上客。^[2]

瓦卢斯五十多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行省总督，曾在阿非利加和叙利亚任职。他于前13年和提比略一起担任执政官，先娶了阿格里帕的一个女儿，后来娶了奥古斯都的甥孙女克劳狄娅·普尔科拉^[3]。元首显然认为瓦卢斯是个忠诚可靠的部下。公元7年，瓦卢斯奉命统领日耳曼，管辖莱茵河边境和向易北河延伸的、正在发展的行省。他的任务是，在帝国的精力和资源集中于镇压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叛乱时，确保日耳曼地区的稳定。瓦卢斯手中有5个军团和大量辅助部队来支撑自己的权威，不过这些部队的很大一部分兵力可能已经被调往伊利里库姆。另外，征募新兵的困难意味着新兵不大可能被送往日耳曼。同时，无疑有很多雄心勃勃和精明强干的军官寻求到巴尔干的大战前线任职，以建功立业。瓦卢斯没有被派往前线，也没有被派往靠近叛乱地区的行省，说明奥古斯都认为他虽然能干但不是特别有才华，至少没有突出的军事才华。前4年，瓦卢斯担任叙利亚总督时，曾率军开进犹太，展示军力，平定了大希律王驾崩引发的骚乱，但此次行动很少有真正的战斗。据我们所知，瓦卢斯从来没有亲身参加过战斗。^[4]

但日耳曼地区似乎一片安宁，原因之一是像阿米尼乌斯这样的当地贵族接受了罗马的统治。到这时，阿米尼乌斯的父亲可能已经去世，但他的叔叔是瓦卢斯餐桌上的另一位常客，切鲁西人的贵族塞格斯特斯^[5]也是如此。塞格斯特的幼子是新建的供奉罗马女神与奥古斯都的新崇拜仪式的祭司，祭拜地点在乌比部落的民政中心（即今天的科隆，由阿格里帕建造）。最后一次大规模冲突发生在公元5年，此后日耳曼基本上和平安定，只是偶尔有一些小规模的反罗马的叛乱

和零星的部落间冲突。在瓦卢斯统辖下，日耳曼酋长们开始采用向总督上诉而不是互相袭击的手段来解决争端。前不久建立的罗马平民定居点在扩大，它们的位置常常在旧军营或其附近。^[6]

后来有人批评瓦卢斯简单地认为这个行省已经彻底安定，而不是处于被征服的过程中，还批评他藐视当地居民，认为日耳曼人“仅仅外形和说话像人类，虽然不会臣服于刀剑，却会屈服于法律”。但这些批评都是后见之明，不过这并不是说他的所有行动都是明智的或处理得很好。他开始向各部落定期收税，而在过去，各部落被罗马打败并臣服于罗马时，罗马人只会征收牛或粮食。他的税收可能很严苛，也可能不严苛，但毕竟是新鲜事，不可避免地受到批评，被认为象征着日耳曼人不再是罗马的盟友，而是臣民。在罗马外省治理的漫长历史中，腐败是个司空见惯的问题，可能让日耳曼的局势变得更糟。维莱伊乌斯说瓦卢斯贪得无厌，在治理叙利亚期间，“上任前他是个穷人，叙利亚是个富裕省份；他离开时成了富人，叙利亚却变穷了”。^[7]

日耳曼人对罗马的怨恨愈演愈烈，税收更是火上浇油。和在潘诺尼亚一样，最恨罗马的是那些从来没有与罗马军队交过手的较年轻武士。同时，看到罗马人从攻击马罗博杜斯的行动中撤退，在伊利里库姆花了很大力气却依然未能镇压叛乱，日耳曼人对罗马强大力量的畏惧也可能消失了。看来罗马人并非不可战胜，就连那些和罗马结盟而获益甚多的人也开始考虑，与罗马友好在将来是不是明智的政策。阿米尼乌斯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位罗马骑士决定抛弃自己的罗马公民权，反抗罗马帝国。我们不知道他是何时做出这个决定的，也不知道促使他反叛的动因又是什么。对自己和其他部落丧失独立而感到愤怒，是极可能的原因，同时他也不满意征服者对日耳曼人的待遇。虽然他已经是罗马公民，但可能觉得其他公民对他只是屈尊俯就。他的弟弟的名字弗拉乌斯是罗马人取的拉丁文名字，字面意思是“金

发”，很难说这是侮辱还是亲昵的称呼，就像“红毛”“姜黄毛”

“蓝蓝”这样的绰号。另外，我们也要考虑，或许阿米尼乌斯自己也有野心。他通过与罗马人结交，攀升到了很高的地位，成为自己部落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他或许觉得，现在继续效忠罗马也不会有晋升的希望了。近期事件表明，罗马不是不可战胜的。而率领自己部落和其他部落赢得自由的英雄必将获得极大的威望，得到更大的、更永久性的权力，有希望成为马罗博杜斯那样强大的领袖。个人野心和对自由的渴望绝不是不能共存的，后来的事件肯定能说明阿米尼乌斯渴望统治的权力。[\[8\]](#)

但目前他还很谨慎，秘密而小心地筹划叛乱。公元9年春夏，瓦卢斯开始巡视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各地，带着3个军团，分别是第十七、十八和十九军团，另外还有6个辅助步兵大队以及3个骑兵单位。这是在展示罗马的武力，而不是出征，因为他不认为会遇到顽强抵抗。作为对各地骚乱的回应，瓦卢斯派遣小分队到许多自称感到受威胁、需要罗马保护的村庄和其他社区。他行进时接见各地的贵族，听取他们的请愿，并按照罗马总督的惯常方式仲裁他们长期而复杂的争端。到夏末，总督及其将士准备返回邻近莱茵河的冬季营地，这时传来消息，更东方的地区发生了叛乱。可能是阿米尼乌斯告诉他这个消息的。这起叛乱也是阿米尼乌斯暗地里安排的。瓦卢斯按照标准的罗马方式做出反应，就像他前4年在犹太做的那样，立刻率军去讨伐叛军。同样和在犹太一样，罗马军队刚刚出现，叛军的公开抵抗就瓦解了。[\[9\]](#)

问题显然已经解决了，瓦卢斯于9月开始向西撤退。与原计划相比，他的返程比较晚，路程也更远。给养肯定已经不多了，这意味着他必须匆匆赶路，但没有理由觉得会遇到麻烦，所以这也不是严重的问题。他的部队可能有相当多的缺编，所以全军可能只有1万至1.5万作战人员。此外还有数千名奴隶，包括军队的奴隶（作为马夫、骡夫

之类)和军官们的奴隶与自由侍从。瓦卢斯的军队在行军时不忘奢侈舒适,我们知道至少有一名军官带着一张镶嵌象牙的精美卧榻,所以军队受到大量运载行李的骡子和大车的拖累。军中还有一些平民,其中一些可能是为官兵提供物资的商贩,其他人则是旅客,在日耳曼部落待了一个季节之后乐于得到军队保护,还有大量的妇女和儿童。奥古斯都曾禁止在役士兵结婚,但我们不知道这个禁令是前13年广泛军事改革的一部分,还是在公元6年或其他年份颁布的。禁令的原因可能是政府不愿意供养太多的军人家属,或者向太多孤儿寡妇支付抚恤金,同时也是为了让军队能够随时行动,快速地从帝国的一端调动到另一端。有些士兵可能在禁令颁布之前结了婚,所以他们服役时有妻子。也有的士兵干脆无视这道禁令,结婚生子(尽管这是非法的),当局对这种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0\]](#)

在如此深入日耳曼的地方,没有宽阔而平整的罗马式大道。长达十多里的行军队伍沿着大车留下的蜿蜒老路,穿过树林、耕地、草地和沼泽。罗马人的路线是不难预测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必须始终走在道路上。阿米尼乌斯和其他部族领袖提供的本地向导帮助罗马人寻找道路,队伍缓缓行进,只有最基本的安保措施。瓦卢斯相信自己处于友邦领地,急于赶路,免得连绵秋雨将道路变成泥沼。他不认为自己会遇到威胁,所以也没有提高警惕;他相信,万一遇到麻烦,切鲁西人和其他部落提供的侦察兵会提前发出警告。塞格斯特斯突然告诉总督,阿米尼乌斯图谋造反,总督却无动于衷,肯定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酋长在攻击另一个。阿米尼乌斯否认了塞格斯特斯的所有指控,毕竟他是罗马公民,是一名久经考验的骑士。大多数罗马人,就像大多数帝国主义势力的领导人一样,都不愿意相信土著竟然拒绝接受与殖民者合作、享受他们“更优越”文化和统治的好处。[\[11\]](#)

过了一段时间，阿米尼乌斯离开了罗马人的行军队伍，说要去找更多的辅助部队、向导或其他帮助。但其实他是去与正在集结起来准备打击罗马人的日耳曼军队会合。随后一些天里，小股部族武装开始骚扰罗马队伍的一些部分，并在罗马人开始组织防御之前就撤退了。奥斯纳布吕克附近卡尔克里泽山的考古发掘显示，在大约20英里的距离，日耳曼人发动了一系列攻击，最后在卡尔克里泽山发动了决定性的大伏击。阿米尼乌斯显然做了精心准备。他选择的伏击地点是一个狭窄的通道，道路穿过草地，一侧是林木茂密的山丘，另一侧是沼泽地。在天然障碍物之外，日耳曼人还伐倒树木以拖慢罗马人的行军速度，挖掘了一道壕沟以防止罗马人改走另一条道路逃避伏击，并在道路一侧山坡的树丛中建起500码长的壁垒。修建壁垒的材料部分是泥炭，部分是泥土，显然是受到罗马军队经常建造的野战工事的启发。[\[12\]](#).

阿米尼乌斯从为罗马服役的军旅生涯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无情高效地运用了自己的知识。他确保瓦卢斯一定会走这条道路，而且他的伏击准备工作一定花了好几天，甚至好几周。形势对罗马人非常不利。更糟糕的是，下起了暴雨，道路变成了烂泥潭，行军速度被拖慢，装备也难以操作。瓦卢斯对危机的处理很不好。他在早期就命令将大部分辎重焚毁，这很可能会传播紧张气氛。敌人迅猛攻击，蚕食着罗马军队，绝望情绪开始蔓延。他们抵达敌人精心准备的伏击场时，敌人的攻击更猛烈了。日耳曼人的壁垒有好几个出击点，武士们可以从那里冲出去进攻，然后撤回来躲避。壁垒虽然不超过五英尺高，但足以打断罗马人进攻的势头，而且给了在那里作战的日耳曼武士居高临下的优势。罗马人在狭窄的道路上被围堵得动弹不得，并且四面八方同时遭到攻击。罗马人努力组成协调一致的战线。[\[13\]](#).

一位特别优秀的将领仍然有机会恢复部队的秩序，向敌人发动集中攻击，从而脱险。瓦卢斯不是一位特别优秀的将领，很快就失去了

对部队的控制。他的一名部下自行率领骑兵冲了出去，后来在另一条道路上被包围和屠杀。瓦卢斯自己也负了伤（我们不知道伤得有多重），不久之后就和另一名高级军官一同自杀了。他的父亲是在腓立比战役之后自杀的。然而，在内战中失败而自尽的罗马贵族可以得到仰慕，但率军与外敌作战的指挥官自杀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指挥官都绝望了，那么士兵们还有什么斗志？一些人，包括几名高级军官，投降了，其他人逃走了，或者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被日耳曼人砍倒。一些士兵还在战斗，发动了绝望的进攻，希望突破壁垒，逃出包围。在战斗中，壁垒的一部分坍塌了。考古发掘让我们能瞥见最后殊死搏斗的一些场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头骡子的骨骸，它脖子上挂的铃铛塞满了不久前从地上拔起来的草，以便减小声响，说明罗马人企图借着夜色掩护悄悄发动进攻。另一头骡子爬过壁垒，坠落到另外一边，摔断了脖子。[\[14\]](#)

突围的努力都失败了，瓦卢斯大军的士兵们一个个丧命。很多俘虏也被兴高采烈的日耳曼人作为祭品处死，以感谢诸神给了他们这场胜利。也有一些士兵被当作奴隶，多年后有些人逃回了罗马，或者被赎回，讲述了当年的恐怖故事。瓦卢斯被匆匆火葬，但没有烧完。他的遗骸被埋葬，但后来又被挖出来，遭到亵渎。三个军团的鹰旗，其他很多军旗，大量甲冑、武器和其他装备被掳走。胜利的纪念品被分发给各部落，或者被送给其他部落，以鼓舞他们加入叛乱。瓦卢斯的首级被送给马罗博杜斯，但马科曼尼人的国王选择与罗马维持和平，并且害怕阿米尼乌斯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于是将这恐怖的礼物转送给罗马人。瓦卢斯的首级最终被送到罗马，被恰当地火化，并以礼下葬。[\[15\]](#)

在正式宣布伊利里库姆的胜利仅仅五天之后，日耳曼大灾祸的噩耗传到了罗马。至少假以时日便可以从巴尔干抽调部队到莱茵河前线。但在日耳曼的惨败比在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失败严重得多，

可以与前53年卡莱战役的灾难，甚至汉尼拔施加给罗马的惨败相提并论。仅仅几天之内，3个军团被全歼，这相当于全军总兵力的十分之一以上。在更多消息送抵之前，罗马人不知道在日耳曼的其他罗马军队是不是也已经被消灭了，成群结队的日耳曼武士是不是已经渡过日耳曼，正在洗劫高卢。此次失败本身已经很严重，对元首及其政权更是严峻挑战，因为他们一直自诩得到诸神恩宠，因此常胜不败。更糟糕的是，他的一支军队丢失了宝贵的鹰旗，给罗马的荣誉抹上了一个新的污点。何况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在过去常常夸耀自己收复丢失鹰旗的功绩，如今就更显尴尬。恐惧迅速在罗马蔓延。[\[16\]](#)

奥古斯都震惊了，这一次似乎更愤怒而不是绝望。狄奥说有好几部史料讲到元首备感受挫，撕坏了自己的衣服。他命令对罗马城的14个区加强巡逻，谨防动乱，尤其是防止蛮族出身的奴隶趁机造反。这不大可能发生，但军队的出现强调了政府仍然掌控着局面，让紧张的人放下心来，让潜在的不安定分子不敢行动。元首担心他的日耳曼骑兵卫队对自己不利（奥古斯都年轻时的卫队是西班牙人，后来换成了日耳曼人）。这是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这些日耳曼士兵还是被非常公开地调离罗马。一个更强有力的姿态是，奥古斯都宣誓，“如果共和国局势改善”，就举办特别的竞技会来感谢“至善至伟朱庇特”。这是一种荒废了一个多世纪的仪式，奥古斯都将其复苏。同时，他延长了各行省总督的任期，以保障稳定性，让有经验的人掌管帝国各地。他下令进行新的征兵，不足为奇的是，这次比公元6年更难招到新兵。于是他命令以抽签方式强行征兵，尽管这种方法不受欢迎。有些人仍然企图逃避兵役。为了以儆效尤，政府处死了一些逃兵役的人。与此同时，在役士兵的兵役期被延长，更多已经退伍的老兵被重新入伍。政府又一次收购奴隶，赋予其自由，并将其组成特别部队。[\[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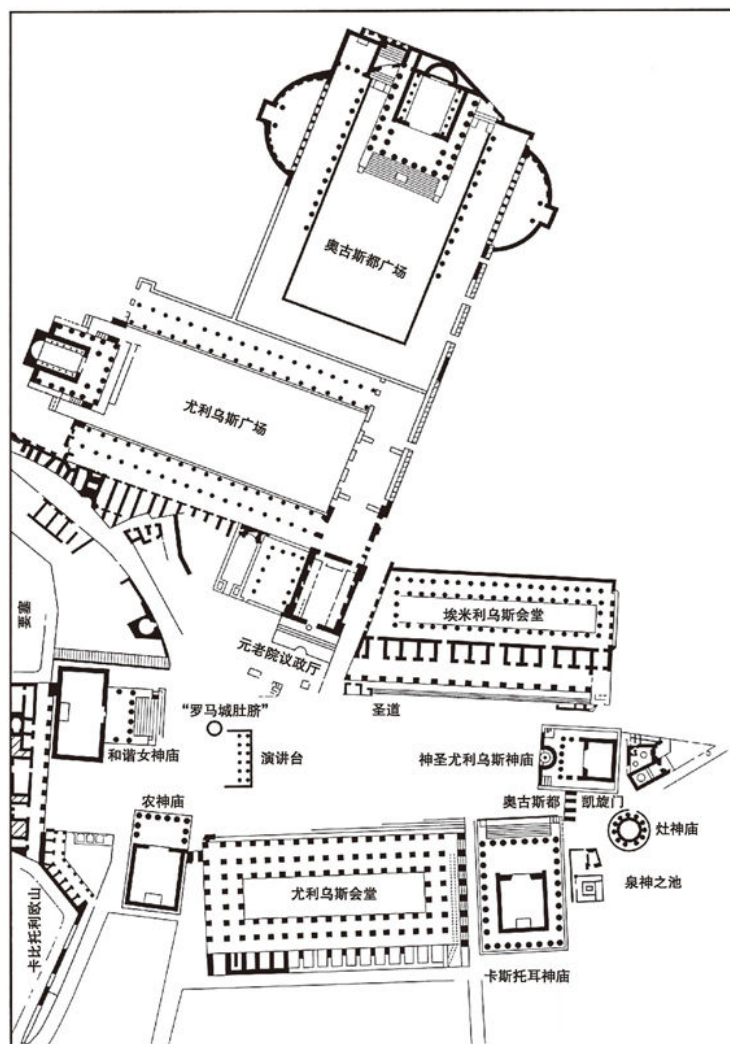
很快，提比略被派往莱茵河地区执掌大局。在这期间，奥古斯都一连好几个月拒绝剃须理发，就像他当初发誓为被害的尤利乌斯·恺撒复仇一样。这一次没有发行描绘他满脸胡须的钱币或图像。公众心目中的奥古斯都不是那个邋里邋遢、头发蓬乱的老人，而仍然是青春永驻、沉稳从容的元首。私下里，他暴跳如雷地痛斥瓦卢斯，有时在家里用头撞门，喊道：“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还我军团来！”已经死掉的将军被当成替罪羊，而最早的一批文献将阿米尼乌斯描述为叛徒。这两种说法都不算不公平，但都不是完整的故事。后来，元首每年都将此次灾难的日子当作哀悼日。他没有组建新的军团来取代损失掉的3个军团，这说明要补充现有单位的兵力，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即便多年后组建新军团时，也从来不用十七、十八和十九这三个番号。[\[18\]](#)

随后几个月里，日耳曼传来了稍微好一些的消息。就像历史上所有的非正规军一样，阿米尼乌斯的部下在得胜之后就作鸟兽散，带着战利品各自回家过冬。目前只有少量武士还在作战，其他一些被他们的成功激励并且也想得到荣耀和战利品的人也加入进来。瓦卢斯之前派到各地的小分队大多损失掉了，但一群日耳曼武士攻击位于阿里索[\[19\]](#)的罗马军事基地（可能就是哈尔滕发掘出来的地点）时被打退了。在英勇的防御战之后，阿里索守军带着大量平民借着夜色溜走，戏剧性地安全撤回莱茵河边境。河上的所有渡口都在罗马人手中，似乎并没有遭到猛烈攻击。瓦卢斯剩下的2个军团和一些辅助部队基本上完好，指挥官们在竭尽全力地组织连贯一致的防御。[\[20\]](#)

最后岁月

但此时，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行省失陷了。考古学家在这个地区发掘的所有罗马驻军营地和平民定居点都在这个时期被突然放弃了。在随后四个作战季节里，提比略要么在莱茵河上，要么向东开展

惩罚性行动。后来日耳曼尼库斯也前来与他并肩作战。我们对这些战役知之甚少，但他们似乎逐渐从莱茵河的安全地带向东越打越远，烧毁村庄、摧毁庄稼、掳掠牲畜，杀死或俘虏他们抓到的所有人。罗马人把这种行动称为“焦土政策”，并且很擅长，但他们显然遇到了顽强抵抗。阿米尼乌斯是消灭了罗马军团的英雄，他的权势日渐增长，不仅领导着很多切鲁西人，还有其他部落的武士追随他。瓦卢斯的失败粉碎了罗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就像日本人在1941~1942年迅速征服香港、马来半岛和缅甸，在整个远东抹杀了大英帝国的威名一样。要从这样的奇耻大辱中恢复元气，是非常困难的，或许是不可能做到的。[\[21\]](#)



公元14年，罗马市中心

在奥古斯都的余生，罗马人一直在日耳曼作战，他显然还希望收复这个失去的行省。罗马人在这期间取得的很多成就主要是象征意义的，没有实际价值。公元11年，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合兵一处，发动了越过莱茵河的第一次大规模远征，但没有发生很多战斗。阿米尼乌斯和其他日耳曼领袖非常明智地避免与罗马人交锋，因为局势对罗马人有利，而罗马指挥官们也同样谨慎，没有长途追击日耳曼人。9月23日，他们在敌境庆祝了奥古斯都的生日，百夫长们组织了一系列赛马活动，随后大军撤过了莱茵河。虽然目前还没有报仇雪恨或收复军旗的希望，但罗马人自信的进军至少说明他们目前掌控着局势，以确保将来罗马人会取得最终胜利。[\[22\]](#)

持续的战争给了提比略机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表现出很愿意为国家奔波劳碌的态度。每年冬天他都返回罗马，从公元9年到10年，在参加元老院会议和其他公共集会时，他通常坐在奥古斯都身旁，在两位执政官之间。元首写给提比略、后来被苏埃托尼乌斯引用的几封信，可能就出自这些年。苏埃托尼乌斯引用这些信，是为了证明奥古斯都对提比略的喜爱，如：“我亲爱的提比略，我由衷地赞扬你的作战指挥。我相信，面对这么多困难，面对缺乏斗志的军队，没有人能够表现得比你更审慎。”“我听说你因为作战而万分疲惫。假如我不同情你，愿诸神惩罚我！我求你一定要珍重身体。如果你病倒，那么你母亲和我都活不下去了，罗马人民也会陷入危险。”“我身体怎么样并不要紧，重要的是你。”和往常一样，奥古斯都的信里充满了引用和机智的希腊谚语，用来加强他的观点。[\[23\]](#)

公元10年1月，提比略以自己和弟弟德鲁苏斯的名义将广场上修缮完毕的和谐女神庙对外开放，用日耳曼战争（可能指的是之前的成功战役，而不是近期的战争）的收益支付修缮工程开销。他因为伊利里库姆平叛战争的胜利而得到的凯旋式被推迟到公元12年10月12日。在

凯旋式上，他手中资深执政官军权的有效范围被扩展到整个帝国，而不仅仅是他已经在主持作战的西部各行省。奥古斯都也因为平叛的胜利而被赞颂为凯旋将军，但和往常一样，他谢绝了这荣誉。到晚年，他已经二十一次荣获凯旋将军的称号，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纪录。日耳曼尼库斯凭借镇压巴尔干叛乱的战功获得了凯旋式符号的荣誉，并成为公元12年执政官，此时他只有二十六岁。他跳过了裁判官这个级别，而提比略的儿子德鲁苏斯在公元11年担任财务官，也被内定会尽早担任执政官。[\[24\]](#)

日耳曼灾难的噩耗传到罗马之前，奥古斯都在公元9年的主要担忧是，他鼓励婚姻和生育的法律会引发人民的怨恨。虽然大多数人认为他的立法值得被尊重，但不喜欢法律对未婚和无子女人士的处罚，而且法律限制人们从直系亲属之外的人那里继承财产。在过去，富裕而无子女的人很容易赢得朋友，因为很多人希望继承一份财产。现在这种事情比较难办了，如果没有亲属可以继承财产，那么金钱和地产都可能被收归国有。法律鼓励大家生育三个孩子以上，但养这么多孩子要花很多钱，尤其是要让所有孩子都成为骑士，就需要大笔财产，更不用说让孩子们都享有舒适的生活了。[\[25\]](#)

富人肯定最关心这些法律。在一些竞技会上，一群骑士非常坚决地要求撤销这些法律。奥古斯都为此召开了一次公共集会，展示了日耳曼尼库斯人丁兴旺的家庭，作为榜样，然后将到场的骑士分为两类：有孩子的（占大多数）和没有孩子的。在这次集会或元老院的一次会议上，他发表了演讲，可能是由其他人代他宣读演讲稿。一段时间里是每年被分配给他的财务官负责读他的稿子，日耳曼尼库斯在这些年里也承担过这个责任。在这次演讲中，奥古斯都重申了关于养育未来新一代的必要性，引用了前2世纪的一篇著名演讲（告诫当时的元老，一定要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大量内容。[\[26\]](#)

奥古斯都的唯一妥协是对婚姻法律做了一些修改，新版本在当年晚些时候由两名补任执政官推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人都是单身汉，没有孩子）。《帕皮乌斯与波派乌斯法》^[27]和旧版本婚姻法之间的具体差别是什么，我们很难确定，因为后世的法学家将这两部法律合并起来了。但很明显，精英阶层仍然觉得新法律很严苛。长远来看，婚姻法并不能阻止旧贵族世家的灭绝倾向，主要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太高，这不是国家能控制的事情。不过《帕皮乌斯与波派乌斯法》的确带来了一些收入，并强调了奥古斯都眼中的罗马人应当具备负责任和遵守道德的行为。在瓦卢斯及其军队灭亡之后，这种传统道德观或许显得尤其重要。^[28]

这些年很艰难，更糟糕的是公元12年发生了严重的洪灾，扰乱了一个重要节日。恺撒·奥古斯都年事已高，人们感到一个没有他的世界即将到来。很多罗马人，尤其是贵族，长期以来热衷于占星，现在它变得更流行了。奥古斯都禁止大家私下里向预言家和占星家询问未来。即便一群人去请教预言家和占星家，也被禁止询问某人的生命何时终结。与此同时，元首公布了他自己出生的细节情况和当时的星相，让那些懂得占星的人帮他算命。一年前，他放松了禁止骑士作为角斗士参加竞技的法令，因为一些骑士无视这道法律，仍然出现在竞技场上。群众似乎喜欢观看富人以这种方式拿自己的生命和肢体冒险，就连奥古斯都也喜欢观看这种比赛。^[29]

但元首并不总是这样胸襟开阔、慷慨大方和愿意对挑战法律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约在这个时期，提图斯·拉比埃努斯写的书被没收和公开焚烧了。他的祖父是尤利乌斯·恺撒在高卢的副手，但在前49年倒向庞培阵营。这位提图斯·拉比埃努斯喜欢在公开朗读自己的著作时宣布要省略下面一段，等他去世之后才能公开这个段落。他还恶毒攻击很多重要的公众人物，不过我们不确定他是诽谤他们，还是要让大家想起这些人过去的不明智之举。与公开攻击相比，他刻

意省略著作片段又宣布死后公布的做法更是阴险。罗马人喜爱双关语，于是给他取了一个绰号“疯狗”（Rabienus，与他的名字 Labienus 音近）。据我们所知，他没有攻击奥古斯都及其亲人，但可能赞扬过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的其他旧敌。拉比埃努斯为了抗议政府销毁他的著作，自杀了。[\[30\]](#)

同样尖酸刻薄的演说家卡西乌斯·塞维鲁吹嘘自己已经将被销毁的拉比埃努斯作品牢记于胸。他常在法庭坚决而咄咄逼人地起诉他人，并因此闻名，但他也喜欢按照历史悠久的罗马檄文的风格撰写侮辱名人的小册子。他应当没有攻击奥古斯都。但大约在公元12年，奥古斯都动用公元6年修改的关于“叛逆”罪（定义非常模糊，是一种侵犯罗马国家与人民“尊严”的罪行）的法律，起诉了卡西乌斯。这似乎是史上第一次用这种罪名来起诉以文字和口头形式攻击他人的行为。卡西乌斯被判有罪，被流放到相对比较舒适的克里特岛。在提比略及其继承者统治下，“叛逆”罪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对付那些被认为对皇帝不忠的人，这种审判变得司空见惯，审查也更普遍了。有了这样的后见之明，我们会觉得奥古斯都用“叛逆”罪来起诉人，是一个特别不祥的征兆，但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注意，如炮火一般凶狠的人身攻击和侮辱也表明，精英阶层内部持续存在敌意，而这些敌意与元首没有什么关系，或者关系甚微。对官职和荣耀的竞争也在继续。前11年，竞选裁判官的16名候选人票数相当，于是奥古斯都允许他们全体担任这个职务，不过后来恢复了正常的每年12名裁判官。[\[31\]](#)

政府采取了更多措施，减轻年迈奥古斯都的工作和纪念场合的负担。公元12年，日耳曼尼库斯宣读了元首的一份演讲稿。元首请求元老们在他抵达和离开广场时不要向他正式请安和道别。他还请求他们，当他在家的時候，减少拜访他的次数，并说自己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经常到元老们家中用餐，请他们见谅。次年，一直作为试探元老

院意见的元首御前会议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成员不再由抽签产生并有六个月任期，而是变成终身制，全部成员由元首挑选。元首御前会议得到了更大的权威，于是它的决定可以算作整个元老院的法令。这样无疑有助于奥古斯都在舒适的家中处理更多政务。狄奥说他有时候会倚靠在卧榻上接见御前会议成员。^[32]

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明显结果是，提比略及其儿子们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这是为他们在元首去世后继承大权铺路。但要说奥古斯都在这个变动中仅仅是傀儡，就错了。他显然继续承担大量工作，做出重大决策，不过得到了谋臣和亲人的辅佐。他仍然是先前那位经验丰富、精明狡黠的政治家。公元13年，对5%遗产税（用来为军事国库提供资金）的怨言愈演愈烈。奥古斯都的对策是邀请元老们出谋划策，为军事国库提供安全稳定的财源。在任何时候，军费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此时日耳曼战争还在继续。提比略不在罗马，日耳曼尼库斯和德鲁苏斯被奥古斯都要求不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免得大家说这是他们祖父的意思。元老院讨论了此事，向元首呈送了一些书面建议。没有一条建议是切实可行的，都是大肆攻击现行制度，却没有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恺撒·奥古斯都随后宣布他支持征收财产税，并派人开始登记所有人的财产，准备征收新税。手足无措的元老院迅速表示，他们还是更愿意延续旧的遗产税，而不是面对新的不确定的未来。元首宣布自己也很高兴接受这么明智的决定。^[33]

同样在公元13年，奥古斯都的行省指挥权和其他职权再一次被延长了十年时间。同时，提比略也终于得到相同的权力。近几年里，提比略的头像开始出现在钱币的背面，正面是奥古斯都头像。奥古斯都和提比略还被授予执政官权力，以监督一次人口普查。此次普查于公元14年5月结束，共493.7万名公民被登记在册，这比元首在前28年主持的第一次普查时多了将近90万人。对奥古斯都来说，这个增长清楚地表明他为罗马人民恢复了和平与繁荣。安东尼自杀已经过去四十三

年了，恺撒·奥古斯都七十六岁。狄奥说有征兆表明即将发生一个变化。其中一个征兆是，在一次竞技会上，一个疯子跑到抬着神像和符号的游行队伍中，一屁股坐在尤利乌斯·恺撒的座席上。另一个征兆是，卡比托利欧山上一座奥古斯都雕像基座上“恺撒”（CAESAR）的字母C被闪电击中了，剩下的AESAR在伊特鲁里亚语中是“神”的意思。人们认为这意味着他即将成为神。苏埃托尼乌斯说，人口普查结束时照例举行的仪式上，一只鹰在奥古斯都头顶上绕着飞了好几圈，然后停在一座神庙的三角楣饰上，就在“阿格里帕”的第一个字母上方。元首原本打算宣读正式的誓言，要在随后五年中（直到下一次人口普查）保卫罗马人民的福祉，但他决定让提比略帮他读，说自己不会活到兑现誓言的时候了。[\[34\]](#)

最后的旅行

据说，在这一年的某个时候，元首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驶往撒丁岛外海的那个关押波斯图穆斯·阿格里帕的小岛。只有一个贵族陪伴着他，即前任执政官保卢斯·费边·马克西穆斯，他在这一年去世了。许多学者认为奥古斯都的这次旅行是后人虚构的故事，是为了让大家怀疑奥古斯都对继承安排的真实想法。但既然这个宣称他离开罗马很久的故事能够流传得这么广，说明它可能是真的。奥古斯都和他的外孙（曾是他的养子）可能有过泪流满面的重逢。但非常明确的是，此事对他的计划没有任何影响。元首在前一年立下遗嘱，并将其交给维斯塔贞女保管，并且没有想要修改遗嘱。提比略是他的主要继承人，得到三分之二的财产，剩余三分之一留给了李维娅。波斯图穆斯什么也得不到，遗嘱里只是说不准将波斯图穆斯和两个尤利娅安葬在奥古斯都陵寝。[\[35\]](#)

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由于人口普查工作，提比略留在意大利，只在夏末短暂视察了伊利里库姆，查看这个行省是否仍然稳定和安

全。他无疑需要处理很多请愿和当地纠纷，但没有迹象表明当地的总体安定受到威胁。伊利里库姆离意大利不远，往返很方便，他可以在那里从事一些有价值和有威望的工作，并仍然可以返回罗马过冬。奥古斯都和李维娅陪提比略走了旅程的第一段，并打算一直走到贝内文托，部分原因是元首想观看那不勒斯即将举行的纪念他的竞技会。一行人向西南方前进到阿斯图拉港，然后乘船，这打破了他只在白天乘船的习惯，因为天气很好。夜间，恺撒·奥古斯都突患胃病，症状是腹泻。[\[36\]](#)

他的病情似乎不是特别严重，于是船继续沿着海岸向南航行，到了卡普里岛。他在那里拥有一座别墅，就是陈列着化石收藏品的那座别墅。他们接近主要港口普泰奥利时，遇到了一艘从亚历山大港开来的商船，船员和乘客像膜拜神祇一样向他问候。他们身穿白衣，头戴花环，焚香献礼。他们可能原本就在献祭，以纪念自己安全抵达目的地。他们热情洋溢地向恺撒·奥古斯都呼喊，声称“由于他，他们才能生存；由于他，他们才能航行；由于他，他们才能享受自由和繁荣”。元首很高兴，给自己身边的每个人发了40奥留斯金币（相当于1000迪纳厄斯或4000塞斯特尔提乌斯），并指示他们这笔钱只能用来购买从亚历山大港来的商品。[\[37\]](#)

他在卡普里岛休息了四天，似乎已经恢复了健康。他心里充满了节日喜悦，喜爱聚会和开玩笑，于是向他的罗马伙伴发放了希腊服饰，向希腊朋友发放罗马服饰。然后他命令大家都换上这些衣服。作为游戏的一部分，罗马人要说希腊语，希腊人要说拉丁语。这些天里，他兴致勃勃地观看当地少年的操练，这是希腊人长期定居并影响当地习俗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少年要经历一些隐约具有军事意味的体育训练，然后才被认可为正式的公民，可以成为社区的一分子。奥古斯都宴请他们，向人群抛掷奖品兑换券（奖品是水果和美食之类），鼓励大家开玩笑，甚至拿他开涮。一天，他和提比略的一名随行人员开

了个玩笑。奥古斯都编了两行诗，然后假装它是某位名人创作的，他不过是引用而已，并要求这个人说出两行诗的作者。

奥古斯都虽然还时而受到腹泻折磨，但觉得身体已经恢复不少，能够渡海前往那不勒斯，观看纪念他的竞技会。随后，他和提比略一起旅行到贝内文托，在那里与提比略道别。恺撒·奥古斯都返程时走到位于诺拉的别墅，就又一次病倒了，比之前更严重。他父亲就是在这座乡间别墅去世的，或许这个巧合让他愈发坚信，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命令向提比略发出讯息，要他回来。提比略可能正沿着阿庇乌斯大道向布隆迪西乌姆的大港进发。提比略有没有在元首合眼前赶到他身边，史料众说纷纭，但苏埃托尼乌斯（他的记述最详细也最令人信服）说提比略赶到了。提比略和元首一起待了很长时间，讨论国家大事。但在提比略离开的时候，据说仆役们听到奥古斯都喃喃自语：“哦，不幸的罗马人民，要被这样的嘴巴缓缓地嚼烂。”^[38]

此次会面之后，元首没有再谈国家大事，不过夸耀说，在他之前，罗马是泥土砖块建成的，而他把罗马变成了一座大理石城市。这既是指他缔造的和平与繁荣，也反映了他给城市带来了新的面貌。我们不知道他坚持了多少天。狄奥说他只吃自己在花园里种的一棵无花果树上的果实，还说有传闻称李维娅在一些无花果上涂抹了毒药，然后将它们交给奥古斯都，而她自己只吃干净的果实。这些故事，以及奥古斯都嘲讽提比略的话，可能都是多年后提比略极度不得人心时产生的，所以没有多大意义。按照古典世界的标准，奥古斯都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而且身体一直都不算很健壮，所以他的死亡极有可能是自然原因，不需要其他解释。可能元首无法进食，身体太虚弱，心脏就衰竭了。^[39]

苏埃托尼乌斯详细描述了他的最后一天，即公元14年8月19日。我们不知道苏埃托尼乌斯的资料来源是什么，但他的叙述很有说服力。

至少他的记述代表了大家的理念，一位贤君应当如何迎接死亡。恺撒·奥古斯都多次询问外面是否有骚动，显然是担心群众蜂拥而来哀悼他，或者引发动乱，从而威胁国家稳定和继承权的顺利交接。他关注自己的仪表，叫人拿来一面镜子，让一名奴隶帮他梳头，并帮他调整好自己的下巴的位置（就像垂死的尤利乌斯·恺撒拉起自己的托加袍盖住头部）。他这样做好准备之后，让奴隶把他的一些朋友叫进来，问他们是否觉得，他在人生的哑剧或喜剧中表演得还不错。然后他改用希腊语，念了几行诗，可能是引用，也可能是他自己编的，是演员离开舞台时的谢幕词：“既然我表演得很好，请大家都鼓掌，用掌声送我离开舞台。”^[40]

这个故事表明，奥古斯都显然期待大家的赞许和鼓掌。没有迹象表明奥古斯都在弥留之际有过疑虑，但狄奥说的可能是对的，他说奥古斯都看到了人生的讽刺，并承认即便是最成功的人也终有一死。随后奥古斯都让朋友们离去，但在他们走出门之前，问了近期从罗马赶来的人，李维拉（提比略之子德鲁苏斯的妻子，前不久生病了）的情况怎么样了^[41]。^[42]

奥古斯都身边只剩下李维娅和近侍。他有些焦躁，说自己要被四十个年轻人抬走了。苏埃托尼乌斯说元首的遗体后来被四十名禁卫军士兵抬走，但元首为自己的葬礼做了详细安排，所以他脑子里可能已经有这个想法了。他在第九个钟点^[43]（从黎明算起，按照我们的计算，应当是下午晚些时候或者傍晚）去世，倒在李维娅的怀抱里，最后一次亲吻了她。他对她的临终遗言是：“李维娅，记住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永别了。”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圣尤利乌斯之子和“祖国之父”去世了。李维娅可能先秘不发丧，等继承的事情准备妥当，才宣布他的死讯。不过这种说法可能只是关于元首之死的阴谋论的一部分。^[44]

根据阿格里帕、德鲁苏斯和其他死在远离罗马地方的皇室成员的葬礼安排，元首的遗体可能还经历了最后一次旅行。为了避开8月的酷热，送葬队伍在夜间出发，诺拉镇的议员们庄严地抬着棺木，踏上了前往罗马的道路。途中每一天都将遗体停放在经过的城镇的会堂（那里比较荫凉），各个城镇的领导人每夜轮流将棺木抬到下一个主要社区。所到之处，人们纷纷表示哀悼和敬仰。很少有人记得奥古斯都领导国家之前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一群显要的骑士在罗马以南不远处的博维莱（阿尔巴朗格的旧址）迎接了送葬队伍，将其送到城内，把棺木停放在帕拉丁山上奥古斯都府邸的前厅。^[45]

元老院讨论了如何更好地尊崇他。元老院过去在这方面的建议都被奥古斯都认为太过分。奥古斯都的亲人决定了他没有考虑到的少量葬礼细节。他的葬礼按照贵族葬礼的惯例，从广场上的人群聚集开始。日期可能是9月8日，但我们没有证据。尽管奥古斯都的葬礼比尤利乌斯·恺撒的葬礼更有秩序，但人们来到广场向奥古斯都致敬时，无疑会联想起尤利乌斯·恺撒。按照规矩，演员们戴着奥古斯都祖先的葬礼面具，但也有人戴着罗马史上其他一些与奥古斯都家族无关的伟人的面具，其中就有庞培。奥古斯都广场上“最杰出的人”大多（或全部）登场了，以纪念他们当中最伟大的罗马人的去世。恺撒·奥古斯都不仅仅是一位贵族，他还是罗马城的第二位缔造者，恢复罗马和平、繁荣和恰当的人神关系的大功臣。所以，即便在死后，他也和生前一样，与历史上的所有伟大业绩和英雄领袖有着紧密联系。

尤利乌斯·恺撒的形象没有被展出，因为他已经是神，不是凡人。但这并不是说他被忽略了，或者他的事迹被刻意遗忘。提比略登上神圣尤利乌斯神庙外面的演讲台，发表了第一份悼词。他身穿丧服（黑色上衣和托加袍）。他的儿子德鲁苏斯也穿着丧服，发表了第二份悼词，地点是“老”演讲台（它被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改造过）。周围的纪念碑和建筑上尽是奥古斯都的象征物。元老们也到场

了。下一年的行政长官只穿上衣，没有披托加袍，将遗体抬到战神广场。沿途有更多的景象让大家想到元首的荣耀和建筑工程。奥古斯都的遗体被封闭在棺材内，此时已是夏末，而且他已经去世几周，遗体已经腐烂。棺材上方载着整洁而完美无瑕的奥古斯都蜡像，是凯旋将军的形象，侧卧在象牙和黄金制成的卧榻上。游行队伍中还有他的两座金像，一座是元老们从尤利乌斯议政厅（是奥古斯都修复了这座建筑）搬来的，另一座由一辆凯旋战车承载着。^[46]

战神广场上已经准备好了火葬柴堆，棺材被放到柴堆上。然后，罗马的高级祭司们绕着柴堆行走。随后是一些被选出来的骑士，再往后是禁卫军战士，其中一些士兵将自己的功勋奖章扔到棺材上，就像尤利乌斯·恺撒的士兵在他的葬礼上做的一样。然后，禁卫军百夫长们将火炬丢到火葬柴堆上，这些木柴都是精心准备好的，柴堆很快就燃烧起来。这时，一只鹰被从广场建筑中放出，飞到空中，象征元首的灵魂飞向天堂，到他养父身边，成为神祇。一位前任裁判官后来公开发誓，说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奥古斯都飞向了天空。^[47]

一连五天，年迈的李维娅留在火葬地点附近，或许待在临时的棚子内。一些家人和显要的骑士陪伴着他。五天后，这些人赤着脚，解开腰带（于是上衣垂落到脚腕处），收集了骨灰和一些残余骨骸，把它们放到一个骨灰瓮内。骨灰瓮被送到差不多五十年前奥古斯都为自己建造的宏伟陵墓内。

^[1] Velleius Paterculus 2.127.3 (Loeb translation).

^[2] 阿米尼乌斯及其早期生活，见Velleius Paterculus 2.118.1-3, Tacitus, *Ann.* 2.9-10, 88, with P. Wells, *The Battle that Stopped Rome* (2003), pp. 105-10, 及A. Murdoch, *Rome's Greatest Defeat. Massacre in the Teutoburg Forest* (2006), pp. 75-97, 尤见83-6; 奥古斯都不愿意授予公民权，见Suetonius, *Augustus* 40.3.

[3]. 奥古斯都的姐姐小屋大维娅的外孙女。

[4]. 关于瓦卢斯，见P.Wells, *The Battle that Stopped Rome* (2003) , pp.80-86, A.Murdoch, *Rome's Greatest Defeat.Massacre in the Teutoburg Forest* (2006) , pp.49-74, 及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 pp.401, 424-5, 434, 437。

[5]. 塞格斯特斯也是阿米尼乌斯的岳父，不过他非常不喜欢这个女婿。

[6]. Tacitus, *Ann.*1.57-59, Velleius Paterculus 2.118.4.

[7]. Velleius Paterculus 2.117.2-4 包含引文, Dio 56.18.1-5。

[8]. 概况见S.Dyson, 'Native Revolt Patterns in the Roman Empire' , *Aufstieg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2.3 (1975) , pp.38-175。

[9]. 关于他的军队，见Velleius Paterculus 2.117.1；关于叛乱，见Dio 56.18.5-19.4。

[10]. Dio 56.20.1-2, 提到百夫长马尔库斯·凯利乌斯衣冠冢上的释奴；关于随军携带卧榻，见W.Schlüter, 'The 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t Kalkriese near Osnabrück' , in J.Creighton & R.Wilson, *Roman Germany.Studies in Cultural Interaction.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ementary Series* 32 (1999) , pp.125-59, 尤见148-9；关于军人的婚姻，见B.Campbell, 'The marriage of soldiers under the Empire' , *JRS* 68 (1978) , pp.153-66。

[11]. Velleius Paterculus 2.118.4, Dio 56.19.2-3, Tacitus, *Ann.*1.58.

[12]. 关于考古发掘和对战役一系列不同的复原解读，见A.Rost, 'The Battle between Romans and Germans in Kalkriese: Interpreting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from an ancient battlefield' 及S.Wilbers-Rost, 'The site of the Varus Battle at Kalkriese.Recent Results from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 均载于A.Morillo, N.Hanel & E.Martín, *Limes XX: 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Roman Frontier Studies.Anejos de Gladius* 13 Vol.3 (2009) , pp.1339-45, 1347-52,

W.Schlüter, ‘The 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t Kalkriese near Osnabrück’, in J.Creighton & R.Wilson, *Roman Germany. Studies in Cultur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ementary Series* 32 (1999), pp.125–59, P.Wells, *The Battle that Stopped Rome* (2003), A.Murdoch, *Rome’s Greatest Defeat. Massacre in the Teutoburg Forest* (2006); M.McNally, *Teutoburg Forest AD 9. The Destruction of Varus and his Legions* (2011) 配有精美的插图, 很容易读到的论文集J.Oorthuys (ed.), *The Varian Disaster: The 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 Ancient Warfare special issue* (2009) 也有很好的插图; 主要的古代史料为Dio 56.19.1–22.2, Velleius Paterculus 2.119.1–5, Tacitus, *Ann.*1.61–2。本书的叙述以上述全部史料为基础, 更详尽的讨论见引用的著作。

[13] 关于尤利乌斯·恺撒的一些士兵对损失辎重的反应, 见BG 5.33, 并对比5.44。

[14] 关于指挥官的恰当行为, 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1996), pp.163–5。

[15] Tacitus, *Ann.*1.57–8, 71, Velleius Paterculus 2.119.5.

[16] Velleius Paterculus 2.117.1.

[17] Dio 56.23.1–4, Suetonius, *Augustus* 23.1–2.

[18] Suetonius, *Augustus* 23.2; 关于罗马军团, 见L.Keppie, *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 pp.163–9。

[19] 应当在今天的德国境内, 具体地点至今不详。

[20] Dio 56.22.2a–4, Velleius Paterculus 2.120.1–6, with P.Wells, *The Battle that Stopped Rome* (2003), pp.200–12, A.Murdoch, *Rome’s Greatest Defeat. Massacre in the Teutoburg Forest* (2006), pp.121–8.

[21] 关于焦土政策, 见J.Roth, *The Logistics of the Roman Army at War, 264 BC–AD 235* (1999), pp.148–55, 298–305。

[22] Dio 56.25.2–3. 注585。

[23] Suetonius, *Tiberius* 21.5-6.

[24] Dio 56.17.1-3, 25.1, Suetonius, *Tiberius* 17.2, *Res Gestae* 4, with B. 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 61-4, 与 T. Barnes, 'The victories of Augustus', *JRS* 64 (1974), pp. 21-6.

[25] 对这些法律的影响, 讨论见 A. Wallace-Hadrill, 'Family inheritance in the Augustan Marriage Laws', in J. Edmondson (ed.), *Augustus* (2009), pp. 250-74 =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27 (1981), pp. 58-80.

[26] Dio 56.1.2-10.3, Suetonius, *Augustus* 34.2, 89.2.

[27] 得名自上述的两位补任执政官。

[28] Tacitus, *Ann.* 3.25-8 强调了修改后的法律的严苛, S. Treggiari, *Roman Marriage* (1991), 尤见 pp. 60-80; 另见 K. 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1996), pp. 128-40 讲到, 这些担忧的更大背景是, 人们害怕道德的堕落会导致瓦卢斯战败这样的灾难。法律有可能是在瓦卢斯战败的噩耗传来之后颁布的, 但它的基本形式可能在此之前就拟定了。

[29] Dio 56.25.7-8, 27.4, Suetonius, *Augustus* 43.3.

[30] 关于 Labienus 见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 486, 及 B. Levick, *Augustus. Image and Substance* (2010), pp. 190-91.

[31] Dio 56.25.4, 27.1, Tacitus, *Ann.* 1.72, with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 486-7.

[32] Dio 56.26.1-3, 28.2-3.

[33] Dio 56.28.4-6; 关于提比略在这些年的地位, 见 B. 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 61-7.

[34] Dio 56.29.1-6, Suetonius, *Augustus* 97.1-3, *Res Gestae* 8.

[35] Tacitus, *Ann.* 1.5, Dio 56.30.1 论及此次旅行; Suetonius, *Augustus* 101.1-3 论及遗嘱, 奥古斯都规定两个尤利娅不准入葬他的陵寝, 可能也对波斯图穆斯做了类似的禁止;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433不认可此事，而B.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64-5很好地描述了此次旅行。

[36] Dio 56.29.2. 目前对奥古斯都临终前的最详细叙述，见Suetonius, *Augustus* 97.3-100.1，提供了下文的绝大部分细节。有价值的讨论见D.Wardle, ‘A perfect send-off: Suetonius and the dying art of Augustus (Suetonius Aug.99)’ , *Mnemosyne* 60 (2007), pp.443-63。

[37] Suetonius, *Augustus* 98.2包含这句引文。

[38] “嘴巴”的引文，见Suetonius, *Tiberius* 21.2; Dio 56.31.1称，他引用的大部分史料都说提比略是在奥古斯都去世后才抵达的。

[39] Dio 56.30.1-4, with A.Barrett,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pp.242-7.

[40] Suetonius, *Augustus* 99 (Loeb translation) .

[41] 也有资料表明，奥古斯都临终前过问的是李维拉与德鲁苏斯的女儿尤利娅·李维娅（5~43年）的病情。

[42] Dio 56.30.4.

[43] 古罗马人将白天和黑夜各分为十二个钟点，每个钟点的时间不等长。关于其计算方法也有争议，一般认为是从黎明或黄昏开始计时。也有学者认为应当从午夜开始计算。

[44] 引文来自Suetonius, *Augustus* 99.1; Dio 31.1讲到李维娅在几天内秘不发丧。

[45] Suetonius, *Augustus* 100.2, Dio 56.31.2.

[46] 葬礼的主要信息来自Suetonius, *Augustus* 100.2-4, Dio 56.34.1-42.4; 与苏埃托尼乌斯不同，狄奥的说法是，德鲁苏斯在神圣尤利乌斯神庙前的演讲台发表悼词，而提比略在旧的演讲台致悼词。

[47] Suetonius, *Augustus* 100.4, Dio 56.42.3.

终章 “着急也要从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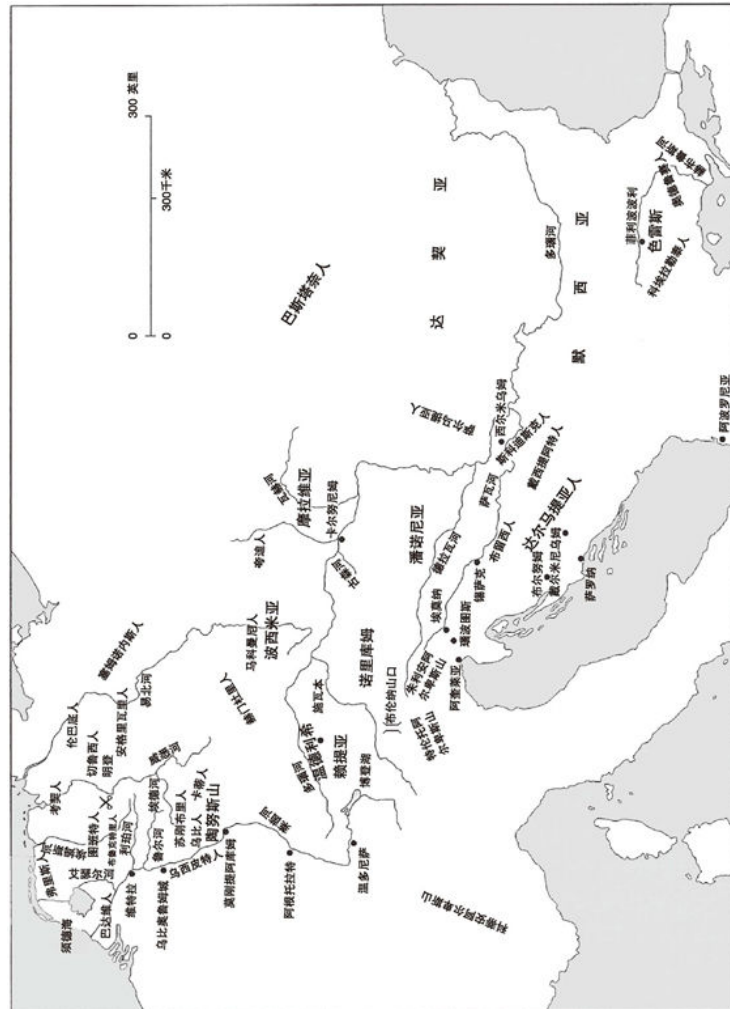
的确，民主制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君主制……听起来就令人不快，对人民来说却是最务实的政府形式。因为找到一个优秀的人，比找到很多优秀的人要容易……因为君主制不属于缺乏美德的大多数人……如果曾经有过繁荣的民主制国家，它一定只维持了很短时间。

——狄奥，3世纪初^[1]。

奥古斯都用赏金引诱军队，用免费口粮拉拢人民，用和平的舒适吸引整个世界，然后逐渐占有了元老院、行政长官和立法者的权力。没有人反对他，因为最勇敢的人都死在了战场上，或死于政治清洗。

——塔西佗，2世纪初^[2]。

送葬队伍前往罗马期间，以及后来的葬礼期间，公共事务大体上都暂停了，元老们聚集起来聆听奥古斯都的遗嘱。提比略和李维娅被指定为他的主要继承人，不过按照罗马人的惯例，其他关系较远的亲戚也被列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以免提比略和李维娅先离世。奥古斯都还将数额庞大的43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金钱赠给国家，并向所有公民和军人发放了赏金。禁卫军的普通士兵每人得到1000塞斯特尔提乌斯，准军事的城市大队和火警队成员每人得到500塞斯特尔提乌斯，而每位军团士兵和公元6年与9年被征募的释奴士兵得到了300塞斯特尔提乌斯。军官得到的赏金肯定比士兵多很多。奥古斯都的慷慨清楚地表明，他承认自己的主宰地位说到底还是依赖于军队的绝对忠诚。奥古斯都十九岁成为军阀，此后始终是一位军阀。^[3]



莱茵河与多瑙河边疆

提比略已经拥有奥古斯都所有重要的权力，包括高级军权和保民官权力。奥古斯都去世后，提比略便自然而然地向禁卫军和在罗马的其他部队发号施令，并写信给各省驻军的指挥官。实际上，国家从同时拥有两位元首，又一次变成了只有一位。提比略并不是以奥古斯都的养子或继承人的身份继承了他的权力，他原本就拥有这些权力。但表面文章还是很重要的，正如奥古斯都在前27年1月“卸去”职权，在前23年7月辞去执政官职位，然后元老院说服他接过国家领导权一样，提比略也希望元老院来赋予他领导人的角色。提比略的性格与奥古斯都截然不同，这一次的表没有过去那样圆滑，或许安排得也没有以

前那么好。提比略的笨拙仪态和过于复杂的演讲风格让很多人稀里糊涂，搞不清楚他的真实用意，但最后元老们“说服”他必须接过那受到万民缅怀的父亲的全部职责。

9月17日，元老院宣布奥古斯都是神，于是提比略的正式称号变成了提比略·尤利乌斯·恺撒·奥古斯都、神之子。奥古斯都的遗嘱里要求提比略也用“奥古斯都”的名字，但新元首拒绝让元老院投票确认此事。他宣称自己只是为了遵从父亲的意愿和纪念他，才会用“奥古斯都”的名字。同样，他也拒绝自动继承“祖国之父”的头衔。就像他在元老院假装不愿意当元首一样，这样的谦虚并不能掩盖其想要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急切心情。在奥古斯都向他授予每一项权力的时候，他显然已经决定将来要承担元首的角色。^[4]

除了提比略之外，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人选。奥古斯都驾崩的消息使得多瑙河沿线的一些军团发生了哗变，后来莱茵河畔的一些部队也哗变了。哗变的原因是闲得无聊、早已服满兵役的士兵迟迟不能退伍、严苛纪律造成的挫折感，以及新世界的不确定性（那个给他们军饷、他们宣誓效忠的人已经不在人世）。总的来讲，这些哗变士兵想要的仅仅是改善条件和其他短期特权。莱茵河驻军曾短暂地讨论推举他们的统帅日耳曼尼库斯为元首，取代提比略，但很快不了了之。日耳曼尼库斯是提比略的养子，完全遵守罗马人的孝道，对养父忠心耿耿，而且人们不愿意回到内战。

奥古斯都几乎刚合眼，就有一位禁卫军百夫长动身前往关押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的那个小岛。这名军官到了岛上之后，杀死了奥古斯都的外孙，尽管后者年轻健壮，拼命抵抗。百夫长及其部下返回罗马向提比略报告后，提比略坚决否认自己下达了处死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的命令。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新元首是不是在说实话。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有的说他撒谎，有的说幕后元凶是李维娅。也有人说是奥古

斯都下的命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的最后一道命令让人想起他当年作为三头同盟之一时杀伐决断的残酷，这是他最后一次发出“记住，你必须死！”的指令。塔西佗对此表示怀疑，说奥古斯都在其他时候都不曾杀过自己的亲人。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的死显然对提比略最有利，因为这样他就少了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我们永远没办法知道究竟是谁下的命令。这一年结束之前，他的前妻尤利娅也去世了。他曾下令降低她的生活水平，更加严苛地对待她，这显然缩短了她的生命。^[5]

随后的岁月里，奥古斯都的亲人继续以极高的死亡率纷纷离世。公元19年，日耳曼尼库斯在东方行省去世。虽然有传闻说他是被满腹嫉妒的提比略或李维娅毒死的，但他可能也是噩运的牺牲品。德鲁苏斯于公元23年去世，他可能是被妻子（日耳曼尼库斯的妹妹、克劳狄的姐姐，也是德鲁苏斯的堂妹）及其情夫（野心勃勃的禁卫军司令卢基乌斯·艾利乌斯·塞扬努斯）害死的。塞扬努斯的阴谋诡计帮助提比略打击了日耳曼尼库斯的遗孀和儿子们。阿格里皮娜（尤利娅唯一仍然在世的孩子）和她的两个年纪较长的儿子后来都遭到逮捕和流放，全都在流亡生活中死亡。李维娅比丈夫多活了十五年，不过她与儿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她于公元29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但提比略没有追授她很多荣誉。直到她的孙子克劳狄当皇帝之后，才封她为神。

在提比略统治的最初几周，他常说希望元老们发挥更大的作用来辅佐他，但实际上他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他最早的决策之一就是将选举从公民大会改到元老院，于是选举围场就变成了纯粹的观赏性公园和公共娱乐场所。虽然奥古斯都一直能确保他青睐的人当选，但在他的统治下，没有被内定的职位仍然会带来真正的（有时甚至是腐败凶残的）竞争，而且选民有时会违背他的意愿。不过提比略的这个改革没有受到公开的反抗，元老们更愿意为了竞选而拉拢其他元老，

而不是笼络一大群选民。这个改革似乎并没有影响行政长官的质量。
[6].

与奥古斯都不同的是，提比略不喜欢巡视外省，后来渐渐地，他对日常接见元老和罗马的其他人也厌烦了。公元26年，他离开了罗马，次年隐居到卡普里岛，在余下的十年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回过罗马。公元14年~16年，日耳曼尼库斯继续统领莱茵河前线，但后来被召回并派往东方。德鲁苏斯主要待在罗马，在日耳曼尼库斯死后，提比略没有尝试让德鲁苏斯巡视各行省。各行省由其总督负责，其中很多人的任期长得超乎寻常，但他们都没有被要求发动积极的对外战争。奥古斯都曾建议保持现有的疆界，虽然这只是为了从公元6年和9年的灾祸中恢复元气而做的短期停顿，提比略却把这当作他毕生的准则。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相比，提比略在位时的军事行动比较少，公开庆祝胜利的活动也少得多，也没有利用战利品建造很多新的纪念性建筑。与奥古斯都在世时相比，提比略在罗马的建筑工程和娱乐上花的钱少得多了。[7].

对这些年的事件，我们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他们都将提比略描绘为睚眦必报、心狠手辣的小人，并暗示他有隐秘的变态行为，简而言之，他是个恶魔，比卡利古拉和尼禄之流只好一点点。现代学者普遍反对这种偏见，虽然他们有些过于正面地评价提比略，但他们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总的来讲，提比略在位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尤其是在外省。虽然没有许多积极的对外战争，但外交上一般都是成功的。阿米尼乌斯被日耳曼尼库斯击败，活了下来，罗马人后来不再攻击他的时候，他就转而攻击马罗博杜斯，而不是罗马人。马科曼尼人的国王被击败，逃到罗马帝国境内，以流亡者的身份生活。他自己的部落联盟瓦解了。大约在日耳曼尼库斯去世的时候，阿米尼乌斯被他自己的一些酋长谋杀，因为他们怨恨他的强势。他一度统一起来的各部族再次变成一盘散沙，而且互相敌对。

在几十年之后，莱茵河或多瑙河边疆才会再次出现这样一位魅力十足的领袖。于是，罗马人无须费力，两大威胁就被解除了。

在二十三年里，帝国总体而言很安定，边疆和一些行省的问题都得到了控制。在这些方面，提比略的决策似乎是理智的。他的大多数继承者都将效仿他，不像奥古斯都那样不断巡视帝国各地。和提比略一样，这些后世的皇帝也不会派遣自己家族的高级成员代替他们去巡视各地。对很多皇帝来说，这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或者至少是没有可以信赖的亲戚。奥古斯都的多位元首共同执政的理念只是偶尔被复苏，成功的例子更少。这本身似乎并不重要，尽管这的确意味着，将来多人执政的前景会受限。虽然这与罗马的过去相比是一个深刻变革，但我们很难判断它对政治体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好是坏。

更严重的是，提比略逐渐退出了公共生活。元老和帝国各地及外邦的使者必须赶到卡普里岛，等待拜见提比略。提比略甚至在统治早期，还身在罗马的时候，就越来越依赖塞扬努斯，而不信任其他任何人。部分原因是，塞扬努斯是个骑士，提比略不认为他会有太大野心。阿格里帕也有类似的背景，但在奥古斯都的帮助下成为元老并飞黄腾达，一直是一位优秀将领和行政管理者。塞扬努斯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但还是很快从禁卫军司令崛起成为元首最重要的谋臣。提比略离开罗马之后，塞扬努斯有效控制了外界与他的接触。德鲁苏斯、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们和其他很多显要人士被除掉，以儆效尤。提比略常用“叛逆”罪名来镇压他不喜欢的人。现在这项罪名的使用范围很广，执行非常严苛，对元首的哪怕最不明显的攻击也会遭到严惩。公元31年，提比略担任执政官（不过没有亲自到罗马），并将塞扬努斯扶植为自己的同僚执政官，后来授予他资深执政官的军权。这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似乎在提携塞扬努斯到共治元首和继承人的位置。但最后他改了主意，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清洗。塞扬努斯被逮捕和处决。罗马的精英阶层还有很多人因此丧命。

提比略的统治在元老和高级骑士当中制造了恐怖气氛，令人回想起内战和政治清洗。在提比略的继承者们统治期间，这种恐怖气氛也始终没有完全消散。人们的情绪与奥古斯都时期完全不同，部分原因是奥古斯都在三头同盟时期制造了足够的恐怖气氛，以震慑所有反对派（最大胆或最愚蠢的密谋者除外）。更重要的是，奥古斯都认真地去了解国内最显要的人士，与他们结交，带着尊重对待他们。提比略的不善交际和最终离开罗马城的举动，导致了一个并非有意为之的结果：后世的元首们越来越难培植奥古斯都时期那种轻松的气氛。李维娅的儿子未必是史料描写的那种恶魔，但至少在上述方面，他是一位糟糕的元首。在他统治时期，君主制原形毕露，而环绕着他的宫廷和廷臣的形象也更加明显了。塞扬努斯之所以能够攀升到这么高的位置，完全是因为得到了元首的宠信，而不是他具有军人或行政长官的突出才干。^[8]

屋大维、恺撒和奥古斯都

本书不涉及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也不会讲他们给元首国的性质带来的变化，因为这些本身就是非常宏大的题目。罗马人自己的判断是，奥古斯都比后来的几乎所有皇帝都强。很多年后，罗马人的一个习惯是，希望每一位皇帝“比图拉真更善良，比奥古斯都更幸运”

（指的是奥古斯都的很多亲人早逝）。元老们除了对共和国的贵族领导抱有怀旧的喜爱（表现形式往往是对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赞扬）之外，对元首国的现实并无怨恨，肯定也没有真正的抵抗。只有在卡利古拉被谋杀之后，元老院才短暂地商讨恢复共和国，但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转而决定选择谁当新元首。罗马人普遍承认元首国是有效的，对它本身的不满情绪很少。关键之处在于皇帝是不是好人或贤君（衡量标准是内政外交能否取得成功），是否对元老阶层抱有充分的尊重。所以，奥古斯都的政府体制没有受到挑战，奥古斯都本人成了

优秀元首的典范。这明确证明了他的成功，比这更有效的证据应当不多了。^[9]

在当时和现代一样，对奥古斯都本身很难做一个评判，因为他太复杂，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裁决。终其一生，他都受到雄心壮志的驱动。在某个时间（可能要到尤利乌斯·恺撒被谋杀之后，但我们不能确定），他决心要成为罗马第一人，此后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毫不犹豫地动用暴力，在后来的岁月里杀人如麻，令人噤若寒蝉，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随时改换阵营。所有的罗马贵族都是雄心勃勃的，但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如此悍然摒弃传统的约束，也没有人如此公开地将自己的目标定为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不过，话说回来，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是尤利乌斯·恺撒（终身独裁官，满载荣誉，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罗马人）的继承人。年轻的奥古斯都所处的局势和他的行动一样，都是史无前例的，但至少他的动机植根于他所在社会阶层的传统。

奥古斯都的野心是明目张胆的、不受约束的。随着越来越接近最终胜利，他对敌人也变得更宽容了。他的宽大仁慈比尤利乌斯·恺撒更审慎，但仍然是真诚的。尤其在与安东尼的战争中，他只有在情势必需的情况下（当然是根据他自己的判断）才会杀死对手；只要他觉得安全，就会宽恕敌人。早先他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他对敌人铁面无情，或者只是偶尔开恩。奇怪的是，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宽恕所有敌人，而另一个人起初草菅人命，后来懂得克制自己，不再胡乱杀人，那么第二个人反而更容易得到大家的感激。尤利乌斯·恺撒的对手们不知道如何理解他的仁慈。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后，奥古斯都大体上停止了杀戮其他罗马人，几个例外是在发生或真或假的阴谋之后。最终，他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清洗。他厉行自我克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别人强迫他停止杀戮的。从政治角度看，他的这种做法很明智，因为满怀自信、对皇帝有好感的精英阶层肯定更

容易对付。但他的一些继承者更加残暴嗜血，但仍然能长期掌权。不管奥古斯都的行为是否务实，毕竟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应当为此仰慕奥古斯都，就像我们必须谴责他早年的凶残一样。

他在早年并没有深思熟虑的计划或愿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后来所创政权背后的思想在他年轻时已经清晰成形。早期他的行动全是为了最直接的目标：赢得权力、击败敌人。他可能没有时间考虑其他东西。在早期岁月，他宣扬自己与尤利乌斯·恺撒的关系，歌颂后者的丰功伟绩，为他复仇，同时为自己赢得权力。后来，在前30年代，他开始更多关心人民的福祉，在罗马修缮和新建纪念性建筑与基础设施，并管理罗马城的粮食供应。这也是非常明智的政治举措，但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后他继续从事这方面工作，说明他的目标不仅仅是短期的俘获人心。奥古斯都无情地追求权力，但得到权力之后，就表现出非常希望把事情处理好的姿态，不管是粮食和饮水供应、道路系统、各种行政长官职位，还是罗马、意大利与各行省的治理。他一掷千金地修复旧神庙和建造新神庙，是为了恢复人与神之间的恰当关系，因为诸神曾经让罗马伟大，将来还会如此。我们没办法知道他内心深处的秉性，也不知道他这种集中有力的政策背后的真实信念，但至少他希望别人看到他在做一些事情，他的这种冲动很可能是真诚的。同样，他努力改善罗马精英阶层的行为和道德，是因为罗马人普遍相信，他们的不端行为招致了共和国晚期的那些灾祸，只要他们遵从美德，国家未来就会变好。

奥古斯都无情地追逐权力，然后紧紧握着权力，尽管他在公共场合假装不是这样。这样的雄心肯定是任何一位成功的政治领袖的标志性特征，很多不是那么成功的领袖也是这样。但他运用这种权力，为大众福祉服务。他努力让共和国再一次正常运转起来，我们不能否认他成功了，因为他缔造的和平与稳定使得国家欣欣向荣。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在他的统治下，更多人的生活水平比之前几代人提高了。他

需要处理的问题都是传统问题，尽管他的一些手段比较新颖。尤利乌斯·恺撒曾尝试处理其中一些问题，其他人也试过，但他们都没有机会像奥古斯都那样全面、彻底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确保天下人都知道，他是在为全民福祉而辛劳。但话又说回来，这种自我推销是所有罗马政治家都会做的。他赋予一些个人和社区好处，让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所以个人利益往往和更广泛的益处融为一体。但事实仍然是，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确实统治得很好。

奥古斯都的地位是逐渐提升的。从前30年开始，他有效垄断了军队的控制权，用现代术语来说，他是一位军事独裁者，尽管他小心翼翼地避免“独裁官”的头衔。他的法律地位的变化似乎不是循序渐进的。每一个变化都是精心策划出来的，并做了准备，然后才实施，并不断摸索、反复修改。同时，随着一年年过去，他的名字和形象深入到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奥古斯都的影响力几乎无处不在。在过去，还不曾有人对罗马帝国这么大的地域施加如此大的影响。在获得突出地位的同时，他也不得不承担繁重的工作：不断有使团和请愿者从各行省和国外前来拜见他。他亲自接见其中很多使者，或者让一位亲密盟友或亲属接见他们，这样就能确保很多个人和社区对他的忠诚，尤其是那些得到好处的个人和社区。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理解和判断往往非常具有地域性的事情。

恺撒·奥古斯都是一位军事独裁者，控制了国家。即便他后来非常得民心，也不能掩盖上述事实。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前1世纪的罗马发生了极大混乱。若在更早期的时代，他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腓立比获胜，或者奥古斯都在与塞克斯图斯·庞培或安东尼交战时阵亡或者病死，历史将会怎样发展，做这样的猜想是没有意义的。对历史爱好者来说，这些假设是非常有趣的饭后话题，但依赖太多无法精确衡量的因素，所以没有任何历史价值。奥

古斯都取得了胜利，并活到高龄。我们永远不能知道如果他失败了或者早逝，如果他选择了迥然不同的统治风格，会发生什么事情。

同样，我们也不能草率地把奥古斯都时代与我们自己的时代相比拟。当今很多西方民主国家核心的体制惰性有点像罗马共和国最后几十年的情况，那时元老院领导人忙于互相之间的争斗，没有直面那些所有人都承认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情况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西方社会，但两个时空之间的差别更多也更大：罗马共和国的状态更糟糕，因为它的政治变得非常凶暴。罗马共和国的命运是一个教训：任何体制，哪怕是长期成功的体制，都不能逃脱腐朽和崩溃的威胁。但在坠入这样的深渊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崩溃的命运可能会成为现实，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它是不可避免的；当今西方社会还远远没有到可能出现现代版尤利乌斯·恺撒或奥古斯都的时候，我们应当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都是才华横溢的人，但他们都曾下达导致成千上万人在内战中死亡命令。除非我们愿意相信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否则就必须始终记住，他们虽有伟大成就，但同时也是双手沾满血污的屠夫。根据军阀和独裁者的标准，他们都非凡地高效和温和。有些比他们坏得多的独裁者，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许。

奥古斯都签字命令发动政治清洗，但也非常自制，谢绝了元老院投票决定授予他的很多过分的荣誉。他偷走了另一个男人的妻子，虽然对她忠贞不贰，但之前也有过很多偷情的经历。另外，他还宣传旧式的道德观和婚姻的益处。他放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外孙女和外孙，他也敦促其他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年轻时，他违反了法律和先例，组建了一支私人军队去对抗合法选举产生的执政官，后来自己制定法律，并同意接受这些法律的约束。总的来讲，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行为不断得到改善。

他的矛盾之处始终存在，正如这样简单的事实始终存在一样：他是一个军阀，通过杀戮同胞得到了统治地位；他能够保住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因为没有谁的军事力量能与他相提并论。被欢呼为“祖国之父”的成熟政治家和得到亚历山大港水手赞颂（因为他让他们和平地航行和生活）的年迈元首控制着军队，并让军队只对他一人忠诚。他一生中取得的其他成就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他是一位成功的军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军事独裁者当中，恺撒·奥古斯都不算太坏，至少他确立主宰地位之后，施行了善政。不管他有多少矛盾之处，至少在上述方面，他的戏剧表演应当得到热烈鼓掌。

[1]. Dio 44.2.1-3 (Loeb translation).

[2]. Tacitus, *Ann.*1.2.

[3]. Tacitus, *Ann.*1.8.

[4]. 关于这个名字，见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247, n.11 有资料 and 讨论。

[5]. 关于提比略登基和他在位的早期，见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pp.68-81, 及R.Seager, *Tiberius* (2005), pp.40-59。

[6]. Tacitus, *Ann.*1.15.

[7]. Tacitus, *Ann.*1.11 讲到奥古斯都的建议。

[8]. 提比略在位期间情况，详见Levick,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及R.Seager, *Tiberius* (2005)。

[9]. Eutropius, *Breviarium* 8.5; 奥古斯都留下的制度注定失败的观点，见J.Drinkwater, ‘The Principate-lifebelt, or millstone around the neck of Empire?’, 载于O.Hekster, G.Kleijn & D.Slootjes (eds), *Crises and the Roman Empire* (2007), pp.67-74; 卡利古拉遇刺之后的情

況，见A.Barrett, *Caligula. The Corruption of Power* (1989) , pp.172-6。

附录一 元老晋升体系（荣耀之路）

若要从政，需依次参选和担任一系列官职，履行军事和民政职责。奥古斯都修改了各个官职的职责及其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审视他出生和逝世时的晋升体系。

前63年的元老晋升体系

最低年龄要求(岁)	官职	数量(人)	职责
			理论上,从政之前要服十年兵役。一般作为军事保民官,或者在担任行省总督的亲友的幕僚中效力。
30	财务官	20	在罗马和各行省负责财政管理。每一位行省总督配备一名财务官,作为其副手。财务官自动获得元老身份。
	平民保民官	10	只有平民才能获得这个官职,而且它不是晋升体系中必须经过的步骤。保民官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负责保护人民。他们可以否决任何行政长官的行动,可以向公民大会提交立法。
36	市政官	4	不是晋升体系中必须经过的步骤。其中两个职位仅限平民担任。在罗马负责行政管理,包括主持某些一年一度的节庆,并监管粮食供应与公共档案。

前63年的元老晋升体系-续表

最低年龄要求(岁)	官职	数量(人)	职责
39	裁判官	8	在罗马负责司法和行政管理,主持所有主要法庭。一年任期结束之后一般被外派,以资深裁判官或资深执政官的衔级担任行省总督。
42	执政官	2	共和国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在一年任期内留在罗马,按照月份轮流享有优先权。大多数执政官会向公民大会提交立法。一年任期结束之后一般被外派,以资深执政官的衔级担任重要行省的总督。
	监察官	每5年有2人	通常是前任执政官,威望极高,负责监督公民人口与财产普查,并审核元老名录。

苏拉修改了晋升体系，重新规定了参选每一级官职的最低年龄要求。除平民保民官之外的所有官职任期都从当年1月1日开始，12月31日结束。平民保民官在12月10日就职。

公元14年的元老晋升体系

最低年龄要求(岁)	官职	数量(人)	职责
接近 20 岁	二十人团成员	20	在罗马负责初级管理工作。
20 出头	军事保民官	24	每个军团(驻扎在埃及的军团除外)有一名出身元老家庭的高级军事保民官。有一段时间,奥古斯都也让两名高级军事保民官联合指挥一个骑兵单位。

公元14年的元老晋升体系-续表1

最低年龄要求(岁)	官职	数量(人)	职责
25	财务官	20	财务官的财政工作被减少,仅限于在元老院行省负责财政工作。在罗马,财务官负责协助执政官组织元老院会议,也负责监管罗马的公共档案。
	市政官(平民必须担任市政官或平民保民官,贵族可以跳过这些步骤)	6	失去了管理节庆活动、粮食供应和公共档案的职能。继续执行其他行政职能。
	平民保民官	10	失去了否决权和向公民大会提交立法的权力。仍然有权接受公民的上诉,可以参与法律案件。
30	裁判官	12	负责主持主要法庭。现在也负责主持节庆和竞技会。
	军团长	约 22	负责指挥各军团(驻扎在埃及的军团除外)。
	资深执政官	约 10	元老院行省的总督。

公元14年的元老晋升体系-续表2

最低年龄要求(岁)	官职	数量(人)	职责
理论上, 苏拉设置的 42 岁的年龄要求仍然有效。实际上常采用 33 岁的标准(我们不知道这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的豁免)。	执政官	2 (选举产生的执政官在任上死亡或辞职时, 会任命补任执政官来接替)	国家的高级行政长官, 有权向公民大会提交立法和主持元老院会议。实际上, 执政官的地位低于奥古斯都和提比略, 他们在元老院时会坐在两位执政官之间。
	帝国行省总督	约 9	帝国行省 (埃及除外) 和犹太等小行省的总督。每个这样的行省驻扎一个或多个军团。

附录二 耶稣的出生年代

对于拿撒勒的耶稣的出生年代和具体情况，我们唯一的资料来源是福音书。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其他史料提及此事，后世的相关史料肯定受到了福音书的影响，或许完全取材于福音书。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记载于很多早期史料中。这不足为奇，因为希腊或罗马的文献没有理由去记述外省任何人的出生。就连著名罗马人的出生情况也很少被完整记载下来，往往非常含糊，甚至没有任何记录。我们不知道尤利乌斯·恺撒的确切出生日期。他可能出生于前100年，但由于苏埃托尼乌斯和普鲁塔克写的传记的开头部分都已经遗失，前100年也只是个很好的猜测，有些学者提出他出生在前102年。关于奥古斯都出生的故事是在很久之后被记录在案的，那时大家已经知道他是位多么重要的人物。^[1]

在福音书当中，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描述了耶稣的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书时间一般被认为是1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不过直接证据极少。我们有理由说它们的成书时间不可能比这更晚，但可能更早一些。《马可福音》的成书时间被认为早一些，可能比《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早十年，但没有描写耶稣的诞生。《约翰福音》被认为是四福音书中最晚的一部，也没有写到耶稣诞生。我们必须记住，福音书不是记载当时事件的史书，它的宗旨是传达神学信息。所以它们描述了耶稣生平事迹中在神学方面重要的内容，写到其他事件也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例如，福音书很少写到耶稣的童年，完全没有涉及他传福音之前的成年生活。历史学家或者传记家会渴望

这一类的细节信息，以及尽可能多的背景资料，但福音书的重点不在于此。作为比较，我们应当注意到，我们对罗马领导人在政治上变得重要之前的生平也知之甚少。我们要牢记，福音书作者在其主线之外插入的题外话可能不准确，所以我们不能以它们为基础得出严肃的理论。

《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明确写道，耶稣诞生在大希律王统治时期。《路加福音》第1章第5节具体写道，施洗约翰出生在大希律王在世时，所以耶稣也出生在同时期。大希律王于前4年去世，所以耶稣可能出生在此前的一两年，大约是前6～前5年，或者是前4年年初。也有人提出，前7年的星相对琐罗亚斯德教占星家（《马太福音》中的东方博士指的很可能就是琐罗亚斯德教占星家）来说有特别的意义，所以耶稣可能出生于前7年。我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格来判断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这几个年份都与“耶稣在本丢·彼拉多担任犹太地区长官时期（公元26～36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说法相吻合。

《路加福音》第2章第1～2节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难题，这段著名的经文写道：“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前文已经讲到，没有其他文献提及奥古斯都下了一道单独的命令，对帝国各行省进行人口普查和征税。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奥古斯都从来没有发布过这样的命令，但我们必须谨慎，不能仅凭一个证据就认为这是真的。今天很少有人真正懂得自己国家税收制度的所有方面，所以路加未必懂得罗马帝国税收的管理机制。即便他懂，他也未必会非常小心准确地对其加以描述。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就像政府的其他很多方面一样，帝国的税收制度得到了整顿。作为整顿工作的一部分，大多数行省，或许是所有行省，都接受了一次或多次人口普查，以评估当地人民的纳税义务。对很多地区而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普查，至少是罗马直接统治下的第一次。这些评估与罗马的传统人口普查有显著区别，后者仅涉及罗马公民及其财产。

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奎里尼乌斯（就是钦定本圣经中说的居里扭）主持的人口普查被犹太人民怀恨在心，引发了一些反抗。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这次普查于公元6年开始，当时大希律王的儿子阿奇劳斯被废黜，犹太成为罗马直接统辖的一个行省，由叙利亚总督奎里尼乌斯监管建立行省的过程。于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关于耶稣诞生日期的说法就有了直接矛盾，《路加福音》的第1章第5节和第2章第1～2节也互相抵触。为了让这些段落互相协调，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复杂的理论，但这些理论都不能让人完全满意。有人提出，在公元6年的约十年前，大希律王还在世的时候，曾有过一次人口普查，而奎里尼乌斯也在公元6年之前担任过一次叙利亚总督（没有文献证据）。这种理论依赖太多的猜测。大希律王死的时候，叙利亚总督是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瓦卢斯是在前6年接替盖乌斯·桑提乌斯·萨图尔尼努斯的，而后者是在前9年开始担任叙利亚总督的。这些时间点似乎是明确的，尽管这些年恰好处于提比略在罗得岛的时期，留下的资料不多。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一个人先后两次担任同一个职位不是不可能（后来这种事情就变得非常罕见了），但奎里尼乌斯不大可能在大希律王活着的时候当过叙利亚总督，除非只当了几个月，但那样的可能性太小。大希律王活着的时候，奎里尼乌斯可能在这个地区，或许担任过加拉太总督，后来他肯定在盖乌斯·恺撒的幕僚中，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参与了人口普查。[\[2\]](#)

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说法，公元6年由奎里尼乌斯主持的人口普查是罗马人在犹太开展的第一次普查，被犹太人当作一件悲痛的事情铭记。在此之前，似乎不大可能有罗马人直接开展人口普查。我们知道，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在高卢开展过多次人口普查，比如前27年、前12年和公元14年的几次，但高卢是一个直接受罗马统辖的行

省，不是一个附庸国。遗憾的是，我们对附庸国（尤其是犹太）的税收制度和它们与罗马的关系知之甚少。大希律王可以调节征税的数量，这说明他应当有一个评估人口和财产的制度，极有可能是根据某种形式的普查。普查多久执行一次，又如何运作（比如是否要求人们在其家乡接受登记），我们都不知道。^[3]

《路加福音》第2章第3～5节说，就是因为需要回到家乡接受普查登记，约瑟才和他的未婚妻一起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去往犹太的伯利恒，后来玛利亚在伯利恒生下了一个儿子。弥赛亚出生在伯利恒是非常重要的。《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简单地说，耶稣出生在伯利恒，而没有解释伯利恒是不是约瑟和玛利亚平时的居住地，也没有提到人口普查。我们不必将此视为与《路加福音》矛盾，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福音书的作者没有为他们描述的事件提供完整又详细的历史背景，而是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告诉读者。约瑟和玛利亚可能确实需要去伯利恒接受大希律王王国的官员举行的某种形式的普查，而这普查与税收有关联。当时的人们也完全可能认为，他们的税金说到底其实是交给恺撒·奥古斯都的，因为是他扶植大希律王当上国王，并为他撑腰，让他维持权力。不管罗马国家、元首和大希律王这样的附庸统治者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法律关系（研究此话题的学术著作汗牛充栋，但没有什么实际结果，因为缺乏证据），当时的人的确有可能这样想，尤其是在事件发生几十年甚至更久之后。^[4]

这全都是有可能的，但仍然只是猜测。很可能，在1世纪晚期，提到人口普查，大家就自动想起了奎里尼乌斯那次有名的普查。但我们较难相信公元6年的普查和之前的普查之间有什么直接联系，除非可以肯定公元6年的普查是建立在大希律王朝税收制度的基础上，而大希律王朝的税收制度是建立在哈斯蒙王朝的制度上。在罗马治下的埃及，罗马时期和托勒密王朝之间有着相当多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应当不是埃及独有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作者都相信耶稣出生

在大希律王晚年，这让我们再一次估计耶稣诞生时间为约前6～前5年。约瑟可能在那个时间前往伯利恒以便接受人口普查的登记，并可能被迫（或自愿）把未婚妻一起带去。《马太福音》似乎说明他们在伯利恒待了一段时间。东方博士的出现（应当是来自帝国之外，可能是帕提亚帝国的腹地）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很多商人会进行这样的旅行。同样，《马太福音》说约瑟一家从犹太逃往埃及，也是说得过去的。埃及，尤其是亚历山大港，有规模很大的犹太人社区。^[5]

这些说法虽然可信，但我们还是拿不准。毕竟我们手头的资料只有两部福音书中的短暂叙述，也没有关于这些年的犹太以及它和罗马关系的更多信息，所以我们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这些说法。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而避免教条的、不明智的做法。但这种主题不可避免地会比奥古斯都之类人物的生平细节更容易引起情绪化的反应，人们对圣经叙述的证据常常施加不同的标准。因此，人们常说，大希律王屠杀婴儿的故事（根据《马太福音》第2章第16～18节，大希律王下令处死所有出生在伯利恒的男婴）是虚构的。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除了《马太福音》之外，没有其他史料提及此事。路加没有讲到这个故事，于公元1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写作的约瑟夫斯也没有提及此事，尽管他在记述大希律王统治时一般都写得非常详细。约瑟夫斯记录了大希律王统治时期大量的血腥屠杀，国王的很多亲属和耶路撒冷贵族都成为他的牺牲品。所以，《马太福音》中屠杀婴儿的恶行是大希律王能做出来的，但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故事受到了大希律王自身经历的启发：他处决了好几个被指控阴谋反对他的儿子。这些理论，就像其他一些强调伯利恒作为耶稣出生地的神学重要性的理论一样，值得考虑，但都没有真凭实据。同样，说某事是可能发生的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说它肯定发生过。和本书的其余部分一样，在此处也必须承认，我们掌握的证据有限；我们要提醒自己，奥古斯都生平以及一般来讲的古代史的很多方面，都是无法百分之百确定的。^[6]

[1]. 早期史料中关于耶稣被处决，见Tacitus, Ann.15.44, Josephus, *AJ* 18.63-4.20.200, 有关讨论见E.Schürer, G.Vermes & F.Millar,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1 (1973), pp.430-41介绍了关于 *testimonium Flavianum* 的大量文献，因为这些段落中的一部分或许全部，是后人篡改添加的。关于尤利乌斯·恺撒的诞生，见A.Goldsworthy, *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 p.30。

[2]. Josephus, *BJ* 2.117-18, *AJ* 17.355, 18.1, 26, *ILS* 2683; 讨论见E.Schürer, G.Vermes & F.Millar,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1 (1973), pp.258-9, 注释 *ILS* 918 记载了一位不知名的元老两次担任帝国行省总督，至少一次是在叙利亚。这也许就是奎里尼乌斯。令问题更加复杂的是，2世纪末3世纪初的基督教辩护者德尔图良将耶稣出生年份定为叙利亚总督Coponius举行的人口普查期间，见Tertullian, *Against Marcion* 4.19; Strabo, *Geog.*12.5.6, Tacitus, *Ann.*3.48 记载了奎里尼乌斯在奇里乞亚边境赢得的一场胜利，时间可能是约前4~前3年，可能是他担任加拉太和潘菲利亚总督期间。

[3]. 见Goudineau in *CAH2* X, p.490涉及在高卢举行的人口普查。

[4]. 非常有价值的讨论，见E.Schürer, G.Vermes & F.Millar,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1 (1973), pp.399-427, 更简洁的讨论见P.Richardson, *Herod. King of the Jews and Friend of the Romans* (1996), pp.295-8。

[5]. 关于埃及，见A.Bowman in *CAH2* X, pp.679-86, 689-93。

[6]. 关于对大屠杀的质疑，见J.Richardson, *The Romans in Spain* (1996), pp.297-8。即便在A.Murdoch, *Rome's Greatest Defeat. Massacre in the Teutoburg Forest* (2006), p.59这部与本话题似乎无关的书里，大屠杀也被视为事实。

术语解释

市政官 (Aedile)：市政官是负责主持罗马城日常生活某些方面（包括举办某些一年一度的节庆）的行政长官。市政官的地位一般在财务官与裁判官之间。市政官的数量比裁判官少，并且不是晋升体系中必需的阶段。

《埃涅阿斯纪》 (Aeneid)：诗人维吉尔创作的十二卷史诗，在他死后发表。它发表后当即被认可为拉丁文诗歌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并成为标准教材。它讲述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在故国灭亡后的旅行，最后他和族人定居在意大利，其后裔建立了罗马城。

军事国库 (Aerarium militare)：公元6年，奥古斯都建立了军事国库，以便提供军费，尤其是支付军饷和退伍奖金。军事国库最早的资金大部分都是奥古斯都自掏腰包，但后来为了维持军事国库，征收了不得人心的遗产税。

军团旗手 (Aquilifer)：执掌一个罗马军团军旗 (aquila) 的旗手。军旗其实是一尊银质或镀金的雄鹰塑像，安放在一根木杖顶端。

骑兵团 (Ala)：骑兵团是辅助骑兵的单位，兵力大致相当于一个步兵大队。

奥古斯都和平祭坛 (Ara Pacis Augustae)：这是奥古斯都时期最杰出的艺术作品之一。元老院投票决定建造这座祭坛，以纪念奥古斯都于前13年返回罗马。祭坛于前9年落成。和平的主题纪念了内战的结束和对外战争的胜利。

威望 (Auctoritas)：一位罗马元老的名望和影响力。军事成就可以极大地提高一个人的威望。

观鸟占卜师 (Augur)：观鸟占卜师是罗马最重要的祭司团体之一，共十五人，终身制。他们最重要的职责是监督正确地观察和诠释神谕（定期占卜是罗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尤利乌斯·恺撒担任独裁官期间，增加了第十六名观鸟占卜师。

辅助部队 (Auxilia)：共和国晚期招募的非罗马公民士兵，也叫支援部队。

床弩 (Ballista)：一种有两根臂、利用扭力的大型弩，可以发射弩箭或石块，精准度相当高。床弩尺寸不一，绝大多数用于攻城。

纯白托加袍 (Candidatus)：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会穿一种特别的白色托加袍，以此向其他公民宣布自己即将参选。英语中“候选人”一词candidate就来源于此。

铁甲骑兵 (Cataphract)：身披重甲的骑兵，其坐骑往往也用护甲。铁甲骑兵是帕提亚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百夫长 (Centurion)：罗马军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军官级别。最初的百夫长指挥一个80人的百人队。一个罗马军团中最资深的百夫长是首席百夫长 (primus pilus)，地位极高，任期只有一年。

百人队 (centuria)：罗马军队最基本的小单位，由一名百夫长指挥，一般有80名士兵。

大队 (cohors)：罗马军团的基本战术单位，包括6个百人队，每个百人队有80名士兵，一共有480人。

百人会议 (Comitia Centuriata)：负责选举最高级行政长官（包括执政官和裁判官）的罗马公民大会。根据人口普查中登记的财产情况，全体公民被分为193个投票百人团。富人尽管人数少，但对选举结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百人会议的结构据说是效仿早期罗马军队的组织结构。

部落会议 (Comitia Tributa)：全体罗马人民（包括贵族和平民）的一种大会。根据血统出身，将全体公民分为35个投票部落。部落会议有立法权，由一名执政官、裁判官或席位市政官主持。部落会议还可以选举一些官职，比如财务官和席位市政官。

平民大会 (Concilium Plebis)：罗马平民的会议，负责立法或选举某些行政长官，如平民保民官。贵族不可以参加平民大会。根据血统出身，将全体平民分为35个投票部落。会议由平民保民官主持。

执政官 (Consul)：每年的两名执政官是罗马共和国选举产生的最高级行政长官，他们负责指挥重要的作战。任期结束之后，元老院有时会授予他们一些权力，此时他们被称为资深执政官 (proconsul)。

元老院议政厅 (Curia) 和尤利乌斯议政厅 (Curia Julia)：元老院议政厅位于罗马城广场的北侧，据说是由一位国王建造的。苏拉修复了议政厅，但它后来在克洛狄乌斯的葬礼上被烧毁。恺撒担任

独裁官时开始建造一座新的元老院议政厅。但即便在议政厅状态良好时，元老院有时也在其他地方开会，进行一些特定的辩论。

晋升体系（Cursus honorum）：罗马人从政的进阶制度。苏拉担任独裁官时重新颁布和加强了关于行政长官候选人的年龄和其他资格要求的法律。后来奥古斯都修改了这些法律。

独裁官（Dictator）：在极端危机的时期，可以任命一名独裁官，任期六个月，拥有最高的军事和民政大权。后来历次内战的胜利者，如苏拉和尤利乌斯·恺撒，都用这个头衔作为更为长期化权力的基础。

青少年（Ephebe）：希腊城市的少年要在国家指导下，在体育馆（gymnasium）接受训练，主要是为了增强体质，但往往也包括特定的军事训练。

骑士（Equites，单数为Eques）：罗马的骑士是根据人口普查拥有达到最高标准的财产的群体。从格拉古兄弟时期开始，骑士获得了更为正式的政治角色，比如在法庭担任陪审员，这种措施非常有争议。直到奥古斯都时期，才将元老单独化为一个阶层。

法西斯束棒（Fasces，单数为Fascis）：一束装饰性的木棒，长约5英尺，中间捆着一把斧头。法西斯束棒由执法吏扛在肩头，是一位行政长官权力与地位的最明显象征。

奥古斯都广场（Forum Augustum）：奥古斯都建造的广场，复仇者玛尔斯神庙位于其中心。

尤利乌斯广场（Forum Julium），或称恺撒广场（Forum Caesaris）：尤利乌斯·恺撒筹划和开始建造的广场，由奥古斯都完成。维纳斯神庙在其中心。

罗马广场（Forum Romanum）：罗马城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位于卡比托利欧山、帕拉丁山、奎利那雷山和威利亚山之间。公共集会常在广场上的演讲台（Rostra）周围或广场东端举行。平民大会和部落会议通常也在广场举行，进行立法工作。

短剑（Gladius）：拉丁文的剑。短剑一般指的是西班牙短剑（gladius hispaniensis），一直到3世纪，它始终是罗马的标准武器。它用优质钢制成，可以劈砍，但主要用来刺杀。

哈斯蒙王朝（Hasmonaean）：前2世纪，犹太人反叛塞琉古王朝，取得成功。犹太人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由哈斯蒙王朝统治。安东尼和屋大维最终扶植大希律王，取代了古老的哈斯蒙王朝。

军权（Imperium）：行政长官和资深行政长官在其任期内的军事指挥权。奥古斯都被授予高级资深执政官军权（maius imperium proconsulare），也就是比其他所有资深执政官更高的军权。后来阿格里帕和提比略也获得了这种权力。

军团长（Legatus，复数为Legati）：一名受上级委派指挥军队的军官，他本身没有军权。军团长由行政长官选拔，而不是选举产生。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军团长被分为两个主要级别，即指挥一个军团的军团长（legatus legionis）和“奥古斯都军团长”（legatus Augusti，即管辖一个帝国行省的总督）。

军团（Legio）：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征兵。军团是罗马军队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的主要单位。在奥古斯都时代，一个军团的理论兵力约为4800~5000人（分为10个大队，每个大队480人）。但在作战中军团的有效兵力往往少得多，在内战中尤其如此。

执法吏 (Lictor)：一位行政长官的正式侍从，携带法西斯束棒，象征行政长官主持正义、施加极刑和肉刑的权力。执政官由12名执法吏陪同，独裁官通常则有24名执法吏。

骑兵统帅 (Magister Equitum)：共和国独裁官的副手。根据传统，骑兵统帅负责指挥骑兵，因为独裁官被禁止骑马。

奥古斯都陵寝 (Mausoleum)：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前开始建造的宏伟陵墓，得名自卡里亚国王摩索拉斯 (Mausolus) 的著名陵墓，这是古典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

奥古斯都海战 (Naumachia Augusti)：奥古斯都在前2年上演的海战表演，用以娱乐群众。动用了约30艘战船和数千名水手，在一个特别挖掘出来的湖泊上进行。

指名者 (Nomenclator)：一种受过特别训练的奴隶，他的任务是向自己的主人提示走过来的其他公民的名字，以便主人能够以亲切的方式与来人打招呼。拉选票的政治家往往会带一名指名者在自己身边。

凯旋式符号 (Ornamenta triumphalia)：奥古斯都设立了用凯旋式的“符号”而不是凯旋式本身奖励人的办法。前19年之后，除了他的亲属之外，无人获得完整的凯旋式荣誉，得胜的行省总督会得到“凯旋式符号”的奖励。

小凯旋式 (Ovatio)：一种等级较低的凯旋式。在小凯旋式中，将军骑马而不是乘坐战车穿过城市。

万神殿 (Pantheon)：阿格里帕建造的供奉诸神的神庙。虽然神庙的铭文上还有他的名字，但我们今天看到的万神殿其实是哈德良在2世纪重建的。

祖国之父 (Pater patriae)：前2年，奥古斯都获得了这个头衔。

标枪 (Pilum, 复数为pila)：在罗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重型标枪都是罗马军团士兵的标准装备。标枪的枪头狭窄，用来穿透敌人的盾牌，枪杆长而细，使得枪头能够打击到盾牌后的敌人。

祭司长 (Pontifex Maximus)：十五名大祭司 (pontiff) 之首。大祭司是由罗马贵族垄断的三种主要神职人员团体之一。大祭司负责管理许多国家节庆和事件的时间安排。祭司长更像是大祭司团 (College of Pontiffs) 的主席，而不是领导人，但这个职位的威望极高。

裁判官 (Praetor)：裁判官是一年一度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在元老院指导下治理重要性较低的行省，并指挥罗马规模较小的战争。

禁卫军大队 (Praetorian cohort)：这个时期的禁卫军是从各军团精心选拔出来的精锐士兵，装备非常华丽。每一位将军有权组建一个大队的禁卫军，但在内战期间，三头同盟分别控制着好几个禁卫军大队，都是从他们的下属那里接收来的。亚克兴角战役之后，奥古斯都组建了9个永久性的禁卫军大队，作为自己的卫队。在这个阶段，禁卫军在罗马没有永久性的兵营，任何时候都只有3个大队在城内。

长官 (praefectus)：一名拥有骑士身份的军官，职责范围很广，包括指挥盟军或辅助部队。

城市长官 (praefectus urbis)：奥古斯都恢复的一个古旧官职，一般由一位前任执政官担任。城市长官负责罗马城的行政管理，并指挥3个城市大队。

元首国 (Principate)：现代学者为奥古斯都创立的政权取的名字，意思是一位元首 (princeps) 的统治。有时元首被称为皇帝，但这不是非常准确。

元首 (princeps)：元首是第一公民，也是元老院、人民和国家的领导人。奥古斯都更愿意用这个词来指他自己的地位。在过去，元老名录上的第一人是首席元老 (princeps senatus)，由监察官选出，是元老院威望最高、最受尊重的成员。元首这个词本身并不意味着拥有此头衔的人拥有特定权力，而只是代表人们对他的景仰和尊重。

青年元首 (Princeps iuventutis, 复数为principes iuventutis)：盖乌斯·恺撒得到了一个新设立的头衔“青年元首”，后来他的弟弟卢基乌斯也被授予这个头衔。他们还成为骑士阶层象征意义上的领袖。

演讲台 (Rostra)：罗马广场上供演讲的高台。尤利乌斯·恺撒计划对议政厅和周边地区重新规划，以便将罗马广场与他的新广场连接起来。奥古斯都对演讲台做了改造，在罗马广场的另一端建造了一座新的演讲台，靠近神圣尤利乌斯神庙。演讲台装饰着俘虏的敌船的冲角，由此得名。

财务官 (Quaestor)：财务官是一种行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财政方面的，可以作为执政官级别总督的副手，常担任从属性的军事指挥官。

选举围场 (Saepta)：战神广场上的选举区域，不同的人民大会在此举行选举。尤利乌斯·恺撒开始了改造选举围场的工程，后由阿格里帕完成。

蝎弩 (Scorpion)： 罗马军队在野战和攻城战中使用的一种较轻的大型弩。蝎弩射程较大，精准度很高，能够穿透任何形式的铠甲。

世纪节 (ludi saeculares)： 奥古斯都于前17年庆祝了这个节日。一个世纪据说比人的寿命要长。

元老院终极议决 (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 元老院的终极法令，要求行政长官尽一切努力保卫国家。前63年元老院以此镇压喀提林，前49年反对尤利乌斯·恺撒，最后一次使用是前19年镇压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

旗手 (Signifer)： 扛着百人队军旗 (signum) 的旗手。

苏布拉 (Subura)： 苏布拉是维米那勒山和埃斯奎里努斯山之间的谷地，因狭窄街道和贫民区而臭名昭著。

塔兰同 (Talent)： 塔兰同是希腊的一个重量和货币单位，规格差别相当大，从约57磅到83磅不等。史料中很少能明确说明它们使用这个单位时用的是哪一种标准。

龟阵 (Testudo)： 罗马军团士兵的一种著名阵形，士兵们将自己的长盾重叠起来，保护自己的前方、两侧和头顶。这种阵形一般在攻击敌人防御工事时使用。

司库阶层 (Tribuni aerarii)： 人口普查登记的低于骑士阶层的群体。对这个群体我们了解较少。

军事保民官 (Tribunus militum)： 共和国的每个军团有6名军事保民官，他们要么是选举产生的，要么是被任命的。任何时间都由其中两人执掌指挥权。在奥古斯都时代，每个军团仍然有6名军事保民官，但其中一人是元老身份，将来会从政，地位最高。这名军事保民

官被称为“宽带军事保民官”（tribunus laticlavus），得名自他胸甲一圈宽条纹。他是军团的二把手，仅次于军团长。另外五名“窄带军事保民官”（tribuni angusticlavii）的条纹较窄，是骑士身份，一般在此之前曾担任一个辅助大队的指挥官。

平民保民官（Tribune of the plebs）：每年选举产生10名平民保民官，拥有政治权力而没有军事职责，可以就任何问题立法。在共和国晚期，许多有野心的将军，比如马略、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都借助保民官的帮助，为自己获取重要的职位。奥古斯都被授予了平民保民官一职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权力。

保民官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平民保民官的权力，包括召集元老院开会和向公民大会提交法案的权力。奥古斯都被授予这种权力。后来阿格里帕和提比略也得到了保民官权力。

凯旋式（Triumph）：元老院授权的大型庆祝活动，以嘉奖得胜的将领。形式为沿着圣道（罗马城举行庆典的主要道路）游行，展示得胜将领获得的战利品和战俘，最后高潮是在仪式中处决被俘的敌酋。得胜将领乘坐一辆战车，打扮得如朱庇特神像一般，一名奴隶将象征胜利的花冠举在他头顶。这名奴隶应当不断小声提醒将军，他纵然获得这般荣耀，也不过是凡人而已。

三头同盟（Triumvir）：前43年，平民大会通过了一位保民官提出的《提提乌斯法》，任命安东尼、李必达和屋大维为“恢复国家秩序”的三人理事会（triumviri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三头同盟被授予独裁官的权力，起初任期被规定为五年。

城市大队（Urban cohorts）：奥古斯都为罗马城组建了3个城市大队，作为准军事的警察部队。他们的指挥官是城市长官（praefectus urbis）。奥古斯都时期可能还组建了第4个大队，以保

卫高卢卢格敦的帝国铸币厂。提比略在位时，这个大队肯定已经在卢格敦了。

方旗（vexillum）：一种方形旗帜，挂在旗杆上，用来标示将军的位置，也是一队士兵携带的旗帜。将军的方旗通常是红色的。

火警队（Vigiles）：奥古斯都于公元6年组建了7个大队，作为消防队和罗马城的夜间巡警。每个大队负责当时罗马城14个区域中的2个。

主要人物

阿格里皮娜（约前14～公元33年）：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女儿。她嫁给了日耳曼尼库斯，生了五个孩子。日耳曼尼库斯于公元19年去世，她受到提比略的猜疑。她和两个儿子在流亡期间死去。

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约前63～前12年）：阿格里帕是奥古斯都交情最深的朋友和最忠诚、最能干的副手。奥古斯都得知尤利乌斯·恺撒遇刺的消息时，阿格里帕就在他身边。阿格里帕的高明本领在战胜塞克斯图斯·庞培和安东尼的胜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也是一位非常高效的行政管理者和建筑工程主持者。前21年，他娶了丧夫的尤利娅，和她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不断晋升，成为元首的同僚。

阿提娅（？～前43年）：尤利乌斯·恺撒的姐姐尤利娅和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的女儿。她嫁给了盖乌斯·屋大维，生了奥古斯都。丧夫之后，她嫁给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普斯。奥古斯都第一次成为执政官（此时他仅有十九岁）之后不久，阿提娅去世了。

提图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约前106～前32年）：西塞罗的终身好友和通信伙伴。他始终是骑士身份，没有从政，但仍然与共和国的几乎所有显贵都保持友好关系。他也和奥古斯都通信。他的女儿嫁给了阿格里帕。阿提库斯意识到自己身患绝症，便自杀了。

奥古斯都（前63～公元14年）：原名盖乌斯·屋大维，后更名为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和恺撒·奥古斯都。他是尤利乌斯·恺撒的甥孙，在内战中得胜，成为共和国的唯一主人。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约前85～前41年）：他的父亲在前78年和李必达的父亲一起被处决。他的母亲是塞维利娅，尤利乌斯·恺撒的长期情人。前49年内战爆发时，他被认为是元老院最有前途的青年之一。他在法萨卢斯战役中对抗尤利乌斯·恺撒，但得到宽恕，并被任命为裁判官。但他仍然领导“解放者”（即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密谋者群体），后来在腓立比战败自杀。

盖乌斯·恺撒（前20～公元4年）：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长子，于前17年被奥古斯都收养，得到极大恩宠。前1年，他得到主要的行省指挥职位，但在公元3年负了重伤，于次年年初去世。

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约前85～前41年）：前53年，他担任克拉苏的财务官，在帕提亚的惨败中幸存。他也与尤利乌斯·恺撒对抗，但在法萨卢斯战役后投降，并被尤利乌斯·恺撒任命为裁判官。他和李必达都娶了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的妹妹。他和布鲁图斯一起领导“解放者”，但在第一次腓立比战役之后自杀。

卢基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约前108| 前106～前62年）：出身于历史悠久但后来比较衰败的贵族世家，喀提林绝望地追求高官职位，付出了高昂代价，最终企图发动政变，被西塞罗镇压。

小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前95～前46年）：加图是尤利乌斯·恺撒的不共戴天之敌，以严峻的美德闻名，宁愿自杀也不愿意接受他的仁慈。塞维利娅是他的同母异父姐姐，她的儿子布鲁图斯后来娶了加图孀居的女儿。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约前106～前43年）：西塞罗是他那一代人中最成功的新人之一，是罗马最优秀的演说家。前63年，他担任执政官，智胜喀提林，但后来因为自己行动的合法性问题遭到攻击。在内战中，他最终反对尤利乌斯·恺撒阵营，但后来得到宽恕。尤利乌斯·恺撒遇刺身亡之后，西塞罗鼓励“解放者”，然后企图利用奥古斯都来消灭安东尼。后三头同盟建立后，他成为政治清洗的第一批牺牲品之一。

克劳狄（前10～公元54年）：瘸腿且被怀疑头脑有问题，克劳狄被奥古斯都和李维娅阻拦在公共生活之外。直到克劳狄的侄子卡利古拉统治期间，他才担任官职。卡利古拉被谋杀后，克劳狄被禁卫军推举为元首。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约前70|前69～前30年）：统治以埃及为中心的马其顿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终其一生都是罗马人的忠实盟友。她的不幸在于，她生活的时代恰好是罗马共和国被内战分裂的时期，最后她与落败的马克·安东尼联系过于紧密。她发现奥古斯都不会允许她或她的孩子保留权力，便自杀了。

“富人”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约前115～前53年）：克拉苏以富有而闻名，所以得到绰号“富人”。他在苏拉麾下崭露头角，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前59年，他和庞培、尤利乌斯·恺撒一起组成了前三头同盟，并在前55年第二次担任执政官（同僚是庞培）。他主动向帕提亚人发起进攻，在卡莱受挫。在随后的撤退中，他被杀死，他的军队大部分遭到屠杀。

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前30年执政官，生卒不详）：富人克拉苏的孙子，在奥古斯都对抗安东尼时加入前者，后来在担任马其顿总督期间讨伐邻近的部族，赢得一连串胜利。他在前27年庆祝凯旋式，此后就从史册中消失，不过他的养子于前14年担任执政官。

德鲁苏斯（前38～前9年）：李维娅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提比略·克劳狄·尼禄的次子。他得到快速晋升，在阿尔卑斯山作战赢得军事荣耀，然后在日耳曼作战，最远打到易北河。他娶了安东尼娅（屋大维娅和马克·安东尼的女儿），生了三个孩子，包括日耳曼尼库斯和克劳狄。德鲁苏斯于前9年因坠马负伤而死。

小德鲁苏斯（前13～公元23年）：提比略和维普撒尼娅的儿子，李维娅的孙子。公元4年，提比略被奥古斯都收养，于是小德鲁苏斯成了奥古斯都的孙子。

富尔维娅（？～前40年）：马克·安东尼的妻子，和他生了两个儿子，安提勒斯和尤卢斯。在与安东尼结婚前，她已经结过两次婚，两任丈夫都不幸惨死。马克·安东尼起初不情愿地支持卢基乌斯·安东尼失败的叛乱，后来与她断绝关系，据说她不久之后就死了。

日耳曼尼库斯（前15～公元19年）：德鲁苏斯和安东尼娅的儿子，颇得民心。公元6年潘诺尼亚叛乱和公元9年日耳曼叛乱之后，他开始获得越来越重要的指挥职务。他于公元19年去世，死状非常可疑。

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前65～前8年）：一位成功释奴的儿子，受过良好教育，在腓立比战役中为“解放者”而战。几年后他成为梅塞纳斯文人圈子的一员，认识了奥古斯都。奥古斯都赠给贺拉斯一座昂贵的庄园，让他能够专注于写作。奥古斯都还想聘请他为秘书，被他谢绝，不过两人仍然维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尤利娅：尤利乌斯·恺撒的姐姐、奥古斯都的外祖母。她嫁给了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和他生了一个女儿阿提娅。

尤利娅，奥古斯都的女儿（前39～公元14年）：奥古斯都的独生女。奥古斯都利用她来巩固自己与主要支持者的联盟，将她先后嫁给马凯鲁斯、阿格里帕和提比略。她和阿格里帕生了五个孩子，但和提比略只有一个流产的孩子。她与提比略婚姻关系的恶化促使提比略退隐到罗得岛。前2年，她因通奸罪受到谴责，被父亲流放。

尤利娅，奥古斯都的外孙女（约前19～公元28年）：尤利娅和阿格里帕的女儿，也被指控犯有通奸罪，于公元8年被流放。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前100～前44年）：尤利乌斯·恺撒出身于前1世纪比较默默无闻的贵族家庭，政治生涯的早期总的来讲还是循规蹈矩的。前59年，他担任执政官，与庞培和克拉苏秘密结盟，即今天所谓的前三头同盟。在高卢征战十年屡战屡胜之后，他在内战中击败庞培，成为独裁官。他先前的支持者和被他宽恕的敌人组成密谋集团，将他刺杀。

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约前86～前13| 前12年）：他的父亲是一位执政官，在前78年企图发动政变。内战期间，李必达支持尤利乌斯·恺撒，逐渐得到提升，于前44年得到骑兵统帅的高位。因此他掌握了很多军队，在独裁官被刺杀后占据了强有力的地位。但在随后的岁月里，他的士兵并不热情地支持他。他与马克·安东尼和奥古斯都组成后三头同盟，但后来他的权力逐渐萎缩，于前36年遭到镇压，余生几乎处于被软禁状态。

李维娅·德鲁茜拉（约前58～公元29年）：从前38年到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她一直是奥古斯都的妻子。他们只有一个流产的孩子。但她在前一段婚姻中生的两个儿子，提比略和德鲁苏斯，在政界发挥了重要作用，都作为军事统帅赢得了荣誉。提比略、卡利古拉、克劳狄和尼禄这四位皇帝都是李维娅的后代。奥古斯都在世时，她常在公共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奥古斯都重要的幕后谋士。

李维（提图斯·李维乌斯，约前59～公元17年，或前64～公元12年）：奥古斯都时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创作了142卷罗马史，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和道德教诲，从罗马建城一直讲到前9年德鲁苏斯去世。他的著作只有一小部分保存至今，其余部分只有简略概述存世。奥古斯都开玩笑地批评他是庞培派，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李维敌视新政权。在很多方面，他都歌颂了元首所珍视的那些美德。

卢基乌斯·安东尼（约前80？～前40|前39年）：马克·安东尼的两个弟弟之一，于前41年起兵反叛奥古斯都，在佩鲁西亚被击败。他得到赦免，被派往西班牙当总督，但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卢基乌斯·恺撒（前17～公元2年）：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次子，被奥古斯都收养，和兄长盖乌斯一样得到极大恩宠。公元2年，他被派往西班牙，途中在马西利亚病逝。

盖乌斯·梅塞纳斯（约前63～前8年）：奥古斯都的长期挚友和支持者，一直是骑士，没有担任过官职。即便如此，有好几次他是罗马的实际领导者，在政坛发挥了核心作用，尤其是在后三头同盟时代。后来他继续辅佐奥古斯都，并结交了许多作家，包括诗人贺拉斯和维吉尔。

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前42～前23年）：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和前任执政官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的儿子，得到元首的极大恩宠，后来突然去世。

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普斯（生卒不详，前56年执政官，最后一次在史料中出现是前43年）：阿提娅的第二任丈夫，奥古斯都的继父，似乎在奥古斯都政治生涯初期帮助过他。

盖乌斯·马略（约前157～前87年）：尤利乌斯·恺撒的姑父，是一位新人，后成为当时最有名的罗马军事统帅，史无前例地连续五次担任执政官。但他与苏拉的竞争导致了内战，在夺取罗马几天后去世。

马克·安东尼（前86|前83～前30年）：一个非常成功的贵族世家成员，父亲去世时给他留下大量债务，他自己也很快债台高筑。在高卢战争的最后几年里，他为尤利乌斯·恺撒效力，后来在内战中也支持他。安东尼于前44年担任执政官，因此在尤利乌斯·恺撒遇刺后处于有权有势的地位。他和奥古斯都的关系开始时就很恶劣，但在互相冲突了一段时间之后联手，并与李必达一起组成了后三头同盟。他们一同打败了“解放者”，但安东尼后来远征帕提亚失败，他的地位遭到了致命性的打击。而他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私情损害了他在罗马的形象。前31年，他在亚克兴角战败，于次年自杀。

屋大维娅（约前69～前11年）：奥古斯都的姐姐，先嫁给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后改嫁马克·安东尼，以便巩固弟弟与安东尼的联盟。她在第一段婚姻中生了一个儿子马凯鲁斯，在第二段婚姻中生了两个女儿，大安东尼娅和小安东尼娅。

盖乌斯·屋大维（？～前59年）：奥古斯都的父亲，出身于富裕的骑士家庭，是家族里第一个到罗马从政的成员。他于前61年当选裁判官，并成功担任马其顿总督，但在回家途中死在位于诺拉的别墅。

奥维德（普布利乌斯·奥维德乌斯·纳索，前43～公元17年）：属于比维吉尔和贺拉斯更年轻的一代人，所以没有参加过内战。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元首国的和平环境中创作的。他的风格远远不像老一代诗人那样尊重传统，他的《爱的艺术》尤其令奥古斯都不悦。公元8年，他卷入了小尤利娅的丑闻，被放逐到黑海。

伟大的格奈乌斯·庞培（前106～前48年）：庞培是他所在时代最著名的罗马将军，在苏拉麾下飞黄腾达。他辉煌的政治生涯打破了几乎所有规矩。前50年代，他担任西班牙各行省总督，却留在罗马城外，派遣他的军团长去治理行省。在内战中，他与尤利乌斯·恺撒对抗，于前48年在法萨卢斯战败，不久之后在埃及被谋杀。

塞克斯图斯·庞培·马格努斯·皮乌斯（约前67～前36年）：伟大的庞培的幼子，在尤利乌斯·恺撒遇刺前不久招兵买马，准备与他对抗，但后来才成为一支真正强大的力量。他占据了西西里岛，将其作为自己的基地，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得以封锁意大利并营救逃避政治清洗的流亡者。虽然赢得了一些海战，但他最终被奥古斯都及其支持者打败。

波斯图穆斯·阿格里帕（前12～公元14年）：阿格里帕和尤利娅最小的孩子，之所以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是在父亲死后才出生的。在他于公元4年被奥古斯都收养之前，公众很少注意到他。即便被收养之后，他也没有得到任何官职，几年后被边缘化和流放。奥古斯都去世之后不久，他就被谋杀，但幕后指使者的身份不详。

斯克利博尼娅（公元16年之后去世）：奥古斯都的妻子，尤利娅的母亲，陪伴女儿一同流亡。

提图斯·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生卒不详，前37年和前26年执政官）：奥古斯都最忠诚可靠的下属之一，地位可能仅次于阿格里帕。他于前16年担任城市长官，但不久之后就从此史册中消失了，可能是去世了，

“幸运的”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前138～前78年）：出身于历史悠久但后来破落的贵族世家，苏拉于前88年率军进攻罗马，以武力夺权成功。随后他与马略的支持者和其他敌人打了一

场内战，自立为独裁官，并发明了“公敌宣告”手段，以便将谋杀对手的行为合法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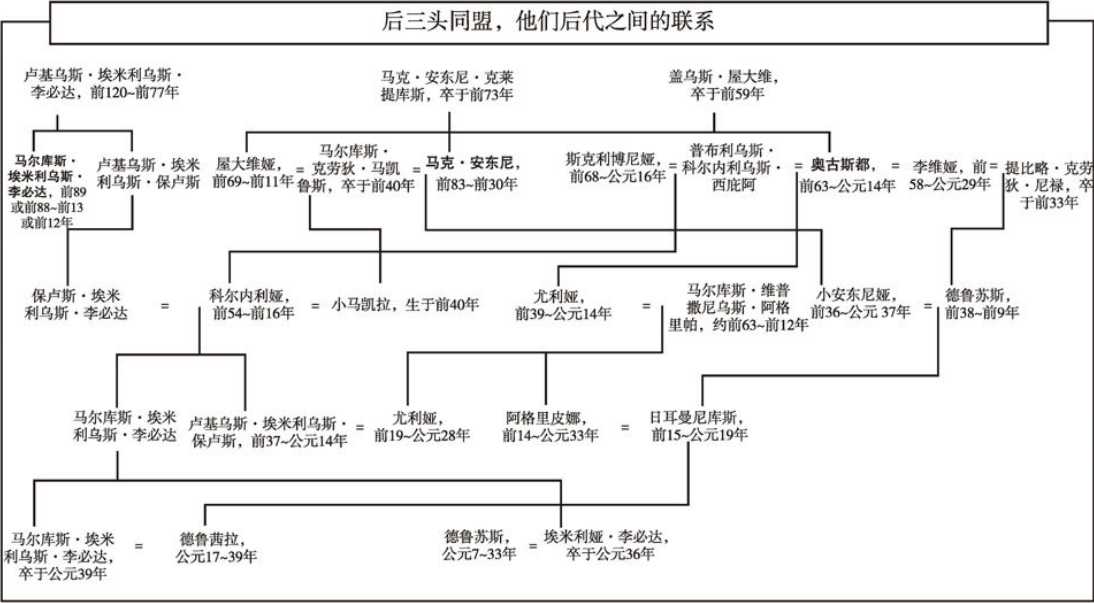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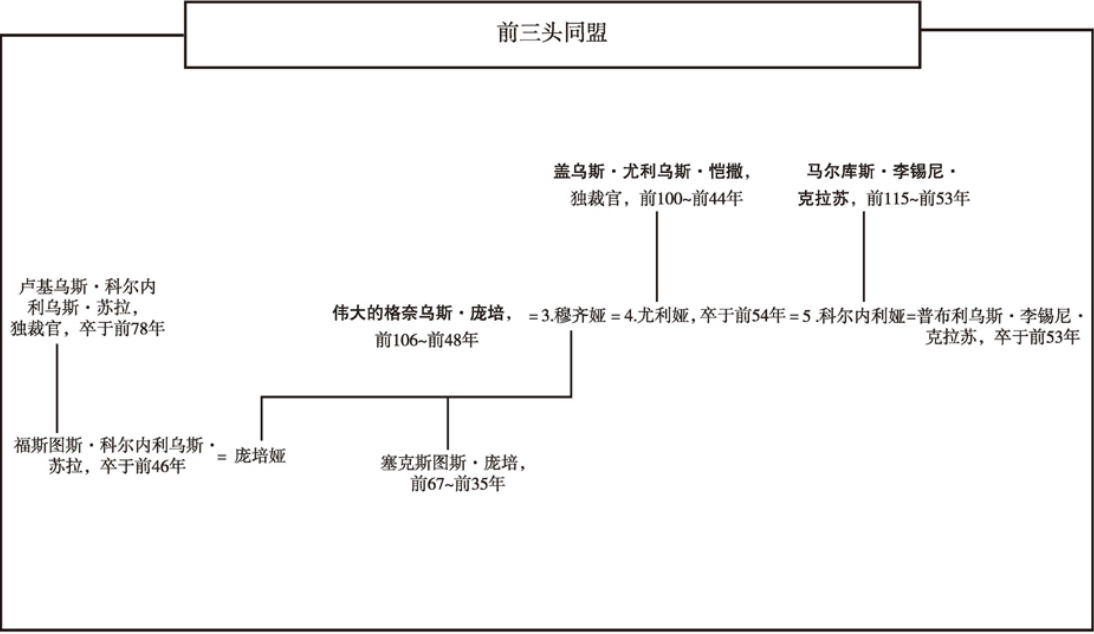
提比略（前42～公元37年）：李维娅和第一任丈夫提比略·克劳狄·尼禄的长子，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些重要官职和行省指挥职务。他最先娶了阿格里帕的女儿维普撒尼娅，后来与她离婚，以便与尤利娅结婚，但与尤利娅都非常不幸福。前6年，他自愿退隐到罗得岛，在随后十年里被排除在政坛之外。最后他被允许返回意大利，直到盖乌斯和卢基乌斯·恺撒去世之后，才被奥古斯都收养。随后几年里，他得到了与元首平起平坐的权力，于公元14年顺利继承了元首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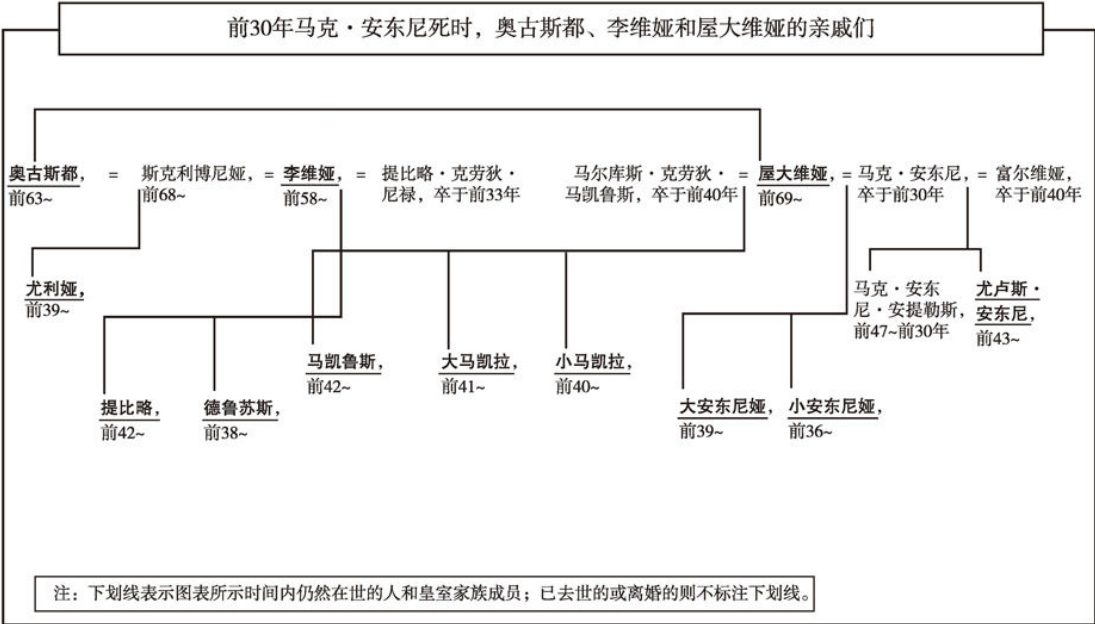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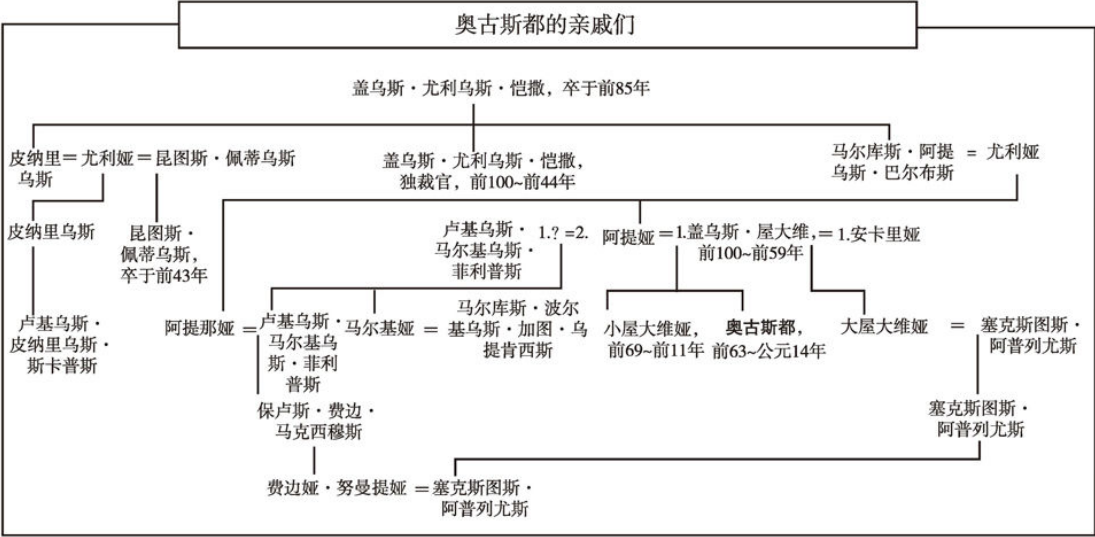
维普撒尼娅（前36～公元20年）：阿格里帕和庞贝尼娅（阿提库斯的女儿）的女儿，嫁给了提比略。提比略与她离婚，以便与尤利娅结婚，但据说后来非常后悔。维普撒尼娅之后改嫁一位元老，生了几个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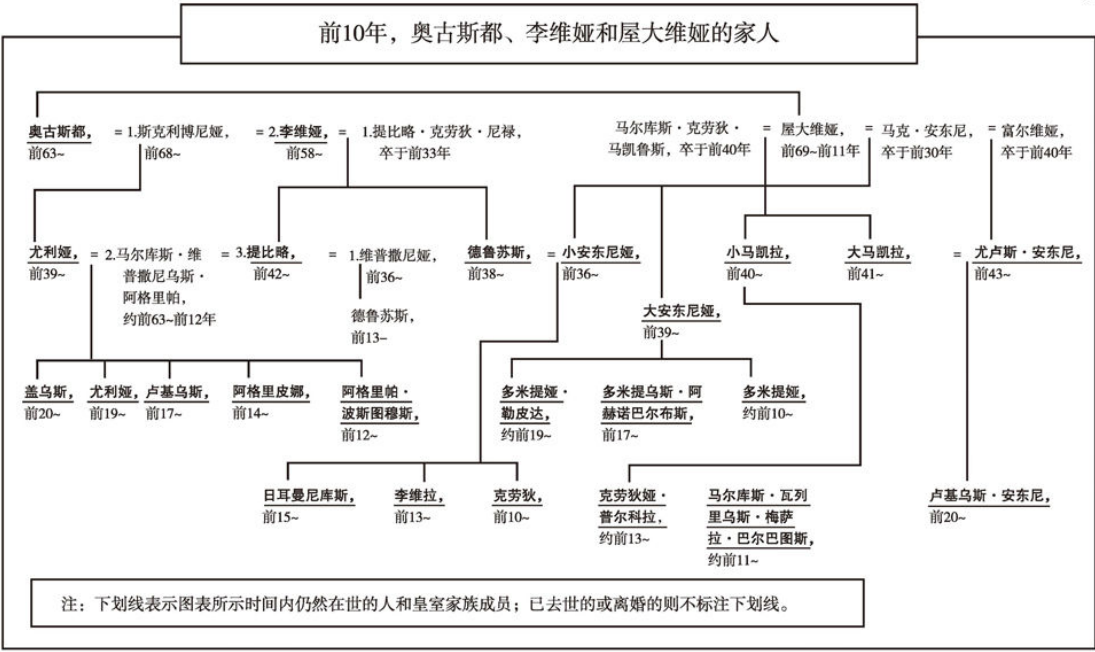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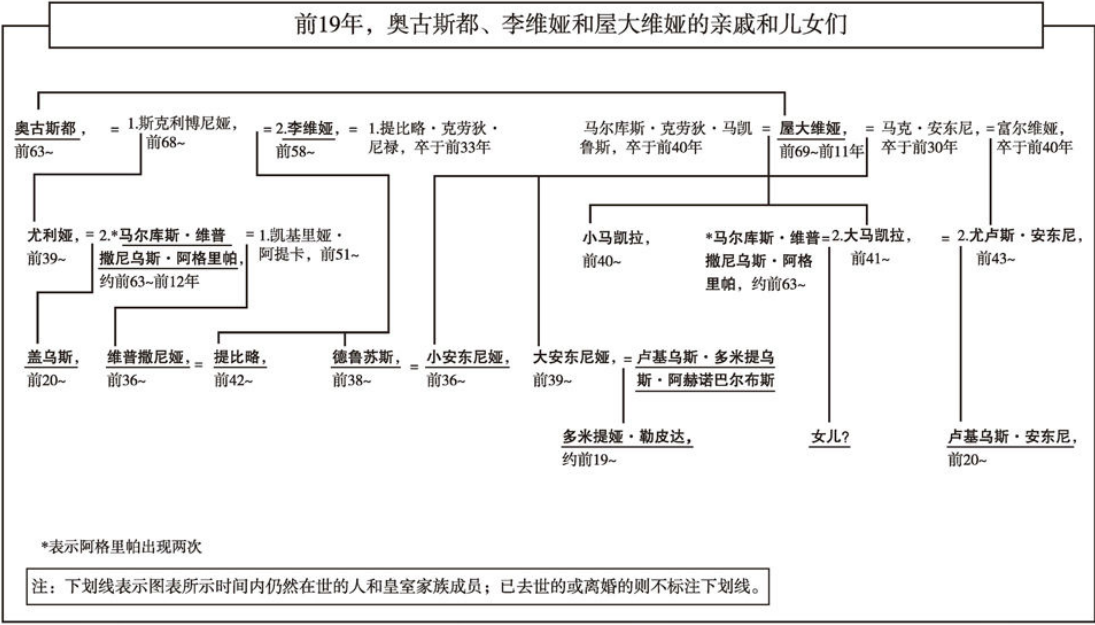
维吉尔（普布利乌斯·维吉利乌斯·马罗，前70～前19年）：虽然维吉尔在后三头同盟组织的没收土地行动中损失了一些土地，但后来成为梅塞纳斯和奥古斯都的朋友，创作了符合新政权口味的作品。他的《埃涅阿斯纪》在其去世时尚未完成，他希望将稿子毁掉，但奥古斯都命人整理了稿件，公开发表，作品得到了极大赞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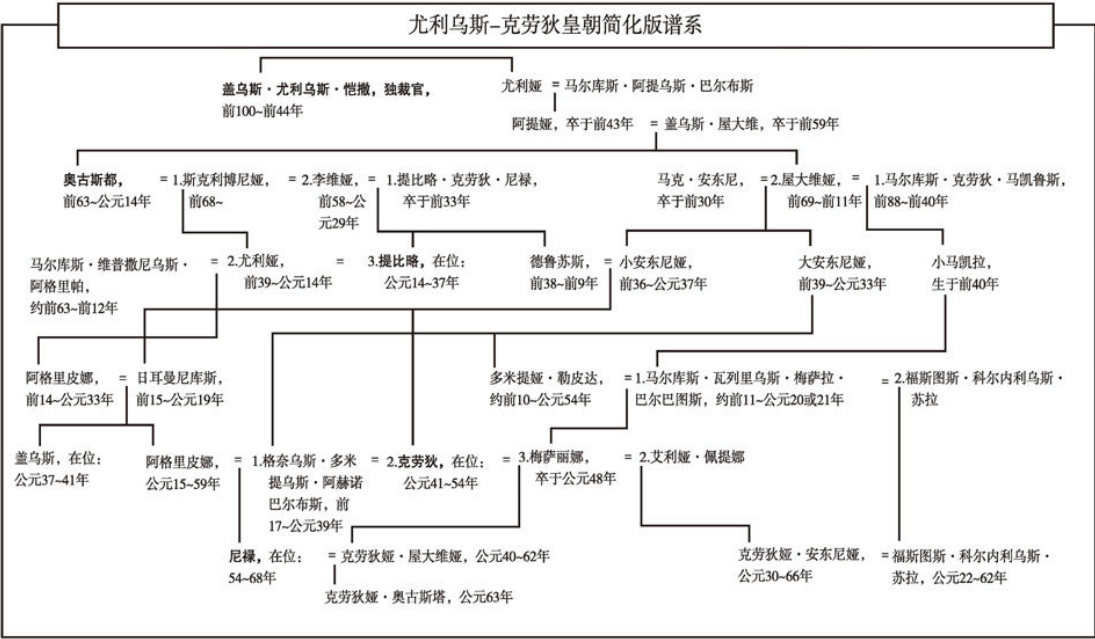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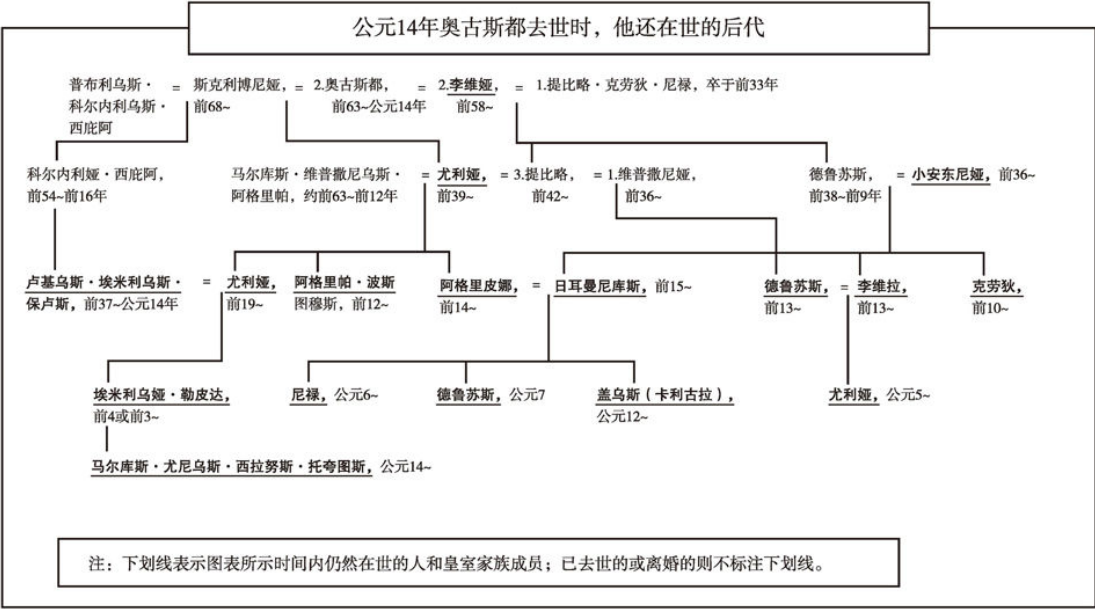
谱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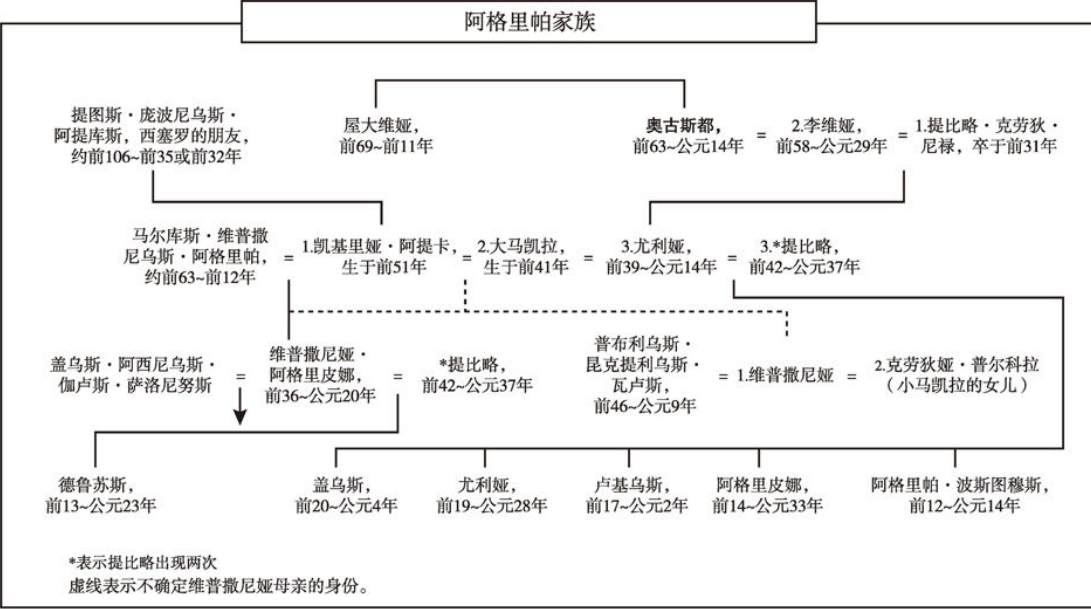
1. 前三头同盟
2. 后三头同盟，他们后代之间的联系
3. 奥古斯都的亲戚们
4. 前30年马克·安东尼死时，奥古斯都、李维娅和屋大维娅的亲戚们
5. 前19年，奥古斯都、李维娅和屋大维娅的亲戚和儿女们
6. 前10年，奥古斯都、李维娅和屋大维娅的家人
7. 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时，他还在世的后代
8. 尤利乌斯-克劳狄皇朝简化版谱系
9. 阿格里帕家族











参考文献

Adcock, F., *The Roman Art of War under the Republic* (1940)

Alföldy, G., *Noricum* (1974)

Badian, E., *Publicans and Sinners* (1972)

Badian, E., ‘“Crisis Theor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Principate’, in W. Wirth, *Romanitas and Christianitas* (1982), pp. 18–41

Balsdon, J., ‘Fabula Clodiana’, *Historia* 15 (1966), pp. 65–73

Barnes, T., ‘The victories of Augustus’, *JRS* 64 (1974), pp. 21–6

Barrett, A., *Caligula. The Corruption of Power* (1989)

Barrett, A.,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

Barton, T., ‘Augustus and Capricorn: Astrological polyvalency and imperial rhetoric’, *JRS* 85 (1995), pp. 33–51

Billows, R., 'The religious procession of the Ara Pacis Augustae: Augustus' *supplicatio* in 13 BC', *JRA* 6 (1993), pp. 80–92

Billows, R., *Julius Caesar. The Colossus of Rome* (2009)

Bingen, J., *Hellenistic Egypt: Monarchy, Society, Economy, Culture* (2007)

Birch, R., 'The Settlement of 26 June AD 4 and its Aftermath', *Classical Quarterly* 31 (1981), pp. 443–56

Boatright, M., 'The Pomerial extension of Augustus', *Historia* 35 (1986), pp. 13–27

Bowersock, G., *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 (1965)

Bowersock, G., 'Augustus and the East: The problem of succession', in Millar & Segal (1990), pp. 169–88

Bradley, K., 'Wet-nursing at Rome. A Study in Social Relations', in Rawson (1986), pp. 201–29

Brandon, C., 'Cement, concrete and settling barges at Sebastos: comparisons with other Roman harbour examples and the descriptions of Vitruvius', in A. Raban & K. Houm (eds), *Caesarea Maritima. A Retrospective after Two Millennia* (1996), pp. 25–40

Brunt, P.,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1971)

Brunt, P., 'The administrators of Roman Egypt' , *JRS* 65 (1975) , pp. 124-47

Brunt, P., 'Princeps and equites' , *JRS* 73 (1983) , pp. 42-75

Brunt, P., 'The role of the Senate in the Augustan regime' , *Classical Quarterly* 34. 2 (1984) , pp. 423-44

Camp, J., *The Archaeology of Athens* (2001)

Campbell, B., 'The marriage of soldiers under the Empire' , *JRS* 68 (1978) , pp. 153-66

Campbell, B., 'War and diplomacy: Rome and Parthia, 31 BC-AD 235' , in Rich & Shipley (1993) , pp. 213-40

Campbell, J., *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 31 BC-AD 235* (1984)

Carson, R., 'Caesar and the monarchy' , *Greece & Rome* 4 (1957) , pp. 46-53

Carter, J., *The Battle of Actium: The Rise and Triumph of Augustus Caesar* (1970)

Cartledge, P., 'The second thoughts of Augustus on the res publica in 28| 7 BC' , *Greece and Rome* 31 (1984) , pp. 30-40

Champlin, E., 'Tiberius and the Heavenly Twins' , *JRS* 101 (2011) , pp. 73-99

Chilver, G., 'Augustus and the Roman constitution 1939-1950', *Historia* 1 (1950), pp. 408-35

Christol, M., *Une Histoire Provinciale. La Gaule narbonnaise av. J.-C. au III^e siècle ap. J.-C.* (2010)

Clarke, J., 'Augustan domestic interiors: propaganda or fashion?' in Galinsky (2005), pp. 264-78

Collins, J., 'Caesar and the corruption of power', *Historia* 4 (1957), pp. 445-65

Conlin, D., *The Artists of the Ara Paci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reece and Rome* (1997)

Connolly, P., *Greece and Rome at War* (1981)

Cooley, M. (ed.), *The Age of Augustus. Lactor 17* (2003)

Corbett, J., 'The Succession policy of Augustus', *Latomus* 33 (1974), pp. 87-97

Crawford, M., *Roman Republican Coinage* (1974)

Crook, J., 'Some remarks on the Augustan Constitution', *Classical Review* 3 (1953), pp. 10-12

Cunliffe, B., *Greeks, Romans and Barbarians: Spheres of Interaction* (1988)

Curchin, L., *The Romanization of Central Spain. Complexity, Diversity and Change in a Provincial*

Hinterland (2004)

Delia, D. , ‘Fulvia Reconsidered’ , in S. Pomperoy (ed.) , *Women’ s History and Ancient History* (1991) , pp. 197–217

Dennison, M. , *Empress of Rome. The Life of Livia* (2010)

Derks, T. , *Gods, Temples and Ritual Practi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igions Ideas and Values in Roman Gaul* (1998)

Dixon, S. , *The Roman Mother* (1988)

Dowling, M. , *Clemency and Cruelty in the Roman World* (2006)

Drinkwater, J. , *Roman Gaul. The Three Provinces, 58 BC–AD 260* (1983)

Drinkwater, J. , ‘The Principate – lifebelt, or millstone around the neck of Empire? ’ , in O. Hekster, G. Kleijn & D. Slootjes (eds) , *Crises and the Roman Empire* (2007) , pp. 67–74

Durán Cabello, R. M. , ‘Edificios de espectáculo’ , in X. Raventós (ed.) , *Les capitales provinciales de Hispania 2. Merida: Colonia Augustua Emerita* (2004)

Dyson, S. , ‘Native Revolt Patterns in the Roman Empire’ ,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2.

3 (1975) , pp. 38-175

Dyson, S. , *The Creation of the Roman Frontier* (1985)

Dyson, S. , *Rome. A Living Portrait of an Ancient City* (2010)

Eck, W. , ‘Senatorial Self-Representation: Developments in the Augustan Period’ , in Millar & Segal (eds) (1990) , pp. 129-67

Eck, W. , *The Age of Augustus* (2003)

Edmondson, J. (ed.) , *Augustus* (2009)

Ehrenberg, V. & Jones, A. ,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Reigns of Augustus and Tiberius* (2nd edn, 1975)

Everitt, A. , *Cicero. A Turbulent Life* (2001)

Everitt, A. , *Augustus: The Life of Rome’ s First Emperor* (2006)

Fantham, E. , *Julia Augusti, the Emperor’ s Daughter* (2006)

Ferrary, J. , ‘The powers of Augustus’ , in Edmondson (2009) , pp. 90-136

Ferrill, A. , ‘Prosopography and the Last Years of Augustus’ , *Historia* 20 (1971) , pp. 718-31

Ferrill, A., 'Augustus and his daughter: a modern myth', in C. Deroux (ed.), *Studies in Latin Literature and Roman History* 2 (1980), pp. 332-46

Feugère, M. (ed.), *L'Équipement Militaire et L'Armement de la République, Journal of Roman Military Equipment Studies* 8 (1997)

Finley, M. I. (ed.), *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 (1976)

Fishwick, D., *The Imperial Cult in the Latin West: Studies in the Ruler Cult of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Vol. 3 (2002)

Flory, M., 'Abducta Neroni Uxor: The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on the marriage of Octavian and Liv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8 (1988), pp. 343-59

Flower, H., 'The tradition of the spolia opima: M. Claudius Marcellus and Augustus', *Classical Antiquity* 19 (2000), pp. 34-64

Franzen, P., 'The Augustan legionary fortress at Nijmegen. Legionary and auxiliary soldiers', in A. Morillo, N. Hanel & E. Martín, *Limes XX: 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 Roman Frontier Studies. Anejos de Gladius* 13 Vol. 1 (2009), pp. 1257-69

Gabba, E., 'The Perusine War and Triumviral Italy',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75 (1971), pp. 139-60

Gabba, E. (trans. P. Cuff) , *The Roman Republic, the Army and the Allies* (1976)

Galinsky, K. , *Augustan Culture* (1996)

Galinsky, K. (ed.) ,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Augustus* (2005)

Galinsky, K. , *Augustus.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of an Emperor* (2012)

Gardner, J. , ‘The Dictator’ , in Griffin (2009) , pp. 57–71

Garnsey, P. ,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Responses to Risk and Crisis* (1988)

Gelzer, M. (trans. P. Needham) , *Caesar. Politician and Statesman* (1968)

Goldsworthy, A. , *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1996)

Goldsworthy, A. , ‘ “Instinctive genius” : the depiction of Caesar the general’ , in Welch & Powell (1998) , pp. 193–219

Goldsworthy, A. , *In the Name of Rome* (2004)

Goldsworthy, A. , *The Complete Roman Army* (2004)

Goldsworthy, A. , *Caesar: 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

- Goldsworthy, A. , *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
- Goudineau, C. , *César et la Gaule* (1995)
- Gowers, E. , ‘Augustus and “Syracuse” ’ , *JRS* 100 (2010) , pp. 69–87
- Grant, M. , *Cleopatra* (1972)
- Green, P. , *Alexander to Actium: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 (1990)
- Greenhalgh, P. , *Pompey: The Roman Alexander* (1980)
- Griffin, J. , ‘Augustus and the poets: “Caesar qui cogere posset” ’ , in Millar & Segal (1990) , pp. 189–218
- Griffin, M. , ‘The Elder Seneca and Spain’ , *JRS* 62 (1972) , pp. 1–19
- Griffin, M. (ed.) , *A Companion to Julius Caesar* (2009)
- Grimal, P. (trans. A. Train) , *Love in Ancient Rome* (1986)
- Gruen, E. , *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74)
- Gruen, E. , ‘Cleopatra in Rome. Fact and Fantasies’ , in D. Braund & C. Gill (eds) , *Myths, History and Culture in Republican Rome: Studies in honour of T. P. Wiseman* (2003) , pp. 257–74

Gruen, E. , ‘Caesar as a politician’ , in
Griffin (2009) , pp. 23–36

Gwynn, A. , *Roman Education* (1926)

Hallett, J. , ‘Perusinae Glandes and the Changing Image
of Augustus’ , *American Journal of Ancient History*
2 (1977) , pp. 151–71

Harmand, J. , *L’ armée et le soldat à Rome de 107 à 50
avant nôtre ère* (Paris, 1967)

Harrington, D. , ‘The Battle of Actium – a study in
historiography’ , *Ancient World* 9. 1–2 (1984) , pp. 59–64

Hölbl, G. (trans. T. Saavedra) , *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 (2001)

Holder, P. , *The Auxilia from Augustus to Trajan* (1980)

Holland, R. , *Augustus. Godfather of Europe* (2004)

Huzar, E. , ‘Mark Antony: Marriages vs. careers’ , *The
Classical Journal* 81 (1985| 6) , pp. 97–111

James, S. , *Rome and the Sword. How Warriors and Weapons
Shaped Roman History* (2011)

Johnson, J. , ‘The authenticity and validity of Antony’ s
will’ , *L’ Antiquité Classique* 47 (1978) , pp. 494–503

Jones, A. , ‘The *Imperium* of Augustus’ , *JRS* 41 (1951) , pp. 112–19

Jones, A. , ‘The elections under Augustus’ , *JRS* 45 (1955) , pp. 9–21

Jones, R. , ‘The Roman Military Occupation of North-West Spain’ , *JRS* 66 (1976) , pp. 45–66

Kennedy, D. (ed.) , *The Roman Army in the East.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ements* 18 (1996)

Kennedy, D. , ‘Parthia and Rome: eastern perspectives’ , in Kennedy (1996) , pp. 67–90

Keppie, L. , *Colonisation and Veteran Settlement in Italy: 47–14 BC* (1983)

Keppie, L. , *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

Keppie, L. , ‘A centurion of legio Martia at Padova?’ , *Journal of Roman Military Equipment Studies* 2 (1991) , pp. 115–21 = L. Keppie, *Legions and Veterans: Roman Army Papers 1971–2000* (2000) , pp. 68–74

King, D. , *The Elgin Marbles* (2006)

Kos, M. , *Appian and Illyricum* (2005)

Lacey, W. , ‘Summi Fastigii Vocabulum: The story of a title’ , *JRS* 69 (1979) , pp. 28–34

Lacey, W. , *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

Lange, C. , *Res Publica Constituta. Actium, 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 (2009)

Lange, C. , ‘The Battle of Actium: A reconsideration’ , *Classical Quarterly* 61. 2 (2011) , pp. 608–23

Last, H. , ‘Imperium Maius: A note’ , *JRS* 37 (1947) , pp. 157–64

Le Bohec, Y. , *The Imperial Roman Army* (1994)

Leon, E. , ‘Scribonia and her daughters’ ,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82 (1951) , pp. 168–75

Levick, B. , ‘Abdication and Agrippa Postumus’ , *Historia* 21 (1972) , pp. 674–97

Levick, B. , ‘Julians and Claudians’ , *Greece and Rome* 22 (1975) , pp. 29–38

Levick, B. , *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

Levick, B. , *Augustus. Image and Substance* (2010)

Lewis, N. Reinhold, M. (eds) , *Roman Civilization. Selected Readings* Vol. 1: *The Republic and the Augustan Age* (3rd edn, 1990)

Liebeschuetz, J., 'The settlement of 27 BC' , in C. Deroux, *Studies in Latin Literature and Roman History* (2008) , pp. 345-65

Linderski, J., 'Aphrodisias and the *Res Gestae*: The *Genera Militiae* and the Status of Octavian' , *JRS* 74 (1984) , pp. 74-80

Lintott, A., 'Electoral bribery in the Roman Republic' , *JRS* 80 (1990) , pp. 1-16

Lintott, A.,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99)

Lintott, A., *Cicero as Evidence* (2008)

Lintott, A., 'The assassination' , in Griffin (2009) , pp. 72-82

Lo Cascio, E., 'The Size of the Roman Population: Beloch and the Meaning of the Augustan Census Figures' , *JRS* 84 (1994) , pp. 23-40

Lowe, B., *Roman Iberia.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2009)

Luce, T., 'Livy, Augustus, and the Forum Augustum' , in Edmondson (2009) , pp. 399-415

MacMullen, R., *Enemies of the Roman Order. Treason, Unrest and Alienation in the Empire* (1967)

MacMullen, R. , *Romanization in the Time of Augustus* (2000)

McNally, M. , *Teutoburg Forest AD 9. The Destruction of Varus and his Legions*. Osprey Campaign Series 228 (2011)

Magie, D. , ‘Augustus’ War in Spain (26-25 BC) ’ , *Classical Philology* 15 (1920) , pp. 323-39

Manley, J. , *AD 43 The Roman Invasion of Britain – A Reassessment* (2002)

Marrou, H. ,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1956)

Matyszak, P. , *Mithridates the Great. Rome’ s Indomitable Enemy* (2004)

Maxfield, V. , *The Military Decorations of the Roman Army* (1981)

Mayor, A. , *The Poison King* (2010)

Meier, C. (trans. D. McLintock) , *Caesar* (1996)

Mellor, R. , *Tacitus* (1993)

Mierse, W. , *Temples and Towns in Roman Iberia. The Social Dynamics of Sanctuary Designs from the Third Century BC to the Third Century AD* (1999)

Millar, F. , *A Study of Cassius Dio* (1964)

Millar, F., 'Triumvirate and Principate' , *JRS* 63 (1973) , pp. 50-67

Millar, F., *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 (1977)

Millar, F., 'Empire and City, Augustus to Julian: Obligations, excuses and status' , *JRS* 73 (1983) , pp. 76-96

Millar, F. & Segal, E. (eds) , *Caesar Augustus. Seven Aspects* (corrected paperback edn, 1990)

Millar, F., 'State and Subject: the impact of monarchy' , in Millar & Segal (1990) , pp. 37-60

Millar, F., *The Roman Near East 31 BC-AD 337* (1993)

Millar, F., *The Crowd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1998)

Mitchell, T., *Cicero: The Ascending Years* (1979)

Mitchell, T., *Cicero the Senior Statesman* (1991)

Morillo Cerdán, A., 'The Augustean Spanish Experience: The origin of the *limes* system?' , in A. Morillo, N. Hanel & E. Martín, *Limes XX: 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 Roman Frontier Studies. Anejos de Gladius* 13 Vol. 1 (2009) , pp. 239-51

Morrison, J. & Coates, J., *Greek and Roman Oared Warships* (1996)

Mouritsen, H. , *Plebs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2001)

Murdoch, A. , *Rome' s Greatest Defeat. Massacre in the Teutoburg Forest* (2006)

Nicolet, C. , 'Augustus, Government, and the Propertied Classes' , in Millar & Segal (1990) , pp. 89–128

North, J. , 'Caesar at the Lupercalia' , *JRS* 98 (2008) , pp. 144–60

Oorthuys, J. (ed.) , *The Varian Disaster: The 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 Ancient Warfare* special issue (2009)

Osgood, J. , *Caesar' 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aget, R. , 'The ancient ports of Cumae' , *JRS* 58 (1968) , pp. 152–69

Paget, R. , 'The Naval Battle of Cumae in 38 BC' , *Latomus* 29 (1970) , pp. 363–9

Parker, H. , *The Roman Legions* (1957)

Patterson, J. , 'The City of Rome Revisited: From Mid-Republic to Mid-Empire' , *JRS* 100 (2010) , pp. 210–32

Pelling, C. ,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1988)

Pelling, C. , *Plutarch and History* (2002)

Pitassi, M., *The Navies of Rome* (2009)

Platner, S. & Ashby, T., *A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1929)

Pollini, J., ‘Appuleii and Some Others on the Ara Pacis’ ,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90 (1986) , pp. 453–60

Potter, D., ‘Emperors, their borders and their neighbours: the scope of imperial *mandata*’ , in Kennedy (1996) , pp. 49–66

Powell, A., ‘ “An island amid the flame” : The Strategy and Imagery of Sextus Pompeius, 43–36 BC’ , in Powell & Welch (2002) , pp. 103–33

Powell, A. & Welch, K. (eds) , *Sextus Pompeius* (2002)

Powell, A., *Virgil the Partisan: A Study in the Re-integration of Classics* (2008)

Powell, L., *Eager for Glory. The Untold Story of Drusus the Elder, Conqueror of Germany* (2011)

Price, S., *Rituals and Power. The Roman Imperial Cult in Asia Minor* (1985)

Purcell, N., ‘Livia and the Womanhood of Rome’ ,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86) , pp. 78–105 = Edmondson (2009) , pp. 165–94

Queseda Sanz, F., ‘*Gladius hispaniensis*: an archaeological view from Iberia’ , *Journal of Roman Military Equipment Studies* 8 (1997) , pp. 251–70

Queseda Sanz, F., *Armas de la Antigua Iberia de Tartessos a Numancia* (2010)

Raaflaub, K. & Toher, M. (eds) , *Between Republic and Empire. Interpretations of Augustus and his Principate* (1990)

Raaflaub, K.,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Augustus’ military reforms’ , in Edmondson (2009) , pp. 203–28

Ramsay, J., ‘The Senate, Mark Antony, and Caesar’ s Legislative Legacy’ , *Classical Quarterly* 44 (1994) , pp. 130–45

Ramsay, J. & Licht, A., *The Comet of 44 BC and Caesar’ s Funeral Games* (1997)

Ramsay, J., ‘Did Mark Antony contemplate an alliance with his political enemies in July 44 B.C.E.? ’ , *Classical Philology* 96. 3 (2001) , pp. 253–68

Ramsay, J., ‘Mark Antony’ s Judiciary Reform and its revival under the Triumvirs’ , *JRS* 95 (2005) , pp.20–37

Ramsay, J., ‘The Proconsular Years: Politics at a Distance’ , in Griffin (2009) , pp. 37–56

Rawson, B. (ed.) , *The Family in Ancient Rome* (1986)

Rawson, B. (ed) , *Marriage, Divorce and Children in Ancient Rome* (1991)

Rawson, B. ,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Roman Italy* (2003)

Rawson, E. , ‘Caesar’ s Heritage: Hellenistic Kings and their Roman Equals’ , *JRS* 65 (1975) , pp. 148-59

Rawson, E. , ‘The Ciceronian Aristocracy and its properties’ , in Finley (ed.) (1976) , pp. 85-102

Rawson, E. ,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Roman Republic* (1985)

Rea, J. , ‘Lease of a Red Cow called Thayris’ ,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68 (1982) , pp. 277-82

Reinhold, M. , *Marcus Agrippa: A Biography* (1933)

Reynolds, J. , *Aphrodisias and Rome* (1982)

Ribera i Lacomba, A. & Calvo Galvez, M. , ‘La primera evidencia arqueológica de la destrucción de Valentia por Pompeyo’ ,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8 (1995) , pp.19-40

Rice, E. , *Cleopatra* (1999)

Rice Holmes, T. , *The Roman Republic* Vols 1-3 (1923-8)

Rice Holmes, T., *The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 (1928)

Rich, J., *Declaring War in the Roman Republic in the Period of Transmarine Expansion* (1976)

Rich, J. & Shipley, G. (eds) , *War and Society in the Roman World* (1993)

Rich, J., 'Augustus and the spolia opima' , *Chiron* 26 (1996) , pp. 85-127

Rich, J., 'The Parthian honours' ,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66 (1998) , pp.71-128

Rich, J., 'Augustus, War and Peace' , in Edmondson (2009) , pp. 137-64=L. de Blois, P. Erdkamp, O. Hekster, G. de Kleijn S. Mols (eds) , *The Representation and Perception of Roman Imperial Power: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Workshop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Impact of Empire (Roman Empire c.200 BC-AD 476)* . Netherlands Institute in Rome, 20-23 March 2002 (2003) , pp. 329-57

Rich, J., 'Cantabrian closure: Augustus' Spanish War and the ending of his memoirs' , in Smith & Powell (2009) , pp. 145-72

Richardson, J., 'The triumph, the praetors and the Senate in the early second century BC' , *JRS* 65 (1976) , pp. 50-63

Richardson, J., ‘*Imperium Romanum*: Empire and the Language of Power’ , *JRS* 81 (1991) , pp. 1–9

Richardson, J., *The Romans in Spain* (1996)

Richardson, J., *Augustan Rome 44 BC TO AD 14. The Restoration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mpire* (2012)

Richardson, P., *Herod. King of the Jews and Friend of the Romans* (1996)

Rickman, G., *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 (1980)

Rihll, T., ‘Lead Slingshot (*glandes*) ’ , *JRA* 22 (2009) , pp.149–69

Roddaz, J. M., *Marcus Agrippa* (1984)

Rogers, W., *Greek and Roman Naval Warfare* (1937)

Roller, D., *The Building Programme of Herod the Great* (1998)

Rose, C., ‘Princes and barbarians on the Ara Pacis’ ,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94 (1990) , pp. 453–67

Rosenstein, N., *Imperatores Victi* (1993)

Rost, A., ‘The Battle between Romans and Germans in Kalkriese: Interpreting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from an ancient battlefield’ , in A. Morillo, N. Hanel & E. *Martín*,

Limes XX: 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 Roman Frontier Studies. Anejos de Gladius 13 Vol.3 (2009) , pp. 1339–45

Roth, J. , *The Logistics of the Roman Army at War (264 BC–AD 235)* (1999)

Roymans, N. , *Tribal Societies in Northern Gaul: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Cingula* 12 (1990)

Saddington, D.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Auxiliary Forces from Caesar to Vespasian (49 BC–AD 79)* (1982)

Sailer, R. , ‘Anecdot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 *Greece and Rome* 27 (1980) , pp. 69–83

Salmon, E. , ‘The Evolution of Augustus’ Principate’ , *Historia* 5 (1956) , pp.456–78

Salway, B. , ‘What’ s in a name? A survey of Roman onomastic practice from 700 BC–AD 700’ , *JRS* 84 (1994) , pp.124–45

Scheid, J. , ‘To honour the Princeps and venerate the gods. Public cult, neighbourhood cults, and imperial cult in Augustan Rome’ , in Edmondson (2009) , pp. 275–99

Scheidel, W. , ‘Emperors, Aristocrats, and the Grim Reaper: Towards a 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Roman Elite’ , *Classical Quarterly* 49 (1999) , pp. 254–81

Schlüter, W., ‘The 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t Kalkriese near Osnabrück’ , in J. Creighton & R. Wilson, *Roman Germany. Studies in Cultur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ementary Series* 32 (1999) , pp. 125–59

Schürer, E., Vermes, G. & Millar, F.,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 1 (1973)

Scott, K.,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44–30 BC’ ,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1 (1933) , pp. 7–49

Seager, R., *Pompey the Great. A Political Biography* (2nd edn, 2002)

Seager, R., *Tiberius* (2005)

Shatzman, I., *Senatorial Wealth and Roman Politics. Collection Latomus* Vol. 142 (1975)

Sheppard, S., *Philippi 42 BC. The Death of the Roman Republic. Osprey Campaign Series* 199 (2008)

Sheppard, S., *Actium: Downfall of Antony and Cleopatra. Osprey Campaign Series* 211 (2009)

Sherk, R., *Roman Documents from the Greek East* (1969)

Sherwin-White, A., *Rom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st, 168 BC–AD 1* (1984)

Siani-Davies, M., 'Ptolemy XII Auletes and the Romans' , *Historia* 46 (1997) , pp. 306-40

Sidebotham, S., 'Aelius Gallus and Arabia' *Latomus* 45 (1986) , pp. 590-602

Simpson, C., 'The date of the dedication of the Temple of Mars Ultor' , *JRS* 67 (1977) , pp.91-4

Slater, W., 'Pueri, Turba Minuta' , i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21 (1974) , pp. 133-40

Smith, C. & Powell, A. (eds) , *The Lost Memoirs of August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Autobiography* (2009)

Smith, R., *Service in the Post-Marian Roman Army* (1958)

Spaul, J., *ALA²* (1994)

Spawforth, A., *Greece and the Augustan Cultural Revolution. Greek Culture in the Roman World* (2012)

Speidel, M., 'The Roman army in Judaea under the Procurators' , in M. Speidel, *Roman Army Studies* Vol. 2, Mayors (1992) , pp. 224-32

Stavely, E., 'The "Fasces" and "Imperium Maius" ' , *Historia* 12 (1963) , pp. 458-84

Stevenson, T., 'The ideal benefactor and the father analogy in Greek and Roman thought' , *Classical Quarterly* 42 (1992) , pp. 421-36

Stockton, D., 'Primus and Murena' , *Historia*
14 (1965) , pp. 18-40

Stockton, D., *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

Swan, M., 'The consular fasti of 23 BC and the
conspiracy of Varro Murena' ,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71 (1967) , pp. 235-47

Syme, R., 'Notes on the legions under Augustus' , *JRS*
23 (1933) , pp. 14-33

Syme, R., 'The Spanish War of Augustus' ,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55 (1934) , pp. 293-317

Syme, R., 'The Allegiance of Labienus' *JRS* 28 (1938) ,
pp. 113-25

Syme, R., *Tacitus* (2 vols, 1958)

Syme, R., 'Imperator Caesar: A study in imperial
nomenclature' , *Historia* 7 (1958) , pp. 172-88=*Roman Papers*
Vol. 1 (1979) , pp. 181-96

Syme, R., 'Livy and Augustus' ,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64 (1959) , pp. 27-87

Syme, R., *The Roman Revolution* (paperback edn, 1960)

Syme, R., *History in Ovid* (1978)

Syme, R. , ‘The conquest of North-West Spain’ , *Roman Papers* Vol. 2 (1979) , pp.825–54

Syme, R. , ‘Neglected children on the *Ara Pacis*’ ,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88 (1984) , pp. 583–9

Syme, R. , *The Augustan Aristocracy* (1986)

Talbert, R. , ‘Augustus and the Senate’ , *Greece and Rome* 31 (1984) , pp. 55–63

Tatum, W. , *The Patrician Tribune Publius Clodius Pulcher* (1999)

Taylor, L. Ross, *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 (1949)

Taylor, L. Ross, ‘The rise of Julius Caesar’ , *Greece and Rome* 4 (1957) , pp. 10–18

Taylor, L. Ross, *Roman Voting Assemblies: 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 (1966)

Taylor, L. Ross, ‘The dating of major legislation and elections in Caesar’ s first consulship’ , *Historia* 17 (1968) , pp.173–93

Tchernia, A. , ‘Italian wine in Gaul at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 in P.Garnsey, K. Hopkins & C. Whittaker (eds) , *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1983) , pp. 87–104

Todd, M. , *Roman Britain* (3rd edn, 1999)

Todd, M. , *The Early Germans* (2004)

Toher, M. , ‘Augustus and the Evolution of Roman Historiography’ , in Raaflaub & Toher (1990) , pp. 139–54

Torelli, M. , *Typology and Structure of Roman Historical Reliefs* (1982)

Treggiari, S. , *Roman Marriage* (1991)

Treggiari, S. , ‘Divorce Roman Style: How easy and frequent was it? ’ in Rawson (1991) , pp. 131–46

Trillmich, W. (trans. C. Nader) , *Colonia Augusta Emerita, Capital of Lusitania* in Edmondson (2009) , pp. 427–67

Tyldesley, J. , *Cleopatra. Last Queen of Egypt* (2009)

Tyrell, W. , ‘Labienus’ departure from Caesar in January 49 BC’ , *His-toria* 21 (1972) , pp. 424–40

Ullman, B. , ‘Cleopatra’ s pearls’ , *The Classical Journal* 52. 5 (Feb. 1957) , pp. 193–201

Veyne, P. (trans. B. Pearce) , *Bread and Circuses* (1992)

Wallace-Hadrill, A. , ‘Civilis Principis: between citizen and king’ , *JRS* 72 (1982) , pp. 32–48

Wallace-Hadrill, A. , ‘Image and authority in the coinage of Augustus’ , *JRS* 76 (1986) , pp. 66–87

Wallace-Hadrill, A., *Suetonius* (2nd edn, 1995)

Wallace-Hadrill, A., 'Family inheritance in the Augustan Marriage Laws' in Edmondson (2009), pp. 250-74=*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27 (1981), pp. 58-80

Ward, A., *Marcus Crassus and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1977)

Wardle, D., 'Valerius Maximus on the Domus Augusta, Augustus, and Tiberius', *Classical Quarterly* 50 (2000), pp. 479-93

Wardle, D., 'A perfect send-off: Suetonius and the dying art of Augustus (Suetonius Aug. 99)', *Mnemosyne* 60 (2007), pp. 443-63

Watson, G., *The Roman Soldier* (1985)

Webster, G., *The Roman Invasion of Britain* (rev. edn, 1993)

Weigel, R., *Lepidus. The Tarnished Triumvir* (1992)

Weinstock, S., *Divus Julius* (1971)

Welch, K. & Powell, A. (eds), *Julius Caesar as Artful Reporter: The War 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Instruments* (1998)

Welch, K., 'Sextus Pompeius and the *Res Publica* in 42-39 BC', in Powell & Welch (2002), pp. 31-63

Wells, C., *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An Examin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1972)

Wells, C., 'What' s new along the Lippe: Recent work in North Germany' , *Britannia* 29 (1998) , pp. 457–64

Wells, P., *The Barbarians Speak. How the Conquered Peoples Shaped the Roman Empire* (1999)

Wells, P., *The Battle that Stopped Rome* (2003)

White, L., 'Herod and the Jewish experience of Augustan rule' , in Galinsky (2005) , pp. 361–87

White, P., *Promised Verse. Poets in the Society of Augustan Rome* (1993)

Wiedermann, T.,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Ovid' s *Tristia* 2' , *Classical Quarterly* 25 (1975) , pp. 264–71

Wilbers-Rost, S., 'The site of the Varus Battle at Kalkriese. Recent Results from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 in A. Morillo, N. Hanel & E. Martín, *Limes XX: 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 Roman Frontier Studies. Anejos de Gladius* 13 Vol. 3 (2009) , pp. 1347–52

Williams, C., *Roman Homosexuality. Ideologies of Masculinit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1999)

Williams, G., 'Did Maecenas "Fall from favour" ? Augustan Literary Patronage' , in Raaflaub & Toher (1990) ,

pp. 258–75

Wiseman, T., ‘*Conspicui Postes Tectaque Digna Deo*: the public image of aristocratic and imperial houses in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Empire’ , in *L’ Urbs. Espace urbain et histoire* (1987) , pp. 393–413

Wiseman, T., ‘The House of Augustus and the Lupercal’ , *JRA* 22 (2009) , pp. 527–45

Wolters, R., *Die Schlacht im Teutoburger Wald* (2008)

Woolf, G., ‘Roman Peace’ , in Rich & Shipley (1993) , pp. 171–94

Yakobson, A., ‘*Petitio et Largitio*: 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the centuriate assembly of the Late Republic’ , *JRS* 8 (1992) , pp. 32–52

Yavetz, Z., *Plebs and Princeps* (1969)

Yavetz, Z., *Julius Caesar and his Public Image* (1983)

Yavetz, Z., ‘The *Res Gestae* and Augustus’ public image’ , in Millar & Segal (1990) , pp. 1–36

Yavetz, Z., ‘The personality of Augustus’ , in Raaflaub & Toher (1990) , pp. 21–41, 32

Zanker, P. (trans. A. Shapiro) , *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

Zink, S., 'Reconstructing the Palatine temple of Apollo: a case study in early Augustan temple design' , *JRA* 21 (2008) , pp. 47–63

Ziolkowski, J. & Putnam, J., *The Virgilian Tradition. The First Fifteen Hundred Years* (2008)

缩写词

Ampelius, *Lib. mem*=Lucius Ampellius, *Liber memorialis*

Appian, *BC*=Appian, *Civil Wars*

Appian, *Bell Hisp.*=Appian, *Spanish Wars*

Broughton, *MRR 2*=Broughton, T., & Patterson, M. (1951) ,
The Magistrates of the Roman Republic Vol. 2

Caesar, *BC*=Caesar, *The Civil Wars*

Caesar, *BG*=Caesar, *The Gallic Wars*

CAH² IX=Crook, J., Lintott, A., & Rawson, E. (eds) ,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2nd edn Vol. IX: *The Last Age of the Roman Republic*, 146-43 BC.

CAH² X=Bowman, A., Champlin, E., & Lintott, A. (eds) ,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2nd edn Vol. X: *The Augustan Empire*, 43 BC-AD 69.

Cicero, *ad Att.*=Cicero, *Letters to Atticus*

Cicero, *ad Fam.*=Cicero, *Letters to his Friends*

Cicero, *ad Quintum Fratrem*=Cicero, *Letters to his Brother Quintus*

Cicero, *Agr.*=Cicero, *Orationes de Lege Agraria*

Cicero, *Cat.*=Cicero, *Catilinarian Orations*

Cicero, *de reg. Alex F.*=Cicero, fragment from the *Oration Concerning the King of Alexandria*

Cicero, *Verrines*=Cicero, *Verrine Orations*

CIG=*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

CIL=*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Comp. Nic.=Fragment of Nicolaus of Damascus, *History*

De vir. Ill=the anonymous *de viris illustribus*

Dio=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Galen, *Comm. In Hipp. Epid.*, CMG=Kühn, C., *Galenus Medicus* (1821–33), supplemented by Diels, H. *et alii* (1918–)

Gellius, NA=Aulus Gellius, *Attic Nights*

ILLRP=Degrassi, A. (ed.) (1963–5), *Inscriptiones Latinae Liberae Rei Publicae*

ILS=Dessau, H. (1892–1916), *In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Josephus, *A*≠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Josephus, *B*≠Josephus, *The Jewish War*

JRA=*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JRS=*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Justin=Justinus, *Epitome*

Livy, *Pers.*=Livy, *Roman History. Periochae.*

OGIS=Dittenberger, W., *Orientis Graeci Inscriptiones Selectae* (1903-5) .

Pliny the Elder, *NH*=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Pliny the Younger, *Epistulae*=Pliny the Younger, *Letters*

Quintilian=Quintilian, *Training in Oratory*

Sallust, *Bell Cat.*=Sallust, *The Catilinarian War*

Sallust, *Bell Jug.*=Sallust, *The Jugurthine War*

Sallust, *Hist.*=Sallust, *Histories*

SEG.=Roussel, P., Tod, M., Ziebarth, E. & Hondius, J. (eds) , *Supple-mentum Epigraphicum Graecum* (1923-)

Serv.=Servius

Strabo, *Geog.*=Strabo, *Geography*

Tacitus, *Ann.*=Tacitus, *Annals*

Valerius Maximus=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oings and Sayings*

Velleius Paterculus=Velleius Paterculus, *Roman History*

译名对照表

Achilles阿喀琉斯

Actian Arch亚克兴凯旋门

Actian Games亚克兴竞技场

Actium, Battle of亚克兴角战役

Aedui tribe埃杜依部落

Aeneas埃涅阿斯

Aeneid《埃涅阿斯纪》

aerariummilitare军事国库

Agrippa, Marcus Vipsanius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

Ahenobarbus, CnaeusDomitius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

Ahenobarbus, Lucius Domitius (cos.16 BC) 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前16年执政官）

Alba Longa阿尔巴朗格

Alesia阿莱西亚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Helios亚历山大·赫利俄斯

Alexandria亚历山大港

Aliso (Halter) 阿里索 (哈尔滕)

Allobroges阿洛布罗基人

Amatius (false Marius) 阿玛提乌斯 (假马略)

Amphipolis安菲波利斯

Antonia (the younger) 小安东尼娅

Antonia (the elder) 大安东尼娅

Antoninus, Iullus尤卢斯·安东尼

Antonius, Caius (brother of Mark Antony) 盖乌斯·安东尼
(马克·安东尼的弟弟)

Antonius, Caius (cos.63 BC) 盖乌斯·安东尼 (前63年执政官)

Antonius, Lucius卢基乌斯·安东尼

Antonius Creticus, Marcus马克·安东尼·克莱提库斯

Antyllus, Marcus Antonius马克·安东尼·安提勒斯

Aphrodisias阿佛洛狄西阿斯

Apollo阿波罗

Apollonia阿波罗尼亚

Appian阿庇安

Appian Way阿庇乌斯大道

Aqua Alsietina阿尔希提纳水道

Aqua Julia尤利乌斯高架渠

Aqua Virgo维尔戈水道

Aquileia阿奎莱亚

Aquitania阿基坦

Ara Pacis Augustae奥古斯都和平祭坛

Arabia Felix阿拉伯福地

Archelaus, King of Judaea阿奇劳斯，犹太国王

Ares (Mars) 阿瑞斯 (玛尔斯)

Areus (philosopher) 阿莱乌斯 (哲学家)

Argonauts阿尔戈英雄

Armenia亚美尼亚

Arminius阿米尼乌斯

Arsinoe阿尔西诺伊

Artaxias II , King of Aremnia阿尔塔夏二世，亚美尼亚国王

Astura阿斯图拉

Asturians阿斯图里亚斯人

Athenodorus阿提诺多罗斯

Atia阿提娅

Augusta Emerita (Mérida) 奥古斯塔·埃梅里塔（梅里达）

Baetica贝提卡

Baiae巴亚

Balbus, Lucius Cornelius 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

Balbus, Lucius Cornelius (the younger) 小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

Balbus, Marcus Atius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

Bassus, Publius Ventidius普布利乌斯·温提迪乌斯·巴苏斯

Bastarnae巴斯塔奈人

Bathyllus (actor) 巴绪卢（演员）

Belgica比利时

Beneventum 贝内文托

Berytus (Beirut) 贝里图斯 (贝鲁特)

Bessi 培西人

Bibulus, Marcus Calpurnius 马尔库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毕布路斯

Bithynia 比提尼亚

Bononia 波诺尼亚

Bovillae 博维莱

Brundisium 布隆迪西乌姆

Brutus, Decimus Junius 迪基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

Brutus, Marcus Junius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

Caepio, Fannius 范尼乌斯·凯皮欧

Caesar, Caius 盖乌斯·恺撒

Caesar, Lucius 卢基乌斯·恺撒

Caesar, Lucius Julius 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

Caesaraugusta (Zaragoza) 恺撒奥古斯塔 (萨拉戈萨)

Caesarea Maritima 恺撒利亚港

Caesarion 恺撒里昂

Calenus, Quintus Fufius昆图斯·弗费乌斯·卡雷努斯

Caligula, Emperor卡利古拉, 皇帝

Campus Martius战神广场

Candace, Queen of Ethiopia康达吉, 埃塞俄比亚女王

Canidius, Publius普布利乌斯·卡尼迪乌斯

Cantabrians坎塔布里亚人

Cape Mylae米莱角

Capito, Caius Ateius盖乌斯·阿泰乌斯·卡皮托

Capreae (Capri) 卡普里岛

Carinae卡里奈区

Carrhae, battle of (53 BC) 卡莱战役 (前53年)

Caryatids女像柱

Cassius Longinus, Gaius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

Catiline, Lucius Sergius卢基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

Catina (Catania) 卡提纳 (卡塔尼亚)

Cato the Elder老加图

Cato the Younger小加图

Catullus, Caius Valerius Catullus, Gaius Valerius盖乌斯·瓦列里乌斯·卡图卢斯

Catulus, Quintus Lutatius (cos.78 BC)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前78年执政官）

Catuvellauni卡图维劳尼人

Celtiberians凯尔特伊比利亚人

Censors监察官

Ceres刻瑞斯

Chatti卡蒂人

Chauci考契人

Cherusci切鲁西人

Cicero, Marcus Tullius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Cicero, Marcus Tullius (the younger) 小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Cicero, Quintus Tullius昆图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Cinna, Cnaeus Cornelius格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秦纳

Circus Flaminius弗拉米尼乌斯广场

Circus Maximus马克西穆斯广场

Claudia克劳狄娅

Claudia Pulchra克劳狄娅·普尔科拉

Claudius, Emperor克劳狄，皇帝

Cleopatra Selene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

Cloaca Maxima大下水道

Clodius Pulcher, Publius普布利乌斯·克劳狄·普尔喀

Concordia, shrines to和谐女神圣所

*consilium principis*元首御前会议

contubernales (‘tent-companions’) “帐篷伙伴”

Cornelia (Pompey’s wife) 科尔内利娅（庞培的妻子）

Cornelia (mother of the Gracchi) 科尔内利娅（格拉古兄弟的母亲）

*corona civica*橡叶冠

*corona navalis*海战金冠

Corsica科西嘉岛

Corvinus, Marcus Valerius Messalla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梅萨拉·考尔维努斯

Cossus, Cornelius科尔内利乌斯·考苏斯

Crassus, Marcus Licinius 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

Crispinus, Titus Quinctius 提图斯·昆克提乌斯·克里斯皮努斯

culpeus virtutis (‘shield of virtues’) 美德之盾

Cumae 库迈

Curia Julia (Senate House) 尤利乌斯议政厅 (元老院议政厅)

Cytheris (actress) 西塞莉丝 (演员)

Cyzicus 库济库斯

Dacia 达契亚

Dalmatians 达尔马提亚人

Deiotarus, King of Galatia 狄奥塔鲁斯, 加拉太国王

Deldo, King of the Bastarnae 巴斯塔奈人的国王戴尔多

Demosthenes 德摩斯梯尼

Diana 狄安娜

Dido, Queen of Carthage 狄多, 迦太基女王

Dio, Cassius 卡西乌斯·狄奥

Dioscuri, cult of 狄俄斯库里崇拜

Diribitorium 计票大厅

Dolabella, Publius Cornelius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

Domitian, Emperor 图密善皇帝

Drusus 德鲁苏斯

Drusus, Marcus Livius 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

Dyrrachium 狄拉奇乌姆

Ebro, River 埃布罗河

Ennius 恩纽斯

Ephesus 以弗所

Epirus 伊庇鲁斯

Ethiopians 埃塞俄比亚人

Euphrates, River 幼发拉底河

fascēs 法西斯束棒

Festival of Augustalia 奥古斯都节

festival of Lupercalia 牧神节

fetiales 国务祭司

Flaccus, Caius Norbanus 盖乌斯·诺巴努斯·弗拉库斯

Flaccus, Marcus Valerius 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

*Flamines*祭司

Flavus弗拉乌斯

Florus弗罗鲁斯

Forum Augustum奥古斯都广场

Forum Boarium屠牛广场

Forum Gallorum, Battle of高卢广场战役

Forum Julium尤利乌斯广场

Frisii弗里斯人

Fulvia富尔维娅

Gades (Cadiz) 加的斯

Galatia加拉太

Galilee加利利

Gallus, Marcus Aelius马尔库斯·艾利乌斯·伽卢斯

Gallus, Caius Asinius (cos. 8BC) 盖乌斯·阿西尼乌斯·伽卢斯 (前8年执政官)

Gallus, Caius Cornelius盖乌斯·科尔内利乌斯·伽卢斯

Gaul内高卢

Gallia Comata (‘Long-Haired Gaul’) 长发高卢

Gallia Narbonensis纳博讷高卢

Germanicus日耳曼尼库斯

Glaukon (sea god) 格劳科斯 (海神)

Gospel of Luke 《路加福音》

Gospel of Matthew 《马太福音》

Gracchus, Gaius Sempronius盖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

Gracchus, Sempronius (poet) 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 (诗人)

Gracchus, Tiberius Sempronius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

Graves, Robert 罗伯特·格雷夫斯

Gulf of Ambracia安布拉基亚湾

Gyaros, (Greek island renowned for its poverty) 伊亚罗斯 (以贫困出名的希腊小岛)

Hadrian, Emperor哈德良, 皇帝

Hall of Liberty自由大厅

Hannibal汉尼拔

harpax 哈尔帕克斯

Helvetii tribe 赫尔维蒂部落

Hercules 赫拉克勒斯

Herod the Great, King of Judaea 大希律王，犹太国王

Hirtius, Aulus 奥卢斯·希尔提乌斯

Homer 荷马

Horace 贺拉斯

Hortensia 霍尔腾西娅

Hortensius, Marcus 马尔库斯·霍尔腾西乌斯

House of Livia 李维娅府

Hyrcanus II, King of Judaea 赫卡努斯二世，犹太国王

Idumaeans 以东人

Iliad 《伊利亚特》

Ilithyia (goddess of childbirth) 厄勒梯亚（助产女神）

Illyria 伊利里亚

Illyricum 伊利里库姆

insulae (tenement blocks) 公寓楼

Isauria 伊苏利亚

Isis伊西斯

Janus Geminus雅努斯·格米努斯

Jerusalem耶路撒冷

Jesus耶稣

John the Baptist施洗约翰

Josephus约瑟夫斯

Judaea犹太

Julia (daughter of Agrippa and Julia) 尤利娅 (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女儿)

Julia (daughter of Augustus) 尤利娅 (奥古斯都的女儿)

Julia (grandmother of Augustus) 尤利娅 (奥古斯都的外祖母)

Julia (mother of Antony) 尤利娅 (安东尼的母亲)

Julia (wife of Cornelius Lentulus) 尤利娅 (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的妻子)

Julian, Emperor 尤利安, 皇帝

Julius Caesar 尤利乌斯·恺撒

Juno朱诺

Jupiter朱庇特

Jupiter Optimus Maximus至善至伟朱庇特

Kalkriese (near Osnabrück) 卡尔克里泽山（奥斯纳布吕克附近）

Knidos克尼多斯岛

La Tène culture拉登文化

La Turbie拉蒂尔比耶

Labeo, Marcus Antistius马尔库斯·安梯斯提乌斯·拉比奥

Labienus, Titus提图斯·拉比埃努斯

Lake Avernus阿维尔努斯湖

Lake Moeris摩里斯湖

*lares and penates*拉瑞斯和皮纳特斯

Largus, Valerius瓦列里乌斯·拉尔古斯

Latin拉丁文

*Legio V Alaudae*第五“云雀”军团

*Legio VI Victrix*第六“胜利”军团

*Ninth Hispana*第九“西班牙”军团

*Legio X Gemina*第十“孪生子”军团

*Legio XIII Gemina*第十三“孪生子”军团

*Legio XIV Gemina*第十四“孪生子”军团

*Legio Martia*玛尔斯军团

Lentulus, Publius Cornelius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

Lepidus, Marcus Aemilius the triumvir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后三头同盟之一）

Lepidus, Marcus Aemilius (father of the triumvir)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后三头同盟之一李必达的父亲）

Lesbos 莱斯博斯岛

lex Julia de adulteriis《尤利乌斯处置通奸法》

lex J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尤利乌斯婚姻法》

lex Papia Poppaea《帕皮乌斯与波派乌斯法》

Libo, Lucius Scribonius 卢基乌斯·斯克利博尼乌斯·利博

Licinus, Julius 尤利乌斯·李基努斯

Livia (Drusilla) 李维娅（德鲁茜拉）

Livilla 李维拉

Livy, Titus 提图斯·李维

Lollius, Marcus 马尔库斯·劳里乌斯

Londinium 伦蒂尼乌姆

Luca 卢卡

Lucan 卢坎

ludi Apollinares 阿波罗节

ludi Ceriales 刻瑞斯节

Lugdunum (Lyons) 卢格敦 (里昂)

lustratio (purification ceremony) 净化仪式

Macrobius 马克罗比乌斯

Maecenas, Caius 盖乌斯·梅塞纳斯

maiestas law 叛逆法

Manius 马尼乌斯

Marcella 马凯拉

Marcellus 马凯鲁斯

Marcellus, Marcus Claudius 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

Marcomanni 马科曼尼人

Mariamne, Queen of Judaea 米利暗, 犹太王后

Marius, Caius 盖乌斯·马略

Mark Antony (Marcus Antonius) 马克·安东尼

Mars 玛尔斯

Marsyas 马西亚斯

Martial 马提亚尔

Masada 马萨达

Massilia 马西利亚

Matius, Caius 盖乌斯·马提乌斯

Mausoleum of Augustus 奥古斯都陵墓

Mausolos, King 摩索拉斯国王

Maximus, Paullus Fabius 保卢斯·费边·马克西穆斯

Menas 梅纳斯

Mercury 墨丘利

Messalla Corvinus, Marcus Valerius 马尔库斯·梅萨拉·考尔
维努斯

Messana (Messina) 墨西拿

Metulus 梅图鲁斯

Miletus 米利都

Milo米罗

Minerva密涅瓦

Mithridates VI, King of Pontus米特里达梯六世，本都国王

Mount Vesuvius维苏威火山

Munda蒙达

Murena, Lucinius 李锡尼·穆里纳

Murena, Varro瓦罗·穆里纳

Musa, Antonius安东尼·穆萨

Mussolini, Benito贝尼托·墨索里尼

Mutina穆蒂纳

Mylae米莱

Naples那不勒斯

Narbo (Narbonne) 纳尔博 (纳博讷)

Naulochus瑙洛库斯

*naumachia Augusti*奥古斯都海战

Neptune尼普顿

Nero, Emperor尼禄，皇帝

Nero, Tiberius Claudius提比略·克劳狄·尼禄

Nerva, Lucius Coccius卢基乌斯·考基乌斯·涅尔瓦

Nicaea尼西亚

Nicolaus of Damascus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

Nicomedia尼科米底亚

Nijmegen奈梅亨

Nola诺拉

*Nomenclatores*指名者

Noricum 诺里库姆

Noviodunum (Nyons) 新堡 (尼永)

Numidia努米底亚

Octavia屋大维娅

Octavius, Caius (father of Augustus) 盖乌斯·屋大维 (奥古斯都的父亲)

Odrysae欧德律赛人

Odyssey 《奥德赛》

Olympic Games奥林匹克运动会

Oppius奥庇乌斯

Orosius 奥罗修斯

Ovid (Publius Ovidius Naso) 奥维德 (普布利乌斯·奥维德乌斯·纳索)

Ars Amatoria 《爱的艺术》

Oxyrhyncus 俄克喜林库斯

Panathenaic Games 泛雅典运动会

Pandateria (island) 潘达特里亚 (岛)

Pannonians 潘诺尼亚人

Panormus (Palermo) 潘诺姆斯 (巴勒莫)

Pansa, Caius Vibius 盖乌斯·威比乌斯·潘萨

Pantheon 万神殿

Paros 帕罗斯

Parthia 帕提亚

Paullus, Lucius Aemilius 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

Pedius, Quintus 昆图斯·佩蒂乌斯

Pergamum 帕加马

Persians 波斯人

Perusine War 佩鲁西亚战争

Petronius, Publius 普布利乌斯·佩特罗尼乌斯

Pharsalus, Battle 法萨卢斯战役

Philip II, King of Macedon 腓力二世, 马其顿国王

Philippi, Battle of 腓立比战役

Philippus, Lucius Marcius 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普斯

Phoebe (freedwoman) 福柏 (女释奴)

Phraates IV, King of Parthia 弗拉特斯四世, 帕提亚国王

pietas (piety) 虔敬

Pinarius, Lucius 卢基乌斯·皮纳里乌斯

Piso, Lucius Calpurnius 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

Planasia 普拉纳西亚

Plancus, Lucius Munatius 卢基乌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

Plebeian Games 平民竞技会

Pliny the Elder 老普林尼

Plutarch 普鲁塔克

Pollio, Caius Asinius 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

Pollio, Vedius 维迪乌斯·波利奥

Pompeius, Cnaeus 格奈乌斯·庞培

Pompeius, Sextus 塞克斯图斯·庞培

Pompey the Great “伟大的” 庞培

Pomponia 庞贝尼娅

pontifex maximus 祭司长

Porta Capena 第一大门

Porticus of Livia 李维娅门廊

Porticus of Octavia 屋大维娅门廊

Postumus, Agrippa 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

praefectus urbis 城市长官

praetors 裁判官

Primus, Marcus 马尔库斯·普里穆斯

princeps iuventutis 青年元首

Proculius, Caius 盖乌斯·普罗库雷乌斯

Propertius 普罗佩提乌斯

Proscriptions 政治清洗

Ptolemy XIII, King of Egypt 托勒密十三世，埃及国王

Ptolemy XIV, King of Egypt托勒密十四世，埃及国王

Ptolemy Philadelphus托勒密·费拉德尔甫斯

*Publicani*包税人

Puteoli普泰奥利

Pylades (actor) 皮拉得斯 (演员)

Quirinius, Publius Sulpicius (Cyrenius) 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奎里尼乌斯 (居里扭)

Res Gestae《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

Rhaeti赖提亚人

Rhea Silvia雷娅·西尔维亚

Rhegium瑞吉昂

Rhodes罗得岛

Rhone罗讷河

Roma (goddess) 罗马 (女神)

Romulus and Remus罗慕路斯和雷穆斯

Rubicon, River卢比孔河

Rufus, Marcus Egnatius马尔库斯·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

Rufus, Publius or Plautius普布利乌斯或普劳提乌斯·鲁弗斯

*Saepta*选举围场

Saepta Julia尤利乌斯围场

Sallust (Gaius SallustiusCrispus) 撒路斯提乌斯 (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

Salvidienus Rufus, Quintus昆图斯·萨尔维迪努斯·鲁弗斯

Samaritans撒马利亚人

Samos萨摩斯岛

Sardinia撒丁岛

Saturninus, Caius Sentius盖乌斯·桑提乌斯·萨图尔尼努斯

Sava, River萨瓦河

Scipio Nasica, Quintus Cornelius Metellus Pius昆图斯·科尔内利乌斯·梅特卢斯·皮乌斯·西庇阿·纳西卡

Scodra斯科多拉

Scribonia斯克利博尼娅

Scribonius斯克利博尼乌斯

Sebasteni赛巴斯托斯人

Secular Games (*ludi saeculares*) 世纪节

Segesta (Sisak) 塞杰斯塔 (锡萨克)

Segestes塞格斯特斯

Segimer西吉莫尔

Sejanus, Lucius Aelius卢基乌斯·艾利乌斯·塞扬努斯

Sempronia塞姆普罗尼娅

*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元老院终极议决

Servilia (mother of Brutus) 塞维利娅 (布鲁图斯的母亲)

Sestius, Lucius卢基乌斯·塞思提乌斯

Severus, Cassius卡西乌斯·塞维鲁

Shakespeare, William威廉·莎士比亚

Sicily西西里岛

Silanus, Caius盖乌斯·西拉努斯

Silanus, Decimus Junius迪基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

Sisenna, Cornelius科尔内利乌斯·希森纳

Social War同盟者战争

Sosius, Caius盖乌斯·索希乌斯

Sparta斯巴达

*Speculatores*侦察者

Sphaerus斯法埃鲁斯

*spolia opima*最高战利品

Strabo斯特拉波

SUEBI苏维汇人

Suetonius苏埃托尼乌斯

Sulla, Lucius the dictator卢基乌斯·苏拉，独裁官

Surrentum (Sorrento) 苏伦图姆（索伦托）

Sybilline Books 《西卜 林书》

Syme, Sir Ronald罗纳尔德·赛姆爵士

Syracuse叙拉古

Tacitus塔西佗

Tarentum (Taranto) 塔兰托

Tarragona今天的塔拉戈纳

Tauromenium陶罗梅尼乌姆

Taurus, Titus Statilius提图斯·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

Tellus大地母亲

Temple of Apollo Sosianus阿波罗·索希阿努斯神庙

Temple of Bellona战神庙

Temple of Castor and Pollux卡斯托耳与波鲁克斯神庙

Temple of Concord和谐女神庙

Temple of Fortuna Redux幸运返乡女神庙

Temple of Janus Geminus阴阳面雅诺神庙

Temple of Jupiter雅努斯·格米努斯神庙

Temple of Jupiter Feretrius誓言守护者朱庇特神庙

Temple of Mars Ultor复仇者玛尔斯神庙

Temple of Palatine Apollo帕拉丁阿波罗神庙

Temple of Quirinus奎里努斯神庙

Temple of the Divine Julius神圣尤利乌斯神庙

Temple of Venus Genetrix祖先维纳斯神庙

Temple of Vesta灶神庙

Tencteri滕科特利人

Terentia特伦提娅

Thapsus塔普苏斯

Theatre of Marcellus马凯鲁斯剧场

Theatre of Pompey 庞培剧场

Thetis 忒提斯

Thurii 图里

Tiber, River 台伯河

Tiberius, Emperor 提比略，皇帝

Tiridates 梯里达底

Titius (tribune) 提提乌斯 (保民官)

Titius, Marcus 马尔库斯·提提

Tomi 托米

Toranius, Caius 盖乌斯·托拉尼乌斯

Torone (‘ladle’) 托伦涅 (“长柄勺”)

Trajan, Emperor 图拉真，皇帝

Treaty of Misenum 《米西努姆条约》

Trebonius, Caius 盖乌斯·特雷博尼乌斯

trianomina 三名法

Trinovantes 特里诺文特人

Trojan Games 特洛伊竞技会

Tullia图利娅

tumultus (state of emergency) 紧急状态

Twelve Tables十二铜表法

Ubi tribe 乌比部落

Usipetes tribe乌西皮特部落

Valencia巴伦西亚

Valley of the Inn因河流域

Varius, Lucius卢基乌斯·瓦里乌斯

Varro, Marcus Terentius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

Varus, Publius Quinctilius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

Veii维爱

Velitrae韦莱特里

Velleius Paterculus, Caius格瓦斯·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

Ventidius Bassus, Publius普布利乌斯·温提迪乌斯·巴苏斯

Venus维纳斯

Vesta灶神

Vestal Virgins维斯塔贞女

Via Aemilia埃米利乌斯大道

Via Egnatia艾格纳提乌斯大道

Via Flaminia弗拉米乌斯大道

Via Sacra圣道

Victory (goddess) 胜利女神

*Vigiles*警备队

Vindelici温德利希人

Vinicius, Marcus马尔库斯·维尼基乌斯

Vipsania维普撒尼娅

Virgil维吉尔

Vitellius, Quintus昆图斯·维特里乌斯

Volsci伏尔西人

Vulcan武尔坎

Waal, River瓦尔河

Waldgirmes瓦尔德吉尔姆斯

Weser, River威悉河

Xanthus桑瑟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英）阿德里安·戈兹沃西（Adrian Goldsworthy）著；陆大鹏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9（2017.1重印）

书名原文：Augustus: From Revolutionary to Emperor

ISBN 978-7-5097-9244-5

I . ①奥… II . ①阿…②陆… III. ①奥古斯都（前63-14）-传记
IV. ①K835.46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5140号

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

著者|（英）阿德里安·戈兹沃西

译者|陆大鹏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周方茹 安莉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开本: 889mm×1194mm 1| 32

印张: 22.25 插页: 0.5 字数: 508千字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97-9244-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177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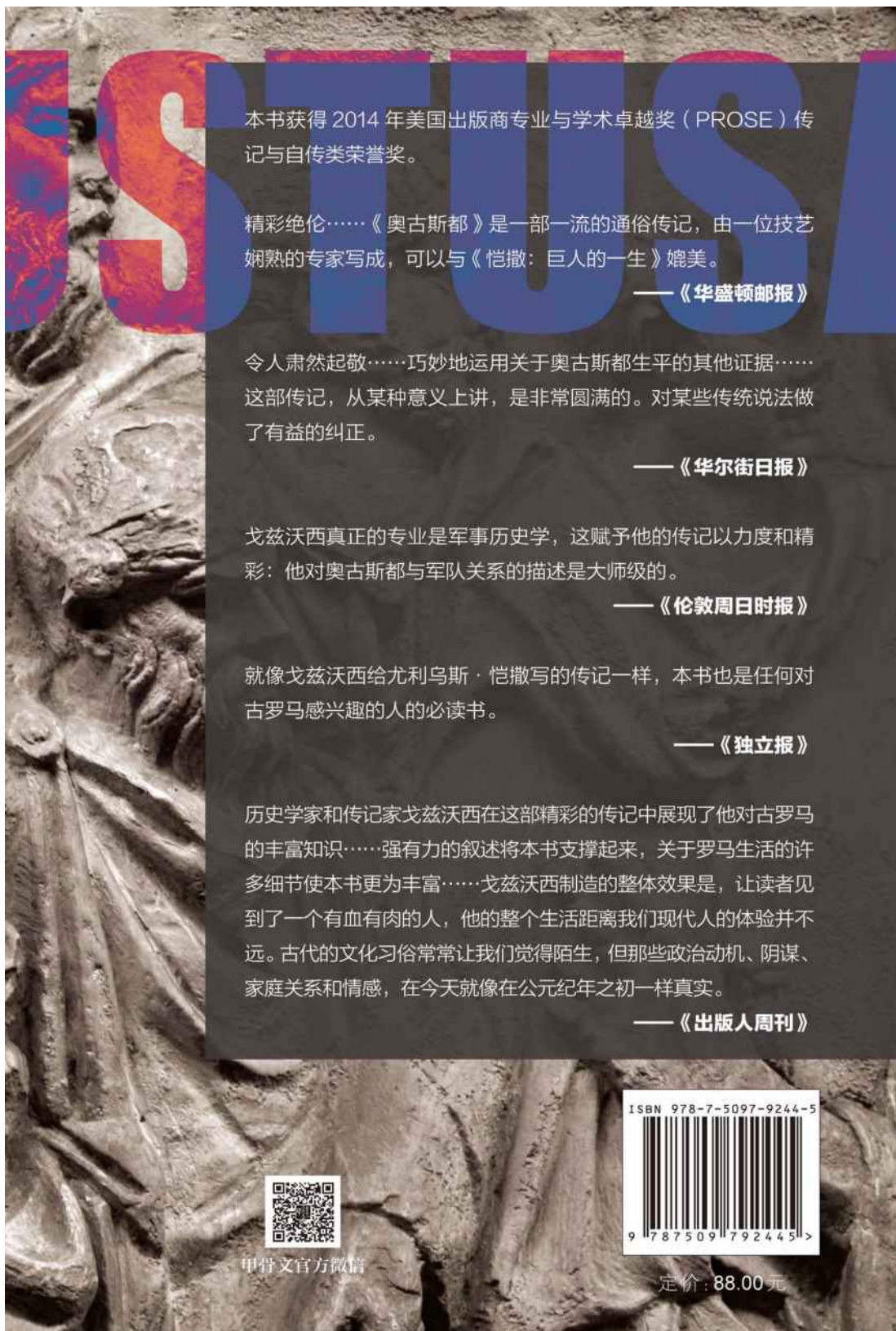
定价 8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UGU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 / 宋 涛



本书获得 2014 年美国出版商专业与学术卓越奖（PROSE）传记与自传类荣誉奖。

精彩绝伦……《奥古斯都》是一部一流的通俗传记，由一位技艺娴熟的专家写成，可以与《恺撒：巨人的一生》媲美。

——《华盛顿邮报》

令人肃然起敬……巧妙地运用关于奥古斯都生平的其他证据……这部传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非常圆满的。对某些传统说法做了有益的纠正。

——《华尔街日报》

戈兹沃西真正的专业是军事历史学，这赋予他的传记以力度和精彩：他对奥古斯都与军队关系的描述是大师级的。

——《伦敦周日时报》

就像戈兹沃西给尤利乌斯·恺撒写的传记一样，本书也是任何对古罗马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

——《独立报》

历史学家和传记家戈兹沃西在这部精彩的传记中展现了他对古罗马的丰富知识……强有力的叙述将本书支撑起来，关于罗马生活的许多细节使本书更为丰富……戈兹沃西制造的整体效果是，让读者见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的整个生活距离我们现代人的体验并不远。古代的文化习俗常常让我们觉得陌生，但那些政治动机、阴谋、家庭关系和情感，在今天就像在公元纪年之初一样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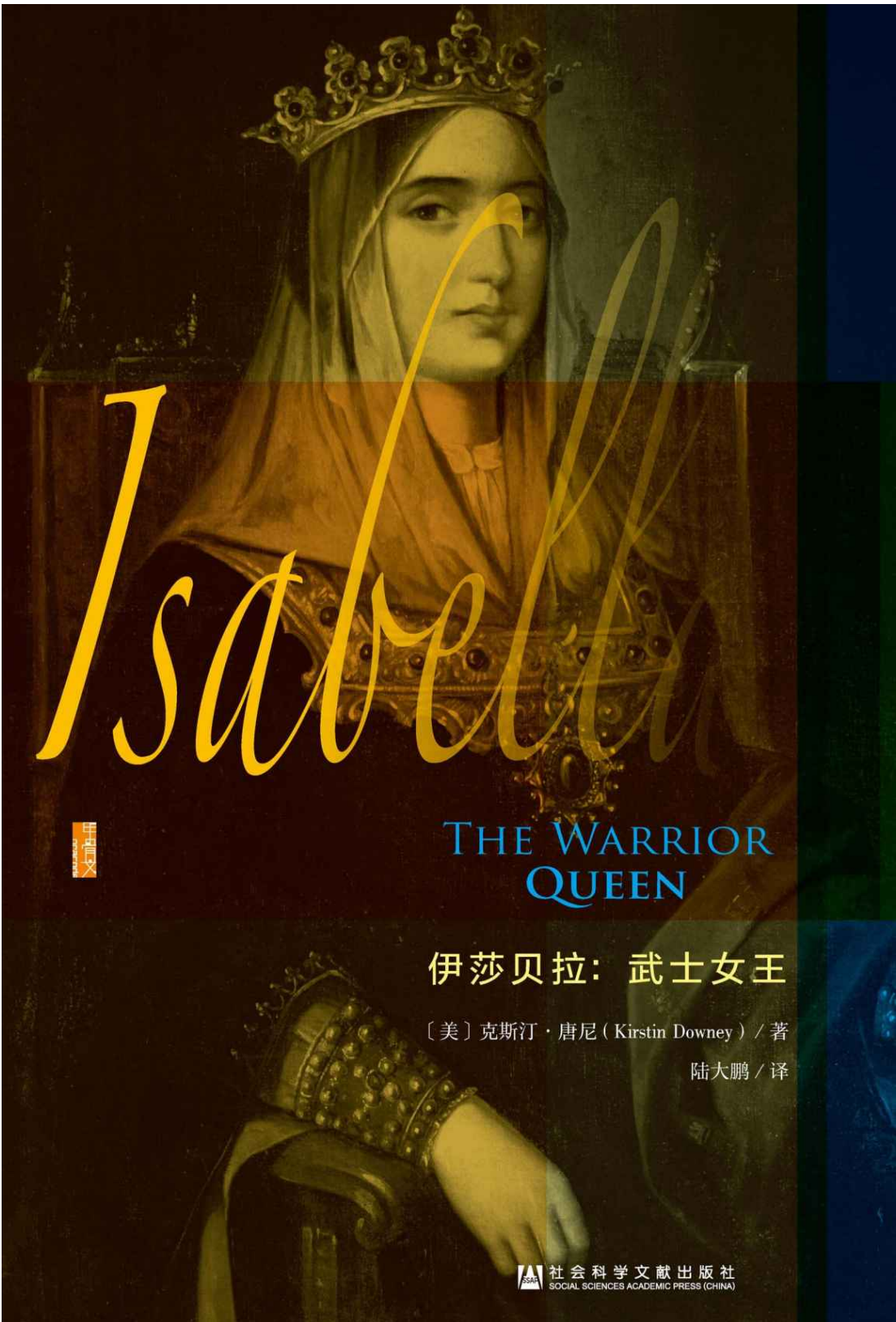
——《出版人周刊》



甲骨文官方微信



定价: 88.00 元

A detailed portrait of Isabella of Castile, the Warrior Queen, wearing a crown and a red and gold robe.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moody. The title 'Isabella' is written in a large, elegant, golden script across the center of the image.

Isabella

THE WARRIOR QUEEN

伊莎贝拉：武士女王

〔美〕克斯汀·唐尼 (Kirstin Downey) / 著

陆大鹏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克斯汀·唐尼 (Kirstin Downey)

著有《罗斯福新政背后的女性》，该书入选了 2009 年《洛杉矶时报》图书奖最终名单。她是《纽约时报》畅销书《经济危机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曾是《华盛顿邮报》雇员作者。2008 年，《华盛顿邮报》因对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唐尼对此亦有贡献。她是 2001 年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获得者。她的丈夫是尼尔·华纳·埃弗莱特，他们有五个孩子。

陆大鹏 / 译者

英德译者，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热爱一切 long ago 和 far away 的东西。代表译作“地中海史诗三部曲”以及《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等。豆瓣、新浪微博：陆大鹏 Hans。微信公号：ldphans

Isabella: The Warrior Queen

Copyright © 2014 by Kirstin Downey



THE WARRIOR QUEEN

伊莎贝拉：武士女王

〔美〕克斯汀·唐尼 (Kirstin Downey) / 著

陆大鹏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伊莎贝拉坐在圣母玛丽亚与圣婴脚下。我们相信这幅画创作于1520年，作者是伊莎贝拉最宠爱的宫廷画家米歇尔·西托。

Colegiata de Santa María la Mayor, Toro, Spain. (Album
Art Resource, NY)



阿雷瓦洛城堡。伊莎贝拉和弟弟阿方索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此处度过的，远离腐化的塞哥维亚宫廷。他们的同父异母兄长，“无能的”恩里克四世国王在塞哥维亚。

(Guillermo Pis Gonzales| Shutterstock.com)



拉莫塔要塞巍峨庄严的城堡，位于梅迪纳·德尔·坎波。伊莎贝拉童年在此度过了一些愉快的时光。后来她把切萨雷·博吉亚囚禁于此，打算以谋杀罪审判他。

(Marques| Shutterstock.com)



有城墙环绕的阿维拉城。贵族们在这里掀起了政变，推翻恩里克四世国王，以他的异母弟取而代之。

(Lukasz Janyst| Shutterstock.com)



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的雕版画像。她是伊莎贝拉最好的朋友。保存在马德里历史博物馆。

(Album| Art Resource, 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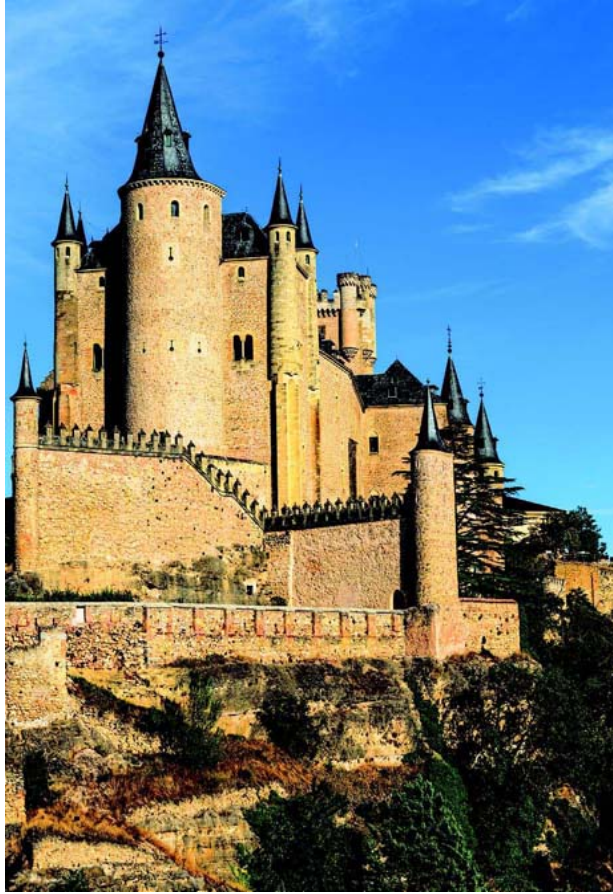
恩里克四世国王，伊莎贝拉的异母兄。塞哥维亚城堡的彩绘玻璃窗。

(Roberaten| Shutterstock.com)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伊莎贝拉终生的盟友和保护者。雕刻师为Salvador Amaya。

Parque histórico de Navalcarneo, Madrid. (Salvador Amaya)



恩里克四世国王在塞哥维亚的宫殿和要塞。伊莎贝拉在此地精心筹划了一场政变，为自己登基做准备。

(matthi | Shutterstoc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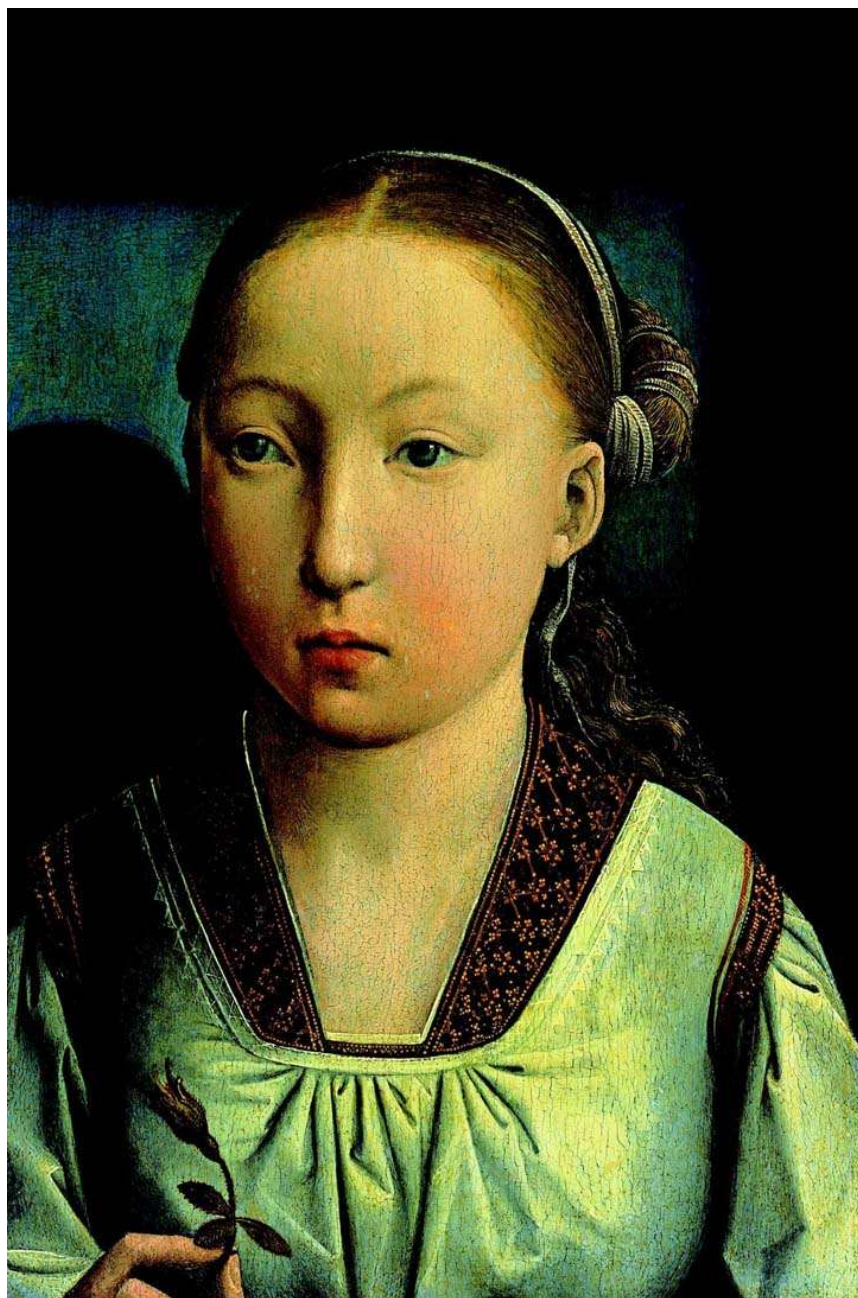
塞哥维亚城堡内的御座厅，伊莎贝拉的祖先（一直追溯到佩拉约，他被认为是8世纪开始了基督徒收复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先驱者）的雕像。

(Anton Ivanov| Shutterstock.com)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结婚画像。Madrigal del las Altas Torres, Augustinian convent, vila.

(Album| Art Resource, 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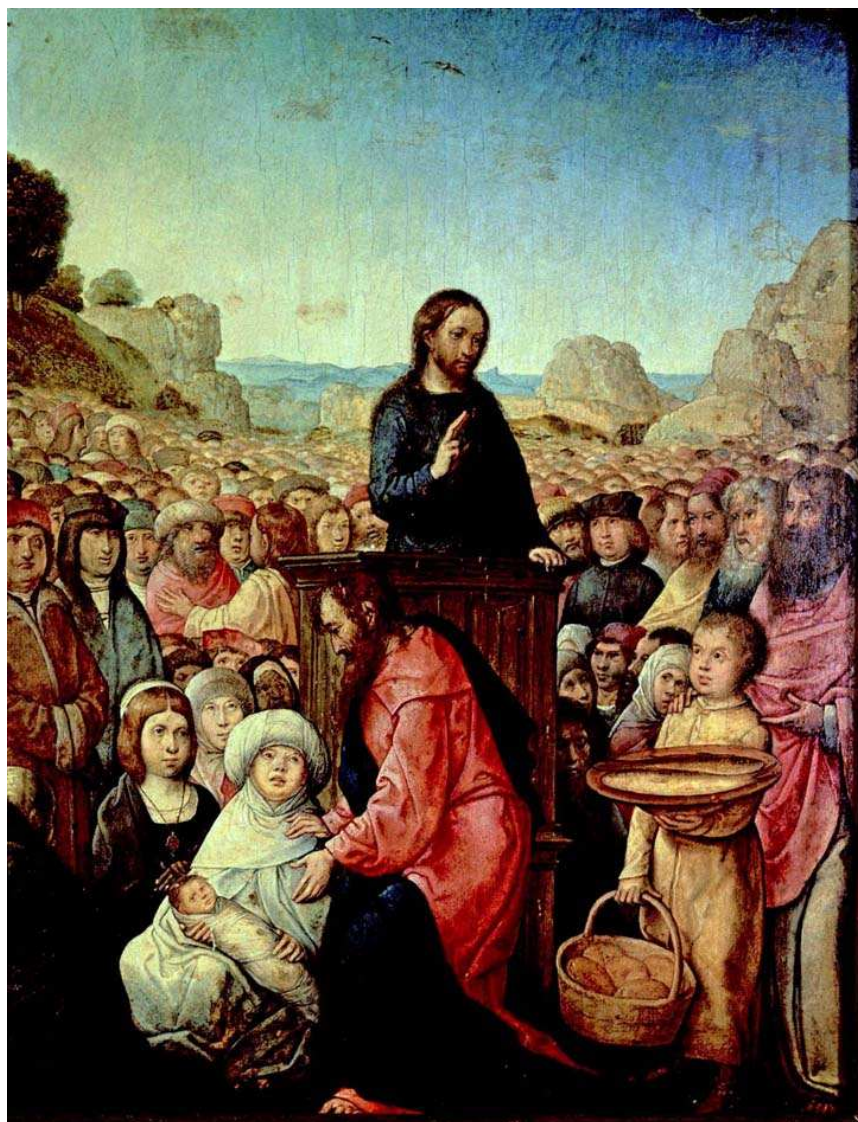
伊莎贝拉的女儿，阿拉贡的凯瑟琳画像，胡安·德·佛兰德作。Thyssen-Bornemisza Museum, Madrid.

(Museo Thyssen-Bornemisza| Scala| Art Resource, NY)



卡斯蒂利亚的胡安娜（伊莎贝拉的女儿）及其丈夫，美男子腓力。Royal Chapel, Granada.

(Album Art Resource, NY)



伊莎贝拉请人绘制的四十七幅宗教画之一，取材基督生平。在《鱼和饼的奇迹》中，伊莎贝拉被描绘为人群中的旁观者。

(Album Art Resource, NY)



伊莎贝拉请人绘制的另一幅宗教画，描绘迦拿的婚礼。伊莎贝拉的儿子胡安王子被描绘位新郎，他的妻子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被描绘为新娘。

Metropolitan Art Museum, New York.

(Copyright © The Metropolitan Art Museum. Image
Source: Art Resource, NY)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伊莎贝拉青年时代不断扩张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

Topkapı Museum, Istanbul.

(Gianni Dagli Orti | The Art Archive at Art Resource,
NY)



15世纪画作，描绘圣母玛丽亚佑护斐迪南与伊莎贝拉、他们的三个最年长的孩子和一群修女，恶魔在他们头顶上飞舞。作者是Diego de la Cru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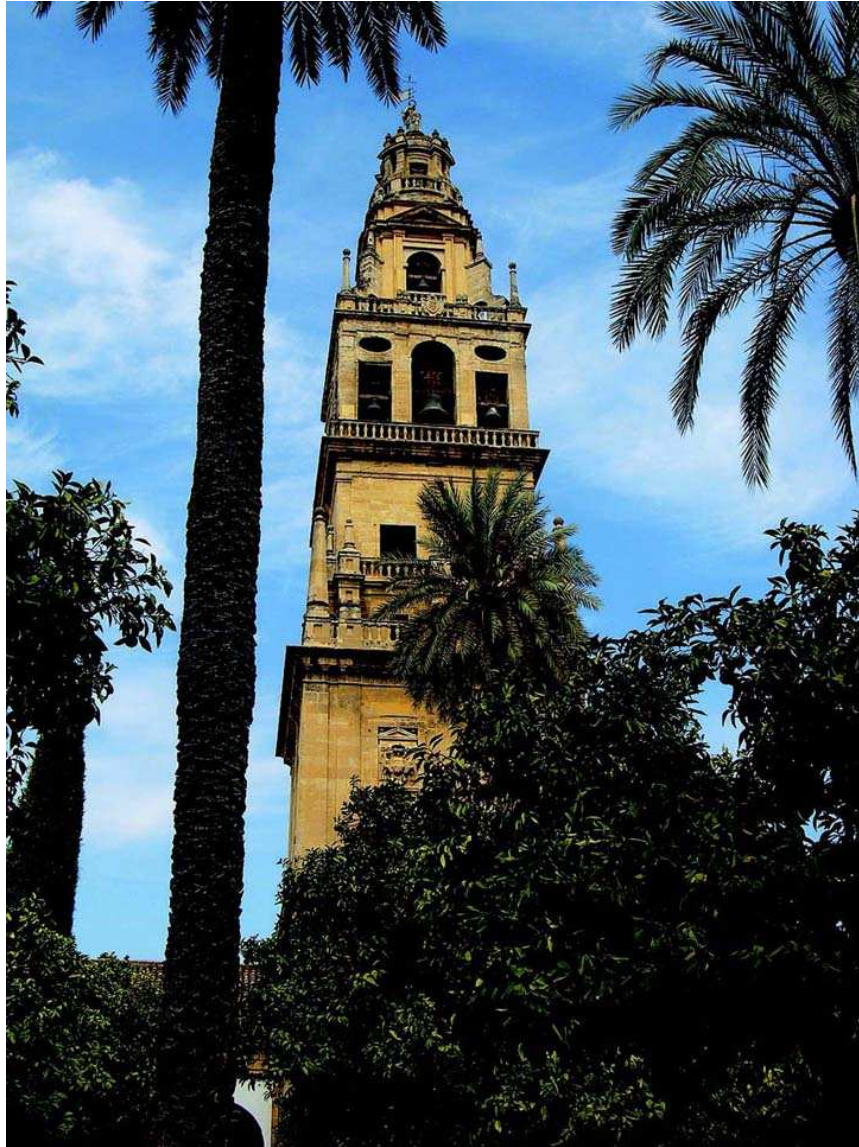
Monasterio de Las Huelgas, Burgos.

(Album| Art Resource, 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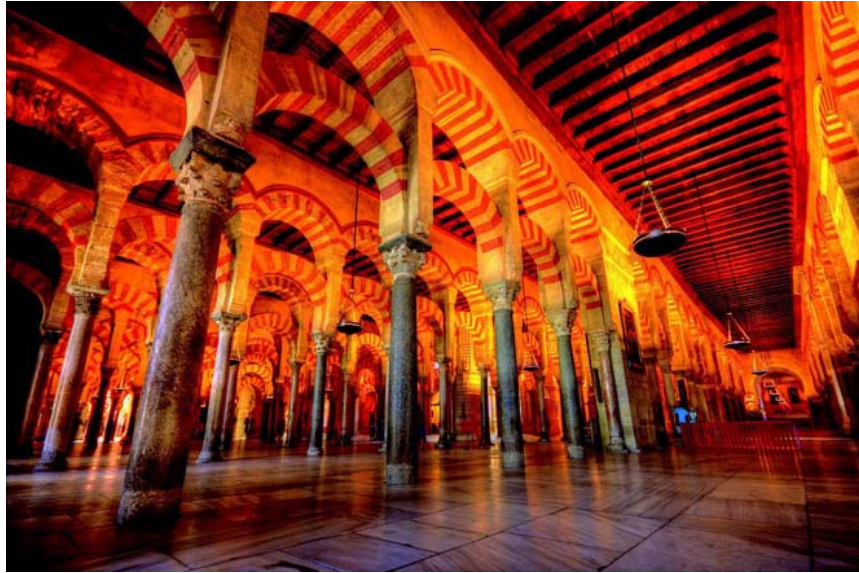
16世纪画作，描绘土耳其人与基督徒之间的一次海战，作者是威尼斯画家雅各布·丁托列托。

Prado Museum, Madrid. (Album Art Resource, NY)



塞维利亚著名的吉拉达塔。

(Ethan Pilla)



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在“收复失地”运动早期被改为基督教的大教堂，在伊莎贝拉时代也是教堂。

(Francesco R. Iacomino | Shutterstock.com)



格拉纳达的阿尔卡萨瓦要塞。“收复失地”运动期间，此处是伊莎贝拉的军事大本营。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年，给双方造成严重伤亡和损失。

(Anibal Trejo | Shutterstock.com)



龙达位于山巅，由崇山峻岭环绕。卡斯蒂利亚军队攻克龙达，是伊莎贝拉的一大胜利，尤其是因为解放了约四百名被囚禁在那里的基督徒奴隶。

(Cornfield| Shutterstock.com)



针对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的自杀攻击。这是伊莎贝拉请人为托莱多大教堂合唱区制作的五十四幅木刻画之一。

(Album| Art Resource, NY)



伊莎贝拉女王赞助的第一个大型建筑项目，托莱多的王家圣约翰教堂。女王命令将被解放的基督徒奴隶的镣铐悬挂在教堂外墙，以纪念他们遭到的磨难。

(Madrugada Verde | Shutterstock.com)



格拉纳达的阿兰布拉宫，纳斯尔王朝摩尔人建造的宫殿，墙上铭刻有阿拉伯文的诗歌与经文。

(Madrugada Verde| Shutterstock.com)



19世纪画作，描绘格拉纳达投降时的伊莎贝拉、斐迪南和巴布狄尔。这是数百年来基督徒针对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Album| Art Resource, 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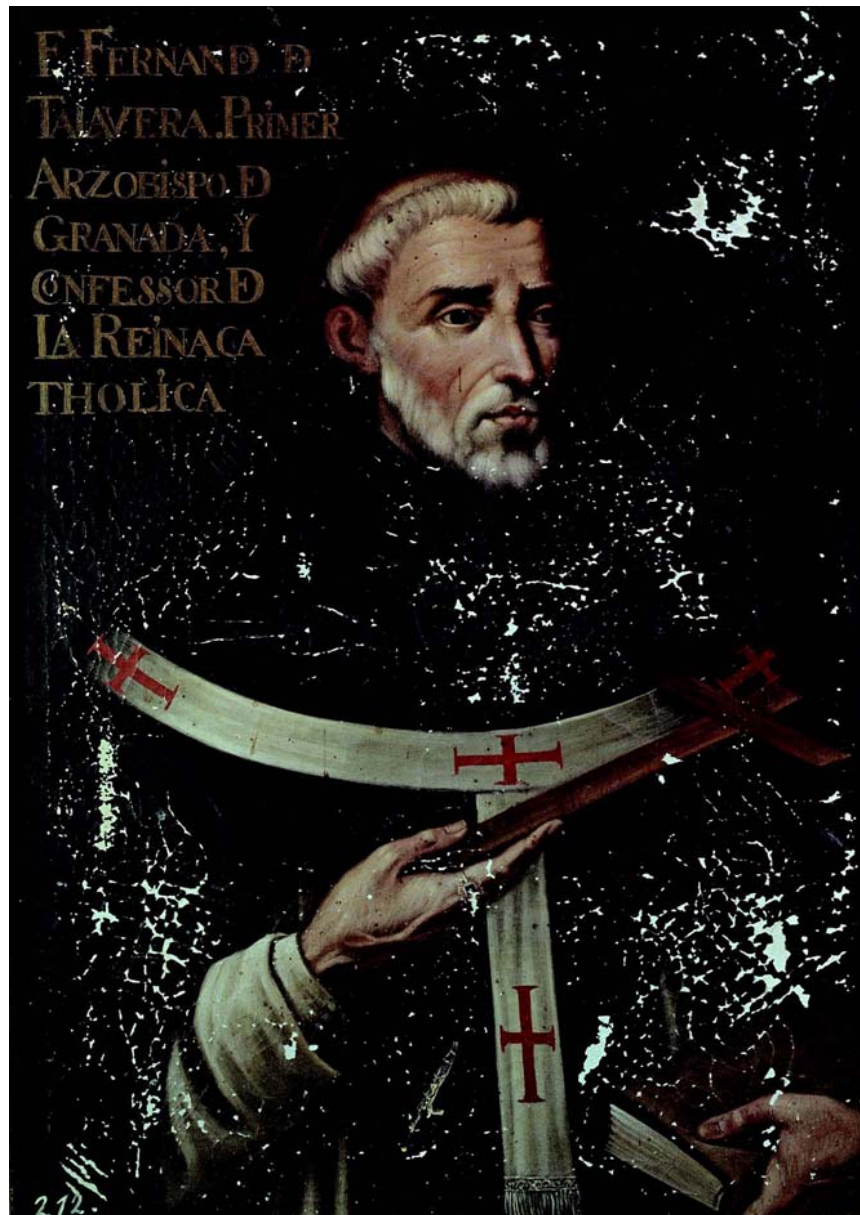
木刻画，描绘“收复失地”运动之后穆斯林妇女被强迫接受洗礼。

(bpk, Berlin| Capilla Real de Granada| Alfredo Dagli
Orti| Art Resource, 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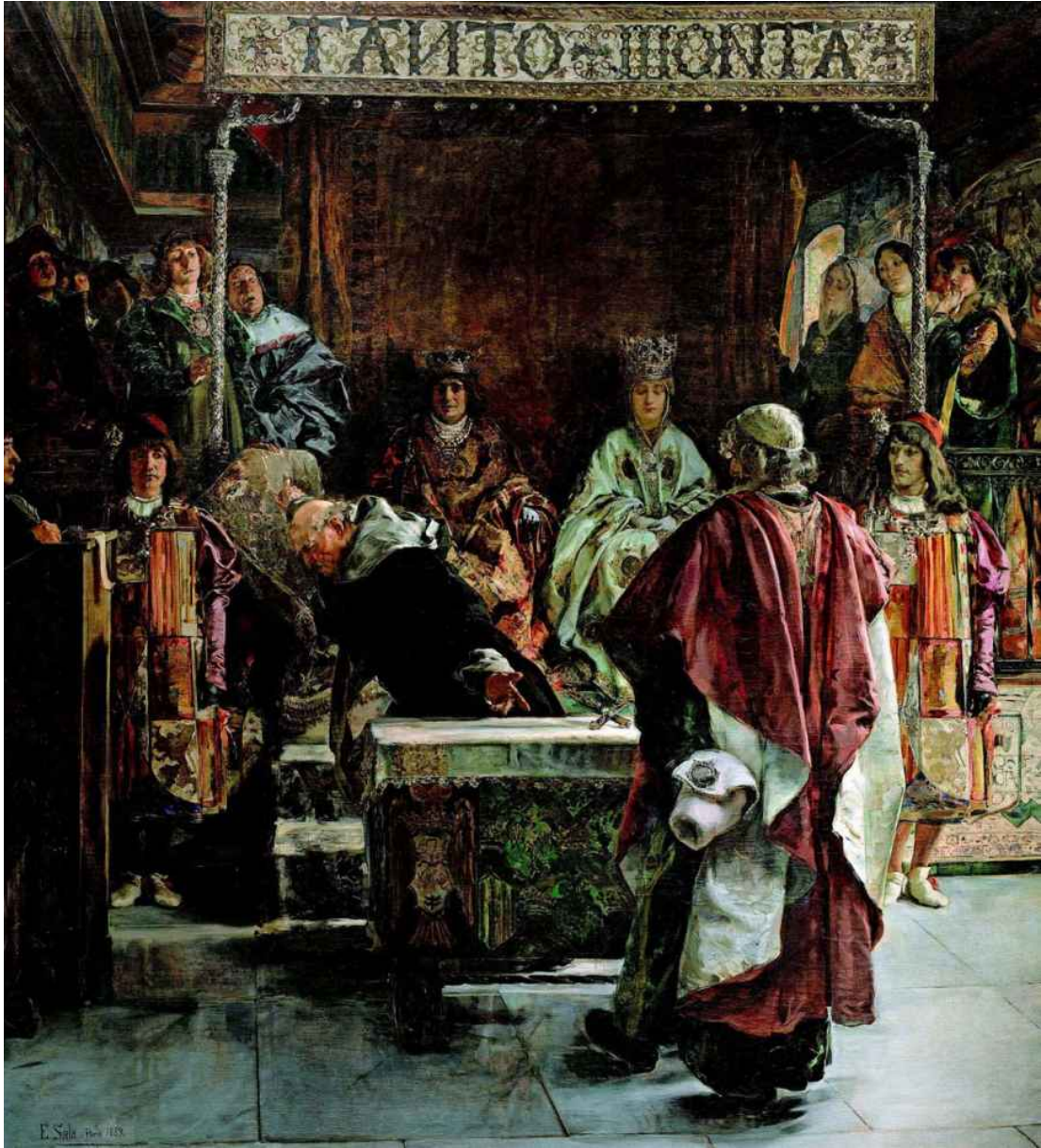
弗朗西斯科·西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托莱多大主教，伊莎贝拉的忏悔神父，后来是西班牙红衣主教和摄政。雕刻师为Salvador Amaya。Parque histórico de Navalcarneo, Madrid.

(Salvador Amaya)



修士埃尔南·德·塔拉韦拉，伊莎贝拉的长期忏悔神父和格拉纳达大主教，出身改宗犹太人家庭，后被指控将其住宅当作犹太教圣殿，遭到异端裁判所的迫害。San Lorenzo de El Escorial, Spain.

(Album| Art Resource, 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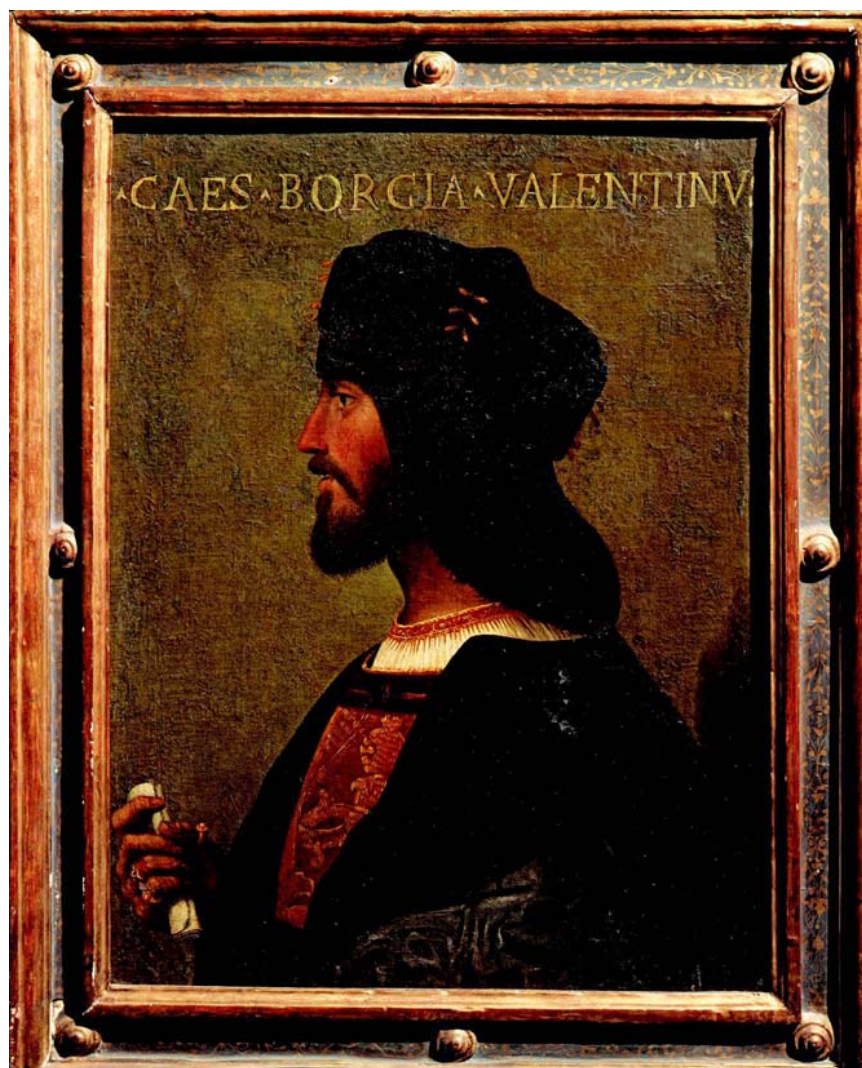
19世纪画作，描绘1492年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主宗教法官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愤怒地拒绝一名犹太人留在家园的哀求。Prado Museum, Madrid.

(Copyright of the image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Art Resource, NY)



罗德里戈·博吉亚（臭名昭著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沉溺肉体享受，但也高度欣赏文化，与伊莎贝拉女王发生了激烈冲突。Museo Diocesano A' Arte Sacro, Orte.

(Gianni Dagli Orti| The Art Archive at Art Resource, NY)



切萨雷·博吉亚，亚历山大六世教皇的儿子，伊莎贝拉认为他是社会公害。
Palazzo Venezia, Rome.

(Scala| Art Resource, NY)



小圣殿，建筑师多纳托·布拉曼特的作品，文艺复兴全盛期艺术的杰作。由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赞助，以纪念他们的儿子胡安。Vatican Hill, Rome.

(Daniele Silva | Shutterstock.com)



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认为伊莎贝拉是他最重要的恩主。雕刻师为 Salvador Amaya。Parque histórico de Navalcarneo, Madrid.

(Salvador Amaya)



美洲国家组织华盛顿总部入口处的伊莎贝拉雕像。该组织有三十五个成员国，包括阿根廷、巴哈马、巴巴多斯、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美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

(Rene and Peter van der Krogt,
[http: || www.vanderkrogt.net|](http://www.vanderkrogt.net))



《名望的胜利》是伊莎贝拉女王拥有的约370幅美丽挂毯之一，描绘的是彼特拉克关于光荣与记忆的诗歌。Metropolitan Art Museum, New York.

(Copyright © The Metropolitan Art Museum. Image
Source: Art Resource, NY)



本书获誉

克斯汀·唐尼成功地恢复了伊莎贝拉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伊莎贝拉是史上最令人着迷也最有争议的女性之一，这是一部令人手不释卷的新传记。

——阿曼达·福尔曼，《纽约时报》畅销书《乔治亚娜：德文郡公爵夫人》作者

伊莎贝拉女王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女性之一。她为现代欧洲与美洲奠定了基础，在这方面的功绩超过当时的任何人。克斯汀·唐尼运用穆斯林、犹太和基督教史料，写下这部精彩纷呈的传记，揭示了伊莎贝拉如何变得如此重要，并娓娓道来地讲述了她令人难以置信的充满戏剧性的故事。

——杰克·韦瑟福德，《纽约时报》畅销书《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构成》作者

克斯汀·唐尼笔下的中世纪历史如同现代悬疑小说一般引人入胜。伊莎贝拉女王的时代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旧大陆因为新大陆的发现而震惊。这部文笔优雅而充满洞察力的传记揭示了她在此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迪尔德丽·贝尔，美国全国图书奖获奖作品《塞缪尔·贝克福特》作者

在这部令人惊艳的传记中，克斯汀·唐尼将历史上最强大的女王的故事讲述得栩栩如生。伊莎贝拉对世界的重大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一直延续到今日。唐尼特别擅长揭示伊莎贝拉人性的一面，她的人生是一场无止境的斗争，始终在努力捍卫自己的地位，战胜企图推翻她的男人们（包括她自己的不忠实而妒火中烧的丈夫）的阴谋诡计。这个故事在今天仍然很有意义。

——琳内·奥尔森，畅销书《那些愤怒的日子：罗斯福、林白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斗争》作者

这是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的一部扣人心弦的革命性传记。这位颇有争议的西班牙女王赞助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向新大陆的远航，建立了异端裁判所，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统治者之一。

伊莎贝拉出生的时候，基督教渐显颓势，奥斯曼帝国咄咄逼人地迅猛扩张。少女时代的伊莎贝拉受到了圣女贞德的激励。虔诚的贞德将她的人民团结起来，领导他们抗击外国侵略者，赢得胜利。1474年，在绝大部分女性几乎没有任何权利的时代，二十三岁的伊莎贝拉挑战自己充满敌意的兄长和反复无常的丈夫，夺得了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统治权。她此后的勋业已成为传奇。她结束了延续二十四代人时间的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斗争，迫使北非入侵者退过地中海。她为统一的西班牙奠定了基础。她赞助哥伦布去往西印度群岛的远航，并在罗德里戈·博吉亚（臭名昭著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帮助下，通过谈判，为西班牙争取到新大陆很大一部分的控制权。她还建立了嗜血的异端裁判所，消灭所有反对她的人。此后数百年中，异端裁判所将严重损害西班牙的名誉。不管她是圣人还是魔鬼，没有一位女性统治者比她更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在今天的世界上，东、西两个半球有数亿人讲西班牙语，信奉天主教。但由于几个世纪的错误报道，她的成就常常被归功于她的丈夫斐迪南（他勇敢无畏，花天酒地，但伊莎贝拉非常爱他），所以如今历史几乎遗忘了伊莎贝拉的影响。唐尼运用新的学术成果，创作了这部明晰晓畅的传记，讲述了这位聪明绝顶、热忱如火但被遗忘的女性的故事；描摹了驱动她一辈子的那种信仰，以及她主宰的那片充满古老矛盾与阴谋的土地。

献给Laura Gregg Roa，她曾和我一起坐在巴拿马可可索罗的防波堤上，梦想着航船与远方的土地，以及那位派遣探险家到我们海岸的

女王。

- [序章](#)
- [一 平平淡淡的出生](#)
- [二 阴影中的童年](#)
- [三 令人胆寒的岁月](#)
- [四 伊莎贝拉孤身面对命运](#)
- [五 结婚](#)
- [六 斐迪南和他的家人](#)
- [七 新婚夫妇](#)
- [八 博吉亚家族](#)
- [九 准备统治](#)
- [十 伊莎贝拉登基](#)
- [十一 伊莎贝拉的部落](#)
- [十二 整个世界在战栗](#)
- [十三 女王的战争](#)
- [十四 异端裁判所的建立者](#)
- [十五 在天堂登陆](#)
- [十六 博吉亚把新大陆给了她](#)
- [十七 虚妄与幻想之国](#)
- [十八 信仰与家庭](#)
- [十九 土耳其人兵临城下](#)
- [二十 流亡的以色列人](#)
- [二十一 三个女儿](#)
- [二十二 失去牧者的教会](#)
- [二十三 伊莎贝拉女王之死](#)
- [二十四 伊莎贝拉之后的世界](#)
- [后记](#)
- [致谢](#)
- [译名对照表](#)
- [参考文献](#)

伊莎贝拉的西班牙



伊莎贝拉时代的欧洲



基督教世界，600年



伊斯兰世界，7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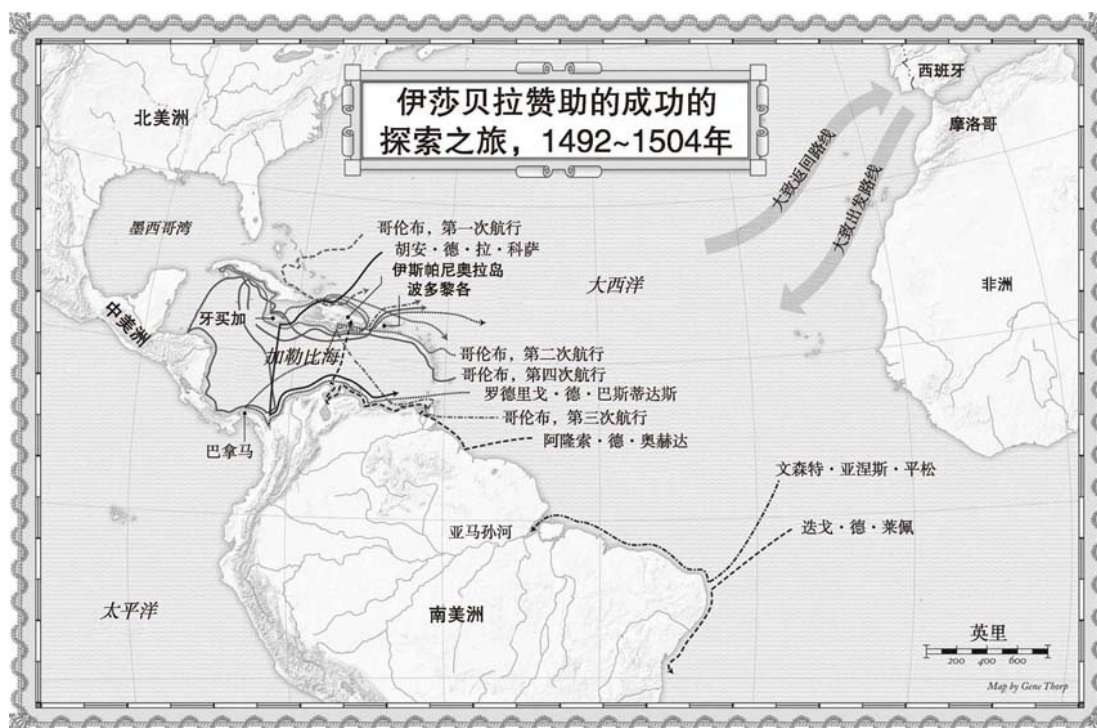
扩张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1451~1574年



格拉纳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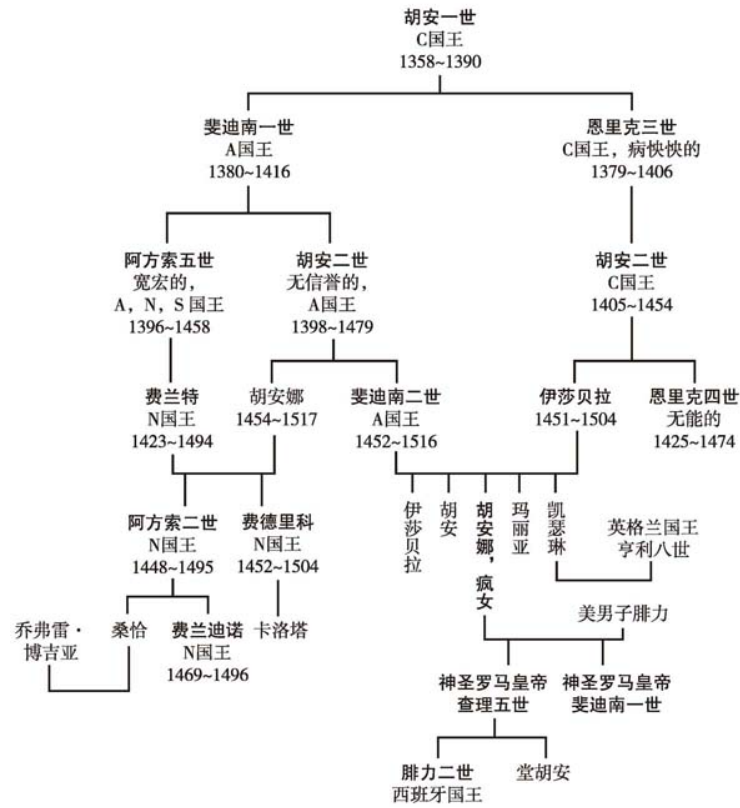


伊莎贝拉赞助的成功的探索之旅，1492~15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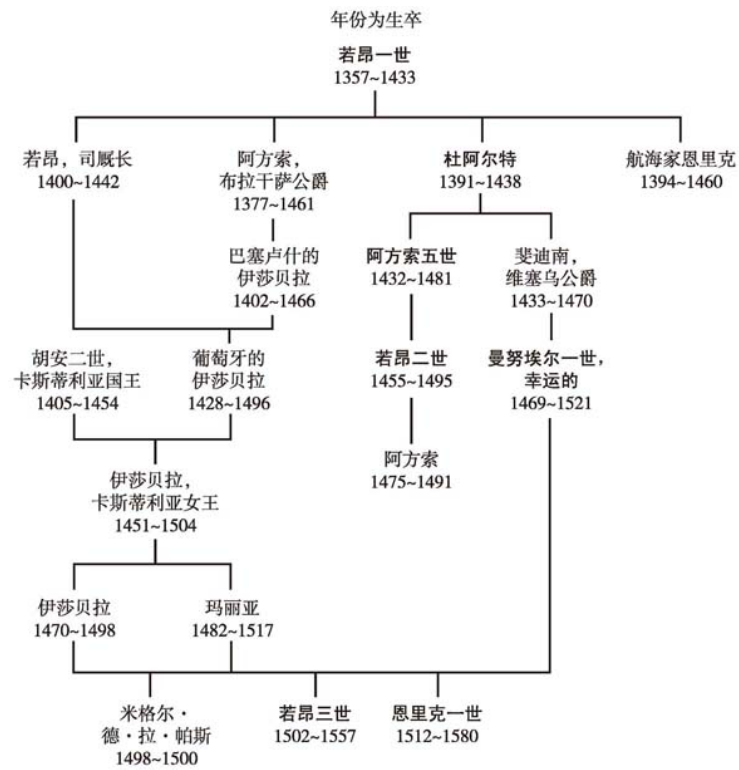


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西西里与那不勒斯王室，特拉斯塔马拉王族

C=卡斯蒂利亚, A=阿拉贡, N=那不勒斯, S=西西里, 年份为生卒



葡萄牙王室



序章

在西班牙中北部，一座高耸险峻的悬崖俯瞰着饱经风雨的平原。在悬崖之上的城堡内，一位身材苗条的红发公主正在最后敲定一场典礼的计划。她的国家已经摇摇欲坠，即将陷入无政府状态，而这场典礼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内战。

她的名字是伊莎贝拉。她刚刚得到消息，她的兄长，恩里克四世国王（人称“无能的恩里克”，既指他在政治上的昏庸无能，也指性无能）驾崩了。

恩里克四世国王淫荡的年轻妻子忙着和宫廷的其他绅士寻欢作乐，后来生了个孩子。很多人怀疑这孩子不是国王的血脉。伊莎贝拉决定自立为女王，结束王位继承的争议。这位二十三岁的女子实际上是在谋划一场政变。

卡斯蒂利亚与莱昂联合王国是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国家。两百多年来，没有一个女人曾统治这个国家。欧洲的很多国家不允许女性单独执政。少数能够执政的女人一般也是以摄政者的身份，辅佐年幼而不能理政的儿子。伊莎贝拉的丈夫斐迪南是邻国阿拉贡的王储，但恩里克四世死讯传来时，他不在伊莎贝拉身边。于是她决定抢占先机，为自己夺取王冠。

在1474年12月这个寒冷的清晨，伊莎贝拉为自己的仪容作了最后的修饰。她希望用自己的雍容华贵和君临天下的辉煌排场震撼人们。

她穿上一件缀着宝石的雅致长袍，脖子上戴着一颗熠熠生辉的深红色红宝石。

原本就对这盛大排场肃然起敬的观察者如今又惊呼起来，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景象。根据伊莎贝拉的命令，一位宫廷官员走在她的坐骑前方，高高举起一支出鞘的宝剑，直指天顶，这宝剑是代表君王主持正义之权力的古老象征。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警示姿态，象征伊莎贝拉决心要夺得权力，并强有力地行使权力。

伊莎贝拉镇静自若地在广场上临时搭建的高台落座。一顶银冠被戴在她头上。在群众的欢呼声中，伊莎贝拉被宣布为女王。随后她前往塞哥维亚城的大教堂。她拜倒在祭坛前祷告，向上帝表示感谢，并恳求上帝帮助她睿智地统治，保佑国泰民安。她面临的使命是非常艰巨的。她相信基督教正面临致命的危险。

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东欧和南欧咄咄逼人，不断开疆拓土。穆斯林在安达卢西亚的格拉纳达王国仍然势力稳固。伊莎贝拉和其他人担心，格拉纳达将是穆斯林向西班牙其他地区进攻的桥头堡。连续多位教皇希望有一位具有钢铁意志的统帅、一位坚忍不拔的武士能够挺身而出，抵挡穆斯林的威胁。然而接过战旗的却是一位年轻女子，一个小女孩的母亲。

她运用的手段高效但残酷。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历史学家将争论她一生的意义。她是一位圣人？还是魔鬼？

但在那个冬日的下午，她站在塞哥维亚的阳光下时，没有流露出任何畏惧或犹豫。在圣女贞德榜样的激励下（圣女贞德死于伊莎贝拉出生的仅仅二十年前，伊莎贝拉在童年经常听到圣女贞德的故事），伊莎贝拉开始将自己塑造为宗教偶像。她的内心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

命运，洋溢着“热烈、神秘和强有力”^[1]的信念。她坚信上帝站在她这边，上帝希望她统治国家。很多年后，她才对此产生了怀疑。

^[1] J.H.Elliott,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London: Penguin, 1990), p.103.

一 平平淡淡的出生

在西班牙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尤其在中世纪，血统决定了谁是统治者，所以卡斯蒂利亚王子或公主的诞生是普天同庆的喜事。人们屏住呼吸，等待婴儿降生。国内最高贵的家族往往有机会在近处期待，他们互相竞争，争夺观看王室婴儿出生的机会。人们在大街小巷组织庆祝活动，互相交换礼物；孩子的洗礼是特别庄重虔敬的庆祝仪式。

但在1451年4月底，胡安二世国王的女儿伊莎贝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却没有这样欢乐的节日气氛。卡斯蒂利亚已经有一个男性继承人了，即伊莎贝拉的异母兄恩里克（他的母亲是胡安二世的第一任妻子），所以大统的继承似乎已经确定无疑了。恩里克王子二十六岁，已婚，已经有自己的宫廷。他的孩子将会继承他。

伊莎贝拉的母亲时年二十三岁，是胡安二世的第二任妻子。她分娩的时候，国王并不在她身边。伊莎贝拉于星期四下午出生在一座其貌不扬的砖石宫殿（它环绕着一座罗马风格的庭院）的“一个空气不畅通的二楼卧室的小凹室内”^[1]。卧室内连壁炉都没有，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个冒烟的火盆。宫殿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北部的一座偏僻的农业城镇——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斯·托雷斯^[2]，王族的男性成员常将他们嫌弃的女性亲属藏匿在此地。小镇只有几千居民，躲在保护他们免遭攻击的城墙后。婴儿的母亲，胡安二世的妻子，是葡萄牙的伊莎贝拉，而她的母亲则是巴塞卢什的伊莎贝拉，也是葡萄

牙人。女婴也被取名为伊莎贝拉。她有一半葡萄牙血统。伊比利亚的各个王族，无论是葡萄牙的、卡斯蒂利亚的，还是阿拉贡的，都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习惯，即用祖辈的名字给孩子取名。所以伊莎贝拉得名自她的葡萄牙外祖母。

妻子分娩几天后，胡安二世国王派遣信使到几座大城市，向官员通知公主诞生的消息。但他有些漫不经心，所以我们很难确定伊莎贝拉出生的准确日期。有可能是4月22日。在一封日期为4月23日、从马德里发出的信中，胡安二世告诉塞哥维亚的官员，“感谢我主的恩典”^[3]，他的妻子在星期四生了一个小公主。

档案保管人同样说不准，伊莎贝拉是在何地接受洗礼的。王室的洗礼通常蕴含政治和宗教意义。王储的洗礼一般在国内最宏伟的大教堂之一，以隆重的典礼进行。但编年史没有提到国王参加了伊莎贝拉的洗礼。洗礼的地点可能是马德里加尔本地的圣尼古拉教堂。竟然无人知道伊莎贝拉是在何处接受洗礼的，说明大家对她的出生是多么缺乏兴趣。

在很多方面，小伊莎贝拉的出生简直可以说是分散了她父母的注意力，因为他们正忙于应对围绕他们的政治阴谋。她的父亲即将与最亲密的朋友和谋臣阿尔瓦罗·德·卢纳爆发冲突、分道扬镳。阿尔瓦罗才华横溢，但冷酷无情。小伊莎贝拉的母亲正在怂恿丈夫与阿尔瓦罗决裂。这很可能引发意义重大的结果。正是阿尔瓦罗撮合了伊莎贝拉父母的婚姻，并且可能毒死了胡安二世的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玛丽亚。她曾命令阿尔瓦罗·德·卢纳离开宫廷，随后她突然全身长出肿胀的粉红色斑块，就这样丧命了。她的妹妹^[4]是她的盟友，生活在一座遥远的城市，却在同一个星期死于同一种怪病。^[5]阿尔瓦罗牢牢把持着国王和朝政。伊莎贝拉王后感到，如果阿尔瓦罗觉得她威胁

了他的控制力，她自己恐怕也会朝不保夕。但她仍然执意与阿尔瓦罗作对。

她或许是相信自己别无选择。胡安二世的年轻王后从一开始就如履薄冰。想赢得国王的好感，实在太难。胡安二世本来更愿意娶一位甜美的法兰西公主，但阿尔瓦罗“秘密地瞒着国王”，认定与葡萄牙联姻对国家更有利。^[6]他在胡安二世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国王商谈联姻条件。国王得知自己在此事中没有决定权，不禁勃然大怒。宫内人人皆知国王的不悦。

不受丈夫欢迎的新娘伊莎贝拉于1447年在一群葡萄牙侍从的护卫下抵达卡斯蒂利亚，马上开始竭尽全力地取悦丈夫。胡安二世时年四十二岁，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和精明世故的人，喜欢读哲学和文学，并且酷爱正在勃艮第发源的文艺复兴早期绘画技法。他身材魁梧，双眼碧蓝，皮肤红润，同时也非常精于世故和沉溺于享乐，非常好色。十九岁的新娘很快发现，有其他女人和她竞争国王的恩宠。她努力讨好国王，对他百依百顺。但她没有很快怀孕，这让她有些担忧。^[7]如果她不能生育，丈夫就可能与她离婚，或者把她送走、过上与世隔绝和耻辱的弃妇生活。当时绝大多数女性的主要价值就是生儿育女的能力，在王族尤其如此。如果她生不出一个孩子，她就会被认为是简直一钱不值。

不足为奇的是，王后感到宫中的年轻佳丽对她构成了威胁。就连她自己的侍女之一比阿特丽斯·德·席尔瓦也吸引了国王的眼球。伊莎贝拉王后一定是愤怒到了极点，命人将这名侍女抓起来，锁进地下室一个壁橱内，一连三天不给她吃喝。比阿特丽斯·德·席尔瓦被释放后声称自己被囚禁期间得到了宗教的启示，此后终身遮住自己的脸，以掩盖美丽的面容，后来还创建了自己的女修会。伊莎贝拉王后如此大动肝火地对待被她认为是竞争对手的女人，说明她的婚姻摇摇

欲坠。但随着时间流逝，胡安二世渐渐对妻子产生了好感。小伊莎贝拉出生后，伊莎贝拉王后又在两年后为国王添了第二个孩子阿方索王子。王子吸引到了比小伊莎贝拉多得多的关注。胡安二世国王现在有一个男性继承人，还新得了个“备胎”。

伊莎贝拉王后与阿尔瓦罗·德·卢纳的关系高度紧张，这让她巩固自己婚姻的过程更加复杂。阿尔瓦罗和胡安二世国王常常一起外出寻欢作乐。一座由女修院改成的妓院是他们最喜欢的去处之一。阿尔瓦罗对胡安二世的来去行踪保持着紧密控制，甚至国王和王后何时可以享受床第之欢也要听他的。他对国王的影响力极大，操纵国王将大量财产和荣誉交给他，于是他成了国内首富。阿尔瓦罗被任命为卡斯蒂利亚的司厩长^[8]，这是国内最高的军职；同时他被任命为圣雅各骑士团的大团长，这是卡斯蒂利亚最富裕的军事修会。仅仅以圣雅各骑士团大团长的身份，阿尔瓦罗就控制着超过六十座城镇和城堡，统治着十万臣民。^[9]

胡安二世国王几乎把整个王国都拱手交给了阿尔瓦罗。卡斯蒂利亚的才子们开玩笑说，由于阿尔瓦罗·德·卢纳的存在，胡安二世“除了吃没有别的事情”^[10]。

不足为奇，伊莎贝拉对这种局面很不满意。有一次她突然来到卡斯蒂利亚的重镇巴利亚多利德，去拜访丈夫，当晚和他一起过夜。阿尔瓦罗得知她到了那里，大为光火，匆匆赶到宫殿，猛敲国王卧室的门。“我不是告诉你不要来吗？”他当着一群宫廷成员的面，怒斥王后。大家都被他的愤怒惊呆了。^[11]此后伊莎贝拉对阿尔瓦罗更加憎恶。还有一次，他明目张胆地威胁王后：“是我让你当上王后，我也能让你当不了。”^[12]

敌视阿尔瓦罗·德·卢纳的绝非伊莎贝拉一个人。他享受各种特权的崇高地位令其他许多贵族满腹嫉妒，尤其是王亲国戚，他们觉得

享受胡安二世国王恩典的应当是他们，而不是阿尔瓦罗·德·卢纳。几乎所有人都批评阿尔瓦罗的傲慢和贪婪。胡安二世国王的第二段婚姻已经到了第六个年头，他终于鼓起勇气，直面阿尔瓦罗，下令将他处决。1453年，在巴利亚多利德的主广场，阿尔瓦罗遭到公开羞辱，并被斩首。国王大胆地展示自己的权威，令全国为之震惊。但胡安二世几乎马上就后悔了，因为没了阿尔瓦罗，他就不得不自己承担治国重担，他从来就不想这么做。他陷入抑郁，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享年四十九岁。

丧夫对不幸的年轻王后来说是又一个打击。她陷入了编年史家所说的“深切的悲伤”，很少说话，常常木然地凝视虚空，起初可能是因为产后抑郁症，后来是因为孤独和悲恸。^[13]她相信阿尔瓦罗·德·卢纳的鬼魂在纠缠她。有时在凄苦的夜风中，她幻想自己听到了他的哀号。小伊莎贝拉几乎成了孤儿，这让她与弟弟的关系更加亲近，他俩共同承受着不幸的童年。两个孩子紧紧拥抱，互相安慰。

对卡斯蒂利亚来说，国王和阿尔瓦罗·德·卢纳一辈子政治联盟的崩溃发生在一个不幸的时刻，此时国家正处于其历史上的一个低潮。由于贵族之间的政治斗争，国家分崩离析。更危险的是，国王和在邻国阿拉贡的亲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后者一直企图控制卡斯蒂利亚。乡村犯罪猖獗，但统治者因为几乎持续不断的内战而无暇顾及乡村治安。

胡安二世驾崩后，伊莎贝拉的异母兄恩里克登基为王，史称恩里克四世，此时她只有三岁。恩里克四世统治的最初几年还比较成功，但曾经困扰他父王的相同问题再次浮现出来。

个人生活和政治的动荡深刻影响了伊莎贝拉的生活。恩里克四世有很多优点，但也有一些人格缺陷。由于王室内部的紧张关系，恩里克四世的缺陷越来越突出。作为卡斯蒂利亚的统治者，恩里克四世国

王如今完全控制着他的继母伊莎贝拉太后。国王理应像尊重母亲一样尊重太后，但她其实比自己的继子还年轻三岁。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更是一锅沸水，爱恨交织。恩里克四世国王很少下功夫去抚育自己的妹妹和弟弟，他们与他之间的关系造成了许多紧张和恐惧。

童年生活这样风波迭起，伊莎贝拉很自然地从小从唯一给她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些安全感的机构那里获得慰藉——天主教会。在中世纪，天主教会的仪式主宰着欧洲基督徒的生活。在中世纪世界，教会和教会日历就是人们的生活遵循的节律。每天的宗教仪式都伴随着教堂钟声：晨祷、晚祷、午夜的守夜仪式；一年中的每一天都属于某位特定的圣徒，人们应当向这位圣徒表达虔敬，举行特定形式的尊崇礼拜。相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人，在伊莎贝拉的生活中，宗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为卡斯蒂利亚宫廷实质上是流动的，在国内从一座宫殿转移到另一座。每一座宫殿也是僧院或女修院，王族不在那里的时候，由僧侣和修女照管宫殿。而王族到达某一座宫殿的时候，僧侣和修女一定会在那里。伊莎贝拉从小到大，身边围绕着神职人员。

这个很早就失去父母的孩子很自然地转向教会，寻求它的教诲作为道德的指导。伊莎贝拉变得特别容易受到教会官员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被证明是过着节制克己生活的教士。清扫和建造教堂、涤荡教会的腐败、促进教会发展，并洗净教会的污点和异端思想，成了她一生执着的事业。伊莎贝拉不断思考着罪与罚的主题，她相信所有人都是挪亚的幸存儿子们的后裔。上帝被人类的恶行激怒，用大洪水消灭了其他人类，只有挪亚及其儿子们乘船到了安全地带。她热爱《新约》，但她的生活遵守的是《旧约》的严苛道德观。她总是更愿意以眼还眼，而不是伸过另外一面脸给人打。

她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受到了她出生的数百年前、发生在地中海另一端的事件的影响。尤其是四个人（其中三人来自黎凡特^[14]，第四

个人是穆罕默德，他出生在阿拉伯半岛）宣称自己听到了神与他们对话，他们的言行将对此后许多世纪产生深远影响。前三个人是亚伯拉罕、摩西（他们都是犹太人）和耶稣（生为犹太人，长为犹太人，但后来创立了一门新宗教）。在伊莎贝拉周围，在她度过白天与黑夜的教堂和宫殿，到处是描绘这三位生平故事与言行的绘画、挂毯、雕塑、书籍和插图手稿。

亚伯拉罕是一位先知，摈弃了偶像崇拜，接受了全能的唯一真神的概念，并且相信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神。他被认为是犹太人的祖先。摩西也是一位先知，为犹太人带来了十诫，这是道德生活的基本准则。他宣称十诫是由神直接传给他的。耶稣是犹太人，他提倡的宗教以犹太教为基础，但也有一些差异。他呼吁他的追随者向天下人传教，让更多人接受他们这种改革信仰（后来被称为基督教）。

在上古时代发生的冲突，一直到伊莎贝拉时代的西班牙还触手可及。基督徒对犹太人很愤怒，因为犹太人不接受耶稣的教诲，也不信耶稣复活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基督徒相信，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部分罪责在于犹太人的统治者，并且犹太人的统治者后来迫害了耶稣的追随者。而犹太人相信，耶稣是被罗马人处死的，基督徒指责犹太人害死了耶稣是没有道理的。犹太人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信仰。很多人对这些不同的观点非常沉迷和执着，所以即便在遥远的西班牙，即便过了这么多年，仍然有许多清白无辜的人因为这些事情而遭到残害。

《新约》多次提及西班牙。圣保罗有一次说他打算拜访西班牙。圣哲罗姆^[15]后来描述了保罗去西班牙的路线。耶稣的另一位使徒圣雅各据说也去过西班牙，尽管证据很少，但西欧的虔诚基督徒坚信他到过西班牙北部。于是，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16]这座城镇成了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17]这意味着，欧洲的很多基督

徒长途跋涉来到西班牙北部，穿过被称为加利西亚的地区。所以，在中世纪，西班牙内部的问题对其他地区也有政治和宗教上的影响。

西班牙也仍然浸润在古典希腊和罗马文明的氛围中。伊莎贝拉和她的家人相信他们是传说中的武士与半神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后代。他们相信赫拉克勒斯建立了阿雷瓦洛、塞哥维亚，阿维拉和萨拉曼卡等城市，这些都是伊莎贝拉耳熟能详的地方。赫拉克勒斯尤其与一座古老的灯塔有密切联系。它坐落于西班牙北部加利西亚沿海一个因为常发生海难而臭名远扬的地方，高180英尺，是腓尼基时代建造的。即便在伊莎贝拉的时代，这座灯塔也会被视为了不起的建筑伟业。这个历史遗迹表现了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如何在西班牙人的脑海中水乳交融。伊莎贝拉命令编纂并帮助编辑整理的一部史书——1493年出版的迭戈·德·巴莱拉的《西班牙编年史》，就突出表现了卡斯蒂利亚王国与希腊的联系。该书的献词甚至刻意提及伊莎贝拉的雅典公爵夫人头衔（因为她的丈夫斐迪南享有雅典公爵的头衔）。

对当时的西班牙人来说，赫拉克勒斯这样的神话人物在西班牙的历史中发挥作用，并非一个特别牵强附会的理论，因为西班牙随处可见令人肃然起敬的罗马遗迹。塞哥维亚这座宝石般的美丽小镇对伊莎贝拉的成长施加了深远影响。在这座城镇，古罗马的高架渠从20多英里之外的地方送来清澈的山泉水，高架渠在接近城镇的最后一段路程要越过一座94英尺深的山谷。西班牙的其他许多城市也曾是繁荣的罗马重镇，包括塞维利亚、萨拉曼卡和萨拉戈萨。一些最著名的罗马作家就来自伊比利亚，包括马提亚尔^[18]、卢坎努斯^[19]和老塞内卡^[20]；哈德良和图拉真这两位罗马皇帝出生在塞维利亚附近。^[21]

奥古斯都皇帝于前38年宣布西班牙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在随后将近六个世纪里，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就和伟大的罗马帝国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罗马人不仅建造公路、剧场、竞技场、桥梁、高架

渠和神庙，还引入了他们的政治和司法体制，以及他们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理念。”法兰西史学家让·德科拉写道。^[22]

伊莎贝拉的出生地，即马德里加尔的那座宫殿，中间有一座庭院，这是典型的罗马设计风格。但罗马风格的建筑不只这么一座。很多住宅也是以类似风格建造的，所有房间的门都面向一条拱廊，围绕着一个天井。伊比利亚半岛的居民采纳了希腊—罗马的风俗习惯。渐渐地，西班牙人有时会自称希腊人。遵循历史悠久的惯例，宗教跟着政治权力而来。希腊和罗马诸神主宰着罗马帝国的精神生活，直到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开始了基督教会与国家合作的新时代。基督教战胜了希腊罗马的异教崇拜，罗马人对基督徒的迫害最终停止。罗马帝国官方对基督教的支持使得信徒数量发生爆炸式猛增。就连小村庄也建起了自己的教堂。教会的层级结构把罗马帝国全境的基督教会联系起来。五个主要的基督教中心发展起来：安条克、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基督教成了欧洲、近东和北非的主要宗教。

许多个世纪流逝了，罗马的力量分崩离析。腐败和外族的不断入侵严重削弱了旧的罗马帝国的西部。5世纪，西哥特人（一个日耳曼蛮族）通过比利牛斯山脉蜂拥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在新的权力真空中迅速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是北方人，一般是金发，比地中海周边的各个黑发民族更魁梧一些。西哥特人会制作精美的首饰，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他们定都于半岛腹地的托莱多，后来宣布基督教为他们的国教。历史学家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23]骄傲地说，西哥特人统治的王国是“世界的美丽装饰”^[24]。伊莎贝拉拥有西哥特人的红金色头发和灰蓝色眼睛，自认为是西哥特人的后代。她热情地阅读伊西多尔记载西哥特时代的史书，并收藏了他的好几部作品。

罗马的传统和基督教互相交织，帝国的文化和文学遗产以多种形式在欧洲各地得以保存。此时罗马帝国已经一分为二。欧洲东部以大都市君士坦丁堡为首都，成了基督教的中心和古典传统的文化中心，以及拜占庭帝国的家园。西欧则在蛮族入侵的打击下四分五裂，但宗教中心仍在罗马。最终，基督教的东、西两支逐渐疏远了，教义也出现了差异。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自认为是古代传统的守卫者。在西欧（包括西班牙），罗马天主教占据主宰地位。基督教的两支结下宿怨，各自都认为自己比另一方优越。怠慢演化成了侮辱。

西班牙也有大量犹太人居住，他们的祖先因为遭到罗马人的迫害，被分散到地中海的各个角落。他们渐渐繁荣昌盛起来。西哥特人开始嫉妒犹太人，产生了反犹主义情绪。7世纪，金蒂拉国王命令将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境，或强迫他们皈依基督教。702年，托莱多第十七次宗教会议召开，命令将犹太人奴役，并禁止他们结婚^[25]。但西班牙人没有完全执行这些严酷的法律，很多犹太人在西班牙继续生活。有些犹太人为了生存，自称是基督徒。他们当然不是自愿的，而是非常怨恨虐待他们的西哥特人。

8世纪初，后罗马时代的西欧分成许多日耳曼王国，一盘散沙，日渐式微。新一代外来入侵者开始袭击西欧。在北方，来自冰岛、格陵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探险家与海盗蜂拥冲进英格兰、法兰西和爱尔兰，烧杀抢掠，令当地人噤若寒蝉。^[26]

对西班牙来说，威胁来自南方。一种新的宗教出现了，它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神论信仰为基础，但增添了一些突出特点。这种新宗教的创始人是先知穆罕默德，他曾是商人，相信神向他启示了宗教真理。他生于570年，在613~632年传播新的信仰。他尊重犹太人和基督徒，因为他们的教诲对他有启发，但他相信伊斯兰教才是真正的信仰，是神直接给他的最终版本的启示。伊斯兰教（源自一个阿拉伯语

的词，意思是“顺从”，或忠顺于神）开始吸引到数十位信徒。它越来越受欢迎，威胁到了阿拉伯半岛的既有社会秩序。

穆罕默德住在麦加，但随着他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他迁往邻近的麦地那城。以麦地那为基地，他开始了一场征讨自己故乡的军事行动。他袭击贸易商队，掳掠贵重的战利品，扣押人质。一些基督徒和犹太人支持穆罕默德。反对他，或者与他的敌人合作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则被剥夺土地、自由或被处决。到穆罕默德去世时，他已经是阿拉伯半岛西部的统治者。穆斯林奋力传播伊斯兰信仰，也派遣成群结队的武装信徒去攻击反抗的中心。7世纪30年代，他们占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大部；642年，他们占领了埃及。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殖民扩张。穆斯林攻占了拜占庭帝国的南半部分，以阿拉伯人取代当地原先的领导人。“地产和财富……被大规模地重新分配。”^[27]历史学家约翰·埃斯波西托写道。

伊斯兰教对基督教发起了特殊的挑战。伊斯兰教是与基督教相竞争的一种宗教哲学，是一种新的致力于自我传播的信仰。它确立了固定的崇拜模式和行为准则，能够为信徒所接受，也有助于社会运转得更为顺畅。“诞生伊始，伊斯兰教便成为基督教的主要竞争对手，与它争夺人心；伊斯兰文明是欧洲基督教世界最近的邻居，也是最致命的敌手。”^[28]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写道。

领土扩张的绝佳蓝图，乃是效仿他们的武装先知穆罕默德的行为。穆罕默德确曾敦促追随者扩张领地，呼吁他们借助武力夺取地产和财富。他们在袭击作战中抓获了许多俘虏。俘虏被分配给各部落和家庭。被击败的敌方统治者的女眷被穆斯林当作妻妾。这种过程建立了一种行政和军事机器，使得伊斯兰教几乎同时迅速扩张到许多地区。很多人热切希望加入袭击敌境的穆斯林军队，传播他们的信仰，为自己敛财，或者寻求冒险。

时机对伊斯兰教的成功也是一大关键。拜占庭和波斯这两个帝国刚刚结束漫长的冲突，双方都已经精疲力竭。穆斯林发动进攻的时候，拜占庭和波斯都缺乏自卫的意志和资源。

711年，穆斯林迅速征服了西班牙，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就在十二年前，他们占领了北非。穆斯林征服西班牙的全部细节已经消失在史海中，因为西哥特文明被消灭了，穆斯林文化占据主宰地位。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历史是由胜利者讲述的。一份罕见的保存至今的基督教文献，称为《754年编年史》，责怪西哥特的内乱导致了国家的迅速灭亡，因为西哥特王国无法动员力量以抵抗外来威胁。711年，一位新国王罗德里克登上王位，但他不得民心，且缺乏统治经验。他的竞争对手痛恨罗德里克，于是帮助和鼓励穆斯林入侵。基督教编年史家称此次入侵特别恐怖，许多城市被付之一炬，男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孩童遭屠杀，各地均遭洗劫。历史学家罗杰·科林斯将此次入侵与历史上的大灾祸相提并论，如“亚当的堕落、特洛伊的陷落、巴比伦人占领耶路撒冷、罗马遭洗劫，”他如此写道。^[29]

穆斯林方面的记载与之类似，不过是从胜利者的角度来展现事件的。在他们看来，入侵西班牙在宗教上是正义的，因为穆罕默德说安拉的意志就是“各地区……都将被我的人民征服”^[30]。

最全面地记载此次入侵的作者是阿拉伯历史学家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马喀里。据他记载，入侵的开端是，先遣部队（两船士兵）袭击了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满载战利品”而归。这些士兵报告称，他们发现了“一个富饶国度，那里尽是美丽的山谷、肥沃的土地，丰产各式各样的农产品，得到许多大河的浇灌，遍布甜美的甘泉”^[31]。此次行动的指挥官惊讶地发现，这片富饶土地离北非只有咫尺之遥。“两地相隔的不是大洋，而仅仅是一条狭窄海峡。”其中一人对另外一人说道。这解释了征服西班牙将会多么轻松。^[32]

随后，一位名叫塔里夫·阿布·扎拉赫的柏柏尔武士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袭击，投入了500~1000人，并带回来“丰厚的战利品和好几名俘虏，他们非常英俊，穆萨^[33]和他的伙伴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俊美的人”。塔里夫·阿布·扎拉赫成功远征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人想去安达卢西亚”，马喀里写道。^[34]

不久之后，穆斯林军队发动了第三次，也是破坏性更大的袭击，仍然由阿布·扎拉赫指挥。据马喀里记载，他大肆杀戮破坏，烧毁房屋，摧毁了一座当地人“非常尊崇”的教堂。“随后他处死了遇见的居民，抓了一些俘虏，然后安全返回非洲”^[35]。

穆斯林开始制定大规模入侵并永久征服西班牙的计划。负责此事的人是一位名叫塔里克·伊本·齐亚德·伊本·阿卜杜拉的武士。他率领数千士兵进入西班牙南部，用四艘船在80英里宽的海峡来回摆渡，将军队运往对岸，直到他的所有部下都抵达欧洲。据说，在渡海过程中，塔里克梦见穆罕默德承诺他的入侵一定成功。这种神秘的体验让塔里克信心满怀，他抵达西班牙之后，立刻横冲直撞，“开始攻击和摧毁附近的国度”（马喀里的话）^[36]。他们在西班牙最南端登陆的地点是一块巨岩，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为“塔里克山”，再后来就成了“直布罗陀”。^[37]

参加此次远征的可能有一万五千名阿拉伯和柏柏尔士兵。来自非洲的柏柏尔人似乎发挥了关键作用。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里康说塔里克是柏柏尔人，他的士兵也大多是柏柏尔人。^[38]一般来讲，西班牙男人被屠杀，妇孺被变卖为奴。穆斯林军队没有杀死当地女人，而是将她们俘虏，说明很少有阿拉伯人将妻子家眷一并带到西班牙。阿拉伯军队进展神速，也说明他们没有受到家眷的羁绊。^[39]

这些意想不到的攻击令伊比利亚人呆若木鸡。他们努力做出反应，但他们的军队陷入混乱，一盘散沙。第一次大规模攻击发生时，

罗德里克正在遥远的北方。他火速南下，从王国各地征集增援部队。塔里克也从北非调来增援部队。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士兵蜂拥来到他麾下。这可能是第一次有穆斯林从非洲调来援兵，以对付基督徒。

据马喀里记载，塔里克敦促他的士兵以安拉的名义英勇拼杀。塔里克告诉士兵们：“大家要知道，你们只要忍受一时的苦难，最终将收获丰厚的愉悦和快乐。你们必须知道……美丽的少女在等待你们，她们像天堂处女一样美丽，脖子戴着闪闪发光、不计其数的珍珠和珠宝，她们的身躯穿着贵重的点缀黄金的丝绸衣服，她们侧卧在君主和帝王奢华宫殿的柔软卧榻上，等待你们！”^[40]

士兵们欢呼万岁，奔向战场。罗德里克丧命，西哥特军队土崩瓦解，基督徒抱头鼠窜。罗德里克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据说他淹死在一条溪流中。“基督徒不得不躲在自己的城堡和要塞内，逃离平坦的乡间，躲藏到山区。”^[41]

塔里克身先士卒，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进攻，征服了一座又一座城市。“安拉让崇拜偶像的人心惊胆战，”马喀里写道，因为基督徒原以为穆斯林只是来掳掠财物，然后会返回位于北非的家园。现在他们意识到，穆斯林是来夺取和占领整个王国的。^[42]有些城市很快投降；其他的城市则羸弱地坚持抵抗。

据马喀里记载，塔里克努力用如下手段进一步威吓基督徒：

他命令士兵在营地内当着哥特俘虏的面，将死人的肉烧熟。在大铜锅里把人肉烧好之后，他命令将肉切成许多份，就像要分给士兵们吃一样；然后他故意把一些俘虏放走，让他们回去告诉同胞，他们目睹了多么可怕的事情。果然，这种策略收到了预想的效果，这些逃亡者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异教徒的恐慌。^[43]

穆斯林横扫乡村，骑着从基督徒手中夺来的马匹，而既存的罗马道路让他们得以轻松地快速行动。一位名叫穆格赫斯·鲁米的穆斯林将领奉命攻击西班牙南部重镇科尔多瓦，而其他部队则奔向马拉加和埃尔维利亚。塔里克开赴西哥特首都托莱多（位于半岛的中心附近）。在科尔多瓦，穆格赫斯的军队打得岗哨出其不意，战胜了那里的驻军。部分基督徒士兵和总督逃走了，躲在城市附近的一座教堂内。据阿拉伯历史学家记载，穆斯林军队攻打教堂三个月之久，最后厌倦了等待。他们命令难民要么改信伊斯兰教，要么称臣纳贡。难民拒绝了，于是穆斯林军队纵火焚烧教堂，将教堂内的人全部烧死。[\[44\]](#).

“攻克科尔多瓦之后，”马喀里写道，“穆格赫斯集合了城内所有犹太人，让他们掌管城市，更信任他们而不是基督徒，因为犹太人痛恨和敌视基督徒。”随后穆格赫斯将城内宫殿据为己有，让穆斯林在城市的其余部分安顿下来。[\[45\]](#).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地中海沿岸城市埃尔维利亚，穆斯林运用了同样的策略：“他们将这座城市的要塞交给犹太人管理，这种做法在后来的岁月里变得几乎很普遍；每当穆斯林占领一座城镇，便将其交给犹太人管理，只留下少量穆斯林，大军则继续新的征服。如果犹太人太少，就留下比较多的穆斯林来掌管城市。”[\[46\]](#).

据马喀里记载，塔里克将一群犹太人带在身边，去控制都城托莱多。在那里，他们掳掠了大量珍奇财宝，包括：

二十五顶金冠，每一顶都属于一位曾经统治安达卢西亚的哥特国王（哥特人的习俗是，每一位国王都要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存放一顶金冠，上面镌刻着他的名字、肖像、子女的数量、他的寿命和在位时间）；二十一部《摩西五经》《福音书》或《诗篇》抄本；亚伯拉罕的书，摩西的书，其他几部包含自然与艺术奥妙的书，或者关于用动

植物和矿物造福人类的书；一部包含古希腊哲学家的护身符的书，还有一些食谱、草药与万灵药的集子；好几个装满珍珠、红宝石、翡翠、黄玉和五花八门宝石的金瓶；许多高大的房间，摆满黄金和精美袍服，各式各样的昂贵丝绸锦缎服装，更不要说镀金甲胄，精美的匕首和剑、弓、长矛和各种各样的进攻与防御性兵器。[\[47\]](#).

他们还发现了一张镶嵌珠宝的金银桌子，据说曾属于所罗门王。这些令人垂涎欲滴的战利品，被士兵们敲成碎片、瓜分一空。

马喀里记载道，基督徒向北逃跑，留下的人则被迫纳贡。被抛弃的房屋被入侵者占为己有。“阿拉伯人在基督徒抛弃的城镇居住下来；因为只要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奉命在某地定居，他就毫不犹豫地带着家眷住进来。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深入这个国度，基督徒的偶像崇拜被消灭和摧毁。”更多北非人和阿拉伯人潮水般涌过海峡：

伟大征服的捷报传遍穆斯林居住的各国，叙利亚和其他遥远地区的许多人渴望去安达卢西亚，在那里安居乐业。于是，阿拉伯半岛的许多精英和显要人士离开了他们父亲的帐篷，定居到安达卢西亚。[\[48\]](#).

在这过程中，许多重要的文化和宗教场所遭到毁坏；神圣的遗物被抛弃。马喀里记载道，著名的科尔多瓦清真寺“用基督教大钟熔化铸成的青铜灯来照明……还让基督徒俘虏将许多被拆毁的教堂的材料搬运到科尔多瓦，以扩建清真寺”。[\[49\]](#).

这一系列事件令伊比利亚的许多居民刻骨铭心。伊莎贝拉命人撰写的《西班牙编年史》从被打败的伊比利亚人的视角记录了穆斯林征服的许多细节。编年史家迭戈·德·巴莱拉写道：“国内十室九空，哀鸿遍野，尽是血泪。”女人“遭到强暴”，“孩童被屠杀”，而在有些城市，“大部分”平民惨遭屠戮。[\[50\]](#).

732年，法兰克国王“铁锤”查理^[51]在图尔击败阿拉伯军队。穆斯林向西欧的进军终于止步于比利牛斯山脉，即法兰西与西班牙之间重峦叠嶂的边境。

* * *

最终，只有一小股基督教势力还在西班牙活跃，主要在最北端的阿斯图里亚斯。马喀里写道：“一个可鄙的野蛮人，叫佩拉约^[52]，在加利西亚崛起。他斥责同胞可耻的奴隶状态和怯懦的逃跑，开始煽动他们为过去的伤害而复仇，将穆斯林从他们祖先的土地驱逐出去。”

从这个时期起，安达卢西亚的基督徒开始在他们仍然占据的地区抵抗穆斯林的进攻，并保卫自己的妻女。而在此之前，他们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御敌自卫的意愿。抵抗是这样发端的：加利西亚的所有大小城镇和村庄都在穆斯林手中，仅有的例外是一座险峻的山峰。佩拉约带着一小群人躲在那里。他的追随者在那里一个个饿死，最后只剩下大约三十个男人和十个女人，除了从石缝中收集的蜂蜜，没有任何食物。他们自己也像蜜蜂一样，居住在石缝之间。但佩拉约及其部下逐渐在山区各个隘道设防，直到穆斯林得知了他们的防御准备；但穆斯林觉得佩拉约的人太少，因此不以为意，放任佩拉约的力量逐渐增强。穆斯林说：“三十个住在岩石上的野蛮人不足为虑。他们迟早一死。”^[53]

这些残余的西哥特人在风雨飘零、寒风刺骨的加利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顽强地生存下来，他们一度作为伊比利亚半岛主人而享有的舒适和繁华已经恍若隔世。马喀里的史书描写了他们艰苦的生存斗争。佩拉约的兄弟法维拉在打猎时被一头熊杀死，这说明他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拼命。西哥特人的后裔在此后二十四代的时间里一点一点、一英里一英里地收复半岛，大部分时间都是逐步蚕食，直到伊莎

贝拉诞生的时期，穆斯林在西班牙的地盘只剩下了南方的格拉纳达王国。基督徒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在教会与国家紧密合作的基础上，使得他们在收复失地的漫长反攻中能够维持凝聚力。于是，在伊比利亚半岛，教会与国家“紧密团结”起来。^[54]

佩拉约的故事令伊莎贝拉魂牵梦萦。她相信自己就是这位坚强的西哥特英雄的直系后裔，是他的事业的继承者。她的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塞哥维亚的城堡宫殿度过的，这里的壁龛内到处是她祖先的雕像，佩拉约被刻画为她的第一位祖先。他的雕像屹立在御座厅，默默地参与政府管理的每一个事件。

但在西班牙的其余地区，对那些接受穆斯林（在西班牙，穆斯林也被称为摩尔人，因为他们最初来自摩洛哥^[55]）统治的基督徒和犹太人来说，生活并不是特别严酷。其中很多人过得很舒适。他们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只要他们为了这项特权缴纳额外的税赋。在穆斯林征服之后的岁月，很多西班牙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中有些皈依者（被称为穆拉迪人）是真诚的。也有人假装皈依，目的是从统治阶级那里得到好处。同样，有些参与入侵的柏柏尔人也是不情愿的或者被强迫的穆斯林。有些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也是这样。

若没有历来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犹太人的帮助，穆斯林不可能如此彻底、如此迅速地打败西哥特人。有些犹太人欢迎新来者，帮助他们管理他们的新领地。对犹太人来说，穆斯林的统治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他们在西哥特人统治下遭受的虐待不可同日而语。犹太人逐渐发展出了一个文学、科学、医学和诗歌的黄金时代。

但对基督徒来说，犹太人帮助穆斯林打败西哥特人的事实，再加上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宿怨（因为早期基督教殉道者在圣地遭到犹太人迫害），成了黑暗和痛苦的回忆。在随后七百年中，尽管三种信仰共

存，并且赞颂对方的艺术、文学与美食成就，但愤怒的痛苦仍然潜伏在表面之下。

历史学家简·I. 史密斯写道：“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在伊比利亚半岛为邻的时代，常被认为是跨宗教信仰的和谐共存的理想时期。”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这个时代很短。没过多久，就出现了紧张、偏见，以及穆斯林和基督徒对少数派的迫害，这些方面才是三大群体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到10世纪，早期入侵的混乱已经平息，伊比利亚半岛出现了两大阵营对峙的清晰局面：北方是基督教王国莱昂^[56]，南方是幅员更辽阔、穆斯林统治的安达卢西亚。二者之间存在一个薄弱的边疆地带。阿卜·杜·拉赫曼三世统治科尔多瓦时期（912～961），西班牙的伊斯兰国家达到了力量和名望的巅峰。这是欣欣向荣和成果斐然的时期，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知识分子在阿卜·杜·拉赫曼三世的赞助下，为艺术、文学、天文学、医学和其他文化与科学做出了极大贡献。穆斯林对所谓“有经者”^[57]高度宽容，社会各群体间的交流也是轻松而稳定的。在这个时期，相当多的基督徒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尽管直到10世纪下半叶，安达卢西亚的基督徒人数一直多于穆斯林。^[58]

在这些年里，很多基督徒和犹太人采纳了阿拉伯人的风俗和衣着打扮。

10世纪末，在阿布·阿米尔·曼苏尔^[59]治下，宽容逐渐成为过去。“他开始对基督徒进行一系列残酷无情的迫害，包括抢劫教堂和其他基督教场所。”^[60]社会各群体间的交流变得紧张。史密斯写道：

虔诚的穆斯林避免与异教徒说话，除非隔着一段距离。如果一位穆斯林和一位基督徒在公共道路上相遇，基督徒必须为穆斯林让路。基督徒的房屋高度不能超过穆斯林的房屋。作为“异教徒”的基督徒不能雇佣穆斯林……基督徒被安葬在他们自己的墓地，远离穆斯林墓地……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会当即被判处死刑……于是，西班牙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和谐共处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宽容、偏见和互相猜忌。[\[61\]](#)。

学者达里奥·费尔南德斯—莫雷拉认为，西班牙是各宗教和平共处的天堂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是一个神话”，[\[62\]](#)因为在西班牙有很多基督徒和犹太人被穆斯林杀死或迫害。例如，穆斯林统治者曼苏尔令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噤若寒蝉。他洗劫了萨拉戈萨、奥斯马、萨莫拉、莱昂、阿斯托尔加、科英布拉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等城市。985年，他将巴塞罗那付之一炬，将侥幸活命的居民变卖为奴。1066年，格拉纳达的穆斯林掀起暴乱，摧毁了整个犹太人社区，屠杀了数千人。这比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时基督徒在莱茵兰屠杀的犹太人还要多。12世纪，穆斯林将居住在马拉加和格拉纳达的全体基督徒驱逐出境，押送到摩洛哥。[\[63\]](#)。

令基督徒人心大振的是，他们在莱昂王国的最西北方发现了所谓的圣雅各（西班牙语称圣地亚哥）墓，即据说曾造访西班牙的那位圣徒。他们建造了一座泥土墙壁的简陋教堂来安放圣雅各的遗骸。不久之后，这个地方，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就成了整个西欧基督徒朝圣的重要目的地，于是建起了一座更华美的教堂。997年，穆斯林攻占了圣地亚哥城。他们保留了圣雅各墓，但摧毁了所有公共建筑，拆毁了许多教堂。[\[64\]](#)这样的行动造成的结果是，基督徒收复失地的运动变成了一场十字军圣战。

即便是比较宽容的穆斯林统治者，对非穆斯林也是抱着鄙夷的态度。“禁止穆斯林为犹太人或基督徒按摩；禁止穆斯林为他们清理垃圾或厕所，”穆斯林法学家伊本·阿卜敦写道，

事实上，犹太人和基督徒更适合做这样的工作……若一件衣服曾经属于一名麻风病患者、犹太人或基督徒，在出售时必须告知买主，否则不得出售；如果这件衣服曾经属于一个道德堕落的人，也是如此……任何犹太人或基督徒不得穿戴贵族、法学家或富人的服饰……犹太人和基督徒必须佩戴特定的标志，以便大家识别他们，这对他们也是一种耻辱的标志……禁止向犹太人和基督徒出售科学书籍。[\[65\]](#)

伊莎贝拉特别关心与女性有关的事情，而性别关系也影响了居住在西班牙的人民的观念。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在某些方面尊重女性，但也都是父权主义的，在一些重要方面视女性为二等公民。在基督教的卡斯蒂利亚，女性的地位远远谈不上理想，但在穆斯林地区却更糟糕。在这些地区，女性的活动在法律上受到种种限制：她们被禁止与男人一起乘船旅行；不能在室外洗衣服；不能在夏季坐在河边，因为会有男人在那里。更重要的是，尽管西班牙南部气候炎热，她们被要求穿厚重肥大的衣服，如“希贾布”。她们被与男性隔开；她们一般不能迈出家门。[\[66\]](#)这样的禁足对伊莎贝拉来说会是不可想象的糟糕。她逐渐成长为一位性格坚强、精力充沛而热衷于活动的女子，常骑马外出，有时身边只带少量侍从。

对伊莎贝拉这样有独立精神的女性来说，另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是，成千上万的女性在摩尔人统治下形同性奴。文学和艺术中很少描绘性奴，而男性历史学家很少提及她们，或只是一笔带过，所以我们很难判断这些女性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一套插图版手稿中有一些罕见的描绘小妾的图画，其中有女人身穿轻薄透明的长袍，侍候正在下棋或玩其他桌面游戏的男人饮食。她们脸上露出悲哀的表情。[\[67\]](#)

一夫多妻是另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在三大宗教的早期，都曾有过一夫多妻制，但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逐渐消失了，而在伊斯兰教中始终没有完全隐退。穆斯林文化允许男人娶多达四位妻子，但不允许

女人拥有多位丈夫。穆罕默德拥有十一位被公开认可的妻子，年龄不一。富裕的穆斯林可以效仿先知，维持庞大的后宫，而战争源源不断地为此提供新的女性。男人们向往这种生活。穆斯林统治者阿卜杜·拉赫曼三世，就是那位常被描述为格拉纳达黄金时代引领文明之光的贤君，拥有200个孩子，其中150个是男孩，其余是女孩。^[68]据说他的后宫有6300个女人。

伊莎贝拉若是想到穆斯林世界各地那许许多多被搁置的结发妻子们，一定会感到不安。这些女人在夜间听到丈夫与更年轻的女人（进入家门的新妻子）做爱，一定孤枕难眠。穆斯林统治者拥有这么多女人，肯定不是全靠追求得来的，于是绑架和拐卖基督徒及犹太女人的生意迅速火爆起来。她们被奴役后便会被改掉名字，怀孕后又会被改名，名字常带有“乌姆”的前缀，意思是“……之母”。不幸的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的妻子埃吉罗娜就这样被嫁给了一名穆斯林军人，被更名为乌姆—阿西姆，即“阿西姆的母亲”。

很多女人不会喜欢后宫生活，所以必须守卫和监视她们。一大群宦官奴隶承担这个责任。来自东欧的白奴会被切除睾丸，但来自非洲的黑奴一般会被切除睾丸和阴茎，以确保他们无法与主人的女人们发生性关系。

伊莎贝拉童年时期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让711年的摩尔人入侵显得仿佛就在昨天。1453年，她还只有两岁的时候，大约也是她父亲驾崩的时间，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土耳其人攻克。这座城市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奄奄一息，但终于被征服的时候，还是惊天动地。一千年间，这座充满异国情调的位于遥远东方的城市，一直是基督教世界的伟大都市。查士丁尼建成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时候，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九百多年后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这么多世纪以来，君士坦丁堡是古典世界的一个活生生的遗迹。那里的居民仍然自称“罗马

人”；他们经常阅读希腊经典，包括《荷马史诗》；他们自认为是罗马帝国东半部分的延续。在这一千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君士坦丁堡也是欧洲的军事堡垒。它守卫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关键渡口，将亚洲的游牧民族军队阻挡在欧洲之外。674~678年，这座城市抵挡住了阿拉伯军队的连续多年攻打；并在717~718年打退了阿拉伯军队第二次更坚决的进攻。防御的胜利被归功于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墙和“希腊火”的神奇武器，这是一种类似凝固汽油的物质，其配方是一个严密保守的秘密。

但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惨遭洗劫，受到了致命打击。由于金钱纠纷，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基督徒军队蹂躏了这座城市。此后，君士坦丁堡陷入了漫长的衰落。它的领土一年年锐减，直到只剩下城市本身和城外的零星土地。君士坦丁堡向西欧求援，但西欧人忙于互相厮杀，不愿意去关注一座遥远城市的危境，而且西欧人还在为东西方基督教会大分裂而恼怒，所以对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徒没有什么同情心。1453年，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发动最后进攻时，君士坦丁堡只能召集七千守军，包括七百名热那亚人，去抵挡杀到城下的八万大军。在七周的鏖战之后，城市于5月29日陷落。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命运无人知晓。大多数史料都说他身先士卒，阵亡沙场。据说后来只能通过他脚上的紫色鞋子判断他的身份。在他身边死战到底的有一位来自西班牙的贵族，他是极少数前来帮助守城的西欧人之一。

君士坦丁堡遭到的最后猛攻和毁灭，是一场令人胆寒的壮观盛景。目击者，如米蒂利尼的热那亚人大主教“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和威尼斯的尼科洛·巴尔巴罗，描述了城市遭到残酷洗劫的场面，谈及大屠杀、强奸和奴役。教堂被烧毁，珍贵的圣物被抛弃，约十二万本书籍和手稿（有的出自上古）丢失、被烧或损毁：“在三天之内，土耳其人洗劫了城市，恣意毁坏书籍，因为书对四处掳掠的士兵来说

没有什么价值。于是，在西方学者眼中，土耳其人成为欧洲曾经遇到的对高雅文化和学术的最大威胁。”^[69]

西欧的观察家大为警醒，感到整个欧洲文明都受到了威胁。对伊莎贝拉来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一个凶险的预兆，说明有可能发生很多恶事。她的宫廷编年史家阿隆索·德·帕伦西亚（伊莎贝拉雇佣他，让他给她讲故事）记载当时的历史事件时，对伊莎贝拉的诞生只用了大约一页纸，而对君士坦丁堡陷落却用了三页。帕伦西亚说此事是“灾祸”和“大难”，可能意味着“基督教的毁灭”^[70]。

在随后一些年里，君士坦丁堡的幸存者精神恍惚、满腹忧伤地离散到欧洲各地。很多人的个人生活被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毁掉了。穆斯林处置君士坦丁堡的妇孺，就像他们于711年在西班牙做的那样。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属下的外交官乔治·斯弗朗齐斯记载道，他的妻子和孩子在破城之后被抓走，后来成了苏丹的御马总管的奴隶，此人“通过出售其他许多美丽的贵妇，积攒了巨额财富”。^[71]

西欧人，尤其是西班牙人，心惊胆战地揣测穆斯林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在哪里。穆罕默德二世发誓，要将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大祭坛变成喂马的食槽。而且，西班牙比罗马更接近穆斯林人口中心，距北非只有8英里^[72]。“伊斯兰教两次对基督教构成了普遍的军事威胁，”历史学家约翰·麦克曼纳斯写道，“第一次是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的快速征服，一时间似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摇摇欲坠。第二次是15～17世纪，奥斯曼人图谋主宰世界。”^[73]

伊莎贝拉公主诞生的时期正是基督教世界第二次受到严重威胁的时代。虽然我们对她的童年生活知之甚少，既不知道她的出生日期，也不确定她的洗礼地点，但有一点非常重要，被记载下来。这是伊莎贝拉还是小姑娘的时候自己决定的第一个正式举措。她捐赠了大约200

马拉维迪^[74]，用来资助收复格拉纳达——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堡垒——的军事行动。

[1]. Nancy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 16.

[2]. 以下简称马德里加尔（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所加）。

[3]. King of Castile Don Juan II to the City of Segovia on the birth of his daughter Isabel, Madrid, April 23, 1451, Archivo Exmo, Ayuntamiento de Segovia.

[4]. 阿拉贡的玛丽亚的妹妹埃莉诺（1402~1445）是葡萄牙国王杜阿尔特的女儿。

[5]. Jerónimo Zurita, *Anales de Aragon* (Zaragoza: 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ólico” [C.S.I.C] de la Exma Diputación Provincial, 1975), vol. 6, p.33, “that they had been given herbs,” poisonous herbs, by Luna.

[6]. Fernán Pérez de Guzmán, *Comienza la crónica del serenísimo príncipe Don Juan, segundo rey deste nombre* (Madrid: Librería y Casa Editorial Hernando, 1930), p.633.

[7]. Peggy K.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7.

[8]. 司厩长的官职起源于罗马帝国，最初是管理马匹的官员，后来在中世纪欧洲演变成负责保管维护国王的军械的官员，再后来变为军队的重要指挥官。

[9].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p.19.

[10].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p.19.

[11]. Didier T. Jaén, *John II of Castile and the Grand Master Álvaro de Luna* (Madrid: Editorial Castalia, 1978), pp.189-90.

[12] Nicholas Round, *The Greatest Man Uncrowned: A Study of the Fall of Don Álvaro de Luna* (London: Tamesis Books, 1986), p.42.

[13]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p.19.

[14] 黎凡特是历史上的地理名称，指代并不精确，一般指的是中东、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的一大片地区。历史上，黎凡特在西欧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中担当重要的经济角色。

[15] 圣哲罗姆（约347~420）是天主教神父、神学家与历史学家，出生于意大利东北部。他将《圣经》的大部分译为拉丁文，即著名的“武加大译本”。

[16] “圣地亚哥”就是西班牙语的圣雅各。

[17] Jean Descola, *A History of Spai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 pp.40-42.

[18] 马提亚尔（约38~约104），出身西班牙的古罗马诗人，以其十二卷本讽刺短诗闻名。

[19] 即马尔库斯·安奈乌斯·卢坎努斯（39~65），他的未完成史诗《法萨利亚》描述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被誉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之后最伟大的拉丁文史诗。

[20] 老塞内卡（前54~39），出身西班牙科尔多瓦的古罗马著名修辞学家和作家。他的儿子小塞内卡（约前4~65）是著名斯多噶派哲学家、政治家、戏剧家、幽默家，还是尼禄皇帝的教师和谋臣。

[21] Townsend Miller, *The Castles and the Crown: Spain, 1451-1555*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3), p.17.

[22] Descola, *History of Spain*, pp.32 and 33.

[23]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约560~636）担任塞维利亚大主教三十多年，被认为是“古典世界的最后一位学者”。他对促使西哥特人从阿里乌异端改信天主教做出了很大贡献。他被奉为圣徒，著作很多，包括《词源》和多部史书。

[24] *Isidore of Seville's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the Goths, Vandals and Suevi*, trans. Guido Donini and Gordon B. Ford (Leiden:

Brill, 1966) , p.1.

[25] 原文有误。托莱多第十七次宗教会议的时间是694年，宣布镇压犹太人的法令。第十八次会议大约在702年举行，但我们今天不知道其议程。

[26] Didier T. Jaén, *John II of Castile and the Grand Master Álvaro de Luna* (Madrid: Editorial Castalia, 1978) , pp.189-90.

[27] John L. Esposito, *The Oxford History of Isla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p.13.

[28] Bernard Lewis, *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p.2: xvi.

[29] Roger Collins, *The Arab Conquest of Spain: 710-797*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1995) , P.63.

[30] Ahmad ibn Muhammad Al-Maqqari,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trans. Pascual de Gayangos, 2 vols. (London: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1840-43) , p.1: 250, referring to quote from Ayyeshah, widow of the Prophet.

[31] Ahmad ibn Muhammad Al-Maqqari,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trans. Pascual de Gayangos, 2 vols. (London: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1840-43) , p.1: 18.

[32] Ahmad ibn Muhammad Al-Maqqari,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trans. Pascual de Gayangos, 2 vols. (London: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1840-43) , pp.1: 264-65.

[33] 指的是穆萨·本·努赛尔（640~716），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瓦利德一世时期的重臣和名将。他是穆斯林北非的总督，并指挥了在西班牙的征服战争。

[34] Ahmad ibn Muhammad Al-Maqqari,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trans. Pascual de Gayangos, 2 vols. (London: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1840-43) , p.1: 265.

[35]. Ahmad ibn Muhammad Al-Maqqari,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trans. Pascual de Gayangos, 2 vols. (London: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1840-43) , p.1: 265.

[36]. Ahmad ibn Muhammad Al-Maqqari,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trans. Pascual de Gayangos, 2 vols. (London: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1840-43) , p.1: 267.

[37]. Lewis, *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bammad*, p.2: 111.

[38]. Collins, *Arab Conquest of Spain*, p.97.

[39]. Collins, *Arab Conquest of Spain*, p.105.

[40]. Al-Maqqari, *Mohammedaan Dynasties*, p.1: 272.

[41]. Al-Maqqari, *Mohammedaan Dynasties*, p.1: 275.

[42]. Al-Maqqari, *Mohammedaan Dynasties*, p.1: 275.

[43]. Al-Maqqari, *Mohammedaan Dynasties*, p.1: 276.

[44]. Al-Maqqari, *Mohammedaan Dynasties*, p.1: 279.

[45]. Al-Maqqari, *Mohammedaan Dynasties*, p.1: 280.

[46]. Al-Maqqari, *Mohammedaan Dynasties*, pp.1: 280-81. Gayangos said he believes this pattern was so consistent because Jews in Iberia may have already been in communication with North Africans. Of the Berbers who came from North Africa, some were of Jewish descent, and allied themselves with the Jews in Spain upon their arrival. Others may have been only superficially Muslim, and retaining Jewish customs and beliefs “felt great sympathy for their former brethren” (pp.511, 531) .

[47]. Al-Maqqari, *Mohammedan Dynasties*, pp.1: 282-88.

[48]. Al-Maqqari, *Mohammedan Dynasties*, pp.1: 291, 2: 20.

[49]. Al-Maqqari, *Mohammedan Dynasties*, p.2: 41.

[50] Diego de Valera, *Crónica de España* (Salamanca, 1499). Only three copies of this book survive, including one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in Washington, D.C.

[51] 严格地说，“铁锤”查理是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宫相，并非国王。当然他是实际掌权者。后来他的儿子“矮子”丕平成为加洛林王朝的第一位国王。

[52] 佩拉约（约685~737），西哥特贵族，在穆斯林占据伊比利亚半岛绝大部分的时期，他坚持抵抗，于718年在西班牙北方一隅建立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国（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之后建立的第一个基督教政权），开始了伊比利亚半岛基督徒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失地”的历史进程。910年，阿斯图里亚斯王国一分为三：莱昂、加利西亚、阿斯图里亚斯。924年，莱昂统一了三国，从此改称莱昂王国。

[53] Al-Maqqari, *Mohammedan Dynasties*, p.2: 34.

[54] Descola, *History of Spain*, p.82.

[55] 在中世纪，北非、伊比利亚半岛、西西里岛和马耳他岛等地的穆斯林被欧洲基督徒称为“摩尔人”，他们并不一定是来自摩洛哥的穆斯林。摩尔人并非单一民族，而是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人等。“摩尔人”也被用来泛指穆斯林。

[56] 前面的脚注已经讲了莱昂王国的由来，它的后续是：1065年，东部一地区分裂出去，建立卡斯蒂利亚王国；1139年，葡萄牙地区分裂出去，建立葡萄牙王国；1230年，卡斯蒂利亚与莱昂永久性联合。

[57] 伊斯兰教所说的“有经者”指的是受神启示者，具体常指犹太人和基督徒。有经者的特征：信仰唯一神；有共同的先知，如摩西（天主教称梅瑟，伊斯兰教称穆萨）；信世界末日、死后复活、审判、天堂、天使；相信创造说。

[58] Jane I. Smith, “Islam and Christendom: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Religious Interaction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ies,” in Esposit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Islam*, pp.318-19.

[59] 阿布·阿米尔·曼苏尔（约938~1002），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的权臣和实际统治者，对基督教势力发动57场战役，攻无不克，一度是伊比利亚半岛穆斯林势力范围的世纪主宰。

[60] Jane I. Smith, “Islam and Christendom: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Religious Interaction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ies, ” in Esposit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Islam*, p.320.

[61] Jane I. Smith, “Islam and Christendom: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Religious Interaction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ies, ” in Esposit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Islam*, p.320.

[62] Dario Fernández-Morera, “The Myth of the Andalusian Paradise, ” *Intercollegiate Review* 41, no.2 (Fall 2006) .

[63] Smith, “Islam and Christendom, ” pp.22, 23, 25, 29.

[64] Al-Maqqari, *Mohammedan Dynasties*, p.2: 195.

[65] Fernandez-Morera, “Myth of Andalusian Paradise, ” p.27.

[66] Fernandez-Morera, “Myth of Andalusian Paradise, ” , pp.27-28.

[67] Bradley Smith, *Spain: A History in Art*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1) , pp.60-62, depicting works held at El Escorial.

[68] Al-Maqqari, *Mohammedan Dynasties*, pp.2: 124-25.

[69] Nancy Bisaha, *Creating East and West: Renaissance Humanists and the Ottoman Turk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 p.68.

[70] Alonso Fernández de Palencia, *Crónica de Enrique IV*, ed. Antonio Paz y Meliá (Madrid: Ediciones Atlas, 1973-75) , PP.50-52.

[71]. George Sphrantzes,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 Chronicle,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0), p.70.

[72]. 直布罗陀海峡最窄处为8.9英里，合14.3公里。

[73]. John McManners,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66.

[74]. 马拉维迪是11~19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多种货币和记账单位的名称，币值非常混乱。

二 阴影中的童年

伊莎贝拉的母亲始终没有真正恢复清醒的神智，于是，伊莎贝拉的异母兄，恩里克四世国王（有人称他为“可能是中世纪西班牙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1]）成为伊莎贝拉童年的主宰。国王的喜怒无常和心血来潮影响着她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们不确定伊莎贝拉最早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接触恩里克四世的，因为她的童年的太多细节已经湮灭在历史中。

在她的幼年，兄妹俩很少见面。伊莎贝拉的父亲驾崩的时候，她只有三岁，而弟弟阿方索还是襁褓中的婴儿。1454年，在国王驾崩后的某个时间，伊莎贝拉太后带着两个孩子退隐到一个偏僻的乡村小镇阿雷瓦洛，距离伊莎贝拉的出生地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斯·托雷斯大约15英里，远离宫廷的浮华。阿雷瓦洛也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城镇，位于阿达哈河与阿雷瓦利略河交汇处，那里有一座强大的要塞，曾有一位王后被囚禁在那里。伊莎贝拉的新家是一座拥有厚重石墙的城堡，在很高处有很小的窗户，城堡外环绕着护墙和干壕沟。这座城堡从来没有得到改建，缺乏舒适的生活条件、采光和通风。它的位置非常偏僻。与宫廷有联系的著名学者罗德里戈·桑切斯·德·阿雷瓦洛说它非常孤苦凄凉，“阿雷瓦洛是座荒凉的小镇”。^[2]恩里克四世原本希望太后和她的孩子们留在宫廷，但她拒绝了。于是国王派遣两百人作为他们的卫兵，保护他们免遭强盗和绑架者的袭击，但也将他们严密隔离起来。^[3]这个地方的环境也很严酷，冬季滴水成冻，夏

季酷热难当。白雪皑皑的瓜达拉马山就在远方，在几英里之外，与阿雷瓦洛之间隔着平坦干旱的乡村。

伊莎贝拉家庭生活的不稳定，是整个王国的动荡的缩影。恩里克四世国王的庸碌无能造成了权力真空，使得王国陷入混乱。贵族们原本可以在各自领地维护国王的统治，却变成了残暴而互相杀伐的军阀。他们恐吓农民，搜刮越来越贫困的土地。强奸、盗窃和谋杀司空见惯。

社会发生这样的瓦解，是因为伊莎贝拉幼年的伊比利亚半岛分裂为多个互相仇视的国家：伊莎贝拉的家园——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王国，占据着今天的西班牙的北部和中部；葡萄牙人占据着半岛西侧边缘的土地，直接面向大西洋。伊比利亚东部的几个王国，巴伦西亚、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结成了一个紧张的、不稳定的联邦，并通过联姻与纳瓦拉（位于伊比利亚半岛最北端边缘的一个王国）绑在一起，这些国家都面向东方，朝向地中海。摩尔人的格拉纳达王国横跨西班牙南部，从直布罗陀一直延伸到阿尔梅里亚港（这个地区被称为安达卢西亚），控制着与非洲隔海相望的地中海沿岸。

半岛没有中央权威，一片混乱，西班牙的大多数居民都像伊莎贝拉一样，住在戒备森严的建筑群或其附近。随处可见这些石制或木制防御工事，其中很多耸立在陡峭的悬崖之上，以至于半岛中部的这个王国被称为卡斯蒂利亚，即“城堡的土地”。西班牙人住在室内，躲在厚厚的石墙之后，从可作箭眼的小窗向外眺望，在天际线上寻找危险的迹象。他们始终生活在戒备状态中。伊莎贝拉长大成人的这片土地始终战乱不休。

虽然有这些困难，但伊莎贝拉也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在她童年时期，一个由精明强干的成年人组成的小圈子填补了伊莎贝拉和阿方索双亲的缺失，在他们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时期抚育和教导他们。他

们的祖辈只有一人还在世，即伊莎贝拉太后的母亲——巴塞卢什的伊莎贝拉。这位五十多岁的葡萄牙寡妇出身于富裕而强大的布拉干萨家族。小公主伊莎贝拉还在学走路的时候，外祖母伊莎贝拉来到阿雷瓦洛，和女儿的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外祖母认真地监督着家庭。巴塞卢什的伊莎贝拉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女人，阅历丰富，能够帮助塑造小伊莎贝拉的世界观，为她将来的执政做准备。据编年史家迭戈·德·巴莱拉说，她是“能够出谋划策的了不起的女人”，“对她女儿是极大的帮助和安慰”。^[4]

外祖母伊莎贝拉是葡萄牙人所说的“光辉一代”的成员，即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1358~1433）的儿女。若昂一世的长子杜阿尔特是一位哲学家^[5]；次子佩德罗是艺术赞助人；另一个儿子恩里克就是著名的“航海家恩里克”；最小的儿子费尔南多率军入侵摩洛哥，兵败战死，被封为圣徒。伊莎贝拉的丈夫是若昂一世的儿子若昂，以睿智著称，曾担任要职——葡萄牙的司厩长。伊莎贝拉也有王族血统，因为她是若昂一世国王的孙女^[6]。葡萄牙王室相信未来的关键在于航海和国际贸易，于是非常积极进取地推动这两项事业。海外扩张给葡萄牙带来许多财富，让它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小伊莎贝拉公主也受到了这方面的教育，并且将其牢记在心。

依附于卡斯蒂利亚王室的一对夫妇也将对小伊莎贝拉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妻子是伊莎贝拉的家庭教师克拉拉·阿尔瓦尔那埃斯，她是和伊莎贝拉的母亲与外祖母一起从葡萄牙来到卡斯蒂利亚的。克拉拉的丈夫贡萨洛·查孔曾是伊莎贝拉的父亲胡安二世国王的廷臣，也是国王指派掌管孩子们教育的几个人之一。查孔是伊莎贝拉太后宫廷的管理者，也曾是阿尔瓦罗·德·卢纳的管家，所以查孔和伊莎贝拉的母亲与外祖母一样，都曾参与治国理政。他们现在都已经脱离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但都曾经是权势炙手可热的人，处在政治、家族和统治相交织的核心。并且他们都雄心勃勃，渴望重返权力核心。

阿雷瓦洛城堡的总督名叫莫森·佩德罗·德·博瓦迪利亚，已婚，有三个孩子，他们成了伊莎贝拉的玩伴。^[7]两家人变得很亲近。博瓦迪利亚家族为王室效力的历史很悠久，有一位祖先曾是阿方索十一世的财政大臣，并曾作为大使去阿维尼翁觐见教皇。佩德罗的女儿比阿特丽斯差不多比伊莎贝拉年长十岁，扮演起了小公主的姐姐的角色。她秀气漂亮、能言善辩、聪明机敏，成了伊莎贝拉最忠实的伙伴和可以吐露心迹的密友。这两个女人从平平淡淡的开端，一直崛起成为西班牙的主宰。比阿特丽斯不仅仅是一位朋友。她是一个非常高明的盟友和策略家，擅长缔结联盟和拉拢新朋友。

在这些年里，宫廷档案或编年史很少提到伊莎贝拉的存在。有只言片语表明，公主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或者喜欢参观历史名胜。有一次她参观了历史上西哥特的都城托莱多。但没有人对她投去很多注意力。她渐渐长得相当漂亮、娴静和虔诚。她是第三顺序王位继承人^[8]，但在国王的眼里，她的主要价值是将来用作联姻的潜在棋子。西班牙和外国都城对她的诞生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而她的童年也是默默无闻的。话又说回来，她为什么会吸引很多注意呢？在当时，不仅在基督教文化，而且在希伯来和阿拉伯世界，女孩都是不值一提的。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女人会行使真正的权力，更不要说改变世界了。

在阿雷瓦洛，公主上课学习，变得酷爱读书。她对世界兴趣盎然，喜欢关于遥远国度怪异动植物的故事。她喜欢关于亚瑟王宫廷的故事和描述人们面对困难做出高贵行为的英雄传说（不管是神话、《圣经》故事还是传奇）。一部西班牙化的圣女贞德传记《法兰西少女》被伊莎贝拉当作指导自己举止的指南，而圣女贞德积极的虔诚也被明确描述为“比任何其他女士”的生平事迹更值得伊莎贝拉去效仿。^[9]伊莎贝拉还喜欢《伊索寓言》，这是用动物故事进行道德教训的故事集。

她的正式教育很扎实，但比较肤浅。她学习了礼仪和家政技能，并初步学习了语法、哲学和历史。她懂多种语言，能阅读法语和意大利语书籍，不仅会说卡斯蒂利亚的西班牙语，还会说葡萄牙语，即她的母亲和外祖母的语言。她像母亲一样有音乐天赋，好几样乐器都演奏得很好，唱歌也很出色。她也擅长舞蹈。

但她没有得到男人，尤其是将来要执掌朝纲的男人会得到的那种教育。例如，她幼年没有学过拉丁语，那是国际外交的语言。她很快就敏锐地认识到，这在她的教育中是一个明显的、令人尴尬的缺陷。

她学习了女红和刺绣，这在当时是教育女孩的必备课程；还学习了一位统治者的妻子需要的其他技能。她还获得了必需的社交技能。她坚强而活跃，勇敢，精通骑术。她喜欢打猎、聚会、游戏、艺术和建筑。她的行为举止被认为符合她的年龄和地位，没有得到额外的关注。

对她的未来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年里，她掌握了钢铁意志的自制力，这让她能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借机思考如何应对遇到的情况。这后来成为她的性格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她学会了保持城府、严守秘密。很快她就会意识到，这种技能是她生存的关键。

她变得非常虔诚。基督教是中世纪欧洲生活的基石，宗教是伊莎贝拉受到的教育的很大一部分。阿雷瓦洛有一座很活跃的圣方济各会修道院，所以那里总会有宗教学者。伊莎贝拉变得非常喜爱这个修会及其创始人圣方济各，他投身于清贫和简朴的生活。她认为自己的主保圣人是施洗约翰和福音书作者约翰，后者是十二使徒中唯一没有在基督教早期岁月殉难的，在以弗所照料了耶稣的年迈母亲。就是这第二位圣约翰写下了《约翰福音》，记述耶稣基督生平的四大经典之一。

她母亲的很多朋友也都笃信宗教。比阿特丽斯·德·席尔瓦，就是那个曾吸引国王注意、被锁在壁橱内、最后成为修女的葡萄牙贵族女子，也参与了伊莎贝拉的教育。伊莎贝拉母亲的一位侍女特雷莎·恩里克斯也是伊莎贝拉的教师之一。比阿特丽斯创立了一个新的女修会，圣母无染原罪会，赞颂耶稣母亲发挥的特殊的特殊的精神作用。恩里克斯特别热衷于领圣餐，因此得到了“酷爱圣餐的疯子”的绰号。在伊莎贝拉的少女时代，除了这些一对一的宗教课程之外，她还阅读了恰当的宗教书籍，如马丁·德·科尔多瓦修士的《贵妇的花园》，这是一部女性人格培养的指南，作者写书的时候特别考虑了伊莎贝拉的情况。该书强调绝对的虔诚，甚至列出了可以接受的活动的清单，包括每天做弥撒、背诵祷文、聆听布道和与教会长老讨论教义。马丁说，女性的贞洁也很重要：“即便一个女人道德高尚，若是没了贞洁，她只是风中的浮渣和灰尘；因为不贞洁的女人即便美丽，也会让自己变脏。她越是美丽，就越是肮脏和腐朽。”^[10]

* * *

但伊莎贝拉的童年过得并非如此严苛。尽管阿雷瓦洛和马德里加尔相对来讲是偏僻的小地方，附近有一座城镇成了公主最喜欢拜访的地方。梅迪纳·德尔·坎波距阿雷瓦洛12英里，骑马或骡子需要一整天，是欧洲最重要的购物场所之一。这是一个集市城镇，吸引了来自已知世界各地的商人，他们在此处买卖华贵的织物、珠宝、食品、皮具、工具、玩具、化妆品、药品、罕见香料和充满异国情调的水果。这是一座美丽的城镇，屹立着四十座教堂和修道院尖顶，街道两边是富商、金融家和贵族的豪华宅邸。^[11]它的国际化色彩很鲜明，使它成为卡斯蒂利亚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镇之一。“在整个欧洲，哪怕是意大利君主的宫廷，没有一座奢侈品市场可以和卡斯蒂利亚的市场媲美。”历史学家海梅·比森斯·比韦斯写道。^[12]

经济繁荣的来源是羊毛贸易。卡斯蒂利亚王国是养羊大国，羊毛产量很高，是该国贵族的主要财富来源，也是梅迪纳·德尔·坎波的核心商品。对伊莎贝拉和其他贵族来说，这座城镇的富庶似乎表明羊毛是稳定的财源，所以他们没有去注意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正在发展的工商业，以及那些正在改变欧洲其他国家经济的新趋势。

伊莎贝拉看到梅迪纳·德尔·坎波出售的五彩斑斓的各色商品，一定满怀渴望，因为她的家庭的财政常常很紧张。这种情况是本不应当出现的。胡安二世国王的遗嘱为孀居的太后及其儿女提供了舒适的生活条件。太后“只要保持贞洁”，就可以保留对孩子们的监护权。^[13]阿雷瓦洛、马德里加尔、索里亚和马德里郊区的税收也属于她。伊莎贝拉将得到库埃利亚尔城的税收，在十二岁生日那天将从马德里加尔城得到100万马拉维迪。她母亲去世后，马德里加尔的税赋收入也将被留给伊莎贝拉，这足以保障她舒适的生活。阿方索是王位继承人，得到的收入更为可观。他将成为圣雅各骑士团的大团长（阿尔瓦罗·德·卢纳曾占据这个油水丰厚的位置），十四岁生日那天将获得卡斯蒂利亚司厩长的职位。四座城镇的税收归他所有，并且在她母亲去世后，她曾经享有的所有城镇（除了马德里加尔）也将由他继承。

但据编年史家记载，恩里克四世国王“不尊重父亲的遗愿”，将胡安二世为了供养自己第二位妻子和子女的土地和财产都挪作他用。^[14]他把圣雅各骑士团大团长职位赏给了自己的一名亲信，并将另外一名宠臣任命为司厩长。后来他从伊莎贝拉手中夺走了库埃利亚尔的税收，将其赏给他人。学者玛丽亚·伊莎贝拉·德尔·巴尔·巴尔迪维索写道，恩里克四世“积极地活动”，剥夺伊莎贝拉理应享有的遗产，这给公主造成了“经济上的困难”。^[15]

所以，伊莎贝拉的家庭在经济上相当拮据。宫廷编年史家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记载道，伊莎贝拉童年时“严重匮乏生活必需

品”，这对渴望拥有美丽衣服和首饰的少女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她后来特别喜好华丽炫目的打扮，让外国外交官觉得她的仪表奢华得惊人。^[16]

其他迹象也表明，恩里克四世国王并不关心伊莎贝拉及其家庭的利益。胡安二世驾崩不久之后，恩里克四世去阿雷瓦洛拜见他的继母，伊莎贝拉太后。一位廷臣佩德罗·希龙陪他一同前往。此人名义上是卡拉特拉瓦修会的大团长，这是一个要求成员单身守贞的宗教和军事修会，立誓捍卫基督教信仰。但希龙可不是什么圣人，而是一个腐化堕落的酒色之徒，把自己的身份当成笑话。他的职位非常无聊，不过能够带来丰厚的收入。佩德罗的社会地位显然比太后低，恩里克四世却允许他下流无耻地追求这位二十六岁的寡妇。据编年史家阿隆索·德·帕伦西亚说，太后非常生气。此事对伊莎贝拉太后是个侮辱，也表明这位曾经的王后如今的势力是多么薄弱。她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大威胁。帕伦西亚记载道，此后，她“将自己关在一个黑暗的房间内，保持沉默，陷入抑郁，后来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17]

国王和他的朋友是怎么想的？佩德罗·希龙或许仅仅是个粗鄙之徒，但也可能是真诚地向风韵犹存的太后求爱。恩里克四世国王在干什么？新国王可能觉得这样贬低自己年轻漂亮的继母，非常好玩。他可能觉得这种场面很滑稽。

或者他有一个更阴险的动机。如果年轻而寂寞的太后接受了希龙的求爱，恩里克四世就可以说太后违反了她丈夫的遗嘱，没有保持贞洁。那么她就会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

所以此事表明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即恩里克四世及其盟友可能在某个时间曾企图控制两个孩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太后和她的母亲将孩子们留在阿雷瓦洛，避开外界的目光，在那里一待就是至少七年。

上述的丑恶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表明了恩里克四世国王性格的内在矛盾。因为他有时候很敏感，有时却是个笨拙的傻瓜。就连他的外貌也具有奇怪的二元对立。他高大魁梧，金发碧眼，手掌和手指都很粗大，“外貌凶悍，几乎像雄狮”，令人畏惧。^[18]但他的习性癖好却与粗犷的外表有很大矛盾，因为他爱好唱歌，嗓音“甜美，富于抑扬顿挫”，而且喜欢忧伤的歌曲。他的仪态粗暴生硬，却是软心肠，容易受到那些懂得如何操纵他的人的影响。他的肖像保存至今的不多，其中一幅描绘他戴着一顶装饰鲜花的帽子，侧身骑在马背上^[19]，马的身上点缀着缎带和铃铛。

恩里克四世登基伊始在卡斯蒂利亚广受爱戴，享有“慷慨的恩里克”的美誉。他建造了许多房屋，是教堂和修道院的大赞助人。我们知道他常常深思熟虑，喜欢在美丽和宁静的环境里与教士进行富有教诲意义的交谈。^[20]

他最喜爱的家是宏伟的塞哥维亚城，那里有高耸的罗马高架渠和许多美丽的教堂。自童年以来，他常在那里找到安宁与幸福。西班牙宫廷实际上是巡回的，所以他在国内不断走南闯北，但塞哥维亚始终是他最喜爱的地方。他亲热地称它为“我的塞哥维亚”，而从来不曾这样称呼卡斯蒂利亚的其他地方。在很多方面，他都格外恩宠塞哥维亚，资助公共工程和建筑项目，为当地人民提供很多就业机会，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准。塞哥维亚的市民感到自己得到了特权，并因为与王室有这样紧密的联系和因此得到繁荣而骄傲。每次他抵达这里，都会受到热烈欢迎。

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塞哥维亚就为他专门建造了一座宅邸。他始终喜爱这座宅子。它的名字是王家圣安东尼修道院，位于城郊，他从那里可以轻松进城，或去往城堡和大自然环境，因为他会花许多时间在乡村骑马，享受自然。他可能打算自己将来就葬在塞哥维亚，因

为修道院中殿旁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似乎是墓室或纪念堂的合适场地。他在塞哥维亚感到很安全。

恩里克四世也是个温和的动物爱好者，有自己的动物园，豢养着狮子、豹猫、鹿、熊崽、豹子，以及他的最爱，一头体型很大的山羊。他长期在塞哥维亚和马德里周边的森林狩猎。但他沉溺打猎，是为了逃避治国理政的麻烦。但拖延并不能解决问题，他的懒惰和对辛苦工作的厌恶使得原本很小的问题渐渐恶化。

简而言之，恩里克四世是个温和善良的人，不喜争斗，热衷于交友而不是树敌。若是生在另一个时代，他或许能成为一个备受爱戴的人。在恩里克四世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与父王针锋相对，但父王驾崩时，他守候在父王身边。他登基后最早一批决策包括允许他父亲任命的一百五十九人保留原职，而不是安插自己的亲信到这些职位上去。“先王——我的父亲已经上天堂了。我毫不怀疑，他的去世给你们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悲伤。”他对这些人说道。^[21]他还赦免了一些被流放、排挤或监禁的政敌，归还他们的财产和头衔，让他们得以又一次在国内活跃起来。

这是一个和善且宽容的人的举动，却产生了不幸的政治影响。很快，恩里克四世就被一群忘恩负义的小人包围了，他们对国王没有忠心，还觉得自己享有的闲职美差是理所应当。更糟糕的是，他的家族的敌人，尤其是阿拉贡亲戚们（他们嫉妒他的卡斯蒂利亚领地），得以自由地从事破坏他统治的叛乱行动。被国王宽恕的人不知报答，却不断想方设法地与他作对。这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时代，恩里克四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 * *

恩里克四世生活的另一个方面使得他面对攻击时特别脆弱。他喜欢和一些英俊潇洒的小伙子一起出游，这种享乐活动很频繁，时间也很长。他常在郊外的狩猎小屋与他们相会。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同性恋。只要他能生出足够多的王位继承人以确保大统的顺利传承，同性恋也不是个政治问题。但他没有孩子，而且这个时期欧洲人对同性恋的态度在变得更强硬。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人们对同性恋比较宽容，甚至将其浪漫化，但随着经济形势恶化、社会变得萧条，文化立场也开始发生变化。文艺复兴早期的享乐主义和文化繁荣也导致了保守派的反击。宗教狂热分子敦促信徒摒弃世俗的生活方式和肉体享乐，并积极地惩罚那些拒绝服从的人。例如，在伊莎贝拉出生前后一年内出生的，有两个佛罗伦萨人，画家和科学家列奥纳多·达·芬奇，他是个高调浮夸的同性恋者；另外一人是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他是一个热忱如火、清心寡欲的教士，坚决反对艺术，因为艺术促进了伤风败俗和精神腐朽。这个时代的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不仅限于西班牙。

恩里克四世国王在塞哥维亚明目张胆的同性恋行为受到了许多西班牙人的批评，甚至一些外国人也注意到了。捷克朝圣者沙塞克与一位贵族同行。恩里克四世国王在塞哥维亚的城堡款待了他们。沙塞克目睹了恩里克四世宫廷的活动，大为震惊。“他们过着这样邪恶的鸡奸生活，人们不愿意、羞于谈及他们的罪行。”沙塞克在他的旅行回忆录中写道。他回国后，这部回忆录流传甚广。[\[22\]](#)

并且，遗憾的是，就像他的父王一样，恩里克四世也对某些人过于依赖，导致这些人能够轻松地操纵他，往往会损害他自己的利益或伤害他的家人。他起初最喜爱的宠臣是胡安·帕切科，他是佩德罗·希龙（曾向伊莎贝拉太后求爱的那个人）的兄弟。

帕切科曾是恩里克四世父亲的朋友阿尔瓦罗·德·卢纳的门客，而且实际上就是阿尔瓦罗（当时阿尔瓦罗是年轻的恩里克的保护人）把他介绍到宫廷的，且得到了他父王的默许。恩里克四世登基不久后，便封帕切科为比列纳侯爵，这让帕切科得到了许多财富，并得以帮助他的兄弟（招人讨厌的佩德罗·希龙）晋身，包括帮助希龙得到卡拉特拉瓦修会大团长这个威望极高、油水极多的职位。

恩里克四世被胡安·帕切科玩弄得心醉神迷，受到他的极大影响，甚至完全被他主宰，往往造成了严重后果，因为帕切科不像阿尔瓦罗·德·卢纳对胡安二世国王那样，至少是忠心耿耿的。帕切科狡猾、奸诈、自私自利，哪怕仅仅为了一丁点好处也毫无顾忌地拼命害人。一般笔调比较温和的编年史家恩里克斯·德尔·卡斯蒂略称帕切科为“忘恩负义、暴政、难填欲壑的典型”。[\[23\]](#)

占恩里克四世便宜的不只帕切科一个人。国王的慷慨大方过了头，向他的男宠们一掷千金地赏赐礼物和特权，这些人只会变得更加贪得无厌，国王完全没有办法满足他们。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原本应属于伊莎贝拉家庭的税收和财产才被挪用，而不是因为恩里克四世故意与伊莎贝拉姐弟为敌。

恩里克四世的编年史家卡斯蒂略记载道，国王的总会计师和国库总管迭戈·阿里亚斯警示国王，说国库已经吃紧：“陛下的开销实在太多了，却没有什么收益，因为很多人完全没有在为陛下效力，也不配得到赏赐，陛下却给了他们很多；陛下最好改变习惯，只赏赐那些为陛下效劳的人，而不是那些对陛下无益的人。”恩里克四世哀伤地答道，他没有选择，因为若要维持臣民的支持，国王就必须慷慨大方。[\[24\]](#)

1454年和1455年，恩里克四世国王将宫廷临时迁往阿雷瓦洛，此时伊莎贝拉大约四岁。在这个年龄，大多数孩子开始对自己周围的世界

界有了认识。恩里克四世很快向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宣战，一时间群情激昂。根据王室惯例，恩里克四世举起了他的祖先——西哥特领袖佩拉约的旗帜。“作为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必须消灭迫害我们信仰的敌人”，他向国民如此宣讲，赢得了欢呼和掌声。^[25]很多人热切期待一场新的战争。有些人当然是出于宗教原因，但战利品的诱惑也很重要。仅仅是宣布即将开展军事行动，就为国王开拓了财源：朝廷向贵族、各城镇和教会征收额外的税赋以提供军费，而西班牙裔的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他是阿拉贡人）授权恩里克四世向士兵销售赎罪券，以此敛财。教皇后来还允许恩里克四世出售赎罪券以洗脱已经死去的人的罪孽，好让死者的亲属有机会确保他们的亲人升天堂，不管他们生前犯过什么罪行。^[26]

另外，王室即将举行一场婚礼。婚礼通常是充满节日气氛的欢乐活动，所有人都会开心。恩里克四世正在进行谈判，希望迎娶一位美丽的葡萄牙公主，名叫胡安娜^[27]，她凭借美丽的舞姿受到世人仰慕。人们对即将举行的婚礼兴奋地大谈特谈，因为恩里克四世很可能从此次婚姻中得到一个继承人。随后，恩里克四世及其廷臣又一次离开阿雷瓦洛，动身出发了，这一次是前往科尔多瓦的婚礼地点。他年幼的兄弟和妹妹没有被允许参加婚礼。

胡安娜丰满健美而风骚轻浮。1455年5月，她带着一群俊俏的葡萄牙侍女（她们穿的袍服“主要是为了露，而不是为了遮”），抵达科尔多瓦。^[28]但恩里克四世对婚礼没有多少热情，始终闷闷不乐，似乎没有“庆祝”的兴致。^[29]

廷臣们很快发现，最容易取悦年轻王后的东西，就是奢华的礼物和昂贵的娱乐活动。在科尔多瓦的一次奢侈盛宴上，一位希望讨得她欢心的主教将一只装满镶嵌宝石的戒指的碗传来传去，让胡安娜及其侍女各自挑选自己喜欢的。

恩里克四世国王能够以自由之身迎娶胡安娜，是因为他已经成功获得与前妻——他的表姐布兰卡^[30]，一位来自阿拉贡的“有德而美丽”的公主——离婚的许可。^[31]他和布兰卡的婚姻持续了十三年，从一开始就很不愉快，因为当时只有十五岁的恩里克非常害羞而笨拙，在新婚之夜未能圆房。这一晚的气氛非常紧张，布兰卡的父亲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32]，与恩里克的父亲有仇，在新婚洞房外的走廊里踱来踱去，所以年轻的夫妻未能办成事，也不足为奇。但过了十三年之后，他们仍然没有一男半女。最后恩里克四世决定与布兰卡离婚，理由就是未能圆房，他“中了邪”，和布兰卡公主亲近的时候无法勃起，十之八九是因为中了巫术。^[33]他把这一切都怪罪在不幸的公主身上，并让两名妓女来证明，他和她们睡觉的时候就毫无问题。三位教士组成的委员会批准了离婚，布兰卡被送回了阿拉贡。

但和恩里克四世的第一次新婚之夜一样，他与第二任妻子胡安娜的第一夜也未能成功。这一次，又有一群宫廷官员聚集起来，等待看沾上血迹的床单，但这一次他们又失望了。新婚之夜“让所有人都不满意”，一位宫廷人士说道。^[34]

在公开婚礼不久之后，恩里克四世和新娘去了他在塞哥维亚的家。夫妻俩在那里受到了似乎无休止的舞会、狩猎和娱乐活动的热烈欢迎。他们的时间在塞哥维亚的两个地方度过——城堡和附近的一座称为圣马丁宫的宅邸。恩里克四世对圣马丁宫进行了改建。在国王亲自监督下，城堡被“彻底翻新”，增添了许多华丽装饰。历史学家堂爱德华多·德·奥利弗-果波恩斯写道，宫廷“辉煌奢华的名声与日俱增”。^[35]

有些人对国王的建筑工程表示仰慕，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国王的这些消遣让他忽视了王国最紧迫的大事。对他的统治的批评之声越来越大。看到自己力量逐渐削弱的领袖，往往会发动战争来获取自负的

爱国主义的支持，但恩里克四世国王最终启动收复格拉纳达的战争时，这种历史悠久、久经考验的政治工具也适得其反了。

此次战争的军费来自教会信众。世人皆知，军费的很大一部分被贝尔特兰·德·拉·奎瓦贪污了（此人是一位魅力十足、风流倜傥的廷臣，深得国王和新王后的宠爱），而士兵们却没有得到军饷。^[36]恩里克四世率领宫廷人士出征后，把远征视为儿戏，而非真正的战争。轻浮的年轻王后及其侍从跟随着军队。有一次，贵妇们骑马到了战场上，胡安娜哈哈大笑地向空中射箭，表示自己参加了战争。国王似乎把战争当成一个大笑话。事实上，他收了一些北非领导人的礼物，同时却自称在攻击他们的盟友。非斯^[37]国王给他送去了西瓜、莲子和特制的马具，给他的妻子送来了麝香、乳香和香草味的香膏。^[38]久经沙场的军人和那些深谙西班牙南部伊斯兰国家意图的人感到“羞耻和愤怒”，将自己的担忧告诉了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大主教越发坚信，卡斯蒂利亚局势在日渐恶化。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仅仅几年之后，恩里克四世对穆斯林的漫不经心或和善态度在卡斯蒂利亚遭到了许多批评。有人认为他背叛了卡斯蒂利亚的文化与宗教。

考虑到当时的局势，恩里克四世的作战方式也让他成了笑料。在那个时期，战争的很大一部分行动就是打击敌人的经济，比如纵火烧毁敌人的庄稼或杀死敌人的牲畜，迫使弱势一方向强者行贿，使其退兵。这种破坏行动的部分乐趣在于，人们可以有机会从事在和平时绝对不会被允许的行为。尤其是年轻人热衷于大胆地袭击破坏，展示自己的英雄气概，与敌人直接发生接触。但恩里克四世不准部队烧毁敌人的橄榄林，因为橄榄树长成和结果需要很长时间。他教导士兵们，人和动植物的生命都是非常珍贵的，这让士兵们“瞠目结舌”。^[39]

* * *

在这些年里，恩里克四世的同父异母妹妹伊莎贝拉和弟弟阿方索同他们的母亲、外祖母与家族朋友一起，待在阿雷瓦洛。阿方索是王位继承人，因此拥有特殊地位。但他所在的小群体仍然生活在远离朝廷喧嚣的小小世界里，只听到了前线传来的只言片语。照顾他们的那群成年人——外祖母伊莎贝拉、博瓦迪利亚一家、贡萨洛·查孔夫妇，保护着两个孩子，赋予他们一些安全感和稳定性。

伊莎贝拉渐渐长大，开始对关于其他女孩及其生活的故事感兴趣，她这个年纪的姑娘往往是这样的。伊莎贝拉五岁的时候，法兰西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欧洲正在大幅度地重新审视圣女贞德这个人物，她是一位法兰西姑娘，组织自己的同胞站在一面宗教大旗下，抵抗外国入侵者。贞德出生于一个小村庄，相信自己得到了圣徒的启示，要团结法兰西人民抵抗英格兰人，并保卫法兰西王储查理。贞德让她的同胞羞愧地看到，战争不应当是中饱私囊的经济活动，也不是为了展示个人英勇，而是一种精神的使命。她被英格兰人俘获，于1431年被以异端罪处以火刑，那是伊莎贝拉出生的二十年前。^[40]贞德受到的具体指控是，在战争期间和在狱中，她穿着男人的衣服，这是被《申命记》禁止的。法兰西朝廷于1456年进行了第二次审判，重新审视了所有证据，洗脱了贞德的罪名，为她最终被封圣铺平了道路。在中世纪的最后岁月，贞德的经历和牺牲让很多虔诚的男女心向往之。各地的人们都在辩论，在贞德赢得辉煌胜利的过程中，上帝发挥了何种作用。

这种辩论对阿雷瓦洛的宫殿有特别的影响力。负责教育伊莎贝拉的一些人对贞德及其军事胜利特别着迷。卡斯蒂利亚宫廷的一位教士罗德里戈·桑切斯·德·阿雷瓦洛在贞德璨若流星的军事生涯期间居住在法兰西，对她非常景仰。伊莎贝拉的家庭总管贡萨洛·查孔（也是伊莎贝拉的家庭教师的丈夫）回忆道，伊莎贝拉的父亲曾经非常尊重地迎接贞德的使者。查孔随身携带着一封据说是贞德亲笔写下的

信，并将它像圣物一样展示。据说，查孔创作了一部匿名编年史，其中描写了一个类似贞德的人物，并说是上帝激励了她。^[41]这部编年史的一些版本，即《法兰西少女》是特意献给伊莎贝拉公主的。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法兰西少女没有死，而是欢乐地骑马走入夕阳。^[42]

伊莎贝拉身边的一些人可能把圣女贞德描绘为值得伊莎贝拉学习的楷模，是“天降”奇女子，从外国入侵者手中“挽救了国家”。^[43]贞德的事迹得到了重新审视和改编，成为女性在战争中可以效仿的角色。传播这些故事的人的目的可能是影响伊莎贝拉，让她自视为圣女贞德第二。无论如何，不管这种想法是别人灌输给她的，还是她自己想出来的，伊莎贝拉的想象力都受到了极大激发，因为她已经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某种事业牺牲的殉道者。而且她天性浪漫，喜爱和尊重那些为了天下人福祉而做出极大牺牲的英雄。更重要的是，她深切而热忱地相信奇迹和上帝的神迹。不久之后，她就会找到一些与她英雄所见略同的人，与他们合作。

但在生命的这个阶段，伊莎贝拉的主要价值仍然是王室婚姻市场上的政治棋子。1457年，她年仅六岁时，恩里克四世为伊莎贝拉和阿方索都安排了婚姻。伊莎贝拉将嫁给他们的阿拉贡亲戚胡安二世国王的幼子斐迪南。阿方索将要娶胡安二世国王最小的女儿胡安娜。^[44]对伊莎贝拉来说，这门婚事不错，但只能说是次级的选择，因为斐迪南不是王位继承人。斐迪南有一个哥哥卡洛斯，他才是阿拉贡和纳瓦拉（这两个王国与卡斯蒂利亚毗邻）的王储。能与胡安娜结婚，对阿方索来说已经很好了，因为恩里克四世相信自己将来会有自己的儿子，他将成为国王，并迎娶一位地位高贵的女子。对伊莎贝拉来说，与斐迪南结婚是不错的前景。他与她年龄相仿，据说身体健壮、讨人喜欢且机智敏锐。他也是她的远房堂弟^[45]。由于这种紧密的联系和家族内部激烈的竞争，关于这个男孩的消息经常传到伊莎贝拉耳边。

她渐渐开始相信，斐迪南是她的真命天子，她将来很可能要到阿拉贡生活。

但是，伊莎贝拉大约十岁的时候，恩里克四世宣布与斐迪南的异母兄卡洛斯缔结盟约，并提议将伊莎贝拉改为许配给他。卡洛斯热切希望巩固与卡斯蒂利亚的关系，很快同意了。于是，伊莎贝拉不再是一个同龄人的未婚妻，却被许配给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这肯定让公主很沮丧，尤其是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告诉她，她会嫁给一个同龄的帅小伙。但她没有流露出自己的心迹。事实上，大家不觉得她有资格发表意见。这种事情是她控制不了的。她的王兄对她的人身有绝对控制权，有权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将她嫁出去。在随后一年里，伊莎贝拉调整自己的心态，去应对新形势。

* * *

大约在同一时间，伊莎贝拉的生活突然发生了更为直接的突然变化。大约在1461年或1462年年初，她十岁，弟弟八岁，恩里克四世国王命令两个孩子立刻到他身边。伊莎贝拉和阿方索被突然从与母亲一起居住的安全环境中拉走，在武装护卫下被永久性地搬到了宫廷。他们从一个安定的乡村环境搬迁到一连串繁华而复杂的大都市，而这个时期正是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阶段。婚姻谈判是瞬息万变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而此种策略即将导致令人不快的结局。邻国阿拉贡的胡安二世国王，也就是卡洛斯、斐迪南和胡安娜的父亲，正在给恩里克四世国王及卡斯蒂利亚贵族制造麻烦。恩里克四世国王则在怂恿阿拉贡人反叛胡安二世国王。恩里克四世要确保自己控制着两个孩子，因为他们是婚约的主人公，也是当前的王位继承人。但其他事件也发挥了作用。卡斯蒂略是对恩里克四世最为同情的编年史家，但他也承认宫廷的某些人“图谋不轨”，想要控制两个孩子。^[46]只要恩里克四世

还没有自己的骨肉，两个孩子就是潜在的王位竞争者。而且他们是国王的继妹和继弟，所以在他的心血来潮面前显得很脆弱。

两个几乎可算孤儿的孩子来到的宫廷正在变得越来越荒淫无耻和放纵不羁。显然国王几乎完全没有抚育他们的计划。胡安娜王后太年轻，自己还乳臭未干，在宫廷里很少有年长的男子能监督她。她和侍女们放纵地与男性廷臣打情骂俏。他们的淫荡享乐激怒了年纪较长、更保守和虔诚的宫廷观察者。有一位才子描述这些女人为“慷慨的少女”，这里的慷慨指的可不是对金钱的大方。^[47]

恩里克四世也不是一个理想的家长式人物。主宰宫廷的是他的全部为男性的朋友们，包括“农夫、杂耍艺人、演员、骡夫、精明的小贩”。在非常注重阶级的社会，这样的人理应受到贵族家庭的鄙夷。恩里克四世却喜欢在私人场合与这些人结交。^[48]他喜欢摩尔人的生活方式，不坐王座，却喜欢坐在软垫和地毯上，常常头上戴头巾或斗篷兜帽。若不是卡斯蒂利亚与格拉纳达正处于战争状态，他这种矫揉造作原本会显得无害或甚至浪漫。富于魅力的年轻廷臣贝尔特兰·德·拉·奎瓦也吸引了很多注意力，尤其是在他得到国王和王后两人的恩宠之后。“他既能取悦国王，也能满足王后。”学者特奥菲洛·鲁伊斯辛辣地写道。^[49]

大约十岁的伊莎贝拉开始担任胡安娜王后的侍女，并在王后扈从队伍中观察到了宫廷的一举一动。她几乎全天候待在胡安娜身边。伊莎贝拉在很小的年纪就观察到了宫廷中泛滥的风流韵事。但她自己没有卷入其中，而是保持一种超然和不同寻常的严肃与虔诚。对这么小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姿态一定显得少年老成，肯定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在随后几年里，她仍然是王后宫廷的一员，主要居住在塞哥维亚的雄伟城堡内。^[50]阿方索的教育被交给宫廷的一位训练有素的绅士。伊莎贝拉则被交给不负责任的年轻王后来教导。

伊莎贝拉后来回忆道，这个阶段让她恐惧、孤立而凄苦。“我和弟弟阿方索小的时候，”她写道，“我们被强行地、刻意地从母亲怀抱中带走，在胡安娜王后监管下受教育……这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监护……影响很坏。”^[51]多年后，她在给哥哥恩里克四世的一封信中写道，她当时为了保护自己，尽可能隔绝自己：“为了避开你的不道德行为，我留在宫中，保护自己的荣誉，为自己的生命提心吊胆……在上帝恩典下才活下来。”^[52]

她学会了从宗教中寻找慰藉。终其一生，宗教都是她的避风港。西班牙最著名的教士之一恰好住在塞哥维亚城堡山坡下的修道院内，他的显赫家世让他得到很大尊重。他是多明我会的修士，穿着简朴，克己复礼，常常隐居在一座洞穴内安静地冥思。他的叔叔是一位著名的红衣主教，住在罗马，但他没有和富有的叔叔一起生活，而是留在国内，在当地社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关键作用。他的名字是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后来在伊莎贝拉和阿方索的童年时期成为他们的忏悔神父（至少是间或地担当这个角色）。

伊莎贝拉信任这样一位理智而清醒的当地教士，不足为奇。两个孩子都需要尽可能地寻找强有力的盟友。

* * *

宫廷传来了更多消息。让大家都颇感意外的是，胡安娜王后终于怀孕了。1462年2月，她生下了大家期待已久的继承人。胡安娜分娩的时候，伊莎贝拉作为她的侍女之一，也在场。根据宫廷礼仪的特殊规定，王后必须蹲着分娩，两侧站着一群观察者。王后在阵痛中挣扎的时候，一名贵族扶着她的身体。王后一侧站着国王的宠臣胡安·帕切科，观察分娩过程。另一侧是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和另外两名显贵。这次分娩并不顺利，生了一个女儿，按照家族的习惯（用父

母的名字给孩子命名），取名为胡安娜。不久之后，婴儿在卡里略手中接受洗礼。伊莎贝拉公主担任孩子的教母。[\[53\]](#)

恩里克四世国王之前的性生活不成功，所以有人窃窃私语，怀疑这孩子不是国王的血脉。恩里克四世在第一段婚姻的十三年里一直性无能，所以大家会产生这样的怀疑。不过他后来可能治愈了自己的不育症。在这些年里到访西班牙的德意志医生希罗尼穆斯·闵采尔说，他听说，恩里克四世的“阳具根部细而弱，但前端很大”，所以他很难维持勃起，但王后接受了人工授精，即将装满恩里克四世精液的金管插入她的阴道。[\[54\]](#)然而一些接受过咨询的犹太医生相信恩里克四世患有无法治愈的不育症。

恩里克四世自己的行为也更加招致人们议论纷纷。在胡安娜出生一周之内，他封贝尔特兰·德·拉·奎瓦为莱德斯马伯爵，这对一位出身比较寒微的贵族来说是很重大的新荣誉。这让宫中风言风语更加猖獗。

为了庆祝胡安娜的诞生，举行了很多庆祝活动，包括一场比武大会。5月，恩里克四世将贵族们召集到马德里，令其向新生的公主宣誓效忠。7月，王国议会在托莱多开会，重复了效忠誓言。

卡斯蒂利亚贵族们向新出世的公主效忠，视其为当然继承人。但因为恩里克四世在与布兰卡离婚时的证词中说自己性无能，他的政敌很快开始质疑胡安娜的合法性和继承权。他们把这孩子称为“贝尔特兰之女胡安娜”，贝尔特兰就是那个双性恋廷臣。恩里克四世的密友胡安·帕切科在向公主宣誓效忠的当天，写了一份文件，质疑这孩子的王位继承权，并在文件上签名。在这份声明中，帕切科说他是因为“畏惧”国王才宣誓的，但“不打算……也不愿意危害王国的大统传承”。[\[55\]](#)

怀疑女婴的血统，自然是有一些理由的。胡安娜王后的招蜂引蝶令人怀疑她的贞洁。人们开始回忆起一个特殊的事件，当时有外国外交官在场见证：德·拉·奎瓦参加了一场比武，刻意戴着字母“J”符号，即他为之奋战的女士的名字的首字母。很多人推测，他的爱情对象就是王后胡安娜（Juana）。[56]

在这种风流韵事、流言蜚语的环境中，伊莎贝拉几乎无声无息，不引起任何注意。但她的名字常常作为潜在外国联盟讨价还价的砝码，出现在对话中。她成了一个又一个政治阴谋的棋子，尤其是在1461年之后，阿拉贡的太子卡洛斯（也就是她的未婚夫）突然去世之后。卡洛斯的死亡为恩里克四世提供了新的机遇，因为胡安二世国王在阿拉贡王国不得人心。一群加泰罗尼亚[57]人提议，卡洛斯死了之后，恩里克四世应当成为阿拉贡的下一位国王。恩里克四世喜欢这提议。这种争议很容易造成流血谋杀，因为卡洛斯的父亲，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仍然健在，他可不喜欢这种设想。

胡安·帕切科按照他一贯的两面耍滑的手段，提议请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他因为精明狡猾而获得了一个新绰号“万能蜘蛛”）调停阿拉贡的继承纠纷。这就给了法兰西国王一个良机，而帕切科也会得到丰厚的报偿。在帕切科敦促下，恩里克四世愚蠢地同意了。随后路易十一国王也接受了阿拉贡的慷慨贿赂，转而支持卡洛斯的父亲，而不是恩里克四世，令后者恼羞成怒。这让帕切科和恩里克四世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也让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和法兰西都争吵起来。

如今恩里克四世需要新的盟友，一个能够为他提供军事援助的新的王国。1463年，他开始与英格兰谈判。一时间，这个遥远国度的婚姻提议为年轻的伊莎贝拉公主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性。英格兰大使来到西班牙，希望她能与“欧洲条件最好的单身汉”——英俊潇洒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喜结良缘。[58]

似乎，卡斯蒂利亚的御妹伊莎贝拉不久之后将成为英格兰王后。

[1]. Ana Sánchez Prieto, *Enrique IV el Impotente* (Madrid: Alderabán Ediciones, 1999) , p.7.

[2]. Peggy K.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18.

[3]. Peggy K.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20.

[4]. Diego de Valera, *Crónicas de los reyes de Castilla: Memorial de diversas hazañas. Crónica del rey Enrique IV*, 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Madrid: Espasa-Calpe, 1941) , doc.33, cited Peggy K.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14.

[5]. 后成为葡萄牙国王，1433~1438年在位。

[6]. 巴塞卢什的伊莎贝拉的父亲是布拉干萨公爵阿方索，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儿子。她嫁给了自己的叔叔。

[7]. Condesa de Yebes, *La Marquesa de Moya: la dama del descubrimiento* (Madrid: Ediciones Cultura Hispánica, 1966) , p.13.

[8]. 排在她前面的是国王的女儿和伊莎贝拉的弟弟阿方索。

[9]. *La Poncella de Francia*, cited in Nancy Bradley Warren, *Women of God and Arms: Female Spirituali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1380-160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 p.107.

[10]. Friar Martín de Córdoba, p.94, cited in Nancy Bradley Warren, *Women of God and Arms: Female Spirituali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1380-160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 p.107.

[11]. Antonio Blanco Sánchez, *Sobre Medina del Campo y la reina agraviada* (Medina del Campo: Caballeros de la Hispanidad, 1994) , pp.76-77 and 94-99.

[12]. Jaime Vicens Vives, “The Economies of Catalonia and Castile, ” in *Spai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1369-1516: Essays and Extracts by Historians of Spain*, ed. J.R.L.Highfield, trans. Frances M. López-Morillas (New York: Harper&Row, 1972) , p.43.

[13]. *Memorias de Don Enrique IV de Castilla. vol.2, La colección diplomática del mismo rey*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Historia, 1835-1913) , doc.96, cited in Liss, *Isabel the Queen*, p.17.

[14]. “Ciertó es que el nuevo monarca, Enrique IV, que subió al trono en 1454, no respetó los deseos paternos y entregó el maestrazgo de Santiago a su favorite Beltra’ n de la Cueva y el cargo de condestable a otro de sus fieles, Miguel Lucas de Iranzo.”

[15]. 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 “Isabel, Infanta and Princess of Castile, ” in *Isabella la Católica, Queen of Castile: Critical Essays*, ed.by David A.Boruchoff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p.42.

[16]. Liss, *Isabel the Queen*, p.13.

[17]. Alonso Fernandez de Palencia, *Crónica de Enrique IV*, ed. Antonio Paz y Meliá (Madrid: Ediciones Atlas, 1973-75) , dec.1, bk.3, chap.2, cited in Liss, *Isabel the Queen*, p.14.

[18]. Diego Enríquez del Castillo, *Crónica de Enrique IV*, ed Aureliano Sánchez Martín (Valladolid: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1994) , pp.133-35.

[19]. 用横鞍侧身骑马（两腿都放在马匹一侧），通常是贵族女性骑马的方法。

[20]. Diego Enríquez del Castillo, *Crónica de Enrique IV*, ed Aureliano Sánchez Martín (Valladolid: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1994) , p.134.

[21] Diego Enríquez del Castillo, *Crónica de Enrique IV*, ed Aureliano Sánchez Martín (Valladolid: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1994) , pp.138-39.

[22] Malcolm Letts, ed. and trans., *The Travels of Leo of Rozmital Through Germany, Flanders, England, France, Spain, Portugal and Italy, 1465-1467*. Hakluyt Socie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 p.96.

[23] Enríquez del Castillo, *Crónica de Enrique IV*, p.248.

[24] Enríquez del Castillo, *Crónica de Enrique IV*, p.163.

[25] Enríquez del Castillo, *Crónica de Enrique IV*, pp.146-47.

[26] Liss, *Isabel the Queen*, p.48.

[27] 葡萄牙国王杜阿尔特的女儿。

[28]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 p.29.

[29] Alonso de Palencia, “Fiesta, ” in *Crónica de Enrique IV*, ed. Antonio Paz y Meliá (Madrid: Atlas, 1973) , p.75.

[30] 恩里克四世的母亲（阿拉贡的玛丽亚）与布兰卡的父亲（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是姐弟，他们的父亲是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一世。

[31]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469-1476*, ed. Julio Puyol (Madrid: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934) , p.55.

[32] 请读者注意，不要与恩里克四世的父亲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混淆。

[33] Emilio Calderón, “Maleficio, ” in *Usos y costumbres sexuales de los Reyes de España* (Madrid: Editorial Cirene, 1991) , p.70.

[34] *Memorias de Don Enrique IV de Castilla*, vol.2, p.638.

[35] Eduardo de Oliver-Copóns, *El Alcázar de Segovia* (Valladolid: Imprenta Castellana, 1916) , pp.99-105.

[36] Purcell, *Great Captain*, p.32.

[37] 非斯是今天摩洛哥的第二大城市，一度是首都，也指摩洛哥北部地区。在本书涉及的时代，非斯王国指的是统治摩洛哥的柏柏尔人的马林王朝，其首都就是非斯。

[38] Purcell, *Great Captain*, p.31.

[39] Nancy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1991) , p.25.

[40] Felix Grayeff, *Joan of Arc: Legends and Truth* (London: Philip Goodall, 1978) .

[41] Liss, *Isabel the Queen*, p.18.

[42] Warren, *Women of God and Arms*, pp.89, 106-18.

[43] Nancy Bradley Warren, “La Pucelle, the ‘Puzzel,’ and La Doncella: Joan of Arc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Spain, ” presentation at the 4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 Kalamazoo, Mich., May 12-15, 2011.

[44] Liss, *Isabel the Queen*, p.52.

[45] 伊莎贝拉的祖父（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三世）和斐迪南的祖父（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一世）是兄弟，都是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一世的儿子。

[46] Enríquez del Castillo, *Crónica*, p.183.

[47] Purcell, *Great Captain*, p.29.

[48]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p.23.

[49] Teofilo Ruiz, *The Other 1492: Ferdinand, Isabella and the Making of an Empire* (Teaching Co., 2002) .

[50]. Liss, *Isabel the Queen*, p.53.

[51]. *Memorias de Don Enrique IV de Castilla*, vol.2, p.638.

[52]. Isabel I of Castile, letter of March 1471, in *Memorias de Don Enrique IV de Castilla*, vol.2, cited in Liss, *Isabel the Queen*, p.60.

[53]. Liss, *Isabel the Queen*, p.53.

[54]. Liss, *Isabel the Queen*, p.47.

[55]. Nancy F.Marino, *Don Juan Pacheco: Wealth and Power in Late Medieval Spain* (Tempe: 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06) , p.92.

[56].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pp.31-32.

[57]. 此时加泰罗尼亚是阿拉贡王国的一部分，在今天西班牙的东北角。

[58]. Charles Derek Ross, *Edward IV*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p.84.

三 令人胆寒的岁月

1464年，伊莎贝拉还不到十三岁的时候，她的哥哥恩里克四世接受了英格兰的提议，同意将她许配给爱德华四世国王，以缔结两国之间的政治联盟。^[1]伊莎贝拉将成为王后。

这可能是恩里克四世的一个慷慨举动，为的是给自己的同父异母妹妹争得美好的未来。伊莎贝拉和恩里克四世互相之间不时流露出明显的亲情。他们都喜爱音乐，有时他会唱歌，让她伴着音乐跳舞。他们还有其他一些共同兴趣——骑马、打猎、深刻而高水平的谈话。他们还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但是，与英格兰国王的婚约也许是因为恩里克四世企图将伊莎贝拉排挤出卡斯蒂利亚的王位继承体系，将她迁往遥远的外国，尤其是当时有传闻人们在质疑胡安娜的合法性。

不管恩里克四世的动机是什么，与英格兰国王结婚的前景会让大多数少女心花怒放。二十二岁的约克的爱德华刚刚登上英格兰王位。他魅力十足、金发碧眼、身强力壮，身高6英尺4英寸^[2]，聪明机敏，擅长宫廷的狩猎和比武游戏，穿着雅致的毛皮大衣，佩戴富丽的首饰，并且热爱骑士罗曼司。这些特点结合起来，让女人们无法抗拒他的魅力，而好色的年轻国王也热情洋溢地在风月场纵横捭阖。

即便排除廷臣照例奉上的阿谀奉承，爱德华四世也吸引到了一些真诚的赞誉。“他外貌英俊……非常有君主气派……面容俊秀，身材魁梧，健壮，清爽，”托马斯·莫尔爵士写道。德意志旅行家加布里

埃尔·特策尔于1466年写道：“他远远超过其他所有人。”就连他的批评者也承认，他非常俊美。法兰西廷臣菲利普·德·科米纳^[3]则称：“我不记得见过更英俊的君王。”^[4]

嫁给爱德华四世的前景，对喜爱打猎和宫廷爱情故事的伊莎贝拉一定是特别诱人甚至是令她眼花缭乱的美事。她将得到一位了不起的丈夫，成为全天下的嫉妒的对象，并且她将成为英格兰王后。何况她与英格兰也有血统上的联系。伊莎贝拉相信西班牙和英格兰有与生俱来的王朝血脉亲缘。她的祖母是兰开斯特的凯瑟琳，而凯瑟琳的父亲是英格兰著名的大贵族冈特的约翰（爱德华三世的儿子），约翰娶了卡斯蒂利亚的康斯坦丝^[5]，所以对卡斯蒂利亚王位也有权力主张。爱德华四世是冈特的约翰的后代^[6]，所以他是伊莎贝拉的远房亲戚。如果这门亲事顺利结成，旧的亲戚关系又重新续上了。

这门婚事为英格兰也能带来一些战略机遇。爱德华四世是“残酷的”佩德罗国王的女儿^[7]的后代，所以他对卡斯蒂利亚王位也有权力主张，如果他再娶了伊莎贝拉，他的继承权就更有力了。英格兰诗人们已经在写打油诗，颂扬爱德华四世不仅是英格兰国王，理应享有法兰西王位，还将成为西班牙王位的继承者：“英格兰和法兰西都是你的，你为何否认？西班牙那美丽国度也属于你。”^[8]

婚姻的建议提出后，伊莎贝拉便在家中等待决定。当时交通困难，从一个朝廷送消息到另一个的朝廷可能要花几个月，因为廷臣们必须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但最后让她大失所望的是，爱德华四世以极其不寻常的方式，选择了另一个女人。

英格兰的谋臣们在法兰西和西班牙为爱德华四世谋求婚姻，然而他们被蒙在鼓里，因为国王已经非常冲动地娶了一个美丽的寡妇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她是少数成功抵挡住国王求爱攻势的女人之一。既然搞不到手，在狂热之中，他选择了将她娶进门。1464年4月30日，他

们在她家族友人的家中秘密结婚，参加婚礼的人很少。^[9]爱德华四世一定很快就对自己的私订终身后悔了，因为他在随后六个月里隐匿此事。就连他的朋友们也不知道此事。

这种局面让在国外为他谈判与外国公主结婚条件的大臣们更为尴尬。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直到1464年10月10日才被正式通知爱德华四世的秘密婚姻。商讨让路易十一的妻妹博娜嫁给爱德华四世的谈判已经持续了六个月。爱德华四世的重要盟友沃里克伯爵之前代表他在法兰西谈判，这下子遭到了极大羞辱，十分愤怒，因为他在“积极促成”英法联姻的时候，国王竟欺瞒了他。^[10]一位英格兰编年史家如此描述沃里克伯爵的反应：“沃里克伯爵回国之后得知此事，大为不悦。”^[11]

英格兰国王勇敢骄傲，但目光短浅而喜好寻欢作乐。如果伊莎贝拉能够嫁给他，赢得他的心，并辅佐他治国理政，那么欧洲历史会在很多方面改写，英格兰和卡斯蒂利亚两国都可能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爱德华四世的婚姻给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因为他娶的那个女人“贪得无厌，野心勃勃地扩张她的家族的利益，暴躁易怒，心胸狭隘”。^[12]她也是兰开斯特派^[13]（约克王朝的敌人）的一员。为了取悦妻子，爱德华四世不得不为她在前一段婚姻中生的两个孩子、五个兄弟和七个未婚姐妹在宫廷安排职位。和恩里克四世国王一样，爱德华四世最后被奸佞小人团团包围。他派往法兰西的使臣和曾经的盟友沃里克伯爵因为受骗而大怒，转而反对他。爱德华四世的王朝幻梦粉碎了，尽管他和伊丽莎白生了十个孩子。他驾崩后，他的两个年纪最大的儿子，分别是十岁和十三岁，神秘地失踪，据说在伦敦塔被身份不明的人杀害。^[14]

在遥远的卡斯蒂利亚，还是小姑娘的伊莎贝拉因为自己被抛弃而愤怒，多年后告诉外国使节，她竟然被“英格兰的一个寡妇”给比了

下去。这清楚地说明她在随后的二十年中仍然为自己被抛弃而感到怨恨。和伊丽莎白·伍德维尔一样，她也不会容忍怠慢冷落，更不会宽恕侵害自己的人。^[15]伊莎贝拉除了那些好的品质之外，也逐渐养成了一种强硬的作风。这帮助她在童年和少女时代的重重困难中生存下来，但也让她变得严苛和冷酷。

恩里克四世在等待英格兰的消息时，开始猜到这门婚事不会成功，于是开始考虑将伊莎贝拉嫁给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他是一位战争英雄，若得到他的支持，卡斯蒂利亚的国防会更为巩固。这样的婚事同样能够有效地将伊莎贝拉迁出卡斯蒂利亚王国，免得她妨碍小胡安娜继承王位，同样还可以改善与葡萄牙的关系。而且葡萄牙已经有一位继承人，即阿方索五世的儿子若昂。所以，若昂的孩子将统治葡萄牙；胡安娜的孩子将统治卡斯蒂利亚。而伊莎贝拉的孩子不会继承任何一个王位。

1463年4月，恩里克四世将刚刚十三岁的伊莎贝拉和胡安娜王后带到了埃尔蓬特—德尔阿索维斯波（卡斯蒂利亚中西部，靠近葡萄牙边境），去会见阿方索五世国王。三十一岁的葡萄牙国王大腹便便、人到中年且自命不凡，对自己的小亲戚“颇为钟爱”。而伊莎贝拉在王后和她自己母亲（是葡萄牙人）的压力下，无疑也是为了争取时间、等待英格兰联姻的消息，机巧地或者天真地让葡萄牙国王相信，她也喜欢他。^[16]这是她犯的一个错误。

但恩里克四世国王在卡斯蒂利亚的支持率在猛跌，而他提议的与葡萄牙的联姻也不得民心。尤其是，有两个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有钱有势的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已经厌倦了恩里克四世摇摆不定的领导。他还支持那些百般嫉妒恩里克四世的阿拉贡亲戚，早就希望引导卡斯蒂利亚的公共政策，去亲近阿拉贡而非葡萄牙。同时，胡安·帕切科因为自己的宠臣地位被其他人取代而恼羞成怒。卡里略

和帕切科开始煽动针对恩里克四世的叛乱。首先，他们打算控制年轻的阿方索王子和伊莎贝拉公主，于是坚持要求得到两个孩子的监护权，表面理由是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警示称，有“图谋不轨”的人企图杀害阿方索，并将伊莎贝拉嫁出去，“以便将我国的继承权交给一个没有资格的人”，他们指的是小胡安娜。^[17]

他们向全国发表公开信，并广泛传播，宣布自己与国王决裂。这封公开信被称为《布尔戈斯声明》，流露出对国王的鄙夷和嘲讽，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他们要求恩里克四世解散他的摩尔人卫队，指控这些卫兵强暴男人和女人；要求恩里克四世摒弃他的新宠臣贝尔特兰·德·拉·奎瓦；并不再假装胡安娜是自己的合法孩子。声明中写道：“显而易见，她不是陛下的女儿。”^[18]

恩里克四世总是急于抚慰自己的批评者，于是屈服于帕切科和卡里略，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甚至剥夺了自己女儿的王位继承权，将继承权交给了他的异母弟阿方索：“诸位周知，为避免任何形式的丑闻……我宣布本王国的合法继承权属于我的弟弟阿方索王子，不属于其他任何人。”贝尔特兰被送走。在卡韦松举行的一次典礼上，贵族们宣誓效忠，支持阿方索为继承人。圣雅各骑士团大团长的职位也被转给阿方索。阿方索被交给比列纳侯爵胡安·帕切科监护，后者在恩里克四世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也发挥了关键作用。^[19]

* * *

这是阿方索人生的一个不幸阶段，因为有传闻说他在帕切科监护下遭到了虐待，甚至遭到性侵。编年史家帕伦西亚称，帕切科是恋童癖，企图引诱阿方索，以便更容易摆布他。很多人相信，恩里克四世自己小的时候就遭到过性侵。事实上，到此时，特拉斯塔马拉王朝^[20]已经有三人据说遭到过性侵：胡安二世与他的两个儿子恩里克四世和如今的阿方索。

这有可能是真的。用性来操纵政治家和其他权贵的事情历史悠久，屡见不鲜。在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的故事里，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事实似乎能够说明，确实存在性侵儿童的丑事。恋童癖者常常在受害者年纪很小的时候下手，常常几乎在其父母或监护人的眼皮底下，用所谓“栽培”的模式勾引受害者，在与其发生性关系之后，在其他方面也主宰受害者。伊莎贝拉家族的男人们确实有被侵害的典型特征。在三个案例中，受害者的父母都不在场，或者被严重问题纠缠而不得脱身，使得男童的生活中出现一个空白。恋童癖者在这些条件下如鱼得水。

伊莎贝拉的父亲胡安二世国王受到十八岁的阿尔瓦罗·德·卢纳影响时，只有六岁。德·卢纳很快就开始在孩子的床上睡觉。胡安二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而他的母亲正忙于统治一个处于可怕内乱中的国家；阿尔瓦罗起初对男孩表示关怀的时候，她还很感激。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写道：“国王不分昼夜，都和堂阿尔瓦罗·德·卢纳待在一起。”^[21]但据历史学家特奥菲洛·鲁伊斯记载，后来太后发现胡安二世与德·卢纳的关系变得太“亲密”。她命令“将堂阿尔瓦罗送离宫廷，后来在儿子的恳求和坚持下才允许他回来”。^[22]

阿尔瓦罗是一名贵族的私生子，父亲对他丝毫不关心。他被从母亲身边带走，在他的叔叔——天主教教皇^[23]家中被抚养长大，身边环绕着一群因守贞誓言而不能结婚的教士。阿尔瓦罗·德·卢纳英俊潇洒，有魅力，温和可亲；他最终结了婚，生了孩子。但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虽然很多女人喜欢他，他却没有公开地与其中任何一个有过瓜葛。他鼓励其他人相信，这证明了他对宫廷贵妇超乎寻常的殷勤。但这也许说明他的性兴趣主要在别的方面。例如，在阿尔瓦罗家中，有一个颇不寻常的男孩胡安·帕切科担任侍从。帕切科重复了阿尔瓦罗·德·卢纳设定的模式。

胡安二世国王长大成人、结婚生子（恩里克）之后，阿尔瓦罗·德·卢纳将胡安·帕切科（年纪比恩里克大六岁）介绍给年轻的王子，将他安插在王子家中。很快，胡安·帕切科就牢牢控制了恩里克，就像当初阿尔瓦罗迷住恩里克的父亲一样。

阿尔瓦罗·德·卢纳和胡安·帕切科分别对胡安二世和恩里克四世施加了相当程度的个人影响。这非常引人注目，以至于有人说这是巫术。这种现象在恋童癖者与其受害者之间是常见的。这种性行为不是浪漫，而是一种侵害。侵害者常常通过羞辱受害者来获得愉悦，有时在公共场合羞辱受害者，目的是展示自己对受害者的主宰。受害者常既感到愤怒又觉得羞耻，因为有的时候性行为会给他们快感。年幼时被性侵过的人成年之后常常难以维持感情关系，要么太容易产生性兴奋，要么变成性无能。另外，受害者常因为负罪感而变得非常虔诚，为了他们眼中自己的错误造成的罪孽寻求救赎。

生活在胡安二世宫廷的一位编年史家写道：“胡安二世……始终受到堂阿尔瓦罗·德·卢纳的影响，直到在贵族们的压力下，国王泪流满面地下令将他斩首。”^[24]另一位编年史家补充道：胡安二世“性格软弱，易受暗示影响，到了可耻地屈服于”堂阿尔瓦罗·德·卢纳的地步。^[25]当然，这种关系对伊莎贝拉的母亲来说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她拼命努力让丈夫摆脱阿尔瓦罗的魔咒，随后眼睁睁看着丈夫因为阿尔瓦罗的死而陷入黑暗的抑郁。

几十年后，恩里克四世和胡安·帕切科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恩里克四世的一位编年史家是目击证人，他说，在胡安·帕切科影响下，“凌辱和享乐成了国王的习惯”。他成了“堂胡安·帕切科的被动的工具。帕切科是阿尔瓦罗·德·卢纳刻意安插在国王身边的……没有一件事情不需要堂胡安·帕切科的命令”。^[26]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甚至说帕切科是“天生的怪物”。^[27]历史学家费尔南多

• 德尔·普尔加尔^[28]称，恩里克四世在十四岁时被人教会了“不得体的享乐”，因为他没有性经验，所以无法抵御这种快乐。^[29]

对胡安二世和恩里克四世来说，国王与宠臣之间的关系都引发了批评和讥讽，这损害了国王的权威，导致国内出现针对国王的公开敌意。即便为了一点点好处，胡安·帕切科也毫无顾忌地杀人，有时会有无辜的旁观者因为他的阴谋诡计而丧命。

* * *

但在这个阶段，长期蒙受胡安·帕切科羞辱的恩里克四世国王怒气冲冲，出乎意料地开始抵抗帕切科的控制。不幸的是，这导致了恩里克四世的末日。恩里克四世将他的新宠堂贝尔特兰召回宫中，进一步提升他的地位，让他不仅是一位伯爵，还成为阿尔布开克公爵。对卡斯蒂利亚的很多人来说，这是致命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大群贵族愤怒地爆发了。布尔戈斯、塞维利亚、科尔多瓦，甚至古都托莱多，都揭竿而起，反对恩里克四世。国王撤退了，躲在塞哥维亚。他的头号死敌竟然是高级教士、好战的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恩里克四世写信给大主教，请求他的支持。卡里略简慢无礼地对信使说：

“回去告诉你的国王，我烦透了他和他的事情。我们现在要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卡斯蒂利亚之王。”^[30]

1465年6月5日，在一场命运攸关的革命中，贵族们聚集在高墙环绕的阿维拉城，举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典礼。他们制作了一个假人，代表恩里克四世，发动政变，将他废黜。代表国王的真人大小的假人被放在高台的椅子上。一名贵族走上前来，将王冠从假人头顶上打落。另一名贵族取走了权杖。这是一场展示给公众的仪式，就像阿尔瓦罗·德·卢纳被处决虽然是真的，但也是象征意义的事件一样。假人被踢倒在地。典礼的最后步骤是，十二岁的阿方索王子被带到广场，由官员抬在肩膀上，王冠被戴在他头上。反叛者现在控制了一个

孩童，作为王位竞争者。恩里克四世身边的廷臣之所以坚持要求控制御弟的原因，一下子变得很清晰了。

恩里克四世国王大为恐慌，面对这攻击简直毫无还手之力。叛军的行动不仅仅是在戏仿卡斯蒂利亚的王位传承大统，简直就是亵渎神灵。他措手不及，急于获得盟友，因为王国的许多主要贵族参加了阿维拉的叛乱。这正中胡安·帕切科的下怀。他向恩里克四世承诺，他可以将阿方索还给他，并率军来保卫国王，条件是恩里克四世必须允许他的兄弟佩德罗·希龙（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大团长）迎娶伊莎贝拉公主。这个超乎寻常的提议如果落实，一旦阿方索死亡且胡安娜的合法性仍然受到质疑，帕切科家族就进入了王位继承体系，甚至能让他们统治卡斯蒂利亚。

这个建议成了高层次磋商的议题，显然说明伊莎贝拉已经不再处于被人遗忘的阴影中。恩里克四世国王的象征性被废，意味着她也成了最高统治权的竞争者之一。从这以后，伊莎贝拉的存在就成了宫廷编年史家感兴趣的话题，她的活动也得到了更详细的记载。国王在胡安娜合法性的问题上屈从于贵族之后，胡安娜的继承权就彻底消失了；现在恩里克四世自己的统治权也受到了挑战。

恩里克四世国王又一次屈服了。这位意志薄弱的国王始终可怜兮兮地热切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他同意了胡安·帕切科的提议，将十五岁的妹妹许配给了一位修会领导人，后者虽然宣誓要守贞，其实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恩里克四世派遣了一名使者去拜见教皇，请求允许希龙不再遵守所谓的守贞誓言。^[31]

现在轮到伊莎贝拉惊恐了。仅仅在一两年之前，她还相信自己将要嫁给欧洲最受人仰慕的年轻国王之一；现在她却被卖给了一个常常寻花问柳的堕落淫棍。何况他的出身比她低微得多，年龄却比她大得

多。令人尴尬的是，佩德罗·希龙还曾向伊莎贝拉的母亲发起下流的求爱。

佩德罗·希龙骑马奔向伊莎贝拉所在的马德里，急于将她收入囊中。这是伊莎贝拉人生中被宫廷档案详细记载的第一件事情。编年史家写道，她恳求上帝的佑助和指引，哀求躲过这门婚事，跪着祈祷几乎两天之久。^[32]绝望之下，她请求上帝用死亡来阻止这门婚事，要么是她死，要么是佩德罗·希龙死。

她家中的亲信和侍从同样被新的形势震惊和激怒了。据某些故事说，伊莎贝拉的忠实朋友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抓起一把刀，发誓要杀掉佩德罗·希龙。但幸运的是，至少对伊莎贝拉的支持者和编年史家来说幸运的是，希龙暴毙了。他匆匆赶来娶伊莎贝拉，但在途中扁桃体严重感染，阻碍呼吸，就这么死掉了。希龙突然而出乎意料的死亡让伊莎贝拉及其朋友长舒了一口气。后来，在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甚至有人开始说，这是一个奇迹。

* * *

伊莎贝拉公主被送到恩里克四世最巩固的基地，美丽的塞哥维亚城，那里的雄伟城墙、牢固要塞和高踞于崎岖悬崖之上的位置给了它固若金汤的形象。希龙的死亡解除了她的恐惧，但也对恩里克四世和卡斯蒂利亚贵族之间的和平谈判造成了致命打击。阿方索仍然在贵族手中，并继续宣称对王位的权力主张，而敌意又一次公开爆发。伊莎贝拉躲在塞哥维亚，由恩里克四世的妻子胡安娜王后陪伴。此时胡安娜更像是伊莎贝拉的狱卒，而不是伴侣。长期以来，年轻的王后对伊莎贝拉视若无物，但如今伊莎贝拉对她、她的丈夫和女儿构成了威胁。所以，伊莎贝拉处于如履薄冰的境地，有些廷臣担心王后会杀害她。

塞哥维亚的紧张气氛蔓延到整个王国。所有人都必须在恩里克四世和年轻的竞争者阿方索之间做出选择，零星的暴力活动演化成了内战。“整个王国都拿起武器，陷入流血冲突：没有一个贵族或一座城市保持中立。”编年史家迭戈·德·科梅纳雷斯写道。^[33]

各地陷入混乱；犯罪分子利用这种局面兴风作浪。这一年，有一群来自中欧的贵族到西班牙朝圣，他们得到了一位嫁给神圣罗马皇帝的葡萄牙公主^[34]发放的安全通行证，但这几乎一点用也没有。他们报告称，在西班牙极北部的卡达瓜河两岸遭到了一群由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组成的匪徒的袭击，后来用钱买命才逃脱；在毕尔巴鄂附近的巴尔马塞达，他们险些被谋杀，又一次不得不用钱买命；在奥尔梅多，武装匪徒三次企图冲进他们借住的房子，他们离开房子时，匪徒用石头击打他们，企图激怒他们，然后就有借口发动更公开的袭击。一名朝圣者失踪，据信被绑架到穆斯林的领土，被卖为奴隶；在巴塞罗那附近的莫林斯·德雷伊，他们险些被当地一群搜寻犯有谋杀罪的陌生人的义务警员处决。这群朝圣者离开伊比利亚半岛之后去了意大利，觉得那里的生活比在西班牙安全多了。

1467年8月，阿方索的军队和恩里克四世的军队在奥尔梅多附近发生冲突，但没有分出胜负。阿方索王子时年十三岁，自称阿方索国王，和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并肩作战。大主教的教袍里穿着铠甲。恩里克四世国王临阵脱逃，出了大丑，躲在邻近一座村庄，直到战斗结束。但阿方索在战场上打得很英勇。随后几天内，恩里克四世的一些支持者叛变。最让他震惊的是，他的故乡塞哥维亚城，曾经享受过他慷慨馈赠和支持的塞哥维亚城，也公然为阿方索及其军队打开大门。就连塞哥维亚都放弃了恩里克四世。

阿方索在恶毒的胡安·帕切科（就是他煽动了叛乱）陪伴下入城。阿方索用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方式对自己的异母兄复仇。他原本

是个天性和善的孩子，却命令将恩里克四世动物园内的动物全部杀死。只有一只动物被饶了性命，那就是恩里克四世心爱的山羊，胡安·帕切科特意请求阿方索饶了它。阿方索的暴行既怪异又令人不安，十分不寻常，或许也能说明他的确经受过某种羞耻的虐待。虐待动物是遭性侵的儿童的常见行为。社会学家发现，90%的家庭暴力活动和虐待动物行为之间有联系。

阿方索的到来让伊莎贝拉陷入了两难境地。被关在塞哥维亚、受到王后监视的年轻公主如今面临一个艰难抉择。她可以继续支持异母兄恩里克四世国王，但如今塞哥维亚城即将陷落，这将使她陷入危险；或者她可以冒险站到年轻的暴发户、亲弟弟阿方索那边。她做了决定。她选择了阿方索，改为对他效忠。她的少年弟弟胜利入城，伊莎贝拉冲上去迎接他。随后几个月里，她常常与他一同旅行，热情地支持他的王位继承权。他们一同骑马来到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家，他们的母亲身边，位于阿雷瓦洛的安全避难所。

* * *

伊莎贝拉及其随行人员成为阿方索宫廷的一部分，而王子继续开展针对他们的异母兄的激烈内战。在这期间，伊莎贝拉生命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第一次露面了。围绕在年轻的姐弟俩身边的反叛者当然大多是成年人，其中有些已经很成熟，甚至老迈。但这个年轻人只有大约十四岁，比阿方索大一岁，比伊莎贝拉小一岁。他的名字是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反对恩里克四世的叛乱爆发时，贡萨洛的家族迅速加入了叛军。他的哥哥将会继承家族在安达卢西亚的繁荣地产，贡萨洛则接受训练，要进入军旅。1467年，贡萨洛在一名教师的照料下被送往卡斯蒂利亚，成为阿方索的侍从，希望能够与宫廷建立联系，为他的未来生活提供保障。很快，他就和阿方索与伊莎贝拉亲近起来，姐弟俩同样也在努力，在成年人的世界里站稳脚跟。

贡萨洛和伊莎贝拉一同辗转旅行，应对着征途上的各种不确定性，逐渐成了挚友。他们的友谊应当是纯洁的，毕竟她将会成为一位王后，而他始终只是个贵族的次子。但在那个时代，宫廷爱情被浪漫化，品行无可挑剔的男性贵族可以向贵族女子表达至死不渝的爱。贡萨洛很早就发誓要捍卫伊莎贝拉的利益，她也很快投桃报李。

在很多方面，他们非常相像。贡萨洛虽然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但已经十分理智、能言善辩和沉着冷静。他拥有语言天赋，酷爱读书，喜欢钻研军事历史，将军事力量视为宗教虔诚的一种表现。他为自己选择的箴言是：“为了荣誉，献出生命；为了上帝，献出荣誉和生命。”^[35]

他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操练武艺，随时为作战做好准备。“我曾经避开其他人，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用细剑练习剑术，一练就是几个小时。”他后来回忆道，“因为剑术对我来说就像走路或跑步一样自然而然，而且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人体自然运动的一项运动。”^[36]

贡萨洛英俊而时髦。他的哥哥很爱他，给了他足够的金钱，让他在宫廷过得舒适而优雅。他的服饰非常华美，曾有人描述他在“并非重大节日的”一天穿着“一件红色天鹅绒斗篷，镶着紫貂皮边，价值2000杜卡特^[37]”。^[38]他小的时候身材不高，但后来长得非常魁梧健壮，擅长骑术，武艺娴熟。他特别擅长中世纪一种流行的游戏，名叫“抓杆子”：“他……有时纵马疾驰，有时轻盈地掉头狂奔，保持最高速度，在马背上弯下腰来，从地面上抓起杆子……然后他突然调转方向，快速奔驰，举起盾牌，即便其他人向他投掷一千根杆子，也没有人伤得了他。”^[39]

伊莎贝拉相当宠信贡萨洛，称他为骑士王子。^[40]没过多久，他就凭借自己的赫赫战功被赞誉为“骁将”。他自信一定会有一个光辉的未来。

他的哥哥控制着家族财政，恳求他约束自己，不要太奢靡，免得他“一年之内就要破产”。但贡萨洛置之不理。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你肯定不会因为受到如此无聊的贫困的威胁，就放弃上帝给我的锦绣前程。但我坚信，你永远不会停止供养心爱的弟弟，因为一贯正确的上帝永远宠爱那些除了荣誉没有别的目标的人，上帝不会让我缺少自信，一定会保佑我取得我的星相预言的辉煌成就。”^[41]

* * *

在这个时期，阿方索国王的宫廷似乎形势一片大好。年轻的姐弟欢欣鼓舞地准备统治国家，幻想自己是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主宰。伊莎贝拉坚信阿方索注定会赢得荣誉。她为他的十四岁生日组织了盛大的聚会，在庆祝活动上参加了假面剧的表演，用诗歌预言他的伟大成就：他会继续主持正义、屡战屡胜，对臣民慷慨大方，上帝会发现他值得赞美；“他的领地将会扩展到目力所及之处”。^[42]她说，他的财富将会与米达斯^[43]国王媲美，他的军事胜利将与亚历山大大帝比肩。她预言，他将赢得永恒的名望，他的行动将为他赢得“人间和天堂的光荣”。^[44]

阿方索投桃报李地向伊莎贝拉表达挚爱和亲情，热情地回应她的预言。在阿雷瓦洛，他们在母亲家中时，他赠予她一件丰厚的礼物。他将梅迪纳·德尔·坎波（这是较早宣布支持他的城市之一）的主权 and 税收送给了她。这是对她的感谢，让她非常开心，因为她一直喜欢去那里的集市，在那里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店铺和货摊度过了童年的许多愉快时光。

这是阿方索及其盟友的巅峰时刻，此后政治局势就转为对这个自封为国王的王子不利。伊莎贝拉家庭的多年好友贡萨洛·查孔担任伊莎贝拉的幕僚长，代表她去占领梅迪纳·德尔·坎波，遭到了当地人的抵抗。梅迪纳·德尔·坎波的居民又改弦易张，重投恩里克四世国

王的阵营。随后，托莱多传来了坏消息。托莱多是阿方索最强大的基地，他的盟友卡里略是那里的大主教。那里的一系列爆炸性事件在大街上激发了武装冲突，阿方索的善良天性在政治上却成了障碍。具体事实晦暗不明且错综复杂，但涉及正在将卡斯蒂利亚人向不同方向拉扯的宗教争端。托莱多很早就宣布支持阿方索，但随着内战延续下去，有效的中央政府的缺失引发了社会动乱。

以色列历史学家本齐恩·内塔尼亚胡对这些关键事件作了最详尽的记述。他将事件的起源追溯到1467年夏季，当时托莱多的教会官员雇用了一名犹太税吏去收缴外人欠教会的债款。一名改信基督教的犹太法官支持阿方索，反对任用此人，说自己没有批准。教会官员的回应是将这名法官绝罚。法官怒火中烧，集合了一群全副武装的改宗犹太人，攻击了正在做礼拜的教堂，杀死了两名卷入争吵的官员。一些基督徒害怕那些假装基督徒的人发动普遍的攻击，于是准备用武力对抗改宗犹太人。

改宗犹太人则害怕再次爆发1391年那样的反犹大屠杀，于是动员了4000人，以大教堂为基地，在教堂门口安放火炮，向过路人和他们怀疑在准备攻击他们的人开炮。他们占据这个阵地几乎一天之久，造成了许多伤亡。但基督徒已经做出了反应，人数比改宗犹太人多得多。成群结队游荡的基督徒和改宗犹太人之间发生了正面冲突。整个街区被付之一炬。在随后的战斗中，150多名改宗犹太人被杀，更多人的房屋和财产被夺走。有些基督徒相信改宗犹太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保护了他们的改宗犹太人邻居。

局势高度紧张，很多人相信在托莱多不可能出现宗教和平了。在此次暴乱之后，许多改宗犹太人离开了托莱多，迁往别地。贪得无厌的基督徒官员利用这机会，颁布法令，撤销政府内所有改宗犹太人的职务，并允许抢劫改宗犹太人财产的人保留赃物。

托莱多的基督徒官员写信给阿方索，请求他确认新的法规，并赦免针对改宗犹太人的所有违法犯罪行为。这些官员推断，阿方索势单力薄，又这么年轻，一定会同意。不料，他告诉他们，基督徒在托莱多的行为是“不名誉和可耻的”，他宁愿冒丧失托莱多的风险，也不愿意宽恕他们的罪行。恩里克四世国王对此事也犹豫不决，但最终同意基督徒提出的要求，并允许他们保留从改宗犹太人家庭抢劫的财产。于是，托莱多在内战中回到了恩里克四世的阵营。这对阿方索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托莱多是战略要地，而且具有历史意义。

阿方索与伊莎贝拉在梅迪纳·德尔·坎波的集市玩乐的时候，得知了托莱多的近况，以及那里的官员背叛了他们。阿方索决定火速赶往托莱多，攻打和收复它。伊莎贝拉和他一起骑马南下，赶往高墙环绕的大城市阿维拉，这是通往托莱多道路上的一个必经之地。

随后，在卡尔德尼奥萨（毗邻阿维拉的一个小村庄），阿方索病倒了。一位编年史家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阿方索国王身边有……他的姐姐，伊莎贝拉公主殿下。他们坐下来用餐，菜肴当中有一道鳟鱼馅饼，他主动去尝，虽然只吃了一点。饭后他陷入熟睡，这在他身上是很稀罕的事情。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就上床睡觉了，一直到第二天第三课（上午九点）。他之前从来没有起这么晚过。

他的内侍赶来，触摸他的手，发现他身体没有了热量。他没有醒来，于是他们开始呼天抢地地喊叫，但他仍然没有反应。他们的喊声极大，托莱多大主教、圣雅各大团长（比列纳侯爵胡安·帕切科）和公主殿下都赶来了，但他仍然毫无反应。他们触摸了他的所有肢体，没有发现肿胀。

医生匆匆赶来，命令给国王放血，但没有血流出来；他的舌头肿了，口腔发黑，但没有疫病的迹象。那些深深爱他的人为国王的生命担忧，惊恐万状，开始高喊，哀求我主保佑他的生命。有的人宣誓要出家，有的人发誓要去远方朝圣。其他人许下了不同的诺言。但任何治疗都没有用，纯洁的国王于1468年8月5日将他的灵魂复归上帝……据信，他的死因是吃

了有毒的草药，因为他虽然年轻，在大家眼里却很可能成为比他哥哥更精力充沛的君王。^[45]

我们不清楚阿方索是患疫病而死（如果是疫病作祟，那么无人知道它下一次在何处发作），还是被毒死的。伊莎贝拉突然间孤身一人，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而她之前以最戏剧性的方式挑战了恩里克四世。她的外祖母此时也已经去世；她母亲帮不了她的忙。伊莎贝拉目前在王位继承人的顺序中排在很靠前的位置，这很危险，因为在这个王国，王位继承人常常英年早逝。肯定有很多人希望她也很快离开人世。

^[1] James Gairdner, ed., *Letters and Papers Illustrative of the Reigns of Richard III and Henry VIII*, p.1: 31, cited in Charles Derek Ross, *Edward IV*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85; Cora Louise Scofield, *The Life and Reign of Edward the Fourth, King of England and of France and Lord of Ireland* (London: Frank Cass&Co., 1967), p.1: 320.

^[2] 约合193厘米。

^[3] 菲利普·德·科米纳（1447～1511年），勃艮第和法兰西政治家、外交官和作家。他的回忆录是15世纪欧洲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

^[4] Ross, *Edward IV*, p.10.

^[5] 卡斯蒂利亚国王“残酷的”佩德罗的女儿。

^[6] 原文有误，爱德华四世应当是兰利的埃德蒙（冈特的约翰的弟弟）的后代。

^[7] 伊莎贝拉，即康斯坦丝的妹妹。冈特的约翰和兰利的埃德蒙分别娶了“残酷的”佩德罗的两个女儿康斯坦丝和伊莎贝拉。

^[8] Scofield, *Life and Reign of Edward the Fourth*, p.1: 154.

^[9] Ross, *Edward IV*, p.85.

[10] Ross, *Edward IV*, p.90.

[11] John Warkworth, *A Chronicle of the First Thirteen Years of the Reign of King Edward the Fourth*, ed. James Orchard Halliwell (London: Camden Society, 1839) , p.3.

[12] Ross, *Edward IV*, p.89.

[13] 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的母亲是亨利五世的弟妹，因此是兰开斯特王朝的支持者。伊丽莎白的第一任丈夫在玫瑰战争中为兰开斯特王朝效忠并战死。

[14] 即“塔楼内的王子”的传说，指的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儿子——爱德华（被加冕为爱德华五世）和理查（受封约克公爵）。爱德华四世去世时，这两位王子年仅十岁和十三岁，由爱德华四世的弟弟理查（格洛斯特公爵）摄政。但这位摄政王随后攫取王位，史称理查三世，并将自己的两个侄子囚禁在伦敦塔。后来这两位王子就销声匿迹了。人们普遍相信，他们是被谋杀的。幕后元凶有可能是理查三世，但没有过硬的证据。这个谜团至今没有解开。

[15] Scofield, *Life and Reign of Edward the Fourth*, p.1: 320; Henry Ellis, ed., *Original Letter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History, Including Numerous Royal Letters*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6) , series 2, p.1: 152; Gairdner, *Letters and Papers Illustrative*, p.1: 31; Cora Louise Scofield, “The Movements of the Earl of Warwick in the Summer of 1464,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October 1906) , pp.732-33.

[16] Alonso Fernández de Palencia, *Crónica de Enrique IV*, ed. Antonio Paz y Meliá (Madrid: Ediciones Atlas, 1975) , dec.I, bk.5, chap.2, cited in Peggy K.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54.

[17] Alonso Fernández de Palencia, *Crónica de Enrique IV*, ed. Antonio Paz y Meliá (Madrid: Ediciones Atlas, 1975) , dec.I, bk.5, chap.2, cited in Peggy K.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56.

[18] Townsend Miller, *The Castles and the Crown: Spain 7451-1555*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3) , pp.40-41.

[19] Townsend Miller, *The Castles and the Crown: Spain 7451-1555*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3) , p.41.

[20] 在本书涉及的时代，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统治着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国王室是亲戚。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的由来是这样的：1350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私生子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和继位国王“残酷的”佩德罗一世（即恩里克的异母兄）为了争夺王位，发生了冲突。恩里克与阿拉贡和法兰西结盟，佩德罗一世与英格兰结盟（当时正是英法百年战争期间）。1369年，恩里克亲自刺死了佩德罗一世，篡位成功，在卡斯蒂利亚建立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称恩里克二世，他就是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伊莎贝拉女王的父亲）的曾祖父。另外，1410年，阿拉贡国王马丁二世驾崩无嗣，国民推举卡斯蒂利亚的斐迪南（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的叔叔，曾为其摄政）为国王，称斐迪南一世。于是，在阿拉贡也建立了特拉斯塔马拉王朝。最后，通过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的婚姻，两国的特拉斯塔马拉王朝合并起来。

[21] Josef Miguel de Flores, *Crónica de Don Alvaro de Luna, condestable de los reynos de Castilla y de León* (Madrid: Imprenta de Antonio de Sancha, 1784) , p.15.

[22] Teofilo F.Ruiz, *Spain's Centuries of Crisis: 1300-1474* (West Sussex, U.K.: Wiley Blackwell, 2011) , p.89.

[23] 他的叔叔是对立教皇本笃十三世，不被罗马天主教会正式承认。

[24] Ana Sánchez Prieto, *Enrique IV el Impotente* (Madrid: Alderaban Ediciones, 1999) , p.13.

[25] Gregorio Marañón, *Ensayo biológico sobre Enrique IV de Castilla y su tiempo* (Madrid: Colección Austral, 1997) , pp.30-31.

[26] Gregorio Marañón, *Ensayo biológico sobre Enrique IV de Castilla y su tiempo* (Madrid: Colección Austral, 1997) , p.33.

[27] Fray Gerónimo de la Cruz, a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an who based his account on a fifteenth-century Castilian chronicle, cited in Nancy F. Marino, *Don Juan Pacheco: Wealth and Power in Late Medieval Spain* (Tempe: 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06) , p.51.

[28] 就是前文说到的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在古西班牙语中，埃尔南多和费尔南多其实是同一个名字。

[29] Barbara Weissberger, “Alfonso de Palencia,” in *Queer Iberia*, ed. Josiah Blackmore and Gregory S. Hutches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15.

[30] Miller, *Castles and Crown*, p.42.

[31] Miller, *Castles and Crown*, p.45.

[32] William Prescott,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Philadelphia: J.B.Lippincott, 1873), p.181-82.

[33] Diego de Colmenares, *Historia de la insigne ciudad de Segovia*, revised by Gabriel María Vergara (Segovia: Imprenta de la Tierra de Segovia, 1931), p.276.

[34] 葡萄牙的埃莉诺（1434~1467），葡萄牙国王杜阿尔特的女儿，嫁给了哈布斯堡家族的首位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

[35]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p.35.

[36]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p.34.

[37] 杜卡特是欧洲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使用过的一种金币，币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差别很大。

[38]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p.42.

[39]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p.41.

[40]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p.42.

[41].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 pp.42-43.

[42]. Liss, *Isabel the Queen*, p.63.

[43]. 希腊神话中能够点石成金的弗里吉亚国王。

[44]. María Dolores Cabanas Gonzalez, Carmelo Luis López, and Gregorio del Ser Quijano, *Isabel de Castilla y su época: Estudios y selección de textos* (Alcalá de Henares: Universidad de Alcalá, 2007) , pp.22-23.

[45]. Purcell, *Great Captain*, p.37.

四 伊莎贝拉孤身面对命运

在中世纪，人的生命随时都可能骤然熄灭，伊莎贝拉对此已经有过多次体验。她父亲在四十九岁时驾崩，让她几乎成了孤儿；她的未婚夫佩德罗·希龙感染了咽喉疾病，几个小时就死去了。

但年轻、强壮而健康的阿方索，在纵马疾驰的越野旅行的过程中突然暴死，让很多人产生了压抑的猜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前一天，他还春风得意；后一天，他的旅行伙伴就不得不决定如何运输他的遗体。阿方索的遗体被运往他的家乡阿雷瓦洛，准备安葬在圣方济各修道院，那里的教士在他和伊莎贝拉最年幼的时期对他们的生活发挥过稳定作用。

他临终最后时光的细节被镌刻在他身边每个人的记忆中：如果他感染了疫病，那么同行的其他人为何奇迹般地毫发未伤？他吃了什么不洁净的食物吗？最令人警醒的是：有没有可能，他是被毒死的？

这种猜测并非天方夜谭。数千年来，在艰险的时代，毒药常常在王位传承中发挥作用；一张埃及纸莎草纸上就记载了上古的一份毒药配方。西班牙人的祖先古希腊人^[1]长期用毒药处决罪犯，或者自杀。据说赫拉克勒斯就是被涂在他衣服内侧的毒药杀死的。而用毒药自杀的最著名例子之一就是苏格拉底，他于前402年用毒芹自杀^[2]。在伊莎贝拉的时代，人们在谈到用毒药杀人时常常提及“草药”，例如毒

芹，但也包括乌头、洋地黄或蒿。编年史家们很快就猜测，阿方索是被他们所说的“草药”毒死的。

安排毒杀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事情。毒药可以随身携带，也容易伪装，易于混入其他物质，造成怪异和神秘的症状。大多数毒药通过饮食来害人，轻松程度令人惊诧。有些毒药的毒性极强，即便是尝一小口，不到七滴的剂量，也能置人于死地。^[3]其他很多毒药的致死剂量不到1盎司。砒霜可以碾成粉；毒蘑菇可以干燥起来，掺入鲜美的肉酱汁；有些毒药可以通过皮肤吸收，比如受害者戴着美观但被动过手脚的手套散步，就会中毒。

成功的毒杀可以模仿自然疾病，这样就较难发现真实死因。例如砒霜会导致严重的肠胃紊乱和低血压，而严重的食物中毒也可能造成这些症状。毒蘑菇若是切成片放入色拉或与肉一起油炸，可能让受害者皮肤出现紫红色斑点，毒蘑菇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谋杀手段，因为某些传染性的疫病会造成类似的变色。^[4]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亚王后和葡萄牙王后埃莉诺（玛丽亚的妹妹、胡安二世的小姨子）这对阿拉贡姐妹在相继几天内死去，据说身体上就布满了这样的斑点。如果姐妹当中只有一人死亡，那么看上去就像是疫病，然而姐妹俩在相距遥远的两座城市，在很短时间内突然相继死亡，而且症状惊人的相似，所以人们普遍相信她们是被谋杀的。

对投毒者来说，巧妙的下毒手段是成功的关键。波斯王后帕丽萨提斯在一把刀的一面刀刃涂了毒药，然后用这把刀切肉，将有毒的一面肉给她的儿媳，同时自己吃了无毒的一面。另一种毒药锑可溶于水，很容易用其他味道掩盖它的气味，所以常被当成谋杀工具。

中世纪晚期向文艺复兴时期过渡的阶段，大约也就是伊莎贝拉长大成人的时期，毒药的流行程度大大提升。威尼斯和罗马出现了传授毒药技术的学校。一家这样的谋杀学校竟大胆地发放了一张价目表，

根据客户地位和目标身份的不同，杀人的价码也不同。在意大利半岛，下毒害人的现象司空见惯，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新的词“被意大利”，意思是被毒死。一个来自巴伦西亚的西班牙名门望族——博吉亚家族，在搬到罗马之后成了著名的毒药专家。

但也有人观察到，阿方索的死状不完全符合任何一种已知的毒药。那么也许阿方索真的是病死的？疫病在当时的确是无处不在的威胁。不时有致命的传染病横扫欧洲。14世纪50年代的黑死病从中国通过丝绸之路来到欧洲^[5]，据估计杀死了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据称阿维拉城在阿方索去世的这一年夏季爆发了一种传染病。

不过阿方索被毒杀仍然是一种可能性。很快，就有流言蜚语传开，说阿方索是被谋杀的。恩里克四世国王有充足的理由憎恨自己的异母弟。阿方索占领了恩里克四世钟爱的塞哥维亚城，还屠杀了他心爱的动物，这就足够让恩里克四世成为阿方索的不共戴天之敌，何况阿方索还在努力夺走他的王位。如果阿方索真的是被谋杀的，那么具体执行的凶手会是谁呢？

当然，凶手可能是匿名的职业杀手，受命于恩里克四世。或者，下毒的可能是胡安·帕切科，恩里克四世的情人和对手。帕切科历来奸诈阴险，常常背信弃义，假装友好而从背后捅人一刀。或许他相信阿方索的前景不妙，于是决定重新回到恩里克四世身边。除掉阿方索，会让他更容易转换阵营。很快就有确凿迹象表明，帕切科不仅在与反对恩里克四世的叛军联络与合作，还和恩里克四世一直互通消息。

也许还有其他方面的动机。阿方索支持托莱多的改宗犹太人，这说明这位年轻王子不像他的支持者希望的那样容易操纵；也许他们决定及时止损。西班牙历史学家玛丽亚·多洛雷斯·卡门·莫拉莱斯·

穆尼斯撰写了阿方索的传记。她花费多年时间检查证据，最后结论是，他是被谋杀的。^[6]

如果阿方索是被杀害的，那么具体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几乎马上就会想到他在卡尔德尼奥萨吃的鳟鱼馅饼。所有人当中，只有阿方索吃了馅饼；其他人都没有生病。但剩饭被喂给了村里的狗，这些狗全都没有生病的明显迹象。不过，狗消化残羹剩饭的能力比人类强，或许它们也吃了有毒的馅饼，但并没有受到影响。

年轻的公主远离亲人和朋友，万分悲痛。面对这新的灾祸，她脑子里思索着这些问题，因为她必须打定主意，如何将此事告知天下。在考虑这问题的同时，她也必须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阿方索死了，伊莎贝拉现在是王位继承人。如果阿方索被某人视为致命威胁，因而被除掉，那么伊莎贝拉显然也处于危险中。如果她高声疾呼，说自己的弟弟是被谋杀的，那么她自己的处境就更危险了。如果她提出这样的指控，那么凶手几乎一定会再度出手。于是她宣布阿方索死于疫病。这至少能为她争取一点时间。她写信通知官员们，阿方索“于三点钟病逝”。^[7]

* * *

与此同时，阿方索的支持者突然间变得对伊莎贝拉不是那么殷勤保护了。他们迅速把她送到阿维拉，在那里激烈争论，应当如何处置她。这是一个奇怪的决定。如果阿方索不是被毒死的，那么就是死于疫病。伊莎贝拉却被送到正在爆发新一轮瘟疫的阿维拉城。这些决定突出体现了，这些人对伊莎贝拉的福祉是多么冷漠。

有两个人希望伊莎贝拉自立为女王。胡安·帕切科希望将她从阿维拉迁走，送到他选的一个地方。年轻的公主对他的意图肯定大为警觉。卡里略希望伊莎贝拉留在阿维拉，那里虽然爆发了瘟疫，但卡里

略控制着那里的驻军。帕切科说他希望伊莎贝拉嫁给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卡里略要把她嫁给阿拉贡的斐迪南。^[8]所有人都打算让她成为傀儡，听自己调遣使唤。在权贵们争吵的时候，伊莎贝拉发现自己只是个旁观者。

她有很好的理由去争夺王位。她参加了叛乱，与相信必须废黜恩里克四世的人为伍，所以她现在可以顺理成章地自己攫取王位。这很可能也是最安全的选择。她已经冒犯了国王，不能指望他宽宏大量。她对王位的权力主张似乎也能得到政治支持：王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塞维利亚城迅速推举她接替阿方索，成为女王。^[9]她在等待其他城市的消息。例如，穆尔西亚的官员已经得知阿方索的死讯，承诺尽快给出答复。^[10]

在这时刻，伊莎贝拉做出了她的许多改变人生命运的重大决定中的第一个，体现出了她钢铁般的自制力。在历史上，品尝过权力的滋味的人，比如阿方索与伊莎贝拉，通常非常不愿意放弃权力。争夺王位者会拼命努力，往往至死方休。贵族们敦促她自立为王，向她施加极大压力，要求把叛乱继续下去，因为那样能够延迟他们面对国王的日期，并且，当然她也有可能胜利。

伊莎贝拉隐居到阿维拉的圣安娜修道院，居住在修女当中，与她们一起祈祷。她思考着下一步如何是好。事实证明，她加入阿方索的决定是大错特错。她掂量着自己对兄长恩里克四世的忠诚，以及她自己的政治雄心。这一次，她选择了比较安全的道路。她理智地认识到，自己的王位继承权比阿方索弱，因为她是女人；而且就连阿方索也没有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于是她发表了宣言：“把王国归还我的兄长堂恩里克，那样才能恢复卡斯蒂利亚的和平。”她在对全国的公开信中写道：“但如果你们把我看作胡安二世国王——吾君吾父——的女儿，觉得我配得上他的姓氏，那么就让国王（我的兄长）、贵族

和教士宣布，在他百年之后，我将继承王国……在我看来，这是你们能够做的最大贡献。”^[11]

她告诉天下人，恩里克四世是真正的国王，她目前不是君主，但她应当成为他的继承人。她强调自己支持他的统治，但补充说，她希望他会统治得更贤明。“上帝取走了我的弟弟阿方索的生命，”她在给胡安·帕切科和大主教卡里略的信中写道，“只要恩里克四世国王在世，我就不会接管政府，也不会自称女王，而是尽我所能，辅佐恩里克四世国王，将国家治理得比先前更好。”^[12]

恩里克四世感激地做出了积极回应，他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把不愉快的事情抛于脑后。1468年8月，在阿维拉和其他地方进行了一连串匆忙的谈判之后，伊莎贝拉和兄长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协议。她被接纳为他的继承人，并得到了一些属于她自己的财产：阿维拉城；繁荣的梅迪纳·德尔·坎波，那里的集市吸引了欧洲各地的商贩和购物者；以及韦特、莫利纳、埃斯卡洛纳和乌韦达等城镇。于是她拥有了在全国星罗棋布的产业。国王还向她保证，再也不会强迫她接受不符合她意愿的婚事。作为交换条件，她承诺在结婚前首先征询恩里克四世的意见。恩里克四世答应与给自己制造了许多尴尬的妻子离婚，将她送回国。^[13]

很快，双方就达成了初步协定。两周后，她写信给自己的老师贡萨洛·查孔，署名是“蒙上帝洪恩的伊莎贝拉公主，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王国的合法继承人”。^[14]

后来有观察者说，伊莎贝拉一生奉行“超乎寻常的审慎”。这就是此种审慎的第一个例子。^[15]没过多久，一些城市改弦易张，向国王宣誓效忠。穆尔西亚的官员始终没有回复伊莎贝拉的关于阿方索死亡的信。如果她上了胡搅蛮缠的贵族的当，就会丧失很多支持，并且直接与国王分庭抗礼。恩里克四世很快开始努力巩固自己的地位。

伊莎贝拉向恩里克四世效忠，给了国王一件无价之宝：保住脸面、顺利地下台阶。双方正式确定了和解的条件。国王以卡达尔索为基地，伊莎贝拉则搬到附近的塞夫雷罗斯。这两座城市都在西班牙中部，他们就在那里敲定协定的细节。两个阵营之间有使者穿梭往返。最后，1468年9月18日，也就是阿方索去世大约两个月之后，兄妹俩在吉桑多公牛（距阿维拉约50英里）的田野（此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式会面。此地一座山隘脚下树立着一些古老的公牛雕像，有真实的公牛尺寸，饱经风霜。这些雕像为何被安放于此，已经无人知晓。这是一个鬼气弥漫的地方，来自世界的另一个时代，令人想起希腊神话中对公牛的尊崇，以及与公牛的生死有关的游戏和节庆活动。

在这风声萧瑟的原野，伊莎贝拉与恩里克四世公开和解了。伊莎贝拉骑着一头骡子赶来，这是象征性地展示自己的王室贵胄地位和谦逊态度。卡里略大主教徒步陪伴她。在随后的典礼上，她被正式指定为王储。她也宣誓仅在得到恩里克四世批准的情况下才结婚。国王将自己承诺给她的城镇全都交给了她。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还把阿斯图里亚斯亲王领地也给了她，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是王储的世袭头衔。^[16]教皇使节表示支持此项协定，赋予了典礼一种宗教气氛。

始终奸诈狡猾的胡安·帕切科也出现在此次会议上，这一次是在国王身边。他又一次改换阵营，几乎当即重新得到国王的恩宠，又一次成为国王的亲信谋臣和密友。恩里克四世国王似乎宽恕了帕切科的作奸犯科。在这个危险时刻站在伊莎贝拉身旁、全力支持她的，是托莱多大主教卡里略。反复无常的国王可能会将怒火发泄到卡里略身上。

在随后几周内，国王公开指认伊莎贝拉为自己的继承人，甚至丢人现眼地承认小女孩胡安娜不是他的骨肉。他在给全国各城镇官员的信中写道：“我婚姻不幸，未能生育自己的合法继承人。”^[17]

胡安娜王后进一步丧失了名誉，因为她在内战期间与恩里克四世两地分居，却又生下了一个孩子。阿方索和恩里克四世领军互相厮杀的时候，胡安娜被安顿在丰塞卡主教宅邸。令人窘迫的是，她怀上了主教的孩子。即便如此，她得知国王与伊莎贝拉之间的谈判后，仍然暴跳如雷。她还没有放弃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女王的希望。虽然身怀六甲，她却企图在夜间离开丰塞卡主教的宅邸。她安排仆人帮她从一扇敞开的窗户逃走，坐在篮子里，降落到地面上。然而绳子断了，于是王后跌落倒地，受了一些擦伤。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衣衫不整的王后随后闯入自己曾经的追求者贝尔特兰·德·拉·奎瓦家中，寻求庇护，却发现他正与一群男性朋友嬉戏作乐。据说他粗鲁地让她走开，然后告诉那些正在窃笑的朋友们，他从来不喜欢她“瘦骨嶙峋的腿”。胡安娜王后不得不继续跋涉，去寻找朋友和盟友，最后抵达了势力强大的门多萨家族的地盘。门多萨家族是传统派，支持王室特权，他们庇护了落难的王后。

与此同时，国王和伊莎贝拉离开了吉桑多公牛，一同前往卡达尔索。恩里克四世近期住在那里。在卡达尔索，他们一同用膳，弥合关系。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伊莎贝拉全心全意地与恩里克四世冰释前嫌，以“喜悦的面容”和“完全的顺从”应对他。不久之后，恩里克四世去往奥卡尼亚城，伊莎贝拉也随他一同前往。^[18]

随后的九个月，伊莎贝拉待在奥卡尼亚，这座城市处于帕切科的控制之下，距离她最熟悉的城市——塞哥维亚和马德里加尔有一段距离，并且她对奥卡尼亚完全陌生。但这个新环境也有好处：她居住在古铁雷·德·卡德纳斯家中，此人是她在阿雷瓦洛的童年老师贡萨洛·查孔的外甥。所以她可以说是来到了友人当中。卡德纳斯和查孔都曾支持阿方索，而恩里克四世允许她住在卡德纳斯家，说明国王又一次信任她，允许她选择自己的追随者。伊莎贝拉的财政状况也有所改善，恩里克四世终于将梅迪纳·德尔·坎波的管辖权和税收交给了

她。伊莎贝拉开始为自己将来执政做准备，给贵族们写信，并主持一些典礼仪庆。她现在是阿斯图里亚斯亲王。[\[19\]](#).

但几周之后，叛军被解散之后，恩里克四世的诺言就显得转瞬即逝和不可靠了。很显然，他不打算兑现自己的所有承诺。他没有把承诺给伊莎贝拉的其他地产交付，并在胡安·帕切科的敦促下，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打击她的地位。卡里略大主教非常担忧，住进了距离奥卡尼亚7英里的一座要塞，在那里监视伊莎贝拉宫廷的动向，并贿赂那里的仆人，让他们向他报告事态发展。[\[20\]](#).

很快，值得担忧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随着时间流逝，胡安娜坚定不移地宣称小胡安娜是国王的亲生女儿，说服了更多人，而国王也因为自己剥夺了这孩子的继承权而感到羞耻，因为他真心爱这个孩子；他也为关于他性无能和“软心肠”的传闻而羞耻。很快，他就把自己和王国受到的一切伤害都怪罪到伊莎贝拉头上。“于是国王……不仅失去了对公主的爱，还开始恨她。”一位见证人后来回忆道。[\[21\]](#).

恩里克四世食言了，又一次开始想办法把伊莎贝拉嫁到国外。她新近获得的战略价值和地位使得很多人前来追求她。她的美貌和在社交场合的优雅更是增添了她作为结婚对象的魅力。此时她的身体已经完全成熟，很多人觉得她非常可爱。一位编年史家描绘她“身材中等，婀娜多姿，肢体匀称，非常白皙；眼睛颜色介于灰色和蓝色之间，目光优雅娴静，面容姣好，非常美丽和快活”。[\[22\]](#).

在随后一年里，恩里克四世至少认真考虑了四名求婚者。

首先是又一位来自英格兰的上佳人选：与伊莎贝拉年龄相仿的理查，爱德华四世的弟弟，不久之后变得闻名遐迩。[\[23\]](#)据说他身材中等；他的金雀花王朝血统的兄弟都是金发碧眼、身材魁梧，而他的发

色和肤色都比较深，身材矮一些。不幸的是，他天生一只肩膀比另一只高。但他有很多优点。他曾率军保卫爱德华四世，屡立战功，威名赫赫，成了英格兰仅次于国王的二号人物。此时他被认为是伊莎贝拉的合适丈夫人选。但理查是第一个被恩里克四世否决的人选，因为卡斯蒂利亚没过多久就与英格兰断绝了外交关系（具体时间是1469年7月），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的组合是转瞬即逝的。^[24]

这对伊莎贝拉来说可谓大幸，因为虽然理查最终成为英格兰国王，史称理查三世，但后来在残酷的内战中兵败身死，导致篡位的都铎家族攫取了权力，亨利七世当上了国王。作家V. B. 兰姆如此评价理查三世：“他自己忠心耿耿，却不能看透他人的奸诈；在奸佞小人的阴谋昭然若揭的时候，他又不能以足够无情的手段消灭他们。他对叛徒的宽宏仁慈令人瞩目，又是致命的，让他丢掉了王冠、生命和名誉。”^[25]

理查三世的名誉后来遭到了威廉·莎士比亚的诋毁。莎士比亚为了取悦都铎王朝，将理查三世描绘成阴森恐怖的驼背恶棍，谋杀了自己年幼的两个侄子。“亨利七世篡位之后，文人的立场几乎一夜之间发生变化，真是有意思。”一位历史学家尖刻地评论道。^[26]伊莎贝拉避免了与历史上这黑暗一页扯上关系。

第二位候选的单身汉是贝里公爵^[27]瓦卢瓦的查理，即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的弟弟。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间在历史上长期互相敌视，因此这门婚事不大可能成真。但伊莎贝拉还是谨慎地打听了他的情况。她派了一位教士秘密地去法兰西，一窥这位公爵的究竟。教士回来之后报告称，查理“软弱而女人气，两腿瘦长，眼睛半盲，总是泪汪汪的”。^[28]这样的评价不大可能赢得一位少女的心。

但路易十一还是希望促成此事，派了使者去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斯·托雷斯见伊莎贝拉，此时她待在母亲身边。伊莎贝拉小心地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她仅仅表示，她会遵守王国的法律，以卡斯蒂利亚和卡斯蒂利亚王室的荣誉、声望和荣耀为重。”这含糊的回答让她能够保持沉稳，而同时仍然表现出顺从于男人们为她的未来所做的谈判。^[29]不久之后，查理也被排除了。

这样伊莎贝拉的人生伴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而且都来自伊比利亚半岛，都是她的亲戚。首先是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三十七岁，她母亲的亲戚^[30]。强大的门多萨氏族、胡安·帕切科和恩里克四世都支持他，不过他对十七岁少女来说不是特别有吸引力的选择。

就连阿方索五世在公共场合的仪态也不讨少女的喜欢。葡萄牙国王命人制作的壁毯将他描绘为穿着过于雕琢、老套的盔甲，而不是较年轻的武士和贵妇们喜爱的新风格。

出于个人原因，恩里克四世也更愿意选择阿方索五世。恩里克四世对小胡安娜的感情非常复杂，因此饱受折磨。她的血统是可疑的，但他坚信她是自己的女儿，他必须想办法保护她的前程。根据他的计划，伊莎贝拉将嫁给阿方索五世，胡安娜会嫁给阿方索五世的儿子，即葡萄牙王储若昂。那么，胡安娜的孩子将极有可能统治两个国家（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而伊莎贝拉会被排挤出去，嫁给一个她觉得“可憎”的男人，没有出头之日。^[31]

局势对阿方索五世有利，因为恩里克四世国王寻求向自己的妹妹复仇，把她嫁给一个她讨厌的人。阿方索五世则对年轻貌美的公主印象极佳，相信她也喜欢自己。在他脑子里，爱情和王朝野心是一体的。他开始觉得，这门婚事已经板上钉钉了。1469年4月30日，恩里克四世和阿方索五世就婚姻条件达成了最终协议。婚礼将在阿方索五世抵达卡斯蒂利亚的两个月后举行，如果伊莎贝拉不同意，她和她的支

持者将被宣布为不法之徒。这等于是说，如果婚礼未能举行，阿方索五世有权向卡斯蒂利亚发动战争。协议的条件允许阿方索五世开始自称为阿斯图里亚斯亲王，这是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人的传统头衔。还有一个后备方案：如果婚礼未能举行，阿方索五世有权迎娶小胡安娜，并与恩里克四世结盟，一同向伊莎贝拉及其盟友开战。^[32]

但伊莎贝拉还有一个选择，也是她最喜爱的人，即她童年时代就相信会成为自己真命天子的那个青年。他就是斐迪南，时年十六岁，英俊潇洒，她的远房堂弟，将来注定要统治邻国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斐迪南的哥哥卡洛斯已经去世，所以他比之前更有吸引力了。并且，他已经是拥有自己王冠的国家元首：他父亲在前不久立他为西西里国王。所以如果伊莎贝拉嫁给她，马上就会成为王后。斐迪南也是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偏向的人选。多年来，卡里略一直在秘密地与斐迪南的父亲——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合作，不断促进斐迪南的利益。

恩里克四世国王直截了当地禁止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结婚。

虽然兄长坚决反对，但即将十八岁的公主相信斐迪南会成为她的理想夫君。她瞒着兄长，已经开始秘密与斐迪南谈婚论嫁。

“只能是他，不能是别人。”伊莎贝拉私下里告诉她的盟友。^[33]

^[1] 当然这是中世纪西班牙人自己的想法。不过古希腊人在西班牙沿海地区曾有殖民地，因此西班牙人或许有一些希腊血脉。

^[2] 原文有误，苏格拉底死于前399年，而且他是被判死刑，被迫服毒的，很难说这是自杀。

^[3] Serita Deborah Stevens and Anne Klarner, *Deadly Doses: A Writer's Guide to Poisons* (Cincinnati: Writers Digest Books,

1990) .

[4] Charles Thompson, and John Samuel, *Poisons and Poisoners* (London: Harold Shaylor, 1931) , p.83.

[5] 据欧洲的传说, 1347年蒙古军队攻打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热那亚人据点卡法, 将黑死病死者尸体投入城中。乘船逃跑的热那亚人将黑死病带到了南欧, 随后黑死病向西欧和北欧传播。

[6] Maria Dolores Carmen Morales Muñiz, *Alfonso de Ávila, Rey de Castilla* (Ávila: 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Ávila, Institución Gran Duque de Alba, 1988) , p.363.

[7] Nancy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1991) , p.50.

[8] Peggy K.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68.

[9] John Edwards, *The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hs, 1474-1520* (Oxford, U.K.: Blackwell, 2000) , p.8.

[10]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p.50.

[11] Townsend Miller, *The Castles and the Crown: Spain 1451-1555*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3) , p.52.

[12] Diego de Valera, *Memorial de diversas hazañas*, 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Madrid: 1941) , p.139, cited in Warren H. Carroll, *Isabel of Spain: The Catholic Queen* (Front Royal, Va.: Christendom Press, 1991) , p.35.

[13] Miller, *Castles and Crown*, pp.51 and 52.

[14] Liss, *Isabel the Queen*, p.68.

[15] María Dolores Cabanas González, Carmelo Luis López, and Gregorio del Ser Quijano, *Isabel de Castilla y su época: studios y*

selección de textos (Alcalá de Henares: Universidad de Alcalá, 2007) , p.27.

[16]. Edwards,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hs*, pp.8, 9.

[17].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 Patrimonio Real, 7-112, leg.738, cited in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p.57.

[18].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469-1476*, ed. Julio Puyol (Madrid: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934) , p.69.

[19]. Liss, *Isabel the Queen*, p.69.

[20].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p.59.

[21]. *Crónica incompleta*, p.70.

[22]. Salvador de Madariaga, *Christopher Columbus: Being the Life of the Very Magnificent Lord Don Cristóbal Colón* (New York: Macmillan, 1940) , p.5.

[23]. Vivien B. Lamb, *The Betrayal of Richard II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roversy* (London: Mitre Press, 1968) , p.43.

[24]. 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 “Isabel, Infanta, and Princess of Castile, ” in *Isabella la Católica, Queen of Castile: Critical Essays*, ed. David A. Boruchoff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p.49.

[25]. Lamb, *Betrayal*, p.43.

[26]. Lamb, *Betrayal*, p.57.

[27]. 贝里公爵的头衔常被封给法兰西王室幼支。

[28]. Liss, *Isabel the Queen*, p.73.

[29]. Mari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 *Isabel the Queen*, p.50.

[30]. 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的父亲是杜阿尔特一世。伊莎贝拉的外祖父是葡萄牙司厩长若昂。杜阿尔特一世是若昂的哥哥，他们都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儿子。

[31]. *Crónica incompleta*, p.70.

[32]. Edwards, *Spain of Catholic Monarchs*, p.12.

[33]. Juan Ferrer to Juan II of Aragon, January 30, 1469, cited in Carroll, p.47.

五 结婚

伊莎贝拉私下里判定，年轻健美的阿拉贡的斐迪南是她的最佳选择。斐迪南也是这么想的。但和任何动人的浪漫史一样，他们之间也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段精彩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始终非常浪漫的西班牙人会把他们的故事谱写成传奇。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之间的婚姻协商必须秘密进行，借助于密信和地下通信。恩里克四世已经打破了自己对伊莎贝拉的许多诺言，但她仍然奉行自己的承诺，即在结婚前必须得到他的许可。于是年轻的恋人起初是鸿雁传书。早期的一封信已经流露出伊莎贝拉那种谨慎的调情技巧和聪明地操纵男性心理的本领，这将是她的标志。她在给斐迪南的一封回信中写道：“你必须告诉我，你希望我怎么做。你要我怎么做，我就一定办到……恭顺地服从你的命令的公主。”任何一个十七岁男孩读到这样的话，感受到女性的温柔如水和将来必然得到的性愉悦，都肯定心花怒放。^[1]

他们的婚约于1469年3月5日正式敲定。斐迪南承诺尊重卡斯蒂利亚各城市的权力，承认伊莎贝拉是卡斯蒂利亚的真正君主。他还承诺要永久定居于卡斯蒂利亚。^[2]

这对恋人还必须排除宗教的障碍。506年，罗马帝国灭亡之际，在阿格德^[3]举行的天主教会会议禁止堂表兄妹或远房堂表兄妹结婚，除非得到教会的特别许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是远房堂姐弟，他们的曾祖

父是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一世，所以他们需要得到教皇的许可才能合法地结婚。这样的许可很难获得，代价很大，因为他们必须说服教皇批准他们结婚。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解决了这个问题，从塞哥维亚大主教胡安·阿里亚斯那里获得了许可。阿里亚斯做出此决定的理由是，胡安二世国王告诉他，自己在过去从教皇那里得到了婚姻许可。

伊莎贝拉的盟友，包括卡里略大主教和贡萨洛·查孔，为她和斐迪南操办的一场相对安全的代理婚礼仪式，很快就举行了。据说她得到的礼金高达4万金弗罗林^[4]。^[5]承诺的礼金没有全部到位，但到了一部分，还送来了一些珠宝。伊莎贝拉很快就开始炫耀这些珠宝。

随后，这对少年夫妻决定举办一场两人都亲自到场的婚礼。这很难安排，因为障碍很多。强大的葡萄牙国王正在踌躇满志地为自己继承的航海国家打造一个全球帝国，他相信伊莎贝拉注定是他的新娘。恩里克四世国王察觉有些不对劲，威胁伊莎贝拉，她若是企图离开马德里，就把她囚禁在那里。胡安二世国王担心自己的儿子若是在卡斯蒂利亚被捕，可能丢掉性命。因此，十七岁的斐迪南和十八岁的伊莎贝拉的首次相会笼罩在机密气氛和极强的戏剧性当中。少年夫妻和他们的盟友炮制了一场复杂的欺骗把戏，静候机会降临。

首先，他们等待恩里克四世国王离开奥卡尼亚（位于卡斯蒂利亚中部），去处置安达卢西亚的一些紧迫的行政问题。国王临走之前特地要求公主承诺不会趁着他不在家结婚。但他刚刚出城，伊莎贝拉公主就宣布打算去阿雷瓦洛为弟弟扫墓，阿雷瓦洛也是她母亲的住地和她自己童年的居所。这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因为她心爱的弟弟仅仅去世了一年，而且他的追思仪式还没有举行。夜间，她在两名侍从陪伴下，骑马离开奥卡尼亚。

旅途的开端不顺利。恩里克四世国王把阿雷瓦洛给了他的盟友普拉森西亚伯爵，而伯爵害怕伊莎贝拉将这座城市收回、转交给她的母

亲，于是在城门前拦截她，不准她入城。伊莎贝拉不得不在安葬阿方索的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缅怀他。随后她去拜访自己的母亲，后者已经搬到了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斯·托雷斯。

在这几周里，伊莎贝拉比之前的任何时段都更茕茕孑立。她直接地、公开地与王兄和葡萄牙国王分庭抗礼。葡萄牙国王为了阻止她嫁给其他人，威胁发动战争。她的母亲帮不了她，因为母亲的精神有问题，完全依赖伊莎贝拉，而不能为女儿提供帮助。伊莎贝拉敬爱的外祖母已经去世，而胆怯的朋友也离她而去。就连伊莎贝拉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也转而反对她。胡安·帕切科说服了伊莎贝拉的侍女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和门西亚·德·拉·托雷，让她们相信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结婚是件坏事，于是企图阻止。这两个女人参加了跟踪和监视伊莎贝拉的计划。

在马德里加尔，伊莎贝拉得知自己受到了严密监视。恩里克四世国王知道她住在何处。在他提示下，法兰西使者来到马德里加尔，代表法兰西国王的弟弟贝里公爵向伊莎贝拉求婚。使者抵达后，她冷静地与他们周旋，尽管她此时已经通过代理秘密地与斐迪南结婚了。她把法兰西外交官操纵得团团转，让这些傲慢的外交官离开时误以为已经成功地说服了公主，她很快就会成为贝里公爵的新娘。他们带着喜讯返回法兰西了。

但恩里克四世国王知道伊莎贝拉违抗御旨、离开了奥卡尼亚，于是生了疑心，警示马德里加尔的官员，若她成功地与斐迪南结婚，就严惩他们。公主带着一些随从逃到了一座邻近城镇，躲进一家修道院，随后去了阿维拉。在那里，中世纪风格的高耸城墙上的狂躁的卫兵挥手让她们离去，因为城内又一次爆发了瘟疫。在几乎延续一整天的旅途之后，疲惫的公主终于来到巴利亚多利德城，那里的官员答应保护她。托莱多大主教的侄女玛丽亚（她的丈夫是一位名叫胡安·德

• 比韦罗的贵族）欢迎公主投宿她家（在城市中央广场附近）。伊莎贝拉于1469年8月30日夜间抵达那里。

与此同时，斐迪南也在艰险地奔波跋涉。伊莎贝拉派了两名使者——贡萨洛·查孔的外甥古铁雷·德·卡德纳斯和廷臣阿隆索·德·帕伦西亚，去阿拉贡护送斐迪南到卡斯蒂利亚。他们在返回卡斯蒂利亚的途中得知，沿途将会有层层堵截，边境上的城堡都在高度戒备地监视年轻的夫妻。卡德纳斯觉得斐迪南不会去了。帕伦西亚认为斐迪南一定会去，因为帕伦西亚之前去斐迪南那里取赠给伊莎贝拉的珠宝时，斐迪南非常急切地希望奔去营救伊莎贝拉，帮助她摆脱蛮不讲理的哥哥。^[6]

帕伦西亚和卡德纳斯抵达了萨拉戈萨，在一座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地下室内秘密会见了年轻的王子。^[7]斐迪南果然急于奔赴伊莎贝拉身边。

但斐迪南必须想办法偷偷溜过戒备森严的边境，悄无声息地从阿拉贡潜入卡斯蒂利亚。这趟旅程超过225英里，要翻越一座险峻山岭。斐迪南决定夜间行动，隐姓埋名，只带五名密友作为保镖。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因为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治安都很糟糕，大多数人都为了保障安全，会成群结队地旅行。

年轻的王子英俊、瘦削和强健。他穿上了破衣烂衫，乔装打扮为赶骡子的人，在一处客栈时甚至扮作同行伙伴的仆人，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隐秘行动，十分顺利，通常在夜间行进，以避开恩里克四世的探子。有一次，他们躲藏在奥斯马镇附近的一座要塞内，此地大约是他们旅途的中点。他们到得比预期要早，惊扰了一名不知道他们即将前来的哨兵。哨兵发出警报，大呼小叫，向企图进入城堡大门的陌生人投掷一块大石头，险些击中王子。但斐迪南最终被城堡内的贵族认出，受到欢迎。这些贵族支持他的事业。于是他在两百名士

兵的护卫下继续前进，抵达巴利亚多利德。伊莎贝拉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

1469年10月12日，伊莎贝拉公主写信给兄长，告诉她自己的打算，请求他接受她的决定。她将自己的婚姻告知了他，却未得到他的同意。如今骰子已经掷出去了^[8]。

* * *

10月14日午夜，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终于在胡安·德·比韦罗（卡斯蒂利亚贵族，托莱多大主教的亲戚，而大主教帮助促成了这门婚事）家中相遇。斐迪南及其侍从骑马来到这座设防宫殿（位于巴利亚多利德市中心），从后门进入。他走进房间时，古铁雷·德·卡德纳斯兴奋地喊道：“是他！是他！”并兴高采烈地向伊莎贝拉指出斐迪南。

但他俩立刻发现了对方。他们第一次相遇，都带着爱慕凝视着对方。有些贵族坚持让伊莎贝拉要求斐迪南吻她的手，以示臣服。她说这没必要，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他是已经在位的国王，地位说不定比她更高。

伊莎贝拉看到的是一位翩翩少年，比她略矮一点点，头发按照当时欧洲的时尚剪成很长和向下梳的发型。他已经脱去旅行的衣服，换上“精美华服”，因为斐迪南总是注重优雅的仪表。^[9]他不算很帅，但强健有力，肤色比伊莎贝拉深一些，是那种放荡不羁的黝黑。在她眼中，他是一个优秀的男子汉。

年轻的斐迪南“身材中等，肢体匀称，面容俊秀，眼神欢快，头发漆黑且笔直，面色健康”。编年史家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如此描述道，“他擅长骑术；精于长枪比武……喜爱运动，骁勇善

战……他拥有一种特殊的优雅，特别有亲和力，所有和他说话的人会立刻喜欢上他，心甘情愿为他效劳，因为他谈吐非常好”。[\[10\]](#)

这位少年激情澎湃，漂亮的年轻公主无疑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帕伦西亚回忆道，他们一见钟情，情意绵绵；他们“爱的冲动”显而易见，若不是五十九岁的托莱多大主教在场主持会面（此次会见一共两小时），他们就要拥抱起来了。

他们交换了结婚的正式承诺，由一名公证人记录在案，成为法律事件。大主教高声朗读了婚约以及教皇的许可书（因为新娘和新郎是血亲关系）。法律程序结束后，卡里略大主教觉得他们最好尽快成婚，以防恩里克四世出人意料地从安达卢西亚返回。

五天后，1469年10月19日，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在比韦罗宅邸的大厅正式举行婚礼。礼毕后设宴。这对新人囊中羞涩，为了支付婚礼的开销，不得不借钱。[\[11\]](#)正式证婚人是斐迪南的外祖父（卡斯蒂利亚海军司令）和姨母玛丽亚。一大群当地显贵也参加了婚礼。

当晚新人圆房，十分顺利，令各方都颇为满意。见证人演奏着喇叭、长笛和鼓，走进新房，沾着血迹的床单被展示给候在室外的人群。[\[12\]](#)随后在巴利亚多利德举行了七天的盛大欢庆；市民们欢呼着围观新人走上街头向大家致意。

他们的首次相遇和婚礼已经成为传奇。伊莎贝拉深深爱上了勇敢的年轻王子；事实证明他是一位热情的追求者。她哥哥的反对值得忧虑，但他肯定会看到这是门当户对的婚事，一定会祝福他们的结合。

有一个潜在的麻烦：斐迪南聪明、魅力十足而激情洋溢，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生了两个私生子。不过若认真考虑，这也不是坏事。

这两个私生子需要供养，但考虑到伊莎贝拉家族的生育难题，斐迪南已经被证明的生育能力或许是件好事。

天空中只有一朵阴云。坠入爱河的年轻女子可能没有注意到此事，但参加婚礼的很多客人无疑想到了这一点。斐迪南是条件极佳的夫君，因为他是好几个富裕而重要的王国的继承人。他已经是西西里国王，将来还会继承阿拉贡、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光辉的巴塞罗那城是其明珠）。但他之所以成为继承人，是因为他的哥哥和姐姐出人意料地突然死亡。卡洛斯和布兰卡究竟是怎么死的？

[1]. Félix de Llanos e Torriglia, *Así llegó a reinar Isabel la Católica* (Madrid, 1927), p.163, cited in Peggy K.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73.

[2]. John Edwards, *The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hs, 1474-1520* (Oxford, U.K.: Blackwell, 2000), pp.11, 13.

[3]. 法国南部港口城市。

[4]. 金币名，1252年首先在佛罗伦萨铸造，后来欧洲许多国家均有仿造，币值不等。

[5]. Liss, *Isabel the Queen*, p.71.

[6]. Liss, *Isabel the Queen*, p.75.

[7]. Liss, *Isabel the Queen*, p.75.

[8]. “骰子已掷出”（*iacta alea est*）是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向共和国元老院开战时的名言。意为这是一场赌博。

[9].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469-1476*, ed. Julio Puyol (Madrid: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934), p.90.

[10] Salvador de Madariaga, *Christopher Columbus: Being the life of the Very Magnificent Lord Don Cristóbal Colón* (New York: Macmillan, 1940) , p.8.

[11] J.H.Elliott,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London: Penguin, 1990) , p.15.

[12] Liss, *Isabel the Queen*, p.79.

六 斐迪南和他的家人

在邻国阿拉贡，斐迪南的七十一岁老父亲胡安二世国王，正在密切关注巴利亚多利德的事态。这门成功的婚姻代表着他毕生努力（目标是控制邻国卡斯蒂利亚）的巅峰。甚至在孩提时代，他就已经对卡斯蒂利亚垂涎欲滴。

胡安二世国王把心爱的儿子斐迪南送去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他们家族的敌人若有机会一定会杀死这个年轻人），是为了他自己的父亲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目标，即主宰卡斯蒂利亚。所以胡安二世密切关注着巴利亚多利德的事态，利用一个通信和间谍网观察和了解那里的一举一动。

胡安二世国王能够看得见，足以证明他克服困难的钢铁意志。年过六旬之后，他的双眼都生了白内障，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抗生素、麻醉剂和现代手术技术，他最终失明了。1466年夏季，他六十八岁的时候，决定接受一名技艺高超的犹太医生的治疗，此人学习过古印度和罗马摘除白内障的技术，方法是将一根锋利、烧得红热的针插入眼球。胡安二世的家人努力劝他放弃这个念头，警示说这种手术太危险，尤其是对他这样年纪的人。就连医生也犹豫了。但胡安二世愿意为了重见光明而拿自己的健康冒险。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此事体现了他毕生的顽强决心和为了自己的目标愿意豪赌的意志。

胡安二世国王所在的卡斯蒂利亚王族素来善于利用机遇。他的父亲是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伊莎贝拉的父亲）的叔叔，通过政治交易成为阿拉贡、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诸王国的国王。阿拉贡的胡安二世本人在兄弟姐妹七人中排行第三，但也想当国王。1419年，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娶了纳瓦拉王国的三十二岁寡妇女王（且没有孩子），就这样通过婚姻成了纳瓦拉国王。但他只是女王的夫君，自己不是真正的君主，而且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阿拉贡。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即纳瓦拉王储卡洛斯，以及两个女儿布兰卡与埃莉诺。但胡安二世不满足于自己已经有的东西——正在发展壮大的家庭和纳瓦拉的治理，而是渴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纳瓦拉女王于1441年去世，享年五十四岁。胡安二世保留了国王的头衔，尽管这个头衔实际上属于他的儿子，二十岁的卡洛斯。随后胡安二世国王续弦了，这一次娶了十九岁的卡斯蒂利亚贵族女子胡安娜·恩里克斯，生了两个孩子，斐迪南和胡安娜。他的后两个孩子比之前的子女小二十多岁。从一开始，胡安二世国王就在方方面面表现出更偏爱斐迪南和胡安娜。他对斐迪南（后来娶了伊莎贝拉公主）尤其疼爱，和他始终有一种特别的亲近。

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对卡斯蒂利亚的渴望从他幼年便生根发芽了，因为他的家族的两代人曾经梦想统治卡斯蒂利亚。胡安二世的父亲（也叫斐迪南）是卡斯蒂利亚王室的幼子，曾在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伊莎贝拉的父亲，六岁时继承了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王位，但因年幼无法理政）幼年摄政，品尝到了卡斯蒂利亚权力的滋味。斐迪南仅仅是摄政，这让他非常不爽，渴望自己当国王。邻国阿拉贡的国王驾崩无嗣，其臣民推举斐迪南为国王，于是他愉快地接受了，将自己一家从卡斯蒂利亚迁往阿拉贡。他成了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一世。但阿拉贡绝不是他渴望的天堂。

它其实是三个相对独立的国家——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拼凑而成的笨拙的联合体，并且有一系列令人失望的难题，难以治理和管束。

斐迪南一世在阿拉贡王位上没有坐多久就驾崩了，把王国留给了自己的儿子阿方索五世，即胡安二世的长兄。阿方索五世以阿拉贡为基地，征服了那不勒斯，那是意大利半岛沿海的一座繁荣的大城市。^[1]阿方索五世迷恋意大利的文化、知识、美食和温和气候，不肯回国，让妻子和弟弟们（包括胡安二世）以他的名义治理阿拉贡。他的弟弟们，就像他们的父亲斐迪南一世一样，不满足于仅仅担任摄政，毕竟治国理政是一项艰苦工作。

胡安二世和兄弟们开始在阿拉贡回忆自己曾经在卡斯蒂利亚的美好生活，于是开始密谋夺回那里的权力。他们对伊莎贝拉父亲（此时已经成年）的卡斯蒂利亚王国垂涎欲滴，幻想取而代之。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的荒政让阿拉贡的胡安二世等人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于是，伊莎贝拉的父亲终其一生都不得不对自己的堂兄弟的侵犯保持警惕。这就是他完全依赖阿尔瓦罗·德·卢纳的原因之一，因为阿尔瓦罗非常有效地保护了他的利益。1445年，也就是伊莎贝拉出生的六年前，爆发了一场激烈冲突，阿拉贡堂兄弟们入侵了卡斯蒂利亚，企图夺权。阿尔瓦罗·德·卢纳勇敢地保卫卡斯蒂利亚，击败了入侵者。阿拉贡的胡安二世的一个兄弟在战斗中负伤，后来死亡；一些重要的盟友被俘，于是胡安二世孤零零地撤回阿拉贡，回到作为摄政者的生活中，为了失败的耻辱而闷闷不乐。

随后二十年里，伊莎贝拉长大成人，而阿拉贡的胡安二世在谋划复仇。他打算用计谋来得到自己当年用武力未能得到的东西。现在他

的计划是借助自己的后代夺回卡斯蒂利亚，手段则是让自己最宠爱的儿子迎娶伊莎贝拉。

* * *

胡安二世对王朝联姻的第一个尝试是把自己的女儿布兰卡嫁给恩里克四世，那是在1440年。但布兰卡没有生育，于是他的梦想破碎了。

更重要的是，恩里克四世国王与自己的岳父阿拉贡的胡安二世国王的不愉快经历使得前者对后者提高了警惕。恩里克四世与布兰卡的十三年婚姻始终没有圆房，并且他很可能持续遭到布兰卡父亲的鄙夷。三十年前，在恩里克四世的新婚之夜，正是阿拉贡的胡安二世国王在新房外踱来踱去，而恩里克四世在新房内无法完成作为丈夫的义务。

如今，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婚姻给了胡安二世国王达到自己目的的第二次机会。控制身为卡斯蒂利亚王储的公主，是控制卡斯蒂利亚的另一种手段，如今也近在咫尺了。这就是恩里克四世坚决反对伊莎贝拉嫁给胡安二世之子斐迪南的原因之一。就连伊莎贝拉的忠实朋友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也企图阻止这门婚事，向恩里克四世通风报信。她的动机可能是担心伊莎贝拉出了油锅又入虎口。

换句话说，伊莎贝拉通过结婚扩张了自己的势力，确立了自己相对于兄长的独立性，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承担了一些风险。她的新公公是一个恶毒、睚眦必报和自私的人，为了控制她的土地可以不择手段。他在阿拉贡的绰号是“无信誉的胡安”。

胡安二世的不守信誉在他自己的家庭关系中也暴露无遗。他与长子卡洛斯的关系很紧张。卡洛斯的性格与父亲迥然不同。卡洛斯风度

翩翩，有文化修养，聪慧渊博，是文艺复兴式的文人，在社会品位发生变化的年代非常受欢迎。而他的父亲胡安二世更像是中世纪的产物，是英勇无畏的武士，更喜欢戎马倥偬，而不是阅读诗歌或观看戏剧。卡洛斯的喜好使得他在阿拉贡和他伯父阿方索五世的意大利领地都颇得民心。事实上，卡洛斯曾旅行到那不勒斯，与阿方索五世一起生活。他们都是绅士，热爱艺术、文学、诗歌和音乐，这让胡安二世非常恼火。历史学家艾伦·赖德写道：“胡安二世对任何形式的艺术都没有任何品位，也没有时间去欣赏。而卡洛斯酷爱艺术，因此得到了文化修养很高的伯父的钟爱。”^[2]

胡安二世国王与他的第二任妻子胡安娜·恩里克斯比较投机，他们是在1447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三年后，恩里克四世和布兰卡结婚七年后）结婚的。胡安娜·恩里克斯和他一样，也有吞并卡斯蒂利亚的梦想。借用一位阿拉贡历史学家的话，她的“顽强精神和毫无底线的野心”与胡安二世相仿。^[3]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斐迪南生于1452年。他们的女儿胡安娜在几年后呱呱坠地。

嫉妒是这个新家庭的标志。作为继母，胡安娜王后怨恨和敌视卡洛斯，因为他获得了权势和地位的优势。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而不是胡安二世第一任妻子的儿子，得到纳瓦拉王位。胡安二世国王也开始讨厌自己受到民众爱戴的长子，后者似乎能够无比轻松地赢得新朋友。于是胡安二世开始密谋提携自己的宠儿斐迪南。王室充满了高度紧张的气氛，受伤害的情感和侮辱在这里发酵，年长的孩子们意识到，他们在父亲心中的地位被父亲的新家庭排挤掉了。

胡安二世国王在第一段婚姻中生的女儿布兰卡悲伤地抱怨自己在被恩里克四世抛弃（理由是未能圆房）后，又遭到父亲的冷遇。布兰卡回家之后，胡安二世没有帮助这位不幸的公主疗伤，反而觉得她是个令人尴尬的失败者，尽管她并没有做什么错事。在布兰卡死前不久

签署的一份语调凄凉的文件中，她写道，“国王堂胡安忘记了”对自己第一段婚姻所生的孩子们应有的“父爱与亲情”。^[4]

1458年，阿拉贡局势发生了巨变。在意大利享受生活的阿方索五世终于去世。他的弟弟胡安二世是他的继承人，于是成为阿方索五世在伊比利亚和西西里岛领地的统治者，而阿方索五世的孩子们保留了那不勒斯的控制权。胡安二世本应公开指定自己的长子卡洛斯为阿拉贡和纳瓦拉的继承人，但他拒绝这么做。

与此同时，阿拉贡臣民越来越骚动不安，因为经济萧条，国王却劳师远征，王族内部争吵不休。加泰罗尼亚亲王领地的核心巴塞罗那，也是它的最大城市和历史上最繁华的都市，遭遇了外贸的衰落。加泰罗尼亚人开始相信，朝廷的玩忽职守、目光短浅和远距离遥控统治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巴塞罗那城的两百豪门望族主要依靠投资的收入，在近百年来收入不断减少。他们热切期待卡洛斯继位。然而，他们逐渐意识到，胡安二世国王没有要把加泰罗尼亚交给卡洛斯的意思。

* * *

公民们忧心忡忡。在15世纪初，特拉斯塔马拉家族迁往他们的新王国时，加泰罗尼亚欣欣向荣、繁荣昌盛，从事着高度活跃的布料、珊瑚、香料、丝绸和棉花贸易。但阿方索五世国王航向意大利，占据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意大利半岛。似乎没有人关注阿拉贡的利益了。

到1452年斐迪南出生时，阿拉贡人，尤其是加泰罗尼亚人，感到自己的国家正在分崩离析。“加泰罗尼亚曾经非常幸运和光荣，也是最虔诚的国度，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都受到人们敬畏。”绝望的埃尔恩^[5]主教若昂·马加里特于1454年告诉巴塞罗那的立法者，“现在加

泰罗尼亚被完全毁掉了，迷失了，因为它失去了自己的光荣君主。看哪，它丧失了全部力量、荣誉和宗教管辖；曾经有权有势的诸侯和骑士垮台破产；大小城镇土崩瓦解，腐蚀了全民的福祉；骑士没有骏马，只能骑骡子；寡妇、孤儿和儿童寻求慰藉，却是徒劳；海盗掳掠港口，恣意纵横四海。”[\[6\]](#).

阿拉贡受到一系列特别残酷的政策（称为“恶政”）的压迫，导致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非常艰难。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农奴制，主宰着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的经济生活。这种制度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很普遍，但卡斯蒂利亚却并非如此，那里的农民不是农奴，有行动和结婚自由，有权选择职业，不过事实上绝大多数农民的选择非常有限，因为贵族的人口极少，却拥有极大权力，占据着王国97%的财富。

而在加泰罗尼亚，农民的处境要黑暗得多，并且在大约连续五个世纪里不断恶化。在9世纪和10世纪，加泰罗尼亚的农民是自由民，拥有自己的小农场，分布在全国各地。那时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已婚妇女有权控制自己带来的财产，并在丈夫去世后享有其财产的10%，这让大多数妇女在老年能有一些经济保障。[\[7\]](#).

但随着欧洲遭到入侵者的袭击，为了自卫，人们建造起了许多城堡。到11世纪末，加泰罗尼亚已经有超过八百座城堡，其中很多间隔只有三五英里。居民们在这些防御工事周围搭建自己的房屋，以求得保护，或者在教堂周围建房居住，因为他们相信，居住在教堂周围三十步距离内的人不会遭到暴力伤害，享有和教堂本身一样的神圣避难权。这种局面使得农民越来越依赖他们的保护者（要么是世俗领袖，要么是教会长老）。这些地区性领导人渐渐认为自己有权支配这些农民，因为农民成了他们的臣子。

贵族权力逐渐增长，女性地位随之下降。嫁妆，即新娘的家族向新郎家族支付的款项，变得越来越重要，结果是女孩的经济价值低于男孩。后来财产继承制度越来越倾向于将绝大部分或全部财产传给一个孩子，不给其他孩子任何财产。这有利于维持强势的家族产业，但年幼的孩子们就惨了。

于是，越来越少的人对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越来越强的主宰权。农民被迫接受世俗或教会领主的统治，承认自己是服从他们权威的臣民。农民一般被要求居住在地主的土地上。财产交易不仅转移了地产本身的控制权，还包括居住在土地上的农民的人身权。要想搬走，农民必须花钱购买自由，即赎身。有些农民还被迫指定自己农奴地位的继承人，具体是指他们孩子中的哪一个。如果农民的妻子与人通奸或地主土地上的房屋被烧毁，农民会被罚款。

据阿拉贡历史学家记载，疾病对阿拉贡的打击比对欧洲其他地方更为严重，造成了灾难性后果。14世纪初，黑死病横扫欧洲，杀死了欧洲人口的至少25%，加泰罗尼亚作为跨地中海航运和世界贸易的中心，损失更为惨重，在黑死病首次爆发之后的几十年里损失了高达50%人口。^[8]虽然劳动力的减少让很多地方的劳动者获得了更大权利，但在阿拉贡产生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因为此时阿拉贡的经济也崩溃了。贵族应对收入减少的办法就是更残酷地压迫幸存的农民。

很多农场十室九空，因为居住在那里的农民要么死去，要么逃亡。贵族开始追捕逃离田地的农奴。想要离开的农民必须支付越来越高的赎身钱。一个女人若是想和自己地主的领地之外的人结婚，必须缴税。有些领主拒绝接受这些赎金和税金，因此等于是阻止农民离开。另外，新的法律禁止不肯接受这些压榨的农民起诉其领主。农民被要求服从领主的要求，不管这些要求是否公平。

换句话说，加泰罗尼亚的贵族应对疫病的对策就是，寻找新的办法来剥削人口已经大大减少的农奴。1402年，阿拉贡王后玛丽亚写信给教皇本笃十三世，谈及农民的绝境，称此种局面“害处极大”，并说教会本身就是最大的地主。^[9]但局势却更加恶化下去。

体制变得越来越严苛，剥削越来越残酷，于是出现了“恶政”的说法。据1462年撰写的一份报告，阿拉贡的哺乳期妇女通常必须还要为地主的孩子喂奶，于是她们自己的孩子能吃到的奶就少了。农民还说，领主常要求新婚女子的初夜权。领主说这是子虚乌有的虚假指控，但同意禁止初夜权。^[10]

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的阿拉贡分支，即斐迪南一世、阿方索五世和胡安二世这三位国王，意识到了体制内在的问题，但不愿意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恰恰相反，他们利用这种局面，既压榨贵族，也剥削农奴，以支持自己在国外的冒险。“阿方索五世经常承诺要从意大利南部返回，去处理他那越来越绝望的都城的问题。”历史学会艾伦·赖德写道，“但从1435年他远征西西里岛，到二十三年之后他驾崩，他始终没有返回，而是遥控加泰罗尼亚，对它的控制力越来越弱。”^[11]

阿拉贡的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统治者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1455年，他们禁止了农奴制，但一年后为了笼络贵族又恢复了农奴制。1458年，朝廷的政策又一次发生变化。类似地，1461年12月，胡安二世国王的第二任妻子胡安娜王后命令贵族停止对农民的压迫，但一个月后她又反悔了。她赞扬贵族遏制农民的努力，与此同时她却利用农民的支持，组建一支军队，抵抗那些越来越憎恶王室朝三暮四的贵族。^[12]没过多久，特拉斯塔马拉家族就不得不同时对付蠢蠢欲动的农民和兴风作浪的贵族。

* * *

胡安二世国王在努力应对这些问题的同时，他那颇得民心又温和可亲的儿子卡洛斯始终是他的眼中钉。1459年10月，阿方索五世在意大利驾崩，胡安二世企图在都城萨拉戈萨将自己和妻子加冕为阿拉贡君主，但加泰罗尼亚人发出抗议，要求比亚纳亲王^[13]卡洛斯必须在场，否则不为他们加冕。卡洛斯王子于1460年从意大利返回巴塞罗那。

就是在这个时期，卡洛斯王子决定，为了加强自己对阿拉贡王位的继承权，他需要迎娶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公主。他对这门亲事非常热情，称伊莎贝拉为“我最美丽的公主”。^[14]卡斯蒂利亚的恩里克四世国王有一段时间曾积极推动伊莎贝拉和卡洛斯的婚姻，部分原因是为了向自己的前岳父胡安二世国王复仇，因为胡安二世希望伊莎贝拉嫁给自己最心爱的儿子斐迪南。

但胡安二世国王的妻子得知消息后，大发脾气，因为这阻碍了她为自己的儿子斐迪南做的安排。阿拉贡编年史家赫罗尼莫·苏里塔称，王后“大哭大闹，放声咒骂”。^[15]胡安二世国王决定推动卡洛斯与葡萄牙公主卡塔利娜结婚。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卡洛斯被“言之凿凿的父爱的表示”诱骗到了父亲身边。^[16]然而胡安二世逮捕了卡洛斯，将他投入监牢。此事令加泰罗尼亚人大为沮丧，因为他们视卡洛斯为合法继承人，相信胡安二世国王此举是违法的。“卡洛斯已经悔罪，却遭到睚眦必报的父亲虐待，人们普遍对卡洛斯非常同情。”^[17]

1461年2月6日，在加泰罗尼亚的列伊达，危机发展到了一个巅峰。加泰罗尼亚使者坚持要求胡安二世国王释放卡洛斯并认可他是自己的继承人。胡安二世干脆拒绝接见这些使者，说自己太忙。他企图离开列伊达，但发现城门紧闭。

然后，胡安二世直面使者，冷冰冰地坚称，斐迪南才是他的继承人。“使者们，你们除了我的儿子堂斐迪南之外，没有别的王子。”他发表了这声明之后，鼓乐喧天，随后列数了斐迪南的所有头衔，包括阿拉贡王子。加泰罗尼亚人怒吼道：“上帝保佑，我们要的是堂卡洛斯！”^[18]

胡安二世国王最后被迫认可卡洛斯为王储，但很难掩饰自己的怒火。“在公开场合，胡安二世命令在萨拉戈萨举行庆祝活动和装点城郭，以示和解；私下里，他更加憎恨卡洛斯和迫使他可耻地屈服的加泰罗尼亚人。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他对那些挫败他的敌人，仍然是满腔怒火，丝毫未减。”^[19]

加泰罗尼亚人几乎可以确信，疾病缠身且盲眼的六十三岁老国王胡安二世已经时日无多；他们只要坚持反抗，最终必然能战胜他。不料胡安二世让他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仍然顽强地活着，而且做了手术，恢复了视力。

先走一步的却是卡洛斯，他在短暂患病后于1461年9月23日在巴塞罗那去世。很多人相信他是被毒死的，凶手可能就是他的继母胡安娜王后，她公开要求推举她的儿子斐迪南为王储。卡洛斯的死因不是很清楚。他曾经得过肺炎；历史学家艾伦·赖德认为他的死因是“肺部感染，由于压力而加重了病情”。

但卡洛斯的死亡时间实在太可疑。即便胡安二世没有命令杀死自己的儿子，卡洛斯的死亡肯定对他有利，铺平了他与妻子的宠儿——九岁的斐迪南成为王储的道路。

但斐迪南通往宝座的道路并不平坦。加泰罗尼亚公众因卡洛斯的死而悲痛万分，不太愿意接受新王储。在巴塞罗那，群众举行盛大集会，表达对卡洛斯的哀思，有些人开始将刚刚去世的卡洛斯奉为圣

徒，尊崇他的遗迹。据说只要触摸他的棺材，就能治愈肿瘤、皮肤病，还能让盲人恢复视力。成千上万人聚集起来，见证这些奇迹的痊愈。民间流传的说法是，“长嗣大人”去世后，仍然通过体内蕴含的“神圣力量”做出伟大的业绩。[\[20\]](#)

胡安二世国王力图辟谣，说穷人收了贿赂，所以传播这些奇迹治愈的故事。但他很难维持道德权威，因为他与此同时还宣布，斐迪南的母亲胡安娜（人们相信是她谋害了卡洛斯）将担任王储斐迪南的摄政者，因为这孩子年纪还太小。从某些角度看，卡洛斯的死亡增加，而不是减少了阿拉贡的紧张气氛。

因此，小斐迪南在国内旅行时，必须带着大群侍从和保镖，以防他自己的臣民伤害他。他母亲前往巴塞罗那，但因为害怕遭到民众攻击，又突然离开。斐迪南和他母亲离开巴塞罗那之后，他们的政敌声称，王后参与了屠杀“敬拜有福的圣卡洛斯”的群众的阴谋。反叛者公开处决了好几名据说与王后共谋的官员。

群众对王室没有多少尊重。在乡村各地，贵族与成群结队的武装农民之间发生对抗，导致暴力流血。为了赢得支持去镇压反叛的臣民，胡安二世缔结了一系列错综复杂、阴险歹毒的条约，做了相应安排。这将造成持久而复杂的后果。

下一个成为阴谋诡计的牺牲品的，是他的长女布兰卡，她在与恩里克四世离婚后回到了娘家。她曾热爱和支持自己的哥哥卡洛斯。现在，卡洛斯去世后，她成了纳瓦拉王位的继承人，尽管在纳瓦拉王国，单身女性不能统治。不过这让她成了胡安二世国王的绊脚石。胡安二世将自己不幸的布兰卡交给她的妹妹富瓦伯爵夫人[\[21\]](#)监管。布兰卡被“强行带到法兰西，死在狱中”。人们普遍相信，她是被毒死的。[\[22\]](#)

布兰卡的死亡，对胡安二世国王和他的第二个家庭来说，又是“天助我也”的好事。但布兰卡在死前重新对纳瓦拉王位提出了权力主张，并将自己的继承权赠给自己的前夫，卡斯蒂利亚的恩里克四世国王。换句话说，她宁愿把继承权交给抛弃她、羞辱她的前夫，也不愿意交给阴险的父亲和异母弟。

把女儿送往法兰西，仅仅是胡安二世国王新计划的第一步。他与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缔结了秘密协定，请他帮忙镇压阿拉贡的反叛者。根据密约，路易十一将出兵帮助胡安二世镇压加泰罗尼亚的叛乱。作为交换，胡安二世承诺允许法兰西军队占领阿拉贡的两座城堡——佩皮尼昂和科利乌尔。通过这种非同寻常的举动，胡安二世国王将国土割让给了阿拉贡的宿敌法兰西。“通过这鲁莽轻率、决断失当的协议，”赖德写道，“胡安二世彻底粉碎了和平解决加泰罗尼亚难题的任何残余希望。这协议将在他的余生始终困扰他。”^[23]

胡安二世国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迫使他的臣民屈服。他向列伊达发动袭击，摧毁了那里的庄稼收成，威胁要让那里的居民饿死。国王的残暴令加泰罗尼亚人震惊而恐惧，更加决心要颠覆胡安二世及其家族。加泰罗尼亚官员告诉胡安娜，他们要褫夺她的王后身份，要求她离开，如果愿意，可以将斐迪南带走。王后决定反抗。她盘踞在赫罗纳的要塞，在国王的鼓舞下准备作战。1463年6月6日，要塞开始遭到攻击。6月26日，一大群士兵短暂地突破了城墙，令守军惊慌失措。据说胡安娜满大街乱跑，寻找她的儿子，最后发现十二岁的儿子正在大教堂外玩耍。她心力交瘁地晕倒了。7月22日，士气低落且资金耗尽的攻击者最终撤退了，但对遭到围攻的母子来说，这是漫长的七周。胡安二世国王的强硬路线成功了。

但胡安二世国王的臣民越来越憎恨和鄙视他。胡安二世与法兰西签订密约的消息令加泰罗尼亚人愤恨，因为他们将法兰西视为不共戴

天之敌。他们把为法兰西人打开阿拉贡王国大门的胡安二世看作卖国贼。一位历史学家写道：“胜利的保王党如今被人看作外国压迫和暴行的走狗。”^[24]

为了对抗胡安二世，加泰罗尼亚人需要强有力的盟友。正如胡安二世求助于法兰西，加泰罗尼亚贵族现在去找卡斯蒂利亚的恩里克四世国王（他曾是卡洛斯的朋友）。加泰罗尼亚贵族否认斐迪南的继承权，将其奉献给恩里克四世，而恩里克四世的第一个冲动不是抓住机遇，而是犹豫不决。他说，在接受这个提议之前，他必须寻求议事会的建议。这就造成了几周的耽搁。但与此同时，他占领了胡安二世国王的一些零星城镇。这当然让胡安二世国王十分恼火。胡安二世国王没有能够从一位虚弱的昏君手里夺走卡斯蒂利亚，这位昏君却占据了胡安二世的一些领土。胡安二世现在内外交困，不仅要镇压国内叛乱，还要面对卡斯蒂利亚人。

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之间出现了战争的风险，恰在这时，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狡猾地自告奋勇为两国仲裁。他为了得到这个仲裁使命，接受了胡安二世国王的贿赂，同时又向胡安·帕切科行贿，以便确保能够进行仲裁。恩里克四世国王抵达了会面地点，以探讨仲裁事宜。他非常典型地既笨拙又缺乏安全感，冠冕堂皇地到场，身边环绕着三百名摩尔人保镖，但路易十一国王劝诱他渡过比达索阿河，去谈判地点。迫使恩里克四世衣着光鲜地渡河，使他陷入了守势，让他既狼狈又显得过于华丽。路易十一则刻意衣着朴素。他发出了致命打击。他宣布，恩里克四世应当放弃加泰罗尼亚，将其交给胡安二世；并归还卡斯蒂利亚人占领的位于纳瓦拉、巴伦西亚和阿拉贡的土地。路易十一要求加泰罗尼亚服从这裁决，尽管加泰罗尼亚人并没有被允许参与谈判。

卡斯蒂利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目瞪口呆。恩里克四世国王又一次屈服，灰溜溜走了。他渐渐意识到，他被自己最好的朋友胡安·帕切科和前岳父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当猴耍了。这是恩里克四世国王反对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结婚的另一个原因。

同时，加泰罗尼亚人找到了鄙视他们的君主胡安二世的另一个理由，因为他又一次背叛了他们的利益。1463年6月，加泰罗尼亚议会宣布，凡以美言赞誉胡安二世者，一律处死。

但胡安二世国王为自己和儿子的雄心壮志仍然强劲。1464年9月21日，斐迪南被指定为阿拉贡和西西里国王。即便是斐迪南的政敌也认识到，他身心强健而精明强干，而且年轻人总是让人产生乐观情绪。所以，人们希望，斐迪南登基之后，阿拉贡的局面会改善。

到1465年7月，伊莎贝拉公主十四岁，斐迪南十三岁，胡安二世国王又故技重演，企图颠覆卡斯蒂利亚，尽管他自己在阿拉贡王位上也立足不稳。这一次，他支持了起兵反抗恩里克四世的卡里略领导的贵族，促使恩里克四世认可弟弟阿方索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是又一次给卡斯蒂利亚国王的伤口上撒盐。据历史学家亨利·约翰·蔡特说，胡安二世国王“更急于在卡斯蒂利亚搞阴谋诡计，以便干预其政治，从中渔利，而不是确保自己领地的和平与繁荣”。[\[25\]](#)

但阿方索王子的早逝意味着，卡斯蒂利亚的政治局势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胡安二世国王又开始努力促成伊莎贝拉和他的儿子斐迪南的婚姻。他求助于老友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卡里略和胡安二世国王操纵政局，让年轻的卡斯蒂利亚公主伊莎贝拉与年轻的阿拉贡王子斐迪南结婚。如今在婚礼上站在伊莎贝拉旁边的，就是这样的斐迪南，这样一个人的儿子。

伊莎贝拉嫁给了胡安二世国王最宠爱的孩子。年轻的斐迪南虽然眼睛里带着喜悦，常常喜笑颜开，但秉性却和父亲如出一辙。

[1]. 他征服的不仅是那不勒斯这座城市，还有那不勒斯王国（今日意大利的南半部分）和西西里王国。

[2]. Alan Ryder, *The Wreck of Catalonia: Civil War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77.

[3]. William Prescott,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Philadelphia: J.B.Lippincott, 1873), p.63.

[4]. “El dicho Rey Don Juan..., ” order granted by Blanca de Navarre, April 30, 1462,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p.19, A-7, folio 16 to 20, cited in *Indice de la colección de don Luis Salazar y Castro, formado por Antonio de Vargas-Zúñiga y Montero de Espinosa y Baltasar Cuartero y Huerta*, vol.1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949).

[5]. 今天西班牙与法国边境的一个城镇，属于法国，当地人多讲加泰罗尼亚语。

[6]. Joan Margarit, bishop of Elna, addressing the Cortes of Barcelona, Oct.6, 1454; published in R. Albert and J. Gassiot, *Parlaments a les corts catalanes* (Barcelona: Editorial Barcino, 1928), pp.209-10; cited in Ryder, *Wreck of Catalonia*, p.29.

[7]. Paul H. Freedman, *Origins of Peasant Servitude in Medieval Cataloni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46.

[8]. Ryder, *Wreck of Catalonia*, pp.156, 163.

[9]. Ryder, *Wreck of Catalonia*, p, 183.

[10]. Ryder, *Wreck of Catalonia*, p.193.

[11]. Ryder, *Wreck of Catalonia*, p.186.

[12]. Ryder, *Wreck of Catalonia*, p.186.

[13]. 比亚纳亲王此时为纳瓦拉王储的称号，后成为西班牙王储的称号。

[14]. Jerónimo Zurita, *Andes de Aragón* (Zaragoza: 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ólico” [C.S.I.C.] de le Excma Diputación Provincial, 1977), vol.8, p.242.

[15]. Jerónimo Zurita, *Andes de Aragón* (Zaragoza: 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ólico” [C.S.I.C.] de le Excma Diputación Provincial, 1977), vol.8, p.281.

[16]. Ryder, *Wreck of Catalonia*, p.83.

[17]. Ryder, *Wreck of Catalonia*, p.87.

[18]. Ryder, *Wreck of Catalonia*, pp.88 and 89.

[19]. Ryder, *Wreck of Catalonia*, p.92.

[20]. Ryder, *Wreck of Catalonia*, pp.94-95.

[21]. 即阿拉贡的埃莉诺（1426~1479），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与纳瓦拉女王布兰卡一世的女儿，卡洛斯和布兰卡的妹妹。她嫁给了法兰西的富瓦伯爵。在兄长和姐姐死后，她是纳瓦拉王位的继承人，但将这个继承权转移给了父亲。胡安二世死后，埃莉诺短暂地成为纳瓦拉女王，两周后去世。

[22]. Ryder, *Wreck of Catalonia*, p.104.

[23]. Ryder, *Wreck of Catalonia*, p.105.

[24]. Ryder, *Wreck of Catalonia*, p.124.

[25]. Henry John Chaytor, *A History of Aragon and Catalonia* (London: Methuen, 1933).

七 新婚夫妇

这对新婚夫妇的家庭历史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但他们早期生活有一个方面简单而显而易见：他们之间有强烈的性吸引。1469年10月14日，他们第一次见面，在这一周内就结婚了。不到三个月，伊莎贝拉就有了身孕。恩里克四世国王的不育症对国民来说是耻辱和担忧的来源，而伊莎贝拉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证明了自己的生育能力。对促成这门婚事有功的人们满意地看到，夫妻关系暖意融融而充满激情。

两人都身体健康而强壮，精力充沛而果断有力。伊莎贝拉的文化修养更高，喜欢与学者和有浪漫情怀的人相伴；斐迪南是实干家，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伊莎贝拉很想要个孩子，斐迪南也很乐意帮她实现这个梦想。

除了身体的互相吸引之外，这对年轻人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是西班牙人，从小就被灌输了关于西班牙民族历史、命运和挑战的相同信念。斐迪南第一次走进塞哥维亚城堡的大厅，仰望长长的西班牙基督徒君主的雕像群时，他在注视自己的祖先，也在观察伊莎贝拉的祖先。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开始婚姻生活时，遵从了中世纪晚期常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习俗。例如，王室夫妻要用一种符号或图画来代表他们的结合，以便将他们的婚姻昭告天下，因为当时很多人是文盲。伊莎贝拉选择的符号是箭（flecha），因为字母f代表斐迪南；斐迪南的符

号是轭（yugo），因为字母y代表Ysabel，这是伊莎贝拉的名字在当时的卡斯蒂利亚的常见拼法。箭和轭的符号被以艺术形式互相交织起来，并用链条连接起来，用图像来代表他们的婚姻。这种图像最终出现在西班牙全境的政府建筑和教堂。

夫妻俩的宗教礼拜也反映了对仪式的尊崇，不过伊莎贝拉更虔诚。两人都是天主教徒，从小在教士的环绕下长大。两人现在都供养了忏悔师，并定期与神父交谈，以审视自己的灵魂。

斐迪南轻松地赢得了很多人的爱戴。他是个有天赋的骑手，精通长枪比武和鹰猎，并且擅长球类游戏，如回力球。他喜欢下棋、打牌和赌博。他读书不多。伊莎贝拉对刺绣和编织感兴趣，所以他们可以各自从事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互相聊天逗乐，身边常常围着急于讨好他们的廷臣。白天，宫里开展娱乐活动，人们进行轻松风趣的闲聊；晚间，他们欣赏音乐和舞蹈。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心理和情感上也有共同点。他俩都是在即将继承王位的长兄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他俩的成长过程中，周围都环绕着权力真空造成的战争和骚乱，让孩提时代的他们感到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十分脆弱。他俩都决心一扫前朝的颓唐，用此前缺乏的那种坚定决心来统治国家。

他俩都曾有不寻常的童年。伊莎贝拉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她按照自己想象的婚姻生活理所应当的样子，去经营自己的婚姻。她从修女那里学会了纺线、织布和刺绣，亲手给斐迪南制作所有衬衫。^[1]他们几乎总是需要为金钱拮据而担忧，但至少他们这种共同承担牺牲、一同经历风雨的感觉给了他们一些兴奋。一位阿拉贡编年史家写道：斐迪南“去卡斯蒂利亚时身无分文，公主也没有钱”。^[2]斐迪南常向父亲要钱，但因为阿拉贡国王陷于内战不能自拔，没有多少钱分给儿子，所以斐迪南时常空手而归。

对年轻的夫妻来说，这是个激动人心而充满乐观的时期。如果他们生了个儿子，伊莎贝拉的王位继承权就会得到很大的加强，因为她是下一位男性继承人的母亲。他们的孩子将同时统治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将两个王国融合成统一的西班牙。自佩拉约离开山洞开始收复伊比利亚半岛以来，统一的西班牙就始终是人们的夙愿。

最后，通过她的婚姻，伊莎贝拉为自己确立了无可争议的王室地位。斐迪南是西西里国王，伊莎贝拉是他的王后。曾为自己寻找一个合法身份而挣扎的那位公主如今成了一位国家元首的夫人。她骄傲地采纳了他的诸多头衔，对他们共同的高贵血统非常自豪。因此她不仅成了他的爱人，还是他最坚强的捍卫者，热切地保卫他们的辉煌地位，甚至不惜与血亲（即斐迪南的外祖父——卡斯蒂利亚海军司令的男性继承人们）为敌。“有一天，海军司令在和斐迪南打牌时突然非常不客气地说话，”一位观察者回忆道，“一位廷臣说，海军司令毕竟是国王的亲戚。伊莎贝拉立刻驳斥说，斐迪南没有亲戚，只有臣民。”^[3]

* * *

但伊莎贝拉的婚姻使得她自己家族的问题越发严重。伊莎贝拉为自己和兄长恩里克四世国王关系的裂痕而担忧，希望能够尽快与他重归于好。婚礼之后，她和斐迪南派了三名使者去见恩里克四世，请求他接受木已成舟的现实，并承诺尊重他、向他效忠。他们恳求国王原谅他们，说他们自己是国王的“顺从的儿女”，希望“辅佐他，给他的国度带来和谐与和平”^[4]。

恩里克四世很久才给予答复，并且非常冷淡。他说，他要与谋臣商议后再作打算。但此后就没有书信送来。他对这门婚事肯定是怒气冲冲，也不肯原谅伊莎贝拉。他一定觉得，他的宿敌——阿拉贡国王

胡安二世，也是他的前岳父——又一次打败了他，而胡安二世的儿子斐迪南最终会取代小胡安娜，统治卡斯蒂利亚。

1470年3月，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又给恩里克四世写了一封信。他们再次恳求国王宽恕他们，并询问，若请教会法庭裁决，是否有助于解决分歧。这一次，恩里克四世根本没有回信。

他身边的人煽动兄妹间的嫌隙越来越严重。每个人这么做都有自己的理由。卡斯蒂利亚的胡安娜王后希望保护她自己女儿的王位继承权。胡安·帕切科最自豪的，就是他的比列纳侯爵头衔，他如今对伊莎贝拉的婚姻忧心忡忡，因为比列纳侯爵头衔曾属于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那还是在奥尔梅多战役之前，在那场战役中阿尔瓦罗·德·卢纳打败了胡安二世；胡安·帕切科担心胡安二世一家可能会把他们相信属于他们的东西收回。国王身边的其他人也肯定热切地指出，御妹嫁给斐迪南，就是公然向王兄挑战，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国王都不会对这种放肆行为善罢甘休。在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女子居然为自己的婚姻大事当家做主，而不请求族长的批准，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争取民意支持，伊莎贝拉发表了公开声明，解释她为什么嫁给斐迪南。为了确立自己的公信力并强调自己目的的严肃性，他们在10月22日，也就是婚礼没几天之后，召开了第一次正式的国务会议。

伊莎贝拉求助于那些她觉得有可能帮助恢复王族和睦的人。恩里克四世国王将阿雷瓦洛城（伊莎贝拉母亲的产业）封给了普拉森西亚伯爵，这举动让伊莎贝拉十分恼火。但伊莎贝拉还是给伯爵夫人写了一封亲切友好的信，讨论了局势，并强调自己对国王的忠诚；她请求伯爵夫人帮她向恩里克四世说情。“亲爱的伯爵夫人，”她写道，

“您一定已经看到了我给王兄的一封信的副本，我在此信中解释了我为何离开马德里加尔，前往高贵的巴利亚多利德城。”^[5]她告诉伯爵夫人，她正在恳求恩里克四世批准她的婚姻；她说自己选择这门婚事

是“为了侍奉上帝，并为国王效劳，为了国家的安宁，用我的意志和坚强的心为他效力，并追随他”。在信的末尾，她提出了“一个饱含爱意的请求”，请求伯爵夫人将此信转给恩里克四世。

伊莎贝拉的这番努力没有结果。恩里克四世仍然不答复。他的沉默显得阴森可怖。年轻的夫妇现在认识到，他们已经和恩里克四世国王与胡安娜王后及其冷酷无情的盟友胡安·帕切科结成了死敌。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越来越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于是请求斐迪南的父亲出兵保护他们。但胡安二世手头拮据，受困于阿拉贡内战，无兵可派。他敦促儿子和儿媳征求斐迪南的卡斯蒂利亚外祖父和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的建议。这位大主教仍然是他们最忠实的朋友。^[6]

伊莎贝拉的政治盟友几乎立刻作鸟兽散。就连她与斐迪南的婚礼所在地——巴利亚多利德城，也放弃了她的事业，转而与恩里克四世结盟。恩里克四世切断了伊莎贝拉的经济来源，使夫妇俩的财政状况极为恶化。不久之后，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领地就只剩下梅迪纳·德尔·坎波（始终大力支持他们的贡萨洛·查孔帮助他们镇守此地）和阿维拉（由查孔的儿子胡安驻守）。^[7]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撤到了巴利亚多利德附近的杜埃尼亚斯镇（距巴利亚多利德约20英里），此地是卡里略大主教的势力范围，他们在此处寻找避风港。

恩里克四世国王对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敌意在卡斯蒂利亚人所共知，很快许多西班牙人便开始对他俩避之不及。一位阿拉贡大使在给胡安二世国王的信中写道：“很少有权贵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支持两位年轻的君主。”^[8]

雪上加霜的是，斐迪南与最重要的盟友卡里略大主教发生了冲突，此时夫妇俩的衣食住行其实都是卡里略大主教在供养。胡安二世国王特别指示儿子要听卡里略的话，遵照他的建议办事，然而斐迪南觉得大主教太飞扬跋扈。卡里略则认为斐迪南任性顽固。斐迪南告诉

卡里略，“他不会像卡斯蒂利亚的许多君王一样任由他（卡里略）摆布”^[9]。卡里略很快就向胡安二世国王发出潮水般的书信和消息，抱怨少年斐迪南不听他的管教。

这番争吵让伊莎贝拉陷入了尴尬境地。斐迪南是她丈夫，她应当对他忠心耿耿，但卡里略始终是她忠实的朋友，其他人抛弃她的时候，卡里略也一直站在她那边。胡安二世国王也觉得斐迪南太鲁莽，多次写信给他，要他服从卡里略的意见。

随后，一个新问题给年轻的夫妻带来了更多麻烦。允许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结婚的教皇许可书被证明是匆匆伪造出来的，是卡里略大主教和胡安二世国王的使臣莫森·皮埃雷斯·德·佩拉尔塔安排伪造了这份教会文书。^[10]这两人急于促成婚事，于是将另一时期发布的许可书伪装成教皇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结婚的许可。斐迪南与伊莎贝拉未能从教皇那里获得正式的文书许可，意味着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乱伦。斐迪南对自己的父亲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他获得正式的许可，把事情办好。

这些事件让伊莎贝拉颇感不安。她必须获得恰当的许可，那样她即将出世的孩子才具有合法性。但如果教皇害怕得罪恩里克四世国王而拒绝批准，事情就难办了。果不其然，教皇保罗二世支持恩里克四世，拒绝为伊莎贝拉提供必需的文书。

他们等待了漫长的好几个月。五十三岁的教皇保罗二世不肯回心转意，最终大家认清了形势：只有一位新的教皇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等待的过程给伊莎贝拉造成了很大伤害。即便此事圆满解决过后，她也花费了很大气力，血亲若想结婚，必须提前很长时间从梵蒂冈获得许可，这样就能预先杜绝类似问题。欧洲各王室常常通婚，因此经常需要得到教皇的许可。后来，伊莎贝拉对教皇许可书的关注将造成长期而灾难性的后果。

但在目前，等待教皇批准的不确定性给第一次当母亲的伊莎贝拉造成了更多压力。毕竟从教会或政府的角度看，她的婚姻并不合法。她就这样煎熬着等待孩子的诞生。若这是个男孩，她的地位将得到大大巩固，因为那样她就是阿拉贡无可争议的王位继承人的母亲，而且男孩继承卡斯蒂利亚王位的优先权会比另外两个候选人——伊莎贝拉自己和胡安娜公主——强得多。

10月1日，伊莎贝拉开始阵痛。漫长而艰难的分娩持续了一整夜：“骑士们和斐迪南度过了许多个心急如焚的钟头，对伊莎贝拉的危险状况忧心忡忡。”^[11]孩子于1470年10月2日上午晚些时候诞生。分娩过程中，伊莎贝拉自己的生命可能都受到了威胁。在当时，分娩一般都是有危险性的，许多产妇因为并发症、感染或失血而死亡。

五位见证人待在产房，以确保被展示给世人的孩子确实是产妇本人所生。没有人希望产生替换婴儿的谣言而使王位继承的问题更加复杂。根据15世纪的风俗，为伊莎贝拉接生的可能是一位产婆，而不是医生。她还要求在阵痛过程中给她的脸罩上一块丝绸面纱，不让见证人看到她脸上的痛苦表情。她生了个女孩。卡里略大主教为孩子取名为伊莎贝拉，与其母亲、外祖母和曾外祖母同名。

当天下午，新妈妈伊莎贝拉向国民宣告了令人失望的消息。“天主给了我们一位小公主，”她在一封信中宣布。^[12]这是很糟糕的消息，在阿拉贡尤其不妙，因为女性不能继承阿拉贡王位。胡安二世国王得知消息时“公开表示沮丧”^[13]，因为他精心谋划的计划——让他的后代统治卡斯蒂利亚——受到了威胁。

但对恩里克四世国王来说，这是喜讯。对小胡安娜来说，女孩的威胁要比男孩小得多。他得知女婴诞生的消息后，立刻采取行动，剥夺伊莎贝拉所剩无几的封地和头衔。他占据了钟爱的梅迪纳·德尔·坎波城。他还宣布，九岁的胡安娜将与一位法兰西贵族结婚，即贝

里公爵查理，也就是曾谈判要娶伊莎贝拉的那个两腿瘦长的家伙。恩里克四世这么做，只能理解为刻意火上浇油。查理不再是法兰西王储，因为他兄长的妻子生了个儿子，但胡安娜与一位法兰西贵族的婚姻可能导致法兰西对卡斯蒂利亚王位蠢蠢欲动。很快法兰西的野心就昭然若揭了：他们坚持要求，为了让小胡安娜配得上法兰西王位的第三顺序继承人，应当立小胡安娜为卡斯蒂利亚王储。恩里克四世同意了。他这个欠考虑的举动，表现出对异母妹的满腔怒火。他宁愿把王国交给不共戴天之敌法兰西，也不愿交给伊莎贝拉和斐迪南。

1470年10月26日，在洛索亚山谷（阿拉贡边境附近）举行的一次公开典礼上，恩里克四世正式宣布，他剥夺了伊莎贝拉的王位继承权，要求卡斯蒂利亚人“不得将公主视为合法继承人，也不得服从她”。^[14]这只是个空虚的姿态而已。恩里克四世为了强调剥夺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继承权的意图，还宣布，胡安娜与法兰西的贝里公爵结婚后，贝里公爵将被加封为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成为卡斯蒂利亚王位的继承人。^[15]

* * *

这对年轻的夫妇来说，真是一个糟糕的月份。伊莎贝拉还在休养。斐迪南骑马时摔成重伤，高烧不退，而在那个时代没有抗生素，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已经很倒霉了，卡斯蒂利亚与法兰西的新联姻更是令人警觉。胡安二世国王担心儿子、儿媳和小孙女的人身安全，告诉谋臣，他相信他们处于“莫大危险”中。^[16]在此前的阿拉贡内战中，他将一些城镇割让给了法兰西。如今为了夺回这些城镇，他又与法兰西交战。他还相信，法兰西军人可能在恩里克四世国王的怂恿下扣押斐迪南，以防止他和伊莎贝拉争夺卡斯蒂利亚王位。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12月8日，恩里克四世国王给贝里公爵查理（伊莎贝

拉的前追求者）写了一封密信，敦促他派遣“最强悍的士兵”去抓捕伊莎贝拉和斐迪南。^[17]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早有戒心，并认识到恩里克四世的间谍在监视自己的行动，于是不断搬迁，寻求庇护。他们躲进了恩里克斯家族（斐迪南母亲的亲戚）的一处庄园，后来又搬进卡里略家。和大主教一起生活是高度紧张的，因为他和斐迪南还在不断争吵。

随后三年（1470~1473），伊莎贝拉常常举步维艰。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仍然深陷与法兰西的战争，要求斐迪南前去助战。这是一场愚蠢的战争，原因是胡安二世对自己国度的管理不善，但风险仍然是很大的。胡安二世国王已经八十多岁了，需要斐迪南的青春活力和强悍精神，才有可能打败法兰西。1472年2月，斐迪南动身前往阿拉贡。^[18]在随后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远方；伊莎贝拉和她的小女儿留在卡斯蒂利亚，囊中羞涩，几乎没有任何朋友。

雪上加霜的是，斐迪南回到阿拉贡之后，并不洁身自好，而是与其他女人寻欢作乐。从他们婚姻的早期，伊莎贝拉就不得不忍受斐迪南几乎持续不断的不忠。毕竟他在结婚前就有了两个私生子。起初，伊莎贝拉还能比较容易地、慷慨地接受他们结婚前发生的事情。

但他们新婚宴尔，没过多久，斐迪南就开始拈花惹草，而且有时他的私情维持很长时间，令人窘迫。斐迪南出征作战时，带着情妇阿尔东萨·罗伊格·德·伊瓦拉（后来被加封为埃沃尔子爵），她是个年轻漂亮的加泰罗尼亚女人，来自塞尔韦拉。阿尔东萨随同斐迪南征战时女扮男装，但这怎么可能遮人眼目呢。他俩已经生了两个孩子，阿隆索和胡安娜，而且斐迪南公开承认他们是他的骨肉。

很快，又有一个女人进入他的视野，他于1472~1473年冬季，在佩皮尼昂（法兰西—加泰罗尼亚边境附近）的战场附近，与她嬉戏取

乐。她叫华纳·尼古劳，是个下级官员的女儿。他俩生了一个孩子，也叫胡安娜。几年后，斐迪南访问毕尔巴鄂时，发现了一个名叫托达·德·拉雷亚的年轻女子。他俩的热恋制造出又一个孩子，取名为玛丽亚。玛丽亚的母亲对自己和王子的私情非常自豪，公开展示自己的女儿。玛丽亚没有正式头衔，被民众称为“绝妙女”。斐迪南的情妇远不止这么多。宫廷编年史家普尔加尔叹息道：“他深爱自己的妻子，却与其他女人行淫作乐。”^[19]

斐迪南的不忠让伊莎贝拉非常吃醋，对她伤害很深，尽管她在世人面前表现得坦然而淡泊。有一次在塞哥维亚城堡的一个房间，夫妻俩因为这事争吵起来。廷臣们听见了呼喊和殴打的声音，然后是凄惨的闷声抽噎。

愿意观察的人都能发现伊莎贝拉的不幸处境。例如，卡斯蒂利亚贵族诗人戈麦斯·曼里克写了一首关于伊莎贝拉的诗，提到了她“悲哀的美丽的”面庞，并补充说，“这位女士就像无人居住的空城一样孤寂”。^[20]

1473年4月，斐迪南再次准备前往佩皮尼昂，与法兰西交战。伊莎贝拉对此颇为不悦。她的女儿小伊莎贝拉出生已经三年多了，她担心自己不能再次怀孕。而且她正处于脆弱的时期，独自一人住在卡斯蒂利亚，而恩里克四世国王敌视她。她给公公写了一封信，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恼怒：“我得知法兰西入侵陛下的王国，感到极其焦虑。若我这里的条件允许，我绝不会忍受与我的夫君分离，而一定会陪伴他去营救陛下，因为对我来说，留下来比与他一同出征更痛苦难熬。”^[21]

不过这一次斐迪南抵达前线的时候，战役已经打赢了。但他还是在那里待了七个月，帮助父王重整防御，无疑还与旧情妇们再度欢聚。他直到1473年12月才回到伊莎贝拉身边。

这年11月，伊莎贝拉写信给斐迪南，恳求他回来。她告诉他，恩里克四世国王身患重病，随时可能驾崩，或者丧失行动能力，因此她需要丈夫的支持。斐迪南拒绝了，强调战事吃紧，但他显然在利用自己与伊莎贝拉的分离向她施压，要她劝说恩里克四世国王立他为卡斯蒂利亚王储，并向他，而非伊莎贝拉，发出传位誓言。斐迪南的信是他们夫妻间保存至今的少量信件之一，也是极其巧妙的杰作，用浪漫的渴望掩饰狡猾的欺骗、威胁和恫吓：

我不知道天主为何给了我最美好的东西，却不让我纵情享受，因为这三年来我和你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七个月。现在我必须告诉你，我必须去劝导这些人尽自己的义务。但这些事情在圣诞节之前还不能做。不过在这期间，如果你能安排国王（恩里克四世）传唤我去，宣誓向我传位，那么我立刻可以上路，到你身边。但如果不能，我就没有理由离开我的父王。虽然我尽自己所能，但这不幸的困境让我情绪很坏，不知何去何从。我恳求你努力，至少写信给大主教和红衣主教。我不是说这是你的任务，也不是否认我最高的职责是满足你的愿望……我求你，我的夫人，求你原谅我迟迟不能到你身边，给你造成的烦恼与麻烦。我恭候你的回信。从现在一直到永远，你的奴隶。[\[22\]](#).

事实上，斐迪南虽然甜言蜜语，但思绪常常在别处。在这些年里给父王的信中，斐迪南常常谈及自己的私生子，尤其是阿隆索，而很少提及他的合法孩子小伊莎贝拉。1474年夏季，他公开承认阿隆索为自己的儿子，开始为他寻找稳定的收入来源。虽然伊莎贝拉很悲伤，但还是热切地保障斐迪南的私生子得到良好的教育。她有一次谈及阿隆索时说：“他是我高贵的夫君的儿子，理应得到与他的高贵血统相衬的教育。”[\[23\]](#).

婚姻中另一个令人不快的地方就是，斐迪南和其他女人生了很多孩子，和自己的妻子却只有一个女儿。伊莎贝拉需要更多王位继承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斐迪南长期不在她身边，所以这就不可能办到了。刚结婚不久，她就怀了孕，此后过了许多漫长岁月，再也没有成

功地怀孕。小伊莎贝拉成长过程中，一直是独生女。随着时间流逝，形势变得很明显了：斐迪南固然爱伊莎贝拉，但对她也有怨恨，所以尽可能远离她。他或许在盘算，假如伊莎贝拉生不出男孩，那么他自己或许能成为卡斯蒂利亚王储。他自己也有卡斯蒂利亚王族血统，因此对王位有不错的权力主张。他或许在静观其变，为多种结局做准备，给自己尽可能大的灵活机动空间。

但宫廷的另一个男人，与伊莎贝拉的花心丈夫形成了鲜明对比。那就是她的多年好友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此时只有二十出头。他曾是她的弟弟阿方索的扈从之一，阿方索死时，他就在伊莎贝拉身边。他非常喜爱伊莎贝拉，从十几岁时就对她赤胆忠心。阿方索去世不久之后，恩里克四世重新执政，贡萨洛和他的教师一起回到伊莎贝拉居住的那座城镇，在她家附近住下。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来，他答道：“我不是为了任何私利，而完全是为了能够以某种方式侍奉公主殿下。”^[24]

贡萨洛加入了伊莎贝拉的宫廷，随后几年里常作为她的侍卫之一陪伴她旅行，始终与她保持一个尊重的距离。伊莎贝拉准备嫁给斐迪南的几个里，贡萨洛随同她的卫队从恩里克四世的宫廷（位于奥卡尼亚）去了马德里加尔。后来恩里克四世的军队前来抓捕伊莎贝拉时，贡萨洛陪伴她从马德里加尔去了巴利亚多利德。^[25]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的婚礼上，贡萨洛担任她的侍从。

伊莎贝拉婚后的最初几个月，贡萨洛待在宫廷，但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后，贡萨洛离开了。他去了家乡科尔多瓦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希望加入修会。修道院长拒绝了他，说上帝对他有别的安排；^[26]贡萨洛在科尔多瓦的时候，就待在卡拉特拉瓦骑士团（一个军事修会）的会堂。在那里，他遵守本笃会的规章制度，奉行贞洁，在宿

舍内保持静默，每周只吃三次肉，并定期斋戒。即便如此，他夜间还是佩着剑，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为了扶贫济弱而战斗。[\[27\]](#)

他对女性的骑士风度使他成了当地的一个传奇。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富有的单身汉是个“大胆的浪荡子”，爱上了一个贫穷的美丽孤女。她拒绝他的放肆行为，于是他打算绑架她，将她强行带回自己家。贡萨洛在大街上走路，突然听到年轻女子的呼喊声，看到三名武装人员将那女子拖走。贡萨洛冲上前去，抽出利剑，打伤了那贵族，杀死了他的一名走狗。然后贡萨洛护送女子安全回家，赢得了当地居民的爱戴和尊重。[\[28\]](#)

贡萨洛最终返回宫廷，侍奉伊莎贝拉公主，直到1473年底斐迪南终于从对法战争中返回。此时，贡萨洛又一次离开，走得非常突然，引发了一些议论。他结了婚，但妻子生产不久后去世了。贡萨洛没有着急续弦，当了十多年的单身汉。他对伊莎贝拉的殷勤侍奉让有些人怀疑，他爱公主，或者她爱他。但没有任何记载表明两人之间有越轨行为，只是斐迪南“当伊莎贝拉指责他不忠的时候”曾有一句暧昧不明的评论，“……暗示她也有一个情夫，即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为斐迪南作传的玛丽·珀塞尔写道：“这个猜测没有任何根据……斐迪南可能是对贡萨洛吃醋，因为贡萨洛的勇敢和运动技能与他旗鼓相当，相貌和谈吐比他还好。所以斐迪南让贡萨洛离开了。更有可能的真相是，伊莎贝拉的道德观极其敏感，而且决心要在方方面面都做臣民的表率，于是刻意让贡萨洛离开宫廷，免得给人嚼舌根的口实，尽管他俩的关系再纯洁不过了。”[\[29\]](#)

伊莎贝拉的确极其小心地保护自己贞洁的声誉。她曾目睹胡安娜王后因为淫荡而毁了自己，于是非常小心谨慎地确保任何人都不能质疑她的孩子的血统。丈夫不在身边的时候，她格外小心，让所有侍女都睡在自己房间，互相见证。在阿尔卡拉的一次聚会上，国王不在，

王后想跳舞，就刻意让一名侍女陪舞，而不是公开与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跳舞。

最重要的是，伊莎贝拉是一个高度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她来说，婚姻是毕生的承诺，离婚是不可想象的。她已经与斐迪南结为连理。但在某个时间，伊莎贝拉认识到，斐迪南的政治利益与她的并不吻合，她需要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开辟自己的道路。如果她想与恩里克四世国王修复关系、赢得卡斯蒂利亚贵族的支持并重新成为王储，她必须自己想办法。

[1]. Townsend Miller, *The Castles and the Crown: Spain, 7451-1555*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3) , p.69.

[2]. Jerónimo Zurita, *Andes de Aragón* (Zaragoza: 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ólico” [C.S.I.C.] de le Excma Diputación Provincial, 1975 and 1977) , p.7: 620.

[3]. Miller, *Castles and Crown*, p.69.

[4]. Aureliano Sánchez Martín, *Crónica de Enrique IV de Diego Enríquez del Castillo* (Valladolid: Secretariado de Publicaciones,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1994) , Chapter 137, P.335.

[5]. Isabella to the Countess of Palencia, October 30, 1469, in 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 *Isabella la Católica, Princesa, 1468-1474* (Valladolid 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 1974) , citing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9-30-7-6483, folios 485-486.

[6]. Peggy K.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40.

[7]. Peggy K.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83.

[8]. Tarsicio de Azcona, *Isabella la Católica: Estudio crítico de su vida y su reinado* (Madrid: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1993) , p.162.

[9]. William Prescott,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38) , p.225.

[10]. William D. Phillips, Jr. *Enrique IV and the Crisis of Fifteenth-Century Castile, 1425-1480* (Cambridge, Mass.: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78) , p.113.

[11]. Nancy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1991) , p.92.

[12]. Jaime Vicens Vives, *Historia crítica de la vida y reinado de Ferdinand II de Aragón* (Zaragoza: 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ólico, 1962) , p.279, no.912.

[13].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p.93.

[14]. Diego Clemencin, *Elogio de la reina Católica Doña Isabella* (Madrid: Imprenta de Sancha, 1820) , p.6: 100.

[15].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 Diversos de Castilla, leg.9, number 65, folio 2v, cited in 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 *Isabel la Católica, Princesa*, p.497.

[16]. Vicens Vives, *Historia crítica*, p.288.

[17].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p.97.

[18]. Liss, *Isabel the Queen*, p.85.

[19]. Fernando del Pulgar, *Crónica de los Señores Reyes Católicos*, 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Madrid: Espasa-Calpe, 1943) , p.75.

[20]. Peggy K.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 p.74.

[21]. Isabella to Juan II of Aragon, April 29, 1473, in Antonio Paz y Meliá, *El cronista Alonso de Palencia, su vida y obras, sus decadas y las crónicas contemporáneas* (Madrid: 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 1914) , p.127, cited in Warren H. Carroll, *Isabel of Spain: The Catholic Queen* (Front Royal, Va.: Christendom Press, 1991) , p.65.

[22]. Vicente Rodríguez Valencia, *Isabella la Católica en la opinión de españoles y extranjeros, siglos XV al XX* (Valladolid: 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 1970) , p.3: 74, trans. Warren Carroll and Maria Barone, *Isabel of Spain*, p.72.

[23]. Fusero Clemente, *The Borgias*, trans. by Peter Gree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3) , p.16.

[24].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 p.41.

[25].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 p.43.

[26].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 pp.46-47.

[27].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 p.46.

[28].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 pp.48-49.

[29].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 p.49.

八 博吉亚家族

这些年里，伊莎贝拉陷入孤立，被丈夫抛在一边，前途得不到保障。但从东方来了一位盟友和谋士，我们可以说此人是代表上帝来帮助她的。

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德·博吉亚身体强健、耽于肉欲、风度翩翩而且对女性有磁石般的吸引力。他是西班牙人，是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的外甥。这位教皇在位期间的作为更像是一个皇朝的初创，而非宗教使命。卡利克斯特三世将年仅二十五岁的罗德里戈提携为红衣主教，那时罗德里戈连神父都不是。不久之后，卡利克斯特三世又授予罗德里戈许多教会荣誉。舅舅去世后，罗德里戈巧妙地保住了自己的这些崇高地位，要做到这一点的确需要特别的狡黠。主宰梵蒂冈厅堂的意大利红衣主教一般憎恶和鄙视外国人，尤其是那些威胁到他们在基督教世界主宰权的外国人。他们会运用罗马黑帮匪徒去攻击那些对他们构成潜在威胁的外来者。这些匪徒会非常愿意把罗德里戈杀掉，让他去冥界陪伴舅父。

面对这可怕的障碍，罗德里戈成功地维持了自己的地位——罗马天主教会最高级的教士之一。1471年夏季，伊莎贝拉是个处境岌岌可危的二十岁新婚少妇，而罗德里戈已经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这对伊莎贝拉很重要，因为保罗二世教皇拒绝给她颁发结婚许可书，而她必须得到这样一份许可书，才能将自己的孩子合法化。1471年7月，他们得知，保罗二世去世了，一位新的教皇，意大利人弗朗切斯科·德拉·

罗韦雷已经继位，称号为西克斯图斯四世。罗德里戈在梵蒂冈的典礼上为新教皇加冕，因此有能力帮助伊莎贝拉获得正确的文书。

随后，1472年，伊莎贝拉的小女儿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罗德里戈宣布自己要回到西班牙故乡，作一次访问。西克斯图斯四世教皇决定组建一支军队打退穆斯林的进犯，于是派遣使者到欧洲各国宫廷游说，寻求支持。博吉亚奉命去安抚卡斯蒂利亚的紧张情绪，为新的军事行动赢得恩里克四世国王的支持。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很快意识到，博吉亚的访问给了他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拉拢一位非常有价值、能够在许多深层次方面帮助自己的盟友。

到此时，罗德里戈已经在意大利生活了二十多年，但他对西班牙的忠诚和热爱，在他心中仍然是第一位的。他的第一语言仍然是加泰罗尼亚语。历史学家玛丽昂·约翰逊写道：“对罗德里戈来说，重返西班牙也是一次感伤之旅，得到了一个机会在家乡重新获得力量，提醒自己，他的根在巴伦西亚省。”^[1]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看到博吉亚对故乡的热爱，觉得这是与他交际的一个机会。他们认识到，博吉亚也需要自己的盟友。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一定已经认识到，如果他妥善行事，并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支持，教皇的位置在他唾手可得范围内。博吉亚家族这样的外国人在罗马的地位如履薄冰，因为意大利人对外国人有很强的偏见。罗德里戈知道自己在西班牙故乡需要强大的靠山。

罗德里戈·德·博吉亚于1431年出生在哈蒂瓦，那是巴伦西亚附近一座位于崎岖山峰之上的小镇，制高点是一座中世纪城堡。博吉亚对阿拉贡王国有很强的认同感，相信自己是一个古老而高贵的家族的后裔，他的祖先曾在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失地的事业中英勇奋战。博吉亚家族人丁兴旺，骄傲、无畏，而且寡廉鲜耻、毫无道德顾忌。年轻

的罗德里戈很早就用了母亲的姓氏，以便与舅舅拉近关系。博吉亚家族并不富裕，而擅长最大限度地利用任何优势。

博吉亚家族最早参与到教会高层政治中，是借助他们与一位名叫佩德罗·德·卢纳的西班牙裔红衣主教的联系。佩德罗·德·卢纳就是阿尔瓦罗·德·卢纳的叔叔。在梵蒂冈的精英团体——红衣主教当中，西班牙人很少。1378年格里高利十一世教皇去世时，佩德罗·德·卢纳是唯一一位西班牙裔红衣主教，其他人都是法兰西人或意大利人。为了在教会的会议中发挥影响力，佩德罗·德·卢纳需要在西班牙国内有自己的盟友，这种情况很快就非常明显了。格里高利十一世是法兰西人，他去世几天之后，梵蒂冈就爆发了种族主义的冲突。红衣主教们，包括佩德罗·德·卢纳，遵照习惯和传统，举行了盛大仪式，召开秘密会议，选举新教皇。但这一次，会议场所之外聚集了群情激昂的罗马暴民，他们要求必须选出一位来自罗马的意大利教皇。胆战心惊的红衣主教们害怕被暴民撕成碎片，在室内环视，发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教士，他们相信他是在罗马城出生的。尽管这位老人极力抗议，他们还是给他披上了教皇的袍服，为他戴上冠冕，把他推搡到祭坛前，就这样推举出了下一位“基督在人间的代表”。然后他们快速逃离了会场。

这个出乎意料地当上教皇的人，即乌尔班六世，就职之后决定要严肃对待自己的职责。他开始改革教会，谴责奢靡之风和不道德的罪行。红衣主教们之前被大街上的暴民吓倒，现在被新教皇的改革吓坏了，又一次逃离罗马。不久之后，他们提名一个法兰西人为新教皇，称克雷芒七世。但乌尔班六世坚决不肯退位，于是基督教有了两位互相对立的教皇，一个在罗马，一个在阿维尼翁。意大利和北欧支持罗马教皇乌尔班六世；法兰西和西班牙力挺阿维尼翁教皇克雷芒七世。各地的各级教士都必须选择一个阵营，于是众多国王、主教、修道院、慈善机构和大学都必须支持两位教皇中的一位。乌尔班六世和克

雷芒七世死后，又有新人接替他们各自的位置，于是教会的分裂一直持续到1418年。信众们目睹高级教士像小孩子一样互相争吵不休，教会的道德权威受到损害。佩德罗·德·卢纳这样的西班牙人发现自己处于比较孤立的位置，如履薄冰地应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

与此同时，在阿拉贡，在这消磨意志的环境中，一个来自哈蒂瓦名叫阿隆索·德·博吉亚的虔诚青年正在成长。他虔诚、坚定而勤奋，很快吸引到教会长老们的注意。一位四处巡游的巴伦西亚布道者文森特·费雷尔也注意到了阿隆索·德·博吉亚。费雷尔的宣讲极具煽动性，吸引了南欧各地的大量群众。费雷尔成功地让大量犹太人改信基督教，要么是通过威吓，要么是借助他的雄辩。他的信徒很快占据了西班牙的很多政府高层职位。文森特·费雷尔一次讲道时看到了人群中的阿隆索·德·博吉亚，预言他有一天会成为教皇。这样的推荐对阿隆索很有用，对他也是很大的激励。他开始相信自己或许有特殊的使命，将要弥合教会的分裂。

阿隆索·德·博吉亚最终成为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五世的宗教顾问。阿方索五世去了那不勒斯，再也没有回国，他兢兢业业的顾问阿隆索·德·博吉亚也去了那不勒斯。博吉亚就像自己希冀的那样，努力促进弥合教会分裂的鸿沟，表现出了极大勇气，并赢得了调解人的声誉。他开始在教会攀升。为了奖赏他对国王和教皇的忠实效劳，阿隆索于1444年被任命为红衣主教。而他依赖于另一位西班牙盟友——红衣主教胡安·德·托尔克马达的大力支持。很快，西班牙人就开始在梵蒂冈组成了他们自己的小集体。

1451年，伊莎贝拉公主出生的时候，教皇尼古拉五世（意大利人）统治着梵蒂冈。文艺复兴即将拉开大幕，尼古拉五世是文艺的赞助人，收藏了大量书籍和手稿，他的收藏后来成为梵蒂冈图书馆的核心。他安排将许多古希腊著作翻译成拉丁文，收集整理古罗马作品，

并重建了许多古典时期的纪念性建筑，以及宫殿、桥梁和道路。所有这些文化活动和公共工程意味着，他在梵蒂冈的朋友们有了很多发横财的途径。

到此时，红衣主教阿隆索·德·博吉亚已经身居高位，财政状况得到改善，有能力帮助自己的亲戚，包括他那精明强干而雄心勃勃的外甥罗德里戈。罗德里戈是在阿拉贡王国的领地内长大成人的。罗德里戈只有十四岁的时候，阿隆索为这个前程大好的外甥在巴伦西亚搞到了他的第一个教会职位。几年后，阿隆索带罗德里戈去了罗马。年轻的罗德里戈在梵蒂冈很快就帮上了舅舅的忙。

1455年，尼古拉五世教皇去世，红衣主教团选举阿隆索为新教皇，名号为卡利克斯特三世。有些观察者说，红衣主教团之所以选这个西班牙人，是因为他身患痛风，看上去非常衰老。其他红衣主教觉得他很快就会去世，这样他们能有时间准备自己竞选。但卡利克斯特三世的身体比看上去强健得多。他成为教皇对西班牙人来说可是激发民族自豪感的美事，西班牙人认为这是伊比利亚半岛作为基督教堡垒理应得到的认可。在伊莎贝拉早年岁月，这位西班牙教皇就是基督在人间的代表和基督教世界的领袖，一切宗教事务的最终裁决者。信徒们为他和他的持续健康祈祷。

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卡利克斯特三世很快大力提携西班牙亲友。他继位后最早的正式举措之一就是就是将已故的文森特·费雷尔封为圣徒。费雷尔非常幸运地成功预言了阿隆索·博吉亚出乎意料的伟大前程。

卡利克斯特三世继位三周之后，二十四岁的罗德里戈被任命为教廷秘书，并获得位于巴伦西亚的一些油水很足的圣职，这给了他丰厚的收入。二十五岁时，尽管他并不是神父，特别宠爱他的舅舅还是任命他为红衣主教。次年，他获得了在梵蒂冈威望仅次于教皇的最高

职务——教廷副秘书长，即“基督教世界的政府”^[2]的行政管理者，这个职位给了他2万杜卡特的年收入。随后他被任命为巴伦西亚主教，年收入又多了2万杜卡特，他由此成为阿拉贡国内第二大领地的宗教首脑。

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将其他亲戚也提拔到梵蒂冈的各个实权职位上。“这些亲戚和亲戚的亲戚不断涌现，他们每个人都在阳光下得到自己的一个角落，”教廷历史学家克莱门特·富塞罗写道，“每一个前来求助的人都会得到一个闲职或古怪的职位。几百年来，教廷变得越来越臃肿膨胀，设立了不计其数的此类闲职。”^[3]意大利人将教皇的这些党羽轻蔑地称为“加泰罗尼亚人”。

作为西班牙人，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胸中一直抱有伊比利亚人自古以来对穆斯林威胁的担忧。自711年以来，这种担忧就是伊比利亚半岛文化的一部分。1453年，也就是他当选教皇的两年前，君士坦丁堡陷落，他深感震动和不安，如饥似渴地倾听关于此后东欧局势的报告。富塞罗写道：“他登上教皇圣座，心里带着一个伟大的、压倒一切的计划，即从土耳其人的弯刀下解放基督教欧洲。尤其是因为自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土耳其人的弯刀威逼着基督教欧洲的咽喉。他的所有努力、所有思绪、所有政治活动，都聚焦于挽救基督教欧洲的目标。”^[4]

欧洲的基督徒统治者很少像他一样对此忧心忡忡。欧洲各国沉溺于互相之间的领土争端，没有做多少努力去挽救君士坦丁堡。后来他们反对穆斯林的努力也是三心二意、缺乏效力。这种状况让欧洲的城市在土耳其人面前显得特别脆弱；似乎任何土耳其人，只要有勇气和决心，都能轻易掳走欧洲的财富和妇女。15世纪50年代，在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胜利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开始自称恺撒，以罗马皇帝自命，率领30万大军，再一次准备发动攻势。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发布命

令，号召欧洲各国提供资金和军队，去抵抗土耳其人，但收效甚微。尤其对北欧人和在意大利北部互相厮杀的各城邦而言，土耳其的威胁似乎太遥远，转瞬即逝。

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决心凭借自己的力量保卫基督教。为了征集资金，他在梵蒂冈厉行节约，这与尼古拉五世的挥金如土相比，自然是截然相反。卡利克斯特三世命令将教廷宝库内的金银餐具熔化，以便为军备筹款。有人发掘出了一座大理石墓穴，内有两具身穿金线丝袍的干尸。卡利克斯特三世大喜过望，命令将这些宝物送到梵蒂冈，不是为了保管或研究，而是为了卖掉换钱。

卡利克斯特三世还鼓励公众去敬仰虔诚信教的武士，以鼓动民众。他敦促重新审视圣女贞德的生平，将她的形象重塑为敬畏上帝、抵抗侵略者的解放战士。圣女贞德身上的异端污点被洗净，她的传奇流传得越来越广。圣女贞德的平反发生在伊莎贝拉六岁时。圣女贞德被教会宣布为纯洁无辜，名誉得到恢复，并在被封圣的道路上迈了一大步。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曾说：“只有在战场上，光荣的棕榈才会生长。”^[5]

从东欧传来的报告越来越急迫和严重，他对基督教自卫的关注也越来越密切。土耳其军队在进军匈牙利，并沿着多瑙河西进。1456年，土耳其军队包围了雅典；当地居民意识到无人来援助他们，于是选择投降。雅典人未曾抵抗，因此得到饶恕，被允许继续信奉自己的宗教传统。但曾经发明了“民主”这个词的雅典人，如今被奥斯曼人视为奴隶。帕提农神庙被改为清真寺。带有女像柱的厄瑞克忒翁神庙被当作后宫。强壮的男孩被送去接受训练，成为奥斯曼士兵；漂亮女孩被送走，成为富裕穆斯林男人的小妾。历史学家T. C. F. 霍普金斯说：“1456年，雅典被奥斯曼人占领，这对欧洲人和基督徒来说，是一记晴天霹雳，因为大家原以为雅典会作为西方思想与道德优越性的

堡垒，抵挡住任何进攻……很多欧洲人担心，奥斯曼帝国即将征服他们，而他们无力反抗。”^[6]

卡利克斯特三世在位期间，运用自己积攒的资金，开展了到当时为止基督教世界发动的最大规模的反击。他装配了一支舰队去对抗土耳其人，起初取得了一些成功。土耳其人在希腊诸岛的一场海战中被击败。而贝尔格莱德城遭到奥斯曼人攻打，成功地将其击退。

但卡利克斯特三世已经八十岁了，而且他之所以当选教皇，就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好。1458年夏季，伊莎贝拉七岁时，他病倒了，据说已经奄奄一息。基督教世界各地的教堂都得到了警示；人们举行守夜，热忱地为他恢复健康而祈祷。罗德里戈得知舅舅病重时正在蒂沃利休假。他匆匆赶回罗马，但他抵达时，消息已经传遍天下。意大利人的乌合之众聚集起来，攻击那些在阿拉贡教皇在位时期获利发迹的西班牙人。罗德里戈的仆人逃之夭夭，他的宅邸遭到洗劫。大多数西班牙人逃离罗马城。罗德里戈留下来照顾舅舅。卡利克斯特三世于8月6日去世。只有一位坚定的朋友，威尼斯红衣主教彼得罗·巴尔博在这惊心动魄的时刻留在博吉亚身边。他的忠诚赢得了博吉亚毕生的感激。

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去世了。尽管意大利人对西班牙的敌对情绪高涨，年轻的博吉亚还是坚持下来。红衣主教们召开秘密会议以选举新教皇时，罗德里戈·博吉亚和彼得罗·巴尔博还在罗马。他们联合起来支持一位意大利人，即后来的庇护二世，赢得了他的感激。

* * *

罗德里戈在随后一些年里春风得意。他巧妙地操纵教皇传承的政治活动，保住了自己的所有产业，甚至保住了梵蒂冈副秘书长的职

位。在随后的岁月里，他继续扩张自己的领地，有几次是继承了卡利克斯特三世在位期间赏赐给其他亲戚的财产。

罗德里戈利用这些资本，为自己攀登到教皇的高峰铺平道路。他一掷千金地奖赏朋友和盟友，并举办奢华的娱乐活动，让他的豪宅成为罗马市民注意力的焦点，而当时的罗马特别喜好世俗的繁华。罗德里戈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复兴式巨人，既纵情享受肉体愉悦，又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诗人、艺术家和音乐家得到他的赞助；他是印刷机的最早赞助者之一，当时人们已经开始用印刷机生产古代和现代作家的作品。造访他在罗马的宅邸的意大利客人无不感到惊艳，兴高采烈地谈及他家的“描绘故事的挂毯”、配有“深红色帷幕”的巨大床榻和“装满精致的金银器皿”的餐具柜。^[7]

他是个性格复杂多面的人。他笃信宗教，饮食有节，饮酒有度，而且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他的虔诚。不过他也英俊潇洒，他的神职人员身份对很多女人来说，更增添了禁果的诱惑力。罗德里戈发现自己很难抗拒诱惑。要让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人震惊，是非常困难的，但即便按照当时的放荡不羁的风尚，罗德里戈的风流也很快引发了丑闻。1460年5月的一次新生儿洗礼庆祝活动不知怎的变成了长达两周的纵欲狂欢。此次聚会邀请了许多美女，她们的丈夫则被刻意排除在外。很快罗德里戈的拈花惹草就变得臭名远扬，以至于即便在这个特别淫荡放纵的年代，也有连续多位教皇敦促他克制自己，以维护教会的尊严。

此时教会还在摆脱分裂造成的耻辱，因此不能承受这样的臭名。当教会领导人，尤其是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和庇护二世，在努力强调国外威胁（即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无法对教会内部的威胁熟视无睹。罪恶和腐败在伤害基督教会，使得它无力行使道德权威，去动员信众以反抗步步紧逼的穆斯林力量。

教会人士越来越猖獗的不端行为吸引了教会批评者的注意。这些不端行为有宗教方面的，也有世俗方面的，包括买卖圣职、裙带关系（尤其是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的行为）和普遍存在的教士不守贞洁的行为。另一种越来越严重的恶行是销售赎罪券，即富人不管犯下多大罪过，均可用金钱来赎罪，并收买教会领导人。与此同时，世俗统治者在干涉主教与修道院长的提名和任命，这种做法被称为“俗人授职”。这就使得统治者能够把自己的人选（往往是庸碌无能和没有资格的人，经常是他们的私生子）安插到教会职位上。

上述的很多弱点和罪过在罗德里戈身上都很突出，他代表着文艺复兴最好的一面，也代表最坏的一面。他文化素养极高，非常宽容，但也是个风流快活的浪荡子，玩世不恭，没有道德底线。对博吉亚和教会来说，他的虚伪都造成了严重问题。

但罗德里戈的财富和权力还在蒸蒸日上。他的朋友彼得罗·巴尔博成了下一位教皇，即保罗二世。彼得罗·巴尔博死后，罗德里戈处于极有利的位置，有能力帮助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夺得教皇圣座，头衔为西克斯图斯四世。西克斯图斯四世开始了一段了不起的文艺复兴风格的统治，建造了西斯廷教堂，建立了梵蒂冈档案馆，并重建罗马城。

由于博吉亚的干预，在西克斯图斯四世教皇在位期间，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终于获得了他们渴望已久的教皇许可书，他们的婚姻得到了合法化。

如今，博吉亚、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命运紧密交织起来。西克斯图斯四世就职时，传来了土耳其人侵犯欧洲的更多消息。新教皇决定派遣使者到西欧各国，保证在他的精神统治下基督教世界内部保持安定，并筹集打退土耳其人所需的资金。于是他派遣博吉亚作为大使，访问西班牙。

罗德里戈于1472年年初开始了奢华的旅行，5月抵达阿拉贡，以一位教会亲王的身份衣锦还乡。有三位主教陪同他，他还带来了两名意大利画家，安排他们美化巴伦西亚（罗德里戈自己原先的主教区）的大教堂。

在巴伦西亚，博吉亚会见了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和斐迪南。进入巴伦西亚城时，博吉亚前呼后拥，骑马在丝绸华盖下行进，鼓乐喧天，好不热闹。博吉亚举办了盛大宴会，款待众人，席间尽是山珍海味、琼浆玉液。在随后十五个月里，他与斐迪南及其父王多次会谈。这些会谈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三人发现，他们相当投机。

罗德里戈是他们的臣民，因为他虽然居住在罗马，仍然是阿拉贡人。廷臣们说，胡安二世和斐迪南对此非常敏感。意大利的动荡让罗德里戈深刻体会到，他在意大利的命运永远得不到保障，非意大利裔的教皇一定会招致群众的怨恨。虽然他野心勃勃，但也是个目光长远、小心谨慎的人，所以他需要一个后备方案，以防某一天他需要仓皇逃离罗马。因此他倾向于帮助他的国王。而他和斐迪南相遇之后，都觉得对方是一个可以合作的、非常有价值的人。

斐迪南小心地将这些情况都报告给父王。例如，在1472年8月，他写信给父王，汇报了自己与博吉亚会谈的进展。^[8]1473年3月，在给父王的一封信中，他若无其事地将博吉亚称为自己的“伙伴”^[9]。

另一次重要的会晤发生在1472年9月中旬，地点是巴伦西亚。这一次，与会者还有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他是富裕而极具影响力的门多萨家族的后裔，还是西贡萨主教。博吉亚进入家乡城市时大摆排场，门多萨的排场更豪华。^[10]博吉亚野心勃勃，门多萨也是如此。

2月底，博吉亚前往埃纳雷斯堡，在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伊莎贝拉的最忠实支持者）家中见到了伊莎贝拉，并在那里待了三周。卡里略为了招待博吉亚挥金如土，大摆筵席，因为他希望梵蒂冈提携他为西班牙的红衣主教，他相信自己有资格得到这个位置。^[11]博吉亚似乎对伊莎贝拉印象不错。伊莎贝拉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但毕竟博吉亚此行得到了教皇的支持，因此他拜访伊莎贝拉，有利于她作为恩里克四世继承人的权力主张。

罗德里戈无疑也在寻求推进自己的地位，但他渐渐相信，这对年轻夫妻是西班牙充满希望的未来。他给了他们良好的祝愿和实际的支持。他是建立战略性同盟的大师，很快就发现，伊莎贝拉的团队还需要什么人。那就是西贡萨主教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也是贵族当中最坚决地支持恩里克四世的人。恩里克四世国王无意中帮助了伊莎贝拉与门多萨结盟，因为他派遣门多萨去面见博吉亚，希望在自己与妹妹的斗争中能得到梵蒂冈的支持。然而门多萨转而效忠于伊莎贝拉。

很快，各方就做了一些交易。博吉亚得到承诺，将在阿拉贡获得更多土地和头衔。胡安二世国王通过谈判让门多萨成为红衣主教，并被任命为塞维利亚大主教。梵蒂冈给了门多萨这些高级头衔，而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最终得到了强大的门多萨家族的支持。这个家族不仅包括西贡萨主教，还包括滕迪利亚伯爵迭戈·乌尔塔多·德·门多萨，以及他们庞大的封臣和盟友网络。^[12]

这些帮助对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恩里克四世统治的末期，”恩里克四世的传记作者威廉·菲利普斯写道，“门多萨家族同意，他们虽然不会反对国王，但在他驾崩后也不会支持他的女儿胡安娜。”^[13]罗德里戈承诺给门多萨家族成员之一红衣主教的冠冕，于是将门多萨家族拉拢到伊莎贝拉一方，给了她至关重要的

支持。恩里克四世国王在世期间，门多萨将对他保持效忠，但他获得红衣主教地位，象征着他作为新的红衣主教（梵蒂冈在卡斯蒂利亚的最高代表，即卡斯蒂利亚的精神领袖）与伊莎贝拉公主（希望成为卡斯蒂利亚的世俗领袖）之间的联盟。

在这些谈判之后，伊莎贝拉对罗德里戈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们很难知道她的真实想法。她热忱地主张改革教会，洁净基督教，铲除腐败。她自己的宗教顾问都是非常虔诚的人，效仿耶稣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简朴清贫。但伊莎贝拉愿意对某些高级教士的世俗罪孽视而不见。博吉亚不是教士当中唯一的浪荡子。门多萨也以贪恋女色而闻名，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伊莎贝拉曾将大主教的孩子称为他的“可爱的小小的罪过”。

在某些层面上，伊莎贝拉一定接受了人性的本来面目，尤其是当这样做对她有利时。她一定会喜欢罗德里戈个性的某些方面，尤其是他对文化和学术的浓厚兴趣。他的文化素养比她丈夫高，肯定对罗马文化与艺术的最新潮流了如指掌，她对这些话题非常着迷，从中受到很大启发。他在西班牙的时候，或许与伊莎贝拉探讨了新的艺术风格。在很短时间内，她就对这个主题有了很多了解。他起航返回罗马的时候，已经处于她的影响之下，她也受到他的影响。他同意将她的女儿——小伊莎贝拉公主合法化，甚至承诺要做这孩子的教父。

博吉亚的承诺或许体现了他的信念，即他相信伊莎贝拉有执政的能力。或者他相信，斐迪南很快将会以伊莎贝拉夫君的身份统治国家。但博吉亚做的交易肯定对他自己的未来利益有好处。罗德里戈四十二岁，虽然是个教士，也在考虑自己的后代。这位擅长阴谋诡计的教士正在向教皇的高峰攀登。虽然曾发过守贞的誓言，他却有了自己的家庭。他已经有了一个私生子佩德罗·路易斯。他返回罗马后，将与一位年轻的罗马妇人（名叫瓦诺莎·代·卡塔内）开始长期的同居

关系，和她又生了四个私生子：切萨雷、乔万尼、卢克雷齐娅和焦弗雷^[14]。他是个溺爱孩子的慈父，一定知道自己需要很多闲职、财产和头衔，以便安排孩子们的未来。他憧憬自己的孩子终有一日以贵族地主的身份重返西班牙。胡安二世国王承诺为他的家人提供土地和头衔。如果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成为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新统治者，将有能力保障他的孩子们的未来。

罗德里戈就是后来历史上臭名昭著、极其腐化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他成了伊莎贝拉的一个新的价值无法估量的盟友。^[15]伊莎贝拉与博吉亚的联盟将产生改变世界的深刻影响。但目前，卡斯蒂利亚在酝酿麻烦。

卡里略大主教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他坚信自己有资格得到红衣主教位置，却被门多萨捷足先登。他盛情款待博吉亚，却没有收到自己希望的效果。何况，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与博吉亚和门多萨做了交易。而卡里略之前花了很大力气去帮助和支持这对年轻人；还远远不能确定伊莎贝拉有机会成为君主的时候，他就力挺伊莎贝拉，在动荡的年代支持和庇护她。结果公主和她的丈夫却加入了一场阴谋，把红衣主教职位给了那个曾经是恩里克四世盟友的人。

怎么会这样？原因之一可能是，公主和王子并非总能知恩图报。卡里略在过去对伊莎贝拉和斐迪南鼎力相助，但门多萨对他俩的未来更关键，这方面的考虑可能更重要。也许，斐迪南对自己少年时与卡里略的摩擦记忆犹新，心怀怨恨。还有一种可能。门多萨广受尊重，人品比卡里略更好。不久之后，门多萨的睿智裁断就对年轻的夫妇产生了极大益处。

无论如何，木已成舟。佩德罗·门多萨于1472年春季获得红衣主教冠冕。塞哥维亚城举行了游行活动，庆祝此事。在游行队伍中，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手捧红衣主教冠冕。他是恩里克四世的幕僚

长，负责监督塞哥维亚要塞和王室宝库，同时也是塞哥维亚市长。他是塞哥维亚的改宗犹太人的领袖，是当时很多朝秦暮楚的人的典型。在阿维拉的闹剧（恩里克四世国王被按照仪式要求废黜）时，卡布雷拉在胡安·帕切科身边，后来脱离帕切科，重归恩里克四世阵营，并再次得宠。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与伊莎贝拉的儿时朋友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结了婚，现在又向伊莎贝拉阵营靠拢。

到1473年3月，权力平衡开始明显地偏向伊莎贝拉。斐迪南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确保最尊贵的公主，即我的夫人，顺利继承王位的一切工作，均已完成。”^[16]现在所有的棋子——罗德里戈·博吉亚、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红衣主教门多萨均已就位。伊莎贝拉开始布棋子。她为自己的下一步棋做好了准备。

^[1] Marion Johnson, *The Borgias* (New York: Holt, Rinehart&Winston, 1981), p.74.

^[2] Clemente Fusero, *The Borgias*, trans. Peter Green (New York: Praeger, 1972), p.75.

^[3] Clemente Fusero, *The Borgias*, trans. Peter Green (New York: Praeger, 1972), p.77.

^[4] Clemente Fusero, *The Borgias*, trans. Peter Green (New York: Praeger, 1972), p.78.

^[5] Clemente Fusero, *The Borgias*, trans. Peter Green (New York: Praeger, 1972), p.79.

^[6] T.C.F.Hopkins, *Empires, Wars and Battles: The Middle East from Antiquity to the Rise of the New World* (New York: Forge Books, 2006), p.213.

^[7] Fusero, *Borgias*, p.119.

[8]. Ferdinand to Juan II , August 1472, Biblioteca Nacional, *Índice de la colección de don Luis Salazar y Castro, formado por Antonio de Vargas-Zúñiga y Montero de Espinosa y Baltasar Cuartero y Huerta*, vol.1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949) , appendix letter 55.

[9]. Ferdinand to Juan II , March 1473, Biblioteca Nacional, *Índice de la colección de don Luis Salazar y Castro, formado por Antonio de Vargas-Zúñiga y Montero de Espinosa y Baltasar Cuartero y Huerta*, vol.1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949) , appendix letter 65.

[10]. José Sanchis y Sivera, “El cardenal Rodrigo de Borgia en Valencia, ” *Boletín del Real Academia de Historia* 84 (1924) , p.149.

[11]. Peggy K.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91.

[12]. John Edwards, *The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hs, 474-1520* (Oxford, U.K.: Blackwell, 2000) , p.18.

[13]. William D. Phillips, Jr., *Enrique IV and the Crisis of Fifteenth-Century Castile, 1425-1480* (Cambridge, Mass.: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78) , p.117.

[14]. 焦弗雷 (Gioffre) 也叫乔弗雷 (Jofré)。另外, 罗德里戈·博吉亚一家虽然是西班牙人, 但他的这几个孩子主要在意大利活动, 他们的意大利名字更有名。为了逻辑上的一致性, 本书中这四个孩子的名字全部用意大利语形式, 不用西班牙语。例如, 用“乔万尼”而不是“胡安”, 用“切萨雷”而不是“塞萨尔”。“切萨雷”其实就是意大利语的“恺撒”。

[15]. Richard P. McBrien, *Lives of the Popes: The Pontiffs from St. Peter to John Paul II*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7) , p.182.

[16]. Tarcisio de Azcona, *Isabel la Católica: Estudio crítico de su vida y su reinado* (Madrid: Biblioteca de Auto res Cristianos,

1993) , p.186, cited in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 (New York: Sc. Martin' s Press, 1991) , p.108.

九 准备统治

为了恢复自己的王位继承权，伊莎贝拉开展了多方面攻势，与罗德里戈·博吉亚的联盟只是其中一部分。她的行动主要是独立完成的，利用了斐迪南及其父王提供的帮助，也运用了自己的资源。从1471年到1474年，斐迪南通常都远离伊莎贝拉，在法兰西—阿拉贡边境。在他外出期间，她寻求与一些贵族重结旧好，巩固各城市对自己的支持，并尽可能与兄长恩里克四世修复关系。她做了这些方面的工作，为当卡斯蒂利亚女王做准备，尽管国内局势迅速恶化，但她的任务越来越艰巨。

伊莎贝拉以阿方索·卡里略在埃纳雷斯堡的要塞为基地，同时在多条战线上活动。对某些人，她简单地以新头衔和土地作为诱饵，拉拢他们到自己这边。有些城市曾经支持恩里克四世国王，但后来被他胡乱分封城市的做法激怒。对这些城市，伊莎贝拉也以精明的手段去拉拢，表示自己会比恩里克四世更照顾它们的利益。一些城市秘密地改为效忠于她。

她还找到了一些外国盟友。例如，1472年夏季，她设宴招待勃艮第外交官。没过多久，勃艮第人就开始敦促恩里克四世恢复伊莎贝拉的王位继承人地位。

她还独立自主地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与法兰西（此时法兰西正与她丈夫的阿拉贡王国交战）建立联系，提议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路易

十一的儿子查理。学者玛丽亚·伊莎贝拉·德尔·巴尔·巴尔迪维索写道：“她培植与法兰西的友谊，后来1474年6月法兰西入侵鲁西永^[1]的时候，她不仅没有与路易十一对抗，还告诉他，她依然打算让她的女儿与法兰西的查理成亲。”^[2]换句话说，她没有屈从于自己夫家的利益，而是在追寻自己的利益。

伊莎贝拉将自己建设为一支独立力量的努力很复杂，卡斯蒂利亚全境爆发的激烈内乱对她也有帮助。王国深陷危机，虽然这让她或者其他任何人都难以掌控局面，但也使得她能够自命为国家的救星，能够给国家的混乱局面带来解决方案。

恩里克四世国王优柔寡断、软弱无能，以至于国内的犯罪分子能够恣意偷窃、抢劫、谋杀和强奸，而不必过于担心法律的惩罚。假币四处通行，人们担忧钱币再也没有价值。通货膨胀十分嚣张，人民难以购买生活必需品。饥荒肆虐，开始有人饿死。在加利西亚，有五十多座城堡化为强盗巢穴。小军阀横行乡里，从朝圣者、农民和旅客手中掳掠食物和钱财。

动乱的一大原因是宗教纷争。在卡斯蒂利亚各地，基督徒和近一个世纪以来才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之间爆发了冲突。许多犹太人家族在改宗之后繁荣昌盛起来，招致了基督徒的嫉妒。有人指责这些犹太人的改宗是不真诚的。事实上，有些犹太人是真诚地改信了基督教，也有的是假装改宗。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很难查明的。

1473年3月，科尔多瓦城爆发了反对改宗犹太人的暴乱。一个宗教游行队伍经过一个改宗犹太人社区时，有个小孩从一座楼房的顶层窗户里倾倒了某种液体，可能是尿，洒到了圣母玛丽亚塑像头上。一名铁匠因此大怒，说那小孩是故意的，呼喊要求基督徒攻击改宗犹太人的家庭，报复他们的亵渎行为。人们涌上街头。一些基督徒，包括贵族阿隆索·德·阿吉拉尔（伊莎贝拉年轻的军人朋友贡萨洛·费尔

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哥哥），力图阻止暴民伤害改宗犹太人，但人群同样凶残地攻击这些见义勇为的基督徒。全城爆发了公开对垒的武装冲突。这一天结束时，改宗犹太人惨遭屠杀，男人被杀死，女人被强暴，住房被掳掠和烧毁。

此次冲突的消息传遍了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犯罪分子和歹徒恶棍利用政府权力真空，效仿科尔多瓦的暴乱，对改宗犹太人烧杀抢掠，不过这些都是无端的暴行了。据以色列历史学家本齐恩·内塔尼亚胡记载，一些城市发生了暴乱，包括蒙托罗、拉兰布拉和桑泰利亚。^[3]在阿尔莫多瓦尔、赫雷斯和埃西哈，当地官员采取了严厉措施，防止类似的暴力活动。

在塞维利亚，成千上万的改宗犹太人动员起来自卫，让基督徒胆战心惊，害怕他们会为其他地方的改宗犹太人遭受的迫害而复仇。随后一名改宗犹太人用刀刺了一名基督徒，暴民开始洗劫一个改宗犹太人社区。但这一次，由基督徒、武装的改宗犹太人和市政府组成的联盟遏制住了暴民，恢复了秩序。

国家原本就因为战争和内乱而风雨飘摇，宗教暴力更是进一步损害了稳定性。这些暴力活动发生的时机，正是国际形势迅速恶化的时候。土耳其穆斯林军队继续向欧洲进犯。穆斯林军队在君士坦丁堡和希腊取胜之后，又乘胜进军，入侵了塞尔维亚，即后来的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地区。1474年2月，布罗塔迪伯爵给西班牙朝廷的一封信发出警示，一支“极其强大的”军队正在开赴意大利，“企图毁灭欧洲……和基督教”^[4]。

当年晚些时候，阿尔巴尼亚的要塞城市斯库塔里^[5]（与意大利只隔着亚得里亚海，当时属于威尼斯帝国）遭到土耳其人攻打，9月曾险些被占领。土耳其人最后撤军，但城内有三千军民死于饥饿或干渴。意大利人文学者乔治·梅卢拉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者，他警示称，土耳

其人只是暂时撤回君士坦丁堡，他们正在那里“建造一支强大的舰队”，以便再次发动进攻。梅卢拉写道，土耳其人的最终目标是西欧。^[6]

1474年10月，意大利传来消息，土耳其人果然在准备攻打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城市。使者告诉西班牙官员，塞尔维亚人和意大利人非常担心土耳其人的下一次入侵迫在眉睫。^[7]这些报告让居住在地中海周边尤其是西西里岛的人们噤若寒蝉。如果土耳其人决定攻击意大利半岛，斐迪南在西西里岛的领地极有可能首当其冲遭到打击。

伊莎贝拉越来越坚信，卡斯蒂利亚的未来受到了威胁，她的命运就是统治国家，而只有她能够以铁腕保护自己的王国。恩里克四世国王太消极，假如情势危急，他显然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所以伊莎贝拉越来越需要赢得他的祝福，并劝服他再一次指定她为王位继承人。她向自己幼年的玩伴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如今是塞哥维亚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少妇）求助。

伊莎贝拉有能力帮忙的时候，给了比阿特丽斯很大帮助。在伊莎贝拉帮助下，比阿特丽斯嫁给了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即塞哥维亚城堡王室宝库的管理人和塞哥维亚市市长。这对夫妻感情很好，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比阿特丽斯长成了一位美丽聪慧的女性，受到宫廷其他男人的尊重，包括好色的红衣主教门多萨和恩里克四世国王。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有一次病倒，比阿特丽斯代替丈夫管理城市和守卫城堡。现在比阿特丽斯有能力报恩，在伊莎贝拉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施以援手。

比阿特丽斯是一位非常值得仰慕的女性。一位同时代人描述她是“举止高贵，兼具审慎、美德与勇气”的典型。^[8]一幅木刻画显示她身段苗条，鼻梁挺直，樱唇饱满；她也像伊莎贝拉一样，身体强健，

虽然多次怀孕，最终一共生了九个孩子（七男两女），但身体一直很好。她给伊莎贝拉带来的，不仅是友谊，还有一个友好的大家族。

她的丈夫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据说外貌英俊，品行高尚。他是一位魅力十足的廷臣，比平均身材高一些，眼睛碧蓝，相貌端正，满头栗色直发。他是恩里克四世最信任的官员之一，早先是恩里克四世的内廷管家，从恩里克四世继位开始就为他打理内廷。后来他负责管理国王在塞哥维亚的主要基地，打理他的金库。在这样一个因为腐化堕落而遭到普遍抨击的宫廷，作为改宗犹太人的卡布雷拉凭借品行端正、尽忠职守和办事高效而鹤立鸡群。

比阿特丽斯劝说丈夫，他俩需要着眼未来，与伊莎贝拉结盟是明智之举。而她的丈夫在此期间与胡安·帕切科发生了不愉快的争吵，准备改换阵营。1473年6月15日，伊莎贝拉与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签署了一项协定，承诺自己若成为女王，将加封他为莫亚侯爵。莫亚是昆卡附近的一座城镇，距离他的出生地不远。^[9]

伊莎贝拉在此项协定中的主要谈判代表是她的主财务官阿方索·德·金塔尼利亚，他在塞哥维亚的宫廷和埃纳雷斯堡（伊莎贝拉和卡里略大主教住在这里）之间来回穿梭，办成了此事。除了与比阿特丽斯和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达成战略合作之外，伊莎贝拉还指示金塔尼利亚尽一切努力弥合她与王兄之间的裂痕。这意味着伊莎贝拉与宫廷之间有着长期的、紧密的联系。比阿特丽斯和卡布雷拉私下里劝诫国王，和御妹重归于好的时候到了。

最终比阿特丽斯决定一鼓作气，促成和解。据几十年后撰写史书的一位编年史家说，她将恩里克四世带到塞哥维亚城堡的一个僻静房间，开诚布公地，甚至是严厉地向他谈及国内局势。比阿特丽斯提醒他，他曾遭到胡安·帕切科背叛；并指出，伊莎贝拉一直忠于和热爱国王。她敦促他切断与胡安·帕切科的情感联系，与伊莎贝拉和好，

立她为继承人，并重整朝纲。她告诉他，如果他与伊莎贝拉议和并允许她回到宫廷，王国会“枯木逢春”。^[10]

忧伤的国王承认，她说的大部分是正确的，并说他觉得这一切都怪他自己。他的回答反映了他深深的抑郁和悲伤。那么多他爱的人背叛了他，如今他对生活中其他的人也不再信任。“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遭到的严重伤害，”他对她说，“如你所言，是我的罪孽的结果；我的大错让我在上帝面前蒙羞。”^[11]他说自己由于大失所望和受到的精神上的打击，备受困扰，垂头丧气，有时无视了“良言”，而坚持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走下去。

他说，局势已经令人绝望：“即便我按照你说的，与王子和公主和解，国家也无药可救了，因为它已经败坏了。国内紊乱到了极点，在世的任何人都无力修补。虽然我知道，与妹妹和解是最好的办法，但没有办法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害了。”

恩里克四世最后同意会见伊莎贝拉，两人已经四年没有相见了。他们在圣诞节期间在塞哥维亚相见。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和卡里略大主教一同骑马前往埃纳雷斯堡，向伊莎贝拉发出邀请。斐迪南刚刚从阿拉贡抵达，所以也在埃纳雷斯堡。公主得到的建议是，尽快前往塞哥维亚，但轻装简从，以免节外生枝。^[12]她特地带上了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然后准备迅速出发。她告诉斐迪南在一小段路程之后跟随她，提高警惕，以防被俘。为了防止局势恶化，她决定把女儿留下。

伊莎贝拉及其伙伴趁夜色骑马行进，沿着一千年前古罗马人建造的、现已损坏的道路，快速穿过干旱的平原，于1473年12月29日拂晓抵达塞哥维亚。有贡萨洛在身边，伊莎贝拉无所畏惧。喜怒无常的恩里克四世国王完全有可能在伊莎贝拉抵达之前改变主意，而在胡安·帕切科的撺掇下，他完全可能伤害她。斐迪南紧随伊莎贝拉之后，在

塞普尔韦达镇（距离塞哥维亚约35英里）投宿，等待进一步消息。大家都心急如焚地等着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自兄妹上次见面，已经过去四个漫长年头，有很多分歧没有得到解决，积累起来。

但恩里克四世与伊莎贝拉真正重逢的时候，一笑泯恩仇。虽然这些年里互相敌视，但兄妹再次相逢，的确非常高兴。恩里克四世刚刚打猎回来，情绪很好，而她在城堡等待他，并“以极大的谦卑”欢迎他。他欣喜地向她致意，“亲热地与她拥抱”。^[13]他俩来到附近一个房间，一起落座。她向他宣誓效忠，为之前的冒犯赔礼道歉，并请他考虑，她与斐迪南的婚姻对卡斯蒂利亚“福祉”的好处。^[14]

起初他的反应和蔼可亲，但没有做任何承诺。当晚他们在城堡用膳，他甚至允许她从宝库中挑选一件喜欢的饰品。然后他们按照多年前的习惯，一同欣赏音乐，恩里克四世唱歌，伊莎贝拉跳舞。随后几天，他们一同在城里漫步，并骑马出游。塞哥维亚人注意到他俩之间的和谐气氛。

一切顺利，恩里克四世和伊莎贝拉相处非常愉快，很快就邀请斐迪南也来。他于新年抵达宫廷。两个男人——伊莎贝拉的兄长和丈夫——第一次见面。气氛友好而热情。在随后一周内，他们一同欢度节日。

1月9日，三人和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与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夫妇一同用膳。^[15]席间，恩里克四世突然弯下身去，胃病发作了。他被匆匆送回城堡，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在他房间外焦急地等候消息。没过多久，胡安·帕切科出现了，提出了疑问：恩里克四世国王中毒了吗？此时大家心头一定都有了这个疑问。没人说得准。帕切科敦促国王逮捕伊莎贝拉，国王拒绝了，但伊莎贝拉和兄长之间的关系迅速冷淡下来。衰弱的国王很快离开塞哥维亚，去了他认为安全的马德里。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留在塞哥维亚，决心这一次不再逃跑。

不管发生什么事，伊莎贝拉都决定留在塞哥维亚。她甚至派人把女儿接到身边。她要昭告天下，自己是国王的继承人。

随后一年里，恩里克四世的健康日渐恶化，而伊莎贝拉的势力越来越强。但在这几个月里，国家动荡不安。权力易手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廷臣们不得不再一次选择阵营。站错队的人，就可能成为牺牲品。他们有理由相信年轻的夫妻能成功：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拥有青春活力，有政治力量，是未来的希望。而恩里克四世国王毕竟只有四十八岁，还是有可能恢复健康的。他犯过错误，但不是个坏人，而且也在努力妥善治理国家。

就连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和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也缠身于宫廷错综复杂的结盟关系。国王的两位长期盟友贝纳文蒂伯爵和红衣主教门多萨请求他们劝伊莎贝拉将她的女儿的监护权交给他们（贝纳文蒂伯爵和门多萨），以担保假如伊莎贝拉成为女王，会善待他们。伊莎贝拉起初不同意，但最后不情愿地答应了。^[16]

据宫廷编年史家阿隆索·德·帕伦西亚记载，虽然伊莎贝拉做了这个让步，但贝纳文蒂伯爵随后参与了一起绑架伊莎贝拉的阴谋。德·帕伦西亚说自己无意中听到一群密谋者，包括贝纳文蒂伯爵，在商讨计划。伊莎贝拉得知此事后，劝斐迪南逃跑，因为她觉得斐迪南处境危险，而她自己毕竟是御妹，相对安全。斐迪南假装出猎，离开了。年轻的伊莎贝拉果然被带走，不过被送到了塞普尔韦达的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由斐迪南的卡斯蒂利亚外祖父照料。^[17]8月，斐迪南离开卡斯蒂利亚，前往阿拉贡，再一次去阿拉贡—法兰西边境帮助他的父王。随后几个月里，伊莎贝拉又是孤身涉险。

伊莎贝拉在塞哥维亚居住期间，与红衣主教门多萨越来越亲近，这让他的长期竞争对手——妒火中烧的托莱多大主教卡里略十分恼怒。伊莎贝拉和红衣主教做了很多工作去抚慰卡里略大主教，为他的

一个侄女安排了非常有利的婚事，帮助他的一个侄子在潘普洛纳搞到一个主教职位。但大主教仍然因为被门多萨抢走了红衣主教职位而闷闷不乐。由于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他对门多萨的怨恨一下子爆发成了公开的敌意。卡里略大主教对炼金术很感兴趣，雇用了一个江湖医生和所谓的巫师，此人告诉他，有办法制造黄金。伊莎贝拉的忏悔神父阿隆索·德·布尔戈斯修士与这个炼金术士争吵起来，最后竟然斗殴起来。伊莎贝拉认为炼金术是扯淡，将炼金术士逐出了塞哥维亚的宫殿。^[18]卡里略感到这是对他的侮辱，气哼哼地出了城。

对卡里略大主教来说，这是压断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戏剧性地背弃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奔到恩里克四世国王那边，敦促他立小胡安娜为继承人。兄妹间的裂痕再次扩大。很快就爆发了暴力冲突，恩里克四世和伊莎贝拉的支持者在国内一些城镇发生斗殴。^[19]

随后，恩里克四世国王遭到了心理上和情感上的一次严重打击。1474年10月4日，胡安·帕切科突然出人意料地去世了，死于喉疾，病情和死状非常像他的兄弟佩德罗·希龙，这非常奇怪。他的仆人们立刻偷走了他的财产，将他的尸体藏在一些酒罐之间。^[20]这对恩里克四世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尽管胡安·帕切科奸诈阴险而贪得无厌，却是恩里克四世最重要的试探民意的工具、毕生盟友和卡斯蒂利亚仅次于国王本人的二号人物。恩里克四世一生中对爱知之甚少。他与父亲的关系充满矛盾；他母亲去世得非常突然，可能是被敌人毒死的；他与两任妻子的关系也是灾难性的，令他十分孤独。胡安·帕切科是他一生中最恒定的因素，他的死似乎让国王连生存的意志都没有了。我们似乎很难理解这一点，但恩里克四世似乎很爱帕切科。

恩里克四世国王凄楚地哀叹，帕切科对他就像父亲一样。为了表示对帕切科家族的恩宠，他立刻任命帕切科的儿子为圣地亚哥骑士团大团长，将这个令人垂涎欲滴的职位，连同强大的修会的控制权

和大片土地，都给了他。伊莎贝拉原本希望将这个大团长职位收归王室，使之成为王族的财产，她父亲也曾这样设想。但恩里克四世这样一下子就在卡斯蒂利亚树立了一个新的重要竞争对手，即帕切科的儿子，新的比列纳侯爵。^[21]

感情上受到的打击往往导致身体健康的恶化。恩里克四世愈发沮丧抑郁，身体越来越差。而伊莎贝拉的力量和势力日渐增长。国民的支持越来越转向她，她也改变了自己的语调，变得更加倾向于和解。她向恩里克四世的盟友保证，她不会因为他们的反对而报复他们。例如，她写信给阿罗伯爵，请求与他面谈。她下了很大功夫去强调，他无须畏惧她、斐迪南或托莱多大主教；她还“向上帝、向圣母玛丽亚宣誓，用我的右手画十字”。^[22]

恩里克四世的健康持续走下坡路，现在开始咯血。他去了马德里，“希望在那里休养并恢复元气”，^[23]但他到了那里之后，在秋风中散步时很快头晕目眩。随后他在自己寝室内病倒了。到12月，他已经衰弱到不能骑马去城外的狩猎小屋。12月的第一周，恩里克四世国王的病情急剧恶化，他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了。在他的最后一天，一连十多个小时，他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一名修士被传来，听他告解。两人谈了漫长的一个钟头。国王告诉修士，他要把国家大事留给红衣主教门多萨、年轻的新任比列纳侯爵和其他一些官员。他要求用他的珠宝和财产来还债，并将他安葬在瓜达卢佩圣母教堂，长眠在他母亲身侧。这座教堂是一个著名的有神迹的场所，人们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山区找到了一尊圣母玛丽亚的雕像。

1474年12月11日约凌晨2点，他与世长辞，享年四十九岁。他临终时，有红衣主教门多萨、贝纳文蒂伯爵、新任比列纳侯爵和其他几名议事会成员侍奉在卧榻前。^[24]一名骑手火速将国王驾崩的消息送给

伊莎贝拉。自一年前圣诞节时恩里克四世在塞哥维亚城堡病倒以来，伊莎贝拉就住在城堡。

关于恩里克四世去世时床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众说纷纭。^[25]编年史家帕伦西亚说，恩里克四世宣布立自己的女儿为继承人。但他没有留下遗嘱，或者至少人们没有找到遗嘱。一些目击者和其他历史学家宣称，国王曾立过遗嘱，但它被偷走、隐藏或销毁了。的确，我们很难相信恩里克四世国王没有为小胡安娜留下具体的安排，因为他非常疼爱这孩子。小胡安娜此时只有十三岁，虽然没有和他一起生活，但他向朋友写信，殷勤细致地询问她的健康状况。^[26]我们也很难相信，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国王居然没有为王位继承做过安排。

不过，在临终时刻，恩里克四世显然摒弃了自己一生中曾经爱过的很多东西。他曾赞助自己钟爱的城市塞哥维亚的多座美丽教堂，却要求将自己埋葬在母亲身边。他的母亲是阿拉贡的玛丽亚，即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的姐姐。也就是说，恩里克四世的残酷的岳父胡安二世也是他的舅舅。这些家庭关系是恩里克四世与伊莎贝拉矛盾的促成因素之一。恩里克四世选择长眠于母亲身旁，这又一次展现了特拉斯塔马拉王族内部的亲缘和权力关系是多么错综复杂、扭曲而可悲。

贵族们急于尽早奔到新女王身边，所以给恩里克四世做的宗教仪式匆匆结束了，他的遗体被迅速埋葬到瓜达卢佩圣母教堂。恩里克四世甚至把自己最喜爱的塞哥维亚城都输给了异母妹。他的朋友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和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已经在将宝库转交给伊莎贝拉女王。

^[1] 鲁西永伯爵领地在当时是加泰罗尼亚的一部分，今天则属于法国。

[2]. 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 “Isabel, Infanta and Princess, ” in Boruchoff, 53.

[3]. Benzion Netanyahu, *The Origins of the Inquisition in Fifteenth-Century Spai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 p.804.

[4]. Conde Brotardi, in Trento, February 7, 1474,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A-7, folio 158, S&Z, p.164, cited in Biblioteca Nacional, *Índice de la colección de don Luis Salazar y Castro, formado por Antonio de Vargas-Zúñiga y Montero de Espinosa y Baltasar Cuartero y Huerta*, vol.1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949) , letter 632.

[5]. 今阿尔巴尼亚北部城市斯库台。

[6]. George Merula, “The Siege of Shkodra” (1474) , trans. George Elsie, in *Texts and Documents of Albanian History*, [http: || www.albanianhistory.net| en| texts1000-1799| AH1474.html](http://www.albanianhistory.net/en/texts1000-1799/AH1474.html).

[7]. Karolus Vitalus Caurell to unknown person, “remitiendo el juramento que se menciona en la ficha siguiente y el gran temor que había sobre una invasion de los turcos en Ragusa y Veneci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October 27, 1474.A-7, folio 158, p.164, cited in *Indice de la colección de don Luis Salazar y Castro*, vol.1, letter 631.

[8]. Gonzalo de Oviedo y Valdés, cited in Don Eduardo de Oliver-Copóns, *El Alcázar de Segovia* (Valladolid: Imprenta Castellana, 1916) , p.129.

[9]. Andrés de Cabrera, June 15, 1473, A-7, folio 89-91, in *Índice de la colección de don Luis Salazar y Castro*, vol.1, letter 617.

[10].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469-1476, según un manuscript anónimo de la época*, ed. Julio Puyol (Madrid: Tipografía de Archivos, 1934) , pp.113-21.

[11].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469-1476, según un manuscript anónimo de la época*, ed. Julio Puyol (Madrid: Tipografía de Archivos, 1934) , pp.113-21.

[12]. Diego de Colmenares, *Historia de la insigne ciudad de Segovia*, revised by Gabriel María Vergara (Segovia: Imprenta de la Tierra de Segovia, 1931) , p.319.

[13]. Diego de Colmenares, *Historia de la insigne ciudad de Segovia*, revised by Gabriel María Vergara (Segovia: Imprenta de la Tierra de Segovia, 1931) , p.320.

[14]. Diego de Colmenares, *Historia de la insigne ciudad de Segovia*, revised by Gabriel María Vergara (Segovia: Imprenta de la Tierra de Segovia, 1931) , p.320.

[15]. Peggy K.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93.

[16]. Peggy K.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93.

[17]. Peggy K.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94.

[18]. Peggy K.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95.

[19]. Peggy K.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95.

[20]. Nancy F. Marino, *Don Juan Pacheco: Wealth and Power in Late Medieval Spain* (Tempe: 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06) , pp.163-64.

[21]. Liss, *Isabel the Queen*, p.95.

[22]. 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 *Isabel la Católica, Princesa*, pp.506-8,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Colección

Salazar, M-26, folio 92-92V.

[23] Diego Enríquez del Castillo, *Crónica de Enrique IV*, ed. Aureliano Sánchez Martín (Valladolid: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1994) , p.398.

[24] Diego Enríquez del Castillo, *Crónica de Enrique IV*, ed. Aureliano Sánchez Martín (Valladolid: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1994) , p.96.

[25] Townsend Miller, *The Castles and the Crown: Spain, 1451-1555*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3) , p.79.

[26] Liss, *Isabel the Queen*, p.96.

十 伊莎贝拉登基

在塞哥维亚，伊莎贝拉得知恩里克四世死讯后，放声大哭，说自己感受到“极大的悲伤”^[1]。她的心情一定很复杂，因为尽管恩里克四世对她做了很多残酷的事情，兄妹俩的确有过真挚的感情。他是她最后一位活跃的近亲。她的父亲和弟弟阿方索均已去世；她的母亲尽管还在世，却神志不清，在公共生活中不能发挥任何作用。斐迪南远在阿拉贡，伊莎贝拉必须独自面对恩里克四世的死亡。他的去世是她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然而，不管伊莎贝拉多么悲恸，似乎都已经为这消息做好了准备。她迅速开始采取行动。她的朋友们——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及其丈夫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她的幼时教师贡萨洛·查孔及其外甥古铁雷·德·卡德纳斯——很快聚集到她周围。除了他们，塞哥维亚还无人知道国王驾崩的消息。伊莎贝拉的团队希望利用出其不意的因素，决定性地确立她的统治权，并迅速造成既成事实，以排除小胡安娜的竞争。几个小时内，伊莎贝拉及其盟友就开始落实计划。准备工作完成后，伊莎贝拉换上丧服，向王国各地发出书信，告知卡斯蒂利亚人民恩里克四世国王已经驾崩，并在城内准备葬礼。

恩里克四世死后的那一天，从早到晚都是风云激荡。塞哥维亚市民几十年后还记得这一天。上午10点，圣米迦勒教堂（塞哥维亚的主要教堂，距城堡约1|4英里）敲响了大钟；很快城内其他教堂也开始鸣钟，这刺耳的钟声传遍大街小巷。从上午11点开始，神父们在圣米迦

勒教堂举行哀思弥撒。一切按照既定仪式举行，包括吟唱赞美诗、诵读经文、进行特定的祷告，信众做出回应等。仪式是用拉丁文进行的，由钟声和歌声伴奏，为了让亡魂安息，点燃了蜡烛。

11点半，仪式结束，官员和市民从教堂鱼贯而出，走上大街，聚集到中央广场。一位官员向群众呼喊，宣布恩里克四世国王驾崩，并且没有留下一个合法继承人，所以他的妹妹伊莎贝拉将继承王位。两名在恩里克四世病榻前见证他去世的人士公开确认，国王已死。

伊莎贝拉公主也参加了弥撒。仪式结束几个小时之后，她脱下黑色丧服，身穿光彩夺目的华服，佩戴黄金和珠宝首饰，再次出现。她走回同一座教堂，让大家宣布她为女王。她在短得让人惊讶的时间里，成功安排好了威风堂堂的象征性的权力交接。她显然为此已经准备了几个月。

很快，游行队伍走进广场。领头的是手捧伊莎贝拉和特拉斯塔马拉王族（伊莎贝拉和斐迪南都是该家族的成员）纹章的武士，然后跟着伊莎贝拉的忠实教师贡萨洛·查孔的外甥古铁雷·德·卡德纳斯。随后就是满身珠光宝气的公主，她骑着一匹乳白色的骏马，而不是像吉桑多公牛条约时那样骑着表示谦卑的骡子。她来到主广场，身边陪着乐师，鼓乐齐鸣。在圣米迦勒教堂门口，她登上阶梯，走到一处覆盖锦缎的平台上。^[2]

紧随她身后和陪伴在她身侧的有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恩里克四世信任的宝库管理人和塞哥维亚市市长）及其夫人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塞哥维亚主教（改宗犹太人）胡安·阿里亚斯·达维拉和其他一些市政官员和教士全部步行跟随女王的队伍。犹太人社区的一些成员也在队伍中，包括拉比亚伯拉罕·塞尼奥尔及其追随者，他们以此公开表达对公主成为女王的支持。根据一位公证人的记载，人群中还有教皇使节、一些骑士和贵族、一群圣方济各会与多明

我会修士、塞哥维亚的巨商富贾和一大群普通市民，其中大多数市民都是羊毛制造业（本城的支柱产业）的雇员。

伊莎贝拉以响亮和清晰的嗓音向人群讲话。二十三岁的公主站在高台上，宣誓要捍卫教会和卡斯蒂利亚与莱昂人民。她右手按着《圣经》，以上帝之名发誓，要服从教会的训诫。她宣誓要促进人民的福祉，改善他们的生活，伸张正义，并保护贵族的特权。人群用传统的言辞向她宣誓效忠，表示接受她为统治者。

随后，官员们在她面前跪下，向她宣誓效忠，认可她为女王，并向她的丈夫斐迪南宣誓。卡布雷拉将城堡和宝库的钥匙交给伊莎贝拉，因为现在城堡和宝库属于她了。她又将钥匙还给卡布雷拉，请他保管。他向她宣誓效忠，承诺要妥善管理该地区的“各城堡与要塞”。伊莎贝拉很快奖赏了她的最亲密朋友卡布雷拉和查孔。按照伊莎贝拉的承诺，卡布雷拉和比阿特丽斯很快成为莫亚侯爵和侯爵夫人。查孔则被晋升为女王的幕僚长。女王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在过去曾经忠诚对待她的人，将会得到伊莎贝拉女王的恩宠奖掖。

伊莎贝拉的四岁女儿被抬起，作为下一位王位继承人，展示给群众。这强调了卡斯蒂利亚当下和未来对女性继承权的认可。自乌拉卡（1109～1126年在位）和1217年的贝伦加利亚女王以来，卡斯蒂利亚与莱昂还不曾有一位独立统治的女王。近两百多年来，王位都是传承给男性的。现在伊莎贝拉成为君主，她的女儿成了王储。

伊莎贝拉女王是自行发布“宣言”、自立为王的，而不是按照卡斯蒂利亚的传统由国民推举为王。事实上，她是自己给自己加冕的。

[3]随后武士们呐喊道：“卡斯蒂利亚，卡斯蒂利亚，卡斯蒂利亚，无比尊贵、无比强大的公主，我们的女王伊莎贝拉万岁！无比尊贵、无比强大的国王，她的合法丈夫，堂斐迪南万岁！”据市民回忆，当时人群掌声雷动，鼓乐喧天，所有人都欢呼雀跃。

随后女王及其队伍返回了教堂，走进有穹顶的大门，人群跟在后面。她在主祭坛前跪下，然后匍匐在上帝面前。随后她站起身来，将王室的挂饰捧在手中，放在祭坛上，仿佛在献上祭品。尽管她表现得仿佛她的君权来自神授，但实际上她发动了一场政变。恩里克四世国王曾犹豫不决，不知道立谁为自己的继承人，但在他最后的五年里曾明确表示，要小胡安娜接替他成为统治者。现在没有人提起胡安娜的名字了。

自那一天起，历史学家就大感困惑，不知道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合法统治者究竟是伊莎贝拉，还是胡安娜。或许胡安娜的确是国王的亲骨肉，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伊莎贝拉就是个篡位者。但胡安娜或许并非国王的孩子。无论如何，在这个日子，在塞哥维亚（恩里克四世及其两位妻子的婚姻时光大部分是在这里度过的），当地人民倾向于相信伊莎贝拉是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真正的合法统治者。

伊莎贝拉女王走出教堂后，游行队伍又在她周围聚集。这一次，古铁雷·德·卡德纳斯骑马打头阵，举起一支宝剑，剑尖指向天空，象征主持正义。据帕伦西亚记载，人群震惊之下喃喃低语，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一位女性宣示自己主持正义、施加惩罚的权力。伊莎贝拉有意识地选用男性气概的象征，后来在一些典礼场合，她也是这么做的。她甚至命人制作了一幅挂毯，描绘女王握着剑的形象，标题为《名望》。[\[4\]](#)

这显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用那种方式竖直地举起剑，这是一个“军事十字”的视觉符号。从登基的最初时刻起，伊莎贝拉女王就开始为自己打造一种形象：泰然自若、沉着冷静、光辉灿烂、神圣、血统高贵、得到上帝佑助。

她穿过城市，经过犹太人区的边缘，进入那座由摩尔人装饰的宫殿，即她的家。她骑马前进，周围簇拥着徒步的贵族，市政官员跟在

后面。她威风凛凛地走过这座中世纪城市的蜿蜒街道，走向自己祖先的家园，即悬崖边上的要塞，以一位当世女性的身份在祖先雕像之间占据自己的位置。

她是独自登上王座的。她进入城堡，将它和城堡塔楼内储藏的金银财宝都据为己有，因为她是它们的合法主人。“当夜，她就住在这宫中”，一位塞哥维亚学者后来记载道。^[5]

* * *

随后几天内，伊莎贝拉开始得到消息，国家其他地区的臣民对她的加冕做何反应。大主教阿方索·卡里略迅速宣布支持她，于是王国的主要教区托莱多的精神领袖就站到了她的阵营。卡里略还旅行到塞哥维亚，向她宣誓效忠。红衣主教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将恩里克四世的遗体送到最后安息之所之后，也匆匆赶到伊莎贝拉女王身边。罗德里戈·博吉亚帮助门多萨当上红衣主教的努力在恩里克四世死后立刻结出了果实：门多萨当即宣布支持伊莎贝拉，而非胡安娜。

全国各地传来了消息。伊莎贝拉的自我加冕在北方得到赞扬，尤其在老卡斯蒂利亚^[6]，包括阿维拉、塞普尔韦达、巴利亚多利德、托尔德西利亚斯、托莱多和穆尔西亚。在安达卢西亚的基督徒控制区和埃斯特雷马杜拉，有人提出了一些质疑，因为那里的人们不是很了解伊莎贝拉。她显然需要尽快去那里，让大家感受到她的存在。加利西亚似乎处于叛乱边缘^[7]，但那里的局面也比王国其他地区更糟糕。

但是，给新政权造成最初两次危机的，是比较私人的问题。第一次危机是夫妻间的争吵威胁到了王国的稳定性；第二次危机是一个被抛弃的求婚者造成的。这些问题是在卡斯蒂利亚普遍而持续的社会紊

乱、经济崩坏的大环境下爆发的。因此伊莎贝拉不得不同时处置许多难题。

首先是婚姻的危机。恩里克四世死后，伊莎贝拉并没有着急通知斐迪南。当时他正在自己家中，即阿拉贡王国的首都萨拉戈萨，距离塞哥维亚约175英里。历史学家约翰·爱德华兹写道：“她似乎并不着急希望丈夫到身边来。”^[8]她派了一名行动迟缓的信使去见斐迪南，通知恩里克四世的死讯，并建议他考虑阿拉贡的当前局势，自行斟酌如何决策。她没有敦促这名信使快速行动。她故意没有及时通知斐迪南来参加加冕典礼，就是为了断绝他自己索取卡斯蒂利亚王位的希望。

所以斐迪南一直到加冕礼好几天之后才得知了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国王驾崩，伊莎贝拉登基。他父亲的老友卡里略大主教派了一名信使火速给斐迪南通风报信，强调他必须立刻到卡斯蒂利亚。恩里克四世奄奄一息的时候，红衣主教门多萨也给斐迪南送了信，同样建议他迅速赶到塞哥维亚。

伊莎贝拉女王身边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急于将新进展告诉国王。例如，古铁雷·德·卡德纳斯写信给斐迪南，天真地描述了自己在加冕礼上扮演的独特角色，即捧着正义之剑。斐迪南于12月21日收到了信，也就是塞哥维亚加冕礼的一周之后。他得知妻子独立登上了王位，不禁暴跳如雷。^[9]他立刻跳上马背，奔向塞哥维亚。

他对陪他从阿拉贡出发的编年史家帕伦西亚说：“我从未听说过，竟然有女人篡夺男性的特权。”^[10]帕伦西亚努力安慰国王，说她“毕竟只是个妇道人家”，等她认识到自己需要男性的保护之后，一定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行动。斐迪南身边的其他人更为不安；一位男性编年史家说，伊莎贝拉做的事情“有些阴险”。^[11]

斐迪南压抑自己的怒气，自我安慰说，伊莎贝拉一定只是一时糊涂。他告诉自己，等他到了塞哥维亚之后，她就会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一定会顺从于他的权威。他对自己的床上功夫无比自信，相信一定能够凭这个让她服服帖帖。一位编年史家记载道，斐迪南“相信自己只要耐心，一定能够满足妻子的爱欲需求，那样就能轻松地克服妻子的顽固，那顽固是奸臣在他妻子心里撺掇起来的”。^[12]

斐迪南抵达时，伊莎贝拉已经独立执政两个多星期了，所以有时时间细细考虑自己要对斐迪南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斐迪南也在争取时间。12月30日，他接近了塞哥维亚，但没有直接进城，而是在附近的图雷加诺要塞等待。伊莎贝拉及满朝文武为欢迎他的典礼做了安排。准备工作进行的时候，双方不断传递消息。

1月2日，斐迪南从塞哥维亚的大门进入城市，身穿奢华的皮毛和金线华服。伊莎贝拉女王没有亲自去迎接他，而是让一大群官员和教士，包括门多萨和卡里略，去迎接他，并打着华盖，将他护送到圣米迦勒教堂（也就是两周前伊莎贝拉登基的地点）门廊上。人们正式询问他，是否愿意以女王的丈夫的身份统治，他表示同意。塞哥维亚的市议员然后宣誓支持他，称“他们将服从和接纳殿下，因为殿下是我们的女王陛下的合法夫君”。^[13]

然后斐迪南在游行队伍的护送下来到城堡。伊莎贝拉在大门内等候。现在他俩的角色逆转了。掌控局面的人是她。现在他需要来拜见她，而不是她求见他。她遵循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历史上女王们立下的法律先例来行事，不过那些女王是几百年前统治的，她们的事迹主要是被记载在古老的编年史里。伊莎贝拉的登基被认为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人们相信女人有可能有能力独立统治），但在现实中仍然是惊世骇俗的，宫廷的男人们尤其感到震惊。男性主宰世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连伊莎贝拉的支持者对如何处置局面也有点困惑和糊涂。学者

在史册中寻找女性君权的先例。伊莎贝拉的登基虽然不是史无前例的，但的确十分不寻常。

因此，伊莎贝拉的举动违反了西班牙的传统。对欧洲大陆其他地方的人来说，这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学者努莉亚·西列拉斯-费尔南德斯写道：“欧洲各地的情况是相似的，女王一般只有在如下情况才能以丈夫的名义统治：国王亲自指定女王，并且有能力将自己的抉择强加于他的臣民。”^[14]

不过贝伦加利亚女王只统治了几个月，就将王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只有乌拉卡（1109～1126年在位）统治的时间比较长。她结过婚，但婚姻后来破裂，于是她独立地统治国家。

学者特雷莎·艾伦菲特写道：“乌拉卡推翻了这样的观念：娶了女王的男人将自动分享妻子的国度的统治权。”^[15]

斐迪南的谋臣感到特别沮丧，努力去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帕伦西亚说，这局面全怪那些“持续不断地怂恿”伊莎贝拉的人促使她产生“女人的……耍性子”。^[16]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伊莎贝拉是出于自己的原因，自行决定独自统治的。她不愿意冒险让斐迪南分享王权，从而造成不愉快的后果。或许她再也不信任他了。他长期远离卡斯蒂利亚，在伊莎贝拉需要他的时候却不肯回来，他的风流成性，肯定都让伊莎贝拉觉得他不靠谱。而且他也可能会企图将她排挤到继承体系之外。

夫妇终于见面时，双方都大发脾气，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争执”。^[17]正如她担心的那样，斐迪南及其亲戚认为他才应当是无可争议的统治者，因为他是伊莎贝拉父亲的血缘最近的仍然在世的男性亲属。他的一些支持者相信女人没有治国理政的能力。但伊莎贝拉及其支持者坚称，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由女王独自统治的历史很悠久，最

突出的就是乌拉卡女王，她在12世纪初执掌王权。他们说，伊莎贝拉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的直系后裔，斐迪南在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权力只能是源自他和伊莎贝拉的婚姻关系。换句话说，伊莎贝拉和斐迪南都觉得自己是合法统治者，对方只是统治者的配偶。

斐迪南大发雷霆，觉得自己受到了公开的羞辱，损害了他的男性气概。他宣布自己要回阿拉贡。伊莎贝拉恳求他留下，辩称，“她绝对不会有理由想要对她最亲爱的夫君造成哪怕是一丁点的羞辱。为了夫君的幸福和荣誉，她甘愿牺牲不仅是王位，还有她自己的健康”。她说，她“不愿意，也不能够与他分离”。

伊莎贝拉的婚姻真正陷入了危机，这种分歧有可能毁掉她的婚姻和她的王国。此时，她完全可能在压力下退缩，仅仅为了婚姻的和谐就将王国的控制权交给他。

她需要一个男人在自己身边，以克服她的性别造成的问题。历史学家詹娜·比安基尼在写到贝伦加利亚女王时说：“女性，即便那些很明显拥有王位继承权的女性，如果没有结婚，也很少被接受为君主。”^[18]

而且，为了确立伊莎贝拉的权威，她的婚姻必须要开花结果，所以她需要斐迪南。学者米丽娅姆·沙迪斯写道：“中世纪的女王之所以能够成为女王，是因为她是一位国王的妻子或女儿。但几乎不可避免的情况是，成功的女王必须是一位母亲。”^[19]

所以伊莎贝拉必须找到办法，保住自己与斐迪南的婚姻。所以，虽然她继续坚守自己的立场，但非常温和气。她努力抚慰斐迪南，最后他停止了反抗。她劝服了他，他俩的权力分割主要是表面上的，不是实质的；作为她的丈夫，他将享有个人权力和自治权。她指出，如果他反对她的统治权，那么他就损害了他们的独生女的权益。他还

必须承认与伊莎贝拉签的婚前协议的有效性，他在协议中同意，他的身份将是女王的配偶，而不是国王。^[20]他当时在婚礼前的兴奋情绪中匆匆签署了协议，或许没有注意到这个条款的重要性。

伊莎贝拉用一种分享权力的协议，想办法安抚了他。托莱多大主教和塞维利亚大主教帮忙起草了一份新协定，称为《塞哥维亚协定》，给了斐迪南很少实权，但很多象征性的重要地位。伊莎贝拉仍然是卡斯蒂利亚的“主权女王”，她的孩子，而不是斐迪南与其他女人所生的孩子，将继承王位。但他们提议，在公文、宣言、钱币铭文中，将同时签署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的名字，并且斐迪南的名字在前面。但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主权以及任命官员和财政决定权都仅属于伊莎贝拉。

为了向世人展示夫妻的团结，他们拟定了一句箴言：Monta tanto, tanto monta。意思是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两人一样，完全平等。这为斐迪南挽回了颜面，让他能够宣称，伊莎贝拉在他们婚姻余下时光里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有他的部分功劳。但这种平等只是表面上的，因为事实上，按照伊莎贝拉的盟友的说法，假如她不认可斐迪南写的文件，就对其加以修改，或者撕掉；而斐迪南的拉丁文很差，所以看不懂卡斯蒂利亚宫廷与其他国家元首之间的书信。而伊莎贝拉很快开始下大力气学习拉丁文，以便更好地掌握国际外交的语言，并要求她的女儿和侍女都一同听课学习。

但当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不在一起的时候，他将享有与女王相同的权力，并有权代理她行事。《塞哥维亚协定》的谈判是在圣诞节期间进行的，随后五个月他一直在卡斯蒂利亚。^[21]这是自他们结婚第一年以来，他俩待在一起最久的时段。

伊莎贝拉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卡斯蒂利亚的统治权将属于她，但她的做法损害了自己在史册中的形象。她在世的时候，地位比斐迪

南优先，事实上她主宰着卡斯蒂利亚，而卡斯蒂利亚比阿拉贡幅员更辽阔也更重要。但名号的问题，即他的名字在她前面，产生了长期影响，因为他们后来被世人称为“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这似乎暗示他处于主宰地位。西班牙语的特点更加剧了这个问题：在英语中，这对夫妻君主被称为国王与女王，而在西班牙语里，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名号是“国王”的复数，所以他们是“双王”。英语国家的人很容易误会卡斯蒂利亚的统治者是国王，而实际上是女王。伊莎贝拉在卡斯蒂利亚的女王地位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以至于观察者与评论者似乎无法理解，一个女人居然能成为君主，于是他们坚持认为斐迪南是统治者，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在公文、远离伊比利亚半岛的外交圈子（那里得到的关于西班牙的消息都是二手的）和最终的历史书里，斐迪南的名字都被置于伊莎贝拉之前。后来，她的一些成就也被归功于他。

为了让丈夫开心，伊莎贝拉愿意做这样的妥协。在某些方面，斐迪南的确开心了。他还年轻，只有二十二岁左右，但已经非常玩世不恭，他可能意识到，只要世人觉得他有权，那么和他真正有权也差不多。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关于婚姻的漫长谈判与和解最终导致命运发生了另一个奇怪的扭转。当地的一名教士，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他的叔叔是罗马的一位势力强大的红衣主教），在促成夫妻和解、达成联合统治协议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莎贝拉童年时见过托尔克马达，不过我们很难说他们之间有多少交集。她肯定认识他，因为他是王家圣十字修道院（多明我会的一座古老的修道院）的院长，在塞哥维亚是一位相当有地位的教士。托尔克马达和斐迪南很快发现，他们非常投缘；托尔克马达成了斐迪南最喜爱的忏悔神父和私人密友。德·托尔克马达很快开始陪伴国王在卡斯蒂利亚各地巡游，始终在御前，以至于其他官员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例如，

1475年6月，斐迪南前往巴利亚多利德和布尔戈斯，将伊莎贝拉留在阿维拉。此行托尔克马达就陪在他身边。两个月后，托尔克马达和国王一起在巴利亚多利德；这年11月，他也和斐迪南一同旅行。1476年1月和2月，他又在国王的随员队伍中。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他至少陪国王进行了两次长途旅行。

当时的婚姻很脆弱，所以夫妻俩通过特别恩宠托尔克马达（是他帮助他们在精神上、婚姻上和政治上合为一体），来突显自己的团结一心。他们下令扩建他的修道院，最重要的工程是给修道院建造了一座新的大门，以赞颂他们的和睦。这座大门装饰着大量象征他俩的精美符号，还带有Manto tanto, tanto monta的铭文，这是一个被大量运用的建筑主题。这是夫妻俩共同开展的第一项主要的建筑工程。大门纪念了他们登上卡斯蒂利亚王位的大事。他们还对最亲密的朋友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和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表现出极大的恩宠，在雕塑中给了他们突出的地位。在雄伟大门的正上方有一座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他脚下则是巴伦西亚的走遍天下讲道的修士文森特·费雷尔（如今已被封为圣徒）。在基督像之下是一幅场景画，中央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圣母玛丽亚、婴孩耶稣和抹大拉的玛丽亚。但伊莎贝拉女王和她的朋友比阿特丽斯的石像就在耶稣一家的右侧，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在左侧。用这种方式，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告诉后人，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和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在他们掌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伊莎贝拉女王肯定需要托尔克马达帮助她维持婚姻的稳定，因为有的时候分享权力的安排更像是表面文章，而不是实际。伊莎贝拉努力让大家都觉得斐迪南的地位极高，因为这有利于减少他们婚姻的摩擦，因为如果让一个男人貌似掌握主宰权，她的地位就更稳固。她确立自己为王国的唯一掌权者之后，就开始假装她是与丈夫合作统治的。女王的忏悔神父埃尔南·德·塔拉韦拉回忆说，她口述了王室命

令，让他起草，并让他签名，仿佛这是两人共同的决策。她对他说：“签成‘国王和女王’。”^[22]

伊莎贝拉努力让世人相信，他们的婚姻非常幸福和谐，夫妻为了国家的福祉精诚合作。但许多证据表明，幸福的婚姻只是假象，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婚姻的虚构”^[23]。他们分开居住的时候，他的权威比他们生活在一起时更大。他常常旅行，往往是去和她相反的方向。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联合为内廷和行政幕僚任命官员。伊莎贝拉的多年好友贡萨洛·查孔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古铁雷·德·卡德纳斯是副财政大臣。阿拉贡的加夫列尔·桑切斯被指派管理内廷财务。很多高级职位被交给了受过良好教育、才干得到证明的改宗犹太人，这些人是通过自己的才华获得职位的，而不是通过世袭。例如，卡斯蒂利亚人阿隆索·德·布尔戈斯是布尔戈斯一位前拉比的孙子，他担任宫廷的政治与宗教顾问和伊莎贝拉的忏悔神父。与伊莎贝拉同样亲近的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也是改宗犹太人，他就是她的朋友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的丈夫。

然而，就在伊莎贝拉与家族的一名成员缓和关系的同时，另一名成员却制造了难题。

* * *

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是伊莎贝拉的远房舅舅^[24]，还是恩里克四世的第二任妻子胡安娜王后的哥哥。他仍然觉得，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私订终身，让他失去了伊莎贝拉和卡斯蒂利亚王位。在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结婚后的四年中，阿方索五世威望日增。1471年，他赢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成功入侵北非的艾西拉和丹吉尔^[25]，控制了那里储量丰富的金矿。阿方索五世变得很富有。他是个虚荣而骄傲的人，用

羊毛和丝绸挂毯来记载和宣扬自己的胜利。挂毯上画着他的军队潮水般翻越城墙、占领城市，将妇女儿童从家中驱赶出去。

在这些挂毯里，阿方索五世把自己的形象描绘得非常伟岸英武。画中，他和儿子若昂骑马位于战场中央，身披精美铠甲，身旁是黑压压的步兵。他在战场的实际表现远远没有图画中那么光荣。艾西拉的穆斯林想投降，阿方索五世与其进行停战谈判的时候，他那些受到肾上腺素刺激的士兵却自作主张地攻打城墙，而不愿意接受谈判得来的胜利。阿方索五世很快不得不加入混战，与士兵们一起冲上城墙。穆斯林守军措手不及，阿方索五世及其士兵屠杀了约2000名穆斯林，俘虏5000人，对一些居民躲避进去的清真寺发动了特别残酷的攻击。

[26] 尽管基督教会禁止奴隶贸易，但阿方索五世有权将俘虏卖为奴隶，因为他从教皇尼古拉五世那里获得了特别许可，只要被卖的人是“撒拉森人、异教徒和其他不信基督的人”。

阿方索五世刚愎自用，鲁莽冲动，并且极其执拗。他曾设定某个日期为登陆日，但那一天黎明时乌云密布、狂风怒号，他仍然坚持要求部队冲上海滩。士兵们跟随他登上适航性很差的船只，一些船只被波涛吞没，或者在礁岩上撞得粉碎。这一天有约200名骑士和步兵溺死，他们的沉重装备把他们拖向海底。这个恐怖事件被记载到某张挂毯上，告诉大家，阿方索五世愿意付出昂贵的生命代价，来换取自己的光荣胜利。

因为阿方索五世惯于呼风唤雨，所以被伊莎贝拉“抛弃”（这是他的看法）后感到“特别恼火”。他可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忘记这种怠慢的人。[27] 现在伊莎贝拉的敌人找到办法，煽动他的旧恨，从中渔利。他们提议让他成为卡斯蒂利亚（葡萄牙的长期竞争对手）的国王。对他来说，卡斯蒂利亚是非常有价值的：它囊括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约三分之二，而葡萄牙只相当于半岛的四分之一。[28] 阿方索五

世因为近期在北非的胜利已经得意忘形，若再掌控卡斯蒂利亚与莱昂，那么他将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君王之一。

伊莎贝拉的敌人甚至可以提出新的联姻，因为小胡安娜（已故的恩里克四世和他的葡萄牙裔王后的女儿）也对卡斯蒂利亚王位有权力主张，并且尚未婚嫁。胡安·帕切科（恩里克四世国王那位宠臣的儿子，与父亲同名）在父亲死后，控制了胡安娜公主。这位公主现年十三岁，被当作与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联姻的棋子。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也提出了自己的联姻建议，提议将斐迪南的妹妹（目前在阿拉贡）嫁给阿方索五世。

阿方索五世拒绝了这项提议，而要求伊莎贝拉和斐迪南退位，坚称他的外甥女小胡安娜才是真正的女王。伊莎贝拉回应说，现在那些鼓吹胡安娜有统治权的人，恰恰就是过去坚持说她是野种的人。

卡斯蒂利亚与葡萄牙的争端显然值得忧虑。但在统治的早期——此时她的加冕礼刚刚过了几个月，伊莎贝拉女王还有更优先的事务要处理。为了巩固对自己王国的权威，她用盛大排场来提高王室的地位，增强她的统治。她终于完全自由，并且拥有自己的资源，所以可以采纳奢华的穿着打扮了。斐迪南也是这样。他们的衣服里编织着金线，身上佩戴珠宝，身穿皮草。他们志得意满，衣锦还乡，重返自己之前去过的地方，接受群众的赞颂和崇拜。他们来到巴利亚多利德，他们曾在此地匆匆成婚，以逃避恩里克四世的卫兵和爪牙。但这一次，他们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人们为他们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聚会、比武大会、斗牛赛、盛大宴会和音乐演出，年轻人在这些场合表演了最时髦的舞蹈。

但两位君主得知阿方索五世的军队正在边境集结，打算入侵卡斯蒂利亚，于是庆祝活动戛然而止。小胡安娜指控伊莎贝拉毒死了她的

父亲，非法窃取王位。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决定帮助小胡安娜报仇，并夺取卡斯蒂利亚王位。

5月底，战争爆发了。阿方索五世率领超过1万步骑兵、200车补给物资、重型火炮和其他辎重，杀入卡斯蒂利亚国境。他大肆炫耀自己的财富，运来了大量黄金十字架、金币和有雕刻图案的银盘，以展示自己的优势力量和资源。“他一掷千金”地笼络卡斯蒂利亚贵族，希望他们接受他与外甥女胡安娜结婚，并成为他们的国王。^[29]舅舅与外甥女结婚需要教皇的特别许可，但国王仍然大力推动自己的计划。阿方索五世在埃斯特雷马杜拉（靠近葡萄牙边境）举办奢靡的庆祝活动，欢庆他与胡安娜的订婚和婚礼，然后又开始备战。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也在备战。她负责后勤，他领兵作战。这很快成为他们固定的合作模式。她激烈地敦促他奋勇杀敌，他几乎立刻率军出征。

伊莎贝拉命令国民将战火燃到葡萄牙，攻击葡萄牙大小城镇，而不是坐等葡萄牙军队杀到眼前。她在给全国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

“诸位知晓，葡萄牙国王堂阿方索及其军队入侵了卡斯蒂利亚，目标是挑起令人发指的暴行。”所以，她宣布，她已经命令堂阿方索·德·卡德纳斯“以血与火对付葡萄牙国王”，攻入他的王国，摧毁那里的城镇和村庄。她希望臣民拿起武器，保卫卡斯蒂利亚，以展现他们对王室的“古老而惯常的忠诚”。^[30]

随后是长达九个月的越境袭掠，战线不断转移。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动员速度相当快，但还是占下风，因为阿方索五世享有盛誉，是一位久经沙场、老谋深算的老将。战局对伊莎贝拉和斐迪南非常不利。在这场所谓“1475~1479年战争”中，卡斯蒂利亚的权贵不得不再一次选择阵营。很多权贵仍然忠于伊莎贝拉，而其他一些人比较暧昧，还有一位重要的前盟友——反复无常的托莱多大主教阿方索·卡

里略干脆叛变投敌了。这位势力强大的高级教士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渐渐怨恨起来。斐迪南对他不够尊重，让他恼火；而且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越来越多地和他的竞争对手门多萨（他夺走了卡里略的红衣主教位置）合作，也让他不爽；而且为了炼金术士的事情，他还和伊莎贝拉发生了令人窘迫的公开冲突。如今，伊莎贝拉最需要卡里略帮助和支持的时候，他背叛了她。

伊莎贝拉骑马来到卡里略的要塞，希望他能帮忙防御外敌。然而大主教通过一名信使粗暴地通知她，他已经改换了阵营。他对自己的仆人说：“如果女王从一扇门进来，我就从另一扇出去。”^[31]她被这骤然的形势逆转震惊了，因为卡里略大主教在将近十年里一直是她的盟友。有观察者说她跪了下来，向上帝祷告，感到自己孤立无援。自从她和卡里略大主教一起支持她的弟弟阿方索王子以来，大主教就一直在她身边，如今他的背叛对她伤害极深。

但她到人生的这个阶段已经体验了许多失望，所以她像往常一样，很快重整旗鼓，继续前进。她大力笼络叛变的贵族，表示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宽恕和奖赏他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的努力收到了成效，大局开始向她的方向扭转。阿方索五世不得不将军队撤离卡斯蒂利亚，以保卫葡萄牙境内的遭到伊莎贝拉攻击的各城市。

1476年3月1日，在规模很大的托罗战役中，双方终于发生了大决战。葡萄牙军队的指挥官是阿方索五世、他的二十一岁儿子若昂王子和反戈一击的托莱多大主教卡里略。另一方是伊莎贝拉的军队，指挥官是斐迪南、阿尔瓦公爵、红衣主教门多萨和其他的卡斯蒂利亚贵族。当天雾气弥漫、大雨瓢泼，战场血腥而混乱，爆发了激烈的肉搏战。这一天有数百人，可能多达一千人阵亡。死亡的葡萄牙人当中有些不是战死的，而是在黑暗与混乱中溺死在杜罗河。

我们很难准确地了解当时的战局，因为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的记载不同。若昂王子指挥的部队打赢了他们那部分的战斗；斐迪南国王指挥的部队打赢了另一部分的战斗。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阿方索五世率领溃败的军队逃离了战场。卡斯蒂利亚人缴获了他的战旗，即葡萄牙王旗。一位名叫杜阿尔特·德·阿尔梅达的葡萄牙勇士努力夺回王旗，但失败了。德·阿尔梅达用右臂举着王旗，对方砍断了他的右臂，于是他将王旗转移到左臂，坚持战斗。然后他的左臂也被砍断，于是他用牙咬着王旗，直到最后牺牲。不过葡萄牙人后来收复了王旗。

此役的结局没有决定性。但伊莎贝拉运用天才的政治宣传手段，将此役描绘为卡斯蒂利亚的辉煌胜利。双方其实互有胜负，但在卡斯蒂利亚，斐迪南被追捧为胜利者，而阿方索五世被描绘为怯懦的败军之将和笑柄。按照中世纪的习惯，抢占敌人军旗也算是胜利。伊莎贝拉宣布这是上帝的意愿和对他们统治的佑护。在托尔德西利亚斯的圣保罗修道院，冬季寒风中，她赤足行走，向上帝感恩，并起誓在托莱多建造一座修道院和教堂，以永久纪念此次胜利。

操控国民对战役的观感，比战役实际的结果更能有力地影响民意，最终让他们相信政府宣传的版本。一群研究了此次战役及其后果的西班牙历史学家写道：“托罗战役不是军事胜利，而是政治胜利，所以它是一个决定性事件，因为它结束了卡斯蒂利亚的内战，有利于天主教双王。”^[32]

但和平并没有很快降临，而是在随后四年里渐渐促成的，双方还蒙受了一些生命损失。战争直到1479年才正式结束，伊莎贝拉直接与她的葡萄牙姨母比阿特丽斯（伊莎贝拉母亲的妹妹）谈判，缔结了和约。这些谈判的级别很高，因为他们代表着家族的关系。比阿特丽斯是阿方索五世的堂姐，也是若昂王子的岳母，所以与战争双方都既是

血亲又是姻亲。她是个非常睿智的女人，就像她的母亲（即伊莎贝拉的外祖母）一样。最终大家都同意遵守她制定的和平条件，以解决争端。

战争的第一年之后，阿方索五世本人就不再参战。不过由于他原本享有极高的军事声誉和地位，所以打成平手的托罗战役对他仍然是一次可耻的失败。他有些沮丧，寻求法兰西的增援和支持，在那里待了一年，恳求法兰西出兵，但完全是白费工夫。他逐渐认识到，不讲信誉的路易十一国王在考虑将他转交给斐迪南。他开始计划乔装打扮，逃离法兰西，路易十一羞愧地命令安排船只送这位受辱的国王回国。^[33]阿方索五世回到葡萄牙，与儿子若昂分享权力，后者使用了“若昂二世国王”的头衔。阿方索五世于1481年在一家修道院去世。他曾轻蔑地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视为不过是任性的黄口小儿，最后却被他们打得一败涂地。年轻的若昂二世国王接受了停战协定，但满腹怨恨，继续敌视伊莎贝拉女王。她则在卡斯蒂利亚警惕地观察他的动向。

小胡安娜的生活也垮掉了。她的父亲恩里克四世国王（如果真的是她父亲的话）没有为她的未来做有效的保障。她的母亲胡安娜王后，即恩里克四世的妻子，后来又生了两个私生子，于1475年在马德里去世，享年只有三十六岁，死因不明。她给自己曾经非常骄傲的兄长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丢尽了脸，后者为了支持她女儿的事业和捍卫家族荣誉所做的努力酿成了凄惨的大祸。“有人说她是被兄长毒死的……也有人说她是因为企图堕胎而死的，”学者南希·F. 马里诺写道，“她死的时候，无人为她哀哭。”^[34]

母亲死了，丈夫阿方索五世又跑到法兰西，抛弃了她，小胡安娜孤苦伶仃。伊莎贝拉与比阿特丽斯商定的停战协定给了胡安娜进入女修院的选择，她同意了，要么是自愿当修女，要么是因为相信自己别

无选择。战争爆发四年后，胡安娜进入了葡萄牙科英布拉的圣克拉拉女修院，后来搬到圣乔治城堡。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即她才是合法的女王，毕生都用“我，女王”来给书信签名。但她深居简出，没有给任何人制造麻烦，似乎一直过着正常生活，直到1530年去世。

伊莎贝拉有没有篡夺胡安娜的王位，取代她成为女王？小胡安娜可能真的是恩里克四世的女儿，理应成为女王。但她母亲的放荡成性肯定让人怀疑小胡安娜的合法性。恩里克四世自己的性行为也招致更多质疑。

在三十四年的成年生涯中，恩里克四世度过了二十年的婚姻，先是娶了布兰卡，然后是胡安娜，却没有生出别的孩子来，不管是合法的还是私生子。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君主，生的孩子比他多得多。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有十个合法儿女，可能还有五个私生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有两个合法孩子，十二个私生子；作为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吉亚理应守贞，却有四到八个孩子。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至少有八个孩子；阿方索五世至少有五个儿女。很多女人若能为国王生孩子，一定会感到万分荣幸。我们简直可以肯定，恩里克四世国王有某种生殖系统疾病，他的医生也认为他不育。如果他是同性恋，那么可能对女性也有很低程度的性欲。

伊莎贝拉对这些情况知晓多少？或许很多。她曾作为胡安娜王后的侍女，在宫廷生活，所以能够直接地、近距离地、全天候地与年轻的王后接触。她可能亲眼看到过一些事情，因此确信小胡安娜不是恩里克四世的骨肉。

或许，伊莎贝拉对胡安娜的合法性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相信自己是上天注定要统治国家，国家也需要她的统治。她显然对王国的许多问题高度关注和尽心尽责，登基之后就立刻开始处置近几十年来持

续恶化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安娜对广大公民有任何责任感。

* * *

不管伊莎贝拉女王登基是否具有合法性或最终的正当性，葡萄牙的威胁开始消散之后，她就将全副精力转向卡斯蒂利亚面对的问题。1476年4月，她召开了她的第一次行政议事会，即国会。她面临着令人生畏的巨大挑战。王国的货币贬值，财政一团糟，消费者遭到欺骗，犯罪分子猖獗而有恃无恐。她开始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没过多久就取得了一些了不起的成功。

她恢复了武装民兵的旧制度，即所谓“神圣兄弟会”。神圣兄弟会其实就是各城镇授权的执法武装力量，任务是抓捕罪犯。这些神圣兄弟会单位的开销由各城镇承担，很快被组织成一种独立的、向王室负责的民兵，得到训练，负责维持治安，听命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伊莎贝拉亲自主持了很多审判。有些批评者或许会质疑，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在遭到草草的判决（最高惩罚是死刑）之前，有没有受到正当程序的审判。但大多数人很感激，因为在几十年的无法无天之后，治安终于得到了恢复。

伊莎贝拉还调整了御前议事会的人员构成。在她兄长当政期间，御前议事会被贵族主宰。她的新议事会里有三名贵族和九名律师。议事会的领导人是一位教士；她早期的人选之一是改宗犹太人阿方索·德·布尔戈斯。通过这种手段，她提高了政府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培养了一个官僚系统，其成员为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凭借功绩而非高贵的出身得到任命。她常选择改宗犹太人担任要职，这凸显了从中世纪的管理原则转变为近代化的原则。这种做法也鼓励更多犹太人看到皈依基督教的好处。

她还对教会进行了新的审查。她鼓励学术，重视教士的教育，并努力涤荡教会的腐败。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教会的腐败都越来越引人关注。

伊莎贝拉女王努力处置各式各样问题的时候，她的盟友们关切地观察着她。改宗犹太人廷臣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在给西班牙驻罗马大使的信中写道，她“太年轻”，就承担起了管理“这么桀骜不驯”的民族的重任，“每个钟头都在听取这么多建议、这么多信息，而且它们互相矛盾……包含那些让普通人的耳朵难以分辨的弄虚作假的言辞”^[35]。他补充道，犯罪非常普遍和猖獗，所以她不得不肩负这些重担，因为“由于缺乏司法，国家面临遭到永久天罚的威胁”。

但伊莎贝拉一直在考虑她的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一项任务：组建并维持一支大军，去攻击信奉伊斯兰教的格拉纳达埃米尔国，她相信格拉纳达可能成为穆斯林力量再度进攻伊比利亚半岛的桥头堡。放眼未来，她担心与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不断扩张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必有一战。她还为保护自己的家庭而担忧。她的家庭终于又开始增添枝叶了。

^[1] 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 “Isabel, Infanta and Princessa,” in *Isabella la Católica, Queen of Castile: Critical Essays*, ed. David A. Boruchoff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54.

^[2] Peggy K.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96.

^[3] Peggy K.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97.

^[4] Liss, *Isabel the Queen*, pp.97, 98.

[5]. Diego de Colmenares, *Historia de la insigne ciudad de Segovia*, revised by Gabriel María Vergara (Segovia: Imprenta de la Tierra de Segovia, 1931), p.330.

[6]. 老卡斯蒂利亚是相对于新卡斯蒂利亚而言，都是西班牙的地区名，老卡斯蒂利亚在北，新卡斯蒂利亚在南，是比老卡斯蒂利亚更晚从穆斯林手中收复的。

[7]. John Edwards, *The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hs, 1474-1520* (Oxford, U.K.: Blackwell, 2000), p.21.

[8]. John Edwards, *The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hs, 1474-1520* (Oxford, U.K.: Blackwell, 2000), p.21.

[9]. John Edwards, *The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hs, 1474-1520* (Oxford, U.K.: Blackwell, 2000), pp.21, 22.

[10]. Alonso Fernández de Palencia, *Crónica de Enrique IV*, ed. Antonio Paz y Meliá (Madrid: Ediciones Atlas, 1975), pp.160-61.

[11].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469-1476*, ed. Julio Puyol (Madrid: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934), p.145.

[12]. *Memorias de Don Enrique IV de Castilla*, vol.2, *La colección diplomática del mismo rey*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Historia, 1835-1913), doc.206.

[13]. M.Grau Sanz, “Así fue coronado Isabel la Católica,” *Estudios Segovianos* 1 (1949), pp.24-39.

[14]. Nuria Silleras-Fernández, *Power, Piety and Patronage in Late Medieval Queenship*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5.

[15]. Theresa Earenfigh, ed., *Queenship and Political Power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pain* (Hampshire, U.K.: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5), p.xiv.

[16]. Liss, *Isabel the Queen*, p.105.

[17]. William Prescott,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Philadelphia: J.B.Lippincott, 1896) , p.118.

[18]. Janna Bianchini, *The Queens Hand, Power and Authority in the Reign of Berenguela of Castil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 p.21.

[19]. Miriam Shadis, *Berenguela of Castile (1180-1246) and Political Women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p.23.

[20]. Edwards, *Spain of Catholic Monarchs*, p.22.

[21]. Edwards, *Spain of Catholic Monarchs*, p.22.

[22]. Peggy K.Liss, “Isabel, Myth and History, ” in Boruchoff, p.60.

[23]. Barbara F.Weissberger, “‘Tanto monta: The Catholic Monarchs’ Nuptial Fiction and the Power of Isabel I of Castile, ” *The Rule of Wome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s. Anne J.Cruz and Mihoko Suzuki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 PP.43, 46.

[24]. 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儿子杜阿尔特国王是阿方索五世的父亲。若昂一世的另一个儿子司厓长若昂是伊莎贝拉女王的外祖父。

[25]. 丹吉尔在今天摩洛哥北部，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入口处的北非一侧，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26]. Ruy de Pina, 1902, ch. 165, cited in Miguel Ángel de Bunes Ibarra et al., *The Invention of Glory: Afonso V and the Pastrana Tapestries* (Madrid: Fundación Carlos de Amberes, 2011) , p.75.

[27]. Edwards,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hs*, p.5.

[28]. Edwards,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hs*, p.1.

[29]. Andrés Bernáldez, *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Crónica inedita del siglo XV* (Granada: Imprenta y Librería de Don José María Zamora, 1856) , p.51.

[30]. Queen Isabella, June 21, 1475, from Àvila, in *Documentos referentes a las relaciones con Portugal durante 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d. Antonio de La Torre and Luis Suárez Fernández (1858; Valladol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Patronato Menéndez Pelayo, 1963) , letter 524, pp.1: 85–87.

[31]. Fernando del Pulgar to Obispo de Osma, in *Letras: Glosa a las coplas de Mingo Revulgo* (Madrid: Ediciones de la Lectura, 1929) , letter 5, pp.27–29.

[32]. Luis Suárez Fernández,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and Manuel Fernández Álvarez, *La Espan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474–1516* (Madrid: Espasa-Calpe, 1969) , p.163.

[33]. Cora Louise Scofield, *The Life and Reign of Edward the Fourth, King of England and of France and Lord of Ireland* (London: Frank Cass & Co., 1967) , p.1: 195.

[34]. Nancy F. Marino, *Don Juan Pacheco: Wealth and Power in Late Medieval Spain* (Tempe: 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06) , p.172.

[35]. Fernando del Pulgar to Obsipo de Osma, in Fernando del Pulgar, *Letras: Glosa a las coplas de Mingo Revulgo* (Madrid: Ediciones de la Lectura, 1929) , letter 5, pp.27–29.

十一 伊莎贝拉的部落

小伊莎贝拉（与母亲和外祖母同名）快到八岁的时候，终于有了个弟弟。

她的母亲伊莎贝拉女王在漫长七年中未曾生育，一直在等待和希冀，因为对王室来说，繁衍子嗣是最重要的责任。伊莎贝拉女王焦急地求医问药；她在圣所祷告，寻求那些被认为能帮助生儿育女的圣徒的佑助；她斋戒禁食，自我惩罚。在这些年里，她至少流产过一次，而且是个男孩，所以尤其令人失望。

1477年秋季，斐迪南回家待了几个月，问题就自然解决了。伊莎贝拉又一次怀孕，这让大家长舒了一口气。她之前承受了极大的压力。1478年3月，一位廷臣在给斐迪南的信中写道：“这真是喜事，陛下，因为这是西班牙最重大的事情，没有比它更重要、更让人渴望的了。”^[1]等待孩子降生的时候，斐迪南热切地祈祷这是个儿子，并发誓，如果他的愿望实现，他会好好感谢上帝。而伊莎贝拉已经有了如何表达对上帝的感激的想法。

1478年6月30日，孩子出生了。这一年伊莎贝拉二十七岁。分娩是按照王室的规矩办的：伊莎贝拉由产婆照料，室内挤满了贵族和市政官员，他们将见证这孩子的确是女王所生。伊莎贝拉终于产下婴儿时，整座城市欣喜若狂。疯狂而喧闹的庆祝活动持续了三天三夜。

这是个男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男性继承人，小伊莎贝拉的出生造成的失望被迅速抛在脑后。他们给婴儿取名为胡安，与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同名。胡安也是伊莎贝拉的主保圣人（福音书作者约翰）^[2]和斐迪南的主保圣人（施洗约翰）的名字。但伊莎贝拉因为特别喜悦，在说到自己儿子时，常常称他为她的“天使”。他长着淡金色头发，容貌精细，看上去还真有点像小天使。全国的西班牙人都兴高采烈，这个男孩的诞生被认为是上帝恩宠的明证。这孩子将同时统治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让两个目前仅仅由联姻而维系的王国得到永久性的政治联合。

与伊莎贝拉女王及其女儿伊莎贝拉出生的冷清不同，这个男孩的降生受到了无比热烈的隆重欢迎。胡安王子诞生大约一周后的7月9日，塞维利亚街头举行了盛大游行，从王宫一直走到大教堂，成群结队的观众和祝福者挤进狭窄街巷，为男性继承人的诞生而欢呼雀跃。孩子的保姆骑着一匹骡子，怀抱裹着锦缎的婴儿，在锦缎华盖下前进，两侧是八名身穿黑色天鹅绒大氅的市政官员。后面跟着三名年轻的宫廷侍从，捧着黄金和钱币的赠礼。衣着光鲜的廷臣争抢游行队伍中的位置；教士高举白银十字架。塞维利亚大主教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他对王室的支持换来了红衣主教冠冕的奖赏）亲自主持洗礼。

“城里所有教堂的所有十字架”都被搬到室外，以迎接游行队伍。“数不胜数的乐师演奏着五花八门的乐器，包括喇叭、鼓和笛子”，欢迎小王子。^[3]

一个月后，举办了第二场典礼，比之前那一场更豪华。这一次，身体已经恢复的伊莎贝拉女王也在游行队伍中，身披镶嵌珠宝、带有闪闪发光珍珠的长袍，周围环绕着卡斯蒂利亚的最高级廷臣。她在教堂主祭坛前，参加了大弥撒。

编年史家安德烈斯·贝纳尔德斯记载道：“女王去做弥撒，将王子展示给圣殿，并按照神圣教会的规矩，胜利地将孩子奉献给上帝。”这话显然是在类比《新约》中婴儿耶稣被展示给上帝的故事。^[4]根据《路加福音》，玛丽亚和约瑟在耶稣出生四十天之后，按照犹太人的风俗，将他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女王的这种仪式在中世纪很流行，目的是向上帝祈祷，为母亲的安然无恙和婴儿的健康而感恩上帝。

的确，在忠诚的西班牙人看来，胡安的诞生是个神圣的奇迹。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越来越多地被比作神圣家族，尤其是伊莎贝拉被认为是丰饶的母亲的典型，在天主教的思维中是玛丽亚那样的人物，即生育了神圣的男孩的女人，不仅是世俗的女王，也是上天的女王。对宫廷的改宗犹太人（即犹太人血统的天主教徒），如迭戈·德·巴莱拉、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和伊莎贝拉的新任忏悔神父埃尔南·德·塔拉韦拉来说，这孩子的诞生简直就是《圣经》里预言的那种事件。普尔加尔在给一位同僚的信中写道：“很显然，我们相信，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因为在漫长的等待之后，上帝把小王子赐给我们。”

女王有义务给王国生下男性继承人，这是她欠王国的债，如今还清了。至于我，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王子，因为所有受到热切期待而生的孩子都是上帝的朋友，正如以撒、撒母耳和圣约翰……并非没有理由。因为他们都是在许多祈祷和牺牲之后被怀上并出生的……因为上帝摒弃了恩里克四世的神庙，也没有选择阿方索的部落；而选择了他更喜爱的伊莎贝拉的部落。^[5]

儿子出生的喜悦抵消了前些年的一些愤恨。伊莎贝拉那么长时间没有怀孕，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斐迪南在她成为女王之后的几年里几乎一直不在家。首先是针对葡萄牙人的战争，这是说得过去的理由，因为斐迪南常常需要领兵作战。但夫妻异地的时间往往很久。在她统

治初期的几个月，伊莎贝拉和丈夫在一起，但1475年的余下时光他们是分开的。1476年，夫妻俩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大约十一周，有四十一周是分开的。1477年、1478年和1479年，他们一起待的时间是每年只有一半。我们很难想象，互相深爱的人会甘愿如此长期分居。

1475年5月斐迪南的一封信表明，如今夫妻分居是伊莎贝拉的主意，而不是他希望的，或许是因为她一直在马不停蹄地拼命工作，并奔波忙碌，以处理朝政：

我的夫人，现在很清楚了，我们俩当中谁更爱对方……我看到，我在辗转难眠的时候，你还可以快活，因为信使接踵而至，却没有你的信。你不写信给我，不是因为我没有纸，也不是因为你不会写字，而是因为你不爱我，因为你骄傲……啊！有一天你会恢复旧时对我的爱。如果没有的话，我一定会死，那就是你的罪责了。^[6]

伊莎贝拉是否真的有时对斐迪南不好？至少有一位观察者说，她对他漫不经心，对他发号施令。一位外国宾客写道：“女王才是君主，国王不过是她的仆人。不管她做出什么决定，他马上照办。”^[7]

他们肯定有过口角。1475年7月，在托尔德西利亚斯，当着别人的面，他们发生了激烈争吵。斐迪南此前离开了托尔德西利亚斯去讨伐葡萄牙人。敌人来了，严阵以待，而斐迪南的补给不多了。他寡不敌众，决定撤回托尔德西利亚斯，收集补给和增援部队。伊莎贝拉认为这是他的怯战和失败，对他加以苛评，话里带着讥讽：“虽然我们妇道人家没有智力去判断，没有勇气去实践，也没有舌头可以说话，但我发现，我们有眼睛去看。真相就是，我看到一支大军在托尔德西利亚斯离开了战场。虽然我是女人，也能看得出，有了这样一支大军，我一定能征服世界，因为它包括那么优秀的骑士、战马和士兵。”^[8]她告诉他，他必须更勇敢：“任何事情不开头，就不可能有成效。”

斐迪南则为自己辩护，说他的兵力只有敌人的十分之一，如果交战，必然造成大量人员死亡。他说，她似乎对他们没有取得胜利而活着回来感到失望，却没有给出更合适的“慰藉之词”。^[9]“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能让你满意。”他愤恨地对妻子说。不久之后，就爆发了托罗战役，至少在实际的层面上，他们胜利了。

托尔德西利亚斯的那次争吵不是他们的唯一一次。他们还因为其他女人，以及斐迪南对女王不忠而争吵。我们知道的他的荒淫作乐都是在远离宫廷的地方，比如他回到家乡巴塞罗那，或者在他自己的王国其他地方旅行的时候，但有时他在离宫廷很近的地方也会偷腥。

有一个因为擅长勾引男人而臭名远扬的年轻女子通过与伊莎贝拉的密友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的关系，来到了宫廷。比阿特丽斯深得女王宠信，因此她的亲戚也能接近宫廷。这名女子是比阿特丽斯的侄女，也叫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十分美艳迷人。她很快吸引了斐迪南的眼球，没过多久就与他打得火热。这名年轻女子的父亲曾是王室狩猎官，这在宫廷引发了许多粗俗下流的笑话，人们讲到情人们跟踪和捕捉猎物，不禁窃笑。有人在年轻的比阿特丽斯的家门上用木炭作画，意大利廷臣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说画的是“淫荡的动物”。女王恰好有一次经过，看到了这些画。宫廷的一位才子大胆地向女王指出这些画，说道：“陛下，请看博瓦迪利亚小姐每天打猎时杀死的猎物的脑袋。”^[10]这句笑话很聪明，但一定让女王感到羞耻和尴尬。

女王最后命令让年轻的比阿特丽斯嫁给访问宫廷的一名贵族，然后把新婚夫妇派到遥远的加那利群岛，去镇压造反的土著。以这种方式被嫁出去然后送走的年轻女人，不止比阿特丽斯一个。这种处理男女关系的手段变得单调乏味或笨拙，但没有记载表明斐迪南对此发表

过抗议。或许他自己也对这些年轻女人腻烦了，并不介意妻子帮他解决掉潜在的不愉快结局。

在教会的管理上，国王和女王的意见也不一致。伊莎贝拉致力于改革教会，罢免那些把教会职位当作捞油水的闲职的人，代之以真正有心布道和领导信众的神父与修女。她一定感到非常恼火，因为斐迪南在为他的私生子谋求一个教会职位，而这种行为恰恰就是教会改革家们正在大力抨击的。

1475年年末，斐迪南的私生子哥哥阿拉贡的胡安去世了。他们的父亲曾安排让胡安成为萨拉戈萨大主教，这是阿拉贡王国最高的教会职位，负责督导许多信徒的灵魂，并且控制着大量财富、大片土地和许多臣民。现在，这个职位空缺出来了，斐迪南请求父王将这个职位交给他自己的私生子，阿拉贡的堂阿隆索，他此时六岁。^[11]他的请求是有问题的：一个六岁的孩子如何为信众提供精神上的指导？而且这显然是腐败行为，因为它的目的很明显是控制教会资金，这些资金将由六岁的大主教或其父亲管理和使用。更糟糕的是，这个职位已经被许给了一位非常有资格的成熟的教士奥西亚斯·德·普吉奥，他已经在做接任大主教的准备工作了。

1476年3月，斐迪南又一次提出了请求。梵蒂冈更认可的人选奥西亚斯拒绝让步。斐迪南和他的父亲警告奥西亚斯，若他坚持要求这个职位，他的家族在阿拉贡的地产将被没收。此时奥西亚斯明智地放弃了。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很快妥协，任命斐迪南的儿子（此时已经七岁了）为萨拉戈萨大主教。

伊莎贝拉真诚地希望消灭买卖圣职，以及授予圣职过程中的贪腐恶行。对她来讲，上述谈判在多个层面是非常敏感的。她非常不赞同斐迪南为其私生子做的那种事情。与丈夫不同，她始终为教会职位寻找最坚强和最优秀的人选。梵蒂冈官员一般不喜欢被国王和女王们强

迫任命他们选择的人到教会职位上，并称这种举动为俗人授职。但伊莎贝拉选择的人都非常符合教会的无私利他的理想。梵蒂冈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帕斯托尔写道：“但我们必须说，伊莎贝拉运用自己的特权，去提携那些真正出类拔萃的人。”而在那个时代，大多数教会职位都被富人和人脉强的人纳入囊中，而不是那些真正有资格配得上的人。^[12]

* * *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在某些方面有分歧，但在其他方面，他们的宗教信仰、王朝雄心和神圣使命感将他们凝聚在一起。为了庆祝斐迪南在托罗战役“打败”葡萄牙人的所谓“胜利”，伊莎贝拉开始在托莱多建造一座新教堂。她将其命名为“王家圣约翰教堂”，以纪念她已故的父亲（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和斐迪南仍然在世的父亲（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这个名字也能同时纪念他们夫妻的主保圣人：福音书作者约翰和施洗约翰。

伊莎贝拉对建筑越来越感兴趣，在这座教堂的工程里开始研发自己的风格和品味，将所谓的银匠式风格^[13]发展和改造为后来所称的伊莎贝拉风格。这种风格包含传统的伊比利亚元素，有朴素但高耸且洞穴状的哥特式内部结构，外部有丰富的雕塑装饰，这些雕塑全都是用金色岩石制作的。很快，萨拉曼卡、塞哥维亚、巴利亚多利德、杜罗河畔阿兰达、布尔戈斯和塞维利亚就涌现了以这种风格建造的教堂、大学 and 医院，全都带有她的个人徽记，包括她的纹章和“轭与箭”图案，即象征她与斐迪南婚姻的铭刻符号。代表戈耳狄俄斯之结的绳索将这些元素连接起来。这是著名的传说中亚历山大大帝遇到的戈耳狄俄斯之结的典故，他解开这个难解的结的办法，就是用剑将它砍断。这本身就带有含义：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第一座伊莎贝拉风格建筑，也是最清晰地带有她个人徽记的，就是王家圣约翰教堂。1477年开工，不到一年的时间，教堂和它附带的修道院已经有一些圣方济各会修士住下。但1479年女王和国王前来视察工程的时候，她发出了极其严苛的批评。据说，她问道：“你们就给我造了这么个玩意儿？”^[14]

在女王监督下，建筑师胡安·瓜斯迅速设计了更复杂和精美的方案。伊莎贝拉的品位也在发展，符合正在开始时髦的文艺复兴风格的最新潮流，后来她在罗马赞助了风格完全不同的建筑。但在卡斯蒂利亚，这种风格成为她的标志，融合了古典、伊比利亚和穆斯林主题。这些建筑成了她来，她见，她征服^[15]的地点的永久性视觉记载。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罗马联合建造的建筑，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儿子胡安的出生，后来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杰作，称为小圣殿。它的位置在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相信圣彼得于约公元64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耶稣曾称圣彼得为“磐石”，要将自己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16]据说圣彼得死在尼禄皇帝发起的对基督徒的一次大镇压期间，尼禄怪罪罗马的基督徒纵火烧毁了城市。圣彼得受难的具体地点已经不可考，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选择的地点很有传奇意义，并且与一座更早期的纪念性建筑——古罗马的灶神庙有联系。灶神是炉灶、家和家庭的女神。

后来，这个地点建造起了一座古老的修道院，称为蒙托里奥圣彼得修道院，有几百年历史。到15世纪70年代，这座修道院年久失修，被人遗弃。1472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决定翻修它。他要求自己的私人忏悔神父阿马德奥·梅内斯·达·席尔瓦承担此项翻修工程。^[17]这就与伊莎贝拉女王拉上了关系，因为僧人梅内斯·达·席尔瓦曾是一位葡萄牙贵族，巧合的是，就是比阿特丽斯·德·席尔瓦（前文提到的创立了圣母无染原罪会的圣徒般贵妇）的兄弟。

比阿特丽斯的兄弟阿马德奥对翻修神圣场所的新职责特别上心，声称自己在那里的一座洞穴曾目睹神秘的幻象。这为翻修工程吸引了更多赞助。1480年，小王子胡安两岁的时候，斐迪南国王宣布自己打算为工程付款，因为他曾起誓要为圣彼得建造一座教堂。^[18]这就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为得到一个儿子的恩赐而感谢上帝的办法。

阿马德奥·梅内斯·达·席尔瓦于1482年去世。几年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将工程交给他们派驻罗马的大使贝尔纳迪诺·洛佩斯·德·卡瓦哈尔。他则将建造这座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的任务交给了一位默默无闻、来自米兰的中年建筑师。此人凭借融合古代与现代的建筑风格以及建造装饰性建筑，开始声名鹊起。他的名字是多纳托·布拉曼特，他为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建造的建筑后来被誉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极盛期建筑的第一个典型。许多代的艺术史学家将为之喜悦和惊艳。这座教堂有穹顶和多利亚式立柱，据《世界建筑地图集》的说法，“圆形的平面图象征神圣的完美”，“受到古代神庙的启发，小圣殿既是对古典世界的颂扬，也是基督教的纪念建筑”。^[19]

* * *

胡安1478年出生时，似乎缓解了他父母间的紧张气氛，并让他们得以将自己宣扬为蒸蒸日上的基督教王室，拥有悠久历史和大好前程。1479年之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相伴的时间比分离的时间多。孩子们接踵而至。

1479年11月，在托莱多，伊莎贝拉又一次分娩，这一次生了个女儿，取名为胡安娜。她的名字也是为了纪念所有名叫约翰 胡安的伟人。一位游吟歌手在歌颂孩子的出生时说：“就这样，他们用光荣的约翰的名字给她命名，就是上帝在凡人当中选择的约翰。”^[20]

但这一次，这个名字有特别意义，因为在这年1月，斐迪南的生性好战而坚忍不拔的父亲终于去世，享年八十一岁。斐迪南继承了他，终于成为阿拉贡、巴伦西亚、加泰罗尼亚和西西里岛的统治者。他新出生的女儿是对祖父胡安二世的坚定决心——他的亲骨肉将要统治整个伊比利亚——的纪念和佐证。这是个非常漂亮的孩子，比恭敬顺从的姐姐伊莎贝拉公主和可爱可亲的哥哥胡安更冲动和任性。

伊莎贝拉又怀孕了，与之前几次怀孕相比，身体笨重得多，也难受得多，所以难以旅行。1482年6月，三十一岁的女王在科尔多瓦分娩，很快就发现，这次分娩有些不同寻常。她很快生了个孩子，但又阵痛了一天半，生了第二个孩子，即双胞胎的第二个，然而是个死胎。双胞胎中活下来的那个，是个金发的女孩，被取名为玛丽亚。但在这戏剧性的出生之后，玛丽亚的童年很少引起大家注意。她已经有三个哥哥姐姐，因此在人群中默默无闻，恭顺地服从父母。

十年后，伊莎贝拉女王又生了个小女孩，取名为卡塔利娜（即凯瑟琳），以纪念他们的祖先兰开斯特的凯瑟琳。1485年12月16日，这个孩子降生于一个越来越辉煌壮丽的世界，出生在埃纳雷斯堡一座宫殿的一个装饰着美丽挂毯的卧室，排场富丽堂皇。她强健、聪明而坚定，外貌很像姐姐们，皮肤白皙，草莓金色头发，长大一些后发色变深，成了浅红褐色。她后来获得了一个绰号，在未来人们的心目中与她父亲的世袭王国联系起来。她后来被称为阿拉贡的凯瑟琳，不久之后就被称为威尔士王妃，未来的英格兰王后。在伊莎贝拉的所有儿女当中，凯瑟琳最像母亲。

伊莎贝拉女王在分娩时总是带着她一贯的坚忍不拔和超乎寻常的刚毅。一位宫廷观察者说：“我从侍奉她的侍女那里得知，不管是她患病还是生产而蒙受痛苦的时候……她们从未见过她抱怨，而是以令人惊叹的坚毅默默承受。”^[21]

伊莎贝拉三十五岁的时候有了五个孩子，她的家庭圆满了。这位独立的女王曾经轻松地跳上马背，毫无困难地到处旅行。如今，她旅行时必须带着庞大的随行队伍。宫廷仍然是巡回式的，所以女王不仅需要到处搬运她自己的器物，还有一大群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需要的各种东西。

他们经常旅行，因为治国理政的需求从来不会放松。例如，1481年年初，伊莎贝拉女王在梅迪纳·德尔·坎波，2月去往巴利亚多利德，在那里一直待到4月，然后去了阿拉贡的卡拉泰乌德。6月，她去了拉穆埃拉，然后是萨拉戈萨。从8月到11月，她在巴塞罗那。12月，她和斐迪南几乎每天都在旅途中，从莫林斯—德雷伊到塔拉戈纳、康布里拉、佩雷略、托尔托萨、圣马特奥、阿尔梅纳、莫维德罗、巴伦西亚，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天回到了莫维德罗。

旅行可不是轻松的事情。1489年，伊莎贝拉女王雇用了约四百名廷臣、内廷幕僚和仆役，他们全都要随同她旅行。^[22]她的薪水最高的侍女代表着国内地位最高的贵族女子，不仅包括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如今的头衔是莫亚侯爵夫人），还有特雷莎·恩里克斯、伊内斯·曼里克、玛丽亚·德·卢纳，埃莉诺·德·索托马约尔和安娜·比阿特丽斯·德·门多萨。随行人员还有卫兵、侍从、侍酒、厨师、洗衣女工、乐师和御医。伊莎贝拉的职责包括为所有这些人提供衣食住行。

她的孩子们各有自己的内廷人员。1493年，胡安王子十五岁，有八十二人侍候。凯瑟琳十三岁的时候，有十五人为她服务。^[23]

长途旅行的时候，女王的队伍很长。大约在这个时期访问卡斯蒂利亚的朝圣者特策尔描述了他目睹一位贵族的巡回宫廷旅行的盛况。据他记载，贵族本人会骑骡子，仆人们步行跟在他旁边，有时沿途要搜寻饮食，然后迅速及时为主子准备餐饮并安排住宿地或露营地。他

看到有些仆人累得“路都走不动”。他对他们的坚毅肃然起敬。特策尔说：“西班牙人是能够忍耐饥饿和吃苦耐劳的民族。”^[24]

骑马或骑骡子旅行，并带着满载物资的大车，不仅让人疲劳，而且对安排筹划工作也是个考验，因为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在各地旅行时需要保持王家的气派和风度。例如，孩子们的服饰和外表不仅是值得骄傲的，也是统治国家的必需条件，表达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和重要性。他们穿的是镶嵌珠宝的天鹅绒或锦缎袍子。这些衣服都需要清洗、缝补和运输。每到一处，都需要摆出王室的排场，这意味着画作、配插图的手稿、挂毯和地毯也需要跟随王室，运输到各地。宫廷文书、司法命令和书信被装在大型皮箱和金属箱里运输。

伊莎贝拉深刻认识到自己的教育有空白，所以特别重视孩子们的成长和教育。她童年时没有学过拉丁文，不得不在成年之后恶补。她为自己雇用了一名教师，即女学者比阿特丽斯·加林多。伊莎贝拉和宫廷的所有女士，包括她的女儿们，都要学拉丁文。

伊莎贝拉在用拉丁文时犯过错，感到羞耻，于是小心地避免她的孩子们重蹈覆辙。她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享有第一流的教育，因为他们将来要在文化水平最高的圈子里活动。伊莎贝拉对女童教育的高度重视促使欧洲各地的女性教育发生了一场革命，因为她的宫廷为独立统治或与丈夫合作统治的女王|王后设立了新的标准。在伊莎贝拉女王的督促和严格要求之下，她的孩子们得到了水平极高的教育。

伊莎贝拉的孩子们不仅学习《圣经》，圣奥古斯丁、圣哲罗姆和圣格里高利的著作，还学习古典作品，如塞内卡、普鲁登提乌斯^[25]和罗马历史学家们的作品。她和其他西班牙贵族自认为是希腊人的后代，因此既熟悉《圣经》世界，也热爱古典世界。

伊莎贝拉为男孩们聘请的教师是聪明绝顶的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和学者安杰拉的彼得·马特，也叫佩德罗·马蒂尔·德·安杰拉，他在宫廷的位置给了他一个独特窗口，得以了解西班牙历史和国际事务。他把孩子们培养成令全欧洲惊叹的神童。荷兰学者伊拉斯谟后来说凯瑟琳“作为一个女人，渊博到了奇迹的程度”，并且比她最终的丈夫、博学的亨利八世国王更精通学术。^[26]胡安娜公主能够和外国廷臣轻松而随意地用拉丁文交谈。她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可以背诵拉丁文诗歌，并自己写诗。

宫廷教育是以学院的形式，著名学者引领孩子们进行亚里士多德式的研讨和辩论。艺术家和学者与贵族耳鬓厮磨，分享思想和观点，创作诗歌、谣曲、警句。很快，他们还开始创作早期的小说。一位研究文艺复兴艺术的学者说：“伊莎贝拉宫廷的一大特点就是她大力赞助艺术家，以及她对文化的热爱。她是这种艺术政策背后的推动力量。一些画家完全靠王室的赞助为生，例如胡安·德·佛兰德、梅尔希奥·阿莱曼（米歇尔·西托）^[27]……伊莎贝拉对艺术的慷慨赞助成为一时风尚，西班牙的豪门大族纷纷效仿。”^[28]

除了创作文艺作品之外，这些艺术家还要教导王室的孩子及其侍从与仆人。胡安王子早年是由一名多明我会修士教导的，此人是萨拉曼卡大学的教授。孩子们长大之后，课程的范围也扩大了，包括教理问答^[29]、拉丁文、卡斯蒂利亚语语法、教会史、世俗历史、哲学、纹章学、绘画、音乐和歌唱。一位德意志学者描写了彼得·马特上的一堂拉丁文课，孩子们围绕在他身旁：“他的弟子包括比亚埃尔莫萨公爵、卡尔多纳公爵、堂胡安·卡里略、堂佩德罗·德·门多萨，和其他许多贵族子弟。我看到他们在背诵尤维纳利斯^[30]和贺拉斯的作品。”他写道：“这些活动在西班牙唤醒了人们对文学的兴趣。”^[31]

很快，有两个新来的孩子加入了这些学童。他们是热那亚探险家克里斯托瓦尔·科隆（英语称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儿子。这两个男孩，十六岁的迭戈和六岁的斐迪南（以国王的名字命名）来到伊莎贝拉的宫廷，担任她的儿子胡安的侍从。他们成了宫廷的固定人员。据历史学家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记载，迭戈“像他父亲一样魁梧，彬彬有礼，身材匀称，长脸，天庭饱满”，很讨人喜欢，不过没有他父亲那样聪明绝顶。弟弟斐迪南·哥伦布可爱而受欢迎，“非常亲切友好，谈吐优美”，对激动人心的新环境充满热情。^[32]他的父亲常常旅行，所以迭戈和斐迪南·哥伦布是在伊莎贝拉手下长大成人的，起初在她儿子的内廷担任侍从，后来成为女王本人的侍从。

两个男孩很好地利用了他们周围的机遇。当时书籍稀罕又昂贵，但年轻的斐迪南·哥伦布到十六岁时已经拥有238本书。^[33]他是个非常聪慧的学生，成为彼得·马特的非正式助手和高徒，因此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发展有了直接的了解。斐迪南·哥伦布后来为了捍卫自己父亲的功业，写了一本异彩纷呈的传记《海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传》。学者本杰明·基恩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写道：“天主教双王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赞助者，在他们的宫廷……斐迪南·哥伦布形成了对书籍和学术的兴趣，后来这兴趣演化成一种压倒一切的激情。”^[34]

后来，斐迪南·哥伦布长大成人之后变得富有，并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私人藏书数量在欧洲是第一。他为西班牙双王效劳五十多年，在代表他们旅行的过程中收集了大约15400本书。他的私人图书馆有精心编写的目录，藏有珍贵的古代手稿、古典时期著作、数学和科学论著、宗教著作和最早的印刷机制作的书籍。他还收藏了3200幅印刷画作，包括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许多作品。

在这种环境中，知识的竞赛如火如荼，很快宫廷的很多孩子就吸引了欧洲其他地区学者的注意。彼得·马特对自己培养的学生非常自豪。后来他的弟子们的成就吸引了全欧洲的赞誉时，他说：“我是西班牙几乎所有王子和全部公主们的文学上的养父。”[\[35\]](#)。

被吸引到伊莎贝拉宫廷的许多学者和艺术家依赖她的赞助生活，他们之间往往缔结了维系几十年的深厚情谊，他们的纽带将欧洲的许多宫廷联系起来。这些联系还延伸到他们培养的年轻贵族，这些贵族很快自己也能成为文艺的赞助人。

在伊莎贝拉的宫廷，女孩接受的教育与男孩类似，但也学习家政，仿佛她们不仅仅被培养成为王后，还要学会尽职尽责的家庭主妇的务实本领。她们学习缝纫、编织、刺绣和烘焙。凯瑟琳结婚后为自己的丈夫制作衬衫的故事已经很有名，就像她母亲当年那样。

王室的女儿们被敦促以母亲为榜样（伊莎贝拉正在打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同样也将自己视为基督教的战士。例如，一本歌谣集中的一首带有军事意味的歌曲教育胡安娜公主要“学习光辉夺目的卡斯蒂利亚伟大女王，她是美德的源泉”，并在征服中“举起十字架”。[\[36\]](#)。

王室的孩子们被教育要敏锐地知晓自己未来的地位和职责。除了接受在宫廷的孩子们都享有的普通教育之外，王子和公主们还要学习宫廷礼仪和自我展示的艺术。他们要表现得端庄得体、饱含尊严并且令人肃然起敬。关于他们的服饰有特别的规矩，以使服饰保持整洁笔挺的完美状态。

为了保持最佳仪表，胡安王子每个月要定做两双新鞋，每周定做两双新的拖鞋或摩尔式靴子。他的帽子和其他衣物都只能穿戴三次，就要换掉。他每天都要用一条新的腰带。他要遵照特别的时间表，将

自己不再使用的衣物交给仆人，送给他们使用，或者转售。女王有一次得知胡安王子和胡安娜公主把自己最喜爱的衣物藏起来，而没有交给仆人，非常生气。她还要求孩子们将没有吃的或多余的食物送给仆人，以免浪费。有时剩余的食物非常多，因为宫廷的膳食有很多仪式。^[37]这些作为礼物的食物也是为内廷工作的廷臣们获得的补偿的一部分，所以伊莎贝拉的怒气也表现了她强烈的“贵人理应行为高尚”的观念，即地位高的人必须做到慷慨和公正。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只有一个儿子，这让他们有点担心。如果有更多男孩，王室的未来就更有保障。胡安的身体不是特别强健，所以更加让人担忧。但生的女儿多也有优点，因为她们都可以与另一个王国联姻以构建外交联盟。每一个远嫁外国的女儿都是一份活生生的条约，也是在外国都城的大使。

胡安出生并确立了大统继承之后没多久，就有人预言了王室生女儿的好处。1478年，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在给伊莎贝拉的信中写道：“若陛下再给我们两到三个女儿，二十年后，陛下就会欣喜地看到，您的子孙坐在欧洲所有的王座上。”^[38]果然，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会努力利用女儿们的婚姻来巩固盟约，加强他们在西欧的防御。

他们对前不久与葡萄牙的战争还记忆犹新。他们虽然为长女伊莎贝拉考虑了好几桩潜在的婚姻，但最终与葡萄牙人谈判，决定将她嫁给葡萄牙王储。这门婚事是他们与葡萄牙签订停战协定时有人提议的。小伊莎贝拉公主很快就被称为葡萄牙的未来王后，并被当作“见习的”王后来对待。她将会嫁给阿方索五世国王的孙子，即若昂二世的儿子阿方索。葡萄牙王室和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王室一样，习惯用父亲、母亲和祖父母的名字给孩子命名，所以重名非常多。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决定与哈布斯堡家族缔结两门婚事，以便对他们的竞争对手法兰西形成包围。未来的神圣罗马皇帝——奥地利的马

克西米利安统治着德意志，娶了勃艮第的玛丽，生了两个孩子，与伊莎贝拉的孩子胡安和胡安娜年龄相仿。胡安娜被许配给奥地利大公腓力（绰号“美男子腓力”），胡安则与腓力的妹妹——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订婚。这两桩婚事将卡斯蒂利亚与勃艮第宫廷和哈布斯堡家族紧密联系起来。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虽然还只是个孩子，却已经有了一段惊世骇俗的婚史。三岁时，她被许配给法兰西太子，未来的国王查理八世，所以是在法兰西宫院长大的，身份是查理的未婚妻和未来的法兰西王后。但查理八世抛弃了她，娶了布列塔尼的安妮（布列塔尼公国的继承人和欧洲最富有的女人）。不幸的玛格丽特在法兰西滞留两年，才被接回国。这段屈辱的经历让年轻的玛格丽特公主更愿意嫁给法兰西的竞争对手，所以她欢迎，并且热切期待着与卡斯蒂利亚的胡安王子的婚姻。

伊莎贝拉的两个年幼的女儿玛丽亚和凯瑟琳的未来婚姻大事也得到了考虑。最终，最年轻的凯瑟琳被许配给了英格兰王子亚瑟，即亨利七世国王的长子和可能的继承人。英格兰王国的实力比法兰西和卡斯蒂利亚弱很多，因此更适合“安排”一个幼女。亨利七世热切希望为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获得一位西班牙新娘，在1487年就向卡斯蒂利亚提议迎娶凯瑟琳，当时她还只有两岁，而亚瑟还是个婴儿。^[39]

孩子们逐渐长大，外国外交官们不吝溢美之词地描写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家庭，既讴歌他们的辉煌排场，也赞颂他们家人之间的亲热。法兰西使臣罗歇·马夏多看过一场斗牛赛，国王和女王带着孩子们也在观看。马夏多注意到，在比赛过程中，伊莎贝拉女王一直把婴儿凯瑟琳抱在怀里，疼爱地与她交流互动。^[40]

但并不是所有人看到伊莎贝拉家庭的人丁兴旺都感到喜悦。据普尔加尔记载，1478年，格拉纳达的埃米尔^[41]阿布·哈桑·阿里派遣

了使者，为胡安王子的出生道贺，但利用这个机会通知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他们将不再按照两国的停战协定纳贡，并将立即停止。阿布·哈桑·阿里甚至可能更进一步。据说他还说，曾向基督徒纳贡的格拉纳达君主都已经死了，如今他打算把造币厂改为打造长枪的工厂，准备攻击基督徒。

这些威胁传来的时候，卡斯蒂利亚人还得到消息，一支强大的奥斯曼军队正在集结，准备攻打地中海东部的罗得岛，或许甚至更凶险，要袭击南欧某地。年轻的女王刚成为母亲，像绝大多数女人一样对自己的脆弱的孩子有极强的保护天性，因此她对这些消息感到忧心忡忡，因为她的王国也受到了极严重的威胁。

她在从15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这些年里的心境，被描绘在一幅不寻常的画里。这幅画如今被保存在布尔戈斯的拉斯维尔加斯修道院，在她父母的陵墓和圣龛附近。在画中，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并肩而立祈祷，三个孩子（可能是伊莎贝拉、胡安和胡安娜）聚拢在他们身后。这幅画可能是在玛丽亚和凯瑟琳出生以前创作的，那就是15世纪80年代初。伊莎贝拉的面部表情显得悲伤而焦虑。附近站着一群修女，同样面带愁色。

在画的中央，身形巨大的圣母玛丽亚耸立到空中，伸出手臂，保护王族和修女。他们躲在圣母的刺绣斗篷下。玛丽亚手里拿着一捆箭。在画作的顶端，两个头上长角、带有利爪的恶魔扑过天空，威胁下方的王族。其中一个魔鬼拿着箭，比玛丽亚手中的箭更长且更尖利。第二个魔鬼背负着沉重的书。我们不确定他是送来书，还是将书拿走。

伊莎贝拉想要的，或许仅仅是和睦幸福的家庭。但女王感到，在更广阔的世界，树欲静而风不止。

[1]. Tarsicio Azcona, cited in Peggy K.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153.

[2]. 西班牙语里的“胡安”相当于英语的“约翰”。

[3]. Andrés Bernáldez, *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Crónica inedita del siglo XV* (Granada: Imprenta y Libreria de Don José Maria Zamora, 1856) , p.459.

[4]. Andrés Bernáldez, *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Crónica inedita del siglo XV* (Granada: Imprenta y Libreria de Don José Maria Zamora, 1856) , chap. 33, cited in 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 *Isabel I de Castilla, 1451-1504* (Madrid: Ediciones del Orto, 2004) , p.75.

[5]. Hernando del Pulgar, *Letras: Glosa a las coplas de Mingo Revulgo* (Madrid: Ediciones de La Lectura, 1929) , letter 9, in Liss, *Isabel the Queen*, pp.154-55.

[6]. Vicente Rodríguez Valencia, *Isabel la Católica en la opinión de españoles y extranjeros, siglos XV al XX* (Valladolid: 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 1970) , vol.3, pp.75-79.

[7]. Giles Tremlett, *Catherine of Aragon: The Spanish Queen of Henry VIII* (New York: Walker & Co, 2010) , p.24.

[8].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469-1476*, ed. Julio Puyol (Madrid: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934) , p.239.

[9].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469-1476*, ed. Julio Puyol (Madrid: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934) , pp.243-45.

[10]. Baldesar Castiglione, *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trans. Charles S.Singlet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59) , p.191.

[11]. Don Ferdinand to King Juan II , November 23, 1475, Burgos: Biblioteca Nacional, cited in Biblioteca Nacional, *Índice de la colección de don Luis Salazar y Castro, formado por Antonio de*

Vargas-Zúñiga y Montero de Espinosa y Baltasar Cuartero y Huerta, vol.1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949), letter 126.

[12] Ludwig Pastor, *The History of the Popes from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trans. E.F. Peeler (St. Louis, Mo.: B. Herder, 1898), p. 4: 397.

[13] 银匠式风格 (Plateresque) 是15世纪末在哥特风格晚期与文艺复兴风格之间在西班牙出现的一种艺术 (主要是建筑) 风格, 在随后两个世纪得到发展。它吸收了摩尔人风格、哥特式和伦巴底装饰元素等, 在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时期达到巅峰。

[14] Sergio L. Sanabria, "A Late Gothic Drawing of San Juan de los Reyes in Toledo at the Prado Museum in Madrid,"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51, no. 2 (June 1992), pp. 161-73.

[15] 典出恺撒的名言“我来, 我见, 我征服” (Veni, vidi, vici)。前47年, 恺撒挥师小亚细亚, 仅用几周就击败博斯普鲁斯国王法尔纳基斯二世 (济莱战役), 向元老院报告时用了这句话。

[16] 典出《新约·马太福音》, 16: 18。

[17] Jack Freiberg, *Bramante's Tempietto and the Spanish Crown* (Rom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2005), p. 1: 154.

[18] Jack Freiberg, *Bramante's Tempietto and the Spanish Crown* (Rom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2005), p. 1: 155.

[19] John Julius Norwich, *The World Atlas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Portland House, 1988), p. 276.

[20] Bethany Aram, *Juana the Mad: Sovereignty and Destiny in Renaissance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5.

[21] Tremlett, *Catherine of Aragon*, pp. 26-27.

[22] María del Cristo González Marrero, *La casa de Isabel la Católica: espacios domésticos y vida cotidiana* (Ávila: Diputación de Ávila, Institución Gran Duque de Alba, 2004), p.40.

[23] María del Cristo González Marrero, *La casa de Isabel la Católica: espacios domésticos y vida cotidiana* (Ávila: Diputación de Ávila, Institución Gran Duque de Alba, 2004), pp.42, 43.

[24] Malcolm Letts, ed. and trans., *The Travels of Leo of Rozmital through Germany, Flanders, England, France, Spain, Portugal and Italy, 1465-1467*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25] 普鲁登提乌斯(348~?), 古罗马的基督徒诗人, 可能出生于西班牙北部。

[26] Erasmus, *Opus Epistolaru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7] 米歇尔·西托(约1469~1525)生于今天爱沙尼亚的塔林, 可能是佛兰芒移民的后代。他是荷兰画派的早期艺术家, 一生大部分时间担任卡斯蒂利亚、神圣罗马帝国和荷兰的宫廷画家。他有时被称为梅尔希奥·阿莱曼, “阿莱曼”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德意志人。

[28] Mark P.McDonald, *Ferdinand Columbus: Renaissance Collector*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 p.35.

[29] 教理问答是宗教教育的常见手段, 通常采用问答形式, 以教育儿童、劝人信教和申明信仰。中世纪教理问答集中阐述信、望、爱的意义, 后来的教理问答又增加了其他主题, 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印刷术发明之后更受到重视。

[30] 迪基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1世纪末2世纪初)是古罗马诗人, 著有《讽刺集》。

[31] Mark P.McDonald, *Ferdinand Columbus: Renaissance Collector*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 p.36.

[32] 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 y Valdés, *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 (Madrid: Imprent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851) , part 1, p.71.

[33] McDonald, *Ferdinand Columbus*, p.42.

[34] Ferdinand Columbus, *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 By His Son Ferdinand*, trans. Benjamin Kee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9) , p.vii.

[35] Antonia Fraser, *The Wives of Henry VIII*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 p.11.

[36] Aram, *Juana the Mad*, p.21.

[37] Aram, *Juana the Mad*, pp.18-19.

[38] Fraser, *Wives of Henry VIII*, p.11.

[39] Fraser, *Wives of Henry VIII*, p.16.

[40] James Gairdner, ed., “Journals of Roger Machado, ” in *Historia Regis Henrici Septimi*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and Roberts, 1858) , pp.157-99.

[41] 埃米尔是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其最初本意有军事统帅的意思，最早用于哈里发派驻在外的军事统帅及各地总督，亦有作为最高级贵族称号。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内乱，各地总督与哈里发之关系越发疏离，最后不少地方的埃米尔与哈里发之间的从属关系仅仅是象征性的，埃米尔遂在此权力交替中取得一地之军政大权，并成为当地的君主。今天以埃米尔头衔为国家元首的国家有科威特和卡塔尔。

十二 整个世界在战栗

在伊莎贝拉女王统治期间，有一个人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她。她从未与此人相遇，但在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让东欧和南欧噤若寒蝉：富有而强大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人称征服者穆罕默德。

他是个难以捉摸的人，受到穆斯林的热爱和尊崇，被奉为伟大而强健的武士；他得到许多犹太人的仰慕，因为他对犹太人友好和宽容，允许他们生活在他的国度；但基督徒认为他是个残酷无情的侵略者，对他非常恐惧，因为他决心要扩张奥斯曼帝国、吞噬欧洲。为了成功，他甘愿付出很高的代价。估计有87.3万人的死亡应当由他直接负责，也就是每年约2.9万人。^[1]他登基不久之后的1453年，也就是伊莎贝拉两岁的时候，他便征服了君士坦丁堡。那是他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在伊莎贝拉的童年和成年早期，穆罕默德二世常说打算消灭基督教。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开始自称恺撒，并开始向罗马进军，以兑现他的誓言。他计划从东方，穿过希腊、东欧和奥地利来进攻罗马；或者从南方，也就是说可能以西西里岛为跳板；或从西方进攻，利用北非为入侵欧洲的基地，穿过西班牙。这最后一种设想对欧洲的威胁最大，因为这条进攻路线曾经被证明是有效的。而对西西里岛或西班牙的威胁，是对伊莎贝拉女王及其家族的直接侵略。

穆罕默德二世是苏丹穆拉德二世的幼子。穆拉德二世是一位勇猛的武士，为奥斯曼帝国开疆拓土。他主宰的是一个多民族和多语言的文化，大部分臣民是穆斯林，但也有基督徒和犹太人，还有真心实意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当然也有一些基督徒和犹太人为了得到更好的待遇和逃避异教徒被征收的赋税，而假装改信伊斯兰教。改信伊斯兰教其实有很多好处，因为奴隶和士兵往往是非穆斯林。奥斯曼帝国建造了一台极其高效的战争机器，通过不断侵略外国来维持。

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为计划中的向西欧的攻势打好了基础。他率军深入今天的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他攻击瓦拉几亚（多瑙河以北的一个亲王国）的统治者，将他的两个儿子扣为人质。这两个孩子被灌输了奥斯曼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以便回国之后被安排为傀儡总督。

穆拉德二世还征服了阿尔巴尼亚的各个诸侯国，将一位阿尔巴尼亚王公约翰·卡斯特里奥蒂的儿子扣为人质。这孩子名义上改信了伊斯兰教。他后来的名字是斯坎德培，一度是穆拉德二世的忠实盟友，甚至成为苏丹的宠臣。

穆拉德二世的最辉煌胜利之一，是征服了萨洛尼卡（今天的塞萨洛尼基）。它曾是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也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道路的重要中转站。1430年，他重创了防守萨洛尼卡的威尼斯守军，然后敦促自己的士兵屠城，许诺将被毁坏城市内的一切财富都赏给他们。据记载，他说道：“城里的东西，我都给你们，包括男人、女人、儿童、金银。我只要这座城市。”士兵们欢呼雀跃，“像疯狂的野兽一样”翻越城墙。^[2]

城防崩溃了，威尼斯守军且战且退到港口，登上等候在那里的桨帆船，逃之夭夭。土耳其人在城内横冲直撞，屠杀了许多人，将7000

人运走，变卖为奴。据一位幸存者约翰·阿纳戈诺斯特斯说：

他们将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聚拢起来，把他们像牲口一样捆起来，然后把他们全都驱赶到城外的营地。还有很多人死了，没有被押到要塞或者在大街上清点，也没有得到埋葬。每一名士兵都带着自己抓捕的一大群俘虏，匆匆将他们赶到城外，快速将他们交给战友，以防更有权势的人将俘虏夺走。所以看到年老或患病因而跟不上队伍的奴隶，士兵就当场将他们杀死。然后他们首次将父母与孩子分开，妻子与丈夫分开，将亲戚朋友分开……城内到处是哀号和绝望。^[3]

穆拉德二世的成功迫使基督徒们质疑，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曼努埃尔·马拉克斯斯写道：“在他有生之年，他占领了西方的许多城市和地区；征服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不计其数区域；因为上帝允许他这么做，为的是惩罚我们的罪孽，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止他。”^[4]

穆拉德二世的儿子穆罕默德非常聪明和渊博，但比父亲更冷酷无情。他生于1432年，也就是萨洛尼卡被征服的两年后。他是穆拉德二世苏丹的第三子，母亲是穆拉德二世的女奴妃嫔之一。奴役穆斯林是违法的，所以她可能是基督徒或犹太人出身。我们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后宫的很多女人是没有名字的。穆罕默德在母亲身边，在埃迪尔内（位于君士坦丁堡西南）的后宫长大。虽然他自幼热衷读书，但也有了“傲慢、野蛮和凶暴”的名声。^[5]

1437年，穆罕默德的长兄去世。1443年，他的二哥被一位谋士杀害，凶手还杀死了王子的两个儿子。凶手被迅速处决，“没有招供他的杀人动机”^[6]，所以有人怀疑，这起谋杀是为了给十一岁的穆罕默德将来继位扫清障碍。苏丹穆拉德二世开始准备让穆罕默德继位。穆拉德二世和穆罕默德一同在希腊西部开疆拓土。

1450年，伊莎贝拉出生的前一年，土耳其苏丹和他的儿子不得不去处置阿尔巴尼亚人的一场顽强的反叛。阿尔巴尼亚人的领导人是苏丹的前盟友，阿尔巴尼亚人质斯坎德培。他恢复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摒弃伊斯兰教。随后他成功地打退了土耳其人的进攻，在西欧成为英雄。穆拉德二世和穆罕默德不得不撤退，返回位于埃迪尔内的宫殿。

西班牙人向斯坎德培提供了援助，因为他们认识到，斯坎德培的努力是东欧针对声势越来越浩大的土耳其人的第一次成功的抵抗。阿拉贡和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五世（斐迪南的伯父，伊莎贝拉父亲的堂兄^[7]）向斯坎德培提供了财政和军事两方面的援助。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罗德里戈·博吉亚的舅舅）也援助斯坎德培，让他得以守住战线，阻挡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十多年之久。

阿尔巴尼亚战局的逆转令苏丹穆拉德二世匆匆撤退。1451年2月，他突然因中风而去世。十八岁的穆罕默德成为苏丹，称穆罕默德二世。他立即去了父亲的后宫，女眷们安慰他，请他节哀。穆罕默德二世站着与他父亲的最高级别妻子哈利马·哈图恩谈话时，他的一名部下来到浴室，扼死了她的还是婴孩的儿子，消灭了皇位的潜在竞争者。穆罕默德二世对此没有任何羞耻感。不久之后，他就在法律中规定，让将来的苏丹都杀死自己的兄弟。穆罕默德二世在一道皇家法令中宣布：“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考虑，苏丹应将他的兄弟处死。”^[8]

对待敌人，他甚至更加残暴，做出了许多野蛮的暴行，令他恶名远扬。例如，热那亚商人雅各布·德·坎皮描绘了穆罕默德二世设计的残酷刑罚。执行死刑的手段之一是，将犯人按倒在地，将一根削尖的长木桩插入此人的肛门；然后用木槌猛地把木桩钉入人体。他命令将一些犯人的双手或鼻子或脚砍掉。他常命令将犯人的眼睛挖掉。雅

各布写道：“简言之，没有一位统治者比他更受人畏惧、更无情和更残忍。此人简直是尼禄第二，比尼禄糟糕得多。”^[9]

穆罕默德二世肯定不是凡夫俗子。就连他的外貌也非同一般。他目光炯炯而犀利，有长长的鹰钩鼻。他胡须浓密，头上常戴着一顶巨大的头巾。据一位见过他的威尼斯使者说，他“身材匀称”，比平均身高略高一些。“他精通武艺。相貌令人恐惧而不引发尊崇。很少有笑意……他最热衷于学习的是世界地理和兵法；他渴望统治。”^[10]

穆罕默德二世成为苏丹之后，立刻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征服君士坦丁堡，它是拜占庭帝国的核心、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近几十年来，奥斯曼帝国历代苏丹不断蚕食君士坦丁堡的外围乡村，所以到1452年，它已经是土耳其人主宰的海洋中的一个孤岛。但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工事固若金汤，作为一座抵御来自东方攻击的堡垒，已经坚持了上千年。它的地理位置非常易守难攻，在一个三角形半岛上，南面是马尔马拉海，北面是被称为金角湾的水域。三角形的第三边由三道城墙保护，将该城的七座山丘环绕在内。君士坦丁堡被认为几乎是坚不可摧的。

穆罕默德二世首先在君士坦丁堡以北8英里处建造一座要塞。起初他表现得很友好，当地居民甚至为他提供建材，以加快工程进度。但他很快开始攻击村民，将其卖为奴隶。随后他集结了一支超过100艘战船的舰队，并为攻势动员了超过8万大军。

君士坦丁堡承受极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已经有几十年了。到1452年，它的人口仅有约45000人。该城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向西欧各国朝廷派遣使节，恳求援助，但大多数统治者都忙于自己的麻烦，不肯出手相救。一群热那亚人驰援君士坦丁堡，还有一群西班牙人，包括一些来自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人，还有一名叫堂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的卡斯蒂利亚贵族也去了君士坦丁堡。但最终，守

卫城墙的还是只有约7000名身体健全的士兵，大多数是希腊人。他们在海上也是寡不敌众，战船数量只有土耳其人的大约五分之一。

穆罕默德二世告诉君士坦丁十一世和当地官员，如果他们和平地将城市拱手交出，就可以继续生活在那里。但他们相信威尼斯的援军就要到了，于是拒绝投降。1453年4月6日，穆罕默德二世向君士坦丁堡发动了猛烈炮击。他向麾下将士许诺，破城之后，允许他们自由劫掠三天，这是穆斯林军队的标准做法。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利勒·伊纳尔哲克写道：“宗教法律要求他允许士兵劫掠三天。这座城市是被武力夺取的，因此……动产都是士兵们的合法战利品，市民也可以被合法地卖为奴隶。”^[11]

但奥斯曼军队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是穆斯林，因此忠诚度是可疑的。土耳其军中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常常背叛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向基督徒军队泄露穆罕默德二世的计划，所以守军能够巩固薄弱地点。佛罗伦萨商人贾科莫·特塔尔迪参加了君士坦丁堡保卫战，最后成功地游泳逃生。他写道：“（奥斯曼军中的基督徒）向我们这边偷偷用大炮或弓射来书信。他们还非常巧妙地溜到我们这边来。”^[12]

君士坦丁堡守军英勇奋战，但在随后六周内，城市的防御一点点地、不可避免地被损坏了。守军对外界援助已经绝望，举行了宗教游行，唱起圣歌，向基督和圣母祈祷，恳求他们保护自己，抵御土耳其人。

在最后的日子里，一大群男女老少、修女僧人“躲进”圣索菲亚大教堂。他们“受到迷信的鼓舞，传说土耳其人前进到君士坦丁大帝石柱时，一位天使就会从天而降，将一支剑交给坐在石柱旁的一个穷人，告诉他：‘拿着这支剑，为上帝的人民复仇吧’”。然而，土耳其人用斧子砍倒了大教堂的门，将信众拖出去卖为奴隶。圣徒雕像被

打碎，教堂圣器被掳走。历史学家弗朗茨·巴宾格尔^[13]写道：“随后发生了无法想象的恐怖暴行。”^[14]

穆斯林军队的最后总攻由近卫军（幼年就被俘虏的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接受军事训练）打头阵。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和托莱多的堂弗朗西斯科一起勇敢地殊死搏斗，这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他们。不久之后，一只顶着近卫军帽子的十字架被“举起来游行示众，以此作乐”。^[15]

在攻城战中，土耳其军队杀死了4000人，将几乎所有居民变卖为奴。他们劫掠了教堂、皇宫和富人的住宅。他们对君士坦丁堡神话般的精美建筑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几天之后，雄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它那享有盛誉的镶嵌画被用灰泥遮盖起来，因为伊斯兰教律法禁止描绘人像的图画。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神圣遗物原本被虔诚的基督徒尊崇而视为圣物，如今被抛弃、糟践或嘲讽。珍贵而罕见的古典时代手稿被撕毁，以便取下封皮卖钱，手稿本身则被扔进垃圾堆。

穆罕默德二世于1453年5月胜利进入君士坦丁堡，据说看到建筑物受损时喊道：“我们掳掠和摧毁的，是怎样一座城市啊！”^[16]

他的自责如果是真诚的，那么也很短暂。这个星期五，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的午间祈祷仪式上，穆罕默德二世戴上了一顶特别的头巾，还高高举起一支出鞘的利剑。他喊道：“感谢真主、世界的主宰！”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随后“胜利的穆斯林们举起双手，欢呼起来”。^[17]

很快，关于君士坦丁堡妇女命运的故事就传遍了西欧。很多女人，包括小女孩和修女，毋庸置疑遭到了强暴，有时甚至是轮奸和性虐待。

其他一些故事可能是后人附会，但对欧洲的女王、王后和公主们有特别意义。据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说，拜占庭皇帝的女儿被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掳走，供自己享用。在故事的某些版本里，她抵抗他的侵犯，遭到谋杀；根据其他版本，她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上遭到强奸。还有一个版本是，穆罕默德二世强迫她改信伊斯兰教，她拒绝了，被剥光衣服并斩首。^{[18][19]}西欧人普遍相信，假如他们的国家落入穆斯林手中，他们的公主们也会遭到类似命运。

穆罕默德二世的确从俘虏（不管是否皇室成员）当中选了一些供自己取乐。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两个侄子为穆罕默德二世服务，其中至少一个据说成了苏丹的情人。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幕僚长乔治·斯弗朗齐斯活了下来，被监禁十八个月，最终获释，但他的儿子已经死亡，女儿则被送进了穆罕默德二世的后宫。1455年9月，斯弗朗齐斯写道：“我的美丽的女儿萨玛尔在苏丹后宫患传染病而死。”^[20]一些邻国的统治者主动将自己的女儿送给穆罕默德二世作为妻妾，希望讨得他的欢心，避免他的怒火。他接受了不少，这些公主们就生活在他的后宫，受到宦官的监视，从此在史册中销声匿迹。

穆罕默德二世将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21]，于1453年6月24日夜间离开，带走了大群希腊女孩和妇女，作为他的战利品。为了充实街巷空荡荡的伊斯坦布尔的人口，被征服城市萨洛尼卡的犹太人家被搬迁到这里。

此次胜利让穆罕默德二世对更多冒险充满了渴望。热那亚官员安杰洛·洛梅利诺在面见穆罕默德二世之后说，他“在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变得非常傲慢，很快自视为整个世界的主人，并公开宣誓，两年之内，他就要打到罗马”。^[22]

据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利勒·伊纳尔哲克记载，果然穆罕默德二世开始自命为“两海之王”，指的是黑海和地中海。他的野心昭然若

揭。[\[23\]](#)

* * *

君士坦丁堡的惨剧令西欧人心惊胆寒。教皇尼古拉五世称穆罕默德二世为“撒旦之子”，并努力组织一次协调有力的反攻，以夺回君士坦丁堡，但他出师未捷身先死。西班牙人阿方索·博吉亚接替他，于1455年成为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卡利克斯特三世是罗德里戈的舅舅，也对伊斯兰教的威胁高度重视，写信给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的年轻国王“遗腹子”拉斯洛[\[24\]](#)，表示愿意支持他，并呼吁将土耳其人不仅逐出君士坦丁堡，还要赶出整个欧洲。

在这些年里，穆罕默德二世纵情声色。他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俘虏特别受到注意。他的后宫有四百女眷。穆斯塔法·阿里写道：“穆罕默德二世常常彻夜纵情享乐，玩弄美眸的仙女一般的女奴；白天他则和天使般的男性侍从一起酗酒。”[\[25\]](#)

1454年和1455年，他向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发动进攻，这是钳形攻势，目标是扩张领土，攻入西欧。他攻克了新布尔多，下令将当地官员斩首。他与麾下将士分享该城的74名少女，并将320名男童掳走，作为近卫军新兵。但在大城市贝尔格莱德，由于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的军事支持和援兵，土耳其人被打退了。穆罕默德二世受挫，但并未退缩。

次年，即1456年，伊莎贝拉五岁。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攻击了雅典和科林斯，斩获两城。他的这些征服令伊比利亚半岛居民大为悲痛，因为西班牙人相信自己是希腊文化的继承者。

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即来自巴伦西亚的博吉亚，于1458年去世。下一任教皇庇护二世企图阻挡穆罕默德二世的步步紧逼，但没有

取得多少成绩。1459年年底，伊莎贝拉八岁，整个塞尔维亚被穆罕默德二世占领。约20万塞尔维亚人被土耳其人奴役。没过多久，穆罕默德二世又攻打色萨利的加尔季基翁城，杀死全城6000居民，包括妇孺。热那亚人在黑海之滨的殖民地阿玛斯拉未作抵抗便投降，三分之二居民被卖为奴隶。

1461年，大约在伊莎贝拉搬到兄长恩里克四世宫廷的时期，只有一位拜占庭领袖还在抵抗穆罕默德二世：黑海之滨特拉布宗^[26]城的统治者大卫·科穆宁。穆罕默德二世警告他，若不投降，必然全灭。大卫接受了投降条件，流亡到色雷斯，在君士坦丁堡的西北方向。但两年后，穆罕默德二世命令将他、他的七个儿子中的六个以及一个侄子处死。他最小的儿子乔治只有三岁，得到饶恕。他的女儿安娜也被饶了性命。乔治被送给一个土耳其家庭，成长为穆斯林。他长大后逃走，改信基督教，销声匿迹。他的失踪标志着传奇的科穆宁皇朝的最后消亡。他的姐姐安娜在穆罕默德二世的后宫终老。^[27]

如今，穆罕默德二世把安纳托利亚的整个黑海沿岸地区纳入自己的帝国。1462年春季，他又一次入侵瓦拉几亚。他父亲曾经控制的人质弗拉德是在土耳其宫院长大的，遭到过殴打和虐待，被派回去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傀儡统治瓦拉几亚，但揭竿而起反对奥斯曼人，并与匈牙利的基督教统治者结盟。弗拉德凶猛地与穆罕默德二世厮杀，赢得了“穿刺公弗拉德”的绰号，他就是后来的“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原型。据估计，他杀死了数万人，部分原因是为了打退土耳其人。最后他遇刺身亡。

1465年，伊莎贝拉十四岁，穆罕默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稍事休息。但在1466年，他又一次出征，这一次是攻打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斯坎德培（曾被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后来又恢复基督教信仰并攻击土耳其人）年事已高，疲惫不堪。他去往罗马，恳求抵抗土耳

其人所需的财政和军械支援，但只有斐迪南的堂兄那不勒斯国王愿意帮助他。援助越来越少，因为西欧人对基督徒被土耳其人打败的消息已经麻木了。

1469年1月，伊莎贝拉快十八岁了，正在准备与斐迪南结婚。此时从东方传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数万土耳其军队攻入奥地利的心脏，杀到维也纳附近，杀死超过2万人。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当时还在准备一次海上的进攻，但无人知道他的攻击目标。据报告，他装配了250艘帆船，包括120艘桨帆船，还集结了至少8万大军。他按照攻打君士坦丁堡时的路数，故伎重演：极其细致的计划和集中令人惊恐的强大力量。据说他在筹划“攻打欧洲的战役”，并打算从海路进攻。这意味着地中海南岸的所有国家都可能是他的潜在目标。^[28]

1470年6月，他的庞大舰队起航了，开往内格罗蓬特（希腊的第二大岛，位于希腊半岛的东海岸）。内格罗蓬特在古典时期的名字是优卑亚或尤里普斯。穆罕默德二世击溃了哈尔基斯城的守军，随即占领全岛。次日，他命令将所有长了胡须的俘虏带到他面前。俘虏被命令跪下，形成一个圈，双手被捆起来。数百人就这样被斩首。妇女和女孩被分发给胜利者。随后土耳其人将该岛更名为埃格里博兹。随后四百年，该岛一直是土耳其人的领地。

7月，奥斯曼军队西进，攻击希腊大陆，于28日经过底比斯，29日经过雅典，随后途经其他许多城市。很多希腊人被奴役。哈夫萨全城人口被肃清。苏丹命令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搬迁到那里。

1471年，伊莎贝拉二十岁，穆罕默德二世休养生息了一年，准备来年再战。这年圣诞节，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派遣五位红衣主教向各国发出警示，土耳其人即将进攻；并鼓舞西欧的防御力量。正是承担着这样的使命，罗德里戈·博吉亚才来到西班牙，以确保那里的居民

知晓基督徒面临的威胁的严重程度。他发现，伊莎贝拉公主非常认真地倾听他的警示。

1474年，伊莎贝拉二十三岁，准备登基。穆罕默德二世四十二岁，患上了痛风。他变得很肥胖，患有多种疾病。他继续在宫殿里筹划新的征服。此时斯坎德培已经死了，阿尔巴尼亚王公们明显削弱了许多。1474年5月，超过8万奥斯曼军队包围了亚得里亚海之滨的斯库塔里城（也叫斯库台），隔海就是意大利半岛的“靴跟”。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猛攻该城的6000居民，其中只有约2000人是守军。目击者称，奥斯曼人攻打斯库塔里的城墙时，高呼：“罗马！罗马！”这是在明确表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罗马。[\[29\]](#)

在斯库塔里，阿尔巴尼亚人成功地又一次阻挡住奥斯曼人，在城堡高墙之后侥幸在干渴和饥荒中生存下来。但在1479年，他们的好运气用光了。土耳其人卷土重来，这一次斯库塔里的威尼斯统治者与奥斯曼人达成停战协定，撤走了，于是阿尔巴尼亚居民别无选择，只得投降。很多丧失家园的阿尔巴尼亚人逃跑了，流亡到意大利和西班牙。

这一切灾祸都是一个人造成的，那就是穆罕默德二世。斯库塔里围城战的目击者马林·巴莱蒂写道：“他招来了所有的阴暗和毁灭；他摧残和毁掉了所有的一切，他是真正的瘟疫。谁能说得清，他征服了多少地区、城市、国家、王国和帝国！整个世界为了他而战栗。”[\[30\]](#)

法兰西人皮埃尔·德·奥比松（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的大团长）将穆罕默德二世比作撒旦和路西法。他说，穆罕默德二世是

不可言喻的暴君，他摧毁了如此之多孩童的灵魂，强迫他们背弃基督教信仰，让他们盲目地坠入地狱。他让处女和少女遭到蹂躏，屠戮年轻和年老的男子，亵渎了神圣遗物，污染了教堂和修道院，摧毁、压迫和攫取

许多王国、亲王国和城市，包括君士坦丁堡。他将这些国度据为己有，化为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的场所。[\[31\]](#)

1480年，伊莎贝拉二十九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两个是女儿。穆罕默德二世的又一次大规模攻势迫在眉睫。他在准备期待已久的向意大利的攻势。一支包括约140艘船只和1.8万远征军的舰队在意大利半岛的“靴跟”处登陆。[\[32\]](#)他的原计划是攻击布林迪西，但转往奥特朗托。这是座小城镇，防御很弱，很快就被土耳其人占领。该城的2.2万居民中只有1万活了下来。和君士坦丁堡的情况一样，居民们蜂拥躲进当地的大教堂，这反而让敌人屠杀他们时更轻松。约800人被带到附近一座山上，奥斯曼人告诉他们，他们如果现场改信伊斯兰教，就可以活命。他们拒绝了，于是被斩首。他们的尸体被抛弃在荒野，被野兽吃掉。约8000人被装运上船，送往阿尔巴尼亚，卖为奴隶。[\[33\]](#)

伊莎贝拉对此事特别关注，并心急如焚地观察局势。她写信给那不勒斯人，告诉他们，卡斯蒂利亚将出兵援助他们。援兵和武器装备很快就送抵了。[\[34\]](#)

同时，穆罕默德二世在准备向西欧的最后入侵。很多人相信，基督教国家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例如，1481年，古典学者彼得·肖特（斯特拉斯堡的教士）从博洛尼亚前往罗马，以便再看最后一眼这座城市。他写道，他去罗马是为了在“永恒之城被土耳其人占领之前再看最后一眼”。[\[35\]](#)

1481年年初，穆罕默德二世四十九岁，他开始了军事动员。他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西进。无人知晓他的目标，可能是斐迪南的西西里王国。对伊莎贝拉来说特别不祥的是，有传闻称穆罕默德二世在准备攻击埃及的马木留克苏丹国。这种可能性让西班牙人大为惊恐，因为711年（那时也是穆斯林军队积极扩张的时期）西班牙被占领时，敌人

就是从北非来的。伊莎贝拉的宫廷编年史家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记载道：“国王和女王每天都收到消息，土耳其人在海上集结了庞大舰队，要去征服西西里王国。无论他们在何处登陆，都抓捕基督徒并残忍地杀害他们。”^[36]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预计随时都可能遭到攻击，于是开始厉兵秣马。他们命令国内所有教堂都组织每天的祷告，向人民解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并鼓励他们准备迎敌。他们与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的堂兄）达成了协议，帮助他保卫那不勒斯，条件是他要帮助他们保卫西西里岛。他们派遣了一位受到信赖的官员阿隆索·德·金塔尼利亚视察全国各地，清点武器、船只和要塞。他们派了其他官员去视察各港口，以判断它们若遭到海路进攻是否会很脆弱。他们向英格兰人和葡萄牙人求教，学习抵御海路攻击的策略。

伊莎贝拉肩负起加强防御、抵抗迫在眉睫的攻击的使命。她用宗教信仰来动员军队，保卫祖国。普尔加尔写道，所有人都被教导，“土耳其人制订了庞大的计划，要杀戮基督徒；土耳其人每天都在欺凌和屠戮基督徒；以及整个基督教世界联合抗敌的必要性。像所有的虔诚基督徒一样，他们应当感谢上帝，因为发生了这样宏大的事件，让他们知道，应当为了国王和家园的荣誉，表现出极大热情，并歌颂基督教”。^[37]

伊莎贝拉的努力最后收到了成效。但她运用的手段将给她的名字带来无法磨灭的污点。

^[1] John Freely, *The Grand Turk* (New York: Overlook Press, 2009) .

^[2] Mark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

p.30.

[3] Mark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 p.30.

[4] Marios Philippides, *Emperors, Patriarchs and Sultans of Constantinople: A Short Chronic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Brookline, Mass.: Hellenic College Press, 1990) , p.31. Translation from an anonymous Greek chronic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5] Freely, *The Grand Turk*, p.20.

[6] Freely, *The Grand Turk*, p.12.

[7] 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五世的父亲是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一世，伊莎贝拉的祖父是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三世。斐迪南一世和恩里克三世是兄弟俩。

[8] Freely, *The Grand Turk*, p.21.

[9] Franz Babinger, *Mehmed the Conquere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430.

[10] Giacomo de Langushi, cited in Freely, *Grand Turk*, p.59.

[11] Halil Inalcik,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London: Phoenix Press, 2000) , p.26.

[12] Marios Philippides, ed., *Mehmed II the Conqueror: And the Fall of the Franco-Byzantine Levant to the Ottoman Turks: Some Western Views and Testimonies* (Tempe: 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07) , p.171.

[13] 弗朗茨·巴宾格尔（1891～1967）是德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对奥斯曼帝国的研究闻名，他的名著是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传记。

[14] Babinger, *Mehmed the Conqueror*, p.93.

[15] Babinger, *Mehmed the Conqueror*, p.93.

[16] Kritoboulos quoted in Freely, *Grand Turk*, p.43.

[17] Evlyia Celebi quoted in Freely, *Grand Turk*, p.46.

[18] 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没有子嗣，所以这些故事是虚构的。不过，他的弟弟托马斯的女儿索菲亚嫁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后来俄国以此为由声称继承了拜占庭的遗产。

[19] Philippides, *Mehmed II the Conqueror*, pp.37-40.

[20] Freely, *Grand Turk*, p.48.

[21] 原文如此。实际上，土耳其语里早在10世纪就有了“伊斯坦布尔”的说法（拼写有差别），“伊斯坦布尔”或许是“君士坦丁堡”的简单讹误，或许是通过别的途径变化而来的。讲希腊语的人将君士坦丁堡亲昵地称为“波利斯”，即“城市”。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人会说，他要“eis tin polin”（进城），土耳其人也许会把这个短语误听成“伊斯坦布尔”。在1453年之前，土耳其语已经很普遍地将这座城市称为“伊斯坦布尔”，不过官方的说法仍然用“君士坦丁堡”，并且一直用到19世纪。1930年，土耳其共和国规定只使用“伊斯坦布尔”。不过，1453年之后，有人开始称这座城市为“伊斯兰堡”（Islambol）——这在土耳其语中是一个双关语，意思是“遍布伊斯兰”。但这个名字没能打动土耳其人的耳朵。据说这个名字是穆罕默德二世取的。

[22] Freely, *Grand Turk*, p.49.

[23] Inalcik, *The Ottoman Empire*, p.29.

[24] “遗腹子”拉斯洛，即匈牙利国王、克罗地亚和波西米亚国王拉斯洛五世（1440~1457），同时还是奥地利公爵。他的父亲哈布斯堡的阿尔布雷希特统治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波西米亚，去世后拉斯洛才出生，所以叫“遗腹子”。只有奥地利承认拉斯洛的统治权，匈牙利贵族选举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后于1444年在黑海岸边的瓦尔纳被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二世击败身死）为匈牙利国王。拉斯洛的母亲为儿子争夺匈牙利王位，与瓦迪斯瓦夫三世发生战争。瓦迪斯瓦夫三世死后，匈牙利人选举贵族匈雅提·亚诺什（传奇的英雄）为摄政王。匈雅提死后，其长子被拉斯洛处死，匈牙利贵族反叛拉斯洛，拉斯洛在布拉格意外死去。匈雅提的次子成为匈牙利国王，称马加什一世。

[25]. Freely, *Grand Turk*, p.60.

[26]. 特拉布宗是从拜占庭帝国分裂出的三个帝国之一，创立于1204年4月，持续了257年。特拉布宗帝国的第一代君主阿列克赛一世是拜占庭帝国科穆宁皇朝最后一位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一世的曾孙，他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预见十字军将攻取君士坦丁堡，便占据特拉布宗独立建国。在地理上，特拉布宗的版图从未超过黑海南岸地区。1461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消灭了特拉布宗。

[27]. Freely, *Grand Turk*, p.69.

[28]. Babinger, *Mehmed the Conqueror*, p.280.

[29]. Marin Barleti, *The Siege of Shkodra: Albania's Courageous Stand Against the Ottoman Conquest 1478*, trans. David Hosaflook (Tirana, Albania: Onufri, 2012) , p.184.

[30]. Marin Barleti, *The Siege of Shkodra: Albania's Courageous Stand Against the Ottoman Conquest 1478*, trans. David Hosaflook (Tirana, Albania: Onufri, 2012) , p.51.

[31]. Freely, *Grand Turk*, p.181.

[32]. Babinger, *Mehmed the Conqueror*, p.390.

[33]. Babinger, *Mehmed the Conqueror*, pp.390-92.

[34]. Carta de Reina de Sicilia al Conde de Cardona, Sitio de Otranto, 1481, in Antonio Paz y Meliá, *El cronista Alonso de Palencia, su vida y sus obras, sus decadas y las crónicas contemporáneas* (Madrid: 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 1914) , pp.310-11.

[35]. Freely, *Grand Turk*, p.170.

[36]. Hernando del Pulgar, *Crónica de los Senores Reyes Católicos por su secretario Fernando del Pulgar*, 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Madrid: Espasa-Calpe, 1943) , vol.1, p.435.

[37]. Hernando del Pulgar, *Crónica de los Senores Reyes Católicos por su secretario Fernando del Pulgar*, 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Madrid: Espasa-Calpe, 1943) , vol.1, p.435.

十三 女王的战争

解决了葡萄牙问题之后，伊莎贝拉女王立刻将注意力转向西班牙南部。该地区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原因有二。在短期内，她必须应对邻国——穆斯林的格拉纳达埃米尔国近期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侵略性，因为此时卡斯蒂利亚的边防十分羸弱、四分五裂而不可靠。长远来看，她需要在地中海沿岸拥有一个强势的地位，以便保护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日渐增长的威胁。

第一步是保障卡斯蒂利亚与伊斯兰世界的边界。伊莎贝拉女王必须想办法，让居住在安达卢西亚被基督徒控制的那部分的贵族停止内斗。由于恩里克四世国王从遥远的塞哥维亚对安达卢西亚的统治非常松懈不力，该地区已经深陷内乱多年。现在尤其要紧的是平定塞维利亚（南部最大的城市 and 最重要的内河港口）的骚乱，因为边境上又燃起了新的战火。

边境对面就是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穆斯林国度——格拉纳达王国，如今由尚武的纳斯尔王朝统治。这个武装到牙齿的埃米尔国沿着地中海海岸延伸约250英里，深入内陆约93英里；其边境得到许多牢固城堡的保护。格拉纳达王国的最大城市和“王冠宝石”是格拉纳达城，位于多山的内陆，但纳斯尔王朝也控制着重要的地中海港口，如马拉加、马贝拉和阿尔梅里亚，所以能够轻松地 从海外获得增援和持续的物资补给。

从这些巩固的基地，格拉纳达人能够向卡斯蒂利亚国土发动闪电般的快速袭击，掳掠人口，将其变卖为奴、索取赎金，或者将俘虏用做劳工或性奴。历史学家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马喀里写道：“恩里克四世在位期间，一直到1474年，他们利用这一时期卡斯蒂利亚全境的动荡和叛乱，每年发动远征。”^[1]

1474年，恩里克四世国王驾崩，格拉纳达也有了一位新的领导人。阿布·哈桑·阿里比他之前的统治者更好战。在与他同样意志坚强的正妻法蒂玛^[2]（也是他的表妹）帮助和支持下，他扩充了穆斯林军队，加强其攻击力。苏丹^[3]的好战让他自己的国民也感到担忧。一位阿拉伯编年史家称，阿布·哈桑“慷慨大方、英勇善战、热爱战争和战争带来的威胁与恐怖”。^[4]这是伊斯兰世界大举扩张的光荣年代，他无疑也想效仿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东方取得的成功，自信真主既然支持他们，也会支持他。

阿布·哈桑越来越大胆和坚决。据阿拉伯历史学家记载，“他让那些从来不曾受到穆斯林骚扰的基督徒也胆战心惊”。他没有占领基督徒的土地，而是集中力量于袭掠，带回“丰富的战利品和大量俘虏”。^[5]1478年4月，他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阅兵，展示了他的军队和军械。此时奥斯曼帝国正在巴尔干半岛扩张，所以纳斯尔王朝新的侵略性让卡斯蒂利亚人忧心忡忡，害怕纳斯尔王朝与土耳其人结盟，允许土耳其人使用其地中海港口来入侵西班牙。这可能是711年、1086年和1195年事件^[6]的重演，即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统治者从其他伊斯兰国家获得增援。

但基督徒并不是清白无辜的受害者。他们也会袭击穆斯林地区，并断断续续地发动攻势，征服一些穆斯林家族已经生活数百年的土地。基督徒认为他们的胜利是收复失地；穆斯林认为这是在抢劫他们的家园。伊莎贝拉像阿布·哈桑一样坚信不疑，她的世界观是正确

的，西班牙的整个南部地区都理应属于她，所以她能够理直气壮地对敌人的任何挑衅加以军事应对。

现在，阿布·哈桑认为伊莎贝拉的崛起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好消息，标志着卡斯蒂利亚的脆弱。公主成为女王不久之后，也就是葡萄牙侵略者涌入卡斯蒂利亚的时期，阿布·哈桑发出了令人不安的誓言，他不再向卡斯蒂利亚称臣纳贡，而就是这种贡金维持了两国之间脆弱的停战状态。阿拉伯史料称，他用特别具有威胁性的言辞送去了这消息。他说，格拉纳达向卡斯蒂利亚纳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向基督徒纳贡的君主们都已经死了。在格拉纳达，我们铸造的唯一东西……是铁制兵器和长枪，用来杀伐我们的敌人。”^[7]意大利学者彼得·马特生活在伊莎贝拉的宫廷，他得知，阿布·哈桑在发出这威胁的同时，还咄咄逼人地抚弄着一支锋利长枪的刃。

这一威胁的结果令格拉纳达很满意。基督徒没有做出任何直接回应，似乎接受了这种条件下的和平。但卡斯蒂利亚朝廷内部已经认清了对方的讯号。彼得·马特写道：“国王和女王对这消息感到不安。”^[8]但伊莎贝拉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她在自己的另外两条边境上正在打仗，还在努力恢复国内的安定。但她认识到，时间很紧迫，因为不仅好战的格拉纳达对她构成威胁，而且格拉纳达还可能得到北非、埃及或土耳其的穆斯林盟友的支持。事实上，正如伊莎贝拉所担心的，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很快就向北非穆斯林请求支援和帮助。然后他们还去求助于土耳其人。

1477年中期，为了更好地评估局势，伊莎贝拉女王首次视察塞维利亚，在那里待了一年多。她发现这座城市状态很差。王宫（即城堡）半壁倾颓，急需修缮。街头犯罪十分猖獗，市民在夜间不敢上街。安达卢西亚的两个最顶尖的显赫家族，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和加的斯侯爵的家族，互相争斗不休，乃至兵戎相见。五花八门的矛盾

都在酝酿，武装冲突随时可能爆发。她用自己的惯用手法来给该地区伸张正义：主持持续几个小时的司法程序以解决争端；允许人民上诉喊冤；并努力让冲突各方维持一定程度的和谐。她惯常的严厉司法狠狠制裁了犯罪分子。她甚至在劝说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和加的斯侯爵的家族和解的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功。她在安达卢西亚的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待了三个月，然后动身返回卡斯蒂利亚，那里有一些事务在等待她的处理。为了争取时间，她于1478和阿布·哈桑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停战协定，也没有索要贡金。^[9]

1480年，返回卡斯蒂利亚之后，伊莎贝拉与葡萄牙正式缔结和约，还没有喘息的时间，就收到了奥斯曼军队成功进攻奥特朗托的“可怕消息”（这是伊莎贝拉的西班牙编年史家帕伦西亚的说法）。西班牙人惊恐地得知，土耳其人向奥特朗托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奇袭，尽管奥特朗托市民没有“一丝一毫的抵抗”，却有很多人遭到屠杀。人们已经畏惧了很久的进攻让土耳其人在意大利半岛得到了一个立足点，可以从那里蹂躏意大利内陆，准备夺取罗马。因此对奥特朗托的进攻的严重性不容小觑。帕伦西亚写道，土耳其人的目标是“消灭天主教”。^[10]

奥特朗托的迅速陷落让基督徒痛苦地认识到，土耳其人能够非常轻松地袭击伊比利亚半岛，尤其是如果他们利用马拉加、阿尔梅里亚或马贝拉那样的城镇作为滩头阵地，并与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结盟。很显然，如果土耳其人这样来袭，西班牙人没有办法抵挡他们。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就必须首先铲除有可能为敌人所用的滩头阵地。从此，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似乎就开始寻找开战的借口。很快他们就有了机会。这一次，是格拉纳达发动了一次偷袭。

1481年圣诞节，在阿拉伯史料所称的一个“暴风骤雨的黑夜”^[11]，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军队侵犯并攻击了卡斯蒂利亚境内的山区城

镇萨阿拉。在夜色和风雨掩护下，他们大胆地攀上这座兵力薄弱、战备很差的要塞的城墙。编年史家帕伦西亚写道：“基督徒魂飞魄散，毫无得到救援的希望。”他们无力抵抗穆斯林的进攻，“很多人被剑砍杀，其他人则被俘虏，押往格拉纳达”。^[12]阿布·哈桑占领了这座城镇，留下部队驻守。“他扬扬得意地返回格拉纳达，对此次冒险的良好结局十分满意。”阿拉伯历史学家写道。^[13]

但格拉纳达的一些年纪较大、更为理智的人担心，这次行动太鲁莽。他们对阿布·哈桑的治国能力表达了担忧。明目张胆地向基督徒挑衅，可能造成恶果。格拉纳达的一些人开始看到凶险的预兆、令人不安的天象，足以让迷信的人惴惴不安。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得知萨阿拉陷落的消息时，正在梅迪纳·德尔·坎波。他们得知此事，非常沮丧。此次遇袭不仅是一长串边境冲突中新的一起，对西班牙的自尊也是一次打击。萨阿拉是斐迪南的祖父安特克拉的斐迪南^[14]于1410年在一次令人悲痛的围城战之后，从格拉纳达手中征服的。现在，除了不久前的损失之外，又有萨阿拉的约150人被俘虏，关押在防守巩固的龙达镇。令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大为不安的是，萨阿拉被敌人永久性占领了。

从这个新基地出发，穆斯林军队继续向哈恩、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和穆尔西亚的方向袭击，如入无人之境。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离前线太远，无力干预。用耶韦斯伯爵夫人的话说，该地区如今“几乎任凭异教徒处置”。^[15]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在过去，格拉纳达的威胁对西班牙来说是若隐若现的痛楚，如今突然加剧成难以忍受的剧痛。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结婚时就有粗略的想法，将来要把格拉纳达收回到基督教世界。如今形势变得十万火急。

但他们应当怎么办呢？要想战胜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军队，就需要西班牙的所有王国齐心协力，做出极大努力，因为格拉纳达得到许多山顶要塞的保护，每一座要塞都几乎是坚不可摧的。何况纳斯尔王朝与北非的穆斯林很接近，所以极有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增援和支持。阿拉贡编年史家赫罗尼莫·苏里塔写道，纳斯尔王朝“很显然能够得到咫尺之外的穆斯林国度的援助”，所以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认识到，要想“让西班牙的那个部分和全世界摆脱这些敌人的征服与奴役”，就需要他们能够获得的“所有力量、军队和干劲”。^[16]

西班牙的两位君主暂时还没有准备好去做这样的全面努力。起初，他们依赖于防御策略以自卫，同时为他们眼中的最终的殊死搏斗做准备。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命令格拉纳达王国周围的卡斯蒂利亚要塞城市都加强自身防御，准备作战。他们还进行了海上封锁，开始骚扰北非和格拉纳达的各港口城市之间的物资和人员运输。

但就在西班牙的两位君主完成战争准备之前，塞维利亚贵族、头发火红、脾气急躁的加的斯侯爵罗德里戈·庞塞·德·莱昂（他曾与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互相争斗）自作主张起来。一名密谈（曾被关押在阿尔阿马地牢的一名前奴隶）告诉庞塞·德·莱昂，城墙巩固的阿尔阿马（位于格拉纳达王国富饶的农业腹地）的防御很薄弱，或许是很好的攻击目标。加的斯侯爵自行决定占领该城。他和他的盟友选择的进攻日期是1482年2月27日，并于夜间发动了进攻，就像穆斯林夜袭萨阿拉那样。他们猛冲进城，将其占领，杀死800名穆斯林，俘虏3000人，并在一座高塔的城堞上树立了十字架。就这样，双方都等待了许久的战争，以混乱和出人意料的方式，拉开了大幕。

现在轮到穆斯林震惊和畏惧了，因为他们认为阿尔阿马是格拉纳达城周围的防御圈的关键一环。阿尔阿马被称为格拉纳达城的“眼睛”，因为它的瞭望塔能够向公民们发出警报，告诉他们卡斯蒂利亚

人攻入了他们的土地。从穆斯林的角度看，这也是一次偷袭。另外，急于报复的卡斯蒂利亚人运用的手段让穆斯林怒火中烧。阿拉伯历史学家写道：“城市的护墙、街巷和清真寺堆满了死尸，血流成河。”
[17]卡斯蒂利亚人从城墙上将死尸抛了下去。

这是伊莎贝拉收复失地篇章中的第一次大胜。她很快意识到了此役的重大意义。但它的手段太残忍，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 * *

穆斯林迅速集结了一支军队，去收复阿尔阿马。抵达城市外墙时，他们看到野狗在撕咬他们同胞的腐烂尸体。这景象令他们大怒。这对穆斯林的情感来说是双重的伤害，因为他们相信狗是不洁净的动物。格拉纳达的士兵们决心要将卡斯蒂利亚人逐出阿尔阿马要塞，围攻它数周之久。卡斯蒂利亚人被困在城内，饮水有限，开始缓缓地干渴而死。他们派出了使者，先宣布他们的胜利，然后报告他们的困境。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又一次在梅迪纳·德尔·坎波过冬，距离阿尔阿马400英里，而且伊莎贝拉又一次怀孕了。但他们还是迅速准备了一支军队，去援救被包围的西班牙人。国王几乎立刻出征了，女王准备几周后跟随他去科尔多瓦。同时，加的斯侯爵的夫人去找她丈夫的长期对头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求救。公爵当即答应，搁置了他对加的斯侯爵的长期敌意。他是第一个赶到阿尔阿马援救落难基督徒的。他与加的斯侯爵在战场相遇，拥抱起来，建立了重要的新联盟，这对后来的局势有深远影响。

西班牙增援部队赶到了，围攻阿尔阿马的穆斯林军队认识到，他们很快会在兵力上处于下风，于是决定撤退。但他们明确表示，他们还会卷土重来、收复城镇。与此同时，他们在卡斯蒂利亚南部各地

发动了进攻，抓住一切机会杀戮卡斯蒂利亚人、占领土地和抓捕俘虏。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在科尔多瓦会合，以雄伟森严的阿尔卡萨瓦[18]要塞为军事大本营，并与安达卢西亚贵族商讨下一步如何行动。女王坚持不准任何撤退。据编年史家帕伦西亚记载，这时鼓舞人心的喜讯传来，基督徒军队收复了奥特朗托，最终驱逐了土耳其人。[19]西班牙派遣了70艘战船去支援那不勒斯人[20]，再加上葡萄牙和匈牙利军队的帮助，联合赶走了盘踞奥特朗托的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混乱也有利于基督徒方面，因为穆罕默德二世出乎意料地去世了，引发了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于是奥斯曼军队撤离了意大利南部。尽管奥特朗托已经十室九空，但它的收复仍然是基督徒团结自卫能力的重要象征。伊莎贝拉女王敦促自己的部队奋勇拼杀时，刻意会提及奥特朗托的例子。

女王意志坚定，积极参与战事的运筹帷幄。她开始阵痛之前还在参加一次作战会议。她向与会者告辞，然后离开，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孩子，即玛丽亚公主。小玛丽亚得名自基督的母亲，其实是双胞胎之一。上文已经讲到，另外一个孩子是死胎。卡斯蒂利亚人像穆斯林一样迷信，觉得这个孩子的死亡是一个预兆，是上天给出的凶兆。宫廷人员组成游行队伍，来到科尔多瓦的大教堂，举行了一个仪式，既庆祝玛丽亚公主的诞生，也哀悼另外一个孩子的死亡，并进行了悲恸的冥思。[21]

仪式的举行地点是光辉璀璨的前科尔多瓦清真寺，天花板高耸，室内有森林般的庄严石柱；1236年科尔多瓦被基督徒占领（这是收复失地运动的一个早期阶段）后，这座清真寺被改为大教堂。穆斯林的清真寺是建在原先的西哥特的圣文森特教堂原址上的，而圣文森特教

堂则取代了更古老的一座罗马神庙。清真寺的美丽石柱吸收了教堂和神庙的结构元素。

双胞胎之一的死亡的确是个凶兆，因为即将发生许多死亡与杀戮。奥特朗托的胜利被证明是基督徒方面的一次罕见的快速胜利。收复格拉纳达的战争将持续漫长的十年，双方都将蒙受惨重损失。卡斯蒂利亚人需要集中力量才能取胜，因为格拉纳达人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且敌对基督徒的意志非常顽强。对双方来讲，这都是一场痛苦的战争。编年史家苏里塔写道：“战争非常野蛮和残酷，以至于国内没有一个地方不曾被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血染红。”^[22]

敌人的战斗力很强，而且地形也非常复杂，是同样棘手的挑战。从半岛北部开赴南部的战场，就已经是了不得的冒险，因为卡斯蒂利亚人需要穿越极度干旱的平原，将人员、物资和火炮运过崇山峻岭。这场战争需要无比艰巨的动员和大量的财政牺牲，因为全国的所有资源都被集中于这项宏大事业。历史学家L. P. 哈维写道，战局“在15世纪80年代晚期之前，都是悬而未决的”。^[23]

一直到1489年，伊莎贝拉才有了必胜的自信。这一年，她雇人创作了一系列纪念收复失地战争每一次胜利的艺术品中的第一件。起初她选择了二十个事件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后来向木刻画家罗德里戈·阿莱曼订购了二十幅浮雕木刻画，打算用作托莱多大教堂（这是自西哥特时代以来，西班牙最重要的教堂）唱诗区的椅背装饰。几年后，她又订购了新的一批二十幅椅背木刻画，因为又发生了二十次重大胜利或受降。最后，被认为值得纪念的事件的数量达到五十四之多。浮雕木刻画是一种早期的军事照片新闻，记载了目击者亲眼所见的风云变幻的大事件，若没有这些记载，这些事件恐怕会消失在历史记忆中。按照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安·德·马塔·卡利亚索·阿罗基亚的说法，这些画作具有“极大的历史和考古价值”。^[24]在这套引人

注目的系列画作中，我们能看到垂死的士兵、哀恸的穆斯林、被摧毁的城堡和敌我双方的英雄主义壮举。

随后十年里，两位君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安达卢西亚的两个主要基地——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度过，运筹帷幄。伊莎贝拉专注于战争，斐迪南则经常被他自己的阿拉贡王国的事件，以及他与邻国法兰西关于北方一些省份的争端转移注意力。但每一次他松懈下来的时候，伊莎贝拉都会告诫他要振奋精神、继续努力。用历史学家佩吉·利斯的话说，这是一场“女王的战争”。^[25]

但两位君主起初没有为如此漫长艰苦的战争做好准备，因此最初几年里连续失望。1482年夏季，斐迪南国王和加的斯侯爵草率地决定攻击洛哈，这是格拉纳达王国西部边缘山区的一座要塞。穆斯林派遣了一支大军去对付他们，双方都打得很勇猛，卡斯蒂利亚人被击退。另外，国王的副将之一，堂罗德里戈·特列斯·希龙（王国的三大骑士团之一——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大团长）中了一支毒箭，牺牲了。阿罗伯爵和滕迪利亚伯爵都身负重伤。哈维写道：“卡斯蒂利亚人混乱地败退，将火炮和攻城武器丢弃在战场上。对斐迪南国王来说这是一场灾难，他不得不长途跋涉返回科尔多瓦，重新组建军队。”^[26]伊莎贝拉女王在科尔多瓦等待他归来，对此役的失败和她的军队的惨重损失备感羞耻。对两位君主来说，这次失败突出表明了一点：他们需要更好的战略筹划。

第二次失败则教会他们，必须尊重敌人的力量、顽强和足智多谋。国王不得不去加利西亚处置那里的民变。他不在期间，为了给洛哈的失败报仇雪恨，安达卢西亚的卡斯蒂利亚人自行组织了针对格拉纳达人的大规模攻势。安达卢西亚贵族的精英云集于此，参加冒险，身穿光辉夺目的铠甲。商贩牵着驮马跟随军队，期待获得丰富的战利品。这支军队开赴海港马拉加，需要穿过一片被称为阿士阿尔奇亚的

地区（这是崇山峻岭之间的一个富饶的农业谷地），踌躇满志，相信自己的兵力和精良且美观的装备一定能战胜敌人。他们梦想征服马拉加（格拉纳达最重要的海港），对穆斯林施加一次快速而决定性的打击。加的斯侯爵因为之前受过挫折，敦促大家谨慎，但没人愿意听他的话。

行军队伍拖得太长，首尾不能相顾的军队很容易遭到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士兵们骑马穿过格拉纳达乡村，焚烧庄稼，四处掳掠，然后进入马拉加以北的山地隘道。马拉加人民看得见卡斯蒂利亚人纵火产生的烟柱。阿布·哈桑派遣了他最优秀的两名将领，他们协调了一次非常高效的伏击。卡斯蒂利亚军队的长长的、脆弱的纵队进入通往海岸的最后一座山谷时，穆斯林军队在山谷一个狭窄地带两侧的高地上严阵以待。他们居高临下地攻击基督徒的行军纵队。

卡斯蒂利亚人受到辘重的拖累，并且没有预想到穆斯林军队的攻击如此凶悍，因此落入陷阱，惨遭屠戮。死者多达数千人。一些士兵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逃进一座崎岖的山沟，被本领高强的神射手逐个消灭。曾反对此次远征的加的斯侯爵侥幸逃脱，但他的很多亲戚都阵亡了。他的兄弟迭戈和贝尔特兰被杀，两个侄子也战死了。有800多骑兵牺牲，1500人被俘。西丰特斯伯爵被俘。卡斯蒂利亚士兵们头晕目眩地四处乱跑。据说有些士兵的斗志完全瓦解，竟然束手就擒，乖乖地被穆斯林女人抓走。

穆斯林大获全胜。阿拉伯史料喜悦地记载道，此次胜利“令基督徒魂飞魄散，让穆斯林士气大振”。^[27]对基督徒来说，这又是一次彻彻底底的、丢人现眼的溃败。女王在马德里得知了噩耗。洛哈的失败教会了她妥善谋划的重要性，而阿士阿尔奇亚的惨败告诉她，傲慢自负会有什么风险。事实证明，穆斯林是勇敢而机智的战士，他们熟

悉当地的地形地貌，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而且对他们来讲，这是一场保卫自己家园和生活方式的斗争。

从此之后，国王和女王开始更好地配合。斐迪南率军作战，而伊莎贝拉负责后勤补给，并确保战地医院随时准备接收和医治伤员，帮助他们重返战场。对两位君主来说，筹集资金常常是很大的挑战。斐迪南经常是亲自带兵取胜的人，而伊莎贝拉在战场附近等候和观战，一丝不苟地注意细节，看部队是否达成了她希望的所有目标，以及是否最大限度地把握了机遇。

所以，他们花了十多年才征服格拉纳达，“部分是通过武力，部分是招降纳叛，部分借助审慎，部分通过金银收买”。他们用金钱收买穆斯林的当地政府官员，让他们拿着钱移民到北非或奥斯曼帝国，把城堡居民留下来自生自灭。^[28]卡斯蒂利亚人还切断了向穆斯林地区运送粮食的海上航运，并摧毁庄稼和收成，慢慢饿死敌人。

对穆斯林来讲，他们早期的两次重大胜利应当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明智地运用自己的资源、等待时机、把握机会并团结一致，是能够打败卡斯蒂利亚人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都有弱点，可以利用。斐迪南有时鲁莽地不顾危险，伊莎贝拉讨厌看到双方的人无谓地死亡，她的仁慈心与战争必需的残酷相抵触。另外，卡斯蒂利亚人的补给线很长，这是一个极大的弱点。他们每一次转移，都必须将粮食和弹药运来，这让他们很脆弱。

* * *

但穆斯林的胜利没有给他们带来原本应有的益处。格拉纳达人发生了窝里斗，因为他们国内有自己的问题。

凶悍的苏丹阿布·哈桑用威胁挑起了战争，现在他的私生活给他制造了很大麻烦。只要他集中注意力于手头的工作，他的政权就井井有条并能够取得军事胜利。他的正妻法蒂玛曾是他的爱人、朋友、支持者和谋士。但一夫多妻制造成了一些棘手的后勤上的和感情上的挑战。阿布·哈桑开始偏爱后宫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基督徒时，这些复杂问题对他造成了沉重打击。据阿拉伯史料记载，“他后宫里最得宠的两位美女”之间发生了至死方休的残酷竞争。两位争风吃醋的妻子中势力更强的是法蒂玛，她是阿布·哈桑的表妹，也是阿布·阿卜杜勒王子（西班牙人称其为巴布狄尔）的母亲。另外一位女子是伊莎贝拉·德·索利斯，马尔托斯（哈恩附近的一座城镇）市长的女儿，一些年前被袭掠当地的穆斯林军队掳走；她改信了伊斯兰教，名字也被改为索拉娅。国王对索拉娅非常痴情，和她生了两个孩子，并宠爱这两个孩子超过其他的子女。但巴布狄尔王子的母亲“不仅刻骨仇恨索拉娅，而且一心想把她和她的孩子都杀掉”。^[29]

家庭内部的猛烈争吵很快扩散。法蒂玛是一位前任苏丹的女儿，有很多强有力的朋友，她敦促自己的儿子巴布狄尔尝试推翻父亲。阿布·哈桑的声望因此受损。据阿拉伯史料记载，他原本被视为捍卫伊斯兰教的伟大战士，如今却被认为“铁石心肠而残酷”，他的儿子巴布狄尔则很快被大家认为是风度翩翩、“和蔼可亲并且优雅得体”。^[30]

所以，在战争早期的几年，阿布·哈桑未能趁敌人尚未准备好的时候彻底击溃西班牙军队，而是不得不返回格拉纳达，去镇压阿拉伯历史学家所说的“一场恐怖的叛乱，撕裂了格拉纳达人的灵魂”。^[31]据阿拉伯编年史家努布达特·阿斯尔记载，就在穆斯林军队在洛哈取胜的那天，王室的纠纷公开化了。法蒂玛很快就带着自己的儿子们，包括巴布狄尔，去了瓜迪斯^[32]，“被当地人欢呼为统治者，随后格拉纳达也推举他们为统治者”。^[33]

宫廷纠纷升级为武装冲突。格拉纳达人民分成两个阵营，互相残杀。有些人支持阿布·哈桑，包括他精明强干的弟弟阿卜·杜拉·撒加^[34]，他是一位广受尊重的老将。其他人则支持阿布·哈桑的儿子巴布狄尔。年轻的巴布狄尔急于在战场上向父亲和叔叔证明自己的本领。这个糟糕的决定最终导致了他的灭亡。1483年，斐迪南国王再次出征。此前战局对卡斯蒂利亚人不利。但命运改变了力量对比。巴布狄尔企图获得一场让世人仰慕他的大胜，于是决定率军攻击属于卡斯蒂利亚的卢塞纳。这很快演化成一场激烈的肉搏战。伊莎贝拉女王雇人制作了描绘此役的木刻画，图中有一大群人马在一座要塞之外的战场殊死搏斗，挥舞着中世纪的兵器——剑、弩和长枪。格拉纳达的好几位名将在此役中阵亡，包括巴布狄尔的岳父，曾领导洛哈防御战的勇敢的市长。在图中，他跌倒在地，但还带着高贵与尊严，姿态令人想起希腊艺术中著名的垂死高卢人^[35]的形象。在此役中，巴布狄尔的坐骑精疲力竭，坠入一条河。巴布狄尔害怕丢掉性命，于是投降，被卡斯蒂利亚人俘获。

这是战局的一个大逆转。目瞪口呆的卡斯蒂利亚人幸运地抓住了巴布狄尔，这是最珍贵的一件战利品。但如何利用这非同一般的机遇呢，什么才是最佳策略？

斐迪南国王紧急与谋臣们会商，大家意见不一。有些人主张将年轻的王子监禁起来，有些人说释放他，让他回去在国内继续煽动叛乱。伊莎贝拉女王做了决定性的裁决。阿拉伯史料记载道，“她的意见最聪明，对穆斯林来说也最为致命”，得到了卡斯蒂利亚国王的认同。阿拉伯史官表达了震惊，因为斐迪南随后对巴布狄尔以礼相待，“带着极大的尊重与爱意和他会谈，不允许他亲吻自己的手，而是与他热情拥抱，并称他为自己的朋友”。^[36]

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又一次表现出他们改变他人的意志和笼络人心的独特本领。巴布狄尔受到了父亲的虐待，而斐迪南对这位被母亲宠坏的年轻王子表现出极大的礼貌。为了确保巴布狄尔的获释，他的母亲法蒂玛给斐迪南送来“巨额”赎金，斐迪南接受了。巴布狄尔则宣誓臣服于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并承诺每年奉上大笔贡金。他还答应释放300名基督徒俘虏。^[37]

王子被俘又被赎回的消息在格拉纳达引发了喜悦的欢呼，也让一些人担忧。魅力十足的年轻王子回家了，但他的人民现在开始怀疑他们对他们以及祖国事业的忠诚。他的父亲则对他十分轻蔑，因为儿子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居然臣服于敌人。混乱的内战再次爆发。

但阿布·哈桑疾病缠身，很快就病倒，不得不退位，将王位交给了弟弟，备受尊重的撒加尔。阿布·哈桑离开了格拉纳达，退隐了，把年轻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带走，不久之后去世了。索拉娅很快恢复了自己童年的名字伊莎贝拉，重新皈依基督教，给自己的两个儿子改名为格拉纳达的斐迪南（以纪念斐迪南国王）和格拉纳达的胡安（以纪念胡安王子）。几年后，母子三人就生活在伊莎贝拉女王的宫廷，参加基督教的仪式。

但阿布·哈桑的死让撒加尔和他的侄子巴布狄尔之间发生了直接的竞争。继承危机削弱了埃米尔国的力量。领导层如此混乱，从此战局就转为对基督徒有利。伊莎贝拉稳步赢得了一连串胜利，尽管她的很多进展付出了昂贵代价，包括金钱和生命的代价。

1484年6月，卡斯蒂利亚人征服了阿洛拉镇。阿莱曼的木刻画记载了这个事件，并且表现出西班牙人越来越善战。画中，要塞城墙被炮击严重损毁。猛烈炮火现在变成了他们的攻击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墙倾塌之后，守军只能投降。木刻画描绘了要塞司令跪在斐迪南面

前、呈上城门钥匙的场面。穆斯林的表情很惊愕，西班牙人则很严肃。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塞维利亚过冬，筹划下一步行动。次年夏季，他们攻打并占领了科因和卡尔塔马，然后转向格拉纳达最难对付的目标之一——龙达，它坐落在一座高高的台地之上，四面全是陡峭岩壁。一个聪明的计谋为西班牙人赢得了胜利。斐迪南佯攻港口城市马拉加，格拉纳达人匆匆将可以动用的兵力调往那个方向，以保卫他们与外界的重要联系纽带。同时，加的斯侯爵率军快速返回龙达，在守军得到增援之前猛烈攻城。卡斯蒂利亚人围攻和炮击龙达，切断了它的水源。

消耗战持续了两周。苏里塔写道，龙达“由国内许多最勇敢的穆斯林守卫，所有摩尔人都是英勇的战士”。战斗昼夜不息，最终穆斯林战士“被希望投降的妇孺的哀求和哭泣所感动”，开始询问和平条件。^[38]卡斯蒂利亚人于1485年5月22日占领龙达。

这次胜利对伊莎贝拉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攻克了龙达之后，有约400名被关押在那里的基督徒奴隶得到解放。其中一些人还是从萨阿拉被掳来的。他们身体虚弱，饥肠辘辘，需要慢慢调养以恢复健康。伊莎贝拉女王命令将这些人曾佩戴的沉重枷锁用大车运往托莱多，悬挂在她的圣约翰王家修道院外墙上，以提醒信众，基督徒曾受到怎样的折磨。

龙达居民被允许留在家中。市政领导人被要求向卡斯蒂利亚宣誓效忠，向卡斯蒂利亚王室缴纳税金（数额与以前缴给纳斯尔王朝的相同），并且如果得到命令，要出兵为卡斯蒂利亚王室作战。斐迪南国王承诺不干预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并允许他们根据伊斯兰教法解决自己的争端。

此后，卡斯蒂利亚人进军港口城市马贝拉，它迅速投降。事实上，在斐迪南国王驾到之前，该城的顶级官员就与他取得联系，请求允许他们成为西班牙两位君主的臣民，或者乘坐斐迪南提供的船只，去往“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39]。阿莱曼的木刻画表现了马贝拉的投降，画中有一名穆斯林士兵改换了阵营，向接近城门的卡斯蒂利亚人提供帮助和建议。

控制龙达和马贝拉之后，两位君主决定，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一段时间了。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在卡斯蒂利亚过冬，具体地点是马德里附近的埃纳雷斯堡。1486年1月16日，凯瑟琳公主，也就是未来的“阿拉贡的凯瑟琳”，出生了。伊莎贝拉女王因为产后感染，有一段时间没有参与战事。但斐迪南于5月13日黎明动身，再次远征格拉纳达。他显然没有具体的进攻计划，而是尽快前进，打算捕捉有利机遇。伊莎贝拉有时不确定他的位置，有一次在信中写道“不知你在何处攻城略地”。^[40]

斐迪南率军南下，奔向安达卢西亚。他渡过了科尔多瓦附近的耶瓜斯河，稍事停留以接收整个半岛给他送来的物资。加的斯侯爵也来了，带来了更多增援部队。斐迪南在此地得知，巴布狄尔尽管曾宣誓效忠于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还是与撒加达成了谅解，正在谋划攻击基督徒。撒加尔和巴布狄尔瓜分了格拉纳达的各城市，弥合了分歧。

夜间，斐迪南召集贵族开会，商议如何行动。按照加的斯侯爵的建议，他们决定再一次尝试攻打洛哈，也就是四年前他们失败的地方。此时防守洛哈的是巴布狄尔本人。作为先期准备工作，西班牙人先攻打并占领了洛哈附近的伊略拉、莫克林、蒙特夫里奥和科洛梅拉。参与这些军事行动的有西班牙贵族，也有一些来自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新来者。一个叫斯凯尔斯勋爵的人带来了一队英格兰士兵，个个踌躇满志。

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女王辞别的时候，女王写信给他，刻意照顾他的骄傲，夸张地对他表示礼貌和恭敬。她有一次提议，允许巴布狄尔占据巴萨和瓜迪斯这两座要塞（正被撒加尔控制），以换取他交出洛哈，但随后非常刻意地纠正自己并道歉：“请原谅你的夫人，因为我并不懂这些事情。”^[41]

5月28日，星期天，西班牙军队开始炮击洛哈。在场的彼得·马特写道，斐迪南的攻势非常凌厉。炮击很猛烈，但时间不长。编年史家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说，炮击只持续了一天两晚，巴布狄尔就献城投降。

在洛哈战役期间，伊莎贝拉的公众形象是非常刻意的宗教虔诚。她花了几天几夜时间祈祷和斋戒，请求上帝赐予胜利；同时她在为丈夫和其他军人的命运而担忧。卡斯蒂利亚人占领洛哈之后，她很快来到军中。

巴布狄尔又一次落入他们手中。他再次请求释放他，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再次同意，尽管他曾宣誓臣服后来又食言了。到此时，已经很明显，对两位君主来说，让巴布狄尔回到格拉纳达制造内乱的价值比关押着他要大得多。为了换取自由，巴布狄尔与伊莎贝拉女王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与她之前向斐迪南国王提议的很类似。她承诺支持他发动政变，反对他的叔叔。

在洛哈，战局发生了非常显而易见的转变，伊莎贝拉开始沉思起来，她于5月30日写信给斐迪南，“圣母赐予我们胜利，给了我们这座城镇。愿天主将这胜利维持下去”，并说此次胜利“非常了不起”。但生命的损失让她不安。“摩尔人为了保卫洛哈而死，我们的人也有死亡，”她写道，“……这些死亡让我心情沉重。”^[42]

但她不能优柔寡断。两位君主继续向伊略拉、莫克林和蒙特夫里奥推进，这些城镇都已投降。根据阿莱曼的木刻画，女王带着六岁的胡安娜公主进入莫克林，接受其投降。图中，伊莎贝拉和女儿周围有红衣主教门多萨和几名少年侍从陪伴。女王和孩子骑在马背上，走进一个混乱而令人恐惧的场景。图中描绘了一座因为被臼炮击中爆炸而燃烧的塔楼。据编年史家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说，臼炮的炮弹点燃了穆斯林的火药桶。[\[43\]](#)

女王返回了科尔多瓦，为斐迪南国王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欢迎庆典。他于四天后抵达科尔多瓦。1486年的战役就这样结束了。

* * *

这年冬天，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待在萨拉曼卡。冬去春来，新的作战季节开始，他们又回到了科尔多瓦的大本营。春季，巴布狄尔兑现承诺，发动了政变。1487年4月7日，斐迪南攻打贝莱斯—马拉加（关键港口马拉加附近的一座城镇）。正面交锋之后，那里的穆斯林军队于4月27日投降。撒加尔率军从格拉纳达出发，去保卫贝莱斯—马拉加。但他前脚刚走，巴布狄尔就控制了都城。这对撒加尔来说是一记沉重打击。他看到保卫贝莱斯—马拉加和返回格拉纳达都没有意义，于是率军前往瓜迪斯。就这样，格拉纳达的军队被永久性地分割为两块，首尾不能相顾。

巴布狄尔之所以能够驱逐自己的叔叔，是因为他和伊莎贝拉女王的秘密协定。他曾写信给她，解释自己有机会颠覆撒加尔，但需要军队、武器和补给物资。伊莎贝拉派了自己的儿时好友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去支援巴布狄尔。他们一同将撒加尔堵在格拉纳达之外，巴布狄尔被宣布为国王。4月29日，巴布狄尔写信给伊莎贝拉女王，宣布自己战胜了叔叔，并确认自己在洛哈向她发下的效忠誓言。他还与她达成了一项新协议，按照她的建议，“在合适的时候，

将格拉纳达交给她，以换取王国东部的一些地方，而那些地方目前是忠于撒加尔的”^[44]。据历史学家L. P. 哈维说，几乎可以肯定此时他是“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秘密盟友。^[45]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随后奔向下一个富饶的目标，即海港和要塞城市马拉加。他们知道，这将是本次战争最重要的战役，因为这个海港是格拉纳达的穆斯林与地中海其他地区的穆斯林之间的关键联系纽带。马拉加可能也是最难对付的单一目标，因为它包含三座要塞。如果他们能占领马拉加，那么内陆城市格拉纳达就是瓮中之鳖了。斐迪南于5月6日抵达马拉加，伊莎贝拉两周后抵达。当时有报告称，马拉加爆发了瘟疫。女王在此刻赶到，足以证明她夺取这座港口城市的坚定决心。两位君主在城门外建立了帐篷营地。

首先他们尝试劝降，之前有不少摩尔人城镇是这样投降的。他们发出警告，如果穆斯林不投降，就会被奴役。撒加尔已经离开了前线，所以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告诉守军，他们不大可能得到格拉纳达其他穆斯林的支持。但守军坚决拒绝谈判。于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对城市开始了严密的包围封锁，打算用饥饿迫使居民屈服。

炮击开始了。城市被围攻了漫长的三个月。粮食越来越少，居民开始饿死。卡斯蒂利亚军队的士气也低落下去，有士兵逃跑。马拉加的穆斯林指挥官威胁，如果卡斯蒂利亚人不撤军，他就杀死城内的600名基督徒俘虏。斐迪南的答复是，如果基督徒奴隶受到伤害，他就“把西班牙的穆斯林杀个精光”。^[46]城市最后投降了，但残酷的战斗让两位君主变得铁石心肠，对居民施加了惩罚。

马拉加的所有幸存居民都成为国王和女王的财产。女奴被送给基督徒贵妇。教皇获赠100名奴隶。红衣主教门多萨得到70名。马拉加的犹太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财产，但必须缴纳约1万金卡斯特亚诺^[47]的赎金，否则将被强制迁走。大法官和拉比亚伯拉罕·塞尼奥尔（伊莎

贝拉儿时在塞哥维亚的朋友）筹集并支付了所有犹太人的赎金。没有人愿意帮穆斯林付赎金。被俘的大约5000人中，约4000人成为奴隶。[\[48\]](#)清真寺被改为教堂。600名基督徒俘虏和龙达的奴隶一样憔悴干瘪，得到解放，获得食物，被悉心照料，恢复了健康。

马拉加失陷之后，格拉纳达西部完全属于卡斯蒂利亚人了，格拉纳达只有少数大城镇还在纳斯尔王朝统治下。瓜迪斯、巴萨和都城格拉纳达是王国内陆的重要城镇；阿尔梅里亚是格拉纳达的最后一个主要海港。

1488年，在斐迪南的国度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攻克了贝拉、贝莱斯—弗兰科和贝莱斯—鲁维奥。这一年，战事变得更紧迫，因为有消息传来，土耳其人又在大举出动，这一次有约10万陆军和505艘桨帆船的舰队。

下面一场大规模攻城战的目标是巴萨。1489年6月，卡斯蒂利亚军队抵达该城。这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鏖战。他们进展甚微，考虑撤军。斐迪南国王给正在哈恩的女王送去消息，征求她的意见。她坚持要求卡斯蒂利亚人坚持战斗，说她会想办法提供胜利所需的任何东西。她鼓励部队振作精神，想一想卡斯蒂利亚人越来越多的胜利，并坚信自己是在为上帝服务。“敌人还是原来的敌人，而且比以前弱了。”她告诉丈夫和部队。她还承诺，要不断祈祷，恳求上帝始终支持他们。这些话语振奋和鼓舞了部队。彼得·马特写道：“于是我们站稳了脚跟。”他的意思是他们不会退缩，不会放弃攻城战。[\[49\]](#)

到1489年，驻扎在巴萨周围的卡斯蒂利亚军队已经变成了一支凝聚力极强的力量，部队内部的和谐团结与昂扬斗志显而易见。士兵来自西班牙的所有不同地区，包括阿斯图里亚斯、加利西亚、巴斯克地区、埃斯特雷马杜拉，还有卡斯蒂利亚人和阿拉贡人。他们的方言各不相同，但他们融洽得让人惊讶，由一种共同的公共使命感团结起

来。他们在凝聚成一个民族，在一面宗教大旗下组织起来。马特对米兰红衣主教乔万尼·阿钦博尔多说：“语言、风俗、习惯五花八门的8万步兵和1.5万骑兵，竟然如此团结融洽，真是难以置信。人们对王室的威严如此尊重，以至于一直到今天，没有发生任何骚乱；没有偷盗行为；没有拦路抢劫的匪徒；没有私人争吵。不过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坏事，肇事者必然遭到严厉惩戒，以儆效尤。”^[50]

严明的军纪让这位人文主义学者想起了古希腊人。他写道：“所有这些不知姓名的军人，聚集在同一个营地，英勇作战，服从长官和统帅的命令，你会以为他们是在同一座房子里长大的，说同一种语言，服从同一种纪律。你会觉得我们的军营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蓝本建立起来的。”^[51]

1489年秋季，伊莎贝拉女王从哈恩去往附近的城镇乌韦达，那里距离巴萨很近，她能够监督前线战事。11月，她决定亲自去巴萨，就像她之前去马拉加一样，鼓舞士气。她的到来令摩尔人的抵抗开始瓦解。她以隆重的排场抵达，陪在她身边的是她年纪最大的孩子，十九岁的伊莎贝拉公主。伊莎贝拉女王到场后，巴萨的领导和居民相信，投降条件一定会比较仁慈，也一定会得到很好的遵守。他们很快与她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城内的精英阶层保留自己的财产并离去，而普通市民被允许按照自己的风俗继续生活。

根据协议，巴萨的穆斯林士兵得到金钱，帮助卡斯蒂利亚人攻打撒加尔的剩余要塞。巴萨的主要领导人西迪·叶海亚去了瓜迪斯，找到住在那里的撒加尔，劝服他，抵抗是毫无意义的。12月22日，撒加尔拱手交出了港口城市阿尔梅里亚，并于12月30日交出了瓜迪斯。他以2万卡斯蒂利亚诺的价钱卖掉了自己在安达卢西亚的全部私产，然后去北非定居。阿拉伯史料说他这么做是为了激怒他的侄子巴布狄尔。据努布达特·阿斯尔说：

很多人说，撒加爾及其将领把他们曾统治的核心村庄和地区卖给了卡斯蒂利亚的统治者，并拿到了钱。他这么做是为了向侄子以及他的那些留在格拉纳达城的将领报复……那些人的统治区域只剩下了格拉纳达城，与敌人达成了停战协定。他这么做是为了将格拉纳达切断，像摧毁国家的其他地区一样，毁掉那座城市。^[52]

阿尔梅里亚的投降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格拉纳达城与整个南海岸之间的联系都被切断了，纳斯尔王朝丧失了最后一个出海口，也就失去了从海上获得增援的途径。斐迪南国王、伊莎贝拉女王和伊莎贝拉公主都参加了阿尔梅里亚城的正式投降仪式。阿莱曼的木刻画上有一个戴头巾、蓄着大胡子的人，可能就是撒加爾，他在斐迪南国王面前，几乎跪下来，亲吻国王的脚。同时，在城门上方，一位穆斯林举起双手，要么是表示欢迎，要么是在哀哭。^[53]

1489年的系列事件，尤其是巴萨攻城战和伊莎贝拉在其投降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我们今天玩的一种游戏也留下了长期性的影响。当时象棋在西班牙非常流行，巴萨战役不久之后，女王就成了棋盘上最强大的一个棋子，能够向所有方向远距离移动；她的任务是保护和捍卫棋盘上的关键棋子——国王。在伊莎贝拉出生以前，某些版本的象棋中就有女王的角色，但到这个时期，发明于印度的象棋经历了彻头彻尾的演化，女王变成了一个主宰性的棋子。象棋的变化被大约1496年于萨拉曼卡出版的一本关于象棋新规则的流行书籍记录下来。该书的作者是拉米雷斯·德·卢塞纳。将当时的象棋称为“女王的戏”，而女王的新功能是可以“任意移动，只要她的路径是敞开的”。^[54]伊莎贝拉女王成了战争游戏中一个强有力的角色，因而流芳千古。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最近的胜利对彻底完成“收复失地”是至关重要的。到1492年，纳斯尔王朝已经灭亡，但战争尚未结束。1490年和1491年，两位君主开始围攻格拉纳达的都城。穆斯林希望，入冬之

后，西班牙人会撤军以躲避严寒，但这些希望落空了，因为格拉纳达人看到西班牙人正在格拉纳达城外建造一个永久性驻军城镇，并将其命名为圣菲（意思是“神圣信仰”）。虽然希望渺茫，格拉纳达人还在坚守。城内开始有人饿死，形势越来越绝望。

战役的最后一年，1491年，持续不断发生小规模交锋，穆斯林努力寻找办法来打击攻城者。巴布狄尔如今是格拉纳达的埃米尔，我们对他具体起到什么作用不太了解。他曾承诺要将格拉纳达交给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但现在他的末日快到了，他似乎处于麻木状态。一群最显赫的格拉纳达贵族、神职人员和权贵与他会面，指出埃米尔国的绝望处境、粮食匮乏和最强大武士的牺牲，已经无人能够继续战斗。海外也没有救援的希望。这个代表团说道：“我们已经向居住在大海对面的马格里布^[55]的穆斯林兄弟求救，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我们，也没有起兵援救我们。”^[56]

巴布狄尔命令他们自己讨论这个问题并提出建议。城市长老们决定派遣一位使者去见西班牙的两位君主，请求和谈。巴布狄尔同意了。今天的许多学者相信，巴布狄尔此时已经与卡斯蒂利亚人达成了秘密协定，但害怕如果被自己的臣民知道，他会丧命。他将开启和谈的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让他们分担这些责任。

到此时，巴布狄尔似乎主要是在考虑自己的私利。在与卡斯蒂利亚人（代表是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他的阿拉伯语很流利）的谈判中，巴布狄尔要求对他个人做出保障：“告诉我，国王和女王能否确切保证，让我拥有阿普哈拉斯^[57]？这是我们谈判的第一条。国王和女王能否保证兑现诺言，把我当作一位亲戚？”^[58]

据说贡萨洛的回答是：“殿下，只要您一直为两位陛下效力，他们就会信守诺言，保证给您的土地。”^[59]换句话说，巴布狄尔必须永久性臣服于伊莎贝拉和斐迪南。

据哈维的说法，最终的和谈其实取决于巴布狄尔和西班牙的两位君主之间的“私人的秘密谅解”。于是，格拉纳达投降了。

广泛流传的公开协定允许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继续居住在自己的家园，保留自己的财产，遵照自己的伊斯兰教法行事；他们需在三年内离开西班牙去北非，路费由卡斯蒂利亚承担。穆斯林被允许保留自己的信仰，不会被强迫改信基督教。穆斯林在投降时必须释放他们的基督徒奴隶。基督徒被禁止进入清真寺。

有两个条款适用于居住在纳斯尔王国内的犹太人。他们被禁止征税或者对穆斯林行使任何权力。穆斯林获得的权益也适用于居住在格拉纳达的犹太人，为期三年。期满之后，若犹太人不改信基督教，就必须迁往北非。

根据此项协定，阿兰布拉宫^[60]将于1月6日（基督教的主显节）被交给基督徒，以纪念东方三博士^[61]给婴儿基督献上礼物的日子。但巴布狄尔建议加快领土交接，因为格拉纳达居民因为丧失家园而骚动不安。于是他们把交接日期提前，用哈维的话说，巴布狄尔得到了“恰当的书面收据”，确认这笔交易业已完成。^[62]

于是，在1492年年初，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终于占领了格拉纳达都城。1月2日，在庆典上，巴布狄尔将城门钥匙交出。两位君主在十四岁的胡安王子陪同下，走进大门。苏里塔回忆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欢庆和幸福的日子”。^[63]考虑到当时的环境，他们入城时非常宁静安详，这有些令人惊讶。巴布狄尔已经将自己的儿子送给他们当人质，以确保城市被和平地交给卡斯蒂利亚人。城市顺利交接之后，巴布狄尔的儿子被送回家人身边。^[64]十字架和卡斯蒂利亚旗帜被安插在要塞的制高点，神父们唱起赞美诗，举行弥撒。

巴布狄尔就这样拱手交出了自己从祖辈继承下来的产业。他离开时经过了一座后来被称为叹息桥的桥梁。据说他那曾经无比骄傲的母亲跟在他脚边，训斥他丢掉了祖先的土地，没能传给后人。撒加爾已经去了北非；巴布狄尔不久之后也去了。西班牙的两位君主显然希望他离开，尽管他们在受降时曾保证他在西班牙占有的土地。就这样，他凄凉地生活在西班牙主宰之下。据信他死于非斯。他们的后宫佳丽命运如何，无人知晓。

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及其儿女来说，占领这座城市是一个震撼人心的事件。格拉纳达的美丽的阿兰布拉宫，即纳斯尔王朝的摩尔人建造的宫殿，让两位君主颇为惊艳。他们心怀震撼，徘徊在宫殿的小径和花园内，欣赏旖旎风光，观看流水般的阿拉伯文字。宫殿的墙上铭刻着阿拉伯文的诗歌和神圣律法。伊莎贝拉注意到，其中一条铭文不断重现：唯有真主是胜利者（或：唯有真主全能）。[65]

宫殿规模极大，令游客肃然起敬。宫内到处是穆斯林主宰伊比利亚半岛时期留下的符号印迹。一位目击者说，在宫殿中央，他们发现了十七面卡斯蒂利亚旗帜，每一面都代表穆斯林战胜基督徒军队的一次胜利。其中一名旗帜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66]他们还得知，这座童话般的宫殿，是由基督徒奴隶的血汗建成的。

还有一个发现让卡斯蒂利亚人毛骨悚然。附近的一群洞穴曾被用作监牢，很多犯人在围城战期间就被活活饿死。德意志旅行家希罗尼穆斯·闵采尔几年后参观了阿兰布拉宫。他说，他得知，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抵达时，城内原先的7000名基督徒奴隶只剩下1500人。幸存的奴隶憔悴不堪、满身污秽地出现了。

其中约有750人已经濒临死亡。他们离开地牢的时候，唱歌赞颂救世主耶稣。他们拜倒在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脚下，哭泣着、呼喊着表达感恩。足足用了两辆大车，才将他们原先佩戴的枷锁运走。

大多数奴隶虽然处境艰难，还是保留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伊莎贝拉询问一位被关押了四十四年的干瘪的俘虏，他能支撑下来，是不是靠信仰：“在你囚徒生涯的最初几年，如果有人告诉你，耶稣基督没有出生并成为你的救赎者，你会怎么想？”这人答道：“我会痛苦而死。”^[67]

九名基督徒俘虏（两个伦巴底人和七个卡斯蒂利亚人）背弃了基督教，成为穆斯林。这种异端和叛教行为罪大恶极，不能饶恕，于是国王命令将他们处死。他们遭到殴打，然后被处以火刑。这是对异端罪的常见惩罚。

击败格拉纳达的胜利为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在全欧洲赢得了赫赫威名，因为这是几百年来基督教针对伊斯兰教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对很多欧洲人来说，这算是给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报了一点仇。苏里塔写道：“征服格拉纳达之后，永久和平降临了。基督教世界各国都颂扬和讴歌这次胜利。消息一直传播到土耳其人和苏丹的最遥远土地……面对这样野蛮和凶残的民族，这样的敌人和异教徒，持续不断而残酷无情的战争延续了数百年。如今，战争结束了。”^[68]

斐迪南迅速采取行动，确保这次伟大胜利的功劳全是他的。就在占领格拉纳达的这一天，他兴高采烈地写信给威尼斯的统治者：“我希望你们知道，在许多辛劳、代价、死亡和我们的臣民流了许多血之后，于1492年1月2日，上帝赐予我彻底的胜利，消灭了格拉纳达王国和我们天主教信仰的敌人。……从此之后你们拥有了一个天主教国度。”^[69]

除了阿莱曼的54幅纪念战争的唱诗班木刻画之外，还有另外一套艺术作品纪念了这场胜利，即格拉纳达王家小教堂的祭坛装饰画。其中包括描绘穆斯林投降的木刻画，由同时代人记录了1492年1月的这个日子。有一幅木刻画表现的是伊莎贝拉和斐迪南骑马进入格拉纳达；

她的衣服遮盖全身，只露出脸。她的习惯入乡随俗，所以此处她的服饰类似布卡^[70]，不过戴着一顶宽檐帽。她甚至在帽子上戴了面纱，以遮蔽脖子。

在另一幅木刻画中，巴布狄尔走到国王和女王面前，献上格拉纳达的城门钥匙。长长的一队基督徒俘虏从他身后的要塞散乱地走出来。第三幅木刻画表现的是穆斯林在一座喷泉处接受洗礼。第四幅是浑身遮得严严实实的穆斯林妇女接受洗礼，隔着厚重的面纱还可以看得到她们悲伤的眼睛。

很显然，将这个新省份融入西班牙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但西班牙的两位君主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负责宗教监督与控制的机构。它已经严阵以待，去镇压穆斯林。

[1] Salma Khadra Jayyusi, ed., *The Legacy of Muslim Spain* (Leiden: Brill, 1994), p.1: 83.

[2] 她又名阿伊莎，绰号“可敬的”，因为据说她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

[3] 严谨地讲，阿布·哈桑·阿里的正式头衔是埃米尔，但有时也被称为苏丹。

[4] José Antonio Conde,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Arabes en España, 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árabigas* (Madrid: Biblioteca de Historiadores Españoles, Marín y Compañía, 1874), p.309.

[5] José Antonio Conde,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Arabes en España, 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árabigas* (Madrid: Biblioteca de Historiadores Españoles, Marín y Compañía, 1874), p.309.

[6] 1086年事件是在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的凌厉攻势下，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诸侯招架不住，邀请北非的穆拉比特王朝出兵相助。10月23日，在萨

拉卡战役中，卡斯蒂利亚军队大败，“收复失地”运动停滞了几十年。1195年事件是7月18日的阿拉克斯战役中，穆斯林的穆瓦希德王朝（横跨北非与西班牙南部）军队大败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卡斯蒂利亚陷入动荡。

[7]. José Antonio Conde,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Arabes en España, 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árbigas* (Madrid: Biblioteca de Historiadores Españoles, Marín y Compañía, 1874) , p.310.

[8]. Peter Martyr, *Opus Epistolarum: 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ondon: Wellcome Library) , epistle 32, August 13, 1488.

[9]. L.P.Harvey, *Islamic Spain, 1250 to 15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p.268.

[10]. Alonso Fernández de Palencia, *Guerra de Granada* (Barcelona: Linkgua Ediciones, 2009) bk.1, pp.13-14.

[11]. Don Jose Antonio Conde,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Arabes en Espana: 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árbigas* (Madrid: Marin y Co., 1874) , p.310.

[12]. Don Jose Antonio Conde,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Arabes en Espana: 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árbigas* (Madrid: Marin y Co., 1874) , p.310.

[13]. Don Jose Antonio Conde,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Arabes en Espana: 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árbigas* (Madrid: Marin y Co., 1874) , p.310.

[14]. 安特克拉的斐迪南，即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一世（1380~1416），绰号“公正的斐迪南”“诚实的斐迪南”。1410年，在与格拉纳达的战争中，他征服了安特克拉城，因此得到另一个绰号“安特克拉的斐迪南”。

[15]. Condesa de Yebes, *La marquesa de Moya: la dama del descubrimiento, 1440-1511* (Madrid: Ediciones Cultura Hispánica, 1966) , p.58.

- [16]. Jerónimo Zurita, *Andes de Aragón*, vol. 8, p.406.
- [17]. Conde, p.310.
- [18]. 阿尔卡萨瓦 (Alcazaba) 源自阿拉伯语, 原指摩尔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造的一种设防工事。
- [19]. Palencia, *Guerra de Granada*, p.33.
- [20]. Hernando del Pulgar, *Crónica de Los Señore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de Castilla y de Aragón* (Valencia: Imprenta de Benito Monfort, 1780) , p.173.
- [21]. Zurita, *Anales de Aragón*, vol.8, pp.414-15.
- [22]. Zurita, *Anales de Aragón*, vol.8, pp.406-10.
- [23]. Harvey, *Islamic Spain*, p.268.
- [24]. Juan Maca Carriazo y Arroquia, *Los relieves de la guerra de Granada en la sillería del coro de la Catedral de Toledo* (Granad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1985) , p.33.
- [25]. Peggy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194.
- [26]. Harvey, *Islamic Spain*, p.273.
- [27]. Harvey, *Islamic Spain*, p.312.
- [28]. Jerónimo Münzer, *Viaje por España y Portugal, 1494-1495* (Madrid: Ediciones Polifemo, 1991) , pp.117-19.
- [29]. Harvey, *Islamic Spain*, p.309.
- [30]. Conde,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p.310.
- [31]. Conde,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p.311.
- [32]. 瓜迪斯为西班牙南部一城镇, 在格拉纳达城东北方。

[33]. Conde,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p.274.

[34]. “撒加尔”的意思是勇士。

[35]. “垂死高卢人”是17世纪在罗马郊区发掘出的一座古罗马大理石像，被认为是希腊化时期一座青铜像的复制品，其原作可能源自前230～前220年纪念安纳托利亚的希腊化统治者战胜高卢人（或凯尔特人）。

[36]. Conde,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p.313.

[37]. Conde,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p.312.

[38]. Conde,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p.315.

[39]. Conde,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p.288.

[40]. Isabella to Ferdinand, May 18, 1486, *Cartas autógrafa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e Espana, Don Fernando and Doña Isabel que conservan en el archivo de Simancas, 1474-1502*, ed. Amalia Prieto Cantara (Valladolid: 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 1971), letter 9, p.57.

[41]. Isabella to Ferdinand, May 18, 1486, *Cartas autógrafa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e Espana, Don Fernando and Doña Isabel que conservan en el archivo de Simancas, 1474-1502*, ed. Amalia Prieto Cantara (Valladolid: 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 1971), letter 9, p.57.

[42]. Isabella to Ferdinand, May 18, 1486, *Cartas autógrafa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e Espana, Don Fernando and Doña Isabel que conservan en el archivo de Simancas, 1474-1502*, ed. Amalia Prieto Cantara (Valladolid: 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 1971), letter 9, p.57.

[43].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Los relieves de la guerra de Granada*, p.58.

[44]. Liss, *Isabel the Queen*, p.216.

[45] Harvey, *Islamic Spain*, p.301.

[46] Liss, *Isabel the Queen*, p.218.

[47] 卡斯特亚诺是黄金重量单位，约合0.46克，亦为古金币名。

[48] Liss, *Isabel the Queen*, pp.219-20.

[49] Peter Martyr to Sforza, August 14, 1489, in Martyr, *Opus Epistolarum*.

[50] Peter Martyr to Sforza, August 14, 1489, in Martyr, *Opus Epistolarum*.

[51] Peter Martyr to Sforza, August 14, 1489, in Martyr, *Opus Epistolarum*.

[52] Harvey, *Islamic Spain*, p.301.

[53]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Los relieves de la guerra de Granada*, p.112.

[54] Marilyn Yalom, *Birth of the Chess Quee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5), p.195.

[55] 欧洲人称之为巴巴利，而阿拉伯人称之为马格里布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一带。

[56] Harvey, *Islamic Spain*, p.310.

[57] 阿普哈拉斯是安达卢西亚南部一地区。

[58] Harvey, *Islamic Spain*, p.312.

[59] Harvey, *Islamic Spain*, p.312.

[60] “阿兰布拉”的意思是“红色城堡”或“红宫”，是摩尔王朝时期修建的古代清真寺、宫殿和城堡建筑群。宫殿为原格拉纳达摩尔人国王所建，现在则是一处穆斯林建筑与文化博物馆。该宫城是伊斯兰教世俗建筑与园林建造技艺完

美结合的建筑名作，是阿拉伯式宫殿庭院建筑的优秀代表，1984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61] 原文为Magi，典出《新约·马太福音》第2章第1～12节的记载，在耶稣基督出生时，有来自东方的“博士”或“国王”或“术士”朝拜初生的耶稣。Magi指的很可能是来自帕提亚帝国的琐罗亚斯德教占星家。

[62] Harvey, *Islamic Spain*, p.322.

[63] Zurita, *Anales de Aragón*, vol. 8, p.602.

[64] Bernarndo Del Roi to Italy, January 7, 1492, cited in Arnold Harris Mathew, *The Diary of John Burchard of Strasburg* (London: Francis Griffiths, 1910), pp.1: 407-8.

[65] Hieronymus Münzer, *Viaje por España y Portugal* (Granada: Asociación Cultural Hispano Alemana, 1981), pp.19-20.

[66] Mathew, *Diary of Burchard*, pp.1: 407-8.

[67] Münzer, *Viaje por España y Portugal*, p.95.

[68] Zurita, *Anales de Aragón*, vol. 8, p.603.

[69] Mathew, *Diary of Burchard*, pp.1: 317-18.

[70] 布卡是伊斯兰教传统中女性在公众场合用以掩盖面部和身体的罩袍。

十四 异端裁判所的建立者

这些岁月里，所有人心中都充满宗教仇恨，穆斯林和基督徒在西班牙与东欧兵戎相见。双方都自我辩护，称自己的行动是为了敬奉神。伊莎贝拉女王建立了一个教会与政府合作的机构，称为异端裁判所。

异端裁判所的镇压对象是那些正式自称为基督徒，但其行为让其他人怀疑他们的信仰不真诚的人。伊莎贝拉在世时，异端裁判所的主要迫害对象是改宗犹太人，即公开皈依基督教、自称为基督徒的犹太人。起初，穆斯林和犹太人并不是异端裁判所的目标。它的任务是揭露不诚心的伪基督徒，对其加以矫正；如果他们不思悔改，就会被处以火刑，这是对异端罪的传统刑罚。但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后来觉得，他们国境内的犹太人会诱导改宗犹太人，于是决定强迫西班牙的所有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不接受洗礼的犹太人被驱逐出境。后来，穆斯林也遭到迫害，尽管两位君主在接受格拉纳达投降时曾特别承诺，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信仰。上述的两项政策都让心不甘情不愿的基督徒越来越多，他们将受到异端裁判所的审判。

我们知道，女王于1477年在塞维利亚的时候，第一次考虑建立异端裁判所。她于1480年，也就是土耳其人占领奥特朗托、西班牙与格拉纳达的战争即将爆发的那年，正式建立了异端裁判所。她这么做其实并不非常情愿，而是受到塞维利亚和其他地方的教士的强烈敦促。教士们告诉她，安达卢西亚的改宗犹太人当中异端蔓延，危害人的灵

魂，并且损害了国家安全。因此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的起源部分是由于战时的紧张气氛，因为在这个时期，人们互相猜忌，不可靠的忠诚比平时更难以得到宽容。但事实证明异端裁判所是一种政府压迫与控制人民的极其有效的工具，所以它作为一个机构，存在了三百多年。历代君主因此得到了一种方便的手段，去镇压敌人，并惩罚主流社会不认可的种种“不和谐”行为。

它的最早一批牺牲品是犹太人出身的基督徒，他们仍然遵守一些犹太教的习俗，这被称为“犹太化”，所以很难判断他们是否真诚地皈依了基督教。但后来，同性恋者、穆斯林出身的人、新教徒、离婚的人，全都受到同样的审查。反政府人士或者被指控有各种不合常规思想的人，也都成为异端裁判所的猎物。

不过，西班牙异端裁判所（也称宗教法庭）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因为他们相信，这种机构是有必要存在的。在多年内乱和动荡之后，很多人看到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并且在消灭社会不和谐现象，感到很高兴。西班牙人渐渐变得非常珍视宗教正统。偏执的人，甚至心胸狭隘和书生气的普通人，是异端裁判所最热忱的拥护者。它的牺牲品或潜在牺牲品，对它既恨又怕。用历史学家亨利·卡门的话说，它成了“西班牙土地上一种标准的现象”。^[1]

没有人能说得准，伊莎贝拉在建立异端裁判所的时候，究竟是怎么想的。也没有人能说得准，究竟有多少人受到了它的影响。研究异端裁判所的学者常常带入了自己的偏见。异端裁判所常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以至于真相和大家的观感已经混为一谈，难以厘清。英格兰的宣传家以异端裁判所的存在为证据，称自己的王国在道德上比西班牙优越，尽管英格兰政府也在残酷地镇压国内的宗教少数派。据说奥斯曼苏丹巴耶济德二世曾严厉谴责异端裁判所，尽管不久前奥斯曼帝国屠杀了数万名自己国内的异端分子，即那些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一

种神秘主义的苏非派别而不信政府规定的逊尼派教义的人。换句话说，宗教压迫不是什么新鲜事，也绝不是西班牙独有的。

近几十年来，数百名学者仔细研读了异端裁判所留存至今的文献残篇。历史学家曾相信，被火刑处死的人数量极多，但近期的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学术界对实际死亡人数的估计大大缩小了。数十万人被异端裁判所处死的说法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但毋庸置疑的是，伊莎贝拉在位期间，有很多人被火刑处死，可能至少有1000人，或者多达2000人。例如，在宗教首都托莱多，伊莎贝拉在世期间，宗教法官处死了168人。^[2]该地区有约85人受审但最后被无罪释放。还有120人被缺席审判，因为他们已经逃亡或者死去。死亡数字之所以能够判断，是因为宗教法官常常运用异端裁判所的文献机制为证据，审判那些已经过世的人，然后焚烧死者的骨骸。逃跑的人会被缺席审判，然后会制作他们的肖像并烧毁，就像伊莎贝拉的两兄弟争夺王位期间，在阿维拉，恩里克四世国王的木偶般的肖像被象征性地废黜一样。在那个时代，用蜡、木料或布制作的人像被认为具有仪式上的意义。

西班牙异端裁判所不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原创的新主意。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大部分阶段，在政教分离的概念被发明之前，政府和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在大多数文化中，反对宗教教义，就等同于挑战政治权威。因此异端裁判所作为一种机构，有很深的根源和早就规定好的规则，只不过西班牙人为其引入了一些创新的特点。

异端裁判所的指导原则是，不遵守宗教与政治常规等于叛国。在伊莎贝拉的时代，教会和国家是一体的，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力是融合起来的。对宗教正统的威胁，就是对政治统治集团的威胁。君主们相信，他们之所以登上王位，是因为上帝的意志。质疑上帝，就等于是

质疑君主的政治合法性。另外，国王和女王也要负责监管臣民的生活和灵魂。国王和女王若不能铲除异端，他们自己的灵魂也有危险。

异端裁判所这个词（inquisition）源自拉丁语inquisitio，字面意思是“调查”。西班牙异端裁判所遵循的是特定的罗马法。例如，罗马人允许刑讯逼供，因为他们相信大多数罪犯不会主动承认自己的罪行，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受罚。但罗马人知道，刑讯得来的口供往往不可靠，因此他们要求官员在获得供词之后还要从嫌疑人那里得到说明，证实嫌疑人的供词是在刑讯之下得来的。罗马皇帝们发现刑讯逼供是达到他们自己目的的有效办法。历史学家卢·安·霍姆扎写道，在后来的岁月里，“刑讯逼供的做法也变得更普遍……尤其在叛国案中”。^[3]刑讯逼供在西班牙也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执法手段：受害者被处以水刑（口中被泼入大量的水，使其有被溺死的痛苦感觉），或者被吊在房梁上，使肩膀脱臼。

一些国王和教皇曾用异端裁判的手段来镇压各种各样的异端分子。火刑则是对异端分子的传统刑罚。例如圣女贞德因为女扮男装，被判违背了教会的规矩，于是被烧死。西班牙人收复格拉纳达时发现的九名改信伊斯兰教的前基督徒被认为是叛教者，于是被判死刑。

在伊莎贝拉时代之前规模最大的一次镇压异端的事件发生在12世纪初到14世纪初，迫害对象是西欧流行的一种基督教分裂派别，称为清洁派。清洁派不遵守教会正统的表现是，他们允许女性成为教会领袖，批评梵蒂冈与教会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并遵循一种特别的使得他们非常瘦的饮食规矩。他们说，他们的信仰让他们非常特别；他们自称“完美者”。1234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对清洁派进行镇压，并处死不肯放弃自己信念的人。仅在1244年3月的一天，法兰西就有约两百名清洁派成员被烧死。那些不愿意为了自己的非正统思想牺牲的人假装改过自新，转入地下。

那个时代没有“疑罪从无”的原则。嫌疑人被简单地推断有罪。在这次宗教镇压之下，那些被指控有非正统行为但认罪的人得到了原谅，但还是受到了一些惩罚：他们被强迫戴一顶尖顶帽或穿特殊的衬衫，或者被强迫光着脚或裸体行走，或者以其他方式表示悔罪。那些认罪之后又恢复原先异端思想的人，会被处以死刑。

异端裁判所的体制鼓励人们互相检举揭发。告密者可以匿名揭发思想可疑的人。被揭发者的一些貌似无辜的行为可能被人指控是对基督教信仰不真诚，比如避免吃猪肉、在犹太教的安息日穿干净衣服，或者在犹太教的节日点蜡烛。事实证明，很多人愿意秘密告发自己的朋友、雇主和熟人。恣意检举他人而无须承担个人风险，这让人性最丑恶的一面暴露了出来。

根据这些检举，很多人被投入监狱，有的遭到毒刑拷打，直到认罪。如果他们真心实意地认罪，那么可能逃过死刑，得到有限的惩罚。但如果他们故态复萌或者他们的异端思想被认为是冥顽不灵的，那么教会官员会将他们交给政府官员，由后者执行死刑。

这样惨无人道的不公，如何在西班牙猛烈地爆发出来？这个复杂而自相矛盾的问题的答案，要追溯到基督教的起源。耶稣的教导是基督教的基础，但他自己是个犹太人。他在犹太地区被罗马官员处死，犹太人的领袖默许了罗马人的行动，因为他们可能害怕他不合常规的传道会给他们惹上麻烦，得罪统治他们的罗马人；也可能他们认为耶稣的行为挑战了他们自己的权威。关于这些事件，世俗历史的记载极少，但它们对基督徒来说是一项核心信条。

1世纪的犹太人有很好的理由对罗马人感到担忧，并努力用自己的办法来维持秩序，因为耶稣去世几十年后，犹太人因为另一次叛乱而被从犹太家园驱逐出去。一些犹太人迁往西班牙，这是罗马帝国的一

个重要部分，此时已经有一些犹太人在那里安家落户了。到伊莎贝拉的时代，一些犹太人家族在伊比利亚半岛已经生活了1500多年。

希伯来历史学家和金融家以撒·阿布拉瓦内尔是异端裁判所时期伊比利亚半岛最有影响的犹太人之一。他写道，他的家族在以色列的第二圣殿^[4]时期就生活在塞维利亚了。^[5]第二圣殿于公元70年被摧毁之后，更多犹太人来到伊比利亚半岛。据一位学者记载，在“烈火将美丽的耶路撒冷化为灰烬”之后的时期，有的犹太人去了巴比伦，有的去了埃及，但“最显赫的家族去了西班牙，其中有便雅悯和犹大支派的残部，大卫王家族的后裔”。^[6]事实上，作为敬语的“堂”可能源自希伯来语的“adon”一词，意思是“君主或主人”，不过也有人说“堂”的词源是拉丁语dominus（主人）。

背井离乡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西班牙繁荣昌盛起来，有些犹太人成为多个文化领域（包括哲学、医学、文学、天文学和科学）的伟大学者。罗马帝国灭亡后，他们在西哥特人统治时期经历了一个受压迫的时代，但并没有被逐出自己几百年来的家园。他们与穆斯林结盟，得以维持舒适的生活，于约公元1000年前后，在高度文明的科尔多瓦达到了一个文化巅峰。很多犹太人说阿拉伯语，越来越习惯阿拉伯人的风俗。但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亲密关系使得基督徒非常猜疑他们，因为西班牙的天主教徒还保留着这样的文化记忆：犹太人曾帮助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半岛。

在伊斯兰教主宰伊比利亚半岛的几个世纪里，犹太人被迫向穆斯林缴纳特殊赋税，并服从一些专门针对他们的法规，以换取穆斯林的宽容。他们的生活并非完全安宁，因为伊斯兰宗教狂热不时掀起狂潮。例如，1068年12月，格拉纳达的一群穆斯林暴民屠杀了约1500户犹太人。^[7]基督徒逐渐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半岛的土地，而犹太人也不

时地遭到基督徒的迫害。犹太人常常被困在互相杀伐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只得尽可能随机应变，努力生存下去。

在这些世纪里，西班牙王室一般认为自己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责任去保护犹太人。由于历史悠久的仇恨的存在，王室很难始终如一地贯彻这项政策。1391年，伊莎贝拉出生的大约六十年前，声势越来越浩大的基督教狂热浪潮开始针对犹太人。反犹的传道者在王国各地漫游，发表气势汹汹的演说，大谈耶稣的受难，警示犹太教的威胁，并怂恿暴民攻击犹太人、摧毁犹太会堂。许多人因此丧命，数千名犹太人被迫改信基督教，犹太会堂被改为基督教堂。这场暴力活动的中心是塞维利亚。此后，塞维利亚成了许多为了生存而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的家园。其他一些犹太人家族，如阿布拉瓦内尔家族，为了逃避迫害，迁往葡萄牙。^[8]也有一些人迁往格拉纳达或北非。许多家庭因此妻离子散：有的人接受了洗礼，有的人勇敢地坚持自己的犹太教信仰。1411年，又一轮猛烈的传教运动迫使大批犹太人改宗。

反犹的狂热活动发生的时期，一般是中央政府虚弱的时期。例如，1391年的反犹迫害运动，发生在十一岁的恩里克三世国王^[9]（绰号“病恹恹的恩里克”或“软弱的恩里克”）登基之后的那一年。他尝试惩罚那些迫害犹太人的凶手，但不得不屈服于政治压力，允许对犹太人施加新的限制。伊莎贝拉登基的时候，在西班牙的犹太人总数已经下降到约8万人，而基督徒人口为约600万。

于1391年和1411年被强迫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被允许摒弃被强迫许下的誓言。危险消散之后，他们可以恢复犹太教信仰，而不必担心更多迫害。但出于种种原因，一些改宗犹太人选择继续信奉基督教。有的人是真心实意皈依的。有些人觉得，改宗之后，就能得到许多职业和机遇，而这些好处是非基督徒无法得到的。所以这些人是为了方便起见才皈依基督教的。结果就是，在伊莎贝拉在世期间，有很多老

年人，孩提时代是犹太教徒，后来改信基督教。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孩子，被称为改宗犹太人。这样的人有数万人，其中很多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

1390年之后，很多改宗犹太人在政府获得了报酬丰厚、影响力很强的职位。他们在经济上和职业上的成功，激起了许多基督徒的嫉妒。在过去，很多职位几乎可以自动地从基督徒父亲传给儿子，如今他们却要面对改宗犹太人的竞争。

改宗犹太人还进入了教会，成为神父和主教。不足为奇的是，人们担心有基督教信仰并不纯粹的人获得教职，去负责照管基督徒的灵魂。据研究异端裁判所的历史学家亨利·卡门说，在卡斯蒂利亚，在伊莎贝拉在世期间，至少有四名主教是改宗犹太人，在梵蒂冈代表西班牙人的红衣主教胡安·德·托尔克马达也是。^[10]

异端裁判所的鼓吹者当中肯定有反犹太主义的情绪。但西班牙的局势比北欧和东欧那种明目张胆的偏执更为微妙和复杂。一般来讲，在卡斯蒂利亚，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关系比欧洲大陆其他地方要好。1296年，犹太人被逐出英格兰；1394年，被逐出法兰西。但伊比利亚半岛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很多犹太人难民定居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在那里，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存在亲近关系，数百年来世代为邻。

没有证据表明伊莎贝拉是个反犹太主义者。她和一些犹太教徒有亲密和友好的关系。其中之一是卡斯蒂利亚最有名的拉比，来自塞哥维亚的亚伯拉罕·塞尼奥尔，他是女王的长期支持者。另外，以撒·阿布拉瓦内尔（他的家族在伊比利亚半岛生活了一千多年）担任女王和她的葡萄牙亲戚的财政顾问。他们的家族已经合作了多年。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开始迫害在葡萄牙境内的伊莎贝拉的亲戚，阿布拉瓦内尔不得不逃离葡萄牙，随后返回卡斯蒂

利亚，得到信任。由于同样的原因，伊莎贝拉的亲戚也在同一时期逃离葡萄牙，来到卡斯蒂利亚。到1491年，阿布拉瓦内尔已经成为女王的私人财政代表。^[11]

女王还很依赖一些犹太血统人士的辅佐。她身边有很多改宗犹太人。她的忏悔神父埃尔南·德·塔拉韦拉就是改宗犹太人。她雇来记载她的朝代历史的人编年史家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也是改宗犹太人。塞哥维亚的司库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也是改宗犹太人，他对女王的极大贡献被刻画在石刻雕塑上，永垂青史。

而且她的亲人可能也有犹太血统。西班牙犹太人相信，伊莎贝拉的丈夫斐迪南的母亲是改宗犹太人的后代。据拉比埃利亚胡·卡普萨利记载，他与多位塞法迪犹太人^[12]交流过，他们都相信斐迪南的卡斯蒂利亚外曾祖父阿隆索·恩里克斯^[13]曾爱上一位美丽的犹太少妇，名叫帕洛玛。两人有了私情，生了个儿子。这孩子很可爱，于是恩里克斯将他带到自己家中，和自己的其他儿女一起抚养长大。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卡斯蒂利亚海军司令，地位最高的贵族之一，他的女儿胡安娜·恩里克斯嫁给了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14]

但伊莎贝拉成为女王的时候，改宗犹太人已经变得不得民心，他们和基督徒之间酝酿许久的敌意正在开始涌现。近几十年来，一直有人敦促开展某种形式的教会调查，看一些改宗犹太人是真的基督徒，还是仅仅假装皈依，以获取历史上由基督徒专享的油水足的职位。伊莎贝拉的哥哥恩里克四世曾请求教皇批准他进行这样的调查，但后来不了了之。后来，伊莎贝拉竭尽全力构建统一战线以对付格拉纳达的时候，这件事又沸腾了起来。

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一个名叫阿隆索·德·奥赫达的神父怂恿伊莎贝拉女王建立异端裁判所。他是塞维利亚多明我会的修道院长，享有圣洁的声誉。他相信，很多改宗犹太人是假装信奉基督教。伊莎贝

拉于1477~1478年居住在塞维利亚时，阿隆索·德·奥赫达给她送去了当地改宗犹太人假装皈依基督教的报告，强烈地敦促她采取行动。她不是塞维利亚人，所以可能会倾向于听信他，因为他比她更熟悉当地民情。

并非所有人都相信有必要组建异端裁判所。事实上，伊莎贝拉的忏悔神父和最亲近的宗教顾问埃尔南·德·塔拉韦拉“反对建立异端裁判所”^[15]。她的改宗犹太人编年史家普尔加尔也反对，说这会让安达卢西亚的人民受到不公正的惩罚，而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没有接受过很好的基督教神学教育。“大人，我相信”，普尔加尔在1481年给红衣主教门多萨的公开抗议信中写道：

有的人有罪，是因为他们邪恶；而其他人，也是大多数人，之所以有罪，是因为他们效仿那些恶人；如果有好的基督徒给他们做榜样的话，他们是能够洗心革面的。但那里的老基督徒是恶人，而新基督徒是善良的犹太人。大人，我能确定，在安达卢西亚有1万名十岁至二十岁的少女，她们从出生起就足不出户，她们知道的宗教教义完全来自她们的父母，除此之外不曾听说过或学过任何教义。把这样的人全都烧死，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16]

但很快有匿名报告，质疑普尔加尔自己是否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以及是否忠于王室。他不得不退出对这个话题的公开讨论。但他相信，伊莎贝拉在组建异端裁判所的时候，她的意图是可以理解的。至少他在当时说自己相信这一点。^[17]

毫无疑问，伊莎贝拉本人是个热忱的信徒，花了大量时间在私人祭坛前祈祷，并努力揣测上帝对她人生的安排；她着迷于参加弥撒，甚至在访问卡斯蒂利亚的宗教中心时，居住在托莱多大教堂唱诗堂之上的一套房间内。她不做礼拜的时候，最喜欢的消遣是制作祭坛的刺绣装饰品，悬挂在她的王国和耶路撒冷的各个教堂内。她逃避令人

疲惫的宫廷生活时，会退隐到瓜达卢佩的一座修道院，并称其为她的“天堂”。

她的虔诚有黑暗的一面。在精神世界里，她害怕未知的、危险的东西。她雇人绘制的王室全家肖像中，她躲避在圣母玛丽亚的怀抱中，而他们的头顶上有咄咄逼人的恶魔在飞舞。这样的设计不是巧合。

改宗犹太人的问题爆发的时候，女王特别容易受到教士的影响。她的女儿伊莎贝拉七岁了，而伊莎贝拉女王无法再次生儿育女。她受到了极大的社会与政治压力，因为她必须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去继承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国的王位，并永久性地将两国联合起来。她担心自己的不育是因为上帝对她不满，热切希望重新得到上帝的恩宠。

另外，关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的消息常常包含可信的、真实的报告，讲到土耳其人得到了一些伪基督徒的帮助，这些人为土耳其人提供物质援助，包括地图、建议和内部消息，帮助他们征服基督教社区。在征服格拉纳达的过程中，肯定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另外，基督教欧洲的一些犹太人在私下里为奥斯曼帝国的胜利喝彩，因为根据他们的弥赛亚信仰，基督教世界毁灭之后，“犹太人将得到救赎”，所以基督教世界的失败加快了“弥赛亚的降临”。^[18]克里特岛的拉比卡普萨利在他的著作中清楚地表达了这种信念，将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描绘为仅仅对恶人残酷的大英雄。^[19]

欧洲各地的人们越来越执拗地担心遭到宗教上的背叛。

* * *

15世纪70年代末，伊莎贝拉在进行积极进取的维护治安行动时，关于改宗犹太人的争议令问题激化了。她正在奔向塞维利亚（可以说

是王国最重要的城市，也是国际贸易的一个枢纽），这是她第一次去那里。塞维利亚发生了内乱，她要努力证明，中央政府的权威有能力消灭无政府状况。例如，在她南下的过程中，在中世纪风格的城镇卡塞雷斯，她停留了相当长时间，努力重建秩序与安宁，惩罚罪犯，伸张正义。据普尔加尔记载，当地恢复了法治，所有居民都“非常满意”。在整顿治安的同时，她还视察了王国边境的防御工事，去了葡萄牙边境上的巴达霍斯。

伊莎贝拉抵达塞维利亚后，发现当地乌烟瘴气。用普尔加尔的话说，当地“到处是丑闻、纷争和战争”，导致多人死伤。^[20]她立刻开始重复自己在其他地方的行动（正是这样的行动为她赢得人民的支持与敬仰），即主持正义。

每个星期五，她在城堡公开接受请愿，人们可以向她陈情上诉。她端坐在一个大房间的高高椅子上（椅子上铺着金线织物），廷臣和法律顾问环绕在她四周，帮助她澄清每一个案子的真相。然后她会做出裁决。罪犯被判刑，其中很多被判死刑；受害者即刻得到赔偿。两个月内，她就颇有建树；街头犯罪和抢劫基本上销声匿迹。很多罪犯和被指控有不端行为的人看到她是动真格的，纷纷逃离塞维利亚。普尔加尔写道：“因为她给人民带来正义，善良的人们非常爱戴她，恶人则畏惧她。”^[21]

然而，她的手段虽然高效，并且或许是必需的，但也是专断的。最终塞维利亚居民噤若寒蝉。加的斯主教堂阿隆索·德·索利斯恳求她对坏人多一些仁慈，并表示，上帝珍视那些“内心谦卑”因而能够发慈悲的人。^[22]

女王的立场有所缓和。“她看到不计其数的男女因为畏惧司法而饱受折磨，被他们的泪水和呻吟所感动”，决定对普通罪犯实施一次

大赦。^[23]消息传了出去，很快就有4000多人返回了塞维利亚地区。伊莎贝拉严苛的司法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赞赏。

将类似的调查工作延伸到宗教领域，是很容易的事情。很快，奥赫达的主张——建立异端裁判所——就有了更多支持者。他的热情支持者之一是菲利波·德·巴尔贝里修士，近期抵达卡斯蒂利亚的宗教法官，原籍西西里。他在寻求对一道古老的法令（源于1223年）进行确认，这道法令允许在西西里岛进行异端裁判，以铲除异端；还规定异端分子财产的三分之一将被异端裁判所没收。教皇使节尼科洛·佛朗哥（特雷维索^[24]主教）也同意。于是很快这三人都怂恿伊莎贝拉采取行动了。^[25]

随后，他们发现斐迪南国王也赞同他们的观点。异端裁判所建立之后，就成为非常有用的铲除异己的工具，还能从被指控犯有异端罪的人那里收到金钱，这些钱可以用于其他用途。国王很快加入了这场“合唱”。他已经选择了主管异端裁判所的理想人选：他的长期忏悔神父，严峻顽固而清心寡欲的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即红衣主教胡安·德·托尔克马达的侄子。

历史学家拉斐尔·萨巴蒂尼认为，“对斐迪南来说，这个建议或许是颇有诱惑力的”，因为这一方面能让他立刻满足自己虔诚的虚荣心；另一方面又能充实几乎已经枯竭的国库，因为被迫害的是社会上一个非常富裕的群体。既能良心坦荡，又能大发横财，何乐而不为呢。不过，虽然斐迪南是西班牙的君主之一，而且是阿拉贡的最高统治者，但他在卡斯蒂利亚没有伊莎贝拉那样的权力。卡斯蒂利亚毕竟是伊莎贝拉王国，虽然斐迪南在卡斯蒂利亚的地位不是简单的君主配偶，但根据法律和政策，他必须服从于她的意志。所以他能够做的，仅仅是帮助三位教士游说。他们四人使尽浑身解数去敦促伊莎贝拉，于是她让步了。^[26]

伊莎贝拉不情愿地同意开展初步调查，以确定新皈依的基督徒当中遵循犹太教习惯的程度。1477年，她请求红衣主教佩德罗·门多萨开始向民众告知此事。红衣主教门多萨命令准备一份教导手册，向那些不熟悉基督教规则与仪式，或忘记了这些知识的人解释。这是一种教义问答手册，解释了洗礼、告解和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信条。门多萨命令在西班牙的所有教堂、布道坛和学校宣讲这份手册。其他人主张对不信基督的人施行更严厉的制裁，以净化教会。但伊莎贝拉和红衣主教门多萨起初不愿意使用过激手段。

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局势恶化。1478年的圣周^[27]，一个出身于著名的古斯曼家族的年轻卡斯蒂利亚人，在追求一个年轻的改宗犹太人姑娘。他说，他在她家的时候，偶然听到她父亲亵渎耶稣的名字，并侮辱基督教。他向一名多明我会神父告发了此事。奥赫达得知后立刻对被告的家庭进行了调查。被告及其五名朋友表示悔罪，得到了宽恕。但狂热的奥赫达认为这还不足以赎清这些人的罪孽，于是加倍努力，呼吁女王注意这些他认为的危险的叛教行为。据教会历史学家萨巴蒂尼说，女王又一次不同意，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不同意施行严厉制裁。^[28]

但主张建立异端裁判所的人此时得到了一个强大的盟友。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是塞哥维亚一座多明我会修道院的院长，也是几十年来德高望重的教士。他是看着伊莎贝拉长大的，还曾作为斐迪南的宗教顾问和忏悔神父，陪同他到各地旅行。此外，作为一位前任红衣主教的侄子，他的话很有分量。现在，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反对改宗犹太人。

伊莎贝拉女王不情愿地同意向教皇申请一份诏书，即官方的法律文件，授权在西班牙组建异端裁判所。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于1478年11月7日批准了建立异端裁判所的请求，允许两位君主挑选三位主教、

大主教或神父，在两个王国内担任宗教法官。但伊莎贝拉仍然很犹豫，不愿意发动有些人在敦促她做的那种严厉的调查。她更加努力地开展教育工作，以确保人们受到关于可能的叛教行为的教育，而不是因为过失而受罚。同时她和斐迪南去了托莱多。卡斯蒂利亚国会在那里开会，向他们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和继承人胡安宣誓效忠。随后伊莎贝拉又生下了一个孩子，即胡安娜。两年过去了，她没有做任何努力推动异端裁判所的成立。

但关于组建异端裁判所的讨论很自然地让改宗犹太人惶惶不可终日。一位新皈依的基督徒写了一本小册子，批评两位君主竟然考虑这样的事情。^[29]攻击王室始终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有些人认为这本批评君主的小册子恰恰证明王权受到了严重的、危险的冒犯。这本小册子流通的时间也很不凑巧，因为那时奥斯曼军队刚刚征服了奥特朗托。

1480年9月，两位君主决定贯彻教皇诏书，任命了两位高级宗教法官去领导异端裁判所，即门多萨和托尔克马达。这两人任命了其他一些人启动工作，在塞维利亚建立了一个大本营，因为有人抱怨，塞维利亚的问题最严重。很快，就有一群身穿白袍、头戴黑帽的宗教法官开始在从卡斯蒂利亚北部到塞维利亚的游行队伍中行进。人们被告知，要么悔罪并接受宽恕，要么好自为之。

有些改宗犹太人大为惶恐，迅速逃离塞维利亚。他们的匆匆逃跑让宗教法官更觉得他们有罪。很快王室就发出通知，要求查明哪些人逃亡，以及逃往何处。异端裁判所的触手伸向全国各地。宗教法官宣布，他们将逮捕任何以这种方式逃离塞维利亚的人。国内各地的贵族协助教会追捕嫌疑人。改宗犹太人开始受到审判，有些人被定罪。

第一次公开处决，即信仰审判^[30]，于1481年2月6日在塞维利亚举行，也就是异端裁判所建立的仅仅几个月之后。六人被处以火刑。

教士阿隆索·德·奥赫达在这一天做了得意洋洋的布道，但几周后他就死于瘟疫。若在其他时期，异端裁判所声势最壮的支持者的死亡，或许会让整个异端裁判所事业画上句号。但奥赫达已经发动了一件非常宏大且丑恶的事情。数十人逃亡，意味着必须追踪并调查他们。塞维利亚有数百人悔罪，在等待更全面审判期间挤满了监狱。为了处理这些工作，需要更多教士。根据1482年2月的一份教皇法令，七位宗教法官获得任命。此事发生的时候，国内的宗教狂热正在高涨；就在同一个月，伊莎贝拉呼吁西班牙的所有骑士支持针对格拉纳达的战争。[\[31\]](#)

关于改宗犹太人问题的更多、更普遍的报告导致在科尔多瓦和哈恩（收复失地运动的另外两个军事基地）组建了类似的宗教法庭。1485年，托莱多建立了宗教法庭。很快，在全国各地，在阿维拉、梅迪纳·德尔·坎波、塞哥维亚、西贡萨和巴利亚多利德，都组建了异端裁判所。斐迪南在巴塞罗那、萨拉戈萨和巴伦西亚启动了类似的行动。

斐迪南领地内的异端裁判所很快就变得比卡斯蒂利亚的异端裁判所更臭名昭著。在1482年的一份教皇诏书中，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对阿拉贡王国发生的一些事情提出了严正抗议。

他指控道，斐迪南国内的异端裁判所的动机不是宗教热忱，也不是拯救灵魂，而是对财富的贪婪；很多真正的、虔诚的基督徒，由于敌人、竞争对手、奴隶和更加低贱和不恰当的人的证词，在没有任何合法证据的情况下，就被投入世俗监狱，遭到刑讯，被谴责为异端分子，剥夺财产，交给世俗当局处死；这些恶行危害人的灵魂，立下了有害的恶例，令人作呕。[\[32\]](#)

斐迪南迅速做出回应，说他对教皇竟然被“上述改宗犹太人的持续不断、奸诈狡猾的劝导”而蒙蔽感到“震惊”，并警告教皇“所以

要多加小心，不要继续追究此事”。^[33]

几周后，教皇就退缩了。但在斐迪南的王国，公民继续反对异端裁判所，很多人觉得它的程序不公正，违反了传统的法律。在萨拉戈萨附近的特鲁埃尔，发生了反对异端裁判所的起义，但被军队镇压下去。1485年9月15日夜，宗教法官佩德罗·阿韦斯在萨拉戈萨大教堂祭坛前祈祷时，被刺客戳死。刺客要么是改宗犹太人，要么是改宗犹太人雇用的。这起暗杀让改宗犹太人的命运更糟糕了，因为阿韦斯是在跪着祈祷时被杀的，因此很快就被视为一位圣徒。密谋者被处决，阿拉贡的民意转向支持异端裁判所。

每一个新的宗教法庭在启动的时候，会发布“恩典敕令”，呼吁信徒前来悔罪并得到宽恕。他们被告知，如果他们真诚地悔改，就会得到宽恕；但如果冥顽不灵，他们的罪孽迟早会被揭露，那时受到的惩罚会更严酷。梵蒂冈历史学家萨巴蒂尼相信，伊莎贝拉女王和红衣主教门多萨希望用这个程序来劝导人们回到教会的怀抱，而避免流血。

但“恩典敕令”的执行导致更多人受到指控。很多人主动来寻求赦免，忏悔自己的异端罪行。但要证明他们的真诚，悔罪的人必须告发其他仍然在遵循犹太教规矩的人。如果他们告发别人，就可能让别人受到恐怖的折磨，或许会死亡；如果他们不告发别人，他们的悔罪就被认为是不完整的、不真诚的。萨巴蒂尼写道：“这些可怜的叛教者，发现自己腹背受敌。他们要么可耻地背叛那些他们知道还在信奉犹太教的同胞，要么不仅承受火刑的残酷死亡，而且还被没收财产，他们的儿女将沦为乞丐。”^[34]

如果一个人犯了以下错误之一，就会被认为是伪基督徒：声称弥赛亚还没有降临；说摩西的律法和耶稣基督的一样好；遵守犹太教的安息日，在那一天穿干净衬衫，或者在星期五晚上避免劳动；遵循犹

太教的饮食规矩；大斋节^[35]期间吃肉；遵守以斯帖斋戒或犹太教要求的其他斋戒；背诵大卫王《诗篇》时不说“荣耀归于圣父、圣子与圣灵”这一句；在生孩子之后的四十天里不去教堂做礼拜；为自己的孩子行割礼或给他们取希伯来名字；按照犹太教的习俗结婚；在开始长途旅行之前举办告别晚宴；携带犹太教的宗教器具；临死前将脸转向墙壁；用温水清洗尸体；用犹太教的习俗哀悼死者；在犹太教墓地埋葬死者。^[36]

当然，上述行为可能是改宗犹太人的家庭习惯，而没有刻意的宗教意义。其中有些在传统的基督徒家庭也很常见，这意味着，即便那些根本不是异端分子的人，即便那些最虔诚的天主教徒，也可能被判有罪。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安·安东尼奥·略伦特研究了文献资料，认为上述法规在制定时就“带有刻意的恶毒”，是为了尽可能广地撒网，抓捕尽可能多的人。^[37]有些宗教法官的工作狂热非常惊人。

在有些案例中，为了给处决犯人的决定辩护，异端裁判所给出了滑稽可笑的说法。中世纪一个流传很久的民间传说是，犹太人会绑架并杀死基督徒婴儿，这是对耶稣基督之死的恐怖重演。这时，西班牙出现了一个故事，主人公是一个被称为拉瓜尔迪亚圣婴的孩子，据说他在这样一起牺牲仪式中被犹太人杀害。这起所谓的人祭谋杀案受到调查，导致1491年有六名改宗犹太人和五名犹太人在阿维拉被判死刑。有些犯人在遭到刑讯后认罪；但并没有小孩失踪的报告，也始终没有找到小孩的尸体。^[38]

异端裁判所的财政方面是它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促进因素，因为它为政府带来了大量金钱。如历史学家何塞·马丁内斯·米连所说，异端裁判所从建立之初就要自筹经费：宗教法官的薪水和监禁犯人的费用来自犯人的家产。^[39]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1477年，教皇

西克斯图斯四世批准伊莎贝拉将异端裁判所没收的所有货物或金钱纳入王室金库。这条规则被吸收进了1484年的塞维利亚法令。

异端裁判所的标准操作流程有三个步骤：扣押、没收和出售。犯人最初因异端罪被捕，就是扣押。犯人被传唤到听证会上，被命令公开自己的所有财产。异端裁判所会制作一份财产清单，并向犯人高声宣读，要求他签字。档案一式三份，法庭官员会注意犯人是否企图隐藏自己的财产。犯人被羁押候审。他的财产被没收，由国家控制。若犯人负有债务，会用他的财产向债权人还债。

然后，异端裁判所以犯人的名义代为保管他的财产和货物。若犯人被无罪开释，那么他的财产和货物将被归还。但如果他被判有罪，财产就被交给异端裁判所的金库。货物会被估价，然后法庭将其拍卖。犯人的亲属不被允许竞买。

很显然，异端裁判所受到经济上的刺激，会想方设法将嫌疑人判定有罪。有的时候，有权有势的人可以收买异端裁判所，保住自己的部分财产；但异端裁判所的很多牺牲者很穷，没有多少财产可以被扣押。于是，很多贫困家庭连自己最后一点点财产也丧失殆尽。

但由于很多被迫害的人很穷，所以异端裁判所的收入往往不足以覆盖羁押所有犯人并为其提供口粮的开销，所以有的时候王室会给异端裁判所一些经济补助。斐迪南努力想办法来弥补异端裁判所的财政亏空，但异端裁判所的官员常常无法按时领到薪水。因此教会官员常常被选来担任宗教法官，因为他们自己从教会得到的收入能够维持生活开销，无须依赖别人。

由于异端裁判所的迫害，许多曾经的犹太人家庭面对两难的选择。有些犹太人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但正如普尔加尔所警示的，宗教教育一般发生在一个人的童年，所以很多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在基督

徒生活的最基本圣礼和仪式方面受到的教育很差。也有的犹太人仅仅是名义上皈依基督教，内心实际上还忠于犹太教。几乎每个改宗犹太人家庭里，都有这些现象并存，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困难。

例如，假如一个改宗犹太人家庭有亲戚来访，而这些亲戚仍然信奉犹太教，那么如何准备饮食？不管主人家是怎么吃饭的，他们肯定会为客人准备犹太人的食物。但如果这么做，那么改宗犹太人家的主妇就有犯下异端罪的危险，可能会被指控遵循犹太教习俗。如果一个心怀不满的仆人告发，那么主妇就可能遭到起诉。

类似地，如果改宗犹太人家庭接受犹太亲戚的款待，吃了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准备的饭菜，那么他们就可能遭到起诉。如果家里生了孩子而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庆祝，即便这家人是定期听弥撒的天主教徒，也可能遭到起诉。

改宗犹太人如履薄冰，很难不犯错误。根据基督教律法，施舍犹太人乞丐，是罪孽。在犹太教的圣日拜访犹太会堂，是罪孽。不吃猪肉是很可疑的。

嫉妒和恶意很快发挥了作用，而且有很多基督徒相信犹太人的财富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例如，据编年史家迭戈·德·巴莱拉记载，1473年的科尔多瓦暴乱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很多基督徒“看到科尔多瓦的改宗犹太人非常富裕，能够买官……因而大怒”。当官的改宗犹太人以“傲慢”的方式行使职权，这让基督徒非常恼怒。^[40]有时犹太人也会作证指控已经改宗的其他犹太人，因为他们相信后者皈依基督教仅仅是为了得到金钱的好处。

改宗犹太人的另一个麻烦是，他们当中很多人从事的职业让他们不讨人喜欢。放债是一种风险很大的行当，高利贷有时会让债务人走投无路。基督徒不被允许放债，因为这是一种有罪的职业。但犹太人

可以从事这种行业。税吏很少得到同胞的喜爱，而很多改宗犹太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在社会底层的财政困难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税吏却在寻求最大限度地搜刮民脂民膏。例如，1480年，塞维利亚城有21名税吏和2名财政官，全都是改宗犹太人。[\[41\]](#)

犹太人和改宗犹太人还占据了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国库和税务部门的大多数高级职务。例如，改宗犹太人迭戈·阿里亚斯·达维拉是恩里克四世国王在位期间国内最高级的财政官员。改宗犹太人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在塞哥维亚担任司库，先是为恩里克四世国王效力，后为伊莎贝拉服务。

托莱多城的异端裁判所档案表明，至少在异端裁判的早期，在当地遭到起诉的人是中产阶级，不属于精英阶层。被判死刑的人当中有鞋匠、屠夫、编织匠和商人，以及他们的妻子。但也有更富裕的人陷入罗网。

但遗憾的是，对于异端裁判所，我们知之甚少。被火刑处死的人真的是异端分子，还是皈依基督教但保留了一些犹太教习俗的人？研究了大量庭审证词和现存编年史的学者们没有一致的意见。以色列学者本齐恩·内塔尼亚胡相信，大多数被烧死的人其实是基督徒，因为虔诚的犹太人鄙视和憎恨他们，认为他们是机会主义的叛徒。他写道，当时的犹太作家看到这些新皈依的基督徒受到的苦难，起初表达了“公开的喜悦”。希伯来学者杰贝兹称改宗犹太人为“上帝的敌人”。伊本·舒艾卜说，改宗犹太人的“邪恶”“在我们眼里比非犹太人更恶劣”。[\[42\]](#)

但也有历史学家相信被定罪的人是“秘密的犹太人”，即面对巨大压力但秘密保留犹太教信仰的人。勒妮·莱文·梅拉麦德研读了许多庭审记录，她相信很多犹太女人虽然表面上遵守基督教的要求，但私下里还是勇敢地在自己家庭维持一种犹太人的核心特性：

所有这些女性，母亲、姨母、姐妹和妻子，都遵守犹太教律法，教导或者被教导犹太教律法，都认同她们的犹太传统。她们全都受到教导，要把自己当作以色列的女儿。她们非常清楚自己这么做是在拿生命冒险。她们都愿意默默地颠覆天主教会的教导，无视落入异端裁判所监狱或者被绞死的风险。所有人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良心坦荡。[\[43\]](#)。

如果梅拉麦德是正确的，的确有很多犹太人仅仅在假装基督徒，那么当时的很多基督徒怀疑他们，也不足为奇了。有些神父和修女是改宗犹太人，其中一些还在教会攀升到了高层。这意味着他们在宣讲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吗？庭审表明，有些人的确如此。在托莱多，在异端裁判所的最初十年里，两名神父和一名修女被指控犯有犹太异端罪；两名神父被无罪开释，但修女被判死刑。[\[44\]](#)。

一个著名案例是塞哥维亚主教胡安·阿里亚斯·达维拉的案子，他是西班牙最重要教堂之一的领袖。1411年，圣文森特·费雷尔在塞哥维亚的精彩宣讲说服了他的家庭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45\]](#)。

胡安的父亲迭戈·阿里亚斯·达维拉和母亲埃尔维拉由此发迹；迭戈成为恩里克四世国王的司库。但有传闻称，他们一家仅仅是假装皈依基督教，目的是获得财政的好处，他们私下里还是信奉犹太教，并嘲讽基督教。迭戈和埃尔维拉的儿子胡安在二十四岁时便成为神父，随后当上塞哥维亚主教，于是风言风语更厉害了。

胡安的父母去世多年后，宗教法官来了，问题变得更尖锐。塞哥维亚主教对异端裁判所发出抗议，然后直接向梵蒂冈的教皇提出申诉。他首先采取了预防措施，将自己已故亲属（包括父母）的遗骸从墓穴中挖出，亲自带到了罗马。有些人觉得他是在以恰当的方式抗议异端裁判所的心狠手辣，也有人相信他的行动恰恰证明他的家庭是伪基督徒。塞哥维亚主教再也没有返回西班牙，于1497年在罗马去世。

在卡斯蒂利亚，他的家庭的活动受到了长期调查。据历史学家戴维·马丁·吉特利茨的说法，“从1486年到1490年，数十名目击证人提供了关于这个家族的证词”，声称迭戈·阿里亚斯·达维拉的家族在假装基督徒的那些年里，实际上仍然遵守犹太教的安息日，过犹太教的主要节日，按照犹太教的规矩饮食，支持犹太会堂，并逃避去基督教堂做礼拜。另外，胡安的父亲曾“经常鄙夷基督教的标志，尤其是圣徒”。^[46]这些证词很自然地让人对他的儿子——塞哥维亚主教的宗教信仰产生怀疑。

发生在西班牙天主教核心的一桩丑闻或许让人越来越感到教会本身遭到了异教徒的破坏。西班牙除了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之外最重要的朝圣地点是瓜达卢佩的圣龕，这个地方也是伊莎贝拉女王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她几乎每年都访问该地。

瓜达卢佩圣龕的中心是一尊面色黧黑的圣母玛丽亚雕像，据传说，它是由圣路加雕刻的；711年穆斯林入侵西班牙之后，这尊雕像被埋在地下，以免落入穆斯林手中。基督徒成功收复该地区之后，由于当地一名农民目睹的幻象，雕像被重新发掘出来。这名农民向神父指出了雕像埋藏的地点。这个地点演变为一个广受欢迎的圣龕。

信徒尊崇这尊雕像，将它与一些奇迹（包括基督徒奴隶逃脱穆斯林主人）联系起来。整个半岛的西班牙天主教徒艰难地跋山涉水，来到瓜达卢佩，向圣母像祷告，或者悔罪、告解，并从居住在此处的约130名修士那里获得赦罪。

瓜达卢佩是西班牙最神圣的主教管区的最神圣的圣龕，由托莱多的教会管辖。托莱多则是西班牙地位最高的教士——托莱多大主教和红衣主教佩德罗·门多萨，伊莎贝拉的密友和顾问——的领地。

上述的所有宝贵的记忆给圣龕带来了财富，让居住在那里的修士能够过得舒适，专注于学术和艺术，如为手稿绘制插图。他们的饮食条件很好，修道院里有热的和冷的流动水。

瓜达卢佩城也因为宗教旅游业繁荣起来，许多饭馆、客栈和商人靠向每年成群结队赶来的朝圣者出售货物和提供服务而发财致富。据学者格蕾琴·斯塔爾一勒博说，当地人口有约10%是改宗犹太人。^[47]

异端裁判所建立之后，开始流传一些说法，称瓜达卢佩的改宗犹太人神父特别优待城里的改宗犹太人商人，给他们出谋划策，帮助他们保留犹太人习俗，鼓励他们遵守犹太人的饮食律法，并想方设法蒙蔽基督徒，让基督徒觉得这些改宗犹太人也信奉基督教。据斯塔爾一勒博的研究，斐迪南国王于1483年9月驾临瓜达卢佩。很快，当地居民和圣龕的修士都受到了调查。

一些改宗犹太人家庭逃离了瓜达卢佩。一个大家族逃往穆斯林控制下的马拉加（当时正与卡斯蒂利亚交战），公开以犹太人的方式生活。

斯塔爾一勒博写道，1485年，瓜达卢佩的一名市民被确认犯有遵循犹太教律法的异端罪，在信仰审判中被处以火刑。还有四十五人在死后或缺席被判有罪。^[48]

据斯塔爾一勒博记载，随后，异端裁判所举行了一次绝密会议，以调查瓜达卢佩的神父是否也是异端分子。很快就有确凿证据表明，这些判断是正确的。例如，一名改宗犹太人忏悔神父，迭戈·德·马切纳修士，被多名证人指认，曾指导其他改宗犹太人逃避基督教仪式，如在大斋节期间不吃肉。他告诉其他修士，他们可以在耶稣受难节吃煮的鸡肉，而非烤鸡肉，这样别人就察觉不出。他还曾公开质疑

圣母玛丽亚是否真的是处女（圣母玛丽亚是童真女，这是西班牙虔诚天主教徒的信条之一），并告诉别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洗礼。

证人说，另一名改宗犹太人教士，修道院长贡萨洛·德·马德里临死前接受临终涂油礼时假装呕吐，以避免吃下圣饼。修士路易斯·德·马德里，改宗犹太人，曾在修道院公开表示，他认识两个改宗犹太人修士，他们在举行圣餐仪式时拒绝为圣饼祝圣；但他不肯说这两人是谁。有三名修士被发现行过割礼。还有几名修士装病，以逃避弥撒或唱圣诗。

最终，西班牙中心最神圣的圣地的130名修士中有21人因为所谓的犹太教活动而遭到谴责。据斯塔尔一勒博的说法，其中一人被终身监禁，迭戈·德·马切纳被处以火刑。[\[49\]](#)

西班牙的天主教会企图隐瞒这起丑闻，将他们收集到的关于这座修道院的改宗犹太人修士的活动的文献资料藏匿起来。但有些文献始终没有被销毁，斯塔尔一勒博对其作了详尽的研究，并写了一本书《在圣母的阴影下》。

但这桩丑闻在西班牙几乎人尽皆知，让人们更加猜疑，其他的宗教修会是否也包藏了异教徒。

在此期间，伊莎贝拉女王肯定知道瓜达卢佩的情况，因为她命令使用从该城的改宗犹太人那里没收的100万马拉维迪，为朝圣者建造一座医院。然后她自己出资100万马拉维迪，以承担此项工程的开支。

那些成为虔诚基督徒的西班牙改宗犹太人有时也加剧了紧张气氛。他们与其他人拉开距离，或者自觉高人一等。他们满脑子都是血统论。不过基督徒也是这样。在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基督徒抱成一团，在由犹太会堂改建的基督教堂内做礼拜。有人

声称自己是耶稣家族的直系后裔。布尔戈斯主教阿隆索·德·卡塔赫纳是拉比希罗马赫·哈·利未（皈依基督教后改名为布尔戈斯的保罗）的儿子，据说曾这样吟诵圣母经：“圣母玛丽亚，我的血亲，为我祈祷吧。”在阿拉贡，这样的人自称“以色列的基督徒”。[50].

研究异端裁判所的著名历史学家亨利·卡门写道：“这些改宗犹太人的态度，或许是出于自卫，而不是傲慢。但他们加剧了新老基督徒之间的互不信任。尤其是，一个改宗犹太人民族的概念，植根于犹太人基督徒的心灵，让别人觉得他们是一个单独的、外来的、敌对的团体。这造成了命运攸关的影响。”[51].

最终，改宗犹太人发现自己无论在犹太人还是基督徒社区，都找不到真诚的朋友，而此时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正在奔向战争。到这时，几乎所有地方都对他们产生了猜忌。内塔尼亚胡写道，在15世纪40年代末，只有“少数”改宗犹太人被视为可能的异端分子，但在随后几十年里，老基督徒的民意发生了重大变化，“绝大多数”改宗犹太人都被视为确凿无疑的异端分子。[52].

* * *

不管表象之下的现实如何，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的所作所为都是超乎寻常地违背基督教精神、凶残而可憎。它与西班牙思想的另一项强大的原则（曾经由伊莎贝拉的兄长恩里克四世表达出来）完全相反，即宽恕是基督教的一个根本特征。恩里克四世曾受到压力，去惩罚一名多次背叛他的贵族，将此人传唤到自己面前，然后将他释放，并说，宽恕是他的信仰的一个关键支柱。“我宽恕你，”恩里克四世说，“以便我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上帝能够宽恕我的灵魂。”[53].

在这个案例里，恩里克四世国王宽恕的是实际上有罪的人。而如今伊莎贝拉残酷镇压的，却是没有任何罪过，或者危害极小的人。她

自己内心一定很矛盾，因为她允许自己身边的人对异端裁判所的正义性和道德性提出严正的质疑，不过她自己没有表达过任何疑虑。她允许编年史家普尔加尔在王室赞助的著作中写道：“宗教法官和世俗刽子手的行为残忍，表现出极大的敌意，不仅敌视那些被他们惩罚和折磨的人，还敌视所有的新基督徒。”^[54]

斐迪南是个没有道德原则的人，他对异端裁判所应当不会感到任何道德顾虑。事实上，历史学家本齐恩·内塔尼亚胡相信，斐迪南是“异端裁判所的真正始作俑者”。^[55]他写道，斐迪南

表现得守道德、虔诚信教；因为他对伦理与宗教在人的生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有准确的判断。他没有公开挑战道德，而是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懂得如何拿捏群众的情绪，它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因素；他也懂得利用群众的激情的力量……作为他统治国家的动力。因此，他利用群众对改宗犹太人的仇恨和关于异端罪的教会法律，去推动自己的政治利益，同时努力把自己打扮为神圣教会的真正儿子。他对捍卫宗教律法的热忱，甚至超过了他主持民事法律的热情……因此他没有正式地调查异端裁判所的司法程序，以避免承担它的裁决带来的责任；并防止别人反驳他的说法，即他对宗教法官的裁决完全信任。但他常常干预异端裁判所的战利品的收集与分配。^[56]

那么，伊莎贝拉女王的立场是怎么样呢？毕竟她在其他很多方面被描述为充满人道关怀，并且热忱地学习基督的生平和教诲。她如何能为异端裁判所的残忍和草菅人命辩护？

简而言之，伊莎贝拉的个性非常复杂，包含五花八门的元素。虽然她在很多方面显得仁慈宽大，但也有睚眦必报的一面，让她非常严酷、穷追不舍、不屈不挠地惩罚她眼中的恶人，并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或许是这样推断的：异端裁判所是达到有价值、正当合理的目的的手段；为了战胜格拉纳达，她需要得到安达卢西亚老基督徒（尤其是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的老基督徒）全心全意的支持，而这些人非常敌视改宗犹太人。或许她相信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威胁，只有

最残酷无情的策略才能帮助基督教西班牙在土耳其人的进攻下生存下来。或许，她当真是为自己臣民的精神福祉担忧，尽管这种担忧是受到误导而产生的。对每一种宗教信仰的狂热信徒来说，只有他们的信仰才是宇宙的关键。无论如何，伊莎贝拉完全能够把自己的举措——建立和支持异端裁判所——合理化。成功的统治者为了追寻自己眼中的更大福祉，往往甘愿牺牲其他人。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对伊莎贝拉来说，“要想安全地控制安达卢西亚，就必须想办法消除骚乱”。^[57]

但在针对格拉纳达的战争结束后，她的立场也没有变化。她残酷镇压的打击面反而扩大了。1492年3月，在秘密磋商之后，她和斐迪南命令犹太人（此前没有受到异端裁判所的大力迫害）立刻皈依基督教，否则将其驱逐出境。他们认为，犹太人在西班牙的存在会诱惑改宗犹太人，让后者抛弃基督教信仰，使其丧失救赎的机会。犹太人到她面前恳求时，她告诉他们，这个决定是斐迪南在梦中做出的，因此是上帝的意志。“你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决定吗？”她对前来恳求她收回成命的犹太人代表说道，“是上帝让国王心中产生了这想法。”在犹太人的恳求之下，她也不肯向丈夫表达抗议。她告诉他们：“国王的心就像河流一样，都在天主的掌控之下。天主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国王的心意。”^[58]从此，伊莎贝拉的犹太人臣民知道，局面已经不可挽回了。

卡斯蒂利亚与穆斯林签订的条约的一个条款就预示了伊莎贝拉新的、更严苛的立场。这个条款说，被卡斯蒂利亚征服的地区的犹太人必须在三年内皈依基督教，否则必须迁往北非。但在结束漫长战争的激动中，人们忘记了这个条款。

所以伊莎贝拉的命令公布之后，大多数犹太人都感到震惊，甚至不知所措。此前，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表达

自己对犹太人不满意。他们对犹太人一直表达尊敬和友谊。有人相信斐迪南有犹太血统。以撒·阿布拉瓦内尔的大部分成年时光里，都是伊莎贝拉及其家族的备受信赖的谋士和财政顾问。他后来说，他得知伊莎贝拉的命令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回忆道：“王室的命令颁布时，我正在宫里。我哀求国王，求他发慈悲，一直求到我自己累垮。我三次跪着恳求国王：‘哦，国王陛下，看着我们，不要这样残酷地对待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您的仆人？只要允许我们留在陛下的国度，我们甘愿献出金银，献出我们拥有的一切。’”

不足为奇的是，犹太人提议的高额贿赂让斐迪南兴趣盎然，他显然犹豫了，在考虑此事。但他的忏悔神父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跳了起来，恼怒地比画着，指责斐迪南为了三十枚银钱，就要背叛自己的信仰。犹太将自己的朋友耶稣出卖给罗马人（目的是处死耶稣），得到的赏金就是三十枚银钱。斐迪南决定坚持原先的决定。随后阿布拉瓦内尔恳求自己的朋友们采取措施，阻碍这道王室法令的实施，

但正如蝮蛇用灰尘堵住耳朵，不听要蛇人的声音，国王也狠下心来，不理睬犹太人的苦苦哀求，而是宣布，就是把犹太人的全部财富都给他，他也不会撤销这道法令。坐在他右手边的女王也反对撤销法令，敦促他将已经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为了求国王撤销法令，我们想尽了办法，耗尽了力气。但任何智慧都无益，任何人都帮不了我们。这邪恶的法令宣布的地方，或者它的消息传播到的地方，我们的民族号啕大哭，为自己的绝境哀哭；因为自从犹太民族被逐出圣地家园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放逐。

[\[59\]](#).

有些犹太人，如伊莎贝拉童年的盟友拉比亚伯拉罕·塞尼奥尔，不情愿地同意改宗。他在瓜达卢佩修道院接受了洗礼，女王就站在他身旁。“成千上万人”也带着悔恨接受了洗礼。[\[60\]](#).

其他的犹太人选择了背井离乡，他们知道路上的风险极大，他们的一些家人会丧生。堂以撒·阿布拉瓦内尔告诫和鼓励犹太人坚守犹

太教信仰，即便失去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对他来说，信仰是至关重要的。他和家人逃到了那不勒斯，后来又去了威尼斯。其他的犹太人则逃往葡萄牙、奥斯曼帝国、北非或欧洲其他地区。

据编年史家记载，犹太人逃离西班牙，是一幅凄惨的景象。卡斯蒂利亚编年史家安德烈斯·贝纳尔德斯写道：“在王室法令规定的期限内，犹太人廉价出售和处理了自己的财产，所得甚微；他们到处哀求基督徒买下他们的财产，却找不到买家。豪门大宅被以微不足道的价钱出售；用一头驴就能换来一座房子。一小块布或亚麻就能换得一座葡萄园。”

虽然他们被禁止带走金银，还是秘密地在满载货物的牲口的鞍具、笼头和挽具里藏了大量金银。在边境城镇和海港，他们会受到专门官员的搜身。为了逃避搜查，有些人竟将多达30个杜卡特吞下肚。富裕的犹太人为穷人支付路费，互相慈善友爱，以便让除了极少数最穷苦的人之外，大多数人都不要改宗。在7月的第一周，他们踏上了离开故国的道路，男女老少都亡命天涯；有步行的，有骑马、骑驴的，有坐车的；每个人都走向自己选定的港口。在路上，在他们经过的国家，他们遇到极大的困难，蒙受了笔墨难以描摹的不幸。有的人倒下，有的人爬起；有人死去，有婴儿诞生；有的人晕倒，有的人患病；基督徒们看到他们的惨状，无不怜悯他们，劝说他们接受洗礼。有些人因为痛苦万分，皈依了基督教；但这样的人很少。拉比们鼓舞大家，让年轻人和女人唱歌，吹笛子，打鼓，给大家鼓劲，维持大家的精气神。^[61]

塞哥维亚的犹太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三天是这样度过的：他们在墓地“用自己的泪水浇灌父辈的骨灰；他们的哀哭让所有听到的人心生怜悯”。^[62]很多人离开西班牙时，携带的只有从犹太会堂取走的珍贵的希伯来文手稿。

第一批离开的是一些居住在格拉纳达的犹太人家庭，不久之后其他犹太人也追随他们动身了。他们来到港口，斐迪南为他们安排了船只。有些人在海上溺死，或者侥幸从海难中逃生。有些人被冻死。许

多人病倒。他们遭到强盗袭击，被抢走财物，甚至身上的衣服，被卖为奴隶。有些人被抛弃在遥远的海岸。一群人来到了非斯，那里正发生旱灾，于是他们被赶走。他们被迫在干旱平原搭起营帐，很快就开始有人饿死。关于犹太人吞下黄金、将其偷运出西班牙的故事流传甚广；非洲的穆斯林“谋杀了一些犹太人，然后剖开尸体，寻找黄金”。^[63]

被放逐的犹太人在不同的基督徒国家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很多人去了葡萄牙，他们在那里只要缴纳沉重的赋税，就可以停留。在热那亚，一手拿面包、一手拿十字架的神父欢迎他们；他们若要填饱肚子，必须皈依基督教。^[64]臭名昭著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受到其他很多人的谩骂，但他对犹太人比较友好，允许他们定居在教皇国，并保护他们。

西班牙异端裁判所既恶毒，又悲剧。但从伊莎贝拉的角度看，它将西班牙团结了起来，得以消灭内部的宗教纷争，让国民可以一致对外。这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大规模，从伊莎贝拉的角度看也是最成功的强迫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行动之一。消灭外来者的行动有其好处；宗教宽容并非普遍性的概念。现在，西班牙做好了准备，并且足够心狠手辣，即将成为到当时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世界霸权。

^[1] Henry Kamen,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 Historical Revis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7), p.82.

^[2]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Catálogo de las causas contra la fe seguidas ante el tribunal de Santo Oficio de la Inquisición de Toledo* (Madrid, 1903).

^[3] Lu Ann Homza, ed. and trans.,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1478-1614: An Anthology of Sources*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6), p.xi.

[4]. 犹太教的第一圣殿是所罗门王建造的，于前586年被新巴比伦帝国摧毁，耶路撒冷被征服，犹太王国部分人口被掳走，即所谓“巴比伦之囚”。后巴比伦的居鲁士大帝允许犹太人重建圣殿，于前516年建成，即第二圣殿。公元66年，犹太人反叛罗马帝国。70年，罗马将领提图斯（后来的皇帝）占领耶路撒冷，摧毁第二圣殿。根据犹太教的信仰，未来将会有第三圣殿出现。

[5]. Benzion Netanyahu, *Don Isaac Abravanel: Statesman and Philosopher*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82), p.3.

[6]. Elias Hiam Lindo,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Spain and Portugal* (1848; repr.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70), p.6.

[7]. Elias Hiam Lindo,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Spain and Portugal* (1848; repr.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70), p.51.

[8]. Netanyahu, *Don Isaac Abravanel*, p.6.

[9]. 伊莎贝拉女王的祖父。

[10]. Kamen, *Spanish Inquisition*, p.30.

[11]. Netanyahu, *Don Isaac Abravanel*, p.52.

[12]. 塞法迪犹太人即西班牙—葡萄牙系犹太人。“塞法迪”是《圣经》中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称呼。犹太人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即德意志系犹太人。

[13]. 这个阿隆索·恩里克斯的父亲是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的私生子。

[14]. Yolanda Moreno Koch, *El judaísmo hispano, según la crónica hebrea de Rabi Eliyahu Capsali* (Granad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2005), pp.133-35.

[15]. Jerónimo Zurita, *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1927), p.1: 127, cited in Netanyahu, *Origins of the Inquisition*, p.899.

[16]. Ian MacPherson and Angus MacKay, *Lov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Fifteenth-Century Spain* (Leiden: Brill, 1998) , p.183.

[17]. Ian MacPherson and Angus MacKay, *Lov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Fifteenth-Century Spain* (Leiden: Brill, 1998) , p.184.

[18]. Charles Berlin, *Elijah Capsali' s Seder Eliyyahu Zuta*,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September 1962, p.82.

[19]. Charles Berlin, “A Sixteenth Century Hebrew Chronicle of the Ottoman Empire: The Seder Eliyahu Zuta of Elijah Capsali and Its Message, ” *in Studies in Jewish Bibliograph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ed. Charles Berlin (New York: KTAV Publishing, 1971) , PP.23-31.

[20]. Hernando del Pulgar, *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Madrid: Espasa-Calpe, 1943) , p.1: 309.

[21]. Hernando del Pulgar, *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Madrid: Espasa-Calpe, 1943) , pp.1: 310-11.

[22]. Hernando del Pulgar, *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Madrid: Espasa-Calpe, 1943) , p.1: 314.

[23]. Hernando del Pulgar, *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Madrid: Espasa-Calpe, 1943) , p.1: 313.

[24]. 特雷维索为意大利城镇，位于威尼斯城以北16英里处。

[25]. Rafael Sabatini, *Torquemada and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 History* (London: Stanley Paul, 1924) , p.98.

[26]. Rafael Sabatini, *Torquemada and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 History* (London: Stanley Paul, 1924) , pp.98-99.

[27]. 复活节前一周。

[28]. Rafael Sabatini, *Torquemada and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 History* (London: Stanley Paul, 1924) , pp.102-3.

[29]. Rafael Sabatini, *Torquemada and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 History* (London: Stanley Paul, 1924) , p.108.

[30]. 信仰审判 (Auto-da-fé) , 字面意思是“信仰的行动” , 是西班牙、葡萄牙和后来的墨西哥异端裁判所时期异端分子的仪式性公开忏悔, 随后一般会被处以火刑。

[31]. Peggy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196.

[32]. Henry Charles Lea, *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in Spain* (London: Macmillan, 1906) , p.1: 587.

[33]. Kamen, *Spanish Inquisition*, pp.49-50.

[34]. Sabatini, *Torquemada*, pp.120-21.

[35]. 大斋节是基督教徒为准备复活节而进行悔罪的一段时间, 这是从使徒时期就有的传统节期。

[36]. Sabatini, *Torquemada*, pp.121-24.

[37]. Sabatini, *Torquemada*, p.125.

[38]. Ben Zion Netanyahu, *The Origins of the Inquisition in Fifteenth-Century Spai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 p.1035.

[39]. José Martínez Millán, “Structures of Inquisitorial Finance, ” in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nd the Inquisitorial Mind*, ed. Ángel Alcalá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0]. Netanyahu, *Origins of Inquisition*, p.898.

[41]. Netanyahu, *Origins of Inquisition*, p.972.

[42]. Netanyahu, *Origins of Inquisition*, p.930.

[43]. Renée Levine Melammed, *Heretics or Daughters of Israel? The Crypto-Jewish Women of Casti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p.174.

[44].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Catálogo, pp.198, 228, 239.

[45]. David Martin Gitlitz, *Secrecy and Deceit: The Religion of the Crypto-Jew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02) , p.576.

[46]. David Martin Gitlitz, *Secrecy and Deceit: The Religion of the Crypto-Jew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02) , p.576.

[47]. Gretchen D. Starr-LeBeau, *In the Shadow of the Virgin: Inquisitors, Friars, and Conversos in Guadalupe, Spa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39.

[48]. Gretchen D. Starr-LeBeau, *In the Shadow of the Virgin: Inquisitors, Friars, and Conversos in Guadalupe, Spa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172.

[49]. Gretchen D. Starr-LeBeau, *In the Shadow of the Virgin: Inquisitors, Friars, and Conversos in Guadalupe, Spa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217.

[50]. Kamen, *Spanish Inquisition*, p.42.

[51]. Kamen, *Spanish Inquisition*, p.42.

[52]. Netanyahu, *Origins of Inquisition*, p.1010.

[53]. Netanyahu, *Origins of Inquisition*, p.795.

[54]. Netanyahu, *Origins of Inquisition*, p.903.

[55]. Netanyahu, *Origins of Inquisition*, p.921.

[56]. Netanyahu, *Origins of Inquisition*, p.1032.

[57]. Netanyahu, *Origins of Inquisition*, p.918.

[58]. Netanyahu, *Don Isaac Abravanel*, p.56.

[59]. Lindo, *History of Jews of Spain*, p.284.

[60]. Charles Berlin, *Elijah Capsali's Seder Eliyyahu Zuta*, p.154.

[61]. Andrés Bernáldez, *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crónica inedita del siglo XV* (Granada: Imprenta y Librería de Don José María Zamora, 1856), quoted in Lindo, *History of Jews of Spain*, p.285.

[62]. Andrés Bernáldez, *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crónica inedita del siglo XV* (Granada: Imprenta y Librería de Don José María Zamora, 1856), quoted in Lindo, *History of Jews of Spain*, p.285.

[63]. Andrés Bernáldez, *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crónica inedita del siglo XV* (Granada: Imprenta y Librería de Don José María Zamora, 1856), quoted in Lindo, *History of Jews of Spain*, p.290.

[64]. Andrés Bernáldez, *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crónica inedita del siglo XV* (Granada: Imprenta y Librería de Don José María Zamora, 1856), quoted in Lindo, *History of Jews of Spain*, p.291.

十五 在天堂登陆

伊莎贝拉女王在保障了自己王国的边界，并缓和了国内的紧张气氛之后，几乎不可避免地将注意力转向外界，甚至是欧洲之外。全球探索的新时代即将拉开大幕。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狭小的伊比利亚半岛范围内是竞争对手，现在他们正在变成世界舞台上的较量对手，开始一场激烈的角逐，要争夺海外领地和贸易路线。发现新领土正在变成新的伟大事业，而只有少数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认识到了未来的事业是多么宏大。能够抓住机遇的人就能获得丰厚利润，赢得无上光荣。没能抓住机会的人，就会落后。

航海探索事业的先驱是葡萄牙人，领导他们的探索活动的，是航海家恩里克，这位王子是葡萄牙向南和绕过非洲扩张的最大功臣。葡萄牙王室的“光辉一代”构建出一种新的世界观，看到了发现远方土地、绘制地图、殖民定居并占领的巨大潜力。因此，葡萄牙不断膨胀，倨傲不已，并获得大量新财富。

商业探索对伊莎贝拉女王来说也是家族的生意。她热爱的外祖母，葡萄牙贵妇巴塞卢什的伊莎贝拉，是航海家恩里克王子的侄女和弟媳^[1]。所以恩里克王子是伊莎贝拉的太姥爷。伊莎贝拉年轻的时候，1462~1487年，卡斯蒂利亚深陷于内战而羸弱不堪的时期，葡萄牙向大西洋发动了八次独立的航海探险，获得越来越多的领土，年复一年地超过卡斯蒂利亚。^[2]

伊莎贝拉登基的时候，非常了解海上的这些新进展，因为在1475～1479年与葡萄牙的战争结束后的和谈中，就涉及了这些探险。1479年的《阿尔卡索瓦斯条约》让她控制了加那利群岛，但将非洲西海岸的所有新发现土地和佛得角群岛全部交给葡萄牙人。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立刻开始在这些地区扩张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加强葡萄牙的贸易路线和商业帝国。他与卡斯蒂利亚的竞争很激烈，因此将他的探险家的发现作为国家机密来保守。葡萄牙探险家向东方越走越远：他们首先乘船南下，于1484年发现了刚果河，1488年绕过好望角；然后他们从陆路深入印度和埃塞俄比亚。

在此期间，伊莎贝拉控制并巩固了加那利群岛，于1480年在大加那利岛建立了殖民地。这些亚热带岛屿位于非洲西海岸，当地土著被称为关契斯人。西欧人在古时曾到过此地，但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险家直到15世纪初才开始比较频繁地造访加那利群岛。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曾为争夺加那利群岛而厮杀，但《阿尔卡索瓦斯条约》之后，卡斯蒂利亚得以启动更为系统性的殖民定居。关契斯人反抗卡斯蒂利亚的统治，但被击败，部分原因是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那位性感的侄女及其新丈夫非常残酷无情地镇压了土著。于是加那利群岛成为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一部分。该群岛成了繁荣的殖民地，为进一步探险提供了前进基地。

15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魅力十足而善于把握机会的航海家从葡萄牙来到伊莎贝拉的宫廷，献上了一份颇有诱惑力的探险计划，还声称自己与伊莎贝拉的葡萄牙外祖父母有联系。女王愿意倾听他。这位航海家是意大利人，之前住在里斯本，他的名字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的妻子是费莉帕·莫尼斯，她的父亲曾在伊莎贝拉的外祖父——葡萄牙的堂若昂王子^[3]家中服务。^[4]费莉帕·莫尼斯的家庭与航海家恩里克王子也有联系，曾参加葡萄牙人的一些早期探险。哥伦布与这个家庭结亲之后，他的岳母把自己丈夫的一些航海器具和地图给

了女婿。据说哥伦布收到这些礼物时非常高兴。^[5]后来哥伦布的妻子费莉帕去世了。丧妻的航海家制订了一项大胆的航海探险计划，热切希望将其付诸实施。单身爸爸哥伦布带着年幼的儿子迭戈，搬到卡斯蒂利亚，开始向女王提建议。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相信，有可能向西航行，绕地球一周，抵达东印度群岛，这样就能绕过土耳其人对东方丝绸香料的垄断。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没有人能够环球航行，因为大洋上距离极远，途中没有可供停留的地点。关于有人尝试环球航行的传闻很多，但都没有被证实。哥伦布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以及航海技能，可以战胜这考验。他热情洋溢地告诉女王，这样一次远征的收益足以让两位君主充实因为格拉纳达战争而枯竭的国库，或许甚至能提供足够资金，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从穆斯林手中征服耶路撒冷。女王听了这话自然大悦。

哥伦布对两位君主的推销非常浪漫，而不是很务实。从一开始，他就用甜美的“歌曲”诱惑他们，在信中称他们为“大洋诸岛的国王和女王”。^[6]伊莎贝拉有相应的背景 and 知识，会倾向于聆听他的建议。但她忙于针对格拉纳达的战争，还在抚养五个孩子，所以无暇实践。而且宫廷的大部分人都对哥伦布的建议存疑。他花了七年时间，坚持不懈地劝导，最后才得以率领三艘船的小船队起航离开卡斯蒂利亚。伊莎贝拉两次将哥伦布的建议交给学者委员会进一步研究（这是屡试不爽的推迟困难决定的一种行政技术），学者两次答复称，哥伦布的旅行风险太大，成功的可能性极小。

但伊莎贝拉还是决定为此次探险出资，并相信哥伦布是领导远航的上佳人选。他似乎完全有资格和能力从事此种探险，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航海家和领航员，而且他制作了精细而详尽的地图，呈送给宫廷，展现了自己的本领。但他对远航的具体路线语焉不详，甚至遮遮

掩掩，这有些奇怪。从他的角度，他是在努力保守自己的创意的秘密，免得被人窃走，但有些观察者觉得他的想法本身就很模糊。另外，在当时，古典学术被认为是一切智慧的源泉，因此人们在激烈讨论他的设想时，援引了数千年前古人对这个话题的观点。

在恩里克四世国王驾崩后的内战期间，哥伦布首先将自己的建议呈送给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哥伦布努力劝说葡萄牙人为他的远航出资，与若昂二世就赞助的条件谈判，但无功而返。哥伦布对自己一旦成功将获得的报偿的期望值非常高。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西印度史》的作者）记述道，哥伦布要求的赏赐是：被封为骑士，获得“堂”的头衔，并且从他发现的地区获取的黄金和其他可出售物资的十分之一要给他。若昂二世国王此时对这一类的探险的管理已经很有经验，嘲笑哥伦布为放肆的“幻想家”，提出的尽是没有根据的狂想。^[7]

精明的国王不愿意提供哥伦布要求的资金，但利用哥伦布给他的信息，派遣了一支远征队，去往哥伦布描述的方向。然而水手们没有发现土地，回来之后愤恨地抱怨哥伦布是个犯了大错的傻瓜。哥伦布发现自己遭到背叛，大为光火，怀疑葡萄牙国王已经偷窃了他的秘密。他盛怒之下离开了葡萄牙，来到卡斯蒂利亚，向那里的君主提出同样的建议。他派遣自己忠实的兄弟巴尔托洛梅奥去英格兰，求助于英格兰国王，但据探险家和历史学家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巴尔德斯^[8]说，亨利七世国王“嘲笑哥伦布的话，认为他是胡说八道”。^[9]

哥伦布亲自向卡斯蒂利亚女王提出建议，他说的故事将天文学、航海与神话历史和古人著作编织在一起。他家境普通，自学成才，所以宫廷学者很快发现，他对古典学术的掌握漏洞百出。两个奉命研究他的建议的专家委员会驳斥了他的论断，正确地指出，地球比哥伦布

所说的大得多，并得出结论，他的旅行很可能消耗巨资，造成令人窘迫的失败，除了损失水手的生命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但这个激情洋溢、神秘莫测的外国人让其他很多人为之着迷，包括女王本人。女王决定支持哥伦布的事业。他们开始了一种小步舞般若即若离的特殊关系。哥伦布在宫廷侍奉了多年，努力表现自己对卡斯蒂利亚利益的热情，甚至主动要求参加针对格拉纳达的战争。这些年里，他至少面见女王四次，有时是和国王和女王两人面谈。他曾在科尔多瓦城堡的觐见厅拜见君主，在两位君主位于巴萨和马拉加的战场军营拜见他们，在圣菲拜见他们（当时两位君主正在主持格拉纳达围城战）。其中一些会议后来成了传奇：有好几次，哥伦布遭到拒绝，闷闷不乐地离开宫廷，但有人报告女王他离开了，她又命人传他回来，继续商谈。他不在宫廷的时候，居住在韦尔瓦（在西班牙南方）的拉比达^[10]修道院。所以王室的命令意味着他要离开修道院生活，返回到尘世，去讨论他的探险计划。当然，他住在修道院，也是为了吸引女王的注意力，赢得她的尊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哥伦布像教士一样过着贞洁的单身生活，因为他与塞维利亚的一个女人有了长期私情，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斐迪南。他现在有了两个孩子，需要养家糊口。

伊莎贝拉一直拖着哥伦布，鼓励他，只给他一点点钱，虽然数额不大，但让他心存希望，相信她有朝一日会支持他的计划。她实际上是一直让他保持待命状态，随时可以起航。1487年5月5日，卡斯蒂利亚国库支付哥伦布3000马拉维迪；7月3日，发放了同样数额；8月27日，他得到4000马拉维迪，并奉命去马拉加的王室营地；10月15日，同样数额；1488年6月16日，又是3000马拉维迪。换句话说，他得到了每年约1.2万马拉维迪的聘金，据航海历史学家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说，这相当于“一个一等水兵”的薪水。^[11]

这笔钱太少，不足以让他在宫廷维持体面生活，所以他有时也要依赖施舍。他的仪表越来越寒酸，这会损害他在高傲而浮夸的西班牙宫廷臣眼中的形象。

次年，伊莎贝拉将维持他生活的责任交给她的其他臣民，要求酒店和客栈老板们帮助供养他。1489年5月12日，两位君主给他提供了一封写给所有市政和地区官员的公开信，命令官员们为“来到我们宫廷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提供食宿。^[12]

随着每一个新的事态发展，哥伦布的希望潮起潮落。女王的态度很暧昧，而其他方面也有人愿意为他提供资金。两位人脉很强的西班牙官员，梅迪纳塞利公爵和阿拉贡金融家路易斯·德·桑堂赫尔后来都说，他们当时愿意资助哥伦布的远航。梅迪纳塞利公爵说，哥伦布在等待卡斯蒂利亚王室的答复时，他支持哥伦布并为其提供住宿已达两年之久，他自己有三四艘船随时待命，可以立刻送哥伦布开始远航。梅迪纳塞利公爵向女王报告了自己的打算，但女王决定由卡斯蒂利亚王室独占这个机遇以及可能的收益。这让公爵颇为恼火，他后来相信自己是最早认识到哥伦布远航的潜力的人之一，但被排挤在外。

公爵后来给红衣主教门多萨的信中写道：

但由于我觉得这应当是女王陛下的事业，于是我从罗塔写信给陛下，她回信说，我应当把哥伦布送到她那里，于是我把哥伦布送到她那里，并请求女王陛下，因为我没有尝试资助哥伦布的远航，而是代表她安排此事，那么希望她允许我得到远航收益的一部分，并让远航船只在我的港口装载货物，返航时也在我的港口卸货。女王陛下接见了，又把他交给阿隆索·德·金塔尼利亚，后者代表女王写信给我说，女王觉得此事不大可能成功；但如果成功了，她会让我分一杯羹。但在询问哥伦布之后，她决定自己资助他去印度。^[13]

相当早的时期，观察者就注意到，伊莎贝拉和哥伦布之间有种亲切的关系；他们的谈话很轻松，以至于人们称其为“闲聊”。他们差

不多同龄，就连外貌也有点像（微红发色、白皙皮肤，而西班牙的绝大多数人是黑发黑眼），而且他们对异国的土地、动物、植物和人都有浪漫的兴趣。他们都对周边的世界充满好奇。比较不明显，但通过直觉能察觉到的是，他俩都有一种弥赛亚的使命感，并且都非常虔诚。他们都想传播基督教信仰，都相信他们会因此得到世俗的回报。毫无疑问，他们的动机都是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他们都追寻世俗的财富，但都不希望别人这样看他们。

哥伦布和伊莎贝拉一样，对世界历史的观念比较混杂，将古典学术与神话和近期历史中有文字记载的史实混为一谈。他提议的航行的基础是托勒密的《地理学》，这部书写于2世纪，在15世纪初被重新发现。读了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记述（波罗于13世纪去过亚洲）之后，哥伦布相信自己抵达东方后会遇见特定的人和地方。和女王一样，他相信祭司王约翰的传说，即神话中的那位基督徒国王，滞留在东亚某地的穆斯林或蒙古人当中。他向伊莎贝拉承诺要找到那个世界，也就是伊莎贝拉命令迭戈·德·巴莱拉在《编年史》中描写的那个世界。

但哥伦布也有疯狂的一面，这或许就是他愿意承担这一艰险任务的原因，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若踏上这旅程，必死无疑。他拥有狂野的想象力。他签名时用的是自己设计的秘密签名，用字母和图像融合，难以解读。有些人相信，他用这种神秘的签名来秘密表达自己和孩子的犹太人血统。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用某种密码来书写，是时髦的风尚。另一个意大利人列奥纳多·达·芬奇差不多与哥伦布同龄，曾写过一份只能通过镜子来阅读的手稿，闻名遐迩。哥伦布和达·芬奇一样，花了大量时间来发展自己的理论，疯狂地在笔记本、日记本和书籍的空白处写字。在他拥有的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他在第99页做了特别的笔记，提及“占卜、预兆和……预言

的形式……（包括）召唤恶魔”。他对马尔库斯·凯基乌斯等人听到“虚空中有人说话”的记述特别兴趣盎然。^[14]

后来他说自己也听到“虚空中有人说话”。中世纪的这种对天使与魔鬼的着迷和畏惧，在伊莎贝拉身上也有。

哥伦布的个性非常复杂，自相矛盾，非常有趣而难以捉摸。他对自己的出身语焉不详，但意大利人确信他出身于热那亚。他可能有犹太血统。有人认为他是为葡萄牙效力的间谍。他可能出生于贫民家庭。驱动他的力量无疑包括对金钱的渴望，以及让自己与后代跻身贵族的憧憬。这或许就是他为什么对自己的卑贱出身遮遮掩掩，也许还能解释他为什么始终没有迎娶他的儿子斐迪南的母亲，因为她极可能出身社会下层。

同时，我们可以肯定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儿子斐迪南后来说他“遵守宗教律法一丝不苟，斋戒和祈祷都非常严格，简直像某个宗教修会的成员”。^[15]其他人也是这么看哥伦布的：他的领航员（也曾是竞争对手）胡安·德·拉·科萨描述哥伦布为圣克里斯托弗，要将基督教福音传给新大陆的人们。

对哥伦布的传记作者来说，厘清事实与虚构始终是一大挑战，因为他制造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神话。例如，飞黄腾达之后，他开始自视为殉道者，描述自己在卡斯蒂利亚宫廷曾经多么茕茕孑立、孤立无援。事实上，由于他拥有极强的个人魅力，而且他的想法引人入胜，从相当早的时期，他就吸引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支持者。红衣主教门多萨很敬佩他，而门多萨的建议得到伊莎贝拉女王的极大尊重。卡斯蒂利亚财政大臣阿隆索·德·金塔尼利亚在经济上支持哥伦布，还有一群热那亚商人为他出资，两位愿意庇荫他的人士——梅迪纳塞利公爵和阿拉贡金融家路易斯·德·桑堂赫尔也力挺他。好几位教士，包括伊莎贝拉的忏悔神父之一和胡安王子的教师之一，也支持哥伦布的

事业。伊莎贝拉的莫逆之交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也认为他的远征值得冒风险。

哥伦布的最主要、影响力也最强的支持者群体是胡安王子的宫廷。胡安王子在1492年夏季只有十四岁。他身边的人都是两位君主精心选拔的，任务是负责未来国王的成长、教育和道德指引。伊莎贝拉女王仔细地监督她心爱的儿子受到的抚育。王子的密友在她面前也有影响力。例如，王子宫廷的主管是古铁雷·德·卡德纳斯，也就是伊莎贝拉登基典礼上高举宝剑的那个人。此时，他作为女王备受信赖的谋臣，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担任过许多官职，权责越来越大。

女王的另一位亲密朋友是宫廷少年（包括王子）的人文主义教师彼得·马特。他成了哥伦布的朋友，后来成为研究新大陆发现的早期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哥伦布的另一位有影响的支持者是王子的女教师胡安娜·德·托雷斯·阿维拉，她也是御前近臣。哥伦布给胡安娜写的一封信表明，他是她信任的密友之一。胡安娜的兄弟安东尼奥参加了哥伦布去往新大陆的第二次远航。后来哥伦布需要向卡斯蒂利亚宫廷发送消息，希望确保消息一定能送到女王手中，于是将书信托付给安东尼奥。

但据观察家的说法，哥伦布的头号支持者是女王本人。唯独她一人看到了哥伦布能够为卡斯蒂利亚带来的益处的宏观图景：一个或许能够在将来改变卡斯蒂利亚命运的机遇。她的丈夫对哥伦布远航几乎没有丝毫兴趣，因为他始终更专注于地中海世界，而不是大西洋。哥伦布的儿子后来写道：“女王始终帮助和恩宠哥伦布，而国王对他的计划总是持保留态度，不是很热心。”^[16]

到1491年夏季，与格拉纳达的战争还在持续的时候，哥伦布灰心丧气，觉得自己永远得不到女王的批准了。他去拉比达接自己的儿子迭戈，打算去法兰西寻求查理八世国王的支持。修道院长胡安·佩雷

斯曾是女王的忏悔神父，表示愿意帮助哥伦布向女王说情。佩雷斯给女王写了封信，两周后得到答复。伊莎贝拉指示佩雷斯到宫廷来，于是佩雷斯修士骑着哥伦布帮他租来的一头骡子，去了格拉纳达。他抵达后，提醒伊莎贝拉不要忘了哥伦布的计划，并告诉他，哥伦布手头拮据。于是她再次传唤哥伦布，这一次还给了他2万马拉维迪，以便他到宫廷时能衣着得体。[\[17\]](#)

于是，哥伦布在伊莎贝拉资助下来到格拉纳达。这时，格拉纳达终于被基督徒占领。他觉得最后的障碍终于被克服了。但宫廷学者又一次反对哥伦布的计划，认为它不切实际。他大为沮丧，备好骡子，收拾行装，和佩雷斯一起返回科尔多瓦，准备北上。这是他受到的最后打击。“哥伦布对自己这次受到的待遇怨恨了一辈子。”莫里森写道。[\[18\]](#)

但哥伦布此时找到了一位新的支持者，终于交了好运。改宗犹太人路易斯·德·桑堂赫尔（国王的内廷财务总管）决定干预。桑堂赫尔去找到女王，一心要说服她，告诉她，他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女王陛下在国家大事上素来坚决果敢，而如今对风险这么小却可能为上帝的事业做出极大贡献、极大地增进教会利益，更不要说为她王国和王室带来极大收益与荣耀的事情，居然优柔寡断起来。如果哥伦布把给她的建议奉献给其他任何一位君主，对卡斯蒂利亚王室将是极大损失，对她个人也是严厉的责备。[\[19\]](#)

桑堂赫尔还说，他会自掏腰包为船队出资。伊莎贝拉表示会重新考虑，或许还说要用自己的珠宝作为远航的费用。桑堂赫尔赶紧说，大可不必。女王给哥伦布送去消息，信使在皮诺斯蓬特村（距离格拉纳达约10英里处）追上了他。远航终于得到了批准。

* * *

哥伦布遇到的一连串漫长耽搁和大失所望，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为自己提出的价码太高、太大胆。他的要求是，一旦成功，他要被任命为“大洋海军上将”，这在卡斯蒂利亚贵族当中会是非常高的衔级；他要求女王任命他为他发现的所有岛屿与大陆的总督；他要有权任命和罢免（他发现的地区的）官员；他要有权任命法官来监管（他发现的地区的）各港口的事务。他还要求，他即将发现的土地上所有出售、交换或生产的商品价值的十分之一要归他所有。^[20]他的要求超乎寻常，承担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很多人觉得，从欧洲驶向未经勘测的海洋，很可能是死路一条。而葡萄牙人在探索时，总是沿着非洲海岸航行。

他的要求非常复杂，因此需要大量文书工作，而协议的条件后来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哥伦布和伊莎贝拉制定了一系列契约，以确认双方的协议安排，并准备文件来帮助他的工作。哥伦布获得了正式的王室许可，去开展远航；契约规定了如果他的航行成功，他将得到哪些头衔和补偿；他得到了通行证和官方介绍信，以便递送给他抵达亚洲后遇到的外国君主与权贵。

伊莎贝拉同意为他的远航出资。开销其实并不大，因为只有三艘船。女王还将承担约90名船员的薪水和补给。据历史学家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的研究，远航的总开支为约200万马拉维迪^[21]，大致相当于“一名中层外省贵族的年收入”，“但远航风险很大，专家学者对哥伦布的事业冷嘲热讽，而且战时现金短缺”。^[22]

从一开始，伊莎贝拉就强调，此次远航纯粹是卡斯蒂利亚的事业。据探险家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和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巴尔德斯说，哥伦布向伊莎贝拉做出的承诺包括，船员必须是卡斯蒂利亚人。在90名参加远航的男子和男孩当中，有85人

是来自韦尔瓦和安达卢西亚的卡斯蒂利亚人，1人是葡萄牙人，4人（包括哥伦布自己）是意大利人。^[23]没有一个阿拉贡人。

尽管女王声称整个远航是王室特权，但没有为其预支款项。她的现金总是很紧张，于是命令帕洛斯镇为哥伦布准备两艘船，以抵消王室此前要求该镇支付的一笔罚金。帕洛斯官员被命令“在收到我们的书信十天之内，无须我们的进一步指示，不得拖延耽搁”，提供两艘装配齐全的船。女王还发出警告，若他们未能执行命令，则将“丧失我们的恩宠”，并每人罚款1万马拉维迪。^[24]官员们立刻开始行动，很快提供了两艘帆船：“尼尼亚”号^[25]和“平塔”号。

路易斯·德·桑堂赫尔和一个名叫弗朗切斯科·皮内利的热那亚人提供了远航所需的其余资金，据说从神圣兄弟会的金库借了钱。据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说，他们后来从“赎罪券销售”中得到了补偿，并且全部款项“后来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一个贫穷主教管区销售赎罪券的收益”中收回。埃斯特雷马杜拉是一个干旱而漫天尘土的省份，大多数居民只能勉强度日。^[26]这样一个贫困地区为远航出资，的确很讽刺。同样讽刺并且或许并非完全偶然的是，在随后几百年里追随哥伦布脚步冒着生命危险远航的许多探险家也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

即便在女王的具体支持下，远航的组织工作也不轻松。很多水手觉得，向西驶入无边无际、残酷无情的大洋，是一趟毫无意义、极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旅途。拉斯·卡萨斯后来写道：“很难找到愿意在看不到陆地的大洋上航行超过一天的水手，因为在那个时代，看不到陆地被认为是非常恐怖和可怕的事情，没有水手愿意冒这个险。”^[27]

女王预想到了这个问题，为了鼓励志愿者报名，规定任何参加此次远航的罪犯都将被赦免。有四个人利用这个途径，逃脱了牢狱之灾。^[28]

哥伦布交了好运，因为平松三兄弟（卡斯蒂利亚航海圈子里非常有名的卓越航海家）加入了他的队伍，成为远征队的领导者。长兄马丁·阿隆索·平松担任“平塔”号的船长，弗朗西斯科担任副船长；老三文森特·亚涅斯担任“尼尼亚”号的船长。有一些水手出于对平松三兄弟的尊敬，并认可他们的本领和才干，也加入远征。另一个有名的航海家族，来自涅夫拉的尼尼奥家族，也加入进来，并鼓励更多人加入。

一位至关重要的志愿者是船主胡安·德·拉·科萨，他带来了自己的船，“圣玛丽亚”号（这是三艘当中最大的船），并担任副船长。哥伦布是整个远征队的总指挥，在“圣玛丽亚”号上与德·拉·科萨一同航行。

航海圈子里流传着一种说法，称古代文献或秘密文件证明了哥伦布的理论。这对招募水手的工作很有帮助。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是，在哥伦布从岳母那里得到的“工具和地图”当中有一套包含航行指南的手册。这些文件非常珍贵，在葡萄牙被当作国家机密，泄露这些秘密是犯罪行为。尽管拥有一个精明强干的领导核心，但于1492年8月初集合起来的水手队伍还是有点像乌合之众。

远征队的每一名成员在离开帕洛斯之前都被要求做告解，并接受圣餐。他们于1492年8月3日黎明前半个小时扬帆起航。他们经过了拉比达的修道院（哥伦布曾在那里的朋友当中度过许多时光），在船上听得见修士们在吟唱、做晨祷的古老仪式。^[29]然后，他们向非洲以西的新近被殖民的加那利群岛的方向航行。

这三艘小小的帆船（船的长度不超过60英尺）在加那利群岛短暂停留，随后于9月6日继续航行。到落日时分，陆地已经被抛在脑后，再也看不见一丝踪迹。哥伦布及其船员驶入了不曾勘测的未知之海。

一天天流逝，一个月过去了。在某个时间，哥伦布开始篡改航海日志，让水手们以为自己距离已知陆地并没有那么远。

参加哥伦布首次远航的水手们后来说，随着他们“穿越大洋”，他们越来越恐惧，“每个钟头，他们心中的恐惧越发猛烈，而他们看到自己寻找的陆地的希望在逐渐消散”。水手们开始焦躁不安，有些人开始“窃窃私语”地质疑哥伦布的航海本领。他们害怕自己参加此次远航是上了当，会遭遇海难；他们开始怀疑，国王和女王为了不确定的收益，竟残酷地拿他们的生命冒险。“他们开始私下里商谈，要不要干脆把哥伦布扔进大海。”哥伦布用“甜蜜的话语”抚慰图谋哗变的水手，告诉他们，他们只要坚持不懈，必然赢得光荣和好运。

“他承诺，再过几天，他们的辛劳和奔波就结束了，必将获得毋庸置疑的大量财富。”[\[30\]](#)

随后，官员们也开始质疑哥伦布的领导。10月第一周的某个时间，哥伦布和马丁·阿隆索·平松发生了一次“激烈争吵”，为他们应当走什么方向大吵起来。哥伦布觉得平松是在挑战他的权威，是犯上作乱，因此很怨恨他。但大家同意继续按照哥伦布设定的方向航行。[\[31\]](#)

10月初，紧张情绪消退了一点，水手们看到海面上有一些漂浮的植物，说明他们已经接近海岸了。他们在大洋上航行了五个星期之后，在10月12日早晨，突然有人喊起来：“陆地！”

第一个看到陆地的水手是罗德里戈·德·特里亚纳，他在速度最快的“平塔”号上。这对他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因为第一个发现陆地的人将从女王手中获得一件丝绸上衣和1万马拉维迪的奖赏。

“哥伦布看到陆地，跪了下来，喜极而泣”，他开始唱《感恩赞》。[\[32\]](#)水手们喜悦地互相拥抱。但罗德里戈·德·特里亚纳没有

收到女王承诺的奖赏。哥伦布很快就宣称自己才是第一个看到陆地的人，因为他在前一夜就看到了天际线上的亮光，并向船上的官员们指出。水手们被要求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哥伦布却去与他们争夺奖品，这非常不利于维持良好的士气，对后来发生的事情也是个预兆。

三艘船在加勒比海某地（可能是巴哈马）的一个岛屿登陆，不过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哪一個島。哥伦布在航行途中篡改航海日志，给后来的学者制造了麻烦，无法复原他的航线。另外，他的航海日志原件的抄本神秘失踪了。它们之所以被偷窃，或许是因为它们包含的信息很珍贵，是美洲的藏宝图。或者是哥伦布的儿子们死后，他们家族的书籍和文件被粗枝大叶地清洗和丢弃了，或者被卡斯蒂利亚廷臣丢掉了，因为国王和女王从一处宫殿迁往另一处，需要减轻行李的负担。但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与哥伦布的孩子們交好，得到了一个比较早期的抄本，抄录了它的大部分内容。他的记述是关于此次改变世界的航行的最重要史料。

水手们看到的是一座美丽的热带岛屿，棕榈树和鲜花芬芳的灌木迎风摇曳。在西班牙，此时天气已经在转冷，寒风劲吹。而在这个地方，和煦的微风让人觉得仿佛在永恒的春天。他们看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稀奇的动植物，包括令人赏心悦目、色泽鲜艳的鹦鹉。他们努力描绘自己看到的景象。和许多来到加勒比海的旅行者一样，他们将其比作天堂。

这里的色彩都比欧洲的更鲜亮和轻柔，令他们眼花缭乱。海滩上的沙子是珊瑚颗粒构成的，白得闪闪发光，与西班牙海边的黑石头迥然不同。岸边的海水与细沙海底的颜色相同，形成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浅蓝，几乎是青绿，简直一点也不蓝。就连天空的蓝色也比其他地方要清淡一些、明亮一些。

这个世界似乎温和而友善。犬牙交错的珊瑚礁或许很危险，但水手们安全登陆之后，岛上似乎没有什么威胁。珊瑚礁海湾内，岸边的海水十分宁静。欧洲的风常常裹挟乌云、苦雨和寒气，而此处的风温暖而稳健，爱抚和慰藉人的皮肤。

鹈鹕沿着海岸盘旋，不时猛地扎入水中，寻找下一顿餐食，很快就捕捉到了猎物。鲜亮的鱼儿在浅水中成群游动。树上的水果任人采摘。其中最美丽的树是棕榈，海岸上到处都有棕榈，有的成群，有的孤零零地伸出枝丫到海面上，风景如画，可为人们提供荫凉和建材。

哥伦布看到的第一样东西让他颇感惊讶：赤身露体的人。海滩上有一群岛民，几乎全是男人，全身一丝不挂。几天后，水手们也看到了女人，一些美丽的裸女，敏捷矫健，对自己强壮而窈窕的身躯十分自豪。

对生活在四季如春地方的人来说，不穿衣服是很有道理的事情。10月，白天的平均气温为八十几华氏度，夜间是七十几华氏度^[33]，因此无须穿衣服。这对欧洲人来说新鲜事，因为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穿着笨重的羊毛衣服，以抵御恶劣天气，同时也将他们限制在出身的社会等级和阶层内。

生活在清冷而多风的欧洲的人们读到水手们对此地的描述，觉得这仿佛天堂。人们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是一个令人感到愉悦和刺激的细节。它也有了一种在全欧洲引起回响的言外之意：这种简单的生活让人回想起更轻松、更简单而不是那么物质主义的时代；这种纯洁就像圣方济各，他摒弃华丽的衣服，抛弃物质财富；不受约束、自由奔放的性行为也与传统的欧洲道德观相抵触。但哥伦布不是唯一强调土著人裸体的人。在新大陆登陆的第一批欧洲人全都强调了这一点。

哥伦布描述岛民为“温和与宁静的人民，质朴无华”，更让欧洲人兴趣盎然。他送给土著一些小饰物，如小红帽和玻璃珠子，他们将珠子挂在自己脖子上。^[34]他说，作为交换，他们给了他黄金。

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最初交往是礼尚往来的。印第安人很友善，似乎愿意与令他们惊讶的新客人合作。他们无疑厌恶欧洲人的体臭，并对他们毛茸茸的大胡子感兴趣，因为他们自己非常清洁，并剃去体毛。但他们非常礼貌，所以没有向欧洲人指出这些问题。他们对新来者非常好奇，有些人似乎在思考，这些新来者究竟来自大地还是天空。

根据哥伦布的航海日志（他计划返回卡斯蒂利亚之后将日志同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分享），他立刻开始考虑如何最妥善地奴役他们。登陆后的第一天，即1492年10月12日，他写道，土著学习很快，“应当能成为很好的仆人”。10月13日，他开始催促他们帮他寻找黄金，但他们不是很愿意。第三天，他记录道，他们非常不擅武艺，所以“只要五十人，就能征服他们，迫使他们俯首帖耳”。很快，西班牙人将一些印第安人带到自己船上，却没有顾虑印第安人是否发出了抗议。^[35]

哥伦布及其部下继续航行，穿过据信是巴哈马的地区，观察当地动植物。哥伦布相信自己来到了亚洲或印度沿海的岛屿，仔细地记载了这些岛屿的特征。他的文字描绘美丽的风景时越来越有诗意，因为他没有发现任何先进的商业文明。他也只搜罗到一点点黄金，主要是用一些小玩意儿换来的。土著把这些小玩意儿当作首饰，戴在身上，或者用来装饰鼻子。

他抵达每一座岛屿，都给它取名。为了感谢上帝，他把第一个岛屿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思是“神圣的救主”）。第二个岛屿则被命

名为圣母玛丽亚岛。第三个是用国王的名字命名的，称为费尔南狄纳岛。第四个根据女王的名字，被取名为伊莎贝拉岛。

令人不安的是，11月20日，“平塔”号船长马丁·阿隆索·平松没打招呼，就擅自驾船离开了。他可能与哥伦布发生了冲突，或许打算自己独立去寻找黄金，另外两艘船的官员和水手在离家千里的地方被丢下，感到恐惧。他们对离去的伙伴感到恼火，也为他们担心。他们只能继续前进。

12月初，哥伦布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36]（或者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叫作海地），并以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名义将其占领。他得知该岛内陆有黄金产地，而临近岛屿还有更多黄金。

12月20日，哥伦布收到了一位部落酋长的邀请，前去拜访。此人控制着海地的很大一部分。这位名叫瓜卡纳加里克斯的酋长送给哥伦布一件欢迎礼物：一件用棉布和五颜六色鱼骨制成的美丽衣服，中间有一个装饰性的面具，是用一大块黄金锤击制成的。随后，土著又送来成篮的食物和礼品。会见的时间很吉利：1492年圣诞夜。

但在这一晚，哥伦布一定是放松了警惕。凌晨，“圣玛丽亚”号上所有人都在熟睡。值班的哨兵也打盹了。这艘船是他们最大的一艘，也运载着数量最多的补给物资，竟滑到一座沙洲处，搁浅了。潮水将它推到岛屿边缘的珊瑚礁上，船底破裂，船体进水。有些船员张皇失措，跳上划艇，逃到“尼尼亚”号上，抛弃了自己的船。

大家很快意识到，“圣玛丽亚”号无法挽救了。但他们也知道，必须竭尽全力地将“圣玛丽亚”号上的物资和装备全部卸下，因为他们要想在这陌生土地生存下去，非常需要它们。卡斯蒂利亚人最脆弱的时候，酋长瓜卡纳加里克斯恰好抵达了。他动员了自己的所有族民，帮助欧洲人将物资搬运到岸上，同情他们的损失，并确保物资被

安全卸下和储存起来。瓜卡纳加里克斯劝他们不要担心，既然他们无处可去，他会给他们两座大房子居住。很快有更多印第安人赶来，送来了更多黄金作为礼物。当夜，酋长以盛宴款待基督徒，菜肴包括番薯和龙虾，以及用木薯粉制作的面包。

哥伦布相信自己与瓜卡纳加里克斯已经缔结真挚的友谊，于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平塔”号还是踪迹全无，可能已经彻底离去了。剩下的人太多，“尼尼亚”号是三艘船里最小的，不够承载他们。于是他告诉自己，“圣玛丽亚”号搁浅是上帝的意志，因为他决心在此处建造一座要塞，使之成为一座欧洲殖民地。他要把一些人留在岛上。因为这一天是圣诞节，他将新的定居点命名为“圣诞节”。他们用从“圣玛丽亚”号拆卸的木板和木料建造了一座巩固的小要塞。他们拥有足够维持一年的面包和饼干、葡萄酒和弹药，而且岛上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哥伦布告诉自己，被留下的人一定不会有问题。他挑选了39人留下，包括一名木匠、一名有医疗技能的人、一名炮手兼工程师、一名裁缝和一些水手。他是如何挑选人的，没有资料保存下来。有些人可能自愿留下来。有些殖民者是上层阶级的人，其中一人曾是国王的幕僚人员，还有一人是一位有权有势的教士的侄儿，所以留在岛上未必是一种惩罚。或许有人希望得到机会，第一个去搜罗岛上的黄金。也有人或许被岛上美丽而热情奔放的女人迷住了。不过哥伦布的一些部下得知自己被选中留下，一定不高兴。

1493年1月2日，也就是格拉纳达投降的整整一年后，探险家们举行了一次告别宴会。哥伦布担心马丁·阿隆索·平松抢在他前头返回西班牙、散播假消息以污蔑他，所以急于起航。留下一群殖民者，似乎是理智的决定，因为印第安人与新殖民者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据哥伦布自己的记载：“酋长对哥伦布表现出深深的爱意，对他离去感到非常悲伤，尤其是看到他起航的时候。”^[37]

哥伦布开始返航，穿过加勒比海诸岛。1月6日，马丁·阿隆索·平松和“平塔”号突然露面了。平松告诉哥伦布，他之前离开大部队，不是有意为之。哥伦布怒气冲冲地与他质，斥责平松在撒谎，是由于“傲慢、放肆和贪婪”才离开大部队。他指控平松犯上作乱，并愤恨地说他的行动是“撒旦的恶行，因为他（平松）希望阻碍航行，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38\]](#)

哥伦布发出这些指控，是有根据的。据说平松为自己和他的船员搜罗了很多黄金。但平松对哥伦布留下39人的做法也感到不安。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大，哥伦布似乎与平松三兄弟都发生了冲突。

1月13日，又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剩余两艘船在返航途中，风却停了，他们来到一座无遮无挡的港湾。哥伦布派遣一些水手上岸去收集番薯为食，遇见了一些印第安武士。这些印第安人与他们见过的不同。他们外貌凶悍，脸上涂着木炭，看上去凶神恶煞。哥伦布及其部下猜测，他们可能就是和顺的印第安人胆战心惊地提及的令人生畏的食人部落。双方交换了一些物品，但这些印第安人突然用弓箭攻击他们。西班牙人奋起自卫，打伤了两名印第安人，其余的印第安人迅速逃走了，消失在森林里。这是欧洲人和印第安人在新大陆的第一次暴力冲突。

此事让哥伦布更加急于回家。他们修理了船只，然后向东航行。他们带上了找到的食物的样品、鹦鹉、黄金物品和他们捕获的一小群土著。返程耗时约两个月。他们遭遇了恶劣天气，平松的船被暴风吹到西班牙北部的加利西亚，不得不随后折向南方。

但奇怪的是，哥伦布没有直接返回西班牙。他首先于1493年2月底在葡萄牙附近的岛屿登陆。这让怀疑他是葡萄牙间谍的人有了嚼舌根的材料。他说自己被无法抵挡的猛烈风暴吹到了里斯本港口。他从里斯本写信给伊莎贝拉女王，汇报自己的发现。但在里斯本的时候，他

与若昂二世国王至少进行了三次单独的私人会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哥伦布大肆吹嘘自己，因为他曾经向葡萄牙寻求经济援助，却被拒绝了。

若昂二世国王已经多次被伊莎贝拉女王抢占上风，得知哥伦布新发现的消息后非常恼火。据他的廷臣说，他考虑把哥伦布当作叛徒杀掉，因为他可能从葡萄牙窃取了航海机密。但他最后决定用外交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哥伦布在里斯本受到热烈欢迎。人们在街头争先恐后地去看他带回来的稀奇东西和他随行队伍中的印第安人。这一天围观他的人当中，有很多人会牢记此事多年。伊比利亚半岛由此兴起了航海冒险的风潮。比如，当时葡萄牙宫廷雇用的人当中，有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侍从，名叫斐迪南·麦哲伦。

若昂二世国王选择放哥伦布离去，但发出了严正警告：根据《阿尔卡索瓦斯条约》，哥伦布主张的那些土地都属于葡萄牙人。他发誓要到卡斯蒂利亚与女王理论此事。

哥伦布获准离开。在帕洛斯，他追上了兴风作浪的平松船长，但没过多久，平松就染上了一种神秘的疾病，回家几天后就去世了。哥伦布的潜在竞争对手和眼中钉就这样消失了。但很快就开始流传一种说法，称平松兄弟是此次成功远航的主要功臣，而哥伦布曾想半途而废。后来，所有人都认识到他们抵达的土地的极大价值之后，此事成了漫长的法律纠纷的主题。

* * *

女王迅速理解了哥伦布的发现的重大意义。她敦促他尽快到巴塞罗那见她。两位君主正住在巴塞罗那，处理在格拉纳达战争期间搁置

多年的内政事务。4月7日，哥伦布收到了两位君主写给“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信（强调了他的新的荣誉头衔）。[39]伊莎贝拉显然希望立刻采取行动，开展更多的远征：

我们已经读了你的来信，对你写的东西非常高兴。我们欣喜地看到，上帝给了你的辛劳这么好的结果，并很好地引导你开始的工作。你的功绩对上帝，以及对我们的国家，都是卓越的贡献。除了你为上帝效劳的事业之外，你将得到我们的许多恩宠，上帝一定会为此高兴……我们希望你已经开始的工作在上帝的佑助下继续进行并拓展，同时也希望你到我们身边来。因此，为了给我们效力，请尽快前来，以便及时地获得你需要的一切；你看，夏季已经开始，返回你业已发现的土地的旅程不能耽搁，你看是否能在塞维利亚或其他地区找到你需要的物资，以便返回。请收到此信后立刻给我们回信，以便在你前来我们身边和返回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做好准备工作。等你返回的时候，一切将准备就绪。[40]

哥伦布春风得意地穿过塞维利亚城的时候，有一个激动万分的小男孩，站在古老的圣尼古拉教堂旁，观看他的到来。这个孩子就是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他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成为西印度群岛的探险家、殖民者、神父和印第安人权益的捍卫者。哥伦布带着美丽的绿鹦鹉、身穿稀奇古怪服装的印第安人、大块黄金和用宝石与鱼骨制成的面具，在大街小巷游行。他让西班牙国民对海外探索迸发出莫大的激情。拉斯·卡萨斯后来回忆道：“发现了一片叫作‘印度’的土地，那里满是形形色色、闻所未闻的人和东西，而发现者本人将在一些印第安人陪同下走这样或那样的路线！这消息如同野火，在卡斯蒂利亚不胫而走。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看他；他经过的城镇，大街上挤满了人，摩肩接踵，都是来欢迎他的。”[41]

在巴塞罗那，他受到的欢迎甚至更加隆重热情。两位君主屏气凝神地听着他的故事。哥伦布的儿子回忆道：

这消息让两位君主非常欣喜；他们命令举行隆重的典礼来欢迎他，要配得上他这样的大功臣。整个宫廷和城市的人都出来迎接他；

天主教双王公开欢迎他；他们威风凛凛、辉煌壮观地端坐在富丽堂皇的宝座上，头顶上有金线织就的华盖。他走上前来亲吻他们的手，他们从宝座上站起来，仿佛他是一位大贵族，不肯让他亲吻他们的手，而是让他在他们身旁落座。[\[42\]](#)

在巴塞罗那，人群中也有一个兴高采烈的男孩，那就是未来的探险家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巴尔德斯，他当时是宫廷的一名侍从。他记得那激动人心的场面、黄金的礼物、稀奇古怪的食物和新物种、啼鸣婉转的鸟儿，以及服饰奇妙而怪异的印第安人。

“这时，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来了，带来了他的第一次发现之旅带回的第一批印第安人。”奥维多写道。[\[43\]](#)

国王和女王把哥伦布当作一位显赫的绅士，十分礼遇：“国王和女王非常和蔼可亲，非常优雅地接见了。”随后他详细介绍了他的经历和远方国度的财富。他们还讲到，那里有数百万人，若不接受洗礼和挽救，就要下地狱。因为，令人不安的是，此次远航发现了“偶像崇拜、恶魔献祭和崇拜撒旦的仪式”的迹象。[\[44\]](#)

两位君主“听得全神贯注，举起手来祷告，然后跪下，感谢上帝”。拉斯·卡萨斯写道：

王家小教堂的唱诗班唱起了《感恩赞》，而管乐器给出回应。的确，这一刻仿佛充溢着天堂的喜悦。谁能描摹国王、女王和贵族们洒下的热泪？所有人心中是怎么样的欢腾、喜悦和幸福！大家都互相鼓励，要在新的土地上定居，并让那里的人们皈依基督教。他们能看到，两位君主，尤其是伊莎贝拉女王，多么重视信仰的传播。两位君主用言语和行动表现出，他们如此大悦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得到了上帝的恩宠，因为上帝允许他们支持和资助此次远航（尽管出钱很少），找到了这么多等待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45\]](#)

在此期间，红衣主教门多萨（他是地位极高的贵族，而且备受伊莎贝拉的景仰，因此被称为西班牙的第三位君主），设盛宴款待了哥伦布。这也是哥伦布极为得宠的又一个迹象。宴会上，航海家坐在红衣主教“身旁最尊贵的位置”上。哥伦布在富丽堂皇的节庆气氛下，“第一次享用了礼节隆重、有试吃者侍奉的盛大宴会”。“统治者赏赐给哥伦布雨点般的荣誉。”[\[46\]](#).

最大的荣誉就是，女王命令将航海家的两个儿子迭戈和斐迪南接到宫廷，担任王子的侍从，在宫中生活。他们将和宫廷的其他贵族子弟一样，受到最好的教育。哥伦布的儿子们实际上是在女王的孩子当中长大的，还成为胡安王子的好友，担任他的侍从。即便在王子长大成人之后，哥伦布的两个儿子也“深得恩宠，并住在王子宫中”。[\[47\]](#).

所以，在第二次远航时，哥伦布的排场就大多了。他奉命返回那些新岛屿。他此次的装备非常豪华，拥有17艘船和大量乘客。很多有权有势的人争先恐后地要参加远航，去往那神奇的土地、那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人们翘首以盼，期望那唾手可得的财富。六个月后，哥伦布再度出发。

在随后的岁月里，由于哥伦布的第二、三、四次远航的结果不同，他的命运也兴衰沉浮。他坚守自己的信念，即自己找到了通往印度的道路，尽管越来越多的如山铁证表明，他发现的其实是欧洲世界此前不知晓的一块新大陆。

哥伦布始终相信，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可靠的捍卫者，是女王。此时他俩的关系正处于巅峰。他用宫廷爱情的口吻向她说话。她的最高级廷臣被允许这样“放肆”。他在给女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欲望的钥匙，已经在巴塞罗那给了陛下。如果您品尝我的善意的滋味，就会发现，自那时起，它的芬芳与甜美增加了许多……在巴

塞罗那，我将自己全身心奉献给陛下，没有任何保留，包括我的心灵、我的荣誉和我的家财。”^[48]

然而，就在哥伦布认可伊莎贝拉的赞助的重要性的同时，在欧洲其他地方，她发挥的作用却被人抹杀了。2月15日，哥伦布在葡萄牙登陆之后，给路易斯·德·桑堂赫尔（曾支持他远航的那位阿拉贡金融家）写了一封信，记述自己的远航。这封信是和另外一封给王室的信一起发出的。哥伦布描绘了远方岛屿的美丽、丰富的自然资源、他看到的美丽的裸体土著——“男男女女，都一丝不挂，像刚从娘胎出来一样”、唾手可得的遍地黄金，以及“凶残”食人部落的存在。^[49]他写道，这一切都是胜利地奉献给“最高贵的国王和女王”的，“并献给他们闻名遐迩的国度。为了这一切，整个基督教世界理应感到喜悦，举行庆祝，并庄重地向圣三位一体感恩，虔诚地祈祷，因为将有许多人皈依我们神圣的信仰，此后还能给我们带来物质利益”。^[50]

哥伦布给路易斯·德·桑堂赫尔的信带来了这些激动人心的新闻，很快就广泛传播起来，成为一个出版现象，在新发明的印刷机帮助下，在全欧洲得到复制传播。在安特卫普、巴塞尔、巴黎、罗马、佛罗伦萨、斯特拉斯堡和巴利亚多利德，有多达十六种拉丁文版本得以出版。不过，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哥伦布的信里提及了女王和国王，并且此次远航纯粹是卡斯蒂利亚的事业，由伊莎贝拉赞助，但几乎所有印刷版本的信里都只说斐迪南是远航的恩主和赞助人。有些版本甚至附有披挂甲冑的斐迪南的木刻肖像。哥伦布传记作者莫里森注意到，没有人把功劳归于女王，这个疏漏“颇为奇怪”。^[51]而且，这些印刷版本在提到哥伦布发现的岛屿时，具体讲到了费尔南狄纳岛和其他岛屿，而哥伦布以女王的名字命名的岛屿——伊莎贝拉岛，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美丽的岛”。

我们不知道伊莎贝拉对这些令人窘迫的轻慢是如何反应的，也不知道斐迪南是否曾寻求纠正这些错误。或许，如果新发现的赞助者是个男人，大家会觉得更容易接受。人们的这种观念使得伊莎贝拉可以集中注意力于手头的工作。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她必须找到办法，确保远航的收益只属于她的王国和她的人民。她必须确保，新发现的土地将属于卡斯蒂利亚，她必须寻求最高权威的终极裁决。

于是，她又一次寻求罗马和梵蒂冈的支持。她的盟友西班牙人罗德里戈·博吉亚刚刚成为教皇，称号为亚历山大六世。

[1]. 巴塞卢什的伊莎贝拉的父亲是航海家恩里克的哥哥。她的丈夫是航海家恩里克的弟弟。

[2].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Columbu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0.

[3]. 即前文讲到的葡萄牙司厖长若昂。

[4].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trans. and ed. Andrée Collar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19.

[5].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trans. and ed. Andrée Collar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p.19.

[6]. Fernández-Armesto, *Columbus*, p.4.

[7].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p.22.

[8].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巴尔德斯（1478~1557），一般简称奥维多。他参加了西班牙对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并写了一部很长的编年史记录此事，这是关于这段历史的极少数的第一手史料之一。他在伊莎贝拉女王的宫廷长大，曾是胡安王子的侍从。

[9]. Capitan 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 y Valdés, *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 (Madrid: Imprent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851) , pt.1, p.19.

[10] “拉比达” 在阿拉伯语中是“瞭望塔”的意思。

[11] Samuel Eliot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vol.1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42) , p.118.

[12] Samuel Eliot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vol.1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42) , p.130.

[13] Duke of Medina Celi to Grand Cardinal of Spain, March 19, 1493, in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on 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ed. and trans. Samuel Eliot Morison (New York: Limited Editions Club, 1963) , p.20.

[14] Fernández-Armesto, *Columbus*, p.41.

[15] Ferdinand Columbus, *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 By His Son Ferdinand*, trans. Benjamin Kee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9) , p.9.

[16] Ferdinand Columbus, *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 By His Son Ferdinand*, trans. Benjamin Kee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9) , p.284.

[17]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vol.1, p.133.

[18]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vol.1, p.135.

[19]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vol.1, p.136.

[20] Columbus, *Life of Columbus*, p.42.

[21]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vol.1, p.137. Morison calculated that 2 million maravedis would be \$14, 000 in 1942 dollars (when he performed the calculation); that would be \$195, 000 in 2012.

[22] Fernández-Armesto, *Columbus*, p.62.

[23] Alice Bache Gould, cited in Samuel Eliot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49), pp.141-42.

[24] Royal decree requiring the people of Palos to provide Columbus with caravels *Pinta and Niña*, April 30, 1492, Archives of the Indies, in Samuel Eliot Morison, ed. and trans.,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pp.31-32.

[25] “尼尼亚”的意思是“女孩”。

[26] Fernández-Armesto, *Columbus*, p.62.

[27]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p.23.

[28] Alice Bache Gould, cited in Morison,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pp.33 and 34.

[29]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one-volume ed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49), pp.158-59.

[30] Oviedo, *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pp.22, 23.

[31] Fernández-Armesto, *Columbus*, p.80.

[32] Oviedo, *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p.24.

[33] 80华氏度约合26.7摄氏度, 70华氏度约合21.1摄氏度。

[34]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one-volume edition, p.229.

[35] Morison, trans.,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pp.65, 67, 68.

[36] 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西班牙岛”。目前, 该岛西部为海地共和国, 东部为多米尼加共和国。

- [37] Morison, trans.,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p.142.
- [38] Morison, trans.,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p.146.
- [39]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one-volume edition, p.2: 7.
- [40]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one-volume edition, p.2: 8.
- [41]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p.37.
- [42] Columbus, *Life of Columbus*, p.100.
- [43] Oviedo, *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p.29.
- [44] Oviedo, *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p.29.
- [45]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p.38-39 (book 1, chapter 78) .
- [46]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p.42 (book 1, chapter 80) .
- [47] Oviedo, *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p.71.
- [48] Fernández-Armesto, *Columbus*, p.61.
- [49] Columbus' s Letter to the Sovereigns on His First Voyage, February 15 to March 4, 1493,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in Morison, ed. and trans.,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pp.180-86.
- [50] Columbus' s Letter to the Sovereigns on His First Voyage, February 15 to March 4, 1493,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in Morison, ed. and trans.,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pp.180-86.
- [51] Morison, ed. and trans.,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p.181.

十六 博吉亚把新大陆给了她

巧合的是，恰恰在哥伦布开始发现之旅的时候，也就是1492年8月，罗德里戈·博吉亚当选为教皇。这是历史上第二次有西班牙人成为教会的最高领袖，而他的精神统治将在很多方面令人难忘。

首先是梵蒂冈的资深观察家见过的最为奢华的就职庆典。游行队伍中有十三队身披甲胄的武士，由一名雇佣兵统领指挥。随后是诸位红衣主教的扈从随员，身穿五光十色的制服。红衣主教们骑马前进，头戴主教冠，身穿丝绸长袍。教皇前方走着十二匹白马，由十二名英俊少年牵着。游行路线两侧的商店和住宅都张挂着五颜六色的旗帜。礼炮齐鸣，如同雷霆；狂热的群众高呼“博吉亚！博吉亚！”以欢迎新任教皇。

博吉亚骑马（或骡子）从梵蒂冈宫来到圣彼得大教堂，在一张镀金椅子上坐下，而宫廷官员上前亲吻他的脚。然后他走上圣安德烈小教堂的阶梯，端坐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黄金圣座上。教皇的三重冕被戴在他头上。

博吉亚对自己的任职有极高期望。他选用的称号是伟大的希腊征服者的名字，自称亚历山大六世。他欣喜若狂。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据说他穿上教皇的法衣时，几乎像个孩子般喜气洋洋。”^[1]

并非所有欧洲人都和他一样喜气洋洋。已经有传闻称，选举教皇的程序比较世俗化，而非严守教会规矩；博吉亚之所以当选，是因为

肆无忌惮地贿赂其他红衣主教；礼物和教职易手，换取选票。据说，为了从博吉亚府向拥有关键一票的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家里运送金银财宝，竟动用了四头健壮的骡子。博吉亚当选之后，斯福尔扎迅速得到了威望极高的教廷副秘书长职位。

用金钱购买教皇三重冕，如果博吉亚真的这么干了的话，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专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梵蒂冈，用金钱换取高级职位的行为不受赞同，但仍然司空见惯。在这个世界里，壮观的排场和奢靡景观需要世俗的财富来买单，教士们疯狂搜罗教职，榨取金钱，那样才能放纵地夸耀自己的财富。

财富的一部分被投入颂扬上帝的伟大艺术品的创作。在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雇用下，桑德罗·波提切利^[2]和多梅尼科·吉兰达约^[3]为西斯廷教堂创作了描绘摩西生平的壁画。红衣主教让·比约尔·德·拉格拉于拉聘请米开朗琪罗雕刻了耶稣和玛丽亚的大理石像，即令人心痛的《哀悼基督》。红衣主教斯福尔扎的家族聘请列奥纳多·达·芬奇创作了《最后的晚餐》。但是，似乎梵蒂冈山上的精神境界越高，那里的人们的道德水准就越低。

教会腐败不是新鲜事。几十年前的1458年，卡利克斯特三世（罗德里戈的舅舅阿方索·德·博吉亚）去世后，竞选的贿赂拉拢活动也非常猖獗。红衣主教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于黎明时分在梵蒂冈的厕所与年轻的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吉亚接头。博吉亚告诉他，自己已经答应投票支持法兰西红衣主教纪尧姆·德·埃斯图特维尔，以换取让他继续担任梵蒂冈的肥差——副秘书长的书面保证。皮可洛米尼对罗德里戈说，他是个“年轻傻瓜”，纪尧姆的承诺一钱不值。皮可洛米尼告诉博吉亚，纪尧姆会向着红衣主教团里的其他法兰西人；如果投票给纪尧姆，博吉亚就会失去副秘书长职位，并损害教会的利益。次日，博吉亚投票给皮可洛米尼，后者已经搞到了其他必需

的票数。皮可洛米尼戴上了教皇三重冕，成为庇护二世教皇，而罗德里戈保住了副秘书长职位，成为庇护二世最宠爱的弟子。

在随后三十四年里，又有三位教皇戴上了渔人权戒^[4]，罗德里戈则一路顺风，继续发达。庇护二世去世后，罗德里戈又一次交了好运：他的朋友彼得罗·巴尔博（卡利克斯特三世去世后发生了反对西班牙人的暴乱，巴尔博站在罗德里戈那边）成了教皇保罗二世。在彼得罗·巴尔博当选的那次秘密会议期间，罗德里戈患病，但他毕竟是巴尔博的长期盟友，因此仍然地位稳固。

下一位教皇是西克斯图斯四世，他派遣罗德里戈以教皇特使的身份去西班牙，给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帮了大忙；然后是英诺森八世，他于1484~1492年担任教皇。英诺森八世临终前哀叹教会的糟糕状况，告诉围在他床前的红衣主教们，他非常懊悔，自己辜负了教会。大家注意到了他的虔诚表达，但他的悔过来得太晚，已经无法逆转他造成的严重事态：他敦促在北欧调查巫术，向出价最高的人兜售圣职，还邀请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并占领那不勒斯王国，并承诺教廷支持他。

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吉亚担任教廷高官的岁月里，始终是天主教会信任的官员，以聪慧、敏锐和勤于政事而闻名。他在梵蒂冈内部的活动也非常机敏，并持续地积累油水丰厚的教职和岗位。罗德里戈得到了阿尔巴诺、波尔图、巴伦西亚、カタ赫纳和马略卡等主教管区。他在意大利也有领地，包括内皮、奇维塔卡斯泰拉纳和索里亚诺，这些城镇是控制卡西乌斯大道和弗拉米乌斯大道^[5]的要塞，而这条大道是通往罗马以北的主动脉。1482年，他获得了苏比亚科修道院的收益，而这座修道院控制着二十二个村庄。他还得到了福萨诺瓦修道院（在通往那不勒斯的道路上）的收入。这意味着，他控制了从罗马北上和南下的主干道上的关键地产。

他的日渐扩大的帝国的一部分来自阿拉贡国王斐迪南的恩赐。巴伦西亚、卡塔赫纳和马略卡都是斐迪南的领地。在斐迪南的默许下，罗德里戈还在巴伦西亚的宗教地位提高之后，成为首任巴伦西亚大主教。

罗德里戈在梵蒂冈的攀升，与他的同胞在西班牙故国的崛起交相辉映。西班牙人的威望越来越高。全欧洲都将征服格拉纳达视为数百年来基督教势力的最重要军事成就，甚至有人觉得这是伟大的基督教都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部分补偿。罗德里戈·博吉亚竭尽全力地宣扬西班牙的功绩。1492年1月，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终于完成长达七百年的“收复失地运动”之后，博吉亚在罗马街头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罗马装点城郭，灯火辉煌，篝火熊熊，以各种娱乐活动欢庆胜利。娱乐活动包括斗牛赛，其间有五头公牛被杀死，这是罗马举行过的第一次斗牛赛，是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吉亚特别举办的。”^[6]

* * *

对红衣主教博吉亚来说，格拉纳达的辉煌胜利可不是小事，因为意大利人主宰了教会统治集团，一般对外国人十分鄙夷。罗德里戈地位崇高，但毕竟是个外来者，容易遭到批评。所以他非常珍视西班牙祖国与他的联系和对他的支持。西班牙国威大振，也提高了他自己的威望。

但罗德里戈·博吉亚与西班牙的两位君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挫折。1492年初秋，伊莎贝拉得知罗德里戈成为教皇后，心情很矛盾。博吉亚是她的臣民，他当上教皇，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肯定是好事，而且她与他有私人关系。他曾帮助她获得王位，她有理由对他感激。他新官上任三把火，承诺要改革教会，并消灭罗马严重的街头犯罪。他效仿伊莎贝拉的政策，仔细地搜寻匪帮头领和杀人犯。罪犯被捕之后，很快被处以绞刑，尸体被悬挂在台伯河沿岸的绞刑架上腐

烂。^[7]他还提议在已经黯然失色的曾经的罗马帝国都城开展一些重要的重建工程。从圣天使堡到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他建造了一条宏伟大道，即亚历山大大道（后来被称为博吉亚新道）。^[8]他还在罗马的一些最神圣的圣所启动了美化工程，伊莎贝拉对此大表赞扬。

但伊莎贝拉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道德和是否配得上这样重要的位置抱有疑虑。在公开场合，她和斐迪南对他当上教皇表示喜悦，但私下里他们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据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彼得·马特（他在加入伊莎贝拉的宫廷之前曾在梵蒂冈工作）说，两位君主担心，尽管罗德里戈绝顶聪明，并且有行善的潜力，他也表现出一些令人不安的人格缺陷，并且野心勃勃地推动他的众多私生子的利益。这些孩子正在长大成人，马特对他们的生身父亲是谁没有任何疑问。他在十多年的许多书信中多次具体提及博吉亚的儿子们。在梵蒂冈，教皇内层圈子里有很多人 also 对此心知肚明。

“由于这件事情，我的两位君主感受不到喜悦，而是愁眉不展，”彼得·马特在博吉亚被提名为教皇不久之后写道，“这似乎预示着基督教世界将掀起一场风暴，而不是风平浪静。两位君主因为他们是他们的臣民而高兴，但更因为他低贱地吹嘘自己生了很多渎神的孩子而难过。他们怀疑，对于圣彼得的三重冕会出现纷争。”但他们会抱最好的希望，“如果基督徒的慈善心能够战胜作为父亲的天性，他或许能为所有基督徒建造一座通往天堂的、比石柱更坚强的桥梁……愿上帝保佑，我们能听到他运用自己的极大才华去行善”。^[9]

彼得·马特向自己在罗马的朋友表达了担忧，因为据传说罗德里戈是通过行贿得到教皇位置的。马特担心如果此事大白于天下，会损害基督教信仰。“有人窃窃私语地告诉我……低贱、渎神和犯罪之事。据说你们的恩主攀登到这样的高峰，不是依靠文学才华、自制或慈善的热情，而是用黄金白银和诺言来为自己搭建梯子。”他在给教

皇的朋友弗朗齐斯库斯·普拉坦西斯·格里奥拉努斯的信中写道，“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梯子是靠天堂围墙上，以便掀翻基督，去满足你们的恩主对荣耀的渴望。”另外，如果罗德里戈执着于“他那疯狂的欲望，即将他的儿子们提携到最高位置”，意大利和欧洲的权力平衡会被扰乱。^[10]

彼得·马特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他向据说从博吉亚那里获益最多的人之一——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斯福尔扎是马特在米兰的儿时朋友，支持博吉亚参选教皇，并被博吉亚提升到副秘书长职位上。

最尊贵的阁下，我要告诉您，我的两位君主对英诺森八世的去世感到悲哀，对亚历山大六世成为教皇也不高兴，尽管他们是他们的臣民。因为他们担心，他的贪婪、野心，以及更糟糕的——他对子女的软心肠会把基督教会拖垮。您也不是清清白白的，因为据说您曾帮助他登上高位……愿上帝保佑，让他对您和您的家族心存感激。^[11]

欧洲各地的理想主义和虔诚的基督徒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们相信教会深陷于极其危险的腐败，教廷的世俗权力正在增长。许多非常虔诚的西班牙人，包括伊莎贝拉，都对这种局面深感不安。她做了很多工作，努力提升西班牙天主教会的道德观和水准，所以罗马的教会最高层出现了严重的不端行为令她尤其沮丧。

1492年8月6日，红衣主教们召开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时，伊莎贝拉派驻梵蒂冈的大使——卡斯蒂利亚人贝尔纳迪诺·洛佩斯·德·卡瓦哈尔受邀向聚集起来参加弥撒的红衣主教们讲话。他利用这机会，发表了一次言辞激烈的布道，抨击他眼中的教会的精神危机，以及选举一位正直人士接替教皇英诺森八世的必要性：

堕落了，堕落了，曾经多么高尚的罗马教会的荣光与威严啊！……现今，我们蒙受了更深的创伤。由于这些腐朽罪行，我们的下属抗命不尊，人民和君主蔑视我们，土耳其人嘲讽和掠夺我们；因为就在我们沉溺于享

乐、野心和贪欲的时候，教会圣座的光辉消失了，教会照料信众的所有警觉都被搁置了。

他呼吁选出一位能够领导和激励民众的新教皇，并且要足够圣洁，能够“创造奇迹，将教会从这么深的毁灭之渊里挽救出来，简直是从粪坑里拉出来”。^[12]

特别值得担忧的是，红衣主教职位和教会的高级职位几乎被显赫教士、贵族和国王的亲属垄断了，而不是真正诚心于教会事业的学识渊博的人。这些令人垂涎欲滴的职位能够带来大量收入，而无须代表教区人民从事任何具体工作。所以很多占据教会高位的人根本懒得踏足于被交给他们的主教管区。之前教会也曾努力制止此种瘟疫般的任人唯亲。例如，在1458年，红衣主教们召开了秘密会议，打算以教皇庇护二世去世为契机，改良和清扫教会的行政系统。有人提出了呼吁梵蒂冈进行结构调整的请愿，得到了几乎所有红衣主教的支持。每一位红衣主教都承诺，假如他当选，会开展特定的改革。这份请愿承诺将神圣的红衣主教团的人数限定为二十四人，以便让每一位成员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还要求禁止将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人或未受教育的人任命为红衣主教；将每位教皇任命自己的侄子或外甥为红衣主教的数量限制为一人；要求教皇以更民主的方式统治，要求他在缔结政治盟约或处置教会财产之前，需寻求红衣主教团的批准；要求教皇承诺向土耳其人开战。大家同意，在选举不久之后，新教皇将宣布上述几条承诺的全部内容。

但这些承诺从未得到落实。罗德里戈的朋友彼得罗·巴尔博当选为教皇，即保罗二世，他就职后第一个举措就是静悄悄地摈弃了上述承诺。但为了保住自己的教皇权力，他提升了红衣主教的地位。他命令他们穿红色丝绸的袍服，因为红色染料最昂贵。他命令他们在外出时必须大量扈从前呼后拥，他还确保那些收入有限的红衣主教从教会得到补助金，以增加收入。他实际上把红衣主教变成了教会的“君

王”。新的收益让神圣的红衣主教团更愿意放弃之前的承诺，但也让世人更加看清教会的世俗和贪婪。随后保罗二世将他的三名侄子或外甥任命为红衣主教。侄儿、外甥们在梵蒂冈的角色特别烦人。当教皇是很困难的工作，而教皇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自然希望身边有值得信赖、将他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亲信。老年人一般会让成年的儿孙来辅佐自己。教皇理论上没有儿孙，所以侄儿外甥就是最好的选择。但以这种方式得到任命的许多侄儿外甥都仅仅是忠于教皇的亲信，在教会资金的支持下过着奢靡生活，而没有什么宗教上的使命感。

好几位教皇其实有自己的孩子，但这些孩子通常是在他们成为神父之前出生的，或者在他们攀登到高位之前去世了，所以不会扎眼。英诺森八世有两个私生子，是在他成为教士之前生的。其他教皇可能也有自己的儿子，但都小心地掩盖他们的身份，称其为自己的侄儿、外甥或堂表兄弟。

对教士来说，隐蔽自己孩子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在基督教会领导层中晋身的一个关键条件就是守贞誓言。在早期教会，几乎所有教士都是有妇之夫。人们相信基督没有结过婚，但他的大多数使徒都有妻子。但随着罗马天主教会越来越富裕，教士被要求单身，因为大家相信，守贞代表着一种体制化的对尘世享乐的弃绝，也让教士更容易集中精力于手头工作；也能让教会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经济资源，而不必担心教会公款被挪用，去抚养教会官员的儿女。

然而，罗德里戈·博吉亚当上教皇之后，大约六七个年轻人出现在他身边，与他关系密切。这些年轻人吸引了许多代历史学家的全副注意力。罗德里戈自己对这些年轻人的身份讳莫如深。有些学者倾向于相信，他们是他的子侄辈。但对西班牙人来说，这些年轻人的身份不是秘密。罗德里戈没有向西班牙人隐瞒自己越来越多的私生子的真

实身份，因为他忙着为他们在西班牙置办有权有势的地位。没有人确定他究竟有多少私生子，也不知道他们的年龄，更不知道他们的母亲是谁，但肯定有一群年轻人得到罗德里戈的关心照顾，他关心他们的出人头地，简直如同关注自己。

这是一些非常俊秀而聪慧的孩子，或许罗德里戈完全做不到否认他们的存在。罗德里戈还是个红衣主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社会上抛头露面。

大家相信，他的长子是佩德罗·路易斯，罗德里戈特别热切地为他谋个好出路。1483年5月，他给了佩德罗5万杜卡特，在西班牙买个采邑；这年11月，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颁布了一道法令，宣布：尽管佩德罗的出身可能存在疑问，但他在教会眼里是个合法出生的孩子。佩德罗的财产和名字得到了保障，于是来到西班牙。此时他大约二十岁，加入了针对格拉纳达的战争。他在龙达围城战中表现非常英勇。1485年年底，斐迪南国王授予这个年轻人威望很高的头衔——甘迪亚公爵，并规定该头衔可以世袭。公爵是最高级别的贵族，仅次于国王和亲王，所以这是一项珍贵的封赏。甘迪亚镇风光旖旎，布局整齐优美，靠近大海。佩德罗·路易斯很快就在阿拉贡建造了两座雄伟的宅邸，一座在甘迪亚，另一座在巴伦西亚城内。

斐迪南国王还欢迎年轻的博吉亚加入王族，批准博吉亚迎娶斐迪南的年轻亲戚玛丽亚·恩里克斯·德·卢纳。他们没有马上结婚，因为玛丽亚·恩里克斯尚未成年，但这次订婚让博吉亚家族与西班牙王室产生了直接的姻亲关系。

但不幸的是，这个前程大好的青年于1488年一次度假并探望在意大利的亲人时去世了。但罗德里戈在罗马还有其他的继承人。下一个继承佩德罗的产业与头衔的孩子的意大利语名字是乔万尼，西班牙语

名字是胡安。佩德罗·路易斯在遗嘱中立弟弟乔万尼为受益人。这意味着，乔万尼将成为下一代甘迪亚公爵。

此外至少还有三个孩子。切萨雷英俊而机智，被安排当教士，这是贵族家庭中次子的一般命运。六岁时，他就已经是教廷书记；三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巴伦西亚大教堂的一名法政教士、哈蒂瓦的会吏长和甘迪亚的修道院院长。1480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将他合法化。他的父亲成为教皇后，大约十六岁的切萨雷成为巴伦西亚大主教。所以，从理论上讲，他对巴伦西亚省和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岛的所有居民负有宗教指导的义务。

同时，罗德里戈的女儿卢克雷齐娅因性情温柔可亲和惊人的美丽而闻名遐迩。她长发金黄，步伐优雅。此外罗德里戈至少还有一个儿子，名叫乔弗雷。

但伊莎贝拉对教士违逆性道德的行为深恶痛绝，视之为大逆不道。她孜孜不倦、穷追不舍地努力扫净西班牙天主教会内的贪污腐化和裙带关系。她为自己选择的宗教顾问都是拥有无可挑剔的道德权威、贞洁生活方式和禁欲苦行的人。她选择埃尔南·德·塔拉韦拉为自己的终身忏悔神父，是因为他严格奉行基督一般的简朴生活和慈悲心。彻底征服格拉纳达之后，她将塔拉韦拉（出身于改宗犹太人家庭）提升到重要的新岗位——格拉纳达大主教，将安达卢西亚人数大大增加的基督徒的宗教引导托付于他，并派遣他去格拉纳达，监督教会工作在那里的进展。

接替塔拉韦拉担任女王忏悔神父的，是一位隐居的前僧人西斯内罗斯，他曾徒步漫游各地，寻求面包的施舍。这是托钵僧传统早期就有的做法。西斯内罗斯身穿粗糙的内衣，即所谓刚毛衬衫，用来摩擦自己的皮肤，以提醒自己教会殉道者曾经受的苦难。他夜间睡在一块木板上，据说还会自我鞭笞，以惩罚自己的罪孽和缺陷。西斯内罗斯

非常不情愿地来到了女王宫廷。伊莎贝拉请求他像管理自己的灵魂那样勤勉地管理她的灵魂。

伊莎贝拉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间出现摩擦，是不足为奇的。起初，她向亚历山大六世派驻西班牙朝廷的大使弗朗西斯科·德普拉抱怨，教皇大张旗鼓地展示自己的私生子，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弗朗西斯科是加泰罗尼亚人，他告诉她，在近期的几位教皇当中，亚历山大六世的活动不算稀奇。他将自己与伊莎贝拉的谈话汇报给教皇，告诉他，自己实际上是告诉女王，她太天真了。他在给亚历山大六世的信中写道：“我还把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与英诺森八世的一些事情告诉了她，证明您的行为比上述两位教皇体面得多。”^[13]

为博吉亚的孩子们所做的婚姻安排很快产生了国际影响。卢克雷齐娅被许配给一名加泰罗尼亚贵族，后来被许给另外一人。第二门婚约于1492年11月被终止。^[14]她父亲当上了教皇，自然要为卢克雷齐娅安排更好的前程。

她被安排了一门更显赫的婚事，丈夫是乔万尼·斯福尔扎，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的一位地位较低的贵族。他是亚得里亚海沿岸小镇佩萨罗的领主。联姻的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因为之前为卢克雷齐娅安排过其他婚约。西班牙贵族的婚姻需要得到两位君主的批准，斐迪南国王已经为卢克雷齐娅的上一门婚事做了正式祝福。随后，被摈弃的前任未婚夫令人窘迫地出现在罗马，要求教皇和米兰公爵给他金钱补偿，才肯离去。

此事摆平之后，新的婚事筹划继续进行。婚礼于梵蒂冈举行。美丽的新娘卢克雷齐娅身穿奢华的袍服，佩戴熠熠生辉的珠宝。陪伴她走进大厅的是十九岁的朱莉娅·法尔内塞，这是一位美艳不可方物的绝世佳人，许多观察者相信她是教皇的情妇。新郎穿着金线长袍。卢克雷齐娅的兄弟切萨雷和乔万尼在一旁见证。教皇和一位意大利贵族

主持了婚礼。新婚夫妇出席了盛宴，许多教会官员和罗马贵族到场庆贺。伊莎贝拉对在神圣的梵蒂冈大厅举办婚礼的消息感到不悦，又一次将自己的担忧传达给教皇。

女王和教皇在异端和犹太人的问题上也有分歧。教皇觉得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主持异端裁判所和强迫犹太人皈依或离开西班牙的问题上过于严酷，丧失了理智。在罗马，犹太人被允许自由定居，并保留自己的信仰，只要不公开礼拜就可以。一群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在切奇利亚马尔泰拉镇附近的一座营地住下，得到了教皇的庇护。

西班牙驻梵蒂冈大使迭戈·洛佩斯·德·阿罗得知教皇决定欢迎西班牙犹太人，大为恼火。他坚持说，亚历山大六世作为教会领袖，理应第一个驱逐犹太人才对。教皇不理睬他。斐迪南不相信教皇这么做是出于善心或怜悯。他说，亚历山大六世允许犹太人定居在教皇国，仅仅是因为可以向他们收取额外的税赋，以此榨取钱财。斐迪南冷哼道：“但凡是能卖得出去的东西，教皇都能拿来挣钱！”^[15]

* * *

虽然和教皇有很多分歧，但伊莎贝拉并不打算与他撕破脸皮。她有要务与教皇处理，于是姑且搁置争议。她得知哥伦布发现新土地的消息之后，立刻开始确保发现的一切东西都仅属于她一人。哥伦布还没有返回她的宫廷，她便将哥伦布的信转发给教皇，要求裁决这些岛屿的主权。伊莎贝拉一定是刚刚得到哥伦布的消息，就立刻派人快马加鞭地向教皇提出请求。

精明的教皇和伊莎贝拉一样，立刻理解了这些发现的重大意义，以及迅速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他也明白，自己欠西班牙人很多，尤其是欠斐迪南。斐迪南除了为教皇提供政治掩护与支持之外，在红衣主教博吉亚成为教皇之前还给了他同时拥有三个油水丰厚的阿拉贡主教

管区的权力，提供了将教皇的儿子切萨雷合法化的文书，还提名年轻的切萨雷为潘普洛纳与巴伦西亚主教。后来，斐迪南又同意将这个少年提升为巴伦西亚大主教。

1493年，就职不久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心甘情愿满足伊莎贝拉的要求，于是迅速发布了关于新大陆的四道诏书。诏书是用铅制印章封印的法律文书，拥有特殊的权威和重要性。这四道诏书给了伊莎贝拉想要的东西。据20世纪的历史学家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说：

他急于和两位王室恩主扯平，因此等于是让他们自己开出条件。他就新发现的土地颁布了一系列诏书，而没有顾及葡萄牙的正当要求。这四道诏书不是专断草率的决定。它们是教皇给出的有利于卡斯蒂利亚的主权说明，根据则是教皇所谓的处置目前不受任何基督徒君主占有或统治的新发现土地与异教徒人民的权力。^[16]

三道关于新发现的诏书于1493年5月3日和4日颁布。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里斯本仅仅是两个月前的事情，再加上类似正式文书的处置程序烦琐，所以这个速度算非常惊人了。诏书被复制了多份，以便让未来的探险家将其展示给有可能提出异议的人。

在四道诏书的正式引文里，教皇都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致意。有意思的是，诏书将新发现的土地全部给了“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统治者”，也就是只给了伊莎贝拉一个人。斐迪南一贯善于捕捉个人利益，一定是觉得新的土地的价值较低，因此不屑一顾。否则他一定会确保诏书也授予他具体的权益。

1493年5月4日的诏书将半个地球赐给了伊莎贝拉女王。根据这份教皇的主权授予诏书，

在北极与南极之间划定一条子午线，该线距离一般所称的亚速群岛与佛得角应有100里格^[17]。在该子午线以西和以南的已发现和即将发现的

所有岛屿与大陆，无论是印度还是其他地区，只要未被其他基督徒国王占据，均属于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统治者。^[18]

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强调，他授予这些权力的条件是，传播宗教福音应当是探索的主要目标。他期望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西班牙扩张天主教势力的成绩之上再接再厉。教皇诏书强调，传教是授予领土的理由：

在令上帝喜悦、令我满意的其他工作中，这一项（传福音）无疑是最重要的，即让天主教信仰和基督教，尤其在我们的时代，得到提升，传扬四海，让被征服的野蛮民族能够接受真正的信仰，灵魂得救。由于天主的怜悯和恩宠，我被传唤到圣彼得的圣座上，尽管我没有圣彼得的品质。我认可你们才是真正的天主教国王与君主，因为你们一贯如此，你们的著名功绩几乎已经驰名世界。你们不满足于已有功绩，而是尽一切努力，刻苦钻研，勤奋工作，不吝惜劳力和花费，不惧危险，甚至不怕自己流血，以便完成上帝的事业，并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此目标，投入你们的全副力量。你们从撒拉森人的暴政下收复格拉纳达王国的功绩足以证明这一点。你们为天主的圣名增添了荣耀。我们的动机正当光荣，我们应当自发地、慷慨地为你们提供手段，让你们能够为了如此神圣、如此值得赞扬、如此令永生之上帝喜悦的目标而努力，每一天都增添上帝的荣光，并拓展基督教的帝国。^[19]

在同一份诏书里，教皇还写道，他“挚爱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新大陆建立的殖民地，“建有一座拥有足够防御工事的塔楼，他将随他前去的一些基督徒安置在那里”，已经开始了建立新帝国的过程。^[20]当然，他指的是“圣玛丽亚”号搁浅后哥伦布留在当地的小群体。

教皇对谁有权控制未发现土地的裁决肯定让葡萄牙人不悦。于是，伊莎贝拉和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进行了谈判，商定如何瓜分全球。谈判在卡斯蒂利亚的托尔德西利亚斯镇举行。1494年6月，他们达成了协议，即《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将分割两国势力范围的南北子午线从佛得角群岛向西推了370里格，而不是教皇规定的佛得角群岛

以西100里格，这就让葡萄牙得以保留卡斯蒂利亚已经让出的非洲海岸的全部权益。葡萄牙人很满意：他们可能在1493年哥伦布返航后立刻派遣远征船队，发现了南美洲东部的一大片土地，即今天的巴西，那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争端的解决结果，至少在当时，并且从伊莎贝拉和若昂二世的视角看，是西班牙现在占据了新土地的西段，而葡萄牙控制南段，包括巴西和非洲沿海。两个亲戚平分了蛋糕。

* * *

世界的其他部分也需要瓜分。斐迪南希望教皇支持他的那不勒斯亲戚，去统治那不勒斯王国。罗德里戈成为教皇的时候，斐迪南的妹妹胡安娜是那不勒斯王后，她嫁给了他们的堂兄——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21]。罗德里戈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和加冕礼。^[22]因此，阿拉贡和那不勒斯的王室是近亲，而且通常是盟友。

那不勒斯是个富裕的王国，人口稠密，山川壮美。该王国的领地囊括整个意大利半岛南半部分。所以，那不勒斯在地中海贸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其他一些欧洲强国（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兰西）的垂涎。法兰西人相信他们对那不勒斯王国拥有合法的权力主张，因为他们曾经占据那不勒斯王位^[23]，不过后来王位被斐迪南的伯父“宽宏的”阿方索夺走了。教皇被要求裁断谁才是那不勒斯的合法君主。前一任教皇英诺森八世与费兰特有宿仇，因此支持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这显然给未来制造了麻烦。

另外，统治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也与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的家族有仇。卢多维科·斯福尔扎^[24]鼓励查理八世，如果他入侵意大利和占领那不勒斯，斯福尔扎家族会出手相助。这意味着，就在新教皇罗德里戈·博吉亚就职的时候，那不勒斯统治者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希望确保教皇支持费兰特继续统治该国。

为了帮助自己的亲戚，斐迪南向亚历山大六世提出了一项他不可能拒绝的建议。1493年中，西班牙驻梵蒂冈大使迭戈·洛佩斯·德·阿罗来到教廷，向教皇宣誓效忠。为了换取教皇对阿拉贡人继续当那不勒斯国王的支持，德·阿罗得到授权，允许博吉亚的儿子乔万尼迎娶斐迪南的亲戚玛丽亚·恩里克斯·德·卢纳。这对热衷于向上爬的博吉亚家族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亚历山大六世告诉儿子胡安，他希望与西班牙王室攀亲，但也希望现在或者在不远的未来从伊莎贝拉女王手中获得一些位于格拉纳达的原属于摩尔人的地产。^[25]

还有另外一项联姻计划。那不勒斯王室愿意将费兰特国王的私生孙女桑恰嫁给教皇的儿子乔弗雷，并奉上丰厚的嫁妆。于是教皇为自己的后代安排了又一场王家婚姻。桑恰和乔弗雷在1494年结婚了，此时他们都还是十几岁的孩子。

作为交换，教皇给了斐迪南和费兰特这两位国王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让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继续控制那不勒斯。费兰特于1494年初去世，教皇宣布那不勒斯王位将传给费兰特的儿子阿方索，而非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这个决定当然让法兰西人和米兰人都很恼怒，他们开始一起筹划推翻教皇的决定，破坏他与阿拉贡王室的联盟。

乔万尼·博吉亚和斐迪南的亲戚玛丽亚·恩里克斯的婚礼非常奢靡，令人难忘。它代表着博吉亚家族的辉煌胜利，他们已经发迹了。乔万尼带着大量扈从和配得上王室婚礼的贵重礼品来到西班牙。他父亲为他准备了珍贵的商品，一同带去，包括“成箱成箱的富丽堂皇的天鹅绒、锦缎、织锦、银线布、缎子和皮毛……软垫、镶嵌黄金的床罩、镶金边和鲜红色缎子滚边的白色锦缎制成的帐子、绘制有亚历山大大帝和摩西历史图景的壁毯，以及大量银餐具”。还有许多珠宝首饰：一件带有巨大祖母绿和大钻石的挂件，供乔万尼戴在帽子上；给

公爵夫人准备了嵌满珍珠和钻石的黄金十字架，其中包含真十字架的一个碎片，是教皇亲自放上去的。^[26]

婚礼的穷奢极欲招致了许多非议。曼托瓦^[27]使者报告称：“这位公爵出发（去西班牙）的时候非常富有，满载珠宝、金钱和其他便携的贵重物品与白银。据说他一年后回来，把所有货物都留在西班牙，然后回意大利再收割一次。”^[28]

1493年9月，乔万尼娶了玛丽亚·恩里克斯之后，就成了斐迪南国王的姻亲，也是西班牙地位最高的精英家族之一的亲戚。但这个青年从抵达西班牙起，表现就很不像话。他疯狂酗酒，沉溺于逛妓院，用射击猫狗这样的活动自娱。他父亲甚至听到了令人不安的说法，称他未能圆房。这个报告很快被证明是假的。事实上，他的妻子很快连续两次怀孕，生了一儿一女。

乔万尼没有赢得西班牙人的好评。一位观察者称：“他是一个非常卑鄙的青年，满脑子是虚妄的光辉灿烂的想法，愚蠢，傲慢，残酷，不讲道理。”^[29]他的行为举止也没有为他赢得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好感。他被召回罗马，不知何时才能返回西班牙，两位君主并不因此感到遗憾。他的妻子玛丽亚·恩里克斯留在西班牙，自己抚养儿女。

与此同时，教皇对梵蒂冈的管理招致人民的不满。亚历山大六世遭到了红衣主教团的公开反叛。为了加强对这个群体的控制，他史无前例地增加了十三名新的红衣主教人选。其中三人是他的秘书，第四个是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美艳动人的朱莉娅的兄弟），第五个是他自己的儿子切萨雷。原有的红衣主教们坚决反对，但教皇说他一定要做这个改变，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他言出必行。在9月20日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只有十一位红衣主教到场；七人投票赞同教皇的计划，四人弃权。还有十名红衣主教抵制此次会议。^[30]

就这样，在有限的支持下，切萨雷·博吉亚于1493年9月23日成为红衣主教。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没有任何宗教使命感。很快他就明确表示，希望从教士的誓言中得到解脱。

梵蒂冈的博吉亚争议发生的时候，整个意大利半岛也在酝酿紧张的气氛。意大利始终没有建立起任何中央政府，政局非常不稳定和危险，因为各个大城邦——威尼斯、米兰、罗马、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和持续不断的争斗。米兰、那不勒斯和罗马在争夺那不勒斯王位。威尼斯正在与土耳其人争夺它在巴尔干半岛的属地，连吃败仗。佛罗伦萨出现了权力真空。那里的政治家洛伦佐·德·美第奇于1492年去世，留下他那笨拙的儿子皮耶罗掌权。

米兰的人文主义学者彼得·马特相信意大利正处于战争边缘。1492年9月，他写道：“我相信，意大利君主们正在自我毁灭。”他描述了米兰和那不勒斯正在酝酿的互相仇恨和嫉妒，似乎要刺激法兰西发动暴力干预。“……就这样，意大利在慢慢锻造即将用来杀死它的那把剑。”^[31]

法兰西人的确图谋入侵意大利。为了确保西班牙不会干预他们的南征，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向斐迪南国王提议，归还鲁西永和佩皮尼昂，即斐迪南的父亲胡安二世在镇压阿拉贡内乱时丧失的土地。西班牙和法兰西开始了谈判。观察家注意到，西班牙和法兰西的条约实际上意味着，西班牙将不再寻求监管意大利局势。这是一个新的证据，表明意大利人和法兰西人之间即将爆发战争。

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这个作为天主教家园的国度，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并没有足够的道德权威，去成为一种稳定局势的力量。1493年6月12日，在教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西班牙大使洛佩斯·德·阿罗谴责了教皇的外交政策，说它使得意大利处于“永久战争的状态”。他还批评了“教廷的贪污腐化，以及买卖圣职的丑闻”。^[32]

但这些分歧，至少在当前，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他在西班牙的两位恩主共同的虔诚信仰所掩盖了。毋庸置疑，他们三人全都深沉地忠于天主教（如果不是忠于它暗含的价值观），并且都努力用能够增进教会威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信仰。

就在这个时期，斐迪南、伊莎贝拉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赞助建筑师多纳托·布拉曼特在梵蒂冈山上设计和建造被称为小圣殿的纪念性陵墓。小圣殿是文艺复兴全盛期的一件艺术杰作，准确地追溯了古典世界的传统。它由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出资建造，饰有象征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和西班牙朝圣活动的扇贝壳主题图案。它的奠基石于1502年安放，上面用仿中世纪字体镌刻着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名字。伊莎贝拉和红衣主教贝尔纳迪诺·洛佩斯·德·卡瓦哈尔通力合作，为小圣殿搜集了超过五件圣物，包括真十字架的碎片和婴孩耶稣摇篮的碎片。在罗马的观察者看来，这座建筑令人耳目一新，有许多创新；它也是一个视觉象征。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联合统治代表着中世纪向近代过渡。

西班牙人合作的另一项工程是圣母大殿的精美装饰。这是罗马最大的教堂，献给圣母。教皇出钱建造了这座教堂的辉煌的镀金天花板，其中使用的黄金据说是第一批从新大陆运回的贵金属，是伊莎贝拉给教会的馈赠。^[33]

女王和教皇都相信新大陆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并感到，教会注定要在那里取得很大进展。亚历山大六世在自己位于梵蒂冈的私人住所展示了他请平图里基奥^[34]创作的一幅杰作，于1492~1494年间完成。画中，教皇跪在复活的基督面前祈祷。这幅画的名字叫《复活》，背景中，就在基督空荡荡的墓穴上面不远处，描绘着美洲原住民的形象。他们被画得浑身赤裸、身强力壮、肌肉发达、头戴羽毛饰物。这是我们所知的欧洲艺术中第一次表现印第安人的形象。将他们

包括在这幅杰作之内，凸显了教皇很早就对新大陆兴趣盎然，并认识到向新大陆传教的关键意义。

教皇很快就认识到新大陆的重要性，于是伊莎贝拉得以将她自己的宗教价值观（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强加于一个崭新的半球。她给新大陆的数百万人送去了卡斯蒂利亚风格的教育、医疗和政治制度，以及宗教价值观。异端裁判所在西班牙扎根不久之后，也被传播到新大陆。这意味着，西班牙独特的混合思想——一方面是对知识的追求与开明思想，一方面是对宗教异己的不宽容——越过了大洋，影响拉丁美洲的文化与政治生活五百多年。

但教皇给伊莎贝拉和西班牙未来的最宝贵礼物是，他将世界一分为二，将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给了伊莎贝拉。总的来讲，这是一笔非同小可的交易：首先，竟然有人胆敢切分地球；其次，天主教会如此强大，未来许多代的很多人从来没有想到要质疑教会的此项裁决。

但新大陆的美洲原住民很快就开始质疑教皇给伊莎贝拉的赠礼。他们后来得知，教皇将数百万土著居住的土地夺走，用笔墨和封印制作了一封文书，竟然就将他们的土地交给了欧洲人。他们难以理解这样的概念：一个人，即教皇，竟然被认为有权处置天与地。

1512年，有人将这种概念解释给哥伦比亚的两名印第安西努部落酋长，他们惊诧地摇了摇头。其中一人说：“教皇一定是醉了。”
[35].

[1]. Michael Mallett, *The Borea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Dynast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9), p.120.

[2]. 桑德罗·波提切利（约1445~1510），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画家，属于洛伦佐·德·美第奇赞助的佛罗伦萨画派。他的最著名作品包括《维纳斯的诞生》和《春》。

[3]. 多梅尼科·吉兰达约（1449~1494），来自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是一个大型绘画工坊的领导人，米开朗琪罗曾为他工作。

[4]. 渔人权戒是一枚图章戒指，象征教皇的权力，因为教皇是圣彼得的继承人，而圣彼得曾是渔夫。另外，《新约·马可福音》1：17写道：“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1842年之前，教皇用渔人权戒作为图章，签署官方文件。

[5]. 弗拉米乌斯大道是古罗马的一条大道，从罗马越过亚平宁山脉，通往里米尼，由盖乌斯·弗拉米乌斯（前187年执政官）主持建造。

[6]. John Fyvie, *The Story of the Borea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3), p. 29.

[7]. Paul Strathern, *The Artist,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Warrior: The Intersecting Lives of Da Vinci, Machiavelli, and Borgia and the World They Shaped*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9), p. 69.

[8]. Mary Hollingsworth, *The Cardinal's Hat: Money, Ambition and Everyday Life in the Court of a Borgia Prince* (Woodstock, N.Y.: Overlook Press, 2005), p. 230.

[9]. Peter Martyr to Count of Tendilla, September 23, 1492, in *Opus Epistolarum: 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ondon: Wellcome Library).

[10]. Peter Martyr to Franciscus Pratensis Griolanus, September 18, 1492, in *Opus Epistolarum: 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ondon: Wellcome Library).

[11]. Peter Martyr to Ascanio Sforza, September 27, 1492, in *Opus Epistolarum: 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ondon: Wellcome Library).

[12]. Peter de Roo, *Material for a History of Pope Alexander VI, His Relatives and His Time*, vol. 2 (New York: Universal Knowledge Foundation, 1924). pp. 308-14.

[13] Vatican Secret Records, ASV, A.A.ARM I -X VIII, 5023, ff 6IV-64r, cited in Sarah Bradford, *Lucrezia Borgia* (New York: Viking, 2004) , pp.22 and 23.

[14] Vatican Secret Records, ASV, A.A.ARM I -X VIII, 5023, ff 6IV-64r, cited in Sarah Bradford, *Lucrezia Borgia* (New York: Viking, 2004) , p.24.

[15] Jean Lucas-Dubreton, *The Boreas* (New York: E. p.Dutton & Co., 1955) , pp.82-83.

[16] Samuel Eliot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onevolume ed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49) , p.2: 22.

[17] 里格这个长度单位曾在英国和拉美等地流行，原意是一个人步行一小时的距离。自中世纪以来，不同国家的里格的长度不一。西班牙古时的里格也有浮动，曾被官方规定为合4180米。

[18] Paul Gottschalk, *The Earliest Diplomatic Documents on America: The Papal Bulls of 1493 and 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 (Berlin: Paul Gottschalk, 1927) , p.35.

[19] Paul Gottschalk, *The Earliest Diplomatic Documents on America: The Papal Bulls of 1493 and 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 (Berlin: Paul Gottschalk, 1927) , p.21.

[20] Paul Gottschalk, *The Earliest Diplomatic Documents on America: The Papal Bulls of 1493 and 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 (Berlin: Paul Gottschalk, 1927) , p.21.

[21] 正式称号为斐迪南一世。

[22] Malletc, p.97.

[23] 法兰西王室对那不勒斯王国的权力主张的由来：1266年，安茹的查理（法王路易九世的弟弟）在教廷支持下，击败原先统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霍亨施陶芬王朝，成为西西里与那不勒斯国王。1282年，西西里岛人民发动起义，在阿拉贡国王佩德罗三世（他的妻子是霍亨施陶芬王朝的成员）支持下将法军从

西西里岛驱逐出去。从此，阿拉贡王室占据西西里岛，安茹家族占据那不勒斯。1416年，阿拉贡国王“宽宏的”阿方索五世驱逐安茹家族，将西西里与那不勒斯联合在阿拉贡王室统治之下。

[24]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1452~1508），米兰公爵（1494~1499）。他是斯福尔扎家族在米兰统治的开创者弗朗切斯科一世·斯福尔扎（1401~1466）的次子。他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等艺术家的赞助者。他统治米兰的时期，是米兰文艺复兴最后也最辉煌的阶段。达·芬奇的《最后晚餐》就是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出资创作的。

[25] Bradford, *Lucrezia Borgia*, p.30.

[26] Bradford, *Lucrezia Borgia*, p.31.

[27] 曼托瓦是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地区的一座城市，是重要的文化与艺术中心。

[28] Miquel Batllori, *La Familia Borja*, Luzio, p.120, July 13, 1493, cited Bradford, *Lucrezia Borgia*, p.31.

[29] Marion Johnson, *The Borea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81), p.116.

[30] Christopher Hibbert, *The Borgias and Their Enemies, 1439-1513* (New York: Harcourt, 2008), p.51.

[31] Peter Martyr to Count of Tendilla and Archbishop of Granada, September 28, 1492, in *Opus Epistolarum*.

[32]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p.224.

[33] Antonio de la Torre, *Documentos*, pp.142-43; Jack Freiberg, *Bramante's Tempietto and the Spanish Crown*.

[34] 平图里基奥，真名贝尔纳迪诺·迪·贝托（1454~151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他因身材矮小，得到一个译名“平图里基奥”，意思是“小画家”，他有时自己也签名为平图里基奥。

[35] Hugh Thomas, *The Conquest of Mexico* (London: Pimlico, 1993) , p.72.

十七 虚妄与幻想之国

1492年之后的数百年中，许多代学者曾激烈地争论，谁是第一批登上新大陆海岸的非美洲人。有人说，这项功绩应当属于北欧人，或威尔士人，或非洲人，或波利尼西亚人。最近还有人说，是中国人。上述的部分或全部民族，或许的确曾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瞥见过美洲或多或少的一些土地。他们看了，又离去了。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立刻认识到这项发现的重大意义，并将其占为己有，然后迅速将冒险变成热火朝天的事业，引发了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人口流动之一。这个人就是伊莎贝拉女王。

在旧大陆的所有统治者当中，只有她从一开始就明确认识到此项发现的意义，并采取了有效措施，将未来的远征体制化，并向美洲殖民。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比她落后了一百年，最后才占据了西班牙人觉得没有价值的北美洲剩余土地。葡萄牙人起初集中力量于贸易交换，只建立了一个贸易站网络，以支撑他们的贸易路线。西班牙人则几乎立刻开始大量定居于美洲，将卡斯蒂利亚人和美洲人的血统融合，形成了一个新民族。

哥伦布于1493年返航不久之后，伊莎贝拉女王就得出结论：他的发现太重要，不能让任何单独一个人，哪怕是她的朋友，去垄断。她得到了教皇的祝福之后，立刻开始投入资源和力量，组织新的远征，有效地控制其财政，以便让她的臣民，即卡斯蒂利亚人，成为主要受益者。几个月后，她给了哥伦布更多人手和船只，让他返回美洲，但

也赞助了其他探险家。很快，就有一艘又一艘船，在不同的卡斯蒂利亚船长和水手驾驶下，从塞维利亚起航西去，执行她赋予的使命。

哥伦布奉命又执行了三次远航，成绩不一。但在随后十年内，她还派出了至少六支探险队。阿隆索·德·奥赫达领导了其中一个探险队，由首次远航的领航员陪同：胡安·德·拉·科萨与佛罗伦萨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一同远航，亚美利哥借助花言巧语上了船，后来美洲就是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命名很偶然，也有些难以解释。其他探险队的领导人包括文森特·亚涅斯·平松（平松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个）、迭戈·德·莱佩（一个能干的航海家，是平松家族的亲戚）、佩德罗·阿隆索·尼尼奥（来自尼尼奥航海世家）和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一位来自塞维利亚的富商，他的探险队里有一个年轻人叫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

在女王的许可下，在随后十年里，这些探险队抵达并勘察了美洲数千英里的海岸线。哥伦布查看了加勒比海的大多数主要岛屿，以及中美洲沿海。阿隆索·德·奥赫达抵达了今天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胡安·德·拉·科萨探索了哥伦比亚和巴拿马沿海的一些岛屿。文森特·亚涅斯·平松来到了巴西，他是第一个看到亚马孙河的欧洲人。巴斯蒂达斯在巴尔沃亚陪伴下，发现了巴拿马大陆。去往巴拿马的探险特别重要，因为那里的地峡很狭窄，让人有可能从大西洋进入太平洋。巴尔沃亚是第一个从美洲海岸看到太平洋的欧洲人。

每一次探险都引发了更多探险，就像瀑布一样，延续数十载。埃尔南·科尔特斯于1504年抵达加勒比海，征服了墨西哥，后来探索了下加利福尼亚^[1]。胡安·庞塞·德·莱昂第一次到新大陆是1493年，他勘察了佛罗里达沿海，那里是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分。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于1509年与阿隆索·德·奥赫达一同去美洲，于1533年征服了秘鲁。这些探险让几代人为之奋斗不息。佩德罗·德·贝拉

- 门多萨参加了15世纪80年代对大加那利岛的征服；他的孙子阿尔瓦
- 努涅斯·卡韦萨·德·巴卡来到佛罗里达，不幸被困，遭到奴役，花了九年时间，徒步穿过今天的德克萨斯州南部和美国西南部，最后平安抵达墨西哥的安全地带。[\[2\]](#)

伊莎贝拉决定允许除了哥伦布之外的其他人参加探险，让哥伦布很痛苦，他相信他已经获得了探索他发现的土地并从中获得商业利益的专有权力。但他原先的推测——他抵达了印度——很快被证明是不准确的。尽管哥伦布是一位极其优秀的航海家，但也被证明是一个糟糕的行政管理者和眼光很差的人，很快几乎所有人都看清了他的这些缺点。

但在最初，伊莎贝拉对这位意大利航海家绝对信任。哥伦布返回巴塞罗那一个月内，她就准备了十六道王室命令，为他的下次远航做准备。伊莎贝拉照例用官样文章的说法（将她的名字和斐迪南的名字并置），给他下达了具体的指示。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也是她讲得最详细的，是要求对印第安人进行宗教的教诲。她命令，哥伦布应当“用一切手段和办法……努力赢得他们的心”，让他们皈依“我们的神圣的天主教信仰”，并教他们西班牙语，以便让他们理解即将展开的宗教教育。为了传教的目的，她派去了十二名神父。

伊莎贝拉女王明确指示了哥伦布及其部下，应当如何与美洲原住民相处。她命令他们“善待印第安人，不要伤害他们，与他们应当多多沟通和亲善，以诚相待，尽力帮助对方”。女王还指示，若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虐待”印第安人，哥伦布应当凭借女王授予他的权威（他是海军上将、王室代表和总督）“对其严惩”。

她希望保障远征的财政管理得稳妥，既管理好起初的开支，也要妥善经营她期望最终获得的收益。为了更好地监督财务，她让哥伦布和堂胡安·德·丰塞卡联合负责船只的采购和物资补给。丰塞卡是来

自科卡（距离伊莎贝拉家族的大本营塞哥维亚不远）的贵族出身的官僚，他的家族长久以来一直是王室的忠实仆人。丰塞卡不是航海家，但是一位后勤专家，伊莎贝拉曾让他负责其他的复杂任务。他与哥伦布共同承担雇用人手和金钱支出的责任。

女王颁布了新的法律法规，决定如何向新大陆殖民。所有参与新探险的人都需要登记在册，并向卡斯蒂利亚王室宣誓效忠。朝廷在塞维利亚建立了海关，以便记录和追踪从新大陆来的船只货物。以物易物的权利由卡斯蒂利亚王室独享。

* * *

1493年9月25日，也就是哥伦布从西印度群岛胜利返航的仅仅六个月之后，他再次出发，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远航。这一次他的队伍比先前大得多。他热情洋溢地描述他发现的土地的种种奇观——那是一座天堂，黄金就在地面上唾手可得，仿佛树上悬挂的鲜美水果，伸手去摘就行——激发了群众山呼海啸般的激情，人们争先恐后地要参加远航。这一次有十七艘船出发，参与者约1500人。我们没有全部远航者的完整名单，但这一次有一些人脉很强的廷臣参加，其中很多人在未来的远航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如胡安·庞塞·德·莱昂和阿隆索·德·奥赫达，他俩都因为在格拉纳达战争中表现英勇而闻名。还有一些阿拉贡贵族参加，包括一个叫莫森·佩德罗·马加里特的人，他与斐迪南国王有长期的亲密关系。

与女王及其内廷有直接关系的人则更多，包括女王的御医迭戈·阿尔瓦雷斯·昌卡；安东尼奥·德·托雷斯，王储的女教师的兄弟；梅尔希奥·马尔多纳多，他曾是派驻梵蒂冈的大使；还有弗朗西斯科·德·佩纳罗斯，女王身边的一位廷臣，以及他的兄弟佩德罗·德·拉斯·卡萨斯。最后这两人将自己的第一手故事告诉了佩德罗的儿子，即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他后来成为研究西印度群岛

的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哥伦布被允许带上了一些意大利朋友，包括他的兄弟迭戈和一个叫米凯莱·德·库内奥的热那亚人。

关于第二次远航的资料比第一次多得多。哥伦布此次记了日记，他的日记虽然没有保存到今天，但描写新大陆的第一代历史学家能读到他的日记。另外至少有三位远航者，小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迭戈·阿尔瓦雷斯·昌卡和米凯莱·德·库内奥都根据自己亲眼所见，或者是从可靠人士那里听来的情况，写了信或者著书立传。此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巴尔德斯和彼得·马特也传播了相关记述，他们对这些事件有内部消息。

哥伦布得到了他索要的一切。他被授予“大洋与西印度群岛总督及海军上将”的崇高头衔，他的孩子们后来继承了这个头衔。两位君主指示他“善待印第安人”，但也授权他可以审判民事与刑事案件，并惩罚罪犯。他奉命为卡斯蒂利亚占据新的土地。

不足为奇的是，从准备工作的很早阶段，哥伦布和丰塞卡之间就发生了摩擦。哥伦布自认为是无可置疑的远征总司令，但堂胡安·德·丰塞卡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和促进两位君主的利益。两人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了矛盾：哥伦布的卫队人数、参加此次远航的马匹质量，等等。丰塞卡不是航海家，也不是探险家，这让哥伦布恼火，但丰塞卡是一位筹划和管理大型事业的大师。他的职能实际上就是王室的“殖民事务大臣”^[3]，在随后几年里他的权力会水涨船高。

在丰塞卡的督导下，哥伦布舰队得到了足以维持六个月航行的物资，包括大量食物、装备、工具、家畜、种子和相当多的武器。这是一项独特而代价昂贵的事业。航海历史学家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写道：“不曾有一个欧洲国家开展过规模可与此相提并论的海外殖民远征。”^[4]

这不过是许多后续航行中的第一次。没过多久，王室就会在欧洲和大陆之间建立半定期的往返航班，向探险家和殖民者运送邮件、食物和给养，然后将王室攫取的新领土上获得的财富运回西班牙。

哥伦布及其庞大舰队就像上次那样，从西班牙航向加那利群岛。但这一次，这位意大利探险家已经是一位显赫的名人了，在加那利群岛得到了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的热烈欢迎和款待与伴游。比阿特丽斯就是斐迪南国王曾经的情妇，伊莎贝拉最好朋友的侄女，现在还算年轻，在这些年里卖弄风骚的名声仍然炽烈。在节庆活动、岛屿漫游和礼炮齐鸣声中，哥伦布与比阿特丽斯发生了一场露水情缘，持续时间为漫长的三天。与此同时，1000多名士兵在哥伦布背后闲逛、翻白眼，并嘲笑他的浪漫狂欢。^[5]对此次远航来说，这不是一个吉利的开端，而哥伦布与斐迪南老情人的嬉戏一定传到了女王耳边。

但哥伦布于10月13日离开加那利群岛之后，就弥补了之前浪费的时间。虽然遭遇了风暴，但他们在三周后便抵达了西印度群岛。和上一次远航一样，第一次目睹陆地让大家欢呼雀跃。拉斯·卡萨斯记载道：“11月3日，星期天，黎明时分，所有船上的人都看得见陆地，个个兴高采烈，仿佛天堂突然在他们面前敞开了……他们按照水手的规矩，在黎明时唱《又圣母经》，对海岸上吹来的花香感到惊奇；他们看到绿色鹦鹉像鸚一样成群飞舞，一直在尖叫。”^[6]

但从此开始，坏运气就上门了。卡斯蒂利亚人抵达今天波多黎各以东的一串岛屿不久之后，就遭遇了一个凶悍的印第安人部落，称为加勒比人。加勒比人看到卡斯蒂利亚人，就逃进了山里。据库内奥说，一些西班牙人急于寻找财宝，脱离大部队，独自离开了。十几个人“为了抢劫”走进荒野，去寻找黄金。^[7]他们很快就失踪了，哥伦布不得不派遣数百人，分成四个队伍，去寻找他们。

西班牙人之前遇见的加勒比印第安人原来是食人族。走进他们营地的卡斯蒂利亚人惊恐地发现，加勒比人似乎在煮人肉。他们“看到横梁上挂着盐腌的人腿，就像我们的风干火腿一样。有一个刚刚被杀的年轻人的头，还带着血，他的部分身体和鹅肉与煮鸚鵡肉混在一处，随时可以下锅。篝火边还有其他的身體部分，随时可以在火坑上烤”。这是彼得·马特在给意大利的一位朋友信中写的。他是从此次远征的一位幸存者那里得知了此事。他们还发现加勒比人关押着一些俘虏，包括体态丰满的年轻女人和被阉割了的年轻男子，之所以阉割他们，可能是为了让肉更鲜嫩。^[8]

所有保存至今的资料都讲到了这个故事，只是说法有出入。对此的解释也不尽相同。有些学者现在认为，这些活动是一种仪式，以纪念勇敢的敌人或去世的亲人。但探险家们的记载都说这是食人，他们都相信加勒比人把人肉当作食物。

这景象当然让探险家们魂飞魄散，他们认定失踪的伙伴或许已经在岛屿其他地方的菜单上了。但事实上西班牙土匪们爬到了一座山顶，点起了大火，以便同伴能找到他们的位置。大部队找到了他们，在一名热心的印第安老妇指引下将他们带回船上。西班牙人离开了这个岛，带走了三十名被加勒比人俘虏的印第安人，他们被关押的状况表明，加勒比人打算把他们奴役并吃掉。这些得到解救的美洲原住民至少在最初很愿意与西班牙人一同离开。

不久之后，卡斯蒂利亚人与加勒比人多次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死亡。奥维多在几年后到达此地，写了关于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第一次接触的史书。他说，好战的印第安人，即武士们，配备了箭头涂毒的箭，这种毒药会攻击人的神经系统。没有办法解毒，所以中箭的人“会发疯至死……咬啮自己的手和肉，不管这多么疼痛”。^[9]有些中了毒箭的西班牙人得以幸存，不过我们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能活下来，

可能是他们饮食较好，或者得到了较好的医治。其他中箭的人死去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治疗，因为不同部落用的毒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令人精神高度紧张，也让大家对自己面对的未知危险更加焦虑。

此时哥伦布越来越担忧自己第一次远航时“圣玛丽亚”号搁浅导致他不得不留下的39名殖民者的命运。他将他们托付给一位貌似友善的部落酋长，但他现在有理由感到担心。西班牙舰队穿过群岛，奔向殖民者被留下的地方，途中建立了一个定居点，用女王的名字命名为伊莎贝拉。它所在的岛屿被称为伊斯帕尼奥拉岛或圣多明各岛，包括今天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个岛屿成为卡斯蒂利亚的主要行动基地和随后历次远征的集结地。

哥伦布的旅伴很快发现，他大大夸张了这片新土地的良辰美景。的确，此地林木青翠，富有异国情调，气候温暖宜人，但在热带的潮湿环境里昆虫繁殖极快，人们被蚊子叮得简直要发疯。他们的腿上长出令人疼痛万分的脓肿，引发感染，掏空了人的体力；很多人患病死亡。从西班牙带来的给养不够了，在当地很难找到食物，就是找到了也难以下咽。“患病、垂死和饥肠辘辘的人极多，让大家士气低沉。据其中健康的人说，这是一幅催人泪下的惨景。”拉斯·卡萨斯写道：

局势改善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基督徒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雪上加霜的是，他们知道，自己要死在离家万里的地方，得不到垂死者通常能够得到的任何慰藉，就连给他们递杯水的人也没有……随后，很多从小养尊处优、从来不知道吃苦为何物的贵族觉得自己的状况无法忍受，有些人在极大的愤恨中死去；恐怕有些人是彻底绝望而死的。[\[10\]](#)

为了生存，西班牙人不得不吃狗肉和爬行动物，但对很多人来说，这还不够。大约有一半的西班牙人在慢慢饿死，因挨饿而奄奄一息的印第安人更多。他们因为感染了欧洲人传播来的传染病——包括天花、麻疹、霍乱、伤寒和淋巴结鼠疫——而死去。这是这些疾病第

一次出现在美洲。遍地死尸。奥维多得知：“臭气熏天，滋生疫病。”^[11]

而与此同时，财富也不像哥伦布说的那样漫山遍野、唾手可得。只有通过艰苦的劳动——在炎炎赤日下，从地下或河床开采矿石，或者种庄稼——才能获得财富。

很快传来了更糟糕的消息。哥伦布最终到达“圣诞节”（即伊斯帕尼奥拉岛上，他留下39名定居者的地方）时，发现定居者已经全部死亡，可能是在前一个月被杀的。十几具尸体被丢在烈日下暴晒。米凯莱·德·库内奥说死者的眼睛都被挖掉了；他相信印第安人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吃了。^[12]村庄被付之一炬。

哥伦布一度觉得很友善的那个当地酋长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支支吾吾，并假装腿上有伤，企图逃避他们的询问。西班牙人轻松识破了他的骗局，就应当如何惩罚酋长发生了争吵。哥伦布主张，既然事实没有搞清楚，就不能惩罚他，因为那样必然使得他们遭到更不友好的土著的更多袭击。

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互相之间能够交流和听得越来越多，于是真相被渐渐揭露。39名定居者从居住在附近的印第安人那里抢劫食物和女人，招致了对方的敌意。哥伦布的儿子斐迪南说，哥伦布的大部队离开后，被留在当地的定居者很快发生内讧。他们“每人抢了四五个老婆”，即从印第安人那里掳来的女人，并搜寻黄金，还为了黄金而争吵。一个印第安部落进攻他们，杀死了一些定居者。其他人则是病死的。

毋庸置疑，不少定居者是被杀害的。第二次远航的有些成员得出的结论是，哥伦布竟然放任土著肆无忌惮地谋害西班牙人，这足以证明这位航海家软弱无能，或者对船员们不忠诚。就连一些传教士也希

望哥伦布对印第安人采取强硬立场，处死可能的凶手。哥伦布发现，无论他从宽发落还是严惩凶手，都会遭到批评。

* * *

无论在大西洋东岸还是西岸，哥伦布都因为第一次远航时留下的定居者被杀而遭到批评。国内的西班牙人完全不理解新来者所处的环境。西班牙人在新大陆感受到的文化冲击，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生活在这个陌生环境的西班牙人产生了奇怪的幻想和恐惧。伊莎贝拉镇很快就被抛弃，在口口相传之下成了闹鬼之地，据说被害的贵族的阴灵会于夜间在大街上行走，哀号并哭泣。

关于谋杀、死亡和食人行为的报告令西班牙人大感不安，有些人开始觉得印第安人不算是纯粹的人类。当然，许多代的探险家就是用这种说法来为自己的种种暴行辩护的。

哥伦布放任许多残酷暴行发生。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卡斯蒂利亚人俘获了一名加勒比人妇女，哥伦布的朋友米凯莱·德·库内奥索要她。库内奥将她带进自己的船舱，“心中产生了从她身上取乐的欲望”。^[13]她拼命抵抗，高呼救命。他残酷地用绳子抽打她。船上没有一个人来救助她，最后她屈服了。这是有史可查的第一次有印第安女性遭到强奸的案例，后来美洲将发生许多此类暴行。哥伦布没有阻止，也没有干预，这让我们不禁要问，他还放任不管了多少事情，以及他自己做过什么事情。

在第二次远航期间，西班牙人开始屠杀印第安人。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说，第一次严重的屠杀是哥伦布和卡斯蒂利亚人对印第安人小小的挑衅反应过激。五名印第安人被指示帮助三名殖民者渡过一条河，却将他们困在河边，偷走了西班牙人的一些衣服包裹。据信，这个部落的首长将这些衣服占为己有了。哥伦布的仆人之一阿

隆索·德·奥赫达对这起盗窃行为怒不可遏，囚禁了参与其中的一些印第安人，命令将其中一人的耳朵割掉。这是当时欧洲常见的对小偷的刑罚。哥伦布却命令将另外三名印第安人处死，以惩罚他们参与抢劫。他后来心软了，但消息传来，酋长的人为了这死刑的威胁而发起报复，攻击了其他一些基督徒。西班牙人对一起简单的盗窃行为做出了迅捷而残暴的反应，从此双方就陷入了暴行和报复的恶性循环。

“这是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犯下的第一桩罪行，”拉斯·卡萨斯写道，“流血开始了。后来，全岛都要血流成河。”^[14]

拉斯·卡萨斯认为哥伦布残暴地对待印第安人，悍然违背了伊莎贝拉女王给他的关于如何与印第安人相处的命令。两位君主发布了具体的指示，要求西班牙人尊重印第安人，要派遣使者安排谈判，对方应邀而来的话，要送上礼物。据拉斯·卡萨斯记载，哥伦布做的恰恰相反，他擅自闯入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并且违逆了“基督徒的慈善、温和与爱好和平的精神”。^[15]

哥伦布也很快被证明是一个无能的行政管理者，管束不住部下。他的船员几乎持续不断地掀起哗变，反对他的领导。这不完全是他的错。人们距离地位稳固的权威人物有千里之遥，并且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所以领导者很难让他们接受上下级的指挥体系。恐惧、迷茫和怨恨的情绪搅和在一起，随时可以引发爆炸。

哥伦布还遭到了部下一定程度的鄙夷。水手中的很多卡斯蒂利亚人为自己的民族而骄傲，鄙视他这个外国人。他没有真正显赫的贵族家世，也让大家觉得他不值钱，毕竟他们生活的文化里最重视的就是血统和祖先。参加远航的很多人，如阿拉贡人莫森·佩德罗·马加利特，是贵族，所以自视甚高，很难放下身价来。很多人不愿意劳动，觉得哥伦布让他们干活是非常不成体统的，何况他们觉得哥伦布的身份比他们低。

斐迪南国王的朋友马加里特最终觉得受够了。他纠集了其他一些心怀不满的分子，夺取了三艘船，返回西班牙，跑到宫廷去向国王和女王汇报，称此次远征一败涂地，哥伦布在那里胡作非为。一同返回的少量阿拉贡人发现，他们可以直接向斐迪南报告哥伦布的情况，而斐迪南非常愿意聆听他们的抱怨。

毋庸置疑，哥伦布在管理部下时的确心狠手辣。“海军上将为了完成工作，不得不运用暴力、威胁和限制的手段，”拉斯·卡萨斯写道，“不足为奇的是，结果是大家痛恨海军上将。于是，他在西班牙的名声就变成了：他是一个令所有西班牙人憎恨的残酷暴徒，一个不配统治他人的家伙。”^[16]

西班牙人（包括哥伦布）对其他人，尤其是印第安人遭受的痛苦与折磨熟视无睹，这倒是很奇怪。他们简直不能理解，印第安女人为何甘愿从西班牙船上跳下，在惊涛骇浪中游泳很长时间以逃回家园。哥伦布和他的一些部下于1495年2月返回西班牙，留下大量人手作为殖民者。此时，印第安人已经非常不信任欧洲人，这也是情有可原。在第二次远航中，卡斯蒂利亚人俘虏了1600名美洲原住民。他们无法将所有俘虏都装上船，于是选择了其中最好的装船，而将约400人释放。

原住民被释放时的反应表明，卡斯蒂利亚人和美洲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坏了。库内奥忍俊不禁地注意到，那些被释放的人都疯狂地要离开西班牙人。俘虏中的许多妇女处于哺乳期，却匆匆逃走，丢下了自己的孩子。“她们害怕我们会再次捕捉她们，于是为了逃离我们，将自己的婴儿丢在地上，像绝望的人一样拼命逃跑”，遁入山中，一口气跑了几夭，以便尽可能远离卡斯蒂利亚人。^[17]

哥伦布把这些奴隶当作可以卖掉换钱的战利品。而西班牙人则在考虑如何搜集黄金和其他财宝。但伊莎贝拉女王得知探险家返航时满

船载着数百奴隶，不禁大怒。她之前坚持要求礼遇印第安人，哥伦布却放肆地对她的明确命令置之不理。她命令将所有奴隶尽快运回新大陆。有些奴隶被送回了，但此时很多印第安人已经被冻死，或者患上新的疾病而死去。

年轻的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目睹了这一切，因为他的父亲和叔叔送给他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少年当作奴隶，巴尔托洛梅和这个男孩成了朋友。伊莎贝拉命令将所有幸存的奴隶送回新大陆时，巴尔托洛梅的朋友也被送回了。但这段友谊对巴尔托洛梅影响极大，开始塑造了他对印第安人的态度，让他后来成为当时最坚决的印第安人权益捍卫者。

掳掠人口作为奴隶不是哥伦布违抗女王命令的唯一方面。她在托尔德西利亚斯与葡萄牙人就新大陆的主权谈判的时候，曾要求哥伦布回西班牙帮忙，但他忙着加勒比海事务，没有回国。于是她不得不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为自己的权益争斗，尽管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新大陆。

哥伦布终于结束了第二次远航、返回西班牙的时候，寻求以其他方法让女王相信他的发现的重要性。他开始穿圣方济各会教士的服装，或许是为了向伊莎贝拉女王展现自己的虔诚。但除了带回奴隶之外，他还带回了比前一次更为贵重的礼物和稀奇物件。

编年史家安德烈斯·贝纳尔德斯记载道，据目击者称，这些稀罕东西包括“一个金项圈……重达600卡斯特亚诺”，还有：

冠冕、面具、腰带、衣领和许多用棉布制成的纺织品。在所有这些东西里，魔鬼都以猫、猫头鹰脸或其他木制的更恐怖的形象出现……他携带着一些长翅膀的冠冕，它们侧面有黄金的眼睛……尤其是一顶据说曾属于酋长卡奥纳沃的王冠，非常大，很高，眼睛上有翅膀，就像盾牌；黄金眼睛有银杯那么大，重量相当于面具的一半，每个眼睛都像是用某种非常奇

怪和巧妙的手法上釉的。这顶王冠上也有魔鬼的形象；我相信在他们眼里，魔鬼就是这样的，他们都是些偶像崇拜者，把魔鬼当成自己的主子。
[18].

在卡斯蒂利亚人看来，这些东西突出体现了居住在那些岛屿上的人的灵魂受到了致命危险，所以新的传教工作是非常紧迫的。

但到此时，新发现的新奇劲儿已经磨灭了不少，对哥伦布及其对伊斯帕尼奥拉岛管理的批评开始激烈起来。“人们对他怨声载道，因为他没有找到黄金，”贝纳尔德斯写道。人们听到传说，之前的殖民者是被活活饿死的：“有消息表明，那里的人们生活极其匮乏。”
[19].

伊莎贝拉仍然对哥伦布很友好，但此时她对这个热那亚探险家的管理才能和本领越来越怀疑。从此时起，他的权力逐渐减小，伊莎贝拉开始将卡斯蒂利亚海外扩张事业的责任交给其他人。哥伦布曾经的幸运开始黯淡。

但她仍然很欣赏他的勇敢，仍然是他最重要的恩主。现在他留在宫廷，为女王效力。例如，1497年初，女王居住在布尔戈斯，等待一支舰队从佛兰德将她的儿媳送到西班牙，但由于天气恶劣，舰队迟迟不来。等待期间，她按计划要去一趟索里亚，已经准备动身了，但就在出发的前夜，哥伦布给她写了封短信，告诉她风向已经转变，舰队很快将抵达卡斯蒂利亚北部。果然，次日，第一批船只就进入了港口，伊莎贝拉得以到场欢迎贵宾。

她很感谢哥伦布的专业技能，并又一次想起了他的航海知识。后来她给他写了一封信：

身边有你这样一位对海洋经验丰富的博学之士，真是幸运。我很感谢你，感谢你的特殊贡献和服务，既感谢你及时来信（你的警示和建议对我

帮助极大），也感谢你一贯表现出的对我的真正善意和爱戴；你是我的一位特殊而忠实的仆人。[\[20\]](#).

1498年2月，她进一步提升了哥伦布家族的地位，任命他的两个儿子为她本人的侍从，这是皇恩浩荡的表现。[\[21\]](#).

但哥伦布在宫廷的其他地方越来越不得人心，旁人也越来越难为他辩护。他已经麻烦缠身，却死不承认。他曾向两位君主承诺，要寻得一条通往东方的道路。他无意中跌跌撞撞找到了非常重要的新大陆，但它不是印度。中国和印度拥有非常先进和发达的文化，他们的统治者居住在大都市的宫殿里。而到目前为止，哥伦布遇到的印第安人居住在小岛上的草棚子里。他拒绝接受现实——不管他多么希望自己找到了东方，但那既不是中国也不是印度——所以说得好听些，他不够诚实；若说得难听些，他就是个骗子。

有些人认为，他们在新大陆遇到的灾祸全都是哥伦布的错。他舌灿莲花的承诺现在看来是一场空。与他一同去美洲的人当中有很多，可能有一半，已经丧命。还有很多人财政破产。其他的人则在美洲染上了梅毒，这是一种痛苦而有时会致命的疾病。梅毒病状的发展分好几期，而且在那个年代欧洲人对它的抵抗力较弱，所以它的破坏性比今天要猛烈得多。在与染有梅毒的人发生性关系两周到四周后，患者身体会出现下疳肿块，不过患者起初在其他方面可能貌似健康。他们的下肢会出现形态恐怖的溃烂。第二期症状于约三个月后发生，患者开始身体不适、虚弱、恶心呕吐、发热、身体疼痛。然后，这些症状可能会消失。最后一期症状包括失明、绝育和死亡。所以，有的人可能在12月感染，但一直到次年3月回国时才出现症状，然后又将这种传染病传播给其他人。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巴尔德斯、斐迪南·哥伦布和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都坚持认为，梅毒是从美洲传播到

欧洲的，当时的其他一些医学论著也这么认为。“有些与哥伦布一同踏上发现之旅的基督徒，以及参加第二次远航的某些人，将这种疫病带到了西班牙，”奥维多写道，“于是其他人也染上了这种疾病。”[\[22\]](#)。

拉斯·卡萨斯的意见也是如此。“证据确凿，所有那些荒淫无度、在这个岛上没有保守贞洁的西班牙人，都染了病。一百个人当中未必有一个逃脱，除非性伴侣从来没有得过这种病，”他写道，“印第安人，无论男女，即便有这种病，也几乎不受影响，简直就像得了天花一样；但西班牙人患病后痛苦不堪，尤其是下疳肿块没有出现的时候。”[\[23\]](#)。

据拉蒙·帕内修士（他参加了哥伦布的第二次远航，并收集了台诺[\[24\]](#)部落的民间传说）记载，印第安人熟悉梅毒，不同部落的语言对它的称呼不同。根据台诺人的一个传说，有一位神话英雄曾到过一遥远国度，从一个外国女人那里染上了这种疾病。或许，梅毒是从其他地方起源的，可能最初的形态不同，来自地球的另一个地方，或许来自欧洲、亚洲或非洲，后来渐渐发生了五花八门的变异。梅毒来自外国和异邦的概念在欧洲也很盛行，西班牙人称它为“法兰西病”，法兰西人说它是“那不勒斯病”。教廷的西班牙籍医生卡斯帕里·托雷利亚写道：“据报道，此种恶症于1493年在法兰西开始蔓延，一直传染到西班牙、地中海各岛屿和意大利，最后传遍了欧洲。”[\[25\]](#)。

但一位名叫鲁伊·迪亚斯·德·伊斯拉的西班牙外科医生说，梅毒在欧洲的最早出现是在西班牙，“时间是1493年，地点是巴塞罗那城，后来又传染到全欧洲和世界各地”。[\[26\]](#)他还补充说，梅毒是从伊斯帕尼奥拉岛传来的。哥伦布及其部下返回西班牙时肯定在巴塞罗那受到了热烈欢迎。

谁是第一批被感染者？据鲁伊·迪亚斯·德·伊斯拉说，航海家马丁·阿隆索·平松是最早的患者之一，从第一次远航返回西班牙后，他没多久就去世了。另一个早期患者是莫森·佩德罗·马加里特，奥维多说他“受到极大痛苦，唉声叹气，我觉得他的症状和那些患有此种痛苦疾病的人相同”。^[27]据卡斯帕里·托雷利亚说，切萨雷·博吉亚很快也染上了梅毒。根据近期的考古证据，那不勒斯王族的多名女性也很早就成为梅毒的牺牲品。^[28]哥伦布自己可能也患上了梅毒，因为在莫森·佩德罗·马加里特领导的那一半水手患上梅毒的同一时间，哥伦布也病倒了五个月。

据奥维多说，这种疾病很快传遍欧洲：

在上述的1496年，有些廷臣开始感受到这种痛苦，但起初梅毒是一种贫贱之人的疾病，所以据信这些贱民是从娼妓身上，通过邪恶和淫荡行为染病的。但后来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也开始患病……所有看到这种疾病症状的人都大感惊异，既是因为这种疫病传染性强且恐怖，也是因为死掉的人太多。因为这是一种新的疾病，医生对其不太了解，也不知道如何治疗，其他人也无法根据经验给出意见。

但他说，在伊斯帕尼奥拉岛，“这种病很常见，当地人懂得如何治疗”。^[29]

这对哥伦布的儿子们来说是另一桩不幸，因为患者和死者家属高声辱骂他们。斐迪南和迭戈在格拉纳达外出的时候，成群结队的愤怒群众围堵他们（尽管他们是女王的亲信），并喊道：“蚊子海军上将的儿子们来了！就是他发现了虚妄与幻想之国，毁掉了卡斯蒂利亚绅士们的性命！”^[30]

哥伦布的声誉受损，伊莎贝拉不太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但他不断恳求，于是两年多后，她终于让步，批准了第三次远航。

* * *

1498年5月30日，哥伦布率领六艘船只出发，这与第二次航行的盛况相比黯然失色。这一次，堂胡安·德·丰塞卡以铁腕筹划了远航。女王又一次给哥伦布下达了具体的指示。最要紧的是他必须冷静而优雅地对待印第安人，引领他们走向“和平安宁”，并让他们皈依天主教信仰。^[31]

但哥伦布到达圣多明各岛后得到了坏消息，发现“全岛处于动荡和骚乱中，因为他之前留在那里的人大多已经死亡，剩余的人中有160多人染上了梅毒”。^[32]

虽然抵达后遇到了糟糕的混乱状况，但哥伦布很快驾船离开了，因为他更感兴趣的是发现新土地，而非统治已经发现的地方。他这一次在南美洲沿海有了一些新发现。但他返回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时候，那里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他的部下在过去常常被逼到哗变的边缘。在第三次远航时，水手们当真造反了。哥伦布花了很大力气，企图恢复控制。哗变的消息传到了卡斯蒂利亚宫廷，那里的人们坚决反对哥伦布。用彼得·马特的话说，他们开始将这个意大利航海家及其兄弟视为“不公正的奸贼、残酷的敌人和让西班牙人流血的恶棍”，“喜好”杀戮反对自己的人。^[33]

哥伦布即将被撤职并替换。在卡斯蒂利亚，有三支远征队正在筹备中，得到女王的支持，并由丰塞卡组织。哥伦布不会有机会指挥这三支远征队。

第一支远征队由阿隆索·德·奥赫达领导，他曾参加格拉纳达战争，并参加了哥伦布的第二次远航。他得到批准，向南方探索。他于1499年5月出发，很快抵达了南美洲海岸，发现了一个地方，他称之为小威尼斯，即今天的委内瑞拉。

领航员阿隆索·尼尼奥于1499年稍晚时候起航，也探索了南美洲，回来时满载金银财宝。这一年秋季，文森特·亚涅斯·平松抵达巴西海岸。当年晚些时候，另外一位探险家迭戈·德·莱佩沿着巴西海岸继续南下。

一个更大的步伐，对西班牙和世界的未来有重大影响，发生在1500年。来自塞维利亚的富裕公证人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探索了巴拿马，于1502年返回西班牙，但不知道他距离广袤的太平洋已经只有几十英里。这个发现属于巴斯蒂达斯的同船水手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

当然，这些船队来来去去都没有得到哥伦布的同意，这直接违反了哥伦布于1492年开始探险时与王室达成的协议。他看到自己的特权遭到侵犯，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被轻视、遭排挤的殉道者，受到恶毒闯入者的侵害。他越来越虔诚信教，迫害妄想狂也越来越厉害。

但有的时候，迫害妄想狂的人也是正确的。伊莎贝拉确实在找人取代哥伦布，成为新的探险家和管理者。1499年春季，西印度群岛传来坏消息，于是她派遣弗朗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一个享有美誉、人脉很广的人）去调查，授权他逮捕反叛者并从哥伦布手中接管各港口。他也是伊莎贝拉的好友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的亲戚，可能是她的兄弟，所以他是伊莎贝拉内层亲信圈子的成员。博瓦迪利亚于1500年8月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入港时就看到一幅恐怖景象：绞刑架上挂着五具西班牙人的尸体。他得知，第二天还要绞死五人。哥伦布和帮助他管理岛屿的兄弟正在对违抗他们的人施行越来越严酷的惩罚。

博瓦迪利亚抵达的时候，哥伦布在外探险，所以博瓦迪利亚调查案件的时候，哥伦布不能在现场为自己辩护。博瓦迪利亚的调查发现，哥伦布犯下了累累暴行。他曾命令将一名女子的舌头割掉，因为

她诽谤他和他的兄弟。他曾命令将一名同性恋者的喉管割断。他命令将因为挨饿而偷面包的人绞死。他对其他类似的犯人施以残酷且有可能致命的鞭刑。

听到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博瓦迪利亚立刻控制了城市，搬进哥伦布宅邸，扣押了他的财产。哥伦布对新大陆土地的统治结束了。

哥伦布返回伊斯帕尼奥拉岛之后，博瓦迪利亚对他表现出极大蔑视，甚至不准他为自己辩护。他将哥伦布戴上手铐脚镣，押回西班牙。他们入港之后，船长同意摘去哥伦布的手铐脚镣，但航海家骄傲地拒绝了。他说，除非女王命令摘掉手铐脚镣，否则他要一直戴着。

但他回国后，伊莎贝拉女王并不很想见他。到此时，他已经连续多次违抗了她的具体指示。他在西班牙的一座监狱消沉了漫长的六周，才被女王传唤到格拉纳达的阿兰布拉宫。她对他说话很亲切，让他感到鼓舞。但他的命运已经被裁定了。

1501年，女王将博瓦迪利亚召回西班牙，但没有让哥伦布回到伊斯帕尼奥拉岛总督的旧职上去。她派遣了另一名官僚尼古拉斯·德·奥万多修士去主持新大陆的司法。奥万多也是卡斯蒂利亚人，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与伊莎贝拉的家族有历史悠久的关系。他的母亲曾是伊莎贝拉母亲的侍女，而奥万多自己曾在胡安王子（伊莎贝拉的儿子）的宫廷效力。他于1501年9月3日被任命为总督。博瓦迪利亚和奥万多都是很能干的行政管理者。在他们治理下，殖民者的死亡率和哥伦布统治时期相比没有降低，仍然是惊人得高，但此时大家已经觉得这是正常现象，所以没有人像责怪哥伦布那样怪罪他们。

动身前往新大陆之际，奥万多收到了一些具体的新规矩。只有卡斯蒂利亚人被允许在美洲居留；他要将在美洲发现的其他国家的人都

送回西班牙。未得卡斯蒂利亚王室的明确批准，不得进行任何探索。他还要善待印第安人，“用爱，而不是武力”，使其皈依基督教。[\[34\]](#)

对哥伦布来说火上浇油的是，女王还给奥万多配备了一支多达29艘船的舰队，而且物资配备齐全，“这是前往新大陆的规模最大的舰队”，还有约2500名定居者，男女都有，包括农夫和工匠。[\[35\]](#)小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第一次去美洲就是在这次远航中。

但这还不是哥伦布的末日。伊莎贝拉于1502年派遣他做了最后一次探险，那是他的第四次远航，有4艘船参加。他被要求远离伊斯帕尼奥拉岛，但他还是决定去那里一趟。博瓦迪利亚的二十几艘船正在准备回国，奥万多刚刚接过指挥权。哥伦布向奥万多发出警示，称海上正在酝酿一场大风暴，博瓦迪利亚的舰队应当在港里等待一段时间再出航。但哥伦布的公信力极差，奥万多辱骂他，嘲弄他的警示。博瓦迪利亚的舰队满载西班牙人从加勒比海诸岛搜刮的20万比索[\[36\]](#)黄金出发了。哥伦布预测的风暴果然狠狠打击了博瓦迪利亚。他的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3艘船踉跄着回到圣多明各岛。在此期间，哥伦布的船只紧靠岸边，毫发未伤。

哥伦布最艰险也最成功的一次航行就这样开始了。在他的第四次新大陆之旅期间，他沿着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沿岸航行，抵达巴拿马和一个他称为波托韦洛的美丽港口。那里的港湾很狭窄，三面有群山，得以避开风暴，并且岸边满是葱翠的雨林，鸟儿在树间啼鸣。

哥伦布觉得，这是装卸货物的一个理想场所。或许这是建立海关的不错地点。后来，这里果然建起了一座海关。

在巴拿马，哥伦布听说当地的地下埋藏着大量黄金，因为印第安人的一个葬仪习俗是将财宝与亲人遗体一起下葬。他预测，将来能够

在这里挖掘出大量金银财宝。后来果然如此。

在巴拿马，他还得知不远处有大片水域。事实上，太平洋就在距离他50英里的地方，隔着一条地峡，地峡上有一条称为查格雷斯的长河，适合航行，可以走到巴拿马地峡的中点。这就是后来的两大洋的连接纽带——巴拿马运河的所在地，它是将欧洲与亚洲联系起来的水道。一些年后，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发现了这个秘密，成功穿过巴拿马地峡。他是第一个从美洲看到太平洋的欧洲人，那是欧洲绕过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封锁去往印度与中国的航道的第二部分。这条路线原来一直存在。

此时已经有消息传来，哥伦布承诺的黄金的确存在，不过是在美洲大陆，不是在岛屿上。很快，黄金就被开采出来，用巨轮运回卡斯蒂利亚供其支配使用。国家中央海关在塞维利亚建立起来。任何人若想去西印度群岛，必须得到海关官员的批准。在波托韦洛建起了另一座海关，大量黄金白银从那里出发，从新大陆运往旧大陆。波托韦洛成为巴拿马地峡上最重要的港口，以及一个大型年度市场的地点。巨大的西班牙盖伦帆船^[37]可以安全地集合在那里，将美洲的财富运往西班牙。蔗糖、烟草、奎宁、玻璃和葡萄酒也通过这些港口流通。作为这些货物的交换，据说世界上现存黄金的三分之一曾经过波托韦洛，流入王室国库，为伊莎贝拉的儿女和孙辈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帮助他们持续地保卫欧洲和天主教信仰。

* * *

伊莎贝拉对新大陆的影响不管说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难以估量。新大陆的发现和殖民使得西班牙在随后两个世纪里稳居世界第一富国和强国的地位，尽管这让很多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去往新大陆的殖民者和探险家有大约一半英年早逝；土著居民的死亡率，主要是由于此前未知疾病的打击，要高得多。在哥伦布最早发现的岛群，

整个美洲原住民人口遭到沉重打击。杀死他们的微生物不能说是欧洲人恶意造成的，从美洲传播到欧洲的病菌也不能责怪欧洲人，但数百万人受到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新大陆土著中幸存的人绝大多数都与西班牙人通婚，于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种族。在伊莎贝拉女王统治下，这个新种族被称为西班牙裔人。她确立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萨拉曼卡大学的教授们对西班牙语的语法规则作了标准化，并将其广泛传播。伊莎贝拉将卡斯蒂利亚文化输出到全球。

她确立基督教为美洲的正式宗教。人祭和食人行为被禁止。到1542年，奴隶制也被禁止。天主教的力量拓展到整个美洲大陆。它的价值观——支持家庭、尊重教育、教会组织慈善活动，以及通过自省劝人向善、捍卫弱者（如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传统，都传遍了美洲。

伊莎贝拉将卡斯蒂利亚的强项出口到新大陆，但也输出了卡斯蒂利亚坏的一面，包括异端裁判所。在新大陆，错误的思想也不会得到宽容。另外，卡斯蒂利亚犯下的政治和经济错误被复制到了拉丁美洲。

这一切的发生，都是由于一位勇敢的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他的目光长远的赞助者伊莎贝拉女王的通力合作。因为她愿意探索新世界，因为她认识到世界可能比她出生时的人们相信的更大，她被誉为西班牙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而对西班牙扩张领土贡献最大的人，莫过于哥伦布。“他将基督教信仰传播到了遥远的陌生国度，”奥维多写道。由于哥伦布，“如此之多的黄金白银、珍珠和其他财宝与货物流入西班牙。其他任何一位西班牙人都没有为祖国带来这么多财富”。[\[38\]](#)。

-
- [1]. 下加利福尼亚是今天墨西哥最西北部的一个州。
- [2]. Andrés Reséndez, *A Land So Strange: The Epic Journey of Cabeza de Vac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 .
- [3]. Roger Bigelow Merriman,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New York: Cooper Square, 1962) , p.2: 205.
- [4]. Samuel Eliot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Boston: Little, Brown, 1949) , p.390.
- [5]. Laurence Bergreen, *Columbus: The Four Voyages, 1492-1504* (New York: Viking, 2011) , pp.129-30.
- [6].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trans. and ed. Andrée Collard (1875; rep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originally circulated between 1560 and 1600) , p.43 (original chapter 84) .
- [7]. Samuel Eliot Morison,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on 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New York: Limited Editions Club, 1963) , p.211.
- [8]. Peter Martyr to Pomponius Letus, December 5, 1494, in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in the Writings of Peter Martyr of Anghiera*, ed. Ernest Lunardi, Elisa Magioncalda, and Rosanna Mazzacane (Rome: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 1992) , p.57.
- [9]. Capitan 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 y Valdés, *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 (Madrid: Imprent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851) , pt.1, pp.30-35.
- [10].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pp.48-50 (chaps.88 and 92) .
- [11]. Oviedo, *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p.49.

[12]. Morison,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p.213.

[13]. Morison,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p.212.

[14].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p.52 (chapter 92) .

[15].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pp.52-53 (chapter 92) .

[16].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p.49.

[17]. Morison,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p.226.

[18]. Andrés Bernáldez, *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Crónica inedita del siglo XV* (Granada: Imprenta y Libreria de Don José María Zamora, 1856) , pp.1: 331-32.

[19]. Andrés Bernáldez, *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Tomo I (Granada: Imprenta y Librería de José María Zamora, 1856) .

[20]. Salvador de Madariaga, *Christopher Columbus: Being the Life of the Very Magnificent Lord Don Cristóbal Colón* (New York: Macmillan, 1940) , p.304.

[21]. Salvador de Madariaga, *Christopher Columbus: Being the Life of the Very Magnificent Lord Don Cristóbal Colón* (New York: Macmillan, 1940) , p.306.

[22]. Oviedo, *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p.88.

[23].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Apologética historia*, ch.19, p.44, ed. Serrano y Sanz (Madrid: Bailly y Bailliere, 1909) [this citation is in the book, which is in the Hispanic Reading room] , cited in Samuel Eliot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vol.2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42) , p.196.

[24]. 台诺人是多米尼加和海地所在的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原住民，后被西班牙殖民者奴役和迫害，且因无法抵御欧洲人带来的天花等疾病，现已完全灭绝。今天的多米尼加人主要是西班牙人与非洲人的混血后裔。

[25]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Apologética historia*, ch.19, p.44, ed. Serrano y Sanz (Madrid: Bailly y Bailliere, 1909) [this citation is in the book, which is in the Hispanic Reading room] , cited in Samuel Eliot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vol.2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42) , p.2: 204.

[26] Karl Sudhoff, *Earliest Printed Literature on Syphilis*, p.xxxii, 190, cited in Samuel Eliot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vol.2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42) , p.2: 198.

[27] Oviedo, cited Karl Sudhoff, *Earliest Printed Literature on Syphilis*, p.xxxii, 190, cited in Samuel Eliot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vol.2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42) , pp.201-2.

[28] Tom Mueller, “CSI: Italian Renaissance, ” in *Smithsonian Magazine*, July-August 2013.

[29] Morison,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p.202.

[30] Ferdinand Columbus, *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 By His Son Ferdinand*, trans. Benjamin Kee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9) , pp.221-22.

[31] Madariaga, Christopher Columbus, p.305.

[32] Morison,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p.212.

[33] Morison,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p.2: 301.

[34] Hugh Thomas, *Rivers of Gold: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from Columbus to Magell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 pp.201-2.

[35] Hugh Thomas, *Rivers of Gold: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from Columbus to Magell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 p.205.

[36] 当时1比索的法定重量为27.468克。

[37]. 盖伦帆船是至少有两层甲板的大型帆船，在16~18世纪被欧洲多国采用。它可以说是卡拉维尔帆船及克拉克帆船的改良版本，船身坚固，可用作远洋航行。最重要的是，它的生产成本比克拉克帆船便宜，生产三艘克拉克帆船的成本可以生产五艘盖伦帆船。盖伦帆船被制造出来的年代，正好是西欧各国争相建立海上强权的大航海时代。所以，盖伦帆船的面世对欧洲局势的发展亦有一定影响。

[38]. Oviedo, *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p.84.

十八 信仰与家庭

伊莎贝拉的孩子们长大了，成为青少年，她的生活因此发生了变化。她有五个孩子——继承人胡安和他的四个姐妹。她要做很多工作，去监督孩子们的教育，教导他们治国理政之道。她为他们与欧洲各地的王室缔结婚姻，每一次谈判都是独立而复杂的，需要高超的政治和外交本领。同时，每个孩子都需要得到培养，为将来当国王或王后做准备。

伊莎贝拉女王是一位慈母，但对孩子的要求也很严格。她生性严肃、坚定顽强而非常虔诚，也希望孩子们有同样的品格。任何人都不可以逃避责任或质疑自己的义务。孩子们的行为必须是无可指摘的，不仅在出席重大场合时，在宫廷内与其他人交往时也必须如此。伊莎贝拉的是非观极强。她的世界几乎是黑白分明的。自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需的。

她对仪表和姿态的标准也是非常高的。一方面，她需要在公共场合成功地活动，就需要奢华的排场以展示王国的财富与力量；但另一方面，她内心里又信奉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即服饰和外表应当简朴谦卑。富丽堂皇的外表是一种极其关键的工具，可以吸引公众、震慑竞争对手和让外国使臣肃然起敬。这样的辉煌仪表非常有价值，外国使节回国后讲到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会表达出敬畏。另外，征服格拉纳达让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成了驰名欧洲的名人，所以他们比以往更需要维持盛大的排场。

所以，在公共场合，伊莎贝拉及其家人都穿戴得珠光宝气，这成了全欧洲津津乐道的话题。她也确保自己的孩子们得到警示，这种奢靡服饰代表着道德上的风险和虚伪。她对服装的选择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是很精明的，但她也知道，这实质上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

如果宫廷的华丽服饰只是一种虚荣，那么也是一种恢宏的虚荣。一位陪同英格兰使臣去西班牙商谈凯瑟琳公主与亚瑟王子婚约的军人看到西班牙王室的服装和珠宝，大吃一惊。斐迪南“穿着精美紫貂皮镶边的金线华服”，而伊莎贝拉穿着黄金镶边、饰有珍贵宝石的黑色天鹅绒斗篷。^[1]次日，斐迪南换上了深红色天鹅绒衣服，而伊莎贝拉穿着金线华服。年纪最大的孩子，胡安和伊莎贝拉短暂地在父母身边亮相。胡安像父亲一样穿着深红色天鹅绒衣服；伊莎贝拉像母亲一样穿着金线华服，裙裾很大，是绿色天鹅绒的，还披着“金黑两色的网状斗篷，饰有珍珠和宝石”。^[2]王室以宴会、舞会、斗牛赛和比武大会招待英格兰使者，一连数日。每一次露面，王室成员的衣服都不一样，但都富丽堂皇。

* * *

但伊莎贝拉的忏悔神父埃尔南·德·塔拉韦拉一直告诚信众不要屈服于炫耀性消费的诱惑，而要避免“奢华的服饰”。他写了一本论著，论述好基督徒应当如何穿着打扮，如何饮食，以免养成恶习，导致罪孽和饕餮的罪过。例如，过于裸露身体的衣服违背了自然法则，因为人类理应用衣服遮盖自己的躯体，以防严寒或炽日的伤害。他补充说，裸体是被严格禁止的，从亚当、夏娃以来一贯如此。他还建议女性遮盖自己的头发，以表达端庄。他敦促大家以“必需和理智”的方式饮食，杜绝“昂贵或奢侈”。^[3]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地位，有恰当的穿着打扮。

不足为奇的是，伊莎贝拉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的服饰令教会圈子里的一些人感到不满。塔拉韦拉多次当面质疑她的服饰和行为，让她颇为窘迫。有一次，他告诉她，虚荣会“令上帝发怒”。^[4]她答道，在正式场合，她必须那样穿着打扮，以塑造西班牙富裕和强大的形象。但这些问题让她花了很多时间来焦灼地思考，审视自己是否符合自己的精神理想。

她请人绘制的一套虽小但精致的画作体现了她内心的纠葛。这是一系列描绘基督生平场景的画，大多是根据《圣经》文本，供伊莎贝拉本人礼拜上帝之用。它们可能是被当作祭坛装饰的一部分。在该系列的四十七幅油画中，有二十几幅留存至今。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是展现伊莎贝拉思维与宗教哲学，以及她灌输给孩子们的理念的窗口。这些油画揭示了她的生活是艺术史学家石川千代所说的“极其保守的事业”，并且表现了她对“朴素严峻而低调”的宫廷的深切渴望。^[5]

这套油画是由伊莎贝拉女王供养的两名宫廷画家胡安·德·佛兰德和米歇尔·西托（都在佛兰德学艺）创作的，描绘的是《新约》人物。画中人物的服饰是创作这些画时的风格，所以比更准确地描绘上古服饰的图像更能激起观者的共鸣。画中的许多东西——凸面镜、布谷鸟钟、古典式柱顶盘、哥特式拱形结构、一种称为小灵狗的小型猎犬，都是15世纪80年代富人家中时髦的东西。据信，塔拉韦拉大主教也参与了这些画作的构思。

伊莎贝拉和她的孩子们是这套油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家庭成员被描绘为基督生平场景的旁观者和参与者。将自己的家庭成员画在这样的油画里，在当时不算特别稀罕；很多贵族家庭请人将他们画在图里，身穿华丽长袍，跪在理想化的神圣家庭面前祈祷。但伊莎贝拉的艺术品没有把她和家人置于光辉的前景中。他们是油画中的配角，穿着普通公民的衣服，出现在戏剧场景中。在一幅描绘基督的神迹之

一（用几片面包和一点鱼喂饱成千上万人）^[6]的油画当中，伊莎贝拉的形象是一个谦卑而虔诚的旁观者，身穿朴素的袍子和斗篷，坐在人群中。^[7]

她的儿子胡安及其未婚妻可能也以类似的方式被描绘为迦拿的婚礼^[8]的主角。胡安满头金发，容貌秀气，向一个合掌祈祷的金发少女说话，打着手势。基督深色头发，作沉思状，坐在桌前，在自己母亲旁边、年轻夫妇附近。一面凸面镜（当时流行的家用设备）挂在墙上。桌上铺着白色桌布，看上去有点像祭坛，可以清楚地看到面包与酒，象征圣餐。在这幅画里，婚礼变成了一种宗教礼拜，一种弥撒。^[9]

在其他油画里，时髦和暴露肌肤的服装被等同于罪孽。在一个场景里，一个被蒙住眼睛的人，可能是耶稣，遭到嘲笑。折磨他的人仿佛是装腔作势、傲慢自负的年轻卡斯蒂利亚廷臣，身穿非常时髦的衣服。他们的紧身裤露出下肢修长、优美而结实的肌肉；有一个嘲笑耶稣的男子穿着鲜红色的紧身裤，股囊^[10]特别鼓胀。^[11]

伊莎贝拉在内心里将朴素、自然而不具有性意味的服装视为理想，尽管她自己的宫廷服饰越来越繁复华丽，以便追逐新的文艺复兴精神的时髦。在随后的岁月里，如何平衡世俗与精神世界的难题将以多种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困扰她和她的孩子们。她的所有孩子都被灌输了驱动伊莎贝拉的那种宗教热忱，并表现出同样的执着，而同时他们必须与自己执掌的世俗权力做斗争。

这些油画也清楚地表明了她对欧洲三大宗教之间矛盾的看法。例如，在上述的描绘被蒙眼的人遭到嘲弄的油画里，一名头戴宽檐帽的犹太人大祭司匆匆离去，他意识到了那举动的残酷，但没有做任何事情去阻止。在另一幅描绘耶稣被嘲弄地带上荆棘冠冕的画作中，一个戴头巾、看上去像土耳其人的人在一旁观看，却没有干预。但犹太人

大祭司和这个土耳其人似乎都对自己看到的事情不满而感到痛苦。作为个人的犹太人和土耳其人并没有被描绘成本质上就是恶人，而是放任痛苦的事件发生。

伊莎贝拉请人创作的油画也表现了她将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视为基督及其利益的捍卫者。例如，在描绘衣着简朴的基督令加利利海波涛平静的画面中，耶稣的船上飘扬的旗帜上带有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的纹章。在另一个发生在耶稣受难之后的场景里，耶稣出现在母亲面前，而玛丽亚家的房顶上有卡斯蒂利亚的纹章盾。

有意思的是，根据《新约》，基督死后并没有出现在母亲面前过，尽管据说他在五百多人面前出现了至少六七次。伊莎贝拉女王描绘这个非正典的故事，说明她着意于在基督教故事里给耶稣母亲一个更重要的地位，要么是出于她自己的原因，要么是她觉得玛丽亚的作用被教会低估了。与此同时，她也在积极推动一个修女会（圣母无染原罪会），该组织推崇圣母玛丽亚为神圣，仅仅由于玛丽亚自己，而不是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12]当然，母亲感到自己为儿女所做的努力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是很自然的。伊莎贝拉或许相信玛丽亚应当得到更多的荣耀。

孩子们逐渐长成少男少女，伊莎贝拉女王将他们留在身边。15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动荡岁月里，他们与她一同前往战区。孩子们的童年可没有在乡村胡乱嬉戏。伊莎贝拉的孩子的童年是在针对他们通常所称的“异教徒”的战争中度过的。他们居住在战区边界的戒备森严的城堡里，随军转移时则居住在军营中。这些旅行非常辛苦，要翻越崇山峻岭，穿过干旱平原，顶着炎炎赤日或刺骨寒风。他们有时住在帐篷里，夏天酷热难当，冬天则挤在火盆旁取暖。他们旅行时带着便携式祭坛，以便祈祷；一群教士，包括国王和女王的忏悔神父，以

及王室的神父，陪伴他们，前进时高举着大十字架。他们的生活就是持续不断的、军事化的朝圣。

王室如此深入地参与战事，是很不寻常的。大多数统治者不会让自己的家庭成员蒙受风险，肯定不会让妻子和小孩身临战区。在大多数战争里，统治者都将他们几乎完全不认识的人送到遥远地方，去冒生命危险。例如当时奥斯曼军队的核心是奴隶兵。类似地，同一时期的意大利统治者依赖雇佣兵为他们打仗。在中世纪近期，贵族出征的时候，倾向于把自己的出征当作体育运动一般，仅限于温暖宜人的夏季几个月进行。他们仪式化的战争游戏，如比武大会，一直延续到伊莎贝拉时代，是节庆期间广受欢迎的观赏性娱乐。

但对伊莎贝拉、斐迪南及其孩子们来说，战争是真实的、触手可及的、个人化的。针对格拉纳达的战争延续了十年。伊莎贝拉的第一个孩子，与母亲同名的伊莎贝拉的几乎整个童年是在与父母一同转战各地的过程中度过的，先是与葡萄牙人作战，然后是讨伐格拉纳达。1492年穆斯林都城投降时，她二十一岁，最小的孩子凯瑟琳七岁。伊莎贝拉生女儿玛丽亚不久前还在参加作战会议，突然感受到阵痛，才离开了会议。

王室全副心思投入收复西班牙失地的努力。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身边环绕着军人，这些军人是他们的亲属或朋友，或朋友的亲属。一支部队出征时（往往由斐迪南国王率领），王室成员目送他们离去，并等待看谁能回来，回来时是何种状态。阵亡的战士往往比伊莎贝拉的孩子只大几岁，可能几年前还是他们的玩伴。伊莎贝拉女王认识指挥各部队的贵族及其父母，并视察过他们居住的城市。有人阵亡时，她往往知道谁受到的打击最大。

伊莎贝拉及其家人的生活随时受到战争的威胁。例如，一天夜间，在格拉纳达城外的军营，斐迪南入睡之后，她在帐篷中祈祷。她

不小心丢下了一支火炬，将床单点着了。大火在她的临时住所迅速蔓延。在警报的呼喊声中，所有人都会被叫醒。士兵们相信自己遭到了敌人攻击，匆忙去拿剑。火苗越蹿越高，女王迅速收好自己的地图和作战计划，走出帐篷去找自己的丈夫和十三岁儿子，发现他们都很安全。但营地被烧毁了。他们在营地的所有财产毁于一旦。王室成员继续作战时，不得不穿借来的衣服。

女王的孩子有时与敌人发生紧张、恐怖或悲伤的遭遇。军队攻打一座城市时，孩子们有时会听见城内居民的喊叫和哀哭。他们看到了敌人，但也看到了战争的无辜牺牲品。

就连接受一座城市投降的过程也未必一帆风顺，假如双方发起脾气的話。西班牙人接受城镇投降时，一般是斐迪南国王率军去接受当地显贵的效忠誓言。投降的决定在城内往往是有争议的。城镇居民有时会觉得自已遭到了出卖，他们的猜疑有时是正确的。

并非只有斐迪南一个人直接以身涉险。伊莎贝拉至少四次进入敌城接受投降，包括阿尔梅里亚和巴萨。在巴萨，十几岁的伊莎贝拉公主陪伴女王进城。莫克林投降后，胡安娜公主也来到伊莎贝拉女王身边。胡安王子和女王一起在哈恩城下的军中。巴布狄尔在格拉纳达投降的时候，城门钥匙被先呈给斐迪南国王，然后交给伊莎贝拉女王，最后交给十三岁的胡安王子。全部五个孩子都在前沿大本营——科尔多瓦的阿尔卡萨瓦待了很长时间。

至少有两次，伊莎贝拉公主陷入了特别危险的境地。她的父母与葡萄牙人交战时，她被留在塞哥维亚，由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的父亲佩德罗照料。伊莎贝拉女王将这座城市的管辖权交给了比阿特丽斯及其丈夫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塞哥维亚的许多居民对这次权力与财富转移心怀不满。市民掀起暴动，反对新的市政府，占领了城市，控制了公主所在的城堡。大约七岁的伊莎贝拉公主一连几天

被困在城堡的一座塔楼内，而城堡内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呼小叫，表达自己的愤怒。伊莎贝拉女王得知消息后，立刻去援救自己的女儿，只带了少量随从，火速赶往塞哥维亚。塞哥维亚市民企图阻拦女王进城，抱怨说他们对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的治理不满，他不得民心，因为他是改宗犹太人。女王傲慢地命令市民让路，并承诺调查此事。女王径直进城，接回了自己的女儿。她兑现了诺言，调查了当地局势，但坚持让德·卡布雷拉管辖该城。对她的女儿，这一定是一段恐怖的经历。

另一次，伊莎贝拉公主作为人质被交给葡萄牙人，以保证她的父母会遵守条约。那时她年仅八岁。她离开家庭，在葡萄牙生活了三年。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伊莎贝拉公主都被期望继续前进、丝毫不流露出软弱或犹豫。

自杀攻击的威胁让西班牙人始终感到胆寒。例如，西班牙人攻打马拉加的时候，一名穆斯林进入西班牙军营，自称是线人，被允许在等待觐见女王的时候在营内各地行动。他看到一对衣着优雅的男女在一座帐篷里下棋，猜测他们就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凶狠地拔刀攻击他们。那女人其实是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而男人是伊莎贝拉的亲戚，一名葡萄牙贵族。他们幸运地逃过了这轮攻击。凶手被擒获处决。但发生在军营内部的这次攻击凸显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在战时自称为盟友的人其实可能是威胁，危险无处不在。

王室无人遭刺杀，倒令人惊讶。除了与穆斯林的战争之外，还有很多人对王室恨之入骨。在格拉纳达和其他地方，犹太人、摇摆不定的改宗犹太人、异端裁判所的批评者、穆斯林，都有充足的理由去想要伤害王室成员。与此同时，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的一些人始终没有原谅斐迪南的家族，因为他父亲在14世纪60年代开展了残暴的内战。

国王和女王知道自己受到威胁，所以始终保持警惕。由于这个原因，1493年12月斐迪南国王在巴塞罗那遭到一个手舞刀子的疯子攻击时，他们的第一个推断是，这是蓄谋已久的行刺。国王脖子后面被刺中，仅仅因为他脖子上一般都戴有沉甸甸的金项链，使得刀子不能刺得更深，他才幸存。伊莎贝拉女王的第一个想法是，斐迪南遭到的攻击是加泰罗尼亚贵族发动叛乱的第一个迹象。于是她首先确保两个王国的继承人——年轻的胡安的安全，命令他快速赶往一艘停泊在岸边的船上躲避，然后才去找自己的丈夫。

他们得知斐迪南还活着，伊莎贝拉就发送消息给在法兰西、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盟友，让他们放心。然后她和女儿们来到斐迪南身边。大约五十天里，他发着高烧，勉强支撑，状况时好时坏。他们找来了最好的医生。“一群内科和外科医生被唤来，”彼得·马特焦急地告诉滕迪利亚伯爵和格拉纳达大主教，“……我们拼命努力，心里既有恐惧也有希望。”^[13]

伊莎贝拉女王和女儿们用尽了能想到的一切宗教手段，为国王的生命祈祷。在他恢复期间的每一天，她都祈祷“苦路”，即想象自己走在基督身后，看着他被判死刑，一直到他被下葬。每一步都需要特别的祷告和安静的冥思，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孩子们作了自己的牺牲，赤足到附近一座山上朝圣。如彼得·马特在几周后的说法，有的孩子是跪在地上爬行的，“为了国王的安全向上帝起誓”。^[14]

另外，女王还发誓，她，她的侍女们以及女儿们都不穿“锦缎或丝绸”制成的圈环裙，这是女王最喜欢的一种风格，但教会不赞成，因为它是一种非常麻烦而浮夸的新发明，并且不庄重。^[15]

由于所有这些精神和医疗的帮助，也要感谢斐迪南的强健体魄，他渐渐康复了。伊莎贝拉女王一定觉得，既然战争已经结束，他们显然得到了上帝的恩宠，所以她不穿锦缎或丝绸裙子的誓言没有必要坚

守下去了。于是很快她就开始为女儿的婚礼做准备，为大家都准备了华丽的服饰。

15世纪90年代，所有五个孩子都接近成年，女王为他们安排了合适的婚姻，将要借此提高西班牙在世界舞台的地位，保障西班牙的边境和西班牙社会的宗教。毕竟，西班牙人需要帮助：他们统治着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容易遭到奥斯曼人的攻击；而他们的亲戚统治着那不勒斯王国，该国的奥特朗托遭到了土耳其人的一次攻击。斐迪南的妹妹胡安娜是那不勒斯王后，不断向他们报告意大利南部和地中海东部令人担忧的局势。

要不了多久，他们就需要集中兵力保护意大利南部，抵御奥斯曼人的攻击。奥特朗托海峡是基督教意大利和穆斯林占据的阿尔巴尼亚之间的狭窄水道，连接着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宽度仅有45英里，帆船或用奴隶作桨手的桨帆船一天不到就可以横跨海峡。那不勒斯王国需要盟友，以降低穆斯林再次入侵的可能性。

为了保障自己的王国，伊莎贝拉运用自己的亲人，就像她运用她的臣民、武器装备和城堡一样，将西班牙打造成坚不可摧的要塞，在欧洲各地缔结婚约，以巩固国防。这些联姻将会加强西欧各基督教国家的关系和盟约。

每一桩婚事都具有战略意义。长女伊莎贝拉可靠而值得信赖，她将嫁给葡萄牙王储，以保护西班牙的后院、促进西班牙的利益。幼女凯瑟琳将嫁给英格兰王储，让那个岛国更紧密地与西班牙人的需求和基督徒控制的地中海地区联系起来。这是桩门当户对的绝佳婚事，因为年轻的亚瑟王子生于1486年，比凯瑟琳只小一岁。第四个孩子玛丽亚的未来还是考虑与谈判的主题。伊莎贝拉看中的是苏格兰前程远大的王储詹姆斯^[16]。伊莎贝拉相信，如果她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英格

兰和苏格兰国王，就能为英伦三岛带来和平，这两个国家将成为基督教世界更可靠的支持者。

但重中之重是她第二和第三个孩子的未来，即王储胡安和他的妹妹胡安娜。胡安和胡安娜分别与神圣罗马皇帝^[17]的孙女玛格丽特和孙子腓力订婚，这是为了在西班牙与德意志和奥地利诸侯国邦联之间缔结钢铁般的共同防御与合作关系。这两门婚事意味着，中欧最大的国家将与西班牙合作，成为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的壁垒。另外，神圣罗马帝国也有保卫天主教会的历史性角色要扮演，伊莎贝拉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锦上添花的是，腓力和玛格丽特还分别是富饶的勃艮第公国和低地国家的继承人。

但伊莎贝拉并非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者。她也努力为孩子们谋得尽可能幸福的婚姻。在这个时代，富裕的老男人垂涎年轻貌美的少女，而将自己最美丽女儿献给年迈国王的家庭往往能够得到金钱、土地和为亲戚谋得油水丰厚的宫廷职位的回报。伊莎贝拉肯定在为她的女儿们寻找有利的婚姻，他们的家族里不会有仅仅为了爱情的婚姻。但她还是希望为所有孩子找到合适的对象，最好是相貌好、年龄相仿，并且拥有能够促进婚姻幸福的特质，或者至少能让人比较满意。她无疑回想起了自己的少女时代，一个又一个男人被提议为她的未来夫君。伊莎贝拉为自己的孩子挑选配偶时，绝不会接受泪汪汪的眼睛或瘦长的双腿。

不过，这些婚姻安排还是很像买卖牲口。英国国家档案馆里有一份保存至今的文献，详细记载了凯瑟琳与威尔士亲王亚瑟之间婚姻谈判的过程。西班牙和英格兰大使面谈以敲定这笔交易的条件，其中包括凯瑟琳的父母应当提供多少嫁妆，而新郎的父亲——英格兰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国王应当出多少礼金。亨利七世希望婚礼尽快举行，以

便凯瑟琳的高贵血统巩固他的家族对英格兰王位的并非很稳固的权力主张。但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吝啬鬼。谈判的记载被送回了西班牙：

英格兰使者称，关于此项联盟，没有什么好谈的，于是开门见山地谈及婚约。他们非常客气礼貌，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颇有美誉。随后，他们请西班牙人提出婚约的金额。

西班牙大使答道，应当由英格兰提出婚约的金额，因为是他们先提议此门婚事，并且他们那边是儿子。

英格兰使者索要的嫁妆数额是他们之前在西班牙索要的五倍。

西班牙大使提议将此事呈请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裁决，他们会按照对方的诚意作慷慨的答复。

英格兰使者说，这样对双方都不方便，而且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不会同意的。

西班牙大使抱怨道，英格兰人的要求不合理。考虑到英格兰国王每天经历的事情，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竟然敢将女儿交给他，令人惊讶。西班牙大使说这话时非常客气，以免对方不悦或发怒。

英格兰使者把嫁妆数额减少了三分之一。

西班牙人提议，因为时间充裕，应当选择两人或四人作为仲裁人。

英格兰使者不同意，并给出了理由。

西班牙人希望英格兰人给出最低的价码。

英格兰人把嫁妆数额减少了一半。

西班牙人说，这门婚事对英格兰国王会非常有利，所以他应当满足于西班牙公主的通常嫁妆。

英格兰人希望将所有条件言明，以防止婚约缔结之后发生争端。他们索要的嫁妆是他们之前在西班牙索要的两倍。

西班牙大使提议的数字是之前的四分之一。

英格兰人问为什么，因为这钱不是从国王和女王自己的保险箱里拿出来的，而是来自他们臣民的口袋，那么国王和女王何不大方些？他们谈及了与法兰西、勃艮第和苏格兰的旧条约，以此为证据，说这些国家给的嫁妆都更多。

他们还说，英格兰的物价很高，面值最小的硬币也值八个西班牙马拉维迪，而且英格兰的达官贵人开销非常大。克拉伦斯、兰开斯特、白金汉、萨默塞特、诺福克和约克等公爵领地，沃里克、索尔兹伯里和林肯伯爵领地以及多塞特侯爵领地的英格兰王公贵族很富有。所以，英格兰并不存在什么危险，英格兰人觉得没有理由降低自己的要求。[\[18\]](#).

讨价还价就这样继续下去。虽然双方都希望这门婚事谈成，但都在拼命占便宜。亨利七世非常节俭和精打细算，所以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非常富有，而伊莎贝拉有四个女儿要出嫁妆。双方对各自出的金钱数额和婚姻安排讨价还价，从1488年一直谈到1509年，从凯瑟琳三岁的时候一直谈到她二十四岁。

根据英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书信和文献，伊莎贝拉决定了嫁妆谈判的很多条件，具体给出了嫁妆的细节，并选择了陪同凯瑟琳去英格兰的卡斯蒂利亚官员的人选。

这套文献表明，伊莎贝拉是西班牙处理国际事务（包括缔结军事联盟、谈判贸易协定和安排婚姻）的幕后推动力量。19世纪50年代，有一位居住在英国 的德意志学者古斯塔夫·贝尔根罗特花了多年时间研究西班牙与英格兰之间的来往书信。他必须破解伊莎贝拉与她在英格兰的使者通信时所用的密码和暗语。她处处施加影响，而斐迪南的影响无处可见，除了书信抬头的称呼部分。这些书信一般都写成仿佛来自国王和女王两人，但在一些比较长的信里，伊莎贝拉忘记了自己制造的神话，仅提到自己，“我，女王”。至少有两次出现了这种疏忽，分别是1497年1月和1502年12月的信中。[\[19\]](#).

伊莎贝拉在国际谈判中和处理内政时一样，恭维奉承和用计操纵双管齐下。例如，1496年9月，在给西班牙驻英格兰大使的信中，她称亨利七世国王为“拥有崇高美德和坚忍不拔的君王”，她显然认定这些话会被重复给英格兰国王听，而他在自己篡夺来的王位上坐得并不安稳。^[20]她在信中说，她期望，他们的孩子结婚之后，英格兰与西班牙的关系会更加紧密。她深知亨利七世急于和历史悠久而受到尊重的豪门贵族结成联盟。

她还在尝试改善亨利七世与苏格兰的关系，如果成功，就会大大打击法兰西的力量，加强北欧对南欧的问题（尤其是土耳其人构成的威胁）的支持。伊莎贝拉女王用亚瑟与凯瑟琳的婚姻前景作为诱饵，向亨利七世施加压力，要他改善与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的关系。伊莎贝拉的所有女儿都结婚之后，她对冈萨雷斯·德·普埃夫拉说：

“亨利七世必须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苏格兰国王。”果然，英格兰的玛格丽特公主于1503年嫁给了詹姆士四世。^[21]

虽然谈判过程非常复杂，但无论是从西班牙在欧洲的地位的角度看，还是对这几对年轻人来说，几桩婚事似乎都很值得憧憬。但所有的婚姻，即便是最幸福的，也会带来挑战。他们的婚姻也不例外。

年纪最长的伊莎贝拉第一个结婚，那是在1490年。她二十岁的时候嫁给了若昂二世国王的儿子，十五岁的阿方索王子。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交换人质以确保和约执行的三年里，这对少年住在莫拉，由伊莎贝拉女王的葡萄牙姨母比阿特丽斯照料。阿方索与伊莎贝拉从她八岁、他三岁的时候就朝夕相伴，互相非常喜爱。为了确保比阿特丽斯尽心尽责地照料这两个孩子，她的儿子堂曼努埃尔被送到卡斯蒂利亚生活，见到了伊莎贝拉女王，很信任她。^[22]堂曼努埃尔是个讨人喜欢、谦恭有礼的男孩，伊莎贝拉女王或许把他看做保障未来的“保险

单”。在外国宫廷有一个盟友总归是好事。而且假如葡萄牙的阿方索王子有什么不测，那么曼努埃尔就有一天可能成为国王。

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两个王族之间有纠纷，甚至曾兵戎相见。但若昂二世国王已经得出结论：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联姻是非常理想的。阿方索是个服服帖帖的孩子，年轻的伊莎贝拉很快也变成这样。葡萄牙的新领地为王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而关于阿方索的报告（尽管肯定被奴颜婢膝的廷臣夸大了）称这位年轻王子为“世上有过的最英俊、最帅气的男子”^[23]。

1488年8月，葡萄牙贵族和编年史家鲁伊·德·桑德来到卡斯蒂利亚，送来了讨论阿方索与伊莎贝拉婚姻的书信。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热情欢迎他，尽管女王对这孩子父亲的人品持保留意见。宫廷举办了兴高采烈的庆祝活动。人们在塞维利亚纵情狂欢。大家在宫里跳舞到深夜。伊莎贝拉及其女儿们的舞姿非常优雅，闻名遐迩。最后伊莎贝拉对葡萄牙大使说：“天色已晚。”以宣布聚会结束。他答道：“不晚，陛下，而是很早！”因为第一缕曙光正在射入窗户。^[24]

据法兰西廷臣菲利普·德·科米纳说，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同意这桩婚事，以改善伊比利亚半岛的安全：“他们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了葡萄牙国王的儿子，好让整个西班牙安定和平，因为他们除了纳瓦拉王国之外，已经完全控制了所有省份。”^[25]对双方家族来说，这都是数十年来以来第一次王室婚姻。两个王国都筹划和协调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庆祝活动。首先在塞维利亚举行了连续几周的庆祝，年轻的伊莎贝拉的父母和姐妹都参加了。然后，一群西班牙和葡萄牙权贵将新娘从卡斯蒂利亚送往葡萄牙的埃武拉城。伊莎贝拉公主的随行队伍由托莱多大主教、红衣主教佩德罗·门多萨领导。自从恩里克四世国王驾崩和伊莎贝拉女王登上卡斯蒂利亚王位以来，他始终是伊莎贝拉女王的重要盟友。

伊莎贝拉公主由她的葡萄牙亲戚堂曼努埃尔（他在交换人质期间住在卡斯蒂利亚）护送去见婆家人。现在堂曼努埃尔是维塞乌公爵和贝雅公爵，本来这些头衔属于他的哥哥迭戈，但迭戈被若昂二世杀了，后来若昂二世将这些头衔给了曼努埃尔。曼努埃尔与伊莎贝拉同龄，在与她一同在两个王国旅行途中，变得特别仰慕她。

年轻的伊莎贝拉抵达葡萄牙之后，受到热情洋溢的欢迎。据一位葡萄牙编年史家记载，她经过街巷时，受到了喧天鼓乐和欢呼的欢迎，“似乎大地都在震颤”。^[26]年轻夫妻的寓所装饰着“富丽堂皇的锦缎和精美壁毯”，公主获赠许多礼物。^[27]

伊莎贝拉和阿方索于1490年11月25日在埃武拉举行婚礼。随后几周举行了许多“盛大节庆”、宴会、舞会和其他庆祝活动。^[28]编年史家回忆道，在一次称为“哑剧”的庆祝活动中，若昂二世国王举办了一次比武，“巧妙地打扮成天鹅国王，非常富丽堂皇、魅力无穷和温文尔雅”。

他走进大厅时，身边有一大群雄伟“巨舰”，“巨舰”下是用成卷布匹绘制成的大洋的惊涛骇浪，同时有雷霆般的炮响，喇叭与号角齐鸣，吟游诗人在演奏乐器。人们扮演的大副、领航员与水手发出狂野的呼喊和混乱的口哨声，他们穿着锦缎和丝绸衣服……国王大踏步走出来，穿着非常奢华的假面舞会戏服，与公主翩翩起舞，其他人也携手自己的女伴，这样走进来……当夜他们纵情歌舞，上演了许多笑剧，举办了许多庆祝活动。^[29]

对这两个越来越富饶的国家的两位宠儿来说，这是一场壮美的婚礼。阿方索年仅十五岁，伊莎贝拉二十岁，尽管有年龄差距，他们孩提时代缔结的友谊很快演化成炽热的爱情。他们的婚姻起步非常顺利，据编年史家记载，婚礼结束后，“所有人都心满意足、十分开心”。^[30]

这桩婚姻对西班牙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人们对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战争还记忆犹新，而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的和平条约让一些人仍然心怀怨恨。若昂二世的父亲在葡萄牙做的一些事情，就像恩里克四世国王在卡斯蒂利亚做的一样：漫不经心地将土地、产业和教职封赏给高级贵族，以赢得他们的支持和忠诚，在这过程中却削弱了自己。据历史学家安东尼奥·恩里克·德·奥利韦拉·马克斯记载，在若昂二世的祖父在位期间，只有两位公爵和六位伯爵。但在阿方索五世国王驾崩时，已经增长到四位公爵、三位侯爵、二十五位伯爵、一位子爵和一位男爵，而且全都得到了大量土地与收入的封赏。若昂二世国王终于继承王位的时候愤恨地说，他父亲给他留下的土地只剩下道路所占的范围。[\[31\]](#)

1481年，父王驾崩，若昂二世成为国王，立即开始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工作。这一套工作与欧洲其他成功国家，如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所做的相同，即稳定王室的统治，遏制在朝纲紊乱、内乱频仍期间变得傲慢而无法无天的贵族。他开始管束贵族，但在这一过程中与自己的亲戚伊莎贝拉女王又发生了冲突。伊莎贝拉母亲的家族包括布拉干萨公爵和维塞乌公爵，他们是葡萄牙最富裕和强大的家族，类似西班牙的门多萨家族。若昂二世国王得知，他们与伊莎贝拉通风报信，他相信他们是在叛国。在查获了一些可疑文件之后，他囚禁了布拉干萨公爵，对其加以审判，将其定罪并处决。后来，在一次大发雷霆时，他打死了堂曼努埃尔的兄长，后者可能参与了反对国王的一起阴谋。没有人说得清，这位公爵是如何被戮死的。有人说是国王亲自动手，也有人说是廷臣帮忙的，但此事在整个西欧引发了惊恐。例如，法兰西廷臣科米纳斥责若昂二世“野蛮”。科米纳和其他很多人一样，相信若昂二世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亲戚。[\[32\]](#)

伊莎贝拉女王对这些杀戮深感不安，在卡斯蒂利亚庇护逃亡者，向遭到若昂二世迫害的许多权贵提供土地和产业。此后她很少提及若

昂二世的名字。此后她只称他为“那个人”，这是非常严厉的鄙夷。

年轻的伊莎贝拉虽然是父母的宠儿，但显然不得不肩负起恢复睦邻友好的艰巨任务。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这肯定不轻松。但伊莎贝拉拥有一些有利条件。她在葡萄牙度过了童年的许多岁月，所以会说葡萄牙语，而且熟悉该国的风俗习惯；她跳葡萄牙舞时非常优美，令家人倍感骄傲，以至于宫廷正式场合与外交宴会上也会请她一展舞姿。但她继承了母亲的个性，有本领让自己的婚姻非常成功。她甚至成功赢得了公公——坚忍而冷血的若昂二世国王的好感。

* * *

这对年轻夫妇婚姻生活的最初几个月简直是田园诗。在一个明媚的日子，他们乘坐一艘张挂彩旗的游船在河上泛游，在乡间愉快地野餐。1491年7月的一天，若昂二世国王提议在下午晚些时候骑马出游，王子在最后关头决定与父亲一起纵马奔驰。在出游途中，他的马绊倒在地，王子摔落马背，被马压在下面。他母亲得到王子负伤的消息，于是和伊莎贝拉一起奔到他身旁。他们哀求上帝挽救他，但他再也没能说话，三个小时后便去世了。[\[33\]](#)

阿方索王子深得葡萄牙人民爱戴，整个王国为他的死哀悼。男人们拔下自己的头发与胡须，女人们用指甲猛抓自己的脸庞，留下一道道血印子，以示哀痛。国内到处传来“悲痛万分的哭喊与极其响亮的哀悼声”。[\[34\]](#)

阿方索的父母十分悲痛，但最痛苦的是还是他的妻子伊莎贝拉。她的悲恸感人至深，后来王室的许多代人讲到此事，还会赞美她。她抽泣着割掉了自己的金发，戴上面纱，不让任何人看到她的面庞。她换上丧服，一连四十天不肯换衣服，以惩罚自己的身体。她几乎完全禁食，变得非常消瘦，最后才同意喝一点肉汤。她病倒了，发高烧。

她躲在一间黑洞洞的房间里，只点一根蜡烛照明，阅读宗教著作和祈祷文。她每天听弥撒，一次又一次领圣餐。她执迷于胡思乱想，琢磨是什么导致她和葡萄牙遭到这样的灾祸。她深刻自省，探索自己是否做了让上帝不满的事。

这样深切的哀恸在当时不算稀罕。葡萄牙人表达哀恸的习俗就是剪掉头发、忽视个人卫生、长时间穿脏衣服，以及类似的事情。例如，在这期间，若昂二世国王及其妻子不再坐在桌前用膳，而是“坐在地上，用陶土餐具吃饭，取消了一切体面的排场”。^[35]

成为寡妇的儿媳的悲恸有助于排解她的公婆的痛苦。他们为她的安康，甚至是性命担忧，于是将她的床搬进他们自己的寝室。她只同意接受最低限度的舒适条件，包括仅仅用一条非常单薄的印度床单御寒。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听到阿方索的死讯，也十分悲伤。根据伊莎贝拉女王的外孙女在五十年后请人编纂的一本关于基督徒女性恰当行为的书里的相关记载，伊莎贝拉给女儿写了充满温情而真挚的慰问信，塔拉韦拉大主教也写了信安慰她。据记载，这些信本身也催人泪下：“除非是铁石心肠的人，没有人在听到这些话时会不流眼泪！”^[36]

伊莎贝拉公主为阿方索哀悼的时候，越来越执着于他们可能犯有的罪行，正是这样的罪行激怒了上帝，所以她才夺走了这个年轻人的生命。她越来越坚信，阿方索的死是因为葡萄牙纵容异端思想蔓延。^[37]没有人知道这种想法是谁最先有的，但人们越来越怀疑，上帝在惩罚葡萄牙包庇异教徒，这对随后的一些年产生了深远影响。

伊莎贝拉的父母派人接公主回家，希望她赶紧回来，以帮助她恢复元气。她回来之后，已经变得极其虔诚，继续用饥饿和肉体痛苦来折磨自己。她说自己绝不再嫁。她恢复了原先的让她感到舒服的角

色，即陪伴和辅佐母亲。此时伊莎贝拉女王已经四十岁，不得不同时应对国内外的难题。

阿方索的死在葡萄牙造成了政治动荡。王位继承出现了争议。若昂二世希望指定自己的私生子若热为继承人，但很多人显然不认可若热的继承权。胡安娜·贝尔特兰尼娅^[38]，也就是恩里克四世国王相信是自己女儿的那个女子，居住在葡萄牙的一座修道院。所以即便是对合法性的一丁点怀疑，也足以摧毁一个君主国。但这不再是伊莎贝拉公主的问题了，她已经把自己在葡萄牙的生活抛在脑后。

但在1495年，若昂二世国王驾崩了。他生前不情愿地决定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堂弟曼努埃尔。曼努埃尔在自己的兄长被杀之后获得了维塞乌公爵的头衔。对他来说，这是难以置信的好运气。他兄弟姐妹一共九人，他排行第八，所以在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极不可能继承王位。但他的哥哥们都已经一个一个撒手人寰。曼努埃尔性情温和，懂得策略，所以在若昂二世国王充满风波的统治期间生存下来。另外，葡萄牙新近获得的繁荣意味着，虽然它是个小国，却发展出了一个宝贵的全球贸易帝国。很快，这个年轻人就被称为“幸运的曼努埃尔”，这是个很恰当的名号。^[39]

曼努埃尔一世还有一个幸运的打算。他想娶阿方索的遗孀——伊莎贝拉公主。他最初喜欢上她，是他护送她去葡萄牙的时候。让他着迷的，或许是她魅力，或许是她充满魔力的舞姿。锦上添花的是，她是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位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排在弟弟胡安之后。有些人在窃窃私语，说胡安王子看上去不是很健壮。曼努埃尔一世说不定能成为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这两国所有领土的国王。

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向曼努埃尔一世国王建议，把他们较小的女儿玛丽亚嫁给他，但他固执己见。他说自己要么娶伊莎贝拉，要么到伊比利亚半岛之外找一位新娘。于是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开始向

年轻的寡妇施加压力，让她停止服丧和夸张的宗教仪式，嫁给曼努埃尔一世。伊莎贝拉坚决拒绝。据彼得·马特记载，她是个非常坚定的年轻女子，一口咬定自己绝不会“再与另一个男人婚配”，“到这一天为止，任何手段都说服不了她”。^[40]

这事就只能这样了。卡斯蒂利亚在发生许多事情，战争和探索航行正在进行，于是伊莎贝拉的再婚就被暂时搁置。

* * *

王室的注意力转向胡安，母亲的“天使”，他继续享受当时所有家庭的长子得到的优待。到1496年，他十八岁的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前呼后拥的内廷人员，每天的活动遵循极其细致的日程安排。十几名侍从前后侍奉他，在专门官员的配合下，确保他穿上身的每一件衣服都臻至完美，让他的仪表无懈可击。他的全套服装配备极其奢华，包括不计其数的锦缎、金线织物和天鹅绒服装。有专人负责王子的银夜壶，随时供他方便地使用。

胡安还有自己的谋士与盟友。他们主要是富户和贵族家庭的子弟，但他的圈子成员也有其他一些人，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两个儿子。

宫廷的男孩们继续接受意大利学者彼得·马特的最新潮的人文主义教育。他对自己培养未来西班牙国王的工作非常自豪。他开玩笑地说，自己主持着一个角力学校，即古希腊训练年轻人摔跤的学校。

“我的房子里整天挤满了活泼欢快的贵族子弟，”他在给布拉加大主教（葡萄牙的最高级教士之一）的信中夸耀道：

他们现在开始渐渐摒弃空虚的爱情（你非常清楚，他们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在这方面轻车熟路），转向文学。他们现在开始认识到，与祖辈灌输他们的错误观念相反，文学并不是军事生涯的障碍。他们承认，学习文

学对军事帮助极大。我努力说服他们，若没有文学的帮助，任何人都不能在和平或战争时期扬名。我们的角力学校让女王非常满意，她就是君主所有崇高美德的活生生的例子。她命令……她的子侄经常到我这里来，还命令比亚埃尔莫萨公爵（国王的侄子）也跟我学习，除非有急事，不准离开我家。西班牙所有权贵的年轻继承人都跟我学艺。他们每人带两名教师来旁听，以便按照我的安排，回家之后与他们一起复习语法规则，并重复在我这里听到的课。[\[41\]](#)。

按照马特和其他人的说法，王子是个敏感而热爱学术的青年，潜力巨大，但不是很健壮。马特谈到了王子的“娇嫩的颞部”，注意到王子的饮食是经过细致监控的，以帮助他维持体力。他的一封信体现了一种不祥预感：只要这个年轻人能活下去，“西班牙定会让世界愉悦”。[\[42\]](#)。

似乎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等待胡安王子和他的妹妹胡安娜。由于王室的王朝联姻安排，胡安将迎娶神圣罗马皇帝的孙女，美丽的玛格丽特，她和哥哥腓力一起，是极其富饶的勃艮第与佛兰德领地的继承人；而胡安的妹妹胡安娜将嫁给腓力。

尤其对伊莎贝拉女王及其孩子们这样酷爱文艺复兴早期艺术与文化的人来说，这的确是激动人心的婚姻安排。玛格丽特和腓力的世界在社会和艺术上非常前卫和高端成熟。他们统治的土地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也是北欧早期文艺复兴许多伟大作品的故乡。根特祭坛装饰上令人着迷的亚当夏娃图由大师扬·范·艾克创作，在国际上引起轰动，推动了绘画艺术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这幅画是由好人腓力聘请范·艾克绘制的。好人腓力是玛格丽特和腓力的曾外祖父。这种艺术在西班牙特别受到仰慕，因为伊莎贝拉的父亲曾聘请扬·范·艾克的同时代人罗希尔·范·德·魏登创作米拉弗洛雷斯祭坛装饰画。

腓力和玛格丽特兄妹自身也是条件非常好的婚姻对象。他们家族有不计其数的画像被创作出来，用来公开展出，或者送到欧洲各地用

来“相亲”。一套创作于约1495年的双联画包含兄妹两人的肖像，头顶上还画着他们的纹章，以宣扬他们注定要继承的广阔的领地。此时腓力约十六岁，玛格丽特约十四岁，画中分别有十八个单独的纹章围绕他们。

从画中看，两人都皮肤白皙，赤褐色头发，容貌精细，红唇饱满，这些体征在当时是很受仰慕的。肖像也体现了他们的极其富有：腓力戴着很宽的金项链，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金项圈，身穿白色貂皮镶边的长袍；玛格丽特戴的金项链比较长，喉部悬挂着很大的红色宝石垂饰；她的裙子是用富丽堂皇的锦缎织物制成的。腓力头戴可能是黑天鹅绒的帽子，玛格丽特戴红帽，遮盖了自己的头发，黑纱如瀑布般滚下，从后脖颈垂到肩膀。^[43]

玛格丽特受到普遍赞誉，但最引人爱慕的是腓力。他因为英俊而获得了“美男子腓力”的绰号。不过他受到的慷慨赞誉并没有冲昏他的头脑，因为大家都说他风度翩翩、具有丰富的个人魅力。

尽管他们拥有财富和地位，但童年却很悲惨和艰难。他们的母亲玛丽（富饶的勃艮第公国的继承人、好人腓力的孙女）嫁给了神圣罗马皇帝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很快生了两个孩子。1482年，玛丽和马克西米利安在布鲁日附近的草地狩猎。玛丽的马在跳过一条水道时突然转向，二十五岁的玛丽从马背摔下，而马则倒下来，压在她身上。她内脏受损，三周后去世。和通常情况一样，她的死亡引发了继承的问题。他们伤心欲绝的父亲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腓力和玛格丽特被交给他们的外祖母照料。此时腓力年仅四岁，玛格丽特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婴儿。随后几年，他是在欧洲北部的佛兰德领地与外祖母一同度过的。

玛格丽特很快被许配给未来的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三岁时被送到昂布瓦斯宫，交给法兰西宫廷抚育。但查理八世看到一个更富有的

女继承人——布列塔尼的安妮在婚姻市场待价而沽的时候，就抛弃了玛格丽特。年仅十一岁的玛格丽特被送回家，去面对不同的命运。这对玛格丽特及其父亲来说是双重羞辱，因为丧偶的马克西米利安原本打算娶布列塔尼的安妮。而在此期间，勃艮第公国的孩童继承人腓力落入一连串自私自利的廷臣手中，与伊莎贝拉女王的父亲和兄弟们的经历类似。玛格丽特和腓力与胡安娜订婚的时候，他们的前史应当给伊莎贝拉女王敲响警钟。

婚礼需要大量的后勤筹备工作。1496年，十七岁的胡安娜要先嫁给腓力。将有一支舰队送她北上去佛兰德，然后带玛格丽特回到卡斯蒂利亚，以便举行她与胡安娜的婚礼。

胡安娜启程的日子快到了，女王表示对此旅途有些担忧，或许还担心胡安娜不能很好地胜任她未来的新责任。由于法兰西入侵意大利以便夺取那不勒斯，欧洲各地燃起了战火，所以海路漫长而充满风险。而且从卡斯蒂利亚到佛兰德的路途要经过法兰西沿海。伊莎贝拉担心胡安娜被法兰西人拦截并俘虏。女王组织了110艘船的舰队以及约1万士兵和水手，去护送她的女儿。如果遭遇恶劣天气，他们不能在法兰西寻求庇护，而只能向更西方航行，深入大西洋，然后努力去往英格兰。伊莎贝拉满腹忧愁，陪胡安娜到了她启程的地点，西班牙北岸的港口城市拉雷多，在船上与女儿待了两晚。她看到女儿要离开，十分悲伤。据彼得·马特记载，胡安娜最终离去的时候，伊莎贝拉留在岸边目送舰队驶出，“并为自己的女儿哀哭”，随后才返回布尔戈斯。

伊莎贝拉女王给英格兰朝廷写了至少四封信，恳求亨利七世国王，假如命运作怪，胡安娜的船被吹到了英格兰海岸，一定要照顾她。在其中一封信里，她要求自己的驻英大使确保，如果胡安娜在英

格兰登陆，一定会得到“热烈欢迎”。在另一封信里，她请求亨利七世国王把胡安娜当作自己的女儿来看待。

伊莎贝拉女王“对自己的女儿忧心忡忡，”彼得·马特写道，

因为没人能说得准，狂风、波涛汹涌大海的巨岩礁石和海上形形色色的危险，会给她的孩子，一个羸弱的小姑娘，带来什么……她脑子里不仅思索着在西班牙海航行的人们常常遭遇的各种灾祸，还唉声叹气地担忧可能发生的事情。她身边日夜有本领高强的水手陪伴，她不断询问他们，现在是什么风向，他们觉得舰队耽搁的原因是什么；她哀叹自己的命运，因为她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送到最遥远的比利时，而且恰恰是这个时节，由于凛冬将至，海上几乎无法航行，何况法兰西对我们抱有敌意，所以不可能有许多信使来往传送消息。[\[44\]](#)

胡安娜是伊莎贝拉第一个离家远行的孩子，但她母亲的担忧似乎超出了正常范围。胡安娜似乎已经做好了离家远嫁的准备，并且满心欢喜，热切希望出发。她自己不会成为君主或统治者，所以受到的教育与哥哥不同，但也受到了良好教育，做了充分准备。胡安娜及其姐妹曾与母亲一同学习拉丁文，她们的教师是一位叫比阿特丽斯·加林多的年轻女子，曾是萨拉曼卡大学的学者。加林多精通拉丁文，而胡安娜对这门外交语言掌握得也很不错，大家对此肃然起敬。胡安娜甚至能用拉丁文写诗，得到了一些赞扬。

在治国理政方面，胡安娜受到的教育也不如哥哥胡安和姐姐伊莎贝拉。因为胡安和伊莎贝拉年纪较大，常常陪同父母参与重大场合，很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地学习如何掌控必需的程序和宫廷礼节，而胡安娜、凯瑟琳和玛丽亚常常被留在后面，没有机会抛头露面。现在，伊莎贝拉女王似乎不愿意胡安娜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她似乎在这个女儿，自己的第三个孩子身上发现了某种弱点。

伊莎贝拉女王之所以特别忧愁，另一个原因是，她收到了一些噩耗。她的母亲之前许多年一直居住在阿雷瓦洛，她在这年8月中旬去世

了。这消息对女王的打击很大。用马特的话说，她母亲多年来一直隐居不出，“因为年高而疲惫不堪且衰弱”；^[45]但伊莎贝拉每年拜访母亲一两次，为了看望母亲，她要骑马横穿整个王国，并花时间陪伴她。在这些拜访期间，她通常会亲自侍奉母亲。母亲的死让她震惊，因为她是伊莎贝拉自己原先家庭的最后一位成员。伊莎贝拉终于离开沿海地区，去布尔戈斯的时候，就是为了去主持母亲的葬礼。

胡安娜启程几天之后，伊莎贝拉还在与目睹女儿离去造成的忧郁做斗争的时候，伊莎贝拉就开始尽职尽责地安排母亲的送葬和下葬仪式。马特写道，虽然自己的母亲在公共生活中被遗忘了那么久，她要确保她“一定要以适合王后的身份，风光体面地上路”。伊莎贝拉女王命令将她母亲的遗体运往布尔戈斯附近一座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在那里将其安葬在她父亲胡安二世国王和英年早逝的弟弟阿方索身旁”。^[46]

他们三人长眠的地点是米拉弗洛雷斯的一座哥特式修道院，在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沿途，邻近卡斯蒂利亚多位国王和王后的埋葬地。这座修道院是她父亲出资建造的，他把自己心爱的罗希尔·范·德·魏登祭坛装饰画就安放在那里。他们的雪花石膏墓穴是佛兰芒雕塑家吉尔·德·西洛埃设计的。墓穴的基座是八角星形，这对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是神圣的符号。墓穴非常精美，纹理稠密，立体感强，十分华丽，有大量独立的圣徒与使徒塑像守卫他们的安息。伊莎贝拉确保父母一同长眠于他们喜爱的地方，并且邻近他们仰慕的艺术品。

* * *

与此同时，胡安娜在长达十七天令人胆寒的艰难航行后，于1496年9月8日安全抵达佛兰德。如她母亲所预测的，航船曾被迫在英格兰短暂躲避，随后才继续前进。舰队中一艘船在风暴中沉没，胡安娜失

去了许多侍从人员和大部分结婚礼物。最后，腓力也没有到场迎接她。他正在奥地利的蒂罗尔，与父亲待在一起。一个多月后，他才赶来与胡安娜相见。胡安娜抵达佛兰德时，迎接她的是腓力的十六岁妹妹玛格丽特，后者代表整个家族来欢迎胡安娜。

胡安娜暂时投宿于一家修道院，“十六位贵族小姐和一名妇人，个个身穿金线华服”，在她身边侍奉。^[47]她和玛格丽特一同前往里尔，等待腓力。10月12日，腓力终于来到她身边。漫长而令人窘迫的等待无疑让胡安娜十分沮丧。在长达五周的时间里，她一直在纠结自己是不是被未婚夫抛弃了。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她的新小姑子玛格丽特身上。

但腓力来了之后，她的疑虑全都烟消云散。胡安娜和腓力一见钟情。所有关于他如何英俊和魅力十足的传闻原来都是真的，她很快就深深爱上了自己的夫君。六天后，他们接受了胡安娜的神父的婚姻祝福，立即圆房。他们的正式婚礼仪式于10月20日举行。他们两人可谓金童玉女，令人倾慕。腓力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沉浸在人父的自豪中，说：“上帝让他俩结为连理，真是了不起的媒人。”^[48]

婚礼结束后，胡安娜便成了勃艮第公爵夫人，因为她丈夫腓力是勃艮第公爵。他在勃艮第其实就是君主，不过头衔是公爵，因为勃艮第是一个诸侯国邦联，由某位法兰西国王封给他的儿子，头衔就是公爵。勃艮第公国由若干省份组成，版图形似新月，包括今日的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尤其是今天的勃艮第地区。勃艮第公国的东面是神圣罗马帝国，由腓力的父亲和祖父统治，但西面和南面是法兰西，它是一个强大而危险的盟友。法兰西对勃艮第的财富与文化繁荣十分垂涎。

腓力和胡安娜前呼后拥地一同巡视他们的领地，察访了布鲁塞尔、根特、里尔、安特卫普和布鲁日等重要城市。作为公国的新统治

者，他们沿途受到了热烈欢迎。从佛兰德很少有消息传到西班牙，毕竟路途遥远，而且风暴肆虐。不过最终喜讯还是传到了卡斯蒂利亚：胡安娜得到了臣民的热情欢迎。伊莎贝拉女王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一位编年史家喜出望外地描写了胡安娜胜利进入安特卫普的盛大场面，只见喇叭手和其他乐师为她的抵达奏乐助兴：

这位非常尊贵和有德的女士……仪态健美而端庄，风度优雅，是公爵的国度里有史以来穿着打扮最富丽堂皇的一位。她遵照西班牙风俗，骑着一头骡子，没有戴帽子或面纱，后面跟着十六位年轻的贵族小姐和一位贵妇，都身穿金线华服，同样骑骡子，身边还有衣着华丽的侍从。[\[49\]](#)

在后来被称为“喜悦入城”的典礼中，公爵夫人在一座又一座城市受到了华丽排场的盛大欢迎。当地官员向她献上城门钥匙。到处为她举办宴会、舞会和比武大赛，每座城市争奇斗艳，想方设法用新颖的庆祝活动来欢迎她。

例如，在布鲁塞尔的大广场，人们为了给胡安娜提供教益和娱乐，表演了一系列场景，有虚构、神话和历史人物。有一个场景把胡安娜描绘为《圣经》中的犹滴，她杀死荷罗浮尼，以解放自己的人民。还有类似的表现挑战男权的女性英雄人物的场景。胡安娜的母亲伊莎贝拉女王似乎在各地都特别引起关注，被视为一种新的女武士的榜样。显然胡安娜的新臣民期望她在佛兰德能效仿自己的母亲，有所建树。

这些场景、表演和娱乐被认为非常了不起，值得铭记。有人在一份特别的插图版手稿中重现了这些景象，称为《阿拉贡—卡斯蒂利亚的胡安娜的喜悦入城》，后来成为此类艺术品的模板。宫廷的奢靡是毋庸置疑的。

这份插图版手稿明确表明，天真而缄默的年轻公主是在简朴而贞洁的环境里长大成人的，如今到了沉溺享乐的勃艮第宫廷，不免飘飘然起来。法兰西国王常常以金钱收买勃艮第廷臣，所以他们更忠于浮夸奢靡的法兰西王族，而不是腓力和胡安娜。例如，有些场景表演，要么是隐晦地，要么是公开地对胡安娜及其家族表示敌意。

在一个场景中，一位衣着华美的公主被描绘为黑皮肤的埃塞俄比亚人，跨骑着马，身边环绕着服饰怪异的随从，那些人都穿着毛茸茸的紧身衣，手里拿着棍棒。^[50]有种族主义思想的北欧人常说西班牙人是非洲人的近亲，这个稀奇古怪的场景是刻意侮辱胡安娜的。在另一幅场景画中，胡安娜的母亲伊莎贝拉取走了格拉纳达的巴布狄尔的王冠，后者跪拜在她面前。这幅画是双刃剑，一方面认可伊莎贝拉在收复格拉纳达战争中的领导角色；另一方面，男人向女人跪拜，不是为了追求女性而是屈服于她，这让人对性别关系问题感到很不舒服。

其他场景则有伤风化。在题为《巴黎的审判》的图中，三位女神裸体跳舞，这在保守的西班牙艺术中是很少出现的。而一幅描绘佛兰芒宫廷的画则表现了男女公开交媾，而狂欢场所边缘的一个男性角色，可能是公爵本人，似乎醉得不省人事。

在此期间，卡斯蒂利亚与佛兰德之间的通信似乎出了问题。胡安娜很少写信回娘家，并为自己不回信百般搪塞。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得知她怀孕了，这对外祖父母来说是一大喜讯。1498年8月，一名作为使者出访佛兰德的西班牙教士报告称自己在7月见到了胡安娜，情况很乐观。“她非常美丽和健壮，”教士写道，“怀孕的月份已经大了。”^[51]

胡安娜抵达佛兰德几个月后，胡安的新娘玛格丽特被送往西班牙。海上又是惊涛骇浪，胡安娜舰队的船只损失让大家都有点害怕坐船，但玛格丽特最终动身前往西班牙了。她经历了胡安娜遇到过的同

样艰险难受的旅途；有一次，船上险象环生，勇气十足的公主用法语写了一首诗描绘自己的险境：“这是玛格丽特，一位高贵的小姐；结过两次婚，仍然是处女。”

舰队安全抵达了桑坦德港，胡安王子及其父亲匆匆赶去迎接她。她想按照传统习俗吻他们的手以示尊敬。他们热情而亲切地欢迎她，护送她到布尔戈斯。在那里，她见到了女王。伊莎贝拉衣着华美，一见到玛格丽特就亲热地拥抱她。

所有人都被玛格丽特的魅力吸引，无论她走到何处，都有人群围观。彼得·马特在给一位身在罗马的西班牙红衣主教的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如果你见到她，会以为自己看到的是维纳斯本人。”^[52]西班牙及其属地的未来王后得到了人们兴高采烈的欢迎；婚礼于1497年4月3日（棕枝主日^[53]）举行。她获赠了不计其数的贵重礼物。

这桩婚姻极其幸运，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立刻能够融洽相处。即便他们之间没有婚姻纽带的联系，似乎也都能成为朋友。斐迪南赞美玛格丽特“优雅、快乐”和“温柔”的性情。^[54]玛格丽特与伊莎贝拉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她和伊莎贝拉一样虔诚，也会花很多时间根据《时间祈祷书》来祈祷敬神。她在文化上也非常活跃，并且和伊莎贝拉一样酷爱艺术。

她们都喜爱精美挂毯，这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特别贵重的挂毯，如用丝绸或羊毛制成的，有时缀以金银线，价格可以抵得上一艘战舰，需要大量织工耗费多年方可完成。伊莎贝拉拥有欧洲第一流的壁毯收藏，数量最终多达约370件；玛格丽特到西班牙的时候带来了17件挂毯，很快伊莎贝拉赠给她更多。^[55]

他俩也都喜欢以女性角色为中心的绘画。《圣经》中女性角色的场景是伊莎贝拉最钟爱的主题，后来玛格丽特收藏画作时也以此为重

心。其中一幅这样的画是伊莎贝拉在玛格丽特抵达西班牙时期请人绘制的，即1496~1499年，表现的是莎乐美镇静自若地将施洗约翰的首级展示给希律二世和她母亲希罗底看^[56]。这幅画的作者是伊莎贝拉最喜爱的艺术家之一，胡安·德·佛兰德，玛格丽特也很仰慕这位画家。^[57]伊莎贝拉把胡安·德·佛兰德从佛兰德盛情邀请到卡斯蒂利亚，让他担任宫廷画师，并给他定期的薪水。

这些年里，伊莎贝拉还集齐了一套描绘基督生平的画作，由胡安·德·佛兰德在玛格丽特留在西班牙宫廷期间创作。其中一幅画描绘玛格丽特为迦拿的婚礼中的新娘。玛格丽特非常欣赏这套画作，理解其价值。

伊莎贝拉很喜欢向玛格丽特赠送礼物。玛格丽特爱花，于是伊莎贝拉送给她许多植物图案的珠宝。有些图案是雏菊，这是个文字游戏，因为她的名字在法语中就是雏菊的意思。伊莎贝拉赠给玛格丽特一件珠宝，也用这个花卉主题，它看上去像一枝白玫瑰，是用黄金覆盖白色珐琅制成的。^[58]

唯一的问题是，佛兰芒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点尴尬。佛兰芒人不喜欢西班牙人的拘谨严峻和复杂烦琐的宫廷礼节与习俗。他们觉得西班牙人是自命不凡的道学先生，太自我压抑。西班牙人觉得佛兰芒人懒散、粗心、缺乏纪律。但这对幸福的夫妻关系似乎非常融洽。

胡安王子坦诚地表达对妻子的崇拜和挚爱。事实上，御医们开始担心，他太爱妻子，沉溺于床第之欢，影响睡眠，消耗体力过多。据彼得·马特说，御医敦促女王让胡安和玛格丽特分开一段时间，以便王子从“过于频繁的交媾”中得到休息，但伊莎贝拉看到儿子如此沐浴爱河，很开心，没有干预他们，并说她相信，“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59]。^[60]

胡安和妻子住在大学城萨拉曼卡，那里的教授和学生们期望自己的学术与艺术活动得到更多赞助，为此欢呼雀跃。萨拉曼卡大学是欧洲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伊莎贝拉女王对那里的学术活动很支持。她鼓励高等教育的手段之一是雇用数十名毕业于那里的大学生，在日渐壮大的政府机关中担任官员。她还雇人建造类似于她父母陵墓的新建筑，并遵循她的标志性的建筑风格，即所谓伊莎贝拉风格。该风格包含富丽的哥特元素，但也受到佛兰芒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有大量的表面装饰。萨拉曼卡大学主楼的外立面就是这种风格，饰有花卉图案、神奇生物和纹章，都突出体现了西班牙正在演化成的伟大帝国的恢宏气度。王储定居于萨拉曼卡，更是增添了这座城市的光辉。令众人喜上眉梢的是，玛格丽特怀孕了。

1497年春夏是伊莎贝拉个人生活的一个巅峰。她打败了格拉纳达的穆斯林，恢复了卡斯蒂利亚的和平。哥伦布带回了在大西洋彼岸发现新土地的激动人心的喜讯，西班牙未来的繁荣越来越有保障。胡安的婚姻很幸福。佛兰德传来的消息并非全是悦耳之音，但胡安娜的婚姻无疑是一桩绝佳的婚事。伊莎贝拉公主回到了家，这对女王来说是一大慰藉。玛丽亚和凯瑟琳成长为可亲可敬的少女，令父母欣喜。凯瑟琳正在为远嫁英格兰做准备。

一切顺风顺水。现在需要做的就只剩下在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王族之间缔结一桩新婚姻，以保障卡斯蒂利亚的边境。伊莎贝拉女王不断与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谈判，敦促他接受玛丽亚。但他依旧坚持非伊莎贝拉公主不娶。他又一次拒绝了玛丽亚。伊莎贝拉公主仍然不同意。曼努埃尔一世坚持向伊莎贝拉求婚。伊莎贝拉公主和母亲之间展开了一场考验意志力的拉锯战。

当然，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在比拼意志力的斗争中，伊莎贝拉女王从来没有输过。伊莎贝拉公主终于同意，这令曼努埃尔一世国王大

喜过望。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一起在梅迪纳·德尔·坎波度夏，去萨拉曼卡拜访了胡安和玛格丽特，然后去往西面的巴伦西亚·德·亚尔坎塔拉。伊莎贝拉公主和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的婚礼将在那里举行。不情愿的新娘要求婚礼一切从简，所以仪式非常简朴。

但曼努埃尔一世和伊莎贝拉公主的大喜之日接近之时，却有人快马加鞭送来消息，称胡安王子突患重病。萨拉曼卡主教迭戈·德·德萨写信称，胡安在几天前还春风得意，现在却日渐衰弱，丧失了胃口。“本地所有人都在恳求陛下前来，希望王子的身体好转；因为病情急迫，我们没有等待陛下的命令，便传唤了女王御医和其他医生。”他在给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信中写道。^[61]

斐迪南奔到胡安病榻前。伊莎贝拉不能去，因为她需要准备伊莎贝拉公主的婚礼。随后几天内，国王给妻子送去的消息自相矛盾，是为了掩饰致命的预后。他悲痛得疯疯癫癫，甚至发去了一封含混不清的信，暗示他自己已经死了。他或许是觉得，如果她最终发现，尽管儿子死了，但丈夫活了下来，就不会那么痛苦。

曼努埃尔一世国王也想封锁消息。他得知胡安奄奄一息后，要求不要传播消息，等他与伊莎贝拉公主完婚后再说，以防止她在婚礼期间遭受痛苦。他可能也是担心公主在服丧期间会企图推迟婚礼。

在此期间，胡安王子已经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努力安慰父亲。斐迪南哀求他振作精神，加强生存意志。胡安说自己对即将到上帝身边感到知足。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平静地接受自己的急促死亡，说明他过去曾经患病或身体虚弱。世人皆知他易患病，肠胃弱，最后他可能是死于结核病。

胡安的最后举动，除了请求父母照顾他年轻的妻子（而且正在怀孕）外，还要求用他的家产赎买被穆斯林扣押的基督徒奴隶的自由。

在他的遗嘱里，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甚至比为他的遗腹子提供生计更重要。他于1497年10月4日去世。伊莎贝拉女王得知噩耗时，悲痛但听天由命：“上帝把他给我，又把他带走了。”^[62]

胡安王子被安葬在萨拉曼卡，后来遗骸被迁往阿维拉，那是他自己想要的埋葬地。玛格丽特因悲恸而病倒，病情严重。伊莎贝拉奔到她身边，慈爱而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帮助她恢复了元气。玛格丽特后来告诉自己的父亲，她相信伊莎贝拉的照料救了她的命。但她的孩子是早产儿，夭折了。玛格丽特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私下里对素来健康的女儿早产感到怀疑。他猜测是法兰西人在她的食物里下了导致堕胎的药，以致她流产。这绝非异想天开：法兰西人肯定会视这个婴儿为极其严重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威胁，因为他若长大成人，将成为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继承人，还会与勃艮第和德意志有紧密联系，使其受到西班牙主宰。

不管流产原因是什么，事实依然是，胡安的孩子也离世了。苏里塔写道，“这新的损失”打破了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希望，“他们的哀痛越发加深”。^[63]

悲剧性的消息——先是胡安去世，然后他的继承人死亡——传遍了欧洲。西班牙陷入悲痛。“整个西班牙的唯一明光熄灭了，”彼得·马特在给埃尔南·德·塔拉韦拉（此时是格拉纳达大主教）的信中写道，“……两位君主努力掩饰他们的莫大伤痛，但我们察觉得到，他们的心灵萎靡不振。他们在公开场合时常常垂眼看着对方，那时隐藏在内心的伤痛就流露出来。”^[64]

就连他们的敌人也对这个家族的不幸感到同情。法兰西大使菲利普·德·科米纳称，胡安的死“给国王和女王带来了难以言说的伤痛，女王的悲痛尤其深切。她看上去了无生气。我从未听说过欧洲有哪位君王死后得到这样深切而普遍的哀悼。”^[65]科米纳说，他得

知，西班牙的所有商店业主都穿上了粗布黑色丧服，一连停业四十天。人们还让动物披麻戴孝。贵族和士绅给他们的骡子披上黑布，一直遮盖到膝盖，全身也都盖上黑布，只露出耳朵。各城市的大门上方悬挂黑旗。[\[66\]](#)

这个家族此前尽享幸福与美名，领土（我指的是通过继承关系）超过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其他家族，而今遭到这样的打击，多么凄惨！……这事故是多么意外而惨痛！而且恰恰发生在他们已经征服了全国、规划了律法、确立了司法行政机构并且他们本人幸福安康的时候，仿佛上帝与人类合谋将其权力与荣耀提升到超过欧洲其他所有君王的时候。[\[67\]](#)

不过，这个事件虽然对卡斯蒂利亚及其王室来说是大悲剧，但对葡萄牙国王“幸运的”曼努埃尔一世来说，却是超乎寻常的好运。一夜之间，他娶到了自己想要的女人，还成了一个真正庞大的帝国的继承人。他和年轻的伊莎贝拉公主现在是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当然继承人，将主宰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所有海外领地。到1497年，大家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些海外领地的范围可能极其广袤。

伊莎贝拉女王在签订《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以便与葡萄牙瓜分新大陆的时候，就已经预想到这些。她把世界的一半分给若昂二世国王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另外一半可能会归属她的女儿伊莎贝拉（作为卡斯蒂利亚女王和继承人）？她谈判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曼努埃尔可能继承葡萄牙王位，并且他会爱慕伊莎贝拉公主，而伊莎贝拉公主也可能成为女王的继承人？换句话说，她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意识地将一半留给自己，将另一半留给即将成为葡萄牙王后的心爱女儿，而这两半将在下一代人的时候重归一体？

这些问题，我们当然是不可能知道真相的，但伊莎贝拉素来对葡萄牙与西班牙政治和家族关系有敏锐的把握，所以上述推测有相当大的可能性。1494年6月签订《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之际，若昂二世国

王没有合法的男性继承人，正在努力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将他的私生子若热合法化，以便由他继承王位。但教皇拒绝了，所以在若昂二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曼努埃尔有朝一日会当上葡萄牙国王就是很明显的事情了。

胡安王子的去世意味着伊莎贝拉和曼努埃尔一世必须返回西班牙，以便宣誓成为王国继承人。令继承问题越发复杂的是，伊莎贝拉公主是个女人。这在卡斯蒂利亚不是问题，伊莎贝拉女王的成功统治已经让这个问题变得不重要，但阿拉贡的国会不愿意接受女性君主。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伊莎贝拉公主被发现怀孕的时候，大家非常激动。如果她生了个儿子，那么这男孩将继承一切。在这件事情上，伊莎贝拉公主又一次达成了大家的期望。她嫁给曼努埃尔一世几个月后就怀孕了，于1498年8月23日在萨拉戈萨诞下麟儿。

但伊莎贝拉公主的勤于斋戒和克己终于造成了恶果。她分娩时身体非常消瘦，生孩子一小时后就去世了。她要求将她的遗体穿上修女服装，安葬在卡斯蒂利亚托莱多的圣伊莎贝拉修道院。她希望死了之后能回家。伊莎贝拉女王抱着临终的女儿，直到她咽气。^[68]

就在胡安王子去世一年后，新的悲剧降临到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身上。他们当时还在为儿子服丧。但这一次，他们得到了安慰，因为伊莎贝拉公主生了个儿子，他是葡萄牙、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位，以及两国所有海外领地的继承人。阿拉贡人迅速将继承权授予这个婴儿。他被取名为米格尔·德·拉·帕斯^[69]，但人们很快发现他身体羸弱，需要特别仔细的照料才能生存。曼努埃尔一世国王成了鳏夫，需要回葡萄牙理政，于是回国了，将儿子托付给岳母。伊莎贝拉女王无微不至地照料孩子，但观察家们说，这个男孩长大成人的希望不大。

* * *

这些悲伤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太子妃玛格丽特一直待在婆家，爱护和支持他们。她与婆婆很亲近，从她那里学到许多治国之术。但现在她需要决定自己的未来生活。她的佛兰芒侍从们一直不喜欢西班牙，她觉得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她的离去让伊莎贝拉女王很伤心，因为她曾对玛格丽特与胡安的婚姻寄予厚望，并希望这个聪明多思的儿媳能成为她的孙辈和继承人的母亲。胡安的死亡让这美梦破灭了，或者至少当时大家是这么想的。

玛格丽特返回了佛兰德，住在哥哥腓力的宫廷，与嫂子胡安娜友好相处。她与胡安娜第一次相见是三年前胡安娜作为新娘抵达佛兰德的时候。玛格丽特对西班牙依旧很忠诚，穿着西班牙服饰，以彰显自己的忠心。但她家族的男人们几乎马上就开始为她考虑新的联姻。没过多久她就被送到萨伏依公爵那里，他统治着今天法国东南部与意大利和瑞士接壤的一片地区。她像以往一样，尽可能利用局势。几年后，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她回到家，再也没有结婚。

但16世纪初她在根特见证了一件大喜事。那就是腓力和胡安娜的头生子查理的诞生。他生于2月24日，根据罗马天主教历法，是圣马提亚的瞻礼日，伊莎贝拉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个幸运和负有责任的日子，因为根据基督教信仰，在耶稣受难并升天堂之后，剩余的十一名使徒商议选择一人来接替已经自杀的叛徒犹大，成为他们群体的第十二名成员。他们考虑了两个人选。在祈祷之后，使徒们抽签决定谁是新使徒。圣马提亚赢得了这项荣誉，但也获得了责任，因为很多信徒都知道他们可能会殉道牺牲。伊莎贝拉得知查理诞生的消息后告诉国王：“相信我，陛下，正如圣马提亚抽中了签，这孩子也是被命运选中的，要成为我们国度的继承人。”^[70]

伊莎贝拉女王又一次猜中了。1500年夏季，查理出生仅仅几个月后，小米格尔·德·拉·帕斯（曼努埃尔一世和伊莎贝拉的儿子）在

外祖母怀中死去。居住在遥远佛兰德的查理如今是王国的继承人，不过他长大成人的地方离伊莎贝拉花费毕生精力保卫的土地太遥远。米格尔的死是最后的打击，给伊莎贝拉造成极大伤痛。从此刻起，她的精力、健康和干劲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但寡居的玛格丽特参加了小查理的洗礼。她被指定为孩子的教母，被选定在根特祭坛画（也称《羔羊的颂赞》）前的洗礼池旁抱着婴儿。玛格丽特又一次穿着西班牙服装以表忠心，并且仍然在为自己丈夫的死哀悼。她怀里抱着胡安的小外甥。她请求给这孩子取名为胡安，这既是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让孩子的母亲胡安娜能够接受，因为这个名字在他们家族里有悠久历史。但胡安娜的丈夫腓力大公坚持给孩子取名为查理。^[71]

不过，玛格丽特还是在现场打点。如果她自己的孩子还活着，她一定也会这样关怀。

[1]. Ruth Mathilda Anderson, *Hispanic Costume, 1480-1530* (New York: 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 1979), p.135.

[2]. Ruth Mathilda Anderson, *Hispanic Costume, 1480-1530* (New York: 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 1979), p.135.

[3]. Teresa de Castro, ed., “El tratado sobre el vestir, calzar y comer del Arzobispo Hernando de Talavera,” *Espacio, tiempo, forma*, Serie III, *Historia medieval*, no.14 (2001), pp.11-92.

[4]. Nancy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1), p.261.

[5]. Chiyo Ishikawa, *The retablo of Isabel la Católica* (Brussels: Brepols, 2004), p.1.

[6]. 《新约·马太福音》，14：13～21。

[7]. *Miracle of the Loaves and Fishes*, Patrimonio Nacional, Palacio Real, Madrid.

[8]. “迦拿的婚礼”是《新约·约翰福音》中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在一次婚宴上将水变成酒。

[9]. *Marriage of Cana*,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City.

[10]. 股囊 (codpiece) 为欧洲古时男子裤子的一部分，是裆部的一个布盖或囊，以保护阳具。

[11]. *Mocking of Christ*, Palacio Real, Madrid.

[12]. Ignacio Omaechevarría, *Orígenes de La Concepción de Toledo* (Burgos: Aldecoa, 1976) , pp.8-10.

[13]. Peter Martyr to Count of Tendilla and Archbishop of Granada, November 8, 1492, in *Opus Epistolarum: 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ondon: Wellcome Library) .

[14]. Peter Martyr to Count of Tendilla, December 23, 1492, in *Opus Epistolarum: 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ondon: Wellcome Library) .

[15]. *Crónica de Felipe Primero, llamado El Hermoso*, Lorenzo de Padilla y Dirigida to Emperador Carlos V, in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ed. Miguel Salvá y Munar and Pedro Sainz de Baranda (Madrid: Imprenta de la Viuda de Calero, 1846) , p.8: 20.

[16]. 后来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 (1473~1513, 在位: 1488~1513) 。

[17]. 指弗里德里希三世。他的儿子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18]. Rodrigo González de Puebla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 July 15, 1488,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1, *Henry VIII: 1485-*

1509, ed. Gustav Bergenroth (London: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 s Treasury, 1862) .

[19] Letters of December 1497 and December 1502, Rodrigo González de Puebla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 July 15, 1488,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1, *Henry VIII: 1485-1509*, ed. Gustav Bergenroth (London: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 s Treasury, 1862) .

[20] Isabella to De Puebla, September 12, 1496, Rodrigo González de Puebla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 July 15, 1488,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1, *Henry VIII: 1485-1509*, ed. Gustav Bergenroth (London: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 s Treasury, 1862) .

[21] Isabella to De Puebla, September 12, 1496, Rodrigo González de Puebla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 July 15, 1488,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1, *Henry VIII: 1485-1509*, ed. Gustav Bergenroth (London: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 s Treasury, 1862) .

[22] Ruy de Pina, *Crónica de el-rei D. Affonso V* (Lisbon: Escriptorio, 1901) , pp.1: 147-48.

[23] Elaine Sanceau, *The Perfect Prince: A Biography of the King Dom João II* (Porto and Lisbon: Livraria Civilização, 1959) , p.318.

[24] Elaine Sanceau, *The Perfect Prince: A Biography of the King Dom João II* (Porto and Lisbon: Livraria Civilização, 1959) , p.377.

[25] Philippe de Commynes, *The Memoirs of Philippe de Commynes, Lord of Argenton* (London: G. and W.B. Whittaker, 1823) , p.2: 402.

[26] Ruy de Pina, *Croniqua Delrey Dom Joham II* (Coimbra: Atlantida, 1950) , p.113.

[27] Ruy de Pina, *Croniqua Delrey Dom Joham II* (Coimbra: Atlantida, 1950) , p.123.

[28] Ruy de Pina, *Croniqua Delrey Dom Joham II* (Coimbra: Atlantida, 1950) , p.125.

[29] Ruy de Pina, cited in Antonio Henrique de Oliveira Marques, *Daily Life in Portugal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trans. S.S.Wyatt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1) , pp.264-65.

[30] Ruy de Pina, *Croniqua Delrey Dom Joham II*, p.130.

[31] Antonio Henrique de Oliveira Marques, *History of Portugal*, vol.1, *From Lusitania to Emp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 p.1: 179.

[32] Commynes, *Memoirs of Comines*, p.2: 402.

[33] Peter Martyr to Alfonso Carrillo, bishop of Pamplona, March 18, 1492, in *Opus Epistolarum*.

[34] Ruy de Pina, cited in Oliveira Marques, *Daily Life in Portugal*, pp.274-75.

[35] Ruy de Pina, cited in Oliveira Marques, *Daily Life in Portugal*, pp.277-79.

[36] José-Luis Martín, *Isabel la Católica: sus hijas y las damas de su corte, modelos de doncellas, casadas y viudas, en el Carro de Las Doñas. 1542* (Ávila: 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Ávila, Institución “Gran Duque de Alba, ” 2001) , pp.102-5.

[37] Jerónimo Zurita, *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 el Católico: De las empresas y ligas de Italia*, vol.2 (Zaragoza: Diputación General de Aragón, 1989-1994) , p.26-29.

[38]. 这个绰号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她实际上是恩里克四世之妻与贝尔特兰·德·拉·奎瓦私通所生。

[39]. 自此我们称他为“曼努埃尔一世”。

[40]. Peter Martyr to Pomponius Laetus, December 7, 1494, in *Opus Epistolarum*.

[41].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 of Braga, September 1, 1492, in *Opus Epistolarum*.

[42]. Peter Martyr to Ludovidus Torres, March 30, 1492, in *Opus Epistolarum*.

[43]. Dagmar Eichberger, *Women of Distinction: Margaret of York, Margaret of Austria* (Turnhout, Belgium: Brepols, 2005), pp.139-40.

[44].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 December 10, 1496, in *Opus Epistolarum*.

[45].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 December 10, 1496, in *Opus Epistolarum*.

[46].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 December 10, 1496, in *Opus Epistolarum*.

[47]. Christopher Hare, *The High and Puissant Princess Marguerite of Austria, Princess Dowager of Spain, Duchess Dowager of Savoy, Regent of the Netherland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ons, 1907), p, 66.

[48]. Jacobo Stuart Fitz-James and Falcó Alba, *Correspondencia de Gutierre Gómez de Fuensalida* (Madrid: Imprenta Alemana, 1907), p. xxii.

[49]. Bethany Aram, *Juana the Mad: Sovereignty and Dynasty in Renaissance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37-38.

[50] Dagmar Eichberger, *Women at the Burgundian Court: Presence and Influence* (Turnhout, Belgium: Brepols, 2010) , p.46.

[51] The Sub-prior of Santa Cruz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 August 16, 1498, in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1, *Henry VIII: 1485-1509*, ed. Gustav Bergenroth (London: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 s Treasury, 1862) .

[52]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 June 13, 1497, in *Opus Epistolarum*.

[53] 棕枝主日又称受难主日，是基督教节日，圣周的第一天，也就是复活节前的星期日，纪念当年耶稣在众人欢呼簇拥下进入耶路撒冷。该节日的游行队伍通常由教友组成，他们手执棕榈枝，代表耶稣入城时人们撒在他面前的圣枝。其礼拜仪式包括对基督受难和死亡情景的描述。早在公元4世纪，耶路撒冷就开始庆祝圣枝主日，而西欧则始于8世纪。

[54] Fernando Díaz-Plaja, *Historia de España en sus documentos, sigh XV* (Madrid: Ediciones Catedra, 1984) , p.346.

[55] Thomas P.Campbell, *Tapestry in the Renaissance: Art and Magnificence*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2) , pp.4, 138.

[56] 莎乐美，犹太国王希律二世和希罗底的女儿，擅长舞蹈。据说她一次舞蹈表演令父王大悦，允许她索要奖赏。在母亲怂恿下，她要求将施洗约翰杀死。

[57] Eichberger, *Women of Distinction*, pp.195-96.

[58] Eichberger, *Women of Distinction*, pp.184-85.

[59] 典出《新约·马太福音》，19：6。

[60]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 June 13, 1497, in *Opus Epistolarum*.

[61]. Biblioteca de la Academia Real, Volumen ms.en folio, rotulado, “Varios de Historia y Marina, ” E 132, p.89; Fray Diego de Deza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 1497, 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 y Valdés, *Libro de la Camara Real del principe Don Juan e officios de su casa e servicio ordinario* (Madrid: La Sociedad de Bibliofilos Españoles, 1870) , pp.232–33.

[62]. Peggy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p.324–25.

[63]. Jerónimo Zurita, *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 el Católico: De las empresas y ligas de Italia*, ed. Angel Canellas López (Zaragoza: Diputación General de Aragón, 1989) , p.2: 67.

[64].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 of Granada, October 30, 1497, in *Opus Epistolarum*.

[65]. Philippe de Commynes, *The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 Lord of Argenton* (London: G. and W.B. Whittaker, 1823) , p.2: 400.

[66]. Philippe de Commynes, *The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 Lord of Argenton* (London: G. and W.B. Whittaker, 1823) , p.2: 400–1.

[67]. Philippe de Commynes, *The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 Lord of Argenton* (London: G. and W.B. Whittaker, 1823) , p.2: 401.

[68]. Zurita, *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 pp.2: 120–21.

[69]. “帕斯”是和平、安宁的意思。

[70]. Alonso de Santa Cruz, *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Seville: Escuela de Estudios Hispano-Americanos de Sevilla, 1951) , p.2: 215; a similar account appears in *La Crónica del emperador Carlos V*.

[71]. Bethany Aram, *Juana the Mad: Sovereignty and Dynasty in Renaissance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 pp.53–54.

十九 土耳其人兵临城下

伊莎贝拉人到中年了。四十多岁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她少女时代就困扰她的难题——奥斯曼土耳其人咄咄逼人的扩张——不会消失，而且似乎正在加剧。对南欧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个令人胆寒的前景。他们看到，土耳其人正在向他们杀来。

这意味着，统治国家二十年之后，伊莎贝拉女王仍然得不到休息。她统治的最初四年用于对抗葡萄牙，以便恢复卡斯蒂利亚西翼的和平。随后三年，她在卡斯蒂利亚全境纵横奔波，医治被内战和猖獗犯罪撕裂的国土；随后十二年，她与纳斯尔王朝交战，以收复格拉纳达、稳固伊比利亚半岛。随后的九年，即1494~1503年，她将全身心投入保卫和巩固南欧的战斗，抵御似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奥斯曼土耳其人。

奥斯曼帝国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战争机器。军事行动是它生存的核心。从战争中夺得的战利品的流通，是它经济的基石。大规模的人口掳掠给了帝国源源不断的人力，将其作为炮灰不断送往战场。“圣战的理念是奥斯曼国家的建立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利勒·伊纳尔哲克写道，“边疆领地的社会服从于一种特定的文化模式，浸润在持续不断的圣战和伊斯兰教不断扩张直到覆盖全世界的理念中。圣战是一种宗教义务，激励了各式各样的事业与牺牲。”
[\[1\]](#)

这也是“无止境的掠夺”的体制。^[2]据历史学家杰森·古德温说：“奥斯曼帝国是为了战争而生存的。这个帝国的每一位总督都是将领；每一个警察都是近卫军士兵；每一座隘道都有守卫；每一条道路都有军事用途的目的地……每一个疯子都有自己的团体，那些不惜拿自己性命冒险的狂徒，他们心甘情愿地当人肉攻城槌，或者人肉桥梁。”^[3]

土耳其帝国向基督徒发出了令人生畏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以及军事威胁。土耳其人有很多方面值得钦佩：在国内，他们秩序井然，乐善好施，喜好清洁，往往非常虔诚，这种虔诚精神有时会让人善良而耐心，并且内部安定团结。对他们统治下的异族，土耳其人在那个时代算得上非常宽容了：很多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在土耳其人的土地找到了避风港；在当时的西欧，同性恋是一桩罪行，在土耳其却能得到接受，不受指摘。伊莎贝拉坚持要求天主教士过简朴的生活并守贞。有些教士反对她的要求，觉得穆斯林世界的生活更惬意。于是他们带着自己的小妾去了奥斯曼帝国，过上了开心的婚姻生活。伊斯兰教本身也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宗教，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大多数人民最终都皈依了伊斯兰教，有的是出于真诚信仰，有的是因为那样的话生活会更轻松一些。对很多男人来说，皈依是相当容易的，只要他们不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或犹太教徒。希望保留自己宗教信仰的人只需要缴一点额外的税并忍耐被当作异教徒而受鄙夷的尴尬，就可以了，不会受到迫害。但皈依伊斯兰教会更为有利。由于上述这些原因，生活在穆斯林土地的异教徒一般都选择了皈依。

但其他国家的人，若是出于宗教原因或更愿意自治，或害怕被土耳其人统治，而选择反抗土耳其人的主宰，就将面对截然不同的前景：奴役、变童、儿童被拐卖、劫掠、死亡和毁灭。女人还要受到强奸、性虐待以及屈服于越来越保守的关于女性行为的规矩等额外威胁。对伊莎贝拉女王来说，别无选择，只能奋起反抗。

土耳其人的挑战越来越严重。土耳其强大的陆军早就令人生畏，如今也开始建立自己的海军。他们聚集了数量惊人的船只，以准备进攻西欧，逐渐成为地中海的主人。同时，土耳其人支持的海盗在南欧沿海肆虐，导致当地人逃离沿海地区。

而西欧的基督徒统治者之间幼稚的争斗打破了力量平衡，使得意大利半岛尤其脆弱，似乎唾手可得。1494年，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执行了占领那不勒斯的疯狂计划。令人震惊的是，他率军横穿意大利，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在半岛一路烧杀抢掠地南下。查理八世大军杀到时，统治意大利各城邦的乳臭未干而腐化堕落的暴君们一个个举手投降，任由他通过。查理八世驾临那不勒斯的时候，他的士兵纵酒淫乐，而此时梅毒刚刚从新大陆传播到欧洲。他的军队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得以蹒跚回国；其他人都死于作战、饥饿或疾病。事实证明，意大利面对外敌入侵是非常脆弱的，而斐迪南的那些统治那不勒斯的阿拉贡亲戚庸碌无能，不得民心，竟然自己逃命，不顾百姓死活。

但自从1480年土耳其人占领奥特朗托以来，奥斯曼帝国经历了一些变化，有了一位新领袖。当年，趁着奥斯曼帝国短暂的虚弱，那不勒斯人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匈牙利援助下收复了奥特朗托。1481年5月，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突然驾崩。很多人怀疑他是被毒死的。他的死亡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穆罕默德二世原打算传位于儿子杰姆，但另一个儿子巴耶济德也想要皇位。根据穆罕默德二世颁布的法律^[4]，皇位争夺一般会导致兄弟相残。

兄弟俩各自纠结力量，展开了武装冲突，巴耶济德得胜，史称巴耶济德二世。但随后杰姆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逃到了基督教欧洲寻求庇护，在博德鲁姆投降。博德鲁姆是位于土耳其沿海的一座强大要塞，是基督教势力在该地区少数硕果仅存的前哨之一。博德鲁

姆也是哈利卡纳苏斯的古老王陵^[5]的所在地。当地的基督徒指挥官接受了杰姆，将他送往戒备更加森严的罗得岛基地，那里是医院骑士团（或称圣约翰骑士团，原本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在耶路撒冷救助穷人的团体）的大本营。从罗得岛，杰姆被送往欧洲大陆，最后辗转到了罗马，成为英诺森八世的座上宾，其实也是人质。

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很高兴让杰姆离开他的帝国，以便安心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开始向教皇支付每年400金杜卡特的费用，让杰姆留在梵蒂冈，当教皇的客人和囚徒。在随后十年内，杰姆成为互相争斗的欧洲列强的一个重要棋子，因为他是奥斯曼皇位的一个潜在的竞争者，因此对巴耶济德二世来说是个潜在威胁。所以土耳其苏丹不愿意与欧洲人直接对抗。杰姆生活在罗马，直到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查理八世离开罗马的时候，把杰姆带走，当作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工具。1495年，在去往那不勒斯途中，这位土耳其皇子神秘地死去了。他可能是被巴耶济德二世派人毒死的，或许是因为纵欲和饮食无节制而死。不管他的死因如何，他的死使得奥斯曼人的扩张不再受到约束。

这些事件发生在伊莎贝拉征服格拉纳达的十二年里。当时的奥斯曼军队是欧洲最强悍的陆军，在决定发动攻势时能够集结数十万大军。如果奥斯曼人选择支援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就可以通过格拉纳达的地中海港口输送军队上陆，阻止西班牙人的“收复失地运动”完成。他们甚至可以继续北上，入侵西班牙本土，重演711年的事件。

格拉纳达的穆斯林的确曾向土耳其人求援，但据一位名叫海雷丁的土耳其—希腊海盗（被西方人称为“巴巴罗萨”，即红胡子）^[6]的说法，土耳其人认为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必败无疑，因此没有干预。

但土耳其人计划最终要攻打西欧。首先他们需要对付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7]，很多马木留克都信仰一种称为苏非派的神秘教派。奥斯

曼帝国的逊尼派穆斯林认为苏非派是异常危险的异端。奥斯曼人控制了埃及和邻近的北非之后，去往南欧就只需要跨越地中海的短短一跳。

但奥斯曼人当下对西欧还没有什么作为，巴耶济德二世对此十分恼火，因为他领导的主战派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催促他立刻向基督教西欧发动进攻。一年又一年，越来越严重的事态报告传到西班牙，有的是使者发回的书信，有的是逃往西欧的绝望的东欧难民亲自带来的。这些报告发出警示：巴耶济德二世正在集结一支庞大舰队，目标是由基督徒统治者控制的地中海岛屿。教皇英诺森八世和后来的亚历山大六世也发出了潮水般的警示。巴耶济德二世的动向也是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持续关注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岛屿，如西西里岛和马略卡岛，可能成为敌人进攻的目标。

1488年，威尼斯人得知，巴耶济德二世正在集结一支包含“各式各样战舰”的“庞大舰队”，打算攻击爱琴海上的威尼斯属地，并且苏丹“已经将目标定为塞浦路斯”，这是靠近土耳其海岸的一个威尼斯前哨。^[8]威尼斯人派遣了一支舰队迎战，巴耶济德二世撤军了。1490年，土耳其人又一次进攻，威尼斯人又一次匆匆准备应战，但随后发生的冲突未能决出胜负。

在勇猛的战士——匈牙利国王马加什一世^[9]驾崩后，奥斯曼人终于找到了从陆路攻入欧洲的途径，于1492年向丧失了领袖的匈牙利王国发动大规模袭击。奥斯曼历史专家V. J. 帕里写道：“1492年的大入侵给基督徒造成了迅速而恐怖的毁灭。”奥斯曼人于次年再度进攻：“1493年，入侵再度展开，比以往更凶猛，克罗地亚和下施泰尔马克^[10]再次遭到蹂躏。9月9日在阿德比纳战役中，克罗地亚贵族几乎被消灭殆尽。”^[11]

* * *

这一年，在所谓的克尔包沃原野战役中，基督教势力蒙受了恐怖的损失。克尔包沃原野在克罗地亚南部的内陆小镇阿德比纳附近，与意大利隔着亚得里亚海相望。一天之内，有约7000名克罗地亚士兵丧命，该国的大多数贵族要么死亡，要么被奴役。此役导致大量人口迁徙，一波波克罗地亚难民逃往奥地利和意大利沿海，以躲避土耳其人。

在西欧，每年都要上演一场阴森可怕的猜测游戏，揣摩土耳其人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什么。会是西西里岛吗？塞浦路斯？罗得岛？罗马？那不勒斯？土耳其人成功征服的地方传来的消息令西欧人越发心惊胆战。

逃离奥斯曼兵锋的难民饱受摧残。从斯库塔里战役幸存的阿尔巴尼亚人马林·贝西凯米十一岁时曾目睹自己全家三十人中有二十六人惨遭屠戮。他告诉威尼斯元老院，他相信巴耶济德二世是“世界上有过的最嗜血的人”。多年后，他回忆道：

我亲眼看到威尼斯人血流成河。我看到不计其数出身最高贵的公民被迫逃亡。我看到有多少高贵的将领阵亡！我看到多少港口和海岸堆满了声名显赫、出身高贵的人的尸体！有多少船只被击沉！我看到多少被打败的城市销声匿迹！回忆起我们时代的恐怖危险，简直让所有人的心为之战栗。[\[12\]](#)

奥斯曼和阿拉伯史料保存至今的文献表明，基督徒的恐惧不是空穴来风。波斯学者伊德尔斯·比特里西讲到奥斯曼军队攻击黑山的扎布利亚克城堡和阿尔巴尼亚的德利希特城堡时，说有一次穆斯林武士看到一群基督徒正在企图坐船逃走，船上还载着他们的家财细软。

那些勇敢的英雄从未见过这样的船只，上面装满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珍贵战利品，更不要说漂亮的男孩，以及如同天堂处女一般美丽的女人。对战利品和奖赏的贪欲驱使士兵们潮水般涌向河岸。一大群受过训练、精通游泳的人脱下衣服，跳入水中，牙齿咬着剑。他们拼命地游，让他们的勇

气之剑大显神威。一眨眼工夫，他们就用利剑砍倒了异教徒，俘获了所有亲眷和美女。他们还缴获了大量战利品、金钱和数不胜数的财物。^[13]

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他们所谓“异教徒”的死是麻木不仁的。一份记载斯库塔里（或称斯库台，在阿尔巴尼亚的科索沃附近）围城战的奥斯曼史料对顽强抵抗土耳其人进攻直至饿死的居民表达了鄙夷。奥斯曼编年史家凯末尔·帕夏扎德写道：“那些肮脏的猪，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什么都吞得下去，也不管干净还是脏。”^[14]

这已经很糟糕了。但奥斯曼帝国对社会各阶层女性的压迫越来越严重，原教旨主义的正统思想对女性行为举止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像伊莎贝拉女王那样意志坚强、思想独立的女性（她非常活跃，常常骑马巡视王国各地，治国理政，在公共广场主持司法）一定会极其憎恶关于土耳其人统治下女性生活的报告。作为四个女儿的母亲，这些报告一定会让她尤其感到不寒而栗。

奥斯曼统治者不仅宽恕强奸被俘基督徒女性的行为，甚至大加鼓励。海盗巴巴罗萨和他的编年史家撰写他的回忆录（《海雷丁帕夏^[15]的圣战》）时，巴巴罗萨描述他的父亲于1462年在土耳其人征服米蒂利尼（希腊的莱斯博斯岛的一座城市）时俘虏了他母亲：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从基督徒手中夺取米蒂利尼之后，在当地留下了一队士兵。他们没有带女眷前来，当地也没有可供他们迎娶的摩尔女人，因为岛上所有女人都是基督徒，于是他们请求苏丹给他们一些女人，以便继续为他效力。伟大的苏丹觉得他们的请求有道理，命令他们从基督徒的女儿们当中娶妻。因为基督徒不愿意将女儿给他们，于是他们用武力抢夺女人，娶了她们。就这样，他们得到了奖赏，这片土地得到了守卫。士兵们得到女人之后，心满意足。^[16]

巴巴罗萨的母亲原是个寡妇，后来与新丈夫生了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儿子们成了海盗，袭击基督徒船只，以俘获基督徒和犹太人并将其奴役为业。

新苏丹巴耶济德二世比他父亲穆罕默德二世更为保守和正统。14世纪，西欧商人说奥斯曼帝国的大街上到处是女人。到16世纪，商人们报告称，街上很少看到女人。随着时光流逝，女人们被要求用宽大的长袍遮蔽自己的身体，最终有些女人不仅盖住了头部，还遮挡了脸和眼睛，被允许出门上街的时候，就只能跌跌撞撞地走路。

根据许多年后土耳其内政部发布的报告，这些年里，女性的处境越来越差，而西方访客根本看不到奥斯曼女人。女人越来越多地被圈禁家中，生活在高墙环绕之中，只能通过网格窗看到阳光，常常受到宦官的守卫。她们被禁止与男人一起到公共场所，甚至与丈夫一起上街也不行。对女性的教育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甚至接近土耳其政府所说的“罪孽”。女性必须与外界隔绝。一份政府报告写道：“就连她的手指尖也不可以被看到。”^[17]

奥斯曼人非常鄙视基督徒的做法，即允许女性与男人生活，并在无人陪护的情况下抛头露面。奥斯曼人艾弗里雅·切莱比出身于一个和宫廷有关系的富户，在17世纪初撰写了他的《游记》。他参观了维也纳附近的一座度假城镇：

城墙环绕的维也纳城的所有异教徒贵族和显要人士，都在这座城市及其花园和果园休闲娱乐，达数周数月之久……因为气候宜人，所以这座城市的漂亮少男少女是有名的。男男女女都厮混一处，不知道授受不亲。女人们和我们奥斯曼人坐在一起饮酒聊天，她们的丈夫也不加置评，而是走到外面。他们不觉得这可耻。原因是，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女人占上风。自从圣母玛丽亚的时代，他们的行为就是这样没羞没臊。^[18]

基督徒或犹太女性若是被土耳其人俘虏，就等于被宣判了社交死刑，因为即便她们能够逃回家，在自己的文化里也会受到鄙视。奥斯曼帝国的女奴被要求为主人提供性服务。奥斯曼人奉行一夫多妻制，这是对女性的歧视和践踏，基督徒和犹太人的习俗都是禁止一夫多妻制的。所以，如果基督徒或犹太人女性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结婚，然后

逃回家，也仍然算是犯了罪孽且违反法律，因为她们参与了一夫多妻的婚姻。

当然，奴隶制不是奥斯曼帝国独有的现象。1500年，奴隶制在全世界都很普遍。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大多数战俘（尤其是加那利群岛人和非洲黑人）被当作家奴。在格拉纳达战争中被俘的一些穆斯林，如马拉加围城战中被俘的穆斯林，也被奴役。伊莎贝拉的每个女儿结婚并离开西班牙的时候，随行队伍中都有两到三名奴隶。

但在奥斯曼土耳其，奴役基督徒是帝国最重要、利润最丰厚的产业。袭掠行动和不断的军事扩张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奴隶。基督徒无论贵族或农奴，都面对同样的被奥斯曼人奴役的威胁。每年有数万基督徒遭奴役；据巴巴罗萨自己的记录，他毕其一生拐卖了至少4万人。16世纪初的十年，每年俄国和波兰有约17500人被掳走为奴。^[19]东欧奴隶贸易规模如此宏大，以至于“奴隶”（slave）和“斯拉夫人”（slav）这两个词产生了关联。

土耳其人征战时有专业的奴隶贩子随军，负责聚集俘虏，并为其估值。奴隶披枷戴锁，被分为十人一组，被驱赶着行进。年纪小的俘虏，包括儿童和婴儿，被放在篮子和袋子里，装在大车或骡背上搬运。有时儿童被认为很有价值，因为他们可以被收养，被训练成劳工或者性奴。但有时，成年人和年纪较大的孩子被掳走的时候，小孩会被当作无用的负担而留下。1499年6月，奥斯曼人进攻达尔马提亚的扎德尔之后，威尼斯人在一处田野里发现了约五十名被抛弃的婴儿。^[20]

伊斯兰教律法允许将生为奴隶的人或战俘奴役。自由穆斯林不可以被奴役，但可以奴役基督徒、犹太人和异教徒。据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利勒·伊纳尔哲克说，整个经济“依赖于奴隶制”。历史学家帕尔·福多尔写道：“无休止的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奴隶。”^[21]

根据供需情况，奴隶的市场价也会波动。伊纳尔哲克分析了奥斯曼帝国的财产文献，写道，奴隶是仅次于现金和地产的第三重要的遗产。例如，丝绸行业依赖训练有素的奴隶劳工来生产商品。但有时奴隶数量太多，会使得奴隶价格下降：有一次，奴隶的价格低至“一顶毡帽”。^[22]据伊纳尔哲克说，销售奴隶的劳动力也是一门产业：“很多人靠出租奴隶为生，租金为每天7或12阿克切。”^[23]（阿克切是一种小铜币，价值很低。）

被土耳其人奴役的基督徒往往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土耳其人斩断俘虏与其故乡的纽带的手段是，将大批俘虏迁往遥远的地区。有的时候，在奥斯曼军队发动袭击之后的短期内，如果有幸存者，他们可以赎回自己的亲属；但很少有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支付高额赎金。企图逃跑的奴隶遭到残酷的惩罚，被毒打、挨饿或披枷戴锁。奴隶被迁往离家数千英里之外，逃亡的机会便很渺茫了。逃跑是极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超自然的力量才能佑助奴隶逃跑。匈牙利的圣龕内保存着奇迹般从土耳其人手中逃跑的故事，他们通常是得到了天神的帮助。成功逃回的人将自己身上的枷锁存放在教堂。伊莎贝拉女王也做过这种事情，将得到解放的基督徒奴隶的枷锁悬挂在她于托莱多建立的王家圣约翰教堂墙上。

那个时代能识文断字的人不多，所以关于囚徒生活的第一人称叙述极其罕见、扣人心弦而流传广泛。有一位基督徒曾是罗马尼亚的一名学生，后来被奥斯曼人掳走，过了二十年的奴隶生活，被转卖七次，最后逃脱。匈牙利的乔治的回忆录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是畅销书，于1480年至约1550年间多次印刷。他后来在罗马成为教士，描述了奥斯曼帝国的奴隶产业是如何运作的：

在所有行省，正如其他类型的贸易一样，也有特别的公共场所，专供买卖奴隶之用，是法律规定的奴隶市场。可怜的俘虏被带到这个公开的市场，被绳子和铁链束缚，仿佛是等候屠宰的羊。在那里，他们接受检查，

被剥光衣服。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有理性的生物就这样像无智的牲畜一样被评头论足，以最低价格出售。令人羞耻的是，无论男女，生殖器都被所有人公开地摆弄。他们被强迫在大家面前光着身子走来走去、跑步、慢行、跳跃，以便清清楚楚地展示，他们是强壮还是虚弱，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女人）是处女还是妇人。如果他们看到有奴隶害羞脸红，就围过去催促他们，用棍子殴打他们，戳他们，强迫他们在公众眼前做那些自己羞于做的事情。

在哀哭的母亲眼皮底下，儿子被出售。当着沮丧的儿子的面，母亲被卖走。妻子被当作娼妓一般耍弄，丈夫只能羞惭地目睹她被卖给别的男人。一个小男孩被从母亲怀里夺走……母子分离……人没有任何尊严，没有任何阶级的区分。圣人和平民的价钱是一样的。士兵和乡巴佬受到同样的衡量。另外，这还只是他们痛苦的开端……

唉，有多少人因为不愿承受这样的危机，陷入绝望的深渊！有多少人，逃进了深山老林，死法千奇百怪，有的因为饥饿干渴而死。还有这最后的罪恶：他们自行了断，要么上吊，要么跳河，一瞬间失去了生命，也毁掉了自己的灵魂。[\[24\]](#).

乔治写道，逃跑未遂而被抓回的奴隶遭到“鞭笞、毒打和痛殴”，肢体被烧因而残废，或者耳朵或鼻子被割掉。[\[25\]](#).

他也证实了奥斯曼帝国女性的生活方式。他写道，女人被禁止买卖任何东西。她们不可以骑马。即便在自己家里，她们也要戴面纱。在他曾生活的一户人家，儿媳在公公面前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东西、说过一个字，或者露出面庞来，尽管他们在同一座房屋已经生活了二十年。而且“公共场合男女之间极少交谈，如果你在他们那里生活一年，恐怕也不会听到一次男女之间的公开谈话”。[\[26\]](#).

还不只这些。在土耳其人已经牢牢控制的地区，政府强制执行一种叫“德夫希尔梅”的儿童奴隶制。此制度的起源约在1432年[\[27\]](#)，但在穆罕默德二世与巴耶济德二世时期大大扩展，也就是伊莎贝拉的孩子出生和成长期间。1451~1481年，通过此项制度，每年约有1.5

万~2万基督徒儿童被强征。^[28]德夫希尔梅有特定的规矩。每三至五年，土耳其官员会在基督教地区的各城镇巡视。八岁到十八岁的儿童被带到公共广场，供他们检视。土耳其官员会挑选最聪明和美貌的，将其带走。他们喜欢挑选贵族和教士的孩子。只有基督徒的孩子被强征，犹太人的孩子被认为更适合从事商业。特别漂亮的小孩会被送进宫；强壮而健康的将成为工人或士兵。所有小孩都被从其家人身边带走，接受割礼，带到土耳其人的家庭，得到抚养，直到能够从事某种服务。^[29]很多人被训练成近卫军战士，毕生以杀戮为业。他们被禁止结婚，这使得他们特别凶悍。

研究奥斯曼历史的一些学者认为，对农村孩子来说，被选中其实是好事，因为这给了他们在军队或政府机关向上攀升的流动性。但大多数家庭不愿意失去自己最有前途的孩子，从此阴阳两隔。我们知道，有些父母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被选中，故意将其弄成残疾。

与此同时，在西欧，就像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和之后一样，一连串的教皇在恳求基督徒君主们关注东方局势，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起来，共同保卫基督教世界、抵抗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进攻路线上的土地——匈牙利、威尼斯、地中海沿岸和西班牙——的统治者们敏锐地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尽其所能地处置。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统治者觉得这不干他们的事，在收到求援时，多次借口自己无钱征战。例如，1490年，教皇英诺森八世请求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出资以帮助抵御正在威胁意大利的土耳其人，国王反驳道：“我的王国位于西方和北方，距离罗马非常遥远，虽然有丰富的商品财货，却并非遍地黄金白银。”^[30]

类似地，1493年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写信给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讲到土耳其人的威胁，描述了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发生的大屠杀。亨利七世像北欧的大多数君主一样，对“大规模屠杀”表达了热

切的同情，但没有实质性的行动。1月12日，他从温莎城堡写信给教皇称，尽管他觉得这些消息“极其令人不安”，但“遥远的距离和诸事纠缠”使得他无力提供更具体的帮助。[\[31\]](#)

这就是伊莎贝拉女王坚持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的原因之一。她努力希望这两位君主能够对共同对抗奥斯曼人的事业更感兴趣。

但伊莎贝拉并非基督教世界希望打退土耳其人的唯一君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率军入侵意大利的借口之一就是，他是一名基督徒武士，打算去击退土耳其人。他或许自己也相信这套说辞，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但据他的大使菲利普·德·科米纳说，查理八世从来不打算做那么困难的事情：国王“在第一次入侵意大利时，大谈”他“对土耳其的意图……宣称自己这么做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更接近土耳其，更容易入侵它；但这话全是巧言令色，是骗人的”。[\[32\]](#)

有些人希望查理八世的这话是真诚的。法兰西国王是西欧最强大的君主，最有实力与奥斯曼帝国对抗。1494年3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写信给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请求他们敦促查理八世搁置自己在那不勒斯的利益，集中力量对付东方的威胁。[\[33\]](#)随后的4月6日，教皇亲自写信给查理八世，赞扬他攻击土耳其人的意图。[\[34\]](#)

但在法兰西国内，国王的计划被视为发疯。“因为，在所有经验丰富、聪明睿智的人看来，这是一桩非常危险的事业。”科米纳写道。另外，远征虽然受到溢美之词的赞誉，但其实装备和物资都很差劲：“国王年轻无知、顽固不化，既没有金钱、军官，也没有士兵。”他的远征资金是从热那亚银行以高利贷借来的，出征时没有“帐篷或营帐，尽管军队开入伦巴底时已是隆冬”。[\[35\]](#)

意大利人没有把法兰西国王当真，认为他愚蠢而容易上当。另外，他的脑袋特别大，与身体的比例不协调，所以有人称他为“胖头查理”。据历史学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说，欧洲的大多数统治者似乎都认为他计划的远征是“愚蠢青年的假日郊游”。^[36]但查理八世的天真和为自己争得荣耀的渴望使得他容易受到他人的阴谋操纵。那不勒斯的王族在意大利不得民心；有人告诉查理八世，那不勒斯人民会把他当作解放者来欢迎。

这倒是真的：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斐迪南的堂兄，也是妹夫）颇不得人心。他是私生子（这给王位传承造成了疑难），而且运用形形色色的残暴手段来建立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包括囚禁和杀戮那不勒斯古老贵族豪门的许多成员。他把一些贵族监禁了多年；他命令将一些贵族处死，然后将其尸体制成标本，当作战利品摆放在宴会桌前。他特别喜欢设宴招待某人后将其杀死。他的残暴让那不勒斯的很多反对派噤若寒蝉，但没有为自己赢得许多朋友。

所以，查理八世最初进军意大利的时候，无人反对他。例如，威尼斯在静观其变。威尼斯不希望“招致国王的敌意”，威尼斯编年史家彼得罗·本博回忆道：

尤其是因为查理八世可能自行放弃自己的此次远征，因为大多数人往往会心血来潮地改变主意。或者，因为他年轻而不谙兵法，会因为即将开展的战争的困难和规模宏大而丧气；或许，如果出现了其他什么耽搁，或者其他统治者给他的前进制造了困难，他可能没有办法脱身。^[37]

与此同时，佛罗伦萨政府在摇摇欲坠。伟大的领袖洛伦佐·德·美第奇于1492年年初去世，将统治权传给儿子皮耶罗，但这个年轻人令佛罗伦萨人大失所望。而且佛罗伦萨人已经在进行深刻的自省，思考自己在人世间的地位，并被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修士火药味十足的讲道所感染。萨伏那洛拉劝诫群众摒弃世俗的物质主义和现代世界

的腐化，以及教会本身的腐化。罗德里戈·博吉亚成为教皇，令萨伏那洛拉更加激烈地抨击罗马教廷，也使得佛罗伦萨比以往更加孤立。

但很多基督徒，包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都在某些程度上希望查理八世能够成功地利用意大利为基地对抗土耳其人。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基督徒几乎持续不断地在穆斯林手下遭受失望、惨败和挫折。消息传到东欧，称查理八世将率领一支大军来主持正义。土耳其人听说了他的进军，向他们在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占领区的盟友发出警示，要他们撤入山区。这些国家的基督徒望眼欲穿地注视海岸线，祈祷得到拯救。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显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相信查理八世要去攻打奥斯曼人。在1495年7月从布尔戈斯发送给英格兰朝廷的一份备忘录中，他们说，他们向查理八世提议援助他，承诺允许法兰西军队利用他们在北非占领的一处基地，以攻入圣地。他们告诉查理八世，这是发动攻势的大好时机，“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镇压异教徒”，因为摩尔人“被饥饿和瘟疫折磨得十分羸弱”。但他们说，查理八世对他们的建议很冷淡。[\[38\]](#)

西班牙的两位君主也努力利用局势。查理八世提议，免费将佩皮尼昂和鲁西永（斐迪南的父亲胡安二世国王在加泰罗尼亚内战中丧失了这些地区）归还斐迪南。这个提议太好，岂容错过？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迅速与法兰西签订了一项和约。此项和约将西班牙置于场外，使其无法干预法兰西在其他地区的活动，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

很快，查理八世的真实意图就昭然若揭。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判断，法兰西国王的真正目标是颠覆费兰特国王，而费兰特是他们的血亲。他们派遣安东尼奥·德·丰塞卡（影响力很大的丰塞卡家族的另一名成员）作为大使，去拦截查理八世并警告他，那不勒斯王位的传承应当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西班牙的两位君主告诉丰塞卡，假如查

理八世不同意停止进军，就“当着他的面撕毁旧条约，对其宣战”。^[39]丰塞卡后来果然这么做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不光是摆姿态，还当真集结了一支军队，并派遣一支舰队到那不勒斯，由伊莎贝拉的童年好友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指挥。舰队很快从卡斯蒂利亚的马拉加港启程了。

但查理八世无所畏惧，继续进军。几周后，他就率军抵达罗马，未受任何抵抗便入城，羞辱了教皇，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就是在这个关头，他们带走了土耳其皇子杰姆，然后挥师南下，开往那不勒斯。查理八世说他打算推翻巴耶济德二世，以杰姆取而代之，作为受基督徒操控的傀儡苏丹。这个想法只是空中楼阁，因杰姆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那不勒斯的暴君费兰特突然因心脏感染而暴毙。他的儿子阿方索二世继位了。但阿方索二世意识到，查理八世正在率军南下，就一下子对当国王不感兴趣了。他怯懦地逃离了自己的王国，留下二十四岁的儿子费兰迪诺^[40]代为统治。阿方索二世渡海到了西西里岛（由他的西班牙亲戚斐迪南国王统治），温顺地宣布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公民。年轻的费兰迪诺努力组织防御，但看到法兰西军队的凶悍不禁面如土色，敦促自己的公民投降以保住性命。他的臣民立刻表示同意，拦住了费兰迪诺再次进入那不勒斯城的道路。他带着亲眷离开城市，将剩余军队带到了海外。

于是，1495年2月22日，查理八世在市民邀请下进入那不勒斯城，但市民很快就后悔不迭。他的军队开始洗劫城市，从历史悠久的豪门望族那里抢劫贵重财产。

仿佛这还不算够糟，城里突然爆发了一种怪异、神秘而令人不安的新疾病，酿成大祸。那就是烈性的梅毒，当时在欧洲还很新鲜，还没有名字。根据它最初引起公众注意的地点，它被称为“法兰西病”

或“西班牙病”。梅毒很快从意大利南部向北传播，然后传到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政治家伊德尔斯·比特里西也染上了梅毒，称其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疾病。^[41]威尼斯编年史家彼得罗·本博是最早描绘梅毒病状的欧洲人之一：

一般最先受影响的是生殖器，身体疼痛不堪，然后出现下疳肿块，主要是出现在头部、面部，四肢也会有。身体长出瘤子和肿块，起初比较硬，之后肿块里满是血和脓。就这样，很多人在几乎所有肢体上都受到漫长折磨之后，悲惨死去，而且因为肿胀和溃烂，几乎认不出本来面目。完全不知道用何种药物可以治疗这种新的、前所未有的疫病。^[42]

就这样，梅毒在欧洲、北非和中东蔓延肆虐，杀死很多人，而让其他患者毁容、失明或者不育。

* * *

不足为奇的是，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在兴致盎然地关注查理八世的进军。起初，他对查理八世国王军队的实力，以及他自己的兄弟杰姆皇子构成的威胁感到担忧。但随后的事件表明，意大利十分虚弱、一盘散沙，面对协调一致的攻击完全无力抵抗。突然间，欧洲显得比以往脆弱得多。土耳其人准备利用这个好机会。“实际上，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得知查理八世进入佛罗伦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装配旧的桨帆船，并建造新船。他还命令步兵与骑兵部队备战，随时待命。”本博写道。^[43]

但法兰西入侵意大利的残暴真正震惊了欧洲其他国家。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派出的军队抵达意大利半岛，以抵抗法兰西人。现在，西班牙两位君主动员了其他一些统治者，包括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导人、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教皇。他们组成了所谓神圣联盟。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当然倾向于立刻加入，因为他憎恶查理八世，原因是年轻的法兰西国王抛弃了他的女儿，又夺走了他自己的未婚妻布列塔

尼的安妮。威尼斯人则判定，局势已然失控。英格兰很快也被说服，加入神圣联盟，因为亨利七世国王急于讨好血统高贵的伊莎贝拉女王。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用凯瑟琳和亚瑟的婚约（亨利七世急于促成这门婚事）作为条件，向亨利七世施压，要求他支持在意大利反对法兰西的战争，并且越快越好。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给西班牙驻英大使的信中多次强调这一点。“如今战争已经爆发，一天的价值就超过西班牙和法兰西开战之前的一年。”他们在1496年3月的信中写道，“这是为了教皇和教会而战的战争。”^[44]

1496年3月，凯瑟琳和亚瑟的婚约最终敲定的时候，威尼斯、西班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签署了为期二十五年的条约，以保护和捍卫教皇。亨利七世国王很快也加入进来。

签署条约的每一位统治者都承诺出兵，以集结3.4万骑兵和2万步兵的大军；若有需要，还要提供资金来派遣一支舰队去保卫意大利。这个联盟的组建非常迅速而悄无声息，以至于法兰西驻威尼斯大使菲利普·德·科米纳完全被蒙在鼓里，尽管他与其他国家的大使保持着不间断的通信。据本博回忆，科米纳得知此事时“目瞪口呆”，从威尼斯执政官宫殿跌跌撞撞地出来，要求伙伴们重新讲一下他刚才听到的消息，因为他完全无法理解。^[45]

伊莎贝拉为联盟提供的军队“纯粹是卡斯蒂利亚官兵，由一名卡斯蒂利亚统帅指挥”，这位统帅就是她的毕生好友和坚定支持者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六名负责领兵的军官中，有四人曾于格拉纳达战争期间在神圣兄弟会服役。有些军官自从争夺卡斯蒂利亚继承权的、对抗葡萄牙的战争以来，就为伊莎贝拉效力。弗朗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原定也要去意大利，但被改为派往伊斯帕尼奥拉岛，以处置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遭遇的反叛。第一批出征意大利的军

队有约5000人，后来有更多援兵。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兵将他们打赢格拉纳达战争期间运用的技术——攻城、轻炮和出其不意——带到了意大利战役，取得了惊人的胜利。

最重要的是，意大利战争原本由为了个人私利而厮杀的雇佣兵所主宰，雇佣兵不是为了自己信仰的伟大事业而战，而西班牙军队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团队精神。[\[46\]](#)

这支约有四十艘船的西班牙舰队与那不勒斯国王费兰迪诺会合了。费兰迪诺还有十二艘仍然忠于他的战船。他们抵达那不勒斯后发现，很多居民重新向费兰迪诺效忠，各地的人们都在开始反击法兰西人。

尽管缺少粮食和给养，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还是很快速在意大利战场扬名立威，赢得了“大元帅”的绰号。例如，克罗托内镇从效忠费兰迪诺改为投奔法兰西，然后回到费兰迪诺怀抱，最后又转到法兰西阵营。贡萨洛在卡拉布里亚登陆，猛攻克罗托内，将其占领，结束了它的朝三暮四。本博称贡萨洛为“非常英勇无畏的壮士”。威尼斯人敬佩地看着他在一场“正面交锋”中击溃法兰西军队及其支持者，杀死一些军官和两百名步兵与骑兵，并俘获二十多名贵族。[\[47\]](#)贡萨洛在特拉战役里也扭转了战局。

到1496年7月，费兰迪诺国王重返那不勒斯的宝座，主要是得益于西班牙的支持，尤其是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援助。费兰迪诺不久之后去世了，王位传给了他的叔叔费德里科。三年时间里，那不勒斯连续有了四个国王，其中没有一个是像样的统治者。那不勒斯王国是意大利最大的统一领地，也是最容易遭到侵略的，继续像往常那样，如同无舵之船，摇摆不定。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从西班牙的两位君主那里得到的帮助非常感激。1496年12月，他授予他们一个新的崇高头衔——天主教国王，以嘉奖他们帮忙将法兰西人逐出那不勒斯，以及成功征服格拉纳达的功绩。^[48]两位君主对这个新头衔感到非常自豪，开始用它作为自己的个人称号。他们的臣民也开始这样称呼他们。在宣布授予此头衔的书信中，教皇写道：

你们是基督徒君王的榜样和楷模，因你们没有为了贪图土地和主宰权而用自己的力量和武力去毁坏和杀戮其他基督徒，而是为了基督徒的福祉而战，为了保卫教会与信仰而战……你们对教廷的尊重和虔敬已经多次表现出来，在近期的那不勒斯战争中又一次展现无遗。你们一直努力捍卫和扩展天主教信仰与天主教会。那么，还有谁比二位陛下更配得上天主教国王的头衔？^[49]

近期屡战屡胜的头号功臣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在意大利又待了两年，扫荡残敌，包括帮助教皇收复罗马的港口城市奥斯提亚。大元帅最终于1498年夏季返回西班牙。他立刻赶往宫廷所在的萨拉戈萨。斐迪南国王拥抱并亲吻他，以示欢迎，将他引导到女王面前。她端坐在宝座上，周围环绕着侍女，但看到贡萨洛走来，就起身走到他面前的台阶上。“他单膝跪下，亲吻她的手；但她扶他起来，拥抱他，并说：‘大元帅，我们非常欢迎你。’”^[50]

伊莎贝拉为了嘉奖他的功业，慷慨地封授他城镇、城堡和在格拉纳达与伊略拉的地租。他此前在洛哈已经拥有一些地产。贡萨洛本是次子，如今自己也成了一个富人。

不过，在扶植费兰迪诺重登王位的胜利之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感到那不勒斯没有对他们的贡献表达出充分的认可，因此感到恼火。他们对那不勒斯的忘恩负义十分不悦。

在此期间，查理八世国王逃离了意大利，丢下了自己的士兵，也没有采取措施将军队幸存者接回国。几年后，他一头撞上门楣，伤重不治身亡。他可能也染上了梅毒，并可能因此不育，没有留下子嗣。他的亲戚奥尔良公爵继承了王位，史称路易十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科米纳的说法，查理八世若是当真去攻击巴耶济德二世，而不是企图吞并那不勒斯，是有可能取胜的。科米纳在威尼斯得知，东欧有“数百万基督徒”对查理八世充满信心，在准备发动起义来支持他。例如，在色萨利，有五千多人聚集起来，准备作战。“所有这些国家，阿尔巴尼亚、斯拉沃尼亚^[51]和希腊，全都人口稠密，都通过与威尼斯和阿普利亚^[52]的居民频繁通信而熟知我们国王的名望与个性，无比热切盼望国王指示他们发动起义”，但都只能徒劳地等待。大使悲哀地总结道，假如查理八世进军奥斯曼帝国，说不定已经建立奇功。^[53]

但土耳其仍然是一个与欧洲势不两立的敌人。杰姆死了，巴耶济德二世判定攻打欧洲的时机到了。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威尼斯。1496年，他禁止威尼斯粮商进入奥斯曼港口，切断了他们的贸易关系。他囚禁了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威尼斯商人。1497年，一艘运载基督徒朝圣者去耶路撒冷的威尼斯船只被俘，乘客被杀死或奴役。^[54]

彼得·马特写道，到了1499年中期，卡斯蒂利亚宫廷流传着一种说法，称土耳其人正在伊斯坦布尔集结一支“庞大的舰队”，并且“在全希腊征募陆军”。^[55]几个月后传来了更多细节：舰队有超过300艘船，这在当时是极其庞大的数字了，其中包括一些马特称为“海上塔楼”的船只，即浮动的要塞，能够与敌船平行行驶并接近，让塔楼上的士兵向敌船水手射击。

让西班牙人长舒一口气的是，这支奥斯曼舰队遭遇了风暴，损失了一些船只，但西班牙人失望地发现，这些损失在土耳其人看来仅仅

是短期的挫折。据说巴耶济德二世统领着12万大军。[\[56\]](#)

1499年8月，巴耶济德二世攻打并占领了勒班陀，这是威尼斯在希腊西海岸维持的几个贸易据点之一，这些据点是威尼斯的亚得里亚海贸易帝国的关键部分。到此时，威尼斯人差不多已经放弃了从西欧得到增援的希望；他们之前向西欧求援而失望，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威尼斯财力枯竭，而且遭到土耳其人的痛打已经超过六十年，于是几乎未加抵抗就放弃了勒班陀。

这年冬天，威尼斯人恢复了一点胆量，派遣使者去伊斯坦布尔，要求归还勒班陀并释放被囚的威尼斯商人。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则要求他们将莫东和科罗尼这两座城市交出，并年年纳贡。[\[57\]](#)他的意图显然是消灭威尼斯人在希腊大陆的贸易据点，并巩固自己对整个希腊的控制。得知此事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向西欧各国发出呼吁，恳求他们支援威尼斯。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决定采取行动。女王派了一支舰队去支援威尼斯人，仍由她的挚友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统领。她请求其他国家也加入。1500年1月20日，她和斐迪南指示他们的大使冈萨雷斯·德·普埃夫拉，恳求英格兰国王出兵。

我们从意大利得到消息，土耳其人重创了威尼斯人的舰队和土地，已经占领勒班陀城，因为威尼斯人抵抗甚微。你可以想见，我们对此感到多么忧伤。基督教受到了威胁，所以我们决定派遣我们的舰队……请告诉我们的兄弟英格兰国王，我们恳求他帮助抵御土耳其人，他们是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敌。请尽快回信，告诉我们他说了什么，以及他能提供什么。
[\[58\]](#)

但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不愿出手相助。6月，冈萨雷斯·德·普埃夫拉向女王报告称：“亨利七世大力赞扬了两位陛下派遣舰队抗击土耳其人的打算，但补充说，尽管他与威尼斯关系非常密切，但威尼斯

人没有告诉他，他们的处境如此危急。亨利七世似乎不愿意参加针对土耳其人的远征。”[\[59\]](#)。

法兰西人派了一些部队去支援威尼斯人，但很快撤离前线，随后在海上失事了。

但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舰队已经在路上了。他率领600名久经战阵的骑士和约8000步兵，从马拉加起航。他们驶向西西里岛，于1500年7月19日抵达，在那里停留了约一个月。贡萨洛的再次启程遇到了一些延误，因为天气酷热，而且为他的军队搜寻粮草很困难。斐迪南是西西里的统治者，但当地官员似乎并不热心于帮助卡斯蒂利亚军队，尽管卡斯蒂利亚女王和西西里国王是夫妻。

所以贡萨洛前往地中海东部的旅途十分缓慢。他还受到误导，误以为威尼斯人已经控制住了局势。8月13日，他得知，事实并非如此。他收到了教皇的一封十万火急的信，敦促他尽快去援救莫东城。但他抵达该地区时，莫东和科罗尼均已被土耳其人攻克。

莫东于8月9日陷落，原因之一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土耳其人封锁了这个港口，守军粮草和火药短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双方都知道，新的补给物资对这座要塞的防御至关重要。土耳其指挥官命令部下，任何允许物资通过封锁线的人，格杀勿论。但威尼斯人还是成功地将补给船送过了封锁线，驶入港口，令守军欢欣鼓舞。要塞司令官急于将火药运进要塞，他宣布，第一个运送一桶火药入城的人将得到一个金德拉克马[\[60\]](#)的赏金，于是一些士兵抛下了自己的岗位，跑去运送弹药。

但要塞内有阿尔巴尼亚间谍或内奸，他们挥动双手或斗篷，向土耳其人发讯号，告诉他们城墙无人把守。土耳其人在无人防守的那段城墙下架起云梯，1万多土耳其人潮水般涌入。“发生了一场凄惨的大

屠杀；所有人都被杀或被俘并变卖为奴，无人得以幸免。”马特写道，“土耳其人的君主为胜利而欣喜，扬扬得意、狂妄自大地返回了拜占庭^[61]。”^[62]

很快土耳其人再次得胜，不禁踌躇满志。在返回伊斯坦布尔途中，土耳其军队途经科罗尼港，那里的人们已经得知了莫东的悲惨结局。科罗尼守军“被邻居的灾祸和土耳其人的威胁吓得战战兢兢，举手投降了”，马特总结道，“就这样，由于我们的怠惰，敌人的力量大增，而我们被削弱了。”^[63]

远离卡斯蒂利亚家园和基地的大元帅终于抵达东方，奉命阻挡住土耳其人的怒潮。他面临的局面很不乐观。10月2日，贡萨洛及其部下加入了位于科孚岛（希腊西海岸的一个岛屿，在亚得里亚海以南）的威尼斯舰队。到11月7日，他在考虑攻打凯法利尼亚港，土耳其人曾将那里作为进攻勒班陀的集结地。在给两位君主的信中，他写道，他觉得这个港口“是世界第一良港，而且是一个属于土耳其人的岛屿”。^[64]另外，那里只有约300土耳其士兵，另有基督徒平民约3500人。这个岛屿的历史很有意思：它曾属于莱奥纳尔多·托科，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的近亲。为了报复凯法利尼亚支援基督徒将领斯坎德培（他自15世纪60年代就一直在抵抗土耳其人的侵略），土耳其人占领了这个岛。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作战时总是携带一个婴孩耶稣像。他带着圣像，率军来到凯法利尼亚城堡前，宣称自己是“西班牙摩尔人的征服者”，勒令守军投降。土耳其士兵被上级禁止投降，说他们不会放弃，但给他送去了礼物——一支黄金弓和一个装满箭的黄金箭筒，以示尊重。随后爆发了争夺城堡的激战，基督徒把这座城堡称为圣乔治堡。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的粮食濒临告罄，“饥肠辘辘”，找到什么就吃什么。^[65]

有一次，土耳其人企图从要塞城墙下挖地道出去，但西班牙人发现了，炸毁了地道，将被困在地下的人炸死。贡萨洛想出了一个计划。他命令对城墙连续炮击数日，让守军精疲力竭。随后他下令发动全面进攻。他们于1500年12月24日取得了胜利。

此次征服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给西班牙赢得了莫大光荣。阿拉贡历史学家赫罗尼莫·苏里塔写道，收复凯法利尼亚是“众口传颂的伟大胜利”，因为这是自差不多五十年前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基督徒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的唯一一座要塞。^[66]这将是随后一百多年里基督徒的最后一次胜利，也是最后一次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失地。但它成了一个象征，告诉大家，有效地抵抗土耳其人是完全能做到的。土耳其人始终未能夺回这个岛屿，许多年后，哈布斯堡家族以其为基地，在决定性的勒班陀大海战中打败了土耳其人。

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在《威尼斯史》中写道，收复凯法利尼亚的独特胜利，“只有在西班牙帮助下才得以成功”。^[67]威尼斯人认识到，贡萨洛是此次胜利的大功臣。他们把他请到他们的城市，授予他威尼斯荣誉公民的头衔，并慷慨赏赐和嘉奖他。拜占庭帝国皇族的最后一位年迈的后人赞誉贡萨洛为拜占庭皇位的继承者。

此次胜利的成果当然是非常有限的。1502年12月，威尼斯人与奥斯曼人达成了协议，把奥斯曼人在大陆上索要的一切都拱手奉上。这标志着奥斯曼—威尼斯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从军事角度看，1499～1502年的战争是地中海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世界之间鸿沟构建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学家丹尼尔·戈夫曼写道，“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奥斯曼人与威尼斯人之间的边界几乎完全依托海岸线，因此泾渭分明。”^[68]但凯法利尼亚大捷和随后的停战帮助基督教西方在土耳其的节节进攻之下赢得了二十年的喘息之机，得以择日再战。历史学家科林·因贝尔写道，“奥斯曼人暂不攻击欧洲的时期一直延续到

1521年”，在此期间土耳其人将注意力转向伊斯兰世界内部，凶残地镇压宗教异端和分离运动。[\[69\]](#)

地中海东部的这些事件对大元帅来说亦悲亦喜，因为贡萨洛很快得知，他在希腊与土耳其人作战的同时，西班牙的被征服穆斯林发动叛乱，杀死了他的兄长。趁着西班牙的大部分军队在海外征战，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发动了一场叛乱，杀死了一些卡斯蒂利亚军人，包括贡萨洛的兄长堂阿隆索·德·阿吉拉尔。穆斯林仍然对西班牙基督徒的“收复失地”愤愤不平，对自己被强迫皈依基督教也十分恼火。阿隆索的尸体被切成碎片，几乎无法认清身份。

但贡萨洛不能回家，也不能继续在东欧讨伐土耳其人。他被召回西西里岛，去处置意大利境内发生的新战事。路易十二国王统治下的法兰西再次决定夺回那不勒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赶来营救他们那些不得民心的亲戚（那不勒斯王室得不到自己人民的支持，并且持续受到法兰西的压力），他们已经感到身心俱疲。那不勒斯王室的忘恩负义也让两位君主痛苦。西班牙的两位君主在给他们驻英大使的信中写道：“费德里科国王从未对我们为他做的事情表示过一丝一毫的感激，对我们也没有一点和善或兄弟情谊，却恰恰相反。即便如此，我们从未停止为他奔波劳碌，尽我们所能帮助他，与法兰西国王和解，以便他能稳坐王位，让法兰西国王停止手头的事业。”[\[70\]](#)

看到卡斯蒂利亚的支持减弱，法兰西又发出新的威胁，那不勒斯王室决定从一个令人吃惊的方面寻求军事援助。他们请求土耳其人出兵支援，或者至少他们是这样告诉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这一步实在太过分了。两位君主告诉他们的大使：

费德里科国王寻求土耳其人的帮助，一年多前通过他的大使向我们通知了此事，并表明了他的决心，尽管我们反对他这么做，批评他，努力劝

他回头是岸。最后我们告诉他，如果他敢这么做，我们将是他的头号敌人。但我们还是不能劝服他罢手……土耳其人参与了此事，光是因为这个，我们就应当不仅拒绝支持费德里科国王，还要反对他……看到费德里科国王仍然坚决要寻求土耳其人的支援，我们为了基督教信仰，必须与基督教君主们团结一心。[\[71\]](#)。

于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决定与他们的宿敌法兰西结盟，在西班牙与法兰西两国之间瓜分那不勒斯。他们很快这样办了。那不勒斯王族飘零到五湖四海。费德里科国王去法兰西居住；其他人，包括斐迪南的妹妹和王储（费德里科的儿子斐迪南，卡拉布里亚公爵）去了西班牙。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对他们自己在那不勒斯的行动极力辩解，毕竟他们实际上是攫取了自己亲戚的王国。但他们当时说，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务实的考虑。他们告诉宫廷的人们，他们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如彼得·马特解释的，他们选择夺取“那不勒斯王国的一半，以免它整个儿落入法兰西手中”，他们希望将来能够控制整个那不勒斯王国。但马特记载道，两位君主的话引起了震惊，因为费德里科国王“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人”。[\[72\]](#)。

不足为奇的是，瓜分那不勒斯的两个盟友——西班牙和法兰西毕竟芥蒂太深，没有办法和和气气地瓜分战利品。他们在边境发生冲突，最终引发了战争。遵照西班牙两位君主的新命令，贡萨洛又一次与法兰西人正面对垒。1503年4月28日发生在切里尼奥拉的战役被军事史学家认为是近代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战术是使用小型火器，从堑壕里射击，这设立了一个榜样，全世界的西班牙人纷纷效仿，使得随后两百年间伊比利亚人在军事上保持着优势。他还创立了一项习惯，即在战役结束后为敌方的阵亡者祈祷。

最后，在对法战争中，西班牙成为无可争议的胜利者，控制了整个那不勒斯。这意味着，西班牙帝国如今囊括了意大利半岛的整个南半部分。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成为那不勒斯总督，深得民心，在那里稳固地确立了西班牙的统治。西班牙在随后三百年里一直掌控着这座城市及其周边的各省份。

在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治理下，那不勒斯人不会享有自治权，还受到宗教不宽容的影响。此时，宗教不宽容已经成为西班牙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但是，那不勒斯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不必过于害怕土耳其人支持的海盗，也基本上不必担心法兰西的继续侵犯。

更重要的是，在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的扩张接近巅峰的时期，西班牙帝国对那不勒斯的控制，减弱了奥斯曼军队入侵意大利半岛的威胁，并最终彻底消除了此威胁。历史学家托马索·阿斯塔里塔写道：“在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之前，那不勒斯一直是基督教世界抵抗土耳其人的壁垒。”^[73]

^[1] Halil Inalcik, *The Ottoman Empire*, p.6.

^[2] Jason Goodwin, *Lords of the Horizon: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Henry Holt, 1998), p.69.

^[3] Jason Goodwin, *Lords of the Horizon: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Henry Holt, 1998), p.65.

^[4] 穆罕默德二世澄清了奥斯曼帝国皇位继承的规则，后来还把这个兄弟相残的手段写进了法律：“我的儿子中不论谁继承了苏丹皇位，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考虑，他都应将其兄弟处死。大多数法学家都对此表示认可。今后将按此执行。”此后，每位新苏丹登基都将大开杀戒。这种残酷手段在1595年穆罕默德三世登基时达到了顶峰，他的十九位兄弟全部被处死。

^[5] 卡里亚国王摩索拉斯（Mausolus）的著名陵墓，建于前4世纪中叶，是古典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后来英语中“陵墓”（Mausoleum）一词即源自他的名

字。

[6] 这位著名的海盗头子和海军将领的原名是赫兹尔。他的哥哥奥鲁奇是传奇式的海盗，头发和胡须都是红色的，被西方人称为“巴巴罗萨”，后被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伊莎贝拉女王的外孙，详见下文）剿灭。原本是黑发的赫兹尔将自己的胡须染成了红色，成为新的巴巴罗萨，后归顺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苏莱曼给这位年轻的海盗授予了一个新的荣誉称号海雷丁，意思是“信仰之善”。

[7] 马木留克王朝在1250~1517年统治埃及和叙利亚。“马木留克”是阿拉伯语，意为“奴隶”。自9世纪起，伊斯兰世界就已开始起用奴隶军人。奴隶军人往往利用军队篡夺统治权。马木留克将领在阿尤布王朝苏丹萨利赫·阿尤布（1240~1249年在位）去世后夺取王位。1258年，马木留克王朝恢复哈里发的地位，并保护麦加和麦地那的统治者。在马木留克王朝统治下，残余的十字军被赶出地中海东部沿岸，而蒙古人也被赶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文化上，他们在史书撰写及建筑方面成就辉煌。最后他们被奥斯曼帝国打败。

[8] Pietro Bembo, *History of Venice*, ed. and trans. Robert W. Ulery, J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9), p.1: 39.

[9] 匈牙利摄政王匈雅提·亚诺什（传奇的英雄）的次子。他接替前文讲到的“遗腹子”拉斯洛，成为匈牙利国王（在位1458~1490）。另外他还是波西米亚国王（在位1469~1490）和奥地利公爵（1487~1490）。

[10] 今天斯洛文尼亚东北部一地区。

[11] V. J. Parry,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to 173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57, 58.

[12] Marin Barleti, *The Siege of Shkodra: Albania's Courageous Stand Against Ottoman Conquest 1478*, trans. David Hosaflook (Tirana, Albania: Onufri, 2012), p.194.

[13] Marin Barleti, *The Siege of Shkodra: Albania's Courageous Stand Against Ottoman Conquest 1478*, trans. David Hosaflook (Tirana, Albania: Onufri, 2012), p.233.

[14] Marin Barleti, *The Siege of Shkodra: Albania's Courageous Stand Against Ottoman Conquest 1478*, trans. David Hosaflook (Tirana, Albania: Onufri, 2012) , p.241.

[15] 帕夏 (Pasha) 源自土耳其语或波斯语, 是奥斯曼帝国军政高官的头衔。它也可作为敬语, 类似英语的Lord或Sir。帕夏一词也广泛应用于阿拉伯语。行省总督一般享有帕夏的头衔。

[16] Miguel A. de Bunes Ibarra and Emilio Sola, *La vida y historia de Hayradin, llamado Barbarroja* (Granad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1997) , p.33.

[17] Press Departmen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he Turkish Woman in History* (Ankara, Turkey, 1937) , p.10.

[18] Robert Dankoff and Sooyoung Kim, *An Ottoman Traveler: Selections from the Book of Travels of Evliya Celebi* (London: Eland, 2010) , p.231.

[19] Halil Inalcik, *Studies in Ottom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85) , p.39.

[20] Klemen Pust, "Slavery, Childhood and the Border: The Ethics and Economics of Child Displacement Along the Triplex Confiniu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presented at the 15th World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South Africa, July 9-13, 2012.

[21] Halil Inalcik, *Studies in Ottom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Variorum Imprints, 1985) , p.35.

[22] Geza Palffy, "Ransom Slavery Along the Ottoman-Hungarian Frontier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 in Suraiya Faroqhi and Halil Inalcik, ed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Heritage* (Leiden: Brill, 2007) , p.37.

[23] Halil Inalcik, *Studies in Ottom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p.27.

[24]. Georgius de Hungaria, *Libellus de Ritu et Moribus Turcorum* (1530) ; digitized version provided by Göttingen State and University Library, Germany, translated by Paul A.Healy, ch.6.

[25]. Georgius de Hungaria, *Libellus de Ritu et Moribus Turcorum* (1530) ; digitized version provided by Göttingen State and University Library, Germany, translated by Paul A.Healy, chapter 7.

[26]. Georgius de Hungaria, *Libellus de Ritu et Moribus Turcorum* (1530) ; digitized version provided by Göttingen State and University Library, Germany, translated by Paul A.Healy, chapter 12.

[27]. 德夫希尔梅制度是由奥斯曼帝国早年的古兰（kul）制度发展来的，这一发展在巴耶济德一世在位（1389~1403）时完成。原先的“古兰”源于战俘和国家购买的奴隶。穆拉德一世（在位1359~1389）为了遏制逐渐增长和蠢蠢欲动的土耳其贵族势力，开始用德夫希尔梅的手段培植只忠于自己、独立于正规军的力量。

[28]. Inalcik, *Studies in Ottom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p.26.

[29]. Ekmeleddin Ihsanoglu, *The History of the Ottoman State,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Istanbul: Research Centre for Islamic History, Art and Culture, 2001) , pp.1: 352-55.

[30]. King James IV, in Edinburgh, May 21, 1490, in “Venice 1486-1490, ” in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 ed. Rawdon Brown (Great Britain: National Archives, 1864) .

[31]. Henry VII to Pope Alexander VI, January 12, 1493, in “Venice 1486-1490, ” in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 ed. Rawdon Brown (Great Britain: National Archives, 1864) .

[32]. Philippe de Comynes, *The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 Lord of Argenton* (London: G. and W.B.Whittaker, 1823) , pp.2: 363-64.

[33]. Pope Alexander VI to Isabella and Ferdinand, March 20, 1494,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 Patronato Real, leg.60, folio 34, cited in Luis Suárez Fernández,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Isabel la Católica, estudio y documentos* (Valladolid: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1971) , pp.189–90.

[34].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 Patronato Real, leg.60, fol.35, cited in Suárez Fernández,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Isabel la Católica*, pp.192–94.

[35]. Commynes,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 pp.2: 159–60.

[36]. John Addington Symond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New York: Henry Holt&Co., 1894) , p.105.

[37]. Bembo, *History of Venice*, p.1: 79.

[38]. Memoir of what has taken place between Ferdinand and Isabella and the King of France, July 20, 1495, in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1, *Henry VIII: 1485–1509*, ed. Gustav Bergenroth (London: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 s Treasury, 1862) .

[39].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s of Braga and Pamplona, October 31, 1494, in *Opus Epistolarum: 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ondon: Wellcome Library) .

[40]. 正式称号是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

[41]. Birsan Bulmus, *Plagues, Quarantin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Ottoman Empi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 p.45.

[42]. Bembo, *History of Venice*, p.1: 219.

[43]. Bembo, *History of Venice*, p.1: 115.

[44] Ferdinand and Isabella to De Puebla, March 28, 1496, in Bergenroth, ed.,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vol.1.

[45] Bembo, *History of Venice*, p.1: 121.

[46] Paul Stewart, “The Santa Hermandad and the First Italian Campaign of Gonzalo de Córdoba, 1495–1498, ” *Renaissance Quarterly* 28, no.1 (Spring 1975) , pp.29–37.

[47] Bembo, *History of Venice*, p.1: 203.

[48] Miguel Ángel Ladero Quesada, *La Españ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99) , p.276.

[49] Alison Caplan, “The World of Isabel la Católica, ” in David Boruchoff, ed., *Isabel la Católica, Queen of Castile: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p.29.

[50]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 p.124.

[51] 斯洛沃尼亚是历史上的一个地区，位于今天克罗地亚的东部，其北面是德拉瓦河，南面是萨瓦河，东面是多瑙河。

[52] 阿普利亚（拉丁文古名），或称普利亚（现代意大利语的名字），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大区，东邻亚得里亚海，东南面临伊奥尼亚海，南面则邻近奥特朗托海峡及塔兰托湾。该区南部知名的萨伦托半岛，组成了意大利“靴跟”的一部分。

[53] Commynes,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 p.2: 251.

[54]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p.1: 75.

[55] Peter Martyr to Count of Tendilla, April 26, 1499, in *Opus Epistolarum*.

[56].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 of Granada, September 3, 1499, in *Opus Epistolarum*.

[57]. Daniel Goffm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43.

[58].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 Patronato Real, leg.52, fol.70, Bergenroth, cited in Luis Suárez Fernández,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Isabel la Católica: Estudios y documentos* (Valladolid: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2002), pp.6: 88-90.

[59]. De Puebla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 June 16, 1500, in Bergenroth, ed.,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vol.1,

[60]. 德拉克马原为古希腊的货币和重量单位。后来亚美尼亚、奥斯曼帝国等国家也用过这个单位。1德拉克马大约有3~4克。

[61]. 此处拜占庭指的是伊斯坦布尔城。

[62]. Peter Martyr to Peter Fagardius, September 2, 1500, in *Opus Epistolarum*.

[63]. Peter Martyr to Peter Fagardius, September 2, 1500, in *Opus Epistolarum*.

[64]. Biblioteca Nacional, mss 20.211, folio 12, cited in Suárez Fernández,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Isabel la Católica*, p.6: 180-81.

[65]. Purcell, *Great Captain*, pp.136-37.

[66]. Jerónimo Zurita, *Historia del rey Don Fernando el Católico: De las empresas y ligas de Italia*, ed. Ángel Canellas López (Zaragoza: Diputación General de Aragón, 1989), pp.2: 264-65.

[67]. John Julius Norwich, *A History of Veni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8), p.385.

[68]. Goffman, *Ottoman Empire*, p.144.

[69]. 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 p.41.

[70]. Ferdinand and Isabella to De Puebla, July 29, 1501, in Bergenroth, ed.,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71]. Ferdinand and Isabella to De Puebla, July 29, 1501, in Bergenroth, ed.,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72].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 February 16, 1501, in *Opus Epistolarum*.

[73]. Tommaso Astarita, *The Continuity of Feudal Power: The Caracciolo di Brienza in Spanish Napl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13.

二十 流亡的以色列人

在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犹太人被迫离开之后，犹太人和穆斯林仍然受到西班牙两位君主坚定不移推行天主教的措施的伤害。

伊莎贝拉女王的目标其实并非驱逐人口，而是迫使所有人都皈依基督教。这既是为了国家安全考虑，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不朽灵魂。当然这是她的看法。但对那些坚决要保留自己信仰的穆斯林和犹太人来说，皈依基督教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宗教仇恨的腐蚀性极强，而且能够永久性地自我维系下去。在这些年里发生的事情，将影响后来的许多个世纪。

伊莎贝拉女王并不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她从未质疑过自己的行为。事实上，随着时光流逝，她的信念越来越坚决。她相信自己所做的是必需之事，尽管她也承认她的行动给人们造成了痛苦。例如，在15世纪80年代，一些西班牙人，包括塞哥维亚主教，对她的作为提出了批评，并请求教皇英诺森八世加以干预、叫停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她对自己的驻罗马大使承认：“我造成了极大的灾祸，让许多城镇、省份和王国十室九空。”^[1]但她对教皇辩解说，她这么做是为了捍卫基督教信仰。

在那个时代和那个世界，并非只有伊莎贝拉女王一个人在做自认为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那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时代。在那些岁月里，穆斯林为自己残酷伤害基督徒而辩护，基督徒认为迫害穆斯林是正当

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理直气壮地折磨犹太人。一些犹太人为自己在基督徒手中受到的不公而愤怒，转而热情洋溢地支持奥斯曼政权。威尼斯控制的克里特岛上的拉比埃利亚胡·卡普萨利在著作中赞扬土耳其人对基督徒国家的侵略，认为这表明即将发生一场精神的大灾变，导致弥赛亚降临。^[2]欧洲各地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许多犹太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另外，三种信仰的教徒都大肆宣扬自己受到的伤害，却对其他人的痛苦毫无恻隐之心。基督徒主要哀叹基督徒受到的不公，穆斯林为穆斯林哀哭，犹太人为犹太人悲痛。留存至今的文献里很少有人同情不同信仰的人。西班牙基督徒注意到了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的伤心欲绝，但对此做了合理化的解释。在奥斯曼帝国旅行的商人注意到奴隶市场挤满了可怜兮兮的基督徒奴隶，但很少质疑奴隶制度本身是否公正。这只不过是一个艰难世界里的又一种残酷事实。

“收复失地”运动完成不久之后，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遭遇了新麻烦。格拉纳达投降的时候，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曾向穆斯林做过好几项具体的承诺。穆斯林被允许保留自己的财产和房屋，在清真寺内自由礼拜，不受骚扰，并维持自己的风俗、语言和服饰。简而言之，他们可以继续遵守自己的信仰，不受阻挠。根据阿拉伯人的记载，投降的时候，“所有人泪流满面”，但穆斯林同意投降，因为他们的生命和宗教信仰将得到保护。他们相信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会信守承诺。他们的史料还提及，代表两位君主谈判的不是本人，正是大元帅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他的阿拉伯语说得很流利，受到尊重。^[3]

在1492年达成和平投降，当然挽救了双方很多人的生命，因为伊莎贝拉女王决心要占领西班牙南部。从她的角度看，没有别的选择。

但受降不久之后，伊莎贝拉就开始向先前埃米尔国境内的穆斯林施压，勒令他们皈依基督教。不到十年时间，她和丈夫就完全违背了曾向穆斯林做出的承诺。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与她的根本信念相符。她相信自己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女王，都有精神上的义务，必须传播基督教信仰，扩大基督徒人数。她可以这样解释：让大量穆斯林人口留在西班牙南部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们可能会欢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但格拉纳达的穆斯林不足为奇地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起初，改宗的过程依赖温和但坚持不懈的劝导。伊莎贝拉女王的忏悔神父，改宗犹太人埃尔南·德·塔拉韦拉，被任命为格拉纳达大主教。他立刻着手，通过循序渐进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教育，吸引尽可能多的穆斯林皈依。他学习了阿拉伯语，阅读《古兰经》，以寻找相通的元素，来阐释两种信仰的相似之处。这对塔拉韦拉来说是一个重要岗位，但他离开宫廷对伊莎贝拉来说是个损失，因为她依赖他的判断力和明智已经十多年了。例如，她的女儿伊莎贝拉八岁时作为人质被送到葡萄牙之后，是塔拉韦拉负责监督和教育这个小姑娘。^[4]

塔拉韦拉的好友滕迪利亚伯爵被任命为在安达卢西亚的最高级卡斯蒂利亚行政长官。这位伯爵就是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红衣主教门多萨的侄子，他们家族出了很多思想深邃而开明的知识分子，因而闻名。就是滕迪利亚伯爵劝意大利人文学者彼得·马特搬到卡斯蒂利亚，将古典学术和文艺复兴思潮引入那里。滕迪利亚伯爵很尊重伊斯兰教信仰和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但他也致力于让所有人皈依基督教的事业。

塔拉韦拉和滕迪利亚伯爵静悄悄地开始打入穆斯林人群，将不少人拉到基督教这边，并结交了许多安达卢西亚穆斯林，因为后者相信

他俩值得信赖。但他们的传教工作让很多穆斯林如坐针毡，很多人开始不情愿地考虑迁往北非，以逃避皈依的压力。

塔拉韦拉去了格拉纳达之后，女王忏悔神父的岗位就空缺了。她选择的新人是弗朗西斯科·西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这是一位修身苦行的凶悍的宗教战士，出身托雷拉古纳（马德里附近一座小镇）贫民家庭。伊莎贝拉赞同西斯内罗斯严格的宗教和道德规矩，他的克己节欲说明他的生命比那些耽于享乐的人有更崇高的使命。多种宗教都有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即认为清心寡欲是一种神圣的表现。伊莎贝拉认为苦修者比普通人更神圣，她这么想或许是有理由的。如果一个人摈弃了尘世的野心，那么他肯定往集中思绪于精神世界前进了一步，尽管他随后做出的判断未必是理智的。另外，由于他的克己节欲，西斯内罗斯肯定比其他人较不容易腐化堕落；她不用担心他为自己搜罗世俗的财富。她选择了西斯内罗斯，也就是选择了与罗德里戈·博吉亚截然相反的人。博吉亚沉溺于享乐，但更宽容。

红衣主教佩德罗·门多萨于1494年末去世，于是卡斯蒂利亚最高级的教会职位——托莱多大主教，就空缺了。门多萨是在卡里略大主教死后得到这个位置的。伊莎贝拉做了安排，把这个职位给了西斯内罗斯。因此他将成为西班牙最重要和最有权势的教士。西斯内罗斯起初拒绝，因为他更希望过僧人的孤寂生活，但在女王的压力下最终接受了。这让斐迪南国王非常恼火，因为他打算让自己的私生子阿隆索（萨拉戈萨大主教，此时也生养了一大群儿女，数量还在增加）得到卡斯蒂利亚最高的教会职位，以获得更多财富和威望。但伊莎贝拉坚持要把托莱多大主教职位交给西斯内罗斯。国王的私生子已经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适合履行宗教使命，而西斯内罗斯与他截然相反。伊莎贝拉选择了一个宗教狂热分子，这就让她的王国走上了更僵化、更缺乏宽容的宗教道路。这显然是她有意为之，是在刻意转变路线。战争

让她变得冷酷，生活让她悲伤，她自己也变得更加僵化、更缺乏宽容。

* * *

到15世纪90年代末，西斯内罗斯判定，塔拉韦拉以温和劝导让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做法见效太慢。他请求女王允许他访问安达卢西亚，获准后率领一群言辞激烈的讲道者去了那里。他们开始采纳强硬过激的手段，包括激烈的宣讲、贿赂和威胁，迫使穆斯林改宗。他尤其下了大力气去对付那些出身穆斯林、已经皈依基督教但在他看来不够真诚的人，招致了人们的恐惧和愤怒。一些前穆斯林无疑有理由担心自己落入异端裁判所手中，因为他们内心里还是穆斯林，或者可能被指控仍然抱有伊斯兰信念。但当局允许匿名举报，所以任何人都可能被判定犯有异端罪。很多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已经发现，皈依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免于迫害。

但这一时期的一些穆斯林为了方便起见，还是皈依了。有一天，约有4000人受了洗礼。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同意改宗？有些人可能很容易改宗，因为他们原本对宗教就比较淡泊。有些人第一次接触基督教，可能是真诚地皈依了，或许被塔拉韦拉说服了，或许是因为害怕下地狱。其他人可能看到山雨欲来，基督徒现在统治了国家，如果他们改信基督教，生活会容易一些。有些人可能是被西斯内罗斯的贿赂收买了。西斯内罗斯赠送每一个愿意受洗的人一件衬衫。

传教的成功让西斯内罗斯热情洋溢，促使他再接再厉。对他来讲，攻击伊斯兰教信仰已经不够了。他还开始攻击伊斯兰文化与文学。1499年，在格拉纳达，他主持了大规模焚书活动，烧毁了大量珍稀罕见的装饰黄金的阿拉伯文手抄本。只有约300份医学论著得以幸免。西斯内罗斯自己是个饱学之士，所以他毁坏安达卢西亚伊斯兰文

化残存瑰宝的行动，是有意为之，表明了他对伊斯兰学术和知识的明目张胆的鄙视。这让人想起1453年土耳其人恣意损毁君士坦丁堡的手稿与书籍。正如土耳其人的焚书让基督徒愤怒，西斯内罗斯的焚书也让穆斯林怒不可遏。

很多虔诚的穆斯林对大规模皈依感到不安，而西斯内罗斯的恣意破坏让他们怒火中烧。他们相信，他的行动违背了西班牙两位君主在接受格拉纳达投降时做出的承诺。城内发生了暴力活动。一群暴民冲到西斯内罗斯的住地。他不得不躲在房内。他的一名雇员被杀。似乎一场普遍的叛乱就要爆发了。

塔拉韦拉大主教和滕迪利亚伯爵一同来到风暴的中央，倡导和平。他们走到一大群愤怒的穆斯林当中，这对他们自己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这被认为是善意的姿态。塔拉韦拉的和善是世人皆知的。有些市民甚至请求允许亲吻他的衣襟。为了担保摩尔人的忧虑能够得到充分表达，滕迪利亚伯爵主动将妻儿作为人质交给他们，同时与他们商谈导致此次暴动的那些问题。但就在格拉纳达城内紧张情绪消失的时候，叛乱在城外山区蔓延，内战风波再起，像上次内战一样凶险。

斐迪南国王得知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斯^[5]的所作所为后，嘲笑女王愚蠢地将这个人选到这个岗位上。有人听到他对女王说：“所以，为了你的大主教，我们可能要付出惨重代价。我们花了许多年才得到的，这莽汉在几个钟头内就丢光了。”^[6]伊莎贝拉命令西斯内罗斯到宫廷来，然后“以最严厉的言辞”质问他。^[7]她对他的策略的态度可能是模棱两可的。他取得的成绩——大量穆斯林皈依——一定会让她高兴。而且此次叛乱可能给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需要的借口，让他们可以辩解说，投降条约的条件已经被穆斯林破坏了。1500年1月末，斐迪南国王告诉格拉纳达的穆斯林，所有人都必须皈依基督教。他提议，任何人只要在2月25日前受洗，就既往不咎。

在这巨大压力下，很多穆斯林同意受洗。这种值得商榷的传教手段似乎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期限之前，有约5万人皈依。^[8]但那些不愿意皈依也不愿意离开的穆斯林发动了叛乱，抵抗王室敕令，并向北非和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求援。这促使西班牙王室进一步镇压穆斯林，因为他们害怕伊斯兰世界向安达卢西亚发动新的入侵。不同时期，在不同地点，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暴力冲突。斐迪南国王残酷无情地镇压穆斯林反对派。发生了一些暴行：在阿普哈拉斯（格拉纳达城附近的一个山区）的一座城镇，穆斯林妇孺躲进一座清真寺，西班牙士兵将清真寺炸毁了。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哥哥阿隆索·德·阿吉拉尔就是在这样一起地区性叛乱中被杀的。穆斯林引诱一支卡斯蒂利亚军队进入一座山涧，将其尽数屠戮。穆斯林在西班牙南部横冲直撞，见到基督徒就杀。“死者甚多。他们不饶恕自己遇到的任何人，也绝不留活口或抓俘虏。”彼得·马特写道。^[9]在卡斯蒂利亚人和穆斯林的一次紧张的谈判中，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不愿意做任何让步。他们给叛军两个选择，要么皈依基督教，要么离开西班牙。国王和女王表示，如果他们愿意离开，政府可以出钱把他们送往北非。从此刻起，任何形式的宗教宽容都不可能存在了。

许多穆斯林决定离开。彼得·马特写道，为了避免放弃伊斯兰教，他们“选择离开故土和家园”。“他们的离去让两位君主颇为满意。他们说，就这样，土地中的坏种子会被渐渐清洗干净。”^[10]

但后来，即便那些皈依了的人，也发现自己受到猜忌。异端裁判所开始迫害他们。过去是前犹太人因为所谓的信仰不真诚而遭到审讯、迫害而处决，如今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皈依基督教或者宣称皈依的穆斯林身上。按照巴巴利^[11]海盗海雷丁帕夏的说法，事实上，有些人的确是假装皈依，在自己家里挖掘地下室，秘密向孩子传授《古兰

经》知识。海雷丁将这样一些穆斯林运送到了安全的北非。^[12]在西班牙的假基督徒若是不悔改，就被异端裁判所烧死。伊莎贝拉女王支持这样的调查，就像过去支持对改宗犹太人的调查一样。她相信必须除掉国内所有的假基督徒，因为穆斯林会破坏那些已经受洗的人的信念。

于是，更多穆斯林离开了安达卢西亚，渡过狭窄的海峡，前往北非或奥斯曼帝国。他们为自己被迫背井离乡而愤怒。有些人开始从事海盗活动，认为这是对西班牙基督徒虐待他们所做出的正当的、值得赞扬的报复。

土耳其人利用了北非穆斯林对海盗活动的新兴趣，开始向其提供支援，并鼓励他们从事海盗活动。地中海的海盗问题越来越严重。据海雷丁帕夏回忆，以北非为基地的海盗袭击西班牙目标，掳掠财产，奴役基督徒，并高呼：“安拉！安拉！”仅在一个月內，海雷丁就俘虏并奴役了3800名基督徒。^[13]他的活动对奥斯曼人的价值很大，后来他们封他为海军司令。

与此同时，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在其他国家过得也很凄惨。很多人逃到了葡萄牙。冷酷无情而秉承机会主义的若昂二世国王允许他们入境，只要他们缴纳高额入境税。但葡萄牙对犹太人的欢迎是很短暂的；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葡萄牙停留的时间超过了规定，就将成为奴隶。

但很多犹太人接受了若昂二世国王的条件，往西前往葡萄牙，但几乎随即遭受了新的灾祸。很多人刚过边境，就遭到抢劫。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犹太人去了葡萄牙，但基督教和犹太人的编年史说数量很大。难民被塞进距离卡斯蒂利亚边境不远的一连串营地。^[14]很快这些临时定居点就蔓延疾病，许多家庭死绝，这让居住在附近城镇的葡萄牙人大为恐慌。他们要求将犹太人再次强行迁走。

现在犹太人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陷阱，因为若昂二世国王向他们征收高额离境税，所以已经抵达葡萄牙的犹太人要想合法地离开葡萄牙，又得大放血。另外，那些愿意离开的人被强迫乘坐国王名下的船只，于是国王再次从这些陷入绝境的犹太人身上榨取利润。非国王所属的船只的船长若帮助犹太人，会被处决。^[15]

若昂二世国王虽然急于对犹太人趁火打劫，但也想强迫他们皈依基督教。在1492年10月19日的敕令中，他下令，任何接受洗礼的犹太人可以免缴入境税和离境税。期限到了之后，他宣布，任何无钱离开葡萄牙的犹太人都将成为奴隶。于是，1000~1500犹太人成了国王的奴隶。

随后国王宣布，犹太人若不缴税，他将夺走他们的孩子。数百名，或许多达两千名犹太儿童被运往非洲西海岸的荒岛圣多美，在那里因饥谨和日晒雨淋而死。当时的卡斯蒂利亚编年史里几乎没有对此事的记载。或许人们觉得这事太让人毛骨悚然，因此不能记载。弗朗索瓦·苏瓦耶说，卡斯蒂利亚编年史未记载抛弃儿童于荒岛的丑事，是“无法解释的过错”。^[16]

但是，这些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表明，若昂二世国王做出如此残酷之事的动机可能是什么。阿拉贡历史学家赫罗尼莫·苏里塔能够接触到原始的档案文献，他写道，若昂的儿媳伊莎贝拉公主在丈夫阿方索死后悲痛欲绝，坚信是葡萄牙的罪恶导致了这个年轻人的死。据苏里塔说，她对葡萄牙愿意接受逃离西班牙异端裁判所迫害的犹太人和改宗犹太人尤其担忧，因为这些人激怒了上帝的异端分子。她变得对此事如癫似狂。苏里塔写道：“她的第一任丈夫堂阿方索王子遭遇的灾祸，被她理解为，是因为葡萄牙人接纳逃离卡斯蒂利亚的异端分子和叛教者。”“她对此有极大的顾虑，非常害怕冒犯了上帝，以至于相信她的丈夫就是因为受上帝的惩罚而死的。”^[17]

年轻的阿方索死后，葡萄牙王室失去了儿子和合法继承人，于是在很多讨论中进行了这样阴郁的思考。所以，若昂二世国王对犹太儿童的虐待，可能是为了自己儿子的死而向上帝和犹太人报复。

伊莎贝拉女王肯定得知了这些事情，不过没有史料记载她对若昂二世凶恶地害死犹太儿童的反应。不过大约在这个时期，她向已经逃往葡萄牙并想要回家的犹太人发放通行证，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宣誓皈依基督教。于是很多人辗转回到卡斯蒂利亚，不情愿地接受了洗礼和皈依。

若昂二世国王最终于1495年驾崩，葡萄牙境内幸存的犹太人（数量在减少）无疑松了一口气。但这个喘息之机很短暂。曼努埃尔一世国王于1495年登基，起初对被奴役的犹太人表现出怜悯，命令将其释放。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决定将他们逐出葡萄牙，除非他们同意皈依基督教。伊莎贝拉公主（曼努埃尔一世追求的年轻寡妇）让他承诺，一定要强迫犹太人接受洗礼，才会同意嫁给他；他必须驱逐任何曾在西班牙被判异端罪的人。起初曼努埃尔一世国王担心这是伊莎贝拉不肯嫁给他的又一个借口。所以，据苏里塔说，伊莎贝拉公主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承诺自己宣誓，“同意结婚，并到他的国家，与他一起生活”，条件是他必须确保驱逐异端分子。^[18]

但按照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恩里克·德·奥利韦拉·马克斯的说法，曼努埃尔一世其实自己原本就打算镇压犹太人，伊莎贝拉公主的“苦苦相逼”只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19]他驱逐犹太人的举动和欧洲其他统治者如出一辙，这种做法被认为能够减少内部紧张和宗教间矛盾。

但曼努埃尔一世国王自己也非常虔诚，想出了一种新的强迫犹太人皈依的严苛手段：他命令，犹太人可以离开，但必须留下不满十四岁的孩子，这些孩子将被分配给葡萄牙基督徒家庭抚养。这种做法和

土耳其人的德夫希尔梅概念很相似，令人不寒而栗。为了保住自己的孩子，葡萄牙有数千名犹太人终于妥协，皈依了基督教。人们熟知的情况又发生了：有些人是真诚皈依，有些人只是假装。

即便皈依了基督教，犹太人仍然受到基督徒的敌视。1506年，基督徒暴民在里斯本兴风作浪，屠杀了两千名前犹太人。曼努埃尔一世国王处决了暴民首领，但犹太人清楚地看到，即便皈依基督教，自己的安全仍然没有保障。

很快，犹太人不仅逃离西班牙，也开始逃离葡萄牙，前往阿姆斯特丹、北非，最好的目的地则是奥斯曼帝国。与流传甚广的神话相反的是，巴耶济德二世并没有明确地欢迎犹太人到奥斯曼领土。^[20]但他确实允许他们入境，但他们必须遵守主宰着奥斯曼文化的伊斯兰教法：犹太人必须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缴纳特别税，并以多种方式向伊斯兰信仰表达尊重。

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许多犹太人觉得奥斯曼国家是安全的避风港。那里的限制是可以接受的。很快，许多犹太人在精神和心理上恢复了元气，开始繁荣昌盛。

但他们没有遗忘曾经的苦难。例如，居住在克里特岛的拉比埃利亚胡·卡普萨利一家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每一次胜利都表明神战胜了邪恶的基督徒。很多犹太人秘密地支持土耳其人。一些塞法迪犹太人成了伊斯坦布尔的奴隶贩子，将基督徒俘虏卖给后宫或当作桨帆船奴隶。卡普萨利说，西班牙犹太人带来了关于“火器发展”的珍贵的技术信息，这帮助土耳其人在针对基督徒的战争中赢得了更多胜利。^[21]

有些人开始觉得，基督徒被土耳其人打败，是因为他们的罪孽受到上帝的惩罚。据马丁·雅各布斯说，当时居住在热那亚的犹太历史

学家约瑟·哈一科恩认为，“奥斯曼人的崛起是上帝的神圣安排的一部分，宗旨是惩罚基督教对犹太人的持续迫害”。哈一科恩说，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洗劫，是基督教的“图像”和“偶像”被扫地出门，这是“上帝的预言得到实现”，就像先知耶利米说的那样。^[22]

在随后五百年里，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称为塞法迪犹太人）和穆斯林将对在西班牙的生活保留苦乐参半的回忆，后来他们把西班牙视为失落了的天堂。历史学家简·格伯写道：“消失了的塞法迪土地成为犹太人历史的一个伟大主题，有点像圣殿被毁和巴比伦之囚。”^[23]另一位历史学家萨勒马·卡德拉·贾乌西则说：“观光安达卢西亚、目睹其伟大的伊斯兰纪念建筑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无不感到自豪和遗憾。”^[24]

伊莎贝拉成功地将西班牙变成几乎纯粹的天主教国家，但她也丧失了在西班牙生活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勤奋和技艺。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她在国内树敌颇多。异端裁判所及其代表的宗教不宽容，成为她的遗产的一个无法磨灭的污点，在许多世代里困扰着西班牙。

^[1] David A. Boruchoff, “Introduction: Instructions for Sainthood and Other Feminine Wile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Isabel I,” in Boruchoff, *Isabel la Catól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4.

^[2] Charles Berlin, *Elijah Capsali's Seder Eliyyahu Zuta*,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September 1962.

^[3] Don José Antonio Conde,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Árabes en España, 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árabigas* (Madrid: Biblioteca de Historiadores Españoles. Marín, y Compañía, 1874), p. 320.

[4]. Antonio de la Torre and Luis Suárez Fernández, *Documentos referentes a las relaciones con Portugal durante 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858; Valladol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Patronato Menéndez Pelayo, 1963) , pp.2: 116-17.

[5]. 此时西斯内罗斯还不是红衣主教。1507年，在斐迪南支持下，他成为红衣主教。

[6]. William Prescott,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New York: Harper&Brothers, 1854) , vol.1, p.420.

[7]. William Prescott,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New York: Harper&Brothers, 1854) , vol.1, p.457.

[8]. Peggy Liss,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331.

[9].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 June 9, 1501, in *Opus Epistolarum: 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ondon: Wellcome Library) .

[10].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 June 9, 1501, in *Opus Epistolarum: 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ondon: Wellcome Library) .

[11]. 欧洲人称为巴巴利而阿拉伯人称为马格里布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一带。

[12]. Miguel Ángel de Bunes Ibarra and Emilio Sola, *La vida, y historia de Hayradin, llamado Barbarroja* (Granad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1997) , p.43.

[13]. Miguel Ángel de Bunes Ibarra and Emilio Sola, *La vida, y historia de Hayradin, llamado Barbarroja* (Granad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1997) , p.46.

[14]. François Soyer, “King João II of Portugal, ‘O Príncipe Perfeito, ’ and the Jews (1481-1495) , ” *Sefarad* 69, no.1 (2009) .

[15] François Soyer, “King João II of Portugal, ‘O Príncipe Perfeito,’ and the Jews (1481–1495),” *Sefarad* 69, no.1 (2009), p.91.

[16] François Soyer, “King João II of Portugal, ‘O Príncipe Perfeito,’ and the Jews (1481–1495),” *Sefarad* 69, no.1 (2009), p.97.

[17] Jerónimo Zurita, *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 el Católico: De las empresas y ligas de Italia*, ed. Angel Canellas López (Zaragoza: Diputación General de Aragón, 1989), pp.2: 26–29.

[18] Jerónimo Zurita, *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 el Católico: De las empresas y ligas de Italia*, ed. Angel Canellas López (Zaragoza: Diputación General de Aragón, 1989), pp.2: 26–29.

[19] Antonio Henrique de Oliveira Marques, *History of Portug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I, p.213.

[20] Minna Rozen,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Istanbul: The Formative Years, 1453–1566* (Leiden: Brill, 2010), p.38.

[21] Aryeh Shmuelewitz, “Capsali as a Source for Ottoman History, 1450–152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9 (1978), p.342.

[22] Martin Jacobs, “Joseph ha-Kohen, Paolo Giovio and Sixteen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Jewish Intellectuals in Early Modern Italy*, ed. David B. Ruderman and Giuseppe Veltri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p.74.

[23] Jane S. Gerber, *The Jews of Spain: A History of the Sephardic Experienc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p.xi.

[[24](#)]. Salma Khadra jayyusi, ed., *The Legacy of Muslim Spain* (Leiden: Brill, 1994) , p.xvii.

二十一 三个女儿

1500年之后的岁月，伊莎贝拉女王步入知天命之年，但她勤政依旧，不曾松懈。她继续处置海外战争和国内动荡时，还有两个孩子（她的女儿玛丽亚和凯瑟琳）即将成年，她还打算将胡安娜（此时成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王位继承人）召回西班牙，使其宣誓成为下一位女王。她必须对胡安娜加以培养，帮助她未来执政。与三个女儿的关系都有问题，作为母亲的伊莎贝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女王身体欠佳。她通常拥有无所畏惧的意志力、干劲和充沛精力，现在开始感到一阵阵的衰弱疲劳。她时常感冒发烧。那些在过去让她非常成功的工作，她现在开始延缓、耽搁，甚至放弃。

胡安娜于1502年回国，与丈夫一同骑马来到托莱多，以便接受册封为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位继承人。伊莎贝拉身体有恙，不能骑马迎接，而是在宫中等待女儿回家。斐迪南国王和腓力大公骑马走在胡安娜前面，先行入城。这对未来的西班牙女王来说，是失了礼数。这个错误表明，曾经精心策划自己登基典礼的伊莎贝拉，已经开始犯错误。她素来运用自己不可战胜的意志力来塑造事件以及人们对它的感受，如今她却没有力量像过去那样掌控方方面面了。

她的问题既有身体上的，也有心理的。伊莎贝拉患有具体情况不明的内脏疾病，可能是癌症，也可能是其他疾病。她还遭受了三次严重的个人打击：她最宠爱的两个孩子，胡安和伊莎贝拉（他们本来是

要接替她的位置的)的死亡，以及她的小外孙米格尔·德·拉·帕斯（他若长大成人，将继承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葡萄牙）的夭折。伊莎贝拉的希望和对未来的安排全成了泡影，所以她很难恢复元气。米格尔于1500年7月夭折的几个月中，她心烦意乱，几乎无法与人交流。

很多活动不得不推迟。人文学者卢乔·马里内罗·西库罗（西西里人，生活在卡斯蒂利亚宫廷）告诉一位朋友，宫廷的生活几乎完全停顿了。“我们最虔诚的两位君主和整个宫廷被巨大的悲恸席卷，无人敢于接近女王，也不敢和她说话。”他告诉自己的笔友费德里科·马内尔，“因为国王和女王被沉痛的心情折弯了腰，这也不奇怪，因为在很短时间内，他们失去了三位声名显赫的王子公主，全都是合法的继承人。”^[1]

问题还不只这些最近发生的悲剧。在公共场合，伊莎贝拉女王维持着坚韧的仪态，但痛苦和疾病摧毁了她的外貌。她青春年少时的美貌淡去了。她变得肥胖。她用一顶不好看的帽子盖着头，可能是出于宗教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她的头发在稀疏或变灰白。有些肖像捕捉到了她越来越满腹惆怅的表情。

在私人场合，她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消失了。一位生活在宫廷的年轻贵族对彼得·马特说，伊莎贝拉女王“十分悲戚”，他感到这很难理解。他告诉马特，女王受到臣民的仰慕和敬畏，但政治权力和地位并不能让她开心。马特表示同意。^[2]

很快，西班牙人民就觉察到，女王遇到了某种严重的问题，而整个国家也出了问题。随着她的精力衰弱，很多其他东西也开始土崩瓦解。

例如，曾参加格拉纳达战争并与哥伦布一同远航的阿隆索·德·奥赫达返回伊斯帕尼奥拉岛时，带来了消息。他告诉卡斯蒂利亚殖民

者们，伊莎贝拉女王身患重病，据说已经时日无多。所有人都知道伊莎贝拉因为亲人的死亡而深受打击，但大家简直无法想象，这样坚强而不屈不挠的人竟然也会倒下。哥伦布认为这消息是恶毒的谣言，他的儿子斐迪南后来回忆说，这是奥赫达的诡计，目的是破坏哥伦布对那些岛屿的治理和监督。^[3]

但随着这消息在群岛流传，人们的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微妙变化。伊莎贝拉曾明确表示，她是印第安人的保护者，伤害印第安人的人将遭到严惩。但随着她的健康状况恶化，殖民者渐渐胆子大了起来，对美洲原住民更加咄咄逼人。

后来成为殖民者的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当时还很年轻，在美洲寻求发财。他于1502年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目睹了殖民者立场的变化。他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美洲大发现的宫廷内层圈子的成员。他出身来自塞哥维亚、后迁往塞维利亚的一个改宗犹太人家庭^[4]，他的父亲和三个叔伯曾参加哥伦布的第二次美洲远航。拉斯·卡萨斯决定自己也去美洲，后来回忆说自己起初受到了美洲原住民的热情欢迎。这时西班牙人在岛上已经居住了十年，很多印第安人还视其为友好的势力。

拉斯·卡萨斯注意到，殖民者得知伊莎贝拉病重的消息后，对印第安人的态度就变得严酷得多了。西班牙人要求印第安人为他们服务和劳作。如果印第安人拒绝或者反抗，西班牙人有时会报之以令人发指的残忍暴行，驱使猎狗将其撕成碎片，或者砍断男女与婴儿的肢体。

雪上加霜的是，如今去往新大陆的定居者的素质也在急剧下降。最早的一批是普通水手。前途大好的青年成群结队加入了哥伦布的第二次远航。但第一批探索者中有很多人已经死于梅毒或其他疾病，或被杀，因此要吸引探索者和殖民者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王室吸引新殖

民者的手段是，赦免死刑犯或徒刑很长的犯人，条件是他们必须移民到美洲。社会渣滓作为旧大陆派往新大陆的使者，开始横渡大西洋。哥伦布说如今居住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班牙人“尽些些流浪汉”。
[\[5\]](#)

拉斯·卡萨斯说，发生了这些暴行，是因为现在向女王隐瞒真相比较容易。他对自己目睹的惨状大感不安，成了一位人权捍卫者，在美洲与欧洲之间来回穿梭，努力劝说卡斯蒂利亚政府阻止新大陆发生的恶行。

但在那些年里，为了健康考虑，伊莎贝拉的精力仅限于保障卡斯蒂利亚本身。大统传承的问题很紧迫，而且伊莎贝拉公主的死使得王国的左翼（与葡萄牙的边境）又一次变得脆弱。

伊莎贝拉公主死后，三十一岁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又一次成了单身汉。伊莎贝拉女王曾努力劝他娶玛丽亚，而不是伊莎贝拉公主，因为伊莎贝拉公主不愿意再嫁，但曼努埃尔一世非常坚决地要伊莎贝拉公主，拒绝玛丽亚。现在，伊莎贝拉女王不得不又一次向他提议，将玛丽亚嫁给他（此时玛丽亚十五岁），希望他这一次能够接受。他接受了，最终娶了玛丽亚。

这对玛丽亚当然是非常尴尬的。但她排行第四，原本是双胞胎之一，但在娘胎里只存活了她一个。作为家中的第三个小妹，她已经习惯于在别人有了自己的选择之后，接受别人挑剩下的。关于为玛丽亚置办服装和珠宝首饰的记载比她的哥哥姐姐少得多。衣服是很贵的，玛丽亚得到的可能是修剪过的二手衣服，而不是像哥哥姐姐那样得到大量新衣服。

所以她也可能会接受二手的丈夫。她一定感到痛苦，因为曼努埃尔一世多次拒绝她。最后，他才不情愿地同意。1500年4月，葡萄牙和

西班牙王室签订了婚约。她的父母给了曼努埃尔一世不少油水。他将得到20万金多乌拉^[6]的嫁妆，分三期支付。玛丽亚将得到450万马拉维迪的年金（来自塞维利亚的地租），可以财务独立，过得舒舒服服。^[7]玛丽亚还将受到很好的侍奉，让国王的宫廷排场更辉煌。5月，大家决定，玛丽亚的内廷将有四十七人，其中有六名侍女、一名幕僚长、一名大管家、文书、会计、男仆和四名侍从。另外，她还有“两到三名白奴”陪伴。^[8]这些白奴可能是在战争中从穆斯林那里俘虏的俄罗斯或希腊奴隶，但仍然被西班牙人当作奴隶来使唤。

但有一个小问题。曼努埃尔一世要娶的是亡妻的妹妹，这违反了《利未记》禁止与前任配偶的兄弟姐妹结婚的规定。当然，曼努埃尔一世是鳏夫，所以禁令可能并不适用。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还是决定从教皇那里获得批准（即正式的宗教上的豁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不像过去那样好说话了。他开始觉得自己对西班牙成功的贡献没有得到充分认可，这在梵蒂冈导致了一些大发脾气的场面。这一次，他要求斐迪南封他的亲戚路易斯·博吉亚为巴伦西亚大主教，作为回报。这曾是切萨雷的教会职位，但他此时已经脱离了教会。罗德里戈觉得，他在当上教皇之前就是巴伦西亚大主教，这个位子属于他的家族，应当是世袭的。教皇于8月24日签署了批准曼努埃尔一世与玛丽亚结婚的文书。^[9]

曼努埃尔一世与玛丽亚的婚礼于1500年10月举行。编年史家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说，葡萄牙的国王和贵族们“以盛大的仪式”欢迎了公主。^[10]伊莎贝拉女王的葡萄牙姨母和亲戚们对玛丽亚百般追捧，帮助她适应葡萄牙的生活。

从一开始，这桩婚姻就传来好消息。1500年11月24日，葡萄牙一位廷臣给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信中写道：“感谢上帝，王后陛下总是

衣着贵气，非常丰满、温和。国王对她表现出极大的爱意，对她十分依恋，宫廷的所有绅士和贵妇都很爱她。”^[11]

玛丽亚性情柔顺而随和，愿意既往不咎，也得到了夫君的热烈欢迎。次年夏季她怀孕了，于1502年6月6日生下了一个儿子，即未来的若昂三世国王。再下一年，她又生了个可爱的女儿，取名为伊莎贝拉。随后十年里，她几乎每年都生一个孩子。一共八个孩子长大成人，葡萄牙王位传承安全无虞。编年史家普鲁登西奥·德·桑多瓦尔修士写道：“上帝给他们的果实非常丰饶。”^[12]

有了玛丽亚王后的陪伴，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的生活平稳有序而成果丰硕。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恩里克·德·奥利韦拉·马克斯写道：“从16世纪初开始，在他一生中，葡萄牙人无论在阿拉伯半岛还是马来西亚，捷报频传，完全控制了印度洋。”^[13]伊莎贝拉的女儿就是不断扩张的葡萄牙帝国的王后，而她在卡斯蒂利亚故国的亲人则统治着幅员辽阔且持续扩张的西班牙帝国。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绕过了好望角，于1498年从海路抵达印度，并带着满船香料返回葡萄牙。如今葡萄牙人找到了绕过奥斯曼瓶颈去亚洲的道路，绕过非洲海岸，直接获取亚洲的丝绸、香料和其他商品。葡萄牙人还扩大了在南美洲的巴西的领地。根据1494年瓜分全球的《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巴西是属于他们的。

现在，大家清楚地看到，《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正中伊莎贝拉的下怀，因为现在她是西班牙女王，而她女儿是葡萄牙王后。母女俩统治着世界的很大一部分，财富泉涌般输入她们的国家，给了她们充足的财力去做很多事情。历史学家爱德华·麦克默多写道：“堂曼努埃尔此时处于王室辉煌的巅峰。荣誉、财富，一切似乎都争先恐后地将自己奉献在他脚下。”他们生活在“真正东方式的奢华与美丽排场中。欧洲各地的歌手和演员争相献艺，取悦国王，在他卧室为他奏

乐，催他入眠。赛马、塔霍河畔的骑行、山珍海味的宴席、斗牛赛、比武大会，都是宫廷的娱乐”。[\[14\]](#)

玛丽亚王后和曼努埃尔一世国王像伊莎贝拉女王一样，在新大陆也致力于传教和基督教信仰的灌输。葡萄牙人派遣了很多传教士到非洲、南美洲和亚洲，扩大了基督徒的数量。里斯本城门处的贝伦修道院，就像塞维利亚的大教堂一样，是所有远航的葡萄牙水手出发和归来时必去的地方。探险家们在起航前要在这里听弥撒。卡斯蒂利亚人当然也是一边探索，一边传教。对伊莎贝拉女王及其女儿玛丽亚来说，西班牙与葡萄牙的联盟在方方面面都很成功，她们认为这是因为上帝恩宠她们。

玛丽亚曾明确地这么说过。修士埃尔南多·涅托曾问她，她是否因为一生中得到的馈赠——她的幸福婚姻、孩子们和享受的财富——而感激上帝。玛丽亚王后当场跪下，举手祷告，说：“我感谢你，伟大的真正的上帝，感谢你给我所有这些馈赠和利益。”[\[15\]](#)

但伊莎贝拉女王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家里还有一个孩子，也是她最小的孩子卡塔利娜，一般被称为“阿拉贡的凯瑟琳”。在商谈婚姻和嫁妆的这么多年里，她已经长大了，一直被称为威尔士王妃。她终于可以前往英格兰了。伊莎贝拉不愿意失去她，用了一个又一个借口延缓凯瑟琳的启程。1499年5月19日，为凯瑟琳和亚瑟举行了代理婚礼[\[16\]](#)。10月，亚瑟王子写信给凯瑟琳，问她何时亲身到英格兰。1500年1月，英格兰王室再次询问。4月，西班牙人解释说，凯瑟琳之所以耽搁，是因为国内发生了穆斯林叛乱，后来又因为天气恶劣而未能起航。10月，英格兰人再次询问，凯瑟琳何时前往。1501年1月，伊莎贝拉女王告诉他们，凯瑟琳暂时还不能出发，因为临行前要见父亲一面。5月21日，他们说，她身体染病，不能动身。7月，他们说，西班牙天气炎热，所以她动身很慢。

事实是，到1501年，旅行计划敲定的时候，伊莎贝拉女王已经被普遍认为“健康状况很差”，所以不愿意让自己伶俐体贴的女儿离开。^[17]母女俩的性情和仪态很相似，都知道一旦凯瑟琳离开西班牙，可能就永远见不到彼此了。

凯瑟琳最终于1501年夏季出发，也就是代理婚礼的两年后。她母亲身体虚弱，未能送她到海边道别，就像她当年为胡安娜送行去佛兰德那样。她们在格拉纳达辞别了。凯瑟琳于4月15日从北方的拉科鲁尼亚^[18]起航时，只有十五岁。女王亲笔给船上的水手写了好几封焦虑的书信，确保他们尽力保护凯瑟琳。

旅途险象环生，和胡安娜与玛格丽特出嫁时的旅途一样。航海危险是因为当时的造船技术还很原始，船只很小，即便在风平浪静时也只能勉强算安全。凯瑟琳及其随行人员从西班牙到英格兰的旅途花了六周时间，首先越过比斯开湾，然后跨越英吉利海峡。在旅途初期，他们遭遇了从大西洋刮来的猛烈风暴。舰队中有一艘船失踪，他们不得不匆匆返回港口以修理船只，然后再度出发。这是煎熬人的磨难，但凯瑟琳一直保持镇静自若。

她的船只于1501年10月2日在普利茅斯下锚。欢呼的人群热烈欢迎这位公主。亨利七世国王筹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他坚持要在婚礼举行之前，亲自去见公主。她揭开自己的新娘面纱，给他过目。他宣布自己非常高兴，并与她的父母分享自己的喜悦。“我们非常仰慕她的美丽，以及她宜人和尊贵的仪态。”亨利七世国王于1501年11月28日给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信中写道：“……我们欢欣鼓舞，由衷地喜悦……两个王室和两个王国之间的联合，如今已经圆满完成，所以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利益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凯瑟琳和亚瑟于11月14日在老圣保罗大教堂举行婚礼。关于他们有无圆房，有些争议。据说皮肤苍白而身材苗条的王子“大摇大摆地

从洞房出来，要喝啤酒”。^[19]但凯瑟琳的家庭教师埃尔维拉·曼努埃尔说凯瑟琳还是个“清清白白的处女”。^[20]但凯瑟琳和亚瑟都还年轻，所以就算有问题，将来也必然能解决。

最后伊莎贝拉将注意力转向最困难的问题。排行第三的胡安娜从没有接受过治国理政的教育，如今成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还有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岛，此外他们也渐渐意识到，还包括大西洋彼岸的广袤土地）的王位继承人。她聪明伶俐，受过良好教育，但没有受过统治国家的训练，所以必须将她召回西班牙，开始帮助她准备迎接未来的艰巨使命。所以，她必须和丈夫腓力大公一同回到卡斯蒂利亚。

但胡安娜那里出了些问题。或许伊莎贝拉在胡安娜前往佛兰德之前与她一起待在拉雷多的时候，就预感到了灾难。胡安娜抵达佛兰德的时候，腓力大公没有亲自迎接，这就不是一个好兆头。事实上，腓力身边的佛兰芒廷臣都被法兰西国王收买了，从一开始就努力破坏夫妻俩的关系。

腓力冷淡地将胡安娜抛在一边，自己慢吞吞地去迎接她，这预示着更糟糕的事情。他们不太般配，这很快就很明显了。胡安娜很漂亮，腓力迅速与她圆房。胡安娜很快就怀孕了。但英俊而虚荣的年轻大公惯于从佛兰德和法兰西挑选最美丽的女人来享用，所以在他眼里，胡安娜并不算什么。另外，她的严肃性情和对他的炽热的爱，也让他感到腻烦和恼火。传记作者克里斯托弗·黑尔写道：“他唯一关心的，就是在布鲁塞尔的热闹宫廷寻欢作乐。”而胡安娜“泪流满面地抱怨”他对自己的冷淡，只会让他更不耐烦。^[21]

胡安娜是在一个充满使命感、气氛融洽的宫院长大的。她一直是受爱慕和宠爱的宝贝。而在佛兰德，她发现自己难以应付险恶的宫廷政治，那里的人面和心不和，一边假装亲近，一边却在暗地里坑害对

方。腓力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母亲，所以他特别容易受到廷臣们的操纵，而这些廷臣也学会了利用他的兴趣、口味和欲望。

腓力的喜好非常前卫，近似奢靡。例如，他是佛兰芒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的赞助者，而博斯最有名的作品是《人间乐园》。博斯的作品表面上是宗教题材，但描绘的却是神奇而淫荡的人兽在梦幻般的田园风光中嬉戏。画作中常常出现色情的和性虐待的意象，让观看者不确定这究竟是在传达宗教教训，还是在鄙夷地嘲弄传统的道德观。

卡斯蒂利亚和佛兰德（后者由勃艮第人主宰）这两个国家的文化鸿沟是非常明显的，玛格丽特公主和胡安王子的随从们也是性情大异的。卡斯蒂利亚人宁静、庄重、严峻而虔诚，勃艮第人无拘无束、耽于享乐而愤世嫉俗。伊莎贝拉派到女儿身边的随从们震惊地发现，勃艮第宫廷“道德腐化”；勃艮第人觉得西班牙人老派而严峻乏味。

[\[22\]](#)那些希望腓力抛弃胡安娜的佛兰芒和法兰西廷臣迅速找到很多办法来攻击她，让她显得愚蠢，甚至精神有问题。

遵照廷臣的建议，腓力控制了胡安娜的内廷，从佛兰芒贵族当中挑选新的侍从给她，并决定给他们付多少薪水。这在宫廷内造成了紧张气氛。有些佛兰芒人的薪水被降低了，因为宫廷的人数越来越多，需要领薪水的人比过去多了很多。有些跟随胡安娜前来的西班牙人得不到任何薪水。另外，胡安娜也得不到任何金钱来支付给他们。西班牙人被强迫遵守勃艮第人的风俗与生活标准，还被当作不受欢迎的外来者。

气候的变化也让西班牙人大吃一惊。胡安娜的西班牙随从们被北欧阴郁的严冬冻得瑟瑟发抖、垂头丧气，很多有办法的人就回国了，于是她身边的支持少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佛兰芒廷臣，他们听从腓力的命令，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听从控制腓力的谋士们的命令。

不得不留在佛兰德过冬以等待玛格丽特前往西班牙的水手们的条件特别艰苦。胡安娜希望让玛格丽特早日启程，但没有成功。腓力对西班牙水手和士兵不闻不问，让他们在苦寒的北欧沿海自行解决过冬的难题。他不曾为他们的到来或住宿做任何准备工作。在随后几个月里，有多达9000西班牙水手和士兵因饥寒而死。

这样明目张胆的麻木不仁让卡斯蒂利亚人目瞪口呆。胡安娜身边剩余的卡斯蒂利亚侍从大为惊恐。佛兰芒人也从中看出，他们完全可以这样虐待西班牙人，而不必忌惮后果。

胡安娜没有钱给她的侍女们当嫁妆，这给她们中的一些人造成了危机。至少有一名卡斯蒂利亚侍女，出身地位很高的博瓦迪利亚家族，因此被召回国，嫁给西班牙人。但这个年轻女子忠于胡安娜，决定留在她身边。此外还有八名侍女留下。但胡安娜囊中羞涩，维持不了这些侍女的生活，于是她们一个个离开了胡安娜。最终她几乎完全被佛兰芒廷臣包围，其中很多人在拼命损害她的利益。陪同她远嫁佛兰德的西班牙人当中，只有两三名奴隶仍然在她身边。他们可能是没有别的选择。

这种局面是对胡安娜的背叛，也违背了她的婚姻契约。据历史学家贝瑟尼·阿拉姆说，1495年的条约规定，胡安娜和玛格丽特都将得到2万埃斯库多^[23]的岁入，以维持她们自己及其内廷的生活。^[24]在西班牙，玛格丽特得到的岁入不只这么多，还收到了其他许多贵重礼物。但在佛兰德，朝廷通过里尔的财政官衙发放给胡安娜的钱被截留，或者被佛兰芒廷臣贪污。

伊莎贝拉得知胡安娜在佛兰德的糟糕处境之后，促使她的驻佛兰德大使确保胡安娜得到应得的钱。他们尝试贿赂佛兰芒高官，以确保这些钱被支付给胡安娜，但其他人给这些高官的贿赂更多，以达到他

们的目的。西班牙人的努力没有成功。就连胡安娜获赠的礼物也被夺走，分发给其他人。

腓力似乎刻意让局势恶化。他不给妻子任何钱，哪怕是零用钱也不给。在她的仆人和西班牙使者看来，她没有为他们去努力抗争，或者抗争得远远不够。她很快就似乎屈服于这难以容忍的条件，听天由命了。

一位到访佛兰德宫廷的西班牙大使写道，胡安娜“生活拮据”，以至于她的仆人“快要饿死”。^[25]他说，胡安娜急需从父母那里得到经济支持。事实上，大使说，腓力不给他安排饮食，所以他也恳求卡斯蒂利亚给他送点现金。

腓力不定期给胡安娜金钱，而是大肆赏赐礼物，不过什么时候给，以及给什么，都由他决定。他赠给她一些属于他家族的贵重珠宝，有时也给她的仆人礼物和现金，所以他们更忠于腓力，而不忠于她。事实上，他们很快发现，只要不理睬、不尊重胡安娜的权威，他们就更容易得到腓力的恩宠。

这是典型的家庭暴力，让被征服的一方稀里糊涂、手足无措。腓力让胡安娜害怕、恐惧，并公开受辱。他不给她生活必需品，限制她获得金钱、朋友和与家人的联系。历史学家南希·鲁宾写道：“腓力……虐待胡安娜的手段简直成了一门精细的艺术，用性、温柔和恐吓来主宰她。”^[26]

腓力自己则被一名官员弗朗索瓦·德·布斯莱登控制，此人是贝桑松大主教，把大公掌握在自己手掌心，就像阿尔瓦罗·德·卢纳牢牢控制伊莎贝拉的父亲、胡安·帕切科主宰伊莎贝拉的哥哥恩里克四世一样。就连描述其关系的措辞也很像。派驻佛兰芒宫廷的西班牙大

使古铁雷·戈麦斯·德·富恩萨利达写道，“大主教若是不发话，腓力都不知道怎么吃饭。”[\[27\]](#)。

腓力的谋臣们纵容和怂恿他的恶习，以此控制他，就像阿尔瓦罗·德·卢纳操纵伊莎贝拉的父亲——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一样。胡安娜的处境和自己的外祖母伊莎贝拉类似，都被夹在丈夫及其宠臣之间，也同样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有一次，西班牙大使富恩萨利达敦促胡安娜强硬起来，与腓力独处的时候提出自己的要求。胡安娜摇摇头，悲伤地说，无论她私下里和腓力说什么，他都会告诉大主教。她告诉富恩萨利达，大主教是“腓力灵魂的绝对主人”。[\[28\]](#)。

很快就有迹象表明，腓力脑子里在盘算对胡安娜不利。胡安娜的哥哥胡安王子于1497年去世后，她为他服丧，腓力很快开始自称阿斯图里亚斯亲王，但这个头衔应当属于胡安娜的姐姐伊莎贝拉，即葡萄牙王后。腓力还开始努力想办法拉拢法兰西支持他对卡斯蒂利亚王位的权力主张，以取代他的大姨子伊莎贝拉，尽管她才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伊莎贝拉及其儿子米格尔的死为腓力控制整个西班牙扫清了道路。他似乎觉得胡安娜的存在很讨厌。1502年他抢在胡安娜前头进入托莱多，不是偶然。他决心取代她的位置。

腓力对自己儿女的态度也非常冷酷。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他对胡安娜控制欲极强，常虐待她。他们的孩子如期而至。1498年年末，大家都在屏住呼吸等待一个男孩的诞生，但这年11月15日，胡安娜生了个女儿埃莉诺。胡安娜身体健壮，生产非常顺利。

腓力在妻子分娩后大肆夸耀自己，他身穿富丽堂皇的锦缎和绿色丝绸衣服参加比武大会，以庆祝孩子的安全降生，赢得了群众的掌声。但他私下里告诉胡安娜，他觉得生了个女儿是令人沮丧的失败，

他不会为供养这孩子出一分钱。据西班牙大使的说法，大公说：“因为这是个女孩，让大公夫人自己承担孩子的抚养。如果上帝给我们一个儿子，我会出钱抚养。”^[29]

但胡安娜很快又怀孕了，这一次，1500年2月24日，在根特生下了万众期待的男孩，取名为查理。这就是伊莎贝拉女王在卡斯蒂利亚预言的那个孩子，因为他出生于圣马提亚的瞻礼日，他最终将成为西班牙国王。

第三个孩子伊莎贝拉出生于1501年，得名自胡安娜的母亲。小伊莎贝拉出生不久后，腓力把孩子们从胡安娜身边带走，安排由其他人抚养。这对她是新的打击。

我们不清楚伊莎贝拉女王对这些事态了解多少，也很难说，假如她知道，能够做些什么。她只能从大使那里了解到一鳞半爪的情况，似乎没有人能够认清胡安娜身边发生的怪事，尽管大家都同意，存在严重的问题。西班牙大使们敦促胡安娜写信给母亲，但她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多给母亲写信。在大使的一再问询下，她承认自己非常想念母亲，若是写信，伤痛太大。她告诉一名到访的教士，她“一想到自己的母亲，以及与她分隔多么遥远，就忍不住落泪”。^[30]

由于多方面原因，伊莎贝拉女王希望胡安娜回国。她和斐迪南国王敦促年轻夫妇尽快到西班牙来，并带上孩子，以确保他们的遗产。由于西班牙与法兰西的关系持续紧张，西班牙的两位君主告诉年轻夫妇，要坐船来。此时，因为法兰西入侵意大利，西班牙与法兰西已经陷入了多年争端，斐迪南还因为法兰西仍然占据鲁西永和佩皮尼昂这两座边境城市而愤愤不平。如果法兰西俘获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王位继承人，西班牙就将丧失一切砝码，胡安娜还可能会受到伤害。

但腓力坚持走陆路，穿过法兰西。他同意向路易十二国王宣誓效忠，以换取两国边境上三座城镇的控制权。胡安娜拒绝臣服于法兰西，刻意穿着西班牙服饰，并在舞会上跳了一支西班牙舞，令法兰西东道主恼火，让她丈夫窘迫。此时他似乎已经到了完全无法容忍看到她的地步。

这对年轻夫妇于1502年抵达西班牙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伊莎贝拉女王派遣她高度信赖的好友古铁雷·德·卡德纳斯（三十年前她登基的时候，就是他在庆典上高举宝剑）去边境迎接并护送他们到宫廷。德·卡德纳斯自女王的少女时代就是她力量的源泉和可信赖的盟友，她在处置新的家庭关系时，寻求他的辅佐。

伊莎贝拉没有安排好胡安娜和腓力进入托莱多的仪式，但其他方面的很多事情都按照计划顺利进行了。他们来到这座古老的西哥特城市，因为国会在那里召集。伊莎贝拉安排国会向胡安娜宣誓效忠，尊她为母亲的当然继承人，而腓力获得的是较低的君主配偶的身份。然后夫妻俩前往萨拉戈萨，阿拉贡国会同样向胡安娜宣誓效忠，这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指定女性为王位继承人。腓力意识到自己的继承权下降了一位，很不高兴。他不愿意仅仅当女王的配偶。勃艮第曾经有过女性统治者，所以他对女性掌权的概念并不陌生，但他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大发雷霆。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尽其所能地平息紧张气氛。他们努力去更加了解腓力，对其施加影响，但他显然更关心娱乐，而不是教导。他的粗野举止与他的青春帅气形成对照，使得所有人都感到不舒服。在布尔戈斯的一次比武大会上，他向人群抛掷吃剩的糖果，看着穷人争抢，哈哈大笑。他喜欢在化装舞会上穿土耳其服饰，并假装自己是摩尔人。但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还是安排了聚会、宴席和比武大会，为腓力

提供消遣。胡安娜又一次怀孕之后，讨好腓力变得更重要。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希望腓力和胡安娜永久性留在卡斯蒂利亚。

但腓力越来越急切地要离开。他的亲密伙伴布斯莱登大主教和他一起到了西班牙，在短暂患病后暴毙。腓力厌恶卡斯蒂利亚的生活，简直恐慌起来。他似乎觉得，大主教是被毒死的，他自己也会遭到同样命运。他急于尽快离开卡斯蒂利亚。他宣布自己立刻就要动身。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恳求他留下。圣诞节到了。他们又一次与法兰西交战，争议话题仍然是那不勒斯和鲁西永。胡安娜怀孕的月份已经大了，让她走远路很危险。

但腓力坚持要走，说他已经答应自己的臣民，要在一年内返回佛兰德。让胡安娜公主在圣诞节期间被丈夫抛下，是很尴尬的事情。她还爱他，至少在某些层面上是爱的，但他对她毫无兴趣，所以她在这段关系中无计可施。她哭泣，抽噎，哀求他留下。他粗暴地拒绝，这在卡斯蒂利亚宫廷人尽皆知。彼得·马特对他的顽固感到震惊。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这些事情也没有让腓力软下心肠，他无比坚决，准备出发了。”^[31]

圣诞节期间，腓力起航前往佛兰德。他跨越边境进入法兰西之后，找到了许多新的娱乐。法兰西人是寻找愉快消遣的大师。他在那里逗留了数月，明确表示他离开卡斯蒂利亚的理由都只是借口。胡安娜的父母正在与法兰西争夺那不勒斯，对他的不忠和软弱性格感到震惊。他完全被法兰西人主宰，受制于他们，这对他自己和对西班牙的利益都是威胁。彼得·马特写道：“他的谋臣都被法兰西的贿赂收买了。他们对他的影响力极大，以至于他似乎不是自己的主人。”^[32]

腓力继续在法兰西停留，让胡安娜越发感到自己被抛弃了，她对他在夫妻分离期间的拈花惹草十分吃醋，甚至到了执迷的地步。她的

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西班牙驻佛兰德大使古铁雷·戈麦斯·德·富恩萨利达写道：“他特别容易受到谋臣的影响，那些人让他过着放荡的生活，执迷不悟，带他从一个宴会去另一个宴会，从一个女人身边到另一个女人身边，直到他的身体和灵魂都被法兰西人控制，他们把他变成了自己的卫星。”^[33]

胡安娜备受羞辱和伤害，竟将怒火转向自己的母亲，因为母亲坚持要她留在西班牙。斐迪南又一次上战场，在佩皮尼昂与法兰西人交战，所以伊莎贝拉承受了胡安娜的大部分怒火。公主“终日愁眉苦脸，日日夜夜地胡思乱想，若没有人催她，她就一言不发；一旦说话，都是令人不快的话”。彼得·马特写道。^[34]

3月，胡安娜几乎无法抑制的怒火还在燃烧的时候，在埃纳雷斯堡生下了自己的第四个孩子，也是她的第二个儿子。他被取名为斐迪南，以纪念他的外祖父。这次分娩仍然很顺利。胡安娜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就开始坚持要求到自己丈夫身边。她发了疯似的要重新夺回他的爱和关注。为了尽快动身，她愿意把婴儿留在她父母身边。伊莎贝拉想尽办法延缓她的动身，因为要去佛兰德，就需要从陆路经过法兰西，此时西班牙与法兰西激战正酣；若走海路，就要承受极大风险。

伊莎贝拉劝服胡安娜，她们应当去家乡，即塞哥维亚的宫殿，因为塞哥维亚在去往布尔戈斯的路上，因此也在去佛兰德的路上。到了那里之后，她派遣胡安·德·丰塞卡护送胡安娜继续前进，去梅迪纳·德尔·坎波。伊莎贝拉一定是觉得此事十分微妙，才挑选胡安·德·丰塞卡，因为他原本已经在忙于监管前往新大陆的远航，她一定是觉得可以完全信赖他。

胡安娜抵达梅迪纳·德尔·坎波的拉莫塔城堡之后，收到了腓力的一封信，要求她到他身边。她大吵大闹地要立刻出发。她命令仆人

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动身。这让胡安·德·丰塞卡陷入了两难境地，因为如果他阻拦她，就会招致她的愤怒；如果他不阻拦，就等于是违背了女王的命令。最后丰塞卡命令将要塞大门紧闭，不准胡安娜离开。她大发脾气，威胁等她当了女王之后要处死他。的确，伊莎贝拉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胡安娜很快就会有权力惩罚让她不悦的人。

丰塞卡向伊莎贝拉发去十万火急的消息，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努力劝说胡安娜等待她母亲抵达来商讨此事。胡安娜怒气冲冲，企图冲出要塞，仿佛要孤身一人去佛兰德。丰塞卡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准开门。胡安娜大声叫骂哭喊，拒绝回房，于寒风中在要塞城墙上待了一夜。她飘忽不定和歇斯底里的行为引起了全城人的注意。

伊莎贝拉女王的身体很差，但她是个护犊心极强的母亲，立刻上路去照顾自己的女儿。就像当年与葡萄牙人发生战争、国内爆发叛乱、她的长女伊莎贝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被困在塞哥维亚城堡蒙受风险，她急匆匆奔去营救女儿一样。伊莎贝拉和胡安娜的对质让双方都很痛苦。带有虐待性质的关系里，执迷不悟的爱是可怜兮兮的景观，而这一旦发生在王室，立刻就成为了令人窘迫的公共丑闻。

最后胡安娜冷静下来，离去了。伊莎贝拉精疲力竭，再也不能前进，于是在梅迪纳·德尔·坎波家中住下。这是她童年很熟悉的地方。这不幸的事件让她越发衰弱。她的一位秘书写道，伊莎贝拉女王“被公主殿下搞得悲恸而疲惫”。[\[35\]](#)。

与此同时，伊莎贝拉对卡斯蒂利亚的梦想似乎要化为泡影了。胡安娜的行为明确表明，她缺乏稳固确立自己为女王而必需的冷静和稳重。而且她和一个轻浮而堕落的男人捆绑在一起，这男人更关心自己享乐，而非西班牙的利益。

胡安娜返回佛兰德之后，发生了更多戏剧性事件。腓力与宫廷的一位女士发生了炽热的婚外情。胡安娜大吃其醋，向竞争对手猛扑过去，命令将那女人的长长金发剪掉。腓力暴跳如雷。“他对她的言辞非常残酷，对她伤害很大。他们说他还动手打她。”编年史家阿隆索·德·圣克鲁斯写道，“因为胡安娜公主是个娇弱的年轻女子，而且自幼娇生惯养，受到母亲的教导，所以对自己受到的虐待非常悲愤，病倒在床。”^[36]

为了让胡安娜闭嘴，腓力命令将她关在卧室内。她猛烈捶打地板和天花板，要求与丈夫说话。他置之不理，她开始绝食。西班牙大使的报告让伊莎贝拉更悲伤，她敦促使者们想办法促进互相争斗的夫妻间“互爱和谐”。^[37]

伊莎贝拉的御医担心，女王因为胡安娜而产生的感情波动会促使她的健康恶化。她的病情确实从那时起持续恶化，几乎一直高烧不退。“女王忧心忡忡，对腓力王子非常恼火。”圣克鲁斯写道，“她也为自己安排了他们的婚姻而感到痛苦。”^[38]

但伊莎贝拉还有另外一件棘手的家事要解决：又有一位年轻的亲戚英年早逝。凯瑟琳的丈夫威尔士亲王亚瑟于1502年4月2日因瘟疫去世。凯瑟琳也染上了瘟疫，但活了下来。又有一个宫廷陷入深切的哀恸。他们又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如何安排寡居的公主。

伊莎贝拉女王向英格兰国王提了两个建议：要么把凯瑟琳送回西班牙，要么把他嫁给亚瑟的弟弟亨利。两国宫廷都在考虑第二个选择，以及如何顺畅地处理财政上的安排。当然，这立刻引发了新问题，因为当初凯瑟琳和亚瑟结婚时为了金钱的争执还没有平息，嫁妆的一部分还没有支付。

亨利七世国王一边为自己儿子哀悼，一边紧紧抓住自己的保险箱。他要求西班牙朝廷支付剩余的嫁妆。他让年轻公主的生活很困难，拒绝给她现金以支付她自己和侍从的生活开销。凯瑟琳成了寡妇，就已经够糟糕的了，现在她还成了一个穷困的寡妇。她不得不从娘家和亨利七世国王那里哀求施舍。唯一安慰她的，是婆婆约克的伊丽莎白的善意。

但这唯一的支持也消失了。亚瑟王子去世大约十个月之后，约克的伊丽莎白因难产而去世。亨利七世为自己温柔而长期受苦的妻子的死流了几滴眼泪，然后开始寻求续弦。他觊觎凯瑟琳青春年少的面庞和身体。或许当初她抵达英格兰时，他急于看她，不仅仅是为了儿子的利益。他写信给卡斯蒂利亚，建议把凯瑟琳嫁给他。

这建议让伊莎贝拉女王大为震惊。她明确无误地拒绝了。“那将是史无前例的非常糟糕的事情，仅仅提及，就冒犯人的耳朵。”她告诉自己的驻英大使。^[39]她坚持说，英格兰的唯一选择是年轻的亨利。要么让凯瑟琳嫁给亨利王子，要么让她回家。

但要安排这桩婚事，又需要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批准亨利娶自己兄长亚瑟的遗孀。但她真的算是遗孀吗？有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凯瑟琳与亚瑟是否已经圆房。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

斐迪南国王被要求向教皇提出这个请求。教皇是国王的毕生盟友，不过他们的关系也有过起伏。这些关于教皇特许的长距离讨论非常耗时和复杂，有时要花费昂贵的代价，所以伊莎贝拉开始寻求所有人的帮助，以确保教皇的官方文书尽快送抵西班牙和英格兰宫廷。

1504年，让人等待许久的文书终于到了。伊莎贝拉长舒了一口气。她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看到凯瑟琳终于顺利地成为未来亨利八世国王的王后，或许能够缔结一段美满婚姻，她感到满意。

毕竟，已经有了教皇的许可和祝福，能出什么差错呢？[\[40\]](#).

[\[1\]](#). Caro Lynn, *A College Professor of the Renaissance: Lucio Marineo Sículo Among the Spanish Humanis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7) , p.122.

[\[2\]](#). Peter Martyr to Perdro Fagiardo, Lord of Cartagena, December 19, 1494, in *Opus Epistolarum: 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ondon: Wellcome Library) .

[\[3\]](#). Ferdinand Columbus, *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 By His Son Ferdinan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9) , p.215.

[\[4\]](#).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An Account, Much Abbreviated,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ed. Franklin W.Knight, trans. Andrew Hurley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3) , p.xvi.

[\[5\]](#).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trans. Andrée Collard (New York: Harper&Row, 1971) , p.71.

[\[6\]](#). 多乌拉是11~16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多种金币，币值在不同世代和地区差别很大。“多乌拉”原先的意思是“两个马拉维迪”。

[\[7\]](#). Ruth Mathilda Anderson, *Hispanic Costume, 1480-1530* (New York: 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 1979) , p.142.

[\[8\]](#). Document from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Colección Salazar, A-11, fol.288r-v , cited in Luis Suárez Fernández,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Isabel la Católica: Estudios y documentos* (Valladolid: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2002) , pp.6: 108-9.

[\[9\]](#). Nancy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 (New York: St.Martin' s Press, 1991) , p.378.

[10]. Hernando del Pulgar, *Crónica de los Senore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de Castilla y de Aragón* (Madrid: Biblioteca de Auto res Españoles, Librería de los Sucesores de Hernando, 1923) , p.3: 65.

[11]. Ochoa de Isasaga to the Reyes Católicos, November 24, 1500, Estabdo Leg.3678, fol.17, cited in Antonio de la Torre, and Luis Suárez Fernández, *Documentos referentes a las relaciones con Portugal durante 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858; Valladol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Patronato Menéndez Pelayo, 1963) , pp.66-69.

[12]. Fray Prudencio de Sandoval, *Historia de la vida y hechos del emperador Carlos V* (Madrid: Biblioteca de Autores Españoles, Atlas, 1955) , p.22.

[13]. Antonio Henrique de Oliveira Marques, *History of Portugal, vol.1, From Lusitania to Emp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 p.2: 214.

[14]. Edward McMurdo, *History of Portugal* (London: St.Dunstan' s House, 1889) , pp.3: 111-13.

[15]. José-Luis Martín, *Isabel la Católica: sus hijas y las damas de su corte, modelos de doncellas, casadas y viudas, en el Carro de las Doñas, 1542* (Ávila: 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Ávila, Institución “Gran Duque de Alba, ” 2001) , p.109.

[16]. 即本人未到场, 由他人代行仪式。

[17]. Sandoval, *Historia de la vida y hechos*, p.20.

[18]. 拉科鲁尼亚为西班牙西北部港口城市。

[19]. Giles Tremlett, *Catherine of Aragon: The Spanish Queen of Henry VIII* (New York: Walker&Co., 2010) , p.81.

[20]. Garrett Mattingly, *Catherine of Aragon* (New York: Quality Paperback Books, 1941) , p.55.

[21] Christopher Hare, *The High and Puissant Princess Marguerite of Austria, Princess Dowager of Spain, Duchess Dowager of Savoy, Regent of the Netherland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ons, 1907) , p.79.

[22] Bethany Aram, *Juana the Mad: Sovereignty and Dynasty in Renaissance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 p.35.

[23] 西班牙、葡萄牙的古货币，不同时期的币值差别很大。

[24] Bethany Aram, *Juana the Mad: Sovereignty and Dynasty in Renaissance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 p.47.

[25] Subprior of Santa Cruz to Fernando and Isabel, January 15, 1499,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 Patronato Real 52-116, cited Bethany Aram, *Juana the Mad: Sovereignty and Dynasty in Renaissance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 pp.48, 49.

[26]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p.377.

[27] Jacobo Stuart Fitz-James and Falcó Alba, *Correspondencia de Gutierre Gómez de Fuensalida* (Madrid: Imprenta Alemana, 1907) , p. xxvii.

[28] Jacobo Stuart Fitz-James and Falcó Alba, *Correspondencia de Gutierre Gómez de Fuensalida* (Madrid: Imprenta Alemana, 1907) , p. xxv.

[29] Tomás de Matienzo to Fernando and Isabel, January 15, 1499,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 Patronato Real 52-116, cited in Aram, *Juana the Mad*, p.52.

[30] Subprior of Santa Cruz to Isabella, January 15, 1499, in Bergenroth, ed.,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31].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 September 20, 1502, in *Opus Epistolarum*.

[32].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 December 19, 1503, in *Opus Epistolarum*.

[33]. Stuart Fitz-James and Alba, *Correspondencia de Gómez de Fuensalida*, p. ix.

[34]. Peter Martyr to Cardinal Santa Croce, March 10, 1503, in *Opus Epistolarum*.

[35]. Vicente Rodríguez Valencia, *Isabel la Católica en la opinión de españoles y extranjeros, siglos XV al XX* (Valladolid: Institute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 1970) , p.1: 278.

[36]. Alonso de Santa Cruz, *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Seville: Escuela de Estudios Hispano-Americanos de Sevilla, 1951) , p.302.

[37]. Aram, *Juana the Mad*, p.77.

[38]. Santa Cruz, *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p.302.

[39]. Tremlett, *Catherine of Aragon*, p.99.

[40]. 后来的故事非常有名。亨利八世因凯瑟琳没有生下男性继承人而厌弃她，为了与她离婚并娶安妮·博林，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后来英格兰脱离了天主教会。

二十二 失去牧者的教会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伊莎贝拉女王的全副精力集中于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她的宗教信仰、儿女的福祉，以及西班牙的安全。

对法战争仍在进行，一年年拖下去，令人疲惫。法兰西开始命途多舛的入侵意大利半岛的行动，已经差不多过去十年了。1499年，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离开西班牙，去希腊和意大利作战。1503年，他又参加了那不勒斯的扫荡残敌的行动。他和他的部下为西班牙的两位君主效力，勇猛无畏而不知疲倦地奋斗，抵挡着严酷天气、疲劳，甚至饥馑。随着战争继续，女王一直是他最坚持不懈的支持者。1503年5月，她亲笔写信给他，敦促他在那不勒斯赢得彻底胜利。“所有基督徒和异教徒的眼睛都在注视你的事业。”她这样告诉他，恳求他尽快前进，取得尽可能大的战果。^[1]

尽管女王对贡萨洛很忠诚，但西班牙有人在大力诋毁攻击她，领头并煽风点火的就是斐迪南，他从远距离批评贡萨洛的所谓错误或过失。那些斥责贡萨洛的战役花费过大、耗时过久的人，都会得到国王恩宠。传记作家玛丽·珀塞尔写道：“所有人都窃窃私语，贵族们，甚至国王本人都说大元帅的好运气用完了。……伊莎贝拉女王是唯一支持他的人，说他们不应当在亲眼看到战况之前就评判他。”^[2]

但所有目睹贡萨洛作战的人，都认可他的英勇。一位法兰西编年史家写道：“西班牙人打起仗来像魔鬼，大元帅在进攻的第一线冲锋

陷阵，直呼自己的武士们的姓名，鼓舞他们。”^[3]1503年12月，在加里尼奥拉，通过一次经典的奇袭，他赢得了一场压倒性胜利。他在冬季寒风刺骨、大雨瓢泼的恶劣天气中攻击法兰西军队。敌人的一些关键的防御阵地无人防守。西班牙人建造了一座隐蔽的桥，部队借此猛然冲入法军营地，“一举全歼在意大利的法兰西军队”。军事史学家查尔斯·奥曼写道。^[4]

西班牙人大获全胜。彼得·马特写道：“参战的法兰西人中，绝大多数都死于刀剑、饥馑、疾病，逃脱的人极少。”^[5]在卡斯蒂利亚，伊莎贝拉女王对自己的长期好友取得的伟大胜利禁不住扬扬得意。“我坚信不疑，他必然胜利，”她告诉廷臣们，“大元帅办不到的，我们国内无人能办得到。那些诋毁他的人纯粹是出于嫉妒。”^[6]

对法兰西人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大元帅在取胜之后，对落败的敌人大发慈悲。他收拢了法兰西残兵败将（他们被其领袖抛弃在意大利），免费提供交通工具，送他们回家。这对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来说是又一剂苦药，于是他决定夺回鲁西永和佩皮尼昂，作为报复。为了这两个城镇，法兰西和斐迪南及其父亲已经争斗了五十年。斐迪南国王率军迅速北上，企图驱逐法军。在那不勒斯战争期间，大元帅赢得了所有的荣誉，国王置身于局外，现在他大放光彩的机会来了。

在卡斯蒂利亚，伊莎贝拉女王又一次开始了行动。她继续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动员军队、准备战争。她把战争后勤发挥到完美的程度，高效地聚集部队、给养、甲冑、马匹、大车、粮草和医疗物资，并准备好运输。用西班牙历史学家塔西西奥·德·阿斯科纳的话说，她成了军需后勤艺术的“完美专家”。^[7]

但伊莎贝拉对此次军事行动并不感到高兴，因为她执着于讨伐穆斯林，而不是其他基督徒。据彼得·马特记载：

我们的天主教女王似乎从来不会因为这种成功而感到喜悦。每当她得知不管什么地方有基督徒流血死亡，就愁云满面。这是故作姿态还是发自内心，唯有上帝知道，因为他居住在人的内心。她叹息道，她更希望这些鲜血没有流，让这些人去对抗我们律法的敌人。但国王镇静自若，平静地说，不管敌人是什么人，都应当被消灭。^[8]

彼得·马特说不准伊莎贝拉的悲伤是真是假。尽管他在她的宫廷生活了超过十五年，并在她身边待过很长时间，仍然很难把握她的真实感受。她掩饰自己真实思绪和情感的本领纯熟得惊人。

斐迪南率军奔向西班牙北部的战场之时，尽管胡安娜问题缠身，伊莎贝拉还是确保国王得到所需的给养和军械。全国各地派来装备精良的辅助部队。她定期了解部队的运动情况，每天有多名信使快马加鞭地送来战区的最新消息。但她对这次新战役并不热情。她担心法兰西人会愚蠢地尝试猛攻固若金汤的萨尔萨斯城堡，那样他们会伤亡惨重。到此时，西班牙已经连续征战三十年，西班牙军队已经成为一台极其高效的杀戮机器，伊莎贝拉可以预见法兰西必然再次遭到惨败。

事实上，在部队前进之时，伊莎贝拉女王给塞哥维亚的所有男女修道院发去书信，命令他们为法兰西士兵祈祷。在他们估计战役开始的那天，她率领宫廷作了一天的祈祷和斋戒。她为法兰西的安全祈祷。女王的祷告生效了：法兰西人决定在夜间，趁斐迪南及其士兵睡觉时，放弃自己的阵地。斐迪南发现法军撤退，于是追击，但法军已经安全逃脱了。伊莎贝拉得知丧命的基督徒极少，长舒了一口气。彼得·马特在1503年11月写道：“就这样，上帝听到了神圣女王和宫廷的教士与贵妇们的祈祷。他给了法兰西人一条出路，让他们安全撤退。那么，请感谢上帝。因为你赢得了一场流血极少的胜利，所以上帝亲近你。”^[9]

当然，这样的结局没有给斐迪南希冀的那种光荣胜利，于是他继续批评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

伊莎贝拉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斐迪南：获取教皇的批准，好让凯瑟琳与亨利结婚。她自己不能直接向教皇请求许可，因为她此时正在与教皇公开冲突，通过信使给他送去了书信，批评他的行为和领导教会的方式。她相信，教会未能自我改良，使得教会陷入了危机。她表达这些担忧的时候，新教运动还没有开始，此时马丁·路德是埃尔富特的一名十九岁大学生；而反宗教改革运动，即天主教会对手德的批评做的回应，还是四十年之后的事情。

伊莎贝拉女王知道，在意大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身边环绕着丑闻和批评。目光炯炯、长着鹰钩鼻的意大利讲道者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发表了言辞激烈的布道，攻击教会和公共生活的腐败。他警告大家提防坏神父与坏僧人、鸡奸、色情作品、赌博、卖淫、酗酒和放荡服装。他告诉群众，上帝会降下灾祸，以惩罚人们的罪孽。1492年年末，他在夜间得到了一个幻象，看见天上一只手挥舞着剑。他警示说，上帝在发怒，将要复仇。此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占据上风，在各地击溃基督徒军队，所以全欧洲人都愿意听信他的这番推论。萨伏那洛拉告诉他的追随者：“天主的剑要来了，很快就要来。”1495年，法兰西军队野蛮入侵意大利，很快让佛罗伦萨群众相信，他预见了未来。

他关于教会腐化堕落的讲道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包括伊莎贝拉。她正在努力涤荡西班牙教会的腐败。萨伏那洛拉的传记作者戴斯蒙德·苏厄德写道：“他的首要目标是改革和复苏天主教世界。”伊莎贝拉也在同样的动机驱使下努力，尽管她不愿意如此公开地挑战教会。

萨伏那洛拉获得了更多追随者，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开始感到不安，因为萨伏那洛拉谴责的很多罪恶，亚历山大六世自己都犯过。教

皇打算收买萨伏那洛拉，于是提议封他为红衣主教，但这名修士公开拒绝了这诱惑，并称戴上这主教冠的人会遗忘基督生活的关键教义。

“虚荣的篝火”事件令萨伏那洛拉声名鹊起，这一事件发生在1497年和1498年的大斋节。商业银行家和佛罗伦萨实际统治者洛伦佐·德·美第奇死后，城里出现了权力真空。1496年和1497年，佛罗伦萨发生了旱灾和饥荒。儿童倒毙在街头；人们蜂拥而去，抢夺施舍的免费粮食，导致有人被踩踏而死。萨伏那洛拉劝服群众，他们的淫荡享乐招致了上帝的怒火。他呼吁他们搭建一个木头平台，在上面烧毁代表人类罪恶的东西和并非生活必需的奢侈品。被投入篝火的东西包括华丽服装、纸牌、画作和书籍，其中有的是色情作品，但也有伟大的艺术作品，它们歌颂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核心的感官享受。

很快萨伏那洛拉开始公开谴责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起初对此不予理睬。随着支持者越来越多，佛罗伦萨的修士对教皇的詈骂也越来越刺耳。他把亚历山大六世比作奴役以色列人的埃及法老，将自己比作解放人民的摩西。最后教皇受够了，决定永久性除掉萨伏那洛拉。他对萨伏那洛拉施以绝罚。但萨伏那洛拉反驳说，教皇的行动无效。亚历山大六世在一封信里称萨伏那洛拉为“小虫子”，他很快决定将这个讨厌的神父处死。[\[10\]](#)

萨伏那洛拉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快到了。他停止讲道，决定向欧洲各国君主求救。他请求神圣罗马皇帝和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与匈牙利国王召开一次会议，推翻教皇：

复仇的时刻到了。天主命令我揭示新的秘密，向世界明确宣示，由于你们的疏忽，圣彼得之船受到了怎样的威胁。教会从头到脚满是罪恶，但你们不仅没有设法医治它，还向污染教会的邪恶之源俯首称臣。因此，天主大为震怒，长期以来已经让教会没有了牧者。

然后他继续具体地攻击教皇，提及亚历山大六世“所有那些昭然若揭的罪恶——我宣布他不是基督徒，也不相信上帝的存在”。[\[11\]](#)

在给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信中，他补充了一些特别有针对性和攻击性的句子：“你们打败异教徒的胜利有什么益处？你们建造的是空中楼阁，因为教会的地基在崩坍，整个建筑就要毁灭。”[\[12\]](#)

萨伏那洛拉的盟友将书信送给各位统治者，包括西班牙的两位君主。但信的一个副本落入了教皇手中，这对他来说是压断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宗教法官就质疑萨伏那洛拉的正统性，希望证明他是个奸诈的异端分子。他遭到毒刑拷打，最终承认，他的讲道全都是“骄傲”的行动，是“为了个人出风头”。[\[13\]](#)他签署了认罪书。教会已经从他身上得到需要的东西，于是将他绞死，并焚毁尸体。那时他已经丧失了群众的拥护。他受火刑时，群众中的佛罗伦萨人往火里投掷火药，让火烧得更热。

但萨伏那洛拉的行动给了马丁·路德一些灵感。他仰慕萨伏那洛拉的言辞和挑战教廷权力的勇气。1524年，路德出版了一本书，记载萨伏那洛拉的冥思，并对其加以赞誉。

马丁·路德不是萨伏那洛拉的唯一仰慕者。在遥远的卡斯蒂利亚，伊莎贝拉女王收藏了萨伏那洛拉写的一份评论著作，还有一部手写稿，是宗教冥思的书，翻译成了西班牙文，称为《论诗篇第51篇》。[\[14\]](#)

伊莎贝拉私下里通过自己的大使向教皇施压，希望他能像萨伏那洛拉公开宣传的那样有所改良。她支持组建一个议事会，对罗马天主教会进行研究，并执行必需的改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反对她的做法。他是在现存制度下攀升到教会权力巅峰的，改革议事会可能会威胁他为自己和家人获得的一切。

因此，伊莎贝拉和教皇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有时她发现与自己对抗的有西班牙教士，因为他们不支持她进行的教会改革；还有梵蒂冈，因为它抱怨她过于严苛。她任命西斯内罗斯为托莱多大主教，就象征着她在西班牙塑造的教会机构与罗马惯常的情况之间的差别。

许多西班牙教士已经惯于在教会拥有的大量地产上过轻松舒适的生活，由敬畏上帝的教民供养。这些教民通过向教会赠送货物与财产，来保障自己的灵魂得救。但卡斯蒂利亚的最高级教士托莱多大主教西斯内罗斯遵循的是基督本人的榜样，回避富丽堂皇的排场。他穿着粗布袍子，赤脚从一家修道院走到另一家，并寻求人们施舍饭菜。这是罗马与西班牙的天主教会之间早期争议的话题之一。教皇抗议说，西斯内罗斯没有维持教会的尊严，命令他穿得更尊贵些。

但西斯内罗斯固执己见，并得到伊莎贝拉的大力支持。他到了每一家修道院，都认真查账，寻找奢侈生活的迹象。他命令各家修道院取消所有的奢侈排场，只提供朴素和便宜的饭食，并放弃贵重服装。教士的小妾被从修道院赶走。他强调教士应当为信众服务。发出抗议的教士被赶出他们居住的修道院。有些教士举行了示威游行，在托莱多高举十字架，高唱“以色列人在流亡”，以强调自己的苦楚。[\[15\]](#)

教皇派遣葡萄牙红衣主教若热·达·科斯塔来调查。他与卡斯蒂利亚教士们达成一致意见，认为西斯内罗斯的节俭苦行措施太过分了。达·科斯塔求见女王，并告诉她，他认为西斯内罗斯的改革损害了修道院的利益，他的道貌岸然只不过是实现自己野心的借口。他坚持要求伊莎贝拉迫使西斯内罗斯辞职。[\[16\]](#)

女王面无表情地听他说话。他说完之后，她答道：“你疯了吗？你知道自己在和谁说话吗？”

红衣主教达·科斯塔冷淡地答道，伊莎贝拉和他一样，只不过是“一捧尘土”而已。换句话说，她的圣洁和西斯内罗斯一样，只是虚荣而已。^[17]

但伊莎贝拉坚定不移地支持西斯内罗斯及其改革，她相信教会需要改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最终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妥协，允许西斯内罗斯继续开展改革。

但教皇战胜了另一个狂热的教士，臭名昭著的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即斐迪南的前任忏悔神父，后成为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首席宗教法官。托尔克马达变成了一个危险的狂热分子，于是教皇决定在1494年静悄悄地将他罢免，说这是为了照顾他的健康，因为他患了痛风。^[18]

但几年后，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突出地表达了对托尔克马达及其在异端裁判所工作的感激。1497年他们的儿子胡安王子去世后，遗体被安放在托尔克马达的宗教家园，即阿维拉的王家圣多马修道院，并特地要求拨出专款，在那里举行数千次弥撒，以抚慰胡安的灵魂。将胡安埋葬在那里，使得这座教堂成了一个朝圣地，增进了它在信徒当中的声望，也纪念了托尔克马达及其手段。

伊莎贝拉女王与教皇的分歧导致他们各自的最亲密盟友在罗马发生了多次激烈冲突。第一次这样的冲突让教皇措手不及。

在法兰西于1494年第一次入侵意大利之后，女王派遣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去保卫教皇，他成功地帮助教皇国收复了港口城市奥斯提亚。1497年，教皇邀请大元帅去罗马，以便褒奖他。他以为这个虔诚的卡斯蒂利亚军人会受宠若惊；不料贡萨洛利用这次机会，表达了自己对梵蒂冈道德败坏的严重担忧，还说教皇没有给基督徒立下好榜样。据阿拉贡编年史家苏里塔记载，贡萨洛告诉教皇，他

为教会制造了“丑闻和危险”。他要求教皇改过自新，并说他必须要这么做。教皇被贡萨洛的口若悬河震惊了，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被大元帅直言不讳的批评弄得“怯懦而羞愧”。[19].

两年后，伊莎贝拉及其盟友对教皇发出了新的批评。1499年年末，西班牙的两位君主命令他们的大使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向教皇大声宣读他俩写的对教皇的斥责，抨击他道德堕落、为自己孩子谋取私利，以及他的儿子切萨雷惊世骇俗的丑行。教皇大发雷霆，企图夺走这封信并将其撕成两半，高声辱骂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德·拉·维加在一封信里向伊莎贝拉汇报了此事，并说教皇“极度虚伪”，令人无法忍受。[20].

在1498年的另一次类似冲突中，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威胁要命人将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扔进台伯河。这话有点怪异，因为亚历山大六世自己儿子的死尸是从同一条河里打捞上来的。[21]听到这些话的大使们说，西班牙人告诉教皇，他的儿子的死是上帝在惩罚教皇的罪孽；教皇反驳说，卡斯蒂利亚的胡安王子和伊莎贝拉公主的死是因为伊莎贝拉女王篡夺恩里克四世国王之女的王位，因此犯下大罪，并高呼，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是“侵略者和篡位者”。[22].

教皇生气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伊莎贝拉在收复格拉纳达之后，应当给他的家族一些格拉纳达的土地。他让自己的儿子甘迪亚公爵乔万尼（他已经去了西班牙）向女王索要这样的土地，并以为女王一定会满口答应。但乔万尼后来被刺死并被扔进台伯河，他的遗孀（也是斐迪南的亲戚）顽固地大吵大闹，并开始一口咬定，她相信是乔万尼的哥哥切萨雷杀害了乔万尼。她要求以谋杀罪审判切萨雷。斐迪南的家族不仅没有慷慨地封赏土地，还要起诉教皇家。

乔万尼被谋杀的动机非常模糊。有些人相信，切萨雷怨恨自己被迫成为教士，嫉妒弟弟纵情享乐的世俗生活。也有可能是因为非常棘

手的三角恋，因为切萨雷和乔万尼都与阿拉贡的桑恰有私情，而桑恰嫁给了他们的弟弟乔弗雷。但桑恰也是斐迪南的亲戚。这真是一团乱麻。

人们普遍怀疑切萨雷下令谋杀了斐迪南的另一个亲戚，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的私生子——比谢列的阿方索。不幸的阿方索是切萨雷的妹妹——美丽的卢克雷齐娅的丈夫。令事情越发复杂的是，被谋杀的阿方索是切萨雷的情妇桑恰的兄弟。又是一团乱麻。

伊莎贝拉女王也非常不赞成切萨雷辞去红衣主教职位的动机和手段。切萨雷从来不想当教士。现在他的弟弟死了，他希望离开教会，娶一位公主，以便自己成为一位亲王。他看中了那不勒斯国王费德里科的女儿卡洛塔。卡洛塔不想嫁给切萨雷，因为大家都知道切萨雷患有梅毒，而且她父亲也不曾尝试强迫她嫁给切萨雷。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也不这么打算。此时，他们全都开始觉得，与切萨雷扯上家庭关系，对自己的生命是威胁。

于是，切萨雷和他的教皇父亲与法兰西结盟了。这个举动出人意料，也与之前的事态很不协调，因为仅仅在两年前，亚历山大六世还呼吁全欧洲的统治者与他联合，对抗入侵意大利、控制教皇国土地和占领那不勒斯的法兰西人。现在教皇却化敌为友，而且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向他提出了慷慨的提议。教皇批准路易十二与相貌普通而虔诚的瓦卢瓦的让娜离婚，以便他能娶富有的寡妇布列塔尼的安妮^[23]。作为交换，路易十二允许切萨雷在法兰西随意挑选一位女继承人当老婆。他选择了阿尔布雷的夏洛特，她是一位法兰西贵族，也是纳瓦拉王室成员。切萨雷辞去红衣主教职位的当天，路易十二封他为瓦伦蒂努瓦公爵，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文字游戏，因为切萨雷曾经是巴伦西亚大主教^[24]。于是切萨雷获得了一个新绰号“瓦伦蒂诺”。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热衷于建立一个军事扩张的家族产业，以扩张自己的领土，于是任命切萨雷为教皇国军队总司令。切萨雷开始率军在意大利横冲直撞，控制了伊莫拉和弗利城。切萨雷还指挥法兰西军队攻打那不勒斯与卡普阿，防守这两座城市的是意大利雇佣兵统领普罗罗斯佩罗·科隆纳。所以，他最后参加了彻底消灭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族的行动。就在这个时候，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看到他们亲戚的统治已经垮台，于是与法兰西联手，瓜分了那不勒斯。

切萨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父亲作为教皇发挥的作用，也是因为他的确是欺骗和奸诈的天才，而且他拥有个人魅力，能够让阻挡他的人放松警惕，并使得他在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获得民众支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的同时代人马基雅弗利非常崇拜和仰慕他，到了着迷的程度。但切萨雷的胜利始终不能带来永久性的机制，他身后留下的只有死亡和毁灭。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伊莎贝拉女王得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1503年8月去世的消息时，并不很悲伤。当时她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但她得知一个虔诚的人（庇护三世）接替他成为教皇后，不禁喜笑颜开。

伊莎贝拉得知罗德里戈·博吉亚去世时似乎并不“悲痛”，马特小心翼翼地写道，“但她得知锡耶纳的红衣主教、庇护二世的外甥成为教皇，并选择了庇护三世的称号后，表现出非常喜悦。”她命令城内的神父作特别的祷告，并召唤市民到教堂为新教皇的健康和教会的优秀领导祈祷。“然后她指示用圣歌和赞美诗，《感恩赞》向全能的上帝感恩，因为他为教会提供了这样一位牧者，因为女王素来对此人评价很高。”^[25]但庇护三世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接替他的是尤利乌斯二世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发布了凯瑟琳婚姻所需的批准文书，但谨慎地说，凯瑟琳之前与亚瑟的婚姻“或许”已经圆过房。^[26]

与博吉亚家族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亚历山大六世的死亡也神秘莫测、充满矛盾和极端复杂。据说教皇和切萨雷一同用餐，后来两人都突然病倒，情况非常严重。彼得·马特在意大利和梵蒂冈拥有广泛的通信网络，他坚信教皇父子偶然喝了他们为一位客人准备的毒酒，弄巧成拙，把自己毒倒了。教皇已经七十岁了，他死后，尸体迅速开始腐烂，变得肿胀和臭气熏天。切萨雷只有二十七岁，得以幸存，因为他被包裹在一张暖和的骡皮内，得以维持体温，同时为自己的生命而搏斗。

切萨雷恢复之后，寻求到西班牙朋友那里躲避。那不勒斯有很多与他家族友好的西班牙人，他认为那不勒斯的主人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也是朋友。但切萨雷抵达那不勒斯后，贡萨洛就遵照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的命令，将切萨雷逮捕，押往西班牙的一座监狱。

伊莎贝拉希望以谋杀罪审判切萨雷·博吉亚。就这样，切萨雷·博吉亚这个玩世不恭、被马基雅弗利称为政治天才的人，被正义感极强的伊莎贝拉打垮了。伊莎贝拉决定，是时候永久性地消灭切萨雷了。他被押往巴伦西亚的钦奇利亚要塞，但他企图将狱长勒死并将其从城墙上推下去，后来被转移到梅迪纳·德尔·坎波戒备森严的拉莫塔要塞，受到伊莎贝拉的密切监视，行动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他唯一的伙伴是他的猎鹰。

伊莎贝拉无声无息、不引人注意地成了切萨雷“最无情的敌人”。大家都看不到这一点，就连敏锐的政治观察家马基雅弗利也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崇拜的英雄最厉害的敌人是一个他在自己的著作《君主论》中从来没有提及的人。完全错判形势的马基雅弗利不知道的是，欧洲这一代君主中最有战略眼光、最高效的君主，其实是个女人。因为恰恰是伊莎贝拉女王拥有马基雅弗利最为推崇的许多品质。

普罗斯佩罗·科隆纳（在那不勒斯，他是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关键盟友）将切萨雷·博吉亚押送到拉莫塔要塞，交给伊莎贝拉管辖。科隆纳抵达梅迪纳·德尔·坎波后求见女王，此时女王始终待在城镇中心广场边缘的宫殿内室，深居简出。

“我想见那个坐在床上统治世界的女人。”科隆纳告诉斐迪南。
[27] 于是他被带进去，与女王见面。

[1]. Vicente Rodríguez Valencia, *Isabel la Católica en la opinión de españoles y extranjeros, siglos XV al XX* (Valladolid: 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 1970), p.1: 278.

[2].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p.155.

[3].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p.158.

[4]. Charles Oman,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E.P.Dutton, 1937), p.55.

[5].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 and count, January 12, 1504, in *Opus Epistolarum: 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ondon: Wellcome Library).

[6].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 and count, January 12, 1504, in *Opus Epistolarum: 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ondon: Wellcome Library), p.178.

[7]. Tarsicio de Azcona, *Juana de Castilla, mal llamada La Beltraneja, 1462-1530* (Madrid: Fundación Universitaria Española, 1998), p.65.

[8].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 and count, January 12, 1504, in *Opus Epistolarum*.

[9].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 of Granada, November 1, 1503, in *Opus Epistolarum*.

[10]. Desmond Seward, *The Burning of the Vanities: Savonarola and the Borgia Pope* (Stroud, U.K.: Sutton, 2006) , p.221.

[11]. Desmond Seward, *The Burning of the Vanities: Savonarola and the Borgia Pope* (Stroud, U.K.: Sutton, 2006) , p.229.

[12]. Fray Prudencio de Sandoval, *Historia de la Vida y Hechos del Emperador Carlos V*, Biblioteca de Autores Españoles (Madrid: Atlas, 1955) , p.22.

[13]. Fray Prudencio de Sandoval, *Historia de la Vida y Hechos del Emperador Carlos V*, Biblioteca de Autores Españoles (Madrid: Atlas, 1955) , pp.250–51.

[14]. Francisco Javier Sánchez Cantón, *Libros, tapices y cuadros que collecciónó Isabel la Católica*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1950) , p.54.

[15]. Nancy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 (New York: St.Martin' s Press, 1991) , pp.337–38.

[16]. Nancy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 (New York: St.Martin' s Press, 1991) , p.367.

[17]. Nancy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 (New York: St.Martin' s Press, 1991) , p.367.

[18]. Nancy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 (New York: St.Martin' s Press, 1991) , p.339.

[19]. Jerónimo Zurita, *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 el Católico: De las empresas y ligas de Italia* (Zaragoza: Diputacion General de Aragón, 1989) , pp.2: 6–7.

[20]. William Prescott,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Philadelphia: J.B.Lippincott, p.502.

[21]. William Prescott,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Philadelphia: J.B.Lippincott, p.502.

[22]. Jean Lucas-Dubreton, *The Borgias* (New York: E.P.Dutton&Co., 1955), p.159.

[23]. 即前文讲到的法王查理八世之妻。

[24]. 瓦伦蒂努瓦 (Valentinois)、巴伦西亚 (Valencia) 和瓦伦蒂诺 (Valentino) 拼写与发音相近。

[25]. Peter Martyr to Count of Tendilla and Archbishop of Granada, November 10, 1503, in *Opus Epistolarum*.

[26]. Pope Julius II, December 26, 1503,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Spain.

[27]. Prescott, *History of the Reign*, p.585.

二十三 伊莎贝拉女王之死

1502~1504年，伊莎贝拉的健康状况显然越来越糟糕。因此她能取得的成绩也有限。她的身体时好时坏，但无法预测何时能好一点。她在1502年11月21日给女婿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的信中解释道：

我收到了你的大使胡安·德·费雷拉捎来的信。我很想早点给你回信，但做不到，因为我身体很差。后来我觉得有所好转，但又病倒两次，因此无法亲笔写信……感谢上帝，我现在好了点，但还是没办法写信……尊贵的、伟大的国王，我最亲爱的儿子，愿上帝好好保佑捍卫你。^[1]

但在1504年10月，伊莎贝拉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她患有水肿，身体肿胀，高烧不退，喘气困难，口渴难耐但无法进食。她的皮肤下有明显的瘤子和肿块。御医已经放弃了治愈女王的希望。伊莎贝拉女王几乎完全卧床不起，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写下了自己的最终遗嘱。

卡斯蒂利亚宫廷变得鸦雀无声、心惊肉跳，为她担忧，但也越来越为自己担心。胡安娜和腓力远在佛兰德，斐迪南国王的地位不明确，王位传承悬而未决，令人忧心忡忡。所有人都因为必须在即将展开的冲突中选择站队而挣扎。“西班牙的灾祸到了！”彼得·马特在给自已的朋友埃尔南·德·塔拉韦拉和滕迪利亚伯爵的信中写道，并描写了女王逐渐恶化的症状。“……我们看到国王和内侍满面乌云。大家已经在窃窃私语，如果她走了，将发生什么情况。”^[2]

他们为西班牙的未来担忧，因为伊莎贝拉平息了过去的混乱，而如今没有人说得准，权力交接将和平进行，还是会发生暴力冲突。很

多西班牙人渐渐相信，伊莎贝拉是阻止混乱的唯一屏障，是她给这样一个饱受摧残的国度带来了和平。马特给另一位廷臣的信中写道：

昨天我们悲戚地在宫中坐下的时候，你问我，我对渐渐衰弱的女王怎么看。我担心，如果她辞世，那么美德和宗教也要摒弃我们而去。我希望，我们被上帝招走的时候，能够去她将要去的那个地方。在她一生中，她超越了人类的巅峰，所以她不可能死，她必将青史留名，永不磨灭。所以我们必须为她哀悼，但我们也要羡慕她，因为她将享受双重的生命。因为她留下的世界将被她的永恒名望所装点，而她自己将在天堂，与上帝一起永生。^[3]

在西班牙全境，人们纷纷去教堂，为伊莎贝拉女王的生命祈祷，表示如果上帝让她活下去，他们自己愿意赎罪或朝圣。他们发现了凶险的预兆，从中解读恶事。春季发生地震，导致城墙与塔楼坍塌，将一些人活活压死在废墟中；安达卢西亚出人意料地出现了特别恶劣的天气，导致饥荒和疫病。西班牙人有时间斟酌所有这些预兆，因为伊莎贝拉自从1502年就一直患病，但在1504年秋季的三个月里越来越羸弱。

在英格兰，凯瑟琳心急火燎地等待关于母亲健康状况的消息，写信询问母亲的状况。凯瑟琳说，她从姐姐胡安娜那里得知，母亲的症状发热在缓解，因此感到欣慰；她希望母亲的身体在好转。她请求伊莎贝拉尽快回信，因为她在收到母亲的信、得知母亲已经康复之前，无法“满足或快乐”。^[4]她急于得到信息，在11月26日发出了同一封信的多个副本，以确保至少有一份抵达母亲手中。

与此同时，伊莎贝拉女王在苦苦支撑，等待批准凯瑟琳与亨利王子结婚的教皇文书送抵。英格兰的伍斯特主教告诉亨利七世国王，教皇文书的一个副本在正式发布之前被“秘密地”先行发给伊莎贝拉，“以便安慰已经临终的她”。^[5]

文书抵达后，她的工作也完成了。女王终于看到，她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她请求为她举行临终涂油礼。仪式举行了，神父在她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唇和手上涂了经过祝圣的圣油。御医、亲人和挚友聚集在病榻前祷告。

在现场的有斐迪南、伊莎贝拉的儿时好友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以及她的忏悔神父——托莱多大主教西斯内罗斯。

她要求斐迪南国王承诺不续弦。这可能出于对未来新娘的嫉妒，也可能是因为她希望保护他们的儿女的遗产，所以不愿意看到斐迪南再娶。据苏里塔说，斐迪南宣誓不会再娶，“好几个人证实”国王发出了这样的誓言。^[6]

一般情况下，临终涂油礼要在临终的人的脚上也涂油，但伊莎贝拉女王不准房间内除了神父之外的任何人看到她的脚。这有点奇怪，编年史家的解释是，这是由于她羞怯和贞洁。

有史料记载的伊莎贝拉的最后举动是，神父们结束祷告时，她用手在自己胸前画了十字。她于1504年11月26日去世。同一天，凯瑟琳给她写下了心急火燎的信。伊莎贝拉享年五十三岁。

“就这样，最尊贵的伊莎贝拉女王、西班牙人的荣誉和所有女性的楷模，在梅迪纳·德尔·坎波与世长辞。”圣克鲁斯写道。“宫廷和所有城市的人们自发地表达悲痛，他们的悲伤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们失去的是一位最卓越的女王，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优秀的人统治一个民族。”^[7]

当世人们记忆中最猛烈的暴风骤雨降临了，仿佛天空也在哭泣。斐迪南国王向欧洲各国统治者通知女王驾崩，命令将其遗体运到格拉

纳达，不过他自己没有陪同灵柩。于是，女王的送葬队伍，包括忠诚的彼得·马特，动身前往安达卢西亚。

消息传到各地，许多地方的人都为伊莎贝拉的去世而悲恸。历史学家赫罗尼莫·苏里塔写道：

在所有国度，不仅她的臣民和同胞，所有人都普遍表达了深切的哀恸和悲伤。最低的评价也是，她不仅是她的时代，也是许多世纪以来最卓越和勇敢的女性。这位高度虔诚的女王非常重视圣事和扩展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而且她非常审慎和认真地行事，让居住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所有人都从中受益。^[8]

意大利人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曾在西班牙生活。在他的著作《廷臣之书》中，他赞颂伊莎贝拉为欧洲近期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

除非全体西班牙人，不管贵族还是平民，不分男女贫富，全都串通好了，虚伪地赞颂她，那么在我们的时代，不管在何地，都不曾有过比伊莎贝拉女王更光辉的榜样。她的真挚的善良、精神的伟大、审慎、虔诚、贞洁、彬彬有礼、慷慨大方——简而言之，所有类型的美德——都超越世人。这位女士的名望极高，传扬四海，各国无人不知，而那些生活在她身边的人、目睹她举止的人，全都证实，这名望源自她的美德与功绩。不管是谁，只要看看她的行为，就会发现这是事实。她留下了不计其数的东西可以为此证明，如果我们愿意，可以一一列举。但所有人都知道，她登基的时候，卡斯蒂利亚的大部分被权贵主宰。但她以绝对的公正收复了整个国土，以至于那些被剥夺土地的人也对她忠心不贰，心甘情愿地交出霸占的财产。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她在保卫自己的国家、抵抗强大敌人的时候，总是表现出莫大勇气与智慧。在这样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中，敌人在为自己的财产、生命、宗教（按照他们的想法）和真主而战斗。而她无论在作战会议中还是亲临前线时，总是表现出高超的才干，我们时代的君王几乎难以望其项背，不要说没有本事效仿她，甚至没有资格嫉妒她。^[9]

卡斯蒂廖内说，她为西班牙人的行为举止设立了一套新标准：

因此，人民对她非常尊崇，既有爱戴，也有畏惧。他们的心中仍然饱含这种尊崇，仿佛他们觉得，她还在从天堂注视他们，或许会从那里嘉许或批评他们。因此，这些国度仍然被她的名望和她设立的手段所统治，所以，尽管她的生命结束了，她的权威仍然延续，就像一个轮子在外力驱动下滚了一段时间之后，若撤去外力，仍然能够自行前进好一段距离。[\[10\]](#).

就连外国的敌人也认可她的功业。法兰西人菲利普·德·科米纳写道，伊莎贝拉“据说是世界上最睿智和高尚的人之一”。[\[11\]](#).

她在临终前的最后两个月写了遗嘱，又多次修改，将自己的遗嘱当作一份蓝图，希望她死后的西班牙能够按照这蓝图发展。她高屋建瓴地预测了可能出现的问题。

她命令传位给她的女儿胡安娜公主，她将成为“上述属于我的各国、土地与领地的女王，上帝允许我指定她为王国的君主”。[\[12\]](#)也就是说，王位将直接传给胡安娜。但伊莎贝拉增加了一个限制性条款：如果胡安娜不在国内，或者“被证明不愿意统治，或没有能力统治”，斐迪南将担任摄政王，直到胡安娜的长子查理王子二十岁，能够继承王位。伊莎贝拉特别敦促胡安娜和腓力“顺从于”斐迪南，因为他“拥有突出的美德”。她刻意将腓力大公排除在西班牙统治者的角色之外，这是她有意为之。

伊莎贝拉确保斐迪南能够得到舒适的生活，把三个教会骑士团的大团长头衔都给了他，这样他就能得到一笔丰厚的收入；另外王室从美洲获得的年收入的一半也归属斐迪南。她在遗嘱里对他不吝溢美之词。她说，她给他留下的巨大财富“比我希望给他的要少，比他理应享有的少得多，因为他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13\]](#).

她对丈夫表达的深切挚爱远远超过了法律文书一般的客套话。她要把自己的珠宝首饰都留给他，“让他睹物思人，回想起我在世时

候对他始终抱有的热爱，并且让他知晓，我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等待他前来团聚；希望这份记忆能鼓舞他生活得更公正和圣洁”。[\[14\]](#)。

她要求将凯瑟琳和玛丽亚的嫁妆按照婚约全数支付。这就能让她们在各自的婚姻生活中继续下去，不必担心因为金钱纠纷而发生争吵。

她要求将自己埋葬在标志着她最伟大胜利的地方，即格拉纳达。具体地点是阿兰布拉宫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她要求大家不要为她服丧，而是把用来置办丧服的金钱捐献给穷人。她要求偿清她的债务。

她命令捐献巨款（包括200万马拉维迪）给慈善事业，为贫家女子置办嫁妆，帮助她们结婚，或者从事宗教事业。她要求为200名被她所谓的异教徒控制的俘虏赎买自由。上述慈善活动所需的资金来自变卖她的私产所得。

她请求王国感谢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及其妻子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的贡献，让他们保有莫亚侯爵和侯爵夫人的头衔，世袭罔替。她还特别赞扬了贡萨洛·查孔，她儿时的教师，以及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曾任西班牙驻梵蒂冈大使）。许多年前，在阿雷瓦洛，查孔是教导她学习圣女贞德这样一位女性榜样的人之一。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是曾代表她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斗争、谴责这位教皇腐化的廷臣。

她思绪里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她的宗教原则。伊莎贝拉女王希望她的子孙辈都能认识到自己保卫和推进基督教信仰的义务，指导他们遵循教会的训诫，并将异端裁判所维持下去。她告诉他们永远不要放弃直布罗陀（711年，北非人就是从这块巨岩出发，入侵西班牙），说那座城市和地区应当永远是西班牙王室的领地和财产。

她最耐人寻味的姿态之一与她的兄长恩里克四世有关。当年她嫁给斐迪南，与兄长发生了戏剧性冲突，后来又夺取了王位。仿佛是为了补偿兄长，伊莎贝拉将自己最珍贵的财产——一件圣物，她相信它曾属于耶稣基督，并且拥有医治疾病的奇效——赠给兄长最心爱的安东尼奥教堂（位于塞哥维亚城郊）。这件圣物是一小块血染的布头，据说是基督的无缝上衣的一块，在他受难的日子被撕了下来。

圣安东尼奥是恩里克四世幼时的家，后来被改为修道院，在伊莎贝拉在位期间又改为克拉利萨女修会的女修院。那里的修女们为劳工提供精神慰藉和社区服务。这些劳工在塞哥维亚的古罗马高架渠下，以擦洗羊皮为业，艰难度日。在女修院内，修女们照料弃婴，这些婴儿被母亲抛弃，要么是因为贫困，要么因为是私生子。

修女们生活在远离尘嚣的修道院，将这一小块布当作圣物小心保管，相信它具有医治妇科疾病的神奇。布上还连着一只智齿。修女们相信，这只智齿属于伊莎贝拉，她把自己的智齿留在女修院，是为了让自己的一样东西始终留在塞哥维亚，并且与曾属于耶稣基督的圣物一起安息。

另外，伊莎贝拉下令，如果无法将她的遗体运往她希望的位于格拉纳达的埋葬地，就将她安葬在这家女修院，或者是她在托莱多建造的圣约翰王家修道院与教堂。

她要求自己下葬时穿一件圣方济各会的修女服，并将自己心爱的女儿伊莎贝拉公主的遗体迁来，母女一同长眠。她希望用一块简朴的石碑标示她的坟墓，坟墓应当与地面齐平，不要建造高高的墓葬堆。

她后来给遗嘱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款，包括她之前忽略了一些小事，并发布了另外两项指令。这两项要求都表明，她深刻认识到，她的民族即将在宗教和帝国霸业上遇到巨大挑战。她要求将修道院的改

革继续进行，“以避免伤害和丑闻”。她还明确规定，发现大西洋彼岸新大陆的“主要目的”是“向土著传播天主教信仰”，不得伤害新大陆的土著居民，而是要“公正地”对待他们。^[15]

伊莎贝拉驾崩后，斐迪南国王向公众宣布了噩耗，并派遣信使到西班牙各地发布消息。他宣布，胡安娜成为女王，他将辅佐她统治。由于胡安娜不在国内，他先承担起治国重担。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返回西班牙。

斐迪南命令送葬队伍立刻出发，前往格拉纳达。大雨瓢泼，人们考虑是否等天气好转再行动，但斐迪南坚持立刻启程，无人敢于质疑国王。他派遣送葬队伍运送灵柩出发了，但没有亲自陪同。彼得·马特是送葬队伍成员，他后来回忆说这趟旅程是可怕的磨难：“似乎大海的惊涛骇浪在驱赶我们……我们穿过山谷和平原，简直是在游泳，道路化为水塘和湖泊。到处是烂泥，举步维艰。”^[16]

他们经过了伊莎贝拉的幼时家园阿雷瓦洛，然后继续南下。领导人经常聚起来商议，讨论是否应当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继续前进。在托莱多，他们认真考虑停下，等候天气好转，但他们害怕激怒斐迪南，于是继续跌跌撞撞地艰难前进，在疾风苦雨和烂泥中挪动。路上有人死去，被暴涨的河水卷走，也有牲口溺死。“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比这更恐怖的事情，”马特写道，“我们这一程，没有一里路不是在死亡危险中走过的。”^[17]

最终，在数周的旅行之后，他们抵达了格拉纳达，将伊莎贝拉的遗体停放在阿兰布拉宫的一座教堂，等待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安息之地。

仿佛上苍不愿意让她被安葬在格拉纳达，大自然的力量联合起来阻挠她的灵柩被运往那里。将她安葬在塞哥维亚（她和兄长恩里克四

世钟爱的美丽城市)就简单多了,但人们害怕斐迪南发怒,于是他们在泥潭中挣扎前进数周,终于抵达了曾经的纳斯尔王朝国都。前往格拉纳达的旅程总是会变成恐怖而难忘的磨难。

首先,根据她的指示,人们将她安葬在纳斯尔王朝一座旧宫殿(被改为一座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庄严小教堂内。^[18]

后来,1521年,伊莎贝拉的遗骸被转移到格拉纳达市中心一座豪华大教堂内,墓穴上方设有威风凛凛的大理石雕像。她想要的是一座简朴的坟墓,只要有与地面齐平的石碑就可以了。她希望自己长眠在伊莎贝拉公主身侧,但她女儿的遗体始终没有被迁往那里。伊莎贝拉女王的长眠之所被宗教符号所环绕,就像穆斯林在阿兰布拉宫的墙壁上一遍又一遍地书写“唯有真主是胜利者”一样。

^[1] Isabel to King Manuel of Portugal, November 21, 1501, in *Documentos referentes a las relaciones con Portugal durante 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d, Antonio de la Torre and Luis Suárez Fernández (1858; Valladol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Patronato Menéndez Pelayo, 1963), pp.3: 106-7.

^[2] Peter Martyr to Count of Tendilla and Archbishop Talavera, October 3, 1504, in *Opus Epistolarum: 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ondon: Wellcome Library).

^[3] Peter Martyr to Licenciado Polancus, Royal Counselor, October 15, 1504, in *Opus Epistolarum: 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ondon: Wellcome Library).

^[4] Catherine, Princess of Wales, to Queen Isabella, November 26, 1504, in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1, Henry VIII: 1485-

1509, ed. Gustav Bergenroth (London: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 s Treasury, 1862) .

[5]. Bishop of Worcester to Henry VII, March 15, 1505, in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1, *Henry VIII: 1485-1509*, ed. Gustav Bergenroth (London: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 s Treasury, 1862) .

[6]. Jerónimo Zurita, *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 el Católico: De las empresas y ligas de Italia*, ed. Ángel Canellas López (Zaragoza: Diputación General de Aragón, 1989) , p.3: 331.

[7]. Alonso de Santa Cruz, *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d.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Seville: Escuela de Estudios Hispano-Americanos de Sevilla, 1951) , p.2: 303.

[8]. Zurita, *Historia del Rey*, pp.328-29.

[9]. Baldesar Castiglione, *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trans. Charles S.Singleton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59) , p.237.

[10]. Baldesar Castiglione, *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trans. Charles S.Singleton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59) , p.238.

[11]. Philippe de Commynes, *The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 Lord of Argenton* (London: G. and W.B.Whittaker, 1823) , p.2: 402.

[12]. *Testamento de la Reina Isabel la Católica, Publicaciones del quinto centenario, 1504-2004*, Granada, p.59.

[13]. Nancy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 (New York: St.Martin' s Press, 1991) , p.414.

[14]. Nancy Rubin, *Isabella of Castile: 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 (New York: St.Martin' s Press, 1991) , p.414.

[15]. *Testamento de la Reina Isabel la Católica*, p.59.

[16]. Peter Martyr to Ferdinand of Aragon, December 25, 1504, in *Opus Epistolarum*.

[17]. Peter Martyr to Ferdinand of Aragon, December 25, 1504, in *Opus Epistolarum*.

[18]. Juan Antonio Vilar Sánchez, *Los Reyes Católicos en la Alhambra* (Granada: Editorial COMARES, 2007) , pp.135–37; and Juan Manuel Barrios Rozva, *Guía de la Granada Desaparecida* (Granada: Editorial COMARES, 2006) , pp.131–33.

二十四 伊莎贝拉之后的世界

正如朝廷所畏惧的，伊莎贝拉驾崩后，西班牙迅速失控。但二十年后，在她奠定的基础之上，西班牙崛起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国，受到羡慕、敬仰，也被所有人畏惧。西班牙艺术、文学和建筑的黄金时代即将降临，各领域的天才们创作出不朽杰作。其中有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画家格列柯^[1]和委拉斯开兹^[2]。正如伊莎贝拉女王所希望的，她的孙辈和曾孙辈继续了她未竟的事业，投入了自己的心血，既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后果。

但这一切，从一个混乱的时期发轫。

伊莎贝拉尸骨未寒，斐迪南的缺陷就暴露无遗。她去世的那天，他给其他王国的君主写信，宣布她的死讯。例如，他告诉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伊莎贝拉的死是“他经历的最严重的灾难”。^[3]他告诉亨利七世，他的女儿胡安娜是新的女王。但他立刻补充说，国家的实际控制者是他。

他没有护送伊莎贝拉灵柩去往格拉纳达，没有参与那场沉闷的长途旅行。在正常情况下，即便是感情最疏远的夫妻，也会护送配偶的遗体去下葬。他闭门不出，与谋臣商议了一周，然后开始胡作非为。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以最漫不经心、麻木不仁的方式，处理掉了她的财产。她要求变卖她的财产以赈济穷人和清偿债务。他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以最快的速度将她的财产变现，并且办得非

常不得体，“混乱、贪婪而缺乏透明度”。^[4]廷臣和教士们争相廉价买下这些财产，日后高价出手。金银器皿被熔化，以获取贵金属。其他物品都被草草地低价出售。

不到两个月时间，斐迪南就廉价处理掉了伊莎贝拉精心收藏的基督生平画像，甚至包括那些有她家人肖像的作品，每幅画只卖2~6杜卡多。他似乎没有请人给画作估价；包含黄金的画像的价钱和没有黄金的一样。^[5]书籍、壁毯、乐谱和祈祷书都被抛撒一空。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收藏品被随随便便地拆散。用历史学家塔西奥·德·阿斯科纳的话来说，这仿佛“明媚的白昼之后紧跟的是阴暗和凄苦的黑夜”。^[6]

然后斐迪南集中注意力，想办法把女儿和女婿排挤到权力之外。他很快提出要续弦，起初追求的对象是胡安娜·贝尔特兰尼娅。她就是恩里克四世国王的妻子的孩子，可能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如果她真的是国王的女儿的话），如今已经人到中年。当然，当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与葡萄牙交战，主张伊莎贝拉才是合法继承人。在随后发生的战争中，成千上万人丧命。

但是，如果斐迪南现在可以让人们相信，胡安娜才是合法继承人，而当初与葡萄牙的战争是一个不幸的错误，那么他就可以重新获得伊莎贝拉还在世时他在伊比利亚半岛享有的权利。这意味着他必须把胡安娜·贝尔特兰尼娅从她生活的修道院拉出来，他可能觉得，当初她是被强迫才当修女的。如果他娶了胡安娜·贝尔特兰尼娅，那么他与伊莎贝拉生的孩子就丧失了继承权，伊莎贝拉整个统治的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

他的这个主意让所有人都震惊而噤声。西班牙各地很快涌现了反对派。很显然，斐迪南非常不得民心。之前人民表现出的对君主的爱戴，对象是伊莎贝拉，不是他。

与此同时，在佛兰德，按照彼得·马特的说法，腓力大公“对权力垂涎欲滴”。他一直在密切关注伊莎贝拉越来越糟糕的健康，并寻求进一步孤立胡安娜，以控制局势。^[7]1504年11月初，他辞退了从卡斯蒂利亚带来的十二名侍从，给了她的多明我会忏悔神父40里弗，让他自己返回西班牙。^[8]他恩威并用，确保胡安娜周围的人对他言听计从，而不忠于胡安娜。卡斯蒂利亚大使富恩萨利达说，剩余的西班牙侍从“都是叛徒犹大的亲戚，他们没有一个保持忠诚，全都竭尽全力为腓力效劳”。^[9]

就连富恩萨利达也被宫廷的态度吓倒了。他也得知伊莎贝拉时日无多了，但没有告诉胡安娜。他可能是在见风使舵，等待看清在业已发动的权力斗争中谁是最后赢家。

腓力得知伊莎贝拉死讯后，决定向妻子——卡斯蒂利亚的新女王——隐瞒消息。他把妻子牢牢控制，使其几乎处于软禁状态。在一段时间内，或许有一周或更久，他在筹划阴谋，把妻子蒙在鼓里。斐迪南国王派遣了一位官方信使胡安·罗德里格斯·德·丰塞卡，于12月12日正式向腓力夫妇宣布消息。

胡安娜终于得知了真相，一定倍感痛苦。她与母亲在梅迪纳·德尔·坎波的最后一次会面非常不幸，双方大吵特吵，而她自己在卡斯蒂利亚家中的时候很少考虑伊莎贝拉越来越衰弱的健康。现在母亲去世的消息对她造成了沉重打击，她开始效仿姐姐伊莎贝拉公主哀悼丈夫阿方索的那种夸张的哀恸，因为那种姿态得到了人们的赞扬。胡安娜要求别人不要烦扰她的哀悼，避免与其他人接触，独自静修。在追求享乐的佛兰德，葬礼习俗没有那么戏剧性。胡安娜的行为只是让佛兰芒人越发觉得她古怪或者滑稽。

在此期间，腓力忙着安排自己加冕成为卡斯蒂利亚、莱昂和格拉纳达国王的典礼，在其中只给了胡安娜很小的角色。1月中旬，他在布

鲁塞尔的圣米迦勒与圣古都勒教堂（一座巍峨的哥特式建筑）加冕为国王^[10]，胡安娜立在他身侧。曾经在伊莎贝拉面前高举的正义之剑，如今被交给了腓力，而不是胡安娜。

与正在宫廷的西班牙大使商谈之后，胡安娜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并将信托付给一名仆人去递交。这个仆人是阿拉贡人，是斐迪南的臣民，却将其交给了腓力。腓力读了信，大为不悦。他命令将使者之一，斐迪南的私人秘书洛佩·德·孔奇略斯逮捕、投入监狱并毒刑拷打。腓力如此激烈的反应说明，胡安娜的信是告诉她父亲，应当阻止腓力将卡斯蒂利亚王位占为己有。使者“被投入肮脏的地牢，仿佛他犯下了弥天大罪”，彼得·马特告诉他的朋友塔拉韦拉，并补充说，后来洛佩·德·孔奇略斯终于获释，跌跌撞撞地走入阳光下时，一时间昏厥了，头发也掉光了。^[11]

腓力在胡安娜周围建造的隔离墙出现了这个裂缝之后，他命令佛兰德的任何人不经他的允许，不准与西班牙的任何人交流。

腓力的谋臣们准备了一封假称由胡安娜写下的信，信中将统治权转交给腓力，并说这是由于她对他的“爱”。据传记作者贝瑟尼·阿拉姆说，她不肯用“爱”这个词，拒绝在信上签名，于是他们伪造了她的签名，将信发出。^[12]

然后腓力开始收买人心。他用油水丰厚的地产、权益和特权笼络西班牙贵族，要求他们支持他当卡斯蒂利亚国王、摈弃斐迪南。他开始与法兰西谈判，寻求他们的支持，以便从岳父手中攫取权力。对西班牙人来说，这是一个切实的威胁，因他们曾与法兰西争夺鲁西永和那不勒斯，视法兰西为不共戴天之敌。

腓力和斐迪南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宣传战，以争夺统治权。他们都企图夺取王位，但首先必须把胡安娜排挤掉。腓力和斐迪南起初各自

宣称胡安娜有精神病，后来联合起来这么宣传，说她的疯病太厉害，无法统治。将她除掉之后，就只剩下了两个竞争者。胡安娜的父亲和丈夫都大肆散播关于她所谓疯狂举止的谣言。在梅迪纳·德尔·坎波的争吵、胡安娜的自我隔绝、她对丈夫的情人的吃醋和攻击（她割掉了“小三”的头发），都成了流传甚广的故事，被认为是她发疯的证据。如果女人对男性的权力构成挑战，或者以其他方式构成麻烦，那么宣称她们是疯子，是一种久经考验、屡试不爽的手段，能够有效打击她们的公信力。

据阿拉姆记载，1505年年初，斐迪南召开国会，要求指定他为胡安娜的摄政。他提及了伊莎贝拉女王的遗嘱，并说女王因为“羞耻和悲痛”，没有明说胡安娜为什么不适合统治——因为胡安娜的“激情”使得她没有治国理政的能力。^[13]造谣攻势就这样开始了，很快就有很多人相信，胡安娜“疯了”。

而在佛兰德，公正的观察者说，她看上去很正常，行为举止也没问题。威尼斯大使维琴佐·奎里尼记述了他与胡安娜一起度过的一个盛宴晚会，她“穿着黑色天鹅绒，看上去非常健康”；他觉得她“非常端庄美丽，仪态完全是一个理智而谨慎的女人”。他代表威尼斯政府向她问候，她做了“温和可亲的答复”；然后他俩一同散步，走到一场比武大会，地点是宫殿底层的一个宽敞的大厅，灯火通明。^[14]

大约六个月后的1506年年初，据奎里尼记载，腓力派遣他宫中的一名使者，德·拉·肖先生去卡斯蒂利亚，与斐迪南会谈，以确保他们双方口径一致，即胡安娜“没有能力，也不适合统治”。奎里尼说，很多佛兰芒廷臣希望腓力这么做，因为他们已经从卡斯蒂利亚领到了“补助金”，数额在每年500~3000杜卡特不等。他们害怕，假如胡安娜执政，会砍掉这些补助金。他们还希望从卡斯蒂利亚君主指挥的三个宗教骑士团那里，为自己的“孩子、孙辈和关系最远的亲朋好友

友”搞到油水丰厚的闲职。^[15]“大臣们也希望避免发生叛乱。”奎里尼写道。

他们担心天性热血沸腾的西班牙人，尤其是喜好变动、互相争斗的权贵们会起来反抗，要求由他们的合法君主——新女王来统治。大臣们现在的目标是，在腓力国王抵达西班牙之前，他的岳父应当传播胡安娜女王不适合统治的消息（这里的人普遍相信）；他们还希望，斐迪南国王会服从他们的意愿，既是因为这样符合他的利益，也是因为，在伊莎贝拉女王驾崩时，他不肯交出卡斯蒂利亚政权的理由之一就是，他声称自己的女儿没有能力、不适合治国；从腓力国王的大使的最后几封信来看，斐迪南国王似乎仍然抱有这种意见。腓力国王的大使们正在竭尽全力地安排此事，因为事关他们自身利益：德·韦尔先生从卡斯蒂利亚得到3000杜卡特的年金，而且还得到承诺，第一个出现空缺的主教职位将被送给他的兄弟之一；德·拉·肖先生领取1000杜卡特年金；所有人都希望，腓力国王将为他们的孩子、孙辈和关系最遥远的亲朋好友搞到圣雅各、卡拉特拉瓦或阿尔坎塔拉骑士团的指挥职位。尽管斐迪南国王是这三个骑士团的主人，并且控制其全部收入，但空缺的指挥职位分别由两位君主轮流分配，所以轮到腓力国王的时候，斐迪南国王必须接受他建议的人选。^[16]

佛兰芒廷臣使出浑身解数，在胡安娜和她的父亲之间挑拨离间。西班牙大使阿罗伯爵曾获准短暂地觐见胡安娜，但腓力的盟友警告他不要久留，并要“好好效劳”腓力。据奎里尼记载，胡安娜热情地接见了阿罗伯爵，并非常温柔可亲地询问她父亲的身体如何，因为她上一次得到他的消息还是六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他是否真的像传闻那样，一心要伤害她……大使答道，这些传闻全都是子虚乌有；她的父王爱她，也爱她的丈夫，就像爱自己的孩子……随后大使按照自己接到的警告，迅速离开了。他告诉奎里尼，他明确地知道，腓力国王的谋臣告诉女王，她父亲对她满怀恶意，不愿意看到她出现在西班牙。这是为了让她下一次与父亲见面时，以不妥当的方式对待他。而斐迪南听信谗言，认为女儿不爱他，于是更加愿意剥夺她的统治权。^[17]

不管斐迪南究竟知道什么情况，又不知道什么，他都在4月中旬给了腓力答复，让腓力放心，他会把事情安排好，“让各方面都满意”。^[18]斐迪南甜言蜜语地敦促腓力到卡斯蒂利亚来，以便安排好方方面面的事情。

腓力犹豫不决，不敢去卡斯蒂利亚。他对自己的好友贝桑松大主教的暴毙仍然满腹狐疑，因此害怕假如自己踏入西班牙，斐迪南会杀害他。这么害怕的不只他一个人。1506年6月，一位生活在罗马的贵族写信给腓力，敦促他在与斐迪南打交道时必须高度谨慎，以免成为下毒或其他暴力袭击的牺牲品。他还特别敦促腓力始终避免与斐迪南一同用膳。^[19]

但要想赢得西班牙及其领地的丰厚奖品，腓力和胡安娜必须亲自到场掌控。他们从海路去了卡斯蒂利亚，把孩子们留在佛兰德，由腓力聪明和善的妹妹玛格丽特（卡斯蒂利亚王子胡安的年轻寡妇）照料。玛格丽特和留在家中的四个孩子——埃莉诺、查理、伊莎贝拉和玛丽（胡安娜最小的孩子，还是婴儿）住在美丽的小镇梅赫伦，与位于根特的佛兰芒大王宫及满肚子阴谋诡计的廷臣们拉开距离。

胡安娜和腓力的这次航海旅途惊心动魄。途中风暴把他们吹到了英格兰，亨利七世国王与他们会面，待了一段时间。腓力及其侍从想尽办法证明胡安娜的精神有问题，拼命努力让英格兰朝廷相信她是个疯子。亨利七世私下里告诉自己的廷臣，他觉得胡安娜完全正常。与舰队一起旅行的其他国家的人也说，胡安娜举止可亲而得体，其他人在风暴中张皇失措的时候，她却沉着冷静。

腓力和胡安娜抵达卡斯蒂利亚的时候，斐迪南已经再婚了，不过不是像他希望的那样娶到胡安娜·贝尔特兰尼娅。他狡猾地绕开了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迅速与西班牙的宿敌法兰西结盟。他娶了一位十八岁的泼辣的法兰西公主，也是他的甥孙女热尔梅娜·德·富瓦，即他

的同父异母姐姐^[20]的孙女。作为交换，他承诺要把那不勒斯留给他和热尔梅娜生的孩子。^[21]这对路易十二国王很有吸引力，因为热尔梅娜是他的外甥女^[22]，而且这项协议将会把那不勒斯重新纳入法兰西的势力范围。斐迪南还同意为路易十二的军事行动买单。

斐迪南国王告诉他的臣民，他需要娶这位年轻的法兰西公主，以便为阿拉贡王位生出一个男性继承人。事实上，他这么做就是为了威胁胡安娜的孩子们的继承权，从而激怒腓力。需要一个继承人的辩解很荒唐：此时斐迪南有三个年轻而有生育能力的女儿、三个外孙和四个外孙女，都可以继承王位（胡安娜最终一共生了六个孩子。玛丽亚已经生了三个。凯瑟琳在未来也可能有自己的孩子）。这意味着，斐迪南打算生出更多孩子，让他们与已经有的孩子们竞争。

他的宣言对胡安娜打击最深。因为如果斐迪南生了新的孩子，胡安娜对阿拉贡的王位继承权将受到威胁。凯瑟琳也感到痛苦。她此时二十岁，在英格兰茕茕孑立，失去了丈夫，正在期望与年轻的亨利王子结婚。若失去在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体系中的位置，将会让她的日子更难过。

虽然斐迪南曾向伊莎贝拉承诺不续弦，他的火速再婚尽管不体面，但并不让人觉得意外。他或许已经厌倦了当一个疾病缠身的女人的丈夫。到1505年7月，他已经成为英格兰朝廷窃笑的闲言碎语的主题。使者们告诉亨利七世，斐迪南“在他这个年纪还非常好色”，此时他五十三岁。另外，他仍然被认为“外貌英俊”，尽管他失去了一颗牙之后有点口齿不清，而且“左眼有点斜”。何况斐迪南“据说富得流油，因为在他的女王在世时，他从阿拉贡和西西里岛获得的收入一分钱都没有花”。^[23]

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腓力的父亲、婴儿查理的祖父）认为，可以用女色来操控这个局势。他尝试引诱斐迪南缔结另一

门在政治上更安全的婚姻，让他在“德意志能找得到的最高贵的处女公主……脸蛋最美丽、身材最窈窕的佳丽”当中随意挑选。^[24]

但斐迪南匆匆奔向了热尔梅娜·德·富瓦的婚床。他们的结婚契约于1505年9月缔结，此时伊莎贝拉的一周年忌日还没有到。^[25]斐迪南解释说，他之所以娶了一位法兰西新娘，是为了让法兰西支持他，而不是支持腓力。但很多西班牙家庭在历次对法战争中失去了许多亲人，他们一定很难接受。

而且他根本没有办法向那些曾爱戴和尊重伊莎贝拉女王的人民解释。人民无法理解，斐迪南为什么能够这么迅速地找到新人来替换她。人们觉得斐迪南对热尔梅娜的追求不堪入目，尤其是因为人们对伊莎贝拉的感激和理解是在她去世后才增长起来的。彼得·马特告诉塔拉韦拉，“所有人都觉得，很难接受如此仓促的新婚姻”，特别是因为国民“尊崇”去世了的伊莎贝拉，如同“膜拜”活着的她。^[26]

斐迪南与热尔梅娜度蜜月的地点就是当初他与伊莎贝拉新婚伊始的那个地方——杜埃尼亚斯小镇。很多人觉得这是非常不尊重亡妻的行为。不久之后，喜欢穿法兰西风格服饰的热尔梅娜开始扮演起卡斯蒂利亚代理女王的角色。

斐迪南在卡斯蒂利亚的支持度骤降。1506年4月，腓力和胡安娜抵达国内后，整个西班牙联合一心，支持他们。几乎所有贵族都抛弃了斐迪南，一小群死硬分子除外。伊莎贝拉的忠诚谋臣，包括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伊莎贝拉在遗嘱里提及了他），都坚决反对她的丈夫。只有少数人，包括大主教西斯内罗斯与阿尔瓦公爵，仍然忠于斐迪南。女儿回国不到两个月后，斐迪南宣布他要回到自己的家乡阿拉贡，于是离开了卡斯蒂利亚。跟随他的人很少，几乎和1469年他第一次来卡斯蒂利亚与伊莎贝拉结婚时一样少。彼得·马特在给塔拉韦

拉的信中写道，“他的血亲”几乎全都“摈弃他……部分是因为害怕，部分是因为贪婪”。[27].

斐迪南离开之前有没有与胡安娜见面，很难说得清；如果他们见面了，也只是短暂的拜访。不管怎么样，肯定不是非常愉快的道别。卡斯蒂利亚毫不客气地把斐迪南扫地出门了。斐迪南携夫人离开了卡斯蒂利亚，去往阿拉贡，然后去了他的富饶的新王国那不勒斯，在那里受到了英雄征服者一般的欢迎。自决定性击败法兰西之后担任那不勒斯总督的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举办了盛大的欢迎庆典，迎接斐迪南。但斐迪南看到一些显赫的意大利人，甚至一些法兰西人不吝溢美之词地赞扬贡萨洛，十分恼火。贡萨洛是极少数既能得到部下的爱戴，也能赢得被他打败的敌人尊重的将领之一。斐迪南对贡萨洛的嫉妒越来越厉害。

与此同时，在卡斯蒂利亚，腓力寻求国会批准将胡安娜监禁起来。但卡斯蒂利亚官员们不同意。他们与胡安娜见了面，表达他们对她的支持。胡安娜说她希望斐迪南回来，但腓力为他俩在1506年7月安排了联合加冕典礼，他成为国王，胡安娜成为女王。

这就是腓力需要的开端。他开始在卡斯蒂利亚随心所欲。他罢免了伊莎贝拉任命的一些官员，用自己来自佛兰德的朋友取而代之。他剥夺了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对塞哥维亚城的统治权，尽管伊莎贝拉在遗嘱里明确表示将塞哥维亚封给比阿特丽斯，终生享有，并子孙世袭。腓力把这个城市交给了他的新宠臣堂胡安·曼努埃尔。

1506年9月，腓力出人意料地去世了。他正在布尔戈斯参加堂胡安·曼努埃尔为他举办的一次聚会，感到口渴。他喝了一大口凉水，就生病了。他死于胃病，就像所有曾阻碍斐迪南的人都突然死亡一样。腓力享年只有二十八岁。

斐迪南派人谋杀了腓力吗？可能性很大。到此时，斐迪南的异母兄卡洛斯、姐姐布兰卡和伊莎贝拉的哥哥恩里克四世都已经神秘地死去了，每一次的受益者都是斐迪南。不过，在没有抗生素和验尸的时代，没有办法确定死因是否为毒杀。

胡安娜女王在腓力的病床前守夜，但他咽气时，她没有流眼泪。他对她一直很残酷，她对他的死很可能抱有复杂的感情。但她为他哀悼和举行葬礼的方式很怪异，更让人觉得她的精神有问题。

她想把他埋葬在格拉纳达，这符合他的地位，因为他是她的丈夫，也是未来的西班牙国王——年轻的查理（此时仍在佛兰德）的父亲。但她对如何将丈夫的遗体（做了防腐处理）运到格拉纳达感到踌躇，尤其是因为此时她的卡斯蒂利亚臣民越来越多地呼吁她开始主持朝政。而她从来没有学习过治国之术，也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方面的兴趣。她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重，因为自两年前伊莎贝拉驾崩以来，王国一直在忍受权力真空。于是胡安娜女王推迟了葬礼，将丈夫的灵柩从一家修道院移到另一家，同时她在考虑如何处置当前局势。在卡斯蒂利亚，没有一位近亲能够帮助她做出决策。

另外，她又一次怀孕了，在丈夫去世约五个月之后生下了她的最后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取名为凯瑟琳。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增加了她的压力。

胡安娜女王尝试通过夸张的服丧和闭门哀悼来推迟做出决策。这对一个普通女人来说不算失常，但作为一位女王，终日闭门不出，而她必须应对一系列紧迫的国家大事和国际事务，就造成了复杂而棘手的问题。不过她采取了一项措施：1506年12月18日，她签署了一项法令，取消了腓力向其朋友封赏的在卡斯蒂利亚的所有权益和土地。

[\[28\]](#)她命令恢复到伊莎贝拉分封的那种状态。

但她似乎不喜欢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一个女人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做出在社会上不寻常的事情，并且这让所有人都不舒服。伊莎贝拉曾受到赞扬，但她的统治也被认为是怪异的反常现象。尽管伊莎贝拉作为统治者取得了成功，女性仍然被认为低于男性一等，不大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就在这一年，胡安娜的妹夫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向斐迪南宣布自己第四个孩子（也是第二个儿子）路易斯诞生时，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如果我的王后，我挚爱和宝贵的妻子，生的是女儿，我们向您通知时就会更谦卑一些，因为那样才符合一个女儿的身份，但今天凌晨2到3点之间，天主施恩于她，她生下了一个儿子，所以我们给您写信，希望您知晓此事。您也会了解，我们原本担心这会像其他孩子一样是个女儿，会让我俩感到羞愧，所以生了儿子之后，我们感到加倍地开心和满意！[\[29\]](#)

在这样的环境里，胡安娜不愿意努力去控制她那动荡不安的王国，也是情有可原了。大多数人都希望被视为其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陌生的局外人，所以胡安娜决定，她的统治手段就是根本不统治。

女人在丧夫之后闭门不出是非常流行的做法，甚至受到鼓励。伊莎贝拉女王的母亲就是这么做的，伊莎贝拉女王的长女在丈夫阿方索（葡萄牙王储）去世后也想这么做。历史学家贝瑟尼·阿拉姆写道，这种“虔诚的隐居”，在16世纪变得非常流行，胡安娜处于这种时尚的最前沿。“胡安娜女王在其母于1504年驾崩后的许多举措——斋戒、朴素服装、静默、独处和守夜，可能与这种或自愿或强迫的隐居有关联。”[\[30\]](#)

但胡安娜对自己的女儿凯瑟琳非常疼爱，这也是她的六个孩子当中被允许留在她身边的唯一一个。其他五个孩子都被从她身边夺走了。腓力坚持把四个较大的孩子，包括继承人查理，留在佛兰德，由胡安娜的小姑子玛格丽特（腓力的妹妹）照料。胡安娜在西班牙的另

一个孩子，儿子斐迪南，是胡安娜1503年回家的那段不幸时期生下的，一直由伊莎贝拉和斐迪南国王照料，后来斐迪南国王把这孩子留在自己身边。

胡安娜为凯瑟琳安排了水平极高的教育，就像她母亲为其女儿们做的那样。凯瑟琳长大之后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擅长舞蹈，人们称她优雅而彬彬有礼。年轻的凯瑟琳是她的外祖母伊莎贝拉女王制定的女性教育高标准的另一个例证。她后来成为葡萄牙王后，是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品收藏家之一，她收藏的非欧洲艺术品的数量在欧洲大陆排名第一。[\[31\]](#)

简而言之，胡安娜王后的生活是卡斯蒂利亚上层妇女的传统生活。她是一位虔诚而慈爱的母亲，就是虔敬的天主教家庭倾向于喜爱的那种女性。如果一个普通女人选择这样的生活，会被认为值得尊敬，甚至圣洁。但如果一位女王这么做，而不是像男人一样行使权威以便统治男人们，那么她或许真算得上是疯子。关于胡安娜发疯的传闻被认定是事实，她也没有足够努力在公共生活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并捍卫自己的声誉。

很快，胡安娜就有了自己的绰号。她的丈夫被称为“美男子腓力”。她在历史中留下的名字则是“疯女胡安娜”。一代又一代男性历史学家谈到这个荒唐的年轻女子，禁不住捧腹大笑。他们觉得“精神有问题”这个说法还不够，有些人甚至说她是“疯子”。

很多人对女性统治国家的事实感到不舒服，而胡安娜缓慢地开始控制朝政时，她显得非常软弱，甚至太软弱了，没有能力治理。她没有母亲的坚毅和勇气，不敢走出女性行为的既定边界，在执政之后也没有采取决定性行动，因此很快就丧失了所有权力。

在此期间，王国的实际摄政者是西班牙地位最高的教士，即伊莎贝拉曾经的忏悔神父西斯内罗斯，她把他提携到托莱多大主教的高位。在观察了政治局势之后，西斯内罗斯决定把斐迪南请回到卡斯蒂利亚。

* * *

此时，斐迪南和热尔梅娜王后正在慢悠悠地巡视他们的领地，包括他的新的那不勒斯王国，但很快开始返程。他回国后，胡安娜对父亲毕恭毕敬，或许是为了服从母亲的遗嘱，即她应当“顺从于”斐迪南。胡安娜继续留在宫中，闭门不出，斋戒祈祷。后来斐迪南及其朋友决定对她实施武装护卫。她有时被软禁起来，并且人们向她谎称爆发了瘟疫或其他危险，让她不敢离开。她的余生就这样作为囚徒待在托尔德西利亚斯，亲人会来拜访她，但她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

斐迪南终于可以独自统治了。他发现自己比过去更喜欢西斯内罗斯。西斯内罗斯是一个久经考验的盟友，愿意帮助他从胡安娜女王手中夺权。斐迪南从那不勒斯回国不久之后，西斯内罗斯从尤利乌斯二世教皇那里收到了红衣主教的冠冕，于是成为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斯。他和斐迪南一起向世人宣传，胡安娜女王情感脆弱，无法统治西班牙。

但其他一些曾经是伊莎贝拉女王忠实盟友的人对斐迪南的统治感到不舒服。埃尔南·德·塔拉韦拉发现他作为格拉纳达大主教的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于是请求彼得·马特调查是怎么回事。马特查不到真相。后来，塔拉韦拉自己也落入了异端裁判所的魔爪。

一位魔鬼般的新任宗教法官迭戈·罗德里格斯·卢塞拉于1499年被任命为科尔多瓦宗教法庭的领导人。他的前任因诈骗和敲诈勒索而被定罪。卢塞拉开始对城内的富人进行新一轮的疯狂迫害，称那里有

一大群亲犹太分子。很多被他指控的人说，他其实是以起诉为借口，掠夺他们的财产。根据历史学家亨利·卡门的研究，一些改宗犹太人后来作证称，他们被囚禁在监狱里，狱卒强迫他们向基督徒教授犹太教的祈祷，好让卢塞拉指控富裕的基督徒秘密皈依了犹太教。发出抗议的人们也被异端裁判所盯上。

一项调查对卢塞拉的手段提出了质疑，被处决的人数突然大大增加，以便杀人灭口。1504年和1505年，多达147人被处以火刑。这正是伊莎贝拉卧病在床、奄奄一息的时期。我们不知道伊莎贝拉是否了解发生了这些迫害事件，但斐迪南肯定是知情的。

渐渐地，就连伊莎贝拉女王的近臣也受到了异端裁判所的威胁。塔拉韦拉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他是改宗犹太人出身。卢塞拉找到一些人，让他们作证，塔拉韦拉将其在格拉纳达的大主教宅邸作为秘密的犹太教圣殿。塔拉韦拉的女性亲属被指控在厨房内执行犹太教仪式。塔拉韦拉遭到监禁、殴打，被强迫赤足游街，以证明自己的悔罪。这位八十岁的老教士受到普遍尊重，被认为是一位善良的伟人。很多人看到他受到这样的虐待，发出了义愤填膺的抗议。最终塔拉韦拉得到释放。但他的健康严重受损，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此后，人们高声疾呼，要求惩治卢塞拉，但斐迪南庇护他，为他辩解。卢塞拉最终被罢免，但斐迪南在此案中的角色清楚地表明，对他来讲，异端裁判所是个纯粹的政治工具，用来恐吓他人，以敲诈钱财。他愿意让清白无辜的人受到迫害，即便许多证人能够证明这些指控是子虚乌有。

塔拉韦拉的命运清楚地表明，异端裁判所运作的最初三十年里，很大一部分受害者的死亡应当由斐迪南负责。伊莎贝拉女王肯定不是完全无辜的，并且她相信异端裁判所有必要存在，以铲除异端，但在她的孩子和孙辈眼里，异端裁判所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主要是斐迪

南在幕后发力。多年后，他的后代在塞哥维亚王宫的大厅（从佩拉约开始，历代西班牙君王的雕像都在那里陈列）树立了他的雕像，把在西班牙设立异端裁判所的全部功绩（或者说罪责）都给了斐迪南。

斐迪南完全掌权之后，还可以自由地发泄对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嫉妒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年轻和脆弱的时候，是贡萨洛站在他们身边；他曾帮助他们抗击土耳其人，赢得了五十年里第一次打败土耳其人的真正胜利。他为西班牙获得了令人垂涎欲滴的那不勒斯，法兰西也一心想得到那不勒斯，为此不惜牺牲数万名法兰西士兵的生命。自他们的孩提时代（伊莎贝拉的弟弟阿方索王子在卡尔德尼奥萨吃了鳟鱼馅饼之后死亡的时期）以来，贡萨洛始终对伊莎贝拉忠心耿耿。贡萨洛曾说，最让他感到骄傲的，就是他知道女王完全信任和支持他。

女王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有两位编年史家称，贡萨洛悲痛欲绝。一位史家写到他的“极度悲伤和流泪”，另一位则说，所有西班牙人都为她的死而悲痛，但“最痛苦的是贡萨洛·费尔南德斯，他自从十四岁担任女王侍从以来，就是在她的宫院长大成人的”。[\[32\]](#)

所有接触过大元帅的人，都继续对他赞誉有加。据编年史家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记载：

他领兵作战的时候，无论是熬夜还是饥饿都影响不了他。若有需要，他主动承担最艰难的任务，去面对最大的风险。他天性严肃，不喜欢开玩笑，但在危险的时刻，常常和部下打趣逗乐，以此鼓舞他们的斗志。他曾说，将军的善意言辞能赢得士兵的爱戴。他擅长改良各项事务，也勤于将事情圆满解决。他既有才干，也刻苦勤奋，不仅凭借智慧和努力战胜敌人，还在聪明才智方面远远超过他们。[\[33\]](#)

斐迪南妒火中烧，对贡萨洛在那不勒斯的治理工作吹毛求疵，并确信大元帅破坏了他的权威，是一个潜在的叛徒。斐迪南将他召回西

班牙，说打算任命他为圣雅各骑士团团长，以此尊崇他。但贡萨洛回国后，这个提议就被抛在脑后。贡萨洛得到的任务是在热尔梅娜王后骑马时拉着她的缰绳。贡萨洛很快就在洛哈隐居，不再得到军事任务。他的侄子参加了对宗教法官卢塞拉不端行为的抗议，斐迪南说这个年轻人是叛贼，命令将他们家族的蒙蒂利亚城堡摧毁。这个年轻人是贡萨洛的哥哥阿隆索·德·阿吉拉尔的儿子，而阿隆索在镇压阿普哈拉斯叛乱时为了保卫卡斯蒂利亚而牺牲了生命。阿隆索和贡萨洛的祖先留下的家园就这样被摧毁了，斐迪南以此展示了自己的主宰地位。

斐迪南也不是很热衷于将切萨雷·博吉亚绳之以法。博吉亚目前仍被关押在梅迪纳·德尔·坎波的拉莫塔要塞，伊莎贝拉曾打算以谋杀罪审判他。胡安娜女王和母亲一样，相信切萨雷·博吉亚是个危险分子，于是继续监禁他。但在1507年，博吉亚成功逃离城堡，逃往纳瓦拉，在那里找到了雇佣兵的工作。但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他被杀死，尸体后来才被发现，身上有多处伤，并且被剥光，衣服和甲冑都被抢走。这就是切萨雷·博吉亚的悲惨结局，尽管他的父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曾给他那么多荣誉和奖赏。

斐迪南国王在处理美洲事务时也表现出了自己的漫不经心和麻木不仁。1506年，哥伦布结束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返回西班牙。此时他早衰得很严重。他经历了恐怖的磨难，遭遇海难，被抛弃在牙买加，过了几个月才得到营救。他抵达卡斯蒂利亚的时候，大约就是伊莎贝拉去世的时间，他也非常深切地为她哀悼。哥伦布的朋友们后来回忆，他当时就知道，斐迪南永远不会像伊莎贝拉那样认可他的功劳。

哥伦布得知女王的死讯时，就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结束了。“在塞维利亚，哥伦布得知伊莎贝拉女王驾崩，万分哀痛”，人权捍卫者

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后来写道：

对他来讲，她代表着庇护和希望。不管多少痛苦、艰难或损失（即便失去他自己的生命），都不如这噩耗对他的打击更沉重，让他更悲哀……她谦逊而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服务。至于天主教国王斐迪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仅在言辞和行动上对哥伦布忘恩负义，还想方设法地去伤害他。斐迪南口蜜腹剑。我们相信，如果他有办法取消他和女王公正地授予哥伦布的特权，而不至于良心不安和丢脸，他一定已经这么做了。我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斐迪南这样讨厌哥伦布，对他如此不公正，毕竟哥伦布为王室做出了极大贡献，其他任何君主都不曾得到这样的贡献。[\[34\]](#)

哥伦布于1506年在巴利亚多利德去世。他假装自己晚年受到种种摧残虐待，但其实过得还挺舒服。他喜欢让世人觉得他是某种殉道者，但事实上他给两个儿子留下大宗遗产，他的后代也如他所愿，成为高级贵族。

新大陆不再像伊莎贝拉在位时那样得到密切关注，那里的局势开始变得非常狂野和不堪。斐迪南对探索不感兴趣，除非能找到新的财源。他独自统治时期的第一阶段，探索远航衰落了。伊莎贝拉最初病倒的时候，探险就已经放缓。学者们对探险活动的减少感到困惑。

“哥伦布于1502年开始他最后一次远航之后的六年里，西班牙的探险活动沉寂下来，这很奇怪，”罗杰·梅里曼写道，“这期间只开展了两次零散的远航，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业绩。”[\[35\]](#)

不幸的是，由于西班牙政府的忽视、贪婪、残暴和管理不善，美洲原住民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虐待。拉斯·卡萨斯相信，如果伊莎贝拉还在，印第安人的死亡会少得多：“伊莎贝拉女王的神圣热情、悉心照料、不知疲倦的努力和挽救印第安人的一丝不苟的意志，从她在发现西印度群岛之后几年里发布的王室法令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考虑到，在一段时间内，关于西印度群岛的信息只是猜测和道听途说，所以她关注西印度群岛的事件还不到十年。”[\[36\]](#)

母亲辞世，父亲自私自利、麻木不仁地胡作非为，居住在遥远英格兰的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也受了不少罪。1509年，她终于嫁给了年轻的亨利八世国王。她父亲让她在英格兰宫廷逗留了多年，有时几乎身无分文，同时他与亨利七世为了未交付的部分嫁妆而讨价还价。亨利七世国王在临终时认可了凯瑟琳的优点，敦促儿子娶她，随后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凯瑟琳和亨利八世结婚不久之后，斐迪南与亨利八世缔结了一项条约，共同对抗法兰西，然后背叛和羞辱了亨利八世，自己在纳瓦拉占据了一些土地。这让亨利八世勃然大怒。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正在努力为自己在世界舞台赢得一个地位。此事让年轻夫妇的婚姻产生了裂痕。

这额外的压力给凯瑟琳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她一直为自己无法为丈夫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而忧心忡忡。亨利八世和斐迪南的争吵让她压力很大，是她于1514年流产的原因之一。“由于两位国王，以及她的丈夫和父亲之间的矛盾，英格兰王后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导致流产。据说，由于她无法忍受悲哀，生下了一个死亡的早产儿。”彼得·马特向路易斯·乌尔塔多·德·门多萨透露消息，“她丈夫因为遭到她父亲的背叛而责怪无辜的王后，不断向她抱怨。”^[37]

伊莎贝拉驾崩后，斐迪南的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就昭然若揭。在他统治的剩余时间里，他为了边境的领土得失与邻国争吵不休，与一个又一个欧洲大国交战。他嫉妒西斯内罗斯，害怕他比自己更得到公众敬仰，于是让他率军远征北非。他以为这个七十三岁的老教士太衰弱，没有本事赢得军事荣耀。但西斯内罗斯毫无畏惧、意气风发地出征了，征服了奥兰城，解救了被囚禁在那里的约1.5万基督徒奴隶。^[38]

但此次征服，再加上大约同一时期在北非的其他几次进攻，使得基督徒与北非穆斯林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促使穆斯林海盗加紧袭击地中海沿海地区。海盗首领海雷丁向毫无防备的城镇发动进攻，有

时得到曾经居住在西班牙的人的帮助。他取得了很大成功，以至于巴耶济德二世的儿子“残酷的”塞利姆一世任命海雷丁为土耳其舰队司令。1517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正如伊莎贝拉曾担心的那样，他们开始对西班牙步步紧逼。

斐迪南在卡斯蒂利亚摄政的岁月里，基督徒得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帮助。伊斯兰世界爆发了一种异端运动，使得土耳其人的注意力暂时离开了在欧洲的征服，转向离自己更近的矛盾。这种异端运动由谢赫^[39]萨非·丁领导的神秘主义集团发起，他自称是穆罕默德的一个女婿的后代。他的集团被称为萨法维耶教团。“奥斯曼人是严谨的正统穆斯林，憎恶萨法维耶教团的异端教导，”历史学家V. J. 帕里写道，“但他们正确地判断，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上的危险；对他们来讲，这也是严重的政治威胁。”^[40]

在这期间，西班牙得到一个喘息之机，就像巴耶济德二世和杰姆争斗期间一样。这些年里，在佛兰德的梅赫伦，年轻的查理（卡斯蒂利王位的继承人）在玛格丽特（伊莎贝拉女王心爱的儿媳，最终按照伊莎贝拉的希望，抚养了伊莎贝拉的继承人们）照料下，逐渐长大成人。玛格丽特将伊莎贝拉的遗产承袭下去。她甚至在伊莎贝拉的财产被匆匆拍卖的时候，从中带走了许多以基督生平为主题的画作，将其留在自己手边。在梅赫伦，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看到了这些画作，赞扬它们的“纯净和卓越”。这话后来成了一句名言。^[41]

玛格丽特确保这些画作始终作为一套，不被拆散，并将其作为成人礼，赠给伊莎贝拉的外孙们。今天这些画作大部分保存在马德里的王宫，其余的则成为各大艺术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包括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华盛顿的国家艺术画廊。

玛格丽特对艺术的浓厚兴趣使得她在梅赫伦的宅邸成为欧洲第一个拉美艺术的伟大中心。埃尔南·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时收集的黄金

面具、黑曜石仪式用具和羽毛头饰被送给了查理王子，但由玛格丽特保管。这是欧洲人第一次瞥见美洲丰富而形式多样的艺术传统。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余生是在隐居中度过的，国王再也没有派遣他出征。但他的军事领导已经变革了西班牙军队，他的影响持续了好几代人。1515年12月，他在发高烧之后去世，受到全国人民的哀悼。在临终告解时，他说自己只有三个遗憾，一是背叛了那不勒斯国王^[42]；二是背叛切萨雷·博吉亚，这两人都是因为信任他才来找他的；至于第三件遗憾的事情，他说只有上帝知道。他曾再婚，但被安葬在格拉纳达的圣哲罗姆修道院，距离伊莎贝拉女王最后的长眠之地很近。他的墓地上方悬挂着他为卡斯蒂利亚王室浴血奋战一百场战役的纪念垂饰。

彼得·马特小心翼翼地见风使舵，保住了自己在宫廷的位置。他说，贡萨洛的死讯传来，西班牙举国哀悼。“呜呼哀哉，西班牙！”马特用他典型的华丽辞藻写道，在一封信里记述了贡萨洛的所有伟大胜利，并提及，他的“大元帅”称号实至名归。斐迪南国王得知贡萨洛去世后，似乎也有些懊悔。“国王得知这消息，颇为烦恼，或者说似乎是这样。只有上帝知道人的内心。”马特写道，“因为斐迪南的宽宏有时受到怀疑，所以他允许贡萨洛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舒适地生活。”^[43]

* * *

斐迪南国王于1516年去世，也就是贡萨洛辞世几个月之后。斐迪南曾在妻子的要求下服用一种用公牛睾丸制成的药剂，以增强性功能，但这种药剂的副作用损害了他的健康。斐迪南始终没有和年轻热情的妻子生出健康的孩子，这有点奇怪。此前他一直是以特别多产而闻名的。斐迪南和热尔梅娜只生了一个孩子，而那个婴儿出生之后很快就夭折了。当然，因为斐迪南特别风流，所以他可能是最早患上梅

毒的欧洲人之一，当时梅毒在他的王国大肆传染，而且可能是从巴塞罗那开始传播的，当时他就居住在那里。近期的法医学证据表明，阿拉贡王族的多名成员曾患有梅毒。当时梅毒是无法治愈的，而且会导致不育。

据说在1494年，梅毒从巴塞罗那传播到那不勒斯，在那里形成大爆发。斐迪南所在的阿拉贡王族有许多成员要么成为梅毒的牺牲品，要么曾受到其威胁，不管有没有感染上。他的亲戚们常在那不勒斯和巴塞罗那之间来回穿梭，并在意大利全境活动，常常带着大量阿谀奉承、品行风骚的廷臣。

研究那不勒斯王族的考古病理学家发现，斐迪南的堂兄费兰特国王（生于1423年，卒于1494年，享年71岁）死于结肠癌，似乎没有感染过梅毒。但他的较年轻的亲戚们几乎肯定得过梅毒。费兰特的孙女，美丽的阿拉贡的伊莎贝拉^[44]。（生于1470年，嫁给米兰公爵）有梅毒的生物标志。我们相信她曾尝试用水银治疗自己的疾病，导致她的牙齿变黑。她尝试刮去自己变黑牙齿的珐琅质，以消灭证据。她的同父异母妹妹的下肢有梅毒造成的溃烂。在当时，腿部和身体其他部位的溃烂是梅毒的一个常见标志。^[45]

斐迪南去世的地点是一个叫马德里加莱霍的小村庄的一座小屋，当时他正在旅行。但与伊莎贝拉的驾崩不同，他的去世没有引起西班牙人的举国哀恸。他被葬在格拉纳达，在伊莎贝拉身旁，位于一座与伊莎贝拉的要求相抵触的雄伟陵墓内。伊莎贝拉曾要求将女儿伊莎贝拉埋葬在她身边，但她女儿的遗体被留在托莱多。最后，斐迪南、伊莎贝拉女王、胡安娜女王和腓力国王永久安息于一处，这是公共宣传的胜利，也是玩世不恭地宣示了王室的所谓和睦。

在随后几个世纪里，斐迪南声名鹊起，伊莎贝拉的很多成就都被认为是他的功劳。在官方文件中，他的名字被写在伊莎贝拉前面（有

的时候是因为她特地要求把他的名字加上去），所以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有时会被自己的性别歧视思想所蒙蔽，把他当作事件的主要推动者，尽管他扮演的角色是很次要的。

许多年里，一代代学者审视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二十五年婚姻，努力推断出他们各自做出了多少贡献，哪些决定是他的，哪些是她的。要回答这些问题，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是，看看伊莎贝拉女王去世后，斐迪南独自执政时干得怎么样。她去世后，他还活了十二年，一直到1516年。他与伊莎贝拉共同执政的时候，他可以算得上欧洲最伟大的君主之一，被认为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没了伊莎贝拉，他几乎没有做出一点点有意义的成绩，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国际阴谋上。

意大利人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在伊莎贝拉去世后的西班牙生活过一些年。在他的著作《廷臣之书》中，他斟酌了这对夫妻的相对重要性。这部书记载了在乌尔比诺公爵的宫殿内进行的一系列长谈。有一次，卡斯蒂廖内的伙伴问他，伊莎贝拉是否真的做了他所称的那些事情。真正建功立业的难道不是斐迪南吗？他问道。

卡斯蒂廖内答道，斐迪南有资格与伊莎贝拉相提并论，但仅仅因为她选择了爱他。“因为女王认为他配得上做她的丈夫，并且非常爱他、尊敬他，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资格与她相提并论，”卡斯蒂廖内写道，“但我相信，恰恰是由于她，他才获得了巨大的声望，这声望才是最贵重的嫁妆，其价值不亚于卡斯蒂利亚王国。”

爱的确是难以解释的。

* * *

伊莎贝拉的哈布斯堡血统的外孙和外孙女们，受到玛格丽特的悉心照料，受益良多，承担起他们家族庞大领地的沉重责任。他们的领地环绕整个世界。查理于1516年成为西班牙国王，1519年成为神圣罗马皇帝，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在他统治下，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这是两个拥有无穷财富的神话般的帝国。

胡安娜的次子斐迪南出生于西班牙（当时胡安娜与腓力访问卡斯蒂利亚），在西班牙长大，后来获得了家族在奥地利的领地。他肩负起监视与奥斯曼土耳其人边界的责任。1529年，他成功抵挡住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围攻，遏制住他们在陆地的进攻。1558年，他的兄长查理五世退隐到西班牙的一家修道院，于是斐迪南成为神圣罗马皇帝。几十年后的1571年，查理五世的儿子堂胡安指挥一支海军，在勒班陀港口附近击败奥斯曼人，这是基督教西方对土耳其人取得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胜利。维也纳之战和勒班陀海战的胜利并非如某些人所称是决定性的，但仍然都是世界历史上的分水岭。它们标志着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并清楚地表明，西方将会坚持下去，并高效地战斗，最终遏制住土耳其人的扩张。

指挥棒传到了伊莎贝拉的外孙查理五世和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手里，然后传给腓力二世和堂胡安。他们是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唯一一支强大力量，组织自己的防御，将人们团结在宗教大旗下，致力于捍卫宗教正统，从而与声势浩大的敌人对抗。他们仍然自视为基督教的捍卫者，将从新大陆获取的全部资源投入这场斗争。他们也四面树敌，包括一个新的敌人——在他们看来属于异端的基督教分支，即新教运动。正如他们的外祖父母镇压异端，他们也运用异端裁判所的机制来镇压这些思想犯——新教徒。但新教在西班牙始终没有构成像在欧洲其他地方那样的威胁。在伊莎贝拉治下开展的教会改革运动已经在反宗教改革运动开动之前许久就铲除了天主教會的许多最严重的弊端。

在这支新的基督教军队中与哈布斯堡家族并肩作战的，有来自新大陆的印第安人的后裔，包括阿兹特克领袖蒙特祖玛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探险家埃尔南·科尔特斯的孙辈，他们互相通婚，繁衍子嗣。在新大陆，在随后的一百二十年里，西班牙人将建造7万座教堂、500座修道院和30万座教会赞助的学校与医院。他们还将兴建至少4座大学，分别在哥伦比亚、秘鲁和墨西哥。他们还从新大陆获取了价值约15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将其用于欧洲的事业。^[46]

伊莎贝拉出生的时候，基督教是一种奄奄一息的宗教，因为内部纷争、外部攻击而羸弱不堪。她去世五百年后的今天，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信徒包括两百多个国家的约20亿人。其中有一个人出生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在2013年成为教皇后自称方济各一世。第一批被他封为圣徒的人，就是1480年在奥特朗托被杀害的800人，他称他们为殉道者。

伊莎贝拉的直接后裔仍然在欧洲各地掌权。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英国、丹麦、挪威、瑞典和摩纳哥的王族都尊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为祖先。^[47]

^[1] 格列柯原名多米尼柯·狄奥托科普洛（1541～1614），西班牙绘画艺术的第一位大师。“格列柯”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希腊人”，因为他出生于克里特岛。他的画作数量惊人，最著名的有《奥尔加斯伯爵下葬》等。

^[2] 迭戈·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黄金时代最重要的画家之一，擅长肖像画，创作了许多王室成员和显贵的画像，最著名的杰作为《宫女》。

^[3] King Ferdinand to King Henry VII, November 26, 1504, in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1, *Henry VIII: 1485-1509*, ed. Gustav

Bergenroth (London: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 s Treasury, 1862) .

[4]. Tarsicio de Azcona, *Isabel la Católica: Estudio crítico de su vida y su reinado* (Madrid: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1993) , p.951.

[5]. Chiyo Ishikawa, *The retablo of Isabel la Católica* (Turnhout, Belgium: Brepols, 2004) , pp.5-8.

[6]. Azcona, *Isabel la Católica*, p.951.

[7]. Peter Martyr, *Opus Epistolarum: 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ondon: Wellcome Library) , vol.3, letter 285.

[8]. Bethany Aram, *Juana the Mad: Sovereignty and Dynasty in Renaissance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 pp.77-78.

[9]. Jacobo Stuart Fitz-James and Falcó Alba, *Correspondencia de Gutierre Gómez de Fuensalida* (Madrid: Imprenta Alemana, 1907) , p.389.

[10]. 正式称号为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国王腓力一世。

[11]. Peter Martyr to Archbishop of Granada, August 4, 1505, in *Opus Epistolarum*.

[12]. Aram, *Juana the Mad*, p.82.

[13]. Aram, *Juana the Mad*, p.80.

[14]. Vincenzo Quirini to the Signory, September 1505,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 vol.1, 1502-1509, ed. Rawdon Brown (Great Britain: National Archives, 1864) , pp.300-10.

[15]. Quirini to the Signory, April 4, 1506,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

vol.1, 1502-1509, ed. Rawdon Brown (Great Britain: National Archives, 1864) , pp.300-10.

[16] Quirini to the Signory, April 4, 1506,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 vol.1, 1502-1509, ed. Rawdon Brown (Great Britain: National Archives, 1864) , pp.300-10.

[17] Quirini to the Signory, April 4, 1506,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 vol.1, 1502-1509, ed. Rawdon Brown (Great Britain: National Archives, 1864) , pp.300-10.

[18] Quirini to the Signory, April 4, 1506, April 16, 1506,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 vol.1, 1502-1509, ed. Rawdon Brown (Great Britain: National Archives, 1864) , pp.300-10.

[19] Philibert Naturel to Philip le Beau, June 7, 1506, LM 24195, correspondence of Margaret of Austria, Archives du Nord, Lille, France.

[20] 即前文讲到的富瓦伯爵夫人，阿拉贡的埃莉诺（1426~1479）。

[21] King Ferdinand to De Puebla, December 1505,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1, *Henry VIII: 1485-1509*, ed. Gustav Bergenroth (London: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 s Treasury, 1862) .

[22] 热尔梅娜的母亲是路易十二的姐姐。

[23] James Braybroke to Henry VII, July 1505,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1, *Henry VIII: 1485-1509*, ed. Gustav

Bergenroth (London: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 s Treasury, 1862) .

[24] Maximilian de Austria, 1505, in Fernando Díaz-Plaja, *Historia de España en sus documentos, siglo XVI* (Madrid: Ediciones Catedra, 1988) .

[25] April 4, 1506, Brussels, September 9, 1505, in Brown, ed.,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vol.1.

[26] Peter Martyr, in *Opus Epistolarum*, vol.3, letter 300.

[27] Peter Martyr, in *Opus Epistolarum*, vol.3, letter 311.

[28] Aram, *Juana the Mad*, p.88.

[29] Elaine Sanceau, *The Reign of the Fortunate King, 1495-1521* (New York: Archon Books, 1970) , p.140.

[30] Aram, *Juana the Mad*, p.10.

[31] Annemarie Jordan, *The Development of Catherine of Austria' s Collection in the Queen' s Household: Its Character and Cost* (London: Simon&Schuster, 2010) .

[32]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 p.190.

[33] Mary Purcell,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 p.159.

[34]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trans. and ed. Andrée Collard (New York: Harper&Row, 1971) , pp.138-39.

[35] Roger Bigelow Merriman,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New York: Cooper Square, 1962) , vol.1, p.213.

[36] Las Casas, *History of the Indies*, p.35.

[37]. Peter Martyr to Luis Hurtado de Mendoza, December 31, 1514, in *Opus Epistolarum*, epistle 542.

[38]. Robert C. Davis, *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 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 1500–180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p. xiv.

[39]. 谢赫 (Sheikh) 是阿拉伯语中常见的尊称, 指“部落长老”“伊斯兰教教长”“智慧的男子”等, 通常是超过四十岁且博学的人。在阿拉伯半岛, 谢赫是部落首领的头衔之一。

[40]. V. J. Parry,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to 173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p. 64.

[41]. Ishikawa, *The retablo of Isabel la Católica*, p. 1.

[42]. 可能指的是西班牙与法兰西瓜分那不勒斯王国。

[43]. Peter Martyr to Marquess of Mondejar, December 5, 1515, in *Opus Epistolarum*.

[44]. 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的女儿。

[45]. Tom Mueller, “CSI: Italian Renaissance, ” *Smithsonian*, July–August 2013.

[46]. G. González Dávila, *Teatro de Las Grandeza de la Villa de Madrid* (Madrid, 1623) , quoted in Clarence Henry Haring, *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Spain and the Ind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pp. xii and xiii.

[47]. 今天欧洲国家元首是伊莎贝拉后代的还有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

后记

每一个爱书人都有自己最喜爱的地方，可以躲在那里静静地读书，并梦想遥远的国度。我小的时候生活在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区，当时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我家附近的一座混凝土海堤，从那里可以远眺加勒比海。在我的幻想中，我无须游历很远，因为我坐的地方，双腿垂在海面的地方，就是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502年最后一次远航期间拜访过的地方。当时他还在拼命努力给他的赞助人——严肃而活跃のカスティ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带回喜讯。

巴拿马曾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一个枢纽，此地随处可见伊莎贝拉的遗产。成吨的黄金白银从巴拿马运回欧洲，让女王的后代能够在旧大陆扩张自己的权力和领地。巴拿马有十几处遗迹，大多已经倾颓，被热带雨林的藤蔓覆盖。西班牙人统治全球的时候曾生活在那些地方，在那里工作。已成断壁残垣的圣洛伦佐堡和破破烂烂的巴拿马老城足以证明，即便最强盛的政治势力也是转瞬即逝的。这给我留下了生动的印象。那时的我是美国的海外帝国的孩子，而美国正处于力量的巅峰，在全世界既受仰慕，也遭痛恨。

在大学里，我继续追寻自己对西班牙历史、艺术和文学的兴趣。我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伊莎贝拉女王曾赞助这所大学，并对其十分钟爱）读书时，游览了西班牙，参观了许多宫殿、城堡和博物馆，它们都曾得到新大陆财富的赞助。当时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刚刚去世，西班牙在历史的一段黑暗时期之后又一次向全世界开放。

有一天，我在前往马德里旅行的时候，火车意外地在一个破落的小村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斯·托雷斯停下了。我有的是时间，于是在这个村庄遍地尘埃的小巷漫步，突然一座砖石建筑映入我的眼帘。一个小小的标牌告诉我，伊莎贝拉就出生于此。这座中世纪建筑并不起眼，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位君主的家。这景象让我认识到，伊莎贝拉的开端是多么卑微，她如同流星一般的崛起是多么出人意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女性很少执掌权力的时代，一个出自这种背景的年轻女子，居然能够为她的孙辈称霸全球铺平道路。我为此着迷，我觉得，为伊莎贝拉写一本书的想法就在那时诞生在我脑子里。不过，做了几十年的新闻记者之后，我才重拾自己最初对历史的兴趣。我对伊莎贝拉女王兴趣盎然，对她的举动感到困惑不解，希望更好地了解她，了解她做了什么事情，又是为什么。最重要的是，必须从她所在时代的背景来理解她，我就是这样努力的。

对她的传记作者来说，伊莎贝拉女王的生平就是一场墨迹测验^[1]。每位作者都对她的生平有自己的视角和内在的偏见。天主教徒以一种方式看待她；新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对她的看法完全不同。关于她的一些虚假信息流传甚广。西班牙历史曾被宣传家系统性地扭曲抹黑，这种过程被称为“黑色传奇”^[2]。穆斯林控制西班牙的时代被描绘得无比美好，这也是不准确的。另外，欧洲人、美洲原住民及其后代对西班牙征服新大陆的看法肯定也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伊莎贝拉是世界历史上最富争议的统治者之一，既受敬仰，也遭到妖魔化。

我在此应当揭示一下自己特别的偏见。首先，关于信仰。我在宗教方面并不活跃。我的祖先主要是来自欧洲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我努力对我描述的所有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的情感保持开放的态度。我有一个特别的偏见是，我认为杀人和奴役人是邪恶的行为，不管受害者是什么人，也不管残酷的行为在当时为什么能够被合理化。

总的来讲，我觉得伊莎贝拉派遣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去新大陆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就是所谓“哥伦布大交换”的产物。

我年幼的时候，母亲常骄傲地告诉我，她的家族最初抵达新大陆，来到了詹姆斯镇。这意味着她拥有早期美国殖民者的血统。我父亲拥有部分美洲原住民血统，是伦尼莱纳佩部落的后代，他会笑着答道：“是啊，你们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你们的船，欢迎了你们。”

所以，我对丧失了土地的美洲原住民的权力主张非常同情。我对欧洲人抵达美洲时遇到的挑战也感到同情，因为他们也受尽了苦难，损失惨重。

同时我也非常赞赏早期新大陆探索者表现出的莫大勇气。我第一次看到新大陆的西班牙要塞是我六岁的时候，当时我参观了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要塞。几年后，我们家从美国迁往巴拿马，途中要在通往新奥尔良的现代高速公路上行驶三天。然后，我们从新奥尔良出发，在海上航行四天。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这也算很长的旅途了。

有一天，我们开车穿过巴拿马的加勒比海沿海丛林，去往圣洛伦佐堡。我大感意外地认识到，它与我在圣奥古斯丁看到的要塞是姊妹。我很早就看到了西班牙帝国的庞大规模和尺度，它横跨大洋扩张到如此遥远的地方，以及它多么高效地将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强加于数千英里之外的土地。不管你对该时期的西班牙的看法如何，它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

我的视角的另一部分来自我作为新闻记者的人生经历。我曾报道过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与15世纪的伊比利亚人面对的，是一模一样的。作为记者，我非常重视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在为本书所做的研究工作中，我始终首先去寻找亲身在场、亲眼见证历史事件的人们的说法。我注意到了后世学者对这些原始资料的批评，但一般来讲我

倾向于更重视目击者记述，而不是后人（他们并不在事件现场）的阐释。幸运的是，在国会图书馆（驰名世界的优秀图书馆），我能找到大量这样的原始资料。那里的数十位图书馆员帮助我找到了我需要的书籍，或者帮助我读到古书和手稿，让我能够找到本书描述的许多事件的最早记载。

我特别努力地去寻找非传统的或者“外界”的记述，以尽可能清晰地把故事讲得更完整。关于异端裁判所及其影响的记述，我查阅了犹太人的史料，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犹太学收藏品中找到了非常珍贵的材料。关于格拉纳达王国的史实和奥斯曼帝国进攻时期，我找到了阿拉伯史料和来自东欧的当时的第一人称记述。其中一些史料只是在前不久才被翻译成英文。某些资料还从来没有被译为英文过，于是我自费请人将其翻译成英文。为了追寻本书的故事，我旅行到西班牙、英格兰、法国、巴拿马和波多黎各，尽可能地使用当地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资源。

我有时引用的是比较老的历史书，而不是历史事件当时的原始记载，仅仅因为这些历史书的语言太美。此处仅举两个例子，威廉·希克林·普雷斯科特和本齐恩·内塔尼亚胡的作品已经有些过时了，现在有更新的研究，但他们的成就非常伟大，在各自领域内是了不起的先驱者，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意味着，本书与今天大多数学术性很强的历史学家的作品都不同。在有些地方，这一点最明显，如关于加勒比海食人行为和梅毒可能起源于新大陆。许多现代历史学家对关于这些方面的记述表达了怀疑，可能是对某些早期欧洲编年史家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矫枉过正了。这些早期欧洲编年史家毕竟是急于为欧洲人攫取美洲土地辩护。但是，不计其数的第一人称记述在一些基本的事实上意见一致，所以我把它们视为极有可能真实的资料，展现出来。

此外，食人行为有宗教仪式的元素，或者是人类绝望之下的疯狂之举。这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我不认为，提到这一点就是对任何族群的歧视。新的研究表明，詹姆士镇也曾发生过食人行为，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吃人肉，并非某种文化所独有。

关于梅毒，这种疾病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别凶猛的方式席卷欧洲，我不认为这是巧合。当时的许多第一手记述都讲到，出现了一种性传播的可怕的新疾病。另外，传染往往是双向的。梅毒可能是从西向东传播的，但天花、麻疹、流感和腺鼠疫同时从东向西传播，造成的死亡人数多得多。而且，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在19世纪初首次将梅毒传播到夏威夷群岛。

关于伊莎贝拉家族中儿童可能遭受性虐待的讨论，源自我自己和我的同事的新闻工作，并咨询了相关领域的心理学专家。孤立的档案记载讨论了伊莎贝拉家族的事件。将其综合起来看，我们就看到了一种长期存在但直到今天才得到调查和揭露的性虐待。15世纪末卡斯蒂利亚宫廷内的模式很像近期曝光的一些关于教士和其他权威人物的丑闻。

我努力将伊莎贝拉置于她的时代背景下，置于她所生活的空间内。她是个热忱虔诚的天主教徒，生活在奥斯曼土耳其人似乎即将彻底消灭基督教的时代。我坚信，她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从她的角度看，她受到了上帝召唤，要捍卫基督教信仰，去抵抗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

[1] 也称罗夏测验，得名自瑞士心理分析学家赫尔曼·罗夏（1884～1922），是一种心理学测试，通过解读和分析人对墨迹的认知，来评估人的心理状态，如思维紊乱等。

[2]. 191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利安·胡德利亚斯（Julián Juderías）在其著作《黑色传奇和历史真相》中提出，现代欧洲历史学对西班牙帝国及其人民和文化进行了妖魔化，忽视西班牙帝国的正面成就。

致谢

要让我感谢所有对本书有贡献的人，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从很多方面看，我这一生都在为这本书而工作，不管当时我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在这期间，许多人给了我指导、高明的视角和鼓舞。

我的母亲Melinda Hoppe Young嗜书如命，而且是个浪漫主义者，她激励我不管走到哪里，都寻找故事。而且，我和她一起去过很多美妙的地方！她热爱巴拿马的丛林、废墟和历史。她无所畏惧地带我们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去远行，去看我们能够找到什么。她驾驶一辆客货两用车，带着我们渡过河床、探索荒凉的热带海滩，远足到鲜有外邦人涉足的偏远内陆农村。

我童年的最好朋友Laura Gregg Roa与我同龄，和我们一样对巴拿马及其西班牙和印第安传统着迷。她常和我们一起探险。后来Laura比我先考到了驾照，于是我们俩独自驾车远行，这一次是Laura开车。有时我们骑摩托车，有时更安静地坐在她父母的旅行车里。

2000年，美国将巴拿马运河区归还巴拿马人，Laura留在当地，教授西班牙语和法语，后来搬到比利时，在那里的美国军事学校教书。她曾希望帮助我为本书做研究，但五十二岁时因癌症去世，留下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我把本书献给她。

我离开巴拿马运河区，去上大学，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新闻专业，这是一个幸运的选择，最终让我进入媒体业。在大学的时候，

我沉溺于西班牙和拉美艺术与历史，并修了几门这些方面的课。我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待了一学期，就是那个时候，本书开始在我脑子里成形。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萨拉曼卡大学的教授们给了我在该时期历史方面的基本功，这为我后来独立开展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我开始认真为本书做研究之后，多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给了我宝贵的帮助，让我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以及伊莎贝拉生活的环境。首先要感谢了不起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教授Teofilo Ruiz。在我为本书做研究和写作期间，他多次与我谈话。他渊博的学术、慷慨的秉性和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都给了我极大灵感。让我非常荣幸的是，他阅读了快完稿时的本书手稿，并提出了富于几十项修改和提高了的建议。Ruiz教授，谢谢你。

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历史教授Simon Doubleday在我的工作开始时与我促膝长谈。本书快结束时，尽管他正在西班牙旅行并做自己的研究，还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提出了好几项非常重要的修改意见。

西雅图大学的历史教授Theresa Earenfight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西班牙语文学教授Nancy Marino给了我建议和鼓舞。我常常参考石川千代关于伊莎贝拉私人宗教艺术品的精彩而美丽的书，书里包含一些非常杰出的画作，通常情况下公众是看不到的，因为它们被收藏在马德里的王宫，而王宫不对外开放。在我写作的最后阶段，她也与我探讨了手稿的情况。David Hosaflook关于阿尔巴尼亚历史的开创性著作帮助我理解了伊莎贝拉文件中提到的正在东欧发生的可怕事件究竟指的是什么。

如果本书在史实或诠释上有任何错误，都由我本人负责。

我的优秀经纪人和朋友Gail Ross让这本书的诞生成为可能，她在Ross Yoon经纪公司的合伙人Howard Yoon准备了非常精彩的提案，吸引到了Nan A. Talese| Doubleday出版社的编辑Ronit Feldman。Ronit鼓励和引导我从事研究和写作，担任我的顾问。我们每年都了解到关于伊莎贝拉的新知识，思考其意义。Ronit是一位有天赋的文字大师，非常擅长组织工作，她灵巧地引导本书的创作，直到问世。Nan A. Talese是一位著名的天才编辑，对最终产品作了一些精巧的修改。我还要感谢Doubleday团队的其他人，包括装帧设计师Pei Loi Koay、制作编辑Nora Reichard和校对编辑Janet Biehl。我对他们所有人都很感激。

我从许多图书馆和艺术博物馆的渊博专家那里得到了很大帮助。要感谢的人太多，无法一一列举。我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国会图书馆进行的，那里的西班牙语图书室的专家们帮助我走上正确道路，并指引我去阅读一般藏书、珍本书与手稿。我尤其要感谢Juan Manuel Pérez、Everette E. Larson、Barbara A. Tenenbaum、Georgette M. Dorn、Katherine McCann、Tracy North、Eric Frazier、Betty Culpepper、Janice C. Ruth和Sheridan Harvey。

西班牙的人们始终优雅而慷慨，接受一轮又一轮去西班牙寻根的美国人的询问。西班牙驻美国大使馆的Barbara Minguez Garcia和Jorge Sobredo帮助我铺平道路，向我引荐一些关键的档案工作者，从而帮助我接触到罕见而珍贵的早期手稿。Severiano Hernandez Vicente、Gonzalo Anes Alvarez、Carlos Martinez Shaw、Manuel Barrios Aguilera和Gregorio Hernandez Sanchez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所有的档案馆都是非常美妙的地方，可以待一下午，也可以待一个月。但我要特别感谢马德里的王家历史学院和国家图书馆，塞哥维亚、塞维利亚、西曼卡斯、巴利亚多利德、格拉纳达和埃斯科里亚尔的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本书提到的一些重要艺术品存放在马德

里的普拉多博物馆、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艺术画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布尔戈斯的拉斯维尔加斯修道院。为了寻找伊莎贝拉的足迹，我走遍了西班牙，途中享用了许多杯美酒和许多盘“塔帕斯”小食。

在法国，我在里尔的北方档案馆查阅了关于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文献。在伦敦，我在大英博物馆和国家档案馆度过了许多时光。伦敦的韦尔科姆图书馆提供了彼得·马特《书信集》的英译本。

在巴拿马、波多黎各和墨西哥，我参观了与本书涉及新大陆各章相关的许多历史名胜。我感激那些拥有远见卓识、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半球也有值得保存的历史的人们。

在美国，我参考了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加州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与艺术馆、芝加哥艺术学院、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苏世民楼、华盛顿学院米勒图书馆、马里兰大学麦凯尔丁图书馆和乔治城大学劳因格图书馆的藏品。

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和阿灵顿的绝妙图书馆为我提供了近二十年出版的很大一部分材料。

塞哥维亚旅游局工作人员Marta Rueda和我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带我在全城观光，与我分享她几十年来关于伊莎贝拉의思考和观点。她不仅是一位向导，还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圣米迦勒酒店的所有者给了我一个俯瞰圣米迦勒教堂红瓦屋顶的房间，让我能够眺望伊莎贝拉登基的地点。他们对我始终热情而慷慨。

我还要感谢法国里尔的Louisa Woodville、Alexis Simendinger、Kim Winfrey和Camille Brilloit；墨西哥圣米格尔德阿连德的Jesus Ibarra；还有Luis Chaffo、Holly Hall、Laura Evenson和Wendy Silverthorne。

若没有我之前的学者们的努力，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其中一些人还健在，有些人已经与世长辞。此处的列举并没有任何顺序。我要特别感谢Marí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Juan de Mata Carriazo、Jerónimo Zurita、Luis Suárez、Tarsicio Azcona、Peggy Liss、Nancy Rubin和William Hickling Prescott。

在本书快结尾的时候，我的力量快要枯竭，此时我的妹妹Elizabeth Gately开启了参考文献的工作，慷慨地贡献了她的时间和爱。她是个非常棒的妹妹。我的婆婆B. J. Averitt与我分享了她对于伊斯兰艺术的知识 and 毕生兴趣。

我亲爱的丈夫Neil Warner Averitt协助了我的研究工作，他对世界历史的知识非常渊博，能够帮助我在相距甚远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正如我们的孩子们喜欢说的，他就是一部大百科全书。他三次阅读了我的手稿，认真编辑了文字，并提出了富于真知灼见的建议。他近期对早期教会历史和耶稣基督生平产生的兴趣对我也有很大帮助。我对基督教的很多方面都不了解，是他教育了我。

我们的五个孩子——John、Elizabeth、Amelia、Alex和Rachel都听我讲述伊莎贝拉的故事许多个钟头，并相信我一定能够把本书写完。我想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感谢。

尤其是我的女儿Rachel和我一去西班牙，探索乡村，冒险进入橄榄树丛，远足穿过巨型向日葵的田地，以便寻找特殊的有利位置去观察在一般情况下很难看到的历史名胜。我们在古罗马大道上漫步，爬上倾颓的城堡遗迹。她那勇敢无畏的精神与我母亲相同。她愿意与我一同旅行，也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富有冒险趣味。

译名对照表

A

Abraham 亚伯拉罕

Abravanel, Isaac 以撒·阿布拉瓦内尔

Abu Abd Allah, see Boabdil, Prince 阿布·阿卜杜勒王子，见巴布狄尔

Abu al-Hasan Ali 阿布·哈桑·阿里

Abu Zarah, Tarif 塔里夫·阿布·扎拉赫

Adon (lord; master) 君主或主人

Aegean Sea 爱琴海

Aesop's fables 《伊索寓言》

Africa 非洲

al-Andalus, see Andalusia 安达卢西亚

Alba, duke of 阿尔瓦公爵

Albania阿尔巴尼亚

Alcáçovas, Treaty of 《阿尔卡索瓦斯条约》

Alcalá de Henares埃纳雷斯堡

Alcazaba fortress阿尔卡萨瓦要塞

Alcázar palace城堡宫殿

Alchemy炼金术

Alemán, Melchior梅尔希奥·阿莱曼

Alemán, Rodrigo罗德里戈·阿莱曼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VI, Pope亚历山大六世，教皇

Alexandria亚历山大港

Alfonso, prince of Castile and León阿方索，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王子（伊莎贝拉女王之弟）

Alfonso, prince of Portugal阿方索，葡萄牙王子（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之子）

Alfonso II , king of Naples阿方索二世，那不勒斯国王

Alfonso V , king of Portugal阿方索五世，葡萄牙国王

Alfonso V “the Magnanimous,” king of Aragon (Alfonso I of Naples) “宽宏的”阿方索五世，阿拉贡国王（作为那不勒斯国王，称阿方索一世）

Alfonso XI, king of León阿方索十一世，莱昂国王

Alfonso de Cárdenas阿方索·德·卡德纳斯

Alfonso of Bisceglie比谢列的阿方索

Alhama阿尔阿马

Alhambra palace阿兰布拉宫

Al-Mansur, Abu Amir阿布·阿米尔·曼苏尔

Al-Maqqari, Ahmad ibn Muhammad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马喀里

Almeida, Duarte de杜阿尔特·德·阿尔梅达

Almería阿尔梅里亚

Alonso de Aguilar阿隆索·德·阿吉拉尔

Alonso de Aragon (Ferdinand’s illegitimate son) 阿拉贡的阿隆索（斐迪南国王的私生子）

Alonso de Burgos阿隆索·德·布尔戈斯

Alonso de Cartagena (Paul of Burgos) 阿隆索·德·卡塔赫纳（布尔戈斯的保罗之子）

Alonso de Santa Cruz阿隆索·德·圣克鲁斯

Alora, Battle of阿洛拉战役

Alpujarras阿普哈拉斯

Alvarnèez, Clara克拉拉·阿尔瓦尔那埃斯

Álvaro de Luna阿尔瓦罗·德·卢纳

Amazon River亚马孙河

Anagostes, Ioannis约翰·阿纳戈诺斯特斯

Andalusia安达卢西亚

Anne of Brittany布列塔尼的安妮

Antioch安条克

Antwerp安特卫普

Aragon, Kingdom阿拉贡王国

Aram, Bethany贝瑟尼·阿拉姆

Arbués, Pedro佩德罗·阿韦斯

Arcimboldo, Giovanni乔万尼·阿钦博尔多

Arévalo阿雷瓦洛

Argentina阿根廷

Arias, Diego迭戈·阿里亚斯

Arias Dávila, Diego and Elvira迭戈与埃尔维拉·阿里亚斯·达维拉

Arias Dávila, Juan胡安·阿里亚斯·达维拉

Arthur, prince of Wales亚瑟，威尔士亲王

Asilah, Battle of艾西拉战役

Astarita, Thommaso托马索·阿斯塔里塔

Asturias阿斯图里亚斯

Athens雅典

Atlantic Ocean大西洋

Aubusson, Pierre d' 皮埃尔·德·奥比松

Augustus, emperor of Rome奥古斯都，罗马皇帝

Ausias de Puggio奥西亚斯·德·普吉奥

Austria奥地利

Avignon, popes阿维尼翁的教皇

Ávila阿维拉

Axarquí a阿士阿尔奇亚

Azcona, Tarsicio de塔西西奥·德·阿斯科纳

B

Babinger巴宾格尔

Babylon巴比伦

Bahamas巴哈马

Balboa, Vasco Nuñez de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

Barbaro, Niccolò尼科洛·巴尔巴罗

Barbarossa (Khair ad-Din) 巴巴罗萨 (海雷丁)

Barberi, Filippo de' 菲利波·德·巴尔贝里

Barbo, Pietro, see Paul II , Pope彼得罗·巴尔博, 教皇保罗二世

Barcelona巴塞罗那

Barleti, Marin马林·巴莱蒂

Basque country巴斯克地区

Bayezid II , Ottoman sultan巴耶济德二世, 奥斯曼苏丹

Baza巴萨

Beatriz (Isabella' s aunt) 比阿特丽斯 (伊莎贝拉女王的姨母)

Beatriz de Silva比阿特丽斯·德·席尔瓦

Becikemi, Marin马林·贝西凯米

Belém, monastery of贝伦修道院

Belgrade贝尔格莱德

Bembo, Pietro彼得罗·本博

Benedict X III, Pope本笃十三世

Benevente, Count贝纳文蒂伯爵

Berbers柏柏尔人

Berenguela, queen of Castile and León贝伦加利亚，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女王

Bergenroth, Gustav古斯塔夫·贝尔根罗特

Bernáldez, Andrés安德烈斯·贝纳尔德斯

Bianchini, Janna詹娜·比安基尼

Bilhères de Lagraulas, Jean de让·比约尔·德·拉格拉

Bitlisi, Idris-i伊德尔斯·比特里西

Black Legend黑色传奇

Black Sea黑海

Blanca, princess of Aragon布兰卡，阿拉贡公主（恩里克四世第一任妻子）

Boabdil, Prince (Abu Abd Allah) 巴布狄尔王子（阿布·阿卜杜勒）

Bobadilla, Beatriz de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

Bobadilla, Beatriz de (niece) 比阿特丽斯·德·博瓦迪利亚（侄女）

Bobadilla, Francisco de弗朗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

Bobadilla, Mosèn Pedro de莫森·佩德罗·德·博瓦迪利亚

Bodrum博德鲁姆

Bonfire of the Vanities虚荣的篝火

Borgia, Alonso (Alonso de Borja) 阿隆索·博吉亚（卡利克斯特三世教皇）

Borgia, Cesare切萨雷·博吉亚

Borgia, Giofreddo焦弗雷·博吉亚

Borgia, Jofre乔弗雷·博吉亚

Borgia, Juan (Giovanni), duke of Gandia乔万尼·博吉亚，甘迪亚公爵

Borgia, Lucrezia卢克雷齐娅·博吉亚

Borgia, Pedro Luis佩德罗·路易斯·博吉亚

Borgia, Rodrigo, see Alexander VI, Pope罗德里戈·博吉亚
(亚历山大六世教皇)

Bosporus博斯普鲁斯海峡

Botticelli, Sandro桑德罗·波提切利

Braganza family布拉干萨家族

Bramante, Donato多纳托·布拉曼特

Brazil巴西

Bridge of Sighs叹息桥

Brindisi布林迪西

Brotardi, Count of布罗塔迪伯爵

Brussels布鲁塞尔

Burgo de Osma, El奥斯马镇

Burgos布尔戈斯

Burgundy勃艮第

Byzantine Empire拜占庭帝国

C

Cabeza de Vaca, álvar Núñez阿尔瓦·努涅斯·卡韦萨·德·巴卡

Cabrera, Andrés de安德烈斯·德·卡布雷拉

cacique (chief) , as term酋长

Cadalso卡达尔索

Cádiz, Rodrigo Ponce de León, Marquess of加的斯侯爵, 罗德里戈·庞塞·德·莱昂

Calabria卡拉布里亚

Calatrava, order of卡拉特拉瓦骑士团

Calixtus III, Pope卡利克斯特三世, 教皇

Canary Islands加那利群岛

cancioneros (books of songs) 歌谣集

canes (game) 抓杆子 (游戏)

Cape of Good Hope好望角

Cape Verde Islands佛得角群岛

Capsali, Eliyahu埃利亚胡·卡普萨利

Cardenosa 卡尔德尼奥萨

Caribbean 加勒比海

Caribe tribe 加勒比部落

Carlos (Charles), prince of Aragon 卡洛斯 (查理), 阿拉贡王子 (斐迪南国王的异母兄)

Carlota, princess of Naples 卡洛塔, 那不勒斯公主

Carrillo, Alfonso, archbishop of Toledo 托莱多大主教, 阿方索·卡里略

Casa de Contración 海关

Castel Sant Angelo 圣天使堡

Castiglione, Baldassare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

Castile, Kingdom of 卡斯蒂利亚王国

Castillo, Enriquez del 恩里克斯·德尔·卡斯蒂略

Castrioti, John, see Skanderbeg 约翰·卡斯特里奥蒂, 见: 斯坎德培

Catalina, princess of Portugal 卡塔利娜, 葡萄牙公主

Catalonia, Kingdom of 加泰罗尼亚王国

Cathars 清洁派

Catherine, queen of Portugal (daughter of Juana and Philip) 卡塔利娜, 葡萄牙王后 (疯女胡安娜与美男子腓力的女儿)

Catherine of Aragon, princess (Catalina; Ferdinand and Isabella's daughter) 阿拉贡的凯瑟琳, 公主 (卡塔利娜, 斐迪南国王与伊莎贝拉女王的女儿)

Catherine of Lancaster 兰开斯特的凯瑟琳

Catholic Council of Agde 阿格德天主教会议

Cecelia Martella 切奇利亚马尔泰拉

Celebi, Evliya 艾弗里雅·切莱比

Cephalonia 凯法利尼亚

Cerignola 切里尼奥拉

Cervantes, Miguel de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Chacón, Gonzalo 贡萨洛·查孔

Chacón, Juan 胡安·查孔

Chagres River 查格雷河

Chanca, Diego Álvarez 迭戈·阿尔瓦雷斯·昌卡

Charles, Dauphin of France 查理, 法兰西太子

Charles, duke of Berry 查理, 贝里公爵

Charles, prince of France 查理，法兰西王子

Charles V , Holy Roman emperor 查理五世，神圣罗马皇帝

Charles VIII “the Fathead, ” king of France 查理八世，“胖头查理”，法兰西国王

Charles of Valois 瓦卢瓦的查理

Charlotte of Albret 阿尔布雷的夏洛特

Chaytor, John Henry 亨利·约翰·蔡特

Chinchilla, fortress of 钦奇利亚要塞

Chintila, Visigoth king 金蒂拉，西哥特国王

Chronicle of Spain (Crónica; Diego deValera) 《西班牙编年史》（迭戈·德·巴莱拉）

Cifuentes, Count of 西丰特斯伯爵

Cisneros, Francisco Jiménez de 弗朗西斯科·西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

Clarissa order 克拉利萨女修会

Clement VII, Pope 克雷芒七世

Coín 科因

College of Cardinals 红衣主教团

Collins, Roger 罗杰·科林斯

Collioure 科利乌尔

Colmenares, Diego de 迭戈·德·科梅纳雷斯

Colonna, Prospero 普罗斯佩罗·科隆纳

Columbian Exchange 哥伦布大交换

Columbus, Bartholomew 巴尔托洛梅奥·哥伦布

Columbus, Christopher (Cristóbal Colon)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克里斯托瓦尔·科隆)

Columbus, Diego (Columbus' s brother) 迭戈·哥伦布 (哥伦布的兄弟)

Columbus, Diego (Columbus' s son) 迭戈·哥伦布 (哥伦布的儿子)

Columbus, Ferdinand 斐迪南·哥伦布 (哥伦布的儿子)

Commynes, Philippe de 菲利普·德·科米纳

Comnenus, David 大卫·科穆宁

Comnenus, George and Anna 乔治和安娜·科穆宁

Concepcionistas (religious order) 圣母无染原罪会

Concordat of Segovia 《塞哥维亚协定》

Constance of Castile卡斯蒂利亚的康斯坦丝

Constantine, emperor of Rome君士坦丁，罗马皇帝

Constantine XI, Byzantine emperor君士坦丁十一世，拜占庭皇帝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

Córdoba科尔多瓦

Corfu科孚岛

Coron科罗尼

Cortes of Castile (administrative council) 卡斯蒂利亚国会

Cortés, Hernán埃尔南·科尔特斯

Costa, Jorge da若热·达·科斯塔

Croatia克罗地亚

Crotone克罗托内

Cuéllar库埃利亚尔

Cueva, Beltrán de la贝尔特兰·德·拉·奎瓦

Cuneo, Michele de米凯莱·德·库内奥

Cyprus塞浦路斯

D

Dalmatia达尔马提亚

de la Chau, Monsieur德·拉·肖先生

della Rovere, Francesco, see Sixtus IV, Pope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 即西克斯图斯四世

De Puebla, Ambassador德·普埃夫拉, 大使

Descola, Jean让·德科拉

des Prats, Francisco弗朗西斯科·德普拉

devsirme system (child slavery) 德夫希尔梅制度

Díaz de Isla, Ruy鲁伊·迪亚斯·德·伊斯拉

Diego de Deza迭戈·德·德萨

Diego de Lepe迭戈·德·莱佩

Diego de Marchena迭戈·德·马切纳

Diego de Valera迭戈·德·巴莱拉

Djem (son of Mehmed' s II) 杰姆 (穆罕默德二世之子)

Dominican Republic多米尼加共和国

Dominicans多明我会

Dracula, Count 德古拉伯爵

Duarte (son of Jaoa I) 杜阿尔特 (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之子)

Duenas 杜埃尼亚斯

Dürer, Albrecht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E

Earenfight, Theresa 特雷莎·艾伦菲特

Edward III, king of England 爱德华三世, 英格兰国王

Edward IV, king of England 爱德华四世, 英格兰国王

Edwards, John 约翰·爱德华兹

Eleanor (daughter of Juana and Philip) 埃莉诺 (疯女胡安娜与美男子腓力之女)

Eleanor, princess of Aragon 埃莉诺, 阿拉贡公主 (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之女)

El Greco 格列柯

Elizabeth of York 约克的伊丽莎白

El Zagal, Abdalah 阿卜·杜拉·撒加尔

Enrique IV, King of Castile and León “El Impotente” 恩里克四世, 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国王, “无能的”

Enriquez de Luna, Maria 玛丽亚·恩里克斯·德·卢纳

Enriquez, Juana, see Juana, queen of Aragon 胡安娜·恩里克斯, 阿拉贡王后

Enriquez, Teresa “loca de sacramento” 特雷莎·恩里克斯,
“酷爱圣餐的疯子”

F

Fatima (wife of Abu al-HasanAli) 法蒂玛 (阿布·哈桑·阿里)

Federico, king of Naples 费德里科, 那不勒斯国王

Ferdinand, duke of Calabria 斐迪南, 卡拉布利亚公爵

Ferdinand, prince (son of Juana and Philip) 斐迪南王子, (疯女胡安娜与美男子腓力之子)

Ferdinand I , king of Aragon 斐迪南一世, 阿拉贡国王

Ferdinand of Antequera 安特克拉的斐迪南

Ferdinand of Granada 格拉纳达的斐迪南

Fernández-Armesto, Felipe 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

Fernández de Córdoba, Gonzalo “GreatCaptain”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 大元帅

Fernández-Morera, Dario 达里奥·费尔南德斯—莫雷拉

Fernandina Island 费尔南狄纳岛

Fernando (son of João I) 费尔南多 (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之子)

Ferrandino (Ferdinand II) , king of Naples费兰迪诺 (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

Ferrante (Ferdinand I) , king of Naples费兰特 (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一世)

Flanders佛兰德

Florence佛罗伦萨

Florida佛罗里达

Fodor, Pal帕尔·福多尔

Fonseca, Antonio安东尼奥·丰塞卡

Fonseca, Juan de胡安·德·丰塞卡

Fonseca, Juan Rodriquez de胡安·罗德里格斯·德·丰塞卡

Francis of Assisi, Saint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Franciscans方济各会

Francisco de Toledo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

Francis I , Pope方济各一世, 教皇

Franco, Francisco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Franco, Niccolò尼科洛·佛朗哥

Fuensalida, Gutierre Gomez de 古铁雷·戈麦斯·德·富恩萨利
达

Fusero, Clemente 克莱门特·富塞罗

G

Galicia加利西亚

Galindo, Beatriz比阿特丽斯·加林多

Gama, Vasco da瓦斯科·达伽马

Gandí a甘迪亚

Garcilasso de la Vega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

Garden of Noblewomen (Martin de Córdoba) 马丁·德·科尔多瓦 (《贵妇的花园》)

Garignola, Battle of加里尼奥拉战役

Gazavat-IHayreddin Pasa (Holy War of Hayredden Pasha; Barbarossa) 《海雷丁帕夏的圣战》

Genoa热那亚

Geography (Ptolemy) 托勒密《地理学》

Georgius de Hungaria匈牙利的乔治

Gerber, Jane简·格伯

Germana de Foix热尔梅娜·德·富瓦

Ghent根特

Ghirlandaio, Domenico多梅尼科·吉兰达约

Gibraltar (Jabal Tarik; Mountain of Tarek) 直布罗陀 (“塔里克山”)

Girón, Pedro佩德罗·希龙

Girón, Rodrigo Téllez罗德里戈·特列斯·希龙

Gitlitz, David Martin戴维·马丁·吉特利茨

Goffman, Daniel丹尼尔·戈夫曼

Golden Horn金角湾

Gonzalo de Madrid贡萨洛·德·马德里

Good Hope, Cape of好望角

Goodwin, Jason杰森·古德温

Granada格拉纳达

Gregory XI, Pope格里高利十一世

Griolanus, Franciscus Pratensis弗朗齐斯库斯·普拉坦西斯·格里奥拉努斯

Guacanagari (cacique) 瓜卡纳加里克斯 (酋长)

Guadalupe, shrine of, see Santa Maria de瓜达卢佩圣母教堂

Guadix瓜迪斯

Guanches tribe 关契斯部落

Guas, Juan 胡安·瓜斯

Gutierre de Cárdenas 古铁雷·德·卡德纳斯

Guzmán family 古斯曼家族

H

Hagia Sophia, Cathedral of 圣索菲亚清真寺

Haiti 海地

Ha-Kohen, Joseph 约瑟·哈—科恩

Halicarnassus, Mausoleum of 哈利卡纳苏斯的王陵

Halima Hatun 哈利马·哈图恩

Hapsburg family 哈布斯堡家族

Haro, Count of 阿罗伯爵

Harvard University, Houghton Library at 霍顿图书馆，哈佛大学

Harvey, L. P. L. P. 哈维

Hayreddin Pasha 海雷丁帕夏

Henry III, king of Castile 恩里克三世，卡斯蒂利亚国王

Henry VII, king of England 亨利七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VIII, king of England 亨利八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the Navigator, prince of Portugal 航海家恩里克，葡萄牙王子

Hercules赫拉克勒斯

Hispania西班牙

Hispaniola (Haiti) 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地）

Historia de las Indias (Las Casas) 《西印度史》（拉斯·卡萨斯）

Hojeda, Alonso de阿隆索·德·奥赫达

Holy Child of La Guardia拉瓜尔迪亚圣婴

Holy Roman Empire神圣罗马帝国

Homer荷马

Homza, Lu Ann卢·安·霍姆扎

Hopkins, T. C. F.T. C. F. 霍普金斯

Huelva韦尔瓦

Hungary匈牙利

I

Ibarra, Aldonza Roig de 阿尔东萨·罗伊格·德·伊瓦拉

Ibn Khallikan 伊本·赫里康

Ibn Shuaib 伊本·舒艾卜

Imber, Colin 科林·因贝尔

Inalcik, Halil 哈利勒·伊纳尔哲克

Isabella, Queen of Castile and León 伊莎贝拉，卡斯蒂利亚与
莱昂女王

J

Jabez (Hebrew scholar) 杰贝兹 (希伯来学者)

Jacobs, Martin 马丁·雅各布斯

Jacopo de Campi 雅各布·德·坎皮

Jaén 哈恩

Jamaica 牙买加

James, prince of Scotland 詹姆斯, 苏格兰王子

James IV, king of Scotland 詹姆斯四世, 苏格兰国王

James, Saint (Santiago) 圣雅各 (圣地亚哥)

Janissary warriors 近卫军战士

Jayyusi, Salma Khadra 萨勒马·卡德拉·贾乌西

Jerome, Saint 圣哲罗姆

Jerusalem 耶路撒冷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

Joan of Valois 瓦卢瓦的让娜

João, constable of Portugal (son of João I) 若昂, 司厩长
(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之子)

João I , king of Portugal若昂一世，葡萄牙国王

João II , king of Portugal若昂二世，葡萄牙国王

João III, king of Portugal若昂三世，葡萄牙国王

John the Baptist, Saint施洗约翰

John the Evangelist, Saint福音书作者约翰

John of Gaunt冈特的约翰

Johnson, Marion玛丽昂·约翰逊

Jorge (Juan II ' s illegitimate son) 若热（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之私生子）

Juana (Ferdinand and Aldonza' s illegitimate daughter) 胡安娜（斐迪南国王与阿尔东萨的私生女）

Juana la Beltraneja, princess (daughter of Enrique and Juana) 胡安娜·贝尔特兰尼娅（恩里克四世与胡安娜的女儿）

Juana of Aragon, Queen (wife of Enrique) 阿拉贡的胡安娜（恩里克四世之妻）

Juan I , king of Castile胡安一世，卡斯蒂利亚国王

Juan II , king of Aragon胡安二世，阿拉贡国王

Juan II , king of Castile and León胡安二世，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国王

Juan, prince (Ferdinand and Isabella' s son) 胡安, 王子
(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的儿子)

Juan, prince of Portugal 胡安, 葡萄牙王子

Juan de Flandes (John of Flanders) 胡安·德·佛兰德

Juan de la Cosa 胡安·德·拉·科萨

Juan de Vivero 胡安·德·比韦罗

Juan of Aragon 阿拉贡的胡安

Juan of Granada 格拉纳达的胡安

Judas 犹大

Julius II , Pope 尤利乌斯二世, 教皇

Justinian, Roman emperor 查士丁尼, 罗马皇帝

K

Kamen, Henry 亨利·卡门

Keen, Benjamin 本杰明·基恩

Kemal Pasha-zade 凯末尔·帕夏扎德

Khair ad-Din, see Barbarossa 海雷丁，即巴巴罗萨

Knights Hospitaller (Order of St. John) 医院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

Krbava Field, Battle of 克尔包沃原野战役

L

La Isabella Island (La Ysla Bella) 伊莎贝拉岛

Lamb, V. B.V. B. 兰姆

La Mota, fortress of 拉莫塔要塞

La Navidad settlement 圣诞节定居点

La Rabida, monastery of 拉比达修道院

Las Casas, Bartolomé de 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

Las Huelgas, Monastery of 拉斯维尔加斯修道院

lay investiture 俗人授职

Lenni Lenape tribe 伦尼莱纳佩部落

Leonardo da Vinci 列奥纳多·达·芬奇

Leonard of Chios 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

Leonor, queen of Portugal 埃莉诺，葡萄牙王后

Leonor de Sotomayor 埃莉诺·德·索托马约尔

Lepanto 勒班陀

Lesbos 莱斯博斯岛

Levi, Selomahha希罗马赫·哈·利未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 The (F. Columbus) 《海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传》(斐迪南·哥伦布)

lighthouse, Phoenician腓尼基灯塔

Lille里尔

Lisbon里斯本

Liss, Peggy佩吉·利斯

Lleida列伊达

Llorente, Juan Antonio胡安·安东尼奥·略伦特

Lomellino, Angelo安杰洛·洛梅利诺

Lope de Conchillos洛佩·德·孔奇略斯

López de Carvajal, Bernardino贝尔纳迪诺·洛佩斯·德·卡瓦哈尔

López de Haro, Diego迭戈洛佩斯·德·阿罗

López de Mendoza, Inigo, Count of Tendilla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滕迪利亚伯爵

Louis XI, king of France路易十一世，法兰西国王

Louis XII, king of France路易十二世，法兰西国王

Lucena卢塞纳

Lucero, Diego Rodriguez迭戈·罗德里格斯·卢塞拉

Luis, prince of Portugal路易斯，葡萄牙王子

Luis de Madrid路易斯·德·马德里

Luís de Santángel路易斯·德·桑堂赫尔

Luke, Gospel of 《路加福音》

Luke, Saint圣路加

Luther, Martin马丁·路德

M

Macedonia 马其顿

Machado, Roger 罗歇·马夏多

Machiavelli, Niccolò 尼科洛·马基雅弗利

McMurdo, Edward 爱德华·麦克默多

Madrid 马德里

Madrigal del las Altas Torres 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
斯·托雷斯

Magellan, Ferdinand 斐迪南·麦哲伦

Málaga 马拉加

Maldonado, Melchior 梅尔希奥·马尔多纳多

mal usos (bad customs) policy 恶政

Mamluks 马木留克

Manel, Fadrique 费德里科·马内尔

Manrique, Gómez 戈麦斯·曼里克

Manrique, Inéz 伊内斯·曼里克

Manuel, Elvira 埃尔维拉·曼努埃尔

Manuel, Juan胡安·曼努埃尔

Manuel I “the Fortunate”, king of Portugal曼努埃尔一世，葡萄牙国王，“幸运的”

Marbella马贝拉

Margaret of Austria奥地利的玛格丽特

Margaret of England英格兰的玛格丽特

Margarit, Joan若昂·马加里特

Margarit, Mosén Pedro莫森·佩德罗·马加里特

María, queen of Aragon玛丽亚，阿拉贡王后

María, queen of Portugal (Ferdinand and Isabella's daughter) 玛丽亚，葡萄牙王后（伊莎贝拉女王与斐迪南国王的女儿）

María “La Excelenta” (Ferdinand's illegitimate daughter) 玛丽亚，“绝妙女”（斐迪南国王的私生女）

María of Aragon阿拉贡的玛丽亚

Marino, Nancy F. 南希·F. 马里诺

Martel, Charles铁锤查理

Martin de Córdoba马丁·德·科尔多瓦

Martyr D' Anghiera, Peter (Peter Martyr; Pedro Martír de Anglería) : 安杰拉的彼得·马特(佩德罗·马蒂尔·德·安杰拉)

Mary of Burgundy勃艮第的玛丽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Juan de胡安·德·马塔·卡利亚索·阿罗基亚

Matthias, Saint圣马提亚

Matthias Corvinus, king of Hungary马加什一世, 匈牙利国王

Maximilian I , Holy Roman emperor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神圣罗马皇帝

Mechelen梅赫伦

Medici, Lorenzo de洛伦佐·德·美第奇

Medici, Piero de皮耶罗·德·美第奇

Medinaceli, duke of梅迪纳塞利公爵

Medina del Campo梅迪纳·德尔·坎波

Medina-Sidonia梅迪纳—西多尼亚

Mediterranean Sea地中海

Mehmed II “the Conqueror”, Ottoman穆罕默德二世, “征服者”, 奥斯曼苏丹

Melammed, René Levine勒妮·莱文·梅拉麦德

Mendoza, Ana and Beatriz de安娜与比阿特丽斯德·门多萨

Mendoza, Diego Hurtado de迭戈·乌尔塔多·德·门多萨

Mendoza, Luis Hurtado de路易斯·乌尔塔多德·门多萨

Mendoza, Pedro de Vera佩德罗·德·贝拉·门多萨

Mendoza, Pedro González de佩德罗·冈萨雷斯·德·门多萨

Menes da Silva, Amadeo阿马德奥·梅内斯·达·席尔瓦

Merriman, Roger罗杰·梅里曼

Merula, George乔治·梅卢拉

Mexico墨西哥

Michelangelo米开朗琪罗

Miguel de la Paz, Prince米格尔·德·拉·帕斯, 王子

Milan米兰

Millán, José Martínez何塞·马丁内斯·米连

Miraflores, Cartuja de, Altarpiece (Vander Weyden) 米拉弗洛雷斯祭坛装饰画(范·德·魏登)

Moclín莫克林

Moctezuma蒙特祖玛

Modon莫东

Moniz, Felipa 费莉帕·莫尼斯

Monta tanto, tanto monta motto 两人一样，完全平等

Montilla, castle of 蒙蒂利亚城堡

More, Thomas 托马斯·莫尔

Morison, Samuel Eliot 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

Morocco 摩洛哥

Moses 摩西

Mugheyth Ar-rumi 穆格赫斯·鲁米

Muhammad, Prophet 先知穆罕默德

muladíes (converts to Islam) 穆拉迪人（皈依伊斯兰教的人）

Muñiz, María Dolores Morales Carmen 玛丽亚·多洛雷斯·卡门
• 莫拉莱斯·穆尼斯

Münzer, Jerónimo 希罗尼穆斯·闵采尔

Murad II 穆拉德二世

Murcia 穆尔西亚

Mytilene 米蒂利尼

N

Naples那不勒斯

Nasrid dynasty纳斯尔王朝

Navarre, Kingdom of纳瓦拉王国

Negroponte (Egriboz) 内格罗蓬特（埃格里博兹）

Nero, emperor of Rome尼禄，罗马皇帝

Netanyahu, Benzio本齐恩·内塔尼亚胡

Nicholas V , Pope尼古拉五世

Nicolau, Joana华纳·尼古劳

Nieto, Hernando埃尔南多·涅托

Niña “尼尼亚” 号

Niño, Pedro Alonso佩德罗·阿隆索·尼尼奥

Noah挪亚

Norwich, John Julius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

Nubdhat Al-Asr努布达特·阿斯尔

0

Ocaña奥卡尼亚

Oliveira Marques, Antonio Henrique历史学家安东尼奥·恩里克·德·奥利韦拉·马克斯

Oliver-CopónsDon Eduardo de堂爱德华多·德·奥利弗—果波恩斯

Oman, Charles查尔斯·奥曼

Oran奥兰

Order of St. John of Jerusalem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

Order of Santiago圣雅各骑士团

Otranto奥特朗托

Ovando, Nicolás de尼古拉斯·德·奥万多

Oviedo y Valdés, Gonzalo Fernández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巴尔德斯

P

Pacheco, Juan胡安·帕切科

Pacheco, Juan (son) 胡安·帕切科 (儿子)

Pacific Ocean太平洋

Palencia, Alonso de阿隆索·德·帕伦西亚

Palestine巴勒斯坦

Paloma (Jewish matron) 帕洛玛 (犹太妇人)

Pamplona潘普洛纳

Panama巴拿马

Pane, Ramon拉蒙·帕内

Parisatys, queen of Persia帕丽萨提斯, 波斯王后

Parry, V. J. V. J. 帕里

Parthenon万神殿

Pastor, Ludwig路德维希·帕斯托尔

Paul, Saint圣保罗

Paul II , Pope保罗二世, 教皇

Paul of Burgos (Alonso de Cartagena) 布尔戈斯的保罗 (阿隆索·德·卡塔赫纳)

Pedro, king of Spain 佩德罗, 西班牙国王

Pedro (son of João I) 佩德罗, 若昂一世之子

Pedro de Luna 佩德罗·德·卢纳

Pelayo 佩拉约

Penalos, Francisco de 弗朗西斯科·德·佩纳罗斯

Peralta, Mosén Pierres de 莫森·皮埃雷斯·德·佩拉尔塔

Perpignan 佩皮尼昂

Persian Empire 波斯帝国

Peru 秘鲁

Peter, Saint 圣彼得

Philip, archduke of Austria “the Handsome, ” “the Fair” 腓力, 奥地利大公, “美男子”

Philip II 腓力二世

Philip the Good 好人腓力

Phillips, William 威廉·菲利普斯

Piccolomini, Enea Silvio, see Pius II , Pope恩尼亚·席维欧
• 皮可洛米尼, 庇护二世教皇

Pietà (Michelangelo) 《哀悼基督》 (米开朗琪罗)

Pinelli, Francesco 弗朗切斯科·皮内利

Pinta “平塔”号

Pinturicchio 平图里基奥

Pinzón,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平松

Pinzón, Martin Alonso 马丁·阿隆索·平松

Pinzón, Vicente Yáñez 文森特·亚涅斯·平松

Pius II , Pope 庇护二世, 教皇

Pius III, Pope 庇护三世, 教皇

Pizarr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Plasencia, Count of 普拉森西亚伯爵

Plateresque architecture 银匠式风格

Plutarch 普鲁塔克

Polo, Marco 马可·波罗

Ponce de León, Juan 胡安·庞塞·德·莱昂

Poncella de Francia, La 《法兰西少女》

Portobelo波托韦洛

Portuga葡萄牙

Posthumos, Ladislaus, king of Bohemiaand Hungary “遗腹子” 拉斯洛，波西米亚与匈牙利国王

Prescott, William Hickling威廉·希克林·普雷斯科特

Prester John祭司王约翰

Ptolemy托勒密

Pulgar, Hernando del埃尔南多·德尔·普尔加尔

Purcell, Mary玛丽·珀塞尔

Q

Quintanilla, Alfonso de阿方索·德·金塔尼利亚

Quirini, Vincenzo维琴佐·奎里尼

R

Ramírez de Lucena 拉米雷斯·德·卢塞纳

Representation of Burgos 《布尔戈斯声明》

Resurrection, The (Pinturicchio) 《复活》(平图里基奥)

Rhodes 罗得岛

Richard III, king of England 理查三世, 英格兰国王

Roderic, Visigoth king 罗德里克, 西哥特国王

Rodrigo de Bastidas 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

Rodrigo de Triana 罗德里戈·德·特里亚纳

Ronda 龙达

Roussillon 鲁西永

Royal Holy Cross Monastery (Conventode Santa Cruz la Real) 王家圣十字修道院

Ruiz, Teofilo 特奥菲洛·鲁伊斯

Ruy de Sande 鲁伊·德·桑德

Ryder, Alan 艾伦·赖德

S

Sabatini, Raphael 拉斐尔·萨巴蒂尼

Safawiyya heresy 萨法维耶异端

Safi ad-Din, Sheik 萨非·丁, 谢赫

St. Andrew, Chapel of 圣安得烈小教堂

Saint George, Castle of 圣乔治堡

St. Nicholas, Church of 圣尼古拉教堂

St. Peter' s Basilica 圣彼得大教堂

St. Vincent, church of 圣文森特教堂

Salamanca 萨拉曼卡

Salome 莎乐美

Salonika 萨洛尼卡

San Antonio, Church of 圣安东尼奥教堂

San Antonio El Real (Royal Monastery of St. Anthony) 王家
圣安东尼修道院

Sancha of Aragon 阿拉贡的桑恰

Sánchez, Gabriel 加夫列尔·桑切斯

Sánchez de Arévalo, Rodrigo 罗德里戈·桑切斯·德·阿雷瓦洛

Sandoval, Fray Prudencio de 普鲁登西奥·德·桑多瓦尔修士

San Francisco, Church of 圣弗朗西斯科教堂

San Francisco, Convent of 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

San Jerónimo, Monastery of 圣热罗尼莫修道院

San Juan de los Reyes, Monastery of 王家圣约翰修道院

San Lorenzo, Castillo de 圣洛伦佐城堡

San Martin palace 圣马丁宫

San Miguel, Church of 圣米迦勒教堂

San Pablo, Monastery of 圣保罗修道院

San Pietro in Montorio 蒙托里奥圣彼得修道院

San Salvador Island 圣萨尔瓦多岛

Santa Clara, Convent of 圣克拉拉女修院

Santa Fe 圣菲

Santa Hermandad (Sacred Brotherhood) 神圣兄弟会

Santa Isabel, Convent of 圣伊莎贝拉修道院

Santa Maria “圣母玛丽亚”号

Santa María de Concepción Island 圣母玛利亚岛

Santa Maria de Guadalupe, Church of 瓜达卢佩圣母教堂

Santa Maria Maggiore, Church of 圣母大殿

Santander 桑坦德

Santiago, Order of 圣雅各骑士团

Santiago de Compostela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Santo Domingo, see Hispaniola 圣多明各岛，即伊斯帕尼奥拉岛

Santo Tomás, Royal Monastery of 王家圣多马修道院

São Tomé 圣多美

Savonarola, Girolamo 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

Savoy, duke of 萨伏依公爵

Scales, Lord 斯凯尔斯勋爵

Schott, Peter 彼得·肖特

Scotland 苏格兰

Scutari 斯库塔里

Second Temple 第二圣殿

Segovia 塞哥维亚

Selim the Grim残酷的塞利姆

Senior, Abraham亚伯拉罕·塞尼奥尔

Sephardim塞法迪犹太人

Seville塞维利亚

Seward, Desmond戴斯蒙德·苏厄德

Sforza, Ascanio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

Sforza, Giovanni乔万尼·斯福尔扎

Sforza, Ludovico卢多维科·斯福尔扎

Shadis, Mariam米丽娅姆·沙迪斯

Shakespeare, William威廉·莎士比亚

sharia law伊斯兰教法

Shiites什叶派

Shkodra, see Scutari斯库台，见：斯库塔里

Sicily西西里岛

Siculo, Lucio Marineo卢乔·马里内罗·西库罗

Silleras-Fernandez, Nuria努莉亚·西列拉斯—费尔南德斯

Sistine Chapel西斯廷教堂

Sittow, Michael 米歇尔·西托

Sixtus IV 西克斯图斯四世，教皇

Skanderbeg (John Castrioti) 斯坎德培

Smith, Jane I. 简·I. 史密斯

Socrates 苏格拉底

Solis, Alonso de 阿隆索·德·索利斯

Solomon 所罗门

Soyer, François 弗朗索瓦·苏瓦耶

Sphrantzes, George 乔治·斯弗朗齐斯

Sphrantzes, Tamar 萨玛尔·斯弗朗齐斯

Starr-LeBeau Gretchen 格蕾琴·斯塔尔—勒博

Sufism 苏非派

Sunnis 逊尼派

Syria 叙利亚

T

Taino 台诺人

Talavera, Hernán de 埃尔南·德·塔拉韦拉

Tarik ibn Zeyad ibn Abdillah 塔里克·伊本·齐亚德·伊本·
阿卜杜拉

Tempietto 小圣殿

Teruel 特鲁埃尔

Tetaldi, Giacomo 贾科莫·特塔尔迪

Tetzel, Gabriel 加布里埃尔·特策尔

Thebes 底比斯

Thrace 色雷斯

Tiber River 台伯河

Toco, Leonardo 莱奥纳尔多·托科

Toda de Larrea 托达·德·拉雷亚

Toledo 托莱多

Tordesillas 托尔德西利亚斯

Toro, Battle of 托罗战役

Toros de Guisando吉桑多公牛

Torquemada, Juan de胡安·德·托尔克马达

Torquemada, Tomás de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

Torrella, Caspare卡斯帕里·托雷利亚

Torres y ávila, Antonio de安东尼奥·德·托雷斯·阿维拉

Torres y ávila, Juana de胡安娜·德·托雷斯·阿维拉

Trastámara family特拉斯塔马拉王族

Trebizond特拉布宗

Tudor family都铎王族

U

Ubeda 乌韦达

Urban VI, Pope 乌尔班六世，教皇

Urbino, duke of 乌尔比诺公爵

Urraca, queen of Castile and León 乌尔比诺，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女王

V

Valdivieso, Maria Isabel del Val 玛利亚·伊莎贝拉·德尔·
巴尔·巴尔迪维索

Valencia, Kingdom 巴伦西亚王国

Valencia de Alcántara 巴伦西亚·德·亚尔坎塔拉

Valentino 瓦伦蒂诺

Valladolid 巴利亚多利德

Van der Weyden, Rogier 罗希尔·范·德·魏登

Van Eyck, Jan 扬·范·艾克

Vanozza dei Catanei 瓦诺莎·代·卡塔内

Vatican 梵蒂冈

Venezuela 委内瑞拉

Vespucci, Amerigo 亚美利哥·韦斯普奇

Vesta, Temple of 灶神庙

Via Alessandrina (Borgo Nuovo) 亚历山大大道 (博吉亚新道)

Vikings 维京人

Villena, Marquis of (Pacheco' s son) 比列纳侯爵 (帕切科之子)

Vincent Ferrer, Saint 圣文森特 • 费雷尔

Visigoths 西哥特人

Vives, Jaime Vicens 海梅 • 比森斯 • 比韦斯

Vlad the Impaler 穿刺公弗拉德

W

Wallachia 瓦拉几亚

Warwick, Earl of 沃里克伯爵

Woodville, Elizabeth 伊丽莎白·伍德维尔

X

Xativa哈蒂瓦

Y

Yahya, Sidi西迪 • 叶海亚

Yebes, Countess of耶韦斯伯爵夫人

yugo (Yoke) 轭

Yugoslavia南斯拉夫

Z

Zahara 萨阿拉

Zaragoza 萨拉戈萨

Zoraya (Isabel de Solís) 索拉娅 (伊莎贝拉·德·索利斯)

Zurita, Jerónimo 赫罗尼莫·苏里塔

参考文献

Abenia, C., and R. Bágueña. *Catálogo de una serie de carta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479–1502)*. Valencia: Universidad de Valencia, 1945.

Abulafia, David. *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 Allen Lane, 2011.

Ady, Cecilia M. *A History of Milan Under the Sforza*. London: Methuen, 1907.

Ahmad, Jalal Al-E. *Plagued by the West*. Translated from the Persian by Paul Sprachman. Bibliotheca Persica, Center for Iranian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61.

Aksan, Virginia H., and Daniel Goffma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s: Remapping the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Alcala, Angel.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nd the Inquisitorial Mind*. Symposium internacional sobre la inquisición en Española. Newark, N.Y., 1983.

Allen, Peter Lewis. *The Wages of Sin: Sex and Disease, Past and Pres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Al-Maqqari, Ahmad ibn Muhammad.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Translated by Pascual de Gayangos. 2 vols. London: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1840-43.

Álvarez Palenzuela, Vicente Ángel. "Relations Between Portugal and Castile in the Late Middle Ages—13th to 16th Centuries." *e-JPH* 1, no.1 (Summer 2003).

Anderson, Ruth Mathilda. *Hispanic Costume, 1480-1530*. New York: 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 1979.

Andrés Díaz, Rosana de. *El último decenio del reinado de Isabel I, a través de la tesorería de Alonso de Morales (1495-1504)*. Valladolid: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Instituto de Historia Simancas, 2004.

Anes y Álvarez de Castrillón, Gonzalo. *Isabel la Católica y su tiempo*.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2005.

Aram, Bethany. *Juana the Mad: Sovereignty and Dynasty in Renaissance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 *Catálogo V. Patronato Real, 834-1851*. Edited by Amalia Prieto Cantero. Valladolid: Cuerpo Facultativo de Archiveros, Bibliotecarios y Arqueólogos, 1946-49.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Catálogo de las causas contra la fe seguidas ante el Tribunal del Santo Oficio de la Inquisición de Toledo*. Madrid, 1903.

Armas, Antonio Rumeu de. *Itinerari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474-1516*. Madrid: Raycar, 1974.

Astarita, Tommaso. *The Continuity of Feudal Power: The Caracciolo di Brienza in Spanish Napl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Azcona, Tarsicio de. *Isabela la Católica: Estudio crítico de su vida y su reinado*. Madrid: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1993.

———. *Juana de Castilla, mal llamada La Beltraneja, 1462-1530*. Madrid: Fundación Universitaria Española, 1998.

———. *Isabel la Católica, vida y reinado*. Madrid: La Esfera de los Libros, 2004.

Babinger, Franz. *Mehmed the Conquerer and His Tim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Backhouse, Janet. *The Isabella Breviary*.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993.

Barleti, Marin. *The Siege of Shkodra: Albania's Courageous Stand Against Ottoman Conquest 1478*. Translated by David Hosaflook. Tirana, Albania: Onufri, 2012.

Barrios Aguilera, Manuel. *La convivencia negada: Historia de los moriscos del Reino de Granada*. Granada: Editorial COMARES, 2007.

———. *La suerte de los vencidos*. Granada: Editorial Universidad de Granada, 2009.

Barrios Rozúa, Juan Manuel. *Guía de la Granada desaparecida*. Granada: Editorial COMARES, 2006.

Baumgartner, Frederic. *Louis XII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Beg, Tursun. *The History of Mehmed the Conqueror*.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alil Inalcik and Rhoads Murphey. Minneapolis: Bibliotheca Islamica, 1978.

Bembo, Pietro. *History of Venic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 W. Ulery, Jr. 3 v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9.

Benecke, Gerhard. *Maximilian I, 1459–1519: An Analytical 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2.

Benítez, Fray Jesús Miguel. *Madrigal de las Altas Torres: Monasterio de Nuestra Señora de Gracia*. León: Edilesa, undated.

Bergreen, Laurence. *Columbus: The Four Voyages, 1492–1504*. New York: Viking, 2011.

Berlin, Charles. *Elijah Capsali' s Seder Eliyyahu Zuta*. Ph.D.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September 1962.

——. “A Sixteenth Century Hebrew Chronicle of the Ottoman Empire: The Seder Eliyahu Zuta of Elijah Capsali and Its Message.” In Berlin, ed., *Studies in Jewish Bibliograph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KTAV Publishing, 1971.

Berlin, Charles, ed. *Studies in Jewish Bibliograph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Honor of I. Edward Kiev*. New York: KTAV Publishing, 1971.

Bernáldez, Andrés. *Histori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Crónica inédita del siglo XV*. 2 vols. Granada: Imprenta y Librería de Don José María Zamora, 1856.

——. *Memorias d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que escriba el bachiller Andrés Bernáldez*. Edited by Manuel Gómez-Moreno and Juan de M. Carriazo.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962.

Bianchini, Janna. *The Queens Hand, Power and Authority in the Reign of Berenguela of Castil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Bisaha, Nancy. *Creating East and West: Renaissance Humanists and the Ottoman Turk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Bisso, Don José. *Crónica de la Provincia de Sevilla*. In *Crónica general de España, historica ilustrada y descriptiva*

de sus provincias, sus poblaciones más importantes de la península y de ultramar. Madrid: Rubio, Grilo y Vitturi, 1869.

Blackmore, Josiah, and Gregory S. Hutcheson. *Queer Iberi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lanco Sánchez, Antonio. *Sobre Medina del Campo y la reina agraviada.* Medina del Campo: Caballeros de la Hispanidad, 1994.

Blázquez Hernández, Gregorio. “María Vela y Cueto, la mujer fuerte.” *Diario de Ávila*, May 14, 2006.

Blurnenthal, Debra. *Enemies and Familiars: Slavery and the Mastery in Fifteenth-Century Valenc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Boruchoff, David A., ed. *Isabel la Católica, Queen of Castile: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Bóscolo, Alberto, ed. *Fernando el Católico e Italia.* Zaragoza: Institución Fernando el Católico (C.S.I.C) de la Excma 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Zaragoza, 1954.

Boswell, John. *Christianity, Social Tolerance and Homosex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Bown, Stephen R. *1494: How a Family Feud in Medieval Spain Divided the World in Half.*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1.

Bradford, Ernie. *The Sultan's Admiral: Barbarossa—Pirate and Empire Builder*.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69.

———. *Gibraltar: The History of a Fortres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ich, 1971.

Bradford, Sarah. *Cesare Borgia*.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76.

———. *Lucrezia Borgia*. New York: Viking, 2004.

Bulmus, Birsan. *Plagues, Quarantin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Ottoman Empi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Bunes Ibarra, Miguel Ángel de, and Emilio Sola. *La vida, y historia de Hayradin, llamado Barbarroja*. Granad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1997.

Bunes Ibarra, Miguel Ángel, et al. *The Invention of Glory: Afonso V and the Pastrana Tapestries*. Madrid: Fundación Carlos de Amberes, 2011.

Burke, Ulick Ralph. *The Great Captain; An Eventful Chapter in Spanish History*.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877.

Cabanas González, María Dolores, Carmelo Luis López, and Gregorio del Ser Quijano. *Isabel de Castilla y su época: Estudios y selección de textos*. Alcalá de Henares: Universidad de Alcalá, 2007.

Calderón, Emilio. *Usos y costumbres sexuales de los Reyes de España*. Madrid: Editorial Cirene, 1991.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 I, *Henry VIII: 1485-1509*. Edited by Gustav Bergenroth. London: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Treasury, 1862.

Campbell, Thomas P. *Tapestry in the Renaissance: Art and Magnificence*.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2.

Campo, Victoria, and Victor Infantes, eds. *La Poncella de Francia: La historia Castellana de Juana de Arco*. Madrid: Iberoamericana, 2006.

Capponi, Niccolò.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Great Christian-Muslim Clash at the Battle of Lepanto*. Cambridge, Mass.: Da Capo Press, 2007.

Caro Baroja. *Los Mariscos del Reino de Granada*.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2010.

Carroll, Warren H. *Isabel of Spain: The Catholic Queen*. Front Royal, Va.: Christendom Press, 1991.

Cartas Autógrafa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e España,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que conservan en el Archivo de Simancas, 1474-1502. Valladolid: 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 1971.

Castiglione, Baldesar. *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Translated by Charles S. Singleton.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59.

Castro, Teresa de, ed. “El tratado sobre el vestir,
calzar y comer del Arzobispo Hernando de Talavera.”
Espacio, tiempo, y forma. Serie III. *Historia Medieval*,
no.14 (2001) , pp.11–92.

Cervantes, Miguel de. “*The Bagnios of Algiers*” and
“*The Great Sultana*”: *Two Plays of Captivit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Barbara Fuchs and Aaron J. Ilik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Chaytor, Henry John. *A History of Aragon and Catalonia*.
London: Methuen, 1933.

Cheetham, Anthony. *The Life and Times of Richard III*.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2.

Chesterton, G.K. *Lepanto*.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2004.

Chipman, Donald E. *Montezuma's Children: Aztec Royalty
Under Spanish Rule, 1520–170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5.

*Chronicles and Memorial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During the Middle Ages*. Oxford University, 1879.

Chueca Goitia, Fernando. *Historica de la arquitectura española: Edad antigua, edad media*. 2 vols. Ávila: Fundación Cultural Santa Teresa, 2001.

Classen, Albrecht. "The World of the Turks Described by an Eyewitness: Georgius de Hungaria' s Dialectical Discourse on the Foreign World of the Ottoman Empire."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Leiden: Brill, 2003.

Clemencín, Diego. *Elogio de la Reina Católica Doña Isabella*. Madrid: Imprenta de Sancha, 1820.

Clemente, Fusero. *The Borgias*, Translated by Peter Green.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66.

Collins, Roger. *The Arab Conquest of Spain: 710–797*.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1995.

Collison-Morley, Lacy. *Naples Through the Centuries*.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 1925.

Colmenares, Diego de. *Historia de la insigne ciudad de Segovia*. Revised by Gabriel María Vergara. Segovia: Imprenta de la Tierra de Segovia, 1931.

Columbus, Ferdinand. *The Life of the Admiral Christopher Columbus: By His Son Ferdinan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Benjamin Kee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9.

Commynes, Philippe de. *The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ines, Lord of Argenton*. London: G. and W.B. Whittaker, 1823,

Conde, Don José Antonio.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de los Arabes en España, sacada de varios manuscritos y memorias arábicas*. Madrid: Biblioteca de Historiadores Españoles, Marín y Compañía, 1874.

Constable, Olivia Remie. *Medieval Iberia: Readings from Christian, Muslim and Jewish Sourc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Consuelo Díez Bedmar, María del. *Teresa de Torres, (ca. 1442-1521) Condesa de Castilla*. Madrid: Ediciones del Orto, 2004.

Cook, Weston F. "The Cannon Conquest of Nasrid Spain and the End of the Reconquista."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7, no.1 (January 1993) .

Cortés Timoner, María del Mar. *Sor María de Santo Domingo (1470/86-1524)* . Madrid: Ediciones del Orto, 2004.

Costa-Gomes, Rita. *The Making of a Court Society: Kings and Nobles in Late Medieval Portugal*.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raig, Leigh Ann. *Wandering Women and Holy Matrons: Women as Pilgrim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Leiden: Brill, 2009.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469–1476.
Edited by Julio Puyol. Madrid: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934.

Csukovits, Eniko. “Miraculous Escapes from Ottoman Captivity.” In Suraiya Faroqhi and Halil Inalcik, ed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Heritage*. Leiden: E.J.Brill, 2007.

Da Costa, Isaac. *Noble Families Among the Sephardic Jews by Isaac da Costa (1798–1860) .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Capadose Family (Including Their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 by Bertram Brewster, and an Excursus on Their Jewish History, by Cecil Roth*.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Dankoff, Robert, and Sooyoung Kim. *An Ottoman Traveler: Selections from the Book of Travels of Evilya Celebi*. London: Eland, 2010.

Dávid, Géza, and Pál Fodor, eds. *Ransom Slavery Along the Ottoman Borders: Early Fifteenth–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Leiden: Brill, 2007.

Davis, Robert C. *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 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 1500–180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De la Torre, Antonio. *Documentor sobr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vol.2. Barcelona: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1962.

De la Torre, Antonio, and Luis Suárez Fernández.
Documentos a las relaciones en Portugal durante 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vol.3. Valladolid, 1963.

Descola, Jean. *A History of Spai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

De Winter, Patrick M. "A Book of Hours of Queen Isabel la Católica." *The 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68, no.10 (December 1981) , pp.342-427.

Díaz del Castillo, Bernal. *The Conquest of New Spain*. Translated by John M. Cohen.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63.

Díaz-Plaja, Fernando. *Historia de España en sus documentos, siglo XV*. Madrid: Ediciones Catedra, 1984.

——. *Historia de España en sus documentos, siglo XVI*. Madrid: Ediciones Catedra, 1988.

Donini, Guido, and Gordon B. Ford, trans. *Isidore of Seville's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the Goths, Vandals and Suevi*. Leiden: Brill, 1966.

Doubleday, Simon, and David Coleman, eds. *In the Light of Medieval Spain: Islam, the West, 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P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Drane, Augusta Theodosia. *The Knights of St. John: A History to the Siege of Vienna, 1688*. U.K.: Leonaur, 2009.

Duffy, Eamon. *Marking the Hours: English People and Their Prayers, 1240–1570*.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Earenfight, Theresa. *The King's Other Body: María of Castile and the Crown of Arag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Edge, P. Granville. "Pre-Census Population Records of Spa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6, no.176 (December 1931), pp.416–23.

Edward IV on May 26th, 1464 (A Contemporary Account Now First Set Forth from a 15th Century Manuscript), London, 1935.

Edwards John. *The Spain of the Catholic Monarchs, 1474–1520*. Oxford, U.K.: Blackwell, 2000.

Eguílaz Yánuas, Leopoldo de. *Reseña histórica de la conquista del reino de Granada por los Reyes Católicos según las cronistas árabes*. Granada: Tip. Hospital de Santa Cruz, 1894.

Eichberger, Dagmar, ed. *Women of Distinction: Margaret of York, Margaret of Austria*. Turnhout, Belgium: Brepols, 2005.

———. *Women at the Burgundian Court: Presence and Influence*. Belgium: Brepols, 2010.

Eisenberg, Daniel. "Enrique IV and Greogrio Marañon." *Renaissance Quarterly* 29, no.1 (Spring 1976) .

Elbl, Ivana. "Man of His Time (and Peers) : A New Look at Henry the Navigator." *Luso-Brazilian Review* 28, no.2 (Winter 1991) , pp.73-89.

Elliott, J.H. *Spain and Its World, 1500-1700: Selected Essay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1989.

——.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London: Penguin, 1990.

Ellis, Henry, ed. *Original Letter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History, Including Numerous Royal Letters*.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6.

Encinas, Alonso de. *Madrigal de las Altas Torres, cuna de Isabel la Católica*. Madrid: Revista geográfica española, 1955.

Enríquez del Castillo, Diego. *Crónica de Enrique IV*. Edited by Aureliano Sánchez Martín. Valladolid: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1994.

Espejo, Cristóbal, and Julián Paz. *Las antiguas ferias de Medina Del Campo: Investigación histórica acerca de ellas*. Valladolid: Maxtor, 2003.

Esposito, John L. *The Oxford History of Isla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Faroghi, Suraiya, and Halil Inalcik.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Heritage*. Leiden: Brill, 2007.

Faroghi, Suraiya, and Kate Flee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ume 2: The Ottoman Empire as a World Power, 1453–1603*.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Fehrenbach, T.R. *Fire and Blood: A History of Mexico*.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95.

Fernandez Álvarez, Manuel. *Juana la Loca: la cautiva de Tordesillas*. Spain: Espasa-Calpe, 2008.

———. *Isabel la Católica*. Madrid: Espasa Calpe, 2006.

Fernández Collado, Ángel, et al. *Cathedral of Toledo*. Translated by Surtees Robinson. Toledo: Cabildo Catedral Primada, 2009.

Fernández de Oviedo, Gonzalo. *Na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 Indi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terling A. Stoudemi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9.

Fernández Gómez, Marcos. *El Alcazar y la Atarazanas de Sevilla en 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Seville: Patronato del Real Alcázar y de la Casa Consistorial de Sevilla, 2011.

Fernández-Armesto, Felipe. *Columbu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Columbus on Himself*.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9.

——. *1492: The Year the World Bega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9.

Fernández-Morera, Dario. “The Myth of the Andalusian Paradise.” *Intercollegiate Review* 41, no.2 (Fall 2006) .

Fichtner, Paula S. *Ferdinand I of Austria: The Politics of Dynasticism in the Age of the Reformation*. Boulder, Col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2.

Finlay, George. *The History of Greece: From Its Conquest by the Crusaders to Its Conquest by the Turks, and the Empire of Trebizond, 1204-1461*. Edinburgh and London: Blackwood, 1851.

——. *The History of Greece Under Othoman and Venetian Domination*. Edinburgh and London: Blackwood, 1861.

Fisher, Sydney Nettleton. “Sultan Bayezit and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urke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35.

——. *Foreign Relations of Turkey, 1481-1512*.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48.

Fletcher, Richard. *Moorish Spai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Flores, Josef Miguel de. *Crónica de Don Alvaro de Luna, condestable de los reynos de Castilla y de León*. Madrid: Imprenta de Antonio de Sancha, 1784.

Francisco, Adam S. *Martin Luther and Islam: A Study in Sixteenth-Century Polemics and Apologetics*. Leiden: Brill, 2007.

Fraser, Antonia. *The Wives of Henry VIII*.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Freedman, Paul H. *Origins of Peasant Servitude in Medieval Cataloni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Freely, John. *Ionian Islands: Corfu, Cephalonia, Ithaka and Beyond*. London: I.B. Tauris, 2008.

———. *Aladdin's Lamp, How Greek Science Came to Europe Through the Islamic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9.

———. *The Grand Turk*. New York: Overlook Press, 2009.

———. *Jem Sultan: The Adventures of a Captive Turkish Prince in Renaissance Europ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Freeman, Charles. *Holy Bones, Holy Dust: How Relics Shaped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Freiberg, Jack. *Bramante's Tempietto and the Spanish Crown*. Rom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2005.

Frucht, Richard, ed. *Eastern Europ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eople, Lands and Culture*. Santa Barbara, Calif.: ABC-CLIO, 2004.

Fulin, Rinaldo. *I Diarii di Marino Sanuto*. Venice: M. Visentini, 1880.

Fusero, Clemente. *The Borgias*. Translated by Peter Green. New York: Praeger, 1972.

Fyvie, John. *The Story of the Borgias*.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13.

Gairdner, James, ed. "Journals of Roger Machado," in *Historia Regis Henrici Septimi*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and Roberts, 1858), pp.157-99,

———. *Letters and Papers Illustrative of the Reigns of Richard III and Henry VII*. London: Longman, Green, Longman and Roberts, 1861.

Galíndez Carvajal, Lorenzo. *Crónica de los Reyes de Castilla*. Madrid: Librería de los sucesores de Hernando, 1923.

Garcés, María Antonia. *Cervantes in Algiers: A Captive's Tale*. Nashville, Tenn.: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02.

García Mercadel, José. *La segunda mujer del Rey Católico, doña Germana de Foix, última reina de Aragón*. Barcelona: Editorial Juventud, SA, 1942.

Gayangos, Pascual de.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London: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1843.

Georgius de Hungaria. *Libellus de Ritu et Moribus Turcorum* (1530) ; digitized version provided by Göttingen State and University Library, Germany.

Gerber, Jane S. *The Jews of Spain: A History of the Sephardic Experienc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Gerli, E.Michael, "Social Crisis and Conversion: Apostasy and Inquisition in the Chronicles of Fernando del Pulgar and Andrés Bernáldez." *Hispanic Review* 70, no.2 (Spring 2002) , pp.19-25.

Gitlitz, David Martin. *Secrecy and Deceit: The Religion of the Crypto Jew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02.

Goffman, Daniel.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Gómara, Francisco López de. *Los corsarios Barbarroja*. Madrid: Ediciones Polefemo, 1989.

Gomarez Marín, Antonio. *Documento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492-1504)* . Murcia: Academia Real Alfonso X el

Sabio, 2000.

Gómez, María A., Santiago Juan-Navarro, and Phyllis Zatlin, eds. *Juana of Castile: History and Myth of the Mad Queen*. Lewisburg, 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González Marrero, María del Cristo. *La casa de Isabel la Católica, espacios domesticos y vida cotidiana*. Ávila: Diputación de Ávila, Institución “Gran Duque de Alba,” 2004.

Gonzálo Herrera, Manuel. *Castilla: Negro sobre rojo, de Enrique IV a Isabel la Católica*. Segovia: Ediciones Castellanas, 1993.

Goodwin, Jason. *Lords of the Horizon: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Henry Holt, 1998.

Gottschalk, Paul. *The Earliest Diplomatic Documents on America, the Papal Bulls of 1493 and 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 Berlin: Paul Gottschalk, 1927.

Gould, Alicia Bache. *Nueva lista documentada de los tripulantes de Colón en 1492*. Madrid: Viuda de E. Maestre, 1942-44.

Goury, M. Jules, and Owen Jones. *Plans, Elevations, Sections and Details of the Alhambra: from Drawings Taken on the Spot in 1834*. London: Owen Jones, 1842.

Graña Cid, María del Mar. *Beatriz de Silva (ca. 1426–ca. 1491)*. Madrid: Ediciones del Orto, 2004.

Grayeff, Felix. *Joan of Arc: Legends and Truth*. London: Philip Goodall, 1978.

Green, Mary Anne Everett. *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Twelfth Century to the Close of the Reign of Queen Mary*.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6.

Green, Toby. *Inquisition: The Reign of Fear*. New York: St.Martin' s Press, 2009.

Hach, W. , J.Dissemod, and V.Hach-Wunderly. “The Long Road to Syphilitic Leg Ulcers.” *Phlebogie* 2| 2013. Schattauer 2013.

Hare, Christopher (pseudonym for Maria Andrews) . *The High and Puissant Princess Marguerite of Austria, Princess Dowager of Spain, Duchess Dowager of Savoy, Regent of the Netherland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 Sons, 1907.

——. *Maximilian the Dreamer: Holy Roman Emperor, 1459–1519*. Germany: S.Paul & Co. , 1913.

Haring, Clarence Henry. *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Spain and the Ind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Harvey, L.P. *Islamic Spain, 1250 to 15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Hayden, Deborah. *Pox: Genius, Madness and Mysteries of Syphili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Hefele, Karl Josephon von. *The Life of Cardinal Ximénez*. Translated by John Canon Dalton. London: Catholic Publishing & Bookselling Company, 1860.

Hess, Andrew C. *Forgotten Frontier: A History of the Sixteenth-Century Ibero-African Fronti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Heywood, Colin. *Writing Ottoman History: Docu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 Aldershot, Hampshire, U.K.: Ashgate Publishing, 2002.

Hicks, Michael. *Anne Neville, Queen to Richard III*. Gloucestershire, U.K.: Tempus, 2006.

Highfield, Roger, ed. *Spai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1369–1516: Essays and Extracts by Historians of Spain*. Translated by Frances M. López-Morilla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Hills, George. *Rock of Contention: A History of Gibraltar*. London: Robert Hale & Co., 1974.

Himmerich y Valencia, Robert. *The Encomenderos of New Spain, 1521–1555*.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1.

Hollingsworth, Mary. *The Cardinal's Hat: Money, Ambition and Everyday Life in the Court of a Borgia Prince*. Woodstock, N.Y.: Overlook Press, 2005.

Homza, Lu Ann, ed and trans.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1478-1614: An Anthology of Sources*.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6.

Hopkins, T.C.F. *Empires, Wars, and Battles: The Middle East from Antiquity to the Rise of the New World*. New York: Forge Books, 2006.

Hutson, James. *Forgotten Features of the Founding: The Recovery of Religious Themes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3.

Ihsanoglu, Ekmeleddin. ed. *The History of the Ottoman State,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2 vols. Istanbul: Research Centre for Islamic History, Art and Culture, 2001.

Imber, Colin.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Inalcik, Halil. *Studies in Ottom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85.

———.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London: Phoenix Press, 2000.

Irizarry, Estelle. *Christopher Columbus's Love Letter to Queen Isabel*. San Juan, Puerto Rico: Ediciones Puerto, 2012.

Irving, Washington. *Chronicle of the Conquest of Granada*. Philadelphia: Carey, Lea & Carey, 1829.

Irwin, Robert. *The Alhamb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Ishikawa, Chiyo. *The Retablo of Isabel la Católica*. Brussels: Brepols, 2004.

Izbicki, Thomas. *Protector of the Faith: Cardinal Johannes de Turrecremata and the Defense of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1981.

Jacobs, Martin. "Joseph ha-Kohen, Paolo Giovio and Sixteen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In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Jewish Intellectuals in Early Modern Italy*. Edited by David B. Ruderman and Giuseppe Veltri.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Jaén, Didier T. *John II of Castile and the Grand Master Álvaro de Luna*. Madrid: Editorial Castalia, 1978.

Jayyusi, Salma Khadra, ed. *The Legacy of Muslim Spain*. Leiden: Brill, 1994.

Jennings, Ronald C. *Studies on Ottoman Social Histor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Women, Zimmis and Sharia Courts in Kayseri, Cyprus and Trabzon*. Istanbul: Isis Press, 1999.

Johnson, Marion. *The Borgia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81.

Jones, Jonathan. *The Lost Battles: Leonardo, Michelangelo, and the Artistic Duel That Defined the Renaissance*.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10.

Jordan, Annemarie. *The Development of Catherine of Austria's Collection in the Queen's Household: Its Character and Cost*. Providence, R. I.: Brown University, 1994.

Kagan, Richard L. "Prescott's Paradigm: America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and the Decline of Spa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 no.2 (April 1996), pp.423-46.

Kagan, Richard L., and Abigail Dyer. *Inquisitorial Inquiries: Brief Lives of Secret Jews and Other Heretic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Kamen, Henry.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 Historical Revis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7.

——. *Empire: How Spain Became a World Power 1492-1761*.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

——. *Spain, 1469-1714: A Society of Conflict*. Harlow, U.K.: Pearson Education, 2005.

Kaplan, Gregory B. "In Search of Salvation: The Deification of Isabel la Católica in Converso Poetry."

Hispanic Review 66, no.3 (Summer 1998) , pp. 289–308.

Kizilov, Mikhail. *Slav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Crim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ristian, Muslim and Jewish Sources*.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07.

Kleinschmidt, Harald. *Ruling the Waves: Emperor Maximilian I, the Search for Islan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 Picture c.1500*. Netherlands: Hes & De Graaf, 2008.

Koch, Yolanda Moreno. *El judaísmo hispano, según la crónica hebrea de Rabí Eliyahu Capsali*. Granad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2005.

Kraus, H.P. *Americana Vetustissima: Fifty Books, Manuscripts, and Maps Relating to America from the First Fifty Years After Its Discovery (1493–1592) : In Celebration of the Columbus Quincentenary*. New York: H.P.Kraus, 1990.

Labalme, Patricia H., and Laura Sanguinetti White, eds. *Venice, Cittdà Excelentissima: Selections from the Renaissance Diaries of Marin Sanudo*. Translated by Linda L.Carrol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Ladero Quesada, Miguel Ángel. *Castilla y la conquista del reino de Granada*. Granada: Diputacion Provincial de Granada, 1993,

———. *La Españ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99.

——. *La guerra de Granada, 1482-1491*. Granada: Los Libros de la Estrella, 2001.

——. *Los Reyes Católicos y su tiempo*. Madrid: Centro de Información y Documentación Científica, 2004.

Lamb, Vivien B. *The Betrayal of Richard II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roversy*. London: Mitre Press, 1968.

Lanyon, Anna. *The New World of Martin Cortes*. Cambridge, Mass.: Da Capo Press, 2004.

Las Casas, Bartolomé de. *An Account, Much Abbreviated,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 Edited by Franklin W. Knight. Translated by Andrew Hurley.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3.

——. *Apologética historia de las Indias*, Edited by Manuel Serrano y Sanz. Madrid: Bailly y Baillièrre, 1909.

——. *History of the Indi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ndrée Collar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Circulated between 1560 and 1600; first published in 1875.

Lea, Henry Charles. “Lucero the Inquisito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 no.4 (July 1897) .

——. *A 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in Spain*. London: Macmillan, 1906.

Letts, Malcolm, ed. and trans. *The Travels of Leo of Rozmital through, Germany, Flanders, England, France, Spain,*

Portugal and Italy, 1465-1467. Hakluyt Socie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Levack, Brian P. *The 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Longman Group, 1987.

Levine Melammed, Renée. *Heretics or Daughters of Israel? The Crypto-Jewish Women of Casti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Lewis, Bernard. *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Lindo, Elias Hiam.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Spain and Portugal*. 1848. Reprint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70.

Liss, Peggy K.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Liss, Peggy K. *Isabel the Queen: Life and Tim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 “Isabel of Castille (1451-1504) , Her Self-Representation and Its Context.” In *Queenship and Political Power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pain*. Edited by Theresa Earenfight. Hampshire,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2005.

Llorente, Juan Antonio. *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Spain*. Williamstown, Mass.: The John Lilburne Co., 1967.

Lojendio, Luis-María de. *Gonzalo de Córdoba, El Gran Capitán*. Madrid: Espasa-Calpe, 1942.

López de Coca Castañer, José Enrique. “La Conquista de Granada: El Testimonio de los Vencidos.” *Norba: Revista de Historia* 18 (2005) .

Lorenzo Arribas, Josemi. *Juana I de Castilla y Aragón, 1479-1555*. Madrid: Ediciones del Orto, 2004,

Lucas-Dubreton, Jean. *The Borgias*. New York: E. P. Dutton, 1955.

Luke, Mary M. *Catherine the Queen*. New York: Coward-McCann, Inc., 1967.

Lunenfeld, Marvin. *Keepers of the City: The Corregidores of Isabella I of Castile, 1474-1504*.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Lynn, Caro. *A College Professor of the Renaissance: Lucio Marineo Siculo Among the Spanish Humanis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7.

Machiavelli, Niccolò. *The Prince and the Discourse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50.

MacKay, Angus. “Ritual and Propaganda in Fifteenth Century Spain.” *Past&Present*, no. 10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y 1985.

MacPherson, Ian, and Angus MacKay. *Lov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Fifteenth Century Spain*. Leiden: Brill, 1998.

Madariaga, Salvador de. *Christopher Columbus: Being the Life of the Very Magnificent Lord Don Cristóbal Colón*. New York: Macmillan, 1940.

Major, Richard Henry. *The Life of Prince Henry of Portugal, Surnamed the Navigator*. London: A. Asher & Co., 1868.

Mallett, Michael. *The Borgia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Dynasty*.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9.

Mann, Charles C. *1491: New Revelations of the Americas Before Columbu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Mann, James. *1493: 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1.

———. “Exhibition of Portuguese Art at the Royal Academy.” *Burlington Magazine* 97, no.633 (December 1955) , pp.367–73.

Marañón, Gregorio. *Ensayo biológico sobre Enrique IV de Castilla y su tiempo*. Madrid: Colección Austral, 1997.

Marek, George R. *The Bed and the Throne: The Life of Isabella d’ Est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6.

Marino, Nancy F. *Don Juan Pacheco: Wealth and Power in Late Medieval Spain*. Tempe: 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06.

Márquez de la Plata, Vicenta María. *Mujeres renacentistas en la corte de Isabela la Católica*. Madrid: Editorial Castalia, 2005.

Martín, José Luis. *Isabel la Católica: sus hijas y las damas de su corte, modelos de doncellas, casadas y viudas, en el Carro de las Doñas, 1542*. Ávila; 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Ávila, Institución “Gran Duque de Alba, ” 2001.

Martínez Millán, José. “Structures of Inquisitorial Finance.” In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nd the Inquisitorial Mind*. Edited by Angel Alcalá.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Martyr, Peter, of Anghiera. *Opus Epistolarum: The Work of the Letters of Peter Martyr*. Letters written between 1457 and 1526,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ca. 1855. London: Wellcome Library.

———.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in the Writings of Peter Martyr of Anghiera*. Edited by Ernest Lunardi, Elisa Magioncalda, and Rosanna Mazzacane. Translated by Felix Azzola. Rome: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 Libreria dello Stato, 1992.

——. *De Orbo Novo: The Eight Decades of Peter Martyr D' Anghera*. Translated by Francis Augustus MacNutt. Project Gutenberg, 2004.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Juan de. *Crónica de Juan II de Castilla*.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982.

——. *Los relieves de la guerra de Granada en la sillería del coro de la Catedral de Toledo*. Granad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1985.

Mathew, Arnold Harris. *The Diary of John Burchard of Strasburg*. London: Francis Griffiths, 1910.

Mattingly, Garrett. *Catherine of Aragon*. New York: Quality Paperback Books, 1941.

Maxwell-Stuart, P.G. *Chronicles of the Popes*. New York: Thames & Huckon, 1997.

Mazower, Mark.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McBrien, Richard P. *Lives of the Popes: The Pontiffs from St. Peter to John Paul II*.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7.

McDonald, Mark P. *Ferdinand Columbus: Renaissance Collector*.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

McManners, John.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McMurdo, Edward. *History of Portugal*. London: St. Dunstan' s House, 1889.

Memorial Histórico español: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opúsculos, y antigüedades que publica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vol.6. Madrid: Imprent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Historia, 1853.

Memorias de Don Enrique IV de Castilla, vol.2, *La colección diplomática del mismo rey*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Historia, 1835-1913.

Menocal, María Rosa. *The Ornament of the World: How Muslims, Jews, and Christians Created a Culture of Tolerance in Medieval Spain*. Boston: Little, Brown, 2002.

Menzies, Gavin.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2.

Merriman, Roger Bigelow.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New York: Cooper Square, 1962.

Merula, George. "The Siege of Shkodra" (1474) .
Translated by George Elsie. *Texts and Documents of Albanian History*, <http://www.albanianhistory.net/en/texts1000-1799/AH1474.html>.

Miller, Kathryn A. *Guardians of Isl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Miller, Townsend. *The Castles and the Crown: Spain, 1451-1555*.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3.

Monasterio de San Antonio el Real, Segovia.

Morales Muñiz, María Dolores-Carmen. *Alfonso de Ávila, Rey de Castilla*. Ávila: 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Ávila, Institución "Gran Duque de Alba," 1988.

Morales Muñiz, María Dolores-Carmen, and Luis Caro Dobón. "La muerte del rey Alfonso XII de Castilla." *Revista Hidalguía* 358-59 (2013), p.293.

Morgan, David. *Medieval Persia, 1040-1797*. Singapore: 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ers, 1988.

Morgenthau, Henry.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orison, Samuel Eliot.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vol.1. Boston: Little, Brown, 1942.

———. *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One-volume ed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49.

Morison, Samuel Eliot, trans. and ed. *Journals and Other Documents on the Life and Voyage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New York: Limited Editions Club, 1963.

Mueller, Tom. "CSI: Italian Renaissance." *Smithsonian Magazine*. July–August 2013.

Münzer, Jerónimo. *Viaje por España y Portugal, 1494–1495*. Madrid: Ediciones Polifemo, 1991.

Murphy, Cullen. *God's Jury: The Inquisi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2.

Myers, Kathleen Ann. *Fernández de Oviedo's Chronicle of America: A New History for a New Worl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7.

Nader, Helen. *Power and Gender in Renaissance Spai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Netanyahu, Benzion. *Don Isaac Abravanel: Statesman and Philosopher*.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82.

———. *The Origins of the Inquisition in Fifteenth Century Spai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 *The Marranos of Spain: From Late 14th to the Early 16th Century, According to Contemporary Hebrew Sour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Norwich John Julius. *The World Atlas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Portland House, 1988.

——. *A History of Veni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O' Callaghan, Joseph P. *A History of Medieval Spai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5.

Oliveira Marques, Antonio Henrique de. *Daily Life in Portugal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Translated by S. S. Wyatt.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1.

——. *History of Portugal*, vol.1, *From Lusitania to Emp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Oliver-Copóns, D. Eduardo de. *El Alcázar de Segovia*. Valladolid: Imprenta Castellana, 1916.

Omaechevarría, Ignacio. *Orígenes de La Concepción de Toledo*. Burgos: Aldecoa, 1976.

Oman, Charles.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E. R Dutton, 1937...

Önalp, Ertugrul. *Las Memorias de Barbarroja*. Ankara: Ankara Üniversitesi Basimevi, 1997.

Oviedo y Valdés, Gonzalo Fernández de. *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 Madrid: Imprent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851.

——. *Libro de la Cámara Real del Príncipe Don Juan e officios de su casa e servicio ordinario*. Madrid: La Sociedad de Bibliófilos Españoles, 1870.

——. *Na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 Indies*. Translated by Sterling A. Soutudemi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9.

——. *Batallas quinquagenas*. 2 vols. Madrid: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2000.

——. *Writing from the Edge of the World: The Memoirs of Darien, 1514–1527*, Translated by Glen F. Dille.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6.

Padilla, Lorenzo de. *Crónica de Felipe Primero, llamado El Hermoso*. In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Edited by Miguel Salvá and Pedro Sainz de Baranda. Madrid: Imprenta de la Viuda de Calero, 1846.

Paez Carrascosa, José. *Ronda and the Serranía*. Translated by Katie Boyle. Ronda, Spain: Publicaciones Ronda, 2000.

Palencia, Alonso Fernández de. *Crónica de Enrique IV*. Edited by Antonio Paz y Meliá. Reprint, Madrid: Ediciones Atlas, 1975.

——. *Guerra de Granada*. Reprint, Barcelona: Linkgua Ediciones, 2009.

Parker, Margaret R. *The Story of a Story Across Cultures: The Case of the Doncella Teodor*. London: Tamesis, 1996.

Parkes, Henry Bamford. *A History of Mexico*,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9.

Parry, V. J.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to 173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astor, Ludwig von. *The History of the Popes from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Translated by E. F. Peeler. St. Louis: B. Herder, 1898.

Patterson, Jack E. *Fonseca: Building the New World: How a Controversial Spanish Bishop Helped Find and Settle an Empire in the Americas*.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0.

Paz Julián. *Catálogo de la colección de documentor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2 vols. Madrid: Insrituto de Valencia de Don Juan, 1930–31.

Paz y Meliá, Antonio. *El cronista Alonso de Palencia, su vida y sus obras, sus décadas y las crónicas contemporáneas*. Madrid: 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 1914.

Pearson, Andrea G. “Margaret of Austria’ s Devotional Portrait Diptychs.” *Women’ s Art Journal* 22, no. 2 (Autumn 2001–Winter 2002) , pp.19–25.

Peirce, Leslie P. *The Imperial Harem: Women and Sovereign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In Search of the Harem: Sexual Crime and Social Space in Ottoman Royal Law of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Ottoman Empire: Myths, Realities and Black Holes*. Istanbul: The Isis Press, 2006.

Penzer, N. M. *The Harem: Inside the Seraglio of the Turkish Sultans*.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05.

Pérez de Guzmán, Fernán. *Comienza la crónica del serenísimo Príncipe Don Juan, segundo rey deste nombre*. Madrid: Librería y Casa Editorial Hernando, 1930.

Pérez Samper, María Ángeles. *Isabel la Católica*. Barcelona: Random House Mondadori, 2004.

Peters, Edward. “Jewish History and Gentile Memory.” *Jewish History* 9, no. 1 (Spring 1995) .

Philippides, Marios. *Patriarchs, Emperors, and Sultans: A Short Chronic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Brookline, Mass.: Hellenic College Press, 1990.

Philippides, Marios, ed. *Mehmed II the Conqueror: And the Fall of the Franco-Byzantine Levant to the Ottoman Turks: Some Western Views and Testimonies*. Tempe: 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07.

Phillips, Carla Rahn, and William D. Phillips. “Christopher Columbu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iography.” *History Teacher* 25, no. 2 (February 1992) , pp.119–35.

Phillips, William D., Jr. *Enrique IV and the Crisis of Fifteenth-Century Castile, 1425-1480*. Cambridge, Mass.: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78.

Pina, Ruy de. *Crónica de El-Rei D. Afonso V*, vol.1. Lisbon: Escriitorio, 1901.

——. *Croniqua delrey Dom Joham II*. Coimbra: Atlantida-Livraria Editora, 1950.

Pohl, John, and Charles M. Robinson III. *Aztecs and Conquistadores: The Spanish Invas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Aztec Empire*. New York: Osprey, 2005.

Pou, José. “Un monument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n Roma.” *V Congreso de Historia de la Corona de Aragón*, Zaragoza, Oct 4-11, 1952. Zaragoza: 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ólico, 1954.

Pratt, Michael. *Britain's Greek Empire: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he Ionian Islands from the Fall of Byzantium*. n. p.: Rex Collings, 1978.

Prescott, William.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38.

——.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896.

Press Departmen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he Turkish Woman in History*. Ankara, Turkey, 1937.

Prieto Cantero, Amalia.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 catálogo V, Patronato Real (834-1851) ; tomo II*. Valladolid: Cuerpo Facultativo de Archiveros, Bibliotecarios y Arqueológicos, 1949.

——. *Cartas autografa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de España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que conseruan en el Archivo de Simancas, 1474-1502*. Vallodolid: Insituto Isabel la Cato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 1971.

Pulgar, Hernando del. *Crónica de los Senore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de Castillay de Aragón*. Valencia: Imprenta de Benito Monfort, 1780.

——. *Crónica de los Señores Reye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de Castilla y de Aragón*. Madrid: Biblioteca de Autores Españoles, Librería de los Sucesores de Hernando, 1923.

——. *Letras: Glosa a las coplas de Mingo Revulgo*. Madrid: Ediciones de la Lectura, 1929.

——. *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dited by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Madrid: Espasa-Calpe, S.A., 1943.

Purcell, Maty. *The Great Captain: 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 New York: Alvin Redman, 1963.

Pust, Klemen. "Slavery, Childhood and the Border: The Ethics and Economics of Child Displacement Along the Triplex Confiniu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resented at the 15th

World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South Africa, July 9–13, 2012.

Puyol, Julio. *Crónica incomplet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469–1476: Según un manuscrito anónimo de la época*. Madrid: Tipografía de Archivos, 1934.

Quintana, Manuel José. *Memoirs of Gonzalo Hernández, Styled the Great Captain*. Translated by Joseph Russell. London: Edward Churton, 1851.

Reilly, Bernard F. *The Kingdom of Leon-Castilla Under Queen Urraca, 1109–112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Reséndez, Andrés. *A Land So Strange: The Epic Journey of Cabeza de Vac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

Reston, James, Jr. *Dogs of God, Columbus, the Inquisition, and the Defeat of the Moors*. New York: Anchor, 2006.

Reyes Ruiz, Manuel. *The Royal Chapel of Granada: The Exchange (“Lonja”), the Church, the Museum: Visitor’s Guide*. Translated by Neil McLaren. Granada: Fifth Centenary Publications, 2004.

———. *Testamento de la Reina Isabel la Católica: Testamento del Rey Fernando el Católico*. Granada: Capilla Real de Granada, 2004.

Ribot, Luis, Julio Valdeón, and Elena Maza. *Isabel la Católica y su época. Actas del congreso internacional 2004*. Valladolid;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de Historia Simancas,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2004.

Rivera Garrecas, María-Milagros. *Juana de Mendoza*. Madrid: Ediciones del Orto, 2004.

Rodríguez Valencia, Vicente. *Isabel la Católica en la opinión de españoles y extranjeros, siglos XV al XX*. 3 vols. Valladolid: 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 1970.

Roo, Peter de. *Material for a History of Pope Alexander VI, His Relatives and His Time*, vol. 5. New York: The Universal Knowledge Foundation, 1924.

Rosell, Cayetano, et al. *Crónicas de los Reyes de Castilla: Desde Don Alfonso el sabio hasta los católicos Don Fernando y Doña Isabel*. Madrid: Librería de los Sucesores de Hernando, 1923.

Ross, Charles Derek. *Edward IV*.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Rothschild, Bruce M. “History of Syphilis.”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Oxford Journals, 2005: 40 (May 15) , pp.1454–63.

Round, Nicholas. *The Greatest Man Uncrowned: A Study of the Fall of Don Álvaro de Luna*. London: Tamesis Books, 1986.

Rowdon, Maurice. *The Spanish Terror: Spanish Imperialis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Constable, 1974.

Rozen, Minna.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Istanbul: The Formative Years, 1453–1566*. Leiden: Brill, 2010.

Rubin, Nancy. *Isabella of Castile: The First Renaissance Quee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Ruderman, David B., and Giuseppe Verdi, eds.,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Jewish Intellectuals in Early Modern Ital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Ruiz, Teofilo. *Spanish Society, 1400–1600*, Essex, U.K.: Pearson Education 2001.

——. *The Other 1492: Ferdinand, Isabella, and the Making of an Empire*. Chantilly, Va., Teaching Co., 2002.

——. *Spain's Centuries of Crisis: 1300–1474*. West Essex, U.K.: Wiley-Blackwell, 2011.

Ruiz-Domènec, José Enrique. *El Gran Capitán: Retrato de una época*. Barcelona: Ediciones Peninsula, 2002.

Ruy de Pina. *Chronica de el-rei D. Affonso V*. Lisboa: Escriptorio, 1901.

——. *Croniqua Delrey Dom Joham II*. Coimbra: Adantida, 1950.

Ryder, Alan. *The Wreck of Catalonia: Civil War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Sabatini, Rafael. *Torquemada and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 History*. London: Stanley Paul, 1924.

Sahagún, Fray Bernardino de. *Florentine Codex: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hings of New Spain*. Translated by Arthur J. O. Anderson and Charles Dibble.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82.

Salter, Anna. *Predators, Pedophiles, Rapists and Other Sex Offend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Sanceau, Elaine. *Henry the Navigator: The Story of a Great Prince and His Time*. New York: W.W.Norton, 1947.

———. *The Perfect Prince: A Biography of the King Dom João II*. Porto and Lisbon: Livraria Civilização, 1959.

———. *The Reign of the Fortunate King, 1495–1521*. New York: Archon Books, 1970.

Sánchez Cantón, Francisco Javier. *Libros, tapices y cuadros que colleccionó Isabel la Católica*.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1950.

Sanchez Martín, Aureliano. *Crónica de Enrique IV de Diego Enríquez del Castillo*. Valladolid: Secretariado de Publicaciones,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1994.

Sánchez Prieto, Ana. *Enrique IV el Impotente*. Madrid: Alderaban Ediciones, 1999.

Sanchis y Sivera, José. “El Cardenal Rodrigo de Borgia en Valencia.” *Boletín de la Real Academia de Historia* 84 (1924) , p.149.

Sandoval, Fray Prudencio de. *Historia de la vida y bechos del Emperador Carlos V*. Madrid: Biblioteca de Autores Españoles, Atlas, 1955.

Santa Cruz, Alonso de. *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dited by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2 vols. Seville: Escuela de Estudios Hispano-Americanos de Sevilla, 1951.

Santa María de Miraflores. Burgos: Caja de Ahorros Municipal de Burgos, 1992.

Sanz, M. Grau. “Así fue coronada Isabel la Católica, ” *Estudios Segovianos 1* (1949) , pp, 24-36.

Saracheck, Joseph. *Don Isaac Abravanel*. New York: Bloch Publishing Co. , 1938.

Sarwar, Ghulam. *History of Shah Ismail Safavi*. 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 1939.

Scofield, Cora Louise, “The Movements of the Earl of Warwick in the Summer of 1464.”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October 1906) .

——. *The Life and Reign of Edward the Fourth, King of England and of France and Lord of Ireland*. London: Frank Cass & Co., 1967.

Seton Watson, R. W. *Maximilian I: Holy Roman Emperor*. Westminster, U.K.: Archibald Constable & Co., 1902.

Seward, Desmond. *The Burning of the Vanities: Savonarola and the Borgia Pope*. Stroud, U.K.: Sutton, 2006.

Shadis, Miriam. *Berenguela of Castile (1180-1246) and Political Women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Shaw, Stanford.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Shmuelevitz, Aryeh. "Capsali as a Source for Ottoman History, 1450-152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9 (1978) , pp.339-44.

Simpson, Leonard Francis.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V*. London: Longman, Green, Longman Roberts & Green, 1862.

Smith, Bradley. *Spain: A History in Art*.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1.

Smith, George. *The Coronation of Elizabeth Wydeville, Queen Consort of Edward IV, on May 26th, 1465: A Contemporary Account Set Forth from a XV Century Manuscript*. London: Ellis, 1935.

Solé, José María. *Los reyes infieles, amantes y bastardo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a Alfonso XIII*. Madrid: La Esfera de los Libros, 2005.

Soyer, Francois. *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and Muslims of Portugal: King Manuel I and the End of Religious Tolerance, 1496-1497*. Leiden: Brill, 2007.

——. “King João II of Portugal, ‘O Principe Perfeito,’ and the Jews (1481-1495).” *Sefarad* 69, no.1 (2009).

Sphrantzes, George.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 Chronicle, 1401-1477*.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0.

Starr-LeBeau, Gretchen. *In the Shadow of the Virgin: Inquisitors, Friars and Converses in Guadalupe, Spa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Stevens, Serita Deborah, and Anne Klarner. *Deadly Doses: A Writer's Guide to Poisons*. Cincinnati: Writers Digest Books, 1990.

Stewart, Paul. “The Santa Hermandad and the First Italian Campaign of Gonzalo de Córdoba, 1495-1498.” *Renaissance Quarterly* 28, no. 1 (Spring 1975), pp.29-37.

Strathern, Paul. *The Artist,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Warrior: The Intersecting Lives of Da Vinci, Machiavelli, and*

Borgia and the World They Shaped.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9.

Stuart Fitz-James, Jacobo, and Falcó Alba, eds.
Correspondencia de Gutierre Gómez de Fuensalida. Madrid: Imprenta Alemana, 1907.

Suarez Fernandez, Luis.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Isabel la Católica: Estudios y documentos*. Valladolid: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1971, 2002.

Suárez Fernández, Luis,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and Manuel Fernández Álvarez. *La Españ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474-1516*. Madrid: Espasa-Calpe, 1969.

Sudhoff, Karl. *The Earliest Printed Literature on Syphilis, Being Ten Tractates from the Years 1495-1498*. Adapted by Charles Singer. Florence: R. Lier & Co., 1925.

Symonds, John Addingto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New York: Henry Holt, 1894.

Tagarelli, Antonio, Giuseppe Tagarelli, Paola Lagonia, and Ann Piro, "A Brief History of Syphilis by Its Symptoms." *History of Medicine* 19, no. 4. Acta Dermatovenerologica Croatia, 2011.

Tanner, Marie. *Jerusalem on the Hill: Rome and the Vision of St. Peter's in the Renaissance*. Belgium: Brepols, 2011.

Thomas, Hugh. *The Conquest of Mexico*. London: Pimlico, 1993.

——. *Rivers of Gold: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from Columbus to Magell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 *The Golden Empire: Spain, Charles V, and the Cre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Thompson, Charles, and John Samuel. *Poisons and Poisoners*. London: Harold Shaylor, 1931.

Thompson, E. A. *The Goths in Spai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Tilly, Charles. “The Europe of Columbus and Bayazid.” 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Project, *Middle East Report*, no. 178 (September–October 1992) .

Torre, Antonio de la. *Documentos sobr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Barcelona: Atenas A.G. , 1966.

Torre, Antonio de la, and Luis Suárez Fernández. *Documentos referentes a las relaciones con Portugal durante 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858. Valladol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Patronato Menendez Pelayo, 1963.

Trame, Richard H. *Rodrigo Sánchez de Arévalo, 1404–1470: Spanish Diplomat and Champion of the Papacy*.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58.

Tremayne, Eleanor E. *First Governess of the Netherlands: Margaret of Austria*,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08.

Tremlett, Giles. *Catherine of Aragon, the Spanish Queen of Henry VIII*. New York: Walker & Co., 2010.

Val Valdivieso, María Isabel del. *Isabel la Católica, princesa (1468-1474)*. Valladolid: Instituto "Isabel la Católica" de Historia Eclesiástica, 1974.

———. *Isabel I de Castilla, 1451-1504*. Madrid: Ediciones del Orto, 2004.

Val Valdivieso, María Isabel del, and Julio Valdeón Baroque. *Isabel la Católica, Reina de Castilla*. Valladolid: Ambito Ediciones, 2004.

Valdecasas, Guillermo G. *Fernando el Católico y el Gran Capitán*. Granada: Editorial COMARES, 1988.

Valdeón Baroque, Julio. *Judíos y conversos en la Castilla medieval*. Valladolid: Universidad de Valladolid, 2000.

Valera, Diego de. *Historia de España*. Salamanca, 1499.

———. *Crónic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Madrid: José Molina, 1927.

———. *Crónicas de los reyes de Castilla: Memorial de diversas bazañas. Crónica del Rey Enrique IV*. Edited by Juan

de Mata Carriazo y Arroquia. Madrid: Espasa-Calpe, 1941.

Varela, Consuelo. *Cristóbal Colón: Textos y documentos completos*.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92.

Varga, Domokos. *Hungary in Greatness and Decline: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Martha Szacsvey Liptak. Atlanta: Hungarian Cultural Foundation, 1982.

Vargas-Zuñiga, Antonio, and Baltasar Cuartero. *Indice de la coleccion de Don Luts de Salazar y Castro*. Madrid: Imprenta y Editorial Maestre, 1949.

“Venice: 1486-1490.” In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 ed. Rawdon Brown. London: National Archives, 1864.

Vicens Vives, Jaime. *El Príncipe Don Fernando (El Católico) , Rey de Sicilia*. Zaragoza: 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xSlico” (C.S.I.C.) de le Exma Diputación Provincial, 1949.

——.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Translated by Frances M. López-Morillas. Princec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 *Spai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1369-1516: Essays and Extracts by Historians of Spain*. Edited by J. R. L. Highfield and Frances M. López-Morilla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 *Historia crítica de la vida y reinado de Ferdinand de Aragón*. Zaragoza: 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ólico, 1962, 2006.

Vickery, Paul S.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Great Prophet of the Americas*. 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06.

Vinyoles y Vidal, Teresa-María, and Mireia Comas Vía. *Estefanía Carrós y de Mur, ca. 1455–1511*. Madrid: Ediciones del Orto, 2004.

Walpole, Horace. *Historic Doubts on the Life and Reign of Richard the Third*. Guernsey, U.K.: Guernsey Press Co., 1987.

Warkworth, John. *A Chronicle of the First Thirteen Years of the Reign of King Edward the Fourth*. Edited by James Orchard Halliwell. London: Camden Society, 1839.

Warren, Nancy Bradley. *Women of God and Arms: Female Spirituali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1380–160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Wass, Glenn Elwood. *The Legendary Character of Kaiser Maximili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1.

Watt, William Montgomery. *A History of Islamic Spai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5.

Webb, Diana. *Medieval European Pilgrimage, c. 700 to c. 1500*. Hampshire, U.K.: Palgrave, 2002.

Weber, Alison. "Recent Studies on Women and Early Modern Religion in Spanish." *Renaissance Quarterly* 52 (1999) .

Weiss, Jessica. *Inquisitive Objects: Material Culture and Conversos in Early Modern Ciudad Real*. LAII Research Paper Series,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October 2011.

Weissberger, Barbara F. "Alfonso de Palencia, " in *Queer Iberia*, ed. Josiah Blackmore and Gregory S. Hutches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Queen Isabel I of Castile: Power, Patronage, Persona*. Rochester, N.Y.: Tamesis, 2008.

——. "Tanto Monta: The Catholic Monarchs' Nuptial Fiction and the Power of Isabel of Castile, " in *Rule of Wome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ited by Anne J. Cruz and Mihoko Suzuki.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Wolf, John B. *Barbary Coast: Algiers Under the Turks, 1500 to 1830*. New York: W.W. Norton, 1979.

Yebes, Condesa de. *La Marquesa de Moya: la dama del descubrimiento, 1440-1511*. Madrid: Ediciones Cultura Hispánica, 1966.

Zilfi, Madeline C. *Women in the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Women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Leiden: Brill, 1997.

Zurita, Jerónimo. *Anales de Aragón*. Zaragoza: Instituto "Fernando el Católico" (C.S.I.C.) de la Excma Diputación

Provincial, 1975 and 1977.

——. *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 el Católico: De las empresas y ligas de Italia*. Edited by Ángel Canellas Lopez. Zaragoza: Diputación General de Aragón, 19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莎贝拉：武士女王|（美）唐尼著；陆大鹏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5（2016.8重印）

ISBN 978-7-5097-8794-6

I . ①伊… II . ①唐… ②陆… III. ①伊莎贝拉（1451～1504）-传记 IV. ①K835.51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5006号

伊莎贝拉：武士女王

著者|（美）克斯汀·唐尼

译者| 陆大鹏

出版人| 谢寿光

项目统筹| 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 冯立君

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开本：889mm×1194mm 1| 32

印张：20.875 插页：1 字数：471千字

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2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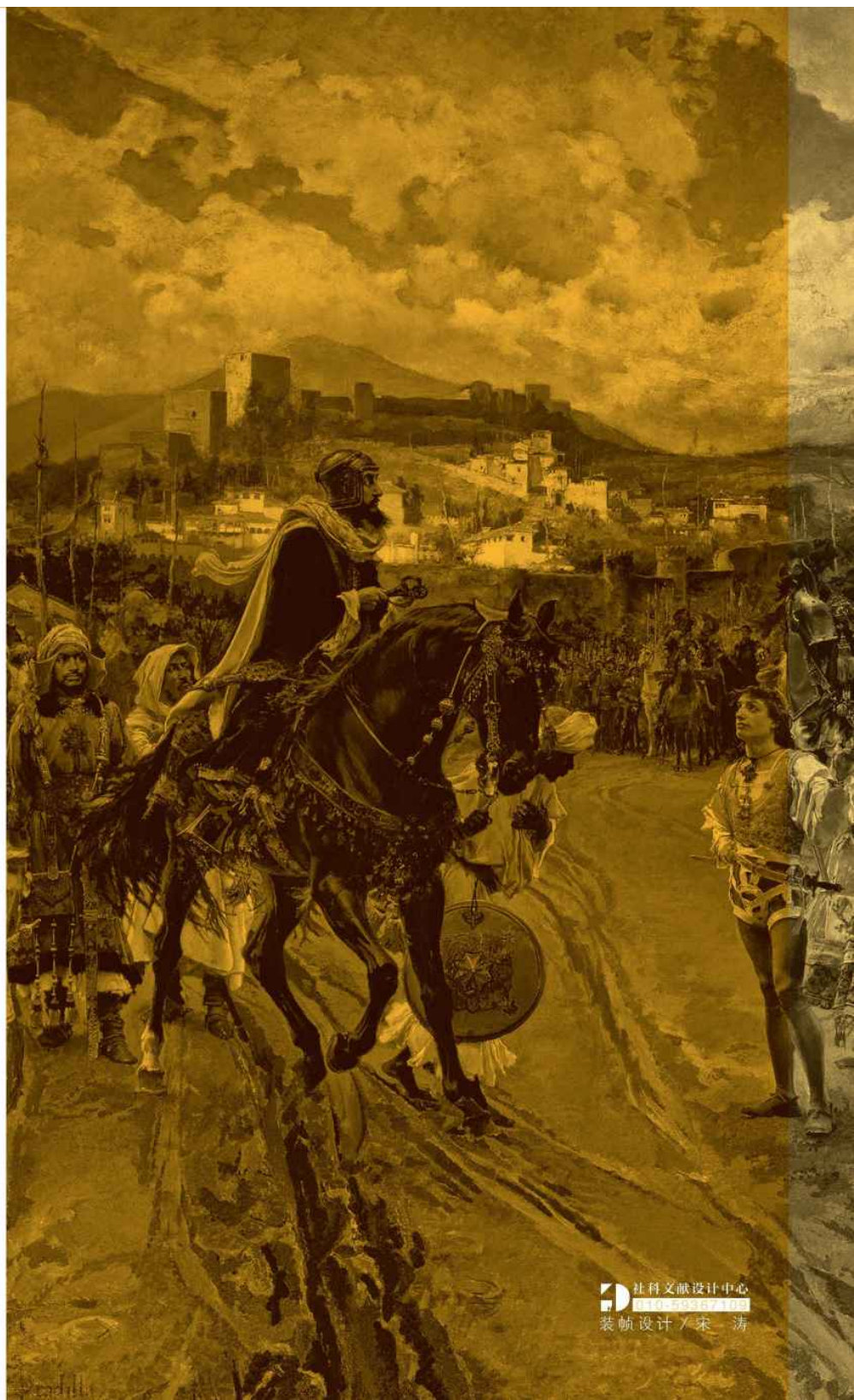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7-5097-8794-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1769号

定价 8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克斯汀·唐尼成功地恢复了伊莎贝拉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伊莎贝拉是史上最令人着迷也最有争议的女性之一，这是一部令人手不释卷的新传记。

——阿曼达·福尔曼，《纽约时报》畅销书《乔治亚娜：德文郡公爵夫人》作者

伊莎贝拉女王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女性之一。她为现代欧洲与美洲奠定了基础，在这方面的功绩超过当时的任何人。克斯汀·唐尼运用穆斯林、犹太和基督教史料，写下这部精彩纷呈的传记。

——杰克·韦瑟福德，《纽约时报》畅销书《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构成》作者

克斯汀·唐尼笔下的中世纪历史如同现代悬疑小说一般引人入胜。伊莎贝拉女王的时代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

——迪尔德丽·贝尔，美国全国图书奖获奖作品《塞缪尔·贝克特》作者

在这部令人惊艳的传记中，克斯汀·唐尼将历史上最强大的女王的故事讲述得栩栩如生。伊莎贝拉对世界的重大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一直延续到今日。

——琳内·奥尔森，畅销书《那些愤怒的日子：罗斯福、林白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斗争》作者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097-8794-6



9 787509 787946 >

定价：86.00元

永乐帝

—— 华夷秩序的完成

永乐帝：
華夷秩序の完成

こい
そい
しよ

こいほんやん
そいしよ
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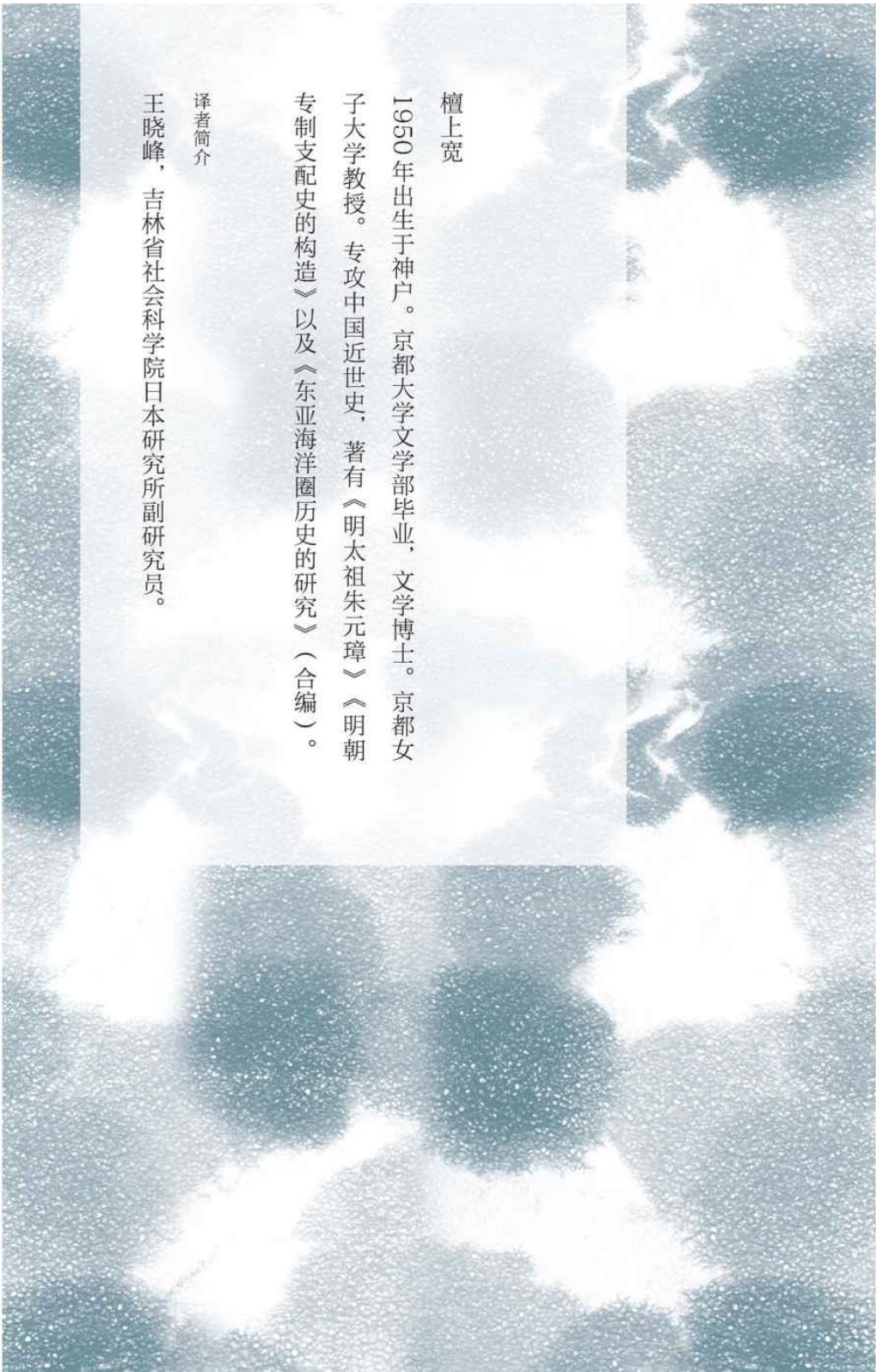


ほん
やん

〔日〕檀上寛／著
danjo hiroshi

王晓峰／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檀上宽

1950年出生于神户。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文学博士。京都女子大学教授。专攻中国近世史，著有《明太祖朱元璋》《明朝专制支配史的构造》以及《东亚海洋圈历史的研究》（合编）。

译者简介

王晓峰，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EIRAKUTEI KAI-CHITSUJYO NO KANSEI

©Hiroshi Danjou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简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做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华夷秩序的完成

永樂帝：

華夷秩序の完成

〔日〕檀上寛／著
danjo hiroshi

王晓峰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引言](#)
- [1 “中华”的世界](#)
- [2 大明帝国的诞生](#)
- [3 皇统的走向](#)
- [4 夺权的道路](#)
- [5 历史的转折](#)
- [6 坠落的时代](#)
- [7 天命所在](#)
- [8 超越忽必烈](#)
- [9 华夷秩序的统治者](#)
- [10 永乐帝的遗产](#)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文库版后记](#)

引言

公元1402年（中国明代建文四年）盛夏。

酷暑下的明朝首都南京正陷入一场空前混乱之中。受封于抗蒙前线基地北京的燕王，统率数万大军，攻下南京，武力夺取皇位。他发动靖难之役，悍然举兵反叛，攻打侄儿建文帝朱允炆（1377～1402？年），历时四年战事，成为明朝第三代皇帝。

他就是明太宗朱棣（1360～1424年），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的第四子。后来，与他一样出身、由藩王成为皇帝的明世宗嘉靖皇帝（1507～1566年）尤其尊崇太宗朱棣，并改其庙号为“成祖”，此后史书多称朱棣为“明成祖”或者“永乐皇帝”。自明朝以后形成了一皇帝一年号、以年号称呼皇帝名号的惯例，“明洪武帝”“清康熙帝”等都是如此。

朱棣是在杀戮与反叛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的即位实际上是不合法的篡夺帝位。他即位之初，清洗了近一万人，这与其父朱元璋在位期间杀人达十万人没有本质的区别。明朝初期，出现了他们这样两位性格残忍、猜疑心极强、手段残酷的皇帝。但是，在明朝建立之初，他们的杀戮行为与其说是出于本性，不如说是为了强化皇权采取的手段，这样说绝不是为他们辩护。

实际上，洪武、永乐并称，是因为明朝的国家体制是由朱元璋和永乐帝两代皇帝确立的。朱元璋打下基础，永乐皇帝强化了皇权，这

已是定论。这话应该所言不虚吧。历来像“太祖”“高祖”等带有“祖”字的庙号，都是授予王朝的开创者的，后来永乐皇帝的庙号被嘉靖皇帝由“太宗”改为“成祖”，这说明后世认为明成祖朱棣与明太祖朱元璋拥有同等地位。

当然，二人是绝不相同的。布衣出身的朱元璋以勤俭著称，即便在对外政策上，除了必需的花费，他也是比较消极的。与此相反，喜好排场的永乐皇帝在位期间，相较于内政，他更愿意在外交方面发挥才干，始终贯彻积极的外交政策。声势浩大的蒙古亲征、郑和下西洋等都是在朱元璋时代无法想象的大事业。而从他们的外交政策中可以看出的这种差别，同样也能从后世对他们的评价中看出。

例如，谈及在促进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作用，后世对二人的评价很低。正是由他们确立的明朝专制国家体制阻碍了本应顺利发展的中国近代化，使得此后中国被世界远远甩在了后面。可以说，曾经作为世界先进国家的中国由强盛转为没落，就是从他们在位期间开始的。因此，他们二人作为中国社会“负面体制”的确立者，成为“近代”话语体系中被排斥的对象。

但是，对于永乐皇帝的施政政策，也有一部分正面评价。如他的积极对外政策促进了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明朝的安定与发展，也带来了民族间的融合。

在中国国内，即便是从民族问题的角度出发，提出这种看法来肯定永乐皇帝的作为，也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与前面提到的近代化问题都是功利主义的看法，从中可以窥见中国人对待永乐皇帝的普遍态度。

认为永乐皇帝是民族融合推进者的看法虽说有些极端，但是他的确有时能获得中国人的理解和同情，原因何在呢？这恐怕是由于永乐

皇帝推行了积极的外交政策，将中华文化广播于海外，这也是他与其性格极为内敛的父亲朱元璋的最大差异吧。中国人是否意识到这点暂且不论，但永乐皇帝确实激发起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在由于现代化的成功而充满自信的中国，自1990年以来，相继出版了不少永乐帝的传记，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但本书并不想从永乐皇帝对现代中国近代化的功罪得失的角度来进行中国史的研究，而是以14、15世纪的中国与周边东亚诸国的关系为轴，重现永乐王朝，客观分析永乐皇帝的作为及影响。同时，在探讨异于欧洲的中国式近代化模式的过程中，尝试冷静地对永乐皇帝的政绩做出定位。

为此，我觉得有必要首先要明确已经对永乐皇帝盖棺定论的中国式世界观、中国式伦理，即完全异于欧洲中心发展史观、世界观的独特的中国式世界观，并最终从中展现出与欧洲不同的中国式近代化模式。在我们将视线聚焦14、15世纪的中国明朝之前，首先来了解一下永乐皇帝毕生追寻的“中华”的内涵。



永乐时代的欧亚概略图

1 “中华”的世界

（1）中华与夷狄

“中华”的概念

自古以来，中国自称本国为“中华”。

所谓中华，就是居于天下的中心、拥有最优秀文化的地区。居于东亚之首，广传文明，始终作为周边各国、各民族领袖的中国人经常自信又自负地这样称呼自己。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当中依然保留着“中华”的字样，由此可见一斑。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清王朝的灭亡，在中国大陆上演王朝兴衰更迭的，确实是曾居于世界之巅的中华帝国。

“中华”一词本身并不是自古就有的。最早也不过是从东汉至三国时期出现的。此前，在西周（公元前11～前8世纪）时期使用过“夏”“华”“诸夏”“华夏”“中国”“中州”“中土”等称呼。当然，这些称呼并非指现在的中国全境或中华帝国，而仅指以位于陕西的周王朝政权为中心的一定地域范围。一般认为，周王室与同族、同盟各国之间相互产生的一种强烈的一体感，逐渐催生出了这些称呼。

其中，“夏”源自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华”则由“华美”转义而来，含文化优秀先进之意。概言之，“诸夏”“华夏”都是彰显中国文化先进性的称呼。

另一方面，“中国”“中土”“中州”则是表明本国位于世界的中心，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提出的称呼。周王室及其同盟各国自己命名为“华夏”或者“中国”，旨在强调、尊崇自身文明的先进性，而俯视除自身之外的周边各国或异民族。

两种概念范围的“华（夏）”与“中”最终相互连接产生了“中华”的概念。“中华”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地理上，都处于世界的中心，进一步说，“中华”成为规范世界体系的概念。此后，虽然“华”及“中国”等称呼也一直在使用，但那始终是“中华”词义的简称，或者说，并不是“中华”概念之外的其他含义。

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

认为自己处于世界中心的“中华”的观念，早在“中华”一词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于中国人的意识之中。“中华”的词义本身虽分为“中”与“华”两个部分，但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是浑然一体的，“中华”就是他们的精神家园。虽说“中华”是以周王朝为中心的同族、同盟意识的产物，但也包含了很多对“中华”以外周边世界的想象。

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中华”的四方存在着被称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夷狄”，将他们与“中华”区别开来，确保了中华世界的优越性。

一般来说，“中华思想”的世界观，其思想主体并不是脱离现实的。中国处于周边异民族的包围之中，在与现实存在的周边各民族长期接触、交往（包括战争、对立、妥协、和平等）的过程中，把异民

族贬低为“夷狄”，并确认了中华世界的优越地位。正因为“夷狄”的存在，“中华”才会成为世界的中心，所以，中华思想也可称为“华夷思想”。

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统一的过程中，中华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虽然认为与异民族之间存在差异，但并不是太歧视他们。直到战国时期以后，“夷狄”在儒家典籍中反复出现，成为侮蔑的对象，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儒家思想强调“华夷之别”，认为夷狄与禽兽无异，被视为野蛮人，自此，“夷狄”的概念被确定下来。

假如仅仅是满足于区别与“夷狄”之间的差异，那么中华思想也就仅仅是一种民族排除的理论，而也许它本身也有那样的倾向。在世界上也存在与中华思想类似的思想，如古埃及、古印度都有过类似的思想。但中国与那些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设定了“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差异，而且将“中华”置于“夷狄”的上位，并将两者共存的世界提升为一种思想体系。

而给予这种思想体系的形成以巨大贡献的，无疑就是助长“华夷之辨”的儒家思想。先假设存在这种差别，然后再将其归纳成一种思想体系，这确实是强调中国优越性的巧妙手段，但必须承认，中国为处理与周边民族的现实关系而架构的“中华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

天命思想

具体地说，在处理华夷关系中发挥作用的，是作为中国思想基础的“天命思想”。

对中国人来说，作为宇宙主宰和万物本原的“天”是一种绝对性的存在。天的观念产生于周朝，随着历史变迁，其内容虽有变化，但这种观念始终贯穿于中国人的意识中。他们认为从天体运行到四季变迁，万事万物万象皆是基于天的意志而存在。

其中，天的最大作用就是让有德者承天命，来治理天下。天作为抽象的存在，本身并不能统治天下，因此要让有德者代行上天的意志。天子是得受天命的天之子，必须要修身养德，教化民众，以应天命。

天子一旦失德，百姓离心，上天就会另选有德者改奉天命，这就是所谓的“革命”。要避免“革命”，天子就必须不断用心德治，教化民众，充分发挥自身“德”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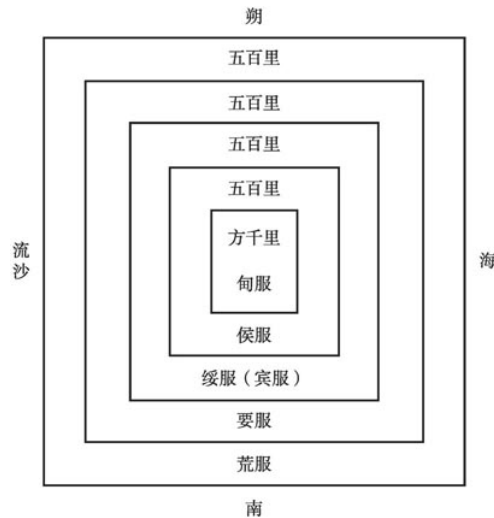
天子以德治国，恩德广播四方。夷狄仰慕天子之德、中华之文化，四方来朝。中华与夷狄之间形成了新的关系。

作为天子与百姓之间媒介的“德”起到了使夷狄臣服的作用。“有德君民（有德者成为民众的君主）”的天命思想就是天子教化民众的“德化思想”，它成功地将中华与夷狄结为一体。

五服图

谋求华夷共存的中华思想在古代中国人的意识中塑造了如下的思想世界。

以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或《荀子·正论篇》为代表的很多儒家典籍中都记载了有关“五服图”的记述。五服图就是将天子恩泽所及的地域，以天子为中心用同心方框划分出来的五个范围。也可以说，是以对天子的臣服程度划分出的五个区域的概念图。



五服图

根据五服图，中央区域是天子直辖地域，方圆千里（一里大约四百米），称为“甸服”，然后，沿中央区域外侧依次再向外分别扩展五百里，即为侯服、绥服（也称宾服）、要服、荒服四个区域。荒服的外延，东至大海，西到流沙，北达朔，南及南，最后远达“四海”。被“四海”包围的地域，就是所谓“天下”。

从最外侧荒服的边界来统计，是方圆五千里的范围，用现代计量单位来测算，大约是四百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中国领土总面积（约一千万平方公里）的二分之一弱，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辽阔。中国人思想中的世界已经超越了现实世界的地域范围，具有无限扩展性。

位于天下中央位置的甸服是天子直辖的京畿地区，居民从事耕作，为天子提供各种服务。侯服、绥服（宾服）是诸侯的领地，担负守卫京畿地区的责任。再往外，就是异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要服是蛮夷居住地，荒服是戎狄居住地，都属于未开化地区。

《荀子·正论篇》中，按照天子举行仪式的标准划分了这些地区。

天子在甸服举行的仪式称为“日祭”，那里的百姓参加每天一次的祭祀仪式，侯服的百姓要承担的义务是“月祠”，即每月一次的祭祀仪式，宾服（绥服）的百姓要参加称为“时享”的季节性礼仪活动。这三服都是亲近天子的地域，称为“中华”。

与之相对，要服地区的百姓每年一次携带贡品来中原向天子问安，称为“岁贡”；最外侧的荒服地区，只是在天子更迭的时候才会来中原朝贡，称为“终王”。与前面的三服相比，夷狄与中华的关系相当疏远，勉强依靠朝贡关系维系。也就是说，中华天子对夷狄德化的证明以及夷狄对中华文化的向慕，具体归结为这种朝贡行为。

话说回来，天下的中心就是受天命的天子所统治的中华世界。中华世界以外的同心方框就是夷狄世界，“华”与“夷”之间存在明确的差异，而维系、沟通华夷之间联系的就是被天子德化感召的夷狄对中华的朝贡关系。

并且，从中华思想的伦理角度来说，华夷差异的本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夷狄受天子德化感召，接受了中华之礼（文化）、义（道义心），则同样被视为中华子民，而不再是未开化的野蛮人。

再思辨

如果再进一步剖析中华思想，华夷之辨就不只是民族性差异的问题了，必然涉及文化范畴的探讨。一方面，如果夷狄被中华礼义同化，就会成为中华子民；另一方面，即便是中华子民，如果丧失了中华礼义，则与夷狄无异。中华思想中对夷狄的歧视与包容经常以互为表里的关系共存。事实上，汉代公羊学派的“天下”思想，就打破了中华与夷狄的界限，构架起一个“天下一统”的中华世界。

尽管如此，华夷秩序依然是以民族差异为基本前提，并加入了中华道德伦理而形成的。如果夷狄始终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那他们就很难成为中华子民。礼义原本出自中华，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影响力也越来越小。如同在水面投一颗石子，会产生一圈圈的涟漪，当涟漪扩散到最大限度时就消失了。夷狄所受到的中华道德影响的深浅，决定了它与中华的关系的亲疏。由此形成的华夷关系就是华夷秩序。

纵向模式的天命思想与横向模式的华夷思想，两者以天子为基点垂直交叉，构筑起中华世界。其中，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中华都处于世界的中心，包括周边的夷狄世界，就形成了“天下”。而且，在这个世界中，起到维护或破坏作用的只是天子。天子失德则失去天命，夷狄也不再朝贡。相反，天子勤修德政则能保持天命不绝，而夷狄则会四方来朝，中华世界盛世来临。

来中华朝贡的夷狄数量的多寡，标志着天下安定的程度。四方夷狄来朝，就证明天子是以德治国，恩泽四方。后世，中国历代皇帝都积极地促使周边各国朝贡，就是这种传统观念的反映。现实世界中的皇帝都借助中华世界的思想伦理来证明自己取得皇位的正当性。

汉武帝时期，儒教成为国教后，这种思想倾向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华的范围一度扩大，“中华”的观念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曾经为少数人所持的“天下观”，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为政者通过意识形态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反过来意识形态也限定了为政者的行为。皇帝扮演着儒教世界的天子角色，来维持现实世界的统治秩序。

意识形态决定现实走向，华夷秩序也不例外，中华思想创造了中华帝国。

（2）中华世界的变迁

大唐帝国

“中华”思想之下的华夷秩序在国际政治中的具体化，就是中原王朝对周边各国、各民族的“册封”。

册封制就是中原王朝的皇帝封夷狄的首领为王，并以此确定君臣关系的制度。但这种华夷君臣关系与中原王朝朝廷内的君臣关系不同，夷狄的首领受封之后，被称为“外臣”，册封时被授予代表其身份的“印章”，并且要按期朝贡。中华的“德化”与夷狄的“朝贡”体现为“册封”与“朝贡”的互换，通过这种行为来维持中原王朝与周边夷狄间的国际秩序（君臣秩序）。

册封制本身产生于统一王朝建立之后的汉代。朝鲜及南越国（现在的广东到越南北部）是最早受册封的夷狄政权，后来，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民族接受册封。公元57年，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倭奴国”被东汉光武帝赐予金印。西域各国也仰慕汉王朝的威势，陆续来朝，从西汉至东汉，出现了四夷来朝的中华盛世。

不过华夷秩序最完善成熟的时候当然是在唐朝时期。被誉为“世界帝国”的唐王朝凭借绝对的军事、经济、政治实力君临东亚世界。当时的朝鲜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以及渤海国等都受到唐朝册封成为藩属国。周边各国都利用唐王朝具有权威性的册封来证明、强化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当时的东亚国际形势确实是以唐王朝为中心发展变化的。

但是，同为东亚国家的岛国日本却没有接受唐朝册封，而是始终谋求与唐朝的对等地位。但这只是日本单方面的想法，与唐王朝的想

法完全不同。日本是什么？唐朝认为日本只不过是一个地处偏远的朝贡国，它的遣唐使被认为是朝贡使，既然是朝贡国，那么，按照华夷思想的逻辑，日本只是受到大唐恩惠的夷狄。

羁縻政策

唐王朝被称为“世界帝国”的理由，一般认为是唐王朝文化、民族的多样性及其积极的对外政策。与汉王朝相比，唐王朝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策略，势力范围空前扩大。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羁縻州（府）”的设置，即“羁縻政策”。

所谓“羁縻政策”就是唐王朝在其周边夷狄地区设置中原王朝式的府、州、县，使其行政管理模式内地化。但这种“内地化”与汉族管制又不尽相同，他们拥有民族自治权，中原王朝仅通过授予夷狄首领官职实行间接管理。管理羁縻州的机构是“都护府”，不仅是在中亚、蒙古，在中国东北部及越南等地也都设置了都护府，作为唐王朝管理周边各国的据点。

“羁縻”原本是驾驭牛马等牲畜的意思，在这里则是将异民族视为禽兽，防止他们脱离唐王朝控制的怀柔政策。羁縻州数量最多时接近900个，由汉人担任都护官职直接对夷狄首领实行管理，比“册封关系”具有更强的控制力。

当然，不是所有的周边民族都会臣服于唐王朝的统治。唐王朝的边境地区经常会受到周边强大的少数民族——如突厥、吐蕃、维吾尔等民族——的侵扰、威胁。而唐王朝则通过与这些民族缔结“盟约”来缓解军事冲突，达到和平共处。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盟约”关系是一种基于儒家思想的家族血缘关系。

缔结盟约之后，两国则根据双方势力的强弱确定为父子、兄弟或者舅甥的关系。中原王朝处于绝对优势的时候，双方是父子关系，反之，则是兄弟或者舅甥的关系。而且，中原王朝的皇帝通常将自己的女儿（实际上多为其他女子）下嫁夷狄首领，通过政治联姻来强化盟约关系，即所谓“和亲公主”。对于册封关系不适用的周边民族、国家，大唐帝国就通过“和亲”方式与它们建立拟家族血缘关系而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政治权力的结果

以大唐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基本上包括以下四种情况：一是以朝鲜等国为对象的册封关系；二是以日本为首的朝贡关系；三是对弱小民族的羁縻关系；四是与周边强大少数民族间的盟约关系。这四种情况是在华夷秩序下根据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强弱由中心向四周依次排列的。

距离中心最近的是受中原文化熏陶最深、居住在中原王朝境内、羁縻体制下的各民族。它的外围是对天子执臣下之礼、受中原王朝册封的各国家，再外围则是仰慕中原文化、时常来朝的处于边远地区的朝贡国。这在理论上是按照受中原文化熏陶程度排序的，但实际上是基于唐王朝在政治、军事上可以控制的程度排序的。

另外，对于敌对各民族，唐王朝采取缔结盟约，建立不同于君臣关系的拟家族血缘关系，并扮演关系中的长辈来保持自身的领导地位。

君臣秩序也好，家族秩序也罢，最终的基本原则就是将周边各国、各民族纳入华夷秩序之下，建立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对于周边各国各民族来说，不论目的如何，强化自身政权也好，学习中原文化也好，还是为了纯粹的贸易往来，都必须与唐王朝结成某种

程度的关系。唐王朝则巧妙地利用他们的各种欲求，充分发挥政治影响力，维护唐王朝在东亚的领导地位。大唐世界帝国就是唐王朝政治影响力的结果。

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蒙古势力的抬头

以大唐为中心建立的世界帝国国际秩序随着唐的灭亡迅速崩溃了。公元907年大唐被节度使朱全忠所灭，中国历史进入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交替更迭的五代十国分裂时期。而中原王朝对周边各国的政治控制力显著下降。

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始终向中原朝贡的契丹族，在唐灭亡后，势力迅速壮大，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辽称帝。

契丹灭了东部的渤海国之后，开始入侵中原，灭了后唐政权。随后，因契丹帮助而建立起来的后晋政权，割让给辽以今天的北京为中心的燕云十六州，并向辽帝称臣。中华屈服于夷狄之下，在华夷交往史上，首次出现了中原王朝如此屈辱的情况。

即便在北宋统一中原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变化。

一般认为，中国近世是“征服王朝的时代”。大金兴起灭辽之后，出燕云十六州，南下灭北宋，占领中国华北地区。其间，大宋在与金、辽对抗中经常处于劣势，每年都要向金、辽缴纳大量“岁币”以换取和平。

这一时期的国际秩序，宋辽之间是兄弟关系，而金与南宋之间是君臣关系（后来又变成叔侄关系）。无论宋朝想法如何，它始终都不具有在国际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治军事实力。

诚然，大宋与高丽之间的册封关系依然存在，依旧维持着以宋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是，大宋与金之间却是相反的君臣关系，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秩序是极其复杂的。唐王朝时期一统天下的国际秩序已不复存在，政治上呈现多极化状态。夷狄的实力已经强大到颠覆传统意义上的华夷秩序的程度。

13世纪初，新兴的蒙古势力抬头，并最终灭掉南宋，统一中国，建立元朝。自此，中华与夷狄的地位完全逆转。中华处于夷狄的统治之下，这是史无前例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忽必烈全盛时期

蒙古势力凭借绝对的军事实力席卷中国社会，并很快建立起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忽必烈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定国号为“元”，也将势力范围向周边扩展。最重要的是，元朝不必再像以前的中原王朝那样烦恼于北方少数民族侵扰之苦。虽说元朝统治上层也出现过“海都之乱”的权力争夺，但盘踞长城以北的势力依旧同属于蒙古族。元朝疆域也扩大到宋朝未曾有过的程度。

忽必烈时期，高丽完全成为元朝的附属国，同时，忽必烈又向越南占城、缅甸、爪哇等南方各地派军远征，使之内附元朝。到13世纪末期，很多国家都处于元朝的统治之下，与元结为君臣关系，史称“忽必烈全盛时期”。自唐灭亡以后，处于混乱状态的东亚国际秩序结束了，曾经的华夷秩序重新建立起来。

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处于元朝统治下，众所周知，元朝远征日本、爪哇等国都失败了。周边的一些国家因不满元朝的野蛮统治也奋起抗争，拒绝朝贡。

“元寇”两次远征日本，原因在于日本多次拒绝元朝的招降使者。宋朝没有强制日本臣属，而元朝是采取恐吓方式才被日本拒绝的，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

当时，日本为什么拒绝元朝的招降，详细情况并不清楚。可能是对元朝傲慢态度的反击，抑或当时的日本不重视对外关系。但日本对元朝的使者不予理睬，后来又在镰仓的龙口斩杀了元朝的使者，这至少表明了日本绝不臣服元朝的立场。换言之，日本拒绝参加以元王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框架，也不承认元朝属于中华正统王朝。

最终，日本与元朝之间没有建立政治秩序，站在元朝的立场，日本甚至连边远地区的朝贡国都算不上。领邦日本处于华夷秩序之外，这对元朝来说是唯一的遗憾吧。据说，忽必烈至死都念念不忘要第三次远征日本。元朝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并未如忽必烈所愿，就功亏一篑了。

商品流通的世界

宋元时期的东亚国际秩序在政治、军事上并不处于稳定状态，时有冲突发生。但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却比唐以前更加紧密了，尤其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宋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丝绸、棉布等纺织品以及茶、陶瓷器等各种各样的商品以销售为目的被批量生产，通过经贸活动流向周边国家。

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与以往时代截然不同，民间贸易成为主流。与以前附属于朝贡活动的“朝贡贸易”不同，民间商人独自乘船往来于各国之间，统一的东亚经济贸易圈逐渐形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宋贸易”。日本与大宋之间并没有正式政府交往，但大宋商船经常驶往日本的博多进行贸易。到南宋时期，平清盛开放兵庫港口（大轮田泊）允许大宋商船通航濑户内海，旨在独占日宋贸易的利益。

周边各国需要中原王朝的各种商品物资，同样，中国也需要外国商品，但生活必需品比重很少，大部分属于奢侈品及贵重商品，旨在满足上流社会的欲求。因而，宋元时期，国际经济贸易在朝廷的支持下十分发达，最典型的的就是“南海贸易”的发展。

唐朝时期，阿拉伯商人就频繁来航中国沿海地区。他们从阿拉伯海出发，经印度洋穿过东南亚海域，到达中国广州，与当地中国商人交易。

唐朝在广州设置“市舶使”，管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阿拉伯商人带来了香料、药、象牙、犀牛角、玳瑁（鳖甲）、珠宝等奢侈品，这些商品迅速在上流社会流行。

而宋代则仿照唐代设置了“市舶司”，除广州外，在浙江的杭州、明州，福建的泉州等地都设置了这一机构，旨在将海外贸易利润收归朝廷。南海贸易的相关事务主要由广州和泉州的市舶司进行管理。

北宋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额占南海贸易的九成以上；南宋时期，距离都城杭州很近的泉州贸易空前繁荣。在泉州、广州设置了供外国商人居住的区域“蕃坊”，领导人称为“蕃长”，“蕃坊”拥有治外法权。南宋末年，在海外贸易中成为巨富，并担任泉州市舶司长官（提举市舶）的蒲寿庚，就是“蕃坊”里的外国人。

元朝灭南宋、吞并江南地区后，依托当地雄厚的经济实力，促进了南海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元朝政权让治下的穆斯林商人代表朝廷代管南海贸易，采取“半官半民”的方式，由朝廷独占海外贸易，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为了确保海外贸易的航线通畅、安全，元朝多次出兵海上，同时，促使东南亚各国来中原朝贡，以确保奢侈品的供应。

其结果是，以印度西南端的奎隆为首，有很多国家地区向元朝纳贡，自印度洋经南中国海，到达东中国海域，形成了以元朝为中心的贸易圈。通过穆斯林商人的活动，联系到了西方的阿拉伯、波斯地区。

正如杉山正明所说，大元帝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中国南方的经济实力，利用穆斯林的商业网络，成功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经济贸易圈。马可·波罗在他的《东方见闻录》中，用“世界最大港口”来称赞位于这一贸易圈东端的泉州的繁华景象。

元朝的衰退——大动乱的开始

然而这种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绝不是稳固的。

14世纪初，随着元朝的没落，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逐渐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民间秘密的海外贸易及海贼活动的出现。从朝鲜半岛经中国东海到南海的海域，成为倭寇、海贼等武装商人活动的范围，元朝建立的经济贸易圈已经被他们主导，海外贸易秩序处于混乱的状态。

同一时期，元朝周边各国也发生了政治上的动乱。朝鲜半岛及安南（越南）的旧王朝被推翻；日本进入南北朝时代，政权分裂，政治陷入混乱。这些国家的政治状况，是不是元朝统治弱化的联动结果，

尚无定论。但是，周边各国的政权更迭或政治动乱，恰逢元朝的衰败，无疑助长了东亚局势的混乱，已经无法恢复到原有的秩序。

如同日本与元朝的关系一样，以元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没有完善起来，加之周边国家政治上的动乱，使得既存的国际秩序开始崩裂，而倭寇与海贼的出现加剧了东亚秩序崩溃的速度。倭寇、海贼原本是随着东亚国际贸易商业化伴生的破坏性存在，他们趁着东亚国际秩序的崩坏，横行海上。而东亚各国正自顾不暇，谁都不再具备足以震慑他们的力量了。

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东亚国际旧秩序崩毁在即，各国重新洗牌已成趋势。为此，打破旧体制，用新的王朝取代元朝统治，使局势焕然一新，已经成为必然。而大元帝国的衰亡并不仅仅是一国的问题，以此为导火线，引发了14世纪东亚全境的大动乱。

明朝成立前夜的东亚世界秩序，就处于这样一种亟待重建的混乱中。

2 大明帝国的诞生

（1）中华秩序的恢复

洪水·疫病·倭寇

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天下大治。14世纪后，元朝统治迅速崩溃。围绕着皇位的继承权归属问题，元朝统治阶层内部权力斗争不断，甚至爆发内乱。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天历元年（1328年）爆发的上都派与大都派之间的内战，双方为争夺帝位，将都城所在的华北地区化为战场。元朝不仅没有建立起新的国际秩序，连国内的统治都很难达到稳固。

元朝的内乱不止发生在统治阶层内部，而且自上而下，遍及社会，其中最悲惨的就是下层百姓。他们不仅受到官吏、地主的残酷剥削，而且每年都会遭受水灾、旱灾、蝗灾等不可抗拒的天灾袭击。饱受饥馑的百姓为求生存，只能抛家舍业，远走他乡。几万、几十万的饥民、流民为了生存逃亡各地。

加剧这种事态的是至正四年（1344年）开始发生的黄河大泛滥。华北一带持续的暴雨致使黄河决堤，咆哮的河水吞没了河北至河南、山东一带的大片土地，无数百姓丧生。甚至还发生过造成黄河改道数百公里的大泛滥。

持续的天灾最终造成了瘟疫的爆发。在这场瘟疫中，早已饱受饥馑、仅以草木为食勉强存活的百姓完全无力抵御，每天都会成千上万地倒下，其景惨不忍睹，如同人间地狱。而此时，始终忙于争权夺位的元朝统治阶层早已无暇顾及，无力回天了。

实际上，欧亚大陆的西端也在同时发生着同样的情况。

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地区，即“饥饿草原地带”突然发生了黑死病。1347年黑死病向西传染至君士坦丁堡后，迅速在整个欧洲蔓延爆发。一说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被感染死亡，人数达3500万，“是由于异教徒犹太人下毒造成的”的传言在当时盛行，由此也造成了大量犹太人被无辜屠杀。

此后，黑死病肆虐欧洲数年，在欧洲社会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终于沉寂下来。黑死病作为欧洲中世纪末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至今仍深深铭刻在人们心中。

那么在中国发生的瘟疫究竟是不是黑死病呢？这个问题至今尚无法确认。但是，当时沟通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十分繁荣，发源于中亚的黑死病通过丝绸之路被带到中国，这种可能性也并不是没有。事实上，也确实存在持这种看法的研究者。这种观点对错暂且不论，但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同时发生天灾瘟疫，夺走无数生命，这确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以及随之发生的社会动乱，两者之间并非没有关系。恰在此时，欧亚大陆最东端的朝鲜半岛沿岸则倭寇猖獗。

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位的至正十年（1350年），用中国的干支纪年就是庚寅年，朝鲜半岛受到了倭寇如潮涌般的大规模袭击。自此以后，倭寇源源不断，蜂拥而至，高丽王朝饱受

倭寇之苦，不得不投入大量财力用于抗倭。史书中常说“庚寅以来之倭寇”，正是因为庚寅以后才有了倭寇极度猖獗的现象。

天下大乱，弥勒下世——红巾之乱

14世纪中叶，东亚地区正处于极度混乱之中。特别是元朝统治下的民众中确实不断积压着不满情绪，但是，民众并没有把这种不满对谁发泄出来。

民众的不满情绪被信仰所化解。元末民间非法宗教组织“白莲教”宣扬弥勒佛下世救度众生的教义，吸收了大批信众，势力迅速壮大。贫苦的民众抱着一丝希望入教，更加坚定了他们反元的决心。

“天下大乱，弥勒下世”的教义，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

河南地区的白莲教主韩山童在传教的同时，打着“复宋”的旗号准备举兵反元，对元朝的残酷统治早已不满的广大民众，很快聚集在“复宋”的旗帜下。在“复宋”的号召下，包括无赖、野心家在内的各类反元势力及社会阶层纷纷加入白莲教。白莲教组织不再是当初单纯的民间宗教团体了，已经变成了谋求改变社会现状的革命集团。

反元起义之火首先在距离白莲教活动地区很远的东南沿岸燃起。

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台州（在今浙江省）出身、以海运为业的方国珍在海上聚众起义，附近的民众纷纷加入到起义队伍中，势力迅速壮大。腐败的元朝已无力镇压，更害怕从江南到大都的海上粮道被截断，只能对方国珍实行封官招抚的政策。方国珍完全控制了台州一带的制海权，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这是元末首次反元起义。

至正十一年五月，一直处于秘密反元活动的白莲教徒，在头领刘福通的率领下，在颍州（在今安徽省）举兵反元。起义迅速扩大到周

边地区，饱受十几年天灾肆虐及元朝残暴统治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反元起义一时间遍及河南、安徽。

起义军的标志就是头扎红巾，所过之地，不管是地方官府还是平日欺压百姓的地主，都受到起义军的冲击——“红巾之乱”由此爆发。

同年八月，湖北地区也发生了白莲教起义，他们同样头系红巾，并逐渐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战略要地。按照地理位置划分，通常称安徽起义军为“东红巾军”，湖北起义军为“西红巾军”。但两地红巾军之间没有任何统属关系，各自为战。之后，西红巾军四面出击，势力范围从湖南、湖北扩大到江西地区。在红巾军起义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元朝统治就出现了华北、华中两大政治真空区。

在这种形势下，各地起义不断，遥相呼应，至正十二年二月，定远（在今安徽省）豪族郭子兴率领数千青年攻打濠州（今安徽凤阳），赶走朝廷官员，占领濠州作为起义根据地。出身贫民、曾为云游僧人、后来成为明太祖的朱元璋，三月的时候参加了郭子兴的义军。

至正十三年（1353年）五月，浮海贩盐出身的张士诚在江苏泰州举兵起义，并迅速发展成为拥有一万人的地方武装。后来，他把根据地转移到苏州，凭借着苏州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最后成为能与朱元璋争霸的对手。

两类义军

元末农民起义军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东、西红巾军所代表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起义军。当然，这类义军并不都是白莲教徒。虽然白莲教是起义农民的精神支柱，但同时也被那些趁乱图谋扩大势力的野心家所利用。东系红巾军的实际领导者刘福通正是这类人，之后，从西系红巾军中崛起的陈友谅以及与东红巾军有关联的朱元璋也都是这类人。

另一类是完全不带有宗教色彩的义军，如方国珍、张士诚等人。他们原本就依靠海运为生，起义后，仍然依靠海外贸易所得利润作为发展、壮大自己势力的财源。他们只以自身利益需求为行动准则，有时甚至对与元朝官府合作也毫不介意。这类义军没有政策及原则上的一贯性，自始至终也并没有统一天下的志向。某种意义上讲，在元末国际商业化大发展的背景下，他们正属于趁着社会动荡迅速崛起的近世叛乱者。

朱元璋成功的秘密

在众多起义军中，朱元璋最终取得了胜利，原因何在呢？当然可以认为有各种原因，但是，提出“不杀”的口号，获得了民心，以及用铁的纪律管理起义军，这两点或许可以说是其他义军所不具备的特点。此外或许还有一些侥幸的因素吧。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以江南要地南京为根据地，凭借江南富庶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发展壮大，争霸天下。

朱元璋参加了凤阳郭子兴义军之后不久就带着少数部下南下。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渡过长江，至正十六年攻占集庆路，改名为“应天府”，这就是现在的南京。应天府有“奉应天命”之意，既是表示朱元璋对南京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他的志向非同一般。

此时，朱元璋获得了江南地区地主阶层的广泛支持，已经成长为拥有众多知识分子的地方政权。江南地区的地主阶层给予迅速壮大的

朱家军团财政上的支持，以获得成为朱元璋治下地方官吏的好处，并进而更加积极地支持朱元璋政权。朱元璋占据着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同时，又得到江南地主阶层人力、财力的全力支持，这是他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正当东系红巾军轰轰烈烈北伐大都之际，朱元璋却独自南下江南，足见其先见之明。宋朝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朱元璋顺势应时，不能不说他很幸运。

当然，朱元璋在复杂的局势中做出正确的判断，独自南下取得江南地主阶层的支持，这是他个人能力的表现，而与江南地主的合作，也是他努力的结果。后来朱元璋以江南为中心建立明王朝，也绝不是偶然的。

竞争对手——陈友谅和张士诚

至正十年爆发的反元起义，历经二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北伐失败后，东系红巾军开始走下坡路，而西系红巾军内部也发生分裂，局势进入了弱肉强食、群雄割据的时期。各地义军各自为政，为争夺霸权相互角逐。各路英雄为了生存下去，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锋。

这其中，最有可能问鼎天下的，有坐镇九江（在今江西省）的汉王陈友谅、占据苏州的周王（后来改为“吴王”）张士诚以及据守南京的朱元璋。其中出身西系红巾军的陈友谅是朱元璋最强的对手。从陈友谅暗杀首领徐寿辉夺取义军领导权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为夺取天下不择手段的冷酷无情的枭雄。而且，他占据长江中游地区，可以随时顺江而下威胁南京，地理位置占据优势。

再者，虽说苏州的张士诚野心不大，但他拥有长江三角洲无可匹敌的雄厚财力，实力强大。张士诚麾下有着众多的富豪和文人谋士，而元朝末年的苏州也已经发展成为经济、文化中心，他治下的人力、财力都很雄厚。朱元璋恰好夹在陈友谅与张士诚之间，腹背受敌。

这种情况下，持久战的局面对于朱元璋极为不利，于是，他采纳了军师刘基的建议，首先攻打野心勃勃的陈友谅。经过多次交锋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朱元璋在鄱阳湖大败陈友谅，全歼其军队，消灭了一个劲敌。在这次胜利后领土迅速扩大的朱元璋于第二年自立为“吴王”，却没有急于称帝。

击败陈友谅后，朱元璋全力备战应对最后一个强敌张士诚。经过周密的准备，至正二十六年八月，朱元璋派遣二十万大军对苏州发动总攻。

面对朱元璋的进攻，张士诚的抵抗虽十分顽强，但已无力回天。苏州城在坚守半年之后，于第二年六月终于被攻陷，张士诚兵败自杀，苏州城包括官员、将士在内的二十万人被强制迁移到南京城。张士诚政权被消灭，朱元璋一统江南富庶地区，结束了元末群雄争霸的局面。朱元璋投身反元斗争十五年后，中国历史再度进入了天下统一的倒计时。

洪武——大明帝国的诞生

至正二十八年正月三日，朱元璋在南京城外圜丘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称帝即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大明帝国诞生了。在战火尚未冷却的江南，贫农出身的朱元璋在南京发布一系列诏命，高调宣示新时代的到来。当时，朱元璋年仅四十一岁，妻子马氏立为皇后，长子朱标被册封为皇太子。新王朝各种制度的整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大明朝的前途充满生机。

大明朝虽然建立，但当时实际控制的疆域仅仅是北至黄河、南达福建的区域，远没有控制中国全部疆域。最重要的是，大明朝的最大敌人大元政权仍然盘踞北方。元朝不灭，大明朝就没有真正统一中国。换言之，此前，朱元璋在群雄争霸战中成为最后的获胜者，也只不过是取得了挑战大元政权的资格。朱元璋是群雄中的佼佼者，却未必是最终的胜利者。中国未来的走向全要靠朱元璋了。

早在前一年十月，朱元璋就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大军二十五万，向大都方向展开北伐。北伐军兵锋所指，所向披靡，夺回了华北各地。

面对朱元璋的北伐，失去大半领土的元政权已经无力抗衡，各地元军纷纷溃逃，元朝土崩瓦解。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大都陷落，元顺帝不战而向北逃逸。徐达兵不血刃和平接收大都，并没有遇到预想中的抵抗，北伐落下帷幕。

之后，明军继续追击元军残部，逃到上都的元顺帝马上又跑到应昌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东北），最后病逝于应昌。明军随后突袭应昌，顺帝之子元昭宗带着少数部下继续北逃，顺帝的孙子被俘。

洪武三年六月北伐军凯旋，朱元璋颁布《平定沙漠诏》，昭告天下。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北归夷狄之地，念其顺应天时，朱元璋赐予谥号“顺帝”。元明之争在此尘埃落定。

（2）从元到明

元明革命是民族矛盾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明朝推翻元朝政权是汉民族对蒙古统治的反抗，因而，反元起义是民族革命。一般认为，反元起义之初，北伐檄文中明确提出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那么反元起义的开端就是民族矛盾。而朱元璋作为汉民族的代表，取得了民族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中国学术界认定朱元璋不仅是民族英雄，他所建立的明朝甚至是中华辉煌复兴的象征。显然，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反映出来的极具情绪化的政治性解释。

近年来，中国学界再也没有出现“元末农民起义是民族革命”的观点。普遍认为，官僚、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是元末农民起义爆发的主要原因。贫农出身的朱元璋也由于其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在反元过程中发生转变，倒向地主阶级一方，最终建立起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王朝。反元起义过程中发生了由民族斗争向阶级斗争的转变。这种观点对于中国的多民族现状来说，不给那些民族分裂势力以任何挑拨和制造民族矛盾、民族分裂的机会。

围绕这个问题，在日本学界也进行过激烈的探讨。最后得出的权威结论是，元末农民起义基本上属于阶级斗争，但最终由朱元璋将所有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朱元璋在倒向地主阶级一方后，必然要实现地主阶级统治的正当化，他为了将阶级矛盾隐藏在民族矛盾之下，大力宣扬汉民族国家的复兴。

在这个解释当中，最初的研究者一方的先入观点发生了很大作用。即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属于异民族的征服王朝，而驱逐元朝的大明

朝理所当然成为汉民族的王朝，这样的观点毫无疑问地成为默认的前提。

奇妙的解释

日本学界得出的结论却使日本社会流传着一种奇妙的解释，即朱元璋不是民族英雄，反元起义也不是民族革命，但大明朝确是汉民族国家的再兴。

这种奇怪的观点实际上只是片面理解“中华”一词，并以此推断原因，简单地将“中华”等同于汉民族或者汉民族国家，而忽略了问题的本质。通过“明朝=中华=汉民族”和“元朝=夷狄=异民族”这种二元对立的图式来理解元明政权更替的过程，在削减了“反元起义=民族革命”的虚构性之后，就只留下“汉民族国家的再兴”这样的观点了。

这种看法的错误不再赘言。原本，华夷思想（中华思想）包含了以民族、人种划分中华与夷狄的观念，同时也具有超越它的理论。即如果能领会中华之礼仪，夷狄也会成为中华之民，那么丧失了礼仪，即便是中华之民也会沦为夷狄。这种极富融合性的思想才是传统的华夷思想。

前面提到的檄文中，朱元璋阐述了同样的主旨。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太祖实录》吴元年十月丙寅）

朱元璋在檄文中不问汉民族还是非汉民族，表明了一视同仁的看法，明确了大明王朝的建立并不是以纯粹的汉民族国家的复兴为目

标。

一提到汉民族国家，通常会认为是只由汉民族构成的单一民族国家，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存在过那样的政权。明朝也不例外，大明政权成立伊始，社会上仍然存在元政权的残留影响，社会构成上依然是多民族杂居的复杂民族状态。朱元璋的部下中有很多包括蒙古人在内的非汉族将领，他的众多妃子中也有蒙古人、高丽人等。大明朝本身就是个多民族国家。

北伐即便是民族革命又如何

中华的恢复，无论从理念上还是事实上，都不能说是汉民族国家的复兴。从夷狄手中恢复中华之民的中华，在明朝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一个全新的中华世界，这成为身为中华天子的朱元璋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首要之务，就是驱逐前元王朝的势力，并使得明朝对中国的统治正当化。这并不是单纯的驱逐异民族的问题，而是有必要在包容异民族在内的中华理论体系中找到反元革命正当化的理论。

这一理论就是在中华历史上历代王朝更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有德君民”的天命思想，即旧王朝不修德政，新王朝承天命取而代之的模式。

如同朱元璋在讨元檄文中所说，他秉承“天授”取代了元朝对中国的统治。他说“彼时（忽必烈时代）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即便是夷狄，如果能修德政，同样可以成为中华天子，朱元璋十分赞赏忽必烈政权，“四海以内，罔不臣服”。

但是，元朝末期，政治腐败，导致进入了混乱无序的黑暗时代。问题在于，元朝统治者失德，已经重新沦为夷狄身份，却还想要继续

君临中华之地。既然天命已失，元政权就应该让位于新天子，自己重回夷狄之地。对于不想让位的夷狄，只能以武力讨伐。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让中华与蛮夷各得其所，重新确立华夷体系。出于这种考虑，朱元璋当然要通过天命思想和华夷思想使得反元革命正当化。

对于明朝来说，北伐是否属于民族革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是正“华夷之辨”的“圣战”。将夷狄驱逐回夷狄之地，由新天子统治中华。“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只是基于传统的中华理论体系的“革命”口号。因此，不能认为反元革命就是排他性的民族革命。

不知不觉中

冷静下来，仔细地阅读一下檄文的内容，就会发现上述理论很容易理解。但为什么会让人产生误解呢？恐怕是历史学家的眼光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近代民族国家观的影响。

此前的单一民族建立国家的事实，造成了将中国仅视为汉民族国家而忽略其他少数民族的结果。既然汉民族国家是一种常态，大明朝当然也是汉民族国家，并由此推演出反元革命等同于民族革命的假设。

历史早已证明，民族国家观本身是不切实际的。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性民族问题，一元化的民族国家观已经行不通了。以多元化民族状况为前提，谋求民族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共识。

与此相同，欧洲中心史观也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同的地区都有各自的固有观念，都在提出自己的要求。

同样，一定要依据中国的国情来理解中国，这样的原则在近年来越来越被重视起来。可以说，围绕着元明政权更迭的问题，也到了放下成见重新解读的阶段了。

宋元与明清——时代区分的问题

与欧洲中心史观的发展趋势相关，近年来几乎被人淡忘的课题就是时代区分的问题。

战后历史学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在欧洲发展史观的基础上，如何克服“停滞论”的影响，更加合理地研究理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到哪个时代发展到古代奴隶制、从哪个时代开始封建社会或者什么时候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等，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发展轨迹是研究者最关心的问题。

关于明史研究，把明朝视为与清朝连接的一个时代，那么处于中间位置的明末清初时期就被赋予了“变革期”的特殊意味。明末清初时期或被视为封建制度的崩溃期，或被理解为重新整合期，或被明确认定是封建社会确立期，各种观点说法纷纷登场。虽然这场争论最后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无果而终，但是在将“明清”视为一个整体的时代范畴这一点上，研究者们达成了共识。

在日本东洋史学界，自从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年）将宋元时代划分为近世前期、把明清时代确定为近世后期以来，将宋元与明清视为两个时代范畴的看法也开始流行起来。战后，明清史研究的课题与宋元史课题研究的差异也很快明确了。宋元史的研究围绕着“唐宋变革期”的评价问题展开，而明清史的研究则聚焦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时期。

宫崎市定的卓见——元明的连续性

这一观点在于强调处于宋元与明清时代过渡时期的“元末明初期”具有极其微妙的地位。在宋元史研究的课题中，只不过把它归纳为元末农民起义略加关注；明清史研究者也仅仅是将它作为讨论明末清初的导入部分。总之，不管从哪个立场出发，元末明初都没有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特殊时期被学界广泛意识到。

元史研究中没有展望明史的视角，而明史研究中没有上溯到元代的相关诸问题。加之，学界将元明革命视为民族革命的关系也好，以及异民族王朝与汉民族王朝的异质性也罢，都使得双方在研究领域上达成一种彼此敬而远之、互不插足的默契。

实际来讲，在日本学界，元史研究与明史研究的互不接续的状态所形成的元明时代相互断绝的观念已经定型。

基于这种研究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末，首先提出元明连续性的学者是宫崎市定。他意识到元朝与明朝统治民族之间的断绝性，但他想要从风俗、习惯等领域展现贯穿于社会基层的主流思想。对于一直无条件认可元明断绝性的日本学者来说，这种想法崭新且值得注意，本应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当时的研究者都墨守各自的研究领域，没有继承、发展宫崎的观点，这种状况历经四十年，一直持续至今。

面向新的框架组合

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价值观的多样化给日本史学研究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欧洲中心发展史观正在退出主导地位，但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体系还难以确立。换言之，就是既有对社会发展的怀疑论，也有认为“近代”本身是相对化的见解。走在

历史前面的“近代”并不是前途一片光明。对“近代”和“发展”坚定的绝对信仰在眩目般展开的历史画卷中开始不停地动摇。

受这种趋势影响，中国史研究也要面对新的框架组合，新角度的研究正在摸索中进行。就明清史研究而言，曾经仅仅作为明末清初研究导论部分的明初期的研究已经开始担负特殊的意义了。

由朱元璋一手打造的“明初体制”在14世纪的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价值，它在其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又处于怎样的地位呢？与历来的研究不同，不是从明末上溯到明初来研究明史，而是以明初为起点透视明末乃至现代中国，这种新的角度已经开始成为日本学者研究的热点。

新的研究视角旨在探求元明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探讨元末，就无法准确定位明初。对于这么明显的道理，我觉得现在有必要冷静下来仔细地思考一下。那当然不止于简单地讨论元明的内在联系，而是整体把握和理解宋元与明清两大时期的内在关系，对于元明革命的评价问题或许也会在此有所突破。

新的框架重新组合之际，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研究者们最关心的现代性课题。

（3）明初体制的意义

被固定化的秩序

结束元末乱局、登上帝位的朱元璋，当务之急就是要确立大明朝的政治基础。以朱元璋为起始的明初执政者为证明大明政权的正当化而极力推崇儒家思想，同时，又以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秩序为依据进一步稳固大明政治体制。其中，成为大明政治理论基础的当然就是天命思想和华夷思想。

具体而言，即依据基于天命思想的君—臣—民的政治秩序来整肃大明社会的各阶层，依据出自华夷思想的与周边诸国的宗藩关系（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确立国际秩序。而朱元璋居于中心，作为统治者发挥作用，以他为中心轴心的中华与蛮夷共存的世界——久违的华夷秩序终于出现在东亚。

这个秩序框架本身并不是明初特有的。自古以来，每次王朝更迭，新王朝的开创者们都会将这种思想作为自己王朝的政治理论基础。只是亲身经历元末乱局的明初为政者们认为，仅仅单纯地恢复传统的政治秩序还不足以避免社会乱局的再次发生，因而，为长期稳固统治秩序，有必要使政治秩序固定化。为此，必须强化皇帝作为秩序统括者的权力，并在强权政治的背景下施行统治。

严刑酷法与“三拜九叩”——提高皇帝威望

事实上，朱元璋在位的三十一年间，对皇权的强化和秩序的稳固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通过几次大案，肃清大批破坏既有秩序的腐败官员、不法地主，以及废除抗衡皇权的宰相制度，整備官僚机构

等，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这场明初政治体制改革中，牺牲者远远超过十万人，造成元末社会乱局的官民一体的腐败结构在表面上暂时瓦解了。

朱元璋在扫清障碍、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高度关注强化皇权。

为了羞辱官员，在朝堂上进行对官员棍棒加身的“廷杖”之刑；设置直属于皇帝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施行以“凌迟（切割身体致死的刑法）”“剥皮”为代表的严刑酷法；提出与皇家有关的文字忌讳，用“文字狱”的方式处罚大量文人。这一切措施旨在强化对皇帝的恐惧，从而提高皇权。

其结果是使得皇帝与一般官民的身份差距如同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一样。皇帝被高高奉养在深宫，不能被一般官民轻易见到。官员在觐见皇帝时，不允许站立，只能遵守极其屈辱的礼节，即跪拜皇帝三次，每次还要磕头三次的“三跪九叩头”之礼，据说“三跪九叩头”之礼用于觐见皇帝就是始自朱元璋。不仅如此，如果朱元璋脾气不好的时候，即便是大臣也不免廷杖的惨祸，被打死者也为数不少。正是在这种充满杀戮的恐怖政治氛围中，明朝专制体制确立了。

儒家思想的具体应用

但是，如果认为以上措施都是由于朱元璋个性残忍造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确实，现在看来，他的所作所为荒谬之极，是不能被接受的。即便是为了巩固政权，也不能杀十万人吧。当然，对于造成他实施这些措施的明初时代特性及当时能够容忍这种情况发生的中国社会结构有必要深入研究，但最重要的是他实施的政策本身，实际上并没有脱离儒家思想的范畴。

一般认为儒家思想中，皇帝以德政引导民众，而以法（刑罚）来处罚不能以德化之的“小人”。当然，使用刑罚仅限于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法治国不是儒家的本意。它要求天子必须推行德政，法只不过处于辅助的位置。

这种理论在现实中却完全变成了不同的结果。现实世界的皇帝以法治国，德仅仅成为使法律的实施正当化的手段。即以法为主、以德为辅，在以德治国的外衣下，包裹着严刑酷法。皇帝逆用了儒家的理论，打着德治的旗帜，却以法治维持政治秩序。

符合社会需求

受到统治的社会一方，同样有积极容纳法治的基础：对民众来说，要保障自己的生命财产，就必须维持现行的秩序。社会期待着皇帝施行德政，作为秩序统括者的皇帝却依靠法治。为惩罚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脱轨者，人们甘愿接受皇帝的专制统治。

皇帝（国家）与社会对于维持政治秩序的双向选择，最终决定了儒教世界在现实社会中的脱胎换骨。传统儒学中的以德为基础的君一臣一民的政治秩序，在现实世界却不得不借助专制统治的形式即皇帝一官一民的国家政治秩序发挥作用。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皇权强化，是国家与社会相互政治角力的结果与要求。皇帝独裁体制绝不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每次社会秩序崩坏后，在重建传统政治秩序过程中儒家思想自身的演变与选择。

朱元璋的政策始终是遵循儒家理论的，在大明体制建立之初的社会需求背景下，他借助实现德治之名推行彻底的法治。即依靠法治惩罚秩序的破坏者、脱轨者，同时，也依靠法治强制性使政治秩序固定化。与此有关的数次疑案和恐怖政治则是朱元璋个性使然，远远超出了社会预想的发展，造成了无数的牺牲者，但这一切也都随着他的离

世逐渐平息了。中国的儒家理论借助皇帝来维持政治秩序的结果，就是在明代初期造就了一位疯狂而又执着的皇帝。

“科举”的变化

最终，在明初出现了一个以皇帝为顶点的极权专制国家。无论是官僚还是民众都处于皇权统治下，社会各阶层都被赋予一定的社会地位，一整套社会生活秩序保障体制在皇权统治下建立起来。官员随时处于皇帝的监视之下，不允许有任何过失。官员每天只能在锦衣密探的监视下谨慎度日。官员名义上是皇帝职责的分担者，其实只是皇权专制下的客体。

朝廷官员的任用也更具有统治性。原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官员任用制度是科举制，即选取乡里等社会基层组织的有德者即“士”任用为各级官吏，这是儒家理论的制度化。即便对于作为预备官员群体的“士”，朱元璋也想要将其纳入国家政治秩序框架当中。

他限定了科举考试的对象，仅限于学校的学生（中央国子监的监生和地方各府州县学的生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其他人等禁止参加科举。要想成为官员，首先必须上学，才有可能取得学生的身份。这里的“士”已经成为一种身份，一种出仕必备的资格。“士”作为未来官员的预备队，已经被提前整体纳入国家身份秩序框架中，这足以显示朱元璋的深谋远虑。

户籍制度与分类管理

朱元璋的极权统治不可能不涉及普通民众，他制定的基本政策就是户籍制度，每户都拥有一个户籍。并且，根据民众的职业不同，实行户籍分类管理。

按照规定，普通农民属于“民户”，手工业者属于“匠户”，士兵属于“军户”，盐业劳动者属于“灶户”，其他依此类推。每户职业世袭，不许改换户籍。户籍制度将每个普通民众都牢牢地控制在各自的社会生活领域和地域范围内。

朱元璋在乡村推行“里甲制”，将所有民众纳入“里甲制”管理中，实施征税与治安管理。“里甲制”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在里内，由国家任命的“里老人”担任法官，有地方势力的户担任“里长”负责征收税粮。“里甲制”的施行，使得明代极权专制的触角延伸到社会最基层组织，并且向民众宣传教育敕语《六论》，灌输谨守各自本分的思想。

现实世界的皇帝一官一民的政治秩序在明代初期达到了完善和稳定的程度。每个人都对应各自的阶层、身份，被牢牢控制在各自的社会地位上。朱元璋想以个人的权力与法治来维持这一秩序，取代元朝成为新帝的他建立起了一个他律且强制性的儒家政治秩序。这个遵循儒家政治理论建立起来的儒家世界在现实中却以完全相反的姿态呈现出来，它就是明朝专制国家，一个真实不虚的实体。

北元与倭寇

对于开创不久的明朝来说，国防上最大的威胁是逃到北方的蒙古残余势力“北元”与在中国沿海地区侵扰的“倭寇”。

北元虽然遭到明军的毁灭性打击，但不久又恢复一定实力，对大明来说，不能忽视它的存在。朱元璋在北部边境地区设置常驻将军，实行军政管辖，随后，又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封王，领兵驻守在长城沿线，负责北方边境安全。这样既防止了将军专权的危险性，又强化了对长城沿线的控制。洪武末年，北元势力分裂，加之明朝北边防御的强化，北元的威胁消失了。

而倭寇问题就比较复杂一些。当初，一直活跃于朝鲜半岛的倭寇，趁着元末中国国内社会混乱之机，侵扰中国沿海地区，并迅速蔓延开来。明朝创立之后，亟待解决的就是倭寇之害。

使倭寇问题复杂化的原因在于，元末群雄中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的残党与倭寇勾结，成为肆虐中国沿海的海盗。这些元末群雄残部不愿顺服朱元璋的统治而逃到海上，勾结沿岸不法奸民从事反明活动。明初沿海骚乱大幅增加，正是因为他们与蜂拥而来的倭寇联起手来，这也成为侵扰大明沿海的巨大危害。

为解决倭寇问题，洪武初年，明朝采取了强制措施，断然施行“海禁”，禁止沿海民众出海。其实，元代也曾经禁止商人出海，但却不限制一般民众。因此，明初沿海普通民众的海上活动也很活跃。明朝实行海禁后，在沿海地区又设置了众多城堡要塞及军事组织“卫所”，旨在以此防御倭寇侵扰，强化海防体制，断绝倭寇与沿岸奸民的勾结，彻底解决倭寇问题。

海禁

提起明代的海禁，一般会认为是国家要独占海上贸易的巨大利益而禁止民间的自由贸易。但必须说，这种看法是无视明初国情的一大误解。海禁的本来目的不是禁止民间海上商贸，确切说，是以平定倭寇侵扰、对内维持治安为目的。

明朝实行海禁之初，与宋元时期一样，都是通过市舶司推行民间海外贸易的。贸易商人只要在市舶司办理正规手续，就可以自由出海贸易，而海外商人来华贸易自大明创立后就从未断绝过。大明初期，海禁与市舶司贸易始终没有任何矛盾地并存着。因此，与宋元时期相比，明初的对外政策并不是很消极的。反而应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

时期，明朝向周边国家频繁派遣使者、促进朝贡等，充分重视对外政策。

从洪武元年到洪武二年，大明向高丽、安南、日本、占城、爪哇、西洋（印度东南沿岸各国）派遣使者，递交即位玺书，并继续向其他国家派遣使者。与对待蒙古、倭寇在军事上加强防御、在经济上设置市舶司贸易的政策不同，明朝对外谋求重建与周边诸国的政治秩序，重振国威。重新平衡元末以来混乱的国际关系，确立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这正是新王朝的责任。

市舶司的废止

洪武七年（1374年）市舶司的废止，是明朝对外政策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洪武初年，曾在江苏太仓设置市舶司，但由于担心贸易纷争波及首都南京而废除了，不久又恢复到传统的宁波、泉州、广州三地。至洪武七年，三地市舶司也被废除了，民间的海外贸易被禁止，对外交流仅限于与周边国家的朝贡的形式。

对外贸易仅保留国家间的朝贡贸易，又恢复到唐朝以前朝贡制度与朝贡贸易一体化的国际交流的形式。即朝贡使节除了进献给中国皇帝的贡品外，将其他的物资在指定的场所与官府进行交易，最后剩余的物资才被允许与民间商人交易。

国际贸易一旦限定在国家之间，那么此前一直从事海外贸易的民间商人就要失业。民间商人只能以身犯禁进行秘密贸易，与想取缔他们的大明朝之间开始了无休止的拉锯战。

原本为防御倭寇侵扰而实施的海禁，一变为封禁民间海上贸易的经济措施，成为朝贡体制的辅助手段。作为大明对外政策的一环，海

禁发生了质的转变，至此，形成了明代朝贡制度一朝贡贸易—海禁三位一体的独特的对外体制，即所谓的海禁、朝贡体制。

贯穿中国历史的最大谜题

在元朝得到迅速发展的市舶司贸易，为何会突然被禁止呢？禁止民间海外贸易，企图切断大明民间与周边各国联系的海禁政策当中，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目的呢？这不单是明初的问题，而且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大谜题。

的确，将原因归结为国家独占贸易是很多人的看法。但前文已经解释过关于海禁的本因与目的，贸易独占的说法只不过是后人以今度古的一种推测，而严格地说，这种推测是错误的。

朱元璋完全无视朝贡贸易带来的利润。朝贡贸易中，朱元璋对朝贡国进献的贡品，既不要求贵重，也不求多，简易足矣，但他“回赐”的物品却远远超过贡品，并对来访使节所带贸易物品施行免税的政策。不仅如此，朝贡使节驻华期间的费用全部由大明承担。对于朱元璋来说，朝贡中的贸易无足轻重，只是对朝贡国施予恩惠的手段。

假如说国家独占贸易的理由不成立，那为何市舶司会被废止呢？

诚然，明初东南沿海地区，有民间商人、武装商人团、海盗、倭寇、走私商人各色人等，异常复杂，他们相互勾结，联络、拉拢当地不法官员，从事海外贸易，构成了大明统治不安定因素。为了彻底解除海外贸易引发的各种问题，明朝经过深思熟虑，断然废止了市舶司。

另外，海外商品大量流入大明境内，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可能会动摇明朝统治基础，这也应是原因之一。经历了元末的社会混

乱，明初的中国社会发展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萎缩，不管是租税还是徭役，都以实物形式征收。对外贸易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将民众被动卷入商品经济中，不仅使他们的生活状态不安定，甚至会危及立足于自然经济的大明社会的安定。对自然经济体制崩溃的恐惧符合政策的基础，从这一点来看，废止市舶司是没错的。

但是，尽管存在上述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对建立明朝国家统治的迫切愿望吧。明朝在建立起极权专制体制的同时，也将这种体制推及周边国家，以使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秩序化。即明朝以东亚宗主国的身份，整肃海外贸易，将所有对外关系归结到与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上。其结果就是市舶司的废止以及与之相关的朝贡制度、朝贡贸易、海禁的一体化。

“勘合制度”的意义

洪武十六年（1383年）施行的“勘合制度”更加彻底地贯彻了上述方针。

大明三位一体的朝贡体制直接引发了以朝贡贸易为目的的伪装的朝贡使的大量出现。针对这一问题，为避免与周边各国发生矛盾，明朝推出“勘合制度”，即发给朝贡国勘合（一种符契），来华朝贡时必须携带，以此甄别朝贡使的真假，达到正常发挥朝贡制度机能的目的。勘合制度是体现明朝本位的一种强制措施，随着它的不断强化，周边国家被更强力地控制在明朝国家统治下。

在这种严格统治下，周边诸国仍然频繁来华朝贡，原因何在呢？对周边诸国来说，中国丰富的物资极具吸引力，他们更容易将勘合理解为来华的贸易许可证。必须说，这是倾向于朝贡国想法的单方面解释。勘合绝不是贸易许可证之类的东西，只不过是辨别朝贡使身份的证明书。

但是，明朝在看透周边诸国的意图后，也确实在利用勘合制度控制周边诸国。明朝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周边诸国的贸易需求为筹码，实现了对周边各国的统制及国际秩序的安定。

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确立实际就是周边诸国来华朝贡的体制。即便有些国家不接受大明册封，而是以贸易为主要目的来华，只要他们携带国君的“表文（国书）”，那他们也会与被册封国一样，受到朝贡国的待遇。假如有从遥远的海外来的“边远国家”，他们的贸易需求也会得到满足。就明朝而言，不管是以自身王朝正当化为目的也好，还是为了国际秩序的安定也好，周边国家的朝贡体制都是必要的条件。

元末乱局带来的动荡的东亚国际秩序，在明朝稳步努力下逐渐回归到正轨。并且，明朝建立的国际秩序与以往的唐代、元代时期的不同，是禁止一切民间对外交流的极权统治体制。元代时期那种开放自由的情景不再出现，周边诸国的一切注定被卷入这种既束缚又压抑的明朝体制下。而把这一切变成可能的就是朱元璋创立的拥有政治经济实力的大明朝。

华夷秩序的理想型——中国社会的体制性归结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明朝专制体制是华夷秩序最完善、最理想的体现形式。华夷秩序本意就是中华与蛮夷各得其所，表现为蛮夷向中华朝贡。明朝尤其执着于四方来朝的朝贡体制，其深层也必然包含着完全实现理想的华夷秩序的希望。

明朝禁止一切民间对外交流，仅限于国家间的官方交流，目的就在于凭借强大的政治权威和经济实力强制构建华夷秩序，并使之固定化。如同君一臣一民的天下秩序理念通过皇帝一官一民的国家政治

秩序形式固定化一样，基于“德化”与“朝贡”的华夷秩序以极权专制统治的形式在明初的东亚出现了。

盛行于元代的市舶司贸易在明初被强行禁止了，因此，有一部分人提出明朝初期对外政策是“向后”或“向内”倒退的负面评价。中国学界关于明初海禁的普遍看法，也都强调海禁是阻碍明初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主要原因。朱元璋建立的极权专制主义自然被曲解为是使本应顺利发展的中国社会受到强力阻碍甚至是后退的体制。

的确，明初的海禁政策阻碍了宋元以来海外贸易的发展，确实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以现代化发展为目标的中国对明初海禁的否定性评价也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基于传统史观的正反评价都不能揭示海禁问题的本质，大概只有介入超越传统史观的中国式理论才能得出正确的评价吧。

作为历代中华帝国存在依据的天命思想和华夷思想，发展到明朝初期，造就出少有匹敌的专制国家。明朝对内推行皇权专制体制统治民众，对外建立大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规范周边诸国。大明皇帝以天下秩序与华夷秩序交叉构建起统括中华与蛮夷的世界体系。它既反映了历经元末混乱创立的明朝在恢复政治秩序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儒家思想，也是中国社会随着历代王朝更迭专制程度不断强化的体制性归结。

3 皇统的走向

（1）燕王的事迹

没有正式命名

帝王出生时，为强调其异于常人之处，经常附会各种异象。据传，朱元璋诞生之时，屋中红光满溢，夜晚从外面看，好像着火一样。据明朝的官方记录《明实录》记载，永乐皇帝出生时情景大致相同，屋中充满五色霞光，映照在宫门之上，几天都没有消失。大概是寓意永乐皇帝继其父朱元璋之天命，承接皇统。

明朝第三代皇帝，明成祖永乐帝，名朱棣，朱元璋第四子，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生于南京（当时称应天府），是在朱元璋起兵反元八年，也就是他以南京为根据地四年之后出生的。

当时的朱元璋，西面陈友谅，东临张士诚，处于二者夹攻的不利局势中。随着自身势力的发展，必然与周边群雄发生冲突。当时，陈友谅占据长江上游，图谋攻占南京，朱元璋则一度采取守势。随着形势变化，朱元璋开始转守为攻，恰在此时，朱棣出生了。朱元璋把南京作为根据地后，就一直在率军征战，朱棣出生后，仍然在不停地打仗。

恐怕是由于这种频繁征战的关系，朱棣出生后，朱元璋一直没有时间给他起正式的名字。朱棣和他的三位兄长[朱元璋的长子朱标，至正十五年（1355年）生于太平（今安徽省当涂县），次子是朱棣，三子是朱橐] 一样，都只有小名。直到他第七个儿子朱棣出生后，朱元璋才开始给他们正式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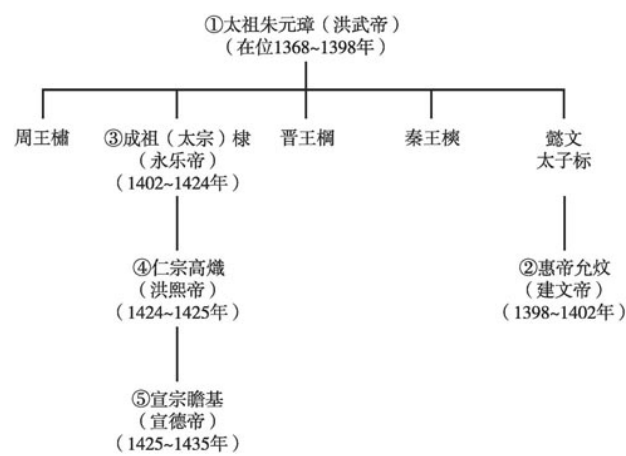
官方记录

朱元璋给儿子正式命名是在明朝成立仅十天后匆匆忙忙完成的。

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元璋在刚刚竣工的太庙中举行祭典，在祖先牌位前确定七位皇子的名号。

新王朝的创设在稳步进行，各项制度准备就绪，只等举行即位仪式，宣布王朝的成立。而此前，当然要向大明内外宣布众多皇子的存在，以此证明新王朝前途安泰。此时，朱棣八岁，第二年册封为皇太子的朱元璋长子朱标也刚刚十三岁。

长子朱标和四子朱棣，这两个将成为宿命中的对手的兄弟，据说都是朱元璋正室、孝慈皇后马氏 的儿子。朱元璋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子嗣最多的皇帝，有皇子26人，公主16人。



明初帝系略图

据《明实录》记载，孝慈皇后生有五子，长子朱标、次子朱棣、三子朱橚、四子朱棣、五子朱橚。《明史》沿袭了这一说法。在官方记录中，朱棣为孝慈皇后嫡子一事是作为不争的事实流传下来的。

并非嫡子

但是，经过很多中国学者的诸多考证，现在已经确定这种说法是捏造的。事实上，朱棣不是孝慈皇后的嫡子，而是朱元璋众多后妃中的一个妃子所出的庶子，孝慈皇后也没有过儿子。自朱元璋投身反元起义以来，与他同甘共苦的孝慈皇后始终没有生过儿子，于是 she 就把朱元璋后妃所生的儿子带在身边，当作亲生儿子一样养育，前面的五个皇子都是这种情况。长子朱标、次子朱棣、三子朱橚都是淑妃所生，朱棣及其弟弟朱橚乃出自硕妃。

实际上，朱棣是不是皇后嫡子的问题，在他去世后不久，就流传到民间，成为议论的焦点。当时关于朱棣生母的传言，很多史书中都有记载。当然，传言的目的在于追究朱棣继承皇位的正统性问题。

其中甚至有传言怀疑朱棣的母亲是元顺帝的妃子，大意是明军攻陷大都后，已经身怀有孕的元顺帝妃子洪吉喇氏被朱元璋纳入后宫，不久就生出了朱棣，所以，朱棣的父亲就应该是元朝最后的皇帝顺帝。这当然是极其荒谬的谣传，但它也能反映出朱棣生母的问题已经成为民间街头巷尾的话题了。

最终彻底澄清这一问题的证据就是《南京太常寺志》这本书。太常寺是负责皇室礼仪等方面的机构，它编辑的《南京太常寺志》一书中明确记载着朱棣是硕妃之子。这本书现在应该已经不存在了，好像它一直留存到清初，书中只有部分内容分别被引用到其他各类典籍中

才得以保留到现在。后世学者对这些引文进行分析研究后，现在基本确定了朱棣的生母是硕妃的说法。

捏造事实的目的

朱棣隐讳生母、自称孝慈皇后嫡子的原因何在呢？不用说，当然是为了使自己篡夺皇位名正言顺。后来，他起兵反叛已经成为皇帝的自己的侄儿，暴力夺取皇位。对于这种不争的事实，朱棣并不是不能敷衍一时，但从皇位正统论的立场出发，要想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就必须是皇后嫡子的身份，否则没有资格。因此，一有机会，朱棣就会表明自己是孝慈皇后的嫡子，这就是要表示自己是正统的继承者吧。

作为官方记录，《明实录》将朱棣记为孝慈皇后的嫡子，那么皇统当然可以由朱棣继承。皇帝自己都说是皇后的嫡子了，史官当然就会照此记录了。他出生的秘密从史书中抹掉了，他的愿望被制造成为真实的历史。也就是说，皇帝在此凭借个人的意志篡改了史书。

中国历史上，虽说这种事例不在少数，但在永乐时期的官方记录中这种现象却过分地多。明明不可能的事情却被当作像真的发生过一样被记录着，如果不能推测出隐藏在文字里面的真相，很可能犯下不可想象的错误。永乐时期的这种情况绝大多数都与朱棣皇位正统问题有关。

他从即位开始，就背负着无法抹除的过去，他一生都在与自己的过去斗争。因此，他必须要成为世人公认的伟大皇帝，而事实上，他也为此苦苦奋斗，并最终达成了愿望。仅从这一点来看，他并不是普通的皇帝。但是，现在讨论这个问题还略早。

首都问题与北方防卫——摆在眼前的大问题

洪武元年八月，明朝驱逐了元朝势力，恢复了中华王朝，但蒙古的威胁并未解除。作为一个王朝，元朝的确灭亡了，但蒙古人只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蒙古，作为草原上的势力并没有被消除。残余的北元政权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实力威胁着大明，如何解决北元的威胁仍然是大明必须面对的问题。

与历代中原王朝相比，明朝的建立具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条件。定都位于江南的南京完成统一大业的，明朝是首例。中国历代中原王朝都定都华北地区，如长安、洛阳、开封等，都在黄河流域设立国都。因此在布防军队防御北部地区时，从首都调控军队也很容易，中央的力量足以威慑北部边疆。

明朝没有那样做，与北部防御不同，明朝定都南京旨在依托江南富庶的经济进行发展。但其结果，对于北部防御却是极其不利的。难以调控防卫北方的军事力量始终是大明定都南京的致命弱点。假如在定都南京不变的情况下操控防卫北方的几十万军队，容易造成将军擅权作乱的危险。北方防卫与定都问题成为朱元璋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朱元璋似乎早就发现了定都南京的局限性，大明成立之初，他就让大臣们讨论建都问题，提出都城的候选地。大臣们提出西安、洛阳、开封、北平（今北京）等地，并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最后朱元璋决定还是定都南京。因为如果现在迁都，必定要进行大规模的都城修建，给百姓带来过重的负担。如今王朝基础尚不稳固，不适合迁都。这样，都城问题暂时搁置了。

南京远离北部边境

都城设置是关系到国家体制的重大决策。甚至可以说，国防问题事关国家命运，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会导致国家灭亡。视首都位置

来建立国防体制是新王朝夯实根基的先决条件，但定都南京给北方防卫带来极大的困扰。

如前所述，明朝国防上的遗留问题是防御北方的北元势力的威胁和东南沿海地区猖獗的倭寇问题。明朝颁布海禁令，禁止沿海地区民众与倭寇的勾结，强化了海防体制，完成了对倭寇的打压。在解决倭寇问题上，南京京师体制确实起到了有利作用，首都位于东南地区，使得海禁政策和海防行动更容易实施，对海上贸易统治的完成起到相当有力的效果。都城南京发挥了前线基地的作用。

但是，对海上防卫有利的优点同时也是北方防卫的缺点。南京距离北边过于遥远，它们之间是包括黄河流域在内的中原地带的广大地区。

在北方防卫上，明朝面临三个突出问题。

一是用何种方式进行防御；二是如何在位于东南方向的南京操控布防北边的庞大军队；三是如何利用北边到南京的广大中间地带做好都城防御。

特别是第三点，中间地带不仅是北方防卫线的大后方，也有必要在国内发生叛乱时采取特别的措施。

诸王分封

针对这些问题，朱元璋实行了诸王分封的对策，封皇子为王，率军驻防全国各地。因为都是皇帝自己的儿子，所以也不担心他们会脱离中央的控制，通过他们就可以将北边的军事力量直接掌控在皇帝手中。这样一来，北方大军的统率权得以保障，而将军独揽军权、犯上

作乱的危险也解除了，北方防卫万无一失。而且，分封到各地的诸王成为国家的屏障拱卫京师，发挥着防波堤的作用。

朱元璋前后三次封王，即洪武三年、十一年、二十四年。洪武三年第一次封王，分封次子朱棣为秦王、三子朱樉为晋王、四子朱棣为燕王等共计九位王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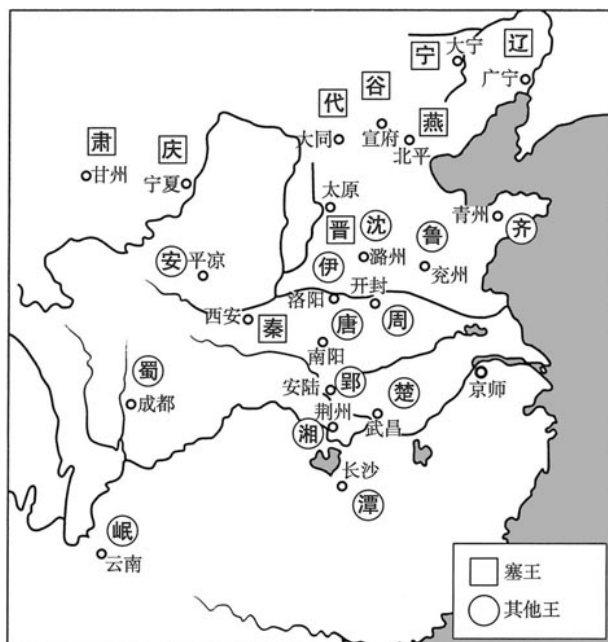
但当时诸位皇子还未成年，并没有立即前往封地，他们真正离京就藩是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以后，这一年，秦王到陕西西安，晋王到山西太原。洪武十三年时，燕王到北平就藩。此后，朱元璋的儿子都是成年以后就藩的，除一人夭折以外，总共分封了二十四位藩王（如果包括洪武九年就藩的侄子靖江王，就是二十五位）。

诸位藩王的封地如同一个扇面一样，是以首都南京为基点，从东北向西南展开配置的。每个诸王都位于扇轴上，而位于扇面基点的是他们的父皇朱元璋，坐镇中央掌控全局。扇面无论是打开还是合上，都是按照中央的旨意，诸王完全掌握在南京的控制之下。诸王分封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同姓分封体制，并不是建都南京的大明朝所特有的。

曾经普遍流行于汉代和晋代的诸王分封制度，随着皇权的强化已经逐渐废止了，连皇子本身也成为官僚机构中的一员，这是人所共知的。至少，在唐宋时期没有皇子就藩的例子。明朝恢复诸王分封制度是以定都南京为先决条件的。但可以看出，分封皇族和功臣为王，这一点明显是受了元朝的影响。

元朝的分封制中，诸汗国对自己的封地拥有实际统治权，而明朝诸王仅拥有自己封地的税收权。虽然元明分封体制各异，但明朝诸王就藩与王国形成则几乎完全承袭了元朝的制度。实际上，明朝虽然提出光复中华之汉唐文化，但在具体制度及机构等很多方面是学习元朝

的，诸王分封制也不例外。在否定元朝政权的基础上建立的明朝也在无意识中肯定了元朝的统治，在很多方面都不能不承认元明之间的连续性。



诸王分封图

九名“塞王”

明代诸王就藩的同时开设王府，与王府官共同负责王国的治理。王府官制度几经变迁，最后演变为“长史司”的设立，长史负责藩王的教导、规劝，管理王府全部庶务。

为保护王国安全，设置了“护卫”，规定一王府三护卫，但也不一定都遵守这个规定。据《明史》记载，护卫少的藩王有三千士兵，护卫多的藩王拥有士兵一万九千人。各藩王封国内一旦发生紧急军事情况，藩王有权调动王府直属护卫及附近卫所官兵，指挥行动。

明朝的军事制度实行的是以每卫5600人为单位的“卫所”作为其基层军事组织。全国各地设置卫所，各地卫所直属于各省都指挥使司，各省都指挥使司又隶属于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即由皇帝—五军都督府（中央）—都指挥使司（地方）—卫所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指挥系统，都指挥使司的长官为都指挥使，他们只有持皇帝颁发的“圣旨”，才能有权调动卫所军队。

王府护卫在组织上与普通的卫所相同，但从指挥系统来看，王府护卫不直属于中央五军都督府，确切说是属于藩王亲军。王府护卫的武官都由藩王亲信担任，因而，藩王在护卫中的控制力很强。另外，对王府附近卫所的军队，原则上藩王必须持有皇帝的圣旨才有权指挥，但同时还规定，在紧急情况下，藩王拥有指挥卫所军队的权力。那么，可以说，藩王在地方上拥有绝对的军事权。

沿长城一线分封诸王御边的措施，暂时解决了定都南京带来的北方防卫薄弱的问题。御边的藩王与内地的诸王不同，被称为“塞王”，至洪武末年，由东向西顺序，有广宁（在今辽宁省）的辽王、大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宁王、北平的燕王、宣府（在今河北省）的谷王、大同（在今山西省）的代王、太原的晋王、西安的秦王、宁夏的庆王、甘州（在今甘肃省）的肃王等，共计九名塞王御边，威慑北方。

如同东南沿海的倭寇问题通过强化海防和海禁政策才得以解决一样，如今，长城防卫线也开始启动，它是稳固大明边防的专守防卫措施。即使与历代王朝相比，明朝的国防也都是毫不逊色的。

叶伯巨，触逆鳞

但是，诸王分封制从一开始就孕育着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从旨在强化皇权与中央集权的明朝中央方针的角度看，无论如何，分封制

都是与之相悖的，具有“分权化”的危险。的确，朱元璋在世时，皇帝与诸藩王是父子关系，儿子反叛父亲的可能性是相当低的。朱元璋认为，与其让异姓将军们把持军权，不如交给骨肉至亲，这样更有安全感。

当然，朱元璋并不是不知道诸王分封的危险。他饱读诗书，熟知历史上诸王分封的弊害。但是，要将几十万戍边大军全权交给异姓将军，朱元璋还是不放心。他在提出诸王分封制之时，一再表明，这不是出自自私的目的，而是“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的措施。虽说历史的教训已毋庸赘言，但确立现实的国防体制，才是此时的当务之急。

因此，对于分封制持不同意见者，朱元璋采取断然打压的措施，洪武九年（1376年）的大明体制改革中，众多官僚被下狱或降职，人人自危。其间，发生了异常的天象变化，朱元璋下诏求直言。以此为契机，在改革中始终处于恐慌状态的官员们则借机发泄心中不满。此时，平遥（在今陕西省）县学训导叶伯巨在上书中预言诸王分封制将来必留祸根。

叶伯巨上书万言，豁出性命苦谏朱元璋。谏言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针对诸王分封制。他提出分封制恐怕会使藩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不利于中央集权，事实上朱棣夺权恰恰验证了他的先见之明。他极力建言废止分封制，并引用汉代“吴楚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作为佐证，强调分封制的弊害。但他的谏言反而激怒了朱元璋，叶伯巨被关押狱中，死于非命。

集权与分权的夹缝

对于一介地方教师的苦谏，朱元璋的反应未免过于激烈了。这恐怕是因为朱元璋在对诸位藩王的信任中仍然保留着一丝不安吧。而叶

伯巨的直言恰恰戳到了他心中的痛处，因此，对叶伯巨的打压乃是特意为之。对于妨碍国家方针的言行，必须抹杀在襁褓之中。同时，也是要消除自己心中的不安，朱元璋牺牲了叶伯巨。朱元璋在分封藩王之时，确实采取了分化藩王权力的万全之策，即各藩王对封地内的土地及民众不具有统辖权。由地方最高行政机关布政使司管理封地民众，禁止藩王与地方官员接触，藩王只能接受地方官员提供的俸禄，自身没有向民众征税的权限。朱元璋赋予藩王的权限仅限于军事方面，禁止藩王干涉一切民政。他甚至把这一规定写入《皇明祖训》中，以告诫后世子孙。

尽管如此，朱元璋去世后不久，燕王朱棣即举兵反叛，夺取了帝位。所以说，分封制并不完善。

永乐帝继位后，历经数年，逐步采取了将藩王迁往内地、削减藩王护卫等措施，从根本上清除了分封体制对皇权造成的威胁。这恐怕正因为朱棣是利用分封制夺取了皇位，才更加熟知分封制的危险性而将之清除。自朱棣之后，藩王变成了依靠地方供养俸禄维持生存的普通王侯，并由此成为明末财政吃紧的主要原因。明初和明末相比，虽说藩王形式上没有区别，但实质上已经完全不同。

藩王分封体制是朱元璋定都南京期间，在集权与分权的夹缝中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政策。朱元璋采取的让皇子领兵戍边的措施，解决了北边将领分化、威胁皇权的危险。但由此产生的藩王分封体制却如同叶伯巨预言的那样，加深了分权化的程度。只有在朱元璋健在时才能发挥作用的分封体制，也随着他的离世瞬间崩溃了。朱元璋亲手创建的南京京师体制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发挥其效力。

藩王教育

对于一心建立皇帝集权统治的朱元璋来说，官员只不过是皇帝实现这一目的的棋子，作为皇帝的代理在集权体制中发挥作用，维持整个统治体制的秩序，确保大明体制的长治久安。作为大明国家防卫屏障的藩王也同样是集权体制的组成部分。正如朱元璋所说的“藩王分封不是出自私心”，表明了他的真实想法。无论是官员还是藩王，在他所设计的国家建设的蓝图中，都只不过是各自的位置上各尽其责。

不过，官员和藩王还是有区别的。对于官员，无论是免职还是处罚，皇帝都可以随意决定，但藩王不能随意更换。这不仅由于藩王是骨肉亲人，也是为了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皇统的延续。因此，肩负着下一代重任的藩王必须要养成符合皇帝期望的技能，同时，教导藩王也是对他们寄予厚望的皇帝的责任。

洪武三年，藩王分封制施行的同时，朱元璋也开始全面推行对藩王的系统教育。其实，早在大明建政前，朱元璋就邀请了当时声望最高的大儒——金华（在今浙江省）的宋濂出仕，对皇子进行全面系统的儒家教育。朱元璋从未上过学，但他的皇子们却从小就接受儒学大家的培养、熏陶，熟读四书五经及各种史籍，并且熟知儒家礼法。洪武六年，御制的《昭鉴录》及《祖训录》等皇家专用训诫书编纂完成，其中的训诫成为皇子、藩王必须恪守的规则。就在这种系统的皇家教育模式中，皇子被培养出了将来作为藩王所应具备的技能和本领。

朱元璋绝不希望他的皇子们被培养成白面书生那样的贵公子，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像自己一统天下一样，成为不畏惧任何困难、精通文武之道、统御天下的英明王者。

大明皇子到一定年龄之后，按照规定要到演武场习武，每天的训练是必须完成的义务。洪武八年（1375年）以来，朱元璋多次带领皇

太子及诸藩王回到故乡凤阳，让他们到自己的出生地实际感受创业的艰辛，然后在野外进行实地战斗训练。总之，他就是让将会成为明王朝统治者的儿子们亲身体会他们自己肩负的重要责任。

燕王就藩北平

对于诸皇子，朱元璋一律是平等对待的，并没有对哪位皇子特别宠爱，只是特别重视皇太子，皇太子作为皇位继承人，受到重视也是理所当然的。身为五位皇子母亲的孝慈皇后也同样注意自己的言行，对诸皇子一视同仁，尽量避免自己的喜好影响到皇子间的关系。

当然，如何评价皇子间能力差别的问题留作后话，这里暂且不提。朱元璋历经数次生死决战，最终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铁血生涯使得他依然能够冷静客观地对待自己的儿子。

这一点从他对诸藩王领地的分封可见一斑：次子秦王封地在西安，三子晋王封地为太原，四子燕王封地在北平。西安乃汉唐古都，作为仅次于皇太子的次子秦王的封地是再适合不过了。另外，太原也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是抵御蒙古入侵的重镇。但是众所周知，如果将西安、太原、北平三地比较而言，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具有更重要意义的地点莫过于北平了。

北平仍残存着元代都城宫殿。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为营建都城，将北平内众多元朝宫殿拆解后运往南京。而就在几年前，北平还作为被誉为“世界之都”的元大都号令世界。能有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封地的藩王当然是具有过人之处的人才。

朱元璋将北平封给了燕王而不是他的两个哥哥，足以表明他对燕王的期望甚高。而且朱元璋还将与燕王青梅竹马的、开国功臣名列第

二的徐达的女儿选为燕王妃，也可佐证他对燕王的重视。燕王早在年轻之时，就已经在言行中展现出了足以让朱元璋赏识的才能。

燕王就藩之时，朱元璋允许他直接使用元朝的宫殿开府建藩，其中的隆福宫就成为燕王府，自此，燕王在北平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岁月。朱棣即位之后，再次返回了北平。北平既是他的创业之地，也是大明朝的新起点。可以说，就藩北平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从他二十一岁之时的北平之行拉开了序幕。

（2）暗斗

朕无北顾之忧

洪武朝后半期正是藩王分封制发挥效用的时期，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不用说自然是分封到北平的燕王。自洪武二十三年以来，他与皇兄晋王多次率军出击蒙古，纵横驰骋漠北地区，取得了辉煌战果。

燕王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洪武二十三年初次作战。相对于晋王的无功而返，燕王运用计谋俘获了数万蒙古人，赢得了此次北伐的成功。看到燕王大捷的战报，朱元璋大喜：

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癸亥朔）

自此，始终默默无闻的燕王一鸣惊人，向世人展现出自己的能力。

此时的朱元璋恐怕更是洋洋自得吧。曾经被叶伯巨苦谏诟病的藩王分封制不是正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发挥作用吗？藩王的存在稳定了北部边防，明王朝的未来似乎是一片光明。

但实际上，藩王分封制的内在矛盾已经开始出现。朱元璋沉浸在藩王分封制取得成效的喜悦中，与之相反，燕王的功绩却使得一个人痛苦伤心，他就是皇太子朱标。

为人友爱——皇太子的秉性

史书上评价朱标“为人友爱”，与其父朱元璋的性格完全相反。他天性温厚，一身的文弱书生气质，据说这类人大多都神经质且心思细腻。明朝建立之初，他就被朱元璋册封为皇太子，与其他的皇子完全不同，他所接受的教育是彻底的帝王教育。自洪武十年（1377年）朱标二十三岁时，朱元璋让他接触朝政，培养他管理朝政的能力，所有官员的奏疏都必须由皇太子过目，以此积累他作为守成之君的实际经验。

朱标也十分认真地处理政务。他深知身为皇太子的责任，殚精竭虑，以此回报父皇对自己的期望。

但他温厚的性情似乎不能符合朱元璋的统治方式。朱标向来不赞成父皇的严刑酷法，但他性格软弱，即便偶尔向朱元璋提出反对意见，反而惹得朱元璋大怒斥责，他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主张了，充其量是动之以情，希望以此能改变朱元璋的心意。朱标性格软弱是不争的事实，朱元璋对此也是略有不满的。

如前所述，永乐时期编纂的史书中有诸多不实之处，作为明朝官方记录的《明实录》也是一样，记载朱元璋政绩的《太祖实录》中，所有不利于燕王的记述完全被抹去，改写成对其有利的情况。燕王孙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完成的《太宗实录》则完全袭用了《太祖实录》对燕王的记述，没有任何更改。

被收录到《太宗实录》卷首的《奉天靖难事迹》中记载着朱元璋与马皇后关于皇位继承人的对话，即皇太子性格软弱，朱元璋想将太子之位让位给燕王，但马皇后对这种轻率的言论提出了责备。

而且，这段轶闻的出处源自永乐年间编纂的官方史籍《奉天靖难记》。但《奉天靖难记》中的记述则变成了由于皇太子朱标性情乖张，诅咒朱元璋，又向朱元璋索要兵权，因此，朱元璋非常害怕，所

以与马皇后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简直就是太过于荒唐的判断了。皇太子的性格软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即便是《奉天靖难事迹》也改变了相关的记述，将改换皇太子的原因归结为朱标性格上的柔弱。

被隐藏的史实太多

当然，这段轶闻的可信度相当低。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对话，自然是发生在马皇后在世之时，但马皇后已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去世，此时，燕王二十三岁，到北平就藩刚刚两年，还未北伐蒙古，他的能力也没有被世人共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就废除皇位正统继承人皇太子朱标，甚至不考虑燕王的两位兄长，直接册封燕王为皇太子，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这倒可以视为永乐皇帝朱棣夺取皇位后，为了标榜自己帝位的正统化而篡改的史实之一。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前文提到的洪武二十三年燕王北伐之事，恐怕也有润色夸张之嫌吧。燕王率军北伐的确是事实，但他的身边还有颍国公傅友德、南雄侯赵庸为首的一批沙场宿将率部同行，他们都处于燕王的节制之下，而实际上绝大部分战斗应该都是由这些将领指挥的。但在史书中，他们的战功都被抹杀了，所有战果都为燕王一人独占。即便史书没有被篡改，但被隐藏的史实也太多了。

更有甚者，《奉天靖难记》竟然说北伐中毫无战功的晋王勾结皇太子，指责燕王独霸战功，而朱元璋不相信他们对燕王的指责，并开始怀疑皇太子的品行。从朱元璋与朱标的关系来看，这段记述纯属捏造的可能性很大。历史的真相是，秦王、晋王等藩王品行恶劣，激怒了朱元璋，要处罚他们，而皇太子朱标一再为他们求情辩护。像皇太子这种“友爱”的性格，很可能被人在篡改历史中利用。

在永乐时期编纂的官方史书中，对燕王的三位兄弟评价都较低。非但评价低，而且给人留下了他们无法成为合格的领导者的印象，让

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认为就应该让燕王继承大统。

在相当于《奉天靖难事迹》底本的《奉天靖难记》中，建文帝在位四年间的记录完全是站在燕王的立场上编纂的。在书中，原本作为叛军的燕王军队变身为旨在清除建文帝身边“奸臣”的“清君侧”的正义之师。如果不带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看这本书的话，很难分清究竟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永乐时期官修史书的基本情况由此可见一斑，但其中记载的史实也不能一概而论。

虽说永乐年间编纂的官方史书捏造、篡改了大量史实，但还不尽然。即便是《太祖实录》，其中大部分内容也大概还是保持原状未经改动的。关于燕王的记述，除去被捏造的部分，其余的内容虽说略有夸张，但还是有可信度的，或者说，现在只能相信它，毕竟没有比它更原始的史料记载了。

比如洪武朝后半期对蒙古作战的记载，是否全是燕王一人的战绩暂且不论，但他在对蒙古的作战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这的确也是事实。

争执与纠纷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燕王与皇太子朱标之间的关系。早在《太祖实录》的记述中，字里行间就已经流露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奉天靖难记》及《奉天靖难事迹》等史书中也都记载着这样一段轶闻：洪武二十年参加北伐蒙古的大将军蓝玉凯旋后，有一天，他向皇太子询问，陛下的几位皇子中谁最受宠爱，皇太子当即回答是燕王，大将军蓝玉也认同这一点。

蓝玉多次随大军北征，当然了解北平燕王府的情况。而且，蓝玉是开国功臣中名列第三位的常遇春的义弟，而常遇春的女儿就是皇太

子妃。也就是说，蓝玉和皇太子朱标是亲戚，那么，他们之间出现上述那段对话也绝非不可思议。反过来看，皇太子通过蓝玉来探听燕王的动向，这种可能性也存在。即便并非如此，皇太子常伴朱元璋左右，也自然熟知他父皇的秉性好恶，对他而言，燕王就是令他时刻不安的存在。

那么，由此可以推断，皇太子在燕王面前有强烈的自卑感。以朱元璋对皇子们所期待的文成武就的标准来看，无论朱元璋如何偏爱朱标，皇太子都欠缺军事才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众多皇子中称得上文武兼备的唯有燕王。

皇位继承的问题暂且不论，朱元璋对燕王寄予厚望却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了。那么，对心思细腻且性格软弱的皇太子而言，恐怕身为皇太子本身就让自己觉得不安，确切地说，假如燕王与皇太子之间确实存在矛盾，那应该是皇太子自身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会更加强烈。

总是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兄弟在和自己相比较，一般来讲，做兄长的心里是无法忍受这种极其不舒服的感觉的，最终会形成一种自卑、不安等混杂在一起的纠结心理，进而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做皇帝。皇太子这种疑心必定会随着燕王获得的战功越来越大而变得越来越重。应该说这是身为皇太子的一种不幸吧。他的后半生始终在和燕王的影子争斗，一直到死也不会从阴影中解脱出来。

皇太子之死——犹豫的朱元璋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天降噩耗，年仅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在苦闷的煎熬中突然离世。前一年朱标在巡查迁都候补地西安之时过于疲劳，回京后一病不起，再没恢复。

朱元璋得知噩耗，异常悲痛。虽说皇太子文弱的性格令他有一丝不安，但皇太子的离世，对六十五岁的朱元璋造成的打击看起来非常大。和当年糟糠之妻马皇后去世之时一样，朱元璋也是毫不掩饰地扶灵大哭，伤心欲绝。

但是，身为皇帝，他不能沉湎于悲伤，即便是自己的儿子死了，他也要尽皇帝的职责。朱元璋身为大明皇帝，很快从悲伤中恢复过来，开始着手新皇储的人选问题。《太祖实录》及《太宗实录》对于立谁为太子之事记载说，皇太子死后，朱元璋召集近臣商讨太子人选问题，当时，朱元璋力推燕王为太子。

（朕第四子贤明仁厚、英武似朕，朕欲立为太子，何如？）

朱元璋在近臣面前透露出了长期隐藏在心中的想法。却立即遭到了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反对，他说：

（陛下言是，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

被他这样一说，朱元璋再没回答，不得已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

这就是事实

史书中的这段记述旨在告诉世人，朱元璋原本是要立燕王为太子，结果，皇位由皇太子的嫡子继承，但那并非朱元璋的本意。关于这段文字的真伪，有过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普遍认为这也是永乐皇帝捏造出来的。因为《明实录》同样有很多被篡改之处，所以普遍认为这段文字也属于这一类。

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川越泰博先生发现了记载相同内容的新史料，即朱元璋在位时的起居注（记录皇帝日常生活起

居的日记体官方史书）残本，经过研究分析后确认史料是真实的。起居注是唯一专门记录皇帝言行的史书，由此可以断定，朱元璋与近臣对话的史料是真实的，朱元璋当时的确考虑过让燕王继承皇位。

而且，这种想法恐怕不是在皇太子死后突然产生的，在皇太子生前就有过些许期待，而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才会脱口而出。那么，我们也就能够理解皇太子在世时的苦闷了。

燕王也一定会敏锐地感觉到父皇对自己的期望，幸运的话，皇位轮到自己继承也并非没有可能。当然，这种可能性接近于零，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的规定，只要皇太子朱标没有犯下特别大的罪过，废黜太子几乎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此，皇太子之死，使得燕王在此前勉强维持的心理平衡瞬间倾覆，指向了皇位继承。因为皇位继承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自己继承皇位的概率相当高。

事实上，从皇太子死后到皇太孙册立，朱元璋思考了近半年之久，足以表明他内心的犹疑不决。直到最后，他仍然无法决断。不用说，朱元璋自然了解燕王与皇太孙的关系要比燕王与皇太子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复杂。没想到皇太子之死竟然使得北平与南京之间内在的冲突一下子尖锐化了。历史的齿轮在这一刻开始转动了。

隐忧

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的皇太孙朱允炆，即明朝第二代皇帝建文帝，是皇太子朱标的第二子，洪武十年（1377年）十一月出生。由于朱标的长子早逝，他就被册立为皇太孙，当时的朱允炆年仅十六岁，还是一个略带稚气的少年。

史书记载，朱允炆性格“仁厚”“至孝”，秉承了他父亲的柔弱气质。据说朱标病危之际，他不思食寝，守候床前，把自己的身体熬得消瘦，甚至他的祖父朱元璋都心疼得要他保重身体。

据说朱允炆的头型有些偏平，朱元璋就昵称他为“半月之子”，同时，也是担心那是一个不吉之兆。总之，不管怎样，心思细腻且神经质的文人类型的朱允炆，远远不是朱元璋心目中的皇帝形象。在朱允炆被册立为皇太孙的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策划发起了“蓝玉案”，杀了一万五千人，明初功臣宿将被杀戮殆尽，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为朱允炆坐稳皇位铺平道路。

虽然诛杀了大批功臣，但朱元璋担心的事情似乎还没有解决。实际上，对朱允炆而言，他最担心的莫过于北方的藩王。

有一天，朱元璋向朱允炆自夸藩王分封制的成就。朱允炆的回答如下：

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

朱元璋无言以对，询问朱允炆有何对策，他回答说：

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人，又不可则废之，又甚者则举兵伐之。

（《明史窃》卷三《革除记》）

虽然朱元璋赞同朱允炆的见解，但心中必定会有一丝不安。同样，朱允炆也不过是用自己说的话来消除内心的不安。

尊与卑——燕王与皇太孙的微妙关系

皇太孙与皇太子，他们与诸藩王的关系截然不同。皇太子是各藩王的长兄，处于“兄弟秩序”中的上位，而皇太孙则是各藩王的侄儿，在“尊卑秩序”中处于下位。在重视家庭伦理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长幼尊卑的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按照尊卑秩序，晚辈必须立于长辈的下方。对朱允炆而言，所有的藩王都是他的叔父、他的长辈。当然，按照国家政治秩序，身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处于各藩王的上位，但是同时在家庭伦理处于下位的他，却必须在心理上承受来自长辈的威压。

而对藩王来说，就要做自己侄儿的臣子，虽说这个侄儿就是将来的皇帝，但心理上还是很难接受。他们似乎不经意间就会对皇太孙表现出傲慢的态度。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流传着这样的逸闻。

有一次，燕王开玩笑地一边重重拍着朱允炆的后背，一边说：

不意儿乃有今日！

目睹他们谈话的朱元璋指责燕王无礼，朱允炆反而为燕王解围说：

臣叔父爱臣故耳！

（《建文年谱》卷上）

为了不辜负祖父对自己的厚望，年仅十六岁的朱允炆过早地背负起身为皇太孙的重任。在政治和道德两个方面，他尽可能地发挥出超常的才干，从来没有倚仗皇太孙的身份责难或忤逆长辈的行为，以期获得世人的认可。

性格“仁厚”“至孝”的朱允炆，在礼仪方面忠实地实践着家庭伦理的尊卑秩序，同时，还必须巩固自己皇位继承者的地位。对于年轻的皇太孙而言，这实在是一种困局。

再无顾忌——两位兄长离世

自洪武二十五年朱允炆被册立为皇太孙，到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的六年间，在朱元璋的威望下，大明朝野平稳过渡，没有任何大事发生。皇太孙与各藩王都各守本分，相安无事。连一向引人瞩目的燕王，也在册立皇太孙之后的第二年返回北方，专心御敌，不再回京。朝野上下一片平静，一如暴风雨前的宁静，充斥着压抑与不安。

而就在此时，历史的齿轮又极其精妙地转动了，如果说这是天意，好像让人觉得确实有一种神秘力量在左右历史的走向一样。此后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阻碍燕王登上皇位的两位兄长相继离世——洪武二十八年三月，秦王去世；洪武三十一年三月，晋王离世。从燕王的角度来看，除了他的父皇朱元璋，再没有人值得他顾忌、能阻挡他继承皇位了。

燕王在各藩王中最具才干，且已成为藩王中年纪最大的兄长，又率领大军，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北部边疆的强大防御，可以说，在各藩王当中，对蒙古的攻防能力无出其右者。燕王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年，三次越过长城，出击并重创蒙古。在燕王的武力震慑下，北部边疆固若金汤。

太祖驾崩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燕王势力的强大则是足以威胁南京安全的双刃剑。在频繁出击蒙古的过程中，燕王借机与驻扎北平的将领及地方官员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似有若无的关系网。

按大明律法规定，平时禁止藩王与当地官员接触，但凭借燕王的才干，把他们拉拢过来并非难事。但要在南京遥控北平地区，难度却相当大。而且，勉强维持北平与南京平衡的只有时日不多的朱元璋。

就在这种表面平静但暗流涌动的局势下，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结束了他波澜起伏的一生，享年七十一岁。遗体安葬在南京郊外位于钟山的孝陵。遵照朱元璋遗诏，皇太孙朱允炆即位登基，这就是有着悲剧命运的建文帝。

此时，建文帝年仅二十二岁，而燕王已经三十九岁。至此，朱元璋在世时燕王与建文帝之间潜藏的冲突迅速表面化、尖锐化了，朱元璋的离世再次加速了历史齿轮的转动。

4 夺权的道路

（1）南人朝廷

建文新政

在明初政治史上，如何定位建文时代呢？

建文时代介于恢宏的洪武时代与永乐时代之间，仅有短暂的四年历程，几乎不受世人关注。建文帝在位四年，仅有的建树就是他推行的“削藩政策”和“官制改革”，但也正是这两项重大政策直接导致了建文政权的垮台，饱受后世诟病。近年来，学界考虑到建文时代与明初政治体制确立的关系，对它的关注日益增加，开始重新认识它的历史地位。

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旨在削弱藩王势力，但最终引发了燕王的叛乱，即“靖难之变”，导致了建文政权的崩溃。这个问题我们还会在下文中详细阐述。

而官制改革则是标榜《周礼》、追求理想主义、充满复古倾向的改革。结果仅仅是更改了官职名称，基本没有发挥作用。

可以说，削藩政策导致了建文政权的倒台，官制改革也没有任何实质作用。因此，学界往往强调建文政权的无能，对其基本没有什么积极评价。

“书生亡国”——黄子澄、齐泰、方孝孺

传统评价中，有三个人被认为是推行“削藩”与“官制改革”政策、造成建文政权崩溃的始作俑者。他们就是太常寺卿（掌管国家祭祀、礼乐的官员）黄子澄、兵部尚书（相当于陆军大臣）齐泰、翰林侍讲学士（相当于国立大学博士）方孝孺。其中，黄子澄、齐泰负责削藩事务，方孝孺主导官制改革，这都是大家熟知的了。

黄子澄是洪武十八年科举会试（中央礼部考试）获得第一名的一位才子，建文帝任皇太孙时，他伴读东宫。建文帝非常信任黄子澄，在他被册立为皇太孙之后，首先就向黄子澄咨询削藩之事。当时，黄子澄以汉朝吴楚七国之乱为佐证，很乐观地认为，如果藩王叛乱，只要出动朝廷大军，叛乱不难平定。这种乐观的估计日后却成为致命的错误，这恐怕是当事人想象不到的。

齐泰是与黄子澄同年参加科举考试成为进士的，在朱元璋晚年时受到重用，朱元璋临终时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他的记忆力超强，无人能出其右，但他并不具备军事才能。在削藩过程中，他的建议仅作为参考，真正掌控主导权的是黄子澄，其实齐泰本来也没有掌控作战大局的能力。由这样的两个文人来担任作战首脑，那么足以预见建文政权的悲剧了。

与他们相比，方孝孺的情况稍有不同，他是陕西汉中府学的教授，是世人公认的一代大儒，洪武年间曾两次被举荐入京。但是他的主张与朱元璋推行的法治政策不符，所以他只被委以闲职，担任地方学校的教授。不过，朱元璋对他的学识评价很高，认为可以在适合发挥他才能的时候再起用他。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按照太祖遗命，召方孝孺入京，作为特别顾问参与朝政。

这三个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属于空有理论但缺乏实际政务处理能力的文人类型。自此，建文政权短命的原因被归结为柔弱仁孝的皇帝加上不懂世事的文人官员，作为“书生亡国”的典型世代流传着。当然，由于朱元璋的肃清政策，大批优秀将领被杀殆尽，致使燕王叛乱之时，建文帝无可御敌之将，这也是建文政权失败的重要因素。

但是，“书生亡国”足以概括建文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吗？

二者性质不同

这里想说的是，齐泰、黄子澄负责削藩，方孝孺主导官制改革，这些的确是事实。在历来的研究中，往往将“削藩”与“官制改革”这毫无关联的二者在“书生”决策这一共同点上来研究其具体内容与实施过程，但却很少注意二者在性质上的不同，对他们三人也总是同等评价。

但实际上，这三个人的关系并不是十分融洽，而是相当微妙。方孝孺应诏入京之时，已经掌握实权的齐、黄两人拒绝他的加入，理由是方孝孺名望太高并且与他们意见相左。为此，方孝孺只能居于“顾问”的地位。齐、黄两人与方孝孺对建文政权都抱有各自的理想，正是这种差异，衍生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削藩”与“官制改革”两种毫无关联的政策。

的确，如果从建文政权当时所处的情况来看，实行“削藩”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朱允炆被册封为皇太孙之时就向黄子澄咨询削藩之事，是因为作为长辈的他们在那时就已经开始显现出“不法”之心了。

据记载，建文帝在实行削藩之际，以晋王怀有异谋、秦王为人残暴为名，将二人召回南京。这段记述出自《明实录》，所以不能断定

其真伪，但可以肯定的是，与中央集权制背道而驰的藩王分封制的威胁性已经表露无遗。建文帝为巩固政权，削藩势在必行。

但是建文帝实行削藩想要一蹴而就，却是过于性急了，超出了形势的需要，反而起到了反作用。而后来永乐皇帝采取缓行之策，将驻边藩王移封内地，削减藩王护卫，历经数年，最终完成削藩。与之相比，建文帝的做法实乃不智之举。无法否认，当时藩王势大，但归根到底，是齐泰、黄子澄的无能，使得建文朝廷没能事先进行充分的准备，这应该也是失败的原因。可以说，建文政权在自身尚未稳固的情况下，就与藩王分封制近身肉搏，最终溃败。

而官制改革则略有不同，负责官职改革的方孝孺，是继承了宋元以来正统朱子学的“浙东学派”的领袖。他是要借助建文帝改革来实现“浙东学派”的理想，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而官制改革只是其中一环。这种理想主义政策是建文时代所独有的，是空前绝后的。这就意味着，相比于削藩政策，浙东学派的理念更为重要，现在我们必须从中寻求建文时代真正的特征。

浙东学派的理念

何谓“浙东学派”？它指的是以金华为中心，在浙江省东部一带发展起来的朱子学派。元末明初时，金华有“小邹鲁”之称，历史上是众多思想家辈出之地。所谓“邹鲁”，当然是孟子和孔子故国的称呼。以金华为中心的广大浙东地区，即便在文化先进的江南地区，也称得上是儒学的渊薮，思辨风气浓厚，放眼江南无出其右。

因而，至正十六年（1356年）占据南京的朱元璋，刚一进入浙东地区，就全力拉拢当地名家、大儒。而对元朝早已失去信心的浙东学人，同样盼望着新的统治者的出现，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很多的浙东

学人都曾致力于大明朝的建立，其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就是他们的领袖刘基和宋濂。

刘基作为朱元璋的首席军师，谋略无双，名望甚高，世人尊称“当世孔明”，辅佐朱元璋一统天下。宋濂负责皇太子及皇子们的教导之责，此外，还担负明朝各项制度、礼仪的创建，为大明体制的确立贡献良多。方孝孺就是宋濂的弟子。

“浙东学派”的思想特点，最重要的就是经世致用，他们不是单纯地空谈理论，而是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民众生活问题。早在元末社会动荡时期，“浙东学派”就协助当地官员在浙东各地试行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他们积极支持朱元璋壮大实力，旨在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结束元末混乱的局面，重新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以此实现他们的政治理念。

但是，明朝建立后，为确保王朝的统一和强化以皇帝为中心的极权统治，朱元璋对朝廷官员及江南豪族势力进行了彻底的打压。虽说建立起了“浙东学派”追求的中央集权体制，但过程与手段则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下层民众，都被卷入到恐怖的政治漩涡中，他们自身也成了牺牲品。

作为“浙东学派”领袖的刘基和宋濂逐渐从权力中心被疏离出来，最终都死于非命。可以说，洪武朝后半期，是包括“浙东学派”在内的“南人（指在过去南宋统治下的江南出身的汉人）”的受难日。

时机成熟

因此，朱元璋的离世也意味着南人重回权力中心的时机到来了。事实上，建文政权中最活跃的三个人都是南人，由此也产生了与洪武

时期明显不同的状况。

而且，他们三人的背后，有性格仁厚且至孝的建文帝的支持、保护，可以一心埋头实施新政。建文帝也将削藩事务交给齐、黄二人全权负责，自己专心处理其他政务。建文帝和他的父亲一样，反对祖父朱元璋的严刑酷法。说建文帝年少气盛也好，有一扫藩王的雄心也罢，无论如何他都在全力以赴地为实现心中的“圣王时代”的理想而努力。

怀有同样理想的方孝孺则成为建文帝实现目标的最佳拍档。儒家所推崇的上古盛世，是周公辅佐他的外甥周成王实现的。方孝孺则自比周公，而把建文帝视为成王，一心要开创盛世。

他的理想就是要在建文政权实现“浙东学派”的理念，弥补在洪武朝的遗憾。而且，现在有建文帝的支持，实现“浙东学派”的“养民”政治理念也不是不可能的。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方孝孺比他的老师宋濂更具有理想主义倾向，因为他将毕生心血致力于在建文时代再现上古盛世。如今前景可期，他正要一鼓作气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具体化，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仿效《周礼》而推行的官制改革。

方孝孺推行的政策不仅有官制改革，还包括各种减轻民众负担的措施，如减轻刑罚、减免租税、削减各地关税、大赦天下等各种重视民生的政策。可以说，方孝孺一力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与朱元璋时代的为政理念完全相反的。他所推行的理想主义政策是对洪武时代的批判，或许确是“书生”的空想主义，却深深刻着“养民”的烙印。的确，从实效性来看，理想主义政策很多方面与现实脱节，反而造成麻烦。而且，短暂的建文时代也很难产生真正的实效，这也许是方孝孺的不幸。

但在后世，建文时代却成了世人憧憬的田园牧歌式的对象，而被憧憬的内容全部都是基于成为现代社会主流的社会民生政策。方孝孺推行的养民政策，即便是“书生”的空想，却也触动了暗藏人们心底的某种东西。或许可以说，建文新政穿越了时空，符合中国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它已经成为流传后世的传说。而齐、黄的削藩政策则属于其他范畴，这是毫无疑问的。

绝对的自相矛盾

由于决策者立场不同，制定推行的政策也截然不同。建文时代并行的两种政策“削藩”与“官制改革”，不仅内容上毫无关联，甚至连各自的目标都截然相反。“削藩政策”旨在弥补洪武体制存在的不足，消除藩王分封对中央构成的威胁，强化以皇帝为核心的集权体制，保证建文政权的稳定。因此，“削藩”政策可以视为洪武朝以来大明中央集权制确立过程中的一环。

另外，以官制改革为代表的重视社会民生的改革政策则是建立在否定洪武体制的基础之上的。建文政权施行的所有民生政策都是对洪武时代的批判。可以说，建文新政一改洪武时期恐怖的“法治”政策，高举“德治”大旗，提倡“养民”，自下而上地巩固政权基础。不难发现，削藩与官制改革同样都是以稳固政权为目的的政策，但两者的方向却是全然相反的。

“削藩”旨在强化皇权，而重视民生、强调民本必然伴随着皇权相对弱化。在这种绝对的自相矛盾中，建文政权起航了。如果从建文年代上溯到元明交替，在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内，再来思考这两种政策的话，就能发现建文政权在两种政策的矛盾中的状况。同时，这也如实反映了建文政权在大明成长初期孜孜以求上古盛世的状况。

本来，强化皇权（法）与重视民生（德）并不是不能相容的。使两者之间达到平衡，政权就会稳固。建文政权的悲剧在于两种政策完全出自不能相互配合的决策者，权力中心缺乏一个能够平衡两种政策的核心决策者。

两种政策互不协调，各自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削藩最终引发了“靖难之变”，大明国内陷入内乱。但是，据说即便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建文帝仍致力于开创上古盛世，再现圣王时代，对于北方的战火，几乎是毫不介意。

即便没有燕王的叛乱，恐怕建文政权也会从内部崩溃。这也可以算作又一个“书生亡国”的事例吧。

太祖遗诏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朱元璋驾崩，随后，遗诏马上就被送达到各地藩王手中。遗诏确定由皇太孙继承皇位，同时昭告天下，太祖葬礼期间大明臣民必须遵守的各项条款。其中，有这样一条规定：“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

遗诏发布后，各地藩王是如何应对的，具体情况无从得知。但唯一例外的就是燕王，史书详细记述了燕王此时的情况，从中可以略窥他与南京之间的博弈。但是，站在燕王立场的官方史书与记载建文帝的野史，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有若干不同。例如，正史《太宗实录》做了如下记述：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宫召上。已至淮安，太孙与齐泰等谋诈令人赍敕符令上归国。及太祖太渐问左右燕王来未，凡三问无敢对者。

太祖崩。是夜即敛，七日而葬，皇太孙遂矫诏嗣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逾月始讣告诸王，且止毋奔丧。上闻讣哀毁几绝，日南向恸哭。

按照这段记述，燕王是奉太祖的召唤，赶赴南京探望病情。朱元璋是想要让在世的儿子中最年长的燕王即位，而不是让皇太孙即位。但是，由于皇太孙的阴谋，燕王不得已中途返回北平。《太祖实录》及《奉天靖难记》中也都记载了大致相同的内容。

按照字面的意思理解，由于皇太孙的阴谋，太祖临终前，没能与燕王见面，太祖驾崩后一个月，朱允炆才公布遗诏。而且，遗诏是皇太孙与齐泰伪造的，并非太祖本意。太祖朱元璋原本想让燕王继承皇位的，但是，齐泰等人阴谋矫诏，篡改太祖意图，皇太孙才登上了帝位。或许是这个原因，太祖遗诏没有被收录到上述三本史书中。

实际上，遗诏的确是太祖所写，遗诏中也明确由皇太孙继承皇位。

16世纪初编纂的官方史书《大明会典》中全文收录了太祖遗诏的内容，这表明太祖遗诏是官方认证无误的事实。皇太孙继承皇位、禁止藩王参加葬礼等也都是事实。这应该是朱元璋担心举行葬礼时发生不测而预先安排下的。从燕王夺权篡位至《大明会典》成书，历经百余年，真相终于大白天下。

前述《太宗实录》等书的记载，可以理解为站在燕王立场篡改史书的例证之一。它强调燕王才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而皇太孙集团从中阴谋破坏。齐泰等人被演绎为皇帝身边阴谋矫诏的奸佞之人，为后来燕王能够站在“大义名分”的道德高度，以“清君侧”的旗号名正言顺地举兵夺权埋下伏笔。史实就这样被非常巧妙地篡改了。

野史中的记录

野史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与官方史书有差异。比如明末嘉靖年间（1522～1566年）编纂的《建文皇帝事迹备遗录》是如下记载的：

太祖高皇帝崩。遗命燕王不许渡江进香，除朝廷大事许令藩臣赍表，毋得擅自离国。时诸王子皆得赴京奔丧吊泣，惟王于中途闻此而止，王大怒，欲令进舟，见江口设兵以阻，遂不果。

道衍进曰：“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违治命，反为不孝也。惟愿殿下养成龙虎之威，他日风云感会，羽翼高举，则大江投鞭可断也，今日何得屑屑于此哉？”王深然其意，遂返国。

这段记述与《太宗实录》明显不同，它不以太祖遗诏的真伪性作为问题，而是主要强调觊觎皇位的燕王受阻于南京的严密防守，不得已返回北平，等待时机。有别于官方史书，认为燕王早有篡位之心，是大多数野史的共同的认知。

明中后期，围绕建文时代的史事，出现了众多野史。其中大多数是怀念建文时代的，对悲惨去世的建文帝抱以同情态度，确切地说，更多的是对燕王的批判。因此，必须要注意野史中那些与永乐时期官方史书存在出入的地方，它们很多都是站在建文帝的立场上捏造出来的，比如《致身录》《从亡随笔》等完全都是伪书。

虽说《建文皇帝事迹备遗录》不是伪书，但它记述的也不是全部都是史实。如燕王受阻于长江、道衍出谋划策等情节，是颇为戏剧化的。道衍作为燕王的幕僚、军师，在靖难之变中非常活跃，是一个怪僧。在野史中，他被描绘成一个筹划、煽动燕王夺权篡位的幕后黑手。

总而言之，永乐时期的官方史书是以使燕王继承皇位正当化为目的编纂的，而野史则是以燕王谋朝篡位、野心不断膨胀为线索展开

的。《建文皇帝事迹备遗录》中燕王与道衍的对话也略显做作，这恐怕是为了渲染燕王起兵而夸张的情节。

燕王上京了吗

那么，事实上，太祖驾崩之后，燕王与建文帝相互博弈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实际上，在中国的正史、野史之外，第三方史料中还保存着客观真实的记述。

专门研究建文时期史料、史实真伪的王崇武先生，在20世纪，著有《明靖难史事考证稿》一书，关于这个问题提供了一则史料。那就是由朝鲜编纂的官方史书《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一段记录：

（建文元年）三月，军一人自辽东逃来，本国人，属（大明）东宁卫，以辽东役烦逃还。言：“燕王欲祭太祖高皇帝，率师如京，新皇帝许令单骑入城。燕王乃还兴师，以尽逐君侧之恶为名。”（《定宗实录》己卯元年三月）

在朝鲜半岛，高丽灭亡之后，朝鲜取而代之。朝鲜保留着各个朝代的实录，不仅有朝鲜的历史，还包括关于明清两朝的各种史料，一直保存到现在。朝鲜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它所编写的关于中国的史料，比起中国官方自己编纂的史料更具有客观性。可以说，《朝鲜王朝实录》中的这段史料，可信度相当高。

诚然，这段史料在说明事情经过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建文元年三月这个时间点。我们知道，燕王是在七月起兵的，而不是三月。如果着眼于这点，那么这段史料的可信度就会降低，客观性也难以成立。

但是，无视时间上的顺序，将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放在一个地方记述，这是史书编纂的惯用方法。我认为这段史料也可以归为这一类。《朝鲜王朝实录》借逃亡军人之口，将这段历史归纳为从燕王进京祭奠到发动靖难之变这样一条线索。如果仅根据时间上的不符而降低这份史料的价值，无论如何我是难以认同的。

终现的决裂

燕王率军南下进京的确是事实，而且，也不是奉遗诏回京的。当时，燕王已经到达南京城下，南京朝廷也就没有固守遗诏不许燕王入京祭奠，而是规定燕王只能单骑入城。对于这样苛刻的附加条件，燕王是无论如何不会答应的，恐怕他也能感到只身入城的危险吧。

按照《皇明祖训》的规定，藩王离开封地回京之时，是允许带领护卫同行的。此次，燕王率军回京，并没有违反规定。

但是，从南京政权的反应来看，燕王统率大军回京祭奠，确实有小题大做的味道了。或者说，燕王要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展示实力，向建文政权示威呢。

对燕王十分警惕的建文政权，自然不能允许他率军入城。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允许燕王单骑进城，以此来测试燕王的真实意图，也是建文政权眼下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应对措施。但是，燕王拒绝了这一要求，这明确表示出燕王已经决定与建文政权公开决裂。燕王这种无视皇帝旨意的行为，显然已经构成了对新皇帝的大不敬。

不难理解，燕王兵临城下，建文政权理应能感觉到他意图不轨，而燕王自然也不会只身入城，身陷险地，最终选择与建文政权公开决裂。他们之间的猜忌和敌意，通过这次事件毫无疑问地再次深化了。

的确，燕王此次南京之行，也确定了篡位的最后决心。燕王的反应，也迫使建文政权必须变被动为主动，先下手为强了。

太祖驾崩而失去控制的历史齿轮再也无人可以阻挡它的转动了。

（2）举兵前夜

拥有“重兵”

建文帝即位之时，各藩王的实力究竟如何呢？建文帝断然实行削藩，各藩王的实力确实都能威胁到南京政权吗？很多史料都强调，藩王拥有“重兵”，已然达到无视南京政权的程度。就如同叶伯巨所预料的，藩王势力已经尾大不掉，最终与南京政权开启战端。

诚然，朱元璋为防止藩王势大，采取了万全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军队统帅权收归皇帝手中，各藩王只能奉诏指挥军队。这种情况下，藩王不会对南京政权形成军事威胁。至少朱元璋在位期间，各藩王是否觊觎皇位暂且不论，仅就军事力量而言，各藩王从未形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但是，建文时期有所不同，太祖在位时，与各藩王是父子关系，以此为基点分封制可以充分运转起来。当建文帝被突然扔到这个系统里时，他必定难以胜任对叔父辈的藩王的驾驭。藩王仅拥有对军队的指挥权本身，在建文帝看来，恐怕就已经是拥有“重兵”了。尤其对活跃于北部边境的燕王，建文帝更是会感到难以名状的威胁，这很容易理解。

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威胁到建文政权的并不是藩王分封制本身，而只是燕王的势力。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必须说，这种看法只是从事件结果反推出的一种理解。

建文时期的藩王分封制乃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太祖时期完全属于朱元璋个人的独有体制，还没有形成完善运转的制度，尚处于极不稳

定的状态。这种情况必然会诞生燕王这样的人物。而谁也不能保证将来不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燕王。

削藩

在各地藩王中，当数燕王对南京的威胁最大。这是因为燕王在世诸王中年纪最长，又长期戍守北边，在常年对蒙作战的实际经验中锻炼出一身卓越的军事才能。因此，建文帝断然削藩，其首要目标当然就是燕王，夺其军权、削其封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关于削藩的顺序，在建文集团内出现了分歧。

齐泰建议直接对燕王下手，黄子澄则认为，剪除燕王，首先要从其周边实力较弱的藩王着手，先断其羽翼，最后再灭燕王。黄子澄这样考虑是顾忌燕王的军事实力，同时，他觉得直接针对燕王，师出无名，假如是对付历来不法的藩王，那就没问题。最终，建文帝采纳了黄子澄的意见。必须说，建文政权在这个决定上铸成了大错，为燕王起兵反叛提供了充分的准备时间。

建文帝即位仅两个月后，洪武三十一年七月，断然实行了第一次削藩。首先被削藩的是周王朱橚，周王是太祖朱元璋第五子，素来行为不法。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这个，而在于他是燕王一母同胞的兄弟，燕王与周王同是硕妃所生。削除周王封地，正是按照黄子澄的建议，斩断燕王手足。

以此为开端，建文政权连续展开削藩。同年十一月，齐王被削藩，第二年即建文元年（1399年）正月是代王，四月是湘王，六月是岷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总共有五个藩王被剥夺王位。其中，最悲惨的当数湘王：他不屑于被官差抓捕，关闭王府大门，放火自焚，悲愤而死。削藩绝不是不会流血的。

告发者是十岁的儿子——捏造的吗

致力于建文时代研究的川越泰博先生认为，削藩是按照极为周密的计划进行的，并从中发现了一定规律。首先藩王府内有人告密，检举藩王的谋反计划，然后里应外合，一举拿下王府，软禁藩王。告发和拘留、软禁变成了削藩的固定模式和特色。

而且，据南京政权公布，抓捕周王之际，告发者是周王的第二子，年仅十岁。十岁的孩子告发自己的父亲，这种事很难让人相信。

此外，被抓捕的藩王还会招供出同谋的藩王，然后再顺藤摸瓜逐渐扩大规模，前述的几位藩王都是这样被削藩的。很明显，藩王谋反是捏造出来的，这种不问真假的蛮横做法，与朱元璋制造的疑狱事件没有任何差别。

南京政权在剪除燕王周边羽翼的同时，也在周密进行针对燕王的计划。

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建文帝派近臣掌管北平地区的军事及民政事务，监视燕王的动向。负责民政、担任北平布政使的是工部侍郎张昺，负责军事、担任都指挥使的是谢贵。他们二人赴任后，将燕王的动向逐一汇报给南京，一直持续到燕王起兵叛乱。

建文元年二月，建文政权为视察全国民生情况，新设“采访使”一职，全国各地共派遣采访使二十四人。担任北平采访使的是刑部侍郎暴昭，他同样身负监视燕王行动的密旨。南京政权推进削藩政策的同时，针对燕王，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监视体系，连一只苍蝇都别想逃过皇帝的眼睛。

剥夺军权

南京政权不仅对燕王进行严密的监视，同时，还密谋削弱他的军事力量。南京政权最忌惮的就是燕王麾下的虎狼之师。燕王一手培养的护卫部队，跟随他屡次出击蒙古，出生入死，因而，燕王深受护卫拥戴，在护卫中威望甚高。有鉴于此，南京政权不可能放任其发展壮大，为防止削藩中发生意外，必须剥夺燕王的军权。

建文元年三月，建文帝采纳了齐泰、黄子澄的献策，以强化边防守备为名，命宋忠为都督，统率三万大军驻扎在北平以北的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附近）。而且，要从燕王护卫中征选精兵编入宋忠麾下，旨在从根本上削弱燕王的军事实力。对于皇帝的命令，燕王竟然没有任何违背，将大部分护卫部队都给了宋忠。同时，南京政权还召还了燕王护卫中任官职的大批指挥使回京，比如蒙古族的猛将关童等，大批优秀将领从燕王手中被调回南京。南京政权不仅削减燕王的兵卒，而且选拔精兵勇将，想要从根本上瓦解燕王的军事力量。据说，后来燕王起兵之时，部下只有八百人，可以说，南京政权的一系列措施使燕王的军事力量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南京政府安排周详，同年三月，建文帝还命徐凯为都督，率军驻扎临清（在今山东省），以耿璫为都督驻军山海关，与开平的宋忠遥相呼应，迅速对北平形成了牢固的三角包围之势。他们与北平城内的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联手，厉兵秣马，准备抓捕燕王。

燕王被剥夺了军权，如同孤家寡人，不仅时刻处于监视之中，而且被大军合围，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诚然，对燕王来说，若先对南京政权发难，不仅客观形势不利，而且还师出无名。但若任由事态发展，则自己难免要步其他藩王的后尘，被抓捕削藩。燕王面临自受封北平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

暗中练兵，葛诚背叛

面对南京政权步步紧逼的削藩政策，燕王绝不是束手待毙。当初，建文帝对周王削藩之际，燕王立即上书建文帝，为周王求情，而且，言辞极其恭敬卑微，以“至亲之情”恳求建文帝不要重罚周王。

当然，燕王自己也知道上书不会起到任何作用，这只不过是他起兵计划中的一环，旨在为起兵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上书被驳回后，燕王立即称病卧床，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以此蒙蔽南京政权的监视耳目，借机闭门不出，隐身王府内，暗中筹谋起兵大计。其间，他在北平附近招募青壮充实护卫，并在各地寻求奇人异士等，加紧起兵的准备。

燕王府原本使用的是元朝的宫殿，占地很大，周围建有城墙堡垒，在王府的后院，由军师道衍亲自指挥，每天操练士兵。王府的地下设有秘密工场，日夜不停地打造兵器。为掩人耳目，在地表上建有建筑，周围建有围墙。而且，在王府后院饲养了很多鸭子和鸟，它们的叫声足以掩盖军队操练及打造兵器的声音，只是有不雅之嫌。

建文元年正月，为祝贺新年，燕王派长史葛诚进京。长史是负责藩王府内长史司的官员，承担对藩王的指导及总管王府政务的要职。燕王派深得自己信任的葛诚进京，表面上是为了庆祝新年，实际上是让他伺机探听南京政权的情况。

出乎意料的是，葛诚在建文帝召问之时，竟然背叛了燕王，将北平的情况和盘托出，并且约定，南京政权对燕王削藩时，愿做内应。葛诚大概是对陷入绝境的燕王失去信心了，为谋求自保而选择投靠南京。

葛诚返回北平复命时心神不定，燕王立即判断出他已经投靠南京了。但燕王装作不知，让他继续与南京联络，以免惊动南京方面的耳目。

燕王来朝的怪事

在这种双方交锋的紧张局势下，发生了一件让南京政府震惊不已的事件。在葛诚进京一个月后的建文元年二月，燕王突然出现在南京。姜清的《姜氏秘史》中做了如下记载：

燕王来朝。御史曾凤韶是日侍班，王由皇道入登陛，不拜。凤韶劾奏曰：“殿下宜展君臣之礼，宫中乃叙叔侄之情，燕王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帝曰：“王至亲，勿问。”

记录燕王来朝的史书绝不在少数，但大多都只是记载了燕王对建文帝的不敬以及燕王的优柔寡断，而没有记载南京政府的应对措施。除了户部侍郎卓敬上书建议将燕王移封南昌以外，连积极推动削藩的齐泰、黄子澄都没有任何行动。最后，燕王不仅没有被软禁，反而平安返回北平。

抓捕燕王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就这样被眼睁睁错过了。假若历史真是如此，对燕王来说，实属侥幸，而对建文政权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致命失误。但是，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燕王到底为何来到南京呢？燕王每天都处于严密的监视、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敌方阵地南京，本身就非比寻常。

官方看法之外

实际上，关于燕王来朝的事件，一直存在诸多疑惑。清朝初年，朝廷召集很多学者编纂《明史》，对明代的各种疑案进行分析、考证及事实确认。其中，关于燕王是否来朝的事件也进行了充分慎重的考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发生燕王来朝一事。根据有两个方面：其一，燕王当时处于严密的监视与包围之中，不可能轻易出来；其二，后来燕王起兵，在建文四年渡过长江兵临南京之时，曾感慨道“已数

年未过长江矣”。当年太祖驾崩，燕王赶赴南京时被拒于长江对岸后，数年来一直没有进京朝拜。在最后决定胜负之时，眺望长江景色，他说出了上述的感慨。由此判断，燕王来朝事件是假的。

自从清政府的官方见解出来后，这个疑案似乎是解决了。但近几年的研究，不知为何，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燕王来朝是事实。关于燕王来朝的目的，普遍认为也是为了迷惑南京政权，同时，燕王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枭雄，把自己置身于险地，谋求打破僵局。

燕王来朝否定说，立论根据是燕王所说的那句感慨，但是，从建文元年来算，这时也已经过去三年了，这不能成为燕王在建文元年没来朝拜的理由。除此之外，燕王来朝肯定说还认为，《皇明祖训》规定藩王每年有义务进京朝拜，所以，燕王来朝也是正常的。燕王来朝的说法似乎越来越成为不可动摇的事实了。

仍然存在疑点

但无论如何，燕王来朝的说法依然存在疑点，理由有两点。一是按照时间上的顺序关系看，前后时间不符；二是史料被明显篡改过。

关于第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清初学者谈迁（1594～1657年）编写的《国榷》，书中所记载的建文年间的内容还是比较真实的。官纂史书《太宗实录》完全没有记载燕王来朝的事情，而《国榷》中明确记载了燕王来朝的具体时间。据它所载，燕王在建文元年二月乙丑（二十五日）来到南京，三月辛卯（二十六日）离开南京，在南京滞留二十七天。^[1]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间燕王以世子（后来的大明第四代皇帝明仁宗）为首的三个儿子也来到南京，参加太祖的小祥（周年

忌）。关于这一点，在《奉天靖难记》及《太宗实录》中建文元年三月的条目中，也记载着燕王世子等三人都在南京，说明这是事实。

他们来京的具体时间不明，但离京时间在《国榷》中有明确记载，是四月丁卯（二十八日）。这就是说，燕王父子在同一时间齐聚南京。而且，在《国榷》三月辛卯的条目中，还记载了燕王离京之际，让三个儿子继续留在南京的内容。

假若这是真实的，那么，在时间前后顺序上就出现问题了。根据众多野史记载，燕王决定派三个儿子赴京，以此迷惑南京政权，手下谋士中立即有人提出反对，担心世子等人去南京后，被当作人质扣留。但燕王心意已决，而当三个儿子出发之后，他却又非常后悔。据说，当三个儿子平安归来时，燕王父子喜极而泣，同时，他们还带回了南京方面的大量情报。

这就是说，燕王既是在北平为三个儿子送行，也同样在北平迎接儿子归来。假若仅限于野史的记载，则难以想象他们父子在南京相聚的事情会是真的。假如真有此事，那么情况应该是这样，三个儿子出发后，燕王也随即奔赴北平，在南京与三个儿子相聚后，又先于他们离京。但问题是，既然决定上京，为何不一起出发，或自己一人赴京，而一定要采取这么复杂的方式呢？如果按照野史所示，是由于燕王对儿子的担忧才会去南京相聚，又未免过于牵强了。

如果按照《太宗实录》的记载，燕王世子上京是事实，那么，野史与《国榷》记载的内容就是相互矛盾的。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燕王来朝一事是假的。若不这样解释，恐怕就难以理解燕王送迎儿子这一喜一忧的理由以及儿子带回南京情报这

条脉络。将原本不存在的事情与燕王世子进京的事实强行联系在一起，这是《国榷》中不合理的地方。这是证明燕王没有来朝的第一个理由。

史料上的篡改

那么，在谈迁的《国榷》中为何会出现“燕王来朝”的虚构呢？这就要提到第二个理由，史料被篡改的问题，这一点相当重要。

最初记载燕王来朝的史书是姜清的《姜氏秘史》，具体的成书年代不明，不过，据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一位叫信天缘生的人所写，《姜氏秘史》大约成书于明末嘉靖年间（1522～1566年）。《姜氏秘史》明确记载了燕王从皇帝专用御道进殿、面见建文帝不行君臣之礼等。这段记述始见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刊行的《建文朝野汇编》一书中，此后，其他野史大多沿袭了这一说法。

但是，在年代更久的野史中，却发现了略有不同的记载。至少是在正德年间（1506～1521年）以前编纂出版的《革朝遗忠录》以及正德十五年（1520年）刊行的《革除遗事》等书中记载，来京朝拜的并不是燕王，而是变成了“诸王”或“藩王”，燕王的名字从未出现。

那么，最初的史料记载是“诸王（藩王）来朝”。至于为何而来，是祝贺建文帝即位改元，还是按照《皇明祖训》的规定定期朝拜，并不明了。但至少可以确定，建文元年初，很多藩王聚集南京确是事实。

按照《革朝遗忠录》及《革除遗事》的记载，来朝期间，由于藩王之中有人对建文帝不敬，遭到御史曾凤韶的弹劾。这说明藩王中肯定有人看不起这个当皇帝的侄子，言行间对建文帝不够尊重，虽然建文帝没有追究，却被曾凤韶以“大不敬”之罪弹劾。

这两部书中，都没有明确说明对建文帝不敬的是燕王，而仅仅记载为“藩王”。当然这个“藩王”有可能是燕王。但是，当时正在南京政权严密监视中的燕王特意跑到南京的建文帝面前故做不敬之行，按照常理，这是不可能的。

燕王不能来朝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他此前称病卧床，闭门不出，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往来，已然是无法上京。而且，这正是他不进京朝拜的最好理由。官纂史书《太宗实录》仅仅记载了燕王的三个儿子进京，当然是没有燕王来朝这件事了。

“燕王来朝”传说的生成

一件与燕王无关的事件发生了，但燕王反而被换成了这件事的主角。岁月流逝，对建文帝抱有同情心的野史将“对皇帝不敬的藩王”替换成了“燕王”，一个虚构的故事诞生了。

恰值万历年间，连朝廷内部都有要求恢复建文帝声誉的呼声，“建文”年号得以解禁，被抹杀了近二百年的仅存在四年的建文政权的历史终于被承认是属于明朝正史。

也许是受到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燕王不得不成为塑造建文帝形象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燕王在这个以悲剧结尾的剧本中，扮演了活跃于舞台的重要角色。至此，“燕王来朝”的传说生成了。

[1]. 原文如此。二十七天似有误。——编者注

5 历史的转折

（1）靖难之变

一场大戏

燕王，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永乐皇帝，在他六十五年的生涯中，成为他人人生转折点的莫过于在他四十岁到四十三岁期间发生的靖难之变。

在这次内乱中，他获得胜利，成为大明第三代皇帝。他在位的二十二年中，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将大明推向了政治、经济发展的顶峰，史称“永乐盛世”。仅从他所开创的大明盛世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称得上是一代有为的帝王，这一点并无夸张。

但是，假若没有发生靖难之变，或者靖难之变中他没有获胜，也就没有他后来的丰功伟绩。他所引发的靖难之变伴随着戏剧性的效果成为大明走向永乐盛世的前奏而广受世人瞩目。暂且不论他的皇位正统问题，在我们谈到永乐时代之时，如同舞台戏剧的开幕，首先亮相的就是靖难之变。

而且，靖难之变本身就是情节完整、故事复杂的一场大戏。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北平与南京，时而平行，时而交错，构成了一幅色彩、线条、明暗搭配都浑然一体的复杂壮丽的画面。它宛如一首叙

事诗，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巨大的全景图。故事按照起承转合的节奏高速发展，瞬间就已达到高潮。

起句就是南京政权推行的削藩政策以及由此陷入困境的燕王的情况。承句是被逼无奈的燕王起兵反叛，以华北地区作为舞台与南京军队展开大战。转句是燕王进逼南京，在南京城下展开攻防战。最后的结句（合句）是南京陷落，燕王登基。

假若再加入建文帝的悲剧，那么，靖难之变就会延续为另一个与永乐治世完全不同的故事。事实上，若将靖难之变当成一个故事，那么，它既可以成为以建文帝为主人公以天下为舞台的悲剧，也可以成为以燕王为主人公的夺取天下的成功传说。这样一个内容丰富的故事，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与意愿来解读。

明快的起承转合

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史书的一种体裁，它不同于正史中的纪传体及按年代顺序编写史书的编年体，而是将某一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写清楚，最后以作者的一段评论为结尾的历史叙述。当然，纪事本末并不是故事，而是以原始史料为基础的第二次史料的汇编、总结，它必须是忠于史实的史书。

明代纪事本末的代表著作，有明末学者高岱编写的《鸿猷录》及清初学者谷应泰编写的《明史纪事本末》。两部书都对靖难之变的描写着墨甚多，而且并不是一概而论，恐怕是有意识地针对读者的立场刻意琢磨而成。两书都将靖难之变分为若干部分展开叙述，各个部分之间完全可以按照前述的起承转合的格式归纳。

例如《鸿猷录》中关于靖难之变的内容标题：

①靖难师起

②转战山东

③再出河北

④长驱金陵

⑤入正大统

按照起承转合的格式，起句是①，承句是②和③，转句是④，结句是⑤。

《明史纪事本末》中也是如此：

①削夺诸藩

②燕王起兵

③建文逊国

这里①是起句，承句、转句包含在②中，③是结句。《鸿猷录》的结句是“入正大统”，明显是站在燕王的立场，而《明史纪事本末》恰恰相反，“建文逊国”是站在建文帝的角度。但对靖难之变的叙述顺序，两部书完全相同，而起承转合的格式也完全适用于这两部书。

史实与虚构

《明史纪事本末》完全是站在批判燕王的立场，而《鸿猷录》则对建文帝抱有同情的态度，但最终承认永乐皇帝奉“天命”继大统。两部书的立场不尽相同，但都没有故意虚构历史、曲解事实，归根结底，两部书都称得上是真正的史书。

但另一方面，靖难之变本身所具有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已然不能认为是纯粹的史实了，最终从史实中脱离一步，就进入了虚构的世界。明末以建文帝为题材的伪书的出现（如《致身录》《从亡随笔》等），就是最好的例子。书中对南京陷落后建文帝的下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相当有故事性。这大概是对建文帝深表同情的人煞费苦心杜撰出来的。

虽然出现了伪书，但丝毫没有影响靖难之变的戏剧性，而事实却因虚构而被扭曲了。并不是说虚构不好，关键是借助史实来表达对建文帝的同情的过程中，用虚构代替了事实。

即使是出于单纯的动机，也不可以将虚构的故事当成史实。捕捉、提炼人们内心热烈的情感，那属于文学的范畴，而最早通过文学方式描述靖难之变的是远在中国东方的岛国日本。

幸田露伴的《命运》

日本大正时期，一位文豪以靖难之变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他的这部代表作从正文开始发表到最后写完自跋，总共花了十九年的时间。这部小说就是幸田露伴的《命运》。

他从《明史》开始，精读了与这段历史相关的各种史书，用带有汉文味道的优美语言编写了一个故事。他的这部小说完全忠于史实，按照前述的起承转合的格式叙述情节，最后以方孝孺为建文帝殉节结尾。作品的主题特意采用了古老的表现手法，从建文、永乐交替的历史风云中发掘出了毁灭之美。

从他执笔的动机来看，他既不对建文帝表示同情，也不对永乐皇帝进行批判，而是将这一切结果都视为本该如此的、冷静的宿命论。他用“数”来表示宿命。

“数”是什么？所谓“数”就如同所说的命数、定数，被定下的机缘，也就是命运。“数”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它是超出人的知识范畴的、无法计算的一种存在。他从宿命论的角度解读靖难之变，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在他虚拟的宿命的世界中，史实变成了虚构，虚构变成了史实。史实与虚构被幸田露伴结合在一起。可以说，靖难之变在幸田露伴的《命运》中完成了在异于历史维度的文学层面上的升华。

想要品味富有文学色彩的靖难之变的读者，我建议不妨读一读《命运》，这本书大概能让你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何为命运多舛。

但在讨论永乐时代之前，有关靖难之变的相关知识，我们还是有必要预先了解的。靖难之变拉开了永乐时代的帷幕，这是大家熟知的。在这里，我想以《鸿猷录》《明史纪事本末》为参考，略微加入一点我的个人见解，重新探寻“靖难之变”的大致经过。某种意义上，大家也可以将本章所讨论的靖难之变视为新版的《明史纪事本末》。当然，文章的格式将与原版的《明史纪事本末》相同，依然采用起承转合的四段论法（中国文学研究者、诗人福本雅一先生，旁征博引，为幸田露伴的《命运》做了极其详尽精彩的注释，希望大家可以参照阅读）。

一生中最大的骗局

面对南京政权的重重监控，燕王决定派三个儿子进京，以此迷惑南京政权，为自己争取时间。但这一决定很可能使自己的三个儿子被南京政权当作人质扣留软禁，可以说，这是燕王孤注一掷的豪赌。而南京政权没想到燕王如此应对，仓促之间确实有扣留他们的打算，然而，黄子澄害怕因此会刺激燕王立即起兵反叛而反对扣留，最后，决

定放还燕王的三个儿子返回北平。这是南京政权的又一次大失误，而燕王自然是非常高兴地欢迎三个儿子归来。

尽管燕王费尽心思努力应对，但形势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峻。南京政权连续出招，一步步将燕王逼入绝境。

建文元年五月，北平布政司及按察司的官员被南京政权以接受燕王府贿赂的罪名判处流放或降职。紧接着，六月又以参与燕王谋反计划为由，诛杀了燕王府护卫，燕王也因此受到重责。至此，南京政权抓捕燕王、削其封地只是时间问题了，建文帝的削藩诏书随时都有可能送达北平。

就在此时，看似大势已去的燕王演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骗局——装疯。在密切监视着他的南京政权的眼皮底下，燕王突然以疯子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他时而在北平的大街上奔跑、喊叫，时而冲进民居抢东西吃等，做出各种怪异行为，有时甚至在大街上昏倒，一整天都不起来。燕王发疯的消息迅速扩散，北平内外尽人皆知。

消息传到南京，据说当时南京政权还真的信以为真，可见燕王的演技相当高超。但是，南京方面很快就识破了燕王逼真的演技，原来是葛诚暗中向南京告密。南京方面随即密令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开始实施抓捕燕王的计划。

掉落的瓦片——决断之时

然而，南京方面抓捕燕王的密令却被了解内情的都指挥僉事（都指挥司的属官）张信泄露给了燕王。一直以来，张信非常崇拜燕王，但在燕王与南京之间，他始终摇摆不定，难以抉择，直到此刻，他最终决定站到燕王一方，向燕王坦白了建文帝的密令。

事已至此，燕王立即召来军师道衍连同一众亲信，着手起兵事宜。起兵在即，王府内一片紧张的氛围。在《明史纪事本末》的“燕王起兵”一节中，用非常具有戏剧性的画面记录了这一时刻：

乃召僧道衍至谋事。适暴风雨，檐瓦堕，燕王心恶之，色不怿。道衍以为祥。王谩骂：“和尚妄，乌得祥！”道衍曰：“殿下不闻乎？‘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坠，天易黄屋耳！”王喜。

道衍的话当然是为了打消众人心中的不安，但是，在这样恶劣的暴雨情景，非要说它是好事，燕王心中不悦，于是马上问道：

和尚妄，乌得祥！

面对燕王不满的责问，道衍看起来毫不惊慌，从容不迫地做了如下回答：

殿下不闻乎？“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坠，天易黄屋耳！

不用说，龙当然是皇帝的象征。另外，按照中国的五行学说，土德居中，其色尚黄。因此，明朝的制度规定，皇宫的瓦片为黄色，藩王宫殿的瓦片为青色。道衍所说，把青瓦换成黄瓦，象征着燕王将成为皇帝。据说，燕王听闻道衍振振有词的解释，非常高兴，一扫之前的不安，变得信心十足。能将不吉利的征兆转瞬间变为吉祥之象，道衍不愧为天才的谋士，心智超群。

唯有起兵

南京方面对燕王削藩已经进入倒计时，留给燕王的时间不多了。燕王命令护卫指挥使朱能、张玉率领八百精锐勇士防守王府，整个燕王府进入临战状态。陷入绝境的一部分北平官员，有的甚至躲到寺院中避难，北平处于危险状态。

而南京方面的做法相当明显，已经预先确定了进攻王府的日期。都指挥使谢贵统率北平内外所有卫所的士卒，将燕王府团团包围，还在端礼门等四门外面构筑栅栏，切断燕王府通往外界的一切通道，意图将燕王府一网打尽。

不久，建文帝剥夺燕王爵位、抓捕燕王府所有官员的诏书送到北平，并很快递交给燕王。随后，张昺、谢贵率领士兵威胁燕王府交出要抓捕的官员，否则立即攻打王府。士兵中有弓箭手向王府内射箭，战斗一触即发。事已至此，对燕王来说，不管结果如何，要打破困境，唯有起兵反抗，否则只能引颈就戮。

但燕王府寡不敌众，若不讲谋略死拼硬打，那很快就会失败。燕王没有那样做，他与朱能密谋以计取之，首先诱杀张昺、谢贵，他们一死，南京朝廷兵马群龙无首，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必然发生内乱，那时，燕王府的危机自然化解。于是，燕王以交出获罪官员为名，巧妙地把他们二人骗了过来。

一块西瓜引发的政变

建文元年七月四日，燕王以病体痊愈为名在王府设宴，又派人邀请张昺、谢贵赴宴。他们二人都算得上很谨慎稳重之人，不接受燕王的邀请。于是，又以查验、抓捕获罪官员为名邀请二人前往燕王府，没想到他们竟然很痛快地同意了。随后，他们率领大队人马，戒备森严地来到了燕王府门前。

他们准备进王府时，门卫以随身卫兵人数过多为由，只允许他们二人进府。一向谨慎小心的二人竟然没有任何怀疑，很轻易地就按照门卫的要求，只身进入王府，现在看来这有些不可思议。恐怕他们二人早就认为，在南京政府的强大攻势下，燕王已然无力反抗了，因而

就毫无防备地进了王府，掉进了老奸巨猾的燕王为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

宴会就设在宫殿之内，燕王很恭敬地款待他们二人。宴饮在非常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此时，王府又为他们二人摆上新鲜的西瓜。据说这是新采摘的西瓜，所以，燕王一再盛情邀请他们品尝。燕王自己也拿起一块西瓜，在放到嘴边刚要吃的时候，突然一下子站了起来，对着二人怒骂：

今编户齐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为天子亲属，旦夕莫必其命。县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为乎？

燕王说完，就将手里的西瓜猛地摔在了地上，而这正是事先约定的信号。此时，隐藏在殿外的士卒一拥而上，将张昺、谢贵二人擒下。这一切就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随即，早已投靠南京方面的长史葛诚和护卫指挥使卢振也被推搡着押上来。燕王对着他们高声怒骂：

我何病，迫于若奸臣耳！

随后，将张昺、谢贵押出殿外，全部斩首。建文元年七月四日，燕王起兵。

靖君王之难

当天夜里，张玉等人受燕王之命，趁夜色混入北平九门之中，夺下其中八个城门，基本控制了北平全城，而剩余的西直门被攻下也只是时间问题。

第二天，燕王以道衍为军师执掌全军，同时宣布否认建文帝年号，而继续尊奉洪武年号。

之后，燕王向麾下将士发布誓师檄文，声称此次起兵并非谋反，而是因为当今皇帝年幼，为奸臣所蒙蔽，所以要诛杀奸臣，清君之侧，实乃不得已而为之。所谓君侧之奸臣，自然是指齐泰、黄子澄等人。

尽管如此，公然向皇帝举起反旗的燕王还是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利的立场上。虽然他是在被逼无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兵反叛，但只要与皇帝为敌，那就是谋叛。而且，他诛杀朝廷官员，那就意味着与天下为敌。因此，燕王无论如何都必须为自己迄今为止的和今后仍要继续的行动找到一个正当的具有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靖君王之难”。

这也是《皇明祖训》规定的藩王的义务。原本太祖朱元璋分封诸王旨在消除朝廷危难，巩固社稷，现今奸佞之臣执掌朝政，皇帝却被排斥在权力之外。从奸臣手中夺回皇权、辅佐新帝，这样的大义名分对燕王来说是起兵反叛的最好借口。

他将麾下军队命名为“靖难之师”，以“清君侧”的旗号在各地为自己正名。此次内乱前后历时四年之久，史称“靖难之变”。

真实意图是为夺权

燕王在麾下将士中散发檄文为反叛正名，同时郑重地向建文帝呈送了一份书信。信中列举了若干不得已起兵的理由，大概内容如下：

臣守藩于燕，二十余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诚以君臣大分，骨肉至亲，恒思加慎。然奸佞齐、黄剪削宗藩，加害无辜，迫言臣谋不轨。如今已至生死存亡之际。亲藩既灭，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睹《祖训》有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谨俯伏俟命。

（摘自《燕王令旨》）

燕王当然没有真心想要“清君之侧”，尽管信中所说至情至理，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谎言一目了然。最明显的就是他引述的《皇明祖训》中的内容，实际上，恰恰说明了他的行为违反了《祖训》的规定。

按照《皇明祖训》的规定，诸王起兵勤王必须以接到皇帝密诏为前提。不用说，燕王当然没有建文帝的密诏。而且，燕王在这封上书中故意省略了这条祖训的后半部分，即规定诸王讨伐奸佞后，收兵拜谒天子，然后必须返回封地。燕王当然要删掉这一部分了，因为他的真正目的不是“靖难”，而是“夺权”。

真的很幸运

在麾下将士中散发檄文也好，上书建文帝也好，都不过是燕王夺权之前说的场面话，而他的真实意图不可能说出来。

若要自己起兵反叛师出有名，必须要高举“清君之侧”的旗号，以这样的大义名分来洗白叛军之名。那么，必须说，作为削藩推行者的齐泰和黄子澄就成了最好的靶子。不管南京方面如何出招，燕王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自己的对策。

从燕王初期的作战行动就可以证明，他虽然标榜“靖君王难”，却并不是一举南下南京，而始终在北方地区作战。当然，当时燕王兵力不足，想要直取南京也是不大可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壮大自身实力，彻底扫清北方地区，首先免除后顾之忧。

起兵两天后，即七月六日，燕王以世子高炽镇守北平，亲自带领次子高煦、三子高燧从北平出发投入战场。首先攻下北平以东的通州，八日再占蓟州，随后相继攻占居庸关、怀来、遵化、永平等地，仅用了两周时间，燕王就全线占领了北平周边要地。

燕王军队势如破竹，席卷河北。他抓住了南京方面瞬间的失误，断然起兵，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战果。这是在绝地反击下起死回生的一场反叛大戏。

（2）理想的破灭

法治还是德治

仅靠八百将士起兵的燕王，在与自诩强大的南京方面交战中，最终取得了胜利，原因何在呢？至今为止，学界有诸多看法，大家各持己见。

例如：燕王多次与蒙古作战，军事才能过人；由于朱元璋的肃清政策，南京方面的优秀武将几乎被杀一空，无可可用之将；齐泰、黄子澄等人对战局的认识过于幼稚，等等。虽说这些都是从结果推测原因，但主要原因基本上就是以上这几种，学界至今还没有提出更有说服力的新理由。

但是，为何这些理由同时出现在建文时代呢？大部分的解释反而变得平淡无奇、索然无味了。这恐怕是因为这种结果论始终欠缺一种足以将诸多偶然因素必然化，从而找到决定性因素的视角。即使我们察觉到这个问题，也无法用一种明确的理论阐明它。

如前所述，建文政权迅速崩溃的最大原因是其政治体制没有确立。当然，其中也包括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这些书生掌权却不通军事，且彼此政见不和不能协同平叛，但失败的原因绝不是那么简单的。在元末明初的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新旧王朝的更迭如同孕妇分娩前的痛苦，确切地说，建文时代只是大明成长过程中的摇篮时期。

建文时代以方孝孺为代表的“浙东学派”高举“以德治国”的旗号推行重视民生的政策，这是对洪武时代依靠“酷法治国”政策的批判。但同时，由齐泰、黄子澄针对洪武朝以来的藩王分封制断然实行的过激的削藩政策，却同样也是基于“法治”。某种意义上，建文政

权的悲剧正是由于这两大政策不能相互磨合造成的。可以说，齐泰、黄子澄与方孝孺从未有过共聚一堂共商朝政走向的情况。

当初削藩实权掌握在齐泰、黄子澄等削藩派手中，由于政见不同，方孝孺被他们排挤，没能进入到决策中枢。即便如此，削藩派内部对于削藩的具体措施、步骤依然存在诸多分歧，并非铁板一块。比如，高巍主张效法汉代主父偃的“推恩令”，分化诸王及其子弟，卓敬则提出将燕王移封南昌。各种方案里，最为激烈的莫过于齐泰、黄子澄的方式，主张武力围剿燕王。难怪燕王将他们二人当成“清君之侧”的标靶。

建文政权自成立以来，事关政权未来发展的决策中枢就存在分歧。深受建文帝赏识重用的齐泰、黄子澄在内部分歧未解决的情况下，就执意进行大刀阔斧的武力削藩。此种状态下，假若身为建文政权舵手的朱允炆能发挥出作为最高决策者的领导能力，或者事态能够转好也未可知。但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身为皇帝、集政权内部矛盾于一身的建文帝的犹疑不决，最终导致了建文政权的悲剧。

建文帝自成为皇太孙以来，就衷心向往着“德治”。建文帝深受儒家教育熏陶，他心目中的理想多半来自儒家传统理论中被理想化的“仁政”思想，而非冷酷的现实社会。一旦要求他作为皇帝决定国家大政时，他就会在“德治”与“法治”之间摇摆不定，无法决断。而且，当危难离去，建文帝很快又回到他的“德治”理想中，很有第二代皇帝独具的乐天派特点。可以说，正是建文帝的优柔寡断、踌躇不前早早注定了建文政权的失败。

难以置信的失败

建文帝对于形势的盲目乐观和临危应变能力的欠缺，在内乱勃发之初就已经显示出来了。据说，燕王起兵后，建文帝毫不在意，依旧

每天与方孝孺等人讨论《周礼》，幻想着重现上古盛世。当黄子澄提醒他早日剿灭燕王叛乱时，一向重视黄子澄谏言的建文帝却很轻松地说“燕王不足虑”。直到建文帝整備好北伐叛乱的征北军时，燕王已经起兵反叛二十天之久了，这时是七月二十四日。

这天，建文帝以开国功臣之一长兴侯耿炳文为征北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督宁忠任左右副将军，引兵三十万讨伐燕王。耿炳文时年六十五岁，身经百战，此次担当北伐燕王的重任。恐怕建文帝送别大军出征之时就十分笃定北伐必然大捷，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失败。

他最担心的莫过于背负“弑叔”的恶名，大军出发之际，他多次严命全军将士绝对不能杀死燕王。不许杀死敌军大将，这种命令想必会挫伤出征大军的锐气吧。仅从这一点也能如实反映出建文帝优柔寡断的性格。

征北大军行军缓慢，直到八月二十日才到达真定（在今河北省境内）。耿炳文坐镇真定，分兵三处，其中大军先锋九千人在北平以南百余公里的雄县扎营布阵。但是，没想到燕王趁大军立足未稳，在十五日夜率军偷袭雄县，耿炳文先锋九千人无一生还，八千匹战马全部落入燕王手中。

而燕王又趁胜南下，在真定城外与征北军展开激战。此战，征北军大败，副将军李坚、宁忠被俘，阵亡士兵无数。

致命的选择——点将李景隆

大战中险些没命的耿炳文逃回城内，立即重新整军，加强城防，备战燕王攻城。虽说首战失利，但他手里仍有几十万大军，数量上依然占有很大优势。燕王大军包围真定，猛攻三日不下。攻坚战对燕王

大军消耗过大，强攻不下，燕王果断撤军返回北平。对征北军来说，在真定暂时遏制住了燕王继续南下的势头。

征北军战败的消息很快传到南京建文帝的耳朵里。原本不应该失败的征北军失败了，对于从未怀疑过征北军定会取得大捷的建文帝来说似乎是巨大的打击。随后，建文帝立刻召集黄子澄前来商议对策。黄子澄劝道，“胜负常事，不足虑。”

不论黄子澄怎么劝说，惊恐万状的建文帝充耳不闻，他免去了耿炳文的职务，另选李景隆为大将军。这成为决定建文政权命运的关键一步。

李景隆是朱元璋姐姐的儿子，也是开国功臣李文忠的长子。他的父亲是文武兼备的一代名将，表面看，李景隆颇有将门虎子之风，但他实际上并没有领军作战的能力，仅仅凭借勋贵子弟的身份赢得建文帝的信任。据说，深知李景隆无能的燕王，在得知是他接任征北大将军时欣喜不已。

果然不出所料，建文元年十一月初，李景隆统兵五十万，在北平城外遭遇燕王大军埋伏，惨败而逃。无数士卒战死，大量武器、粮食等辎重被夺。但李景隆压下战败的消息，不敢上报建文帝。据说，建文帝还在次月犒赏了李景隆，特赐予太子太师之位，表明李景隆深得建文帝赏识。此后，李景隆每战必败，充分暴露了他的无能。

乱了阵脚的朝廷

李景隆战败不久，建文元年十一月九日，燕王挟大胜之威向天下发布檄文，同时，再次上书建文帝，为自己的行为正名。与上次上书一样，言明自己乃是不得已起兵，并强烈要求建文帝处罚奸臣齐泰、黄子澄。可以说，这严重超越了南京方面容忍的底线。

然而，建文帝却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行动。他突然罢免了齐泰、黄子澄，满足了燕王的要求。谁也不明白建文帝为何要这样做、他是如何考虑的。或许他认为，罢免了齐泰、黄子澄，燕王至少也会停止进攻吧。事已至此，建文帝依然没有意识到，燕王的真实意图并非清君之侧，而是要篡夺皇位。

代替齐泰、黄子澄的是新任兵部尚书茹瑺。据《明史》记载，他与黄子澄不合，又因为受贿刚被降为地方官员，此时，特意被召回京城担任要职。后来，燕王兵临南京时，他和李景隆一起率先投降，因此他被燕王封为忠诚伯，变身为“靖难”功臣。建文帝竟然将军国大事托付给这种人，却放弃了绝对忠诚于他的齐泰、黄子澄，足见当时的他是多么的焦头烂额。

方孝孺领军指挥

随着战局的不利，建文帝心中的不安感愈加强烈。不久，茹瑺也被撤职，齐泰、黄子澄被重新起用了。建文三年（1401年）闰三月以后，建文帝再次罢免了二人，命方孝孺全面指挥对燕王作战。曾经不赞同齐、黄二人削藩的方孝孺如今却要为削藩买单，只能说是天意弄人。

方孝孺几乎是豁出了性命想要扭转局面，但为时已晚。他指挥的作战未曾一胜，每战必败，建文政权就这样一点点被蚕食，每况愈下。

指望原本为学究的方孝孺能与军事专家燕王对抗，这未免过于天真了。应该说，只有在没有战争的太平盛世才能真正发挥出他的才干，这也是朱元璋在世时所期望的。

在“德治”与“法治”之间始终摇摆不定的建文政权最终统一在重视“德治”的方孝孺手中。但那是因为，在这种局势下，已无暇再论建文政权的体制确立，而足以担当起大局的人物，恐怕除了方孝孺再也没有更适合的了。

此后建文政权如同怒海中挣扎的一叶小舟，深陷迷途，无力回天。当方孝孺将内部所有分歧统一时，建文政权已经走到了尽头。

人心所向在于金陵之战的成败——燕王进京

时间已经逼近建文三年年底，十二月，燕王命世子高炽领一队人马镇守北平，自己统率全军南下直逼南京。燕王起兵已经两年有余，虽然在与征北军的交战中屡战屡胜，但实际控制的地区只有北平附近的几座城池。两年多来，双方都没有找到决战之机，战局陷入胶着状态。

仅在华北地区与征北军展开拉锯战是无法打开局面的。虽然在具体战役中取得胜利，但当燕王大军离开，征北军立刻就抢回来。燕王军队在人员、物资的供给方面与南京方面差距还很大，想要将南京方面逼入绝境，常规战法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一旦双方进入持久战，时间越长，战局对燕王越不利。经过两年的内战，北平方面已经日渐不支。

此外，还有一点对燕王极其不利，那就是“叛军”的头衔。不论燕王打下多少城池，取得多大胜利，只要建文政权存在，就无法改变自己“叛军”之名。因为建文政权具有毫无疑问的正统性，只要战局没有决定性的变化，就意味着，“政府军”对“叛军”的对抗模式会一直持续下去。无论你“靖难”也好，“大义”也罢，燕王起兵反叛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也不是说局面对燕王完全不利。虽说燕王反叛，但靖难之变实质上属于皇室内部的皇位之争。对大多数人而言，谁当皇帝都无所谓，如同高岱的《鸿猷录》所说，人心所向取决于金陵（南京）之胜负，都在观望谁能取得最终胜利。

即便是叛军，若能夺得天下就会成为天子之师。何况，燕王本来就是太祖朱元璋的儿子。目前对燕王来说，只有攻陷南京，推翻建文政权，继承皇位，号令天下，那么这一切问题才可以解决。

恰在此时，南京方面传来一则消息。与太祖朱元璋一样，建文帝对待宦官极为苛刻，因此宦官中有人不堪忍受，愿意投靠燕王。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南京防御极其空虚，可以一举拿下。燕王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决定直取南京。出发前，道衍一再忠告，途经的所有城池一律不要理睬，直插南京。当然，燕王早就明白其中的重要性。

此后，直到建文四年六月，半年时间内，燕王离开北平，深入敌后，谋求打开新局面。当然，燕王大军南下并不顺利，建文四年四月，淝河、小河、齐眉（均在今安徽省）的作战都曾遭遇惨败，几乎就要撤退返回北平了。能够渡过这些难关，依靠的就是军队在反复战斗中培养起来的强大的凝聚力。

胜负已分——灵璧之战

此刻，南京方面早已乱了阵脚。在之前的战役中，尽管政府军取得了连胜，但南京方面认为惨败的燕王军队必定返回北平，不但没有加大追击力度，反而特意调回一部分军队加强南京防御。而为防备燕王骑兵攻击，政府军挖壕筑砦，费时费力，延缓了追击攻势，错失了良机。命运之神眷顾了燕王一方，休整恢复后的燕王大军主动出战，给予政府军以致命一击。

大败的政府军退守灵璧，重新整军集结，固守城池，与潮水般涌来的燕王大军对峙。灵璧是防卫南京的最后藩屏，若这里被攻陷，南京将彻底暴露在燕王大军的攻击下。政府军中谁都心知肚明，建文政权存亡的命运在此一战，这将是他们的背水一战。

但是，在燕王大军势如破竹的攻击下，无论是谁都已经无法阻挡攻势了。决定胜负的灵璧大战最后以有幸屡次获得幸运之神眷顾的燕王大军完胜告终。这也就意味着，持续了四年之久的内乱，就要接近尾声了。据说，消息传到南京，黄子澄心如刀绞仰天痛哭：

大事去矣！吾辈万死不足赎误国之罪。

经此一役，政府军兵败如山倒，此前一直处于观望态度的各地守将开始迅速倒向燕王，争夺天下的靖难之变终于迎来了最后一幕高潮。

南京陷落

建文四年五月，燕王大军继续南下泗州（在今安徽省），当地守将不战而降。燕王大军迅速南进，渡淮河、破盱眙（在今安徽省），一路直下扬州（在今江苏省），扬州守将绑了监察御史，献城投降。

扬州失守，南京震惊，扬州与南京近在咫尺。于是，建文帝下罪己诏，同时，急诏各地发兵勤王，没有任何回应。

此时，束手无策的建文帝采纳了方孝孺的缓兵之计，向燕王提出划地而治，希望以此能暂缓燕王大军攻势，借机在南方紧急募兵，等待勤王之师的到来。

建文帝即刻派燕王的堂姐庆成郡主作为特使与燕王谈判，但胜利在握的燕王当然不会给建文帝可乘之机，在完成“靖难”之前，绝不

收兵，他拒绝了建文帝的要求。庆成郡主只好无功而返。

谈判期间，南京方面的守将趁机陆续投降。六月，都督检事陈瑄率水军投到燕王帐下。有水军相助，燕王大军渡江如虎添翼，虽遭到南京方面的抵抗，但终于成功在镇江登陆。镇江守将自觉大势已去，不愿做无谓抵抗，开城投降。据说，得知长江天险被突破、镇江陷落，建文帝面色忧郁，在宫殿前久久徘徊。

燕王大军已然近在眼前，已经打光所有底牌没有任何保护的南京方面采取了最后一条策略：中国传统的战法“坚壁清野”。方孝孺提出，将南京城外的百姓全部迁入城内参与防守，拆毁城外所有房屋，销毁城外可能被燕王利用的一切东西。南京方面命令城外百姓将拆解的木料、石料等运到城内，在酷暑下无数百姓因为饥渴难耐一个又一个地倒在运输途中死去。不堪忍受的百姓有的甚至点着了自家房屋，酷热下火势迅速蔓延，南京城外瞬间化为一片火海。

燕王大军距离南京越来越近了，对固守南京不再抱有希望的大臣们纷纷劝建文帝放弃南京，暂避一时，日后图之，但却遭到了方孝孺的强烈反对。他建议建文帝留守南京，只要等到勤王军队到来，就能反败为胜。当时，齐泰、黄子澄等人正拼命地在南京周边地区招募军队，对于他们的努力，方孝孺大概还抱有一丝希望吧。

六月十三日，燕王大军从容进驻位于南京城西北方长江边上的金川门。当时，金川门守将是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九子谷王和李景隆，他们二人为避内乱逃回南京，在这里任守备。他们在城楼看见燕王大军到来，立即打开城门投降。

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去向

南京城破，燕王大军蜂拥而入，在一片混乱中，逐一接收官府衙门。在建文元年削藩中被囚禁的周王和齐王也很快被解救出来。据说，他们二人与燕王重逢，喜极而泣。

不久，燕王与周王登上金川门城楼，听着城内的喧嚣声，怀着满腔的思绪，眺望着南京街头。远处的东南方向，大明皇宫的红色墙壁和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忽然间，他们看见皇宫方向升起一股黑烟，很快冒出红色的火光，就在燕王的注目之下，整个皇宫被大火吞没。

震惊的燕王立即派心腹宦官前去查看，等宦官到皇宫的时候，火势迅速蔓延，已经无法控制了。燕王大军将士拼命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但在皇宫的废墟中只找到了被烧得焦黑的皇后尸体。找遍皇宫，也没有发现建文帝的尸骸。在《明史》本纪中简单记载了建文帝的行踪：

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变”就这样谢幕了，以一种谁也无法预料的悲剧性结局告终。人固有一死，虽说这是人之常理，但是由于皇太子的死而失常的历史齿轮在没有修复的状态下就加速运转走向毁灭，最后在无谓的空转声中自我解体，仍然是难以逆料的。必须说，大明王朝建立仅三十余年，历史就发生了转折。

6 坠落的时代

（1）建文帝出逃

自焚还是出逃

燕王大军进入南京，建文政权垮台，在混乱中，建文帝最后下落如何呢？

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很多种说法，但至今未有定论。原因在于存在两套完全相反的史料，但无论哪套史料，都没有决定性的根据。

一套是以《奉天靖难记》《太宗实录》为代表的官方史料。它们详细记载了南京城陷落之际，建文帝自焚而死，燕王找到他的尸体并厚葬的全部过程。后经多方考证，可以确认并未发现建文帝尸体，由此，一般认为这套官方史料属于捏造。但是，若是自焚而死，尸体被烧光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自焚说还有一定的可信度。

另一套史料则属于野史。它们记载南京陷落时，建文帝化妆成和尚，随同一部分亲信离开南京，然后辗转各地，隐姓埋名幸存下来。野史生动描述了建文帝出逃之后的详细情况。

据野史记载，燕王大军压境，建文帝企图自杀，被身边亲信制止，劝说逃走。当时，有一个亲信说，太祖临终之际曾留下一只密匣，说危难之际打开它。众人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度牒（僧人的身份

证明）、袈裟、草鞋、僧帽以及一些盘缠。于是，建文帝剃发换装，由神乐观道士引路，在数名随从的保护下离开了南京城。

官方史书之所以采用“自焚说”，是燕王（即永乐帝）要顺利继承皇位，必须要确认前任皇帝已死。身为篡位者，昭告天下前任皇帝已死，这应该是必须要采取的措施。只有谎称遗体已经被找到，才能按照皇家礼法举行葬仪并继承皇位。而野史的记载对“自焚说”是持怀疑态度的，在野史中，非常逼真地描述了永乐皇帝下令用皇后的遗体代替建文帝举行葬礼的详细情况。

另外，野史采用的“出逃说”则源于民间对建文帝的同情，由于民间对建文帝的绝对支持，也使得建文帝“出逃说”更加深入人心。一般来说，建文帝“出逃说”本身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材，再辅野史本身的创作特点，使得“出逃说”更具有传奇色彩，当然也不能否认其中难免诸多夸张之处。比如，前述“太祖密匣”之事多为传言附会。总之，如前所述，随着“出逃说”流传得愈来愈广，附会夸张的内容也随之增加，最后甚至出现伪书。

并非完全荒唐无稽

但是，若因此断定“出逃说”是荒唐无稽的谬说也未必完全正确，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很多史料都提及，就在“靖难之变”结束不久，建文帝出逃的传言在民间广为流传，连永乐帝也在想方设法寻找建文帝下落。

例如，据《明史》胡濙的传记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胡濙身负寻找建文帝行踪的秘密使命，游历天下，历时十五年，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回京复命，据说，当时永乐帝已经就寝，闻报立即起身召胡濙觐见，听其汇报情况直至天明。

另外，《明史》道衍的传记中也有暗示建文帝出逃的线索。永乐十六年，道衍生命垂危之际，请求永乐皇帝释放一个法名“溥洽”的和尚。溥洽曾任建文帝的主录僧（顾问僧），因为有帮助建文帝出逃的嫌疑而被监禁。据说，永乐皇帝同意了道衍的请求，很快就释放了溥洽。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永乐帝对于建文帝出逃一事怀有强烈的不安。

而且，在永乐皇帝消失二十年之后的正统五年（1440年），在广西省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个和尚冒充建文帝，但由于年龄不符露出马脚，被捕后死于狱中。或许是野史中记载了建文帝化装成和尚出逃后的落脚地点就在广西、云南等西南地区，才会出现冒名顶替的事件。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建文帝出逃的传言在民间流传之广。

完全相反的两种见解自靖难之变后同时并存，而且，互不让步，各自形成了一套体系。两种说法的依据都在于建文帝遗体未被发现这一事实。遗体未被发现既可以解释为尸体被大火烧光了，也可以理解成建文帝出逃隐藏起来了，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同时适用于两种说法。至于偏向于哪种说法，自然是由历史叙述者的立场来决定。总之，不论是自焚说还是出逃说，可以说都有根据，也都没有根据，建文帝下落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而成为历史疑案。

明朝末期万历年间（1573～1620年），以“铁血宰相”著称的张居正（1525～1582年）掌权期间，当时的万历皇帝在讲读课上询问“建文出逃”的问题，张居正的回答则完全是按照野史的记载支持出逃说。他不用前朝遗老的说法，而是将民间的传言讲得绘声绘色。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大明国家体制的固定化，出于对大明体制的维护，明朝统治阶层也开始认可那些为建文帝殉节的忠臣。明朝末期“建文复权”运动的兴起正是由此而来。

到明朝末年，朝野上下普遍认可了建文帝出逃说，明初以来的官方见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有关建文疑案的真相也因此更加扑朔迷离，甚至连官方与民间说法的界限也消失了。

《明史》编纂中的混乱

清朝初年，编纂《明史》之际，涉及建文帝本纪的编写，因此，建文疑案如何解决再次成为难题。由于牵扯到“燕王来朝”之谜的实质，围绕着建文帝自焚还是出逃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由《明史》负责人王鸿绪决定采用“自焚说”而告终，但并没发现新的证据支持“自焚说”。明朝以来的官方说法与野史之间的分歧就这样被保留到《明史》当中。

如前所述，《明史》本纪中，对建文帝最后的行踪做了如下记载：

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但在下文中，又做了这样的补充：

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这种说法多少介绍了建文帝出逃的传闻，可以看出建文帝本纪最终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也佐证了《明史》编纂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混乱。不得不说，尽管负责《明史》编纂的王鸿绪人为决定了建文帝“自焚说”，却无法改变“建文出逃”在《明史》中的疑案性质。

疑案的始末

《明史》究竟为何要倾向于建文帝“自焚说”呢？战前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一语道破了其中关窍：官方立场否定建

文出逃，与清初“朱三太子案”有很大关系。

清朝初期，屡次发生假冒大明皇室后裔朱三太子之名的谋反事件。此时，肯定建文帝出逃说，让人容易联想到明朝皇室后裔的出逃，很可能成为对朱三太子的一种支持。王鸿绪力主“自焚说”，可以视为这是他讨好清朝皇帝的结果，而绝非通过史实考证得出的结论。

那么，当代学界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中国学者大多支持出逃说。建文帝出逃时，野史中记载的太祖遗言的真伪问题暂且不论，但普遍认为建文帝为躲避战火出逃的可能性很大。近年来，中国学者徐作生先生在苏州一带考察研究了与建文帝相关的史迹，进而提出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建文帝隐居在苏州穹窿山皇驾庵，死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这种说法的支持者不少，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大。

另外，日本学界几乎没有支持“出逃说”的学者。确切地说，日本学者对这个问题并不感兴趣。迄今为止，日本学界唯一的一部关于永乐皇帝的传记，即寺田隆信先生的《永乐帝》，也仅仅是将这个问题作为建文帝悲剧的一个附说，并未再做深究。至今从未出现过正面支持“建文出逃”的研究著作。

中日“感觉”上的差异

中日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差，原因何在呢？

日本学界的这种情况比较好理解。日本历史上，那些悲剧的末路英雄往往会在传说当中重生。这应该这是由于日本民众对不幸的英雄会寄予更多的同情吧，日语中甚至出现了“判官びいき（判官焔戻）”^[1]这样的专用词。比如义经传说及丰臣秀赖隐居萨摩藩等，都可以归为这一类传说。相应地，在日本的文化氛围中，“建文出逃”也只是

被看作建文与永乐时代交替过程中的一段轶闻，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在中国情况却有所不同。

中国历史上，史料搜集、整理的传统方式是由官方史料和民间史料构建的双重史料系统。虽说无论哪个国家的历史都有这样的史料搜集系统，但中国的这种情况极其显著。这应该是长期处于专制体制下民众反抗的结果。有时民间史料才是真实的，因为官方史料只记载对当权者有利的方面，不利的方面不是被篡改就是被抹杀。与其说野史采纳了官方史料的东西，不如说民间史料担负着更多的消息来源。

当然，这并不是说野史的内容都是真实可信的。野史中附会的内容与真实的史料都很多。但真正能够弥补官方史料空白的也只有野史才能做到。

当代中国的众多研究者都支持建文出逃说，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是抨击官方史料矛盾之处的结果。但也无法由此断言中国学者就完全专注于野史中特有的史料，而应该看到其中包含着中国学者对官方史料的难以摆脱的怀疑。围绕着“建文出逃”的疑案，中日学者之间的差异也可以说是两国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

两种观点不妨并存

关于“建文出逃”的问题，中国学者中并不是没有持异议者。著名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在对《明史》详细考证后，得出如下结论：

余以为惠帝（建文帝）或死或出亡，既皆无可凭之的证，则不妨两存其说。（《明史考证》第一册）

真相依然隐藏在未知的黑暗中。

至此，本书不再继续探讨“建文出逃”的疑案，我认为不管是自焚说还是出逃说，选择哪种观点都可以。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南京城最混乱的时候，建文帝行踪不明，最后也没有发现他的遗体。这一事实注定要纠缠永乐皇帝一生，他将始终无法摆脱对建文帝出逃的疑虑。

对篡位的永乐帝来说，建文帝的影子超乎沉重地压在了他的心上。在这里，可以确定的有建文帝的遗体没有被发现以及永乐皇帝处于焦躁中这两点，也就足够了。

（2）走向死亡的人们

四种类型

建文四年六月三十日，南京城陷落之际，城内官员的所作所为展露无遗。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 ①南京陷落前临阵脱逃者；
- ②为建文帝以身殉节者；
- ③抢先投降者；
- ④投降或被捕却未变节，最后被处刑者；

特别注意的是燕王对③和④两类极端做法的人的处理方式。

燕王入主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建文政权，为靖难之变画上句号。

进入南京当天，他马上发布“奸臣榜”，下令抓捕二十九名建文官员。其中包括起兵之际他指为奸臣的齐泰、黄子澄，此外，还有建文末期以一己之力独掌朝政的方孝孺。紧接着，他又发布了第二批奸臣榜，列出了五十多名官员，主要的“奸臣”基本上都凑齐了。其中大部分都是放弃抵抗的文臣。

投机者和抓捕奸臣

不惩治奸臣，内乱就不可能终结。除了南京陷落时被抓的方孝孺之外，一场大规模抓捕奸臣的行动开始了。

朱棣将奸臣封为“首恶”和“从恶”，对抓捕到奸臣的人也给予相应的奖励。很多逃亡各地的奸臣一个个被人抓捕、押送南京。属于“从恶”的官员只要对新皇发誓效忠就可以被免罪，而“首恶”则按程序审问后立即处刑。四年内战的一切责任，朱棣当然要全部归罪于“首恶”。虽说这都是战乱年代常有的，但是胜者为王的道理，就这样毫不掩饰地展现出来。

在大肆抓捕奸臣的同时，建文时代的官员相继投降。他们没有打算与建文帝同命运，在生死抉择前，为求自保，抛弃旧主，选择了投降、效忠于谋权篡位的燕王这条道路。至此他们再也不用纠结于复杂的形势，转眼间就匍匐在了燕王的御座之下。

曾经深受建文帝重用的兵部尚书茹瑺，甚至在南京陷落的当日，就立即率领大批官员特意向燕王“劝进”登基。虽说大势已决，但毕竟登基时机尚早，燕王拒绝了这个要求，但这些建文官员的变身速度足以让人瞠目。后来成为永乐朝名臣的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等人都是这一时期投降的。

一切按照洪武旧制

但是，对燕王来说，并不是接受完这些建文旧臣的投降就万事大吉了，还有燕王帐下自就藩以来亲自培养的官员以及起兵之后投到麾下的众多将士，燕王对这些与自己共患难的部下理应给予优厚的待遇，必须与那些新投降过来的建文旧臣区别对待。但或许从燕王的角度来讲，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就是“靖难之变”的善后工作，这离不开建文旧臣的参与。将曾经敌对的两班人马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新政权基础的构建，这比开创新王朝还要有难度。而且，这个任务必须要在短期内完成。

以“不德”为由，数次拒绝“劝进”的燕王，不久就按照预定的计划，于六月十七日即位登基，并将建文时期变更的法律、制度等全部复归为洪武时代的旧制。继而，他在七月朔日发布即位诏书，定次年为永乐元年，同时，发布二十五条施政方针。至此，因内乱而松散的大明政治体制，被太祖朱元璋的后继者重新确立、完善起来。

总之，对永乐帝来说，要想打开局面、渡过难关，只能扮演太祖朱元璋的忠实继承者，除此别无他法。他在强调自己是太祖嫡子的同时，将建文政权以违反祖制定为“叛逆”，并完全恢复、沿袭洪武时期的法度。在永乐政权下，以批判洪武政权为基点建立的建文政权的存在意义被完全否定了。

当然，对建文政权的这种否定并不是对建文旧臣的否定。若将全面清洗建文旧臣作为对建文政权采取的报复性措施，这对永乐政权未来的体制构建来说，绝非上策。既然特意设计了清除奸臣作为内乱的终结，那么接下来，永乐政权的发展也需要将建文旧臣纳入永乐体制中来。永乐政权刚刚建立，建文帝行踪不明，永乐皇帝要洗白篡权者的身份，即便是出于稳定政局的目的，建文旧臣的参与也是不可欠缺的。

变节与殉节的抉择

朱棣重新任用建文旧臣之际，公开说道：

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法、乱政经耳。（《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丙寅）

对于蛊惑皇帝破坏祖法的“奸臣”肯定要除掉，但对建文帝尽职尽责的人则一律免罪，对皇帝尽忠职守那是身为臣子的本分。对此，

朱棣衡量的标准非常明确，对建文旧臣之前的所为概不追究，希望他们今后为永乐政权尽心尽力。

事实也证实了他的话。皇宫中残留的建文时期的奏折，有很多都是针对燕王的对策，其中不乏诽谤永乐帝的言辞。而朱棣将与军事、经济无关的奏折一律烧毁，以此安抚建文旧臣。在他看来，那是他们忠于建文帝的证明，今后同样可以为自己效忠。朱棣展示出宽容的姿态，以此换取建文旧臣的忠心，并对他们抱以很高的期望。

诚然，永乐皇帝宽待建文旧臣的做法也引起了部分下属的不满。永乐帝宣称，建文旧臣全部都是洪武时期太祖朱元璋长期培养出的人才，以此压制内部的不满。永乐帝高调提出回归洪武祖制，不管部下有怎样的不满，恐怕都不敢冒犯皇威。建文旧臣变身永乐官员，在名分上获得了容身之处。

最终，建文旧臣中，继续忠于建文帝的人就是“奸臣”，反之则成为“忠臣”，忠臣与奸臣的区别仅限于是否对永乐帝效忠。这种区别的反差太大了，变节者会受到优待，而守节者就会遭到彻底的镇压。

是舍生取义保持名节呢，还是忍辱偷生明哲保身呢？在变节与殉节的抉择之际，他们迷茫了。变节的建文旧臣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在无法回头的极限状态下，做出一个以全部人生为赌注的苦涩的选择。

壬午殉难

燕王入京后，开始大规模抓捕“奸臣”，伴随着对“首恶”的抓捕，抓捕行动迅速演变成一场杀戮狂潮。不仅仅是“奸臣”本人，连同他的家族、同族甚至好友都被牵连抓捕，押到刑场处以极刑。有时连续行刑数日，甚至连未成年的孩子都不放过，刑场哭声震天，惨不

忍睹。各地被杀的“囚犯”，总人数超过一万人。建文四年为壬午年，所以这场杀戮史称“壬午殉难”。

《明史纪事本末》中的“壬午殉难”卷以及殉难者的传记等书，都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一直保存至今。总之，杀戮之恐怖难以想象，杀戮数量之大、刑罚之残酷绝对不亚于杀了十万人的朱元璋时代。况且，永乐帝为了报复建文政权，肆意杀戮，被杀者凄惨无比。

被永乐帝列为第一首恶的就是主持削藩的黄子澄。

南京陷落时，黄子澄正在苏州招募勤王军队，不久就被抓捕押送到南京。他绝不承认永乐帝的即位，审问中也不停抗辩，抵抗到底。永乐帝大怒，先斩其双手，又断其双脚，最后全身被一寸一寸剁碎至死。阖族六十五人，不分老少全部斩首，妻族数百人流放边境。当时是六月二十五日，南京已陷落十天。

名列第二的首恶齐泰也是同样的结局。

南京陷落前，齐泰积极募兵，以图东山再起。为隐瞒身份，他把惯用的白马染成墨色。然而，马在酷暑下开始流汗，不知不觉中冲掉了墨色。身份暴露后，他被抓捕回南京，与黄子澄同样，被永乐帝残杀，族中所有人被处以死刑或流放，唯一免罪的是他年仅六岁的小儿子。

礼部尚书陈迪，情况更加悲壮。

和其他首恶一样，他被永乐帝亲自审问。在永乐帝面前，他毫不胆怯，大义凛然地指斥其恶行。不久，他和他的六个儿子一起被处刑，行刑前，他的一个儿子哭喊道是父亲连累了他，但他呵止住儿子，然后继续怒骂朱棣。永乐帝大怒，命人把他几个儿子的耳朵和鼻

子割下来，煮熟之后灌进陈迪的嘴里，然后残忍地问他味道如何。陈迪答道：

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

（《皇明逊国臣传》卷二《礼部尚书陈公传》）

他对朱棣责骂不已，被行刑后，在他的怀中发现了一首绝命诗，悲怆壮烈，昭示了对建文帝的忠烈之心，可见他早已做好杀身成仁的准备了。

“瓜蔓抄”

“瓜蔓抄”，一个在谈到壬午殉难时耳熟能详的词。所谓瓜蔓抄，就是如同提起一根藤蔓就带出来很多瓜果一样，无限制地扩大连坐者，然后全部抓捕处刑。

在学界，也有观点把瓜蔓抄与壬午殉难同义理解。原因在于，壬午殉难者中大部分人是被连坐处刑的，看起来很像是瓜蔓抄。实际上，瓜蔓抄只不过是壬午殉难中的一个事件，源于御史大夫景清暗杀永乐帝未遂事件。

建文初年，时任北平布政司参议的景清被召回南京，升任御史大夫（建文时期，都察院都御史更名为御史大夫），并任此职位直至内乱结束。南京城破，很多大臣为建文帝殉节，他则倒向永乐帝一方，并利用与永乐帝旧交的关系，仍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加入永乐政权。但实际上，他并不认可永乐帝即位。

有一天，他身藏利刃进宫，之前一直隐忍不发，就是为了这一天刺杀永乐帝。但是，他刺杀时被永乐帝察觉，被抓了起来。

意识到已经无法逃脱，景清全力做出最后的抵抗，高声怒骂永乐帝。被激怒的永乐帝下令打掉他的牙齿，景清反而口含鲜血喷向永乐帝，血沫飞溅到龙袍上。

暴怒之下，疯了一般的永乐帝用了最残酷的“剥皮”之刑，活生生地剥下整张人皮，再把他的身体全部碾碎，然后，在人皮内塞满稻草，悬挂在长安门示众。

即便如此，永乐帝仍然怒气未消，下令屠其全族，没收其老家的全部财产，连他的好友都连坐被杀，受牵连者无数，老家化为一片废墟，人称“瓜蔓抄”。人们谈及此事，无不心有余悸。

女性的悲剧

类似瓜蔓抄的悲剧各地都有发生，无辜受死者不计其数。但悲剧的主人公却不仅仅是刑场上的殉难者，还有那些幸免于刑侥幸活下来的人在遭受着比死刑还要悲惨的境遇。死刑不过是一时之痛，但是还有些人只要活着就会在痛苦中受折磨。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奸臣”的妻子、姐妹、女儿等与政治完全无关的女性。

齐泰、黄子澄等人被处死后，他们的妻子、姐妹全被发配到教坊司。所谓教坊司，名义上是掌管朝廷歌舞娱乐的机构，但实际上所辖教坊多为官办妓院，主要都是罚没罪臣的妻女为妓。教坊内的官妓不仅要表演歌舞，还要给来此寻欢作乐的男性“荐枕”，遭受凌辱，有的罪臣的妻女还因此怀孕了。永乐十一年，教坊司请旨询问如何处理怀孕的官妓，永乐帝冷冰冰地答道：

由他，不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立斋闲录》卷二）

这些女性的生命在他心中不过是蝼蚁一般地低贱，无足轻重，生杀予夺，肆意玩弄。

女人们的悲剧还在继续。

副都御史茅大芳及其子被处死后，他的妻子同样被送进教坊司。当时，她已经五十六岁，同年因病去世。教坊司请旨如何处理。据说，永乐帝下旨，把尸体扔到南京上元县城门外喂狗。从这些轶事当中，不难看出永乐帝对“奸臣”恨之入骨以及他极其残暴的性格。^[2]

靖难之变将大明卷入战乱，战火所及，生灵涂炭，更使得难以计数的人置身生不如死的悲惨境遇。很多罪臣的妻女不愿进教坊司受辱，为保名节而自杀，而更多的女性被迫沦为永乐功臣、官员的奴隶，遭受非人的待遇。悲剧往往不会在历史的表面展现，而只在暗影中默默潜行。又有多少悲剧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呢？答案已经不为人知了。必须说，靖难之变的后遗症也因此变得很严重。

燕贼篡位——方孝孺就义

提到后遗症很严重，在无数悲剧中，没有比方孝孺就义更具有冲击力的了。永乐帝对方孝孺的处罚不仅仅是纯粹的对“奸臣”的报复，更重要的是企图抹杀建文政权的理念。

建文三年十二月，永乐帝离开北平之际，军师道衍一再请求：

南有方孝孺者，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方孝孺代表的不仅是“浙东学派”，更是天下无数读书人敬仰的楷模。若能笼络住方孝孺，等同于获得天下读书人对永乐政权的支

持。永乐政权刚刚起步，要步入正轨，他们的支持必不可少。因此，永乐帝也想让方孝孺活着。

结果却事与愿违。方孝孺身为天下名望第一的大儒，永乐帝希望他能为自己起草即位诏书，而方孝孺只回应了四个字“燕贼篡位”。永乐帝大怒，下令用短刀割裂他的嘴，然后投入大牢。为了逼他就范，每当抓捕他的家人、门生后，永乐帝就会在方孝孺的面前残杀他们。

他的几位弟弟也惨遭杀害，妻子与几个儿子全都自杀，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亡。最后，方孝孺、黄子澄、齐泰同一天在闹市中被处以极刑，连坐者八百七十三人，流放者无数。这是壬午殉难中最大的惨剧。

所谓“十族”——理念的抹杀

据说，方孝孺殉难时被诛“十族”。通常的说法都是诛“九族”，诛“十族”的说法很少。所谓“九族”，即四个父系的家族、三个母系的家族、两个妻系的家族，合成“九族”，若再加上朋友、门生“一族”，即为“十族”。当然，这个新词仅限用于方孝孺的悲剧。况且，众多朋友、门生被杀，背后有特别的意义。

永乐帝诛杀“十族”的理由无须多言。洪武时期怀才不遇的“浙东学派”，随着建文帝的登基得以推行、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主张“德治”的他们与继承太祖“法治”的永乐帝本来是无法相容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浙东学派”一贯坚持“正统论”，这是身为篡位者的永乐帝绝对不能容忍的。

永乐帝拉拢作为“浙东学派”领袖的方孝孺，是出于谋求自己皇位正统性的政治意图。即便双方没有共同的政治理念，也可以保护

“天下读书种子”。永乐帝在意的是方孝孺及其所代表的天下读书人的口诛笔伐。若能让方孝孺臣服于自己，那么既可以强化永乐政权的权威，更能达到笼络天下读书人的目的。永乐帝此举，大概是为了谋求彻底否定建文政权的同时证明自己继承大统的正当性。能否得到方孝孺的支持就成为影响永乐政权未来走向的一块试金石。

因此，当方孝孺拒绝为永乐帝起草即位诏书，并以“燕贼篡位”四个大字决意殉节时，他和他的信奉者们瞬间变成需要被诛杀的对象。对永乐政权而言，他们已经成为一种障碍，而且再也没有利用价值。进一步说，为了不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方孝孺，即便是“天下读书种子”也必须根除。在维护永乐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建文政权的政治理念随同“十族”一起被抹杀掉了。

皇帝的原罪

南京城陷落后开始的杀戮狂潮一直持续到年底终于平静下来，这场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都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名义上是要追究内乱的罪魁祸首，结果却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这代价不仅包括壬午殉难中的殉难者及所有受牵连者，更为永乐帝之后的治世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原本喜庆热烈的新皇出行，却满是压抑与阴郁的氛围。这是燕王起兵之际就已经被注定的原罪。虽然它非永乐帝所愿，却如同他不甘心却又无法摆脱的篡位者身份一样，这就是宿命。

如何清洗篡位与杀戮的污名呢？这无法逃避的如此冷酷的宿命，注定要伴随他的一生，如影随形。

[1] 判官蛭辰一词为日文谚语，源自日本平安末期的源、平之战，源义经在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广受民众赞誉，却因此受到其兄长源赖朝的妒忌、追杀，

史载其死时年仅三十一岁。民众同情义经的遭遇，这才有了“判官蝼蛄”一说。这里的“判官”是指义经因战功而获得京都判官之职，原意为同情义经，后来被引申为同情弱者。——译者注

[2]. 事见《立斋闲录》卷二。——作者注

7 天命所在

（1）圣王治世

革除

所谓“革除”就是从历史上抹杀建文朝四年的史实。当然，历史事实本身又是无法去除的，所以这是个极其自以为是的词。具体言之，革除就是要在明朝的正史中削除“建文”年号，同时，不承认建文帝是明朝的合法皇帝。

明朝皇帝即位时编纂的《明实录》记载了历代皇帝的事迹，作为明朝的正统史书流传至今。但永乐帝始终没有编纂《建文实录》，对他而言，建文帝并不是先帝，仅仅是“建文君”，而建文朝的四年也是一个没有皇帝的时期。因而，这时一般把建文年间称为“革除年间”，称建文帝为“革除君”。

“革除”一词的由来，源自永乐帝即位后废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一事。太祖朱元璋在位终结于洪武三十一年，加上建文朝的四年，就是洪武三十五年。当时，并没有正式使用“革除”一词。后来的野史逐渐用“革除年间”来表现“建文年间”，“革除”一词才固定为专有名词。《革除遗事》《革除逸史》等都是由此而来。

但是，清代大儒顾炎武（1613～1682年）对“革除”一词的含义提出异议。他在《革除辨》（《亭林文集》卷一）中指出，永乐帝并不是要抹杀建文时代的一切，永乐帝要“革除”的只是从六月十七日即位到当年年底这半年的时间，只是将这半年时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而次年开始都改为“永乐”年号。此前的建文元年元旦至建文四年六月十六日的这段时间，即便在他在位时编纂的《奉天靖难记》中都没有采用洪武纪年。书中既没用建文年号，也没使用洪武年号，只是标记为元年、二年等。

是否完全用洪武年号代替建文年号，大概永乐帝心里也始终犹豫不决，最后决定去掉年号，仅保留年份。他即位后的这半年时间不能没有年号，当然以他的立场，他是绝对不会再使用建文年号的。

以太祖继任者身份自居的永乐帝最终决定这半年时间使用太祖的洪武年号，将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以后的半年定为洪武三十五年。

虽说永乐帝并不是完全抹杀建文年号，但他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在大臣当中，也有人故意曲解“革除”之意，讨好永乐帝。他们上奏之际，揣测永乐帝圣意，特意将建文元年称为洪武三十二年、建文二年称为洪武三十三年。随着“革除”的含义被人为地扩大延展，久而久之，人们产生了“革除”就是抹除建文时代的一切的这种错觉。而在野史中，“革除”被扩大成永乐帝为使自己帝位合法化而采用的欺骗手段。就这样，“革除”一词偏离了永乐帝的本意，演变成悲剧的建文时代的代名词。

《太祖实录》的三次编纂

被认为与“革除”同样目的的，是由官方编纂的《明实录》。这里所说的《明实录》并不是指建文帝实录，而是永乐帝的父亲、太祖朱元璋的实录《太祖实录》。一般来说，皇帝去世后，继位者整理上

一代皇帝的“起居注”及朝臣的奏疏，编纂出皇帝实录。《明实录》包括从《太祖实录》到《熹宗实录》总共十三位皇帝的实录。迄今为止，历代王朝保存完好的实录只有《明实录》和其后的《清实录》。

明代《太祖实录》先后三次编纂。第一次编纂是在建文年间，历时一年，建文三年（1401年）十二月完成。但第一版《太祖实录》编纂于“靖难之变”时期，书中有很多诽谤燕王的言辞。何况很多参与编纂的人都是“壬午殉难”的牺牲者，永乐帝当然不会让这样的实录流传后世，重修《太祖实录》势在必行。

建文四年（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永乐帝下令重修《太祖实录》，而负责监修的官员就是曹国公李景隆和忠诚伯茹瑯。无须赘言，他们曾是建文政权的重臣，也是永乐帝攻打南京时率先投降的变节者。永乐帝命他们两个降臣作为编修实录的代表，意在提高再版《太祖实录》的权威性。可以说，历经百战的永乐帝不仅残暴，也精于谋划。

再版《太祖实录》只用了八个月的时间，至永乐元年六月就完成了。但永乐帝似乎不太满意，永乐九年（1411年）下令第三次编修《太祖实录》，此次编修历时七年，永乐十六年五月完成，最终成果流传至今。至于前两版的《太祖实录》，则在编修期间废弃了，至今已经无法得知前两版的具体内容了。

几次修订《太祖实录》的目的自不必说，永乐帝是要赋予自己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正当性。重修之后有很多内容被篡改，前面的叙述中，我们也举出过几例。后世史书都认为“嫡子”问题是永乐帝编修第一版实录的最大动机。前两版实录都已不存世，我们无法了解其具体内容，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第一版实录中很可能记载着永乐帝庶出的史实。

“皇位继承”合法化的布局

《明通鉴》作者夏燮（1800～1875年）遍览群书，搜罗史料，对永乐帝几次修订《太祖实录》的前因后果做出如下推测。

第一版实录不仅记录了永乐帝庶出的事实，还记载了周王与永乐帝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再版实录的编纂者为了讨好永乐帝，篡改了这一事实，即永乐帝与周王都是马皇后的亲子，而皇太子、秦王、晋王都是庶出。再版实录中，永乐帝变成了太祖的嫡长子，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不存在任何障碍。

永乐帝担心将皇太子定位庶出，反而会招致后世的疑议，于是，下旨姚广孝（道衍的俗名）第三次修订实录。第三版实录将皇太子、秦王、晋王、永乐帝、周王都定为马皇后的亲生儿子，自此，这种说法成为明朝官方定论。但第三版实录又保留了永乐帝与周王“同母”的记述，前后提法自相矛盾。永乐帝死后编纂的《太宗实录》同样沿袭了这种矛盾的提法。

不管怎样，夏燮的观点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确凿的根据。他推测的依据，就是在永乐帝下旨第三次重修实录的诏书中曾批评再版实录的编修者“心术不正”。夏燮就依据“心术不正”四个字，认为这是李景隆等人谄媚永乐帝，并由此延展推测整个编纂实录的过程。至于推测是否准确，至今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自此，庶出的永乐帝在正史中被确定为皇后“嫡子”。已经握有至尊皇权的永乐帝轻而易举地篡改了历史。《太祖实录》庚子（1360年）四月癸酉一节记载了永乐帝的出生：

皇第四子生即 今上皇帝 孝慈皇后出也。

永乐帝背负着篡权与杀戮的污名即位，他在“革除”建文年号的同时，为清洗污名、证明自己皇位继承的合法性而务必首先要进行的布局就是重修《太祖实录》。

非法即位的合法化

按照中国传统的“正名”论，可以说，永乐帝采用了“革除”建文及篡改史书确定“嫡子”身份的策略一步步为自己继承大统正名。但这些措施不过是为了敷衍皇室内部各种限制，还不能成为他注定要做皇帝的积极根据。若使他的非法即位合法化，仅凭太祖朱元璋的权威还不足为恃，必须借助超过他父皇的权威来为自己正名。那就是“天命”，唯有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在”，才能堵住天下悠悠众口。任何王朝、任何皇帝都要借助“天命思想”来证明自己的王朝或帝位的正统性。“天命思想”中具备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权威与理论。没有“天命”的依据，就无法保障新天子的诞生。永乐帝在数次拒绝“劝进”后，不得不“顺天应人”（出自即位诏书）举行了登基仪式。通过登基仪式正式向天下表明自己是奉天命继承大统。

若永乐帝即位是天命所归，那么，他此前的所作所为就是顺应天命所为。由此推之，靖难之变就是奉天意以靖国难，有功之人就是“奉天靖难”的功臣，应该大受表彰。

永乐帝从出生到即位的生涯全都浓缩在官纂史书《奉天靖难记》中，无论从皇家血统还是从天命角度看，这部书都成功地虚构了新天子的诞生。

但是，仅凭这些虚构还不足以为自己继承皇位正名。若没有实质性的作为，这些也不过是篡权大戏中的敷衍之策而已。永乐帝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公认为大有作为的皇帝，是他在背负着篡权与杀戮的罪名之外，真正实现了“永乐治世”。他要以无可否认的“盛世”来

为自己正名、确立永乐政权的基础。确切地说，他的终点不是大明朝的皇帝，而是要成为中华世界的天子。

盛世的证明——《永乐大典》编纂工程

在学界，有观点认为永乐帝的对外成就显著，但内政平平。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如同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到的永乐帝辉煌的对外成就，在永乐二十二年的治世中，他在内政方面同样成就了一番事业，成功塑造了中华天子的形象。

为了证明取代建文乃是天命所在，永乐治下天下必为盛世，盛世之下必然文运昌隆，永乐帝致力完成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大量学者编修《永乐大典》。

再版《太祖实录》完成不久，永乐元年七月，永乐帝下令翰林侍读学士解缙搜集当时保存的各种典籍，编纂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即将古今各种典籍按照类别和内容，原本抄录或摘其精要。编纂工作历时一年有余，于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完成。这部书最初命名为《文献大成》，按照永乐帝的要求，从经（儒家经典）史（历史、地理）子（诸子百家）集（文学）以至天文、医卜、技艺，等等，涵盖了所有领域的典籍，终成一部鸿篇巨制。

大概是由于永乐帝的一再催促而在仓促之间完成的关系，完成后的《文献大成》内容相当不完备，与永乐帝期望的目标相去甚远。永乐帝大为不满，下旨命姚广孝等人重新编修。此次编修不仅组织邀请了民间学者，还派遣通晓典籍的官员到全国各地重金收买书籍。

最后，由二千一百六十九人按照太祖的《洪武正韵》中韵部的顺序将搜集来的各种典籍分类排序，总共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书，在永乐五年十一月上呈永乐帝。实际上，全书是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

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构成的大百科全书，根据年号命名为《永乐大典》。真正符合“永乐盛世”的中国最大的类书诞生了。

“制作者”永乐帝

靖难之变余波未平，永乐帝就急于编纂《永乐大典》，意欲何为？最终就是要上演一出“永乐盛世”来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在。但一般来讲，学界更加关注的问题是在这个大前提下，永乐帝编纂《永乐大典》的直接目的又是什么。普遍认为，永乐帝让反对他即位的文人参与编纂《永乐大典》，旨在笼络天下的读书人。的确，让这些文人编纂一部足以留名青史的巨著来弱化他们的不满情绪，这也是事实。

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让天下所有的读书人都参与编纂，反倒应该回到永乐帝编纂大典所要采取的“类书”方式这一点上分析他的目的。永乐帝在《永乐大典》序言当中如下表述：

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

圣王之所以为圣王，在于身为秩序统治者能循天道而创礼乐、制度。正因为他们“圣王作者”，才得到了上天的支持。永乐帝按照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形式而非“丛书”形式归纳历代典籍，恐怕也是意在“圣王作者”的原因吧。

作者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将天下万物万象归类到各类典籍中。永乐帝依据自己的标准评判古今典籍，重新编修为类书，就是意在划定万物万象的秩序。天下万物万象皆散载于古今各典籍之中，篇帙浩穰，不易查阅。正是通过他的“制作”分类归纳统而为一，一部旷古绝今的文化巨典在永乐帝手中诞生了。而之所以能够完成这部巨典，

就在于他是天道的实践者，也就是天子。他把自己视为“圣王者”，也就是统治天下的圣王。

而且，《永乐大典》收录的各种典籍按照《洪武正韵》韵部顺序归类，这表明大典附带了同为“制作者”的太祖朱元璋的权威。也就是说，《永乐大典》由于是两位天子的“制作物”而成为带有双重权威的盛世象征。这一点是我们要格外注意体会的。

《永乐大典》的命运

《永乐帝大典》最初收藏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之际运往北京，收藏在紫禁城，直至明末清初毁于战火。其间，嘉靖四十一年（1561年）为防止正本损失，嘉靖皇帝下旨誊写了副本，这些副本免于战火，由清朝完整继承下来。众所周知，乾隆帝（1735~1795年）在位时期，编纂中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时，参考了《永乐大典》的很多内容。

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副本伴随着清王朝的悲惨命运，或毁于战火，或被外国侵略者劫掠，损失过半。尤其在清末“亚罗号战争（1856~1860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义和团运动（1900年）”等混乱中惨遭浩劫，遗失国外。据统计，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总共不足八百卷，只占原来总数的百分之三。现在，《永乐大典》残本已经复印、出版，供国内外学者参考、研究。与《四库全书》不同，《永乐大典》完全忠实于原典，据说没有删改一字一句。清朝时期根据《永乐大典》复原了不少书籍，如宋代的基础史料《宋会要》就是其中之一。若《永乐大典》得以保存，那么，很多彻底遗失的书籍典章就会重现人间。每每想到那些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消失的珍贵典籍，就觉得无比可惜。

（2）德治的本质

《圣学心法》

通常认为，永乐帝尊敬唐太宗李世民，效法唐太宗推行内政。当然，这种看法带有片面性，但它的理由也很明显，那就是永乐帝觉得唐太宗与自己一样，都属于非法即位。

杀了作为皇太子的哥哥和弟弟而即位的唐太宗在中华大地开创了旷古绝今的大唐盛世，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被誉为“千古一帝”，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被后世树为典范。翻开中国历史就会知道，不只是永乐帝，很多皇帝都将唐太宗视为榜样。

对为政者来说，所谓实现中华盛世，说到底就是再现“贞观之治”。尤其对于与唐太宗有相同境遇的永乐帝来说，“贞观之治”就是他追求的典范。为实现“盛世”，他效仿唐太宗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为数众多的典籍编纂工作就是其中之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作为帝王规范的《圣学心法》的编纂。

唐太宗晚年为了教导不肖的皇太子李治（后来的唐高宗）为君之道，编纂了训诫书《帝范》。《帝范》由“君体”到“崇文”共十二篇内容构成，是一部讲解历代帝王治国之道的帝王心得书。永乐帝与之相同，在永乐七年（1409年）为皇太子朱高炽（后来的仁宗洪熙帝）编纂了《圣学心法》，汇集了先儒的典籍及语录，阐释了帝王应有的典范。他标榜尧舜以来“道统（圣贤之道的传统）”的传承，将“治国平天下”的要略全部浓缩到这部书中。

但这部书却没有涉及“治国平天下”的实际层面，也与永乐政权的实际政务脱节，仅仅是理想化的空泛理论，因而对后世的影响并不

大，反倒不如作为帝王学范本的宋代以来的《大学衍义》及《资治通鉴》。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永乐帝借助唐太宗之名为自己正名的一种手段。《四库全书》的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甚至非常严厉地批评《圣学心法》是敷衍事实的欺瞒之书。或许应该说，永乐帝在《圣学心法》上的谋算是失败的。

《大全》出而经说亡

从意义层面考虑，与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圣学心法》不同，同样是效仿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另外一次典籍的编纂却在后世引发了各种议论，即永乐十三年（1415年）《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三本“大全”的刊行。效仿唐太宗时编纂《五经正义》，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永乐帝命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读杨荣等人编纂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解读书，旨在将此前对“四书五经”的各种解释统一规范为三本“大全”的解读。

按照这一方针，完全站在“朱子学”立场解读“四书五经”，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永乐十三年九月，三本“大全”完成了。在编纂过程中，《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是参照了与朱子学相关的各种讲义而完成的，而《性理大全》则是汇集了宋元时期性理学（朱子学）相关的专著及各家的语录、诗文而成。

“大全”刊行之后，立即配置到中央国子监及各地方学校作为解读“四书五经”的标准教科书，可见永乐帝对“大全”的重视程度。同时，规定科举考试的内容及标准完全依据这三本教科书的解释，对于此外的所有解读一律不予承认。通常认为，此后，读书人的自由思想完全被禁锢在朱子学的思维中。总之，后世对“大全”的评价不高。

不仅如此，后世的评价认为，三本“大全”编纂时间不到一年，内容难免疏漏，而且是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都有蓝本的前提下抄袭而成，要将这样粗制滥造的东西当作官方教科书来统一读书人的思想，这对于明理的读书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慨叹，在某种意义上是悲怆的：

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

（《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

与《圣学心法》不同，必须承认“大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

刊行的意义

永乐帝刊行“大全”的意义究竟何在呢？他在序文当中做了如下叙述：“《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之道明，则天地、圣人之心可见，而至治之功可成。”天道的实践者自然是天子，但这不过是为了强化“大全”权威性的冠冕堂皇的套话，并非永乐帝的本意。既然“大全”是由官方强制推行的，必定有更直接的政治目的。

若从结论来说，永乐帝编纂、推行“大全”旨在将朱子学定为官方正统儒学，以此确立国家政治理念。

南宋时期已经集大成的朱子学，当初被作为“伪学”受到打压，元朝时期却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但元朝推崇朱子学并不是用来强化政治理念。李焯然先生认为，明太祖尊崇儒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明朝专制体制，但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以朱子学为核心的思想统治体系。永乐帝编纂、刊行“大全”则标志着朱子学作为儒学之正统上升到了独尊地位。

若再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种结果也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何在？如前所述，太祖朱元璋确立的皇权专制体制，是基于儒家理论的“体制性归结”，那么，若要强化这种体制，与之相匹配的独一无二的统治思想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在“皇帝一官一民”的国家政治统治身份秩序确立之后，接下来就要求为政者赋予政治统治秩序以理论根据，即确立统治思想体系。“大全”的刊行是明朝专制体制的必然结果。

可以说，太祖建立了政治、经济上的专制体制，永乐帝则完成了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体系。“大全”的刊行标志着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朱子学”中，这种指责不应该由永乐帝一人承担。作为太祖朱元璋的后继者，他只不过完善、强化了朱元璋所建立的专制体制并使之延续下去，而且是和他的父亲朱元璋一样，强调儒学治国，并以天子的身份完成的。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两位“天子”彻底完成了明朝专制体制的确立。

内阁的设置

永乐帝在内政上的成就当然不止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他在具体的行政制度等方面也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强化专制体制。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设立内阁制度与重用宦官。

如前所述，在建立专制体制的过程中，太祖朱元璋实行独裁统治，在伴随着杀戮的政治改革中，自古以来的宰相制度被废除了，所有权力集于皇帝一身。按照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力学原理，一个无与伦比的专制皇帝在明初出现了。朱元璋甚至在《皇明祖训》中三令五申，严禁恢复宰相制度，以防止皇帝独裁体制受到动摇。

当然，朱元璋建立的专制体制最初并不完善。废除宰相制度完成了权力的一元化，同时，也增加了皇帝的负担。此前，宰相协助皇帝

处理政务，宰相废除后，一切政务都归皇帝裁决。恐怕这种结果并非朱元璋所愿。

据统计，即使是普通的政务，皇帝每天都要批阅两百篇以上的奏折，处理四百件以上的案件（《太祖实录》洪武十七年九月己未[1]）。即便是励精图治的朱元璋，每天要处理如此繁重的政务，也必定异常辛苦。

为解决这一问题，朱元璋在废除宰相官职后，立即设置了“四辅官”协理政务，随后，又仿效宋制设置了“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减轻政务负担。虽然他们作为近侍常年在皇帝身边听用，却没有实权，地位仅相当于正五品官职，严防出现揽权弊害的情况。殿阁大学士只不过是皇帝独裁体制下的咨询机构，不能直接接触到机密。

永乐时期，永乐帝改良了殿阁大学士的制度，把它升格为“内阁”。洪武三十五年（1401年）七月，永乐帝即位不久，即命翰林侍读解缙等七人入文渊阁，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参与机密政务。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初设置的内阁。与殿阁大学士相同，虽说官品低微，但已经从曾经的“顾问”地位一跃成为有权“参与机密”的重要职位。

正因为是在明初

永乐帝即位后，在政权尚未稳固的情况下创设内阁，意图何为呢？可能是由于靖难之变造成的混乱，官僚机构尚不完备，诸多问题亟待处理，急需组建直属于皇帝的顾问机构协理政务。永乐帝从翰林院精英中选拔敢于锐意进取的才俊协助他共同处理政务。

永乐帝最初选拔的七人都是建文旧臣，与他也没有过任何交往。而且，七人之中，年龄最大的胡俨当时也只有四十三岁，其余六人都是三十几岁的青年。永乐帝在建文旧臣中选拔青年才俊，旨在亲自培

养他们成为自己执政的基础，同时，利用他们的才干与冲劲打开局面。在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下，这是能够快速解决内乱遗留的诸多问题，让政治局面迅速回到正轨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选择。

假若在稍长的一段时期内考察内阁制度作用的话，那么，它也是强化皇权专制体制的一环，这无须赘言。

宰相制度的废除弱化了官僚个人的权限，取而代之的是官僚机构，即实行了六部负责制。内阁是与官僚机构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确切地说，它是皇帝专属的辅佐机构。内阁是皇帝想要完全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的、彻底排除官员掣肘、能够行使绝对皇权而专门创设的机构。也可以说，内阁的创设标志着明初专制体制的强化过程已经到达最后的阶段。

明朝中期以后，内阁大学士兼任六部尚书等要职，曾经的低等官员一飞冲天，身居高位。首辅大学士的权限已堪比宰相，至明末张居正任首辅时，权力几乎达到顶峰。

但即便如此，内阁大学士也必须首先获得皇帝的信任，才能拥有那样的权力。这与以官僚机构为后盾对抗皇权的宰相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正是在皇帝独裁体制处于过渡期的明朝初期，才会产生内阁制度。

宦官的跋扈——东厂的恐怖

宦官政治的出现与内阁制度的产生大体相同。为防止宦官干政，太祖朱元璋采取了彻底打压的政策，与之相比，永乐帝则在各方面积极利用宦官。据《明史》列传记载，宦官拥有出使、远征、监军、镇守及特务等大权，全部都是从永乐年间开始。如永乐帝任命宦官为出使国外的使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郑和下西洋；或者派遣宦官到全国

各地任军队的监察官及镇守官。其中，最能体现出永乐帝对宦官信任的就是恶名昭著的特务机关“东厂”。众所周知，太祖朱元璋的恐怖政治依靠的就是“锦衣卫”的间谍活动。锦衣卫是直属于皇帝的禁军之一，它的职能是派遣众多特务、间谍监视、刺探全国臣民的言行。锦衣卫有别于其他正规的官僚机构，它拥有独立的裁判所，即从逮捕、审问到处刑的一整套程序都可以在锦衣卫内部完成。由于锦衣卫审讯、处刑的方式过于残酷，朱元璋晚年的时候取消了锦衣卫，但它在强化皇帝极权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永乐帝一方面恢复了锦衣卫，同时又新设了东厂，派遣宦官充当特务、间谍，加强了对臣民的监视。

朝野对永乐帝即位之前的事情有所反应，永乐帝对此极其敏感，他也一定亲身感受到了除了一部分亲信外其他朝廷官员及民众对他的强烈不满。无论他采取怎样的措施，都不可能一举消除篡权的污名。

有别于肃清“奸臣”的政策，永乐帝觉得有必要下一剂猛药压制官民对他的不满。他采取的对策就是借助锦衣卫和东厂的特务活动，进一步强化政治恐怖。后来，这两个机构被称为“厂卫”，是专制皇帝的忠实走狗，成为所有人都恐惧、忌惮、讨厌的存在。

内廷与外廷的联系者

一般认为，永乐帝宠信宦官的理由之一，是由于靖难之变后期建文帝身边的宦官暗中提供情报，永乐帝才能一举攻下南京结束内乱，因而，他对宦官格外倚重。不能否认，这的确是事实，但原因绝不会如此单纯。

诚然，永乐帝特殊的即位方式加速了宦官的专权。永乐帝需要绝对信任的部下，我们能够理解他在宦官中挑选这些亲信。但后来出现

的宦官作乱，我们也不能把原因都归结到永乐帝的个人嗜好上。重用宦官与创设内阁相同，都是皇帝专制体制强化产生的必然结果。

明朝初期专制主义高涨，在以皇帝为中心的极权专制统治体制确立的过程中，皇帝与官员之间的差距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为了维护皇权的威望，皇帝切断了与官员的直接接触，在内廷（皇帝私生活的场所）与外廷（皇帝的政治场所）之间树起了一道巨大的屏障。内廷与外廷之间的联系人既要是皇帝的亲信，又要是住在内廷的人，那当然只能是宦官。为了能够与朝廷官员顺利地沟通，或者说便于监视官员的行动，宦官成为必不可少的存在。

后来，内阁地位提升、首辅大学士等同于宰相之时，利用皇帝近侍的特权掌控大权的仍然是宦官。

作为明朝宦官之首的“司礼监”不仅拥有行政权、人事权，还握有东厂的监察权，权力极大，有“影子内阁”之称。即便是以“铁血宰相”之名著称的张居正，若没有宦官的帮助，也不可能获得首辅大学士的地位。朝廷官员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要仰宦官的鼻息，不知不觉中，谄媚宦官的风潮充斥官界。

专制皇帝的影子

这些想要把持大权不放的宦官，若是一旦失去皇帝的宠信，就如同板上鱼肉，任由皇帝处置，没有任何抵抗能力。那时，无论拥有怎样的权力、地位，都不能保住项上人头。明代宦官与在幕后操控皇帝，甚至连皇帝即位都可以随意决定的汉唐时期的宦官有本质的不同，这一点要格外注意。明代宦官对皇帝的寄生程度越发地强化了，是如同专制皇帝的影子一般的存在。

内阁和宦官作为明代政治表与里的主角，是在永乐帝的带领下登场的时代的产物。在明初这一时期，上演着追求盛世的大戏，恰恰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成为可能。与圣王治世相距甚远的现实，或许在永乐帝继承太祖朱元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天子名义下的皇帝极权的强化和充满着痛苦呻吟的专制统治，才是永乐帝在新政权起航时标榜的“德治”口号背后的本质。

[1]. 《太祖实录》洪武十七年九月己未条：“给事中张文辅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故有此统计数据。——编者注

8 超越忽必烈

（1）四夷来朝

稳妥的，和平的

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变”，对明王朝的国防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洪武时期，太祖朱元璋针对北方蒙古族及东南沿海的倭寇，确立了专守防卫的国防体制。一方面，对蒙政策采取藩王分封的策略，在长城沿线筑起一道屏障；另一方面，对倭寇的袭扰则实施了海禁与海防的对策，在东南沿海建起严密的防御体系。防御体系形成后，洪武朝后半期国防上暂时获得了安定局面。

但是，“靖难之变”引发的国内混乱不仅导致了国土疏于管理，明朝国防体制也受到动摇。

其一，内乱导致了北方藩王防卫体系陷入瘫痪，一直被打压的蒙古族趁机重新得势。其二，内乱期间，海禁、海防体制废弛，诱发海上走私贸易及倭寇扰边抬头。可以说，不管永乐帝是否愿意，他即位伊始就面临着重建南北国防体制的问题。但是，内乱之后，明朝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攻势解决国防问题。永乐政权首要之务是解决内政问题，全力巩固政权的基础。因此，在外政方面的主要对策只能是暂时

维持现状，采取稳妥、和平的招抚政策，为内政建设营造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

利用瓦剌牵制鞑靼

当时，蒙古草原有两个强大的部族，一个是源自蒙元系统，位于东部地区的鞑靼部，另外一个位于西北部的新兴的瓦剌部。特别是瓦剌部迅速崛起后，大大改变了蒙古草原原有的势力版图。在靖难之变最高潮时，瓦剌部派遣使者向燕王示好，并与鞑靼部保持距离，不断加强自己的实力。

永乐帝对蒙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互相牵制，彼此消耗实力。最初，明朝很重视鞑靼部，多次让他们来大明朝贡，但他们始终没想要归附明朝。反而是瓦剌部在永乐六年（1408年）主动来大明朝贡请封，永乐帝分别册封三位部族长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与之结成君臣关系。至此，利用瓦剌牵制鞑靼的体制初步完成。

这期间，明朝对蒙古草原的东西两端都采取了招抚政策。在东部的满洲地区，明朝积极招抚、拉拢当地女真族，使得众多女真部落归附大明朝廷，并逐一编入卫所。洪武年间设置的“羁縻卫所”仅有五个，到永乐中期数量已经有将近二百个，就这样，大明不知不觉中构筑起对蒙古的严密监视体系。

另外，在蒙古草原的西部，对于天山山脉东端的哈密王家，册封其王为“忠顺王”，设置哈密卫，作为对蒙前线基地，采取间接统治的策略。哈密王家原本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控制住他们，从对外贸易及战略角度出发都是不可或缺的措施。至此，永乐初期，由女真、明朝、哈密构建的从东、南、西三个方向的对蒙包围网正式形成。

不择手段奖励朝贡

与北边一样，在东南沿海地区，永乐帝依然采取怀柔政策。

永乐帝即位不久，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九月，针对东南沿海地区活跃的国内外走私贸易，他颁布诏书，大致内容如下：

凡番国之人，即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赉。遣还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1]

由于内乱而无暇管理的沿海走私贸易者若能回归到传统的政治秩序中，则过往之罪绝不追究。这一措施究竟能有多大实际作用暂且不说，重要的是永乐帝执着于朝贡的形式这一事实，可以了解到他所要建立的国际秩序的模式。和朱元璋一样，他规定只能采取朝贡贸易的形式进行国际贸易，在他看来，利用朝贡制度谋求国际秩序的确立是第一重要的。

但永乐帝与太祖朱元璋的不同点在于，为了奖励朝贡，永乐帝几乎不择手段。前述对走私贸易者的宽大措施就是其中的一例，总之，只要能按照朝贡的程序从事贸易，哪怕稍有违规也不会追究。对于周边各国的朝贡使即使携带违禁品，只要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怀柔远人”为理由不予处罚（《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这是太祖时期想象不到的宽容对待。

复兴华夷秩序

永乐帝如此执着于朝贡制度的理由何在呢？

原因之一，当然是与周边各国缔结君臣关系，确立东亚国际秩序。洪武时期初步形成的国际秩序在建文年间废弛，永乐帝即位后谋

求重建国际秩序。这的确是新政权要面临的政治诉求。永乐帝即位后立即向周边各国派遣使者，积极促进各国来华朝贡，这些国家包括朝鲜、安南、日本、暹罗、爪哇、琉球、占城等国。永乐帝促进各国朝贡，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为了洗刷篡位的污名。因而，他觉得必须要树立起天子的形象。

越来越多的国家来华朝贡，成为蛮夷之国仰慕有德之君的证明。对永乐帝来说，四夷来朝是为自己正名的必要条件。这也是永乐帝执着于四夷来朝的最重要的原因。

永乐帝在外政上最终达到的，是在四夷朝贡的盛世表面下所包含的复兴国际秩序的实质。前述的对鞑靼与瓦剌的招抚也可以说是其中一环。至少在永乐帝即位后的数年间，就没有过利用武力维持国际秩序的想法，在军事方面尽量不动用武力，保持平静。在永乐帝积极促进四夷朝贡的政策推动下，以大明王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逐步建立起来。

与日本的关系

明朝与日本之间正式缔结国交是在永乐时期。

日本自公元5世纪“倭五王”时期后，就从中国册封体制中脱离出来，而遣唐使废止后，日本就完全脱离了华夷秩序体系，独自开展外交。宋元时期，中日两国间的正式国交中断了，仅维持着民间的贸易往来及留学僧之间的文化交流。即便有忽必烈的威胁，也没能改变日本的这种外交方式。

明朝建文年间，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当时，室町幕府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结束了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多元化状态，然后，一反历来的外交政策，转而走起依附中国的外交路线。学界曾有观点

认为，足利义满改变外交策略旨在利用明朝的权威维持其凌驾于天皇之上的绝对地位。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中日之间贸易往来获得的巨大利润是足利义满决定向明朝称臣的最大理由。

太祖朱元璋在位时，足利义满就曾两次派遣使者来华，谋求恢复中日之间邦交。但在名义上，当时的足利义满将军只不过是天皇的陪臣，明朝方面并不把他当作谈判对手。确切地说，太祖朱元璋认为的日本国王是当时在日本北九州大宰府任南朝征西将军的怀良亲王（明朝史书记载的是良怀）。

这大概是因为怀良亲王长期控制对华交往的窗口大宰府，朱元璋才会误认为亲王就是日本国王。或者，当初斩杀明使表示反抗态度的亲王也肯定想要利用明朝的权威建立自己的政权，即后来的“九州王朝”。太祖朱元璋与亲王之间缔结君臣关系，本身就是日本政治多元状态导致的结果。

因此，足利义满在统一南北朝成为日本实际统治者之后，正式向明朝示好，谋求恢复中日邦交。此时，他使用的名号是“日本国准三后源道义”。“源道义”的“源”起于足利氏，是源氏的正支，“道义”则是足利义满出家时的法名。大概他也在犹豫是否自称为“日本国王”吧，最后，使用了“准三后”这种没有任何实际官职的名誉称号，想要与明朝修复邦交。应永八年五月，若换成大明的年号，则正相当于靖难之变激烈进行中的建文三年（1401年）。

日本国王源道义——再次成为册封体制的一员

接受日本朝贡之后，建文四年（相当于日本应永九年），日本遣明使归国之际，建文帝也派明朝使者同行。足利义满特意前往兵庫港迎接明使，继而在北山第招待、接见明使。足利义满按照明朝的礼仪方式大礼拜领了中国皇帝的国书，国书中写有“日本国王源道义”的

文言，并颁发明朝“大统历”，以示奉正朔。虽然无法确认日本与明朝之间册封的事实，但日本加入了明朝华夷秩序是确定的，中日两国正式恢复了久违的邦交。

但中日关系进展并不顺利。明使在日本滞留期间，传来了燕王篡位的消息。应永十年（相当于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为以防万一，足利义满分别准备了两份国书（呈给建文帝的和呈给永乐帝的）然后送明使回国。回国之后燕王即位，使者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递交了送给永乐帝的国书，内容是祝贺永乐帝登基，特献上礼品。

与上次的国书不同，这次足利义满以“日本国王臣源表”开头，毫无顾忌地自称“日本国王”。大概是因为得到建文帝的承认而信心大增吧。永乐帝即位伊始，日本国王就派遣使者前来祝贺，永乐帝也非常感动，热情款待了日本使者一行。次年，永乐帝赐予足利义满龟纽金印和百道堪合，正式册封他为“日本国王”，以表彰其忠心。至此，永乐帝与足利义满之间正式结成了君臣关系，日本再次成为册封体制的一员。

互相依赖——永乐帝和义满

此后，义满每年都派使者朝贡，并应明朝的请求抓捕倭寇押送到明朝。而永乐帝每次都派使者慰劳，对义满大加赞赏，并赐予很多奖赏。特别是永乐四年（1406年）封阿苏山为“寿安镇国之山”，亲自作碑文赠给义满。将日本的山川等同于中华山川对待的措施是永乐帝对义满示好的最大证明。在周边各国国王之中，大概永乐帝很希望极为恭顺的义满成为大明的外臣中的典范吧。

因此，永乐六年（应永十五年）义满的突然去世肯定给永乐帝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次年，永乐帝派遣使节赴日本吊唁，在义满的灵

前宣读“祭文”，以祈冥福，赐谥号“恭献王”。二人始终都没有谋面，但从谥号中可以体会到永乐帝对义满深深的信赖和哀悼之情。

永乐帝如此厚待义满，原因之一，当然是义满对中国异常臣服。义满爱好中国文化，不仅搜集宋元时期的书画，甚至身着明朝服装与明朝使者共同观赏红叶。当时的日本确实流行过中国文化的热潮，但义满对中国文化的热衷还是有些过分了。不过在永乐帝眼中，义满作为“蛮夷”的首领如此仰慕中华文化，绝不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永乐帝也有他自己的想法。时隔九百年，再次将日本纳入册封体制中，不仅稳定了东亚国际秩序，更是自己成为圣王的证明。它意味着忽必烈都无法实现的愿望在自己手中完成了，这不恰恰标志着“永乐盛世”的到来吗？永乐帝和义满当然是互为对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

并非“屈辱外交”

15世纪初，在永乐帝的推动下，迅速重建起东亚国际秩序。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于，不仅是中国方面在推动，周边各国同样需要借助中国的权威。元朝势力的衰退对周边各国的政治变动造成多大的影响暂且不提，只是如同受到元明革命的连动影响，周边各国内部也相继发生政权更迭。

在朝鲜半岛，随着高丽的衰弱，1392年朝鲜王朝兴起并取而代之，永乐帝时期正式接受明朝册封。同在1392年统一南北朝的日本，也在时隔九百年之后主动向明朝称臣。在安南，胡氏从陈氏手中夺取了政权，永乐初期来华朝贡请求册封，但由于其夺权即位而招致疑议，最后发展成为明朝的武力介入，平定安南。谋求自身政权的正当化以及贸易往来，是这些国家来华朝贡请求册封的主要目的。

14、15世纪时期，伴随着东亚地区社会、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产生的倭寇肆虐、贸易圈的扩大等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当然这也暗示着东亚一体化的趋势与东亚各国政治层面的发展有密切有机的联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日本加入册封体制，它象征着东亚在政治上的一体化。如果日本愿意，东亚地区确实有接纳它的共通基础。

但东亚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周边各国在明朝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辐射下完全失去了主体性。至少它们根据自己的判断自主行事，这一点务必要注意。华夷秩序只不过是它们决策的准则之一，究竟是利用它还是无视它，完全在于周边各国的自主决断。相反，为了实现“四夷朝贡”的盛况，明朝有必要进行相应的理论宣传与实践。

因此，义满向大明称臣纳贡并不是“屈辱外交”，以此为由对他的批评、指责都大错特错了。

义满只是遵循当时的国际秩序登上了东亚外交舞台。除了室町幕府第四代将军义持以外，其他继任的将军几乎都沿袭了义满的外交政策。

在日本学界，主要批评义满是东亚朝贡体制开端的罪魁祸首。这种观点在二战前、二战期间时局多艰的日本学界非常流行。今后，日本学界对义满的评价会发生何变化尚不明确，但是，我不希望它走上最近抬头的、向战前回归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方向。

父子相同

通常认为，永乐帝将唐太宗视为终极目标。我也不想正面否定这种观点。但是，若从结论而言，这种观点过于片面，它只着眼于两个人人生境遇的相似性，却完全忽视了唐代与明代的时代差异。唐代以

前，中国还不是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但是，明朝建立前，蒙元世界帝国已经存在了。这一点不同非常重要。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强调元明之间的连续性，1969年他提出一种新观点，认为永乐帝以元世祖忽必烈再世自居。在当时，这种观点过于激进，赞成、支持者很少，不足以改变传统认知。但是，现在看来，我们不得不敬服宫崎先生卓越的见识和敏锐的洞察力。

实际上，鲜为人知的是，永乐帝的父亲太祖朱元璋也是忽必烈的信奉者。每当有事，他都会言及忽必烈在位时“四夷朝贡”的盛世，公正地评价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四海内外莫不臣服”这句话最能代表他言及忽必烈时的深思与向往。考虑到北元势力，他不能直接赞美忽必烈，但可以肯定他经常在心中欣赏忽必烈。对于曾经身为元朝人的朱元璋来说，忽必烈就是近在咫尺的存在，这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但大明开国不久，他身为皇帝只能致力于稳固政权基础，不可能像忽必烈那样开疆拓土。对他而言，建立起大明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就已经足够了，不必要的对外征伐只能是浪费民力和财力。他在《皇明祖训》中规定大明为“不征之国”，严禁随便使用武力，这也正是他的政治体制的表现。他怀抱着对“忽必烈盛世”的憧憬，却始终没能成为忽必烈。

但是，永乐帝却不同。

应该效仿谁

永乐帝展开了与朱元璋完全不同的积极的外交策略，他在位期间，明朝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虽然对蒙古及安南诉诸武力，但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周边各国来华朝贡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洪武时期。在东北地区黑龙江（阿穆尔河）下游流域设置奴儿干都司，将满

洲完全置于明朝管辖之下。以对西藏的分割统治为开端，和西方的交流也日益频繁。洪武时期在西南地区云南等地实行的“土司制度”此时更加完善了。

据说，永乐帝积极的外交策略，与他青年时在北平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北平是元朝的故都元大都，是众多民族杂居的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国际性大都市。它与完全是汉人居住的南京相比，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永乐帝自然而然想去外面开阔眼界，这与他个人雄才大略、气宇轩昂的性格相辅相成，正是这种开放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外交上的积极进取。

的确会有这方面的因素吧，可以想象北平的国际化氛围对他的思想形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建设元大都的忽必烈也肯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尽管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他即位的非法性吧。

如前所述，永乐帝即位之时，就以太祖朱元璋的继任者自居。但若他仅满足于太祖的继承者，就无法洗刷篡位者的污名。若想使“王朝内革命（即篡位）”合法化，创造出新的皇统，就必须开创一个任何人都要认可的“盛世”，那是对太祖政治的继承，更是一种超越。

那么，怎样做才能超越太祖，获得众人的认可呢？那当然是实现太祖时代从未有过的“四夷朝贡”的盛世，塑造出一个真天子的形象。这种情况下，永乐帝应该效仿的不是唐太宗，必定是元世祖忽必烈。

开创新中华

忽必烈君临横跨欧亚大陆的“天下”，统治着中华帝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永乐帝以忽必烈再世自居，想要接近并超越忽必烈，以此

为自己正名。

忽必烈是否将成为中华世界的天子作为目标，这里暂不讨论。依据中国式理论即华夷秩序的观念，四夷朝贡的“忽必烈盛世”被赋予特殊意义，忽必烈被推上“真天子”的神坛。太祖朱元璋也是因此推崇忽必烈，而在这一点上，永乐帝和朱元璋的出发点没有区别，都是遵循传统的华夷秩序。

永乐帝热衷于建立华夷秩序，而太祖朱元璋更重视内政。因此，可以说，永乐帝既是太祖朱元璋的继承者，同时，又是元朝或者说忽必烈的后继者。他超越了朱元璋，开创了一个新的中华。永乐帝去世后，被赋予了与“太祖”同等尊贵的“成祖”的庙号，从他的成就来看，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永乐帝即位之后，再度上演了一出堪比元明革命的大戏。

（2）扩大的中华

郑和的南海之行

在永乐帝积极推进的各项外交政策中，大放异彩的当数由宦官郑和担任总司令官的南海远征。从规模程度来看，真正空前绝后的是从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九年间的七次远征海外。最后的第七次远征时，已经是永乐帝的孙子宣德帝在位时期，所以，永乐年间的海外远征只有六次。

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队远征海外。例如，第一次远征时，随行的士兵就有二万七千八百余名，舰队中大的战船就有六十二艘，还包括很多小船。据统计，被称为“宝船”的最大战船全长约一百五十米，船宽约六十米。确切数字可能或有出入，但可以想象到“宝船”是相当规模的大战船。只有这种规模的大航海才足以载入史册吧。

他们不仅数次访问东南亚诸国，而且每次大航海都延长航线，到达过印度洋、波斯湾、红海沿岸诸国，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途经访问的国家多达三十几个，每次航海归来，都带着出访国的使节回国。郑和七次大航海虽被称为“南海远征”（中国称为“郑和下西洋”），但并不是武力征伐，而是以建立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为目的的访问。

郑和大航海尽管规模宏大，但它真正伟大的意义在于它开始的年代是15世纪初叶，比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提前一个世纪左右。最早到达郑和活动的主要海域的欧洲人是著名的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他在阿拉伯人向导的指引下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港口时，已

经是1498年了，远远落后于郑和。达·伽马在非洲东海岸停靠补给时，当地居民还隐约记得郑和之事，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给予访问国怎样的震撼力了。

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航海集中在15世纪初叶，之后为何突然中断了呢？围绕着这个疑问展开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各种猜测、解释始终不断。有人说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逃亡南方的建文帝，有人说是为了清剿元末群雄张士诚部残余，有人说是为了开拓海外市场，还有人说是为了扬国威于海外……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诸多说法之中，现在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是，郑和的航海行为总的来说是为了海外贸易的扩大与发展。

太祖朱元璋建立了“海禁-朝贡”的二元体制，永乐时期则完全禁止了民间自由贸易。这种情况下，明朝要稳定地获得所需物资，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强朝贡贸易。尤其是明朝上流社会奢侈之风盛行，海外奢侈品的需求量日益加大，因此，对海外贸易的期望也随之逐年提高。可以说，在这种国内背景下，郑和的远征当然就是以促进海外贸易为目的的海外扬威。

郑和远征年表次数

次数	时间	规模	终点
1	1405 年 6 月受命,同年冬出发,1407 年 9 月返回	62 艘船 27800 余人	卡利卡特
2	1407 年 9 月受命出发,1409 年夏返回		卡利卡特
3	1408 年 9 月受命,次年 12 月出发,1411 年 6 月返回	48 艘船 27000 余人	卡利卡特
4	1412 年 11 月受命,次年出发,1415 年 7 月返回,别动队 1416 年返回	63 艘船 27670 人	主舰队到达霍尔木兹海峡; 别动队到达非洲、阿拉伯
5	1416 年 12 月受命,次年秋出发,1419 年 7 月返回,别动队 1420 年返回		主舰队到达霍尔木兹海峡; 别动队到达非洲、阿拉伯
6	1421 年 1 月受命,同年秋出发,1422 年 8 月返回,别动队 1423 年 9 月返回		主舰队到达苏门答腊、泰国 别动队到达非洲、阿拉伯
7	1430 年 6 月受命,同年 12 月出发,1433 年 7 月返回	61 艘船 27550 人	主舰队到达霍尔木兹海峡; 别动队到达麦加

贸易为次

但是，郑和远征海外的目的果真如此吗？况且，他的航海不止一次，而是连续七次远航。且不说七次远征能获得多少利益，远征所耗费的财力、物资之巨远超所得，这也是非常明显的。若以获取海外物产及经济利益为目的，可以通过很多种渠道获得，完全不必特意采用这种复杂的方式。

说起来，永乐时代的对外贸易往往被永乐帝的积极外交所掩盖而产生诸多被误解之处。比如永乐帝放宽海禁、奖励国际贸易以及免除朝贡贸易中附带物资的关税等，容易让人认为永乐帝重视对外贸易。如果把朝贡国数量的增加也理解为永乐帝重视对外贸易的结果，这些想法就大错特错了。

永乐时期的海禁-朝贡体制与洪武时代相比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相比于经济层面更加重视政治层面，永乐帝几乎完全无视朝贡贸易带来的利润。我们从永乐帝的话中可以断定，他的终极理想就是用儒家礼

仪秩序规范“四夷”，确立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并将其永远维持下去。

帝王居中，抚驭万方，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十月辛亥）

可以看出，永乐帝时刻梦想着“四夷朝贡的盛世”。为了奖励朝贡，即使朝贡使节稍稍违反禁令也不予追究。对永乐帝而言，贸易是次要的，而“朝贡”的形式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舟车所及之处

确切地说，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永乐帝振兴贸易的策略，以及把明朝实施海禁理解为国家独占海外贸易的利润，这两种传统看法的基点是相同的：都只是从后世的情况上溯到明初的一种推测，而绝不是结合明初的实际情况来考虑的。

永乐帝谋求的并非贸易获得的利益，而是四夷来朝的“永乐盛世”。塑造中华世界的天子形象和确立有序的国际政治秩序是他的终极愿望。相较于经济层面，明初发展的主要特征更侧重于政治层面的运作，这一点需要格外注意。

明朝海上帝国的宏图随着郑和之死而烟消云散了，此后，明朝的海外事业再无进展，对此，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学界一片惋惜之声。了解近代中国屈辱外交历史的人就会明白为何会有这种惋惜了。郑和远征海外有国内社会背景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永乐帝自身的特殊情况。伴随着他的离去，海外交往随之迎来了终结，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洪武末期，周边诸国来华朝贡有减少的倾向，但到了永乐年间，朝贡国激增，最多时达到六十多个。《明史·西域传》做了如下描

述：

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

在永乐帝积极外交政策的推动下，“四夷藩王”相继来朝。菲律宾、马六甲、所罗门等国的国王率领本族部属、臣僚数百人亲自到紫禁城朝见永乐帝。这是在洪武时期从未有过的情况，永乐帝自然把它当成“永乐盛世”的象征四方传扬。只要是能够促进海外诸国来华朝贡的事情，永乐帝都会尽力去完成。应该说，郑和乘风破浪七下西洋的努力的确获得了回报。

“五服图”——大明华夷秩序的完成

洪武时期以来建立的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框架，经过永乐帝的完善最终得以完成。在华夷秩序中，以永乐帝为中心，中华与夷狄各居其位。15世纪初叶的东亚政治格局就像“五服图”所展现出来的一样。

“五服图”的构图中，中央是天子及其臣下（内臣）统治的地域，外侧周边是诸侯的领地，最外侧则是夷狄居住的蛮荒之地。理论上，永乐时期的周边诸国、诸民族被纳入以永乐帝为中心构成的环绕着他的同心圆形状的华夷秩序中。

“五服图”中，最接近中央的部分是国土之内被编入羁縻卫所及土司制度的诸民族。他们居住的“满洲”“哈密”“西南地区”原本都是“蛮夷”之地。当这些地区成为中华领域之后，他们也就被当成中华子民在这里居住。

既为中华子民，明朝就以“内臣”的标准对待他们。他们的首领更迭或王位继承必须获得明朝的认可，一旦明朝发生战事，他们就有义务出兵助战。此外，还必须定期朝贡，履行“朝贡贸易”。总之，他们相当于内臣，却又不是内臣，恰恰处于内臣与外臣（册封国）之间的位置。

“五服图”中，他们的外侧是接受明朝册封的“外臣”，是与中国皇帝之间结为君臣关系的“册封国”。册封国有义务向中国皇帝朝贡，并专门设定了朝贡的“贡期”“贡道”。

关于贡期，具体而言，比如规定日本是“十年一贡”、琉球是“二年一贡”、东南亚诸国“三年一贡”等。册封国未必能够严格遵守贡期，但必须要定期地按照规定的贡道进京朝贡。

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恢复了宁波、泉州、广州三地市舶司，作为接待朝贡国使节的窗口。海外诸国在其中一个港口的市舶司办理登陆手续，然后按照规定的贡道进京。例如，规定日本使者要在宁波市舶司办理登陆手续，琉球使节由泉州市舶司（后改为福州市舶司）负责、东南亚及南海诸国朝贡使则归广州市舶司管理。曾经作为民间贸易管理机关的市舶司，在明朝海禁-朝贡体制的运营中改变了职能。

如果携带国书

永乐时期来华朝贡国激增，不用说，这当然是“郑和下西洋”的结果，但这些朝贡国多以贸易活动为主要目的，并不接受册封。即便如此，明朝规定，只要他们带来“国书”，就按照“绝域朝贡国”的标准给予相应待遇。对于他们的要求，永乐帝理解为，远邦之国来我大明谋求贸易之利，乃是因为仰慕中华天子之德，虽然他们处于华夷秩序的最外围，但也要把他们纳入大明的统治秩序中。

按照华夷理论，以永乐帝为中心，周边诸民族及国家依次排序，暂时完成了以华夷秩序为核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的构建。理论上，周边诸国及民族是按照中华天子的德化程度排序的，实际上，是基于明朝的政治统治力的程度来排序的。按照“五服图”的排列，完全听命于大明朝廷的是羁縻卫所及土司制度下的各个民族，他们在形式上属于中华子民，即给予“内臣”的待遇。然后，依次是作为“外臣”的册封国及没有正式臣属关系的朝贡国，越往周边，明朝的影响力越低。

诚然，永乐时期的华夷秩序乍一看似乎与唐朝时期的华夷秩序很相像。唐代也设有羁縻州，同样在积极的对外政策推动下出现了“四夷朝贡”的盛世，中华帝国的版图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疆域，唐太宗甚至被北方诸民族尊称为“天可汗”。若仅从表面观察，明代的华夷秩序可以视为唐代的翻版。“羁縻—册封—朝贡”形式的华夷秩序，唐代与明代完全相同。但是，坦率地说，唐代与明代的华夷秩序存在根本的差异。

以对中国物资的需求为筹码

最根本的差异就是明朝实施的海禁政策。

大唐世界帝国的崩溃导致了东亚国际政治秩序瞬间瓦解，但周边诸国之间依然保持着经济贸易上的联系。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周边诸国的经济成长相辅相成，在东亚地域形成了一个非常密切的贸易圈。虽然元代的经济贸易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但民间的海外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

但是，国家间在缺乏有序政治框架的情况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元朝末期的东亚海域内出现了混乱。元末东亚各国商业化的发展中伴生的倭寇、海寇、海贼等，在朝鲜半岛至中国沿海一带肆虐。加之东

亚各国内部的政治混乱，也使得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獗。不论是元朝还是周边诸国都已经不再拥有足以剿灭他们的力量了。

因此，明朝成立伊始就面临着两大课题，即重建唐亡以后崩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以及恢复东亚国际贸易市场的经济秩序。

明朝凭借其强大的国家实力，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成功解决了这两大课题。这就是从洪武时期至永乐时期建立并完善的海禁-朝贡体制。

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把周边诸国对中国物资的需求作为筹码，将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推广遍及东亚全域。若周边诸国想要与中国进行商贸往来，就必须置身于明朝制定的华夷秩序框架中，受其规范。明朝禁止民间的海外交流，而将其限定在国家间的朝贡贸易当中，旨在与周边诸国之间建立起国际性的政治经济秩序。而拥有这种实力的就是新兴的大明王朝。

超越忽必烈——中华“世界体系”的建立

14、15世纪东亚世界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唐代所无法比拟的高度。在这一过程中，明朝凭借政治权力控制经济发展的模式，实施了全面的海禁，同时，建立起强制性的国际政治统治秩序。前面多次谈到了，明朝专制国家的出现以及东亚诸国甘愿臣服于明朝统治的对中国经济的依存现状，是东亚国际秩序得以建立的背景。

不用说，永乐帝的积极外交促进了东亚国际秩序的进一步完善。他想要将所有的周边诸国都纳入体制当中。明朝颁发“堪合”的国家达到十五个，说明即便是需要服从明朝的统治，以此谋求贸易利益的国家也依然很多。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日本，不管足利义满最初的想法如何，但明朝时期的中日关系的确是通过“堪合贸易”不断发展。

永乐时期在东亚世界建立起一个以明朝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高效有机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华与夷狄的关系被秩序化，并以朝贡贸易的利润为媒介维持着华夷秩序的稳定。正是凭借着中华的绝对政治经济实力，构想了一个中华独尊的开放性的统治世界。由此，我们也可以把永乐时期的东亚国际秩序称为中华“世界体系”。

永乐帝对于自己建立起来的新世界秩序是否感到满足，我们无法知晓。但至少可以肯定，日本接受明朝的册封成为外臣，对“永乐盛世”而言，绝对是锦上添花。

对永乐帝而言，他在完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达成了日本的属国化，实现了忽必烈无法完成的奢望，意义重大。当时永乐帝一定很自豪自己超越了忽必烈。明朝华夷秩序的完成不仅寄托着永乐帝的自信和矜持，更是他的苦心经营的结果。

[1]. 《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二上。——编者注。

9 华夷秩序的统治者

（1）顺逆之理

出兵安南

永乐帝构想的新世界秩序，即中华“世界体系”，当然并不都是和平实现的。以郑和远征海外为例，虽说是发展友好外交为主，但偶尔也难免发生武力纷争，造成死伤。有别于那种偶发事件，永乐帝即位之后，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武力维护华夷秩序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出兵安南”和“北征蒙古”。

明朝成立之初，最先来华朝贡受封的国家就是安南陈氏政权。但到了洪武末年，安南权臣黎季犛（又名胡季犛）、胡苍（又名胡查）父子专权自大，甚至出兵侵扰大明边境。后来，明朝因“靖难之变”处于内乱之中，胡氏父子趁机篡权夺位，废黜陈氏，自立为王。

永乐帝即位后，胡查伪称自己是安南国王的外甥，遣使请封，永乐元年（1403年）闰十一月受大明册封。

但是此后，安南仍然屡次侵犯大明领土，还侵略邻国占城，一再挑衅大明权威，触犯永乐帝的神经。不仅如此，经安南陈氏遗臣的证实，胡氏父子篡权夺位虐杀陈氏一族的真相最终水落石出，也使得永乐帝有了武力征伐之意。

就在此时，发生了陈氏后裔陈天平流亡事件。陈天平经由老挝到达南京，他向永乐帝哭诉胡氏父子的罪行，请求大明出兵干涉。永乐帝立即责问胡查此事，胡查认罪，并表示愿意归还侵占大明的领土，迎陈天平回国为王。于是，永乐帝派五千明军护送陈天平回到安南。但胡查早有预谋，途中伏兵四起，陈天平被杀。被触逆鳞的永乐帝非常愤怒。他觉得自己被小小的安南属国耍弄欺骗了，立即下旨发兵安南，命靖难功臣成国侯朱能为征夷将军，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统率八十万大军，出广西、云南进攻安南。此时是永乐四年（1406年）十月。

虽有安南军队抵抗，但明军势大，年末即攻占安南要地，一路南下追击胡氏父子，永乐五年五月将他们抓获押送南京。永乐帝严厉地谴责了他们，然后将二人释放。虽说胡氏父子都是战犯，但因为他们是永乐帝亲自册封过的安南王，才会最终决定不杀他们的吧。

永乐五年六月，永乐帝改安南为交趾，在当地设置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任命汉人官员为三司长官，按照中国内地的行政制度划分府州县制，同时配置卫所。至此，安南完全内地化，持续了约四百年的独立王国消失了。

为何选择安南

出兵安南的始末基本如上所述，但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明朝在“靖难之变”之后，为何一定要对安南动用武力呢？为何必须将其内地化呢？其真实目的何在呢？确切地说，永乐帝早就有意出兵安南，只是一直在寻找机会。另有观点认为，所谓陈氏后裔陈天平，实际上纯属捏造，他只不过是永乐帝为了出兵安南而伪造的口实。陈天平是不是陈氏后裔，虽不能确定其真伪，但他的出现的确有些突然。明军进入安南后，向当地官吏、军民发布檄文，说明了大明朝廷此次

出兵安南的因由。永乐帝在檄文中列举了胡氏父子的二十条罪状，以此震慑胡氏政权，同时昭告天下大明师出有名。檄文中似乎暗藏着解开永乐帝出兵安南之谜的关键。根据檄文的内容，胡氏父子的罪行可以列出如下三项：

第一项是弑王篡权，诱杀陈天平，非法继承安南王位；第二项是屡次侵犯明朝西南边境（广西、云南等地）；第三项是侵略邻国占城，意图称霸东南亚地区。

这些理由与其说事关明朝存亡，不如说是更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理由。这三项的共通之处是都强烈谴责安南胡氏政权的所作所为超出了外臣的本分。若仅仅是不遵守外臣的本分尚可稍加宽恕，但是安南无视大明朝宗主国的妄自尊大的态度，则是对华夷秩序本身的挑战。对身为宗主国皇帝的永乐帝而言，这种挑衅与僭越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予以惩罚。

一朵空花

但是，假若没有其他重大原因，仅凭这些理由，还不足以使用武力征伐他国。实际上，太祖朱元璋在位时就知道胡氏父子的专横，却没有发兵讨伐。

但永乐帝不同，他有更重要的原因。因为安南无视君臣之分的傲慢态度已然超越了明朝与安南之间的問題，而是事关永乐帝身为“中华世界”天子的尊严问题。若要成为中华世界的真天子，他就必须通过讨伐安南向天下展示顺逆之理。

此外，还有其他理由。蒙古曾经三次攻打安南，但都没能将其纳入版图。而征服安南，使其成为中华版图的一部分则会成为永乐帝超越忽必烈的又一个证明。将安南划入大明版图也正是在永乐帝以忽必

烈再世自居的时候完成的。所以，我认为这一点是永乐帝出兵安南的最重要的原因。

反言之，统治安南是永乐帝站在个人立场上考虑的，而非为明朝谋求实际利益。因此，永乐帝的孙子宣德帝（1425～1435年）在即位后，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安南。安南民众对明朝的顽强抵抗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明朝统治安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得不偿失。贤明的宣德帝则放弃了安南，舍名而取实。统治安南不过是“永乐盛世”开放的一朵不结果的空花。

亲征蒙古

永乐年间，活跃于蒙古高原东部的鞑靼部处于分裂状态。永乐六年（1408年）鞑靼部出现了一个名叫本雅失里的人，他是元朝皇室后裔，因在元朝灭亡后蒙古各部的纷争中失利，本雅失里投奔到蒙古高原西方帖木儿帝国的撒马尔罕。帖木儿死后，一心向明朝复仇的本雅失里为了一雪前耻，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蒙古旧地。

本雅失里被推举为可汗后，在他的带领下，鞑靼部迅速统一起来，与明朝的矛盾不断升级。前面我们已经叙述过了，鞑靼部与西方瓦剌部的冲突越来越激烈，陷入困境的瓦剌部为了与明朝联盟，年年向明朝朝贡。但是，鞑靼部却公然敌视大明，拒绝招抚，坚持分裂。

永乐七年四月，本雅失里杀害了前来招抚的明朝使者，一直隐忍自重的永乐帝被激怒了。鞑靼部的无礼行径是身为中华天子的永乐帝所不能容忍的。永乐七年七月，永乐帝任命靖难功臣丘福为大将军，统帅大军十万出征鞑靼。

但是，丘福轻敌冒进，中了本雅失里的埋伏，全军覆没。丘福当然是兵败被杀，更有无数辎重落入敌手。

令人难以置信的败讯传至朝廷，永乐帝大为恼怒。本来要严惩鞑靼，树立天子形象，结果反而在天下人面前失去了皇帝尊严。为了确立华夷秩序，也为了雪耻，击败鞑靼彻底消除边患，永乐帝决定来年春天统帅大军亲征蒙古。

五出三犁

自永乐八年至永乐二十二年的十五年间，永乐帝先后五次亲征蒙古。中国历史上，身为汉民族至高无上的皇帝，越过万里长城、亲自率军出击的唯有永乐皇帝一人。虽说他在燕王时期有过丰富的对蒙作战的经历，但身为皇帝五次亲征蒙古确实是他人生中的一大壮举。明代学者高岱，在其《鸿猷录》中称赞永乐帝“五出三犁（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从结果来看，亲征蒙古耗费的人力、物资无数，而取得的成果未见得多。五次亲征之中，真正发生交战的只有永乐八年的第一次亲征和永乐十二年的第二次亲征，其余的三次亲征几乎没有发生过战斗。数十万大军穿行漠北，却从未遭遇过敌人，御驾亲征的效果都是众所周知的了。

诚然，由于鞑靼部与瓦剌部之间相互争战不休，永乐年间北方边患确实是减少了。或者也可以说这是永乐帝亲征蒙古的效果。但是，永乐帝去世后，仅仅二十年余年，明英宗正统帝（1435～1449年）就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了瓦剌的俘虏，充分说明了亲征的效果不过是暂时性的。永乐帝苦心努力的结果如此而已。

北征蒙古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为何永乐帝还要一再坚持亲征呢？特别是永乐帝二十年开始的连续三年的后三次亲征，无论如何都让人觉得永乐帝所表现出来的对亲征的执着非比寻常。谁都清楚，屡次亲征已是兵民疲敝、财政空虚。尽管如此，永乐帝却不顾大臣的强

烈反对，如同被什么东西迷住了一样，反复亲征。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刑部尚书吴中因为反对亲征被关进大牢，直到永乐帝去世都没有被释放。而兵部尚书方宾害怕受到牵连竟然自杀了，据说他死后仍然没有逃脱惩罚，永乐帝对他的尸体处以凌迟之刑。不得不说，此时永乐帝的行为已经脱离正轨了。

未能实现的理想

那么，驱使永乐帝这样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坦率地说，那就是他想要成为中华世界天子的近乎疯狂的执念吧。

在永乐帝构想的世界秩序中，若蒙古没有纳入华夷秩序框架中，就不能算作真正地实现了“永乐盛世”。相比其他朝贡国，永乐帝更加盼望能让蒙古称臣纳贡，在自己面前行臣下之礼。尤其，对于永乐帝而言，只有像忽必烈那样真正地统一了蒙古，才能与他比肩。

虽说实质性效果不大，但不能否定永乐帝亲征蒙古的意义。对他而言，亲征并非毫无意义，乃是统合中华与夷狄的终极手段。打败蒙古，向天下展示顺逆之理，显示中华天子的威光，这其中包含着他为华夷秩序统治者的志向和尊严。

永乐二十年开始的连续三年的亲征是在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之后发生的，从永乐帝迁都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的意图。永乐帝迁都北京最终完善了国内的政治统治体制，随即开始了他统合华夷秩序的最后一个目标，即必须要将唯一没有被统合到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框架中的蒙古纳入明朝版图，完成中华“世界体系”的梦想。年逾六十的永乐帝所有的心思肯定都离不开他的梦想。

因此，他无论如何都一定要让蒙古臣服。反对他亲征蒙古就等同于阻止他成为中华世界的天子。连续三年的亲征中，永乐帝始终怀着

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恐怕只要他活着就不会停止亲征。似乎他的晚年只有在亲征中才能找到慰藉。

永乐二十二年，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中，永乐帝在蒙古大地上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在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中，他的人生落下了帷幕。距离洪武三年（1370年）他被封为燕王，已经有半个世纪了。一个未能实现的理想，在遥远的长城的那一方，成为永远也无法实现的传说。

（2）天子之都

首都的景象

与亲征同样，另一件让永乐帝怀有执念的大事，就是以统合中华与夷狄为目的，兴建天子之都。换言之，就是迁都到他的根据地北平（北京）。

首都定在何处，国家政治重心也会相应改变。定都问题，历来是中国历代王朝争论的焦点。

一般来说，中国历代都城的变迁可以分为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以中国国内的华北与江南的分界线为轴，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王朝都城也从西北向东南移动。二是宋代以后，随着征服王朝对中原的入侵，王朝都城基本都在游牧地带与农耕地带的分界线上。

秦汉、隋唐时期，长安和洛阳并称为“两都”。特别是东边的洛阳，在隋唐时期称为“东都”，凭借其发达的经济实力支援都城长安，因为它临近输送江南经济能量的大运河的终点开封。史书上有一则有名的传闻，据说，每当长安粮食不足时，大唐皇帝就会率领官员、军队行幸东都，才能勉强缓解粮荒的问题。

到五代、宋朝以后，王朝都城继续向东迁移至作为物资集散地的开封。江南物资沿着运河北上汇集到开封，除了在当地消费之外，大量物资从开封运往全国各地。开封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非常繁荣的商业中心。正是在近世江南地区商业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下，开封作为王朝都城登上历史舞台。

元明时期，王朝都城继续东迁。明朝凭借江南发达的经济实力一统天下，都城就是位于江南中心的南京，足以说明当时江南经济发达的程度之高。南京因具备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优势，而成为中华帝国的首都。伴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王朝都城逐步东迁的过程以大明王朝定都南京为标志走向终结。

经济发展的程度是决定中原王朝都城的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不同，征服王朝的都城始终在北方都城北京。它在宋代以后一跃成为各种政权瞩目的焦点，如契丹建立的辽国、女真建立的金国、蒙古建立的元朝，都将北京定为都城或陪都。辽国的燕京、金国的中都、元朝的大都指的都是北京。北方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基本上都是将北京当作立足北亚、统治中国的据点。

中国近世历史中，随着北方民族的崛起，它们与中原政权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如辽与宋、金与南宋、元与南宋，一般称为“第二次南北朝时期”。元灭南宋一统天下，结束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但元朝却无法对中国南北地区同时实行一元化的统治，在华北与江南地区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租税制度，主要因为元朝还不具备足以掌控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政治力量。

即便是雄才大略的忽必烈也无法做到真正统治江南。当然，这与南宋以来江南地区地主制度的发展，以及随之形成的特定传统文化不无关系。从元朝实行的等级制度来看，江南出身的人被划分为身份最低的“南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不难看出，元朝缺乏统治江南地区的自信。正如爱宕松男先生一语道破的那样，元朝在江南的政治统治力十分脆弱，这的确是事实。

经济与军事的纠结

元末明初，以北京为根据地的元朝与在南京诞生的明朝在中原地区对峙的局面，就如同第二次南北朝时期征服王朝与传统中华王朝的对峙。不久之后，随着明朝的“北伐”以及元朝残余势力的北撤，南北对峙的局面亦随之落幕。然而，统一天下的明王朝很快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即如何解决大明帝国经济中心（南京）与军事中心（北京）南北分离的问题。

经过激烈讨论之后，朱元璋最终决定按照历代王朝的传统定都南京，并且实行“藩王分封制”解决北方边患问题。北京成为对抗蒙古的前线基地，由诸王之中最有才干的燕王率领大军驻守。至此，北京失去了首都的地位，成为基于发达的江南经济背景的南京京师体制的补充和完善。

但是，南京京师体制从建立之初就孕育着巨大的矛盾，又是位置过于偏南的闭锁的“南人政权”，因而，始终存在藩王分封制所附带的分权化危险。朱元璋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目的是在保留藩王分封制的前提下，等待时机迁都北方，最终完成明朝从“江南体制”向“统一体制”的蜕变。但这些计划由于皇太子的突然离世等情况而未能实现，那么，很多未决的课题都留给了下任皇帝。

因此，建文帝即位后，南京京师体制蕴含的矛盾一下子爆发出来。由于掌握实权的南人官员错误的削藩政策，藩王分封制的分权化萌芽瞬间被激发膨胀，引发了靖难之变。结果，建文政权没能完成“统一体制”，在一片混乱中垮台了。但那也可以说，明朝成立以来的京师体制在发挥了一定作用之后迎来了它的终结。

永乐帝即位后，谋求用一种全新的体制取而代之。一言以蔽之，就是实现朱元璋没有完成的夙愿，即完成从江南体制到统一体制的蜕变，同时又解决北方防卫问题。藩王分封制废除之后，能够同时满足这两点要求的办法恐怕只有迁都北方这一条途径。

况且，对永乐帝而言，迁都北方还有他个人的因素，即他所背负的超越忽必烈的宿命。他所承担的使命并不是单纯的对北方边患的消极防御，而恰恰是积极完成中华与夷狄的统合。负有这种历史使命的永乐帝，选择他身为中华世界的天子所要发号施令之处，绝不会舍弃北京这个选项，这里曾经既是征服王朝的都城，又是他的根据地。在他即位那一刻起，迁都北京就已经是大明帝国的既定目标了。

首先升格为陪都

永乐帝即位后不久，即效仿其父朱元璋把故乡凤阳定为中都的做法，在永乐元年正月，改北平为北京顺天府，升格为陪都，以此彰显北京乃“承运兴王之地”。永乐帝此举当然是为了将来迁都北京做铺垫。北京地位提高，与南京并立，即所谓“南北两京制度”开始了。现在南京和北京的地名就来源于此。

北京升格为陪都后，立即展开了相应规模的都城建设。同年二月，设置北京行部（负责行政）和北京行后军都督府（负责军事）管理北京地区，同时，设立北京国子监培养人才。同年八月，强制迁移三千江南富户到北京落籍，充实陪都。“靖难之变”造成北京地区大量土地荒芜，为增加农业人口、开垦土地，永乐帝又从山西迁来大量民户及罪囚，鼓励农垦。

永乐四年开始建造陪都宫殿，并且派遣专员到全国各地采伐、筹措建筑用木材。但是，这一时期，郑和海外远征、永乐帝出兵安南、亲征蒙古等几件大事同时进行，致使财政紧张。由于缺乏资金，陪都宫殿建设进度一推再推，最后不了了之。再次动工已经是永乐十四年的时候了，大约又经过了四年时间，永乐十八年末，北京宫殿才竣工。从开始筹划到竣工完成，实际用了十四年的时间。

当然，其间永乐帝并没有袖手旁观等待北京宫殿的竣工。而是多次巡幸北京，并借机长期驻留，使北京在迁都前就已经开始执行首都的职能。早在永乐七年（1409）永乐帝第一次巡幸北京时就已开始逐步建立北京京师体制。

这一年，永乐帝命皇太子在南京代行朝政，即“监国”，然后，带领众多大臣北巡，在北京驻留约一年半的时间。其间，在当地设置的官府机构都被冠以“行在”二字，由此次随行官员担任长官。形式上，南京是大明首都，但实际上，永乐帝所在的北京成为明朝真正的政治中心。永乐帝决定亲征蒙古也正是在这一年。

永乐帝巡幸北京是为将来迁都做准备。因此，此次在北京滞留期间，永乐帝对迁都北京的事宜只字未提。原本朝野上下对永乐帝就极为不满，若此时公开表明迁都北京，对篡权者永乐帝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因此，迁都北京的计划必须非常慎重地缓步进行。

迁都北京

迁都北京，事关重大，但相关事宜都必须在暗中秘密进行。迁都后解决北京的粮食供应问题就是其中一项。既不能让人发觉迁都的计划，还要在限期内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因此，永乐帝决定开凿大运河，一次性使得江南的经济实力可以为北京所用。

元朝初期也采用河运，但大运河需要经常疏通河道，若是不修缮、维护河道，泥沙就会淤积堵塞河道，无法行船。果然，不久大运河就因泥沙淤积不能使用了，此后就改为海运。海运由元朝政府直接负责经营，从长江下游的刘家港出发运到天津，每年运送粮食大约三百万石。

明朝建立之初，定都南京，不存在粮食供给问题。因此，朱元璋就没有疏通大运河，仍然依靠海运解决北方军队的粮草供应。永乐初年，每年仍旧依靠海运将大量粮食运送到北京和辽东地区。

但是，迁都北京进入日程后，单纯依靠有危险隐患的海运输送粮食已经无法解决北京的粮食供应问题了。以永乐九年会通河的挖掘为开端，永乐帝开始开凿、疏通大运河，确保通往北京的粮道畅通无阻，但对外宣称的理由大概是减少海运之苦之类。总之，永乐帝为迁都北京所做的各种筹备，难以一言概述。全国的经济和军事通过大运河连接起来，以北京为中心的新体制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

此后，一直到迁都前，永乐帝两次巡幸北京，全心致力于新体制的运作。第二次巡幸是从永乐十一年四月到永乐十四年的三年半的时间，其间，永乐帝第二次亲征蒙古。第三次巡幸是从永乐十五年五月到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第二次与第三次巡幸的间隔只有半年多时间。而且，永乐帝第三次巡幸后，再没回过南京。

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北京宫殿（紫禁城）完工后，终于颁布迁都诏书，永乐十九年正月，正式定都北京。而此前在北京官府机构上附加的“行在”二字也被去掉了，南京自然被降格为陪都。虽然在形式上依旧保持着“两京体制”，但北京与南京的地位已经完全逆转，名副其实的北京京师体制的时代到来了。

从洪武到永乐

永乐帝在迁都前多次巡幸北京，因此，学界有观点认为，南京反对永乐帝的势力很强，使他有所忌惮，所以他才断然迁都北京。不能否认，的确有这方面原因。永乐帝在南京杀戮过重，致使江南士族对他极为不满。因此，直到迁都前，永乐帝都不敢公开表明迁都北京，这也确是事实。

但迁都的原因当然不会如此单纯。前面已经多次叙述过，永乐帝迁都北京有多方面因素。主要有两点，其一，迁都北京，大明政权完成了从“江南体制”向“统一体制”的最后蜕变。其二，对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具有重大意义。迁都北京标志着明初的南京京师体制转变为全新的北京京师体制。

两种体制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可能有人会认为洪武政权与永乐政权之间是割裂的，没有连续性。诚然，太祖时期，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未提出过迁都问题。而一心想要统合华夷秩序的永乐帝把都城迁往位于华夷世界分野之处的北京也是事实。因此，把迁都北京视为永乐帝个人的大事业也不能说就是无理的。但是，若从结论而言，迁都北京仍然在太祖政治方针的延长线上，洪武与永乐之间绝不是割裂的。

作为中国社会的体制性归结，在洪武年间已经极权化的明朝国家，凭借着强大的政治权力将社会各阶层全部纳入政治统治当中，加速了明朝国家统治秩序的建立。在南人政权向统一政权转变的过程中，原本基于经济原理的中国历代都城的南迁，却由于政治原理被强制性地拧向北方，那是凭借国家权力才会成为可能的。实际上，洪武时期，朱元璋即便想要迁都，但由于诸多原因，那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明朝通过“堪合制度”等一系列强制性的朝贡贸易措施，将周边各国、各民族纳入以大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框架中，实质上是明朝对内统治秩序的外延。当初，即便是对待最大的强敌蒙古，明朝也曾采取积极的攻势试图将其纳入明朝统治下。但在洪武五年土拉河畔大败元军之后，对蒙政策随即转变为以防御为主，沿长城一线布防固守。明朝定都南京、重心南移之后，对北方的控制力度随之减弱，客观条件不允许对蒙继续采取攻势政策。

洪武时期，无论是完成对内统治，还是对外确立华夷秩序，迁都北方都是必要的条件。之所以没能实现，是因为受洪武时代的历史条件所制约。与朱元璋心目中完美的政治体制相比，南京京师体制是朱元璋在建立统一王朝的各种尝试中，在明初历史条件下不得已采取的次善之策。归根到底，南京京师体制只是暂时的过渡性体制。

尽管如此，那么，南京京师体制就一定会过渡到北京京师体制吗？两种体制之间确实存在割裂，但并不是洪武与永乐之间政权的割裂，而是实现统治程度的体制层面的割裂。从洪武时期到永乐时期，在强化极权统治这一点上始终是一贯的、连续的。也可以说，南京京师体制过渡到北京京师体制之后，明朝彻底完成了国家政权的确立。

历史的必然

永乐朝基本上继承、发展了洪武朝的方针，建立起强大的专制体制。从洪武朝基于经济原理的南人政权向统一政权转变的图景，通过永乐帝的迁都北京扩大为东亚规模的华夷秩序的图景。永乐帝真正继承并超越了朱元璋，他确立了真正的统一王朝，以忽必烈自居，迁都到曾为征服王朝都城的北京。迁都北京也是为近世宋代以来的“第二次南北朝时代”打上终止符的值得纪念的一刻。

永乐帝的优点就在于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他都始终在实践中执着地追求华夷秩序理论的实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要完成中华“世界体系”的确立，迁都北京成为必然。总之，迁都北京并不是加强北方防卫、忌憚南京的反对势力等这些敷衍的理由，而是完成统合华夷秩序的最后一步。迁都后，连续三年的蒙古亲征也是永乐帝对自己一生的总决算。

永乐帝死后，北方的安定状态并未持续太久。如前所述，“土木堡之变”皇帝被俘、偶尔北京被围困等情况都出现过，甚至曾经考虑

要还都南京。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大明都凭借坚守北京，屡次渡过了亡国之危。永乐时代作为天子之都而建的北京，此后成为防御北方的前线基地，发挥出了它的作用。

的确，亲征蒙古的效果只是暂时性的，不可能永远维持华夷秩序。但是，永乐帝积极扩张的对外策略却给后世的中国社会留下了诸多痕迹。首都北京的诞生就是其中之一。

明朝和清朝都定都北京，现代中国也沿袭了这一传统。迁都北京虽说很大程度上附带了永乐帝的个性特色，但实际上却是历史的必然。迁都北京后，中国仍然是中国，但北京却必定永远作为天子之都存在。

10 永乐帝的遗产

（1）盛世的阴翳

多病的结果

如果说掌握绝对权力的永乐帝实际上体弱多病，恐怕难以使人相信。但事实的确如此。他年少的时候经常患病，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质越来越弱。

史书上记载他患有“风痺”“风疾”。但那究竟是一种什么病，至今无法明确。一般认为那是“中风”或者“风湿病”，但从他发病的症状来看，似乎也不是太符合。台湾学者朱鸿先生根据永乐帝发病的症状推测为“癫痫病”。从症状推测病症属于一种看法。

具体的病症暂且不管，永乐帝体弱多病的确是事实，而且似乎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燕王时期，面对南京政权的严密监控，他称病闭门不出，以及起兵前他又装疯在北京大街上奔跑，都是借病来迷惑南京方面的一种伪装。南京方面相信他发疯，也是因为熟知他发病时的症状。

但是，起兵前被充分利用的疾病在永乐帝即位后依旧不断折磨着他的精神和身体，年年加重的病症使他似乎很难处于正常状态。与他

在外交上取得的辉煌耀眼的成就互为表里，关于他个人的传闻、轶事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如同靖难之后的惨剧一般黑暗、沉重。

“鱼吕之乱”

永乐帝除了一个孩子夭折外，共有八个孩子，其中三个儿子、五个女儿，都是他即位前出生的。他成为皇帝之后，再没有过孩子。永乐五年，德高望重的徐皇后早逝之后，永乐帝宠幸的妃子很多，但没有一个妃子怀孕。一般都认为，这是永乐帝为治顽疾常年服药留下的后遗症。

与其父朱元璋一样，他非常热衷于在后宫收纳众多嫔妃。特别是对待朝鲜方面，永乐六年以来，屡次下旨令朝鲜献上美女。每次选美都是朝鲜王朝的屈辱经历，朝鲜王朝有时要下令禁止年轻女子结婚以供选美，若不符合明朝使者的要求，甚至要重新选美。据说这些女子启程前往中国之日，她们的父母亲人想到此生都无法再与孩子相见，哀声恸哭，沿路不绝。

不仅对朝鲜王朝这样，永乐帝在中国国内选美也是如此。但是在选拔的众多美女中，能得到永乐帝宠爱的只不过是极少数。而大多数女子，永乐帝连一眼都没有看，她们只能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后宫中终其一生。尤其是永乐帝久病不愈，精力更加不足，后宫受宠的妃子就更少了。

也正是在此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迁都北京之后，永乐十九年初，后宫妃子吕氏、鱼氏与宦官长期私通，奸情被发现后，两人畏罪自杀。据史书记载，后宫中发生宦官与嫔妃私通的情况绝不在少数。通常来讲，永乐帝都佯装不知。但事已至此，永乐帝不能置之不理。永乐帝把吕氏的婢女抓起来严刑审

问。婢女经不住拷问，不仅交代了吕氏与宦官私通之事，居然还招出了要谋杀皇帝的口供。

此事一出，被连坐抓捕的宫女、宦官竟然达到两千八百人，他们全部被杀。而且，皇帝每次都要亲自看着这些人被杀。有一个妃子在临刑前怒骂永乐帝：

自家阳衰，故私年少寺人，何咎之有？

（《朝鲜王朝世宗实录》甲辰六年十月戊午）

后来，永乐帝还让画工把吕氏与小宦官相抱的情形画下来，以此惩戒后人。恐怕是永乐帝实在忍无可忍才这么做的吧。

对于“鱼吕之乱”的真相，永乐帝未必不清楚。但他为何要借机扩大株连的范围呢？所谓要暗杀永乐帝，可以说，实现的可能性接近于无。尽管如此，永乐帝仍然按照供词“瓜蔓抄”式地增加连坐者。诚然，被抓捕刑讯的嫔妃、宫女也都把与自己有矛盾、纠葛的人招供出来，造成了更多无辜的人被连坐处死，这也是事件扩大的因素之一。

但是，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下令行刑的永乐帝自己。无论如何都很难认为此时的永乐帝还能保持在正常的精神状态中。实际上，“鱼吕之乱”数年前，永乐帝的病情就已经恶化，几乎不能处理国政。经常陷入虚脱状态，时而突然发怒，时而连续沉睡几天，他的老毛病严重地破坏了他的身体状态。这次事件不就是他对自己身体状况极度不满的情绪爆发吗？必须说，“永乐盛世”走向终点的时刻确实到来了。

娘，吾去

话虽如此，但“鱼吕之乱”在中国官纂史书中并没有记载。前述“鱼吕之乱”事件的始末都是出自邻国的《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朝鲜王朝之所以关心这一事件，是很多出身朝鲜的嫔妃在“鱼吕之乱”之中被连坐处死。国小势弱的朝鲜与大国中国相邻，不得不经常向中国“事大（侍奉上位者）”，从《朝鲜王朝实录》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朝鲜作为属国的悲哀与愤怒。

比如，《朝鲜王朝实录》在叙述了“鱼吕之乱”事件之后，接着又记述了朝鲜嫔妃的悲惨经历。

永乐帝死后，生前服侍过他的嫔妃、宫女三十人为其殉葬，其中就包括在“鱼吕之乱”中幸免一死的朝鲜出身的妃子韩氏。殉死之日，按照程序仁宗洪熙帝与她们一同用过送行酒宴之后，她们被带到别殿赴死。别殿里早已并排摆好木制脚凳，等待着她们的到来。仁宗洪熙帝与她们道别之后，她们就被催促着登上木凳套上绞索，宫殿内哭声一片。

行刑的时辰一到，顿时，嫔妃们哭声震天，旁边的宦官立即踢倒木凳，她们相继赴死。韩氏在临死前，向着服侍她的乳母喊着：“娘，吾去！娘，吾去！”

语音未落，她的身体已经在空中飘舞。

殒命前的瞬间，韩氏究竟在想什么呢？是对自己无力抗拒的不公的宿命的悲愤与遗憾吗？后来，韩氏的乳母回国之后，朝鲜王朝才得知了她们的遭遇。韩氏的遗恨通过他的乳母至少能得到一点点的慰藉吧。

紫禁城失火——发泄不满

“鱼吕之乱”的惨祸尚未平息，永乐十九年四月八日夜半，紫禁城上空突然乌云密布，骤然间大雨倾盆。电闪雷鸣中，一道闪电伴随着轰隆隆的雷声击中紫禁城正殿。紫禁城中规模最大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转瞬之间被大火包围，连同周围建筑化为一片火海。大学士杨荣冒死冲进大殿拼命抢出几本重要典籍。大火一直持续到天亮，三座大殿化为一片灰烬。

紫禁城位于天子之都的中心，正殿遭遇雷火化为灰烬，这就是代表上天惩戒的“天谴”吧。永乐帝心中非常恐惧，是自己的所为出现什么问题了吗？还是对百姓实行苛政了呢？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哪里违反了天意。于是，永乐帝颁布诏书，求问于天下。

随即，各地官员纷纷上奏各表想法。他们的要求一言概之，就是停止不急之务。其中，受到批评最多的就是刚刚完成的迁都北京。人们认为建造都城北京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不计其数，尤其是迁都后，江南地区每年要往北京运送大批粮食，江南军民负担之重、困难之大前所未有。

对迁都北京批评最为激烈的都是出身江南的官员，他们绝大多数主张还都南京。此前，他们不敢公开反对迁都，借此机会，似乎是要把所有的不满一下子发泄出来。北京京师体制确实要让江南地区做出很多牺牲。因此，北京京师体制的不足之处受到这些江南官员的强烈批评。

当然，永乐帝并不是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反对迁都。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迁都之前就进行了各种充分的准备。

例如，永乐十八年十月，迁都诏书颁布之前，永乐帝在北京东安门外公开设置了特务机关“东厂”，将一直在暗中隐藏的东厂的存在公开化，目的在于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同时，永乐帝也没有忘记

拉拢这些江南官员，在名义上保留了与北京官府机构完全相同的“南京官”，做出重视南京的姿态。

尽管如此，江南官员仍然不满意，或者说恐怕永乐帝也没有预料到他们会怀有这么强烈的反对。紫禁城大火成为他们攻击都城北京的发泄口。

方迁都时，与大臣密议，久而后定，非轻举也。

（《明史·夏原吉传》）

永乐帝这样一反驳，群臣纷纷上书反对迁都。最后，永乐帝处罚了反对迁都最激烈的礼部主事萧仪，同时，又以事态“不急”“不便”为由，下诏废止了二十项工程，暂时避开群臣的攻击。

不听劝谏

北京迁都前后，接连发生了数起不测之事。在与外廷官员无关的后宫发生了“鱼吕之乱”的丑闻，永乐帝身为男性的尊严被撕得粉碎。紫禁城的三座正殿毁于天火，永乐帝身为天子的尊严在天下人面前尽失。众多大臣反对迁都，身为皇帝的尊严破碎了。在他周围发生的全都是触怒他的事情，对于本已病情恶化的永乐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永乐帝在这种极度糟糕的身心状态下，再度坚持决定亲征。北京迁都次年，永乐二十年三月，永乐帝第三次亲征蒙古，而且是连续三年，每年一次。对他来说，亲征蒙古已经成为他树立威信挽回面子的最后的大事业。他要亲自站在蒙古的土地上成为华夷秩序的统合者，以此印证自身的存在价值。或者说，唯有亲征蒙古才能使他的精神获得慰藉。

不仅是身为天子的责任，当然还包括作为篡位者的负疚、身体病情的恶化以及对自己年老的忧虑等各种负面情绪交织在一起，此时的永乐帝已经处于混沌的精神状态。唯一驱使他亲征的是始终没有完成的执着与信念，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他都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只有执意反对亲征的户部尚书夏原吉冷静地察觉到了永乐帝病情的严重程度。

夏原吉从财政角度对亲征提出异议后，向永乐帝委婉地提出了忠告：

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明史·夏原吉传》）

但永乐帝完全无视夏原吉的劝告，反而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又把他关进监狱。可以说，此时的永乐帝已经听不进去任何反对亲征的劝谏。

最后的亲征

第三、四次亲征蒙古都是无果而终，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永乐帝再次下旨，命皇太子在北京监国，然后，他亲自统率数十万大军开始了第五次蒙古亲征。四月四日，永乐帝率大军从北京出发北上，与前几次亲征一样，过居庸关，继续北行，从独石翻越长城，进入沙漠搜索敌军。

与前两次亲征同样，明军没有遭遇任何敌军，只是在浪费时间。到六月末，历经两个多月的沙漠行军，人马疲惫至极，粮食也已不足，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搜索敌军，于是，永乐帝下令启程返回北京。

随行的大学士杨荣建议，将军中粮食协调分配，即皇帝所用粮食剩余的部分分给军中缺粮的士兵，同样，军中粮食充足的士兵也可将

多余的部分分给缺粮的人，日后加倍返还。这足以说明大军粮食供应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下，想要继续亲征已经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了。

虽说大军缺粮，但还不至于不能行军的饥饿状态。七月七日，明军到达名叫清水源的地方，永乐帝下令杨荣在一处数十丈高的岩壁上刻字，记录明军经过此地之事，传于后世。具体内容虽然不清楚，但在此时还有心思从容刻字留念的，恐怕只有永乐帝了。然而，一周后的七月十四日，大军刚刚到达翠微冈，永乐帝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一些平时从来不曾说过的话竟然脱口而出。永乐帝召集亲信谈话之时，不慌不忙地回过头来，向贴身宦官问道：

“计程何日至北京？”

“其八月中矣。”

永乐帝听完，只是点头不语。

不久，永乐帝转过头来慢慢地对杨荣说道：

东宫历涉年久，政务已熟，还京后，军国事悉付之，朕惟优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

（《北征记》）

此次亲征，永乐帝已是极度疲惫了，确切地说，不仅仅是疲惫，永乐帝连续三年带病远征，不知不觉中已然病入沉疴，他终于想要休息了。三年的亲征给他本已病弱老迈的身体带来了太大的伤害。

临终之地——榆木川

两天后的七月十六日，永乐帝的病情突然恶化，尽管左右侍从悉心照料，但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甚至随着病情的恶化，永乐帝时而

嘟囔着说起了胡话。

夏原吉爱我。（《明史·夏原吉传》）

永乐帝在意识模糊之时，想到的竟然是担心自己身体又反对自己亲征的夏原吉。七月十七日，大军到达榆木川（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之时，永乐帝陷入病危，始终处于昏睡状态。在失去意识之前，永乐帝把因出兵安南有功而颇有声望的英国公（从新城侯晋封）张辅召到枕边宣布遗命：皇太子朱高炽即位，自己按照太祖遗制葬礼从简。这是永乐帝弥留之际下达的最后的命令。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榆木川的营帐内，在一部分亲信的守候下，永乐帝走完了他六十五年波澜起伏的一生。永乐帝逝世了，在位二十二年零一个月，但在只相当于太祖三分之二时间的在位期间，他取得的成就足以与太祖比肩，或者说超越了太祖。二十二年的皇帝生涯在他走过的人生中或许已经足够精彩。永乐帝一生不辍追求的“永乐盛世”随着他的离去永远地终结了。

归来

永乐帝驾崩，营帐内一阵慌乱。为防备万一，几位重臣决定隐瞒皇帝驾崩的消息，暂时秘不发丧，一切等回到北京后再行处理。盛夏时节，尸体很容易腐烂，为了防止臭味飘散，马上把军中所有的锡制器皿集中起来，命军中工匠把这些器具熔化制成棺木盛放遗体，随后将工匠全部斩首封锁消息。为免让人察觉出任何异常，每天照常为皇帝准备早晚用餐。

其间，杨荣等人率领本部人马提前出发赶往北京，将皇帝驾崩的消息禀报给皇太子。皇太子得知消息后，当天即派遣皇太孙（后来的宣宗宣德帝）到开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附近）迎接皇帝灵

柩。皇太孙悲伤之余，着手让夏原吉等人准备葬仪。据说，皇太子亲自前往狱中来到关押夏原吉的牢房，流泪告知永乐帝驾崩的消息时，夏原吉当场哭倒在地，久久不能起来。

八月七日，皇太孙赶到漠北军营，正式公布永乐帝死讯，为皇帝发丧。然后，载有梓宫（天子灵柩）的龙辇（天子座驾）在一片庄严肃穆中启程，文武百官、将士、民众到居庸关迎接皇帝灵柩，哭声震天。八月十日，灵柩到达北京。亲征时场面威武壮观，归来时却悲怆肃穆。

归来之日，皇太子到北京郊外迎接，亲自护送皇帝灵柩进入紫禁城仁智殿，在那里重新安放遗体。然后，举国服丧，禁止一切娱乐、喜庆之事，连续数日举行悼念仪式。九月十日，永乐帝被定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定庙号为“太宗”。

在复杂肃穆的葬礼仪式后，十二月十九日，永乐帝遗体安葬在即将完成的“长陵”。长陵位于北京以北的天寿山，早逝的徐皇后就葬在那里。分别已久的他们终于可以在地下世界重逢了。他们的子孙也都埋葬在那一带。明十三陵中，最大的陵墓——长陵的主人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2）中国史的转折点

逆流

永乐帝之后，仁宗洪熙帝即位，大明朝堂风云随之一变。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仁宗向天下发布即位诏书，定次年为洪熙元年，同时，颁布三十六项恩赦及施政方针。其中包括停止采办“下西洋”用的宝船及云南、交趾地区的金银、香料，仁宗明确修正了永乐帝的政治轨道。事实上，其中多项措施都是根据夏原吉提出的方案制定的，意在调整永乐帝醉心于对外征伐所造成的财政紊乱。

但洪熙时代并不是单纯的对永乐时代的清算，确切地说，洪熙帝施行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与永乐时代的方针完全相反的。

这场政治变动就如同永乐时代这道洪流由于皇帝之死突然受到阻碍而掉头向相反方向流去。这场变动，大概最终不得不演变成“还都南京”的奔流。

曾经在紫禁城失火之际力主还都南京的势力，在永乐帝强力压制下暂时蛰伏了，却如同一股暗流一样，不断寻找机会随时准备再度喷发。永乐帝死后，对南京怀有深刻感情的洪熙帝继承皇位，成为他们复起的良机。当然，究其原因，是南方官员对给江南强加负担的北京京师体制的强烈不满。

洪熙帝即位伊始，朝廷内外官员相继上书请求还都南京。之所以一再上书还都，只是因为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了新皇帝的心思。在他们的支持下，洪熙帝开始着手准备还都事宜。就在此时，街头巷尾欢迎还都的传言似乎也越来越多（关于新皇帝与还都推进派的想法一致以及围绕还都的一系列问题，新宫学先生对此有深入研究）。

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一日，以“谒祭”凤阳皇陵（朱家祖先的陵墓）和南京孝陵（太祖朱元璋的陵墓）的名义，洪熙帝派皇太子（后来的宣德帝）去南京，为还都南京做前期筹备。同月二十八日，洪熙帝正式下诏还都南京，北京官府机构再次附加“行在”二字，北京行部和行后军都督府重新启用。皇帝尚未还都，南京已经成为都城，北京再次降格为陪都。

洪熙帝暴亡

尽管如此，洪熙帝的还都计划还是过于性急了。先皇下葬长陵不过三个月的时间，一般来说是不会在这个时候急于考虑放弃北京的。

这恐怕是由于他对永乐帝晚年无视朝野舆论执意迁都北京以及亲征蒙古怀有不满。总而言之，由于永乐时期的蒙古亲征，洪熙帝即位之初，朝野上下，举国疲敝。这种情况下，洪熙帝满足社会舆论的要求，毅然决定还都南京，恐怕也有发泄情绪之嫌。

最能体现洪熙帝心思的代表性事件，就是对郑和的安排。一方面，曾经屡次远征海外的郑和被召回内陆，任命为南京守备。宣德帝即位后，郑和最后一次远征海外之前一直都是这个官职。随郑和出海的官兵直接编为南京守备军，在洪熙帝驻留行在（北京）期间负责“首都”防卫。对洪熙帝而言，凡是属于“远征海外”这类只是耗费国家财力的项目一律终止，他对此没有任何的留恋和期待。

另一方面，四月四日，洪熙帝下旨修筑“都城”南京的皇城。永乐时期迁都北京后，虽说保留了南京的官府机构，但由于南京降格为陪都，皇城破损增多，需要修缮。第二天，洪熙帝命曾经和郑和一起出海远征、现任南京守备太监的王景弘传旨，来年正月返回南京。至此，南京成为名实相符的明朝都城，南京京师体制的启动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然而，就在此时，突然发生了一起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五月十二日，在位仅十个月、发布还都旨意不过四十三天的洪熙帝突然去世，暴亡原因不明。但有传言，洪熙帝虽以“仁宗”为庙号，但身体极度肥胖，即位后又荒淫无度、不注重保养身体，大概是因此致祸。虽然他在遗诏中提到继续还都南京，但还都的最大推动者突然离世，意味着还都南京的计划只能暂停。

不了了之

洪熙帝死后，宣德帝即位，但他却不想还都南京。宣德帝与他的父亲洪熙帝不同，他从小受到永乐帝的宠爱，而且，在北京生活时间很长，所以，他从来就不打算回到南京。洪熙帝的遗诏在前，他当然不敢公开表示终止还都，但始终对还都之事悬而不决不做处理，最后不了了之。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宣德帝取消了北京行部和行后军都督府的设置，间接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图。虽说如此，但此时，北京仍然是陪都，形式上，仍采取南京京师体制。

直到正统六年（1441年）十一月，紫禁城烧毁的三座正殿重建，北京才重新被定为都城。至此，北京官府机构上的“行在”二字再次被去掉，北京正式成为明朝都城。自洪熙帝下诏还都以来十六年的名实分离的不正规的体制结束了，全新的北京京师体制的时代到来了。

从永乐帝去世到洪熙帝去世期间，还都南京的计划是最引人注目的重大国事。但它是在暂时的热情和喧嚣的带动下推进的，随着洪熙帝的暴亡而终止，不久，就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当然，善后处理需要一些时间，最后终于尘埃落定。此后的明朝历史中，还都南京事宜再也没有被提上日程。应该说，永乐帝毕生的努力没有徒劳而终。

牢固的体制

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日本学界，“明初体制”成为研究热点。原因之一，是日本学界要重新研究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之前的旧体制的作用。战后日本的明清史研究是以明末清初的变革期为中心展开的，将明初体制问题作为研究明末清初变革期的必要课题，可以说是明清史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原因之二，是针对现代化课题的研究，想要通过明初历史的考察来探索现代中国的起点。对此，中国学界把明初体制评价为阻碍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的要因，日本学界同样正在重新认识明初体制的价值，以此考察中国式的“近代”发展状态。总之，对于不同于欧洲式“近代”的中国式“近代”的理解，应该重新回到作为明清时代起点的明初时期，研究其理论及构成。

那么，对于明初体制的基本认识，借用岸本美绪先生的话来形容，是“牢固”的体制。所谓“牢固”，换言之，也可以称为“统治性”吧。明朝不仅在国内实行极权统治，而且，对周边各国也都施行前所未有的强化统治。反过来说，明朝确立起足以建立统治秩序的强大的国家政治权力，然后，再凭借国家政权的强大能量将国内外都强制性纳入这种统治秩序当中。

赋予皇帝权力，皇帝使用权力统治社会、维持秩序，这是中国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中国皇帝的权力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加强化。每当秩序崩坏之后，权力都会被身为秩序统治者的皇帝再次集中，明朝专制国家的产生就是权力集中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明朝专制国家是中国社会的“体制性归结”，那么，当然可以说，明初体制是一种“牢固”的且具有“统治性”的体制。

时代的邂逅

诚然，永乐帝即位的方式及其个人的资质，使得永乐时代具有极其明显的特异性。但是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它在中国式的逻辑中的特异程度。永乐帝矢志追求的只不过是太祖朱元璋建立的专制统治扩及国内外。可以说，他是要“终结”明初时代，结果是完成了明初体制的确立。

虽说明初体制是中国社会的归结点，但不能以此断定中国社会就此固定化了。的确，明初之后的统治者仍然在不断强化明初体制，竭力维持专制统治。但另一方面，社会却逐渐从专制体制中游离出来，试图冲破甚至要推倒它。按照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力学原理，明初时代成立的这种体制，从它完成那一刻起，就必然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的乖离。

本书前面阐述的海禁-朝贡体制，在洪武、永乐时代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外走私贸易的活跃等，不断受到抵抗，最终，明朝末期不得不放宽了海禁政策。在思想方面则表现为与作为统治思想的朱子学对抗的阳明学的兴起，以及一批批判专制体制的思想家在明末的出现，如黄宗羲（1610～1695年）等人。伴随着各个领域既存秩序的破除，明初体制已不再作为明初体制存在了，明朝最终在农民起义中灭亡了。当明末混乱的政治秩序被再次规范，出现了清朝专制国家之时，其中也孕育了中国式的“近代”。

明初时代既是中国史的一个归结点，同时也是新时代的出发点。尤其是最终完成明初体制确立的永乐时代达到了旧时代的一个顶峰，也可以把它视为新时代萌芽的分界点。时代与时代邂逅的时期，姑且称为“中国史的转折点”吧。此后，中国社会在明初体制的制约下，向着中国式的“近代”迈出了缓慢的一步。

这不是欧洲标准的“近代”，至少是带有引号的近代。那是符合中国社会的中国特色的“近代”，而这种中国式“近代”的旧体制的

起源就在遥远的明初时代。永乐帝所留下的遗产将会描绘出一幅怎样的中国“近代史”画像呢？这是在欧洲式“近代”相对化的今天，历史赋予我们史学研究者的重大课题。至今，永乐帝仍然具有现代意义，他在邀请我们来到明初时代。

参考文献

本书的写作参考了许多先行研究，但由于本书的性质所限，不可能将所有的研究都收罗介绍。因此此处在必需要最小的范围内，有限地列举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研究。

I 永乐帝的传记及与他相关的专著

1. 寺田隆信『永楽帝』、人物往来社、一九六六年。のち一九九七年に 中公文庫として再版。

2. David B. Chan. “*The Usurpation of the Prince of Yen, 1398-1402*”,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 San Francisco, 1976.

3. 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7），一九八八年。

4. 商传：《永乐皇帝》，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5. 张奕善《朱明王朝史论辑（太祖、太宗编）》，“国立”编译馆，一九九一年。

6. 晁中辰《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7. 毛佩琦、李焯然《明成祖史论》，文津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8. 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9. 王熹《建文帝 永乐帝》，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II 多章均有参考的文献

1.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五》，一九四五年。

2.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八》，一九四八年。一九七五年1、2合册、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再版。

3. 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一册至第八册，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六年。

4. 檀上寛『明朝専制支配の史的構造』、汲古書院、一九九五年。

5. 川越泰博『明代建文朝史の研究』、汲古書院、一九九七年。

III 各章参考文献

第一章

1. 那波利貞「中華思想」、『岩波講座 東洋思潮』第十七卷、一九三六年。

2. 小倉芳彦『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青木書店、一九七〇年。

3. 堀敏一『中国と古代東アジア世界——中華の世界と諸民族——』、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年。

4.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5. 西嶋定生『日本歴史の国際環境』、東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6. 中村栄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上、吉川弘文館、一九六五年。

7. 森克己『新訂日宋貿易の研究』、『森克己著作選集』第一卷、国書刊行会、一九七五年。のち二〇〇八年に勉誠出版より『新編森克己著作集』として再版。

8. 桑原隲蔵『蒲寿庚の事蹟』、岩波書店、一九三五年。のち『桑原隲蔵全集』第五巻〔岩波書店、一九六八年〕に収録。

9.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10. 杉山正明『クビライの挑戦——モンゴル海上帝国への道——』、朝日新聞社、一九九五年。のち二〇一〇年に講談社学術文庫として再版。

11.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への興亡』上・下、講談社現代新書、一九九六年。

12. 浜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書店、一九九七年。

第二章

1. 吴晗《朱元璋传》，上海三联书店，一九四九年。のち『 吳晗史学論著選集』 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に収録。

2. 谷口規矩雄『 朱元璋』、人物往来社、一九六六年。

3. 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4. 谷川道雄、森正夫編『 中国民衆叛乱史』 2、平凡社東洋文庫、一九七九年。

5. 檀上寛『 明の太祖 朱元璋』、白帝社、一九九四年。

6. 宮崎市定「 洪武から 永楽へ——初期明朝政権の性格——」、『 東洋史研究』 第二十七巻第四号、一九六九年。のち『 宮崎市定全集』 第十三巻[岩波書店、一九九二年] に収録。

7. 檀上寛「 初期明帝国体制論」、『 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11 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統合』、一九九七年。

8. 檀上寛「 明初の海禁と 朝貢-明朝専制支配の 理解に 寄せて-」、『 明清時代史の 基本問題』、汲古書院、一九九七年。

9. 田中健夫『 中世対外関係史』、東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

10. 田中健夫『 倭寇——海の 歴史——』、教育社、一九八二年。のち二〇一二年に 講談社学術文庫として再版。

11. 佐久間 重男『 日明関係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年。

12. 蔵持不三也『ペストの文化誌——ユーロッパの民衆文化と疫病——』、朝日新聞社、一九九五年。

第三章

1. 吴晗《明成祖生母考》，《清华学报》一九三五年第三期。のち『吴晗史学論著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に収録。

2. 佐藤文俊「明・太祖の諸王封建について」、『和田博徳教授古稀記念 明清時代の法と社会』、汲古書院、一九九三年。のち3とともに『明代王府の研究』[研文出版、一九九二年]。

3. 佐藤文俊「洪武九年葉伯巨の獄死」、『明代史研究』第二十号、一九九二年。のち2とともに前掲『明代王府の研究』に収録。

第四章

1. 阪倉篤秀「建文帝の政策」、『人文論究』第二十七卷第三・四号合巻、一九七八年。

2. 朱鴻《明惠帝の用人與政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三期，一九八五年。

3. John W. Dardess. “Confucianism and Autocracy: Professional Elites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1983.

第五章

1. 幸田露伴著、福本雅一注釈『運命』、『日本近代文学大系6 幸田露伴集』、角川書店、一九七四年。なお『運命』は、他に岩波文庫（一九三八年）、講談社文芸文庫（一九九七年）などにも収められている。

第六章

1. 孟森《选刻四库全书评议》，《青鹤杂志》卷一第二十三期，一九三三年。のち『明清史論著集刊』〔世界書局、一九五九年〕に収録。

2. 徐作生《明惠帝出亡穹窿山新证》，《史学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第七章

1. 間野潜龍『明代文化史研究』、同朋舎、一九七九年。

2. 李焯然《明成祖史论》（思想编），文津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3. 山本隆義『中国政治制度の研究』、同朋舎、一九六八年。

4.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一九四九年。のち一九七一年に汲古書院より再版。

5. 三田村泰助『宦官』、中央公論社、一九六三年。のち一九八三年に中公文庫として再版。

第八章

1. 和田清『東亜史研究（蒙古篇）』、東洋文庫、一九五九年。

2. 佐藤進一『足利義満——国家の統一に賭けた生涯——』、平凡社、一九八〇年。のち一九九四年に平凡社ライブラリーとして再版。

3. 村井章介『アジアの中の中世日本』、校倉書房、一九八八年。

4. 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一九八〇年。

5. 寺田隆信『鄭和——中国とイスラム世界を結んだ航海者——』、清水書院、一九八一年。のち一九八四年に清水新書より『中国の大航海者 鄭和』として再版。

6. ルイーズ・リヴァシーズ著、君野隆久訳『中国が海を支配したとき——鄭和とその時代——』、新書館、一九九六年。

第九章

1. 山本達郎『安南史研究I ——元明両朝の安南征略——』、山川出版社、一九五〇年。

2. 奥崎裕司「永楽帝のヴェトナム遠征の原因」、『東アジア世界史の展開』、汲古書院、一九九四年。

3. 愛宕松男『アジアの征服王朝』、河出書房、一九六九年。のち一九八九年に河出文庫として再版。

4. 愛宕松男『中国の歴史6 元明』、講談社、一九七四年。のち一九九八年に講談社学術文庫より『モンゴルと大明帝国』として再版。

5. 新宮学「 初期明朝政権の 建都問題について —— 洪武二十四年皇太子の陝西派遣をめぐって —— 」、『 東方学』 第九十四輯、一九九七年。のち『 北京遷都の研究』[汲古書院、二〇〇四年] に収録。

第十章

1. 新宮学「 南京遷都——永楽十九年四月北京三殿焼失の 波紋——」、『 明清時代の法と 社会』、汲古書院、一九九三年。のち2とともに 前掲『 北京遷都の研究』に収録。

2. 新宮学「 洪熙から 宣徳へ——北京定都への 道——」、『 中国史学』 第三巻、一九九三年。のち1とともに 前掲『 北京遷都の研究』に収録。

3. 岸本美緒「 清朝と ユーラシア」、『 講座世界史2近代世界への 道——変容と 摩擦——』、東京大学出版社会、一九九五年。

后记

写一本关于永乐帝的书是我在写朱元璋传记时就萌生的想法。或者说，我涉足明代史研究的契机，就是源于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强烈个性和他们所生活的明初时代的浓厚兴趣。朱元璋和永乐帝在我的头脑中始终是连带存在的。

多年前我偶尔整理关于朱元璋的传记，从个人角度描述朱元璋时，心中总觉得欠缺点儿什么。明朝专制国家的确立源自朱元璋和永乐帝，更严谨地讲是源自包括建文帝在内的明初政治史，只有把握从洪武至永乐的历史脉络，故事才会更完整。仅从朱元璋一代的传记来看，明初的政治史是不连贯的，因此也可以说，本书是前书的补充。

尽管如此，事实上本书与前书并非一体，阐述的是完全独立的观点。与上本传记式的叙述不同，本书尝试问题设定的叙述方式，深入刻画永乐帝人物特点，解析明初政治史。其成功与否暂且不提，本书通过永乐帝阐述我前述的研究课题的意义很大。作为明朝专制体制的完成者，永乐帝在历史舞台上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从本书的副标题可以看出，永乐帝的雄才大略在外交方面也得以充分发挥。这与相对重视内政的朱元璋的政策相比，看似缺乏连续性。其实，正如本书所论述的，两者之间的政策在根本上是连续的。在构成中华思想根基的天命思想和华夷思想之中，洪武时代进一步强调基于前者的“君一臣一民”的天下秩序，永乐时代则确立并致力于

追求反映后者的华夷秩序。决定两者行动的，归根结底是中华思想理论。他们追求的是在世界上重新确立这两种秩序。貌似不连续的施政方式，其实是在相同理论基础上，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的确，永乐帝从个人情况出发，有积极开展外交的理由。但是，仅仅是以华夷秩序为前提的积极对策而已。而欧洲近代的重商主义政策则完全属于不同层次的问题。

本书的目的不是强调永乐帝如何夺回政权和重新评价他的政绩，而是通过中国传统理论考量他采取的系列政策，重新分析他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永乐帝确立的体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东亚各国都奠定了“近代”以前的社会基础。不论该制度的好坏，一直受中国影响的周边各国，在那个时代形成了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所有行动也被束缚在该秩序内。

不仅在明朝，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也沿袭了“海禁-朝贡”贸易体制，并影响到周边各国。朝鲜和安南也采取了海禁，日本江户时代也实行了众所周知的“锁国”政策。锁国作为海禁的翻版已经成为今日共识。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确立正是在永乐时代。因而可以理解永乐时代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

受讲谈社学术局的横山建城先生之邀，我从事永乐帝相关文献整理已经四年了。最初约定去年（1996年）秋天完稿，随着年龄增长琐事缠身以及与生俱来的惰性，我的工作推迟了一年。此外大概还有一个借口，就是阪神大地震的影响也非常大。

虽然给编辑部添了不少麻烦，但对我来说多出的这一年非常有意义。本书执笔前完成了两篇论文（见参考文献），开拓了我的视野。明初的华夷秩序的印象也是在两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逐渐清晰的。

加上今年七月首次访问冲绳，再次认识到“冲绳是琉球国不是日本”这一事实，使我受益匪浅。将日本相对化，尝试从多个视角观察问题，可以更好地进行对中国的相对化思考，从而避免陷入中华思想独善的弊病。如今一想，这个时期有机会踏上冲绳这块土地，是非常幸运的。

一直没有着手写这本书，实在有些对不住编者横山先生。但是，我开始动笔之后，经常得到横山先生悉心的引导，最终得以完成本书的撰写。如果没有横山先生的鼓励和引导，本书的完稿将会更迟一些。包括照片选择和插图制作都得到横山先生的关照，借此机会再次致谢。

本书完成之际，我在学校已经连续三年进行永乐帝相关教学。尽管是相对抽象的授课内容，但京都女子大学的学生一直坚持参加课程，还有琉球大学的学生们在集中讲课的间隙，在酷暑下陪伴我访问了大量历史遗迹，是他们的支持才使得本书可以顺利完稿，在此对各位同学表示感谢。

文库版后记

本书原著《永乐帝——中华“建立世界体系”的梦想》作为讲谈社选集之一出版，至今正好十五年，在（地震）灾后重建最关键的平成九年（1997年）的盛夏，我在神户家中利用暑假的大部分时间完成原稿写作，那种兴奋好像发生在昨天一般。

十五年的岁月似乎十分短暂，但是仔细想一想其实已经相当长。这次，受讲谈社学术文库之邀，我重新读了一遍原著，岁月流逝的感觉更加强烈。重读原文，不用说那些对主题的深入思考，就连行文的口吻、笔调，还有各章的小标题等，都让我读来有点“自鸣得意”的感觉，想来果然是只有当时的自己才能写出这样一本书吧。如今，即使要求我再写出相同主题的作品，恐怕很难再达到超过原著的水平了。作为地震的亲身经历者的那种焦躁和冲动都交织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那种能量推动我一气呵成完成了这本书。

的确，十五年间学术界变化很大。当时属于非主流的前近代对外交流史以及国际关系论，今天却成为研究的主流，每年有大量成果发表。讨论东亚国际秩序时，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成为惯用说法，在该框架之内分析国际关系，在明清史领域是十分盛行的。另一方面，转眼观察中国社会，国内民族问题以及古今中日之间不稳定因素，使得“华夷秩序”这个词的负面影响如同幽灵一般时而被唤醒，因此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华夷秩序”都是热门课题。

正如大家注意到的，原著副标题“中华‘建立世界体系’的梦想”更改为“华夷秩序的完成”。这并不是为了应和现在“华夷秩序”一词的流行趋势，唯恐落后而匆忙更改的。华夷秩序这个词，在我的原著中已经频繁使用，在第九章还使用了“华夷秩序的统合者”。华夷秩序不仅是原著的主题，对现在的我来讲也是很大的课题。本书在重印之际，除了修订错误和做部分修改外，可以看到几乎没有对原著内容进行更改。

但是毕竟十五年比较长，虽然在原著中表达的个人观点至今没有变化，但有些想法又有深化。首先，我认识到了永乐帝的“梦想”其实在当时暂时地实现了；而从“梦想”到“完成”的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到对永乐帝政绩的评价，也影响了我个人深入分析永乐帝的认知基准。更直接地说，在我心中永乐帝的政绩更加鲜明了，以下简单补充说明一下。

古往今来，在中国理想世界的概念是“天下一家”。《礼记》的《礼运》篇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在圣天子的指导下，发挥每个人的德行，对待他人如同对待自己一样，这样天下仿佛一个大家族。没有盗窃、没有怨恨、消除一切对立的世界，那就是天下一家。历代为政者也经常将自己统治的国家看成天下一家，以此证明王朝统治的正当化。

历代王朝建立之际，为政者都会用“天下一家”来附会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例如，王朝的建立就是统一了天子之家的天下，是天下一家的表现；假若王朝的统一是建立在平定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前提下，那么为政者会说中华与夷狄是一家，这是另一种天下一家。天下一家通常也称为“四海一家”“六合一家”等，被用作表示王朝建立或安定的标志性说法。而在这些词语中，用“华夷一家”代替“天下一家”的说法，则是由永乐帝开始的。

在现代学界，“华夷一家”通常用来作为属于多民族复合国家的清王朝的统治理念的标志性用语，它作为以满族为首的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象征概念，广泛应用在清史研究中，以体现清王朝的政权特点。但是，清史学者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第一次使用“华夷一家”的人是永乐帝。永乐帝之前，没人用过“华夷一家”，可以确定它是永乐帝首次提出的。那么，永乐帝为什么不延用“天下一家”，而一定要提出“华夷一家”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呢？这与在明代之前的元代建立了统合华夷的强大的多民族政权有密切关系。

对于经过元明革命而建立的大明王朝来说，要想使自己的统治正当化，就必定要统治与元朝相当的或者超过它的疆域。仅仅是复兴华夏还不足以超越元朝，还要实现对夷狄的统治，这成为对大明政权的必然要求。于是，明朝成立伊始，就积极地与周边诸国建立朝贡体制。朱元璋时期有十七个国家前来朝贡，与大明缔结君臣关系。从国内外政治的角度，朱元璋积极宣传华夷一统，他曾自豪地提出“统一华夷”“君主华夷”等目标。但是朱元璋的这些口号最后并没有升华到华夷之天下成为一家的高度。我想这恐怕是由于夷狄中势力强大的蒙古一直未被彻底平定，致使他犹豫不决，始终不敢提出“华夷一家”。

这种情况在永乐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雄心勃勃的永乐帝对外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在永乐年间，先后有六十多个周边国家、地区向大明称臣纳贡，出现了“永乐盛世”的局面。其间，永乐帝五次亲征蒙古，一度让蒙古向大明朝贡，这是洪武时期未曾有过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举。此外，辽东女真各族相继编入羁縻卫所，安南（越南）也并入明朝版图等，一个真正的以多民族复合国家政权为特点的大明体制在永乐帝时期完全建立了。而能反映永乐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就是永乐帝所说的“华夷一家”。

明朝取代元朝之后，太祖朱元璋时期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朝贡体制（君臣关系），首先将“君主华夷”的观念体制化，实现了初步的华夷统合。但若要实现超越元代的元明革命，就需要有超越“君主华夷”的更高一层的新的政治理念。那就是在“华”与“夷”的天下中，达到华夷统一的终极境地，即能够将“华”与“夷”融合为一个大家族的“华夷一家”的理念。实际上，明朝在继承了元代之时，就被赋予了实现华夷一家的历史使命，而这一使命最终是由将超越忽必烈作为目标的永乐帝完成的。

永乐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仅限于提出“华夷一家”的政治理念，而是将这种理念付诸行动，在现实的国家政治中将其实现。永乐帝册封周边诸国藩王时，在赐予他们诰命（辞令书）、印章、历书的同时，还赐给藩王专用服饰，并定为惯例。当然，明朝以前，中原王朝也有赏赐给藩王冠服的情况，但没有成为定例，朝服、常服、礼服等服装规格也不统一。而永乐帝赐予藩王的冠服则规定为大明皇帝及宗室成员在举行国家重要典礼、仪式时穿着的礼服。也就是说，永乐帝下赐的是宗室专用的礼服，可以看出他的心思缜密。

原本，明代皇帝及宗室穿用的礼服按照举行国家仪式的重要程度不同，大致分为冕服和皮弁冠服两种。冕服是在祭祀天地及宗庙等最重要的仪式时穿用的，皮弁冠服是皇帝接见朝贡使节、科举进士等次要的仪式时穿用的。明代以前，一般官员也可以穿着这些礼服，但明朝时，这些礼服就变成了皇帝及宗室专用的礼服。当然，即使同样是冕服、皮弁冠服，也有上下等级之分，皇帝、皇太子、亲王、郡王等宗室成员由于身份地位的不同，礼服的样式也各有不同。

永乐帝独创之处就在于，开创将原本是宗室成员才能穿着的专用礼服授予周边诸国藩王的制度。这一制度旨在将亲王（皇帝之子）身份的冕服、郡王（皇帝之孙）身份的皮弁冠服赐予周边藩王，以此与

藩王之间缔结一种父子或祖孙的“拟家族关系”。例如，赐给朝鲜和日本国王的是冕服，赐予琉球、安南等地藩王的是皮弁冠服，将所有的臣属藩王都定位在家族秩序之中。正是永乐帝将华夷一家的理念在现实中具体化、可视化，而大明的朝贡体制也由此具有了理论根据。同时，这也意味着永乐帝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最终完成了自己多年来“一统华夷”的梦想。

的确，朝贡体制在永乐后期出现裂痕，永乐帝不得不亲自维持体制的稳定。如同着魔了一样，永乐帝拼命反复亲征蒙古，对永乐帝来说，打倒宿敌蒙古是他毕生的夙愿。最后，永乐帝倒在亲征蒙古的途中，成为不归之人，每念及此，应该说永乐帝的理想最终止于一场幻梦。但是，他提出的“华夷一家”的观念却历经明朝一代深深烙印在人们的意识中，永乐帝的遗志仍然在后世延续。即便是代明而起的清朝，依然是通过另一种形式继承了永乐帝“华夷一家”的观念，这就是清代为什么会有符合多民族复合国家统治理念的为政观念的原因吧。

大清对中国的统治始于顺治皇帝，顺治帝强调“满汉一家”的观念，旨在促成满族与汉族的融合。到了确立了清朝的国家体制的雍正时代，夷狄出身的清朝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的观念，并使之成为清朝统治中国的根本理念。雍正帝自认是夷狄，但他提出“华夷之别”在于德之有无，进行了著名的“华夷之辨”的论战。而且，自诩为通过对外扩张达到中国最大版图的乾隆帝时期，更是全面提出了“中外一家”的观念，宣传五族共和的盛况。用满、汉、蒙、回、藏这五族共和的所谓“皇清中华”与周边诸外国的“外夷”合并而成“华”与“夷”的天下，就是这种观念夸张化的表现。

如前所述，提起清朝的统治理念，很容易让人想起“华夷一家”，但这一词语在整个清朝只在雍正年间使用过。而且，继雍正之

后的乾隆时期，这种观念被认为是危险思想而被否定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外一家”的提法。某种意义上，“华夷一家”的说法是符合清王朝民族实际性质的恰当用词，但却很难承认它是符合当时历史实情的适当提法。乾隆以后，清朝的对外政策或者说世界观都是从“中外一家”的观念出发的。这就如同曾经的“天下一家”的说法，会根据为政者的不同情况而加以不同的解释，“中外一家”提法也同样在使用中被赋予了各种含义。追寻、研究“天下一家”观念的发展演变同样是很有意义的课题，但那是另外的研究课题，在此不再赘述。

不管是雍正帝的“华夷一家”，还是乾隆帝的“中外一家”，都源自永乐帝的“华夷一家”的观念。“华夷一家”的提法产生之前，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中，决定中国人意识的是天下一家的观念。而“华夷一家”则是适应明初这一时代的要求，由永乐帝独创出来的。这一观念的内在理念，在永乐帝之后，变身为另外一种称呼被清朝继承下来，历经发展，一直延续至今。永乐帝在位的明初时代，以及他所留下的政绩，即便在他离世之后，依然带给中国社会极为深远的影响。从“天下一家”到“华夷一家”，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永乐帝至今仍然向我们追问华夷秩序的实质。

讲谈社学术文库出版部的姜昌秀先生电话告知我本书刊行之事的时候，正是今年九月十八日的傍晚时分。那天恰是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也正是中国反日示威游行最高潮的时候。当时正看电视出神的我接到了姜昌秀先生的电话，谈话中知道了拙著再版刊行之事。不用说，在接到了意想不到的邀请后，我当即表示同意。原版绝版至今已有十年，我本以为这本书不会再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了，没想到姜昌秀先生将拙著发掘出来，我非常开心。

如前所述，这十五年间，我对永乐帝的研究当然有更深化的部分，因此在文库版后记中略做叙述。当然，主要观点仍然都在本书中

论述，后记中只是做一点补充。尽管如此，我在校正本书的过程中，仍深深地感受到如同原著后记中也叙述过的那样，永乐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次，沿着永乐帝的人生轨迹再次追溯这段历史，那种感觉愈发强烈。这样的大人物，在人的一生中恐怕是难得见到吧。再次感谢姜昌秀先生给予我这样珍贵的机会，我也在和老朋友永乐帝重逢的喜悦与格外愉快的气氛中完成了这篇后记。

2012年11月

檀上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日）檀上宽著；王晓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2

（鲤译丛）

ISBN 978-7-5097-7631-5

I . ①永… II . ①檀…②王… III. ①明成祖（1360～1424）-人物研究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0865号

• 鲤译丛 •

永乐帝

——华夷秩序的完成

著者|（日）檀上宽

译者| 王晓峰

出版人| 谢寿光

项目统筹| 冯立君 段其刚 责任编辑| 冯立君 胡亮 张卉

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开本: 787mm×1092mm 1| 32

印张: 9.125 字数: 161千字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97-7631-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1050号

定价 52.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
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

田中健夫／倭寇

檀上宽／永乐帝

加藤徹／西太后

堀敏一／中国通史

本书的目的不是强调永乐帝如何夺回政权和重新评价他的政绩，而是通过中国传统理论观察他采取的系列政策，重新分析他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永乐帝确立的体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东亚各国奠定了『近代』以前的社会基础。不论该制度好坏与否，一直受中国影响的周边各国在那个时代，都形成了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所有行动也被束缚在该秩序内。

——檀上宽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097-7631-5



定价：5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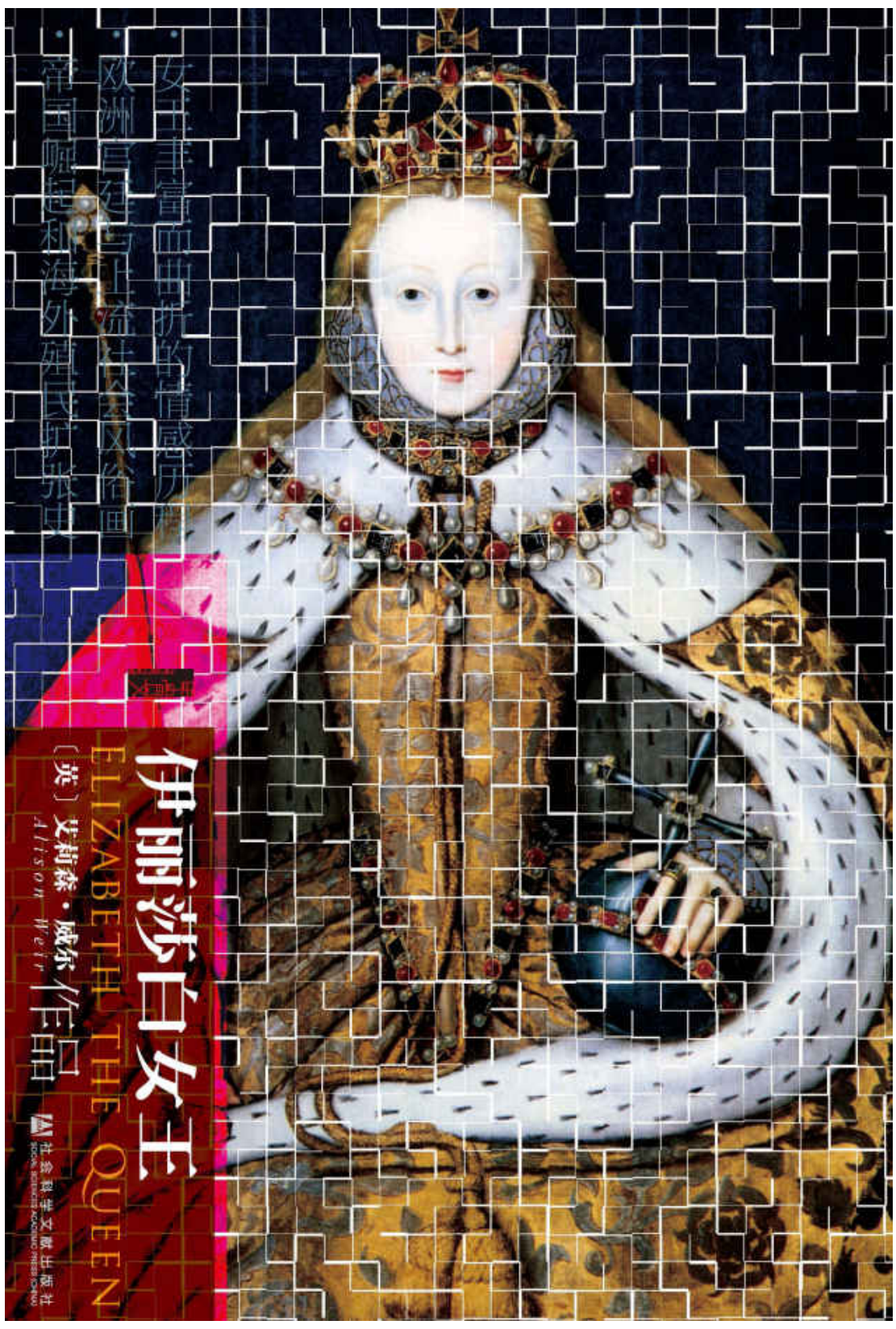
女王丰富而曲折的情感历程
欧洲宫廷与上流社会风俗画
帝国崛起和海外殖民扩张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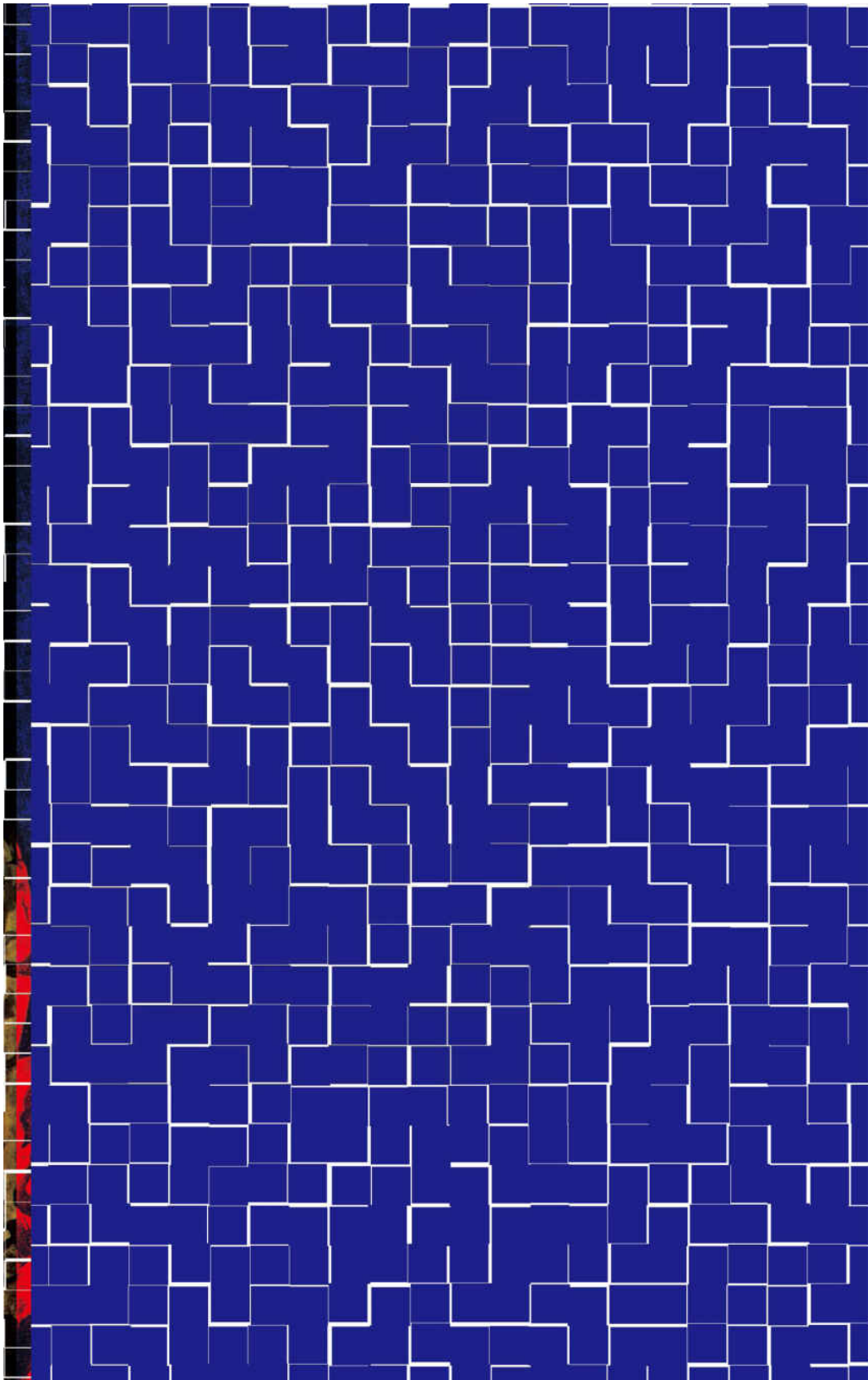
伊丽莎白女王

ELIZABETH THE QUEEN

〔英〕艾莉森·威尔 作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伊丽莎白女王

T H E

Q U E E N

〔英〕艾莉森·威尔 作品
Alison Wei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英王亨利八世



玛丽女王与伊丽莎白公主进入伦敦，1553年



伊丽莎白一世，在登基大典上



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



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



玛丽·斯图亚特从法国归来，1561年



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和玛丽女王



莱蒂丝·诺利斯，莱斯特伯爵夫人



克里斯多福·海登爵士



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



安茹公爵



菲利普·西得尼爵士



华德·莱礼爵士



弗朗西斯·德瑞克爵士



伊丽莎白女王：无敌舰队肖像画



罗伯特·塞西尔



小艾赛克斯伯爵罗伯·德弗罗



英王詹姆士一世（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



伊丽莎白女王晚年



伊丽莎白一世葬礼队伍

Elizabeth the Queen

By Alison Weir

Copyright © 1998 by Alison Wei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书根据兰登书屋2008年版译出，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场出版授权

致谢辞

仅将这本书献给无怨无悔支持我的阿姨与姨丈，宝琳与约翰·马尔斯登夫妇。还要感谢同样支持我的兄弟与弟妹，罗讷与艾莉森·威尔夫妇以及肯尼斯与伊丽莎白·威尔夫妇。

在此容我衷心地致上感谢。

主要人物介绍

皇亲国戚

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

英王亨利七世的次子，都铎王朝第二任国王。为了与伊丽莎白的母亲安·波林成婚，亨利八世不惜与罗马教皇反目，与元配亚拉冈的凯瑟琳离婚，推行宗教改革，并通过允许自己另娶的法案。他将当时英国主教立为英国国教会大主教，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自己则成为英格兰最高宗教领袖，并解散修道院，使英国王室的权力因此达到顶峰。

安·波林（Anne Boleyn, 1507-1536）

英国都铎王朝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就是为了与她结婚，亨利八世与教会断绝关系，推行宗教改革，并与元配亚拉冈的凯瑟琳离婚。安·波林在一五三三年生下伊丽莎白之后，再也无法顺利生出子嗣，使得亨利八世厌倦了她，最终在一五三六年以通奸罪名被斩首示众，结束了“千日王后”的传奇一生。

英国的玛丽女王（Mary, Queen of England, 1516-1558）

亨利八世与元配凯瑟琳的女儿。父母的离婚，导致她度过一段悲惨的青少年时期。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继位之后便决意将英国

恢复为信仰天主的国家，但是她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联姻并不受人民的欢迎，在一五五八年十一月过世时并未留下子嗣，在位仅五年。

诺福克公爵四世汤玛士·霍华 (Thomas Howard, 4th Duke of Norfolk, 1536-1572)

伊丽莎白女王的表亲之一，也是势力庞大的权贵重臣。虽然从小在新教的环境下长大，但是他对天主教徒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深表同情，也因此后来在追求玛丽·斯图亚特的鱼雁往返中，同意参与天主教徒的篡位阴谋。一五七二年因叛国罪成立而遭到斩首处决。

英王爱德华六世 (Edward VI, 1537-1553)

伊丽莎白女王的弟弟，亨利八世唯一的儿子，由第三任妻子珍·西摩所生。一五四七年，当他继位成为英国国王时还只是个十岁的小孩，到他一五五三年去世为止，在位仅六年。

莱蒂丝·诺利斯 (Lettice Knollys, 1541-1634)

弗朗西斯·诺利斯与凯瑟琳·凯利之女，也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姨甥女。她一生总共嫁了三次。二十岁时便嫁给了第一任丈夫艾赛克斯伯爵华特·德弗罗，并且生下后来的小艾赛克斯伯爵罗伯·德弗罗。华特·德弗罗身故后，将儿子托付给伊丽莎白女王，而莱蒂丝则秘密嫁给了女王最钟爱的宠臣莱斯特伯爵。事后才得知的伊丽莎白女王颇有醋意，总是找机会报复莱蒂丝。莱斯特伯爵去世后不到一年，四十七岁的莱蒂丝便下嫁了她儿子小艾赛克斯伯爵的好友布朗特爵士，但在一六〇一年以小艾赛克斯伯爵为首的谋反叛变中，布朗特爵士也受牵连遭到死刑处决。莱蒂丝活到了九十四岁。

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 (Mary Stewart, Queen of Scots, 1542-1587)

伊丽莎白女王的表侄女。她出生不久后，便被加冕为苏格兰女王。因为与法国王储弗朗西斯二世有婚约在身，她从小就在法国宫廷长大，并且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与达恩里勋爵的婚姻虽然没有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同意，但她的儿子詹姆士六世后来成为伊丽莎白女王唯一的继位人选。她与伊丽莎白女王之间的互动，是本书的重头戏之一，她涉嫌谋杀前夫达恩里勋爵、怂恿诺福克公爵与她成婚的阴谋，以及逃亡英国后被软禁期间仍不断地秘密向外界联系谋反篡位的举动，最后终于连伊丽莎白女王也抵挡不住民意，将她送上了断头台。

达恩里勋爵亨利·史都华 (Henry Stuart, Lord Darnley, 1546-1567)

莱诺克斯伯爵马修·史都华之子，他的外祖母是亨利八世的姐姐玛格丽特·都铎，因此他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表外甥。为了争取英国王权的优先继承顺位，他成了苏格兰玛丽女王的第二任丈夫，但是这段婚姻并未修得正果。一五六七年，他被发现在自宅的爆炸案中身亡。

英王詹姆士一世 (King James I of England, 1566-1625)

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与达恩里勋爵之子。虽然他从襁褓时期便被加冕为苏格兰王，但直到一六〇三年他三十七岁，伊丽莎白女王去世时，才继位为英国国王。

参政大臣

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 (Sir William Cecil, Lord Burghley, 1520-1598)

伊丽莎白女王治理国事的首席顾问，也是女王的亲密好友。女王昵称他为“天使先生”。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英国的四十五年期间，他便担任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国务大臣。

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 (Sir Francis Walsingham, 1532-1590)

身为严谨忠诚的清教主义者，因而获得伊丽莎白女王的信任，并且成为她的国务大臣。一五八〇年代起，当伊丽莎白的女王生涯面临继位危机时，他在整个欧洲布下非常精密的情报网络系统以扫荡天主教徒谋反篡位的阴谋行动。伊丽莎白女王昵称沃尔辛厄姆爵士为她的“摩尔人”。

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 (Robert Dudley, Earl of Leicester, 1533-1588)

莱尔子爵、华威伯爵暨诺森伯兰公爵之三子。与伊丽莎白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玩伴，自称是最懂伊丽莎白女王的男人，女王私下喜欢称他“甜美的罗宾”。然而由于第一任妻子的悬疑死亡案件，罗伯特·达德利注定无法与伊丽莎白互定终身。尽管在一五七八年他秘密迎娶了莱蒂丝·诺利斯，但是直到一五八八年去世为止，他终其一生都得到女王的宠爱。

克里斯多福·海登爵士 (Sir Christopher Hatton, 1540-1592)

伊丽莎白相当喜爱的宠臣之一，他是一位北安普敦郡乡绅之子。对伊丽莎白女王而言，他是一个理想的臣子，穷其一生追求着女王，而他与其他追求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为女王保持独身，女王甚至也给了他专属的昵称——“眼睑”。

弗朗西斯·德瑞克爵士 (Sir Francis Drake, 1543-1596)

航海家及武装民船船长。一五八〇年以他最有名的船舰“金鹿号”环游世界一周回到英国，是英国史上第一位航海周游世界的人。一五八八年当英国对抗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伊丽莎白女王授予其指挥官一职。

华德·莱礼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1554-1618)

伊丽莎白女王喜爱的宠臣之一，颇为自负，身兼军人、探险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他在弗吉尼亚州建立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并以女王之名为这块土地命名，又曾经因为让伊丽莎白女王的寝宫侍女怀孕而一度被关入伦敦塔中。一六一八年，因为一项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处以死刑。

约翰·哈林顿爵士 (Sir John Harrington, 1561-1612)

他是约翰·哈林顿与伊莎贝拉·马坎的儿子，他的父母皆为伊丽莎白女王自公主时期的侍从与好友，因此伊丽莎白女王成为他的教母。现今我们所知伊丽莎白女王晚期的宫廷历史多半是经由他的记录得知。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廷臣，以及发明冲水马桶的人。

弗朗西斯·贝肯 (Francis Bacon, 1561-1626)

尼可拉斯·贝肯爵士之子，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的外甥。因威廉·塞西尔之子罗伯特在宫廷中的政治势力日渐茁壮，转而寻求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支持。他天资聪颖，身兼律师、政治家、哲学家及作家，并拥有多部关于历史、法律、哲学等论述著作。后来晋身成为大法官。

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 Earl of Salisbury, 1563-1612）

伯利男爵之子。跟他父亲一样，罗伯特随后也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展露政治长才，成为国务大臣，并且是在伊丽莎白女王过世时将王权和平移转给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的幕后推手。

小艾赛克斯伯爵（Robert Devereux, Earl of Essex, 1567-1601）

艾赛克斯伯爵华特·德弗罗之子。伊丽莎白女王与威廉·塞西尔谨守对其早逝父亲的承诺，协助看顾他自小到大的成长，伊丽莎白女王更成了他的教母；在他的母亲莱蒂丝·诺利斯嫁给罗伯特·达德利之后，莱斯特伯爵在宫廷中也一直提拔这个继子，因此备受这些大人们宠爱的小艾赛克斯伯爵逐渐恃宠而骄，甚至是宫廷里唯一胆敢直言冒犯伊丽莎白女王的人。一六〇一年，小艾赛克斯伯爵因为谋反叛变不成而被处以死刑。伊丽莎白女王因他的死陷入深沉的哀伤之中，直到两年后女王去世之前，都一直被困扰着。

外国求婚者及其他

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1527-1598）

西班牙国王，英国玛丽女王的丈夫，伊丽莎白女王的姐夫。在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下，西班牙的国力达到巅峰，他曾经试图创建一个天主教大帝国，因此与欧洲各国交战多年，但终究并未能如愿以偿。在偏向新教的伊丽莎白继位英国女王后，菲利普二世曾向她求婚未果，之后更展开“对英国的企图”以颠覆王权与宗教信仰。一五八八年派遣无敌舰队远征英格兰，却在英吉利海峡被机动灵活的英国海军击溃，从此西班牙在海上的威力便逐渐衰退。

凯瑟琳·梅迪奇 (Catherine de Medici, 1519-1589)

一五三三年嫁给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她的三个儿子——弗朗西斯二世、查理九世、亨利三世，先后都成了法国国王；其中弗朗西斯二世娶了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并且在她的势力影响下，查理九世也曾对伊丽莎白女王提出联姻协商，而她第四个儿子弗朗西斯·安茹公爵则是伊丽莎白女王任内最后一位求婚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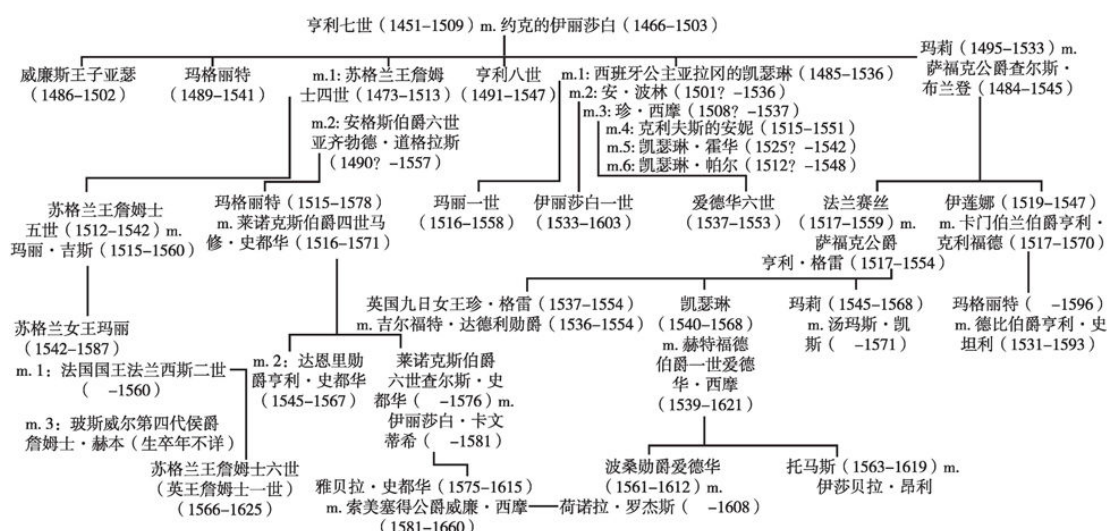
弗朗西斯·安茹公爵 (Francis, Duke of Anjou, 1554-1584)

法王亨利二世与凯瑟琳·梅迪奇之四子。虽然他的年纪比伊丽莎白女王小了二十多岁，但却是最受女王喜爱的追求者，也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最后一段热恋者（至少她表现得如此）。伊丽莎白女王昵称他为“小青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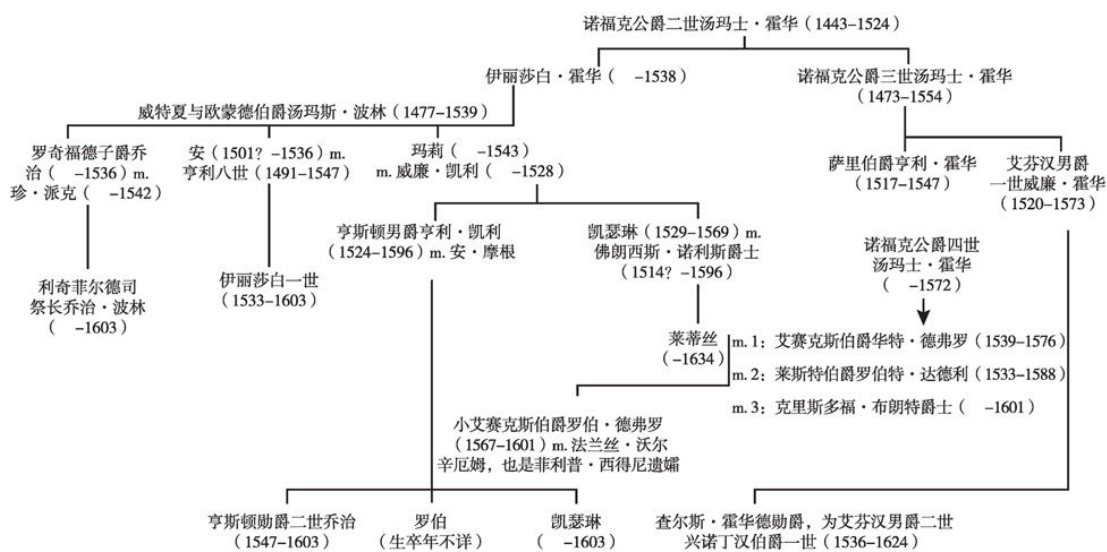
玛丽·吉斯 (Marie de Guise, 1515-1560)

她是法国吉斯公爵的长女，一五四〇年被加冕成为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五世的第二任王后，也是玛丽·斯图亚特的母亲。玛丽·斯图亚特五岁的时候，玛丽·吉斯将她的女儿送往法国宫廷接受法王亨利二世的教养。一五五四年她开始替她的女儿执政。在其执政期间，苏格兰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仰天主教的她与新教之间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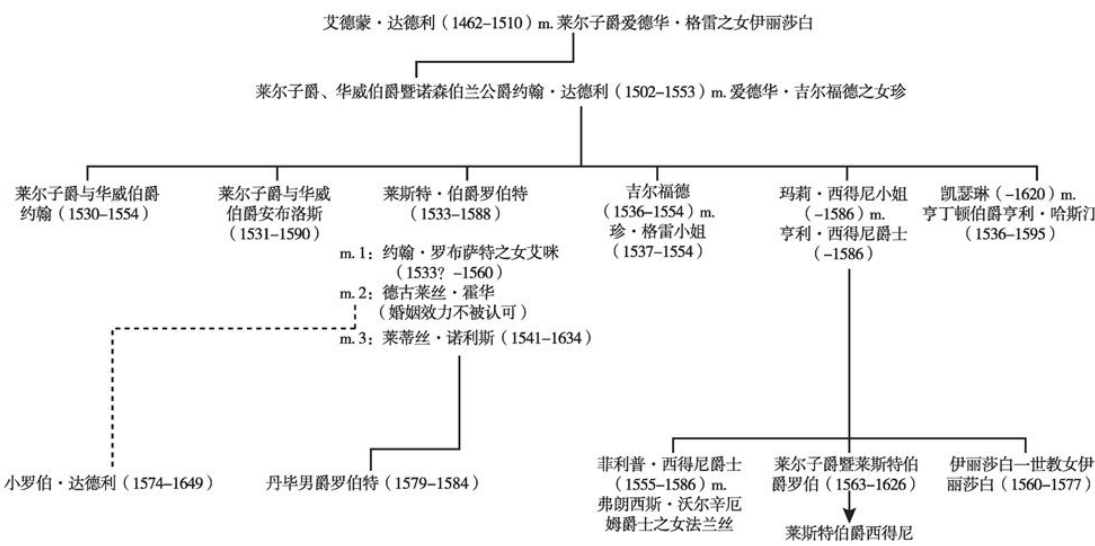
家系表一 都铎家族（m. 指婚姻对象，其后数字表示婚姻次数）



家系表二 波林家族与霍华家族亲属关系



家系表三 达德利家族



- [前言](#)
- [序幕：一五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 [引言：伊丽莎白的英国](#)
- [1 在英国国土上最英国的女人](#)
- [2 上帝啊！请让我们的女王快点嫁人吧！](#)
- [3 鸡毛蒜皮的争端](#)
- [4 潇洒甜美的罗宾](#)
- [5 恶意的指控](#)
- [6 无耻肮脏的传闻](#)
- [7 争议之源](#)
- [8 后继无人](#)
- [9 威胁王权的利害关系](#)
- [10 令人悲痛的肮脏事](#)
- [11 危险人物](#)
- [12 徒然的叫嚣](#)
- [13 仙后葛罗莉安娜](#)
- [14 鲜艳华丽、合乎礼仪又富丽堂皇的宫廷](#)
- [15 斧头的警告](#)
- [16 不尽如人意的议题](#)
- [17 奢侈享受](#)
- [18 狂热的求爱插曲](#)
- [19 进退维谷](#)
- [20 国内外的难题](#)
- [21 残忍极刑](#)
- [22 胜利女神伊莉莎](#)
- [23 大英王国的荣光](#)
- [24 被邪恶包围](#)
- [25 三千宠爱于一身](#)
- [26 日落西山终有时](#)
- [落幕](#)
- [参考文献](#)
- [索引](#)

前言

《伊丽莎白女王》是我有关都铎王朝系列作品中的第三部。在《亨利八世的六个王后》（*The Six Wives of Henry VIII*）中记述了伊丽莎白·都铎的童年时期，也在《大英王国的子嗣》（*Children of England*）中描绘了她早年的生涯，我发现自己非常想要撰写有关她的一生的传记。

这不是一部政治传记，我也并非想要描写那个年代的社会史。我最主要的目的，是记述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后的个人生涯，她个人留下的大量文学遗产，以及那个年代的一切。这本书原始的手稿名为《你所不知道的伊丽莎白一世》，但我很快就发现，“你所不知道的”伊丽莎白一世，其实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因此更换了书名。想要详述她的个人生涯，就无法避免地要提及交织出她的一生的各种政治与社会事件。而我所做的，则是详细记述这些事件的细节，让故事更加合理化，同时也强调伊丽莎白女王对这些议题的反应，展现出她对当代历史的影响。

伊丽莎白年代仿佛一块大画布，伊丽莎白女王与她那个年代又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到底该选择哪些议题，又该删掉哪些，成为对作者最大的考验。我选择的许多细节，皆精细地勾勒出她身为女王与女人的轮廓，也描绘出她性格的许多面向。

这本书由许多故事交织而成：包括伊丽莎白女王与莱斯特伯爵，伊丽莎白女王与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伊丽莎白女王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伊丽莎白女王与小艾赛克斯伯爵，当然，伊丽莎白女王与诸位追求者的精彩故事也不能少。通过时间顺序来叙事，我将每一条轴线串成了整篇故事——但有时候我仍觉得自己像是写了四本书一样！

伊丽莎白女王是一个迷人又有魅力的角色，她的女王生涯值得记录成书。在那个年代，君主掌控国家也支配国家，因此君主的性格对国家的历史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书研究的是一个全盛时期的人治政府。

艾莉森·威尔

一九九八年写于卡苏顿

序幕：一五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五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大批群众聚集在西敏宫和伦敦街头许多地方。不久，群众开始欢呼，因为当时的英国女王玛丽一世（Mary I）当天稍早死亡，死讯正式宣布，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Elizabeth I）正式登基。就在群众议论纷纷之际，身为约克大主教与大法官的尼可拉斯·赫司（Nicholas Heath），正在英国上议院宣布英女王继位的消息。

伦敦的民众们欢欣鼓舞地庆祝一个女人之死，她是上一任的女王，是个女暴君，而接替她的人则大受景仰，是他们的救世主，枢密院长老们纷纷来到赫特福德郡哈特菲尔德的皇家宫殿，不久前同父异母的姐姐误会她密谋篡位，差点就要酿成大祸，于是，伊丽莎白公主在这里聪明又低调地生活着。接近正午，伊丽莎白公主无视于严寒的天气，在宫殿周围的花园里，坐在一棵橡树下，一边呼吸新鲜空气一边看书。

她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即将改变。这几天来，许多对未来有野心的臣子，都已经不再理会快要死亡的玛丽女王，反而故意往北来到哈特菲尔德，对年纪尚轻的继位人选伊丽莎白公主输诚。但当枢密院代表来到花园中，对着伊丽莎白公主跪下，尊称她为新任女王时，伊丽莎白公主噤默了。难以控制浮上心头的各种情绪，她滑落到草地上，抱着膝盖，并且用拉丁文说着：“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接着她倏地站起，恢复了沉着冷静，速速返回宫殿接受民众的喝彩，并准备着手统治英国。

引言：伊丽莎白的英国

英国首位女王玛丽·都铎（Mary Tudor）五年来的统治，简直惨不忍睹。她是亨利八世（Henry VIII）元配亚拉冈公主凯瑟琳（Katherine of Aragon）之女，亨利八世弃绝两人的婚姻，迎娶了第三者——安·波林（Anne Boleyn），因为父亲对母亲的残忍，她青少年时期都在悲惨中度过。玛丽女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自然也对父亲与罗马教廷断绝之举感到震惊；当年亨利八世在摆脱了安·波林后迎娶的第三任太太——珍·西摩（Jane Seymour），随后因密反遭到处决，她生下的儿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成为首位信奉新教的统治者，此举也令玛丽女王大感惊讶。因此，在一五五三年，当爱德华六世年仅十五岁却不幸逝世时，正统的继承人玛丽女王，好不容易克服了新教徒打算让表亲珍·格雷（Lady Jane Grey）继位的谋反，总算在民众的呼声中登基，她也暗自盘算要恢复天主教信仰。为了要有正统天主教继位者来延续她的理念，她做出了致命的错误判断，和欧洲天主教权威西班牙的王储菲利普二世（Philip of Spain）结婚，然而这段婚姻并不受欢迎，很快玛丽女王便失去了臣民的爱戴。随后她恢复反对异端的法规，批准烧死三百多名英国新教徒，民众对她的观感每况愈下，也让她得到了“血腥玛丽”（Bloody Mary）这个绰号。在位的最后一年，英国将加莱（Calais）这块土地输给了法国，这是中世纪大陆帝国的最后一块，玛丽女王被视为罪魁祸首。经历两次假性妊娠和丈夫的冷漠，她得了重病，抑郁而终。

后人可以说，她统治过后的英国“简直糟透了”，国内充满宗教与政治纷争，英国退回到欧洲边缘小国的地位，同时也成为欧洲两大王权势力——西班牙与法国虎视眈眈的对象。英国与西班牙理论上应该联手对付法国，但因为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后，在臣民多所期待之下恢复了英国新教的地位，此举毫无意外地冒犯了菲利普二世，毕竟菲利普二世自视为反欧洲宗教改革运动领袖，并誓言歼灭各种异端。他有罗马教皇、宗教裁判所、耶稣会和西班牙在新大陆所得的庞大资产撑腰，如果被激怒，他可能变成英国的强悍敌人。当时的法国，正遭受宗教战争与内战的撕扯，但法国君主亨利二世不只占领了加莱，而且因为当时苏格兰的统治者与法国联盟，因而得以驻军在苏格兰，对英国形成巨大的威胁。时值英国国库空虚，国家财产几乎都在西班牙菲利普王子与他国兴起的战事中耗损，英国军力与军需品十分吃紧；防卫重镇与边防要塞全都破损不堪，若真的发生战事，恐怕也无力抵御外侮。

英国内部则出现许多纷争与不满的情绪。当时的英国政府负债达二十六万六千英镑，在当时简直就像是天文数字，使许多人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当年英国的人口在三百万到四百万人之间，人民才走过二十五年来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之间的拉扯，社会上宗教分歧严重。玛丽女王逝世时的西班牙驻英国大使宣称英国有三分之二的人信仰天主教；也许他有夸大其词的嫌疑，因为事实上当时的伦敦、上议院和整个政府都以新教徒为主，也绝对地掌握了公众意见。一切都由伦敦主导，英国其他地方的民众自会跟随。

国内情势不稳，民众生活不易。英国并非富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下。地主阶级人士——许多都是在没收隐修院的财产后致富——决心扩大自己的财产版图，于是将农地转为牧羊专用的草地，制造出许多羊毛制品，羊毛制造业也成为英国经济重要的支柱。但圈地政策只让贫民更贫，许多穷人都遭到驱逐，流离失所，他们被迫离开残破的

家园，往大城市流窜，加入一群又一群乞丐与游民的行列中，这也成为伊丽莎白女王年代常见的景象。曾有一度，部分宗教团体会向穷人配给救济品，但在一五三〇年代左右，亨利八世解散了这些宗教团体，使得许多修士和修女也纷纷成了街头的乞丐。市政单位却完全没有伸出援手，反而通过法令禁止穷人进城，此举全然无益。此时街头常见的景象，就是游民男女躺在脏乱的街头，像狗或野兽般待在脏污不堪的街上，而经过的人不但不同情，甚至连正眼也不瞧一下。

“显然，”一五五八年时一名西班牙观察家提笔写下，“英国现在的状况十分凄凉。”尽管民众期待着新任的伊丽莎白女王可以拨乱反正，但还是有许多人怀疑，她有没有能力解决眼前这么多的难题，更有人质疑她这个位子可能坐不久，可能根本连开始着手的机会都没有。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部分人士甚至认定，尽管她坐上王位，但她的根基不稳。从一五三三年九月七日出生那天开始，就有许多人认定亨利八世与安·波林的女儿是个杂种，尽管亨利八世的第二段婚姻有许多含糊不清之处，他依然将这个女儿放入继承人选之中。一五三六年，当安·波林因通奸与谋反被判有罪时，她和亨利八世的婚姻遭到否定，伊丽莎白也被贬为非法子女，因而在继位人选中遭到除名。后来亨利八世与女儿之间融冰，于是在遗嘱的继承顺序中，便将伊丽莎白的名字放在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之后，并通过了国会法案的验证。但亨利八世却忘了恢复她的合法身份，加上伊丽莎白疑似走向新教的倾向，许多觊觎王位的人，包括野心勃勃的外国王子和不忠诚的英国子民，都将她当成眼中钉。除此之外，伊丽莎白毕竟是女性，英国才刚经历玛丽女王统治失败的悲剧，她是史上首位女性在位者。在那所谓的家父长制年代，社会共识认为女性凌驾于男人之上违反天意也违反自然，女性被视为较差、脆弱、较劣等的生物，无法控制脾气，在以男性为主的世界中，天生就不适合掌权。当时圣保罗曾经下令，女性的角色就该在教会中保持安静，并且在家顺从地向丈夫学习。

但在那个年代，对皇室血脉的尊重大于反对女性执政的声浪，而伊丽莎白总归是伟大的亨利八世的女儿，加上几年来，许多人将情感与忠诚寄托在她身上，将她视为未来的解放者和新教的希望。当时英国最需要的，是一双坚定有能力的手，引导它走向安全的道路，让政府更加稳定安康，消弭歧见，让财政问题稳定下来，并提升国际威信。看起来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许多臣民依然殷切盼望她至少能够达到目标。

* * *

伊丽莎白即将统治的英国，社会阶级表面上壁垒分明，每个人生下来的地位都是天意，各个不同的阶层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教养态度和穿着。这是中世纪时代的思想，新任的伊丽莎白女王欣然同意，但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地理上，其背后都隐藏了新的动力；唯物主义潜伏在各个阶层之中，激发了许多动机与竞争心理，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间增长，民众致富机会增加后，逐渐蓄积动力，获得经济复苏。这一时刻的英国已不再是中世纪社会，这个国家逐渐走向政教分离之路，他们有自信，对其成就与日积月累的繁荣盛况感到骄傲不已——而这个繁荣盛况，不只让贵族得利，也让英国经济的最大支柱——商贾与自耕农获益不少。一五九〇年代时，一名波兰观光客观察到，许多英国自耕农的地位，甚至家中的餐食，都比许多波希米亚贵族更好。

伊丽莎白的子民们外表保守，但其实十分精明。他们骨子里极度迷信，相信女巫、精灵、妖精和鬼魅，也非常仰赖先知、巫师和占星家的预言。那个年代人们的死亡率很高，生活并不容易——人类平均寿命约只有四十岁——当年的医疗知识有限，冬天也比现在严寒，也常爆发瘟疫疾病，对许多人来说，日复一日无法消弭的贫穷，让饥荒迫在眉睫，这些人不仅信奉斯多葛派，还有现今人们少有的坚毅精

神，对死亡也有病态性的成见。人生苦短，聪明的人就该提早准备随时可能见到天父的那一天。

伊丽莎白年代的社会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女王必须维持全国的平静，让人民的生活保持秩序，但无论在城市或乡间，总有目无法纪与暴力的事件发生，深夜里在伦敦街头行走是很危险的事情。街道上常有人拦路打劫，财力上许可的人，出国时总会雇用贴身保镖。当时英国法律的规定十分严厉，伴随法律而来的刑罚则非常残酷——在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光是伦敦泰伯恩刑场（Tyburn）就创下处决了六千多人的纪录，鞭刑、烙刑或戴上脚镣手铐也都很常见——但刑罚不一定能奏效。

在十六世纪英国状况最好的时候，旅行也不是那么容易。地主阶级本应负责领地道路修缮维护，但很少有人愿意，因此许多道路在天候不佳的状态下，几乎是无法通行。多数的道路都仅能让人通过或只是羊肠小道，然而在主要干道——女王的快速道路上——至少一应俱全，还有驿站，当时的外籍旅客认为这是欧洲最好的。民众通常仰赖步行或骑马，至于名媛淑女们则多半搭乘马轿。一直到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一段时间后，没有避震又不舒服的马车才开始风行，当然，这只是有钱人家的玩意儿。

到了十六世纪结束时，英国首都伦敦约有二十万人口，成了一个拥挤、肮脏又吵闹的城市，夏日疫病泛滥。但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执政下，伦敦开始蓬勃发展，成了经济重镇，主宰英国的贸易活动，同时伦敦城区开始扩张，延伸到中世纪时期城墙以外的地区，出现有许多教区的卫星小镇。当时的伦敦不只是贸易重镇和海港，还有许多很棒的商店，尤其在威普塞街，许多金匠在此贩卖金制品，在中世纪时的圣彼得大教堂中央广场，也有许多知名市集。在泰晤士河畔的河堤上，贵族建起了一幢一幢的房子，房子前面的花园直接延伸到河边。

每一栋贵族的宅邸都附有私人长堤，伦敦市区的交通混乱拥挤，走水路绝对比较省时省力。在泰晤士河南岸的苏里则是风化区，后来则变成了剧院区，其中最著名的剧团，就是莎士比亚圆形剧场。矗立在泰晤士河对岸的，则是森严的伦敦塔，它具有宫殿、监狱、军械库和堡垒的功能；在都铎王朝期间，伦敦塔则是恶名昭彰的贵族刑场，但这一切的险恶，也不足以阻止伦敦居民携家带眷地参观这个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

在伦敦的城墙内，有钱的商人们盖起了华丽楼房，控制了工匠与贸易公会，这些商人与他们的夫人们都穿上最好的天鹅绒，戴上金项链，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一位当代作家菲利普·史杜伯（Philip Stubbs），赋予当时的伦敦人一些形容词——“无礼、大胆、有权有势又爱出风头”。逗熊和斗鸡是当时商人间最流行的娱乐活动。伦敦是当时英格兰最大的城市，仅次于伦敦的城市，包括诺里奇（Norwich）和布里斯托（Bristol）。

身为岛国人民的英国人，处于欧洲边陲地带，性格极度封闭又有强烈爱国心，新任的女王自然也不例外。宗教改革更助长了这样的趋势，也催生出了一个制图师和地理学家更用心记录英国国境细节的年代，俗世历史学家也开始为更多的读者悉心记录英国史。至于英语，在莎士比亚戏剧出现后更上一层楼，英国人开始认定无论是古典英语还是现代英语，都和任何世界上一种语言一样好。自一四七〇年代印刷术发明以来，原本喜欢阅读希腊罗马经典（无论是原文版或翻译版，这些经典有许多不同版本的选择）、卡斯提里奥尼（Castiglione）、薄伽丘（Boccaccio）、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当时他的书遭到官方查禁）和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识字阶层，开始越来越喜欢看书。诗作，尤其是恋爱诗广受好评。原本只有各郡统治阶层和神职人员才有的读书机会，也扩展到逐渐发展成熟的中产阶级，一五五〇年开始出现的许多公立学

校，都是由非常重视教育的女王主办。这些在为英国文化盛世打下基础——尤其是戏剧——一五八〇年代和一五九〇年代，由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爱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和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带领开始蓬勃发展。

在十六世纪前半段时，开始流行起让出身书香门第的仕女们，和兄弟接受一样的教育——毕竟伊丽莎白女王也从这种平等教育中获益不少——但在一五六七年时，卡斯提里奥尼出版了《宫臣》（*The Courtier*）一书，这股风气从钻研学术转为训练社交技巧。社会赋予这些出身良好的年轻女子懂阅读、会写信、知绘画、谱写音乐、能做女红和跳舞的期待——这些训练全都是希望能提升她们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不过，女王身边的侍女们还是得要饱读诗书、博学多闻，毕竟宫廷依然是文化发展的中心。

伊丽莎白时期多数的艺术作品，都反映了英国民众对上流阶层与中产阶级向往的品位。人物肖像画蔚为流行，但当时的画风重于精致描绘华美的衣服，而非稍早前由小霍尔班（Holbein）和沃尔斯（Eworth）带起的现实派肖像画风。此外，小霍尔班还将细密画引进英格兰，但一直到尼可拉斯·希利亚德（Nicholas Hilliard）出现后，才让细密画成为一股流行风尚，而这股流行风尚成为一项英国传统，至今依然颇受欢迎。

建筑美学逐渐普及：这是贵族建筑的年代，许多旧式的建筑都被翻新或重建成英国文艺复兴式风格。它们充满古典设计、雕像装饰、带状雕刻、高耸的烟囱、有竖框的大窗、雕花栏杆、装饰复杂的柱子和意大利风格的外观。中古世纪的坞堡与城堡不再流行；枪眼、看守小屋和壕沟纳入文艺复兴式的设计后，则完全只有装饰之用。

每一栋华丽的建筑中都一定会有墙上装饰着挂毯与家族画像的长廊，各个房间里则有各种华丽的大理石装饰、壁画、布轴式的镶板、

美丽的石灰天花板、彩色玻璃镶板及用各种徽章装饰的大型角窗与窗台。在建筑装饰中，处处都可以看到许多具有象征性的徽纹。房间里的家具，常以英国橡木制成，再以真皮或天鹅绒装饰于外，银镜、挂有精致刺绣帐的好床，有时会用小键琴来作为装饰，这也反映了在女王的带领下，当时对纯演奏室内乐的狂热。音乐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最重要的艺术现象，加上汤玛士·摩尔利（Thomas Morley）、约翰·威尔比（John Wilbye）、托马斯·威尔克斯（Thomas Weelkes）和约翰·道兰德（John Dowland）的歌谣与小调，刺激并启发了汤马士·泰利斯（Thomas Tallis）和威廉·拜尔德（William Byrd），写出了英国国歌。

这些雄伟的建筑周围的花园和外围比较不起眼的房子，得到许多外国人士的好评。现在很难找到原汁原味的伊丽莎白式花园，但依据当时的记录，我们可以清楚发现，就算一般料理用的香草或药草有增添风味或提炼药物的实用性，但当时的人依然认为酒庄、果园或花圃中拥有罕见又不寻常的植物绝对更重要也更漂亮。时髦的花园可以为建筑的气氛大大加分，另外当时的人建筑设计的一环，还包括建筑周围的石墙或厚厚的角树树篱，就连角度都得计算进去。可以遮阴的乔木、充满传统风味的水缸或雕像，就是完成建筑氛围的最后一笔。

伊丽莎白时期的衣着有特别的艺术形式。人们过去从未如此注重时尚。男性习惯穿贴身的紧身上衣，搭上立领，薄麻布或棉布底下则有垫肩，颈部则有皱边装饰。随后，皱边装饰则被浆得硬挺的环状领取代。男性常穿及膝的灯笼短裤，里面会塞马毛，有时看起来十分可笑，让他们穿着长筒袜的腿看起来像两根竹竿。只有小腿匀称的男子才适合穿灯笼裤。当时也流行短版斗篷，斗篷上缘就固定在立领上，而帽子则要有夸张的羽毛装饰出轻快的感觉。除了剑与匕首外，伊丽莎白时代重视时尚的男子，都喜欢在身上任何地方，装饰各式各样的刺绣、编织和珠宝。

这一时期，女装的部分只有细微变化，但依然以夸张地展现女性曲线为主。前面十几年流行的方形领口，依然是主流，但那几年流行在里面加穿刺绣衬裙，因此一直到十六世纪末时，女性才再度在潮流的带领下露出胸口。女性与男性一样流行穿环状领——一开始只是小皱边，后来演变成一五八〇年代大如车轮的夸张环状皱边领，一五九〇年代再演变为胸前开口的流行设计，后面演变出来的设计，通常是以薄纱为主的领圈。女性的裙子也变得更大更宽，这一切都要感谢来自西班牙的鲸骨圆环，也就是用鲸鱼骨或细铁丝来支撑裙子。女性上半身则会穿着紧身衣，将腰部收成锥形。对此，一则风趣妙语说道，宫廷中的仕女们，看来就像是被绑在钟上的鸡。

袖子——和礼服并不相连——都是全长的，通常布满刺绣，或是十分蓬松以展现底下穿着的细致薄麻布。无论气候如何，制作服装的材料通常采用丝或天鹅绒，当时的人们也常穿戴珠宝——包括发饰、项链、珍珠项链、手环、戒指、领针、胸针、香盒、腰带，有时甚至将装饰有珠宝的书挂在腰间。许多女性都会化妆，也常用含有铅或砷成分的化妆品来改变肤色。化妆品常常被用来遮掩天花的痕迹，毕竟在当时，天花是很常见且人人都怕的疾病。

尽管眼光有些狭隘，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依然放眼海外新世界。十六世纪可以说是英国探索与冒险的年代，许多人都想往海外发展，包括在弗吉尼亚州第一个建立海外殖民地的华德·莱礼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他以女王为这块土地命名，以及环游世界的弗朗西斯·德瑞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

在英国境内，贸易持续蓬勃发展，各项产业也逐渐兴盛。来自欧洲大陆的新教难民们，为英国带来了蕾丝制造、丝绸纺织、雕刻、针线活等产业，毛料产业也持续扩大版图，为更多人带来了财富。一五

六三年颁布的工徒令，是一份长期的强制契约，为工业和农业都带来稳定的契机。

然而商业上的成功也带来了副作用。追求财富、土地与权力，让多数人只在意自己的权益，完全不考虑大众的福祉或是弱势族群的需求。那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年代，政府也十分腐败。宫廷成了有心人士瓜分权力的地方，许多人靠着贿赂便修改了法令。

富人生活无虞。当代作家菲利普·史杜伯透过观察，发现：“在这个年代，如果餐桌上不是满满一桌各式各样的肉类而且每一道都还有酱料来相衬，那么它们就不会被视为正式的餐点。”人们非常愿意砸大钱购买昂贵的进口香料，因为那个年代都在秋天进行屠宰，再将所得的肉装桶腌渍，才能撑到春天，这些经过冬天长期贮存的肉类，急需香料来遮掩强烈的气味。无论哪种年纪或阶层，都会以啤酒取代水饮用，也常从欧洲大陆进口好酒。喝醉是常有的事，因此最常见的方法，就是不将酒放在桌上，转而放在餐具柜上，希望人们不要喝太多。

华德·莱礼爵士是第一个从美洲进口烟草到英国的人，他也因此极受称颂，但在一五六六年将大麻带进英国的，则是约翰·霍金斯。到了一五九〇年代时，抽烟斗是个昂贵但常见的事情——一盎司烟草要价三先令。但似乎是所有的人都会抽烟——无论是王子、臣子、贵族名员、士兵或水手都一样。

这就是伊丽莎白·都铎时期的英国。当她正式登基时，子民对她知之甚少。在严酷的环境中成长，幼年时期充满灾难与不确定性，至少两度陷入生死交关的考验，使她懂得了一定要有自己的支持者，懂得隐藏情绪并仰赖聪明智慧而活。她善于尔虞我诈、掩饰自己、支吾其词，也懂得如何陷害他人，这些都是文艺复兴时期君主必备的特质。到了二十五岁，她终于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尽管在她的生命中充

满了一个又一个的约束，但她早已决心维持自己的独立自主。从姐姐的错误中学习，也下定决心绝不要重蹈覆辙。她认为自己与人民在同一阵线，也会为民众的共同利益努力。她为陷入危机的国家带来了和平与稳定。她细心呵护着英国，就如一位母亲呵护着孩子。因此，她相信，神会留给她一条生路。

1 在英国国土上最英国的女人

伊丽莎白女王上任后的首件要务，就是感谢上帝让她和平接下王位，而之后她曾向西班牙大使透露，她要请求上帝“赐给她恩典，让她能以宽大为怀的心来执政，也不要发生流血事件”。因为有姐姐灾难性执政的前车之鉴，伊丽莎白女王下定决心，绝不让外国势力介入英国政权，西班牙不能，罗马不能，任何国家都不行，并且决心让她自己成为民族主义的焦点——“在英国国土上最英国的女人”。

伊丽莎白拥有显赫的英国血统。她的父亲是来自金雀花王朝的亨利八世，同时还有来自祖父亨利七世的威尔士血统；至于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安·波林，原是英国平民，她的先辈曾是诺福克郡佃农与商贾，在致富后与名门贵族女子缔结姻亲，使得他们变得家世显赫。而安·波林的母亲伊丽莎白·霍华（Elizabeth Howard），则让伊丽莎白女王与萨里伯爵（Earls of Surrey）和诺福克公爵（Dukes of Norfolk）所属的霍华家族沾上了边，这些都是英国最显要的贵族；至于波林家族本身，也与许多英国贵族世家有关，包括凯利家族（the Careys）与萨克维尔家族（the Sackvilles）。

亨利八世约在一五二六年时与安·波林开始相恋，当时他已与西班牙公主亚拉冈的凯瑟琳结婚十七年，而安·波林正是她当年的伴娘。凯瑟琳无法为亨利八世生下他渴求的子嗣，而且多年来，他也一直对这段婚姻的正当性存疑，因为《圣经》严禁任何人迎娶自己兄弟的遗孀：凯瑟琳曾与亨利八世的哥哥阿瑟（Arthur）有过一段短暂婚

姻，但阿瑟却在十五岁时不幸身亡；而凯瑟琳则从此坚决地否定这段婚姻。

亨利八世曾经历过几段恋曲，但他对安·波林却是全心付出，当她表示自己无法成为他的情妇时，他的爱火燃烧得更为炽热。她坚决地表示，自己的贞操绝对是献给夫婿最好的礼物。

到了一五二七年初，亨利八世决定向教皇提出废除婚姻申请。大约在同一时间，他开始计划在婚姻上取得自由后，将随即与安·波林结婚。但教皇不想得罪凯瑟琳那势力强大的西班牙外甥——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Charles V），因而坚决不配合。亨利八世的“婚姻大事”因此延宕了六年，之后英国教会脱离了罗马教廷的管辖，亨利八世也自命为英国国教最高领袖。脱离了宗教束缚后，亨利八世马上宣布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并公布与安·波林结婚的喜讯，在一五三三年安·波林怀孕后，他们便已秘密结婚。但新王后受到的宠爱光环，也很快光芒褪尽。

亨利八世与安·波林一直自信满满地认为会生下男孩，但孩子出世后竟是个女孩，让两人失望透顶。他们以两人的祖母，约克的伊丽莎白与霍华家族的伊丽莎白来为女孩命名，伊丽莎白公主是个健康宝宝，而她的双亲，则希望很快能为她生下个弟弟。

但天不从人愿。接下来安·波林经历了两到三次怀孕失败的打击，亨利八世对她的爱因此荡然无存，转而爱上安·波林的一位侍女——珍·西摩。同时他也发现安并不适合担任一国之母，她在公开场合放荡又不懂收敛，对敌人又充满报复心理。在短暂的时间内，她曾是个好母亲，因为坚持做到名门女子从未有的行为——亲自哺育孩子，并为孩子挑选美丽华服^[1]——而触怒了丈夫。伊丽莎白公主三个月大后，随即有了自己的住所，前往哈特菲尔德宅邸后，母亲安就难得再见她一面了，只有在安完成了其他职责后才能看望女儿。

一五三六年一月，她再度胎死腹中，那天正好是亚拉冈的凯瑟琳的忌日，安的命运就此坠入深谷。她与另五名男子遭到逮捕，一位是她的亲生兄弟，她被控企图谋杀英王与另外二十二项通奸罪名——后来有十一项都完全遭到驳斥，这也代表其他的罪名在没有有效证据的状况下应该也是虚构的。安随即被关入伦敦塔中审判，被定了死罪。她与亨利八世的婚姻宣告无效，她所生的女儿也被视为私生子，在一五三六年五月十九号这天，安·波林被送上了断头台。

母亲被斩首时，伊丽莎白公主都还未满三岁，没有人知道日后她是什么时候，又是在什么状况下发现这个惨剧的。她是个早熟的孩子，很快就发现自身命运的飘荡，她曾问教师，为何有时人们叫她“伊丽莎白公主”，有时又称呼她为“伊丽莎白小姐”。失去父亲的宠爱，带来的问题可能不少，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她可能很早就发现母亲的惨剧。至于这起事件对她情绪的发展，就难有定论了，但显然影响极深。

没有人知道她是否相信母亲的罪名。成年后她只有两次提到安·波林的记录，但这两次都无法看出她的心意，不过她与母亲那边的几位亲戚十分亲近，也很在意他们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尽管她的父亲公开贬低她的出身，同时在安·波林通奸案后那几年，正眼也不瞧她一眼，但在她的一生中，都很敬重她那恐怖的父亲。而那几年，父亲也给了她几位继母，这些继母都很同情失去母亲的她，甚至努力地想要讨好她。

伊丽莎白童年最凄惨的回忆，大概就是八岁这一年了。当时亨利八世的第五任妻子，也是安·波林的一位表妹——凯瑟琳·霍华（Katherine Howard），是个搞不清楚状况的小女孩，她最大的不智之举，就是让秘密情人偷入寝宫，据后人猜测甚至还上了她的床。一五四一年，她的罪行曝光了。事情传入亨利八世耳中，令他痛苦哭

泣，遂坚持不见凯瑟琳·霍华。一五四二年二月，凯瑟琳·霍华走向与安·波林同样的命运末路。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伊丽莎白公主告诉一位朋友，也就是当时年幼的华威伯爵之子——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我绝对不要结婚”。部分作家宣称童年的阴霾，导致她将婚姻与死亡画上等号，尽管没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理论，但这无疑是伊丽莎白童年中最惨淡的一段时光，凯瑟琳·霍华遭到处死的事件，让她想起了母亲悲惨命运的痛苦记忆。

根据都铎王朝的记载，直到亨利八世于一五四三年娶了凯瑟琳·帕尔（Katherine Parr）后，伊丽莎白公主才有了一个像样的家庭；然而接着伊丽莎白公主不明原因地冒犯、触怒了父亲，使父亲下令一年都不见她。在亨利八世于一五四七年一月份去世之前，因为九岁的儿子爱德华六世成功继位，同时伊丽莎白也前往切尔西的宫殿与凯瑟琳·帕尔同住，父女两人才再度言归于好。

也许在很多方面，亨利八世都忽视了他的女儿，但从伊丽莎白公主六岁起，他就坚持让她接受良好教育，这样才能配上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凯瑟琳·帕尔也认真地监督继女的教育，并为伊丽莎白公主请来最好的老师，包括威廉·格林道尔（William Grindal）和著名的剑桥学者罗杰·阿谢姆（Roger Ascham）。阿谢姆身处的学术圈，不只是一群致力于古希腊与拉丁经典及女性教育的人文学家，而且也早已改信英国国教，也就是我们现代所称的新教徒，同时也可以确定，伊丽莎白在那小小年纪便已受到他们的影响。

她聪颖过人、机智且记忆力惊人。阿谢姆曾称从未教过理解力如此优良，记忆力如此惊人的女性。他曾热烈地表示，她的心智似乎没有一般女性的缺点，身上同时拥有贤淑又阳刚的气质；他最高兴的是，面对任何智力上的考验，她都能聪明以对。英国有许多受过教育

的女性，但用“最耀眼的一颗新星”来形容伊丽莎白公主时，阿谢姆绝不夸张。

和那个年代所有受过教育的女性一样，伊丽莎白公主受到的教导，要她在学业上表现得和男性一样稳健，还要超越“自诩完美的希腊与罗马”。导师为她设计的课程，依据今日的标准来说，十分折磨人，但透过这些智力上的练习，她日趋成熟，而且她还有极高的语言天分，当然，她也很爱炫耀这一点。身为一个女王，她不仅能读懂拉丁文、法文、希腊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威尔士文，而且还说得很流利。她看过希腊文版的《新约圣经》《艾索克拉底演说集》及《索福克里斯悲剧集》等经典著作。而且她长年对哲学和历史保持浓厚的兴趣，她的一生中，每一天都会拨冗三个小时来读历史名著。

伊丽莎白公主也擅长许多一般英国女性会的传统女红。青少年时期的她已经会做针线活，甚至会为自己的书绣出漂亮的缝线。阿谢姆表示可以证明她的做工有多漂亮，以及她常常花大把时间在缝制上。从留存至今的她的许多真迹之中，她那灵巧的“罗马斜体字迹”，便可证明她的字迹秀丽。“没有什么能比她的字迹还要优雅的了！”阿谢姆如是说。她也继承了父母对音乐的热爱，不但会弹鲁特琴，有极佳的鉴赏力，甚至有一副好歌喉，还会创作音乐。她也精通马术，她最喜欢的运动之一就是打猎。其他闲暇时间，她喜欢在大自然中走走，或是用十字弓练习射击。尽管在她继位之前并没有太多机会沉浸在舞蹈的世界，但在所有兴趣之中，她最喜爱的就是跳舞了。

伊丽莎白公主在来到切尔西之后，继续在凯瑟琳·帕尔的监督下接受教育，不过这回教育的内容对伊丽莎白来说就有所不同了，这都要怪罪凯瑟琳嫁了一个不适当的新丈夫，他是亨利八世第三任妻子珍·西摩的弟弟——最高上将托马斯·西摩（Thomas Seymour）。托马斯·西摩是个浅薄又野心勃勃的人，他非常妒忌哥哥索美塞得公爵、

英国摄政王爱德华·西摩（Edward Seymour）在国力衰退时握有的重权。他汲汲营营地想提升政治实力，甚至动了歪脑筋要娶老亨利八世的其中一个女儿，却遭到枢密院的吓阻。尽管还在新婚期间，这个爱虚张声势的色鬼，天天都和还在青春期的伊丽莎白厮混，在她的床上呵痒、打屁股，甚至穿着睡衣就进了她的房。家庭女教师凯瑟琳·艾希莉（Katherine Ashley）认为此事是一大丑闻，于是向凯瑟琳王后密报，尽管如此，孀居的王后对将军的行为不以为意，甚至几次加入了他们享乐的行列。

后来凯瑟琳·帕尔怀孕了，然而托马斯·西摩与伊丽莎白公主间的暧昧情愫逐渐滋长。没有人知道后来这段畸恋发展得多荒谬，但他的行为足以激起凯瑟琳的猜疑，于是她把伊丽莎白公主送走了，此举不只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婚姻，更是为了保护公主的名誉。一五八四年，凯瑟琳·帕尔难产过世，枢密院发现了西摩对公主不轨的举动，然而依据亨利八世的遗嘱与国会法案的规定，伊丽莎白公主的继位权仅次于姐姐玛丽公主，若没有君主的同意，伊丽莎白公主不得私订婚约。西摩将军涉嫌再度策划迎娶伊丽莎白公主为妻。事实上，他正在密谋推翻自己的哥哥，随后不久，在国王的寝室外，他被发现带着一把上膛的手枪，因而遭到逮捕。他被判叛国并遭处死；伊丽莎白公主私底下对此做出回应，她对西摩将军的爱毋庸置疑，“今天一个风趣的男人逝世了”。对她来说，又再度验证了两性之间的互动可能致死的想法。

后来连伊丽莎白公主的仆人们都遭到审讯，当然她自己也是，西摩将军计划的肮脏事全都被抖了出来，这件事几乎毁了伊丽莎白公主的名声，让她的生命陷入危机。尽管年纪轻轻，讯问的人又在她身上施加强大压力，但她依然干练地为自己辩护。而小国王虽然喜欢自己的姐姐，但他对此也无能为力，最后伊丽莎白公主靠着乏味又慎重的

生活方式，穿着弟弟与宗教改革家喜欢的清新服装，才成功地抢救回自己的名望。

一五五三年，爱德华死于结核病后，曾为华威伯爵，后来变成诺森伯兰公爵的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试图策划由珍·格雷继位，结果篡位意图未果。珍·格雷是亨利八世的甥孙女，是他最爱的妹妹玛莉（Mary）所出的孙女；在他的遗愿中，若当时的爱德华王子、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皆亡，珍·格雷才可能出线继位。诺森伯兰公爵先是成功驱逐并替代索美塞得公爵，在爱德华六世继位后成为摄政王；爱德华六世之死让他积极想要维护政权，决心不让热爱天主教的玛丽公主推翻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建立的新教声望。为达目的，他让儿子吉尔福德（Guilford）迎娶了珍·格雷，同时煽动爱德华六世签署一份非法文件，改变了继位的顺序。然而英国人民站在玛丽公主这一边，在民意浪潮的支持下，玛丽公主继位了。诺森伯兰公爵犯了叛国罪，而被他利用的珍·格雷最后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诺森伯兰公爵密谋篡位之事与伊丽莎白公主完全无关，她聪明地继续待在国内。当姐姐玛丽公主顺利登基后，伊丽莎白公主也前往伦敦道贺。但这对同父异母的姐妹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不太轻松；随后玛丽女王开始怀疑，伊丽莎白公主的秘密身份为新教徒，这让姐妹两人的关系逐渐转坏。一五五四年时，伊丽莎白公主被控与汤姆斯·怀亚特爵士（Sir Thomas Wyatt）共同谋反，这场骚动从煽动民众反对玛丽女王计划下嫁西班牙菲利普王子开始，导致伊丽莎白公主在伦敦塔中待了三个月，等待行刑之日。没有任何证据能让伊丽莎白公主定罪，尽管最后她被无罪释放，但在姐姐玛丽女王的心目中依然认定伊丽莎白公主有罪。伊丽莎白公主日后曾承认，沦落到伦敦塔中的日子，是年少记忆中最悲惨灰暗的一页；在一次国会演说中，她回忆道：“我的人生陷入危机；我的姐姐如此怨恨我。”安然脱离苦牢后，她从未停止对神的感谢，她把自己成功获救一事归功为一场奇

迹。事实上她应该感谢的是西班牙的菲利普王子，是他帮她向玛丽女王求情，但伊丽莎白公主依然暗自向神祈祷，而且深信神听见了她的祈求，也认可了她虔诚信仰的功效。直到一五七九年底，她依然不时私下祈祷感谢上苍“把我拉出囹圄重回宫殿”。

在成功获释之后，伊丽莎白公主在国内低调行事，避免涉入任何反对姐姐的行动中，就在此时，玛丽女王与菲利普二世的婚姻也触了礁。

伊丽莎白公主于二十五岁时成功登基。她的身形又高又瘦，纤细的腰围、小胸部和美丽纤长的手指却让她可以摆出各种华丽姿态。她继承了母亲橄榄色的黝黑皮肤，不过她有美白的习惯，她会涂抹一种由蛋白、蛋壳粉、罂粟籽、硼砂和明矾调制而成的乳液，让皮肤白皙透亮。她那瘦长的脸型、高颧骨与尖下巴也遗传自安·波林。她的父亲则将红卷发和高挺的鹰钩鼻遗传给她。一五五七年时，一名威尼斯使者曾经写道：“她的面貌姣好不显英气逼人，气质出众、眼睛迷人。”在那又细又弯的眉毛下，她有着一双明亮又凌厉的眼睛，至于眼睛的颜色，众人依然在争议中。尽管她不算非常有魅力，但仍深深吸引许多男性的注意：不是所有臣子的阿谀都是为了奉承她而已。一名使者曾写道，最重要的是，“她那不怒而威的气质，比她的一举一动更令人无法忽视，也不会有人不知道眼前的正是英国女王。”

一五五八年时，并没有人真正了解她的个性。她从很小就学会自己需要他人忠告，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大众面前也得循规蹈矩，如此一来，在反对她的意见出现时才能自保。尽管她大多数的人生，都没有活在公众的眼光之下，她却聪明地在毫不公然张扬的情况下，诉诸公众的力量，她认同公众的利益，她也成为宗教上的赢家，推崇新教。

她总是维持一贯庄严的态度；她有时也感空虚、执拗、独断、倔强、专横；她的幽默感有时带着一种恶意；她也时常做出尖锐的评断，一语中的；但需要的时候，她也能给予温暖，表达怜悯，尤其是面对老者、病人、丧家和不幸的人；在信仰上与面对困境时，她展现了无比的勇气，也从不会暗自蔑视对手。她拥有天生的人道关怀精神，和当时的许多君主相比，她其实不算太残酷；而在那个宗教教条主义的年代，许多人更是认为她拥有不凡的包容度。她自视为“尊荣与诚信”的模范，总是以直接的态度对人，也会支持诸侯的论点，但实际却与她想的有所落差。她和那个年代所有的统治者一样，为达目的会虚应、掩饰和欺瞒。财政节约的需求，让她对每笔开销都小心翼翼，甚至显得有些吝啬，而且直到她死前，都仍在尽量减少花费。面对任何事情，她一定谨守小心为上的箴言：除非必要，否则绝不冒险。毕竟她来自一个险恶的环境。

她懂得善用女人天生的武器，巧妙地利用女人的软弱与缺点，有时甚至用哭闹作为手段，但同时展现出许多男人都欣赏的特质。她睿智，有常识，有毅力，有气节，又有韧性，加上懂得适时妥协，对于现实层面保持清醒的头脑，还有着狡猾又缜密的心思，这让她成为颇受尊敬的君主。男人也许会鄙视她的性别，对于她精准计算时间的能力嗤之以鼻，就算男性们不甚了解她的想法、她的难以捉摸和不按牌理出牌的倾向，却依然还是很欣赏她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时常在非必要的时刻改变心意，甚至用过长的时间来延迟决策过程。

伊丽莎白女王的身体十分健壮、精力充沛，但辛苦的年少时期，让她变得神经质，只要偶尔不知如何是好，便会恐慌、失去理智地恐惧、情绪失控。她无法忍受强烈噪音，尽管性急暴躁，她却顶多只会对着倒霉的智囊们大吼大叫、怒骂脏话。

身在宫廷大群男性之中，她无疑将自己年轻未婚女性的身份，视为莫大的益处：和男人调情就像她的生命原动力，而且她也深知，自己对男性的吸引力，不完全只是来自崇高的地位。就像她的母亲一样，她深知如何向异性展现魅力，用她的风趣、她的活泼、她生动的交谈方式及灵活的眼神，让对方觉得自己很美。她的个性引人注目、魅力十足：曾有一名朝臣如此叙述，“她美得令人屏息、如此亲密又庄严”。比起与女性相处，她认为身在一群男人之中比较得心应手，而且最喜欢让自己身陷宫廷爱情之中。她的一生中最开心的，莫过于认定那些对她阿谀奉承、摇尾乞怜的朝臣们——就像她想象的一样——都爱着她。也因为这样，她把其他女性都视为威胁。

* * *

一五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她在继位的那天下午，召集了从各地来到哈特菲尔德宫的代表们，一起讨论她的立即施政计划。当天她身穿娴静的黑白服装，受到许多新教徒的喜爱，她以冷静沉着且敏锐的态度主掌了会议的进行，让原本担心她缺乏政治经验的人感到惊讶。一位从青少年时期就认识伊丽莎白，而且长期支持她的男子，表示绝对不怀疑她统治人民的能力。他的名字是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在接下来的四十年中，威廉·塞西尔一直都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首席顾问与亲密好友。

到了塞西尔三十八岁时，在北安普敦郡一位乡绅的儿子中，唯有他曾为亨利八世的臣子，他和罗杰·阿谢姆一样都在剑桥就学，也都受到剑桥兴起的人道改革运动影响。大学毕业后，他被父亲送往葛雷法律学院就读，接着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就在高等民事裁判所找到一份报酬丰厚的差事。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爱德华六世的导师约翰·契克之女，玛莉（Mary），她也是位剑桥的人文学家，可惜早死，接着威廉便娶了也是正经八百的第二任太太，缪德莉（Mildred），爱德华

六世时期的管理者安东尼·库克爵士培养的四位高教育水平的女儿之一。缪德莉长相平庸，脸型较长，但两人的婚姻美满且有所出，让塞西尔享受了当父亲的愉悦。根据长期住在他家，并为他写传记的约翰·克拉彭（John Clapham）表示，“只要孩子们在餐桌上就座，他就像被围绕在自己的小王国中。”尽管他崇尚简单的快乐，但他们家族十分富有，在林肯郡的史丹福也有一座宅邸——一五五三年时，他便建造了这个如皇宫般的柏利庄园，另一座宅邸则在萨里郡的温布敦。

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塞西尔越来越成功，成了国王特权法院法官助理、史丹福地区议员、索美塞得摄政王秘书、枢密院成员与国务大臣，直到一五五一年受封爵位。靠着努力与坚毅的精神，他成为迅速崛起的新星，向上级证明自己慎重、博学、值得信赖，也是听令于上级的政治家。本身观点倾向保守，毕生循着中世纪君主统治的精神，与伊丽莎白女王信守相同信念。他非常爱国，是现实主义者，虽不情愿地承认改革之必要，但仍准备将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而且面对国家利益，会毫不忌讳地采用残酷阴险的手段。他本身最大的优点就是极度慎重，而且在接下来几年间，也掌握着英国的命运。

塞西尔是一位充满热诚的新教徒，尽管在玛丽女王在位时，他隐藏了这一点，但他的事业仍一度遭到停摆的命运；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他失去要职，只剩最高诉讼法院的职务。

约翰·克拉彭形容塞西尔“拥有精实的身材，体型完美不显瘦长，面容严肃却不显权威感”。在他的肖像画中——而且他现存的画像比伊丽莎白女王还要多——将他塑造成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他有一双灰眼，粉红肤色，灰白的头发和胡髭（他的头发从一五七二年就开始变白），咖啡色络腮胡，右脸颊上还有三颗肉瘤。处在一群贵族之中，显然身为平民的他相形见绌，而且在那几年内，许多贵族的确也常对他怒目相视。

从爱德华国王在位期间到玛丽女王时期，塞西尔都为伊丽莎白提供经济事务建言，之后又用他的影响力和政治上的经验，让伊丽莎白避开敌人的诡计。她很快就发现了塞西尔存在的价值，塞西尔也很快就了解伊丽莎白独特的价值，于是他们形成了英国史上最重要的联盟。不久后，伊丽莎白便称塞西尔为她的天使——她为每个亲近她的人起的小名，都代表着她的喜好。曾经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塞西尔一度对于她的心意存疑，为此她曾写信道：

天使先生，我怀疑为何给你此昵称，你们那些人（据称）说的话都不具意义；近来我看到了证明，驴子踢你的同时，你已过度反应。如果我感觉到你蔑视我的看重，我将收回天使这个称呼。你要服侍神，敬畏王，和他人和睦相处。可别蠢得忽视她对你的信任。愿神祝福你，也愿你长寿。

因此在伊丽莎白继位的消息向外国与英国驻外使馆宣布后，十一月十七日那天下午的代表会议中，就由塞西尔坐在伊丽莎白女王的身旁。政府宣布为玛丽女王哀悼三日，尽管新任女王持续私下向各个代表秘密咨询，但代表会议却破局，同时许多臣子与皇室支持者抵达哈特菲尔德宅邸，连住宿的地方都不够了。

隔天早上，女王与代表们再度进行非正式会面，安排王室相关事宜，当天稍晚则宣布了骑士统领由罗伯特·达德利担纲。此举引起许多人私底下议论纷纷，因为达德利乃是叛国者诺森伯兰公爵之子，在一五五三年时曾策划杜绝玛丽与伊丽莎白继位的机会，由珍·格雷取而代之。诺森伯兰公爵与珍·格雷都已遭到处斩，而达德利与幸存的兄弟们，也都在伦敦塔被关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后来他幸运获释，于玛丽女王在位期间，他都在老主顾兼老朋友西班牙菲利普王子的军队中担任要角，在一五五七年的圣昆汀战役中表现杰出。回到宫廷中，他努力挣得了一流马术师的名号，也是位技巧纯熟的矛骑兵；然而在达德利身上，叛国的污名依然挥之不去，依然有许多人处处防备他。

对伊丽莎白而言，若要让她和她的臣子及时抵达伦敦，就必须赶紧任命一位骑士统领，而达德利则是不二人选。之前达德利的大哥，当时已死的华威伯爵约翰，曾在爱德华六世期间担任过骑士统领，因此罗伯特·达德利自然是接位的最好人选。更重要的是，他专精于马的相关知识，而且和伊丽莎白自幼熟识；他们算是同年。达德利于一五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生，可能曾是贵族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孩童之一，目的是与皇室后裔爱德华和伊丽莎白切磋知识，他也因此与伊丽莎白熟识。后来达德利曾写道：“从她八岁起，我就比世界上其他男人都还了解她。”

一五五〇年时，达德利受封成为皇家狩猎统领，也就在同一年，他迎娶了诺福克郡赛德斯敦的约翰·罗布萨特爵士之女艾咪（Amy）。爱德华六世出席了他的婚礼。这场婚姻让罗伯特·达德利成为诺福克郡的有钱大地主，此举至少为他带来许多快乐，威廉·塞西尔曾忆道：“那是场充满欲望的婚姻，为的只是欢愉。”

到了一五五三年，达德利顺利成为国会议员，并且支持父亲未竟功成的政变行动。一五五四年，伊丽莎白仍被囚禁在伦敦塔中时，他也依然是伦敦塔的阶下囚，还被判了死刑，尽管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门禁森严的高墙下他们曾见面，但许多史学家仍推测他们见过面，甚至认为他们就此擦出爱的火花。然而这不太可能，因为当时的伊丽莎白受到最严密的监控，而达德利则要求并且也获准许让太太在“任何方便的时候”都可来探望他。我们唯一能臆测的就是，罗伯特·达德利与伊丽莎白坐牢且险些断送性命的共同经验，让他们有了更深一层的联结。一五五七年，罗伯特·达德利从欧洲返国后，就在诺福克郡住下，但他并没有忘记伊丽莎白，且他曾一度“卖掉一块好土地，就只为了援助她”。罗伯特·达德利听到她继位的消息，便匆忙赶到哈特菲尔德宅邸，象征性地提醒伊丽莎白他的地位，献上他的忠诚和效忠的意愿，让伊丽莎白感到难以拒绝。

担任骑士统领期间，罗伯特·达德利的年收入在一千五百英镑左右，外加其他额外补助，包括宫廷中的一个房间。他获得批准让仆人得以随侍在侧，而且还可以穿着如都铎王朝皇室制服般的绿色与白色。他个人就有四匹马任他差遣。这份差事绝非冗职，他必须为女王与皇室成员购买、繁衍、训练和管理马匹。罗伯特·达德利以谨慎的态度工作，以改善皇室马匹的一切，他的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格林尼治培育巴巴利马种。他同时也要负责皇室游行和皇室娱乐的相关事宜，包括马上比武大会、化装舞会、戏剧表演与皇家晚宴，因为对管理和表演技巧天生敏锐，并对大型盛宴与骑士精神非常了解，因此他表现得相当称职。在皇家游行中，他得到最大的荣耀，得以跟在女王身后。因为伊丽莎白女王“非常喜欢好马”，因此她与罗伯特·达德利几乎天天都有接触的机会，在皇室成员离开哈特菲尔德宅邸前，甚至有人看到他们一起在庭院中共骑奔驰。伊丽莎白最喜欢的就是走出户外骑骑马，尤其是身旁有这英俊的年轻人相伴，他每天都敦促伊丽莎白要天天运动，才能稍微抛开治理国事带来的烦忧。伊丽莎白女王与骑士统领的运动时间，很快就成了她日常的习惯。

罗伯特·达德利约有六英尺高，非常有魅力；他的皮肤黝黑，因此也有人昵称他为“吉卜赛”，其实这个形容词主要是用来形容他的人格，而不只是面容。罗柏·侖顿爵士（Sir Robert Naunton）形容“罗伯特·达德利是一个体态优美、面貌端正的人，青少年时期就长得十分俊美，可惜额头很高”。他有一头棕红色的头发、微红的胡髭、高挺的鼻子和看来冷酷的下垂眼。伊丽莎白最喜欢他修长的手指。年纪轻轻的罗伯特·达德利，身形精瘦强壮，还有一双好看的长腿，同时他还懂得以流行又有品味的衣着，来展现身材的优点。他好动又精力旺盛：他能骑马进行长枪比武，懂得马术，会打网球和射箭，也喜欢钓鱼。他对舞蹈与唱歌也很在行，而且也很健谈。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好男人，对科学、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地图制作及航海都非常有兴趣，他读过许多经典著作，法文和意大利文也很流

利。贵族科学家、天文学家，同时也是知名音乐家的约翰·迪伊博士（Dr. John Dee）可能指导过他，因为迪伊博士曾住在诺森伯兰宅邸，没多久之后罗伯特·达德利就将迪伊博士引荐给伊丽莎白女王，而女王对迪伊博士的智能与知识也相当尊敬，因此常常和罗伯特·达德利一起到莫特莱克庄园请益。

罗伯特·达德利受到任命又受到年轻的女王的青睐，让宫廷中许多臣子大感不满，同时也对罗伯特·达德利家族的野心感到忧惧。许多臣子都还记得，他的父亲与祖父埃德蒙·达德利（Edmund Dudley），都曾因为叛国罪锒铛入狱，他的祖父入狱时，刚好碰上亨利八世刚登基的时机，而后人则认为，他遭到判刑，仅是亨利八世为了给挞伐声四起的财政政策找到的代罪羔羊。但伊丽莎白继位不久后，女王对罗伯特·达德利的青睐就扩展到他许多家族成员，其中最具有知名度的就是罗伯特·达德利的兄弟安布洛斯（Ambrose），以及罗伯特·达德利的姐妹，嫁给了彭斯赫斯特的亨利·西得尼爵士（Sir Henry Sidney of Penshurst）的玛莉（Mary）。玛莉后来是女王最喜欢的一位寝宫侍女。

* * *

那一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到十九日，伊丽莎白都和智囊们一起商讨行政相关事宜，到了十一月二十日时，枢密院和大批贵族都来向女王行礼，正式聚集在哈特菲尔德宫大厅，聆听伊丽莎白女王宣布她的首席顾问人选和首次的公开演说。

首先，威廉·塞西尔爵士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并当场宣誓就职。国务大臣一职，并非女王指派给威廉·塞西尔的最佳职务，但却能让她常常与威廉·塞西尔有公务上的接触，毕竟在所有宫廷的男性之中，女王最信任他。他也有疑虑，因为他一向认同当时的男性主义观点——女人是任性、情绪化、软弱又犹豫不定的动物，不适合执政也没

有能力主导政府事务。而伊丽莎白女王即将证明他的观点错误，她首度展现出女王的气魄与高雅的演说风格，让民众对她的观感极佳，也等于告诉了他：“我任命你为枢密院成员，主动为我与我的王国承担苦痛。我相信你不会为任何赠予而贪渎，相信你会忠于国家；这一切无关我们的私交，你会给我你认为最好的建议；如果你认为，某些事情有必要私底下商讨，你就只会告诉我；同时也要告诉你自己，一定要直言谏上。”

体态圆胖、和蔼可亲的律师尼可拉斯·贝肯爵士（Sir Nicholas Bacon），当时被拔擢为国玺大臣，恢复了暂时中止的大法官办公厅，接下来，则公布了其他内阁人选。凯瑟琳·帕尔的兄弟威廉，在玛丽女王时期不受欢迎，终于回到侯爵夫人身边并成为枢密院的一员；而身为热心又忠诚的新教徒，尼可拉斯·瑟洛摩顿爵士（Sir Nicholas Throckmorton）则成为财政大臣。另一位忠心耿耿的新教徒弗朗西斯·诺利斯爵士（Sir Francis Knollys），是伊丽莎白女王表亲，同时也是安·波林的姐妹所出的女儿凯瑟琳·凯利的丈夫，在听到伊丽莎白女王登基的消息后，从流放地日夜兼程赶回来，成为枢密院一员。玛丽女王时期的枢密院成员，有十位受到慰留，包括温切斯特侯爵（Winchester）、舒兹伯利伯爵（Shrewsbury）、德比伯爵（Derby）、阿伦德尔伯爵（Arundel）和潘布鲁克伯爵（Pembroke）；这些人几乎都是中年男子，有相当的政治历练，其中某些人在玛丽女王年代曾对她密谋迫害，伊丽莎白都不计前嫌，但她仍非常不喜欢阿伦德尔伯爵和潘布鲁克伯爵。玛丽女王年代的枢密院成员，只要是天主教的忠诚信徒，都遭到革职，由伊丽莎白女王亲自选出的新教徒取而代之，但比起玛丽女王的年代，新的枢密院组织缩小了不少。因为伊丽莎白女王相信，“若有四十四位议员，可能会让枢密院不协调、无秩序，没有任何好处，这件事自有其道理”。

接着，伊丽莎白女王走上了议事堂前的王位，开始对枢密院发表演说。

亲情伦理让我为姐姐感到哀恸万分，落在我肩上的重担让我惊愕不已；然而，神创造了我，我注定要遵从他的指派，因此我必须服从，我将发自内心地协助他，执行他交付于我的神圣旨意。而我仅是只身一人，因此我向各位议员提出请求，请成为我的助手，在我的领导与你们的协助之下，才能完成全能的神之旨意，为后世子孙留下美好未来。

我将依据有益的建议与决策施政。我需要的仅是你们忠诚的心，也请不要质疑我良善的意愿，请成为可靠又忠实的臣子。

接下来的三天，她都忙着草拟枢密院资政名单，拟定施政方针，加速政府机器的运作，并计划宫中事宜。首先要拔擢的对象，就是在她还是公主的时期就对她忠心不二的人。家庭女教师凯瑟琳·艾希莉晋身成为女侍长及宫廷女侍，统领宫中所有出身贵族家庭的女侍。艾希莉的丈夫约翰则成为皇室珠宝库统领，而伊丽莎白女王原本的会计，托马斯·派瑞（Thomas Parry）则受册封成骑士，成为宫廷账房总管。从伊丽莎白女王出生后便照顾她至今，甚至还教她说威尔士语的威尔士籍护士布兰琪·派瑞（Blanche Parry），则被指派为女王藏书总管。佛朗西斯·诺利斯爵士则同时担任王室宫廷副司库；他的女儿拉堤莎（Laetitia），也有人称她为莱蒂丝（Lettice），则成为女王首席侍女之一。伊丽莎白女王的另一位表亲，也是玛莉·波林的儿子，亨利·凯利（Henry Carey），是一位能力很好的人，则被授予贵族地位，成为亨斯顿男爵（Baron Hunsdon）。

许多曾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任职且笃信天主教的女侍都遭到革职，并以信仰新教的女侍取而代之。伊丽莎白女王十分严格又苛求，她希望以高标准来统御皇室宫殿。她从不雇用面貌丑陋之人，曾经有一位面貌俊美却缺了一颗牙的男子前来，她却硬生生拒绝了对方。但

幸运能在皇室宫殿中得到一席之地的人，就算老了病了都能受到女王的眷顾。女王甚至给他们“丰厚的退休金”。

* * *

玛丽女王濒死之际，菲利普国王（King Philip）派遣使者斐利公爵（Count de Feria）前来英国，向太太的继位者致意，同时也希望，确保结合英国与西班牙共同对抗法国的盎格鲁—哈布斯堡联盟的稳固，并且保护哈布斯堡王朝所拥有的低地国家之贸易市场不受法国侵害。英国与西班牙的联盟，对菲利普国王很重要，他早有准备为了西英友好关系而忽略伊丽莎白女王的异教倾向。甚至在玛丽女王仍在位时，就曾有流言指出，菲利普国王妄想要娶伊丽莎白为妻。

斐利公爵曾在哈特菲尔德宫拜谒过伊丽莎白，他在那里向伊丽莎白女王宣称，她能够继位都要感谢菲利普国王的影响力，但女王却蔑视了这一点，于是女王不留情面地告诉他，她只会感谢自己的人民。但她知道绝对不能疏远西班牙，她和菲利普国王一样，迫切地需要维持这层友好关系。在登基的那一天，笃信天主教的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公开宣称，伊丽莎白女王是私生女，没有资格当英国女王，同时表明他心目中真正的英国女王，应该是身为他的儿媳妇，也是亨利八世甥孙女的苏格兰女王玛丽。

苏格兰女王玛丽与丈夫法国王储已经在苏格兰领土上领教了英国对抗法国与苏格兰联手的军事实力。许多天主教徒都不承认亨利八世与玛丽一世的母亲西班牙公主亚拉冈的凯瑟琳离婚之举，也不承认他与安·波林的婚姻。对天主教徒来说，苏格兰女王玛丽才是英国王位的正统继承人。伊丽莎白女王并不知道法王亨利二世这么做是为了恶意中伤，但她感到十分愤怒与苦恼，当流言指出亨利二世竟想说服教皇宣告她为“英王的私生子、异教徒，没有继承王位的资格”时，她更感愤慨。只要西班牙继续与英国为伍，教皇就会对菲利普国王有所

畏惧，也不敢恣意触怒英国女王。除此之外，伊丽莎白女王已然下定决心，要从法国手上赢回加莱港，她期盼来自菲利普国王的援助；只是，当时的她并不明白，法国对加莱港的影响根深蒂固，这让英国夺回加莱港的希望变得渺茫。

斐利公爵和许多人一样，自然而然地认定女王一定会结婚。当时的人难以想象的是，一个女人竟想独自掌权，不需要男人的指导和保护；而且她也需要一个孩子的父亲，以确保王朝的延续及王权的未来。后来，塞西尔曾告诉女王，“对英国或欧洲来说，婚姻是她唯一确定的担保”，她自己当然也知道，“所有的人都坚信，一个女人若不结婚，就仿佛没有活过。”

就在那一年的十一月，一名德国大使观察到，“女王的这个年纪，于情于理——且以女性心理来说——理应渴望婚姻与枕边人的陪伴。因此她应保持处女之身，抗拒婚姻则是不可思议之举。”而丈夫可以“照顾她，分担政务上的劳苦与疲惫”。尽管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伊丽莎白多次表达独身的意愿，但多数人并不以为意，认为这是少女的羞怯所致，鲜少有人认真对待她的宣言。除此之外，那个年代的人们认为不婚对女性并不健康：因为婚姻可以满足情感与性欲上的需求，带来身心满足的感受。当时的人们认为，女性独身可能会欲求不满，沉溺于幻想与欲望之中，同时心智也会不稳。

对斐利公爵来说，可以配得上伊丽莎白女王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两人缔结姻缘也能带来各式各样的好处。因此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这天，斐利公爵写了这样一封信给菲利普国王：

“我思考得越多，就越确定这一切的情势，但看这个女人挑的丈夫而定。”在他的心中，无疑认定只要菲利普国王求婚，伊丽莎白女王就一定会接受。“如果她决定与他国缔结姻缘，第一个看上的，一定就是陛下。”

然而，伊丽莎白女王曾针对独身说出一些令人不安的言论。只是菲利普国王和斐利公爵都指望着她会想要依赖姐夫给予治国的建议，“她与她的人民，都非陛下所能控制，如果有大使带着一桩美好姻缘而来，他们一定言听计从。”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已经有人在讨论，英国王室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分支间联姻的可能性。在那个当下，对西班牙来说可能无利可图。斐利公爵认为，要撮合伊丽莎白女王与菲利普国王可能相当困难，但“只要好好协调，加上金钱的诱惑”，就有可能达成目标。这位大使继续阐述他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印象：

女王为人刻薄，缺乏深谋远虑，是个自负又聪颖的女人。她一定受过良好教育，深得父亲领导统御的风范。她绝对不想听令于他人。

斐利公爵曾一度为她着迷，大感困惑，在觐见女王时，女王轻松的态度和刻意大笑的习惯，仿佛她都知道他的心事般，这些都让斐利公爵感到困窘。因此他下了定论：“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

关于与伊丽莎白女王间悬而未决的婚姻大事的小道消息早已传遍菲利普国王在布鲁塞尔的臣子间，但当时菲利普国王并不想公开承认，也没有指示斐利公爵向伊丽莎白女王求婚。事实上他对于再度与英国缔结姻缘的意愿低落，也不想与有异教倾向的伊丽莎白女王有太多瓜葛，而且在菲利普国王心目中，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可能比姐姐玛丽女王还要难以驾驭。

* * *

十一月二十三日这天，伊丽莎白女王正式离开哈特菲尔德宫，随行的有一千多名臣子，穿过赫特福德郡和密德塞克斯来到伦敦，正式登基成为女王。沿路的街道上挤满了欢呼的群众，他们争相想要看女王一眼，伦敦市长亲自到城外迎接，同时也发表了欢迎演说，并将市

政参事与郡长介绍给女王。伊丽莎白女王一边微笑着，一边伸出手接受他们的亲吻礼，她看到了一位长者，伦敦主教埃德蒙·波纳

（Edmund Bonner），也就是“血腥波纳”，他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烧死了很多新教徒。主教向女王单膝下跪，但女王收回了她的手，然后转头离开。

她进入了伦敦城区，但因为怀特霍尔宫还没准备好迎接她，因此她便选择暂时住在史密斯菲尔德附近的查特豪斯，这个宅邸曾是一处修道院，当时则是诺斯勋爵的住所。

到了十一月二十八日这天，伊丽莎白女王再度由上千随行人员陪同，移驾到伦敦塔中的房间。一般而言，在加冕仪式当天有许多传统要遵循，但她选择了与传统登基仪式不同的路径，她出现时身穿豪华的紫色天鹅绒服装，脖子上搭配奢华的围巾，然后在人潮拥挤的伦敦街头，走上那新铺好的、装饰着许多旗帜的道路，来到克里波门与伦敦塔丘，沉浸在臣民的喝彩声中。她的加冕仪式游行路线，沿路都有许多孩子用美丽的声音歌颂她，伦敦市的乐团与合唱团悄悄等待，处处传来市区数百个教堂洪亮的钟声，以及大声宣告她将到来的响亮喇叭声。加冕仪式队伍由伦敦市长与嘉德纹章官带领，潘布鲁克伯爵手执御剑，骑着黑色坐骑的罗伯特·达德利则紧紧跟随在女王的坐骑之后。当女王一行人从芬乔奇街与慈爱教堂街口来到伦敦塔时，“传出一阵礼枪射击的声音，那个声音是前所未闻的”，长达一个小时之久。

整个伦敦的人，似乎都挤上街头只为一睹她的风采，也为此感到欣喜若狂，尤其当女王“屈身低头向平民致意”时，他们的热情更达到最高点。约翰·海华德爵士（Sir John Hayward）曾执笔写道：

如果说英国史上有什么人有这样的天赋与风度，天生就能赢得民心，这个人一定是伊丽莎白女王。她举止皆宜，一举一动都恰如其分，她

着眼某一件事，耳朵听着别的声音，同时心里不断地做出判断，还要同时发表演说；她似乎能一心多用。对某些人，她给予怜悯；对某些人，她给予鼓励；对某些人，她做出感谢，至于对其他人，她则和气又机智地发挥幽默感，绝不谴责任何人，绝不遗漏任何一位政府官员，恰到好处地微笑着、眼波流转着，同时散发着善意，大大增加了人们对她的好感，所有人都愿意为她效命，而且在臣子间流传着的，都是对君主的赞颂之词。

高贵的斐利公爵看到她对臣子屈尊俯就的态度，感到十分惊讶，但伦敦民众可不这么认为：他们早就为伊丽莎白女王十分着迷，对她亲民的态度激赏不已，这都是因为女王要求自己在不失尊贵的前提下，实践“刚柔并济的风范”。民众被她的关心、年轻活力与真诚笑容打动，热情地献上了他们满心的祝福。

当大队人马抵达伦敦塔，伊丽莎白女王停下了马，回忆起上一次来到这里时，她还是个戴罪之身，成天忧惧着可能遭到处斩。此时，她在大批群众的眼光之下，再度为当年获释，感到感激不已：“主啊，全能永生的上帝，我要打从心底献上我的感谢，因为你对我的怜悯，我才能有今天。”接着，她转向人民：

有些人从一国之君成为此地之囚徒，而我则从一介囚犯成为一国之君。当年的挫折是神的旨意，而我今日的一切则是他的怜悯。

接着她策马骑入伦敦塔院落并进到了皇家大院，同时召来伦敦塔管理中尉，加入她的行列。他就是亨利·贝汀菲尔德爵士（Sir Henry Bedingfield），以前看守女王的狱卒。但她和蔼地感谢贝汀菲尔德爵士对已故玛丽女王的忠心，同时告诉他将解除职务的消息。只是女王对这位狱卒竟没有一丝怨怼。

“神会原谅你不堪的过去，我也会。”她这样告诉贝汀菲尔德爵士，同时幽默地说：“以后如果我想严加看管哪个人，把他交给你就对了！”

在伦敦塔中临时居住一周后，伊丽莎白女王与她的大队人马改走水路，“在小喇叭吹奏的音乐与欢乐”之下，改道前往斯庄特的索美塞得宅邸，这里是伊丽莎白女王在公主时期居住的地方。在冬日的夜晚，总会有人看见她乘着驳船，在乐音的伴随下穿越泰晤士河，周围还有许多小船，而伦敦的子民们也逐渐习惯，天天都可以看到她穿梭在首都街头，通常都是为了前往某处宴请臣子。她清楚明白，想要继续抓住民心，她就必须维持自己的能见度。

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她再度迁居到怀特霍尔宫，尽管她并不非常喜欢，但这里才是她的主要居所。在这里，皇室上下展开夜夜笙歌的日子，皇室成员们总是想要和女主人一样“调剂一下身心并且狂舞到深夜”，女王当时想要好好享受终获自由的感觉。当时的她刚从幼年时期以来的恐惧中解放，成为各界注意的焦点与奉承的对象，而且还掌握这块土地上最大的权力，在在都让她兴奋不已。

抵达怀特霍尔宫后，斐利公爵发现了一件让他愠怒不已的事情，在伊丽莎白女王主政下宫中打破了过往的惯例，并没有留房间给他；他无法觐见女王，也无法与女王的近臣说上话——他发现女王身边的人纷纷避开他，“好像我是恶魔一样”。事情至此，伊丽莎白女王已经清楚表明，在治理国家的议题上，绝对不受外国势力影响的决心。

伊丽莎白的执政风格与亨利八世迥异，亨利八世执政早年期间，几乎将所有时间用在玩乐上，而治理国家的大事则交给其他臣子；伊丽莎白女王则是日日勤政，为宫廷确定计划，随时注意朝政。她坚持送进宫廷的每封信件都要亲自审阅，但这件事却让塞西尔感到十分气馁，因为他一直认为，女人不该插手这些属于枢密院的工作。当他发现一名外国使节的急件没有先让他这个国务大臣过目，而是直接送到伊丽莎白女王手中，他越发感到恼怒；随后女王又不经意地透露，她已经直接与送信的人讨论其中事宜后，塞西尔更加恼火。于是，塞西

尔找来那位可怜的信差训话，告诉他，信差没有权力直接将信件送给女王陛下，因为“这么重要的事情，不是女性的智慧能处理的”。

年纪轻轻的女王，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连串的日常例行公事。她总是早起，除了天气极差的日子之外，她每天都会到宫廷的花园里快走。然后在寝宫吃为她准备好的早餐，她也会在这里处理日常政务，传唤大臣，让大臣行跪拜礼后再呈上需要御笔签名的信件与文件。接着她会主持枢密院会议。到了中午再回到寝宫中吃午餐，她很少在大众面前进食。下午的时间，她会在谒见室接见外国使节与其他访客，常常都要站好几个小时，并且用拉丁文交谈。通常她会不顾时间上的限制，让自己沉浸在舞蹈的世界中：在谒见室中随意跳六支轻快的双人舞，对她来说是司空见惯。当然，这样的活动也对她善变的情绪有正面帮助。

晚间则有许多国家级的晚宴或皇室余兴节目要参加。伊丽莎白女王喜欢各式各样的音乐，也欢迎各种表演进驻皇室宫殿。有时候她自己也会演奏鲁特琴和小键琴。稍晚，用过晚餐后，她会与臣子玩些纸牌游戏，在上床就寝前，她通常还会再花一个小时左右批阅公文，但晚上的时间就算她需要参事的建议，也不会随意召来塞西尔或其他臣子。她常常在夜半时刻做出决定，却又在清晨改变心意。可以想见，她这样的行径必定让智囊团感到焦躁不已。

* * *

十二月十四日这天，玛丽女王正式在西敏寺下葬，而在新任女王的指示下，她的安魂弥撒则以传统天主教仪式进行。至此，伊丽莎白女王仍未正式提及宗教议题，但大家对她的宗教倾向似乎都心知肚明。在玛丽女王下葬的这一天，斐利公爵写了一封语气阴郁的信给菲利普国王：

这个国家掌握在一群毛头小子、异教徒与叛国者手里。长者与天主教徒极度不满，但却不敢说话。对我来说，女王陛下比她姐姐恐怖多了，她下达旨意的方式，简直可以媲美她的父亲。看来我们失去了这个国家、躯体和灵魂。

斐利公爵开始觉得任务希望渺然。珍贵的英国—西班牙联盟可能触礁，他甚至还没有机会觐见女王。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影响伊丽莎白女王择偶的条件，同时，宫里的传言也让他紧张不已。“大家都认为她绝不可能嫁给外邦人士，也没人知道她喜欢谁，因此每天都会有人建议她尽快大婚。”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发现让各界持续揣测的乐趣与益处，她俨然成为这个游戏的高手。斐利公爵害怕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和枢密院官员都不会考虑“陛下的求婚”。他唯一的希望就只能设法说服部分枢密院官员，若女王下嫁英国人，可能不利于英国。如果他能见到女王，他就能从“与她谈谈对陛下的观感开始，消除她嫁给英国人的想法，这样她才不会连那个不可能下嫁臣子的姐姐都比不上”。英国国内没有人配得上她，这是毋庸置疑的，欧洲大陆有这么多王子等着她的青睐，也可以保护她不受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威胁，如果她随便嫁个贵族就实在太糟糕了。

但菲利普国王也还没正式提亲，斐利公爵只要想到菲利普国王可能不提亲，便日复一日感到焦虑。于是他便更加大胆地施压：“若要她对陛下倾心，请下达指令给我，让我继续执行计划，要不便放弃计划，转而与奥地利的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erdinand）合作，因为我认为其他的婚配人选，恐怕也不能让她点头答应。”他又苦涩地表示：“说不定哪天我们就会听到她结婚的消息，我想我大概会是英国国土上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 * *

一五五八年的圣诞节，伊丽莎白女王终于暗示了未来宗教政策的走向。通常在圣诞节的早上，坎特伯雷大主教都会在女王的私人礼拜堂举行弥撒，但因为前任的波尔主教与玛丽女王同日逝世，当时英国大主教的职位陷入真空。许多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任职过的天主教主教们，都让有新教倾向的伊丽莎白女王难以信任，而在最高阶主教缺席时有权代理职务的约克大主教尼可拉斯·赫司，却声明自己绝对不会为有异教倾向的女王加冕。因此当时便由卡莱尔大主教欧文·奥格尔索普（Owen Oglethorpe）来到怀特霍尔宫，与女王一起进行圣诞弥撒。在弥撒仪式之前，伊丽莎白女王向他下达指示，要他略过举扬圣体的步骤——因为对天主教徒来说，这是弥撒中最神圣的仪式，但新教徒却否定圣餐变体的奇迹。然而欧文·奥格尔索普大主教却决定仪式必须依据他的信念正常进行。当他朗诵福音书时，大主教开始在教众面前举起面包与酒，伊丽莎白女王大声下令要他停止，此举让出席弥撒的人士纷感讶异。但欧文·奥格尔索普大主教仅蹙眉表示不满，便继续弥撒仪式，而伊丽莎白女王则在盛怒下，起身离开了礼拜堂，决心不看这个冒犯了她的仪式。

两天后，她颁布一项声明，裁定部分弥撒仪式可用英文取代拉丁文，并指示在新公告出来之前严禁任何讲道会。她希望透过这个强制令可以吓阻两边的宗教狂热分子，不要再有言语上的角力，也希望能平息动荡。在加冕仪式完成后，国会预定于一月份开会，届时宗教议题将有定夺。

那一年的圣诞假期十二天非常丰富又开心。罗伯特·达德利负责皇室的娱乐节目，包括舞会、宴会和化装舞会等。十二夜显现节当日的活动，其内容充满明确的反教权主义，曼多瓦公爵政府代表伊尔·施凡诺亚（Il Schifanoia），为此感到惊愕不已，于是提笔向主人回报：

公爵阁下理应听说了女王陛下在显现节这天看了一出闹剧的消息，以及晚餐过后那装模作样的仪式，他们让乌鸦穿着枢机主教的衣服，驴子扮成了大主教，狼则变成了男修道院院长。我会保持缄默，也不会恣意记录下皇室的轻蔑与不寻常的放荡。

依循传统，在圣诞假期的第十二夜要交换礼物，就在这天晚上，伊丽莎白女王首度穿上了全新而且昂贵的丝质长袜。她非常喜欢这双长袜，同时矢言再也不穿一般布料的袜子了。

斐利公爵之前沮丧的口气，让菲利普国王决定采取行动。一五五九年一月十日，菲利普国王通知大使斐利公爵：“我已决心将其他相抵触的考虑摆在一旁，也已决定牺牲个人，将婚配大事献给上帝，迎娶英国女王。”因此，当斐利公爵终于有机会私下觐见女王时，他便以菲利普国王之名，正式向伊丽莎白女王求婚。

但菲利普国王显得心不甘情不愿：“相信我”，他私下向他人吐露，“若非要服侍神，我绝不想这么做。要不是清楚了解，如此一来便能得到这个王国好献给神、服侍神，否则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除了维系英国—西班牙联盟“对基督教信仰有莫大帮助”之外，他觉得自己“像个被诅咒的人，等待着命运的判决”。然而，身为西班牙、葡萄牙、欧洲低地国家与新大陆许多地方的统治者，他仿佛认定自己是欧洲天主教之王，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必须拯救英国落入异教的命运。他不想透过暴力手段达成目的，或请罗马教皇将英国革出教门，而是寻求外交手段；但背后的真相其实是在经历与法国多年的战争后，他的财政枯竭，早已没有立场兴起宗教争端，但为了商业利益，他又需要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只要伊丽莎白女王答应求婚，同时像这么多年来一样，愿意维持忠贞的天主教徒身份，让英国“坚持、确保”罗马信仰，这么一来，菲利普国王就愿意帮助她取回加莱港。

然而在一月十日嘱咐斐利公爵求婚後，他认为这么做“会有许多困难”。他是西班牙王室的领导人，不可能常常待在英国境内，这件事当年让玛丽女王十分不满。加上伊丽莎白疑似有异教倾向，他已经可以预见，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会针对继位问题更进一步施压，然而西班牙与法国间的战争，似乎永无止境。他与英国王室的联姻，可能无法像前一任女王那么顺利。他娶伊丽莎白女王，只是为了服侍上帝，只是为了让她愿意发誓弃绝新教信仰，公开宣布自己是天主教徒，同时向教皇请求前罪之赦免。但为了达成这样的结果，伊丽莎白女王必须宣告自己与英国皆受到菲利普国王的救赎，才能免去永远的诅咒，“这样就可以证明，我娶她都是为了服侍上帝”。

但在菲利普国王意料之外的，是英国人对女王再度与西班牙王室联姻的态度。一五五四年，当英国政府宣布当时的菲利普王子与玛丽女王订婚时，许多英国民众纷纷起而抗之，不少人也认定玛丽女王之过，都是受到菲利普国王影响，尽管事实上他曾竭尽所能，阻挡玛丽女王对救赎灵魂的过度狂热，他深深了解此举对她——和他的声誉影响很大。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此时嫁给西班牙国王，不但会让她失去民心，可能也会失去王位。

最后一个问题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罗马教廷严禁男性迎娶亡妻的姐妹，然而菲利普亲王深具信心，认为教皇一定能够理解，并给予特许状同意两人的婚配。

国王陛下终于求婚了，这让斐利公爵松了一口气，而且十分开心。他自信满满地认为，伊丽莎白女王一定能感受到他们赐予她的荣耀——一个小岛的领导者要嫁给欧洲大国的国王了。他似乎已经忘记，在伊丽莎白女王正式登基前曾透露过，玛丽女王之所以失去民心，就是因为嫁给了外邦的王子。他希望伊丽莎白女王能够珍惜，了解这绝对是良缘一桩。

他的第一步就是私下觐见女王，这件事得以最细腻的手段处理。但目前看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伊丽莎白女王正忙着计划她的加冕大典。

她希望挑一个适合的日子，来进行这个仪式——这件事是罗伯特·达德利的建议——她也向精通天文的约翰·迪伊博士探询一番，他告诉女王只要在一月十五日进行加冕，就能确保她的治理之路荣耀又昌盛。时间确定了，罗伯特·达德利便负责安排事宜，同时开始与伦敦市长讨论铺张壮丽的典礼与欢迎仪式。由伦敦市来主办，这可是女王赐予的莫大荣耀。伊丽莎白女王坚持，她的加冕典礼与相关庆典要尽可能地豪华，这样才能抹去那些曾质疑她合法地位与继承正统性的人心中的疑虑。光彩又威严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在那个年代非常重要，当时的人认为豪奢的表象就等于伟大与崇高，因此女王此举是希望透过加冕典礼，来作为一种政治语言。

在十二月底时，准备工作大有进展，人们“夜以继日，每日无休”地赶工。用安特卫普进口的丝、天鹅绒与绸缎制成了金银华服，让英国财政部花了将近四千英镑，还要制作制服、帘子、海报和参与游行与嘉勉仪式者的服装。小号手和传令官都得到新的粗呢大衣，甚至连宫中的弄臣威尔·桑莫斯（Will Somers），和许多次要官员，包括洗衣女琼·希尔顿（Joan Hilton）、鱼商威廉·杜塞（William Toothe）都有新衣可穿。皇室裁缝师修改了玛丽女王加冕典礼所穿的礼袍，又瘦又高的妹妹才穿得下，同时下令，女王一抵达伦敦港时，就得有各种红色的丝袍可挑选。西敏寺安排了更多座位，伦敦的街道上则到处都是凯旋拱门。一般民众家中门窗纷纷挂上织锦与挂毯，女王游行队伍将经过的街道则铺满了全新的石砾。为了制作一张从西敏寺到国会大厦的地毯，特地购买了七百码蓝色的布。每个细节都设想周到，甚至连“女王在加冕典礼的抹油仪式过后要用来擦拭”的棉花都有。伊丽莎白女王加冕仪式总花费高达一万六千七百四十一英镑。

只是，在圣诞假期中伊丽莎白女王与欧文·奥格尔索普大主教发生了冲突后，就没有任何一位主教愿意帮她进行加冕。约克大主教尼可拉斯·赫司更不客气地向女王表明，既然她不愿意见证举扬圣体，那她就是不折不扣的异教徒，他自然不能帮她加冕了。其他的主教也多是天主教徒，都听令于赫司大主教，最后只剩下欧文·奥格尔索普大主教——在经过多方劝说后——终于受到劝服愿意主持仪式。

最后，一切都计划好了。在一五五九年一月十二日星期四这天，女王陛下从怀特霍尔宫登上了她的船，沿着泰晤士河抵达了伦敦塔，依据传统，英国君主登基之前，都必须在这里过一夜。“在市长与市府参事、各界同业公会的船只护卫下，女王的船装点着一缕神秘”。一名威尼斯特使表示，这一幕让他想起威尼斯的耶稣升天节，威尼斯总督象征性地与海成婚。

来到伦敦塔后，首相正式地欢迎她，接着她在“乐团甜美又神圣的演奏下，由美丽又伟大的乐音”引入皇室居所。隔天，她封几名人士为巴斯骑士，接着在星期六的早上，离开了伦敦塔，正式踏上前往伦敦进行加冕仪式之路。

[1] 按当时习俗，富贵人家的做法是生完小孩后不亲自哺乳而是到乡下高薪雇用奶妈授乳。——编者注

2 上帝啊！请让我们的女王快点嫁人吧！

在加冕大典前一天的早晨，伊丽莎白女王盛装穿着一袭以二十三码金绢与银绢织成的长袍，旁边点缀着貂皮，上面还有金色拉花蕾丝的装饰——这是她指定的四种加冕装扮之一，她的头上则戴着一顶金色帽子以及公主的皇冠。窗外雪花片片飘落，天空十分阴郁，女王的随行人员中，臣子们也纷纷穿上绸缎与天鹅绒制的华贵衣裳，戴上耀眼的珠宝。游行队伍逐渐成形，上千位达官显要骑着马，而女王则走向等着她的马儿，马儿身上也披着白色绸缎，旁边以金色缎子装饰，并由两位非常帅气的马夫牵着。

在上马之前，女王大声祷告：“全能永生的上帝，我要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的怜悯，才让我能拥有今日的喜悦。你对我的好与怜悯，就如狮子穴中的但以理般，获得你的救赎逃出狮穴，远离狮爪的折磨。即便我感到不知所措，仍将扛起汝之交付。”这是非常贴切的祷告，因为伦敦塔中的狮子刚好出现，开始吼叫、咆哮，周围的人们则给予热情的掌声。

再度重申自己的坚定信仰，全能的神才是带给她王权荣耀的关键，接着伊丽莎白女王走向她的坐骑，在八层绸缎制的坐垫上坐稳，在头顶上象征阶级的顶篷遮蔽下，展现出“君临天下”的气势，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伦敦街头拉着四英里长的人龙激动地欢迎着她。女王

的登基仪式成为一种政治宣传，盼望能帮伊丽莎白女王与人民打好关系，同时宣告新时代的来临。

在女王坐骑旁边的则是御前护卫——士绅卫队，他们身上的制服由深红色的缎子制成，身上象征性地带着金色战斧。在女王的游行队伍中，也有许多男仆，穿着深红色天鹅绒无袖紧身短上衣，上面装饰着金银纽扣，用红白相间的线，绣上象征都铎王朝的玫瑰与缩写

“ER”字样。在女王通过一片鲜红的号角手之前，可以看到女王身后的是骑士统领罗伯特·达德利，带领着女王的驯马，后面跟着三十九位侍女，这些侍女全都身着深红色天鹅绒长礼服，还有金色袖子。枢密院成员也在游行的行列中，穿上绸缎制的闪亮长袍，展现英勇的姿态。

伦敦市也非常用心，伦敦市长与市府参事投入了大笔金钱，在游行队伍会经过的五个路段上，布置了“华丽游行、豪奢表演与相关装置”，汹涌的人潮都将见证这一切，其中甚至有许多民众彻夜露宿街头，就只为一睹女王风采。在木栏、各色垂帘与绣帷后的，是伦敦同业公会派出的许多代表，他们慎重地穿上镶有毛皮边的礼服，以及各行业的制服。伦敦是新教的大本营，而为女王登基举办的壮丽场面，皆特意结合了玛丽女王时代民不聊生的记忆，这些已然过去，人民可以从继位的伊丽莎白女王身上，找到更多希望。其中的一个主轴，就在于建立真正的宗教概念，当伊丽莎白女王听到这里时，忍不住睁大眼睛双手举向天，仿佛祈祷一般，不断地重复：“阿门”。

伦敦街头的庆祝活动就从芬乔奇街展开，一个孩子将在喧闹的民众面前吟诵欢迎诗。女王要求群众安静，“并迅速变换脸上表情展现极大的专注力仔细聆听，仿佛这孩子的话语让她深受感动”。

第一个盛大欢迎的活动，也就是“玫瑰庆典”，就在慈爱教堂街的三层式舞台上演，由剧团演员出演都铎王朝中的要角，象征着统一

与和谐。在三层台的最底层出现的是一一二十五年来首次一一亨利八世与安·波林同台的场景，最高层则是伊丽莎白女王本人。

在康希尔的一处喷泉旁，由一名孩童代表女王，登高坐在统治者大位上，旁边则有四美德的象征，其中一美德则是“虔诚信仰”，将迷信与愚昧等罪恶踩在脚底下。

威普塞街因为号角声而显得嘈杂，伦敦合唱团则在为庆祝女王登基而装饰华美的艾琳诺十字碑旁，静静等待着。依照惯例，市政记录员要在此献上装在深红色钱包中的一千个金币（相当于六百六十六英镑）。她优雅地收下，并开口说：

感谢市长阁下、诸兄弟与各位民众。有鉴于各位的请求，我定会继续作为一位淑女和女王，请各位放心吧，我会与历代的君王一样以良善对待人民。让诸位了解，为了国家的安全与宁静，如果有需要，我一定花费所有心血在所不辞。愿神恩降临你们。

她的演说引起群众一阵赞叹与欢乐，纷纷为女王的发言陷入“一阵狂喜”。

小康城的庆祝活动，主题则为“时间”。女王仔细打量了表演内容，才若有所思地说：“是时间！时间让我走到这个方向。”这个表演描绘了两个乡村场景，一个逐渐蓬勃富有，另一个则逐渐凋零。接着一个代表“真理”的角色，在时间的酝酿下，于两者之间崛起，并且收到一本来自天堂的英文《圣经》。一个孩子用美丽的诗歌解说，《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将残破的国家变成兴旺的帝国。“真理”将《圣经》献给了女王，女王亲吻了《圣经》，接着紧紧抱在心窝，伦敦展现出的温暖，让她感谢不已，同时“承诺从此以后将当个勤奋的读经者”。

在圣彼得大教堂外，圣保罗中学的一名学者用拉丁文发表了一段演说，赞扬伊丽莎白女王的智能、学习力与各项美德。女王通过拉得关与舰队街时，伴随着背景音乐，欣赏了最后一段表演，这是有关女先知底波拉“预言并重建了以色列”的故事，神派她前来领导他的子民四十年。在剧中，底波拉身穿国会礼袍坐在王位上，并向社会的三大阶级咨询，了解如何成为良善的政府。女王在这里收到一首诗，提醒她底波拉如何在错误之中重建真理。

伊丽莎白女王对这个表演展现极大的兴趣，甚感欢心，同时也不断对臣子表达感谢之意，为她得到的欢迎之声真心地感动。群众爆发出欢呼声时，她也对群众挥手致意，并“一直露出欣喜的表情”，“愿神拯救他们！”在游行的路上，她更数度展现她的人道关怀精神，停下坐骑，以“最温柔和善的语言”向平民诉说，也收下民众馈赠的小礼，包括穷苦的妇女致赠的小花束。在前往西敏寺行经舰队街时，她保留了坐骑旁一位妇女递上的一枝迷迭香。部分外国观察家认为，她和臣子太过亲近，也超过了一位君主为保持威严该有的端庄礼仪，但伊丽莎白女王太了解人民了。她知道人们对她的亲民风格产生共鸣，如果这样能赢得民心，保持民心之所向，她还是会继续循着自己的直觉前进。她的父亲就有这样的风范，有一个人似乎看出了其中的相似之处，直接大喊：“记得老亨利八世吗？”伊丽莎白女王似乎给了他一个微笑。

“你们放心吧，我会成为良善的君主。我不求个人的荣华富贵与平安，那不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她向人民如此宣誓，人们也深深相信她。一名长者转身即去，只是为了不让她看见他感动的泪水。“我敢说那是喜悦的泪水。”她悄悄告诉身边的人。

来到圣殿酒馆，为了女王登基仪式，特地安上了两尊与伦敦神话有关的雕像——那就是巨人歌革玛各（Gogmagog the Albion）和战士

柯里纽斯（Corineus the Briton）——伦敦市政府用它们正式向伊丽莎白女王道别，并且由一名孩童朗诵一首诗：“再会了，伟大的女王！”十天后，出版商李察托希，推出了一本小册子，里面详细记载女王登基日的一切，后来这本小册子成了女王登基日抢手的纪念品，甚至让出版商三度印刷。

在这漫长又成功的一天过后，伊丽莎白女王终于来到西敏寺，夜里终得安寝。

* * *

一月十五日星期日——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日——天气冰冷严寒，地面上覆盖薄薄的一层雪。女王出现在西敏寺大厅，穿着加冕的长袍，外面罩上以丝线刺绣和貂皮装饰的斗篷，脚上则有精致的金银长袜，头戴以威尼斯的金子与珍珠装饰的深红色天鹅绒帽。在横笛、鼓、手风琴与伦敦各教堂钟声带来的欢庆气氛下，女王从西敏寺大厅沿着蓝色地毯，以及英国东南五港口的男爵们手持的顶篷走进了西敏寺；在她身后跟着的是诺福克公爵夫人，轻轻提着女王的裙摆。只要伊丽莎白女王行经的地方，后面就会涌上人潮，每个人都想留下些什么作纪念，因此跟在女王身后的公爵夫人几乎是踉踉跄跄地前进。

数百支火把与蜡烛照亮了整座西敏寺，让墙上垂挂的织锦散发光辉，这些织锦是依据拉斐尔（Raphael）的设计，由亨利八世委托制作。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仪式有其重要性，这不只是因为仪式中采用壮丽的音乐，同时也是在奥格尔索普大主教坚持下，英国最后一次以中世纪的拉丁礼仪进行加冕，不过其中有部分仪式——包括使徒书与福音书——都以英文朗诵。加冕仪式就在奥格尔索普大主教的主持，与西敏寺修院最后一任院长约翰·费肯汉（Dr. Feckenham）的协助下进行。在弥撒的过程中，进行到举扬圣体仪式时，女王仍拒绝在场，她撤到圣爱德华堂内的靠背长椅，并以帘子遮蔽直到举扬圣体仪式结

束，这样的举动受到新教臣民的喝彩。尽管她被视为“纯正古老的天主教信仰捍卫者”，但她的加冕誓词却来自威廉·塞西尔手中的那本英文《圣经》。

英国贵族几乎全体出席在西敏寺的加冕典礼，当臣子们对女王表达欢迎之意时，群众爆出热烈的叫喊声，教堂中的管风琴、喇叭与钟声大作，展现仿佛世界末日般的气势。在接下来的冗长仪式中，伊丽莎白女王一度先行离席更衣，接着在涂油仪式过后再现身时，身穿深红色天鹅绒，头上则戴着金丝。她以这样的穿着准备登基，同时在喇叭的伴奏下，在右手无名指上佩戴象征许配给人民的戒指。接着就是加冕典礼的最高潮——加冕仪式，首先戴上圣爱德华王冠，接着再戴上重达七磅、象征英国王权的帝冠。

在加冕仪式结束后，伊丽莎白女王穿戴完整的王权穿着，并戴上小一点的王冠——可能是一五三三年时，制作给安·波林的那一顶——手执象征君权的球顶令牌，沿着来时路一路往回走，她一边微笑着，一边对着夹道欢迎的热情群众大声问好。“我认为，”曼图亚大使嗤之以鼻地说，“她超出了贵族该有的严肃与端庄。”

随之而来的，是在西敏寺大厅举办的传统豪华晚宴，这项习俗在一八二一年乔治四世登基时取消了。这场晚宴从下午三点，一直到隔天凌晨一点才结束，在晚宴中，按照惯例，女王之护卫者爱德华·戴默克爵士（Sir Edward Dymoke）全副武装进入西敏寺大厅，捍卫女王不让任何人挑战她。这时的伊丽莎白女王高高在上地坐着，头顶上则有象征王者地位的天篷，同时身上又换了一套礼服，这次是一套紫色天鹅绒服。音乐不停歇，女王的表舅威廉·霍华勋爵（Lord William Howard）及萨赛克斯伯爵（Earl of Sussex）不断行屈膝礼，并将各种美味的餐点送到她面前。席间贵族都获得特许可以戴着他们的冠

冕，只有在女王起身敬酒祝他们身体安康，感谢他们对女王的服务时，才需要暂时摘下。

到了一月十六日，因为“女王陛下感到特别劳累”而且得了重感冒，因此将当日原定计划中的马上比武大会延期，镇日留在寝宫中休息与处理政务。接下来几天，女王登基庆祝透过宴会、化装舞会和一连串的比武大会持续下去，罗伯特·达德利在参赛者中表现十分杰出。这些活动都办得十分有条理，让人感受到英国富有与权威的形象，因此外国观察家对于伊丽莎白女王的登基大典与随之而来的庆典一致感到印象深刻。伊丽莎白女王穿着加冕时的长袍，由人绘制了一张以脸部为主的肖像画，然而这幅画现今已不存在，不过这幅画却曾被用在她的第一个国玺及早期的许多文件上；后来有人在一六〇〇年左右复刻了这一幅画，一度存放在华威城堡，现在则在英国国家肖像艺廊展出。

* * *

现在终于坐稳了王位，伊丽莎白女王将注意力转向她的议会即将针对国家要务进行的首次辩论。在这个会议中，主要可能有两项议题：最受争议的宗教议题和最棘手的女王的婚姻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最想知道的不是她会不会结婚，而是她会嫁给谁。和女王婚配关系最大的，是都铎王朝继承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纷扰政界长达四十年之久；没有人知道，万一伊丽莎白女王早逝，该由谁来继任王位。

在政治议题上，许多人开始期盼英法间能取得和平，由此斩断那些想要支持亲法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让法国军队留驻苏格兰的念头。从一月十六日起，苏格兰女王玛丽与她的丈夫开始自称为英格兰的国王与皇后，事已至此，英法之间的和平更显重要。更重要的是，英国必须维持与西班牙间的友情，借以保护两大强权间贸易频繁往来的利益，还可能制衡法国的野心。显然对伊丽莎

白女王来说，要透过外交关系赢得这场战役，就只能策动两个敌国——法国与西班牙——形成互相制衡的关系。

财政赤字更是不得不重视的大问题。伊丽莎白女王每年赚进二十五万英镑，这笔钱要用来支持皇室与政府运作，还要负担姐姐玛丽女王留下的二十六万六千英镑债务。物价不断上涨，但伊丽莎白女王却身体力行最严苛的开销限制，加上贩卖皇室部分的土地来过日子。因此在她任内，每年的花费从未超过三十万英镑。

女王的感冒与恶劣的天气，导致许多国会议员延后抵达伦敦，议会日程已延宕了两天。一五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伊丽莎白女王穿着加冕典礼的礼袍现身，在四十六位议员的陪同下，国会总算正式开议。斐利公爵通知菲利普国王，表示：“天主教徒非常担心英国国会即将做出的决议，而伊丽莎白女王本身的行为已经透露了可能的结果。在为议会开议而前往上议院前，女王当着所有修士的面与西敏寺修院院长会面，这些修士全都手持有点燃的细蜡烛，这是传统天主教信仰的一环，但新教徒却视如敝屣。”

“把那些蜡烛给我拿走！”女王勃然大怒厉声说道。“我受够这些东西了！”她正在一个神圣的地方，这些话语让修院院长感到心惊。此时女王的心情极差，踩着重重的脚步，走向西敏寺中高坛上的王座，直到已故的爱德华六世的导师理查德·寇克斯博士

（Dr. Richard Cox）的布道中，用谩骂的口吻指控他们参与烧死新教徒的恶行，女王的情绪才稍稍平复。他大声怒斥，神拔擢他的仆人伊丽莎白成为尊贵的女王，让她来结束玛丽女王复兴的天主教信仰，他要女王打倒圣徒形象，净化教会中盲目崇拜的习气，并解散玛丽女王重建的所有宗教组织。寇克斯怒吼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女王向来最讨厌冗长的演说，开始越来越烦躁恼怒，一旁的臣子们则胆战心惊冷汗直流。

在国会登上那放着金丝椅垫的王位后，伊丽莎白女王便清楚表明绝不容许任何下议院放肆的举动，许多人原以为女性当政可能较为柔软容易操弄。

玛丽女王当年登基后通过的第一项法案，就是宣告自己的合法身份，毕竟父亲亨利八世下令宣告与她母亲的婚姻不合法。伊丽莎白女王也面临相同的情景：她在一五三六年被认定为私生子，在继承的法令上长年受到“驱逐与排斥”。她的私生子丑名从未被撤销，亨利八世仅在一五四四年的继承法中，将伊丽莎白的继承顺序排在爱德华与玛丽之后。因此，伊丽莎白女王的合法地位备受质疑，于是关于是否该针对自己的合法性采取进一步手段，她向尼可拉斯·贝肯爵士讨教。尼可拉斯·贝肯爵士的建议是谋定而后动，她也接纳了这个意见，但身为私生子的污点及这件事对王位的威胁，直到她离世的那一天都仍是个敏感议题。

伊丽莎白女王的继位人选则是另一个敏感议题。都铎王朝并不是多子多孙的家族，若伊丽莎白女王膝下无子而逝，可能就会面临王位后继无人的窘境。一五四四年的继承法与亨利八世的遗诏中提到，在伊丽莎白女王之后，王位可传给亨利八世的妹妹萨福克公爵夫人玛莉·都铎（Mary, Duchess of Suffolk）。玛莉·都铎有两个女儿，法兰赛丝（Frances）与伊莲娜·布兰登（Eleanor Brandon）。年龄较长的法兰赛丝也生下了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就是噩运连连的英国“九日女王”珍·格雷（Lady Jane Grey），另外两个女儿则是凯瑟琳·格雷小姐（Lady Katherine Grey）与玛莉·格雷小姐（Lady Mary Grey），在一五五九年时，她们分别为十九岁与十四岁。

她们两个都是新教徒，只是伊丽莎白女王打从心底讨厌她们，尤其是凯瑟琳——“女王连正眼都无法瞧她一眼”。在都铎王朝中，她似乎看来最有嫌疑，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五五九年时，传闻菲利普

国王认定凯瑟琳·格雷小姐是继承英国王位最有希望的人选，于是策划绑架她，让她成为哈布斯堡王朝下一任继承人即颓废的唐卡罗王子的妻子。对于伊丽莎白女王的厌恶，凯瑟琳小姐心知肚明，于是一五五九年三月，她向西班牙大使表明，她的阿姨并不希望自己接下王位。不过伊丽莎白女王对驼背矮小的玛莉·格雷小姐也没什么好感。伊丽莎白女王对格雷姐妹的憎恶受到许多人的支持，甚至还有人说她们的父亲支持诺森伯兰公爵的叛国计划，才是导致她们无缘继位的主因。

在萨福克公爵家族血脉中，紧接在格雷姐妹之后，下一顺位的是伊莲娜·布兰登唯一的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她嫁给了后来成为德比伯爵的亨利·史坦利（Henry Stanley）。玛丽女王在位期间，部分人士认定玛格丽特将可望成为王位的接班人，因为他们认为玛格丽特与其他格雷家族的人不一样，并没有参与一五五三年诺森伯兰公爵的叛变。尽管玛格丽特对接下王位没有任何兴趣，伊丽莎白女王依然坚持让她常常到宫中走走，“因为她是我们的血亲”，同时也有一点监管她的意味。可怜的玛格丽特讨厌宫廷生活，也讨厌自己的家庭生活，更讨厌那和她时有龃龉的丈夫，因而从不知内心快乐与平静的滋味。

其实萨福克郡的几位可能接班人，身上都背负着私生子的可疑污点，因为萨福克公爵与前两次婚姻结束的过程疑点重重，使得萨福克公爵夫人玛丽·都铎与萨福克公爵的婚姻合法性也堪虑。

另一位可能的新教人选，就是亨丁顿伯爵三世亨利·哈斯汀（Henry Hastings, 3rd Earl of Huntingdon），他是爱德华三世的后裔。他和玛格丽特一样，对问鼎英格兰一点兴趣都没有，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偶尔会（他后来这样告诉姐夫罗伯特·达德利）“私下偷捏

他太太一把”，警告他们野心不要太大。他根本一点野心也没有，甚至尽量避免“展露自己的长才，忠诚地服侍女王”。

亨利八世的继承法通过后便与苏格兰兴战，当时他的目标是让儿子爱德华迎娶甥孙女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将英格兰与苏格兰一统于英国麾下。苏格兰民众则用暴力加以反抗，因此在决定接班人选时，亨利八世跳过嫁给了苏格兰王詹姆士四世（James IV of Scotland）的姐姐玛格丽特·都铎，也就是玛丽·斯图亚特的祖母。因此，尽管许多天主教徒主张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才是英格兰的合法女王，或至少比伊丽莎白女王还更有继位的正当性，但在英国法令的规定下，她却无权问鼎王位。许多人也认为，不在英国出生的外国人，的确应该自动被摒除在王位继承权之外，因为根据英国法令，这样的人也没有资格继承英国的财产。然而也有人辩称王位的继承应该不在此限。

被亨利八世的继承法跳过的，还有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小姐（Lady Margaret Douglas），她是玛格丽特·都铎梅开二度与安格斯侯爵（the Earl of Angus）所生的女儿，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小姐则嫁给了莱诺克斯伯爵马修·史都华（Matthew Stewart, Earl of Lennox）并诞下两子，这一点对她非常有利。只是她父母的婚姻关系存在着合法性问题，这代表多数人都不会看好她继承王位的可能性。然而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小姐却有着强盛的野心，这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她的大儿子，出生在英格兰的达恩里勋爵亨利（Henry, Lord Darnley）。光是这一点，就让许多人觉得，他比身为外国人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更有继承的权利。

到了一五六一年，苏格兰大使告诉伊丽莎白女王，除了玛丽·斯图亚特之外，“其他对王位有野心的人都没有资格，也不值得一统英国”，但女王不置可否。事实上接班人选的问题，对伊丽莎白女王来

说是一种禁忌。从一开始她便清楚表达自己十分厌恶必须指定接班人的举措。对于被指定为王位继承人后，成为各种阴谋与反抗的焦点，女王是再清楚不过了，而且就算不成为王位继承人，她的人身安全受到的威胁也够多了。她曾表示，如果让其中一位接班人得知继位消息，她一定会在“一个月内再度回到伦敦塔去蹲苦牢”。

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她得要结婚生孩子，针对这一点，斐利公爵已经准备好了。伊丽莎白女王实在太过忙碌，因此斐利公爵只在一月份某日她从寝宫出来时见过她一面。女王尽管感冒了，与斐利公爵交谈时，仍显得“十分开心”，至于斐利公爵小心翼翼提出的问题，她表示她的婚姻问题会在国会中正式讨论。因此，斐利公爵决定稍加等待试试水温，再为菲利普国王求婚。

在二月四日星期六这天，英国下议院起草一份请愿书上呈给女王，要求女王尽快结婚以保护王室血脉的延续。两天后，国会派了一位代表，将请愿书送到怀特霍尔宫，交到女王手里。

请愿书中，议员们提醒伊丽莎白女王，“为了她和她的王国着想，她应该找个配偶，才能帮她分担政务上的重担，这些都是男人该做的”，下议院议长托马斯·贾格雷佛（Sir Thomas Gargrave）屈膝跪在女王面前直率地向女王表示国君寿命有时尽，但全体人民福祉的影响无穷远。万一她始终保持“不婚与处女之身”，绝对会与公众意见“互相抵触”。

听到他的一席话，对于这么敏感的议题，他却采取如此大胆的态度，女王感到震惊，但她很快恢复镇定，仁慈地应道：“在如此令人感到不悦的议题上，讨我欢心显然是你与全国人民的好意”。她再度重申，尽管欧洲各国拥有重权的国王纷纷前来求婚，但她依然坚持独身，而且她认定自己早已有丈夫与孩子了。她亮出手上的王者之戒，同时表示：“我已经嫁人了，我嫁给了英格兰王国。”而后来她也曾

多次这么表示。至于孩子，“那就是你们每一个人，所有的英国男子，对我来说都是孩子，都是亲人。”对于议长还没提出任何人选，她衷心地感到感谢，“这对尊贵的公主来说，是不合适的，对身为臣子的你来说也是不智的。”

伊丽莎白女王继续向下议院表明，她会继续走在神指定的道路上。她向来不倾向接受婚姻，但也并非完全排斥。如果有一天她真的结婚了，也绝不会做出任何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而且她绝对会选择“会和她一样小心翼翼保护王权”的丈夫。只是“如果我不将心思放在婚姻，万能的神会更欢心”。

至于继位的问题，女王允诺“绝不会让王位没有继承人”，但继承人是谁，她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只要她维持单身，她继续表示，她非常确定“神会给我们指引，你们不需要担心继承人的问题，比起我生下的孩子，这个人全体国民可能更有贡献，毕竟最适合的婚配人选，过一段时间可能就销声匿迹了”。她认为自己的孩子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出差错，变成没规矩的孩子”。她其实是在暗示，她亲生的孩子，有一天可能密谋推翻她，毕竟她只是一个女人，届时政坛上德高望重的大老们大概也不会阻止这件事的发生，因为她可能会面临各界要她让位给儿子的压力。到了一五六一年，她向苏格兰大使透露，她认为“一国之君绝对不可能喜欢有继承权的那个孩子”，甚至举出许多实例证明许多王者与继承人之间常有争吵与冲突。尽管历史记载，她曾成为一百多名孩子的教母，但也没有证据显示伊丽莎白女王特别喜欢孩子。在多方考虑之下，她继续说，她个人宁愿将继位之事留待天命来决定，她坚信在神的旨意帮助之下“适合领导的继位者”总会浮出台面。

最后她宣布：“对我来说，这样已经足够。盖棺定论时，我希望身为统治了一段时间的女王，活着是个处子，死了也还是个处子。”

而“童贞女王”的封号就此而起，伊丽莎白女王也尽可能地利用这个封号，让她在随后的几年成为令人崇拜的人物。

女王的演说稿，在二月十日这天于下议院正式宣读。对于伊丽莎白女王的反应，国会议员自然大感吃惊与恐惧：如果她不结婚，自然也不会有亲生的继位者来对抗她安全上的威胁，而英国王位继承的问题，自然也不会有答案了。平定宗教之争原本是意料中的事，然而现在可能也有危险，更不要提她身旁那些新教臣子的性命了。在当时，拒绝婚姻的女子被视为违反自然，多数的男性都认定，他们的女主子只是在表现女性天生的害羞内向，等她知道婚姻的重要性就会清醒了。从那之后，威廉·塞西尔开始不断祈祷“神啊，请赐给女王陛下下一个丈夫和一个儿子，让我们的后代可以有个男性来领导他们”。他也常常用他的期盼来提醒伊丽莎白女王，神一定会“协助女王陛下找到孩子的父亲”。对威廉·塞西尔来说，这个女人当家的政府脱离了自然正轨；他多么渴望看到男性主政，只有伊丽莎白女王结婚并被传宗接代的烦琐事务绑住，他的愿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她的丈夫便能以她之名行执政之实。

但事实上，就像一名枢密院成员说的一样，尽管伊丽莎白女王毫无疑问地“绝对是英国身价最高的女人”，她却对婚姻之事一点不动心。不过在政治上，她保持独身也有好处。她姐姐带给人民伤痛的经验，让下嫁外国君王成为一件冒险的事。嫁给这样的丈夫，也许可以保护英国不受外侮，但也可能掏空英国财政以支持其国家的战事。他也可能将英国视为其国家的附属，而且——如果他自己就是一国之君——他一定长年无法待在英国国内。更重要的是，英国民众具有海岛民族的特性，时而对外国人有无理的仇视与恐惧，对当年玛丽女王下嫁西班牙，他们的敌意很强，甚至暴力相对；因此要他们接受女王再度与外国君主结褵，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当然，伊丽莎白女王随时可以选择嫁给某一位臣子，这也是多数的英国臣民对她的期望。“英国全体臣民都认为，随便选个乡巴佬，都比陌生人好。”罗杰·阿谢姆曾如此写道。而伊尔·施凡诺亚的报告中亦曾提到，每个人“都同意她应该要选择英国人比较好”。持反对意见的只有威廉·塞西尔、阿伦德尔伯爵和伊丽莎白女王的表亲诺福克公爵，他们早已预见女王与外国君主成亲将带来更大益处。

然而，女王并不想下嫁给臣子，她认为这么一来，可能会引起国内与宫廷内危险的对立情形，导致像玫瑰战争时的派系之争，造成的紧张与冲突可能导致内战，毕竟不到十年前，苏格兰才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更重要的是，要贬低自己贵族的血缘身份嫁给一介平民，这让伊丽莎白女王犹豫再三。

最重要的是，从童年时期开始，她一再地受到各种拘束，她不想失去得来不易的自由。十六世纪时的丈夫们——就算是入赘于执政的女王——都专横得令人难以想象，社会也认为男人才是一家之主。做老婆的必须柔顺与服从，遵从婚姻的誓约。女人当政在那个年代算是新颖的概念，且普遍被视为难以接受的状况：尽管她受到神的指示来领导人民，但仍得对丈夫百依百顺。在婚姻议题上，玛丽女王做出了难得的让步，但每当她不愿听从菲利普国王的建议与要求时，她的丈夫就会表示愤慨。在这种状况下的婚姻自然不和谐，而伊丽莎白女王绝对比她姐姐独立许多，她杰出的智能与对皇室血统的骄傲，让她难以屈就任何男人。她天生就是独立的统治者，而且也不想让任何人干扰她的特权。如果她结婚了，她的独立与特权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私底下的她倾向维持独身主义。一五五九年时，她曾告诉一位德国大使“她觉得独身生活非常愉快，而且她也非常习惯维持独身，甚至宁愿进入女修道院生活，就算受到压力，也要誓死保护自己独身的地位”。女王也亲口告诉英国驻外使节，表示她宁愿“在街上乞讨但

维持单身，也不要当个被迫结婚的女王”。又有一次，她表示自己非常认真看待婚姻大事，这对她来说是件严肃的事，因此她不想和别人一样凑合着踏入婚姻。一次她在国会上表示：“如果我是个提着桶子的挤奶女工，我的私生活根本就不会有人闻问，所以我并不想放弃单身生活，勉强下嫁给他国王者。”她似乎将婚姻视为欲求不满者的避风港：一五七六年时，她向英国国会表示，她对婚姻没有敌意，当然她也不会“用错误的态度去评断，那些迫不得已进入婚姻，而无法享受另一种生活的人”。她早已下定决心，不为人类肉欲的弱点所动。

许多作家不断地猜测，伊丽莎白女王对婚姻反感的背后，可能有更根深蒂固的原因。罗伯特·达德利后来告诉一位法国大使，从八岁起，女王陛下就宣告自己绝不踏入婚姻的决心。亨利八世的第五任妻子凯瑟琳·霍华因通奸遭到处死时，伊丽莎白女王才八岁，这件事可能让她意识到父亲用类似的手法处死母亲的痛苦记忆。到了她十五岁那一年，在她青少年时期第一个唤起她的情欲的男人——托马斯·西摩将军——也成了阶下囚。这些事件可能造成她心中的阴影，将婚姻与死亡画上等号。一五六一年，她自己向一位苏格兰大使表示，她青少年时期的某些经验让她无法将婚姻等闲视之，也不认为结婚是安全的事情。她将这样的情绪，怪罪在父亲与姑姑们的婚姻问题上：“有些人的婚姻遭质疑不合法，有些人则被视为私生子，甚至有些人依照自己的喜好态度反复。婚姻的确存在许多疑虑，因此害怕争端的我对婚姻敬而远之。”除此之外，姐姐玛丽女王悲惨的夫妻关系，与其他友人失败的婚姻经验，更加强了女王对拒绝婚姻的念头。在那奉父母之命成婚的年代，许多上流社会的人士婚姻都不甚幸福，有些人甚至与妻子离婚，其中伍斯特伯爵（Earl of Worcester）、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和士鲁斯柏立伯爵（Earl of Shrewsbury）都是很好的例子。这些人私底下都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婚姻顾问，他们坚持——尽管婚姻不成功——依然能维持和谐。

伊丽莎白女王推拖婚姻大事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害怕生产。十六世纪时，妇女怀孕其实是危险的事情，当时生产的死亡率居高不下：伊丽莎白女王的两位继母，珍·西摩与凯瑟琳·帕尔，以及伊丽莎白女王的祖母约克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York），都因分娩导致的高烧而死。玛丽女王则因两度精神性假妊娠而成为众人的笑柄。许多年轻的新娘们，像是已故诺福克公爵夫人，很快地结婚、怀孕，却在婚后不到一年内死于生产过程。伊丽莎白女王的御医胡克医师（Dr. Huick）曾经警告她，生产对她来说可能并不容易，这件事也让她惊吓不已。因此多年来，伊丽莎白女王即使曾认真考虑婚姻，最后都还是紧急刹了车。没错，政治上的因素的确值得她这么做，但内心对生产的惧怕，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也有人认为伊丽莎白女王不愿结婚是因为知道自己不孕，在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这样的谣言甚嚣尘上。但相关事证十分矛盾。在外交上，她的生育能力自然引起各种紧张又谨慎的揣测与探询，因为她缺乏结婚的意愿，流言自然如影随形。在一五五九年斐利公爵的报告中写着：“若我的眼线没有欺瞒，我也相信他们没有，基于他们最近给我的明确事实，我已经确定她无法生育。”到了一五六一年时，接手斐利公爵的大使又写道：“许多医生已经证实了普遍的看法，这个女人并不健康，而且已经可以确定她绝对不孕。”但他也听到其他恶劣的传闻：“许多人都说她已经有了（孩子），但针对这一点，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征兆，当然我自己也不相信。”威尼斯大使曾通知威尼斯公爵伊丽莎白女王不孕的消息，他表示自己得到了与她相关的部分消息，只是“不敢写出来”。

此后，外国特使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追求这脆弱的真相，以保护其君主与王朝的利益。女王寝宫的侍女常常受到许多人谨慎的探询，而西班牙方面则定期贿赂女王专属的洗衣妇，希望她透露女王陛下的经期是否正常。女王的洗衣妇则透露，伊丽莎白女王的女性功能和一般

妇女一样正常，自此菲利普国王便时常进行外交协商，希望伊丽莎白女王能结婚生子。如果有其他合理的理由让他相信女王不孕的话，他绝对不会这么做。

伊丽莎白女王本身也助长了流言。她曾一度神秘地告诉萨赛克斯伯爵，“对她来说，她对婚姻的厌恶感与日俱增，但个中原因她坚决不说，就算她有双胞胎姐妹，她也不愿意吐露。”而一五六六年时，法国大使的侄子好奇地向女王的其中一位御医询问女王生育能力的问题。他告诉御医，女王陛下过去曾一度表示自己从医生处得知自己无法生育，他想要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因为如果这是真的，那他绝对不能让法国王室的任何一个人与伊丽莎白女王成亲。御医则郑重表示，女王陛下简直是在胡言乱语，女王有时就是会突发奇想。如果女王陛下真的要结婚，他可以拍胸脯保证，她绝对可以生十个孩子，或更多，“在大英王国之中，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女王陛下的体质。”

到了一五七九年，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四十岁中期，威廉·塞西尔仔细地讯问了女王的医师、洗衣妇与侍女，以了解女王是否还有生育的希望，在他的私人回忆录中记载着：“依据她的身体状况，身高方面并没有过矮，也没有过胖，没有患病，生殖系统方面也没有非自然的状况出现，但相反地，依据最了解她身体健康的医生判定，及对女王身体状况的侍女们的说辞，只能断定‘女王还是非常有生育的可能性’。”这个调查行动的起因，也出自担心女王在如此大的年纪怀孕，将有可能危及生命。这份报告并未公之于世，也未在宫廷内公布，但塞西尔似乎对调查结果相当满意。

然而日子一年年过去，女王依然膝下无子，因此许多人相信，她从来就不孕。而多年后，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宣称哈维克的贝丝小姐（Bess of Hardwick）告诉她伊丽莎白女王“和一般的女人不一样”，但因为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曾与贝丝小姐发生争执，

希望在伊丽莎白女王面前将她丑化成三姑六婆，因此她的造谣生事定是别有用心，我们不应该太看重她的指控。较可信的消息来源应是伊丽莎白的教子约翰·哈林顿爵士（Sir John Harington），他在一五九〇年代时发表了一些观点，成为普遍性的看法，当时他写下：“她的内心深处厌恶婚姻，而且（就和许多人想的一样）她的身体微恙，并不适合婚姻生活。”伊丽莎白的确可能向哈林顿爵士吐露内心深处对性的厌恶——尽管这在当时人尽皆知——但对于伊丽莎白女王身体的状况，却完全是他的片面之词。事实上在少女情怀之时，伊丽莎白女王总是认为自己的婚姻应该十分美满。

直到伊丽莎白女王死后，剧作家本·琼森（Ben Jonson）——绝对不是钦佩她的人——在觥筹交错间告诉一名苏格兰友人，霍松丹的威廉·左蒙德（William Drummond of Hawthornden），“伊丽莎白女王身上多了一层膜，尽管她多方尝试，但依然不能解决。”但他的消息来源并不确定，他很可能只是散播谣言，也可能只是在酒精的作用下胡言乱语罢了。

许多现代作家质疑流言背后有其可信度，伊丽莎白女王的处女膜可能不正常地肥厚，要不就是有痉挛的症状，导致性交的过程痛苦难耐。近来，作家麦可·布罗克（Michael Bloch）曾提出新的说法，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和温莎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Windsor）一样患了睾酮不敏感症候群（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罹患此症者出生时身上带有男性的XY染色体，但因为身体无法正常制造男性荷尔蒙，因而出现女性性征。患者没有卵巢，只有畸形的子宫与狭窄的阴道。当然这样的患者自然无法生育，而且某些人甚至无法性交。患者成人以后身高较高、有男子特质、四肢修长而且声音尖锐，但有时候这样的患者也会非常有女人味。麦可·布罗克指称伊丽莎白女王可能也罹患了这个病症。但除非有人认真思考本·琼森疑点重重的论

点，不然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说法，也没有其他类似的理论佐证了。

伊丽莎白女王登基伊始，托马斯·查伦纳爵士（Sir Thomas Challoner）曾向她提出警告：“对一位女性统治者来说，维持外在的谨言慎行绝对不算太过分。”换句话说，她的行为必须极尽谨慎之能事。但不久之后，她私生活混乱的各种流言便如影随形，尤其是各天主教国家的国君们时不时辱骂她——程度所及，大概就如同她的母亲一般——说她是个花痴。有人说她拒绝婚姻是为了拥有更多爱人满足欲求。不幸的是，伊丽莎白女王从来就不隐藏自己对性事的兴趣，在谈及性事时也常展现兴致勃勃的样子。再加上她向来喜欢帅气、强壮、聪明的男人，以及她喜欢调情与偶有的失控举动都是人尽皆知，导致许多人认为流言有其真实性，而伊丽莎白女王也绝非她所创造的“童贞女王”形象。

也有不少传言表示她私下生了孩子，但她的生活暴露在公众的眼光之下，她到底要怎么背着人们生下孩子，这一点却没人能解释。哈维克的贝丝小姐妒忌心很重，她最喜欢的事，就是向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回报任何她听到有关伊丽莎白女王的龌龊传闻，例如伊丽莎白女王常常和莱斯特伯爵上床，或是她逼迫克里斯多福·海登爵士（Sir Christopher Hatton）与她做爱。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则冲动地将这些故事全都以信件书写的方式传达给她的一位表亲，蓄意陷贝丝小姐于不义。幸运的是，塞西尔拦截了这些信件，确保女王永远不会看到这些内容。后来贝丝小姐向枢密院方面承认，这些故事都是她捏造的，海登爵士也向约翰·哈林顿爵士发誓，“自己打从心底深处强烈厌恶这样的指控，他绝对和女王陛下没有任何肉体关系”。

至于海外，许多天主教作家，包括英国耶稣会信徒尼可拉斯·桑德斯（Nicholas Sanders）、罗伯·帕森斯（Robert Parsons）和枢机主教威廉·亚伦（Cardinal William Allen），都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放荡形象背后粗鄙又不真实的流言的帮凶。

在英国，如同我们所知，因为担心无知的人民信以为真更加深谣言的流传，因此只要恶意散布有关女王的流言都会受到政府的惩罚。一五九八年时，多塞特郡的爱德华·弗朗西斯就因为要说服一名叫作伊丽莎白·贝莉的女子与他同居，说了一些禁忌的话而遭到审判，他说：“在英格兰最适合这么做，在贵族中就有三个私生子，而她自己出身也很卑贱。”

晚年时期，曾在伦敦塔中虐囚，英国恶名昭彰的虐待狂理查德·塔克里夫（Richard Topclyffe）吹嘘自己摸过伊丽莎白女王的胸部，也看过她的大腿。尽管他应该只是幻想，但我们知道，在伊丽莎白女王晚年时，似乎很喜欢在法国大使面前暴露她的胸部。

然而伊丽莎白女王是个淑女，也是个很棒的女政治家，不可能屈服于不正常的性关系。她是个非常骄傲、自视甚高的女人，非常重视自己崇高的地位，对于资产非常关注，她不太可能为了肉体的欢愉而赔上自己的名声，或危及执政地位。在那个年代，并没有有效的避孕方法，非婚怀孕可能毁坏她得来不易的一切。她能轻易地隐藏对某些男性的爱意与景仰，显示她对于和这些男人谈恋爱不屑一顾。但这些传闻始终未经证实。一五六一年，传闻沸沸扬扬之际，瑞典首相尼尔斯·盖德斯登（Nils Guilderstern）为主子埃里克王（King Erik）求婚。在宫廷中贴身观察过伊丽莎白女王后，尼尔斯·盖德斯登在报告中写道：“她没有任何举止是不合乎礼仪的，我看到许多贞洁、纯洁与端庄稳重的象征；因此我能用性命担保她绝对贞洁无瑕。”

后来几年，许多国家的大使也都有相同的感受。大部分的使节都理解到这些流言大概都是“出自于妒忌与恶意”。一五七一年时，法国大使费奈隆（Fénelon）向法国王太后表示，伊丽莎白女王是“贞洁的好女人”，同时还强调只要体验过英国宫廷生活的人，就绝对不会相信此等流言，因为女王的生活周遭总有“无数的眼光”，这些人对她都是敬畏有加，在这环境下也杜绝她任何不正派行为的可能。

另一位法国大使麦可·卡斯泰尔诺（Michel de Castelnau），与伊丽莎白女王相识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他表示：“如果有人毫无根据却想要以混乱的男女关系来指控她，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外国使节的恶意攻击，以击退其他国家想与英国联手的企图。”多数的西班牙使者对英国女王都怀着敌意，只有一位例外，他就是席尔瓦（de Silva）。他承认自己从未找到有关伊丽莎白女王私生活淫乱的证据。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则曾告诉他：“我不会钻牛角尖。每天有上千人看着我的一言一行，诽谤不会永远困住我。”对伊丽莎白女王的臣子们来说，她的贞洁无疑神圣不可侵犯。几年后，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弗朗西斯·贝肯形容女王“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就如她一心想要的表现一样”，他的感受也得到其他了解女王的人的认同，包括威廉·塞西尔和连任几届国务大臣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

女王刻意表现出的贞洁形象非常重要，这不是她个人的选择，而是国家政策使然。在许多方面，她因此付出不少代价，也被迫终生面对孤独、情感剥夺与禁欲。她的行为的确达到她认为必需的美德，但有时可看出她沉重的压力。她有时会逗弄爱人并给予部分自由——她绝对是个多情种子——但行为绝不超出分际。性事本身在某些方面很可能让她感到恐惧，她内心深处无法将自己交付给某个男人。就算这是真的，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比起作为一个结婚的统治者，身为一个童贞女王让她更感强大。为了维持她的力量，她不仅需要童

贞女王这个封号，更必须将这个角色内化。这也代表无论她个人的感受如何，不正当的性关系将永远与她沾不上边。

当时许多人相信，现在也依然如此，伊丽莎白女王享受追求与调情，她在性事上更是不道德，但事实上她的生活循规蹈矩——几乎从不落单，（就像她自己所说的）“身旁永远有寝宫侍女与有贵族血统的侍女在侧”，她们甚至住在女王房间——她非常看重自己与自己的名誉：“若英格兰的女王成为男人的玩物，那成何体统。”“我的生活就摊在阳光下，有这么多人看着我。”听到国外关于她的部分传言后，她曾如此说道：“我不知道，关于我，怎么会有这么难听的传言出现。”更重要的是，她当然知道某些女王——更甚至是某些后妃——都疑似挑战了道德的界线，这对她来说都是很残酷的一课。更甚者，她维持高高在上的形象之际，也严格控制自己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她心之所向。

当伊丽莎白女王表达独身的意愿时，很少有人把她的话当真。英国国会与枢密院依然认为为女王寻夫指日可待，而外国使节则不断为其主子求婚，希望能打动她的芳心。伊丽莎白女王对这些游戏非常起劲。毕竟她最爱的就是男人的注意与调情，陶醉在受到追求的欢愉之中。这部分她表现得好极了，让很多人以为她早已改变维持独身的决心，只要时间到了，她一定会选择步入婚姻。这个观点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喜欢谈论可能到来的婚礼，或是表示“自己也是个人，对人类的情感并非无感，如果是为了国家的幸福，或其他重要原因，她也可能因此改变心意”而逐渐受到采信。一名臣子说，她变得“对求婚的提议贪婪不已”。在国力羸弱又贫穷时，有欧洲的领导人争相向她求婚，盼望得到英国的友谊，对她有绝对的益处。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有成功的机会，因此也就不会轻易兴战或引起纷争。

伊丽莎白女王的婚事，成为英国政坛的重要议题与政策方向，也引发长达二十五年的臆测，一路上的曲折导致女王陛下的智囊们数不清的困扰，大多数的臣子们都对她固执的行为感到困扰不已。少数人，像是塞西尔，则清楚知道她说到就会做到，就像她多次的表述一样，她没有结婚的意愿。

* * *

从一五五九年二月继位的那天开始，便有使者提出婚姻请求，她被迫经历长达二十五年的谎言生活。斐利公爵后来总算得以私下觐见，并向伊丽莎白女王提出菲利普国王的求婚。面对菲利普国王给予的荣耀，女王竟一点也不知珍惜，这让斐利公爵大感困窘，当女王以委婉的态度表达自己维持独身的意愿时，斐利公爵更感不解。不出所料，西班牙大使斐利公爵果然表示，如果伊丽莎白女王拒绝结婚生子以延续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法国国王将起而抗之，另立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为王。

这简直就是火上浇油，让女王怒气攻心，于是她开始将怒气“发泄”在法王亨利二世（King Henry II）、法国王储和他的儿媳妇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以及法国人和苏格兰人的身上。她的怒火实在太猛烈，经过一段时间的暴怒与跳脚之后，她全身瘫软地倒回王位上，然后告诉斐利公爵自己需要时间思考菲利普国王的求婚。

几天后，她恢复了理智，但仍指出这段婚姻的许多缺点。菲利普国王若迎娶小姨子，会让伊丽莎白女王与菲利普国王本身都陷入姻亲结婚的禁忌中；虽然教皇应该不太可能拒绝菲利普国王的特许请求，但这在英格兰境内将造成争议，因为亨利八世不也曾谨慎地询问教皇是否能特许他迎娶兄弟的遗孀吗？最后英国法院宣布这桩婚姻无效，因此若伊丽莎白女王与姐姐的鳏夫成亲，婚姻的合法性可能也会出现争议。伊丽莎白女王援引希伯来《圣经》中的《利未记》来向斐利公

爵表达自己的立场，她说她不想接受罗马教皇的教令，因为那与神的旨意相违背。因此，她继续说，她无法在不污蔑对父亲的记忆之下，嫁给姐姐的鳏夫。

然而，仍有一线希望。她承诺会在英国国会与枢密院商讨此事，同时让斐利公爵回报菲利普国王，若有一天她决心步入婚姻，菲利普国王将是她的第一人选。

接下来一个月的思考时间，斐利公爵顿觉更有希望。但伊丽莎白女王的顾问们听到求婚消息后，对于女王竟然考虑接受求婚，全都感到惊骇不已，同时热烈地讨论要如何劝阻她打消念头。她向臣子们表示，自己绝不会做出违背英国利益的事情：“我是父亲与母亲身上纯正英国血统的后裔，绝不是西班牙人，我和我的姐姐不一样。”她如是说。然而直截了当地拒绝菲利普国王，不能算是考虑周到的策略，因为英国依然需要与西班牙友好，尤其是在英法还未取得和平之前。因此在这之前，斐利公爵还是能幻想得到更好的答案。

3 鸡毛蒜皮的争端

从伊丽莎白女王青少年时期开始，便因接受剑桥改革运动分子的教导，而深受其信仰与教条的影响，但尽管她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而且信仰新教，她自己本身却不具改革思想；她喜欢的只有唱诗班那传统的宗教仪式、辉煌的赞美诗与圣歌，同时神学作品对智能带来的满足感，也让她深受吸引。她非常了解神学，她在一五六六年向国会宣达：“直到我登基前，我都在钻研神学。”再者，在那人们可能因信仰而遭到焚烧的年代，她却有着相当开明的见解。“耶稣基督只有一个，”她向一位法国大使迈斯公爵安德烈·赫洛特-加龙省（André Hurault, Sieur de Maisse）表示，“其他的问题都无关紧要。”

她与姐姐玛丽女王不同，她并非宗教狂热分子，无论天主教或新教，她都讨厌他人对宗教盲信的狂热，她也没什么时间去听主教们的意见或鄙视那些强硬派的新教神学家彼此称呼对方“基督信仰的兄弟们”。她也不会让主教的职位空闲下来，以维持王国的岁收。

对她来说，针对神学研究与神性的争辩，根本毫无意义。一五九〇年时，她曾在国会的演说中这样表示：“有很多人对神的态度十分鲁莽，过于探究他赐予的福，仿佛是精明的律师在探究证据般。若我无法确定自己走的正是神指引的道路，神定将阻止我继续存在与领导诸位。”在登基后不久，她偷偷告诉斐利公爵，她的信仰与天主教徒“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她也相信在圣餐礼中得见上帝圣体，而且她只对弥撒中的三四项仪式持有异议”。但她说这句话时，英国

急需西班牙的支持。她也非常懂得如何诋毁旧有信仰，一五七七年时，她曾在封写给德国新教徒的信中提及“黑暗又肮脏的天主教会”。

当她听闻西班牙菲利普国王在西属尼德兰迫害新教徒时，她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询问他，如果臣民自己决定走向恶魔之道，为什么他要干涉那么多。此举震惊了菲利普国王的一位大使，因为他曾私自轻率地表示，伊丽莎白女王希望自己能受到被英国人称为教皇的罗马天主教的救赎。在后来的任期中，伊丽莎白女王因为喜欢神学辩论的感觉，而拒绝让疑似为无神论者的华德·莱礼爵士接受调查。

因为这些态度，许多人便指控她毫无信仰。一名西班牙大使夸德拉（de Quadra）观察道：“新教徒让她感到不舒服，另一边，天主教的教义也是，因此许多人开始质疑她可能为无神论者。”但她时时阅读《圣经》，而她生命告终时则说：“在我执政前，已将最后的审判放在心上，因为最终我也要接受更高审判。”对圣餐变体的观点，在这段有点蹩脚的诗句中算是表达了出来，而这段诗句最先则是收录在一六四三年理查德·贝克（Richard Baker）的编年史中：

基督真理字字珠玑

他将面包配给

他的每一言每一句

都是我信奉与谨记的真理

她同时也相信神圣的天命在背后操弄，导引、眷顾着她与她的王国。一五八〇年代，英国面临西班牙的强大威胁时，伊丽莎白女王向法国大使费奈隆表示：“我想最糟的状况就是，神仍未决定英国是否该终止其命运，但至少神也还没赐予他人权力，让那些野心勃勃的男人来终结英国的气数。”

布道会——是新教教会日常早会中最主要的一环——是她最恐惧的事情之一，牧师每每超过一小时的长篇大论，总让她头痛不已。对于在讲道坛上想要跟她说教的人，她更是缺乏耐心，每天她都坐在皇家专属小房间的格子窗旁，窗户或开或关但看女王心情。“照稿演讲，司祭先生！照稿演讲！”有时她会大吼大叫，或是会向布道的人传达讯息，警告他们打消念头，别讲述容易引起女王反感的主题。一五六五年时，圣保罗大教堂司祭诺威尔（Dr. Norwell），抨击了一份写给女王的天主教小册子，同时对偶像崇拜——耶稣受难像——一事口出狂言，而伊丽莎白女王一向坚持要将耶稣受难像收藏在皇室礼拜堂中。

“不要说这个！”女王怒气冲冲地打断他，但司祭先生却故意忽视她。“别再说了！”女王再度大声斥责。“这和你要讲的主题无关，而且这根本是陈腔滥调。”

另一位讲道者约翰·艾尔墨主教（Bishop Aylmer），反对“将遗体装饰得太过精致”，女王也强烈地要求他换个布道主题。“也许，”女王的教子约翰·哈林顿爵士对此表示：“主教显然很不了解女王的个性，要不然他绝对不会选这个主题。”

一五九六年时，伊丽莎白女王年届六十三岁，这在都铎王朝时期被视为大厄年的开始，许多人都无法活过那个年纪，坎特伯雷大主教告诉陆德主教：“女王陛下年轻时对才智与雄辩的迷恋已然不再，可以打动她的心的一般布道，让她感到最开心。”陆德主教因而选择布道的主题：“神教导我们如何计算时间，让我们的心有智慧能依靠。”接着他继续提及许多重要神圣的数字，包括“3”代表三位一体，“7”代表安息日，而“7”乘以“9”就是大厄年，六十三岁。此时，女王开始皱起了眉头。陆德主教慌了手脚赶快转向启示数字“666”，“他能以此证明教皇反对基督”。当他结束布道演说时，伊

伊丽莎白女王倾身探出皇室专属的小房间，恶狠狠地叫他不要乱打如意算盘。“现在我知道了，”她甚至说，“最棒的神职人员都不是最聪明的人。”

“伊丽莎白女王，”英王詹姆士一世时期任格洛斯特主教的葛菲·古曼（Godfrey Goodman, Bishop of Gloucester）回忆道，坚持着“她宁愿自己与神沟通，也不想听别人谈论神的事情。除了四旬期外，她很少听布道会”。来到宫廷中进行布道演讲的人，都收到指示将演说时间缩到最短，布道题目也得从主教认可的主题中选出。约翰·哈林顿爵士就记得，伊丽莎白女王可以在布道会中神游四方。她曾经在一位神职人员说了一些可能冒犯她的话后，还向他道祝贺，显然她是完全没有专心聆听。

但伊丽莎白女王对布道会的厌恶，还有更有力的原因：布道会让男人有机会大放厥词，在当时的宗教气氛之下，这些话只会带来争端，导致社会不安。有一群极端主义的新教徒，后来被称为清教徒，女王打从心底不喜欢他们，原因不只是他们对宗教的狂热，还包括他们坚持要由牧师进行布道。对于女王反对清教主义，多数的臣子都额手称庆，尤其是在一五八五年时，伊丽莎白女王撤销了一个反对周日举办任何体育会和娱乐活动的清教法案。女王认为在每周唯一休息的一天，她的子民有权用任何他们喜欢的方式度过，不用受扫兴的人或事物干扰。她也拒绝同意一项——也是来自清教徒的——建议，将异端邪说、通奸行为和亵渎上帝都立为犯罪项目。她认为这些是道德，非法律范畴。

她对清教徒的抵抗，最有名的事件可能是在艺术领域。许多城市尤其是伦敦的清教权威人士，都非常讨厌博物馆，同时煞费苦心地想要禁止民众观赏戏剧，因为这些都会占去人们上教堂的时间。但女王站在戏剧爱好者那一边：因为她也讨厌布道会。一五七五年，当女王

发现，在柯芬特里，著名的四大《圣经》连环剧遭到清教当权者禁止演出，她随即下令恢复。伦敦的清教徒则开始抱怨，市区中爱上戏院的人就是每年夏天导致黑死病传染和大流行的病源。一五八三年时，伦敦市政当局关闭了萨里岸边的剧院，但伊丽莎白女王回敬一招，组织了自己的剧团，也就是著名的女王剧团。最后市政当局只好让步，但到了一五九七年时，市政当局终于成功说服枢密院同意关闭剧院，他们的理由是，这些剧院是反政府思想酝酿的温床。伊丽莎白女王听闻此事感到十分气愤，枢密院只好仓促地撤回成令。后来直到伊丽莎白女王逝世前，都不再有其他反剧院的行动出现。

伊丽莎白女王特别讨厌已婚神职人员，尤其是主教与大主教。她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承认其妻子的存在，而且她多次以不礼貌的态度对待马修·帕克大主教（Archbishop Matthew Parker）的妻子，让大受惊吓的主教“连听闻女王名讳都胆战心惊”。一五六一年时，他写信告诉塞西尔：“女王陛下对神职人员的婚姻，依然抱持鄙夷的态度，若非我当时十分坚强（他自认如此），可能会完全公开地遭受责难与禁止。”伊丽莎白女王要求那年纪约在七十到九十岁的伊利主教（Bishop of Ely）上枢密院解释自己为什么续弦娶了年轻女子。他的解释是，他再婚只是为了避免受到诱惑犯了通奸罪，但这样的答案也无法说服女王，而许多臣民也抱持与她相同的看法。

玛丽女王当年废除了父亲亨利八世的国王至高权法案，随后当伊丽莎白女王继位时，英国基本上依然是个在教皇管辖下的天主教国家。但多数人都认为，最高权威法案应该会透过国会恢复，就像许多人期待新教的宗教地位可能会有所改变。自从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后，就针对重要的宗教议题做出许多暗示，而这些暗示让许多人相信，英国将会再度脱离天主教会。至于伊丽莎白女王的考虑，则在于英国的教会只能有一个领导人，这个人一定要是国家领导人。她自认受到神

性的召唤，“要为神的荣耀，让英国王权底下的人民得到宗教上统一的秩序，建立新的教会和国家的稳定”。

她最主要的考虑，在于希望大众的礼拜仪式都能遵照正确的方式，并且使用英文，而且她也坚持——主要是因为对更严格的新教臣子感到反感——维持部分天主教仪式。在她专属的小礼拜堂中，她留有蜡烛与耶稣受难像等物品，坚持神职人员戴着帽子、穿着斗篷式长袍与斜襟衣；不过她摒弃了许多更复杂的仪式与习俗，这些都贬抑了天主教，包括相信神迹、特赦权，以及对圣母玛利亚的尊敬。因为讨厌强烈气味，因此她憎恶教堂中的焚香，并且下达禁令。然而清教徒依然时常抱怨她对宗教的态度。

尽管对圣徒的礼拜背离新教理念，但伊丽莎白女王鼓励民众对圣乔治（St. George）的膜拜，当时圣乔治被视为英国的国家象征，同时也是嘉德勋位的守护神。女王也没有禁止濯足仪式，女性宫廷画家利瓦伊娜·提尔林克（Levina Teerlinc）一幅精细的微型画，就记录下女王在登基之初便参与了濯足仪式。伊丽莎白女王也恢复了触摸皮肤肿瘤患者的传统，也就是所谓的“国王的触摸”（the King's Evil）。在中世纪时，这个仪式她的先祖们已经执行了有三世纪之久。她非常看重自己在这个仪式中几近神秘的地位，下定决心将手放在患者身上的患部，希望能达到治疗的效用。她严格限制自己上礼拜堂的次数，大约是每周日一次，以及在四旬大斋期，每次上教堂她一定穿黑色的衣服。

尽管在她的任期中，严重压迫了天主教，但伊丽莎白女王其实一点也不讨厌天主教，她甚至欢迎拒绝服从她的贵族进入宫廷，有时还会到他们家中拜访；她也会雇用天主教徒，包括作曲家威廉·伯德都住在宫廷中。若天主教徒展现对她的忠诚，必定会让她欣喜不已，这样的场景当然也时常出现。一次出巡时，一名男子上前大喊：“女王

万岁！心怀邪念者蒙羞！”女王只是转身朝着也在场的西班牙使者，告诉他：“这个好人定是旧宗教神职人员。”又有一次，在她一五六四年拜访剑桥大学时，看到一群大学生演出了奚落天主教弥撒的一出假面剧；其中一个角色打扮得像条狗，出场时还将圣体衔在口中，伊丽莎白女王见此起身拂袖而去，“并用强烈的言语响应”。后来许多清教徒总是费尽心机地指控她站在天主教徒那一边，对新教的忠诚度不如这些清教徒。

其实伊丽莎白女王任内对天主教压迫的恶名，都是来自政治上的需求，而非宗教狂热的问题，在后面的章节将有更详尽的剖析。遭到处决的教士，几乎都是犯下了违反国家利益，可能严重侵害国家的情事。当年玛丽女王曾在三年内下令焚烧三百多位新教徒；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年代，遭到处决的天主教徒远低于这个数字，在伊丽莎白女王长达四十五年的任期中，仅仅只有四位再洗礼派教徒被处以火刑。和多数的臣民一样，伊丽莎白女王对西班牙宗教法庭大举对异教徒施以火刑的消息感到惊惧和烦恶。当时她的考虑在于，一个人的良心在于个人。根据弗朗西斯·贝肯爵士所述，女王笃信的箴言为“人的良知无法强迫”，而她“也不想无谓地探究他人对旧宗教的情感”。“女王陛下，”他如此写道，“一点也不想窥探他人的内心与任何秘密思想”。她想要的只有臣民的忠诚度、国家，以及对她执政之下的主要宗教达到外表的顺从。

* * *

国会的议事程序，现在准备要通过许多法令的初版了。一五五九年二月九日这一天，恢复英国国教中国王至高权的一项法案，进入了下议院的议事堂，但这项法案在许多方面都有缺失，经过了多次辩论后，法案仍然流产。

在罗马方面，于二月十六日这天，教皇保罗四世（Pope Paul IV）公布了一份教皇诏书，宣告若有支持异端教义之情事，便可能遭废除王位的命运。此令一出，合理化了天主教强权国家圣战出兵英格兰，也让英国对法国可能企图以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进逼王位的恐惧更甚，同时也测试了伊丽莎白女王麾下天主教臣民的忠诚度。

当时，伊丽莎白女王坚持中间路线。新教信仰成为英国既定的宗教，同时她打着谨慎、和解与温和的旗帜。为了不冒犯欧洲的天主教盟国，他们必须行事小心，当然也绝对不能采取激进手段。当新教主教们拒绝明定神职人员必须独身，在教堂中摆上有耶稣像的十字架、一般十字架和蜡烛时，女王本身也不得不让步妥协。至于温和的路线，碰上天主教的主教因反对新观念而被送往伦敦塔时，也再度打了折扣。此时，全国信仰陷入了一片混乱，天主教与新仪式同时存在于教会中。

部分主教与议员开始质疑，女人怎么能成为英国国教最高首领，圣保罗便曾提及女性绝对不可能成为使徒、牧师、导师或传教士。最后伊丽莎白女王同意以最高总督称号取而代之。三月十八日这天，英国下议院通过了国王至高权修正法案。隔一周，伊丽莎白女王下达命令，明确规定此后的圣餐礼，应该以爱德华六世时生效的公祷书为准。

* * *

同时，伊丽莎白女王也一直在思考，该如何响应菲利普国王的提亲。她已经向斐利公爵推诿了一个月，告诉他“应该不想得到不想要的答案吧？”但斐利公爵一开始的乐观开始逐日退却，他已经发现女王身边的新教顾问们，都尽可能地劝阻女王不要接受菲利普国王的求婚。

不过在伊丽莎白女王眼下，还有菲利普国王的竞争敌手，只是斐利公爵不知道罢了。二月二十日这天赫尔芬斯坦伯爵（Count von Helfenstein）从奥地利来访，他是菲利普国王的叔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德一世（Ferdinand I）派来的使者。伯爵的任务表面上是要为伊丽莎白女王继位一事道贺，但骨子里却是为了查探她是否有资格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位的妻子。

二月二十五日这天，伊丽莎白女王以非常亲切的态度接见了赫尔芬斯坦伯爵，他很快就为伊丽莎白女王的魅力迷倒。因此在给主公的信中，他心醉神迷地谈起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精明、威严、智能和“其他英勇事迹”。不久后，他便与女王及她的臣子们提起了奥地利的两位大公，费迪南德二世（Ferdinand II）与查尔斯（Charles）。“当我提及皇帝陛下两位儿子的年龄、品行与天赋时，在场的所有人，无一不竖起耳朵，用崇拜的态度并安静下来仔细聆听，好像想从我身上了解得更仔细详尽一般。他们可能认为，您的其中一位儿子，很快将成为女王陛下的配偶，能够管她，也统治整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尖锐地问赫尔芬斯坦伯爵，是否有事情想要私下报告，但他却含糊带过。英国的臣子们也许并不知道菲利普国王提亲的事，这件事当时还是个秘密，而他还是正式提了亲，但他下令，除非事情有了眉目，不然不要有进一步的动作。

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只要求赫尔芬斯坦伯爵一定要回报一件事情，那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宗教信仰。年龄较长的大公费迪南德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就算弟弟查尔斯对宗教的热诚度较低，他也绝对没有任何异教倾向。赫尔芬斯坦伯爵仔细观察了伊丽莎白女王，且小心翼翼地向她的臣子探询，接着向主公回报：“就我的观察，我并没有发现任何与传统天主教信仰脱轨的行为，因此若英国出现天主教君主，所有宗教上的疑虑便可望透过君令轻松解决。”然而他并没有完全被宫廷外表展现的宗教气氛说服，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在宗教议题上

的态度，实在是“高深莫测”。“她似乎一方面保护着天主教信仰，但同时又没有完全谴责，或于外在表现出拒绝宗教改革的倾向。”因此他决定再等一阵子观察是否会有新的迹象。

到了三月十四日，当英国的宗教问题即将稳定，同时英法的和平协议也将拍板定案时，伊丽莎白女王私下召见了斐利公爵，同时表达自己“身为异教徒，无法与菲利普国王陛下成婚”。最重要的是，她也完全不想结婚。她希望英国与西班牙间的友邦关系，能和缔结姻亲带来一样的益处。当斐利公爵询问她如何做此决定时，她开始变得“心烦意乱且激动异常”，最后斐利公爵只好不断保证，无论是他自己还是菲利普国王，都没有将她视为异端。他也告诉伊丽莎白女王，他们都不敢相信她会批准国会辩论的法案。

伊丽莎白女王则声明，自己是新教徒，没有任何事情能改变她的观点。

“我的主公也不会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斐利公爵则高傲地回答。

“那他当然也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这么做了。”伊丽莎白女王随即反驳。

斐利公爵也私底下揣测，伊丽莎白女王拒绝菲利普国王背后真正的原因。他一直不断地明察暗访，最后终于得到结论，于是他向主公回报：“她无法传宗接代。”在斐利公爵的信件中曾提及神秘的事项，关于菲利普国王没有娶伊丽莎白女王“背后的秘辛”，可能就是来自斐利公爵的揣测。如果这是真的，菲利普国王确实知道伊丽莎白女王无法生育，他为什么要不断地为伊丽莎白女王寻找哈布斯堡王朝中适合的人选，并且一再提及王位继承人一事呢？也许太过依赖立场

时常偏颇的大使报告并不是件聪明的事情，许多大使的报告都以宫廷八卦为主。

当菲利普国王知道伊丽莎白女王的决定后，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他还是提笔写信表达遗憾，表示虽然他非常希望能与伊丽莎白女王成亲，但“良好的邦谊自然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然而，西班牙与法国间也正朝和平之路前进，三月都还没有结束，菲利普国王便急匆匆地宣布将与亨利二世的女儿华洛亚公主伊莉莎白成婚。当伊丽莎白女王听到这个消息，她欣然接受了这件事，她发出了“一声近似笑声的叹息”。她掩饰了与菲利普国王无法成亲的原因，归咎于她没有给个答案，甚至假装愠怒，因为菲利普国王并没有准备好，给她三四个月的时间考虑；她宣布菲利普国王对她的爱，绝对不如斐利公爵所要她相信的那么深刻。而大使斐利公爵则本能地感觉到，伊丽莎白女王是在嘲笑菲利普国王。她保留了面子，菲利普国王订婚的消息让她十分开心，这代表他会维持与英国的邦谊。接着斐利公爵很快地向她保证，他的主公生怕伊丽莎白女王觉得受到轻蔑而焦虑不已，因此就算西班牙与法国建立邦谊，他仍将会“继续作为一个好的兄长，对于她的疑虑给予大量关注，将她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情来看待”。同时，“未来在她的婚姻大事上也会给予协助”。

自此，伊丽莎白女王与斐利公爵的关系便陷入紧张，这可能都是因为她变幻莫测，戏弄或误导他的倾向和喜欢玩外交游戏所致。“简言之，”他绝望地执笔写信给菲利普国王，“我只能向国王陛下回报，这个国家在经历三十年您所知悉的统治现况后，落到恶魔的女儿手中，她是这块土地上最大的恶棍与异端。”斐利公爵于三月收到召唤他回国的消息，感到十分轻松。接替他职位的，将是处世经验老到的一位牧师，拉奎拉主教夸德拉（Alvaro de Quadra），是年三月三

十日，主教抵达伦敦，而斐利公爵则继续以大使之名在英国待到五月。

然而菲利普仍然坚信，伊丽莎白女王与英国，自当回归天主教怀抱，最好可以嫁入哈布斯堡王朝。他已经了解神圣罗马帝国的居心，于是决心撮合伊丽莎白女王与其中一位大公。

四月十一日，他给了斐利公爵一张联络便条，条列出两国联姻的益处，并指示斐利公爵向伊丽莎白女王提出此紧急请求。他表示两位大公都没有自己的公国，因此都能够自由地前往英国并永久居住。两个人都非常适合协助她承担政府运作的责重大任，同时英国还能与哈布斯堡王朝维持良好联系，还有其强权在背后撑腰。因此与哈布斯堡王朝联姻，无论在欧洲或英国臣民眼中，都将能提升她的威望，再也没有人敢起而对抗她。当然这一切的代价，就是要伊丽莎白女王改信天主教，并且放弃自由。

* * *

到了四月初，在菲利普国王与华洛亚公主伊莉莎白大婚后，随着《卡托坎布雷斯和约》的签署，英法与西法之间确定走入和平。根据和约内容，加莱港未来八年将属法国，伊丽莎白女王认为，在那之后，甚至更快就可能夺回加莱港，毕竟这是她的梦想之一，她也以此不断地欺骗自己。政治上，她的根基已更稳固，也更有信心能向欧洲其他国家宣布，英国是一个新教国家。

复活节时，伊丽莎白女王与上议院全体议员研商新法，最后终于与恪守教规的改革人士达成共识。伊丽莎白女王将享有英国国教最高总督称号，仪式统一法则则以一五五二年爱德华六世时生效的公祷书为准。弥撒在法律上失效，所有仪式都需以英文进行。圣餐变体遭到否决；领受圣餐者“只要在心中有信念，便可领受（耶稣的）福

音”。教堂中的装饰品与祭袍将由女王决定。只要超过十六岁的臣民，每周日都必须上教堂，否则将罚锾十二便士。而这些罚锾自然主要是来自不愿服从的天主教徒，否则他们可能会受到骚扰。事实上，在英国部分地区，许多人因为参与弥撒而遭受相当大的骚扰。

四月二十三日，伊丽莎白女王从忙碌的协商行程中抽出空档，与潘布鲁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在布莱尔附近的河畔宅邸贝纳德城堡共进大餐，

餐后女王登上小船航行在泰晤士河上；数百艘船只与拖船经过她的身边，数千人蜂拥而至，来到河岸边争睹女王陛下的风采，女王一路航行，伴随着号角声响起、鼓声响彻云霄、笛子的声音清脆、鸣枪声不绝，爆竹直冲天际，一直到夜间十点女王返回宫中歇息为止。因为这样，女王向人民展现出了不受拘束的优越感，人民自然觉得女王可亲，也接受了女王。

一五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至高权及统一权法案终于通过，五月八日也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批准，新教也成为英国官方钦定的宗教，当时建立的一连串仪式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天主教徒与加尔文教徒都希望法令在很多方面能更进一步，他们就能大加挾伐，但女王决心走中间路线，而她的许多臣子也都如此希望。虽然这项法令触犯了少数激进派和直言不讳的人，一五五九年圣公会的新法却非常成功，给那充满宗教暴力变迁与争辩的时代，带来了一条温和稳定的路线。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这就仿佛在宗教上找到一条实事求是的道路。

新成立的英国国教会正积极寻找精神领袖：从前一年十一月便呈现权位真空状态的坎特伯雷圣座。伊丽莎白女王希望由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担任她的大主教，但帕克却不愿意接下此职务。帕克算是早期的改革派人士，曾是安·波林的教堂牧师，他认为已故的安·波林将女儿性灵的安康交付给他。在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的

年代，马修·帕克的地位逐渐累积，成为剑桥大学副座，然而到了玛丽女王的年代，他却因为结婚而被免去牧师职务。塞西尔对帕克寄予厚望，他打从心底认定帕克有带领新教会的能力。他非常坚定、具有外交手腕，而且也有温和路线的观点。也因为这样，伊丽莎白女王决定无视帕克结婚一事，赋予大主教职位。

但帕克却忧心忡忡。“我宁愿坐牢也不想接下这个职务。”他如此表示，但伊丽莎白女王与塞西尔却十分坚持。而帕克却一直等到一五五九年八月才服从命令。

* * *

此时，斐利公爵早已认定伊丽莎白女王是要下地狱的，但为了竭尽所能地拯救她与她的臣子们受到永久的诅咒毁灭，他和哈布斯堡王朝使者赫尔芬斯坦伯爵一起，希望可以促成伊丽莎白女王与哈布斯堡王朝其中一位大公的姻缘。哈布斯堡君主才刚派人将大儿子费迪南德的画像送抵伦敦使馆，斐利公爵则全力展开这一计划，决心让菲利普国王成为安排这项婚事的大恩人。

大使求见女王，希望谈论这个问题，但女王却轻巧地推拖，让大使恼怒不已。到了四月十八日，他在报告中写下：“老实说，我无法告知国王陛下这个女人想做什么，而最了解她的人，了解得都没有比我多。”

此时，神圣罗马帝国君主知悉伊丽莎白女王拒绝菲利普二世的求婚，也了解了她的异端倾向，已然决定收手，不再促成伊丽莎白女王与那虚伪又顽固的费迪南德大公成婚，而伊丽莎白女王则私底下批评费迪南德大公“还是为自己的家人祈祷就好”。神圣罗马帝国君主转而计划撮合伊丽莎白女王与他的次子查尔斯，同时表示他最适合作英国女王的丈夫。不过这之中自然也还有些风险存在，君主费迪南德一

世交代赫尔芬斯坦伯爵，若非为了政治利益考虑，他绝对不会同意让查尔斯不朽的灵魂受到一点威胁。只是他们都低估了伊丽莎白女王对执行圣公会法令的决心，当时费迪南德一世信心满满地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只要嫁给了查尔斯大公，一定就能改信天主教。

另外，因为报告的欺瞒，英国外交人员以为查尔斯大公的信仰并不非常虔诚，因而太过自信，天真地以为他只要结了婚，便会改信新教。“他和菲利普国王不同，对我们来说选他总比菲利普国王好。”

五月份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德一世派出的第二名使者，开斯帕·布鲁纳男爵（Baron Caspar Breuner）终于来到英国。五月二十六日，他正式抵达，并马上寻求西班牙大使的协助。夸德拉认定这位男爵“并非世界上最狡猾的人”。两天后，夸德拉陪着他一起首度觐见女王，当时他们发现女王正在谒见室中看舞蹈表演。“经过一番暗自祈祷后”，布鲁纳为查尔斯大公求了婚。

伊丽莎白女王面无表情。她只是静静地感谢费迪南德一世认为她配得上他的其中一个儿子，但她也提醒布鲁纳，虽然她的臣子们不断要求她成婚，“那却从不是她的心之所向，她也从来没想到嫁给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就算未来她有可能改变心意，“毕竟她也是人，对人的情感与冲动并非无感”。布鲁纳的希望破灭了，只好告诉查尔斯大公必须悉心等待，但他也补充表示，看过了英国的宫殿与英国女王的收藏后，他很确定这个女人是个“很值得的祸水”。

夸德拉也找了个机会与塞西尔讨论奥地利方面的婚姻计划，却发现就连国务大臣都对此意兴阑珊。大使只好求见女王并采取孤注一掷的做法，他暗示伊丽莎白女王，查尔斯大公会考虑离开天主教会。伊丽莎白女王脑中似乎闪过动摇的念头，但“随即又开始顾左右而言他，表示自己宁愿当修女也不愿结婚，这跟谁都没有关系，当然也是为了画面好看”。她如此告诉夸德拉，她听说查尔斯大公的头不合比

例地大，而她并不想冒险嫁给有残疾的丈夫。本来夸德拉想要针对这个部分澄清，但“浪费了这么多话语后”她宣布，除非是“嫁给她看过也说过话，而且觉得值得的男人”，要不然绝对不婚。

这一点，她狡猾地要求查尔斯来到英国接受检验，便问夸德拉是否认为查尔斯大公会答应。夸德拉表示查尔斯大公为了爱可能奔走天涯，但他无法确定费迪南德一世愿不愿意同意儿子出行。当然，他比较倾向拒绝，因为倘若将来伊丽莎白女王拒绝了查尔斯大公，这会是个公开的羞辱。在欧洲皇室拘束、规矩繁多的状况下，伊丽莎白女王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特殊。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开玩笑，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夸德拉告诉菲利普国王，“但我相信她愿意深入详谈安排这个行程。”费迪南德一世当然拒绝了这个提议，毕竟这是件有失尊严又与欧洲宫廷习性相悖的做法。而查尔斯大公本身也认为，除非与伊丽莎白女王的婚期确定，否则他并不想前往英国。

布鲁纳在完成任务后，退出火线等待回应。五月二十九日，奥地利方面的求婚提交枢密院资深成员决议，伊丽莎白女王则矢言留意他们的建议，唯一的先决条件就是“她必须要先看过并认识这个要成为她丈夫的男人”，才能决定要不要答应。然而在之后与布鲁纳的会面中，她都保持坚定不移的态度，坚持自己现在绝不结婚。只有无所不能的上天可能在未来改变她的心意。她希望神圣罗马帝国君主费迪南德一世能尊重她的诚实。

布鲁纳绝望之余，表示此举可能因此触发主公的怒气，毕竟当初赫尔芬斯坦伯爵受到热情对待，但伊丽莎白女王只说费迪南德一世实在太过急躁，因此她会亲自写信过去好好解释，而布鲁纳也可以尽情地待在英国。男爵将此视为一种鼓励，因此在接下来的两次会面中，他不断设法想要说服伊丽莎白女王告诉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促成

这段良缘”。如果没有，他会尽快回到维也纳。伊丽莎白女王因此勃然大怒，表示虽然自己礼貌上要他留下来，但他也该表现出该有的样子。接下来几天，伊丽莎白女王都非常注意开斯帕·布鲁纳男爵，施展她惊人的谄媚与魅力。但她完全闭口不谈大公的求婚，同时也宣布自己已经发誓，绝不嫁给没见过的人，“当然也绝不相信宫廷画家的画笔”。她清楚记得，当菲利普国王第一次见到玛丽女王时，深深地诅咒了宫廷画家与西班牙使者；而她，伊丽莎白一世，绝对不会让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公有机会这样诅咒。

布鲁纳最大的忧虑，在于担心伊丽莎白女王接受别人的求婚。瑞典埃里克王子在玛丽女王时期便向她求婚了，但因为犯了一个丢脸的错误，要求女王在登基之前一定要给这桩婚姻一个答案，四月初他再度发动追求攻势。伊丽莎白女王以王者傲慢的态度，坚持要埃里克王子在她登基后再度求婚，因此他不得不这么做，甚至送来美丽的绣帷与貂皮作为礼物。五月六日，布鲁纳担心地写下：“瑞典方面带来年轻国王的画像，据此展示给女王看，听说女王给予高度评价。”和哈布斯堡大公不一样，埃里克王子常常写信向伊丽莎白女王表达强烈爱意，女王也开心不已。但女王非常坦白地表示，只有埃里克王子离开他的国家她才愿意嫁给他，毕竟她绝对不可能离开她的国家。但对两人来说，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国家，五月份，瑞典特使已经在英国逗留太久，成了英国宫廷中的笑柄，伊丽莎白女王便拒绝了埃里克王子。后来便再也没有埃里克王子的音讯了。

让布鲁纳更加担忧的，是萨克森与阿道弗斯公爵（Duke of Saxony and Adolphus）、荷斯坦公爵（Duke of Holstein），都同时派遣使者来英国向女王求婚；面对这些追求者，女王都尽量以和缓的态度，在协商过程中礼貌地回绝。

当然也有英国国内的其他追求者，希望获得她的青睐。五月份，两位追求者浮出台面。

第一位追求者，在姐姐玛丽女王在位期间，早就对她表示过爱意——这也让她感到欢欣不已，那就是第十二代阿伦德尔伯爵亨利·菲查伦（Henry Fitzalan），当时他年纪约四十七岁，他是位鳏夫，有一个女儿，他长相不好看，没有壮硕的体格，也没什么礼貌，无法帮他加分。他是一个“轻浮古怪的人，没什么能力，又笨又粗俗”，自以为配得上女王，实在是太有自信了。他只是有钱——住在由女王出租给他，亨利八世位于萨里的无双宫——他的家族血脉可以追溯到诺曼征服战争时期，但财富与家族背景都无法弥补他粗野又愚笨的事实。伊丽莎白女王也未认真搭理他的追求；女王只把他当成小丑，但她将这样的情绪隐藏得很好，用对待其他追求者的态度对待他。

其他的追求女王的人选都是温文尔雅的外交人员，威廉·彼格林爵士（Sir William Pickering）年纪比阿伦德尔伯爵亨利·菲查伦小了五岁，这年五月，他刚结束外交派驻工作返国。前一年十二月起，宫中便有八卦流言指出他与伊丽莎白女王过从甚密。彼格林爵士是亨利七世时期宫内司法官之子，他曾是剑桥大学大师约翰·契克（John Cheke）门下弟子，亨利八世时期，他的声望越来越高。他一直都是忠心耿耿的皇室支持者，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他一直保持与伊丽莎白公主的友好关系，只是在一五五四年时，他因为遭到指控涉入好友托马斯·怀俄特爵士（Sir Thomas Wyatt）的谋反计划，因而被迫出逃。后来他再度受到玛丽女王的重用，派驻意大利与法国宫廷进行外交任务。伊丽莎白女王登基时，他因为身染重病而无法返国，他在耶稣升天日一抵达英国时，马上就受到女王私下召见——这可是莫大的荣幸——两人会面的时间长达四五个小时。宫中出现流言认为女王可能下嫁威廉·彼格林爵士，许多人更指出，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廷臣中，大概只有他配得上女王。隔天，女王又花了五小时的时间与他促

膝长谈，并将他安顿在格林尼治宫的房间中。这是女王面对老朋友，表达经过这么多年很高兴重逢的方法。

彼格林“身材高挑又帅气”，充满男子气概，相貌堂堂，尽管许多女人都无法抵挡他的魅力，他却从未有过婚姻。曾有八卦传闻指出他有一位私生女，他为这个继承人取名为赫丝特（Hester）。他曾买下前基督教会房地产，并在伦敦的圣安德鲁丘拥有一间豪宅，里面有一间庞大的图书馆，让女王又羡慕又妒。尽管非系出名门，他在宫廷与伦敦各地依然十分受欢迎，他私心希望他的个人魅力，能吸引女王与他成婚。他在同侪之中，自然是最有看头的人选，他也深信，女王非常有可能接纳他成为配偶。

彼格林始终未从女王处得到更多的鼓励，而女王也似乎从未认真考虑嫁给彼格林，但是议会议员与廷臣们却开始努力想获得威廉·彼格林爵士的青睐。突然间如此受到看中让彼格林冲昏了头。他开始大洒银弹，为未来成为国王的生活做准备：为了增添自己的光彩，他砸下大钱买了许多奢华的衣物，常常观看娱乐节目，就算没有客人也要大鱼大肉，上菜的同时也要有音乐伴奏——仿佛自己真是皇室成员。而他这样的行为更激起许多人的兴奋之情，伦敦的赌博业者甚至开出二十五比一百的赔率，赌他将成为未来的英国国王。尽管如此，彼格林在公开场合依然坚持女王绝对不会嫁人，但这可能只是用得体的外表来掩饰他私底下的希冀与野心。斐利公爵在最后一次派驻英国的任务中评论道：“这件事如果并不重要，也并不可悲，那这些人可能是疯了。”

为了不想出局，阿伦德尔伯爵也开始在宫廷里说大话，送给伊丽莎白女王的侍女价值达六百英镑的昂贵珠宝，希望侍女们在女主人面前帮他说点好话。尽管阿伦德尔伯爵常常这么做，但就连紧张兮兮的

布鲁纳男爵看在眼里都认为他威胁不了查尔斯大公的机会。阿伦德尔伯爵只是“怀抱着不可能的希冀”而已。

当然，部分上了年纪的贵族人士十分讨厌彼格林的装腔作势，而只要有任何贬低彼格林的机会，都会让阿伦德尔伯爵高兴不已。有一天，威廉·彼格林爵士正要大摇大摆地穿过女王寝宫的密室，前往皇家礼拜堂时，阿伦德尔伯爵挡住了他的去路，同时表明彼格林的阶级太低，不应该出现在那里：他只不过是一届小小骑士，最多只能到谒见室。彼格林表示自己知道得可多了，就像他知道阿伦德尔伯爵是个“厚颜无耻又粗鲁的无赖”。因此阿伦德尔伯爵表示要决斗以分胜负，但彼格林拒绝应战，同时指出阿伦德尔伯爵的能力不及。在这之后，盛怒中的阿伦德尔伯爵便断言，若伊丽莎白女王与彼格林结婚，他就要卖掉所有的财产移居海外。

一五五九年的春天，全国上下都专注在阿伦德尔伯爵与威廉·彼格林爵士的身上。但第三位追求者悄悄地浮上了台面，相较之下，这个人更有希望赢得女王芳心，而且他说不定就是女王曾经爱慕的对象。

这个人就是罗伯特·达德利。

4 潇洒甜美的罗宾

伊丽莎白女王对罗伯特·达德利感情的相关证据出现在一五五九年四月十八日斐利公爵写给菲利普国王的急件中。他在信中写道：

这是我在英国的最后几天。罗伯特·达德利十分讨女王欢心，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甚至有传言指出女王陛下日日夜夜都到他房里报到。这样的传言四处流传到很夸张的地步，甚至有人说达德利夫人的乳房生了病，伊丽莎白女王正在等她去世好嫁给罗伯特·达德利。我向国王陛下保证，这件事已经到了非常紧急的地步，让我不得不考虑是否该以陛下之名，要求见罗伯特·达德利，向他表达陛下的协助与善意，并与他达成协议。

最重要的是，让罗伯特·达德利看见英格兰与西班牙持续友好背后的优点。

其他人当然也发现了伊丽莎白女王与骑士统领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八卦流言很快传进了欧洲皇室的耳中。于菲利普二世时期派驻哈布斯堡宫廷的威尼斯大使保罗·提埃波罗（Paolo Tiepolo），曾向道奇宫与元老院回报：“从很多层面来说，罗伯特·达德利对许多人而言，都是非常俊俏的年轻男子，女王当然也无法抵挡他的魅力与对她的爱意，许多人都相信，只要罗伯特·达德利的夫人——毕竟她已经病了一段时间——过世了，女王很快就会接纳他成为她的丈夫。”

五月十日，伊尔·施凡诺亚大使观察到，“罗伯特·达德利十分受到女王陛下的喜爱，和女王陛下也很亲密。这次我要报告的是许多

人的看法，但我很怕我的信件无法送达，或是您无法看到，为此我要暂时保持缄默，也不要乱说话。”显然伊丽莎白女王与罗伯特·达德利之间的情愫，已经引燃最下流的传闻火花，但这也不令人意外，毕竟罗伯特·达德利已婚。许多人出言中伤，表示伊丽莎白女王特别偏爱罗伯特·达德利，而最看不起他们的则是威廉·塞西尔，因为罗伯特·达德利严重威胁了他的权力。然而，女王已经开始与罗伯特·达德利商讨国家大事，甚至还有不少证据指出，他在先前的宗教法规背后，支持女王对抗各级主教。在女王执政的前几年，拔擢了超过二十七位神职人员，这显然和罗伯特·达德利脱不了关系。

当然，斐利公爵仍抱着一丝希望，盼望哈布斯堡王朝能与英国联姻成功，但他也承认，与伊丽莎白女王协商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女王陛下的想法变幻莫测。“就我而言，我认为她永远没办法决定，到底什么对她最好。有时候她似乎愿意嫁（给大公）了，说话的态度，就像个等待白马王子的女孩，但又有人传说她爱上了罗伯特·达德利，永远也不会让他离开她。”斐利公爵认为，罗伯特·达德利对哈布斯堡王朝联姻协商造成的威胁，比阿伦·德尔伯爵亨利菲查伦和威廉·彼格林爵士都要大。不过这两人到现在都还没出局，伊丽莎白女王时不时与他们打情骂俏；她甚至安排在达德利远行到温莎打猎的期间，马上与彼格林会面。

因为达德利的职务需求，天天都能见到女王，两人之间的情愫也颇有机会悄悄滋长。他们两人都很喜欢打猎，因此常一同骑马外出。他温文儒雅、才智过人、魅力十足又很迷人，是很棒的配偶人选。在他的陪伴之下，伊丽莎白女王才能得到片刻喘息，他和女王拥有心灵相通的顽皮幽默感，因此非常懂得逗女王开心。同时他也非常懂得如何在开玩笑的同时，不让女王感觉受到冒犯，后来他的一位朋友表示，达德利曾说过自己对女王的了解“胜过世界上其他男人”。

当女王和他在一起时，完全不需要过于谨慎，也不用隐瞒自己对他的心意。言谈间，女王常常提起他，总是不愿错过任何称赞他的机会，包括他担任骑士统领的天分、马上比武大会与宫廷余兴节目的条理。女王会在公开场合，与他大跳活泼轻快的双人舞，“在佛罗伦萨舞曲后，以极度华美的姿态凌空跃起”，震慑所有的观众。

女王一向非常重视民众的观感，但她却不太在意他们的想法。然而她多次针对那猥琐的流言——比如“罗伯特·达德利与女王关系不单纯”——毫无根据可言，因为她身边二十四小时都有侍女与宫女陪着。宫廷规矩规定她不能独处，因此她很难有机会在不被他人发现的状况下，和达德利发生性关系。少数发展到如此极端的流言指控，都是来自心怀不轨的外国使节，他们认为拥抱异端的女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就算是天罗地网布下眼线的夸德拉大使，都找不到任何两人之间不轨的证据，因而拒绝相信这些传闻。

四月二十三日，是女王登基后的第一个圣乔治日，伊丽莎白将嘉德勋位颁赠给达德利，让他与皇室三位资深成员齐头并进，这三位皇室成员分别是达德利最主要对手诺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北安普敦侯爵（Marquess of Northampton）与拉特兰伯爵（Earl of Rutland）。此举让气氛败坏，因为这三贵族成员多年来透过为国服务证明了自己许多能力，而达德利则是暴发户兼卖国贼的子孙。他能匹配这个荣耀的唯一原因，就是长相好看与绝佳的马术。

在那不久之后，伊丽莎白女王又赐给他被称为“首府豪宅”的邱园农舍、肯特郡的诺尔公园、约克夏郡与莱斯特郡的土地，也首度赐予他许多金钱。

不久，他便开始在宫廷里分发相关的配给给他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尽管他本身在政府中并未扮演任何政治上的角色，女王依然常常向他请益。“在女王的私人密室中，”一名对手写道，“在女王陛下

身边的，几乎都是他称为手下的人；剩下的都会遭到他的否决，没有他的允许，无法越雷池一步。”伊丽莎白女王容忍着这样的状况，但却从未允许达德利忘记主仆关系；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女王让达德利的建议，凌驾于其他部长级人物做的决定之上。尽管如此，宫廷中的许多人士，依然对他的动机感到疑虑，对他与女王过于友好的关系感到怨妒不已。诺福克公爵怒骂他为暴发户，许多年纪较长的贵族人士也都同意。许多人认为达德利是个利己主义的人，假装爱慕女王完全都是认为有利可图。

但伊丽莎白女王与达德利彼此爱慕的状况，却是不容置疑。他们的爱抵挡了许多风暴，直到死亡降临。我们不能忘记达德利的信件中的真情流露，他的举止传递出的温暖，以及他对女王幸福真心的关心。面对他人，他通常表现出高傲保守的态度，但在女王的身边，两人却是情投意合。达德利一向喜欢美女，也很享受与女王之间的关系。当然，他对女王的感情，并不全然是无私的；而女王对他多少也有利用的成分。女王显然受到他外表的吸引，因为她“常以外表来决定感情因素”。女王崇拜他的勇敢、冒险精神与壮硕健美的体格。而驯服一个如此俊美的男人，让他成为囊中物，也让女王难以抗拒。对她来说，他就是完美的男人形象，他的存在振奋了她的精神；于是她宣布，每天与达德利见面，是重要的例行公事。在许多信件中，他自称为她的“眼睛”，这是她为他取的昵称，他也将这个概念融合到他的签名中，出现两个圆圈上面有两条线。

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在所有的追求者中，罗伯特·达德利有一项无可取代的优势——他无法跟她结婚。只要跟他在一起，伊丽莎白女王就可以尽情享受恋爱不婚的好处。达德利夫人艾咪安全地住在乡间——她很少来到伦敦，而丈夫罗伯特·达德利的工作让他能常常回家探望她——女王可以享受拥有男伴的好处，又不用誓言步入婚姻，牺牲自己的自由，也不用献出自己的身体。身为单身女性，她可以自

在地控制这段恋情的发展，若成为他人的妻子，她就只能服从丈夫的意志。当然，她也因此能保护自己好不容易维持的形象——童贞女王。

没有人知道在这个阶段，罗伯特·达德利是否抱着一线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迎娶伊丽莎白女王。若大使提供的情报正确，他的妻子的确患了乳房方面的疾病，他便能预见自己再度成为自由之身，有资格成为女王配偶的一日——这对一个野心勃勃的男人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但目前为止，这种互相取暖的关系似乎足矣，只要享受这种关系的好处，他若想要当下的荣景延续下去，就得更努力一点。失去了女王的宠爱，他将成为如豺狼虎豹的贵族们的俎边肉，人人都在等着他失宠。

布鲁纳男爵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对罗伯特·达德利的感情非常重要，同时认定自己有义务将此事回报给神圣罗马帝国君主。费迪南德一世十分担心会让自己的孩子娶一个有道德瑕疵的太太，于是便向大使下令，流言蜚语已经传到维也纳，必须找到事情的真相。布鲁纳男爵派出一位特务，慎重地去找伊丽莎白女王的侍女，侍女不情不愿地承认，她们的女主人“的确明显展现出对（达德利）的爱意，甚至已经超出她的形象与威严该有的程度”，但同时也声明，女王绝对“从未忘记保护自己的贞操”。

但不久后，一个难堪的意外正等着布鲁纳男爵。六月五日，在威廉·塞西尔与罗杰·阿谢姆的协助下，女王起草了一封委婉的信给神圣罗马帝国君主，拒绝了查尔斯大公的追求。她认同这场政治婚姻必然能提升她在欧洲人眼中的地位，同时也感谢费迪南德一世如此关照她，但她解释：“当我针对婚姻问题扪心自问，仔细倾听内心深处的声音时，我发现我并不想放弃独居与独身生活，因此我愿意等待神的指示，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

隔天，在温莎举办一场辉煌的仪式，达德利正式就职成为嘉德勋爵士。几乎就在此时，夸德拉大使向菲利普国王与其他人回报，伊丽莎白女王给了达德利一万两千英镑花用；但其实，这笔钱只是要用来为皇室马厩添购爱尔兰马匹。

女王对布鲁纳男爵的态度，也让他感到费解：她回绝了查尔斯大公的追求，但她还是对布鲁纳男爵很好。“尽管女王有点奇怪，但她还是愿意跟我对话。”他这样向费迪南德一世回报，同时也开始暗自希望，女王拒绝查尔斯大公一事还能有转圜余地。六月十日时，大使正徜徉在泰晤士河上，享受夏夜晚风，一艘上面载着财务大臣的皇室驳船漂了过来。女王出来透透气，她邀请布鲁纳男爵登上财务大臣的驳船；两艘驳船并进航行时，她开始为男爵演奏鲁特琴。

布鲁纳男爵陶醉不已，女王甚至邀请他隔天共进早餐——这可是难得一见的殊荣。那天晚上，他再度成为女王驳船上的嘉宾，这艘豪华驳船由八位船夫划桨，船舱中则以深红色的缎子装饰内部。船舱内吊挂着皇室徽章盾牌，驳船的地板上处处是鲜花。女王在金色的软垫上或坐或卧。这晚她的心情轻松愉快，“很健谈、很愉快”，甚至让布鲁纳男爵试着掌舵。不久后，她竟然“主动谈起了查尔斯大公”，也问了很多问题，让布鲁纳男爵认为她可能愿意接受大公成为她的伴侣。但对于结婚前一定要先见过面的要求，女王方面依然没有动摇。当布鲁纳男爵提出许多说法反对此事时，女王仍不听劝，当布鲁纳男爵想要确定女王对查尔斯大公的感觉时，女王以暴怒来逃避回答。但在那个当下，因为女王之前释放出的友谊与善意，让布鲁纳男爵平心静气地告诉女王，神圣罗马帝国君主永远不会停止与她协商婚姻大事。

* * *

不久后，女王的宫廷前往位于格林尼治泰晤士河滨的美丽宫殿，这是伊丽莎白出生的地方。七月二日，伦敦市政府在温莎大公园进行一连串军事演习，女王陛下则从一处守卫台远眺观赏，也就是现在的格林尼治皇后宅邸所在地。七月十一日，达德利主办的马上比武大会正式敲锣，同时也举办了大型野餐活动，光是供餐的大帐篷就有好多个，都是用“上好的支柱撑着顶上的白桦木，帐篷中还装饰着各式各样的鲜花，仿佛是个有玫瑰、紫罗兰、薰衣草、金盏花，并点缀着各式香料植物的花园”。英国皇室的夏日娱乐，包括了达德利为了取悦女王而办的化装舞会，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和女王几乎天天外出骑马——至此她已经开始荒废国政，就只为了与达德利在一起。

女王在格林尼治度假时，法国方面传来亨利二世逝世的消息，他在一次马上长枪比武大会中受到致命重伤。这个消息让英国宫廷一片愕然，尽管亨利二世始终企图想要让儿媳妇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坐上英国王位，但他是一个实际的人，绝对不会想要透过武力强取豪夺，破坏《卡托坎布雷斯和约》带来的和平。他的儿子弗朗西斯二世在七月十日便宣告登基。相较之下，他是一个懦弱又年轻的领导者，几乎完全受到他那邪恶的母亲王太后凯瑟琳·梅迪奇（Catherine de' Medici）及王后那有权有势的舅舅洛兰红衣主教吉斯公爵（Duke of Guise）摆布，他们都是坚定的天主教徒，也是法国的统治者。伊丽莎白女王最要小心面对的，就是吉斯公爵与王太后，他们对伊丽莎白女王充满怨妒之意。除此之外，尽管玛丽·斯图亚特的母亲玛丽·吉斯（Mary of Guise）因为信仰旧宗教的关系，在苏格兰并不受欢迎，却仍扮演苏格兰摄政王的角色，而时值苏格兰在极端加尔文主义派分子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的带领下，经历一连串极端的改革，最后走向一条严酷苦行的新教道路，在欧洲各地都难以一见。

英国政府方面忧心，尽管签署了同盟协议，法国和苏格兰仍会采取双面夹击的方式，攻击英国。而虽然法国与苏格兰近来关系陷入泥

沼，当前情势恐怕对英国也不利。法国军队持续驻扎在苏格兰，若他们在苏格兰占了上风，可能就会考虑从英国北部大举推进。然而，伊丽莎白女王的智囊们没有预料到的，是法国接下来竟会遭到天主教徒与胡格诺教徒（法国新教）间的内战撕裂，让法国毫无余裕也没有足够资源向英国兴战。苏格兰方面也不想伸出援手，因为许多苏格兰人都同情胡格诺教派，也不相信在法国主政的天主教。在此当下，伊丽莎白女王陷入不利的情势中，有充分的理由重新思考婚姻大事。若她能给予法国迎头痛击，让他们处于更大的劣势，她一定愿意去做，因此当她听到弗朗西斯二世大吹牛皮，表示自己将成为英国国王时，她站出来大声表示：“我要嫁给一个会让法国国王头痛的人物，让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她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对法国来说芒刺在背，那就是艾伦侯爵詹姆斯·汉米尔顿（James Hamilton, Earl of Arran）。最早从一五四三年起，亨利八世就曾指定将当时的伊丽莎白公主许配给他。在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怀孕生子前，艾伦侯爵都是苏格兰王位的继承人，而苏格兰的新教贵族们，都希望可以让他与伊丽莎白公主成婚，因为他们两人都是“神之信仰最重要的支持者”，政治上，两人成婚也能促进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关系。

艾伦侯爵当然很愿意按照这个计划走。直到最近，因为玛丽·斯图亚特担心他觊觎王位，他在逃离法国后，始终流亡瑞士。七月初开始，伊丽莎白女王开始协助他逃亡，她派出苏格兰事务专家兼特务托马斯·伦道夫（Thomas Randolph），并指示将艾伦侯爵伪装成商人偷渡进英国国境。很快，许多人就开始私下臆测，艾伦侯爵可能身在英格兰，夸德拉大使则天天在等待女王与艾伦侯爵订婚的消息，他早就看穿“这个人绝对不只是英国宫廷贵宾而已”。事实上，伊丽莎白女王故意操弄她喜欢艾伦侯爵的消息，只是要作为对付法国的武器，而艾伦侯爵一直到八月底才抵达伦敦。

让事情更复杂的是，瑞典的埃里克王子一直在等待伊丽莎白女王的回答，甚至派人表示要亲自前来求爱。长相俊美——又信仰新教——的埃里克王子，在外交圈中被普遍认为是伊丽莎白女王与哈布斯堡王朝或艾伦侯爵联姻的一大劲敌：“这个男人唤醒英国内部的警觉性。”伦道夫表示：“他唤醒了沉睡中的我们，让我们咬紧牙关。”

但伊丽莎白女王内心深处真正想要也需要的，是哈布斯堡王朝君主与菲利普国王能保护英国不受法国侵略，在获得塞西尔的支持后，伊丽莎白女王蓄意重启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姻协商，然后一再推拖直到她高兴为止。

* * *

在此同时，伊丽莎白女王一整个夏天都兴致高昂。每年夏天，若非黑死病猖獗，英国皇室的惯例，就是前往王国各地巡视，住在各地的豪宅中贴近人民，也让人民能够贴近君主。君主出巡不只是为了度假，也是为了处理好公共关系，赢得民众对皇室的喜爱。伊丽莎白女王就如我们所知的非常喜欢出巡。一五五九年七月十七日，是她首度出巡，她的目的地包括埃尔特姆宫、达特福德、科巴姆与无双宫，阿伦德尔伯爵在这里为她举办了整整五天的娱乐节目，他依然幻想自己有机会抱得美人归。其中一场以女王之名举办的晚宴，直到凌晨三点才结束。另一场化装舞会后的晚宴，则有“鼓队、笛手和各式各样的音乐助兴，直到午夜才慢慢散去”。八月十日，伊丽莎白女王离开无双宫，准备前往汉普顿宫时，阿伦德尔公爵送了她一对包装精美的银盘。许多人下注赌女王几周内就会宣布与阿伦德尔公爵订婚，但最后这些人还是输了。

女王出巡的过程，让她和达德利的感情与日俱增，他们之间的亲密变得越来越明显，当然两人之间暧昧的传闻，也传得更为热烈。如果达德利之前曾成为众矢之的，现在更可以说是英国的全民公敌。各

种妒忌与怨恨全都聚集在他身上，他的对手认定他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人格下流，刻意援引他家族的背叛史，希望达到政治目的，他们意有所指地表示这是诺森伯兰家族的竞赛，“看谁的阴谋比较厉害”，准备要迈向执政英国之路。这些流言中伤众所周知、非常普遍，甚至在达德利触怒女王的短暂时期中，伊丽莎白女王也曾提醒他，别忘了他的祖先“三代人都是卖国贼”。

在达德利背后，威廉·塞西尔也表达了嫉妒、不信任与恐惧感。他怨恨达德利控制了女王，不相信他有能力给予女王政治上的建言，又害怕他与女王的关系会走向什么方向。达德利是已婚男子，他与伊丽莎白女王之间的情感，可能引发最负面的揣测。若他的妻子真的死于传说中的疾病，女王又嫁给了他——塞西尔就只能说再见了。无论如何，英国王位与社会福祉都会受到威胁。塞西尔光是想到达德利坐大的情景都感到难以忍受。宫廷之中已然出现派系之争，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但这可不是件好事。为了捍卫自己的未来，捍卫伊丽莎白女王，也捍卫英国王位的延续，塞西尔开始积极协助促成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姻。

平心而论，尽管威廉·塞西尔有许多优点，他对女王的忠诚度也没有任何疑点，但罗伯特·达德利却有制造敌人的天分。他的态度高傲，从不隐瞒野心，还是个虚伪的双面人——但却不至于在“朋友”背后中伤他们——因而让人倒尽胃口。令多数的臣子们最生气的，在于现在想要谒见女王，首先都得恳求罗伯特大人，而罗伯特则可能——而且他也真的会——要求报偿。他为人并不光明正大，总是偷偷在背后搞鬼，让女王所有的婚姻协商破局。为了破坏协商，他会光明正大地在女王面前破坏对手的名声，或是表示联姻之后对英格兰不见得有意义，而加以阻挠。许多人都看穿了他的把戏，这些人的推断相当正确——达德利一切的手段，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若伊丽莎白女王成婚，他的权势将不复存在。

伊丽莎白女王对“潇洒甜美的罗宾”（她在亲密书信中如此称呼他）的情感和宠爱之深，我们可以从女王的态度得知：女王向来相当在意子民们对她的观感，但对于他们对她所宠爱的达德利所表现出的憎恶，却全然视若无睹。但她也没有提升达德利在宫廷中受欢迎的程度——她太珍惜自己的声望，她根本不想与任何人分享。事实上，她非常享受被达德利依赖的感觉，这种依赖，某种程度就代表了他的忠贞度。

有一个人对罗伯特·达德利并不迷恋，但却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名声感到担忧，此人就是前家庭教师凯瑟琳·艾希莉，她曾经因为遭控协助与煽动女主人和西摩将军的秘密恋情，而身陷囹圄，她对于现况的忧心，自然也不难理解。那年八月，艾希莉太太扛下重任向女王抗议，她慎重地下跪“乞求女王以神之名早点结婚，结束这些肮脏的流言，她向女王陛下表示女王与骑士统领之间的行为引起许多邪恶的传闻”。

女王对此大为反感，立即反驳，表示自己只是对达德利亲切一点，“他正直的个性与举动，才让我对他如此亲切”。这已经超出“谁敢反对我们的友情”的范畴了，“毕竟她的身旁总是有寝宫侍女陪伴，她们二十四小时监视着她与骑士统领间是否有不名誉之事”。然而她也大胆表示“若她铁了心肠要做这种不名誉的事，或甚至觉得这种事很有趣——若非神届时还能容忍她——她也不知道谁胆敢阻止她；但她相信神不会容忍有这样的一天”。

艾希莉太太回答女王，表示流言蜚语让女王的名声大受伤害，同时透露自己非常担心这件事可能会在女王的臣子间造成分歧，甚至激起内战。伊丽莎白女王并不想搭理这样的说法。她对艾希莉太太提出劝说的勇气大加赞赏，但依然坚持，若非权衡过各项利弊，绝不会轻易结婚。

若是这样，艾希莉太太回道，女王陛下是否该与达德利保持距离呢？伊丽莎白女王回答时似乎有点动了气，她反驳表示自己必须常常见达德利，因为“在这世界上，她必须面对许多苦痛与磨难，这是她唯一的乐趣”。

不知是艾希莉太太或是谁将女王这一席话转述给布鲁纳男爵听，他认定伊丽莎白女王说的是实话。尽管这些话语处处受到转述，两人的绯闻热潮依然没有退却。布鲁纳男爵深信，这都是因为罗伯特·达德利一直出现在女王左右——毕竟他有个太太，“他的太太是个优秀的女人，什么都给他最好的”，但他却很少回去探望太太。

在奥格斯堡的哈布斯堡君主，也听到了破坏伊丽莎白女王名声的最新传闻，同时也下达命令要求布鲁纳男爵用最谨慎和最严厉的态度，去了解传闻背后有几分真实。八月六日，布鲁纳男爵在回信中写道：

我雇用了一个密探，弗朗西斯·伯斯（Francis Borth），他与女王寝宫的所有侍女都非常熟稔，也认识女王身边所有的人，以及所有陪伴女王长大的人。他们全都对神发誓，女王陛下绝对没有忘记贞操的重要。然而他们也指出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女王陛下对罗伯特·达德利表现出的喜爱，似乎胜于她自己的名声与威严。

没错，对曾经向布鲁纳表示自己对工作苦恼不已，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感情生活的人来说，她似乎并未尽力消除自己正与达德利恋爱中或坠入爱河的印象。

* * *

当月稍晚，瑞典埃里克王子准备航向英国，盼望能得到女王的心，却在半路上遭到北海风暴击退。伊丽莎白女王旋即宣布，这就是上帝保护她的证据，然而埃里克王子并没有那么容易退却。不久后，

他再度出海，但又碰上另一场风暴，船舰受到严重毁损，让他不得不憔悴地返家，但却因此更坚决。为了安慰自己，他用拉丁文写了好几封情书给伊丽莎白女王，信中写着，尽管“命运之神如钢铁般冷酷，如战神般无情”，让他无法穿越海上风暴来到她的身边，但他一定尽快在第一时间内飞越所有的艰难到她身旁，因为“她最深情的埃里克”早已“心系着对她永恒的爱”。尽管他在信中表示要马上见面，但他却很快派出弟弟来到英格兰，希望他的求婚可以得到“好的答案”。

八月二十八日，艾伦侯爵詹姆斯·汉米尔顿秘密抵达伦敦，偷渡进塞西尔位于西敏区的宅邸，寄宿在那里。隔天他在汉普顿宫秘密谒见女王，两天后便在托马斯·伦道夫的护送下，离开英格兰前往苏格兰。他们的计划是让艾伦侯爵领导新教反叛军，对抗摄政王太后政权，转移苏格兰与法国的注意力，让他们不要将野心与焦点放在英国身上；与伊丽莎白女王联姻的说法，至此几乎全断了线，显然女王对艾伦侯爵一点也不感兴趣。艾伦侯爵的故事最后以悲剧收场：他几乎陷入疯狂，无法享受本来就属于他的权力与威望。

看来想要得到女王的心，在外国势力之中最有希望的，莫过于查尔斯大公子了。

* * *

八月底时，伊丽莎白女王移驾到温莎城堡，整日在温莎大公园中骑马奔驰与打猎，而达德利则随侍在侧。夜间，他们会一同坐在窗边谈笑风生，弹奏音乐唱着歌——一把达德利送给伊丽莎白女王的吉特琴，现正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他们似乎完全不理会，这么公开地展现情谊，可能带来流言蜚语的杀伤力，宫中的流言盛传他们两人可能相爱，也可能是床伴。甚至一度有传闻指出女王怀了达德利的孩子，

但时间还是证明了流言纯属子虚乌有。塞西尔用宫中的各种流言警告过伊丽莎白女王，同时要求女王更谨慎，但却只得到她的一笑置之。

依据现在的情势，阿伦德尔伯爵和彼格林爵士，在与女王的爱情游戏中，显然已经出局了，但这两人偶尔仍会就彼此的领先地位争吵。突然杀出的程咬金罗伯特·达德利，让他们相形失色，在挫败中黯然退场。不过，在这不久前，彼格林爵士曾警告夸德拉大使，“他很确定（女王）自始至终都会维持处子之身”。彼格林爵士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维持独身，健康每况愈下，直到一五七五年。

身旁总有一群男人围绕着，让伊丽莎白女王感到十分享受。那年秋天，一度有十几位外国使节长驻宫中，盼能透过两国联姻创造外交邦谊。进展如何？塞西尔酸溜溜地表示：“只有天晓得，我不知道。”对于女王善变的情绪，夸德拉大使也感到费解：有时她装作对哈布斯堡王朝联姻之事完全冷漠，但隔天又仿佛快要成为定局般，认真与我讨论。夸德拉大使在恼怒中写下这封信给斐利公爵：“阁下一定知道，要和这个女人相处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女人一定是由成千上万的恶魔组成的，尽管她总是说自己想要当个修女，整日在单人小室中祷告。然而她的生活却是一片虚假与浮华。”

到了九月初，达德利的姐姐，同时也是伊丽莎白女王最宠爱的寝宫侍女玛莉·西得尼小姐（Lady Mary Sidney）暗访夸德拉大使，并告诉大使，该是重新展开哈布斯堡王朝大公追求的时候了。她要夸德拉大使将女王陛下表面的拒绝摆在一边，“女王就和一般的女孩一样，除非用开玩笑的方式强迫她接受，不然绝不会点头同意”。但接下来几天，要说服伊丽莎白女王就容易多了。枢密院也会要求她答应——因为枢密院成员也受够了她的推托与谎言。夸德拉大使大可放心，若此事不真实，玛莉小姐绝不敢捏造；事实上，她的行动都是受

到女王的指示。伊丽莎白女王绝不可能自行谈论婚姻大事，但她盼望查尔斯大公造访英国的心，绝对不假。

夸德拉大使感到难以置信，因而向达德利查证，达德利拍胸脯保证自己的姐姐绝无说谎。事实上，他自己也想报答菲利普国王，因为一五五四年他锒铛入狱，被关在伦敦塔时，菲利普国王释放了他。伊丽莎白女王的财务大臣托马斯·派瑞，也证实了玛莉小姐的说法，表示女王“深信现阶段婚姻的必要性”。

夸德拉大使能够理解这一点：他非常明白法国对英国造成的威胁，玛莉小姐又告诉他八月份时阿伦德尔伯爵在无双宫密谋毒害伊丽莎白女王与达德利一事，甚至表示担心女主人的安危。事实上，根本没有这起阴谋事件；这都是女王陛下凭空捏造的，想要对夸德拉大使开个玩笑。玛莉·西得尼小姐夜访夸德拉大使，也是女王在背后教唆，希望可以策动夸德拉大使重启哈布斯堡王朝联姻协商大门，因伊丽莎白女王觉得她无法在公开场合与夸德拉大使谈这个话题。

九月十日，正当女王要前往温莎时，布鲁纳男爵在听到夸德拉大使简报后，搭乘驳船前往汉普顿宫。原本满心期待能受到殷勤的招待，却发现女王完全不想接见他，因而恼火不已。但三天后，伊丽莎白女王来到怀特霍尔宫时，夸德拉发现女王的态度和顺多了，只是她依然大声反驳，表示自己并不想嫁给查尔斯大公，或其他外国王子；她只愿意嫁给她见过的人。查尔斯大公不来英国也好，因为横竖她都无法逼迫自己走入婚姻嫁给他。

“真是浪费唇舌。”夸德拉大使不禁抱怨。既然无法避免，女王陛下首先得先决定自己愿意嫁人，然后邀请查尔斯大公来英国拜访她；他已经向她保证，无论如何她都不需要勉强步入婚姻。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此刻也愿意配合——他实在太盼望两国能顺利联姻——希望事情能顺利发展，这样若伊丽莎白女王拒绝了他，查尔斯大公也不至

于尽失颜面。伊丽莎白女王依然犹豫不决，很长一段时间绝口不提这档事。

“我该直话直说，告诉你实话吗？”她问。“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君主这么希望我成为他的儿媳妇，就应该二话不说，直接派他的儿子来到英国，同时免去如此多的保护。我的肚量没有那么小，要让君主牺牲尊严来迎合我。”

夸德拉大使便回报：“就她所说的话和她说话的态度，我知道这件事的结局并不为难，为难的是过程。”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伊丽莎白女王完全地拒绝邀请查尔斯大公前来英国——毕竟无论是女王或一般仕女，请求任何人来当她的丈夫，这样的行为都不妥当；她宁愿千刀万剐而死。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必须采取主动。夸德拉大使向女王保证，此事并不困难。很快，女王便改变态度，表示自己很愿意接待查尔斯大公。女王询问查尔斯大公会说的语言，并且用“和以往谈论自己结婚意愿低落时大相径庭的态度”跟夸德拉大使说话。夸德拉大使深信自己赢了这一仗。

但当大使问到查尔斯大公应该公开来访还是私下来访时，伊丽莎白女王变得十分惊慌，并要大使不要再苦苦相逼。查尔斯大公只要做他觉得妥当的事情就可以了——女王并不想涉入太多，而且他必须明白，女王并没有主动邀请他。女王不断重申此举并非允诺要嫁给查尔斯大公；事实上，她根本还没有决定到底要不要结婚。夸德拉大使认定女王这样的行为“只是维持矜持。我不认为玛莉·西得尼小姐和罗伯特·达德利有错，而且达德利甚至说，他从没想过女王会如此认真。”

这些事情很快在宫中传了开来，很快便有流言指出伊丽莎白女王将在圣诞节与查尔斯大公成婚，但夸德拉大使出奇地冷静：“她是个女人，活泼顽强的女人，我们必须考虑感情因素。”对他来说，查尔

斯大公应马上参访英国：只要见到大公本人，女王就很难拒绝他的魅力。而且她可能也会考虑不敢冒犯哈布斯堡王朝君主而就范。十月二日，夸德拉大使写信给费迪南德一世，催促他不要再拖延派儿子来英国的时间。

* * *

是年秋天，在怀特霍尔宫，罗伯特·达德利抱怨自己居住的房间离河道太近太潮湿。女王便将一楼自己房间隔壁的套房给了他，此举让各界的闲言闲语更上一层楼。“人们对于这件事感到羞耻不已。”夸德拉大使对此战栗不已，但他和多数人一样，在没有证据之前便下了定论。

夸德拉大使表示，尽管罗伯特·达德利的敌人很多，但“诺福克公爵四世却是他的劲敌”。汤玛士·霍华认为，达德利长伴左右，便是女王婚姻协商永远无法成功的原因，同时也公开批评伊丽莎白女王“轻浮又不懂国政”，更进一步警告达德利，若不尽快弃绝“他的虚伪与放肆，可能会不得好死”。

汤玛士·霍华是诗人萨里伯爵亨利·霍华之子，也是诺福克公爵三世老汤玛士·霍华的孙子；而这位老汤玛士·霍华公爵则是女王的祖父辈的亲戚，他们家族自然也与那罪不可赦的诺森伯兰家族为敌。老汤玛士·霍华公爵的孙子是英国显要的贵族，是当时贵族中唯一的公爵，从出生那天起，他就准备享有女王的恩惠与任命，也将担任女王身边的顾问。但达德利总是从中阻挠，他就永远无法如愿。更糟糕的是，宫中的流言蜚语指出，女王总有一天会嫁给达德利。“公爵与其他贵族根本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达德利称王。”夸德拉大使下此定论。尽管达德利已婚，夸德拉大使还是无法摒除这样的念头，也许有一天，达德利将恢复自由之身，下一步就是迎娶伊丽莎白女王——这也是诺福克公爵四世与其他贵族最害怕的一件事。

十月初，“谦恭有礼又高贵”的芬兰公爵约翰（John, Duke of Finland）抵达英国，他是瑞典埃里克王子的弟弟兼特使，他造访英国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谈定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与他那昏庸的哥哥的婚事。伊丽莎白女王之前一再表示自己喜欢埃里克王子，但这似乎也阻挠不了他的决心。虽然瑞典这个国家并不富裕，但埃里克王子却信仰新教，他一直心存幻想，认为伊丽莎白女王会因此嫁给他。

宫廷礼节使得伊丽莎白女王不得不殷勤接待他国君主的弟弟，于是她派遣达德利到克切斯特接待约翰公爵，没想到约翰公爵竟将此事误认为任务成功的象征，英国皇室的臣子们只好透过各种外交手腕，让他认清事实。在那之后，他显然对英国的风俗感到印象深刻，当然还有英国女王，因为女王对他展现了友谊与爱护，对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大大为赞赏；不久，便出现各种传闻，指女王可能不嫁给哥哥埃里克王子，而嫁给约翰公爵。达德利对约翰公爵非常和蔼可亲——十月十九日，甚至以约翰公爵之名，举办了宫廷晚宴——但他肯定不欢迎约翰公爵踏上英国土地。

约翰公爵带来的礼物，极尽浮夸与豪华之能事，但他的礼物中却藏着许多伪币。他的许多行为，都让布鲁纳男爵感到仿如芒刺在背，不得不迫使女王绞尽脑汁让两人不要见面。但当下的情势让女王满意极了，女王玩弄两面游戏的手法，显然十分熟稔。她略施小惠，仿佛就要做出承诺，又在最后一刻收手，让挂心此事的人既困惑又无奈。而就在他们准备放弃之时，她又再度表现出渴慕之情。这个游戏必须要能精准敏锐地掌握时机，这是女王最爱的游戏。她仿佛在追求者面前垂钓着一丝希望，但同时又维持着女性魅力、自由、不允诺的神秘，同时与多位王子维持友好关系，让他们抱着一线想象。

“这里简直就是求爱者度假中心，还有许多爱情纷争要处理”，这年秋天，塞西尔写了这样一封信给尼可拉斯·瑟洛摩顿爵士。他又

这样告诉拉尔夫·赛德勒爵士：“我宁愿看到女王陛下选择其中一人，其他人则光荣地战败。”除了查尔斯大公与瑞典埃里克王子之外，又来了一个丹麦王，他的使者在宫中装模作样地穿上深红色天鹅绒紧身上衣，上面绣上一颗被箭刺穿的爱心，“展现丹麦王对英国女王的爱意”。但对于丹麦王的追求，没有人认真以对，而持续追求女王的萨克森公爵与荷尔斯泰因公爵（the dukes of Saxony and Holstein），也都受到相同对待。在夸德拉大使的记录中显示：“女王陛下漂浮在这些散漫又轻浮的想象中。”在这十到十二位等待女王芳心的追求者派出的使者中，只有奥地利与瑞典使者，较有达成任务的希望。“这两个人献殷勤的态度令人叹为观止”。不久，他们完全无视于伊丽莎白女王的阻止，开始彼此辱骂，甚至准备大动干戈。此事让伊丽莎白女王感到警醒，严格禁止两人同时进入宫廷，“以避免两人在女王面前厮杀”。

夸德拉大使生怕伊丽莎白女王接受埃里克王子而放弃查尔斯大公，但哈布斯堡王朝联姻协商最大的威胁，其实距离女王更近。索尔兹伯里主教约翰·叶威（John Jewel, Bishop of Salisbury）表示，女王可能会表现出想要与他国联姻的模样，但事实上，她希望“与国内的人成婚”。

十一月初，法国大使安托万·诺阿耶（Antoine de Noailles）颇有兴味地看着这样的画面，女王身边两大追求者的使者，夸德拉主教与约翰公爵左右夹击，女王则泰然自若地坐在怀特霍尔宫的长廊上，看着她传闻中的爱人达德利与她的表哥亨斯顿勋爵在竞技场上与各个追求者决战。达德利表现得很好，而亨斯顿勋爵则发现，伊丽莎白女王对此兴趣盎然。

布鲁纳男爵感到十分沮丧。多亏了达德利，看来女王根本不想嫁给查尔斯大公了。布鲁纳男爵于是伤心地告诉女王，自己没有待在英

国的意义了。这件事触怒了伊丽莎白女王，她显得“镇日心烦乖戾，说话没好气”。她知道，若布鲁纳拂袖而去，达德利将成为罪人。

“大体而言可以说，”布鲁纳男爵写道，“女王不婚都是他的错。”夸德拉大使也不断抱怨，达德利“根本就在破坏我们的好事”。女王身边的亲信，此刻却成了过街老鼠，布鲁纳男爵甚至表示：“他到现在都没遭到暗杀，还真是令人惊讶。”许多宫廷之人强烈谴责达德利对女王的影响，同时也十分担忧，伊丽莎白女王会为了他错过一段好姻缘。

十一月时，诺福克公爵杠上了罗伯特·达德利，警告他自己将会竭尽所能促成女王与哈布斯堡王朝联姻。

“建议女王嫁给外国王室的人，便不是好国民，也不是忠臣。”达德利傲慢地反驳，尽管有阿伦德尔伯爵与其他贵族的支持，此话依然让诺福克公爵暴怒得跳脚。

夸德拉大使告诉伊丽莎白女王，查尔斯大公可能已经出发了，因为她开出的条件都已经达成，她只好回答自己还不打算结婚，但等到她看到查尔斯大公，说不定会改变心意。

夸德拉主教生气地表示，是她要求查尔斯大公前来相会，而女王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只是想要见见追求者，彼此互相了解一下，以免未来哪天她真的想要结婚。夸德拉大使内心充满愠怒，接着说了玛莉·西得尼小姐跟他说的话。伊丽莎白女王则表示，内宫许多侍女都常常这样说，她们的出发点都是善意，但自己绝无指示要她们这么做。很快夸德拉大使就知道自己被耍了，并且准备要撤销他努力斡旋已久并期待美好结局的联姻协商。“我不想假装了解女王陛下”，他写道，“对于她，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

他也必须面对伊丽莎白女王可能嫁给罗伯特·达德利的问题，他坚信就算不采信坊间传闻，两人依然是门不当户不对，这是“一位时常提供我可信情报的人”告诉我的事情，同时在十一月十三日，夸德拉大主教也将此事回报给菲利普国王，那就是达德利“正密谋毒杀妻子。显然女王对我们与瑞典方面所做的事情，以及未来对于婚姻协商可能采取的态度，都是想让达德利的对手与英国全国上下猜测不已，直到他们完成刺杀达德利夫人的恐怖任务”。但若此传闻为真，达德利谋害妻子的手段，实在可以说是短视近利，毕竟矛头很快会指向他，接着女王会因为害怕牵涉其中，而永远无法嫁给他。但显然夸德拉大使认定两人都有犯罪的动机，他预言两人若胆敢结为连理，地位的崩解便近在眼前。

流言自然不只局限于英国。长驻在菲利普国王于布鲁塞尔行宫的大使托马斯·查伦纳爵士（Sir Thomas Challoner），在听闻女主人遭到“如此恶劣的中伤”后，感到震惊不已，因此便提笔写信警告塞西尔，但却没有提到任何细节，毕竟写下这样的文字实在是大不韪。托马斯·查伦纳爵士强调，他知道流言为假，但仍要请求女王面对男性时行事更谨慎，并尽早成婚，若女王膝下无子，我们又有什么希望呢？

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伊丽莎白女王指派达德利为温莎古堡的总督与总管。他已经提拔了不少友人与支持者，成为宫廷要角，同时也成为新教最大的拥护者。以此而论，他自然对西班牙抱持敌对态度，而倾向法国那一方。对他来说，英国政府理应成为新教革命的领导着，同时也该放弃与菲利普国王的邦谊。虽然在一五五九年一月份时，他曾被推举为英国国会议员，但在枢密院中却毫无地位，许多人讨厌他对高层政治干涉太多。根据夸德拉大使形容，甚至有人在背后抱怨，表示不想再被女人统治了。

然而，许多英国人面对这个可能成为统治者的男人，纷纷开始大献殷勤，视达德利为领袖及激进派宗教改革先驱，许多虔诚的教义都以他为本。他对宗教的忠诚不容置疑：“尊贵全能的神就是我的准则。”他曾写下如此词句，“自幼接触宗教后，我从未改变心意……自小，我就在神的襁褓中成长。”

在达德利身边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塞西尔在一份私人备忘录中记录下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其中也包括了罗伯特·达德利的妹夫亨利·西得尼爵士（Sir Henry Sidney）、他的兄弟安布洛斯·达德利（Ambrose Dudley）及詹姆士·克洛斯特爵士（Sir James Croft）——这些人都是玛丽女王时期伊丽莎白公主的支持者——以及达德利夫人的哥哥约翰·艾柏雅德（John Appleyard）。在达德利的势力坐大后，塞西尔开始感到自己在宫中地位一日不如一日。他开始小心翼翼地对待达德利，对他友好亲切。背后他则转而与诺福克公爵交好，他是女王的宠臣最大的敌人，进而成为反达德利派领导人物。

当然一些难看的意外插曲也不会少。一名外交使节就质疑英国是否穷到无法雇用杀手，让达德利一刀毙命，而且在这个时期，似乎真的也有人密谋要除掉他，其中有一人——威廉·朱瑞爵士（Sir William Drury）是一名士兵，他的兄弟德鲁（Dru）是位宫廷官——还因此沦落到伦敦塔好几个月，他们的罪名是杀人未遂。这些指控背后的真实程度无法考究，因为后来是由达德利本人将他们保释出狱。十二月时，诺福克公爵公开指摘达德利干扰国家机要，导致两个男人发生严重龃龉。达德利直接向女王诉苦，一周之内，诺福克公爵遭到贬谪，前往英格兰北部与苏格兰边境担任中将一职。这可不是个闲缺，当月，伊丽莎白女王违反与玛丽·吉斯签订的条约，派遣英国舰队协助苏格兰的新教头子对抗苏格兰王太后以及应她召唤而前往助阵的法国军队。

* * *

圣诞节的脚步渐渐近了，伊丽莎白女王与皇室沉浸在轮番的舞会、晚宴、化装舞会与狩猎派对中，伊丽莎白女王完全无视坊间败坏她名誉的传言。

幸好查尔斯大公还没出发前往英国，因为夸德拉大使和布鲁纳男爵已经知道，伊丽莎白女王完全不想嫁入哈布斯堡王朝了，而且他们心中也已有定论，认定女王只是在利用他们“与其他各国为求婚而前来的特使”；他们猜测伊丽莎白女王让他们雾里看花真正的心态，就只是为了牵制法国的侵略，同时要让她的臣子们以为她认真思考婚姻大事。“只要我们在这里，她就可以推诿各界要求她结婚的声浪，用各国王宫贵族的追求作为分身乏术的借口，对她的王权有其帮助。”

十二月时，布鲁纳男爵任务失败离开了英国。这一刻，他对伊丽莎白女王的了解，并没有比一开始多，布鲁纳男爵将她易变的性格归咎于青少年时期的经验，“有时她的身份不合法，有时候又逆转。她在宫廷中长大，然后又被放逐，在登基之前甚至还有被俘下狱的经验。得到王位后，她就仿佛得到一笔大遗产的乡下人”，变得非常骄傲自大，认为自己任何奇怪的念头都该得到满足。“但她错了，若她嫁给了罗伯特·达德利，她一定会引来许多敌意，可能某天晚上就寝前仍是英国女王，隔天就只是个伊丽莎白小姐而已。”

然而伊丽莎白女王似乎也算计到这一点。一五六〇年一月时，夸德拉大使回报，伊丽莎白女王的臣子们，对于女王可能下嫁达德利十分反感；他认为英国的臣子们可能会“设法拨乱反正。英国上下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将他视为女王身边的祸因，因此愤慨地要求女王三思”。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女王不会嫁给别人，只会跟达德利在一起”。

是年三月，传闻达德利试图终止他的婚姻。夸德拉主教听到达德利吹嘘自己“再过个一年地位一定就不同了。他的触角越来越广，每天都在各项事务上扮演更出色的角色。每天他都觉得自己能得到更多，现在则有传闻指出他将与妻子离婚”。尽管如此，这些传闻依然是空穴来风，达德利最终并没有终止其婚姻关系。

* * *

新年刚过不久，奥地利使者赫尔芬斯坦伯爵重返英国，希望可以重启哈布斯堡王朝联姻协商。哈布斯堡王朝的诸侯，波希米亚王与巴伐利亚公爵，皆派来使者呼吁伊丽莎白女王重新考虑，同时也建议查尔斯大公跑一趟英国，亲自追求英国女王，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对婚事漠不关心的模样，触怒了哈布斯堡王朝君主，他坚持若伊丽莎白女王不预先表态，就绝对不会让查尔斯大公动身前往英国。协商陷入僵局，时间来到二月份，两国联姻协商明显破裂。二月十九日，夸德拉大使断言女王的策略将招致大祸，因为失去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持与邦谊，“不仅法国将会摒弃她，她的人民也会，她终将陷入无助之中”。

二月份时，伊丽莎白女王抛弃了另一位外国的追求者，那就是刚接下父亲王位的埃里克王子。伊丽莎白女王在二月二十五日写信给埃里克王，表示虽然自己无法怀疑“您对英国的诚意与热爱，但非常抱歉，我们无法用与殿下同样热切的情感回报”。她宣称自己“从未对任何人有过如此热切的情感”，同时请求埃里克王“好好控制自己的情感，不要让它超出了友谊的界线”。她坚称：“若神指引我步入婚姻，我也不该选择一个总是会缺席的丈夫，无论这个丈夫是多么有权势、有身价的王者。而我也总是这样回答殿下的弟弟，我心中从未怀有嫁作人妇的想法，而是想要保持独身，希望殿下不要再浪费时间等待我的响应。”信末的附笔，伊丽莎白女王恳求埃里克王打消造访英

国的念头，“在这段追求之中，殿下除了期待之外，无法得到任何响应，我也非常担心您如此浩瀚的爱，可能会变成一种负担，这对我们来说都会是一种难以承受之痛”。

一开始，埃里克王无法接受伊丽莎白女王的拒绝，经过几周后，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依然没有软化，埃里克王只好不情不愿地将约翰公爵召唤回国。

而英国国内则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罗伯特·达德利的成功之路，将会就此一帆风顺吗？

5 恶意的指控

一五六〇年二月，诺福克公爵与苏格兰新教头子们和解，为了避免苏格兰王太后玛丽·吉斯引法军占领苏格兰，只要苏格兰女王愿意待在法国，伊丽莎白女王就愿意保护苏格兰的安全。不久后，伊丽莎白女王派遣英国舰队封锁福斯湾，避免来自法国的援军与苏格兰摄政王太后会合。玛丽·吉斯于是出手报复，双方在利思引发激烈冲突，最后英军被击退，折损不少兵力。

伊丽莎白女王当时并不受法国人欢迎，这一点当然不令人意外，四月份时，英国驻法大使尼可拉斯·瑟洛摩顿爵士写信向女王提出警告，表示“可能进行会危害社会的恐怖手段”，玛丽·吉斯阴谋策动一名叫史戴方诺（Stephano）的意大利人，企图毒杀伊丽莎白女王，史戴方诺“是个留着一脸乱胡的魁梧男性”。塞西尔随即起草一份备忘录，要求宫廷上下“对女王的起居饮食加倍留意”，希望可以帮助伊丽莎白女王躲过遭毒杀的危机。“请勿接受陌生人致赠的香水、香水手套或食物。”备忘录中写着这样的句子。

女王面对法国与苏格兰的威胁时的那股勇气，让夸德拉大使印象深刻。他看过伊丽莎白女王与伦敦骑警们骑着她的那不勒斯名马，他发现女王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豪气干云的英姿”。就在此时，罗马教皇庇护四世（Pope Pius IV）写信给伊丽莎白女王，嘱咐她尽快回到天主教廷的怀抱，但女王下令教廷使者到了布鲁塞尔便不得再前进。对于梵蒂冈方面的呼唤，她终其一生都采取装聋作哑的策略。

六月十一日，玛丽·吉斯因水肿逝世，法国方面随即表示追求和平意图。伊丽莎白女王决定派遣威廉·塞西尔到苏格兰去进行协商，希望与苏格兰和法国谈定有利于英国的三方协议。瑟洛摩顿爵士听闻女王的决定后，开始感到焦虑：没有塞西尔在旁敦促，女王可能会草率行事。“谁有这个能力又愿意在女王的决策过程中，很快地站出来反对或质疑呢？谁又能很快地解决悬而不决的窘况？”伊丽莎白女王的决策过程之缓慢是出了名的。“谁能够快速决策？”

塞西尔本人也不想离开宫廷。他怀疑是达德利要女王派遣他到苏格兰去，以免他坏事，他也坚信只要自己一离开，达德利将取代他在宫中的顾问位置。他偷偷告诉瑟洛摩顿爵士：“派遣我前往苏格兰的举措非常奇怪，也引发诸多争议。我一定是遭到出卖，才会被女王派遣出使。”但另外，此行让他得以远离他早已厌倦的宫廷中伤与阴谋的戏码，好好喘一口气。然而在前往爱丁堡时，他仍不禁心情沉重，因为他已经看到自己不在宫廷的日子，有一个人将慢慢挖空他的权力，而这个人也会将英国推向快速毁灭之途，这个男人的名字，与许多流言蜚语永远分不开。

一五六〇年六月，在艾赛克斯有个女修道院院长，布伦特伍德的安妮·道（Annie Dowe of Brentwood），最喜欢和密友们肆无忌惮地大谈来自伦敦的有关伊丽莎白女王和达德利的八卦。她听说达德利送给女王陛下一件红色衬裙。

其中一位朋友也听过这个消息，马上回嘴表示：“你真以为是件衬裙吗？不，他给她的是个孩子哪！我拍胸脯保证。”

安妮·道快乐地将这个宝贵的八卦散布到邻村去。

“亲爱的罗伯特·达德利和女王玩出了火花，”她意有所指地说，“他可是她孩子的父亲哪！”

吓坏了的村民则应道：“为什么？她没有孩子啊！”

“没错，她没有，”安妮·道说，“那孩子正在成形呀！”

这些八卦消息被上呈地方政府，安妮·道也因此遭到逮捕定罪，是年八月沦落下狱。当地地方法官坚持此案必须在密室中审判，以免她编造的故事误传到大众耳里。但官方的动作实在太慢了：八卦消息早已散布到艾赛克斯以外的地方，就算事情过了十年，还是有人认定伊丽莎白女王与达德利有孩子。有一个叫作亨利·霍金斯（Henry Hawkins）的人，就因为制造了“亲爱的罗伯特·达德利与女王陛下有五个孩子，而且都由产婆接生”的流言，而遭到刑罚。此时，英国政府逐渐失去耐心，这么多年来，许多制造谣言的人都因为谣言中伤女王而遭到割耳之刑，或面对与安妮·道一样的命运。

可是，就算用这么残酷的刑罚，也无法停止流言蜚语，各国大使——尤其是西班牙大使——在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后的这个时期来到英国宫廷中，听到这些私生子的宫廷秘辛，纷纷相信这些传言。一名年轻人于一五八〇年代出现在西班牙，宣称自己是伊丽莎白女王与达德利之子；夸张的是，菲利普国王甚至想要确认消息正确性，后来证实这是诈骗一桩。但许多人都愿意相信这些流言，直到今天，尽管许多证据都反对这些传闻的真实性，依然有人深信不疑。

* * *

一五六〇年七月二日，英格兰与苏格兰因为签署了《爱丁堡条约》，战争总算结束——对塞西尔来说，是经过几周来迂回曲折的讨价还价后，总算在外交上得到的一大胜利。在条约的规范下，法国同意退出苏格兰，将苏格兰的国家管理之责交还给苏格兰议会，英格兰与法国都不准干涉。以玛丽女王之名，法方派出的代表承诺她将不再与伊丽莎白女王争夺王位，也不会与英格兰争相部署兵力。最后，法

国在条约中也同意承认伊丽莎白女王为英国女王。看来，事情至此，和平总算露出一线曙光，战争威胁之云雾也消散了。更重要的是，在欧洲各国的眼中，伊丽莎白女王更添威严。塞西尔对于自己的成就感到颇为满意。

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却不这么想。在送往爱丁堡的连续几封信中，对于塞西尔没能确保夺回加莱港，也没有要求法国偿付英国在苏格兰对抗法军的战争费用，女王严加斥责。原本洋洋得意的塞西尔，瞬间黯淡了下来；他认定女王的诸多抱怨，都是达德利在背后搞鬼，只有达德利才会让他遭到中伤。这件事背后可能有其真实性，也有可能是伊丽莎白女王对塞西尔出使的任务抱持负面观感，但这一点随即证明是错误的。

* * *

事实上，伊丽莎白女王正享受着一生中最光辉的夏天。从战争的威胁中解放后，她让自己在达德利的陪伴下，享受一段狂欢的时光，无视每天积压下的政务。到了七月底，她决定离开格林尼治下乡出访，沿着泰晤士河的南岸缓慢地旅行，并住在泰晤士河沿岸的许多豪华宅邸。身为骑士统领的达德利显然也在，但在他的任期结束后，据传他仍待在女王身边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天天外出骑马打猎，伊丽莎白女王总是骑上最有生气的马匹，到了晚间他们会一起跳舞、享受音乐。尽管之前女王曾在达德利面前和其他男人打情骂俏，但现在她全心全意地对待他，就算被指为荡妇或淫妇也无惧。小道消息指出，他们终日关在私室中独处，一名臣子出言劝诫：“全英国上下人人无不拉起嗓子骂道，这家伙简直就是为了虚荣毁了国家啊！”

一名西班牙驻安特卫普特使曾回报，英国宫廷上许多臣子对“看到有人得到这么多宠爱，但女王却完全没有结婚念头”表示反感不已。

对于女王“完全没有结婚的念头”，塞西尔感到十分忧心：与女王婚姻相关的问题，以及王位的继位人选，永远都是他心头的大事，就算是在爱丁堡，他也不断写信表达自己内心的期待：“神定会为您的心指引方向，为了子嗣找到一位父亲，您的孩子将为世代子孙祝福。”许多臣子深信伊丽莎白女王接受了塞西尔的建议，但同时也强烈反对女王的选择。

到了七月底，远离政务将近两个月后，塞西尔终于返回宫中，本来他预期会得到君主的热烈欢迎。但除了其他议员们的温暖道贺外，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却是出奇地冷酷疏离，达德利则是违反他自己公开宣称的原则，大权在握，企图获取夸德拉大使的友谊与支持，以便得到西班牙撑腰，让他能抗衡塞西尔的影响力——这一切女王都看在眼里，同时默许。女王甚至宣布要征召一名能力与她的“文书官”相当的“剑客”。

塞西尔的心沉到谷底，他明白自己离开太久了。于是他做出定论，在他出使期间，女王与她的宠臣间的关系，已经有了最基础的改变。无论怎么想都触动了他的警觉性，但女王对他的态度却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他在爱丁堡的贡献，女王完全没有表示任何谢意，甚至直接表明就算塞西尔为了她盘缠散尽，她也不会支付塞西尔出使的费用。接下来，每当他想要与女王讨论政务时，就会听到女王身边的人说她与达德利在骑马。这些现象在暗示着，只要达德利终止婚姻，女王便可能会下嫁达德利。

有关达德利会离婚——或甚至更糟的揣测——仍甚嚣尘上。一名皇室持火炬手欣然散布他亲眼所见的事实，一天晚间女王前往邱园拜访达德利回宫后，便心花怒放地告诉身旁的侍者关于达德利值得嘉许之处，同时宣布她将赐予达德利更多荣耀。此事引得流言四起，各界开始猜测达德利可望得到公爵爵位，或是等到他成为自由之身，女王

便将与他成婚。这一切都回报上呈枢密院，也让塞西尔忧心忡忡。他无法预测伊丽莎白女王与达德利的感情到底到了哪个地步，但他早已发现女王不顾一切地毁坏自己的形象，造成宫廷危机。

枢密院成员间针对此事进行辩论，对于女王之前未能嫁给一位身价极高的追求者，感到深深惋惜。有些人说这是因为她不喜欢男人；另外则有人认为她想要借由婚姻来与欧洲邻国协商；但多数人认为与外国联姻根本没用，因为欧洲各国皇室心中早有定夺，他们认为女王会嫁给达德利。情势变得十分紧急，夸德拉大使甚至认为宫廷内会有一场叛变，因而表示：“他们的要求是不想再由女人做主，哪天早上醒来，这个女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和男人都进了监狱。”

塞西尔认定自己的政治生涯告终，他开始变得极度沮丧，一个月内便认真考虑提出辞呈，他在一封信中暗示了贝德福德伯爵（Earl of Bedford）。他想要从巴黎召回尼可拉斯·瑟洛摩顿爵士来取代他国务大臣的位置，因此去信表示：“你必须赶紧回国。我不敢写下我想说的话。希望神能让女王陛下了解她自己需要些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与外国联姻的婚姻关系。

国务大臣塞西尔加油添醋地，用女王与宠臣之间的故事来娱乐瑟洛摩顿爵士与其他英国驻外使节，暗示他们若可以向女王表达他国政府的不满，或许稍有帮助让女王能停下脚步思考。

八月三十日，英国皇室脚步移往温莎。前一周，苏格兰国会废除了罗马天主教廷的权利，并且立法规定若在苏格兰进行弥撒仪式，将处死罪。然而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则以法律手段，将新教教会中的加尔文教派立为官方宗教。苏格兰贵族们则开始希望促成艾伦侯爵与伊丽莎白女王的婚事，更加巩固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关系，而无视于伊丽莎白女王对此婚事毫无兴趣。苏格兰方面下定决心“誓死”

也要完成任务，但在双方展开协商之前，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英国许多事务几乎全面停摆。

* * *

罗伯特·达德利从未拥有自己与太太的私有住宅。他就住在邱园，这是女王赐予的宅邸，但伊丽莎白女王清楚表明，任何有关艾咪·达德利的一切，她都讨厌，而且总是突然召唤她的宠臣，所以艾咪从未到过邱园。因此她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亲戚或朋友家。

达德利与他的太太虽已结婚超过八年，但他们却很少见面。女王坚持他必须住在宫廷中，因此他很少回家。历史上有记录艾咪曾造访宫廷，但显然她的出现并不受欢迎。在那个年代，臣子的妻子们单独住在乡下，而丈夫则住在宫廷中的状况并非罕见，妻子们随之住在宫廷中，也是不无可能，但这样花费惊人，而女王又不鼓励臣子们这么做。她喜欢宫里的男性都绕着她打转，而不是以妻子为中心。

一五五八年到一五五九年的冬天，艾咪·达德利都住在林肯郡与柏立圣艾蒙的朋友家。春天来临时，她前往伦敦南部的坎伯韦尔，拜访她母亲的亲人们，而他们都是苏格兰人。在那之后，她似乎主要都住在阿宾登附近的丹契沃斯一带威廉·海德（William Hyde）的家，这个遗址至今仍在，但当年艾咪居住时的模样已不复见。达德利送礼物过去，礼物的样式全都详细记载在他的账簿中：一顶风帽、金纽扣、些许香料、鹿肉、缝纫用丝绸、许多针织品、一副眼镜和襁褓用的荷兰亚麻布。她向来不要求这些物质上的回馈，但达德利却认为这样就可以满足她。他偶尔会去找她，但到了一五六〇年时，他的造访简直就是偶然。

从历史上的记录，很难推断两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他们两人膝下无子，从文献上也找不到艾咪曾怀孕的证据。和所有同阶级的女

性一样，丈夫不在时，她总是悉心打点他的一切，包括土地与农田等。她一定听说了丈夫与女王之间的八卦传闻，但我们无法知道她受到多少影响。

在一五六〇年的仲夏之前，艾咪再度动身，原因不明，这次她搬到库姆纳宫，房东则是达德利家族之前的管家安东尼·佛斯特（Anthony Forster），他也是达德利家族当时的账房与阿宾登地区议员，这幢房子属于威廉·欧文（William Owen），他是前宫廷御医乔治·欧文之子，经历过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与玛丽女王的年代。欧文先生至今仍住在公寓中。

现已找不到原址的库姆纳宫，当时就位于连接牛津与阿宾登的要道上，靠近大村庄，是个中古世纪的小屋，于十四世纪时用灰石砌成，它一度曾是宗教基础的一部分，是阿宾登修道院院长夏日的居所，也曾是许多修士的静养地，还曾是某栋建筑杂草丛生的四角中庭房舍之一。部分文献记载，库姆纳宫是单层楼式的建筑，但至少有三名房客住在大厅楼上，因此它应该还有上层。坐落在美丽的院落中，库姆纳宫修缮得十分好，这一切都要感谢佛斯特先生的改建，居住起来也非常舒适，他后来买下了这幢房子，他死后则葬在附近的教堂中。

艾咪付钱请了许多佣人，身旁还有侍女普戈太太（Mrs. Pirgo），也称普托太太（Mrs. Pirto）或品托太太（Mrs. Pinto）服侍，以及一个朋友欧丁赛尔太太（Mrs. Odingsells），她是威廉·海德那守寡的姐姐，也是之前艾咪住在丹契沃斯时的旅馆老板。当他们在库姆纳宫中安顿好后，这个宅邸显得相当拥挤，住在这里的除了佛斯特夫妇之外（他们是泰晤士威廉公爵的外甥，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都与当时的伊丽莎白公主维持友好关系），还有威廉·欧文那垂垂老矣的母亲欧文太太。艾咪与欧丁赛尔太太住在西翼房中，也就是

大厅的正上方，及欧文老太太的隔壁，佛斯特夫妇则和欧文老太太一样，也有独立的起居空间。佛斯特家、海德家和欧文家长年与达德利家族交好，彼此联姻，当然也都是地方上的要人，达德利太太当然也是。安东尼·佛斯特原是个友善的房东，是个有教养又开过眼界的人，他喜欢音乐、很会唱歌，而且弹得一手小键琴。

斐利公爵和夸德拉大使曾多次在不同时期指出，有流言传说艾咪·达德利“乳房有疾患”，而且可能已经到了晚期。这个传闻可能是真的，但我们唯一能掌握她的健康状况，就是在一五六〇年九月时，她显得情绪非常低落。这种忧伤的情绪，可能是因为听闻丈夫正在等她离世，以娶女王为妻，但也有可能是因为知道自己不久人世而哀伤。

艾咪情绪忧伤的证据来自两处，第一个是女佣的证词，但这个证据来得较晚，第二个则是来自知名度不高的手册——《莱斯特协会公报》。一五八四年，一位未具名的天主教作家，对达德利发动非常狠毒的攻讦，也是十六世纪时达德利名誉受损以及所有跟随着他的污名最主要的消息来源——而消息往往是错误百出。到了现代，这些文献早已被当代学者列为拒绝往来户。《莱斯特协会公报》针对一五六〇年九月发生的事情大加渲染，当然对于其中的信息，我们必须谨慎处理。但其中部分讯息可能是真的，包括它宣称佛斯特家与库姆纳宫的其他住户看到达德利太太“伤心又沉重”都显得十分担忧，因此提笔写信给一位贝利大夫，他是女王在牛津大学的医学教授，请他开立处方给达德利太太。贝利大夫断然拒绝：他也听到了流言，并且“认为一个好太太不需要吃药，而且（他之后曾表示）他怀疑且忧虑这些人会以他的处方之名下毒谋害达德利夫人，那他就成了这些罪人的代罪羔羊”。一五八四年，《莱斯特协会公报》发行后，随即声名狼藉，贝利大夫当时仍在世，且以精湛医术闻名，但他并未对报道加以否

认。此举显示此报道可能为真，若真是如此，这个现象等于证实了女王与达德利的八卦散布的有多么广——还有多少人信以为真。

九月六日星期五，西班牙大使夸德拉主教抵达温莎古堡。十一日时，他写信给菲利普国王的姐妹帕尔玛公爵夫人（Duchess of Parma），报告一桩周末发生的事件，但他并未在信中详细提及事情发生的日期；但从他对此事的报告中，还是可以找出一点蛛丝马迹。

七日星期六这天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二十七岁生日，夸德拉大使想要替主子献上祝贺之意，但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讨论。“在狩猎结束的返程中，伊丽莎白女王告诉我，达德利的太太死了，或是快死了，然后要我什么都不准说。”女王陛下没有多透漏些什么，夸德拉大使可能认定，艾咪即将死于长年来传闻中的乳癌。在那样的情形之下，这样的推断合情合理，伊丽莎白女王不让夸德拉大使多嘴也很自然。

周日，在这场会面之后，威廉·塞西尔抛掉平常的小心翼翼，向夸德拉大使吐露心事。他向天主教西班牙的大使吐露的事情不仅不寻常，而且有其重要性，随后很快就不证自明。

夸德拉主教写道：

就在我与女王的那番谈话后，我遇见了英国宫廷国务大臣塞西尔，我知道他近来失宠了。另外我则发现罗伯特·达德利正力图取代他的位子。我毫无困难地将话题引导到此议题上，在我多次保证对他即将告诉我的事情守口如瓶后，他告诉我，女王近来的行为，让他兴起退出政坛的念头。女王不是个好船长，他说，看到眼前有暴风，却不愿靠岸，对他来说，女王与罗伯特·达德利走得太近，可能引发的灾难显而易见。罗伯特·达德利自命为国家要务统领，也是女王的人，这对王权是极大伤害，而且甚至想要与女王成婚，为了健康与安全着想，女王在宫中绝对不敢提及此事。

塞西尔这一席话背后的含意并不清楚，这段时间，伊丽莎白女王天天出外骑马寻欢——她生日这天，达德利表示女王每天从早到晚都

与他在外狩猎——但塞西尔指的可能是女王镇日单独与达德利相处，可能让自己置身险境中。

全国上下都会容忍这桩婚事，但他说他不吃这一套。因此他决定告老还乡，只是他认为自己可能走不成了，最后只能沦落到伦敦塔中蹲苦窑。他哀求我，看在神的恩典上，帮忙告诫女王，说服她完全抛弃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记得自己亏欠自己与臣民的一切。

至于罗伯特·达德利，他说了两次，觉得他上天堂还比较好一点。他告诉我，女王根本不在乎什么欧洲王子。她根本不觉得需要他国的奥援。她负债累累，却丝毫不去思考该如何走出泥淖，她在伦敦的信用早已破产。

这一席话显然夸大其词，但塞西尔希望能让夸德拉大使了解，伊丽莎白女王如何为了宠臣自毁前程及她的王国。

最后，他提到他们考虑要杀害达德利夫人。“他们不断放出风声表示她生病了”——到了这个地步，夸德拉大使是否想起女王前一天说的话呢？——“其实她根本没有生病，她健康得很，只是得小心被人下毒。他深信，神绝对不会允许人们犯下这样的罪，也不会让这样的阴谋得逞。”

也许塞西尔只是在煽动夸德拉大使，但他也有可能蓄意在大使那想象力丰富的心里营造某种想法：女王——他服侍多年，未来也将持续以忠诚和热情听任差遣的女主子——与她的爱人正策划一场谋杀。塞西尔非常清楚，他的一字一句都将被大使忠实呈报，并且在欧洲各国政府间流传；消息也将很快传回女王与达德利的耳中。若塞西尔真的担心伊丽莎白女王的声誉，就会知道这件事是毁灭女王的一记重击。但这件事中的危险与塞西尔一改往常小心翼翼的态度，却让夸德拉大使显得心烦意乱。事实上，塞西尔只是不择手段，想要用各种方式劝女王清醒一点。这一刻，不仅是他的政治生涯，就连英国的未来与新教的稳定都开始动摇。

塞西尔非常明白，若艾咪·达德利真的遭到谋刺，她的丈夫将恢复自由之身；他也知道这样会造成民众强烈反弹，让罗伯特·达德利终生不得娶女王为妻，届时就算他并没有这么做，但多数人依然会认定他是弑妻凶手。塞西尔这么大胆的举动，就是为了避免达德利与女王成婚。最讽刺的是，弑妻原本能让宠臣达德利恢复自由之身，步入皇室婚姻中，但现在却成了他达成目的最大的绊脚石。

夸德拉大使在震惊中听完了国务大臣的话后，认定没有不相信他的理由，并试着与女王谈论此议题，尽管女王至今从未采纳过他的意见。但就在他谒见女王之前，发生了更重要的事情。

* * *

传统上称作“圣母集市”的活动，于九月八日星期天正式在阿宾登展开，艾咪·达德利让所有的仆人都去放松一下。不知为何，她非常坚持仆人们该去市集逛逛，尽管有些人认为，周日不该是逛市集的时候，但她却坚持要仆人们遵从她的命令。尽管如此，欧丁赛尔太太却冥顽不灵，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去那种要和许多下人与粗人摩肩接踵的地方。对此艾咪感到愤怒不已，但欧丁赛尔太太只说，若她去逛了市集，库姆纳宫便空无一人，没有人能和艾咪一起吃饭了。艾咪生气地反驳，表示反正欧丁赛尔太太并非她的仆人，她想怎样就怎样；无论如何，欧文老太太可以和她一起吃饭。事情至此，欧丁赛尔太太便回房，而艾咪的其他仆人则前往阿宾登的市集。

上午十一点左右，艾咪与欧文老太太的午餐时间到了。库姆纳宫并非空无一人，因为除了欧丁赛尔太太外，佛斯特太太当时也在，这两位太太的仆人们也都还在。但库姆纳宫相当安静，每个人都留在自己的房里。

当天，当艾咪的仆人游览结束返回库姆纳宫时，看到了令人震惊又困惑的一幕，艾咪·达德利的尸体冷冰冰地躺在房间通往大厅的石梯尽头，脖子整个扭断。后来《莱斯特协会公报》表示她的帽子与服装依然完整，丝毫不紊乱，但这项指控并没有任何当时的记录支持佐证。同一位作者则指出，艾咪的遗体应该是在“另一个阶梯”才对，例如中间有平台的阶梯，就和当时的其他证据相符合。

他们马上派遣一名叫鲍尔斯（Bowes）的男仆前往温莎古堡通知达德利。隔天早上，仿佛巧合般，他在路上遇到达德利家的重要干事托马斯·布朗特（Thomas Blount），当时他正朝着反方向前进。布朗特之墓至今仍在基德明斯特基督教会。他是达德利的远亲，有时会帮达德利夫妇传递口信；那天早上，达德利派他从温莎古堡去库姆纳宫跑腿。

鲍尔斯告诉他主母“摔下楼梯”不幸已死的消息时，他并没有回头，反而决定继续朝库姆纳宫前进，没有加快脚步，甚至还在阿宾登的一家旅馆过了一夜。他的确可能前往库姆纳宫，但他后来告诉主子，他只是想去看看“在那个乡间流传了哪些消息”。

晚餐时间，他与一位房东说上了话，假装自己是要前往格洛斯特之旅人，不经意地询问“当地的传闻”。除了不到一英里外发生的“不幸的意外”之外，这位房东也不敢说些什么。布朗特表示，艾咪家的人应该有更详细的内幕，但房东却表示这些人也不知道，因为艾咪死时，这些人全都在圣母集市中闲逛，“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知道艾咪下令要求这些人去逛市集，“她想要自己在家静一静”。

布朗特觉得事有蹊跷，但他态度十分保留，同时又想要询问房东的观点，于是他问：“民众的看法是什么？”

“有些人不愿说，有些人的想法邪恶。”房东语带保留。“至于我自己，我认为这是个不幸（意外），因为这件事竟然发生在最正直的乡绅家中：他的正直，消弭了许多人的邪恶思想。”布朗特这下明白，其他人的态度可能并不这么宽容。

鲍尔斯总算在九月九日星期一的清晨抵达宫中，却发现达德利与女王在一起，于是将消息告知两人。根据夸德拉大使的记录，当时伊丽莎白女王非常惊愕，甚至一度无语。

达德利对于妻子之死显得十分困惑。从鲍尔斯之处听闻布朗特已经在库姆纳宫，当天晚上，他紧急加派一名信使，带一封信给布朗特，指示他详查妻子死亡的内幕。

“布朗特表哥，”他写着，“这个不幸来得如此巨大，如此突然，在得到你的详细报告前，我仍会感到费解，未来会有多少邪恶的念头降临我的身上，这世界还会有多少的恶意指向我，让我无法喘息。我知道这个恐怖的世界将以各种邪恶的说法来指控我，让我怎么也洗不清，但这件事背后一定有一个真相，我请求你，就如同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爱护般，帮助我，给我片刻安宁，现在我只能信任你，信任你会用尽各种方法为我找到真相，毕竟我无法信任任何人了。”他想要深入调查艾咪之死背后的真相，而且希望调查工作“由最谨慎、最实在的人来进行，至少能就他们的知识，必须要能够彻查到底，同时依着他们的正直，能够认真诚实地进行调查工作。竟然有人能犯下这么恐怖的罪行，我的心中感到无限悲凄，因此我一定要透过这样的调查手段，向全世界证明我的清白。”

此时，达德利派遣另一位信使前往诺福克郡，向妻子的亲友们宣布死讯。艾咪的哥哥约翰·艾柏雅德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库姆纳宫，展开他自己的调查行动。

* * *

九月十一日星期二，夸德拉大使在向帕尔玛公爵夫人回报的信件中，附笔写上伊丽莎白女王已经下令，将达德利夫人的死讯公之于世，官方对死因的说法为意外致死。女王接着用意大利文向大使透露，艾咪摔断了脖子，同时强调：“一定是摔下楼梯造成的。”

臣子们对此事的反应，女王早已了然于心，因此她在第一时间下令验尸调查，同时也猜测到达德利将身陷风暴，她马上与这起意外切割，坚持要达德利离宫回去住在邱园宅邸，在那里等待验尸官的判决。

罗伯特·达德利对于这一切感到极为震惊，也对自己的未来忧虑不堪。他和多数人一样，认为艾咪是遭人谋杀，尽管对妻子之死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惋惜之情，他依然非常积极地调查背后的死因，这不单单只是因为他想要将犯人绳之以法，他还希望可以还身为主嫌的自己一个清白，排除任何共谋关系。因此他不断坚持要进行最精密的调查，他知道，证明自己无罪唯一的方式，就是找到真凶。

但空想总是比实际成果容易。九月十日，托马斯·布朗特抵达库姆纳宫，却发现等着他的不仅有主公的信，还有准备调查死亡现场的验尸官与陪审员。布朗特告知达德利最迫切的希望，要他们不择手段彻查到底。他回报主公达德利，表示承审法官“尽管是个乡下人，但在我见过的人之中，算是聪明有能力。我对他们的调查行动有信心，就算有任何缺失，也能表现完美，和他们的聪明才智一样。我听说调查小组中，有人与安东尼·佛斯特为敌。因为他们的智慧，上天让他们产生歧异”。坊间则早已出现传闻，指佛斯特是达德利的共谋。

接着，布朗特与住在库姆纳宫的人士，讨论这场悲剧。但他唯一能向达德利回报的，就是这些人说的都和稍早前房东说的一样，宣称

女主公“非常坚持要她的仆人们都去逛市集，借口想要留下的人都会引发她的怒火”。于是他又重述了一次达德利夫人与欧丁赛尔太太之间的争吵，显然，仆人们也认为，艾咪当天的行径不太像她自己。布朗特写道：“主公，尽管我才来到这里不久，但听到她的各种行径，让我不得不认定她是一个心智怪异的女人。”

布朗特特别侦讯了艾咪的侍女普戈太太，“她似乎非常爱护女主公”，而且当询问普戈太太对此事件的看法，是意外或谋杀时，她表示打从心底认为是意外，绝对不是遭到谋杀或自杀。达德利夫人品行优良，是个贞洁的妇人，每天都会潜心祷告，普戈太太常常听到她不顾一切地向上帝祈祷。“但我想，她心中可能还是有邪念。”换句话说，她也有可能自杀。

“不，亲爱的布朗特先生，”普戈太太赶紧说，“请别这样评断我的话语；如果你一定要如此猜测的话，我很抱歉自己透漏了这么多。这起事件的始末，已然超出人的评断能力了。”在那个年代，自杀被视为道德上的罪，将受到永恒的诅咒：绝对是绝望到了尽头，才有勇气做的事情。布朗特似乎觉得，普戈太太并未否认艾咪自戕的可能性，但对于她向他透漏了这一点，却感到十分懊悔。而布朗特本身显然也认为不能排除自杀的可能性，因此他在写给达德利的信件中断言，达德利应该转忧为喜，因为他是无辜的，相关调查很快就会证实这一点，“那些怀抱恶意的人很快就会散去”。

验尸官正在进行调查工作时，女王减少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机会，大多时间都关在房中，隐藏她的焦虑不让臣子们看见。几次出现时，她都显得苍白又激动。

至于在邱园这边，达德利也焦虑得发愁，为即将揭晓的调查结果，感到激动又无助，宫中流言漫天，他的政敌则擅自揣测定论，坐看达德利发愁。达德利发现日日赋闲在家也是一种折磨，因为他有幸

得以见客，可以听闻到各种传言，其中一位访客是他的裁缝师，来为他定做丧服。他最害怕的，不是永远成为弑妻案最大的嫌疑犯，尽管这已经是够严重的后果，他最怕的是女王再也不愿意见到他。和已婚男子小小暧昧是一回事，但与臭名昭彰的弑妻凶手牵扯不清，又是另一回事了。

布朗特的信在十二日送交到达德利手上，此时威廉·塞西尔竟也意外来访，自从宠臣达德利被踢出宫的那一天起，女王对塞西尔的态度便恢复了：此时宫廷陷入了危机，女王自然必须向最睿智又值得信赖的国务大臣征求意见与支持。塞西尔掩饰胜利的快乐，既然来到了达德利家，他表示自己的目的，是要向达德利阁下表达最诚挚的哀恸，此行大多数的时间，他都喃喃说着一些那个年代的风俗与礼仪规范下的陈腔滥调。

达德利为塞西尔的挂心所感动，并对他的支持感激不已，于是他赶紧提笔写信，感谢政敌表现出的宽容，并且要求塞西尔帮忙向女王询问是否能让他回宫：

感谢阁下来到寒舍，阁下展现出的友情，我将没齿难忘。当然希望阁下能再度大驾光临，但我更希望能与您一起在宫中共事。我只能奢求您给我点建议，觉得我该怎么做最好。若您有疑虑，我请求您，帮我了解我何时能（离开邱园）回到宫中，我将感激不尽。对于我的态度突然大转变，我感到抱歉，但我已经回到邱园一段时日，梦中想起过去，那多么遥远啊！与我心之所向距离多么遥远！请你帮我求得我的自由，脱离此等束缚。请勿忘我，就算无法见面，我也会记得您的恩惠，不会令阁下失望。

同一时间，达德利回信给托马斯·布朗特，要求他提供最新消息：“除非我得到你的消息，知道事情的真相，不然我无法平静。”接着他写信给验尸官的陪同人员，要求他们尽其所能地详查，不要惧怕也不要偏颇。

九月十三日，布朗特捎来令人振奋的消息，调查人员找不到“推测为加害的理由。若我的判断是对的，我认为事件应该稍息了”。此时，布朗特显然认定“此事件是不幸的意外，再没有别的原因”。正在等待判决的达德利因而提笔写信给陪审团主席史密斯先生，想要了解一点官方调查的进度。但史密斯先生却含糊其辞。

在这段时间，达德利先生收到了妻舅亨丁顿伯爵寄来的慰问信，上面写着：“透过信件，听闻了您妻子的不幸。尽管如此，但这不啻是一件好事，让一个痛苦的人变得开怀，从有限的生命升华为不死之身，从惴惴不安的生命中，总算得以安宁，只要敬爱着神，他将会为我们选择最好的道路。”这些都是对痛失亲属者常用的话语，也不难看出，艾咪的家人对于她死亡的消息，抱持着一种从痛苦中解脱的态度。

达德利受到的折磨，并没有笼罩他太久：几天后，验尸官宣布艾咪的死因为意外身故——我们并不知道正确的判决用语，因为这起调查的所有文件都已不复存在。一名顾问表示，女王方面认为这份判决不容置疑，至于塞西尔与其他臣子，包括罗伯特·达德利的妻舅、亨利·西得尼爵士看法也一致。

但对达德利本人来说，这样还不够。他希望调查结果能找到杀害艾咪的凶手，还他清白。他认为此事件可能还有让人另作他想的空間，因而十分忧虑，于是他提名第二位陪审员进入陪审团名单，让调查行动持续进行。然而女王明显地宽心许多，她认为一次调查行动便已足够，尤其是验尸官早已宣告达德利与此意外完全无关。女王毫不犹豫地将达德利召回温莎古堡，恢复了对他完全的宠爱，同时清楚表明，对她来说此事件已经落幕。但为了表达尊重，她要求宫廷上下为艾咪·达德利致哀一个月。

然而，其他人对于达德利是否无罪，就不是这么肯定了。大多数的人都对他妻子之死感到震惊不已，但少数人却不太意外——毕竟流言纷飞。多数人都认为，呈在法官面前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女王的宠臣无罪，意外事件“背后真正的真相”正等待世人去解开。九月十七日，一位大名鼎鼎的清教部长托马斯·列佛（Thomas Lever），他是柯芬特里教区牧师，也是舍伯尔尼医院院长，写信给地方议会，通知他们“在英国的这个地方”，到处充满了“对达德利夫人之死，严重又危险的臆测与怨言，请务必要进行最彻底的调查，找出背后的真相”。

尽管达德利厚葬了夫人，民众的观感依然持续。许多人认为达德利夫人的遗体，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被埋葬在库姆纳宫附近的教区，但因为教堂资料遗失，已经找不到证据。九月二十二日，艾咪的遗体静静躺在牛津的格洛斯特学院，就在那里，就在那天，她在牛津的圣玛丽教堂下葬。女王派了好友诺利斯小姐代表她出席。达德利并未参加太太的丧礼，因为当时英国的惯例，规定追思的人必须与死者同一性别。一五八四年时的《莱斯特协会公报》，指称丧礼中的牧师在演说中提及“这名女子遭到谋刺身亡，令人惋惜”，然而现代留存资料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到了二十世纪，有人寻得艾咪·达德利的棺木，将其掘出，开棺验尸，但却只看到一堆灰尘。

在达德利夫人死亡到丧礼前的那段令人忧虑的日子里，夸德拉大使发现，想要得到进一步的消息难上加难。宫中的臣子都不愿与他说话，他只能听到一些毁灭性的流言和古怪离奇的臆测，因此他与当时许多人一样，心中笃定认为女王与这起谋杀脱不了关系。“可以确定的是，这起案件背后必充满耻辱与丑恶。英国接下来可能因此发生革命。英国女王将沦落到伦敦塔中，而亨丁顿伯爵将可望坐上王位，他也是个异端分子，背后有法国的团体支持他。”显然，若伊丽莎白女王此时下嫁达德利，将会让自己陷入莫大的灾难之中。至于达德利，

在艾咪死前就已经有流言蜚语指称他会谋杀妻子；可想而知，多数人都无法接受她是意外身亡的答案。

* * *

艾咪·达德利究竟是怎么死的？

她的死因是颈椎被扭断，这一点毋庸置疑。她被人发现死在楼梯底下，最容易的推论，就是因为她摔落楼梯而被夺走性命，达德利的支持者则断定，这是上天的决定。但在当时就有人表示，艾咪摔倒的那个阶梯实在太短浅，不可能造成致命的伤势，因而许多人揣测，一定是有人怀着恶意，蓄意将她的脖子扭断，然后将她的遗体置放在楼梯底下，让这起死亡事件看来像是一场意外。就如同我们所见，她的丈夫是主嫌。[\[1\]](#)

《莱斯特协会公报》公开指控达德利为杀人凶手，断言他肯定是买凶杀人，并指称一位叫作里查·佛尼（Richard Verney）的人就是凶手。里查·佛尼是欧文老太太的外甥，过去曾是达德利的男侍，对达德利忠心耿耿。《莱斯特协会公报》断言，里查·佛尼在达德利的“命令”下，在（九月八日）当天都与她（艾咪）独处，另外还有一个人命令家中所有仆人都到两英里外的市场去。但这个推断是错误的，因为命令仆人们离开的人是艾咪，而且他们是去参加市集。尽管如此，这位无名作者依然主张佛尼与那个和他同伙的男子，“绝对知道艾咪是怎么死的”。这可以说是便宜行事，当时佛尼因为“对着我熟识的一位受人尊敬的人”胡言乱语一些邪恶的事情而早已经葬身伦敦，另外那位神秘的共犯，则是因为其他罪行而入狱，最后因为企图“公开”艾咪之死背后的真相，而在狱中惨遭杀害。

如此一来，几乎难以确定事件的细节，因为各项事证都模糊不清。九月八日那天，佛尼的行动与行踪也难以追溯。当年，能将佛尼

与达德利名字相连的记录，要回溯到前一年四月，达德利派人去找佛尼，但佛尼无法过去，因而提笔写信解释并道歉。他在信中提及：

“未来有机会为您效力，或是您有任何吩咐，我将会竭尽所能，全力为您达成使命。”太过深究这些文字背后的意义，是非常不明智的。

当然，佛尼的阿姨欧文老太太，也有可能秘密参与了这场谋杀；当天只有她与艾咪一起用餐，她也可能是艾咪生前最后一个见过她的人。艾咪命令仆人们去市集时，也许早就已经与欧文老太太约好午餐了。欧文老太太是不是想方设法说服她让两人独处呢？艾咪对于欧文老太太在家，却没有因此生气这一点，可能是关键。

当时的艾咪显然急躁着要摆脱所有的仆人。她是不是有秘密访客呢？这个访客是不是丈夫派来要讨论婚姻失效的问题呢？当年英国盛传两人婚姻走到这个地步，以及考虑到谣言可能造成的伤害，罗伯特·达德利自然也会坚持要艾咪私下接见访客，也许还有谨慎的欧文老太太在旁见证或陪伴。抑或是有人误导艾咪，让她以为有访客前来，但背后其实是一桩精心设计的阴谋？另外，我们也预期得到，她在如此忧郁的情绪下，加上可能缠身的疾病，她非常渴望平静与安宁，她只是想在没有仆人干扰的情形下，向某个热心的朋友吐露这样的忧虑。

当然我们也要将欧丁赛尔太太的行为纳入考虑，她坚持顽固地不想去逛市集，简直令艾咪苦恼不已。她是否与伤害艾咪的人连成一口气，或甚至与欧文老太太联手呢？毕竟我们对这两个女人不甚了解，她们是否可能协助共谋完成谋杀呢？欧丁赛尔太太是否负责让佛尼进门，同时欧文太太忙着让艾咪留在餐桌上，又或许一边玩着西洋双陆棋？（据传这是她死前最后玩的游戏）这些问题只是揣测与理论，也都找不到答案。

若艾咪是先遭到杀害，接着才被摆放到楼梯底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库姆纳宫在解散修道院时期改建为一位男子的宅邸时，进行了许多修建工程，许多门都被封闭起来。在艾咪死后不久，曾出现这样的传闻，认为她被人说动——至于是谁，没有人清楚——住在一间在床头后方有秘密通道的房间。传闻中，杀害她的凶手就是从这个秘密通道来到房里。但也有可能是在她与欧文老太太用餐时，杀手便来到她的面前。

艾咪逝世一段时间后，安东尼·佛斯特因为贴心服侍罗伯特·达德利，因而分别在十五个郡获得土地，佛斯特甚至买下了库姆纳宫进行改建。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有不少人相信，佛斯特是达德利谋杀妻子的共犯，这些就是他的报酬，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证据。一五七二年佛斯特死时，达德利从他的后人手上买回这间房子，而这桩买卖也在佛斯特的遗嘱中提及。为什么达德利想要买下拥有这么多黯淡回忆的库姆纳宫，没有人清楚。

许多人，像是布朗特，都将艾咪之死归咎于自杀。她一直有忧郁倾向，而且她的女仆说，死前艾咪的情绪已经到了最极端。长期遭到达德利的忽视，加上达德利与女王公开出双入对，可能都与她的忧郁有关，但也有可能是艾咪的乳癌已经发展到最末期，终日面对无尽的痛苦，也为她带来情绪上的创伤。因此，她自杀的假说的确有一定的可信度，也解释了当日她为何匆匆将仆人赶出屋外。

当时没有人认为艾咪是自然死亡，但从一九五六年以后，依恩·艾尔德教授（Professor Ian Aird）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后，许多现代的历史学家便开始相信这一点。艾尔德教授认为，艾咪罹患乳癌的可能性非常高；“她的乳房患了病”这样的说法，于一五五九年四月份，第一次由夸德拉大使提及。这个疾病在逐渐发展之下，因为癌症的侵蚀而突破原本的肿瘤范围，顺着血液沉积在骨头上，因而会让百

分之五十五的患者骨质变得脆弱，尤其是脊椎会变得非常易碎。因此，若艾咪的乳癌已经来到末期，只是走下楼梯稍微使一点力，就有可能不经意地造成脊椎断裂。但就算这个推论是正确的，却也无法解释，死亡当天艾咪不寻常的举动。另外一个更罕为人知的现代推论，也是一样，这个理论认为她罹患主动脉瘤，心脏附近的大动脉不正常扩大，导致胸部疼痛肿大与心理失常——包括忧郁症与突发的愤怒，主因是大脑血流不稳定所致。突然轻微增加的压力，也可能造成动脉瘤破裂，让患者瞬间死亡。就艾咪的案例而言，因此而摔倒，也有可能让她跌断了脖子。

无论是否自然死亡，艾咪·达德利之死显然便宜了许多人，但最讽刺的是，得利的并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既得利益者。大多数人认定，她的丈夫为了与女王双宿双飞而杀了她，这一点他的确有动机。但就连他这么迟钝的人，都没有笨到以为自己逃得过制裁，若她真的罹患癌症濒临死亡，他只要袖手旁观便可。在她死亡的前一天，伊丽莎白女王恰好告诉夸德拉大使，达德利夫人死了，或是快死了。若伊丽莎白女王涉入此阴谋中，在她确定受害者已死前，她显然不太可能提前让受害者曝光，甚至也不可能提到她——毕竟女王是如此聪明睿智。但若是达德利告知女王两人见不得光的日子即将告终，女王主动谈及此事的行为就显得合理了。女王与达德利在接到消息时的反应显得十分震惊，而且感到困惑，同时两人也都尽可能地要求艾咪之死经过彻底通盘的调查。

达德利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洗脱罪名，针对的是人们的闲言闲语，这一点不难理解，而且事实证明，他非常清楚此事件可能带来的后果；此外他也知道，若没有一个合理的解答，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灾祸。他的妻子自然死亡，对他最有利，许多事证也显示，达德利夫人离死亡也不远了。因此达德利显然不会甘冒如此大的风险杀害她，或让她的遗体成为谜团的风暴中心。

女王并没有插手调查过程，但可以理解的是，她可能在判决出炉后开始想展开损害控制，毕竟调查结果并未阻止可畏的人言，甚至因为她与达德利关系匪浅，而开始用想象判她的罪。现在达德利已恢复自由身，若女王真的曾想过要嫁给他，此刻她也无法在步入婚姻的同时，保有她的王位。许多臣子们都知道，目前为止她一直是婚姻的逃兵，他们认为达德利夫人之死，对她并非好事，毕竟罗伯特·达德利可能开始认真追求她，就算她爱着他，可能也不想这么快就放弃自由之身。这场僵局可能造成冲突，原本女王享受来自各国追求者相争求爱，当碰上了她心仪的对象时，这场爱情游戏可能就无法进展得一样顺利。

实情是，根本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能够指证女王与达德利涉入达德利夫人死亡案。但除了麻烦与不名誉之外，他们什么也没得到，一片认定他有罪的声浪，让达德利痛苦得发狂，直到死亡那一天。

* * *

但有一个人因艾咪·达得利之死而得利，那就是威廉·塞西尔。达德利夫人死亡的消息一出，他随即恢复往昔地位，而对手达德利则遭到宫廷的放逐，当他前往邱园拜访达德利时，他早就胜券在握，风水轮流转，现在他居上风。在这样的状况下，当然也就能表现出宽大为怀的精神。

在一五六〇年的权力斗争中，塞西尔有最强的动机置艾咪·达德利于死地。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若艾咪·达德利如一般人所料死得离奇，质疑的矛头将无情冷酷地射向她的丈夫——而这个目的自然也达到了。塞西尔当然也知道，伊丽莎白女王的内心是如此保守，绝对不可能为了一个名声有污点的男人，甘冒赔上民心与王位的风险。

一五六〇年九月，塞西尔看见达德利逐渐得势，自己的未来却逐渐崩解；他不仅害怕经过多年的努力及对都铎王朝的忠诚后，自己却仍失去优势；同时也忧心英国的未来与圣公会新法。若女王与达德利结发，她在位的时间恐怕成为难以挽回的颓势，最终甚至可能导致她遭废位；或更糟的，让外国势力介入，以天主教徒玛丽·斯图亚特取代她。塞西尔早已警告过伊丽莎白女王，她正一头栽入灾难之中，但女王丝毫不听劝，让他为她担心不已，担心她可能下嫁达德利，破坏塞西尔如此努力才得到的成就。因此，威廉·塞西尔可能因此决心走向一条不幸的道路，逼迫女王停下脚步深思，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塞西尔非常实际，也爱管闲事。最有可能的状况是，当他听闻达德利与女王漏了口风，表示艾咪病得非常重时，便决定尽快采取行动：让人们以为艾咪遭到谋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塞西尔并非心狠手辣，也许他认为艾咪本就因疾病的痛苦而濒临死亡边缘，而缩短她受苦的时间也算是一种怜悯。因此在决定计划后，他便在九月八日早上告诉夸德拉大使，伊丽莎白女王与达德利说的不是事实：艾咪·达德利其实好得不得了。他知道，接下来他说的话会传遍欧洲，他透露达德利密谋弑妻，于是在事发之前，便埋下了怀疑的种子。他请求夸德拉主教劝阻伊丽莎白女王嫁给达德利的想法，但此后当然不需要这么做，而夸德拉大使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若库姆纳宫中有同谋，对塞西尔来说就更轻而易举了——也许是欧文老太太，也许是欧丁赛尔太太——随便托词，在八日中午将艾咪留在家中。既然她的健康情形不佳，塞西尔雇用来的杀手，不消多少时间就能扭断她的脖子，将尸体置于楼梯底下。塞西尔不常寻求暴力手段，但他也许认为这个方法带来的益处，可能不仅是公平而已。

当然，以上理论都没有直接证据能佐证，但实情就是，塞西尔的确有动机谋杀艾咪，而且在艾咪死后，得利最多的就是他。然而他是

个爱国人士，致力于服务国家，他想必认为英国与女王才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1]. 事发后，艾咪·达德利同母异父的哥哥——约翰·艾柏雅德曾扬言他手上握有妹妹死亡的秘密线索，但是因为顾虑到当时已成为莱斯特伯爵的前妹夫达德利，所以才将消息压制下来。这句话似乎暗藏玄机，颇耐人寻味；但他的动机很明显是为了钱，可能是想要达德利付他一笔封口费，或者是想从达德利的政敌那边拿到一些好处。一五六七年，约翰·艾柏雅德怀疑这是一场骗局，便向佛里特监狱要求提出有关达德利夫人死亡的相关证据；而委员会也提供了一份验尸官的报告复本给他。最后，他很快撤销了控诉，并且宣称他非常满意这份调查，而他妹妹的死亡纯属意外。——作者注

6 无耻肮脏的传闻

关于达德利疑似弑妻的传闻迅速蔓延开来，传到全国各地的教士耳中，宗教人士“反复散布流言，几乎要危及女王的尊严与对女王的忠诚”。

很快，欧洲方面也出现耳语。十月六日，尼可拉斯·瑟洛摩顿爵士从巴黎致信给塞西尔，要求要了解艾咪·达德利“离奇的死亡事件”。其实在法国宫廷中，这件丑闻早已传了开来，法国方面甚至下了极度不堪的定论，在写给北安普敦侯爵的信件中瑟洛摩顿爵士透露：

这一刻我希望我死去，便不用听闻关于女王这些下流不名誉的丑闻，让法国的贵族们喜不自胜，认为自己总算成功地贬低了英国国格——不让欧洲继续传述女王等人的事情，那会让我头发倒竖、怒火中烧。有人耻笑我们，有人威胁我们，也有人辱骂诋毁女王。甚至也有人说：“这是什么样的宗教，让一个臣子弑妻，君主不仅不追究，甚至还想嫁给他？”若无法消弭这些谣言中伤，或证实传闻为真，英国国格将从此被践踏在地，各国兴战，最终推翻女王与英国王朝可能势在必行。

尼可拉斯·瑟洛摩顿爵士表示，女王的传闻让他的心在淌血，因此为了英国的安全、尊严及女王的名誉，他祈祷女王千万不要忘记这一切，贸然下嫁达德利——英国其他的驻外使节也有同样的心声。

托马斯·伦道夫则从爱丁堡来信，表示自己“心中无限难受，从未感到如此巨大的悲伤”。十月底，对法国宫廷贵族的毒舌感到厌烦

的瑟洛摩顿爵士，认为时机恰当，应该告诉塞西尔，法国王室普遍认定艾咪·达德利是遭到丈夫杀害；玛丽·斯图亚特则恶毒地表示：

“看来英国女王即将嫁给帮她养马的下人，这个人为了娶她还杀了妻子！”因为知道大多数的人都认定伊丽莎白女王是这起谋杀案的共犯，因此瑟洛摩顿爵士强调“停止艾咪·达德利死亡案的调查，对女王的尊严有多深远的意义”，同时提醒塞西尔：“谣言已经让我们快要成为笑柄和憎恨的对象，这件事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若这种情形真的发生，神与宗教，我们国家的基础将不再受到尊重，女王与国家的声誉将遭到败坏、谴责与忽视，国破家亡，成为列强的嘴边肉。”

欧洲各地对此事的谴责声浪纷然四起，许多人甚至认为达德利已私下与女王成亲。德国的新教君主更是惶恐，过去他们将英国视为盟邦，但现在伊丽莎白女王却不顾一切地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夸德拉大使向瑟洛摩顿爵士表明：“阁下的女主人伊丽莎白女王是个自重的女人，却不太尊重王权，现在也将不再有人建议她摆脱此愚行。”没有人敢要求她放弃达德利。尽管女王知道各界对两人的流言蜚语，但除了愤慨外却采取无视的态度，尤其在瑟洛摩顿爵士派遣秘书罗伯特·琼斯（Robert Jones），要求议会想办法对法国方面的流言采取行动，同时希望可以劝阻女王下嫁达德利时，更为明显。

看在琼斯眼里，他认为女王看起来“一点也不沉重，也不认为这是重大事件。但罗伯特·达德利发生了这件事，她的确甚感困惑”。她告诉琼斯此行无意义，但他却不顾一切地持续尝试说服女王下嫁达德利有多愚蠢，而只惹得女王暴怒并表示：“这我已经听过了！”当他再度向女王提及达德利家族与诺森伯兰家族七年前试图另立珍·格雷为王的阴谋时，伊丽莎白女王却嘲笑他。绝望之余，他只好透露法国王室对女王与达德利的看法，但女王却轻描淡写地表示：“此事已经过审理，显然传闻内容与事实不符。”当妻子死亡时，达德利人在

宫中，他的手下也全都“没有试图进入他妻子的住所；事情已经发生了，请不要影响我的臣子与我的尊严”。

伊丽莎白女王所说的“试图”被许多人视为一种证明，认定她也不相信调查结果意外死亡，或甚至更糟的是，可能是她说溜了嘴，达德利夫人之死，她可能知情。但也有可能是听到琼斯回报的法国宫廷传言后，在未经思考之下脱口而出的响应，只是假设艾咪之死可能是人为。再者，女王提及“他妻子的住所”，此事可能不尽正确，但当时她怒火中烧，说话时可能并未拘泥细节。

但流言似乎永不止息。传闻直指女王早已私下许配给达德利，或甚至大胆揣测她已珠胎暗结。时间早已证明这些流言的虚假，但艾咪·达德利之死仍继续遭到夸张渲染，最后甚至成为乡野传奇。在十六世纪末时，达德利的政敌多次试图搬出这件丑闻，每次的细节都被形容得更丑恶。就连伊丽莎白女王的继位者上任后，伦敦的一出戏剧中都提及此事，台词写着：“要一个女人闭嘴最好的方法，就是扭断她的脖子；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做的。”几世纪后，在华特·史考特（Sir Walter Scott）的虚构小说《凯尼尔沃思古堡》中，艾咪·达德利之死的谣言几乎完全被神化，作者将艾咪死亡的时间定在一五七五年伊丽莎白女王走访凯尼尔沃思古堡时，然后以最扭曲的阴谋诡计来描写这个事件。直到今天，乡野间都还流传着有人要神职人员到库姆纳宫中，为一个水池驱魔，据说那个水池被艾咪·达德利可怜的鬼魂纠缠。

* * *

是年十月，英国宫廷结束了追悼仪式，有关女王是否将与达德利成婚的流言四起。“对这些人来说，作最坏的打算才是明智之举。”夸德拉大使这样告诉帕尔玛公爵夫人。只有萨赛克斯伯爵鼓吹支持这段婚姻；虽然他非常憎恨达德利，但他十分忧心王位继承问题，他认

为对女王来说，随便找个丈夫，都比没有丈夫来得好。然而并没有其他人支持这样的观点。

流言蜚语之外，若女王决心让达德利做她的配偶，那就是将自己隔离在欧洲的婚姻场域之外，断绝自己透过婚姻关系，为英国带来政治经济利益的机会；就算走到这一步，要重新考虑与查尔斯大公或艾伦侯爵大婚，让自己远离达德利，也不算太晚。最重要的是，对她来说，婚姻是她手上最大的王牌，透过这个手段，她可以让欧洲各国的贵族对英国亲善友好，平衡欧洲势力。

达德利究竟适不适合做个丈夫，也有其疑问；在他妻子去世之前，他便已处处不受欢迎，若女王下嫁臣子——这件事可能会在宫廷中引起心结与派系内斗，甚至引发内战，让大众对宠臣的负面观感更严重——就世界的观点而言，她等于是贬低贵族的身份。

在一五五四年丈夫遭到斩首后，女王的表亲萨福克公爵夫人嫁给了管家亚德利安·史卓克斯（Adrian Stokes），最后却蒙羞，地位尽失。伊丽莎白女王非常在意自己至高无上的王权，她认为自己的地位崇高，绝对不愿贬低自己。尽管爱达德利至深，她也知道达德利的地位没有资格成为自己的伴侣。

最重要的是，若嫁给达德利，她会招致不少危险，并违背她过去厌恶婚姻的宣言。维持独身，她便能掌控全局，在这段感情上占上风；一旦结了婚，两人之间的角色关系将对调，就算她是一国之君，伊丽莎白女王依然将失去独立地位视为畏途。除此之外，若她不嫁给达德利，就可以证明传闻所言不真，让自己远离丑闻风暴。

对个人来说，从丑闻事件爆发以来，伊丽莎白女王对达德利的感情丝毫不变。当他重返宫廷时，两人之间仿佛从未发生任何事情，流言八卦丝毫也不能让两人动摇，罗伯特·达德利就和往常一样骄傲有

自信。死因调查正式还他清白后，他已经成为自由之身，他认为自己追求女王没有丝毫不妥。他的行为让关于两人将结婚的传言不减，在此同时，另一派的揣测出现了，有人认为女王即将宣布接受异国婚姻。伊丽莎白女王最喜欢成为他人讨论的焦点，针对这两项传闻，她一如往常地不置可否，令人难以捉摸。

塞西尔的信心与日俱增，他认为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过去几周来，伊丽莎白女王情感上的挣扎，他都看在眼里，但他知道政治上的判断，对女王来说比以往更要紧，尽管她并不想缺少达德利的陪伴，但她已经不可能嫁给达德利了。塞西尔非常清楚，任何对达德利意有所指的批评，都不受女王欢迎，因此他很聪明地不用过多的建议来增加女王的负担，而是给她更多时间去思考各种选择。

他也去信提醒瑟洛摩顿爵士，停止向女王施压，因为他早已发现诸侯多次向女王表明，罗伯特·达德利并非适合的伴侣人选，但却只是让女王勃然大怒，让她更加决心宠爱并保护他。凯瑟琳·艾希莉的丈夫最近的一席话贬低了达德利，伊丽莎白女王则在一怒之下将他赶出宫廷，随之而来的是艾希莉太太只好向达德利哭诉，并说服他帮忙向女王求情，让丈夫回宫。

伊丽莎白女王的确感到心碎，但她意识到自己对王权的责任与义务，于是在进行决策时，她的理智依然凌驾于情感之上。但要做出决定也并不太困难：达德利身为已婚男子，比起恢复自由后，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吸引力更多，威胁更少。在瑟洛摩顿爵士与其他臣子们为未来忧心的同时，她的心中已悄然做出决定。

到了十月十五日，塞西尔向夸德拉大使透露，女王已经向他表明绝对不会嫁给达德利。十一月时，女王宣布将拔擢达德利晋升贵族地位；其实达德利一直纠缠着女王要求提拔，女王才不情不愿地答应。于是便开始起草英王制诰，直至授予爵位那一天，根据罗伯特·琼斯

的说法，女王做了一件震惊四座的事情，也让达德利惊吓不已，女王拿起一把剑“将圣旨划成碎片”，表明因为达德利家族三代以来都是叛国贼，因此上议院中再也不能容忍达德利家族的人存在。这显然不是冲动而做做样子，而是女王精心策划，要向全世界——以及达德利——宣告，伊丽莎白女王非常在意民众观感，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下定决心绝不嫁给达德利。

达德利怒视着女王，哀求她不要在众臣面前辱骂他。女王却只是拍拍他的脸颊，揶揄地表示：“不，不，熊与粗木的后代不会这么快被抛弃。”女王这一席话，意指达德利的父亲与兄长在担任华威伯爵时的徽章图案。女王这一大动作很快地传了开来，臣子们看见达德利的挫败一片欢欣鼓舞。达德利的部分朋友与支持者，试图要说服女王抛下一切顾忌嫁给他，但她却“啐了一口”，表示自己绝不可能嫁给臣子。当这些说客们反对，并提议女王可拔擢达德利为王时，她的回答是：“不，若我答应你们，便是不智之事。”她曾暗示将在主显节时立达德利为莱斯特伯爵，但随后马上改变心意，同时决定此事现在不宜。

从此之后，在每次的爱情游戏之中，伊丽莎白女王便不曾再让个人情感破坏自己的理性。她再清楚不过，无论何时，只要她放弃了身为女王的道德与权威，就会失去尊重与威信，甚至失去王位。至此雨过天晴，十一月都还没过，罗伯特·琼斯就发现相关传闻已几乎要消失殆尽。达德利依然在女王身边，两人有实无名，但伊丽莎白女王已然掌控全局。她拥有达德利的陪伴、忠诚与他的鼓舞。让人不得不认为，其实她想要的从来就不超过这个界限。

* * *

然而，此时，另一个宫廷丑闻正悄悄成形。尽管伊丽莎白女王很不想承认，但在亨利八世的继承法中，凯瑟琳·格雷小姐竟是伊丽莎

白女王身后的继任人选。

凯瑟琳小姐是格雷三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现已年届二十岁。女王向来就不喜欢她，甚至将她和姐姐玛莉·格雷小姐，从寝宫侍女贬为谒见室侍女；无论凯瑟琳小姐如何抗议都无效。她是个野心十足的年轻女性，赢得连续几任西班牙大使的支持，期盼透过她能让天主教在英国复兴。尽管凯瑟琳小姐成长过程中受到新教的熏陶，但在玛丽女王执政的过程，她发现信仰天主教有机可乘，随后在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后，斐利公爵暗中策划让凯瑟琳小姐嫁给菲利普国王的儿子唐卡罗王子（Don Carlos），接着引发政变，让凯瑟琳小姐成为英国女王，这样就可以将英国纳入西班牙版图中。由此也不难理解，伊丽莎白女王为何将这个远房亲戚视为一种威胁。

在离开英国之前，斐利公爵嘱咐凯瑟琳小姐千万不能嫁人，要一直保持单身，直到斐利公爵为她与欧洲皇室缔结姻缘。然而在一五五九年初，凯瑟琳小姐与母亲一同前往密德塞克斯的汉沃斯，在索美塞得公爵夫人（Duchess of Somerset）家中做客，公爵夫人是爱德华六世时期的护国公遗孀，而凯瑟琳小姐就在此行中与公爵夫人的大儿子赫特福德伯爵爱德华·西摩（Edward Seymour, Earl of Hertford）相遇相恋。萨福克公爵夫人看在眼里，提议两人成婚；当时她已经在密谋，让其中一个女儿坐上王位，恢复家族荣耀的光景，她认为年轻的赫特福德伯爵，可以让人们忆起他的父亲，因而受到欢迎。凯瑟琳小姐一时被热恋冲昏了头，于是便开心地接受了母亲的安排。

但两人想要成亲，眼前却横亘着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由女王对待继位顺序离她最近的人态度看来，她是不太可能答应这门亲事。在一五三六年亨利八世通过的继承法中，规定凡有皇室血统的人，若在成婚前未得到统治者的同意便属通敌叛国。因此萨福克公爵夫人决定向女王请愿，然而她还来不及这么做，便不幸在一五五九年十一月因

病离世。凯瑟琳小姐实在太害怕女王，根本不敢接近她，更遑论提及此事；西班牙方面野心勃勃地想要利用她的阴谋，也已传到伊丽莎白女王的耳中，凯瑟琳小姐行事更需谨慎。

但塞西尔却意外发现她与赫特福德伯爵之间的事，认为让两人成婚可以破坏西班牙的阴谋。于是他准备伸出援手帮他们一把。

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多毁灭性又无依据的传言，说凯瑟琳小姐将要嫁给艾伦侯爵，让英格兰与苏格兰王权就此结合。事情至此，伊丽莎白女王因为害怕将表妹推入敌人手中，决心不能一直排挤她，因而恢复她原本的职位，继续作寝宫侍女，同时压抑各种情绪，设法对她和蔼可亲——“才能让她闭嘴。”夸德拉大使讽刺地说。“女王甚至考虑要收养她”，夸德拉大使着重表示，凯瑟琳小姐现在可以说是女王陛下的“女儿”了。夸德拉主教也听到了部分传言，将凯瑟琳小姐的名字，与另一位危险的追求者连在一起，那位追求者就是亨丁顿伯爵。

凯瑟琳小姐对这些体面的婚姻关系，一点兴趣也没有；她时常躲过女王的监视，私下与赫特福德伯爵见面。他的姐姐珍恩·西摩小姐（Lady Jane Seymour）也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未婚女官之一，她对于弟弟有机会迎娶王位未来的继承人，感到兴奋不已，因而成了两人之间的中间人，夜夜陪着凯瑟琳小姐到西敏区肯依路爱人的家中。当赫特福德伯爵来到怀特霍尔宫时，珍恩·西摩小姐则设法让两人独处，让出自己在侍女寝室的狭小房间。也就是在这里，赫特福德伯爵秘密向凯瑟琳小姐求了婚。“我爱你，也爱你的提议。”她回答，“我愿意嫁给你。”

一五六〇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的某个早晨，女王远在肯特郡艾森打猎，这对小情侣抓住了这个机会。凯瑟琳小姐借口牙痛离开了皇室舞会，凯瑟琳小姐与珍恩小姐一同沿着泰晤士河来到肯依路，这一

天赫特福德伯爵也为了凯瑟琳小姐的到来，而支开所有的仆人。珍恩小姐安排了一位神父到家中进行结婚仪式，但神父却没有出现。珍恩小姐毕竟交游广阔，顺利找到另一位据说是天主教的神父，她自己则当唯一的见证人，结婚仪式就这样开始了。神父离开后，珍恩小姐“赶他们入洞房”，让这对新婚的恋人独处了两小时，接着才回来与凯瑟琳小姐一同返回怀特霍尔宫。一回到宫中，她们就与宫廷人士一同用晚膳，没有人料到她们到哪去了。

* * *

是年十一月，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二世的耳朵患了严重的感染。经过几周的苟延残喘，他于十二月六日逝世，接着由十岁的弟弟查理九世（Charles IX）即位。然而实权却落入新的摄政王手中，她就是王太后凯瑟琳·梅迪奇，吉斯家族随即陷入弱势中。

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守寡之时只有十八岁，她的未来悬而未决。年轻丈夫之死让她悲痛不已，但经过一段恰当的服丧时间后，没有人会质疑她再嫁的决定。同时，她也必须统治一个国家，而且没多久，王太后便开始妒忌玛丽·斯图亚特的地位与影响力，不断催促她尽快返回苏格兰。玛丽身为吉斯家族的人，让许多人争相想成为她的丈夫，但凯瑟琳·梅迪奇却全数否决，因为她知道玛丽·斯图亚特婚后将继续留在法国国内。

在英国方面，伊丽莎白女王的表亲，莱诺克斯伯爵夫人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小姐（Margaret Douglas, Countess of Lennox），听说了弗朗西斯二世死亡的消息，马上想到要推荐自己的儿子达恩里勋爵亨利·史都华（Henry Stewart, Lord Darnley）成为苏格兰女王未来伴侣的候选人。在未告知伊丽莎白女王的情形下，她要儿子前往法国表达追求之意，但这对玛丽·斯图亚特来说还太早了，她还没调适好心情接受新的丈夫。更严重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发现了莱诺克斯伯爵

夫人的诡计，当达恩里勋爵回到家中，女王立即下令将两人软禁在伦敦家中。

伊丽莎白女王自然对法国统治者轮替的事情感到戒慎恐惧。弗朗西斯二世与玛丽·斯图亚特总是不愿正式批准《爱丁堡条约》，而且一直在使用英国军徽，英法两国关系至此更陷僵局；但随后情势逐渐明朗，法国新政权显然没有兴趣也没有资源造成伊丽莎白女王的烦恼。

这一年十二月，伊丽莎白女王的皇室主管会计，垂垂老矣的托马斯·派瑞爵士也逃不过死神之手。他同时也兼任宫廷监察官的肥缺，达德利垂涎此职务已久，但一五六一年一月份，伊丽莎白女王经过审慎思考后，决定将此重责大任交给威廉·塞西尔。接着在三月份，贝德福德伯爵因此表示：“各界惯于谈论与某人相关的事件，看来已然落幕，偶尔传言会再起，但时冷时热。”

达德利显然已经开始感到自己受到冷落。塞西尔告诉瑟洛摩顿爵士：“无论何种传闻与舆论，我都已确定罗伯特·达德利此刻的恐惧多于希望，这也是女王对他的态度。”但达德利并没有放弃迎娶伊丽莎白女王的希望，他公开地招募自己的追随者。他知道女王最在意的，是西班牙方面对最近一起丑闻的反应，但他也知道菲利普二世知道伊丽莎白女王有下嫁臣子的可能，而菲利普国王自然会想要与这位臣子友好，才能在英国更加推广天主教信仰。因此，达德利大胆决定寻求菲利普国王支持他与女王的婚姻。伊丽莎白女王可能同意这个计划，甚至在背后指挥，她的动机有很多：她知道若天主教强权国家误以为她私心想要在英国推广旧宗教，就不会再煽动要将她逐出教会。

一月时，达德利派遣妻舅亨利·西得尼爵士向夸德拉大使表达他的立场，若他顺利与女王成婚，英国便将恢复天主教信仰，达德利“从那之后也愿意如下属般，听任（菲利普国王的）差遣”。西得尼

爵士向夸德拉大使透露，伊丽莎白女王对“塞西尔的专横”已感厌烦，且非常积极想要“解决宗教分歧”；他也强调“女王多么想要这一桩婚姻”，并强调若菲利普国王尽可能地说服她，重新思考嫁给达德利的可能性，等于是帮了大忙。这对一个早已自视为新教信仰胜利者的男人来说，真是一个奇怪的立场，但达德利野心至上，他并未停下脚步仔细思考：若他的诡计被拆穿，将造成什么样的局面。

尽管夸德拉大使一向认定达德利的丑闻让他不适合成为女王的伴侣，但他却从未想过，若两人成婚，英国主政的新教精英们将会在宫廷中掀起派系斗争巨浪，英国政府便不会将钳制天主教的政策放在优先地位。尽管如此，对于亨利·西得尼爵士揭露这令人吃惊的真相，他却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针对此事之所闻，我完全不敢向国王陛下提及一丝一毫，女王或达德利也并未允诺让我执笔，”他拘谨地表示，“我无法猜测女王陛下的心意，尽管我的主公总是努力想要帮忙，他的建议却一向不受采纳。”

亨利·西得尼爵士此时也不得不承认，但仍然辩称若夸德拉大使“对达德利夫人之死的真相感到确定”，他不知道为何夸德拉主教不愿将达德利的允诺回报给菲利普国王，既然女王与达德利“陷入热恋中，结婚就是最终目标了”。夸德拉大使指出，尽管达德利已从弑妻丑闻中得到清白，但许多人依然不相信他无罪。西得尼爵士也同意此事为两人成婚最大的阻碍，但同时也强调，他确信艾咪·达德利之死绝对是意外——“他非常仔细地调查死因，也清楚明白社会大众抱持着相反的意见。”

亨利·西得尼爵士继续点出，若缺乏菲利普国王的支持，不仅伊丽莎白女王与达德利的婚姻将难以达成，英国对天主教的禁令也将无

松绑的可能性。只要能够得到菲利普国王的支持，“此事将全面翻盘，女王与达德利将即刻全力投入天主教复兴的运动中”。

虽然夸德拉大使认为西得尼爵士是诚实的人，但他却无法忘怀，在查尔斯大公的联姻协商中，玛莉·西得尼小姐在伊丽莎白女王的默许下欺骗了他，因此他心存芥蒂，认为这次的事情背后一定又有阴谋。但在二月十三日时，西得尼爵士带着达德利前来，与夸德拉大使私下一会，女王的宠臣达德利亲自证实了西得尼爵士所说的一切。在这次会面后，夸德拉大使便深信不疑，于是在接下来给菲利普国王的回报中提及，要是达德利娶了女王，对天主教绝对有利。

菲利普国王也十分赞同这个计划，但他并不相信伊丽莎白女王，于是坚持要夸德拉大使在进行下一步之前，得先得到“女王亲笔签名以证实”。夸德拉大使正式谒见女王，但当他表明，对于女王考虑下嫁达德利一事感到十分开心时，女王却支吾其词。

“经过几番遁辞后，女王表示要坦诚以对，因此告诉了我她心底的秘密，她说自己并非圣人，也无法否认自己对罗伯特·达德利的感情，毕竟他拥有许多优点，虽然知道自己的婚姻大事重要性与日俱增，但女王从未想过要嫁给达德利或任何人，但为了迎合英国观点，她一定得嫁个英国人。”

“菲利普国王怎么看呢？”她问，眼里闪烁着光芒，“若我嫁给了自己的侍从呢？”

“无论您选择什么对象，主公都将为您找到归宿而开心，毕竟这对贵国非常重要”，夸德拉大使向女王保证。“我非常确定，菲利普国王陛下听闻达德利阁下有此荣幸，将会非常高兴，我知道菲利普国王对他一向关照，对他也十分尊重。”夸德拉大使补充说明，当时的

伊丽莎白女王“在以她身份地位所允许的程度内，表现出十分欢喜的样子。”

然而塞西尔对此事的发展，就一点也不开心了。三月份时，他向夸德拉大使要一份菲利普国王支持女王与达德利成婚的信。他解释道，女王并不想做出任何事情影响臣子的善意，可能会用这封信作为借口召开国会，将此作为提案。塞西尔知道，国会方面没有讨论余地，一定会拒绝菲利普国王提出的任何人选。夸德拉大使也明白，于是他转而疑心此事是要败坏天主教名声的陷阱。到了四月中旬，他的猜疑显然得到了证实，他遭人指控涉入一起天主教对付女王的阴谋；几位拒绝服从的主要人物都遭到逮捕。欧洲各国四处流传着，只要伊丽莎白女王愿意承认罗马教皇的地位高于英国教会，菲利普国王便将支持她与达德利成婚。此事引起一阵喧闹自然也不令人意外，但其实当时只有极少数的证据，能证实此阴谋的存在。最有可能的状况是，此事为塞西尔凭空捏造以中伤达德利，避免他迎娶女王。

接下来几周，塞西尔成功地在宫廷中引发反天主教浪潮。达德利很快就发现，若他与夸德拉主教接触的事情曝光，他可能将要面对丧失地位的窘况。他知道自己阴谋已经被发现，要西班牙方面正式支持他与女王成婚已经不可能。

尽管伊丽莎白女王向夸德拉大使保证，她并不认为大使涉入天主教谋叛事件，但塞西尔却持续用计为难夸德拉主教。就连夸德拉大使的秘书也被买通来监视他，夸德拉大使的信件都遭到拦截、阅读，访客则遭到跟踪与监视，同时也遭到指控，表示他在致西班牙的信件中有毁谤意图。

在沮丧中，达德利只好向友人讨教该如何是好，甚至有人建议他离开英国，到外国避居。但当女王在格林尼治宫中的房间隔壁赐给了达德利一间房时，他的情绪又大为振奋，激起了他——不幸的是，还

有其他人——遐想的空间，认为她此举是要让两人能私下享受亲密时光。对达德利来说，一五六一年的夏天，就算没有西班牙的帮助，依然是成功晋身为女王伴侣的好时机。到了五月份，他已经全然放弃与天主教方面的斡旋，自此之后，他便维持新教忠诚派的形象，甚至夸张地自吹自擂：“放眼整个英国境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我还要努力推动真正的宗教信仰。”

事实上，这一切并不如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借由操弄宗教狂热与爱国情操，达德利希望能就此表明自己是适合女王的伴侣，同时还要证明自己的影响力和塞西尔不相上下。某种程度上他的确做到了：尽管艾咪·达德利之死没有被遗忘，但从这个时期之后，人们已经不再只将他视为女王的宠臣，如塞西尔一辈的政治人物都开始认为，与达德利保持友好关系对自己有利。然而塞西尔从未停止对伊丽莎白女王可能有一天会改变心意而决定下嫁达德利的恐惧，他总是被迫祭出狡猾手段以破坏达德利的企图。

至于伊丽莎白女王方面，则让达德利——和所有人——费疑猜。六月份的一个夜晚，夸德拉大使是皇家驳船上的座上宾，女王出席了泰晤士河上一场华丽的水上庆典。“女王、罗伯特·达德利与我单独在船中，两人便开始笑闹，她对这种嬉闹的喜爱胜过了政治。他们的玩笑非常夸张，达德利甚至告诉她，只要她愿意，我就是在场的神职人员，可以为两人证婚，女王似乎一点也不恼火，她只说不知道我懂的英文够不够多。”尊贵的主教可一点也笑不出来，让两人嘲弄了一阵后，他冷冷地向女王表示，她应该要远离专横的塞西尔与其他顾问，重新恢复天主教信仰。若她能这么做，就能尽快嫁给达德利，因为在菲利普国王的支持下，绝对无人胆敢反对两国联手。伊丽莎白女王并不愿失去菲利普国王发出的善意，只好装作对他的提议兴致勃勃。

那年夏天，多数的观察家都认为，女王对达德利的爱已然“到达最高点”。尽管有消息传出，瑞典埃里克王准备动身前往英国，继续追求伊丽莎白女王，但多数人都认定，认真追求伊丽莎白女王的人，其实只有一个。而女王在看到埃里克王的全新画像后，特别为了刺激达德利而表示，若埃里克王真如画像显示得这般英俊，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拒绝得了他。

对达德利的爱感到如此安心，伊丽莎白女王甚至会口出残忍讥讽。几年后，查理九世派遣大使前来告诉伊丽莎白女王与达德利，他认为两人应尽速成婚，同时希望可以见见达德利，伊丽莎白女王却反驳：“派新郎去见这么伟大的国王，简直是太不尊重了。”接着她微笑着说：“我简直离不开罗伯特啊，他就像我的爱犬，无论他出现在哪里，人们都会认为女王驾到。”

就算达德利对女王这样的对待感到厌烦，他也未曾表现出来，多年来他也未曾考虑再娶。伊丽莎白女王大施恩惠，让达德利一直在她身边守候——一五六一年十月份，她赐给达德利一年一千英镑的抚恤金——包括有利可图的职务、特权，让他虽非官员却握有政治实权，证明女王对他的宠爱及希望。

* * *

一五六一年三月，在赫特福德伯爵前往法国执行外交任务时，凯瑟琳·格雷小姐发现自己有孕。三月二十三日，她的好友兼共犯珍恩·西摩小姐去世，死时芳龄二十，死因可能为结核病。伊丽莎白女王下令，在西敏寺厚葬珍恩·西摩小姐，但她死后便留下凯瑟琳·格雷小姐独自吞下仓促成婚留下的苦果。

她匆忙地去信给丈夫：“我就快要有孩子了。请你尽速返家决定我们两人该何去何从。”同时她还得强装笑颜，每天继续在宫中处理

琐事，并暗自祈祷不会有人发现异状。

但到了七月份，这份希冀很快破灭。当月女王预备前往东英吉利出巡，凯瑟琳则被选中要随侍在侧。当一行人抵达伊普斯维奇时，凯瑟琳对于宫中女总管异样的眼光，感到极度苦恼，因此于夜间擅自到达德利的房中求见，她知道唯有达德利能让女王从盛怒中缓和下来。她跪在达德利的床边啜泣着，将一切和盘托出，哀求达德利帮助她。达德利知道凯瑟琳·格雷小姐所说的一切，对英国王位继承将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于是她要她离开。在万念俱灰之下，凯瑟琳只好转向另一位家族老友桑特罗夫人伊丽莎白·卡文蒂希（Elizabeth Cavendish, Lady Saintlow）的房间，她从玛丽女王执政的年代起，便是伊丽莎白公主的宫女，后来她声名远播，成为大名鼎鼎的哈维克的贝丝（Bess of Hardwick）。然而凯瑟琳却只得到贝丝小姐盛怒下的言辞攻击，贝丝小姐怒指她愚蠢，并且拒绝涉入此事，以免引起女王不满。

隔天早上，达德利向女王报告她的姨甥女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在那之后，凯瑟琳小姐便成为皇室的耻辱。伊丽莎白女王认为，凯瑟琳小姐除了让英国王位继承陷入危机外，还因为软弱而屈服于内心的情感，因此就王位继承问题而言，她绝非适合的人选，而她也认定两人暗通款曲等于是对英国王权的谋叛，只是并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一点。塞西尔则认定，凯瑟琳小姐腹中那不合法的孩子，就是上帝反对格雷家族入主英国王位的象征。

八月份，宫廷人士返回怀特霍尔宫时，凯瑟琳小姐成了伦敦塔的阶下囚，而赫特福德伯爵则被召回，他承认了与凯瑟琳腹中胎儿的关系，接着便与太太一同沦为囚犯，两人被囚禁在不同的牢房中。两人遭到禁见。在九月二十四日这一天，凯瑟琳小姐生下了一个儿子，艾德华·西摩。在王位继承顺序中突然出现一名男性候选人，让女王对这对夫妻更感愤慨，担心凯瑟琳小姐生下了一个儿子会让她成为人民

心中更适合的女王人选。为了让这个婴儿无法与她争夺王位，伊丽莎白女王下令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一个调查行动，了解两人婚姻的合法性。

调查小组用严厉的态度分别审问了两位囚犯，甚至要求两人提供“那无耻的谈话”及各项证据，以证明两人并非“假结婚”，但当然都没有。唯一的证人已经死亡，而帮他们证婚的神父又不知去向。赫特福德伯爵为了遗产问题，而指凯瑟琳为妻，但她早已失去财产继承权。一五六二年，在历经几个月的调查后，调查小组宣布两人婚姻无效，因此两人所出为非婚生子女，同时因为两人“奸淫和不正当的私下婚配”，这对违法夫妻被判牢狱之灾，此举自然也合了女王的意。幸运的是，女王并未要求完全依照法律将两人以叛国罪处置。

然而凯瑟琳·格雷小姐使皇室蒙羞，意味着继伊丽莎白女王之后，她要接下王位的可能性已成云烟，这个事件也让女王更加相信，绝不能提前公布继位者。是年九月，她向苏格兰大使莱星顿的威廉·梅特兰（William Maitland of Lethington）表示，他认为臣子们“总是要求我在生前就要立下接班人”并不合理。

只是，还是有不少人对凯瑟琳小姐感到怜惜；他们认为她与赫特福德伯爵的婚姻有效，同时觉得英国政府对两人的处置“太过严苛”。他们的支持者认为，若女王完成了身为统治者的义务，结了婚生了孩子，那么用法律来惩罚这对年轻夫妇就显得多余了。

7 争议之源

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从一五五八年，便认定自己是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事实上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接下英国王位能带来的利益，因此她始终拒绝核准《爱丁堡条约》，这份条约完全断绝她在伊丽莎白女王之后，“英国王权第二顺位”的可能性。她也拒绝承认伊丽莎白为英国女王，甚至将英国军徽用在她的部队上。因为这些因素，一五六一年的夏天，伊丽莎白女王拒绝在玛丽·斯图亚特过境英国返回苏格兰时，给予安全通行权。女王后来随即改变心意，但到了八月十九日，玛丽·斯图亚特已经从法国搭船出发抵达爱丁堡的利思港。玛丽·斯图亚特回到睽违二十多年的王国，在许多方面都让伊丽莎白女王烦躁不已。除了因为她的表亲在欧洲天主教派的眼中是比伊丽莎白女王更适合的女王人选，而对伊丽莎白的王朝带来实质的威胁外，国境之北还有宗教冲突的阴影潜伏着：玛丽·斯图亚特告诉罗马教皇，她想要在苏格兰王国内重建天主教信仰。

对个人而言，伊丽莎白女王将玛丽·斯图亚特视为对手：她比伊丽莎白女王年轻，据说也较为貌美；而玛丽·斯图亚特的寡妇身份，代表英国女王不再是欧洲贵族追求的唯一对象。欧洲各国都认定玛丽·斯图亚特一定会再婚，因此她的择偶对表姑伊丽莎白女王来说，也是一大担忧，她担心欧洲的天主教强权进驻邻国。最重要的是，一个觊觎英国王位的天主教徒，距离如此近，让伊丽莎白女王感到芒刺在背。这些事情，加上两位女性执政者之间的角力，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内，一直都是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关系的焦点。

* * *

出生于一五四二年，玛丽·斯图亚特在出生一周内就继承了父亲詹姆士五世遗留下的王位，为了逃避亨利八世“强行逼迫”她成为儿媳，也就是成为后来的爱德华六世的妻子，年仅五岁的她就被送往法国，和亨利二世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也因此与王储弗朗西斯（Dauphin Francis）订了婚。童年的时光，她都在豪奢稳定的环境中成长，和表姑伊丽莎白公主的成长过程大相径庭。

玛丽·斯图亚特受的教育，在许多方面都走传统路线。她深受礼赞天主教信仰的影响，并且接受一名身家良好的女性应该要有的才艺教育与可取的知识。和伊丽莎白女王不同的是，她并不爱炫耀学识，反而喜欢弗朗索瓦·拉伯雷（Rabelais）的讽刺文学，或法国文艺复兴诗人皮耶·龙萨（Ronsard）那温文儒雅的诗句，以及拉丁与希腊沉重的文学作品。她从小就学会用法文说写，如母语般流利，但她对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只有一知半解的程度，虽然听得懂，但却无法书写。当她返回苏格兰时，她只记得简单的苏格兰文，只能与尼可拉斯·瑟洛摩顿爵士及约翰·诺克斯礼貌性地寒暄，但她仍非常努力地在语言能力上精进。尽管亨利二世想把玛丽·斯图亚特栽培成法国、苏格兰与英国未来的女王，但他一直认为让玛丽·斯图亚特学英文不太恰当，因此一直到她成年后才开始正式接触英文。

返回苏格兰国境中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从各方面看来都是美丽优雅的法国女子，会吟诵时髦的十四行诗，也懂得精美的针线活与刺绣，而她的部分作品甚至流传至今，她的字体也非常好看。她总是精心打扮，喜欢音乐、跳舞、芭蕾舞与舞会，同时精通马术。

因为在法国宫廷成长的经验，她相当世故精明。她对男人很有吸引力，这一点毋庸置疑，就连个性阴郁乖张的约翰·诺克斯都形容她“迷倒众生，令人销魂”。尽管玛丽·斯图亚特的名声很好，但她那

天生的浪漫与冲动，使她无论多么纯洁，总是勾引着男性，也因为她对人性的判断力不佳，后来都导致许多严重苦果：有些人得寸进尺，其他人则带给她深深的伤痛。更重要的是，尽管她非常懂得运用自身魅力，就连最正直的男人也无法抵挡，但提到统治国家时，她却认定另一半只能扮演她配偶的角色。苏格兰驻英大使莱星顿的威廉·梅特兰，便曾告诉托马斯·伦道夫，在玛丽·斯图亚特身上看不到伊丽莎白女王拥有的成熟判断力与政治经验。

在那个人类平均身高都比现在矮小的时代，身高六尺的玛丽·斯图亚特算是相当修长。她的体型纤细，皮肤白皙，拥有栗色的卷发与棕色的眼睛。在她偏东方风味的脸孔上，却有过长的鼻子，这都是父亲的遗传。举止仪态高雅尊贵，她已经决定要成为最亲民的统治者。她对朋友大方忠诚，因此下属们都很欣赏她。

玛丽·斯图亚特是不屈不挠的女性，十分坚持自己的信念，也有捍卫信念的勇气，但在政治这门艺术上，她却缺乏实战经验。她常任由情绪摆布，易受到心情变化的影响，而且也从不隐藏自己的感受。情势发展良好时，她快乐得雀跃不已，但挫折与压力却容易让她陷入忧郁的悲伤中，一名英国大使不得不以“病态疯狂的女人”字眼来形容她。他人不客气的态度就能让她濒临崩溃边缘，她甚至还有多次因紧张压力而多日卧病在床的记录——这对许多当代人来说，都是非常怪异的行为。与伊丽莎白女王不同的是，玛丽·斯图亚特并不喜欢健康的体能活动，因此常常生病，而她的病因常是体侧不明疼痛。但这些疾病可能都是情绪歇斯底里造成的结果。

对玛丽来说，经历了在法国宫廷中精致豪奢的生活，苏格兰王国为她带来不少文化冲击。苏格兰位处欧洲偏远地区，与文艺复兴带来的文明影响完全沾不上边。苏格兰气候冷冽，住在原始城堡与塔形城堡的贵族们皆未经开化、充满暴力倾向。这里的宗教充满加尔文主

义，尽管臣子们热烈欢迎她返国，但不久，她便因公开在礼拜堂中聆听的弥撒仪式中充满“偶像崇拜”，而遭到约翰·诺克斯告诫。约翰·诺克斯的训斥让玛丽·斯图亚特因愤怒而哭泣，但他十分担心新任女王会想要反宗教改革；然而主政派的新教人士早已准备好要容忍她的天主教倾向，毕竟在他们眼中，伊丽莎白女王与艾伦侯爵未能成婚，无法一统英格兰与苏格兰，让他们仿如受到冷落。说起玛丽·斯图亚特，她其实一点儿也不了解苏格兰人民，也不知道经过与她的母亲玛丽·吉斯对抗后，人民有多么怨恨与法国有关的一切。在多数人眼中，她其实是个外国人。

然而她愿意让步，她很快宣布臣民在礼拜仪式中可享自由。此举安抚了苏格兰国会缙绅们，迅速地，她便在这些政治人物中号召了一批支持者。

在统治苏格兰的前几年，玛丽·斯图亚特的主要顾问，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詹姆士·斯图亚特（James Stuart），一五六二年她正式册封哥哥为莫雷伯爵（Earl of Moray）。莫雷伯爵是国王詹姆士五世众多的私生子之一，后因进入主圣会并于一五六〇年主导苏格兰宗教改革而崛起。除此之外，莫雷伯爵甚至主动以苏格兰女王之名对抗约翰·诺克斯，并坚持女王可以在自己的小礼拜堂中聆听弥撒，而他也因此得到了玛丽的信任。此后玛丽·斯图亚特一直到再婚前，都以莫雷伯爵的建议来统治苏格兰。

* * *

伊丽莎白女王对玛丽·斯图亚特有着矛盾情结：一方面将玛丽·斯图亚特视为危险的对手，另一方面又因为两人都是女性执政者，还有表亲关系，而认为两人十分相似。因此，伊丽莎白女王宣布，若玛丽·斯图亚特放弃争夺英国王位，伊丽莎白女王就愿意与之交好。虽然塞西尔对此大表反对，但伊丽莎白女王依然坚持要与苏格兰女王一

会，她认为两人面对面，就可以一起解决英国王位继承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以及《爱丁堡条约》中可能存在的误解。

不久后，玛丽·斯图亚特也有了相同的想法。她有许多怨恨伊丽莎白女王的理由，毕竟伊丽莎白女王在自己的王国中，一手建立了新教霸权，但玛丽·斯图亚特知道，若自己与伊丽莎白女王建立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绝对有利无害。她始终不愿核准《爱丁堡条约》，主要是因为害怕若放弃英国军徽的使用权，可能会损害自己未来超越伊丽莎白女王的机会。莫雷伯爵与苏格兰领主们，一直希望她能与表姑伊丽莎白女王达成共识：只要玛丽·斯图亚特放弃争夺英格兰王位，伊丽莎白女王便可能将她预立为王位接班人作为回报。当有人将此事呈报伊丽莎白女王时，她一如往常地闪避回答，塞西尔私下则为伊丽莎白女王身后可能再有女性执政者感到万分恐惧。

玛丽·斯图亚特派遣大使威廉·梅特兰到英格兰表达友善的问候，并询问伊丽莎白女王是否有改变《爱丁堡条约》内容的计划。经过一番热情欢迎，威廉·梅特兰完全不浪费任何时间，马上将玛丽·斯图亚特是否能成为英国下一任女王事宜搬上台面。而伊丽莎白女王明显露出失望神色。

“我原期待着贵国女王有其他要事，”伊丽莎白女王说，“这些花言巧语我听多了。”“不，”她继续表示，她“并不想讨论有关王位继承问题”。

“我死了以后，谁最有合法性，就由谁来继承王位，”她当场宣布，“若贵国女王恰好符合这个条件，绝对不会让她失望；若他人有更高的合法性，要我伤害这样的合法性，一点也不合理。”虽然她勉强承认自己并不知道有谁比玛丽·斯图亚特更适合，但她还是不想公开自己的意图，这样可能会危害自己的安全，毕竟“人们膜拜的是旭日东升，而非夕阳西下”。她并不反对立玛丽·斯图亚特为王位接班

人，只是亨利八世的继承法可能会妨碍她这么做，且无论玛丽·斯图亚特提出什么样的主张，都得经过国会讨论。“毕竟我是嫁给了这个王国，当我宣誓时，便已无法改变国家法律。”伊丽莎白女王如此提醒威廉·梅特兰。女王继续表示，最好是让苏格兰当个友善的邻居，这样就可以赢得英国民心；他们就更有可能会将她视为合法的王位继承人。

尽管如此，此事依然危机四伏。

“也许我会喜欢我的裹尸布，但自古以来，统治者怎么可能关照将继位的孩子呢？”伊丽莎白女王如此断言，“我姐姐在位期间，我对这种事情的体会可多了，有多少人渴望让我掌权？又有多少人忙着想要陷害我？身为一个统治者，身系家国希望，永远都寝食难安。若让各国知道未来谁将接下我的王位，我就永远不得安宁了。”

从玛丽·斯图亚特的观点来看，这个答案无法满足她；尽管如此，对于她的要求来说，伊丽莎白女王已经摆出最友善又合理的态度，这也为两位女王开启了更多真诚交心的机会。

九月十七日，伊丽莎白女王再度去信给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要求她核准《爱丁堡条约》，但威廉·梅特兰在第二次谒见伊丽莎白女王时，态度显得更为强硬，他对伊丽莎白女王提出警告，若玛丽·斯图亚特无法成为英国王位的继承人，可能会采取强制行动。他提醒伊丽莎白女王：“尽管女王陛下认定自己的地位合法，但欧洲各国显然不是这么想。”梅特兰大使如此赤裸裸的要求，仿佛想要从她身上强行得到她愿意重新考虑并更改《爱丁堡条约》的保证，显然这让女王感到不安。塞西尔自然也对此感到不悦，毕竟《爱丁堡条约》是他的心血。而正因为苏格兰女王的天主教信仰与对英国王位的觊觎，塞西尔一点也不信任玛丽·斯图亚特，他也曾坦率地直接向伊丽

莎白女王挑明这一点，伊丽莎白女王旋即对于自己透露太多口风感到后悔不已。

到了十二月份，她不断要求，希望与玛丽·斯图亚特尽快一会，以讨论彼此之间的分歧，她再度执笔写信给玛丽·斯图亚特，亲自提议两人相见。玛丽·斯图亚特以热情的态度响应，表达自己对于与“最亲爱的姐妹”当面对面，感到欢欣期待，并且不断向托马斯·伦道夫询问有关伊丽莎白女王的问题，包括“她的健康情形、活动状况、饮食习惯与各式各样的问题”。看着表姑的画像，她表示“希望两人其中一人是男性，这样就可以通过联姻一统两国。”

“我想只要她们两人更熟稔以后，女王便可以就宗教问题，跟她（玛丽·斯图亚特）进行更多讨论。”梅特兰大使充满希望地告诉塞西尔。但他并没有说出他最担心的事，玛丽·斯图亚特的才智并不及伊丽莎白女王，这一点也是玛丽·斯图亚特的智囊们最大的顾虑。但要让两人见面，并非一夕之间便可成行，在接下来数月的书信往返与外交协商下，两国的女王都越来越等不及，她们非常期待能够见面。

梅特兰大使写信给塞西尔道：“我国女王醉心于欢欣的情绪中，一直期待着能够与她表姑会面，完全不需要任何劝说，但她的意念实在太坚决，顾问们都不敢提出建议。”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贵族们，对于提供资金让玛丽·斯图亚特正式出访英国，皆激烈反对，伊丽莎白女王的智囊们也用法国政界反玛丽·吉斯的声浪来警告她，显然法方也反对玛丽·斯图亚特此行。但伊丽莎白女王并不听从，对她来说，和玛丽·斯图亚特相见可以得到的好处很多，这份希望早已超越冒犯法国的风险。

伊丽莎白女王如此渴望会见小表亲，背后其实也有令人得以信服的个人因素。伊丽莎白女王是个极度自负的人，她非常好奇地想要知道，玛丽·斯图亚特是否如传闻中的那么貌美，而且她非常希望答案

是否定的。对于玛丽·斯图亚特那使欧洲男性倾倒追求的名声在外，伊丽莎白女王很是嫉妒，她无法忍受玛丽·斯图亚特的争宠。当一名德国籍大使告诉她，据传玛丽·斯图亚特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时，伊丽莎白女王立即回嘴表示不相信，因为“她绝对比苏格兰女王还要优越”。

* * *

在英国方面，伊丽莎白女王顺利度过了达德利丑闻的灾难，继续维持声望。一五六一年九月八日，当她准备入住伦敦的圣詹姆士宫时，约有一万人来到现场想要亲眼看看女王，“这些人都非常高兴，也非常喜欢她”。

那一年的秋天，瑞典埃里克王再度提出要求，盼能与伊丽莎白女王共结连理。尽管那一段时间伊丽莎白女王积极鼓励他，但根据夸德拉大使表示，女王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避免埃里克王将目标转向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但要不了多久，就连这个勇敢无畏至今不渝的追求者，也对她失去了兴趣，放弃了追求。七年后芬兰约翰公爵罢免埃里克王，并在一五七七年谋杀了他。

达德利的命运依然在走下坡。一五六一年十一月时，有人看到伊丽莎白女王乔装打扮，从后门溜出怀特霍尔，去看他的射箭比赛。十二月二十六日，伊丽莎白女王让他的兄弟安布洛斯·达德利恢复华威伯爵（Earldom of Warwick）的地位，这是过去达德利的父亲与已故兄长的爵位。此外，女王还赐予华威城堡与英国中部的大片土地，而十二月二十二日时，达德利成为伦敦律师学院中的内殿律师学院成员，并在一场土地纠纷中提供证据。五天后，他在律师学院的大厅主持了一场壮观的集会，这一切都只为了一件事，让女王得以嫁给达德利。

达德利本人则时常希望丑闻能有雨过天晴的一天，但萨克森公爵派出的大使曾向主公转告，伊丽莎白女王向他透露：“从未想过与达德利结婚，但她对他的喜爱，比起其他人更甚，因为在她姐姐在位期间，所有的人将她孤立时，达德利对她的友善与注意力却从未减过一丝一毫，甚至还卖掉自己的财产，在经济上援助她。她只是认为，针对他的信赖与持续的关怀，自己应该涌泉以报。”

但达德利要的不只这些。一五六二年一月，他再度寻求夸德拉大使的帮助，要求菲利普国王写封推荐信支持他追求伊丽莎白女王。这次他并未再用假装自己要改信天主教的手段来欺骗西班牙方面，只是暗示法国方面提出一份丰厚的贿赂，希望他运用自己在女王面前的影响力。但夸德拉大使才不想被骗第二次。他只是圆滑地表示，女王陛下知道菲利普国王非常希望看到她出嫁，同时女王也知道，菲利普国王对达德利有很高的期待。因此要请主公写一封推荐信，绝对是无意义之举。在夸德拉大使的眼中，两人成婚最大的绊脚石其实是女王在婚姻议题上捉摸不定的心意；但若达德利希望的话，大使愿意再与女王谈谈这个话题。

达德利的确这么希望，于是不久之后，夸德拉主教便向女王询问，在婚姻议题上她是否已经下定决心。

“我与初生之日一样，在婚姻关系上孑然一身。”她告诉他，同时强调，自己已经决心不接受任何素未谋面的追求者，这也代表她非常清楚，自己可能只能嫁给英国人了，“也就是说，她认为找不到比罗伯特·达德利更适合自己的人了”。她继续表示，自己最希望的就是接到友善的他国国王来信，像是菲利普国王，建议她嫁给达德利，这样她的臣子们才不会指责，她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而选择达德利。这一点，她表示，也是达德利所希望的。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夸德拉大使对她的动机感到十分怀疑，并且“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回避了她的问题，还建议她不要犹豫太久，应该赶紧满足达德利的要求，而且他知道菲利普国王将因此感到欣喜。事实上，夸德拉大使与菲利普国王都知道，伊丽莎白女王一旦下嫁达德利，将会牺牲地位与名望，动摇她的王权，甚至让天主教有机会在英国复辟——就像现在英国以北的苏格兰一样。

就在此时，伊丽莎白女王将当年他父亲的许多封地，全都归还给达德利，让他能够维持自己的地位。当年稍晚，女王授予他一份利益丰厚的执照，让他可以免税出口毛料。此举再度引起新一波的流言，认为女王将嫁给他。但到了六月时，伦敦出现传闻，指称女王与达德利在友人潘布鲁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于伦敦的住处贝纳德城堡秘密结婚。女王觉得这样的传闻非常有趣，同时以取笑夸德拉大使为乐，告诉他寝宫侍女们都在询问，现在他是否该像亲吻女王一样亲吻达德利的手。而达德利本人则公开表示，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应允要嫁给他，“只是不在今年”。

英国国会指控夸德拉大使为散布谣言的始作俑者，但他否认这样的行为，仅表示自己因为无法告诉大家女王已婚的讯息，甚感抱歉。

* * *

一五六二年春天，莱诺克斯伯爵夫人与儿子达恩里勋爵，终于脱离在伦敦家中遭软禁的惨况，再度成为女王跟前的红人。但莱诺克斯伯爵夫人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不久之后，她又开始积极做媒，想撮合达恩里勋爵与玛丽·斯图亚特，借此融合两股问鼎英国王位的势力。然而这样的可能性早已触动伊丽莎白女王的敏感神经，只是这次莱诺克斯伯爵夫人实在太过火了，她的计划暗示着要推翻女王。计划很快便曝了光，而她那疑似叛国的计划，让她遭到逮捕成为伦敦塔中的囚犯。

到了五月，经过数月的协商触礁，玛丽·斯图亚特再度派遣威廉·梅特兰大使前往英国，要他带上口信，希望促成英方尽快邀请她进行外交访问。伊丽莎白女王告诉梅特兰大使，她绝对不会让任何事情延宕与玛丽·斯图亚特的会面，心情大好的玛丽·斯图亚特于是去信给吉斯公爵：“我猜你想象得到，当世界看到我们俩——英国女王与我——相处得如此融洽，会有多么震惊！”

不幸的是，法国爆发了一场天主教与胡格诺教派之间的冲突，尼可拉斯·瑟洛摩顿爵士与罗伯特·达德利便呼吁伊丽莎白女王全力支持遭受到胁迫的胡格诺教派人士，之后这些人也许就能协助她夺回加莱港以实现她内心最渴望的一个梦想。瑟洛摩顿爵士提醒她，与天主教忠仆玛丽·斯图亚特见面，或是与吉斯公爵的任何关联，在此时都不合时宜。

玛丽·斯图亚特发现计划可能有变时，明显感到不悦，但伊丽莎白女王丝毫不想卷入他国内战的纠纷中，便毅然决定继续与玛丽·斯图亚特的会面计划，理由是两人会面可带来极大利益。然而枢密院在最终要通过两国元首外交访问计划时，强烈建议她不要在当时与玛丽·斯图亚特见面，因为这样一来，会加强各界对她与吉斯家族联手的观感，为理应受她救助的法国新教徒带来更多劫难。但是，除非瑟洛摩顿爵士强烈建议她另寻他法，否则，她宣布自己将“维持原案”与玛丽·斯图亚特见面，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玛丽·斯图亚特出访的准备工作已然展开，但却遇上这个季节罕见的潮湿天气，让道路难以通行，导致出访行程受阻。事情也出现不令人意外的发展，有人——亨利·西得尼爵士——语带抱怨悲叹，捎了一封紧急信函给瑟洛摩顿爵士，表示只有他能说服女王放弃这灾难性的决定，要求瑟洛摩顿爵士好好运用他说服女王的能力。但在瑟洛

摩顿爵士回应这封信前，六月二十五日，法国的宗教冲突就以不稳定的和平现况作结，两国女王的会面再无障碍。

两周后，伊丽莎白女王与威廉·梅特兰大使为玛丽·斯图亚特出访之事进行计划的最后讨论，两位女王将在约克或任何一个英国北方城市会面，以苏格兰女王方便为主，时间则定在八月二十日到九月二十日之间，接着梅特兰大使则回到北方，向玛丽·斯图亚特确定细节。在约克这边，市政单位已经买进大量存粮以供两国统治者之用，并且着手计划一连串的活动，两国的贵族们也开始定制新装，但同时也对此开销大感不满。

六天后，瑟洛摩顿爵士发出紧急讯息通知英国政府方面，尽管凯瑟琳·梅迪奇努力维持和平，但法国内战再度开打。这次，伊丽莎白女王知道，她绝不能再让胡格诺教领袖孔德王子（the Prince de Condé）与加斯帕德·科利尼将军（Admiral de Coligny）孤军奋战或对法国的事态坐视不管。对于玛丽·斯图亚特公开鼓舞天主教派人士推翻胡格诺教派，伊丽莎白女王感到十分不悦。七月十五日，她不愿地派出亨利·西得尼爵士前往苏格兰，通知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她的英国行可能要暂缓一年。玛丽·斯图亚特对此次会面充满期待，暂缓出访的影响就是让她整日瑟缩在床上哭泣，直到亨利·西得尼爵士告诉她伊丽莎白女王跟她一样失望透顶才重新振作。

玛丽·斯图亚特与伊丽莎白女王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她决心再嫁，并且倾向嫁给位高权重的天主教国家统治者，足以胁迫伊丽莎白女王重新权衡《爱丁堡条约》，并将条约内容改为对玛丽·斯图亚特有利。伊丽莎白女王对她的意图心知肚明，而这些意图着实也对伊丽莎白女王造成严重的威胁，因为苏格兰女王的吸引力不仅可能动摇她现在的地位，还可能影响未来英国王位的继承问题。若玛丽·斯图亚特嫁给了西班牙王朝、奥地利王朝或法国王室的某位王子，天主教的

势力威胁就可能延伸到伊丽莎白女王自家的门户。而她最大的梦魇，就是苏格兰将被利用以作为他国侵略英国的跳板。

伊丽莎白女王因此决定，要运用自己微妙的说服力量来影响玛丽·斯图亚特，让她选择一个威胁性较低的丈夫，最好由伊丽莎白女王来为她做选择。她甚至向梅特兰大使建议，让玛丽·斯图亚特嫁入英国贵族之家，但他断然拒绝这样的提议，表示女主公绝对不会考虑任何可能削弱她名望的配偶。

事实上，玛丽·斯图亚特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菲利普二世未来的继承人唐卡罗王子（Prince Don Carlos），她从法国宫廷的传言中得知，唐卡罗王子是个勇敢的豪侠；但事实上，他是个残酷成性的性变态，还患有癫痫症。她对查理九世毫无兴趣——他年纪实在太轻，她也不喜欢奥地利的查尔斯大公——他实在太穷了！

伊丽莎白女王自然不乐见玛丽·斯图亚特嫁入天主教西班牙王朝，因此郑重警告玛丽·斯图亚特，若她真的接受西班牙方面的追求，伊丽莎白女王此后将成为她永远的敌人。“权衡你的每一步”，这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忠告；若玛丽·斯图亚特选择英国方面认可的丈夫，伊丽莎白女王将成为她永远的朋友。

* * *

两个月后，伊丽莎白女王签署一项条约，矢言协助胡格诺教派，为了回报英国，胡格诺教派人士须拱手让出纽海芬（后更名为勒阿弗尔）给英国，以担保英国重掌加莱港的可能性，这是英国希望从敌人手中夺回的权力。

伊丽莎白女王的爱国情操，因重掌加莱港的希望而熊熊燃烧。一五六二年十月份，她下令召集六千名精兵，并指派指挥官为华威伯爵

安布洛斯·达德利，将派遣他们起程前往纽海芬与迪耶普，以支持当地的胡格诺教派人士。

然而她都还没有机会下令指挥士兵们前往法国，伊丽莎白女王便罹患重病，生命几乎危在旦夕。

8 后继无人

在伊丽莎白女王执政前期，天花异常猖獗，一五六〇年代初期甚至演变为大流行，仿佛要淘汰掉“老弱妇孺”一般：贝德福德伯爵夫人与数百位贵族都相继患病。天花是种令人畏惧的疾病，除了威胁病患的生命外，病后痊愈的人外貌通常也都大受影响。托马斯·伦道夫便形容天花的早期症状为“头部剧痛，胃肠不适与剧烈咳嗽”。

一五六二年十月十日，伊丽莎白女王开始感受到身体不适，当时她正在汉普顿宫中。她与当时许多人一样，认为泡个热水澡，然后到户外走走就会好；但结果她反而感冒了。几个小时内，她便因高烧只能卧病在床。

伯考特医师（Dr. Burcot）是颇受敬重但脾气暴躁的德国医师，他被召入宫中医治伊丽莎白女王。他诊断为天花，但伊丽莎白女王身上连一颗疹子都没有，女王认为他不学无术，因而将他赶走。发疹情形被视为是天花大爆发的前兆，但却一点也没有，经过一天多的时间，女王高烧的情形加剧。十月十六日时，她已经病得非常严重了，首先是无力气说话，接着更渐渐陷入无意识之中，这个状况维持了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宫廷御医担心女王的末日将届，紧急从伦敦召来了塞西尔。

隔天晚上，危机蛰伏，伊丽莎白女王恍恍惚惚地在意识边缘弥留，英国枢密院紧急仓促地召开集会，对于继位问题悬而未决，枢密

院成员们都感到恐慌不已。若伊丽莎白女王如多数人所想般在此时离世，谁能接下英国王位呢？根据夸德拉大使的回报，接下来几天，枢密院与顾问们进行紧急磋商，政界意见分歧：激进派的新教人士赏识凯瑟琳·格雷小姐，温和派的新教团体则支持与女王血缘甚远的亨丁顿伯爵。剩下的人则希望由大法官来裁决。没有任何人提及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名字。但毕竟政界并没有任何共识，也暗示着未来将出现分歧与厄运。

就在英国皇室准备着手进行女王追思仪式的同时，亨斯顿勋爵说服了顽强抵抗的伯考特医师——有人说他说服的筹码是一把尖锐的短刃——再度为女王进行治疗。他依据阿拉伯人最先采用，也是英国中世纪医师加德斯登的约翰（John of Gaddesden）建议的治疗方法，将女王包裹在红色法兰绒中，再让她睡在火炉旁的草褥上，接着服下一剂医师的特效药。两小时后，伊丽莎白女王奇迹般地恢复意识，甚至能开口说话。

宫廷顾问们忧心忡忡地聚集在她的病榻旁。此时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病重，“死神紧紧地扼住了我，使我动弹不得，”随后她向国会代表表示，接着，她最忧心的部分，就转移到死后该如何维持政府运作。濒死之际，她只能将一切寄托在她最相信的人身上，她下令宫廷顾问们指派罗伯特·达德利作英国护国公，每年可得两万英镑的丰厚薪资。她也要求让达德利的贴身随从，就连睡眠时间都在达德利房中的坦沃斯（Tamworth），得到每年五百英镑的退休金。过去直到现在，许多人都认为，女王此举是为了封口，坦沃斯可能就是两人每次幽会时的看门狗，然而伊丽莎白女王认为能扭转定论，宣称“尽管她一直深爱着罗伯特·达德利，但有神作为见证，两人之间绝无见不得人的举动”。她当时显然认定自己即将面对最终审判，针对此事肯定不会说谎。

尽管宫廷顾问们对于她的命令感到愤怒，“但他们答应了她的任何要求”，因为她大限将至，没有人想要与她争论，让她感到为难，但夸德拉大使表示：“她的愿望不可能成真”。指定达德利为护国公只会引起政坛的权力斗争。

不久之后，伯考特医师带着一些药来到伊丽莎白女王的寝宫，就在此时，伊丽莎白女王一边呻吟着，一边发现第一波天花发疹出现在手上。

“天降瘟疫！”伯考特医师告诉充满威严的病患。“哪一个比较好？手上长了疹子，还是要长在脸上，或甚至长在致命的心窝？”他告诉焦虑不已的宫廷顾问们，出疹是个好现象，代表最糟的状况已经过去了。脓包很快会干燥，接着形成痂皮然后褪去。

从那之后，枢密院与多数臣民皆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伊丽莎白女王的健康情形大有进展——托马斯·伦道夫留下她仅卧床六天的记录——但死神之手曾那么接近，心怀感激的臣子们甚至发行硬币来纪念女王康复。对女王的生命与死神擦肩而过，“盲目的怒火与激烈的憎恨”如排山倒海而来，这样的气氛在和平稳定的政府与王位延续的不确定间一触即发，甚至有引发内战之势。恐惧让枢密院成员与国会议员们决心迫使女王尽早结婚，为国家生下一个继承人，不再犹豫，也不要再有冗长无结果的追求关系与外交协商。

在她缠绵病榻期间，伊丽莎白女王坚持只让她最宠爱的侍女贴近身边，没有人比她的好友，亨利·西得尼爵士的妻子与达德利的妹妹玛莉·西得尼小姐更全心全意地照顾她。女王身上天花留下的麻子最终褪去时，玛莉·西得尼小姐却得了天花，而且留下十分丑陋的疤痕，以至于她从此未再于宫廷内现身。玛莉·西得尼小姐生病期间亨利·西得尼爵士都在国外，后来他写下：“当我前往纽海芬时，我留下她孑然一身，她是个美丽的淑女，至少在我眼中是最美的，当我总

算回国，我发现天花侮辱了她的美貌，这都是因为她不断地照顾女王陛下。而现在她只能被孤独囚禁。”

伊丽莎白女王为玛莉·西得尼小姐的悲剧感到遗憾不已，于是与她仍维持友好关系，她偶尔会在肯特郡的彭斯赫斯特庄园私下与她见面，这是西得尼家族乡间的住所。女王也会在非常罕见的情形下，说动玛莉·西得尼小姐前往皇宫，玛莉·西得尼小姐会一直躲在房里，而女王则放下所有皇室的惯例与礼仪，到她房里找她。

至于差点成为英国统治者的达德利，在十月二十日这天，伊丽莎白女王才刚赐予他每年一千英镑的退休金，同时终于将他拔擢为枢密院成员；为了维持和平，女王也将同样的荣耀赐给他的对手诺福克公爵。尽管两人之间的敌对关系一如往常地紧张，但现在在公开场合上，两人都表现出“亲密的样子”。至于达德利，为了证明自己是忠诚又勤奋的枢密院士，他终其一生都比他人还要勤于参与院会。

到了十月二十五日，伊丽莎白女王总算恢复处理日常政务，然而对于国会将对她提出的部分要求，她也了然于心：国内的气氛与枢密院的态度，让她无法忽视大众的呼声。因此她只好设法推迟国会开会的时间，但他的顾问们一点儿也不想忍受她的拖延政策。十一月时，她与之前曾追求她的阿伦德尔伯爵亨利·菲查伦发生了火爆冲突，她也因此愤怒泪流，他坚持己见，并坚持王位继承权一事攸关全国利益，因此贵族们有权干涉。当月稍晚，伊丽莎白女王需要国会通过一笔预算，因此在毫无选择的情形下只好召开国会。

* * *

当伊丽莎白女王第二任的国会于一五六二年一月十二日召开时，国会议员们早已决心就此解决英国王位继承的棘手问题。在国会开议的仪式中，圣保罗大教堂司祭长亚利山德·诺瓦（Alexander

Nowell, Dean of St. Paul's), 在达德利的命令下首先提及此事, 指控女王不婚。

“就如玛丽女王的婚姻对英格兰造成的灾难一般, 现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婚姻问题, 也造成一样大的灾难。若您的父母也有相同的想法, 何来有您?” 他这样问女王, “呜呼! 我等从何而来?” 此后, 伊丽莎白女王对他再也没好气。

但上下议院的议员们却一面倒地支持诺瓦, 并且随即决定上下议院联手, 要以委婉语气的请愿书上呈给女王陛下, 呼吁她尽快成婚, 或指定继位者, “让宫廷顾问们将担惊受怕, 或让臣民感受到无尽的欢喜”。塞西尔非公开地支持这份请愿书——“这个问题太过深入, 是我无法触及的范围”, 他记录下这样的心情, “但神给了一个恰到好处时机!”

两份请愿书的用字遣词皆谦卑, 以伊丽莎白女王卧病期间对臣子们造成的恐慌为题, 提醒她若未立继承人便离世将可能造成问题:

恐怖的内战、他国统治者的无情干涉, 国内还可能有各派系野心勃勃的臣子叛乱暴动, 贵族世家惨遭毒手, 生灵涂炭, 城镇遭到烧杀掳掠, 人民拥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与财产都会受到影响, 公民权利遭到剥夺, 叛国与各种灾祸将接踵而至。

臣等忧心国内异教派系, 那异议不断且心怀不轨的天主教徒。自诺曼人征服英国后, 大英帝国就不曾出现后继无以为定的景况。请女王陛下三思, 若得后代子孙, 将可带来安稳、确定与愉快的生活, 也足以消弭各种阻碍与疑虑。

伊丽莎白女王总是认定, 她的婚姻大事和英国王位继承问题与臣子们无关, 是她的私人问题, 但她无法失去国会的支持, 因此只好诉诸模糊焦点与拖延战术。在一月二十八日的晚膳过后, 女王在怀特霍尔宫回廊中接见了下议院代表。下议院议长单膝下跪呈上了下议院请

愿书，女王“以感谢的心情”接下请愿书，接着发表了“一场完美的演说”，在演说中，女王允诺议长与议员们，自己对继位人选问题的关心与外界一致，尤其自大病初愈以来更甚之。并借由透露自己自病愈以来，继位问题便萦绕心头不去，赢得臣子的怜悯。“我最重视的不只是自己的安危，当然还有你们。”

她告诉臣子们自己非常努力，扛起难忍的重大责任。臣子们要求她指定一位继位者，但在经过审慎商议之前，她无法着手进行如此重要的问题，于是她宁愿考虑选择正确的接班人。若她的选择引发内战，臣子们都有失去性命的危险，“但我却更可能赔上性命与灵魂，”她说自己的任何行为都得为神负责。

为接班一事请愿并非臣子们的职责，女王如此劝说，但她能辨明出自爱与忠诚的人与那些挑拨离间的人之间的差异。她不想听到臣子们谈论她的身后事，毕竟她知道，自己一直都是个生死有命的凡人。她答应臣子们会多方采纳意见，给臣子们一个交代。

“因此我向诸位保证，”她以此作结，“在我死后，你们将可能经历许多继任者，但再也不会再有向我如此天生自然的国母了。”

两天后，她又接见了带着上议院请愿书的代表，请愿书中同样敦促女王尽快成婚：“只要您愿意大婚，找一位适合与之成婚的人选，尽快成婚。”就算她选了罗伯特·达德利，他们也认为，选他总比不结婚好。若她拒绝婚姻，他们便只能请求她指定继位者，“毕竟统治者一死，法律随之衰败”。上议院的议员们都希望能尽快阻绝玛丽·斯图亚特的野心：“身为天生的英国人”，他们并不希望“在异邦统治者下俯首称臣”，而玛丽·斯图亚特“是个陌生人，依据英国法律，并没有接任英国王位之权”。曾经历都铎王朝四个统治者的拉尔夫·赛德勒爵士（Sir Ralph Sadler）就表示，若玛丽·斯图亚特统治英国，“就连路上的石板都会起而抗之”。

女王脸上明显表现出不悦，并告诉上议院代表，她已经答应过下议院代表，而且她已经发现“许多穷忙的人，脑袋中不断运转着不切实际的想法与无谓的判断”，但她期盼在如此重大的议题上，上议院有比强迫她更好的想法。要她结婚并非不可：“臣子们在她脸上看到的纹路并非皱纹，而是天花的遗毒，尽管她年纪大了点，神依然能如同圣依撒伯尔般，赐予她一个后裔，而议员们对于自己的提议最好深思熟虑，因为若她宣布了接班人，英格兰可能面临流血命运。”

一开始，上下两院被她展现的感激之情与雄辩的话术所蒙蔽，并没有发现这是伊丽莎白女王再度拖延的诡计；他们深深相信，女王定会逐步解决婚姻与继位问题，但事实上，她所说的话根本没有任何效力。随之而来的，是国会停止讨论继位问题，一直到二月十二日，下议院逐渐失去耐性，再度写信给女王，提醒女王上下议院都在等待她的答案。但伊丽莎白女王只是在争取时间，直到国会投票通过她的补助案。

此时，国会已然将焦点转向其他议题，如通过法案保护一五五九年的圣公会法案。这些法案从各种面向延伸了英王最高权威，并对向罗马教皇致敬与反对英国国教的人士予以惩罚。到了二月，宗教会议通过恢复亨利八世订定的圣公会三十九条信条（取代爱德华六世的四十二条信条），将英国国教的基本教义奉为圭臬：最后在一五七一年由英国国会通过。

是年四月十日，英国国会进行了休会典礼，得到了补助后的女王出席了休会典礼，并给了国玺大臣尼可拉斯·贝肯爵士一封亲笔信，里面是她针对上下议院的请愿回复的答案。因臣子们冒失的举动而愤怒不已，伊丽莎白女王先前拟了两份手稿，里面表示上下议院上呈给她的是“两大册文章”，但后来她怒气渐消，于是改掉了这些文字。最后她的亲笔信是这样的：

既然我已起誓并做出决定，若在座有人质疑我不想透过政治交易去过婚姻生活的决心（例如我的独身主义），就请他们停止这样的异议，你们必须相信那是错误的想法。那是我认为对喜欢独处的女人最好的选择，但我心里也忖度这定不符他国贵族的标准。但若我改变自己的喜好迎合诸位，我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心思了。我仅盼此生能在宁静中“安然逝去”，若无法得到诸位一丝的保证，就算我身后也是无法安宁。

就是这样了。英国国会就在伊丽莎白女王形容为“没有回答的答案”中休会了，这对议员们精心起草的请愿书来说，是十分不满意的答案。

* * *

拒绝了玛丽·斯图亚特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接班人，英国上议院议员们，等于是暗中支持凯瑟琳·格雷小姐作为下一任英国女王。她支持者众多。凯瑟琳小姐与赫特福德郡勋爵自一五六一年八月起便一直在伦敦塔中，但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不好的对待。凯瑟琳小姐的牢房中悬吊着华美的帘幕与绣帷，她生活舒适，房里甚至还有土耳其地毯，她可以睡在坚固的床上，使用柔软的羽毛床垫。她的每一餐都是在牢房中由人伺候，而且她还养了一只宠物狗做伴。这一切的安排，女王全都知情，而且也都经过女王同意，但女王不知道看守凯瑟琳小姐的狱卒为了怜悯她和她的丈夫，让这对年轻的恋人时时见面，甚至在夜里还同睡在那张羽毛床上。

一五六二年秋天凯瑟琳小姐再度怀孕，在一五六三年二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托马斯。这件事当然逃不过伊丽莎白女王的法眼，女王怒火中烧，于是下令无论如何，不准凯瑟琳·格雷小姐和赫特福德郡勋爵再见面。两人从此再也无缘相见，凯瑟琳小姐则将生命中的黄金年代，都用来为失去的爱哭泣。

赫特福德郡勋爵则被送交皇室法庭审理，他因“恣意摘取伊丽莎白皇室的处子血脉”被判有罪，甚至“一犯再犯”而加重其刑。他被判赔一万五千英镑，后下调为三千英镑。至于爱德华·华纳爵士（Sir Edward Warner），伦敦塔那位让这对小情人不时见面的好心副官，则遭到了解雇。

夏日时分，伦敦塔中出现了黑死病疫情，女王将这对年轻夫妇送往乡间，并派人严加看守，分别软禁在不同处。至此事态已然明了，伊丽莎白女王显然是将凯瑟琳·格雷小姐视为王位继承人，然是年稍后，传言凯瑟琳·格雷小姐密谋让两子合法化，消息一出，女王再度将姨甥女关回伦敦塔中，唯恐她成为叛乱者的目标。两人血缘相近，凯瑟琳小姐又育有两子，对伊丽莎白女王的王权造成非常大的威胁。此后凯瑟琳小姐便一直被囚禁在伦敦塔中，只能偶尔离开，短暂地在守卫陪同下返回萨福克郡，到克菲尔德宅邸副官的家中。赫特福德郡勋爵屡次可怜地要求能与她见面，却总是遭到断然拒绝。

凯瑟琳·格雷小姐一五六八年在克菲尔德宅中死于肺结核。女王出资为她在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举办丧礼，从此对赫特福德郡勋爵不再抱着怨恨，并让他离开了伦敦塔。赫特福德郡勋爵之后至少再婚两次，而且非常长寿。至于他与凯瑟琳小姐所出的两个儿子，后来都由塞西尔负起教养之责，甚至与自己的孩子一同养育了一段时间。

* * *

一五六三年二月，玛丽·斯图亚特也闹出了丑闻，自从返回苏格兰后，她对法国便起了思乡情怀，她雇用了一位年轻的法国人作为秘书，皮埃尔·德·沙特拉尔（Pierre de Chastelard）。玛丽·斯图亚特非常不智地展现了对这段畸恋的热爱，这个小伙子随即展开行动响应女主公的热情，苏格兰贵族们早已妒忌他的影响力，后又在玛丽

- 斯图亚特的床上发现了她，这严重地影响了她的名誉。皮埃尔·德·沙特拉尔随即遭到逮捕，于二月二十二日被处以极刑。

* * *

伊丽莎白女王从天花病情中康复后，华威公爵安布洛斯·达德利带领的精兵终于出发前往法国，成功夺下了纽海芬。然而在一五六三年三月，胡格诺教派领袖落网，加上吉斯公爵遭到谋杀后，凯瑟琳·梅迪奇总算结束了这次宗教冲突。这批英国精兵显然成了冗员，但伊丽莎白女王依然拨款给他们，希望可以顺利夺回加莱港，并要求他们继续待在法国直到完成任务。只是法国恢复平静后，天主教与新教便联手转向对抗英国入侵者，致使纽海芬遭到封锁。英国的这支精兵中，竟然又出现严重黑死病疫情，严重削弱战力。过了几个月，围城态势不减，眼看夺回加莱港的希望更是渺茫。

就在此时，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却固执地要支持她那“亲爱的姐妹、温柔的表姑与朋友”，她抗拒了吉斯派系拉拢她的所有诱惑。十一月二日这一天，玛丽·斯图亚特写信给伊丽莎白女王，表达对听闻表姑康复感到松了一口气，同时表示：“你那美丽的脸庞将依然完美无瑕。”玛丽·斯图亚特依然积极想见伊丽莎白女王，甚至更渴望表姑将她立为英国王位继承人。伊丽莎白女王也执笔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信，表达对吉斯公爵之死的遗憾，在英国国会休会到四月后，伊丽莎白女王下令羁押约翰·黑尔斯（John Hales），这名律师写了一本册子嘲弄玛丽·斯图亚特对英国王位的觊觎，公开支持凯瑟琳·格雷小姐，并将册子广为流传。伊丽莎白女王也暂时解除尼可拉斯·贝肯爵士的圣职。

苏格兰大使威廉·梅特兰依然努力在为玛丽·斯图亚特争取成为预立继承人一事，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再清楚不过王位继承权是棘手的问题。王位继承权不是她能用来册封他人的礼物，这是攸关英国法纪

的权利，而且就如同我们所见，竞争者间谁呼声最高也时有争议。若要英国国会接受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为伊丽莎白女王的继承人，首先玛丽·斯图亚特就必须先表现出关心英国利益的态度，但她的婚姻关系到目前为止对此毫无帮助。伊丽莎白女王不住地向塞西尔抱怨，针对玛丽·斯图亚特与英国王位继承权的问题，她仿佛“身在迷宫中”，根本不知道该选哪条路好，但塞西尔也无法安抚她。伊丽莎白女王非常清楚，玛丽·斯图亚特的天主教倾向，致使塞西尔完全无法信任她，然而塞西尔曾警告过她，若将这个表亲完全从继承权上除名，最后两国只能走向战争这条路。塞西尔最不受欢迎的建议，就是要伊丽莎白女王尽快成婚。

由于对那残酷的性格完全不知情，玛丽·斯图亚特依然希望能与唐卡罗王子缔结姻亲，英国方面则将此举视为与英国利益不符。伊丽莎白女王最大的期望，就是让玛丽·斯图亚特嫁给忠贞不贰的英国子民，大约就在此时，她首度提出让罗伯特·达德利与苏格兰女王结婚的念头。一开始，这似乎是要报复他煽动国会向她施压，要她尽速结婚的手段。但随后她开始发现这件事情的重要，于是认真以对。

这件事并不如想象中荒谬。若要说在北部的邻邦促进英国利益，达德利是伊丽莎白女王唯一能信任的人；达德利近年来迅速掌权，获得如贵族般的地位，这一切都要感谢伊丽莎白女王，而且就算他对女王并非出于爱情，也不可能忘记这个他曾动心过的女人。达德利渴望成为统治者，而且特别喜欢红头发的女人；只要玛丽·斯图亚特嫁给了他，就等于是欧洲的婚姻市场上出局，外国势力介入苏格兰政治的可能性也就退去大半。英格兰与苏格兰的邦谊便可更进一步。达德利身为新教徒，加尔文教派自然愿意接受他，他们自然就能好好观察苏格兰天主教派的一举一动。唯一的坏处，当然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得要放弃达德利，但眼下看来，她似乎已经准备好终生独身，虽然与达德利断绝关系并不容易，但只要坚信这样对她和英国都好，就比较容

易说服自己。更重要的是，王室联姻协商需要一段时间，不下数年也要好几个月。

对于两国间的关系，大多数人的观点都与伊丽莎白女王不同。只有塞西尔明了让玛丽·斯图亚特与达德利成婚能带来的益处。对塞西尔个人而言，他巴不得达德利离得越远越好，因此非常支持这个计划。在一五六三年的春天，伊丽莎白女王首度向梅特兰大使提及此事，在一次单独会晤的过程中，女王突然脱口而出，表示想要提出一个人选与他的女主公成婚，“此人天生风度翩翩，若她允诺下嫁，绝对会发现此人胜过任何欧洲诸侯”，尴尬不已的梅特兰大使已然猜到这个人选，他想要把它当作贵族间的笑语，一笑置之。然而，他随即发现女王的态度非常认真，于是结结巴巴地表示“这是伊丽莎白女王对女主公的赏识，才会愿意做出如此珍贵的赠予，然而他非常明白，女主公绝对不希望，将表姑身边带来如此欢喜与慰藉的人抢走”。但要劝退伊丽莎白女王并不容易。女王表示，很不幸，华威伯爵并不像他的弟弟如此俊帅，否则定让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与安布洛斯成婚，而自己则成为罗伯特·达德利的太太。梅特兰大使则表示，女王陛下还是可以下嫁达德利，“等到女王陛下蒙主宠召时，便可将英国王位与亲王留给苏格兰女王继承；这样一来罗伯特·达德利便能让其中一人，或甚至两人都生下继位者。”

塞西尔也将达德利捧上了天，他写信给梅特兰大使表示：“罗伯特·达德利出身贵族世家，不受任何出身尊贵者时有的诱惑所蒙蔽，性格优良，身家丰厚与王子可拟，此说仅出于尊敬，而非要冒犯任何贵族，但他绝对比任何贵族更好。罗伯特·达德利非常尊敬（塞西尔在这里写了一个‘喜爱’的字眼，但后来又划掉）女王，因此女王认为除此殊荣，实在没有什么能再册封馈赠给他了。”梅特兰大使则私下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强行推荐被她抛弃的爱人——还只是个平民——给苏格兰女王，这简直就是侮辱，尤其是各界普遍认为他背负着

卖国贼与弑妻凶手的罪名，梅特兰大使回到苏格兰后，完全没有向玛丽·斯图亚特提及伊丽莎白女王的提议。但他将此事告诉夸德拉大使，夸德拉大使则将之转述给菲利普国王，不久，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苏格兰与法国。大多数的人都将这件事视为笑话，没有人相信伊丽莎白女王是认真的。

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决心继续朝此方向前进，若达成目标，她也能原谅莱诺克斯伯爵夫人了。一五六三年春天，伊丽莎白女王下令释放莱诺克斯伯爵夫人，唯一的条件，是要夫人答应永远不再密谋让儿子与玛丽·斯图亚特成婚。而且六月份时，伊丽莎白女王写信给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要求解除莱诺克斯伯爵之前被剥夺财产和公民权利的命令，让他能返回苏格兰家乡。

达德利的权力声望依然在顶峰。六月时，伊丽莎白女王将华威郡的凯尼尔沃思城堡册封给他，这是一个庞大的中世纪堡垒，十四世纪时，高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将它改造为华丽的宫殿。诺森伯兰公爵曾短暂拥有这座堡垒，达德利多年来一直盼望能将它要回来。现在，他自己在乡间也有宅邸，就在哥哥安布洛斯的封地华威城堡南边五里处，得手后，罗伯特·达德利不浪费丁点时间，随即着手进行精美的计划，重新修缮整顿凯尼尔沃思城堡，以使用来为女王找乐子。整顿计划很长，还要再过十年凯尼尔沃思城堡才能接待女王，但它即将成为伊丽莎白女王麾下最华美的一座宫殿。

尽管达德利享受着少数人才有的奢侈生活，他依然花费无度。他的骄傲，让他时时想要炫耀女王赐予的荣华富贵，让那些对他的权力垂涎不已的人，全都围绕在他的身边。结果，与他合作的人与跟随他的人便增加了，让他形成了自己的小团体。对于不欢迎自己与不支持自己的人，达德利总是能敏感察觉，他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报复

那些不报答恩赐的支持者，但对那些忠心耿耿的仆人则坚定不移又大方。

* * *

华威伯爵安布洛斯·达德利依然在纽海芬，努力在资源不足，部队又疫病丛生战斗力锐减的情形下与法国对抗。七月份，伊丽莎白女王同意，在别无选择的情形下，他只能将纽海芬拱手让给法国，但在英法双方协商的过程中，他的腿却遭到敌人以一记毛瑟枪击中。七月底，在面子尽失的状况下英军撤离法国。华威伯爵总算回到英国，但他的腿永远无法复原，终生都得拄着拐杖行走。罗伯特·达德利特地南下普兹茅斯迎接他的哥哥，但女王却派了信差警告他，返国士兵身上带着黑死病疫情，可能传染给他。达德利违抗了女王的命令，当他见到因疼痛而卧床的哥哥安布洛斯时，伊丽莎白女王大为震怒，要求他不准回宫，以免带回传染病。

当时伊丽莎白女王的情绪极差：对于法国之役及痛失纽海芬的耻辱感到愤怒不已。看来重夺加莱港是无望了，更糟糕的是，英国内部出现认为女性领导者无能的声浪。夸德拉大使此时回报，表示许多人士指控女王应负全责，同时不断呐喊：“上帝垂怜，给英国一个王吧！”

伊丽莎白女王十分担忧，返国的士兵会将疫病带回英国。是年夏季，英国果然大规模爆发疫病，光是伦敦每周就会夺走三千多条人命，在英国首都近郊的乡间，后来则总共有两万余人丧生。被死神带走的人之中，包括了夸德拉大使，他在八月份逝世，然而一直到死前，他仍不断地为伊丽莎白女王带来许多困扰。他那极度偏颇的报告，让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外交关系每况愈下。

* * *

在这一个月，伊丽莎白女王派遣托马斯·伦道夫回到苏格兰，并指示要他说服玛丽·斯图亚特，让表姑伊丽莎白女王为她择偶。伊丽莎白要他告诉玛丽·斯图亚特，若她同意“就婚姻大事满足英国方面的要求”，那么伊丽莎白女王将成为她的慈母，甚至愿意“进一步赐予她成为下一任英国女王的地位与权力，有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助力，对她绝对有益”。至于谁将作为她的丈夫，伊丽莎白女王要托马斯·伦道夫先以“本国内一位贵族出身人士，甚至可说是玛丽·斯图亚特绝对猜不透的人选”来转达。

玛丽·斯图亚特显然一头雾水，并要求托马斯·伦道夫明说。在英国的贵族之中，她的“好姐妹”到底认为谁最适合她呢？伦道夫非常明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意图，暗自祈祷不用自己向她揭晓这个对象，他向塞西尔表示，以玛丽·斯图亚特的“皇室眼光”来说，要她如此降格“屈从下嫁给地位如此低的人”，简直太荒谬了。幸运的是，伊丽莎白女王仍在玩时间游戏，只是想要吊吊玛丽·斯图亚特的胃口，并阻止她接受其他国家的求婚，让她接下来几个月内都挂心此事。因此当伦道夫返回英国后，玛丽·斯图亚特依然不明就里。

到了一五六三年的秋天，唐卡罗王子生了一场重病，玛丽·斯图亚特嫁入西班牙皇室的希望显然落空了。对苏格兰女王来说，找到适合的人选作夫婿是最重要的事，这一切都是为了政治与王朝利益考虑——她和伊丽莎白女王一样，膝下仍无子嗣，而且她也不适合独身生活。托马斯·伦道夫将这一切归因于她罹患忧郁症、常为情绪挫折不断哭泣，及欲求不满。

唐卡罗王子的病，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更是一大助力，毕竟她竭尽所能地在幕后操控，希望可以延后玛丽·斯图亚特与他成婚的时间，以便另寻更“安全”的配偶人选。

就在此时，伊丽莎白女王想起自己对国会的承诺，便试图想要重启与哈布斯堡王朝查尔斯大公的婚姻协商。一开始，这样的想法似乎渺然无望，因为尽管英方表示两国联姻“前途光明，伊丽莎白女王嫁妆肯定丰厚且尊贵”，哈布斯堡王朝君主依然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动机感到疑心，而且他并未忘记伊丽莎白女王之前拒绝过他的儿子，对伊丽莎白女王与达德利之间的绯闻也时有所闻。在英国王室所有的宫殿中，达德利的房间都在女王隔壁；在所有宫廷的娱乐活动中，达德利都扮演男主人的角色；他过着王者般的生活，权势富贵享用不尽。

尽管眼前困难重重，伊丽莎白女王依然盼望查尔斯大公能重新追求她，因为她身为一个女人，要她主动提出追求是绝对不可能的。塞西尔因此写信给一名在德国的密探，要他接近符腾堡公爵（Duke of Wurttemberg），再由符腾堡公爵写信给哈布斯堡王朝君主。费迪南德一世因而同意重启协商，但依然显得小心翼翼。塞西尔当然也是清楚地向查尔斯大公表示一定要慢慢来，因为女王至今仍不忘独身的念头。尽管她知道，若要与外国联姻，查尔斯大公会是她最好的选择，但她对此事依然采取忽冷忽热的态度。

一五六四年一月，符腾堡公爵以哈布斯堡王朝君主之名，派出一名特使阿赫斯佛鲁斯·亚林格（Ahasverus Allinga）前往都铎王朝，以了解伊丽莎白女王对婚姻的真实想法。亚林格特使在只有塞西尔与两名侍女陪同下，与伊丽莎白女王见面。亚林格特使与国务大臣塞西尔不断鼓吹两国联姻的价值与利益，女王却要他们省省力气，“她绝不会受到任何威逼利诱影响，坚定不移，因为她内心早已认定，若此生要结婚，她也要以女王身份成婚，而非以伊丽莎白之名嫁人。”她表示，之前的联姻协商会失败，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必须负极大责任：他的行为就像个老婆婆一样，不让儿子到英国来见她。她依然坚持，永远不会接受素未谋面的追求者，查尔斯大公也必须主动再度展开追

求，因为让女方主动“将使她蒙羞”。她同时也强调，自己内心早已认定，宁愿当个独身的乞丐婆子，也胜过当个结婚的女王。

亚林格事后告诉塞西尔，没有必要继续进行联姻协商，这并不令人意外，然而塞西尔却十分坚定地表示，女王与亚林格谈话后表现出极大的欢喜，他与女王两人相识已久，他知道女王没有理由不接受这段婚姻。亚林格便带着诸多不满与满腹茫然返国。

* * *

一五六四年三月，伊丽莎白女王显然不想再让玛丽·斯图亚特继续揣测她的英国追求者是谁。于是向托马斯·伦道夫指示，在与苏格兰女王协商时，可省略“模棱两可的字眼”，但到了玛丽·斯图亚特跟前，当要转达她的追求者身份时，托马斯·伦道夫依然多有回避，玛丽·斯图亚特便直截了当地问：“现在，伦道夫先生，你的女主人公认真地想要我嫁给罗伯特·达德利吗？”

伦道夫畏畏缩缩地承认了。“看来我表现出如此大的耐心，让女王陛下十分开心吧？”然而她对伊丽莎白女王的提议感到惊讶，同时也有点恼怒，但她依然维持表面上的友善。她决心主宰自己的命运，对于一个前夫是法国国王，自己本身又是一国之君的女人来说，她显然认为达德利不够格。她傲慢地问伦道夫，伊丽莎白女王曾经答应“把我当作姐妹或女儿看待。你觉得她要我嫁给一个卑微的臣子，有顾及我的面子吗？”伦道夫则回答英国找不到这么好的人，这段婚姻也将为她的王国带来益处。玛丽·斯图亚特仅表示，自己要私下思考这件事的可能性。

若伴随这桩婚姻而来，伊丽莎白女王许诺愿将她预立为英国王位继承人，玛丽·斯图亚特可能对嫁给达德利意愿更高。事实上正相反，她认为伊丽莎白女王耍了她。尽管伊丽莎白女王展现出认真的态度

度，但玛丽·斯图亚特压根不认为伊丽莎白女王舍得与达德利分离——许多人也抱持着与她相同的看法。

不只玛丽·斯图亚特对这桩婚事兴致索然，达德利也是，对于要离开英国前往一个他心目中的蛮荒之地，他感到异常恐慌，想到要离开伊丽莎白女王更是让他神伤，毕竟他心中对于迎娶伊丽莎白女王还抱着一丝希望。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坚持要他配合，在毫无选择的状态下，他只能默默服从。

于是伊丽莎白女王希望可以重启与玛丽·斯图亚特见面的计划，并提议两人于是年夏天会晤。然而，玛丽·斯图亚特此时却不想与表姑面对面了，因为她正私下设法重新开始与唐卡罗王子结婚的协商，所以她不想表现出赞成与罗伯特·达德利结婚的样子，以免给西班牙方面错误的观感。玛丽·斯图亚特于是拒绝了伊丽莎白女王的邀约，让伊丽莎白女王自觉被冒犯，也让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关系在那个夏天降到冰点。

* * *

到了四月十一日，英法之间签署了《特鲁瓦条约》，让双方的敌对关系正式落幕，英国夺回加莱港的希望正式落空。

六月份时，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派遣新的大使唐迪亚哥（Don Diego）前往英国，这位大使对促进英国与西班牙关系多有贡献。就在一个月，哈布斯堡王朝君主费迪南德一世逝世，哈布斯堡王朝于是由他的长子继位，称为马克西米连二世。这件事导致伊丽莎白女王与查尔斯大公的婚姻协商暂时陷入僵局，尽管新任君主希望弟弟“千万不能像上次一样，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但新任君主对两国联姻显得比父亲还要积极。

八月五日，伊丽莎白女王上任以来最大的发展，那就是访问剑桥，而且还待了五天之久。穿着显眼的黑色天鹅绒礼服搭配玫瑰装饰，头上戴着珠光宝气的帽子，上面装饰着一根羽毛，后面还有装饰着珍珠宝石的长纱，伊丽莎白女王在号角的伴奏与大批随行人员的陪衬下，走进了剑桥市。身为剑桥校长的塞西尔自然带领着诸位学者出面迎接，单膝下跪喊着“女王陛下万万岁！”

此行，一如她事前的要求，女王享受正式仪式的光荣与许多余兴节目，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活动”，这些多数出自达德利的心思，在塞西尔的要求下，达德利甚至担任了典礼官。伊丽莎白女王对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礼拜堂的壮丽，感到印象深刻——“全国最好的一座礼拜堂”——当然还有唱诗班。她几乎访遍了所有学院，包括她父亲成立的三一学院与曾祖母玛格丽·特波福夫人创立的圣约翰学院。她参与了许多课程，看了拉丁戏剧演出，听了演讲，发表演说并参与辩论，她收到许多书、手套与糖果（蜜饯）作为礼物，只要有机会便与学者们——当然以拉丁文为主——尽情谈话。她可以用拉丁文发表优雅的演说，对拉丁文的掌握度极高：在一次演说中，她允诺建立新的学院——但这个承诺最后未能在剑桥实现，而是在牛津实现了，一五七一年，伊丽莎白女王正式成立了牛津大学耶稣学院。

当某位演说者公开赞扬她的贞节时，伊丽莎白女王深受感动，并表示：“愿神祝福你的心，直到最后。”但当这位演说者赞扬她的其他特质时，女王却撇开了头，咬着嘴唇与手指，展现出不寻常的尴尬模样。

八月十日，比计划中晚了一天，女王才“开开心心地结束”剑桥访问之行，她表示“若还有够多的啤酒与麦芽酒能供应给宫廷人士享用的话”，她还想再待更久。

* * *

在这次访问行程结束后，伦敦地区开始出现流言指女王将嫁给查尔斯大公，且准备在维也纳成立使馆，并且向马克西米连二世致意哀悼他的父丧，但事实上却是要定下这门亲事。其实这又是伊丽莎白女王狡猾的拖延政策而已。

她还是希望可以让达德利与玛丽·斯图亚特成婚，但当年九月，终于获得允许返回苏格兰的莱诺克斯公爵，却向伦道夫提出警告，这件事不可能成功：“达德利既非古老高尚的贵族世家后裔，且他的血缘还有瑕疵。恐怕苏格兰方面不可能接受他。”若英方持续强硬施压，苏格兰方面说不定会接受他的儿子达恩里勋爵亨利·史都华。

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命令下，塞西尔继续针对此事施压，为两人成婚的合理性写了十六页长的信件给伦道夫，并坚称只要嫁给了达德利，玛丽·斯图亚特定能得到英国王位继承权，而且绝对会得到国会的许可。然而玛丽·斯图亚特想要更明确的答案，她认为英国王位本来就属于她，但现在却得答应其中的附加条件，这也让玛丽·斯图亚特感到愤怒不已。

当然她也十分忧心，她不愿接受达德利一事，恐将成为两国关系的绊脚石，因此到了九月份，为了强调自己的善意，她派出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彬彬有礼、风度翩翩、学养程度又好的詹姆士·梅尔维尔爵士（Sir James Melville）前往英国。几年后，在梅尔维尔爵士的回忆录中，鲜活地提到这次与随后几次的出使经验，这些记录对历史学家来说尽管不是最可靠的资料来源，但依然弥足珍贵。

在接到玛丽·斯图亚特近期来信中语气最唐突的一封后，伊丽莎白女王随即召来梅尔维尔爵士大肆抱怨。伊丽莎白女王收起了情绪，将她盛怒之下回的信给梅尔维尔爵士过目，她告诉梅尔维尔爵士，自己决定不寄出这封信是因为觉得这封信措辞太温和。梅尔维尔爵士后

来总算说服她玛丽·斯图亚特没有冒犯的意思，伊丽莎白女王才开心地将两封信都撕掉。

梅尔维尔爵士的机智与完美，在与伊丽莎白女王首度的谈话中尽显无遗，在他待在宫中的九天里面，女王去哪里都要求他随行，和他不断嬉闹，博取他的赞美。他长年待在法国、意大利与德国宫廷，这使他的语言能力极强，也让伊丽莎白女王如棋逢敌手般展现她语言专家的长才。女王也为了吸引他的目光特别打扮，这天穿着英式服装，隔天可能就是法国风格，第三天可能又变身成意大利女子。女王还问他哪一种他最欣赏，“我说是意大利风的装扮，这让她开心不已，因为她最喜欢和意大利女性一样，戴着有网纱的帽子展现她的金发。其实她的发色比金黄再偏红一点，但她的卷发看来十分自然”。

她也询问梅尔维尔爵士：什么样的发色在他的国家最受欢迎。她的发色与梅尔维尔爵士的女主公相比又如何？两人之间谁最美？梅尔维尔爵士当下随即明了，英格兰与苏格兰两国之间未来的邦谊，但看他如何回答，因此他技巧性地回答，并装作自然地表示：“两人最大的缺点就是都太美了”。当伊丽莎白女王坚持要他回答时，他则称伊丽莎白女王是英格兰最美的女王，而玛丽·斯图亚特则是苏格兰最美的女王。对于这个答案，伊丽莎白女王并不满意，于是她淘气地坚持要他做出选择。于是梅尔维尔爵士非常精明地回答：“两人都是彼此国家贵族中最美的女子，女王陛下（肤色）较白，而我们的女王也很可爱。”

“我们俩谁比较高？”伊丽莎白女王停顿了一下又问。

梅尔维尔爵士表示玛丽·斯图亚特比较高。

“那她太高了，”女王回答，“因为我不高也不矮。”

“接着她问我（玛丽·斯图亚特）做什么样的运动。我告诉她，当我为了出使英国从苏格兰出发时，女王正从高地打猎返回宫廷；若在繁杂的政务之外还有闲暇，她就会看些好书，了解许多国家的历史，有时会弹弹鲁特琴与小键琴。接着（伊丽莎白女王）便要问我她演奏得好不好。”

“以女王的地位来说，算是好的了。”梅尔维尔爵士回道。

当晚，为了向梅尔维尔爵士展现自己的音乐天分，伊丽莎白女王便精心安排，由表哥亨斯顿勋爵装作不经意地，带着梅尔维尔爵士穿过回廊经过一个小房间，而女王则独自在房中弹着小键琴。亨斯顿勋爵演得非常逼真，梅尔维尔爵士当然不是个傻子，但当他称赞女王的弹奏技巧时，她装作不知道梅尔维尔爵士在场，于是上前“装作要用左手打我”，并称“她弹奏小键琴是为了排遣忧郁，因此总是独自弹奏，从未在男人面前表演。”她责怪梅尔维尔爵士进入这个房间不回避，同时问他为何在此。他用殷勤的话语准备欠身离开，他说：“听见如此动人的音乐，令人销魂，不知为何地将我引来此房间。”女王满意极了，于是坐在一块软垫上，梅尔维尔爵士跪在她身旁时，“她亲手递给我一块软垫，要我放在膝下，我一开始拒绝了，但她坚持要我接受”。当女王再问道，她与玛丽·斯图亚特两人谁的音乐素养高时，他只好勉强承认是伊丽莎白女王。

为了取悦女王，他延后起程离开的时间，在英国宫廷多待了一晚，就为了看女王跳舞。不出所料，伊丽莎白女王果然问他，玛丽·斯图亚特的舞是否跳得跟她一样好。“她跳得没这么高，也没有这么威风。”当然，这是个奉承的答案。

九月二十八日是梅尔维尔爵士出使任务的最后一天，在圣詹姆士宫的谒见室中，伊丽莎白女王总算将罗伯特·达德利拔擢册封为贵族，当时梅尔维尔爵士与其他大使皆在场。为了让苏格兰女王玛丽·

斯图亚特“更看得起他”，他在许多地方显要与宫廷臣子面前被封为登比男爵与莱斯特伯爵（Baron of Denbigh and Earl of Leicester）。这是个隆重的仪式，身为新任伯爵，新的格言就是“效忠与忠诚”，要表现出最严肃与庄严的那一面。当罗伯特·达德利跪在地上行礼，由女王亲手在他的领子与貂毛披风上授予伯爵勋章时，梅尔维尔爵士目睹伊丽莎白女王微笑着搔搔他的脖子，他因此大感震惊。尽管女王多次重申，自己仅将达德利当作“兄弟与好友”，这样的行为与此简直大相径庭。

典礼仪式结束后，伊丽莎白女王与梅尔维尔爵士说上话，问他：“您喜欢我的新臣子吗？”梅尔维尔爵士知道，玛丽·斯图亚特与达德利成婚的想法在苏格兰非常不受欢迎，于是他便不置可否，女王便指向在典礼中担任捧剑官的年轻的达恩里勋爵，“但您却比较喜欢那边那个小伙子！”

他厌恶地看了那个毫无男子气概的小伙子一眼，梅尔维尔爵士表示：“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都不会想要选择那样的男人，他比较像个女人，不像个男人，他看起来十分好色、无须，像个娘们儿。”

伊丽莎白女王绞尽脑汁想要向梅尔维尔爵士证明，她是真心想要撮合莱斯特伯爵与苏格兰女王，因此邀请他在莱斯特伯爵与塞西尔的陪同下进入她的寝宫，让他见识她的珍宝。她从小橱柜中拿出苏格兰女王的画像，并热切地给了她一个吻。梅尔维尔爵士发现柜中还有一个东西，用纸妥善保存，上面还有女王亲笔题字，写着“爵爷的画像”，此时梅尔维尔爵士运用了各种说服的技巧，才终于说动伊丽莎白女王，将她用纸妥善保存的莱斯特伯爵画像拿出来。梅尔维尔爵士于是表示，这是献给苏格兰女王最好的礼物，伊丽莎白女王却拒绝送出这份礼物，因为她只有这一幅达德利的画像。

“但女王陛下拥有他本人呀！”梅尔维尔爵士打趣地说，但他内心早已明白，伊丽莎白女王对于提出莱斯特伯爵作为玛丽·斯图亚特的大婚人选已经开始后悔。他当然也不惊讶，因为他早已发现，伊丽莎白女王与莱斯特伯爵根本“不可分割”。

在赐予他“如网球般大的红宝石后”，她再也不会给他任何宝物了。若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答应她的建议，伊丽莎白女王表示“她将一步一步地得到她所希冀的一切”。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女王愿意送一个美丽的钻石给她。

梅尔维尔爵士与伊丽莎白女王的谈话，并非仅止于诙谐有趣。一次在讨论玛丽·斯图亚特的婚姻大事时，伊丽莎白女王告诉他“自己已然决心，至死都要维持童贞女王的节操，除了表亲苏格兰女王不顺从外，没有什么能迫使她改变心意”。敏锐的梅尔维尔爵士随即惋惜地答道：“女王陛下，您不需要告诉我这些。我了解您的心意。您知道若自己结婚了，顶多就是英国的王后，但现在您既是女王又是王后。您根本无法忍受他人凌驾于您之上。”

梅尔维尔爵士终于有机会与莱斯特伯爵私下谈话，伯爵告诉梅尔维尔爵士，自己连替苏格兰女王擦鞋都不配。他也据实以告，表示自己对玛丽·斯图亚特一点兴趣也没有，并将这个计划背后的主谋推给了塞西尔——“他的秘密政敌”——只是想把他踢得越远越好。

在出使期间，梅尔维尔爵士与宫廷许多人谈话，在西班牙使馆中，他发现其中的人士对女王怀着敌意，于是针对伊丽莎白女王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当他返回苏格兰时，他的调查结果指出英国女王并不是个老实坦白的人，而是异常伪善，这一切只让玛丽·斯图亚特更加起疑，对英格兰与苏格兰关系一点帮助也没有。他此行出使带来唯一的正面影响，就是双方同意，英格兰与苏格兰的专员可以在贝维克会面，讨论达德利与玛丽·斯图亚特大婚事宜。伊丽莎白女王向梅尔维

尔爵士表示，“若玛丽·斯图亚特真想结婚，除了莱斯特伯爵，没有第二人选，因为她自己已然决定一生独活，因此她希望表亲苏格兰女王可以嫁给他，他才是最适合的人。这样也能解决她心中的恐惧与疑虑，生怕在死前可能遭人谋朝篡位，因为她非常清楚，莱斯特伯爵如此值得喜爱与信赖，在伊丽莎白女王在世期间，他绝对不会同意，也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梅尔维尔爵士表面上虚应故事，在此同时，他转往西班牙大使馆，想让玛丽·斯图亚特与唐卡罗王子婚姻协商继续进行，却徒劳无功。玛丽·斯图亚特对这门亲事只好死了心，但她想要先确定希望已然成空，才愿意寻找新的夫婿人选。实情是唐卡罗王子现在的心理状态实在太不稳定，显然无法与任何人结婚。

尽管从未认真考虑过要嫁给罗伯特·达德利，但玛丽·斯图亚特却发现自己开始审慎思考，是否有可能嫁给年轻的达恩里勋爵。就如同莱诺克斯伯爵家族所说，这桩婚姻绝对有利可图：将两股问鼎英国王位的势力联合在一起，也可以将天主教倾向的莱诺克斯家族纳入旗下——玛丽·斯图亚特认为，莱诺克斯家族的势力比表面来得大——争夺王位才有希望。只是，还有一个问题：达恩里勋爵依然在英国，他和他的母亲都住在宫中，女王拒绝让他们陪同莱诺克斯伯爵前往苏格兰；而且身为臣子，伊丽莎白女王是否会答应他离宫，也还是个问题。

在与西班牙联姻的希望落空后，梅尔维尔爵士再度在玛丽·斯图亚特的指示下，会见莱诺克斯伯爵夫人，讨论苏格兰女王与达恩里勋爵成婚的可能性。她热情地欢迎梅尔维尔爵士的到来，并致赠一份礼物要他转交给玛丽·斯图亚特、莫雷伯爵与梅特兰大使，“因为她依然深深希望，在与苏格兰女王的婚姻之中，她的儿子能比莱斯特伯爵有更进一步的机会”。

伊丽莎白女王是如此敏锐，早已察觉到端倪。于是对先前写给玛丽·斯图亚特的信件内容，她感到懊悔不已，于是要求莱诺克斯伯爵恢复原职，甚至去信给玛丽·斯图亚特，希望能说服她不让莱诺克斯伯爵进入，但玛丽·斯图亚特并非出尔反尔的人。

十一月份，当英国与苏格兰专员在贝维克碰面时，两国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玛丽·斯图亚特同父异母的哥哥莫雷伯爵，要求伊丽莎白女王清楚说明，若玛丽·斯图亚特接受莱斯特伯爵为丈夫，能得到什么益处，但英国方面却始终无法给予清楚答案，他们只是不断重申，玛丽·斯图亚特若想坐上英国王位，接受这段婚姻是唯一的方法。怒气瞬间迸发，苏格兰方面感觉受辱，愤而离开了谈判桌。

接下来一个月，莫雷伯爵与梅特兰大使皆去信给塞西尔，表示除非伊丽莎白女王允诺将王位传给玛丽·斯图亚特，否则苏格兰丝毫不考虑这桩亲事。让各界惊讶不已的是，伊丽莎白女王不为所动。她认为到了这一步，玛丽·斯图亚特永远不可能接受莱斯特伯爵了，她也非常清楚，玛丽·斯图亚特抱着嫁给达恩里勋爵的希冀，为此玛丽·斯图亚特也得来求助伊丽莎白女王，因为达恩里勋爵是她的臣子。在认定玛丽·斯图亚特定会有事相求之下，伊丽莎白女王认为，就算表亲拒绝了她提出的夫婿人选，她也不算输了面子。塞西尔也算到了这一点，于是建议让达恩里勋爵前往苏格兰拜见父亲，来吊吊苏格兰女王的胃口，莱斯特伯爵闻言大声赞好。玛丽·斯图亚特本人则表示，莱斯特伯爵甚至去信警告，伊丽莎白女王在两人亲事的背后，其实算计的是要吓阻其他危险的追求者。至于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对这个计划的热情则开始消退，她也采取与塞西尔同样的观点，开始相信让玛丽·斯图亚特与达恩里勋爵成婚，对英国的威胁总比让玛丽嫁给有权有势的天主教国家贵族来得小，毕竟经过最近的仔细观察后，伊丽莎白女王早已发现，达恩里勋爵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丝毫无害。但为了策略上的理由，她还是不能让达恩里勋爵去苏格兰。

莱斯特伯爵最近刚被女王指派做牛津大学校长，已正式恢复对女王的追求，过去几个月来，他绞尽脑汁表现出自己的未来属于她，只有他对她最好。而他也总算得到新任西班牙大使唐迪亚哥的支持，来对抗女王撮合他与玛丽·斯图亚特的企图，同时也不断地鼓吹，让达恩里勋爵正式追求苏格兰女王。此时，他深深相信，伊丽莎白女王设计这次的计划，让他与玛丽·斯图亚特配对，都是为了测试他对她的忠诚；而他认定，自己已证明了忠贞不贰，没有顺水推舟。

十二月时，因为一场肠胃炎，女王再度重病，英国王位继承问题再度浮上台面。幸运的是，她非常迅速地恢复了健康，但就如同塞西尔对瑟洛摩顿爵士所说的，“这段时间她给我们的只有深深恐惧”。英国内部再次对她的婚姻问题开始施压，塞西尔甚至转而求神，他在祷词中表示：“若有适当人选出现，能驯服这个女人，他愿言听计从”。若不能实现，他告诉瑟洛摩顿爵士：“我只能告诉你，事情如此紧急，我根本活不下去了。”

索尔兹伯里主教约翰·叶威则写下许多人的心声：“我们如此渺小，连未来的统治者都无法知晓！神啊，我深信，为了国家的安全福祉，您定能保伊丽莎白女王安康！”

9 威胁王权的利害关系

在一五六五年的几个月中，塞西尔似乎看到伊丽莎白女王认真考虑与外国联姻的端倪。除了重新对女王展开追求的查尔斯大公外，凯瑟琳·梅迪奇也派遣特使保罗·德·富瓦（Paul de Foix）前来求亲，希望能让伊丽莎白女王与查理九世成亲。法国王太后不计代价地想要阻止英国与哈布斯堡王朝势力的联合。伊丽莎白女王私下对此兴趣缺缺：她已经三十一岁了，但查理九世才十四岁，她告诉西班牙大使唐迪亚哥，她一点也不喜欢让世人在礼堂外嘲笑她“老牛吃嫩草”。英国驻巴黎大使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告诉她，这个年轻的国王可能会长得很高，但膝盖与各处关节都有疙瘩，而且腿部比例失衡。他说话短而仓促，个性反复无常，而且有冲动性格。更重要的是，他一个英文字也不会。就连女王的弄臣都恳求她不能嫁，因为这个人“就算不是个婴儿也还是个儿童”。

伊丽莎白女王告诉德·富瓦特使，她觉得自己太老，恐怕无法嫁给他的主公。她宁愿死，也不愿像姐姐一样被年轻的丈夫鄙视、抛弃。毕竟两人之间年龄差距极大，世人可能会嘲弄查理九世嫁给了妈妈吧！

德·富瓦特使感觉受到屈辱，便暗示此事到此为止，然而伊丽莎白女王依然希望维持与法国的邦谊，避免法国再度与苏格兰交好联手。同时，她也希望暗示哈布斯堡王朝，想要追求她的人不只有他们。于是她着手展开不变的把戏，在若有似无的承诺与希望中牵绊她

的追求者。她公开的行为，就是突然大发雷霆，指控法国国王根本没把她放在心上，竟然准备要突然收手不再追求。她希望将重点导向两国联姻的难处，这样法国方面就能理解，她为什么不说清楚。

接着，她去信给在巴黎的托马斯·史密斯爵士，要求他老实地评论查理九世这个人。在他的回信中表示，他认为查理九世适合当她的丈夫，因为他“是十分听话的年纪，但又十分聪明。我愿意支持查理九世，也认为女王陛下会喜欢他”。

伊丽莎白女王向德·富瓦特使表示，她必须与英国贵族们稍事商量，但多数的贵族都公开反对这桩婚姻，似乎只有莱斯特伯爵支持。只要有事情能够转移女王的注意力，较为合适的哈布斯堡王朝联姻就会失焦。塞西尔则不表态，但他并不认为伊丽莎白女王真的对查理九世有兴趣。枢密院多数成员都对此大表反对，尤其是萨赛克斯伯爵，他表示要小心查理九世的“法国习性”，在法国“和漂亮的女子交好”，这样一来“对英国王室延续香火一点帮助也没有”。

德·富瓦特使对于英国方面密室会谈的一切浑然不知，当女王盛赞查理九世超乎常人的早熟时，他以为成功在望。接下来五个月，伊丽莎白女王就享受着被追求的乐趣，同意交换两人的画像，甚至讨论起查理九世秘密访英计划。在母亲的指导之下，查理九世正式宣布自己爱上英国女王，并乖乖表现出热烈追求之意。但在这段时间，伊丽莎白女王一方面抗拒德·富瓦特使为得到确定的答案而不断地施压，同时一方面私下考虑起与查尔斯大公成婚的可能性。

就在此时，莱斯特伯爵始终热衷于支持英法联姻，塞西尔与哈布斯堡的特使们则料中了他的心思，此举只是在掩饰他背后的野心。显然他正以行动延缓女王做出决定的速度，以阻止她嫁给任何一个除了他以外的男人。

* * *

一五六五年二月份，托马斯·伦道夫已经整整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孜孜不倦地努力，希望能让女王安排玛丽·斯图亚特与莱斯特伯爵成婚的计划成功，而且也逐渐感觉到，玛丽·斯图亚特总算开始接受这个想法：她曾暗示若条件够吸引人，她说不定真会接受新任的莱斯特伯爵。伦道夫随即欢天喜地地写信给女主公，向她报告这个好消息。

接着他尝到了挫败的苦涩，塞西尔回信给他，表示女王已改变心意，同时也在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与莱诺克斯伯爵夫人的要求下，决定答应让达恩里勋爵亨利·史都华前往苏格兰，表面上则以家族事由为借口放行。伊丽莎白女王不是傻瓜，对于他想前往苏格兰的原因，清楚得很；尤其是后来，许多人都相信，伊丽莎白女王对达恩里勋爵的了解多过玛丽·斯图亚特，让达恩里勋爵离开，是基于她相信若给玛丽·斯图亚特够多的饵，总有一天她会上钩。

在达恩里勋爵抵达苏格兰的前三天，据传幽灵战士们在深夜的爱丁堡街头起了冲突，许多迷信的人深信这暗示着恶事即将发生。玛丽·斯图亚特一点也不相信这些传言，二月十三日，当达恩里勋爵抵达爱丁堡时，她给予温暖的欢迎。

她马上对他深深着迷；詹姆士·梅尔维尔爵士表示，玛丽·斯图亚特努力地控制她的情感，但她很快就陷入情网，无法与达恩里勋爵稍离。现年十九岁，比玛丽·斯图亚特小三岁的达恩里勋爵的体格非常有魅力，他是个卷发又礼数周到的年轻人，而且还很有成就；他写的信非常优雅，有精湛的鲁特琴技，对运动也十分在行。玛丽·斯图亚特认定他是“世上最有吸引力，也是拥有最佳身材比例的修长的男子”。但她还不知道，在那温文儒雅的外表下，达恩里勋爵其实是个被宠坏的、莽撞的、放纵的、性格不稳定的、具有攻击性的而且非常

笨拙的人。对达恩里勋爵的怦然心动让她蒙蔽了双眼，玛丽·斯图亚特决定将国家与社会公益的考虑摆在一边，对苏格兰贵族们的反对声浪及小心为上的建议，也全都充耳不闻。

玛丽·斯图亚特并未表明她对达恩里勋爵的情感，是年二月却两度写信给伊丽莎白女王，表示希望可以确定继位事宜。三月十五日，伦道夫送交伊丽莎白女王的回应，信中写着，若她的好表亲玛丽·斯图亚特同意嫁给莱斯特伯爵，伊丽莎白女王将会给予莱斯特伯爵各种荣耀，同时也会私下运作完成玛丽·斯图亚特的心愿。但她并不愿意正式面对玛丽·斯图亚特的要求，也不愿意在她自己结婚或正式确定终其一生独身前，公开此决定——她近期内就会决定其中一个答案。得到这样的答案后，玛丽·斯图亚特“尽情地哭了个痛快”，表示“伊丽莎白女王此话十分邪恶，并指控伊丽莎白女王伤害了她”，浪费她的时间。

此时，玛丽·斯图亚特已然深深爱上达恩里勋爵。当他因风疹重病时，玛丽·斯图亚特害怕他死亡，简直像发狂了似的，而且一点也不隐藏她的感受。她甚至不顾可能感染的风险去探望他，甚至亲自照顾他。当他总算康复，她已经确定自己要嫁给他了。根据伦道夫表示，她的心意非常明显，但她的宫廷顾问则持保留态度。“许多人都祝福他，但也有许多人怀疑他，内心深处思量着，除了平凡有礼的年轻人外，到底什么对苏格兰最好。”莫雷伯爵与支持者则作了最坏的打算，认为达恩里勋爵的天主教信仰，可能导致“他们的威权与王朝遭到推翻而覆灭”。

* * *

女王的爱情也在英国引起各界的担忧。一日清晨，莱斯特伯爵带着西班牙大使唐迪亚哥在温莎大公园中骑行，回程时经过女王寝宫旁的一条小路。莱斯特伯爵忽然动了戏弄的念头，便开始大呼小叫，宣

布莱斯特伯爵驾到；女王竟出现在窗边，唐迪亚哥诧异地看到，女王穿着十分透明的睡袍，而且完全不在意自己的衣着随便，便与莱斯特伯爵打招呼。宫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每天早上女王着装时，莱斯特伯爵都会到女王寝宫一会儿，每当莱斯特伯爵将连衣裙递给她时，都会得到女王的一个吻——连衣裙可是那个年代的女性贴身衣物。

因为这些传言，让莱斯特伯爵与诺福克公爵的不和更甚。当年三月，在怀特霍尔宫的网球场上，丑陋的意外发生了，两位爵爷当时正在女王面前比赛网球。达德利伯爵“觉得很热，流了很多汗，于是从女王手中接过手帕擦脸”。在他如此不敬的举动震慑之下，诺福克公爵大发脾气，指称莱斯特伯爵“太过无礼，矢言用球拍痛揍他的脸”。若非女王在旁惊声尖叫要他住手，他可能真会这么做。后来受到女王怒气波及的是诺福克公爵，而不是莱斯特伯爵，而此事对两人关系一点帮助也没有。

同一个月内，莱斯特伯爵继续追求女王，安排葛雷法学院一个剧团到宫中，在女王面前表演。这场余兴节目，由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主办的晚宴开始，接着，唐迪亚哥的报道中写道：

那是一场马上长枪比武竞赛。参赛者为艾赛克斯伯爵、萨赛克斯伯爵与亨斯顿勋爵。这场竞赛结束后，所有人穿过女王房间，来到一个准备了一出英文喜剧的地方。剧情是有关婚姻的问题，是女神朱诺与黛安娜之间的对话，朱诺象征着婚姻，黛安娜则是禁欲。丘比特的判决则支持婚姻派。女王转向我说：“这完全是在挑衅我。”

唐迪亚哥大使觉得这一切“非常戏剧化……在看完了戏剧表演后，便是萨梯化装舞会，当中有一位希腊神话中嗜酒好色的森林之神，他与女性跳舞，在那之后，进来了一排十二人，总共十排的男性，他们稍早之前都参与了马上长枪比武竞赛，他们全都配着武器，向女士们邀舞”。

* * *

四月十五日，伦道夫的报告中表示，玛丽·斯图亚特与达恩里勋爵不只是看对眼了，有传言指出，玛丽·斯图亚特准备要“摒弃其他机会”嫁给达恩里勋爵。莫雷伯爵的派系团结起来对抗入侵者，而玛丽·斯图亚特则受到达恩里勋爵与她的意大利籍秘书戴·维里奇欧（David Rizzio）煽动，对莫雷伯爵的派系感到愤怒不已，脱口而出大骂同父异母的哥哥“根本是想谋权篡位”。两人之间完全决裂，并造成日后的严重影响。

到了四月十八日，威廉·梅特兰大使抵达伦敦，他告知伊丽莎白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已然决定要与达恩里勋爵大婚。伊丽莎白女王对此“奇怪而且不太可行的求婚”表示惊讶，并对达恩里勋爵违抗命令感到愤怒不已——身为伊丽莎白女王的表亲与臣子，必须在女王的许可之下才得以结婚。五月一日，伊丽莎白女王透过英国枢密院去函警告玛丽·斯图亚特，若她真与达恩里勋爵成婚，“不但不适合、毫无利益可言，且将对两国与两国领导者间的友好关系造成威胁”。若玛丽·斯图亚特不愿遵守，伊丽莎白女王将可能“直接在英国国内挑选一位贵族作为王储”。在塞西尔的带领下，枢密院多数成员都签署了这份文件；值得注意的是，莱斯特伯爵就是例外。许多英国枢密院成员都认为女王的愤怒只是做做样子，因为他们都认定伊丽莎白女王是玛丽·斯图亚特踏入这场灾难性婚姻幕后的黑手。尽管如此，英国政府方面依然认定，玛丽·斯图亚特选择达恩里勋爵作为配偶，就是为了巩固英国王位的继承权，但她这么做，对伊丽莎白女王造成史无前例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英国天主教徒对事情的发展感到欢欣不已。

尼可拉斯·瑟洛摩顿爵士旋即朝北出发，要捉拿达恩里勋爵回英国，同时也要警告玛丽·斯图亚特，两人的结合“将对两国共同友好

关系不利”。瑟洛摩顿爵士奉女王之命，要“尽可能地阻止或拖延这桩婚姻”；显然在她眼里，从不认为达恩里勋爵真的会背叛她。五月十五日，瑟洛摩顿爵士总算抵达苏格兰王宫，并亲眼见证玛丽·斯图亚特真如传闻般“被热烈的爱迷了心窍，早已失去领导人该有的理智”。他感到十分忧心，于是呼吁她要冷静，却仿如对牛弹琴。伦道夫记录道：“她实在太痴狂，甚至有些人以为她被施了巫术。把羞耻完全抛诸脑后。”

随后，尼可拉斯·瑟洛摩顿爵士正式觐见苏格兰女王，并表示伊丽莎白女王的反对。为了维持皇室贵族的优雅，玛丽·斯图亚特要他回报伊丽莎白女王，“她要为自己的婚姻做决定。她再也不要活在只有是与否的世界中。”瑟洛摩顿爵士感受到她猛烈语气背后的警告意味，于是写信提醒塞西尔。

伊丽莎白女王此刻总算明白，玛丽·斯图亚特这辈子都不会接受莱斯特伯爵作为配偶，为了挽回面子，她只好告诉唐迪亚哥大使，罗伯特·达德利也并不同意这桩婚姻，至于大众则普遍认为，其实是伊丽莎白女王无法放弃他。反观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这一边，现在伊丽莎白女王已经放弃了计划，于是他再度公开表现出追求女王的企图心。因为许多贵族与臣子都很担心女王将无子嗣，也因此使他得到比过去更多的支持。

六月初，唐迪亚哥大使的报告中表示，莱斯特伯爵认为胜利就在指间：“女王似乎也赞成这桩婚姻，而法国大使也认为她会以贫穷之类的原因，回绝查尔斯大公的追求，让自己远离这个泥淖。”唐迪亚哥大使也向枢密院中的重要成员萨赛克斯伯爵表示，他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可能终身不婚，就算她真的愿意结婚，也不可能要莱斯特伯爵之外的人。萨赛克斯伯爵非常讨厌莱斯特伯爵，对莱斯特伯爵与女王结

婚的说法嗤之以鼻。“除了查尔斯大公之外，也没有什么人选配得上她了。”萨赛克斯伯爵断然表示。

就连塞西尔似乎都接受了所谓的宿命论，比起五年前，现在的他对于自己的地位更了然于心，他要自己做好准备，接受达德利作女王的配偶，尽管——在他日后的回忆录中曾记载——这段婚姻对王国毫无利益可言。就个人而言，塞西尔越来越喜欢这个难伺候的女主子，他担心莱斯特伯爵会是个不友善又善妒的丈夫。但显然没有人会反对，莱斯特伯爵现在与诺福克公爵、萨赛克斯伯爵及塞西尔本人齐名，共同成为英国政坛影响力最大的四巨头。

在这四人之中诺福克公爵的势力最小。尽管他是英国独一无二的公爵，也是最高尚的贵族，但却尝尽苦涩、受尽挫折，认为自己的天分全付诸流水。一五六五年的夏天，他开始向萨赛克斯伯爵靠拢，因为两人同样对莱斯特伯爵反感。

萨赛克斯伯爵汤马斯·瑞克里夫（Thomas Ratcliffe）的母亲来自霍华家族，因而与女王的血缘沾上边。出生于一五二五年的他选择走上军事道路，最近刚结束九年爱尔兰中尉役期，这份工作并不轻松，但他却非常积极，有时也十分残忍，只是成就却不如预期。莱斯特伯爵的妻舅亨利·西得尼爵士则是他的手下，但亨利·西得尼爵士并不看好萨赛克斯伯爵的能力，据此，莱斯特伯爵得以对抗萨赛克斯伯爵。这显然有点不公，毕竟萨赛克斯伯爵度过了非常严酷的考验，牺牲了他的健康与精神，他后来因过于羸弱而不得不要求女王将他召回。

萨赛克斯伯爵发现有机可乘，应当组织一个反莱斯特伯爵的团体，而诺福克公爵也愿意参加。他们的秘密成员还有亨斯顿勋爵以及女王的舅舅霍华德勋爵。但很快，莱斯特公爵便召集了一堆支持者，

组成了与其相抗衡的团体，夏季来临时，两个派系阵营皆公开持武在宫中与城里昂首阔步。

* * *

同时，瑟洛摩顿爵士要求达恩里勋爵与莱诺克斯伯爵，立即与他一同返英，“两人并未谨守职责，身为女王陛下的臣子，在并未考虑女王利益的情形下，企图做出傲慢又放肆的举动”。但他并不知道，事已至此，许多苏格兰贵族也开始支持两人成婚，同时也并未察觉，伊丽莎白女王对莫雷伯爵要求支持的声音十分冷淡；女王表示，若莫雷伯爵的目的只是要给予玛丽·斯图亚特建议，她便乐意支持。身为姐妹执政者，她不能支持反抗力量来对抗另一个神圣的女王。达恩里勋爵拒绝听从伊丽莎白女王的命令——“对自己现在身处的地方十分满意，也有意持续待在这里”——瑟洛摩顿爵士也早已发觉，此刻要改变玛丽·斯图亚特的心意，为时已晚：于是在五月二十一日这天，他通知伊丽莎白女王：“苏格兰女王对达恩里勋爵已经超越一切，态势看来无法挽回。”但他仍成功获得玛丽·斯图亚特的承诺，表示她愿意等三个月再行最后决定。

至此，伦道夫与许多人士早已看穿达恩里勋爵，他一天一天地变得更加傲慢，也开始滥用权势，仗势欺人，这样的态度令人担忧，针对玛丽·斯图亚特一头栽进爱情漩涡，还想仓促成婚，特使表达了忧虑，也说出许多人的心情。他的结论是：女王一定被施了法；“她对达恩里勋爵的爱恋让她性情大变，甚至让她的名誉遭到质疑，地位受到威胁，国家也即将分崩离析。我也预见苏格兰与他国的友好关系即将化为乌有，对国家的伤害将接踵而来。”

针对达恩里勋爵的任何批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都不想听，哀伤的伦道夫嗟叹道：“自达恩里勋爵踏上苏格兰国土，便带来无数灾难。女王的未来如何，与达恩里勋爵婚后，她将有什么样的人

生，就留给他人去想吧！”对于苏格兰女王“令人摇头叹息的可怜景况”，他感到非常同情，看到她的巨大转变，变得几乎令人无法辨认，他说：“女王陛下舍弃了一切，她的智慧聪颖不再，她的美丽不如以往，她那令人振奋与鼓励的特质，我已经再也认不得。”

* * *

伊丽莎白女王很少让情感战胜理智，尤其是在婚姻议题上，但有时她也会感受到被逼婚或做决定的压力，大得受不了。一五六五年五月，面临法国方面施压，要伊丽莎白女王即刻决定是否接受查理九世的求婚，以及臣子们殷殷期盼的压力，她在枢密院会议时崩溃痛哭，直指莱斯特伯爵、塞西尔与瑟洛摩顿爵士，要以逼婚的方式摧毁她。她溃堤的情绪让三个男人很是震惊，他们只好尽力安抚她，同时发誓绝不再逼迫她做违反意志的决定，并保证对她忠心耿耿。

六月底，她知道已经无法再拖延下去，伊丽莎白女王正式以对方太年轻为理由，拒绝了查理九世的追求。她告诉德·富瓦特使，对她来说，一个可以让她生下子嗣的丈夫才有用。她强调，她不想让丈夫篡夺权力，控制英国财政、陆军与海军，因为这就是丈夫的主要功能。

由于忧心莱斯特伯爵会乘胜追击，塞西尔、诺福克公爵和萨赛克斯伯爵，动用各种资源希望能促成与哈布斯堡的婚事。马克西米连二世的特使亚当·瑞科维奇（Adam Zwetkovich）于五月份抵达英国，表面上是为了回赠已故君主的勋章，实则为观察伊丽莎白女王是否真心想与查尔斯大公成婚：再一次的拒绝就太羞耻了。他也想借机谨慎观察，有关伊丽莎白女王与莱斯特公爵间的传闻真假；若两人之间清白，便有望重启婚姻协商。

现任的哈布斯堡君主，希望能确定英国这次的诚意，诺福克公爵要求莱斯特伯爵支持这桩婚事，放弃追求女王的念头。毕竟，当下伊丽莎白女王看来对这个计划兴致高昂，尽管不情愿，但莱斯特伯爵只能别无选择地顺从，却发现自己被指派为谈判员之一，要与瑟洛摩顿爵士一起前去与亚当·瑞科维奇协商。若女王最后真与查尔斯大公成婚，莱斯特伯爵将失去所有特权、影响力与女王的偏袒，只能盼望对手的垂怜。法国方面，既然无法透过姻亲关系与英国联手对抗共同敌人西班牙，自然也插手反对英国与哈布斯堡王朝联姻，并且也开始竭尽所能地希望可以说服伊丽莎白女王嫁给莱斯特伯爵。但让莱斯特伯爵生气的是，尽管外界难以看穿女王真正的心思，但女王表现出的态度似乎偏向嫁给查尔斯大公。

莱斯特伯爵感到十分沮丧，因而向唐迪亚哥透露，他觉得伊丽莎白女王绝不可能嫁给他，“因为她心意已决，要嫁给有权有势的贵族，无论如何也不会选择自己的臣子”。然而唐迪亚哥大使十分欣赏莱斯特伯爵，他抱持着十分乐观的态度，并向菲利普二世回报，表示“罗伯特·达德利的追求还未结束”。但他的主公却下令，要他与奥地利特使合作，让哈布斯堡王朝联姻协商有个快乐的结局，但在此同时还要协助莱斯特伯爵往目标前进，“努力帮助他，若有一天他真的能与女王大婚，让他依然保持对西班牙的友好关系”。

瑞科维奇特使因宫廷传闻而大受鼓舞。当他见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他向女王表示查尔斯大公“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她”。但她却言辞闪烁，甚至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泼了他一头冷水：“我从未向任何人保证不嫁给莱斯特伯爵。”瑞科维奇特使却告诉她，罗伯特·达德利是她与查尔斯大公婚姻协商中间“最重要的发起人，也是最友善的倡议者”。

“我会选择独身，”她宣布，“英国女王的使命，并未强迫我一定要为英国利益而嫁。”

随后，她似乎突然又对联姻一事有了兴趣，她突然提起有关她与达德利之间的恶意谣传的这个奇怪的话题：“哈布斯堡王朝会发现，我的举止一向合乎礼节。”然而瑞科维奇特使希望能有更确切的证据，于是“煞费苦心地展开调查关于女王陛下的正直与节操之行动”。当他发现找不到任何一丝有关女王关系杂乱的证据时，他感到十分震撼，于是下了一个定论，有关伊丽莎白女王的种种传闻“分明是妒忌、恶意与仇视下的产物”。至于莱斯特伯爵，也只是“尊贵的女王以真诚、纯洁和最高尚的爱戴来疼惜他，将他视为兄弟”。

经过两次觐见后，瑞科维奇特使始终不明白，对这么棒的婚姻提议，她的态度怎能如此百变无常。“她以聪颖的态度婉拒，对此事一直反复无常，使得她连最深处的心思也糊涂了，因此外界对她的意图，也就有了各种版本的解释。”但她也可能是用点心机，希望让奥地利方面提出更好的条件，到了夏天，伊丽莎白女王对联姻一事，似乎变得更加积极。

瑞科维奇特使发现这一点后，松了一口气，并开始猜想，女王是否会暗中派人前往维也纳一探查尔斯大公的真面目，因此便写信给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提醒他要随时让查尔斯大公保持在最佳状态，并“骑上最好的骏马”才能让英国方面耳目一新。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并不承认；她依然坚持，要先与追求者见过面，才能决定要不要接受对方，同时表示，她不相信别人的眼光。

“我已强调过上千次，”她暴躁地表示，“我依然没有改变心意，而且永远不会改变。”她又问查尔斯大公是否能秘密出访英国，她表示自己不想让对方认为是宫廷画师与使节们在搞鬼，就像菲利普国王看到玛丽女王的第一眼一样。然而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却认为这个

提议在欧洲贵族中“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也毫无先例可循”，同时坚持若要查尔斯大公前往英国，就必须“以适当得体的礼仪相待”，而且两人之间的婚姻协商，必须达到令人满意的约束程度。接着，便出现了有关查尔斯大公的随从费用由谁支付的问题，伊丽莎白女王这边表示，那是哈布斯堡王朝君主的责任，而马克西米连二世则坚持要伊丽莎白女王负责。

随后，女王便开始用宗教难题来捣乱，她坚持自己不该嫁给不同信仰的人，因为两个想法不同的人，无法平和地共处在一个屋檐下，同时指出若两人在宗教上有歧见，对英国王权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若查尔斯大公维持天主教信仰，势必走上这条绝路。瑞科维奇特使提醒她，她一直都知道查尔斯大公信仰旧宗教，但伊丽莎白女王却辩驳，表示她一直以为查尔斯大公的信仰不深，因此随时都愿意改变想法。但在听说查尔斯大公不愿改变信仰，同时萨赛克斯伯爵提议让查尔斯大公陪伴女王参与圣公会仪式，然后再私下听弥撒后，女王便准备要放弃联姻计划。然而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对这一点十分顽固，坚持要求让他的弟弟与奥地利派出的随从们公开听弥撒。这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仿佛诅咒一般，因为她非常清楚，英国臣民们绝对无法接受，联姻协商仿佛打了死结，但是双方都仍希望能找到妥协的办法。

* * *

一五六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清晨，尽管已答应了瑟洛摩顿爵士，但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依然在爱丁堡的荷里路德宫嫁给了达恩里勋爵。在这场天主教的盛大婚礼过后，新郎很快露出了真面目——他是个耳根子软又放荡的恶霸，他的傲慢触怒了许多苏格兰贵族。根据伦道夫的报告：“许多人都开始担心，在这些人环伺之下，他的小命可能活不长了。”达恩里勋爵希望自己能正式册封为亲王，但莫雷

伯爵却成功地拦阻这件事，而他在法国、西班牙与梵蒂冈的认同下，也只能忍受自己“亨利王”的虚名。

身为天主教徒，多数的苏格兰贵族都不相信他，而且很快就发现，他根本不适合担纲任何政治上的重责大任。他们忍受他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还有点用处。此时，莫雷伯爵在女王的丈夫跟前十分不受欢迎，内战看来一触即发。

听闻玛丽·斯图亚特成婚一事，伊丽莎白女王大为光火，认定她的表亲不信守承诺，破坏国家宗教体制，同时强烈呼吁她尽快与莫雷伯爵达成和平协议，但“性格刚烈的”玛丽·斯图亚特才不愿意。她打算在无人干涉的情形下统治苏格兰，重建天主教信仰，并矢言将苏格兰的反叛领主们“逼到天涯海角”。她自然也无法容忍英国方面的干涉。

为了报复，伊丽莎白女王再度将莱诺克斯伯爵送入伦敦塔，并驰援莫雷伯爵，然而她并不想引发战争，因此她只拨小额款项给莫雷伯爵。八月五日，伊丽莎白女王再度呼吁玛丽·斯图亚特尽快与同父异母的哥哥和解，但玛丽·斯图亚特竟在隔天就宣布他为违法之徒，随后狂妄地向伊丽莎白女王表示：“女王陛下希望她的好姐妹别再管闲事了。”接着，她以瑟洛摩顿爵士拒绝接受达恩里勋爵以亲王名义发给的安全通行权一事为由，逮捕了瑟洛摩顿爵士。事情至此，伊丽莎白女王怒火中烧，当然她也有愤怒的理由。身为女主公，她有权将臣子达恩里勋爵召回英国，但达恩里勋爵却违抗了她的命令。她认定玛丽·斯图亚特在背后撑腰，要达恩里勋爵违背伊丽莎白女王的命令，玛丽·斯图亚特压根儿不想与伊丽莎白女王讨论婚姻大事；于是她所幸在表姑未同意的情形下嫁给了达恩里勋爵。伊丽莎白女王与玛丽·斯图亚特之间从此开始交恶也不令人意外了。从此，她对表侄女的厌

恶与仇视便表现得更加明显。而她的第一步，就是从帮助莫雷伯爵开始。

* * *

是年八月，都铎王朝的另一个危机正悄悄成形。尽管姐姐成为皇室污点，但玛莉·格雷小姐——宫廷人士总嘲弄地称她为“驼子玛莉”——依然在宫中，担任伊丽莎白女王的寝宫侍女，女王想要就近看管她。玛莉·格雷小姐现年已二十五岁了，而且没有美貌或才智可言，以那个年代的婚姻标准来说，她的年纪也太大了；当然，伊丽莎白女王也不太可能允许她结婚。

难以寻找能与自己匹配的人，地位卑微的玛莉·格雷小姐爱上了女王陛下的脚夫刘易舍姆区的托马斯·齐斯（Thomas Keyes of Lewisham），这个男人的年龄是她的两倍，而且因为体型关系，被称为全伦敦最大的人。一天晚上九点，在怀特霍尔宫水门旁，脚夫齐斯所住的小屋中，两人在神父的见证下秘密结婚了，而这位神父的身份从未曝光。几周后，玛莉·格雷小姐承认自己有辱女王门风，让女王发了好大一场脾气。女王将脚夫齐斯交付舰队街监狱判坐牢三年，随后在答应永远不与妻子见面的条件下，他才顺利出狱。女王不择手段地设法让这段婚姻被判无效，但伦敦主教格林达尔拒绝合作，让女王苦恼不已。

玛莉·格雷小姐则被送往白金汉郡切克斯——也就是现在英国首相居住的地方——并在威廉·霍特里的看管下接受软禁。经过一段时间，她又辗转被送往萨福克公爵遗孀凯瑟琳·魏勒比在格林尼治的家，公爵夫人待她不薄，并对塞西尔表示：“玛莉·格雷小姐为自己的错误感到羞耻，甚至常常都吃不下。我怕她会因为懊悔而死，给她一点安慰不为过。”虽然大受打击，但玛莉·格雷小姐仍大胆抗命，在每一封信件的最后署名“玛莉·齐斯”。她也为自己的顽固付出了

代价：一五七一年，她的丈夫死后，女王拒绝让她披上丧服。然而，在丈夫死后，女王偶尔会批准她回宫，只是玛莉·格雷小姐的身体遭到悲伤的折磨，鲜少能享受女王给予的权利。

事实上，两人的婚事对女王一点影响也没有：齐斯没有贵族血缘，也没有政治野心。玛莉·格雷小姐从未觊觎过王位。两人也都未涉及任何叛国行动。如此严苛的惩罚，显示女王对于英国王位继承问题非常敏感。

在女王前任家庭女教师凯瑟琳·艾希莉去世带来的冲击下，玛莉·格雷小姐不诚实的举动为伊丽莎白女王带来的苦恼心情，变得更巨大。从小凯瑟琳·艾希莉带着她长大，取代了她那无缘的母亲，她年少时的那些黑暗日子，都是凯瑟琳·艾希莉陪她度过。后来斯罗普郡的阿格连比老师（Mistress Eglionby of Shropshire）取代了凯瑟琳·艾希莉，然而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她的人生从此不同了。她失去了一位挚友，失去了一位真正爱她的人，失去了一位敢在需要时指责她的人。

玛莉·格雷小姐的背叛与艾希莉老师之死，这两件令人沮丧的事情让女王心情大坏，在塞西尔的记录下，当年八月“女王似乎感到很受莱斯特伯爵冒犯”。而且原因十分明显，达德利竟胆敢与伊丽莎白女王的一位表亲兼知己眉来眼去，这个对象就是美丽的红发女孩莱蒂丝·诺利斯，四年前她曾与赫里福德子爵（Viscount Hereford）成婚，而且“她也一直是宫廷中最美丽的女孩之一”。她的父亲是弗朗西斯·诺利斯爵士（Sir Francis Knollys），母亲则为凯瑟琳·凯利（Katherine Carey），而凯瑟琳·凯利的母亲玛莉·波林（Mary Boleyn），则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安·波林的妹妹。部分人士认为，瑟洛摩顿爵士刻意让莱斯特伯爵陷入一段暧昧情事，目的就是要

了解伊丽莎白女王是否有嫁给他的想法。若没有，瑟洛摩顿爵士希望能拉拢莱斯特伯爵，一起促成英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姻。

若此传闻为真，瑟洛摩顿爵士此举显然得到反效果，为了报复，妒火熊熊燃烧的伊丽莎白女王开始对莱斯特伯爵的朋友汤马斯·希尼治爵士（Thomas Heneage）刻意展现出好感。希尼治爵士从一五六〇年起，一直担任枢密院传令官，而且是安全的已婚身份。“这个年轻人的机智与风度令人愉悦”，而他那“与生俱来的优雅生活态度与和蔼可亲的谈吐，仿佛出生贵族之家”。在学术与政治上，他并不是省油的灯，超凡的天分为他赢得在皇室财务管理室的重要职位，后来甚至进一步成为皇室管家。

女王对希尼治爵士的注意，让莱斯特伯爵气愤难平，两人也因此发生几次冲突。随后，莱斯特伯爵要求女王答应，让他“和其他人一样可以回家生活”，这等于是火上浇油。女王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还因此愠怒了三天。接着女王派他前往当时正发生流血冲突的温莎，莱斯特伯爵因而指称女王一代新人换旧人，伊丽莎白女王则用同样一句话予以反击，并表示为自己浪费在他身上的时间感到懊悔——“及其他好臣子们！”塞西尔向一名友人透露：“女王怒火中烧，用非常讽刺的语气，责骂他关于希尼治爵士的事情及他和子爵夫人的暧昧情事。”

而莱斯特伯爵用霸道的态度对待女王的一名仆人，也让女王愤怒不已，于是女王公然在宫廷上对着莱斯特伯爵大吼：“该死的畜生，我总希望你好，但我的宠信似乎不足以断绝他人的干涉。若你想在此称王，我会让你知道你的下场。这个国家女人当家，不是男人。”写了伊丽莎白年代宫廷回忆录的罗柏·侖顿爵士（Sir Robert Naunton），也记下了这次的意外事件，“让莱斯特伯爵非常沮丧的是，他那惺惺作态的谦逊，反而成了最佳美德”。

由于受到了相当大的警告，莱斯特伯爵接下来几天都将自己关在房中，而希尼治爵士则被悄悄送出宫。后来，在违反心意的状态下，塞西尔与萨赛克斯伯爵苦劝女王与莱斯特公爵和好。伊丽莎白女王将他召至跟前，两人对泣，言归于好。

然而对莱斯特公爵来说，这是人生中一个年代的结束。他与女王的关系有了改变：初恋那种使人心醉的热情已灭，他认为女王最终会嫁给他的那种笃定，也烟消云散。今后他仍会爱着她，但那会是一份更深沉的爱，更无私的爱，就像结褵多年的丈夫对太太的爱一般；更重要的是，这一份爱，让他能在别处寻找在女王身上得不到的那份满足。

达德利对莱蒂丝的暧昧之情很快就燃烧殆尽，随后希尼治爵士则返回温莎：女王永远拒绝不了男性的爱慕，此后女王一直对他展现相当的偏宠。一直到她的热情冷却变回友情，莱斯特伯爵与希尼治爵士才恢复友谊。

那年夏天，用帅气的外表掳获女王心的不只有希尼治爵士。第十代欧蒙德伯爵兼爱尔兰财政大臣，也是女王远房表亲的托马斯·巴特勒（Thomas Butler）来宫中做客，女王开始注意到他。被人称为“黑汤姆”（Black Tom）的他年纪与女王相仿，曾在她父王的朝廷接受栽培，因此她本来有机会与他更为熟识。他很有魅力、令人称羡，接下来一整年几乎都长伴女王左右。但莱斯特公爵知道两人没什么，当约克大主教大胆告诫女王不应与欧蒙德伯爵走得太近时——女王那都铎家族的脾气爆发了——而莱斯特伯爵则站在她这一边。

住在温莎的时间，女王多数都在骑马打猎。西班牙大使唐迪亚哥发现，她实在太热衷了，却“让所有人都累翻了，对侍女与臣子们的表现，她感到十分丢脸。但对他们来说，疲惫胜过了愉悦”。

在温莎期间，一天，伊丽莎白女王、唐迪亚哥及一名意大利特使在公园中漫步，唐迪亚哥大使对女王不断要求查尔斯大公亲自访英感到厌倦，于是小小嘲弄了她一下，问她有没有在他的房间或哈布斯堡王朝特使的房间里看到没见过的人，她是否满意？

女王大吃一惊——陷入恐慌。在无语之中，她慌乱地看着唐迪亚哥身后意大利特使的表情，特使迸出的笑声令她困窘。伊丽莎白女王随即会意这是个笑话，于是冷静下来，表示若查尔斯大公愿意放下尊严，用这样的方式来访也不错。

“偷偷告诉你们，有蛮多欧洲贵族，都用这种方式来跟我见过面。”她神秘地透露这件事。

在玛莉·格雷小姐事件过后，对女王来说，确立王储一事变得更为重要。八月十四日，瑞科维奇特使受召，带着伊丽莎白女王给哈布斯堡王朝君主的一封信返国，信中提及“高贵的答案”。瑞科维奇特使十分有信心，此事将有正面结果，而塞西尔也告诉自己：“感谢老天，女王陛下总算愿意面对婚姻了。”在写给驻扎在巴黎的托马斯·史密斯爵士的信中，他表示：“许多人都认为查尔斯大公将会访英——若他真的成行，并且与我方在宗教议题上达成共识，让他与女王陛下都能接受——这件事应能成功。”

当得知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以查尔斯大公不该迎娶异教徒为由，正用尽各种方法阻挡两国的婚姻协商时，他感到愤怒异常。唐迪亚哥却认为，伊丽莎白女王根本一点也不想嫁给查尔斯大公，而且坚持“若伊丽莎白女王真要结婚，对象也一定是莱斯特伯爵”。

菲利普国王则已然下定决心要成为英国重返天主教阵营的桥梁，但要完成这神圣的使命，现在还不是时候。菲利普国王认为，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就是“英国宗教信仰重建的唯一门路；其他的方

法都不通”。但这并不代表他主张推翻伊丽莎白女王，毕竟这个方法实在太危险。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玛丽·斯图亚特耐心等待，直到英国王位确定传到她手上的那一天。

* * *

莫雷伯爵与他的叛党们此时已退到格拉斯哥，但无论去到哪，玛丽·斯图亚特都领着军队步步进逼。十月六日，叛党逃往英国，盼能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捐助。接见莫雷伯爵时，伊丽莎白女王身着黑色服装，让他一直跪着不起身，并公开斥责他反叛神圣的王权：“我们不会收留任何违抗王权的臣子，因为我们知道，全能的神将因此惩罚我们，为我们的王国降下灾祸。”至于援金，一毛也没有，但莫雷伯爵可以待在英国境内作流亡分子。在历史上著名的“大追捕”行动中，玛丽·斯图亚特派出军队，到苏格兰以外的地方搜捕叛党，和平反战的伊丽莎白女王，完全没有帮助莫雷伯爵，从而让玛丽·斯图亚特轻易获得胜利。

但胜利的喜悦却十分空虚。难以驾驭的苏格兰领主们变得更难以控制，达恩里勋爵时常醉醺醺的，苏格兰臣子们则如此形容他，“冥顽不灵、高傲自大又堕落”，甚至会在爱丁堡街头与人起争执。伦道夫则形容这个人“厚颜无耻、横行霸道，总认为别人不够尊敬他”。玛丽·斯图亚特对他的痴迷已成过去，年纪轻轻的两人之间起了不少不愉快的“冲突”（争执）。之前玛丽·斯图亚特总仰赖威廉·梅特兰大使的建议，现在则总向她的意大利籍秘书戴维·里奇欧倾诉。

“戴维爵爷”是宫廷中其他臣子对他轻蔑的称呼，他来自皮埃蒙特，一五六一年时随着萨瓦大使一行人，来到苏格兰宫廷。玛丽·斯图亚特认为他低沉的嗓音很有磁性，于是说服他留在苏格兰宫廷中，参加四重唱。玛丽·斯图亚特将他立为法国秘书后，他也与达恩里勋爵有

了好交情。一五六五年六月时，根据伦道夫的记载，里奇欧秘书俨然成为“无所不能的人”。

里奇欧秘书的影响力日增，玛丽·斯图亚特女王也更加宠爱他，让达恩里勋爵对这傲慢自负的意大利鬼子的怨恨也越来越多。除此之外，想要得到玛丽·斯图亚特的宠信与恩赐的人，也都必须先贿赂里奇欧秘书才能见她一面。若他是个伟大的贵族人士，这一切就较为合理，但他不是，因此他很快成为众人敌意、嘲弄与愤怒的对象。婚姻失败，又受到活泼的里奇欧秘书吸引，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因而未能察觉她那不妥当的偏袒造成的问题日渐滋长。

流亡境外的新教领袖们则将情势算计得很清楚，同时决定返回苏格兰境内，盼望能打倒里奇欧势力——若他们够幸运的话，当然还要除掉达恩里勋爵。他们在苏格兰境内有个帮手梅特兰，他也十分妒忌这个意大利鬼子，竟能在女王面前取代他的地位，甚至他们也赢得了达恩里勋爵的友情，他有个不同的妒忌理由：他认为自己的太太与里奇欧秘书有染，而反叛军领袖们也乐于灌输他这样的想法。而达恩里勋爵本人内心的愤恨也异常痛苦，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法理上应得的权力，而且玛丽·斯图亚特也不愿与他讨论政务。

十二月时，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宣布有孕。然而她的婚姻显然有名无实，因为两人之间都尽可能地闪避彼此。在玛丽·斯图亚特费心处理政事时，达恩里勋爵多数的乐趣都来自打猎。若她感到寂寞，需要人逗她开心时，总是由里奇欧秘书陪伴在她身边。

10 令人悲痛的肮脏事

一五六五年十一月份，莱斯特伯爵与诺福克公爵间的“大冲突”，达到史无前例的高点。两边派系人马开始穿上专属制服，莱斯特伯爵的支持者皆穿紫色，而诺福克公爵与萨赛克斯伯爵阵营则以黄色为主。这些派系中的新血，都倾向诉诸暴力与叫嚣来解决分歧，两边阵营的紧张情势一度危急，让萨赛克斯伯爵向女王投诉他的太太有生命危险。

伊丽莎白女王非常清楚，自己对莱斯特伯爵的偏袒，就是这些麻烦事的问题根源，然而莱斯特伯爵甚至吹嘘自己是个“有女王陛下撑腰，便什么也不用倚靠的男人”，让事情更加恶化。女王曾在谒见室中公开警告他，要他不要表现得与女王太过亲近，招致妒忌，盼能化解纷争。

这次她亲自担任这些派系之间的协调者，坚持要双方放下争执。亨利·西得尼爵士从爱尔兰写信给莱斯特伯爵：“听说您最近做出极大退让。”但他却同时煽风点火：“也许您与对方能装作表面和谐，但在确定之前别轻易相信，因为这样的信任通常都会带来背叛。”宫廷中许多人也有相同的看法，在双方谦恭有礼的虚假外表下嗅到火药味。

是月，德·富瓦大使发现，莱斯特伯爵依然疯狂追求女王，而莱斯特伯爵的对手们也感觉与他假装友好非常容易。诺福克公爵却是唯

一的例外。

十二月初，诺福克公爵觐见女王，他趁这次机会大大鼓吹婚姻的好处，以及稳定继位问题带来的利益。他向伊丽莎白女王表示，英国宫廷中多数有权的臣子都希望她嫁给查尔斯大公。若有人支持女王与莱斯特伯爵成婚，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女王心之所向，“绝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段婚姻能为英国带来任何利益，或对女王的尊严有任何帮助”。伊丽莎白女王一直以礼貌的态度聆听诺福克公爵的说法，但却拒绝说出任何确定的答案，接着她答应了诺福克公爵退下的请求，这次的会面才结束。

很快，在那之后，诺福克公爵去找莱斯特伯爵，并警告他别忘记自己前一年夏天允诺过放弃对女王的追求。莱斯特伯爵非常克制地不与他发生龃龉，诺福克公爵接着带着自己为王权与国家争一口气的骄傲返家。

这一年的圣诞节，莱斯特伯爵信心满满地，再一次请求女王嫁给他。女王一如往常地回以模棱两可的话，故意要他等到二月份的圣烛节才有答案，但接下来几天，女王似乎非常认真地思考他的求婚。宫廷中流言满天飞，而莱斯特伯爵则大大利用了他成为亲王的可能性，在这段时间内树立了更多敌人。德·富瓦大使则私下向唐迪亚哥大使发誓，“女王在新年之夜一定与莱斯特伯爵上床了”，但唐迪亚哥大使并未完全采信他的说法，认定这是他居心叵测想要践踏女王的贞操，破坏女王与哈布斯堡王朝联姻的机会。

在主显节时，因为希尼治爵士被选为“第十二夜国王”，整夜都将由他来主持宫廷宴席，因此莱斯特伯爵与他爆发了新一轮的冲突。在进行一个益智游戏的时候，希尼治爵士逼迫莱斯特伯爵问女王，心里最难消除的是什么？——是妒忌还是恶意搬弄是非的人散播的邪恶想法。

“罗伯特·达德利伯爵因为不便拒绝，只好服从。女王礼貌性地表示两者都很难消除，但对她个人来说，妒忌更是难以抹去的情绪。”莱斯特伯爵以为这句话是冲着他来的，女王故意暗示莱斯特伯爵对她不忠，于是莱斯特伯爵给了希尼治爵士一个口信，表示因为他无理的举动，将“用棍棒来惩戒他”。希尼治爵士于是反驳：“这样的惩戒一点也不公平，若罗伯特·达德利伯爵冒犯了他，将会尝到他的剑有多利。但罗伯特·达德利伯爵却只回答，希尼治爵士不是他的对手，因此他会把惩戒的时间，延后到他认为适当的时机。”法国大使表示，希尼治爵士向女王告了状，让女王对莱斯特伯爵感到气恼不已，甚至向他发飙，“若因为她的宠爱，让他变得如此傲慢无礼，他应该尽快改正态度，否则女王能提拔他也能贬谪他”。“陷入忧愁”的莱斯特伯爵，接下来几天都关在房里足不出户，他这样的举动达成了预期的效果，让女王的怒气很快就变成了原谅。很快，威尼斯方面就出现了相关传闻，指出伊丽莎白女王想册封他为公爵，并嫁给他。圣烛节来了又走，女王这边却杳无音讯，很快大家就明白，伊丽莎白女王只是又使了她最著名的一招——拖延战术。

诺福克公爵依然决心要将莱斯特伯爵斗倒。表面上，两人都尽心尽力地想要维持友好，但两人彼此之间的憎意依然十分明显。因此当法国国王出于对嘉德勋章的感谢，准备要授予伊丽莎白女王的两位臣子圣米迦勒勋章殊荣，并且人选由她决定时，她提名了莱斯特伯爵与诺福克公爵，典礼时间就定在一月二十四日。

诺福克公爵怨恨莱斯特伯爵得到的一切荣耀，于是拒绝参加，经过女王多方说服才让他答应出席。典礼当天，诺福克公爵与莱斯特伯爵穿上了白色与黄褐色的天鹅绒礼袍，装饰着金色与银色蕾丝緞边，两人先在怀特霍尔宫的“大议事厅”等待，接着才前往进行授勋仪式的礼拜堂。在两人礼貌周到的外表下，憎恨的情绪已到达沸点。女王对此授勋仪式也意兴阑珊。在法国方面将这个勋章赠予达恩里勋爵

后，女王便发现圣米迦勒勋章如此泛滥地发给了太多人，也降低了圣米迦勒勋章本身的价值。

典礼过后不久，诺福克公爵从塞西尔处听闻女王的宠臣完全忽视自己的诺言，依然持续追求行动，诺福克公爵于是去找莱斯特伯爵，坚持要他放弃任何一丁点儿想要娶女王的意图。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支持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姻计划。莱斯特伯爵同意尽可能地帮忙，但前提是不能让伊丽莎白女王觉得自己不喜欢她，这样她可能会“发女人脾气，毁灭他”。他非常信守承诺，真的跑到女王跟前，要求女王为了自己也为了国家着想赶快结婚，当然也可以阻止别人继续诬赖他阻挡女王的婚姻之路。

不久之后，伊丽莎白女王在一次与唐迪亚哥大使在怀特霍尔宫的私人花园散步时，因为莱斯特伯爵无私地要伊丽莎白女王为了英国尽快结婚而向大使出言盛赞。事实上，阻挡女王婚姻之路的，并不是她对莱斯特伯爵的私情，而是哈布斯堡王朝君主不答应她的条件。一月份，当马克西米连二世要求她放松条件时，她依然紧守底线，表示若自己嫁给一个不同信仰的男人，将会造成“千千万万个麻烦事”。

莱斯特伯爵真正的感受随后也浮出台面，当伊丽莎白女王沉醉在与欧蒙德伯爵的调情之中时，莱斯特伯爵生气了。他与女王吵了一架，什么目的也没达成，愤而离宫。诺福克公爵也离开了，一直在乡间待到九月。

莱斯特伯爵受够了。他厌倦了冲突与诡计，同时对于自己因女王不婚而遭到的指控感到郁闷。人们以为他大大地影响了女王的决定，但其实根本不是。他成为政府运作失当的代罪羔羊，但政府运作成功时的归劳都归功于女王，与他无关。在他离宫的那段时间，塞西尔与瑟洛摩顿爵士，为他提供国家与宫廷内许多情报，他向塞西尔透露自己对于女王能好好结婚，一点也不抱希望；瑟洛摩顿爵士则建议他远

离宫廷，以免成为众矢之的。他的确没有回宫的打算，对女王的脾气及女王要他演出的累人的追求戏码也都倒尽了胃口。

* * *

一五六六年二月，达恩里勋爵听闻里奇欧总待在玛丽·斯图亚特房中，和她进行“秘密活动”，而且还可能是她腹中那未出世的孩子父亲（这个传闻到了十七世纪初期依然广为流传），再也受不了太太背叛自己的所有传言；同时他也不想再忍受作个无实权的国王。于是他向身边的人清楚表明，自己除了得到执政王权之外，什么也不要，若有人能协助他成功达成目标，他就会竭尽所能地协助苏格兰新教。对于那些肆无忌惮的苏格兰领主们而言，他们一致地讨厌里奇欧秘书的影响力，希望他和达恩里勋爵远离苏格兰政治圈，而这个提议正好让达恩里勋爵如同待宰的羔羊。看来年老体衰的拉斯文勋爵帕特里克（Patrick, Lord Ruthven）与摩顿伯爵（Earl of Morton）是主要共谋，但许多证据强烈显示他们只是挂名，来掩护背后流亡的莫雷伯爵与反叛军的行动，而后者正暗中蛰伏，希望能重新站上权力的浪头。

这些共谋的人决定在苏格兰女王的面前刺杀里奇欧：他们知道玛丽·斯图亚特已经怀孕六个月，从而希望能因而伤害她与未出世的孩子，让她变得无生育能力。在领主们表面上的支持下，达恩里勋爵便开始妄想自己被立为亲王，或者万一玛丽·斯图亚特死于生产过程，他就能成为摄政王，甚至取而代之坐上王位。无论玛丽·斯图亚特未来命运如何，他都认为自己将在苏格兰称王，就算她身心健全地在政变中存活下来，胎儿也未受伤害，叛党们表示，可以随达恩里勋爵高兴，将玛丽·斯图亚特囚禁在史特林城堡中。

但达恩里勋爵的同党们有其他的计划。他们想在时机确定的时候，演一出戏给玛丽·斯图亚特看，让她以为达恩里勋爵独自策划谋

杀里奇欧的计划，而且还试图想要伤害她，以煽动玛丽·斯图亚特判他叛国罪——最终将处以极刑。这一石二鸟之计，将为他们一次除掉两个不受欢迎的眼中钉。

托马斯·伦道夫在苏格兰宫廷中听到消息，于是在二月十三日通知了莱斯特伯爵：

我非常确定，现在的苏格兰女王对这场婚姻感到后悔莫及，她彻头彻尾地痛恨她的丈夫。我也知道，若宫廷中的谋反计划真的进行顺利，在女王丈夫的同意下，戴维·里奇欧十天内便会人头落地。更多令人悲痛的肮脏事，不断传进我耳里——甚至还有对付苏格兰女王本人的计划。

莱斯特伯爵并不想如实回报。尽管如此，塞西尔与英国枢密院也已经发现这个谋刺计划，也猜测出苏格兰女王将遭受的伤害。但一直到叛党行动之后，伊丽莎白女王才知道：三月六日，伦道夫便要求塞西尔通知女王谋反计划，但他的信件并未及时送达伦敦。

叛党们原定于三月十二日进行谋刺计划，但因担心伦道夫背叛他们，因而提前三天行动，以免伊丽莎白女王插手阻拦。一五六六年三月九日，拉斯文勋爵带着一批持械男子进入荷里路德宫，这时怀孕六个月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与阿盖尔小姐和里奇欧正在用膳，里奇欧虽身在女王面前，却并未依照礼俗脱下帽子。突然间达恩里勋爵、手持武器的拉斯文勋爵和一群人闯入房里，将女王推向一边，抓住了意大利籍的秘书里奇欧，里奇欧随即大喊：“侍卫！侍卫！快救我，我的夫人！”同时一手抓住了玛丽·斯图亚特的裙摆。持械男子将他拉开，接着他被拖进隔壁房间，被以残忍野蛮的手段谋杀了，死时身上有五十六处刀伤。玛丽·斯图亚特被人强行压制以免她前去营救，后来她表示其中一名叛党，拿着上膛的手枪对着她隆起的肚子。当她询问达恩里勋爵为何做出“如此缺德的肮脏事”时，他破口回骂表示“这两个多月来，她陪伴戴维的时间比陪他还多”。

在震惊之中，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被幽禁在房中，但接下来的两天内，她设法说服了她那不太聪明的丈夫，这群叛党接下来要谋杀的目标就是他。达恩里勋爵被吓得惊慌失措，背叛了所有参与谋刺计划的叛党人士，玛丽·斯图亚特随即明了，这场反叛行动真正的目标是她。三月十一日子夜，苏格兰女王夫妇从后方的阶梯悄悄离开，穿过仆人们的住处逃离了皇宫，跨上马，飞也似的在夜里穿梭了二十五英里，终于抵达敦巴。

苏格兰女王在敦巴决定为里奇欧之死复仇，于是召集了八千人的军队反攻爱丁堡，终于在三月十八日重新夺回首都控制权。然而叛党们早已逃离爱丁堡，并且热血沸腾地准备报复达恩里勋爵的背信弃义。不久之后，玛丽·斯图亚特便发现达恩里勋爵涉入里奇欧之死的程度甚深，夫妻两人之间的短暂的和解至此戛然而止。两人的感情至此破裂，玛丽·斯图亚特将达恩里勋爵排除在所有政务之外。尽管他仍住在宫中，但总被视为一个乖戾愠怒又危险的麻烦人物，而且持续受到监管，以免他又涉入任何阴谋中。

当玛丽·斯图亚特从敦巴寄出一封充满情绪与画面的信件，通知伊丽莎白女王里奇欧之死与达恩里勋爵涉案的情事时，伊丽莎白女王对玛丽·斯图亚特遭受的一切磨难，感到十分惊恐。伊丽莎白女王将玛丽·斯图亚特的一幅缩小画像挂在腰间，召见了唐迪亚哥大使，花了整整一个小时与他讨论这件邪恶的事情，她告诉唐迪亚哥大使：

“若我是玛丽·斯图亚特，我一定会拿起丈夫手中的那把剑刺向他。”她随即想起自己谈论此事的对象是唐迪亚哥大使，于是很快地加上一句，自己绝对不会这样对待查尔斯大公。

返回爱丁堡后，玛丽·斯图亚特发现莫雷伯爵表示愿意协助她。她在危险中的表现让莫雷伯爵大为激赏，莫雷伯爵花了一番工夫说服她，自己站在她那一边。她让莫雷伯爵重回议事厅堂，在她怀孕后

期，莫雷伯爵渐渐地成为苏格兰实际上的统治者，也让自己能与伊丽莎白女王匹配。苏格兰贵族们不想再与达恩里勋爵啰唆，毫不掩饰他们对他的轻视。

苏格兰发生的恐怖事件，让伊丽莎白女王为玛丽·斯图亚特感到十分忧心，于是她要她放下双方歧异，因此有一段时间，两位女王间的关系大有进展。两位表亲再度鱼雁往返了一段时间，伊丽莎白女王扮演较年长、较有智慧的姐姐角色，提供许多宝贵意见，同时也为玛丽·斯图亚特祈祷，希望她生产时经历短暂痛苦获得甜美果实。

“我，”她表示，“也‘怀着’极大的期待，盼望听到好消息。”玛丽·斯图亚特充满感激之情，于是献给伊丽莎白女王一个最大的荣耀，询问她是否愿意当孩子的教母。

玛丽·斯图亚特对这位“最亲爱的姐妹”如此努力促成她的愿望十分感激，英国王位继承问题的紧张情势，似乎也减缓不少。在玛丽·斯图亚特的眼里，查尔斯大公是最适合表姑的配偶人选，于是热切地为联姻计划背书。

* * *

伊丽莎白女王与莱斯特伯爵的冷战只维持了两星期：一如往常，女王无法忍受没有他的生活，到了三月底，因为“讨厌”他不在的日子，女王派了一位侍女桃乐丝太太，前去告诉他：“你那轻率的举动影响了她，女王陛下因你长时间不在而变得苛刻。”四月一日，莱斯特伯爵便重返宫廷，在伊丽莎白女王表示再也不让他离开自己身边后，两人再度和好。

塞西尔暗自说服自己，要让女王对宠臣的感情顺其自然，他努力调整心情，接受女王可能嫁给莱斯特伯爵的结果，但他自然对这样的发展不太满意，不只是他的个人因素，还因为他深深相信，两人成婚

无法为英国带来任何益处。四月份时，他着手制作了一张图表，将莱斯特伯爵与查尔斯大公做比较，在每一个评比的项目中，莱斯特伯爵几乎都输：他出身平凡家庭，在“财富、受人敬重的程度与权力”上，他样样都无法为这段婚姻加分；他与前妻并未生子，他可能也无法生育。这可能是“一段充满色欲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始于放荡将终于伤痛。查尔斯大公“受人尊崇”，而莱斯特伯爵则“受许多人唾弃，还因前妻之死蒙羞”。若他娶了伊丽莎白女王，“世人将认为有关伊丽莎白女王与莱斯特伯爵之间的流言蜚语都是真的”。

就如以往在信件中的坚决般，塞西尔总认为这些流言是错误的；他也深信，时间一久，伊丽莎白女王将会接受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姻，他总是在心中祈祷，神会将她的心导向这个方向，否则她统治之下的英国将充满麻烦、不平静。

然而莱斯特伯爵并未在宫中待太久。他与女王之间依然冷淡，传闻甚至指出，女王打算免去他骑士统领之职责。到了四月底，女王让莱斯特伯爵前往诺福克郡的庄园，但莱斯特伯爵这次的离开，并未获得女王的善意对待，女王写了一些尖酸刻薄的责难，但相关证据至今已荡然无存。震惊不已的莱斯特伯爵转而告诉瑟洛摩顿爵士：

我收到了你（的信件）和另一封向来能带给我极大安慰的信，但现在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区分这些音讯。若能在我身上找到任何起因，便是我活该，我愿面对更糟的惩罚，然而没有任何人能坚持像我一样离错误如此遥远，我非常清楚，自己绝无犯错：我从未刻意冒犯。人总会犯错；我只希望那唯一最重要的人能原谅——是的，遗忘——我。若长久以来的服侍与多年的表现，仍不能证明坚定不移的忠诚，我又该如何相信过去的这些宠信，一时的错误就毁去了过去建立的一切吗？

他实在太过沮丧，甚至表示：“我现在只想蜷缩在一个被遗忘的洞穴角落，或可以长眠的坟墓中。”

女王再一次将他召回宫中，他不耐烦地回去，但女王想与他和解，不久后，他又再度回到最受宠的位置。

五月份，伊丽莎白女王总算同意，派遣塞西尔的妻舅汤玛士·丹奈特（Thomas Dannett）前去奥格斯堡与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斡旋，女王表示若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同意让查尔斯大公访英，他与女王之间的婚姻协商，就再也没有任何阻挠。然而马克西米连二世依然执著于宗教问题，于是原本计划赠予其嘉德勋章的伊丽莎白女王，决定在对方态度软化前延后赠予计划。

丹奈特特使也在维也纳见到查尔斯大公本人，并向女王汇报大公本人殷勤有礼、友善可亲、变通不守旧、博学多闻、十分得人心，也非常喜欢户外运动；曾得过天花而幸存，但天花并未减损他的帅气。

“身为一个男人”，他显得“十分俊俏，长相好看，体格健美，腰围小，胸围宽阔；尽管穿着全副服装，依然看得出大腿与小腿比例完美”。尽管“有一点伛偻”，他骑马时依然挺拔。唯一的缺点是对宗教信仰虔诚，可能永远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丹奈特特使希望女王对查尔斯大公私下参与弥撒仪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女王却固执地拒绝了。丹奈特特使一直在奥地利待到八月，徒劳地等待女王改变心意，但他却只等到女王要一张画像的要求。

* * *

六月十九日，在戒备森严的爱丁堡城堡中，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经过漫长又痛苦的生产过程，终于产下一个健康的男婴詹姆士，也大幅增加了她继承英国王位的可能性。从此她对英国王位的企图，不再只是为了自己，还为了她的儿子。

数十年后，詹姆士·梅尔维尔爵士的回忆录引用了一个来源不明的故事，指出伊丽莎白女王对詹姆士出世的反应。对于当时的她，梅

尔维尔爵士表示：“展现出极大的欢乐之情，在晚膳后开心跳舞。”六月二十三日，当塞西尔悄悄地告诉她这个消息，“听闻消息后，她悲怆地跌坐，猛然对着侍女们大喊，苏格兰女王已经是个男孩的妈妈了，而她却只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但梅尔维尔爵士并未亲眼见证此事，仅表示自己是听闻宫廷中的朋友转述，但当时他却未记录下来，现代也未有当时留存下来的相关证据以资证明。而梅尔维尔爵士向玛丽·斯图亚特转述伊丽莎白女王的反应时，仅表示王子的诞生“让女王陛下感激不已”。事实上，在梅尔维尔爵士抵达之前，塞西尔便已先行告知女王此消息，而唐迪亚哥大使则称：“女王对于新生儿的诞生显得相当高兴。”

伊丽莎白女王确定告诉梅尔维尔爵士的，是她“已经决定要（在王储问题上）满足苏格兰女王，于此，她相信是她这个好姐妹应得的，因此她打从心底，希望这个问题能以此方法决定”。詹姆士王子的诞生，伊丽莎白女王强调，一定可以“刺激议员们”在下次的议会开议时解决这个问题。玛丽·斯图亚特闻此自然欢欣不已，信心满满地期待正式被立为伊丽莎白女王的王储。根据梅尔维尔爵士的记载，莱斯特伯爵、潘布鲁克伯爵、诺福克公爵和许多朝臣，都支持由玛丽·斯图亚特继承伊丽莎白女王的王位。

塞西尔知道玛丽·斯图亚特正利用她的权力，使尽绝招要让伊丽莎白女王言听计从。他派出的一名间谍，在那年夏天时回报，透露玛丽·斯图亚特曾向宫廷顾问表示，她想要得到英国天主教贵族的支持，在英国诸郡建立权力基础，尤其是旧宗教信仰根深蒂固的英国北部。“她计划要在爱尔兰兴战，让英国因此忙得不可开交；然后她要备一支精兵，由她挥师英国；进入英国的那一天，就是她准备登基为女王的一天。”塞西尔对这一类报告的真实性，一向抱持着质疑的态度，他老早知道玛丽·斯图亚特与英国天主教徒间的联系，而且他派出的密探也表示，这些人都听任她的差遣。只是他认定玛丽·斯图亚

特主要的目标是继位，而非篡位。听闻此消息，伊丽莎白女王迅即派遣亨利·奇里格鲁爵士（Sir Henry Killigrew）前去警告玛丽·斯图亚特，千万不要为了强行取得继位资格，煽动支持她的英国臣民。

但在当下，玛丽·斯图亚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苏格兰建立稳定的政府。她的丈夫也是一大问题。玛丽·斯图亚特与达恩里勋爵间的关系已降到冰点。他们极少一同进餐，也不再同床共枕，尽可能地避免两人共处。八月时，贝福德伯爵向枢密院回报，“根据回报，有关女王对他的批评，实在不符合女性的端庄与女王的尊贵。”

达恩里勋爵出言恐吓，表示自己要搬到国外定居，这对玛丽·斯图亚特来说，是非常不堪的责难，她十分恐惧这件事。到了十月份，梅特兰大使已经发现，玛丽·斯图亚特对于与他共度一生的想法已然绝望。

* * *

八月，丹奈特特使沮丧地自维也纳返英，哈布斯堡王朝联姻协商似乎已然走入死棋状态，伊丽莎白女王则大费周章地向哈布斯堡王朝君主表示，这一切都与莱斯特伯爵毫无关系，“因为英国宫廷上下，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一样，对这个联姻计划如此倾心着迷，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一样，努力要我们也有一致的目标”。

到了秋天，伊丽莎白女王决定派萨赛克斯伯爵前去维也纳，表面上将嘉德勋章献给哈布斯堡王朝君主，事实上却是要说服对方答应她的要求。此时，她已开始抱怨“查尔斯大公的聘金”太少，相关议题与其他事项的争议，让萨赛克斯伯爵延后好几个月才离开英国。马克西米连二世则提醒伊丽莎白女王，“应该是未来的太太要送给丈夫嫁妆及结婚礼物才对”。伊丽莎白女王的行为，证实了他的疑虑，使他

认定伊丽莎白女王“认为只要在某方面和某些角度上使出拖延政策，便可以得到好处”。

伊丽莎白女王于八月份离开格林尼治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出巡，途经北安普敦郡，前往曾为灰衣修士兄弟会的斯坦福时，女王并没有到在附近的塞西尔家做客，因为他的女儿正患天花。接着女王抵达牛津郡，住在古老的伍德斯托克宫中，也就是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她曾被软禁的地方。在这里她走出随从队伍与许多学者见面，他们出城来护送女王进入牛津城，市长、市府参事与各级学者也表达诚挚的欢迎，甚至还有人大喊：“女王万岁！”

她以拉丁文向他们致谢，接着以希腊文发表皇室演说，接着在《感恩赞》的乐声中参加了基督教会礼拜式。然后热热闹闹地在大学城中进行巡视，公开演说，参与辩论，聆听布道、课堂授课与戏剧等活动。伊丽莎白女王最喜欢的，是由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撰写，现已失传的骑士的故事《派拉蒙和阿色提》

（*Palamon and Arcite*），但这次演出发生了舞台倒塌的悲剧，导致三人丧生，超过五人受伤。伊丽莎白女王赶紧派出她的御医前往救治伤者，并且下令接下来的表演都延后到隔日，她还于是日亲自感谢理查德·爱德华兹带来的愉快体验。

在圣约翰学院，日后以天主教的烈士而闻名的艾蒙·坎庇恩院长（Master Edmund Campion）告诉女王：“无论您做什么，想些什么，女王陛下的身边总如有神助。”伊丽莎白女王笑了起来，并转向莱斯特伯爵，表示这指的就是他。莱斯特伯爵身为学校校长，为女王此行做东，而走访剑桥大学之行，则是另一位校长塞西尔做东。

在她离开前最后一次露面时，伊丽莎白女王用拉丁文演说了自己撰写的讲稿，同时疾呼她希望学习风气滋长，这个说法广受好评。当女王离开牛津时，学生与学校人员跟着她的队伍走到城外两英里处。

其中一人安东尼·伍德忆道：“她那和蔼、友善又高贵的举止，在学者们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让他们争相效法。”

伊丽莎白女王此次出巡，原计划前往莱斯特伯爵的凯尼尔沃思城堡一访，但宫廷流言却称两人即将宣布订婚，伊丽莎白女王因而警觉气氛不对，于是决定取消访问行程。然而莱斯特伯爵仍要说服她改变心意，她便真的前往凯尼尔沃思城堡了，莱斯特伯爵费心改造的全新城堡也让她印象十分深刻。

* * *

这一年秋天，因皇室经费短缺，伊丽莎白女王不得不召开国会，但让她恼火的是，此时的国会开议只让议员们对继位问题旧事重提，而到了这个节骨眼，继位问题已然成为女王与大众之间的敏感议题。近来英国国内突然出现许多书册，为凯瑟琳与玛莉·格雷姐妹继位背书，而一名国会议员莫利纽克斯先生（Mr. Molyneux）竟大胆建议，再度采用之前上书女王的请愿书。在场的枢密院成员匆忙阻止他，但下议院坚持马上解决这件事情，并着手准备召集上下议院再度向女王请愿。

有人事先告知了伊丽莎白女王，于是她下令要塞西尔向国会表示：“只要有贵族愿意，她便点头嫁。”但此时“触碰继位问题的底线，对女王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此时仍不宜作相关讨论”。然而上下议院仍坚持到底，尤其是下议院大胆地拒绝通过王室特别津贴，除非女王先解决王位继承相关问题。

王室的女主人对此感到愤怒异常，并且告诉唐迪亚哥大使，她绝不会让国会插手此事。为了人民的福祉，她一定要得到王室特别津贴，国会应以慷慨殷勤的态度投下赞成票。唐迪亚哥大使则认为，若伊丽莎白女王真想结婚，一定不会出现这些恼怒情绪。女王却回答，

她非常清楚这回事，一周内便会写信给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明示自己倾向接受这段联姻”。唐迪亚哥大使知道伊丽莎白女王又在虚张声势，毕竟马克西米连二世并未放松他的条件，而数月来，两国间的协商也早已步入僵局，但他一句话也没说。

十月二十一日，上议院一名代表在谒见室等待女王，盼能提醒她重视王朝的未来，同时也要求她尽快决定继位人选。伊丽莎白女王原本不想接见他们，但却遭到莱斯特伯爵劝服，女王对于上议院被下议院说动支持下议院的危险举动，感到怒不可遏，并且提醒他们，在她父亲在位的年代，下议院可不敢如此造反。至于上议院若想恣意而为，那她也一样。

三天后，上议院果然照着女王的指示去做，与下议院站在同一阵线。女王暴怒不已，对诺福克公爵用了非常强烈的字眼，对着他咆哮，指他简直没比叛国贼好到哪去。潘布鲁克伯爵试图为诺福克公爵开脱，她却说他听起来像个爱吹牛的士兵。莱斯特伯爵是下一个遭殃的。她哭着表示，就算全世界背弃她，她依然认为他不会这么做。

“我愿死在你的手上。”他许下誓言。

“那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她大声反驳。

然后轮到了北安普敦侯爵。

“在你来兜着圈子跟我谈婚姻大事前，”她警告他，“你最好先想好，你那令人愤慨的离婚事件与新婚妻子有什么好理由！”说完后，女王拂袖离开了会议室去找唐迪亚哥大使，现在他已经是她最好的朋友了。根据他的记载，伊丽莎白女王最气的是莱斯特伯爵，并且针对这忘恩负义的家伙，征询唐迪亚哥大使的意见，毕竟她过去对莱斯特伯爵如此宠信，这一刻她感到自尊受伤。于是她下定决心抛弃

他，让查尔斯大公能顺利访英。随后莱斯特伯爵与潘布鲁克伯爵则因发现自己被排除在谒见室之外，感到十分气愤。女王则不断抱怨，所有的贵族“都在与她作对”。

她对顽固强硬的下议院议员，应也说了类似的话，下议院团结一气，决心在女王同意他们的要求前，拒绝参加任何政府运作相关事宜。伊丽莎白女王气愤难平地向唐迪亚哥大使表示：“不知道这些恶魔想怎样！”

“妥协让步有损女王陛下的尊严。”他如此提议。

但这件事无法如以往般善了，伊丽莎白女王心知肚明。因此她将上下两院的三十位代表召进怀特霍尔宫，但她想要亲自透过这个场合说明，因而拒绝两院议长陪同。她几乎完全没控制脾气，开宗明义直指“下议院这些放肆的人”根本是在“策划谋反”，并将她反对公布继位人选的所有理由再度演述一遍，同时因为上议院在如此愚蠢的议题上支持下议院，女王也出言大加讽刺。

难道我并非生于这个王国内吗？难道我的父母不是吗？我的家国不就在这里吗？我招惹了谁？我又让谁吃了亏？自从上任后，我统治的功绩如何？只有妒忌折磨我。我不需要说太多，我的所作所为不证自明。我早已允诺会结婚，为了个人的名誉，我也绝不会破坏君主公开许下的承诺。因此我再度重申，只要时机适当，我一定会尽快成婚，当然我也希望自己能育孩子，不然我绝不结婚。

对于继位问题，她继续阐述：

在你们之中，从未有过任何一人与我一样，尝过身为备位君主的滋味，或是被自己的姐妹仇视的滋味——我始终感谢上苍让我活到现在！在今日的下议院中，有许多人在我姐姐在位时，曾恶意将我纳入他们谋反计划的一部分。若非我高贵的情操，他们无赖的行为早该公之于世。我绝不容许继位者再面临那样的压力。

继位问题并不简单，“对英国与我都充满了危险。统治者总尊崇达观的人，但我要的是如天使般虔诚的人，就算成为备位君主，也绝不想篡位”。

她坚定地责备议员们的莽撞：应将继位问题，留待她——国家的统治者、“诸位的统治者与领袖”来决定，“以下犯上是极端荒谬的事情”。她只想要说，当她确定不会危及自己时，便是确立王储的最佳时机。

至于这些反抗她的臣子们，她希望这次事件的煽动者能及时悔悟，并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至于我自己，我重视的并非生死问题，毕竟人都会死，尽管我是个女人，但我与我的父亲有一样的勇气，承担起王者的责任。我是你们最神圣的女王。我绝不会因为任何暴力胁迫而做任何事情。感谢上苍赋予我这些能力，就算我离开了这个王国，也能在任何基督教国家生存下来。

女王这番激烈的发言也许暂且让上议院的态度和缓下来，然下议院却不为所动。当塞西尔在下议院宣读经由他修改的女王演说时，只得到一片静默。三天后，有更多人要求向女王请愿。到了此时，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受够了下议院的反抗，在十一月九日这天，在女王的命令下，弗朗西斯·诺利斯爵士“宣布女王陛下向议会下达命令，禁止各级议员再兴争议，并接受女王陛下对婚姻的承诺”。

此举引发骚动：国会议员们对伊丽莎白女王高压的态度感到不满，并将女王的行径视为“对议员惯常的法理自由”的侵害，对于议员们试图侵犯她的特权，女王则感到愤怒不已。是年十一月十一日，伊丽莎白女王召见下议院议长，并要求他对下议院议员施压，“他收到女王陛下的特别命令，禁止再针对此事进行相关讨论”。

然而下议院议员们铁了心肠不愿服从。是月底，伊丽莎白女王便知道自己被议员们控制了，他们依然未通过她急需的款项，既然她依然不愿配合，显然议员们也不会听话。她可以选择放弃她非常需要的款项，进而解散国会，也可以选择妥协。这场纷争从原本的继位问题争议，已然转变为王权与国会之间的特权之争，而女王并不想针对这敏感议题与国会一决高下。于是她聪明地停止反抗，勉强让国会成员自由讨论继位问题，才终于获得她急需的款项三分之一。下议院对此感到狂喜又欣慰，甚至因而同意在不讨论继位问题的基础上，马上通过皇室特别补助款法案。然而国会议员却在法案前言，试图加上女王体现结婚的承诺，女王寒着脸看着呈在她面前等待批准的草案，在周围潦草地涂写：“我不知道为什么个人对王国的未来走向，会成为补助款项草案的前言；我也不能理解，在我未许可的状况下，为何有人敢如此大胆无畏，无视我的话！”

随后前言中的条款被慎重地移除了，留在草案中的，只剩下一段简短的话，提及国会诚心希望未来继位问题能尽快解决。此事当然也使玛丽·斯图亚特的希望破灭，她一直期待英国国会能批准她的继承权。

一五六七年一月二日，伊丽莎白女王解散了早已学乖的国会，讽刺地告诉国会议员们：“小心将领导者的耐心消耗殆尽，因为我已经耐心尽失！请将我的惩戒谨记在心，避免更痛苦的打击，也请让我安慰你们沮丧的灵魂。至少我对你们是史上罕见的和善领导者。”

伊丽莎白女王表现得仿佛自己赢了一城，但塞西尔却指出她根本是个输家，他给了女王一份备忘录，上面列举出女王身为领导者并未达成的所有责任：“继位问题悬而不决，婚姻问题无解，危机接踵而来，整个王朝世代迷失方向。”

* * *

一五六六年十一月，玛丽·斯图亚特与许多宫廷顾问讨论摆脱达恩里勋爵的方法，但却成效不彰。两人的婚姻无法宣告无效，因为那会导致儿子詹姆士的合法性堪虑。部分贵族则希望她以叛国罪之名逮捕达恩里勋爵，但她对此却十分犹豫，因为各国使节已抵达苏格兰，准备参加詹姆士王子的受洗大典。如此奢华的天主教圣典，也是苏格兰的最后一次，十二月十七日在史特林城堡正式举办。伊丽莎白女王成为詹姆士王子的教母，并派出贝福德伯爵代表参加，他带来伊丽莎白女王的礼物，一枚纯金的洗礼盘，上面有精致的雕刻再涂上精美的涂瓷釉。但这个洗礼盘做得太小了，伊丽莎白女王觉得应该道歉，于是解释自己不知道小詹姆士竟然长得这么大。至于怒气腾腾的达恩里勋爵，出于怨恨，并未参加儿子的受洗大典。

受洗大典之后，贝福德伯爵带上女主公的另一个口信，那是个令人欢喜的消息，伊丽莎白女王已然允诺扫除任何阻挡玛丽·斯图亚特继位的法令，希望换得玛丽·斯图亚特许下在伊丽莎白在世期间绝不图谋篡位的承诺。

玛丽·斯图亚特此时则开始仰赖玻斯威尔侯爵詹姆士·赫本（James Hepburn, Earl of Bothwell），他在敦巴的城堡是玛丽·斯图亚特在里奇欧秘书遭谋杀时的避难所。他也在敦巴城堡召集了自己的支持者与女王的支持者，一同返回爱丁堡取得胜利。曾有当时人形容玻斯威尔侯爵为“鲁莽危险的年轻小伙子”，但他在短暂旅居法国时学得有教养的态度，则掩饰了他那无情无耻的性格。他是个新教徒，最近刚与善良正直的珍·高登小姐结婚。但珍·高登小姐无法助他登上王位，从此称王的妄想，就成了他追求苏格兰女王背后最大的动力。

玻斯威尔侯爵如此受到女王青睐，自然也招致同侪妒忌，贝福德伯爵则记述道：“他的影响力之大，就连戴维·里奇欧都未受到如此

深的厌恶。”

十二月二十四日，达恩里勋爵离开了苏格兰宫廷，去格拉斯哥找他的父亲莱诺克斯伯爵马修·史都华，而玛丽·斯图亚特则正式原谅了杀害里奇欧的嫌犯。显然她正在努力寻求摆脱丈夫的方法，是月，她也在克雷格米勒城堡一次贵族会议中，向梅特兰大使如此透露。

“女王陛下，请让我们来解决此事，如此一来您的恩典必不受辱，并受国会支持。”他真诚地表示。

“没有什么事能污染我的名誉与良知。”女王坚持着。然而在那次会议中，玻斯威尔侯爵与其他贵族，首度试图谋杀达恩里勋爵，但历史上并未留下证据证明玛丽·斯图亚特知情，或同意此事。

冬日来临，达恩里勋爵生病了。皇室消息指出他得了天花，但历史证据看来比较像是梅毒。无论他生了什么病，那都让他衰弱不已，不得不卧床。

但玛丽·斯图亚特与伊丽莎白女王之间的关系，正在走上坡。

“我们总希望能以理想的公正性，来带给您好印象，因此得到您珍贵的友谊。”一月份，苏格兰女王写了这样一句话给她的表姑。但两国间脆弱的友好关系，很快便陷入无法挽回的崩毁中。

* * *

一月二十日，因为担心丈夫在苏格兰西部造反，玛丽·斯图亚特无奈地前往格拉斯哥找她的丈夫，说服他一同返回爱丁堡。她的态度是如此热切，并且允诺只要他身体好起来，她将以妻子的身份待在他身边。在苏格兰首都，玻斯威尔侯爵正等着迎接王室男女主人，并带领他们前往玛丽·斯图亚特的行宫柯克欧菲尔德，达恩里勋爵决定在此住下，不愿前往玛丽·斯图亚特提议的克雷格米勒城堡。柯克欧菲

尔德最著名的就是清新的空气，位于城墙外一处山丘上，可远眺牛门街，周围则是美丽的花园。现今的爱丁堡大学评议会厅就是达恩里勋爵当年居住的受禄牧师之屋。楼下则有一个女王的房间，女王常前往探望，甚至在他生病痛苦时会在屋里陪他。

这一年一月，玻斯威尔侯爵与摩顿伯爵见面，再度着手策划谋杀达恩里勋爵计划，但这两位爵爷随后都否认涉入此案。玻斯威尔侯爵詹姆士·赫本也与亲人讨论谋刺达恩里勋爵的事。尽管没有证据显示玛丽·斯图亚特知情，然而当时的许多人都认定，当初她就是在玻斯威尔侯爵的建议下，将达恩里勋爵接回爱丁堡。

在达恩里勋爵返回爱丁堡的第一夜，玛丽·斯图亚特与他促膝长谈、玩牌，装作一个乖巧的好太太。达恩里勋爵的父亲莱诺克斯伯爵马修·史都华后来表示，当他前往爱丁堡拜访儿子时，发现儿子变得十分悲惨，急需他人的陪伴与安慰，且仅能从赞美诗中得到慰藉。

二月八日，玛丽·斯图亚特终于宣布愿意核准《爱丁堡条约》，隔天苏格兰特使便出访英格兰。当晚，玛丽·斯图亚特原想在柯克欧菲尔德陪伴达恩里勋爵，但随后又想起，自己答应要参加在荷里路德宫的一场结婚化装舞会。她温柔地与丈夫道再见，在他手里放了一枚戒指作为爱的证明，借着在火把的照明与随从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柯克欧菲尔德。

11 危险人物

一五六七年二月十日凌晨两点，爱丁堡市区传出了猛烈的爆炸声响，许多人仓皇来到柯克欧菲尔德宫，却只看到无情的火焰将柯克欧菲尔德宫烧成灰烬，而在果园中则找到身上仅着睡袍的达恩里勋爵与他的随从泰勒的尸体。两人颈上的痕迹显示皆系被勒死：两人显然并非因爆炸而死，爆炸可能只是为了摧毁谋杀的相关证据。许多人认为，达恩里勋爵可能感到不对劲，与仆人一同离家察看，结果在外头遭到攻击。一名年老的邻人曾听到他呼喊：“兄弟，可怜我吧！以怜悯所有人的神之名！”在爆炸声响过后，第一个跑到街上的人是威廉·布雷艾德队长，他是玻斯威尔侯爵的人，随后他遭到逮捕，但他发誓自己只是在附近与朋友把酒言欢。

苏格兰女王当晚也被爆炸声惊醒，当她听闻达恩里勋爵死亡的消息，表示感到震惊与恐惧，并矢言以最快的速度揪出杀夫凶手加以严惩。她同时也认定这个凶手的目的，也是杀害她：若她未前往荷里路德宫参加婚礼，便可能惨遭不测，于是她一点时间也不浪费，随即着手撰写信件给各国皇室，宣布自己“奇迹般”死里逃生。

达恩里勋爵毫无疑问是遭到谋杀：许多人都有陷害他的动机，他的死也让许多人有机可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女王，她早已不爱达恩里勋爵，而且想方设法要亲自除掉他。她也认为达恩里勋爵有不良企图，最近她甚至向詹姆斯·毕腾大主教（Archbishop James Beaton）抱怨，丈夫企图绑架儿子统治国家。

玻斯威尔侯爵也想害死达恩里勋爵，这样他才有机会迎娶女王，统治苏格兰。他是一个“夸大自负的人，有着难以想象的骄傲、凶恶与虚荣，为了自己的野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是当时的一位人士对他的形容。

还有其他苏格兰贵族，也都十分厌恶达恩里勋爵，在里奇欧死后，这些贵族人士总认定达恩里勋爵背叛了他们。对疑犯的推论，甚至衍生到对苏格兰有非分之想的外国贵族：包括天主教领导者菲利普二世、查理九世与罗马教皇，他们都不希望看到达恩里勋爵的丑闻糟蹋了天主教的风气。相反，伊丽莎白女王则急切地想要在苏格兰扩展新教优势，尽管有莫雷伯爵主导，但达恩里勋爵依然是个障碍。

但对苏格兰与欧洲各地的贵族来说，多数人都认为证据指向玻斯威尔侯爵，而且很快就牵连到玛丽·斯图亚特。

二月二十四日，伊丽莎白女王即将收到来自苏格兰卧底的回报，指出达恩里勋爵之死的背后，比起官方公布的说法有更邪恶的动机，于是伊丽莎白女王从怀特霍尔宫非常紧急地写信给玛丽·斯图亚特。取代以往信件“亲爱的姐妹”的开头，她写道：

女士：

听闻你的前夫遭到令人毛骨悚然又恶劣的手段残杀，让我连耳朵都竖直了，我的心也在颤抖，他是我们共同的表亲，让我难过得几乎无法提笔写下此信；但我仍无法隐藏，自己对你的怜悯多于他的事实。我希望能协助我那信仰虔诚的表侄女与挚友，因此我得叮咛你保持你的傲气，千万不要如多数人说的一样，动手报复那些对你坏的人。我必须规劝你，给你忠告，我请求你将我的话放在心上，未来碰上了任何困境，你便将不致恐惧。我热切地写下此信，并非质疑你，而是出于情感所趋。

法国王太后凯瑟琳·梅迪奇则向她周遭的人表示，玛丽·斯图亚特能摆脱那傻子，简直就是天降的福气，但同时提醒她的前儿媳，若

她不尽快找出凶手并加以严惩，法方将视它为污点，并成为她的敌人。

玛丽·斯图亚特积极想要摆脱与此案的关联，下令展开调查，但目击证人具结书都在可疑的情形下节录，甚至有人受到刑求。若同父异母的妹妹遭到推翻，莫雷伯爵便有可能坐上苏格兰王位，他负责统筹这些文件，因此这些证据全都不足采信。玛丽·斯图亚特可能是因为当时健康情形不佳因而变得优柔寡断，在达恩里勋爵死后几周内，也不愿主动对抗那个出现在爱丁堡的匿名公告中被指控为杀人凶手嫌疑的玻斯威尔侯爵。

达恩里勋爵的父母则陷入极度的痛苦中，不只因为儿子之死，还因为女王对于将罪犯绳之以法，似乎兴致缺缺。伊丽莎白女王将忧郁的莱诺克斯伯爵夫人从伦敦塔中释放出来，并将她交由理查德·萨克维尔爵士（Sir Richard Sackville）照料。唐迪亚哥大使则透露，莱诺克斯伯爵夫人一口咬定，玛丽·斯图亚特“某种程度上一定插手此事”，这都是为了“替她那个意大利秘书报仇”。莱诺克斯伯爵则成功地对玛丽·斯图亚特施压，私下起诉玻斯威尔侯爵谋杀达恩里勋爵，但在一次开庭中证人们因受到恐惧都不愿出席，最后玻斯威尔侯爵在四月十二日遭到无罪释放。

四月二十四日，再度从病中康复的玛丽·斯图亚特，前往史特林探望儿子后返回爱丁堡。玻斯威尔侯爵莽撞又不顾两人的声誉地——但也有可能是在玛丽·斯图亚特同意与事前知情的状态下，因为她拒绝其他人的援救——绑架了她，并将她带往敦巴，并“蹂躏”了她，以此确保玛丽·斯图亚特无法拒绝与他结婚的请求。

在绑架案过后不久，英国的格雷男爵（Lord Grey）带着口讯来访，要告诉苏格兰女王，对于她无法将杀夫凶手正法，反而展现出支持的意味，伊丽莎白女王感到“十分困惑”，“仿佛就如坊间传言般

涉入此般罪行”。玛丽·斯图亚特当时被软禁，自然没有接到这个口信。当伊丽莎白女王听闻玛丽·斯图亚特委身于玻斯威尔侯爵时，感到惊愕万分。

六月三日，苏格兰教会因玻斯威尔侯爵与妻子的一名侍女通奸，因而将他逐出教会，同时也宣布他的妻子可合理离婚。此举也让玻斯威尔侯爵得以迎娶玛丽·斯图亚特。五月十五日，两人在荷里路德宫以新教仪式成婚。在那之后，玛丽·斯图亚特曾声称自己别无选择，但许多人认为她行为堕落，因而断定她与玻斯威尔侯爵联手谋害了达恩里勋爵。

伊丽莎白女王对玛丽·斯图亚特的举止深感遗憾，这次与她在艾咪·达德利疑遭谋害时的处理态度大相径庭，在一封写给玛丽·斯图亚特的信件中，她劝道：“女士，我们的友情以成功来维系，但逆境乃真正友谊之试金石，因此我必须说这些话。”她知道玛丽斯图亚特再婚的消息，于是说：

坦白告诉你，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你怎么会做出如此错误的选择，在如此仓促之下嫁给一个臣子，他除了各种恶名昭彰的缺点外，公众也将你前夫之死怪罪于他，尽管我们知道他侵犯了你，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他的错。而且你嫁给他是件危险的事，毕竟他还有个合法的妻子，但你们两人却没有合法的子嗣！

你可以无视我们的看法，但我们深感抱歉，无法抱着更好的想法。我们将诚挚地致力于运用各种力量，将任何与贵国臣子为敌的凶手绳之以法，无论你与他之间有多亲密，接下来你都应该小心你的儿子詹姆士王子，保护他就是保护你自己与你的王国。

伊丽莎白女王向伦道夫表示，她“非常不欣赏苏格兰女王的作为，因为实在是太厌恶，因而为她感到羞耻”。而且伊丽莎白女王不支持这段婚姻，还有其他的原因。伦道夫一直以来总不断提醒伊丽莎白女王，“相较起任何人，玻斯威尔侯爵绝对是英国永恒的敌人”。

伊丽莎白女王忧心，若满足了他的野心，他可能会煽动玛丽·斯图亚特与英国作对。贝福德伯爵也因此下达指示，“安抚”所有“痛恨玻斯威尔侯爵坐大”的苏格兰贵族。

婚礼两天后，玛丽·斯图亚特已经开始后悔自己的愚蠢，而事实也证明，玻斯威尔侯爵是个不良丈夫，对一些无聊的琐事常感不满，并对其他贵族的势力表现出嫉妒之意。法国大使看出她的忧伤，也听到她寻死的念头；她甚至有一度还想拿刀自残。但是他发现除了心理上的忧伤之外，玛丽·斯图亚特其实抵挡不了玻斯威尔侯爵身体上的诱惑。

苏格兰贵族们无法容忍这段婚姻。好不容易才摆脱了里奇欧秘书与达恩里勋爵，他们根本无法忍受野心勃勃又莽撞无礼的玻斯威尔侯爵来做苏格兰王，于是他们很快便准备要以武力对抗他。冲突于六月十五日发生在卡伯里山。这次起义鲜有溅血，那一天的冲突过后，玛丽·斯图亚特遭到贵族软禁，而玻斯威尔侯爵则逃回敦巴，随后再由奥克尼岛出境逃往丹麦。贵族们向女王保证，他们并不想伤害她，但她随即便发现，自己如同被囚困的重刑犯。

因此她在受到轻视的状况下，哭着回到爱丁堡，而她的臣子们对她的看法则是毫无保留。当她进入拥挤的街道时，人们辱骂她为淫妇、杀夫凶手，甚至有人大喊：“烧了这个贱货！杀了她！淹死她！”

“我要吊死这些人！折磨这些人！”她哭着说，但她的羞辱如此直接。街头更张贴了公告，将人鱼的形象——象征着妓女——加诸她身上，只要有机会便挑衅她。而她的王朝显然已经告终。

在遭到革除王权的两天后，玛丽·斯图亚特被关入位于金罗斯利文湖中岛上的一个城堡中。除了身上的衣服，她一无所有，在她被囚

禁后几周内，她便流产失去了一对双胞胎，而且大失血，使得她不得不卧床休息很长一段时间。同时，玛丽·斯图亚特底下的贵族们，正用尽心机激起民众对她的反对声浪，并想方设法要处置她。

伊丽莎白女王听闻此事，对于臣子囚禁女王背后象征的意义感到忧心不已。无论玛丽·斯图亚特做了些什么——伊丽莎白女王对她的行为也深感遗憾，但她个人一点也不怜悯玛丽·斯图亚特——但玛丽·斯图亚特依然是神圣的君主，无论是“本质上或法律上”，人们都必须对她忠诚、服从，而苏格兰贵族们对她的态度，已经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一个女王遭到迫害而放弃王权，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更令人警醒的是，在英国也出现了许多为推翻玛丽·斯图亚特喝彩的歌谣。因此让伊丽莎白女王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地努力救援玛丽·斯图亚特。

* * *

六月二十日，玻斯威尔侯爵的一位随从遭到逮捕，并被迫将后来被称为“首饰盒密函”的信件交给了摩顿伯爵。“首饰盒密函”是玛丽·斯图亚特与玻斯威尔侯爵两人鱼雁往返的数封密函，若能鉴定真伪，便能指控女王为杀人帮凶。贵族们则向玛丽·斯图亚特表示，她只能选择接受审判，且“首饰盒密函”定会成为重点证物，或是选择退位，要不然就是与玻斯威尔侯爵离婚。她拒绝接受这些选择，根据她的政敌们转述，她只希望能够搭上小船，与玻斯威尔侯爵一起出行，看看命运将他们带往何处。此时罗马教皇听闻她近来的行为，也在七月二日拒绝未来与她的任何关联。

七月初，伊丽莎白女王再度派遣瑟洛摩顿爵士前往苏格兰，希望能协助玛丽·斯图亚特与贵族达成协议，英方坚持由玛丽·斯图亚特复位。在完成任务后，他同时要求苏格兰方面找出谋杀达恩里勋爵的真凶，并将其绳之以法。最重要的是，他也确定了詹姆士王子的安

危，毕竟他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也有王权上的重要性；若有必要，瑟洛摩顿爵士可以将詹姆士王子带回英国，由伊丽莎白女王保护他。瑟洛摩顿爵士曾告诉莱斯特伯爵“这是我政治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次出使任务”，他慢慢地朝北走，但随后却被皇室贵族赶上，以女王之名下令要他尽快赶路。

苏格兰的民众受到约翰·诺克斯的煽动，出现反玛丽·斯图亚特情结，同时苏格兰国内对于瑟洛摩顿爵士的干预也十分反感。他们禁止瑟洛摩顿爵士接近玛丽·斯图亚特，苏格兰贵族们甚至表示，若伊丽莎白女王不愿相助，便要处决玛丽·斯图亚特，并与英国断交向法国示好。瑟洛摩顿爵士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一封信给玛丽·斯图亚特，建议她与玻斯威尔侯爵离婚。事情已经到了如此绝境，玛丽·斯图亚特依然拒绝。

苏格兰贵族不同意让詹姆士王子前往英国，现在他们决定要让玛丽·斯图亚特退位，由她的儿子继位。因为小产而使身体羸弱，她根本无力抵抗；然而在七月二十四日，当她被要求签署放弃王位的同意书时，她拒绝了，并要求召开苏格兰国会。林赛男爵（Lord Lindsay）威胁她若不从将割开她的颈项，她才屈从。五天后，她那还在襁褓中的儿子，便在新教仪式中，于史特林加冕成为詹姆士六世。加冕日那一天，利文湖也有疯狂庆祝的活动，而负责看守玛丽·斯图亚特的守卫们，则极尽所能地侮辱她。

七月二十七日，怒不可遏的伊丽莎白女王对瑟洛摩顿爵士下达指令，要他向苏格兰方面表达：“他们在《圣经》中找到什么样的正当理由，可以推翻自己的君主？在基督教王权中，他们又找到什么样的法律，记载臣子可以逮捕自己的君主，软禁君主，甚至还想审判君主？在任何法规中都找不到这样的规定。”若玛丽·斯图亚特是遭到

胁迫下位，伊丽莎白女王威胁道：“我们一定会直接采取行动，对付他们，向他们的王权展开报复，为后世子孙立下典范。”

瑟洛摩顿爵士认为（他也曾向莱斯特伯爵表示），若有人试图营救玛丽·斯图亚特，都只会造成她惨遭杀害的命运，但同时也不会有人怀疑，若伊丽莎白女王并未以如此激烈的话语响应苏格兰贵族们对待玛丽·斯图亚特的方式，苏格兰贵族们可能早已将玛丽·斯图亚特处斩。能让玛丽·斯图亚特知道伊丽莎白女王积极为了她的安危着想，瑟洛摩顿爵士感到十分感激，“我想那可怜的女士一定知道”。然而对那些原为英国新教同盟的人士来说，因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干涉，现在双方关系降至冰点，大战一触即发。

尽管有引发战争的危险，伊丽莎白女王在只有莱斯特伯爵的支持下，依然决定要在此事件上取得胜利，因而无视瑟洛摩顿爵士与塞西尔的请求与警告，这两人希望能与莫雷伯爵保持友善关系，同时对于伊丽莎白女王仿佛着魔般想要使苏格兰顺从的想法，感到警觉不已。对于要求释放玛丽·斯图亚特一事感到不满，伊丽莎白女王决心尽可能地破坏莫雷伯爵建立稳定政府的努力。为了冷落莫雷伯爵，伊丽莎白女王故意召回瑟洛摩顿爵士，以展现自己不认同莫雷伯爵王权的态度。这不仅仅是个策略，但瑟洛摩顿爵士一直努力向伊丽莎白女王解释，莫雷伯爵其实早已手握大权，而大多数的苏格兰人都不希望令王权蒙羞的玛丽·斯图亚特复辟。莫雷伯爵对伊丽莎白女王很反感，也不把她当回事，他如此告诉塞西尔：“尽管贵国女王陛下、你的女主公似乎公开地表达对现况的不满，但我一点也不怀疑，在她心里其实很喜欢现在的状况。”

然而在八月十一日时，伊丽莎白女王因“颈部扭伤造成的疼痛”而大感脾气暴躁，向塞西尔说了“十分具有攻击性的话语”，严厉地斥责他与其他议员们，竟然想不到任何方法，可以协助她为苏格兰女

王遭到囚禁一事进行报复，更无法将她救出。塞西尔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后，伊丽莎白女王便开始大吼大叫，表示要对苏格兰宣战，要塞西尔去警告莫雷伯爵，若他与其他苏格兰贵族们继续囚禁玛丽·斯图亚特，或胆敢威胁她的生命与安危，伊丽莎白女王将以身为统治者之名，用最强烈的手段进行报复。当塞西尔试图为莫雷伯爵辩护时，伊丽莎白女王勃然大怒地表示，若有人能包容邻国统治者遭到非法手段推翻，显然对于自己国家的在位者也不抱着尽忠职守的心意。然而塞西尔不为所动，只提醒她若向苏格兰方面威胁宣战，对方可能会故意处决玛丽·斯图亚特。

一周后，英国国务大臣塞西尔十分确定女主公并不真想与邻国开战，阴郁地表示女王的所作所为，有损他过去七八年来好不容易与苏格兰建立的邦谊。尽管她不再表示要兴战，却仍不断谴责莫雷伯爵。塞西尔对她的想法了然于心，他知道女王并不希望让人们认为她对表亲玛丽·斯图亚特抱持着偏见，而且她也为自己担心，害怕臣子胆大妄为以苏格兰事件为师来反抗她。到了八月二十二日，当莫雷伯爵被选为摄政议会议长时，伊丽莎白女王拒绝承认他的正当地位，也不愿承认詹姆士六世为新任苏格兰王。一直到十月份她才冷静下来，直面苏格兰情势已无法挽回的事实。

* * *

六月份，伊丽莎白女王派遣萨赛克斯伯爵前往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将嘉德勋章的殊荣献给马克西米连二世，并一探查尔斯大公的真面目。他送回的报告十分有帮助：查尔斯大公身材修长，留着红棕色的头发与胡髭，“脸部比例均匀，和蔼可亲，肤色也非常健康；他的表情与言语都使人感到愉快，谦恭有礼却仍保有其应有的尊贵；身材比例好，没有畸形或瑕疵；双脚都很干净，比例极佳，有着能和身高匹配的粗细程度”。而且“整个人没有什么让人感到不悦之处”。

他能流利地使用四种语言，德文则是他的母语，他在哈布斯堡王朝非常受人崇敬，据说非常聪颖、心胸宽阔又勇敢。深谙打猎之道、骑术、纵鹰猎捕与各种户外活动，萨赛克斯伯爵甚至大赞他的马术。他非常聪明，教育程度极高，而且非常富有，生活在“尊荣与尊贵之中”。

两国联姻协商成功唯一的绊脚石就是宗教问题了，就算是为了取悦伊丽莎白女王，查尔斯大公也不愿改信。只是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已经准备让步：只要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软化，让他弟弟除了公开陪伴她参加圣公会礼拜外，可以私下参与弥撒仪式，如此一来，查尔斯大公就绝不会做出任何破坏英国国教的事情，同时也愿意马上迎娶伊丽莎白女王。到了十月，萨赛克斯伯爵写信给伊丽莎白女王，呼吁她接受这个条件，同时私下寄给塞西尔一个纸条：“各界的看法是，若女王陛下在他的宗教争议上不愿满足他，那就代表她绝对不想接受这件事。”

因为此事的高度争议性，伊丽莎白女王转向枢密院寻求意见。塞西尔与诺福克公爵都倾向接受对方的妥协，但莱斯特伯爵认为女王成婚将毁了他的一切，而北安普敦侯爵、潘布鲁克伯爵与佛朗西斯·诺利斯爵士均反对。尽管知道不能再拖太久，必须给查尔斯大公一个答案，但伊丽莎白女王依然无法下定决心，几周来，枢密院中的反对派一直抗争，想让女王接受他们的观点。至于在维也纳方面，让萨赛克斯伯爵感到愤怒不已的，就是莱斯特伯爵用尽心机——“完全不讨人喜欢”——破坏联姻计划，包括策动积极派的新教神职人员强烈反对，不让信仰天主教的查尔斯大公接近圣坛。

最终莱斯特伯爵获得了胜利。十二月十四日这天，伊丽莎白女王亲自结束了长达八年的联姻协商，写信给萨赛克斯伯爵，表示让查尔斯大公私下进行他的宗教仪式，完全违背了她的道德观及宗教统一的

政策。就算她个人答应了，英国国会也不一定会愿意，在没有国会的背书下，她绝不会一意孤行。塞西尔、诺福克公爵与萨赛克斯伯爵的希望也到此告终，而他们将令人失望的结果全都怪罪到莱斯特伯爵身上，同时也预见“伊丽莎白女王终身不婚可能带来的损害”。哈布斯堡王朝君主也感到“震惊不已”，同时拒绝伊丽莎白女王对查尔斯大公访英讨论宗教事宜的要求——她也已经料到他会拒绝——沮丧的萨赛克斯伯爵则交出嘉德勋章，展开了返家的长途旅程。

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可说是伊丽莎白女王十分睿智的举动，这一决定让英国不致陷入宗教纷争，降低了造反的可能性与内战。她绝对没有忘记，当她的姐姐要嫁给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时，英国民众是如何群情激愤地反对，同时她也非常清楚，过去十年来，民众对宗教的态度变得更坚定。她希望臣子们能清楚知道，她绝对不会做出任何违反他们的爱与忠诚的事，也绝不会让国家法律遭到破坏，就算是她的丈夫也不行。

与哈布斯堡王朝联姻协商破局，恰好碰上英国与西班牙间关系降至低点，起因是直言不讳的格洛斯特主教约翰·曼（John Man, Bishop of Gloucester）说出了不恰当的话；当时伊丽莎白女王派他担任西班牙大使，他抵达西班牙后便公开诋毁天主教信仰与罗马教皇，同时警告女主公伊丽莎白女王“避开黑暗的力量”。伊丽莎白女王紧急将他召回后，在菲利普国王的坚持下，一五六八年春天后，她便没有再派使者前往西班牙宫廷了。唐迪亚哥大使也在同一时间被召回，由仇视英国的德·斯佩斯（Don Guerau de Spes）取而代之。

尼德兰方面也发生严重的冲突，过去数十年来，菲利普国王的许多臣子，尤其在北部地区几省，纷纷改信宗教改革后的新信仰，对独裁专横的统治者菲利普国王的不满情绪逐渐上升。天主教会遭到褻渎，哈布斯堡王朝的许多官员纷纷受到攻击。在受到法治与秩序崩解

的威胁之下，菲利普国王派出所向披靡的亚尔瓦公爵（Duke of Alva）领着五万精兵，前往镇压反叛军。但任务执行的效率极差，西班牙军队就这样驻扎在布鲁塞尔不动，几乎就在伊丽莎白女王管辖区的大门口，为英国带来极大的威胁。

伊丽莎白女王自然是倾向新教反叛军那一边，其领袖奥兰治亲王“沉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 Prince of Orange）逃亡到德意志，但因为西班牙驻军离英国实在太近，伊丽莎白女王始终不敢响应他们的求助。英国国内出现恐慌情绪，许多人认为亚尔瓦公爵很快就会接获命令入侵英国，然而菲利普国王依然盼望伊丽莎白女王改信天主教的希冀并不是秘密，若他决定强行逼迫，也不是不可能。伊丽莎白女王因此紧急下令加强英国海军边防——这是她面对西班牙大军唯一的保护。

* * *

一五六八年三月，在莫雷伯爵与塞西尔定期通信之下，英国与苏格兰之间的关系缓和不少，伊丽莎白女王于是向莫雷伯爵建议，由她出面向囚禁了玻斯威尔侯爵的丹麦王请求，将囚犯释回苏格兰，接受达恩里勋爵谋杀案的审判。

长久以来，伊丽莎白女王一直垂涎着玛丽·斯图亚特的珠宝，尤其是其中有一条以六条项圈串成的大珍珠项链。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伊丽莎白女王委托莫雷伯爵出面，并以超出法国王太后凯瑟琳·梅迪奇所开的价钱，用一万两千埃居^[1]购得这一批珠宝收藏。五月一日，珍珠项链抵达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掩饰不住兴奋之情，向莱斯特伯爵与潘布鲁克伯爵炫耀。这串珍珠项链后来于许多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画像中都可见到。

五月二日，玛丽·斯图亚特逃离了利文湖。苏格兰地主的弟弟乔治·道格拉斯（George Douglas），“幻想与玛丽·斯图亚特坠入爱河”，在五月节庆典的掩护下，安排一位仆人偷取了地主的钥匙，并为囚犯玛丽·斯图亚特伪装，仓促地送上在岸边等候的船只。接着道格拉斯护送玛丽·斯图亚特前往汉弥尔顿宫，与几名苏格兰贵族及六千名反叛军会合。当伊丽莎白女王听闻此事，亲手写了一封信恭喜玛丽·斯图亚特，并提供协助与支持。

但事情并不顺利，五月十三日，玛丽·斯图亚特的反叛军，在雷克塞德遭到莫雷伯爵的精兵击退，仓皇中，她知道什么都没了，只好从战场上逃离。她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轻骑往南逃，甚至剪掉头发避免被认出来，仅靠着牛奶与燕麦过活。五月十六日，她终于穿越索尔韦湾逃出苏格兰，来到卡门伯兰沃京顿，希望能得到英国的庇护，并宣布由伊丽莎白女王来保护她的安危。怀着苦涩的报复情绪，她急需一支军队驰援，让她永远战胜敌人。

英国政府方面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她，面对这个不受欢迎的访客，他们只好先将她软禁在卡莱尔，等待伦敦方面的指示。她的到来，为英国政府未来二十年的运作，造成了进退两难的僵局。

伊丽莎白女王坚持，玛丽·斯图亚特应随即重新登基为王。但塞西尔认为协助一个多年来遭到臣子算计反叛的女王，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无论如何，玛丽·斯图亚特都是英国的敌人，政治上也并非无害，应随即将玛丽·斯图亚特送回苏格兰。但伊丽莎白女王反驳，表示这样做等于是将玛丽·斯图亚特推入绝境——她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到底要怎么处置玛丽·斯图亚特，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伊丽莎白女王能做的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有危机。她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以玛丽·斯图亚特之名与苏格兰开战，她觉得最有利的状况，就是协助玛

丽·斯图亚特与苏格兰贵族之间和解，这样对英国最有利。若将玛丽·斯图亚特送往法国或西班牙，更是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但若伊丽莎白女王让她在英国自由活动，她将可能成为英国境内天主教反抗势力的灵魂人物。伊丽莎白女王非常清楚，无论在英国境内或国外，有一批信仰旧宗教的人认为玛丽·斯图亚特比她还要适合统治英国，尤其是在倾向天主教信仰的英国北部，玛丽·斯图亚特在这里深耕多年，得到不少支持，这些人因为她逃到英国来而不禁欢欣鼓舞。见过她的人都为她的美貌与魅力痴迷，当然还有她那说服人心的力量。因此，英国方面不需要太多想象，也知道她早已成为复仇与篡位的原动力，而英国方面始终忧心，菲利普国王可能从尼德兰调兵遣将来英国支持玛丽·斯图亚特。

最终伊丽莎白女王决定，不将玛丽·斯图亚特关入大牢，但以“上宾”之名将她有尊严地软禁，并严加看守。“我们的女王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马修·帕克大主教如此表示。伊丽莎白女王派遣佛罗西斯·诺利斯爵士前往卡莱尔迎接玛丽·斯图亚特，并设法控制她。他表示还不能把玛丽·斯图亚特带到女王跟前，“因为有关她犯下谋杀罪的传闻尚未澄清”：在玛丽·斯图亚特未正式摆脱谋杀达恩里勋爵的污名前，未婚身份的伊丽莎白女王不能见她，也不能在宫廷里迎接她。听闻此事，玛丽·斯图亚特不禁哭了。

伊丽莎白女王曾提出承认玛丽·斯图亚特为苏格兰女王的意见，同时以君主的对等地位迎接她的看法，但这样的说法很快就被枢密院推翻，枢密院方面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考虑要以一个从未放弃谋夺英国王位的天主教女王来作为邻国君主，取代对英国友好的新教领袖。伊丽莎白女王写信给玛丽·斯图亚特，向她解释这个决定：“若你觉得无法见我是一件奇怪的事，请你记得，在你恢复清白以前，接见你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合适的事情。但只要你能够恢复尊严与清白，我以神之名向你发誓，我要做的第一件事（见你），绝对能让我感到欣喜不

己。”法国使者冷淡地看着这一切，认为只要让这两个女王见面，两人一定会在一周内因妒忌而作对。他认为伊丽莎白女王根本不希望玛丽·斯图亚特接近她。

听闻玛丽·斯图亚特连更换的衣裳都没有，伊丽莎白女王表示要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给她，于是诺利斯爵士顺便带上一箱衣物。但诺利斯爵士却觉得很没面子，因为里面装着的是“两件破损的直筒连衣裙，两条黑色天鹅绒裙衫，两双鞋子，此外什么也没有了”。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他只好告诉玛丽·斯图亚特，“女王陛下的侍女搞错了，送成给侍女用的东西”。事实上，伊丽莎白女王亲自挑选了这些东西，故意暗示玛丽·斯图亚特，她现在只能仰赖英国的救济；随后诺利斯爵士并未回信表达玛丽·斯图亚特的感激之意，而伊丽莎白女王甚至还写信给表侄女，问她喜不喜欢她帮她选的衣服。

对于伊丽莎白女王的“冷处理”，玛丽·斯图亚特在六月十三日生气地回信：

女士，若你认定我为了保命才来到这里，请将心中这样的念头抹去，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证明我的清白，也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以惩戒那些中伤我的人；我不会与他们平起平坐，我是来到你的面前指控这些人。感谢上帝，我非常确定自己的清白无辜，你将我监禁于此，简直是大错特错，而这不也正是鼓励我那些背信弃义的敌人，继续坚决地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吗？我不会也不愿承认他们的污蔑，然而在你面前，以朋友的身份，我非常乐意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我绝不要透过我的臣子们进行辩驳。

* * *

除非伊丽莎白女王愿意接见她，否则她当然也无法自我辩护，于是在挫折的情绪之中，她从暴怒转为偶然爆发的哭泣，在哭泣中，她则不断抱怨自己受到“邪恶的对待”。枢密院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六月二十日，枢密院方面支持伊丽莎白女王拒绝接见玛丽·斯图亚特的

决定，表示女王不能“让玛丽·斯图亚特在未受审的情形下离开”。当然，英国法院没有审判他国君主的制度，因此伊丽莎白女王下令进行政治调查——“以证明玛丽·斯图亚特的清白”，事实上这就如同刑事法庭一般，只是不以刑事法庭为名。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厘清在达恩里勋爵谋杀案中，玛丽·斯图亚特是否涉案，同时也要了解她是否够格恢复女王地位。六位英国侯爵被钦点为调查小组组员以检视相关证据。女王宣布亲自担任玛丽·斯图亚特与苏格兰臣子之间的仲裁。

在一封致玛丽·斯图亚特要求她声明自己清白的信件中，伊丽莎白女王写上：“噢，女士！这世上再也没有人比我知道调查结果，或比我更加渴望听到调查结果还你清白与尊严。”只要能确定玛丽·斯图亚特的清白，她一定会——她允诺——随即在宫廷中接见她。

但目前为止，玛丽·斯图亚特总算顿悟，充其量她也不过是表姑的阶下囚。当他人告知她调查结果悬而未决时，她气愤地表示，身为一国之君，只有神能审判她：“我已经知道这一切是如何陷害我。在我与我的女王好姐妹之间，有太多敌人，他们协助那些叛乱分子，设法将我与我的好姐妹分开。”在这里面其实有相当程度的事实，但玛丽·斯图亚特坚信，展开调查是伊丽莎白女王帮助她重回王座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告诉玛丽·斯图亚特，调查工作是为了了解莫雷伯爵对王权的行事与态度，同时承诺，若调查结果并非对莫雷伯爵与他的同党不利，绝不会轻易进行审判。

六月二十日，英国枢密院明确地建议伊丽莎白女王反对任何有助于玛丽·斯图亚特东山再起的举措。她却不愿听从：她已经答应过玛丽·斯图亚特，也会信守承诺。臣子不能恣意反对王权。但她背负着沉重的压力，于是在一封信中，她向玛丽·斯图亚特请求：“请站在我的立场想一想，不要总是以你自己为中心。”

七月份，玛丽·斯图亚特被送往约克郡的博尔顿城堡，这也将是她未来的居所。博尔顿城堡距离苏格兰与伦敦距离都够远，不会引起太大的安全疑虑。玛丽·斯图亚特在博尔顿城堡中过着女王般的生活，甚至还能享受打猎的乐趣，但她身边依然有重兵看守，弗朗西斯·诺利斯爵士就是“东道主”。失去自由让她暴怒，随之而来的眼泪与脾气则让诺利斯爵士难以招架。

此时，苏格兰出现团结的“女王党”，其中两名成员，哈里斯勋爵（Lord Herries）与罗斯郡主教（Bishop of Ross）干脆直接前往英国，为玛丽·斯图亚特的案子辩护。“若玛丽·斯图亚特在我这个亲爱的表姑与好友的审理之下得到赦免，”伊丽莎白女王告诉哈里斯勋爵，“我会派人联络反叛她的人士，了解他们推翻女王的原因。看看他们是否说得出充分理由，但我想不可能，这样一来，我就能协助玛丽·斯图亚特重新登基，但条件是她必须放弃对英国王位的觊觎，断绝与法国结盟，取消苏格兰的弥撒仪式。”这些条件非常严苛，然而伊丽莎白女王承诺的一切十分明确，玛丽·斯图亚特则身在绝境中。七月二十八日，她同意“以感谢的心情向伊丽莎白女王陛下和盘托出”。但她并不知道，各界都认为她为了自己不该随便发言。而且她也不知道，九月二十日时，伊丽莎白女王再三向莫雷伯爵保证，她并非要助玛丽·斯图亚特东山再起，尽管相关报告显示了相反的迹象。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她同意参加了。

十月四日，此案正式在约克开庭审理。伊丽莎白女王向调查小组专员下达指令，若条件对英国有利，就要助玛丽·斯图亚特复位。但让她最感心烦的，就是除了了解莫雷伯爵主要的企图就是不让玛丽·斯图亚特返回苏格兰外，漫天无尽的阴谋论与延期，却一事无成。因为莫雷伯爵无法如他最初所保证的，可以证明玛丽·斯图亚特秘密参与了谋杀案来制造“严厉的指控”，因此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怒气与女王再三保证“若证据够有说服力，将不会再就玛丽·斯图亚特复位一

事施压”的刺激下，他终于拿出了“首饰盒密函”存在的秘密。他的目的，在这个紧要关头，就是要用首饰盒密函来对付玛丽·斯图亚特——事实上，这就是玛丽·斯图亚特案中，指控她最主要的证物了。但接下来就出现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至今已被问过无数遍：这些证据是假造的吗？

首饰盒密函于一五八四年失踪，现已不存在，但却有九件复制品出现在不同的数据库中。原始的信函有八封，据传是玛丽·斯图亚特与玻斯威尔侯爵两人鱼雁往返的信件、十二首法文十四行诗翻译，以及没有日期却答应嫁给玻斯威尔侯爵的承诺。这些信件都放置在一个约长三十厘米的银盒中，上面还篆刻着“F”字样，代表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二世，可能就是现在于苏格兰莱诺克斯罗浮宅邸展出的那个银盒。摩顿伯爵表示，这个首饰盒在爱丁堡佩特罗一处宅邸中被人发现，此后有关这些信件的真伪，引发无数冲突与矛盾。有些人认为，尽管这些信件为真，但苏格兰贵族却刻意在其中增添了罪恶的一面。也有人表示，这是其他侍女写给玻斯威尔侯爵的情书。但这些推论都并未用来为玛丽·斯图亚特辩护。当莫雷伯爵在庭上提出这些充满争议的文件时，他坚持这些信件是玛丽·斯图亚特的亲笔字迹。尽管玛丽·斯图亚特对此否认，而她想要亲眼看看信件的要求也不被允许。许多现代的历史学家因此认定，首饰盒密函是假造的，背后的目的就是要将她定罪。但若这些信件为真，那就是玛丽·斯图亚特谋杀达恩里勋爵的铁证。

诺福克公爵亲眼看过这些信件，他毫不怀疑背后执笔的人是谁；事实上，信件内容实在让他太过惊愕，他还因而写信给伊丽莎白女王，表示“玛丽·斯图亚特与玻斯威尔侯爵之间的爱情十分放纵，她非常厌恶与痛恨那被她谋杀的丈夫，痛恨的程度，到了连对神最虔诚的好人也会憎恶的地步”。鳏居已久的诺福克公爵在一次打猎出游时，对于威廉·梅丹德建议他可考虑娶玛丽·斯图亚特，也甚感震

惊，尤其是因为他身为委员会主席的关系，必须宁死不屈。诺利斯爵士则认为结婚可能是控制玛丽·斯图亚特的好方法，但在法国大使与塞西尔的密探警告下，伊丽莎白女王却不这么认为，同时责令诺福克公爵提起这个话题。

“我怎么会想娶一个这么奇怪的女人，这样一个恶名昭彰的荡妇与杀夫凶手？”他反驳。

我喜欢睡得安稳。在女王陛下的恩惠下，我认为自己就和她一样，是自己的地盘上英国诺里奇的好贵族，只是她是在苏格兰。我知道她总是觊觎女王陛下的王冠，我知道自己若与她成婚，女王陛下肯定会指控我图谋您的王冠与项上人头。

至此，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显得和缓许多，再也没有人提到有关婚姻的问题。然而在诺福克公爵的心中，却已悄悄种下一颗野心的种子。

当伊丽莎白女王拿到首饰盒密函副本时，她表示自己坚信这些信件是真的，并表示“信件内容提到许多不堪入耳，且非常容易便能将玛丽·斯图亚特定罪的事证”。然而调查委员会缺乏进度，加上诺福克公爵忠诚度堪虑，伊丽莎白女王一怒之下终止调查，移往西敏区由莱斯特伯爵、塞西尔与其他枢密院成员进行——这些人多数与玛丽·斯图亚特没有私交——作为新的调查委员。在此同时，塞西尔呼吁将玛丽·斯图亚特移往位于以新教为主的英国中部地区戒备更森严的特伯利城堡，但伊丽莎白女王却犹豫不决，她希望保有玛丽·斯图亚特依然是英国皇室上宾而非得以重兵戒备的囚犯的形象。尽管塞西尔说得有道理，但就连莱斯特伯爵也无法说服她。

虽然接受了英文祈祷经，但玛丽·斯图亚特依然维持虔诚天主教徒的身份，而且——为了驱散她近来的不幸——她甚至告诉菲利普国王，愿意为宗教舍身。新任西班牙大使德·斯佩斯与他的主公都十分

担心玛丽·斯图亚特的安危，于是在十一月九日决定采取行动，联络了玛丽·斯图亚特在英国的支持者。然而他们却高估了她的支持者。在未来几年内，许多天主教强权国家也不断犯下同样的错误，德·斯佩斯意图推翻伊丽莎白女王好让玛丽·斯图亚特坐上英国王位，他相信安排玛丽·斯图亚特逃亡或起义反抗伊丽莎白女王将是易如反掌的事。

显然从踏上英国国土的那一刻起，玛丽·斯图亚特便已在盘算如何打倒伊丽莎白女王。她向诺里斯爵士表示自己并不想惹更多麻烦，但通过审查与检察她的通信，枢密院与莫雷伯爵都怀疑她并未说实话。九月份时，她曾向西班牙王后表示，只要有菲利普国王的协助，她一定可以将英国“变成我们的王权势力范围”；但当时菲利普国王对她的行为过于震惊，无法仔细考虑介入。大约是在此时，了解玛丽·斯图亚特反抗她绝不会手软后，伊丽莎白女王才确定地向莫雷伯爵保证，审判结果将会以首饰盒密函的内容为主，以作为宣布玛丽·斯图亚特是否有罪的基准。

当西敏厅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进行审判时，伊丽莎白女王本人正在汉普顿宫中。隔天，莫雷伯爵以谋杀达恩里勋爵之名起诉了玻斯威尔侯爵，而玛丽·斯图亚特则是因事先知情而有罪。而支持玛丽·斯图亚特的委员会成员则要求，针对此控诉让她亲自答辩。十二月四日，伊丽莎白女王同意此举合理，但同时表示“为了让她更称心”，莫雷伯爵应先提出他手上的证据。接着尽管玛丽·斯图亚特一直强烈地坚持首饰盒密函为伪造的，同时宣称要模仿她的字迹非常容易，但伊丽莎白女王拒绝玛丽·斯图亚特提出任何证据为自己辩护。而且也不同意让玛丽·斯图亚特看这些信件。伊丽莎白女王宣称，若要玛丽·斯图亚特提供证据，简直就是褻渎了她，但事实上，她是不希望她那美丽有吸引力的表侄女有机会公开宣称自己无辜，借以赢得人心，否则就难以将首饰盒密函当作有利证据。

十二月六日，代表玛丽·斯图亚特的委员们退出调查委员会。看来就连他们都无法完全确定女主人公是无辜的。到了十二月七日，莫雷伯爵再度指控玛丽·斯图亚特为杀人犯，也是首饰盒密函的作者，为了达到轰动的效果，委员会成员接下来几天都在用玛丽·斯图亚特的真迹，进行笔迹比对。玛丽·斯图亚特则不断哀求要看这些首饰盒密函，但她的请求一直被拒。伊丽莎白女王多次表示，她得以正式以信件方式，为那些针对她而来的指控答辩，但她始终拒绝，并要求伊丽莎白女王先承诺，调查结果无论如何都要以无罪作结。这件事，毫无疑问，当然不可能。

英国方面的调查委员会与枢密院，无条件一致认定首饰盒密函是真迹，主要的论点，在于内容包含许多“除了玛丽·斯图亚特本人外，鲜少有人能杜撰出来的重要信息，且信件中讨论到除了她与玻斯威尔侯爵之外，别人都不知道的谈话内容”。至于要如何处置玛丽·斯图亚特，委员会成员意见便陷入分歧。伊丽莎白女王最不希望的就是让她的表亲沦为杀人凶手，但她认为玛丽·斯图亚特有必要面对遭废位的事实，在英国隐姓埋名安静度过余生，于是要求诺利斯爵士去说服玛丽·斯图亚特。另一个选择，就是让玛丽·斯图亚特与詹姆士六世一起共同统治苏格兰，而莫雷伯爵则担任摄政王。这样一来，玛丽·斯图亚特依然是苏格兰名义上的女王，只是必须永远住在英国，而莫雷伯爵则以她之名行统治之实。

十二月十四日，伊丽莎白女王召集了枢密院与各级贵族到汉普顿宫，聆听调查委员会宣读公报，同时一同检视首饰盒密函。对于能了解调查行动的详细情况，贵族们纷纷向伊丽莎白女王表达感激之意，“他们认为这起案件十分重大，他们打从内心认为只有女王陛下的地位能够仲裁”。玛丽·斯图亚特犯罪的事实如此显而易见，伊丽莎白女王绝不能在宫中接见她。但若她没有提出反驳，也不能直接宣判她

有罪，更何况除了在伊丽莎白女王面前外，她坚持拒绝辩护——当然也一样不可能。

一周后，伊丽莎白女王依然因首饰盒密函带来的冲击感到心烦不已，除此之外，她以前的导师罗杰·阿谢姆也去世了，随后她派出委员会成员，向玛丽·斯图亚特详细报告调查结果，并带上一封伊丽莎白女王的信，通知她：“身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也是你最亲近的表亲，对于发现你的罪行，我们感到由衷的抱歉与沮丧。”同时给予玛丽·斯图亚特最后一个答辩的机会，但玛丽·斯图亚特却没有回应。

由于英国民众对玛丽·斯图亚特的反弹实在太强烈，以致伊丽莎白女王无法宣布她无罪，当然她也不希望曾为一国女王的玛丽·斯图亚特面对审判的公断，于是在一五六九年一月，调查委员会公布了唯一可能的判决结果——那就是没有任何事证对玛丽·斯图亚特不利。但玛丽·斯图亚特则拒绝承认任何司法调查判决结果。

然而伊丽莎白女王依然不敢还她自由：她的威胁性实在太，就算被俘下狱，伊丽莎白女王都能隐约感觉到，英国境内的天主教徒已然开始将玛丽·斯图亚特当作他们的意见领袖。至于对玛丽·斯图亚特本人来说，此刻她对英国女王头衔的兴趣，俨然胜过了恢复苏格兰女王地位。

“苏格兰女王，”塞西尔提醒伊丽莎白女王，“现在是，而且也一直都是，威胁您的地位最危险的人物。”

[\[1\]](#) 埃居（法文：écu）是法国古货币的一种。五法郎的银币称为一埃居。
——编者注

12 徒然的叫嚣

在一五六八与一五六九年间的冬天，诺福克公爵叛意越来越浓，尤其在萨赛克斯伯爵离开后，他似乎再也没有阻碍，萨赛克斯伯爵被指派为英国北郡议会主席，不得不听命于曾追求伊丽莎白女王的阿伦德尔伯爵亨利·菲查伦。加上几位英国北部的天主教贵族人士，包括诺森伯兰伯爵与德比伯爵，都希望包括塞西尔与莱斯特伯爵等这一群强硬派的异教徒能够被逐出枢密院，这些人近来已逐渐走向极端新教主义，成为俗称的清教徒。

十一月时，因为塞西尔的策划，英国成功地从西班牙舰船上偷取了八万五千英镑——这是菲利普国王向热那亚的银行家商借，用来支付亚尔瓦公爵麾下士兵的钱——以救助贫困的南安普敦，使得英国与西班牙间的关系更趋恶化。一五六九年一月，伊丽莎白女王不但没有将钱还给西班牙，在缺乏资金的状况下，她无礼地表示要将这笔钱没收充公，并表示她会将钱直接还给热那亚的银行家。有一段时间，各界都十分忧心，菲利普国王一气之下将以此意外作为借口向英国宣战，但诺福克公爵与阿伦德尔伯爵，则在西班牙大使德·斯佩斯的支持下，尽可能地让塞西尔背负英国与西班牙交恶的责任，希望能尽快打倒塞西尔，让他沦落成伦敦塔的囚犯。

几周内，因为得知塞西尔仍然想方设法要阻止他与女王结婚——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指望早已变成不实际的妄想——莱斯特伯爵就成了这项阴谋的共犯。尽管诺福克公爵与阿伦德尔伯爵十分厌恶

他，但仍无法拒绝他的支持，因此有一段时间，这三个男人间的关系相当和平。

然而，菲利普国王不但没有向英国开战，反而只是下令要驻扎在尼德兰的军队羁押英国船只与财产。他认为在与英国正式开战前，让荷兰方面的臣子再度归顺才是主要任务。

一五六九年一月份，玛丽·斯图亚特终于移监特伯利城堡。这是一个位于英国斯塔福德郡一处残破不堪又阴森的城堡，玛丽·斯图亚特对此自然是非常不情愿。在接下来十五年间，这份工资过低又负荷过重的严密看守职务便都是交由第六代士鲁斯柏立侯爵乔治·塔伯特（George Talbot, Sixth Earl of Shrewsbury）来执行。他的夫人就是可怕的伊丽莎白·卡文蒂希，也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哈维克的贝丝小姐”。尽管贝丝小姐多次与伊丽莎白女王起冲突，伊丽莎白女王依然相信士鲁斯柏立侯爵。玛丽·斯图亚特与这两人相处愉快，甚至亲手制作礼物给贝丝小姐，并以她“那有说服力的语调、考虑周到的脑袋、不屈服的勇气与开阔的心胸”将恪守清规的士鲁斯柏立侯爵迷得神魂颠倒。英国枢密院于是警告他“千万别让她控制了他，甚至协助她逃亡”。塞西尔对玛丽·斯图亚特的诡计特别戒慎恐惧，他打从心底认定“就算这对夫妇在来到她身边前非常厌恶她，只要她靠着绝对的机智与甜言蜜语，就有可能扳回一城”。

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对玛丽·斯图亚特没有什么耐性，只能以女王身份面对她。她对玛丽·斯图亚特的人格评价极低，当女王发现法国大使认为“苏格兰女王的语调与外貌肯定有其非凡之处，才能让她的敌人都为她辩护”，她感到十分不悦。

而在士鲁斯柏立侯爵的照顾下，玛丽·斯图亚特得以在他于英国中部的各处居所轮流居住：特伯利、温菲德、查兹华斯与谢菲尔德城堡。一五六九年，士鲁斯柏立侯爵承认自己无法抵挡玛丽·斯图亚特

的魅力，将他对玛丽·斯图亚特的印象留下给后世子孙：“她除了是一个好人外，事实上和我们的女王无法相比，两人同样都有十分诱人的优雅仪态，但她有悦耳的苏格兰口音，在温暖动人的特质下，包装着洞悉人心的智慧。也许有些人会在名望的驱使下为她解围，而一起获得荣耀的氛围可能会扰乱他的心，为她冒险。”他非常清楚，玛丽·斯图亚特“能如何影响人心。她留着一头黑发，但诺利斯爵士却说她的发色多变”。

受到英国与西班牙关系恶化的消息鼓舞，这一年的一月，玛丽·斯图亚特与德·斯佩斯大使联络，表示放弃苏格兰王位简直就是要她的命，同时允诺“若你的主公能助我一臂之力，三个月内我定能成为英国女王，全国各地都将响起弥撒曲。”德·斯佩斯大使一五一十地转述了玛丽·斯图亚特的话，同时请求菲利普国王在尼德兰海域下达英国船只禁运令，只是这个海域的贸易利益之大，此政策从推出之际便注定要失败。

紧接着，在瑟洛摩顿爵士的推动与莱斯特伯爵的支持下，让玛丽·斯图亚特与诺福克公爵结婚，婚后随即让玛丽·斯图亚特复辟为苏格兰女王的策略再度浮上台面。唯一的条件是，玛丽·斯图亚特必须同意保留苏格兰的新教信仰，并与英国交好。只要玛丽·斯图亚特与诺福克公爵成婚，也就能说服伊丽莎白女王将玛丽·斯图亚特预立为王储，继位问题就此解决；而玛丽·斯图亚特也将不再是天主教反抗军的焦点人物，同时英国与西班牙间的邦谊也可望恢复。但塞西尔是这个计划最大的绊脚石，这也是诺福克郡公爵与阿伦德尔伯爵组成的派系希望能逼他离开的原因。目前为止，他们对付塞西尔的阴谋计划，已经得到许多英国北郡贵族与西班牙大使德·斯佩斯的支持，但无论如何，德·斯佩斯大使一直都是个祸根。

显然，让玛丽·斯图亚特与诺福克公爵成婚的计划并未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首肯，尽管此计划的细节曾透过贵族联署的一封信与玛丽·斯图亚特沟通过。另外还有莱斯特伯爵，他肯定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危险的不归路上。但历史证据显示，对诺福克公爵怀疑已久的伊丽莎白女王，显然猜到了他们的计谋，但她决定在表态支持或谴责之前先静观其变。

到了二月，一位佛罗伦萨银行家罗伯特·理达费（Robert Ridolfi）来找德·斯佩斯大使。事实上是诺福克公爵与阿伦德尔伯爵派遣他前来当说客，盼望西班牙方面能支持这个计划。理达费告诉西班牙大使德·斯佩斯，他们希望在适当的时机下，重新建立英国的天主教政府。显然他们希望能得到亚尔瓦公爵军力的支持，但当他们发现这仅是奢望后，便渐渐了解赶走塞西尔的计划难以成功。

这个计划一片灰暗的前景，让他们陷入绝望之中。于是在圣灰日这一天，正当女王在晚餐时间于谒见室接见他们时，莱斯特伯爵大胆地告诉伊丽莎白女王，因为国务大臣的领导技巧不佳，因此多数的臣子都为国家事务感到忧心不已，再这样下去，若非英国面临危机，就是塞西尔可能得人头落地。对此，伊丽莎白女王爆发了一阵怒气，禁止莱斯特伯爵再说出任何反对塞西尔的话，同时明确表示，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塞西尔在她心中忠心耿耿的形象。

当时也在场的诺福克公爵跟着加入争论。他向女王表示，许多贵族对塞西尔都抱持着与莱斯特伯爵一样的看法。此刻，伊丽莎白女王的情绪坏到极点，大吼着要他闭嘴。但当诺福克公爵在女王面前向北安普敦侯爵表示：“当莱斯特伯爵支持并赞同国务大臣的意见时，女王多么宠信他呀；但现在他抱持着正确的信念，反对国务大臣的意见时，女王对他根本没好气，甚至还想把他打入大牢。不，不！他并不孤单！”伊丽莎白女王对此却保持缄默。

这件事使莱斯特伯爵感到焦躁异常，于是他威胁诺福克公爵，要将他反对塞西尔的阴谋告诉女王。但此时的塞西尔已经猜到这些人的密谋，也知道自己的未来与生命都将受到威胁，于是开始友善地对待诺福克公爵，小心翼翼地不要引发诺福克公爵与他同党的怒火。同时，塞西尔也开始着手进行拉拢莱斯特伯爵的计划，而莱斯特伯爵也很快地警告他要小心。国务大臣有伊丽莎白女王在背后撑腰，情势发展至此，这些密谋反对他的人也了解到，塞西尔所向披靡。

* * *

到了四月，玛丽·斯图亚特发现，她在苏格兰的支持者，并未与莫雷伯爵达成和解，因而感到气愤难平。在重度忧郁之中，她完全没有食欲并常常哭泣。而伊丽莎白女王则十分盼望表侄女这个麻烦人物尽快离开她的国家；同时也一直抱着与苏格兰方面协商遣返玛丽·斯图亚特的希望，但得先确定她返回苏格兰后的安危，才能送她回去。莫雷伯爵强烈反对伊丽莎白女王对玛丽·斯图亚特的安排，这一点也并未让玛丽·斯图亚特感到好过。无论如何她依然不屈不挠。

然而，玛丽·斯图亚特发现了一个逃脱的方法。诺福克公爵一开始反对娶一个叛国贼的想法，随着时间的流逝，针对此事他开始更进一步地思考：对他来说，若她与玻斯威尔侯爵的婚姻无效，苏格兰女王与忠心耿耿的英国贵族结婚，是非常合理的安排；当玛丽·斯图亚特复位后，他便能在苏格兰捍卫伊丽莎白女王的利益。除此之外，当然，他自己也能得到加冕的机会。于是在一五六九年五月，玛丽·斯图亚特透过罗斯郡主教得知正式求婚的消息，让她感到喜不自胜，原本伊丽莎白女王理应反对这个计划，但到了六月份，玛丽·斯图亚特已经开始与诺福克公爵通信，这代表他已展开了追求。玛丽·斯图亚特在信末写上“对你充满信心的玛丽”，而且身为前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还送“我亲爱的诺福克”一个亲手缝制的坐垫，上面绣

着一把亮晃晃的刀切断一个据说是代表伊丽莎白女王的绿葡萄藤。两人对于浪漫爱情都不感兴趣：这只是将两股野心势力结合的过程。

由于诺福克公爵知道伊丽莎白女王认为他觊觎苏格兰国王的地位，甚至会反噬图谋她的英国王位，因而可能会反对这桩婚事，诺福克公爵于六月份开始游说他的旧敌塞西尔，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但塞西尔对玛丽·斯图亚特的怀疑甚深，不断提醒诺福克公爵，要摆脱这个泥沼唯一的方法，就是向伊丽莎白女王坦承错误。莱斯特伯爵则担心自己涉入此案，他向塞西尔表示——虽然塞西尔可能想起之前这群人反对他的阴谋——自己并未背叛他的信任。在确定他们能说服伊丽莎白女王这事对她有利之前，没有任何一位谋反同党愿意向女王透露这个婚姻计划。

诺福克公爵实在太畏惧伊丽莎白女王的怒气，因而不敢轻易听从塞西尔的建议，但依然有人向女王透露此事，因此到了七月底时，诺福克公爵向玛丽·斯图亚特求婚一事在宫廷中已人尽皆知。事实上，枢密院多数成员都支持这个计划。伊丽莎白女王则在侍女们的谈笑间，听闻了这桩计划，但她忧心两人将联手对付她，因而持反对意见。于是在八月一日，与诺福克公爵在里奇蒙德宫花园见面时，伊丽莎白女王给了他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女王问刚从伦敦来的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诺福克公爵可能猜到女王意有所指，因而表示什么也没有。

“没有？”女王装作非常惊讶地又问了一次。“你从伦敦来，结果连个婚礼的消息都不知道？”柯林·登小姐不经意地现身，还带着花束献给女王，却意外拯救了诺福克公爵，让他不用回答女王的问题。他抓住这个机会，赶紧溜到莱斯特伯爵的房间去。当莱斯特伯爵从金斯顿狩猎回来时，诺福克公爵赶紧问他认为自己该怎么做，莱斯特伯爵则答应，若时机许可，将为他在女王面前说情。

八月初，当莫雷伯爵向伊丽莎白女王清楚表明，他与其他苏格兰贵族，都不会接受玛丽·斯图亚特复辟时，支持这段婚姻的人都大感不满。这个消息也让伊丽莎白女王愤怒不已，于是她矢言继续为玛丽·斯图亚特复位一事努力。只是，看来唯一的方法就是诉诸武力，但莫雷伯爵知道，伊丽莎白女王一定尽可能地避免走到这一步。

八月五日，英国皇室每年夏天的例行出巡，来到了欧丹兹，到了八月十一日，则来到吉尔福德附近的洛斯黎公园，也是威廉·摩尔爵士的领地。现在，当年女王出巡时所住的房间，依然存在。隔天早上，伊丽莎白女王坐在前门的阶梯上，听着摩尔爵士的孩子们漫不经心地边演奏着鲁特琴边歌唱时，莱斯特伯爵跪在女王身边，谈起了诺福克公爵的事。伊丽莎白女王允诺，几天内将与公爵好好讨论。

两天后在法纳姆，伊丽莎白女王邀请诺福克公爵与她私下餐叙——这是难得的殊荣——但席间女王给了他多次机会坦白，他却依然没有勇气坦承自己已向玛丽·斯图亚特求婚一事。晚餐结束后，诺福克公爵忆道：“她故意刺了我一下，她说希望我每天晚上都能睡得安稳。”——故意引述他前一年夏天所说的话。“女王陛下的话让我感到不安，但我认为当时的时间与地点，不太适合麻烦她。”尽管如此，伊丽莎白女王依然给他许多机会坦白从宽，但他一直都没有抓住机会。他已决心朝向结婚之路前进，并向一名友人透露：“在失去这段婚姻之前，他可能会先失去性命。”

* * *

六月，亚尔瓦公爵以菲利普国王之名清楚地向德·斯佩斯大使表示，西班牙不会与英国开战，要他不准涉入任何反叛伊丽莎白女王或其政府的阴谋中，尽量保持中立。

但德·斯佩斯大使是个无可救药的祸头。八月八日，亚尔瓦公爵便向菲利普国王抱怨，德·斯佩斯大使完全不听从其命令，他已与英国北郡的叛乱权贵连成一气，企图营救玛丽·斯图亚特并将她立为英国女王，同时也不断鼓励诺福克公爵与玛丽·斯图亚特结婚。

出巡中的英国皇室气氛陷入一片紧张。伊丽莎白女王闻到叛变的味道，怒气一触即发，玛丽·斯图亚特可能也有份，让她更加生气，于是向法国大使费奈隆抱怨，她在表侄女面前尽力扮演慈母的角色，玛丽·斯图亚特却以涉嫌策动叛变来回报她。“对待一个不想善待母亲的人，不如就配给她一个邪恶的后母吧！”然而法国大使却表示，不相信台面下有不祥的事情在运作着，但伊丽莎白女王只是摇摇头。

“我已经知道这些制造麻烦的人是谁，”她宣布，“而且有些人的项上人头要小心了。”

九月初，皇室出巡来到汉普郡南安普敦伯爵位于蒂奇菲尔德的领地，女王陛下已经陷入一种狂怒的情绪中，她怒气冲冲地对着塞西尔与莱斯特伯爵大声斥责，并指控他们随着玛丽·斯图亚特起舞，意图谋反。莱斯特伯爵逃上床假装生病。到了九月六日，他哀求女王来探望他，当女王坐在他的床边时，他将诺福克公爵依然妄想迎娶玛丽·斯图亚特一事据实以告。

伊丽莎白女王则说，若这两人真的结婚，婚后四个月内，她可能很快就要回到伦敦塔去蹲苦牢。莱斯特伯爵悲惨地哀求女王，原谅他之前涉入此项阴谋，解释当时他误以为自己这样做对女王最好。女王当真以为他病重，在忧心他的健康情形之下，便发自内心地原谅了他。

至于诺福克公爵，又是另一回事了。当天下午，伊丽莎白女王召见他到宫中的长廊，发了一顿脾气，对他的不忠诚加以训斥，同时要

他为自己的忠贞发誓，“再也不与苏格兰人胡来”。诺福克公爵打着哆嗦，试图以轻松的态度解释自己的计划，他表示自己“并没有非常看重玛丽·斯图亚特”，而且并不非常重视与她结婚这件事。但伊丽莎白女王却不为所动，将她的厌恶表现得非常直接，而诺福克公爵也发现，宫中所有人都疏远他，包括莱斯特伯爵。九月十六日，诺福克公爵不告而别返回伦敦，并赌气似地继续追求玛丽·斯图亚特，他认为此刻已然无法在不失颜面的状态下抽身。伊丽莎白女王深感事有蹊跷，于是从桑迪斯勋爵位于贝辛斯托克拜恩一带的宅邸送出了召集令，命令诺福克公爵回宫。此时，塞西尔则安排人持续监视德·斯佩斯大使，他的信件往来也都必须受到检查；为了谨慎起见，他同时也命令全国各地忠诚的臣子们，为各种紧急状况做好准备。

九月二十三日，伊丽莎白女王总算返回温莎堡，于是也发现诺福克公爵虽宣称自己吃了治疗疟疾的泻剂，因此当天无法外出，但事实上却忽视她的召令，甚至跑到他所属领地的诺福克郡的肯宁霍尔。伊丽莎白女王随即有所警觉，认定他的意图就是要在他的领地上激起反抗她的势力，因此在九月二十五日这天，伊丽莎白女王对他下达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命令，要求他即刻回到温莎。但又一次地，诺福克公爵实在太过畏惧而不敢听话照做，尽管玛丽·斯图亚特曾在一封信中要求他不要害怕，要勇敢面对她的表姑。

* * *

最巧的是，就在同一时间，英国北部也正在酝酿另一个推翻女王的行动，主要来自当地的长期斗争，与皇室长期以来对当地的干涉，因此当地贵族想要重建旧宗教作为当地主要的信仰，他们痛恨塞西尔与其他信仰新教的枢密院成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女王不愿指定苏格兰女王为王储感到十分气愤。一开始，诺福克公爵并未涉入此阴谋中，但西班牙大使却相当活跃地煽动这些反抗活动。

在英国其他地方，多数的天主教徒都对伊丽莎白女王忠心耿耿，但过去数十年来，英国北部人士一直没有完全接受宗教上的改变，因此这些英国北部的权贵们，如虔诚的天主教徒——诺森伯兰伯爵（Northumberland）与威斯特摩兰伯爵（Westmorland），便开始秘密召集大批士绅阶级人士，以户外活动为名大批聚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起义对抗，而计划内容则是要杀光英国北部所有皇室官员，营救他们从春天起就开始不断联络的玛丽·斯图亚特。但有部分人士，只想驱逐伊丽莎白女王身边那些“坏心肠的顾问”，也有些人想要罢黜伊丽莎白女王，拱玛丽·斯图亚特为王。法国国王也涉入此阴谋，他允诺提供反抗军援助，而佛罗伦萨银行家罗伯特·理达费则在背后金援。自伊丽莎白女王上任以来，这次的反抗事件无疑造成了最危险的威胁。此时，英国十一年来的和平，似乎就要以暴力画下句点。

塞西尔与伊丽莎白女王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已感觉到，“精心深耕的北部”天主教贵族正准备要造反对付她。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诺福克公爵从东部起义，加入反叛军势力，而且毫无疑问地，他也同时在精心策划这件事。根据威廉·康登表示：“宫廷中人心惶惶、充满恐惧，唯恐诺福克公爵加入反叛行列，于是他们决定，若他真这么做，就要置苏格兰女王于死地。”

但随即发现诺福克公爵在英国东部的支持度极低。更何况因为他实在病得太重、太沮丧，因而没有费心召集支持者。此刻他最关心的事，就是要试着控制损害，因此他写信给女王，哀求女王原谅他，并为他无法前去温莎侍候女王道歉。他继续表示，他知道自己是个“有嫌疑的人”，但他担心自己会被送往伦敦塔——“对一个忠诚的人来说，这是很大的惊恐”。

伊丽莎白女王则刻薄地表示，她并不会罗织任何罪名给他，一切都是他自己应得的罪；同时发出另外两份诏书，坚持就算重病，也要

诺福克伯爵尽速回宫，如果有必要就躺在担架上。塞西尔与其他枢密院成员也写信呼吁他听从女王的命令。

最后，诺福克公爵停止反抗。对于北部的谋反计划他早就知情，但忧心遭到牵连，他派了一位信差前往威斯特摩兰郡，要求对方取消起义行动：“我被召回宫中，若您不愿意，我的小命可能就不保了。”

十月三日，在前往温莎的途中，诺福克公爵遭到逮捕。塞西尔向他再三保证，若他愿意向伊丽莎白女王和盘托出，女王绝对不会对他太过严苛，但十天后，他最害怕的事情成真，他被送往伦敦塔。伊丽莎白女王的怒气直可燎原，她决定让他饱受折磨，以报复他几个月来为她带来的焦虑与担忧。同一时间，瑟洛摩顿爵士也疑因涉入阴谋中而受到质疑，被囚禁在他位于萨里卡效尔顿的农舍中；阿伦德尔伯爵与潘布鲁克伯爵也同样遭到软禁。潘布鲁克伯爵很快便获释，但来年便死亡，而阿伦德尔伯爵则在无双宫中接受严密看守，一直到来年三月，才在莱斯特伯爵的协助下获释。

十月十六日，塞西尔提醒伊丽莎白女王，英国王位最大的威胁来自玛丽·斯图亚特，并以以下的话语来提醒她身负重任。

您身边总有一定程度的危机。若您愿结婚，危机将减轻许多；若您拒绝婚姻，将更增危险。若钳制玛丽·斯图亚特，无论在英国或在苏格兰，都能降低威胁；若让她自由，则威胁蛰伏。若她真涉入丈夫的谋杀案中，她的危险性便大大降低；但若忽略其重要性，谋杀案的伤痕将加剧，更添危机。

伊丽莎白女王在枢密院中公开表示，她希望以叛国罪起诉诺福克公爵，但塞西尔并不认为诺福克公爵的行为“称得上是反叛，因此我大胆请求女王陛下，只要要求调查出事情真相，而不要以叛国罪名相

待”。事实上，诺福克公爵是否意图叛国，相关证据少得可怜，自然也不足以起诉他。

女王显然气昏了头，出言威胁表示若英国法律不足以处斩诺福克公爵，她定会动用私权力来处置他。她过于气愤以致昏厥，枢密院成员只好赶紧拿来醋与烧过的羽毛。

一如往常地，当她的怒气过后，她便知道塞西尔是对的：以法律以外的手段处置诺福克公爵，便可称为暴政，就是这么简单明了，但她并不是个暴君。最后她只好勉强承认，诺福克公爵不一定有叛国意图，并同意将他关在伦敦塔中反省一段时间。此时，塞西尔则建议伊丽莎白女王将诺福克公爵迎娶玛丽·斯图亚特的想法转为寻找另一个更适合的对象。

十月二十六日，伊丽莎白女王送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给英国驻法国代表亨利·诺里斯爵士（Sir Henry Norris），信中详述了近来发生的事件，让亨利·诺里斯爵士与查理九世和凯瑟琳·梅迪奇沟通。伊丽莎白女王坚决主张：“对我们而言，（玛丽·斯图亚特的）性命因这些束缚而受到救赎，自她突然造访本国，便受到各级贵族尊荣礼遇、款待与侍候，我们以英国惯有的怜悯，帮助她度过这些苦恼的事，我们不计前嫌，但她却以各种方法冒犯我们，她的部分行径已然天下皆知。”关于达恩里勋爵谋杀案调查，“这些状况则让人质疑她是否有罪”。伊丽莎白女王现在希望自己没有下达调查命令。她其实还没有“全然决定要协助玛丽·斯图亚特复辟”，接着自从在约克展开调查以后，她就发现了这些“混乱、不高尚又危险的小动作”。

伊丽莎白女王认为，她的表亲不断用“连串的信件、眼泪与口信”对她疲劳轰炸，承诺“除了我们之外，再没有任何人能帮她，而来到我们国家后，除了我们的建议外，她什么也不要”。但相反，她背着伊丽莎白女王密谋下嫁诺福克公爵。与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者

所称完全相反，伊丽莎白女王“从未想过”要指定玛丽·斯图亚特为她的王储。伊丽莎白女王感到“相当遗憾，甚至可以说，有点羞耻，竟然被玛丽·斯图亚特如此利用，而我们竟还如此想方设法地拯救她的性命”。诺里斯爵士也强调，玛丽·斯图亚特对于在英国居住条件的抱怨，完全不正确。

* * *

十一月份，在听闻诺福克公爵的命运并得到西班牙允诺的援助下，英国北部的贵族们动员起他们的反抗力量，集结两千五百人开始往南移动，攻陷了杜伦大教堂，继续往最终目标特伯利城堡前进，也就是玛丽·斯图亚特被囚禁的地方——“她被各界视为这些纷扰背后的动机”。伊丽莎白女王也这么认为，同时首度认真思考枢密院成员建议处斩玛丽·斯图亚特的要求。她同时也同意让枢密院着手草拟死刑执行令，以备万一发现表亲果真涉入反叛行动，或反叛行动可能会成功时使用。

在英国北部其他地方，也同时发生几起零星的起义事件。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命令下，玛丽·斯图亚特被带往信奉新教为主的中部柯芬特里，亨丁顿伯爵则被指派前往支持生病的士鲁斯柏立伯爵，接手看守玛丽·斯图亚特的任务。港埠全面关闭，民兵部队全都进入警戒状态。温莎则为围城做好准备。

反叛军在确定前往柯芬特里营救玛丽·斯图亚特无望后，反叛贵族们失去了信心，因为解救玛丽·斯图亚特一直都是反叛计划的核心。十二月二十日，起义正式宣告失败，反叛军成员四处窜逃，以避免皇室两万八千援军的报复，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指示下，援军听从萨赛克斯伯爵的号令北上。萨赛克斯伯爵追捕诺森伯兰伯爵与威斯特摩兰伯爵等反叛军领袖到苏格兰边境，直到他们逃入苏格兰境内。“这

些害群之马已经逃入他国的羽翼之下”，塞西尔在圣诞节当天如此评论。

在面对叛军起义的过程中，伊丽莎白女王向全世界展现了冷静无畏的态度，与潘布鲁克伯爵一起待在温莎，潘布鲁克伯爵已重新获得女王的信任，在外国势力入侵时，他被指派为贴身保护女王的人，而莱斯特伯爵则提供她精神上的支持。女王的表哥亨斯顿勋爵也被派往英国北部，以武力强力支持萨赛克斯伯爵。在反叛军撤退，王室危机过后，莱斯特伯爵则回到凯尼尔沃思过圣诞节。

在“北方叛变事件”中，最令人担心的一点，可能就是菲利普国王竟同意给予叛军援助，也显示他对伊丽莎白女王变得十分不友善。他同时也指示亚尔瓦公爵送给玛丽·斯图亚特一万元现金。于是在塞西尔的敦促下，伊丽莎白女王向臣民展现任何反叛她统治的行为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的决心。“无论天涯海角，都要让这些反叛人士无所遁形，”伊丽莎白女王命令萨赛克斯伯爵，“别饶过任何一个反叛分子。我们没有多余的心力去饶恕他们。”

萨赛克斯伯爵一点时间也不浪费，追捕到反叛军余党杀鸡儆猴。这次都铎王朝的报复手段异常野蛮，每个村庄都逃不过至少有一人遭到处斩的命运，“被送上断头台的尸体就吊在原处直到碎裂”。到了一五七〇年二月四日，有六百到七百五十位平民被绞死，两百位士绅阶级人士被剥夺地位与利益，这些人的财产权归其他忠诚派的贵族；但只有少数人接受极刑处分，而那些协助反叛计划的人竟能活命，伊丽莎白女王感到十分不公平。

诺福克公爵被嘉德勋章除名，温莎古堡内也不再展示他的成就，并且依照惯例将他丢入护城河。诺福克公爵从牢房里写信给女王：

“现在我知道接近苏格兰女王，造成女王陛下多大的不悦，但我绝对没有其他非分之想。”

至于反叛行动背后的首领威斯特摩兰伯爵，则与诺森伯兰公爵夫人一同流亡法兰德斯，而伊丽莎白女王则认为，应对涉入反叛行动的诺森伯兰公爵夫人施以火刑。至于诺森伯兰伯爵四处躲藏，避开追捕长达数月，但在一五七〇年八月时仍被苏格兰人逮捕，交还给英方发落，并在约克遭受极刑处置。处决玛丽·斯图亚特的计划被悄悄遗忘了。

但另一场反叛冲突的再起，与北方叛变事件结束的速度几乎一样快，这次的首领是势力强大的达克列勋爵（Lord Dacre），他不满自己在英国北方的领地势力受到影响。亨斯顿勋爵则在一周内以惊人的实力将他镇压下来，随后女王诚挚地祝贺他大获全胜：“我很想知道，我的哈利，”（女王写道）“究竟是大获全胜让我感到欢喜，还是因为神指派了你为我获得胜利，我向你保证，为了英国的利益，第一件事已让我心满意足，但在我心深处，第二件事让我更满意。爱你的表妹，伊丽莎白R。”

此事大大地巩固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地位，一五七〇年一月二十三日，更令人高兴的事情，就是她在伦敦成立了皇家交易所，由托玛斯·葛莱兴爵士（Sir Thomas Gresham）建立，作为伦敦市商贾与银行家的贸易中心。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斯托（John Stow）记载：“伊丽莎白女王陛下在贵族们的陪同下，从她居住的索美塞得宅邸前往斯庄特，接着从圣殿酒馆穿过舰队街、威普塞街，再进入市中心，接着从交易所的北面穿越针线街，抵达托玛斯·葛莱兴爵士所在的主教门街晚餐。晚餐过后，女王陛下便从康希尔出来，从交易所的南面进入，在她仔细参观了交易所的每个部分后，便在报信人与号角声中宣布其为皇家交易所。”

* * *

就在同一天，因对手忧心他企图坐大为王，苏格兰摄政王莫雷伯爵在琳璃斯哥被刺杀。当伊丽莎白女王听闻此暴行，便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仔细思量英国边境以北的邻国可能发生的政治风暴。在威廉·梅特兰的运作下形成派系致力于玛丽·斯图亚特复辟一事，苏格兰的确陷入混乱。消息传进英国，玛丽·斯图亚特狂喜不已，并试图与儿子詹姆士六世联系，但伊丽莎白女王知道多数的苏格兰人并不希望女王复位，因而先声夺人，阻止她的妄想。

只是法国与西班牙国王都希望能抓住这个机会，让玛丽·斯图亚特重掌苏格兰王权。但因玛丽·斯图亚特参与了最近几起阴谋与叛变，因此若非在极度严格的条件下，伊丽莎白女王绝不考虑这一点，而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玛丽·斯图亚特一直不愿核准的《爱丁堡条约》。

苏格兰女王持续带来的麻烦，在一五七〇年二月二十五日这天显得更加严重，罗马教皇庇护五世受到过时旧闻的北方叛变事件所启发，冲动地公布了一份教皇诏书——“教籍逐出令”，将伊丽莎白女王开除教籍，称她为“英格兰的伪女王，邪恶的魔鬼”。教籍逐出令免去她统治英国的职务，赦免所有忠诚拥戴她的天主教徒的罪，同时将诏令延伸到持续拥护她的人。罗马教皇此举刺激伊丽莎白女王的许多臣子与各国贵族起而抗之，这些反抗行动被称为圣战，同时也鼓励了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者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地盘上作乱。其造成最大的灾难，就是破坏了伊丽莎白女王麾下天主教臣子对她的忠诚度，让这些都成为可能的反叛分子，每个人都有嫌疑。从此之后，这些人必须在痛苦挣扎中做出忠诚度的抉择，因为道德良知已经不再是折中办法。

此事也造成英国新教徒的态度转为强硬，他们变得更加爱国，甚至更加拥护爱戴伊丽莎白女王。他们被激化的忠诚度，让他们更坚决

要处决玛丽·斯图亚特，并以更严厉的法令对付天主教徒。教皇诏书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将英国的天主教议题从宗教问题提升到政治层次，但也因为这样，失去了诏书真正的目的性。多数英国人选择忽视它；一名男子前往圣保罗大教堂的院子，将这份诏书钉在伦敦主教的住所前，他随即遭到逮捕、刑求并处决。英国北部可能是这份诏书唯一受欢迎之处，然而天主教势力也受到打压。

欧洲天主教的主要势力，西班牙与法国国王都在犹疑着是否该入侵英国。相反，菲利普二世与查理九世都气愤地谴责罗马教皇之举，认为他并未事先与他们讨论，实在太过急躁。伊丽莎白女王则大胆宣誓，绝不让天主教的船舰进入英国任何港湾，否则她将受到轻视。以新教信仰为主的伦敦民众，对女王的感受产生共鸣，认定这个教皇诏书不过是“制造噪音的只字词组，徒然叫嚣罢了”。

伊丽莎白女王的想法是，让宗教与王权以平等关系在政治上成为一体，同时也认定若有任何事情影响了这个政治体，身为统治者的女王便有责任在政治的基础上进行处理。在教皇诏令发布后，她的对策就是将天主教方面的任何阴谋视为叛变，或违反国家利益之罪，而非仅以异端视之。受到谴责惩罚的天主教徒并非宗教烈士，而是出卖国家的叛国贼。

大体上，伊丽莎白女王个人从未对天主教徒表现出厌恶感。只要他们表面归顺，女王并不在意他们内心真正的信仰为何。只有在内心的信仰转为阴谋时，她才会祭出法律手段。

大约在这个时期，塞西尔开始组织间谍网络，希望能及早发现企图谋反的人，毕竟还是有少数英国天主教徒，愿意宣誓效忠罗马教皇，以及为他们心目中认定的真女王舍生取义。这些人认定玛丽·斯图亚特才是“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则是“篡位者”，并将推翻伊丽莎白女王视为他们的天职。

四月底，伊丽莎白女王接获枢密院方面的警告，若她强行让玛丽·斯图亚特回到苏格兰复辟，她可能也无法在自己的王国中安稳过活；但受到法国方面威胁，若她不信守承诺，恐怕将导致战争，伊丽莎白女王因而拒绝听取枢密院意见。不久后，伊丽莎白女王提出一份严苛的条件给玛丽·斯图亚特，要她先答应这些条件，才愿意考虑协助她复位。条件不仅包括要玛丽·斯图亚特核准《爱丁堡条约》，还要她将儿子詹姆士送到英国作人质，以确保她不会兴风作浪。塞西尔提醒伊丽莎白女王，她这样等于是让自己人陷入危险，但却引发女王一阵暴怒的眼泪与脾气，国务大臣塞西尔只好让步。当尼可拉斯·贝肯爵士坚持地指出，考虑释放玛丽·斯图亚特简直就是神经错乱时，他也得到女王同样的暴怒响应。但这些哭闹的戏码，其实只是为了演给法国大使看罢了。

整个夏天，为了对法国使出怀柔政策，伊丽莎白女王都主张为玛丽·斯图亚特复位而努力，但事实上，她只是再度使出拖延的老招数，让玛丽·斯图亚特继续受到她的监管。没有人猜得到她对此事真正的感受。当莱斯特伯爵提议，协助玛丽·斯图亚特在有限的权力下复位时，伊丽莎白女王指责他太支持苏格兰女王，导致他一气之下再度离宫。但这次的事件很快又成过眼云烟，几天内他便再度回宫与女王和好。

女王暴躁易怒的脾气，因腿部疑似罹患了静脉曲张性溃疡而变得更严重。她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导致她疼痛不堪，但她依然坚持要出巡。但她的臣子们也不得不忍受她不断生气，以及喜怒无常的脾气。

六月份时，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恳，玛丽·斯图亚特送给伊丽莎白女王一个书桌，上面的锁，刻着玛丽·斯图亚特遭挟持前两位女王那几年常用的密码。伊丽莎白女王用手指拨弄着那个锁，一边叹着气：

“希望神能让一切，回到我们两人制定这个密码时的模样。”直到十月，玛丽·斯图亚特才答应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条件。

七月十二日，伊丽莎白女王最赞同的人选，莱诺克斯伯爵成为苏格兰摄政王，一直要到孙子成年后才交还王位。新任摄政王马上就以共谋串通谋杀达恩里勋爵处斩了天主教汉米尔顿大主教。此举也在苏格兰的贵族派系间造成更严重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女王继续将莱诺克斯伯爵夫人挟持在英国宫廷中作为人质，以维持莱诺克斯伯爵的忠诚。

八月初，塞西尔与莱斯特伯爵终于成功说服伊丽莎白女王，多数人都认为诺福克公爵冒犯王权的举动只是被耍了，没有恶意，将他从伦敦塔中释放出来——毕竟牢中已爆发黑死病疫情——改为软禁，并且要他发誓再也不会与苏格兰女王有任何交集。诺福克公爵答应了，接着才得以返回他位于伦敦的宅邸——史密斯菲尔德附近的查特豪斯。

* * *

玛丽·斯图亚特继续住在英国以及近来王权的阴谋与不平静，让伊丽莎白女王应该成婚并尽快生下自己的子嗣一事，变得更加迫切。新教王储的诞生，长远来看将能抵消玛丽·斯图亚特问鼎英国王位的势力，尤其是个男孩更好。面对外国势力的入侵与国内的反叛者，没有孩子的伊丽莎白女王只能独自对抗这一切，毫无招架之力，遭到暗杀的恐惧也如影随形。若她膝下无子而死，玛丽·斯图亚特夺位的势力将长驱直入，伊丽莎白女王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因此在八月份时，尽管她一如往常地“厌恶婚姻”，伊丽莎白女王依然派遣特使前往哈布斯堡王朝，盼能让英国与哈布斯堡联姻的计划复活。查尔斯大公依然单身，但他清楚表示自己对伊丽莎白女王兴

趣全失，而女王则假装对他的拒绝愤怒不已。不久后，他便娶了一位巴伐利亚公主，转而疯狂迫害异教徒，直到他于一五九〇年逝世。

到了九月，出现新的追求者求婚，这次是查理九世的弟弟兼王储，现年十九岁的安茹公爵亨利（Henry, Duke of Anjou）。查理九世与凯瑟琳·梅迪奇都希望透过两国联姻计划能够让英法两国携手，面对西班牙共组坚强的同盟。对于与法国之间冗长的协商过程，能为她带来的政治利益和渴望已久的邦谊，伊丽莎白女王感到十分有兴趣，塞西尔也开始评估两国同盟能带来哪些价值，并针对法国方面认真的程度提出试探性的建议。为此，他派出凶恶的新教徒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前往巴黎，作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婚姻特使。

沃尔辛厄姆爵士已近四十岁；曾就读于剑桥大学、葛雷法学院与帕多瓦大学，而后成为国会议员；最后来到塞西尔门下，在宫中谋得一职，接着担任塞西尔的秘密特务一员。因为他黝黑的肤色与黑色服装，伊丽莎白女王昵称沃尔辛厄姆爵士为她的“摩尔人”。尽管她十分中意他，偶尔也会前往沃尔辛厄姆爵士位于萨里巴恩厄姆斯的家中做客，但女王总是认为他配不上她的聪慧。沃尔辛厄姆爵士是个严肃、有纪律又有教养的人，拥有极强的信念与令人畏惧的能力，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他与莱斯特伯爵十分要好。除了英文之外，他会说四种语言，是外交官中的佼佼者，对国际政治非常拿手。身为清教徒，他对西班牙与苏格兰女王抱持着相当程度的厌恶与不信任。伊丽莎白女王知道这是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就算他不赞同也一定会贯彻她的命令。但对于他人生中对宗教的使命，女王却抱持着保留的态度，因为他完全投入所有精力、金钱，甚至到最后——赔上了健康。

宗教问题依然是婚姻协商过程中最大的绊脚石。伊丽莎白女王依然与过去一样，坚持丈夫需遵守英国法律，而受到宗教操控的安茹公

爵则坚持自己绝不会背弃信仰。而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可能对这桩婚配感到强烈厌恶，因为安茹公爵与双性杂交的恶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时他已是恶名昭彰的花花公子，但他也喜欢男人，后来更毫不掩饰地成为异性装扮癖，穿着女装华服，化着精致的妆出现在宫廷舞会上。一名威尼斯特使曾记载：“他完全受到感官享受的支配，身上搽着香水与精油。带着双环戒，耳朵上还有垂挂的耳环。”尽管安茹公爵的母亲凯瑟琳·梅迪奇非常支持这段联姻，希望能让儿子坐上王座，但安茹公爵本人对此却淡如水。怀着清教主义的沃尔辛厄姆爵士自然也不赞成。

十一月时，伊丽莎白女王派遣莱斯特伯爵召唤法国大使费奈隆前来觐见。伊丽莎白女王刻意打扮，装作腼腆的仕女，表示对自己维持单身如此之久，感到十分后悔。费奈隆大使表示可以协助改变现况，且若他能谈成伊丽莎白女王与安茹公爵的婚事，将是非常大的荣耀。伊丽莎白女王断言三十七岁的自己，结婚已太晚，尽管如此，她依然努力表现出渴望婚姻的模样。她也提到安茹公爵比自己年轻很多，但当莱斯特公爵妙语如珠地表示：“对你来说真是太好了！”女王纵声大笑。

不久，费奈隆大使决定试探一下莱斯特伯爵对此计划的态度，并对他竟然大加支持感到惊讶。由于得到莱斯特伯爵的保证，加上伊丽莎白女王表现出渴望的模样，费奈隆大使便告知王太后凯瑟琳·梅迪奇，时机成熟可以正式求婚。

* * *

十一年来和平稳定的政府，加上罗马教皇的挑衅，让伊丽莎白女王在人民的心目中建立了有能力、有智慧又尊贵的统治者形象。一五七〇年十一月，人民首度表现出对女王的感激，在她的登基纪念日这一天，全国人民以公休一天来庆祝。前一年的这一天，只有全国教堂

以钟声庆祝，但这一年的这一天，英国民众决定以“超越罗马教皇制定的任何假日”来庆祝。一五七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这一天正式成为英国教会的重要节日，以示对童贞女王的尊敬，女王也被誉为英国的朱迪丝与德博拉^[1]，甚至超越了早已被禁止的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当然部分清教徒也十分担心，伊丽莎白女王已经成为另一个盲目崇拜的偶像。

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登基纪念日，人民便以对王权的感恩祈祷来颂扬他们被女王从天主教之中解救出来。布道会、洪亮的教堂钟声，各地都举办了庆祝活动，还有怀特霍尔宫著名的登基纪念日马上长枪比武竞赛。由女王亲自撰写，包含当日相关仪式内容的特别祈祷书也付梓成书，甚至也出现了许多民谣歌曲。英国各地的女王子民，都特别饮一杯酒敬祝女王身体健康、国运昌隆，甚至大开宴席、燃放烟火、生起营火，而海上的皇室船舰也都“大鸣礼炮”致敬。

威廉·康登便叙述，“为了证明对女王的热爱”，女王的子民一直到她任期结束时，仍持续庆祝“神圣的十七日”。在一五八八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庆典甚至延续到十一月十九日，也就是圣伊丽莎白日。这些庆祝仪式并未随着她离世而消失，她的继位者鼓励英国民众继续这些仪式，以强调英国的伟大，于是庆祝伊丽莎白女王的登基纪念日的传统，便一直维持到十八世纪左右。

怀特霍尔宫的马上长枪比武竞赛，通常都由女王本人在旁观赏，这是那个“黄金年代”中最辉煌的时光。马上长枪比武竞赛一直由女王的护卫亨利·李爵士（Sir Henry Lee）主持，直到他于一五九〇年退休后，才由卡门伯兰伯爵乔治·克里佛（George Clifford, Earl of Cumberland）接替。而出席的观众约有一万两千多人，给予宫廷中的年轻人一些机会展现他们英勇的骑士精神，以拓展名气。这些活动的盛况空前，参赛者总以最精致、最有创意的服装现身，而主题则通

常以神话为主。当伊丽莎白女王与侍女一起坐在最顶层楼座，居高临下看着骑士比武场时，每一位参赛者也都会献上礼物给女王，这个地方也就是当今的英国伦敦皇家骑兵团的阅兵场。

而伊丽莎白女王则好装扮为正义女神阿斯特赖亚、月亮女神、“海之女神”或女猎神黛安娜、史诗《仙后》（*The Faerie Queen*, 1596）中的女猎神妙月，或是较晚期的仙后葛罗莉安娜。在扮演这些超自然角色中，伊丽莎白女王接受骑士们的敬意与忠诚。她的护卫们穿上她最喜爱的装扮——尼可拉斯·希利亚德便曾手绘一幅克里佛全副武装，并在帽上装饰着女王手套的模样——在马上长枪比武竞赛中，以女王之名抵御所有的挑战者，在比武大会结束后，所有参赛者手中装饰着具有象征性细腻纹章的盾牌，将被放置在怀特霍尔宫的盾之长廊中。如此，象征着英格兰最后荣光的骑士精神，在伊丽莎白女王与臣子们努力之下以此方式发扬光大。

[1] Deborah（德博拉）是犹太女先知；Judith（朱迪丝）则是犹太女英雄。——译者注

13 仙后葛罗莉安娜

“在旁观者眼中，带着王冠君临天下的荣耀，比起在位者实际感受到的乐趣还多”，伊丽莎白女王有这么一句名言。与此同时，她却着迷又谨慎地保护着身为统治者的特权：“处理问题，我有权自由心证，除了神以外，我的任何行为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因为神，她深深相信，才让她通过如此多的考验仍能生存至今，还坐上王位，她也相信因为神对她的偏爱，才让她得以统治世人。一五七六年时，她向国会方面表示：“经过这么多年的统治带来的那些偶然的特殊利益，我都将它们归功于上帝。十七年来，在我的引导之下，上帝的羽翼赐给你们繁荣，保护你们，让你们成功，我从不怀疑同样一双稳定的手，将继续引领你们更臻完美。”

身为“上帝创造之物”，神指定的女王，她的冠冕神圣不可侵犯，伊丽莎白女王相信，她自己就能完全掌握教会与治国难解的问题。“一国之君，”她表示，“能以高贵的智慧处理世事，这是一般平民学不来的。”若她感觉有人对王权的觊觎超过那神圣特权的界线，便会以最快速度加以斥责。“她是一个不容置疑又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宫廷史家罗柏·依顿如此记载。“她仿佛人间天神。”诺斯勋爵如此断言：“若要说有完美的血肉之躯，那肯定是女王陛下。”

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在臣子的爱戴下治理国家。她骄傲地表示，自己与所有人一样“只是平凡的英国人”，并不断对人民强调自己就像是母亲，最重视的就是“人民的安宁与

平静”。“她如同献身于民，一切都为民着想。”一名西班牙使节发现，伊丽莎白女王总是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她的直觉总是能告诉她，到底什么对人民最好。她对公平正义非常顽固，但对“平凡的人”从不“摆架子”，每天都愿意收受请愿书，并全心支持平民权益。华德·莱礼爵士向詹姆士一世表示：“伊丽莎白女王总把平民的感受，摆在最伟大的参事的权威之上。她是最卑微又最伟大的王者，总是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当今的许多资料中，依然能看见伊丽莎白女王对臣子的尊重，她最常说的话就是：“谢谢你，我的好部下。”

伊丽莎白女王的教子约翰·哈林顿爵士，透露了一件小事，不难看出女王面对臣子的智慧：

她的心总像是夏日清晨从西面吹来的微风：让身旁的人感到清新芬芳。她的演说总能赢得人心，面对她的领导，她的臣子们总是展现出爱戴；而她总是说，在这个国家里，她必须仰赖由对她的敬爱中衍生出的服从，来带领国家。借此她也将自己的智慧展现无遗：无论是失去了女王对他们的信心，或是展现出对领导者的爱与服从，有哪个上位者会说这是臣民的自由选择，而非遭到胁迫？她当然展现出极大气魄，才能在毫不拘束之下赢得人民的服从。而且在人民丧失信心时，她也不畏做出改变，展现出乃父之风。

在个人王权的年代，最重要的是，统治者若能越常现身越好。而伊丽莎白女王的能见度总是很高，每年总会四处视察，常常沿着伦敦街道骑马出巡，或搭上她的专属驳船航行在泰晤士河上。

她也认为透过一连串沉着的演说，为臣子解释她的决策非常重要。许多演说内容都由她自己亲手撰写、印制成册并正式宣告。她是天生的演说家与演员，能在“毫无准备的状况下，以出色、精炼又恰当的措辞”演说。她非常懂得掌控观众，让所有人都折服。“相较于命令，统治者的承诺更该铭刻于听众的心中”，她向国会如此说明。

晚年她的写作与公开演说风格变得更加华丽、矫揉造作且夸张，跟随时下盛行的尤弗伊斯（Euphues）体，这是小说家约翰·黎里（John Lyly）在最早的英国文学小说《尤弗伊斯：才智之剖析》中发明的文体，而伊丽莎白女王也是这个文体的代表之一。

很少有人知道伊丽莎白女王待人处事多么微妙。“我看过她假装微笑，仿佛喜爱身边的每一个人，”约翰·哈林顿爵士仍记得：“让每个人向她吐露内心最深处想法；但她偶尔会突然私下思考这些事情，记下每个人的意见，若有机会便与他们私下沟通，甚至会针对他们一个多月前说的话当面反驳。她这些可怜的猎物，从不知道眼前等着他们的是可怕的陷阱啊！”

她不愧为亨利八世的女儿：她要求他人即刻顺从并尊重她，而且无论怎么做“都以父亲为楷模”。“帝王的尊严，”她断言，“是人们顺服的关键。”她常喜欢谈起父亲亨利八世，甚至部分演说还以父亲的演说为本。她也喜欢提醒枢密院成员们，相较之下，她的父亲比她严苛得多。当臣子们冒失地挑战她的观点时，她便会大发雷霆，表示：“若我非女儿身，而是个汉子，诸位可就不敢如此放肆了！”一五九三年，她在国会上表达自己对亨利八世的情义：“他是一个我从小就尊敬的人，面对他，我总深感自己的不足。”不过她依然承认自己的领导风格，比起父亲亨利八世“较为温和稳健”且仁慈。

相对于伊丽莎白女王杰出的才智，在政治与治国上她出人意料地认真。她十分精明、务实、极度认真，从不害怕踏出妥协的一步。面对叛乱与战争时，她也能展现出无比的勇气。她派驻在爱尔兰的代表，也是个粗野海盗的约翰·佩洛特-加龙省爵士（Sir John Perrot），曾如此形容她：“看哪！她可要怕这些西班牙鬼子怕得尿裤子了！”但他随后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话，并改口表示：“她有坚强无比的心，无愧于她的出身。”

伊丽莎白女王最重视的，就是在英国建立稳定有秩序的政府。她仿佛有种天生的本能，能直觉地感应什么对国家最好，她最大的要务就是维持法规、建立教会、避免战争，同时还要精减开支。她向她亲自挑选出来的法官们表示，他们应该“宣誓效忠于真相，而非效忠女王”。她爱好和平，常常主动调解他国战争与纷争。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如此形容她：“她在执政上的智慧与得体，超越了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以后的所有君主。”

“史上从未有过如伊丽莎白女王般有智慧的女性。”塞西尔称颂道，“她能说能懂各种语言，充分了解社会阶级、处理方式与各国国君，她对英国的了解更是一绝，甚至没有任何一位宫廷参事能告诉她任何她不知道的事情。”

* * *

尽管如此，在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时期的社会中，对女性元首依然有着根深蒂固、以偏概全的观念。姐姐玛丽女王带来不愉快的经验，似乎让大众更加确定女性天生就不适合执政。一五五八年，在《反女性统治怪物的第一响号角》（*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书中，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写着：“我相信上帝曾给予当代的某些人启示，女人治国，在男人之上承担帝国兴衰之责，毕竟是比较魔鬼还可怕。”女人，他又强调，天性懦弱、意志薄弱、没有耐心、软弱又愚蠢，是恶魔之门，永远贪得无厌。瑞士改革派人士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则认为，女性执政的政府“背离了自然的本质与真理，就如奴役般不可饶恕”。

一名法国特使要求在他觐见女王时，枢密院成员皆须在场，表现出了男性歧视女性的典型特质，等于是暗指他特地前来讨论的国家大事，超出了女性所能理解的范围。女王陛下则怒气冲冲地回道：“大

使先生恐怕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认为我们没有能力在没有枢密院的情形下响应他的问题。这也许是法国的惯例，毕竟法国国王年纪尚轻，但本国政治现况比法国好多了。”

伊丽莎白女王并非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她颇能接受那个年代的教条，认为女人受到极大限制，表示自己是一个“想要有清醒的判断力，也想保留死后名声的女人”。“我的执政经验，”她在执政晚年时曾这样告诉法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 of France），“让我变得如此顽强，以至于我相信自己对于身为执政者该有的特质并不无知。”

“就算我不如母狮般明智，”她总喜欢这么说，“我也是狮子之后，继承了许多狮子的特质。”她的支持者却总喜欢强调，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后，便符合了古先知默林的预言：“皇室将出现童贞女王统治国家，她的令牌一挥能及荷兰海岸，伟大的卡斯提亚听闻她的名号也会丧胆。”这个“伟大的卡斯提亚”指的当然就是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卡斯提亚就位于西班牙。

为了弥补“性别上的弱点”，伊丽莎白女王将这些转化为能量，让她得以在以男人为主的世界中生存。她利用女性的特质来掌控手下的男人，让他们保护她。她精于调情撒娇，让臣子们对她忠心不二，而且在臣子们彼此争宠之中，宫廷中的权力才得到了平衡。身为一国之君，她的地位高于一般人，她建立了这项常规。她曾向威尼斯大使主张：“我的性别无法削弱我的声威。”

她的策略非常成功，身为女性执政者，她克服了性别歧视的问题，她的臣民甚至将她视为英国史上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她可以说是最受人民爱戴的国君之一。

身为一名女性，在本身的传奇性上，反而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优势，因为在臣子、作家与诗人们的骑士精神下，她可以展现出寓言或神话中的形象。她是“被选中的玫瑰”，在她的身边，由倾慕崇拜之情衍生出的狂热油然而生，而她也被置于将近神一般的地位。到了统治的晚期，国会的一份法案曾这样形容女王：“神圣女王陛下”。英国作曲家约翰·道兰德（John Dowland）曾写过一首歌，名为《伊丽莎白圣母颂》（*Vivat Eliza for an Ave Maria*），毫不保留地展现在后宗教改革时期由对女王的崇敬完全代替在人民心中的女神形象。

伊丽莎白女王则将贞操德行视为最高指导原则，推动了童贞女王的形象与膜拜风气，她等于是献身给国家与人民。她将早年与圣母玛利亚连在一起的纯洁形象，变成了自己的象征与代名词：玫瑰、月亮、貂与凤凰。她也与亨利七世（Henry VII）一样，最喜欢称自己为阿瑟王后裔，有关阿瑟王的传奇，一直都是伊丽莎白一世年代露天历史剧最爱的题材。

不过，最致力于推广伊丽莎白女王崇拜的，就是诗人与剧作家了。在一五九六年出版的史诗《仙后》中，埃德蒙·斯宾塞（Edmond Spenser）将伊丽莎白女王比喻为“仙后葛罗莉安娜”与“女猎神妙月”。威廉·莎士比亚、本·琼森与华德·莱礼爵士，则称伊丽莎白女王为海之女神辛西亚或女猎神黛安娜，“贞洁又美丽”。而其他的诗人则以神圣的处女、第一个来到人间的女性潘多拉、欧莉安娜公主或“英格兰的正义女神阿斯特赖亚，白色国度的艳阳”来颂扬伊丽莎白女王，英国国教会则视她为新的朱蒂丝或德博拉。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期间，诗作、歌曲、民谣与牧歌几乎都颂扬着她，并向神祈祷能保护她远离敌人，以及以她的美德和贞洁来称赞她。像她这样的统治者，能抓住人民的心，在英国史上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 * *

除了激励臣子之外，她亲近的参事们常常发现，伊丽莎白女王也很容易暴怒。身为一个深懂微妙的因循之道的女性统治者，她熟于拖延与假装之道，对于无法马上解决的问题，她通常以搁置处理。她的臣子们，缺乏她的敏锐度，也不懂她的动机，常常被她的行为逼得发狂，因为她不是一个轻易露出心思的人，但他们仍不得不让步，因为从长远来看，比起仓促决定，拖延时间能让她为国家做出更好的决定。只要状况许可，她都会玩时间游戏。

“这让我厌倦人生。”一五七四年，因为伊丽莎白女王显得特别不随和，另一位国务大臣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便如此表示。“逝去的时间不会重返，失去优势，却仍得承担风险，问题也没有解决。我无法得到女王的许可，许可也完全没有进展，但日子一天又一天、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要继续）延宕到下一秒，到中午，到明天。”而塞西尔则有一次发怒，表示：“女王陛下一直不给一个坚决的答案，让我烦躁难安。”

年纪越来越大后，伊丽莎白女王在签署文件时更是犹豫。国务大臣们还得因此“说些故事或演讲来娱乐她，让她因此感到愉悦”，才能让她的思绪暂时脱离政务。

女王的其中一个座右铭，非常适合她，那就是“眼观八方，紧闭嘴巴”，她与父亲一样，都有自己的主张。“说起她的心思，这我只能语带保留，因为无论是女人或女王的身份，她的心皆深不可测。”臣子杜德利·吉格斯（Dudley Digges）曾如此记载。她很早就知道，摊牌绝不是件聪明的事。哈林顿爵士仍记得：“在国家大事上，她身边最聪明的人与最好的参事，对她的想法常感疑惑，只因她很少透露她的看法。”从公主时期一直到贵为女王，她似乎从不知安全感为何物：她身边永远有毒药或刺客的尖刀等着她，敌人一再地找机会摧毁她。她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在床上安然离世。

若有需要，伊丽莎白女王也能展现坚决与强悍的一面，在历史上已知的两次事件中，她毫不畏惧地下令刑求违法者。尽管刑求并不合法，但伊丽莎白女王认为，为了国家安全利益，这是必要的手段；这两次的事件中，遭到刑求的人都参与危害女王性命的阴谋。就连伦敦塔中的狱卒都知道，若自己做出越权的事情，女王的怒火可能烧得他们体无完肤。她最讨厌死刑，因此只要能符合公平正义，她便会尽可能对遭判极刑的重大罪犯赦免缓刑。根据塞西尔表示，她是个“非常具有怜悯心的女人”。她总是非常关心案件的审判，若有需要也会出手干涉。

从许多方面来说，她都是保守派人士，非常尊重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阶级制度的旧观念，也非常珍惜“地位、优越感与身份”等这些传统观点。弗朗西斯·贝肯爵士透过观察发现“女王陛下爱好和平，她的爱好从未改变”。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名书记，曾提醒接任者“避免成为新风俗惯例的发起人或爱好者”。

枢密院成员们常常为她出乎意料的行为感到气恼。尽管她平易近人又亲切，却也十分重视自己的尊贵地位，若有人表面上吝于展现对她的尊重，或在她面前未展现出应有的谦逊，灾难就会降临到这些人头上。英国皇室礼仪中规定与女王说话的人必须行屈膝礼，除非女王同意否则不得起身。若女王站着，没有人能坐着，晚年她同意让年老跛腿的塞西尔在她跟前坐在担架上时，显然是非常大的恩赐。

吝啬是她最常遭受的批评。事实上，她从姐姐手上继承负债累累的国家之初，便已下定决心，不仅要完全清偿债务，还要节省开支。虽然收紧银根的经济政策往往不受欢迎，但在许多欧洲国家纷纷走向破产之际，这却得以维持英国偿付的能力。在每年仅略微超过三十万英镑的小额收支之下，她支撑起自己、宫廷与政府的全面开销。为了

在预算内完成任务，伊丽莎白女王展现出遗传自祖父亨利七世的精打细算之风，她在在位期间，总是能以有限的资源完成许多重要事项。

然而在个人的装扮上，她花钱绝不手软，因为在那个人王权的年代，华丽与浮夸在视觉上等于是权力的象征。“身为统治者，就仿佛高人一等俯瞰世界。”伊丽莎白女王表示。因此宫廷仪式、摆设与娱乐活动的开销，绝对省不得，伊丽莎白女王的衣柜也是，这些都是王权的象征，必须展现给外国使节与宫廷宾客们看。这仿佛是都铎王朝传承下来的习惯，维持光彩夺目的门面，不只让人印象深刻，更让所有走访宫廷的人咋舌。

在这些盛典与仪式中，伊丽莎白女王偶尔也会表现出平凡的一面，就像在册封达德利为莱斯特伯爵时，轻轻地搔了搔他脖子的动作。她非常平易近人，而且也不轻易向惯例风俗低头。她打断庄严的演说与布道会的事情，也是时有所闻：她甚至会命令啰唆得让她失去耐性的演说者闭嘴。但对于她尊敬喜欢的演讲，她也不吝于赞赏，一次下议院新任的议长进行了十分具有说服力的公开演说后，伊丽莎白女王便激动得用手圈住了对方的颈项。她告诉身边的侍女自己感到非常抱歉，“毕竟两人并不熟识”。

* * *

十六世纪时的王权，在民间依然有着神秘的形象，伊丽莎白一世则全心全意地推动这样的形象。自十三世纪以来，便有透过御触治疗国王的邪恶（King's Evil）的风俗，君王用手触摸淋巴结核患者，据称有治疗奇效。无论在怀特霍尔宫中还是在出巡的路上，伊丽莎白女王时常“勇敢且从不作恶”地“触摸身上有疮或溃疡”的患者，她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这么做是件好事。

每年在复活节前，她总会穿上围裙，臂上放着一条毛巾，主持皇家濯足一事，模仿最后的晚餐中的耶稣形象，为贫穷可怜的妇女洗脚（当然，她的施赈吏已经先帮这些妇女洗过一遍了），再赐给她们许多布匹、鱼、面包、起司与酒。依据传统，这些毛巾与围裙，以及君主的袍子都要赠予受惠者，但伊丽莎白女王并不希望这些穷人为了她的衣服打架，于是创了一个新风俗的先例，将濯足礼布施钱装在红色皮包中赠予这些人。

* * *

说起治理国家，伊丽莎白女王受参事与议员们的激赏，而这些人都是依据忠诚度、诚实度与能力，由她亲自挑选出来，并拥有绝佳的洞察力。尽管她曾向一名大使表示：“我们没有枢密院不行，对国家事务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自负。”但在听过所有枢密院参事的意见后，则是由她来做出最后的重大决定，尤其在外交事务上，她有最独到的见解。她并不认为自己一定要参考参事们的意见，甚至常常对他们大吼大叫；更有甚者，要是参事与她意见不合，她便会暂时禁止他们踏入宫中。许多参事为了提出意见，都必须有受到轻微处罚的心理准备。

女王一点也不在意让大臣们感到不便，她认为大臣必须和她一样认真工作、有效率，致力于履行国家职责。若他们办不到，她会坚持了解原因；她能洞察一切，是个严格的女主公。一次亨斯顿勋爵离开他的公职太久，伊丽莎白女王便对他的儿子发飙：“畜生！若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干脆任他自生自灭，找人来替他的职好了，我们才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

哈林顿爵士则记得她总是要塞西尔陪着她交谈到深夜，

在他离去后再召来一位臣子，偶尔测试身边的人对她的感情。每个人都会私下展现机智。若有人在她面前伪装掩饰，或不采纳她的意见，她绝不善罢甘休，有时惩罚也是不可避免的。

经过这些深夜咨商后，在第二天破晓前，女王就已准备好继续处理国政。她似乎不需要太多睡眠，说她是工作狂绝不夸张，甚至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形容。哈林顿爵士证实有一次她甚至一边写信，一边下达命令，同时还可以听取简报，并下达简单明了的指示。

每天她都会与臣子们接力进行私下咨询，读信与公文，写信或向他人下达命令，了解账目并听取他人的请愿。她将信件、备忘录与手札都挂在腰间的“大型随身囊”中或寝宫中，若不需要了就丢掉。因为知道枢密院参事会在她面前隐瞒意见，因此她很少参与日常的枢密院会——尽管她非常懂得与他们的辩论之道。她宁愿在背后对事务严加管束。在她刚继任的时候，塞西尔非常努力阻止她涉入过多政务，因为他认为这不是女人家的事，但几年过去了，他变得十分尊敬她、相信她，认定她是他的统治者，认同她是一个聪颖有智慧的女性。

在日常事务上，伊丽莎白女王将决定权委派给枢密院，但当决策正确时，她会居功；若策略造成问题时，枢密院参事便得一肩扛下责任。根据哈林顿爵士记载，塞西尔“总在处理失当时流下眼泪，因为他知道最困难的不是弥补错误，而是安抚女主公的情绪”。她的坏脾气无人不知：甚至会甩国务大臣耳光，将拖鞋丢到沃尔辛厄姆爵士脸上，或是殴打惹她生气的人，有一次在一怒之下，她从枢密院会上断然拂袖而去，她回到了寝宫中看书，一直到冷静下来才停止，而每一次的情绪爆发，她都这样处理。她也从不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调整。莱斯特伯爵是这样形容她的：“感谢老天，她的批评不像其他君主如暴风般的脾气，但对期盼越高的人，她的批评有时甚至越不留余地。”

“当她微笑，”哈林顿爵士曾如此抒发心情，“仿佛温暖的太阳，人人都想沉浸其中，但当乌云瞬间聚集时，震耳欲聋的雷声可能出其不意地劈向任何人。”一名曾亲眼见证她大发雷霆的法国大使透露：“我看到她对着任何一个人发泄怒气，我只想瞬间躲到加尔各答去，她的怒气如同死亡般带来恐惧感。”一五五九年，身为年轻的女王，伊丽莎白愤怒地训斥两名仆人，他们表示将把这种恐惧的情绪“带到坟墓里去”。一位臣子大胆上前一跪，为两人向女王求情“请求恢复他们男仆的身份，但让他大感惊奇的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安慰两人的心灵”。

塞西尔身为女王身边最亲近的参事，很早就知道如何判断她的情绪，也知道要如何度过她的情绪风暴。她身边的仆人们记录道：“有时候都必须忍受她暴怒之下的口出恶言，就如同我多年来的经验般。”三十多年来，塞西尔一直都是她的主要参事，也是她在枢密院中最棒的温和派力量。“欧洲没有任何一位君主，”她有一次曾表示，“拥有像塞西尔这么好的参事。”

伊丽莎白女王喜欢旧派的特权阶级，也喜欢所谓的士绅阶级，也就是“新贵族”，这些人的好运来自他们的财富，而伊丽莎白女王则以能力来决定枢密院成员人选，当然还有他们的教养。她认为这些服务国家的人必须有最高素质。她身边多数的臣子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彼此有亲戚关系，当然也因此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中带来和谐的家庭气氛。尽管罗柏·依顿曾指称，她就是宫廷派系内讧的罪魁祸首，但“西得尼文件”（the Sidney Papers）则表示，她“懂得运用智慧制衡各大势力”。

然而比起枢密院，英国国会就显得更难掌握，因为国会的层级更低。女王认为，身为一国之君，她的权力完全凌驾于国会之上，但下议院中的清教徒却常常反对许多议案，而上下两院也常常嫉妒彼此的

权力与特权，总是想方设法要拓展自己的权力。女王与国会的冲突因此难以避免，就如同我们所见，伊丽莎白女王偶尔也有不得不认输的时候。只要可以，她都会尽量避开国会。在她执政的四十五年间，国会仅开议过十次，总共工时约为一百四十周——根本不到三年。女王仅在国会开议前与休会前，穿着她的长袍，带着王冠，坐着驳船或骑马而来参与仪式；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她会亲手撰写演讲稿。若上下议院议员想要与她沟通，就必须派遣代表前往她当时所居住的宫殿。在议院代表上前下跪后，她会从王位起身优雅地鞠躬或行屈膝礼回应。传令员会负责为她带来议事辩论的消息，而塞西尔则负责向上下两院传达她的期许。

“宣布召开国会是我的权力，”伊丽莎白女王一次曾如此提醒两院议长，“解散国会，或进行决策也一样是我的权力；不同意国会的决议也是我的权力。”部分事情，包括继位与她的婚姻，就是她认为不适合由国会讨论的问题，但国会方面的想法总是相反。

在外交政策上，欧洲在法国与西班牙这一类天主教强权主导下，伊丽莎白女王的政策以保持英国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为主。靠着就连参事都不见得能理解的迂回曲折的外交政策，她成功地达成了目标。战争会威胁大英王国的稳定与她的财政，因此对她来说仿佛诅咒。她与菲利普二世的态度大相径庭，她完全不想建立自己的帝国，因此在一五九三年，她向国会宣告：

这件事对我来说如此简单自然，那就是这么多年的统治下来，我没有任何拓展疆界、扩大领土的想法；尽管我有多次的机会。我心已决，绝不入侵任何邻国疆土，也不夺取他国王权。能治理我自己的国家，以君主之名执政，足矣。

* * *

伊丽莎白女王的性格复杂。她是个十分认真的知识分子，时间许可下，每天都会花上三小时读历史书（“我想像我这种不是教授的人，很少能和我一样爱看书了。”一次她向国会如此夸耀），一直到她晚年死前，都会将翻译塔西佗（Tacitus）、波爱修斯（Boethius）、普鲁塔克（Plutarch）、贺拉斯（Horace）与西塞罗（Cicero）的作品作为娱乐，她甚至也能吐出“流畅又拗口的诅咒”，就和那个年代多数好人家的仕女一样。一次塞西尔迅速而神秘地带走一位清教徒富勒先生（Mr. Fuller）上呈给女王的一本书，书中提及“仁慈的女王陛下”不时“在邪神、公众之前，最令人悲伤的是常在神与耶稣存在之处，在许多神的荣耀降临之所，圣人、宗教与禁忌之处”口出诅咒，“在女王陛下邪恶的示范下，多数的臣子也常常口出诅咒，甚至说亵渎的话，这简直是让神的名誉扫地”。伊丽莎白女王要求看那本书，但在一名侍女的默许之下，那本书很幸运地“不见了”。

与母亲安·波林一样，伊丽莎白女王非常喜欢俏皮话，真实的笑话及“以机智胜过最机智的人”。对于喜剧演员理查德·塔莱登（Richard Tarleton）与女侏儒滑稽的动作，总是能引发她激动大笑。但她有完美的餐桌礼仪，吃喝的动作都十分优雅，最喜欢的饮料是啤酒。

她本人也非常机智。当一名法国大使向她抱怨，自己等了六天才等到觐见女王的机会时，她俏皮地答道：“就像世界的运转是六天一样，这是神定下的规则。神的力量，是有弱点的人无法比拟的。”

她那毋庸置疑的性吸引力与自信，总是让男人趋之若鹜，而一名臣子曾表示，伊丽莎白女王的“情感并非镌刻在硬石上，而是精致地雕塑在纯白的蜡里”。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她以越来越激烈的手段，想要追回逝去的青春，而宫廷里那些具有骑士风范的臣子们，则

不断向她保证，她是宫里最美丽的女子，她那极度的虚荣心，让她全然相信这些谎言。“她是一个让时间也惊艳的女子。”华德莱礼爵士曾如此感叹。

她最大的兴趣就是骑术，这是她最常见的活动，此外还有打猎与跳舞。有一幅画详细地描绘出她在彭斯赫斯特庄园与一名疑似为莱斯特伯爵的男子共舞；两人正在表演拉沃尔塔舞，这是一种极富争议的舞蹈，男伴会将女伴高高举起转圈，而女伴的腿则甩在外头，因此受到许多神职人员的谴责，认为这种舞蹈是造成放荡甚至谋杀的原因。一些比较不具争议性的舞蹈，则需要更高难度的技巧与优雅的态度，尤其是女王钟爱的双人舞，舞者先轻快地踏五步，接着凌空飞跃而起，接着双脚要同时落地。而伊丽莎白女王则坚持融合更多更复杂的舞步，这也有效地避免了舞技较差的臣子参与这种舞蹈。年纪渐长后，在宫廷舞蹈的场合中，她多半扮演观众的角色，但她的标准依然高得吓人。一名法国大使记述：“当她身边的侍女跳舞时，可以看见她的头、手、脚皆随着节奏轻点。若侍女们跳得不受她好评，便会受到她的责难，她无疑精通此道。”

伊丽莎白女王最喜欢的桌上游戏是纸牌与西洋棋。她也十分喜爱戏剧、马上长枪比武和残忍的斗熊游戏，在泰晤士河南岸的派瑞斯花园，就有一个她的养熊场。

钻研哲学则是她多年不变的喜好。一五九三年，在听闻法王亨利四世改信天主教的消息后，伊丽莎白女王大感心烦，于是花了二十六个小时将波爱修著作《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翻译成英文，借以平复愤怒的情绪。她是一个“好学孜孜不倦”的人，她毕生对于学问总抱持着高昂的兴趣，而她的语言天分也从未消退。“说错拉丁文带给我的恐惧，比惹怒了西班牙、法国、苏格兰国王，加上整个吉斯家族与他们的盟国还要可怕。”她曾

如此说道。一次她曾自吹自擂，表示自己“一点也不害怕西班牙国王，因为他一直到十二岁，连自己语言的字母都还学不好”。

伊丽莎白女王非常重视教育大计，致力于催生伊顿公学与西敏中学。她热切希望中上阶级人士都能有文化涵养，因此创办了文法学校，延续了英王爱德华六世草创的教育基业。此外，她还创立了牛津耶稣学院。

另外，她对音乐也十分热情。除了鲁特琴与小键琴技巧高超外，伊丽莎白女王甚至会“为芭蕾舞音乐和一般乐曲谱曲，进而演奏且随之起舞”。她大方资助当代音乐大师汤马士·泰利斯（Thomas Tallis）与威廉·拜尔德（William Byrd），两人皆对她的歌唱音质赞誉有加。她演奏过的小键琴，上面还有波林家族家徽，目前依然珍藏在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中。

伊丽莎白女王对著名占星家暨巫师约翰·迪伊的资助护持着他，让他远离行恶魔仪式的罪名与迫害。一五六四年，约翰·迪伊曾写道：伊丽莎白女王“以她那超乎常人、慷慨大肚的智慧，给我慰藉并鼓励我，让我继续哲学与数学上的研究。”她偶尔会前往莫特莱克拜访他——一五七五年，他记录下：“女王陛下与她那伟大的枢密院，以及许多贵族人士，都来参观我的图书馆。”她甚至在宫中给约翰·迪伊备了个房间，但他并不想中断研究，因而婉拒了。

令伊丽莎白女王着迷的，不只是约翰·迪伊的科学与神秘学研究，还有他预知未来的能力；生在那迷信的年代，她对这些预言都认真以对。一五七七年，约翰·迪伊预测出“英国将建立无可匹敌的大帝国”，也就是这样的预言，启发了伊丽莎白女王，鼓励德瑞克爵士、莱礼爵士与吉尔伯特等探险家出航，发现新大陆，并试图在新大陆建立英国版图。许多事情她都会听取约翰·迪伊的意见：新的彗星、牙痛、科学疑问以及解梦。

受到感动时，伊丽莎白女王也有怜悯慈爱的一面。面对好友诺里斯小姐“生命中的噩耗”，在爱尔兰战争中失去了挚爱的儿子时，伊丽莎白女王如此通情达理地回应：“别为了无用的事伤害自己，展现出好的模范以慰藉与你同样悲痛的人。自然天理的循环已然达成，人生谁无死，而他得到应有的光荣，让身为基督徒的明智判断安慰你那沉重的悲痛，人生本无欢乐，听天意而已。”两年后，诺里斯家又有两个儿子战死爱尔兰沙场，伊丽莎白女王再度写信安慰悲痛的诺里斯家双亲：“我们与你们一起，只希望我们心中所有的安慰，都能在如此悲痛的意外中，聊慰两位的心。我们并不愿意动笔写下这些话语，唯恐将给你们带来更多伤痛，但我无法克制自己，尽管你们顺从神的旨意，却无法避免一再的打击。尽管我们的伤痛不亚于你们，但仍该作为楷模。”当伊丽莎白女王听闻亨丁顿伯爵的死讯，甚至将皇室全数移驾到怀特霍尔宫，只为了能好好地告诉亨丁顿伯爵遗孀这个坏消息。

* * *

在伊丽莎白女王长寿的人生中，她的体魄一直十分健壮，让她能尽情享受严峻的日常活动。她饮食有度，活得长寿，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都能维持身体机能，让政府运作得宜。她精力旺盛，甚至能惊人地站上好几个小时，让疲惫不堪的臣子与外国使者们都感到狼狈不堪。

她年轻时的神经问题，似乎来自压力、不安全感与悲惨的童年经验。她童年时期遭遇的创伤与惊吓，尤其是了解母亲命运的过程，可能对她的神经系统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她部分的神经问题，在继位之后自然减少了，后来在她更年期时才又复发。随后她常遭受焦虑、歇斯底里、躁症发作、强迫症与逐渐加重的忧郁症反复发作的影响。她厌恶噪音，无法忍受门窗紧闭与人群，这显示她有幽闭恐惧症。她

偶有恐慌症发作的情形：一次在前往小礼拜堂的途中，“她突然无法克制地遭受恐惧折磨”，根据西班牙大使表示，她甚至必须接受搀扶才能回房。

这些病症显然主要是神经性的问题。她肩负的重任带来的压力与紧张，与总是活在生命安全受威胁的意识下，可能都会让意志不坚的人崩溃。许多当代人认为，她拒绝婚姻与生子带来的满足，便是违反了生命自然。塞西尔的观点则是，结婚生子对于治愈她的精神问题，可能有奇效。

在她那个年代的标准之下，伊丽莎白女王可说是个非常挑剔的女性，容易大惊小怪。她十分厌恶特定的气味，尤其是香水皮革，在一次某位臣子穿着香水皮革靴前去觐见女王时，她随即拒绝了他上呈的请愿书，皱起了鼻子，臣子只好嘲弄地说：“啧！女王陛下，臭的是我的鞋子！”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才和缓下来。对于他人的口臭，她的忍耐度就更低了。一次在接见一位法国特使后，她痛苦惊呼：“老天爷啊！若这个人继续留下，我该如何是好？他走了一个小时后，我仍能闻到那股臭味！”特使后来得知女王陛下的话，随即羞愧地逃回法国。

伊丽莎白女王也讨厌厨房的腥臊污垢。最不幸的是，在汉普顿宫中，她的御用厨房就位于她的寝宫楼下，“女王陛下不只坐立难安，甚至影响了食欲”。用玫瑰水在空中喷洒，似乎也无法掩盖住那股气味，因此汉普顿宫在一五六七年不得不改建新的厨房。这个厨房便一直保存至今，成为宫廷中的下午茶室。

随着年纪增长，伊丽莎白女王开始有了头痛的烦恼，这可能是偏头痛、眼压高或风湿病造成的。“脚踝上有一个开放性的烂疮”于一五六九年七月首度曝光之后，她甚至有多次因而无法行走的记录：一五七〇年出巡时，她甚至不得不坐在担架上。虽然一五七一年时她的

烂疮已经痊愈，但女王却留下了微跛的后遗症，而她对此事十分敏感。尽管如此，这却从未影响她每天早晨最喜欢的长途健行习惯。

尽管她的身体毛病多，但几乎都是慢性病，而非急症，她也多次展现不愿屈服的意志力。和父亲一样，她最讨厌生病，也不愿人们认为她生病了。一五七七年，她下令要莱斯特伯爵通知塞西尔，为她带来一些他居住的巴克斯顿的温泉水。但他将温泉水运抵宫中时，女王却不愿意服下，她认为“温泉水离开原始地便没有益处了”。但她不愿服用的原因，只是有人说——当然也是事实——她的“脚上生疮”，但她从未正面承认；事实上，她甚至为了莱斯特伯爵写信给塞西尔一事，斥责了他一顿。

来年她遭受“极度严重”的牙痛，但她“并不认为，也从不认为”她的烂牙需要拔除，因此她的医生也不敢如此建议。她尝试了许多减缓症状的方法，但都徒劳无功。在枢密院多次的建议下，伊丽莎白女王依然不愿意“接受器械性的治疗”。英勇的伦敦主教约翰·艾尔墨向她表示，拔牙并不是件恐怖的事，并愿意在她面前，拔掉一颗蛀烂的牙。于是在一五七八年十二月，他接受了拔牙治疗，也因此，伊丽莎白女王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折磨后，最后终于同意让医生为她施行拔牙手术。术后，任何有关牙齿的事情都成了禁忌话题，之后每当出现了蛀牙，她都只愿意忍痛，再也不愿意接受拔牙治疗，因为她听说菲利普国王在接受拔牙治疗后，从此只能吃流质食物。这个决定让她多年来断断续续地受牙痛、牙龈疾病之苦，最后甚至出现面部与颈部神经痛。当代的数据显示她的脸颊肿起，可能就是脓疮造成的结果。她越来越喜欢含糖食物、蛋奶冻与布丁，对牙痛的状况一点也没有帮助，但她仍成功地保住了部分牙齿，只是在她晚年时，一名外国观察家发现，她的牙齿“非常黄，而且极度不对称，还有不少缺牙”。

接近晚年，伊丽莎白女王也从不愿承认自己身体不适。一五九七年时，塞西尔曾发现“她的右手大拇指疼痛不堪，但却强忍着不让人知道，不论是不是痛风，都没人敢问，这使她签署（文件）时都疼痛难忍”。

她的医生是最顶尖的，在那个年代，多数医生犹豫不决又危险的治疗可能加速病患的死亡，但伊丽莎白女王没有时间找他们来，而且她也尽可能地避免与医生打照面。尽管她喜欢强迫生病的臣子依照她的调配吞下她认为有治疗奇效的“药草水果汤”，但当她生病时，要说服她吃药并不容易。偶尔会发现，伊丽莎白女王仿佛扮演慈母的角色，喂食这些普通又古老的方剂让友人吞服，甚至自吹自擂地表示，这些方剂能治愈全天下所有的病。伊丽莎白女王的独门配方，只剩一剂留存至今，是她亲自调配用来治疗有听力问题的诺斯勋爵的，“烤一小块豆粉糕，待它温度上升，剥成两半，两半各滴进三到四汤匙的苦杏仁油，接着睡前将两块豆粉糕固定在两耳上，贴得越紧越好，保持头部温暖”，但历史上并没有记录它的功效。

伊丽莎白女王极度反对当时流行的泻剂，因为她认为，吃了泻剂的人就有偷懒开小差的理由，于是禁止她的侍女们服用泻剂。一五九七年，两位侍女并未服从她的命令，“偷吃了泻剂”，因而被罚三天不准入宫。

伊丽莎白女王不愿承认身体上的毛病，原因也是有迹可循。“在其他人的身上，生病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而在统治者身上就更严重了。”她认为这意味着，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会认为她失控了；也代表她向人类的弱点低头，但我们已经知道，伊丽莎白女王总希望被视为超凡入圣。生病也代表年老，这也是她极度不想承认的一件事，而年老也威胁到童贞女王形象永恒青春的核心概念。

* * *

在都铎王朝年代，皇室的形象非常重要，比现代的皇室形象更为尊贵，辉煌的表象就是权力与伟大的同义词。都铎时期的君主最著名的就是光彩夺目的一面，相对于个人魅力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们公开演说的服装与那个年代君主所建造和居住的宫殿中，都能看出这样的表征。

伊丽莎白女王的衣柜，据传有超过三千件华服。随着她的各种服饰变得越来越浮夸、华美，她的衣着在其在世时便已成为传奇。神圣的新教处子，穿着朴素的黑白相间的服饰，在玛丽女王在位期间，成功为伊丽莎白女王加分；继位后，她的服饰风格大幅扭转，出现色彩缤纷、炫耀卖弄的形象。伊丽莎白女王在人像绘画中，总是身着蚕丝、天鹅绒、缎子、塔夫绸或金丝织成的衣裳，上面装饰着真正的宝石、无数的珍珠，并奢侈地以金银线镶饰，硬挺的襞襟与浆过的网纱制成的立领，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夸张。她最喜欢的颜色是黑、白与银，并以银色的半透明头纱作装饰。她的许多衣服上，都装饰着她自己的象征物，包括玫瑰、太阳、彩虹、巨兽、蜘蛛、麦穗、桑葚、红石榴与她最爱的花——三色堇。

有时候伊丽莎白女王的服装与其他服饰，则是臣子送给她的新年礼物；有些礼物她甚至一生都没穿过。这些衣服，与其他弃之可惜的服饰与鞋子，她都会送给侍女们。但部分友人与臣子赠予的礼物，她又显得十分珍惜：一五七五年，哈维克的贝丝小姐在送了女王一件上面绣着各式各样的花与康乃馨的蓝色斗篷后，听闻宫中的朋友转述：“女王陛下从未这么欣赏您送的礼物；斗篷的颜色与特殊的装饰，让这件衣服价值不菲，让女王因此用我从未听闻的好话大赞夫人您。”贝丝小姐因而感激涕零。

身为未婚女子，伊丽莎白女王非常喜欢穿低胸的衣服，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老年，通常她都将头发在背后扎成发髻，但偶尔也会刻意

将烫卷的头发放下。年纪渐增，头发渐白后，她甚至会戴上红色假发，这在宫中的侍女间蔚为风尚。她的许多衣服都是宫中裁缝师沃特·费雪（Walter Fish）量身定做的，亚当·布兰德（Adam Bland）则负责提供毛饰。

每天早上，寝宫侍女都要花两小时，才能帮女王着装完成。在至少四个宫殿中，女王都有提供流动自来水的专属厕所，除此之外，她还随时带着专用的浴缸，让她在每个宫殿中都泡澡，此外还有一年两次的药浴。显然，伊丽莎白女王比那个年代多数人都还要频繁地泡澡，一年至少会泡三次。她用金质牙签与象牙牙签来剔牙，并用擦牙布让牙齿光可鉴人。在那个时代，因为误信吃甜食能让呼吸气味变甜，她因而吃进大量糖分。

在华丽的衣裳下，她穿着细致的亚麻布，以保护无法洗涤的服装不受汗水的侵蚀。而这些衣服则分为许多不同的部分，包括三角胸衣、短外衣、袖套、衬裙与环状领，再透过绑结或扣子固定在鲸骨束腹上，最后再穿上随着流行增大的鲸骨环——一种坚硬环状的裙状物。伊丽莎白女王从小就习惯穿这样的衣物，但她偶尔会要求宫廷制鲸骨环师约翰·贝特（John Bate）帮她稍微修改一下，因为她的衬布常碰到与三个世纪后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一样的问题。一五七九年西班牙大使门多萨曾表示，若伊丽莎白女王不将鲸骨环移到一边，让他可以“走近她身边，以免听不到声音”，两人就几乎无法好好沟通。但伊丽莎白女王的仪容看起来一点也不可笑：约翰·海华德爵士则形容，女王“带着莫大的尊荣，一举手一投足间都充满贵气”。

伊丽莎白女王的每一件衣服几乎都极尽可能地精致。家庭女教师凯瑟琳·艾希莉曾送她一条手帕，周围以金银丝线收边。在她初上任之时，伊丽莎白女王收到来自意大利的一双丝质袜作为贺礼，让她矢言此后再也不穿别的材质的袜子了。在位期间，她多数的袜子都由亨

利·赫梅（Henry Herne）制作，或由寝宫侍女缝制而成。目前在哈德菲尔宅邸中，展出一双据称是伊丽莎白一世穿过的丝质袜、一顶草编的宽边帽及长指手套。伊丽莎白女王的制鞋工匠盖瑞·强斯顿，每周都会制作一双新鞋给女王穿。冬天时，伊丽莎白女王外出都会穿斗篷或披风，一六〇〇年时统计，她已有一百九十八件斗篷。

根据约翰·海华德爵士的观察，伊丽莎白女王的外貌“修长挺立；她的头发偏向淡金色，前额大而白皙，眼睛水灵有活力，但却有近视的嫌疑，她的山根较平，鼻子突起；脸部比例长，但加上些许的威严与谦逊后，仍拥有傲人的美丽”。与那个年代多数的女性一样，伊丽莎白女王也会使用化妆品让外表更有魅力，用蛋白、蛋壳粉、明矾、硼砂、罂粟籽与水做的乳液，让皮肤更白皙，并用墨角兰或玫瑰水散发出芬芳气味。她会用碱液洗头，这是一种木头烧成灰烬后与水混合的液体，她会将这种液体与镜子一起放在梳妆台上的罐子里，并将梳子放在珠宝盒中。

着装完毕后，她会戴上大量的珠宝，让站在烛光之下的她闪闪发光，让身边的人都感到光彩夺目。一五九七年，法国大使发现她戴着“无数的珠宝，除了头上，还有她纤细的颈项、手臂与食指上，她的脖子与手腕上都戴着大量的珍珠，两手各戴一个手环，看来都价值不菲”。四年后，让意大利大使感到惊奇的是，伊丽莎白女王“穿着全白的衣裳，装饰着许多珍珠、刺绣与钻石，她能撑得住这些珠宝，让我感到十分讶异”。一名德国访客则表示，伊丽莎白女王穿戴的任何衣物“都镶着大大的钻石与其他珍贵宝石，而在她那裸露的胸前，则戴着一条长长的金银丝细装饰的披巾，上面还夹着一只看起来活生生、非常逼真的丑陋蜘蛛”。

伊丽莎白女王的珠宝收藏数量庞大，可以说是欧洲最棒的，而且她的收藏声名远播，就连罗马教皇都曾对它们痴心妄想。一五八七

年，她已经拥有六百二十八件收藏品了。许多都是继承自父母的收藏：她拥有安·波林那著名的姓名字母坠饰，还有亨利八世留下的一个周围镶满红宝石的大蓝宝石，后来经过德国珠宝技师史匹尔曼大师（Master Spilman）重新镶嵌。多数的珠宝都是他人相赠的礼物，新年期间，或女王前往臣子家中拜访时，臣子们都会送女王价值不菲的小装饰物，或是价值连城的礼物，而此举后来也成了英国传统。克里斯多福·海登爵士曾送她许多套礼物，甚至有一套多达七件的珠宝。伊丽莎白女王拥有的部分珠宝，在西班牙宝藏船惨遭劫掠时遭盗取。但她还有更多的珠宝收藏，可能都来自身为金匠与微图画家的尼可拉斯·希利亚德所作。许多珠宝上面甚至铭刻着女王的一个座右铭——Semper Eaden（意指永恒不变）。

女王也拥有许多珠宝表，且都为十字架、花朵或坠饰的形状，还有许多镶着宝石的手镯、腰带、领饰、坠饰、耳环、臂镯、纽扣、香盒与扣链等。她拥有许多以珠宝镶饰把柄的鸵鸟羽毛扇，以及许多新奇的珠宝饰品，有些上面有象征意义的文字，有些则是暗藏巧妙的双关语，多数则刻着她的名字。她最爱的珠宝样式是船或动物的形状，她拥有的珍珠都象征着处女般的纯洁，全都是最上等的，甚至包括曾为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所有的长珍珠串。她拥有的部分珍珠，现在镶嵌在大英帝国王冠上；其他的都遗失了。伊丽莎白女王的一个戒指上，绘有她与安·波林的画像，现在则收藏在切克斯。伊丽莎白女王也常将珠宝当作礼物送给身边的参事们——托马斯·赫内基爵士（Sir Thomas Heneage）就得到精美的舰队宝石，这是一个奖章型的画像盒，由尼可拉斯·希利亚德设计，现在则存放在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至于教子的儿子则得到有她侧影的玛瑙。女王的衣柜清册中，显示有许多件珠宝在出巡过程或其他地方“不小心遗失了”；这些多数都是黄金或钻石纽扣，或怪物外形的胸针。一五八四年，她就曾在温斯特遗忘一件珠宝。令人感伤的是，在她死后这些珠宝四

散，只剩不到几件。“噢，这些珠宝！”一六二六年，一位英国国会议员嗟叹，“是伊丽莎白年代的骄傲与光荣！”

伊丽莎白女王拥有的较为夸张的服饰，主要都用在与国家相关的场合，包括宫廷庆典、女王现身、接待外国使者与描绘官方画像时。她的日常穿着则较为朴素——有一次她甚至“连续三天穿着同一件全黑的服装”，而每天早晨，她都喜欢穿着较宽松的衣服，周围装饰着羽毛。那些华美的服装与珠宝就是她的工作服，对外显示王权的象征，对于维持童贞女王的形象也非常重要。这是无人能及的高尚庄严，因此伊丽莎白女王的服装总是比他人还要更夸张。

当然，这样的行为也引发清教倾向人士的批评。一名主教便大胆地在宫廷的一次宣教中申斥女王浸淫在过分打扮自己的这种虚华中。之后，女王对他的冒失愤怒不已，向她的侍女们抱怨：“若主教大人再继续讨论此事，就送他上天堂吧，但他别想有人陪伴，留下他的衣钵吧！”

* * *

伊丽莎白一世的画像，一直是许多重量级著作喜欢讨论的话题。尽管在继位后的几年间，她的画像需求量非常大，但根据塞西尔所说，她“非常不愿意被画出真面目”，因此画像与她的相似度不大。最早期的画像，都只画出女王戴着法式兜帽的半脸；现在留存下来的模板并不多了。在华威城堡正式举行的加冕大典的画像上，她也露出全部的脸，现在则收藏在英国国家肖像艺廊。这幅画在油画木板上的肖像，经过年轮分析，大约出自一六〇〇年，而且可能是利瓦伊娜·提尔林克（Levina Teerlinc）遗失的原作的复制品，利瓦伊娜·提尔林克是一位法兰德斯艺术家，她在伊丽莎白女王继位初期的几年，为女王画了许多幅肖像。提尔林克最著名的作品，就是绘制了伊丽莎白

女王穿着加冕长袍的肖像，后于一六〇〇年左右由尼可拉斯·希利亚德重制。

到了一五六三年，伊丽莎白女王与塞西尔都开始担心，外界对她的形象有所误解：华德·莱礼爵士曾记载“一位学艺不精的画师所绘的伊丽莎白女王肖像，在她的命令下，被敲碎焚毁”。塞西尔提议制作相似度大的女王画像，让坊间的艺术家能复制得像一点，但伊丽莎白女王并不喜欢这个想法，因为她认为根本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的技术够好，能画出最佳范本。一直到将近十年后，汉斯·艾沃斯（Hans Eworth）入宫成为宫廷画家，他那充满寓意的画风，让女王凌驾于司婚姻女神朱诺，司智慧、工艺、发明的女神米娜瓦与美丽的维纳斯女神之上。一五六〇年代的其他画像稀少，一五六七年时，萨赛克斯伯爵向荷兰摄政王表示，这些画像与它们真正的主角“无可比拟”。

一五七二年时，一位不知名的画家，终于绘制出日后成为所有伊丽莎白女王画像复制品的基准作品，那就是知名的达恩里肖像画（Darnley Protrait）。也就是在此时，伊丽莎白女王发现，她的金匠尼可拉斯·希利亚德，也是个极富天分的肖像画家与微图画家；伊丽莎白女王的凤凰肖像画与鹈鹕肖像画，也都是他的绘画作品。伊丽莎白女王非常钦佩希利亚德的天分，并且正式称呼他为“女王的画匠”，甚至开心地花了数个小时，与他讨论“许多艺术范畴的问题”。至此，伊丽莎白女王已年届四十，对脸上的皱纹非常在意。在她的坚持之下，希利亚德必须负责绘制她的画像，而他则记得：“在一个美丽花园的露天小径中，附近一棵树也没有，也没有任何遮阴。”伊丽莎白女王告诉他，“展现一个人的模样，不需要任何阴影，但一定要在自然光下”，最后他绘制出的肖像，并不具有君主的高贵尊严，而是穿着耀眼的衣服美化过后的形象。

此后，女王对于自己外在形象的呈现便显得十分在意，对于打扮与权威的呈现重于画像的真实性。在趋近晚年的画像中，伊丽莎白女王的面部依然是光滑、无老化痕迹、无表情变化的模样。这无疑给予她的臣子一种安慰，在充满不安的世界中，让臣子们认为女王陛下丝毫没有改变，对这些人来说，一般人性的规范似乎毫无作用。

在一五八〇年代，对于伊丽莎白女王绘像的需求激增。创作丰富的尼可拉斯·希利亚德手绘了许多伊丽莎白女王的微型图像，臣子则最爱佩戴在身上，至于另一位宫廷画师乔治·高尔（George Gower），则绘制较大幅的画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无敌舰队肖像画，目前这幅画像还有许多不同版本。另一位受到女王宠信的画师则是约翰·贝慈（John Bettes）。这些画家绘制的肖像画，在刻意展现王权象征、服饰与地位之下，创造了一股特殊的英国服装画像风潮，而这股潮流一直维持到下一个世纪。

一五九二年，马库斯·加拉德（Marcus Gheeraerts）绘制的充满气势的迪奇里肖像画，是伊丽莎白女王大型的全身肖像留存至今的少数作品。画中的女王脚踏英国地图，而她脚下踩着的牛津郡的迪奇里公园，是她的支持者亨利·李爵士（Sir Henry Lee）的家乡，而这幅画像便是由他委托制作。这幅画中充满了象征的符码，其中还有很多未解，但却是伊丽莎白女王肖像画中的一个亮点。女王的脸部描绘得和其他肖像一样，这是绘制一个老妇人最谨慎的方法。

一直到伊丽莎白女王辞世前，小马库斯·加拉德（Marcus Gheeraerts the Younger）、威廉·席格（William Segar）与罗伯·比克（Robert Peake），一直维持着由希利亚德开启的传统风格。现在于多塞特郡舍伯尔尼城堡展出的一幅画中，画师比克将垂垂老矣的伊丽莎白女王描绘成一位年轻女子，坐在轿舆上，由臣子们推着前往布莱尔参加一场婚礼。在伊丽莎白女王死前六年，希利亚德依然为伊

伊丽莎白女王绘制肖像画。他绘制的画像，有二十几幅流传到后世：这些肖像画现在被统称为“青春的假面”。至于在哈德菲尔宅邸中出自无名氏之手的彩虹肖像画，则出现于一六〇〇年左右，画中同样也充满各式各样的符码，将伊丽莎白女王描绘为届适婚年龄的美丽太阳女神。

因此，目前世上只有少数画像，呈现出伊丽莎白一世真正的面容。一五七五年时，意大利籍宫廷画师费德里哥·朱卡洛（Federico Zuccaro）绘制了伊丽莎白女王与莱斯特伯爵的画像，令人失望的是，这幅画早已佚失；而他的初稿则透露出某种程度的真实性。一五九〇年代的奖章上，女王的面部绘像则呈现出松垮的下巴与脸颊，而且市面上流传着“让她气愤不已的”许多类似的绘像，因此一五九六年，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命令下，英国枢密院下令查封并销毁许多展现出她老态龙钟、孱弱不已与一脸病容的画像。英国王位继承问题悬而未决，政府不能冒险让臣民看见她年华老去的模样。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幅微型画，几乎可以确定是埃萨克·奥利佛（Isaac Oliver）活灵活现的作品，他试图描绘他所见到的伊丽莎白女王，但这幅画却始终未完成，现在则在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中展出。而那幅著名的忧郁的“伊丽莎白女王的年代与死亡”，则绘于她死后，几乎可以说是当今留存的作品中，最接近她真实样貌的一幅。伊丽莎白女王那满布皱纹的面容与小马库斯·加拉德的作品相距甚远。

总而言之，这个年代多数的伊丽莎白一世画像，其实都是经过修改的形象。历史上所有的画家都相当谄媚、愚忠，但在伊丽莎白女王年代，她的画像其实是刻意要展现出四十五年来完全不变的形象。只要比较维多利亚女王最初的照片与同一时期所谓的真实肖像画，就会知道肖像画与真实反映一切的相片差异有多大。而在伊丽莎白一世的年代，这样的差异，无疑发展到极致的境界。

14 鲜艳华丽、合乎礼仪又富丽堂皇的宫廷

将全欧洲最壮丽的宫殿作为布景，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大戏如火如荼地上演。多数的场景都位于泰晤士河沿岸，除了要有良好的排水系统外，这样一来女王便能轻易地靠着驳船移动。部分宫殿则通过女王专用的道路连接到伦敦，也就是所谓的英皇大道，包括切尔西、里奇蒙德与汉普顿宫，以及在泰晤士河南岸，从兰贝斯宫到格林尼治，再到艾尔萨之间的蜿蜒小路。

这些宫殿的数量并不少于女王的华服与女王生命中重要时刻的仪式，当然也是个人王权明显可见的象征。在这些宫殿中，有超过两千条亨利八世指定使用的绣帷，时至今日仅剩二十八条留在汉普顿宫中，还有更多是他的孩子所需，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绘画与艺术品收藏。

都铎王朝常四处出巡：一次迁徙的人数可能高达一千五百多人，因此卫生设备便是最重要的需求。约翰·哈林顿爵士便曾抱怨：“就算是在国内最优良、最高贵的宫殿中，尽管备有污水池、排水管、污水闸门，并让可怜的人们帮我们清扫、冲洗，但整个环境还是臭得让人厌恶不已！”伊丽莎白女王的马桶都有盖子，而侍女们则不断清理，但其他的仆人还必须服侍宫中的其他人，因此许多人喜欢到庭院中透透气或坐在墙边，也就不令人意外了。一直到一五九六年，约翰

- 哈林顿爵士才发明了马桶与厕所；一年内，伊丽莎白女王便在里奇蒙德宫装设了一个。

另一个问题在于地方上的粮食供应有限，宫廷移居当地，为当地人的饮食带来许多限制。经过一段时间，宫廷就得移居别的宫殿，清空打扫原本居住的地方，也恢复当地粮食的贮存量。因此，伊丽莎白女王也不得不时常在各宫殿之间迁徙。她与许多较重的行李，只要可行，都会靠着驳船移动，宫廷中的其他人与较轻的物品则靠着陆运前进。

尽管各处宫殿既辉煌又华丽，但在女王的命令下，各处宫殿都紧抓开支。若皇室主管会计的花费超出每年皇室可运用的四万英镑预算，就大难临头了。女王的各处宫殿修缮费用主要来自地税。除了温莎城堡之外，伊丽莎白女王花费极少的费用在重建与扩建宫殿上——这一点与她的父亲非常不同。经费主要用在维护皇室宫殿的外观；而臣子们的薪水，则从亨利八世时期至今未变。

除了皇室宫殿之外，伊丽莎白女王也继承了六十座城堡与五十座宅邸，多数都卖或租给了臣子们，例如伦敦的查特豪斯宅邸、杜伦宅邸与贝纳德城堡。除了皇室出巡时可用的宅邸外，她也任由部分皇室建筑逐渐毁坏。斯庄特的索美塞得宅邸则常作为外国宾客居住之用，但在伊丽莎白女王任内，也曾在此居住了十四回。高特的约翰所留下的萨伏伊城堡，则被改建为医院，克勒肯维尔的圣约翰修道院则被改建为节庆典礼官办公室。伊丽莎白女王的衣橱则放置在圣安德鲁丘的皇室衣橱中。她主要居住的宫殿都是“交通方便的建筑”，也就是泰晤士河谷沿岸的宫殿。

西敏宫，英国皇室在伦敦的住所之一，也是十一世纪以来英国政府运作的主要机关，于一五一二年不幸遭到焚毁，只留下部分高塔与烟囱。对面的怀特霍尔宫，是伊丽莎白女王最主要的居所，她在此居

住的时间比其他地方都长。怀特霍尔宫是一个庞大又不规则的建筑，占地二十三公顷，宫中有两千间房，尽管多数的房间都又小又窄，它却是欧洲最大的宫殿。它原名约克宫殿，这个宫殿原为约克大主教在伦敦的居所，后于一五二〇年代由沃斯红衣主教献给了亨利八世。亨利八世扩建了这座宫殿，将它变得尽善尽美。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年代，它最出名的就是充满中世纪风情而非文艺复兴风味的特殊装潢。其中充满许多古意，活灵活现的壁饰来自十三世纪，而在建造年代较近的枢密室中，有小霍尔班描绘都铎王朝的大型作品：亨利七世与亨利八世肖像，以及他们的妻子们画像。一位观察家曾表示：“国王就站在那里，展现出崇高的权威感，栩栩如生，让一旁的人为他的出现感到窘迫、自惭形秽。”而伊丽莎白一世就喜欢站在这些画像前接见宾客，以强调自己是大人物后裔的身份。

金碧辉煌的怀特霍尔宫中宽敞的谒见室有非常典型的规则可循：大厅随后是警卫厅，接着才能进入谒见室，最后才是由黑棍侍卫看守的枢密室，这群侍卫会进行筛选，只有女王钦准的人才能进入。女王几乎一整天都待在这里面；晚间她则透过玩纸牌游戏或与亲信聊天，轻松一下。在谒见室之后的则是女王的私人空间，也就是“内殿”，只有享有特权的人可以进入：内殿包括了供女王紧急撤退的密室、寝室与许多小型的密室。

穿着得宜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大厅、警卫厅与谒见室，也才能看到女王正式工作的一面，或是她来回穿梭在皇室礼拜堂的身影。当她不住在这些宫殿中时，宾客便得以在引导人员的陪伴下参观这些房间，甚至可以进入女王寝室，但仍有不少人抱怨：“所有的帷幕都被拆走了，白白的四面墙，其实也没什么好看。”当女王住在里面时，大厅尽管空间狭窄，仍会举办宴会、历史剧与戏剧演出，一五八一年时，伊丽莎白女王在布道堂隔壁新建了一座宴会厅，让臣子们能在露天空间下聆听布道。

伊丽莎白女王的寝室能遥望泰晤士河。一名德国宾客保罗·亨兹纳（Paul Hentzner），便于一五九八年发现女王的床“是由各种不同颜色的木头组成，被褥则由丝、天鹅绒、金、银与各种材质装饰”，主要的布料则是在印度染色的丝。此外还有放着丝质桌巾的餐桌，绑上坐垫的椅子，以及“两个制作精美的小橱柜”，用来收藏女王的墨宝。一个“用满满的珍珠装饰外表”的珠宝箱则装着女王的手环与耳环。隔壁则是一间有镀金天花板与“设备完善的厕所”的房间。亨兹纳大使也发现整个房间只有一个小窗户，又闷热又阴暗。女王的寝室则有一条秘密通道通往河岸的检查哨，伊丽莎白女王有时会在晚间来此登上她的驳船，沿着泰晤士河航行巡视或弹奏鲁特琴。

宫殿外则有一片果园与“一座最大、最高贵的花园”，园中有三十四座上了漆的巨柱，柱上则有传说中的怪物雕像，这些怪物浑身镀金，它们同时也有日晷的用途，以三十种不同的方式来辨识时间。女王非常注意花园的细节，并希望花园全年都是繁花盛开的景象，甚至到了冬天都还要充满丰富的色彩。当年怀特霍尔宫的骑士比武场，就位于现代的骑兵卫队阅兵场上，并且由一个回廊穿过霍班大门（延伸到伦敦市区的主要街道）再连接到宫殿中与皇室专用的顶层楼座，也可以再前往大礼堂旁的养兔场，这些地方都戒备森严。除此之外，宫中也有网球场与斗鸡场。

温莎城堡也是伊丽莎白女王最喜欢的居住地之一，但因为温莎城堡冬天难以留住温度，因此女王最喜欢将它作为夏宫。她在此建了一个石造露台，沿着上庭院北侧延伸经过女王寝室窗户的下方，女王总在傍晚时分在这露台上呼吸新鲜空气，或于每日清晨踏着轻松的步伐“暖身”。在露台下方则有美丽的花园，“有许多小径与迷宫”。一五八三年时，伊丽莎白女王又建造了长达九十多英尺的室内回廊，让她在天气潮湿时也能运动；这个回廊现在则变身成为皇家图书馆，而伊丽莎白女王当时使用的壁炉依然留存至今，但都铎时代流行的低屋

顶则于一八三二年进行置换。传闻中，伊丽莎白一世的鬼魂依然出没于此。她建造的其他设施——包括一座私人礼拜堂、一座桥、一个户外宴会亭——全都已经消失。一五六七年，她曾计划要在圣乔治礼拜堂中她父亲的墓穴上立一个价值不菲的墓碑，但最后却不了了之。

在温莎大公园中，伊丽莎白女王可以恣意享受打猎的乐趣，穿上各种华丽的服饰，远离多数的臣子。伊丽莎白女王向来不是个安静的女子，从不畏惧“亲手杀死”雄鹿，她善于使用十字弓，看见灰色猎犬撕扯着猎物，她也不退缩。她对动物的痛苦挣扎无动于衷：她曾放走一只雄鹿，但下令割下雄鹿的双耳作为战利品。晚年时期，伊丽莎白女王与侍女们，偶尔会在城堡东北边的特制看台上射击猎物，但只要体力允许，伊丽莎白女王还是喜欢与男性一起享受骑马驰骋的感觉。

伊丽莎白女王在温莎古堡的房间极其奢华。睡在一张装饰得十分华美的大床上，上面还垂着“各种奇妙的绣帷”，而她枕在头下的垫子“则是由女王陛下亲手缝制的珍贵软垫”。这里有流动水源的厕所，四面墙与天花板都是镜子。大厅则是戏剧、宴会与皇室礼拜堂儿童合唱团举办音乐会时最佳的布景。一五九八年参观了温莎古堡的保罗·亨兹纳，看到亨利八世与安·波林那张镶着金银的御用床架、法国特制的绣帷、独角兽角——其实可能是独角鲸的长牙等奇珍异宝装饰的房间。

格林尼治宫是伊丽莎白女王出生的地方，宫殿虽由三个庭院所环绕，然而它却比大多数其他的宫殿都还来得小；但其奢豪的程度不亚于其他宫殿与城堡，因此格林尼治宫主要用于国家的重要场合与接见外宾。外国使者会搭着驳船来此，在河岸边的检查哨，就会受到热烈欢迎。一五五九年七月，伊丽莎白女王即位后，首度以女王身份前往格林尼治宫时，就在此观赏海军于泰晤士河上的演习，同时在公园进

行阅兵。当女王的船队出发去海外探险时，她也会在此向船队挥手道别。许多上面彩绘着都铎家徽的长凳“就摆放在花园中，让女王随时能歇歇腿”。宫殿里的多数的房间都能看见河景，谒见室中甚至有一面高达八英尺的玻璃窗。礼拜堂中的壁挂是金色的织花台布，还有一个镀金的壁龛让女王行圣餐礼之用。

经过一五六二年那场差点夺去性命的天花后，伊丽莎白女王有一段时间，远离了她父亲那位于萨里以红砖砌成的汉普顿宫，但在复活节与圣灵降临节，甚至偶尔在圣诞节时，她还是会“相当开心地使用这个空间”，同时也会在汉普顿宫接见使节与他国贵族，并大肆铺张地献上娱乐节目，让他们在亨利八世的大厅那哥特式木拱脚屋顶下，观赏戏剧演出。在那个年代，与汉普顿宫同样声名远播的，就是克洛斯特格林宫的御座厅，被誉为天堂之厅（后于十七世纪与都铎王朝其他建筑一同拆毁），当女王不在的时候，“穿戴整齐的一般大众”就可以花钱进入参观。亨兹纳大使便曾记载说，“宫里的波斯地毯以真金、珍珠与珍贵宝石装饰，国王的宝座就更不用说了”，宝座上的软垫是咖啡色天鹅绒，镶上三颗珍贵的钻石、红宝石与蓝宝石。一张长达二十八英尺的桌子，上面覆盖着边缘镶着珍珠的天鹅绒桌巾，另一张桌子则用巴西木制成，上面嵌满了银饰。桌上放了一面镀金的镜子与黑檀木制的国际跳棋棋盘、一个象牙材质的西洋棋盘，以及七管象牙与金特制的长笛，吹奏长笛时能模仿各种动物的声音。除此之外还有西洋双陆棋盘及纯银制的骰子，以及各式各样令人惊讶不已的乐器。宾客也可以前往大厅北面参观兽角展示厅，皇室打猎大会过后，鹿角等战利品都存放在这里。

汉普顿宫，可以说是女王所有的宫殿中，装饰得最精致的一处。“所有的墙面都因金银装饰而显得闪闪发光，”亨兹纳大使曾在报告中这么写道，“许多大型的房间，都因为有完美的壁画、珍珠贝写字台与各种乐器，而显得光彩夺目，而女王陛下显然也十分欣赏这些装

饰。”天花板有浮凸雕工、交错的横梁与金质垂饰，这些宫殿的木梁，多被镶嵌或上漆变成红色、黄色、蓝色与绿色，甚至还有立体画壁饰。尽管宫中的装饰如此华丽，伊丽莎白女王仍认为汉普顿宫是个令人不安、不健康的地方，因此汉普顿宫主要作为展示厅。

伊丽莎白女王最喜欢的是汉普顿宫的花园，并下令将由新大陆带来的烟草与马铃薯种植在园里。一五七〇年，她又扩建了亨利八世的马厩，多了两个谷仓与一座马车房。

从汉普顿宫往河的上游前进，在韦布里奇附近有座小而精美的欧特兰宫，是个“令人精神一振的打猎场”，而一五四〇年，亨利八世就在这里与凯瑟琳·霍华举行婚礼，伊丽莎白女王一生至少有二十次因优良的打猎环境而走访欧特兰宫，而园中的大批乌鸦则让女王大感兴奋。但欧特兰宫至今已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许多民宅。

里奇蒙德宫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祖父亨利七世最爱的居所，这座宫殿建得高耸入云，但一直到伊丽莎白女王晚年时，她才开始懂得欣赏里奇蒙德宫的迷人之处，每年夏天在花园与果园最美丽的时候皆来此居住。里奇蒙德宫简直就像童话故事中的城堡，有许多爬满爬山虎与球根植物的塔楼，塔顶则有金银两色的风向仪；宫中的天花板为扇形穹顶，还有许多大型凸肚窗，最大的大厅长宽为一百乘以四十英尺，墙上则挂着描绘英王们英勇形象的肖像，宫中还有连串的回廊与凉廊穿过美丽的花园。建筑本身就充满美感，再加上各式各样的花草与两百多棵树，果园中则有不少蜜桃、苹果、梨子与布拉斯李子。

里奇蒙德宫一共有十八个厨房，维持宫中的食物供应。另一个吸引伊丽莎白女王的主要因素，就是祖父发明的铅锤测量系统，能汲取天然泉水到宫里。而里奇蒙德宫相当防风，伊丽莎白女王因而称里奇蒙德宫为“我老年时最温暖的巢穴”。

另一个相当精美的夏宫，“是伊丽莎白女王最喜欢的一座宫殿”，是萨里的无双宫，这是英王亨利八世于一五三〇年间，以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仿效伟大的法国罗亚尔皇宫兴建的雄伟建筑。玛丽一世将它租赁给阿伦德尔伯爵后，尽管伊丽莎白女王是无双宫的常客，但直到一五九二年阿伦德尔伯爵逝世为止仍一直无法如愿取回它的使用权。在伊丽莎白女王造访无双宫时，天天都会到大公园里骑马打猎。当她在无双宫接见外宾时，房里都摆满了从附近的汉普顿宫中搬来的家具与挂饰。无双宫是一个非常小的宫殿，宫中并没有大厅，当女王移驾住在无双宫中时，甚至必须架设大量帐篷，才能容纳所有的宾客。尽管如此，皇室御用的房间依然十分华丽，宫中有一个很棒的图书馆，在宫内的天井中，有一个气势恢宏的白色大理石喷泉与一座钟塔。无双宫最著名的就是它那新奇的八角形高塔，墙面刷得粉白，与金色石膏的浮雕图案交错，在这如诗如画的地方，有许多经典的雕像，还可以发现最著名的一座塑像——树林里的月之女神。

伦敦的圣詹姆士宫则一度是玛丽女王的最爱，她甚至选在圣詹姆士宫中咽下最后一口气，但这里却不太受伊丽莎白女王欢迎，但每当怀特霍尔宫在进行清扫时，她就会把这里当作伦敦的政府总部。除了大门上还有伊丽莎白女王的盾形纹章外，这里的都铎王室礼拜堂仅留下些许痕迹，此外还有代表威尔士王子凯威莱德（the Welsh Prince Cadwaladr）的狮子雕像与红龙，都铎王朝采纳了这个标志。圣詹姆士宫有专属的公园与人工池塘萝萨蒙湖。

伊丽莎白女王非常厌恶伦敦塔。因为她的母亲和许多与她亲近的人，都在伦敦塔中悲惨地死去，而她本身也有来自一五五四年被囚禁其中的恐怖记忆。她也十分憎恶伦敦塔动物园中的噪声与臭味。因此除了加冕典礼前不得不前往伦敦塔之外，她再也没有去过伦敦塔中属于她的房间也就没什么稀奇的了。无论如何，在各宫殿中，属于女王的房间永远都是完美的状态，一五九八年，亨兹纳大使与另一位访客

汤玛士·皮列特（Thomas Platter）透露，御用寝室都挂满以银饰与金银线缝制而成的绣帷，房中还有一张顶篷上以珍珠精致装饰的大床。同时房中还展示了一张椅子，这是为了年老垂矣的亨利八世特制的椅子，上面附有脚凳，还有伊丽莎白女王的不少华服及许多珍贵物品，都依然放置在这里。女王召开国会时所穿的袍子也放在伦敦塔中，每个月都要定时晾一下。她的服装都会定期洒上香粉去除霉味——光是一五八四年一整年内，女王的衣服就用了二十四磅重的香粉。

当王室移居怀特霍尔宫时，皇家珠宝就放置在伦敦塔中展示，但伊丽莎白年代的珠宝，不是被重新熔解，就是在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手下遗失，多数都未能留存至今。

充满古典中世纪风味的伍德斯托克宫，则是另一个伊丽莎白女王极力避免前往的宅邸，因为在玛丽女王执政的年代，她曾在此遭到软禁一年。只有偶尔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她才会在出巡时来到伍德斯托克宫过夜。

伊丽莎白女王的狩猎小屋依然保存在艾平森林中；曾有十分生动的传说指出，在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伊丽莎白女王骑着一匹驯马，踏上这里的阶梯。这个狩猎小屋其实是亨利八世所建，作为打猎时瞭望的看台。伊丽莎白女王也曾以逐渐腐朽的埃尔特姆宫作为狩猎小屋。

即位后的伊丽莎白女王，对于她在受限的童年曾住过的地方敬而远之。哈德菲尔宅邸的橡树，就种在她听闻自己接下王位的房间窗外，茂密地开枝散叶一直到十九世纪，现在宫殿中的商店，依然可见这棵橡树的遗迹。伊丽莎白女王出巡时会住在哈德菲尔宅邸，但在她身故后，多数在欧德宫的住所都遭到毁弃，只有侧厅留存至今，但也有了大幅度的改变。亚诗里奇宫、纽荷尔宫、亨斯顿宅邸当时都已出

租，而纽荷尔宫、亨斯顿宅邸则是租给了萨赛克斯伯爵。在继位后的首次出巡中，伊丽莎白女王曾到访恩菲尔德宫，但又很快地离开。但恩菲尔德宫中的一座火炉被保存了下来，目前仍在绅士之路的一幢民宅中，上头还有“E. R.”的花押字样及拉丁铭文：“人唯一的防备就是服侍神；其他事物都是虚幻。”伊丽莎白女王较常为恩菲尔德宫旁的艾尔辛格宫增添光彩，因此艾尔辛格宫保存良好；窗上依然挂着遮蔽用的帆布，女王寝宫中也安上有纹章的彩绘玻璃，同时保持火炉燃烧以避免湿气。一五九六年，伊丽莎白女王下令在雄鹿公园中“大设陷阱，晚餐后开始猎雄鹿”。但恩菲尔德的两处宫殿都未留下太多遗迹；亚诗里奇宫原址现在则为雅克比福地四十厅博物馆。

事实上，伊丽莎白女王居住过的宫殿，几乎没有几座能幸存至今。怀特霍尔宫于一六九八年被大火付之一炬。其他的宫殿在奥利弗·克伦威尔起义的年代也都没能留下，至于挺过那场苦难的几座宫殿则太过巨大，对于乔治王朝时期又嫌过时。里奇蒙德宫则在英联邦时期被摧毁殆尽，现在只剩下外面的门房。格林尼治宫、伦敦塔中的御用房间与无双宫，也都在十七世纪晚期惨遭破坏。残破不堪的伍德斯托克宫被拆毁，另建布伦海姆宫，而索美塞得宅邸则原地重建。纽荷尔宫的一处侧厅幸运地保存下来，但温莎古堡中的皇室专用房间则于十九世纪初大规模改建。时至今日，历史并未留下太多证据供后人瞻仰都铎王朝宫廷的绚丽。

* * *

宫廷并不只是政府运作重地，也是伊丽莎白女王展现庄严高贵姿态的舞台。宫殿也是英国文化的中心、艺术品的最佳艺廊，让外国使节眼睛一亮。熟谙财富的能见度对政治的重要性，因此伊丽莎白女王对宫廷的一切出手阔绰。宫廷在绘画、音乐、服饰与其他装饰艺术上

的选择，自然而然地反映出女王的品位，也为许多郡主乡间宅邸的摆设创造新的趋势。

伊丽莎白女王与整个宫廷每年都有既定不变的行程。秋天，是新的法律年度，国会也正式开议，宫廷便会迁回怀特霍尔宫，伦敦市长与市府参事会穿上最好的毛皮制衣服，前往伦敦的城门迎接女王，一起穿越街道，沉浸在臣民的欢呼与喝彩中。十一月十七日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继位日，而她通常会在怀特霍尔宫或汉普顿宫度过圣诞节，接下来十二日的狂欢，便在第十二夜的主显节达到高潮，宫廷人士开始交换礼物，女王则在皇家礼拜堂接受臣子馈赠黄金、乳香与没药等物。至于圣诞节当天，伊丽莎白女王通常在祷告中度过。男性臣子们通常会待在宫中，等待狂欢活动展开，鲜少有人胆敢“冒着触怒女王的危险”偷溜出宫，回去陪家人。宫廷人士最主要的消遣娱乐，就是跳舞与普利麦罗之类的纸牌戏，就连平日小心谨慎的伊丽莎白女王，都可能小赌一把试试身手。还好她的牌运都相当不错，就连一向不喜欢她的作家本·琼森都曾表示——但也可能是一种恶意的表现——她一定是靠作弊才能如此幸运。当然也有戏剧演出——圣诞佳节，宫廷中最多可上演十一出戏剧，而忏悔节则有更多戏剧表演。

女王回到伦敦后，便常出现在大众面前，有时前往贵族家中用膳，参与婚礼，看人斗熊，有时则观赏军演或到河畔参加游乐会。她的专用驳船都固定停靠在泰晤士河畔萨里的派瑞斯花园。德国大使亨兹纳曾形容“这艘船有很棒的两个船舱，用玻璃窗户、挂画与镀金装饰得美轮美奂”。女王专属的船舱用金银两色软垫与缀有花瓣的深红色天鹅绒地毯，布置得贵气逼人。驳船通常由二十位划手操作，以轻快的速度前进。

新年伊始，伊丽莎白女王便会移驾欧特兰、格林尼治、无双宫或里奇蒙德宫，但到了春日时节，为了濯足节与复活节，还是会回到怀

特霍尔宫。四月份，女王一行人则前往温莎，在圣乔治日参加嘉德勋章授勋仪式。到了夏季，伊丽莎白女王与英国宫廷便会出巡，最后在欧特兰、汉普顿宫、温莎古堡或无双宫度过初秋，最后才返回怀特霍尔宫。

而伊丽莎白女王的日常行程则富于变化。她表示自己“并不是早起的女子”，除非完整地梳妆打扮后，否则绝不会出现在别人面前，但她喜欢在早餐前，在她的私人花园中快走一圈。她很少衣着随便，但在一五七八年，士鲁斯柏立侯爵之子撞见她坐在窗台上，偷听他人的八卦话题：“我看着她，眼睛睁得斗大；她表现出非常羞愧的样子，因为她还没准备好，甚至仍穿着睡衣。因此当天晚餐后，她准备要去散步时，用手指轻弹我的额头，并转头向宫务大臣说我早上看到她衣衫不整的样子，并表示自己感到羞愧不已。”

另一次，在盛装打扮后，伊丽莎白女王将头探出窗台，发现艾德华·戴尔爵士（Sir Edward Dyer）因无法求得宫中的职务而忧郁地待在花园中。伊丽莎白女王便以意大利文问他：“你的脑袋空空，还能想些什么呢？”

“想着一个女人的承诺。”他意有所指地答道。

“愤怒能让愚蠢的男人也机智，但愤怒只会让人更贫穷。”伊丽莎白女王嘲讽地说，随即在莽撞的戴尔爵士有机会开口前，便抽身远离了窗台。

因为她常熬夜，于夜间工作，因此伊丽莎白女王通常起得十分晚。侍女会端上早餐——白面包、肉块浓汤、麦芽酒、啤酒或红酒——来到她的寝室，女王接着便一边工作一边玩耍，直到用餐时间，约为十一点，“伴随着音乐与歌唱，跳个六七支活泼的双人舞，是她清晨的固定活动之一。女王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投入自己的爱好之

中，接着才专心于繁杂的内政大事、阅读信件、要求答复，思考哪些议题应召开枢密院会，并与各级大臣商讨事务。当她感到厌倦时，便会在没有仆人的陪伴下，召集几位有学识之人，在花园的树荫下或舒适的长廊中散散步，接着搭上马车，在众人的面前，前往附近的果园与田野走走，有时也会去打猎或放鹰行猎；这大概就是女王的一天，但她还是会花一些时间阅读并钻研学问。”经过一段时间于里奇蒙德宫对女王的观察后，一名宫廷人士埃德蒙·波亨（Edmund Bohun）透露。哈林顿爵士则记得：“伊丽莎白女王习惯每天早上以阅读来纾解不平静的心绪。当心里的平静消失殆尽时，她总是遵照塞涅卡纳（Seneca）的名言，益处多多。”

午后，伊丽莎白女王有小寐片刻的习惯；她也时常在其他时间小睡一下。晚餐时间是下午五点，接着就是观看余兴节目，一直到晚上九点，接着到谒见室中进行晚安仪式，接着食品室会提供一些消夜小点。接着领宾员会宣布：“夜间安寝！”英王更衣随从会清空谒见室，守夜人开始在宫殿周围巡逻。此刻，臣子们应该自动退下，但多数臣子都不会这么做。

女王赞助的许多音乐家与画家，都有得到嘉奖表扬的机会。伊丽莎白女王非常喜欢露天历史剧、假面剧与戏剧演出，许多民间剧作，包括威廉·莎士比亚与本·琼森的作品，都曾在宫里演出过，每一出戏剧演出的成本约为四百英镑。根据历史记载，在一五九七年，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之后，伊丽莎白女王便对吹牛骑士一角感到十分着迷，甚至要求莎士比亚写一出有关吹牛骑士的爱情故事。最后写出的作品，就是《温莎的风流娘们儿》，据传这是大文豪莎士比亚在两星期内仓促完成的作品，却让女王欣赏不已。另一出剧本《第十二夜》也是为了要一六〇一年在宫中演出而撰写的作品。

伊丽莎白女王十分热爱剧场，同时在清教徒的运作之下，积极努力保护剧场不受迫害。一五八三年，伊丽莎白成立了她专属的女王剧团，其中她最喜欢的一位演员，就是喜剧演员理查德·塔莱登（Richard Tarleton），他随便一个滑稽的动作，就能逗得女王笑到流泪。在一次表演中，伊丽莎白女王“得先命令这个小丑退场，以免她笑得喘不过气来”。

伊丽莎白女王也喜欢露天历史剧，有时甚至在谒见室中也会参与演出，不过她每次都演自己，且若要说服她加入跳舞的行列也并不困难，她总是毫不犹豫地加入。

每到了娱乐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总是相当大手笔：所有的仪式与宴会都十分铺张，以整齐有秩序又庄重的仪式，让宾客们印象十分深刻。一六〇一年，一名意大利特使便表示，再也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看到哪国皇室能比英国更井然有序”，且总是“鲜艳华丽、合乎礼仪又富丽堂皇”。

伊丽莎白女王是能见度非常高的统治者。每个星期天，她总是一贯地从皇家礼拜堂走向谒见室，一路上有许多人争睹她的风采，当女王迈着“高贵的”步伐经过时，人人都忍不住屈膝行礼；她常常停下脚步与部分人士交谈。舍伯里的赫伯特勋爵（Lord Herbert of Cherbury）依然记得，当年身为宫中年轻小伙子的自己，一次参与了这样的场合：“女王陛下一看到我就停下脚步，口吐她常用的惊叹之词：‘该死的！’她惊呼道：‘这是谁呀？’在场的每个人都看着我，但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直到女王（士绅）卫队队长詹姆士·克洛夫特爵士（Sir James Croft）发现女王停下脚步，于是掉过头来告诉她我的身份，说我娶了威廉·赫伯特爵士（Sir William Herbert）的女儿。女王陛下因此用充满兴味的眼神看着我，又惊叹地咒了一句，

表示：‘这么早婚还真可惜了！’随即将手递给我让我行了两次吻手礼，两次她都轻轻地拍了我的脸颊。”

另一名德国访客利奥波德·冯·维德（Leopold von Wedel），于一五八四年目睹了女王陛下的星期日游行，并详细地描述“伊丽莎白女王如何展现自己优雅的一面，以谦逊的风采接下无论是富者或贫者的请愿书。当她经过身边时，许多人都不禁跪下，她总是会说：‘我由衷地感谢你。’接着是八响号角声，暗示晚餐时间的到来”。

维德也发现伊丽莎白女王那平易近人的态度。“她以非常友善温和的态度与人谈天、说着俏皮话，甚至用手指着皇家卫队队长华德·莱礼爵士的脸，说他的脸弄脏了。她甚至主动要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干净，但莱礼爵士抢先了一步。”伊丽莎白女王也喜欢在回廊中，一边与臣子聊天，一边懒洋洋地斜倚在地上的软垫上。但与此同时，她也有极度威严的一面。汤玛士·皮列特就曾记录下这一刻，伊丽莎白女王与枢密院参事及随从们，一同走出谒见室，从窗户望向隔壁的回廊，注视着庭院中的人们，“每个人都不禁跪下，女王陛下则说：‘愿神祝福我的子民。’所有人都不住地哭泣着：‘天佑女王！’这些人会一直保持着跪姿，一直到女王陛下做出起身的手势，他们才会毕恭毕敬地起身。”

一五九八年时，亨兹纳大使与许多其他英国民众，获准进入参观女王晚餐精致的准备流程：在号角与铜鼓声中，卫士护送仆人将桌巾、盐罐与食物捧进谒见室，最前面则有传令官手持仪仗引导。所有的人员在进出谒见室时，都必须对着顶篷底下空荡荡的王位庄严地鞠躬三次。当侍女们负责铺设餐桌时，男仆们必须在一旁等待，一边摆上桌巾与食物。接着，穿着丝质白衣的首席女侍，与另一名手持试餐叉的女随员步入谒见室；后者会在餐桌与空荡荡的位子前优雅地跪拜三次，接着恭敬地走近餐桌，以“仿如女王亲临现场般的敬畏态度”

用面包与盐擦拭餐盘。接着她会让所有的卫士“试吃”——尝遍每一盘食物，确保食物没有被下毒的疑虑，接下来更多首席女侍会进入谒见室，“以特别严肃的态度，将餐桌上的肉类抬起，捧进女王所在的内宫，穿过更多的私人房间，女王选择了她要的菜色后，其他的就分给宫中侍女们”。

伊丽莎白女王通常独自一人于寝室内用膳，她也有专门为她准备食物的专属厨房。只有某些特殊的时候，她才会来到谒见室，在众人面前用膳，大众则得以进入回廊中一睹女王风采。一五八四年圣诞节，维德大使享有这个殊荣，得以目睹女王用膳的模样，他发现女王用膳时，有年轻男子在旁伺候，他们必须跪着递上肉与饮料，在女王进餐的同时也必须一直跪着。威廉·霍华勋爵、赫特福德伯爵与克里斯多福·海登爵士则站在她身后。她以非常平易近人的态度与他们交谈，但女王与他们交谈时，他们都一直跪着，一直保持这样的姿势，直到女王示意他们起身。在女王用餐的同时，皇家乐团持续“演奏悦耳动听的音乐”。会有四名仆人拿着银碗与毛巾上前，让女王洗手。

虽然女王每一餐的菜色选择从不低于二十样，但她通常吃得不多，较喜欢鸡肉与鹿肉等轻食，年龄渐长后，因为咀嚼困难，她开始会要求要浓汤或炖菜等食物。伊尔·施凡诺亚（Il Schifanoya）曾宣称，虽然女王的餐点中“有大块美味的连骨肉，她依然要求要有如意大利风格的优雅与洁净”。

伊丽莎白女王最爱的美食是浓郁的蛋糕、糖果、水果馅饼与油炸甜面包，结果导致她一口烂牙。她宣称自己一周吃两次鱼，也就是周五与周四（在她统治的年代，这两天被称为鱼大餐日，以促进渔业发展）；但事实上，因为这样每年会额外耗费六百四十六英镑的巨资，因此这两天的餐点都偷偷换成其他肉类，而且她与多数的臣子不同，她总是遵行各个斋戒日。

伊丽莎白女王爱吃的白面包，原料是黑斯登小麦，它是远近驰名的优良麦种。女王也喝淡啤酒，但她会避开较浓的麦酒。约翰·克莱普汉（John Clapham）曾写道：“女王的饮食非常节制。她喝的啤酒中会加三分之一的水。她从未遵照定时用餐的准则，除非饿了否则不吃。”她将自己强健的体魄归功于“从不执著于饮食与睡眠定时定量，而是倾听身体的声音”。她也从不“以食为乐，贪图味觉享受”。

臣子们则在大厅用餐，宫廷中主要的职员们，会分散坐在各公务人员的桌次。女王寝宫的侍女们为身上的鲸骨环所累，椅子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的侍女，因此她们只好“蹲在地上匆促地用餐完毕”，大厅的地板上撒满了香草与青草，保持空气清新，遮掩脏污。

贵族与骑士皆有权带仆人进入宫中，因此宫廷厨房每日皆须准备上百人的免费餐点，依据每人阶级不同都有不同的菜单。宫中总是会剩下许多厨余，负责供应伙食的单位，也必须控制宫廷的支出，因此无力处理厨余问题。宫廷管理与组织相当没有效率：若女王夜半想要来点点心，这道命令会经过一连串的官员，导致最后送达时，菜都已经冷了，女王因而对食物多所抱怨。在温莎古堡中，所有的设备都相当古老，女王的膳食都在派斯克大街的公共厨房烹煮，再由仆人扛着穿梭半英里回到古堡中。到离世前，伊丽莎白女王终于受不了如此差劲的管理，因此“以十分尖酸刻薄的语气宣布自己要清理宫廷门户”，但在她的改革计划付诸实行之前“女王陛下便已蒙主宠召”了。

外国使节与宾客，常对于皇家礼拜堂合唱团的表现赞叹不已——由三十二位成年男性与十二位男童组成的合唱团——合唱的乐音似乎超越了平凡的人类。一名丹麦使者曾表示，格林尼治的神圣仪式，实

在是“唱得太悦耳了，就算是有重听的人也会觉得动听不已”，另一名法国特使则认为：“我曾到过法国、意大利与西班牙，却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乐音。这个音乐会的绝美与悦耳，言语难以形容。”

伊丽莎白女王非常喜欢有音韵变化的教堂音乐，因而不顾清教徒试图将此音乐逐出教堂门的要求，也因此保存了一项流传至今的传统，在教堂中哼唱圣歌与赞美诗。女王也在宫廷中庇护了几位天主教歌手与乐手，其中一位便是威廉·拜尔德（William Byrd），保他不受被迫害的命运，甚至让拜尔德能以拉丁文谱曲。可想而知，尽管这件事并不影响他人权利，女王此举却让清教徒抱怨连连。每当谈起了音乐，伊丽莎白女王总愿意让步。但有一次她曾抱怨，著名的管风琴家克里斯多福·泰伊（Christopher Tye）弹奏时音准有问题，“他却托人告诉女王，是女王的耳朵有问题”。

伊丽莎白女王也会在伦敦皇家交易所举办免费音乐聆赏，让穷人也能分享她对音乐的热爱。她自己也在宫中培养了三十二位管弦乐手。

* * *

女王身边的维安滴水不漏。理论上，她身边会有十二位荣誉警卫官戒备，但事实上，贴身保护女王的，是亨利七世时期设立的国民警卫队侍卫，并固定由亨利八世创立的士绅卫队支援。士绅卫队队长包括克里斯多福·海登爵士与华德·莱礼爵士，他们最著名的就是修长的身材与俊美的面孔。尽管身边有大队人马保护，伊丽莎白女王的参事们依然担心，她的维安工作并不够严密，有人可能会突破重围威胁女王性命，毕竟在女王的任期内，的确发生过几次这样的危险。塞西尔对毒害的忧虑大过于暴力胁迫，因此他起草一份备忘录，提议“对女王的衣着与饮食保持相当程度的警戒”，并提醒女王不要乱碰可疑的香水、手套与食物等礼品。但伊丽莎白女王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抱

持着轻松的态度，甚至喜欢冒点险，对人民的爱戴信心满满——也让忧心不已的大臣们十分不高兴。

英国宫廷十分庞大，每周都要花上数百英镑才能维持运作，因此伊丽莎白女王身边的侍从，比几位先王都来得更少；她的侍女们也是如此，寝宫中只有几位士绅、十位马夫，晚安仪式后也只有一位守夜人防守谒见室。伊丽莎白女王雇用了弄臣格林家族（the Greens）、鞑靼人伊波丽塔（Ippolita），也就是“我们亲爱的女侏儒”、意大利籍弄臣托玛席娜（Thomasina），以及意大利籍丑角摩纳可

（Monarcho），莎士比亚曾在剧作《爱的徒劳》中提及他。寝宫中还有几位男仆，另外还雇用一位身着黑装的小男孩，他总是穿着黑色塔夫绸制的外套，而臀部上方则戴有金属丝装饰。

* * *

宫廷中有形形色色的人。伊丽莎白女王总是希望宫廷人士能遵守严格的礼节与礼仪规范，为全国各地的人们立下良好典范，大加推广骑士精神与绅士风范，在卡斯提里奥尼（Castiglione）的《宫臣》一书中便有相当好的示范。卡斯提里奥尼声称理想的廷臣应该是雍容大度、机智风趣又愿意冒险的人，会不断求精进。

童贞女王也盼望臣子们能维持高度的道德操守，绝不容忍关系混乱，因为她非常清楚，这样会影响她个人的形象。尽管如此，包括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与约翰·欧贝瑞（John Aubrey）等评论家，都曾提及英国宫廷中的不道德行为依然占多数，包括“卖淫、骂脏话、说下流的话、冒犯神、跳舞、玩纸牌、饮酒闹事、酗酒烂醉、暴饮暴食、争吵等这一类的麻烦事”，对此，伊丽莎白女王麾下的清教徒众臣，也皆有所感。事实上，根据当代编年史家拉斐尔·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记载，不良行为“完全被排除在宫外，至少在女王陛下的门户之中，各级人员都非常努力，不良行为十

分罕见，甚至不需要对违反规定的人强烈指责或严加矫正”。宫廷中的丑闻并不常见，但若真爆出了丑闻，便是个敏感议题。

伊丽莎白女王的臣子们认为，宫中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每个人都疯狂竞争地位与晋升机会，此事当然也带来不少压力。与女王较亲近的臣子们，成为廷臣的核心人物便能得到许多报偿，包括得到宫廷与政府中的差事，被册封为骑士或贵族（十分罕见），垄断商品、年金、退休金、监护权与贷款等。许多奉承女王的人——尤其是莱斯特伯爵——死时仍欠女王大笔金钱，尽管她常宽大为怀地延长支借期限，却很少将他人的借贷一笔勾销。她也从不过度地赏赐特权与偏宠——她也不能这么做，因此她总是让宫廷人士不断猜测，抱着希冀。

为了争夺地位，宫中常会出现流言蜚语、背后中伤与争宠的情形，暴力情形仍十分罕见，女王下令除了作为装饰品外，禁止使用长剑，若有人私下决斗，将被罚砍去右手。尽管女王对破坏这些规定的人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聪明的臣子们都知道，斗争最好还是靠脑袋。最恰当的做法，就是热切焦急地在回廊中等待，希望有机会能在女王经过时，抓准时机与她交谈，甚至有幸被她“召入”内宫中，这样被女王注意到的机会就更大了。当然，就如哈林顿爵士所说，只靠“空话、恶意嘲笑、夜晚空想与白天摇尾乞怜”是不可能达成目标的。若他够幸运，就有可能靠着礼品或金钱等贿赂，得到有贵族血统的贵族成员青睐，进而成为他攀上高峰的快捷方式。显然不用怀疑，伊丽莎白时代的廷臣们，都已经准备好为得到女王注意而进行长期抗战，希望能达成哈林顿爵士所称的“野心关卡”。许多年轻的臣子们甚至随身携带地位的证明，只希望能表现得更突出；还有些人则穿着异国风的服饰。许多人为了在宫中留得一席之地而债台高筑。

宫中鲜少有人能达成与女王面对面对话的梦想，但根据哈林顿爵士描述，那些成功的人，得到女王宠幸最佳的时机，是“在早餐餐具

摆设好之前”。 “在女王走出寝室之时，这些人应该大方地上前，单膝下跪，并说：‘天佑女王，恳求女王向忠诚的仆人透露，何时是见女王陛下神圣面容的最佳时机。’ ”这一招与献上珠宝礼物一样，通常能达成预期中的效果，除非女王陛下情绪不佳。海登爵士某天觐见女王后，却慌张不安、汗流浹背地出来，警告哈林顿爵士：“若阁下今日欲告状，劝您放弃这个念头。时机不对。”若勉强女王承诺她不情愿的给予，就可能“让女王与任何人大起龃龉”。若女王获悉某人将上呈请愿书，便会随即驱走请愿人，并说出些令人倒胃口的话，像是：“呸！你的靴子臭死了！”而女王同意某项要求，也并不代表她马上就会将承诺付诸实行：通常会有冗长不堪的等待接续而来，有时她也会就此遗忘了她的承诺。

一位“平庸的北部女性”听闻女王健忘的习性，便曾要求女王以书面承诺。

“为什么，难道我的承诺，并不是你想要的答复吗？”女王在一片愕然中反问，“并准备将她赶走”。

“哎呀！女王陛下！”这名女子直率地表示，“人们总是说，空口无凭比不上白纸黑字。”一般而言，女王对如此傲慢无礼的举动相当不感冒，但这次她却笑了，而这名女子也成功地得到女王的书面承诺。

许多人强烈谴责宫廷中肤浅的表面功夫，曾有名才子将这种现象形容为：“光彩华丽的悲剧，充满恶意与鄙视”。华德·莱礼爵士曾写下此名言：“宫廷的一切，就如朽木般闪耀发亮。”贪腐问题盛行，女王也无力阻止这样的趋势，更无法阻止唯利是图的人们。魏勒比勋爵（Lord Willoughby）可说是宫廷中唯一一位不同流合污的贵族人士，“他与贪腐者并非一丘之貉，他从不容忍宫廷中一丝一毫的奉承谄媚”。多数人皆都会同意，“真正诚实的人，绝对不太喜欢宫廷

中的一切，聪明的人也不会在这个场域中逗留太久，唯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这个国家的女主人”。

士绅阶级及以上的人士，都有入宫的机会，然而就像塞西尔所说的一样，在宫中，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就像是没有竿子的撑竿跳”。几乎所有的臣子之间都有血缘关系，或因姻亲与忠诚而结合，因此宫廷中的家族气氛十分明显。只不过，这样的气氛也无法避免部分人士的诡计，或宠臣之间的派系斗争。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期间，十分善于制衡派系维持和平；一直到她年老后，派系间才逐渐变得更难以控制。

有几位重要的臣子，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母系亲戚，尽管她十分照顾这些亲友，但除非这些人有重大贡献，否则她并不轻易拔擢他们或封爵。她一直不答应让表舅艾芬汉的威廉·霍华勋爵晋升成为伯爵，因为这个表舅不够有钱，而表哥亨斯顿勋爵（Lord Hunsdon），则是在伊丽莎白女王册封他为威特夏伯爵（Earl of Wiltshire）之前，便已走上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这个暴躁的老人拒绝了这项殊荣，并向女王表示：“女王陛下，既然我在生时，你认为我不配得到这份荣耀，现在我要死了，我想自己就更没有资格得到这份奖赏。”但事实上，亨斯顿勋爵是个直言不讳的军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一直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宠信。波林家族的其他亲戚，在这个出色的表亲护航下，在各种不同领域逐渐繁荣了起来，他们包括诺利斯家族（the Knollyses）、萨克维尔家族（the Sackvilles）、霍华家族（the Howards）、史塔福德家族（the Staffords）、富泰斯库家族（the Fortescues）与艾希莉家族（the Ashleys）。与伊丽莎白女王感情最好的是表妹凯瑟琳·凯利（Katherine Carey），她是亨斯顿勋爵的妹妹，也是佛朗西斯·诺利斯爵士（Sir Francis Knollys）的老婆。一五六九年凯瑟琳去世时，伊丽莎白女王简直悲痛欲绝。

伊丽莎白女王非常享受她与臣子间的特殊关系，臣子们彼此争相赞美女王：有些人甚至夸张到将房子重建成字母E型，等待女王走访参观。多数来到宫中的男性，都接受了女王的思维：他们是受过高水平教育、有涵养、游遍八方，且能说多国语言的人。与生俱来的财富，让他们自信满满，甚至愿意资助艺术家与学者。伊丽莎白女王要求他们要穿着体面，定下了服装标准规则，若臣子不服从，对前途可是一大不利。“我记得她对着马修爵士那有饰边的衣服啐了一口，还说这个蠢材连最后一丁点智慧都没了。”哈林顿爵士记录下这件事。“老天请原谅我如此嘲弄的口气！”

尽管伊丽莎白女王试图保存古老的社会阶级世袭制度，却造成了社会势利的风气，而在那多数人都讲话粗鄙的时代，臣子们却没有因为口音问题而遭到歧视。许多流传至今的信件，显示海登爵士总是将“ask”说成“axe”，相较于正常的“it”发音，莱斯特伯爵总是喜欢说“hit”，无法改掉那个“h”音的习惯，而莱礼爵士则有“明显的德文郡口音”。从女王书写的文字来看，她应该是操着一口优美的伦敦口音，说话时也会刻意拖长元音。

伊丽莎白女王若生在当今世上，可以说是个只与男性打交道的女人。尽管她也有部分女性朋友，但总体而言，她讨厌宫中出现其他女性，宁愿自己是宫廷中大批男性间唯一的焦点；因此，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中，只有不到三十名女性，其多数都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随从。宫廷中并没有明文规定臣子不许携带家眷，但这样的举动并不受欢迎，臣子的夫人们也无法享用免费的食宿，而伊丽莎白女王也很少松绑这样的规定。

伊丽莎白女王与男性众臣之间的关系，反映出旧时代宫廷爱情游戏的概念，也就是这些追求者抱着无望的希冀，追求着高不可攀的女主人，只能远观。许多臣子写给伊丽莎白女王的信件，看来都像情

书：克里斯多福·海登爵士便非常典型：“我的心、我的灵，与我的身、我的命，都将侍奉你视为天堂般美好，没有了你，生活简直比地狱更煎熬。”一五八一年，士鲁斯柏立勋爵请求女王让他进宫时，便如此写道：“我将无视于健康情形、长途跋涉、时节，或任何与见女王一面相关的事，女王就是我最大的安慰，只要女王陛下开心，就是我与我的后代子孙最大的快乐，女王不在的每一个小时，都仿如一年般难熬。”女王六十三岁那一年，诺里斯勋爵因健康问题退休，他便表示：“离开了女王陛下的身边，我内心深处的忧伤，远超过痛风对我的肢体造成的疼痛；女王陛下的眼神，比起世上的其他东西，能带给我心中最真诚的喜悦。”女王相当陶醉，也十分期待这等注意力。海登爵士便曾表示，她垂钓着的是男人的灵魂。

臣子们的这些举动，也不尽是出于谄媚与私利，毕竟伊丽莎白女王总让男人神魂颠倒。她总是能轻易地得到男性的注意力，让他们对自己的想法不断猜测、抱着希望。但有时她那难以预料的行为，也会令人受挫不已：一下挑逗、嬉戏又不正经，下一秒可能又变得跋扈刻薄——简言之，就是自负到了极点。但伊丽莎白女王是个相当有幽默感的人。当牛津伯爵在向女王弯腰行礼时，不慎放屁后，他感到羞愧不已，因此自我惩罚放逐了七年时间；当他回宫时，伊丽莎白女王诚挚地迎接他，并调皮地表示：“伯爵阁下，我已经忘了那个屁。”

她为亲近的臣子取的小名，都是情感的象征：莱斯特伯爵是她的“眼睛”，海登爵士是她的“眼睑”，塞西尔是她的“灵魂”，沃尔辛厄姆爵士则是她的“小摩尔人”。但她绝不让任何人与她太过贴近。一五八二年，一位年轻小伙子，“大胆地越过了礼节的界线，踩上了王位前的那块地毯，甚至在女王坐在王位上时，靠在王位上的软垫上，当下女王并未对这个冒犯她的小子说些什么，只是大声斥责宫务大臣，为何允许这种行为”。

* * *

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寝宫中，她的身边永远伴随着七位寝宫侍女、六位首席女仆与四位侍从，当她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侍女与女仆们永远紧跟在她身边。她很少一人独处，这些女子们日日夜夜都跟在她身边。这些人员都按照时间轮值，资历最深的侍女们，会在女王的寝室等待，资历最浅的侍女们则在女王的房间陪伴她。其中一位侍女的工作，就是在女王必经之路上撒花瓣。首席女仆们则偶尔必须跑跑腿，在女王的餐桌前等待，为她撩裙摆，同时负责照顾女王的衣物与珠宝。这些侍女们只有上工才能领工资，除非有女王的命令，否则她们绝不能擅自离宫。糟糕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对于侍女们的需求及家庭责任没什么同情心，因此时常拒绝让侍女们休息。若她要求友人前往相陪，可能完全没有期限。因此，可怜的凯瑟琳·凯利便死于宫中，死时丈夫未能在身边相陪，只因为伊丽莎白女王无法忍受她不在身边。

女王的侍女与女仆们，是从她的亲戚或臣子的家属中精挑细选来的。能侍奉女王的女子，通常能得到一段好姻缘，因此侍女的工作人人抢，而且也常要以大笔的金钱来确保家族中的女孩能成为侍女；甚至有一位父亲为此付了一千三百英镑。当女王侍女雷顿小姐准备退休时，马上有十二位女子提出申请，争抢她的职务。

与多数的男性臣子一样，女王的侍女们都有很高的教育程度且博学多闻，多数的侍女们，都读过《圣经》或拉丁与希腊文豪的翻译作品。侍女们的其中一份工作，就是要从女王那丰富的图书馆中，选出一本书，大声念给女主公听。而且在皇室所有的宫殿中，每间房都能看到书本的踪迹。一名观察家就发现：“若有不明就里的人误闯英国宫廷，可能会以为自己来到了大学所设的公立学校，而不是皇室宫殿。”

伊丽莎白女王的侍女与女仆们，也必须会女红、音乐、跳舞与骑术，这样她们才能与女主公一同分享她的兴趣，以此来娱乐女主公。部分侍女熟稔蒸馏香甜酒、药品或香水之道，有些甚至会做糖果与蜜饯。

伊丽莎白女王的要求极高，总毫不犹豫地批评他人的错误。迟到与马虎只会引来一阵严厉的申斥，她设下严格纪律，对于因触怒了她而吃了耳光或遭到鞭打的侍女，一点也不感到同情，就算只是小错也一样。她的怒气令人胆寒与畏惧，她也常“咒骂那些不懂规矩、目无尊长的村姑”，她的女仆们“因此常常哭泣，显得十分悲惨”。另外，她身边的许多女性，也是她最亲近的朋友，她对她们展现无私的情感。

一五九五年，当布丽姬·曼纳斯（Bridget Manners）加入服侍女王的行列，她的叔父给了她这些建议：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天天向万能的天神祷告，用温顺、爱与服从，全心全意地投入伺候女王陛下的差事，对此，你一定要勤奋、守密与忠诚。基本上就是不要成为爱管闲事的人。成为侍女后尽量保持缄默，这是你的天职。你说的话、做的事，一定要尽量对大家都好，不能伤害任何人。若能遵循这些建议，对你绝对有好处。

伊丽莎白女王要求侍女们只能身穿黑或白或黑白相间的服饰，这样她自己身上鲜明的颜色与饰品，才能在众人之中跳脱出来。若有侍女胆敢穿着风采压过女王的衣服，就大难临头了，例如玛莉·霍华小姐（Lady Mary Howard）有一套绝美至极的礼服，心生嫉妒的伊丽莎白女王，甚至没有经过衣服主人的同意，就私下拿来试穿，结果却发现衣服太短了。因此她告诉玛莉·霍华小姐，这件衣服对她来说“太过细致了”，这个不幸的女孩只好将这件衣服收进衣柜深处，直到女王死后才重见光明。

宫廷有侍女们专用的马厩，而女仆们因为工资低廉得可怜，根本买不起自己的马，因此有权向皇室商借马匹。通常女王身边的侍女们，都会收到来访的显贵们致赠的礼物，伊丽莎白女王，也会将自己昂贵又美丽的服饰转赠给她们。

伊丽莎白女王身边的几位侍女都在历史上留下名号：像是曾为女王保姆与女教师的布兰琪·派瑞（Blanche Parry）——也是女王身边的侍女中做得最久的一位，还有凯瑟琳·艾希莉（Katherine Ashley）；伊莎贝拉·马坎（Isabella Markham），一五五四年，当伊丽莎白女王锒铛入狱时，她就在狱中服侍女王，后来她嫁给了约翰·哈林顿爵士，她也是伊丽莎白女王那与父亲同名的教子之母；玛莉·瑞克里夫（Mary Radcliffe）服侍了伊丽莎白女王四十年，为了她的女主公，甚至拒绝了所有追求者；玛莉·西得尼小姐（Lady Mary Sidney），尽管身上留下天花的严重伤疤，依然与女王保持友好关系，直到一五八六年她死亡为止：她就是知名军人与诗人菲利普·西得尼（Sir Philip Sidney）的母亲，她自己的学识也相当广泛。菲利普还有个名气很大的姐姐，也叫玛莉，她自己本身是位诗人，且根据诗人斯宾塞形容，在英国富人之中“以性别而言，她是个相当完美罕见的人”，一五七六年完婚后，十五岁的玛莉也成为一名女王寝宫侍女。一家三代都成为女王的首席女仆，在那个年代其实并非罕见。

安·罗素（Anne Russell）是华威伯爵安布洛斯·达德利的老婆，在一五六五年，于怀特霍尔宫举办铺张的婚礼前，便有诗人写诗赞美她那纯净的优雅、才智天分与动人的嗓音。晚年的伊丽莎白女王，与北安普敦侯爵威廉·帕尔第三任妻子赫莲娜·厄斯多特（Helena Ulstdotter）相当亲近，她与女王相差了四十岁之多。赫莲娜多数时间都待在宫中，她在威廉·帕尔侯爵死后再婚时，伊丽莎白女王同意她维持侯爵夫人之名，并保留侯爵夫人的所有权利，并将位于萨里古老的辛恩皇室庄园赏赐给了她。

尽管在上任伊始，伊丽莎白女王便嘱咐身边的侍女“千万别与她讨论公事”，因为部分图谋不轨的臣子常会成功地贿赂宫女将请愿书转交给女主公，这通常是侍女们最有利可图的油水。“我们从不祭拜圣人，只要向女王身边的侍女祷告就行了，”一名臣子曾如此讥讽。莱礼爵士表示，这些侍女“简直就像女巫般，造成的损害不少，却没什么益处”。罗伯·西得尼爵士（Sir Robert Sidney）一次曾强迫史库达摩尔小姐（Lady Scudamore）帮他转交信件给女王，希望能谋得五港同盟总督一职。

“你知道信件内容吗？”女王问她。

“不，女王陛下。”史库达摩尔小姐答道。

“五港同盟已经够混乱了。”伊丽莎白女王边看信边咕哝着，甚至“不屑地呸了两三声！”。不久后，女王便将五港同盟总督一职赐给了罗伯·西得尼的对手柯本勋爵（Lord Cobham），而柯本勋爵的请愿书则由另一位侍女罗素太太（Mistress Russell）递交。

关于侍女们的爱情与性冒险，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是许多作家书写的主题。尽管在年纪增长后，她对年轻人的忍耐度的确下降了，但她那恶名昭彰的反对态度，显然不只是同性相忌可以解释的。她不只是以父母的立场来管教这些未婚女子——最年轻的甚至只有十四岁——守护着她们的贞操，这些女孩的父母，也都希望这些孩子透过服侍女王能缔结更好的姻缘；人人皆知，被人强摘了贞操后的女子，在婚姻市场上毫无价值。若她的侍女在未获得她的许可之下，试图私订终身，伊丽莎白女王都会非常愤怒——几乎相当于用非常下流的手段违反了礼仪制度，毕竟为侍女们安排适切的婚配，是女王的责任。侍女名誉扫地引发的“丑闻与恶名”可能连带重创她的道德形象，因此她非常重视这一点。所以只要有人违反了规定，都会受到极严重的惩治。

如同我们先前所知道的，凯瑟琳·格雷小姐与玛莉·格雷小姐可怜的命运。在伊丽莎白女王晚年时，华德·莱礼爵士勾引并迎娶了伊丽莎白女王的一位侍女，因而遭到伊丽莎白女王愤怒的报复。女王的一名侍女玛莉·薛尔登（Mary Shelton）——也是她波林家族的表妹——秘密嫁给了詹姆士·史库达摩尔（James Scudamore）后，伊丽莎白女王的开明“显然只是说说而已”，玛莉因此断了一只手指：“从未有人为丈夫付出过如此巨大的代价”。后来伊丽莎白女王向玛莉道歉，并将她拔擢为女王房的专属侍女。弗朗西斯·法瓦沙尔（Frances Vavasour）犯下了同样的罪，也招致类似的惩罚，而他的姐姐安则是个邈邈女人，于一五八一年时，在女眷室中偷偷生下了牛津伯爵（Earl of Oxford）的私生子，后又因爱人不愿娶她，而遭受到不能挽回的贬黜惩罚，但女王要求牛津伯爵交两千英镑以养育这个孩子，同时短暂地将他关入伦敦塔，并将他逐出宫外。

事实上，历史记录显示，伊丽莎白女王并不反对侍女们结婚，但规定她们只能选择被认可的对象。证据显示，她从未阻止侍女们缔结有益的姻缘，甚至还有十八位侍女成功嫁入英国的贵族之家。但在大好的机会来临之前，女王都希望侍女们能保持处子之身，就像她自己一样。哈林顿爵士就曾记录下这一段：伊丽莎白女王总爱问侍女们“想不想嫁人”，也会“规劝她身边的所有侍女维持处子之身；聪明的侍女们，因为了解女王的想法，都会对自己真正的心之所向三缄其口”。

若有侍女不想接受一段婚姻，伊丽莎白女王也会保护她。一五八三年，恐怖的沙皇伊凡（Tsar Ivan the Terrible）要求迎娶玛莉·哈斯汀小姐（Lady Mary Hastings），以巩固盎格鲁英国-俄罗斯联盟。对于可能被送往俄罗斯，想到那野蛮的风俗，玛莉·哈斯汀小姐吓坏了，伊丽莎白女王便拒绝接受这样的提议，但事情过了多年后，玛莉依然被人戏称为“俄罗斯女沙皇”。另一回，女王则“费尽唇

舌”，希望能说动法兰西丝·霍华小姐（Lady Frances Howard）不要嫁给赫特福德伯爵（Earl of Hertford），因为女王认为他并不是真的喜爱法兰西丝，或在意她的幸福。但面对一个被爱冲昏了头的女孩，女王“最后表示她无法阻挡他人的企盼”，最后证明女王是对的，两人的婚姻就如同那个年代许多贵族联姻般触礁了。

女王严格的态度，导致每当她的女仆们陷入爱的漩涡时，都害怕得不敢向女王承认此事——在满是男人的宫廷里，这种事屡见不鲜——于是常常被迫偷偷摸摸地展开地下情。一直到伊丽莎白女王离世前，女王对事情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但对事务的掌握却越来越松散，涉入不正常爱情中的侍女也就越来越多了。因此，一五九〇年代可称为英国宫廷的丑闻年代。据传伊丽莎白·维侬（Elizabeth Vernon）怀了南安普敦伯爵（Earl of Southampton）的孩子，有人说她是遭到“暴力胁迫才有了身孕，但她并不怪罪这个不轨的行为，只说伯爵会好好处理这件事”。她说得没错，伯爵的确娶了她，及时在孩子出生前给了她一个合法地位。伊丽莎白女王感到十分生气，因而将南安普敦伯爵与新任妻子关进舰队街监狱长达两周。玛莉·费顿（Mary Fitton）曾作男性打扮，只为了溜出宫外见情夫，也因为未婚怀孕而惨遭下狱命运，同时被永远逐出宫外。一五九一年，莱斯特伯爵的私生子，只因为亲吻了卡文蒂希夫人（Mistress Cavendish），就遭到放逐的命运。

这些女孩们，自然有满腔的朝气，经过一整天端庄的行为，回到简朴的女眷室——位于阁楼底下，屋顶漏水且没有暖气的房间——后都会释放一下一整天的压抑。部分下人则睡在较低的层板后方，因此也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理论上，侍女们都归侍女长管，但当年的侍女长，管理风格显然十分松散，因此侍女们的夜间嬉闹，常常惹恼睡在附近房间较年长的臣子们。

诺利斯爵士在宫中的住所，就在侍女们嬉戏玩闹的房间隔壁，尽管他多次警告，但夜间几乎仍不得安宁。最后，一天晚上在侍女们的嬉闹声中，他终于按捺不住脾气，脱掉身上的睡衣，拿下鼻梁上的眼镜，放下手中阿雷蒂诺的书，走到他房间的边门，以非常严肃的眼神看着这些侍女。现在，就让读者们自己判断，这些可怜虫必须忍受多少煎熬，因为他对着她们，在房里来回踱步长达一个小时。

当然在全是女性的环境中，妒忌与争吵是不可能少的，虽然女王总是期盼，所有的争吵都能看在她的面子上修补好，但她还不至于成为争论的主角。她对侍女们总是非常和善，尤其对丧亲或家中出问题的侍女更是相当亲切。

* * *

在统治期间，伊丽莎白一世在英国境内出巡了二十五次，出巡的时间通常在七月到八月份伦敦黑死病疫情猖獗之时。对她而言，出巡就像是怡人的假期，从日常繁忙的公务中暂时抽身，也有机会可以与民众面对面，赢得人民的心。她走访了二十个不同的郡，多数的郡都在南部与西部，此外还有许多乡镇；到英国北部出巡的计划从未实现过，女王出巡中经过最北边的城市，是斯坦福郡。在每个郡接壤之处，都会有郡长与相关人员出来迎接，并在她停留的期间随侍在侧，而在每个乡镇中，镇长与市府参事都会穿上礼袍与礼服来迎接，并象征性地将钥匙递交给女王。无论她前往何处，教堂钟声总是伴随着她的抵达飘扬。

十六世纪时，旅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多数的道路状况都不佳，许多所谓的道路其实都是因雨而泥泞不堪的车道而已。二轮马车或四轮马车都很容易被卡住，若是湿雨的天气——尽管雨势向来吓不倒伊丽莎白女王——每个人身上都会溅满泥点。就算天气好，宫廷人士一次也只能移动十到十二英里。伊丽莎白女王前往布里斯托时，面对的是“漫长又危险的旅程”，因为英国西部的道路相当不良，抵达布里

斯托时，女王甚至感谢老天让她保全了性命。一五七三年，塞西尔曾记录下，女王“从肯特郡与萨赛克斯出发时，就遇上重重困难，路上竟有如此多的石头、低凹和比山峰区更糟糕的路况”。

女王的交通工具包括马骑、配上软垫的无顶马车，或一五六四年时首度从荷兰引进英国的无避震十二轮马车，外表是以镀金的钉子固定的红色皮革，只能乘载两人，而且一点也不舒适。因此大队人马还会再带上两个轿子以免发生意外，女王的侍女也可能需要。在伊丽莎白女王的身后，是五百多人的长队，以及一望无际、多达两千四百匹的马与四百到六百辆装载着衣物、珠宝、补给品、皇室财产、公文的马车，还会带着帐篷，若宫廷迁徙到空间不足的宅邸时，仆人便无法睡在室内。

在疲惫的旅程中，伊丽莎白女王从未表现出精神萎靡的样子，她也希望臣子们都能表现出一样的精神。多数臣子对于出巡带来的庞大经济负担，都感到十分厌恶——根据塞西尔统计约为每年两千英镑——因此他们努力说服女王放弃出巡计划，但伊丽莎白女王十分坚持，一直到生命终了前的最后一年。一六〇一年，臣子们开始不断抱怨又要展开出巡长征时，伊丽莎白女王要求“老者就留在宫内，年轻力壮的就跟着她出发”。

伊丽莎白女王认为，出巡反而能节省开支，毕竟维持宫廷运作的费用，都由臣子负担，尽管她非常小心，从不强迫无力负担费用的人，而财政部与酒宴室则力挺。但她的臣子们对于出巡随之而来的繁重准备工作与一片混乱，感到十分厌烦，其实这也是当今皇室出游准备工作的写照。副宫务大臣会在与女王协商后，负责规划路线，并直接与地方上的显要、镇长与可能的接待人员联络相关事宜。接着皇室探子与两名寝室守卫便要负责检查女王的房间。路线的规划完全依照安全而定。接着就是无止境的打包。

女王几乎从一上任起便开始出巡，一五六〇年代，甚至每两年就出巡一次。伊丽莎白女王宫廷的黄金年代约在一五七〇年代，出巡的规划简直成了一种精致艺术。一五八〇年代的出巡路线以安全为重，但到了一五九〇年代，伊丽莎白女王似乎想要证明自己依然与年轻时一样有活力，因而恢复了累人的出巡行程。

若说出巡增进了她受欢迎的程度，绝对是毫无疑问的。大批的政府官员与仆人出现，多彩多姿的服装打扮，伴随着整个皇室，带给一路上各地前来争相目睹女王真面目的人们一种亮丽的公开展现。贫穷的平民总是不禁下跪大喊着：“天佑女王陛下！”人们受到鼓舞，得以上前与女王说话，甚至亲手递交请愿书，统治者的平易近人让每个人啧啧称奇。

以下是当时的记录报道：

在出巡的途中，亲近女王变得容易；许多民众、地方行政官员、乡绅与孩童都欢天喜地、毫不畏惧地等待女王现身。她会以开放的态度聆听民众痛苦的抱怨，以及伤者的诉苦。她会亲手接下并以最宽容大度的音调读出请愿书中粗鄙的内容，并不断向民众保证，她一定会特别注意这些事情；而且她一向能说到做到。对于平民无礼的举动，她从不生气，对于放肆不恭或不断骚扰的诉愿者，她也从不感冒犯。因此在她在位期间，没有什么事情比她的屈尊俯就与不可思议的温和态度更能赢得人心了。

一次，被逼急了了的杭汀顿的班洛维斯律师，对女王的车队喝道：“停车，好家伙！停下你的车，让我与女王说说话！”此时伊丽莎白女王竟笑得仿佛有人在呵痒一般，但她仍遵照礼节规范，优雅地先向他道谢，并伸出手让他行吻手礼。在出巡中突然被邀请进入临近的民宅，吃点东西提提神，对女王来说也不是新鲜事。

“她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的欢呼与喝彩。”一五六八年，曾有西班牙大使记录下出巡实况：“她告诉我，这能让她心情大好，也让我

窥见她受臣民爱戴的一面，以及她对这一切多么珍惜。有时她会下令要车队往人最多的地方去，在人群中高高站起，感谢人民。”

皇室走访乡镇与城市，总是能提振贸易与产业。当伊丽莎白女王要走访某地的消息传出时，当地人便会陷入疯狂准备之中：

消息一出，

孩童也不禁雀跃；

少的、老的、富的、穷的，

皆感染兴奋之情，

拍着手嘶吼着，

“颂赞此时！

女王将至，

高贵地带着随从与权势。”

家家户户都在窗口挂起绣帷、染布或绿色树枝，有人准备演说，街道上的垃圾清空，有时甚至还重新铺路，人人争相购买镀银的杯子，作为献给女王的礼物。

一五六五年女王在柯芬特里收到的一个杯子中，发现装着价值一百英镑的金币作为礼物，她为此感动不已。

“这样的礼物真少见。”她说。

“只要女王陛下喜欢，”市长表示，“我们还有更多。”伊丽莎白女王询问他的言下之意。

“这是敬爱您的臣民的心意。”这是市长的回答。

“感谢你，市长先生，它的意义更深重。”女王附和着。

一五七九年在桑德维奇，女王对当地行政官员的妻子们，致上最大的赞美，这些妻子们献上一百六十道菜，于是在没有试吃员的状况下，女王浅尝了几道菜，并要求她们将其中几道菜送到她下榻的地方，让她稍晚可以享用。

在这些出巡的过程中，伊丽莎白女王至少在两百四十处地点过夜，部分时间住在自己的领地上，但她更常要求富有的臣子或当地显要款待她。“夏日，当她被在外的消遣娱乐逗得乐不可支，或巡视整个国家的领土时，贵族的家就是她的宫殿。”作家威廉·哈里森观察到这个现象。她总共到过一百五十户人家中做客。

女王下榻的地方“一定要让她感到轻松与喜欢，且不能太热或太吵”；而不重要的人士，就只能在有限的资源下搭伙，毕竟不是所有的宅邸都能容纳宫廷中的每个人。偶尔当女王抵达时间较晚时，接待的人就得为了蜡烛大伤荷包。宫廷出巡的人口众多，也会消耗不少食物。皇室的到访，可能维持几天时间，因此常让招待者的财务出状况：一五七七年，尼可拉斯·贝肯爵士便砸下五百七十七英镑，在圣奥尔本斯附近的高兰城招待了女王四天，而一五九一年时，女王在斯坦福的伯利宅邸待了十天，让塞西尔的财产瞬间缩水一千英镑。

一六〇〇年时，招待过女王两次的亨利·李爵士写信给塞西尔，表示自己听说“女王陛下扬言再度出巡”，而且可能“再来我家，尽管我感到十分荣幸”；然而“我的财产已不容许我如此挥霍”。同一年，林肯伯爵接获通知，女王正朝向他位于切尔西的家前进，他于是逃到乡间，当女王抵达时，整个宅邸大门深锁。此举自然触怒了女王，于是坚持隔一周要再访林肯与伯爵共餐。塞西尔与诺丁汉伯爵于是转告了林肯伯爵，并表示他们会安排一切，再将费用交由他处理，这让林肯伯爵惊骇不已。尽管如此，多数的臣子们，依然将女王到访

视为莫大的殊荣，并竭诚欢迎女王做客的机会，甚至还有不少乡镇争相设法列入女王出巡的路线中。若女王因故无法前往，负责接待的人甚至还会有怨言。

在豪华的宅邸中为女王准备的余兴节目，通常都十分丰富多变。这些接待者纷纷提出新奇又别致的点子来吸引女王，彼此竞争。在萨里的贝丁顿公园，弗朗西斯·加露爵士（Sir Francis Carew）甚至刻意以帐篷遮住一棵樱桃树，延后它开花的时间，得到过季樱桃——象征着纯洁的童贞——以献给女王。另一名接待者则将管弦乐团隐藏在人工洞穴中。还有露天历史剧、游乐会、筵席、假面剧、戏剧、跳舞、杂技表演、烟火释放、活人画、歌唱、乡野娱乐及美妙的打猎体验。许多娱乐节目都有其寓意作为主题，为童贞女王喝彩。同样受到欢迎的，包括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神、美女与好色之徒，以及阿瑟王传奇中的角色，包括人鱼与精灵。许多戏剧与诗句，都来自当代最好的作家之手，像是乔治·盖斯柯恩（George Gascoigne）与约翰·黎里（John Lyly）。款待女王最出名的一次，发生在一五七五年的凯尼尔沃思，之后我们会再详细介绍，这是女王一生中接受过最华贵、印象最深刻——当然也是最贵的——一次招待了。

英国的许多贵族的宅邸空间都相当宽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在女王出巡时能款待她。其中包括塞西尔位于艾赛克斯特欧伯兹的宅邸，他在这里做东款待女王多达十三回。女王也为屋内的设计出点子，并要求屋内的女王专属寝室安上人工树，天花板上还要有天文钟。并且建造了五座回廊，即使天气不佳，女王也能在回廊中漫步，天气好时，则有四座花园可以选择。克里斯多福·海登爵士也在特欧伯兹的霍登比建造了豪华宅邸，进而成为英国国内继汉普顿宫之后第二大的建筑。毫无疑问，女王就是他建造这栋宅邸的原动力，这是献给女王的礼物。这些建筑耗费巨资，塞西尔甚至写信给海登爵士，表示：“上天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讨她欢心，就算倾家荡产，我们也

要硬撑到底。”事实上，英国财政部支付了部分的建筑费用。但令人伤感的是，这两幢宅邸都在英国内战中遭到破坏，进而颓圮。

对负责接待女王的人来说，献上许多昂贵的稀世珍宝给女王，也是他们的义务，当然也就在庞大的经费上，再添一笔负担。一五九八年在邱园掌玺大臣艾格登爵士（Lord Keeper Egerton）于女王抵达他的宅邸之时，致赠一把珠宝扇与钻石垂饰，晚餐时再度奉上一把小键琴，而寝室中还有“一件华美的礼服与裙子”等着她。女王并不因此满足，甚至要求要玛瑙做的盐罐、汤匙与叉子，而艾格登爵士真在与女王道别时献上了这个礼物。东道主也得要致赠礼物给女王的随行人员，此外，尽管女王坚持臣子与仆人们的行为无懈可击，但事实上他们常有偷窃行为。无论如何，多数款待过女王的人，依然都十分珍惜这份回忆。

伊丽莎白女王出巡时，心情总是无忧无虑，享受度假的愉快，“任何事物都能轻易取悦她”且“也非常容易开心”，对于任何娱乐她的行为都表现出“极大的欣喜”，同时仍维持一贯的谦逊。在冗长不堪的欢迎致辞中，她也表现出极大耐性，绝不显露不耐烦的神色，就算是最微不足道的礼物，也能得到女王的衷心感谢。她常常口出称赞之词，当她顺道前往布里斯托的圣玛利红崖教堂参观时，便表示“这是全英国最精致、最好的教堂”。在塞西尔的协助下，她总是能在出巡前完成重要工作。她也常常改变她的出巡行程，对办理招待事宜的人造成相当大的不便，也因此引发不少民怨。一五八二年，伊丽莎白女王取消了莱科特之行，让诺利斯勋爵与勋爵夫人相当失望。幸运一点的名门仕族，总是能等到女王这个友善的宾客，但若奉上有酸味的啤酒给女王，可能还是会让女王不太开心，但她也不至于对他人招待过程中的不周口出恶言。

部分人担任东道主时，对于女王的出现则相当惊讶。就像塞西尔的秘书麦可·希克斯（Michael Hicks）就在多次练习后，准备了欢迎致辞，但当伊丽莎白女王抵达他家时，“女王陛下高贵的身影与庄严的相貌，让我瞬间太过震惊，连眼睛都睁不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什么也想不起来”。女王无法理解接待她的人怎会突然变得如此愚蠢，“但她依然庄重地表示，很高兴能来我家。我知道我的余生都会恨我自己。”希克斯悔恨地说。

为了让臣子们也能分享出巡的喜悦，伊丽莎白女王总会在返宫后将见闻撰文发行。这些小册子广受欢迎，而且，也一如预期地加深了童贞女王的传奇。

15 斧头的警告

一五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伊丽莎白女王为了表扬塞西尔对王室的贡献，册封他为伯利男爵一世。女王身边亲近的参事团成员，包括伯利男爵、萨赛克斯伯爵、莱斯特伯爵与沃尔辛厄姆爵士。塞西尔向来精明狡猾又十分谨慎，莱斯特伯爵则冲动激进；莱斯特伯爵与沃尔辛厄姆爵士因为对新教的忠诚信仰，自然成为盟友，在同一个月，莱斯特伯爵的至交好友瑟洛摩顿爵士因肋膜炎去世后，两人的交情日深。

然而，当伯利男爵与萨赛克斯伯爵支持女王与安茹公爵成婚时，莱斯特伯爵假意支持，实则大加反对。宫中其他人士则确信，在罗马教皇的阻止之下，英国很可能面临被欧洲孤立的命运，因此十分需要与法国等欧洲强权建立邦谊。虽然法方强烈谴责伊丽莎白女王对玛丽·斯图亚特的处置方式，却忧心西班牙在尼德兰的驻军与英军，因此认为与英国联手形成防御联盟有其必要性。查理九世也迫切需要外援来对付逐渐坐大的吉斯家族势力，同时也盼望能吓阻伊丽莎白女王支持法国境内的胡格诺教徒。

莱斯特伯爵表示，伊丽莎白女王“迄今未曾如此倾向婚姻之路”，并且十分清楚英法联姻背后的价值，于是这一年二月，她派遣表哥巴克赫斯特勋爵（Lord Buckhurst）出使巴黎，表面上是要恭喜查理九世大婚，实际上她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秘密通知法方，伊丽莎白女王“感激地接受”求婚，也准备好与法方商讨结婚事宜。这个消

息让查理九世大感振奋，他急迫地希望在吉斯家族拉拢他那性格不稳、野心勃勃又爱管闲事的弟弟之前，尽快将他送出国外。接下来，这吃力不讨好的亲事协商工作，就落在英国长驻巴黎的大使沃尔辛厄姆爵士头上。

“若她并未刻意欺瞒，”伯利男爵表示，“女王陛下对这桩婚事应该是认真的。”若婚事进行得顺利，“在各级臣子的心目中，英国王位继承这一难解又危险的问题，便能顺利埋葬——是全英国上下都在等待的一场葬礼。”

然而从协商之初，宗教问题就成了最大的障碍。伊丽莎白女王坚持要安茹公爵改入圣公会，但身为虔诚天主教徒的他，却受到罗马教廷大使与洛兰红衣主教影响，不愿为了国家的前途违反道德良知。

安茹公爵对这门亲事完全没兴趣，于是向母亲抱怨，若自己娶了这名闻遐迩的恶妇，恐怕将成为全欧洲的笑柄。忧心忡忡的法国王太后凯瑟琳·梅迪奇于是要求法国大使费奈隆在英国宫廷中仔细调查，以厘清传闻的真实性，费奈隆大使则回报表示，并未听到任何以兹证明的传闻，安茹公爵只好勉强答应婚事协商继续进行。当然，协商很快便陷入僵局。

* * *

同一年二月，摩顿伯爵（Earl of Morton）与詹姆士六世派出的几位代表抵达伦敦，他们清楚地表示，不希望伊丽莎白女王针对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复位一事继续施压。其实自从罗马教皇发布了将伊丽莎白女王逐出教会的诏令后，伊丽莎白女王根本不想让邻国继续掌握在一个天主教的麻烦人物手中，因此早已对玛丽·斯图亚特复位一事失去了兴趣，然而对于詹姆士六世的无礼的举动，她依然感到不太高兴。

伊丽莎白女王不再伸出援手的事实，最后传进了玛丽·斯图亚特耳里，于是她向友人罗斯主教表示，“若从她手上得不到更多的援助，那就希望我那亲爱的表姑能谅解我”，她要向外国势力寻求援助。若阴谋计划能让她获得自由，甚或更进一步地夺取英国王位，那这就是她想要走的路。于是，她一步步地迈入伊丽莎白女王执政年代中最大的一起谋反事件中。

北方起义联盟瓦解后，便再没有人听闻当年担任罗马教皇双面谍的佛罗伦萨银行家罗伯特·理达费（Roberto Ridolfi）的下落，直到一五七一年，他主动联络玛丽·斯图亚特，表明自己愿意担任她在欧洲宫廷中的代表，在欧洲各地号召支持她的力量。他精心策划了一个谋反计划，要让欧洲的天主教势力入侵英国，推翻伊丽莎白政权，让玛丽·斯图亚特与诺福克公爵取而代之；菲利普国王与罗马教皇已经展现原则上支持的态度。

玛丽·斯图亚特在得到罗马教皇首肯后，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这是她期待已久的梦想。她要理达费通知他的盟友，若他们入侵英国，定能得到英国国内许多影响力深远的贵族支持，并将自己专用的凭据提供给理达费，以向菲利普国王、罗马教皇与亚尔瓦公爵证明真实性。

玛丽·斯图亚特依然对诺福克公爵抱着希望。当他长期在伦敦塔中受苦时，玛丽·斯图亚特不断写信给他，灌输两人在时机允许时仍应成婚的想法：“你曾许下承诺成为我的人，我也是你的人。我认为英国女王与全英国上下的人，都会支持我们。你也答应过绝对不会离开我。”但诺福克公爵根本不认为伊丽莎白女王会支持这桩婚事，且在出狱之时，他便已向伊丽莎白女王发誓，“此生绝不再妄想与苏格兰女王结婚”。但他的命运就如在他之前与之后的许多男人一样，不断地受到玛丽·斯图亚特致命的诱惑。

一五七一年二月八日，玛丽·斯图亚特再度写信给诺福克公爵，并透露了理达费的计划，同时邀请他加入谋叛的行列。诺福克公爵完全不想蹚这趟浑水，这毕竟是重大的叛国罪，对自己十分危险。对于玛丽·斯图亚特要他改信天主教的坚持，他也觉得十分敏感。三月十日，玛丽·斯图亚特却成功地突破他的心结，在王位权势的吸引之下，诺福克公爵与理达费秘密碰面，并允诺协助玛丽·斯图亚特的叛变行动。但他拒绝签署一份向菲利普国王要求人力与物力支持的文件，而理达费擅自在文件上伪造了他的签名。

两周后，理达费离开英国前往罗马，罗马教皇欣喜地祝福他的大业成功。

四月份，伯利男爵在苏格兰的探子回报，取得了苏格兰女王与阿尔瓦公爵通信的证据。这个消息代表着大难临头，于是士鲁斯柏立侯爵便接获命令，严加看守玛丽·斯图亚特的一举一动。

接下来，他国政府也证实了英国的忧虑成真，在理达费前往罗马的途中，曾途经托斯卡纳大公（Grand Duke of Tuscany）的领地，大公写信警告伯利男爵，提醒他这位佛罗伦萨银行家图谋不轨，且可能与苏格兰女王有关。之后，士鲁斯柏立侯爵拷问玛丽·斯图亚特是否与他国势力有所牵连，但对于侯爵所说的一切，她都表示自己不知情。然而侯爵并未因此放松警戒，因为英国政府一直在等待她蠢蠢欲动时机，借此好好处理玛丽·斯图亚特的问题。

一五七一年五月，当英国国会再度开议，议程的首务就是要抢先一步发现天主教方面谋反的活动，并加强国家安全，因此国会快速地通过了三项法案。从那时起，若指伊丽莎白女王统治身份不合法，公开表述、撰写或指称伊丽莎白女王为异教徒、信仰不正统、主张分裂、专制或篡位的人，将被视为重度叛国罪。将教皇诏令携入英国国境者也以通敌叛国罪论处。十字架、玫瑰念珠与宗教相关的图像也都

遭到全面禁止，同时下令逃亡海外的天主教徒立即返国，否则将丧失在英国国内的所有财产。

英国的天主教徒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无法执行自己信仰的宗教仪式，若不参加圣公会仪式，甚至还会遭到罚款。在谈论女王时也得小心翼翼，在教皇的封锁造成的政治气氛下，天主教徒因宗教信仰的关系，地位只比叛国贼好一点。许多天主教徒于是仰望期盼玛丽·斯图亚特来拯救他们，只是这股力量比菲利普国王、罗马教皇及玛丽·斯图亚特预期来得微弱。事实上，英国多数的天主教徒早已效忠伊丽莎白女王。

六月底，菲利普二世在马德里迎接理达费。此时他的谋反计划已然尘埃落定：亚尔瓦公爵将率领六千名西班牙精兵从尼德兰入侵英国，接着挥军占领伦敦。在此同时，诺福克公爵负责煽动英国的天主教徒起义推翻伊丽莎白政权，诺福克公爵需负责活捉伊丽莎白女王，进而谋杀或押解作为人质换取玛丽·斯图亚特的释放。获释后的玛丽·斯图亚特将坐上英国女王大位，接着与诺福克公爵大婚，不久便可同时统治英格兰与苏格兰，并在这两个国家重建天主教信仰。

但这个计划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理达费与多数的天主教人士一样，都高估了英国境内愿意以玛丽·斯图亚特之名起义的天主教徒人数——他认为至少会有三万九千人。且身为佛罗伦萨银行家的理达费，对英国政局与英国人根本一无所知，而理应对这两件事情十分了解的诺福克公爵，又太过盲目，被野心蒙蔽了双眼，以至于忽略了这个重点。

最后只剩下亚尔瓦公爵否决这个计划。亚尔瓦公爵十分看不起理达费，认为他只是个“多嘴的家伙”，并坚信入侵英国之举肯定会失败，且若入侵行动真失败了，将会对天主教信仰与玛丽·斯图亚特的理想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甚至可能害她丧命。于是他拒绝由他直接出

兵入侵英国，他非常清楚，在没有他的援军之下，菲利普国王根本无法帮助苏格兰女王。整个夏天，许多谋反者皆来说服亚尔瓦公爵，希望他改变心意，但都未能成功。

* * *

莱斯特伯爵气势仍相当高。七月份时，法庭总算推翻一五五四年时他背负的叛国罪名，证明他的清白。未来若他的政敌再以叛国贼之名污辱他，将会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尽管他比任何人都还要亲近女王，但在这份情感上，他也有了竞争对手。他的朋友托马斯·赫内基爵士（Sir Thomas Heneage）也享受着女王的宠信，除此之外，宫中也出现了另一位竞争对手——克里斯多福·海登爵士（Christopher Hatton）。

一五四〇年出生的海登爵士，是一位北安普敦郡乡绅之子，并在牛津大学与内殿法学会中受过教育。据传，伊丽莎白女王曾于一五六二年，在内殿法学会假面剧《郭博达克王》中看过他跳舞。在一五六四年，海登爵士受到拔擢成为她的四十卫士一员后，他那优雅的舞姿与骑士比武场上的技巧便掳获了女王的心。此后，他迅速攀升为女王跟前的红人，得到许多土地与宫廷权力作为奖赏，并在一五六九年成为女王房的男仆，然后在一五七一年更成为北安普敦郡国会代表。到了一五七二年，女王再度指派他担任四十卫士长，成为女王的贴身保镖，因此他的工作与女王有了大量的交集。

到了一五七一年，他已然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至交，甚至也有了专属的昵称。“莱斯特伯爵是她的‘眼睛’，海登爵士是她的‘眼睑’。到了更后期，女王甚至将他称呼为‘我的羊肉’或‘我的牧羊人’。”

海登爵士是个相当理想的臣子。根据宫廷史家罗柏·依顿记载，海登爵士是个“修长且身材比例好的男子”，尼可拉斯·希利亚德称他为“英国境内最俊俏的人”。他的长相相当俊美，拥有一头黑发与一双黑眼，但他最吸引伊丽莎白女王之处，就是他那健壮身材散发的魅力与撼动人心的演说。每当他写信，就仿佛恋人絮语般，有时甚至会在信末加上个双关语：“别了，我最亲爱的女孩。全心全意永远属于你，你最快乐的奴隶眼睑敬上。”

一次在两人两天未见之下，海登爵士便写信给女王：

比起与你分开一天，我再也不会以为选择死亡或地狱是个大错误。我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当我感到失落，就更觉离你遥远。服侍你的世界就像天堂，没有你的世界比地狱还难挨。愿神能让我多陪你一个小时。我的脑中充满千丝万缕。我感到十分惊奇。请等着我，我最亲爱的可爱的女孩。对你的热情淹没了我。言语再无法形容。爱我，而我也爱着你。永生永世。

海登爵士用花言巧语和各种稀世珍宝来奉承女王陛下，用他的双眼传达对女王的爱意。他穷其一生追求着女王，而他与其他追求者不同之处，在于他为女王保持独身，这一点让女王相当满意。不过，女王知不知道他用其他方法满足性需求，而且还有个私生女，就不得而知了。

莱斯特伯爵当然相当嫉妒海登爵士，甚至企图贬低他在女王眼中的地位。“当女王称赞海登爵士的舞姿时，莱斯特伯爵便会告诉女王，他会帮她找到更好的舞蹈大师，绝对能把海登爵士比下去。”

“呸！”女王轻蔑地哼了一声，毫不放在眼里。“我才不想管你有什么人。海登爵士是专家！”

随后，女王又对年轻潇洒的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Edward de Vere, Earl of Oxford）倾心，也让莱斯特伯爵感到相当没有面

子，牛津伯爵和海登爵士一样，透过精湛的马上长枪比武技巧掳获女王的心。性格随和的牛津伯爵受到相当程度的古典教育，舞艺精通还会弹小键琴，同时也是个超凡的马术专家——这些精湛的技术，也让他成为女王跟前的红人，当然，女王也相当欣赏他修长的身材与榛果色的眼珠。

人人都认定，牛津伯爵将成为英国宫廷中亮眼的新星，莱斯特伯爵的对手们则不断祈祷牛津伯爵能取代他的地位。当牛津伯爵在西敏寺迎娶伯利男爵的女儿安妮·塞西尔时，女王大方地出席参加，并封他一个昵称——她的“野猪”。但他很快就对年仅十五岁的新婚妻子失去了兴趣，厌倦了宫廷生活，于是将全副精力寄托在海外探险上。尽管女王“对他的个性、舞艺与他的英勇，给予较他人更多的喜爱”，他也完全无法打入女王身边的圈子，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吸引他融入宫廷之中”。“若非他那变化无常的性格，他的地位定能迅速窜起。”一名当时的观察家表示。

* * *

直到一五七一年三月前，都只有女王最亲近的亲信们才知道法国方面求婚的消息。当月，女王向枢密院表示愿意嫁给安茹公爵时，枢密院方面显然感到又惊又喜。就如同伯利男爵所说的一样，这段联姻“绝对能让教皇的恶意阻挠烟消云散”。但先前婚姻协商触礁带来的阴影仍在，枢密院参事们乐观中仍带着保留，其中一名参事相当不明智地问安茹公爵做她的丈夫是否太年轻，大大地激怒了女王陛下。

不久后，凯瑟琳·梅迪奇派出一位特使古弋朵·卡瓦尔坎蒂（Guido Cavalcanti）前往英国宫廷，正式为安茹公爵提亲，他带了一幅比本人好看的画像与一连串的要求：英国方面必须同意安茹公爵实行天主教仪式；婚礼后的隔天，就须让公爵大人加冕成为英王；英国财政部终生每年付六万英镑给公爵大人作为薪资。伊丽莎白女王相

当反对这些条件：她绝不同意安茹公爵加冕为英王，也不愿意付终生薪俸给他，同时在她勉强同意安茹公爵不需参与圣公会仪式后，她断然拒绝让安茹公爵参与弥撒仪式，就算是私底下也不行。

这年春夏两季，两人的婚姻协商理所当然进行得相当缓慢，更糟的是，有耳语传入伊丽莎白女王这一头，显示安茹公爵在友人的撑腰之下，不愿意继续婚姻相关事宜，同时在听闻伊丽莎白女王罹患了静脉曲张造成的溃疡后，甚至公开指称伊丽莎白女王是“瘸腿的老怪物”。针对儿子的无理举动，法国王太后凯瑟琳·梅迪奇正式道歉，但此事件过后的一段时间内，伊丽莎白女王对年华老去相当敏感，因而在法国大使费奈隆面前忍痛跳舞。她意有所指地表示，自己希望亲王陛下不要抱怨自己被迫娶了个跛脚新娘。

但年龄差距的确造成她的担忧，她也时常向侍女们提及此事，但当柯本小姐提议在“年龄不平等”的前提下，不要再坚持走向这桩婚姻之路时，女王仿佛大受污辱，勃然大怒地表示：“我俩之间仅差十岁！”柯本小姐便再也不敢忤逆她的意思了。

安茹公爵不情愿的态度惹恼了伊丽莎白女王，因此她为婚姻协商加上了更多难题，甚至一度提出返还加莱港作为协商成功的条件。伯利男爵警告沃尔辛厄姆爵士，女王似乎故意坚持许多法国绝不会答应条件。在欧洲方面，许多外交圈人士也都感到相当困惑，西班牙方面则普遍认定，伊丽莎白女王绝不会真的成婚，她只是假装对这桩婚姻感兴趣以得到法国方面的支持。“她对嫁给安茹公爵的意愿，不会比我多！”斐利公爵断言。

六月七日，驻巴黎的威尼斯大使回报：“许多法国宫廷人士都坚信婚姻协商将成。”然而安茹公爵依然坚持，绝对不为任何人改变信仰，到了七月份，沃尔辛厄姆爵士显得意志十分消沉。伯利男爵知道公众意见倾向支持这段联姻，于是说服伊丽莎白女王，至少同意让安

茹公爵私下参与弥撒仪式，但她表示自己的道德观不容许任何天主教仪式出现在英国境内。她继续毫无诚意地表示，她不知道为什么安茹公爵在不伤害道德良知的前提下，无法加入英国圣公会。

伯利男爵于是对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感到绝望。与法国贵族结婚，可能是保护她与英国对抗教皇与西班牙恶意唯一的方法，但她似乎正竭尽所能地破坏协商成果。但沃尔辛厄姆爵士与莱斯特伯爵却认为，安茹公爵只是假装对天主教热情，事实却不然，同时也认为，时间一长，法国方面就会让步，女王就占有绝对优势。莱斯特伯爵的背信弃义，让伯利男爵十分失望，认定莱斯特伯爵根本就是私心想与女王结婚。当然，他的确秘密向法方建议，针对弥撒仪式一事千万不要让步。

八月份时，法国王太后再度派出一位特使保罗·德·富瓦（Paul de Foix）前往伦敦，亲自向伯利男爵恳求，但伊丽莎白女王依然故我，不愿妥协。看来她又在玩那拖延战术的老把戏，不断拉长协商战线，却丝毫不想达成任何好结果。伯利男爵知道她的想法，于是在八月三十一日厌倦地向女王提议，表示自己愿意主动指示枢密院，寻找其他保护她的方法，只是“女王陛下究竟要如何解决眼前的危机，答案大概只有上帝知道”。

九月份时，德·富瓦特使灰心丧志地回到法国，最了解伊丽莎白女王的莱斯特伯爵也不得不断然告诉沃尔辛厄姆爵士：“女王陛下的心中，对这段婚姻已不再抱任何希冀，毕竟我们已经尽力提出各种解决之道，但她却依然不断地提出难题。”当月，威尼斯驻巴黎大使回报，表示安茹公爵婚姻协商触礁，但是“英国与法国间的彼此了解，仍有可能形成稳固的联盟”。

* * *

得到理达费谋反事件相关情报后，伯利男爵便建议女王，今年不适合如往常般出巡，但女王不愿理会。甚至在八月二十四日时，前往诺福克公爵位于艾赛克斯沃顿的宅邸做客。

两天后，这时对多数的反叛者来说，理达费的谋反计划注定失败已经是再明显不过，锋头便转而对上诺福克公爵。一名臣子起了疑心，向政府回报诺福克公爵疑似以玛丽·斯图亚特之名，寄送金钱与信件到她于苏格兰的友人处。这件事大大地激怒了伊丽莎白女王，因此在九月三日，诺福克公爵就因重度叛国罪遭到逮捕，随后在九月七日深夜“被秘密带往伦敦塔中囚禁，毫无阻碍”。隔天英国探子就在诺福克公爵位于伦敦的家——查特豪斯宅邸的屋顶瓷砖下，找到一沓有玛丽·斯图亚特署名的信件。

在此同时，苏格兰方面传出消息，苏格兰摄政王莱诺克斯伯爵，于九月四日在史特林城堡遭到谋杀，这一切都是为了报复他吊死了汉米尔顿大主教。而这个位子将由女王自己的人选马尔伯爵（Earl of Mar）来取代，让伊丽莎白女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十月十一日，女王签署一份命令，要求相关人员对他的仆人们刑求，以得到更多相关证据，诺福克公爵总算吐露自己涉入的情节，尽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保证，自己从无陷害女王之意。因此负责讯问他的人员便认定，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对那女人愚蠢的感情”，才是背后最大的动机。没多久后，他便亲笔撰写了自己的认罪自白书。

十月二十四日，尽管有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但玛丽·斯图亚特在英国遭到软禁后的正式代表罗斯主教，也被押进了伦敦塔中，在肢刑架严刑拷问的威胁下，他将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而他所透露的证据，也足以将玛丽·斯图亚特和诺福克公爵都抓来治罪。他强调，玛丽·斯图亚特并不适合做个太太，因为她毒害了第一任丈夫，参与谋杀第二任丈夫的阴谋团体，再嫁给了杀害丈夫的凶手，并希望对方在

战争中死去。罗斯主教认为，玛丽·斯图亚特一定也对诺福克公爵图谋不轨。

“老天，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负责拷问罗斯主教的威尔森先生不住地惊叫。“什么样的女王，什么样的使者啊！”

罗斯主教提供的证据，致使许多英国贵族，疑因涉嫌与诺福克公爵共谋而遭到逮捕，包括南安普敦伯爵、阿伦德尔伯爵、科巴姆勋爵与伦利勋爵。阿伦德尔伯爵用尽心机想要恢复清白，最后却是徒劳无功，余生都在成为皇室耻辱的阴云中度过。南安普敦伯爵则在伦敦塔中被关了一年多。西班牙大使则被英国驱逐出境，至于理达费，这起阴谋背后真正的主谋，则安全地潜逃出境，让伊丽莎白女王完全找不到他。

* * *

在发现理达费阴谋案后，伊丽莎白女王对玛丽·斯图亚特的态度，变得相当严峻，并下令进一步严加看守这个表亲。此时她已完全不再想协助玛丽·斯图亚特复位；相反，她已经了然于心，这一生再也不会放她自由。她坚信玛丽·斯图亚特会不惜代价换取自由，若有可能，甚至会强夺伊丽莎白女王的王位。在理想破灭之下，伊丽莎白女王下令要伯利男爵公布首饰盒密函，并且总算承认了詹姆士六世为苏格兰王的地位。

当阴谋案相关证据正式摊在玛丽·斯图亚特面前时，她只表示一切都是为了夺回苏格兰政权，其他人的非分之想“都是滔天大罪，漫天大谎”。她表示自己与理达费完全没有关联，对诺福克公爵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只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臣子，与她无关。

查理九世一直支持着玛丽·斯图亚特，此刻也决定放弃这个前兄嫂，让她自己面对未来的命运。“唉，这可怜的愚人，至死方休。他们定会夺她的命。这都是她的错，都是她太愚蠢。”查理九世说道。

在阴谋事件曝光后几周来，这是玛丽·斯图亚特最害怕的一件事。遭到王室罢黜的第一弹，就是英方下令，将她身边许多疑似涉案的人全数调离。对如此“严苛的手段”，玛丽·斯图亚特表现出义愤填膺的模样，但这却也帮不了她。

一段时间后，情势看来似乎能让她平安无事时，她鲁莽地写信给伊丽莎白女王，希望女王准许她离去。她的信件石沉大海，而玛丽·斯图亚特又再度提笔写信，以“无礼、暴躁、怒气冲冲又充满恶意的语气”表达自己的立场。伊丽莎白女王怒不可遏，于是告诉玛丽·斯图亚特，应该对于自己没有遭受更严重的处置，也没有弃她于危险之中心存感激。

* * *

理达费阴谋案水落石出，让伊丽莎白女王与英国政府警觉与法国建交，尤其是缔结姻亲关系，应当说是相当紧急的事件。伊丽莎白女王只好让步，并尽可能地让她与安茹公爵垂死的婚姻协商复生，于是她承诺，愿让安茹公爵私下进行弥撒仪式。“女王陛下从未如此渴望过婚姻”，伯利男爵写下如此字句。

沃尔辛厄姆爵士却提议不要重启协商大门，因为就算伊丽莎白女王答应“他的任何要求”，安茹公爵仍将“断然拒绝”两人成婚。夏都诺夫小姐（Mademoiselle de Chateauneuf）尽管传闻指出他可能会迎娶波兰公主，但他却完全不愿离开法国宫廷。若伊丽莎白女王坚持继续协商，沃尔辛厄姆爵士提出警告，她将可能面临遭公开拒绝的耻辱。

但伊丽莎白女王并不愿放弃，十二月份，在伯利男爵的支持下，派遣了托马斯·史密斯爵士前往巴黎测试水温；若下嫁安茹公爵无望，托马斯·史密斯爵士的任务就改为与法方缔结友好与互助条约，以打破两国向来敌对的情势。史密斯爵士坚信，与法方联姻是维护伊丽莎白女王未来安危的重要步骤，但他也知道，女王很快将在婚姻市场上失去优势：她年纪已经不轻了，三十八岁的她也不再美貌，还有掉发危机，甚至必须以假发片或全顶假发遮丑。“她之前的毛发有多茂盛，现在就有多秃。”史密斯爵士向伯利男爵表示。

大使先生很快就发现，尽管安茹公爵的母亲“热泪盈眶”地哀求他，他对伊丽莎白女王与英国王位已不再有任何兴趣。“亲王现在被更重要的事情所羁绊，并且他也坚持自己的信仰。”史密斯爵士冷漠地表示。对于他的行为，伊丽莎白女王自然感到愤怒不已，她沉痛地声明，既然寻找配偶的企图反而让她受到利用，她希望臣子们能理解她为何宁愿选择独身。

但两天后，凯瑟琳·梅迪奇发现，法国相当需要英国的友好，因此建议伊丽莎白女王另订一门亲事，于是推出小儿子阿朗松公爵赫其里斯-弗朗西斯（Hercules-Francis, Duke of Alençon）代替哥哥成为新郎。“若不透过联姻的方式，她无法建立如此坚定又长久的同盟或亲善关系”，而在宗教议题上，阿朗松公爵是个“较不细心谨慎的人”。

史密斯爵士随即理解这桩婚配能带来许多政治利益，并赞成凯瑟琳王太后的论点，若伊丽莎白女王“真想结婚，绝对找不到更适合她的对象了。阿朗松公爵这个人选，绝对比其他入好一万倍”。阿朗松公爵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对胡格诺教徒的怜悯，而且也“不是那么顽固、鲁莽，不那么倾向天主教，而且并不像他哥哥般（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说）愚蠢又倔强得像头骡子。他较为温和、有弹性，是较好

沟通的人”。而且他也永远无法坐上法王大位，因此移居英格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但史密斯爵士却表示，自己无法理解，为什么提及“繁衍后代”的问题时，法国宫廷中每个人都表示，阿朗松公爵“比别人更适合”，这件事只能留待伊丽莎白女王费心了。

尽管如此，阿朗松公爵年仅十七岁，不到伊丽莎白女王一半的年龄，且在童年经历两次天花的洗礼后，脸上留下了难看的疤痕。他一直都是个身子羸弱的孩子，与同龄的孩子相较起来体型瘦小。他的母亲骄傲地指着他脸上新长的胡须，表示这些胡须可以遮盖掉一些疤痕，同时指称“他精力相当充沛且健壮”。史密斯爵士认为那些麻子“并不影响他的男人味”。

当臣子们向伊丽莎白女王转告阿朗松公爵的求婚时，她以阿朗松公爵太年轻、体格太小而断然拒绝。当伯利男爵坚持，阿朗松公爵的身高与他一样高时，伊丽莎白女王愤然表示：“我看是跟你孙子一样高吧！”沃尔辛厄姆爵士却抱持相当乐观的态度，认为在这次的婚姻协商中，宗教上的难题不会再是艰难的绊脚石了，因此建议女王陛下展开协商，女王因此答应了。她永远拒绝不了他人追求的滋味，并认为自己定能无限期地延长这个追逐游戏。

* * *

一五七二年的新年期间，莱斯特伯爵送给女王一个珠宝手环，中间则是小小的表面——史上第一个为人所知的手表。尽管这是个庆祝的季节，宫廷中的气氛依然紧绷。

一五七二年一月十六日，在西敏寺大厅，诺福克公爵在二十六位贵族组成的陪审团审讯下被定罪，同时被判犯下十三项重度叛国罪。这次的判决——就如过去都铎时期大部分的审判一样——资料都并未留存。士鲁斯柏立侯爵在旁聆讯，哭得仿佛像是要他亲手杀了诺福克

公爵般。取出内脏与五马分尸是叛国贼的惩罚，但若叛国贼是贵族身份的话，政府给予最严重的惩罚就是斩首而已。

诺福克公爵再度回到伦敦塔中，日夜受到严密监控，他以写道别信与规劝信给孩子们来打发时间。针对他的请求，伊丽莎白女王大方地同意，让他的朋友伯利男爵做孩子们的看护人。当士鲁斯柏立侯爵将诺福克公爵遭到罢黜一事告知玛丽·斯图亚特时，她哭得十分可怜。

诺福克公爵定于一月二十一日执行死刑，但伊丽莎白女王却无法签署他的死刑执行令。这不只是因为他是英国最高等的贵族，普遍受到人民景仰；还因为他是女王的表亲，与她“有血缘上的亲近关系”。她延后了死刑执行的时程，拖了好几周。

“女王陛下就是心肠这么软的女子，”伯利男爵叹了一口气，“心软只为她带来伤害，从未有任何建树，但她却觉得，做伤害自己的事比较可爱。一定是神冥冥之中在保她性命啊！”

二月初，女王终于被劝服，愿意执行死刑令，但就在诺福克公爵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晚上，她紧急召来伯利男爵，苦恼不已地表示要废止执行命令；隔天特地来到伦敦塔丘观看诺福克公爵死刑的人们，只能看到另外两名男囚被吊死。

枢密院成员们都不能理解她的犹豫。“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在帮助女王陛下。”伯利男爵不住地祈祷，亨斯顿勋爵则表示：“这世界都知道女王非常明智，对于一个如此在意身份的人来说，也没有人能比她有更大的智慧，尤其是保命之道。女王陛下更要当心的，就是生命操控在人民手上，因此得注意家国毁灭与宗教败亡。”

一直到一五七二年三月底，诺福克公爵的处决案依然搁置，因为女王罹患了非常严重的肠胃炎。她的医生为她的性命感到忧虑，莱斯特伯爵与伯利男爵则花了整整三天，日日夜夜焦虑地守在她的病榻旁，莱斯特伯爵代理了嘉德勋章颁赠仪式，而在这次的仪式中，获奖人包括了伯利男爵。这两人之间的对立已经不再紧绷：他们会因社交需要而拜访彼此，以友善的态度对待彼此，也建立了友好的工作关系。尽管在政治上两人时常意见相左，但两人都对女王、对国家、对新教信仰忠贞不贰。

伊丽莎白女王病愈后，对此病轻描淡写，只说自己是吃了不新鲜的鱼，但对枢密院来说，继承问题未解的忧虑再度成为焦点，因为他们知道，若女王此时辞世，英国将落入外国势力之中，然后以高压的态度推动天主教信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只好说服伊丽莎白女王紧急召开国会，制订方案对抗玛丽·斯图亚特势力。

就在这一个月，年已八十多岁的温切斯特伯爵逝世。财务大臣的职位先是给了莱斯特伯爵，他以“相关经验与知识不足”为由婉拒了。接着女王将这个职务封给了伯利男爵，于是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放下国务大臣这个吃重的工作。他的痛风问题越来越严重，四月份痛风严重发作时，就连女王都担心他的身体，还到他床前去关心他。

是月，伊丽莎白女王再度签署诺福克公爵的死刑执行令，然后又在这最后一刻反悔。看来，最终诺福克公爵可能不需要面对极刑的那一刻。

英国民众对玛丽·斯图亚特的反感达到了高点，伊丽莎白女王多数的臣民都认同沃尔辛厄姆爵士的看法，认为：“只要留这个邪恶的女人不死，女王陛下的王权就难以安定，女王身边的忠仆们也难保身家安全。”

一五七二年五月八日，英国国会开议，上下两院共同聆听玛丽·斯图亚特犯下的罪行报告，并立即指示将她处死。一名英国国会议员表示，听闻苏格兰女王谋杀达恩里勋爵的手法，并致使苏格兰陷入一片混乱后，他觉得寝食难安，并坚持要女王陛下“砍下她项上人头，省去这一切的纷扰”。另一名国会议员则指出：“先前早已提醒过她，接下来就用斧头来警告她。”

上议院与下议院共同组成一个委员会，以决定玛丽·斯图亚特的命运。五月十九日，委员会成员想出了两种解决玛丽·斯图亚特问题的方法。英国方面可以叛国罪将她治罪，进而将她处斩，或者是可以透过立法的手段，将她排除在英国王位继承之外，并警告她，若再动伊丽莎白女王的歪脑筋，将会丢了性命。

国会方面一致倾向第一种选择，但女王却坚持第二种选择较为明智，他国统治者不须遵从英国法律，她的名誉并不允许她剥夺苏格兰女王的权力。且若采用第一种方法，国会便将维持整个夏天开议，造成财政沉重的负担，而且伦敦的夏天常有黑死病疫情。

英国上下两院完全不在乎：他们只想让玛丽·斯图亚特见血。
“许多议员都为女王掬了一把泪”，就连主教会议都以许多“神圣的论点”来说服伊丽莎白女王同意夺去玛丽·斯图亚特的性命。主教们指出，若女王不愿处决这个弑夫凶手、叛国主谋，这个苏格兰的克莱天奈斯拖（Clytemnestra）^[1]，就是违反了神的意志与自己的良知。也要女王千万不要认为“法律上威胁性的话语”就可以阻止玛丽·斯图亚特未来再动什么坏脑筋，也无法避免有二心的臣子们协助她。

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国会起草一份请愿书上呈女王，这份请愿书名为“好臣子的呐喊与女王陛下的恻隐之心”。然而伊丽莎白女王早已下定决心，无法“将一只飞出笼中寻求自由，来到我羽翼之下的鸟儿杀死。我的荣誉与良知都不允许！”同时，她也不想激怒支

持玛丽·斯图亚特的天主教人士，让他们持械报复。五月二十八日，她从上下两院代表手中接过请愿书，但在讲稿已不存在的一场演说中，女王以高明的演讲术拒绝了国会的请求，甚至让议员代表感谢女王对他们的好。只有认定玛丽·斯图亚特是个“恶名昭彰的贱人”的激进派国会议员彼得·文特沃斯（Peter Wentworth），被人听到私下嘀咕着不需要感谢女王。

五月二十六日，在被迫以较不激烈的手段对付玛丽·斯图亚特的情况下，英国国会撰写了一份法案，详细列出她所犯的罪，并剥夺她宣称对英国王位的所有权利。此后若有人胆敢宣称为继位者，或主张拥有继位权，便是违法英国法律。但当此令提交女王，准备进行御准时，女王却行使了否决权。看来她完全不想采取任何对付表侄女的策略，这让枢密院十分失望；他们派驻国外的探子笃定地回报，菲利普国王与罗马教皇也参与了这场阴谋，准备推翻她而巩固玛丽·斯图亚特的地位。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伊丽莎白女王写了一首有关玛丽·斯图亚特的十四行诗，相当出名，随后在女王仍在世时，由乔治·帕特南（George Puttenham）收录在他的书《诗艺论》（*The Art of Poesie*）中出版。以下摘录这首十四行诗：

争议之源，播下了不和之种，
背离常轨，在和平之田中毫无所获。
漂离他国的船只，不得入港来；
本国不见容的陌生势力往他处去。
生锈久置的剑将重新磨亮，
削去寻求变化者的头颅，为胜利欢呼。

饶过了玛丽·斯图亚特，伊丽莎白女王便不得不拿诺福克公爵开刀。国会相当激动，盼望法令能付诸实现，因此在五月三十一日这天，伊丽莎白女王屈从于这股潮流，签署诺福克公爵死刑执行令。隔天，她罕见地踏入伦敦塔，确保这样的安排恰当且适切，但她并未见囚犯一面。

六月二日清晨七点，诺福克公爵在伦敦塔丘正式处斩，向围观的群众宣布他从未信奉罗马教皇，并承认将他斩首的判决是正义的。

“人在这里丧命并非新鲜事，”他向群众表示，“从悲天悯人的女王上任后，我是第一个叛徒，愿上帝让我成为最后一个狂妄之徒。”身着高贵的黑色绸缎紧身上衣，他拒绝蒙眼，因而死得勇敢，据说他的头颅“一刀就被斩断”。他的遗体被埋在伦敦塔的锁链中的圣彼得教堂祭坛下，与几位表亲一起做伴，包括安·波林与凯瑟琳·霍华。怀特霍尔宫的臣子们则表示，当天伊丽莎白女王显得郁郁寡欢。

[1] 克莱天奈斯拖：希腊神话人物。阿葛曼农之妻，与奸夫一同谋杀阿葛曼农，后皆为其子所杀。——译者注

16 不尽如人意的议题

一五七二年四月十九日，英国与法国确定签订《布卢瓦条约》。条约中订定，两国将互相提供军事与海上援助，对抗共同敌人。他们的共同敌人，当然是包含西班牙与尼德兰境内信仰新教的地区，但伊丽莎白女王依然秘密援助后者，主要的目的是刺激菲利普国王与亚尔瓦公爵。这项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英国在欧洲再也不孤单，同时也等同于结束了法国对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援。因此英国王室在怀特霍尔宫举办了铺张豪华的晚宴，由莱斯特伯爵做东，他甚至自吹自擂地表示：“这是我有记忆以来最盛大的一次了。”

这一年的春天，因为忧心玛丽·斯图亚特会向西班牙求援，凯瑟琳·梅迪奇再度与托马斯·史密斯爵士协商两国联姻对邦谊的必要性。

“耶稣啊！”王太后叹了一口气：“贵国女王难道看不出这么简单的道理，若她不婚，危险就永远存在？若她风光嫁入欧洲贵族世家，还有谁胆敢威胁她的安危？”

史密斯点头表示同意，并回答若伊丽莎白女王陛下有个孩子，“那这些胆敢前来挑战王权的麻烦人物，像是苏格兰女王或其他想要置她于死地的人，根本就没戏唱了”。

“为什么只要一个孩子？为什么不生个五六个？”凯瑟琳王太后忍不住问，毕竟她自己就生了十个。

“她若能生一个，就谢天谢地啦！”史密斯大使随即答道，言词间充满了情绪。

“才不呢！”王太后表示，“至少该生个两个男孩，以防其中一个死了，然后再生个三四个女孩与我们联姻，并与其他国家贵族成亲维持国力。”

“为什么？”史密斯大使微笑着，“您希望公爵殿下加紧脚步吗？”

凯瑟琳王太后笑着说：“我当然非常希望。”她表示，“我认为在我有生之年至少会有三四个吧，这样我也不需要翻山越岭跨海去看女王陛下和他们了。”

六月时，法国王太后派遣一位特使蒙莫朗西伯爵（Duke of Montmorency）前往伦敦，并授予权力批准《布卢瓦条约》，且正式提出阿朗松公爵作为追求女王的人选。伊丽莎白女王是个相当亲切的女主人，盛情款待来访的大使，并致赠嘉德勋章给蒙莫朗西伯爵；但对于法国方面的求婚，她并没有多说什么，对阿朗松公爵的年纪与外表则持保留意见。蒙莫朗西伯爵离开时，伊丽莎白女王允诺会好好考虑联姻一事，并在一个月内给查理九世一个答案。

接着伊丽莎白女王要伯利男爵下达指示，请沃尔辛厄姆爵士针对阿朗松公爵提出完整报告。在沃尔辛厄姆爵士回报表示阿朗松公爵相当聪明、英勇，不像一般法国人那么轻浮，同时在宗教议题上“能轻易说服他相信真理就好”，让女王感到欢喜不已。他脸上那丑陋的疤痕闻名遐迩，但许多人都不断向伊丽莎白女王保证，绝对不如传言中可怕，“他脸上的缺陷并不严重，因为这些疤痕较厚，并不是又大又深的那种”。而他的胡须也遮盖掉部分的疤痕，但“他鼻子上的些许疤痕就较为讨厌”，尽管如此“我最后一次觐见他时，发现他一天一

天变得更加俊美”。尽管如此，“他最大的缺点恐怕就是眼睛了。除了脸上的天花疤痕外，他似乎得不到任何宠爱。当我将他的眼睛与女王陛下优雅的眼睛相比时，这两对眼睛恐怕永远无法有相似之处”。伯利男爵十分忧虑，于是开始相信费奈隆大使所言，表示他认识一位能治愈公爵脸上疤痕的医生。

接下来几周，伊丽莎白女王都在深切考虑此事，情绪反复无常，让她最放不下心的依然是阿朗松公爵的小小年纪。令她最忧虑的，则是这段荒谬的婚姻，会引来欧洲各界什么样的看法。在实际面上，她也在考虑，阿朗松公爵脸上的天花疤痕，是否可以作为谈判的条件，要求法方返还加莱港作为这门亲事的条件。

接着到了七月份，凯瑟琳·梅迪奇派出阿朗松公爵的好友穆尔亲王（Monsieur de la Mole）出使英国，希望能成功说服伊丽莎白女王接受阿朗松公爵的求婚。穆尔亲王是个俊帅又优雅的年轻人，法方希望用他那堂堂的风采来软化伊丽莎白女王的心。“看来王太后距离成功比我想象得还要近。”伯利男爵记录了他的观察。

伊丽莎白女王对穆尔亲王的魅力意兴阑珊，同时也并不相信凯瑟琳·梅迪奇，她认为法方只是想要引诱她加入对抗驻扎在尼德兰的亚尔瓦公爵的战争中，法国方面对于家门口就有强大的西班牙军队，感到与英国一样的紧张。查理九世期盼能让阿朗松公爵担任尼德兰摄政王，但这部分对英国来说也有其利益存在，由法国军队驻扎在尼德兰，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也无法舒缓紧绷的情势，毕竟，女王陛下认定比起西班牙驻军，瓦洛王朝并不稳定，也不值得相信。

一五七二年七月，伊丽莎白女王又有了度假心情，于是穿越泰晤士河谷与英国中部地区，展开一场出巡长征。在特欧伯兹接受伯利男爵的款待后，女王于二十五日抵达高兰城，国玺大臣尼可拉斯·贝肯爵士在赫特福德郡的宅邸新落成，于是他偕同担任学者工作的太太安

库克，与两位学识极高的儿子安东尼与弗朗西斯，一同欢迎女王莅临。女王对于这座宅邸的豪阔气派，丝毫不感特别。

“阁下似乎将房子建得太小了。”女王说。

“不，女王陛下，”贝肯爵士回答，“是女王陛下让我大得连房子都容不下了。”

来到柯芬特里，书记告诉女王，当地民众“纷纷贪婪地想要一见女王陛下”。八月份时，她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待在华威，在公爵夫人的陪伴下，女王坐着无顶马车抵达，好让群众争睹女王风采。在华威的书记阿格良贝（Mr. Aglionby）支支吾吾地说完欢迎词后，伊丽莎白女王要他放松一下。

“请上前，亲爱的书记，”女王说，“有人告诉我，你不敢正眼瞧我，也不敢直言，但若我是你的话，我可能会比你更怕我自己。”

当地的男男女女在华威城堡的庭院里示范了乡间舞步，女王就从她的窗户欣赏；“女王陛下似乎心情相当好，相当开心”。一天在城堡中用晚膳的时间，她坚持要穆尔亲王陪坐在她身旁。接着他以激赏的心情，看着女王弹奏竖琴给所有的宾客听。他们私下交谈了几回，一天晚间，穆尔亲王甚至陪着女王，去看公爵与公爵夫人安排的灿烂烟火与模拟水上战斗，牛津伯爵也参与了这些活动，“女王看起来都相当愉悦”。

不幸的是，这些活动却因为爆竹与烟火点燃的火花，造成城里四栋民宅起火燃烧，附近还有一栋亨利·考伯先生的房舍遭到焚毁，而蒙上阴影。伊丽莎白女王亲自对他与他的妻子表达了遗憾，并在臣子之间发起了募捐，募得二十五英镑又六十三便士。

尽管穆尔亲王相当努力，伊丽莎白女王依然不愿意允诺接受阿朗松公爵的追求。她向费奈隆大使表达了疑虑，并坚持若不亲眼见见阿朗松公爵，就无法下决定。法国大使费奈隆则表示，法王与王太后相当愿意安排一个见面的机会，但唯一的条件是，她必须先答应成婚。她回答自己必须先与公爵见面，确定彼此相爱，才能给确定的答案。伯利男爵此时正遭受严重痛风之苦，只能坐着担车加入出巡的行列，他已经开始怀疑这场联姻可能无法实现了。

到了八月二十二日，伊丽莎白女王抵达了凯尼尔沃思，接受莱斯特伯爵的招待；当地举办了“相当高贵的运动赛事”。但到了九月三日这天，女王出外打猎，一名信差带着沃尔辛厄姆爵士从巴黎送来的信抵达，而这是一封让女王流泪的信，她取消接下来的所有娱乐节目，并将穆尔亲王送回法国去。一名长驻伦敦的西班牙探子通知亚尔瓦公爵，伊丽莎白女王将负责音乐与表演的艺人送走，再也没有舞蹈、滑稽剧，这些负责娱乐女王的人近来无所事事，因为英国皇室有不尽如人意的议题要思考。

* * *

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国发生的事件，几乎撕裂英法两国好不容易建立的邦谊。查理九世的妹妹法兰西公主玛格丽特，与信仰新教的纳瓦拉国王亨利（Henry of Navarre）大婚的这一天，心怀不轨的天主教吉斯派系，在凯瑟琳·梅迪奇的支持下，企图谋杀胡格诺教派首领加斯帕·德·科利尼将军（Admiral de Coligny），因为他逐渐获得国王的重视，使得王太后感到相当妒忌。这个计划最后虽然失败了，却在巴黎引发了一场暴动与惊慌。八月二十四日是圣巴托罗缪日前夕，在法王查理九世不情不愿的协助下，凯瑟琳·梅迪奇下令诛杀城中所有的胡格诺派教徒。天主教徒群起屠杀了所有被他们揪出

的胡格诺派教徒，巴黎发生的这场血案导致三千到四千人丧生。接下来四天，同样的滥杀情形蔓延各省，让死亡人数攀升到一万人。

菲利普国王听闻此讯，竟私下在寝室中欢喜狂舞，玛丽·斯图亚特也彻夜未眠地庆祝，而罗马教皇则对一举歼灭这么多异教徒，表达满意。此事件后来被称为圣巴托罗缪惨案，震惊欧洲各地的新教徒，引发反法与反天主教情结。逃亡英国的胡格诺教徒带着许多伤痛悲惨的故事，街道上血流成河，河里则是望不尽的尸体。伯利男爵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而沃尔辛厄姆爵士在大屠杀的当下躲了起来，幸运地捡回一条命，但却受到严重惊吓。

尽管伊丽莎白女王十分气愤，并矢言找上法国王太后为大屠杀事件负责，但女王也知道，她根本无法为受害的胡格诺教徒复仇，她不能放弃英法联盟，这对她与英国的安危都相当重要。她能做的，只有表达深深的震惊与气愤，接着秘密援助武器给胡格诺教徒，并透过外交手段来保护他们。

到了九月五日，法国大使费奈隆要求觐见女王，当面向女王转达法国政府对大屠杀事件的解释，他指称这一切都是“意外”，伊丽莎白女王让他在牛津等了三天。最后他终于在伍德斯托克宫获准觐见女王，却发现伊丽莎白女王与宫廷上下全体人员都穿着最沉重的丧服，他走上前行吻手礼时，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站着，以斥责的眼神看着他。伊丽莎白女王冷着一张脸，领着费奈隆大使到窗边，表示她希望查理九世愿意在世人的关注下，洗清自己的污名。费奈隆大使则说谎不眨眼地表示，当时查理九世发现新教徒试图谋反，杀害的对象是他与他的家人，因此他必须先声夺人，以避免遭到杀害。而迫害胡格诺教徒绝非国王陛下的意思，他也并未撤销宗教容忍的官方命令。

伊丽莎白女王直指如此的挑衅行为并不能作为暴力泛滥的借口。她同时表示，当自己看到大屠杀的消息时，忍不住哭泣。但查理九世

身为一国之君也是个明理的人，因此她必须接受查理九世的解释，同时在费奈隆大使保证在主公的眼中没有什么比英法联盟更重要后，感到些许宽慰。她深深希望，接下来几周，查理九世能运用权力，弥补如此恐怖的溅血事件，这当然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名誉，洗清自己在世人眼中的污点。

尽管阿朗松公爵与大屠杀毫无关系，甚至曾大声疾呼反对这起暴力行为，但伊丽莎白女王仍不愿再进行婚姻协商。

“我们怎么可能还认为国王陛下的弟弟，适合做我国亲王呢？如果夫妇之间存在着模拟两可的难题时，我们又要如何相信这两人之间的爱意会滋长、延续、衍生？”女王如此诘问沃尔辛厄姆爵士。因此，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两国协商戛然而止，但法国方面持续努力恢复协商。当法国王太后提出要求，希望让伊丽莎白女王与阿朗松公爵在第三国见面时，伊丽莎白女王随即宣布，除非查理九世未来对待胡格诺教派的手段令她满意。

十月份，查理九世派遣特使慕维席耶（Mauvissière）前往伦敦，请求伊丽莎白女王这个被逐出教会的人担任他新生女儿的教母，两国关系开始融冰。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尽管这个女婴将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女王终究还是答应了。但她认为，若由莱斯特伯爵这个著名的新教信奉者，代表她前往法国参与施洗典礼，实在太过冒险，因而改派伍斯特伯爵（Earl of Worcester）带着一个金盘前往祝贺，然而他的船在英吉利海峡不幸遭海盗洗劫，金盘便消失无踪。

毫不意外，圣巴托罗缪惨案在伊丽莎白的臣民间激起一阵要玛丽·斯图亚特项上人头来赔的呼声，他们认为玛丽·斯图亚特肯定涉入这起天主教阴谋。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并不希望透过处决玛丽·斯图亚特的方式，激怒菲利普国王与罗马教皇，因此在九月十日这天，在女王的指示下，枢密院参事们秘密命令马尔伯爵，前去商讨玛

丽·斯图亚特重返苏格兰事宜，并由苏格兰方面以谋杀达恩里勋爵之名惩罚她，而这项惩罚，无疑就是要夺去玛丽·斯图亚特的小命了。但马尔伯爵表示，若处决时有英国士兵在场，他才愿意，但此举会让人将玛丽·斯图亚特之死，联想到伊丽莎白女王身上，因此伊丽莎白女王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

十月份，危机解除后，英国境内对于屠杀事件的反弹力道已过。但就在这个月，马尔伯爵去世，而玛丽·斯图亚特的命运也就有了改变，因为苏格兰摄政王改为摩顿伯爵，而他则是玛丽·斯图亚特最大的敌人。

此时，伯利男爵试图想要重启英国、西班牙与低地国家间自一五六九年以来便遭封港令限制的贸易，这一封港令对双方都是一大伤害。尽管西班牙与英国双方依然在冷战中，作风务实的亚尔瓦公爵已经看到，恢复贸易对各方都有好处，也能减少国与国间的紧张关系，但菲利普国王始终不愿听信。

“陛下，有时候身为统治者，就必须去做自己并不愿意的事情。”亚尔瓦公爵指出。但菲利普国王仍无法与英方交好，因此一直到一五七三年，两国的封港令才正式解除。

* * *

经过了十三年，伊丽莎白女王与莱斯特伯爵之间的感情，已不如过去那么热烈，但两人仍为传闻所扰。事实上，伊丽莎白女王与莱斯特伯爵之间仿如老夫老妻般，分享彼此的兴趣，提供对方感情寄托与支持。他们之间共同的热情与忠诚所在，在两人之间形成根深蒂固的联结，永远也无法撕裂，最后情势逐渐明朗，就连莱斯特伯爵都清楚明白，女王这一生都不会嫁给他。对他这样的男人来说，这是十分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毕竟他与同阶级的人一样，都非常渴望由自己的子

嗣来继承他的财产与头衔。表面上，他扮演着忠贞不贰的追求者，和他一样的还包括海登爵士与牛津伯爵。

海登爵士总是以眼泪及怨怼，来表达自己的愤怒，而女王对牛津伯爵的偏宠，就让他嫉妒不已，因为近来他认定自己在女王心中，有比他人更高的情感价值。他在政坛上的对手们，宣称“就算女王真如传闻中那么贞洁又那么好，海登爵士在内宫中对女王的依赖也已超过了常理”，这样的说法自有其道理存在。

然而事情的发展，可能都不如他们两人的预期。一五七二年十月，海登爵士的一位朋友，诗人艾德华·戴尔（Edward Dyer）的来信，成为相当可靠的证据，表明两人似乎无话不谈。戴尔爵士写道：“虽然一开始，女王陛下（相当礼貌地）征询你的意见，一直到她对你产生情愫前，她一直都相当忍耐你的粗鲁；现在先前的满足感褪去后，它对你的帮助可能不如伤害来得大。不要太过谴责女王陛下的弱点，而要喜悦地称赞这是她的天性，仿佛这一切就是她天生使然。”

后人对于戴尔爵士所指的一切多所推测。伊丽莎白女王最终是否抛弃一切的顾忌，交出了她相当自豪的贞操？或者她更出乎意料地在满足性需求的同时，巧妙地维持处子之身？后者较有可能。若海登爵士的身体勾引了她，在某种程度上，女王又委身于他，她显然相当后悔，更希望他依然仍将她视为童贞女王。据传海登爵士写了相当多柏拉图式的信件给女王，因而不支持这样的推论，但我们可以看见，两人之间的情感相当炽热。然而海登爵士随后曾向约翰·哈林顿爵士发誓，他与女王之间绝对清白。

到了年底，伊丽莎白女王迁往汉普顿宫过圣诞节与忏悔节；在主显节这天，莱斯特伯爵送给女王两个镶嵌着宝石的闪亮领饰。不久后，女王便与伯利男爵大吵一架，原因不明。莱斯特伯爵表示愿意为两人调解，刚好女王也有意和解。“我向你保证，女王陛下一如往常

地赞同我的意见，”莱斯特伯爵的信件中写着，“我想，你们两人的情谊能够恢复。感谢老天，女王陛下的怒气并不像其他国君一般，就算她偶尔犀利，也是因为她相当看重我们。每个人都有报答她的义务，这是我们非做不可的义务。我们两个都属于这个层级，我亲眼见证你不输给任何人的坦率热诚。支持住，你绝对不会失败。”

一五七三年五月，士鲁斯柏立侯爵之子向父亲回报：

莱斯特伯爵对女王陛下相当深情，女王陛下也对他展现出一往情深的模样。近来，他比以往都更努力要取悦女王。现在宫中有两位姐妹都对他相当深情，但却希望渺茫：她们是谢菲尔德小姐与法兰西丝·霍华。她们（彼此争着谁是最爱他的人）陷入一场爱情战争中，伊丽莎白女王对她们的态度也不好，当然对莱斯特伯爵也没好气，甚至还派了眼线在他身边。

显然，莱斯特伯爵与谢菲尔德小姐德古莱丝（Douglas）的秘恋，就算不到几年，也有几个月的时间，但却紧守住这个秘密，就怕惹怒了女王。

谢菲尔德小姐年届二十五岁，长得十分标致。她就是近来逝世的霍华德勋爵威廉之女，他是女王的舅舅，也是枢密院参事，尽管谢菲尔德小姐年纪轻轻就已经嫁给了谢尔菲德勋爵，但一五六八年勋爵撒手人寰，留下德古莱丝这个年仅二十岁的遗孀。不久后，她随即升格为女王寝室侍女并搬入宫中，就在这之后不久，她便吸引了莱斯特伯爵的注意力。更有可能的状况是，莱斯特伯爵因为怨恨海登爵士对女王的影响，愤而展开这段恋情。

宫廷传言随后则说，这段畸恋可能从谢尔菲德勋爵在世时就开始，两人在莱斯特伯爵造访贝尔瓦尔城堡时就已有通奸的情事。也有人说谢菲尔德勋爵曾找到两人的通信，罪证确凿地证实了两人的奸情，但当他前往伦敦准备请求离婚时，莱斯特伯爵派人毒死了他。没有其他证据支持这个理论，但莱斯特伯爵常遭政敌指控对任何与他不

和的人下毒，甚至包括了他的好友尼可拉斯·瑟洛摩顿爵士，因此这样的传闻可信度并不高。

后来德古莱丝的确成为莱斯特伯爵的情妇，并且开始要求婚姻关系，尽管莱斯特伯爵一再重申，他与女王之间的关系容不下他对别人的承诺。在一封写给不知名女士的信中（这个对象很可能就是德古莱丝）他解释了自己的立场，并给予对方两种选择：要不就继续当她的情妇，要不他会帮她找个适合的丈夫人选。不用说，这两种选择她都无法接受，尽管她一直都知道莱斯特伯爵对自己的情感：“如你所知，我一直喜欢着你、爱着你。尽管我是个意志不坚的人，但在上帝面前，我并非没有道德良知，对朋友也该要坦诚，我特别选择了你，对我来说就是最珍贵的事，我如此在意，甚至可为了你抛弃我的政治地位。”

一五七三年春天，宫廷人士开始流传两人之间的八卦，谣言指出，在一五七一年到一五七二年间，德古莱丝疑似怀了莱斯特伯爵的孩子，并在达德利城堡中秘密产下一个孩子，这座城堡属于莱斯特伯爵的姐姐，而她则嫁给了莱斯特伯爵的表哥爱德华·达德利勋爵。他们的结晶是个女孩，在受洗之前就不幸死亡。后来德古莱丝坚决否认这样的传闻，但许多人依然深信不疑。

事情至此，两人要隐瞒私通的秘密，似乎也不可能了，德古莱丝知道，若两人之间的细节遭到公布，她的一生名节就败裂了。因此她便更进一步地逼迫莱斯特伯爵尽快迎娶她，甚至威胁他若不照做，她将在女王面前抖出一切。伊丽莎白女王对两人的关系早已疑心，但她只知道，德古莱丝与她的一位姐妹法兰西丝（Frances）正因抢夺莱斯特伯爵形成对立状态。

五月份，莱斯特伯爵允诺与德古莱丝秘密结婚。两人的结婚典礼就在埃舍尔的一栋小屋中举办，当场至少有三名证人。新娘由莱斯特

伯爵的一位朋友牵出场，并以潘布鲁克伯爵致赠给莱斯特伯爵的一枚钻石戒指作为信物。尽管两人婚姻的合法性随后遭到质疑，反对派人士引起了一股骚乱，但相关证据依然直指两人的婚姻充满合法性。

婚后，莱斯特伯爵的生活就奔波在两个女人之间，在宫中维持之前与伊丽莎白女王的情谊，而女王之前的质疑也似乎减轻了下来；当他不在宫中时，则秘密前往埃舍尔与莱斯特宅邸和德古莱丝一起生活。他非常清楚，他的敌人只要抓住机会就会趁机败坏他的名声，若此事走漏风声，他知道他们甚至会毁了他。因此当德古莱丝要求佣人们以公爵夫人的等级伺候她时，莱斯特伯爵严格禁止，以免漏了口风。

* * *

一五七三年七月，查理九世宣布，法国的胡格诺教派臣民在宗教上得以追随自由意志，看来法国的宗教纷争即将落幕。在这件事之后，法国方面再度向伊丽莎白女王提出与阿朗松公爵成婚的请求，法国王太后宣称，这项和平协议完全是为了伊丽莎白女王而定。但事实上是阿朗松公爵促请兄长尽速下令。

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关系大有进展，查理九世与法国王太后十分担心伊丽莎白女王会抛弃英法联盟，因此提出无条件让阿朗松公爵前往英国的想法。但伊丽莎白女王的热情冷却后，变得十分倔强，坚持要阿朗松公爵答应就算被拒绝也不能生气的条件。因此接下来几个月，法国急切地想要得到答案，而伊丽莎白女王则玩起了拖延游戏的老招。

* * *

九月七日，伊丽莎白女王正式迈入四十岁，在都铎时期，这个年纪的女人无论是步入婚姻或成为人母都为时已晚。为了向女王祝寿，莱斯特伯爵送她一把白色羽毛扇，纯金的扇柄上刻着他的家徽——熊，以及象征女王的徽章——狮子。

这一年的十二月，已从法国被召回的沃尔辛厄姆爵士，取代了伯利男爵，被任命为首席国务大臣。他的主要任务在于外国事务，在这个职务范围内，他将专心致力于将“蛇蝎女”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绳之以法。他也会竭尽所能，循序渐进地建立有效又有力的情报网，得到全欧洲最棒的情报，让他可以有效地阻挡天主教的阴谋，保护女王不受伤害。

就在此时，伊丽莎白女王简直被热情的臣民奉为神祇，全民共同的目标就是保护女王。英国人民发现，女王是英国抵御列强唯一的堡垒，他们非常敬爱女王，因此当一名唐卡斯特平民竟敢诽谤女王时，当地武警介入，才阻止暴民将他五马分尸。

在枢密院中，沃尔辛厄姆爵士则有已被视为英国新教激进派领袖的莱斯特伯爵支持，但他常与女王起争执，因为女王强烈厌恶他那独裁的手段与固执己见的想法，但女王仍相当佩服他的机智，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尽管他的意见不见得受欢迎。他在女王面前从不畏惧表达心声，女王知道他总以她的利益为最高考虑，因此也给他许多批评的自由。

* * *

一五七四年三月，英法双方总算拟定，要让伊丽莎白女王与阿朗松公爵在多佛一带会面，但在两人有机会正式见面之前，阿朗松公爵便受到纳瓦拉国王亨利连累，疑似涉入一连串反抗哥哥的阴谋中，因

而被软禁在圣杰曼。法国方面仍不断呼吁两人成婚，对此，伊丽莎白女王响应表示，若她期待自己的丈夫能恢复自由之身，应不算过分。

接着在一五七四年五月三十日，查理九世疑似因先天性梅毒身亡，这可能是瓦洛斯家族的遗传疾病。“阿朗松公爵也是同样血源，他可能逃过一劫吗？”女王表示。查理九世死后，弟弟安茹公爵从波兰被紧急召回继位，他登上法国王位成为亨利三世。他是一个易受神职人员支配的天主教狂热分子，也受到吉斯派系的掌控，英国方面开始出现担忧的声浪，生怕他会结束法国的宗教容忍政策，甚至斩断与伊丽莎白女王的联盟。

为了避免遭到孤立，英国随即向西班牙靠拢。七月份时，西班牙派出一位新任大使门多萨前往伦敦，受到女王礼遇，英国与西班牙的外交关系正式恢复。八月份时，《布里斯托条约》让英国与西班牙走向谨慎的和平之路。

就在此时，依照情势来看，亨利三世倾向于法国王太后设下的温和路线，让法国的新教大众松了一口气。但亨利三世与伊丽莎白女王之间的关系依然冷淡，同一年的稍后，伊丽莎白女王派遣了诺斯勋爵（Lord North）作为法国大使，但亨利三世相当无礼地对待他。当法国王太后让两位宫廷侏儒弄臣打扮得像伊丽莎白女王时，他也被迫在旁观看；凯瑟琳·梅迪奇接着还问刚取消软禁由她严加看管的阿朗松公爵，觉得自己的未婚妻长得如何。诺斯勋爵又气又窘，当愤怒不已的伊丽莎白女王直接表现出不悦时，凯瑟琳·梅迪奇又道歉了，编出诺斯勋爵法文不够好，无法理解法式幽默个中道理作为借口，表示法方完全没有污辱的意思。

不久后消息传到英国，阿朗松公爵逃离母亲的监视，在欧洲各地漫无目的地游荡，成为欧洲不怀好意的贵族眼中待宰的肥羊。伊丽莎

白女王立即告诉凯瑟琳·梅迪奇，在这种情况下，休想要她嫁给阿朗松公爵。

* * *

新任西班牙大使门多萨（Mendoza）与前任西班牙大使一样是个麻烦人物。一五七四年九月，他信心满满地回报，伊丽莎白女王为莱斯特伯爵生下了一个女儿，他们将她“藏了起来，但她出生时有主教在旁见证”。

事实上，门多萨大使可能是被一个月前发生的另一则宫廷中的私生子八卦搞糊涂了，八月七日，谢菲尔德小姐德古莱丝生下了莱斯特伯爵的儿子罗伯，华威伯爵与亨利·李爵士都出席了洗礼仪式。尽管这个儿子的出世并不是秘密，伊丽莎白女王定也听闻此事，但历史上并无她表达不悦的记录。因为她打从心底认为，这个孩子是个私生子；若她知道这孩子的父母早已成婚，她的反应可能会更大。在这个状况之下，她大概认定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也会禁不住诱惑的事实，尤其是她又拒这些男人于门外。莱斯特伯爵的处境艰难，他一直想要个儿子，现在尽管有了个儿子，他也不敢宣布那是他的继承人，他总是以“小儿”或“敝人犯的罪”来称呼罗伯。

* * *

四月份，伊丽莎白女王调兵遣将前往爱丁堡，成功地击溃玛丽·斯图亚特的一群支持者，让他们无法控制爱丁堡城堡，同时也摧毁了玛丽·斯图亚特想要复位的希冀。但苏格兰女王一直住在英国一事对英国与西班牙近来的协议不利，一五七四年，伊丽莎白女王试着说服苏格兰新任摄政王摩顿伯爵，希望能让玛丽·斯图亚特返回苏格兰，以谋杀达恩里勋爵之名接受制裁。就连一直与玛丽·斯图亚特为敌的

他都拒绝了，伊丽莎白女王只好继续让玛丽·斯图亚特当英格兰的俘虏。

此时，苏格兰已完全背弃了玛丽·斯图亚特，因此她转而继续打英国王位的坏主意。她自视为天主教信仰领袖，准备推翻异教徒伊丽莎白女王，重建真正的宗教。这是她生命的意义，是她至死方休的圣战。对于自己打的算盘，她完全不感到不安，对现实也一点都不了解。“若非成为英国女王，否则我不离开我的牢笼。”她曾一度如此宣称，且表示自己相当认真。

士鲁斯柏立侯爵的看守工作相当严密，玛丽·斯图亚特根本逃不出他的手掌心，“除非她化身成一只跳蚤或老鼠”。但她能做的，就是在仆人与外界友人的协助之下，偷偷携出许多盖有她象征徽章的信件，暗中与教皇、菲利普国王及其他贵族秘密通信。这样一来，她不但能持续对抗表姑，还能保持对外界消息的灵通。她甚至从法国亡夫遗产的地租中存下一万两千英镑，以此支付给她的支持者，并付出些许贿赂金。一五七五年，当伊丽莎白听闻此事，随即将每周拨给玛丽·斯图亚特五十二英镑的津贴削减到三十英镑。

此时，玛丽·斯图亚特已经三十二岁，软禁的日子也过了六年。她每天的时间都在阅读、祷告、与侍女们聊天、写信、逗弄宠物与制作美丽的刺绣中度过。偶尔她也会送伊丽莎白女王一些小礼物、果酱或是假发。枢密院认为她居心叵测，忧心礼物中可能下毒，但伊丽莎白女王却无条件地接受。但这些礼物却无法软化她对玛丽·斯图亚特严苛的态度，因为沃尔辛厄姆爵士的探子们，又拦截到玛丽·斯图亚特的许多信件，让伊丽莎白女王了解玛丽·斯图亚特只是在等时机，伺机根除表姑。

* * *

一五七四年，伊丽莎白女王抓到证据，认定达恩里勋爵的母亲莱诺克斯伯爵夫人，与玛丽·斯图亚特沆瀣一气。伯爵夫人否认此事，但伊丽莎白女王一点也不相信，同时在发现伯爵夫人计划前往北方时，派人送上口信，命令她千万不要试图去探望儿媳妇。

莱诺克斯伯爵夫人，在小儿子查尔斯·史都华（Charles Stewart）的陪伴下，只好住在查兹华斯附近的拉德福修道院，而士鲁斯柏立侯爵的太太哈维克的贝丝小姐也带着前一段婚姻生下的女儿伊丽莎白·卡文蒂希（Elizabeth Cavendish）来这里拜访她。在两位女性家长的默许下，这两个年轻人被许配在一起。接着查尔斯生了病，传统风俗需由伊丽莎白·卡文蒂希来照料他。两人的爱情开了花，接着在一个月內，两人就订了终身。

由于查尔斯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外甥也是臣子，新娘的人选自然得经过女王同意，当她发现两人私订终身时气得跳脚，将两人的母亲都召回伦敦，女王因两人的放肆，将她们押入大牢关了一段时间作为惩罚。

翌年，伊丽莎白·卡文蒂希生了一个女儿雅贝拉·史都华（Arbella Stewart）。外婆与奶奶都希望这是个儿子，以实践她们的野心。但天不从人愿，一五七六年，查尔斯就因肺结核身故，一五八二年，伊丽莎白·卡文蒂希也随他而去。但还有一个小雅贝拉，她由士鲁斯柏立侯爵夫人带着，在哈维克大宅长大，伊丽莎白女王看见一股威胁她王权的势力正在形成。

* * *

然而小雅贝拉也不是唯一的威胁。从一五七四年开始，来自欧洲耶稣会那受过精良训练、极度忠贞，且充满军事化风格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来到英国，开始秘密运作，试图建立旧宗教。这些神职人员多数

来自法国杜埃的神学院，这是由天主教流亡分子，也就是后来的枢机主教威廉·亚伦于一五六八年建立的学校，菲利普国王与罗马教皇都是资助人。在这里，神职人员特别受到入侵英国的训练，不久后，在罗马、瓦拉多利与塞维尔也开设了类似的学校。

许多神职人员都相当虔诚，并将自己背负的任务，视为替英国境内遭受迫害天主教徒提供性灵上的安慰，并鼓励他们继续维持对信仰的忠诚。其他神职人员则不顾一切地设法破坏英国国教与国家。英国政府并未费神去分辨两者，皆将其视为叛国者，须施以极刑，要不了多久，“神学院学生”对英国人来说，就等于“谋反者”与“叛国者”的同义词。

到了一五八〇年，英国已经有约一百位神学院派教士。在他们的兴风作浪之下，英国开始出现天主教徒不服从的情形，这个趋势点醒了英国政府。即使到一五七〇年代中期，在教会神学院中有谈论到所谓的“对英国的企图”，也就是菲利普国王将入侵英国推翻“女魔头”伊丽莎白，以玛丽·斯图亚特取而代之，这也就是大多数神学院所致力最终目标。但一如往常，这样的想法，并未将现实的政治形势纳入考虑，而这样的骚乱规模也已引起英国政府的正视，许多落网的神学派神职人员都遭到刑求，以供出他们的计划，并随之面临等同叛国者死刑的可怕下场。

在神学院派的骚乱、玛丽·斯图亚特的野心、图谋不轨的菲利普国王与罗马教皇、逐出教会的教皇诏令，以及自身没有继承人的多重胁迫之下，伊丽莎白女王感到十分不安定。唯一能保护王权的，就是她的政治技巧与毅力，再就是她的参事们的忠诚与能力。

17 奢侈享受

一五七五年一月，尼德兰的几个新教公国因为感念伊丽莎白女王的支持，便要她接受荷兰女王与泽兰女王的权位。伊丽莎白女王私心并不喜欢荷兰新教徒，同时至今也仍反对他们的共和主义思想：她之所以帮助他们只是为了制衡亚尔瓦公爵的军队。尽管他人奉上王权大位是一件讨人喜欢又十分吸引人的事情，但女王再度发现自己当初无法对玛丽·斯图亚特动手的同一个原则问题：菲利普国王是位受圣礼涂油的君王，是世代传承的荷兰统治者，是被神指派在那里统治的一国之君。若伊丽莎白女王接受了这个王权，就等于是支持反叛军对抗他国的合法君主，而且还可能导致西班牙增派援军到荷兰。这是进退两难的僵局，她实在无法下定决心，最终还可能导致荷兰方面认为她说谎而感到不悦，更可能招致英国臣民难堪的批评。

不过，到了一五七五年时，伊丽莎白女王已清偿多数的债务，并透过与低地国家恢复贸易，使英国进入了经济繁荣的时代。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关系更加友好，到了一五七五年四月，亨利三世结束了与英国关系紧张的一年，要求与英国重订《布卢瓦条约》，为此，伊丽莎白女王则赠予嘉德勋章回应。终于，沃尔辛厄姆爵士的探子们，总算在这个时期渗透进玛丽·斯图亚特的小圈子。这一段时间，英国的国际事务看来相当稳定。

* * *

到了一五七五年五月十七日，伊丽莎白女王麾下首位走容忍路线的坎特伯雷大主教马修·帕克逝世。在替代人选的议题上，经过多方考虑之后，伯利男爵犯下了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错误之一，提名了爱德蒙·格林多（Edmund Grindal）。结果，格林多竟是个心胸狭窄又严苛的清教徒，女王总是认为他的“预言”充满煽动性与破坏性。他的失误的影响并未立即出现，但接下来两年却是争议不断。

放弃徒劳地把难以安定的牛津伯爵强留在宫中，一五七五年，伊丽莎白女王给予相当大的祝福，让他远行海外。他首先前往直意大利挥霍了他继承的大多数遗产。当他返回英国时，送给女王一双美丽的刺绣手套，但直到女王承诺他的太太绝不会留在宫中之前，他都不愿返回英国。经过适当的安排后，放荡不已的牛津伯爵才回到女王身边——以至于宫中很快出现他与女王相恋的传闻。随后几年，甚至出现——丝毫没有任何可信度——相关传闻，指约在那段期间出生的南安普敦伯爵，就是两人的私生子。

另一个女王的宠臣也兴起许多波澜。一五七五年春天，克里斯多福·海登爵士表示希望取得霍尔本的伊利寓所，这个宫殿原为伊利主教的伦敦居所，宫内还有一个美丽的花园。伊丽莎白女王要求海登爵士建一座美丽的乡间住宅来款待她，同时也用这个方法羞辱伊利寓所原主伊利主教理查德·寇克斯（Richard Cox, Bishop of Ely），因为女王与他常就宗教议题起冲突。寇克斯犹豫不决，无法将伊利寓所租给海登爵士，这样的心情自然不难理解，他相当怨恨宫廷中的“豺狼虎豹”对教会财产的觊觎挪用，但女王却坚持要他这么做。女王因此甚至指示诺斯勋爵（Lord North），写了一封威胁信给伊利主教，表示若他不愿出租，就得面对枢密院调查是否有滥用教会土地的情势，若查证犯罪属实，他主教的职位就可能遭到罢黜，甚至连牧师之职都不保。寇克斯随即在女王的“仁慈”之下答应了，伊利寓所也就出租给了海登爵士。

一五七五年夏天，伊丽莎白女王踏上了史上最著名的出巡之路，也让凯尼尔沃思城堡的“豪奢享受”来到最高潮。负责招待女王的莱斯特伯爵，在女王住在当地的十天内，提供了女王上任以来最豪华、最昂贵的娱乐节目。许多目睹盛况的记述一直留存至今，最著名的就是作家乔治·盖斯柯恩（George Gascoigne）与莱斯特伯爵的礼官罗伯特·兰汉姆（Robert Laneham）所著的全部作品。

这是伊丽莎白女王第三次走访凯尼尔沃思城堡，七月九日星期六，女王正式抵达，莱斯特伯爵策马到七英里外的隆依钦登迎接她，接着便是一连串的招待。到了晚餐时间，甚至在一个昂贵的帐篷中用膳，这是特别为了女王搭建的。晚上八点，经过一整个下午的狩猎，以及在这炎热的夏日中，到处忙碌寻找适合女王口味的麦酒后，他护送女王到点满了上千支火把与蜡烛的城堡中。城门口吊桥的柱子上装饰着象征丰饶的水果与葡萄藤，寓意大地的富庶。有些柱子上则吊着乐器，其他的则装饰着武器，提醒着女王，莱斯特伯爵随时准备好为女王舍生取义。

当女王来到最外层的岗哨时，她忍不住望向了城里的湖，湖上仿佛出现一座“漂浮的岛，银色的外墙被火把点亮，绚烂不已，湖中女神与两个仙女等着女王莅临，她们以古代风俗向女王与城堡主人发表欢迎辞”，并将城堡与阿瑟王传说连在一起，再将城堡献给女王，在场人人都听到，女王也述说因此感受到这座城堡已经属于她的印象。

乐师们继续演奏着，到了城堡入口，出现了一位身穿白丝长袍的女预言家，当众吟诵着欢迎诗句，同时预言女王能享受长寿、和平与繁荣的光芒。接着，来了一位高大的牛津学者，身穿“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装扮，表演了一段滑稽的舞步，再假装因为女王的随从们发出噪音与跺脚，感到羞愧不已。接着有人劝他将城堡的钥匙交给女王陛下。当女王在号角声中进入城堡外院时，有装扮成像阿瑟王武士们

的卫士向她行礼，随从们簇拥着她前往新建的莱斯特建筑，去参观她的房间，透过那美丽的凸肚窗，可以听闻枪响礼炮，可以看见天空中绽放的美丽花火；这一阵喧闹连二十英里外都听得见。幸好专为此场合雇用来的意大利烟火专家，最后被劝服，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将活生生的猫狗射入空中。

自女王上次走访凯尼尔沃思城堡后，莱斯特伯爵又作了翻新与整修，现在，它已成为当代“最豪华的宅邸”了，经过修复后的凯尼尔沃思城堡，并不像伊丽莎白女王拥有的其他宅邸一样以文艺复兴风格为主，而是维持中世纪风格，保留十二世纪的建筑结构。兰汉姆记述：“城堡中的每个房间都十分宽敞，光线充足，内部还有挑高设计，玻璃也闪闪发亮，到了夜间，蜡烛与火把也持续照耀。”湖上还有一个喷水池，池旁有一个赤裸的水中仙女塑像，兰汉姆认为“定睛久视便能燃起欲望”。城堡西边则有一望无尽的鹿公园与打猎场。莱斯特伯爵骄傲地写信向伯利男爵炫耀：“我向你保证，女王陛下这一生绝对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她更喜欢、更称赞的地方，就连她自己的宅邸也一样。”

据传，当女王向莱斯特伯爵表示，从房间窗户无法看到大花园时，莱斯特伯爵下令找来大批工人，一夜之间在女王房间的窗下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花园。隔天一早，当伊丽莎白女王向外望时，她又惊又喜地发现，窗外竟然出现了一座新的花园。这两座花园与伊丽莎白时期大部分的城堡一样，现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作为凯尼尔沃思城堡那辉煌过去的证明。

周日早上，伊丽莎白女王前往当地教会，这天晚餐过后，在高特的约翰家那气派的大厅中，女王享受了“各式各样美妙乐器演奏的音乐”与舞蹈表演。这个晚上还有第二场烟火表演，一直持续到午夜。

隔天天气十分炎热，伊丽莎白女王留在房中休息，直到向晚才出门打猎。四小时后，在一行人点着火把下返回城堡，一个“野人”吓了她一跳，结果那竟是乔治·盖斯柯恩，莱斯特伯爵派他撰写演讲词，并安排娱乐节目。这次，盖斯柯恩穿上了鲜绿色的戏服，上面还黏着常春藤的叶子，身旁还有另一位叫作“回音”的演员；他们两人开始了一段有音韵的对话，接着“野人”折断自己手中的树枝，拜倒在女王的权威之下。这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段树枝飞弹出来，差点打到女王坐骑的头，让它吓得跳了起来。但伊丽莎白女王展现了骑术的专业，顺利让马儿冷静下来。

“没事！没事！”她喊着，而盖斯柯恩则一边发着抖一边松了一口气。

七月十二日周二，女王又再度出门打猎，两天后在凯尼尔沃思城堡内院看了斗熊，当场有十三只熊对上几只小型獒犬。这天晚上又有烟火表演，甚至还有湖面下的演出，甚至出现一名相当柔软的意大利杂技演员，根据兰汉姆的记载，他的脊椎仿佛鲁特琴弦般。

接下来两天，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户外娱乐活动被迫中断，但到了七月十七日星期天，天气再度好转，在上完教堂后，伊丽莎白女王成为凯尼尔沃思城堡庭院中一场乡间婚礼的座上宾。粗野的新郎在之前的足球赛中断了一只脚，跛着脚，穿着父亲的黄褐色紧身上衣，在另外十六位男士的陪伴下入场，这些男士甚至试图要表演枪靶。紧接着就跳起了莫里斯舞，然后分送香料蛋糕与香料酒，接着在场人士都要敬新人一杯，祝他们健康快乐，但带头的人仿佛是这个村庄中最蠢的人。而年过三十的新娘出场时，又仿佛风华尽失，面貌丑陋，甚至散发难闻的味道，身边则有十二位伴娘。能在女王面前跳舞，让她骄傲至极，她装模作样，仿佛自己和伴娘们一样漂亮。舞蹈过后，宾客们都入座欣赏由柯芬特里一个剧团表演的露天历史剧。伊丽莎白女

王觉得这天晚上的活动相当新奇，隔着窗户欣赏这一切，并下令两天后还要再看一次同一出历史剧表演。

这天晚上，她的出现让“美味的宴席”增光不少，餐桌上摆了一千多个玻璃器与银器，并由两百多人呈上三百多道料理。她只吃了一些食物，但却十分喜欢晚餐后的假面剧表演。

到了十八日星期一，她册封十八位男子成为骑士，其中包括了伯利男爵之子托马斯，并对九名患了淋巴结核的病患施行御触。没多久，天气再度变得炎热，女王不得不在房里待到晚间五点才出门打猎。当她打猎回来时，水上历史剧已经准备好演出了，一只十八英尺高的美人鱼与二十四英尺高的海豚塑像已经建好，里面有大队音乐家与一位代表神马阿瑞安的歌手。湖中女神再次出现，身边还有海神崔坦与坏骑士布鲁斯。

柯芬特里露天历史剧于周二再度上演，七月二十日星期三则是这场盛宴的最高潮——莱斯特伯爵下令要乔治·盖斯柯恩“不惜成本”举办的全副装扮的希腊神话假面剧。故事内容为两位女神即贞洁女猎神黛安娜与婚姻女神朱诺，一同说服仙女莎贝塔——几乎就是以女王的名字换音造词——追随她们的榜样。故事的结尾，朱诺提醒莎贝塔要小心黛安娜，并劝她找个理由和朱诺一样嫁人。故事背后的意义，就是要劝伊丽莎白女王跟进，本来故事的主轴中，剧团甚至想要发展到莎贝塔嫁给了谁。当时，当然没有人知道谢菲尔德小姐德古莱丝的存在，女王出巡时她并不在场，到了这个时候，莱斯特伯爵显然已经厌倦了她，并认为自己的婚姻并不合法。

但莱斯特伯爵的运气并不好，接下来这个周三竟然下雨，他试图要透过一出假面剧表达内心想法，但搭好的帐篷剧场却在三英里之外，因为女王一直待在室内，这个计划只好宣告失败。莱斯特伯爵感

到失望不已：隔天伊丽莎白女王就要起程，因此他又命令盖斯柯恩在道别词中夹杂类似的话语。

十九日星期四，伊丽莎白女王离开了凯尼尔沃思城堡，宫廷人士纷纷表示，此生从未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女王驾着坐骑离开时，盖斯柯恩装扮成森林之神席尔威纳斯（Silvanus），从一片神圣的丛林中现身，先是慢慢地走着，接着跑到她的身边，慷慨激昂地朗读他仓促成文的诗句，将大雨形容成上帝的眼泪，为了她的离开掉泪，哀求她留下。当伊丽莎白女王停下马时，他哭得快要不能呼吸，女王甚至不用慢下脚步，仿佛他会追着女王二十英里好说完他的故事。于是女王策马离开了；盖斯柯恩当然追不上她，因此也无法听见他撰写的故事。

莱斯特伯爵与所有的家仆，都非常努力要让事情顺利进行，女王这次来访可以说是相当成功，对宫廷人士或当地人来说，都是毕生难忘的一段回忆，而莱斯特伯爵毕生也难以清偿这笔随之而来的债务。但这场表演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女王嫁给他，尽管一切的准备却在最后被天气打败，他知道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来。因此这次在凯尼尔沃思接待女王后，莱斯特伯爵便开始在他处寻求慰藉，这并非偶然。

离开了凯尼尔沃思，女王在莱斯特伯爵与他那天赋异禀的年轻侄子菲利普·西得尼（Philip Sidney）的陪伴下，来到了艾赛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位于查特里的领地；艾赛克斯伯爵远走爱尔兰，但女王的姨甥女伯爵夫人莱蒂丝·诺利斯（Lettice Knollys），却代夫出面诚挚地迎接女王。莱蒂丝·诺利斯曾到凯尼尔沃思城堡接受招待，尽管许多宫廷人士都猜测，她与莱斯特伯爵已秘密发展出恋情，但女王却不以为意。

在这次出巡后，菲利普·西得尼顺利进入宫廷，很快成为女王的掌旗手。尽管他是西班牙菲利普国王的教子，却在新教的环境下长大，在牛津接受教育，之后又在欧洲各地旅行，遇见许多政治家与学者，并以他渊博的学识、骑士精神及显而易见的能力令他们折服。圣巴托罗缪惨案促使他请求各界组成新教联盟以对抗天主教恶势力，针对这一点，他的舅舅莱斯特伯爵倾全力支持。尽管伊丽莎白女王对西得尼的军事观点抱有疑虑，一五七五年之后，她依然开始派遣他定期进行一些外交事务。

八月十三日，伊丽莎白女王抵达了伍斯特，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提振当地萎靡的羊毛织品业。在当地市府参事的命令之下，当地全体动员进行相关准备：城门漆成灰色，英国国徽也安在上头，女王必经的皇家大道上所有的房子都必须彻底清洗。

伊丽莎白女王无畏天空飘着细雨，依然骑着马进城，高雅地接受了统治者的金杯。尽管全身湿漉漉的，女王依然对欢迎赞美词表示欣喜，一直到致辞告一段落后，女王才要求随扈递上兜帽。接着她参观了大教堂，她的叔父威尔士王子阿瑟·都铎就葬在这里，同时也聆听了短号、低音喇叭与歌唱表演。在那之后，她便前往主教宫殿中的下榻处。周日，民众的欢呼声都已有些喑哑，她坐着无顶马车前往大教堂进行晨间礼拜，一路上不断地呼喊：“谢谢你们！谢谢大家！”两天后，当她离开城里，到附近的薪饷官家做客时，当地士族乡绅甚至陪着她一直到交界处。到了说再见的时刻，所有人都下马来跪在泥地里，而伊丽莎白女王则举起手说：“祝福你们，坐在马上，别下来了！”当晚回到伍斯特时，又是一个湿淋淋的下雨天，但女王依然英挺地坐在马背上，以“欢欣高雅的态度”向民众致意，与民众说话。

离开伍斯特后，伊丽莎白女王前往亨利·李爵士位于伍德斯托克的领地待了几天，在结束出巡前，看了一出描写爱国情操胜过男欢女

爱的戏码。

* * *

一五七五年底，莱斯特伯爵已经厌倦了谢尔菲德小姐德古莱丝·霍华，并积极追求女王的姨甥女，同为英国臣子的友人弗朗西斯·诺利斯爵士与凯瑟琳·凯利生下的女儿，同时也是艾赛克斯伯爵华特·德弗罗之妻莱蒂丝·诺利斯。一五六五年时，莱斯特伯爵与莱蒂丝曾有过短暂火花，若他们以为两人当时的恋情是秘密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十二月份时，一份西班牙探子的报告写着：“这段畸恋成为街头巷尾的话题，并没有任何理由阻止我公开记录下莱斯特伯爵与艾赛克斯伯爵之间的敌意与造成的结果，据说因为艾赛克斯伯爵长年待在爱尔兰，因此他的妻子所出的两个孩子，父亲都是莱斯特伯爵。由此可想见两人之间的不和。”

当时莱蒂丝已年届三十五岁，她在朗格利特的一幅画像绘于一五八五年，描绘出她那黑色杏眼与诱人的美貌。她二十岁时便嫁给了时任赫里福德伯爵的华特·德弗罗，后来几乎都住在查特里，尽管两人育有五个子女，两人的关系似乎不太和谐。

一五七三年，艾赛克斯伯爵领军征战爱尔兰，他的骁勇善战为他赢得相当大的名气。他于一五七五年十一月返英，要不了多久，他一定就听说了妻子与莱斯特伯爵的奸情。尽管传闻有许多部分——包括西班牙探子的回报，那是唯一一份声称莱蒂丝为莱斯特伯爵诞下两子的证据——可能都只是随便的揣测，但许多部分仍有其可信度。一个骑士勾引另一个骑士之妻，这显然大大地违反了骑士精神的宗旨，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使得艾赛克斯伯爵决定改变遗嘱内容，若他年纪轻轻就死，他希望孩子能在亨丁顿伯爵（Earl of Huntingdon）的看管下成长，那是他最有力的友人，也是莱斯特伯爵的妻舅。根据完

全无法容忍艾赛克斯伯爵的亨利·西得尼爵士（Sir Henry Sidney）表示，艾赛克斯伯爵就此成为莱斯特伯爵残酷的对手。

一五七六年七月，艾赛克斯伯爵回到爱尔兰服役。他的婚姻失败，且因莱蒂丝的问题与莱斯特伯爵起了摩擦。两个月后，当他与其他人在都柏林城堡中为痢疾所苦时，他认定自己肯定是因为饮品中遭到“邪恶人士”下毒。但他与当时的其他人，都并未联想到莱斯特伯爵。九月二十二日，艾赛克斯伯爵身故，爱尔兰国王代表亨利·西得尼爵士随即下令进行验尸工作，但在他向枢密院的报告中指出，并未找到任何不轨的证据，仔细检查过艾赛克斯伯爵尸体的医师，也都并未找到非自然死亡的其他因素证据。

艾赛克斯伯爵的头衔，传给了年仅九岁的儿子。艾赛克斯伯爵自知将死之际，曾去信给女王，希望“女王陛下愿意当我孩子的教母”，尤其是他的儿子，现在只能完全依赖女王了。伊丽莎白女王马上取消这孩子继承的所有债务，并将他的监护权判给了从六岁起便已将他纳为家中一分子的伯利男爵。小小年纪的新任艾赛克斯伯爵，是年在伦敦的塞西尔宅邸见到女王。他的母亲莱蒂丝则返回父亲位于牛津一带的宅邸中，她所出的其他孩子，皆根据丈夫的遗愿，被送往亨丁顿伯爵与伯爵夫人在莱斯特郡艾什比德拉佐治的家中。

此时，伊丽莎白女王心中又想到一个男孩，那就是她十五岁的教子约翰·哈林顿。他的父母一直尽心尽力地服侍她：约翰·哈林顿爵士（Sir John Harington）曾经是她父亲亨利八世的臣子，后来甚至成为伊丽莎白女王与托马斯·西摩将军的中间人。一五五四年，在怀俄特爵士的叛变后，伊丽莎白女王被关进伦敦塔大牢，他与他的妻子伊莎贝拉·马坎（Isabella Markham），皆因疑似与当时的伊丽莎白公主同流合污而被迫下狱。伊丽莎白女王即位后，他们的忠诚有了回

报：伊莎贝拉成为女王身边的女侍臣，一五六一年，女王甚至成为哈林顿大儿子的教母。

年纪轻轻的约翰·哈林顿爵士，是个聪颖、机智又有创造力的男孩，有着一本正经的幽默感，让伊丽莎白女王十分欣赏他。历史上留存着伊丽莎白女王写给他最早的一封信件来自一五七六年，当时他还是伊顿公学的一名学童。显然女王认为他开始对公共事务有了兴趣，信中附上她在国会议程结束时的一份演讲稿，手稿中提及她情愿维持独身一事。她写着：

孩子，我请人改写了我的拙劣的讲词给你看，毕竟年轻人还没有资格踏入国会殿堂。闲暇之余请反复思量，每日细读，直到你理解个中道理；也许在你的教母被人遗忘后，于此，你或可持续开花结果。我会这么做，是因为你的父亲已准备好，无论任何灾难降临，都会守护我们、爱着我们。

不久后，哈林顿爵士便来到宫中，而他的信件与他的公开写作，就成了后代了解女王晚年生活最丰富的信息来源。

* * *

过去几个月以来，伊丽莎白女王与格林多大主教的关系每况愈下。一五七六年秋天，女王将他召到跟前，要求他废止所有清教形式的仪式。格林多大主教本身就是个清教徒，无法违背良心遵从命令，几周内便准备好以书信方式捍卫自己的信仰。

十二月份，他将信件交由莱斯特伯爵转呈给女王，而女王则为此感到相当不悦。她将大主教逐出宫外，两人之间唯一的沟通桥梁就是莱斯特伯爵。而相当同情大主教观点的莱斯特伯爵，试图想要寻找一个妥协之道时，伊丽莎白女王与格林多大主教都不愿意让步。至此协商陷入僵局，这个情势一直维持到来年春天。

一五七七年五月，伊丽莎白女王最后一次询问格林多大主教，是否愿意禁止教会中施行清教仪式。他断然拒绝，并哀求着提醒女王陛下，她也是平凡之身，在最后审判时，也必须在上帝面前应答自己的行为。他宣布自己“宁愿触怒平凡人间的统治者，也不愿冒犯大宇宙的真理——上帝”。他持续抗命，伊丽莎白女王相当恼怒，因而将格林多大主教关入兰贝斯宫软禁，也因此有效地避免他以英国最高阶主教身份行使权力。同时也要求伯利男爵，以她之名向各级主教下令，禁绝各种清教礼拜仪式。

女王采取这样的做法，等于是宣告英国国教圣公会的最高统治者是她，而非大主教。尽管如此，枢密院参事们仍认为此举对格林多大主教相当不公，因此纷纷为他辩解，要求女王以较温和的手段对待他。若大主教依然冥顽不灵，女王怒火中烧地表示，绝对要卸除他主教的职位。这次都要归功于莱斯特伯爵与其他人的斡旋，格林多依然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但女王再也不准他履行任何主教职权。因此接下来的五年，英国国教一直没有精神领袖，伊丽莎白女王便直接向各级主教下令。长远来看，女王这样的举动却反而害了自己，也让教会组织更加松散，同时进一步刺激了清教运动。

尽管克里斯多福·海登爵士的政敌们，都认为他唯一的能力就是跳舞与马上长枪比武，但伊丽莎白女王却认为他有能力，是个值得重用的人才。他也与女王一样蔑视清教主义，因此女王认为克里斯多福·海登爵士能支持她以对付格林多大主教的支持者，女王封他骑士名号，并于一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指派他成为枢密院一员。

* * *

一五七六年二月，菲利普二世派遣一位特使尚皮尼（the Sieur de Champigny）以相当直率的态度询问伊丽莎白女王，未来是否会继续援助新教反叛军。在让特使等了两周后，伊丽莎白女王仍不愿正面

答复，因此抱怨菲利普国王并未写信给她，让她感到十分受伤一事。她也提到，西班牙试图在低地国家建立绝对强势的统治，对她来说难以忍受；她敬爱的父亲也不会容忍，而她虽然是个女人，“但也知道如何看待此事”。尽管如此——她意味深长地笑笑——她个人相当欣赏菲利普国王。可怜的尚皮尼大使就在困惑与茫然中返国了。

伊丽莎白女王依然持续伪装自己愿意嫁给阿朗松公爵，这一切都是为了牵制菲利普国王的举动，但到了一五七六年春天，就连她都不得不表示计划胎死腹中。“没有什么能比这些求爱的事情，能为她在国际上招来更多恶名了。”恼怒的沃尔辛厄姆爵士表示。

此时，伊丽莎白女王也已经决定，拒绝尼德兰的王权提议。这年夏天，西班牙驻扎在当地的军队针对无给薪一事引发骚乱，他们的行为让荷兰天主教与新教联手，在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William of Orange）的带领下对抗共同敌人。这一年稍晚，反叛军在根特决定选出自己的议会并为独立努力。菲利普国王对反抗军的行为感到十分生气，指派了一名新任摄政王，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奥地利的堂·胡安（Don John of Austria），他是欧洲闻名遐迩的战士，最近在与土耳其人的勒班陀海战中，操纵兵力得宜获得大胜。

伊丽莎白女王表面上与菲利普国王保持友好关系，私底下仍金援反叛军，但莱斯特公爵疑似在女王不知情的状况下，表示要支持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若有需要甚至愿意派遣英国兵力。同时，荷兰反叛军不断呼吁英国与尼德兰结合兵力，形成一股新教君力，以伊丽莎白女王作为首领。女王拒绝了这项提议，因为她不想耗掉过多的金钱支持这个计划。她已经给荷兰方面两万英镑，又贷款十万六千英镑给他们——这几乎是她一半的年收入。更重要的是，她担心若自己卷入这场战争中，就会赌上王位。

伊丽莎白女王于是自请成为荷兰与奥地利的堂·胡安的中间人，但一五七七年，荷兰方面拒绝了她，而倾向莱斯特伯爵提出的武力援助。同一年稍晚，当奥地利的堂·胡安提出相当不错的和平条件时，他们又写信给莱斯特伯爵，表示不需要他的协助了。这可能也是因为，莱斯特伯爵的军事历练不及二十年。此时他已年届四十四岁，“性格鲜明又常暴怒”，因生活衣食无虑而显得肥胖，而且也不再练习马上长枪比武。当他发现自己无缘成为新教军事强人进而在国际上获得名望时，他感到相当苦涩与失望。

“我好忧郁，”他写信给一位荷兰友人。“我几乎无颜以对亲王（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他的期望几乎完全落空。”

一五七七年的头几个月，沃尔辛厄姆爵士布下的间谍们，发现了一起由奥地利的堂·胡安为主谋的天主教阴谋：在吉斯公爵的协助下，他们计划以一万兵力入侵英国，推翻伊丽莎白女王，恢复英国的天主教秩序。堂·胡安接着打算与玛丽·斯图亚特成亲，共同统治英格兰与苏格兰。沃尔辛厄姆爵士呼吁女王尽快对玛丽·斯图亚特动用严酷的手段，但伊丽莎白女王又一次拒绝了。但这一年，伊丽莎白女王为了感谢沃尔辛厄姆爵士对国家的贡献，将他册封为骑士。幸好尼德兰地区的事情就让堂·胡安有得忙了，因此入侵英国的计划一直未能付诸实行。

一五七七年五月，伊丽莎白女王再度造访高兰城。犹记得一五七二年，女王莅临他家中时的感言，国玺大臣贝肯爵士将住家扩建成两倍大，并额外增建一处托斯卡尼柱廊。改建的结果让女王啧啧称奇，而且相当欣赏美丽的花园和贝肯爵士“贵族”般的居住享受，“每一天用餐时，桌上都满满地点缀了各式各样的花花草草”。女王陛下在这里住了五天，在果园的宴会厅中野餐，或是享用由伦敦快递过来，由十二位主厨准备的美食。尽管有清教性格的国玺大臣贝肯爵士认为

这种宫廷飨宴是种罪恶，他依然暂时将原则摆在一边，砸下二十英镑请人来为女王表演。女王这次造访总计让他花了五百七十七英镑。

高兰城与那个年代其他贵族的宫殿一样，早已不存在。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它的遗迹都还在，包覆着常春藤的外墙也仍屹立不摇，但在那之后，它很快就被拆除了。

一五七七年夏天，黑死病的疫情特别泛滥，女王也被迫取消出巡行程。她只好待在格林尼治宫中，但仍有相关记录显示，她在萨里附近吉尔福德的洛斯利宅邸享受了愉快的两天。

六月份，健康情形早已大不如前的莱斯特伯爵，北行巴克斯顿做矿泉治疗。在路上，他前往好友士鲁斯柏立伯爵与伯爵夫人的家中做客。士鲁斯柏立伯爵夫人，也就是哈维克的贝丝小姐，出狱后又再度成为女王身边的红人，女王淘气地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莱斯特伯爵奇怪的饮食习惯。

“我想应该要告诉你们相关的饮食建议，才不会超出了要求的范围。”女王在信中写着，“每天在莱斯特伯爵的饮食中，须含有两盎司的肉类，供应饮食的分量时，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至于饮料的部分，可以用二十分之一品脱的红酒来舒缓他的胃，圣安妮圣水也是每日必需。庆典时节，必须符合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因此我们也希望你们增加他的饮食分量，在每日必需的两盎司肉类外，晚宴来一份鸚鵡带肩肉，晚餐则吃鸚鵡腿。”

历史并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哈维克的贝丝小姐是否遵照女王的嘱咐行事，但可以确定的是，当莱斯特伯爵来到查兹华斯会见苏格兰女王时，他们交谈的内容仅止于聊天打趣，但当玛丽·斯图亚特抱怨自己长期受到囚禁时，莱斯特伯爵则礼貌性地表达了同情之意。会后他将会面情形写在信中送达伯利男爵手中，因而让时任财政大臣的伯利

男爵向女王请缨前往探视玛丽·斯图亚特。女王却大力反对，因为她听闻太多男人迷倒在这表侄女的美貌与魅力之中而做出傻事。

哈维克的贝丝小姐也让莱斯特伯爵探视她那刚出生的小孙女雅贝拉·史都华，希望莱斯特伯爵也能赞同雅贝拉比玛丽·斯图亚特更有资格继承王位，并说服伊丽莎白女王任命雅贝拉继位。雅贝拉等于是亨利七世的曾孙女，在英国的新教氛围中长大，人生中并没有谋反与丑闻的污点：从各方面来看，她都比苏格兰女王更有资格继位。在雅贝拉祖母的哀求之下，莱斯特伯爵认为这一点相当合理，同时也认为这件事对自己有利。现在他已经听天由命，知道自己一生都不可能成为亲王，但若他的后代能坐上英国王权大位，他也将有利可图。想到这里，他向贝丝小姐提议，让她的孙女与他的私生子成亲；而贝丝小姐眼见莱斯特伯爵庞大的影响力与在宫中的人脉，能为家族带来相当大的利益，因此欣然接受了。

* * *

伊丽莎白时期是大发现与地理扩增的年代。在伊丽莎白女王继位的前一个世纪里，西班牙在美洲与东印度群岛建立了广大的殖民地，葡萄牙则占据了大部分的非洲地区与现在的巴西。新的贸易路线带来新的市场，也有了劫掠的新契机，当时也有不少英国武装民船受不了探险与打劫的诱惑，展开了海上冒险追寻财富、英国货物的新市场、对抗西班牙势力，并以女王之名寻找新的殖民地。

这一类的亡命分子包括弗朗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他是一位德文郡海洋探险家，在一五七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从普利茅斯出发前往新大陆，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从小西班牙手上夺过主导权，毕竟之前西班牙曾攻击骚扰过他的船舰。十五个月后，他从美国带回许多从西班牙船舰掠夺而来的宝藏。这已经不是英国武装民船第一次掠夺西班牙的宝物了，但却是量最大的一次。

德瑞克的战利品与精彩的探险故事，很快就传到女王的耳中，一想到德瑞克劫掠的行为让菲利普国王气得跳脚的样子，女王就开心不已，当然德瑞克英勇的行为也吸引了她。一夜之间，他就变成了英国的名人、西班牙的恶人，西班牙人称他为“艾尔德瑞克”——恶龙的意思。西班牙方面自然对伊丽莎白女王提出抗议，但她却使出模棱两可的怀柔政策，表现出关心的模样，但却任凭这种劫掠事件继续发生，并从中获益，这些武装民船夺来的多数宝物都进了女王的宝库。

到了一五七七年底，弗朗西斯·德瑞克乘着船舰“鹈鹕号”再度出发，展开了名留青史的一次世界探险。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劫掠那些曾抢劫英国商船宝藏的西班牙武装民船而非探险。这次的出航受到英国大众的关注，在正式出航前，沃尔辛厄姆爵士安排德瑞克觐见女王。

“德瑞克！”女王热情地招呼他，“你让我可以报复西班牙国王这个小偷带来的伤害。”德瑞克表示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劫掠菲利普国王的船，以及西班牙在东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伊丽莎白女王满心欢喜地同意了。不过，在这艘船出港之前，都不要告诉伯利男爵这个消息，因为他总是主张不要再刺激西班牙。根据德瑞克表示，女王投资了一千马克（将近六百六十五英镑）；其他的支持者还包括莱斯特伯爵、沃尔辛厄姆爵士和海登爵士。

在德瑞克出发前，皇室派遣的信差带上女王亲送的礼物，一个刺绣的船长帽，并在致赠给德瑞克的丝质围巾上亲手绣上“愿神引领汝、保护汝到最终”。

* * *

另外，摩顿伯爵在苏格兰的摄政王生涯，于一五七八年三月戛然而止，苏格兰贵族策划了一场政变推翻了他，也让将近十二岁的詹姆

士六世展开了正式执政的生涯。

四月四日，玛丽·斯图亚特的丈夫玻斯威尔侯爵逝世，自一五六七年他逃离苏格兰后，就一直被关在丹麦的德拉索尔姆城堡地牢中，因陷入狂暴而被锁在一根柱子上。严酷的牢狱生活与害怕遭到极刑处决的恐惧如影随形，使他精神错乱，但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者坚称，他最终口述了自白，还了玛丽·斯图亚特在达恩里勋爵谋杀案中的清白。依据他当时的心理状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在德拉索尔姆附近的法瑞维亚教堂中，还可以透过玻璃看到玻斯威尔侯爵的干尸。

18 狂热的求爱插曲

一五七八年一月，消息指出荷兰新教军队遭到奥地利的堂·胡安迎头痛击，也让伊丽莎白女王有机会向莱斯特伯爵证明，自己坚持不让英国涉入一场必输无疑的战争是对的。相反，现在她想要透过自己的外交影响力，与菲利普二世一起找到两边都能接受且有利于英国的解决方案。在英国武装民船对菲利普国王的刺激与伊丽莎白女王对荷兰的支援下，英国与西班牙的和平之路走得跌跌撞撞，许多人更开始担心，菲利普国王会请罗马教皇进行封锁，将传说中的“对英国的企图”付诸实践。

伊丽莎白女王对于前身为阿朗松公爵的安茹公爵想要插手干涉尼德兰问题的相关报告，一直相当担心。能保卫英国安全并维持英国经济稳定的和平协商遭到破坏，是她最不乐见的情形，她也不希望法国军队恣意出现在尼德兰。一五七八年春天，情势明朗化，安茹公爵的行动显然没有法国政府的支持，这让她松了一口气，她已经知道，若想控制安茹公爵的行动以利她的国家，最好的方法就是重启婚姻协商，并与法国签订新的条约。当时的她并不知道，但这却是她人生中最后一次踏入欧洲婚姻协商场域中。

此时安茹公爵也兴起相同的想法，在法国宫廷中总被视为麻烦人物的他，其野心总找不到宣泄的出口，然而他心中却暗藏着一个坐上王位的梦想。因此他打算在尼德兰实现他对名望与荣耀的渴望，但现在若没有如英国女王般有权有势的统治者支持，他可能完全无法实现

愿望。若能娶得英国女王，加上英国雄厚的财力做后盾，情势将大为逆转。历史证据显示，安茹公爵先展开了追求：他写信给伊丽莎白女王表明自己的心意，也表示自己愿意由她来主导一切。这真是令人惊奇，他表示“经过两年完全无交集，他已经感受到她的重要性”。安茹公爵的表态让伊丽莎白女王相当满意，也了解到，这封信给了她重启婚姻谈判的筹码。

沃尔辛厄姆爵士对于安茹公爵的花言巧语并不买账，认定“此刻他来向女王求好，绝对是图谋不轨，只为了利用女王”，到时要是安茹公爵带领军队踏入尼德兰境内，女王便不会反对，如此而已。当伊丽莎白女王听闻此说法时，大感不悦，并要莱斯特伯爵向沃尔辛厄姆爵士表示，安茹公爵会爱上自己也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女王表示，安茹公爵只是要让自己在尼德兰更有武装实力，有一天能“践踏我们的领土”。

* * *

自从丈夫过世后，艾赛克斯伯爵夫人莱蒂丝几乎被巨额债务压得喘不过气。野心勃勃又美丽如昔的她，决定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赋，变成了一个自负又投机的女人，她发现情夫莱斯特伯爵没什么理由不娶自己。没有人知道，莱蒂丝对莱斯特伯爵与德古莱丝·谢菲尔德的婚姻关系了解多少，但显然她与莱斯特伯爵本人都认定他是个自由之身。

当莱蒂丝发现自己怀孕了，莱斯特伯爵因为渴求一个合法继承人，便同意与她成婚；一五七八年，两人便在凯尼尔沃思城堡中秘密成婚。接着，莱斯特伯爵买下了艾赛克斯温斯特庄园与宅邸，这样一来，只要他在公务之余便可以偷空前往探望她。因为莱斯特伯爵“极度沉溺在婚姻里”，因此他们的两人世界相当快乐。

婚礼后，莱斯特伯爵再度回到伦敦，待在莱斯特宅邸中，借口自己生病无法进宫。事实上，他可能正在与莱蒂丝享受短暂的蜜月时光，或者“生病”是个策略，因为有迹象显示，四月二十八日，伊丽莎白女王就发现他做的事。以下是西班牙大使门多萨相关的报告：

伊丽莎白女王与我确定了第二十八次觐见的时间，但那天早上她踏进御花园时，却发现门口被人塞进一封信，于是她拿起来读，随即秘密造访莱斯特伯爵的家，发现他在家中病着。女王在那里待到晚上十点，并派人送口信来，表示自己当天身体不适宜见客。我并没有看过那封信的内容，只知道这封信让她随即赶到莱斯特伯爵家中。

这件事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是莱斯特伯爵自己写信，给了相当充分的理由，解释事情紧急，要求女王到他家；第二就是有人发现他秘婚一事，向女王禀报。当然，女王走访莱斯特宅邸可能另有原因，但因为当时的情势与事后女王的反应推断，事情可能就是这样。若信件是莱斯特伯爵本人写的，我们也能理解，他可能是装病以软化女王的态度，缓和女王的盛怒。

五月份时，也许是受到莱斯特伯爵背叛的刺激，伊丽莎白女王派遣特使前往法国重启她与安茹公爵的婚姻协商。此时，莱斯特伯爵再度北行前往巴克斯顿做矿泉治疗，坚持自己依然身体不适。这可能也是他经过思考后做出的决定，暂时离开宫廷，给伊丽莎白女王一些时间，调适自己接受现况，也可能是让口出威胁表示要将莱斯特伯爵拒于门外的女王了解，若真这么做，人生将有多寂寞。无论是什么原因，莱斯特伯爵这一去将近两个月，毕竟女王向来讨厌他不在的生活，因此显得相当不寻常。

莱斯特伯爵不在宫中的日子，伊丽莎白女王将挫折感转而发泄在海登爵士身上，相当明显地表现出若他也如莱斯特伯爵般做出背叛举动，娶了别人，她绝对无法忍受，尤其是海登爵士曾发誓永远效忠女王，且若女王愿意，永远都有机会与他成婚。

在一片困惑中，海登爵士于六月十八日写信给莱斯特伯爵：

自从阁下离宫后，女王显得相当忧郁；个中原因除了猜测外，我也不得而知，尽管如此，我依然得承受并忍受女王冲动的负面情绪。她梦想着一段可能会受伤的婚姻：将我当作那个对象，或是类似的模式。我反驳表示，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愿意被如此大的麻烦绑住，无法透过神的旨意或人间的律法成婚，除非在双方的同意下，以丈夫与妻子之誓互相约束，而我知道，她并未与任何男人有此承诺，因此在任何婚姻之中，她便不会受到伤害。但伯爵阁下，我并不愿意如此唐突地，在只有神知道的状况下步入婚姻，我从未这样想过。

事实上，遭到莱斯特伯爵遗弃，伊丽莎白女王心碎大过愤怒。隔一周，女王收到莱斯特伯爵好几封信，时至今日这些信件早已荡然无存，但海登爵士在六月二十八日通知莱斯特伯爵，女王收信后相当开心，“因为信中的记录，是阁下自始至终表现忠诚的最佳证明”。此刻，女王已迫不及待地等着莱斯特伯爵回来，“阁下已缺席太久，尤其是在那里，可想而知，就算阁下缩短治疗时间也会有疗效，但女王如今下令要你依照医生指示去做。若矿泉疗法并不完全如预期，女王陛下将不会同意你与她再度远行”。

伊丽莎白女王以相当微妙的方式，为她与莱斯特伯爵未来的关系定调：只要莱斯特伯爵能以女王的需求为优先，装作没事般地对待她，并继续做她的好宠臣，面对他那不合适的婚姻，她也愿意抛弃成见。这件事轻描淡写地过去，让莱斯特伯爵松了一口气，继续做他的美梦，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还是要为这些行为付出惨痛代价，伊丽莎白女王曾一度与表妹莱蒂丝如此要好，而现在女王的仇恨难平，于是总装作无视莱蒂丝的存在。除了嫁给莱斯特伯爵外，因为莱蒂丝婚前并未履行身为伯爵遗孀的义务和并未取得伊丽莎白女王的同意，也让女王愤怒不已。

一边是女王，一边是妻子，莱斯特伯爵夹在两个强势的女人中间，他对两人的忠诚成了冲突的来源，莱斯特伯爵忽然了解，从此他的人生将变得非常复杂。为了维持两个女人间的和平，他尽量不提及自己的婚姻。

当然他与女王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他依然得到女王最大的宠信：例如当女王因牙痛彻夜难眠时，莱斯特伯爵会彻夜陪伴她煎熬，他也不断送女王昂贵又特别的礼物，像是一五七九年新年夜，他送给女王的金表。但两人之间不再有过去那种亲密的情谊：两人私下说笑、热情洋溢地互通有无的机会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女王常常对他感到不耐烦，在施予恩惠时显得更加善变。女王更进一步地霸占他所有的时间，让他没有时间去探望妻子，而且女王完全是故意的。

发现莱斯特伯爵秘婚一事，让伊丽莎白女王几乎整个夏天的心情都荡到谷底，枢密院参事们也跟着绝望不已。伊丽莎白女王患了严重牙痛，导致整个脸部肿胀，已经够严重了，医生们还得花很长的时间与她争辩“如何减轻女王陛下的痛苦”一事。在忧郁与痛苦难耐之下，她根本不想做任何决定，不断咆哮着责骂各级大臣，甚至还有一次说沃尔辛厄姆爵士该被吊死——那一次，沃尔辛厄姆爵士冷淡地说，他只请求这由密德塞克斯的陪审团决定便可。

当法国大使出言反对伊丽莎白女王对苏格兰女王的处置时，女王刚听闻沃尔辛厄姆爵士回报，玛丽·斯图亚特再度与吉斯家族联手，试图要谋害她，于是她嘶吼着表示，这个表侄女“是世界上最可恶的女人，几年前就该砍了她的头，只要她活着的一天，就绝对不会放她自由”。

就连面对相当紧急的国家大事，伊丽莎白女王有时也会以牙痛为借口，拒绝与参事们会面。最终，参事们还是说服了她，坚持要她阻

止安茹公爵带领法国军队入主尼德兰。莱斯特伯爵在枢密院中，一向扮演与女王沟通的发言人角色，也向女王“直率、大胆又坦诚地表示自己反对女王的拖延”，这种态度对其他参事们来说，就算敢也多半如对牛弹琴。伊丽莎白女王要他安静。此外，她也不与海登爵士说话。莱斯特伯爵只好尝试向来是万灵丹的卧床招，假装生病，希望女王会再来关心他，但这次连这招都失效了，女王对莱斯特的冷酷无情，让许多人都起了疑心。当伯利男爵与莱斯特伯爵起了争执时，女王也丝毫不想插手介入。

八月九日早晨，伊丽莎白女王总算清醒，了解到安茹公爵并不是在玩游戏，他在尼德兰惹的麻烦事，可能更甚于西班牙。而她的动作已经拖延得太久了。

* * *

这一年，女王出巡的脚步来到东英吉利，这次的计划仓促成行让当地乡绅争相大量购买丝与天鹅绒，以致当地的相关货品瞬间销售告罄。

八月十日，伊丽莎白女王抵达塞特福德，接受天主教派的路克伍德先生（Mr. Rookwood）的招待，他是邻镇萨福克豫斯登庄园的主人。声名狼藉的虐待狂理查德·塔克里夫（Richard Topclyffe），曾刑求拷打过多位天主教神职人员，他形容路克伍德是个罪犯，也是个“恶棍。最重要的是，我们敬爱的女王陛下，竟无视路克伍德那烂房子，向他致谢，甚至让他行吻手礼”。在女王此行中，有人发现路克伍德家中有圣母玛利亚的肖像，路克伍德刻意将它放置在庄园中刺激女王。女王下令焚毁圣母玛利亚像，女王的手下们随即奉命，“让所有人都暗自欢欣不已”。在女王离开后，路克伍德随即遭到逮捕，被关入诺里奇监狱，在牢中度过二十多年余生。他的身家财产则被英国政府没收。

在走访过凯尼尔沃思，接受遭处决的诺福克公爵之子前萨里伯爵菲利普·霍华（Philip Howard）诚挚的招待后，女王前往诺里奇进行令人难忘的一次参访行程，八月十六日，女王抵达“最敬爱她的城市”，受到轰动的欢迎，上百人一同前往问候女王。

她对孩子们纺作的精致毛料织品，以及在圣史蒂芬教堂附近，还有工匠在舞台上亲自为她示范精湛的纺织技巧，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在她的坚持之下，她甚至抽空儿观赏当地的孩子们在市集中为她表演的一场露天历史剧，剧中将女王赞为“恩典的珍珠，世界之宝，人民的最爱，当代的标的，人间之神”。为了女王的到来，他们排演了好几周，因此尽管女王的行程紧凑，但她不想让他们失望。

在参观大教堂时，女王收到消息指出，安茹公爵真的带兵攻打尼德兰，并与尼德兰一带的新教公国签订条约，新教公国邀请他担任他们的总督，并授予他“低地国对抗西班牙暴政的自由卫士”。稍后在主教宫殿的下榻处，伊丽莎白女王的怒气大爆发，大骂大臣怎能让这种事发生，同时拒绝承认自己也袖手旁观，没有阻止这件事情。伊丽莎白女王随即反应过来，派人向菲利普国王表达支持之意，但她却暗中计划以婚姻协商的希望，来转移安茹公爵的注意力。

尽管如此，诺里奇的庆典仍持续下去。八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女王又欣赏了一出有魔术般特殊效果的戏剧演出，包括藏在地底的音乐，但就在演出快结束之际，天公不作美，所有人只好急忙躲雨。在女王来访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二日，“令人难过的周五”，另外有一出有关仙子的滑稽戏，由当时的诗与散文作家汤姆士·查奇亚德（Thomas Churchyard）主笔，随后女王先是将诺里奇市长册封为骑士，接着在晚上七点才带着依依不舍的微笑离开了诺里奇。

“我的心中充满了美妙的感受，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诺里奇。”她微微哽咽地向居民保证。接着，女王在马上挥了一鞭，并含着泪大

喊：“别了！诺里奇！”

女王这次出访，也让二十二名天主教抗命人士因拒绝服从信仰统一的国王至高权法案而沦落下狱。相反，沿途许多愿意服从信仰统一的天主教人士，与地方上的新教杰出分子，都一同被女王册封为骑士。女王走访这些地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颠覆天主教的影响力，加强人民忠贞的程度。查奇亚德发现，无论伊丽莎白女王前往东英吉利的哪个地方，“都能将崎岖的道路变成康庄大道，并赢得人民的心”。

* * *

诺利斯家族一直拒绝接受莱斯特伯爵与莱蒂丝秘密结婚的事实，而莱蒂丝也决心自己绝不要像谢尔菲德小姐德古莱丝·霍华一样，随意遭到遗弃。对于丈夫依然与德古莱丝和儿子保持联络一事，她恨得牙痒痒的，因此坚持丈夫必须与生命中的其他女人切割干净。

莱斯特伯爵对德古莱丝的热情早已熄灭，因此安排在格林尼治宫与她一会，在两位人士的见证下，莱斯特伯爵表示她不再需要负起身为他妻子的任何责任。同时他也同意，若德古莱丝愿意对外否认两人的婚姻，并将抚养小罗伯的权利交给他，他愿意每年付出七百英镑的赡养费。将近二十五年后，德古莱丝写下两人这次会面的唯一记录，她写着自己当场哭成了泪人儿，断然拒绝莱斯特伯爵的提议，也因此让莱斯特伯爵失去耐性，并对着她大吼大叫，表示两人的婚姻根本不合法。

没有人知道，他为何要坚持两人婚姻不合法。毕竟两人结婚时都是凭着自由意志，现场也有见证人，甚至还有神父证婚，两人当时也都未受到其他的关系束缚。两人成婚的仪式完整，身心也都健全。

德古莱丝表示自己需要一些时间思考，但她随后因为害怕若阻挠莱斯特伯爵将遭到恶意报复，因而屈服了。离别时，莱斯特伯爵给她的忠告，是让她赶紧找个好人家，因此那一年都还没有结束，莱斯特伯爵便为她安排了一门亲事，嫁给一位有贵族血统，在宫中逐渐窜起的新势力爱德华·史达福爵士（Sir Edward Stafford），他的妻子是艾咪·达德利的亲戚萝西塔·鲁伯萨特（Rosetta Robsart），但最近刚过世。

一六〇四年，莱斯特伯爵的私生子，当时的小罗伯·达德利爵士，向宫廷中的皇室法庭申请裁决父母的婚姻是否有效。但这事却受到势力庞大的西得尼家族阻挠，因为他们从莱斯特伯爵与华威伯爵处继承了地位，若小罗伯·达德利爵士赢了这场官司，他们就会输了一切。西得尼家族是新王詹姆士一世身边的红人，也许就是因为他们影响了调查结果，因而使此案不了了之。一五七三年这场秘婚的合法性，一直没有定案，迫使小罗伯·达德利爵士不断地想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但他手上的有力证据却遭到扣押。而唯一剩下的其他证据却显示，这段婚姻绝对合法。

到了十九世纪，因为约翰·雪莱-西得尼爵士（Sir John Shelley-Sidney）宣称自己就是迪莱尔·达德利男爵，这段婚姻的合法性问题又再度被提起，若当年小罗伯·达德利的身份合法，并指定了地位的继承人，则约翰·雪莱-西得尼爵士将失去这个资格。英国上议院为此提起调查，最后决定，约翰·雪莱-西得尼爵士无权取得男爵地位，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小罗伯·达德利爵士的父母婚姻绝对合法。而莱斯特伯爵本人，因为个人因素的关系，有完全相反的想法，尽管他非常喜欢这个儿子，但一直到他死前，都从未提起过他的合法性。

莱斯特伯爵感受到压力，非得安排第二次更适宜的婚礼，才能让莱蒂丝与她的父亲满意。因此在一五七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早晨，两人又在莱斯特伯爵于温斯特的宅邸中再度举办了婚礼，座上嘉宾则有诺利斯家族、华威伯爵与潘布鲁克伯爵。莱蒂丝怀孕的消息已广为人知，因此身穿“宽松的礼服”。两年后，为了确定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新娘的家人还召来负责主持婚礼的神父，要他发誓自己曾为两人证婚。两人举办二次婚礼一事，女王并不知情，且消息受到相当严格的控管。

两天后，伊丽莎白女王与皇室人员，在返回伦敦的路途中抵达了温斯特。并在此待了许多天，受到相当高规格而又花费很大的招待，但新任的伯爵夫人则躲得不见人影。莱斯特伯爵交代菲利普·西得尼以女王之名，制作一个田园假面剧《五月姑娘》；剧中有两个人同时追求五月姑娘，结局由伊丽莎白女王决定，到底五月姑娘该选谁。

* * *

是年秋天，伊丽莎白女王与安茹公爵秘密通信，但她并未将信件内容透漏给任何人，伊丽莎白女王开始认真地思考嫁给安茹公爵带来的益处，其中她最需要的，就是建立新的友谊，让英法关系走向新的境界，并在尼德兰取得真正和平，除此之外她更能有效地协助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尽管伯利男爵与萨赛克斯伯爵对这项计划是否能付诸实现并不抱希望，但仍一如往常地表态支持，而人生早已无惧所失的莱斯特伯爵，则以宗教问题为由大表反对，但此时的他与女王间的关系岌岌可危，必须小心行事以免触怒女王。

十月一日奥地利的堂·胡安身亡，菲利普国王派遣帕尔玛公爵（Duke of Parma）麾下的一支军队前往尼德兰镇压。帕尔玛公爵占领了荷兰南部，将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的势力赶往北荷兰与泽兰，随后在一五七九年北部七省成为共和国。

十一月份，安茹公爵已返回法国，并积极寻找支持他再次突袭尼德兰的势力，于是派遣他“最亲爱的”御用衣橱管理大臣圣马可男爵尚恩·席米尔（Jean de Simier, Baron de St.Marc）前往英国，“他是千挑万选中的臣子，精于爱情游戏、各种感官奇想与厮混调戏”，由他来与伊丽莎白女王讨论婚姻协商内容，并帮她准备好迎接安茹公爵“狂热的追求”。

席米尔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曾因怀疑哥哥与妻子有染因而谋害哥哥，而他的妻子则在他出发前往英国前服毒自尽。但他仍于一五七九年一月五日准时带着一行六十人抵达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在对席米尔的背景毫无知悉的情况下，对这位“完美的臣子”相当买账，甚至为他起了小名为她的“猴子”，甚至盛赞他为“她身边最美丽的野兽”，许多人见了两人的相处模式后，都会误以为女王想要嫁给席米尔，而非他的主子。

席米尔抵达英国后，带着价值相当于一万两千克朗^[1]的礼物送给英国宫廷人士。婚姻协商于是进行得相当顺利，同时席米尔也以安茹公爵之名，不断展现高超的调情卖俏技巧，让女王表现得像个轻佻的女孩，仿佛除了他的陪伴外，她不曾感受到如此开心愉快一般。女王甚至以席米尔之名举办了宫廷舞会，舞会上的假面剧中，演出了六名女孩融化在六位追求者的爱中的故事。她尽可能地召来席米尔陪伴在自己身边，甚至常常将他留在身边直至深夜。她珍藏所有席米尔代安茹公爵献上的礼物，包括一本以宝石装订的迷你书，一直将它带在身边。而女王则给了席米尔一些小小的纪念品，回送给安茹公爵，包括自己的迷你画像与手套。一天，伊丽莎白女王宣布，自己非常想送给亲王更多美好又价值连城的东西，但目前为止这样已足够。

过去任何以政治为目的的追求，从未引起女王如此大的兴奋感，女王就在许多浪漫的插曲中度过了这一年的冬天，女王的参事与臣子

们则开始认为，这次女王可能是认真地想结婚了。“像我这样的老女人想结婚可不是好事吗？”她故意这样揶揄西班牙大使门多萨。

“若女王陛下同意嫁给我，”急切不已的新郎来信写着，“保证能过着缠绵美丽的日子，而这一切只为天堂最美的女神而设。”

伊丽莎白女王与安茹公爵间的年龄差距，或是他脸上的天花疤痕已不再重要。伊丽莎白女王回信向痴心追求她的安茹公爵表示，会将她爱的誓言铭刻在大理石上。女王同时也誓言给予永恒的友谊与忠贞不贰，“这对王室来说相当罕见”，同时脸不红气不喘地向安茹公爵保证，自己从未违反过誓言。席米尔的回报中表示，每次只要有人提及安茹公爵的名字，伊丽莎白女王就会眼睛一亮，而女王身边的侍女也曾向席米尔透露，私底下女王几乎无法停止谈论安茹公爵。伊丽莎白女王甚至表示，此刻自己认为世界没有什么比婚姻更令人欢欣，希望自己从前并未浪费这么多时间。

但在席米尔背后，伊丽莎白女王仍有疑问。他的主子真的对她感兴趣，抑或是只想坐上王位？在答案揭晓前，她都无法安心，且除非安茹公爵亲自走一遭来拜访伊丽莎白女王，否则她都不可能知道。

当女王的参事们听闻席米尔竟趁女王不在时进入女王寝室并偷取女王的睡帽与手帕意图作为“给主人的献礼”；又知道某天女王一早便前往席米尔的房间，让他只能穿着无袖紧身短上衣参见女王时，都开始对这种追求方式持保留意见，甚至有人谴责这些举动是“毫无男子气概、丝毫没有尊严的法国式追求”。

若伊丽莎白女王只是刻意与席米尔调情，以使莱斯特伯爵妒忌，这一招可以说是相当成功。尽管莱斯特伯爵表面上必须对席米尔展现友好态度，并在宫中负责招待席米尔，但他对席米尔的敌意，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莱斯特伯爵可能发现了席米尔黑暗过去，有人听到他

指称法国派来的特使用了“爱情魔药与其他非法的方式”才为安茹公爵掳获女王芳心。多数人都不知道莱斯特伯爵的已婚身份，都认定他私心仍盼望与伊丽莎白女王结婚而在愠气；而伊丽莎白女王的侍女们也都不相信席米尔，当他们出言力挺莱斯特伯爵时，伊丽莎白女王严厉地回答：“汝等认为我会不顾颜面、罔顾皇室尊严，认为我一手提拔的仆人比一个基督教国家的贵族还适合做我的丈夫吗？”在这件事情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在女王面前批评席米尔了。

“他展现出对主子的忠诚，而且在这件事情上拥有超乎年龄的睿智与谨慎。”伊丽莎白女王在写给英国驻巴黎大使阿米爱斯·伯勒特爵士（Sir Amyas Paulet）的信中如此表示。“真希望英国也有这么好的仆人，以供差遣。”

但在女王背后，宫廷传言直指席米尔不仅掳获了女王的心，更赢得了女王的身体。

一五七九年三月，席米尔上呈一份联姻条约草案给英国枢密院。“我觉得很有希望，但一切只能等到故事落幕、蜡烛熄灭，而亲王也能安睡才会知道了。这样我才能安心地说出来。”这是他在四月十二日写下的字句。甚至还有英国人已经开始订制女王的婚纱。

但在伦敦方面，反对与赞成这场联姻的人数是三比一，许多人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因为安茹公爵不仅是法国人，而且还是个天主教鬼子^[2]。清教徒对抗这项计划也不遗余力，甚至许多圣公会传教士，都在圣坛上对此大加责难。甚至有一位传教士还大胆地在女王面前预示：“与外国人成婚，只会为国家带来灾难。”因为感觉受到污辱，伊丽莎白女王愤而在布道会中起身离席。民间的反对声浪相当激烈，不只是反对伊丽莎白女王，更重要的是反对法国，女王只好采取行动禁止任何支持臣民反对此计划的文字流出。

到了月底，英国枢密院针对联姻条约进行攻防，但两派意见相左。宗教问题是一大绊脚石，毕竟，尽管安茹公爵对宗教并不狂热，也可能为了伊丽莎白女王而改信新教，但他现已为法国王位的继承人，因此必须维持天主教身份。

除此之外，女王的年龄也是一大问题。此时她已年届四十五岁，就以现代的标准而言，要生孩子也太晚了。伊丽莎白女王也因此感到焦虑，欧洲许多宫廷因此有传言指出，她因此向一个医疗小组请益，而医疗小组则向她保证不会有问题。伯利男爵则在枢密院会中提起，萨伏伊公爵夫人（Duchess of Savoy）将近五十岁时，仍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婴，男婴也活了下来。他继而表示：女王陛下，“是一个气色相当好的人，以男人的眼光而言，在身材姣好的女性中，女王陛下的身形也算是一等一，她的四肢健全、比例完美。大自然不需要让她再增减任何一分，她就能轻易地孕育与生产。”

因为担忧伊丽莎白女王的安危，伯利男爵进行了相当仔细的调查，以了解为英国诞下王位继承人的过程，是否会为女王带来任何危险。在私人备忘录中，伯利男爵提到伊丽莎白女王的身体状况相当好，“有关孕育后代的那些部分并没有功能失常，反而相当健全，这是经由相当了解她那些部分的医生，与非常了解女王陛下身体状况的女性所做的判定。”这些医师预测，伊丽莎白女王至少还有六年的生育机会，因此可以断定，当时她仍未停经。但这也无法保证，在这样的年龄之下，她仍有能力生育，当然也无法确定她是否会在生产过程中身亡，毕竟在十六世纪，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女性死于生产过程。

伯利男爵认为，满足性欲与孕育后代就能治愈女王的颜面神经痛及“当代的医生们归因于缺乏婚姻所致的女性哀伤体虚”，因此认定皇室婚姻带来的益处，远胜于生产的风险，然而沃尔辛厄姆爵士则比

较实际，他站在多数意见的那一边，表示自己也十分担忧孕育下一代对女王带来的风险。

法国大使则支持伯利男爵的乐观意见。关于伊丽莎白女王，他向凯瑟琳·梅迪奇禀报：“维持着一如往昔的美貌。除了年纪之外完全不显老态。”跟她同样星座的女性生育力一向不低，也很少因生产而死亡。在英国，年纪较大的女性育儿也时有所闻：他的邻居就有一位五十六岁女性，目前已怀孕八个月。

* * *

当英国枢密院表示拒绝联姻条约中的其中三项条文时，席米尔气得冲出议事堂，那就是——婚后安茹公爵随即加冕为英王，他将拥有与女王相同的权力，可授予封地与教会职务，同时英国国会还须通过每年给付六万英镑作为他的薪资，且必须给付到两人的孩子成年为止。当然，在安茹公爵来到英国与女王见面前，参议院也都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席米尔直接去找女王，当时女王正在御花园中散步，她以“和蔼的态度倾听，并对参事们不同意她那么想要的一桩婚事，表达出忧伤”。根据门多萨表示，女王旋即变得“非常忧郁”，随后马上告诉侍女们：“他们别妄想事情这样就结了。我一定要结婚。”

因为感到困窘，席米尔随即向安茹公爵通报此事的发展，但安茹公爵的态度相当和缓，仅表示一切交由女王做主。此时，伊丽莎白女王为参事们的态度感到情绪不佳，大臣们只好赶紧退让，并匆忙地召来她最信任的侍女进宫安抚。

到了五月，伊丽莎白女王已经恢复爱抱怨的原貌，向法方表示他们的要求太多：“如果今天他们要娶的女王，有什么身体或心理上的

问题，抑或智能平庸，也许就可以忍受这些过分要求。但一切完全相反——先将我们的幸运摆在一旁——神以其大能赐予我们他的珍宝，一切功劳归于上帝，而非我等的行为（无须大张旗鼓地自我赞扬），但我等在谦逊之中，仍认为要与如亲王般伟大的贵族匹配，我等不需委屈接受此苛刻条件。”

幸好安茹公爵早已指示席米尔，不需要坚持让英国达成所有条件，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已经表露出“强烈的结婚意愿，无论是哪一位参事，执何种意见，都无法扭转女王陛下的心意”。

整个春夏，安茹公爵不断等待英国方面提出邀请，让他出发与女王一会。伊丽莎白女王仍犹豫不决：一方面，伯利男爵与萨赛克斯伯爵不断催促她同意；但另一方面，莱斯特伯爵日复一日地表达反对立场，据传他甚至伏在女王脚边，哀求她不要答应这桩婚事，甚至疑似两度企图谋杀席米尔未果，只是相关证据薄弱。最终伯利男爵打赢了这场战争，但在这之前，女王“整整三天活在极度懊悔之中，哭了好几回，然后才在莱斯特伯爵以外主导这场协商的人士威胁利诱下，签署了通行证”。

一六一五年，伊丽莎白女王的传记作家威廉·康登宣称，七月初，席米尔积极想要拉拢莱斯特伯爵，阻止他极具破坏力的影响力，因此向女王透露莱斯特伯爵已婚消息，伊丽莎白女王“显得恼怒不已，下令要莱斯特伯爵不准离开格林尼治宫半步，甚至还想把他打入伦敦塔中坐牢，这是他的对手们期待已久的一刻。然而他最大、最可怕的敌人萨赛克斯伯爵却向女王说情。因为他认为，没有人该为合法婚姻惹上麻烦，这样的身份是所有男人的荣誉与骄傲”。

就目前的证据来看，女王非常可能在十四个月前就已知道莱斯特伯爵的婚姻状态。康登表示，她仅短暂地将莱斯特伯爵囚禁在他于宫中的房里，接着将他放逐到温斯特，这段时间里，各国大使都在积极

回报英国宫廷中的各项八卦传闻，但历史上却没有其他关于此事的记载。莱斯特伯爵这段时间的确离宫待在温斯特，但他并未失去女王的宠信。根据门多萨大使回报，七月六日，因为安茹公爵的通行证“与莱斯特伯爵的意愿相违背，他感到相当失望，愤而返回五英里外的自宅，女王则急忙赶赴探望他，莱斯特伯爵再度装病，因而使得女王待了两天。随后女王又秘密返回伦敦”。因此可以判定康登所著的一切并非真实。

伊丽莎白女王的确将怒气发泄在莱蒂丝身上。当莱蒂丝大胆穿着一身贵气仿佛以伯爵夫人身份自居，甚至带着大群仆人出现在宫中时，伊丽莎白女王以复仇天使的姿态走到她身边，赏了她一记耳光，并大吼：“就像天空只有一颗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英国只能有一个女王。”当众受到如此屈辱后，莱蒂丝多年都不敢再踏入宫中一步，且就算莱斯特伯爵不断求情，女王依然不准她出现。

七月八日，英国枢密院通知席米尔，英国方面已经裁定安茹公爵造访英国之行。然而他的哥哥亨利三世认为这么做并不明智，但安茹公爵无视于哥哥的阻挡，在乔装打扮下执意前往英国，于八月中出发。为避免此行毫无结果，安茹公爵秘密出访，仅有他本人、伊丽莎白女王与席米尔知晓，但其实英国宫廷多数人都已知道，只是聪明地装糊涂。为了确保秘密，席米尔住进格林尼治宫花园中的一个帐篷，让安茹公爵与他同住。

门多萨大使的报告中显示，伊丽莎白女王“对安茹公爵来访仍显得相当迫不及待，即使参事们已向女王提出两国联姻背后可能的困境。尽管不确定是否能成为她的丈夫，她深信自己的天分与美貌广为人知，因此足以吸引安茹公爵，仍愿前来拜访她”。

七月十七日，伊丽莎白女王差点丢了宝贵的性命，当时她搭乘着驳船正离开格林尼治宫，在林肯伯爵与法国大使的陪伴下，准备前往

德特福德。依据约翰斯托的记载，一位有两三个孩子待在女王陛下的礼拜堂中的猎人托马斯·埃布尔齐（Thomas Appletree），“他正划着船带着滑膛枪到处穿梭巡视，忽然间他鲁莽地开了枪”。其中一发子弹落在距离女王陛下仅六英尺远处，穿透了一位划手的两只手臂，让他翻出了他的座位，“这位划手以为自己要死了，随即凄厉地大喊尖叫出声”。伊丽莎白女王表现得相当镇定，“一直坚强地鼓励这位划手，并表示可以理解他最需要的就是缓解痛苦”。

在女王的命令之下，埃布尔齐被判了死刑，四天内就在他犯下此刑的水边立起了断头台。但事实上，伊丽莎白女王只是想给他一个铁铮铮的教训，“一直到刽子手将绳子绑在他的脖子上，他才在女王陛下的恩典下，获得救赎，免去一死”。

* * *

安茹公爵于八月十七日一早抵达格林尼治宫，直接进入席米尔的大帐篷，他叫醒了席米尔，要求直接与女王会面。当席米尔表示，女王陛下仍在睡觉时，迫不及待的安茹公爵还得按捺住性子，才没有前去叫醒女王，亲吻她的手背。因此，席米尔递了一张纸条给女王陛下，表示他已让累坏了的主子睡下。“愿神能让他安睡在你身边。”

落日时分，伊丽莎白女王仅带着一位侍女偷偷出宫，与安茹公爵共进晚餐。在两人会面之前，女王一直以为他是个外形丑恶又畸形的侏儒；但实际见了面后，却发现眼前的是一个成熟又充满魅力的男子，坑坑疤疤的麻子脸也无损他那黑发、黑眼诙谐风趣的吸引力，对她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合适的丈夫人选。伊丽莎白女王表示，“我这一生中还从未见过比他更适合的人选”。

“这女人实在太入迷，掉进了爱的漩涡中，简直无法好好招待公爵大人，”法国大使向法国王太后回报，“她亲口表示，从未见过比

公爵大人的个性与特质更适合她的人。”

“伊丽莎白女王相当喜欢安茹公爵，也喜欢和他在一起，这是她向部分臣子透露的”，门多萨大使在给菲利普国王的信件中提及此事。伊丽莎白女王曾表示，自己非常高兴能认识他，也相当欣赏他的优点，对他的爱慕之意也超过了对其他男性。她亲口证实，她绝对不会拒绝这个男人来当她的丈夫。然而菲利普国王知道一切都还没有定论，认为这只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伪装。

但这对皇室恋人间互相吸引的火花并不假。安茹公爵不但有魅力，也相当具有性吸引力，追求的手段相当殷勤，伊丽莎白女王则乐不可支地响应。她昵称安茹公爵为她的“小青蛙”，他们甚至互相致赠礼物，互许夸张的誓言，甚至矢言相爱到终老，永不分离。许多臣子们都发现两人的爱的小游戏，其中也包括了莱斯特伯爵，而他也因此感到恶心、尴尬不已。

但他也无力反对，因为台面上就如门多萨大使的报告中写的：

参事们都拒绝承认安茹公爵在英国国境内，同时为了避免触怒女王，大家都眼不见为净，避免进宫，甚至极力避免与安茹公爵面对面说话的机会，参事们现在只在必要时才前往枢密院。到处都有传言指出，若她未先参照臣民的意见，执意结婚，未来很可能后悔莫及。莱斯特伯爵感到相当倒胃口，除了萨赛克斯伯爵外，大部分的参事们也都感到相当恶心。莱斯特伯爵的一位好友向我透露，他拼命诅咒那个法国人，也对萨赛克斯伯爵的行为感到愤怒。

同时，伦敦各地的新话题，就是法国公爵对女王的卖力追求，因此让许多人民，尤其是清教徒愤慨不已，甚至还有一位莱斯特伯爵门下的诗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写出了一个讽刺作品《哈巴德妈妈故事》，席米尔对这个故事相当不悦，而女王命令莱斯特伯爵将斯宾塞赶出家门时，莱斯特伯爵感到相当尴尬，因为不久前

他才动用自己的人脉将斯宾塞安插在爱尔兰的格雷男爵身边，要他在那里创作出最棒的作品《精灵女王》，献给伊丽莎白女王。

安茹公爵名义上并不在英国，他为伊丽莎白女王带来的惊奇，主要来自两人只能抓紧私下短暂相处的时间。只要有时间，伊丽莎白女王就要见他，而且对于两人的分别感到十分厌恶。八月二十三日，女王安排安茹公爵躲在一处帷幕后，观看宫廷舞会，女王为了在他面前好好表现而显得更加外放，比平常跳了更多的舞，甚至朝他的方向挥手微笑，因此让安茹公爵露出了马脚。臣子们都礼貌性地假装没看见。伊丽莎白女王甚至向门多萨大使否认安茹公爵在英国一事，当两位侍女公开讨论安茹公爵的八卦时，女王则下令两人回房。

两天后，莱斯特伯爵“在极度懊悔之中”，努力寻求觐见女王的机会，同时也展现出相当情绪化的模样。这天晚上，他与同样反对两国联姻的西得尼爵士，一起到潘布鲁克伯爵家召开会议，会后莱斯特伯爵决定再也不要忍受这一切，于是带着姐姐玛莉·西得尼离宫了。他仅剩的唯一希望，就是“国会能针对女王结婚与否的问题提出其他见解。”

因为法国方面传来他的一位挚友因一次决斗而身亡的消息，他只好匆匆安排隔日离开。安茹公爵的英国行因此而结束，伊丽莎白女王甚至安排了王室专用的船只“侦察号”让他离境。

在英国行的最后一晚，席米尔向伊丽莎白女王表示，安茹公爵一直叹息、抱怨又睡不着，甚至一早就将席米尔拖下床，向他赞叹女王的“灵性之美”，同时许下了千个誓言，表示若此生不能再见，他可能连一刻钟都活不了。安茹公爵表白，伊丽莎白女王“是他心头的枷锁，也是让他自由的唯一女神”。

八月二十九日，当安茹公爵离开格林尼治时，“两人对于别离的一刻都展现出相当的温柔”。抵达多佛后，他写了四封信给伊丽莎白女王；接着跨越了英吉利海峡，再从布洛因写了三封信，表示她不在身边让他感到相当孤寂，但也只能抹去自己凄凉的眼泪。他说自己是全天下最忠心、最深情的爱情俘虏，并表示他要亲吻女王的脚，只为在这片不平静的海中找到一处港湾。他以“一朵小金花，上面坐着一只小青蛙，里面则有一个（迷你的）亲王及一个珍珠链坠”为这封信封缄。

尽管伊丽莎白女王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但她私下的心绪已大乱，从她这段时期所写的许多文字便可看出端倪，这首诗叫作《亲王的别离》：

懊悔，我为何不敢表达不满；
我爱，却被迫装出厌恶的模样，
我沉溺，却不敢表现出来；
我看来像个十足的哑巴，内心却正絮絮叨叨。
我是，却也不是，我冷如冰，却又热如火。
这样的我，让我的另一面也难接受。
我的在意仿佛太阳下的影子，
萦绕着我，当我想抓住它却又瞬间飞逝，
就在我身旁，就在我身体中，做着早已做过的事。
让我活在更甜蜜的生活中吧！
否则我愿死去，就能忘了爱的意义。

安茹公爵留下席米尔完成联姻条约的其他协商事宜，剩下的部分就是逗伊丽莎白女王开心。但英国境内对这个计划的反对更甚以往，尤其在首都伦敦，许多臣子们甚至强烈反对。菲利普·西得尼忆起了圣巴托罗缪惨案，于是写了一封相当有礼的公开信给伊丽莎白女王反对联姻计划，提醒她法国天主教徒有多么背信弃义，并坚持安茹公爵的母亲是“当代的杰若柏”^[3]，对新教臣子们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而臣子们“尽管非独一无二，也是你最主要的力量”。女王看到这封信后流下了眼泪并严重地斥责了他。因此，他认为以政治考虑，自己最好离宫一年，离宫的这段时间，他住在姐姐位于威顿庄园的家，写了旷世巨著《阿卡迪亚》（*Arcadia*）。门多萨大使则欢欣期待地报告，菲利普·西得尼相当担忧，若女王真要嫁给安茹公爵，英国可能会爆发大革命。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法国大使的预期，因为这一年的秋天，伊丽莎白女王返回伦敦时，他也震惊地亲眼见到“女王变得比以往更貌美，打扮得如太阳般闪耀，骑着一批西班牙骏马，身边跟着一大群人，展现出她的伟大。这些人不只尊敬她，甚至因崇拜她而纷纷下跪，给予成千上万的祝福与欢心的赞词”。

尽管女王受欢迎的程度难以撼动，但这一切很快就要面对威胁。九月份时，一位来自诺福克郡的清教人士约翰·史塔伯斯（John Stubbs），写了一本书名相当冗长的小册子——《发现贪婪之口，若女王陛下未能看清违背神旨意的婚姻带来的罪与罚，英法联姻恐将吞噬英国》。这本小册子在伦敦付梓发行，接着散播到英国各地，变得异常热销，也影响了民众观感。

这本小册子使用的语言十分激烈，而且大大地攻击了女王以及安茹公爵，因此政府对其内容的愤怒并不难预期，文中甚至直指瓦洛王朝因疾病而腐败，因政权残酷而遭上天降罪惩罚的斑斑劣迹，而安茹

公爵则“在纵情声色中被侵蚀殆尽”。他就是“以男人形体出现的古老邪蛇，二度来勾引英国夏娃，准备破坏英国这块净土”，“就连看一眼女王的睡房都不配”。针对女王陛下这个年纪还要传宗接代，史塔伯斯也质疑此举根本不明智。

伊丽莎白女王看到这本小册子时，整个人怒火中烧，不只是因为这本小册子策动人民反对她，还因为它诽谤中伤又污辱了盟邦法国。九月二十七日，伊丽莎白女王发表了声明书，谴责这本小册子无知又具有煽动性，不但查扣了所有的册子将之焚烧殆尽，甚至派人前往圣保罗的十字架前，向臣民宣告绝不因婚姻改变信仰：“她在基督教的环境中长大，生死都是基督徒。”尽管对此“人民看来高呼着感谢上帝”，他们对史塔伯斯“尖锐又讽刺的语气”展现出厌恶的态度，但他曾广受人民爱戴，人们也相当尊敬他的正直。

听闻这样的情形后，伊丽莎白女王在与法官商议后，下令逮捕史塔伯斯以煽动叛乱罪并准备将他吊死，除此之外还有印刷商辛格顿（Singleton）与发行商威廉·佩吉（William Page）。然而此罪实不致死，因此三人改判剃去右手，锒铛入狱。一名法官与律师出言质疑此判决的合法性，最后也遭无妄的牢狱之灾。

伊丽莎白女王展现出一如往常的宽大为怀，以年事已高为由饶恕了印刷商，她也向法国大使解释，她宁愿失去自己的一只手，也不愿减轻史塔伯斯与佩吉的刑责。这两人被带出了伦敦塔，在怀特霍尔宫前广场搭起的刑架上公开受刑，史塔伯斯也在此自我表述自己对女王的忠诚。

“请为我祈祷，此刻，我的大难临‘手’。”他仍勇敢地玩着双关语。接着刽子手便一刀剃下他的右手，“用切肉刀切穿手腕”。在被砍断的右手被热烫的铁烧灼后，史塔伯斯脱下了帽子大喊：“愿神拯救伊丽莎白女王！”接着便昏死过去。然后佩吉则举起血淋淋的断

肢说：“我留下的，是纯正英国人的一只手。”接着便在无人搀扶的情形下，与他的随从们一同离开。大批围观的民众，都在充满同情与不满的静默中，观看行刑。

在愤怒的情绪过去后，伊丽莎白女王随即醒觉，行事冲动与不寻常的残酷举动，已经触怒了公众。于是十八个月后便释放了史塔伯斯，甚至在宫中接见他；一五八一年，他正式成为英国国会议员。

* * *

英国国会预计于十月二十日再度开议，以决定英法联姻条约，但伊丽莎白女王因为忌讳公众意见，同时也记起自己不该丧失臣子们的好意，下令国会休会一个月，并向枢密院征询意见。

英国枢密院因此引发热烈讨论。在沃尔辛厄姆爵士缺席的情形下，莱斯特伯爵与海登爵士召集另外五位参事联合反对这个计划，而伯利男爵则领着另外四位参事投下支持票。一定要记得的是，伊丽莎白女王“似乎对任何有异议或不支持这桩婚事的人都相当不悦”，他们终于一致地要求女王暂时抛开自己的意愿，对他们“敞开心胸”。

伊丽莎白女王显然已经知道，若在参事与臣子们如此反对这桩婚事的情形下，坚持与安茹公爵成婚，绝对是个愚蠢的念头，但十月七日，四位枢密院代表来到她身边，要求了解“女王的心之所向”，她随即了解到自己必须拒绝最后一个嫁人与生育的机会，因而不住地伤心哭泣。她叹道：“她的参事们应仔细思考，对她和她的王国来说，除了成婚、生个孩子继承王位并延续亨利八世的血脉外，似乎没有什么更明确的道路了”。她边哭边表示，询问枢密院的意见是相当愚蠢的事情，她原本期待“枢密院一致通过，让她迈向婚姻之路”；她并不想听参事们的质疑。此刻的她实在太苦恼，无法再继续下去。

枢密院代表们垂头丧气，赶紧退下，向同僚们回报此事。隔天，他们再度谒见女王，表示“只要女王高兴”，枢密院将由衷支持“英法联姻进程”，同时也解释，因为女王如此渴望婚姻，并且如此直接地表示希望丈夫就是安茹公爵，除此之外谁也不要，因此感动了他们，让他们改变心意。此时的伊丽莎白女王已经恢复往昔的冷静沉着，以犀利的言论回击那些反对联姻的人，表示若非他们意见太多，枢密院多数的参事早就同意联姻一事。最后枢密院方面总算说服她同意给一个确定的答案，但她却没有暗示她的答案是什么。她只说：“她觉得直接向我们宣布她要不要嫁给亲王，是一件不适合的事情。”

门多萨大使的报告中则记录着：“在这次的商议过后，伊丽莎白女王显得极度悲伤，且极度暴躁忧郁，只要接近她身边的人都感觉得出来。这一切的事情，在在触动了她的敏感神经。”

在下一一次与参事们的会面中，伊丽莎白女王的情绪极差，并向沃尔辛厄姆爵士表示除了偏袒清教立场外，他一点用处也没有，因此最好离席。她对莱斯特伯爵也没什么好气，诺利斯爵士与海登爵士，也感受到她牙尖嘴利的威力，其中海登爵士更因反对这桩联姻，遭到驱逐出宫一周。

伊丽莎白女王知道，现在她若想维持臣子们的爱戴，就永远不能让安茹公爵当她的丈夫，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状况下延长联姻协商时间，以维持法国方面的友谊，顺道控制安茹公爵的行径。因此在十一月十日时，戴着装饰着法国国徽鸢尾花的头纱，伊丽莎白女王召开了枢密院会，“向枢密院宣布她已决定要结婚，他们什么都不用说了，但必须马上讨论完成婚事的相关事宜”。

十一月二十四日，她同意与席米尔签署婚姻条款，附带条件是要给她两个月的时间处理臣子的问题，让国会同意联姻计划，才能确定

条约内容。若法方无法通融，双方的协议将失效。伊丽莎白女王相当清楚，英国国会要通过此案的可能性极低，但这将成为她最终拒绝协商的好借口。

伊丽莎白女王写信给安茹公爵：

盼你明白，我最亲爱的，婚姻之路最大的障碍，在于让人们欢欣同意。对罗马宗教的信仰，深植于他们的心中。仅求你将此纳入考虑，对英国人来说，此事难以忍受的程度已超乎想象。就我而言，我承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贵族，让我感到如此倾心，也无人像你一样，无论是少有的美德或贴心的个性，都让我想与你共度余生。以此问候我亲爱的小青蛙。

正如约克大主教所说：“法国的事情完全破灭。”

到了十一月底，席米尔便在军队护航下，带着许多精美礼物与一行人返回法国，后来他寄给伊丽莎白女王一连串绑上粉红丝带的热情信件，但伊丽莎白女王对他却没再回复。

同一个月，谢菲尔德小姐德古莱丝嫁给了英国现任驻巴黎大使爱德华·史达福爵士。伊丽莎白女王曾听闻德古莱丝与莱斯特伯爵过从甚密的消息，因此抓住这个机会教训莱蒂丝·诺利斯，大声疾呼，表示因为先前德古莱丝疑与莱斯特伯爵举办过结婚典礼，而忧心两人婚姻的合法性。若两人的婚姻证实合法且有效，女王便得以对莱斯特伯爵下最后通牒：要不就是宣布与莱蒂丝的婚姻无效，给予德古莱丝名分与地位，“否则就在伦敦塔中腐烂”。

萨赛克斯伯爵是德古莱丝的表亲，女王指派他负责侦讯德古莱丝，然而，她却无法提出一五七三年那场婚礼的证人或纸本证据。因为她恨透了莱斯特伯爵，一点也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因此这个反应也不是不能理解。

伊丽莎白女王怀着遭背叛的心情展开报复，到了十二月，莱蒂丝·诺利斯为莱斯特伯爵生下了一个继承人，这让女王更为光火——两人的第一个孩子于一五七八年不幸难产死亡。这个男孩在施洗时被命名为罗伯特，同时继承了父亲丹毕男爵（Baron Denbigh）的封号，但他的父母总是称他为他们的“贵族小淘气”。这件事之后，加上莱斯特伯爵对女王与安茹公爵联姻毫不掩饰的厌恶之情，看来莱斯特伯爵要再得到女王宠信，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了。

* * *

这一年年终时，席米尔写信给伊丽莎白女王：“别忘猴子的忠贞，小青蛙依然活在希冀之中。”就在此时，伊丽莎白女王与门多萨大使讨论了婚姻的议题，“以相当柔情的态度谈起此事，并清楚表态她有多么热切地想要这段婚姻”。

但席米尔在她身上下的魔咒似乎已经过期，伊丽莎白女王再度成为自身命运的女主人。

[1]. 一克朗等于二十五便士，也就是四分之一英镑，所以一万两千克朗等于三千英镑。——译者注

[2]. 天主教鬼子：papist，贬低天主教徒的称法。——译者注

[3]. 杰若粕：Jezebel，《圣经》故事人物，以邪恶淫荡出名。——译者注

19 进退维谷

进入一五八〇年新年，伊丽莎白女王心绪依然阴郁，对反对她成婚的参事依然相当不能谅解，“对莱斯特伯爵也不再展现如以往般宠爱”。但不久后，她已经开始理解，莱斯特伯爵与其他参事反对婚事背后的原因，当法国大使批评莱斯特伯爵，故意提出宗教问题来阻挡婚事进行时，女王不以为然地反驳，指莱斯特伯爵只是在做枢密院参事该做的事。尽管如此，两人似乎也无法恢复往昔的亲密，一直到这一年的四月，她对莱斯特伯爵的态度才开始软化。

一月底时，伊丽莎白女王婚事的考虑期限，在她毫无动作的状况下过去了。门多萨大使记载，安茹公爵相当清楚自己不该施压要答案，反而努力在英国宫廷中争取支持度，他不断写信给女王，要求她释放约翰·史塔伯斯与威廉·佩吉，塑造自己宽大为怀的王者风范。

二月底，门多萨大使听闻伊丽莎白女王向伯利男爵抱怨自己的处境，仿如“前有大河后有追兵般地进退两难”。

“我认为无论是个人意向，或透过任何您信任的人劝说，女王陛下并无结婚意愿”，伯利男爵清楚点明。就连他指出，若女王决意不婚也需“立即点醒安茹公爵”时，女王依然不置可否。女王主要的目的，就是维持与安茹公爵无限期的“鱼雁往返”，对于参事们警告以此低劣的手段对付法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她也充耳不闻。“想要对他国贵族耍花招的人，就是在耍自己。”伯利男爵不满地说。

伊丽莎白女王大胆地继续这条路线，以潦草的字迹，写了一连串日期未定的信件给安茹公爵。在这些信件中，女王技巧性地暗示，因为人民无法接受安茹公爵参与的弥撒仪式，两人当前可能必须否认彼此的关系，但只要给她多一点时间，她也许可以用结婚的好处来说服臣民。一次又一次地，女王盛赞安茹公爵那“坚若磐石”的坚贞，同时又不断将协商进程延迟的责任推卸给法方。“我们的灵魂属于彼此。”女王坚称——但最要紧的问题是，何时呢？

女王大张旗鼓地，尤其是在法国大使面前，表现出依然深爱安茹公爵的模样，甚至带着青蛙样式的珠宝以资证明。女王的腰带上总是系着安茹公爵送她的手套，每天总会仿佛炫耀般拿出来亲吻上百回。一次在宫廷舞会中，伊丽莎白女王甚至逼迫法国大使听她念安茹公爵写给她的一字一句，女王读信的口吻温柔缱绻、充满感情，让法国大使以为，她只是想让反对这段婚姻的人打消念头。

当然，这都是女王装出来的，主要目的是让法国大使感到满意。虽然伊丽莎白女王已经接受自己绝对不能下嫁安茹公爵的事实，但就连枢密院成员们都仍不断猜测。沃尔辛厄姆爵士就曾叹道：“但愿女王陛下能找到方法，解决她的婚姻问题。”萨赛克斯伯爵则曾写下：“若女王陛下还未找到解决方法，定有加速寻求解决之道的必要，毕竟此事为她带来的耻辱，我完全不敢诉诸纸笔，加上她状态未决为她带来的危险，这一切都仰赖婚姻来解决。”

七月，伊丽莎白女王对于莱斯特伯爵反对她结婚，仍难以谅解，尽管女王暴怒的次数减少了，参事们的心情依然相当苦涩。在一次女王大发雷霆过后，有人听到莱斯特伯爵叹道：“宁愿卖掉最后一块地，也不愿再过这种苦日子。”他与女王间的冷战，也让他将怒气转嫁到同僚身上，后来他做得实在太过分，甚至必须写信给伯利男爵道

歉。伊丽莎白女王与往昔的宠臣间，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和谐关系。

行为古怪的牛津伯爵宣布改信罗马信仰，因而不再受到女王器重。为了平衡自己在女王面前的形象，他偷偷向女王揭露秘密信仰天主教的臣子，结果导致这些人都遭到软禁。但这种爆料行为，对牛津伯爵也没什么好处，过去与他交好的朋友都疏远他，伊丽莎白女王也是，她不齿牛津伯爵的行径，而牛津伯爵甚至闹出与一位行为不检点又放荡的女王侍女安妮·伐瓦梭尔（Anne Vavasour）过从甚密的传闻。

接下来的三月，安妮竟然生下了一个儿子，牛津伯爵随即承认父子关系，安排这个孩子的未来。但伊丽莎白女王“为此意外感到恼怒不已”，要安抚她的心情并不容易，于是将安妮与她那不负责任的爱人，一同关进伦敦塔几周。

* * *

一五八〇年，过去五年来相对稳定的英国政局，因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 XIII）再度发布前任教皇对伊丽莎白女王的逐出教令而面临崩毁。到了夏天，英国政府开始警觉，耶稣会神职人员纷至沓来。他们的神圣任务，就是扩大天主教信仰在英国的地位，于是由激进派教士罗伯·帕森斯（Robert Parsons）与虔诚又能鼓动人心的圣艾蒙·坎庇恩神父（Father Edmund Campion）领军，负责耶稣会传教任务最终的大成功及未来十年内英国境内的天主教反抗势力，但这些行动也引发英国相当大的爱国反应。

英国的政治情势不太乐观。玛丽·斯图亚特针对伊丽莎白女王展开了新一轮的阴谋，这次与她勾结的是西班牙大使门多萨，这个相当危险的伙伴关系，维持了将近三年。英国与苏格兰之间的关系，在詹

姆士六世僭越了权力后，便相形冷淡；年纪轻轻的他，有一段时间逐渐向母亲与吉斯家族之间的势力靠拢；国际上也开始出现担忧菲利普二世篡夺葡萄牙王位的声浪。在强大的海军与富庶的国力之下，葡萄牙建立了稳固的帝国，并成为史上最富有的王朝。法国方面，宗教纷争造成的战争再度爆发，让伊丽莎白女王不再奢望与法国联盟，英国再度陷入孤立的境地中。

八月份传来消息，指出菲利普国王吞并了葡萄牙，自称为王。“西班牙国王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了。”伊丽莎白女王咬牙切齿地说。为了回应这个重大威胁，伊丽莎白女王决定大力支持非法觊觎葡萄牙王位的唐·安东尼奥（Don Antonio），他对葡萄牙王位的合法性，比菲利普国王来得更低。为了挫一挫菲利普国王的锐气，伊丽莎白女王更在背后支持安茹公爵在尼德兰的运作，她邀请法国的婚姻协商委员紧急来到英国。

但法方并未实时响应，让女王感到十分光火，很快各界就知道，安茹公爵对于荷兰王位的兴趣大过了英国王位。威尼斯驻巴黎大使就听闻类似的传言，指出安茹公爵对伊丽莎白女王的热情不再，同时还想起了“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与伊丽莎白女王肢体上令人厌恶之处”。九月份，荷兰反抗军遭到帕尔玛公爵连连攻击，节节败退，于是他们请求安茹公爵协助，若能摆脱西班牙势力的纠缠，便愿奉上荷兰王权，现在几乎可以确定，安茹公爵肯定会要求未来的妻子以军力支持，作为两人成婚的条件之一。这件事情的发展触动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敏感神经。“我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己被利用，而是若国会通过我的婚姻协商，但愿我的婚宴，不会成为英国臣民富庶背后的吸血虫。”伊丽莎白女王写下这样的词句。她相当担心这段婚姻可能让英国陷入负担沉重的战争中，“而女王可能也会为此不得不与丈夫起齟齬”。安茹公爵无视伊丽莎白女王的抗议，接受了荷兰方面献上的王权，九月十九日正式成为荷兰统治者。

* * *

一五八〇年九月二十六日，弗朗西斯·德瑞克乘着改名为“金鹿号”的“鹈鹕号”，经过三年的海上探险后，终于回到南安普敦港下锚，这段时间他已环游世界一周，他是继一五一九年到一五二二年费南多·麦哲伦率先完成此创举后的第二人。德瑞克第一个问题是了解女王是否安好，听闻女王依然健在后，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面对西班牙愤怒的报复，极需女王的保护，他破坏了西班牙的贸易，从西班牙处得手八十万英镑宝物，西班牙国王则对他发出追杀令，要他人头落地。

伊丽莎白女王不但没有将他视为罪犯，反而邀请德瑞克前往里奇蒙德宫，让他以冒险故事陪伴女王度过愉快的六个小时。他靠着驮马带回英国的宝物中，包括一顶有五颗绿宝石的王冠，伊丽莎白女王于一五八一年新年那一天还公开佩戴。德瑞克搜刮来的战利品让伊丽莎白女王开心不已，龙心大悦地让他留下一大部分的珍宝。女王自己则得到相当于十六万英镑的宝物，存放在伦敦塔中。虽然门多萨大使以近乎歇斯底里的方式抗议并要求归还，但英方一点也没有归还给西班牙，德瑞克也并未受到惩罚。相反，在女王的命令之下，“金鹿号”从此停泊在泰晤士河上，向大众展现德瑞克英勇的探险故事。

此后，德瑞克成为宫中的大红人，常常造访宫廷。伊丽莎白女王总是热情欢愉地迎接他，听他诉说四处游历的故事，而他则带来许多贵重的礼物致赠给女王，其中包括一具精致的钻石十字架。

* * *

从一五八〇年后，菲利普二世便计划以军事手段利用海上军力入侵英国，致使伊丽莎白女王面临极大危险。当年十二月，在经过询问

两位不知名的英国天主教贵族，刺杀女王是否合法后，罗马教皇发布了刺杀令：

这个女罪人造成天主教信仰遭受颠覆，许多灵魂无法得到救赎。能以虔诚的心，以神之名，让她与这个世界隔绝者非犯罪，而是立下大功。因此若英国贵族愿承担此荣耀之责，将不致有罪之疑虑。

罗马教皇的宣言很快传遍世界各地，这让英国政府大感不悦，同时也警觉到，若女王遭到暗杀，政府将无立足之地。眼前只有保全女王性命，才能避免罗马势力入侵英国。

英国国会与枢密院不断呼吁女王，对天主教异议分子与宣教神职人员采取严苛的手段。尽管女王天性痛恨流血，至今总是采取温和手段，但此刻她也理解到，罗马方面的制裁行动为她带来极大危险。尽管如此，英国国会对于一五八一年三月十八日通过的不服从国教法案依然相当不满意，将拒绝参与圣公会仪式者的罚金，提高到每个月二十英镑之多，若被发现参与弥撒仪式，最高将被判一年有期徒刑，只要改信罗马信仰者，便以叛国之名等同视之。更重要的是，任何散布诋毁女王字眼者，若为初犯，将戴上颈枷手枷示众、砍去双耳并罚金两百英镑；再犯便是死刑。以女王的星座或预言擅自预测女王寿命或继位人选者，也将成为非法之徒。

从这时起，圣艾蒙·坎庇恩与罗伯·帕森斯等传教士被视为英国的重大敌人，尽管如此也并未出现大规模处决的情形。接下来的二十年内，只有不到两百五十位天主教徒遭到死刑或死在狱中。但历史上有相当可信的证据，指出其中约有九十人遭到刑求，尽管在所有的案例中，女王都并未亲自参与判决，但她显然知情。她个人偏好以牢狱之刑或罚锾来惩罚这些犯罪者。

一五八一年一月，当法国同意派遣特使前来英国时，伊丽莎白女王听闻此消息感到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几个月，她将全神贯注地精心

准备法方人员的接待事宜，这不是因为她想要嫁给安茹公爵，而是因为她知道与法方缔结友好条约多么重要。

此时的安茹公爵背负巨额债务压力又缺乏资源，又再度打起与伊丽莎白女王联姻结盟的主意。一五八一年四月，英国等待已久、视为上宾的法国特使终于抵达怀特霍尔宫，特使团的目的是要完成婚姻协商，或确定万一两国不联姻，便得说服伊丽莎白女王支持安茹公爵在尼德兰的基业。

一抵达英国，特使团便致赠由安茹公爵亲自为伊丽莎白女王万中选一的新鲜花束，伊丽莎白女王回信致谢：“这些由小手采摘的甜美花朵，让我感受到无比的祝福，我从未收过如此典雅的礼物，花束上的叶子依然如同刚摘下般新鲜，将你的情感生动地展现在我眼前，真希望这束花永远不会枯萎。”

穿着金色服装的伊丽莎白女王，闪闪发亮，她以相当铺张的宴会与豪奢的大帐篷来款待特使团，这个新式帐篷长三百三十英尺，还有两百九十二扇窗，天花板上装饰着太阳与金色的星星，这是英国方面花了一千七百四十四英镑巨款所建。接下来是更多的晚宴、戏剧、假面剧、历史剧表演、斗熊、马上长枪比武、大型宫廷舞会，以及与枢密院的许多会议。门多萨大使表示，伊丽莎白女王“似乎对卖弄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更重于缔结条约”。

最后伊丽莎白女王终于愿意办正事，她突然向特使团表示，对于自己与安茹公爵之间的年龄差距，依然相当在意。她也觉得自己若下嫁安茹公爵，等于是以错误的方式鼓励英国天主教徒。她也不希望与西班牙方面开战。事实上，她比较偏向以非婚方式缔结盟约。

惊讶不已的特使团迟疑表示，除了联姻条约之外，他们无法为其他事情做主，但伊丽莎白女王态度丝毫没有动摇。特使团继续待在伦

敦，盼望她的态度会软化。

四月四日，女王从格林尼治登上了“金鹿号”，然后为了反抗菲利普国王，刻意在德特福德靠岸与弗朗西斯·德瑞克一同用膳，甚至以他环游世界的英勇事迹，将他册封为骑士。她也带着法国特使团随行。船上的宴会，“是英国自亨利国王时期以来，最豪奢的一次”，在宴会上，女王相当放松又活泼。为了取悦女王，德瑞克的仆人们穿上了红色印第安人的服饰，为女王跳一支战舞，而船长则接着花了四小时的时间，讲述海上探险的事迹。尽管多数的臣子们因无趣而显得无精打采，但女王却显得神采奕奕。

德瑞克陪着女王在船的附近散步时，两人讨论到菲利普国王下令要追杀他的事，女王掏出一把剑，一边开玩笑表示要用这把剑“砍下他的头”，一边假装在空中挥舞着。

伊丽莎白女王意欲向菲利普国王强调英法的防御同盟，因此转向安茹公爵派出的一位特使马修蒙先生（Seigneur de Marchaumont），将手中的剑交给他，要他代替女王执行册封仪式。结果矮胖的探险家发现他自己在甲板上，跪在一位法国人面前，而女王则在旁观看，笑容满面地点着头。

后来女王那紫金相间的束袜带掉了下来，她弯腰调整之际，马修蒙先生询问她，是否愿意“赐予”束袜带，作为主子安茹公爵的战利品。女王则表示“这样一来就没有办法固定她的袜子了”，但返回格林尼治宫后，女王给了她一副束袜带作为给安茹公爵的礼物。

新封的骑士德瑞克，将他环游世界旅程的地图上呈给女王，“并附上一本日记，里头巨细靡遗地记载了他不在这三年发生的每一件事”。这本记事本与“金鹿号”都没能留存到现在；那艘船于一五九九年正式崩毁。当时德瑞克早已离世，但他成为英国的重要传奇人

物，在伊丽莎白女王的臣子与接下来几世纪英国历代君主心中，占据了情感上与想象中的重要地位。

* * *

六月十一日，伊丽莎白女王显然又大幅地改变了心意，法国特使团得以在怀特霍尔宫草拟一份联姻条约。但伊丽莎白女王又坚持，这份条约需由安茹公爵本人背书，法国特使团只能带着不满的情绪返回法国。

进入夏季，安茹公爵已然走投无路，发现自己可能被迫要放弃对荷兰的野心，返回满是豺狼虎豹的法国。尽管伊丽莎白女王借他三万英镑，但这笔钱根本不够，在一封信中，女王暗示自己已然改变心意，不愿嫁给他了：“尽管她的身体永远只能属于她自己，但她的灵魂永远与他常在。”

尽管如此，当她听说法国王太后要安茹公爵迎娶一位西班牙公主时，她随即派出不情不愿的沃尔辛厄姆爵士前往法国，并指示要他捏造伊丽莎白女王其实还想嫁给安茹公爵的谎言，但事实上是要进行不需婚姻关系也能达成的同盟。这绝对不是个简单的任务，尤其是显见未来英国方面会下达一连串自相矛盾的指示，因此不久后，沃尔辛厄姆爵士便在莱斯特伯爵与海登爵士的支持下，要求女王别再想婚姻大事了。但这样的请求仿如对牛弹琴。

“除非女王陛下能有更好的决定，否则此刻若有人将我押入伦敦塔大牢，应该可以说是帮了我很大的忙。”沃尔辛厄姆爵士写了这样的句子给伯利男爵，“若想求得邦谊，我恐怕女王陛下得到的会是敌意，而身为臣子的我则感到相当挫败。”

沃尔辛厄姆爵士向法王亨利三世表示，伊丽莎白女王“愿意结婚，让法王与他的弟弟一起保护她，不受战争的恐惧”。但没有人能保证，就算法方完全答应他的条件，她就真的愿意下嫁。“当女王陛下受到胁迫必须成婚，”沃尔辛厄姆爵士向伯利男爵忍不住抱怨：“她就宁愿与人结盟，在渴望达成结盟之际，她又改变心意想要结婚了。她因此又倾向同意结婚，接着又改为结盟；当结盟或其他要求牵扯到金钱时，女王陛下又回到婚姻议题上打转。”

另一方面，亨利三世与凯瑟琳·梅迪奇坚持，英法任何联盟关系，都需建立在联姻机制上。他们也和伊丽莎白女王一样，焦急地希望可以赶走西班牙在荷兰的势力，若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可以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金援，那就更好了。

经过几周的协商，沃尔辛厄姆爵士直接向伊丽莎白女王表明，她必须做出决定：“若陛下没有这样的意思，请告诉自己，这对你来说就是最糟糕的方法（无论女王陛下认定它的效果如何）。”若女王陛下继续支吾其词，就可能失去其他贵族的友谊，于是伊丽莎白女王选择认定沃尔辛厄姆爵士支持她选择这段婚姻。当他返回英国时，便以开玩笑的口吻表示：“你这无赖，为什么一直批评他（安茹公爵）呢？你简直像墙头草两边倒啊！”

* * *

七月份时，圣艾蒙·坎庇恩遭到逮捕，并被关进了伦敦塔大牢。隔天，他被送往莱斯特宅邸，接受莱斯特伯爵与其他参事们的讯问。根据一个米兰籍人士提供的内线消息：“他应讯的态度相当有学问、慎重又温和，让伯爵们相当欣赏，伯爵们欣赏他的德行与学识，并表示他信天主教真是太可惜了。他们下令卸下他身上的枷锁，并要求伦敦塔中的狱卒们人性地对待他，给他一张床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尽管如此，坎庇恩还是免不了遭到三度刑求，以透露他的同伙，同时撤

回他的主张，但两点他都完全拒绝。随后他免不了面对肃杀的命运：他被吊死，罗马天主教会随后则将他立为圣人。

打压天主教徒全新的严苛法律，免不了引起反弹效果。秋天来临之际，菲利普二世威胁伊丽莎白女王要兴战，门多萨大使警告她，若不听信菲利普国王的忠告，“那就有必要看看，火炮是否能让她听得更清楚一点”。女王则相当沉着，“不带一点感情，仿佛重述一个闹剧情节般，以低沉的口吻”回答他。若他是想要威胁惊吓她，她平静地表示，那她只好把菲利普国王“放到一个他一个字都说不了的地方”。

在这样的当头，安茹公爵认定若他再度前往英国，亲自追求伊丽莎白女王，便能让情势对他有利，甚至还可能大赚一笔。于是在冬季时，他离开了部队，经过了惊险万分的旅程后，他终于在十月三十一日从英国萨赛克斯的拉依登陆了，当他于十一月二日抵达里奇蒙德时，伊丽莎白女王公开地以热情的态度欢迎他，并在里奇蒙德宫附近找了一间宅邸让他住下：伊丽莎白女王亲自监督宅邸的翻修，并俏皮地表示他应该会认得里面的那张床。她也送给安茹公爵一支金钥匙，可以打开宫殿中的任何一扇门，还给他一把镶着宝石的火绳枪，而安茹公爵则送她一只昂贵的钻戒。

两人迅即恢复往昔恋人的角色，伊丽莎白女王对她的“青蛙王子”、“小摩尔人”或“小意大利人”说着一些无意义的甜蜜话，并告诉安茹公爵，他是她遇过“最忠贞不渝的追求者”。门多萨大使发现：“一整个早上直到中午，伊丽莎白女王都不办正事，只待在房中与安茹公爵诉情衷，接着在中午过后，这样的情形甚至会维持到日落后的两三个小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邪恶的勾当。”“忠贞的弗朗西斯”带来的一切都不算太好，宫中开始出现传言，指每天早上安茹公爵还在赖床时，女王便会带着一碗热汤前往探视。有人则是听说，

安茹公爵表示渴望日日夜夜成为女王的入幕之宾，让她了解自己多善于陪伴。伊丽莎白女王更夸张的是，由安茹公爵陪伴她前往圣保罗大教堂参与宗教仪式，以消弭臣子们的忧虑，同时在教堂上下都能看见的地方，公然亲吻安茹公爵。

十一月十一日，门多萨大使通报菲利普二世，法国大使与安茹公爵的随行人员“视两人的婚事为势在必行，但英国大众则嘲弄这个想法，表示安茹公爵要的只是钱。显然女王将会尽可能地避免冒犯他，在安茹公爵重视的荷兰事务上给予承诺，以破坏安茹公爵的哥哥与陛下的关系，这是她最大的阻碍，同时她尽量保持不受干扰，等待时机，准备宣战”。

目前为止，安茹公爵已经开始忧心，伊丽莎白女王为何不公开宣布自己对他的感情。根据门多萨大使的了解，“当伊丽莎白女王与安茹公爵私下相处时，她尽量满足安茹公爵的要求，做到比任何女人对男人都要更好的地步，但她绝不会公开表态”。她也要求法国大使转告，要亨利三世在经济上援助安茹公爵。

十一月二十二日，伊丽莎白女王知道安茹公爵的耐心逐渐被消磨殆尽，伊丽莎白女王安排了一场给他的惊喜。根据门多萨大使的记录，伊丽莎白女王与安茹公爵在怀特霍尔宫的长廊中漫步时，身边有莱斯特伯爵与沃尔辛厄姆爵士相陪，

法国大使来到跟前表示，他想要回信给主子，因为法王亨利三世下令要直接询问伊丽莎白女王对与他弟弟结婚的想法。女王回道，“请如此回应贵国国王：安茹公爵是我的丈夫人选”，接着她转向安茹公爵，在他的唇上深情一吻，再从手上拿下一个戒指，送给安茹公爵作为承诺。安茹公爵则回送一个自己的戒指，不久后，伊丽莎白女王将她的侍女与侍臣们召集到谒见室中，以相当大的音量，将方才的承诺又说了一次。

伊丽莎白女王的宣言，在英国境内与欧洲各地都引发不小的声浪。当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听闻伊丽莎白女王公开接受安茹公爵为丈夫时，下令全安特卫普大鸣钟声以庆祝。安茹公爵“简直乐坏了”，但莱斯特伯爵与海登爵士与女王身边的许多侍女都哭了。威廉·康登写着：“廷臣们”的心情百感交集；有些人乐不可支，有些人羡慕不已，有些人则相当哀伤。伯利男爵时因痛风不得不卧床，也兴奋地表示：“称颂耶和华！”不久后，伊丽莎白女王便宣称，“在恋爱中失去了女性的庄重”，让她说出了超出原本意图的话。无论如何，她刚刚在有见证人的状态下所做的，就等于正式的订婚。

这天晚上，她坐在一群侍女中，显得相当疑虑和忧郁，侍女们则“不断哀诉并对她表达害怕之意，用各式各样的话语使得女王心烦意乱”，甚至睡不着。她试着忽视心中的疑虑，期盼法王会拒绝特使团带回去的条件，让她从承诺中解放出来。若他不愿这么做，她就只能额外提出其他更不可行的要求。若这些方式都行不通，她就必须确保英国国会否决这项婚姻。

隔天一早，伊丽莎白女王向安茹公爵表示，若再度过两个这种煎熬的夜晚，她可能就要安息了，于是她决定现在还不能与他成婚：尽管她对他的感情无法抹灭，但她必须为了全体臣民的福祉，牺牲自己的快乐。安茹公爵只能表示自己相当悲伤与失望，但当他有时间仔细思考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若他无法透过与伊丽莎白女王成婚来资助尼德兰基业，那他只好让她付点分手费了。

* * *

伊丽莎白女王与法方的全新协议，让菲利普国王终于在十一月份准备求和，表示他愿意原谅伊丽莎白女王过往对西班牙的挑衅，并表示愿意重签之前的《英国—西班牙联盟协议》。此举代表伊丽莎白女王此后的危机减少，但英国政府依然时刻不能松懈。

就如伊丽莎白女王所料，亨利三世看到她提出的意见后，果然露出“相当刻薄的表情”，对于伊丽莎白女王拒绝资助安茹公爵在尼德兰的基业一分一毫，忍不住破口大骂，法国方面自然也不愿答应伊丽莎白女王的要求，也就是要他们允诺若西班牙攻打英国，法国将会出兵相挺。毫无意外地，法王立即拒绝了英国开出的条件，当安茹公爵知道了英方的要求后，有人听见他喃喃地抱怨：“女人心思难料，海岛民族个性易变。”

进入十二月，伊丽莎白女王对于好不容易摆脱的窘境，感到欢欣鼓舞，于是她向安茹公爵表示，若他愿意离开英国返回尼德兰，她就愿意借他六万英镑，协助他对抗西班牙势力。安茹公爵接受了这个条件，并安排于十二月二十日起程。根据门多萨大使侧面了解，伊丽莎白女王因为顺利摆脱了安茹公爵，因而在寝室中开心地跳起舞来，接着她也向萨赛克斯伯爵表示，自己对婚姻的厌恶感日渐加深。

然而一直到十二月底，安茹公爵依然出没在英国宫廷中，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并向女王表示，若要他不娶女王就离开英国，他不如死了算了。女王对此十分敏感，于是尖锐地问他，“难道要在她的国家威胁她这个老女人吗？”并表示从今以后，安茹公爵必须努力将她当成姐姐般看待，这一席话让安茹公爵爆发了一阵大哭，女王甚至不得不把自己的手帕借给他。

事已至此，伊丽莎白女王恨不得尽快摆脱他。现在她已经完全不想嫁给他了，安茹公爵却仍持续出没在英国宫廷中，让此事陷入尴尬局面。莱斯特伯爵提议用二十万英镑贿赂他，让他快点离开，但光想到要花这么多钱，就让女王惊骇不已。因此女王要伯利男爵转告安茹公爵，希望他在新年以前离开，才不用砸大钱送女王昂贵的礼物，但这一招也没有用。十二月三十一日来临时，安茹公爵变得更加难缠，不断提醒伊丽莎白女王，她已经承诺过要嫁给他，于是她给了他一万

英镑。但他依然在英国逗留，担心若离开英国国境，就再也得不到更多钱了，这一点自然毋庸置疑。

在担忧安茹公爵的心情之中，伊丽莎白女王仍有慰藉。这一年十二月，她被一文不值的德文郡男子华德·莱礼爵士（Walter Raleigh）迷得神魂颠倒，当时他带着爱尔兰代表的信函，抵达英国宫廷，很快女王便要求这个新来的代表住下来，他接着很快成为女王身旁的亲信。

莱礼爵士出生于一五五二年，在牛津大学受教育；他是伊丽莎白女王前家庭女教师凯瑟琳·艾希莉的大侄子。在青少年晚期时，他曾与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一同并肩作战，一五七八年时，甚至陪伴他那同母异父的弟弟汉弗利·吉尔伯特（Sir Humphrey Gilbert）一同出海探险，然后才在爱尔兰代表的手下找到一份职缺。

他是一位优秀又多才多艺的男性：在那个年代，他同时身兼军人、冒险家、探险家、发明家、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诗人与学者于一身，他也是一位相当具有说服力的演说家、称职的政治人物与国会议员，有解决各种难题的无穷能力。他勇敢无惧、敢于冒险，有气势逼人的男子气概，身材修长、皮肤黝黑，他的眼神锐利，还有明显的胡须。在有关伊丽莎白时期的宫廷轶事中，罗柏·依顿爵士曾提及，他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子，长相俊俏、体型结实”。伊丽莎白女王对于他的聪颖、直率的态度与公正的观点感到印象深刻。“他可以说瞬间就抓住了女王的目光，女王也渐渐被他的演说迷住了，也爱上与他玩一问一答的游戏。事实上，女王将华德·莱礼爵士视为相当神圣的人，拥有世间所有的优点。”故意以他那德文郡口音来做文章，伊丽莎白女王昵称他为“华尔德”。莱礼爵士则称女王为月亮女神辛西亚，一五八五年时他甚至建议，英国在美洲新大陆东部的殖民地以女王来命名为“弗吉尼亚”。

有关莱礼爵士在伊丽莎白女王准备跨过一摊烂泥时，摊开自己的披风铺在地上的故事，首度出现在汤玛士·富勒（Thomas Fuller）十七世纪时的著作《英国名人》（*Worthies of England*）之中；这次的事件并未记录在更早的文件中。无论如何，这个举动与莱礼爵士的性格相当吻合，也符合他与伊丽莎白女王之间的关系互动。

莱礼爵士用一枚钻戒，在宫殿的窗上留下讯息，确保女王能看见，这一行为也深受富勒的赞扬：

我愿登高，但仍忧惧坠落。

据传伊丽莎白女王在这个句子下面刻下：

若心不定，登高无益。

莱礼爵士终生有相当多的著作，包括《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1614年）和许多政治文章、诗作，但因为他拒绝发表自己的作品，因此多数的作品都未能留存至今。一六一八年他因为一项莫须有的罪名遭执行死刑的前夕，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以《时光亦如此》为题，成为英国文学中最动人的一页诗篇，文中他写道：

自然之景，美德之选，

时光孕育出唯一仅有的惊奇……

噢，眼，穿透最纯净之心，

噢，手，俘虏了最崇高的心，

噢，理智，能跨越最深的沙漠……

除了敬爱汝，请允许我服侍汝。

不幸的是，莱礼爵士太过专注于自己的身份地位与天赋，“骄傲得可恨”，那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高傲，若有人不愿屈服于他的魅力中，他便显得相当不屑。他从不将这些人的敌意放在眼里。他的性格相当残忍，青少年时期曾两度锒铛入狱，在爱尔兰时期，反抗军投降后，他也曾于蒙斯特诛杀六百多位西班牙籍雇佣兵。他是个恶名昭彰的骗子，也是个花言巧语、玩弄女性的人。根据约翰·欧贝瑞（John Aubrey）记载，莱礼爵士曾在一棵树下强暴了一位侍女。

“不，亲爱的华德！噢，亲爱的华德！”她虚弱地抗议着，但“危险与欢愉的刺激不断升高，她在狂喜之中哭着。后来还怀了孩子”。

莱礼爵士成为女王身边红人，过程仿如戏剧一般，不久后，他就被安插在斯庄特的杜伦宅邸，接着以各种昂贵闪亮的服饰现身宫廷；光是一双镶有宝石的鞋子，就要价一千五百英镑，让其他的宫廷人士显得相当寒酸。

他如流星般地快速窜起，自然而然地在莱斯特伯爵的心中引发相当大的妒忌与怨恨，他认为这个年轻人入侵了他的地盘，因此相当痛恨他。海登爵士也因此写了一封信，弥封在象征莱礼爵士小名华德的小盒子中，来表达他的忧虑，女王身边出现新的红人，让他逐渐遭到排挤。伊丽莎白女王向他再三保证，表示：“若君主就如神一般（本该如此），自不会有任何产生混乱的疑虑。有许多试图影响她的卑劣之人，都让她相当保护自己的海岸，无论是怎样的洪水泛滥，都无法冲击。”因此他不需要害怕被淹没，她会派出信鸽，“只要看见彩虹，就能带来好的音讯与圣约，再也不会会有洪水的侵害”。她就是牧羊人，而他理应记得“羊儿们对她来说有多重要”。

事实上，莱礼爵士自大自满又贪婪，一直以来都不受欢迎。“许多人都注意到，他常用尖酸的嘲弄与奚落式的责备”，他的骄傲，已

经让他成为“当代最可怕的魔鬼”。“他甚至会为了杜撰一个玩笑，而不在乎失去朋友。”他的敌人们称呼他为“暴发户杰克”或“那个无赖”，也有人说他是“全世界、全宫廷、全城、全乡最讨厌的人”。但倔强不已的他，对自己的不受欢迎反而相当高兴，认为这是成功的象征。

就连女王也看见他那不稳定、不顾一切的天性，但她依然将他的天分运用在许多不同的面向上，指派他为四十卫士长，并于一五八五年册封他为骑士，只是她从未给予他重要的政治职务，也从未让他进入枢密院。他太过喜欢“故意唱反调”，是个“傲慢无礼、情绪极度激昂的人，总是喜欢支配他人”。相反，伊丽莎白女王赐予他油水丰厚的职缺、垄断商品。因此也让他过得丰衣足食，甚至还有闲情能满足冒险、研究与探险的渴望。

伊丽莎白女王的教子约翰·哈林顿爵士，此时也完成了在林肯法律学院的学业，在宫廷里崭露头角。他初试啼声便大获成功，宫廷人士对他的智慧与谈话技巧相当信服。伊丽莎白女王则相当欣赏他的“即席演讲”，但她可能没有发现，哈林顿爵士，私下为后代子孙记载了相当多关于她与当时宫廷的许多隽语轶事，再经过两百多年后才得以公之于世。伊丽莎白女王与教子的感情相当好，但哈林顿爵士从未滥用她的情感以得到宠信或谋取高位。

* * *

新年期间，安茹公爵送给伊丽莎白女王一副镶着珠宝的锚形胸针，象征坚贞不移。女王只好被迫再给予他一万英镑的礼遇，才终于说服了安茹公爵离开英国，而此时的伊丽莎白女王，对于安茹公爵持续现身宫中，已经变得相当暴躁，甚至夜里无法安睡，还常常发烧。一五八二年二月七日，在坎特伯雷依依不舍、泪眼汪汪地与女王话别后，安茹公爵总算在三艘英国军舰护航下起程前往桑德维奇，莱斯特

伯爵与许多贵族都来送行。其实莱斯特伯爵一点也不想去，但伊丽莎白女王警告他，若不以尊敬的态度对待“这世界上她最深爱的人”，他就要遭殃了。女王也仰赖莱斯特伯爵秘密地为她向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传递口信，要他确保安茹公爵再也不会回到英国。此时，伊丽莎白女王并不知道，萨赛克斯伯爵早已暗中要求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在尼德兰居留莱斯特伯爵，但女王命令莱斯特伯爵事成后立即返国，阻挠了这个计划。

伊丽莎白女王装作因失去挚爱而悲愤不已，表示自己再也无法在怀特霍尔宫待下去了，“因为这里充满了他与她的回忆，而她一点也不愿与之分离”。她不时哭泣，并告诉莱斯特伯爵与沃尔辛厄姆爵士，若此生无缘再见安茹公爵，她简直连一个小时都活不下去：她甚至承诺，只要法王同意，安茹公爵六周内就能回到英国境内。她甚至在紧身裙内放上一本镶着她与安茹公爵画像的小祈祷书，这本书的复刻版现珍藏在大英图书馆中。她向门多萨大使表示，若能让她的青蛙王子再回到泰晤士河中优游，她甘愿花上百万英镑，而且她也持续与安茹公爵互通情书。而安茹公爵的回应，则是假装两人仍有婚约在身，拼命逼迫伊丽莎白女王说出一个期限。伊丽莎白女王知道，不戳破这个谎言，尽可能地维持两人的暧昧关系，对自己绝对有好处。而她当然也顺利地达成了目的，用英法同盟的力量制衡西班牙，让菲利普国王不敢轻举妄动，同时也避免了与尼德兰开战的可能性。

二月十日，安茹公爵抵达法拉盛，满心想要以荷兰新教之名出兵。但莱斯特伯爵却向女王表示，这个未来的征服者“简直老而无用，像是离水的鱼，姿态高，却快干枯而死”；伊丽莎白女王惊声尖叫地责骂他的傲慢无礼与拙劣的嘲弄，并指他与他们一家一样，都是叛国贼。结果安茹公爵却发现新臣子们带来的限制，大大地削弱了他的权力，他的无能也害了自己。最后，在帕尔玛公爵夺下一个又一个城池之际，他只能百无聊赖地打网球、打猎，对于反抗军的不支持及

安茹公爵天性的怠惰，伊丽莎白女王的怒气也显得十分无力。“天啊，亲王，您疯癫了吗？”她曾在的一封信中大发雷霆。“您对维系盟约似乎不以为意，反而不断削弱联盟之谊！”

一五八三年一月，因为荷兰反抗军对他的诸多限制，他再也无法忍受，于是安茹公爵背叛了他们，并针对反抗军的许多城市发起多次攻击。“法方从未面对如此不光彩之事。”一位英国特使写信向沃尔辛厄姆爵士透露此事。这次意外的结果，导致安茹公爵不得不离开尼德兰返回法国，他的梦想破灭，帕尔玛公爵的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从此荷兰反抗军对法国势力的介入不再怀抱希望，于是转向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做他们的领袖，以及他们对抗西班牙威胁最大的救赎。

安茹公爵离开英国，预示着伊丽莎白女王最后的爱情生涯告终，她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我是个老女人了，若要谈婚姻，由念主祷文时的念珠陪伴我便已足够。”她哀伤地向臣子们表示。都铎王朝将在她手上终结，直到她卸任的那一天之前，她都必须面对继承问题悬而未决，且有更甚以往的急迫性。更重要的是，她失去的可能是她最重要的谈判筹码：婚姻的可能性。“她再也不是人人争抢的婚配对象”：她已经年华老去，也没有能力孕育下一代。现在枢密院的所有参事都只希望她能将苏格兰女王摒除在王位继承权之外。

* * *

一五八二年五月，吉斯家族、罗马教皇、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与耶稣会一同联手，在巴黎酝酿推翻伊丽莎白女王的天主教谋反计划，他们的目的是让玛丽·斯图亚特登基成为英国女王。

英国政府此刻也早已注意到，耶稣会传教士在英国有多么成功，但伊丽莎白女王依然不愿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对付天主教臣民。“女

王陛下总算渐渐了解，天主教鬼子的势力增加，已经威胁到英国王权。”莱斯特伯爵表示。“感谢神的怜悯，让她总算看清这一切！”

十月份，沃尔辛厄姆爵士派出的探子，得到一份苏格兰女王所写的密码文件，显示她又图谋不轨了。从那一刻起，她的对外通信都受到严密审查，她身边的仆人也更进一步地严加看管她。

到了一五八三年春天，玛丽·斯图亚特与她的天主教盟友们拟订一个计划，让她得以重返苏格兰，与儿子詹姆士六世一起担任国家的共同治理人。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玛丽·斯图亚特坚持主要王权须移转归于她，对此詹姆士六世肯定会抗议。苏格兰也不见得会欢迎一个天主教女王复辟。伊丽莎白女王已经注意到逐渐成形中的阴谋，但她并未认真对待，只是针对苏格兰女王带来的问题相当焦虑地要找到解决方法，避免造成流血事件。玛丽·斯图亚特一厢情愿地认定，詹姆士六世对自孩提时期就未见过的母亲相当孝顺忠诚，一定会合作完成这项计划，但尽管年轻的詹姆士六世曾表达希望母亲恢复自由的渴望，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保护自己的利益与地位，且不仅限于苏格兰，还包括英国王位的继承权。

沃尔辛厄姆爵士依然追着玛丽·斯图亚特不放。同时他也发现，尼可拉斯·瑟洛摩顿爵士的侄子弗朗西斯·瑟洛摩顿（Francis Throckmorton）是天主教徒，且常常夜半秘密造访法国大使馆。他怜悯玛丽·斯图亚特的立场鲜明，沃尔辛厄姆爵士马上正确地推断出他就是玛丽·斯图亚特的间谍。事实上，他与吉斯公爵和耶稣会之间都有联系。但当时沃尔辛厄姆爵士并不知道他这些举动背后真正的目的，因此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他仔细地监视着瑟洛摩顿爵士与法国大使。

* * *

五月份，在特欧伯兹，伊丽莎白女王终于注意到伯利男爵与莱礼爵士的请求，经过他们多次在谒见女王时以“苦涩的眼泪与说情”，在这一感人气氛下女王原谅了牛津伯爵与安妮·伐瓦梭尔私通一事，让他得以重返宫廷。

菲利普·西得尼现在是女王身边的一大亲信，一五八三年，女王册封他为骑士，同时同意了他与法兰丝的婚事，法兰丝是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独生女兼继承人，这桩婚事也让沃尔辛厄姆爵士感到与有荣焉。

七月份时，伦敦主教格林多逝世，死时依然蒙羞，女王选择拔擢前伍斯特主教约翰·惠特吉夫（John Whitgift），成为她在位期间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惠特吉夫大主教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好友，相当支持女王对宗教统一的坚持，自从他的授任后仿佛是对清教主义的反动，对拒绝遵奉英国国教的人采取相当严苛的手段。他是相当严格的新教徒，倾向加尔文主义，是一个认真、固执己见又不屈不挠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政治人物——一五八六年他成为枢密院一员——严格执行宗教纪律。在惠特吉夫雷厉风行的作风下，不到十年，清教主义便失去立基，再也无法威胁圣公会教派了。

这一年七月，莱斯特伯爵发现自己“因为婚姻问题更加失宠”，他在女王面前擅自以“比过去更平常的态度”提及他的婚姻。他甚至大胆以最近莱蒂丝的女儿多丽丝·德弗萝小姐（Lady Dorothy Devereux）与亨利八世的私生子约翰·佩洛特-加龙省爵士（Sir John Perrot）之子，也是日后的爱尔兰代表托马斯·佩洛特-加龙省

（Thomas Perrot）私奔一事，来测试伊丽莎白女王的反应。佩洛特-加龙省家族是恶名远播的冒险家族，女王向来不认同他们。约翰·佩洛特-加龙省爵士因疑似与西班牙勾结谋反，于一五九二年死在伦敦塔中。伊丽莎白女王并不喜欢他，当然也不认为他的儿子配得上艾赛克

斯伯爵的姐妹，但她却胆敢在未经君主同意之下秘婚，伊丽莎白女王认为这一定是多丽丝的母亲带来的负面影响。女王的狂怒简直难以平息：她将多丽丝驱逐出宫，把托马斯·佩洛特-加龙省关进了舰队街监狱，并指莱蒂丝是“豺狼虎豹”，她要向所有基督教宫廷宣布她是个坏女人，甚至认定莱斯特伯爵是个妻子不贞的没用丈夫。但到了八月底，和平重新恢复，传闻中，莱斯特伯爵“再度回到女王陛下身边，仿佛过去十年来，从未有过任何阴影”。

这一年萨赛克斯伯爵死后，莱斯特伯爵最大的敌人也消失了。就连在巴蒙吉家中，逝世前的那一刻，萨赛克斯伯爵都仍不住地吐露，自己对莱斯特伯爵的愤慨，并向枢密院其他参事表示：“我即将前往另一个世界，留下你们面对命运与女王的恩典，请小心那无赖，他肯定不会好好对待你们。你们对这家伙的认识没有我深。”萨赛克斯伯爵离世后，反对莱斯特伯爵的人纷纷噤声，未来他要面对的，是来自暗处、更狡猾的敌人攻讦。

事实上他的势力正逐渐缩减。伊丽莎白女王常常忽略他的建议，尤其在尼德兰事务上。莱斯特伯爵认为，在荷兰这块土地上的西班牙人不除，英国一天都不得安宁，而他一直希望能诉诸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此时的莱斯特伯爵已经五十岁了，变成一个肥胖、秃头的男子，还有高血压带来的偏红气色。他的身体并不好，常有胃痛的情形，而这可能是癌症的警讯；尽管他饮食小心，偶尔前往巴克斯顿进行矿泉疗法，但却始终效果有限。他的健康情形差，也导致他变得脾气不好、更加暴躁，无视于他人的批评，同时将所有人视为敌人。他的朋友们对他性格的转变产生强烈反弹，约翰·艾尔墨主教曾如此写道：“过去我眼中的你，是温和、谦恭又友善的人。我痛恨现在的莱斯特伯爵，却想念以前那个人人称羡的莱斯特伯爵。”

在女王的心目中，莱斯特伯爵依然有相当特殊的地位，但他也发现，自己难以与年轻的新一代亲信们竞争，如莱礼爵士及更年轻的查尔斯·布朗特（Charles Blount），布朗特是蒙袭依勋爵年仅二十岁的弟弟，最近才抵达怀特霍尔宫，在晚宴上见到女王。意外发现了这个魅力十足的陌生人，女王随即询问他的名字，而查尔斯·布朗特却羞红了脸。于是女王伸手招呼示意他上前，然后说：“若未通过考试就进宫来，我可以帮你安插个好位置。”当布朗特结束了法律相关训练后，随即想起女王的允诺，蒙受莫大的恩典，受到女王拉拢，进入她身旁那俊俏的男性宠臣圈子中。

* * *

一五八三年九月，伊丽莎白女王度过五十岁生日；此刻她已统治英国长达二十五年。

一五八三年十月，一位来自华威郡愚蠢荒唐的年轻天主教分子约翰·索默维尔（John Somerville），受到耶稣会宣传的煽动，吹嘘自己要去伦敦掏枪射杀女王，还“希望把她的人头插在竿子上示众，因为她是个蛇蝎女人”，因而遭到逮捕。他被打入纽盖特监狱判决死刑，但在行刑前，他就在牢房内上吊自杀了。

这起事件曝光后，英国境内兴起一阵对伊丽莎白女王的爱国风潮。十一月份，法国大使回报，当伊丽莎白女王前往汉普顿宫时，大批民众沿路跪拜，给予“成千上万的祝福，盼望若有邪恶之人企图伤害女王，能被及早发现并接受该当的惩罚”。女王得不断停下脚步来感谢他们的忠诚，并告诉法国大使“她非常清楚没有任何一个子民不喜欢她”。

20 国内外的难题

一五八三年十一月，佛朗西斯·瑟洛摩顿在伦敦家中就逮，在他家中搜出各种“罪大恶极的宣传手册”、天主教鬼子名单，以及他国船舰能顺利入侵的港湾记录。更令人感到不祥的是，门多萨大使显然涉入这些阴谋极深，这让沃尔辛厄姆爵士感到相当诧异，因为他怀疑的对象主要聚焦在法国大使身上，但若法国大使早知这些阴谋，可能早就避开以免受牵连。

尽管在伦敦塔中遭到刑求，瑟洛摩顿仍不愿吐露实情，但在女王下令二度施行肢刑后，他的勇气尽失。“现在我被迫吐露她的秘密，这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他悲叹道。他透露这些阴谋背后主要的目的就是菲利普国王“对英国的企图”，其主要目的就是让玛丽·斯图亚特成为英国女王。罗马教皇、吉斯家族与耶稣会都涉入此案，计划分四波攻击进行，主要战场为苏格兰、爱尔兰、萨赛克斯与诺福克，而参与起义的则为英国与欧洲各地的天主教徒。计划进行得相当完整，只剩在英国发起叛乱行动。玛丽·斯图亚特与门多萨大使，都全力参与计划每个阶段的执行，但沃尔辛厄姆爵士在监视玛丽·斯图亚特的通信中，早已猜到玛丽·斯图亚特在搞鬼，因为她在多封信件中都漏了口风。

“相关事证显示，她想要骗我们放松戒心，”伊丽莎白女王做出此结论，“这样我们就不会发现他们在英国境内与欧洲各国的阴谋诡计。”

英国政府认定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谋反行动，因此主动出击，捉拿瑟洛摩顿名单中的几位天主教贵族。有些人被关进伦敦塔，有些人听到风声已经逃窜海外。这回因为有足够的证据定罪，因此宫廷人士坚决要求女王将玛丽·斯图亚特绳之以法，但却遭到女王断然拒绝。但她同意在泰伯恩行刑场处决瑟洛摩顿，并将门多萨大使驱逐出英国。门多萨大使临别前的最后一击，表示他的主公将会以战争报复这样的屈辱。但一直到伊丽莎白女王卸任前，西班牙都未再派遣任何一位大使前来英国。

英国国会与枢密院都想采取军事行动，欲以强烈的行动来保护女王，并呼吁女王尽快对玛丽·斯图亚特采取“最后”的手段。但女王依然犹豫不前，而这次莱斯特伯爵也站在她那一边，他提议将继续以尊荣高贵的方式囚禁玛丽·斯图亚特，这样的策略是为了英国的利益，若有一天玛丽·斯图亚特真的登上英国王位，她也会记得自己的命是谁给的。但在其他人都想要玛丽·斯图亚特的项上人头之际，这个意见显得相当孤单。

* * *

一五八四年六月十日，安茹公爵因一场高烧在法国沙托特里逝世。安茹公爵之死意味着法国王位已经没有瓦洛王朝的血脉来继承，法王亨利三世膝下无子，法国王位只好传承给他的一位表亲，纳瓦拉的胡格诺教派领袖亨利·德·波旁（Henry of Bourbon）。

安茹公爵的死讯传来时，伊丽莎白女王显然陷入哀伤，整整三周，几乎天天都在公开场合中哭泣，让旁观者都明了，她对她的“小青蛙”感到相当不舍。英国宫廷也被迫为安茹公爵哀悼，伊丽莎白女王甚至身穿黑色服装悼念了长达六个月。“宫廷气氛一片忧伤，”沃尔辛厄姆爵士这样告诉一位朋友，“许多公开与私下的因素，让我们一整季神伤。”

伊丽莎白女王则写信慰问凯瑟琳·梅迪奇：

尽管您是安茹公爵的母亲，但我的哀伤并不逊于您。您还有其他孩子得以寄托，但我却毫无其他慰藉，此生无缘再见，只盼死后我能与他重逢。夫人，若您能看进我的心坎里，便能看见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然而您有太多沉重负荷，我不想再以哀伤令您烦忧。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可她的诚意。当伊丽莎白女王向法国大使表示“我是个丧夫的寡妇”时，法国大使直指她是一个“非常懂得依照时势所趋调整自己的君主”。

此时传出了更糟糕的消息。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于七月十日在台夫特惨遭暗杀一事，震惊了欧洲各地的新教团体。这起暗杀事件背后的主谋，显然就是菲利普国王，此事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代表着不祥，英国臣民们都相当担心她会是下一个受害者。现在，伊丽莎白女王与帕尔玛公爵的军队在尼德兰的对垒已经毫无阻碍，因为气势衰退的法王亨利三世正忙着处理宫廷中的派系问题，避免派系斗争白热化，而安茹公爵又已不幸去世。帕尔玛公爵的军队逐渐获得优势，拿下了一个又一个城池；伊丽莎白女王则认为，只要西班牙成功征服尼德兰，到时若找不出任何领袖来接替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的位子，菲利普国王接着就会放眼英国。因此，打压苏格兰女王不轨的举动有其迫切性。

玛丽·斯图亚特现已四十二岁，十六年的禁锢生涯，早已侵蚀了她原有的美丽与健康情形。她的头发变得灰白，体态臃肿，同时为风湿病与身体的慢性疼痛所扰。尽管英国政府多次同意让她前往巴克斯顿做矿泉治疗，但她的状况却一点也没有改善。

一五八四年，玛丽·斯图亚特主要居住在谢菲尔德城堡，在士鲁斯柏立侯爵的看守下生活。但偶尔当谢菲尔德城堡要进行清洁工作时，她就会住在士鲁斯柏立侯爵的其他住所。士鲁斯柏立侯爵负责审

查她所有的通信内容，每当她在许可的状态下出外透透气，侯爵都会派遣一整队的守卫陪伴着她。事实上，无论城堡内外，玛丽·斯图亚特的身边都是守卫，到了夜间，甚至连附近的城镇与乡村都有守夜人。任何想要进入城堡外围地区的人，都必须回答自己来访的目的；若没有得到枢密院书面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城堡，也不得与玛丽·斯图亚特交谈。若她要接见访客，也都有人随时在一旁监视。

玛丽·斯图亚特非常痛恨这些限制，但她仍保有女王般的尊荣。她的家眷约有四十八人，此外还能挑选仆人，并给付仆人薪资、她的饮食与燃料所需的费用，尽管每年将近一千英镑，但伊丽莎白女王全都买单，她甚至可以在君主专用的顶篷下用餐，每次用餐时都能享用正式的两道菜餐点，而每道菜都有十六种选择之多。她也得以享受打猎的乐趣，但她的风湿病常常让她无法尽情享乐；因此她便与侍女们一同作精致刺绣手工，或是逗弄她身边许多赏玩用的小狗与鸟儿。她曾向友人表示，这一生除非成为英国女王，否则她可能都无缘踏出这囚锢她的大牢，因此尽管风险极高，她仍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达到目的，无视于严格监督着她的所有眼光。几年过去了，她与英国境外友人的通信越来越困难，这时的她只能仰赖愿意帮她突破沃尔辛厄姆爵士铺天盖地严密检查的家仆。

一五八四年八月，沃尔辛厄姆爵士决定加强玛丽·斯图亚特身边的安全检查；士鲁斯柏立侯爵承担看守玛丽·斯图亚特的重大责任多年，开始倾向对她仁慈宽大，现在，看守玛丽·斯图亚特的工作偶尔也会由拉尔夫·赛德勒爵士（Sir Ralph Sadler）进行。隔月，沃尔辛厄姆爵士出示一封信给伊丽莎白女王看，证明她的表侄女依然密谋要推翻她，玛丽·斯图亚特因而从谢菲尔德移监前往斯塔福德郡的温菲德，到了一五八五年一月，再度被关进那令人望之生畏的特伯利城堡。在那里要出外打猎的可能性变小了，她要请人挟带信件也更加困难。尽管她对此大加抗议，并抱怨特伯利城堡又湿又冷，但她依然能

维持生活水平，且历史证据也显示，英国政府提供了相当充足的饮食与燃料。当然也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因为苏格兰的生活水平远低于英格兰，因此“当她身在自己的国家时，绝不可能接受如此高规格的款待”。

但这一切也无法确保伊丽莎白女王的安全。一五八四年秋天，忧虑的声浪让英国境内的士绅贵族全都动员起来，采取更严格的预防措施以对抗英国王权受到的威胁。一名耶稣会神父克雷顿遭到荷兰政府逮捕，他身上带着一份文件，详细记载了菲利普国王那恶名昭彰的“对英国的企图”，让英方的敏感神经与愤慨顿时爆发。

莱斯特伯爵提议组成一支新教卫士联盟，这些人必须宣誓必要时愿意以女王之名抛头颅洒热血；若苏格兰女王涉及谋反欲取伊丽莎白女王的性命时，就算是偷偷摸摸的地下运作，都必须摧毁掉她。此举得到枢密院许多参事支持，传言女王可能也相当支持，只是她随后否认。这个誓言被称为联盟誓约。这一年十月，当英国政府将这个行动公之于世时，完全击中了社会大众的忧虑，在全国各地得到上千名卫士的热烈回响，他们纷纷加入卫士联盟并大胆宣誓。他们完全不在乎是否会冒犯到信仰天主教的邻人，大声宣告宁愿面对内战也不愿接受天主教鬼子当他们的君主。在伯利男爵的教唆下，有人将联盟誓约让玛丽·斯图亚特过目，以此举清楚地向她表明，若她继续挑衅，她的性命可能会受到重大危机。

玛丽·斯图亚特在罪证确凿的状态下，表示自己对推翻伊丽莎白女王的任何阴谋都不知情，甚至在联盟誓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两天内，她便着手撰写了一封信件给西班牙菲利普国王，要他尽快将“对英国的企图”付诸实践，就算要她赔上性命也无所谓。

伊丽莎白女王对自身安危相当不重视，甚至到了令人挂虑的地步，而宫中的男性参事们对她那犹豫不决的女性特质感到相当疼惜；

他们为了捍卫她的利益，甘愿不惜牺牲性命。尽管臣民上下一心地对她展现忠诚与情感，让她感动不已，但她仍不愿轻易允许所谓的私刑制度，只表示她绝不会轻易地“为了某一个人的错”把另一人杀死，也不愿意允许任何可能影响臣民道德良知的法条。英国国会也有相同的看法，坚持在通过成为法律之前，联盟誓约必须先行修正。从今以后，任何密谋叛国的“不法之徒”，在“面对极刑”之前，都必须先经过审判。

为了避免新法上路后，玛丽·斯图亚特可能要面对审判的窘境，伊丽莎白女王再度尝试与詹姆士六世沟通，盼望他愿意与母亲权力共享。然而尽管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积极想要与英国结盟，但他仍清楚表明自己并不希望母亲回到苏格兰来制造麻烦。伊丽莎白女王这才发现，对于詹姆士六世的背叛，玛丽·斯图亚特被蒙在鼓里好几个月。

* * *

十月份，一本名为《莱斯特国协》的册子，恶意地攻击了莱斯特伯爵，这本书四处流传散布，内容重复叙述着过去到现在，关于他的各种下流、破坏名誉的流言。册子里做出更严重的指控，直指他是个连续杀人魔、性好勒索敲诈，更是个不折不扣的罪犯。这本册子严重地扼杀了他的人格，而且撰写得相当出色，让许多人都相信了它的真实性。莱斯特伯爵向来不是受欢迎的人物，在这个事件当中，仅有的站出来为他说话的人，就是菲利普·西得尼爵士与伊丽莎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下令查禁这本手册，并宣称“只有恶魔”才会相信这些恶意的谎言，并写信给伦敦市长，大赞莱斯特伯爵“对国家的服务、对宗教的忠贞与其他可靠的行事风格”。

几乎可以确定《莱斯特国协》是耶稣会的杰作，在安特卫普或巴黎印制，但这本册子与过去其他的册子不一样的是，书中含有近乎真实的许多细节，也因此增加了它的可信度。许多人都认为，书中内容

的真实性，就是它遭查禁的主因。这些杜撰的故事流传了将近三个世纪，这段时间，莱斯特伯爵一直受到多数史学家的诋毁，被形容成无耻的冒险家与弑妻凶手，一直到了近代，《莱斯特国协》中的瑕疵才被正式揭露，为莱斯特这个女王的忠仆平反。

因为他试图让儿子^[1]与雅贝拉·史都华结婚，因此，莱斯特伯爵的敌人们也质疑，透过这个举动，他是否想要重蹈覆辙，制造与父亲护国公诺森伯兰公爵与珍·格雷小姐一样的阴谋。玛丽·斯图亚特认定，哈维克的贝丝小姐策划“孙女雅贝拉成为英国王位继承人”一事，简直是“徒劳无功”，同时写信要求法国大使，确保伊丽莎白女王了解这个情形。然而莱斯特伯爵却说服女王，他让两人成婚最主要的目的，只是巩固英国与雅贝拉的表哥詹姆士六世之间的关系。

此时，莱斯特伯爵与伊丽莎白女王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新的境界，两人不再互相认定为爱侣，也不再交换书信诉情衷，而是以老朋友的姿态相称，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与情感，维系着两人。宗教也是两人的共通点之一，也是莱斯特伯爵写给女王的许多信件中的主题，包括这一封他于一五八三年写给女王的信：

衷心感谢陛下亲切的问候。您可怜的“眼睛”除了向神祈祷外，别无报答之法，盼神能永远保您平安、健康与喜乐。因为神的仁慈，亲爱的陛下，让您避开许多恶意的侵害。女王陛下维持并建立了神眼中真正的宗教，抵御各种人为的手段与诡计，因此我们看到神赐予您的恩典。愿神佑您有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之势。

他们两人依然有时争吵，一次莱斯特伯爵告诉海登爵士自己不参加枢密院会，因为“这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从女王陛下口中公开吐出，是我毕生最大的耻辱”。就算经过这么多年，女王那些带刺的话还是能深深伤害他，但最后他总是会原谅并遗忘，不过，有时候伊丽莎白女王也会道歉。

一五八四年时，莱斯特伯爵带着他的继子，年仅十八岁的小艾赛克斯伯爵来到宫中，他那“讨人喜欢的个性、雅致的风格、与生俱来的殷勤礼貌，几乎随即为他赢得女王与所有人的心”。莱斯特伯爵因此感到十分满意，殷殷期盼小艾赛克斯伯爵能取代那讨人厌的莱礼爵士在女王心目中的地位，但伊丽莎白女王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认清小艾赛克斯伯爵不只是个俊俏、有教养的小男孩而已。

* * *

这一年的年终时，又爆出另一个与伊丽莎白女王作对的阴谋。一位威尔士国会议员威廉·派瑞（Dr. William Parry），秘密躲在女王在里奇蒙德宫的御花园中，企图在她散步透透气的时候刺杀她，但当女王现身时，他被女王庄严的气势震慑住，甚至看到她的父亲亨利八世的身影，尽管他已下定决心，但他的手就是不听使唤。

他谋杀女王背后的动机有各式各样的传闻：派瑞到过欧洲各地旅行，罗马教皇必定认为他是玛丽·斯图亚特的代表，也是她派驻在巴黎的探子；但派瑞其实也是英国的双面谍，秘密为伯利男爵效力，他从欧洲返国时便已事先通知伊丽莎白女王，他要演一出谋刺未遂的戏码，以利他打入天主教鬼子的圈子中。女王赐予赏金，接着派瑞询问一位合伙人，愿不愿意当那个谋刺女王的人，因此在演出谋刺未遂的戏码前，就因行为怪异而遭人侧目。他也许和前一年的约翰·索默维尔事件一样，精神错乱了，但在审判过程中，他仍能清楚地否认自己意图不轨。

他谋杀女王的意图引发反弹声浪，英国政府方面甚至不想给予其判决前无罪的人权。“想到可能失去这么珍贵的东西，我全身的关节都在颤抖。”一名国会议员记录下这样的心情。英国下议院呼吁女王让他们执行比死刑还可怕的刑罚，来惩罚这些叛国贼，还有更多人要求将玛丽·斯图亚特就地正法。伊丽莎白拒绝了这两种声音，但到了

一五八五年二月，她总算同意判处派瑞绞刑。同时英国国会通过新的法令，要求神学院教士四十天内离开英格兰，否则就要面对通敌叛国罪名的惩罚，而沃尔辛厄姆爵士也开始着手征召更多密探。

尽管女王向国会表达感激之意，谢谢他们“维持我生命的安全，你们的忧虑对我意义深重”，但对于英国孤立的状态与更多意图刺杀她的举动，她依然不为所动。“他们想要夺我性命，”一位来自英国于一五八三年建立的殖民地纽芬兰的代表，曾听过女王如此表述，“但我没什么好害怕。主宰一切的神一直保护我到这一刻，也将会保我安康，我相信神的大能。”

她坚持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不愿在臣子们的殷殷期盼下，受到维安加强的限制。她和过去一样，常常出现在民众的眼前。当她与臣子们到乡间漫步时，她也仅让卫士们“带着轻巧的武器”。她也不愿听从莱斯特伯爵的建议，禁止倾向天主教的人士进宫。这导致枢密院成员总是为她的安危感到焦虑，但同时对于她的勇气也相当佩服。

* * *

三月份，詹姆士六世写信向母亲表明，若要他与“被困在沙漠中”的人联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面对儿子的背叛，玛丽·斯图亚特伤心欲绝，在了解到自己透过外交途径协商重获自由的希望破灭后，她也感到分外愤愤不平。

“唉！”在一封情感丰富的信件中，她向伊丽莎白女王哀诉着，“从未见过如此可恶的不孝子，身为独子，却剥夺母亲的王权与皇室地位？”她矢言抛弃詹姆士。“在这么多基督教国家中，我一定能找到一位有能力掌握我给予的一切的人。”为了避免表阿姨误以为自己在打英国王位的如意算盘，苏格兰女王赶紧补充说明，表示“她比任

何人都厌恶这些可怕的作风与恐怖的行动”。但私底下的她已经决定将她对英国王位的继承权与野心转给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

四月份，阿米爱斯·伯勒特爵士（Sir Amyas Paulet）被指派为玛丽·斯图亚特的管理人，总算得以更严格的监督管理来限制玛丽·斯图亚特的各种行为。伯勒特爵士此时将近五十岁，是一位恪遵规则的人，他以强烈的清教主义观点闻名遐迩。当玛丽·斯图亚特了解这个人的观点时，她相当激烈地大表反对，这不只是因为他“完全没有骑士的资格”，还因为他的容忍度比多数与她信仰同一个宗教的人都要低，阿米爱斯·伯勒特爵士在巴黎担任大使期间，对玛丽·斯图亚特派驻巴黎的探子都相当严酷。但伊丽莎白女王选择伯勒特爵士的原因，是他“对神相当虔敬，对我们十分忠心，可说是相当正直的人，自出生就非常高贵”。他的诚实与对君主毫不畏缩的忠诚，在担任泽西岛总督时便展露无遗，伊丽莎白女王可以完全信任与仰赖他，绝不会受到苏格兰女王的奸计或魅力所诱。事实证明，他是一个非常勤勉又严格的管理人，他的警觉一刻也不松懈，也从不擅离职守，对于玛丽·斯图亚特试图拉拢他的举动，维持一贯不为所动的态度。

上任后，伯勒特爵士刻不容缓地在玛丽·斯图亚特居住的环境中实行“严苛的改变”，玛丽·斯图亚特随即发现，在伯勒特爵士的管理之下，她的人生将过得更加辛苦，也将与整个世界隔绝。伯勒特爵士检查她的每一封信：什么也逃不过他的法眼，许多外国友人寄给她的信件，在沃尔辛厄姆爵士的桌上堆积成山。伯勒特爵士不允许访客拜访玛丽·斯图亚特，并在城堡四周加强维安。玛丽·斯图亚特的仆人们，都不准到城墙上走动，当玛丽·斯图亚特出外散步时，身旁总是陪着大批重装军人，不让任何当地民众接近她。而她也不准施舍救济品给路上的穷人，对此她认为这个规定相当没有教养。

伯勒特爵士的安全规范只有少数漏洞，玛丽·斯图亚特的洗衣妇就住在邻村，定期会来到城堡中，对于这位洗衣妇带来的危险，伯勒特爵士似乎束手无策。除非他每次都要求这些人脱衣检查，但对于他这么正直的人来说，根本不可能，他无法完全确定他们没有挟带玛丽·斯图亚特的口信出去。他能做的就是严密监视这些人。

一五八五年时，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五月份时，菲利普国王为了报复英国攻击他的船只，下令没收停泊在西班牙港湾的所有英国船舰，成为他在里斯本的船队组成部分。尽管不愿意，但他已准备好与英国开战，他认为这是他的神圣使命。三个月后，伊丽莎白女王在无双宫与荷兰签订协约，荷兰成为英国唯一的盟邦。九月份时，她又指派德瑞克爵士为舰队司令，提供一支有二十二艘船与两千人的舰队给他，派他出航准备占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许多一流海港。德瑞克爵士的任务非常成功：他在西班牙海岸占领了维戈港，接着前往东印度群岛，劫掠了圣多明各、古巴的哈瓦那及南美洲西班牙属地首都卡塔赫纳。

此事让菲利普国王感到万分羞辱，但伊丽莎白女王却表现得仿佛与她无关一般：她乐悠悠地表示，德瑞克爵士“根本不在意我同不同意他的举动”。在这次的挑衅举动中，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菲利普国王忙着四处抵挡，同时也让他亲眼见识英国海军的威力。

* * *

七月底，莱斯特伯爵那年仅五岁的独子与继承人登比勋爵，因一场疾病不幸于温斯特死亡，闻此消息，原与伊丽莎白女王一同造访无双宫的他，在没有得到女王同意的情形下，擅自赶往温斯特去安慰他的妻子，留下海登爵士不断向女王致歉，并解释他匆匆离去的原因。听到这个消息，伊丽莎白女王十分感伤，于是派亨利·奇里格鲁爵士（Sir Henry Killigrew），向莱斯特伯爵表达哀悼之意。

儿子之死，让莱斯特伯爵大受打击。年老、体衰、孤寂，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打算从公仆生涯中退下。而海登爵士则写了一封慰留信，才终于劝服他别这么做，塞西尔则提出他与他“那可怜的太太”莱蒂丝，在特欧伯兹暂时栖身，一起面对哀戚的情绪。就在不到一个月内，传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经过长久的等待，莱斯特伯爵总算得到他渴求的军事大权。

在与荷兰签订的协约中，伊丽莎白女王同意保护他们，并派遣一位将军指挥六千名士兵与一千匹战马，这位将军也将是伊丽莎白女王向荷兰议会传达讯息的对口。九月十七日，伊丽莎白女王不情不愿地在压力之下同意将指挥的任务派给莱斯特伯爵，毕竟他是少数她能信任，且对此任务十分积极的人。但他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不见得是个适当的人选，更重要的是，他上一次实地参与军事任务，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战场的一切早已不同，他的对手帕尔玛公爵，则是当时最厉害的军事强人之一。

另外，面对这个问题，伊丽莎白女王依然无法与莱斯特伯爵稍离。过去一年来，伊丽莎白女王的情绪变得更加起伏，脾气更加暴躁。现在的她变得相当依赖，有一晚她“用可怜兮兮的语气”急切地恳求莱斯特伯爵不要去荷兰，不要离开她，她担心自己活不久了。他先是难以决定要不要答应女王，但一天之后，女王又恢复了朝气，但没人知道她的好心情能维持多久。这些行为在在显示，这个时期的伊丽莎白女王正经历更年期困扰。

九月底，伊丽莎白女王夜半叫醒了莱斯特伯爵，下达指示在得到更进一步的通知之前，要他“停止进行”相关的准备活动。在绝望之中，他告诉沃尔辛厄姆爵士：“我对人世已经厌倦。”但到了早上，伊丽莎白女王又改变了命令，让莱斯特伯爵松了一口气；在接下来几

天中，由于莱斯特伯爵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伊丽莎白女王又展现出阴沉、不耐烦的情绪，让莱斯特伯爵的心直往下沉。

对于莱斯特伯爵在荷兰只能担任中將一职，女王的态度十分坚持，不能再更多，因为她忧心莱斯特伯爵可能为了追求“个人的荣耀”，而忘了“对她的忠诚”。最重要的是，他绝对不能接受荷兰方面给予的任何头衔或地位，因为这样等于暗示着女王接受了荷兰王权，但她一点也不想要。

灰心丧志的莱斯特伯爵因而向沃尔辛厄姆爵士吐露心声：“女王陛下不断在试探我有多么敬爱她，如何才能让我放弃对她的忠贞，但事实上没有任何话语能阻挡我对女王忠诚与完成使命的任务，就算她表现出怨恨我的样子，我想是差不多了，因为我再也感受不到任何爱与宠信。”

十月份在里奇蒙德宫，伊丽莎白女王发布了“一份公开声明”，内容长达二十页，针对菲利普国王与世界各地为她将采取的行动辩解，并接着派出菲利普·西得尼爵士前往荷兰，任命他为法拉盛总督，根据英荷协约，英国有权在荷兰的两处港湾驻军，而这就是其中一个。接着她派出了每年几乎要耗尽她一半年度预算的一支军队。

十二月八日，莱斯特伯爵前往荷兰，决心让英国一次性摆脱西班牙的纠缠。他带着一百七十位家眷，其中多数都有贵族血统，而他的妻子莱蒂丝则坚持要有一群侍女服侍，甚至带着大批行囊，包括家具、服饰与马车。女王知道这个情形感到“相当不满”：威胁要换掉莱斯特伯爵的中将职务后，她随即又改变了心意，之后便对英国的荷兰任务不再感兴趣。

莱斯特伯爵离开后，年轻的小艾赛克斯伯爵便晋升为马术将军，这项职务能保他安然地退居第二线。他在马上长枪比武的表现极佳，

甚至超越了莱斯特伯爵的表现，“让许多人对于他未来在军事上的发展感到希望无穷”。十二月十日抵达法拉盛时，荷兰人疯狂欢迎莱斯特伯爵的莅临，盛赞他为荷兰的救星，并以近三周的宴席、烟火表演、游行、娱乐节目及赛事来迎接他。

莱斯特伯爵希望以主动出击的策略，来捍卫荷兰领土。但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对财政的严格把持，并未提供足够的粮饷给军队，因而不允许他这么做。更重要的是，身为君主的伊丽莎白女王，痛苦地发现性别带来的限制，于是决心严格为这项任务把关，只要有机会就插手。莱斯特伯爵不但不能主动出击，“也不能为了更大的利益冒险”。他相当痛恨这一切，他离女王越远，就越不情愿听从女王的命令。

荷兰人成了新的争吵原因。对于伊丽莎白女王拒绝担任荷兰女王，荷兰人感到相当失望，于是将莱斯特伯爵当作君主出巡，这让他感到相当满意，却让女王相当懊悔。莱斯特伯爵不像在执行军事任务，反而仿佛是出巡各地探视子民的君主。要不了多久，接待他的人就热情地邀请他“宣誓成为领导人与总督”。

[1] 这个行为受到质疑的儿子，现在是他的继承人登比勋爵。此时，莱斯特伯爵已经放弃让他那见不得光的私生子做雅贝拉未来的丈夫。这样的安排让哈维克的贝丝小姐也相当中意，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当然比私生子更受人欢迎。——作者注

21 残忍极刑

一五八五年圣诞节前夕，伯勒特爵士对特伯利城堡维安漏洞的担忧总算能稍歇，他接获消息，女王注意到玛丽·斯图亚特的不满，因此指示从特伯利城堡移监到位于十二英里外艾赛克斯伯爵于查特里暂时空下来的坚固宅邸，主要希望能让洗衣妇也能长期住在里面。

“我无法想象，这些人要怎么把手指大的文件带出城堡外。”伯勒特爵士对此感到相当满意。但多次发现玛丽·斯图亚特对外联络的神通广大后，沃尔辛厄姆爵士并不像伯勒特爵士那么确定，然而就在此时，他灵感乍现，不如利用玛丽·斯图亚特对外联系的能力让她自己露出马脚，这样他就有理由处理掉她。

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这个月一名受训中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吉尔伯特·葛佛德（Gilbert Gifford）刚从法国踏上英国土地时，就在拉依遭到逮捕，接着就被带到沃尔辛厄姆爵士跟前。就他所知，葛佛德是玛丽·斯图亚特的友人从巴黎派来英国的间谍，意图与玛丽·斯图亚特恢复联系。在发现计划曝光后，意志不坚的葛佛德随即被煽动，转投沃尔辛厄姆爵士旗下，随后便接受指示传递多份在法国大使馆等待玛丽·斯图亚特已久的信件。玛丽·斯图亚特交给葛佛德的回信，则直接交到沃尔辛厄姆爵士手上，他的秘书托马斯·菲利普斯

（Thomas Phelippes）是密码专家，负责破解信中密码并复制，接着重新封缄，再送回到原定的目的地。透过这个方法，沃尔辛厄姆爵士得以监督玛丽·斯图亚特的通信网，设下了极大的陷阱。

葛佛德告诉玛丽·斯图亚特，他安排了秘密通道，可将信件走私进出查特里。沃尔辛厄姆爵士也发现，巴克斯顿当地的酿酒人马斯特·伯顿（Master Burton），定期运入一桶一桶的酒。葛佛德必须负责说服这个酒商，同时承诺给予丰渥的报偿，将玛丽·斯图亚特的信件藏在防水的小木盒中，穿过桶孔藏在酒中。这位酿酒商是个“正直的人”，他一直相当同情玛丽·斯图亚特，于是便同意了，以为自己是在帮助她；一直到一切都来不及了，他才发现自己被利用了，当伯勒特爵士告诉他这个秘密时，他自知这位客户涉入的风险太大，因而只说出了自己要求的价码。

透过这个新的沟通方式，葛佛德给了玛丽·斯图亚特一封信介绍自己，以及玛丽·斯图亚特在巴黎的探子托马斯·摩根（Thomas Morgan）的到任国书，并表示玛丽·斯图亚特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与境外的友人沟通。对玛丽·斯图亚特来说，与友人们断绝联系这么久，葛佛德的方法仿佛久旱逢甘霖，她大赞葛佛德的计划，对他背后的动机完全不疑有他。不久后，玛丽·斯图亚特开开心心地收下法国大使馆来的二十一包信件，并准备回信。

知道陷害玛丽·斯图亚特一事的人，仅限于沃尔辛厄姆爵士、他的助手莱斯特伯爵，当然也可以确定伊丽莎白女王应该知情，因为她在这段时间曾向法国大使馆表示：“你们持续与苏格兰女王秘密通信，相信我，我都知道我国家中发生的每一件事。在我的姐姐统治期间，我也曾是阶下囚，对于刑犯赢得他人协助、对外秘密联络的奸计，我再清楚不过了。”历史事证显示，她不仅知道这个计划，甚至同意这个计划的进行，并相当密切地关心事件的发展。

* * *

二月五日，伊丽莎白女王从一位侍女处得知（而这位侍女则是看到了一封私人信件），莱斯特伯爵接受了荷兰最高总督职位，并于一

月十五日在海牙的一场庄重的仪式后开始执行“至高无上的命令”，伊丽莎白女王爆发了一阵宫廷人士从未见过的恐怖怒火。

“这足以让欧洲各国贵族视我为妖孽了。”她怒不可遏，并写了一封信斥责他：

不成熟的作为！在事实摆在眼前之前，我等简直无法想象，在我们扶植之下的一个人，甚至得到比这块土地上任何一位臣民更多的宠信，却以如此卑劣的手段破坏国家戒律，造成国家荣誉极大损伤。我等面对此事的立场与命令为：将耽搁与借口摆在一边，为了表示你的忠贞，无论这个职务以我们之名为你带来什么考验，都务必遵从与执行。不许失败，若你的表现与预期相反，将为你招致最大的灾祸。

女王的反应让莱斯特伯爵深感苦恼。他认为自己这么做，能带给女王极大的利益，尽管伊丽莎白女王认为他绝对不敢向她实话实说，但事实上，莱斯特伯爵依然派出了皇室书记威廉·戴维森（Sir William Davison）去向女王解释。但戴维森受到天气状况极差的影响，当他于二月十三日抵达英国时，其他人已先发制人。女王也不愿听他的解释，而是以“最讽刺难听的话语”训了他一顿。“至少在女王听取他的陈述以前，任何人都不会受到她如此大的谴责。”莱斯特伯爵苦涩地说。

荷兰战争为伊丽莎白女王带来极大压力，沃尔辛厄姆爵士发现，“她背负压力的能力日渐消退”。三月份，华威伯爵告诉莱斯特伯爵：“女王陛下的愤怒并未随着时间消退，她的怨恨与怒意反而日渐高涨。”她甚至不给付莱斯特伯爵军队的粮饷，以此给他重大的教训。莱斯特伯爵本想将接受最高总督的责任，推卸到戴维森身上，表示是戴维森爵士要他这么做的，但女王丝毫不相信，甚至立即拔擢戴维森为参事。

枢密院忧心女王怒火中烧的情绪会让她武断地召回莱斯特伯爵，并因此造成两人之间的裂痕，因为要是让西班牙方面看到英国内部闹不和，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枢密院参事们只好极力苦思安抚女王之策，并试图向她解释莱斯特伯爵违抗命令可能的原因；一直到一位信差来访，向女王传达莱斯特伯爵生病的消息，女王才勉强承认莱斯特伯爵只是自以为是地以为这么做能照顾到女王的利益。

三月十四日，托马斯·赫内基爵士通知荷兰国务委员会，莱斯特伯爵必须卸下总督职务——“这么重大的事情，能让许多人心碎”。荷兰方面上书女王，求她收回成命，但最后是伯利男爵以辞职威胁，才让女王不情不愿地同意让莱斯特伯爵继续担任总督一职，但她强调，莱斯特伯爵并非英国正式代表，并要求他莫忘自己对女王的从属关系。

莱斯特伯爵依从形势。四月份在乌特勒支庆祝圣乔治日时，他在庆典上留了一个空荡荡的王位，仿佛女王只是不在而已，女王的座位上甚至还摆放着饮料与食物。

“女王对你依然不太能谅解，”圣乔治日过后莱礼爵士这样告诉莱斯特伯爵，“但感谢神，她已经平静了下来，阁下依然是体贴的罗伯特。”疲惫不堪又情绪低落的莱斯特伯爵写信向沃尔辛厄姆爵士表示：“国务大臣大人，我好疲倦，真的好疲倦。”

* * *

一五八六年三月，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写信给教皇席克斯塔斯五世（Pope Sixtus V），请求教会祝福他“对英国的企图”。教会给予满心的祝福与经济援助。这场侵略阴谋，以讨伐异教徒为名，准备展开大规模圣战。

五月二十日，玛丽·斯图亚特写信给门多萨大使，透露自己愿意“主动退让，将自己应得的（英国王位）继承权让给贵国君主、阁下的主公，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儿子对异教的顽固与坚持”。然而菲利普国王却向罗马教皇表示，自己无意将英国纳入他那幅员广阔的版图，因此决定将英国统治权转交给他的女儿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亚（Infanta Isabella Clara Eugenia）。

五月底，葛佛德将两封玛丽·斯图亚特的信件交给沃尔辛厄姆爵士：第一封是写给门多萨大使的信，她向西班牙方面承诺，对入侵计划鼎力相助，同时允诺寻求詹姆士六世的协助。第二封信则是写给一位支持者查尔斯·佩吉特（Charles Paget）的信，信中提醒他要不断提醒菲利普二世入侵英国的必要性。佩吉特的回信，自然也经过沃尔辛厄姆爵士的审查，透露一名神职人员约翰·巴拉德（John Ballard）刚从法国抵达英国，准备精心安排英国天主教人士起义，西班牙大军也准备同步进攻，时间就在这一年的夏天。

巴拉德神父很快就成了沃尔辛厄姆爵士紧迫关注的对象。与多数曾待在国外的天主教徒一样，这位误入歧途的神职人员，将天主教支持玛丽·斯图亚特登上英国王位的概念，看得太过夸张偏激。对他的任务一片热诚之下，他前去拜访一位相当富有的天主教乡绅，德席克的安东尼·巴宾顿（Anthony Babington of Dethick），他已经在地下支持苏格兰女王长达两年时间了。帅气又热情的巴宾顿，时年二十五岁，出身于英国德比郡一个古老又受崇敬的家庭，曾在士鲁斯柏立侯爵负责看守玛丽·斯图亚特时担任她的侍从。然而英国政府方面早就知道，前一年秋天时，巴宾顿曾涉入一场草率的暗杀行动，目的是在闭门会议中杀害英国枢密院全员。

六月份，有人听闻巴拉德与巴宾顿讨论菲利普国王计划入侵一事，并暗中策划要谋杀伊丽莎白女王，他们准备在谒见室中突袭，或

在她漫步花园时出手，她坐在马车上时，也是个好时机。巴宾顿决定一肩扛起刺杀的重责大任，还有六位友人的协助，后来证实这些他的朋友，都与巴宾顿本人一样，出身权贵阶级，是有为青年，受到良好教育，他们全都是受到苏格兰女王操弄的骑士精神的感召。

沃尔辛厄姆爵士在严密监视巴宾顿的同时，决定让这起谋反事件转向，以利英国政府。幸好玛丽·斯图亚特在巴黎的探子托马斯·摩根听过巴宾顿的名字，并写信向她推荐巴宾顿的忠诚，并指出“要赶走令全世界烦忧的野兽，方法很多”。沃尔辛厄姆爵士不费吹灰之力，就让这封信顺利交到玛丽·斯图亚特手上。

六月二十五日，与他预期得一模一样，玛丽·斯图亚特写信给巴宾顿，接着巴宾顿又于七月六日回信，简述其阴谋计划内容，要求玛丽·斯图亚特同意并给予建议。甚至称呼玛丽·斯图亚特为“我伟大的神圣主母与女王”，他向玛丽·斯图亚特表示“六位英国贵族，都是我可靠的朋友”，会“推翻篡位者”伊丽莎白女王，而他则会负责援救玛丽·斯图亚特逃离查特里，接着在西班牙军队入侵的协助下，助她登基成为英国女王。巴宾顿对玛丽·斯图亚特唯一的要求，就是保护那些执行“残忍极刑”的人，并给予适当的报偿。

这封信由托马斯·菲利浦斯送往查特里。接着沃尔辛厄姆爵士便悬着一颗心等待玛丽·斯图亚特的反应。七月九日，他通知莱斯特伯爵有大事要发生了：“可以确定的是，若此事处理得宜，便能阻断女王陛下任内的所有危机。”

七月十日，菲利浦斯回报：“苏格兰女王已经回复巴宾顿了，而我昨晚就已经收到。”但所谓的回复其实只是一张短签，玛丽·斯图亚特在信中允诺，未来几天会写得更详细。“接下来几天必须更谨慎地对待她。”菲利浦斯说。

沃尔辛厄姆爵士与他殷切企盼的那封信，由玛丽·斯图亚特的两位书记于七月十七日以密码完成，他们从玛丽·斯图亚特手中接过指示，她也随即将它们烧毁。信件的原稿已不存在，显然是遭到巴宾顿湮灭证据，目前留下的则是菲利普斯复制的版本，并以最快速度送交沃尔辛厄姆爵士手上，信上甚至还有菲利普斯手绘的监狱图像。

在漫长的沟通过程中，玛丽·斯图亚特因为替巴宾顿的阴谋背书与支持行刺伊丽莎白女王而有罪：“这项计划准备得如此精细，在里应外合的力量下促成，只要有时间让这六位贵族展开动作；按照指示一步一步完成计划，我可能很快就能离开这里了。”

沃尔辛厄姆爵士要的就是这样一封信，让玛丽·斯图亚特能在一五八五年的关联法之下俯首认罪，同时我们也相当确定，为了了解巴宾顿提及的六位贵族是谁，他在这封“血腥信件”的最后伪造了一个附笔，询问这些人是谁，最后在七月二十九日将信件交到巴宾顿手中。后来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者便指称，其他的信件内容也都是沃尔辛厄姆爵士假造的，尤其是玛丽·斯图亚特支持暗杀伊丽莎白女王的部分：然而玛丽·斯图亚特与门多萨大使的共谋关系是确定的，门多萨大使甚至曾向菲利普国王表示，玛丽·斯图亚特知道阴谋计划的每一步。

此时这些阴谋者，正在伦敦的小酒馆中公开吹嘘他们的冒险精神，甚至提前庆祝胜利。巴宾顿甚至要人画了一幅他与弑君杀手群的团体像，作为“行前纪念”。

七月五日，伊丽莎白女王与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签订《贝维克条约》，让两国君主在遭遇武力侵犯时能够互助保护。这也代表菲利普国王无法从英国北部边界入侵。就在巴宾顿请求玛丽·斯图亚特祝福他的阴谋成功时，儿子最终的背叛消息也传到了玛丽·斯图亚特耳

中：“这让她感到异常愤怒、绝望又难过，更进一步刺激她对眼前阴谋的支持”。

* * *

就在七月，莱斯特伯爵向伊丽莎白女王提起，确保能赢得荷兰战争的方法就是由她来接掌荷兰王权。想到此举可能为财政带来的困境，并忧心过度刺激菲利普国王，伊丽莎白女王以相当歇斯底里的态度响应。接着在冷静下来之后，女王写信给莱斯特伯爵，理性地解释自己犹豫的原因，更强调：“罗伯特，想必你认为在这个季节中，仲夏夜的疯狂影响了我的思考，然而你必须接受我的想法，这就是命令……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不会再与你讨论。尽管不情愿，但我还是要向你道别，我的眼睛，但我会向神祈祷，保你不受伤害，保你远离仇敌，我对你的付出有无尽的感谢。一如往昔的E. R.。”

这也代表她绝对不可能接受荷兰王位。

* * *

到了八月，沃尔辛厄姆爵士搜集到的信息，已足够置苏格兰女王于死地，于是他决定不需等待巴宾顿回复玛丽·斯图亚特，他现在就要出手，在他们任何一个人听到风声之前，在他们有时间烧毁任何通信证据之前，而这些则是沃尔辛厄姆爵士准备上呈法庭的证据。

八月四日，约翰·巴拉德遭到逮捕，以他身为天主教神职人员为由，被送往伦敦塔中囚禁。从友人处听闻这个消息，巴宾顿陷入慌张之中，于是要求一位叫作“野蛮人”的弑君杀手当天就要杀了女王。尽管野蛮人已经准备万全，但却表示自己穿着太不体面，可能进不了宫，巴宾顿于是给了他一枚戒指，要他将戒指卖了，将所得用来买件好一点的衣服。但时间太过仓促，于是当晚巴宾顿便展开逃亡，找地

方躲了起来，伊丽莎白女王此时才将事情原委告诉伯利男爵，并下令要他发布宣告谴责阴谋暴行。有关阴谋计划的相关事证，很快就被复制，接着散布到全国各地，让忠诚派的臣子们能指认这些弑君杀手，各地随即传出抗议声浪。

八月九日，玛丽·斯图亚特到附近的查尔迪打猎时，伯勒特爵士搜查了她的私人物品，扣押了三大袋的信件、珠宝与现金，递交给沃尔辛厄姆爵士。她的书记吉尔伯特·柯勒（Gilbert Curle）与克劳德·诺鲁（Claude Nau），接着骑马到附近的荒野，逮捕了玛丽·斯图亚特本人。涕泪纵横的她被带到附近民宅中整理仪容，接着才被押解回查特里继续拘留。

女王写了一封信给伯勒特爵士：“阿米爱斯，我最细心的忠仆，神在这次的行动中赐予你三大袋的成果，让你可以顺利解决这个麻烦的角色。让那邪恶的坏女人知道，她那些卑鄙行径，经过法律制裁，会带来多沉重的苦痛，我多年来拯救了她的生命，但她却以各种奸诈的行径，造成我难以容忍的损失，那就看神能不能原谅她吧。”

伊丽莎白女王下令遣散玛丽·斯图亚特的仆人们，并以伯勒特爵士指定的对象取而代之；就连听到玛丽·斯图亚特因为失去这些朋友而重病，她也不为所动。

巴宾顿的脸全都被“绿核桃木的外皮划伤”，八月十四日被人发现在伦敦北部的圣约翰森林中，隔天就被押入伦敦塔。当逮捕他的消息公开后，伦敦各地甚至响起欢庆的钟声，伦敦市民纷纷表达感激之意，燃起营火，大开街头嘉年华。伊丽莎白女王被人民的这些爱与忠诚感动不已，因此亲笔写了一封动人的信函感谢伦敦市政厅。

巴宾顿的家遭到搜索，找到许多天主教煽动谋反的证据，以及诅咒伊丽莎白女王身故的预言。此时已有十四人落网，罪名都是重度叛

国罪。八月十八日，审问由伯利男爵、海登爵士与布隆尼大法官在伦敦塔中进行，巴宾顿因畏惧刑求的折磨，天真地以为只要合作就能获得赦免，于是自白承认策划暗杀女王的行动，在接下来七次的自白中，首度透露了阴谋内容，丝毫未保护玛丽·斯图亚特或其他共犯。吉尔伯特·柯勒与克劳德·诺鲁也证实，那些沃尔辛厄姆爵士复制来为玛丽·斯图亚特定罪的信与原版一模一样。

枢密院盼女王能召开国会，解决苏格兰女王的问题。伊丽莎白女王知道上下两院将坚持审判玛丽·斯图亚特并处以极刑，且她将毫无选择必须同意，因此再度使出拖延战术。她的参事相当坚持，指出若涉案情节较轻的阴谋者巴宾顿与他的友人们都必须依照叛国罪面对极刑，也就不该纵放此案背后的主谋玛丽·斯图亚特。九月九日，怀着沉重的心情，伊丽莎白女王屈服了，召开国会。

九月十三日，巴宾顿与他的共犯们面对审判。结果早已未审先判，但伊丽莎白女王坚持，在这个“恐怖的叛国案”之中，通常施加在叛国者身上的刑罚不适用。伯利男爵向海登爵士表示：“我告诉过女王陛下，死刑应以适当、有条理的方式执行，在众人面前对犯人施以极度的痛苦，致死的方式一定要与各种新的谋反手法一样可怕。然而女王陛下并不满意，但她要我向法官表达这个意见。”

死刑正常的执行方法，刽子手必须先确定犯人已死，才会除去他们的内脏。但伯利男爵认为，确保巴宾顿与同党的生命——与折磨——一直延续，直到惩罚够重为止，最后他终于让女王同意他的看法。

在审判期间，尽管巴宾顿“以良好的态度”承认了所有的犯行，但他坚持约翰·巴拉德神父是煽动这个阴谋的主要角色。在伦敦塔的受刑架上，巴拉德只提到阴谋确有其事。伊丽莎白女王并不希望审判期间提及玛丽·斯图亚特的名字，但当审判委员会向她表示，如此一

来这些证据就没意义时，女王才同意在起诉书与巴宾顿的自白书中，可以保留玛丽·斯图亚特的名字。

九月二十日，巴宾顿、巴拉德与另外五位共犯一同带着枷锁从伦敦塔丘前往霍尔本的圣吉尔平原，当地架起了特别高耸的断头台与刑架。在这里的大批民众面前，这些罪犯就要接受叛国者应得的、最恐怖的极刑，一直到最后，巴宾顿仍坚称自己认为参与的“是合法且值得称颂”的活动。根据威廉·康登记载，巴拉德率先受刑：他与其他共犯都“活到最后一秒”才被解下，接着被摘取器官，肠子被活生生拉出体外，且自己全都目睹，然后才被砍头、肢解。临死之际，巴宾顿则不断大喊：“耶稣，救赎我！”怀着报复心而来的人们，因他们眼前的残忍景象感到作呕，意外地对犯人产生了同情心，隔天当剩下的七名共犯被带到刽子手跟前时，女王只好下令，将罪犯吊至死亡后，才能去除内脏与肢解。

行刑后，英国境内出现大量歌谣与文章，很快地“英国所有的人都听到这么可怕的阴谋”，不只是枢密院，就连一般平民百姓，都怒骂着这个造反计划背后的主谋玛丽·斯图亚特，要求审判她、处决她。尽管到了这一刻，但伊丽莎白女王依然想要赦免玛丽·斯图亚特的死罪，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并不赞成处决一个神圣的女性君主。她原本希望犯人死亡就能满足臣民们嗜血与报复的渴望，但她随后发现自己误会了。

枢密院参事们指出，在新型法规之下，有更多制裁玛丽·斯图亚特的好理由。玛丽·斯图亚特密谋伤害伊丽莎白女王性命是不争的事实，证据显示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在宫里。詹姆士六世不太可能捣乱，因为对他来说，母亲死亡才是对他最有利的情形。玛丽·斯图亚特一除，由新教人士来继承英国王位，对英国人民来说就不难接受了。同时还可以去除天主教不满情绪与反抗的焦点。而法国方面早就放弃了

玛丽·斯图亚特；另外，菲利普国王对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够糟了，也没什么更不良的企图。

更重要的是，各界纷纷呼吁伊丽莎白女王多多为人民着想，因为最近的事件，导致英国的子民成为谣言制造者的嘴边肉，他们不断散布恐怖谣言，指伊丽莎白女王已遭到暗杀，或是帕尔玛公爵已入侵诺森伯兰。为了保护国境的安全，英国出动了海军舰队在海岸巡防，人们则以更大的警觉心来捉拿天主教神职人员。

伯勒特爵士感受到逐渐逼近的危机而心神不宁，于是提出警告，表示自己无法无限期地让玛丽·斯图亚特安然待在查特里，因而促请女王将玛丽·斯图亚特移往更坚固的据点。英国枢密院则希望将她打入伦敦塔中，但伊丽莎白女王光想到后果就感到毛骨悚然，因而断然拒绝；她也拒绝了臣子们建议的其他堡垒，最终臣子们终于说服她同意将玛丽·斯图亚特转送往位于北安普敦郡的中世纪小镇法瑟林盖，这是十五世纪时约克王朝的所在地。九月二十五日，玛丽·斯图亚特正式被带往法瑟林盖。

目前依然可以确定，伊丽莎白女王绝不会让她的表侄女接受审判。然而伊丽莎白女王透露，审判绝对有其正当理由，但她也知道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者可能会说，苏格兰女王是外国人，不需要遵循英国法律；而且她是个神圣君主，任何举动只需对上帝负责。于是，这个烫手山芋般的问题，就转交给一群英国律师处理，他们针对此事深入讨论后，认定伊丽莎白女王有权以一五八五年的关联法来起诉玛丽·斯图亚特。

接下来，伊丽莎白女王总算知道，自己无力再阻止审判。于是她勉强同意指派三十六位调查委员——来自枢密院、贵族阶级与法律界人士——来鉴定证据，并担任法官工作。到了九月底，这群人纷纷抵达法瑟林盖。委员成员包括伯利男爵、沃尔辛厄姆爵士、海登爵士与

伯勒特爵士，以及两位天主教贵族蒙塔格（Montague）与鲁姆利（Lumley），以确保审判的公正性。

十月十日，忧心忡忡的莱斯特伯爵，从荷兰来信提醒伊丽莎白女王一切应依法办事。“我们可以确定，”莱斯特伯爵在写给沃尔辛厄姆爵士的信中表示，“若要维护女王陛下的安全，我们必须做的，就是让正义的地位大于政策。”在这种非常时期远离英国，让莱斯特伯爵感到挫折感相当大，他一直想要回国，运用他在女王面前的影响力，让她了解自己必须怎么做。

十月十一日，法院开庭审理，但玛丽·斯图亚特认定英国法院没有资格审理她，表示自己是神威显赫的女王，不需对英格兰平凡的律法俯首称臣，因此拒绝出庭。伯利男爵发现，情势照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对审判本身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因此呼吁她多多思考。

“身在英国，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管辖之下，一位自由君主的冒犯也需听令于女王陛下的法律。”他告诉玛丽·斯图亚特。

“我不是她的臣子，我宁愿死上千回，也不要让自己成了她的下属！”玛丽·斯图亚特勃然大怒。若是如此，伯利男爵警告她，就算她不在场也得接受审判。海登爵士告诉她，审判过程中有民意的支持，可能对她有利，让她躲过对她不利的罪名，但伊丽莎白女王却写了一封冷酷的信给玛丽·斯图亚特：“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手段企图取我性命，让我的王国陷入血洗的危机中。我一定要让你接受本国贵族士绅的审判，而我也将如临现场。”

尽管玛丽·斯图亚特依然不承认英国法院的权力，但仍屈服了。十月十四日，玛丽·斯图亚特开始接受审判，她最主要的罪名，就是密谋叛国危害女王性命。

英国政府方面只有严密地准备才能确保审判以适切又合法的方式进行，但就如那个年代多数的国家审判一样，不准玛丽·斯图亚特带任何辩护人来协助她，她只能自己为自己辩护。苦于慢性风湿病，玛丽·斯图亚特一跛一跛地出现在调查委员会的面前，看来是个修长、穿着黑色衣服、体型壮硕的中年妇女，整张脸“臃肿而富态，有双下巴与栗色的眼睛”，她信心满满地、情绪昂扬地、愤愤不平地否认自己对巴宾顿的阴谋诡计事先知情。她也宣称，法庭上那些写给巴宾顿的一些重要信件都是假的，事实上两人完全没有通信。针对谋杀女王的计划，她说道：“我从未设法杀害我最亲爱的姐妹，那是撕裂灵魂的重罪。”她大声表示，在软禁时期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不择手段重获自由。

大量对她不利的证据，压垮了她华丽雄辩的答辩，使她难以狡赖。伯利男爵因此论断，她毫无疑问地犯下了重罪。审查委员会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女王的信差抵达时，他们已经准备要宣布玛丽·斯图亚特有罪。这天深夜，女王难以入眠，因而下令休会，十天后到伦敦重新召开侦查庭。

十月十六日，大法官正式宣布休会，审查委员们则回到南方。当玛丽·斯图亚特被留在法瑟林盖思考自己未来命运的同时，委员们正在西敏寺的皇室法庭上重新检视证据，并且耐心地承受女王不断的干扰，“但愿女王陛下能够像各国君主一样，将审判的任务，交给能以最理性的态度判断的人！”沃尔辛厄姆爵士为此恼怒不已。重审过后，法官们的结论依然不变，只有一人反对，审判委员会宣布，玛丽·斯图亚特是计划刺杀女王的叛国同谋。在一五八五年关联法的规范下，她难逃死罪，同时也失去了王位继承权。

法院并未宣判刑责；批准法院的判决是女王与国会的权力。

* * *

一开始，英国在荷兰的战事表现得相当好，甚至连帕尔玛公爵都相当佩服。九月份时，英军在阿纳姆一带的聚特芬之战中大获全胜。在这场战役中，小艾赛克斯伯爵表现得骁勇善战，并由莱斯特伯爵册封为骑士，而菲利普·西得尼爵士则因为将腿部的护甲借给一位毫无防备的朋友，导致大腿受了重伤。因为失血过多而显得相当虚弱，菲利普·西得尼爵士骑马狂奔了一英里才返回营区，“不断地谈起女王，表示就算自己受伤或死亡，只要能带给女王荣耀便罢”。但自从菲利普·西得尼爵士黯然返回宫廷后，女王陛下就开始“针对他的一言一行不断找碴”，认为他的伤势可以预防，他将英勇的行径用在错误的地方。但宫廷人士对他却相当赞赏，他们最欣赏的部分，就是菲利普·西得尼爵士即使在干渴之中，仍拒绝其他人给予的一杯水，坚持要他们先将那杯水给了旁边某位垂死的士兵。“汝比我还更为重要。”他这样说。

一开始，许多人以为西得尼爵士会痊愈，伊丽莎白女王会亲笔写一封感谢信给他。但他的伤口却化脓溃烂，让他痛苦了二十六天才死去，年仅三十一岁的他，已然成为英国的一个传奇人物。这一年对西得尼家族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一年：夏天时，亨利·西得尼爵士逝世，没多久，伊丽莎白女王的老朋友玛莉·西得尼小姐也不幸去世。

英国宫廷为这个死去的英雄哀悼，陷入一片哀凄之中，菲利普·西得尼爵士一向十分受欢迎，且一直被视为是骑士精神的最佳代表。他的遗体由一艘打着黑旗的船运回家乡，并在圣保罗大教堂举办了国葬。而女王则因“痛失一位忠仆感到太过悲伤”，因此没有参与国葬。

在聚特芬之战后，莱斯特伯爵率领的军队运气急转直下，这一切不是因为西班牙的报复，而是因为莱斯特伯爵是个无能的指挥官，精于惹恼盟友与手下之道。莱斯特的许多手下因而背弃了他，这场

战争显然就要以最耻辱的失败方式作结。对于莱斯特伯爵办事不力，伊丽莎白女王写信教训他，他灰心丧志地回信表示：“我一直相信，神不会让我在陛下的心中失去地位。”事实上，经过一年的分离，伊丽莎白女王对莱斯特伯爵思念得紧，且十分忧心若再经过一个冬天的战役，莱斯特伯爵的健康可能就会有问题。因此当他表示想要离开荷兰返回英国时，伊丽莎白女王随即准奏。

* * *

十月二十九日再度召开了国会，将其他事务摆在一边，以决定苏格兰女王命运为优先，“这是一个沉重、极度有破坏力且后果严重的问题”。女王陛下毅然决然地不再插手审判事宜，待在里奇蒙德宫中，拒绝一如往常地待在怀特霍尔宫中。她向宫廷人士表示，“她不想知道即将被拆穿的那些下流又悲惨的事情，待在怀特霍尔宫中，她快乐不起来。”

英国上下两院纷纷怒吼着要玛丽·斯图亚特交出项上人头，并一致通过审查委员会对“这个麻烦人物”的判决，同时上书女王，表示“最公平的判决就是处死她”。上下两院派出二十位士绅与四十位国会议员作代表团，于十一月十二日前往里奇蒙德宫上呈这份请愿书，让女王陷入左右为难的痛苦深渊。

女王不断地向代表团强调，在她过去二十八年来统治中，对于玛丽·斯图亚特一向宽大为怀。“在这世界上，我见过许多大风大浪，”她提醒着代表团，“我知道何为臣，何为君，何为盟邦，也见过邪恶之人。我曾在信任中体验背叛，在小处得到大利益。”接着她又表示，对于与她同样性别、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竟不断密谋杀害她，让她感到十分哀伤，她也秘密写信给玛丽·斯图亚特，允诺倘若玛丽·斯图亚特和盘托出，她绝不会让她受到屈辱，也会保她不受指摘，

但这个表侄女仍否认罪行。就算到了这一步，若她真心悔悟，伊丽莎白女王都愿意赦免她的罪。

女王想要满足人民的要求，但臣民们都知道，她可能永远无法下定决心这么做。“我只能告诉你们，最近的这个国会法案中，你们让我相当为难，要我决定她（玛丽·斯图亚特）的死活，这是非常严重又令人厌烦的负担。身为君主，我们一直在明处，全世界的眼光注视着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当心，任何的决定都必须公正可敬。”对于玛丽·斯图亚特的去留，她只表示会祈祷与思考，恳求上帝让她能有更澄澈的思考，因为她明白拖延决定可能带来的危险；但她也以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矢言做出最正确而公平的決定。根据伯利男爵的说法，她的这番演说，“让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两天后，伊丽莎白女王派遣海登爵士递送口信到国会，询问他们能否找到处置玛丽·斯图亚特的“其他方法”。但唯一的办法就是终生单独监禁玛丽·斯图亚特，让她继续成为天主教反叛的乱源，此外就是死刑，别无他法。

而此时的玛丽·斯图亚特，“丝毫未表现出害怕死亡的样子”，就连在十一月十六日，伊丽莎白女王向她表示她的判决是死刑，国会上书请求她下令行刑，要她有心理准备时，她也是一样的态度。十一月十九日，玛丽·斯图亚特正式收到死刑定讞的消息，闻此消息，她表现得相当镇定勇敢，并未表现出忧惧或忏悔。

“我什么也不会说，因为没什么好说。”她依然坚称。她反而写信给外国的友人，包括罗马教皇与吉斯公爵，表示自己绝对清白无辜，并宣称自己将为天主教殉教捐躯。当伯勒特爵士拆除她专属的顶篷，并宣布依据法令规定，她已经是个待死的女人了，因此不配享受君主级的对待时，玛丽·斯图亚特只是将一具十字架与耶稣基督肖像挂在顶篷原本的位置上。

同一天，她写信感谢伊丽莎白女王“给予关心的问候，而我漫长又乏味的朝圣之行已然告终”。她只要求死刑执行时，她的仆人们要在身边，并将她的遗体埋葬在法国。她希望能在所有人面前有尊严地死去，“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到更美好的地方去之际，我想要提醒你，有一天你也需在最终审判中面对自己的罪，在你毁灭的这么多人之中，我只盼你能记得我的牺牲，直到那一刻。”

伯勒特爵士看了这封信，因担心信件内容可能对伊丽莎白女王造成影响，因而决定延后递送时间。他非常希望可以在圣诞节前处决玛丽·斯图亚特。

十一月二十三日，莱斯特伯爵在小艾赛克斯伯爵的陪伴下回到英国。“从我出生以来，从未感受过如此诚挚的欢迎。”事后他曾这样写道。除了女王外，沃尔辛厄姆爵士与伯利男爵见到他都感到欢欣不已，因为此刻他们非常需要他的协助。虽然在他离开的这一年中，他对枢密院的影响力不再，海登爵士与其他人则继而成为英国政治圈中的显要，但伊丽莎白女王依然十分重视莱斯特伯爵的意见，此时也非常需要他的支持。

这天晚上，在与莱斯特伯爵私下晚餐过后，伊丽莎白女王写信给大法官，表示她愿意公开宣布苏格兰女王的刑罚。但这件事让她当晚几乎不能成眠。

此时，法国大使抵达英国，请求英国豁免玛丽·斯图亚特的罪。伊丽莎白女王向法国大使表示，这件事情已经超出她能阻止的范围了。“这是一个由一群罪恶的男性保护的女罪人应该面对的刑罚。”她严厉地向大使表示，若她要顺遂地活下去，玛丽·斯图亚特就不得不死。

伊丽莎白女王向国会提起处置玛丽·斯图亚特的“其他方法”，在国会中完全无人回应。会中上议院询问是否应执行死刑，而其中所有的贵族“皆表示为了女王与英国的安危，他们已别无他法”。国会一致附议玛丽·斯图亚特处决案，十一月二十四日，英国国会再度派遣代表前往里奇蒙德宫请求女王陛下，并以“各种难以辩驳的事由”说服女王下令执行死刑，以保护英国新教、大英联邦与她宝贵的性命。而女王陛下的回复则一如往常地苦恼又犹豫。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若某位君主的头不落地，便无法确保我的安危。而让我最苦恼的是，在我执政多年来，我赦免过许多反叛人士，对许多谋反行动视而不见，现在却被迫要如此对付一个人。我的敌人们难道不会说，这个童贞女王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危，就连眼见自己的亲人溅血也不顾吗？我可能因此被人说成是个残酷的人，但我是如此无辜。不，我非常不赞成这个处理方法，若只是为了我的性命，我绝不愿杀害她。若在这世界上能找到其他的解决办法，我必定会（以更快乐的态度）接受。

她的声明中，依然是模糊不明的口吻：

若要我告诉你们，我并不愿同意你们的请求，依据我的信念，我该直接表达我的意图。若要我告诉你们，我愿同意你们的请求，我就必须告诉你们无权知道的许多事情。我并非昏庸到不知道自身危险的君主，面对日夜威胁我的安危问题，我也并不草率。但有如此多的人透过书写与口语表达来反对我，我只期望你们能接受我的感谢，谅解我的疑虑，以正面的态度接受我无以回答的回答。

伯利男爵刻薄地表示，这一届国会肯定在历史上被称为“坐而言的国会”，因为他们无法起而行。

这天晚上，伊丽莎白女王在疑惧之中，为玛丽·斯图亚特的审判宣布撰写草稿，下令要大法官对国会大声宣读。她的字迹潦草难以辨认，伯利男爵还得不断为布隆尼大法官解释，但在大法官宣读之前，就接到伊丽莎白女王的口信，下令要他暂缓宣读，并将国会延期一周。

隔天，闭门会议再度召开了审判委员会，正式宣判玛丽·斯图亚特之死。在那之后，莱斯特伯爵、伯利男爵与其他人，纷纷运用自己的游说力量，迫使伊丽莎白女王循着人民的期待走。若她不愿意，他们指出，她可能就会失信于民，男性也会认为性别上的弱点让她失了判断力。

十二月二日，当国会重新开议时，伊丽莎白女王与伯利男爵已经重新撰写了宣判书。十二月四日，当宣判书正式宣读时，英国上下陷入一片狂喜，伦敦各地燃起了火把与营火，钟声与赞美诗声不绝于耳。同一天沃尔辛厄姆爵士起草死刑执行令，但女王仍未正式签署，甚至让国会休会到二月十五日，给她十周的时间为此做准备。在这段时间，枢密院参事们将尽可能地迫使犹豫不决的女王面对这必然的结果，并签署执行令。

伊丽莎白女王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法国与苏格兰大使们不断地说服伊丽莎白女王怜悯玛丽·斯图亚特，伊丽莎白女王也相当焦虑，不愿冒犯这些友善的盟国。詹姆士六世则写信提醒她，“英王亨利八世的声誉，因处决了枕边人受到极大影响”，提及了安·波林，让身为她女儿的伊丽莎白女王相当恼怒。但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更关心的是自己未来继承王位的利益，而不是想要拯救母亲的性命；他听说玛丽·斯图亚特自愿将英王权位让给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因此决心防止这样的情形发生。就他而言，他的母亲“除了镇日祈祷、服侍神以外，没有资格管闲事”，但他仍向莱斯特伯爵表示：“为了我的信誉，我还是得坚持保她的命。”

玛丽·斯图亚特将面对死刑执行一事，大大地影响了苏格兰的公众意见，此时苏格兰激起一阵爱国情操，将她视为女英雄；部分贵族甚至语出威胁，表示若玛丽·斯图亚特遭到处决，将对英国宣战，尽管詹姆士六世并不想为了母亲，使出如此激烈的手段，但这一席宣言

依然让他无法忽视——毕竟两国开战要冒很大的险。因此他表面上说说，但事实上要求特使罗伯特·梅维尔爵士（Sir Robert Melville）私底下向伊丽莎白女王表示：“玛丽·斯图亚特之死绝不会刺激苏格兰。”

伊丽莎白女王陷入执政以来最困难的决定。若她签署了执行令，就等于是为神圣的君主判刑开了先例，也等于是杀害了自己的亲人。她将因此遭到全世界的咒骂，甚至刺激天主教强权国家以此为借口展开报复行动。但若她对玛丽·斯图亚特表现出怜悯，未来毕生将成为天主教策划谋反的焦点。伊丽莎白女王知道她身负重责大任，但她并不想背负玛丽·斯图亚特之死之责。

几周以来，伊丽莎白女王活在极大的压力之中，影响了她的判断力，让她濒临崩溃边缘。她的顾忌让她被参事们孤立，她对枢密院说了一个又一个借口，运用自己极佳的拖延技巧，不愿正式做出决定。

伯勒特爵士无法无限期地延迟将玛丽·斯图亚特的诀别信送到伊丽莎白女王手上，历史上可知，女王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收到此信，忧心忡忡的莱斯特伯爵向海登爵士透露：“女王因此而流泪，但我认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此后，伯勒特爵士禁止玛丽·斯图亚特再与伊丽莎白女王沟通。

圣诞节时，宫廷正式移驾格林尼治，女王同意由伯利男爵将沃尔辛厄姆爵士撰写的草稿，制成正式的执行令。执行令准备妥当后，再交由近来擢升，与沃尔辛厄姆爵士一同担任国务大臣的威廉·戴维森爵士妥善保管。

一月六日，罗伯特·梅维尔爵士向伊丽莎白女王建议，若玛丽·斯图亚特正式将继位权转让给她的儿子，就可免她一死，身为新教徒

的詹姆士六世，一定不会偕同天主教人士谋反对抗伊丽莎白女王。然而伊丽莎白女王随即看出这个说词背后的瑕疵，因而大发雷霆。

“以神之名，这根本就是要割断我的喉咙！”伊丽莎白女王怒吼着。“我绝不容忍比他母亲更糟的对象来继位。不，以神之名！你的主公永远没有这个机会。”这样的说法让梅维尔爵士气愤不已，他并未注意到伊丽莎白女王并不愿意指定继承人一事，但他强压着怒气，要求女王延后死刑执行，就算一周也好。

“一个小时也不可能！”伊丽莎白女王怒气冲冲地大吼大叫，接着离开了谒见室。法王亨利三世派人送来的口信也让女王气愤难平，他警告伊丽莎白女王，若她处决了玛丽·斯图亚特，他一定会将它视为公开污辱。女王因此勃然大怒，表示：“那才是让我把这个祸根处理掉最快的途径。”

但许多人都明显地感觉到她犹豫不决，迟迟无法签署执行令。尽管她的参事们“相当努力地运作”，依然未能说服她。他们甚至翻出古希腊的先例，盼能说服她处决一个不断密谋杀她的人乃天经地义，伯利男爵表示：“若没有更多时间让我们除掉这个眼中钉呢？”戴维森则担心：“伊丽莎白女王会与当年对待诺福克公爵相同，若非遭受极大恐惧的催逼，否则不愿取她性命。”

一月份，此案悬而未决已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枢密院甚至刻意散布许多令人忧心的谣言，盼能敦促女王做出决议，包括指称西班牙已然出兵，伦敦全城陷入火海，苏格兰女王逃逸无踪，导致全国上下陷入恐慌，许多人甚至打算拿起武器开战，主要干道上甚至不得不派人看守。此时，枢密院才通知伊丽莎白女王，因疑似涉入谋刺伊丽莎白女王的阴谋中，他们逮捕并讯问了法国大使。这可能是枢密院方面精心策划，要操弄她的恐惧，逼她签署执行令的一个计谋——当然，

枢密院根本没有逮捕法国大使——但无论如何，这个计谋成功地扫除伊丽莎白女王担心刺激法国的顾忌，下令诛杀玛丽·斯图亚特。

“不主动出击就屈服吧！”伊丽莎白女王以拉丁文宣誓，在她的房里来回踱步。“为了不遭人痛击，我们主动出手吧！”

二月一日，伊丽莎白女王突然派人召来效率极高、颇受尊崇的威廉·戴维森爵士，当时他正代理执行身体不适的沃尔辛厄姆爵士的工作。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历史上存在着两个完全矛盾的描述。根据戴维森爵士后来的宣言，伊丽莎白女王向他表示，意图释放玛丽·斯图亚特的报告让她心神纷乱，因此她决定签署玛丽·斯图亚特的死亡执行令刻不容缓。戴维森爵士将执行令放在女王面前，女王仔细阅读后便签下了名字，并表示希望死刑尽快于法瑟林盖城堡大厅举行，不要在庭院中。女王指示他询问代理大法官克里斯多福·海登爵士在执行令上盖上英国国玺，接着拿给沃尔辛厄姆爵士看。

“他一定会当场悲痛不已。”女王冷酷地嘲弄着。

女王最后的指示，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将执行令送达法瑟林盖，接下来“一直到死刑执行完成前，她都不想再听到这件事”。

戴维森爵士随即将执行令让伯利男爵过目，伯利男爵因而松了一口气，接着才呈到海登爵士面前，让他盖上国玺印，执行令就此生效，并可正式执行。隔天，伊丽莎白女王派人传话给戴维森爵士，表示在他与女王进一步沟通之前，绝不可将执行令交给大法官；但当戴维森爵士向女王表示，执行令已然封缄时，女王以相当紧绷的语气问他为什么执行得如此迅速。戴维森爵士忧心女王可能会改变心意，于是向海登爵士寻求建议。二月三日，两人相偕去找伯利男爵，并紧急召开枢密院会，会中参事们不断辩论，在正式派发执行令前，究竟是否该先行知会女王。最后，伯利男爵一肩扛下责任，决定在玛丽·斯

图亚特死亡之前，任何参事都不得再与女王谈论此事，以免女王“想到新的方法干涉，阻止公平正义的伸张”。

为了避免戴维森爵士一肩扛下所有的责任，十位枢密院院士皆同意，分担接下来他们所作所为的责任。伯利男爵因此草拟了死刑执行命令，戴维森爵士接着复制了命令内容，在二月四日将命令书送往法瑟林盖。他的信差是枢密院的一位雇员罗伯·比勒（Robert Beale）。

伊丽莎白女王对此事件的看法则与他们大相径庭。她坚持自己在签署了执行令后，下令要戴维森爵士保密，当她知道执行令盖上国玺印后，便要求戴维森爵士发誓，在她正式下令执行前绝不可让执行令外流。

戴维森爵士可能误会了女王的意思，但其实不太可能。当时与近代历史现象都显示，伯利男爵知道女王需要有人来帮她承担处决玛丽·斯图亚特的罪，因而选择戴维森爵士为代罪羔羊，但却没有直接证据。不过伯利男爵对戴维森爵士的能力，一直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有能力担任英国政府中的任何职务；因此他并不认为戴维森爵士在策略上是可牺牲的消耗品。比较具有可信度的解释，应该是伊丽莎白女王选择让戴维森爵士来背黑锅——成为万夫所指的对象——承担玛丽·斯图亚特之死之责。她认为在关联法的规范下，此举能合理化英方的做法。

毫无疑问的是，在戴维森爵士收集了所有文件离开谒见室时，女王扣留了他。在她经常采用的莱斯特伯爵、约翰·惠特吉夫与其他人的建议下，女王要戴维森爵士询问签署了关联法的伯勒特爵士，是否能直接处理玛丽·斯图亚特以减轻女王的负担，好让伊丽莎白女王宣布玛丽·斯图亚特是自然因素死亡，这样女王就不需为她的死负责。戴维森爵士吓坏了，坚持表示伯勒特爵士绝不会同意如此卑劣的手

法，但伊丽莎白女王向他表示，这是比他还要聪明的人提出的建议，他只好勉强同意写信给伯勒特爵士。

在执行令派发之后，不疑有他的女王再度召来戴维森爵士，表示自己做了有关玛丽·斯图亚特遭到处决的噩梦。于是他再度询问女王，是否希望死刑继续执行。“她说要，并以相当激烈的态度，说出了庄重的誓言。”但她强调：“也许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女王问他是否收到伯勒特爵士的回音，但他表示没有。

当天稍晚来了一封信，但却不是女王等待的回音，尽管伯勒特爵士总是呼吁女王走法律既定的道路，但他也不愿自贬为杀人凶手。

“我的生活与生命都任由女王处置，”他写下了这样的字眼，“但愿我不需要使出如此不正当的手段，在没有法律或执行令的支持下，毁灭我的道德良知，留下这么大一个人格污点给我的后代子孙。”

当女王隔天早上看到他的信时，抱怨这封信太过考究，并疑惑地说着为什么伯勒特爵士会支持关联法。女王“一直责怪特定宫廷人士的讲究，他们口口声声说会为了女王的安危付出全部，但事实上却什么也没做”。

两天后是二月七日，伊丽莎白女王下令要戴维森爵士写一封“措辞尖锐的信”给伯勒特爵士，抱怨为什么“事情还没办好”。戴维森爵士知道，女王依然希望以暗中运作的手段处理玛丽·斯图亚特，于是坚持伯勒特爵士需要执行令，“而不是由我写私人信件给他”以“指导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执行方向”。这件事到此不了了之。

事实上当天执行令就抵达法瑟林盖，当天晚上，伯勒特爵士便提醒玛丽·斯图亚特准备隔天早上八点受死。她相当平静地接受这个消息，当天晚餐时间仍显得相当高兴。在那之后，她写了几封诀别信，

分配了自己仅存的几件遗产。接着花了好几个小时祷告，才在凌晨两点左右入睡。

当她于晨间醒来时，太阳已高挂在天空；当天天气“相当风和日丽”，新教徒将这个现象解释为神赞同处决玛丽·斯图亚特的征兆。准备好了以后，在与仆人们诀别时，玛丽·斯图亚特哭得相当伤心，当她受到召唤准备前往大厅时，她已经整顿好自己的心情。

一五八七年二月八日星期三早上八点整，在北安普敦行政司法官与几位侍女、医生、药剂师与管家的陪同下，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走进了法瑟林盖城堡大厅，眼前有三百人即将成为见证。对于传说中的美人，事实上是个瘸腿、肥胖的中年妇女，还有着双下巴，让许多人感到相当吃惊。但她依然保持着她的尊严与冷静，甚至为了这个场合精心打扮，这是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头上罩着边缘有薄蕾丝的细麻布、香盒链与羔羊颂；颈上挂着金质的十字架；手中握着一幅骨制的耶稣受难像与一个木头十字架；腰带上也系着念珠，念珠的尾端有一个牌子；细麻布做的纱罩系在她的后脑勺，上面绑着细绳，周围则装饰着细致的蕾丝。她身穿黑色缎面服装，上有印花，袖长垂地，上头缝着黑玉纽扣，还有珍珠装饰，短袖的部分也是缎面材质，还有紫色天鹅绒质的袖子装饰。”

当她走向铺满稻草的黑色行刑架时，她转向侍女们表示：“汝等理应欣喜莫哀伤，此后玛丽·斯图亚特所致之苦痛，得到久望的结果。”

彼得伯勒新教司祭长就在行刑架上等待准备安慰她，但她却拒绝了：“司祭长先生，请别为彼此烦心，汝等必知晓我潜心古天主教信仰，在神的恩典下，不便接受汝之祷告，我愿抛洒热血。”但司祭长坚持为她祝祷，她便以更大的音量用拉丁文念出自己的祷词，一边不住地哭泣着。

接着刽子手与他的助手上前，协助她脱去外衣，才不会影响斧头的动作。“我不习惯由这些侍从为我宽衣，也从未在如此多人面前脱去外衣。”她表示。在她脱掉黑色外衣，露出低胸的缎质紧身胸衣与鲜红色的天鹅绒衬裙时，旁观的民众一阵议论纷纷，她穿着天主教殉教的颜色；此外，加上她身上佩戴的宗教饰品，她显然自视为天主教信仰殉道者。

当刽子手跪在玛丽·斯图亚特面前，请求她原谅他接下来不得不做的事情时，玛丽·斯图亚特仿佛事先准备好般表示：“感激你结束了我充满灾祸的一生。”她以坚毅的态度跪下，将头放在断头台上，不断念着：“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刽子手两次重击，才将她的脖子砍断，可能对她的脊神经造成极大刺激，在她死后，嘴唇还动了五分钟才停下来。

依照风俗，刽子手需抓住受刑者的头发，将头颅提起，并大喊：“天佑女王！”但这一次，当刽子手提起她的人头时，细麻布帽与红色假发瞬间掉落，露出了她灰白的头发，“剪得十分短”，只在两边耳上各留下一绺头发。她的脸也仿佛变了一个人，死后的样貌令人难以辨认。

上头有令，须将尸体的衣服剥除焚毁，千万不能留下任何遗迹作为天主教鬼子们崇拜的工具，但当刽子手弯下身

扯掉她脚上的袜子时，他在她的外套中发现了一只小狗，它一直待在那里，接着就跳到了玛丽·斯图亚特的遗体与头颅中间，身上沾满了女主人的血，必须送去与任何沾到血的东西一起清洁。刽子手收了钱后就走了，并没有带着任何属于她的东西离开。她的尸体与头颅被行政司法官送进了一个大房间中，由外科医师不断涂抹香料，直到入土埋葬。

这天下午，在沃尔辛厄姆爵士的命令下，玛丽·斯图亚特的遗体以铅封装，放置在沉重的棺材中。

* * *

处决玛丽·斯图亚特的消息传到伦敦后，民众欢声雷动。到处可听见庆祝的钟声、大鸣枪声致敬，人们点燃营火，每条街上几乎都有随性的宴会。庆祝的气氛维持了一周。

但伊丽莎白女王丝毫不显高兴：二月九日早上九点，当她知道玛丽·斯图亚特遭到处决的消息时，她几乎陷入一阵歇斯底里中。根据康登记载，“她的表情大变，说话颤抖，如此沉重的忧伤让她受到严重打击，仿佛陷入悲痛无法平复般，甚至穿上了哀悼的丧服，不断流泪”。她的情绪爆发，不只是连番哭泣，对于那些以她之名擅自行动，让她落入这般田地的人，她也感到相当气愤。参事们与臣子们早已预料到她会失控，但并未料到如此剧烈的程度，女王对他们严厉的指控，让他们怕得发抖。海登爵士因忧虑而感气馁；沃尔辛厄姆爵士逃回巴恩厄姆斯的家中装病；伯利男爵与莱斯特伯爵则被罚不能会见女王。吓坏了的伯利男爵多次写信给伊丽莎白女王，哀求女王让他“能跪在女王脚边”，感受“女王偶尔的施舍与怜悯，滋润我那悲痛的心灵”，并表示自己愿意下台，但他的信件上只写着“信件未达”。

尽管枢密院不断请求：“女王陛下需要更多食物与睡眠以维持健康。”但伊丽莎白女王几乎无力生活。尽管她的哀痛与痛悔千真万确，但这些情绪都是为了她自己，而非她的表侄女，因为她害怕神会因她处决了玛丽·斯图亚特而惩罚她，对于这么恐怖的消息传开后，她的国际声望又会变得如何，也是她非常担心的一件事。她的第一要务，就是让自己远离遭人谴责的命运。因此在她将悔恨的感受发泄完后，她刻意装出受到情绪与悔恨蹂躏后的惨状，希望这样她的敌人，会认为她为苏格兰女王之死感到如此哀伤，一定不是她下令的。

当然还要找一个代罪羔羊，因为她必须说服欧洲各国君主，英国枢密院才是此事背后的主谋，而不是她。她坚持在她正式授权以前，绝不能将死刑执行令交给枢密院，接着暗示，是戴维森爵士模仿了她的笔迹。但为了说服詹姆士六世她并不需要为他母亲之死负责，伊丽莎白女王指控可怜的戴维森爵士举措失宜；女王拒绝听他的解释，在二月十四日时，他便遭到逮捕，在闭门会议中接受审判，接着被判一笔重大的罚金，并在伦敦塔中监禁到女王高兴为止。伊丽莎白女王本要吊死他，但伯利男爵说服女王，这种报复是暴君才有的行为：她不应该认为“她的权力大于法律”。负责递送执行令的比勒，则被贬为约克的低阶邮差。

就算这样也很难欺骗世人的眼光。“英国女王现在说这不是她的命令，显然是种权宜之计，事实显然与她所称的一切相反。”菲利普二世坚称，许多天主教圣徒则坚定地提醒他，为玛丽·斯图亚特报仇是他的责任。

一如伊丽莎白女王的担忧，她的所作所为，引发天主教欧洲的谩骂，他们强烈的反感，都收录在狠毒的宣传手册与传单中，谴责她是个异教徒，是个无耻邪恶的女人，甚至要神降罪于她。罗马教皇则希望对她发起新的圣战，因此呼吁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在刻意地追悼玛丽·斯图亚特之外，尽快抓住机会入侵英国。而各界也认定，玛丽·斯图亚特已将她继承英国王位之权让给了菲利普国王，他绝对有权这么做。尽管天主教势力不断表明这一点，但随后很快就发现，玛丽·斯图亚特从未正式指派菲利普国王作为她的接班人。然而英国境内的许多天主教徒，包括耶稣会神职人员，仍坚持菲利普国王的女儿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亚是神圣合法的英国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未立遗嘱一事，并未让菲利普国王感到烦恼，他认为玛丽·斯图亚特之死，成了他实现“对英国的企图”、夺取英国王位最好的借口。

伊丽莎白女王写了一封慰问信，给她“亲爱的兄弟”詹姆士六世，将他母亲遭到处决一事，形容成“悲惨的意外，完全违背我的心意。神与许多人都知道，在这件事之中，我非常无辜，我只能恳求你相信我，若我有不良企图，愿意承担任何后果。若此事真为我的意思，我绝不会推诿于他人”。

果不出其然，詹姆士六世刻意营造痛失母亲的儿子形象，但又无法失去伊丽莎白女王这个盟友，因此除了象征性的抗议之外，并未有额外的动作。三月三十一日，詹姆士六世向气愤难平的苏格兰贵族表示，他无法为了替母亲报仇而牺牲英格兰—苏格兰联盟，只能选择相信伊丽莎白女王所说的一切是真的。

法王亨利三世则公开谴责英国处决玛丽·斯图亚特的暴行，对伊丽莎白女王愤怒以对，“真是个杂种、无耻的贱人”。在巴黎，英国大使被拒于宫廷大门之外，同时也完全不敢上街，否则会引来大批奉玛丽·斯图亚特为圣徒的嘈杂人潮。但亨利三世要面对的国际问题太多，无力对英国宣战，最后他对伊丽莎白女王也是束手无策。

三月二十七日，伊丽莎白女王依然情绪不佳，下令要十位触法的枢密院参事到大法官面前报到，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与约翰·惠特吉夫大主教来审判他们的行为。伯利男爵代表所有人，指称戴维森爵士是依照他的命令行事，而他们最大的动力，就是担忧女王的安危。一周后，沃尔辛厄姆爵士发现：“我们那严苛的情势依然存在。财务大臣仍遭罢黜，女王陛下依然在我背后用十分冷酷的言辞对我。”伯利男爵失了宠，也因此让他的儿子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有了证明实力的机会，他支持海登爵士，而海登爵士则认可他的政治技巧，让他在四月份正式走马上任成为大法官，而莱礼爵士则填补了他卫士长的位置。五月份，仍痛苦难耐的伊丽莎白女王向法国大使表示，玛丽·斯图亚特之死“是她毕生无法抹灭的记忆”。

到了五月份，伯利男爵终于获得恩准返回宫廷，但女王依然“以苛刻的言辞对付他”，“称他为叛国贼、伪君子、缺德的小人，要他不准出现在她面前——这一切都是因为苏格兰女王之死”。身为老臣的他只能等待时机，六月份时，伊丽莎白女王特地前往特欧伯兹拜访他，他的忍辱负重有了回报——这是女王在他家住得最久的一次，这段时间两人言归于好，女王的心情也恢复平静。

莱斯特伯爵也得到了女王的原谅，他与伊丽莎白女王再度快乐地争吵着英国该如何扭转在荷兰的劣势。这年春天，菲利普国王下令要帕尔玛公爵尽可能地征服所有的省，让荷兰成为西班牙入侵英国的跳板，其准备工作也已然在进行中，尤其是自从四月以来，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授权下，德瑞克爵士在卡第兹港焚烧了三十七艘西班牙籍船舰。在圣文森港挟持了一百多艘船，并在亚速尔群岛掠夺了大量的西班牙珍宝；因为他的行动，西班牙无敌舰队当年无法出航，但德瑞克爵士嚣张的举动，让菲利普国王更存心要一举侵略英国。莱斯特伯爵全力支持武力干涉荷兰事务，但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相当难测。

在玛丽·斯图亚特处决之初引发的轩然大波过后，伊丽莎白女王指派伯勒特爵士为嘉德骑士事务大臣以兹奖赏。四月份，看来无论是人或神，都已经没有立即性的报复危机后，伊丽莎白女王开始改口，称玛丽·斯图亚特之死有其必要性与公正性；最重要的是，玛丽·斯图亚特死后，她便不再需要面对内部反抗的威胁，因为天主教反叛的势力失去了重心，也没有合法继承王位的人选，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挡由身为新教徒的詹姆士六世继位。境外的天主教徒认为他们在英国境内的教友，应将菲利普国王视为救赎，但他们却大大地低估了伊丽莎白女王麾下天主教臣民的忠诚与爱国心，菲利普国王对他们来说，等同于玛丽·都铎时代的恐怖统治，而他们对西班牙人统治英国的恐惧感也并不亚于效忠伊丽莎白女王的新教臣子。

七月三十日，在女王的命令下，玛丽·斯图亚特的棺木终于在法瑟林盖下葬；在夏日将至之际，她的遗体几乎成了影响健康的乱源，传出极度难闻的臭味，几乎没有人敢进入摆放她遗体的屋里。她的遗体被移往彼得伯勒大教堂（Peterborough Cathedral），以皇室礼仪与壮观的盛典风光下葬。一六一二年，詹姆士一世下令将母亲的棺木移灵西敏寺，放置在伊丽莎白女王下葬处对面的礼拜堂中。

22 胜利女神伊莉莎

莱斯特伯爵仿佛为所欲为般，再度带着全新的三千兵力与一队战舰，于一五八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重返荷兰。帕尔玛公爵故意使出时间战术，一度提出和平诉求，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迂回曲折的协商。

七月二十九日，罗马教皇与西班牙签署了一项条约，同意由菲利普国王提名任何一位他认为适合担任英国统治者的人选，唯一的条件是，这个人必须在英国重建天主教信仰。九月份，菲利普国王下令要帕尔玛公爵组织一支舰队准备入侵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注意到敌国准备入侵的气氛，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和平协商的结果上，因为她知道英国没有强而有力的军队，仅有一支小小的海军，根本没有应战的实力。

同时，英国与荷兰盟邦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眼见尼德兰可能就要爆发内战了，而莱斯特伯爵的无能就是造成现况最主要的原因，于是这一年的秋天，他向伊丽莎白女王提出自己在荷兰毫无用处的说法。女王便在十一月十日将他召回英国。在他离开之前，还下令制造一个纪念章，上面镌刻着他的传奇：“我不愿离开的并非人们，而是那忘恩负义的一群”。

回到英国宫廷中，他气愤地发现，虽然女王表面上亲切地欢迎他，但私下对于他无法与盟友间更进一步地团结并阻挡西班牙的推进

感到相当不满。无法面对女王的斥责，他只好退到温斯特去，并放弃担任了将近三十年的骑士统领头衔，并说服女王将这个荣耀赐予他的继子小艾赛克斯伯爵。

在莱斯特伯爵二度离开英国前往荷兰后，年纪轻轻的小艾赛克斯伯爵与女王变得更加亲近，再透过他新建立的势力为继父赢得优势，毕竟继父对他的栽培，就是为了挽回自己政治上的颓势。也因为两人之间的情感，因此他们从未互相敌对。伊丽莎白女王为年轻的小艾赛克斯伯爵着迷不已，总是将他带在身边，认为有他在身边的生活相当有趣。他拥有伊丽莎白女王喜欢的各种男性特质，但女王相当清楚，他完全没有政治敏锐度。整个夏天，宫廷人士都看他忙着陪女王散步、骑马，晚上则常见两人一起玩牌或听音乐，直到“清晨的鸟鸣声声唤”。

小艾赛克斯伯爵拥有贵族血统：他的身上流着金雀花王朝的血液，同时从小也接受了莱斯特伯爵那严格的新教信仰。他具有骑士精神、自信满满且十分大方。他会写十四行诗，执笔的信件相当时髦、掷地有声，他在宫廷的化装舞会中总是表现良好。他身材看来“十分修长”，拥有红褐色的头发与胡髭，还有高雅的双手。

女性难以抵挡他的魅力、他的男子气概与他健壮的体格，伊丽莎白女王也不例外，尽管她比他年长了三十三岁。但这个年轻人也免不了要花言巧语地称赞女王，或假装被女王的魅力深深吸引，伊丽莎白女王就需要这样的注意力。传言中，她有永生不摧的美丽，她也刻意助长这样的传闻，但到了这个年纪，要维持传言中的姿态越来越困难，她只好使用假发与化妆品来协助。但在小艾赛克斯伯爵的陪伴下，她似乎恢复了逝去的青春。但女王似乎总把他当成自己无缘拥有的儿子，而非爱人或追求者。历史上从未有任何证据显示女王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但曾有人推断，就外貌与体格而言，小艾赛克斯伯爵

都让她想起了托马斯·西摩，在她青春正好的时期，唤醒她的性欲的那个男人。

但小艾赛克斯伯爵也有黑暗的一面。他有时相当情绪化、傲慢跋扈、莽撞无礼、难以相处，当他的脾气上来时总是冲动不已。他不懂自律，更不懂得“隐藏情绪。总是喜怒形于色”，也总是“很容易被激怒，又难以平复情绪”。他是一个复杂的男人，生活过得仓促，但有时又仿佛活在自己的世界般爱做白日梦，做起梦来，连自己吃饭时吃了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在意自己的衣着是否搭配得宜。他总是迈开大步向前走，头部则总是向前倾。他的性格与其他的宫廷人士一样令人费神疑猜，但偶尔与人有了亲密接触后，他总会赶紧前往教堂，在神面前告解好几个小时。尽管他喜欢宫廷华丽炫目的生活，他也喜欢在查特里家中的安静生活。自小，他就有神经衰弱的问题，病情严重时，他甚至必须卧床多日，浑身发热、颤抖、重度忧郁，无法理性地说话或思考。

总是以自我为本位的小艾赛克斯伯爵拥有极大野心；总是想成为剑客中的佼佼者、宫廷中威风凛凛的年轻豪侠，但为了享受豪奢的生活，他需要很多钱，但在这方面却总是匮乏。因此他的生活总是寅吃卯粮，他的财务状况总是在破产边缘，也因此包括女王等人在财务状况许可下总是尽可能地帮他渡过难关。

年纪轻轻的小艾赛克斯伯爵，仿佛有用之不竭的精力，也想要在军事领域上有所作为。菲利普·西得尼死前将剑传给了他，因此他自视为菲利普·西得尼的传人，同时他对自己也相当有信心，认为自己有领导才能，能激发人们奉献的精神。他在这方面的确有相当程度的天分，但他有时行事太过轻率，也过于自负。“没有任何人比他还要更渴望荣耀，”康登记录下这些现象，“也没有人比他更不在乎荣耀以外的一切。”

有一个人相当妒忌小艾赛克斯伯爵的崛起，这个人就是莱礼爵士。他原认为自己能取代莱斯特伯爵，成为女王跟前的第一大红人，但江山代有才人出，他的光芒早已相形失色。莱礼爵士仿佛着了魔般地妒忌着，更暗自决心要颠覆小艾赛克斯伯爵显赫的地位。但当小艾赛克斯伯爵获得进入女王寝室，与女王交谈的殊荣时，负责在门外过滤访客的莱礼爵士，只能将愤怒与怨恨埋在心里。

只要可以，他绝不会放过痛击对手的机会。小艾赛克斯伯爵的姐姐桃乐丝小姐在与人私奔之后，就被禁止入宫了。但这年的七月份，伊丽莎白女王出巡，走访华威伯爵的豪宅诺斯堂时，华威小姐认为伊丽莎白女王的怒气已灭，便邀请桃乐丝小姐与小艾赛克斯伯爵为宾客。莱礼爵士含沙射影地向女王告状，表示小艾赛克斯伯爵将姐姐带进诺斯堂，因为他认为自己对女王不敬也没有关系。伊丽莎白女王大为光火，因此下令要桃乐丝小姐待在房里，一直到女王离开后才得露面。

又羞又窘的小艾赛克斯伯爵，早就猜到是谁在背后搞鬼。于是晚餐后，当他与女王和华威小姐坐在一起时，莱礼爵士正在门外偷听，小艾赛克斯伯爵为姐姐喊冤，并指伊丽莎白女王未经思考的作为“只是要取悦那奸诈的莱礼爵士，我就知道她会在世人面前羞辱我”——这是他事后在信件中对友人的抱怨。

结果这激怒了伊丽莎白女王，她直率地表明“自己无法忍受任何人批评莱礼爵士，同时表示我没有任何理由轻视莱礼爵士。她的一席话让我甚感纷乱，但我依然尽可能地向女王传达他的所作所为与真面目”。

小艾赛克斯伯爵问她：“我的女主公竟然敬畏这样一个男人，我该如何是好？”并以“悲痛暴躁的态度，尽可能地诋毁他”，希望能让莱礼爵士听到他的话。但这一席言论只是更进一步地激怒伊丽莎白

女王，让她怒火中烧，让她毫不庄重地与小艾赛克斯伯爵吵了起来，甚至攻击他母亲莱斯特小姐的道德问题。这对情绪不稳定的小艾赛克斯伯爵来说，简直难以招架，他怒吼着说自己无法坐视家族蒙羞，并坚持在深夜里要把姐姐送走。至于他自己，他告诉女王陛下：“我到了哪里都无法开心，我的情感被狠狠践踏，如莱礼爵士这样的小人却大受敬重，我绝不想待在这样的人身边。”伊丽莎白女王并未回应，只是转过身去，继续与华威小姐聊天。

女王的忽视让他愤怒极了，小艾赛克斯伯爵随即离开那个房间，并安排姐姐立即离开，并随即前往马盖特准备去荷兰，在那里，他能将受伤的情绪发泄在战场上。“与其忧虑一生，不如光荣而死。”他宣称。

但伊丽莎白女王已经猜到，他可能会干傻事，便派出亨斯顿勋爵之子罗伯特·凯利（Robert Carey）将他追回；最后他在桑德维奇追上了小艾赛克斯伯爵，说服他返回诺斯堂，并与女王和解；但他仍不断抱怨女王陛下“对他的态度不够和善”——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还会常常听到他的抱怨。

这件事为两人未来的关系设定了模式，易变又易怒：性格刚烈的两人很容易爆发冲突，口不择言，接着冷战；但相较之下，伊丽莎白女王更需要小艾赛克斯伯爵的存在，最后只好让步。小艾赛克斯伯爵对女王相当有感情，他知道自己凌驾于女王之上，不断地得寸进尺。他绝不让任何女人控制他，甚至包括女王陛下；事实上小艾赛克斯伯爵鄙视女王拥有的王权到了极点，也厌恶自己必须卑躬屈膝的事实，他认为像他这样的男人，除了体能外，智能也比女性更加优越。他也许会奉承女王，装作爱慕女王许久的追求者，但他常以斥责的话来惩罚女王，同时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痛恨女王在两人的关系中占上风。他显然认为女王是个爱管闲事、令人烦躁又过时的老女人。令人

最惊讶的是，女王屡次原谅他的放肆。甚至有人瞎猜，认为女王让小艾赛克斯伯爵在背后发号施令，但面对他不应得的政治势力，或他可能会不知羞耻剥削自肥的利益时，女王的立场又变得相当严谨。然而当小艾赛克斯伯爵深信，这些权位给错了人，与老派的、聪颖的人所说的不同时，他就能胁迫女王听从他的意见。伊丽莎白女王深知这一点，也早有准备。

* * *

十二月二十一日，伊丽莎白女王指派霍华德勋爵查尔斯（Charles, Lord Howard）为中将、海军大臣兼英国海军指挥官，并下令要海军全员戒备。此时，菲利普国王可能很快就要派出他的无敌舰队前来；十一月份时，伊丽莎白女王便听说了他的计划：西班牙大型帆船的无敌舰队，准备痛击英国海军，为帕尔玛公爵先杀出一条血路，让他尽快由荷兰派遣一支精兵进入英国境内。推翻伊丽莎白女王、掌握英国政权后，菲利普国王就会来到英国，为女儿取得英国王位并重建天主教信仰。

根据霍林斯·赫德所记，在一五八八年年关将至之时，英国许多民众想起，部分占星家与预言家曾预测，英国这段时间会有“非比寻常又异常的意外”发生，因此引起极大的恐慌。但伊丽莎白女王拥有自己专属的占星预言家，则较为乐观。

实际上，伊丽莎白女王与她的政府已经开始准备迎战。海港与各地都加强边防，建造了七艘新船，旧船也进行翻修工作。王国各地高处都架起了烽火台，以在敌军入侵的第一时间通报。同时招募水手与军人，并向民间征用武器与仓库。尽管如此，面对敌人入侵，英国仍未有足够的准备，当她发现菲利普国王的舰队也并未完全准备好，可能到来年夏天都不见得有能力出击时，从不愿浪费金钱的伊丽莎白女王，下令遣散英国舰队。

纵然伊丽莎白女王有过人的勇气，但她仍不乐见两国开战：她天性不喜欢军事上的荣耀，对于战争可能带来的财政与生命损伤，她感到相当吃惊。若能透过外交手段解决的问题，她一定会选择这样的途径，当然，一直到无敌舰队真的出港以前，她一定会持续追求和平解决的方法。

因为女王仍然相当气愤，因此并未邀请莱斯特伯爵赴宫中过圣诞节，到了一月，莱斯特伯爵依然没有收到女王的音讯时，他只好写信哀求女王“用陛下那仁慈宽厚的眼睛，看看可怜又苦命的我”。而当莱斯特伯爵知道，当巴克赫斯特勋爵（Lord Buckhurst）提出要他为荷兰战争执行不力一事面对质询，但伊丽莎白女王却拒绝时，又感到相当欣喜。

战争恐将成真，伊丽莎白女王因而召回莱斯特伯爵，在一五五八年的前几个月中，尽管健康情形每况愈下，他仍一丝不苟地出席了枢密院会。莱斯特伯爵展现更甚于他人的态度，警告伊丽莎白女王，外交途径不足矣：她应该更进一步地加强军事实力。

到了四月，伊丽莎白女王下令额外翻修十二艘船，她的政府并负责着手开始针对女王的部队进行密集训练。德瑞克爵士倾向直接航向西班牙，破坏菲利普国王的船只，但伊丽莎白女王担心，在这最需要船只的时期，她可能会因而遭到报复，使得船只被破坏或遭窃，因此并不同意这么做。同时，女王表示，若真的在海上发生冲突，也一定要在英国近海一带进行，这样才能让海军牢牢记得自己为何而战。

伊丽莎白女王依然希望，两国不需要走到战争这步田地。四月份时，她派遣前驻巴黎使节瓦伦泰·戴尔（Dr. Valentine Dale）与帕尔玛公爵见面，希望求和。五月三十日，两国代表见面讨论和谈相关事宜，就在同一天，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一百三十艘船舰，搭载着三万精兵，在麦地那·西都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 Sidonia）的带领下

从里斯本出发前往英国。此时，英国舰队已经进入备战状态，在普利茅斯待命。

在西班牙的船舰上，带着数千份罗马教皇对此战役祝福的诏令，除了重申伊丽莎白女王遭到逐出教会外，甚至呼吁她的臣子们背弃她。这些诏令将在西班牙军队入侵后，在英国境内大肆散布。但到了六月底时，当伊丽莎白女王的臣子们知道诏令存在的消息后，更进一步地展现出对女王的忠贞。

六月初，枢机主教威廉·亚伦发行了一份手册，恶狠狠地攻讦了伊丽莎白女王，这本手册名为《给英国贵族与平民的警告》。在手册中，他将亨利八世形容为“伊丽莎白女王那让世人信以为真的父亲”，而伊丽莎白女王则是“近亲相奸生下的杂种，生来就招致灾祸，是无耻的妓女”。这样的诽谤中伤，让伊丽莎白女王感到气愤又难过，因此她指示戴尔大使，以女王之名向帕尔玛公爵郑重提出抗议。但帕尔玛公爵却表示，自己还未看过亚伦发行的手册，对于教皇的新诏令也一无所知。对于主公与伊丽莎白女王间交恶，他甚感遗憾，但身为军人，他必须听从命令。一直到七月八日，伊丽莎白女王仍不断写信给帕尔玛公爵，询问“有没有迈向和平更合理的方法”，若有，她会毫不犹豫地接受。

“以我对耶稣基督的爱为誓，女王陛下，”海军大臣信中写道，“请您清醒，看看身旁那些可憎的阴谋，这都是为了对付女王陛下与陛下的王国，请您如其他威严的君主般，集合兵力捍卫自己。若女王陛下愿意照做，就不需恐惧。若您不愿听信，大难就在眼前。”

七月十七日，伊丽莎白女王正式结束和谈。

* * *

西班牙舰队的进程受到暴风雨的破坏，但到了七月十九日，西班牙人口中“所向披靡”的无敌舰队，出现在利札德海岸，这是英国人第一次亲眼所见。传言中，德瑞克爵士当时正在普利茅斯玩英式橄榄球，但他坚持在前往御敌之前，还有时间打完这场比赛。

当英国境内的烽火台燃起烽烟时，伊丽莎白女王于七月二十二日晚间，在里奇蒙德宫接获消息。接下来几天，英国枢密院则必须在紧急时期召开每日会议。罗伯特·塞西尔对于女王沉着冷静的反应，感到相当讶异：“看到女王陛下不愠不怒，展现出宽容的情操，许多人大感安慰。”她以相当激励人心的话，向“矢言绝不轻饶这些他国入侵者，以慰英国民众”的莱斯特伯爵做出保证。伊丽莎白女王冷静的反应，主要是因为非常清楚她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让英国有充分的实力击退外侮，而英国皇家海军拥有较小、较轻、较快的船只，“在海面行进时吃水少又平稳”，引用霍华德勋爵查尔斯的说法，就是“所有基督教国家君主麾下最强盛的一支海军”。

由女王亲自执笔的代祷词，在各教堂中大声宣读。宫廷中反而出现前所未有的平静，因为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命令下，各派系之间的口角与仇恨都暂时抛在一边。英国各地的子民们，带着期待与忧虑的心情静静等待着。

沿着英国南岸前进，威严的无敌舰队正朝向荷兰前进，准备护送帕尔玛公爵的军队前往英国。英国海军则在普利茅斯严阵以待，多达一百五十艘战舰，桅杆上皆飘扬着都铎王朝白绿相间的旗帜。霍华德勋爵查尔斯中将担任指挥并由海战经验十足的弗朗西斯·德瑞克爵士辅佐；查尔斯中将知道自己能成为军事首领，是因为自己的地位，而非海战成就，于是勇敢地宣布，自己将“让贤给更有经验的人”。因此德瑞克爵士对霍华德勋爵展现出“忠诚又宽厚”的态度，于是“消除了对这个不确定的合作关系的疑虑”。

查尔斯中将的主舰是过去被称为莱礼方舟的皇家方舟，前一年才由莱礼家族出售给女王。霍华德勋爵得到女王的授权，得以全权依照他的判断与敌方交战。但相反，菲利普国王却写下了相当琐碎的——有些甚至是不合理的——指示，要麦地那·西都尼亚公爵参照。

七月十九日的夜里，霍华德勋爵正式展开追击无敌舰队的任务。七月二十一日星期日，在普利茅斯附近的埃迪斯通，两军短兵相接，却没有任何决定性，两天后又在多塞特郡外围的波特兰发生了更严重的一次冲突，这次造成多艘西班牙大型帆船严重受损，另外还有两艘沉船，七月二十五日在威特岛搁浅。英国皇家舰队在无敌舰队往东迈进的路上，屡次对其迎头痛击，恰好避免皇家海军在远离英国领海后，无敌舰队船只可能准备进行的突袭。

同时英国中部诸郡仍持续征兵，而莱斯特伯爵则被钦点成为皇家军团连队总司令与海军中尉，开始着手在泰晤士河口的蒂尔伯里堡组织四千员精兵，镇守在伦敦东方以对抗帕尔玛公爵的进逼。他已经在河面上部署，阻挡船只长驱直入。

伊丽莎白女王大胆地提出要求，表示自己想要到英国南部主掌征兵事宜，并在帕尔玛公爵踏上英国领土的那一刻与他对决，女王这样的突发奇想，吓坏了参事们。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七月二十七日，莱斯特伯爵邀请她参观蒂尔伯里堡，对皇室军队“喊话”，并强调“亲爱女王，你与所有基督教国家君主相同，拥有如此良好、忠诚、精良的手下”；他认为女王的安危就是神的恩赐，“女王就是这世界上，我们最高尚神圣的拥有，想起了女王，任何人都会感动不已”。

同一天，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距离敦刻尔克不远的加莱港下锚，此时帕尔玛公爵正带领一万六千名精兵，等着跨越英吉利海峡。在附近的海域上，荷兰舰队不停巡防以抵抗西班牙无敌舰队。

英国皇家舰队跟着无敌舰队的脚步来到了加莱港，在七月二十八日的夜间，下令由五艘“地狱火焰”，也就是载满了木头与沥青的火烧船，直接冲撞巡防中的无敌舰队帆船。结果西班牙海军仿佛陷入地狱，强风助长火势，导致恐慌与混乱，打散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破解了他们的新月阵队形，且使他们在强风的阻挡下四处溃散。这样也代表体积较小的英国舰队，在冲突中有更公平较量的立基。这次奇袭的结果，西班牙方面的士气大受打击。

七月二十九日，在法国格拉夫林，麦地那·西都尼亚公爵英勇地重组了他的船队，这个方法并不算失败，接着两军就要进行最后的攻防。但英国皇家舰队仗着数量较大，取得相当的优势，大获全胜。西班牙失去了十一艘船与两千名士兵，英国却只有五十五人阵亡。两军战到弹尽粮绝后才结束了这场战役。

女王还不知道英国皇家舰队占了上风，七月三十日还前往圣詹姆士宫，在那里会比里奇蒙德宫还要安全，而女王在伦敦时，则由亨斯顿勋爵负责她的安全，他随即派遣两千多名武装卫士，在圣詹姆士宫外围拉起封锁线。尽管面对如此大的危险，伊丽莎白女王依然“忧喜不形于色”。

此时风向变了，导致无敌舰队往北推移，让剩下的帆船全部四散。“世界上没什么比看到敌人被南风吹得往北偏移还要更令我开心的事情了。”德瑞克爵士兴奋地写道。霍华德勋爵下令要德瑞克爵士驾船追逐敌船，但也难以造成更多伤害，因为他们的弹药也全数用罄。事实上有了这道风——后来人们将它称为“新教风”，将它视为神恩——他们也不需再多做些什么，接着又来一场强烈风暴，对西班牙无敌舰队造成了更多伤害，远远超越英国皇家舰队原本的预期。

到了八月二日，霍华德勋爵追逐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残余，一直到福斯湾才放弃，掉头往南边航行，留下四处逃窜、残破不堪的西班牙

船舰，独自面对险恶的苏格兰、爱尔兰与康瓦尔海岸。“其中大多数的人，此生可能都无缘再回西班牙了。”一名英国海军士兵记录下这一切。

错误的胜利报道，让西班牙一度提早出现欢乐的气氛，但到了八月三日，当麦地那·西都尼亚公爵下令剩余的船只返航时，西班牙海军此次惨败，成为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兵力（许多士兵都因为在偏远地区的海滩受伤或生病而痛苦致死，也有些人在爱尔兰遭到爱尔兰王的无情屠杀），以及四十四艘船还有更多的船舰被破坏得再也没有航海的价值。另一侧，英国只有一百位士兵阵亡，船舰则是一艘也没少，但伊丽莎白女王仍不敢松懈。在这个“专横暴虐、孤高自傲又疯癫的企图后”，伊丽莎白女王在一封给詹姆士六世的信件中说道：“（菲利普）国王的政权就算还未崩毁，效应也已经开始”。

* * *

英国击退了西班牙战舰，但最大的考验其实来自帕尔玛公爵与他的军队，此时他们就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端，只待海风转向。

伊丽莎白女王认为领土随时有可能遭到“男性力量”的侵略，于是接受莱斯特伯爵的邀约，前往蒂尔伯里堡去振奋军中士气。为了前往蒂尔伯里堡，八月八日女王从圣詹姆士宫搭上她的驳船。枢密院参事们都不断请求她不要前往，害怕她因此更靠近侵略者，并以各种理由阻止她的行动，但女王对他们的意见不理不睬。当伊丽莎白女王回信给莱斯特伯爵，表示自己决定走访蒂尔伯里堡时，莱斯特伯爵回信写道：“我的好女王，若神赐予您健康的身体，就不要改变您的想法。臣在蒂尔伯里堡为您准备了合适、舒服又干净的房间，让您住下，就在军营的一英里外，绝对与圣詹姆士宫的环境一样舒适。”

在莱斯特伯爵徒手握着女王的马勒并小心翼翼地护送下，女王骑着一匹“白得像天使般”的阉马，伪装成“亚马逊族女战士头目”，穿着一袭白色天鹅绒服装，系着银色闪亮的马甲，出现在皇家军队的眼前，身边还有一位年轻的侍从，手执白色软垫，上面放着她那银色头盔，再由奥蒙德伯爵手持女王御剑。莱斯特伯爵将女王此行安排得相当有戏剧效果，加入许多壮观的场面。帐篷上的旗帜与三角旗在微风中挥舞，鼓声与风笛声昂扬，伊丽莎白女王眼眶含着泪，巡视了完美的步兵连队，在装饰完美的战马与装甲部队中，由小艾赛克斯伯爵出任指挥官，他大声吼出：“愿神祝福你们！”而士兵们则单膝下跪，大声回应：“愿主佑女王！”在女王经过身边时，士兵便弯下长矛与军旗，向女王致敬。在激动人心的代祷仪式过后，伊丽莎白女王前往番红花花园附近爱德华里奇的庄园，当晚就住在那里。

八月九日早晨，伊丽莎白女王再度返回军营，空气中瞬间爆出热烈的掌声——“欢声雷动”——伊丽莎白女王表示，自己仿佛“身在一场热血沸腾的战役中”。喧闹声暂歇后，士兵们进行战争演练，然后在女王面前进行阅兵。接着“英勇的女王骑着最庄严的一匹马”，穿得就像“全副武装的希腊智神”，她穿着银色护胸甲，手拿金银相间的小型令牌，伊丽莎白女王再度以她任内最激昂、最著名的演说，来振奋士兵的心。

“我亲爱的子民。”她大声地说。

许多人建议我们，面对武装群众时，一定要留心我们的行为，因为担心他们背叛；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从不曾不信任忠诚又亲爱的子民。

就让专制君主去忧虑吧！我总是行为节制，以神之名，我将最主要的力量与捍卫的信念，托付给臣民忠诚的心与善意，因此我来到这里，在你们面前，在这个时候，不为了我的消遣娱乐，而是在一场白热化的战役中，为了解决生死攸关的问题，放下一切，只为了我的神与王国，为了我的人民、我的荣耀与我的血脉。

我知道自己拥有女人羸弱无力的身体，但我却有着王者的心胸，是英格兰君王的气魄，无论是帕尔玛公爵与西班牙的国王，或欧洲的任何君主，都不准侵略我们王国的边界；我不会回以不名誉的手段，我愿执起武器，愿成为你们的领袖、军师，回报你们的美德。

因此，由（莱斯特）中将代替我，在任何君主手下，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高贵、更有价值的臣子，不需怀疑，只要服从中将的命令，维持军营中的和谐与战场上的勇气，英国很快就能击退神的敌人、我的王国的敌人、我的人民的敌人，胜利威名远播。

在这“最成功的演说”结束时，军营中集合的士兵“皆在激动中大叫大哭”。女王的一位教堂牧师里欧内尔·夏普（Dr. Lionel Sharp），受莱斯特伯爵所托，记录下女王演说的一字一句，隔天女王离开后再度大声宣读给那些当天未能听清楚的人听。女王演说讲稿的复制品四处流传，三十年后，夏普将当日的记录交给白金汉公爵，他的儿子在一六五四年正式将它发行。莱斯特伯爵认为，女王的演说“让良好的臣民受到极大鼓舞，就连最懦弱的一群，面对胆敢踏入英国国境的西班牙，都有能力与他们决战”。

中午时，伊丽莎白女王与莱斯特伯爵在他的帐篷中用餐，她接获消息，指帕尔玛公爵准备渡海。莱斯特伯爵与他的手下们，催促女王为了安全，尽快动身返回伦敦，但她表示不容许自己这么做，并表示要与子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许多人为她的勇气感动不已，但“夜色悄悄地袭上”，消息传来危险将过，因为没有西班牙海军的支持，帕尔玛公爵并不愿自己的士兵冒险，而菲利普国王，虽然心情沉重，也能理解他的看法。

这次的战败，自然让菲利普国王感到挫折不已，于是他退回到马德里附近埃斯科里亚的皇宫中，盼能在祷告之中获得慰藉与理解。

“尽管有这一切不利的迹象，国王陛下依然决心持续兴战。”威尼斯大使的报告中如此显示。菲利普国王向告解的神父表示决心奋战到

底，并希望有神迹相助，就算没有神迹降临，“也希望死后能到他的身边”。西班牙的子民们此时则穿上丧服，在街上行走时显得垂头丧气。

八月十日，德瑞克爵士从格拉夫林捎来的信中提及“帕尔玛公爵丧气得就像失去了幼子的熊”。伊丽莎白女王以凯旋胜利之姿返回伦敦，因为确定无敌舰队不会再来而感到安心，她的首要考虑是撤回舰队、解散部队，让士兵们回家参与农忙收割。在这些事情完成后，伊丽莎白女王才开始庆祝英国的大胜利与她个人的功绩。

她一刻也未“失去镇定的态度”，威尼斯驻巴黎大使表示，“也从未忽略任何必要的细节。她解决问题的敏锐、执行的勇气，在在显示她相当重视荣耀，也决心要拯救国家与自己。”

根据康登的记录，伊丽莎白女王非常感激莱斯特伯爵，她甚至着手起草诏书，准备指派他为英格兰暨爱尔兰副总督，这个职务能带给他的权力，将比英国有史以来的其他臣子都要更高。但伯利男爵、沃尔辛厄姆爵士与海登爵士担心，这么做会让向来得宠的莱斯特伯爵真的成了总督，因此说服女王改变心意，后来的证据显示，莱斯特伯爵一直都不知道女王原本想要给他多大的奖赏。

这一切都要感谢英国政府缜密的准备、严密的训练与军队和资源上的调配，英国军队领袖们的技巧，当然还有那一阵“新教风”，才能征服强大的无敌舰队，也让英国得到史无前例的大胜利。

* * *

八月十七日，蒂尔伯里堡军营正式解散，莱斯特伯爵“在许多士绅的陪伴下，仿佛国王般”凯旋伦敦，并接受人群的欢呼。到了二十

日，伦敦市长与市政参事们，前往圣保罗大教堂参加一个宗教仪式的活动，深深感谢军事上的胜利。

到了九月初，英国海军遣散了大部分的人员；英国国库吃紧，因为这些人员的关系，伊丽莎白女王甚至差点付不出剩下的薪水。在这场战役中，并没有太多人死亡，但船上粮食供应不足与发酸的啤酒，让数千名海军士兵全都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城市中，罹患了伤寒、坏血病或食物中毒，甚至因而死亡。在了解到英国财政部不会再提供更多的金钱后，霍华德勋爵、德瑞克爵士与约翰·霍金斯爵士，便自掏腰包提供酒与竹芋给士兵们。当女王听说部分船长将原本要给船员们的薪水拿来挥霍时勃然大怒，从此之后便以相当鄙视的眼光看待船长们，但事实上，海军士兵们悲惨的处境的一切都要怪她。

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英国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国家庆典。八月二十六日，小艾赛克斯伯爵在怀特霍尔宫指挥了胜利军演的演出，年纪轻轻的小艾赛克斯伯爵在马上长枪比武中对上卡门伯兰伯爵（Earl of Cumberland）。门多萨大使的一位探子，则指莱斯特伯爵夜夜与伊丽莎白女王共享晚餐，夺回了他昔日的权力与声望。但此时的他也病重了，过去几周来的庞大压力让他喘不过气，在军演过后随即奔赴巴克斯顿，盼望当地有疗愈功效的泉水能恢复他的健康。

途中，他通常会在诺利斯勋爵与夫人所居住的牛津郡的莱科特做客停留，八月二十九日，他便在这里写信给伊丽莎白女王：

我深切地恳求女王陛下，容忍一位老臣的大胆，擅自来信一探女主人公是否安好，若有什么能解除她痛苦的良药，便是我在这世上最大的祈求，盼她能健康快乐、长命百岁。至于我这垂垂老矣的身体，陛下依然是我的最佳良药，比我用过的任何特效药都来得有用。但我希望矿泉治疗能一劳永逸解决我的疾患，我只能一如往常地继续为女王陛下的快乐安康祈祷，我恭顺地行吻足礼。

女王陛下最忠诚顺服的仆人R. 莱斯特，在陛下于莱科特的小屋中，
写于周四清晨。

附笔 尽管絮絮叨叨写不尽，仍能感受女王陛下的垂怜。

他的原定计划是要慢慢地前往凯尼尔沃思城堡，但在路上却“不幸得了疟疾”，转而变成“持续不断的高烧”，最后不得不暂时住进伍德斯托克附近查尔伯里公园的狩猎小屋中。就在这里，他于九月四日的清晨四点走完了一生，“身边只有寥寥数人为他阖上双眼”。现代医药历史学家则认为他的死因应为胃癌。他身后被埋葬在华威圣母玛丽亚教堂伯琼礼拜堂中他的小儿子身边，此处的一幅肖像画描绘出带着贵族冠冕、全副武装的莱斯特伯爵，随后被置于他的墓前。

“他贵为成就非凡的宫臣，灵活狡诈，懂得随波逐流，非常懂得自身优势，”康登如此形容莱斯特伯爵，“但他对于权力与威望的追求大过美德，那些贬损他的人群起效尤，总是说一些贬损他的话，就算在他权力最盛的时期，这些人也不忘可耻地以各种诽谤的言语破坏他的名誉，但有些人当然也所言不虚。许多宫廷人士总是公开称颂他，更多的时候，却是私下诽谤他。”

就连他死后，这些造谣中伤都未能稍歇。尽管验尸结果没有任何非自然死亡的现象，但心怀恶意的本·琼森却在毫无根据的情形下，谎称莱蒂丝为了嫁给爱人而毒杀了丈夫，毕竟鲜有人为他的离世感到悲伤，因此许多人都相信这个说法，就连曾为他的门徒的诗人埃德蒙·斯宾塞也一样，他不屑一顾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现在他走了，荣华富贵也已逝去。

再大的功绩也如云烟。

名气随之腐败，

生前许多诗人赞扬着他，

但死后却没有任何诗人盼他重生。

“胆敢表达出意见的人，对莱斯特伯爵之死，几乎都表现出不亚于英国战胜西班牙时的雀跃。”历史学家约翰·斯托写道。

面对失去莱斯特伯爵的惨痛，伊丽莎白女王显然大受打击，毕竟过去三十年来，这个男人比任何人还要更亲近她，她以“兄弟及好友”与他相称。在这最荣耀的时刻，她却陷入了个人的伤痛中。沃尔辛厄姆爵士记录下的一切，显示伊丽莎白女王几乎无心政事，“她的理由是不想让任何人靠近她的身边，只因她为一位男仆之死感到忧伤”。门多萨大使的探子回报，表示在九月十七日时，“女王为莱斯特伯爵之死感到太过遗憾，无视于国内的其他人。她非常感伤，多日来都将自己独自锁在房里，拒绝说话，直到英国财政大臣与其他枢密院参事破门而入，才见到女王的面”。在那之后，根据康登的记载，伊丽莎白女王“总是耐着性子忍住，或努力地掩饰”她的悲伤。

当士鲁斯柏立侯爵来信恭喜伊丽莎白女王打了一场胜仗，并为她失去的挚爱哀悼时，伊丽莎白女王向这个“非常好的人”透露：“汝献上周到心意与善意，我等自当受之并表谢意，然我等只得强忍种种记忆，于此我等别无慰藉，此外我等只得接受神无可避免的旨意，尽管他仁慈地赐予一切荣华，仍收回如此亲爱的人，独留我等于世上。”

伊丽莎白女王哀伤地重读了一次莱斯特伯爵从莱科特的来信，接着在上面题字“他的最后一封信”，接着小心翼翼地将信件收入床边的一个小金库中。伊丽莎白女王死后，有人在小金库中找到这封信，现则收藏于邱园的公共记录办公室。

莱斯特伯爵于遗嘱中留给“我最亲爱、仁慈的女王陛下，是我眼中神最高贵的创造”一个钻石、一个绿宝石链坠与一条有六百多颗珍

珠的美丽项链，但他生前过于挥霍，死时几乎濒临破产，留下了五万英镑的债务给他的遗孀。其中有一半的债主都是女王，而女王为了报复莱蒂丝，于是规定她必须悉数偿还：十月份，伊丽莎白女王下令清查已故的莱斯特伯爵的财务状况，收回了凯尼尔沃思城堡及莱斯特伯爵于华威郡的所有封地，并下令要莱蒂丝拍卖莱斯特伯爵仅存的三个主要住所——凯尼尔沃思宅邸、温斯特宅邸与莱斯特宅邸。对于同样痛失挚爱的莱斯特伯爵遗孀，伊丽莎白女王丝毫不表同情，甚至继续表现出莱蒂丝并不存在的模样。尽管两人的婚姻看来美满——在莱斯特伯爵的遗嘱中，称呼莱蒂丝为“忠贞、深情、非常服顺又贴心的妻子”——但伯爵遗孀莱蒂丝可能是为了确保经济不致匮乏，便于一年内再婚了：她的第三任丈夫是克里斯多福·布朗特爵士（Sir Christopher Blount），她儿子小艾赛克斯伯爵的好友。

莱斯特伯爵剩下的财产，都留给了他的私生子小罗伯特·达德利爵士，对于这个孩子，许多人早已默认他身份的合法性。只是小罗伯特·达德利爵士一直无法证明这一点，因此莱斯特伯爵的身份便传给了他姐姐的儿子罗伯·西得尼爵士。斯庄特的莱斯特宅邸则落入继子的手中，最后继子将它更名为艾赛克斯宅邸。

* * *

在全国上下正为打败无敌舰队而兴高采烈之时，莱斯特伯爵之死几乎遭到世人的忽视，也无人为他哀悼。伊丽莎白女王得伪装出坚强的笑容，带领全国人民一起庆祝，但这一年的秋天，许多人都注意到，伊丽莎白女王“变得更加苍老衰弱，也显得非常空虚忧郁”。当她坐在王位上让乔治·高尔描绘著名的无敌战舰肖像画时，她与之后的许多画像一样，在身上戴着莱斯特伯爵遗留给她的珠链。

莱斯特伯爵逝世后，举办战胜庆祝会的工作，就落在海登爵士、小艾赛克斯伯爵与亨利·李爵士的肩上。他们制作了一枚奖章，上面

记载着许多这场战役的传奇：“上帝召来一阵神风，吹得敌人仓皇四散。”结果奖章大受好评，托马斯·赫内基爵士则指派尼可拉斯·希利亚德制作无敌舰队纪念珠宝，再致赠给女王，但女王后来又还给了赫内基爵士。从此不需再担忧天主教国家因玛丽·斯图亚特之死而报复，伊丽莎白女王大赦威廉·戴维森，让他脱离伦敦塔，来年又免除了他的罚金，到了一五九四年，甚至赏赐他许多封地。伊丽莎白女王从此并未再雇用他，但伊丽莎白女王却每月支付他等同于书记的薪资，一直到女王身故为止。

十一月十二日，伊丽莎白女王领着宫廷人士前往索美塞得宅邸。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七日，伊丽莎白女王登基纪念日，英国上下显得特别欢欣鼓舞，到了十九日也就是圣伊丽莎白日，政府宣布全国放假一天，以纪念军事大胜，于是这一年的这一天，特别举办了感恩仪式、祈祷、盛宴、比武大会、斗鸡与营火晚会。

后于英王詹姆士一世时担任格洛斯特主教的葛菲古曼（Godfrey Goodman），当时只是个五岁的孩子，与家人一起住在斯庄特，他曾忆起这一段故事，这一年的十一月，忽然之间……

夜里大约五点时，外头一片漆黑，突然有人来报，女王要前往市政厅，想看女王动作就要快。大家都起身快跑。当市政厅打开了大门时，看见的是神采奕奕的女王陛下。所有的人都忘情大喊：“天佑女王陛下！”女王告诉我们：“未来你们可能会有个更伟大的君主，但绝不会有比我更仁慈的君王。”语毕，女王便离开了。此事在斯庄特的人们心中，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从未看过更精彩的戏剧或表演，回家的一整段路上，我们都不断讨论女王多么令人钦佩，为了女王，我们又该如何抛头颅洒热血。

庆祝气氛的最高点，就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伊丽莎白女王穿过挂着蓝色布条的栏杆，后面则是喧闹鼓噪的人民，她就坐在一辆精美的有顶双轮马车上，由两匹白马拉着前往圣保罗大教堂，感谢神让英国打赢自阿金库尔战役以来最大的一场胜仗，承认自己亏欠上帝

与神。皇室游行的大阵仗是继伊丽莎白女王登基以来，从未见过的盛大场面，加上女王经过伦敦市区时的庆典游行、歌曲唱诵与民谣。

到了圣保罗大教堂西侧门前，伊丽莎白女王走下双轮马车，在大批民众面前直接跪下，“以最虔敬的态度向神祈祷”。接着才走入挂着醒目旗帜的教堂。随后在布道会结束以后，伊丽莎白女王大声宣读自己所写的祈祷词，并以“最基督徒的方式”向会众发表了演说，她极佳的表达能力，让所有人听得如痴如醉并且大声呼喊祝福女王一生长寿快乐、御敌无数来回应她。

女王接着走到附近主教的宫殿中，与伦敦主教共进餐点，才在“火把的照耀之下”返回下榻的索美塞得宅邸。

* * *

此时伊丽莎白女王的声势达到顶点，让她成为基督教国家中最受人崇敬的君主。就连敌人都相当敬畏她，教皇席克斯塔斯五世便曾表示：

伊丽莎白女王绝对是伟大的女王，若她是个天主教徒，定是天父最钟爱的女儿。看看她伟大的执政能力！她只是个女人，只掌管了半个岛屿，然而西班牙怕她，法国怕她，神圣罗马帝国怕她，全都怕她！

教皇甚至开玩笑，希望自己非神职人员，这样就能娶她：“她会是多么好的妻子哪！我们又能生下多么美好的后代！他们一定能统治全世界。”他也大加赞扬德瑞克爵士的勇气——“多么伟大的船长！”

那是英国声势的顶峰。在法国、意大利，甚至是罗马，就连天主教徒都大加赞扬伊丽莎白女王。法王亨利三世盛赞她的勇气、精神与深谋远虑，断言她的胜利“与历史上最杰出的所有男性最伟大的功绩

可拟”。就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都大赞她，并为了她与波兰和谈。

一五八八年后，童贞女王声名远播，至于在英国境内，子民享受着荣耀的光辉，女王的传奇持续滋长，衍生出一个新的偶像崇拜对象，“胜利女神伊莉莎”。从此她更加确信，神选择了她来统治英国，英国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就是神圣寓意的表现形式，一直到任期告终为止，许多作家与艺术家都不断展现她的权力。她麾下的天主教臣民也展现出忠诚，任何叛乱的威胁已然平息，开辟了一条未来容忍宗教异议人士的康庄大道。多数派的新教徒则深信上帝与神在英国需要帮助的时刻伸出援手，让英国新教圣公会更为稳健。最重要的是，英国人民对国家的信心大增，让文学与艺术灿烂绽放，形成了所谓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

一位西敏寺的学童约翰·史莱（John Sly），透过文字表达了英国民众的孺慕之情，在一篇有关恺撒大帝的文章中（现在收藏在牛津学院中），他不断地以女王的名字书写，甚至创作出这个押韵对句：

红是玫瑰，绿是叶，

愿神拯救伊丽莎白，我们高贵的女王！^[1]

^[1] 原文对句如下：The rose is red, the leaves are green, God save Elizabeth, our noble Queen! ——编者注

23 大英王国的荣光

莱斯特伯爵死后，伊丽莎白女王转而将感情寄托在小艾赛克斯伯爵身上，他很快地便晋身为女王身边的大红人，搬进了继父过去在宫廷中居住的房间，无时无刻不陪伴在女王身旁。想要得到恩宠的宫廷人士，听闻他“善待友人”的名声后都蜂拥而至，他经常替这些友人运用他在女王面前的影响力。但女王常常拒绝他的要求，让他因此气愤不已，“变成一个就连稍微丢脸都感到愤世嫉俗又懦弱的伪君子”。他时常考验伊丽莎白女王的耐心，但女王希望他能安于自己的幸运，然而他从未因此满意，他知道女王非常需要他的陪伴，因而屡次语出威胁要离宫，回到乡间居住，透过这样的手段逼得女王不得不就范。

“她并非信心满满地否定，”他总是说，“只要懂女人心的人都知道，这就是女人柔顺的象征。”他自以为能控制女王，但事实上是小看了女王杰出的智慧与意志力。不过，正因为女王对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情感极深，因此总是能原谅他的小过错：也因为这样，又再度地让他自以为能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小艾赛克斯伯爵与莱斯特伯爵不同的是，他极度受到人们的欢迎，因为他总是以“和蔼可亲与开放的态度，敞开他的公务桌与房间，接待要求见的人”。伊丽莎白女王很快便起了嫉妒心，她希望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成功，只能仰赖她的给予；她不希望有人跟她竞争他人的感情。

小艾赛克斯伯爵过去的监护人伯利男爵，试图想要将这个年轻人召入门下，但小艾赛克斯伯爵对于“人生与追求庞大财富之路，必须一步一步慢慢来，相当缺乏耐心”，同时他也讨厌伯利男爵那逐渐成气候的儿子罗伯特·塞西尔。他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令人望之生畏的权势顶峰。

时年五十五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健康情形非常好。她腿部溃疡的情形已经痊愈，她也一如往常地活力充沛，有时早晨仍会舞上几支双人舞，也定期散步、骑马与打猎。年龄渐长加上政治上的成功，让她更加威严，更有风采，当人民看见她坐着金色马车而过时，她看起来“就像个女神”。小艾赛克斯伯爵相当聪明地在某种程度上对女王言听计从，并在公开场合中以当时最爱使用的隐喻符码向女王表露他的爱与忠诚。“我必须承认，身为男人，比起身为臣子对君主风采的崇拜，陛下那天生的美丽更让我着迷。”他曾这样告诉女王。他天真地以为自己的影响力，永远无人能及。

但很快，他就从这样的幻想中觉醒过来，因为一五八八年十一月时，伊丽莎白女王的眼光转向蒙袭依勋爵之子查尔斯·布朗特（Sir Charles Blount）。他是学者派的年轻人，有着“栗色头发、俊俏的脸蛋，个性冷静沉着，身材修长”，他在马上长枪比武大赛上的精湛技巧，让他备受瞩目。女王在惊羡之下，“从她专属的纯金西洋棋子中，挑选出了女王棋送给他”，他便以深红色的缎带，将这个女王棋系在手臂上。见此状而嫉妒不已的小艾赛克斯伯爵嘲讽地说：“看来所有的蠢人都会受到宠信。”被惹得怒不可遏的布朗特，表示要与他在梅利本公园中单挑，随后在决斗中，他一剑划伤了小艾赛克斯伯爵的大腿，并让他的剑离手。

台面上，伊丽莎白女王强烈反对单挑决斗，但她对于小艾赛克斯伯爵的霸道十分反感，当她听见决斗结果时，勃然大怒地说：“老天

在上，若来个人挫挫他的锐气，教导他正确的态度，也是刚好而已，否则他简直没有王法了。”但伊丽莎白女王坚持，若两人不握手言和就不准回宫，于是两人言听计从，后来尽管布朗特较受女王宠爱，两人竟能成为至交好友。

布朗特曾打过荷兰战争，也对抗过无敌舰队，最大的野心就是要再到各国闯闯，寻求军事冒险的刺激，但伊丽莎白女王总不予理会，只是告诉他：“除非有神迹，否则你不准离开，别像不顾他人眼光的西得尼一样。只有我点头，你才能走。现在你只能待在宫中，好好看书，谈谈战争。”一五八九年，伊丽莎白女王钦点他成为四十卫士一员。

到了十二月，小艾赛克斯伯爵与莱礼爵士发生严重争吵，再度扬言要决斗，但此事挑动了枢密院的敏感神经，于是严格禁止。尽管两人严守秘密，但消息依然传进伊丽莎白女王的耳中，两人因此“麻烦大了”，但小艾赛克斯伯爵却毫不在乎。“她非常喜欢干涉臣子们的不和”，尤其是她的几位爱将，他向法国大使这样表示。

一五八九年春天，小艾赛克斯伯爵寅吃卯粮的习性，让他背负了超过两万三千英镑的巨额债务。当伊丽莎白女王下令，要他随即清偿某一笔借款时，他却提醒女王“爱与仁慈”的重要性，远超过金钱。女王的态度和缓下来，并同意让他抵押一处庄园，得到未来十年所有英国进口甜酒的关税收入，如此一来等于是让他公器私用、中饱私囊。

* * *

这一年的春天，决心打压西班牙的海军实力到底，确保菲利普国王再也无法派遣无敌舰队来威胁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决定派出德瑞克爵士、约翰·诺利斯爵士与莱礼爵士，带着一百五十艘船与两万名士

兵，前往葡萄牙摧毁敌军残余的势力，同时英方忧心葡萄牙爱国分子可能会群起反抗，因此准备由非法觊觎葡萄牙王位的唐·安东尼奥登基。

小艾赛克斯伯爵盼能从中获利清偿债务，积极想要争取出征的机会，但四月初，女王有感他的轻率鲁莽，因而禁止他前往，小艾赛克斯伯爵公然抗命，在女王未允诺的状况下擅自离宫，不顾一切地奔赴法尔茅斯，在四十八小时内奔驰了二百二十英里。当伊丽莎白女王得知他抗命的消息时，小艾赛克斯伯爵已经成功说服罗杰·威廉斯爵士（Sir Roger Williams）让他加入，并出航到海上了。伊丽莎白女王非常生气，派遣弗朗西斯·诺利斯爵士与亨斯顿勋爵搭上轻艇，在英吉利海峡逡巡缉拿小艾赛克斯伯爵，当此举毫无所获，女王便在给德瑞克爵士的一封信中，大大地谴责威廉斯爵士的行径：

他的罪过如此沉重，甚至得宣判死刑。我只要你们不择手段将他押回，严密地看守他，直到我给予新的命令，若你们不从，将可能招致灾祸，因为国家有尊严，希望你们遵从。我要直截了当地命令你们，立即以安全的方式遣送（小艾赛克斯伯爵）。若你们不从，就该接受应得的痛苦，这绝不是儿戏。

女王也写信给小艾赛克斯伯爵，抱怨他“突兀又毫无责任感地离开宫廷、擅离职守；此举对我们的冒犯，理应不难想象。我给予你太多的善意与恩惠，信任你不会擅离职守，却反而使你忽略、遗忘了自己的责任”。

女王的信件花了两个月才送达，当船舰抵达里斯本时，小艾赛克斯伯爵依然在船上，德瑞克爵士发动了一场突袭，但因为葡萄牙方面无法如实起义对抗，因而失败。接着，他们无视于伊丽莎白女王的命令，推进亚速尔群岛，盼能拦截西班牙宝物舰，却在六月底时遭遇海上强风，因而被迫退回英国。历史上有各种不同推测，显示有四千到

一万一千人因而死于疾患，伊丽莎白女王也大大损失了四万九千英镑：这次的出航完全是场灾难。

伊丽莎白女王将怒气发泄在德瑞克爵士身上，她有好一段时间，不愿再让他主掌规模如此大的探险任务，当然还有诺利斯爵士，而小艾赛克斯伯爵反而成了返国英雄，但伊丽莎白女王注意到莱礼爵士出色的表现，于是赐予他一枚奖章。她甚至原谅了小艾赛克斯伯爵与威廉斯爵士的抗命，无视小艾赛克斯伯爵刚愎自用的行为，指其为“年轻人的冲动”，因此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宫廷大开宴席、打猎与马上长枪比武，而小艾赛克斯伯爵“则在女王陛下的好评之中，日复一日地壮大声势”。

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对他的好意，只是更加深了他的不满，让他开始秘密与詹姆士六世通信。而他的姐姐潘妮洛普·瑞奇（Penelope Rich）则向苏格兰王表示，小艾赛克斯伯爵“感到非常厌烦，认为自己仿佛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希望能看见王权轮替，但詹姆士六世却不为所动。

七月份时传来消息，为了报复他杀了吉斯公爵，一位疯狂的修士暗杀了法王亨利三世。因为亨利三世膝下无子，又是瓦洛王朝的最后一个传人，因此便由他那信仰新教的妹夫纳瓦拉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继位，成了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也开启了波旁王朝的历史。

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马上巧立一位天主教的继位者，企图夺取法国王位，但伊丽莎白女王嗅到此举背后的危机，坚决支持新王亨利四世。她于十月份派遣一支由魏勒比勋爵（Lord Willoughby）带领的精兵前往诺曼底，并连续五年金援这支部队，破坏西班牙的反对力量，并协助亨利四世稳坐王位。

* * *

在不堪长期过劳之下，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于一五九零年四月六日逝世，死时为了服侍女王几乎濒临破产，只得瞒过债主在一个夜里下葬，以免他们扣押他的棺材。他对伊丽莎白女王一向忠心，传闻中，他在欧洲各地部署了五十五位探子，保护女王不受天主教敌人恶意侵犯。英国多数人对他的离去感到相当哀伤，但“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西班牙菲利普国王曾这么说。

伊丽莎白女王并未指定任何人与沃尔辛厄姆爵士共同管理英国情报网，也没有马上找人替代他。接下来六年的时间，国务大臣一职就由罗伯特·塞西尔一肩挑起，而女王也相当信任他的能力。伯利男爵培养他的儿子做接班人，对于儿子进步快速也感到相当满意。

出生于一五六三年的罗伯特·塞西尔，据传在婴儿时期被一位粗心的保姆摔到地上，因此让背部畸形、身材矮小、发育不良。罗柏·依顿就形容：“针对他个人的部分，老天爷待他相当苛刻，但若要说脸庞，那可是他最值得骄傲的部分。”伊丽莎白女王昵称他为她的“小矮人”或她的“小精灵”。“因为是女王起的小名，因此我并不讨厌。”罗伯特·塞西尔表示，事实上他对于自己身体的残缺非常敏感，因此痛恨这个名字，但他的对手常残酷地以此来开玩笑。

因为学习力敏锐，他在前往剑桥就学前便已接受导师的调教，之后更前往法国与尼德兰进行外交任务，一五八四年被选为英国国会议员。他反应很快，也有极佳的专注力。他除了是一个十分机灵的政治人物外，也拥有相当的行政才能，且面对吃重的工作也有无限的能力，许多人总是说常常看见他“满手拿着文件，满脑想着事情”。

“打从娘胎就是个宫廷奇才”，他拥有绝佳的演说才能、讨人喜欢的举止与诙谐的幽默感。他并不缺乏狡猾与机灵，但与伯利男爵相较之

下，更缺乏原则。尽管女王对待他，并不如对他父亲那般亲近，但女王仍是全然地信任他。

此时的情势来看，伊丽莎白女王透过拔擢伯利男爵的儿子与莱斯特伯爵的继子，仿佛想要让宫廷的气氛回到她年少之时，然而尽管罗伯特·塞西尔非常愿意与小艾赛克斯伯爵分享荣耀，但后者知道自己缺乏与宫廷人士的亲近互动，因此非常嫉妒罗伯特·塞西尔的政治地位，并决心破坏他的声望。他并不认为自己无法获得宫廷人士青睐并且成为主要的政治参事；也不明白伊丽莎白女王为何从不将“国内事务的权威”加诸同一人身上。

小艾赛克斯伯爵坚持将塞西尔视为敌人，在宫廷中形成派系之争，成为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晚期的重大现象，因此也制造许多纠纷、贿赂与机会主义者。小艾赛克斯伯爵与许多宫廷中的追随者都渴求军事上的荣耀，更希望持续与西班牙对战到底，至于以罗伯特·塞西尔与伯利男爵为中心的派系，则以和平与稳定为主要诉求。从一五九〇年以后，小艾赛克斯伯爵开始在宫廷与国内各处推行贵族统治的概念。只要在宫廷中不受罗伯特·塞西尔青睐，或是赞成与西班牙持续对战的人，纷纷走向这条道路，积极地拥戴他。他也得到伦敦清教徒的支持。罗伯特·塞西尔则紧紧地抓住了宫廷官职与政治机会。在国会方面，他的父亲主宰上议院，而他则成为上议院领袖。

伊丽莎白女王面对她那一代的友人与参事们纷纷离世，也只能调整心态，适应当前较为年轻、较不协调的一代，这些年轻人的思想与品味与她差异甚大，对于长者的态度也越来越轻蔑。女王也得忙于维持宫廷的平和，维持初出茅庐的新派系间的平衡，对一位垂垂老矣的女性来说，这可是相当吃重的工作。

这一年的夏天，在英国所有的城市中，伊丽莎白女王出巡来到了毕乡修道院，由罗素小姐的女儿们负责接待女王，再前往米契汉、萨

里等地，负责招待女王一行人的则是朱力斯·西萨爵士（Sir Julius Caesar），他献给女王“一件银丝织成的华服，上面用刺绣装饰得极其华丽，一件镶着纯金的黑色网状披风，一顶白色塔夫绸制的帽子，上面缀有许多花朵，以及镶有红宝石与钻石的全副黄金珠宝。女王陛下于九月十三日晚膳过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事实上，这段时间对伊丽莎白女王来说相当哀伤。一五九〇年，死神带走了华威伯爵安布洛斯·达德利、过去曾负责看守玛丽·斯图亚特的狱卒士鲁斯柏立伯爵与时年已八十二岁的布兰琪·派瑞小姐（Blanche Parry，她是女王寝宫的首席女仆，打从伊丽莎白出生之日起便服侍着伊丽莎白）。

秋天时，伊丽莎白女王发现，小艾赛克斯伯爵于四月份秘密与沃尔辛厄姆爵士的女儿兼继承人法兰丝（Frances）结婚，她同时也是菲利普·西得尼爵士的遗孀。伊丽莎白女王认为法兰丝身无嫁妆，也毫无美丽可言，根本配不上小艾赛克斯伯爵，因此大发雷霆，整整生气的两周，才在他人的劝说下，接受小艾赛克斯伯爵只是做了他这个身份地位的男人应该做的事，那就是结婚生子。小艾赛克斯伯爵自己则使尽浑身解数，希望能获得女王的谅解，时间一久，女王紧绷的情绪也渐渐放松。

到了十一月十七日的女王登基纪念日，穿着一身黑的小艾赛克斯伯爵以葬礼的步伐走进怀特霍尔宫的骑士比武场，象征自己的耻辱；但在场观看的人很快就发现，女王早就原谅他了。尽管如此，女王却始终不同意将法兰丝视为他的妻子。两天后，他表现杰出，在参赛者之中脱颖而出。

英女王加冕典礼护卫官亨利·李爵士最后一次在幕后指导登基日马上比武大会，为了纪念这一天，他安排了一场护火贞女的盛装游

行，音乐则由约翰·道兰德负责。纪念日过后，亨利·李爵士便与妻子——臭名远播的安妮·伐瓦梭尔退休，回到牛津郡的迪奇里公园。

就在这个时期，女王的教子约翰·哈林顿爵士愚蠢地在女王的侍女之间，流传他下流的翻译之作，亚力奥斯托（Ariosto）的第二十八本诗作《愤怒奥兰多》（*Orlando Furioso*），伊丽莎白女王下令清查是什么样的书引起这么大的欢笑声，但当她亲自阅读时却陷入震惊之中，并宣布这本书的内容不适合年轻女孩阅读。这位“淫秽的诗人”遭到严重的谴责，女王也规定他在翻译完亚力奥斯托的所有作品之前，不准踏入宫廷一步——这么巨大的工作量，几乎占据了他一整年中最美好的时光。

* * *

到了一五九一年，小艾赛克斯伯爵受到已故国玺大臣尼可拉斯·贝肯爵士之子弗朗西斯·贝肯（Francis Bacon）越来越多的影响，他的哥哥安东尼（Anthony Bacon）过去十年来一直担任沃尔辛厄姆爵士在法国的探子，因此与亨利四世结为至交。他们的母亲则是伯利男爵的姐妹，但身为财务大臣的伯利男爵没什么时间照顾外甥，且认为这两个外甥蓄意要破坏他儿子的政治前途，因此一直拒绝将这两个孩子纳入门下。这件事严重地撕裂了家族情感，弗朗西斯·贝肯因而寻求外人支持，当然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弗朗西斯·贝肯当时是个三十岁的律师，也是个博学多闻的国会议员，当时他就已经发行了历史、哲学与法律论述著作。“他的身材普通，未老脸上就已烙上岁月的痕迹；但风度翩翩恰如其分。”这是十七世纪历史学家阿瑟·魏尔森（Arthur Wilson）对他的形容。这位后来晋身成为大法官的弗朗西斯·贝肯，资质远胜罗伯特·塞西尔与小艾赛克斯伯爵，但女王始终不欣赏他，也从不赋予他应得的重责大

任。事实上，弗朗西斯·贝肯与哥哥安东尼都是同性恋，这也有可能是造成女王对他们反感的原因之一。

弗朗西斯·贝肯很快便建立与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情谊，他很快就发现，只要获得这个新朋友的青睐，他就可以对抗罗伯特·塞西尔。高傲又工于心计的弗朗西斯·贝肯接着便看出可以利用小艾赛克斯伯爵“杰出的完美与美德”，以此来达成政治上的声望，同时挫挫罗伯特·塞西尔的锐气。但宫廷人士很快就注意到，尽管伊丽莎白女王愿意在合理范围内，给予小艾赛克斯伯爵任何想要的东西，却不乐见他过度扩张自己的派系，因此来到他身边盼能得到些许利益的人，总是败兴而归。人人都知道，女王害怕他会招来一大群追随者。

诡计多端的弗朗西斯·贝肯，很快就看出了端倪，于是写信给小艾赛克斯伯爵，献上诚挚的建议，试图让他了解自己在女王眼中的地位：“天生不愿被管束的人；享有非以崇高作为得来的地位；却十分受到爱戴；倾向军事行动——我想对世界上任何君主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种形象的人更加危险，更不要说对女性，甚至女王陛下带来的忧虑。”于是他呼吁小艾赛克斯伯爵放弃军事上的野心，才能让女王放心，并透过和平的手段达成目的。这样的建议相当明智合礼，但刚愎自用的小艾赛克斯伯爵拒绝了。

对于自身日见增长的人气，他也并未做任何事情来平息伊丽莎白女王的妒意。女王不仅嫉妒他与其他人交好，更见不得他注意其他的女性。一次女王抓到他正在调戏女王的两位侍女，凯瑟琳·布里姬（Katherine Bridges）与伊丽莎白·罗素（Elizabeth Russell），便以相当厌恶的态度对他大吼大叫，甚至赏了情妇布里姬（她后来真的变成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情妇）一巴掌，并将这两个女孩赶出宫整整三天。但小艾赛克斯伯爵个性也同样善妒：只要女王对他在宫廷中的对手微笑，他就会发怒、生气很久。

五月份，伊丽莎白女王来到特欧伯兹，接受伯利男爵一家的招待长达十天，塞西尔家族筹划了一出戏，暗示女王应正式赐予在此行中接受女王册封为骑士的罗伯特·塞西尔国务大臣之职。女王并未看出他们的暗示，但三个月后便招揽罗伯特·塞西尔进入寝宫中服务。约在这段时间，已经长期受到痛风困扰，且年已七十岁的伯利男爵，请求女王准他退休。伊丽莎白女王只是开玩笑地问他，是否想成为隐士，接着以他是“英国福祉的栋梁”为理由拒绝他离开。

夏季中，皇家卫队队长莱礼爵士宣誓保护女王旗下的侍女，并获得进入的一把钥匙，他秘密地诱惑（但也有可能是被其诱惑）年纪最长的首席侍女伊丽莎白·贝丝·瑟洛克摩顿（Elizabeth Bess Throckmorton），她是尼可拉斯·瑟洛克摩顿爵士的女儿。七月份她便与莱礼爵士珠胎暗结，但她与莱礼爵士的其他情妇不一样：她开始坚持要与莱礼爵士结婚，但任谁都看得出来，女王一定会认为她配不上他。这一年秋天，莱礼爵士与贝丝·瑟洛克摩顿秘密地结婚了。贝丝继续待在宫中，照样执行每天的工作，尽可能地隐瞒自己有了身孕的事实。

针对英国王位继承问题，依然有许多抱怨的声音，这在女王面前是禁忌的话题，聪明人都会尽量避免。这时的伊丽莎白女王忧心宫廷中的派系将成为阴谋者。因此比起过往更加忌讳指定接班人。年纪渐长后，女王更加忧心臣子们会以年轻的男性来取代她成为统治者。事实上许多宫廷人士已经开始秘密与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来往，因为他是最有可能的继位人选。因此这一年八月，当一位精明的国会议员彼得·文特沃斯（Peter Wentworth）发表了一篇名称为《对女王陛下继位人选的短谏》的无礼短文时，他很快就被迫入狱。

这一个月，女王展开了历年来最大张旗鼓的一次出巡。她走访了法纳姆，接着到萨赛克斯的考德雷城堡，接受蒙塔格勋爵与勋爵夫人

（Lord and Lady Montague）的招待，女主人对于能接待女王实在感到相当荣幸，激动得扑向女王的臂弯不住哭泣：“噢，多么快乐时光哪！多么光辉的一天！”在这里，女王享受了几乎可比拟十六年前在凯尼尔沃思城堡的露天历史剧演出与各种新奇的经验。在一次野餐中，甚至摆出了长达四十八码长餐桌的大阵仗。

之后女王前往佩特沃思、奇切斯特、蒂奇菲尔德、普兹茅斯与南安普敦，回程时则经过贝辛与奥迪厄姆，抵达汉普郡的艾维萨姆，赫特福德伯爵在这里准备好一切，希望继自己三十年前娶了凯瑟琳·格雷小姐而失去女王的宠信后，能以此夺回女王亲信的地位。他雇用了三百人来扩建、翻修他的房子，并在公园中架起临时建筑，以招待整个宫廷来访的人士。他甚至在草坪上特别挖出了一个新月形的人工湖，湖中有三座船型人工岛，并种上树木作为桅杆、堡垒与土丘，女王抵达时就从这里鸣枪迎接。就在这座湖边，女王得以坐在绿色缎质顶篷下，欣赏水上历史剧的演出，还有乐团在船上为她现场演奏。女王在这里待了四天，这四天则有宴席、舞会、排球比赛（女王甚至“屈尊俯就”，在场观赏了九十分钟）、烟火表演、歌唱与富含寓意的娱乐节目。女王离开时，天空正下着大雨，一名诗人不禁说着：“太阳不在，夏日又何以为夏日？”女王则从马车上告诉赫特福德伯爵，绝对不会忘记此行的精彩。当她的座车离开公园时，她看到许多音乐家无视于庞大的雨势正为她演奏着，“她喊着要马车停下”，脱掉旅途上她总是戴着的面罩，对音乐家们表示“深深地感谢”。

* * *

好几个月来，法王亨利四世一直写信给伊丽莎白女王，要求她的紧急援助，此时西班牙正与法国天主教势力并肩作战，已经占领了布列塔尼与诺曼底。伊丽莎白女王一直按兵不动，因为她不想让英国陷入另一场耗费巨资的外国战争。但她也不想看到西班牙军队又一次出

现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于是，这一年的夏天，尽管她并不想花费任何不必要的开支，仍不情不愿地同意派遣四千名士兵前往诺曼底。

在所有的臣子中，小艾赛克斯伯爵不断要求她展开行动，且热切地请求女王让他带兵打仗，但女王拒绝了他。他又一次请求，但女王依然不答应。一直到他第三次请求，跪着哀求了两个小时，还有伯利男爵在旁敲边鼓，女王依然不为所动：他实在“太过性急冲动，没有资格职掌兵符”。一直到法王亨利四世亲自介入，伊丽莎白女王才勉强改变心意，告诉他也许可以带兵出征，但同时女王也警告亨利四世，这个小伙子“要的可能是主控权，而非协防”。部分人士认为，伊丽莎白女王无法忍受他不在的日子，更不敢想象万一他战死沙场又会如何。

八月份，小艾赛克斯伯爵总算与英军一同抵达法国，随即快马加鞭去贡比涅见法王亨利四世，并接受高规格的款待。很明显，小艾赛克斯伯爵把战争视为一种较高级的娱乐活动，因为大可利用职权自肥，他十分沉醉于身为军队指挥官的身份。但抵达法国后的第一个月，他几乎什么事也没做，眼睁睁看着法王在努瓦永奋战。小艾赛克斯伯爵的任务，应是围困鲁昂，但若没有法军协助，就无法完成任务。因此他开始夜夜笙歌，举办游行，甚至到敌方阵营之中进行鹰猎，无意义地让自己涉险，引发英国枢密院的一片责难。他无端地浪费时间与金钱，加上并未深思熟虑，没有向女王通报他的计划，让伊丽莎白女王因困窘而气愤难平。

“不管他在哪里，做了什么，或是想做些什么，都与我们无关！”女王气得跳脚，对于派他出兵一事感到万分后悔。在恼火之中，女王下令要他回国。

“看来女王陛下是想要毁了我。”他回以相同的怨怒。伯利男爵认为，女王事实上是想要见小艾赛克斯伯爵，于是说：“但愿女王别

让私人情绪掌控了公共事务。”而历史证据则显示，这次伊丽莎白女王的确让情感凌驾于理智之上。

在小艾赛克斯伯爵离开法国之前，他违反了女王的命令，将二十四位支持者册封为骑士。这个草率的举动让许多人感到不祥，害怕他正在为了私人的原因建立权力网络。从伊丽莎白女王的观点而言，君主本身就是权力之源，如此随意地册封骑士，是女王特有的权力。伯利男爵试图隐瞒他的所作所为，保护小艾赛克斯伯爵别受到女王暴怒以对，但女王还是发现了，意有所指地表示：“在他册封那群骑士之前，他的贵族身份就已经让他开了一间救济院了。”

但当小艾赛克斯伯爵回到英国，施展他的魅力时，女王与他再度言归于好。几天后，在伯利男爵的影响之下，他竟然又得以回到鲁昂加入军队的行列。他在鲁昂写了这一封信给女王：

最美丽、最亲爱且最完美的君主：您寝宫的两扇窗户，就是我最重要的支柱，只要女王陛下信赖我，我也肯定坚心不移。女王陛下给了我一段假期，让我能表达我的爱意，我的命运就如同我的情感，无可比拟。若您不愿赐予我这样的自由，就请夺去我的生命，但请永远不要动摇我的坚定，因为面对如您这么伟大的女王，您没有权力命令我减少对您的爱意。

这次的军事行动以悲剧收场。小艾赛克斯伯爵夺下了高尔内——女王认定“这是个笑话，不是场胜利”——但就是这样了。他的部队受到疫病的袭击，士气低落，其中有三千人因生病而死或擅离职守，他的兄弟也在一场小冲突中丧命。当伊丽莎白女王抱怨他毫无进展时，因疟疾而生病的小艾赛克斯伯爵写了一封可怜兮兮的信给女王，抱怨她不够仁慈，“打碎了我的心与我的判断力”。他仅靠着与鲁昂总督一场温和的战斗，勉强保住了自己的颜面，但这也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慰藉。当女王下令要他辞去指挥官的职务回国时，他竟非常不公平地将这一切怪罪到伯利男爵与罗伯特·塞西尔头上，指控他们迷惑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心，女王才会因此不信任他。

* * *

一五九一年十一月，女王走访了伊利寓所，探望忠心耿耿的海登爵士，当时他已经病重了，女王甚至“亲手为他服用汤药”。不久后他就因为肾衰竭而死，死时尚欠女王五万六千英镑。传闻指他心碎而死，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几乎追债追到坟墓里，一直要他还钱，但这根本不太可能。海登爵士之死，让女王再度陷入哀痛之中：眼见着曾与她亲近的所有人士，正一个一个离她远去。

有一段时间女王显得相当忧郁，笼罩在忧惧死亡的阴霾里，痛恨任何让她想起这个念头的言语。一次诺斯勋爵负责在餐桌上为她切肉，她问起未掀盖的餐点是什么。

“回女王陛下的话，那是个棺材派。”他答道。“棺材派”是当时的一种肉馅派，但这个字眼倏地点燃了女王的怒火。

“你怎么会蠢到给我一个这种名字的派呢？”女王怒吼着。她的反应等于是“警告许多宫廷人士，千万别在她面前提到任何与死亡有关的字眼”。

* * *

小艾赛克斯伯爵于一五九二年一月返回英国。他一直希望的申请竞选牛津大学校长一事已经通过，但当他知道罗伯特·塞西尔提名的人选巴克赫斯特勋爵（Lord Buckhurst）雀屏中选后，整个人陷入暴怒之中。满脑子的妒意与抱怨，让他决定忽视弗朗西斯·贝肯要他寻求政治高位的建议，反而开始策划暗中破坏塞西尔家族的政治势力。

隔一个月，当安东尼·贝肯从法国返英时，小艾赛克斯伯爵随即寻求他的支持。安东尼是个难搞的人，原本就不稳定的脾气因为关节炎而更加严重，但他相当愿意将天分运用在辅佐小艾赛克斯伯爵上。

他们决定由他来协助小艾赛克斯伯爵建立他专属的情报网，希望能因此打动女王，让女王觉得小艾赛克斯伯爵消息灵通，绝对有政治上的可信度，应认真对待他。小艾赛克斯伯爵也开始拉进与法国新教君主亨利四世之间的关系。

但这样还不够：他迫切地渴望他人的注意力与刺激感。到了三月份，他在宫廷中待得十分暴怒，“胸中充满做大事的渴望”，但弗朗西斯·贝肯却告诉他，他应该迈向“成为国家伟人”之路，别一直执著于他心心念念的战争带来的荣耀。女王身边多名参事都渐渐陨落，现在可是他的大好时机，他应该多加利用这一点。

* * *

贝丝·瑟洛克摩顿凭空捏造了一段托词，顺利在二月份请假出宫，她跑到哥哥家，然后于三月份产下一子。这一段时间以来，她逐渐发福的体态，让宫廷中的传言甚嚣尘上，有些人甚至精准地猜出了孩子的父亲是谁。但莱礼爵士始终不承认，对外宣称：“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女人值得我倾心。”

四月份，贝丝回到宫中，许多人都发现她瘦了一大圈。八卦流传得更为热烈，一直到五月份，莱礼爵士的“恶行”被女王知道了，一名宫廷人士记录下，女王“气愤异常，威胁着要让两人面对最残酷的刑罚。许多人认为，华德·莱礼爵士会失去在宫廷中的政治地位与晋升机会，以及女王的宠信；结束他迅速窜起的政治生命，现在，他飞得多高就会跌得多重，而许多人都在暗自欢喜”。

当时莱礼爵士正在海上服役，在巴拿马一带不断找西班牙船舰的麻烦，但他很快就接到“召回令，并随即返回英国”，陷入深深的耻辱之中，他因为欺君瞒上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勾引贵族贞女把贞操托付给他，还在女王未同意的情形下擅自成婚——后面两项都触

犯了重罪。最糟糕的是，伊丽莎白女王觉得自己遭到背叛，因为多年来，莱礼爵士一直都是她非常宠信的爱将，而这场婚姻简直就让他过去信誓旦旦对女王的忠诚都成了笑柄。

到了六月，伊丽莎白女王将他与贝丝送入伦敦塔中，两人分开隔离在不同的牢房中。莱礼爵士受到的监管相对较松：他可以到花园中走走，甚至可能可以去探望太太，但他非常渴望重获自由，因此积极运用各种势力，盼能达成目的。

七月一日，听闻伊丽莎白女王即将离开伦敦，展开一年一度的出巡，莱礼爵士于是写信给罗伯特·塞西尔：

直至今日听闻女王即将远行为止，我从未体验过如此心碎的感觉，我以最大的爱与渴望，多年来跟随着女王多次出巡，现在却被她弃于黑暗的牢笼中。现在我离她很近，每两三天就能听到她的消息，不那么忧伤，但我的心仍堕入了深深的惨痛之中。我多么习惯看见她如亚历山大般奔驰、如猎神黛安娜般狩猎、如维纳斯般婀娜行走，当微风吹拂着她的头发，她那澄澈的脸庞就像个山林水边的仙女；有时坐在树影下的她，也像个女神，有时引吭高歌的她，就像个天使；有时弹奏着天籁的她，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俄耳甫斯。这世界多么残酷呀！一点小错便让我失去希望。她已不再是我信任的人，因为我得不到一丝怜悯。你诚挚的，不值得任何头衔与地位的W. R.

当天稍晚，听闻女王的驳船将通过伦敦塔，于是他恳求狱卒，也就是他的表亲乔治·凯鲁爵士（Sir George Carew）驾船送他到泰晤士河面上，让他可以亲眼看看女王，最好还能吸引女王的注意，但这位狱卒丝毫不敢放肆。凯鲁爵士后来向女王禀报，当时莱礼爵士竟企图自杀，但遭到另一位看守监狱的官员阻止，从他手上夺下了一把短刃，甚至在救援过程中割伤了手。凯鲁爵士也提醒伊丽莎白女王，若她不愿原谅，莱礼爵士可能会因此发疯，但女王完全不受威吓。

但莱礼爵士并未在伦敦塔中待太久。八月初，一艘西班牙宝藏船遭俘，带着价值达八十万英镑的宝物被拖进了达特茅斯。多数的宝藏都被英国籍船员与当地民众瓜分，当卡门伯兰伯爵（Earl of Cumberland）抵达，准备为女王取得她的持份时，引发了一场暴动。女王清楚知道，只有莱礼爵士能重建社会秩序并确保宝物平均分配，因此同意让他出狱。当他抵达达特茅斯时，受到海军将士们的拥戴，但此时所有的珠宝早已不见踪影。但他却成功取得女王的持份，只是其他的投资人，包括他自己，都被迫牺牲。

伊丽莎白女王同意恢复莱礼爵士的自由身，但禁止他入宫。她的怒气丝毫未稍停歇，他只能静默地生活着。接下来的五年，都住在前一年女王恩赐给他，位于德文郡的舍伯尔尼城堡中，“像只离水的鱼，苟延残喘”。随后贝丝正名为他的妻子，于十二月被释放后，也来到舍伯尔尼城堡与他住在一起。

在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中，一幅小马库斯加拉德的神秘画作中，似乎就描绘出莱礼爵士遭罢黜一事。近来进行画作整理后，发现在这幅画中，有一名看来像莱礼爵士的男子被抹去，同时也发现背景中也有一位瘦小的女性，背靠着座椅。她的红发上带着贵族的小冠冕，脖子上则有象征官职的项链，手中握着一把羽毛扇，可想而知，这位就是女王，当时则因不满而避开莱礼爵士。对于莱礼爵士的陨落，小艾赛克斯伯爵因失去一个重要敌人而幸灾乐祸。

这一年的夏天，当女王出巡时，英国爆发了多年来最严重的黑死病疫情。为了远离伦敦，女王远赴西部格洛斯特郡的休德利城堡，接着前往巴斯。此时她已经原谅哈林顿爵士在《愤怒奥兰多》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因此前往巴斯附近的克尔斯登拜访他，他以诚敬的心，将装订精美的翻译著作奉上。

伊丽莎白女王此时感到大权在握。一名德国访客就发现，她“就像个十六岁的女孩”，无论是外表或体力都一样。九月份时，女王再度造访牛津郡，她即兴地以拉丁文响应不久前听到的演说，观看荣誉学位的颁赠，也参与辩论会、布道会、讲课、晚宴与三场乏味的喜剧表演。在她到访的最后一天，女王发表了临别感言，表示：“就算我能将一张嘴换成千张，也无法言谢。”接着她发现可怜的伯利男爵连站都站不稳，竟中断演说，下令仆人们准备担架。“若我能好好照顾你的身体，我能忽视你的心吗？”她做此结论：“但愿不会！”

当女王站在夏托瓦丘上，回望整个城市时，她说：“别了，别了，亲爱的牛津！愿神佑汝，世代交替源源不绝，尽享神圣与美德。”接着她便前往莱科特，住进老友诺利斯勋爵夫妇家中。

* * *

新年时，宫廷里因假面剧与其他新奇的事物而充满开心的欢笑。一五九三年二月时，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情报网已经健全，女王对此感到相当惊奇，最后终于任命他为枢密院一员，他时年二十七岁。现在他终于有了政治家的身份，他总是孜孜不倦，只要有枢密院会必到，也会为了国家利益与对手合作。“此刻对他的贵族地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洗心革面。”一位枢密院成员描写了这件事，“洗清年轻时犯下的过错，培养荣誉又严肃的态度，他的演说与判断力格外受到欣赏。”尤其针对外交事务上的相关知识，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但小艾赛克斯伯爵决定要善用自己的地位，就算散尽家财来扩大势力也不足惜。

总检察长这个职位相当于女王的礼物。四月份，当这个职务空下来时，他特别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弗朗西斯·贝肯得到这个机会。只是那段时间，弗朗西斯·贝肯在国会中针对女王专属预算问题提出

质疑，因此伊丽莎白女王对他并不高兴。当小艾赛克斯伯爵提出这个人选时，女王爆发一阵狂怒，并禁止贝肯觐见。

几个月来，小艾赛克斯伯爵运用他的势力，试图赢得女王的赞同，认为“想要拉拢女王，没有什么比诚挚的恳求更有效”。只是，尽管他不断争辩与哀求，女王总是坚持认为脾气暴躁的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也就是当时的检察长——是个比贝肯更称职的律师，除了“坚持己见”外，她也时常过于忙碌或“反复无常”，以致无法讨论相关问题。她向缠人的小艾赛克斯伯爵表示，“她会接受更有资格评断此事的人的意见”，小艾赛克斯伯爵于是在一次争吵中向贝肯表示：“女王跟我说，没什么别的说，就可以早早上床了。我怀着盛怒离开了。明天我还要去找她。周四我更要写封劝诚信给她。”

* * *

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并未放弃打着天主教旗帜征服英国的野心，近来他几乎重建了西班牙海军，“脑中除了复仇，没有别的想法”。英国再度陷入遭侵略的危机之中，但信心满满的伊丽莎白女王向国会表示：

对于他的威胁，我一点也不害怕。他完善的准备与强大的军事威胁吓不倒我。尽管他挟着比以往更强势的威力前来，我毫不疑惧，我知道神会助我，定能打得他落花流水。正义在我这一方，我有稳固的立基——绝不会失败，在争论之中，神会站在正确的一方。

英国国会非常具有政治正确性地投票通过给予女王三倍的特别津贴，对此，伊丽莎白女王“以君主对臣子们最大的爱，致上她的谢意”。这一年夏天，又来了一阵风，让西班牙船队无法如期出航，伊丽莎白女王再度表示，这是老天垂怜她，她将这样的奇迹视为神的恩赐。

七月份，发生了一件令伊丽莎白女王震惊不已的事情，她的盟友法王亨利四世，为了让自己更能稳坐王位而改信罗马天主教，并宣布：“巴黎可以举行弥撒。”女王写信给他：“听闻这个消息，可知道我的灵魂感受到多大的悲痛，多大的遗憾与多大的压力！做了亏心事却希望能有好的结果，这样的想法十分危险，但我仍盼望你能更加理智。”但当亨利四世再度发布宗教容忍的官方命令时，伊丽莎白女王的担忧顿时缓解，于是她并未停止支持法国对抗西班牙，毕竟若能赢得这场战争，对英国也有好处。

* * *

这一年的夏天，英国爆发了比前一年更严重的黑死病疫情。伦敦的剧院被迫歇业，除了短暂前往萨里的萨顿寓所、帕尔汉公园与萨赛克斯的考德雷公园外，女王在圣诞节以前，主要都只能待在温莎。她在此欢庆六十岁生日，多数时间都用来翻译波爱修斯的作品，她几乎都是亲手提笔翻译，且十二天内就完成了。经过英国国务大臣的提醒，她从十月十日到十一月五日这二十五天，

首先要扣掉四个星期日、三个其他假日，六天女王陛下外出骑马、呼吸新鲜空气，只能忍住翻译的渴望，这样的日子加起来一共有十三天。因此只剩下大约十二天的时间。以每天花两小时翻译来计算，女王陛下从开始翻译到结束，可以说只花了二十四小时的时间。

她的手稿至今依然存在，看起来却是相当杂乱的涂鸦，拼字随意，且随处都有女王更改涂写的痕迹。

冬日来临，对于指派一位新任总检察长，女王依然支吾拖延。小艾赛克斯伯爵也依然纠缠着女王，希望她能选择贝肯，但女王心意已决，只想做出自己的选择；若她无法坚定地反制小艾赛克斯伯爵，人们就会认为年纪增长影响了她的判断力。因此她坚决无视于他挫折的眼泪，当他擅自离宫，以为能动摇女王的心意时，女王也努力忍住情

绪。但这些冲突都让宫廷气氛不佳，当他终于回宫时，女王长篇大论地严厉斥责并诅咒他擅自离开她。接着两人又感性地和解，一直到下次提起这个议题前，两人都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一五九四年初，伯利男爵请求女王决定由谁出任总检察长一职。小艾赛克斯伯爵因而出言挑衅，直言：“我会用尽我的权力、势力、职权与友好关系，拼命也要捍卫贝肯达成理想的权力。”这件事因而继续拖延下去。

这一年，伊丽莎白女王在怀特霍尔宫度过新年，她高坐在豪华的王座上，观赏戏剧与舞蹈表演，一直到凌晨一点，身边则有她的“野马”小艾赛克斯伯爵守候着。一位年纪较长的宫廷人士安东尼·史丹顿（Anthony Standen），眼见女王不断与小艾赛克斯伯爵说话，并以“甜蜜又宠爱的态度”抚摸着他，于是豪气地表示：“在我的老眼之中，女王依然与过去一样美丽。”但那其实是压力相当大的一天，因为小艾赛克斯伯爵发现了一桩对抗女王的密谋，背后的主谋其实与女王相当亲近，而这个人当天才被逮捕。

罗德里戈·洛佩兹（Roderigo Lopez）是个葡萄牙犹太人，一五五九年时，为了逃离异端裁判所的迫害而逃至英国，接着改信基督教，并在伦敦行医，自此平步青云。很快，他就成了圣巴托罗缪医院的资深大夫，包括莱斯特伯爵、沃尔辛厄姆爵士与小艾赛克斯伯爵都是他的病人。一五八六年，他成为女王的首席御医。

身为犹太人的洛佩兹一直不受欢迎：传言中，就是他提供了毒药给莱斯特伯爵，妒忌他的对手则诋毁他那令人信服的精湛医术。他树敌无数，其中一位就是小艾赛克斯伯爵，因为他拒绝成为小艾赛克斯伯爵旗下的探子，且小艾赛克斯伯爵将他当作医生，透漏自己的隐疾，却遭到他无情的泄露。伊丽莎白女王无视于此，因为她的宠信与他逐渐累积的财富，洛佩兹得以无视这些纷扰。

小艾赛克斯伯爵此刻成了反西班牙集团的领袖，也是宫廷中引战派成员。他与当时住在英国，非法觊觎葡萄牙王位的唐·安东尼奥（Don Antonio）建立友谊，希望能透过他来挑衅西班牙。小艾赛克斯伯爵知道，菲利普国王希望能暗杀唐·安东尼奥，小艾赛克斯伯爵于是派遣安东尼·贝肯去保护他。贝肯也因此发现，一位曾因唐·安东尼奥而失去一切，心怀不轨的葡萄牙支持者埃斯特班·斐列拉（Esteban Ferreira），当时正住在洛佩兹医师位于霍尔本的家中，同时也秘密接受西班牙的金援，密谋对觊觎王位的唐·安东尼奥不利。

小艾赛克斯伯爵向女王通报此事，女王于是下令逮捕斐列拉。洛佩兹医师请求女王释放他，表示唐·安东尼奥对他并不好，而斐列拉只是在为英国与西班牙的和平努力，但女王对此说法却表现出“不悦与不同意”，结束了这次的谈话。

两周后，另一位与洛佩兹医师有关联的葡萄牙人高美兹·狄亚维拉（Gomez d' Avila）也因疑似在桑德维奇涉入间谍工作，而遭到逮捕。斐列拉警告洛佩兹医师，若高美兹落网，就有可能将他们和盘托出，洛佩兹医师则表示自己已三度阻挡高美兹来到英国。而这些信件则遭到小艾赛克斯伯爵安排的探子拦截。

斐列拉获知洛佩兹医师背叛了他，于是从实招来，表示洛佩兹医师多年来都接受西班牙金援。高美兹则在肢刑架的威胁下，招出他们全都在暗中密谋对付唐·安东尼奥。另一位葡萄牙人提诺可（Tinoco）则在审讯中向小艾赛克斯伯爵承认，他是西班牙耶稣会派来英国的奸细，目的是要协助斐列拉说服洛佩兹医师倒戈，协助菲利普国王。只要提到西班牙的名称，便能挑动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敏感神经，他认定这些人的证词背后隐含的意义，就是密谋要取女王的性命。

因此，一月一日洛佩兹医师遭到逮捕。他被囚禁在艾赛克斯宅邸（也就是过去的莱斯特宅邸），同时他的住所也遭搜索，但却始终未能找到任何可疑物品。当他接受伯利男爵、罗伯特·塞西尔与小艾赛克斯伯爵的侦讯时，便提出了相当可靠的证据。伯利男爵与罗伯特·塞西尔于是前往汉普顿宫，告诉女王他们确定这个多年来对她忠心耿耿的男子绝对是无辜的，整件事情是因为小艾赛克斯伯爵企图获得众人支持，才能对西班牙展开新一轮的攻击，导致策划多年的谋略失败。

小艾赛克斯伯爵仍坚持己见，但他到了女王面前时，女王却指控他心怀不轨，说他是“轻率鲁莽的年轻人，为了一己之私对付可怜的人，尽管他无法证明自己，但她知道他是清白的”。女王挥挥手要他噤口，接着让他退下。接下来两天，又羞又怒的他感到疲惫不堪，随后又振作了起来，决心找回自己的荣耀，证明自己是对的，并能成功对抗塞西尔家族，再下一城。他将洛佩兹医师移监伦敦塔，几乎不吃不睡地二度审讯其他疑犯。因不堪折磨，或在刑求的威胁下，他们只好说洛佩兹医师涉入阴谋中，同意以五万克朗^[1]的代价毒害女王。这正是小艾赛克斯伯爵想要的证据，因此一月二十八日时，他便写信给安东尼·贝肯：“我发现了最危险、最极端的叛国阴谋。这场阴谋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取女王陛下的性命。刽子手是洛佩兹医师；谋杀的方式则是下毒。”

当提诺可证实三年前菲利普国王曾送给洛佩兹医师一颗钻石与红宝石戒指时，小艾赛克斯伯爵的疑虑又更加可信了。伊丽莎白女王忆起那段时间，洛佩兹医师的确送了她一个类似的礼物，但女王却坚持不收。洛佩兹医师坚决否认这些指控，但当女王证实了戒指一事时，他仅承认于一五八七年时，在沃尔辛厄姆爵士的指示下，他同意将自己的名字，列入前西班牙大使门多萨密谋对付唐·安东尼奥的名单中，但这只是要取信于菲利普国王而已。沃尔辛厄姆爵士已经去世，

听起来可信度如此低的解释也死无对证，因而让洛佩兹医师失去了塞西尔家族的支持。事实上，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让人怀疑，在沃尔辛厄姆爵士在世时洛佩兹医师曾成为他的秘密间谍。事实上，近来许多西班牙的历史资料纸本文件揭露，他的说法的确可信，且他的确是相当无辜，但真正的事实恐怕已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在疲惫与恐惧之中，年老的洛佩兹医师松口了，承认了那些并非事实的阴谋，也决定了自己悲惨的命运。二月份，洛佩兹医师、斐列拉与提诺可遭到通敌叛国罪起诉，同时被判处死刑。英国民众在听到西班牙人变节的消息后，自然对这个犹太人与他的同党犯下的罪感到气愤不已，但伊丽莎白女王则更加头痛，她十分担心法官们为了维护小艾赛克斯伯爵的颜面，因而陷无辜的人入罪：后来她花了四个多月才下定决心签下洛佩兹医师的死刑状。

伊丽莎白女王在汉普顿宫受到睡眠障碍的困扰，一直思考着搬到温莎古堡是否能减轻她的症状。她多次下令宫廷上下打包准备搬迁，但又屡屡改变心意。到了第三次，宫廷雇用来搬运女王专属物品的运货马车夫又被打发走，导致他们抱怨连连。

“看来女王也不过就是跟我老婆一样烦人的女人！”他叹了一口气，但伊丽莎白女王从窗口听到他的抱怨，于是探出头来大笑。

“好大胆的小子！”她大声嚷嚷，随即赐给他三枚金币“要他闭嘴”。不久后，女王总算决定要迁往无双宫。到了三月二十六日，女王终于在无双宫指派了爱德华·柯克爵士为总检察长，小艾赛克斯伯爵认为这是塞西尔家族的胜利，因而愤愤难平。但他脑筋一转，马上建议由弗朗西斯·贝肯出任检察长的职缺。伊丽莎白女王耐心地表示，她绝对不会因为小艾赛克斯伯爵要求她这么做，就拔擢一位她完全不认可的人，小艾赛克斯伯爵气得出宫，表示“在我的意见受到更大重视以前，我决定退隐”。事实上，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将指派检察

长决定延宕了十八个月，这段时间小艾赛克斯伯爵不断要求女王接受他的提议，导致两人发生无数次的龃龉，又再度和好。贝肯兄弟的母亲认为“小艾赛克斯伯爵行事风格充满了暴力倾向”，但女王也常常犹豫不决，甚至向富尔克·格雷维尔（Fulke Greville）表示“我越看越觉得贝肯相当适合”。但在女王与小艾赛克斯伯爵之间，这等于是在测试谁的意志比较坚定，但却没有人愿意让步。

六月七日，在不断咆哮嘲弄的暴民之前，洛佩兹医师与他的“同党”们在泰伯恩行刑场被吊死、取出内脏和分尸，一直到死前，洛佩兹医师仍坚持爱他的女主人公胜过耶稣基督。但女王忧心小艾赛克斯伯爵运用私权，加上她并不全然相信洛佩兹有罪，因此将洛佩兹医师身后留下的许多财产还给他的遗孀与女儿，自己则将从菲利普国王处辗转得来的戒指好好收藏，到死前都一直戴着。

这一年的夏天气候不佳，大雨不停，破坏了英国的农作物，这在都铎时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可能会造成无情的饥荒与物价上涨。

七月份，伊丽莎白女王给了小艾赛克斯伯爵四千英镑来清偿债务，并向他表示：“亲爱的小艾赛克斯，子当自省，以聪颖的态度自助，勿让仇敌有可乘之机，必要时，余自当出手相助。”但若女王协助他的朋友，她总是不理不睬。但他在政坛上的声望越来越高，也获得人们的好评。此时他与詹姆士六世已是好友，派驻在各地的英国大使，都会向他回报国际重要事务。他雇用了四位书记来协助他的通信事宜，而他部署在各地的探子们，则提供他许多相当有用的最高机密。

但此时又出现了令人恐慌的消息。在安特卫普出现了一本诋毁英国王权的书，书名为《英国王位继任事宜研讨会》，作者是耶稣会成员罗伯·帕森斯（Robert Parsons），他将此书献给“英国最尊贵的小艾赛克斯伯爵，因为现在在我们的王国之中，没有人的地位能比他

高，能比他更有尊严”。这本书中讨论了可能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继位者的所有人选，并呼吁由小艾赛克斯伯爵在女王死后成为拥立王权的核心人物。小艾赛克斯伯爵非常清楚，伊丽莎白女王对于任何猜测继位事宜的态度，因此当她发现自己的名字与如此大不敬的文章连在一起，还建议由他来决定一项专属于皇室特权的问题时，感到相当困窘、“非常烦恼”。当女王把这本书拿给他看时，他对女王的反应感到相当害怕，但当他发现女王表现出没什么大不了的态度，且女王也能明白，天主教势力企图影响他的名声时，他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 * *

接着而来的夏天，天气一样潮湿，农作物再度歉收，导致这一年英国发生了更严重的饥荒。许多人因而死亡，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愉快心情一扫而空。

一五九五年七月，四艘西班牙船只大胆洗劫了康瓦尔，放火烧了彭赞斯，并洗劫了整个茅斯霍尔村。这起事件震惊四座，女王与枢密院下令加强英国海岸边防。

尽管小艾赛克斯伯爵持续施压，盼能让弗朗西斯·贝肯坐上检察长大位，但伊丽莎白女王依然不允。一次被逼急了，女王尖声怪叫地表示要“翻遍英国找出适合当检察长的人选”，也不愿意接受弗朗西斯·贝肯，到了十月，她故意忽视贝肯，指派了一位名气不大的律师汤马斯·弗莱明（Thomas Fleming）担任检察长一职。小艾赛克斯伯爵大受打击，甚至将责任不公平地推卸到事实上支持贝肯的塞西尔家族身上，但事情至此，他已经了解，要求女王拔擢他的任何一位友人没有任何意义，为了补偿贝肯，他将名下部分财产让给贝肯，出售后，贝肯得手一千八百英镑。

十一月十七日女王登基纪念日，一如往常地在怀特霍尔宫举办了精彩的马上长枪比武大赛与其他庆祝仪式。女王在长廊中宴请荷兰大使，她一边与荷兰大使讨论对抗西班牙的新策略，一边对着群众与正在比武的骑士点头。

小艾赛克斯伯爵依然是比武场上耀眼的明星，但今年特别不一样，到了晚上时，他参与了由弗朗西斯·贝肯策划的余兴节目，在这个节目中，由三个人分别饰演一位士兵（莱礼爵士）、一位驼背参事（罗伯特·塞西尔）与一位年老的隐士（伯利男爵），他们要他“放弃追求对一位女神无望的爱”，并选择要过充满新奇、名利或深思熟虑的生活。接着一位穿着像是随从的演员大声表示：“这位骑士绝不会摒弃对女主公的爱，女主公的美德让他思想澄明，女王的智慧教导他真正的谋略，女王的美貌与价值，总是能让他有勇气御敌。”这出戏剧若是精心安排的结果，显然隐含着相当大的暗示，但伊丽莎白女王却选择忽视它。

这出戏剧的结局，是小艾赛克斯伯爵摒弃了女神，将胸中满满的爱转为服侍女王的忠诚；在剧中的演说中，他多次恶意抨击塞西尔家族。“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手段相当高明，这次的表演相当成功。”一名观察家表示，但伊丽莎白女王却表示，“若她早知道会有这么多与她有关的事情，她当晚就不会出现了。”

女王始终未恢复对德瑞克爵士的信任，但他依然提议要突袭巴拿马群岛，以转移菲利普国王的注意力，当然也能抢夺更多的西班牙宝藏，女王也同意了。但这位英国英雄再也没有回来：一五九六年，他的舰队返航时两手空空，并带回消息，同年一月二十九日，德瑞克爵士因痢疾病逝于巴拿马，尸体直接海葬。

* * *

一五九六年时，罗伯特·塞西尔已经成为“英国权力最大的枢密院参事，女王几乎整天都与他密室密谈”。而小艾赛克斯伯爵则开始对国家庶务感到厌烦，许多人都发现“伯爵大人对这里的虚假感到厌烦又轻蔑”。他渴望冒险与军事上的成就。

他的渴求即将获得实现，这一年的春天，伊丽莎白女王认为菲利普国王可能会于夏天派遣无敌舰队入侵英国，于是准备让英国海军出航，预先摧毁菲利普的新舰队。伊丽莎白女王、小艾赛克斯伯爵与霍华德勋爵，是此行幕后的金主，提供了一百五十艘船与一万名士兵。伊丽莎白女王则贡献了五万英镑。

渴望冒险的小艾赛克斯伯爵，显然是外出征战的不二人选，但伊丽莎白女王一如往常地“想法一日一变”，甚至语出威胁地表示要取消突袭计划。“女王对这个计划最大的挣扎，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危险就在眼前。”小艾赛克斯伯爵抱怨着，“我知道我若不违反她的意志，就一辈子也别想为她尽心力。”他花费了极大的心力才让女王同意这个冒险计划，若她继续犹豫不决，小艾赛克斯伯爵发誓“二话不说就去当修道士”。

三月份，伊丽莎白女王在有失优雅的情形下，终于同意任命小艾赛克斯伯爵与霍华德勋爵成为共同指挥官，小艾赛克斯伯爵心情大好，甚至将他对塞西尔家族的不满摆在一旁，开心地出发前往普利茅斯掌管舰队、点兵。接着在五月十六日，女王接获密报传来西班牙军队已经群集在加莱港一带，于是下令要小艾赛克斯伯爵与霍华德勋爵随即返回伦敦觐见，“这两人对她意义深重，私交甚笃，她根本不愿让他们涉险”。女王此举在宫廷与普利茅斯引发一阵骚乱，但伊丽莎白女王已陷入疯狂焦虑之中，完全无视于其他人的抗议。小艾赛克斯伯爵强迫她违反意志并执意继续这个冒险行动，但女王反对。伯利男爵则尽可能让她冷静下来，但当刚从圭亚那探险返国的莱礼爵士突然

出现在宫中，哀求女王的原谅并自请成为比小艾赛克斯伯爵与霍华德勋爵更高阶的指挥官时，事情竟变得更糟。

当伊丽莎白女王的情绪终于从这些对抗之中恢复时，她终于接受若小艾赛克斯伯爵与霍华德勋爵能继续担任共同指挥官，这场探险的胜率极高，她只好不情不愿地答应，勉强指派莱礼爵士担任海军少将。小艾赛克斯伯爵松了一口气，与莱礼爵士言归于好，并告诉他：“这次的行动与时机，就是在告诉我俩应彼此了解、相亲相爱。”

很快一切准备就绪，焦虑不已的伊丽莎白女王派富尔克·格雷维尔前往普利茅斯，带了一封诀别信给小艾赛克斯伯爵：“我虔诚地向他请求，无论未来如何，他仁慈的双手都能护卫你们，让你们重罪轻受，赐予你们最大的幸运；返航时情势大好，我也欢欣。在神的祝福之下，愿你们鹏程万里。”还有一封来自罗伯特·塞西尔语气幽默的小纸条：“女王说你很穷，所以给你五先令。”封缄在信中的，则是伊丽莎白女王亲手所写，准备向士兵们大声朗读的祷词：“愿神福佑少洒点英国热血，加速你们的胜利之路。”此语一出，大大地激励了英军士气，小艾赛克斯伯爵于是写下：“若女王能亲眼看见‘她的演说多么有力’，她肯定会非常开心。”

* * *

这一年的春天，亨斯顿勋爵过世，让他的表妹伊丽莎白女王再度陷入忧郁的情绪。就在这个时期，女王总算拔擢一位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朋友成为英国的掌玺大臣——托马斯·艾格登爵士（Sir Thomas Egerton），他是个完美又富有经验的律师，只要英国大法官一职出缺时，重责大任便落到掌玺大臣肩上。他的掌玺交接仪式，由女王在谒见室的一场仪式中正式举行。伊丽莎白女王以一身金色绸缎加上银色緞边的服装出席，站在谒见室中以土耳其地毯制成、象征帝王地位的顶篷下。她向艾格登爵士表示自己的期许，她登基至今只有一个掌玺

大臣，那就是尼可拉斯·贝肯爵士——“我可以告诉你，他是个聪明人”——结束时也只会会有一个掌玺大臣。

“别说了，女王陛下。”也出席了仪式的伯利男爵打了岔，当时他因严重痛风因而只能坐在椅子上。“希望你任内还能有四到五个掌玺大臣。”

“不，这是最后一个了。”伊丽莎白女王回答，接着便因大限即将到来而崩溃痛哭。尴尬不已的艾格登爵士赶紧表示，贝肯爵士的确是个聪明人，但这席话却“触动了女王的伤心处”，让女王哭得更激烈。接着在准备返回寝室时，女王想起伯利男爵要离开谒见室只得坐着他的担架，于是停住脚步迅速表示：“我还在这里时，财政大臣的手下都不准来扶他。这样我就能先走。”

女王走到门边时，突然又想起艾格登爵士还没依循传统，进行掌玺大臣应有的宣誓仪式，但她仍旧哭泣着，大喊：“他若不宣誓，就永远无法恪遵职守，让他宣誓！让他宣誓！”

六月三日，伊丽莎白女王正式指派罗伯特·塞西尔担任英国国务大臣，在一五九〇年以前，他一直有实无名地肩负起国务大臣的责任。同一天，英国海军正式出航前往西班牙，隔月，小艾赛克斯伯爵便大胆地突袭富有的卡第兹港，“安达卢西亚的珍珠”，在这里可以看到，菲利普国王将部分准备好即将侵略英国的船只停放于此。在英国出其不意的偷袭下，西班牙军队毫无招架之力，两周内英国军队便将全城洗劫一空，并放了一把火烧个精光，甚至无视于小艾赛克斯伯爵要他们放过教堂及与宗教相关之所的命令。“若有人想亲眼见识地狱的模样，当时的情景就是最好的样板。”莱礼爵士如此说道。在冲突发生时，他离得很远，但他的脚仍受了重伤，在冲突过后的一段时间，都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事实上，许多促成这次大成功的重要决策，都是他下达的命令，但他的对手小艾赛克斯伯爵却想要独自居

功，莱礼爵士的功劳则相形失色。可想而知，经过卡第兹之役后，两人之间的和解气氛也付之一炬。

当女王听到英军奇袭获胜的消息时，随即提笔写信给小艾赛克斯伯爵：“你真是让我威名远播、令人闻之生畏、声势大好，这不只是因为你的胜利，还包括你的勇气。我是臣民的君主，请让士兵们知道，我并不在意女王的尊贵身份。”

被胜利冲昏了头的小艾赛克斯伯爵，向受困港中的一艘西班牙商船勒索；船东最后决定烧船，也不愿将船上的两千万元交给英国海军。小艾赛克斯伯爵决定无畏地乘胜追击，他认为与其攻击菲利普国王无敌舰队的大本营里斯本，不如拦截将要离港前往东印度群岛载有西班牙宝物的船队，但他的同僚们却相当反对，也因此断送英国掌握数千英镑油水的机会。最糟糕的是，小艾赛克斯伯爵将卡第兹之役中得手的赃物几乎都分给了手下，并未保留给女王。

小艾赛克斯伯爵总算达成理想，成为英雄，当他返回英国时，脸上蓄着黑桃形的络腮胡作为全新造型，接受全国上下感激与崇拜的欢呼，将他视为德瑞克爵士或史奇皮欧（Scipio）再世：“他抓住了人民的心，永不止息。”就连许多神职人员都将他赞为新教斗士，颂扬他的功绩、正义与智慧。当时他简直就成了大英帝国中最受欢迎、最重要的男人。

[1]. 五万克朗相当于一万两千五百英镑。——译者注

24 被邪恶包围

卡第兹之役大胜后，伊丽莎白女王在欧洲的声望更为提高，于是她也与社会大众一起欢喜庆祝——威尼斯人称她为“海之女王”——但让她最挂心的不是军事上的荣耀，而是财政负担，因此当小艾赛克斯伯爵返回宫中时，女王的反应并不如他预期般雀跃称许，不断道谢；而是小心眼地问他花了多少钱，急切地想要知道她投入的资金“换得多大一笔收益”。小艾赛克斯伯爵只好承认女王早已料到的一切，“什么也没有”；事实上，大多数的钱都用来支付给手下了。伊丽莎白女王勃然大怒，表示她早就知道除了她以外，每个人都赚到钱了，最后仍不情不愿地付了两千英镑薪水给他，并要求他之后得如实归还。

让她生气的还不只是金钱问题。她也相当嫉妒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成功，以及成功为他自己在宫廷人士间带来的人气。她因此变得相当没有安全感，毕竟小艾赛克斯伯爵是一个个性不稳定的人，在女王的许多敌人影响之下，让他得到这么高的支持度，可能造成许多危险。因此女王不同意让他发行小册子，描述他的英勇事迹，当部分人士建议发起全国性的感恩行动时，女王坚持只有伦敦得以庆祝。她无法忍受别人称赞他，在枢密院会中甚至刻意贬抑他的军事策略。

但小艾赛克斯伯爵全都承受。“我的命运多舛，难得安宁！”他写信向安东尼·贝肯表示：“这些让我难以消化的尖酸刻薄，就当作幽默吧！告诉你，身为女王亲信带给我的麻烦比荣耀多太多了。”当

女王渐渐了解，她的舰队两手空空地返航并非小艾赛克斯伯爵的错时，她的态度渐渐软化。在一次枢密院会议中，尽管伯利男爵反对有人提议让小艾赛克斯伯爵从卡第兹之役中得到应得的利益，但女王严厉地斥责他，吼道：“亲爱的财政大臣，无论你是害怕还是爱戴，你对小艾赛克斯伯爵阁下的心意，都超越了我。你是个恶棍！是个懦夫！”伯利男爵早就经历过女王这种突如其来的爆发，而女王的态度吓不倒他，他向小艾赛克斯伯爵透露自己的处境左右为难，“日渐衰弱”。虽然最痛恨伯利男爵的安东尼·贝肯表示“感谢神！”，但小艾赛克斯伯爵仍写信给他以表达怜悯之情。尽管如此，他过去与塞西尔家族的恩怨情仇再度浮上台面，变成更加难解的课题；法国大使就发现：“这件事导致宫廷内斗严重；只要是财政大臣那一侧的人，就是小艾赛克斯伯爵派系的敌人。”

小艾赛克斯伯爵掌握了女王与枢密院，积极参与各式各样的国家事务。英国全体臣民谄媚地视他为传奇英雄的翻版，只要他在，身边就会聚集许多人簇拥着他。这个时期有一名诗人形容他为“大英帝国的荣耀，世界的珍奇遗产”。这些奉承当然让他冲昏了头，弗朗西斯·贝肯于是劝他，尽可能地不要踩到皇室特权的界线，并向女王表达最诚挚的忠诚。并要他放弃追求军事成就与派系斗争，投身于枢密院士应尽的义务，同时请求女王指派他担任悬宕已久的掌玺大臣一职，如此一来，他便能得到“监督国务大臣的特定权力”。但小艾赛克斯伯爵变得比过往更冲动、固执，根本听不进这些聪明睿智的谏言。尽管他宣称自己除了“得到女王陛下仁慈的疼爱与侍奉女王有功的好名声”以外，别无所求，但身为大名鼎鼎的征服者，又怎可能划地自限，甘愿担任行政职务？

此时，菲利普国王正为卡第兹之役的挫败气得跳脚，于是宣布要以“暴力手段”对英国展开报复，并下令增建船只，盼能派出比一五八八年的无敌舰队更庞大的海军队伍。

* * *

连续三年，英国夏天都出现暴雨，导致农作物歉收与“饥荒”。食物价格高居不下，地方上出现不满的声音，甚至出现暴动。伊丽莎白女王下令要政府制定出紧急措施，提供食物给穷人，但这一年的冬天有许多人饿死街头。政府宣布周三与周五是饥饿日，要有钱人断食，再将省下来的钱捐出来纾解当地饥荒。

遭到军队解雇的士兵与水手们，让地方上的劳力市场扩张，刚好碰上贸易量大幅下滑，地方上的治安法官不断反映许多地区都出现无业游民组成的暴力集团。

此时约翰·哈林顿爵士再度失宠，这不只是因为他花心，还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名为《大埃阿斯的形变》（*The Metamorphosis of Ajax*），这本书名一语双关地点出他的全新发明——马桶，又称为“厕所”。他知道女王对于气味非常敏感，于是他送给女王这本书，推荐女王将他的新发明安装在里奇蒙德宫。伊丽莎白女王因此而恼火，除了这本书在粪便学上描绘得太过详细外，这本书用有点风趣又带有诽谤意味的文字，点了几位公众人物的名，其中包括女王至今依然难以忘却的莱斯特伯爵，也是个中原因。女王拒绝赐予哈林顿爵士书本的发行权，但哈林顿爵士却公然反抗她，一年内甚至出了三版，导致他再度被女王赶出宫去。

哈林顿爵士加入了爱尔兰战争，并从爱尔兰写信给女王，请求女王的谅解。他的表亲告诉他：“女王有意将你拉拔为亲信，但她认定你会用她来写讽刺短诗，进而影响整个宫廷。有人听到她说：‘这个搞不清楚状况的小诗人，我的教子，若能恢复清醒，远离女人、戏谑与愚蠢的念头，才有资格回到格林尼治来。’”

预料到西班牙可能于是年夏天入侵，小艾赛克斯伯爵于一五九七年初向女王施压，让他再度外出征战。尽管女王的态度开放，但对于该采取什么样的进攻策略与谁该担任指挥官，都无法下定决心。

二月份时，小艾赛克斯伯爵称自己生病，伊丽莎白女王赶忙前往他的病榻前。此举治疗效果奇佳，但接着又因为女王坚持要他与莱礼爵士一同指挥舰队，他的病情又怪异地再度加重，两星期以来，他一直躺在自己的房里，伊丽莎白女王显得十分激动，两人发生争执的宫廷传闻不胫而走。女王宣布“我要故意与他唱反调，挫挫他的锐气”时，证实了这件传闻。女王表示哈林顿爵士那固执难搞的个性，必定是遗传自他的母亲。

当女王再度拒绝指派他的朋友罗伯·西得尼爵士，登上五港同盟战舰，反而将这个荣耀赐予他的仇敌科巴姆勋爵（Lord Cobham）时，小艾赛克斯伯爵更感光火。贝肯建议小艾赛克斯伯爵策略性地退出宫廷运作，因此他“迅速痊愈”，并表示要前往威尔士的领地。此举让女王派人去召唤他，“一切再度归于平静”，伊丽莎白女王总算同意，让他成为“女王的陆军与海军”中将与准将，并封他为军械统领。女王坚信不需要太多的花费，他一定能成就与卡第兹之役相同的胜利。

这次塞西尔家族也支持他的行动，小艾赛克斯伯爵抛弃了过去所有的妒忌，四月份时，邀请他们与莱礼爵士到艾赛克斯宅邸共进晚餐，餐间他们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六月初，小艾赛克斯伯爵与塞西尔家族说服女王重新接纳莱礼爵士。女王将华德莱礼爵士召唤到跟前，告诉他可能会恢复他皇家卫队队长一职，“让他能一如往常地大胆踏入女王寝宫”。那天晚间，女王亲切地邀请他一起出外骑马，但他始终无法恢复女王往昔对他的宠信。

到了六月底，小艾赛克斯伯爵欢天喜地地离开了女王，起程前往海边监督出航的最后准备工作。就在他要出发前的两星期，两人交换了情感满溢的书信，不断地互道珍重再见，小艾赛克斯伯爵称她为“最亲爱、最受人敬重的君主”，并告诉她：“言语也无法形容我的真心意，但我要向您高贵亲爱的心恳求。我用尽心力只为了得到最高的仁慈与女王赐予的快乐。我对女王陛下的牵挂，比任何臣子对君主来得更多。”女王于是致赠礼物给他，为小艾赛克斯伯爵专属的客舱打造了一幅女王绘像，并告诉他，若事情发展不如预期，他就该“记得只要尽了全力，就不用害怕被责怪，我们也不会严格地抨击你”。小艾赛克斯伯爵感谢女王“恩赐一封信件，让他感受到最神圣的灵气”。

接着探子开始回报，西班牙船舰已经几乎准备好可以出航，但英国天候状况极差，连续四年的夏天都受到大雨与洪水的袭击。七月十日英国舰队正式出海后，英国南部一场强风狂吹了四天，英国舰队被迫返港避难。看到遭强风破坏的宫殿，又听见他人误传小艾赛克斯伯爵溺死的消息，导致她在见到小艾赛克斯伯爵以后松了一口气，甚至掉下欢喜的眼泪。罗伯特·塞西尔于是写信告诉他：“女王陛下现在希望我们大家都爱你，她每天晚上都一直赞许你，仿佛你是个天使。”

罗伯特·塞西尔也告诉小艾赛克斯伯爵，伊丽莎白女王如何与一位放肆无礼的波兰大使应对，这位大使在人员众多的谒见室中，以违反所有外交礼节的态度，用拉丁文对女王说了一长串威胁的话，“那种嘴脸是我这一生都没见过的”。伊丽莎白女王愤而从王位上倏地起身，用完美、即席的拉丁文控诉他傲慢无礼的行为，这段演说简直能成为英国乡野传奇，传颂好几个世纪。女王咬牙切齿地说，若他的主子同意他说的这些话，那他显然是个新手国王，且他继承王位的方式定是透过近来兴起的选举，而非血统。

“至于你，虽然我猜想你应该看了很多书来巩固你的论点，但我猜你并没有阅读那些教你如何与君主及贵族交流的章节吧！”若他没有外交豁免权，女王肯定以“其他的方法”来对付他。

女王接着转向其他宫廷人士大喊：“该死的畜生，各位！今天我被迫使用我生疏已久的拉丁文。”但在场的全体人员爆出了敬佩的掌声，当伊丽莎白女王向罗伯特·塞西尔表示她希望小艾赛克斯伯爵在场，听着这场精彩的攻防时，罗伯特·塞西尔承诺会特地写信告诉他。小艾赛克斯伯爵闻此消息，回复：“在我眼中，女王陛下完全符合古代人眼中真正的英雄该有的条件，那就是如黄金般珍贵的心与如黄铜般坚强的身体。”

到了八月，在强风中受损的船舰修复了，英国海军舰队再度出航前往西班牙，但又再度遇上强风，因此始终无法抵达无敌舰队的大本营费罗尔。伊丽莎白女王告诉小艾赛克斯伯爵，他可以去搜罗一些西班牙宝物，但一直到他成功摧毁菲利普国王的舰队后，他才告诉女王他接下来要远行，去追寻西印度群岛的宝物船。这完全不是女王派他出航的目的，女王冷冷地回道：“当我看到超越了正常状态的东风令人钦佩的杰作，我就清楚地看见自己做了多么愚蠢的决定。”同时，女王也警告他：“以月神之名，你可别大胆得再度越线，践踏我们的宽容。你已带给我巨大的痛苦，超过了我原本的预期。”她想要的，只是小艾赛克斯伯爵“平安返航”。

小艾赛克斯伯爵却无视女王的警告，执意前往亚速尔群岛。他在九月十五日抵达时，西班牙舰队已经几乎近在眼前，但他四处寻找他们的踪迹时，他自己的船队开始四散。莱礼爵士带领的一支船队停靠在法亚尔岛，于是他擅自下令洗劫了一个小镇，得手大量的财宝。小艾赛克斯伯爵因相形见绌而气愤难平，于是指控莱礼爵士无视他的命令，因此在渴望荣耀与财富的想法之下，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手下的

军官，攻击了法亚尔岛。他甚至深切地考虑一位船长的建议，差点对莱礼爵士发起军法审判并处决他。“就算他是我的朋友，我也不惜这么做。”他狠狠地说。但有人劝服了莱礼爵士，让他开口道歉，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但他的名望也受到了影响。

此时，小艾赛克斯伯爵冲动地决定要拿下圣米格岛。但在决定全体舰队转向时，他损失了三小时的时间，因此错过了一艘宝物船，让它平安无事地载着三百五十万英镑的银块离开。若英国能挟持这艘船，菲利普国王肯定只能寻求和平之途，但小艾赛克斯伯爵却错失良机，在毫无选择的情形下，只好再度空手回家。

一听说小艾赛克斯伯爵的船舰正在偏远的亚速尔群岛，菲利普国王赶紧下令他的无敌舰队出航，十月十三日时，小艾赛克斯伯爵正在返家的途中。一百四十艘大帆船正离开费罗尔，准备大举入侵法尔茅斯，期盼能拦截并摧毁已无抵抗之力的英国战舰。接着他们要占领法尔茅斯，长驱直入伦敦。英国南部陷入警报之中，并准备好抵御敌军来袭，但到了十月底时正式传来消息，指西班牙舰队在费内·史特勒近海遭到暴风雨的袭击，因而破损不堪、漂流四散。

这场天灾让早已病入膏肓的菲利普国王失望至极。他已经破产，人民对这些毫无建树的战争相当质疑，此时的他也不得不面对，他所谓的“对英国的企图”，可能永远也不会实现了。

* * *

十月二十六日，小艾赛克斯伯爵总算抵达普利茅斯，听闻“西班牙船舰接近英国海岸”的消息让他紧张不已；有些人在利札德海岸看见大帆船的踪影。他赶紧重整旗鼓，出海御敌，但他很快就发现危机过去了。当他回到宫中面对伊丽莎白女王时，“海岛探险”失败的消息早已臭名远播，除了一路上挟持的几艘商船外，他没有什么能献给

女王的礼物。更严重的是，因为他的愚蠢而让英国面临差点遭到敌人入侵的险境，伊丽莎白女王因此对他十分冷淡。

“我绝不允许英国海军离开英吉利海峡。”她这样告诉伯利男爵，她指责小艾赛克斯伯爵“让敌人有余力与胆量来侵略我们”。伊丽莎白女王生气的原因，还包括尽管小艾赛克斯伯爵并未负起责任，但他的人气依然不减。多数的人认为他只是运气不佳，或是认为莱礼爵士才是海上探险任务失败的主因。看来英国的英雄，永远不可能是个无能之人。

小艾赛克斯伯爵相当气愤：他无法理解女王为何对他如此严苛。“在神的允许之下，我们根本不算失败。”他记录下这样的字句。“我们希望女王陛下能理解我们痛苦的日子、胆战心惊的夜晚、恶劣的饮食条件，以及许多无法与结果相提并论的危险。”“那些安坐温暖家中的人，怎能评论我们？”他完全没有解释自己的失败，只是离开了宫廷回到温斯特暗自哭泣，而女王也写信给他。在沮丧之中，他回信给女王：

您让我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我宁愿让自己病重的身体与受创的心灵，寻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休息，也不愿在您的身边，却只能与您距离遥远。对我来说，写下这些您不在乎、不想知道的事情，相当愚蠢。我的心一如往常，现在却被刻薄的世道击得体无完肤，过去只有美好能征服我的心。周日晚间，我正躺在床上，我想，我会在这里将自己埋藏几天。女王陛下的仆人，带着受伤的心，尽管受到刻薄对待仍不改初衷的R. 小艾赛克斯。

小艾赛克斯伯爵的缺席，也像过去一样改变了女王的心。在与牛津伯爵深入地聊过小艾赛克斯伯爵的事情后，女王陛下写信给他，询问他的健康情形。接着她又写了一封信，暗指原谅他的时机已经到了。

小艾赛克斯伯爵于是回信：

最亲爱的女主公，您的仁慈与频繁的来信，保全了一个病重得半死的男人，让他再度重生。自从我第一次快乐地了解了爱的真谛后，便从未一天或任何一小时摆脱希望与妒忌的轮回。若女王陛下能以体贴的心，支持怀着公正之爱的我，让我远离下一次的严苛责骂，我就很开心了。因此，怀抱着希冀，盼女王陛下成为您心目中最好的君主，我俯身亲吻您美丽的手。

这一字一句打动了女王的心，伊丽莎白女王邀请小艾赛克斯伯爵于登基纪念日的庆祝大典返回宫中。但他却不愿意，因为听说女王为感谢霍华德勋爵在对抗无敌舰队与卡第兹之役中的贡献而赐给他诺丁汉伯爵封号，小艾赛克斯伯爵的心中再度生出不满情绪，尽管他是海军大臣，但在宫廷中仅拥有骑士统领级别地位的他，依然比不上诺丁汉伯爵。妒忌不已的小艾赛克斯伯爵认为，卡第兹之役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因此他向女王表示自己生了重病，无法离开温斯特。这件事让女王情绪极差，导致全宫廷都在祈祷小艾赛克斯伯爵赶紧回来，伯利男爵与得到新封号的霍华德勋爵都写信要他快回，但仅是徒劳。

女王登基纪念日从此被称为女王日，这一天就在小艾赛克斯伯爵缺席的情形下到来又过去。伯利男爵又写了一封信给他，提醒小艾赛克斯伯爵，这是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四十周年的纪念日，霍华德勋爵也写了一封信，里面充满了友情的力量。目前为止，小艾赛克斯伯爵自我放逐的念头也开始动摇，于是回了信，表示若女王陛下愿意邀请他回宫，他便愿意回宫。但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受够了，表示：“他的职权所在，包括他必须身在宫中；君主不需与臣子争辩。”

女王拒绝继续讨论此事，表示自己公务繁忙，还要应付法国大使。亨利四世希望能让法国、西班牙与英国达成基本的和平，因此派了特使马利西的安德烈·修洛特-加龙省（André Hurault, Sieur de Maisse）来试探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但据传菲利普国王打算于来年春天再派遣无敌舰队来袭，因此伊丽莎白女王完全没有打算要和谈。虽然后来证实无敌舰队的传闻只是空穴来风，但女王仍保持表面的礼

貌：先是为自己仍穿着睡衣^[1]道歉，并表示因为脸上生了疮而感到尴尬不已；她给了修洛特-加龙省特使一张凳子，并同意让他觐见女王时全程戴着帽子。但她显得有点心不在焉：“每次说话时总是不断起身，对我说的话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她甚至抱怨壁炉的火焰让她眼睛很酸，但事实上壁炉不只离她有六七尺远，且前方正挡着一道厚重的帘子，但女王仍下令要人先把壁炉熄了。”她向修洛特-加龙省特使表示宁愿站着接见他，接着故意补上一句，自己常常故意让讨人厌的特使站久一点，刺激他们。“她一起身我就起立了，”修洛特-加龙省特使的记录中显示，“她又坐下时，我也大方坐下。”

在另一次的会面中，伊丽莎白女王忽然指控菲利普国王十五次企图谋害她。

“这个男人多么爱我啊！”她笑出了声，接着又叹了一口气，表示很可惜两人的宗教观迥异。结果受害的是英国人民，而她对人民的爱，就如同他们对她的爱一般。若要她牺牲任何一点彼此的爱，她还宁愿去死，但女王自认人生已经跨进棺材一半，因此也为民众的未来担忧。女王接着看到修洛特-加龙省特使拉长了脸，她又笑了。

“不！不！我想我还不会那么快死！我还没那么老，马利西的安德烈·修洛特-加龙省特使，没像你想得那么老。”女王想要讨得一些赞美，因此表示很遗憾，特使见过这么多伟大的君主，却得要来看她这个愚蠢的老太婆。对于自己的舞蹈技巧与各种成就，她也显得不屑一顾，“她因此给了我很多称赞她的机会”。当他恰到好处地赞美女王的决策力与深谋远虑的能力时，女王说“她对于世界上许多事情有基本的认知是很自然的，许多人都说她年轻……当有人称赞她的美貌时，她表示虽然三十年前有这样的传言，但自己从来都不漂亮。不过她总是尽可能地提及自己的美丽”。

伊丽莎白女王的衣橱让修洛特-加龙省特使震惊不已。他意外发现女王拥有三千多件衣服。十二月十五日，她第二次觐见女王时，女王身穿意大利式银色纱质服装，边缘还有宽版金色蕾丝装饰。“袖口的V型开口剪裁还有红色塔夫绸装饰”，胸前的开口则露出了白色锦缎短外衣，里面再穿着侍女的无袖宽松内衣，但它们全都开衩到腰部，“完全露出了她的胸线”，当然也暴露了“不少皱纹”。因尴尬而慌乱不安的修洛特-加龙省特使，在两个小时的觐见会谈行程中，完全不知道眼睛该看哪。每次只要看着伊丽莎白女王，他都觉得自己超出了礼仪的规范。更糟糕的是，女王一边讲话“会仿佛觉得太热般，一边用手拉开胸前的上衣”，结果修洛特-加龙省特使便能一路从她的上腹看到肚脐去。她也戴着“大红色的假发”，“两束波浪大卷垂至她的肩膀”；假发上更装饰着珍珠、红宝石与珍珠花冠。修洛特-加龙省特使认为，她只是要以残存无几的风韵来蛊惑他。“尽管她认为这样能维护她的尊严”但“她的脸部看来十分苍老：脸形又长又瘦，牙齿泛黄又不整齐，甚至缺了很多牙，因此她说话时常常含糊不清”。但“要看到身心都保养得这么好、如此体力充沛的老妇人，还真是不容易”。

十二月二十四日最后一次谒见女王时，修洛特-加龙省特使发现女王正在聆赏小竖琴弹奏的孔雀舞曲。他们谈了许多不同的话题，修洛特-加龙省特使发现“没有人能告诉她任何她回答不出来的事情。因为她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伟大君主”。尽管修洛特-加龙省特使相当钦佩伊丽莎白女王，但他此行可以说是毫无建树，徒增忧心，在与西班牙的和平之路上“英国可能会毫不理会”。

修洛特-加龙省特使随即感受到英国宫廷中的紧绷气氛，并正确地推测出，这一切都是因为小艾赛克斯伯爵不在的缘故。伊丽莎白女王告诉他，若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海岛探险真的失败了，她早就砍了他的头，但她调查过这件事，同时很高兴地发现不是他的错。

小艾赛克斯伯爵希望伊丽莎白女王能收回成命，不要给予诺丁汉伯爵特权，但女王并不愿意。他要求用决斗来解决问题，但霍华德勋爵以生病为由拒绝了。这个时期的小艾赛克斯伯爵不出席枢密院与国会的任何活动，以抗议伊丽莎白女王对待他的方式，宫廷中陷入一阵动乱，所有的事项都停罢。显然这样的情形不能持续下去，于是十二月二十八日这天，在罗伯特·塞西尔的建议下，伊丽莎白女王任命小艾赛克斯伯爵为王室典礼大臣，在诺福克公爵遭处决身亡以后，这个职务就暂时空缺；这可说是相当显著的荣耀，再加上女王随即恢复小艾赛克斯伯爵在诺丁汉的地位，这些举动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宫廷终于恢复平静，“风度翩翩的小艾赛克斯伯爵终于再度露面”。同时，诺丁汉伯爵则气恼地返回在切尔西的家中。

在和解的欢欣气氛中，因为小艾赛克斯伯爵不断地恳求，伊丽莎白女王总算放软了态度，让他的母亲莱蒂丝踏入宫廷中，但女王坚持她只能在寝室之中私下见面。过去，莱斯特伯爵夫人多次在回廊中等待，盼在女王经过时见她一面，却总是发现女王从别的通道离开。接着有人邀请她参加女王会出席的宴会，却发现伊丽莎白女王最后一分钟改变了心意。现在尽管女王态度依然冷淡，但她总算能在寝室中见到女王：她谦卑地屈膝行礼、亲吻了女王的手与胸，接着再拥抱她，女王则冷冷地回以亲吻，但对她儿子来说，这还不够，小艾赛克斯伯爵甚至要求伊丽莎白女王在谒见室中，再度重演一遍相见欢的戏码。“我不想被人强迫去做这么不开心的事情。”女王勃然大怒地喝道，这件事总算到此为止。

* * *

一五九八年初，修洛特-加龙省特使终于离开了英国，小艾赛克斯伯爵告诉他，自己对于和谈兴趣不高，因为他不像塞西尔家族，并不相信西班牙与英国之间有和平的可能性，这让修洛特-加龙省特使深感

沮丧。小艾赛克斯伯爵也向修洛特-加龙省特使表示，英国宫廷最大的两个弱点，就是耽搁与矛盾反复，“造成这种局面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君主的性别”。这么说来也没错，宫廷中年轻的男性臣子们面对年老色衰的女性执政者都开始不听话，有些人甚至公开表示，未来绝不愿再见到女性当政的局面。

小艾赛克斯伯爵与其他开始计划未来的人，都已经展开争取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信赖的动作，但一五九八年初，当伊丽莎白女王发现宣称可能会在“果实成熟前先下手为强”的詹姆士下令要他派驻欧洲各地的大使们主张他拥有英国王位继承权时，女王严厉地斥责他：

“若你不改过自新，就别想那么多了。说不定我会对你改观。但我仍要建议你要抱着善意，对你做的事更深思熟虑。”

大体上她的精神相当好，但小艾赛克斯伯爵却仿佛“乌云罩顶”般忧郁，进而从许多宫廷侍女身上寻求慰藉。女王与他的妻子对他这些行为的流言皆感不悦，不断地怀疑让伊丽莎白女王变得低落、凶恶。多次遭到女王恶言相向后，许多侍女们不止一次伤心泪流，当伊丽莎白女王发现小艾赛克斯伯爵与玛莉·霍华之间的暧昧情愫后，女王显得难以忍受。但幸运的是，小艾赛克斯伯爵运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女王她只是在瞎猜，才让女王恢复了好心情。

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朋友，长发花心大少南安普敦伯爵里奥谢思利（Henry Wriothesley, Earl of Southampton）——他最著名的事迹就是资助大文豪莎士比亚——四年来成功地隐瞒他与女王的一位侍女伊丽莎白·维侬（Elizabeth Vernon）之间偷偷摸摸的恋情，后来两人想要结婚，于是在一五九八年的二月份，由里奥谢思利请求伊丽莎白女王的允许，但女王拒绝了。但当他要求离宫两年出国旅游时，女王同意了。二月十日他便前往法国，留下一个孤寂的女子，伊丽莎白·维侬差点哭瞎了美丽的双眼。

伊丽莎白·维侬的哭泣事出有因：她有了身孕。担心自己的名声毁于一旦，她拜托小艾赛克斯伯爵将南安普敦伯爵召回。小艾赛克斯伯爵从善如流且严守秘密，甚至安排这对恋人在艾赛克斯宅邸秘密成婚，当南安普敦伯爵返回巴黎后，伊丽莎白·维侬便待在艾赛克斯宅邸中。

四月份，伊丽莎白女王着手庆祝圣乔治日的到来，为嘉德勋章骑士准备了丰盛佳肴。不久后，一位德国访客保罗·亨兹纳记录下看见她前往格林尼治礼拜堂的过程，为后代子孙留下珍贵的见证：“接着女王走了出来，非常威严；她那长椭圆形的脸相当白皙，但满布皱纹；她的眼睛很小，但乌黑又有精神；她有点鹰钩鼻；嘴唇薄而窄，齿黑；头发呈现赤赭色，但事实上却是假发；头顶上戴着一顶小王冠。她与一般未嫁的英国女性一样穿着低胸服装。她的手十分修长、手指也长，身高不高不矮刚刚好；呈现出神圣庄严的气势，说话的态度温和又有礼。”

当女王陛下经过身边时，“她以非常神圣的态度说话，先向一个人致意，接着换下一个人，她说英语、法语与意大利语，除此之外，她的希腊语、拉丁语等语言都相当流利，她也能操流利的西班牙语、苏格兰语与荷兰语。无论谁与她交谈都会主动跪下；她会用手将某些人扶起来。她的脸转向哪边，在场的人就会不自主地跪下”。

五月份，法王亨利四世与西班牙达成和平协议，导致伊丽莎白女王用“忘恩负义的反基督教义者”来形容他。伯利男爵则呼吁伊丽莎白女王也赶紧与菲利普国王和解，但小艾赛克斯伯爵相当坚决地反对。他希望对西班牙展开大规模的军事侵略，永久性地摧毁西班牙的海军势力。伯利男爵于是指责小艾赛克斯伯爵满脑子只想着战争、厮杀与血腥。伊丽莎白女王则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摆荡，不得不先将工作摆在一边，以维持两人之间的平衡，也因此情绪大坏。总体而

言，她其实赞同塞西尔家族的观点，毕竟眼前若没有任何遭到侵略的危机，主动出钱进行战争筹备工作，其实是相当愚蠢的行为。

为了报复，小艾赛克斯伯爵发行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写上了伯利男爵的观点，并向英国民众喊话寻求支持，因此也激怒了伊丽莎白女王。结果伊丽莎白女王并未签署和平协议，因为盟邦荷兰在菲利普国王将军事侵略重心转往法国后，逐渐恢复了力量，因此拒绝支持这项和平协议。他们看过西班牙人太过丑恶的一面，因此压根不想与他们握手言和。

接着爱尔兰方面传出消息，政治情势逐渐恶化，伊丽莎白女王派出的爱尔兰国王代表已死。于是女王决定派遣小艾赛克斯伯爵的舅舅威廉·诺利斯爵士（Sir William Knollys）出任这项职务，但当她于七月份在枢密院会上宣布这项决定时，小艾赛克斯伯爵为了一己之私，希望能摆脱掉一名政敌，于是提议说塞西尔派系的乔治·凯鲁爵士（Sir George Carew）更能胜任这份工作。当女王拒绝他的提议时，小艾赛克斯伯爵显得相当坚持，两人发生了严重口角，导致态度恶劣、不敬的小艾赛克斯伯爵刻意转过身去背对女王。

“去死！”女王大声吼道，接着赏了他一记耳光。“你最好滚开吊死你自己！”小艾赛克斯伯爵承受不了这样的羞辱，于是他拔出了剑大喊：“我永远无法忍受这么大的耻辱，你的父亲也不曾这么做。”在小艾赛克斯伯爵出手前，诺丁汉伯爵赶紧站到两人中间，但太迟了，小艾赛克斯伯爵知道自己铸下大错。

伊丽莎白女王震惊地静静站着。没有人敢出声。接着，小艾赛克斯伯爵冲出宫，撂下几句狠话，便前往温斯特，抵达温斯特后甚至大胆地写信给女王：

陛下对您自己与我造成了无法忍受的错误，不仅撕裂了情感，也失去了女性应有的荣誉。我无法将您的心想得如此不堪，但您无视我的感受，这是您自己造成的结果。无论结果如何，我只希望女王陛下不要找借口，接受自己是失败的主因，也接受全世界对结果的质疑。一直到女王陛下践踏我之前，我都不曾为自己感到如此骄傲。现在我的绝望就如同我过去的爱般，无怨无悔。愿女王尽得天下间的安稳与快乐，您以错误的态度对待我，最好的惩罚，就是彻头彻尾地了解，您已失去一位忠仆的信任与您身边只剩下一群小人的事实。

多数人都希望女王下令逮捕小艾赛克斯伯爵，将他押入伦敦塔大牢。甚至也有人预测他将面临被处决的命运。但伊丽莎白女王毫无动作，自此也未再提过这次意外事件。

这次争吵象征着两人关系微妙的变化。他们两人厌倦了彼此，难以继续扮演一直以来的角色。小艾赛克斯伯爵对伊丽莎白女王性格上的变化无常与浮躁感到厌倦，而女王则坚持要他遵循与其他臣子相同的行为准则。后来，伊丽莎白女王向法国大使表示，她“对于小艾赛克斯伯爵的冲动的脾气与野心感到相当畏惧，若他受到不良势力的影响，可能就会让自己毁灭”，此时，她只能建议小艾赛克斯伯爵“任何时候都要以顺从她为优先，不要像过去一样，对她摆出如此傲慢的态度；但为了巩固王权，她只得依据英国法律来惩罚他，而非按照自己的心意，但这些刑罚都太轻，带来的效果一定没有吓阻作用”。她仿佛事后诸葛般地补上一句，她的建议并没有办法避免他继续堕落。

到了七月中，威廉·诺利斯爵士写信给外甥小艾赛克斯伯爵，请他“决心走向正途，服侍君主，服侍国家，神的理想从未如此刻般需要你的存在。请记住，在君权与服从之间是没有拉锯战的”。但他的信件石沉大海，于是掌玺大臣托马斯·艾格登爵士便告诉他的朋友：“我亲爱的伯爵阁下，最大的困难在于克服自己的心魔。你离经叛道得还不算远，还有悔悟的机会。”小艾赛克斯伯爵让他的支持者们都

感到相当尴尬，“他破坏了自己的荣誉与名望”，也在伟大的君主面前误了自己，而国家需要他，他应“谦卑服从”。

小艾赛克斯伯爵勃然大怒，表示：

若此时我的国家需要我为公仆，女王陛下不会迫使我过孤独的生活。我永远无法像卑贱的佃农或奴隶一样服从她。当我的尊严受到最大的污辱，宗教能给我反驳的理由吗？面对这种罪名，我绝无法委屈自己，或是你认为这些加诸我的污名是正确的吗？为什么君主就没有错误？臣子就不能不认错吗？宽恕我，宽恕我，爵士阁下，我永远无法遵守这些原则。我受到了错误的对待，我很清楚这一点。

做出了如此危险又穷凶极恶的举动，他依然坚持己见。

事实上，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朋友想要告诉他的是，因为伯利男爵重病了，因此伊丽莎白女王非常需要他。年届七十八岁的伯利男爵，白发苍苍、颤颤巍巍，却仍不得不扛起治国的重责大任，因为女王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都相当仰赖他，尽管知道 he 已近乎全聋、为痛风所苦，就连拿笔都有困难，仍完全无法同意他辞职一事。

最后当伯利男爵在斯庄特家中卧病在床，因年纪与过劳而筋疲力尽时，女王前往探视他，并且充满感情地亲自喂他吃东西。她也致赠药品给伯利男爵，并写上：“我每天都向上苍祈求让你延年益寿，我与人民都将真心诚意地祈祷。人民的幸福就是我最大的安慰，而他们的幸福掌握在你的手中。”女王告诉他，若没有他陪伴在身边，自己也不想活得太长，这句话让伯利男爵不禁潸然泪下。“自始至终，你就是我的一切。”女王陛下肯定地表示。女王因为过于忧心可能会失去伯利男爵一事，因而简直无心政务。伯利男爵是女王年轻时执政集团中仅存的最后一员，其他人都已经死了，若没有了他，女王知道自己将被其他新崛起的年轻势力孤立，这些年轻人多数都讨厌她、视她为强弩之末。当罗伯特·塞西尔为他父亲送上补汤时，他已经虚弱得

无法举起碗来就口。伊丽莎白女王再度到他床前帮忙，她走了以后，伯利男爵写了一封信给他儿子：

我请求你以坚定的态度让女王陛下了解，她的仁慈让我战胜了不足，尽管她不是我的母亲，但却展现出母亲的宽容，用她那伟大的双手喂养我，就像个细心的护士般；若我能重拾饮食的力量，处理这世上的要务绝对是报效她的恩情。若我无力康复，我只希望到了天堂，仍能成为她与上帝的侍从。也谢谢你悉心炖粥。

附笔 以服侍女王来服侍上帝，因为服侍其他人的都确实是被魔鬼所奴役。

伯利男爵于一五九八年八月四日逝世，听到消息，伊丽莎白女王“感到相当遗憾悲伤，甚至流下眼泪”，她躲开了众人私下为他哀悼。几个月过去后，只要有人提及伯利男爵的名字，女王仍会崩溃大哭。

伯利男爵死后，被誉为英国之父。“欧洲没有任何一位君主，有幸拥有这么好的参事。”伊丽莎白女王一度曾如此表示。康登也敬佩地描述，他是一个“集正直、认真、节制、勤勉与正义等特质于一身的男子。除此之外，他的演说流畅又优雅，经过丰富的历练洗涤出一身智慧，加上极度温和稳健的性格与几经考验仍不减的忠诚度。总而言之，伊丽莎白女王非常庆幸能拥有如此伟大的参事，在他审慎的建议下，英国的国家事务总能蒙受恩泽”。

女王下令，尽管伯利男爵将在斯坦福的圣马汀教堂下葬，但仍应在西敏寺为他举行国葬大礼。当场来了五百位身着黑色服装的宾客，形成浩大的队伍，盛况空前，其中小艾赛克斯伯爵“表情最为凝重”，但多数人都认为这是因为“他自己不得人缘”，不是为了对手过世而哀悼。在这最凄凉的境地之中，伊丽莎白女王仍表示，“他玩

弄了她的感情，因此她还要吊他胃口一阵子，就如同他坚守立场般，坚守自己的伟大。”

死神不仅带走了女王最信任的朋友，也带走了她的敌人。九月十三日，经过连续五日的痛苦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国王离世，死前的一场大病侵蚀了他的身体，出现大规模的脓肿与腐臭的暗疮。在他的命令之下，他死前就已经把铅制的棺材放在病床边。西班牙的继位者是对宗教较不狂热，时年只有二十岁的菲利普三世，而他则是漫不经心地接续了父亲大人“对英国的企图”之战。

* * *

伯利男爵死后两周，爱尔兰传出了事态严重的消息。由亨利·巴杰纳爵士（Sir Henry Bagenal）领军的一支英国精兵在黄滩遭到泰隆伯爵二世休·欧尼尔（Hugh O’Neill, Second Earl of Tyrone）带领的爱尔兰反叛军暗算，英军有一千二百名人员死伤，英国北部一路到都柏林一带陷入无人看守的危险之中。这是英军“史上最惨重的一役，也是伊丽莎白女王毕生最大的耻辱”，她知道在伤害扩大到无法收拾以前，她必须加紧脚步。

泰隆伯爵拥有绝佳的战斗水平与能力，他曾一度对伊丽莎白女王输诚，但于一五九五年时变节，并成功地集结爱尔兰当地人，一同对抗占领当地的英军。他想要有敬神崇拜的自由，希望英国军队离开爱尔兰，他同时要在指派政府官员上拥有决定权。许多人将他视为爱尔兰的救世主，许多人都抛弃了英国驻军，加入反叛军的行列，加上西班牙方面与泰隆伯爵结盟，多年来他们一直计划将爱尔兰当作进攻英国的跳板。菲利普二世临死前口述了一封道贺与支持信，寄给了泰隆伯爵，作为他对伊丽莎白女王最后的抵抗。为了控制这个人，伊丽莎白女王知道自己非得指派一位声望极高、能力极佳的国王代表，这个人必须有能力摧毁反抗军势力，建立爱尔兰和平。

小艾赛克斯伯爵依然待在温斯特，等待伊丽莎白女王的道歉，但当他听说了泰隆伯爵的胜利时，便主动写信给女王请缨对抗反叛军，他等不及女王的回信，便赶往怀特霍尔宫，却发现女王压根儿不想见他。他气急败坏地写信给女王：“我来到这里没有其他原因，而是要听候您的差遣。”伊丽莎白女王只简短地回了一句话：“请转达小艾赛克斯伯爵，我重视自己身为伟大君主的身分，就如同他的自傲一般。”

迫切地渴望军事作为，也担心错过重新分配伯利男爵的职务的时机，小艾赛克斯伯爵又装病，再度让他达到预期的效果，融化了女王的心。伊丽莎白女王写了一封慰问的信件，并派了御医医治小艾赛克斯伯爵，让他奇迹般迅速康复，这也促使小艾赛克斯伯爵提笔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感谢信。伊丽莎白女王心花怒放，同意接见他。两人见面对谈时，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相当和善，因此罗伯特·塞西尔与其他宫廷人士一直认为“暴风雨已经过去了”，但事实却不然。小艾赛克斯伯爵要求女王道歉，但女王拒绝了，怀着气愤难平的心情，他又回到温斯特去。事实上，女王也认为自己应该道歉，但小艾赛克斯伯爵也并没有放软态度。两人皆不相让之下，情势陷入了僵局。艾格登爵士与许多人建议小艾赛克斯伯爵臣子的职责就是要服从君主，但小艾赛克斯伯爵却声称女王的态度让他很难服从。就连在巴克赫斯特他要竞选牛津大学校长一事，都无法让他提振精神。

此时，伊丽莎白女王派遣了新任指挥官理查德·宾汉爵士（Sir Richard Bingham）前往爱尔兰，但他抵达爱尔兰没多久后就死了。听到这个消息，小艾赛克斯伯爵再度写信给女王请缨，盼能亲赴战场，这次女王同意了。因此他重返宫廷，两人在一次私下单独会面中，解决了认知上的歧异。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哪一方先道歉，但有可能是女王，因为艾格登爵士将小艾赛克斯伯爵前一年七月写的那封信，拿给女王过目，让女王感到相当困扰。在这次事件以后，女王对小艾赛克

斯伯爵的情分也降低了不少。两人多少都仍感到受伤，而这些伤口，也影响了两人未来对待彼此的态度。

小艾赛克斯伯爵并未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为了扩大自己的人气，他向女王要求担任伯利男爵过去的一——油水丰厚的一——典狱长统领一职，女王表示自己想把选择权留给自己。小艾赛克斯伯爵再度气得出走，再写抗议信给女王，信中他指出，伊丽莎白女王的皇室先辈们都不会这么做。他要女王再好好想清楚，但这封信却只让女王的立场显得更坚定，这项职务便一直无人填补。

勇敢无畏的小艾赛克斯伯爵仍提议由自己担当新任爱尔兰国王代表，坚称自己是抵御泰隆伯爵的唯一人选，尽管多数人都知道，这绝非简单轻松的任务。伊丽莎白女王提名蒙裘依勋爵查尔斯·布朗特（Charles Blount）担任爱尔兰国王代表一职，但他与其他人都没有这个意愿，因此尽管女王对于任命小艾赛克斯伯爵依然持保留态度，但也别无选择。一位名叫罗伯·马可汉（Robert Markham）的宫廷人士就记录下了这件事：“若爱尔兰国王代表能达成他在枢密院会议中的各项承诺，一切都会安好无虑，尽管女王原谅他当着她的面的无礼举动，但我们知道其实不然。她将一切赌在一个以不当行为对待她的男人身上。”

接下来两个月，伊丽莎白女王与小艾赛克斯伯爵不断争论，该如何夺回爱尔兰的主控权。小艾赛克斯伯爵希望女王派遣大批人马前往爱尔兰，当女王拒绝时，他便摆出怒而不语的姿态。“无论女王陛下多么鄙视我，她都不该忘记，她失去的是一个能为了她将危险当运动，将死亡当飨宴的人。”他气急败坏地说。他已经开始考虑不要前往爱尔兰了，“但他的荣誉心不许他不战而屈”。

最后，他的坚持让他得到想要的一切，他募集了伊丽莎白女王上任以来最大的一群精兵——汇集一万六千人的步兵团与一万三千人的

骑兵部队。“愿神护佑，”他向哈林顿爵士表示，“让我在战场上击退泰隆伯爵，将史无前例的荣耀献给女王陛下。”

* * *

此时，伊丽莎白·维侬依然住在艾赛克斯宅邸中。到了她准备生产时，小艾赛克斯伯爵让她去住在他姐姐瑞奇小姐家，此时的瑞奇小姐却正与蒙裘依勋爵发展出非法的恋情，非常善于编造借口。于是在十一月八日这天，伊丽莎白·维侬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为潘妮洛普。

后来，伊丽莎白女王仍发现了这件事，下令要南安普敦伯爵立即返国。他一抵达英国国境随即因未获得女王同意而结婚遭到逮捕，并遭短期拘留在舰队街监狱。小艾赛克斯伯爵此时则将南安普敦伯爵的妻子与女儿留在艾赛克斯宅邸中，保护她们，并尽力斡旋期盼能让好友早日归来。此事对于他和女王之间的和平关系，自然也没什么帮助。

同时他与莱礼爵士也再度交恶。这一年的女王登基日，小艾赛克斯伯爵与追随他的许多人，一起穿戴着黄褐色的羽毛来到比武场，希望能让莱礼爵士相形见绌，因为小艾赛克斯伯爵听说，莱礼爵士派系也打算以这样的方式对付他们。这么无知的行为让伊丽莎白女王难以忍受，于是她早早就离开了，也让那一年的登基日庆祝大典突然告终。

“我愿前往爱尔兰。”一五九九年一月四日，小艾赛克斯伯爵写下这席话，“女王已经无法收回成命。”许多人正期待他的离开，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年纪大了，更难以在宫廷各派系之间维持平衡，也快要无法控制小艾赛克斯伯爵了，“此刻他的所有权势，都仗着女王对他的畏惧与宠爱”。

但眼前他的任务也不轻松。多数英国人都不懂地道的爱尔兰语，只认为他们是野蛮的部落，他们大方地拥抱天主教，只是为了反抗英国封建君主。伊丽莎白时期的其他国王代表都未能征服他们，在这块满是高山与沼泽的地区，多数的英国指挥官也发现一般的战略都难以施展，游击战才是上上之策。

小艾赛克斯伯爵丝毫不将这些难题放在眼里，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一定能击败泰隆伯爵，如此一来，他在各方面就能建立至高无上的权势，超越他认为总是在破坏他的威权的罗伯特·塞西尔与莱礼爵士。但他最担心的，就是在他离开的空当中，他“重要的政敌们”会蛊惑女王，让女王厌恶他。“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在枢密院会上公开表示。也就因为这一份担忧，超越其他的考虑，让他在1599年二度考虑不要前往爱尔兰。

在这一年的主显节，在与来到宫中做客的丹麦大使跳舞前，伊丽莎白女王先与小艾赛克斯伯爵跳了一支舞。此时的伊丽莎白女王正全神贯注于翻译弗吉尔的作品《诗的艺术》，此时已年届六十五岁的她，“依然有能力外出打猎”，承受“每两天一度”的长途骑行，这一年，宫中一位德国宾客汤玛士·皮列特（Thomas Platter）以明显夸张的语言形容，伊丽莎白女王“外表出奇地年轻，看起来绝不超过二十岁”。

此时，小艾赛克斯伯爵逐渐明白，自己接下了“贵族士绅阶级面临的最大挑战”。三月一日，许多人都知道“每天都会传来新的问题，在挑战他的忍耐限度与质疑，甚至让他变得相当不满，多次自问到底应不应该前往爱尔兰”。离开英国的时间越来越接近，他开始要求枢密院同情他的处境，不要对胜利有太多的期待。

对于派小艾赛克斯伯爵前往爱尔兰的决定，伊丽莎白女王也开始动摇。女王并不怀疑他的勇气，但对于小艾赛克斯伯爵的判断力与稳

定性，女王始终存疑，且女王对于他的忠诚度也开始有了疑虑。二月份时，因为约翰·海华德爵士（Sir John Hayward）发表了一本著作，名为《亨利四世的前半生与王权》，以此来向小艾赛克斯伯爵致意。女王痛苦不堪地注意到，自从一五九七年莎士比亚的《理查德二世》公演后，许多臣子们就开始将小艾赛克斯伯爵视为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第二，也就是暗指他可能会如亨利推翻理查德二世一样推翻她。她发现自己无法信任地将史上最大批的军队人马交到小艾赛克斯伯爵手上，于是她表示是这本书冒犯了她。

“我们不能以叛国罪来处置约翰·海华德爵士吗？”伊丽莎白女王询问弗朗西斯·贝肯。

“我想叛国罪是不可能，但有剽窃罪的嫌疑，女王陛下。”贝肯表示。

“怎么说？”

“他剽窃了许多塔西佗的主张！”贝肯微笑响应。但此时的伊丽莎白女王根本无心开玩笑。

“我已做好最坏的打算，”女王宣布，“我要逼他说实话。”她甚至考虑要以肢刑架来对付他，但贝肯劝退了她的念头。尽管如此，海华德爵士依然遭到逮捕，因为文章中提及推翻君主一事，而在闭门会议法庭中遭到审判，一直到伊丽莎白女王死前，他都一直被关在舰队街监狱中。

伊丽莎白女王盼望小艾赛克斯伯爵能借由此事学到一些教训，她于三月十二日签署了任命令，也给予他随时可从爱尔兰返回英国的自由。“女王授予我的权力，超越了其他所有的人。”他有感而发。

三月二十七日，艳阳高照，穿着朴素的小艾赛克斯伯爵领着大批军队，在众人欢呼“天佑伯爵阁下！”的声浪中离开了伦敦。来到伊斯林顿时碰上的一场风暴，被许多人视为“不祥的预兆”。贝肯事后留下这样的字句：“我早就看见，他命中注定在此役中失败。”

由小艾赛克斯伯爵带领着南安普敦伯爵（在女王的眼中，他依然是个皇室之耻）、蒙裘依勋爵，与在此行中将接受他颁赠骑士勋章的约翰·哈林顿爵士；女王忧心小艾赛克斯伯爵会累积太多军事势力，因而不许他将重要职务交给前面两位。但小艾赛克斯伯爵仅忍耐到安全抵达爱尔兰后，便开始随意指派他的好友担任所有工作。

这一趟旅程不断受到暴风雨的侵害，到了四月十五日，他终于抵达都柏林，但却开始受风湿病之苦。英国方面已经同意让他推进到阿尔斯特，攻击泰隆伯爵，但他在爱尔兰的顾问团却要他等到六月，届时牛只已经养肥了，军队的食物来源也不至于短缺。在未通知伊丽莎白女王的状况下，五月初，小艾赛克斯伯爵擅自决定推进到兰斯特，以那里作为据点前往蒙斯特以征服当地叛军。小艾赛克斯伯爵因权势而感到陶然自得，尽管伊丽莎白女王给了他“一封直言不讳的亲笔信”，命令他不准自作主张，他依然准备册封三十八位骑士；他也指派南安普敦伯爵担任骑士统领，此事同样违背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意愿。当女王来信要求他撤回命令时，他断然拒绝，理由是不想让叛军看到英军分裂的情形。

六月终于到来，尽管牛只的确养得很肥，小艾赛克斯伯爵似乎仍没有攻打泰隆伯爵势力的打算。目前他唯一的功绩，就是在凯尔抢夺了一头牛。二十八日时，伊丽莎白女王对于他延后进攻进程感到气愤难平，“她对于小艾赛克斯的军事方针一点也不满意，完全不喜欢他军事上的成果，但却表示一天给予他一千英镑的出巡费”。小艾赛克斯伯爵因此下令，让累坏了的士兵们兼程赶回都柏林，于七月十一日

抵达。听说他离开后，罗伯特·塞西尔得到拔擢成为典狱长统领，他因而气愤难耐，于是向女王抱怨：

为什么要我得到胜利与成功？除了不安与灵魂的伤口外，我在英国什么也得不到，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情。女王陛下不再宠信我的消息，也已传遍军中，难道您在触我的霉头吗？我生是您的，死了也将是女王陛下最忠诚的仆人。

对此伊丽莎白女王丝毫不受感动：她想看到的是行动，不是空话。七月十九日，她正式回复了小艾赛克斯伯爵的信，信中指出：

若考虑你浪费的时间与耗损的大量金钱，以及此行目前为止的成果，那就请你务必了解，各国君主也都在看着我们的行动，以及人民对我们安慰与珍惜的心。但在连番税收与赋税的重担之下，他们开始喊苦，而你迄今带给我们的成果，怎能让我们快乐得起来？之后我们或许不得不面对一些比许多花费还要令人不满的事情，也就是说，这就是英国女王的命运（她曾大败最恐怖的敌人），丛林促成了反抗军的名气，一个人就能对抗上千人与马匹，就算大英帝国派出这么多贵族，也无力相抗衡。

泰隆伯爵此时正以征服者的姿态横扫基督教国家，而小艾赛克斯伯爵却只能写信吹嘘自己能有多英勇，但事实上他只是在浪费人力、金钱与资源。

伊丽莎白女王再度下令要他推进到阿尔斯特，依照他的诺言打倒泰隆伯爵：“每当我想到，若我们动不了这个傲气十足的叛乱分子一根汗毛会为我们的信用带来多大伤害时，我就必须直接命令你，负起你所允诺之责，整合你完全的判断力，完成服侍国家的誓约，依照命令尽快出兵打仗。”

夏天时，许多人都开始议论纷纷，认为女王开始出现年老的表征。不像往常那么常出外骑马，只要骑个一两英里就会抱怨“马匹难以驾驭，当旁人扶她下马时，她的双腿僵硬麻木，几乎无法站立”。伊丽莎白女王相当担心人民会认为她无力于政事，于是当她听见这些

传闻时，马上以严厉的手段对付这些传闻，此后都只带着“少得不符合她身份”的仆人私下出外短途骑行。当亨斯顿勋爵二世问她，这把年纪了还骑马从汉普顿宫前往无双宫，是不是不智的行为时，女王愤怒地大声责骂他。

“我的年纪！”女王怒吼。“陛下！您骑的是快马呀！”勋爵答道。但接下来两天，女王都拒绝与亨斯顿勋爵二世说话。不久后，一名宫廷人士便刻意散布消息：“感谢上天保佑，女王陛下的健康情形良好，也非常享受无双宫新鲜的空气。有关女王的飞短流长很多，非常奇怪，没有合理的解释，这让她感到十分困扰。”但女王并未因此松懈。在看了一封“半途遭到拦截的信件，上面写着‘停止长途旅行也是年老的象征’”，女王刻意延长了她出巡的行程。

* * *

七月的第三周，女王的信件抵达爱尔兰时，小艾赛克斯伯爵正无所谓地第二度对兰斯特展开攻击，攻击不重要的叛军兵团。八月初，因为在亚克洛的一场冲突中，小败于爱尔兰人的手中，小艾赛克斯伯爵不得不退守都柏林，在这场冲突后，他派了书记亨利·卡夫（Henry Cuffe）回英国告知女王，英国于爱尔兰的顾问团告诉他，今年要再对付泰隆伯爵为时已晚，因为爱尔兰的天候变得很坏，且他带去的一万六千名兵力，也只剩下四千人，剩下的不是被杀死、逃走，就是病亡。

这个消息让伊丽莎白女王震惊不已，对于小艾赛克斯伯爵提供的建议感到难以置信；情绪激动之下，女王再度派遣两千名援军，并于八月十日告诉小艾赛克斯伯爵，她希望下一封信中能看见，他“有机会”打得泰隆伯爵节节败退，而不是“有问题”。女王气愤地下令要他尽忠职守，在未能“削弱北方叛军势力前”，没有她的允许不准擅离爱尔兰，同时一定要完成他背负的责任。千万不要再把资源浪费在

“不重要的叛军部队”身上。“希望你能三思，了解到你的行为给了我们合理的动机怀疑你的目的不在于结束战争。”女王展现出洞烛先机的气魄。

小艾赛克斯伯爵因痢疾与肾脏问题而重病，导致士气低落，无力对抗泰隆伯爵，他也清楚知道失败就在眼前，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再度送来一封言辞犀利的信件，坚持要他完成使命，甚至补上一句，不愿听信他人谏言的人，永远不可能拥抱成功。宫廷人士议论纷纷：“小艾赛克斯伯爵什么也没做。”此时开始获得伊丽莎白女王赏识的弗朗西斯·贝肯点醒了她，若将小艾赛克斯伯爵独留在爱尔兰，还“赋予重兵权，可能会让他把持不住而踰矩”。他于是呼吁女王尽快召回小艾赛克斯伯爵。女王态度严肃地感谢他点出她心中的犹豫。

伊丽莎白女王尖锐的批评与抱怨刺伤了小艾赛克斯伯爵狂妄的自尊，于是他开始将全部心力放在塞西尔派系为了破坏他的影响力而在英国可能做出的斗争动作。同时听闻对手巴克赫斯特勋爵（Lord Buckhurst）取代了伯利男爵成为财政大臣一事，也让他气愤难平。女王当然对小艾赛克斯伯爵非常不悦，但他却怪罪于政敌的阴谋，而不是他自己的失败。突然间，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他无心继续待在爱尔兰追求军事胜利带来的光荣；相反，他要回英国捍卫自己的利益。他知道因为自己无能，军队中弥漫着绝望，根本不可能打败泰隆伯爵，此时他一心只想离开。

他于是向惊讶不已的同僚们表示，他想要带着三千兵力横跨威尔士，透过他身为伯爵的权力，私自在封地上募兵，接着推进伦敦逼退塞西尔家族，因为他认为，塞西尔家族的恶政与和平倾向，是导致帝国崩毁的主因。事成之后，他会逼迫女王立他为首长。他坚信自己拥有人民的爱戴，以及支持他的军队，因此这条路必然可行。他又强调自己并不想要伤害女王，也会亲自向她解释自己的行为，希望见到他

平安无事为女王带来的欣慰，能冲淡女王心中所有的不愉快。他的思想越来越偏激，他似乎没有想到，女王可能一点也不希望他侵害女王专属的王权。

蒙裘依勋爵与南安普敦伯爵试图警告小艾赛克斯伯爵，他策划的这一切根本就是鬼话连篇，可能会导致英国内战，但他却不愿听信。因此为了确保他的安全，他们两人要求小艾赛克斯伯爵离开爱尔兰的军中，仅带着“数量足够”的军官与新册封的骑士们，陪他完成他的计划。但他们坚持，在这之前，他必须维持荣誉，完成他打败泰隆伯爵的使命。

* * *

八月底，小艾赛克斯伯爵总算离开都柏林，带着虚弱无力的军队前往阿尔斯特，他写了一封颇富戏剧性的信件给女王：“充满忧伤的思想，遭艰辛、烦忧与悲伤侵蚀的灵魂；被热情冲撞得支离破碎的心；我是个厌恶自己的男人，也厌恶支持我活在世上的一切——女王陛下还有什么要求呢？既然我忠心的服侍，只招来被放逐到这片受诅咒之地的命运，我的人生还有什么寄托呢？”信末署名为“女王陛下最遥远的仆人，小艾赛克斯”。

九月三日，在违反伊丽莎白女王的命令之下，小艾赛克斯伯爵在军队人数二比一的悬殊比例之下，偷偷派人与反抗军领袖（他至少与对方通信长达两周）讲和，他首先要求以比武斗殴的方式解决两人之间的恩怨，但泰隆伯爵以自己年老体衰为由拒绝了，小艾赛克斯伯爵于是要求两人会谈，希望获得宽恕。泰隆伯爵同意了，并向他保证，若他愿意听信泰隆伯爵的建议，泰隆伯爵将辅佐他成为英国第一人。这个说法正中下怀，小艾赛克斯伯爵于是开始考虑与泰隆伯爵结盟。

泰隆伯爵与小艾赛克斯伯爵的会谈中，要求英国将自治权返还给爱尔兰人。九月七日双方领袖骑着马，在卡里克马克罗斯一带，里根河畔的贝拉克林斯湾会面了，为时半小时的会谈中，两人到底讨论了些什么，后人众说纷纭，因为小艾赛克斯伯爵做了一件相当不明智的事情，他忘了带个人作见证，还要求南安普敦伯爵将所有人带到听不见会谈内容的地方。但有三人藏身在附近丛林中，后来他们将所听见的内容作为证据呈交给女王，显示小艾赛克斯伯爵将自己的计划告诉泰隆伯爵，并要求他支持。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政敌们认为，此举等同于与泰隆伯爵联手，准备推翻伊丽莎白女王，让小艾赛克斯伯爵坐上王位，尽管小艾赛克斯伯爵显然未诚实告知伊丽莎白女王他们的会谈内容，但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这次会谈结束时，双方领袖同意，至一六〇〇年五月前，每六周就要更新一次停战协议。在停战协议之中，泰隆伯爵会继续待在他的领地上，英军则不得再新建堡垒或驻军。爱尔兰领袖因而争取到更多时间加强部队实力。

尽管小艾赛克斯伯爵允诺泰隆伯爵会将他的要求亲自呈交给女王陛下，但小艾赛克斯伯爵却认为，反抗军的领袖已经服从他了，丝毫未察觉自己遭受到的耻辱。为了怕女王又抱怨他在军事行动中一事无成，他说服旗下军官签署一份文件，指阿尔斯特的军事活动根本无益，接着便调兵遣将返回都柏林。

一周后，女王听说了两人会谈的消息，但仍不知道停战协议一事，因为小艾赛克斯伯爵认为不适合告诉她，但小艾赛克斯伯爵紧急写信给国王代表，询问女王的反应：“这毫无疑问是泰隆伯爵的风格，每当英军接近时，他便丢出会谈要求。从你的日志中可知，你与这个叛国贼，在四下无人的状况下谈了半个小时，尽管我们对你的信任绝对大过于对一个叛国贼，但对于你处理的方法，却感到相当讶

异。若英国早已决定放弃爱尔兰，派遣像你这样的和谈特使也是多余。”女王提醒小艾赛克斯伯爵，泰隆伯爵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信任这个叛徒所说的话，就仿佛是听信于恶魔的话”——同时坚持要小艾赛克斯伯爵依照原订计划，继续与泰隆伯爵对峙。“我依然坚持命令你继续走向这条道路。”女王表示。

小艾赛克斯伯爵始终没有接到这封信。九月二十四日，他忽然宣布自己要离开爱尔兰回英国，带着许多追随者，半个小时后便上了船，他违抗了女王的命令，而且可以说是抛弃了自己的部队。伊丽莎白女王与许多宫廷人士，将此举解读为擅离职守。六个月的军事行动中，他浪费了三十万英镑公帑，这次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是失败中的失败。

九月二十八日天刚破晓之际，在连续三天三夜奔驰未休息的状态下，小艾赛克斯伯爵总算抵达西敏区，但却发现女王陛下身在无双宫中。他将其他随从留滞在伦敦，自己则搭上兰贝斯的渡船，跨越泰晤士河，在大雨中全速南行，隔天早上十点便抵达无双宫。接着他一身泥泞，大步进入宫中，长驱直入地进到谒见室与女王寝宫中，然后无预警地出现在女王寝室里。

[1]. 事实上是现在的晨袍。——作者注

25 三千宠爱于一身

伊丽莎白女王才刚起床，她的侍女们正在工作。此刻她要戴上那副年轻的妆容、假发、精美的服饰与珠宝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向世人展现更完美的一面。当小艾赛克斯伯爵破门而入，跪在女王面前时，根据一名宫廷人士劳兰·怀特（Rowland Whyte）的记录，“女王才刚起身，整个人披头散发”，脸上满是皱纹未施脂粉。尽管陷入惊吓与尴尬之中，女王陛下依然保持冷静沉着，她伸出手让小艾赛克斯伯爵行吻手礼，并“私下与他谈谈”，“似乎让他感到非常满意”。

伊丽莎白女王完全不知道宫廷外发生了些什么事，可能认为自己的恐惧成真，小艾赛克斯伯爵可能带着一支精兵回来，准备罢黜她、监禁她。但他看起来态度依然相当好，女王陛下仍维持一定的风度要他先退下，同时允诺等两人都准备好后再行深谈。小艾赛克斯伯爵丝毫看不出女王内心的慌乱，也不知道自己已大大地冒犯了女王：“从女王的寝宫中出来后，他回到房里沐浴更衣，他的心情大好，甚至感谢天，尽管他在国外惹了许多麻烦与风暴，家依然给予他恬静的温暖。”

英国宫廷因流言揣测而沸腾了起来。“实在是太令人好奇了，他胆大妄为地直闯女王跟前，女王根本还没准备好，而他则是满身满脸的泥泞。”怀特记录下他的观察。

小艾赛克斯伯爵离开后，伊丽莎白女王很快地结束梳妆打扮，随即召集了当天在无双宫中的四位枢密院参事：罗伯特·塞西尔、亨斯顿勋爵二世、托马斯·艾格登爵士与诺斯勋爵，另外还有威廉·诺利斯爵士。十二点半，女王再度接见小艾赛克斯伯爵，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一切安好，女王以非常仁慈的态度对待他”。不久后就到了晚餐时间，他显得神采奕奕，并以爱尔兰的冒险故事来娱乐友人与宫中的侍女。但怀特感受到台面下的紧绷感：“我仿佛灵光乍现般，感受到此刻暗伏的危险。”

下午，透过罗伯特·塞西尔查明了没有叛乱的危险后，伊丽莎白女王再度召来小艾赛克斯伯爵，这一次“他却发现女王短时间内态度丕变，开始质疑他返国的动机，对于他擅离职守，让英军陷入危险之中也感到相当不悦”。小艾赛克斯伯爵于是动怒，并要求直接向枢密院亲自解释。女王“安排了几位贵族来听审，于是他们便在下午前往枢密院”，伊丽莎白女王则带着满腔怒火回到了房里。

小艾赛克斯伯爵此时被迫脱帽面对枢密院，而罗伯特·塞西尔则指控他违背女王陛下的命令，擅离指挥官职守，罔顾皇室命令，无意义地册封许多骑士“冗员”，且擅闯女王寝宫。五个小时过去了，他不断解释自己的行为，接着有人上前要他先退下，让枢密院会中场休息，讨论这件事。经过仅十五分钟的讨论后，枢密院参事们便要求女王下令逮捕他。

这天晚上十一点，“请阁下待在自己的房中，这是女王陛下给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旨意”：在他的行为受到彻底调查前，他都会被软禁在这里。他的政敌们准备瓮中捉鳖取他性命。隔天一早，枢密院急速召集了全体成员举行会议，小艾赛克斯伯爵又被带到会议上，负责的书记离场，接着关上枢密院大门。然后他接受整整三小时的严密审讯，这段时间他曾一度表现出“严肃审慎”的模样。听到小艾赛克斯

伯爵的证词，伊丽莎白女王无语，只表示自己要再想想。但事实上她的情绪陷入极度愤怒之中，也出现了报复的念头。此刻英国宫廷中出现各种流言，女王与其他枢密院成员仍在等待小艾赛克斯伯爵的余党出现，执行政变计划。到了十月一日清晨，他们都发现这样的忧虑只是无稽，伊丽莎白女王下令由一位友人掌玺大臣艾格登爵士来看守小艾赛克斯伯爵，将他软禁在艾格登爵士位于斯庄特的约克宅邸中，直到女王满意为止。他只能带着两位仆人，访客全部禁见，就连他的妻子也一样。被软禁后不久，小艾赛克斯伯爵便生了病——这次是真的了。

但就连罗伯特·塞西尔都不相信，女王会软禁他太久。

* * *

不久后，哈林顿爵士便接获小艾赛克斯伯爵的口信，哀求他到女王面前，让女王看看他的军事日志，希望能向女王证明自己尽了全力。哈林顿爵士并不愿意面对女王，担心女王会发现在停战协议达成后，他也与泰隆伯爵见了面，甚至接受了反叛军“丰盛晚宴”的招待。哈林顿爵士的恐惧果然成真，当他跪在女王面前发抖时，女王一个箭步逼近他，一把抓住他的腰带，大声斥责他。

“我的天，我简直就不是女王了！”她如狮吼般说：“那个男人比我重要。”接着“女王便快速地来回踱步”，对哈林顿爵士始终皱着眉头。他不住地发抖，仍将自己的军事日志呈交给女王，女王耐心地阅读了一次后，感到毫无新意。

“我的天，你们都是冗员骑士，国王代表更是糟糕透顶，竟聪明到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我们的信任！”女王骂声连连。吓坏了的哈林顿爵士尽可能地安抚她，但“她在盛怒之中什么也听不进去”，在场的所有人都不会怀疑“她是谁的女儿”。

“回去！”女王喝道。哈林顿爵士“并没有等到女王再说一次便脚底抹油”，“仿佛后有爱尔兰追兵般”奔赴克尔斯登。

过了一小段时间，哈林顿爵士便派妻子去女王面前为他求情，并意有所指地指示她告诉女王陛下，她透过对丈夫展现的爱意来感受丈夫的爱。伊丽莎白女王听懂了这个比喻，于是她说：“去吧！去吧！夫人，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经过了这些事情，我依然对我所有的丈夫们，也就是我的人民，抱持着善意；若非这一份特殊的爱，他们也不会给我们如此大的顺服。”语毕，她同意让哈林顿爵士返宫，但当哈林顿爵士真的回来后，女王仍忍不住要挖苦他。

“回到宫中之后，我总感到怒火中烧。”他向一位友人安东尼·史丹顿爵士这么说。

回到宫中才一个小时，女王陛下就威胁要把我送往舰队（街监狱）。我将回答化作诗篇，表示自己服役的时间已经太晚，希望自己不要被迫到舰队街的女王舰队上服役。三天后，所有人对于我仍是自由之身都感到讶异，但我真的很幸运，才过了四五天，女王就谈起了我的名字，也两度与我说话，只是非常短暂。最后她以非常仁慈的态度，在怀特霍尔宫的女王休息室中接见我，她自己同时身兼原告、法官与证人，洗清了我的罪名，仁慈地释放了我。我能说些什么呢？我觉得自己如同圣保罗般为极乐之地而狂喜不已，他在这里听见了人类难以讲述的真理；所以我也不需透露女王说了些什么。在进入天国之前，我再也不可能面对如此圣严的法官了，也没有人能像当时的女王陛下一样，集威严、学识、愠怒与宠信于一身。

十月份，爱尔兰与英国的停战协议到期，泰隆伯爵重新武装。伊丽莎白女王不减怒意，反而更加生气，大骂小艾赛克斯伯爵，并决定给他一个教训。“这种藐视王权的行为，就该公开受到谴责”，她向枢密院表示。同时女王也向法国大使表示，她要让小艾赛克斯伯爵知道，英国是谁当家做主。她气急败坏地表示，就算是她自己的儿子犯了这样的错，也要把他关进英国最可怕的监狱中。但其他国家的人并不知道她究竟有多愤怒，只是天天等着小艾赛克斯伯爵获释的消息。

就连枢密院也已多次建议释放他，他们的理由是，小艾赛克斯伯爵没有恶意，只是无能而已，他犯的错并不严重。

但“女王陛下的怒意似乎不能稍缓”；几个月后，女王陛下才告诉法国大使，小艾赛克斯伯爵抗命的情节有多严重，她其实没有向枢密院据实以告，尽管没有详尽阐述，但历史上留下极少的证据显示，女王陛下认定小艾赛克斯伯爵可能在前往爱尔兰前，就已经与泰隆伯爵狼狈为奸。若果真如此，他的确是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但可想而知，女王陛下掌握的一切并不足以将他定罪，因为女王陛下并不确定该拿小艾赛克斯伯爵怎么办，并要多年后曾记录下这段对话的弗朗西斯·贝肯提供一点意见。贝肯嗅到小艾赛克斯伯爵前途毁于一旦的意味，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治前途，于是决定抛弃他，将全部心力用在迎合女王的要求上。于是他告诉女王，他认为小艾赛克斯伯爵的罪行严重。他建议，绝对不要再派他回爱尔兰。

“如果我还派他回爱尔兰，我就嫁给你！我说到做到！”女王大声呵斥。女王表示自己希望能定小艾赛克斯伯爵的罪，但要怎么做呢？他犯下了叛国罪吗？他的罪行足以送交闭门会议吗？贝肯建议，这些做法都很不妥当，因为虽然小艾赛克斯伯爵非常无能，但政府却掌握不到他蓄意胡为或叛国的证据。在证据不足的情形之下，若贸然将他定罪，依据他受到的欢迎程度来看，英国显然要面对一场民权运动；毕竟，女王陛下在毫不起诉的情形下，将他软禁这么长一段时间，民间已经开始传出反对声浪。这不是伊丽莎白女王希望听到的答案，两人的会面就在女王难看的脸色中结束了。但事后她仔细思考了贝肯所说的一切，英国当时的社会气氛的确不太适合，也相当容易挑起冲突。

十一月十七日女王登基日，伊丽莎白女王展现出无忧无虑的样子，欣赏马上比武竞赛好几个小时。一周后，为了宣布由蒙袭依勋爵

取代小艾赛克斯伯爵出任爱尔兰国王代表，女王突然决定要公开向臣子们说明她对小艾赛克斯伯爵处置的理由。当时的传统，在会期结束的那一天，掌玺大臣必须在闭门会议法庭上发表演说，女王则决定“为了满足社会的期待”，并镇压“法庭外、城市外与国外的危险叛徒对女王陛下与枢密院的流言蜚语”，她要利用这个场合来宣读小艾赛克斯伯爵所犯下的各种令人遗憾的罪行。

小艾赛克斯伯爵也收到与会通知，他哀求地表示自己得了“爱尔兰病”，已经病重无法出席。但伊丽莎白女王并不采信他的借口，因此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下午，他在伍斯特勋爵与由舵手送达约克宅邸的华威伯爵夫人陪同下与会。闭门会议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历史上甚至没有留下在垂死边缘挣扎的小艾赛克斯伯爵与女王见面的证据。

无论如何，到了十一月二十九日，枢密院参事、法官与许多平民们，严肃地聚集在闭门会议中，小艾赛克斯伯爵则以在爱尔兰战事中办事不力，浪费高达三十万英镑公帑，私自与泰隆伯爵联系，有辱国家声誉，以及违抗女王命令、擅自抛下部队而遭到起诉。

贝肯并不在场，当女王问他为什么时，他表示许多人都认为他是背信弃义、背叛朋友的人，因而受到严重的暴力威胁而不敢前往。女王完全不相信他，随后几个月都不愿跟他说话。

小艾赛克斯伯爵的罪行公之于世后，闭门会议的审判也告一段落，他依然被软禁，但许多人依然认为，在未经审判的情形下“就先判定一个人有罪”是不公平的事情。

* * *

在遭到软禁的几周内，小艾赛克斯伯爵蒙受许多痛苦。他正因为肾结石而疼痛不堪，加上不断复发的痢疾，除了仆人之外，他也见不到任何人的面，足不出户，向女王求情的信件也石沉大海，这些让他陷入极度绝望之中。就连勇敢前去探望他的哈林顿爵士，都不敢为他带一封信给伊丽莎白女王，毕竟他与女王的关系才刚恢复，不想“因为小艾赛克斯伯爵的事情再栽一次跟斗”。但英国人民依然未对小艾赛克斯伯爵失去信心，当他病重的消息走漏后，人们就更加怜惜他了：伦敦街头散发着赞美他的宣传手册，内容直指他是无辜的；宫廷的围墙上甚至出现亵渎女王与罗伯特·塞西尔（他被视为是影响女王思想，让女王痛恨小艾赛克斯伯爵的元凶，甚至严重到必须由随扈陪同才能出门）的涂鸦；全国各地的布道会上，牧师们也为这个新教信仰的代表祈祷，呼吁伊丽莎白女王仁慈宽厚。最严重的是，（女王口中的）“邪恶叛徒”则开始大胆地针对女王扯出“挑衅的传闻与诽谤的谎言”。一切的现象都让她非常烦闷，毕竟她穷及一生都在追求臣民的忠诚与爱，女王简直无法忍受看见他们的不满。

因此，十二月初，伊丽莎白女王仁慈地允许长期待在宫中的小艾赛克斯伯爵夫人，刻意穿着丧服在白天时前往探视丈夫，但此时小艾赛克斯伯爵的身心都已病重，因此法兰丝断言“小艾赛克斯伯爵康复的可能性渺茫”。根据怀特的记录，“哀伤让他病重并且衰弱，并迫切地想要早点知道女王陛下打算如何处置他。他吃得很少、睡得很少，靠着流质物体维持基本生命，让身体的炎症加剧”。

听到此消息，女王也相当难过，于是派了八位御医前往诊治，但他们的检查报告都不乐观：他的肝脏“功能丧失，逐渐衰竭”，他的肠子全都溃烂。他无力走路，当仆人们要为他更换被内脏深黑脓血浸湿的床单时，他还得由人搀扶。医生只能开立灌肠剂作为药方，以涤净他的排泄系统。伊丽莎白女王于是下令，将他移居到艾格登爵士家最好的房间，女王眼泛泪光地派遣信差带着几帖汤药与一封能安慰小

艾赛克斯伯爵的信件前往探视，信中女王允诺，若能在符合礼仪的状态下探视她，她非常愿意。女王甚至暗示，等到小艾赛克斯伯爵身体好转后，可以到约克宅邸的花园中透透气。

尽管如此，此时的伊丽莎白女王已经搜集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小艾赛克斯伯爵与泰隆伯爵间的联系已经到了叛国的境界，因此女王依然坚持要惩罚他的罪。但女王陛下愤怒之余仍感忧伤，她后来告诉法国大使，她依然希望能“助小艾赛克斯伯爵悔改”，因为他“仍有非常良善的一面”。

十二月十九日，有谣言指出小艾赛克斯伯爵逝世，许多教堂因而敲起丧钟。罗伯特·塞西尔家的门前，有人字迹潦草地写着：“这里住着个讨厌的家伙！”当女王听闻教堂牧师为小艾赛克斯伯爵祈祷一事时，随即下令他们停止，因为她知道小艾赛克斯伯爵不仅还未死，反而有逐渐好转的迹象。一周后，他已经能坐起，没多久就可以上餐桌吃饭了。

这一年的圣诞节，伊丽莎白女王在里奇蒙德宫度过；宫中人满为患，充满喜悦，女王也看起来神采奕奕，一边与沙克维尔伯爵

（Sackville）和罗伯特·塞西尔玩着纸牌，一边看着侍女们在谒见室中表演乡村舞蹈。同时也依据女王的喜好，献上了“戏剧表演与圣诞节派”。也有不少人在讨论潘布鲁克伯爵的继承人——年纪轻轻的威廉·赫伯特，近来因为他“慎重地循着讨女王欢心的道路前进”，因而在宫中快速累积人气，但事实上他是个乏味单调、毫无野心的年轻人，只爱看书不爱比武，“很快地许多人都发现，女王不欣赏他，全都是他的问题。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缺乏精神，而且是个郁郁寡欢的人”。

一六〇〇年的主显节，一名西班牙探子回报：“伊丽莎白女王大开宴席，英国与爱尔兰教会领袖，都看到垂垂老矣的她跳了三四曲的

双人舞”。

* * *

小艾赛克斯伯爵的姐姐瑞奇小姐，因为不断为弟弟求情，也招致女王陛下的不悦。在她的恋人蒙裘依勋爵于二月七日出发前往爱尔兰前，他向南安普敦伯爵与小艾赛克斯伯爵的友人查尔斯·丹佛斯爵士面授机宜，教他们如何给予小艾赛克斯伯爵最大的帮助。他们也都同意，要告诉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塞西尔派系不断阻挠他的英王之路，以拉拢他的势力，并告诉他，他继承英国王位之路唯一的希望，但看小艾赛克斯伯爵是否能恢复与女王的关系。若詹姆士六世愿意展现军事实力，协助达成目的，蒙裘依勋爵便会带着四千到五千兵力，从爱尔兰南下会合支持他的行动，逼迫伊丽莎白女王同意他们的要求。这三人私下都与小艾赛克斯伯爵有联络，他显然知道也同意这个阴谋计划。但詹姆士六世以外交辞令表示自己毫无兴趣，因此计划便遭到搁置。

一月底时，小艾赛克斯伯爵再度恢复健康，伊丽莎白女王则恢复了强硬的态度，向参事们宣布，她要在二月八日的闭门会议中公开以叛国罪处置他。罗伯特·塞西尔与贝肯因忧心公众意见而劝退了女王，并进一步说服女王私下解决小艾赛克斯伯爵的问题。在罗伯特·塞西尔的建议下，小艾赛克斯伯爵写了一封恳切的信件，请求女王陛下的原谅，并恳求女王降罪于他。“我心中的泪水淹没了我曾有的骄傲。”小艾赛克斯伯爵宣称。在闭门会议的最后一分钟，女王陛下才不情不愿地取消了计划。

三月三日，怀特发现：“女王陛下对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怒气丝毫不减。”艾格登爵士觉得再也无法忍受现况，在他的多次抗议下，伊丽莎白女王总算在三月二十日同意让小艾赛克斯伯爵在李察·伯克里爵士（Sir Richard Berkeley）的监管下，返回艾赛克斯宅邸接受软

禁。此时艾赛克斯宅邸华丽的外表已被取下，此外小艾赛克斯伯爵不得擅离，也只能有几位仆人伺候。他的家人也不准与他住在一起。他依然不断寄出哀伤的信件给女王，要求女王继续关爱他。“我曾如此忠诚宣誓将生命奉献给女王陛下，神是见证。”他再度向女王发誓。

莱礼爵士非常忧心，罗伯特·塞西尔与女王对待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态度不够严苛，于是警告他：

我不够聪明，无法给你什么建议，但若你对这个恶人心软，等到太迟了，懊悔也来不及。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恶意，就算你采取温和路线，也无法消弭他的恶。不要失了你的优势。若你让步，我便能预见你未来的命运。他将成为女王权势与安危最大的威胁。若他重获自由，女王的好日子告终，而我们也一样。

此时小艾赛克斯伯爵早已与身在爱尔兰的蒙裘依勋爵密切通联，向他提出要求，就算詹姆士六世不愿出手，仍要带兵返国协助他。但蒙裘依勋爵此时亲眼见证了爱尔兰的情势后，对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怜悯大减，加上眼前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打倒泰隆伯爵。于是他便表示“无论小艾赛克斯伯爵阁下的野心是什么，他都不愿透过任何行动协助他”。此时小艾赛克斯伯爵再度写信给女王陛下，向她表示“自觉像个被扔到墙角的死尸”。

这一年的春天，伊丽莎白女王精神萎靡不振，显然被处置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方法两头拉扯。斯葛洛普小姐带来一封小艾赛克斯伯爵的信，信中哀求女王陛下，让一位拥抱哀伤不断期盼的人，重新回到女王的怀抱，伊丽莎白女王则忧愁地回复：“没错，的确是这样。”

* * *

对于小艾赛克斯伯爵仍遭监禁一事，英国民间的怒火甚嚣尘上，许多人深信，他未能接受审判的原因，是因为“政府缺乏将他定罪的

不利证据”。为了打击这些流言，六月五日，伊丽莎白女王在约克宅邸，让小艾赛克斯伯爵面对十八位枢密院参事组成的委员会，掌玺大臣艾格登爵士则在旁陪审。还有两百位平民受到邀请出席这场审判。这并非正式的法院，而是为了公布女王事先同意的罪与罚，因而得到女王授权召开的法庭，而女王陛下则是透过此举来操作公众意见。会后许多臣子都开始认为，女王陛下正在为和解之道铺路。

这场庭讯耗时十一小时。囚犯对于自己该怎么做了然于心，于是跪在一群端坐的枢密院参事面前，总检察长爱德华·柯克爵士则宣读他那“罄竹难书的违法行为”。其中情节最重大的，莫过于他恶劣的企图与不服从，但文中也为他开脱，表示他对女王的忠诚度并未受到质疑。王室的四位律师谴责他的行为不端；当小艾赛克斯伯爵看到往昔的友人贝肯也在其中时，感到相当震惊与受伤。事实上，贝肯曾哀求女王不要这么做，但女王坚持一定要他出席。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多亏有大主教约翰·惠特吉夫（Archbishop Whitgift）的协助，小艾赛克斯伯爵总算有椅子可以坐。在几个小时的指控之下，也该是他为自己的错误行为道歉，并恳求女王怜悯的时候了，此时总检察长却擅自发表了攻击小艾赛克斯伯爵的长篇大论，激起小艾赛克斯伯爵满腔的愤怒。庄严的聆讯，很快就变质成为互相攻讦，一直到罗伯特·塞西尔介入，主角们才下戏。小艾赛克斯伯爵则在激动又感人的演说中，表示自己有罪，并针对冒犯了女王深深地表达自己的悔意。“我愿剖开胸膛取出心脏，让诸位看看里面是否有任何一丝不忠的思想！”他哭喊着。

委员会认定小艾赛克斯伯爵诸多犯行全都有罪，艾格登告诉他，若这次召开的是一般法庭，他可能会被罚大量的罚鍰，并终身监禁在伦敦塔中，但毕竟这不是一般法庭，且他也招认了所有的犯行并恳求女王的原谅，他可以回家等待女王陛下的宣判。“看到这原本集三千

宠爱于一身的人，现在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了，真是令人惋惜。”怀特记录下这一刻，许多围观的人也都流下了眼泪。

伊丽莎白女王下令将他带离枢密院会，卸除他王室典礼大臣与机械统领的职务，只让他留下骑士统领的身份。女王曾考虑要释放小艾赛克斯伯爵，但罗伯特·塞西尔与莱礼爵士都提出警告，他一定会再兴风作浪，因此在聆讯过后，小艾赛克斯伯爵依然被软禁在艾赛克斯宅邸中。

三周后，伊丽莎白女王决定取消所有小艾赛克斯伯爵册封的骑士。此举引发宫廷的一阵混乱，许多人根本不敢想象，若告诉老婆她们不再拥有“骑士夫人”的称号，只是个一般的“夫人”会如何。罗伯特·塞西尔因而出手相助，但又过了一段时间，女王陛下才决定放松她的态度。幸运的是，爱尔兰传来了好消息，蒙袭依勋爵证明了他的策略奏效。

* * *

到了夏天，伊丽莎白女王依然忙碌不已。到格林尼治大公园中散步、骑她最宠爱的马灰池与黑威佛，甚至常常公开跳舞，希望能证明“自己不如某些人想得那么老”。她也多次接受贵族人士招待的晚宴，到靶场射箭，在看法国特技演员的走钢索表演时，她也感到相当紧张，甚至观看熊、公牛与猩猩在比武场上的大乱斗。

六月十五日，女王前往布莱尔，参加她最爱的一位首席侍女安·罗素（Anne Russell）与威廉·赫伯特爵士（William Herbert）的婚礼。婚宴过后，由八位宫廷侍女穿上寓意十足的装束，表演了一场假面剧，女王的另一位侍女玛莉·费顿（Mary Fitton），邀请女王共舞。女王陛下询问她的服装代表了什么意义，玛莉·费顿回答：“钟爱。”

“钟爱！”依然因小艾赛克斯伯爵的背叛而伤感的女王嗤之以鼻。“钟爱是假的！”但女王依然加入了共舞的行列。

这一年的八月与九月，伊丽莎白女王每天都外出打猎，此时已年届六十七岁的她，甚至计划长途出巡，前往威特夏与法纳姆，让皇室许多年纪较长的成员语多抱怨及抗议，“于是女王请年纪较长的人士留下，年轻力壮的宫廷人士与她一同出巡”。后来她想到了更好的方法，于是带着一长串队伍前往无双宫，接着转往艾维萨姆，再到欧特兰，据传她在这里显得“非常快乐，状态极佳”。接着她没有出巡，反而是出宫多日，前往贝丁顿公园拜访弗朗西斯·加露爵士（Sir Francis Carew），并到克罗伊登宫拜访约翰·惠特吉夫大主教，还来到她在新森林中的狩猎小屋。

女王的心情起伏变化很大。在肯特郡的彭斯赫斯特庄园中，她显得意志低沉，负责招待她的罗伯·西得尼爵士，因而告诉哈林顿爵士：

对于我们一切的努力，她似乎感到非常满意。我儿子对女王发表了一篇演说，而女王也和蔼地给予回应。侍女们在她面前跳舞，小号手在回廊中演奏，她会吃一两口浓郁的水果蛋糕，用金杯喝一点果汁。最近的几起风暴，似乎让她变得更加羸弱，伯利男爵之死常常让她那美丽的脸庞布满泪水。她偶尔外出，但鲜少这么做，多数时间都独自沉思，有时也会私下写信给好友。一次她在楼上召来仆人，就连在房子附近绕绕都显得疲倦，并表示自己下回会再来。她的到来与离开时，都有六名鼓手与喇叭手在院子里等着她。

这一年夏天，英国已经连续七年歉收。这一段时间以来，女王总忙着处理国家的经济问题。死亡与饥荒引发广泛的不满与社会秩序紊乱，各界纷纷炮轰政府与西班牙昂贵的长期战争，大大地影响了英国的贸易。伊丽莎白女王难以维持收支平衡，只能被迫贱卖手上的土地、珠宝，甚至是亨利八世的国玺，才能勉强支撑负债。许多宫廷人

士也只能仰赖垄断货品与民生用品糊口，但剥削这个系统的结果，便是导致国会的诸多抱怨。

* * *

在六月份聆讯过后，贝肯曾写信给小艾赛克斯伯爵，为参与那场审判表达歉意，同时建议他连续写两封信，经由贝肯润饰后，用来请求女王的宽容。其中一份上面写着：“现在，听过了女王的正义之声后，只能卑微请求，陛下让臣听听您平时正常的声音，只要女王陛下悲悯，臣就能进入另一个境界。若女王陛下恩准，让臣再一次跪倒在女王足前，看着那美丽又仁慈的双眼，就算再受到女王陛下的惩戒，将我打入大牢，甚至是判我死刑，能得女王陛下的怜悯，此生足矣。”

这封信达到了些许的效果。七月份，伯克里爵士不再看守他了，但女王仍下令要小艾赛克斯伯爵待在家中，八月二十六日，在贝肯的建议下，女王总算还给小艾赛克斯伯爵自由。但他依然不准靠近皇宫一步，也不许担任公职，于是他宣布自己将退隐山林。但他与朋友们仍希望得到女王陛下的原谅，而对女王陛下来说，小艾赛克斯伯爵仍未展现出适当的谦逊态度。

小艾赛克斯伯爵依然背负沉重的债务，负债将近一万六千英镑。债权人都显得越来越焦躁不安，但他只是一心企盼着，女王会恢复他独霸甜酒市场的地位。这份合约于米迦勒节告终前，一直在他的收入中占最大宗。因为他写信告知伊丽莎白女王这件事，刻意让她发现他尴尬的处境，但当他开始密集地用更多信件攻势来游说女王时，女王向贝肯坦言：“亲爱的小艾赛克斯伯爵写了很多相当恭顺的信件给我，我也感到十分感动，但……”——此时女王发出了讽刺的笑声——“但经过我仔细思考，我发现他只适合甜酒产业。”贝肯只好代

为求情，“不要完全剥夺伯爵阁下服侍女王的愿望”，但女王陛下却漠视他的请求。

小艾赛克斯伯爵并不知道女王已经看透他了，在回到伦敦后，他一直希望女王同意接见他，于是再一次不顾一切地写信给女王：“臣渴望得到一纸证明，快乐地见到女王陛下，以消除被放逐的不愉快；臣欲亲吻陛下那双公平公正的手，让它治愈我的忧伤，但臣最大的伤口，恐怕已无药可救。来自痛苦、焦急又绝望的SX^[1]，向您请求。”伊丽莎白女王一直无视于他的来信，但这次她派人送上口信：“这样的谢意总会受到欢迎，也永远不过时，他已经相当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他做的一切都是出自善意。”

米迦勒节来了又走，但女王仍未允诺让他再度掌握甜酒市场。历史上留下的证据显示，此时英国政府已经发现他与蒙裘依勋爵的阴谋，那一阵子他甚至还更进一步要求，希望蒙裘依勋爵尽快对英国宫廷发动攻击。

“贪腐的情事——做得越多，伤得越大。”伊丽莎白女王冷冷地说，“难以驾驭的野马只要吃不到粮草，就会变得比较好控制了。”

十月十八日，小艾赛克斯伯爵最后一次绝望地向女王请求：

臣的灵魂哭喊着女王陛下的恩慈，臣欲回到陛下身边，盼结束这漫长的流放。若女王陛下同意臣的请求，陛下肯定是世上最仁慈的君主。若臣不得愿，留得一命、得到自由、过去的宠爱与惩戒又有何意义；在我能见到女王陛下慈爱的脸，亲吻公平公正的那双手前，时间仿佛就像无休止的夜晚，对女王陛下最忠诚的奴仆来说，这世界就像个巨大的坟墓。

十月底，伊丽莎白女王宣布此后甜酒事业的利润由皇室独享；也许女王的用意是要在小艾赛克斯伯爵补偿了所犯下的罪行后，再恢复他的权力，但目前为止，小艾赛克斯伯爵只能宣告破产。

这件事，加上几个月来健康情形不佳、极度的焦躁与压力，终于击垮了他。若说在这残酷的一击之后他便丧失了正常的心智，实不为过，此时更恰好碰上蒙裘依勋爵明确地拒绝协助他。他仿佛着魔了一般，一下极度愤怒，一下又掉入忧郁的黑暗深渊。此时来探望他的哈林顿爵士，记录下他的所见：

生涯抱负受到阻挠，让他很快便陷入疯狂。他的心情不断在痛苦忏悔和愤怒仇恨中摆荡，让他几乎失去了理智、心神。他会说一些奇怪的话，出现一些奇怪的念头，让我想赶快离开他所存在的地方。当他谈起女王时，其内容完全不是一位身体健康心灵健全的人会说的话。他身边总围绕着坏人，更多的邪念就由此出现。女王最懂得如何驾驭高傲的心灵，但拥有高傲心灵的人，却不懂得让步。小艾赛克斯伯爵的灵魂似乎正前后摆荡，就像气候恶劣的海浪。

有人将小艾赛克斯伯爵的一句话转达给伊丽莎白女王：当某人，可能是哈林顿爵士，提及“女王的条件”这个字眼时，他随即打断对方，大吼：“她的条件！她的条件和她尸体一样又臭又邪门！”女王完全无法原谅这件事。

但他的愤怒不只是嘴上说说。此后在他那聪颖又具有野心的秘书亨利·卡夫的阴谋诡计煽动下，小艾赛克斯伯爵暗地里展开了反叛之路，而亨利·卡夫则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背后的主谋。他变得偏执，认定自己运气不好，让政敌要摧毁他而设计的阴谋成功，罗伯特·塞西尔不只密谋要谋杀他，还与菲利普三世共谋要让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亚（Infanta Isabella）坐上王位。他紧急通知女王这件事，要女王尽快远离这个心怀不轨的政要并与他和解，让他回到女王身边。若她不听，那他只好强行：卡夫说服他，回到女王身边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军队友人以及长期爱戴他的人民协助下，直接闯到女王身边。卡夫告诉他，为了荣誉，他不得不这么做：他必须拯救自己的名声。

因此，小艾赛克斯伯爵开始与心有不满的贵族人士联系，包括南安普敦伯爵、拉特兰伯爵，以及他那帮可靠的朋友，像是查尔斯·丹佛斯爵士（Sir Charles Danvers）、小艾赛克斯伯爵的继父克里斯多福·布朗特爵士（Christopher Blount）、天主教异议人士弗朗西斯·特雷舍姆（Francis Tresham）、小艾赛克斯伯爵秘书亨利·卡夫、威尔士籍管家盖利·麦瑞克爵士（Sir Gelli Meyrick），甚至还有他的姐姐蒙裘依勋爵夫人瑞奇小姐（Lady Rich）。为了达到奇效，小艾赛克斯伯爵告诉詹姆士六世，他们设想罗伯特·塞西尔可能的企图，也就是让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亚成为英国女王，呼吁他强硬要求伊丽莎白女王宣布他为英国王位继承人。为此詹姆士六世感到心烦不已，因此以加密后的讯息回复，小艾赛克斯伯爵则仿如炫耀般，将这些信件装在黑色囊袋中，挂在脖子上到处招摇。

很快，这些叛徒的集会，除了艾赛克斯宅邸外，还延伸到南安普敦伯爵住所，以及特鲁里宅邸。小艾赛克斯伯爵甚至企图闯入女王寝室，监禁她，再以女王之名统治英国。还好有罗伯特·塞西尔的探子们，这一群年纪轻轻、爱吹牛皮的纨绔子弟总是在斯庄特会面，让这些探子起了疑心，因此国务大臣罗伯特·塞西尔完全摸清他们想要什么花招，于是准备守株待兔，等小艾赛克斯织出一条绵密的犯罪网后，准备让他作茧自缚。

* * *

十一月份，英国—荷兰联军在新港大胜西班牙军队后，荷兰战争总算告一段落。此刻全英国上下包括女王，都只想要安全的生活，与西班牙维持有尊严的和平。

女王登基日再度来临，怀特霍尔宫一如往常大张旗鼓地庆祝。这一天，小艾赛克斯伯爵写下了历史记录上的最后一封信给伊丽莎白女王，恭喜她登基四十二周年，并再度请求她的原谅：“臣不时想起

（在比武场上）奔驰的日子，接着又不禁思考着，若与陛下见面会是什么光景，但这两件事，我都已经无法得到您的允许，也被您拒于千里之外。”但他同样得不到答案。

此时他已召集相当多的支持者，根据宫廷史家威廉·康登记载，包括“所有的剑客，大胆、有自信的宫廷人士，仕途不顺遂的人，并以各式各样的花言巧语来诋毁他人的人”。边缘人士、反社会人士、军队游离分子、清教牧师、天主教鬼子、探险家与所有的反抗分子，都知道艾赛克斯宅邸的大门为他们敞开。这个团体中几乎所有人都处于经济吃紧的状态，包括小艾赛克斯伯爵的贵族支持者，这是对他们相当不利的情形，但他们认为只要起义成功就会有所改善，这些人早已被蒙蔽，将爱国热情寄托在错误的地方。就连蒙裘依勋爵听到瑞奇小姐加入这个阵营，都开始向他们提供协助，希望这场反叛行动会成功。

圣诞节到了，小艾赛克斯伯爵再一次请求詹姆士六世支持他们，一同对抗塞西尔派系，要求他“阻止这个男人的阴谋、邪恶与疯狂，拯救我那在沉重压力下呻吟的可怜的国家”。他声称：“女王陛下被蒙蔽了双眼，看不见自己的危险。”詹姆士六世同意派遣一位苏格兰大使支持小艾赛克斯伯爵的行动，但一切都要先等小艾赛克斯伯爵正式展开政变行动。

整个圣诞节，伊丽莎白女王都待在怀特霍尔宫；罗伯特·塞西尔服侍女王到晚宴时刻，到了十二月二十六日，宫廷中处处歌舞，女王则与帕玛尔先生一同表演了库伦特舞曲。同时也观赏了这个季节中宫廷总会演出的十一出戏剧。

* * *

在一六〇一年的前几周，小艾赛克斯伯爵总算拟定政变计划，准备三月份展开行动，而他的同党们，则在伦敦各地散布天主教政变的流言。他们决定，一旦掌握了市政厅与伦敦塔，小艾赛克斯伯爵便会接近女王，“安静、迅速得连狗的舌头都来不及伸出来”，接着要求女王召开国会，他便能借机弹劾罗伯特·塞西尔、莱礼爵士与他们的同党，小艾赛克斯伯爵本人则成为摄政王。尽管小艾赛克斯伯爵命令大家无论如何不能伤害女王陛下，但克里斯多福·布朗特爵士表示：“若行动失败，与其面对失望，不如一尝女王陛下的鲜血滋味。”

小艾赛克斯伯爵的一名友人费迪南德多·格吉斯爵士（Sir Ferdinando Gorges）感到相当恐怖，因而将此事告知莱礼爵士。莱礼爵士便向枢密院提出预警，但罗伯特·塞西尔早有准备。二月初，罗伯特·塞西尔刻意放出假消息，指小艾赛克斯伯爵即将被送入伦敦塔大牢。听到此消息，小艾赛克斯伯爵知道时间不多了。

二月七日早晨，一名女王派遣的差使要求他马上前往枢密院，让小艾赛克斯伯爵更感急切。他的朋友们警告他不要去，担心他可能因此遭到逮捕，并呼吁他尽速展开行动。他曾短暂地考虑过逃亡，但他实在无法拒绝荣耀的希望，也无法放弃支持他的人们，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会以他之名起义。他于是将宫里派来的差使遣回，要他表示“小艾赛克斯伯爵刚打完网球，正在休息，全身冒汗”，因此无法参加枢密院会。接着他召集了三百位支持者，向他们表示罗伯特·塞西尔与莱礼爵士正在计划暗杀他，因此敲定隔日起义。他再一度重申，千万不能伤了女王陛下。

是日稍晚，为了激起伦敦民众的情感，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朋友盖利·麦瑞克爵士（Sir Gelli Meyrick），付了四十先令给莎士比亚与宫务大臣剧团的演员们，莎士比亚才不情不愿地在南岸的环球剧场演出激昂的剧作《理查德二世》，还要加上被禁演的退位戏码。

罗伯特·塞西尔已经准备好迎接冲突：他从附近各郡召来兵员，并透过伦敦各级牧师散布消息，要居民翌日待在家中，并安排怀特霍尔宫以两倍人力看守。负责在宫中卧底的丹佛斯爵士，赶紧通知小艾赛克斯伯爵，他的密谋计划曝光，要他能逃就尽快逃。小艾赛克斯伯爵完全不听劝。

隔天，也就是二月八日，他真的策动了政变。当他在艾赛克斯宅邸的庭院中，召集了友人、支持者与两百兵力时，出现大声骚乱，就连女王都听到了，于是女王派遣掌玺大臣艾格登爵士、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帕普汉爵士、伍斯特伯爵与威廉·诺利斯爵士去一探究竟，并坚持要小艾赛克斯伯爵亲自向枢密院解释。小艾赛克斯伯爵邀请这些人到他的图书馆中，但院子中的暴民包围了阶梯上的来者，大吼：“杀了他们！杀了他们！”这压过了官员们要他们放下武器的声音。小艾赛克斯伯爵将四位枢密院参事锁在图书馆中，接着与早已失去控制的追随者一同徒步离开前往伦敦市区。

他并未全副武装，仅穿着平日的服装，以表达和平意愿，身上唯一的武器是一把剑，他穿过了坦普尔大门，走进舰队街，大喊着：“为女王而战！为女王而战！英国王位将被出卖给西班牙人！有人设计要取我性命！”但他高估了自己的声望与可信度：伦敦民众不但没有飞奔到他身边，反而在惊吓之余待在屋内，有些人甚至想要阻止他穿越拉得关，但却失败，而拉得关早已紧闭，以防他闯入。等到他抵达圣保罗大教堂时，他只能面对残酷的事实，没有人会为了他站出来起义。他转向威普塞街后，他的脸上“满是冷汗”，心中满是恐惧。当他抵达一位支持者，也就是伦敦郡长的托马斯·史麦斯（Thomas Smyth）家中时，因为实在流了太多汗，还得请人给他一件干净的衬衫。但此时他的追随者早已弃他而去，用斗篷遮住自己的脸，史麦斯则非常后悔，自己怎会涉入如此疯狂愚蠢的阴谋中，赶紧从家中后门

溜走，前去禀报市长，此时市长正忙着遵照女王发布的禁制令，召集民众对抗叛徒。

此时，英国传令官已经出发，准备到各国发布小艾赛克斯伯爵为叛国贼的消息，政府军队则从查令十字路到怀特霍尔宫一路步下许多路障。许多民众赶忙前往怀特霍尔宫，其中一人表示：“从未见过宫廷之中如此吵闹喧嚣。”约翰·雷维森爵士（Sir John Leveson）带领的一支部队则镇守着拉得关，进入伦敦城的七个大门全都关闭。

下午两点，小艾赛克斯伯爵眼看大势已去，抛弃了剩下的所有追随者，逃亡到昆西斯去，搭上驳船回到家中，却发现格吉斯爵士放了他的人质，接着与他们一起回到怀特霍尔宫。在了解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尴尬后，小艾赛克斯伯爵将自己关在房里，烧掉许多密谋造反的文件与放着苏格兰王信件的黑色囊袋。但要不了多久，女王陛下的士兵们在诺丁汉准将（Lord Admiral Nottingham）的带领下，来到他的宅邸，将他团团包围，用枪炮对着他，要他弃械投降。

小艾赛克斯伯爵爬上了屋顶挥舞着佩剑。“我很快就要飞向天堂！”他大吼道。诺丁汉准将则回答，那很好，反正他就要炸烂这间房子了。小艾赛克斯伯爵别无选择，只能出面，晚间十点刚过，他便交出了佩剑。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将管家阿布迪亚希顿带在身边。不久后，八十五位叛徒也被团团包围，收押囚禁。

* * *

在反抗行动情势未定前，伊丽莎白女王一直表现得稳定沉着，展现出无比的勇气，她从容地对罗伯特·塞西尔下指令，且从不质疑人民的忠诚度。她照常进餐，表示神让她登上了王位，也会保全她的性命，因此绝不让宫廷日常的事务受到影响。她曾一度收到错误的讯息，表示全伦敦城都已归顺小艾赛克斯伯爵，但女王的表现“却仿佛

只是听到有人在舰队街吵了一架”。“女王本来还想出外了解，到底是哪些异议人士胆敢试图推翻她，还好她的参事们好说歹说，才让她继续待在宫内。”对于女王全然相信神的安排，诺丁汉准将极其佩服：“我亲眼见证女王陛下高贵坚毅的情操，仿佛救世主般挺立不摇，甚至想要亲自面对狂妄的叛徒，将一切交由一直保护着她的神来裁决。”当罗伯特·塞西尔为“女王得以安然无恙的喜悦”而表达感激时，他是为许多人表达出他们的心声。

在意外中，女王陛下展现出自己依然是全国最有权威的统治者，特别下令当晚就在重兵戒护下，将南安普敦伯爵与小艾赛克斯伯爵带往兰贝斯宫，而不是伦敦塔，因为“夜太漆黑，（伦敦）塔桥底下难以通行”。但到了隔天清晨三点再度涨潮时，他们便正式被送进了伦敦塔，此外还有包括拉特兰伯爵、丹佛斯爵士、布朗特爵士及其他贵族出身的叛徒。伊丽莎白女王在确定命令执行完毕后，才能安稳入睡。卡夫与其他平民反叛人士则被关进一般大牢。

二月九日，女王告诉法国大使，小艾赛克斯伯爵“是个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终于展现埋藏心底深处的真面目”。女王也承认自己过去纵容他太久，越说越激动，甚至不屑地谈起，小艾赛克斯伯爵如何走遍伦敦市区，高谈阔论却毫无作用，最后还羞耻地躲回家中。若他胆敢踏入怀特霍尔宫一步，女王宣称，她一定会在大门等他、面对他，“一次解决由谁做主的问题”。

在小艾赛克斯伯爵起义失败后，紧张的情势依然存在。哈林顿爵士发现，伊丽莎白女王显得“了无生趣”，甚至没有精神穿戴华丽的服饰。

餐桌上多么精致的食物，都无法引起她的兴趣，只吃一点白面包和浓汤。来自市区的任何消息，都让她心烦意乱，侍女们做的每一件事，她都看不顺眼。我不能说太多，但这么多邪恶的策略阴谋，让女王陛下的好脾

气消磨殆尽。她常在房里踱步，只要听到坏消息就气得跺脚，一次她甚至将一把钝剑刺进了挂毯（绣帷）中。尽管危险已经过去，她就连吃饭都还是随身带着佩剑。所有的骚乱都已平息，但女王陛下仍无心打扮，好几天才换一件衣服，只要有人令她担忧，就会受到责骂，她也完全无法承受任何情绪打击。

伊丽莎白女王希望叛变事件的主谋尽快面对审判，不要误了时机，枢密院已经开始展开调查，解开这场注定失败的阴谋诡计背后的细节。二月十三日，在闭门会议中，公开了叛变的细节。四天后，小艾赛克斯伯爵、南安普敦伯爵与其他贵族的起诉书起草完毕，同时决定两天内处决两位主谋。贝肯早已选择靠向王权这一边，因此也不需为这次的意外感到愧疚。因为蒙袭依勋爵在爱尔兰大胜，因此女王也打算对他涉案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女王也克制住自己，不向詹姆士六世抱怨他支持小艾赛克斯伯爵一事。

到了二月十二日早上，伊丽莎白女王处决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意志更坚定了，小艾赛克斯伯爵的一位追随者利亚船长（Captain Lea），当初就是小艾赛克斯伯爵与泰隆伯爵之间的信差——同时在一五九七年时，还割下一位爱尔兰叛军头颅献给女王，让女王吓得花容失色——他被人发现在宫廷厨房中，准备往女王与侍女们一同用餐的房间走去，他主要的目的，是想用刀抵着女王的脖子，威胁她发布释放小艾赛克斯伯爵的命令，因而遭到逮捕。二月十四日，利亚船长便在纽盖特监狱被判决，隔天便在泰伯恩行刑场正法。

* * *

二月十九日，小艾赛克斯伯爵与南安普敦伯爵，便在西敏厅由其他贵族执行死刑，巴克赫斯特勋爵担任皇家总管大臣主持行刑。嫌犯的罪行是密谋夺取女王王位与性命，监禁枢密院大臣，以不实谣言煽动伦敦民众反抗君主，妨碍女王派出的士兵执行逮捕他们的任务。尽管小艾赛克斯伯爵脸上挂着微笑，但爱德华·柯克爵士、弗朗西斯·

贝肯与约翰·帕普汉爵士，为君主执行了非常具有震撼力的审判，柯克爵士指控小艾赛克斯伯爵心怀不轨，用名字的第一个字自称“英王罗伯”。贝肯爵士的背叛，对小艾赛克斯伯爵来说是“最沉重的一击”，但贝肯爵士向法庭表示：“只要小艾赛克斯伯爵尽忠职守，我就会继续爱戴他。我奉劝他好好服从女王陛下的时间，简直比处理自身庶务还要多。”

小艾赛克斯伯爵穿着一身黑，表现得相当稳定，表示自己无罪，南安普敦伯爵也是，他甚至大胆驳斥每一项罪行，与指控他的人唇枪舌剑。他认定莱礼爵士想要谋杀他，但以证人身份出庭的莱礼爵士则坚决否认。小艾赛克斯伯爵则表示，自己主要的目的，只是要请求女王远离罗伯特·塞西尔，因为他的忠诚是假，贝肯爵士因而怒吼，全副武装登门找女王根本不是请愿的正常手法，更何况他们还“带着一大群人。难道所有的人都愚蠢得以为这样的行为称不上是叛国吗？”当罗伯特·塞西尔询问小艾赛克斯伯爵，在何处听闻他密谋安排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亚成为英女王时，小艾赛克斯伯爵不得不承认，这段谣言来自罗伯特·塞西尔两年前一段不经意说出的话，且他还曲解了罗伯特·塞西尔的意思。“你真是个披着羊皮的狼。感谢老天，你终于露出了真面目。”罗伯特·塞西尔愤愤地说着。

判决自然是无可避免的结局，贵族审判团事前已向资深法官请益过，并参照女王陛下的意愿：经过一个小时的辩论后，小艾赛克斯伯爵被判重度叛国罪，巴克赫斯特勋爵判决他接受最野蛮血腥的叛国者死刑——但由于小艾赛克斯伯爵身为贵族，因此君主得以无条件为其减刑为普通的斩首示众。

聆听宣判后的小艾赛克斯伯爵仍维持冷静、尊严的态度，对于在未来等着他的恐怖命运丝毫不为所动，庭上同意让他结辩：“我可怜的手下们在全世界各地为女王陛下卖命，现在却遭女王恣意牺牲、抛

弃，也是罪有应得。”他希望女王怜悯南安普敦伯爵，但又表示自己“不想阿谀奉承地为自己求饶”，接着他转身看着诸位贵族，又说：“尽管你们在法庭上谴责、惩罚了我，但你们的道德良知肯定会宽恕我，因为我完全没有伤害王权的意思。”各界都预期受到谴责的人应该逐渐展现出恭顺的态度，对许多出席旁听的人来说，小艾赛克斯伯爵身为即将面对最终审判的罪人，简直是不可饶恕的高傲，罪大恶极。

南安普敦伯爵指称，自己是因为太过敬重小艾赛克斯伯爵才会误入歧途，他也遭到死刑宣判，但女王陛下十分心软，最后将刑罚改为在伦敦塔中终身监禁。但女王死后，英王詹姆士一世就还给他自由了。

* * *

许多出席庭讯的人都认为，若小艾赛克斯伯爵愿意哀求女王怜悯，女王一定会饶过他一命，但小艾赛克斯伯爵可以说是说到做到，高傲地连一点“卑躬屈膝的服从”都不愿表现出来。尽管枢密院派出了诺里奇司祭长道德（Dean of Norwich）劝说，他仍不愿认罪。就算他愿认罪，他的存在，对女王陛下的安危依然是很大的威胁。在判决确定的同一天，伊丽莎白女王竟不像以往般拖拖拉拉，直截了当、毫不犹豫地签下了他的死刑执行令；而这份生死状目前仍在大英博物馆中展出。

二月二十一日，罗伯特·塞西尔、诺丁汉伯爵、艾格登爵士与巴克赫斯特勋爵，再度前往伦敦塔探视小艾赛克斯伯爵。小艾赛克斯伯爵的男仆凭空捏造一些在地狱中等待他的极刑，警告他若不认罪，这些就在眼前，于是成功地达成连司祭长也无法达成的任务，因痛悔自责而痛苦不已的小艾赛克斯伯爵，于是要求在枢密院全体参事面前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自白。他以极度谦卑的态度，表示自己“是英国史上

最可恶、最卑鄙又最不懂感恩的叛徒”，并承认“只要自己活着的一天，女王陛下定无法安全生活”。接着他详述自己的罪行，毫不犹豫地牵连了所有的朋友，甚至还有他的姐姐。他要求要见亨利·卡夫，当这位秘书步入会堂时，小艾赛克斯伯爵随即指控他是“陷我于对女王不忠境地的幕后黑手”。

小艾赛克斯伯爵夫人写信哀求罗伯特·塞西尔向女王陛下说情，饶过丈夫不死，表示若失去了丈夫“我再也不想活了”。看到小艾赛克斯伯爵式微，罗伯特·塞西尔事实上也感到相当难过，但这次女王的态度毫不宽容。后来她告诉法国大使，若能在不危及王权尊严之下饶过小艾赛克斯伯爵一命，她绝对非常乐意，“但就连小艾赛克斯伯爵自己都知道，自己不值得饶恕”。但女王仍仁慈地同意让小艾赛克斯伯爵接受私下处决，保全颜面。

二月二十三日，在给予罪犯许多时间自白而延迟行刑后，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死刑执行令还是送往伦敦塔典狱长手中，但伊丽莎白女王随即派人送来命令，下令将死刑执行延后一天。

这一年的忏悔日是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二；女王照常出席宫廷中的忏悔日宴会，并观赏了莎士比亚的一出剧作。这天夜里，她派人送上讯息，下令要伦敦塔典狱长翌日处决小艾赛克斯伯爵，并下令由两位刽子手来押解犯人：“就算其中一个刽子手昏厥了，还有另一个在神宽恕他的灵魂之下可以处死他。”接着女王便返回寝室中独处，隔日一整天都待在房里。

* * *

小艾赛克斯伯爵之死衍生出一则传说，且广为传颂，那就是伊丽莎白女王一次曾在龙心大悦之下，送给小艾赛克斯伯爵一枚戒指，告诉他若陷入困境，就赶紧将戒指交给她，她便会出手相助。一枚宝石

上浮雕着女王人像的金色戒指，据说就是这个信物，目前依然存放在西敏寺教士会堂博物馆中。十七世纪曾出现过这样的传闻，那就是小艾赛克斯伯爵在伦敦塔中时，曾将头探出窗外，将这枚戒指抛给一位男孩，要他将戒指交给斯葛洛普小姐（Lady Scrope），再请她转交给女王；但这个男孩误认了斯葛洛普小姐的姐姐，也就是小艾赛克斯伯爵的政敌诺丁汉准将的夫人，于是准将心怀恶意，命令斯葛洛普小姐留住这枚戒指。这个传闻显示，最后在一六〇三年伊丽莎白女王弥留之际，她曾向女王坦承这枚戒指的事，女王因此愤恨地告诉她：“愿上帝宽恕你，夫人，但我永远也不会。”

但事实上这是个捏造的故事。一六二〇年，在约翰·韦伯斯特的作品《魔鬼的诉讼》中，首度提到这个传言，后又在《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与小艾赛克斯伯爵秘辛，最可信的证人》中详尽阐述，这是一本一六九五年发行的小说。伊丽莎白女王最著名的传记作家威廉·康登，也听说了这项传闻，并对这一不实内容大加挞伐，且历史上绝对有证据支持康登的说法，因为事实上是伊丽莎白女王为她的挚友诺丁汉伯爵夫人送终，女王甚至因为她的死而哀伤欲绝，进而大大地影响了身体健康。

* * *

二月二十四日的晚间，小艾赛克斯伯爵已经准备好赴死，他向看守他的狱卒们表示，很抱歉自己无以为报：“我已身无分文，所剩无几的一切，都得在明晨全还给女王。”

二十五日凌晨，一批精挑细选后的贵族、骑士与市府参事抵达伦敦塔。他们受到邀请准备观看小艾赛克斯伯爵处决过程，于是在伦敦塔中彼得皇家礼拜堂前的断头台附近就座。身为皇家卫队队长的莱礼爵士必须在场，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因为许多人都知道，莱礼爵士与小艾赛克斯伯爵是死对头，甚至还有人看到他抢着坐在前排，于是指

称他幸灾乐祸。他只好退到伦敦塔白塔中的军械库，从那里的窗户观看处决过程。不久后，他甚至表示自己难过地流下泪来。

在三位神职人员的协助下，小艾赛克斯伯爵在八点整以前被带往断头台；他穿着紧身上衣与黑色缎面的裤子，外罩黑色天鹅绒服装，并戴上黑色毛毡制的帽子。他慢慢地步下台阶，脱下帽子，对观众们鞠躬。在英国的传统中，即将遭到处决的人，在离世前有权发表最后的感言，小艾赛克斯伯爵则以相当凄苦的语调发言，“他表示非常感谢神，也知道自已已被君主拒于门外”。接着他又说：

我犯下的罪行比我的顶上发丝还要多。我年轻的时期，都在放纵、淫欲与不贞之中度过，显得骄傲自满、自负虚荣，只懂得追求这世间的声色之乐。对此，我诚心地恳求慈悲的基督，为我向永恒万能的主祈求原谅，尤其是我最后的罪过，如此巨大、如此血腥、如此显著、如此邪恶的罪，拖累许多爱我的人一同冒犯了神、冒犯了君主、冒犯了整个世界。仅盼神能宽恕我们，宽恕我——最微不足道的人。

他也求神保全女王，“我从不愿伤害她，也不愿侵犯她本人”，同时他也要求在场的所有人“发自灵魂深处与他一起祈祷”。最后他则求神原谅他的死对头。

语毕他脱下外衣与襜褕领，跪在断头台上。一名神职人员鼓励他别因为死亡的恐惧而昏厥过去，于是他表示，出外征战时，他多次“感到肉体上的虚弱，因此在冲突中总会求神协助他、让他坚强”。再度望向天空，他热烈地为君主祷告，并背诵出主祷文。接着负责行刑的刽子手跪下，依据惯例请求受刑者原谅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早已准备好允诺，接着再随着神职人员复诵使徒信条。起身后，他脱下紧身上衣，只留下长袖鲜红色的马夹，他俯身以就刑台，并表示自己张开双手时便是准备好了。此时，许多观众都已流下眼泪。

“主啊，请怜悯你忠心的仆人！”小艾赛克斯伯爵祈祷着，然后在刑台上将头歪向一边。“主啊，我将灵魂交付你的手上。”一位神职人员嘱咐他要复诵第五十一篇赞美诗，但才念了两节，他便大喊：“刽子手，给我个痛快吧！”接着张开他的双手，继续大声祷告。刽子手砍了三刀才截断他的颈部，但第一击时他可能就已经死了，因为在那之后他就没有任何动静了。随后刽子手抓住他的头发、举起他的头颅，大喊：“天佑女王！”

* * *

至于其他的共谋，包括布朗特爵士、丹佛斯爵士、麦瑞克爵士与卡夫也都被处决。剩下的人，在罗伯特·塞西尔的建议下，女王便饶过他们一命。其中四十九人遭到监禁与罚款——有些人甚至仍冥顽不灵，于一六〇五年参与历史上知名的火药阴谋事件——至于瑞奇小姐和另外三十人则被无罪释放。小艾赛克斯伯爵夫人随后再嫁，而布朗特爵士遗孀莱蒂丝·诺利斯则活到九十四岁。安东尼·贝肯因失去老朋友而崩溃，在反叛事件三个月后便去世。他弟弟弗朗西斯·贝肯则因服侍女王有功，获得一万二千英镑的奖赏。

许多一般平民为小艾赛克斯伯爵之死哀悼，许多人则以流行民谣思念着他的作为，包括《小艾赛克斯的最后一夜》《英国美丽的骄傲已逝》《呜呼哀哉》，而亲自下令送他上断头台的伊丽莎白女王，也以个人名义为他哀悼。尽管如此，女王仍认为他罪有应得，英国没有了他就更稳定、安全了。

[1]. SX，等同Essex的念音，即艾赛克斯。——译者注

26 日落西山终有时

处决了小艾赛克斯伯爵后，伊丽莎白女王始终未展现出任何悔意。对她来说，这么做只是伸张了正义。但想起他，女王仍会伤感，她的余生都戴着小艾赛克斯伯爵送她的一枚戒指。

小艾赛克斯伯爵死后，全英国权力最大的人就是罗伯特·塞西尔了。他是个高明能干的政治人物，但他始终不受欢迎，人民总认为他与莱礼爵士，是害死小艾赛克斯伯爵的刽子手。“小塞轻松来去，掌握宫廷国君”^[1]成了当时的一句顺口溜。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女王仍全面掌控政务，但社会大众显然不这么想。“若女王下令，我知道全国上下没有第二个人胆敢提出异议。”罗伯特·塞西尔表示。唯一会这么做的人已经死了，宫廷中总算出现难得的平静，就连自命清高的莱礼爵士都无法搅乱一池春水。伊丽莎白女王知道莱礼爵士嫉妒罗伯特·塞西尔的权力，但同时也清楚，他那“天杀的骄傲”得保他永远不会是个麻烦的对手。

一六〇一年三月，罗伯特·塞西尔开始为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继位与自己在新王朝中掌权的未来铺路，于是他开始与苏格兰王保持通信。这一切自然得严加保密，罗伯特·塞西尔也向詹姆士六世表示，千万不要期待他会做出什么违反伊丽莎白女王王权的事情。但只要詹姆士六世愿意听信他的建议与指示，时机到了，他就能确保英国政权安然移交到他手上。詹姆士六世自然乐得乖乖合作。

到了五月，他派遣特使向伊丽莎白女王提出请求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她属意的继承人是谁，但罗伯特·塞西尔却向英国驻爱丁堡大使表示：“女王陛下只给了负面的答案，因为这个要求让女王陛下觉得很刺耳。”目前只要听人谈起继位话题，她都会病态性地反弹，就连苏格兰王闻此消息对她的反应气愤不已并准备联合外国势力来支持他时，也无法让女王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她再一次向詹姆士六世重申，她可以确定的是，在她的葬礼上一切都会有答案；因此，一直到伊丽莎白女王任期届满为止，她与詹姆士六世的关系都相当紧张。尽管如此，在她的信件中仍可以清楚看出，詹姆士六世在伊丽莎白女王心目中，比其他候选人的地位还要高。她只是不敢公开宣布。但她曾私下告诉哈林顿爵士，“还猜不出苏格兰皇室会是英国王位继承人者，简直愚蠢到家。”

小艾赛克斯伯爵死后数月，伊丽莎白女王总感厌烦、悲伤，受到情绪忧郁的困扰，常让她想躲回阴暗的房间，才能好好哭泣。精力枯竭的她，开始无心治理国事，也变得健忘。执政的最后两年，她的意志力被完全摧毁，她这一代的老臣所剩无几，无人能理解她被孤立的苦。这一年夏天，她向法国大使表示“她非常厌世，现在什么也无法满足她，带给她欢乐”。谈起了小艾赛克斯伯爵，女王“不住地叹气，还几乎要掉下泪来”，但仍坚持因为他不听从她的警告，才会自己走上毁灭之路。“胆敢戏弄君权者，不值同情。”女王如是说。

因为女王的情绪起伏大，“忽视了政务，因此让人民开始群起质疑老女人当政的后果”。小艾赛克斯伯爵陨落后，尽管政府不断努力，伊丽莎白女王人气仍直线下滑。“至今，”康登在新王朝开始后写下这些记录：“只有少数人认为（小艾赛克斯伯爵）犯下了杀头罪。”经济问题拖累了国政，与西班牙的战争仿佛永无止境，改革的必要性逐渐清晰。尽管部分说法不实，但伊丽莎白女王仍大受批评，尤其是她大删宫廷预算，让许多宫廷人士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几乎入

不敷出，于是许多人开始期待继位者能拯救他们。此时宫廷中弥漫着贿赂与贪腐的恶习，女王陛下也已无力驱赶这些乱象。“现在到处都是如狐狸般奸诈的人，想要找到值得信赖又善良正直的人，几乎很难了。”女王不住地抱怨。

八月份，伊丽莎白女王接见了专事古物研究的威廉·兰巴德，他也是伦敦塔的文件管理者，他进宫是为了呈交在他照料之下的档案目录复本。伊丽莎白女王显得非常有兴趣，甚至大声阅读部分文件，并告诉他“尽管她到了这个年纪，还是可以做学问，并表示不要轻视她用剩余的岁月来学习”。但当她翻阅理查德二世时代的文件时，显然小艾赛克斯伯爵背叛带来的伤痛阴影，依然在她心里挥之不去，她转向兰巴德说：“我就是理查德二世，你懂吗？会忘了神的恩典的人，也会忘了自己的恩人。这种悲剧，已经在公开的街道上或平民的家中多次上演。”对于她意有所指的话，兰巴德了然于心。但伊丽莎白女王最后还是相当有风度地命他退下，并说：“再见了，良善正直的兰巴德。”两周之后，他便离世了。

这一年夏天，女王出巡来到瑞汀，接着进入汉普郡，在前往桑迪斯勋爵官邸前，她便在汉普郡贝辛的维恩宅邸住进温切斯特侯爵家中，接待法国大使彼林斯上将（Marshal Biron），为此她甚至从汉普顿宫与伦敦塔带来盘子与挂饰。有人听到她吹嘘，表示英国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君主像她一样，在出巡时与在臣子的宅邸中“如此庄严地接待他国大使”。

彼林斯上将的同事苏利公爵（Duck de Sully），对于伊丽莎白女王对国事的渊博知识，感到印象深刻：

我深信这个伟大的女王，与她远播的威名绝对符合。她告诉我许多合情合理的事情，让我既惊喜又钦佩。有远谋的君主常见，但像她一样一步步稳定迈进，能预见障碍、排除万难的统治者就少见了，当问题发生，他

们不需要多做些什么，只要拿出预先计划好的解决方案就能度过危机——这是多数君主缺乏的能力。就短时间内发现的各种功绩，想要称赞英国女王，三言两语实在难以形容，但这些特质都来自她的心思与智慧。

在这次出巡的途中，伊丽莎白女王的臣子们，发现年轻俊美的爱尔兰克兰里卡德侯爵（Earl of Clanricarde），与小艾赛克斯伯爵有那么一点神似，于是他们刻意制造机会，让女王注意到克兰里卡德侯爵，希望能让她振作一点，但女王对他似乎一点兴趣也没有，并表示只要想起小艾赛克斯伯爵，她就感受到无尽的伤痛。

在返回伦敦的途中，女王造访了中殿律师学院，在学院中以“金鹿号”上拆下的木材建造的大厅中，女王主持了一场宴会，并观赏莎士比亚剧作《第十二夜》的演出，而宴会上她所坐的桌子至今依然在原址。

* * *

伊丽莎白女王任期内第十三届也是最后一届国会，在十月份一个乖戾的天气中展开了，这次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破坏专卖权的卑鄙手段，这是导致许多人陷入经济困境的主因。^[2]当女王正式召开国会时，几乎没有人依照惯例问候：“天佑女王陛下”。在女王的国会演讲上，穿着沉重的礼袍、戴着皇冠的女王突然间微微地颤晃了一下，身边许多卫士连忙冲上前去扶住她，以免她撞到地板，这件事短暂地引起骚动。但女王随即恢复，于是典礼继续照常进行。

女王离开国会议事堂后，整个前厅挤满了人，“几乎水泄不通，（接着）女王只好挥动双手才能挪出空间，于是一位领宾员便大喊：‘退后，各位议员，让个位子。’结果一位议员在背后大声说：‘若您要断我们的生路，我们也无法让路。’女王似乎没听见，但她还是抬起了头，望向了说话的人的方向”。

在粮食缺乏与饥荒之中，更严重的问题是，伊丽莎白女王当政的太平年代让英国人口急速上升。圈地运动更是让英国贫穷人口大幅增加的关键，这些人曾受到教区的修士与修女妥善的照顾，但一五三〇年代，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的法令破坏了许多人的宗教生涯，为国家徒增沉重负担。伊丽莎白女王任期将届之际，乞丐成了英国街头的重大问题。

一五九八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救贫法》，于一六〇一年十一月正式上路，将地方上的乞丐托付给当地教区照顾，法律规定教区有责任协助这些人。过去，英国各级城市与自治市镇都有贫民收容所——后又称为济贫工作院——而这个制度则由地方赋税系统来负担支出。

英国下议院决心终结遭权力人士滥用的专卖权，于是提交一项补助案，盼能让女王同意通过一项限制她封赠专卖权的法案。在他们展开行动前，为了避免引起王权上的争端，伊丽莎白女王发布了一项声明，宣布要马上终结当前的体制。下议院闻此全体欢呼，甚至有议员流下欣喜的眼泪，在下议院议长约翰·克洛克（John Croke）带领下全体议员一同为女王祝祷时疯狂大喊：“阿门！”

国会决定派代表向女王表达臣子们最深的感激与欢喜。当他们要决定由哪位议员作为代表时，有些人大喊：“全体议员！全体议员！全体议员！”伊丽莎白女王只好派人表示，尽管宫廷空间非常有限，但她仍希望见到每一个人。下议院全体一百五十位议员都接受了女王的邀请。

十一月三十日，伊丽莎白女王便在怀特霍尔宫的会议室中，端坐王位上接见了他们，同时也证明了旧时的魔法依然有效，她发表了被后代称为“黄金演说”的演讲，而这次演说也成了她与最爱的人民最

后的诀别。议员们跪在她的面前，而议长作为全体议员代表，则开始表达他们诚挚的感谢，但女王坚持要说些话。

她说：

议长先生，我知道阁下的来意，是为了感谢我。请记得，我得到诸位诚挚的感谢，内心的欢喜，绝不亚于赠送如此珍贵心意的你们。我向诸位保证，这世上没有任何君主对臣民的爱，能像我一样多。我从未拥有如此价值连城的珠宝，我会珍藏这件宝物：也就是你们的爱。我对它的尊重，超越了任何有价值的稀世珍宝；诸位的忠诚、爱与感谢——对我是无价的；尽管神给了我超越凡人的地位，但我依着你们的爱来统治国家，这才是王权荣耀的本质。对于神命定我为英国女王，我内心的欢乐从未胜过受到如此多人的爱戴与感激，也能在神的指引下，保护人民生命安全，远离危险。

女王要议员们起身，因为她还有更多话要说，她感谢议员们让她知道人民对专卖权体制的不满：

议长先生，你向我道谢，但我内心的感激远超过你，因此我命令你，代替我向下议院全体人员表达感谢，因为诸位，我才能得知这些事情，我的内心着实感激不尽；若我未能得到诸位的点醒，便可能堕入错误的深渊中，感谢诸位以真正的民意相响应。只要王权的行使依据人民的意愿，并适当地压制特权行使的本质，王权的尊严绝不会受损。是的，听到这样的消息后，一直到能拨乱反正前，我始终无法放下紊乱的心绪，而滥用王权慷慨赠予者，也应了解我绝不通融。

至于我自己，容我为自己辩护：我从不贪婪，也非性好剥削，不是个严苛、独断的君主，也从不挥霍；我向来不爱世间财，只为臣民着想。臣民赠予我的东西，我绝不私藏，而是留待日后再度回赠诸位；是的，我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人民，都是为了人民所用，盼诸位能体认我的用心。

女王向议员们保证，她“除了盼能看见英国再度繁荣外，并不想再活得更久，这也是我唯一的希冀。身为女王，我从未以对臣民良好

有益作为借口、托词，实则赋予他人重权，事实上这一切皆为侍奉王权的老臣应得之利”。若这些人滥用了专卖权体制，她促请：

盼我错误的命令不会触犯天意。在旁观者眼中，带着王冠君临天下的荣耀，比起在位者实际感受到的乐趣还多。就我而言，若非为了履行神加诸我的道德责任，维护神的荣耀并保护人民的安全，而我自己则宁可退位让贤，并为自己不必再为了荣耀而不辞劳苦感到欢喜；我并不想活得太久，也不想统治太久，治理国家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尽管过去到现在，诸位曾见过更伟大、更睿智的君主上位，但绝不会有任何一位君主，像我一般爱民。

除了君主光荣之名与女王独有的权力外，我从未感到如此积极，对于神选择了我作为他的双手，维护他的真理与荣耀，保护这个国家不至于陷入危险、污辱、暴政与压迫之中，我甚感欢欣。在诸位的面前，这一切的功劳用来赞美神，而与我无关；因为我——噢，主啊，我又是什​​么呢？——噢，我该怎么做才能让您更显荣耀呢？但愿上帝不要让这事发生！

会面到此结束，女王请所有代表上前行吻手礼，接着从王位上起身，在喇叭的吹奏下缓缓离开会议室。

没有人质疑，她这次的演说是史上最精彩的一次；一名国会议员表示，这篇演说绝对值得镌刻在黄金之上。更重要的是，她的宽宏大量与迅速响应国会请求的态度，让她节节下滑的受欢迎度再度回升，民众心里对她的敬爱，甚至超过了以往，也让下议院在没有任何反对票的情形下，史无前例地投票通过，给予女王四倍的补助。

十二月十九日，当伊丽莎白女王宣布会期告终，上下两院的议长表示，英国孤立在欧洲大陆边陲地带，一直到女王执政后才享有稳定政府，于是议长代表全体议员，感谢女王“赐予快乐、宁静、甜美又令人安心的和平现况，这是全体人民共享的丰硕果实，一切都要感谢神与女王陛下的恩赐，我们至今仍感激享受。”

伊丽莎白女王则表示，议员们应返家告诉身边的人们，“你们的统治者对你们身家性命的重视，比她自己还要多，她也会天天祈求神，那些为你们的和乐安康祈祷的声音，永远不会只是徒劳”。

* * *

这一年的圣诞节出奇平静，留在宫中的人不多，“就连观看戏剧表演与余兴节目时，守卫都不需要紧守门口”。但庆典还是不能少，十二月二十四日，蒙裘依勋爵在金沙尔大胜了泰隆伯爵，让一千二百名叛军战死沙场。泰隆伯爵逃逸无踪，而前一年秋天抵达苏格兰协助泰隆伯爵的西班牙军队将领则举白旗投降，希望能与英方和谈。一六〇二年一月二日，西班牙军队正式向蒙裘依勋爵投降，并准备返回西班牙。英国则完全掌控了爱尔兰。

女王曾写下这一段话，形容这场胜利“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一场意外”；她希望西班牙全军覆没，但这已经是次要的问题了。蒙裘依勋爵触犯王权一事早已被遗忘；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开始定期写下许多充满情感的信件给他，信末还自己署名“你最亲爱的女王”。一次，蒙裘依勋爵抱怨女王将他当佣人使唤，女王甚至亲笔写下长篇大论的信件支持他，而信件的开头竟是“亲爱的厨房女佣……”在获得大胜后，女王的慰问信则写着：“我差点忘了称赞你的谦卑，在担任女王的厨房女佣后，仍不避讳地担任叛徒的佣人。愿神祝福你平安喜乐。”

一六〇二年六月，当理查德·雷维森爵士（Sir Richard Leveson）领军的小舰队，在十一艘大帆船与一万名士兵的戒护下，挟持了一艘满载着宝藏的葡萄牙武装商船时，德瑞克爵士当年在海上英勇争战的年代，仿佛又要再次降临。然而经由伊丽莎白女王派遣，前往西班牙海岸径行掠夺的舰队，却无功而返。这就是伊丽莎白女王任内最后一次的海上冒险了。

一六〇二年，英国爆发了天花疫情，导致许多人丧生，但伊丽莎白女王仍计划前往布里斯托出巡。只是，英国的天气再度陷入大雨与风暴之中，臣子便以接待她会造成人民在遭受七年饥荒之余更加不便为由，劝退了女王。没想到天气就此好转，这一年英国农作物大丰收，这个迹象显示英国几年来的粮食短缺已经过去。贸易活动再度兴盛，人们也因此显得精神奕奕。

八月份时，伊丽莎白女王宣布，自己的健康情形比过去十二年都好。有一天她甚至骑行十英里，接着还去打猎。回到宫中，她显得精疲力竭，但隔天却又长途健行，许多宫廷人士还以为经过前一天激烈的活动，她一点也不累。此时，罗伯特·塞西尔送了她一副红宝石与黄晶镶嵌的珠宝，刚好衬托“她那活灵活现的眼睛与鲜红的唇色”；当时人依然称颂她是永恒青春的美丽女神。

就在这一个月，伊丽莎白女王离开了格林尼治宫前往奇斯威克，接着造访掌玺大臣艾格登爵士位于密德塞克斯·海菲尔德公园的家，尽管当地正下着倾盆大雨，女王陛下依然受到豪华的招待，更被赞为“我们所有这群人之中最棒的女主人”。艾格登爵士举办了宴会、假面剧演出、音乐幽默短剧演出、乡村祭典、欢乐的游行与早就内定好结果的摸彩大会，女王当然是最大奖的得主。几天后，艾格登爵士便发行了有关这场盛宴的宣传小手册，而民众也都踊跃收藏。因为大雨与天花疫情的关系，女王的出巡行程也被迫缩短，女王也在欧特兰住了一段时间。

九月份是女王的六十九岁大寿，根据斯德丁公爵在欧特兰花园中的观察，“女王健步如飞，仿佛还是个十八岁的年轻女子”。有人告诉他，女王“已经有好几年没这么有活力，心情也没这么开心了”。伍斯特勋爵则告诉士鲁斯柏立勋爵：“宫中一片歌舞升平；女王端坐在谒见室中，看着许多人跳着乡村舞蹈，这让她开心又欢愉。”现在

她已经很少公开跳舞了，但偶然仍能看见，她趁着四下无人之际，私下就着笛声与小鼓跳舞。

这一年的九月，富尔克·格雷维尔告诉士鲁斯柏立勋爵夫人：“我要报告夫人一个好消息，女王的健康与心情、状态都非常好。我已经多年未见她这么好的光景了。”

女王依然幽默。她发现德比伯爵夫人戴着一串有罗伯特·塞西尔画像的项链，于是伸手将它拔下，边笑边将项链系在他的鞋上，后又改挂在他手臂上，让大家都能看到。罗伯特·塞西尔以正面态度看待，甚至还以此吟诗，甚至谱上曲献给女王，让女王龙心大悦。她有时也许臣子们亲近得过分。当一名旅居国外多年的英国人被带到女王跟前跪下时，女王“揪住他的头发要他起立，并假装打了他一记耳光”。

但女王的记忆力也明显开始衰退。十月八日，皇室移驾格林尼治，四天后，部分宫廷人士才抵达，准备向女王致敬。尽管女王记得他们的名字，但一直到其他官员提醒，她才想起自己册封过他们。同时她也发现自己开始难以专注于政务上，而逐渐退化的眼力，则让问题越趋严重。罗伯特·塞西尔则不断提醒枢密院办事员，一定要记得将信件大声阅读给女王听。

* * *

十一月十七日，伊丽莎白女王再度于怀特霍尔宫欢庆登基纪念日，对于“当天一如往常地有庄严的仪式，许多人报以热烈的掌声，仿佛他们从未见过女王”。宫中弄臣盖瑞特，骑着一匹比狗大不了多少的小马进入比武场，“觐见女王后，让女王开心之至”。十二月六日，女王前往罗伯特·塞西尔位于斯庄特的新家一起用餐，随后观赏一位处女、一位寡妇与一位夫人间让彼此皆大欢喜的“巧妙对谈”；

可以想见，最后最幸运的自然还是处女了。女王离开时表现出“非常满足的样子，却在临去之际扭伤了脚”。之后就没有相关记录了，显然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伤。当月稍晚，女王分别前往亨斯顿勋爵与诺丁汉伯爵位于伦敦的家中，接受招待。

这个时期，因为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在与年纪拉扯的这场马拉松赛中，她永远是输家，于是女王又再度陷入重度忧郁中。许多人都开始了解，她的时间不多了。哈林顿爵士于圣诞节前后，对于女王的改变感到震惊不已，因而写信给太太：

我们亲爱的女王、我最挚爱的皇室教母，也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母亲，逐渐展现出人类的弱点；那要与我们争夺她性命的恶魔，太快找上门来了；但若要她从无止境的痛苦与悲伤中解放出来，时间似乎又漫长得发慌。我知道有些人对于我们即将失去的一切，完全不在意，他们只在意在她大限之后的未来。但我的记忆之中，无法抹去女王陛下对我所有的好：她对我母亲的情感，她改变了我父亲的命运，她看护着年少轻狂的我，她喜欢我的即席演说，也欣赏我在学识与诗作上那微小的成就，这些都是她命令我达成的境地。若我不为她此刻的状态掬一把泪，简直就是玷污了赐我恩情的一切源头。

因为女王“陷入令人怜悯的状态”，几乎食不下咽，因此哈林顿爵士为她读了一些自创的玩笑话，希望能振奋她的精神，尽管女王仍能虚弱地微笑以对，却要哈林顿爵士住口，她说：“汝等若知己走到命运尽头的大门处，此等愚蠢言行也难令人发笑。为此我更无食欲。”

当女王问哈林顿爵士是否见过泰隆伯爵时，哈林顿爵士一阵惊愕。“于是我毕恭毕敬地告诉她，我与国王代表一同与他见过面；她抬起头来，以惋惜又气愤的表情看着我说：‘噢，是的，现在我记住你与这个人见过面了。’”但忧郁的情绪起伏，让女王非常难受，

“于是她掉下泪来，不断捶胸顿足”。哈林顿爵士忧心，这意味着她记忆的丧失。“但谁能说，是女王陛下忘记了呢？”他问他的妻子。

这个圣诞节，女王陛下就在怀特霍尔宫中一如往常地在绚烂之中度过，她似乎变得较有精神了。“宫廷显得比以往更热闹。除了舞蹈、斗熊与各种戏剧外，还有很多经典剧作”——罗伯特·塞西尔因为玩牌而输了八百英镑。接着爱尔兰方面又传出更好的消息：泰隆伯爵表示，若女王陛下愿饶他不死，他就愿意投降。蒙裘依勋爵不断敦促女王接受这个条件，让爱尔兰战争画下句点。

* * *

尽管伊丽莎白女王拒绝任命继承人，但年纪越大，各种传闻也就甚嚣尘上。多数人都期待由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继位，因为他信仰新教、已婚，还育有两子。尽管人民对伊丽莎白女王爱戴又钦佩，多数贵族与士绅都不希望再让女王当政：那个年代的男人依然抱持着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作为女性执政者的臣子是一件丢脸的事情。许多人也担心，“世上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女王了”。至于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亚及高特的约翰在欧洲的其他后裔，包括布拉甘萨公爵与帕尔玛公爵，英国人没将他们放在眼里，就连势力旗鼓相当，也覬覦英国王位的菲利普三世也一样。

至于英国内部有权继位的人选，凯瑟琳·格雷的儿子因为身份合法性问题而相当不受欢迎，当然，雅贝拉·史都华身为女性，自然也不被看好。

一五八七年，雅贝拉曾一度进宫，然而她的傲慢触怒了伊丽莎白女王，最后被踢出宫，回家与老祖母哈维克的贝丝小姐住在一起，一直到现在。此时的雅贝拉已经二十八岁了，性格神经质又不稳定，目前仍未婚。贝丝小姐一直是个严酷又吹毛求疵的监护人，雅贝拉因此

非常讨厌她，一六〇二年左右，自觉仿佛在坐牢，因而迫不及待想要逃脱祖母的掌控，她因此托人带了讯息给凯瑟琳·格雷的鳏夫赫特福德伯爵，表示愿意嫁给他的孙子。赫特福德郡伯爵之前因企图与凯瑟琳·格雷结婚并让婚姻合法化，而惹上一身麻烦，立即将此事通报枢密院，他知道伊丽莎白女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同意这对年轻人的婚事，毕竟这两人身上都流着皇室血液，彼此婚配会引起大麻烦。

当一位皇室代表抵达雅贝拉的家询问相关问题时，对于孙女策划出逃的计划仍完全不知情的贝丝小姐，气急败坏地差点就要毒打雅贝拉一顿；后来她则是以恶毒的话咒骂她。哈维克的贝丝小姐也赶紧写信给伊丽莎白女王，向她保证自己对于雅贝拉的“大胆妄为”“完全不知情”，并恳求女王解除她监护这个女孩之责，同时强调：“现在已无法像过去那样掌控她了。”但伊丽莎白女王坚持，雅贝拉必须继续与祖母同住，而祖母则必须更努力地找到控制她的方法。两个月后，雅贝拉再度因试图逃脱被逮，但此时的伊丽莎白女王已经没有心思管这件事了。

但就算全国各阶层的人民，都对伊丽莎白女王逝世后的未来感到焦躁不安，英国王位继承问题也始终是个禁忌。“王位继承！”曾有一位士绅这么说，“哪个不要命的敢说这种话？”

* * *

一六〇三年一月十七日，看来“一切安好”的伊丽莎白女王，与诺福克公爵的小儿子，也就是她的“好汤玛士”汤玛士·霍华勋爵，在查特豪斯共进晚餐，并册封他为沃顿·霍华勋爵（Lord Howard de Walden）。四天后，约翰迪用女王的星座排了命盘，在他的建议下要女王不要继续住在怀特霍尔宫，皇室便从怀特霍尔宫迁往里奇蒙德宫，“女王冬日最温暖的角落”，中途在波特尼停留，让女王得与一位布商约翰·雷西（John Lacy）共进晚餐，两人相识已经多年。此时

的天气比往年都来得湿冷，伴随着冷如刀锋的东北风，女王却坚持穿着夏服，更拒绝搭上皮草。小伯利男爵托马斯·塞西尔提醒弟弟罗伯特·塞西尔，女王陛下应接受“年纪渐长，应多照顾自己的事实，以及不知足于被关在年老躯壳中的年轻心灵”。

在前往里奇蒙德宫的路上，诺丁汉伯爵策马护卫着女王座驾，依仗着女王向来对他好声好气，于是斗胆问她是否愿透露继位者人选。女王回答：“我的位子就是王位，绝不会传给任何恶霸无赖；除了真正的王者之外，还有谁有资格继承我的位子？”诺丁汉伯爵与许多宫廷人士，都将这句话视为在暗示她要詹姆士六世继位的暗号，但女王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二月六日，罹患严重风湿的伊丽莎白女王，接见威尼斯特使乔凡尼·斯嘉拉梅利（Giovanni Scaramelli），他是她任期内第一位威尼斯驻英大使，这也成为她人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高坐在讲台上，身边围绕着臣子们，伊丽莎白女王穿着一件银白相间的塔夫绸搭配金色緞边的服装，服装设计是旧式的宽下摆长裙搭配低胸线，还镶着珍珠与珠宝，还有她那“向来不自然的清淡发色”，头上则戴着王冠。斯嘉拉梅利特使从她的脸上能看得出“历史，但仍不掩她的美丽”。当他弯下身去亲吻女王的裙摆时，女王将他扶起，接着伸手让他行吻手礼。

“欢迎来到英国，外交大臣先生。”女王说的是意大利文。“威尼斯共和国此时派人来拜访一个总是以王权为荣的女王，可说是时机相当恰当。”针对前后任的总督，女王陛下斥责他们四十五年来都未能提醒对方她的存在，并表示自己非常清楚，性别“不是这个过失的主因，我的性别不掩我伟大的声誉，也绝不冒犯那些对待我如同其他君王般平等的人”。特使知道女王打破了总督的偏见因而阻止了一场策划精细的外交政变，也让总督从此不敢再冒犯罗马教廷，因此他以

正面的态度看待女王所说的话，并表示见到女王陛下“身体如此强健”让他感到开心不已。语毕稍停，等待女王同意的响应，但女王无视于此，随即将话题一转：“我不知道自己的意大利文说得好不好；但我想应该不差，因为我从小便开始学习，至今仍不敢稍忘。”

十天后，在多次威胁罗伯特·塞西尔之后，女王写信给蒙裘依勋爵，同意接受泰隆伯爵输诚，给予豁免权，但前提是他须接受最严苛的条件。女王也许老了，是个“孤寂”的老女人，但她想要在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得到最后一次的胜利。

到了二月中，伊丽莎白女王的表侄女，也是她的挚友，诺丁汉伯爵夫人，即已故的亨斯顿勋爵之女，在里奇蒙德宫过世。女王来到床边为她送终，哀伤地下令举办国葬，并陷入深深的低潮中，直至生命的终点都未能复原。此时她的加冕戒指因为她手指肿胀而卡住，导致她疼痛不堪，只好将戒指锯下——这件事对她来说，就像是打破了女王终生嫁给人民那神圣的誓约。她已预料到死神就在不远处等她，因此哀伤地写信向法王亨利四世表示：“我登基后建立的一切，都一点一点地逐渐逝去。”

二月二十六日，法国大使伯蒙特请求谒见女王，时因诺丁汉伯爵夫人刚过世，女王便要他稍待几日，“因为她哭得太过伤心，担心不能自己”。之后她再也未公开露面。“她仿佛突然间消失般，只愿独处，她人生的最后几年，与过去的意气风发，显得天差地别。”斯嘉拉梅利特使说。

此时来到宫廷中的，是女王陛下的表侄罗伯·凯利（Robert Carey），已故的亨斯顿勋爵的小儿子，也是诺丁汉伯爵夫人的兄弟。身为女王陛下的亲属，在一个周末的夜晚，他得以进入一个房间，发现伊丽莎白女王

待在一个客厅中，坐在地板上的一块座垫上。她要我过去。我吻了她的手，告诉她，看到她健康平安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也希望她能继续维持。她执起我的手，紧紧地拧着，告诉我：“不，罗宾，我一点也不好。”接着将她心中的不适全都告诉了我，她说十到十二天以来，她的心很伤感，非常沉重，在这么短的句子中，她就叹了四十到四十五次的气，第一次见到她这个模样，让我也非常难过，在这之前，除了苏格兰女王遭斩首之时，我从未听过她叹气。

女王下令要议事堂准备好，让她隔日一早能前往做礼拜。隔天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正等待着女王到来。到了上午十一点，传令员表示要我们准备好御用厅堂；女王决定不去议事堂了。我们又在那里等了很久，最后她决定在寝宫中祈祷，而厅堂的门则敞开，让她能聆听礼拜程序的进行。从那天以后，她的状况就越来越差了。

最主要的问题似乎是喉咙些微的肿胀——可能是溃疡，接着伴随着感冒上身。到了三月初，女王出现发烧的症状，她的睡眠质量奇差，吞咽困难。到了三月九日，伯蒙特（Beaumont）表示：“女王觉得胃部有烧灼感，始终感觉口渴，让她随时得喝点东西减轻痛苦，避免又硬又干的浓痰让她窒息。她在病中相当坚持，不断拒绝医生开立的任何处方。”这些问题，可能都是流行性感冒与扁桃腺炎的症状，因为她的忧郁而症状加重，但臣子们问她在烦恼些什么时，她告诉他们，“她知道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让她忧心。”

罗伯特·塞西尔预料到女王大限将至，因此清楚地知道，让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和平无虞地接下政权将会是他的责任。到了二月底，他命令罗伯·凯利做好万全准备，只要女王陛下停止呼吸，随即转达苏格兰王要继位的消息。

到了三月十一日，女王陛下暂时恢复了健康，接着症状再度复发，女王“陷入呆滞状态，仿佛一下老了很多”。伯蒙特表示，她“非常懊悔、厌世，尽管参事与御医们强烈要求她同意接受治疗，以减轻痛苦，女王仍坚持不从”。尽管年老，但她依然精神可嘉，她向

跪在她床前哀求要她遵照医生指示的罗伯特·塞西尔及惠特吉夫大主教表示，“她比任何人清楚自己的体力与体质，她并不像他们想的病得那么重”。她也不愿意吃任何东西，只是终日躺在地板上的软垫上，思绪飘散在“挥之不去的忧郁”中，也不愿跟任何人说话。显然她已经不想活了。

“女王的状况越来越糟，因为她并不想康复，她身边没有任何人能说服她到床上休息。”罗伯·凯利表示。

罗伯特·塞西尔持续劝说：“女王陛下，请遵从人民的心，您一定得到床上休息。”女王陛下却喝道：“小伙子，不准对君主使用‘一定得’这个字眼。若你的父亲仍健在，定不允许你这么说，但你知道我要死了，就变得如此狂妄大胆。”

她的喉咙仿佛再也张不开。诺丁汉伯爵来探视她：他之前为妻子治丧而离宫，但随后赶紧回到宫中，协助女王提振精神。他要女王勇敢坚强，但女王却说：“阁下，我的颈间仿佛被上了铁链般难受。仿佛要窒息，仿佛要窒息了，我的病如影随形。”她抱怨“胸闷如火烧，口干舌燥，让她时时无法入睡，非常难受”。这样的症状，显示她已变成支气管炎或肺炎了。

诺丁汉伯爵希望她能上床休息，但女王依然拒绝，告诉他：“若你和我一样，每到上床时间，就会看到那样的情景，就不会一直这样说了”，她又表示“自己已经预见到，若轻易躺下，自己恐怕再也起不了身”。

一天，她拖着病体坐在一张矮椅子上。她发现自己无法起身后，便命令仆人们帮她起身。当她站好后，在无比坚强的意志力及与死神对抗的雄心壮志之下，她纹丝不动地屹立了十五个小时，让宫廷人士

咋舌却又无能为力。最后她因体力透支而昏了过去，众人七手八脚地扶她躺在软垫上，休息了四天。

到了三月十八日，她的状况变得非常糟糕；伯蒙特向法王回报，伊丽莎白女王“看来不省人事，已经两三个小时未语了，过去两天来也没说过几句话，她总是将手指咬在口中，眼睛圆睁，直盯着地板，她总是坐在软垫上不起身，也不愿休息，因为一直睁着眼也不吃东西，她已经瘦了一大圈”。至此，女王已和衣躺在地板上长达三周。

三月十九日，女王病重，罗伯·凯利于是写信通知詹姆士六世，伊丽莎白女王的寿命可能剩不到三天；他已在北方大道各驿站安排好马匹，准备届时飞也似的奔赴苏格兰。隔天，罗伯特·塞西尔寄出一份声明给詹姆士六世，让他在登基典礼上高声朗读。此刻，詹姆士六世只希望伊丽莎白女王最后一口气不要拖得太长，“昏迷不醒、毫无知觉，无法领导统御一个国家”。

为了避免全国上下陷入抗议与恐慌中，罗伯特·塞西尔先是禁止英国政府发行有关女王健康情形的公报，但法国大使仍故意将消息放出去。“女王陛下命在旦夕。”斯嘉拉梅利特使曾提及这一句话。

“过去十天来，女王几乎毫无知觉（令人怜悯）。因忧心天主教入侵，伦敦陷入全面武装的紧张之中。每一间房舍与每一个人都有所行动，绷紧了神经。”依据康登的记载：“女王的健康报告证实，她身体的疾病一天一天地侵蚀着她。”最令人惊讶的是，英国出现一股浪潮，许多清教徒、天主教徒、野心人士与逢迎拍马的人，以最快的速度走海路与陆路前往苏格兰，膜拜即将升起的权威，准备博取他的欢心。

最后，到了三月二十一日，诺丁汉伯爵总算“半推半就”地让伊丽莎白女王愿意上床休息。在床上躺了几个小时候，女王喉中的一处脓疮或溃疡破裂了，她于是表示自己好多了，要仆人们准备一些汤

药。斯嘉拉梅利特使的报告中提及，他们将玫瑰水与红醋栗摆在女王身边，“但她很快就不能言语，从那时起便滴水未进，只是一直侧身躺着，未语，也未与他人相视，但她要人为她读一些沉思录”。惠特吉夫大主教与女王的教堂牧师，从那时起就一直待在她身边，宫廷乐师则在她身边奏点音乐，舒缓她的身心。

参事们都知道，她撑不下去了。二十三日，教堂牧师派瑞在礼拜堂中进行了特别的祈祷仪式，为女王陛下热烈地祈祷，“很少人能不流泪”。皇室日志作者强·曼宁翰（John Manningham），则在女王寝宫中得知，

女王陛下陷入无语状态已两三日，非常悲伤又安静，但她仍维持着意识与记忆，昨日甚至（向派瑞牧师）示意，抬起她的手与眼，面向天堂，她一直坚持的宗教信仰，全心全意地等待耶稣基督的救赎与怜悯，不作他想。听见祈祷声，女王显得十分开心，只要听见耶稣基督之名，就会举起手与眼望向天堂。她不愿听大主教让他长命百岁的祈祷，但当大主教提及天堂与随之而来的欢喜时，女王便会握一握他的手。

看来如果她愿意便得以继续活下去，但没有人能说服她，没有人能强迫君主。御医们表示，女王的身体非常结实健康，还能再活好几年。

那一天，诺丁汉伯爵、艾格登爵士与罗伯特·塞西尔要求女王陛下透露继位者人选，但女王已经失去了语言能力。因此——就如后人所猜测得一样——女王陛下用手与手指在头上比了一个王冠的手势，他们于是猜测，女王陛下希望詹姆士六世接下王位。

斯嘉拉梅利特使返回里奇蒙德宫时，“发现宫廷里里外外人山人海，一片喧嚣，人人急切地等待着”。看来，终点就在不远处了。

六点整，女王陛下感到尚存的体力渐渐流失，于是示意惠特吉夫大主教上前，在她的病榻旁祈祷。在这神圣的一刻，罗伯·凯利也跪

在女王的寝室中，惠特吉夫大主教此时出现的意味，也让他不住感伤流泪：

女王陛下仰躺着，一只手在床上，另一只手则悬空。大主教跪在她身旁，首先询问她对宗教是否忠心；女王则以眼神与握手如实地回答他的问题，让在旁陪伴的人宽慰不少。接着惠特吉夫大主教叙述了她的过去及她要面对的未来：尽管她是这个世界上的伟大女王，但她很快就必须将管理众人的职责交给全能的王。之后他便开始祷告，而周围的人也有所回应。

惠特吉夫大主教一直在她的身旁，握着她的手，给予精神上的安慰，直到他的膝盖痛得受不了，但当他想要起身祝福女王时，女王示意要他再度跪下，继续祷告。于是他又跪了“整整半个小时”，“恳切地请求上帝赐予女王健康的灵魂，他非常热烈地祈祷着，我们都发现，女王相当开心，也让我们见证了她那充满宗教、宽慰的人生最后一段路。时间渐晚，所有人都得离开，只剩下女王的侍女们来照顾她。”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大雨滴滴答答地打在窗棂上，伊丽莎白女王转头面向墙，坠入再也不会醒来的梦境中。派瑞牧师则“为她的灵魂大声祈祷”，她的老朋友华威伯爵夫人与斯葛洛普小姐都随侍在侧，伊丽莎白女王永世长眠，“温驯地像只绵羊，又像苹果树上的成熟苹果”，不久后，在三月二十四日周二清晨的三点整，“曾经璀璨夺目的太阳，终须西行，沉入云雾里”。

[1] 专卖权原是王室赐予的独门权力，拥有者得贩卖如盐与淀粉等民生消费品，但这样的特权经常可耻地遭到拥有者的滥用，因此多数民众对这样的制度都抱持负面观感。——作者注

[2] 原文：Little Cecil trips up and down, he rules both court and crown. ——编者注

落幕

斯葛洛普小姐一发现伊丽莎白女王断了气，便如同事先排练好的，脱下已故的女王手上的一枚蓝宝石戒指，丢出窗外给在外等待已久的弟弟罗伯·凯利，接着他便起程前往苏格兰。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非常清楚，只要接下这枚戒指，他就真的成为英王了。

是日清晨，怀特霍尔宫中与威普塞街已经遍传英王詹姆士一世要继位的消息。“没有人大声嚷嚷，”曼宁翰认为，“女王逝世的消息，刺痛了许多人的心，无法表现出欢欣鼓舞的样子”。尽管如此，这一天接近傍晚时，开始出现低调的庆祝，有人为新王、新王朝、新年代点燃了营火、敲响教堂钟声。渐渐地，人们发现伟大的伊丽莎白年代已成云烟。

三天后，凯利抵达了爱丁堡，正当苏格兰王准备就寝时。因长途奔驰而浑身泥泞脏污的他跪在詹姆士六世面前，称呼他为英国、苏格兰、爱尔兰与法国之王詹姆士。接着再将伊丽莎白女王的戒指交给他。

* * *

此时因皇室搬迁回伦敦，里奇蒙德宫一片萧条，“女王陛下的遗体，于死后独自摆放了一两天，只有少数人能靠近”。没有人进行验尸，只有三名侍女负责处理遗体准备下葬。接着，女王的遗体被涂上油脂，缠绕上裹尸布，奉入铅棺中。

五天后的夜里正式移灵，将棺材放上点满火炬的驳船，前往怀特霍尔宫，将它神圣地置放在大厅中，由许多贵族人士与侍女日日夜夜地看守着。接着再将棺木移到西敏寺，“接受众人的哀悼；并依照自古以来的传统，一直置放在这里，直到新任英王下令埋葬”。

四月二十八日，伊丽莎白女王逝世后一个多月，葬礼队伍缓缓将她的遗体送往西敏寺。那个场景令人肃然起敬：由四匹马拉着上面垂挂着黑色天鹅绒的灵车，棺木上可以见到已故的伊丽莎白女王真人大小的蜡像，穿戴着她生前的礼袍与王冠，手握象征王权的宝球与令牌；蜡像的头上则有六位伯爵手执顶篷。紧跟在后的是由女王陛下的骑士统领牵着女王专属的无鞍驯马。送葬的主要工作是由地位崇高的贵族侍女北安普敦女伯爵来担任，由她带领穿着仿如修道服般之斗篷与兜帽的贵族们，以及其他一千位穿着黑色服装的人士：贵族、参事、士绅、宫廷人士、传令官与仆人们，以及两百七十六位穷人。市长大人与他的诸位教友弟兄也出席，此外还有皇家礼拜堂的儿童合唱团，最后则是莱礼爵士领着女王的四十卫士，卫士们手中的戟全都朝下。在这一片庄严的丧葬队伍行进间，还伴随着美丽壮观的场面，包括五彩缤纷的布条与军旗随风飘扬，以及雄壮的喇叭声。

成千上万的平民沿着出殡的路线哀悼着：史家斯托就表示：“西敏区涌进了各式各样的人，将街道、平房、窗户、街沟等，全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全都是来送葬的，当他们见到躺在棺木上的伊丽莎白女王的蜡像时，人人都不禁叹息、呻吟、哭泣，空前绝后的悲怆，历史上也未记载任何人、任何时间或地点，一位君主之死能激起人民如此大的悲恸。”

在惠特吉夫大主教的主持下，伊丽莎白一世的遗体就埋葬在西敏寺亨利七世礼拜堂北面的侧廊；她的棺木运进了墓穴，置放在她姐姐玛丽一世的棺木上头，皇室的主要官员便依据惯例，将象征职权的白

色徽章击碎，洒在她的棺木上，象征对女王的忠诚划上句点。接着便将墓穴密封。

詹姆士一世下令为伊丽莎白女王修建一座华丽的纪念碑。由马克西米连·柯特（Maximilian Colt）设计，造价七百六十五英镑，于一六〇六年完工。柯特用白色大理石，刻了一座伊丽莎白女王的塑像，看起来是个老妇，因此许多人猜测，他可能是依照女王死后的面模雕刻出来的。这座雕像由尼可拉斯·希利亚德（Nicholas Hilliard）上漆，再由约翰·克利兹（John de Critz）镀金，但现在塑像上的颜色与镀金，已被岁月冲刷殆尽。但这段用拉丁文镌刻在碑上的墓志铭，可能会让女王非常开心，因为这段文字形容她为“大英王国之母，新教与学识的抚育者；精通多国语言，天资过人，身心皆美，是举世无双的君主”。

* * *

四十五年来，“尽管面对各国的挑战”，伊丽莎白女王仍为国家带来和平与稳定的治理——这是她送给人民的无价之宝。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期间，英国从贫困小国，摇身一变成了欧洲强权。在英国水兵的支持下，女王的海军成为人人敬畏的海上霸权，伊丽莎白女王被尊称为“海之女王，北方之星”绝对名副其实。

透过宗教宽容政策，伊丽莎白女王也让人民更加团结，这样的气氛一直影响到了今日的英国，也让人民对她忠贞不贰。她与臣子之间，建立了过去从未见过的特殊关系，至今也无人能出其右。历史上少有如此受到爱戴的女王。在她的统治之下，人民更深具信心地相信他们是被神眷顾的国家，受到上天的护佑，也因为这样的信心，在英国大败无敌舰队多年后，成就了英国文艺复兴。

当然她也并不是没有失败之处。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掌管金钱，穷极一生都得收支平衡，最后却因经济困顿而破了功，死时留下四十万英镑的债务。爱尔兰事实上也未完全归顺，加莱港仍属法国，而至伊丽莎白女王身亡前，英国仍未能在新大陆成功建立永久的殖民地。但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治理下，英国打败了西班牙强权，获得欧洲诸国的敬佩，并透过王权的结合，与苏格兰建立了永远的和平。伊丽莎白女王幸运地拥有许多睿智的参事，这可能也都要归功于挑选公仆时，她识人精明，总能看出他人优点。

伊丽莎白女王总是拖延或闪避许多问题，包括皇室财务、清教主义复苏及国会试图缩减王权，伊丽莎白女王将许多可能成为未来冲突的问题，留给了后代去解决，就算她因各种难以克服的威胁与问题而腹背受敌时，她也尽可能地维持最佳状态。

许多当时的人都见证了她的能耐。伯利男爵是这样说她的：“她是史上最聪颖的女性，她完全清楚同一个年代中，各国君主的兴趣与性格倾向，对于自己的王国也有彻头彻尾的了解，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参事，能说出她不知道的事情。”

“英国的神圣女王有超越男人的能力。”罗伯特·塞西尔写道，“事实上，她根本不像个女人。”接着又渴望地表示：“真希望现在在谒见室中等待的是她，这样我的脚就会轻松一点，夜里也能安睡。”看来詹姆士一世统治的日子，并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

但一直到几年后，许多人才开始理解，自己失去了些什么。“当我们接受苏格兰王的统治后，对女王的思念就更深了，”格洛斯特主教葛菲古曼如是说，“对她的记忆多被称颂：教堂钟声、民众欢欣鼓舞的模样，以及追思她的布道会，都超越了迎接新王詹姆士的期待。”在她死后不过几十年间，她辛苦培养出的和谐气氛便消失无踪，王权与国会之间无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也制造意外。人们用一种

怀旧之情，不断思念着英明女王，她的传奇被人不断美化，成了各式各样的乡野奇谈：在无敌舰队之役前，德瑞克爵士仍在玩保龄球；莱礼爵士将自己的斗篷铺在地上，让女王顺利通过泥泞；伊丽莎白女王对婚姻游戏的操弄，引发几世纪的揣测。

对这位传奇女性来说，最适合的墓志铭，应该就是康登的传记中所述：“再怎么遗忘，也不掩她威名的光辉；因她带来的快乐记忆，至今依然鲜明，在世代子孙的心目中流传下去。”

参考文献

在许多情况下，本书所引述之文字是源自明确的文本或参考书目。而非引述的文字叙述则是参考许多当时的文献资料，经由汇集、整理、撰写而成，其主要来源是：

Acts of the Privy Council

Archaeologia

Calendar of the MSS at Hatfield House

Calendar of the MSS at Longleat

Calendars of State Papers, Foreign and Domestic

The Cecil Papers—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ign of Elizabeth, edited by William Murdin

The Devereux Papers

The Dudley Papers

The Egerton Papers

Simonds D' Ewes: Journals of all the Parliaments during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N. Fourdinier. Amy Robsart

Lives and Letters of the Devereux Earls of Essex

Memoirs of the Reign of Elizabeth, edited by Thomas Birch

Sir Robert Naunton: Fragmenta Regalia

Original letters: several collections

Proceedings and Ordinances of the Privy Council

Progresses and Public Processions of Elizabeth I, edited
by J. Nichols

Queen Elizabeth and Some Foreigners, edited by Victor von
Klarwill

Queen Elizabeth and her Times, edited by Thomas Wright

The Rolls of Parliament

T. Rymer: Foedera

The Sidney Papers

State Papers: various collections

以上完整的细节以及其他参考文献皆列于以下原始文献和二次文
献。

原始文献

Acts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England (32 vols., ed. John Roche Dasent, HMSO, 1890–1918)

Allen, Cardinal William: *Letters and Memorials* (ed. T. F. Knox, 1882)

L' Ambassade de France en Angleterre sous Henri IV, 1598–1605 (4 vols., ed. Laffleur de Kermaingant, 1886–95)

Anecdotes and Traditions Illustrative of Early English History and Literature (ed. W. J. Thomas, Camden Society, 1839)

The Antiquarian Repertory: A Miscellany intended to Preserve and Illustrate several Valuable Remains of Old Times (4 vols., ed. Stephen Perlin and Francis Blyth, 1775–84; ed. F. Grose and T. Astle, 1808)

Archaeologia, or Miscellaneous Tracts relating to Antiquity (102 vols.,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1773–1969)

‘Archives of the English Tournament’ (ed. Sidney Anglo,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2, 1960)

Ascham, Roger: *English Works* (ed. W. A. Wright, 1904)

Ascham, Roger: *Opera* (1703)

Aubrey, John: *Brief Lives* (ed. Andrew Clark, 1898; ed. Anthony Powell, 1949, and Oliver Lawson Dick, 1962)

Bacon, Sir Francis: *Collected Works* (ed. J. Spedding, R. L. Ellis and D. D. Heath, 1857-74)

The Bardon Papers: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Imprisonment and Trial of Mary, Queen of Scots (ed. Conyers Read, Camden Society, 3rd Series, X V II , 1909)

Barthlet, J.: *The Pedigree of Heretics (1566)*

Brantôme, Sieur de: *Oeuvres Complètes* (1823)

Buchanan, George: *Detection of the Doings of Mary, Queen of Scots* (1572)

The Cabala sive scrinia Sacra: Mysterie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in Letters of Illustrious Persons (1654, 1691)

Calendar of Carew MSS, 1575-1588 (ed. J. S. Brewer and W. Bullen, 1868)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17 vols., ed. G. A. Bergenroth, P. de Goyangos, Garrett Mattingly, R. Tyler etc., HMSO, 1862-1965)

Calendar of the Manuscripts of the Marquess of Bath at Longleat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1904-1980)

Calendar of the MSS of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preserved at Hatfield House (18 vols.,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1883-1940)

Calendar of Patent Rolls: Elizabeth I (Public Record Office)

Calendar of the Pepys MSS in Magdalene College, Cambridge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Edward VI, Mary, and Elizabeth, 1547-1580, 1581-90, 1591-1603 (12 vols., ed. Robert Lemon and M. A. E. Green, 1856-72)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Foreign Series, Elizabeth I (23 vols., ed. Joseph Stevenson and W. B. Turnbull etc., 1863-1950)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Ireland (II vols., ed. H. C. Hamilton and R. P. Mahaffy, 1860-1912)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and Manuscripts existing in the Archives and Collections of Milan, Vol. 1 1385-1618 (ed. A. B. Hinds, 1912)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and Manuscript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 and in the other Libraries of Northern Italy 7 vols., ed. Rawdon Brown etc., HMSO, 1864-1947)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Border Affairs (ed. Joseph Bain, 1894-6)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preserved principally at Rome in the Vatican Archives and Library, 1558-78 (ed. J. M. Rigg, 1916-26)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Scotland, 1509-1589 (ed. M. J. Thorpe, 1858)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Scotland, 1547-1603 (12 vols., ed. Joseph Bain, W. K. Boyd and M. S. Guiseppi, 1898-1952)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Spanish, Elizabethan, 1558-1603 (4 vols., .ed. M. A. S. Hume, 1892-9)

Camden, William: *Annales Rerum Anglicarum et Hibernicarum Regnante Elizabetha* (1615; 3 vols., tr. Thomas Hearne, 1717; tr. H. Norton, 1630, 1688; also published as *Annals of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in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England' ed. White Kennett, 1706)

Camden, William: *Britannia* (ed. R. Gough, 1789)

Camden, William: *The History of the Most Renowned and Virtuous Princess Elizabeth, late Queen of England* (1630) ; later published as *The History of the Most Renowned and Victorious Princess Elizabeth* (1675)

Carey, Sir Robert: *Memoirs of the Life of Robert Carey, written by Himself* (ed. John Boyle, 1759; ed. Sir Walter

Scott, 1808; ed. G. H. Powell, 1905) Carleton, Dudley:
*Memorials of Affairs of State in the Reigns of Queen
Elizabeth and King James 1* (3 vols, 1725)

Castelnau, Michel de: *Memoires de Michel de Castelnau,
Seigneur de la Mauvissière* (3 vols, ed.L. Laboureur, 1731)

Castiglione, Balthasar: *The Courtier* (tr.G. Bull, 1967)

*The Cecil Papers: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Affairs from the Year 1552 to 1570, left by William
Cecil, Lord Burghley, at Hatfield House* (15 vols., ed.Samuel
Haynes and William Murdin, 1740-59)

Cecil, Sir Robert: *Letters from Sir Robert Cecil to Sir
George Carew* (ed John Maclean, Camden Society, LX X X VIII,
1864)

Chamberlain, John: *Letters* (ed.Sarah Williams, Camden
Society, LX X IX 1861; 2 vols., ed. N. E. McClur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X II , 1939)

Chettle, Henry: *The Order and Proceeding at the Funeral
of Elizabeth* (1603)

Churchyard, Thomas: *The Service of Sir John Norris in
Brittany in 1591* (1602)

Clapham, John: *Elizabeth of England: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Life and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ed.E. P.

Read and Conyers Read, 1951;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951)

Clifford, Lady Anne: *Diary* (ed.V. Sackville West, 1923)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e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ña (112 vols., 1842-95, and the *Nueva Colección*, 6 vols., 1892 catalogued by J. Paz, 1930-1)

A Collection of Ordinanc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Royal Household, made in Divers Reigns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1790)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Affairs in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1571-96 (ed. William Murdin, 1759)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ials (ed.D. Thom, William Cobbett, and T. B. Rowel I, 1809-98; reissued 1972)

Correspondance de Philippe 11 (5 vols., ed.L. P. Gachard, 1848-79)

The Correspondence of King James VI with Sir Robert Cecil and Others in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ed.J. Bruce, Camden Society, LX X VIII, 1861)

Correspondentie van Robert Dudley, graaf van Leycester (3 vols, ed.H. Brugmans, 1931)

Cotton MSS (British Library)

The Devereux Papers (Collection of the Marquess of Bath, Longleat House) (ed.P. Broughton, Camden Miscellany X III, 1924)

Diary of Philip Julius, Duke of Stettin, Pomerania, through England in 1602 (ed.Gottfried von Bulow and Walter Powel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nd Series, VI, 1892)

Digges, Dudley: *The Compleat Ambassador* (1655; contains many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Duke of Anjou' s courtship of Elizabeth I)

Documents from Simancas relating to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ed.Tomas Gonzalez, tr. and ed. Spencer Hall, 1865)

Dudley Carleton to John Chamberlain: Jacobean Letters, 1603-1624 (ed.M. Lee, 1972)

The Dudley Papers (Collection of the Marquess of Bath, Longleat House)

The Edmondes Papers (ed.G. G. Butler, Roxburghe Club, 1973)

The Egerton Papers (ed.J. Payne Collier, Camden Society, X XII, 1840)

Elizabeth and Mary Stuart (ed.F. A. Mumby, 1914)

Elizabeth I : *A Book of Devotions composed by H. M. Elizabeth R.* (ed. J. P. Hodges and Adam Fox, 1977)

England as seen by Foreigners in the Days of Elizabeth and James I (ed. W. B. Rye, 1865)

D' Ewes, Sir Simonds: *The Journals of all the Parliaments during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revised and published by Paul Bowes, 1682, 1693)

The Foljambe Papers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15th report, Appendix, Part V, 1987)

Fourdinier, N.: *Amy Robsart, the Wife of Lord Robert Dudley, the Favourite of Queen Elizabeth I. Her Life, Ancestry and the True Cause of her Tragic Death* (MS. MC5| 29, Norfolk Record Office)

Foxe, John: *Acts and Monuments of the Church* (1563; 8 vols., ed. G. Townshend and S. R. Cattley, 1837-41)

Fuller, Thomas: *The Church History of Britain* (1665)

Fuller, Thomas: *The Worthies of England* (1662; ed. P. Nuttall, 1890)

A Full View of the Public Transactions in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ed. P. Forbes, 1740-41)

Gascoigne, George: *The Princely Pleasures at the Court at Kenilworth* (1575)

The Girlhood of Queen Elizabeth (ed.F. A. Mumby, 1909)

Gleanings after Time (includes ‘An Elizabethan Schoolboy and his Book’ by A. M. Bell; ed.G. L. Apperson, 1907)

Golding, A.: *A Confutation of the Pope’ s Butt against Elizabeth* (1572)

Goodman, Dr. Godfrey, Bishop of Gloucester: *The Court of James the First* (ed.J. S. Brewer, 1839)

Grafton, Richard: *Abridgement of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1563)

Greville, Fulke: *The Life of the Renowned Sir Philip Sidney* (1652; ed.N. Smith, 1907)

Greyfriars Chronicle (ed.J. Nichols, Camden Society, Old Series, X LX IV, 1852)

Grindal Edmund: *Remains* (ed.W. Nicholson, Parker Society, 1847)

Guide to the Manuscript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2 vols., ed.M. G. Guiseppi; 2 vols. 1923-4)

The Hamilton Papers (ed.J. Bain, 1890-92)

The Hardwick Papers: Miscellaneous State Papers, 1501-1726 (2 vols., ed.Philip Yorke, 2nd Earl of Hardwicke, 1778)

Harington, Sir John: *Letters and Epigrams* (ed. N. E. McClure, 1930)

Harington, Sir John: *A New Discourse of a Stale Subject called the Metamorphosis of Ajax* (1596; ed. Elizabeth Story, 1962)

Harington, Sir John: *Nugae Antiquae, Being a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 of Original Papers in Prose and Verse, Written in the Reigns of Henry VIII, Queen Mary, Elizabeth, King James, etc.* (3 vols., ed. Rev. Henry Harington, 1769–79; 2 vols., ed. Thomas Park, 1804)

Harington, Sir John: *A Tract on the Succession to the Crown* (1602; ed. C. R. Markham, Roxburghe Club, 1880)

Harleian MSS (British Library)

Harleian Miscellany (1746; 10 vols, ed. T. Park 1808–13)

Harrison, William: *An Historical Description of England* (4 vols., 1908)

Hayward, Sir John: *Annals of the First Four Years of the Reign of Elizabeth* (ed. John Bruce, Camden Society, VII, 1840)

Hayward, Sir John: *The First Part of the Life and Reign of King Henry IV* (1599)

Hearne, Thomas: *Remarks and Collections* (Oxford Historical Society, 1898)

Hearne, Thomas: *Syllogue Epistolarum* (1716)

Hentzner, Paul: *A Journey into England in the Year 1598* (tr. Horace Walpole, 1757; 1881-2)

Hentzner, Paul: *Travels in England* (1889)

Heywood, Thomas: *England's Elizabeth* (Harleian Miscellany, X, 1813)

Hilliard, Nicholas: *The Art of Limning* (Walpole Society, 1912)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the Last Four Parliaments of Queen Elizabeth (ed. Heywood Townshend, 1680)

History of Queen Elizabeth, Amy Robsart and the Earl of Leicester (ed. F. J. Burgoyne, 1904)

Hoby, Sir Thomas: *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1561)

Holinshed, Raphael: *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1577; 6 vols., ed. Henry Ellis, 1807-8)

Illustrations of British History in the Reigns of Henry VIII, Edward VI, Mary, Elizabeth and James I (3 vols., ed. E. Lodge, 1838)

Intimate Letters of England's Queens (ed. Margaret Sanders, 1957)

Jonson, Ben: *Conversations with William Drummond* (Shakespeare Society 1842)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ed. Vardon and May, 1803)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Lords (1846)

The Kenilworth Festivities (ed. F. J. Furnivall, New Shakespeare Society, 1890)

Laneham, R.: *A Letter, wherein part of the Entertainment unto the Queen's Majesty at Kenilworth Castle in Warwickshire in this Summer's Progress, 1575, is signified* (1575)

Lansdowne MSS (British Library)

Leti, Gregorio: *Historia o vero vita di Elizabetta, regina d' Inghilterra* (survives only in an abridged French translation published as *La Vie d' Elisabeth, Reine d' Angleterre, traduite d' Italien* (1692; 1696)

The Letter Books of Sir Amias Paulet (ed. John Morris, 1874)

'A Letter from Robert, Earl of Leicester, to a Lady' (ed. Conyers Read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April, 1936)

The Letters of Queen Elizabeth (ed. G. B. Harrison, 1935 and 1968)

The Letters of Queen Elizabeth and James VI of Scotland (ed. John Bruce, Camden Society, X LVI, 1849)

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ed. M. A. E. Wood, 1846)

Lettres de Catherine de Medicis (10 vols, ed. H. Ferrière-Percy, 1880–1909)

Lettres de Marie Stuart (ed. A. Teulet, 1859)

Lettres, Instructions et mémoires de Marie Stuart, Reine d' Ecosse (7 vols., ed. Prince A. Labanoff, 1844)

The Leycester Correspondence: Correspondence of Robert Dudley, Earl of Leicester, during his Government of the Low Countries, 1585–6 (ed. John Bruce, Camden Society, X X VII, 1844)

Leycester's Commonwealth (ed. F. J. Burgoyne, 1904)

De Lisle and Dudley MSS at Penshurst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Report, 1934–46) (Now in the Kent County Archive Office at Maidstone)

Lives and Letters of the Devereux, Earls of Essex (2 vols., ed. Walter Bouchier Devereux, 1853)

The Loseley MSS (ed. A. J. Kempe, 1825)

'Lost from Her Majesty' s Back' (ed. Janet Arnold, The Costume Society, 1980)

Machyn, Henry: *The Diary of Henry Machyn, Citizen and Merchant Tailor of London, from A. D. 1550 to A. D. 1563* (ed. J. G. Nichols, Camden Society, X LII , 1848)

Maisse, André Huralt, Sieur de: *A Journal of all that was Accomplished by M. de Maisse, Ambassador in England from King Henry IV to Queen Elizabeth, 1597* (tr. and ed. G. B. Harrison and R. A. Jones, London, 1931)

Manningham, John: *Diary* (ed. John Bruce and W. Tite, Camden Society, 1858)

Melville, Sir James, of Halhill: *Memoirs of his own Life, 1549-93* (ed. Thomas Thomson, Bannatyne Club, 1829, and A. Francis Steuart, 1929)

Memorials of the Rebellion of 1569 (ed. Cuthbert Sharpe, 1840)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Christopher Hatton (ed. N. H. Nicholas, 1847)

Memoirs of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2 vols., ed. Thomas Birch, 1754) (drawn chiefly from the Bacon MSS in Lambeth Palace Library)

Merbury, C.: *A Brief Discourse on Royal Monarchy etc.* (1581)

Monarchs and the Muse: Poems by Monarchs and Princ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Wales (ed. Sally Purcell, 1972)

Moryson, F.: *An Itinerary* (4 vols., 1907)

La Mothe Fénelon, Bertrand de Salaignac de:
Correspondance Diplomatique (7 vols., Bannatyne Club, 1838-40)

Naunton, Sir Robert: *Fragmenta Regalia, or Observations on the Late Queen Elizabeth, Her Times and Her Favourites* (1653; Harleian Miscellany II, 1744; ed. Edward Arber, 1870, 1896)

Newdigate, Lady: *Gossip from a Muniment Room* (1898)

Not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Ben Jonson by William Drummond of Hawthornden (ed. G. B. Harrison and R. F. Patterson, 1923)

Original Letters Illustrative of British History (II vols., ed. Henry Ellis, 3rd Series, 1824-1846)

Original Letters relative to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ed. H. Robinson, Parker Society, 1846-7)

Parker, Matthew: *Correspondence, 1535-75* (ed. J. Bruce and T. T. Perowne, Parker Society, 1853)

Parsons, Robert: *A Conference about the Next Succession to the Crown of England* (1594)

Peck, Francis: *Desiderata Curiosa* (2 vols., 1732-5; 2 vols., ed. T. Evans, 1779)

Perlin, E.: *Déscription d'Angleterre et d'Écosse* (1558)

The Poems of Queen Elizabeth (ed. Leicester Bradner, 1964)

Proceedings and Ordinances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England (ed. H. Nicholas, Records Commissioners, 1834-7)

The Progresses and Public Processions of Queen Elizabeth (3 vols, ed. J. Nichols, 1823)

Queen Elizabeth and some Foreigners (ed. Victor von Klarwill; tr. T. N. Nash, 1928)

Queen Elizabeth and her Times (2 vols., ed. Thomas Wright, London 1838)

The Queen's Majesty's Passage through the City of London to Westminster the Day before her Coronation (ed. James M. Osborn, 1960; ed. J. E. Neale, 1960)

Raleigh, Sir Walter: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1614, 1677)

Raleigh, Sir Walter: *Letters* (ed. E. Edwards, 1868)

Raleigh, Sir Walter: *Poems* (ed. Agnes Latham, 1929)

Raleigh, Sir Walter: *Works* (8 vols., 1829)

Relations Politiques de France...avec l'Ecosse (5 vols, ed.A. Teulet, 1862)

Rélations Politiques des Pays Bas et de l'Angleterre sous la Règne de Philippe II, 1555-79 (II vols., ed.Kervyn de Lettenhove etc., 1882-1900)

Rotuli Parliamentorum (The Rolls of Parliament) (7 vols., ed.J. Strachey etc., Records Commissioners, 1767-1832)

Royal MSS (British Library)

MSS of the Duke of Rutland at Belvoir Castle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12th. Report, Appendix, Part IV, 1888)

Rymer, Thomas: *Foedera* (20 vols., 1704-35 ed.T. Hardy, Records Commissioners, 1816-69)

The Sadler Papers (2 vols., ed.A. Cliftord, 1809)

Sanders, Nicholas: *De Origine ac Progressu Schismatis Anglicani 1585*; ed.D. Lewis and printed as *The Rise and Growth of the Anglican Schism*, 1877)

The Sayings of Queen Elizabeth (ed.F. Chamberlin, 1923)

Secret Correspondence of Sir Robert Cecil and James I (ed.Lord Hales, 1766)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st Renowned Queen Elizabeth and the Earl of Essex. By a Person of Quality (1695)

The Sidney Papers: Letters and Memorials of State (2 vols., ed. Arthur Collins, 1746)

Sidney, Sir Philip: *Works* (4 vols., ed. A. Feuillerat, 1922–26)

The Somers Tracts (13 vols., ed. Sir Walter Scott, 1809–15)

State Papers, Foreign Series, Elizabeth I, 1589–90 (ed. R. B. Wernham, 1964)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ed. J. K. Laughton, Navy Record Society, 1894)

The Statutes, A. D. 1235–1770 (HMSO 1950)

Statutes of the Realm (II vols., Records Commissioners, 1810–28)

Stow, John *The Annals of England, or a General Chronicle of England* (1592; ed. E. Howes, 1631)

Stow, John: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from Brutus unto this Present Year of Christ* (1580; 1605)

Stow, John: *A Survey of London* (2 vols., ed. C. L. Kingsford, 1908; ed. Henry Morley, 1994.)

Stubbs, John: *A Gaping Gulf, with Letters and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ed. Lloyd E. Berry, 1968)

Strype, John: *Annals of the Reformation* (4 vols., 1820–40)

Strype, John: *Ecclesiastical Memorials* (3 vols., 1721–33; 1822; 1823)

Thomas Platter's Travels in England, 1599 (ed. Clare Williams, 1937)

Tomkyns, J.: *A Sermon preached on the 26th day of May 1584* (1584)

Tothill, R.: *The Passage of our Most Dread Sovereign Lady, Queen Elizabeth through the City of London to Westminster* (1559)

Tudor Royal Proclamations (3 vols., ed. P. L. Hughes and J. F. Larkin, 1964–9)

Tudor and Stuart Proclamations (2 vols., ed. R. Steele, 1910)

Tudor Tracts (ed. A. F. Pollard, 1903)

Unton, Sir Henry: *Correspondence* (ed. Joseph Stevenson, Roxburghe Club 1848)

Walsingham, Sir Francis: *Journal, 1570–83* (ed. C. T. Martin, Camden Miscellany, IV, 1871)

Wilbraham, Sir Robert: *Journal* (Camden Miscellany, X , 1902)

Wilson, Thomas: *The State of England, Anno Domino 1600* (ed. F. J. Fisher, Camden Miscellany, CVI, 3rd Series, LII 1936)

Wriothesley, Charles, Windsor Herald: *A Chronicle of England in the Reigns of the Tudors, from 1485 to 1559* (1581; 2 vols., ed. William Douglas Hamilton, Camden Society, 2nd Series, X , X X , 1875-7)

The Zurich Letters (ed. H. Robinson, Parker Society, 1842)

二次文献

Abbot, Edwin A.: *Bacon and Essex* (1877)

Abbot, Edwin A.: *Francis Bacon* (1885)

Adams, Simon: 'Faction, Clientage and Party, 1550-1603' (*History Today*, X X X II , 1982)

Adlard, George: *Amye Robsart and the Earl of Leicester* (1870)

Aikin, Lucy: *Memoirs of the Court and Times of Queen Elizabeth* (1818)

Aird, Ian: 'The Death of Amy Robsart: Accident, Suicide or Murder-or Disease?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56)

Andrews, K. R. : *English Privateering Voyages 1588-95* (Hakluyt Society, 1959)

Arber, E. (ed.) : *An English Garland* (1877-96)

Armstrong Davison, M. H. : *The Casket Letters* (1965)

Arnold, Janet: *Queen Elizabeth' s Wardrobe Unlock' d* (1988)

Ashdown, Dulcie M. : *Ladies in Waiting* (1976)

Auerbach, Erna: *Nicholas Hilliard* (1961)

Auerbach, Erna: 'Portraits of Queen Elizabeth I' (*Burlington Magazine*, 1953)

Auerbach, Erna: *Tudor Artists* (1954)

Axton, M. : The Queen' s Two Bodies: *Drama and the Elizabethan Succession* (1977)

Bagwell, Richard: *Ireland under the Tudors* (1885)

Bainton, R. : *The Reformat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53)

Bassnett, Susan: *Elizabeth I: A Feminist Perspective* (1988)

Bayne, C. G. : 'The Coronation of Queen Elizabeth'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II*, 1907)

Beckinsale, B. W.: *Burleigh, Tudor Statesman* (1967)

Beckinsale, B. W.: *Elizabeth I* (1963)

Bekker, E.: *Elisabeth und Leicester* (Giessener Studien, V, 1890)

Benson, E. F.: *Sir Francis Drake* (1927)

Bindoff, S. T., Hurstfield, J. and Williams, C. H. (eds.) : *Elizabetha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1961)

Bindoff, S. T.: *Tudor England* (1950)

Black, J. B.: *Elizabeth and Henry IV* (1913)

Black, J. B.: *The Reign of Elizabeth* (1959)

Bloch, M.: *Les Rois Thaumaturges* (1924)

Bloch, Michael: *The Duchess of Windsor* (1996)

Boas, F. S.: *University Drama in the Tudor Age* (1913)

Boyd, M. C.: *Elizabethan Music and Musical Criticism* (1940)

Bradbrook, Muriel: *Drama as Offering: The Princely Pleasures of Kenilworth* (Rice Institute, X LVI, 1960)

Bradford, C. A.: *Blanche Parry* (1935)

Bradford, C. A. : *Helena, Marchioness of Northampton* (1936)

Bradley, E. T. : *The Life of the Lady Arabella Stuart* (1869)

Bromley, J. S. and Kossman, E. H. :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1961)

Brook, V. J. K. : *Whitgift and the English Church* (1957)

Brooke, Iris: *English Costume in the Age of Elizabeth* (1950)

Brookes, E. St. John: *Sir Christopher Hatton, Queen Elizabeth's Favourite* (1946)

Brushfield, T. N. : *The History of Durham House* (Devon Association, X X V)

Buxton, John: *Elizabethan Taste* (1965)

Buxton, John: *Sir Philip Sidney and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1966)

Chamberlin, Frederick: *Elizabeth and Leicester* (1939)

Chamberlin, Frederick: *The Private Character of Queen Elizabeth* (1921)

Chambers, E. K. : *'The Court' in Shakespeare's England* (1925)

Chambers, E. K. : *The Elizabethan Stage* (4 vols. , 1923)

Chambers, E. K. : *Sir Henry Lee* (1930)

Chantelauze, M. R. : *Marie Stuart, sa Procès et son Exécution* (1876)

Chapman, F. : *Ancient Royal Palaces in or near London* (1902)

Chapman, H. W. : *Two Tudor Portraits* (1960)

Christy, M. : ‘Queen Elizabeth’ s Visit to Tilbury in 1588’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34, 1919)

Clark, G. N. : *The Wealth of England, 1496 to 1720* (1946)

Collins, A. J. : ‘The Progress of Queen Elizabeth to Tilbury, 1588’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X , 1936)

Collinson, P. : *The Elizabethan Puritan Movement* (1967)

Cook, Greville : ‘Queen Elizabeth and her Court Musicians’ (*Musical Times*, 79, 1918)

Cowan, S. : *The Last Days of Mary Stuart (incorporat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Journal of Burgoyne)* (1907)

Creighton, Mandell : *Queen Elizabeth* (1899)

Cross, C. : *The Puritan Earl: Henry Hastings, Third Earl of Huntingdon* (1966)

Cust, L.: *Notes on the Authentic Portraits of Mary, Queen of Scots* (1903)

Davenport, C.: *English Embroidered Book bindings* (1899)

Dawley, A.: *John Whitgift and the Reformation* (1955)

Dawson, Giles E. and Kennedy-Skipton, Laetitia:
Elizabethan Handwriting: A Guide to the Reading of Documents and MSS (1968)

Dent, John: *The Quest for Nonsuch* (1962)

Dewar, Mary: *Sir Thomas Smith: A Tudor Intellectual in Office* (1964)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22 vols., ed.L. Stephen and S. Lee, 1885-1909)

Dimmock, Arthur: 'The Conspiracy of Dr Lopez'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July, 1894)

Dodd, A. H.: *Life in Elizabethan England* (1961)

Dorsten, J. A. Van and Strong, Roy: *Leicester's Triumph* (1964)

Dowsing, James: *Forgotten Tudor Palaces in the London Area* (undated)

Dunlop, I.: *Palaces and Progresses of Elizabeth I* (1962)

Dutton, Ralph: *English Court Life from Henry VIII to George II* (1963)

Eccles, Audrey: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1982)

Edwards, Edward: *The Life of Sir Walter Raleigh, together with his Letters* (1868)

Edwards, R. and Ramsey, L. G. G. (eds.) : *The Tudor Age* (1956)

Elton, G. R. : *England under the Tudors* (1955)

Elton, G. R. :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1559–1581* (1986)

Elton, G. R. : *The Tudor Constitution* (1960)

Emmison, F. G. : *Tudor Secretary* (1961)

Erickson, Carolly: *The First Elizabeth* (1983)

Evans, Joan: *English Jewellery from the 5th Century A. D. to 1800* (1921)

Evans, Joan: *A History of Jewellery, 1100–1870* (1953)

Fairbanks A. and Wolpe, B. : *Renaissance Handwriting* (1960)

Falls. C. : *Elizabeth's Irish Wars* (1950)

Falls. C.: *Mountjoy: Elizabethan General* (1955)

la Ferrière, C. F. H. de: *Les Projects de Marriage de la Reine Elisabeth* (1882)

Finch, Peter J.: *John Dee: The World of an Elizabethan Magus* (1972)

Firth, C.H.: *The Ballad History of the Late Tudor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3rd Series III, 1909)

Fisher, F. J. (ed.) : *Essays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1961)

Fleming, David Hay: *Mary, Queen of Scots: From her Birth to her Flight into England* (1898)

Fox Bourne, H. R.: *Sir Philip Sidney* (1891)

Fraser, Antonia: *Mary, Queen of Scots* (1969)

Freedman, Sylvia: *Poor Penelope: Lady Penelope Rich, an Elizabethan Woman* (1983)

Froude, J. A.: *A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Fall of Wolsey to the Defeat of the Armada* (12 vols., 1856-70)

Furnivall, F. J.: *Shakespeare and Mary Fitton* (1897)

Gaunt, William: *Court Painting in England* (1980)

Gardiner, D.: *English Girlhood at School* (1929)

Gee, Henry: *The Elizabethan Prayer Book and Ornaments* (1902)

Geyl, P.: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1555-1609* (1932)

Goodall, W.: *An Examination of the Letters said to be written by Mary, Queen of Scots to James, Earl of Bothwell* (2 vols., 1754)

Grew, J. H.: *Elisabeth d' Angleterre dans la Litterature Française* (1932)

Grun, Bernard: *The Timetables of History* (1991)

Hadfield, A. M.: *Time to Finish the Game* (1964)

Haigh, Christopher: *Elizabeth I* (1988)

Haigh, Christopher (ed.):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1984)

Hale, H. M.: 'The English Historic Portrait: Document and Myth'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63)

Hampden, John (ed.): *Francis Drake, Privateer* (1972)

Handover, P. M.: *The Second Cecil: The Rise to Power, 1563 to 1604 of Sir Robert Cecil* (1959)

Harrison, G. B.: *The Life and Death of Robert Devereux, Earl of Essex* (1937)

Haynes, Alan: 'The Islands Voyage' (*History Today*, X X V , 1975)

Haynes, Alan: *Robert Cecil, Earl of Salisbury* (1989)

Haynes, Alan: 'Supplying the Elizabethan Court' (*History Today* X X VIII, 1978)

Haynes, Alan: *The White Bear: The Elizabethan Earl of Leicester* (1987)

Headlam Wells, Robin: *Spenser's Faerie Queen and the Cult of Elizabeth* (1983)

Hearne, Karen (ed.) : *Dynasties: Painting in Tudor and Jacobean England 1530-1630* (1995)

Henry, L. W.: *The Earl of Essex and Ireland* (British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X X XII, 1959)

Henry, L. W.: 'The Earl of Essex as Strategist and Military Organiser 1596-97'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 VIII, 1953)

Hibbert, Christopher: *The Court at Windsor* (1964)

Hibbert, Christopher: *The Tower of London* (1971)

Hibbert, Christopher: *The Virgin Queen: The Personal History of Elizabeth I* (1992 edn.)

Hosack, J.: *Mary, Queen of Scots and Her Accusers*. (2 vols., 1870–74)

Hotson, Leslie: *Queen Elizabeth' s Entertainment at Mitcham* (1953)

Howard, Philip: *The Royal Palaces* (1960)

Howarth, David: *The Voyage of the Armada*. (1981)

Hughes, P.: *The Reformation in England, Vol. 3* (1950–56)

Hume, M. A. S.: *The Courtships of Queen Elizabeth* (1898, 1904)

Hume, M. A. S.: *Treason and Plot* (1901)

Hurstfield, J.: *Elizabeth I and the Unity of England* (1960)

Hurstfield, J.: *Freedom, 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in Elizabethan England* (1973)

Hurstfield, Joel: *The Queen' s Wards* (1958)

Jackson, E.: 'Amye Robsart' (*Wiltshire Archaeological Magazine*, X VII, 1898)

Jardine, David: *Criminal Trials, Vol. I* (1832)

Jardine, David: *A Reading on the Use of Torture in the Criminal Laws of England* (1837)

Jebb, S.: *Life of Robert, Earl of Leicester* (1727)

Jenkins, Elizabeth: *Elizabeth the Great* (1958)

Jenkins, G.: 'Ways and Means in Elizabethan Propaganda' (*History*, 1941)

Johnson, Paul: *Elizabeth I: A Study in Power and Intellect* (1974)

Kendrick, T. D.: *British Antiquity* (1950)

Kenny, R. W.: *Elizabeth's Admiral* (1970)

Kingsford, C. L.: 'Essex House, formerly Leicester House and Exeter Inn' (*Antiquaries Journal, Archaeologia*, LX X III, 1-54, Oxford, 1923)

Lacey, Robert: *Robert, Earl of Essex: An Elizabethan Icarus* (1971)

Lacey, Robert: *Sir Walter Raleigh* (1973)

Lamont-Brown, R.: *Royal Murder Mysteries* (1990)

Law, Ernest: *The History of Hampton Court Palace* (1890)

Leader, J. D.: *Mary, Queen of Scots in Captivity* (1880)

Lee, A. G.: *The Son of Leicester* (1964)

Lees-Milne, J.: *Tudor Renaissance* (1951)

Lever, T.: *The Herberts of Wilton* (1967)

Levine, M.: *The Early Elizabethan Succession Question, 1558-68* (1966)

Levine, M.: *Tudor Dynastic Problems, 1460-1571* (1973)

Lewis, Michael: , *The Spanish Armada* (1951, 1960)

Lloyd-Howell, A.: *The Rouen Campaign, 1590-92* (1973)

Long, J. H. (ed.): *Music in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 (1968)

Luke, Mary M.: *A Crown for Elizabeth* (1971)

MacCaffrey, Wallace: 'Elizabethan Politics: The First Decade, 1558-1568' (*Past and Present*, April, 1963)

MacCaffrey, Wallace: *The Making of the Elizabethan Regime* (1968)

MacDonald, H.: *Portraits in Prose* (1946)

MacNalty, Arthur S.: *Elizabeth Tudor: The Lonely Queen* (1954)

Mahon, R. H.: *Mary, Queen of Scots* (1924)

Marshall, Rosalind K.: *Elizabeth I* (1991)

Mattingly, Garrett: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1959)

du Maurier, Daphne: *The Golden Lads* (The Bacon brothers) (1975)

Mercer, Derek (ed.) : *Chronicle of the Royal Family* (1991)

Meyer, C. S. : *Elizabeth I and the Religious Settlement of 1559* (1960)

Meyer, A. O. : *England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under Queen Elizabeth* (tr. J. R. McKee, 1916)

Meyer, E. H. : *English Chamber Music* (1946)

Montagu, W. : *Court and Society from Elizabeth to Anne* (2 vols., 1864)

Morley, H. (ed.) : *Ireland under Elizabeth and James I* (1890)

Morris, C. : *The Tudors* (1955)

Mumby, F. A. : *The Fall of Mary Stuart* (1921)

Neale, J. E. : 'The Accession of Queen Elizabeth' (*History Today*, May, 1953)

Neale, J. E. : 'The Elizabethan Acts of Supremacy and Uniformit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50)

Neale, J. 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1949)

Neale, J. E.: *Elizabeth I and her Parliaments*, Vol. I: 1559-1581 (1953) Vol. II: 1584-1601 (1957)

Neale, J. E.: *Essays in Elizabethan History* (1958)

Neale, J. E.: 'Parliament and the Succession Question in 1562-3 and 1566'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21)

Neale, J. E.: *Queen Elizabeth I* (1934; revised edn. 1965)

Neale, J. E.: 'Sayings of Queen Elizabeth' (*History*, X, October 1925)

Neale, J. E.: 'Sir Nicholas Throckmorton's Advice to Queen Elizabeth'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 V, 1950)

Needham, R. and Webster, A.: *Somerset House, Past and Present* (1905)

Nicholas, N. H.: *The Life of William Davison* (1823)

Orwell, G. and Reynolds, R.: *British Pamphleteers* (1948)

Osborne, June: *Entertaining Elizabeth I: The Progresses and Great Houses of her Time* (1989)

The Oxford Book of Royal Anecdotes (ed. E. Longford, 1989)

Paston-Williams, Sarah: *The Art of Dining* (1993)

Peck, D. C.: 'Government Suppression of English Catholic Books: The Case of "Leicester's Commonwealth"' (*Library Quarterly*, XLII, 2, 1977)

Percival, Rachel and Allen: *The Court of Elizabeth I* (1976)

Perry, Maria: *The Word of a Prince: A Life of Elizabeth I* (1990)

Picard, B. L.: *The Tower and the Traitors* (1961)

Plowden, Alison: *Elizabethan England* (1982)

Plowden, Alison: *Elizabeth Regina, 1588-1603* (1980)

Plowden, Alison: *Marriage with my Kingdom: The Courtships of Elizabeth I* (1977)

Plowden, Alison: *Two Queens in One Isle* (1984)

Pollen, J. H.: *The English Catholics in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1920)

Pollen, J. H.: *Mary, Queen of Scots and the Babington Plot* (Scottish Historical Society, 3rd Series, III, 1922)

Porter, H. C.: *Reformation and Reaction in Tudor Cambridge* (1958)

Prior, T. M. : *The Royal Studs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1935)

Quinn, D. B. : *Raleigh and the British Empire* (1947)

Rait, R. S. and Cameron, J. : *King James' s Secret* (1927)

Read, Conyers: *Lord Burghley and Queen Elizabeth* (1960)

Read, Conyers: *Mr. Secretary Cecil and Queen Elizabeth* (1955)

Read, Conyers: *Mr. Secretary Walsingham and the Policy of Queen Elizabeth* (3 vols., 925; reprinted 1967)

Read, Conyers: *The Tudors: 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 in Sixteenth Century England* (1936)

Read, R. R. : *The Rebellion of the Earls, 1569*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nd Series, X X , 1906)

Reese, M. M. : *The Royal Office of Master of the Horse* (1976)

Rice, G. P. : *The Public Speaking of Queen Elizabeth* (1951)

Rich, E. E. : 'The Populat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49)

Richardson, A. : *The Lovers of Queen Elizabeth* (1907)

Ridley, Jasper: *Elizabeth I* (1987)

Robinson, Agnes M. F.: 'Queen Elizabeth and the Valois Prince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1, 1887)

Rosenberg, Eleanor: *Leicester, Patron of Letters* (1955)

Roulstone, M.: *The Royal House of Tudor* (1974)

Rowse, A. L.: *An Elizabethan Garland* (1953)

Rowse, A. L.: *The Elizabethan Renaissance: The Life of the Society* (1971)

Rowse, A. L.: 'Elizabeth' s Coronation' (*History Today*, III, 1953)

Rowse, A. L.: *The England of Elizabeth* (1950)

Rowse, A. L.: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1955)

Rowse, A. L. and Harrison, G. B.: *Queen Elizabeth and her Subjects* (1955)

Rowse, A. L.: *Raleigh and the Throckmortons* (1962)

Rowse, A. L.: *Shakespeare' s Southampton* (1965)

Rowse, A. L.: *The Tower of Lond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1972)

Rowse, A. L.: *Windsor Cast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1974)

The Royal Encyclopaedia (ed. Ronald Allison and Sarah Riddell, 1991)

Rye, W. B.: , *England as seen by Foreigners* (1865)

Rye, W. B.: *The Murder of Amy Robsart* (1885)

Scarisbrick, Diana: *Tudor and Jacobean Jewellery* (1995)

Seymour, William: *An English Family in the Shadow of the Tudors* (1972)

Simpson, A.: *The Wealth of the Gentry, 1540-1640* (1961)

Simpson, R.: *Edmund Campion* (1896)

Sitwell, Edith: *The Queen and the Hive* (1963)

Smith, A. G. R.: *The Government of Elizabethan England* (1967)

Smith, Lacey Baldwin: *The Elizabethan Epic* (1966)

Smith, Lacey Baldwin: *Elizabeth Tudor: Portrait of a Queen* (1976)

Soden, Geoffrey: *Godfrey Goodman, Bishop of Gloucester, 1583-1656* (1953)

Somerset, Anne: *Elizabeth I* (1991)

Spedding, James: *The Letters and Life of Francis Bacon* (2 vols., 1890)

Stafford, Helen G.: *James VI of Scotland and the Throne of England* (1940)

Starkey, David (ed.) : *The English Court from the Wars of the Roses to the Civil War* (1987)

Stebbing, W., *Sir Walter Raleigh* (1899)

Strachey, Lytton: *Elizabeth and Essex* (1928)

Strickland, Agnes: *Life of Queen Elizabeth* (1906)

Strong, Roy: *Artists of the Tudor Court* (1983)

Strong, Roy: *The Cult of Elizabeth* (1977)

Strong, Roy and, Oman, Julia Trevelyan: *Elizabeth R* (1971)

Strong, Roy: *The English Icon: Elizabethan and Jacobean Portraiture* (1969)

Strong, Roy: 'Federigo Zuccaro' s Visit to England in 1575'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959)

Strong, Roy: *Gloriana: The Portraits of Queen Elizabeth I* (1987)

Strong, Roy: 'The Popular Celebration of the Accession Day of Queen Elizabeth I'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947)

Strong Roy: *Portraits of Queen Elizabeth I* (1963)

Strong, Roy: *Splendour at Court* (1973)

Strong, Roy: *Tudor and Jacobean Portraits* (2 vols., HMSO, 1969)

Sugden, John: *Sir Francis Drake* (1990)

Summerson, John: *The Building of Theobalds* (*Archaeologia*, CVII, 1954)

Tanner, Lawrence E.: *The History and Treasures of Westminster Abbey* (1953)

Taylor, W. F.: *The Charterhouse of London* (1912)

Tenison, E. M.: *Elizabethan England*, I to XIII A (1933-61)

Thompson, G. S.: *Lords Lieutenan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23)

Thompson, J. V. P.: *The Supreme Governor* (1940)

Thurley, Simon: *The Royal Palaces of Tudor England* (1993)

Tighe, R. R. and Davis, J. E.: *Annals of Windsor, Being a History of the Castle and Town* (1858)

Tillyard, E. M. W.: *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 (1944)

Tillyard, E. M. W.: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1944)

Tudor and Stuart Portraits (The Weiss Gallery, 1995)

Turton, Godfrey: *The Dragon's Breed: The Story of the Tudors, from Earliest Times to 1603* (1969)

Wallace, M. W.: *Philip Sidney* (1915)

Wallace, W. M.: *Sir Walter Raleigh* (1959)

Waldman, Milton: *Elizabeth and Leicester* (1945)

Walpole, Horace: *Anecdotes of Painting in England* (1876)

Waterhouse, E.: *Painting in Britain, 1530-1790* (1953)

Waters, D. W. 'The Elizabethan Navy and the Armada Campaign' (*Manner's Mirror*, 1949)

Welsford, Enid: *The Court Masque* (1927)

Wernham, R. B.: *Before the Armada: The Growth of English Foreign Policy 1485-1588* (1966)

Wernham, W. B.: 'Queen Elizabeth and the Portugal Expedition of 1589'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51)

Westminster Abbey: *Official Guide* (various edns.)

White, F. O.: *Lives of the Elizabethan Bishops* (1898)

Wiesener, L.: *La Jeunesse d' Elisabeth d' Angleterre* (1878; 2 vols., tr C. M. Yonge, 1879)

Williams, E. Carleton: *Bess of Hardwick* (1959)

Williams, Neville: *All the Queen's Men* (1972)

Williams, Neville: 'The Coronation of Queen Elizabeth I' (*Quarterly Review*, 597, 1953)

Williams, Neville: *Elizabeth I, Queen of England* (1967)

Williams, Neville: *The Life and Times of Elizabeth I* (1972)

Williams, Neville: *Thomas Howard, 4th Duke of Norfolk* (1964)

William, P. 'The Fall of Essex' (*History Today*, 1957)

Williams, Penry: *Life in Tudor England* (1964)

Williamson, Hugh Ross, : *Historical Enigmas* (1974)

Williamson, J. A.: *The Age of Drake* (1960)

Wilson, C.: *Queen Elizabeth and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1970)

Wilson, Derek: *Sweet Robin: A Biography of Robert Dudley, Earl of Leicester, 1533-1588* (1981)

Wilson, E. C.: *England's Eliza* (1939)

Wilson, J. D.: *Life in Shakespeare's England* (1911)

Wilson, Jean: *Entertainments for Elizabeth* (1980)

Wilson, Jean: 'The Harefield Entertainment and the Cult of Elizabeth I' (*Antiquaries Journal*, LX VI, 1986)

Wilson, V. A.: *Queen Elizabeth's Maids of Honour* (1922)

Woodfill, W. L.: *Musicians in English Society from Elizabeth to Charles I* (1953)

Woodworth, W.: *A Purveyance for the Royal Household under Queen Elizabeth*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35, 1945-6)

Wormald, Jenny: *Mary, Queen of Scots; A Study in Failure* (1988)

Wright, W. B.: *Middle Class Culture in Elizabethan England* (1935)

Yates, F. A.: *Astraea: The Imperial Them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75)

Yates, F. A.: 'Elizabethan Chivalry: The Romance of the Accession Day Tilt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947)

Yates, F. A.: 'Queen Elizabeth as Astraea'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947)

Young, Alan: *Tudor and Jacobean Tournaments* (1987)

Youngs, F. A.: *The Proclamations of the Tudor Queens* (1976)

Zweig, Stefan: *The Queen of Scots* (1935)

索引

Abingdon, Berrks. 94-5, 98-9

Accession Day 217-18, 247, 398 406, 420, 430, 439, 450,
459, 476

Adolphus, Duke of Holstein 67, 84

Aglionby, Mr, Recorder of Coventry 286

Aird, Professor Iain 106

Albeit V, Duke of Bavaria 88

Alençon, Duke of (see Francis of Valois)

Allen, William, Cardinal 296, 389

Allinga, Ahasvcrus 145-6

Alva, Duke of (see Ferdinand de Toledo)

Angus, Earl of (see Douglas)

Anjou, Dukes of (see Henry; Francis)

Antonio of Portugal, Don 333, 403, 417-18

Antwerp, Flanders 33, 92, 340, 353, 419

Appletree, Thomas 323-4

Appleyard, John 86, 100 104n

Apprentices, Statute of 1563 9

Argyll, Lady (see Stewart, Jane)

Ariosto, Ludovico 6

Arklow, Ireland 443

Armada, Battle of the Spanish, 1588 217 238, 246, 382,
384, 388-400, 420, 425, 430, 487-8

Armada Jewel, the 237, 398

Arnhem, Netherlands 370

Arran, Earl of (see Hamilton, James)

Arthur, King 223, 299

Arundel, Earl of (see FitzAlan)

Ascham, Roger 13-14, 18, 45, 73, 200

Ashby-de-la-Zouche, Leics. 304

Ashley, John 24, 113, 256

Ashley, Katherine, 15, 24, 78, 113, 164-5, 235, 256,
259, 342

Ashridge, Herts. 247

Ashton, Dr Abdy 462

Association, Act of, 1585 370

Aubrey, John 254, 343

Augsburg, Austria 176

Avila, Gomez d' 417

Aylmer, John, Bishop of London 56, 233, 348, 399

Azores 382, 403, 428

Babington, Sir Anthony, of Dethick 363-7, 369

Bacon, Anthony 286, 407, 411, 418, 425, 468

Bacon, Sir Francis 51, 59, 224, 286, 407, 411, 414, 416,
418-20, 425, 441, 444, 450-51, 453-4, 456-7, 463-4, 468

Bacon, Sir Nicholas, Lord Keeper 23, 41, 139, 141, 214,
266, 286, 307, 407, 422

Bagenal, Sir Henry 437

Baker, Richard 55

Ballard, Father John 363, 365, 367

Barn Elms, Surrey 216, 380

Basing, Hants. 409, 471

Bate, John 235

Bath, City of 414

Bavaria, Duke of (see Albert V)

Baylie, Elizabeth 50

Bayly, Dr 95

Baynard' s Castle, Blackfriars, London 63, 130, 241

Beale, Robert 224, 377, 381

Beaton, James, Archbishop of Glasgow 185

Beaufort, Lady Margaret 148

Beaufort, M. de 480-82

Bedington Park, Surrey 266, 456

Bedford, Countess of 134

Bedford, Earl of (see Russell, Francis)

Bedingfield, Sir Henry 28

Belvoir Castle, Leics. 291

Bendlowes, Sergeant 264

Berkeley, Sir Richard 453, 457

Bermondsey, London 347

Bertie, Peregrine, Lord Willoughby d' Eresby 255, 404

Berwick, Northumberland 151-2

Berwick, Treaty of, 1586 365

Bess of Hardwick (see Cavendish, Elizabeth)

Bethune, Maximilien de, Duke of Sully 471

Bettes, John 238

Bingham, Sir Richard 438

Biron, Marshal 471

Bisham Abbey, Berks. 406

Blackadder, Captain William 185

Blackfriars, London 239, 455

Bland, Adam 235

Blenheim Palace, Oxon. 247

Bloch, Michael 49

Blois, Treaty of, 1572 284-5, 297

Blount, Sir Charles, later Lord Mountjoy 348, 402, 439, 441, 444, 450, 453-5, 457-60, 463, 475, 478, 480

Blount, Sir Christopher 397, 459-60, 462, 468

Blount, Thomas 98-102, 106

Boccaccio, Giovanni 6

Bohemia, King of (see Maximilian II)

Bohun, Edmond 349

Boleyn, Anne, Queen of England, 2, 4, 11-13, 16, 18, 25, 36, 39, 64, 165, 230 236-7, 243, 246, 256, 283, 374

Boleyn, Mary 23-4, 165

Bolton Castle, Yorics. 196-7

Bond of Association 1584 352-3, 377-8

Bonner, Edmund, Bishop of London 26

Borth, Francis 79

Bothwell, Eari of (see Hepburn, James)

Boulogne, Francis 326

Bourke, Richard, Earl of Clanricarde 471

Bowes, Mr 98–9

Branganza, Duke of (see Theodosius II)

Brandon, Charles, Duke of Suffolk 42

Brandon, Eleanor, Countess of Cumberland 41–2

Brandon, Frances, Duchess of Suffolk, 41, 113

Breuner, Baron Caspar 65–8, 73–4, 78–9, 81, 84, 87

Bridges, Katherine 407–8

Bristol, City of 6, 263, 267, 475

Bristol, Treaty of, 1574, 293

British Library and Museum, London 80, 345, 465

Bromley, Sir Thomas, Lord Chancellor 366, 373–4

Browne, Anthony, 1st Viscount Montague 369, 408

Brussels, Flanders 26, 85, 89, 193

Buckingham, 2nd Duke of (George Villiers) 394

Buckhurst, Lord (see Sackville, Thomas)

Burcot, Dr 134–5

Burghley House, Stamford 19, 266)

Burghley, Lord (see Cecil, William)

Burton, Master 360–61

Bury St Edmunds, Suffolk 94

Butler, Thomas, 10th Earl of Ormonde 166, 171, 392

Buxton, Derbyshire 232, 307, 313, 348, 351, 360, 395

Byrd, William 7, 58, 230, 253

Cadiz, Spain 382, 422–6, 430

Cadwaladr, Prince of Wales 246

Caesar, Sir Julius 406

Cahir, Ireland 442

Calais, France 2, 25, 62, 91, 131, 133, 141, H4, 147,
275, 391, 421, 487

Calvin, John 222

Camberwell, London 94

Cambridge, City of 147–8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13, 18, 54, 58, 64, 67, 147–8,
178, 215, 405,

Camden, William 208, 322-3, 340, 367, 380, 386, 394, 396-7, 437, 466, 470, 483, 488

Campion, Father (St) Edmund 178, 333, 335, 338

Canterbury, City of 344

Cape St Vincent 382

Carberry Hill, Battle of, 1567 188

Carew, Sir Francis 266, 456

Carew, Sir George 413, 434

Carey, Eleanor, Lady Scrope 454, 466, 484-5

Carey, George, 2nd Lord Hunsdon 430, 443, 477

Carey, Henry, 1st Lord Hunsdon 24, 84, 135, 149, 157, 159, 211-12, 226, 256, 280, 387, 391, 403, 422, 480

Carey, Katherine, Countess of Nottingham 466, 480, 482

Carey, Katherine, Lady Knollys, 23, 165, 256, 258, 303

Carey, Robert 387, 480-82, 484-5

Carlisle, City of 194-5

Carlos, Don, Infante of Spain, son of Philip II 42, 115, 132-3, 142, 145, 147, 152

Carrickmacross, Ireland 445

Carshalton, Surrey 209

Cartagena, Carribean 357

Casket Letters, The 189, 197–200, 277

Castelnau, Michel de, Sieur de la Mauvissière 51, 288

Castiglione, Balthasar 6–7, 254

Cateau-Cambrésis, Treaty of, 1559 62, 75

Cavalcanti, Guido 274

Cavendish, Elizabeth, Countess of Lennox 295–6

Cavendish, Elizabeth (Bess of Hardwick) , Lady Saindow,
Countess of Shrewsbury 48, 50, 122, 203, 234, 295–6, 308, 353
& n, 476, 478

Cavendish, Mistress 262

Cecil, Anne, Countess of Oxford 274

Cecil House, Strand, London 304, 436

Cecil, Sir Robert 382, 390, 401, 404–5, 407–8, 411–12,
417–18, 420–2, 425–7, 432, 434, 436, 438, 440, 442, 444, 447–
8, 451–3, 455, 458–62, 464–5, 468–9, 475–83, 487

Cecil, Sir Thomas, later 2nd Lord Buighley 301, 479

Cecil, William, 1st Lord Burghley 18-23, 25, 29, 39, 45, 48, 50-52, 57, 64-5, 71, 73, 77, 79-80, 84-6, 89-93, 96-7, 101-3, 108-9, 111, 113-15, 117-20, 122, 127-8, 134, 141-3, 145-8, 150-55, 158-9, 164, 166-7, 171-3, 175-9, 181-2, 190-94, 198-9, 201-5, 207-11, 214-16, 221-2, 224-8, 232, 237-8, 253, 256-7, 263, 266-7, 269, 271, 274-81, 285-7, 290, 292, 299, 301, 304, 308, 315, 318, 321-2, 328, 331, 337-8, 340-41, 346, 352, 355, 357, 362, 366-7, 369-90, 372, 374-7, 380-82, 394, 401, 404-5, 407-8, 410-11, 416-18, 420-22, 424-6, 429, 432, 434, 436-8, 456, 487

Challoner, Sir Thomas 49, 85

Chamberlain, John 254

Champigny, Sieur de 306

Charles of Habsburg, Archduke of Austria 60, 62, 64-6, 71, 73-4, 80-82, 84-5, 87-8, 112, 118, 133, 145-6, 148, 154-5, 158-9, 161-3, 166-7, 169, 174-7. 191-2, 215

Charles V, Holy Roman Emperor, King of Spain 12

Charles XI, King of France 116, 121, 133, 154-5, 160, 171, 186, 208, 210, 213, 215, 269, 277, 285-8, 292, 293

Charterhouse, The, Smithfield, London 27, 215, 241, 276, 479

Chartley, Staffs. 302-3, 360, 364, 366, 368, 385

Chastelard, Pierre de 140–41

Châteauneuf, Mlle, de 278

Château-Thierry, France 350

Chatsworth, Derbyshire 203, 295, 308

Cheke, John 18, 67

Cheke, Mary 18

Chelsea Palace, London 13–14, 240, 266, 432

Chequers, Bucks. 164, 237

Chichester, Sussex 408

Chiswick, London 476

Christopher, Duke of Wurttemberg 145

Churchyard, Thomas 316

Civil War, The 267

Clanricarde, Earl of (see Bourke, Richard)

Clapham, John 18–19, 252

Clifford, George, Earl of Cumberland 217–18, 395, 413

Clifford, Margaret, Lady Strange, Countess of Derby 42

Clinton, Henry, Lord, later Earl of Lincoln 266, 323

Clinton, Lady 206

Cobham, Kent 76

Cobham, Lady 275

Cobham, Lord 260, 277, 426

Cockfield Hall, Suffolk 140

Coke, Sir Edward 414, 418, 454 464

Colchester, Essex 83

Colet, John, Dean of St Paul' s

Coligny, Admiral Gaspard de 132, 287

Colt, Maximilian 486

Compiègne, France 409

Condé, Prince de (see Louis I)

Cooke, Anne, Lady Bacon 286

Cooke, Sir Anthony 18

Cooke, Mildred, Lady Burghley 18

Cornbury Park, Oxon, 396

Cosimo I, Grand Duke of Tuscany 271

Coventry, City of 57, 211, 265, 286, 300–301

Cowdray Castle, Sussex 408, 415

Cowper, Henry 286

Cox, Dr Richard, Bishop of Ely 41, 57, 298

Craigmillar Castle, Edinburgh 183–4

Creighton, Father 352

Critz, John de 486

Croft, Sir James 86, 250

Croke, John 472–4

Cromwell, Oliver 246–7

Croydon Palace, Surrey 456

Cuffe, Henry 443, 458–9, 462, 465 468

Cumberland, Earl of (see Clifford, George)

Cumnor Place, Berks. 94–5, 90–100, 103, 105–6, 109, 112

Curle, Gilbert 366

Dacre, Leonard, Lord 212

Dairy House, the, Kew 72, 92-3, 100-101, 108, 267

Dale, Dr Valentine 389

Dannett, Thomas 176-7

Danvers, Sir Charles 453, 459, 461-2, 468

Damley, Lord (see Stewart, Henry)

Dartfbrd, Kent 76

Dartmouth, Devon 413

Davison, Sir William 362, 375-8, 381-2, 398

Dee, Dr John 22, 33, 230-31, 479

Delft, Netherlands 350

Denchworth, Berks. 94-5

Denmark, King of (see Frederick II)

Deptford, Kent 323, 336

Derby, Countess of 476

Derby, Earls of (see Stanley)

Devereux, Dorothy, Lady Perrot 347, 386-7

Devereux, Penelope, Lady Rich 404, 439, 453, 459-60, 468

Devereux, Robert, 2nd Earl of Essex 304, 347, 354, 358, 360, 370, 372, 384-7, 395, 397-8, 401-12, 414-30, 432-71, 477

Devereux, Walter, Viscount Hereford, 1st Earl of Essex 157, 165, 302-4, 312, 314

Dieppe, France 133

Digges, Dudley 224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3, 106, 472

Ditchley Park, Oxon. 238-9, 406

Doncaster, Yorks. 293

Dorothy, Mrs 175

Douai, France 296

Douglas, Archibald, Earl of Angus 43

Douglas, George 194

Douglas, James, Earl of Morton 172, 184, 189, 198, 270, 289, 294, 309

Douglas, Margaret, Countess of Lennox 42-3, 117, 131, 143, 152, 155, 163, 187, 215, 295-6

Dover, Kent 293, 326

Dowe, Annie, of Brentwood 90

Dowland, John 7, 223

Drake, Sir Francis, 9, 231, 309, 334, 336-7, 357, 382, 388-91, 394-5, 399, 403-4, 420-21, 423, 475, 488

Dragsholm Castle, Denmark 310

Drummond, William of Hawthornden 49

Drury, Drn 86

Drury House, London 459

Drury, Sir William 86

Dublin, Ireland 303, 437-8, 441-2, 444-5

Dudley, Ambrose, Earl of Warwick 22, 86, 129, 133, 141-3, 144, 260, 286, 294, 318, 362, 386, 406

Dudley Castle, Worcs. 291

Dudley, Edmund 22

Dudley, Edward, Lord 291

Dudley, Lord Guilford 15

Dudley, John, Earl of Warwick, Duke of Northumberland 13, 15-16, 20-22, 42, 77, 83, 111, 114, 353

Dudley, John, Earl of Warwick 20, 114

Dudley, Mary, Lady Sidney 22, 80–82, 85, 118, 136, 259, 325, 371, 397

Dudley, Robert, Baron Denbigh 330, 353&n, 357, 396

Dudley, Robert, Earl of Leicester 13, 20–22, 27, 31, 33, 36, 39, 42, 46, 50, 69–75, 77–88, 90–108, 110–114, 117–22, 129–30, 135–6, 142–8, 150–3, 155, 157–62, 165–6, 169–75, 178–80, 190, 192, 199, 202–7, 211, 215–16, 227, 229, 232–3, 239, 256, 262, 269, 272–6, 279–81, 284, 287, 289–94, 298–303, 305, 307–9, 311–18, 320, 322–5, 328–32, 337–41, 344–8, 350, 352–5, 357–9, 361–3, 365, 369–74, 377, 380, 382, 384–5, 388, 390–92, 394–8, 401, 405, 416, 426

Dudley, Sir Robert 262, 294, 308, 317, 353n, 397

Dunbar, Scotland 173–4, 183, 187–8

Dunkirk, Flanders 391

Durham Cathedral 210

Durham House, Strand, London 241, 343

Dyer, Sir Edward 248–9, 290

Dymoke, Sir Edward 39

Eddystone, Devon 390

Edinburgh, Castle and City of 90–92, 110, 156, 174, 176, 184–8, 198, 294, 469 485

Edinburgh, Treaty of, 1560 91, 117, 124, 127, 132, 184,
213-14

Edward III, King of England 42

Edward VI King of England 2, 4, 13-15, 18-20, 41-2, 60,
63-4, 94, 125, 139, 230

Edwards, Richard 178

Egerton, Sir Thomas, Lord Keeper 267, 422, 435, 438,
448, 450, 452-5, 461, 465, 476, 483

Eglionby, Mrs 165

Elisabeth of Valois, Queen of Spain 61-2

Elizabeth I , Queen of England: accession 1, 11, 16, 18

accomplishments and interests 7, 14, 229-31, 249-50,
253, 415-6, 431-2

appearance 16, 235-6, 414, 431, 433-4, 447

Armada speech 393-4

birth 4

character 17, 229, 231

clothes and jewellery 18, 32-3, 234-7, 431

coronation 33-40

court and ceremonial 240-42, 247-62, 405-6, 433-4, 470, 477-8

death 484-5

early life to 1558 9-10, 12-16

financial matters 40, 225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France 25, 40, 62, 75, 89, 91, 116-17, 131, 133, 141, 144, 147, 214, 228, 269, 284, 287-9, 292-4, 297, 333, 336, 382, 399, 404, 409-10, 430, 434

Netherlands 193, 202, 284, 297, 306-7, 311, 333-4, 341, 345, 347, 350-51, 357-9, 361-2, 365, 370-71, 382-4, 434, 459

Ireland 434, 437-8, 440-46, 450, 454, 475

Italy 339, 479-80

The Papacy 25, 89, 213, 296, 333-5, 346, 349, 381, 384, 399

Scotland 75-6, 79, 89-91, 93, 159-60, 167, 190-91, 193, 212-13, 270, 276, 294, 333, 365, 381-2, 469-70

Spain 24-5, 193, 202, 206-8, 228, 284, 292-4, 296-7, 306, 309, 311, 333-4, 336, 338, 340-41, 346, 349-50, 356-7, 363, 365, 381-4, 388-95, 398-9, 403-4, 409, 415, 420, 420-25, 427-31, 434, 459, 475

funeral and tomb 485-6

health and illnesses 17-18, 133-6, 153, 214, 231-4, 401-2, 432, 443, 470, 475-7, 479-83

household 7, 20, 24, 164-5, 253

marriage projects:

Philip of Spain 24-6, 30, 32-3, 43, 52-3, 59-61

Erik of Sweden 50, 66-7, 76, 79, 83-4, 88, 121, 129

Archduke Ferdinand 30, 60, 62, 64

Archduke Charles 60, 62, 64-6, 71, 73-4, 80-82, 84-5, 87-8, 112, 118, 133, 145-6, 148, 154-5, 158-9, 161-3, 166-7, 169, 174-7, 191-2, 215

Arundel 67-9, 71, 76-7, 80

Pickering 67-9, 71, 80

Arran 75-6, 79, 93, 112, 115, 126

Henry of Anjou 215-16, 269-7, 274-6

Francis of Alençon 278-9, 284-, 292-4, 306, 311-16, 318-27, 329-41, 345, 350-51

marriage speculation 45-7, 80, 84, 93, 107, 112-13, 345

palaces (see also separate entries) 240-47

portraits 30-40, 237-9, 413

progresses 76-7, 91, 121, 147-8, 178-9, 206-8, 262-8, 276, 286-7, 298-303, 307, 315-16, 318, 406, 408-9, 413-14, 471, 475-6

as Queen 10, 22-4, 26, 29-30, 219-28, 293, 348, 352-3, 399-400, 487-8

relations with Cecil| Burghley 18-20, 22-3, 29, 90, 92-3, 102, 108, 113, 159, 204-5, 227-8, 269, 290-92, 382, 424-5, 436-7

relations with Essex 304, 384-7, 401-2, 405-11, 414-17, 419-30, 432-6, 438-69

relations with Dudley| Leicester 20-22, 69-75, 77-80, 82, 84-8, 90-93, 96-8, 100-01, 103, 112-14, 117-21, 129-31, 147, 156-9, 165-6, 169-72, 174-6, 202, 272-4, 279, 289-90, 292, 294, 308, 312-14, 322-3, 330-32, 347-8, 353-4, 357-8, 361-3, 365, 372-3, 382, 384, 388, 394-8

relations with Mary, Queen of Scots 124, 127-9, 131-3, 141-2, 144-6, 148-53, 155-8, 163-4, 174, 176-7, 182-3, 186-91, 194-201, 203-5, 207, 211, 214-15, 277-8, 289, 295, 314-15, 333, 346, 349-50, 352, 355, 360-61, 364, 366-70, 371-8, 380-81, 383

relations with Parliament 40-41, 136-9, 179-82, 228, 271, 281-2, 328, 335, 355, 371-4, 415, 471-4

religious matters 26, 30-31, 40, 43-5, 54-9, 63-4, 213-14, 297-8, 305, 316, 335-6, 347

rumours and scandal 49-52, 72-3, 78-80, 85, 90-92, 103-4, 107, 110-12

sexual matters 18, 47-9, 290, 321

and the succession 40-43, 114-15, 296, 308, 345, 408, 433, 478-9

other references 3-6, 9, 26-8, 31, 99, 115-17, 121-3, 131, 140, 143, 164, 206, 208-12, 217-18, 273, 289-81, 298, 304-5, 323-4, 342-4, 346, 354-5, 412-13, 418, 422, 426

Elizabeth of York, Queen of England 12, 47

Elsynge Palace, Enfield, Herts. 247

Eltham Palace, Kent 76, 116, 240, 246

Elvetham, Hants, 409, 456

Ely, Bishop of (sec Cox, Richard)

Ely Place, Holbom, London 298, 411

Enfield Palace, Herts. 247

Epping Forest, Essex 246

Erik X IV, King of Sweden 50, 66-7, 76, 79, 83-4, 88, 121, 129

Erskine, John, Earl of Mar 276, 289

Bscorial Palace, Madrid 394

Esher, Surrey 292

Essex, Earls of (see Devereux)

Essex House, London (formerly Leicester House) 397, 417, 426, 433, 439, 453, 455, 459, 461–2

Eton College, Berks, 230, 304

Euston Hall, Suffolk 315

Eworth, Hans 7, 238

Faarevejle Church, Dragsholm, Denmark 310

Falmouth, Devon 403, 428

Famesc, Alexander, Duke of Parma 318, 333, 345, 351, 357, 368, 370, 382, 384, 388–94

Farnham, Surrey 206, 408, 456

Fayal, Island of 428

Feckenham, Richard, Abbot of Westminster 38, 40–41

Fénelon, Bertrand de Salaignac de la Mothe 51, 55, 207, 214, 216, 270, 275, 286, 288

Ferdinand of Habsburg, Archduke of Austria 30, 60, 62, 64

Ferdinand I, Holy Roman Emperor 60, 62, 64-6, 73-4, 76, 79, 81-2, 88, 145, 147-8

Ferdinand de Toledo, Duke of Alva 193, 202, 204, 206-7, 271-2, 284-5, 287, 289, 297

Feria, Count of (see Figueroa)

Ferreira, Esteban 417-19

Ferrol, Spain 428

Figueroa, Don Gomez Suarez de, Count de Feria 3, 24-8, 30, 32-3, 40, 42-3, 47, 52-3, 60-62, 64, 68, 70, 71, 95, 115, 275

Fish, Walter 235

Fitton, Mary 262, 455

FitzAlan, Henry, 12th Bari of Arundel 23, 45, 67-8, 71, 76-7, 80, 81, 85, 136, 202, 204, 209, 245, 277

Fleet Prison, London 104n, 164, 262, 347, 441, 449

Fleming, Thomas 420

Flushing, Netherlands 345, 358-9

Foix, Paul de 154-5, 160, 169-70, 275-6

Forster, Anthony, MP 94-5, 100, 106

Forster, Mrs 95, 98

Fortescue family 256

Forty Hall, Enfield, Herts. 247

Fotheringhay, Northants. 368-70, 376, 378, 383

Francis, Edward, of Dorset 50

Francis II , King of France 25, 40, 53, 75, 116-17, 125,
146, 197

Francis of Valois, Duke of Alençon, later Duke of Anjou
278-9, 284-8, 292-4, 306, 311-16, 318-27, 329-41, 345, 350-51

Frederick II , King of Denmark 84, 193

Fuller, Mr 229

Fuller, Thomas 342

Gargrave, Sir Thomas 43

Garret the Fool 476

Gascoigne, George 266, 298, 300-01

Genoa, Italy 202

George IV, King of Great Britain 39

Gheeraerts, Marcus, the Younger 239, 413

Gifford, Gilbert 360–61

Gilbert, Sir Humphrey 231, 342

Glasgow, City of 167, 183

Globe Theatre, Southwaric, London 6, 461

Gloucester, City of 99

Gloucester Hall, Oxford 103

Goodman, Godfrey, Bishop of Gloucester 56, 398, 488

Gordon, Jean, Countess of Bothwell 183, 187

Gorges, Sir Ferdinando 460, 462

Gorhambury, St Albans, Herts. 266, 286, 307

Goumay, France 410

Gower, George 238, 398

Gravelines, Flanders 391, 394

Gray' s Inn, London 157, 216

Green family, jesters 253

Greenwich Palace, Kent 21, 67, 74–5, 91, 120, 178, 240, 243–4, 247–8, 252, 307, 317, 322–4, 326, 336–7, 375, 433,

455, 476

Gregory XIII , Pope 333-5, 346, 349, 355

Gresham, Sir Thomas 212

Greville, Fulke 419, 422, 476

Grey, Lady Jane, Queen of England 2, 15-16, 20, 41, 111, 353

Grey, Lady Katherine 41-2, 115-16, 121-3, 134, 139-41, 179, 260, 409, 478

Grey, Lady Mary 41-2, 115, 164-5, 167, 179, 260

Grey of Wilton, Lord 187, 325

Grindal, Edmund, Bishop of Londo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164, 297-8, 305-6, 347

Grindal, William 13

Guiana, Africa 421

Guldeistern, Nils, Chancellor of Sweden 50

Guise, Charles de, Cardinal of Lorraine 75, 89, 116, 230, 269-70, 293, 315, 333, 346, 349

Guise, Francis, Duke of 75, 89, 116, 131, 141

Guise, Henry, Duke of 230, 269, 293, 307, 315, 333, 346,
349, 372, 404

Guzman, Alonso Perez de, Duke of Medina Sidonia 389–92

Habana, Cuba 357

The Hague, Netheriands 361

Hales, John 141

Hamilton, James, Earl of Arran 75–6, 79, 93, 112, 115,
126

Hamilton, John, Archbishop of St Andrews 215, 276

Hamilton Palace, Scotland 194

Hampton Court Palace, Surrey 76, 79, 81, 134, 199–200,
232, 240, 244–5, 248, 267, 290, 348, 419, 443, 471

Hanworth, Middlesex 115

Hardwick Hall, Derbyshire 296

Harefield Park, Middlesex 476

Harington, Sir John (father) 259, 304

Haringcoti, Sir John (son) 48–50, 56, 220–21, 224, 226–
7, 240, 249, 254–6, 259, 290, 304–5, 344, 406, 414, 425–6,
439, 441, 448–9, 451, 456, 458, 463, 477

Harington, Lady 449, 477

Harrison, William 265

Hastings, Henry, 3rd Earl of Huntingdon 42, 102, 104,
135, 211, 231, 303-4

Hastings, Lady Mary 261

Hatfield House, Herts. 1, 12, 18, 20-22, 24, 26, 235,
239, 246-7

Hatton, Sir Christopher 50, 236, 251, 253, 255-7, 267,
272-4, 289-90, 298, 305-6, 309, 313-15, 328-9, 337, 340,
343, 354, 357, 366-7, 369, 372-3, 376-7, 380, 382, 394, 398,
411

Hawkins, Henry 90

Hawkins, Sir John 9, 395

Hawtrcy, William 164

Hayward, Sir John 27, 235, 440-41

Heath, Nicholas, Archbishop of York 1, 31, 34

Helfenstein, Count von 60, 64, 66, 88

Heneage, Sir Thomas 165-6, 170, 237, 272, 362, 398

Henry IV, King of England 440-41

Henry VII, King of England 11, 22, 67, 223, 225, 241, 245, 253, 308, 486

Henry VIII, King of England 2-4, 11-13, 15, 18, 22, 25, 29, 36, 38, 41-2, 46, 53, 57, 64, 67, 75, 94, 114-15, 125, 127, 139, 148, 221, 236, 240-46, 253, 304, 328, 336, 347, 354, 374, 389, 456

Henry II , King of France 3, 25, 52-3, 61, 75, 125

Henry of Bourbon, King of Navarre, later Henry IV, King of France 222, 230, 287, 293, 350, 404, 407, 409, 411, 415, 430, 434, 480

Henry, Duke of Anjou, later Henry III, King of France 215-16, 269-70, 274-6, 278-9, 293-4, 297, 323, 337-41, 344, 350, 375, 382, 399, 404

Hentzner, Paul 242-4, 246, 248, 251, 433-4

Hepburn, James, Earl of Bothwell 183-90, 193, 197-200, 205, 310

Hepburn, James 184

Herbert, Edward, Lord, of Cherbury 250

Herbert, Henry, 2nd Earl of Pembroke 292, 318, 325, 452

Herbert, William, 1st Earl of Pembroke 23, 27, 63, 130, 177, 179-80, 192-3. 209, 211

Herbert, William, 3rd Earl of Pembroke 452, 455

Herbert, Sir William 250

Hercules-Francis, Duke of Alençon (see Francis of Valois)

Hereford, Viscount (see Devereux, Walter) Heme, Henry 235

Herries, Lord 197

Heston, Middlesex 252

Hicks, Michael 267-8

Hilliard, Nicholas 7, 218, 236-9, 273, 398, 486

Hilton, Joan 33

Holbein, Hans 7, 241, 243

Holdenby, Northants, 267

Holinshed, Raphael 254, 388

Holtemans, Master 396

Holyrood Palace, Edinburgh 163, 173, 184-5, 187

Howard, Charles, 2nd Baron of Effingham, 1st Earl of Nottingham 251, 256, 266, 387-92, 395, 421, 430, 432, 434, 462, 465-6, 477, 479, 482-3

Howard, Douglas, Lady Sheffield 290–92, 294, 301, 303, 312, 316–17, 330

Howard, Elizabeth, Countess of Wiltshire 11–12

Howard, Lady Frances 261, 290, 292

Howard, Henry, Earl of Surrey 83

Howard, Katherine, Queen of England 13, 46, 245, 283

Howard, Lady Mary 259, 433

Howard, Philip, Earl of Surrey 315

Howard, Thomas, 3rd Duke of Norfolk 83

Howard, Thomas, 4th Duke of Norfolk 45, 72, 82–3, 85–6, 89, 136, 157, 159, 161, 169–71, 179, 192, 196, 198–9, 202–10, 212, 215, 270–72, 276–7, 279–83, 315, 376, 479

Howard, Thomas, 1st Baron de Walden 256, 479

Howard, William, 1st Baron of Effingham 39, 159, 256, 291

Huicke, Dr 47

Hunsdon, Essex 247

Hunsdon, Lords (see Carey)

Huntingdon Earl of (see Hastings, Henry)

Hurault, André, Sieur de Maisse 54, 236, 430–33

Hyde, William 94—5

Ippolita the Tartarian 253

Ipswich, Suffolk 121

Isabella Clara Eugenia, infanta of Spain 363, 381, 458–9, 478

Islands Voyage, the, 1597 427–9

Isle of Wight, Hants. 390

Ivan IV the Terrible, Tsar of Muscovy 261

James IV, King of Scotland 42

James V, King of Scotland 125–6

James IV and I, King of Scotland and England 56, 176, 182, 187, 189–91, 200, 212, 214–15, 220–21, 230, 270, 277, 309, 317, 333, 346, 353–6, 363, 365, 368, 374–5, 381–3, 392, 404, 408, 419, 433, 453–4, 459–60, 463, 465, 469–70, 478–9, 481–3, 485–8

Jersey, Channel Islands 288, 356

Jesus College, Oxford 148, 230

Jewel, John, Bishop of Salisbury 84, 153

John of Austria, Don 306-7, 311, 318

John, Duke of Finland 83-4, 88, 129

John Frederick II , Duke of Saxony 67, 84, 129

John of Gaddesden 135

John of Gaunt, Duke of Lancaster 143, 241, 299, 478

Johnston, Garrett 235 Jones, Robert 111, 114

Jonson, Ben 49, 223, 248-9, 396

Katherine of Aragon, Queen of England 2, 11-12, 25

Kelston, Somerset 414, 449

Kenilworth Castle, Warwicks, 112, 143, 178-9, 211, 266,
287, 298-302, 312, 39-7

Kenninghall, Norfolk 208, 315

Kew, Surrey (see also the Dairy House, Kew)

Keyes, Thomas, of Lewisham 164

Kidderminster Church, Worcs. 98

Killigrew, Sir Henry 177, 357

King' s College Chapel, Cambridge 147

Kingston, Surrey 206

Kinsale, Battle of 1601 475

Kirk o' Field, Edinburgh 184-5

Knole Park, Kent 72

Knollys, Sir Francis 23-24, 165, 181, 192, 195, 197-200, 203, 256, 262, 303, 316-18, 329

Knollys, Lctdce (Laetitia) , Countess of Essex and Leicester 24, 165-6, 302-4, 312, 314, 316-18, 323, 330, 347, 357-8, 396-7, 403, 432, 468

Knollys, Sir William 256, 434-5, 447, 461

Knox, John 75, 125-6, 189, 222

Lacy, John 479

Lambarde, William 470-71

Lambeth Palace, London 240, 305, 462

Laneham, Robert 298-9

Langside, Battle of, 1568 194

Lea, Captain 463

Lee, Sir Henry 217, 239, 266, 294, 303, 398, 406

Le Havre (Newhaven) , France 133, 136, 141, 144

Leicester, Earls of (see Dudley, Robert; Sidney Earls of Leicester; Sidney, Sir Robert)

Leicester House, London (afterwards Essex House) 292, 312, 338, 397, 417

Leighton, Lady 258

Leith, Edinburgh, Scotland 89, 124

Lennox, Barls of (see Stewart)

Lennox, Countess of (see Douglas, Margaret)

Lennoxlove House, Scotland 197

Lesley, John, Bishop of Ross 197, 205, 270, 276–7

Lever, Thomas, Rector of Coventry 103

Leveson, Sir John 461

Leveson, Sir Richard 475

Leycester's Commonwealth 95, 98, 103–4, 353

Lincoln, Earl of (see Clinton, Henry)

Lincoln's Inn, London 344

Lindsay, Patrick, Lord 190

Linlithgow, Scotland 212

Lisbon, Portugal 357, 389, 403, 423

Lizard, the, Cornwall 389, 429

Lochleven Castle, Kinross, Scotland 188-90, 194

London, Bishop of (see Aylmer, John)

London, City of 1, 3, 5-6, 26-7, 33-8, 57, 62, 68, 73, 76, 117, 131, 134, 148, 157, 212, 220, 240, 247-8, 272, 276, 285, 291, 307, 320, 325, 349, 353, 365-6, 374, 380, 390, 395, 398-9, 415-16, 428, 444, 457, 460-63, 477, 485-6

Long Itchington, Warwicks. 298

Longleat House, Wilts. 303

Lopez, Dr Roderigo 416-19

Lord Chamberlain' s Men, company of actors 461

Lorraine, Cardinal of (see Guise, Charles de)

Loseley Park, Guildford, Surrey 206, 307

Louis I , Prince de Condé 132

Lumley, John, Lord 277, 369

Lyly, John 220, 266

Machiavelli, Niccolo 6

Madrid, Spain 272

Magellan, Ferdinand 334

Maisse, Sieur de (see Hurault, André)

Maitland, William, of Lethington 122, 125, 127-8, 131-2,
142-3, 152, 157, 168, 177, 183, 198, 212

Man, John, Bishop of Gloucester 193

Manners, Bridget 259

Manners, Henry, Earl of Rutland 72

Manners, Roger, Earl of Rutland 459, 462

Manningham, John 483, 485

Mantua, Duke of 31

Mar, Earl of (see Erskine, John)

Marchaumont, Seigneur de 336-7

Margaret of Habsburg, Duchess of Parma 96, 100, 112, 238

Margate, Kent 387

Marguerite de Valois, Queen of Navarre 287

Markham, Isabella, Lady Harington 259, 304

Markham, Robert 439 Marlowe, Christopher 7

Mary of Guise, Queen of Scotland 75, 79, 87, 89

Mary I , Queen of England 1-4, 15-16, 19-20, 23-6, 29-30, 31-2, 36, 40-42, 45-7, 53, 57, 59, 64, 66-7, 86, 94-5, 115, 122, 137, 162, 178, 222, 225, 245-6, 383

Mary, Queen of Scots 25, 30, 32-3, 40, 42-3, 48, 50, 53, 59, 75-6, 89, 91, 108, 111, 116-17, 124-9, 131-3, 135, 139-53, 155-8, 160, 163-4, 167-8, 172-4, 176-7 182-91, 193-201, 203-8, 210-16, 236, 269-72, 276-8, 281-2, 284, 287, 289, 293-6, 297, 308, 310, 315, 333, 345-6, 345-53, 355-6, 360-61, 363-83, 398, 406, 480

Marylebone Park, London 402

Maximilian II , Holy Roman Emperor, King of Bohemia 88, 147-8, 161-2, 171, 176, 178-9, 191-2, 215

Medici, Catherine de' , Queen of France 51, 75, 116-17, 132, 141, 154-5, 186, 193, 210, 215-16, 270, 274-5, 278-9, 284-8, 292-4, 321, 324, 337-8, 350

Medina Sidonia, Duke of (see Guzman, Alonso)

Melville, Sir James 148-152, 156, 176-7

Melville, Sir Robert 374-5

Mendoza, Bernardino de 235, 293-4, 312, 319, 322-6, 329-31, 333-4, 336, 338-9, 341, 345, 349-50, 363, 365, 395, 397, 418

Meyrick, Sir Gelli 459, 461, 468

Mitcham, Surrey 406

Mole, M. de la 285–7

Molyneux, Mr, MP 179

Monarcho the Fool 253

Montague, Lady 408

Montague, Lord (see Browne, Anthony)

Montmorency, Duke of 285

Moray, Earl of (see Stuart, James)

More, Sir William 206

Morgan, Thomas 361, 364

Morley, Thomas 7

Mortlake, Surrey 22, 230

Morton, Earl of (see Douglas, James)

Mountjoy, Lords (see Blount)

Mousehole. Cornwall 420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London 413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40, 237

Nau, Claude 366

Naunton, Sir Robert 21, 166, 219, 228, 273, 342, 405

Neville, Charles, Earl of Westmorland 208–12

Newfoundland, colony of, America 355

Newgate Prison, London 348, 463

Newhall, Essex 247

Newhaven, France (see Le Havre)

Neiuport, Flanders 459

Noailles, Antoine de 84

Nonsuch Palace, Surrey 67, 76, 81, 209, 245–8, 357, 418, 443, 446–7, 456

Norfolk, Duchesses of 38, 47

Norfolk, Dukes of (see also Howard, Thomas) 11

Norris, Sir Henry, later Lord Norris 210, 231, 257, 267, 395, 414

Norris, Sir John 403–4

Norris, Margery, Lady 103, 231, 267, 395, 414

North Hall 386-7

North, Thomas, Lord 27, 219, 233, 295, 298, 411, 447

Northern Rising, the, 1569 208-13, 270

Northampton, Marquess of (see Parr, William)

Northampton, Sheriff of 378

Northumberland, Countess of 212

Northumberland, Duke of (see Dudley, John)

Northumberland, Earl of (see Percy, Thomas)

Norwich, City of 6, 315-16

Norwich, Dean of 465

Nottingham, Countess of (see Carey, Katherine)

Nottingham, Earl of (see Howard, Charles)

Nowell, Alexander, Dean of St Paul' s 55, 137

Noyon, France 410

Oatlands Palace, Weybridge, Surrey 206, 245, 248, 456,
476

Odiham, Hants, 409

Odingsells, Mrs 95, 98, 105, 109

Oglethorpe, Owen, Bishop of Carlisle 31, 34, 38

Oliver, Isaac 239

O' Neill, Hugh, 2nd Earl of Tyrone 437-46, 449-52, 454,
463, 475, 477-8, 480

Orkney Islands, Scotland 188

Ormonde, Earl of (see Butler, Thomas)

Owen, Dr George 94

Owen, Mrs 95, 98, 104-6, 109

Owen, William 94-5

Oxford, City of 94, 178, 288, 304, 414

Oxford, University of 95, 148, 153, 178, 273, 302, 400,
411, 414, 438

Padua, Italy 216

Page, William 327-8, 331

Paget, Charles 363

Palmer, Mr 460

Panama, South America 412, 420-21

Parham Park, Sussex 415

Paris, France 89, 93, 110, 154–5, 167, 210, 215, 269, 275–6, 278, 287, 320, 330, 333, 346, 353, 355–6, 360–61, 364, 382, 389, 394, 415, 433

Paris Garden, London 230, 248

Parker, Matthew,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57, 64, 122, 195, 297

Parma, Duchess of (see Margaret of Habsburg)

Parma, Dukes of (see Farnese, Alexander; Ranuccio I)

Parr, Katherine, Queen of England 13–15, 23, 47

Parr, William, Marquess of Northampton 23, 72, 110, 180, 192, 204, 260

Parry, Blanche 24, 259, 406

Parry, Sir Thomas 24, 81, 117

Parry, Dr 483–4

Parry, Dr William 354–5

Parsons, Father Robert 50, 333, 335, 419

Paul IV, Pope 59

Paulet, Sir Amyas 320, 356, 360–61, 366, 368–9, 372, 375, 377–8, 383

Paulet, William, 1st Marquess of Winchester 23, 281

Paulet, William, 4th Marquess of Winchester 471

Peake, Robert 239

Pembroke, Earls of (see Herbert)

Penshurst Place, Kent 22, 136, 229, 456

Penzance, Cornwall 420

Percy, Thomas, Earl of Northumberland 202, 208, 210-12

Perrot, Sir John 221, 347

Perrot, Sir Thomas 347

Peterborough Cathedral 383

Peterborough, Dean of (Dr Fletcher) 379

Petworth, Sussex 408

Phelippes, Thomas 360, 364

Philip II , King of Spain 2-3, 16, 20, 24-6, 30, 32-3, 40-41, 43, 46, 48, 52-3, 55, 60-62, 64-6, 70, 74, 76, 81, 85-6, 91, 96, 117-19, 130, 143, 147, 161-2, 167, 186, 192-3, 195, 202-3, 206-7, 211, 213, 222, 228, 230, 233, 270-72, 282, 284, 287, 289, 296-7, 302, 306, 309, 311, 316, 318, 324, 333-4, 336, 338-40, 345-6, 349-52, 356-8, 363, 365, 368, 374,

381-2, 384, 388-9, 392, 394, 403-4, 415, 417-21, 423, 425, 428, 430-31, 434, 437-8

Philip III, King of Spain 437, 458, 478

Pickering, Hester 68

Pickering, Sir William 67-9, 71, 80

Piedmont, Italy 168

Pirgo, Jane 95, 101

Pius IV, Pope 89

Pius V, Pope 213, 217, 270-72, 274, 282, 287, 289, 295-6, 311

Platter, Thomas 246, 250, 440

Plymouth, Devon 309, 389-90, 421-2, 429

Pole, Reginald, Cardinal,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31

Poor Law Act 1598 472

Popham, Sir John 461, 464

Portland, Dorset 390

Portsmouth, Hants, 144, 409

Public Record Office, Kew 397

Putney, Surrey 479

Puttenham, George 282

Quadra, Alvaro de, Bishop of Aquila 55, 62, 65, 72, 74, 76, 80-82, 84-89, 92-3, 95-8, 100, 107-8, 111-12, 114, 116-20, 129-31, 134, 143-4

Queen' s House, the, Greenwich 74

Queen' s Men, the, company of players 57, 250

Rabelais, Francis 125

Radcliffe, Mary 259

Raleigh, Sir Walter 9, 55, 220, 223, 229, 231, 238, 250, 253, 255-6, 260, 341-4, 346, 348, 354, 362, 382, 386-7, 390, 402-4, 408, 412-13, 420-23, 426-9, 439-40, 453-5, 460, 464, 466, 469, 486, 488

Randolph, Thomas 76, 79, 110, 125, 128, 134, 136, 144-6, 148, 155-8, 160, 163, 168, 173, 188

Ranuccio I , Duke of Parma 478

Ratcliffe, Thomas, Earl of Sussex 39, 48, 112, 155, 157-9, 161, 166, 169, 177-8, 191-2, 202, 211, 238, 247, 269, 318, 322-3, 325, 330, 347

Reading, Berks. 471

Recusancy, Statute of, 1581 335

Rich, Lady (see Devereux, Penelope)

Richard II , King of England 441, 461, 470

Richmond Palace, Surrey 206, 240, 245, 247-8, 334, 339,
354, 358, 371, 373, 389, 391, 426, 452, 479-80, 483, 485

Ridolfi, Roberto 204, 208, 270-72, 276-8

Ritchie, Edward 393

Rizzio, David 157, 168, 172-4, 183, 186, 188

Robsart, Amy, Lady Dudley 20-21, 73, 85-7, 93-112, 118,
317

Robsart, Sir John 20

Robsart, Rosetta 317

Rome, Italy 271, 296, 333, 399

Ronsard, Pierre 125

Rookwood, Mr 315

Ross, Bishop of (sec Lesley, John)

Rouen, France 410-11

Royal Exchange, London 212, 253

Royal Wardrobe, St Andrew' s Hill, London 241

Rudd, Anthony, Bishop of St David' s 56

Rufford Abbey, Derbyshire 295

Russell, Anne, later Countess of Pembroke 455

Russell, Anne, Countess of Warwick 260, 286, 386-7, 451,
484

Russell, Elizabeth 408

Russell, Francis, Earl of Bedford 93, 117, 177, 182-3,
188

Russell, Lady 406

Ruthven, Patrick, Lord 172-3

Rutland, Earls of (see Manners)

Rycote, Oxon, 267, 395-7, 414

Rye, Sussex 339, 360

Sackville, Sir Richard 187, 256

Sackville, Thomas, Lord Buckhurst, later Earl of Dorset
256, 269, 388, 411, 438, 444, 452, 463-5

Sadler, Sir Ralph 84, 138, 352

Saffron Garden, Essex 393

St Bartholemew' s Eve Massacre, 1572 287–9, 302, 326

St Bartholemew' s Hospital, London 416

St George' s Chapel, Windsor 243

St Giles' s Fields, Holborn 367

St James' s Palace, London 129, 150, 246, 391–2

St John' s Priory, Clerkenwell 241

St John' s Wood, London 366

St Mary, Church of, Stamford 437

St Mary Redcliffe, Church of, Bristol 267

St Mary the Virgin, Church of, Oxford 103

St Mary the Virgin, Church of, Warwick 396

St Paul' s Cathedral, London 6, 37, 213, 327, 339, 371, 395, 399, 461

St Peter ad Vincula, Chapel of, Tower of London 283, 466

Salisbury Cathedral, Wilts. 140

Sanders, Nicholas 50

Sandwich, Kent 265, 344, 387, 417

Sandys, Edwin, Archbishop of York 330

Sandys, Lord 207, 471

San Miguel, Island of 428

San Quentin, Battle of, 1557 20

Santa Domingo, Caribbean 357

Savage, Mr 365

Savoy, Duchess of 321

Savoy Palace, London 241

Saxony, Duke of (see John Frederick II)

Scaramelli, Giovanni 479–80, 482–3

Schifanoia, II 31, 45, 70, 251

Scott, Sir Walter 112

Scrope, Lady (see Carey, Eleanor)

Scudamore, Sir James 260–61

Scudamore, Lady (see Shelton, Mary)

Segar, William 239

Seville, Spain 296

Seymour, Edward, Baron Beauchamp 122, 478

Seymour, Edward, Duke of Somerset, Lord Protector 14-15, 19, 115

Seymour, Edward, Earl of Hertford 115-16, 121-3, 139-40, 251, 261, 409, 478

Seymour, Jane, Queen of England 2, 12, 47

Seymour, Lady Jane 116, 121

Seymour, Thomas, Lord Sudeley 14-15, 46, 78, 304, 385

Seymour, Thomas 140

Seymour, William, later Duke of Somerset

Shakespeare, William 6-7, 223, 249, 253, 433, 441, 461, 465, 471

Sharp, Dr Lionel 393-4

Sheen Manor, Surrey 260

Sheffield Castle, Yorks. 203, 351-2

Sheffield, John, Lord 291

Sheffield, Lady (see Howard, Douglas)

Shelley-Sidney, Sir John 317

Shelton, Mary, Lady Scudamore 260–61

Sherborne Castle, Dorset 239, 413

Shrewsbury, Earls of (see Talbot)

Sidney Earls of Leicester 317

Sidney, Sir Henry 22, 86, 103, 117–19, 132, 136, 159, 169, 303, 325, 370

Sidney, Lady (see Dudley, Mary)

Sidney, Sir Philip 259, 302, 318, 325–6, 346, 353, 358, 370–71, 386, 402, 406

Sidney, Sir Robert, later Earl of Leicester 260, 317, 397, 426, 456

Silva, Don Diego de Guzman de 51, 147, 153–4, 157–8, 161, 166–7, 170–71, 174, 176, 179–80, 187, 193

Simier, Jean de, Baron de St Marc 318–26, 329–30

Singleton, Mr 327–8

Sixtus V, Pope 363, 372, 381, 384, 399

Sly, John 400

Smith, Mr 102

Smith, Sir Thomas 154–5, 167, 224, 278–9, 284

Smyth, Thomas 461

Somers, Will 33

Somerset, Duchess of (see Stanhope, Anne)

Somerset, Edward, Earl of Worcester 451, 461, 476

Somerset House, Strand, London 28, 212, 241, 247, 398–9

Somerset, William, Earl of Worcester 47, 289

Somerville, John 348, 355

Southampton, Earls of (see Wriothesley)

Southampton, Hants. 202, 334, 409

Spenser, Edmund 7, 223, 325, 396

Spes, Don Guerau de 193, 199, 202–4, 206–7, 277

Spilman, Master 236

Stafford family 256

Stafford, Sir Edward 317, 330

Stafford, Staffs. 262

Stamford, Lincs. 19, 178

Standen, Sir Anthony 416, 449

Stanhope, Anne, Duchess of Somerset 115

Stanley, Edward, Earl of Derby 23, 202

Stanley, Henry, Lord Strange, Earl of Derby 42, 47

Stephano, Signor 89

Stettin, Duke of 476

Stewart, Arhella 296, 308, 353&n, 354, 478

Stewart, Charles, 6th Earl of Lennox 295-6

Stewart, Henry, Lord Darnley 43, 117, 131, 143, 150, 152-3, 155-60, 163, 168, 171-4, 177, 182-9, 193, 195-6, 198-9, 210, 215, 281, 289, 294-5, 310

Stewart, Jane, Countess of Argyll 173

Stewart, Matthew, 4th Earl of Lennox 43, 143, 148, 152, 159, 183-4, 187, 215, 276

Stirling Castle, Scotland 172, 182, 187, 190, 276

Stokes, Adrian 113

Stow, John 212, 323, 396, 486

Strange, Lady (see Clifford, Margaret)

Strange, Lord (see Stanley)

Stuart, James, Earl of Moray 126-7, 152, 156-7, 160, 163-4, 167-8, 172, 174, 186, 190-91, 193-4, 197-200, 205-6, 212

Stubbs, John 327-8, 331

Stubbs, Philip 6, 9

Succession, Act of, 1544 4, 15, 41-2, 114-15, 127

Sudeley Castle, Gloucs. 413

Suffolk, Dowser Duchess of (see Willoughby, Katherine)

Suffolk, Duchess of (see Brandon, Fiances)

Suffolk, Duke of (see Brandon)

Sully, Duke of (see Bethune, Maximilien de)

Supremacy, Act of, 1534 57

Supremacy, Act of, 1559 59, 63

Surrey, Earls of (see also Howard, Henry) II

Sussex, Earl of (see Ratcliffe, Thomas)

Sutton Place, Surrcey 415

Syderstone, Norfolk 20

Talbot, Francis, 5th Earl of Shrewsbury 23, 47

Talbot, George, 6th Earl of Shrewsbury 203, 211, 257, 271, 279–80, 290, 308, 351, 363, 397, 406

Talbot, Gilbert, 7th Earl of Shrewsbury 248, 290, 476

Tallis, Thomas 7, 230

Tamworth, Mr 135

Tarleton, Richard 229, 250

Taylor, Mr 185

Teerlinc, Levina 58, 237

Temple, Inns of, London 129, 273, 471

Theobalds, Essex 266–7, 286, 346, 357, 382, 408

Theodosius II , Duke of Braganza 478

Thetford, Norfolk 315

Thomasina, royal dwarf 253

Throckmorton, Elizabeth, Lady Raleigh 260, 408, 412–13

Throckmorton, Francis 346, 349–50

Throckmorton, Sir Nicholas 23, 84, 89–90, 93, 110–11, 113–14, 117, 125, 131–2, 153, 158, 160–1, 163, 165, 172, 175, 189–90, 203, 209, 269, 291, 346, 408

Tiepolo, Paolo 70

Tilbury, Essex 390-95

Tinoco, Senor 417-19

Titchfield, Hants. 207, 408

Toothc, William 33

Topclyffe, Richard 50, 315

Tothill, Richard 38

Tower of London 6, 12, 16, 20-21, 27-8, 34-5, 43, 50, 81, 86, 104, 122, 131, 139-40, 163, 187, 202, 204, 207, 209-10, 215, 224, 246-7, 261, 271, 276-7, 279-80, 282-3, 304, 323, 328, 330, 333-4, 337-8, 347, 349, 365-8, 381, 398, 412-13, 418, 435, 455, 460, 462, 465-6, 470

Tracy, Mr 396

Tresham, Francis 459

Troyes, Treaty of, 1564 147

Tudor, Arthur, Prince of Wales 11, 302

Tudor, Margaret, Queen of Scotland 42-3

Tudor, Mary, Duchess of Suffolk 15, 41-2

Tuscany, Grand Duke of (see Cosimo I)

Tutbury Castle, Stafs. 199, 203, 210, 352, 360

Tyburn, London 350, 419, 463

Tye, Christopher 253

Tyrone, Earl of (see O' Neill, Hugh)

Ulstdotter, Helena, Marchioness of Northampton 260, 486

Uniformity, Act of, 1559 63

Utrecht, Netherlands 362

Valladolid, Spain 296

Vavasour, Anne 261, 332-3, 346, 406

Vavasour, Frances 261

Venice, Italy 34, 170, 479

Vere, Edward de, Earl of Oxford 257, 261, 274, 286, 289, 298, 332-3, 346, 429

Vernon, Elizabeth, Countess of Southampton 261, 433, 439

Verney, Richard 104-5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230, 237, 239

Victoria, Queen of Great Britain 239

Vienna, Austria 66, 73, 148, 162, 176-7, 191-2

Vigo, Spain 357

Virginia, colony of, America 9, 342

Vyne, The, Basingstoke, Hants. 207, 471

Walden, Essex 276

Walsingham, Frances, Lady Sidney, Countess of Essex 346,
406, 452, 465, 468

Walsingham, Sir Francis 51, 215-16, 227, 257, 269, 275-
6, 278-9, 281, 285, 287-8, 292-3, 295, 297, 306-7, 312, 314-
15, 328-9, 332, 337-9, 344-6, 349-52, 355-6, 358, 360-66,
369-70, 372, 374-6, 380, 382, 394, 397, 404, 406-7, 416, 418

Wanstead, Essex 237, 312, 318, 323, 357, 384, 397, 429-
30, 435, 438

Warner, Sir Edward 140

Wars of the Roses 45

Warwick Castle 40, 129, 143, 237, 286

Warwick, Earls of (see Dudley)

Webster, John 466

Wedel, Leopold von 250-51

Weclkes, Thomas 7

Wentworth, Peter, MP 282, 408

Westminster Abbey 29, 34, 38–9, 41, 121, 274, 383, 437, 466, 486

Westminster, Palace of, and Hall 1, 34, 37–39, 199, 241, 279, 370, 446, 463, 485

Westminster School 230, 400

Westmorland, Earl of (see Neville, Charles)

Whitehall Palace, London 27–8, 31, 34, 43, 81–2, 84, 116, 122, 129, 138, 157, 164, 171, 180, 186, 217–18, 226, 231, 241–3, 246–8, 260, 283–4, 328, 335–7, 339, 344, 348, 371, 395, 406, 416, 420, 438, 449, 459–63, 472, 476–7, 479, 485

Whitgift, John, Bishop of Worcester,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56, 347, 382, 454, 456, 481, 483–4, 486

Whyte, Rowland 447–8, 452–3, 455

Wilbyc, John 7

William the Silent, Prince of Orange 193, 306–7, 318, 339, 344–5, 350–51

Williams, Sir Roger 403–4

Williams of Thame, John, Lord 95

Willoughby d' Eresby, Lord (sec Bertie, Peregrine)

Willoughby, Katherine, Dowager Duchess of Suffolk 164

Wilson, Arthur 407

Wilson, Dr 277

Wilton House, Wilts. 326

Wimbledon, Surrey 19

Winchester, Marquesses of (see Paulet)

Windsor Castle and Great Park, Berks. 71, 73, 80–81, 86,
93, 96, 98, 103, 157, 165–6, 208–9, 211–12, 241, 243, 247–8,
252, 415, 418

Windsor, Duchess of (Wallis Simpson) 49

Wingfield Castle, Staffs. 203, 352

Wolsey, Cardinal Thomas 241

Wood, Anthony 178

Woodstock Palace, Oxon. 178, 246–7, 288, 303, 396

Worcester, City of 302–3

Worcester, Earls of (see Somerset)

Workington, Cumberland 194

Wriothesley, Henry, 3rd Earl of Southampton 207, 277

Wriothesley, Henry, 4th Earl of Southampton 261, 298,
433, 439, 441-2, 444-5, 453, 459, 462-5

Wurttemberg, Duke of (see Christopher)

Wyatt, Sir Thomas 16, 67, 304

Yellow Ford, Ireland 437

York, Archbishops of (see also Heath, Nicholas; Sandys,
Edwin; Young, Thomas) 241

York, City of 132, 197, 210, 212, 381

York House, Strand, London 448, 451, 454

York, Royal House of 368

York Place, London (see Whitehall Palace)

Young, Thomas, Archbishop of York 166

Zuccaro, Federico 239

Zutphen, Battle of, 1586 370-71

Zwetkovich, Adam 161-2, 1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丽莎白女王|（英）威尔著；董晏廷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097-5902-8

I . ①伊… II . ①威…②董… III. ①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 传记 IV. ①K835.61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4162号

伊丽莎白女王

著者|（英）艾莉森·威尔（Alison Weir）

译者|董晏廷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责任编辑|冯立君

（010）59367004 责任校对|韩海超 卢江涛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责任印制|岳阳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经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1194mm 1| 32 印张| 23.625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插图印张| 0.75

印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 557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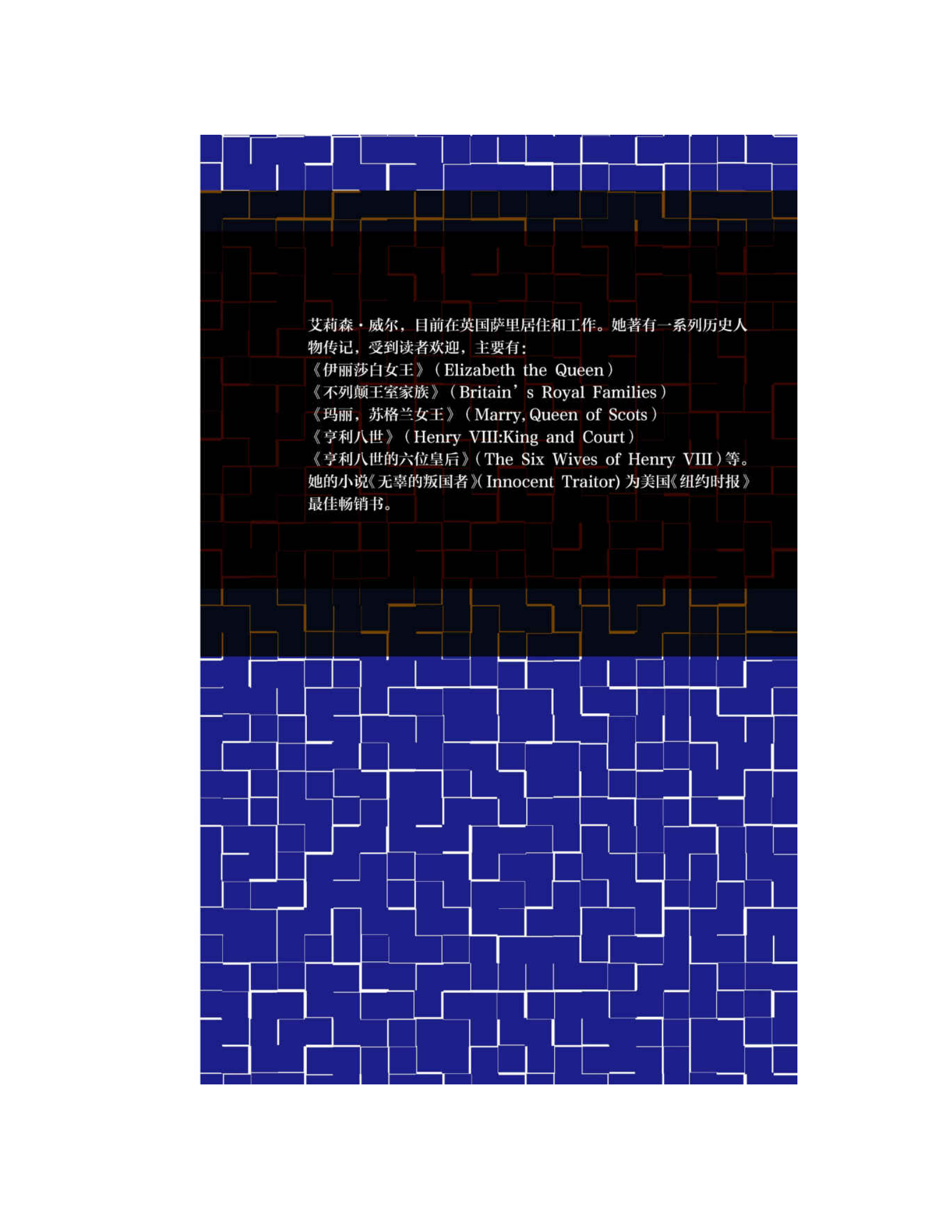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7-5097-5902-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7774号

定价| 7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
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艾莉森·威尔，目前在英国萨里居住和工作。她著有一系列历史人物传记，受到读者欢迎，主要有：

《伊丽莎白女王》(Elizabeth the Queen)

《不列颠王室家族》(Britain's Royal Families)

《玛丽，苏格兰女王》(Mary, Queen of Scots)

《亨利八世》(Henry VIII: King and Court)

《亨利八世的六位皇后》(The Six Wives of Henry VIII) 等。

她的小说《无辜的叛国者》(Innocent Traitor) 为美国《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

优秀……内容丰富，引人入胜……一本优雅、敏锐、精彩而活泼的书。

——《星期日泰晤士报》，米兰达·西摩（Miranda Seymour）

一部描写大英帝国最杰出女王的优秀作品。

——《每日电讯报》，凯思琳·休斯（Kathryn Hughes）

一本见闻广博并充满趣味的传记。

——《泰晤士报》，彼得·阿克罗伊（Peter Ackroyd）

ISBN 978-7-5097-5902-8



ISBN 978-7-5097-5902-8

定价：79.00元

www.ssap.com.cn